Peter Handke

Classics Collection

彼得·汉德克

经典作品合集

文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
无欲的悲歌
左撇子女人
去往第九王国
缓慢的归乡
形同陌路的时刻
试论疲倦
痛苦的中国人

Peter Handke

Die Angst des Tormanns beim Elfmeter

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

[奥地利]彼得·汉德克 著

韩瑞祥 主编 张世胜 等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奥）汉德克（Handke, P.）著；张世胜等译；韩瑞祥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7-208-10844-8

I.①守……II.①汉……②张……③韩……III.①长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IV.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46394号

书名：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

作者：【 奥地利】汉德克（Handke, P.）

主编：韩瑞祥

译者：张世胜　张晏　谢莹莹　贾晨

责任编辑：陈欢欢

转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0844-8|I·1036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 文景每月书情

目　录

编者前言
推销员
1 无序前的秩序
2 最初的无序
3 无序的秩序
4 揭露开始表现出的秩序
5 追踪
6 询问
7 秩序的表面回归和第二场无序前的风平浪静
8 第二个无序
9 错误的揭示
10 真相大白前的宁静
11 真相大白
12 秩序的最终回归
监事会的欢迎词
一个农家保龄球道上有球瓶倒下时
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

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

[奥地利] 彼得·汉德克 著

韩瑞祥 主编

张世胜 张晏 谢莹莹 贾晨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者前言

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被奉为奥地利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也是当今德语乃至世界文坛始终关注的焦点之一。汉德克的一生可以说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像许多著名作家一样，他以独具风格的创作在文坛上引起了持久的争论，更确立了令人仰慕的地位。从1966年成名开始，汉德克为德语文学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因此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如“霍普特曼奖”（1967年）、“毕希纳奖”（1973年）、“海涅奖”（2007年）、“托马斯·曼奖”（2008年）、“卡夫卡奖”（2009年）、“拉扎尔国王金质十字勋章”（塞尔维亚文学勋章，2009年）等。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介到世界许多国家，为当代德语文学赢来了举世瞩目的声望。

汉德克出生在奥地利克恩滕州格里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他孩童时代随父母在柏林（1944—1948）的经历，青年时期在克恩滕乡间的生活都渗透进他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里。1961年，汉德克入格拉茨大学读法律，开始参加“城市公园论坛”的文学活动，成为“格拉茨文学社”的一员。他的第一部小说《大黄蜂》（1966）的问世促使他弃学专事文学创作。1966年，汉德克发表了使他一举成名的剧本《骂观众》，在德语文坛引起空前的轰动，从此也使“格拉茨文学社”名声大振。《骂观众》是汉德克对传统戏剧的公开挑战，也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格拉茨文学社”在文学创造上的共同追求。

就在《骂观众》发表之前不久，汉德克已经在“四七社”文学年会上展露锋芒，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严厉地批评了当代文学墨守于传统描写的软弱无能。在他纲领性的杂文（《文学是浪漫的》，1966；《我是一个住在象牙塔里的人》，1967）中，汉德克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文学对他来说，是不断明白自我的手段；他期待文学作品要表现还没有被意识到的现实，破除一成不变的价值模式，认为追求现实主义的描写文学对此则无能为力。与此同时，他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反对文学作品直接服务于政治目的。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剧作《自我控诉》（1966）、《预言》（1966）、

《卡斯帕》（1968），诗集《内部世界之外部世界之内部世界》（1969）等。

进入70年代后，汉德克在“格拉茨文学社”中的创作率先从语言游戏及语言批判转向寻求自我的“新主体性”文学。标志着这个阶段的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1970）、《无欲的悲歌》（1972）、《短信长别》（1972）、《真实感受的时刻》（1975）、《左撇子女人》（1976）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在表现真实的人生经历中寻找自我，借以摆脱现实生存的困惑。《无欲的悲歌》开辟了70年代“格拉茨文学社”从抽象的语言尝试到自传性文学倾向的先河。这部小说是德语文坛70年代新主体性文学的巅峰之作，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1979年，汉德克在巴黎居住了几年之后回到奥地利，在萨尔茨堡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四部曲《缓慢的归乡》（《缓慢的归乡》，1979；《圣山启示录》，1980；《孩子的故事》，1981；《关于乡村》，1981）虽然在叙述风格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生存空间的缺失和寻找自我依然是其表现的主题；主体与世界的冲突构成了叙述的核心，因为对汉德克来说，现实世界不过是一个虚伪的名称，丑恶、僵化、陌生。他厌倦这个世界，试图通过艺术的手段实现自我构想的完美世界。

从80年代开始，汉德克似乎日益陷入封闭的自我世界里，面对社会生存现实的困惑，他寻求在艺术世界里感受永恒与和谐，在文化寻根中哀悼传统价值的缺失。他先后写了《铅笔的故事》（1982）、《痛苦的中国人》（1983）、《重现》（1986）、《一个作家的下午》（1987）、《试论疲倦》（1989）、《试论成功的日子》（1990）等。但汉德克不是一个陶醉在象牙塔里的作家，他的创作是当代文学困惑的自然表现：世界的无所适从，价值体系的崩溃和叙述危机使文学表现陷入困境。汉德克封闭式的内省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生存的深切反思。

进入90年代后，汉德克定居在巴黎附近的乡村里。从这个时期起，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动荡，南斯拉夫战争也把这位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从《梦幻者告别第九国度》（1991）开始，汉德克的作品（《形同陌路的时刻》，1992；《我在无人湾的岁

月》，1994；《筹划生命的永恒》，1997；《图像消失》，2002；《迷路者的踪迹》，2007等）中到处都潜藏着战争的现实，人性的灾难。1996年，汉德克发表了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批评媒体语言和信息政治，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汉德克对此不屑一顾，一意孤行。1999年，在北约空袭的日子里，他两次穿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旅行。同年，他的南斯拉夫题材戏剧《独木舟之行或者关于战争电影的戏剧》在维也纳皇家剧院首演。为了抗议德国军队轰炸这两个国家和地区，汉德克退回了1973年颁发给他的毕希纳奖。2006年3月18日，汉德克参加了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媒体群起而攻之，他的剧作演出因此在欧洲一些国家被取消，杜塞尔多夫市政府拒绝支付授予他的海涅奖奖金。然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汉德克无视这一切，依然我行我素，坚定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对人性的呼唤，对战争的控诉，对以恶惩恶以牙还牙的非人道毁灭方式的反思："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他因此而成为"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另类。

世纪文景将陆续推出八卷本《汉德克作品集》，意在让我国读者来共同了解和认识这位独具风格和人格魅力的奥地利作家。《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卷收录了汉德克早期的两篇短篇小说和两部中篇小说。与这个时期的戏剧一样，这些作品都是汉德克审美追求的大胆尝试，它们打破了传统的叙述风格，改变了永恒的故事结构，形成了对象与语言、情感与语言和行为与语言之间无与伦比的叙述张力。作者在这里把对现实的观察和感受在艺术表现中凝结成各种各样的生存危机，而每一个象征都深深地印证着这个时代的生存现实和人的精神状态，同样也留下了作者自白的蛛丝马迹。

短篇小说《监事会的欢迎词》是汉德克尝试其叙述风格的处女作。这篇小说已经没有了原本意义上的短篇小说的叙事结构和情节；所谓的欢迎词几乎是在毫无情节关联的描写中变成了对危机四伏的恐惧的独白。房梁的嘎嘎作响，暴风雪的肆虐，门卫儿子惨遭车祸的命运构成了欢迎词叙事话语的核心。这些情景在叙事结构中多层交织，相衬相映，象征性地表现出生存环境的悲凉与险恶，让人不寒而栗。叙述者"我"最终因此陷入了无言的境地，这也是留给读者思考的一

把钥匙。与之相比，《一个农家保龄球道上有球瓶倒下时》虽然没有对危机和恐惧那种强烈的渲染，但却在冷静和深沉的叙述中让人深深地感到社会环境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日常语言和修辞形式在这里表现为异变的亲情关系的象征。小说中，两个奥地利年轻人趁在西柏林逗留之际前往东柏林看望久未谋面的姑姑，可亲人之间的相见并没有出现惯常所期待的真情实感的必然流露，而几乎只有陌生的面面相觑，无言的对答，缺少亲情相印的交流。在整个叙述中，每个被感受到的物体都成为阻碍交流的象征，人物的失语构成了人与人交往的鸿沟。天气的寒冷与亲人的相见蕴含着叙述的深层结构。小说结尾时，两个年轻人不知不觉地没有赶上回程的末班车让人看到了对亲情的期待，而小说的标题则是作者留给读者去破解的叙述之谜。

《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和《推销员》同样也是汉德克叙述风格的开山之作。尤其是《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一时走红德语文坛，而且很快就被搬上了银幕（1971年）。这两部小说都具有浓厚的侦探小说色彩，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划分界限。伴随着语言游戏式的叙述，单一的独白和意识流使得读者在描写语言与描写对象之间的巨大张力中感受着作品表现的内在。

《推销员》是一部没有主线、情节和故事的小说，作者的意愿也不是要写一部新型侦探小说。主人公推销员观察着一切，记录着那一个个哪怕再微不足道的细节，他是无处不在的见证人。从章节标题可以看得出来，这部小说要表现的不是这个主人公本身，而是“秩序与无序”的辩证交替。每个章节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叙述者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件进行普遍意义上的综述和理论上的构建，介绍提要并加以议论。第二部分就是小说的描写，结构上呈现为句子的马赛克，相互之间似乎没有逻辑关联；对侦探情节只言片语的想像与逻辑上悖谬的荒唐断言相互交织在一起；精确的细节描写伴随着语言与事实的不协调。显而易见，这种叙事形式突破了迄今习以为常的小说叙事模式，使其表现的可能性成为不可能。但小说所描写的绝不是随心所欲毫无关联的片断，叙事形式和视角的变化也改变了所要描写的事物。小说中的每一个感受、每一个句子都会触及读者的心灵，使其不由自主地寻求在各个片段之间建立起必然的联系：“这部小说既不是发生在洛杉矶或者西柏林，也不是发生在冬天或者夏天：只要读者读到它，它就会发生在读者的内心里。”作者如此意在让读者在其

中能够寻找到令自己恐惧的故事，令人恐惧的现实故事，因为“每个句子都是一个故事”，会使人“回到现实中来”。

与《推销员》相比，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没有章节之分，结构简单明了，尽管是第三人称叙述，可主人公的视角从头到尾占主导地位。主人公布洛赫是一个当年赫赫有名的守门员。一天早上，他莫名其妙地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因为他以为自己被解雇了。他毫无目的地在维也纳游荡。他偶然和电影院女售票员格达有了一夜之情，却无缘无故地掐死了她。他乘车来到边境上一个偏僻的地方隐匿起来。他在报纸上看到了通缉令，最后驻足在一个守门员前，注视着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扑住点球。这个凶杀案最终并没有结局，好像被遗忘了。在小说描写中，作者所关注的焦点是布洛赫越来越多地受到感知的困扰。布洛赫没有能力把周围一个个物体，一个个人，甚至连自己的身体感受为一个整体。他从环境的每个细节中构想出一个个针对他本人的痛苦暗示或者一个个给他设置的陷阱。这些构想又迫使他实施一个个让人不可思议的、自己也无法控制的行为。布洛赫是一个困扰于生存现实中的病态人，他的观察和感知是一个被追踪者的观察和感知。这部小说深深地渗透着汉德克的语言批判意识。像布洛赫与其所处环境的关系一样，语言与感知之间的危机始终伴随着小说的叙述。《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不愧为70年代初德语中篇小说的一颗明珠。

我们选编出版汉德克的作品，意在让这些集子能够不断地给读者带来另一番阅读的感受和愉悦，并从中有所受益。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选编和翻译疏漏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韩瑞祥

2012年6月

推销员

张晏　译

再也没有什么东西看起来比空虚的游泳池更空虚的了。

——雷蒙德·钱德勒

1　无序前的秩序

谋杀故事的开场就像其他故事一样，无非另外一个故事的延续。被描述的人物和物体在另外那个故事中早已出现，无须再去描述，它们就默默地在那里了。像每个故事一样，谋杀故事也是另外一个并不存在的故事的延续。

何以见得呢：人物和物体的名称前面一下子就用上了一个冠词，这样一来，这名称就代表了在一个故事中曾经出现过的人物和物体。[1]一个男人走到了街道上。那个烟蒂滚落在了人行道上。

故事的开场并不是一个开场，而是延续。故事的开场在使用冠词的时候就考虑到了之前的时间。通过冠词，那些词汇就成了特殊物体的名称。如果普遍意义上的时间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一个特殊故事的时间，这时它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开始。冠词给它所确定的那些物体和人物一个过去形式。定冠词将那些特定的物体和人物从其他的同类中逐个确定下来，从而让词汇构成一个特别的故事。

像所有其他的故事一样，谋杀故事也是以定冠词开始的。与别的故事相反，谋杀故事是与这些已经确定下来的物体和人物玩游戏。因为谋杀故事在确定物体时，让它们之间的关系保持未知与神秘。谋杀故事不交代被描述物体之间真正的关系。就是在这些物体相互之间可能出现的关系中产生了谋杀故事。它产生于句子的捉迷藏游戏中。谋杀故事从一开始就单独地描述每一个物体。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采用的描述视角是一个不了解物体之间相互关联的人。当各种关联被揭开时，他总是晚到一步。描述的视角来自于一个陌生人。

故事由一个人讲起，此人总是后来加入，却从不属于这里。这个后来者在情节发生的地点第一次看到这些物体。他首先要感知所有这些物体。因为要由他来进行描述，所以他既不是未来的谋杀犯，也不是被害人。

通常，他会在运动之中被那个故事所吸引，从第一个句子开始。他从一个地点走到事件发生的地点。他来到那里，然后站住不动。

身边的一切喧嚣让他惊讶，这样就产生了故事：他被吸引住了。他看到了很多，却谁也不认识。仅从外部特征上看，他就显得与众不同。他的举止、目光、出场以及走路的样子将来都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他要引人注目，以便能为自己的描述辩护。通常他是在描述自己，大概就像他在一面镜子里看着自己一样。

如果其他人都穿着干净的鞋子，那他的鞋子一定会沾满灰尘。如果其他人的发型都纹丝不乱，那么他的头发一定要乱蓬蓬的。如果其他人的目光都很坦诚，那么他的目光一定要不像好人。如果其他人都兴致高涨地蹦蹦跳跳，那他则要一瘸一拐。

他来到一个地方，这里的每一个物体或者每一个人都与他的出场形成反差。

他是个陌生人，但绝非褒义上的陌生人。他是个堕落的陌生人。

如果他开口说话，他只用现在时，也只谈眼前发生的事，就好比，他点了杯饮料或者他跟人打招呼。他的语言只是他向前运动的一部分。

很明显他想要得到什么。他的行为举止像一个推销员。也许他就是一个推销员。

当故事开始的时候，展示在这个新来者面前的一切，都是那些物体最美和最好的秩序。这种秩序是如此引人注意，它甚至可以被列举

出来。它是可能出现的最为尴尬的秩序。

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得非常少，所以只能通过这一点才能让这个故事站得住脚，就是这种秩序被描述得非常尴尬，目的是必须与发生谋杀案之后的无秩序形成鲜明的对比。

为什么要描述这种秩序呢，原因就是：将会有事情发生，有些东西会发生变化或者被改变。这是一种不能长时间容忍的秩序。这种秩序是由一声大喊之前屏住的呼吸构成的。

某个物体或者人物被特殊描述的秩序也就显得特别可疑。对一个后脑勺、一个脖子或者是一扇窗玻璃的秩序性的描述会让人担心这些被描述物体将来的秩序。目前描述的秩序的尴尬性与可能发生的无秩序的尴尬性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

这位后来者对目前的秩序感受得更为明显，因为它呈现出一种秩序的特殊形式。这是一种刻意雕琢的秩序，它让陌生人立即觉得是人为规定的。

这种秩序显露在人物刻意为之的特殊行为方式上，显露在对待物体的刻意为之的特殊方式上。这种特殊的秩序是以一种庆祝仪式的形式展现在后来者面前的。

他来时赶上了一个庆祝的时刻。他是来玩游戏的。当他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这里正在庆祝节日。当他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正是一年一度的集市。当他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正在举行化装游行。

这种特殊的秩序表现在鞠躬中，在舞蹈动作里，在下跪的动作中，在两人一组的行进中，在共同的举杯中，在一场盛宴中，在一场游戏中。这种将要被谋杀案打破的特殊秩序，后来者在那位鞠躬者的脖子上看出来了；还有那位先生的太阳穴，他刚刚扬起的打招呼的手；或者是在舞者轻盈的移动中；或者是在玩捉迷藏的孩子身上；或者是在唱歌时起伏不定的胸部；或者是在讲话人刚刚张开的嘴角；或者是在还很干净的地毯上的图案；或者是在刚刚浆过的衬衫前胸的白色上，或者是正在徐徐落下的窗帘的皱褶上；或者是在香料散发的气味中。这是秩序的节日。

行动者们无忧无虑，只想表演。

其中一个人将会突然被详细地描述。之后会有一个人被描述得更为准确。这个情节的人物，除了一人之外，都开始表现。一切都在自己的位置上。秩序越来越鲜明。它现在不可想像地完美。在这个谋杀故事中，在谋杀发生之前，秩序显得简直就像是无序。

后来者看到：

推销员踩在那飘落的纸片上。

他问起路，却忘记了去关注回答，而是惊讶于被问者给他指路时的表情。指甲掐在手心上。不会发生什么事的。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惊讶。在这样的一天，没有人会想到死亡。碎石砌成的小房子里露出一把铁锹把。街道并不空旷。推销员瞥见一块有小孩拳头那么大的石头。头皮绷紧了。没有人用手帕快速地擦把脸。人行道比街道高出不少。推销员的大衣下摆一直垂到脚脖子。从商店门下的缝里涌出来一堆肥皂泡。瓶子几乎是直立着漂浮在水中。窗户和门在交替变换。

他看人比往常更加清晰。指甲从衣服料子上刮过，直到纽扣。推销员自然而然地移动着双腿。汽车里的座椅靠背线条十分优美。路面上不久前被喷过水。让他吃惊的是居然能看到自己的膝盖。窗玻璃闪着光。他不相信地摇了摇头。只有一只鞋闪闪发亮，另外一只仍然布满尘灰。一个念头突然闪现出来。一个手指甲在捶打时弄折了！

推销员用一支铅笔敲打着墙。虽然毫无用处，却又无力去做其他事情，所以他一直在观察一位老妇，她坐在家门口一个矮凳上。

他在房间穿来穿去时与在旷野上走路不太一样。之前提过皮箱的那只手在发抖。电话亭的门锁了。这是一个美好的早晨。在听到第一声钟响之后，他屏住呼吸等待着第二声。鞋尖向上翘了起来！

他没有左顾右盼。那放在方向盘上的双手戴着皮手套。他无法想像现在会有人大叫起来。物体并没有让他感到不安，但是也没有吸引他的注意力。他目光所及的大地完美无缺。他只随身带了一些私人用

品。他的着装更适合于黑暗，而不是大白天。虽然这里没有一丝风吹过，可是他的头发却乱蓬蓬的。迎面而来的人上下打量着他。小溪正流过一处垂直的地方，随之就变细了。推销员侧耳倾听。房子的每个尖角都被磨圆了。突然，面前的街道让他对每一段距离都感到恶心。也许绳子从那个敲钟的人手中脱落了。为什么偏偏现在鞋带又开了？有人正抖开一个遮雨罩套在一辆汽车上。有数不清的方向。手指甲隐隐发痒。两个老妇把很粗的一截树桩锯成了两半。

他现在需要的是分散注意力。躺在地上的水管子突然绷紧了。大衣的口袋又深又宽，他都感觉不到自己的手在里面。他故意跌跌撞撞地走路。房屋的外墙上没有任何涂抹的东西。一切都井然有序。推销员心怀叵测地微笑着。一厚摞报纸用一个夹子固定在报摊上。一辆自行车规规矩矩地靠在墙上。他边走边打着哈欠。只要他一吸气，那些画面就跟着移动。眼睛看到的东西，身体却在拒绝。圆木轰隆隆地从货车里滚落下来。他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才好。一个女人在用抹布擦门把手。车子出故障着火的第一声炸响吓了他一跳。他听到的每一个词都跟随着另外一个词。

他走的路太多，以至于两根鞋带都松开了。电话听筒上还留着一只手的汗渍。他必须不断地重复思路，直到把它们都扼杀掉。他呼气又吸气。

他观察着周围的秩序怎样变为游戏。玻璃叮叮当当地作响不是什么危险的声音。凡是别人跟他搭话，他都只用手势和表情来回答。那个女人的笑声适应了所有其他的声响。虽然推销员认为，他将来也永远不会在这里认识任何人，可他还是尝试着去记住每张面孔。路面上这儿和那儿到处涂着黑色的沥青。他以为握在一起的手指松开了。门前孤零零地立着一只靴子，靴筒被翻了下来。垃圾桶看起来是空的。硬币还带着体温。

他重重地去触摸玻璃，这只是他无所事事的表白而已。因为不舒服，他迈着八字步。两只鞋子都适应了现在的运动方式。现在的寂静只是期待的回答到来之前的寂静。他们在吃着很难消化的饭菜。门被毫不费力地打开了。捧着托盘的手高高地举在头顶上。泡沫聚集在一个障碍物前。思考一下子又变得惬意。这是一只软木塞的爆响声！

他在桌子下面把鞋子晃下来。“如果大炮的炮弹在水面以上爆炸，淹死的人就会浮起来。”他为这寂静感到高兴。那个女人用一根木棍轻轻拨弄着玻璃杯里的泡沫。

他的衣领不再那么干净了。

手掌上有些污渍。

那声喊叫只是听完笑话后爆发出笑声之前的喊叫。

虽然天气并不热，他却觉得衣服都粘在身上。房屋的侧面只有假窗。大街上熙熙攘攘。汗味表明身体很健康。她用拇指拨弄着耳边的发丝。他无法想像，大白天的一声大喊会是在求救。火柴盒只有一个摩擦面被撕开了。他听到的那些词语都是关于普通的人际关系的。柠檬片慢慢地沉到了玻璃杯底。那女人把笤帚放回原位。他清了清嗓子，却什么都没说。在这样陌生的环境里，他甚至想不起来这些物体的名称。当他对面坐的人笑着回过头去时，把喉部完全暴露在他面前。

鹅卵石砌成的小屋里露出报纸的一角！

推销员向后靠着，漫不经心地将双手抱在胸前。就像醉酒时一样，他觉得所有的东西都离他很远。在近处的一片喧嚣声中，他听得出来平时这里是多么安静。窗玻璃上的镜像没有让他吃惊。两只手一左一右搭在陌生人肩头，却不是安静地停在那里。绳子上密密麻麻地挂着空空的衣架。推销员用眼角的余光注意到别人怎样用眼角的余光在打量他。自动点唱机的抓手上上下下，到现在也没有抓住任何一张唱片。他只用了一个动作就把箱子放在地上。当他经过地下室小窗时，一股凉风划过他的手指。灯光亮得耀眼，几乎没留下什么影子。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他眨了眨眼，又觉得自己这样不太礼貌。雾弄乱了头发。衣服都是刚刚熨过的。他现在不想听任何人说什么。他嗅到了某种浓重的气味。他懒洋洋的，只有当他移动身体时，才移动目光。对面那栋房子上所有的百叶窗都放了下来了。

他听到的声音属于他看到的东西。这里的房子到底有没有地下室呢？从座位上他可以看到下面整条街道。地板刚刚已经打过蜡。推销员走路时挺着下巴，就像是赶来参加什么活动。那女人抖开一张干净

的桌布，他只得又把胳膊抬起来。当风停下来时，他觉得好像他突然被人遗弃了一样。

也许他在这里能让自己派上用场。这些想法不是自然而然冒出来的，而是他用尽全力想出来的，时间就这样过得飞快。他很不经意地瞥了一眼表。他看着舌头怎样从嘴唇中间伸出来。一块猪皮泡在积水中。

闪电让屏住呼吸的一群人吓了一跳。那男人用火焰点燃了香烟。物体摆放的顺序显示出大众意见的相似性。推销员把皱成一团的纸币递了过去。气球离香烟是那么近。那男人大笑着咧开了嘴。

那边有群孩子在模仿大人的表演。邮递员在头顶上晃着一封信。推销员摸了摸腋下。他没有再走回桌边，而是走到了窗前。

他没有注意到她的轻蔑，这让她有些难受。一只鞋子的鞋头比另一只的颜色暗一些。金牙闪着光。不只是这种长时间匀速的运动使得一直端坐的推销员感到不安。本来他想去拿那个干玻璃杯，却伸手握住了那个湿的。两个男人，面对面俯下身子，轻声交谈着。推销员没有一一列举出他感知到的事物。一个男人抬起手臂，以此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只能看到无忧无虑的面孔。他默默地搜寻着词汇，好让自己现在不必动弹。他经常在鹅卵石砌成的小屋里过夜。那个男人长着突出的后脑勺！

推销员感到高兴，他不用非得听懂每个词。那个声音响起来，因为刀子切分水果时，突然切到果核。那个男人鞠躬时，亮出了自己的脖子。香烟的烟灰已经弯曲了。随着情绪越来越放松，大家在模仿着现实。

推销员没有发现什么新情况。手上的纹路是潮湿的，被脏东西弄出了一道道黑边。一个小凳子从购物袋中探出头来。他说话时，其他人说的声音更小，以便能听到他的声音。他的腋下有些发痒。他们慢慢地把头转向他。

推销员站在门口，脸上挂着全世界最友好的微笑。

当嘴唇离开物体时，他听到了嘴巴吧嗒吧嗒的声音。有个人的笑声压过了其他人。他们选择了一种允许他们玩的游戏，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甚至都不敢去谈论这游戏。推销员听到纸张在沙沙作响。他腿上有块肌肉在抽动。倒酒时泡沫沙沙作响。新浆过的衬衣不透水。嘴唇很干，在杯边连嘴唇的印记都没有留下。当他把火焰靠近香烟时，他打量着对面那人的脸。他估算着相互之间的距离。灯罩一动不动地挂在电线下面。如果一只苍蝇躺着，那它的“躺”就表达出某种明确的意思。

路面上的污渍很明显缩成一团。鞋子前面没有加钢板。推销员闻到的是烤肉的香味。靴子直到靴筒都糊满了粪便！墙上挂着的盘子间隔十分均匀。排水沟里的玉米棒是哪里来的？那个男人的穿着平淡无奇。

推销员确信，所有的物体都依然在原来的位置上。人群中有人用力地举起了双手，不过他是在欢呼。他太长时间没有眨眼，所以正好错过了瓶子里的液体流出来的那一刻。报纸大标题上有些他完全不认识的名称。

那些人尝试着让他兜售一些东西，好让他们拒绝购买。那个老妇人已经在排水沟前面站了很久，她无法把脚从街道抬上人行道。推销员只是看着面前的桌子和放在上面的两手。虽然一切都按照事先预料的在运行，可是肯定哪儿出现了什么不合常规的东西。他用一枚硬币敲打着玻璃杯。他一动不动的脑袋让所有看到的东西都保持平衡。

那些表演者的声音变成了密谋者的声音。他听不到任何声响，但是却能感受到上方的空气有一丝震动。没人手头有去污剂。一瞬间，那涓涓细流似乎就会没过她的高跟鞋。在这样的噪音下，所有的声音都没什么区别。

他坐直身子。

那哗啦啦的响声不一定是粗暴地挂上话筒的声音。

没有人会为系鞋带而弯下腰。推销员注意到拇指第一个关节上的一个瘊子。虽然房间里已经非常热，随身进来的液体还直冒着气。他几乎可以肯定，这只是一个偶然的接触。他抓向门把手，却没有抓

住。他的无动于衷是如此完美，所有的言语都没有受到打扰。人们选择了一种让游戏者单独行动的游戏，或者是捉迷藏，或者是黑暗中的游戏。运蔬菜的车看起来很正常。

那男人的目光非常刺人。

电话另外一端没有人接听。推销员听到空罐头盒撞击的啪嗒声。那女人把手放在脖子上。人群中有谁戴着手套吗？

这时又来了一个个头矮小肩膀宽大的男人。“非法得来的钞票总是皱皱巴巴的。”推销员先等了一会儿才报出价格。桌布下面有棱有角的东西像是本书。一些沉重的石头被放在防雨罩上。椅子被木条连在一起。有人嘟囔了一句，继续往前走去。

两个人碰巧都想藏在同一个地方，于是就争吵起来，都想让对方另外找个藏身之处，最后时间到了，两人站在来捉人的那个人面前，一脸羞涩。

推销员做了一个动作，以便测试一下，他是否刚刚已经做过这个动作而紧接着又忘记了。

电话还占着线！

那男人低低的前额看起来没什么好事儿。

推销员观察着百叶窗的空隙。几个移动的物体就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这让他感到心安。领带的结打得有点大了。从游戏中第一个返回的人在西服外套上擦着手指。推销员突然将绳子的两部分握在手中。人们发现，刚才还在原来位置上的一个东西现在不在那里了。那女人思索时面部扭曲着。他用一种特殊的姿势拿着香烟，好让商标字样也能烧着。他看到的每一个动作都让眼睛很舒服。那是一声惊讶的呼喊！他专注地看着那只猫裸露的耳朵。

表演者挑选了一个动作，要求从一开始就要躺着。推销员的一只拳头比另一只大。他观察着，那个女人没有把任何一个动作进行到底，而是用下一个动作去掩饰之前那个。手提包合上了。

他把手指横过来，搓了搓干燥的牙齿。他惬意地靠在墙上，可是墙离他还有一段距离，这个动作在进行的过程中就变得不惬意了。

那个丢失的物体很有可能是被一个孩子拿走的！

他们玩游戏时，连语言也变成了游戏，所以，他再也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了。所有的动作最后都变成了圆圈。其间不可能发生什么。推销员是惟一置身事外的人。人们把其他物体重新摆放，以便将那个空缺遮掩起来。那男人的分头分得笔直，简直无可挑剔。

玩游戏的人纷纷回来了，变成了观众。那孩子把手放到背后，可是没有藏起来。那张幽默的素描画的是死亡之前的瞬间，也就是坠落前的瞬间。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声音立即就会被排序组合。推销员发现自己的指甲上有白色的斑点。他的目光到处遇到抗拒。

当门现在也要都关上时，秩序就会变成嘲讽。

街道上的情景一目了然。“突然”这个词不能再用了。推销员终于有节奏地呼吸了。他看到的所有动作都是水平方向的。

他感受到一种不受干扰的现实。

那思想顺从于他所发现的东西。

哪儿都没有漏洞。

那个女人注视着自己精心修剪过指甲的双手。那只跑过去的猫在地板上留下了湿脚印，虽然远近都看不到有任何液体。

2　最初的无序

对秩序的描述只是为了描述第一场谋杀产生的无序。描述秩序的某些句子虽然看起来可以与其他句子排列在一起，但其实更适合将来发生的无序。

秩序紧张得快要撕裂了。所有的物体都被描述得十分富有日常性，以至于自然而然地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那就是这样的日常性还会持续多久呢。这种日常的现实如此完美无缺，所以肯定不会发生爆裂的。

现在发生的谋杀就是要打破这样的现实。它发生在某个时刻，某个地方，那里的一切好像都在有序地运转。

为了让这打破的效果更为强烈，那么，这样的行为并不是表现为一个自然的过程，它在自己发生的那一刻就显得不自然，充满暴力，来自外力，刻意为之。

在正沉浸在日常现实中的证人看来，这是一起谋杀案。

虽然这样的行为被识破了，可是那个作案者则不然。

只有通过这样的行为，那个被描述的现实才成了一个由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以及特殊的人物组成的故事。那些之前已经被描述的物体只有通过谋杀之后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

通过这场谋杀，种种关系就建立起来了，或者说，种种关系特意被隐瞒了，而在故事后来的发展中就会被揭示出来。只是缺少一句话。因为这句话才有了这个故事。因为这句话才出现了这个案件。

谋杀的章节通常是以描述一个无关紧要的物体开始的，不过这个物体就在将来的案发现场。从这个物体的姿态或位置就能预知未来的死亡。

如果在之前的章节中一切都显得是确定和已知的，那么现在一切都显得不确定了。

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只用寥寥数笔来描述，不过无名无姓。如果是从背影开始描述，那么这样的描述通常是以将来的谋杀犯为出发点，而这个从背影被描述的人就是将来的被害人。

一个从正面被描述的人可能既是将来的被害人，又是将来的谋杀犯，同样也是目击证人。

如果描述的是群体中的某个人，那么他就是将来的被害人。

如果描述的是一个群体，可在这个群体之外还有某个人正在靠近，那么这个人通常就是将来的谋杀犯。

如果描述的是某个人，他正在逐渐离开那个群体，那么他通常就是将来的被害人。

如果是从某个人的角度来描述，他虽然不属于某个群体的一员，但是却正好处在这样一个靠近这群体的境况中，而来自这群体的每一个人后来都可以描述这个人，那他就是将来的证人。或者一个人，虽然他从外在形式上看属于这个群体，可事实上却是个刚刚落入其中的陌生人，那么他也是将来的证人。

对于谋杀的描述，同谋杀故事中所有的描述一样，都是从个别到整体。比如首先描述的是一件白色衬衣的胸间血迹斑斑，或者眼神中的惊讶。

凶手首先只是在他自己实施的情节中出场。

被害人毫无预感，可是直到最后一刻来临之前才有所察觉。如果他此后有幸还活着的话，那么他一定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相反，在他身上发生的事，目击证人总是晚一步才觉察得到。

谋杀案马上就要发生，是可以从中看得出来的，那就是直到此刻与日常现实在节奏上保持一致的描述突然变得密集和更确切了。

这种咄咄逼人的事件也可以从中看得出来，那就是对人物的描述被对事物的描述取而代之。

或者是再次对周围所有那些平平常常的事情不厌其烦地一一枚举，借以能够产生强烈的震撼效果。在谋杀之前，一切都好像没完没了地进行着。

在描述的过程中，每个差错现在都具有特别的含义。

由于这种行为而产生的响动或者声音，大都会被证人当做事物自然运行的声音或者响动：一声枪响会被当做汽车出故障着火，或者遭到致命打击的人的咳嗽声会被以为是在不通风的空间产生的咳嗽声。

在谋杀发生的那一刻，对这个故事而言，时间停滞了。

接下来的那句话只适用于那停滞的时间：

香肠耷拉在面包外面。

推销员不再四下观望了。物体是不会自行倒下的。当那个听他说这句话的人向别处望去时，他没有停顿，而是对着下一个人继续说下去。他看见一管剃须膏，盖子被拧了下来。他咬到了自己的舌头。那男人在看自己的拳头。他没戴手套的手握着玻璃杯。推销员笑着看一个啤酒瓶。

他一下子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他一再试图望着同一个缺口。他所看到的一切都让他觉得自己像一个陌生人。果核从果肉中剥离出来时，发出啪嗒一声。他抬起头，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似的。铺在地上的软管突然被人拽到了屋角。他的手软绵绵地放在大腿之间。他不想呆在这里，可也不想离开。

软软的黄油“啪”的一声掉在石头地面上。

咳嗽声折磨着他。

那女人膝盖窝里的血管显露出来。那男人把没有拆封的信揣进口袋里。那只猫什么都没有看见。“这是猪血。”一只玻璃杯在当啷作响，也许是一扇窗玻璃。

路面上只有一块干燥的地方，那儿有一个形状像青蛙似的趴在地上的人。

他的眼皮抽动着。

他敞开外衣走着，看上去毫无什么恶意。推销员侧耳听到的那声呼吸并不是他发出来的。衬衣缝隙间露出那赤裸裸的皮肤。

现在，他们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话题可以交谈，就只好说说自己而已。

他动了动，要让人看到他依然还在这儿。那个男人的背影又宽又大。挥动的双臂展现出他的爽朗。篱笆顶上缠绕着厚实的黄布。他心满意足地摁灭了烟头。汽车的座椅向前靠在了方向盘上。那鞋子摆放在楼梯下面的阴暗处，和平常摆放空鞋的样子不一般。虽然没有风，可是他说话时还是紧紧地按着帽子。那个男人一直没有转过身来，所以他无法看到他的脸。一张报纸拍打在路面上。

两人第一次见面后不久又在相同的地方再次偶遇时，脸上挂着尴尬的微笑。

他盯着为他准备的话筒。当冷汗开始在皮肤上滑落时，他吃了一惊，就像被陌生人触摸了一下。报夹太松了，根本夹不住报纸。那是个看不出年龄的男人。那用力压下去的海绵很快又浮出水面。水管堵死了。

他擦了擦衣服之后看着自己的手指甲。新断裂的地方依然清晰可见。扣子松松地挂在大衣上。箱子里面有很大的空间。他拿起听筒，身子略向前倾，就像人们要倾听回答的样子。所有人都始终在匀速地移动着。谁接近这个群体，那他就是为了加入其中。推销员观察着一只无主的鞋子。

有个东西闪了一下，可是他无法判断出那个想必一闪而过的物体。当他抬起头时，不禁感到头晕目眩。窗帘从开始就是红色的。

他再也看不到水里有气泡了。那辆自行车以一种十分扭曲的样子横卧在路面上。他靠在墙上思考着。他们谈论起他，就像在谈论着一个物体。没人买她的东西，因为她的名字十分可笑。那张报纸刷刷地飞过大街。那女人脖子上，血管在急促地跳动着。电话那头要找的人谁都不认识。

有一只鞋的鞋尖皱成一团。

他观察着，那摊水越变越大。有人出主意，怎样可以除掉那油污。那块砖头不是掉下来的，而是被人扔下来的！那男人用香烟指着他。走进房子里的人比又走出去的人要多！

他瞥见一团孤零零的泥巴，被踩成一大片。瞳孔放大了。那正是缺少拨火钩！

他感到，她的皮肤若没有陌生人的触摸则是不完整的。因为记忆的缺失，他变得健谈起来。他不正眼去看任何人。他的头比往常抬得更高，或者垂得更低，这虽然让他觉得不安全，但是却让他可以发现很多新鲜的事物。突然，紧挨着他的百叶窗刷刷地落下来。那爆裂声不是冲着任何人而来的。浆过的衬衣胸前瞬间晕染出一块污渍。

因为不由自主地碰了一下，推销员连忙道歉。不知是哪里有人叫喊起来，一扇门砰地关上了。水果从那男人手里掉下来。

他拉着脸，仿佛在渴望着人家来辱骂他似的。那女人倾听时甚至都没有屏住呼吸。终于，他厌倦了只是看着别人的后背。又得这样把大衣的扣子从上到下扣起来，这可真是浪费时间啊。

坐垫绽开了。

他不停地走来走去，所以没有人能逮住机会好好打量他。如果长时间只做出一种姿势的话，连衣服都会适应这样的姿势。

那物体沉没之后，水面又恢复了让人不安的平静。

推销员没有听到急速离开的脚步声。手指尖从手套上的一个洞里探了出来。那直立着的熨斗简直咄咄逼人啊！那污渍都可以称得上是一大块了。冰块落到空杯子里。

那百叶窗变形了，几乎让人不知不觉。零零星星的大水滴从电线上落到街道上。鞋带的顶端呈黄泥色。密封塞子在洗漱池里蹦来蹦去。嘴角向上扬起。窗帘垂直落下。那狗在隔壁房子里狂吠。汽车所有的门都大开着。墨水瓶已经干了。抽屉是空的。那个被咬过的苹果嵌在下水道的铁篦子里。液体停止了流动。那只猫在舔着石头。小板凳摆在角落里。一片树叶挂在蜘蛛网上。痰渍里的泡泡破裂了。在这

个描述的时刻，就连从水壶倒进玻璃杯的水发出的声音都显得十分危险。

那目光不容怀疑。那女人摆弄着滑落的长筒袜。那个穿着军装的男人从房子里走出来。一只手把铁锹从鹅卵石小屋里抽出来。有人弯腰去捡一枚硬币，可当他发现那不过是一粒扣子时，又立即直起身来。推销员摸了摸身后。这次的声音不可能又是汽车出故障着火了。

那男人用双手握住脖子。推销员靠在门铃上。没有人用哨子吹出颤音。一只戴着手套的手出现在窗台上。因为受到惊吓，她嘴里发出一声微弱的喊声。里面的电影院里，水妖们突然嚎啕大哭起来。

那窗户并没有帮他醒过神来。当他打开柜门时，空衣架互相撞击着。那辆汽车急刹车时顺着排水沟磨出深深的印记，直到最终停了下来。他听到另一端传来一声窒息的叫喊。那宽大的后背提供了一块很好的靶子。那晃动的听筒沉闷地撞在什么东西上。第二次射击崩起的玻璃碎片停在了第一次射击时玻璃崩起的地方。在他面前，一个烟蒂在街道上滚动。因为害怕，他的鼻孔变得火热。

那遮雨罩鼓鼓囊囊地罩在被遗弃的汽车上。

那些话弥散开来，因为所有人都在倾听着。

那个报纸下面的物体升起来，而没有落下去。烟灰缸被清空了。当推销员提起箱子时，发觉它沉重得异乎寻常。额头发痒。那些圆木大梁之间出现了一个圆洞。他抬起手，将五指分开。大家一致认为，一切井然有序。

他抬起头来四处闻着。他走进这个房间后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自己也许是走错了房间。可能只是普通的肚子疼，所以那个人才用这样的姿势捂着肚子吧？

枪口对着地面。推销员看到了一个小细节。他大惊失色。孩子的脸蛋在跑步时颤动着。“电线犹如它们的影子一样，如此无声无息。”

没有人冲出门去。一股凉风拂过他的耳朵。在这个时刻，他们在为财产所有权而争吵不休。当那只手再次出现时，已经不再是空的。红颜色意味着什么。他倒下时，还试图把帽子扶正。什么东西闻起来像烧糊的布料。这时的寂静显得不太自然。

那辆汽车是街道上黑乎乎的一团东西。车门还在来回摇摆。他用双手护着脸。这是一个毫无目的的动作。突然，电话铃响起来。引擎熄火了。

他也可以贴在一面玻璃上。他先是慢慢看着，然后变得迅速。那扰人的吵闹在这个秩序瞬间里不是不受欢迎的。那只手显然与黑暗形成了反差。“这里不会有人因无聊而死去。”从彻底敞开的大门里飘出一缕薄薄的烟雾。

他们用硬币比较着那片污渍的大小。他的脚步慢了下来。他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完全不可理解。“或许又是小爆竹的响声吧。”瓶子立在他的脚旁！现在把手从兜里掏出来已经太晚了。推销员把商品举得很高，弄得人家不得不仰望着它。躺在草地上的那个人也许已经死了。

他放下铅笔，目光很呆滞，却不是因为看到什么东西。烛芯还在冒烟。推销员抖开手帕。那玻璃杯不合时宜地掉在地上了。

他透过自行车的轮辐看着那个身影。马在打响鼻。他不由自主地直立起来，虽然听不到有爆炸声响起。推销员站在门后的死角里。听筒在叉簧上颤动着。

人们可以利用香槟酒开塞时的爆裂声！

没有人承认听到过响声。

如果他现在飞快地合上书，还能够夹住那只苍蝇。

所有人突然都用手掩住嘴。听他倒下去时发出的声音，仿佛他再也不会站起来似的。为什么他们不继续喝酒呢？与其说他看到，倒不如说预感到那个动作。地板的木条看起来已经松动了。这个群体的图像揭示不出什么。虽然他在系鞋带，眼睛却朝上看去。那些物体在那

个受到惊吓的人手里叮叮当当响。那个奔跑的人手里提着的箱子蹭上墙壁。他一边笑，一边往后退了一步。所有人都显出一副受到惊吓的神情。那女人强忍住没有打起哈欠。铺路石之间的小水洼不停地颤动着。他的拇指突然干了。“那是我的帽子！”

看看那张脸就足够了。没有人说什么。响声不是来自地下室！那两人交换一下眼色。双手抱在怀里。他发现太晚了，那不过是镜子里的影像。那个新来的人无比激动地撞开了门。鼻孔越来越大。

“他两手扶到胯上，动作迅速得就像青蛙伸出舌头捕捉住一只苍蝇一样。”

因为他想不出能说什么话，只得通过移动身体来表明自己要做什么。

手指看上去变得扁平了。最后的几个音节逐渐变成一种含混的声响。那个躺着的人已经再也分不清上下了。在这个时刻，对他来说，每个距离都是无限的。推销员长着一双琥珀色的眼睛。

他说话非常快，仿佛他这样说生死攸关似的。

“电话来得可真不是时候！”

那根湿漉漉的手指试图擦去那个字迹。突然之间，那男人高高地甩起双手。枪口喷出的火焰异常短促，你什么都无法看得清楚。那个垂死的人脸上挂着愤怒的微笑。

最后，对于那个步履蹒跚的人来说，连地上微不足道的凸起都会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

推销员支撑着身子离开桌子。那男人带着不可思议的神情朝下张望着。那些声音毫无意义了。那女人说话时只动了动嘴唇中间的部位。他朝一侧倒去，而不是人们想必期待的向前倒下。离去时，推销员用帽子遮着脸，生怕会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电话线夹在剪子中间。

推销员无法转移开目光。他的表情和他的话互相矛盾。他站在射击线上。他用自己的指甲压了那个躺在地上的人的指甲，那指甲仍然

是白色的。

树皮从锯子上迸开，这意味着什么呢？

推销员发现罐子敞开着。那失去光彩的双眼和大张的嘴巴在说着一种清清楚楚的语言。从这个糖罐里再也不可能倒出糖来了！他将耳朵紧紧贴在这个垂死者的嘴上。推销员手腕上戴着一个黑色皮质手镯！手指突然失去了知觉。

那是一块油渍吗？

他不能确定，那声叫喊来自什么方向。她的眼白不是白色的。那些动作是不由自主做出来的。为什么在这样毫无危险的情况下，他也不愿意让人拍照呢？

电话簿被翻在特定的一页上。当他倒下去时，身体转了一圈。他瘫倒成一团。动作脱离了它们的轨道。因为推销员经常几个小时都无所事事，所以他有充足的时间去观察别人。倒下去那个动作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步一步完成的。他感到有点儿不舒服，于是绷起脚尖。在另外那两只眼睛中间突然出现了第三只眼睛。

推销员从后面揣测着那套西装的料子。一个扫把头从门缝里探出来。那不是一声尖叫，而是呼喊。他嘴里变得很干。

为了相互安慰，他们为那些物体中发出的响声寻找着解释。紧张的肌肉松弛下来了。他们寻找着那个物体，这现在已经不再是游戏的一部分了。突然间，他必须先要想像一下他所看到的一切，这样他才能看见它们。奇怪的是，推销员觉得在衣服兜里有一把钥匙。

那是一个小孩拳头大小的洞。

他猛地从倾曲的姿势中跳起来。

“对于谋杀来说，黄昏是最糟糕的时间。”电话铃一响起，他就停止了咀嚼。在上面前几行，他还在说话，可现在他只是被描述的对象。连香烟头上的烟灰还没有掉下来呢。那是一个响声，它既不是咳

嗽，也不是吞咽，而更像是二者合为一体。“您从来没有见过死人吗？”

他还在动。

他逐渐明白过来了，自己发生了什么事。

那双眼睛又焕发出生机。他踢到一个软软的东西上。

以这样的方式死亡时，死亡的尖叫是由元音组成的。

推销员闻着自己的手指。那个躺着的人的眼睛一味地看着动来动去的物体。翻阅纸张时，它就会发出沙沙的响声。地板缝隙中露出一个扣子。他脸上还挂着剃须膏的泡泡。要从思想里产生一个响亮说出的词语来，那得需要时间。

他不能再指向任何东西了。

那只手慢慢地从他身上滑下去。

“我要死了？”

推销员踱来踱去。

不管他朝着什么方向，再也没有什么物体可以去自由触摸了。那个垂死的人在咳嗽。鼻孔的边缘越来越亮。那个女人在身上四处抓痒。在敞开的大门口，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人影，他的眼睛开始感到灼痛。那只猫兜着圈转来转去。

那个死者或者还没有死的人在注视着他。

这里笼罩着难以置信的宁静。那个孩子用猪皮擦着自己的脸蛋。没有人跳起来。铅笔飞快地划过纸。片刻间，出于恐惧，所有人都用“你”相称相互攀谈起来。[2]

那些动作一再被打断。

那匹马晃了晃耳朵。“在那个卧着的躯体周围，街道湿漉漉的，就像在紧紧地压成一堆的树叶旁可以看到的那样。”起初，他还以为那凝结的血是什么恶作剧的把戏呢。

为什么人们聚集在这座房子门口呢？那个被扔在地上的东西没有再弹起来。他还试图紧紧地抓住那窗帘。那男人戴着厚厚的手套，连书页都无法翻动了。那些动作逐渐变弱了。这会儿没人去留意那自动点唱机。那个垂死的人把凶手描述得时而矮小，时而高大。

推销员听到了一声喘不过气来的尖叫。

那个孩子很费劲地穿上靴子。

那地毯太厚，你要是在这种状态下踏上去，就会踉踉跄跄。

地上有一摊黑乎乎的东西。

每个人都想帮忙。

他越来越安静了。

她有红牙齿。

“那声叫喊现在依然十分刺耳地萦绕在我的耳旁！”

从房子里出来的第一个人立即被人们缠住了，让他讲讲看到了什么。那个垂死者的声音开始含混不清。门没有松动。那只手套插在篱笆上！有人捶打着桌子，烟灰缸随之跳了起来。刀把还在上下颤动。推销员发现，那个垂死者身上像他一样，穿着一件同样图案的衬衣。他喋喋不休地把死亡挂在嘴上。直到最后，他还在怀疑自己肯定会死的。他什么都认不出来了。细小的灰尘从翻滚的车轮里飞落到车辙上。挂在衣架上的衣服挡住了想要探寻汽车里面的目光。有人在大声打着电话。房间里瞬间挤满了人。所有的狗都醒了。

他已经死了，只不过他自己还不知道而已。

人们必须将他翻过身去。

一声叹息接着另一声叹息。

给伤口止血已经没什么用了。

有人在用手指甲挠门。

那橡皮筋嗖的一声从包裹上弹出去了。

有人在那个垂死者的后面笑起来。

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那镜子上不再蒙上新的雾气。

正巧在这一时刻，他的身体似乎必然成了平面。

至少没有什么会再让他感到痛苦了。

他目光里具有尸骨未寒的人的目光里所具有的神色，几乎看上去，仿佛它们依然在注视着某个人，不尽然如此，却几乎如此。

虽然他已经死了，他们还不停地拍打着他的后背。

他还活着？

冰碎裂了。

他身边的所有人突然都退后一步。

又有人呼叫他的名字，先是用疑问句，然后是感叹句。

灯打开了。

他伸展开四肢，直到手指尖和脚尖都完全展开。

凡是碰到他的一切，都让他觉得既冷又热。

开始他只看到自己围着的鞋头贴皮。

那些脸都变红了。

推销员把硬币放到托盘上。

最后那个词有多种含义。

他呼出一口气。

一片安静。

“不！”

推销员又贴着墙往前走过去。

3　无序的秩序

谋杀不是眼下正在发生，而是已经发生了。它不再是一个过程，而已经成了一种行为。要重建旧有的秩序已经不可能。现在要做的就是整理这种行为产生的无序，而整理的方法就是对这种无序进行列举和描述。

所谓列举就是摆出尽可能多的细节。列举尽可能多的细节是为了尽可能多地筛选和淘汰。

通过对没有展现出来的一切的否定，那么对这种行为的描述就可以达到最大可能的限定，限定的是开始那些不计其数的可能性。对这种行为在细节上的描述有利于把不计其数的可能性转化为有限的可能性，再把有限的可能性转化为独一无二的可能性，转化为惟一的可能性，转化为事实。

可以断定的细节越多，就会越早地达到惟一性。对细节的列举的结果就是导致那不可替换性。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如此多的细节使得谋杀犯突然会作为独一无二的、特殊的人物出现。也就是说，这个行为能够分解的细节越多，它们就越清楚地指向那杀人犯。由于谋杀而产生的无序的秩序有利于澄清无序。

这种无序要尽可能地得到澄清，以便能够认识到它的起因。然而，这种无序并不是真的变得有序，而仅限于它被描述而言。为了能够使它得到描述，不对其本身进行任何有序的整理。

对于那些事后的调查者来说，伴随着这种行为发生的时刻，便开始了另外一种时间划分，因为在这个时刻，时间停滞了。这个时间被划分为谋杀之前和之后的时间。在这个谋杀故事中，这个时间的停滞通常是由此而形象地表现出来的，那就是由于发生了这个谋杀行为真的就有一只表停滞了，比如那个被害人的表，因为他重重地摔在地上。

只有当这种无序通过描述被划分和固定下来时，它本身才会得到澄清。但是，对这种无序的澄清不再属于这个故事的一部分。

在这个谋杀故事中，话说到这里，无序是这样设定的，除了那个追究凶手的问题外，所有的问题都能够有个答案，或者那个追究凶手的问题也会有个答案，可是你会深信不疑，故事讲到这儿，问题和答案都是错的。通常情况下，这个错误的答案是由在另一个问题上一个错误的答案引起的，比如在追究作案工具、作案时间和伴随想像等问题上。一块石头会被误认为是凶器，或者手表走得不对，或者错误地判断视线情况。

一个人，如果他不属于那些事后调查者的一员，因为他既没有得到授权，也没有这个义务去进行事后调查，那他就会发现这样的错误，无论如何在谋杀故事中如此。于是，他本来想置身于这个故事之外，却被卷入这个故事之中。他看到了其他人未曾看到的东西。不管是心怀好意，还是居心叵测，他便开始梳理可能的联系，并且玩弄这些联系，就是要取得为数不多的可能性。

他是惟一了解这个细节的人，而这个细节也许突然会使得那些可能性变成惟一可能的事实。

不计其数的或者为数众多的可能性让他惶惑不安。他开始追问，起初只是追问自己：

“请您别动任何东西！”

现在他们才又开始呼吸。

连那最细微的声音在这样的环境里都显得格外刺耳。推销员没有听到正在离开的脚步声。从平放在桌上的话筒里传出来的声音一直在重复同样的话。直到现在，没人说出那个关键性的词语，所以显得还不算太晚。推销员相信自己在死者身上看到了最后几个动作留下的痕迹。

有人偷偷地指向他，让他内心平静下来。

在其他人身上所表现出的种种绝望，比如那狠狠地吸烟的声音，这些现在让他很难受。面对这样的不幸，那女人却仍在使劲地熨着衣服。一瞬间，连那些物体都让他觉得遗憾，不过仅限于那位死者周围的物体。

那双光脚从裤腿下面露出来。“贫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推销员毫无目的地四下张望。他发现自己的手指还一直相互叉得老开。惊吓使他的身体变得沉重了。

他设法让自己动起来，手在大衣口袋里上下移动着。为了阻止水龙头那恼人的滴答声，他迅速地将手指头插在水龙头里。门口出现了一个男人，胳膊下夹着一摞报纸。那个孩子懵懵懂懂地盯着那死者。窗玻璃被打得粉碎。百叶窗卷上去了。那职业装就拥有某种建立秩序的东西。一切都显得十分逼真。她用手指抹掉沾在牙齿上的口红。“再说吧，他这辈子从来就没有真的生过病啊！”

人们从那死者的外表上依然看得出他看到了什么。倒地时，那表盘破裂了。很多人把这响声当成了瓶塞迸发出的爆裂声。由于地面稍微隆起来一块，一摊液体和那死者分离开来了。他穿着袜子立刻就窜了出去。有几个人依然继续忙着自己的事情。当他正在买水果时，怎么会想到一声枪响呢？那个垂死的人又往前走了几步。

突然间，人人都谈论个没完没了。推销员在这样的叫喊声中缩起了脖子。他慢慢地捏碎了攥在拳头里的火柴盒。他不能忍受有人站在他身边，并且一同在想着。“无名尸体，需要提取指纹。”

他的目光终于碰到了一个他可以注视的物体。此时此刻，任何一个动作或许都会被错误地解释。没有人注意到他怅然若失的神情。对于他所看到的东西的回忆依然历历在目，连同他无法相信所发生的事。那思绪一再回到同一个词上。那死者的衣服是刚刚熨好的。那正好是黄昏时分，在这个时分，人们不知道要不要打开灯。这样的情形不适宜让孩子们看到。

为拍摄那躺在地上的躯体，镜头调整到垂直向下的角度。“对于躺在草丛中的死者要用白灰。”那手指尖上涂上了墨迹。那声叫喊弄得他四处瞎撞，尽管它只是冲着动物发出的。

家属们坐在这装饰得毫无品位的起居室里，相互紧紧地靠在一起。有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没有人朝着那令人发问的方向望去。那个躺在地上的人被证实了他本来的身份。推销员急匆匆地收起他的商品。不久前他还憧憬着未来的一切。那个女人脸颊上长了一个肉瘤。在那肉瘤出现的地方，肌肉绷得紧紧的。他不再是为报告什么消息而来的。此刻，那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会被提出来的！可惜他离开了。他就曾经坐在那儿！

他龇了龇牙，可是现在这种龇牙算不得什么动作了。人们会给他合乎比例地画一张像的。他吃了难以消化的饭菜。虽然没有人对某个人提出指控，可是所有人都觉得必须要为自己辩护。那块石头放不进木槽里去。推销员踩在一截剪断的烟头上。他没有关上那电话亭的门。当那个沉重的东西举过他头顶上时，他的脚指头变得不安了。那个穿军装的人把子弹放在小碟子上滚来滚去。“挫指甲是不会让人心跳加快的。”

他用唇音模仿着枪声。声音仍然很沙哑。这样做也不能让他重新焕发生机。推销员无法描述那种声音。那个中弹者片刻间纹丝不动地站在那儿。

人群中有个地方格外拥挤。

那些寻找的人只有吃残羹剩菜了。梯子上有两道横木之间的距离比其他所有横木之间的都要大。推销员若有所思地搓着双手。那死者的身影被人用粉笔在地上画了出来。叉尖从土豆里露出来。那商标已

经被磨损了。他觉得死者的手臂和两腿长得出奇。其他人都被打发走了。她又恢复了老习惯。他早就死了。

那手套他戴着不合适。人们不得不俯身看着他。他坐在那鹅卵石砌成的小房子上。

从哪儿就这么快地弄来这些报纸掩盖现场呢？作案现场与这个行为发生的地方并不一致。他错误地估计了从手指到地面的距离。那是一具男人的尸体。那条蚯蚓被沙子盖住了。那只手抬起来后又落下了。那把椅子并没有放在原来的位置上。

“那颗子弹没有伤到人！”

那个四角形黑洞无非一辆货车敞开的车厢。他梳着背头。那双胶皮靴子的靴筒翻出来了。“一次射击可以引发三种不同的声音。”他又无拘无束地扫视一下周围的环境。他打着手势，陪伴着他暗自的想法。那女人两手抬到胸前，跑过了街道。一个童声说出了那些关键的词语。推销员只是偶然来到这里。

死者裤子后面的兜里插着一副手套，手指部分露了出来。

他害怕那些长久不断的悲伤形式。

那子弹尖上刻着一个十字花。难道他还希望依靠自己躺在那儿的姿势而表达出什么意愿吗？现场被损坏的东西都会被搜集到一起。也许那是一颗误入歧途的子弹。每句话之后都出现令人尴尬的沉默。

推销员越是回忆那个细节，就越发觉得忐忑不安。他看到街道上消防栓周围全都是水。在他想到的那几句话中，总是缺少一个词。

包里的东西全都倒在一块布上。衬衣扣子扣错了，剩下最后一粒扣子没有扣。虽然那死者躺在一个干净的垫子上，他背上却沾满了沙子。

他一边跟人交谈，一边玩弄一个物体。这时，他发现这个物体上有些引人注意的迹象，于是停止说话了。由于无序现在梳理成了有序，那么死亡看样子才成为定局。那孩子的脸映现在糖罐上。

推销员踱来踱去，仿佛有个念头使他难以平静下来。他似乎一定要训练自己，一眼就把握住整个局势。穿着不起眼的男人们下车了。

此间，他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他所看到的画面，他想这样说服自己，他是不是真的看到这样的画面。

在死者的衣服里发现了残留的盐粒。那个过路的行人凝视着地面。推销员压根儿就无法设想，那死者也曾经活过。他先是将两手掠过靴子。那些散落的火柴现在又被收集到一起了。他在触摸时，将一块冷冰冰的东西当做了热乎乎的。上臂上显现出一块接种留下的疤痕。那个受害者毫无预感，不然他事后会大喊出声的。对死者的描述越长，他就越发显得像一件摆设。有人扛着一个长条状的包裹走过去。

推销员的注意力又来得太晚了。他费力地试图让自己停留在当下，因为他就是死盯着一个物体。天慢慢地黑下来了，那些细节再也无法区分了。“那子弹蹒跚着飞出来！”他避免用手指去触摸某种光滑的东西。他们从一侧顺着墙壁划去。他发现，前面路面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片痰渍。没有人看到有人跑过马路。那封信不是恐吓信。那些行装整整齐齐地排成一行。裤子口袋朝外翻出的内兜松弛地垂挂在裤子外面。那物体曾经被人用力地擦洗过，上面留下了一道划痕。有人数起那一道道伤口。他突然抬起头。虽然死者倒下了，可是他并不相信自己会倒下。他自己还把帽子按上去。那些圆木大梁依然一动未动。连那只猫也没有向后退去。推销员似乎可以毫不费力地回过头来忙活自己的事情。

他独自走去。

有人闻一闻那枪管。所有柜子的抽屉和门都大开着。很多人的动作还很拘束。惊吓引起的种种后果让人惬意。他把双手扶在膝盖上，目视前方。死亡的惨叫并不是惊讶的呼喊。

死者穿得很暖和。他看到一个笨重的物体。他的头脑渐渐清醒了。他是一个毫无用处的证人。他避开了别人扔给他的那捆东西。当他对着锁眼吹口气时，迎面腾起一片灰尘。他的皮肤由于受到惊吓而变得十分敏感。他羞于现在改变自己身上的东西，免得别人会以为他

有什么需要隐瞒的事情。如果是在半夜，他倒可能会把那声尖叫当做是求救的呼喊。

通过描述，死者周围的无序变成了一种新的秩序，所以，无序的消除只会导致新的无序的产生。

烟头被一个镊子夹了起来。他仍然一脸不解地看着什么。没有人在方便之后直接按下冲水。有人注意到，推销员经常把手插在衬衫里。

死者要么没有敌人，要么就有许多敌人。突然间，那些物体都开始讲述这桩突发事件来。

他跟每个人都说过话。他有些过于风趣了，其实收敛些更好。

那孩子始终将这起事件当做这个游戏的一部分。他现在不想睁着眼睛了。尸体依然原地未动。他们能够交谈，这让他们感觉好开心。他现在觉得自己的手是多余的。由于惊恐，他浑身上下都感觉刺痒难耐。那女人没有眨眼！

随着那爆裂声而来的是一片轻轻哼唱的宁静。

他无法理解所见到的和所听到的事情之间的联系。一瞬间，那些话显得如此不可思议，从而让人惊恐不安。

那些物体呈现出清晰的轮廓。他体重不大。他不舒服地在椅子上挪了挪。一株小草茎居然割伤了他的手指。他觉得自己所说的一切现在都好像是借口。有人试着给死者戴上那副手套。一开始，他还以为他会呕吐。那只手静静地扶在门把手上。他们清楚地知道该怎样摆弄人的身体。

没有人跟着他。

他们拿比喻来相互安慰着。那个下水管的拐弯部位被拧了下来。他只好读着盖在尸体上的那些报纸。火柴受潮了。

有几个人并不知道那叫声意味着什么，他们立即看了看表。作为推销员，他能够说出很多商品来源地。没有人抖开一条手帕。如果人们知道，他靠近时直直地站在那里的话，那么就可以画出那子弹飞行的路线。这条飞行路线也许与另外一条相交，那样就会得出射击点来。那只靴子是扔掉不要的。

他久久地思考着那个物体，直到他突然忘记了它。周围到处都曾经燃放过小纸炮。那窗帘几乎没有被烧焦。那活儿干得挺干净的。在手电的照射下，草尖都亮闪闪的。在稍远一点儿的地方，孩子们在哭喊。推销员十分镇静。有人把他扔掉的一团皱皱巴巴的纸又递给他。一条狗叫醒了另一条。那躯体突然在他的手臂里瘫软了。他一下子什么都想像不出来了。她看过他的生命线。他因为恐惧而呛了一口。慢慢地，死者显得又不那么可怕了。片刻间，他以为人家说的就是他。探照灯使得他脖子和脑袋分家了。一捆黑乎乎的东西放在地上。人们那急惶惶的样子让人不舒服。他踉踉跄跄走去，而现实情况那股严肃劲儿也随之消失了。

自从他看到他死去之后，离去时，他感觉到鞋底下哪怕再细小的沙子，都一直窜到了头皮上。

他抬头看去时，那些物体呈现出十分鲜明的轮廓。他继续往前走去时，没有看到任何人向他走来。

没有人站在大门入口处。没有人急匆匆地走动而引人注意。那个穿军装的人没有看到任何人弯下腰去。当那些穿着便装的人赶过来时，他们在哪儿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异常。他没有看到有人站在那停放的汽车之间。没有人见过谁跳过那铁丝网篱笆。没有人偷偷地从身上扔掉什么东西。

那些目击证人中，没有一个人看到有人系鞋带。没有人听到百叶窗的沙沙声。他没有看到有人嘴里吐出什么东西来。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什么人都没有听到那渐渐远去的脚步声。没有人看到有枪管从某个窗口伸出来。没有人看到或者听到瓦片从屋顶上滑落下来。

当那个穿军装的人走过来时，他没看到有人把手藏起来。没有一个孩子被一个逃跑的人撞到一边去。没有人看到过小窗里冒出烟。当他转过身来时，没有看到有人飞快地向橱窗张望。

没有人在玩爆竹。没有人用手帕遮住脸。没有人急匆匆地消失在电影院里。

没有人看到有谁在洗手。没有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闻到过火药味。

没有人短暂离开一个聚会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没有人因为头痛早早上床睡觉了。

没有人去旅行。

没有人看到有人扔掉过一双长丝袜。

没有人流过鼻血。

没有人威胁过别人。

没有人笑过。

没有人把水龙头拧得如此大，让人连那叫声都听不到。

“一切都会恢复原状！”

4　揭露开始表现出的秩序

在这谋杀案之前，展现的是一个表面上的秩序，这不过是这个谋杀故事的一个手段而已。只有正好出现的那个人才会觉得这个秩序是一种秩序。它只是打眼看去的一个秩序。只有当这种种现象的秩序被那公然的谋杀打乱时，那么，那个之前所描述的秩序才显得意义重大。这个秩序因为谋杀案的发生而成为无序的故事的一部分。由于谋杀案揭露了这个秩序，所以，时间也就参与其中了，也就是说，在那个陌生人到来之前那段曾经存在一段时间，并且在这段时间里，产生了无序的先决条件。

这种秩序不过是一个感官的秩序而已。在谋杀案发生之后，现在就一定要对这个当时感官上的秩序进行审查。那些构成这个秩序的物

体、人和物品就有可能被相互联系起来，与地点和时间联系起来。那个展现给感官的秩序或许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

那些物体要受到审查，看看它们与这个现在所涉及的对象，也就是这个死者之间会不会存在着联系。

一个个人物要受到审查，看看他们与这个被害人是否有过直接的关系。一件件物品要受到审查，看看被害人本人与它们是否有过关系。一个个人物要受到审查，看看他们与被害人存在联系的物品是否有过关系。要审查的是，案犯在谋杀之后所遗留下来的物品是否能够表明，有一个人与被害人有过种种关系，而且大家都知道事情就是这样，尤其在这个遗留下来的物品上如此。要审查的是大家都知道的物品，因为它们之前曾经和被害人有过关系，那么谋杀发生之后，它们是否与其他人存在关系。一个个人物要受到审查，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曾经与被害人有过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一个个地点要受到审查，看看它们是否与谋杀发生的地点有关系。要审查的是，一个人的关系在案发地点和案发时间是否有可能，因为他不是曾经与被害人的物品有过关系，就是与被害人有过直接的关系，或者在案件之后与被害人的物品发生了关系。

要力图事后确立这些关系，那个正好出现的人无法看得见、听得到和闻得着这样的关系，因为他不过是看一看，听一听和闻一闻而已。

现在要谈的是无序的故事，它被隐瞒了，而与此同时，为了其他的目的，那个秩序的故事却正在进行。

这里要说的是，这个真实的故事是如何一句一句地组合起来的。

如果说这个秩序的故事只是发生在当下和一个地点的话，那么此刻在揭露这个秩序时则关系到这个当下之前的时间和除作案地点以外的其他地点。对这个作为另一个故事的延续而开始的谋杀故事而言，现在要寻找的正是另外那个故事：要追究那些现存物体的历史。列举无序的目的就是服务于这种调查。从那列举的无序中应该让人可以看得出，这种无序是怎样发生的。

那个正好出现的人有意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因为他只看重情节，却不看重这个或者这些引发那些情节的起因。这个故事就是从他那里开始的。在案件发生的那一刻，对他来说，案犯只是由情节构成的。

现在，那些无法澄清的东西使他惴惴不安。而令他惴惴不安的是，他虽然看到了一个动作的结果，却没有看到动作本身。一条线的起点的缺失，使他惴惴不安。

他询问了自己一番之后，开始盘问其他人。

作为局外人，他可以毫无拘束地提问。一个正好出现的人总是很好奇的。不言而喻，他打算弄清楚事情的原委。

然而，他还是引起了别人的怀疑，因为故事进行到这里，每个问题和每个大家都不认识的提问者都必然会引起怀疑。

当他询问起某个人的身体状况时，这或许已经太多了。

想必他发现了什么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在通往那个真实故事的道路上，这个提问者所遇到的那些障碍就产生了这个新故事，可这个新故事却围绕着那个老故事。

在谋杀故事的这一章节中，那个提问者遇到的尽是障碍。

案犯已被提及，不过并不是作为案犯：

一再提出有关时间的问题。

他活着的时候看起来可年轻多了。推销员把信藏在口袋里之后，迅速地朝周围看了看。因为现在受害者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在提到他时，大家都说的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他以前做过什么，以后想做什么。无论听到任何声音，他都不会吓得缩作一团，也没有比别人更长久地盯着什么物体。那个被害人左边数第二个。

推销员瞥见了一个老妇人的双腿。从他说话的语调听来，那句话不是一个问句，而是判断句。他的一生会让人有这样的感觉：他的非自然死亡倒显得十分自然。

在这条街上大家都彼此认识。他急切地打开报纸。一开始，他把黑色看成了红色。另外一个参加者立即上前去接电话，尽管他似乎要下一个台阶才能拿起听筒。那床看上去，仿佛它只是事后被弄得乱七八糟。他没有看表，因为天色已经很暗了。现在就连触摸自己，他都觉得很不舒服。

在这样的光线下，所有的液体看上去都一个样。他发现膝盖窝里有几道微红的皱褶。当他一动起来，手臂的动作显得可笑。现在大家个个都衣冠楚楚，让他觉得很奇怪。房子的墙壁上闪现着刺眼的色彩。

当人家问她最后一次什么时候见到他时，她先是吃了一惊。突然间，大家都不想和产权惹上什么干系了。如果他真是个推销员的话，那他为自己的登门拜访挑了一个错误的时间。

“难道您不看报吗？”

他在光滑的铺石路面上脱下了鞋子。他向后仰着头，好让别人看到他的鼻血流得多么厉害。对面的房子没人居住。由于有闪光灯闪烁，他闭上了眼睛。谁在这个时刻曾是独自一人呢？那条狗嗅着地面。他一看到那躯体，吓得退回来。他屏住呼吸等待谈话中的间歇。“这只手套跟我没有丝毫关系！”当他在地沟盖上走过时，不禁不寒而栗。他提出那些问题来消磨时间。直到现在，他还从未考虑过物体之间的关联。

他一下子在每个人的身影上都看到了与死者身影的相似之处。他敲了敲门，就像那个期待受到别人欢迎的人一样。当有人把糖罐举过他头顶放回原位时，他缩起脖子。她在这样的混乱中如此卖力地洗着衣服，让他感到很好奇。

汽车的前灯晃得他站在黑暗中一动不动。脚踝肿胀起来了。对面那人脸上毫无表情。那软管曾被用来清洗一辆汽车。他本以为会踩上什么硬邦邦的东西，没想到却软绵绵的，让他吃了一惊。房子的主人

出去度假了。门后面的喘息声——如果那说得上是一声喘息的话——停止了。那个被询问的人皱起额头，示意他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那不是油渍！”他不禁又想到死者那远远分开的两只脚。

这不是什么可以随便更换主人的物体。

和他们交谈，困难就在于，他对那些日常用品知之甚少，所以在谈话中，他似乎难以找到向那些非日常用品的过渡。

那刷子刷毛朝上平放着。那样的呼叫，他现在再也不会拿它当真了。他要吹掉某些表明确凿无疑的东西。一群鸟儿发出令人不安的叫声。那孩子举起两只拳头。他一定得小心，不要让别人发现那些问题的提问方式发生了变化。这里曾经放过一个很重的物体。“我只是见过他的面而已！”

他本以为会尝到什么苦东西，却发现有甜甜的味道。他追查这个物体，直到来源地。他给人留下了见多识广的印象。“很多女性都穿着高跟鞋”。推销员头点得过分了。

一张支票的来源已经查清了，纸币的来源却没有。在可能作案的时间里，那个被询问者曾经和其他人在一起。就在此后，有人把一支抽到头的香烟扔到了他的面前。闻起来有股湿乎乎的肥皂味儿。他抓起那把手枪，却并不知道要用它干什么。当他正要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时，却发觉一只手里拿着一个东西。那个撒谎的人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

他感到奇怪，他遇到的每个人偏偏都正在忙活着一些不起眼的事情。一定要检查邮票背面的唾液！没有什么东西他能够拿来去进行威慑。慢慢地，他把语言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他坐在卵石砌成的小屋顶上，说着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词语。

那个物体已经经过了无数人之手。就时间而言，从可疑地点到作案地点的路线太长。这条线索与另外一条线索具有共同的特征。总是会有一个女人与故事相关。推销员自我回答道。因为那汗珠的形状呈长条形，所以那些汗珠无疑是从一个奔跑的人身上掉下来的。他所说的话到现在为止都还是些借口。那些晾衣架以前并没有人用过。

虽然他垂着眼帘，却仔细地观察着面前这个人。他这几天都没有离开过家。那条狗想必会扑咬陌生人的。为什么他觉得一切都像被人动过手脚呢？

虽然他们已经说了很长时间话，可到现在还没人让他坐下。他把洗脸池当成烟灰缸。“死亡根本就不是这事的说辞。”

每当他看着那片血迹时，他的舌头不由得会舔一舔嘴唇。那个被询问者的鞋子颜色深暗，引人注目。第二颗子弹让这个快要跌倒的人又猛地直起身来，而第三颗才使他摇摇晃晃地倒下去了。死者的孩子们偎依在邻居家的床上。“他们侦探小说读得太多了！”

面前这个人的手指郑重地打开香烟盒。脸上毫无表情。他匍匐着身子。那鞋子已经用纸擦过了。那袖口朝外翻起。那些玻璃碎片十分细小，它们倒进垃圾桶时，他连一点响声都没有听到。他没有用手指去触摸任何东西。

当他走进这个房间时，他的动作装作很不自信的样子，仿佛他是第一次踏进这个房间。裙子上那些发亮的污渍周边都黑乎乎的。那洗涤槽与它毫无关系。案发已经好久了。

他若有所思地站在那清洁间门前。他提完问题之后，不厌其烦地摆弄着一个物体。他在思考着自己在回忆中似乎忽视了什么东西。他听不懂旁边桌子上那些人在谈论什么，可是却一再听到那个同样的语言错误。当他关上门时，夹在门缝里的大衣衣角又把他拽回门把手前。

他看出那个女人有洁癖。他懒洋洋的，站都不想站。那只手一定在水里泡了好久。突然间，他忍不住转过身去。没有礼帽遗留在街道上。他注视着死者临终前最后看到的东西。他若有所思地搓着双手。这种恐惧无法治愈任何东西。

他那一个个动作已经融入自己的血肉之中，所以，它们与他的言语就再也难分难解了。那个女人打开门，看到他站在外面，脸上露出一副失望的神情。

这个人断言另外一个不认识他。他再也想不起来他是怎么进来的。他只是因为工作的缘故才来这儿的。他透过猫眼看去。那头发根的颜色与发梢不一样。“如果说这案犯没有理由动手的话，那么他也就没有理由停止。”推销员经历了那么多不太可能的事实，所以现在编造出一个事实来并不太难。当他们互相问候时，他们心并没有想在一起，什么时候停止互相握手，所以，这一个停止握手时，而另一个则依然握个不停，而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另一个停止握手了，可这一个却又开始握起来。

微笑没有浮现在他的眼睛上。他比较着死亡与生存。这是突然做出动作之前那个时刻。子弹刺耳地回响在铺石路面上。它的声音在发抖。那个被询问的人大口大口地喘气，他再也无法不说话了。

所有人突然擦他身旁而过，沿着街道向下跑去。那动作太快或者太慢，他根本来不及去感受它。一扇窗户打开了，可是立即又关上了。他始终连那句预先想好的话都说不出来。当他再次转过身时，那里已经没有人了。

也许他只是那只手滑动了。

寂静让人止不住要咳嗽起来。

她双手捂住脸，不是要保护，而是要掩饰。

那块石头朝下的一面湿漉漉的。一看到那个沉睡的人，他就兴奋起来了。当推销员用脚把那封信从门缝底下踢进去时，屋里突然鸦雀无声了。那双手在长筒袜堆里翻来找去。“每具尸体都得掩埋。”他久久都没有抬起眼睛。街道上那只靴子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么之后您去哪里了？”

那张开的嘴巴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把那个不知情的人扮演得入木三分。他刺激着她，要从她的嘴里套出事实真相。

这里有一股头发烧糊的味道！恰好那一瞬间她禁不住打起了哈欠，结果什么都没有看到。

推销员提出的这个问题中已经包含着答案。他举起那缝衣针，眼睛盯着针尖。地面黏糊糊的。在一个物体旁，他又试着提出这个问题来。他们中断了交谈，直到他听不见为止。从那握成一团的手指之间挤出一些糊状东西。他在垃圾桶里找到一只烧焦的鞋子。“近距离射击时，会留下火药的残迹。”那上衣鼓得离身体太远，看样子不太可能是被水流冲刷造成的。她很快摆弄起自己的手指甲。推销员嫉妒起片刻之前的自己。

那下水道井盖对于这口箱子来说太小了。面对某个词语，那个谈话会跳着绕过去。那匹马又在同一个地方受惊了。难道篱笆上这道粉笔线是一个标记吗？

他的目光无法离开那个物体。突然间，死者的身体发出了响声。那个来回摇摆的话筒总是沉闷地撞在什么东西上。大白天里却如此安静，他听到那风声就像夜风一样。他看得出来，那个女人差不多整天都呆在家里。他不由自主地谈论起自己来。推销员不假思索地站起身来。那封信没有被拆开。也许是他的眼睛跟他开了个玩笑。他已经习惯了提问。

这个男人身上有什么东西让他立即联想到了死亡。他设身处地，又回到那弹簧无疑从靠背椅软垫里弹出来的时刻。那故作的笑声让他觉得疲倦。街上现在躺的不是那个死者，而是遗留下的一个信封。这块地毯本来要用于一个更大的房间！一个拆封刀可以轻而易举地挪作他用。死者脸上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引起了他的好奇。他踏在一块从来还没有人踩过的污渍上。看样子，他提问的不是那个人，而是这个物体。虽然连个人影也看不到，可这房间看上去像有人居住。那个烟头在马路上留下了黑色的印记。直到最后一息，那个垂死的人还以为那临近的死亡是一种幻觉。

那些物体相互之间的距离现在要用射程来测量。

他结结巴巴地说着话，要留给她说话的机会。也许他只需要改变一下视角，那么他就会把一切弄个明明白白。“您肯定是把我错认成另一个人了！”

第二次与这个刚刚认识的人打交道是最为困难的。他远离开每一块窗玻璃。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话后，突然在座的都一声不吭了，之后

两人相互都无话再可说了。他似乎同样可以对着一块石头这样说话。

手指向内弯曲着。听筒自己不再发出响声。她身体前倾，因为她要开始讲话了。死者躺在二楼上面。那瓶子底儿被打掉了。作为无辜者，她却给人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推销员觉得在楼梯间里很自在。那个被咬过的苹果上还留有齿痕。每粒细小的灰尘都被翻动过了。她让他回忆起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一声爆炸，所有的人都四散奔逃。

当他抬头看去时，有几只苍蝇落在他手上。他相信自己听错了。她眨了眨眼睛表示认同。这里到底有多少扇门啊！因为疲倦，他多走了几步，越过目的了。那门把手磨损得太厉害了，上面什么都无法辨认出来。那些物体无用地摆在周围。

这里有没有地方可以让人不受打扰地交谈啊？那个被询问的人坚称自己是土地的主人。当推销员敲门时，他听到里面慌慌张张的动静。房子前面停着一辆不起眼的小车。

他心想着只是摸一摸那外表，不料他的手指头却从一条缝隙中碰到外表里面那个冷冰冰的物体上。尽管人家能够看到她，可她却装腔作势地说着话。所有的柜子里都堆放被遗忘的物品。这个问题用另外一个问题问答了。他坐得离她很远，她不得不大声地说起来。

突然间，他又变得健谈起来。爆炸的那一瞬间，鸟儿都拍打着翅膀飞起来，天花板上的灰泥随之掉落下来。她像出售商品一样出售回答。正是营业时间，商店却关门了。听到那响声时，她什么都没多想。有人跑向电话亭。那个针眼几乎辨认不出来了。只要还有液体随之涌出来，这个涓涓细流就不会间断。他不想去做什么比较。

这张照片展示了受害人还在享受幸福时光的样子。一个小小的动作透露出她已经来过这里。电话和门铃同时响起。那个物体经过了太多只手的触摸。那地毯减弱了他的脚步声。他关上的那扇门又弹回来了。这个尸体是一个序列中的一个数字。他一再让自己相信显而易见的事情。那音乐让他的动作放松下来。她清点着所有属于她的东西。当他注视着她时，她正好在看别处；而当她发现了他的目光，现在又朝他看去时，他却又把目光移向别处；而当他现在发现了她注视的目

光而又朝她看去时，她又望向别处了。他不小心咬到巧克力包装纸上。他还没开口问，她就已经回答了。她压根儿就没有任何房间的钥匙。“您想得太多了！”

为了确认镜子里的影像是不是他，他身子动了动。在他说出那句玩笑话之后，出现了一个停顿。这期间，那句玩笑话慢慢变得严肃了。她所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能够符合那样的描述。看上去，仿佛他在奔跑，可是当他走到近处时，却让人看到他在溜达。她显得非常热爱生活。

响声之后，他立即寻找发出那个响声的物体的名称。当她发觉他想跟自己搭话时，立刻就避开了。“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他从她的眼神中看出她要站起来。那只猫用爪子在镜子后面寻找自己。那玻璃掉在地板上，安然无恙。推销员避免在她对面做出令人意外的动作。他立即就看到了，那个男人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刚才那是枪响，还是爆炸声？“如果说子弹是从一把确定的枪射出的话，那么，这把枪的种种特点就铭刻在这颗子弹上。”

他们互相问好之后，都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于是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

他突然吃到了苹果上的那只瓢虫。

她把手指放在嘴唇上。

他屏息凝神倾听，生怕漏掉什么。

当他的听力突然变差时，他首先会以为视力变差了。

当他抬起头望去时，他觉得她跟自己低着头时记忆中的样子不同。

他没有坐在沙发最外侧。由于愤怒或者恐惧，她的声音在发抖。那一连串的问题让那个被询问的人晕头转向。他以为有人在叫自己，虽然那只是一阵响声而已。她找不到那个罐子的盖子了。他看不到她说话的那张嘴。虽然天气已经凉了，可墙壁还是暖融融的。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却空空如也。

那个被害者在她那儿从来没有说起过别人。棱角分明的石头到处都有。他竭力想说服她重复那个词，却白费气力。对于他自己提出的问题，他似乎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死者的衬衣是敞开的，因为有人听过心跳。

他一定还得净身。

她十分不解地望着他。他比那些被询问的人还要累。这地方很多人都戴这种手套。那个名字对谁都说明不了什么。没有一个细节能够指向另一个细节。他甚至无法再想像现在几点了。她坐在他对面一把空椅子上。他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因为他没有在一个回答中找到对手。他坐在那里，因为找不到清晰的思路而沮丧。

他说了点什么。

“牛奶还是茶？”

5　追踪

当你力图通过询问那一个个人物和探究那一个个物体，从本来不计其数的可能性要达到那惟一可能的事实上时，那么遭遇的则是与之相反的企图，那就是让事情停留在那不计其数的可能性上，或者至少阻止限制在那个惟一可能的事实上，或者不是通过错误的回答，就是通过对物体的错误排列把提问者引到那个错误的惟一可能的事实上。

然而，在谋杀故事中往往是这样，如果询问者不受那些借用手段使其可能无法做出判断的情节左右的话，那么现在就会设定情节，要强劲有力地使其判断成为不可能，因为它们是直接针对他本人的，并且试图通过除掉他而使所有的问题化为乌有。

以往那些情节的手段在于，那些情节压根儿就不会被看得出来是强劲有力的情节，而这个强劲有力的情节，现在至少对那个情节就是冲着他而去的人而言，似乎立刻就会被看得出来是强劲有力的。如果他真的被处理掉了，那么这个狡诈的情节当然又会派上用场，它会把他及其周围的那些物体如此来排列，从而使他要么再次一无所获，要

么再次指向那个错误的事实。他躺在山崖脚上一块大石头旁，脑壳摔得粉碎。他的死让人误以为是一个意外事故。

在谋杀故事中，情节描述到这个地方，那个当事人往往就要动身去继续调查，或者走访询问。他已经发现了限制可能性多少的线索，并且继续去寻求一个能够进一步限制可能性多少的结果。为了阻止把谋杀情节现在描述为他的行为，那么案犯无论如何都要再次采取行动。

他跟踪起那个当事人，或者他让他来跟踪自己。在这个故事中，那无法确定的感觉会告诉被跟踪者，他被人跟踪着。

安全起见，他不会四下张望，而是走非同寻常的路，不断变换方向，走走停停，又突然改变前进的速度。

不过，他自然不会选择这样的方式，那就是跟踪的人发觉被跟踪者已经觉察到他了。他会混在人群中，但不会在人太多的地方，那样跟踪者就会偷偷溜掉。他停留在人群那里，去跟人聊天，虽然他还从来没有跟这些人聊过天。

他会胡说八道，要让别人注意到自己。他会做一些普遍不被认可的事情，因为他在想，当人们不屑于某些事情时，更多就会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

他的举止异乎寻常，就是至少要更多地引起一个人对自己的注意，而不是那个违背自己的意愿注意他的人。

跟踪者只是在他引起的那些响动中得到描述，或者是在那些不是他引起的响动中，因为他是跟踪者。即便他得到描述，那他此刻也不会被认出来的，而且后来也不会再次被认出来。那双手一般都会藏起来，无论如何有一只手，他把礼帽低低地压在额头上，脸孔通常都会在暗处。

被跟踪者从不转过身去，所以他要利用一切至少可以给他提供自己身后发生什么的影像的物体。他，作为别人注意的对象，自己本身就是注意力之所在。他的注意力不仅针对的是跟踪者，而且首先是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跟踪的目标。他心里明白，不知在什么时刻，他身

后那个人就要让跟踪转变成相遇。他随时都得为这个时刻的到来做好准备。他心里明白，那个人不只是跟踪他：跟踪的终点会是跟踪者力图要抓住他。被跟踪者在等待着这个时刻。在这一时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转换角色。

在谋杀故事中，情节描述到这里，往往都是这样，那就是跟踪者抓住被跟踪者：

推销员从一堵墙边走过。

他觉得箱子并不完全是空的。他叉开腿，骑坐在一把椅子上，椅子宽阔的金属靠背至少护住了他的胸部。他就是闭着眼睛也能重新找到这个地方。他在练习回避。此刻天已经彻底黑了，他觉得不会再有人来上门打扰了。没有发出笑声。他不想再去数数了。他看到照片上那个摄影师的影子。他身后的门无声地关上了。他从那些禁止指示牌上学习语言。他懒得说话了。那些痕迹让人看不出任何动作的头绪。“有人在你们这里洗过车吗？”看被害人倒下的姿势，好像他向后要去抓住自己的脚脖子似的。铁丝网栅栏上挂着柠檬皮。头发被轧断了。

那儿从泥潭里伸出来的是什么呢？片刻间，他不知道，黑暗中，那两个身影是相向走去呢，还是已经各奔东西了。直到有人向他说出了那个名字之后，他才意识到那个物体是一把刀子。他已经想到过要利用日光。当他把上衣挂在钉子上时，扣环撕裂了。他刚来没多久。没有人看得出来他的手是湿的。他看见一扇窗户后面有支蜡烛忽明忽暗，而现在其他地方到处都亮着电灯。上次来这儿时，这片铁皮可没有放在这里！

他注视着面前滑来的那一页纸。他避开无关紧要的东西走去，好像他的生命与之休戚相关似的。他无端地敲打起一个钩子。背上的重担让他荡来荡去，所以他成了一个不确定的目标。好在他没有戴表，所以人家也不会向他询问时间，他也就不用低头去看表了！

他发觉自己的大衣上沾着秸秆。为什么这里的地面夯得如此实在？那个孩子正在吹一个纸袋子。他注意着每一个不同寻常的动作。

那伤口没有散裂成一道道。趁着四周漆黑一片，他方便了一下。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这样四处乱逛了多久。他触摸着那地毯的表面。他只听到了自己的呼吸声。那灰烬比他想像的要暖和一些。

那两个相向而行的人从很远的地方就开始找寻一个他们可以望去的物体，直到他们相互擦肩而过。

门被插上了。“因为他没有固定住处，所以无法监控他的动向。”那个问话者再也想不出什么问题来。他的背上痒痒的。他慢慢地按下门把手，结果发觉门已经锁了。看样子，不像是死者自己戴上帽子的。走路时，甚至连大衣刷刷的声音都让他局促不安。那床垫发霉了。当他走上灯光明亮的街道时，他听到篱笆后黑暗的花园里有人在说话。

一个坚硬的物体落在一个流动的东西上。他在一摊积水中洗了洗手。背负着沉重的负担，他早就不再觉得这是一种工作。他从上衣里伸出一只不需要的手臂。如果他想跑过最后这一段路，他不太可能及时地停下来。

他跟人正好聊得如此兴奋不已，所以人家也就让他一口气把话说到头。当他抬腿走过那水管时，他尽可能抬高膝盖。他活着。那门是朝里开的。只有一个推销员才会这样用手接水喝。电话铃响了，快去接，他说，他就来。

单凭那风的话，这些衣物不可能被吹得这样乱七八糟。

他违心地竖起耳朵倾听着。他练习着，在恐惧中仍然不忘记观察。如果他现在需要帮助的话，他不会冲着空无一人的房间问，这儿有人吗，而是这儿没有人吗。他也不能蜷缩在低矮的树丛中。那洗涤槽里没有滤网。他的手慢慢地伸到床垫下面。他蹑手蹑脚地走动着，连地板下面的老鼠也不会受到惊扰。如果他要监视某个人的话，或许也会坐在这同一个位子上。

他只用手就挤干柠檬的汁液。他看着每一个上衣被风吹得鼓起来的人。突然间，他说话的声音变得十分沉闷。只要他呆在死角里，他就是安全的。允许描述的只有被跟踪者的恐惧。

他内心所有的一切都向外迸发。那条路可以当做逃生路。他鼻孔周围都发白了。任何响声他都觉得太吵了。那液体一下子形成了一块块结晶。消音器破坏了这支枪的平衡。

也许跟在他身后的只不过是个小孩子，在模仿他的一举一动。是那窗帘在抖动呢，还是窗帘后面有人在动？黑暗中他睁开双眼。现在所有人已经开始互相告别了。蹲在角落里的那个人突然站起来。当他奔跑时，他对这周围的环境置若罔闻。有人把手搭在他肩膀上，但是他却没有转过身去。那是一声让人平静的叫喊。

当他屏息凝神坐在屋里时，听到外面有人正在捣鼓本来就开着的门。“微笑没有浮现在他的眼睛上。”一只陌生的手的黑影遮住了那个安睡者的脸。回忆早就不再伤害他了。她把湿淋淋的手指伸向他。那些静静伫立的物体让他重新理智起来。一只鸟诱惑他飞起来。他帮助自己穿上大衣。他抬起手准备敲门，却又让它放下来，并且继续走去。那牌子上写着是条死胡同！难道说那个臆想中的跟踪者之所以如此紧跟着他，仅仅是因为他以为自己被跟踪了吗？在他身后，那钥匙被拧了两圈。为什么所有人突然都变得彬彬有礼呢？

他无法看清那个物体是不是在移动。那扇门就是不想闭起来。这样的黑暗是一种惩罚。他让那位女士顺其自然。由于饥饿，他觉得那堵墙都可以享用。走过去的时候，他看到了铺石路面上那些弹痕。他的手不自然地无所事事。他不敢坐下来。那笑声是一个男人的笑声。

他在楼梯上停下来，一只脚高，一只脚低，随时准备继续跑去。有人用一枚钉子在玻璃上划来划去。当他再次晃动那玻璃杯时，那些冰块已经化了。那袜子后跟上有一个洞！他身后那人的脸在镜子里很暗。那水滴从很高的地方拍打在地上。

当他在里面时，第一扇门可以朝外打开，而第二扇门则要朝里开，这样一来，他虽然可以安然无恙地走进去，但是如果他立刻再想出去的话，那就被困住了。那地毯上的灰尘让他心神不安。那火柴现在竖立在摩擦面上。另外那个人在看他时，并没有把头转过来。“他在那鼓起来的上衣里面不只穿着一件衬衣。”

刚才他还说个没完没了，他的沉默现在必然会引起人家的注意。他手上拿着一个鱼头。他无拘无束地说着话。没人觉得他身上有什么

引人注意的东西。这些容器个个都可能窝藏什么。他只是把右手伸向电灯开关。他经常用舌头舔嘴唇。他装出一副热情友好、乐于助人的样子。他不喜欢看到空瓶子四处摆得都是。他使自己面前这个人进入一场谈话。当他踩到烟头时，里面冒出一丝火花来。

他心里感到不安了，因为现在好像没有人跟着自己。所有人都戴上帽子走了。他的血管在膨胀。他听到有响动，好像有人在踮着脚尖走动。一丝风就足够了，那钥匙从他手里掉下去。

他找开关时找错地方了。墙前堆着沙袋！这是远近惟一的建筑物。不管他四下张望也好，还是不四处张望也罢，二者都会引起怀疑的目光。

他很早以前就把那个物体放在那里了，而它现在才倒下去。这样的恐惧至少让他有了自信。他说话时，他下面有个塞满了的烟灰缸。他已经徒劳地打过一次电话。他走进一个没有任何陈设的房间。在变质的黑色水果表面上，他看到了白色的霉点。他只能躲进角落里。那堵墙让他无路可逃。一个看起来醉醺醺的人就躺在他的桌子下面，朝上呆呆地望着他。他可以毫不费力地透过窗户看去。也许另外那个人只是和他同路而已。也许是他听错了。他一次又一次地注视着那个物体，仿佛他在它身上漏掉了什么似的。他屏住呼吸，侧耳倾听。那空荡荡的沙发与他面面相觑。

所有的词他都说错了。他想要用来做点什么的那只手被忽视了。他告诉身边所有的人他将要走哪条路。他目光向两旁瞥去，勉强应付。因为他知道有人在观察他，所以连那些日常往往被忽视的细节都变得十分明显，让他感觉就像是刻意的行为。

他发觉人群中有人做了一个不太自然的动作。他们在离他还很远的地方就开始沉默不语了。他一打开门，整个房子里所有其他的门都砰砰地关上了。他用双手揉着自己的膝盖。当栗子掉落在街道上时，他惊叫着跳到了一旁。

他说话时，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背后有人在走来走去。突然间，他觉得那个身体无边无际。当钥匙已经从外面插进锁眼时，他才冲着门跑去。他蹲了下来。他忘记了自己要找什么，可是仍然找下去。

他还不能死，在这个故事中，人们对他的情况还知道得太少。他借口要系鞋带，走出门去。只要碰到人，他都要停下来询问。他练习着其他动作，免得让人从那些动作上认出来。为什么偏偏这儿下雨的积水还没有干？他试着将空着的那只手伸到大衣内兜里，可不巧的是，那口袋就在空着的这只手一侧。所有的物体都如此摆放着，仿佛它们这样摆放就是暗中守候着他似的。

他等待着没有被监视的那一刻。果核已经在他的手里握了太久。当他们注视着他时，他每次都是拉开随时要走的架势。当他们看向别处时，他就又显出一副随随便便的样子。一块木板被塞进淤泥里！那辆车开得很快，无法看得清车牌。由于思绪混乱，他觉得喘不过气来。当他回忆时，一个童话产生了。

这会儿电影院里谁在笑呢？是演员还是观众？雨中站着一个身影。他在思考着，哪一个动作会是错误的。那水泥还没有凝固。那响声折磨着他，因为他什么都看不到。由于佯装出笑脸，他觉得脸上依然不是滋味。脚下下水道里咕噜的水声出乎意料地伤害着他。正当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着一个物体时，他的手被人抓住了。

他只是犹豫不决和小心翼翼地打声招呼，免得因为说话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他走进灯光圈里，而他身后那个人刚好穿过了最后一个灯光圈。这时，最大的危险正在临近。他或许正好可以拿这些树枝当荆条用！他把椅子顶在门把手的球体下。那敞开的街道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他饿了，他就认为所有的人一定都饿了。

他写字的动作看起来就像是竭力在寻找什么似的。“走路时，由于脚的交替运动而产生的脚印比脚本身要大一些。”脚指头一阵痉挛，正是他现在最终需要的。那门把手火热。本以为还有一级台阶才到下面，不料他的脚却重重地踩到地面上。“刀伤表面是平的。”

他们成群结队地走在人行道上，尽管每个人都想确立自己的位子，可是他们不是人人都能并排有个位子。他突然再也弄不明白物体的用途了。他被观察的时间越长，自己的动作就越发被限制在被观察上。他把什么东西递到面前这个人手里，不过以为那人还没有拿住这个物体，于是他又抓向那个物体，生怕它会掉在地上，而那人此间已经抓住这个物体，并将它往自己怀里拉，以为对方眼下又不想把这个

物体交给他了；他随之立刻又松开手，于是这个物体便掉在地上了，因为对方此间也发觉自己弄错了，并且松开手。

虽然他还没有开始跑起来，可他已经在逃离。他一定要训练自己的机智果断，以便他根本不用在危险来临时，才去想方设法集中精力。

他完全变了一种声音说话。有人在使劲地眨眼睛。突然间，他无法把那句事先已经想好的话说完。借助比较，他或许能够轻而易举地美化自己的处境。刚才他还站在窗前，现在就站在门口了！他为这自然而然的事而感到惊讶，正因为这样，直到此刻，他觉得物体都变得很亲切。他不能老想着自己。那条狗并没有叫，直接伸嘴就咬。

他在射程范围内。他听到有人朝他跑来，不过那人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停住跑动了，像他一样走着。他接受了一个特征，像面具一样。没有人会想念他的。街道一片死寂。

他听到隔壁房间的灯打开或者关上了。没有任何东西在响动。他徒劳地想收回自己所说的话。他不厌其烦地摆弄着一个他或许能够用来防身的物体。他没有雨伞。他看看天气怎么样，从而显出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每一步都要考虑周全。

像动物一样，让他恐惧的不是那静止不动，而是那突然的运动。他站在这里，挺惬意的。他无望地寻找着同伴。“您看到有个陌生人走进房子吗？”他笑起来时，毫无反抗能力。这个危险的动作会需要一个准备动作，从中他可以辨别出这个动作。

他不能迫使自己朝着一个他自己无法改变的方向走去。他异常焦急地走进那栋房子。他不敢把手里这个物体换到另外一只手上去，因为这个动作会让他片刻间两只手都被占住了。他不想去看跟在身后的那个人，因为他以后也不想认出他来。

他跌跌撞撞地走着。他想吹着口哨来表明自己无忧无虑。他来来回回地走着。当他走进那个陌生的房间时，他立即跑到窗前，向外望去。当他又要喘气时，他片刻间注意力就不集中了。有人与他同步走着，这样一来，他就无法分清那各种各样的脚步声。在蹲下去之前，他要做出充分的准备，以便让人家觉得他不怀恶意。

他无法承受任何响动。从耳语当中，他只能听得到那许许多多的咝咝声。每个停住不动的身影他都觉得是跟踪者。他不理解，有人要从他这里得到什么。为了避免嘴里的香烟掉下去，他大笑时头向后仰着。

他必须不断地给自己想出一些新问题来。他冲着那个他黑暗中撞上的物体大吼。他按住沙沙作响的大衣，免得漏听什么。他愤怒地搅着咖啡。惊吓之后，他的腋窝开始发痒。

他一直假装自己在倾听，直到脸上的皮肤都麻木了。他小心翼翼地绕过那辆停着的轿车。演练时，他一定要比在紧急情况下更能忍受。没有人偶尔抬起头来。“一个送啤酒的马车夫显得不太可疑。”

他等待着水壶里突然溢出来的那一滴水。他前面的那条线是一张嘴。没有人竖起大衣领子走路。由于惊吓他瞪大了双眼。他僵直地站着。他不能观察。“这不一定是女鞋吧！”

他手里那个物体突然掉在地上。他握了好久，连自己都不再觉得它的存在了。他手握得特别紧。当有人跟他搭话时，他向后一靠。那个迎面而来的人扭过头去，免得过后还要证实他看见过他。墙上的灰泥鼓起一个个包，诱惑着推销员去弄破它们。他向要坐到他身旁空座位的那个人做自我介绍。他觉得那木屑有股味道。当他经过时，人家停下不扫了，可是后来他等着人家继续扫下去，却白等了一场。他一直坐在那儿，直到所有的椅子都被放到桌子上去。

他找不到从走动到跑动的过渡。看到桌子放在屋子中间，这让他心里忐忑不安。行动受到干扰的人更容易受到攻击。他观察着天花板上水的反光。窗帘轻轻地飘动着。那些落地窗都关着。

他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东西。他慢慢地适应了那惊吓，甚至玩起惊吓来，可是当他意识到自己在玩着惊吓时，又吓了一跳。

他从不左顾右盼。可是，通常情况下，行人时不时都四下看看，哪怕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受到跟踪。他把每个动作都扯到自己身上。鞋子有些夹脚。很长时间以来他都生活得无忧无虑，所以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会发生什么事儿。他走近房子拐角时，绕了一个很大的弯。

那张纸就是执意不让他把它捡起来，千方百计反抗着，他的指甲都撞出血来了。

在绝望中，他把每个词都听得十分仔细。虽然所有的物体都离他很远，可他却觉得空间很压抑。他本应该好好练习，在困境中，在受到跟踪者穷追不舍的紧逼时，依然找得到那钥匙孔。黑暗是绝对的黑。有人挨着他坐在沙发上，坐垫跟着颤动起来。

他又花费了太长的时间去拧紧那只罐子。他觉得惊吓的外形就像是断成几截的箭。他慢慢腾腾地走着，一步又一步，可走路的方式会让人猜测到，他之所以走得这样慢，是因为他竭力克制自己别跑起来。

他不敢再扣上西装上衣的扣子。他一下子变得清醒了。他刻意不去想，那扇门的合页该上油了。他似乎可以不用做这些一再重复的、千篇一律的动作，因为他在做一个动作时就完全是这样了。当他走上大街上，没有看到有人向他走来。突然间，有一个陌生的声音参与到谈话之中。由于害怕，他的双脚疼起来。片刻间，他以为那是一张陌生人的脸。现在他不能预先想像了！恰好是他空着的那一只手够不着的身体部位开始发痒。墙上看不到任何影子。那地毯的边卷了起来。他感觉到气流的阻力。他身上没带纸和笔。街道上热乎乎的。终于有人迎着他的面走来。他感到钱包那令人欣慰的压力。当那个物体意外地从他手里掉下去时，他的嘴唇抽动了一下。在一个局外人看来，他和那个跟踪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他的鞋底上一定沾了很多泥土。

他一边观察着那些物体，一边琢磨着，它们会不会就是陷阱呢。在这个时刻，再也没有门敞开着。他呆在这四堵墙之间无法忍受。他尽量避免任何不规矩的动作。他到处寻找可以和人说话的地方。他从来都不用手碰自己的身体。当他进门时，他想替那个出去的人关上门；而那个出去的人也想替这个进来的人关上门，于是两人都在自己的一边握住门把手，并同时按下去。如果被跟踪时间久了，连他自己都不会再当回事儿的话，这样未免就有危险了。

他心情平静地穿过广场。他想起鹅卵石小房子里那浸透尿液的报纸碎片。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房间里一定有蜘蛛网。一瞬间，他在

那个湿乎乎的污迹里看到了什么东西的影子，可是他现在尽管目不转睛地看着，却怎么也认不出它来。

他试图把那个躺在地上的人摇醒，却白费气力。就连挪动一把椅子，他都觉得是关键的错误。那辆汽车倒着向他开过来。所有的物体现在都很滑。

他毫不惊讶地喝光杯里的水。一旦他想到那个致命的词，就再也摆脱不掉了。他听不到身后有什么动静，这也让他惴惴不安。他的双手眼睁睁地逃离开他，迅速得他都无法跟得上。那个手提箱太显眼了！那空荡荡的门还在微微晃动着。一间电话亭是透明的！

他紧紧地抓住那根链子，好让它不再摇晃。黑暗中的身影是一个女人。此时此刻，当他害怕起来时，他才分得清前后。他手里的铅笔突然从资料上滑下来。他错误地走在围墙另一边。他想着想着就出声了。即使那些迎面而来的人注意到他，他们以后要回忆起的则是另外那个人。救援来得太早了。

他没有时间去蹭掉鞋子上的泥土。那只猫正在舔着水洼里的水。这个谋杀他的案件以后会这样描述的，仿佛他的死只是自然发生的，没有外力干预。黑暗中这件物体会有许许多多的可能！他的手帕上没有绣字母！他们互相认识，可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早就认识。他的每句话都是一个借口。

他高兴的是，那些可见的东西中，没有一个会使他回想起什么来。至少他还在新鲜的空气里活动着。那消防楼梯空无一人。

在做出那个令人惊讶的动作之后，他一定要如此长久地把这个动作掩饰下去，直到它被那个观察者重新解释为一个自然的动作。他觉得，仿佛所有的物体一下子都自成一体了。走在平坦的街道上，他问自己是不是头不晕了。面前那个人的两眼相距很远，他简直无法同时看进两只眼里。

他克制着自己不去爬楼梯。他盯着一块污迹。一个新的动作产生了。他们久久地跟踪他，直到他感到自己安全为止。他横躺着，好让自己成为更狭小的目标。电线的影子还在抖动。

他希望能继续往前走，可是并没有当真。

他再次仔细地观察。

他把手心朝上。那瞳孔已经习惯了一动不动地呆在眼睛的中间。他似乎非得要竭尽全力才能停下前进的脚步。他真的抓着一根救命稻草。他要超过某人，这让他心里很不舒服。他观察着大雾中那些变幻不定的轮廓怎样变成轮廓清晰的身影。当他要随身关上门时，那个后来的人正好也要出去，并且奋力把门拉向另一个方向去。一条条碎布片挂在树上！

他试图要确定那个物体开始在其中活动的瞬间，可是他又晚了片刻才发现这个活动。

他走得忽快忽慢，想这样来拖累那个观察的人。蜘蛛网挂在他的脸上。当情况变得危险时，他感到那些物体一下子变得模糊不清了。他走过时，车里静静地坐着几个人，目光都直盯着前方。他应该先做什么呢？他四面楚歌啊。

他更加猛烈地动起来，借以抵御那万千思绪。那个被咬过的苹果已经变色了。他突然忘记了自己在刚过去的一刹那做过什么。他的思想成了逃跑的思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每一步都像踩在虚幻之中。他扔掉了手里那捆东西之后，徒劳地等着听到落地时发出的响声。他一边在衣兜里找来找去，一边心不在焉地望着前方。他的动作就是那些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焦急动作。他站在那里，一条腿的膝盖顶着另外一条腿的膝盖窝。

他从一群都想要确保自己座位的人身边挤过去。为什么另外那个人到底都不肯超过他呢？感官变得越来越迟钝了。只喊一声救命是不够的。

所有人都让门开着，因为他们以为这扇门必须敞开着。

他自动说起话。在那个使他踉踉跄跄的石头前面，他绕开了。每次他都立即想到最坏的结果。他无法回避这个词。他的笑声改变着他周围的环境。正是由于那个突然的动作，他想借着来阻挡住那个物体，这家伙立刻彻底变卦了。他们等待着虚弱最初的征兆。

当他摸索着找开关时，他碰到的不是开关按钮，而是一只手。宁静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了。

他似乎现在非得知道，那条狗听见什么名字才会应声呢。黑暗保护不了他。这条路上没有绷着绳索。那个词太长了，他不可能喊得出来。在恐惧中，他试图让不动的东西动起来。

他一直都还盼望着，那或许针对的是另外一个人。附近没有什么可以抓得到的东西。死者有什么独特的姿势吗？

他向人展示出他会啐唾沫。他找不到任何别的词语来替代这一个词语。他还未到如此临近的地步。凡是他能够挪动的东西，他都可以拿来当武器用。他觉得自己如释重负。所有的点都离他同样远。

鸟儿的影子或许会提醒鱼儿有危险。又过去了片刻，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全身都发痒。当他看到有人迎着自己走过来时，便慢慢地从衣兜里抽出手来。衣服妨碍着他自由行动。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也是用来吓人的手枪。上衣有一枚扣子没扣上！

他没有看到什么颜色。破破烂烂的女人长筒袜在他面前的街道上飘过。

他踉踉跄跄地穿过那电线杆的影子。

他只能走他可以留下脚印的地方。

一切都光滑得可怕。

每个动作都会成为最后一个。

他或许会靠着转身来消耗时间。

他无法隐藏，他做好逃跑的准备。

他也许之所以听不到那脚步声，是因为那个紧跟他的人踮着脚尖走路。

他试图如此来调整自己的脚步，以便总是有人迎面而来，或者能够听得见。

他用其他手指攥住拇指。

在那条狗附近，他不可能开始跑起来。握紧的拳头是冲着他来的。

在他到达安全地之前，那个时刻就不会停止。如果他用线路将那些跟踪者连接起来的话，他几乎看到的是一个圆圈。

他必须转过身去。

每个想法都会触碰到一个伤口。

绕圈子最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就是螺旋形。他一切都放弃了。

他每个动作的尝试都被他们同样反复地模仿。

那个绕着圈子走的人总是蹦蹦跳跳走路。

他还能够转动钥匙。

一个冰冷的物体触碰到他的脖子。

受到死亡的威胁，他呆若木鸡。

千万别做出错误的动作！

他为这死亡的危险而感到羞愧。

他张开自己的双手。

他呼吸着。

“那可能是一片片雪云！”

他坐到那鹅卵石小房子上面。

他等待着。

他装作死去的样子。

“那里！还有那里！还有那里！”

6　询问

在谋杀故事中知道某些事情的那个人，或者被别人认为知道什么的那个人，在被追问之前，肯定会和追问的人卷入某种关系之中，而正是这种关系使得后者有机会去追问。

对于被询问的人来说，这种关系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暴力存在”：如果拒绝回答的话，很有可能会对拒绝回答的人本身造成某种后果。因为恰恰是询问者才有机会设定这种后果，他们可以通过将后果展示在被问者面前来勒索他。不回答无论如何都会导致某些后果。谋杀故事进行到这里，被问者或者陷入一种非个人的法律暴力，或者一个人的非法暴力之中，这个人可以独断专行地设定这样的后果。可是就连法律也像是一种勒索。

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两种形式的暴力询问都会以不断重复“如果不是这样”开始。如果被问者不回答，那么就会针对他采取一种行动。

如果针对被问者的行动还是不能让被问者回答，或者他的回答明显是错误的，那么这个“如果不是这样”就会一再重复。

如果被问者还是不回答，那么人家就会针对他采取另外一个行动。

如果通过这个行动，被问者依然不回答，那么针对他的就会是另一个行动。

他不行动的次数越多，也就是说，他不回答的次数越多，对他采取的行动也就越多。

这些行动中的每一个无非那个用语言表达的问题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如果不是这样”的堆砌会漫长地进行下去，直到被问者要么开口回答，要么暂时给出回答，要么压根就丧失了回答的能力。

即便被问者不回答，人们也能从他的行为举止中推断出可能的答案来。他的每个手势都是一个可能的回答。他的表情的每个变化都是一种暗示。人们试图从他的每个动作上得出结论。他做的任何动作都有含义。就连他不做的动作也在暗示什么。每一个服务于日常和明确目的的动作都超越了自身，具有某种特别的目的。

保持沉默的被问者做了什么或者什么都不做，都是一种信号。他不再是以自己的意愿做事。他的每个举动都可能传达一种信息。他的每个动作都是不情愿的自我暴露。

对于询问者来说，关键是要将那些揭示日常行为的词语挑选出来。它们寻求揭开被问者的动作、手势和表情里的秘密。他把夹克衫上的一粒纽扣解开又扣上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偏偏就是一排扣子当中这一粒，这意味着什么呢？他独独翘起拇指来，这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他要这么频繁地在脸上擦来擦去呢？他的着装意味着什么呢？他两只脚之间的角度意味着什么呢？用手指打榧子说明了什么呢？拉耳垂呢？嘴角的唾沫呢？

不管被问者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就连谎话，沉默的方式，都是一个可能的回答。就连被问者的睡眠也可能对询问有利。他睡觉的姿势表明了什么呢？他睡梦中都说了些什么呢？为什么他在沉睡中现在又不说话了？他在沉睡中伸出手来在找什么呢？

在谋杀故事中，被问者总是试图破坏这种无数次要求他回答的暴力关系。通常在谋杀故事中，他根本不知道是谁在问他，也不知道询问者是谁派来的。

对于被问者来说，现在重要的是要这样去回答或者不回答，才能得到他无法提出问题却想要的回答，也就是获悉谁在问他或者谁叫人来问他。

询问者和被问者，这两个人都想得到一个回答，不过一个是采用暴力，另外一个是使用技巧。

这一章节，至少是在谋杀故事中，通常是这样结束的，无论是不回答，还是回答有误，被问者都可以如愿以偿地得以逃脱。与此同时，最终正是他，为了得以逃脱，他使用了暴力：

威胁的人首先使用的是文字游戏。

他把重心换到了另外一条腿上，推销员看出来他又要踢自己。在他伸手去抓之前，先用手指练习着动作。撞击让他后退了几步。鞋头向上飞了出去。他感到那些材料似乎也跟随他的心跳颤动起来。即便现在孤身一人，他还是机警地保持先前的姿势。“看来得我们帮助您恢复记忆了！”一开始他还以为是到了夜里才这么昏暗。

他没把这个偶然事件当回事儿。他说完一句话后奇怪地嘟嘟囔囔。他们肯定还要抹去他脸上的冷笑！他的动作现在成了防御动作。

他习惯了被人恶意对待。他刚听到句子开头的那个疑问词，就哆嗦了一下。他们给他举出的每个例子都令人害怕。他充满好奇地倾听着一个故事，而他们则认为那就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他想，也许他能让自己在痛苦中感受到那些物体。他低下头之后，突然一下子想像不出他对面那人的模样。“您想听什么？”因为他瞥见一个物体，它的使用范围就标在自身上，所以他想，只要这物体还能用，他自己就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他以为，自己必须记住在这里所感受到的一切，这对他而言慢慢地成了一种折磨。他沉迷在一个想法中，就像是别人对某种游戏入迷那样。“他睡觉很轻。”

当他一下子说出了事实之后，感到有些尴尬。他听到手指间的香烟在咝咝地燃烧。他不能往后靠。另外那人在房间里夸张地走来走去，以此证明，他有权自由活动。和这个刚刚认识的人单独呆在一起，他觉得沉默成了一种负担。一只鸟飞了起来，发出鸣叫。

陌生人可以听到的动静，他什么都没听到。最后就连咳嗽，他都跟别人不一样。在他再次苏醒过来的那一刻，所有的词语都毫无意义了。就连他祝愿别人度过美好的一天都被认为是在掩饰什么。墙壁是隔音的。这里有一把椅子！

他回答着问题，头都没抬一下。晚上还戴着墨镜的人实在可疑。“我非得要说得更清楚吗？”他抗拒着不肯醒来。在他身体上轻轻抚摸的那只手是他自己的吗？他再也无法安静地坐着。他看人的样子，就好像所有人都认为自己被人盯着一样。至少能活动一下手指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儿啊！

他之所以觉得绝望，是因为他熟悉一些状况，能够拿来和自己现在的状况进行比较。他不习惯这个新环境。他觉得承认事实有些可笑。就连睡觉时他也无法摆脱那个跟踪者。所有人都安慰他，因为他没有安慰他们。“您没有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现在对他来说，一瞬间就是很长的时间。

他都是**后来才**加入到每一个事件里。这幅画上只有一个人眼睛上方没有黑道。

他观察到，他的对手脸上挂着内在的微笑，因为他自然而然地把茶杯拿在手里。只有当他们能够看透他的思想时，才能将他包围，不过那是不可能的。动作刚一开始，他就知道会打中目标。表示肯定的话说了很多，他紧张地等待那个表示转折的“但是”。他们给他留出时间，要让他说点什么。他摇了摇头，以此来试探一下他还有多大自由活动的可能。他们在他面前摆了很多物体，想从他摆弄物体的动作中看出些什么。之前打电话时，他无法谈及此事。他的微笑可能有很多含义。

说话时，他却想着别的事情。他在门上看到香烟烧过的痕迹。因为疼痛，他把脸转向一边。那墙对他而言太高了。他说完那句话后，才意识到自己在说谎。他们想给他提几个问题。他看着前方，好像面前是一条空空如也的大街。这条拉链卡住了！他们绕着弯儿询问那些属于他的东西。说话当间，他肯定突然想起了什么。“我们的耐心到头了！”沉默慢慢地变得可以忍受了。为了逼迫他回答，他们的脸上没有做出任何表情。

他装模作样。每次他们观察他时，他就装出一副被看穿的样子。新鲜空气会对他有好处的！他们留意着他声音中的尾音。当有一个人试图往他身上吐唾沫时，他却被口水呛了一下。他们还需要他。

每个词他都可以用来绕弯子。由于这样的疼痛，他可以使自己不会忘记。他们只能给他带来肉体上的伤害。有人冲着他喊了一个名字，是别人的名字。“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他让那物体落下去又把它举起来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描述这个无关痛痒的过程，而不描述另外那个无关痛痒的过程呢？

他计划好自己的每一个动作。他扔掉火柴的动作不只是为了扔掉火柴。他们给他描绘出一个他自己无法掌控的未来。他衬衣的颜色本身还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也许他的双手比他本身回忆得更好。闭一次眼睛就意味着“是”。这个房间外的景色很好。只有从脖子的动作上才可以看得出，是他在说话。他们已经低声询问了他太长时间。疼痛的叫喊不是什么口供。

他想出来对他们永远都不会提出来的问题的回答。他甚至都不能用手去揉揉眼睛。他撒谎之后，吸气所用的时间比撒谎前要长一些。假如他认为自己有罪的话，他可能会咀嚼得更慢些，使劲吞咽，把腮帮子撑得圆鼓鼓的。他们想让他承认，他是自愿跟着来的。

虽然他此刻没有任何感觉，可是他却觉得，仿佛一丝轻柔的触摸也会引起无法忍受的疼痛。他们不过是先警告一下他，后面可有他好受的。他随身携带的那些东西与可能发生过的事情没什么必然联系。他活不了多久了。他们从他的眼白中得出结论。他背靠墙坐着。打在脸上的一拳让他又醒了过来。他们问他为什么带着一些别人不可能随身携带的物体。

他睡着了，还紧咬着牙关。

“我们想跟您出去散一小会儿步！”

就连他把玩鞋带都可能是一种暗示。当他想把勺子再次放入水中时，盘子却不见了。他没有口误。他身后这个空荡的房间让人很不舒服。这要放在以前的话，人家恐怕会剪掉他的睫毛。他们在他耳旁晃动着一串钥匙。他没问自己在睡觉时是否说过话。他用嘴唇保护着牙齿。不管怎么说，疼痛总还可以消磨时间。

他就要大声喊出来了。

他不想拥有观众。他们试图成为他的朋友，这样就可以让他的思想变得不确定。每次他说话结巴时就会产生某种别的含义。他把手举起来，高过了肩膀，也会被认为有恶意。

他衣兜里装着剪下来的报纸片段，是关于那起事故的。他的意识变得越来越敏感了。他们必须要让他因为疼痛而显得令人讨厌。他们谈到他的财产时就像在说自己的财产。听到这个词时他想到了什么呢？一会儿他会被带到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什么都不需要了。

他不想解释自己为什么在场。有那么一瞬间，他的心都不跳了。他数着窗户有几个角，虽然他确切地知道那个数字。他闭上眼睛等着挨打。有那么一会儿，他坐在那里，眼神惊慌失措。他想念着疼痛。他又吞咽了一下，这让他很生气。“您就是那位幸运的所有者吗？”受挤压的空气发出了嗖嗖声。他们挑了一把腿很高的椅子给他坐。他伸直了脚尖也够不着地面。他不能把嘴唇闭得太紧，免得他们会认为他想要隐瞒什么。

他只想再吸一口气。他觉得现在就连碰到圆形的物体也会让他疼痛。他们已经在缜密安排，好让他的死显得像自然死亡。他一下子想不起来他还能想什么。他的哈欠只打了一半，就被吓住了。因为双手被捆着，他无法保持方向。他们详细记录下他的神情。在他的对手挥拳打过来之前，他的血管就开始膨胀起来。

他目光呆滞地盯着自己的鞋子。他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到，什么都不想，只能在疼痛中感受着自己在场。鼻子前面这个拳头的味道让他想起了什么。这是一个杀人犯！他的行为不再受自己控制。他躺在一个坐满了人的沙发下面。这个杀人犯一口黄牙。他们向他大声喊叫了一堆无关紧要的词汇，中间掺杂着一些问题。窗玻璃上糊着报纸。靴子的靴筒搭在一起。脚脖子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复原。一个死了的推销员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

当他被人掐住脖子时，他迫不得已虔诚地仰着头。惊吓让人看不清文字。他长着那种永不显老的脸。他突然不知道该怎样去造一个句子。他不想再听，也不想再看。

他想说些什么，讲到一半却突然意识到，他想说的东西实在不值一提，可他们却从各个方面逼他把话说完。百叶窗没有完全拉上去。

“他死得活该。”在他离开之前，一定要说一句狠话，可是他无法离开。他没想着要大喊大叫。他屏住呼吸仔细打量着那件物体，连最小的裂痕也不放过，就像是要看个够。当他顿住时，他们还认为他刚刚说漏了嘴。没人听明白那是个笑话，所以出现了令人尴尬的间歇。

他没有看到那个身影，但是却注意到了第一个危险的动作。他的笑声现在成了奢侈品。他们想方设法让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分钟。电灯开关离他的指尖太远了。他徒劳地提前设想着疼痛。柔软的坐垫消减了那一拳的冲击力。在关键的时刻，恰巧他的嘴里又塞得满满的，所以又一次无法说话。对他来说，回忆的困难在于被忘记的不是一个物体，而是一个词。这仁慈的黑暗啊！他们触摸着他说疼的位置，但是他没有身子一颤，或者他虽然颤抖了，但是却晚了一秒：他应该在被触摸到之前就身子一颤的。“那个提问的人在仔细地锉指甲！”他们开始做起自己的动作，就是要让他觉得，这个动作暂时只是一种警告，如果他表现出配合的姿态，这动作随时都会中止，但是不会排除以暗示过的方式一做到底：也就是说，不是用一个词，而是用一个动作来胁迫他。他们缓慢地改变着询问他的方向。这样一来，他必须不时地将头转向提问者，他会在这样缓慢的动作中变得疲惫。有人把手伸到他的腋下，不过却不是为了搀扶他。

他竖着朝门走进来，但却是横着出去的。这把椅子没有座板了。他们不许他低头。慢慢地，他觉得轻松了。那块手帕只有一个地方有皱褶。这个房间布置得让人觉得没有人气。他出汗不是因为害怕。当那个瓶子被塞到一堆瓶子之间时，反作用又把这个瓶子给顶出来了。他们用手指触碰着那些摆放的物体，然后又观察指尖留下的痕迹。

他已经没有能力再去回应他们的动作了。他闭上眼睛时，觉得有些恶心。他们一边不停地询问他，一边假装温柔地抓起他的手腕。他缓慢地呼吸着，以此赢得了很多时间。他强迫自己平静下来。他们只是在等着天完全黑下来才动手。有人问起他的健康状况。

他已经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什么姿势了。他们的势力范围越小，就会越发贪婪地将它发挥到极致。以后他很可能不会重新认出这些物体。他不能表现出怒气。自己的脚都不记得怎样走路了。他们把一个光滑的物体塞进他的手里。他有过前任。他们肯定是弄错人了。因为他一无所有，所以他们无法用破坏财产来吓唬他。疼痛越来越强烈，

简直会要命。他突然感觉到，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他偏偏忘记了什么东西，却无法想得起来。他希望能一个人呆着，于是就使劲摆弄着自己的衣领。这一点让他很高兴，至少还可以偷偷地玩手指。

他千万别因为呆滞的目光而暴露自己。

“我吓到您了吗？”他用双手捂住耳朵。他的对手向他演示着，他怎样在使用暴力之前脱掉上衣。他想像着要怎样逃走。他们用玩笑消磨着他的等待时间。他们把玩一个物体，在那上面演示着有什么好事在等待着他。“他是个激情洋溢的漫游者。”他们推着他转身时，他的衣服里落下来许多沙子。他们把已经知道的事情又问了一遍。当他们生气时，就一板一眼地分开说出自己的话。

他不是他们的朋友。另一个人在挥拳之前，他则在他肩膀上拍了几下。“与这样绚烂的色彩相比，日落简直算不了什么。”他们特别注意词汇在句子中的位置。向上翘起的鞋子让他与周围的环境协调一致。两次挨打之间的等待对他而言已经变得十分自然。现在他们允许他做一切他想做的事情，因为这样他就会暴露自己。虽然空间足够大，可有个人还是紧贴着他走过去。他以后就笑不出来了！听到把手举起来的命令，有个独臂人举起了手。他姿势上最小的变化也会让他们问个不停。现场会造得像不幸坠落一样。

他们许诺给他的那些物体，他想像不出来，所以他们也就无法通过许诺来套出他的回答。他们当着面确定的那些事实，说出来都是命令。现在，每个动作都是错的。他不停地走神。墙上粘着一根头发！他们要求他把那个故事再讲一遍。

他看得最多的就是他们的耳轮。他们在提问时还不能问得过于详细，免得暴露自己。他不能讲话，因为门还开着。那是一把公务手枪！他们等着，直到他喘不上气来。就连一根牙签都可能被他用来自残。所有人都是各自家庭里的父亲。他们在争吵，应该让谁去开门。即使他闭上眼睛，也不能停止去看。不管他把手放在哪里，都觉得它是多余的。“你来接管他吧！”当其他人收拾完他，准备把他移交给下一个人的时候，偏巧此人总是不在。

在疼痛中，他仍然能感知到周围环境的许多细节，不过它们现在并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他一个接一个地追溯着自己的思路，直追到

第一个，要回忆起它来。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他们的优势要大一些。他在为谁工作呢？

他耳朵不聋。“当枪从套子中拔出来时，发出嗖的一声。”他的手格外地安静。头沉重得受不了。他希望迟疑不决的一刻快点出现。挂在下颌的那一滴血，拉得越来越长。他的目光像是被围困的野兽。他试图想像着自己身在别处，却是徒劳。一旦他现在回答了一个问题，那就会没完没了。就连疼痛也无法让他开口，哪怕是发出一声呻吟。

他不坐下来，生怕再站起来时还要耗费时间。“这并不像您想像的那么奇怪！”他手边的那个物体同样会离他无限远。一滴又一滴的血落在同一个地方。

他突然点了点头。他感受到的一切都让他痛苦。只要他身后还站着某个人，他就不会开口。他们需要更华丽的词藻来粉饰杀戮。如果外面地上有积雪，那么这咔拉咔拉的声响就是防滑链。他们找不到适合的话来刺激他。按照声音，他把他想像成另外的样子。没有其他人知道他此刻在哪里。

他不想正中他们的下怀，抬起头来。他一下子闻到了那杀人武器的味道。每次他们转过身去时，都一定会考虑到，他就在他们身后！突然之间，他不再绕弯子了，而是直接谈起那些想法。这个跳跃足够大。灯泡在恰当的时刻炸了。

他让这跳跃靠近自己。那惊吓的一刻还没有过去。他把自己的暗示隐藏在从句里。它们向他发出命令，他在这里应该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您觉得我的领带怎么样？”突然他感觉到自己的双脚，吓了一跳。

他透过腋窝看着自己的对手。他转过身去，但是动作不够快。疼痛让他从昏厥中醒了过来。因为他的未来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现在说话直截了当。就在前一秒钟他还那么健谈，所以他的沉默格外引人注意。抽打来自于身后右边！但愿他们终于能够说得清晰明了，这样他才能为自己辩护！疼痛是如此剧烈，他真想脱下衣服。

之前他就缩紧了肚子。在他们眼里，他已经死了。被粗暴地叫醒之后，他先是朝着错误的方向看去。每次都是在疼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之前，他们就住了手。他必须要扶着什么东西才行。就连不属于他身上的东西，现在也会让他感到疼痛。他千万可别不说话了。他们画出他未来的面目。每次抽打都不会落在同一个部位。花园里橡胶水管的尺寸恰好能塞进他的嘴里。

他听到一块骨头断裂的声音。他开始数数。这些威胁者不可能提出这么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来。他已经没有时间来消化这些想法了。他得不停地说话，不然他们又会开始提问。他的身体因为疼痛而颤抖着。他们想要了解真相。

他也在为这场折磨助阵。他不会再提那些愚蠢的问题了。他们抬起自己的鞋底给他看。头轻轻点一下就足够了。对他来说这是新的情况。他们让他第一个走出房间。他的肋骨间有一个坚硬的物体在往里钻。

他张嘴去咬一根手指。他已经无法再去倾听了。他耸了耸肩，好让那些禁止他一切动作的威胁者慢慢适应他的动作。就算他知道什么，也绝不会告诉他们。他们对付他很容易。他们从来不打他的嘴巴。房间里有一个人是多余的！他不知道，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他们又给了他一分钟时间。突然，在疼痛中间，有了一瞬间的耐心。

他一定是睡着了。当他无话可讲的时候，就在构思新的词句。他们给他看从他的额头抹掉的汗珠。他们现在做的也是一项工作。

他知道得太多了。“这个故事里没有一句真话。”他们在他身上寻找还没有挨过打的部位。他转着圈地跑，希望借此摆脱疼痛。突然，他吃惊地看着他们身后的一个点。

他们**现在**向他提出问题来，他害怕他们之后又会提出问题来。他的眼睛闪烁着。他生命力很强。抽打他时，他们脸上的表情也可以理解为同情。那压抑的空气让他喘不上气来。那块石头有小孩脑袋那么大。那句话说到一半就被人打断了。他们问够了。他的手指尖染上了深色。突然爆发的杀人欲望让他惊讶。一个动作接着另一个动作持续下去。

他现在再也不可阻挡了。他把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了那一拳上。

一阵响声，像是咕噜咕噜冒泡的声音。

一瞬间，那些打斗的人都一动不动。

从那张嘴里涌出一种奇怪的声响。

那个被掐住脖子的人咕咕作响。

呼吸的撞击让他后退了一步。

他紧紧地掐住脖子，直到他听见咔嚓一声响。

他的对手是橡胶做的。

现在他在把玩词语！

门只是虚掩着。

推销员的脚步停在最下面的台阶上，侧耳倾听。

天黑了，他开始说话了。

后怕出现了。

7　秩序的表面回归和第二场无序前的风平浪静

谋杀故事的形式规则慢慢地排挤了日常现实。描述越局限于谋杀本身，这个现实也就必然越多地被排斥在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或者事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些关系能够表明谋杀故事所涉及的那一个关系，即谋杀犯与其被害人之间的关系时，它们才有描述的价值。那些日常关系已经不再属于这个故事了。

然而，一旦突然描述了一个日常关系，那么毫无疑问，它绝对就不会寻常了。无论是描述举起手帕这个动作，还是描述怎样准备一顿

饭，或者描述墙上一块深色的污渍，一个人的手指甲，这些都不是为描述而描述，而是一个信号，一个线索。特别是对平时视而不见的无关紧要的事情的描述就是要引起人们的注意。

如果突然描述了某些对故事当下的发展毫无意义的东西，那么它必然会对未来或者过去有作用。任何不合常理的描述，任何偏离，任何对日常事件的描述，这些都发生在特殊情况下，并且恰恰与之相反。任何对一个独立物体的描述，不管与对其他物体的描述相比更详细、更长，还是更不确切、更短也罢，都会引起猜疑。这个物体只是表面上显得无关紧要而已，而恰恰相反，它对于谋杀故事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就在一句又一句对这个谋杀案的描述中，凡是对日常现实所描述的东西，都对这个谋杀故事意义非凡。也就是说，这个现实服务于这个故事。凡是现实里不属于这个故事的部分，则是不会被描述的：这个案件将这个现实排除了。如果出现了一个描述日常现实的句子，那么它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异物。

然而，在这个谋杀故事的某个地方，现实似乎又参与其中了。于是，这个特殊的谋杀故事好像又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故事。正是因为这个地方，这个谋杀故事似乎前功尽弃了。要把许许多多的可能限定在那惟一可能的事实上，这样的努力当下变得不可能了，也许是因为暴力的缘故。于是，这个谋杀故事现在好像在这里就结束了，没有任何说明，日常现实又返回到描述之中。如果它现在被描述的话，那么它对于这个谋杀故事就不再具有那个特殊的意义了。每句话现在都为自身而存在，什么都说明不了。在这个地方的描述不属于这个谋杀故事，它是对日常关系的描述，没有双关的言外之意。所以，这样的描述也会变得更为模糊。另一方面，它在描述句子里还会夸大那些日常事件，从而导致这个谋杀故事暂时破灭。这样的描述句子现在可以属于用于任何一个随随便便的故事，它们对于后来的真相大白没有什么意义。

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之前是这样，往后无疑也会如此。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开始。没有什么故有的东西停止。如果发生了什么，那也是自然而然。

如果之前在寻找那惟一可能的事实与许许多多当下的可能之间存在过一种张力的话，那么现在的张力就存在于事件的匮乏与按照谋杀故事的规律可以期待的、接踵而来的事件之间，而后者会使得这个日常的故事再次转变为谋杀故事。

然而，故事到了这个地方，依然充斥着对日常现实的乏味无聊的描述。

那个从现实的乏味无聊中而闯入谋杀故事现实中的人现在又回到乏味无聊之中。这个谋杀故事对他而言曾经是一种偏离，这种偏离似乎被化解了。

他虽然还在期待着什么，可是他眼下什么也不能做。他干起自己习以为常的事情。可是现在展现在他面前的秩序让他忐忑不安，因为他突然间再也无法在这个秩序的物体之间建立起关系了。每个物体都独立存在，这让他不安。在这种种日常事物之中，在这重新回归的现实之中，他再也无法忍受了。由于他缺少这样一个关系，他也就失去了所有其他与那些物体的关系。现实让他觉得不现实。因为它没有被说清楚，所以分解成了一个个细节，而在他看来，这些细节互相之间再也毫不关系可言。他再也无法把刀子和面包，房间和门，垂直的东西和水平的东西，快和慢，之前和之后，之后和现在，词语和词语，字母和字母联系在一起。

事情到了如此地步，面对没有说明的现实，他感到恶心，他希望这个谋杀故事再倒转回来。

可是，按照谋杀故事的形式规则，他现在无法自行为之做任何事情。这个日常的现实只会又被外界的暴力排挤出去。可在这其间，他聊以自慰地等着：

他撕下那死皮。他还没有适应这个房间。他太快地苏醒了。大衣还没有干。他摸索着胸前的口袋。由于疼痛，他以为看到的东西是听到的。在坠落的过程中，坠落变成了跳跃。逃跑中没有人会敞着门。地上那一摊摊白色的污渍是被掐住的人吐出来的。

他的衣着很寒酸。他在前厅被箱子绊了一跤。他的手在水里泡了很长时间。他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解衣服扣子。虽然只有他一个人，可是他却觉得空间小得让人难受。那液体颜色很深，他辨认不出来里面有什么东西。

他呼吸没有节奏，因为他毫无意义地看到手指甲没有长长。照片上那个人看起来像活着。回忆立即又活跃起来了。被扯下来的头发顶端还带着烫出的卷儿。

他感觉脸朝右边躺着时恶心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他本来不想死。他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他感受到的一切都是干巴巴的。他利用两次呼吸之间的瞬间抬起了头。不幸的是，他没带多少东西，没法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把玩上。他转了转灯开关，可是什么事都没发生。房间很空荡，他简直想像不出再空荡一些会是什么样子。火柴盒子上没有印字，他也没法借着阅 读来消磨时间。他把手伸向高处，动作却晚了一点儿。单凭肉眼来看，没有什么地方能引起人的注意。看到那个呼呼大睡的人，他激动不安。

他不知道该从哪个物体开始做点什么。他强迫自己至少要读一下报纸。就在这扇紧闭的窗户之后发生了一个故事。呼吸困难让他很受罪。他像一个绝望的人那样仔细搜寻着地毯。下午的时候，他能听到钟表的滴答声。人们看到的被害人照片大多是结婚照。对于他还没有习惯的事情，应该怎样才能戒除呢？

他发布了一条信息，尽管那里根本没有人。

他其实可以去看电影的。为了消耗时间，他又选择了两点之间最远的路来走。在雾中他听到了声音。他觉得身体的这种新处境很惬意。他想着，自己可千万别睡着了。他忽然无法再在门旁找到新东西了。一会儿他就已经把一切记得滚瓜烂熟。

他做着迈出一步的准备。就连在睡眠中，他也无法停止行走。那鹅卵石砌成的小屋渐渐变得有用了。为什么沙发椅摆在地板上呢？在半梦半醒之间，钟表的滴答制造出像滴答声一样一走一停的画面。现在他无法逃到理智的背后去了。每一步都像是一次环球旅行。

他生起气来，因为他找不到大衣背后那个洞了。他打开一扇假门。他突然注意到自己是右撇子。那些物体变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字母组合。他犯了数数的强迫症，搞得自己也很难受。他又喘了一口气。他为这些物体发明了新的排序。他紧张地等待着身体的需要，好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现实妨碍着他。如果他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至少他还可以一如既往保持冷静。

他尝试做出各种可能的动作。他使劲地观察着。在睡眠中发生的事情太少，所以他又醒了过来。他只能艰难度日。一个女人现在可能正在摆弄着花瓶里的花朵。他没有什么生意头脑。他毫无准备地迎来了一段空闲时间。通过供货，他可以让这件物体变成商品。在这个时分，所有的百叶窗都放下了。有人曾在这块地板上打磨过一件沉重的物体。从几处脚印上可以复原出这人走路的步态。他现在做的每个动作都是用来打发时间的。门和门框之间的缝隙很暗。那只昆虫是无色的。

他逐一仔细地看着墙。除了他之外，这里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动起来的东西让他去密切关注。没有任何物体适合于来玩玩思想游戏。现在想要去回忆，已经为时太晚了。他数着能够看到的颜色有几种。那个动物生活在一个不需要用眼睛的地方。他站起来，又躺下，再站起来，又坐下。他尝试着在每一个物体上解读出一个尽可能长的故事来。房间静静地卧在这熟悉的四堵墙之间。也许口袋里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把玩一会儿。

他找不到什么事可做。他那破坏的怒火一开始只体现在眼睛的抽动上。他久久地嚼一块木屑。他做了一个最为普遍的表达绝望的动作，却并没有觉得放松。为了能够将故事继续编下去，他尝试了所有可能的句子形式。这个地方有一根白色的牛毛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无非一个死人而已。他久久地微笑着，超越了这样的理由。他甚至连衬衣上都有口袋。其他人比他先来过这里。这个房间太小，根本没法进行一场真正的打斗。在此之后，他才做起准备。又是下午的这种心跳！

因为他不知道谋杀犯的姓名，所以必须给他想出一个名字来。电话线也可以当做绳索用。他不敢太靠近窗户。当他倒下去时，尘土向他飞过来，过了没一会儿，他就能辨认出地面上一个个细节。那些物

体现在变得毫无用处。当他醒过来时，他注意到自己的身体还没有告终。突然间，谁是凶手对他而言已经不再重要了。他睁开眼睛，注意到一切都没有改变。他一下子再也无法使用那些专门用来描述自己身体部位的词汇了。水渍来自一只倾覆的或者摔落的花瓶。

当他站着的时候，他毫无意义地担心自己会失去平衡。没有一件物体能告诉他什么。他把衬衣的扣子解开又扣上。他从事的工作没有任何交换价值。街上横七竖八地放着一些为死人敬献的花环。他终于可以解决一下内急了。每个平时下意识就能做的动作，他都用意志力控制着去做。他从刚才坐着的沙发上站起来，坐到对面第一个沙发上去，然后看着他曾经坐过，而现在空着的那个座位。他挑衅地盯着墙。在他头顶上的房间里有什么东西倒在地上。也许当他昏昏欲睡时，时间会过得快一些。他双手不安地纠结在一起。他看到的所有物体，都已经毫无用场了，所以，他对它们除了毁坏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做。这是一个宁静的夜晚。要是死者还能经历这一切的话，他或许会感到高兴的。

愤怒中，他既没有把门狠狠地一摔，也没有特别轻轻地关上。把家具重新摆放一下或许可以消磨去很多时间。他试图用谎言来拿现实打趣。他又一次穿着衣服睡了一夜。“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你要是想睡觉，那就得先把脑子清空。”苹果放在那里，被啃了的那一面朝上。

他尽可能不厌其烦地动来动去。他穿着上街的西装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家具摆设都上了毁坏保险。门前的脚垫滑下来了。他试着自己制造出疼痛感。他完全没必要地抖了抖枕头。他把硬币当做螺丝刀来用。爆炸声响起时，有个人迅速地去抓这个孩子。

他需要整个手才能抓住那个物体。没有人跟他说起过窗帘杆的事。“他不再是从前那个他了。”他把电话线从墙里拽了出来。他期待着一件倒霉的事情发生，以便他能让这事儿变好。他无法将一个物体与另外一个进行比较。每个过程都在顺利地进行着。他围在脖子上的围巾，末端很容易被人从背后抓住。他用指纹印满了整面玻璃。一瞬间，他的手离开了墙，依然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刻意停了下来。他在制造一个个无用的形体。那件衣服还在滴水。当他意识到自己躺在哪一边时，他就实在无法继续忍受这一边了。大货车的门被关了好几次，才吧嗒一声扣上了。他直起身来，并没有别的目的。就连平静地躺着也让他觉得是一种负担。时间静静流淌，心跳声清晰可闻。

他把手套的衬里翻了出来。如果可能的话，这块石头正好可以塞进一个伤口里。他不知道该如何开始。当他问自己累不累时，他变得累了。他会玩的那些游戏全都需要一个搭档。他尝试着对自己保密，假装不知道每一个动作最后的状态。第一眼他就把这个物体和另外一个搞混了，他刚开始还试着用另外那个来做比较。他在所有可能的地方留下脚印。他写下一些文字，只是为了借助阅读来消磨时间。

他把冰冷带进了这个房间。他坐在那里，模仿着自然界的声音。他把东西从桌子上碰落，只是为了能再接住它们。他在练习如何机智果断地处理意外情况。他故意让事件发生，又让它们中断。他在思想中与一个颠倒的世界嬉戏。他拆开所有能拆分的东西，再把它们都拼在一起。他不能唱歌。每个动作都让他感到吃力。他忍受不了，居然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没有任何物体能引起他的回忆。在这个时段，所有的想法都让他讨厌。一个松动的螺丝也许让他有点儿事情可做。

他不相信墙是凉的，直到他摸上去。听到声响后，他也想不起与这声响相关的故事。哪怕是有个人在观察着他也好啊！他命令自己要保持理智。无论如何他都知道怎样能消磨时光。他在逃亡，却没有追踪者。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思索。没有人失踪。他突然害怕自己会爆炸。也许这些东西是疯狂的？钥匙插在柜子上，诱人去开。他或许可以观察死者身上的植物和动物世界。也许那只是风吹过留下的痕迹。

他打哈欠时眼睛挤在了一起。他紧张地追随着身体的每个行动。地毯上最细微的灰尘也让他不安。就好像：如果水磨停止了转动，即使是在半夜，磨坊主人也会惊醒。在这里，他不会出什么事的。他有很多时间，虽然他觉得连最为平常的行动都能让他消耗时间，却什么都不做。

整个上午他什么都没想起来。窗玻璃边上的腻子还是软的。他们让他大概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在受到惊吓之后，所有的东西看起来

都变了样。如果他把衬衫往上拉过头顶，别人就看不到他了。就在这段时间，这个房间里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玻璃杯摔在地上却没有碎，让他吓了一跳。

他在练习如何快速反应。他在思考，为什么面包抹了黄油的那一面朝下掉在了地上。他还没有到达极限。当他注意到拉链不需要被扭转时，已经为时太晚了。

他做出一副无辜的表情。也许他现在无所事事，这才是关键的错误。已经干涸的那摊液体的边缘呈黑色。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他故意给感知到的一切都安上一个错误的名字，好去一一纠正。他觉得被吓死也是有可能的。在睡眠中他不会出任何事儿。

他感觉到那种气味如同用针刺鼻子。他观察风，也没有什么新发现。他的手指甲很短，里面没有存留下任何东西。在电影院里，他只是感知到了噪音和大脸盘。“他打碎了一个瓶子的瓶颈。”他给自己设计了一个陷阱，跳了进去。现在压根儿就不是采取措施的恰当时机。透过电话他听到短促而剧烈的呼吸声。这把枪不好用。他问自己，液体真的是湿的吗？“一个人眼睛的颜色是无法改变的。”这个地方看起来适宜居住。他喜欢仰视。他拿在手里掂掂重量的这个物体肯定是另一个。

他要找寻各种关系，只有一个意图：做生意。他把自己关起来，以此来分散注意力。只要他还能睡得着，事情就不至于那么糟糕。出于羞愧，他感觉到了重力。已经想过一遍的那个念头让他觉得恶心。一个不小心的动作就会毁掉这种田园般的宁静。房间里的物体上看不出发生过搏斗的迹象。他一整天都没有真正清醒过。他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时间。他的目光又转回到现实。他一点点地醒了过来。睡着之后，他渐渐感觉不到四肢的存在。每个物体都妨碍他走路。在这里，哪件东西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上。就连街道都可能是一个陷阱。

他走着之字形。那条狗在石头的威胁下退缩了，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自行车从房子角落里露出一截。他走动时会有人听到。“自从发生了这件令人伤心的事情以来，这房间就再也没人动过！”

他很高兴，终于可以空出两手来回走动。柜子的门不易觉察地动了起来。他被吓住了，半天才缓过神来。他站在一个很不利的角落

里。他简直无法想像，其他人正在睡觉。做每一个动作时，他都在担心着动作结束的那一刻，因为他又会重新无事可做。他有意把眼下正在做的事情先做错。

他什么都不做，好让自己感到累。“谁知道这会有什么用！”他弯着腰，在洗脸池上一趴就是好几个小时。他和自己玩牌。他越是频繁地把滚烫的手心贴在冰凉的物体上冷却，他的手就越烫；那些物体越冷，他的手也就越烫。虽然有些无聊，他却一刻不得安宁。他研究着所有物体的特征。他想，这块污渍在玻璃杯的内壁上，因此想擦拭一下。长长的走廊空荡荡的，让人无法忍受。

他试着做出心情愉快时的表情和手势，可是却丝毫没有帮助。他试图将自己在物体上感受到的东西和人性去进行比较，却是徒劳。死者的脸上带着笑纹。

他把灰尘撒在那些物体上，这样有人动过后就会留下痕迹。柜子离门很近，他可以很快地把柜子推过来堵住门。正在熟睡的那只猫嘴角露出了牙齿。他比平时走路时脚步要慢一些。他想在每一件小事上发现可以消磨时间的方法。他想要失去所有的感觉。

他抖了抖身子。他反穿着鞋子。他醒过来了，心在跳动。

他无法想像，在别的什么地方会有别的什么东西。他甚至完全不能想像，除了他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还会有别的什么地方存在。

他一整天都让那盏电灯亮着。他慢慢地把一个错误的盖子拧到罐子上去。周围的环境残缺不堪，他都快辨认不出来了。当他撞到某个物体时，他便用话语和表情来安抚它。他没有必要笑得那么久。他向自己脚下咔嚓作响的地板喊道，它应该放安静些。那货物的来源无法确认，因为它们是大批量生产出来的！出于不耐烦，他感到下颚疼起来。时间会治愈一切伤口。他的脚已经麻了。一切都近在咫尺。

他甚至都不会用钥匙了。他吃饭时，试着什么都不去想，就一门心思地吃饭。他觉得那条新路更有意思。他的手从靴筒里抽了出来。那乏味无聊并没有针对他所期待的什么事上。它没有什么对象。虽然还不至于冷得要命，他也不想睡觉。

要是他忘记了什么东西的话，那么他现在至少还可以试着去回忆一下。为了能和什么人聊天，他必须详细了解大家每天都在做的那些小事儿。他等待着，下一次呼吸后会发生什么。因为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所以一开始他也无法动弹。伤口一跳一跳地疼。

他数过三后没有停，而是一直数下去。一声枪响要比很多声更让人感到不安。他还一直努力让自己保持原来的姿势。他练习忘记将要发生的事。他等着雨变小时，又感到一阵呼吸困难。

他现在无法忍受说出口的词语。他从房间这头走到另一头。他没有什么反复萦绕的想法。他听着老式电话拨号盘转动的时间，听出了拨打的号码。像每天一样，他在一个不熟悉的房间里醒来。他把一根火柴放在门框上面。时间在流逝，而他也渐渐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没有变化，身体也没动。他越来越快地改变着自己的位置。他嗅着那些没有味道的物体。他走好每一步。他停住脚步，因为这样可以消磨时间。他缓慢地做着那些自然的动作，直到不能再慢了。他观察着一个个事物，无缘无故，没有诉求，也跟他毫不相干。他屏住呼吸，迈着小步。他提起箱子又把它放下来。他绝望地洗着手。他故意打了个哈欠。他试着去拆分那些已经被他拆分到不能再小的物体。

他是个推销员，只是不在房间里，而且孤身一人。

他考虑着，该怎样度过一个小时的时间。

他想用一只手去把另外一只手制造的灾祸补救上，可是用这只手却招致了又一次灾祸，只得再用另外那只手来补救，可是又引起了第三桩不幸，他想用第一只手来帮忙，直到他把一切都搞糟了，这才有点儿心满意足了。

像送牛奶的人和送报纸的人一样，这位推销员成了未被发现的死者的发现者。

8　第二个无序

在这个谋杀故事中，日常现实表面上的回归其实只是为描述第二个无序做准备。被描述的现实的乏味无聊应该制造出与所期待的无序

之间最大可能的张力。

对这个故事来说，这个现在以暴力方式设定的无序表明对那所谓的日常现实的描述是正确的。当现在第二起谋杀发生时，这个表面上已经结束的，而且没有结局的谋杀故事依然在继续进行着。

那么第二起谋杀不能像第一起一样，用同样的方式来描述。在这个谋杀故事中，它一般不会被描述为正在发生的过程，而是已经发生的行为。被害人不是当着那些可能会当场经历过程的见证人的面死去的，而是独自一人。谋杀仿佛不是发生的，它是被发现的。被害人被发现了。有人碰到了被害人。人们之前并没有像寻找一个死者一样寻找他，而更确切地说是查找他，比如就是要从他那里获得有关第一起谋杀某些重要线索。

但是，从描述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人们是否会在查找那个以为还活着的人时，却找到的是一具死尸。比如说，如果你离开这个当事人，就是为了获取相应的回报，因为你答应给人家通报信息，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当事人在返回时就再也不会有可能获悉那个可望得到的信息了。这期间，他已经成了一个被害人。

当一个人被孤零零地丢下不管时，这必然就会引起人们的怀疑。

在还没有人被描述之前，那么对物体的详细描述上就已经让人看得出来，有什么东西乱套了。这个尚未出现的人周围的物体都在不自然地快速动来动去，在对它们的描述中，则表明了这个后来才会被描述的人没有做出任何举动。在你踏进的这个房间里，被描述的是那些在地板上飞来飞去的纸屑，或者嗡嗡作响的电风扇，或者是猛烈飘动的窗帘，或者是咣当作响的百叶窗和门，或者在炉子上蹦跳的煮锅，或者从这些煮锅里溢出沸腾的水，或者是丁零当啷的窗帘杆，或者浴室里水龙头的哗哗流水声。

任何对那些物体一种就白天或者夜晚时间而言不同寻常的状态的描述同样一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大白天里亮着灯。深更半夜里收音机的声音开异常大。尽管已经入夜了，可百叶窗却没有放下来。尽管下着雨，可所有的窗户都大开着。大白天里，百叶窗也依然拉得严严实实。深更半夜里，大门洞开。

对被害人描述则留待最后进行。描述被害人周围那些物体是为了逐渐划定案发地点。通过这样的方式，对被害人的描述最后就会变得彻底自然而然了。用来描述受害者的句子就像是在诉说着什么熟悉的东西，甚或知己的东西。如果之前称之为诸如一个打开的罐子，一张弄得乱七八糟的床，一块歪歪扭扭的床前地毯，一支闪烁不定的蜡烛的话，那么现在则是：那具尸体，或者更简单一些：他（或者她）。

通常情况下，从描述被害人的第一句话里还根本看不出来这个被描述的男人或者女人是否已经死了。甚至有时会选择一个词，它还可以不偏不倚地表达当事人的一个行为。这个被描述的男人或者女人不一定非得躺着，他或者她也许还会被描述成坐着。有时候，被害人甚至还靠在什么地方，况且手里还拿着什么东西。这时，所有那些被理解为无关痛痒的词汇都意味着动作。

这就是说，描述特意首先选取了被害人身上所有也适合于活人的特征，是的，它们被视为活人独有的特征，例如健康的气色，或者吃惊的面部表情，或者打眼看上去活灵活现的眼睛，或者带着讽刺意味撅起的嘴巴，或者伸着脑袋偷听。在一个女人身上，通常还会描述一种性感的姿势，或者有句话就是针对她身体上那些性感部位的。这样的描述想必会刺激这位观察者做出某种动作。对一个裸体女人的描述首先会展示出一个生命的画面。之后，描述才会从整体转向细节，也就是转向那种标志着业已出现的死亡的细节。最后描述的才是伤口，或者煤气的味道，或者脖子上的勒痕。这个出现在现场的人首先发现的东西，在最后一句话里才会得到描述。之前的所有句子都是一种对动作的描述，最后一句则是对静止状态的描述。

“她的嘴唇张开时，他听到了轻轻的声响。”那只瓶子不停地晃来晃去，却始终没有倒下。谈话间歇，他听到她隔着长筒袜在腿上使劲地挠。“今天会很热！”

就连一句问候的话，他都说得神秘兮兮的。

她把香水抹在那七个经典部位上。他替她撑着门，已经站了很久，可是她却仍然聊个不停。他不是被一个声响吓了一跳，而是突然

想到了什么。他在电话里听到了那个不幸的消息后，还呆呆地盯着毫无意义的话筒。

她在抚摸那个布娃娃。

走到大街上人群聚集的地方，他总会立即去看躺在地上的人，去看那个脸被盖住的人，去看盖在身上的报纸，去看被毁坏的东西。他想压一压她的膝盖窝。他在自己的衣橱里找到了一件陌生的衣服。房间里只留下他和她时，他立刻找点儿事情做。手套的手指上下叠放着。要是他眼睛里没有那种闪烁的眼神的话，人们或许就会把他当成好人了。

她拒绝吃味道很辛辣的饭菜。他听她说话时，就忍不住去触摸她。

他观察着碎石里那片浸透了狗尿的报纸。画面上那个人脖子朝着一个奇怪的角度扭过去，只有被拧断的脖子才可能会那样。“房主经常去旅行！”那两个老太太对一个骑车的女人一无所知。谋杀犯模仿了被害人那暴露天机的叫声，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没有一点恶意。然而，恰恰因为这个模仿的叫声和被害人的叫声不一样，所以反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坐得舒舒服服的。他强迫自己的头不许疼。他触摸那个女人之前，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的手指尖。尸体躺着的姿势十分怪诞。外面街上有个行人在深深地呼吸，就像是背着沉重的行李。

当他按下电灯开关时，屋里那一个个陈设品立刻展现他的眼前。一切都无可挑剔，对此他似乎与这个女人没有什么好交谈的。现在他可以确信，他就是她的意中人。他这样自然而然地让人注视，这让他不禁感到诧异。他不能让人看出来认识她。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切看上去都千差万别。他们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某些迥然不同的东西。

她眼睁睁地看着他准备要触摸她。屋里嚓嚓作响。她固定好自己的发型。门自动关上了。“我们可别把整栋楼的人都吵醒了！”当窗户下面的声音消失了之后，他心里明白现在一定要格外当心。

他毫不费劲地说着话，一句接一句。他证明自己的博学多识。他根本就不是她所想像的那个样子。灯光弥漫着一种温馨的氛围。他走动时，那提包一再碰在他的膝盖窝上。她说的每句话都让他觉得很中

听。“要是你心里没有邪念，哪会想那么多呢！”她重重地敲打着自己的脸颊。那双睁大的眼睛对灯光没有丝毫的反应。

在这些陌生的物体中，他并没有立即认出她来。她叫他过去，同时却没有说因为什么事儿。意味深长的沉默出现了。现在要把语言转化为行动是何等艰难啊。他感觉很惬意。每次她都最漂亮。因为所有的灯都亮着，想必里面会弄出什么响动来。他拉开一种不同寻常的架势靠墙站着。她的姿态引起了他一个个遐想。因为疲惫，脸面绷得紧紧的。在这样的时机，相互握手可是非同寻常啊。她和他聊这聊那。当他看着她对着浴室的镜子梳理自己的头发时，他就觉得，她在跟什么人较劲。她的皮肤平静下来了。

只有片刻时间，他还可以打量着她。在接着的瞬间里，他就只有眨眨眼睛的份了，而机会似乎就这样溜走了。她屏住呼吸等待着他最终开口说起话来。在白天这个时分，这种响声太大了。

他忘记了闭上眼睛。时间是早还是晚。她的名字很适合呼叫。门打开时让他吃了一惊。她背向他站着。早前，当他要去按门铃时，突然停住了，并且侧耳倾听。这一天可是开了个好头啊！“没有哪条法律禁止散步吧。”

他笨手笨脚地站着。死者穿了一件轻便的夏日西装。他用了“商量”这个词来暗示她知情。他注意到，她突然开始只说他的好话了。“您手腕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

他一定要如此低声细语地说，好让人家根本就听不清楚自己的话。他尽可能站在离门很远的地方，免得门被突然撞开。她无法想像如何看着他吃饭。后面那毫无目的的动作就足以分散去他的注意力了。他鼓起勇气，从她的裙子上摘掉一根头发。他发现了某种红色的东西。他手里拿着大衣站在那里，而她还在兴致勃勃地聊个没完。这鞋子脏得出奇。那裙子与其说掩饰着她的形体，倒不如说使之更显突出。黑暗里，他突然感到手上黏糊糊的。他心照不宣地说起接到了邀请。她向他解释说，她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护理自己的干性头发。也许就是因为那起谋杀，他才这么便宜地买到了这个房子。窗户都大开着，那些家具都淋在雨里。门没有关上，而是深沉地撞在什么东西

上。她的脸上绷起一道道条纹。他在那些烟蒂上发现了红色的痕迹。有人在房间里！

他把灯泡拧了下来。他的脚踢到一个软乎乎的东西上。她的腋窝还发红。那扶手椅如此与众不同，它可以当陷阱用。

他任凭别人怎么去注视自己。这个姑娘发育得早。他听到绳索开始撕裂。她首先胆怯地问起什么东西更划算。一开始人们还希望，她会自己回来的。奇怪的是，起居室的窗户黑着。他想像过她的手会很热。她的形状很有挑衅性。终于他做起了吞咽运动。门把手剧烈地上下动着。在她的房间里，他甚至都不敢脱下大衣。看她的样子，仿佛在最后一刻，她还举起手臂防卫似的。这是他职业的一部分，那就是发现死者，他们曾经都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

当他在黑暗中正要敲门时，手指的关节碰到的不是坚硬的木头，而是落空了。她的瞳孔缩成一团，她急于想做什么。他本来期待着这个受到惊吓的女人会发出凄厉的尖叫，可是房间里却始终一片寂静。她的脖子变得僵硬了。她对他所说的，不是什么真情。

他跟她搭起话来。

他相信这些手指会有所作为。究竟为什么没有人接电话？他问自己，深更半夜里，他会被什么响动给吵醒呢。她突然开始没完没了地说起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来，借以让人看到她受到惊吓。这把钥匙从里面插在锁子里！

她简直在期待着得到他的问候。他们同时举起了酒杯。突然间，他觉得她说话变得自然了。她把那只猫的脑袋按到它的粪便中。他听到外面大街上传来硬纸被撕成两半的声音。她怕冷。

她要求得到他的回报。他说，她应该表现得平静些，尽管她已经很平静了。她看上去不像一个死人。他明知道自己不可为之而非得要去为之。如果那一摊污渍不过是尿液的话，那就一切都没有什么可说的。为什么挂上听筒这个动作不再被描述呢？

当他走进这个寂静的房间时，他四处探了探。那深陷的脚印表明有人突然跳了起来！“当你往一个刚刚挖好的坑里喷水时，这水就会

在相关的地方更快地渗进去，并且会有气泡冒出来。”房间里变得安静了。现在他们必须开始采取行动，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照明很有利。这种触摸就是抓住。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跟随她的动作。她有些地方的皮肤要比别处干燥些。他在哪儿都不脱掉大衣。她变得不耐烦了，因为他总是不肯坐下来。

他把这声叫喊跟一声愉悦的叫喊搞混了。她的手腕很粗糙。头发末端都分叉了。已经好久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了，也该有什么事马上就要发生。她拿着熨斗注视着他。“第一下伤害极少造成血迹四溅。”她有点儿过早地开始笑起来。没有人手头有白纸。什么热乎乎的东西滴到他的头顶上。她在他身边感觉很安全。那手套留下了动物皮的痕迹。

她只是要分散他的注意力。

他立即意识到，到底是一个活人还是死人被藏了起来。逆光让人起初很难一下子辨清细节。他知道那个所要找的物体就在眼前，可是他看来看去，就是看不到它。还没等她手里的笤帚扫过来，他早早就抬起了双腿。她仰面躺着。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即使他说的是显而易见的事，可他自己却觉得像一个个谎言。她忐忑不安地觉得，一再情不自禁地和自己做比较。那一跳持续的时间比他所想像的要长。他把她紧紧地拉到身边，这样一来，她的双手就不会对他有威胁了。她刺激他来反驳。他一秒钟都没有背对着她。她想从他那里知道什么。她的叫喊只是一个喷嚏。“这听起来挺诱人的！”

他只想从外面看一看这座建筑。他为这个此刻正在打电话的女人担心，因为她会说出那个棘手的名字来。甚至连他在黑暗中撞到的物体，他都厉声斥责。她的眼影与眼睛的颜色很和谐。她不停地把电灯开来关去。他身上有吸引她的东西。他愤怒地笑了。“您要往茶里加多少糖？”

他戴着一顶浅色帽子，上面饰有一条黑色带子。她很了解他，而他并不喜欢这样。他肯定亲眼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她把汽车的座椅往前挪了挪。他西装口袋里没有放手帕！她的脖子很纤细。他神情关注地看着她就足够了，她不禁炫耀起自己过去那些所作所为来。慢慢地，他区分出一个个细节来。她的姿势是受到惊吓的姿势。

她抬起头看着他。她的嘴咧得很大，他觉得会看到血。她说话时，她的手指做出了一个个神秘的信号。他突然开始每句话都插嘴。他试图美化一下自己在愤怒时说出来的话，他重复着，开玩笑地夸张着。

这整个房间就成了他们的天地。她梳头时，喘息着。因为她的步伐跟他不一样，所以他一直在试图变换自己的步伐，好跟她一致。可是当他终于和她的脚步保持一致时，他却受不了这种相同的步伐。她把他叫到自己跟前，不是命令。这把钥匙是用玻璃做的。她一步一步地索求回报。他感觉到黑暗中有一个人在场，尽管他并没有听到或看到他。浴室可不是适合开这种玩笑的地方！由于惊吓，她的额头舒展开来。有人敲门后却没有应声，于是他就开始喊起来。这寂静好奇怪。

也许他只是因为紧张看到那些物体变了样。

他要试一试，他是否正是她密切关注的那个人。他把头往旁边歪了一点儿。她解读得如此之慢，还没等到她去翻页，他早就解读完了，并且此间不知道他该做什么呢。他们相互都有很多时间。如果那个被认为死去的人开口说起方言来，那他就不会是鬼了。他发现了自己去按门铃的那根手指上有什么东西。由于受惊，她既听不见也看不见。

他无处不在。当那个泡软的面包裂成两半时，他不禁哆嗦了一下。当他第二次说出她的名字时，他感到失望。她用的是一款很适合自己的香水。虽然她装模作样地摆弄着一个无关紧要的物体，可当他突然抓住她时，她却吓了一跳。她都已经下了车，他才想起来要扶她下车。他拿不定主意，她到底指的是哪个物体。他正好没有带她打电话需要的那枚硬币。房间里的一切迹象都表明主人是仓促启程的。因为他没有听懂她的话，他无论如何得笑起来。

他急促地抚摸着那个空空的地方，那个物体刚才还摆在这里。

她请求他，现在别丢下她一个人不管。在受到惊吓之后，她还做了几个咀嚼的动作，并以吞咽收尾，尽管嘴里什么都没有。无非就是让你赶紧出去！他很晚才发现了她那紧闭的双眼与大张的嘴巴之间的

反差。窗户上的缝隙用胶布封起来了！他没有按下按钮，而是敲敲门，也许正是这样才救了自己一命。

他把长筒袜扔到她怀里。对她现在和他一起所做的一切，她都显得太警觉了。从房子里没有散出任何气味来。

他觉得那个响声是用手指甲在抓挠什么东西。那个死者躺在大街上，扭曲的姿势好奇怪。他回来时，敞开的门立即让他顿生疑窦。她试着拿开嘴里的头发。她比他要容易一些，可以借助一面镜子来审视周围的环境。在他的鞋跟上，沾着一片潮湿的树叶。“现在正是街上安静的时刻。”下雨烘托出它的形态。

没有他，她照样活得很好。她在把玩自己的双手。他听到硬币在自动投币电话机里掉进去。她不是他想的那样。她觉得哪个姿势都不舒服。有人在空中画着她的形体。她在死前还吃了苹果，这样的想像未免太幽静了。

她肯定是一边走一边写下这条消息的。头发上还有口红留下的印记。那床鼓起来的被子慢慢又沉下去了。她早就等待着他的到来。身体向前倒在了方向盘上。她不停地动来动去。

他必须要保持清醒！

她在淋浴时揉着眼睛。

他说话之前，先用手巾包住了电话话筒。她立即在他身后锁上了门。这是一个成功的夜晚。酒喝了一轮又一轮。她的耳垂还在晃动。她很满意。在紧锁的门前堆满了报纸、信件和牛奶瓶。

那是不幸的坠落！

她上气不接下气，简直说不出话来。灯光弥散着宁静的光辉。他们相互说着原原本本的句子。那个人家以为死去的人回来后却显得生气勃勃。他曾经有一次错把孩子的叫喊声当成了受惊吓的呼喊声。他无法描述那个声音。她的两只胳膊软绵绵地垂着。透过钥匙孔，他只能勉强辨认出一只倒扣过来的鞋子。每个人都想把最后一口菜让给别人。他立刻就觉得那个箱子不是空的。首先描述了那一双朝上突起的

脚。她的微笑显而易见。浴缸很长，足够一个女人伸展躺在里面。突然间，他不再喜欢她的脸。如果谋杀已经发生了的话，那他就觉得更可怕。他听到在那紧锁的房门后面有水流的声音。这房间看起来像有人居住。她没有朝他转过身去，倒不是因为无礼。只要他们的身体还相互纠缠在一起，他们俩就相安无事。她还在等着客人来。

他做了一个助跑动作。他的动作已经不再听从于意志。他们相互已经没有什么话再说。他轻轻地抚摸了她一下，仿佛要从她身上挥去什么东西似的。他的眼睛一直都睁着。之后，她的声音变得低沉了。他屏住呼吸，等待着水哗啦啦地流在空浴缸里。受到惊吓后，她的脖子显得很粗壮了。他拥抱她的时候，出于小心，他抓住了她的双手。两人都相信对方会把灯关上。他觉察到自己的胳膊搂在她身子底下。只要他一呼气，他就会犯困。“那个湿漉漉的罐子倒立着，从护套里出来透透风。这时，一切都告吹了。”屋子里如此宁静，要说出一句话都很费劲。门比他更强壮。四处都是扯下来的头发。在关键时刻，有人敲门了。笑声顿然消失了。他只是从脚趾到脖子打量着她。正是这个气味，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气味可以与之比拟。她很偏爱这样的气味。那只苍蝇一再试图要落在他身上。

他不喜欢给不认识的人打电话。这是不可能的，她不会死的。当他进入她身体时，她终于不再笑了。

他让自己放松下来。这扇窗户只能从里面打开。突然间，他没有了对手。他一边聊天，一边付钱。那声叫喊是冲着他来的。所有的物体都挡着他的路。他还没有触摸到她的身体，他手上就感受到了她那火辣辣的劲儿。那个男人深深地俯在敞开的马达罩子上。他从她的神色看得出来，她已经为这样的惊吓早有所备。他在黑暗中辨认出一个浅色的正方形。床还没人碰过。在他觉得不可能出现动静的地方，他发现了一个动静。当她躺在他身上时，他至少有了一个方向。头发在后背散开。“你什么都没有闻到吗？”就连空气都阻碍着他。当他把钥匙插进去时，碰到了软软的东西。他听到有人跳了一下的响动。他感到房间在旋转。椅子倒了。谁是最后一个看到她的？她猛然直起身来。

他一开始并没有看一看地面。他打开门时，刮来一阵风。那个寻找的人找到的是另外的东西，不是他四处要寻找的。打开柜子门时，

有什么东西迎他的面扑来。好奇怪，他居然没戴帽子。大衣的衬里被扯下来了。一种液体从里面渗了出来。

两个人都相信对方会扶着那个罐子。她把毛发对着灯光。万籁俱寂。她的上身从床和被子之间耷拉出来。电话铃白天黑夜响个不停。

除了淋浴角落，她不可能退缩到任何别的地方去。他愚蠢地问她是否受了伤。当那个冲进来的使者随着她的名字说出的不是“有”，而是“是”这个词时，大家都惊呆了，就等着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他用拳头砸着门，却没有绝望的勇气。他所听到的，也许只是一个音节。他不知道自己先要做什么。他忽然注意到自己捂住了鼻子，虽然他并没有闻到任何气味。他恼怒地寻找着晃来晃去的百叶窗的钩子。鞋子放在地上，鞋跟冲上。地毯的毛太短，她没法抓得住。她已经做好了出行的准备。那些抽屉横七竖八地从抽斗里拉了出来。“在惊吓中，鼻子和嘴巴之间的纹路显得更加清晰。”抽泣让他觉得很尴尬。他绕开地板上突出的一切东西。如果一头动物仰卧着，那会是个坏兆头。在这样的时刻，她那裸露的皮肤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那只猫悄悄溜进一个陌生的房间里。

他不再跟她说话，而是自言自语起来。闻起来有股烧焦的味道。人们找到了她。尸体总是躺在屋子最里边一间里，或者一间房子的角落里。

她肯定认识那个凶手。当那个物体从桌子上掉下来时，他为自己的手感到惊讶，因为它居然比那个掉落的物体还要快，并且接住了它。他不用先俯下身子去看她。她的手心冲上。就在最后的时刻，她还试图保持尊严。当她重重地倒在地上时，发出了沉闷的响声！他笨拙地呼吸着。她知道得太多了。临死之前，她再也不曾看到过。现在该是那些表示静止状态的动词派上用场的时候了。她身上只穿着长筒袜。他根本什么也不能做。“您现在一定要非常勇敢！”他开始实施许许多多行动。他跑了一步。毛发从她的拳头里掉出来。他跟她说话就像是对着一头动物。这个女尸眼睛里含着泪水。

9　错误的揭示

谋杀故事进行到这里，似乎已经有一个人要对所造成的无序负责。那一个个行为事态都指向他。他是最后被人看到和被害人在一起。他之前就已经针对被害人采取过这样一个个行动，因此，这个谋杀行为现在表现为与之相关和关键的结局行动。这个人和被害人在激烈的交谈中，很可能在争吵的过程中受到关注。推推搡搡受到关注。一种充满仇恨的目送方式受到关注。

这个人和被害人之间有某种关系，而被害人出于这个人的缘故曾经要求改变这种关系。被害人拥有一个物品，而这个人想把它据为己有。被害人制止了这个人打算在他身上实施的一个行动。被害人做出了一个举动，而这个人又不愿意听之任之。被害人妨碍了这个人想要和一个第三者建立起来的一种关系。被害人所处的位置正是这个人想要拥有的。

被害人的死给这个人带来了好处。在谋杀发生时，这个人并没有去别的地方。在谋杀发生时，这个人一瞬间并没有受到关注。这个人对谋杀表现出过分的吃惊。谋杀发生之后，人们发现这个人神情恍惚。

在案发地点留下的一些痕迹都明确地指向这个人。

这个人在行动之后洗了手。这个人对谋杀表现出过分的吃惊。这个人表现出一个有罪之人的举止。人们碰到这个人时，就像他手里依然紧紧地握着那把刀柄。

这个人清除了一个个痕迹。

人们看到这个人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小路离开案发现场。

这个人说话语无伦次。这个人被缠绕在重重矛盾之中。这个人的面部特征就像一个罪犯。这个人长着一双罪犯的耳朵。

这个人作案后立即把衣服送去清洗。这个人作案后突然花了很多钱。

这个人在血迹里留下了自己的指纹。被害人拳头里的毛发就是来自于这个人的头上。被害人还会把这个人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写在落满

灰尘的地上。

这个人是个远近闻名的射击好手。这个人长着一个长下巴。这个人眼神狡猾。这个人属于另外一个民族。

这个人逃跑了。这个人在被捕时反抗过。这个人拒不回答问题。这个人矢口否认。这个人连无关紧要的事情都不肯承认。这个人提到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第三者。这个人装得好像他说出了真相。这个人没有固定的住处。这个人没有稳定的工作。这个人名声很坏。这个人装作无辜的样子。

所有这一切都是有罪的证据。

谋杀故事写到这里，虽然所有的事态都明确地指向这个人，可是只要他还没有认罪，就可能会有疑点。尽管一切确凿无疑，可是你还是不能确定，因为还缺少关键的那句话。恰恰是谋杀发生的时刻，没有人亲眼看到其完完整整的过程。对于这个瞬间，只有事后的目击证人。你虽然可以说：肯定就是这个人干的，可是你却不能说：就是他干的。只要这个人没有说出那句话，虽然可以认为他有罪，但只是有条件的。关键是，要用计谋或者暴力引诱他说出那句话，只有这句话才能让审问者不安的良心得到平静。

在这个谋杀故事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那个看起来特别像罪犯的人反而是无辜的，在谋杀故事这个地方的结尾，这一点也会被显现出来的。

但始终有这样一个人，他觉得那些无声的罪证如此天衣无缝，值得让人怀疑。在他看来，这个人的罪太过头了。

正是这样一个人，他在那些证据中找寻着破绽。可唯独糟糕的是，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同时也是那个被认定为有罪的人，所以根本没有机会去找寻破绽。不过你尽可以放心的是，他会找到这种破绽的，无论如何在这个谋杀故事中如此。不然的话，这或许也就不能称之为故事了：

“2”是一个美妙的偶数！

站在一具尸体旁边的推销员从一开始就显得很可疑。他发现的第一个东西是一件雨衣。他甚至都没有俯身去看那具尸体。他们尽量拍摄一张最为生动的照片。“所有的物体都是对行为的讲述。”他们把他扣着的西装从肩膀上往下拉，这样他的胳膊就不能动弹了。他们把大衣扔到他头上。下身沾着一些枯萎的树叶。他们祝他做个好梦。两个当官的人出现了。一股苦涩的液体涌上他的喉咙。“这双手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它们可以变得让人很不舒服。他从大街上就看到自己房间亮着灯。为什么他踮着脚尖走路呢？

他们小心地剪下他的手指甲。他们不允许他洗手。他们天生就是些心地善良的人。一所好监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安静的地方之一。

他们把他夹在中间。手湿漉漉的，但是握得很紧。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他咬着手指。他们当着他的面讲了一个笑话，为了向他表明，他不再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每个行为方式都预示着他有罪。他实在悔不该多管闲事啊。

他们用手指掠过他的下巴。一开始他把火当成了向日葵。他们满意地看着他的汗珠。他重复了那句话，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对于问题，他既不能犹豫不决，又不能回答得太快。在尸体周围，所有人都轻手轻脚地走动。他的每个动作都符合他们对他的想像。他说得很流利。对于这个事件，他没能跟踪到最后爆发的时刻。当他俯下身子去看这个垂死的女人时，她的目光刚刚变得浑浊了。打开柜子时，他什么都没想。他承认了一些事情，可那根本谈不上是口供。鞋带太容易断掉，没法用来勒死人。他高兴过，天突然下起雨来。

就像没有别的指望一样，他们喝着咖啡。箱子衬里上留着一个长形物体压过的印迹。墙上的划痕也可能出自一个孩子之手。他案发时刻穿的是什么样的衬衣呢？他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因为他跟那些慌忙逃走的相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所以立刻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听到那一声爆响，他们朝着不同的方向看去。一看到他们，虽然没人发出命令，他还是举起了手臂。他好像呼吸很平静。他一直都做好了起跳的准备，虽然没有机会跳起。

他长着一对招风耳。他走路时有些外八字。他的彬彬有礼只是为了分散注意力。那人肯定立刻就死了。当所有人七嘴八舌地跟他说完话以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宁静瞬间，随之让大家都难以继续开口说话了。

他并不想靠着回答问题来分散人家的注意力。他从来没有见过像她手上那样红的指甲。他们往他的双唇之间塞去一根香烟。他说了很久，只为了收回一个词。他的嘴角变白了。用手枪自杀的现场是很容易伪造的。在他身旁，那液体在不知不觉地滴落。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他几乎不会接触到流血的动物！房间里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味。他像疯了一样冲向死者。

他们紧在肩膀的上方抓住他的手臂，指头从那里捏进去会让人疼痛难忍。在挨打之前，他已经感受到身体做出回应。他的耳朵可疑地闪着光。这只手套显得比本来的样子要大。他据理以争来维护自己对一切可能的财产的所有权。他们正是在这里闹着玩的！

他们同情地望着他。没有人问起他的过去。尸体在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为什么他要造成她是在外面遇害的假象呢？以后他可就没有坦白的机会了。从他的脸上就可以看出他有罪。他们强迫他站着。他的每个故事中都缺少前故事。

他只是找到了那个物体而已。从射击角度可以推导出受害者在最后一刻跳起来了。刚才这一捆东西还是个人。在提问的间隙，他养精蓄锐。他的手比他的思想快。为了避免自己忘记那个词，他想出了那么多辅助记忆的词汇，可到头来还是把它忘掉了。他们轻轻地叩着指尖等待着他回答。只要他看着对面的人身上任何一个地方，那人立即又会提问。为了嘲弄他，他们给他的故事添枝加叶。

当他回避开所有人的目光时，就不知道自己该看向何处。通往门口的路，要不了几步就可以跨过去。当他低下头时，他们已经在等待着他坦白。一受到惊吓，他就得喝口水。

他们表现出一副仿佛理解他的样子。突然，他的讲述从过去转换成现在。他们在他身上简直就是浪费时间。他就是不说他们想听的话。他到底靠什么维持生计呢？当他玩了一次词语游戏后，他们的脸色阴沉下来。他们直勾勾地盯着他，就是试图来扰乱他的呼吸。他们

以刻意的礼貌态度来对待他。他蹲在一个没有靠背的椅子上。他们已经让其他人服软了。

他立刻皮开肉绽了。任何描述都适合于他。在还原谋杀现场时用物体来代表人。门把手有两次被压到底。他的每个动作都被分解了。他双脚朝里放着。“这个时间洗手太反常了！”他的沉默意味着顽固不化，他多说话就意味着别有用心。为什么他的吞咽动作一下子这样夸张呢？

他们向那个物体提出一个个问题来，如此咄咄逼人，仿佛它们是在针对一个人似的。无论他站在哪里，他都逃不过他们的手心。他的供述是如此的清楚，因为他不断地又翻供。她就躺在那边！脸上的化妆不合情理。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已经离他这么远，他们到头无非一个词语而已。“凡是有炊烟升起的地方，肯定就会有人家。”手套“啪”的一声打在他的脸上。他突然想起了“雪”这个词。他还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观察过地面。他不想按照他们所要求的那样去咬紧牙关。他们总是笑得太早。他做出一个轻蔑的手势，真的扔掉了什么东西。他不厌其烦地将裤子上的烟灰掸掉，好让他们看看，他们都干了什么好事。他徒劳地试图尝试说出自己所想的。

他们推断他无罪。在这个时间，人们大多不会成群结队。“老太太们最好还是忙活手里的毛衣针吧！”他左顾右盼，他们以为他在寻找逃跑的路。他们把他的头按到桌子上。如果他们不是事先知道就是他的话，可能就不会再认出他来。从现在开始，如果他们问他，他们那边墙上的表是几点的话，他决不回答。

就是他承认了，他们也不会再相信他。当他们提问时，他吹着口哨。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偷偷地冲他笑了笑，仿佛他可以向他吐露真情似的。如果他们在说出从句前要喘口气的话，他就可以打断他们。作为一个无辜的人，他却最像有罪。他们觉得尸体脸上的表情认出了熟人。当他们拉上窗帘时，他变得十分安静。“这不是我的帽子！”这么久都没人碰他，以至于这一下抽打让他觉得很有人味。那材料是消音的。思考这件事他最好还是交给他们来做！他们强迫他去触摸那个物体。把尸体放在这样一个地方非常奇怪！“你要尽力去回忆！”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身上那些所谓的特征让别人认出了他。

他们让他跨越一个障碍，要观察他的鞋底。他们之中的一个在数他眨眼的次数。如果这么详细地去描述一具尸体，那他不可能真的死了！他露出后悔的表情。他会对他们俯首帖耳的！当他端着一个装满水的茶杯时，手颤抖得更加明显。是什么让他在这种天气时还要跑到室外去呢？他无法再看着他们了。外面大街上有个女人在笑。他有权利撒谎。“那些站在对面的人向证人比划着嫌疑犯展示给证人的姿势和动作。”他的举止非同寻常。这个异乎寻常的态度归结于一种突然的死亡。与这种喊声相比，死亡的叫喊简直就是一种令人舒服的声音。“我没有杀过人！”

他们审视着他的反射。房间里灯火通明。他不能抱怨自己社交太少。一开始有人叫她的小名，可是因为她一次次地都没有回答，人们就用她的全名来喊她。他无法想像她的痛苦。“你早就该这样说了！”他已经到了如此地步，甚至根本再也没有必要尽力调动自己的意志去进行自卫了。就像在一部喜剧电影里，听到令人吃惊的消息之后过了一会儿，他们才又继续之前的动作。

他们越是一本正经地和他说话，就越发无拘无束地和他周旋。欲加之罪，他已经习惯了。她还想试图用大声喊叫来威胁那个不认识的人。他们听够了。他们直勾勾地盯着他，这依然帮不了他们。正当他准备要向他们坦白一些事情时，他们却那样激烈地冲他说起话来，弄得他就插不上话去。从她腿上那些已经干了的汗渍，他们认为她拼命地逃过生。突然有个陌生的声音加入到交谈之中。他避免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看。他们没有给他带来疼痛，而是不快。他们蔑视他，因为他不曾是凶手。他们嫉妒地观察着，他怎样站起身来。这不是他们最后一次看到他。他要让他们看到尽可能多的动作，因为那些都是一个自由人尽可以做到的。当他们给他打电话时，他插在口袋里的手都不会为之一动。走出去时，他把门开得老大。

当他走进电影院时，一个人影从角落里扑向他，并且把他的票撕碎了。

他错过了什么吗？

电子表显示的时间比他手表上要晚一些。她的手指甲颜色已经变黑了。

他突然站住不走了。

她睡得太安静了。

这个麻袋就是一个人。

现在！

10　真相大白前的宁静

在真相大白之前，谋杀故事开始围着自己绕圈子。一切通过描述已经熟悉的东西，还要从头到尾再演绎一遍。所有可能的关系都要再次讲述。怎样可以将那一个个事件错位的图像安排得让人一目了然呢？

每个物体都会被再次追问它的故事。为表现在一个物体上每个特别的、不同寻常的状态都要寻找出故事来。

努力确定每个物体的故事，它与那些别的故事一起就会产生那个惟一可能的事实。

描述进行到这里，通常都会出现地地道道的宁静。从外部来看，不再发生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这种描述是对思想的描述。那些指向谋杀的物体一再相互关联起来，并且彼此交换。每个物体都会受到审视，看它是否在自己的位置上。每个现在不在原来位置上的物体都会受到审视，看它是以何种方式变换了自己的位置。

这里显现出来的秩序无疑就是表象。要寻找的是那个隐藏起来的矛盾。寻找那个被忽略的信号。有什么东西不能衔接在一起呢？哪一个人是因为一句话或者一个动作而暴露了自己呢？那些始终让人不安的孤零零的物体之间的联系在哪儿呢？

对于给自己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来说，那些物体显现出最大可能的混乱。他所思索的每个状态都好像已经最终定性了。他面对这些物体无能为力。这个案件似乎已经终结了。当然情况是这样的，让他所看

到的不过是些尚不完整的句子，其中始终缺少的是那一个词。某些东西被遗忘了。有一个细节的意义没有被认识到。

那个当事人对他所发现的事情一再念叨个不停，就是现在要来说明自己回避了什么不说。这只是涉及到一个细节。因为缺少了这个细节，每个物体看起来都是独立存在的。

在讲述了所有那些故事以后，展现在他面前的那些物体便处在彻底的宁静和平静之中。这样的宁静和平静激起了他那难以平静的回忆。他的每个结论都找不到最终的结果，这让他陷入了混乱。他之所以陷入混乱，这是因为，虽然所有的物体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但他却觉得它们乱七八糟，一团混乱。

在谋杀故事中，真相往往都是因为一次偶然的事件才大白的。真相大白是这样出现的，犹如在描述着一个个科学发现一样。在一次日常行为中，那个当事人突然发现了什么东西。一件发生在他身上不顺利的事导致了这个发现。也许朝着一个不同寻常的方向看一眼，或者偏离开那习以为常的路，或者在不同寻常的时间醒来，这就足够了。

案件的真相大白不是通过思考得来的，而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来自于外部，通过偶然。他必须时刻做好这样的准备。

当真相大白突然出现时，他会吓一跳。在谋杀故事中，真相大白之前，会出现成堆的句子，它们只是由名词构成的。然而，在谋杀故事中，后来依然不会描述，真相大白究竟发生在哪里。而只会描述的是，这个当事人发现了它。从此之后，描述只表现那些由于真相大白而出现的行为。故事进行到这里，虽然人们知道这个当事人在那些物体之间建立起了一目了然的关系，但是要说出这些关系，那就得等到揭开真相的那一刻。

从发现的那一刻起，对循环往复的思想的描述就变成了对行为的描述。从发现的那一刻起，所有的思想都沉默了，无论如何在谋杀故事中如此。直到揭开真相，谋杀故事就只剩下情节了：

再也没有什么东西看起来比空虚的游泳池更空虚的了。

他仔细地记下自己的回忆。一个手指头弯曲得特别厉害。他错过了往天花板上看的时机。看到尸体，他退后了几步。这些物体之间形成了一个角度，其中必有特殊的缘由。他试着想像，事情曾经发生过。由于不舒服，他的呼吸变得没有节奏了。那张报纸停留在它被扔去的那个地方。每个可能的故事都无休无止，没有结果，这让他感到迷惘。那些他所熟悉的细节表明了谋杀，就好像它是在没有谋杀犯的情况下发生了似的。当他的手按下门铃按钮时，房间里的物体都没有动静了。那座椅靠背向前倒在了方向盘上。在那些百叶窗叶片之间，出现了一个浑圆的小洞。她虽然受到了惊吓，但是她手里盛满水的杯子没有溢出一滴水来。那拨火钩突然又出现在了原来的位置上。那把刀子上的鸡毛让他觉得很好笑。透过那厚厚的玻璃，他观察着那一个个听不到声音的动作，那是等待的人群听到死讯后做出的反应。当他看到自己的脸时，立即就可以想像出很久以前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可当他看着**她的**脸时，却根本想像不出在他看到她的这一刻之前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门底下的缝隙够宽的，那股细流不用引导就可以流出来。那辆自行车倒卧在那里的样子，仿佛是它自行倒下的。有好几个百叶窗同时放了下来。她竭尽全力，抓着死者膝盖摇来摇去。帘子下面肯定没有露出鞋子来。两人都喝了死者生前最喜爱的饮料。那些假窗还真的就是假窗。泡沫在障碍物前堆成一团。脸上那奇怪的污渍让死者看上去像活着一样。那条腿奇怪地拧着。因为第一声炸响显得无关痛痒，所以第二声传来时就再也没人抬头张望了。有人伸着两只血淋淋的手冲进房间里。那只猫在地上留下了湿乎乎的足印。为什么她始终都不愿意摘下手套呢？当他走到大街上时，被一辆货车那敞开的黑乎乎的货箱吓得退了回来。他尽量避免去看那双靴子。有人替死者挂上了话筒。那条毛巾刚刚被人用过。他要是起码能够把那种气味说成是甜的就好了！他第一次觉得这些物体真的不会说话。他关上那一扇扇门，费了太多的时间。当他摘下话筒时，在听筒里只听到了一声很响的喘气声。他会是从报纸上得到这个消息的吗？因为那条蚯蚓身上沾满了沙子，想必附近就有沙子。你听到的真的是结结巴巴的声音。在这个时刻，没有人会想到什么行为规范。他们都奋不顾身地扑向她的财产。在子弹从门里穿出来的地方，木头都劈开了。由于害怕，他失去了重心。那个倒在地上的垃圾桶表明是惊慌逃走的。那个水果无疑是后来弄碎的。清洗剂也无济于事。他靠着那只伪装的脚站过。当他用手挤压水中的海绵时，再也没有细小的气泡冒上来。大家一下子都散开了。他放弃了要扣上大衣的想法。一团泥巴从高处扔到了大街上。那个蹒跚走动的人两手再也够不到头了。手指

痉挛般抽搐。他一直都在怀疑，连这谋杀都只是要把他从什么更糟糕的事上引开来。一扇百叶窗曾经打开过一条缝。栽倒时，他还尽量不让自己显得可笑。桃子靠近核的那部分果肉已经干了。挤压时，香烟的盒子裂开了。听到这声爆裂，每个人都在瞬间把眼睛闭上了。为什么她在谋杀发生之后将头发染了？他栽倒在地上，只有一个突发心脏病的人才会这样栽倒在地。那张报纸并没有在他身上展开来。那只被追赶的猫的眼睛滴溜溜地转动着。电话里传出的声音突然被忙音打断了。惊吓给他身体指了一个方向。她的瞳孔跳动过。他竭力要捡起那张纸时，手指甲都划出血来了。他听到一个响声，就像受惊的马发出的叫声。他用剃须刀片在绳索上刮过，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当他用力地拉开车门时，有个东西迎面倒下来。雨停之后，一点风也没有了。只有一个方向他们没有看过。在一团混乱之中，他打眼就看到了一个人影，可紧接着就再也看不见了，真让他失望。他听到了血在血管里奔涌着。听语气，那个声音是冲着一个孩子或者一个物体而去的。他穿了一条没有卷边的裤子。这个杀人犯的人性就表现在他那一个个拼写错误上。在这个和谐的房间里，每个动作和每个声音都是从那些之前的动作和声音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可是因为这一声叫喊，突然有几个自然的动作和声音被跳了过去。一开始有好多人都觉得那是冲着自己来的。在一片寂静中，在他还没有想到苦杏仁这个词之前，就已经闻到了它的味道。那些动作是被告的动作。一位后来的人高兴地冲进门来。那个绝望的人显现出梦游者的神态，让他难以忍受。谋杀发生之后，那些先前准备出售的商品还一直堂而皇之地摆在桌子上。由于惊吓，本来温热的水都让他觉得滚烫。这些事实总括在一起也仍然不能得出那个事实。没有人会料到这样的场景。随着惊吓而来的是对于惊吓的尴尬。尽管他们都十分安静，可是他们的在场仍然打扰了他。那个孩子手里抓着一把气球向他跑来。当凶手弯起手指时，想必他已经挺过了死亡的恐惧。停在那里的汽车，发动机仍然开着。他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的。他想找个能隐藏起双手的地方。当他把刀子从木头里拔出来时，木头发出了响声。牙刷毛朝上留在那里了。由于拥挤不堪，所以被害人死后好一会儿才倒在地上。报纸层层叠叠地滑到了街道上。血先从耳朵里涌了出来。他简直无法用什么词来描述。他只是走开了一步，可是回来时却有了很多新消息。他先是蹲着，之后就倒下了。他不用去看，也能判断出来房间里躺着个死人。

在他还没有意识到真相大白之前，他的身体就已经感觉到了。他思索的那些物体突然好像变得发疯似的。他的呼吸变得紧促了。那个

软乎乎的水果从他的手里掉下去。他把自己遇到的不幸又重新演示了一遍。他平时从来都没有仰着睡过觉！他踩到了花园的皮管子上！洗发膏从软管中流了出来。钟表的指针可能被每个人拨过了！

他正好扶住了落地灯。

他找不到火柴盒。他被绊了一下，他猜那是个障碍物。他用手指尖伸进口袋里，以免弄脏了衣物。他立即就清醒了。

原来他是忽视了这一点！

那双靴子里还热乎乎的——

从手套里探出的拇指尖——

杂物间门上来回晃动的挂锁——

牙齿上的口红——

臭水沟里的一绺头发——

百叶窗——

夜里灯火通明的空房间——

垃圾桶——

碎石砌成的小屋——

捉迷藏游戏——

乳头——

晾衣夹——

按钮——

就是这一个个物体。

在真相大白的那一刻，他吓了一跳，仿佛那谋杀又一次发生似的，而他眼睁睁地看着。

他穿上大衣准备离去。

11　真相大白

描述真相大白具有描述谋杀的形式。而在此之前，要描述的是最大可能的秩序。这样一来，由于真相大白所引起的无序便会越发凸现出来。也就是说，要再次专门描述的是那些有序的东西。

对于这个后来加入其中的人来说，秩序再次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展现出来，因为他最后会让案犯真相大白。当下的秩序越有游戏性，越无忧无虑，真相大白的效果也就越发明显：游戏作为秩序的特殊形式又发生了。

在这场游戏中，每个参与者都只专注于眼前的事情，而丝毫不去考虑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真相大白就发生在一场庆祝活动之中或者娱乐的过程中。它就发生在平平常常的活动之中。

真相大白之所以产生影响，是因为它打断了那些事件的进程，首先是对所有未参与其中的第三者是一种干扰。也有这种可能，人们一开始会以为它是游戏的一部分。就连那个被揭露的人自己一开始也试图把真相大白当做玩笑看。他甚至以游戏的态度参与到真相大白的过程之中，因为他开玩笑般地坦白出某些东西。他也以游戏的态度询问他自己一同参与过的这个故事的一个个细节，就像一个说了梦话的人问别人，他到底都说些什么呢。

他的一个个问题和这个后来加入其中的人的一个个回答是如同一场问答游戏开始的。这个游戏似乎从一开始和事实真相毫不相干，并且只是作为一种假设发生的。然而，它们后来在潜移默化的过渡中逐渐转化成一种严肃的审讯。在这个过程中，严肃的转折点只有在事后才会确定。

一开始是那个嫌疑犯提问，现在一下子是另一个人提问。

真相大白不是以暴力形式发生的，而是依靠技巧。案犯说漏了嘴。

对于那些到此为止还将信将疑的听众来说，他说漏嘴的那一刻就是十分惊讶的一刻。就像是在谋杀现场一样，他们都退缩回去了。就连揭露了凶手的那个人也吓了一跳。虽然他确信此人有罪，可是现在，当这个被揭露的人亲口坦白出来时，连他也觉得这真相大白不在情理之中。

在吃惊之后的一瞬间，真相大白会对所有的人带来尴尬。在谋杀故事中，那个被揭露的人则利用这种尴尬再次来迷惑公众。他控制住了公众。一旦公众落入他的掌控，他也可以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他做着各种准备，要使那些在场人的证词变成不可能。而与此同时，他也澄清了那些尚未澄清的问题。就像谋杀故事的规则所要求的那样，他提到了自己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因为按照他的想法，他的听众中再也没有人可能会有机会把听到的东西告诉别人。

然而，后来却表明，无论如何在这个故事中如此，就连这个过程也属于那个揭露凶手的人所采用的技巧。

正因为如此，他才落入对手的掌控之中，好让这个对手变得一清二楚。不过他预先已经考虑到了，凶手再也无从下手了。比如说，他用来威胁的武器，恰恰不是对着那武器的方向，而是突然威胁着**他**。

他试图逃跑或者干脆放弃。

如果他要逃跑的话，在谋杀故事中一般都会以他的死亡而告终。而凶手的死亡则终结了这起案件。

因此，在对真相大白的描述中，会澄清那些在人们的想像中难以再完美的种种关系。再也不存在什么秘密。之前那些过程和状态之所以表现得那样地模糊不清，是因为以此便可以提出那个询问明确结果的问题。现在所有的过程和状态都一目了然了。每个问题都有了自己的答案。再也没有什么疑惑了。所有内在的东西都浮出了水面。物体和人之间的所有关系都得到了澄清和确定。每个行为都可以从开头追

踪到结尾。每个被描述的物体都和另外一个被描述的物体相关。每个人都和另一个人相关。每个确定的物体都和一个确定的人相关。每个确定的人都和一个确定的物体相关。再也没有什么身份、来历和动机是模糊不清的。

在谋杀故事中，之所以容忍了无序，是因为在这个故事中，最终肯定会出现秩序，即使这个秩序通常都令人失望：

“这看起来像一个孩子，尤其是你要经常呼叫他才行！”

他在人群中自由自在地活动着。在所有的声音中，他最先听到的是叮当声。他自己动手去拿饮料。她向他投来毋庸置疑的一瞥。他斜抓着酒杯。直到现在，他还一句话没说过。他屏住呼吸，等待着自动点唱机的第一声音乐。他没有观察任何人。只要灯光一亮，他就试图去跟自己对面那个人握握手，可是灯光一再那么快地暗下来，他一次次都抓空了。当他想要伸手去拿那个酒杯时，有人抢在他的前面，可是当那个人看到他也伸过手去拿那只酒杯时，手又缩了回去，随之两人没能达到默契，谁该去拿那只杯子，最后，一个第三者把那只酒杯拿走了。他试图躲开迎面走过来的那个人，可是却躲到了和那个人同一个方向，于是他现在又躲到另一边去，可是那个人此间也已经躲到这个方向上了。他站在门前，用手抓着门框，就像是个推销员。他径直向房间里面走去，没有左顾右盼。当他从背后叫他时，他一动不动地站住了，或者是迅速地转过身来。这里没人能逃得出去。

他试来试去想把那根蜡烛立起来，可它就是不肯立着，这又让他几次犯难。正好轮到他时，瓶子却空了。看样子，他很久都没有拿过什么东西了。他的手指一次次地从开关上滑落。躺在地上的这个男人是谁呢？他一直在把玩那个晃来晃去的花瓶，直到它倒下去。他喝得越多，就觉得那些物体越圆滑。他看到了就连在梦里都没有见过的东西。他试图就像无意间一样将酒杯碰倒，并且立刻接住它。可是他还没有开始做起来，先于这个“无意”的“怎么做”却让他不知所措。他盯着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所有的评论都是针对那些说话人所看到的东西。只要人家跟他搭话，他都给出十分理智的回答！他向自己对面那个人打听着他自己正好想知道的事。他也为交谈助绵薄之力。两

人都想抢先坐到空着的椅子上去，同时又不想让对方看出来。当他无意间掠过那把刷子时，给那些站在周围的人脸上溅上了水珠。那软乎乎的黄油慢慢地从刀子上滑落下来。他在所有的口袋里找一块手帕。他用一只劈开的手指甲抚摸着那个女人的后背。当另外一个人弯下腰时，他也弯下身子。他在一块肉上闻来闻去，它成了一个逗乐的玩意儿。他打消了敌意，笑起来了。当那只苍蝇爬到杯子边缘时，他又把它赶回去。

他绊了一跤，有个硬邦邦的东西从他西装上衣的口袋里掉了出来。他向那位女士解释说，她的丧服使得她与众不同，让人感觉很舒服。如果他注意到了他，他也不会表现出来。他打着哈欠，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他的手指摸索着，在皮肤上碰到一块不平的地方。当他要和另一只手达成默契而去扶住倒下的物体时，他的动作显得那样笨拙，让所有的人都觉得碍手碍脚。他需要两只手，可是一时又找不到把手里的酒杯放下来的地方。居然有一个指甲没有剪！当他抱歉地耸起肩膀时，碰到了人家从身旁端过的托盘。

他好像总是冲着什么东西走过去，可是每次又都拐了弯。当他想放下手里的杯子时，可那护垫不翼而飞了。他远远地问候一个自己根本不认识的人。他站在队尾上，可是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他前面那些人根本就不是站队的。他把一个物体咬在牙齿之间，好让自己至少空出一只手来。他为那位女士打开门，可是她却从侧门走出去了。他问候谁，谁就跟他身后的人打起招呼。他用手里的刀子把领带拨正。他没有告诉任何人，隔壁房间里躺着一具尸体。

有一个人，他们不会再问起他。

大伙都聚集在一起。

他那么快地向门把手抓去，手都打滑了。他久久地把玩着手里的一个物体，因为他找不到放的地方。只要他一动，周围那些物体也就动起来。他想去跟她握握手时，却抓空了。他一再将错误的盖子拧到罐子上。所有的座位都有人了。虽然他描述不出他的长相，可是他会认出他来的。没有人看到他时心里会想什么。他跟人死死地握手，这对他有所暴露。他是如此的不明智，所以他只好跟自己一个人玩来玩去。他注意到自己是第一个使用这个物体的人。他背靠墙站着。他突

然使劲地揉起自己的鼻子。那个靠垫慢慢地倒下来。真相大白通常都发生在密闭的空间里。

他的目光无法从她身上移开。那个握在手里的桃核慢慢让他感到不舒服。那条挂在墙上的花园水管显得与其他陈设格格不入。当他用头指向它时，她点了点头。“为什么您现在才告诉我呢？”他随时准备着，万不得已时立刻停止笑。他由着它靠近自己。他一边徒劳地忙着打开瓶子，一边漫不经心地跟她聊着天。他想把书重新插回去，却没能成功。那些寻找的人离得越近，这个被藏起来的物体就越来越大。她的鼻子让他回忆起死亡。要是他执意坚持说出最后那句话的话，那么他就会默默地承认，他认为自己有罪。

他一直盯着一块空荡的地方，可是那里突然出现了一个身影，让他吓了一跳。他惊讶地看到壁纸上那块黑乎乎的污渍。如果他能猜到是谁在背后摸他，那他就赢了。他镇静自若地问起一把拨火钩。他想喊她却不知道她的名字。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曾经从一个垃圾堆旁走过。当他第一次当众说出那些话时，它们都成了错话。他追上去把她故意丢失的东西还给她。桌子上空出的地方让他吓了一跳。只是一眨眼的工夫，而一切或许都成了别的样子。

他打听这里有几个出口。这个房间里多了一个出口。他不敢再去触碰另外一个物体。他不高兴地坐到一边去，不过也不算太远，只要别人一叫他，他立即就能过来。这房间里摆着许许多多的物体，其背后很容易藏起身来。她请求他别再做进一步的描述了。他的视线已经模糊了。他就是一个劲地跟自己本人过招，他构不成任何威胁。突然他开始将自己和其他人区分开来。在游戏中，所有人都说是他们干的。

从那个被撞到肋骨的人缓慢的动作中，他觉察到，他们都要让对方注意到这个人。如果他说他知道这事儿，那只能表明，他并不敢肯定。他的所有举动都来得太晚了。他拿起帽子，却并没有走开。“您问得太多了！”听到可怕的响动，眼睛就会自动闭上，可是看到吓人的场景，眼睛就瞪得老大。这里每个人似乎都认为这种气味没什么特别。凶手被揭穿之前，不再描述所有与案情有关联的人。

他们请求他快点进入正题。他有意让水龙头的水滴滴答答地流着。当所有人都慢慢地不再说话以后，只有他还继续说下去。他试图给那只伸出去打招呼却被忽视的手追加上另外一个意义。对一个只有一个人可以回答的问题，却有几个人在回答。眼下的现实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他的一个个想像，那就是他再也无法忍受它，自己要努力去改变它。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他叉开双腿站立。每个动作现在都可能是致命的。“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他示意的那个人并不是在游戏中摸过他的那个人。出于放松，他们不得不摆弄着那些物体。他们盯着他，好像他是个怪物。另外那个人做出一副高兴的表情。推销员说出的那些话突然间跟摆放在这个房间里的那些物体不再有任何关联了。第一瞬间，他们只是觉得受到打扰了。他一直还以游戏的口气在说话。他手里那些多余的东西扭曲了他所说的话的含义。它们不是用来开这样的玩笑的。他用手里举着的杯子指向案犯。

当他刚才还想像的事情变成现实时，他自己吓了一跳。那个嫌疑犯背对着其他人站着笑起来。推销员仍然保持严肃的神情。大家都原地一动不动。在这样的时刻，他居然绊了一跤，只有孩子们觉得好玩。名字还没有说出来。“您的想像力可真丰富啊！”这时做出一个动作来或许会让人怀疑。那个被揭穿的人的脸上露出轻松的表情。那一个个回答像连珠炮似的。在这个房间里，他和旁边的人之间的距离突然变得比其他所有人之间的距离都要大。他承认自己有罪。有人呼着全名跟那个被揭穿的人搭话了。“我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呢？”推销员讲起那个故事来。在这个故事中，终于一个接着一个句子出现了。那个被揭穿的人的脸虽然没有变样，但是脸色却变样了。他摆脱不掉那种气味。所有人依然期待着，这样的真相大白要么是误会，要么还不是最终的真相大白。那个被揭穿的人好像在一起玩着游戏。听他们说话的口气，仿佛他们在排练着各自的角色。“然后我在逃跑途中把靴子扔掉了？”推销员小心翼翼地啜饮着酒水。他第一个觉察到那个胖孩子那毫无意义的悲伤。这孩子受到嘲笑靠墙站着。那个被揭穿的人禁不住满脸都在冷笑。尽管他们大家都希望揭开谜底，可他们却又感到失望，因为真相大白以后谜语本身也就不复存在了。“我怎么会如此靠近了他，而又没有被他发现呢？”那个被揭穿的人突然窜来窜去。“谁都别想活着离开这个房间。”

他们无言地相互对视着。由于受到惊吓，豆大的汗珠吊在下巴上。衣服在那些受到威胁的人身上瑟瑟发抖。那个被揭穿的人一边朝着他们走过来，一边不停地吹着欢快的口哨。他可以活动的自由空间还不够大，他难以彻底施展出生杀大权在握的架势。他们都简直不敢相信。反正他到了孤注一掷的地步。他们注视着他，就像注视着一个无可救药的人一样。他们退向墙边，相互挤作一团，脚上踩来踩去。他关注着他们做出的每一个动作，并且伴随着自己的一个个动作。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突然轻声说起话来。他用空着的那只手在身后摸着去抓住门把手。他握着武器的方式透露出了他的绝望。“是我干的，是我干的，是我干的！”

一切都呆在自己那毫无意义的地方。一开始，那个被揭穿的人感到颇为尴尬，就这样在人群中被人揭穿了。他事先就激烈地行动起来，好让他们也跟着动起来。“我是迫不得已，只能杀了她！”通常情况下，被揭穿的人都经历过一段痛苦的青春。“在逃跑的路上，我把那只手套弄丢了！”只要他还站在地面上，他的笨拙就没有危险。因为手里拿着酒杯，所以他们无法把手臂举起来。那个孩子在武器的游戏范围内动了动。那种气味是绝对不会弄错的。直到此刻，还没有人习惯了事态的严重性。恐惧使他们彻底麻木了。他的眼神里出现了朦朦胧胧的东西。“我从一个死人跟前跑开了！”他让大家都把鞋子脱掉。他把帽子歪戴在头上。他们默默无声地看着他。第一把抓向那个期待的物体，却落空了，第二把随之又抓去了。突然间，他们听到了他的呼吸声。他毫无用处地张开嘴巴。在大声呼喊之后，他突然不动了。推销员倒在一旁。那个凶器蹦蹦地掉地上。“你完蛋了！”他们都玩累了。

这期间，饭菜已经凉了。这是案犯的声音！那个被揭穿的人无法退后一步。那些散步的人感到很吃惊，一边是一丝不动的墙体突出部分，一边是那个身影突然地动作，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个身影是从突出的墙体后面闪现出来的。当他用干巴巴的指尖抚摸干巴巴的掌心时，他禁不住浑身打起颤来。推销员几乎是满不在乎地打落了他手里的刀子。那个被揭穿的人不停地摸着那个疼痛的地方。片刻间，危险的是，大家都不把这个故事当真。他变得健谈起来。他现在还可以够得着那扇自动关上的门，现在还有机会，现在还有机会，现在还有机会，可是现在为时太晚了。他心不在焉地笑起来。沙发下面露出两只光着的脚来。个个都在期待着现在发生什么。那个孩子的眼皮不像成

年人那样频繁地眨动。他尴尬地跳动着。“他先是朝着那个吓人的地方看去，然后又把目光移开了。”一扇窗户挑衅似的大开着。

他开始动起来，仿佛他要试探自己似的。他咬着下嘴唇。也许这个威胁只是一个试探。眼睛随着脑袋一起转动。嗡嗡的声音是一台摄像机发出的。

“您站在那里别动！”

他们迈开大步朝他走去。

他跳起来，他以为自己是从二楼跳下去的，而他实际是从一楼跳出去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在关键的时刻没有想起那个正确的词语来！

发动机已经启动了，逃跑准备就绪了。

当他将众人推到旁边时，激起了大家的不满。看样子，就像他们两人相互在挑逗似的。每个人都指着另一个方向。“你放我过去吧！”为什么没人开枪呢？那个隐藏起来的人听到那些搜寻的人有说有笑的。当他说出真相时，大家都多么激动啊！他站在两个互相喊话的人之间。那辆车子的左前灯没了。当他提问时，周围的孩子们都在糊弄他。在奔跑的过程中，那些不断变换的画面让他觉得像是在梦中一样。她动起来是多么的美啊！人们轻蔑地看着他们。大衣里的钱包沉得要命。那个逃跑的人流起鼻涕来。成年人都想这样啊！墙边有个人在探头探脑。他不会跑远的。

他动得太早了。当他从藏身之处走出来时，一开始没有人看出他就是那个藏起来的人。他横穿过房间。篱笆太高了。

下雨了，所以他不会有事的。

他将上衣从肩膀上脱下来，就像他再也感觉不到威胁一样。他不知道，他疼得该把手放到哪儿去。

他**渴**了，所以他不会有事的。

他藏起了双手。有个人胳膊流着血，从他身边跑了过去。突然冒出来很多人。

天**晚**了，所以他不会有事的。

只有**一个**动作是指向他的。那只手变得大得可怕。“我要死了。”他做了一个分腿跳。他抬起左边的肩膀。他惊恐的样子吓坏了一只动物！他一边跑一边以自己为轴心转着圈。他本来不想伤害任何人。

他甩起胳膊。现在他觉得害怕也毫无意义了。

他感到了**疼痛**，所以他不会有事的。

当他死的时候，对于观众来说他早就死了。

那些随后参与其中的人已经辨认不出他来。突然间，每个过程都无法停止了。他想让整个世界跟他一起同归于尽。一切都在严格地按部就班进行着。他蜷缩在一个并不存在的角落里。他不情愿地抬起了头。那个纸袋子不肯从他的脚前离去。一堵横着的墙！他已经再也没有时间变成自己了。有人递给他一把椅子。他竭尽全力，试图再次吸入空气。他挣扎着装死了。人们已经在议论他了。他挠着！他死了，就像走路时鞋带慢慢松动了一样。如果真下过雪的话，这会儿雪也停了。

12　秩序的最终回归

如果这个案件不复存在的话，那么谋杀故事就会回到现实中去。为了勾画这个现实，其日常性就会再次得到一一陈述。这里要表明的是，它不再提供什么故事。一切都井然有序，就算什么东西无序的话，那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去描述的。由于谋杀而引起的偏离现在被清除了。所有的东西又各就各位，或者在自己的方向上移动着。那个几乎没有澄清的谋杀已经过去很久了，它已经不再是真实的了：

孩子们已经在玩杀人游戏了。

（1967年）

监事会的欢迎词

贾晨　译

先生们，这里天寒地冻，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解释这种状况。一小时前，我从城外打来电话，询问会议的准备工作是否一切就绪，可是电话无人接听。我很快赶到这里寻找门卫。可我既没有在门房里找到他，也没在楼下的地下室或者大厅里看到他的踪影。最后，我终于在这个房间里找到了他的妻子。房间里很黑，她坐在靠门的一张凳子上，双手从背后抱着脖子，将头深深地埋在两膝之间。我上前询问她出了什么事。她一动不动地回答我说，他们的一个孩子刚才在滑雪时被一辆汽车碾死了，她的丈夫出去了，因此这里的房间没有供暖。所以，我也请求在座的各位原谅，我报告的内容，不会太长。如果各位能够将椅子稍微往前挪挪，可能会更好些，这样我不必大声嚷嚷大家也能听见了。我不想发表什么政治演讲，只想给各位报告一下理事会的经济状况。我很抱歉，窗户的玻璃在暴风雪中打碎了。为了阻止雪片吹进来，在各位到来之前，我和门卫的妻子虽然用塑料袋修补了窗户的破损处，不过这项工作——正如各位所看到的——并没有十分成功地阻挡住雪片。希望雪片吹进来的嚓嚓作响声不会妨碍各位认真倾听我陈述结算审核结果。当然，在这方面，各位完全不必担心，我可以保证，理事会的上层领导一定会秉公执法，按章操作。（假如有人听不到我的讲话，劳驾将座位往前挪一些。）我不得不在如此的情况下问候大家，对此我深表歉意。倘若不是暴风雪袭来，那个孩子就不会滑雪橇，更不会滑到汽车前面出事。之前，当那个女人用线绳在窗前扎塑料袋时，她告诉我说，事发那会儿，她的丈夫正在收拾储藏煤的地下室。突然，她听到下面传来她丈夫的吼叫声，那时，她正在会议室里摆放会议用的椅子。这个吼叫声——正如她自己所说——令她良久伫立，侧耳倾听。不一会儿，丈夫出现在门口，手里还提着装煤的煤桶。他的目光转向一旁，低声吐露出这个噩耗，第二个孩子带回来的消息再次证实了这个噩耗。由于各位的名单在门卫那里也有一份，因此，我要向到场的各位，在座的每一位表达我的问候。我指的是：到场的各位，在座的每一位。（外面风在作响）我感谢大家，在这样的数九寒天里顶风冒雪来听我的报告，这一路确实也不近。也

许，各位在路上可能会想，即刻将踏进一间温暖的屋子，雪片被窗户的温度融化，大家可以围坐在暖和的炉旁取暖。然而，各位现在依然裹着大衣坐在桌子前，更别说房间里放着暖炉了，就连大家刚进门走向椅子时从脚后跟磕掉的雪都还没有融化。我们只看到墙上一个黑色的洞。在这个房间里，在这所荒凉的房子里还有人居住时，那里曾经安放过取暖炉子的锡管烟囱。我感谢大家，尽管如此，各位依然来到这里。我要向各位表达我的谢意和问候，欢迎各位，非常欢迎各位！首先，我要向那边坐在门口的那位先生表达我诚挚的问候，您现在所处的这个黑暗的位置，正是之前那个门卫的妻子坐过的地方。我问候并感谢这位先生，几天前，这位先生接到了关于会议通知的挂号信，并得知将在报告中对理事会的结算审核结果加以公布，他也许认为此事无关紧要，尤其在这样一个数日鹅毛飞雪的寒冬腊月，然而他随即也意识到，理事会的上层可能出了问题：房梁似乎在嘎嘎作响。我说，他也许也觉察到，房梁在嘎嘎作响。不，嘎嘎作响的不是理事会的房梁。（真抱歉，外面好厉害的暴风雪。）他上路了，迎着风雪，冒着严寒，从城外出发前往这里；他必须在下面的村庄里停放汽车，之后沿着一条狭窄的小径来到上面的这个房子。中途，他坐在一家客栈里阅读报纸上关于经济领域的报道，直到报告快开始。沿途上，他在森林里遇到了另一位同样赶来听报告的先生：那人靠在十字路标上，一只手扶稳帽子，另一只手紧紧握着一只冻硬的苹果，前额和头发上都落上了雪。我刚才说：他头发上落满了雪，并且啃着一只冻硬了的苹果。之前那个先生来到他身边时，他们互致了问候。接着，第二个先生把手伸进大衣的口袋，随即掏出一只冻硬的苹果递给之前的那个先生。这时，暴风雪把他头上的帽子掀了起来，两个人应声而笑。是的，他们两个人都笑了起来。（请各位再往前挪动一点，否则大家就完全听不到我说话了。因为房梁仍然嘎嘎作响，注意，我指的不是理事会的房梁。大家每个人都将有权得到决算年度的份额，关于这一点，我想在今天这个不同寻常的会议上通知各位。）当这两位先生顶风冒雪共同前进时，在下面的村子里，载着其他几位先生的豪华轿车也已经抵达。这几位先生身上厚重的黑色大衣在寒风中轻微飘摆，他们站在车的背风处打量着眼前那摇摇欲坠的农舍，思索着要不要上去。我刚才说：农舍。尽管，面对眼前的路，他们无疑也在犹豫和踟蹰，但最终有一个人还是成功打消了另外几个人的担忧，让他们不要担忧理事会的现状。他们在客栈阅读了经济报告之后，便蜷曲双腿，上路前行，来到了这个报告厅。他们对理事会真诚的担忧指引着他们一步步来到了这里。一开始，他们用脚使劲在雪地上踏出一个个

清清楚楚的脚印，后来便愈加疲倦地一步步拖腿前行，渐渐地在身后形成了一条路。其间有一次，他们还驻足回望，想着返回到谷底停车的村庄：阴霾昏暗的天空中，雪片盘旋着落在他们身上。他们望着前方一个接一个向后延伸的脚印，心中猜测着脚印的缘由：这是那个门卫的脚印，在他听到孩子的噩耗时一路奔跑留下的；他曾多次面朝前跌倒，也没用手去做身体的支撑来保护自己；他曾多次僵直地躺在冰冷的雪地上，倒在寒冷中；他几次在跌倒后用颤抖的手指抠入积雪；他几次在摔倒后用舌头舔着苦涩的雪片；他无数次对着那狂风暴雪的天空，仰天长啸！我重复一遍：那个农夫无数次对着那狂风暴雪的天空，仰天长啸。他们也看见了两排脚印，通向前面上方的摇摇欲坠的农舍，这是之前那两个先生留下的。这脚印，是他们谈论理事会状况和通过新股份发行上涨的资金时留下的；是他们咽下玻璃般硬的绿苹果时留下的；是他们迎着风雪前进时留下的。最后，终于所有人都来了，来到了这间房子，当大家迈进敞开着的房门时，已经是夜里。先前的那两位已经坐在那里，膝盖上像现在那样放着便签纸，手指间摆弄着铅笔。你们等待着，等着我宣告报告开始的欢迎词，以便你们能够记录。我向在座的各位致以问候，并感谢各位的到来：当大家记录我的讲话的同时，我要问候那两位在来听报告的路上啃起冻苹果的先生；我还要问候另外四位先生，在你们风尘仆仆地开着豪华轿车，行驶在积雪覆盖的路上赶往村庄时，你们的轿车撞死了农夫的儿子：农夫的儿子，门卫的儿子（梁木现在嘎嘎作响，农舍房顶的梁木在嘎嘎作响，这是厚重的积雪所致。嘎嘎作响的不是理事会的梁木，结算结果显示正常，上层运作也一切正常。梁木弯曲作响的原因只是因为天花板出了问题。）我还要感谢那个农夫为此次会议所做的一切。几天前，他为了粉刷这个房子，搬着一架梯子，从下面的村庄攀登到这间房子。他把梯子扛在肩上，用弯曲的手臂将它扶稳，左手提着一只装满石灰的桶，桶里插着一把破了柄的刷子，他等孩子们用雪橇将堆至与窗户齐高的木头运到院子后，就开始粉刷墙壁。这位农夫一手提桶，另一手搬着梯子，步履艰难地向上攀爬，孜孜不倦地为报告做准备工作；孩子们叽叽喳喳地用雪橇运走木头，为他们父亲的刷墙工作开辟道路，扫清障碍；孩子们的围巾在风中摇曳着。现在我们仍然能看见地面上白色的圆圈彼此交叠：那里便是农夫曾经放桶的位置，每当他爬上梯子，粉刷下一处时，便把桶放在下面形成白圈；门口的黑色圆圈，即现在夹杂着灰尘的雪片吹进房间的地方，是农妇在吃饭时端来的盛着热汤的锅留下的印记：接下来，他们三人坐在地上，或者蹲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把勺子浸在汤里，大吃起来；在这时候，农

妇站在门口，胳膊虚搭在马甲上，哼着关于雪花的民谣。孩子们迎着歌声按节拍拖起步子，脑袋也跟着有节奏地晃动。（我请求各位，千万不要感到丝毫不安：对于理事会，没有什么理由好担心的。大家听到的嘎嘎声，是房顶的梁木发出的，那是因为房顶上积雪太厚，压得房顶嘎嘎作响）。我感谢那个农夫所做出的一切。倘若不是因为他的孩子在下面的那个村庄被车碾死，他应该就会在报告现场，那样他就能听到我的问候，我也就会问候并感谢那个农妇，同样也会问候那些孩子们，并衷心地感谢他们为会议所做的一切。我尤其感谢在座的各位并向你们致以问候。但是，我请求大家，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别动，以免大家走动的脚步加剧屋子的晃动。好厉害的暴风雪啊！我刚才说：好厉害的暴风雪啊，请大家安静地呆在座位上。我感谢你们每一个人的到来并向你们致以问候。只是房梁已嘎嘎作响，我说过，房梁已经嘎嘎作响。我说过，你们应该安安静静地呆在座位上，以免房子坍塌。我说过，我已经说过，你们应该安安静静地呆在座位上。我说过，我已经说过，我已经告诉过各位，你们应该待在座位上！我问候你们！我说过，我已经说过，我问候你们，问候你们每一个为股息红利而来的人！我问候你们每一个人！我问候你们，我……

（1967年）

一个农家保龄球道上有球瓶倒下时

谢莹莹　译

一个寒冷的冬日——那是十二月中的一天——两个正在柏林短暂逗留的奥地利人，一个大学生和他做木匠的弟弟，吃过中饭后在动物园站上了开往弗里德利希大街的城铁，他们要去东柏林探望亲戚。

到了东柏林，两人向经过车站的人民军士兵打听，在哪儿可以买到鲜花。其中一个士兵告诉了他们，但他并不回头也不用手给他们指路，而是紧盯着两个新来者的面孔看。还好，两个人过了街很快找到花店了，其实，在车站出口处就可以看到花店的，回想起来，向人询问纯属多余。两人在花店里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买盆栽还是鲜花，这期间，店员招呼其他客人去了。虽然店里盆栽的花不少，而鲜花只有黄色和白色两种菊花，他们最终还是选定了鲜花。大学生比较能言善道，他让店员选黄白各十朵菊花扎好，并且花不要开得太大。木匠捧着这一大把花，小心翼翼过了街，再走过一条地下通道到车站另一边的出口处，那儿是出租车候客的地方。虽然已经有好几个乘客在等车，电话柱上叫车的铃声也不断响着，不过没有司机去理会。他们两人还是没有多久就坐上了出租车，他们是惟一没有大包小包拿着行李的客人。坐上车，大学生把地址告诉了司机，那是东柏林城北区。司机关了收音机。车子走了一段时间后，大学生才注意到收音机没有声音。

他往旁边看了看，发现他弟弟过分小心地用双臂抱着花。他们没有什么交谈。司机没有问他们从哪儿来。大学生有点懊悔，只穿了没有厚衬里的夹大衣就踏上旅途，靠下摆的地方还掉了一粒扣子。

出租车停下时，外边显得比较明亮。大学生已经习惯车内的环境，望着车外，一下子难以看清外边的东西。他十分吃力地发现，街

道的一边是一些小菜园，园里有低矮的小棚屋，街道另一边的房子离街道比较远，即使近一点的，也很低矮，看起来也很费劲。小树和一些灌木上都披着白霜，怪不得外面忽然变得那么亮。司机应乘客的要求开发票，不过他找发票本找了半天，大学生因此可以从车窗向外仔细观察他们要拜访的人家的窗子。这条街平时少有出租车开过，出租车，特别是停在这儿的出租车，肯定会引人注意的。难道他们的姑姑还没有收到他们昨天从西柏林发出的电报？窗子后头没有人露脸，也没有人开门。

大学生一边把发票折好，一边下车，他弟弟捧着花，笨拙地跟在他后面下车。大学生突然觉察到自己用一根手指拨开额前的头发。他们走进前院，向着门口走去，门上挂着的门牌号正是大学生以前曾经写信给姑姑时所写的号码。他们犹豫不决，不知道由谁按门铃，还在商量着时，终于其中一人按下门铃了。听不见屋里铃声响，他们两人退到门口阶梯下离门稍远的地方。木匠从花束上取下大头针，不过没有打开包着花的纸。大学生记得从前他还收集邮票时，姑姑在每封信里都夹了东德发行的纪念邮票寄给他。他们两人还没有听见屋里的铃声响，门忽然咔嚓一声开了。当门开了一条小缝时，两人才听到铃声，进屋后好久，铃声还响个不停。进屋后在楼梯口两人傻笑了一下，木匠把包花的纸拿下塞进口袋里。上面的门打开了，至少应该是这样，因为当两人走上楼梯可以向楼上望去时，见到姑姑已经站在开着的门往下瞧呢。从这个女人见到他们后的表情可以看出她没有收到电报。姑姑叫了一声格里高尔——那是大学生的名字——就立刻跑回屋里，很快又出来了，两人还没有上到楼梯口的平台，姑姑已经拥抱了他们。她的举止让大学生忘了所有应守的礼数，呆呆地看着她。不知道是太惊讶或是其他原因，她的脖子变得特别短。

她回到屋里，打开所有的门，连床头柜的门也打开了，并且关上一个窗户。等到她从厨房出来时，才发觉还有一个客人，就是刚才在过道上把花送给她的那个人，他现在百无聊赖地站在房间里。大学生告诉姑姑，这是她另外一个侄儿，以前她去奥地利度假时曾经见过的，姑姑的反应是：一语不发到另一个房间去，让两个客人在相当窄小刚刚随便收拾了一下的客厅里站着。

她回到客厅时，外边天色已经有点暗下来了。姑姑拥抱了他们两人，对他们说，在门外，还在楼梯上时，汉斯——木匠的名字——吻

了她的嘴，她就觉得奇怪。她让两人坐下，将咖啡桌四周的椅子摆整齐，一边找着花瓶。她说，还好，今天她买进了蛋糕（大学生奇怪她用“买进”一词，而不用“买”），这么贵的花！门铃响的时候，她正好躺下要睡午觉。“那边”——她说话时，大学生眼睛望着外边——“是个养老院”。你们两人会在这儿过夜吧？汉斯说，他们刚在西柏林吃过午饭，且一一道出吃了些什么，现在真的不饿。他说话时，手放在桌上，于是妇人看到汉斯被电锯锯掉一截的小指头，那是他有一次做工时不小心发生的事情。她没让他把话说完，就告诫他，既然自己曾经弄伤过膝盖，以后做工的时候就该专心一些。大学生的大衣在过道上已经脱下了，看见他背后的床铺，就是妇人刚才还睡在上面的床铺，就感觉更冷了。她注意到他的肩膀冷得缩在一起，就说，冷的时候她自己就躲到床上去，边说边把一块电暖器片放到大学生背后的床上。

厨房里的水壶已经响了半天了，但响声好像没有变大，是否他们两人起先没有注意到水壶响？反正无论怎么样沙发扶手是冷的，连沙发的套子都是冷的。大学生双手捧着咖啡杯，过了一会儿他自问，为什么想到用“无论怎么样”这样的词汇？妇人猜测着大学生脸上的表情，快速地往他的咖啡里加牛奶，大学生说的下一句话是，原来房间里有台电视机，妇人自然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行事，她手上还拿着牛奶瓶，便一步跨到电视机前，把电视打开了。这时大学生低下头，看见咖啡上面结着一层奶皮，那奶皮肯定是很快结成的。他注意到弟弟的咖啡同样是这样，是的，事情一定就是这样的。从现在再开始，他注意不再把看到和听到的在谈话中说出来，害怕妇人又把他说出的事实拿去解读。电视机开始发出沙沙声，但是声音和影像尚未开始清楚出现，妇人便已经关了电视，坐到他们身边，一下看着这个，一下看着那个。可以开始了！大学生发现自己半开玩笑半迷糊地说出这句话。他本该先吃一口蛋糕，蛋糕还在嘴里时喝一口咖啡，但他先喝了一大口咖啡，自然没有吞下去，而是含在嘴里，所以当他张口吃蛋糕的时候，液体就流回杯里了。大学生先前半闭着眼睛，可能这是他弄错次序的原因，可是当他张开眼睛的时候，看见姑姑看着汉斯，他正笨拙地用整只手抓了一把巧克力饼干很快地塞进嘴里，就在妇人的目光下。“这简直令人不敢相信！”大学生叫起来了，其实说这话的是妇人，她说的时候一边指着床头柜上的书，那是一位著名外科医生的传记，大学生很快地纠正了自己，书签是一张小小的圣徒像。没有理由不安了。

三个人开始聊天已有一会儿了，就好像他们并非在桌旁或随便哪儿坐着，两弟兄也不像刚进门时那样老是交换目光，聊天时间越长，环境对他们两人就越显得自然。“自然而然的”这个词汇在他们的聊天中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姑姑说的话，大学生很长时间觉得不可信，不过现在随着房间的温度逐渐升高，他可以在想像中写出妇人说的话，写出的话在他看来是可信的。房间仍然很冷，连已经不那么热的咖啡都在冒气。自相矛盾的现象越来越多，这想法在大学生脑海里闪过。外边没有汽车开过，而姑姑说的话多数以“外边”开始，直至大学生打断她的话，不过当妇人停顿时他马上就道歉，说他打断她的话不是自己想说什么。现在没有人想第一个开口说话了，其结果就是停顿，木匠突然打破沉默，他说起不久就要参加奥地利联邦军队。因为汉斯说的是姑姑不熟悉的方言，她听成了“从匈牙利来的Stukas[3]”，于是大叫起来。大学生用了好几回“外边”这个词使她安静下来。他注意到，从这时开始，每当他说一句话时，妇人立刻就跟着说一遍，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这还不够，大学生刚开始说几个字时她就点头，于是大学生也渐渐变得没有把握，有一次话说一半就停下，结果是姑姑善意地微笑着，接着说声“谢谢”，好像他帮助她解开了字谜似的。事实上大学生在这之后看见窗台上的一份东柏林的报纸《柏林晚报》，那上面的字谜格子有许多还没有填。他很好奇，请姑姑让他看看字谜，他用的词是“überfliegen”[4]，不过当他看到字谜所问不过也就是通常出现的那些，稍微不同的只有一个，问的是“近东一个有侵略性的国家名称”，于是把报纸递给他弟弟。虽然弟弟上午已经猜过西德《星报》上的字谜了，可是马上就很想猜这张报上的字谜。不过，使他不舒服的不是汉斯寻找铅笔的举动，而是现在空荡荡的窗台。他有点不耐烦地让弟弟把报纸归位，他还没有说出口就觉得“归位”这样的措辞很可笑，所以就没有说出来。他站了起来，说想四周看看，说着就走出门去。他纠正自己说，其实是姑姑走了出去，他跟出去的，声称要看看其他房间。不过事实上，大学生想起，“声称”一词，是刚才电视开着时德意志广播电视台的播音员用的，其实根本没有人说起过那个词。

到处一片相同的景象。“到处一片相同的景象。”妇人给他打开房门时说。大学生回答“这里边也冷”。“那里边。”妇人纠正他。“你们在外边这儿做什么呢？”汉斯问，他手里拿着有字谜的报纸跟着他们去走廊上了。大学生说：“我们还是进去吧！”汉斯问道：

“为什么？”“因为我这么说了。”大学生回答说。其实没有人说过什么。

姑姑重复说客厅还有点咖啡等着他们喝，大家回到客厅，厨房里传来锅子的碰撞声，如同神秘的森林深处农家保龄球道上球瓶倒下的声音。注意到这个比喻，大学生问姑姑，她生活在城里，怎么会想到这样的比喻。他这么说的时候，同时想起诗人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5]在一封信里也用过同样的措辞。当然，那儿的比喻是邀请人参与诗人协会，与这儿厨房里的锅碗碰撞声传到客厅的比喻不可同日而语。

因为大学生侧头仔细听着，所以这位不断解释两位客人举止的姑姑说她要到阳台上给鸟儿撒点蛋糕屑。她快速地抓了一把碎屑到另一房间去，在那儿她抱歉地喊道，她得经过那个房间才能到阳台去。大学生现在注意到，刚才厨房里锅子的碰撞声比喻的是鸟儿，妇人在阳台上预先摆放了空的烤盘，鸟儿跳来跳去，徒劳地用喙在空盘子上啄来啄去。两个人看着姑姑像是理所当然地在阳台上的动作感觉到有点生陌生。之所以陌生，那是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姑姑在外边，而他们坐在里边看着，这是一出罕见的表演。当变得不耐烦的汉斯一再问“房屋突出的部分”用什么词可以表达时，大学生吓了一跳。这时，正在照片簿上找一张照片给大学生看的姑姑回答说“阳台”，大学生没让姑姑把话说出口就及时插话说“Erker [6]”。他大吸了一口气，直到放松下来。又顺利过关了！一张纸巾立刻把溢出的咖啡吸干了。

即使他们没有说出来，其实他们三人都一直想着送电报的邮差，邮差到现在还没有来。不过事情明摆着，今天都快临近黄昏了，姑姑还没有去看信箱呢。她让汉斯拿着信箱钥匙下去看看。他手中拿着钥匙的样子多奇怪啊！大学生想。什么事？姑姑困惑地问。不过汉斯手上拿着钥匙回到客厅了。“一个工人在一间客厅里！”大学生喊道，他想开个玩笑。没有人反驳他。大学生想，这不是什么好兆头！那只他到现在都没有注意到的猫摩擦着他的腿，好像为了安慰他。姑姑想起一位妇人，她的名字她一时想不起来，那是一位老妇人，姓名带有贵族称号。幸好奥地利取消了姓名中的贵族称号。

此时外边天色暗下来了。大学生上午在《法兰克福汇报》上看到一首日本诗，是关于黄昏的。“四周的昏暗随着火车尖锐的呼啸声显得更加深沉。”火车尖锐的呼啸声使四周的昏暗更加深沉。没有火车

开过这一带。姑姑试了好多不同的名字，汉斯和格雷戈尔一直注视着她。最后她把电话机拿到桌上，手放到电话机上，自然是还没有拿下听筒。她蹙着眉头，还在按照字母顺序拼读寻找那个忘却的名字。当她对着听筒说话时，大学生也还注意到，她点头示意，让他看看她手上拿着的一张他小时候的照片，“在照相馆里父母身边坐着”，手中拿着一个皮球。

“跑着、拿着、吸着……”每当大学生看相片或者图像时，他想起的总是动词的这种形式，现在也一样：“在相册里，坐在父母身边。”

姑姑在电话里起先以“您”称呼对方——这让大家感到轻松。听筒放在耳边等了一会儿后，她忽然间改用“你”，这让大学生吃了一惊，汗珠立刻从腋下冒出来，汗水让人发痒，他挠着痒时，深信弟弟跟他一样，因为他也在腋窝下狠抓。没有更多的事发生了，只不过接到电话后，姑姑的弟弟和弟媳从东柏林另一个区动身，不久就到了，为了来看从奥地利来的侄儿，他们并没有在底下按铃，而是像熟客一样敲门进屋。妇人从有阳台的房间里拿来两张沙发请新来的客人坐，接着到厨房为大家泡茶。厨房里响着锅子的碰撞声，叔叔患有哮喘，拼命拍打胸口，他的妻子不久就开始谈起西柏林的学生。她说，恨不得抓住他们的头发，一个个吊起来。大学生从洗手间出来了，手变得很干燥，不得不向姑姑要润肤霜。妇人又按照自己的意思解释了他的话，为大学生连同他的弟弟一起喷了“托斯卡”香水，这正是那位她记不起名字的老妇上次带来的。最后，该离开的时候到了，他们两人只被准许在东柏林逗留到午夜。叔叔打电话叫出租车，当然没有人接电话。虽然这样，先前发生的一切慢慢地使大学生安静下来了。大学生和弟弟已经穿上大衣，和姑姑走到过道上了，手中还握着电话筒的叔叔和婶婶留在客厅里。手已经放在门把上，他们还等了一会儿，看看是否有出租车回话。他们已经下楼了，姑姑走在中间，当

没有什么“当”。

姑姑的手插在他们臂弯里，三个人一起走到电车站，牙齿冷得直打颤。他们没有零钱，姑姑塞给他们几个硬币好买车票。电车到站了，他们为了能够及时到达弗里德里希站一边很快上车，一边与姑姑告别。

当大学生觉察到他们并没有上车，已经为时太晚了。

（1969年）

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

张世胜　译

“守门员眼看着足球滚过球门线……”[7]

当安装工约瑟夫·布洛赫——他以前是个著名的守门员——上午去报到上班时，他得知被解雇了。至少布洛赫将下面这件事情理解成了这样一个通知：当他出现在工厂门口时，工人们都在那里站着，只有正在吃早餐的工头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他就离开了建筑工地。他在街上举起手臂，但从他身边开过去的汽车——尽管他根本不是为了叫出租才举起手臂的——不是出租车。后来他听到一个刹车的声音，布洛赫转过身去，他身后停着一辆出租车，出租司机嘴里咒骂着。布洛赫再次转过身，上了出租，让司机开往纳什市场[8]。

那是一个美好的十月天。布洛赫在一家摊铺前吃了一根热香肠，然后从很多摊铺中间穿过，往一家电影院走去。他所看到的一切都让他感到烦心，他试着尽量少去注意。在电影院里他松了口气。

事后他觉得很奇怪，当他一言不发地将钱放在售票处的转盘上时，女售票员似乎自然而然地对他的表情回应出另一个表情。他注意到银幕旁边有一个电子钟，钟面上有亮光。在电影放映中间，他听到了一声钟响；他很久都没有搞明白那是电影里的声音，还是外面纳什市场旁边教堂钟楼上传来的声音。

又到了街上，他给自己买了些葡萄，这个季节葡萄特别便宜。他继续往前走着，一边还吃着葡萄，把葡萄皮吐在地上。他去询问的第一家旅馆把他拒绝了，因为他随身只带着一个公文包；第二家旅馆在背街一条巷子里，门房亲自把他带到楼上的房间里。就在门房还在往外走的时候，布洛赫就躺到了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

晚上，他离开了房间，把自己灌醉了。后来，他又清醒了，就想给朋友们打电话；由于他的这些朋友都不住在城区，而电话机又不把硬币退出来，很快布洛赫就没有零钱了。他向一个警察打了个招呼，

以为能让他停下来，但警察并没有搭理他。布洛赫在想，警察是不是没有听懂自己在街道这侧冲他喊叫的话，然后又想着女售票员如何自然而然将装着电影票的盘子转向他的。当时他对那个动作的速度感到很吃惊，几乎都忘记从盘子里取出电影票。他决定去找那个女售票员。

当他到电影院时，那些橱窗正好暗了下来。布洛赫看到一个男人站在一架梯子上，把今天放映的电影的名字换成第二天的。他等了一会儿，直到他能够看到另一部电影的名字；然后他就回旅馆了。

第二天是个星期六。布洛赫决定再在旅馆里呆一天。除了一对美国夫妻外，他是早餐厅里惟一的客人。他听了一会儿他们的谈话，因为他以前曾经跟着球队到纽约去参加过一项锦标赛，他勉强能够听懂他们的话。然后他很快就走出旅馆，去买几份报纸。因为是周末版，那些报纸都特别沉。他没有把它们叠起来，而是直接夹在胳膊下拿回旅馆。他又坐回先前的早餐桌，有人已经把它收拾好了，他把那些广告副刊取了出来；这让他很抑郁。他看到外边有两个人拿着厚厚的报纸走在街道上。他屏住呼吸，直到他们走了过去。现在他才注意到他们就是那两个美国人；刚才只是在早餐厅里看见他们坐在餐桌旁，等到他们到室外后他没能认出他们来。

他在一家咖啡馆里花了很长时间喝自来水，那是他们盛在杯子里跟咖啡一起端上来的。他时不时站起来，从专门用来摆放杂志的那几张椅子和桌子上取出一份画报。当那个女服务员从他身边拿回那堆画报时，她用了“报纸桌”这个字眼。布洛赫一方面很难忍受翻看那些杂志，另一方面，他在彻底看完一本杂志前也不能把它放到一边去。他时不时稍稍朝街上看两眼，画报页面和外边不停变化的画面所形成的反差让他觉得轻松。往外走的时候，他自己把那份画报放回桌子上。

纳什市场上的摊铺已经关门了。布洛赫一边走着，一边不经意地将脚边被人扔在地上的蔬菜和水果往前踢着。在那些摊铺之间某个地方，他方便了一下，撒尿时，他发现那些木棚的墙壁上到处都被尿弄黑了。

他昨天早些时候吐出来的葡萄皮还在人行道上。当他把纸币放在收钱转盘上时，那张钱在转动时停住了，布洛赫有了机会能说点什

么。那个女售票员答了句。他又说了点什么。因为这不同寻常，女售票员就看着他。这就让他有了机会继续说下去。等他进了电影院之后，他想起来那个女售票员身边有一本小说和一个电炉子。他往后靠了靠，开始注意区分银幕上的细节。

下午稍晚一点的时候，他坐电车出了城，进了体育场。他买了张站票，然后却坐在自己一直没有扔掉的报纸上；前面的观众改变了他的视线，这并没有影响他。比赛中，大部分人都坐下了。布洛赫没有被认出来。他把报纸留在地上，又在上边放了一瓶啤酒，在终场哨声响起之前，他走出了体育场，以免待会儿太拥挤。体育场前停放着很多几乎空荡荡的公共汽车和电车——场内举行的是今天的重要比赛，它们都在那里等着，这让他很吃惊。他上了一辆电车。他在那里独自坐了很久，后来他就开始等待了。是不是裁判员给了加时？布洛赫抬头向上看去，发现太阳开始落山了。他没有想要用这个表达什么，他低下了脑袋。

车外突然刮起了风。几乎就在三声长音组成的终场哨声响起的同时，司机和售票员都登上了公共汽车和电车。人们从体育场里涌了出来。布洛赫想像着，自己似乎听到了很多啤酒瓶掉在球场上的声音；同时，他还听到灰尘拍击车窗的声音。先前在电影院的时候，他往后靠，现在，当观众挤进电车车厢的时候，他往前俯身。他觉得似乎体育场里刚刚打开灯光设施。瞎扯，布洛赫说。他以前在灯光球场是个糟糕的守门员。

在城里，他费了好长时间找电话亭。等他找到一个空电话亭时，发现那里的听筒已经被扯断了，丢在地上。他继续往前走，终于在火车西站打了电话。因为是星期六，他几乎没找到人。后来，他以前认识的一个女人接了电话，他说了好一阵子，她才知道他是谁。他们约好在火车西站附近一家饭馆里见面，他知道那里有一台自动点唱机。他往点唱机里扔硬币，让其他人选歌曲；他就这样消磨着时间，一边等着那个女人。在这期间，他看着墙壁上足球运动员的照片和签名。几年前，一个国家队前锋租下了这家饭馆，后来他去了海外，执教那些野蛮的美国联赛队伍中的一支，联赛解散后他就不知去向了。布洛赫跟一个姑娘聊上了，她坐在点唱机旁边一张桌子旁，胡乱伸手向后抓去，总是选着同一张唱片。她跟着他离开了饭馆。他想要跟她走进最近的一个门洞，但是那些大门早就全都关上了。等到他们打开一扇

大门时才发现，依照歌声判断，第二道门后面正在举行祈祷仪式。他们走进位于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之间一部电梯里，布洛赫摁了顶楼的按钮。电梯还没有上行，那个姑娘就又要出去。布洛赫摁了二层的按钮，他们在二层走出电梯，站在楼梯间里。这会儿那姑娘变得温顺些了。他们一起沿着楼梯往上面爬去。那部电梯停在顶层那儿，他们走进电梯，下来了，然后又回到街上。

布洛赫在姑娘身边跟她一起走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身往回走，去找那家饭馆。那个女人已经在等他了，身上还穿着外套。布洛赫对那个姑娘的女友说——她还在点唱机边的桌子旁等着——那个姑娘不会回来了，然后他跟那个女人离开了饭馆。

布洛赫说："我觉得自己很可笑，你穿着一件外套，而我却没穿外套。"那女人钻进他怀里，傍在他身上。为了伸出胳膊，他假装要给她指什么东西看。然后他却不知道该让她看什么。他立刻有了一个愿望，想要买一份晚报。他们穿过好几条街道，没有看到卖报纸的人。最后，他们坐公共汽车去了火车南站，但是那座火车站早就关了。布洛赫假装吃了一惊；而实际上他也真是吃了一惊。那个女人在汽车里就已经打开手袋，把玩着里面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向他暗示：她不自在。他对她说道："我忘了留张纸条给你。"但他并不知道他自己想用"留"和"纸条"表达什么。不管怎么样，最后他独自上了一辆出租车，往纳什市场方向去了。

由于电影院星期六有夜场，布洛赫甚至来得还太早。他走进了附近一家自助餐厅，站着吃了一份肉饼。他试着在尽量短的时间里给那个女服务员讲一个笑话；等时间到了后，他的笑话还没讲完，他在一个句子中途停了下来，付了账。女服务员大笑起来。

他在街上碰到了一个熟人，那人想问他要钱。布洛赫骂了他一句。当这个喝醉了的男人抓住布洛赫的衬衫时，街道暗了下来。那个醉鬼吃惊地松开了手。布洛赫知道电影院的灯箱广告会暗下来，他很快走开了。在电影院前，他遇到了那个女售票员；她正要上到一个男人的车里。

布洛赫朝她看过去。她已经在副驾驶位置上坐下了，她对他的目光有所回应，其方式是，她在座位上把身下的连衣裙拉直了；至少布

洛赫把这个动作理解为一种回应。没有发生什么事件；她把车门拉上了，轿车就那样开走了。

布洛赫回到旅馆。他发现旅馆的大堂还亮着灯，但空无一人。当他从挂钩上取下钥匙时，从格子上掉下来一张纸条。他把纸条打开，那是账单。就在布洛赫手拿账单站在大堂里看着门边惟一一口箱子时，门房从库房里走了出来。布洛赫马上向他要报纸，同时眼睛还看着敞开着的通往库房的门，显然门房刚才在从库房里搬出来的椅子上睡了一觉。门房把门关上，这样一来，布洛赫就只能看到一架放着一只汤碗的活动梯子。门房走到自己办公桌后边才开始说话。但是，布洛赫已经将关门理解为一个否定的回答，于是他沿着楼梯走上自己房间。在相当长的过道里，他只看到有一扇门前有一双鞋。他进到房间之后，没有解开鞋带就把鞋子脱了下来，也把鞋子放在门外。他躺到床上，立刻就睡着了。

半夜里，他被隔壁的争吵声吵醒了一会儿。可能也只是因为他的听觉被突发而至的清醒弄得紧张了，以至于他将隔壁的声音当成了吵架。他用拳头砸了墙壁一下。然后他就听到水管里的流水声。水又被关上了。安静了，然后他又睡着了。

第二天，布洛赫被房间电话给吵醒了。人家问他是否还要住上一晚。就在布洛赫看着地上的公文包时——房间里没有摆放箱子的地方，他马上说了声“要”，然后就把电话挂上了。他从过道里取回鞋子——可能因为今天是星期天，鞋子没有擦过。之后，他就离开了旅馆，连早饭也没吃。

到了火车南站，他在厕所里用电动剃须刀剃了胡子。他在其中的一个淋浴间里冲了个澡。他一边穿衣服，一边读着报纸的体育版和法制报道。过了一会儿，就在他还正读报时——淋浴间里相当安静，他突然觉得很舒服。他已经穿好了衣服，就靠在自己那个淋浴间的墙上，用一只鞋踢着木凳。这个声音引发了外边的淋浴间女管理员的一声询问，由于他没有回答，她就来敲他的门。布洛赫还是没有回答，那个女人在外边用一条毛巾（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抽打了门把手一下，然后就离开了。布洛赫站着将报纸看完了。

在火车站前面广场上，他遇到了一个熟人，那人正要坐车去郊区给一场低级别的比赛当裁判。布洛赫把这个消息当做了玩笑，也跟着

开起了玩笑，他说，那他自己也可以马上跟着一起走，好去当个边裁。就在那个熟人已经打开他的海员背包[9]，给布洛赫看了看里面的一套裁判服和一网兜柠檬时，布洛赫还跟刚才对待裁判的第一句话一样，把这些东西也当成了开玩笑用的道具，他继续跟这个熟人开着玩笑，他说，既然他跟着一起去，就该马上替他背起那个包。甚至在已经跟熟人坐在开往郊区的火车里、背包已经放在膝盖上时——再加上时间是中午，车厢里几乎没人，他仍然还觉得自己只是在开玩笑。但是，空荡荡的车厢跟他这种不严肃的举动有什么关系，布洛赫却没能搞清楚。这个熟人背着帆布包去郊区，而他——布洛赫——跟着一起去，他们一起在城边的饭馆吃午饭，然后一起——如布洛赫所说的那样——到“一座名副其实的足球场”去。当他独自坐车回城时——他不喜欢那场球赛，这些事情在他看来对双方都是作假。这一切全都是违例的，布洛赫心想着。幸运的是，他在站前广场没有碰到谁。

在公园边上一个电话亭里，他给前妻打了个电话。前妻说，一切都好，但没有问他什么。布洛赫很不安。

他在一家花园咖啡馆里坐下，尽管季节不对，但这家咖啡馆还在营业，他要了杯啤酒。过了一会儿，仍然没有人把啤酒送来，他就走了。那钢桌台上没有铺桌布，刚才把他的眼睛给晃了。他在一家饭馆的窗前站住。里面的人坐在一台电视机前。他观察了一会儿。没有人朝他转过来，他继续往前走了。

他在普拉特公园[10]跟人打了一架。一个家伙从身后把他的夹克拽了下来，另外一个家伙将布洛赫的脑袋往下猛按。布洛赫稍微弯下身子，踢了前面那个家伙一脚。后来，那两个家伙将他逼到一家甜品铺子后边，把他打倒在地。他倒了下去，他们走了。布洛赫在一间厕所里把脸和衣服洗干净了。

在二区一家咖啡馆里，他玩起了台球，直到电视里该播体育新闻了。布洛赫让女服务员打开电视，但他并没有看，似乎那一切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他邀请那个女服务员跟他喝点东西。当她从后边的房间——那里面正在玩一种被禁止的游戏——回来时，布洛赫已经站在门口了。她从他身边走过，什么也没说。布洛赫走了出去。

他回到纳什市场，在看到那些摊铺后边堆得乱七八糟的果蔬箱子时，他又觉得，那些箱子似乎也是一种玩笑，不是认真的。就像没有

言语的笑话！布洛赫心想着。他很喜欢看没有言语的笑话。这种作假和装模作样的印象："这种把裁判哨子放在海员背包里的装模作样！"直到他进了电影院才消失。电影里有个喜剧演员在路过一家废品店时似乎顺手拿起一只小号，然后自然而然地想要吹起来。布洛赫毫不作假，明白无误地认出了这只小号，也认出了所有其他物件。他安静下来了。

看完电影后，他在纳什市场那些摊铺中间等电影院的女售票员。最后一场电影开始一会儿之后，她从电影院里走了出来。为了不吓到她，他没从木棚间朝她迎过去，而是仍然坐在箱子上，直到她走到纳什市场稍微亮堂一点的地方。在一间被弃用的摊铺里，在耷拉下来的波纹铁皮后边，有部电话响了起来。这家摊铺的电话号码大大地写在铁皮上。"空号！"布洛赫马上想到。他走在女售票员身后，没有撵上她。当她登上公共汽车时，他正好赶上，在她后面上了车。他坐在她对面，但中间还隔着几排座椅。等到下一站有人上来并阻挡住布洛赫的视线时，他才开始考虑：她虽然刚才看见他了，但没有认出来。他是不是在打了一架后变了样子呢？布洛赫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他看了玻璃窗一眼，想知道她正在干什么，他觉得很可笑。他从外套内侧口袋里抽出报纸，低头看着上面的字母，但并没有读报。然后，突然间，他在读报的过程中又回过神来了。一个目击证人讲述了一个皮条客被人近距离对着眼睛开枪杀死的情况。"他脑袋后边飞出来一只蝙蝠，朝壁纸撞了过去。我的心怦地一跳。"文章没有重新起另外一段，后面的句子就直接开始讲完全不相关的其他事情了，他吓了一跳。"这个地方本来必须另起一段啊！"布洛赫想，在惊醒之后他很愤怒。他沿着中间的通道向女售票员走去，在她斜对面坐了下来，这样她就能观察到他。但是，他自己没有看着她。

他们下车时，布洛赫发现，他们已经到了很远的郊区，到了机场附近。这会儿是晚上，那里非常安静。布洛赫在那个姑娘身边走着，但不像是想要陪伴她，更没有真的陪着她走。过了一会儿，他碰了碰她。姑娘停了下来，也碰了碰他，非常有力，让他吃了一惊。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她的手袋比她本人更让他觉得熟悉。

他们并排走了一会儿，中间有点距离，没有互相碰着。在楼梯间里他才又碰了她一下。她开始跑了；他走得慢了点。等他到了上面

时，他认出了她的房子，房门大开着。她在黑暗中弄出了点动静，让他知道她在哪里。他朝她走了过去，他们立刻就开始了。

第二天早上他被一阵噪音弄醒了，从房子的窗户向外看去，他看到正好有一架飞机在着陆。飞机上的定位灯不停地闪着，这才让他想起来把窗帘拉上。因为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开灯，窗帘就一直开着。布洛赫躺了下去，闭上眼睛。

闭起眼睛后，他突然觉得没有想像的能力了，这很少见的。尽管他试着用各种各样的图片来想像房间中的东西，但他什么也想像不出来，连他刚刚看见那架着陆的飞机也想像不出来，飞机在跑道上发出的轰鸣声，他现在还能从以前的经历中辨认出，那种声音他几乎可以在想像中再现出来。他睁开眼睛，朝放着小灶台的那个墙角看了一会儿：他记住了茶炉和挂在洗碗池边的干花。他几乎还没有闭上眼睛，那些花和那个茶炉就已经想像不出来了。他想出个救急的法子，他为这些东西造句，不再用单个的字眼，他以为用这些句子组成的故事可以帮助他想像出那些东西。茶炉叫了起来。花是一个朋友送给姑娘的。没人将茶炉从电炉子上取下来。“要我泡茶吗？”姑娘问道。这一点帮助也没有：等到没法忍受时，布洛赫睁开眼睛。他身边的姑娘还睡着。

布洛赫变得神经质起来。一方面，当他睁开眼睛时，这个环境里的情形让他觉得很是咄咄逼人；另外一方面，当他闭上眼睛时，这个环境里的物件所对应的那些单词给他带来的影响更加严重地咄咄逼人。“这是不是因为我刚刚跟她睡过的缘故呢？”他在想。他走进卫生间，冲了很长时间的淋浴。

当他再出来时，茶炉真的叫起来。“你冲澡把我吵醒了！”姑娘说。布洛赫觉得，好像她是第一次直接对他说话。他还没有完全醒来，他回答说。茶壶里是不是有蚂蚁？“蚂蚁？”当滚烫的开水从茶炉里冲到壶底的茶叶上时，布洛赫看到的不是茶叶，而是蚂蚁。他以前曾经将沸腾的水倒在蚂蚁身上。他又把窗帘拉开了。

由于光线只是透过茶罐的小圆洞照射进去，里面的茶叶在茶罐内壁的反光中显得非常特别。布洛赫坐在放茶罐的桌子旁，直盯盯地往茶罐的开口里面看着。他居然对茶叶那独有的亮光这么感兴趣，这让他饶有兴致，同时他还跟姑娘说着话。最后他将盖子按在开口上，但

同时也停住不再说话了。姑娘什么也没注意到。“我叫格达！”她说。布洛赫根本就不想知道这个。她是不是什么也没注意到？他想。但是她已经放了一张唱片，那是首意大利语歌曲，伴奏用的是电吉他。“我喜欢他的嗓子！”她说。布洛赫对意大利流行歌曲一窍不通，他沉默着。

在她出去买早餐那点时间里——“今天星期一！”她说——布洛赫终于能够静静地看看所有的一切了。吃饭时，他们说了很多话。过了一段时间后，布洛赫发现，她在说起他刚刚讲给她的那些东西时，就好像都是说着她自己的东西似的。相反，他在提到她刚刚讲过的那些东西时，却要么只是小心翼翼地引用她的话，要么在用自己的话述说时，每次都会在前面加上一个令人诧异和拉开距离的“这个”或“那个”，仿佛他担心把她的事情说成了自己的。当他说到那个门房或者一个名叫施图姆的足球运动员时，她马上就能够如同知己地说出“那个门房”和“施图姆”。而在她提到一个名叫弗莱迪的熟人和一家名叫“施特凡地窖”的饭馆时，他在紧接着的回答中每次总会说：“那个弗莱迪？”和“那个施特凡地窖？”所有她提到的一切都让他没法搭话，而让他烦心的是，他所说的话，她都能毫无拘束地——这是他的印象——使用。

当然，中间也几次短暂出现这样的情况，谈话对他来说就像对她一样自然而然：他问，她回答；她问，他给出一个自然而然的回答。“这是一架喷气式飞机吗？”——“不是，这是一架螺旋桨飞机。”——“你住哪儿？”——“二区。”他差点还对她讲了打架的事情。

但是，后来这一切都让他越发感到烦心了。他想要回答她的问题，但却停住不说了，因为他认为他想说的都是她知道的。她变得不安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给自己找出事情做，时不时傻乎乎地微笑一下。她不停地转唱片和换唱片，就这样过去了一段时间。她站了起来，躺到床上；他坐到她身边。你今天要去上班吗？她问。

突然他扼住了她的脖子。他马上就紧紧用力掐牢了，她根本还没有来得及把这当成是玩笑。布洛赫听到外边的过道里有声音。他怕得要死。他注意到她的鼻子里流出了液体。她哼哼着。最后，他听到一个什么东西断裂一样的声音。他觉得，就像是在凹凸不平的田间道路上，一块石头突然打中了轿车底盘。已经有唾液滴到了油地毡上。

布洛赫的恐惧如此强烈，他立刻就累了。他躺倒在地上，无法入睡，也无法抬头。他听到有人在外边用一条毛巾抽打门把手。他仔细听着。什么也没有听见。也就是说，他刚才肯定是睡着了。

他不需要多长时间就回过神来了。在回过神来的第一刻，他觉得自己全身都是伤痕；就像是房间里有风似的，他想。实际上，他之前连皮都没有蹭破。尽管如此，他还是幻想着，从他的整个身体里涌出了一种淋巴液。他早就已经站了起来，用一块洗碗布将屋内所有的东西都擦拭了一遍。

他向窗外看去：下边有个人从草地上向一辆货车走去，他一只手拿着很多件挂在衣架上的西装。

他坐着电梯离开了那栋房子，向前走了一段时间，没有改变方向。后来，他乘坐一辆郊区公共汽车到了电车车站，并且从那里坐车到了市内。

等他回到旅馆时才发现，人家以为他不会再回来了，就把他的公文包收起来了。就在他付账时，那个年轻的服务员从库房里把公文包取了出来。布洛赫从一个浅色的圆圈上看出，包上面曾经放过一个瓶底湿了的奶瓶。在门房凑找头时，布洛赫打开了公文包，他发现他们还检查过包里的东西：牙刷柄从皮套里探出头来，小收音机倒在上边。布洛赫向服务员转过身去，但他已经消失到库房里去了。由于门房办公桌后面的空间相当小，布洛赫可以用一只手就把门房扯到自己跟前，吸了一口气后，他抽出另一只手假装朝门房的脸打过去。门房缩成了一团，尽管布洛赫根本就没有打中他。库房里的服务员没有什么动静。这时布洛赫已经拿着包走出去了。

他正好在午休前到了公司的人事部，拿回了自己的证件。布洛赫的那些证件没有准备好，他们还需要打几通电话，这让他觉得很吃惊。他请他们允许他打个电话，然后给前妻打了一个电话，孩子拿起听筒后就立刻开始说了早已会背的那句话：妈妈不在家。布洛赫立刻把电话挂断了。这时，证件已经给他准备好了。布洛赫把工资税卡装进公文包里。当他向那个女人询问还欠着的工资时，她已经走开了。布洛赫将刚才打电话的费用数了出来，放在桌子上，走了出去。

银行也已经关门了。于是，中午他就在一座公园里等着，一直等到他能从自己的往来账户里——他从来都没有过储蓄账户——把钱取出来。[11]由于他以为拿着这些钱还不能走到多远，他决定把那个几乎全新的晶体管收音机退回去。他坐着公共汽车去了自己位于二区的住处，还把闪光灯和剃须刀拿了出来。商店里的人告诉他，他们只能在他另外再买东西的前提下才能回收已经卖出去的东西。布洛赫又坐车去了自己的房间，用一只旅行袋装了两尊奖杯、一个小坠子和两只镀金的球鞋。那两尊奖杯当然只是真奖杯的复制品，是他的球队分别在一次锦标赛和一次杯赛中赢得的。

一开始，废品店里没有人，他把那些东西都取了出来，直接就放在柜台上。接着，他觉得就这样把东西放在柜台上太想当然了，好像它们已经确定要卖了似的，于是他又很快地把它们从柜台上拿下，而且又塞进旅行袋里。当人家问他要这些东西时，他才一一放回到柜台上去。他看到后边的架子上有一个八音盒，盒子上站着的是一个姿势平平常常的陶瓷舞女。跟以前一样，当他看到一个八音盒时，每次都觉得曾经看见过。他没有讨价还价，接受了人家给他的东西报出的第一个价格。

然后，他坐车去了火车南站，胳膊上搭着他从房间里取出来的一件薄外套。在去搭乘公共汽车的路上，他碰到了那个卖报纸的女人。通常情况下，他总是在她的报亭那里买报纸。她拿着一件皮衣，牵着狗走在路上。尽管在买报纸时，他经常会在她递给他报纸和硬币时眼睛望着她的指尖跟她说几句话，但她现在出了报亭后似乎没有认出他来；反正她没有抬头看，也没有对他的问候做出回应。

由于每天只有很少几趟火车开往边境，布洛赫为了消磨下一趟火车出发前的这段时间，就进了一家专放短片集锦的电影院，在那里睡着了。那儿有一次变得相当明亮，窗帘在拉上或者拉开时发出的刷刷声使他觉得近得危险。为了搞清楚那窗帘到底是拉上还是打开了，他睁开了眼睛。有人拿手电筒照到他脸上。布洛赫把这位领位员的手电筒从他手中打掉了，走进了放映厅旁边屋子的厕所。

这里很安静，阳光照了进来。布洛赫在那里静静地站了一会儿。

那个领位员跟在他后面进来了，他威胁说要叫警察。布洛赫拧开水龙头，洗了洗手，然后摁了一下烘手器的按钮，把双手放进热风

里，直到领位员走开为止。

然后，布洛赫开始刷牙了。他从镜子里看着自己如何一只手刷牙，另一只手轻轻地攥成了拳头，奇怪地放在胸口上。他听见放映厅里传来动画人物大喊大叫的声音。

布洛赫以前从一个昔日的女友那儿得知，她现在正在靠近南边国境线的一个镇子经营着一家饭馆。火车站的邮局里有全国的电话号码簿，他想在那里找到她的号码，但徒劳无获；从号码簿上能看出那个镇子有几家旅馆，上面没有店主姓名。此外，布洛赫一会儿就觉得举着电话号码簿太累了，那些电话号码簿挂成一排，书脊朝下。“脸朝下”他突然想到。一个警察进来了，要他出示证件。

那个领位员提出了控诉，警察一边这样说着，一边来回打量着，他一会儿看着布洛赫的护照，一会儿看着他的脸。过了一会儿，布洛赫决定道个歉。但警察已经把护照还给他了，还说了句，你可是去过不少地方啊。布洛赫没有看着警察离开，而是立刻把电话号码簿放下了。有人在大声喊叫。布洛赫抬头看去时，发现他前面的电话亭里有个来自希腊的外籍工人对着话筒大声地说着话。布洛赫考虑了一下，打算不坐火车了，他要改坐汽车。他把车票换好了，买了一块香肠面包和几份报纸。他出了火车站，向汽车站走去。

大巴已经停在那里，只是还关着车门。有几个司机站在离汽车很远的地方，他们说着话。布洛赫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有太阳照着。他吃完了香肠面包，但把报纸放在身边，因为他想把报纸留到路上那几个小时再看。

汽车两侧的行李箱还相当空：几乎没有人带行李。布洛赫在外边等了很长时间，直到后边的折叠门关上。然后他很快从前门上了车，汽车发动了。随着外边一声喊，汽车立刻又停住了。布洛赫没有扭头去看。一个农妇带着大声哭喊的孩子上来了。进到车里后，孩子安静了下来，汽车就出发了。

布洛赫发现，他的座位正好在车轮上方。他的双脚从在这儿拱起的地板上滑了下去。他坐到最后一排椅子上，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在那儿可以方便地扭头向车后看去。他坐下时，正好——尽管这什么意

义也没有——在后视镜里看到司机的眼睛。布洛赫利用将公文包放在身后要侧身的机会，朝车外看去。折叠门发出咔嗒咔嗒的巨大响声。

车里的其他几排座椅都向前，布洛赫前面的两排座椅面对面。在前后排就座的旅客在开车后几乎全都不再聊天了，而他前面的旅客不一会儿就又继续聊开了。那些人的声音让布洛赫觉得很舒服。他有机会倾听，这让他得到了放松。

过了一阵子——汽车已经开上了一级公路——在他身旁坐在角落的一个女人提醒他掉了几枚硬币。她说："这是您的钱吗？"一边还向他演示如何从椅背和椅座之间的缝隙里捏出一枚硬币。在两个座位之间，就在他和女人之间的地方还有另外一枚硬币——一个美分。布洛赫接下那两枚硬币，他回答说，肯定是刚才在侧身的时候掉出来的。由于那个女人没有注意到他曾经侧过身，就开始问他，布洛赫又回答了。慢慢地，尽管他们这样坐着说话并不舒服，还是聊了一会儿。

说话和倾听让布洛赫忘记了把硬币装起来。它们在他的手里变暖和了，就像人家刚刚把它们从电影院售票窗口推出来一样。硬币之所以这么脏，他说，是因为不久前还在球赛开始之前抛起它们挑场地来着。"我对这个一点都不懂！"女旅客说。布洛赫很快就把报纸打开了。"正面还是反面！"她已经继续在说了，布洛赫不得不又把报纸叠起来。之前，就在他往车轮上方的座位上就座时，外套早就已经挂在身边的衣钩上了。他往下坐去时动作过猛，扯着耷拉下来的外套下摆猛烈往下，外套的挂环都扯断了。现在，布洛赫坐在那里，外套放在膝盖上。在这个女人旁边，他无力抵抗。

公路变得坑坑洼洼。由于折叠门没有严实地关上，布洛赫看见外边的光线穿过缝隙在车里闪烁着。不用往车门上的缝隙那边看，他也能在报纸上看到闪烁的光线。他一行一行地读着。然后他抬起头来，观察前面的旅客。他们的位置离他越远，他对他们的观察就越舒服。过了一会儿，他注意到车里闪闪烁烁的光线已经没有了。车外已经黑了。

布洛赫不习惯去感知这么多的细节，他脑袋疼了，也可能是因为他带的那么多报纸的气味。幸运的是，汽车在一个县城里停了下来，

旅客们在一个休息区吃到了晚饭。布洛赫在外边稍稍闲转时，听到室内吧台里的自动售烟机不停地发出哐当的响声。

他在休息区的广场上看到一个有灯光的电话亭，汽车行驶过程中的轰隆声依然在他耳朵里嗡嗡叫个不停，电话亭前面的沙砾发出的嘎吱声让他很舒服。他将那几份报纸扔进了电话亭旁边的垃圾桶，然后把自己关在电话亭里。“我成了一个好的标靶！”他以前曾经在一部电影里听到一个夜间站在窗边的人说过这话。

没有人接听电话。布洛赫又来到外边，站在电话亭的影子下。他听到休息区拉上的窗帘里面赌博机发出叮叮当当声。他走进吧台才发现，里面几乎没人了；大多数旅客已经走出去了。布洛赫站着喝了一杯啤酒，然后走进过道：有几个人已经坐在车里，有些人站在门边，跟司机聊着天，另外一些人站在离汽车稍远一点的暗处，背朝汽车——布洛赫实在讨厌看到这些情况，他用手抹过嘴巴。他并没有直接将头转开！他将头转开，看见过道里还有旅客，他们正带着孩子从卫生间出来。当他用手抹过嘴巴时，手上有股椅背上金属把手的气味。“这不是真的！”布洛赫想。司机已经上了车，把车发动起来了，这就是一个信号：其他人也该上车了。“好像人们不会这么理解似的。”布洛赫想。出发时，公路上溅起了火光，那是人们从窗口快速扔出去的烟头。

没有人再坐在他身边了。布洛赫缩到角落里，把双腿放在凳子上。他解开鞋带，靠在侧窗上，向其他窗户望去。他把双手交叉放在后脖颈上，用脚将座位上的一块面包屑踢了下去，将两只前臂顶在双耳上，直直地看着自己的双肘。他将双肘的内侧顶在太阳穴上，闻着自己的衬衣袖口，在上臂上摩擦自己的下巴，把脑袋往后靠，看着汽车的顶灯。简直没法结束了！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是好，只好坐起来。

他们的汽车开过时，陡坡后边的树所形成的影子在绕着树转圈。挡风玻璃上的两把雨刷没有指向同一个方向。司机旁边的驾照口袋看起来是打开的。在汽车中间过道里有个看起来像手套的东西。在公路旁的牧场上，母牛在睡觉。否认这点是没有意义的。慢慢地，越来越多的旅客在招呼站下车了。他们站到司机身边去，司机就让他们从前边下车了。当汽车停下来时，布洛赫听到汽车顶篷啪啪作响。汽车又停了下来，他听到外边黑暗里有人在大声打招呼。他看到很远的地方有一道没有栅栏的铁路岔口。

快到午夜时分，汽车在边境附近的镇子停下了。车站就在一家旅馆附近，布洛赫在旅馆里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房间。他向那个领他上楼的姑娘打听自己的熟人。他只知道熟人的名字：赫尔塔。那姑娘能够告诉他的是：他的熟人在离本地不远的村子租了一家饭馆。这种声音是怎么回事？布洛赫问，他已经进房间了，姑娘站在门下方。“有几个家伙还在玩九柱戏[12]！”姑娘回答说，然后从房间走了出去。布洛赫没有朝四周看看，脱掉衣服，洗了洗手，就躺到床上了。下面的轰隆声和咣当声还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布洛赫已经睡着了。

他不是自己醒来的，而应该是被什么声音吵醒的。到处都很安静。布洛赫在想，是什么把他吵醒的呢。过了一会儿，他开始想像着，他是被翻叠报纸的声音吓醒的。要不就是柜子的噼啪声？一枚硬币可能是从随便搭在椅子上的裤子里掉了出来，滚到床下了。他在墙上看到一幅木刻画，上面画的是这个地方在土耳其人战争[13]期间的情况；市民站在城墙前，城墙后的钟楼上斜挂着一座钟，让人不由得不认为它正在发出激烈的响声。布洛赫在想，钟下的敲钟人是怎样被钟绳拽起来的；他看到外边的市民都在往城门走去；一些人抱着孩子在跑，一条狗在一个小孩的双腿之间摇着尾巴，小孩看起来好像要摔倒了。小教堂塔楼里的备用小钟也画成了斜的，几乎就要倒了。床下只有一根燃烧过的火柴。外面过道里，离这间屋子很远的地方又有一把钥匙在开锁，他可能就是被这声音弄醒的。

布洛赫吃早餐时听说，一个腿有残疾的小学男生已经失踪两天了。旅馆的姑娘在给汽车司机讲述，司机就在这家旅馆过夜。后来布洛赫从窗户里看到司机开着没坐几个旅客的汽车回去了。随后，姑娘也走开了，布洛赫一个人在餐厅里坐了一阵子。他在身边的椅子上堆起一些报纸。他在报纸上读到，失踪的不是跛子，而是一个不能说话的孩子。姑娘就像是追究责任一样，回来后立刻就说，他楼上有人在吸尘。布洛赫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外面有啤酒瓶发出丁零当啷的声音，装着啤酒瓶的箱子正在被人推过院子。布洛赫听见搬酒工在过道的声音，仿佛是从隔壁的电视里传过来的。姑娘曾经对他说过，老板的母亲白天就坐在隔壁房间，盯着员工的轮班安排计划。

后来，布洛赫在一间杂货店给自己买了一件衬衫、一件内衣和几双袜子。女售货员过了一会儿才从相当昏暗的库房里走出来，布洛赫对她说着完整的句子，但她似乎没有听懂；直到他一件一件地说出自

己想要的东西，她才开始动起来。她一边拉开收款机的抽屉，一边说，橡胶靴子也已经到货了。在把那些东西装在塑料袋子里递给他的同时，她问他还要不要别的东西：手绢？领带？马甲？布洛赫在旅馆里换了衣服，将旧内衣塞进了塑料袋。在外边广场上，在从那个镇子往外走的路上，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人。在一间新建的房子旁，有人正在关闭搅拌机。四周非常安静，布洛赫都觉得自己的脚步有些鲁莽。他停了下来，观察着一家锯木厂的木头垛子上的黑顶篷，似乎那里除了锯木工人的喃喃低语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声音可以听到，估计工人们坐在木头垛子后面正在吃东西呢。

已经有人跟他说过了，那家饭馆就在这条柏油路拐个弯往回走的地方，那儿还有几个农家和一个边境检查站。人家还告诉他，从公路上分出去了一条岔路，岔路在那些农家之间也铺了沥青，但过了一段后就只剩下沙砾路了。然后，就在边境线附近，那条岔路就变成了一座人行桥。边境检查站已经关闭了。当然，布洛赫根本就没有问起检查站的事情。

他看到一只鹰盘旋在一片田野上空。当鹰在空中停住挥动翅膀一头扎下来时，布洛赫才注意到，他刚才没有观察鹰挥动翅膀和下扎的样子，而是在观察鹰可能下扎到田野上哪个地方。鹰在俯冲过程中停住了，然后又向上飞去。

奇特的事情还有，布洛赫从玉米地旁边经过时，没有看到通往玉米地另一头的小道，而是只看到了玉米秆、玉米叶和玉米棒组成的看不穿的玉米丛，有的玉米棒还露出了亮闪闪的玉米粒。还有呢？公路刚刚越过的小溪发出了相当响亮的潺潺声，布洛赫停住了。

他在饭馆里遇到了正在打扫地面的女服务员，他问她，女租赁人[14]在哪里。“她还在睡觉呢！”女服务员说。布洛赫站着点了一瓶啤酒。女服务员从桌子上取下一把椅子。布洛赫从桌子上取下另外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女服务员走到柜台后边。布洛赫将双手放在桌子上。她弯下腰，打开了啤酒。布洛赫将烟灰缸推到一旁。服务员在经过另外一张桌子时拿起桌子上的杯垫。布洛赫将椅子往后推了推。服务员把刚才罩在酒瓶上的杯子取下来，　；将杯垫放在桌子上，把杯子放在上边，将

啤酒倒进杯子，把酒瓶放在桌子上，然后走开了。又来了！布洛赫不知道他该干什么呢。

终于他看到一滴啤酒在杯子外往下流，在墙上看到一只表，指针是两根火柴；一根火柴被折断了半截，当做时针用。他没有看着往下走的那一滴啤酒，而是看着杯垫上那滴酒可能要滴到的地方。服务员一边往地板上抹腻子，一边问他是不是认识女租赁人。布洛赫点点头，等到服务员抬头往上看时，他才说，认识。

一个孩子跑了进来，没有关门。服务员让孩子回到门口，小孩在那里擦了擦鞋子，她又说了一遍后孩子才把门关上。“老板的女儿！”服务员解释说。她接着立刻将孩子带进了厨房。她又回来时，便说道，几天前有个男人来找过老板。“他自称有人找他来挖井。她本来想马上让他走开，但是他还不死心，后来她给他指了指男服务员，那人立刻拿起了一把铁锹，她不得不叫人来，他才离开，而她……”布洛赫正好能够打断她的话。“从那以后，这孩子就害怕挖井的又回来了。”可是，这时边境检查站的稽查员走进来，在柜台旁喝了一杯烧酒。

那个失踪的小学生回家了吗？服务员问道。稽查员回答说：“没有，还没找到呢。”

“他失踪还不到两天呢。”服务员说。稽查员回答说：“可是晚上已经相当冷了。”

“他穿得很暖和啊。”服务员说。是的，他穿得很暖和，稽查员说。

“他跑不了多远。”他补充说。他跑不了多远，服务员也说了一遍。布洛赫看见自动点唱机上边有一对鹿角。服务员说，那是一头鹿跑进地雷区后留下来的。

他听见厨房里有动静。他仔细一听，发现有人在说话。服务员对着关闭的厨房门喊着。那个女租赁人在厨房里回答着。她们俩就这样说了一会儿话。后来，正当要回一句话时，那个女租赁人进来了。布洛赫和她打了个招呼。

她在他的桌子边上坐下，没有坐在他旁边，而是他的对面。她双手放在桌子下的双膝上。布洛赫透过敞开的厨房门，听到冰箱的嗡嗡声。孩子坐在冰箱旁，吃着面包。女租赁人看着他，似乎她很久没有见过他一样。“我们很久没见了！”她说。布洛赫给她讲了一个跟他在这里逗留有关的故事。他从门里看到，那姑娘坐在厨房里相当远的地方。女租赁人将双手放在桌面上，手心手背不停地翻上翻下。服务员上了一份他为她点的饮料。哪个“她”？已经没有人的厨房里，冰箱丁零哐啷地响着。布洛赫透过房门看着厨房里面桌子上的苹果皮。那张桌子下放着一只堆满苹果的碗，有几个苹果已经滚到地上了，这儿一个，那儿一个。门框上的一个钉子上挂着一条工作裤。女租赁人已经把烟灰缸推到她和他之间。布洛赫将酒瓶放到一旁，而她将火柴盒放到自己面前，又把她的杯子放在火柴盒旁边。最后，布洛赫把他的杯子和酒瓶放到右手边上。赫尔塔笑了起来。

那孩子进来了，在女租赁人身后靠在椅子上。她被叫去给厨房送木头，但她一只手开门时把木块掉在地上了。服务员把木头捡了起来，抱进了厨房，孩子又来到女租赁人身后，靠在椅子上。布洛赫觉得这些事情似乎是针对他自己的。

有人从外面敲窗户，但立刻又离开了。是房东的儿子，女租赁人说。然后，外边有些孩子路过，其中一个很快跑到跟前，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然后又跑开了。“放学了！”她说。接着，室内暗了下来，因为外边的街道上有一辆运送家具的汽车停下来。“我的家具来了！”女租赁人说。布洛赫感到一阵轻松，他可以站起来帮忙把家具搬进来了。

搬家具时，柜子的门开了。布洛赫用脚把它踢上。等柜子在卧室里放下时，门又开了。一个搬运工把钥匙交给布洛赫，他把柜门锁上了。可他自己不是主人，布洛赫说。慢慢地，在他说些什么时，就觉得自己已经是这里的人了。女租赁人邀请他吃饭，布洛赫原本打算在她这里住下，他拒绝了她的邀请。但他想晚上再回来。赫尔塔在摆放家具的房间里对他说话，就在他已经往外走去时，她回答了他的话。至少他觉得自己似乎听见她是在喊。他回到餐厅，但他只在全都敞开的门里看到女服务员站在厨房的炉灶边。与此同时，女租赁人正在卧室里将衣服往柜子里放，孩子在餐厅里的一张桌子上写家庭作业。往外走去时，他可能把炉灶上沸腾出来的水声跟一声呼叫弄混了。

尽管边境检查站的房子开着窗户，还是没法往里面看。从外边看去，那间屋子太暗了。但是，从里面肯定已经看见布洛赫了。他察觉到这一点，是因为他自己在从屋子旁边经过时都屏住了呼吸。尽管窗户大开着，有没有可能里面没人呢？为什么是“尽管”？有可能因为窗户大开着而房子里就没人吗？布洛赫回头看了一眼：甚至一个啤酒瓶都被人从窗台上拿掉了，为的是能看见他的背影。他听到一个声音，就像一个瓶子滚到沙发下一样。再说吧，不要想像检查站里会有一套沙发。直到走了好远之后他才明白，那屋子里有一台收音机开着。布洛赫沿着公路的拐弯走着，往昨晚住的镇子走去。他甚至轻松地跑了起来，他面前的公路这么清楚明了地通往那个镇子。

他在一栋栋房子之间徘徊了一阵子。他走进一家咖啡馆。在店主打开自动点唱机之后，他按选了几张唱片，还没等到所有唱片放完，他就已经出去了。他在外边听到店主又把插头拔了出来。一些凳子上坐着等汽车的学童。

他在一家水果摊前站住了，但他站的地方离摊铺很远，水果后的女人没法跟他打招呼。她看着他，等他走近一步。正好站在他前面的一个孩子说了点什么，但是那女人没有回答。这时，有个警察从他后面走过来，走到水果摊近前，她立刻跟警察打了招呼。

这个镇子没有电话亭。布洛赫试着在邮局给一个朋友打电话。他坐在营业厅一条凳子上等待着，但是电话一直没有通。那个邮局女公务员说，这个时间线路超负荷。他骂了她一句，然后走开了。

在镇子外边路过一家浴场时，他看到有两个警察骑着自行车往他这边来了。披着斗篷！他在想。等那两个警察在他面前停下时，他们真的披着斗篷。他们从自行车上下来时，连夹子都没有从裤子上抽下来。布洛赫再次觉得自己似乎在看一座音乐钟。所有这一切，他似乎已经看过一次了。他没有松开通往浴场栅栏的门，尽管那扇门是锁着的。“浴场没开门。”布洛赫说。

那两个警察说着很熟悉的话，但似乎有着完全不同的意思，反正他们故意把“Geh weg！”和“beherzigen”的重音放错位置，听起来就成了“Gehweg”和“Becher-Ziegen”，[15]而且还故意说错话，把“rechtfertigen”说成了“zur rechten Zeit fertig”，[16]还把

“ausweisen”说成了“ausweißen”。[17]那样说究竟又有什么意义呢？警察干吗要对他说起那些贝歇尔山羊呢？它们在这家浴场开张之前乘门敞开着时跑了进去，把所有的东西都弄脏了，甚至连浴场咖啡馆的墙壁也弄脏了，害得人们不得不再次将那些房间都完全刷白，这样就使得浴场没能准时完工。为什么布洛赫要让门那样锁着，而自己呆在人行道上呢？就像是为了嘲笑他一样，那两个警察在继续往前骑行时并没有例行道别，要不他们就只是暗示自己想要用这个来表明点什么。他们没有回头看。布洛赫为了表明自己没有什么可掩饰的，就仍然在栅栏旁边站着，往空荡荡的浴场里面看去。“就像是往一个我走到跟前并想从中拿点东西出来的柜子里看一样。”布洛赫心想着。他想不起来自己原本想在浴场里面干什么。再说吧，天已经黑了，镇子边上各个机关建筑上的门牌已经照亮。当两个姑娘从他身边往火车站方向跑去时，他在她们身后喊话。她们一边跑一边转身，回应了一声呼叫。布洛赫饿了。他在旅馆里吃饭，已经可以听到隔壁房间里的电视声音。后来，他手里拿着杯子走了进去，直到节目结束时现出了图像测试画面。他从人家手里要来钥匙，走上楼去。还在半睡半醒中，他觉得自己听到外边有一辆没有开灯的轿车发动了。他徒劳地想着自己为什么恰恰想起了一辆没有开灯的轿车。在这期间，他肯定已经睡着了。

布洛赫被街道上的砰砰声和喘息声吵醒了，那是有人把垃圾箱里的东西往垃圾车里倒。然而，当他往外看去时，才发现更大的可能是正要出发的汽车刚刚关上折叠门，远一点的地方有人将奶罐往奶场的装卸板上放。在这儿的农村没有垃圾车。误会又来了。

布洛赫看到那个姑娘站在门口，胳臂上有一沓毛巾，那上边放着一支手电筒。他还没有来得及让她注意到自己，她已经又出去站在过道里。她从门外道了声歉，可是布洛赫不明白她怎么回事，因为他自己同时还在她身后叫她来着。他跟着去了过道。她已经进了另外一个房间。布洛赫回到自己房间，将门把手特别响亮地转了两圈，把门关上了。后来，他去找那个已经穿过几个房间之外的姑娘，对她说，那是个误会。姑娘一边将一条毛巾放在洗脸池上，一边回答说，是的，那是个误会，她刚才在过道尽头看过去，可能是把汽车司机当成他了，她就以为他已经下楼去了，所以才进了他房间。布洛赫站在开着的门前，他说，他不是这个意思。她正好打开了水龙头，就请他再说一遍。他回答说，房间里有太多的柜子、箱子和五斗橱。姑娘回答

道，是的，而且这家旅馆的人手太少，关于这一点，刚才她认错人就是个证明，那是因为她自己太累了。他关于柜子的话不是想说这个，布洛赫说，只是在房间里没法动弹。姑娘问他想说什么。布洛赫没有回答。她将脏毛巾拧成一团，以此来指明他的沉默。而布洛赫更多将拧毛巾理解为对自己沉默的一个回答。她将毛巾放在篮子里。布洛赫又没回答，这让她——他以为是这样——将窗帘拉开了，这能让他迅速走了出来，到了暗一点的过道里。“我不是这个意思！”姑娘叫道。她跟在他身后走到过道，然后却又是他跟在她身后，她还要给剩下的房间发毛巾。在拐弯的地方，他们的脚碰到放在地上的一堆脏床单上。布洛赫绕开时，姑娘的一个肥皂盒从毛巾堆上掉下去。你回家路上需要手电筒吗？布洛赫问。“我有男朋友。”姑娘回答说，红着脸站起身来。旅馆里有没有两扇门的房间？布洛赫问。“我男朋友是木匠。”姑娘回答说。他看过一部电影，里面有个小偷在酒店里被关在了两扇门之间，布洛赫说。“我们这儿的房间里从来都没有丢过东西！”姑娘说。

他在楼下的餐厅里读到，在女售票员身边找到了一枚小小的美国硬币，五美分。女售票员的熟人都没有看到她跟美国士兵在一起过；这个季节全国都几乎没有美国游客。另外，他们还在一张报纸的边缘处发现了随便涂抹的笔迹，就像在谈话中顺带乱划的一样。很明显，那些笔迹不是女售票员的。他们正在调查，看它们能否透露点跟访客有关的信息。

老板来到桌子跟前，把那张登记表放在布洛赫面前。他说，这张表一直都在布洛赫房间里。布洛赫填了表。老板站得远点，看着他。在外边的锯木厂里，电动锯刚好放在木头上开始工作。布洛赫听到那种声音，就像是听到什么被禁止的东西。

按说老板应该拿着登记表走到柜台后面去，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拿着表走进隔壁房间里，开始跟——布洛赫看到了——他的母亲说起话来。门开着，让人以为他马上又要出来，但他并没有这样，而是继续说着，甚至最后还把门给关上了。老板没有出来，出来的是那个老女人。老板没有跟着出来，而是留在那个房间里，还将窗帘拉开了。按说他应该关上电视的，但却没有，而是打开了换气扇。

这时，姑娘拿着吸尘器从另外一侧走进餐厅。布洛赫以为自己能够看到她自然而然地拿着吸尘器到街上去。她没有出去，而是将吸尘

器的插头接在插座上，然后将吸尘器在椅子和桌子下推来推去。后来，老板在隔壁房间将窗帘拉上，老板的母亲回到那个房间，老板关掉了换气扇，布洛赫觉得，这一切似乎重又井然有序了。

他问老板这个地区是不是有很多报纸可以看。“只有一些周报和画报。”老板回答说。布洛赫本来是在往外走的时候问的，他用胳膊肘压着门把手，这样就把胳臂夹在把手和门之间了。“就是那么回事！”姑娘在他身后叫道。布洛赫还听到老板问她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他写了几张明信片，但没有立刻把它们扔进邮筒去。等他后来在镇子外边想要把它们塞进一个装在栅栏上的信箱里时，他才发现，这个信箱的邮件第二天早上才会被取走。他的球队曾经在南美打过一次巡回赛，球队在每个地方都必须把有全体球员签名的明信片寄给报社，从那以后，布洛赫就习惯了在旅途中写明信片。

一个班的小学生从旁边过去了。孩子们唱着歌。布洛赫将明信片扔了进去。它们掉在空空的信箱里时，发出噔的一声。不过，这个信箱非常小，根本不可能发出噔的声音。而且，布洛赫立刻就又往前走了。

他穿过田野走了一段时间。仿佛带着雨水一般沉的球掉在脑袋上的感觉减弱了。

在离边境不远的地方开始有森林了。当他看到无人开阔地带另一侧的第一个观察塔时，他转过身往回走。到了森林边缘，他坐在一根树干上。他马上又站了起来。然后他又坐下了，数起自己的钱来。他抬头看了看。尽管地形是平坦的，但地势朝他这个方向在近前拱起，似乎就要挤压他。这儿他坐在森林的边缘，那儿有一间变压器小屋，那儿有一个牛奶摊，那儿有一片田野，那儿有几个人，他在森林边缘这儿。他静静地坐着，直到他连自己的存在都忘记了。后来他注意到，田野上那几个人是领着几条狗的警察。

在一个黑莓丛旁边，布洛赫发现了一辆儿童自行车，车子已经有一半在黑莓丛下边了。他将车子扶起来。车座被旋得相当高，就像是给一个成年人用的一样。轮胎里插着几根黑莓刺，但并没有因此没气。辐条上夹着一根松枝，轮子都被卡住了。布洛赫拉扯着松枝。然

后他就把车子放下了，他担心警察会从远处看到车灯盖子在阳光下的反光。但是警察已经带着狗走远了。

布洛赫看着那些人的背影，他们沿着一道坡走下去。狗身上的标牌和无线电闪闪发光。这种闪光是不是要通知什么呢？是不是闪光信号呢？慢慢地，闪光也没有了这种意义：随着公路改变方向，在远处行驶的轿车的车灯忽闪忽闪，布洛赫身边有小镜子的碎片闪着光，路上的云母片也闪着光。当布洛赫登上自行车时，轮胎下的沙砾滑到一边去了。

他骑了短短一段路程。最后他把自行车靠在变压器小屋上，继续步行往前走。

他看着那张用曲别针固定在牛奶摊上的电影海报，下面其他海报都已经裂成了碎片。布洛赫继续往前走去，看到有个小伙子站在一个农家院子里。那人正在打嗝。他看到一片果园里有很多黄蜂四处乱飞。一个交叉路口旁边，一些罐头盒子里有一些腐烂的花儿。街道旁边的草地里散落着一些空烟盒。他看到关闭的窗前有些窗钩挂在窗台上。当他经过一个打开的窗户时，他闻到一股腐烂的气味。到了饭馆后，女租赁人告诉他，对面房子里昨天死人了。

当他想进厨房去找她时，她来到门口，朝他迎面走来，在他前面进了餐厅。布洛赫走到她前边去，往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走去，但她已经在门附近的一张桌子旁坐下了。当布洛赫想要开始说话时，她立刻抢在他前边。他原本想要提醒她注意女服务员穿着一双整形鞋，但是女租赁人已经用手指着外边街道上，一个推着自行车的警察从这儿路过。“这是那个哑巴学生的自行车！”她说。

那个女服务员也来了，手里拿着画报。他们一起往外看去。布洛赫问那个挖井人是不是又回来了。女租赁人只是听清“回信了”这个词，开始谈起士兵的事情。布洛赫并没说“回信了”，而是说“回来了”。女租赁人就开始说起哑巴学生的事儿。“他根本就无法求救！”女服务员说，她更多是在读那份画报里的一个配图标题。女租赁人讲起了一部电影，里面有鞋钉被和在面团里的情节。布洛赫问观察塔上的哨兵是不是有高倍望远镜，至少那上边有东西在闪闪发光。“从这里根本看不到观察塔！”两个女人中的一个回答说。布洛赫看到她们因为烤过糕点，脸上沾了面粉，尤其是眉毛和发际线上。

他走了出去，走到院子里，但是，没人跟他一起走，他就又回来了。他站在自动点唱机旁边，只留下他身边的位子。女服务员现在坐在柜台后边，她打碎了一只杯子。听到声音后，女租赁人从厨房里出来，但没有看服务员，而是看着他。布洛赫拧了拧自动点唱机背后的按钮，把音乐声放低了点。然后，就在女租赁人还站在门口时，他又把音乐声音放大了一些。女租赁人从他前面穿过餐厅，似乎她要离开这间房子。布洛赫问她要给饭馆的房东——土地所有人——付多少房租。听到这个问题，赫尔塔停住脚步。女服务员把碎片扫在一把铲子上。布洛赫朝赫尔塔走去，女租赁人从他身边走了过去，进了厨房。布洛赫跟在她身后。

由于第二张椅子上卧着一只猫，他就站在她身边。她说起房东儿子，那是她男朋友。布洛赫站到窗前，详细询问他的情况。她描述房东的儿子干些什么。在没有被问的情况下，她继续说着。布洛赫在炉灶旁看到了另外一只一次性杯子。他时不时地说：哦？他在门框边的工作裤里看见了另外一把尺子。他打断了她的话，问她从哪个数字开始数数。她不说话了，甚至都停下来不再切苹果。布洛赫说，他最近注意到自己有个习惯，在数数的时候到二才开始，比如说，今天上午在过街时，他几乎被一辆轿车给撞了，因为他以为第二辆车来之前还有足够的时间，而第一辆轿车他根本就没有数进去。女租赁人说了一句套话作为回答。

布洛赫走到椅子跟前，从后边将椅子抬了抬，猫随之跳了下来。他坐下了，但却把椅子从桌子边往后挪了挪。他这样做，不料撞到身后一张堆放着碗盘的桌子上，一个啤酒瓶掉了下来，滚到厨房沙发下。他为什么一直不停地坐下、站起、走开、闲站、又回来呢？女租赁人问。他是不是要这样来嘲讽她呢？布洛赫没有回答，而是出声读起用来放苹果皮的报纸上的一个笑话。由于报纸——从他的角度看——是反的，他读得结结巴巴的，女租赁人弯下身子，自己接着读起来。外边的女服务员笑出声来。卧室里有什么东西掉到地上了。再没有其他声音。布洛赫之前也没有听到声音。他想要去看看，但女租赁人解释说，她刚才就听到孩子醒来了；她才起床，可能马上就要出来讨要糕点了。实际上，布洛赫接着就听到了一个像抱怨的声音。原来是孩子在睡梦中从床上掉了下来，在床边的地面上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孩子在厨房里说，枕头的垫子下面有几只苍蝇。女租赁人对布洛赫说，邻居家的孩子们因为家里死了人，在停尸期间都在她这里睡

觉，他们习惯于用橡皮筋射杀墙上的苍蝇。到了晚上，他们还把掉在地上的苍蝇放到枕垫下。

在大人往孩子手里塞了几件东西之后——头几件她还扔到地上——她慢慢地安静下来。布洛赫看到女服务员空着一只手从卧室走出来，将苍蝇扔进垃圾桶里。他没有责任，他说。他看到邻居家的屋前有一辆面包师的汽车停了下来，司机将两块面包放在房门台阶上，下边是块黑面包，上边是块白面包。女租赁人让孩子到门口去迎接那个男子。布洛赫听到女服务员在柜台后打开水龙头洗手。他最近一再来道歉，女租赁人说。真的吗？布洛赫问。接着，孩子拿着两块面包回到厨房里。他还看到女服务员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一边向一个客人走去。他想要喝什么？谁？暂时什么也不喝，这就是回答。孩子已经将通往客房的门关上了。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了。”赫尔塔说。布洛赫朝孩子看过去。她站在窗前，看着邻居家的房子。“孩子不算。”她说。布洛赫把这理解为一个预告，她要跟他说点什么吧，但是后来他发现，她的意思是，他可以开始说了。布洛赫什么也想不起来。他说了点下流的话。她立刻就让孩子出去了。他把手放在她旁边。她轻轻地摸着他。他粗暴地抓住了她的手臂，但立刻又松开了。他在外边的街道上碰到了孩子，她正在用一根吸管在墙上的灰泥里钻洞。

他透过打开的窗户往邻居家里看去。他看到一个棺材架上有一个死人，旁边已经放好棺材。墙角里有个女人坐在一条小凳上，她正在用面包蘸着果子酒。桌子后面的凳子上躺着一个年轻小伙子，他正在睡觉。他的肚子上趴着一只猫。

当布洛赫走进这间屋子时，几乎让过道里一个木块给绊倒了。那个农妇走到门口，他走了进去，跟她聊上了。那个小伙子坐了起来，但没有说话。那只猫已经跑出去了。“他整个夜晚都得守灵！”农妇说。她还说，早上她发现那个小伙子有些喝醉了。她转向死者，祈祷着。这期间，她给花换掉水。“他走得非常快，”她说，“我们不得不叫醒孩子，好让他快点跑进镇子里。”但是，孩子还没能告诉神父到底出了什么事情，钟没有敲响。布洛赫注意到那间屋子烧着暖气。过了一会儿，炉子里的木块烧得坍塌成一团了。“再去拿点木块来！”农妇说。小伙子拿着一些木块回来了，他左右手都拿着木块，然后放在炉子旁边，随之扬起很多灰尘。他坐到桌子后面，农妇将木

块扔进炉子里。“我们的一个孩子让南瓜给砸死了。”她说。窗口前有两个老妇走过，她们往里面打了个招呼。布洛赫看到窗台上有一个黑色手袋，是新买来的，里面塞的纸还没有取出来。“突然他哼了一声，死了。”农妇说。

布洛赫能够看到对面餐厅里面去，太阳已经很低了，照进去很远，餐厅的前部，特别是刚刚用水擦过的地板和椅子、桌子以及人的腿在表面上似乎在自行发光。他看到房东的儿子在厨房里，他靠在门上，手臂放在胸口，隔着一段距离对着女租赁人说话。她可能还在桌边坐着。太阳落得越低，布洛赫觉得这些画面离自己越深和越远。他没法往一边看去，直到孩子们在街道上跑来跑去，才把这种印象赶走了。接着，有个孩子带着一束花进来了。农妇将花插进一个杯子里，将杯子放在灵床脚下。这孩子还站在那里。过了一会儿，农妇给了他一枚硬币，孩子走了出去。

布洛赫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就像是有人在地板上摔倒了。但是，那声音还是炉子里的木块烧得坍塌成一团了。布洛赫不再跟农妇聊天，小伙子立刻就在凳子上伸开四肢，又睡着了。后来，来了几个女人，她们念着玫瑰经[18]。有人在食品店前面将黑板上的粉笔字擦去，然后写上了：橙子、焦糖、沙丁鱼。屋子里的人低声说着话，外边的孩子们吵闹着。一只蝙蝠困在窗帘上了。小伙子被叫声吵醒了，他跳了起来，立刻朝蝙蝠扑了过去，但它已经飞出去了。

黄昏了，没有人想开灯。

只有对面的餐厅里还有一点光亮，那是打开的自动点唱机发出的。不过，上面没有什么唱片。隔壁的厨房已经暗下来。布洛赫应邀去吃晚饭，他跟其他人一起坐在桌边。

尽管窗户是关着的，屋子里还是有蚊子到处乱飞。一个孩子被派到饭馆去取杯垫，杯垫取来后放在水杯上面，免得有蚊子掉进去。一个女人说，她丢掉了项链上的坠子。所有人都开始寻找。布洛赫坐在桌边没动。过了一会儿，他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成为找到坠子的人，于是他跟其他人一起找。在屋子里没有找到坠子，他们就在外边过道里继续找。一把铲子倒了，更确切地说，布洛赫在它完全倒下之前抓住了它。小伙子用一支手电筒照着亮，农妇拿来了一盏煤油灯。布洛赫要来手电筒，走到外边的街道上。他弯着腰在沙砾上走来走

去，但没有人跟在他后边。他听到里面过道上有人在喊，坠子找到了。布洛赫不相信，继续找着。然后，他听到窗户后又开始祈祷了。他从外边把手电筒放在窗台上就离开了。

又回到了镇子里，布洛赫在一家咖啡馆坐下，看别人玩扑克牌。他开始跟自己对面的玩家吵了起来。其他玩家要求布洛赫走开。布洛赫走进后屋。那里正在举行一场幻灯报告会。布洛赫看了一阵子。报告讲的是东南亚的兄弟会医院。布洛赫在报告中大声插话，又跟他们吵了起来。他转身走了出去。

他考虑自己是不是应该再回去，但他想不起来自己还能说点什么。他走进另外一家咖啡馆。他在那里想让人家关掉换气扇。他还说，灯光也太暗了。女服务员坐到他跟前，过了一会儿，他假装好像要把手臂搭在她身上。她发现他只是想这么做，还没有等到他能够表明他只是打算这么做而已，她的身子便往后靠了靠。布洛赫想要证明自己，真的就要把手臂搭在她身上，可她已经站了起来。当布洛赫正要站起来时，她走开了。此时此刻，布洛赫似乎一定要装作这个样子，仿佛他要跟随着似的。但他觉得真要这样就太过了，然后就离开了那家馆子。

在旅馆房间里，他天亮前就醒来了。周围的一切立刻让他觉得难以忍受。他思索着，是不是恰好因为现在到了黎明前某个时刻，一切都突然变得难以忍受，所以他才醒来的呢。他身下的床垫已经陷了下去，柜子和五斗橱远远地靠在墙边，他头上的天花板高得让他难以忍受。在这间半明半暗的屋子里，外边的过道里，特别是街上万籁俱寂，布洛赫再也忍受不住了。一种强烈的恶心感攫取了他。他立刻在洗手池里吐了。他吐了一阵子，痛苦没有减轻。他又躺到床上。他没有眩晕，相反，他看到一切都处于难以忍受的平衡之中。他把身子探到窗外，弯腰往下看去，但这也无济于事。一顶遮雨篷静静地立在一辆弃用的轿车上方。他看到屋子里的墙上有两根水管；它们是平行的，上边的界限是天花板，下边的界限是地板。所有他看到的一切都以让人难以忍受的方式划定了界限。恶心让他再也站不起来了，让他缩成一团。他觉得似乎自己被一台千斤顶从他所看到的一切东西中顶开了，或者说，他四周的物件都从他身上顶起来。柜子、洗手池、旅行袋、门：现在他才注意到，他就像处于一种强迫状态，要给每个东西都想出对应的字眼来。每当他看到什么东西，立刻就想起它的字

眼。椅子、衣架、钥匙。之前是那么安静，不再有声音能够转移他的注意力；而现在，因为一方面天色很明亮，他可以看到四周的物件，另一方面，寂静使得没有声音能够转移他的注意力，所以他看着那些物件，似乎它们都在为自己打广告一样。实际上，那种恶心跟以前的恶心相似，就跟他有时候遇到一些广告用语、流行歌曲或者国歌时会有的恶心一样，他不得不直到睡着时还在复述或者哼唱。他屏住呼吸，就像是要打嗝一样。吸气时，那种感觉又回来了。他再次屏住呼吸。过了一会儿，有点效果了，他随之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这一切他再也没法想像了。餐厅已经打扫过了，一个关税官员在那些物件之间走来走去，让老板报出价格。老板将咖啡机和冰箱的发票拿给他看。这两个人在那里谈论着价格，这让布洛赫对头天夜里的状态感到更加可笑。他翻了一下报纸后就放到一边去了，只是还在听那个关税官员说话，那人跟老板就一个冰箱的价格吵了起来。老板的母亲和女服务员也加入其中。所有的人都乱七八糟地说着话。布洛赫掺和进去了。他问道，装饰一个旅馆房间需要多少钱呢。老板说，家具是他以相当低的价格从附近的农民那里买来的，那些农民要么搬走了，要么彻底移居国外了。他跟布洛赫说了一个价格。布洛赫还想知道每个物件的具体价格。老板让姑娘将房间的物品清单拿来，他不仅说出了买进每个物件的价格，而且还说出了他想像中一个箱子或柜子能以多少钱转让。那个关税官员之前一直在做笔记，现在不再写了，而是向姑娘要了一杯葡萄酒。布洛赫满意了，他想要走开。那个关税官员解释道，当他看到一个物件，比如说一台洗衣机时，他立刻就询问价格。那么当他再次见到那个物件，比如说同一个型号的洗衣机时，就不会从外在标志再认得出来，比如说，辨认一台洗衣机，不会从洗涤程序那些按键来看，而只是以此来辨认，那就是第一次看见那个物件，比如说那个洗衣机，曾经值多少钱，也就是说从价格上来辨认。当然价格他记得清清楚楚，正好以这种方式可以辨认出每个物件来。如果那个物件不值钱呢？布洛赫问。他跟没有交换价值的物件就根本不打什么交道，那个关税官员回答说，至少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没有。

那个哑巴学生一直还没有找到。尽管他的自行车得到了确认，而且还搜查了附近的区域，但是没有人开枪。如果开了枪的话，那就可能是个信号，说明有警察发现了什么。布洛赫走进一家理发店，不管怎么样，在屏风后边的吹风机声音很大，他听不到外边有什么动静。

理发师洗手时，姑娘帮布洛赫把衣领上的头发刷掉了。现在，吹风机关了，他听到屏风后边有人在翻纸。响起了砰的一声。但是，那只是屏风后边有个卷发夹子掉进一个铁盆里。

布洛赫问那个姑娘在午休时是不是回家。姑娘回答说，她不是本地人，她每天早上坐火车过来。到了中午，她就去一家咖啡馆，或者跟女同事一起呆在店里。布洛赫问她是不是每天都买回程票。姑娘说，她用的是周票。“周票多少钱？”布洛赫立刻问道。可在姑娘回答之前他就说道，这不关他什么事的。尽管如此，姑娘还是说出价钱。屏风后边的女同事说：“既然不关您的事，您为什么还要问呢？”布洛赫已经站起来了，在等找头时，他看了看镜子旁边的价目表，然后走了出去。

他发现自己有一种奇怪的渴望，什么东西的价格都想知道。当他看到食品店玻璃上有白色字体写出新到货物及其价格时，他觉得很放松。商店前水果箱里的价格标签倒了，他就把它扶了起来。这个动作足以让人走出来问问他是不是要买点什么。在另外一家商店里，有人给一把摇椅裹了一件长长的连衣裙。一个用曲别针别着的价格标签放在椅子上，就在裙子旁边。布洛赫弄不清那个价钱是连衣裙的还是椅子的。他在那里站了很久，直到有人出来问他。他也问了问人家。人家回答说，那个别标签的曲别针一定是从裙子里掉下来的。不过，显而易见，标签不属于摇椅。那椅子自然而然是私人物品。他只是想问问而已，布洛赫说，他已经继续往前走了。那人在他背后喊着哪里可以买到同样款式的摇椅。布洛赫在咖啡馆里问起自动点唱机的价格。那不是他的，老板回答说，是借人家的。他不是这个意思，布洛赫说，他只是想知道价格。直到老板跟他说出价格以后，他才满意了。但是，他不敢确定，老板说。布洛赫现在开始问起饭馆里其他物件的价格，想必老板知道那些物件的价格，因为那些都是他自己的。然后老板说起了浴场的事情，其建筑成本远远超过了估价。“超了多少？”布洛赫问。老板不知道。布洛赫变得不耐烦了。“那预算价格是多少呢？”布洛赫问。老板还是什么也说不出来。不管怎么说，去年春天，有人在一个小房间里发现了一个死人，想必那死者整个冬天都躺在那里。死者的脑袋被塞在一个塑料袋里，是个吉卜赛人。这个地区有几个定居下来的吉卜赛人；他们曾经被关在集中营里，他们或许拿赔偿款在森林边缘修了几所小房子。“听说里面非常干净。”老板说。警察在寻找那个失踪学生的过程中询问了那些居民，他们对新

近擦净的地板，特别是对里面井井有条的秩序感到非常吃惊。但是，正是这种整齐的秩序，老板继续说道，反而加重了他们的嫌疑；因为如果没有理由的话，那些吉卜赛人是不会擦洗地板的。布洛赫没有放弃，他问那些赔偿款是不是够他们修建那些房子。老板说不出来赔偿款有多高。“当时的建筑材料和人力都还便宜。”老板说。布洛赫好奇地转动着粘在啤酒杯下的收据。“这个值钱吗？”接着他问道，一边把手伸进上衣口袋，将一块石头放在桌子上。老板没有拿起石头，回答说，这种石头附近到处都能找到。布洛赫没有说什么。老板就把石头拿在手里，让它在空手上滚动，然后又把它放回到桌子上。完了！布洛赫立刻将这块石头装了起来。

他在门口遇到了那两个理发姑娘。他邀请她们跟他去另外一家咖啡馆。第二个姑娘说，那里的自动点唱机里没有唱片。布洛赫问她想要说什么。她回答说，那个自动点唱机的唱片不好。布洛赫先走了出来，她们跟在他后边。她们要了些喝的，掰开面包。布洛赫朝前倾下身子，自己玩着。她们给他看了自己的证件。当他拿起证件封皮时，他的双手立刻开始冒汗了。她们问他是不是当兵的。第二个姑娘晚上跟一个销售代表约好了；她们想要四个人一起出去，因为两个人没有什么好聊的。“四个人一起去的话，你说点什么，我说点什么。能互相讲些笑话。”布洛赫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隔壁房间里，一个孩子在地上爬来爬去。一条狗在孩子周围跳来跳去，用舌头舔着孩子的脸。柜台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在电话响着的过程中，布洛赫没有听她们说话。士兵大多没有钱，理发姑娘说。布洛赫没有回答。当他看着她们的手时，她们解释说，指甲是让定型水给弄黑的。“染些东西上去也没有用，边上总是黑的。”布洛赫抬起头来。“衣服我们自己买现成的。”“我们相互理发。”“我们夏天回家时，天都亮了。”“我喜欢跳慢舞。”“回家时，我们不再开这么多玩笑，都忘记说话了。”她对什么都很严肃，第一个理发姑娘说。她还说，昨天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她甚至往果园里看去，想看看那个失踪的小学生是不是在里面。布洛赫没有把证件还给她们，而只是放在她们面前的桌子上，好像他根本没有权力看这些证件似的。他看着自己留在塑料封皮上的指纹所形成的薄雾消失了。当她们问起他的职业时，他回答说，他以前是个足球守门员。他解释说，守门员能比场上其他队员踢的时间长一些。“扎莫拉已经很老了。”布洛赫说。作为回应，她们谈起了她们自己认识的足球运动员。她们还说，她们镇子上举行比赛时，她们就

站在客队的球门后边，嘲笑对方的守门员，好让他变得紧张。大多数守门员都是罗圈腿。

布洛赫说，每当他提到什么或者讲述什么时，她们两人要么用她们自己所经历过的、与所提到的对象或者类似对象有关系的故事，要么用她们听人说起的、与之相关的故事来回答。比如说，布洛赫说起他当守门员时曾经遭受过几次肋骨骨折，她们就回答说，几天前，锯木场有个锯木工从一个木板堆上摔了下来，也是肋骨骨折。然后，布洛赫提到，他自己的嘴唇曾经缝过好几次，作为回应，她们就说起电视里播出的一次拳击比赛，那个拳击运动员的眉毛也裂开了。当布洛赫说起他在一次跳跃时撞到了门柱上，还把舌头弄裂了，她们立刻就说，那个哑巴学生也有一个裂开的舌头。

此外，她们还谈起了他不知道的事情，特别是他不认识的人，仿佛他肯定认识他们，或者深知他们的秘密似的。玛丽亚用鳄鱼皮包砸了奥托的脑袋。那个叔叔下到地下室去，把阿尔弗雷德赶到院子里，还用桦树棍子打意大利厨娘。爱德华让她在岔道下了车，害得她不得不半夜里走路回家去；她从那片谋杀儿童的森林里穿过，免得瓦尔特和卡尔看见她走在那条外国人道上，最后把舞会上穿的鞋脱掉了，那是她的弗里德利希先生送给她的。相反，布洛赫提到什么人时都会对每个名字加以解释。甚至他提到的物件，他也会一一进行描述，就是要把它们解释一番。当提到维克托这个名字时，布洛赫就补充道："我的一个熟人"；当他讲起一个间接任意球时，他不仅描述间接任意球是什么，而且还要——就在理发姑娘等着听他继续讲述时——给她们解释任意球的规则；甚至在他提到一个裁判判给一个角球时，他觉得自己应该给她们解释一下，那不是房间的一个墙角[19]。他说的时间越长，就觉得自己说的东西越不自然。慢慢地，他甚至觉得每个字眼都需要一个解释。他不得不控制自己，免得在句子中间停顿下来。有几次，当他把要说的句子事先已经想好时，他却说错了；当理发姑娘们说的话正好跟他在听话时所想的一样结束时，他一开始还无法做出回答。只要他们还在亲切地交谈着，他就越来越多地忘记了四周的环境；就连隔壁房间里的狗和孩子他都不再看了。但是，当他停顿下来或者不知道怎么往下说、接着开始找他还有可能说的句子时，四周的环境又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看到到处有细小的东西。最后，他问阿尔弗雷德是不是她的男朋友；是不是总在柜子上放一根桦树棍子；弗里德利希先生是不是一个销售代表；那条外国人道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是不是因为路边有一个外国人的聚居村。她们很乐意回答他的问题。慢慢地，布洛赫感知到的不是黑发根上漂染白的头发、挂在脖子上的单个领针、一个黑色的指甲、刮净的眉毛上的单个丘疹、空咖啡屋椅子的破垫子，而又是一个个轮廓、一个个动作、一个个声音、一声声惊呼和一个个身影，一切融为一体。他也能用一个稳定迅速的动作抓住突然从桌子上翻倒的手包。第一个理发姑娘让他咬一口她的面包，当她把面包递给他时，他相当自然地咬了一口。

他听到外边有声音，知道学生们已经放假了，好让他们都能去找那个同学。他们只找到几件东西，除了一面破碎的小镜子外，那些东西都跟失踪者没有关系。据说，凭借那个塑料套子，小镜子被确认为是那个哑巴学生的东西。尽管他们特别仔细地搜索了发现镜子附近的区域，还是没有找到更多线索。对布洛赫讲述这些事情的警察还补充说，那些吉卜赛人中有一个，自从哑巴失踪以后，他就再也不知去向了。布洛赫觉得很奇怪，那个警察到了街对面还停住脚步，对他大声说了这些话。他随即问道他们是不是搜查过浴场。警察回答说，浴场是锁着的，没有人能进去，就连吉卜赛人也进不去。

布洛赫到了镇子外面，布洛赫注意到，玉米地几乎全被踩坏了，折断的玉米秆中间露出了黄色的南瓜花。在玉米地中间，始终处在阴影下，这些花现在才开始绽放。公路上到处都是掰断的玉米棒子，有一些剥去了皮，被学生咬了几口：旁边是些从玉米棒子上扯下来的黑色玉米须。还在镇子里，布洛赫就看到他们在等车时用捏成一团的玉米须相互扔来扔去。玉米须非常潮湿，布洛赫每次踩上去时，都会溢出水来，还会发出吱吱的声音，仿佛他走在沼泽地里似的。他几乎让一只被碾死的鼹鼠给绊倒了。它的舌头长长地伸在外边。布洛赫站住了，他用脚尖碰了碰又细又长的、被血迹浸黑的舌头：又脆又硬。他用脚把鼹鼠踢到坡下，继续往前走去。

到了桥跟前时，他从公路上拐下来，沿着小溪往边境走。小溪慢慢越来越深，至少溪水流得越来越慢了。小溪两边的榛子树丛长在小溪上方，伸得很长，几乎都看不到水面。很远的地方有镰刀割东西的吱吱声。溪水流得越慢，看起来就越混浊。在一道拐弯前，溪水彻底停止了流动，而水就变得完全不透明了。从很远的距离传来一辆拖拉机的嗒嗒声，仿佛它跟这一切毫不相干似的。过度成熟的接骨木果实

变成了黑色，一团一团地挂在灌木丛里。一动不动的水面上漂浮着小小的油点。

人们可以看到，水的底层偶尔会升起气泡。榛子树枝的尖头已经垂挂在小溪里面。现在没有外面的声音能转移注意力。那些水泡几乎还没有露出水面，就又消失了。有个东西很快跳了出来，你根本没法看清那是不是一条鱼。

布洛赫过了一阵子突然动身时，水里到处都有汩汩声。他走上一座桥，一动不动地往下看着溪水。水很平稳，漂浮在水上的叶子上面全都是干的。

可以看到鹬鸟在水面上走来走去，不用抬头就能看到它们头顶上有一群蚊子。在一个地方，溪水泛起小小的水浪。当一条鱼从水里跳出来时，又响起啪的一声。岸边有一只蟾蜍坐在另一只身上。一块泥土从岸边掉下去，水下又起了气泡。水面这些小变化会让人觉得非常重要。当它们反复出现时，他会一直观看着，而且当时就已经开始回忆它们了。叶子在水上漂得很慢，不禁让人目不转睛地盯着，连眼眨都不眨一下，因为害怕在眨眼时会把睫毛的动作和叶子的动作弄混了。你会一直这样看着，直到眼睛发烫为止。泥水中，就连几乎探入水里的树枝也没有了影子。

布洛赫目不转睛地往水里看着。在他的视野之外，有个什么物体开始打扰他了。他眨了眨眼，似乎那取决于他的眼睛，但却没往那里看。那个物体慢慢地进入他的视线。他看了一会儿，没有感知到它；他的整个意识似乎是一个盲点。然后，就像是一部喜剧电影里有人不经意地打开了一个箱子，继续说着废话，然后才停住，又扑到箱子跟前。就这样，布洛赫看到脚下的水里有一具小孩尸体。

然后，他回到公路上。在拐弯处，就在离边境线最近的房屋所在的地方，有个警察骑着摩托朝他驶过来。他之前就已经在拐弯镜里看到警察了。随之，警察真的就出现在拐弯处，直挺挺地坐在摩托上。他戴着白色手套，一只手放在车把上，另外一只手放在肚子上。轮胎上沾满了泥巴，轮辐上飘着一片萝卜 叶子。那警察的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布洛赫看着摩托车上的人逐渐离开的时间越长，他就越发觉得自己似乎是在慢慢从一张报纸上抬起头来，然后透过窗户向室外的空地看去：警察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跟他没有关系。同时，布洛赫注

意到，他自己在目送着警察背影时，只是在将看到的情形在很短时间里看成一个比喻。警察从画面上消失了，布洛赫的注意力变得很不集中了。然后，他去了边境上的饭馆，尽管通往餐厅的门敞开着，但他开始时没有碰到人。

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再次将门打开，随之从里面将门小心地关上了。他在角落一张桌子旁坐下，一边将小球推来推去，一边等着，那些小球是用来给扑克牌游戏计算赢牌的。最后，他将插在小球之间的扑克牌洗了洗，跟自己玩了起来。他特别想玩。有一张牌掉到桌子下。他弯下腰去，看到另外一张桌子下蹲着女租赁人的孩子，他旁边全是往前推过的椅子。布洛赫起来坐好，继续玩；扑克牌用得太久了，他觉得每张牌上似乎都涂着厚厚的一层东西。他往邻居房子里看去，那里的棺材架已经空了，两扇窗户都大开着。外边街道上，现在有孩子们在喊叫，桌下的孩子很快将四周的椅子推开，跑了出去。

女服务员从院子里走进来。就像是看见他坐在那里，要给个回应一样，她说，女租赁人去城堡了，她要去让人重新签租赁合同。女服务员后面跟着一个小伙子，他两只手都拎着满满一箱瓶装啤酒，尽管如此，他的嘴巴还是没有闭上。布洛赫跟他打了个招呼，但女服务员说，布洛赫不该跟他说话，他拿着那么重的东西时，没法跟人说话。那个小伙子看起来有点弱智，他将箱子堆在柜台后面。女服务员对他说道："他又没有把灰倒进河里，而是撒到床上了吗？他不再朝那些山羊冲过去了吧？他又把南瓜切开后拿来抹脸吗？"她手拿一瓶啤酒站到门旁，而他却没有回答。当她给他看了看啤酒后，他朝她走了过去。她把啤酒给了他，让他出去了。一只猫跑了进来，跳起来抓住一只苍蝇，然后立刻就把它吃掉了。女服务员把门关上。门还开着时，布洛赫听到隔壁关税检查室里的电话不停地在响。

布洛赫跟在那小伙子后面，往城堡那边走去；他走得很慢，因为他不想超过他。布洛赫看着他用很夸张的手势往一棵梨树上面指，而且还听到他说："蜂窝！"布洛赫打眼看去，也以为自己真的看到那上边挂着一个蜂窝，直到他看了其他树后才知道，那只是因为树干有些地方变粗了。他看到，那个小伙子像是想要证明那是一个蜂窝，就把酒瓶朝着那树冠扔上去。酒瓶里剩下的啤酒在树干上溅开了，瓶子掉进草丛里，落在一堆烂梨上面，梨子堆里立刻嗡嗡地飞起很多苍蝇和黄蜂。就在布洛赫跟在小伙子后边走去时，听到他讲述起一个他昨

天在小溪看到的“洗澡狂”洗澡的情况；他觉得那人的指头全都干瘪了，嘴前放着一个大大的泡沫球。布洛赫问他会不会游泳。他看到那个小伙子咧开嘴，用力地点点头，但却听到他说“不会”。布洛赫走到前边，还听到他继续说着，他没有再回头去看。

在城堡前，他敲了敲门房的窗户。他离玻璃非常近，都能看到里面的情形了。桌子上放着一只装满花的盆子。看门人在沙发上躺着，他刚刚醒来；他向布洛赫打了个手势，布洛赫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点了点头。看门人拿着一把钥匙走了出来，将门打开，但马上又转过身去，走到前边。带着一把钥匙的看门人！布洛赫在想。他再次觉得自己似乎应该在比喻意义上看这一切。他注意到，看门人打算带他穿过那座建筑。他准备将这个误会解释清楚。但是，尽管看门人几乎不说话，也没有出现解释的机会。他们穿过门口，门上到处都钉满了鱼头。布洛赫都准备好了要开始解释，但他肯定已经错过了合适的时机。他们已经走进去了。

进了图书馆后，看门人给他读了书里一些段落：以前农民必须要向地主交纳收成的多少当租金。布洛赫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打断他的话，因为看门人正在翻译一段用拉丁文填写的内容，讲的是一个造反农民的事情。“他必须离开农庄，”看门人读道，“不久后有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他，双脚挂在一根树枝上，脑袋在一堆蚂蚁中间。”租金簿很厚，看门人不得不用双手才能把它合起来。布洛赫问这栋房子里是不是住着人。看门人回答说，不允许到私人房间去。布洛赫听到咔嚓一声，但看门人只是又将书锁了起来。“松树林中的黑暗，”看门人凭记忆引用了一句，“让他失去了理智。”窗前发出了一个响声，似乎一只硕大的苹果从树枝上掉下来。但是，没有发生撞击。布洛赫向外面看去，看到房东的儿子在花园里用一根长棍子捅苹果，棍子顶端绑着一个边缘带有锯齿的袋子，他用锯齿将苹果扯进袋子里，树下的草地上站着女租赁人，她将围裙张得开开的。

隔壁房间里，挂着各种各样的蝴蝶标本。看门人向他展示了他的双手在制作标本时弄得多么脏。尽管如此，很多他们插在钉子上的蝴蝶还是掉了下来。布洛赫看到牌子下的地面上有很多粉末。他走到跟前，看着那些还固定在钉子上的蝴蝶残体。当看门人在他身后关上门时，在他视野之外的地方有什么东西从牌子上掉下来，在下落的过程中就已经变成了粉末。布洛赫看到了一只天蚕蛾，它仿佛被毛茸茸

的、浅绿色的微光覆盖着。布洛赫既没有向前弯腰，也没有往后退。他看着空钉子下面的文字。有些蝴蝶的形状已经改变了很多，只能从它们下边的名称才能认出来。“起居室里的一具尸体。”看门人引用了一句，他已经站在通往下一间屋子的门前。有人在屋外呼叫。一只苹果砸在地上。布洛赫站在窗前向外面望去，他看到一根空树枝弹了回去。女租赁人将那只落在地上的苹果放到那堆已经磕破的苹果里。

后来，来了一班外地的学生，守门人中断了给布洛赫做的导游，从头开始了。布洛赫利用这个机会离开了。

他又回到公路上，在一个邮车站旁边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就像凳子上的一块黄铜牌子所写的，这条长凳是由当地的储蓄银行捐赠的。那些房子离这里非常远，他都没法区分开它们。当钟声响起时，钟楼里的那些钟已经看不清了。一架飞机飞在他头顶很高的地方，他根本都看不到。那架飞机只闪烁了一下。在他身边，长凳上有一道已经干硬的蜗牛印迹。凳子下面的草还是湿的，那是前一夜的露水留下的痕迹。一个烟盒的玻璃纸包装雾蒙蒙的。他看到自己左边是……自己的右边是……自己的身后是……他饿了，继续往前走去。

布洛赫回到了饭馆。他点了一份冷盘。女服务员用一个切面包机切了些面包和香肠，将香肠片放在一个盘子里给他端了上来；她还在香肠上挤了些芥末。布洛赫吃着，天已经黑了下来。外边有个孩子在玩捉迷藏时把自己藏得非常隐蔽，大家都没有找到他。等到他们都不玩了之后，布洛赫才看到那个孩子在空荡荡的街上走着。布洛赫将盘子推开，把啤酒杯垫也推开，还有盐瓶。

女服务员带孩子去睡觉了。后来，孩子又回到了餐厅，穿着睡衣在人群里走来走去。从地面上时不时飞起嗡嗡叫的蛾子。女租赁人回来之后又把孩子抱回卧室。

窗帘已经拉上了，餐厅里坐满了人。柜台旁站着几个小伙子，他们每次大笑时，都会往后退一步。旁边站着一些身着防水面料大衣的姑娘，好像她们马上又要离开似的。那些小伙子当中的一个说了点什么，其他的小伙子跟着发呆，然后才开始突然大笑大叫起来。坐着的人尽量靠在墙边。人们可以看到自动点唱机里的抓手在抓一张唱片；看到唱针砰地扎在唱片上；听到那几个在等着自己唱片的人停止说话了。这一点用也没有，什么都改变不了。一切都依然如故：当女服务

员疲惫地将胳膊耷拉下来时，人们看到那手表从袖口里滑到手腕上，咖啡机的手柄慢慢地翘起来；人们听到有人在打开火柴盒之前将它放到耳边摇晃的声音。人们看到早已喝干的杯子一次又一次地被放到嘴边；看到女服务员拿起一只杯子，试一试能不能拿走它；看到那些小伙子开玩笑地相互抽着耳光。什么都没用。直到有人叫喊着要付账时才又认真起来。

布洛赫喝得醉醺醺的。所有的物件好像都离他很远很远。他离那些事件如此遥远，连他自己都根本再也没有出现在那些他所听到或者看到的场景中了。就像是航拍！他这样想着，一边看着墙上的鹿角和牛羊角。那些声音在他听来就像是些无关紧要的声音，如同广播里转播祈祷仪式时的咳嗽声和清嗓子的声音一样。

后来，房东的儿子走了进来。他穿着一条灯笼裤，将他的外套紧贴着布洛赫挂着，布洛赫不得不往旁边侧了侧身子。

女租赁人坐到房东儿子身边，人们听到她坐下后问他想要喝点什么，然后她朝女服务员喊了他要的东西。布洛赫看着他们俩用同一只杯子喝了一阵子。只要那个家伙说点什么，女租赁人就立刻拍一下他的腰；当她平伸着手去摸他的脸时，人们能看到他抓起她的手，在上面舔一舔。然后，女租赁人坐到另外一张桌子旁。她在那里继续着那些例行公事般的动作。她摸着一个小伙子的头发。房东的儿子又站了起来，在布洛赫身后把手伸到外套里取他的烟。他问布洛赫那件外套是不是妨碍到他了，布洛赫摇了摇头。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很久一直就盯着一块污渍。布洛赫叫道：“结账！”所有的人都认真了一会儿。女租赁人正好仰着头在打开一瓶葡萄酒。她给女服务员打了个手势。女服务员站在柜台前，正在洗杯子。她把杯子放在一个海绵垫子上，让垫子把水吸干。看到女租赁人的手势后，她穿过那些围在柜台四周的小伙子，朝布洛赫走去。在给他找零头时，她用冷冷的手指给了他一些湿漉漉的硬币。他一边站起来，一边将硬币塞进口袋里。是个玩笑吧，布洛赫心想着。或许因为他已经喝醉了，他才觉得这个过程这么复杂。

他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他打开门，走了出去——一切都井然有序。

为了确认一下，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时不时有人走出来解决尿急的事儿。另外一些才到这里的人在听到自动点唱机的声音时就开始跟着一起唱起来。布洛赫走开了。

回镇子，回旅馆，回房间。一共九个字[20]，布洛赫放松地想着。他听到头顶在放洗澡水。至少他听到汩汩的声音，然后还听到喘气和咂嘴的声音。

他再次醒来时，想必几乎就没有睡着。起初他觉得，好像自己魂不附体了。他发觉自己躺在一张床上。没法搬运了！布洛赫心想着。一个瘤子！他感受着自己，仿佛自己突然变形了。他觉得什么都不对劲了。尽管他还安静地躺在那里，这都不过是在装腔作势和奋力挣扎吧。他如此清楚和显眼地躺在那里，所以他没法躲开任何一幅与他可以相提并论的图像。他在那里的样子就是好色，猥琐，不得体，地地道道让人反感的东西。埋了去！布洛赫心想着，禁止掉！弄走！他以为自己在不舒服地摸着自己，然后却又察觉到那只是因为他的意识自然而然地如此强烈，以至于在整个身体表面把意识感受为触觉了；仿佛这种意识，仿佛这些念头对他本人动起手来了，对他本人进行了侮辱，对他本人实施了暴力似的。他躺在那儿，毫无抵抗，无力抵抗；恶心地把那内在的东西一股脑倒出来；并不陌生，只是大不相同。那是猛地一动，他随之就变得不自然了，他从那关联中被剥离开了。他躺在那儿，不可思议，非常真切，无可比拟。他自然而然的意识如此强烈，他连对死亡都产生了恐惧。他出汗了。一枚硬币掉在地上，滚到床下去了。他仔细听着：是个比喻吗？然后他就睡着了。

又醒来了。二、三、四，布洛赫开始数数了。他的状态没有任何改变，但他一定是在睡眠中习惯了这个状态。他将滚到床下的那枚硬币装了起来，然后走下楼去。当他留意和想像时，一个词语总还能引发出另外一个词语来。一个十月的雨天；一大早；一块积满灰尘的窗玻璃：一切按部就班。他跟老板打了个招呼。老板正好把报纸放在架子上。那姑娘正把一个盘子往厨房和餐厅之间的窗口里推：一切依然按部就班。当他小心翼翼地行事时，事情就能够按部就班地继续进行下去，一个接一个地：他坐在自己一直坐的那张桌旁；他打开每天早上都要打开的那份报纸；他读着报纸上的那则消息，说的是人们在格达·T谋杀案中找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那条线索指向这个国家的南部；在死者住处找到的那张报纸上的涂画似乎使得调查得以继续进

行。一个句子引出了另一个句子。那么后来，再后来，再后来……人们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先行安下心来。

过了一会儿，尽管布洛赫实际上一直还在餐厅里坐着，在那儿一个劲地数着外面街上发生的事情，但他突然发现自己意识到了一个句子，那就是："他确实太久无事可做了。"由于布洛赫觉得这是个用来收尾的句子，他就回想自己是如何想到这个句子的。之前是什么呢？对啦！之前，正如他现在想起来的那样，他是这样想的："他对那个射门根本没有准备，他让足球从两腿之间滚了过去。"在这句话之前，他在想那些摄影记者，他们在球门后干扰了他。在这之前："在他身后有人一直站着，但却只是在叫自己的狗到跟前来。"这句话之前呢？在这句话之前，他在想着一个女人，那女人站在一个公园里，转过身来，看着他身后的什么东西，好像在看着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之前呢？之前老板说起那个哑巴学生的事儿，他的尸体在离边境不远的地方被一个边境检查站的稽查员发现了。在想那个学生之前，他在想着那个在球门线近前蹦起来的足球。在想那个足球之前，他看到街上有个卖东西的女人从自己的凳子上跳了起来，去追一个男学生。在看到那个女人之前，他还读到了报纸上的一句话："木匠师傅在追小偷时受到了干扰，因为他还穿着自己的围裙。"但是，在读到报纸上的这句话时，他正好想到自己有一次打架时，外套被人从后面扯过胳膊。他能想到那次打架，是因为他的胫骨在桌子上撞得痛不堪言。在此之前呢？他想不起来是什么让自己的胫骨撞到桌子上了。他在这个过程中试图找到一个线索来想出之前可能是什么：这跟那个动作有关吗？还是跟疼痛有关？还是跟桌子和胫骨的声音有关呢？但是，这个再也没法往回推了。然后，他呆呆地盯着报纸上那张房门照片。由于屋内躺着一具尸体，就不得不把那房门撞开了。就是从这扇门——他心想——开始的，然后他才在那句"他确实太久无事可做了"里重新找到自己。

后来，有好一阵子，情况挺不错的：跟他说话的那些人的嘴唇动作和他听到他们所说的是吻合的；房子不光是由正面组成的；有人正在从奶品店的装卸台那儿将沉重的面粉袋往储藏室里拖；当有人远在下边的街上叫喊什么时，听起来确实就像是从下面那儿传来的声音；那些在对面人行道上走过的人好像又一如既往；那个眼睛下方贴着一张创可贴的小伙子真的有一块鲜血凝结的痂；雨似乎不光只是在这幅画面的前景里下着，而且是在整个视野里下着。然后，布洛赫发现自

己来到一座教堂的前檐下。他一定是在开始下雨时穿过一条小巷子来到这里，站在这屋檐下。

他觉得，教堂里面比他想像的要亮堂些。这样他就可以很快在一条凳子上坐下，看着自己头顶上的天花板壁画。过了一会儿，他认出了那幅画：在旅馆个个房间里都放着的那个宣传册里就有它的照片。布洛赫先前给自己口袋里塞了一份，因为那里面有本地及周边地区的街道和道路示意图，他将那份宣传册掏了出来，看到里面写着：有好些个画家分别参与了那幅画的前景和背景的创作。就在一个画家还在画着背景时，前景中的人物早就已经画好了。布洛赫将目光从纸上移到拱顶。因为他不认识那些人物——可能是圣经故事里的什么形象吧，它们让他觉得百无聊赖。尽管如此，当外面的雨越下越大时，抬头看着拱顶还是很惬意的。那幅画在整个教堂屋顶蔓延四射：背景上是一片几乎没有云彩、简直蓝得单调的天空；有些地方可以看到几片毛卷云；在那些人物头顶很远的地方画着一只鸟。布洛赫猜想着，那个画家迫不得已地画了多大一片呢？画出那么均衡的蓝色是不是很困难呢？那是一种非常浅淡的蓝色，可能当时不得不将蓝色和白色调在一起。调和这样的颜色时，是不是一定要注意到，别让蓝色随着绘画的进行而改变其色调呢？另一方面，蓝色又不是完完全全均衡，而是在同一笔画里还有变化。这么说，人们不能用一种均衡的蓝颜色来涂屋顶，而是实实在在要画出一幅画来？那背景之所以成为天空，不是因为你随随便便用一支尽可能大的画笔，或许甚至一把扫帚，将颜色涂进那为此目的而必然湿乎乎的灰泥里，而是因为，布洛赫琢磨着，那个画家一定要实实在在地画出一片天空来，采用蓝色的细小变化，但是又不得那样明显，免得让人觉得那是在调颜料时的失误。那背景之所以真的看起来像是一片天空，并不是因为人们习惯于在背景上想像出一片天空来，而是因为那儿的天空本来就是一笔一笔画上去的。天空画得那样绝妙，布洛赫心里想，它让人觉得几乎是勾勒上去的，无论如何比前景上那些人物要准确得多。那个画家是不是出于愤怒又添上了那只鸟呢？他是一开始就立刻把那只鸟画上去了，还是在完成之后才添加进去的呢？那个画背景的画家是不是相当绝望呢？没有迹象表明这一点，布洛赫立刻也觉得这种想法太可笑了。甚至他觉得，他在这里琢磨那幅画，走来走去，四处坐坐，走出去，走进来，这些似乎都不过是借口而已。他站了起来：“不要转移注意力！”他自言自语道。就像是要否定自己一样，他朝外边走去，立刻穿过马路，走进一条过道里。他挑衅似的站在那儿，站在那些奶罐旁边，直到雨停

了，也没有人来跟他说话。他走进一家咖啡馆，在那里坐了一会儿，双腿伸得直直的，没有人成全他，没有人被他的腿绊倒，没有人跟他打架。

当他朝外边看去时，看到停放着一辆校车的停车场的一个部分。他在咖啡馆里看到左右墙壁的部分，屋内有一台没有生火的炉子，炉子上放着一束花，另外一侧放着一个衣服架，上面挂着一把雨伞。他看到屋子的另外一部分，自动点唱机就在那里面。点唱机里面有一个光点缓慢地游动着，然后停留在所选曲目的数字标号上。点唱机旁边是自动售烟机，那上面也放着一束花。然后，布洛赫还看到另外一部分，老板站在柜台后面，他帮着站在旁边的女服务员打开一个瓶子。她将瓶子放在托盘上。最后，他看到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他看到自己如何将双腿伸得长长的，鞋头湿漉漉的，脏兮兮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巨大的烟灰缸，旁边有个小一点的花瓶，旁边的桌子上正好没有坐人，上面放着他那只斟满葡萄酒的杯子。他现在注意到，在校车开走之后，眺望停车场的视角跟明信片上的视角一样：这里能看到喷泉旁边的瘟疫纪念碑的一个部分。画面边缘那儿能看到自行车停放架的一部分。

布洛赫很受刺激。在那些部分里面，他看到细节清晰得咄咄逼人：似乎他所看到的那些部分代表着整体。他再次觉得那些细节像是姓名标牌。“灯光文字”，他心想着。就这样，他将女服务员那只戴着一个耳环的耳朵看做是整个人的标志。放在旁边桌子上的一只手包开着一条缝，布洛赫看见里面有一块带着花斑的头巾，他觉得那手包就代表着那个一只手拿着咖啡杯站在后边的女人，她的另一只手迅速地翻着一本画报，只是偶尔在一幅图片上停一下。柜台上很多冰激凌杯子摞在一起，形成了一座小塔，看起来就像是老板的写照。衣架下方地板上有一摊水，代表着上面的雨伞。布洛赫没有看客人们的脑袋，而是看着墙面上跟人头一样高的污渍。他很受刺激，女服务员这会儿正在拉那根脏兮兮的绳子，想要关掉墙上的照明灯——外边已经又亮起来了，他看着那根灯绳，似乎整个墙上的照明灯都是些厚颜无耻的东西，是专门跟他作对的。他脑袋也开始疼起来，因为他走到雨里了。

那些咄咄逼人的细节似乎在污染和彻底扭曲着它们所属的人物和环境。他可以抵抗，其手段就是给这些细节分别命名，然后将这些名

称当做咒骂的话语用在那些形象本身上。他可以将柜台后的老板叫做冰激凌杯子，可以对女服务员说，她就是一个穿过耳垂的耳洞。同样，他也想对那个看画报的女人说：你这个手包！而对邻桌的男子说：你这个裤子上的污渍！那人终于从后屋里走出来，一边付账，一边站着喝干杯子里的葡萄酒。或者等到那人将空杯子放在桌子上走出去以后，冲着他的背影叫道：你是一个指纹，一只门把手，一条衣服上的缝儿，一摊雨水，一个自行车停靠支架，一块汽车轮胎上的挡泥板，诸如此类，直到那个人在外边骑着自行车从画面里消失……甚至连聊天，尤其是那些人的叫声，一声“这样？”一声“啊哈！”让人觉得那样咄咄逼人，你甚至都想要大声重复一遍，当作是嘲弄。

布洛赫走进一家肉食店，买了两块香肠面包。他不想在旅馆吃饭，因为他的盘缠慢慢紧张了。他观察着香肠尖儿，它们靠在一起，挂在一根棒子上。他用手指了指，女售货员就知道该从那根香肠上往下切了。一个孩子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纸条。售货员刚刚说了，边境检查站的稽查员起先以为那个学生的尸体是一个被河水冲到岸上的床垫。她从一个盒子里取出两块面包，把它们切开一道口子，但没有彻底切开。那两块面包烤过了，当刀子切上去时，布洛赫听到咔嚓一声。售货员将面包掰开，然后把香肠片放了进去。布洛赫说，他有的是时间，她应该先为那个孩子服务。他看到那个孩子默默地举着纸条。售货员弯下腰去，看了看纸条。然后她开始剁肉，肉块从板上滑了下来，掉在石头地板上。“啪！”那个孩子叫道。肉块掉在地上不动了。售货员将肉块拾了起来，用刀面将肉剃下一些来，然后包了起来。布洛赫看到外边有学生走过，尽管已经不下雨了，他们还是打着雨伞。他给那个孩子打开门，看着售货员从香肠尖儿上将肠衣撕了下来，然后将香肠片放进第二个面包里。

“生意不好”，售货员说，“人们都住在肉店这一侧的街边。所以，一来街道对面没有住人，不然他们就可以看到街这边有家肉店。二来从这里路过的人从来都不走对面，他们也离肉店太近，也会看不到这里有家肉店，而且橱窗并不比旁边住户的窗户大多少。”

布洛赫觉得很奇怪，他说，那些人为什么不从街道对面走呢，那里很空，能享受到更多的阳光。大概人们都觉得有必要沿着房子走吧！他说。售货员没有听懂他的话，因为他话说到一半时就很讨厌再说下去了，只是低声喃喃。她笑了起来，似乎她只是等着他的回答无

非就是一个笑话。这会儿有几个人从橱窗外经过，店里真的变得如此昏暗，让人觉得像是一个笑话。

一来……二来……布洛赫默默地重复着售货员刚才说的话。他觉得很惊恐，人开始说话时就已经知道自己在一句话快结束时会说些什么。他在外边一边继续往前走，一边吃着香肠面包。他把裹在面包外的油纸叠了起来，准备扔掉。附近没有垃圾桶。他手里拿着纸卷，一会儿往这边走，一会儿往那边走。他把纸塞进上衣口袋里，又取了出来，最后扔进栅栏内的果园里。立刻就有很多鸡从各个方向朝纸卷冲过来，但却又回去了，它们根本没有把纸卷啄开。

布洛赫看到前面有三个男人斜插着往街道对面走了过去，其中两个人穿着制服，他们俩中间的男人穿着考究的黑色西装，戴着一条领带，由于有风，或者由于他们走得太快，领带翻了起来，搭在肩膀上。布洛赫看着那两个警察把那个吉卜 赛人往警察局带。他们一直肩并肩地走到门口，看样子，那个吉卜 赛人很自然地走在两个警察中间，还跟他们说着话。但是，当一个警察把门推开时，另一个警察从吉卜 赛人身后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胳膊肘，没有抓着他。吉卜 赛人回头看着背后的警察，友好地朝他微笑着。那领带结下边的衬衣领子敞开着。布洛赫觉得，这个吉卜 赛人似乎身处一个陷阱之中，当警察碰到他胳膊时，他只能友好而无助地看着警察。

布洛赫跟着他们走进警察局。邮局也在那栋房子里。片刻间，他觉得，如果有人看到他在公共场所吃着香肠面包的话，那么他们或许就会想到他陷入什么麻烦之中呢。“陷入什么麻烦？”他根本就不该想那么多，人家带走吉卜 赛人时，自己在场，没有必要做出什么动作来为之辩解，比如吃香肠面包。只有当他被询问而且受到指责时，他才能做出解释。正因为他必须避免想到自己有可能被询问，他也不该想到事先就为这种情况找到合理的辩解。这种情况压根儿就不会出现。也就是说，如果有人问他是否看到那个吉卜 赛人被带走的话，他不用否认，也不用声称自己因为在吃香肠面包而没有注意到，他可以承认自己就是看到警察带走吉卜 赛人的证人。“证人？”布洛赫打断了自己的想法，他在邮局里等着人家给他接通自己要打的电话。“承认？”这些字眼跟这个对他来说毫无意义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字眼不正是给了他恰好要拒绝的意义嘛。“拒绝？”布洛赫又打断了

自己的想法。没有什么要拒绝的。面对一个个字眼，他一定要小心提防，因为它们会使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变成一种证词。

他被叫进通话间里。他还在想着要避免唤起想要作证的印象，却发现自己用一块手绢将听筒柄缠住了。他有点不知所措，把手绢揣了起来。他怎么从那粗心大意的思绪中转到这手绢上了呢？他在电话里听说，他打电话想要找的那个朋友正在一家训练营里为星期天举行的比赛进行封闭训练呢，没法打电话找到他。布洛赫把另外一个号码给了邮局的女职员。她要求他先付第一个电话的钱。布洛赫付了钱，坐到一条长凳上，在那儿等自己的第二个电话。电话响了，他站起身来。但是，那只是在接收一份贺电。女职员边听边写，然后又一字一字地读了一遍，好让对方确认。布洛赫走来走去。一个邮递员回来了，大声跟女职员对账。布洛赫坐下了。中午刚过，外边路上没有什么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布洛赫变得不耐烦了，但他没有显露出来。他听到那个邮递员讲，这些天来，那个吉卜赛人一直在国境线附近边境检查站的一个避雨棚里躲着。“谁都可以这么说！”布洛赫说。邮递员朝他转过身来，闭口不说了。布洛赫继续说道，邮递员当做新闻炫耀的事情在昨天、前天、大前天的报纸上都能看得到。他说的事情不能说明什么，什么也说明不了，根本就说明不了什么。那个邮递员在他还在讲话时就已经转过身去，悄声跟女职员继续聊着，声音那样低，布洛赫听起来觉得就像是外国电影中那些没有翻译过来的句子，因为那些句子不用翻译也应该可以听得懂。布洛赫的说法没能传过去。突然，他觉得这件事实——恰好在邮局里他没能传过去——并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糟糕的笑话，是那些文字游戏中的一个，差不多从他在体育记者那里读到那些文字游戏之后，他就对它们极其反感了。在他看来，邮递员关于那个吉卜赛人的讲述就是拙劣的双关语，就是笨拙的影射，正如那份贺电一样，贺电里的词儿很是常见，它们根本就不可能是发报人想要说的话。不光说出来的话是一种影射，就连四周的物件也要对他暗示着什么。“似乎它们在对我眨眼，在给我信号！”布洛赫心里想。要不然的话，墨水瓶的盖子紧挨着瓶子，放在吸墨纸上该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那张吸墨纸是今天才新放到写字台上的，因此那上边只能看到很少几处印迹。是不是应该不要说“因此”，而是说“好让”才更正确一些呢？就是说，好让那上边能够看到点印迹？这会儿，女职员拿起了听筒，将贺电字母逐个拼了一遍。她想要凭此传达什么暗示呢？当她拼读“祝一切安好”时，后面隐藏着什么呢？“致以衷心问候”——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些套话代表着

什么呢？“为你自豪的爷爷奶奶”是谁的假名呢？就在当天早上，当布洛赫在报纸上看到小广告“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呢？”时，就立刻把广告当成了陷阱。

他觉得，那个邮递员和那个女职员似乎就是在画面里。“邮局女职员和邮递员”，他纠正了自己的说法。现在，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他自己已经遭到了这种他所痛恨的文字游戏病的猛然袭击。“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不管怎么说，他肯定沉溺于这个字眼里了。在他看来，这个表达很有趣，方式却让人不适。但是，那个句子中的其他字眼就不那么让人不适了吗？当你自言自语地说出“病”这个字眼时，经过几次重复之后只会因此发笑。“一种病袭击了我”：可笑。“我会病的”：同样可笑。“邮局女职员和邮递员”、“邮递员和邮局女职员”、“邮局女职员和邮递员”：惟一的笑话。您知道那个关于邮递员和邮局女职员的笑话吗？“这一切都让人觉得像是一个标题。”布洛赫心想着：“贺电”，“墨水瓶的盖子”，“地板上的吸墨纸碎屑”。挂着各种印章的架子在他看来就像是画出来的。他久久地注视着那个架子，但却想不出那架子上有什么有趣的。再说呢，那其中肯定会有什么趣味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怎么会觉得它像是画出来的呢？或者这又是一个陷阱？这个物件的用途就在于让他说错话吗？布洛赫往另外一个方向看去，又往另外一个方向看去，然后又往另外一个方向看去。这个印泥盒在告诉您什么吗？当您看到这张填好的支票时想到的是什么呢？这拉出抽屉的动作会让您联想起什么呢？布洛赫觉得自己似乎应该清点屋子里的所有东西，好让那些他在清点时打了绊子或者漏掉的物件能够充当证据。邮递员用手掌拍了拍一直还搭在身上的大口袋。“邮递员拍打着口袋，把它拿了下来。”布洛赫心想着，逐字逐句地想着。“现在他把袋子放在桌子上，走进包裹间里。”他给自己描述了这些过程，似乎借此才可以向自己介绍这些过程，就像一个电台记者向观众做介绍一样。过了一会儿，这果真起作用了。

他站着没动，因为电话响了。跟以前一样，每次电话响起时，他都觉得自己已经提早知道了。邮局女职员拿起听筒，然后指了指通话间。他已经走进通话间里。他在琢磨着自己也许误解了那个手势，也许那个手势根本不是打给哪个人的。他拿起听筒，他前妻拿起电话时就直报大名，好像她知道打电话的是他似的。他请她给他往邮局寄点钱，他会自己来取。她以奇特的沉默给予回应。布洛赫听到一声不是

说给自己听的低语。“你在哪里？”那女人问。他说自己双脚冰冷，坐在干地上呢，[21]说完后他大笑起来，就像是遇到了非常有趣的事情。那女人没有回答。布洛赫又听到一声低语。很困难，女人说。为什么？布洛赫问。她没在跟他说，女人回答道。“我把钱往哪儿寄呢？”她要再不帮他一把的话，他马上就得把裤兜翻出来了，布洛赫说。那女人沉默着。然后，对方的听筒就挂上了。

“去年的雪。”布洛赫突然想到，同时他走出了通话间。那是什么意思？事实上，他确实听说边境上的森林里长着茂密繁杂的矮树丛，据说就算是初夏季节还能在那里找到雪块。但是，他并没有想说这个。另外，矮树丛那里没什么可图的啊。“没什么可图？”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说的那个意思。”布洛赫心想着。

他在储蓄银行将随身携带很久的那张一美元纸钞换了。他还想将一张巴西纸币换出去，但是这种货币储蓄银行不收，而且也没有兑换汇率。

布洛赫走进去时，那里的职员正在清点硬币，把它们包成卷，然后再扎上橡皮筋。布洛赫将那张纸钞放在隔板上。旁边是一座音乐钟。布洛赫又看了一眼，才发现那是一个为慈善活动募捐的小箱子。那个男职员抬起头来，却依然继续数着硬币。布洛赫主动将纸钞从玻璃窗下推了过去。那职员将那些硬币卷堆在一旁。布洛赫弯下腰，将纸钞吹到职员的台子上，职员将纸钞展开，用手掌把它弄平，然后用指尖触摸着它。布洛赫看到他的指尖相当黑。从后屋里走出另外一个男职员。是为了见证什么，布洛赫心想着。他请职员将换到的硬币——硬币下连一张纸钞也没有——装进一个小纸袋里，然后将硬币从玻璃窗下推了回去。那个职员将硬币装进一个小纸袋里，跟先前堆放硬币卷时一样，然后把纸袋推给布洛赫。布洛赫想，假如所有的人都要求将钱塞进小袋里，长此以往，储蓄银行就会垮掉了；在所有的购物过程中都可以这么干：也许包装材料的消耗会逐渐将商家逼得破产？至少这么想一想很让人惬意。

布洛赫在一家办公用品商店买了一张本地的徒步旅行地图。他让店员将地图卷好，还买了一支铅笔，并让店员将铅笔装进一个小纸袋里。他手里拿着那卷地图继续往前走。他这会儿觉得自己比先前空着双手时善良了。

他已经走出镇子，到了一个可以观察四周情形的地方。他找了一条凳子坐下来。他用铅笔对照着地图上的细节和自己面前地形的细节。符号解读：这些圆圈代表一片落叶林，这些三角代表着一片针叶林。当他从地图上抬头看去时，发现这些居然都是准确的。那片地方应该是块沼泽地；那儿应该有一座纪念小亭；那儿应该有一座横跨铁路的天桥。如果沿着这条公路走去，肯定要在这儿过一座桥，然后就应该走上一条乡间小道，接着就会走上一道很陡的坡，可能那里已经站着一个人了。也就是说，一定要从这条路拐下来，然后走过这片平地，往那片森林走去，幸好那是一片针叶林。但是，也可能有几个人从森林那边迎面走来，那你就不得不拐个弯，沿着这道坡往下，朝着那家农庄方向走去。你就必须从这个棚子旁走过，然后沿着这条小河跑去。你必须在这个地方跳到河对面去，因为这里有可能迎面过来一辆吉普车。然后，你立刻拐来拐去跑过这片耕地，溜过这道树丛篱笆，走到公路上。那里正好有一辆货车经过，你招手让货车停下，于是就安全了。布洛赫思绪停住了。“如果涉及谋杀案的话，那么你的思维就会跳跃。”他以前在一部电影里听到有人这么说过。

他感到一阵轻松，因为他在地图上找到了一个四边形，但在眼前的地形里却没有找到：一栋本该在那里的屋子不在那里，本该在这个地方拐弯的路实际上是笔直的。布洛赫觉得，好像这种不相符合的情况对他有所帮助似的。

他看着一块地上有一条狗正在朝一个男人跑去。然后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再看那条狗，而是在看那个男人了，那人动来动去，就像一个非得要挡住某人去路的人一样。这会儿他发现，他不再像常见的情形那样看男人和狗，而是在看那个似乎在远处胡乱动弹的孩子。但是，他接着就发现，让他误以为小孩在胡乱动弹的是孩子的叫喊声。男人已经抓住了狗项圈，他们仨——狗、男人和孩子——朝一个方向继续走去。“这是让谁看的呢？”布洛赫心想着。

他面前的地上出现了另外一幅图像：一群正在靠近一块面包屑的蚂蚁。他发现，自己不是在看蚂蚁，而是在看落在面包屑上的苍蝇。

确确实实，他所看到的事情很特别。这些图像让他觉得并不自然。相反，它们似乎是特意为他准备的。它们有着一定的目的。当他端详它们时，它们确确实实就跳入他的眼中。“就像电话接通后的长音一样。”布洛赫想。就像命令一样！他合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又往

那边看去，觉得一切确确实实变样了。他所看到的那些片断似乎在边缘上闪烁着，颤抖着。

布洛赫没有真正站起身来，从坐姿中就径直出发了。过了一会儿，他停住脚步，然后立刻从站立姿势中跑起来。他很快开始冲刺，突然又停住脚步，改变了方向，匀速地跑着，现在换了脚步，再换脚步，停住，现在背身向后跑着，在背身跑动中转过身去，往前继续跑着，又变成背身跑动，背身往前走着，又换成往前跑动，跑了几步后变成全速冲刺，急停下来，在马路边的石头上坐下，立刻又从坐姿中继续跑起来。

他停了下来，又继续往前走，边缘上那些图像似乎如同乌云一样都在往这边涌。最后，它们全都变黑了，中间形成一个圈。“就像是电影里有人透过望远镜在看一样。”他想。他用裤子擦掉腿上的汗水。他从一间地下室旁边走过，由于通往地下室的门半开着，里面的茶叶闪着奇特的光芒。“就像土豆一样。”布洛赫想。

当然他面前的这栋屋子是单层建筑，窗户外的护板紧紧扣着，屋顶上长着苔藓（还是这样一个字眼！），门关着，门框上方写着：小学，屋后的花园里有人在劈柴，那一定是校工，对，学校前当然还有一道树丛构成的篱笆，是，没错，什么都不少，就连黑乎乎的教室里的黑板下边也没少长霉菌，旁边也少不了装着粉笔的盒子，就连外边窗户下边的墙上也少不了那些半圆形，旁边还有一个符号解释证明了那些半圆形是窗钩留下的划痕。说到底，仿佛你所有看到或听到的一切都得到了证实：一切都和那个字眼很般配。

教室里煤箱的盖子敞开着，他能看到箱子里有一个煤铲柄（一个愚人节玩笑！），地上铺着宽木板，因为洗过，木板的缝隙还是湿的，也不能忘记墙上的地图、黑板旁边的洗手池和窗台上的玉米叶子：惟一糟糕的模仿！这种愚人节玩笑他不会中招的。

看起来，他似乎还一直在转圈儿。他忘记了门边的避雷针地线。在他看来，这会儿它像是一个关键词。他应该开始了。他想出办法了：他从学校旁边走过，走进学校后边的院子，跟木屋里的校工谈话。木屋、校工、院子：这都是关键词。他看着校工将一个木块竖在柴墩上，并且抡起斧头来。校工抡起斧头时，他站在院子里搭上话，校工停下手里的活儿，回答了他的话。当他要劈开那个木块时，木块

在他劈下去之前就倒了，他的斧头劈在柴墩上，扬起很多灰尘。校工身后那个木柴垛塌了。又是一个关键词！但是，接下来没有其他词儿了。他只是问着在半明半暗的木屋里干活的校工，是不是所有班级只有这么一间教室。校工回答说，所有班级只有这么一间教室。

难怪那些孩子在离开学校时连说话都还没有学会呢，校工突然这么说道。他将小斧头劈进柴墩里，走出了木屋：他们连一个自己的句子都说不完整，他们相互几乎只说单个的词儿。在布洛赫没有问他的情况下，他说，他们所学的东西只是死记硬背的玩意儿，然后他们就熟练地背出来。除此之外，他们没有能力说出完整的句子。“所有的孩子其实全都多多少少有语言障碍。”校工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校工这么说是为了什么啊？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没关系吗？哦，那校工为什么装得一本正经，仿佛这跟他有关系呢？

布洛赫似乎应该回应，但他没有搭理。要是他开了口的话，那他就得说下去。于是，他又在院子里转了转，帮着校工收拢那些劈柴时从木屋里飞出来的木块。然后，他慢慢悄然地回到公路上，可以不受打扰地离去。

他从操场旁走过。已经是下班时间，足球运动员在训练。球场很湿，球员在踢球时水珠从草地上四溅。布洛赫看了一会儿，天色暗了下来，他便继续往前走去。

他在车站饭馆里吃了一块炸肉饼，喝了几杯啤酒。他在外边的站台上找到一条凳子，坐了下来。一个穿着高跟鞋的姑娘在鹅卵石上走来走去。调度室里的电话响了。一个职员站在门框下，抽着烟。有个人从候车室里走了出来，立刻停住了。调度室里又丁零丁零地响了起来，布洛赫听到有人大声说话，就像是在对着话筒说话。天色已经变暗了。

四处一片安静啊。他看到有人吸烟。一个水龙头被人用力拧开后离开又关上了。好像有人被吓着了一样！远处的黑暗中，有几个人在讲话：他能听到很高的声音，就像是在半梦半醒中一样：a, i。有人在喊：哎哟！听不出来是一个男人还是女人在喊。很远的地方可以清

楚地听到有人说："您看起来可真累坏了！"他也很清楚地看到铁轨之间站着一个铁路工人，他在挠自己的脑袋。布洛赫以为他睡着了。

他可以看到有一列火车开进来。他看着有几个人下了火车，似乎他们犹豫不决要不要下车。最后，一个醉醺醺的男人从火车里走了出来，重重地撞上了车门。布洛赫看到站台上的工作人员用手电筒给了个信号，火车又开走了。

布洛赫在候车室看了看列车时刻表。那天已经没有其他火车经过这里了。不管怎么说，现在很晚了，可以去看电影了。

电影院的前厅里已经坐着好几个人。布洛赫也坐了过去，手里拿着电影票。来的人越来越多。听到那么多声音很舒服。布洛赫走到放映厅前，找个地方排上队，然后走进放映厅里。

那部电影里有人朝一个男人开枪，那男人在很远的地方坐在一堆篝火旁边，后背对着开枪的人。什么也没发生；那个男人没有倒下，依然坐着，也不看看是谁在开枪。过了一会儿。随后，那个男人慢慢地侧身倒了下去，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还是这种老枪，那个开枪的男人对自己旁边的人说：没有穿透力。实际上，那个男人之前就已经坐在火堆边上死去了。

看完电影之后，布洛赫跟两个小伙子坐车前往边境那边。一块石头从车底下撞到汽车上；布洛赫坐在后排，他又警醒了。由于那天正好是领工资的日子，饭馆里没有空桌子。他随便找了个地方跟别人坐在一起。女租赁人走了进来，将手放在他肩上。他明白了，给同桌的所有人点了烧酒。

他准备付账，就将一张叠好的纸钞放在桌子上。他旁边有人将纸钞展开，说道，这张钱里可能还藏着一张呢。布洛赫说：那又怎么样？然后又将纸钞叠了起来。那个家伙把纸钞展开，将一个烟灰缸推到纸钞上。布洛赫抓起烟灰缸，从下往上将烟蒂倒在那家伙的脸上。有人从后边拽走了他的椅子，他滑到桌子下边去了。

布洛赫跳了起来，很快用前臂朝着那个拽掉椅子的家伙的胸口砸去。那家伙撞在墙上，大声呻吟着，因为他连气都喘不上来。有几个

人将布洛赫的双臂拧到后背上，把他推向门口。他没有倒地，只是踉跄了一下，立刻又冲了进去。

他要去打那个展开纸钞的家伙。有人从背后踢了他一脚，他跟那个家伙一起撞到桌子上。正要倒下去时，布洛赫就开始揍他了。

有人抓住他的双腿，把他拉开了。布洛赫踹了那人肋骨一脚，那人松开了他。他们在街上将他的双臂反拧在他脑后，把他东拉西拽。他们带着他在边境检查站前停了下来，把他的脑袋摁到门铃上，然后就走开了。

一个稽查员走了出来，看到布洛赫站在那里，然后又回屋去。布洛赫追上那些家伙，从后边掀翻了一个。其他人都朝他冲了过来。布洛赫躲开了，一头撞上其中一个人的肚子。从饭馆里又出来了几个人。有人将一件外套朝他头上扔。外套碰到了他的小腿，但另外一个人已经将外套的袖子扣在一起了。这会儿他们很快就把他揍得趴下了，然后又回饭馆里面去了。

布洛赫解开那件外套，朝他们追了过去。有一个人停了下来，但没有转身。布洛赫朝他冲了过去，那个家伙立刻又往前走了，布洛赫倒在了地上。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走进饭馆。他想说点什么，但是，当他的舌头开始动起来时，嘴里起了血泡。他在一张桌子旁坐下，用一根手指示意给他拿点喝的东西来。同一张桌子的其他人不理会他。女服务员给他送来一瓶啤酒，没有给他杯子。他以为自己看到桌子上有些小苍蝇在爬来爬去，但那只是烟子。

他太虚弱了，没法单手举起啤酒瓶。于是他用两只手抱住酒瓶，将上身前倾，免得将酒瓶举得太高。他的两耳那样敏感，有好一阵子，他听到邻桌的扑克牌不是掉在桌子上，而是砰砰地砸在桌子上；柜台那里的海绵不是掉进池子里，而是啪啪地砸在池子里；女租赁人的孩子不是穿着木屐走过餐厅，而是啪嗒啪嗒地穿过餐厅；那葡萄酒不是流进杯子里，而是汩汩地淌进杯子里；点唱机不是在演奏，而是在咚咚地闷响。

他听到一个女人吓得尖叫起来，但一个女人在酒馆里尖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就是说，那个女人就不可能是被吓得尖叫起来。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吓醒了，只是因为那个声音，那个女人叫得那样尖厉。

慢慢地，其他细节也失去意义了：那个空啤酒瓶里的泡沫能告诉他的，跟旁边一个家伙刚刚撕开的烟盒一样少之又少。那家伙将烟盒开口撕得老大，用指甲就可以抠出一根香烟来。那些划过的火柴七零八落地插在那松动的地板条里，也不再让他动什么心思了。窗框旁灰泥里那些指甲印不再让他觉得，它们好像跟他有什么关系似的。这会儿，一切都让他冷静了，一切又回到了原样，就像笼罩在一片和谐之中，布洛赫想。他不再有必要从那点唱机上，从那塞满了东西的松鸡得出什么结论了。那些正在天花板上睡觉的苍蝇也不再暗示什么了。

他看到有个家伙在用指头梳头；他看到姑娘们后退着去跳舞；他看到一些家伙站了起来，扣好上衣的纽扣；他听到扑克牌在洗牌时发出的哗啦声，但是，他没有必要停留在这里。

布洛赫累了。他越累就越清晰地感知到所有的一切，并将它们一一区分开来。他看到，有人走出去之后，门就大开。他还看到有个人不停地站起来去把门关上。布洛赫非常累，他看到每个物件都自成一体，特别是它们的轮廓，仿佛这些物件就只有轮廓似的。他直接看到和听到了一切，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先将它们翻译成语言，或者只是将它们理解为语言或文字游戏。他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他觉得一切都很自然。

后来，女租赁人坐到他所在的那张桌子旁，他那样自然而然地用胳膊搂住她，所以她看上去根本就没有觉察到。他将几枚硬币扔进了点唱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径直跟女租赁人跳起舞来。他发现，她每次对他说点什么时都会带上他的名字。

他看到女租赁人一只手握着另一只手，其中不再有什么特别。厚厚的窗帘也不再有什么特别。不言而喻，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他心情轻松地听到那些人在外边的街道上撒尿，然后他们又继续往前走去。

饭馆里变得非常安静，点唱机里的唱片完全清楚地播放出来了。换唱片期间，人们低声说着话，几乎都屏住了呼吸。当下一张唱片开始响起来时，大家感到一阵放松。布洛赫觉得，似乎可以像谈论反复出现的什么事情一样来谈论这些过程。一天的流水账，布洛赫想，可以往明信片上写的东西。“晚上坐在饭馆里，听唱片。”他越来越累，外边有苹果从树上掉下来。

当餐馆里剩下他一个人时，女租赁人走进了厨房。布洛赫坐着没动，直等到那张唱片放完了。他关掉点唱机。现在只有厨房里还有灯光。女租赁人坐在桌边算账。布洛赫朝她走过去，他手里拿着一个啤酒杯垫。当他走出餐厅时，她抬起头来。他朝她走过去时，她看着他。他很晚才想起杯垫来，想要在她看到它之前赶紧把它藏起来，但是，女租赁人已经不看他了，而是看着他手里的杯垫，还问他拿着杯垫干什么，好像她有可能在杯垫上记着一笔还没有支付的账。布洛赫扔掉杯垫，在她身旁坐下，他的动作不是一个接一个，而是每个动作都犹豫片刻。她继续数着，一边还跟他说着话，然后把钱收了起来。布洛赫说，他只是忘记把杯垫放下了，这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她邀请他跟她一起吃饭。她在他面前摆了一块垫板。还缺一把刀，他说，而她已经把刀放在垫板旁边了。她要从花园里把衣服收回来，她说，开始下雨了。没有下雨，他纠正她的说法，只是从树上下雨了，因为有点起风了。但是，她已经走出去，由于她开着门，他看到真的在下雨。他看着她走回来，便对她喊道，她掉了一件衬衣，但是，结果证明，不过是那块地板拖布，它先前就放在门旁。当她在桌边点燃一根蜡烛时，他看到烛泪滴到一只盘子上，因为她手里的蜡烛有点倾斜。她该小心的，他说，烛泪流到盘子上了。但是，她已经把蜡烛立在还在流动的蜡液上，摁了好一会儿，直到蜡烛立住了。“我不知道你是想把蜡烛放在盘子上。”布洛赫说。她打出一个姿势，想要在一个根本没有椅子的地方坐下，布洛赫叫道：“小心！”而她却只是蹲了下去，拾起一枚硬币，那是她数钱时掉到桌子下的。她往卧室里面走去，要去看看孩子，他立刻问她去哪里。甚至有一次，当她从桌边走开时，他在她身后大声问她要到哪里去。她打开了放在橱柜上的收音机。一边听着广播里放出的音乐，一边看着她走来走去，那可是件让人惬意的事情。在电影里，有人打开收音机时，正在播送的节目立刻就停下了，转而播送一道通缉令。

他们坐在桌边说着话。布洛赫觉得似乎自己没有能力说点严肃的事情。他讲了一些笑话，但是女租赁人把他所说的一切全都当真了。他说，她衬衣上的条纹就像足球队服一样，他正想继续往下说，她却已经在问，他是不是不喜欢她的衬衣，他对她的衬衣有什么意见。他使劲强调自己只是开了一个玩笑而已，但一点用也没有。他甚至还说，那件衬衣跟她的白色皮肤非常般配。而她又问，他是不是觉得她的皮肤太苍白。他开玩笑说，厨房装修得几乎跟城里的厨房一样，她问他为什么要说“几乎”。是不是城里的人把他们的东西弄得更加干净些？就连布洛赫拿房东的儿子开玩笑时（他说，房东的儿子可能已经向她求婚了吧），她把他的话也当真了。她说，房东的儿子不是自由之身。他想要打个比方来解释一下自己不是认真的，但那个比方也被她当真了。“我这么说没什么别的意思。”布洛赫说。“你这么说肯定有什么原因吧。”女租赁人回答说。布洛赫笑了。女租赁人问他为什么笑话她。

小孩在卧室里叫了一声。她走了进去，安抚了孩子。等她回来时，布洛赫已经站起来。她站在他面前，盯着他看了好一阵子。然后，她却说起了自己的事情。因为她站得离他很近，他没法回答，往后退了一步。她没有跟着往前动，但却闭嘴不说了。布洛赫想要抓住她。当他终于伸开手时，她却朝旁边看去。布洛赫放下手，假装自己开了个玩笑。女租赁人坐到桌子另一侧，继续讲下去。

他想要说点什么，但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说什么。他竭力回忆着：他没有回忆起到底是什么，但跟恶心有点关系。然后，女租赁人一个手势却让他想起别的事情来。他又想不起来那是什么，但那跟羞耻息息相关。他所感知的，不管是动作还是物件，都没有让他想起别的动作和物件，而让他想起了感受和感觉。他不是回忆起那些感觉，像过去的什么事情一样，而是再次经历着它们，就像是当下的事情一样：他没有想起羞耻和恶心，而是觉得羞耻和恶心，因为当他回忆时，他并没有想起那些引发羞耻和恶心的物件。恶心和羞耻，二者合在一起，如此强烈，他整个身体都因此开始发痒。

外边有一块金属砸在窗户玻璃上。女租赁人对他的问题回答说，那是避雷针的线，它松开了。布洛赫先前在学校那里就已经观察过一根避雷导线，他立刻就将这种重复看成意图了；他接连两次遇到了避雷导线，这不可能是巧合。而且，他觉得一切都很相似；所有的物件

都让他想起它们的相互关联来。避雷导线的再次出现是什么意思呢？他会从这避雷导线上看到什么呢？“避雷导线？”这可能又是一个文字游戏吧？这就意味着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要不就是在暗示他应该给女租赁人讲出所有的事情？还有，为什么那个木盘上放着的饼干像鱼的形状呢？它们在暗示着什么呢？他是不是应该“像鱼一样沉默”呢？他不能再说下去吗？木盘里那些饼干是在向他暗示这个吗？看样子，仿佛他并没有看到这一切，而是在什么地方从一张印着行为规范的海报上看到的。

是的，那是些行为规范。水龙头上方的洗涤残渣命令他做点什么。通常已经打扫干净的桌子上那个啤酒瓶盖也要求他做点什么。这已经形成习惯了：他看到处处都有要求：做这个，干那个。对他来说，一切事先都已经规定好了，放调料罐的架子，放着盛有刚刚做好的果酱的杯子……反复如此。布洛赫注意到，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跟自己说话了：女租赁人站在洗碗池旁，从碟子里捞出那些面包渣。他动过的所有东西都得再收拾一下，她说，取出餐具后他连抽屉都不会关上，他翻过的书也不合起来，就放在那里，他将上衣脱下来后就那样扔在那里。

布洛赫回答说，他真的觉得他没有必要什么都管。只差一点点，比如说，他就松开手里的这个烟灰缸了；他自己都觉得奇怪，烟灰缸还在自己手里。他一边站起来，一边将烟灰缸往前递出去。女租赁人看着他。他盯着烟灰缸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放下了。就像是为了迎合他四周不停重复的暗示，布洛赫重复了自己说过的话。他如此无助，继而又重复了一遍。他看到女租赁人在洗碗池上抖动着自己的胳膊。她说，一块苹果掉进袖口里，不愿意出来了。不愿意出来了？布洛赫模仿起她来，他也抖动着自己的袖口。他觉得，他模仿所有动作时，他似乎就像是坐车时站在某人的身后。但是，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她开始演示他是如何模仿她的了。

在此过程中，她走到冰箱前，那上边放着一个蛋糕盒。布洛赫看着她，她还在模仿他，从后面碰到了蛋糕盒。由于他专注地看着她，她又用胳膊肘往后碰了一下。蛋糕盒滑动了，慢慢地从冰箱的圆边上翻了下来。布洛赫本来可以用手接住它，但是他看着蛋糕盒，一直看到它砸在地上。

当女租赁人弯腰去拾蛋糕盒时，他这走走，那看看，把所有东西都推到墙角去，一把椅子，炉子上的一个打火机，厨房桌子上的一个烟灰缸。“都还好吗？”他问。他问的正是他想让她问他自己的。但是，她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外边的窗玻璃被敲响了，就像避雷导线永远不会再敲打窗玻璃一样。布洛赫在此之前就已经知道会敲的。

女租赁人打开窗户。外边站着边境检查站的稽查员，他讨要一把雨伞，以便在回镇子的路上用。布洛赫说，他也可以马上跟他一起走。他让女租赁人将门框旁工作裤下的雨伞递给自己。他许诺说第二天就把雨伞送回来。只要他还没有送回来，这中间就不会出什么事儿。

他在街上将伞撑开。雨马上就噼里啪啦地下起来，声音很大，他没有听到她有没有回答什么。那个稽查员沿着墙壁跑到雨伞下，他们一起走了。

他们走了几步之后，旅馆的灯就关上了，外边完全暗了下来。非常暗，布洛赫不得不将手遮在眼前。他们沿着一道墙往前直走，他听到墙后有奶牛的叫声。有什么东西从他身边跑过去。街边的树叶刷刷地响着。“我差点就踩着一只刺猬！”稽查员叫道。

布洛赫问他怎么在黑暗中看到刺猬的。官员回答说：“这是我的职业要求。只要看到一个动作或者听到一个声音，就必须能够确认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就连一个在视网膜边缘移动的东西也必须认出来。是的，而且还可以确定其颜色，尽管只有在视网膜的中心才能完全看到颜色。”他们已经走过了边境上的房屋，这会儿在小溪旁的捷径上往前走着。那条路铺满了沙子，布洛赫越来越适应黑暗，沙子也越发明显。

“当然，我们在这里相当清闲，”稽查员说，“自从边境埋上地雷之后，就没有走私了。紧张情绪也减少了。人累了，没法再集中注意力。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就连一点反应也没有。”

布洛赫看到有什么东西朝自己跑来，他往稽查员身后走去。一条狗从他身边跑过，碰到了他。

“要是有人冲我们过来，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抓他。从一开始就站错地了，等到终于站对了地时，就指望着旁边的同事会去抓住他，而同事还指望我来抓他呢，可那个家伙早就跑掉了。”跑掉？布洛赫听到稽查员在雨伞下，在自己旁边深深地吸着气。

他身后的沙子发出了嚓嚓的声音，他转过身去，看到那条狗又回来了。他们继续往前走着，狗跟在他们后边，嗅着他的两个腿窝。布洛赫停住脚步，在小溪旁折下一根榛子树枝，将狗赶走了。

“当人们面对面站着时，”稽查员继续说着，“重要的是，你要看着别人的眼睛。在他开始跑之前，眼睛会预示他将要跑动的方向。但是，你同时还要观察他的双腿。他用哪条腿站着？支撑腿显示的方向就是他要逃跑的方向。但是，要是那人想骗你，并不往那个方向跑，那他就不得不在马上要跑之前换条腿来支撑，而他就会失去很多时间，你就可以朝他扑过去。”布洛赫朝下往小溪看去，虽然可以听到小溪的流水声，但却看不到它。

从一丛灌木里飞起一只硕大的鸟。他听到一个木棚里有鸡用爪子刨地，用喙敲墙木板。“本来是没有规则的，”稽查员说，“你一直都处于劣势，因为那人也会观察，也会看着你会怎么应对他。你只能做出回应。当他开始跑的时候，他在第一步之后就会改变方向，而你的支撑腿却选错了。”

他们已经又走到沥青路上，朝着镇子的入口走去。他们时不时会踩在已经松软的锯末上。那些锯末是在下雨前一路撒到街上的。布洛赫在想，那个稽查员之所以能这么详细地谈论本来用一句话就可以了结的事情，是不是因为他想要说点别的什么。“他说得很熟练！”布洛赫心想。他开始自己试着长篇大论地谈论起通常本来只需要一句话的事情。但是，那个稽查员似乎认为这很自然而然，还问他到底想要说什么。那就是说，稽查员刚才所说的话看来真的就是那些字面意思。在镇子中央，他们遇到了一个舞蹈班的学员。“舞蹈班？”这个词又影射着什么呢？一个姑娘走过他们身边时在她的“手包”里找什么东西，另一个姑娘穿着高“帮”靴子。这些都是代表什么东西的简称吗？他听到那只手包在自己身后合上了。他差点将雨伞合起来，作为回应。

他陪着那个稽查员往外走去，走向镇子的福利住房。“我到现在一直只是租房子住，但我在攒钱，想买一套自己的房子。”稽查员说，他已经走到楼梯间。布洛赫也走了进去。他想不想一起进去喝上一杯烧酒？布洛赫拒绝了，但站在那儿没走。就在稽查员正要往上走时，灯又灭了。布洛赫靠在下边的信箱上。屋子外边，在很高的空中有一架飞机飞过。“邮局的飞机！”稽查员在黑暗中冲下面叫道，他还摁了一下电灯按钮。楼梯间亮了起来。布洛赫很快走了出去。他在旅馆听人说，来了一个很大的旅游团，他们安排这个团住在保龄球室的行军床上，所以，那儿今天很安静。布洛赫问那个告诉他这些事情的姑娘，她是否愿意跟他一起上楼去。她严肃地回答说，今天不可能。后来，他在屋子里听到她在楼道里走过他的房门。因为下雨的缘故，屋子里很冷，他觉得好像到处都撒上了潮湿的刨花。他将雨伞放进洗手池里，伞尖朝下，然后他就和衣躺到床上了。

布洛赫困倦了。他做出几个疲惫的表情，他的本意是想要凭借这些动作让困倦劲显得可笑，但是，正因为如此他更加困倦了。他又想起来了自己在白天说过的一些话。他试着用呼气来摆脱这些东西。然后，他感觉自己睡着了；就像是在一个段落结束之前，他想。一些野鸡飞过火焰。驱赶鸟的人们沿着一块玉米地走着。那个旅馆服务员站在储藏室里，用粉笔将房间号写在他的文件包上。一堆没有叶子的灌木丛上落满了燕子，爬满了蜗牛。

他慢慢地醒过来，注意到有人在隔壁房间里很响地呼吸着，在他半睡半醒中，那呼吸的节奏里组成了句子；他将那人的呼气听成一个拖得很长的“和”，那吸气时长长的声音然后在他这儿变成了一个个句子，它们分别用一个破折号跟“和”连接起来。这个破折号就等于呼气和吸气之间的停顿。士兵们穿着尖头便鞋站在电影院前。那火柴盒就放在烟盒之上。电视机上放着一个花瓶。一辆装着沙子的卡车从一辆轿车旁呼啸而过，扬起很多灰尘。一个想搭便车的男子一只手伸出拇指，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把葡萄，门口有人在说：“请开门！”

“请开门！”最后几个字跟隔壁的呼吸一点也不搭配，那呼吸越来越清楚，而那些句子慢慢地消失了。布洛赫这会儿彻底清醒了。又有人在敲门，而且还说：“请开门！”外边的雨已经停了，他肯定是因此而醒来的。

他很快地站了起来。床垫里的一个弹簧弹回到原来的位置。门外站着那个女服务员，她手里拿着一套早餐。他没有订早餐，他刚刚说完这句话，那个姑娘就已经道过歉，去敲对面的门了。

他又是一个人呆在房间里。他觉得一切都颠倒了。他拧开水龙头。立刻就有一只苍蝇从镜子上掉进洗手池里，很快就被冲走。他坐到床上：刚才那把椅子还在他右边呢，现在却在他左边。那幅画面是左右颠倒的吗？他从左往右看去，然后又从右往左看去。他再次从左往右看去。他觉得这目光就像是阅读一样。他依次看到一个“柜子”，“然后”“一张”“小”“桌子”，“然后”“一个”“纸篓”，“然后”“一块”“窗帘”。相反，他从右往左看去时看到一把，旁边是那张，床下边是，旁边是，上边放着他的，当他四下张望时，看到了，旁边是和。他坐在上，下边是一根，旁边是。他走向：

。布洛赫拉上窗帘，走了出去。

下边的客房都被那个旅游团占用。老板让布洛赫到旁边的屋子去，那里的窗帘拉起来了。老板的母亲坐在电视前。老板将窗帘拉开，站在布洛赫身边。一会儿，他看到老板在自己左边站着，然后，等到他再次抬头看时，情形又反了过来。布洛赫点了一份早餐，还想要报纸。老板回答说，报纸正好有旅游团的成员在看呢。布洛赫用指头摸了摸自己的脸。脸颊似乎僵死了。他很冷。苍蝇在地板上缓慢地爬来爬去，他起先甚至把它们当成了瓢虫。一只蜜蜂从窗台上飞起来，立刻又掉头飞去。外边那些人在水滩之间跳来跳去。他们提着厚厚的购物袋。布洛赫用手在自己的脸上摸了个遍。

老板端着早餐走进来，他说，报纸一直还有人在看。他的声音很小，布洛赫回答时声音也很低。“不急的。”他低声说。在阳光下，电视机的屏幕现在满是灰尘，窗户在屏幕里显出影子。小学生在路过时就是透过那扇窗户向里边张望的。布洛赫一边吃，一边听着电影。老板的母亲不时抱怨着。

他看到外边有一个架子，那上边挂着一个装满报纸的大袋子。他走了出去，先往袋子旁边的一个小缝里扔了一枚硬币，然后取出来一份报纸。他在翻看报纸方面非常熟练，正往屋里走时就已经看到了对他自己的描述。他在大巴里引起了一个女人的注意，因为他的口袋里掉出了硬币；她正要弯腰去拾硬币时，就看到那是些美国硬币。后来她听说，在那个女售票员的尸体旁找到了这种硬币。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把她提供的情况当回事儿，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描述跟女售票员的一个熟人所讲述的是吻合的，那个熟人在出事前的晚上开车去接女售票员时，看到一个男子站在电影院附近。

布洛赫又坐到侧屋去了，看着他们根据那个女人对他的描述而画的画像。这就是说，他们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报纸是什么时候印出来的呢？他看到这份报纸是第一版，通常在头天晚上就已经出来了。他觉得标题和图片似乎是贴在报纸上的，就像电影里的报纸一样，他心里想：电影里的真标题被替换成了跟电影相宜的标题；或者就像是在游乐园里自己可以随意让人印制的号外。

他们将报纸边缘的涂画读成了“施图姆”这个词儿，而且第一个字母是大写的，于是，想当然这就是一个人名字。一个名叫施图姆的人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吗？布洛赫想到他跟女售票员说起过一个朋友，一个名叫施图姆的足球运动员。

女服务员收拾桌子时，布洛赫没有将报纸叠起来。他听到有人说，那个吉卜 赛人已经被放出来了，那个哑巴学生的死是个意外事故。关于那个孩子的事情报纸上只刊登了一张全班合影，因为他从来没有单独照过相。

老板的母亲用来靠在后背的一个垫子从沙发上掉到地上，布洛赫把垫子拾了起来，然后拿着报纸走了出去。他看到旅馆那份报纸放在牌桌上。那个旅游团已经坐车走了。报纸——那是份周末版——非常厚，没法放进报夹里。

一辆小汽车从他身边开过去，他毫无意义地觉得很奇怪——因为天还相当亮，那辆车的车灯没有打开。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他看到果园里有人将装在箱子里的苹果往袋子里倒。一辆超过他的自行车在泥地里滑来滑去。他看到两个农民在一家商店门口相互握手；他们的手非常干燥，他听到了那两只手沙沙地响着。拖拉机在泥路上留下的车印从田间路通往沥青路上。他看到一个老妇弯着腰站在一个橱窗前，她的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那些商店前的停车位都是空的。看来这里的顾客都走后门。“泡沫”“从”“门口的台阶”“淌”“下来”。“席梦思床”“放”“在”“窗玻璃”“后面”。写着价格的黑板被搬回店内。“鸡”“啄起”“掉下来的葡萄”。火鸡卧在果园里的铁丝笼里一动不动。女学徒从屋里走出来，双手叉腰。店主在昏暗的商店里，静静地站在秤后边。“柜台上”“有”“一些酵母碎片”。布洛赫站在房屋的外墙边。当他身边有一扇只是虚掩着的窗户打开时，传出一种奇特的声音。他离开继续往前走去。

他站在一栋新建的房屋前，那里还没有住人，但是已经装上了窗玻璃。里面的房间空空的，透过窗户都可以看到屋后的风景。布洛赫觉得，好像是他造了这栋房子。他自己装了插座，甚至还装上了窗玻璃。就连窗台上的凿子、点心纸和小吃都是他的。

他又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不，灯开关还是灯开关，屋后的花园椅子还是花园椅子。

他继续往前走，因为……

他一定要为继续往前走找个理由吗，为的是……

他的目的是什么，当……时他必须要给这个“当……时”找个理由，因为……能一直这样下去，直到……他已经走了这样远……所以……吗？

为什么一定要从他走在这里而推导出什么结果呢？他非得找个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站在这里吗？为什么当他从一家浴场旁边经过时非得要有什么目的呢？

这些“如此……所以”、“因为”和“为的是”就像是规定一样。他下定决心，避免这些词儿，免得它们……

看样子，仿佛他身边一扇虚掩的窗户被打开了似的。所有可以想到的，所有可以看到的东西都被占用了。不是一声叫喊让他感到恐惧，而是一个被颠倒的句子，它出现在一连串平平常常的句子的末尾。他觉得一切都被改了名字。

那些商店已经关门了。货架前没有人走来走去，看起来装满了东西。没有一个地方没放上东西，至少也有一堆罐子。收款台那里还挂着一张撕了半拉的付款单。那些商店挨得那样紧，所以……

“那些商店挨得很紧，以至于什么东西也没法伸手去指了，因为……”“那些商店挨得那样紧，所以什么东西也没法伸手去指了，因为那些东西相互遮挡着。”停车位上现在只停放着那些女学徒的自行车。

午饭之后，布洛赫去了运动场。还在离那儿很远的地方，他就听到了观众的喊声。当他到达那里时，两支预备队还在踢垫场赛。他在球场正面旁的凳子上坐下，开始看报纸，一直看到了周末副刊。他听到一个声音，就像是一块肉掉在石头地面上；他抬头看去，看到原来是又湿又重的足球砸在一个球员脑袋上。

他站了起来，走开了。等到他回来时，正式比赛已经开始。凳子都被人占了，他沿着球场边走到球门后边。他不想站在离球门太近的地方，就沿着坡道往公路方向走去。他沿着公路一直走到角旗处。他觉得仿佛上衣的一颗纽扣掉了，还蹦到路上。他拾起纽扣，装进兜里。

他和站在旁边的一个人聊起天。他打听是哪两支球队在比赛，还问他们的排名情况。在这种逆风情况下，他们不应该起高球，他说。

他注意到站在旁边这个男子的鞋上有扣环。“我也不清楚，”那个男子回答说，“我是销售代表，只在这儿呆几天。”

“那些球员喊叫得太多了，”布洛赫说，“一场好比赛会进行得非常安静。”

“没有教练在场边朝他们喊着该干什么嘛。”销售代表说。布洛赫觉得好像他们在为第三个人相互交谈似的。

“在这种小场地传球时，你必须很快做出决定。”他说。

他听到有人在鼓掌，就像是球击中了门柱。布洛赫说，他自己曾经跟一个全是光脚队员的球队踢过比赛；每次那些光脚球员踢到球时，那种啪啪的声音就让他没法忍受。

“有一次我在体育场里看到一个球员弄断了自己的腿，”销售代表说，“站在最后一排的人都听到了咔嚓声。”

布洛赫看到旁边还有其他观众在聊天。他没有观察那个正在说话的观众，而是逐个看着正在倾听的观众。他问那个销售代表，他是否曾经尝试过，在进攻时，自始至终就不看前锋，而是一直看着那个守门员，那些前锋正带着球冲向他的球门。

“不看前锋和球，而去看守门员是很难做到的，”布洛赫说，“你非得把自己与球脱离开来，这是地地道道不自然的事情。”你不看足球，而是看着那个守门员，看他双手放在大腿上，又是往前跑，又是往后退，左右晃来晃去，冲着后卫大声叫喊。“通常情况下，只有足球朝球门射出时，你才会注意到他。”

他们一起沿着边线走着。布洛赫听到一声喘息，好像是边裁从他们身旁跑过。“这是非常奇特的景象，你看着守门员没有球，但期望着球的到来，不停地跑来跑去。”他说。

销售代表回答说，他自己没法长时间地朝守门员那儿看，他会情不自禁地立刻扭头去看前锋。布洛赫说，当你看守门员时，你会觉得似乎你自己必须要踢比赛一样。那就像是有人朝一扇门走去时，你不看那个人，而是去看门把手。你会头痛的，而且几乎无法正常呼吸了。

“这个你可以习惯的，”布洛赫说，“但这很可笑。”

裁判判罚点球。所有的观众都往球门后边跑去。

“那个守门员在琢磨那个球员会往哪个角上踢，”布洛赫说，“如果他了解那个射手的话，那他就知道他通常都选择哪个角。但是，射手有可能也会想到守门员在琢磨这个。于是，守门员继续琢磨

着，足球今天会往另外一个角去。但是，如果射手一直还跟守门员一个思路，现在还是想往通常的那个角射呢？事情就这样继续着，不停地继续着。”

布洛赫看到所有的球员都慢慢走出禁区。主罚点球的球员将球摆好。然后，他也往后退，走出了禁区。

“当射手起跑，正要踢球时，守门员的身体就不自觉地预示着他即将往哪个方向扑出去。这样的话，射手就可以从容地往另外一个方向踢了，”布洛赫说，“守门员或许同样无计可施，抓不到什么救命的稻草。”

那射手突然起跑了。穿着鲜黄色球衣的守门员站在那里，根本没有动，罚球手将球踢到守门员的手里。

（1970年）

[1]德语语法中冠词分为定冠词和不定冠词。名词第一次出现时前面往往要加一个不定冠词，如果是确定的或者已知的名词前面则加定冠词。——中译注，下同

[2]德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你”和“您”在日常使用中有着严格的区分，只有亲戚朋友间才用“你”这个称呼，陌生人或还不太熟悉的人在谈话中使用“您”。

[3]Stuka：德语俯冲轰炸机（Sturzkampfflugzeug）的简称。

[4]Uberfliegen：双重含义，本义是“飞越，飞过”，转义是“浏览”。

[5]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ahl，1874—1929）：奥地利作家。

[6]Erker：建筑用语，指建筑物的凸出部位，或者转角上的挑楼。

[7]足球比赛解说词中常用的句子。

[8]纳什市场（Naschmarkt），维也纳市中心的一座市场，以其国际化氛围著称。

[9]海员用的帆布背包，大多用防水帆布做成，用来装旅行随身物品。

[10]普拉特（Prater）公园：位于维也纳二区的一座面积很大的公园，内有游乐场。

[11]往来账户主要用于接受工资等收入进项，并用来操作各种支付，一般无利息。储蓄账户供中长期储蓄使用，大致相当于活期储蓄，有年息。

[12]九柱戏：与保龄球相似的一种游戏。传统九柱戏只使用九根柱子，用球滚地击倒它们。

[13]土耳其人战争：欧洲基督教国家与自1354年开始进攻南欧的土耳其人伊斯兰教帝国进行的一系列战争。

[14]租赁人：pa..chterin，意为承租店家的人，有经营权而无所有权。

[15]Geh weg意即走开；Gehweg意即人行道。beherzigen意即遵循；Becher-Ziegen意即贝歇尔（Becher）山羊。

[16]rechtfertigen意即解释（原因）；zur rechten Zeit fertig意即准时完工。

[17]ausweisen意即证明（身份）；ausweißen意即完全刷白。

[18]玫瑰经（Rosenkranz），正式名称为《圣母圣咏》，十五世纪由天主教会正式颁布，是天主教徒用于歌颂圣母玛利亚的一种礼仪，是一种编排好的经文。

[19]德语中的Ecke一词既可指角落或墙角，也用来指足球运动中的角球。

[20]“回镇子，回旅馆，回房间”的德语原文也是九个字。

[21]双关语。“双脚冰冷”意指突然怕冒险而放弃计划，“坐在干地上”意指没钱了。

Die Angst des Tormanns beim Elfmeter by Peter Handke

Copyright©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0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3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出版得到奥地利教育、艺术和文化部所提供之翻译资助

Die Übersetzung wurde gefördert mit Mitteln des Bundesministeriums

für Unterricht, Kunst und Kultur

Peter Handke

Wunschloses Unglück

无欲的悲歌

[奥地利] 彼得·汉德克 著

韩瑞祥 主编 顾牧 聂军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欲的悲歌/（奥）汉德克（Handke, P.）著；韩瑞祥主编；顾牧，聂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7-208-11369-5

I.①无……II.①汉……②韩……③顾……④聂……III.①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IV.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5937号

书名：无欲的悲歌

作者：【 奥地利】汉德克（Handke, P.）

主编：韩瑞祥

译者：顾牧　聂军

责任编辑：陈欢欢

封扉设计：园　里

转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1369-5|I·1130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 文景每月书情

目　录

编者前言
无欲的悲歌
大黄蜂

无欲的悲歌

[奥地利] 彼得·汉德克 著

韩瑞祥 主编

顾牧 聂军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者前言

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被奉为奥地利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也是当今德语乃至世界文坛始终关注的焦点之一。汉德克的一生可以说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像许多著名作家一样，他以独具风格的创作在文坛上引起了持久的争论，更确立了令人仰慕的地位。从1966年成名开始，汉德克为德语文学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因此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如“霍普特曼奖”（1967年）、“毕希纳奖”（1973年）、“海涅奖”（2007年）、“托马斯·曼奖”（2008年）、“卡夫卡奖”（2009年）、“拉扎尔国王金质十字勋章”（塞尔维亚文学勋章，2009年）等。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介到世界许多国家，为当代德语文学赢来了举世瞩目的声望。

汉德克出生在奥地利克恩滕州格里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他孩童时代（1944—1948年）随父母在柏林的经历，青年时期在克恩滕乡间的生活都渗透进他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里。1961年，汉德克入格拉茨大学读法律，开始参加“城市公园论坛”的文学活动，成为“格拉茨文学社”的一员。他的第一部小说《大黄蜂》（1966）的问世促使他弃学专事文学创作。1966年，汉德克发表了使他一举成名的剧本《骂观众》，在德语文坛引起空前的轰动，从此也使“格拉茨文学社”名声大振。《骂观众》是汉德克对传统戏剧的公开挑战，也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格拉茨文学社”在文学创造上的共同追求。

就在《骂观众》发表之前不久，汉德克已经在“四七社”文学年会上展露锋芒，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严厉地批评了当代文学墨守于传统描写的软弱无能。在他纲领性的杂文（《文学是浪漫的》，1966；《我是一个住在象牙塔里的人》，1967）中，汉德克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文学对他来说，是不断明白自我的手段；他期待文学作品要表现还没有被意识到的现实，破除一成不变的价值模式，认为追求现实主义的描写文学对此则无能为力。与此同时，他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反对文学作品直接服务于政治目的。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剧作《自我控诉》（1966）、《预言》（1966）、

《卡斯帕》（1968），诗集《内部世界之外部世界之内部世界》（1969）等。

进入70年代后，汉德克在“格拉茨文学社”中的创作率先从语言游戏及语言批判转向寻求自我的“新主体性”文学。标志着这个阶段的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1970）、《无欲的悲歌》（1972）、《短信长别》（1972）、《真实感受的时刻》（1975）、《左撇子女人》（1976）分别从不同的度，试图在表现真实的人生经历中寻找自我，借以摆脱现实生存的困惑。《无欲的悲歌》开辟了70年代“格拉茨文学社”从抽象的语言尝试到自传性文学倾向的先河。这部小说是德语文坛70年代新主体性文学的巅峰之作，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1979年，汉德克在巴黎居住了几年之后回到奥地利，在萨尔茨堡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四部曲《缓慢的归乡》（《缓慢的归乡》，1979；《圣山启示录》，1980；《孩子的故事》，1981；《关于乡村》，1981）虽然在叙述风格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生存空间的缺失和寻找自我依然是其表现的主题；主体与世界的冲突构成了叙述的核心，因为对汉德克来说，现实世界不过是一个虚伪的名称，丑恶、僵化、陌生。他厌倦这个世界，试图通过艺术的手段实现自我构想的完美世界。

从80年代开始，汉德克似乎日益陷入封闭的自我世界里，面对社会生存现实的困惑，他寻求在艺术世界里感受永恒与和谐，在文化寻根中哀悼传统价值的缺失。他先后写了《铅笔的故事》（1982）、《痛苦的中国人》（1983）、《重现》（1986）、《一个作家的下午》（1987）、《试论疲倦》（1989）、《试论成功的日子》（1990）等。但汉德克不是一个陶醉在象牙塔里的作家，他的创作是当代文学困惑的自然表现：世界的无所适从，价值体系的崩溃和叙述危机使文学表现陷入困境。汉德克封闭式的内省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生存的深切反思。

进入90年代后，汉德克定居在巴黎附近的乡村里。从这个时期起，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动荡，南斯拉夫战争也把这位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从《梦幻者告别第九国度》（1991）开始，汉德克的作品（《形同陌路的时刻》，1992；《我在无人湾的岁

月》，1994；《筹划生命的永恒》，1997；《图像消失》，2002；《迷路者的踪迹》，2007等）中到处都潜藏着战争的现实，人性的灾难。1996年，汉德克发表了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批评媒体语言和信息政治，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汉德克对此不屑一顾，一意孤行。1999年，在北约空袭的日子里，他两次穿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旅行。同年，他的南斯拉夫题材戏剧《独木舟之行或者关于战争电影的戏剧》在维也纳皇家剧院首演。为了抗议德国军队轰炸这两个国家和地区，汉德克退回了1973年颁发给他的毕希纳奖。2006年3月18日，汉德克参加了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媒体群起而攻之，他的剧作演出因此在欧洲一些国家被取消，杜塞尔多夫市政府拒绝支付授予他的海涅奖奖金。然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汉德克无视这一切，依然我行我素，坚定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对人性的呼唤，对战争的控诉，对以恶惩恶以牙还牙的非人道毁灭方式的反思："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他因此而成为"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另类。

世纪文景将陆续推出八卷本《汉德克作品集》，意在让中国读者来共同了解和认识这位独具风格和人格魅力的奥地利作家。《无欲的悲歌》卷收录了汉德克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大黄蜂》和20世纪70年代初引领潮流的中篇小说《无欲的悲歌》。如果说前者是汉德克一反传统步入文坛的标志的话，那么后者则是继《骂观众》和《卡斯帕》之后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创作时期。

1966年3月，小说《大黄蜂》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终于问世，批评界起初并未给予关注，甚至不感兴趣。而当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作家同年在普林斯顿举行的"四七社"文学年会上向老一代作家提出挑战甚或发难以后，报刊上才出现了对这部小说连篇累牍的评论，其关注的焦点几乎都离不开非同凡响的语言实验和独来独往的形式追求。也有批评家认为这部小说的表现是言之无物的华而不实，炫耀形式的矫揉造作。诚然，汉德克从走上文坛开始，就一如既往地继承了奥地利文学的语言批判传统，语言与叙事的矛盾成为其文学表现的内在主题之一，因此也招来了不少非议。

事实上，小说《大黄蜂》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汉德克文学创作的基础。小说中，叙述者早年的经历和感知以独具风格的魅力焕发出了一种新的生命。在这种表现的背后，潜藏着一种与众不同的审美感知：汉德克在寻找那个逝去的童年，因为叙事的长河从这童年的经历和感知中奔涌而流。可以说，童年的经历和感知构成了汉德克整个叙事的核心。作者在谈到这部小说时也一再强调，与其说是语言形式的实验，倒不如说是一部回忆小说的种种因素所在；一个在战争中还是孩童的人回忆着当年战争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小说年轻的叙述者是个盲人，在回忆的梦想中期盼着那个失踪的弟弟归来，而童年在战争中对血腥暴力的恐惧始终伴随着这样的回忆。这无疑是一种心灵的创伤。整个小说在结构上既没有脉络清晰连续发展的情节，也没有对主人公的整体刻画，而只有对一个个事件细节的描述，对一个个具体事物的感受，一个个相互似乎毫不相干的断片成为结构小说叙事的中心，甚至连一个个章节标题也成了启人深思的隐喻。尤其小说中是对一本失去的书的回忆的情节起到了非同小可的叙事作用。这本在记忆中支离破碎的当下的书展现出贯穿小说始终的创伤性结构。不言而喻，叙述者所叙述的那些看上去最私密和最个性的东西，通过这种感知细腻的叙事方式获得了让读者广泛联想的普遍意义。

《大黄蜂》的叙述者以无与伦比的感知方式渗透到“那些事物和事件的中心”，“撼动了那些无生命的东西”（汉德克），使之发出休戚与共的悲伤：“我所看见的东西，并不是通过眼睛，而是由于那些无生命的东西本身在颤动。此时此刻，我既不觉得它们是异物，也不觉得它们和我之间存在距离，因为仅仅由于我看见它们，那些东西就撕开我的血管，仿佛这种没有生命的东西，也可以说它不再浮现在眼前，会为那个不用眼睛看它的人而痛苦地颤动，并且在向这个观看的人诉说着这种莫名的痛苦；仿佛我心中那可笑的愤怒就是这些东西无法消除永无止境的悲伤似的。”（《大黄蜂》）这样的生存痛苦奠定了汉德克文学表现的基调，构成了其审美感知的内涵。

如果说《大黄蜂》开始了汉德克一反传统的小说叙述风格，那么《无欲的悲歌》则从趋向于语言实验的叙事模式转向近乎写实的自传性文学，代表了“格拉茨文学社”一个新的转折，成为引领上世纪70年代德语文坛的经典之作。汉德克创作这部小说的契机是母亲于1971年底自杀；母亲被异化的人生也成为他文学创作挥之不去的阴影。然而，汉德克把这些传纪和自传因素融贯到一个从《卡斯帕》以来始终

不断发展的主题框架里，那就是异化的生存方式在摧残着人的生存；语言是一个被自然而然所接受的社会秩序的统治工具，语言模式同样在异化生存。在回忆母亲和反思语言的交织中，作者细腻而真切地描绘了母亲在一个具体而僵化的社会现实里被扭曲的人生。

在这里，汉德克打破了迄今所遵循的叙述风格，几乎重蹈了被他嗤之以鼻的“叙述文学”之道。小说叙述是以一位51岁家庭妇女自杀的报纸报道开始的。叙述者“我”立刻要义不容辞地写一篇与这个无名无姓的消息针锋相对的文章，撰写自己母亲那“简单而明了的”故事。在对这个女人命运的回忆中，她那受制于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的生存轨迹自然而然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在叙述者极具张力的感同身受中，这个“故事”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案例”。母亲的生存世界是非常狭小的，她只能在幻想中逃脱到过去的梦境里，而一个幻想的明天对她来说是陌生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小农环境里，接受的是无欲望、秩序和忍受的道德教育。她被迫嫁给了一个酗酒者，短暂而快乐地感受过1938年奥地利被法西斯德国吞并后的情形，随之而来的就是战争，接着安身于贫穷的小市民生存状况中，时而也有小小的反抗。她钟爱文学，因为文学给她带来一种解脱，至少使她有能力来“谈论自己”，感受自己。在阅读行为和由此而产生的对话中，语言作为社会异化的工具毕竟会转化为分析自我生存条件的工具。母亲最终依然无法逃脱社会角色和语言模式对自我生存的毁灭，于是自杀成为她无可选择的必然归宿。这就是一个女人受制于外在现实的生存之路：“个人的命运，即便它真的什么时候作为某种独有的东西有过发展，彻底被非人化了，连做梦的余地都没有了，并且泯灭在宗教、习俗和美好道德的礼仪中，因此，个性中几乎连一点人性的东西都不存在了。”（汉德克）

在《无欲的悲歌》中，对母亲的故事的描写和对叙事在审美感知上的反思相互交织在一起。对叙述者而言，感知母亲被扭曲的人生成为一个痛苦的过程，同时也成为一个叙事问题。在叙事过程中，叙述者越来越偏离了最初保持距离的客观叙事态度，从而成为身临其境的经历者，感同身受的回忆者：“在我写这个故事的几周里，这个故事也不停地让我思考。写作并不像我最初以为的那样，是对自己生活中一个已经完结的阶段的回忆，不过是以语句的形式不断装作回忆的样子而已，这些语句只是宣称保持了距离。我依然会不时地在深夜突然醒来，就像从内心深处突然被轻轻地推出睡梦，体验到自己如何在因

为恐惧而屏住呼吸的同时，身体一秒一秒地在腐朽。黑暗中的空气凝固不动，让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重心，仿佛拔地而起，只是在没有重心的状态下无声地四处飘动，马上就要从四面八方砸下来，把我憋死。”（《无欲的悲歌》）

《无欲的悲歌》以其巧妙的叙事结构和独具特色的叙事风格表现了母亲生与死的故事，其中蕴含着一种启人深思的愿望，一种值得向往的生存，一种无声质问社会暴力的叙述之声。作者后来把这种愿望具体形象地寄托在另一部以女性为中心的小说《左撇子女人》中。

我们选编出版汉德克的作品，意在能够不断地给读者带来另一番阅读的感受和愉悦，并从中有所受益。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选编和翻译疏漏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韩瑞祥

2013年3月

无欲的悲歌

顾牧　译

克恩滕州《人民报》周日版的“综合新闻”一栏里有这样一条消息：“星期五深夜，A地（G县）一名51岁的家庭主妇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

从母亲去世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七个星期了，我想趁着葬礼时那股强烈的想要写写她的欲望还没有变回当初接到自杀消息时的麻木无语让自己开始工作。没错，是让自己开始工作，因为写写母亲的欲望尽管有的时候突如其来，但同时又极飘忽，以至于工作时必须很努力，才不会随兴所至地用打字机在纸上不断敲击同一个字母。单纯的运动疗法对我没有用处，只能让我更加消极和漠然，否则我也完全可以出门去，而且在路上，在旅途中，头脑一片空白地打盹或者无所事事也不会太让人难以忍受。

几个星期以来，我比平常更易怒，杂乱、寒冷或者寂静更是能让我跟人连话也说不得，并且只要看到地板上有细毛或面包屑就弯腰去捡。想到母亲自杀的事，我的感官就会突然变得木然，有时就连我自己都诧异手里拿的东西竟没有早就掉落。但是尽管如此，我依然渴望那样的时刻，因为此时此刻，麻木的感觉不再，头脑一片清明。那是能让我释然的惊骇：终于不再无聊，身体任凭摆布，没有费力地疏远，时间的流逝也不再让我痛苦。

在这样的时候，最让人恼火的似乎莫过于旁人的关心，用一个眼神甚至一句话。我要么马上移开目光，要么截断别人的话头，因为我需要的感觉是：自己正经历的这些是不能理解、无法言语的，只有如此，方能让人感到那惊骇是有意义的、真实的，一旦有人提起，就马上会感到无趣，所有的一切突然间重归空虚。然而我偶尔还是会毫无来由地向别人说起母亲自杀的事，若他们胆敢评论，我又气恼，情愿他们马上岔开话题，或是嘲弄我，不管因为什么。

就像在上一部的“007”电影里，有人问起邦德刚才被他从楼梯扶手上扔下的那个对手是不是死了，他说：“但愿如此吧！”当时我就忍不住轻松地笑了起来。关于死和亡故的玩笑非但根本不会使我不快，甚至能让我感到愉悦。

惊恐的瞬间总是很短暂，更多的是不真实的感觉，一切都在瞬间过后重新隐匿，如果这时旁边有人在，我马上就会更加把心思用在对方身上，仿佛刚才冒犯了他们一样。而且自从动笔，这样的状态，也许恰恰是因为我想要尽量准确地描述它们，结果它们反倒离我而去了，消失了。因为要描述，我开始了对它们的回忆，如同回忆生命中一个已经结束的阶段，艰难的回忆和表述弄得我无暇他顾，竟使我对过去几个星期里那些短暂的白日梦境产生了距离感。我之前会不时出现的“状态”是：日复一日的那些想法只是一些不断机械反复的、存在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的原初想法而已。如今它们四散，意识因为一下子变得空空如也而疼痛。

现在这些都结束了，我不再处于这种状态。写作的时候，总是无法避免地写到从前，写起已经经历过的那些事，至少写作时是如此。我做的工作是文学的，它显现于表面并且具体成一台回忆和表达的机器，不如此又能怎样。而我写母亲的故事，一则是认为自己对她以及她如何走上死亡之路比那些不相干的记者知道得更多，虽然后者借助宗教的、个体心理学的或者社会学的释梦模式或许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解释这个有趣的自杀事件；再者就是为着自己，因为有事情可做，我就能振作起来；最后是因为我恰恰和任何不相干的记者一样，也想把自愿死亡这事看作一个案例。

当然，所有这些解释都不过是随手拈来，可以用同样是随手拈来的另一些解释代替。只是一些彻底失语的瞬间和想要表述这些瞬间的欲望而已，与向来写作的动机没两样。

去参加葬礼时，我在母亲的钱包里发现了一张编号432的邮局收据。星期五晚上，她在回家服药之前还用挂号信往法兰克福寄了一份遗嘱的副本。（又是为什么要用快件呢？）我星期一就在同一家邮局打电话，那是她死后两天半，我看到放在邮局工作人员面前的一卷黄色的挂号信标签：这期间有九封挂号信寄出，现在显示的下一个号码是442，这和我脑海中的那个数字如此相像，猛看上去竟让我产生了混

乱，一时间以为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想要把这些事讲出来的愿望让我真正开怀。那天是多么晴朗；雪；我们吃的是肝泥丸子汤。“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如果这样开讲的话，一切都会像是杜撰出来的，我不想胁迫听众或读者对我个人表示同情，只是要给他们讲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而已。

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我的母亲五十多年前就出生在她后来去世的地方。那个地方但凡有点用的东西，当时都归教堂或者贵族地主所有，其中一部分租给百姓，这些人主要是工匠或者下层农民。贫困的状况之普遍，以至于少量占有土地的情况都还很少见。事实上，当时依然维持着1848年以前的状况，只不过农奴制度正式取消了。我的外祖父——他还健在，如今已经八十六岁了——是个木工，此外还和自己的妻子一起种了几片地，还有草场，每年交一次地租。他祖上是斯洛文尼亚人，和当时大多数下层农民的孩子一样是私生子。这种人即便早已经性成熟，却是既没钱结婚，也没有地方过婚姻生活。他的母亲至少是个家境相当殷实的农家的女儿，他的父亲当时在这家当长工。这个父亲对他而言不再只是“制造者”。不管怎样，他的母亲借此得到了购置一小片田产的钱。

外祖父的前面数代都是一无所有的长工，洗礼证明填得残缺不全，在他人屋檐下出生又死去，身后几乎没有什么遗产，惟一的财产就是要跟进坟墓里去的节日礼服。从外祖父开始，成长的环境才终于让人真正有家的感觉，不再是通过每天的劳动勉强换来的栖身之所。

为了捍卫西方世界的基本经济准则，一家报纸不久前在经济专栏内称财产是物化的自由。对于外祖父这样，历经数代没有财产因而也没有权势的家族里出现的首批有产者（至少是在不动产方面）而言，这种说法倒是有其道理：意识到自己拥有财产而产生的自由感，让人在世世代代任人摆布之后突然第一次有了意愿，那就是要更加自由。这其实只是说：扩大自己的财产，当然鉴于祖父当时所处的状况，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一开始的时候，财产却少得要倾尽心力才能勉强保住，所以抱负远大的小业主们就只有一条路可走：积攒。

于是，我的外祖父就一直积攒，直到在二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丢掉了所有积蓄。接着他又重新开始积攒，不是把省下的钱堆积在一处就算了，而是采用了压抑个人欲求的方式，同时还希望子女也能继承这种骇人的无欲无求，而他的女人，作为一个女人，反正是从一落地就连做梦也不曾想过要有什么不一样。

他继续积攒，要一直积攒到子女们需要资金结婚或者工作为止，像把积蓄提前用在子女，特别是女儿们的教育上的这种念头，他则顺利成章地想都没想过。就连在他的儿子们身上，处处寄人篱下做穷光蛋的噩梦依然根深蒂固。儿子中的一个在中学里得到了免费学习的机会（这更多的是因为巧合而不是提前计划好的），不过才几天，他就因为忍受不了陌生的环境，半夜里步行四十公里从州府走回了家。到达自家屋前，正好是星期六，那通常是打扫房舍的日子，他二话不说就动手扫起了院子，晨曦中，他的扫帚发出的声音足以说明一切了。据说他当了木匠后倒是很勤勉，而且很满足。

他和他的哥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不久就丢了性命。这期间，外祖父继续积攒，并且在三十年代的失业大潮中再次失去了所有积蓄。他积攒，这就是说：他不喝酒，不抽烟，几乎没有什么娱乐。他惟一允许自己参与的娱乐就是星期天的牌局，就算是打牌时赢的钱（他牌打得非常冷静，这让他几乎永远是赢家）也要攒起来，他充其量会从里面拈出一小枚铜子儿给孩子们。战后他又开始积攒，直到今天成了拿国家退休金的人，他也没有停下来过。

那个活下来的儿子成了木工师傅，手下毕竟雇着二十个工人，用不着再积攒了。他开始投资，这也就意味着，他可以喝酒、娱乐，这甚至是他分内的事。和自己沉默了一辈子、什么都不敢享受的父亲不同，他至少凭这个找到了一种语言，虽然这种语言只是他作为乡镇代表，并且代表一个痴迷地用伟大的过去谈论伟大的将来、忘却现实的小党派时才用得到。

身为一个女人，出生在这种环境里从一开始就是致命的，当然这件事也可以让人宽心地来看待：至少不用对未来感到恐惧。节日时在教堂前集市上给人看相的女人从来只给男孩儿看手相占卜 未来，反正对女人来说，所谓未来不过是个玩笑而已。

毫无机会，一切都注定了：男人小打小闹的调情，吃吃地一笑，短暂的目瞪口呆，然后是第一次陌生和克制的表情，随之又开始忙里忙外，一个个孩子出世，忙完厨房的活儿后再跟家人待一会儿，从一开始说的话就没人听，自己也越来越不听人说话，自言自语，然后是腿脚的不灵便，静脉曲张，只剩睡觉时的一声嘟囔，下身的癌症，最后，注定的一切随着死亡而圆满。就连当地女孩儿们常玩的一个游戏也是这样：累了| 倦了| 病了| 病重了| 死了。

我母亲是五个孩子里的倒数第二个。她在学校里被认为是个聪明孩子，老师们给她最好的成绩，尤其欣赏她工整的书写。随后学也就上完了。学习不过是小孩儿的游戏而已。等完成了义务教育，年龄大了，也就没有必要了。女人们现在要做的是在家里演习将来的家务事。

没有恐惧，除了对黑暗和暴风雨本能的害怕；只有冷与热、潮湿与干燥、快乐与不快的交替。

时光就伴随着教堂的节日，伴随着偷偷进舞池而挨耳光，伴随着对兄弟的羡慕和参加合唱团演唱的愉快流逝。至于世界上发生的其他事情就都不清楚了。除了教区的星期日报之外，报纸是不看的，就算是在那份报里能够看到的也只有小说连载而已。

星期天：浇辣根汁的烧牛肉，打牌，女人们恭顺地陪在一旁，全家人和第一台收音机的合影。母亲自有一种活泼的天性，在照片上不是双手叉腰，就是用一条胳膊搂着弟弟的膀子。她总是在笑，仿佛就没有别的表情。

雨——晴，外面——里面，女人的感情变得非常容易受天气的影响，因为“外面”几乎只能是场院，“里面”无一例外是那个没有自己房间的家。

这个地区的气候变化明显：冬天寒冷，夏天闷热，一旦太阳下山或者是躲进树影里，就让人感觉寒冷。雨水很多，从九月初开始，小得可怜的窗户外面就常常是连日潮湿的雾气，可如今房子里的窗户也大不到哪儿去。晾衣绳上挂着水珠。蛤蟆在人面前从暗影里蹦蹦跳跳地穿过路面。蚊子、飞虫，连白天都会出现的夜蛾肆虐。木屋的每一片木板下面都有肉虫和土鳖：肯定会出现的只有这些，因为没有别的

可以指望。很少心满意足，可不管怎么说甚是幸福；基本上心满意足了，却有点不幸福。

不可能和其他的生活方式作比——也就没有了什么需求吧？

故事是从母亲突然对一件事产生兴趣开始的：她想上学，因为尚在童年时，上学就让她感到了自我的存在，当时就像人们所说的："我自觉了。"这是她平生的第一个愿望，并且也说了出来，不断地说，直到最终变成固执的想法。母亲说她"乞求"外祖父允许她去上学，但这是不可能的：打一个手势就足以了结这事。他摇摇手，这种事是无法想像的。

不过老百姓世代都对既成的事实有种尊重：怀孕，战争，国家，习俗和死亡。母亲干脆离家出走，十五六岁时就跑到一个建在湖边的旅馆里学做饭，当时外祖父就由了她，**因为她已经走了**，再说，做饭也没什么可学的。

但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洗碗工，清洁工，厨师助理，主厨。"无论什么时候饭总是要吃的。"照片上是红扑扑的脸，焕发着光彩的脸颊，挽着受到她的感染而拘谨严肃的女友，充满自信的兴高采烈："我不会有事了！"对社交毫不掩饰、溢于言表的兴趣。

都市的生活：短连衣裙（"便裙"），高跟鞋，大波浪和耳环，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甚至还在国外（！）待过，她在黑森林里做清洁房间的女工，拥有众多**崇拜者**，却对谁也不曾**委身**！约会，跳舞，聊天，打趣——对性的恐惧就这样被掩饰过去，"没有我喜欢的"。工作，娱乐，心情沉重，心情轻松，收音机里的希特勒声音很好听。

没有经济能力的人如果想念家乡：回到湖边的旅馆，"现在我已经开始管账了"，工作证明上的溢美之词："……小姐机敏、好学。她勤奋，性格开朗、活泼，因此我们感到很遗憾……她是自愿离开本店。"划船，彻夜跳舞，不知疲倦。

1938年4月10日：德国人说赞成[1]！"16时15分，伴着巴登维勒进行曲[2]，元首乘车胜利抵达，人群的欢呼声不绝于耳，寒冰尽融的沃特

湖上倒映着疗养和避暑胜地上成千上万的十字旗，老帝国[3]和我们本土的飞机要与云朵争高下。”

报纸的广告里夹着代表全民公决的标志，还有绸子的或者纸制的简易小旗。足球队比赛结束后要按照规定说“必胜！”作为告别辞。机动车上标的“A”[4]现在换成了“D”[5]。广播里6：15传达命令，6：35语录，6：40广播操，20：00理查德·瓦格纳音乐会，柯尼斯堡帝国广播电台的娱乐节目和舞曲一直持续到午夜。

“4月10号，你的选票应该是这样的：在**赞成**下面的那个**比较大**的圆圈里**用力**划叉。”

刚刚释放就又重犯的小偷自己交待说，那些相关的物品是在商店里买的。由于这些商店是犹太人的，**所以现在根本就不复存在了**。群众集会以火把游行和纪念会的形式举行，大楼添上了新的代表国家形象的标志后，一个个**面貌一新，和善可亲**，森林和山峰也焕然一新，历史事件被当做大自然的表演展示给乡下人看。

“我们相当兴奋。”母亲讲道。第一次有了集体经历。就连枯燥的工作日也有了节日的气氛，“直到深夜”。一切迄今无法理解和陌生的东西终于都显现出一种伟大的关联：一切都相互归结为一种关系，就连那令人诧异的机械式劳动都有了意义，成为节日。每个人此刻所做出的动作都组合成一种运动的节奏，因为他在心里看到无数其他人同时在做着这样的动作——生活因此获得了一种让人既能产生安全感，同时又能感到自由的形式。

这种节奏刻骨铭心——成为礼仪。“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意志高于个人意志。”于是乎处处如家，再不必思念家乡。照片的后面写着各种地址，第一次买了记事本（别人送的？）：突然间有了许多熟人，发生的事情多到可以让人**遗忘**一些了。她一直希望能为什么事感到骄傲，由于现在做的事那么重要，她便真的感到了骄傲，不是为什么具体的事，而是笼统地感到骄傲，这是一种姿态，是终于获得的一种生活感觉的表达，她不愿再放弃这种不确定的骄傲。

她依然对政治不感兴趣，真实发生在眼前的那些事可完全不一样：化装游行，UFA[6]的一周事件回顾（“大规模循环放映——连映两

周！”），世俗世界里的教堂纪念日。“政治”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玩意儿，可不是化妆舞会，不是圆圈舞，不是民乐团，至少不是那种能看得见的东西。不管往哪儿瞅，一片盛世，“政治”——有吗？——这个词不是一个概念，因为它和其他政治概念一样，在学校的课本里就让人觉得，它与那抓得住、实实在在的东西无缘，只是被当成一种提示词，或者形象化为与人无关的比喻：把压迫比成锁链或者靴子跟，自由比成山峰，经济体系比成让人安心地冒着烟的工厂烟囱，还有下班后抽的烟斗，社会体系比成“皇帝——国王——贵族| 市民——农民——织工| 木匠——乞丐——掘墓人”这样的阶梯：这种游戏通常只有在子女众多的农民、木匠或者织工家里才可能完整地玩一遍。

这段时间促使母亲摆脱了拘谨，变得独立，她有了自己的举止方式，丢掉了最后一丝对肌肤接触的恐惧：小帽歪斜在一边，因为有个小伙子把她的头和自己的按在一起，而她只是自得其乐地冲着照相机笑。（关于照片能够“讲述”这种内容的假设……；但是每一次表述，即便讲的是真实发生过的事，难道不都或多或少是一种假设？如果只满足于报道，那就**少些**，越是想要讲得详细，就越**多些**。假设的成分越多，那么故事在别人看来就会越有趣，因为比起单纯报道事实来，说法本身更容易让人产生认同感？——所以才会有了对诗歌的需求？“河岸边的窒息”，这是托马斯·伯恩哈德[7]的说法。）

战争，一连串捷报伴着强劲的音乐从人民牌收音机里传出。收音机的扬声器表面蒙着罩子，在阴暗的“圣像角”里散发着神秘的光芒。战争“增加了一切事物的不确定性”（克劳塞维茨[8]），让往常日复一日的自然而然成为让人兴奋的偶然，以此提升人的自信。对母亲来说，战争并不同于对我的意义，它不是来自孩提时代，能够影响未来情感世界的恐怖幽灵。开始时，那只是她所经历的一个神奇的世界，一个之前只在广告里看见过的世界。对距离，对**以前和平时期的**林林总总，特别是对身边那些以往只是扮演无关紧要的同志、舞伴或者同事角色的人产生了新的感觉。平生第一次也有了家庭的感觉：

“亲爱的哥哥……！我在地图上找着你现在可能在的地方……你的妹妹……”。

于是有了第一次爱情：她爱上了一个德国的党员同志，这个人当老百姓的时候是银行的职员，现在因为当了部队的军需官而显得与众不同——不久后就身怀六甲。他有妻室，而她爱他，非常爱，对他百依百顺，她把他介绍给父母认识，跟他一起去周边郊游，陪伴他排遣军人的寂寞。

“他对我非常细心，我对他也不像对其他男人那样感到恐惧。”

他做决定，她表示赞同。他送过她一次礼物：香水。他还借给她一台收音机放在屋里，不过后来又拿走了。“当年”他还正在读书，他们一起看一本名叫《壁炉旁》的书。一次，他们到山上的牧场去郊游，下坡时跑了几步，当时母亲不小心放了个屁，我父亲数落她一番，接着往下走时，他自己也不小心放了一个，于是干咳了几下。她后来把这件事讲给我听的时候，身子弯成了一团，一边幸灾乐祸地吃吃笑，一边却又感到不安，因为她正在丑化自己惟一的爱人。她因为自己曾经爱过某个人，而且爱的偏偏又是这样一个人感到可笑。他的个子比她矮，年龄比她大很多，头发几乎掉光了。她穿着平跟鞋走在他身边时，不断调整步伐以配合他，挽着一条不情不愿的胳膊。她的胳膊不断滑脱。这是不般配的、可笑的一对——尽管如此，她直到二十年后还在渴望能够对什么人产生类似的感情，就像当年渴望这个银行的家伙那点可怜的例行公事的体贴。但是没有另一个了：生活教会她的爱情只能固定在一个不能更换、无法替代的对象身上。

中学毕业以后，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父亲：还没有到约定的时间，我就和他在大街上不期而遇。他被晒伤的鼻子上顶着一张折过的纸，脚上穿着凉鞋，牵了条苏格兰牧羊犬。在她家乡的一个小咖啡馆里，他见到了旧情人，母亲的激动，父亲的不知所措，我远远地站在投币点唱机前，点了猫王的《伪装的恶魔》。丈夫已经听到了风声，但只是把最小的儿子派到咖啡馆里作为暗示，那孩子在那儿买了个冰激凌，然后就黏在母亲和陌生人身边，不断重复问她，到底什么时候回家。我父亲把夹片太阳镜夹到另一副眼镜上，间或跟那条狗说几句话，随后打算“那就”买单吧。“不，不，我请你。”他看到母亲也从手提袋里拿出钱包时这样说。我们去旅行度假时，一起给她写了一

张明信片。不管住在哪个旅馆，他都到处跟人说我是他的儿子，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想让别人把我们当成同性恋（“第175条[9]”）。生活让他感到失望，他越来越孤独。“自从了解了人，我就爱上了动物。”他说。当然，这话并不是完全认真的。

临近分娩时，母亲嫁给了德国防卫军的一个士官。这个人对她仰慕已久，也不在乎她就要生下别人的孩子。“非她不娶！”他第一次见到她就这样想，而且马上就和战友打赌说自己能够得到她，同时她也会接受他。她讨厌他，但是大家说服她要有责任感（给孩子一个父亲）：她第一次退缩了，笑容从脸上褪去了一些。不过竟有人心心念念想着她，这让她觉得挺不错。

“我当时想着他反正会战死，”她说，“但后来还是忽然担心起他来。”

不管怎样，她现在可以申请婚姻生活贷款了。她带着孩子坐车去柏林的公婆那里，他们容忍了她的存在。炸弹已经开始落下，她回到家乡。这是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故事，她又开始笑，尖利的声音常常吓人一跳。

她忘记了丈夫，紧紧地搂着孩子，搂得孩子哭起来，蜷缩在屋里。在这栋房子里，自从两个哥哥死了以后，每个人都迟钝地对别人视而不见。没有什么了吗？就这样了？安魂弥撒，小孩子的病，拉上的帘子，和无忧无虑的日子里认识的那些老熟人通信，在厨房和田里忙碌，在田里干活时不断地跑出来把孩子挪到阴凉处；然后就是紧急状况下的汽笛声，在乡下也一样，老百姓就往被当做防空洞的岩洞里逃，村里的第一个弹坑后来成了游戏的场所和垃圾坑。

恰恰是大白天变得阴森恐怖，周围的环境通过一辈子日复一日的接触，已经像汗水一样从儿童的梦魇中排出，变得熟悉，现在却因为人又幻化成幽灵神出鬼没。

不管发生什么事，母亲总是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立在一旁。她并没有变得胆怯，顶多在感染了大家的恐惧时笑上一声，因为她同时又为自己的身体突然毫不羞怯地自行其是而害臊。“你不害臊吗？”或

者“你应该感到害臊！”这始终是人们要求小姑娘，特别是正在长大成人的女孩儿的一条准则。在这种信奉天主教的乡下，谈什么女人的个人生活根本就是欠考虑，太冲动。乜斜的白眼要一直斜到羞臊的感觉不再是装出来的，并且把心底深处最基本的感情都吓退，以至于高兴的时候都会有“女性的脸红”，因为她们理应为这喜悦感到害臊，悲伤的时候不是面色苍白，而是脸红，不是流泪，而是流汗。

在城里时，母亲曾经以为找到了或多或少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至少是让她感到舒服的方式——现在她发现，别人的那种生活方式同样也呈现为使人幸福的生活内容，因为她排除了第二种可能。一旦她不是用原原本本叙述的句子说到自己，人家就会使个眼神让她闭嘴。享受生活，干活时的一个舞步，哼唱一首流行歌曲，这些都是异想天开。因为无人附和，只有自己这样，所以过不了多久连自己也会觉得奇怪。其他人一边过着他们的日子，同时又成为榜样：吃得少到可以作为榜样，互相保持沉默以成为榜样，去忏悔也只是为了提醒留在家里没去的人要记得自己的罪孽。

她就这样处在饥渴的状态中，每一个想要表明立场的小小企图都无非是嘟囔几句而已，倒是感到了自由——但是表达不出来。虽然其他那些人都是孩子，但恰恰孩子们投来如此责备的目光却使人感到压抑。

战争结束后不久，母亲想起自己的丈夫，尽管没人想念她，她还是又去了柏林。那个男人也忘了自己曾经因为打赌追求过她，和一个女朋友生活在一起。那时不是有战争嘛。

但她是带着孩子来的，两个人便无精打采地遵守着履行义务的原则。

住在柏林潘科区转租来的一个大房间里，丈夫，有轨电车司机，酗酒；有轨电车售票员，酗酒；面包师，酗酒。妻子带着期间出生的第二个孩子不断去找东家，哀求人家再给一次机会。这个故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

在这样的贫困中，母亲没有了乡下人那种红扑扑的脸蛋，成了一个相当高贵的女人。她高高地昂着头，走起路来也仪态款款。她现在已经是什么都能穿，穿什么都适合。肩上用不着再围狐皮了。丈夫从

酩酊大醉中清醒过来以后会搂着她，表示自己是爱她的。这时，她就冷酷地给他同情的微笑。再没有什么能伤害她了。

他们常常出去，是漂亮的一对。他喝醉的时候就变得**放肆**，而她则不得不**严厉地**对他，这样他就打她，因为轮不到她来教训他，他可是挣钱养家的人。

她背着他用针流掉了一个孩子。

他在父母那儿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被赶回到她身边。儿时的回忆：他有时带回家的新鲜面包，油黑的粗麦面包照亮了四周阴暗的房间，母亲的赞扬。这类记忆里总是东西比人多，空荡荡的街道废墟上舞动的陀螺，小勺上的燕麦片，俄国牌子的铁钵里灰色的救济粥，人则只有局部：头发，脸颊，手指上结起的疤痕——母亲的食指上有一个小时候留下的长了息肉切痕，跟在她身边走的时候，就可以抓着这块硬硬的隆起的肉。

她没成什么事，也不可能再成什么事，这点根本连预测都不需要。尽管三十岁都不到，她已经在说“我当初”。到目前为止她都没有“认为”过什么，现在生活环境却困难到她生平第一次不得不理智，她有了理解力，却并不理解什么。

她开始构想，甚至尽量按照自己的构想去生活——然后就是“要理智！”——所谓的理智情结——“我已经不说了！”。

她被归类，自己也学会了归类，从人和东西上，尽管几乎没有什么人和东西可以用来学习归类：人，无法交谈的丈夫和尚无法交谈的孩子不能算数，可以用的东西的量也都是最少的——于是她不得不鸡毛蒜皮地算计，节俭持家：星期天穿的鞋平常的日子就不能穿；出门穿的衣服一回家就得马上挂到衣架上；购物袋可不是玩具！那个热腾腾的面包明天才能吃。（我后来行坚信礼时收到的表，仪式一结束马上就被收了起来。）

因为无助，她端起了姿态，却又对自己感到厌倦。她变得敏感，却要用胆怯而费力的自尊心来掩饰。这样的自尊心让她稍受一点委

屈，就立刻慌乱地显出毫无还手之力的样子。想让她感到自卑是很容易的。

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她也认为自己不应该享受，不过却总是难为情地笑着求孩子们让自己舔一口他们的糖。

邻居们喜欢她，赞赏她，她有奥地利人那种合群、爱唱的活泼天性，一个正直的人，没有大城市人的做作和扭捏，没人会戳她的脊梁骨。就连俄罗斯人她都能处得来，因为她能用斯拉夫语和他们交流。她变得健谈，只要有知道的通用词就说，这让她感到摆脱了束缚。

但是她对寻求刺激从来没有兴趣。这种事通常会过早地让她感到有负担，一直听人念叨羞耻心，现在自己成了羞耻心的化身。所谓刺激，她只能理解成是有人想跟她“有什么”，这让她望而却步，她不想跟谁有什么。她后来乐意相处的那些男人都是绅士，她只需要从他们那儿得到温柔这种美好的感觉就足够了。只要能有人说说话，她立刻就不再拘束，几乎感到了幸福。她不再允许人接近自己，因为她需要的是曾经让她感到自我存在的那种体贴——不过这她只有在梦里才能够体会了。她成了中性的，在日常琐事中实现自我。

她不寂寞，但是觉得自己像半个人，因为没有人能够与她互补。“我们俩真是达到了天衣无缝的互补”，她这样讲述自己当年跟银行职员的故事。那才是她理想中的永恒爱情。

战后，大城市：在这个城市里已经不可能有以前那样的城市生活。为了抄近路登高爬低地在城市的废墟中穿行，却依然在等候的长龙中排在队尾，被那些弯起胳膊肘、目光空荡荡的同代人挤到一旁。短暂的苦笑，目光从自己身上转开，和别人一样无目的地左顾右盼，心虚地发觉自己暴露出了和其他这些人一样的欲望，骄傲受了伤害，却依然试图占得上风。可悲啊，因为恰恰是这点让自己跟站在周围的人成了容易互相混淆、可以相互替换的：挤着被挤的，搡着被搡的，骂着被骂的。

到目前为止，那张嘴至少在表现那少女的惊奇（或是那女性的“故作好像”）、那乡土的胆怯或者那放松沉重心灵的白日梦结束时

还常常张开，而到了这种新的生活环境里，它却为了表示顺应大家的坚决，夸张地紧闭起来了，不过由于几乎没有什么能由个人决定，这种坚决也就只能是做做样子。

那面具似的脸，不是像戴了面具一样僵硬，而是像戴了面具一样地活动——矫饰的声音胆怯地尽力不显出与众不同，不光学另一种方言，就连别人用的俗语也要模仿——“喝呀！”，“把你的爪子拿开！”，“你今天吃起饭又像个打谷的人一样！”……从别人那儿看来的姿势，拧着胯，一只脚插在另一只前面……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变成另外一个人，而是成为一类人：从战前的变为战后的，从乡下土包子变成城里人，对这类人完全可以这样来描述：**高个儿，苗条，深色头发**。

描述这样一类人也让人感到摆脱了个人的历史，感到自己总像是被放在陌生人初次打量异性的那种目光之下。

于是，一种从未有机会心安理得地世俗化的精神生活至少在表面上固定下来了，因为它无奈地模仿着那世俗的、特别是在妇女身上很常见的对人际交往的评价体制：那个人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我不是他喜欢的那种，或者我是他喜欢的那种，他却不是我的，或者我们俩是天造地设，或者一个和另一个水火不容——意思是说所有的人际关系形式都已经成为非常有约束力的规则，以至于个别的、对别人多表示些许体贴的行为都成为违背这些规则的特例。比如母亲说起父亲的时候，就认为“其实他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就这样，人们依照类型说生活，乐意看到自己具备了普遍性，不再因自我而受折磨，不管是因为出身，还是个人可能有的头皮屑和汗脚，或者每天都在变化的生存条件。一个小人物通过成为某一类人摆脱了自己那丢人的孤独和孤立无援，失去了自我，却成了某个人，即便只是临时的。

然后，她就那样飘行在街道间，受到各种能让人无忧无虑从旁经过的东西的鼓励，又被所有使人驻足、同时让人陷入内心折磨的东西排斥：排队的长龙，施普雷河上的一座高桥，放着童车的橱窗。（她又偷偷地打掉了一个孩子。）动荡不安，是为了让自己保持安宁；东奔西走，是为了摆脱自我本身。口号：“今天我什么都不愿意想，我就只想开开心心的。”

这暂时如愿以偿了，所有的个性都消失在典型性中。后来，就连忧伤都只是开心的一个短暂的阶段："孤零零，孤零零，像街上的一颗石子，我是这般孤零零。"用这种假冒的乡曲里连傻瓜都能看出来的刻意的多愁善感，她为娱乐大家还要尽一份力。接下来，节目可以在男人们讲的笑话中继续。那些笑话还没有讲出来，下流的语调就足以让人轻松地跟着大家笑起来了。一回到家里却是那四面墙，还有四面墙里的独自一人，兴奋的感觉还能持续一阵，哼着歌，脱鞋时摆个舞步，想要忘我的愿望一闪而过，随后就又拖着步子穿过房间，从丈夫到孩子，从孩子到丈夫，从一件事到另一件。

她每次都打错算盘，回到家，那些市民的自我解脱的法子可就不起作用了，因为生活环境——只有一个房间的居室，要操心的总是一日三餐，和生活伴侣之间的交流方式几乎仅限于下意识的表情动作以及尴尬的性交——还处在市民阶段前的水平。如果至少想要稍稍享受一下生活，那就得出去。家外是成功人士，家里是处于弱势的那一半，永远的失败者。这不是生活！

她后来常常说起这一切——她有种**倾诉**的欲望——每次说起来都常常因为厌恶和伤心而颤抖，尽管只是怯怯的，以至于根本无法将那两种感觉抖掉，反而是将它们抖醒了。

我童年记忆中从卫生间里传来的滑稽的抽泣声，大声擤鼻子，红红的兔子眼。她是，她变成，她一无所成。

（当然，关于某个具体的人所写的这些都有点不具体，但是只有不把母亲作为一个或许很特殊的故事里可能独一无二的主人公并且推而广之才能触动我之外的别人——单纯转述一个时好时坏、结局突然的人生不管怎样都是对听者的冒犯。）

但是这种抽象与用词的危险在于，它有不受控制的倾向，会忘记作为起点的那个人物——像梦中的画面一样，是词语与句子造成的连锁反应，是一种文学仪式，在这种仪式里，个人的生活只不过是开始的动机而已。

这两种危险——一是单纯地转述，再就是人物在优美的语句中毫无痛苦地消失——延缓了写作的速度，因为我担心句子写得越多，就越发失去内心平衡。对一切文学活动来说都是如此，遇到这种事实的力量大到几乎不容杜撰的情况则更为甚之。

所以，我一开始还是从事实出发，寻找适合她的词句。随后，我意识到自己在寻找词句的过程中已经离事实越来越远。现在我是从已有可用的词句出发，不是从事实，而是从社会公有的语言基础出发，从母亲的生活中整理出这些模式里已经规定好的事件，因为只有用一种不是刻意寻找的、公共的语言才能够在所有这些无足轻重的生活事件中找出迫切需要公之于众的内容。

于是，我就逐句把描述女人生活的公共模式储备和母亲特殊的生活作比较，写作活动就产生在一致和矛盾中。关键是不能简单地引用，哪怕那些句子看起来像是引用，也无时无刻不能让人忘记它们写的是一个至少对我而言很特殊的人，只有这样把个人的、于我也完全可以是私人的动机牢牢地、谨慎地放在中心位置，这些句子在我看来才是可用的。

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特别之处：我并不像往常那样一句一句地渐渐远离所描述对象的内心生活，直到最后能够无牵无挂、兴高采烈地从外部观察这些对象，仿佛他们是终于被凝固住的昆虫——而是试图用始终如一的僵硬的严肃态度边写边靠近某人，但却没有一个句子能让我把握这个人，因而不得不反复地从头再来，无法达到通常那样能让人超然事外的全知视角。

因为我平常都是以自己或者自己的那些事为出发点，伴随着写作的过程逐渐与它们脱离，最终任由自己和自己的那些事作为劳动产品或者货品渐行渐远——但是这次，由于我只是**描述者**，无法扮演**被描述者**的角色，所以也就不能产生那样的距离感。我只能和自己保持距离，母亲却无论怎样也不能像我平常对待自己那样，变成一个使人振奋同时内心激昂、越来越快乐的艺术人物。她无法被凝固，始终无法捉摸，语句陷入一团黑暗，杂乱无章地横在纸上。

“无以名状”，故事里常常这样说，或者“难以描述”，我通常把这当做懒惰的托辞，但是现在这个故事却真的和无以名状，和难以

描述的恐惧瞬间息息相关。它描写的是那样的瞬间，意识在其中因为恐惧而猛地一惊；它描写的是那样的恐惧状态，它们如此地短暂，语言对它们来说总是措手不及；它描写的是那样的梦境过程，如此地恐怖，你会在意识中像蛆虫一样经历它们。窒息，惊呆，“一股冰冷的寒意钻进我的脊背，吓得连后脑勺的头发都竖起来了”——鬼故事里的状态一再出现，拧开水龙头后又马上拧上，夜晚在街上手拎一瓶啤酒，只是一些状态而已，不是完整的故事，没有可以期待的、能够给人这样或那样安慰的结局。

顶多在梦里，母亲的故事才会暂时清晰起来：因为在那里，她的情感如此实实在在，以至于让我能够作为双影人去感受这些，与之融为一体，但这恰恰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些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极端的表达欲望与极端的无语碰到一起了。因此，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生模式的秩序就是通过书写而虚构出来的：“当时——后来”，“因为——尽管”，“是——变成——一无所成”，同时希望以此来战胜那种毛骨悚然。而这或许就是这个故事的可笑之处。）

1948年初夏，母亲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刚满周岁的女儿被放在购物袋里——，没有合法证件，离开了东部管制区。他们分别在凌晨偷偷地越过了两条边境线，有一次，一个俄罗斯的边境士兵喊站住，母亲用斯拉夫语回答，像在对暗号。从那时起，对孩子来说周遭就是凌晨、耳语和危险的三合一，坐火车穿越奥地利时的兴高采烈。她又回到了出生时的房子，和自己的家人被安置在两个小房间里，丈夫成为木工哥哥雇佣的第一个工人。她自己又和以前一样成了这栋房子全体居民中的一分子。

和在城里不一样，她在这里因为自己有孩子而感到自豪，也会和孩子们一起出现在人前。她不再忍受任何人的指手画脚。以前她顶多是稍稍跟人对着吹吹牛，现在干脆就嘲弄别人。她可以把任何人嘲弄到哑口无言，特别是丈夫。他常常说起自己的诸多打算，却每次都遭到尖刻的嘲弄，让他很快就说不下去，只能呆呆地看着窗外。不过他第二天又会重新拾起话题。（那些岁月就因为母亲的嘲弄声重新获得了生气！）就这样，每次孩子们表达自己愿望的时候，她都会用嘲弄

打断他们，因为一本正经地表达愿望是可笑的。那个时候，她生了第三个孩子。

她重新操起了乡音，尽管只是闹着玩的：一个在国外待过的女人。以前的那些闺中密友这时基本上也都回到了出生的地方，这些人不过是到城里或者国外去转过一圈而已。

友谊在这种多半限于持家和纯粹过日子的生活形式里顶多意味着关系比较熟，并不是说能够向别人敞开心扉。反正大家心里清楚每个人的烦恼都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这个人想得比较开，那个人不太想得开，全是性格使然。

处在这个阶层的人如果没有烦恼就怪了；神经病。喝醉的人话不会变多，只会更加沉默，或许会发发脾气，或者发出一声欢呼，然后又呆呆出神，直到打烊的时候，才突然不明所以地抽泣起来，要么拥抱，要么打身边的人。

要说一个人本身，那是没有什么可讲的，即便是在教堂做复活节忏悔时，这每年一次的机会本来能够让人说一点自己的事，却也只是喃喃地背诵教义问答手册里的条目。在那些片段中，自我真是比月亮的一部分还让人感觉陌生。如果有谁谈的是自己，而不是信口东拉西扯，那就会被人说成“古怪”。个人的命运就算真能够发展得与众不同，其中的个性也会被磨灭得只剩下梦里的支离破碎，被宗教、习俗和教养的规程弄得疲惫不堪，弄得个人身上几乎就看不到什么人性的东西；“个性”只是作为骂人的词而为人所知。

充满痛苦的念珠；光辉灿烂的念珠；秋收节；全民公决的庆祝活动；女士挑选舞伴；确认友谊关系的庆祝酒；愚人节的恶作剧；守灵；新年夜的接吻——这些形式表达的是个人的忧伤，诉说的欲望，活力，独一无二的感觉，对异乡的渴望，性欲，一言以蔽之，每个在这个颠倒的世界里的思想游戏。在这个世界里似乎尽是角色的转换，你也不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了。

自由自在地生活——工作日去散步，第二次坠入爱河，身为女人却独自去酒馆喝上杯烈酒——这些就已经算是胡作非为了；顶多是“自由自在地”附和一首歌，或者互相邀请跳舞。

被剥夺了个人的故事和个人的情感，久而久之，你就开始像平常形容马这类家畜时说的那样“怯生”起来：你变得胆怯，几乎不再说话了，或是变得有点神经质，在屋里喊来叫去。

这时，上面提到的那些仪式就有了慰藉作用。慰藉：它并不是对某个个体做出的回应，而是因为你身在其中而自然产生；你终于认同了你作为个体什么也不是，至少没什么与众不同。

你彻底不再期待了解个人的情况，因为你不再渴望探询什么，所有的问题都变成了空洞的套话，回答也空泛到不再需要人了，有物就够了：那甜蜜的坟墓，那甜蜜的耶稣，那甜蜜而苦难深重的玛丽亚，所有这些都成为个人心中对死亡的渴望所膜拜的对象，这一切使每日经历的苦难变得甜蜜；你就在面对着这些给人慰藉的物神时消失了。日复一日用同样的方式与同样的事打交道，这些事因此让你觉得神圣；甜蜜的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工作。反正你也别无选择。

你对什么都不再在意了。“好奇”不是一种性格特征，而是女人或者女流的坏习惯。

但是母亲天性好奇，也不知道什么是可提供慰藉的膜拜对象。她不是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干活儿上，只是顺便做做，于是她不满足起来。天主教所说的尘世苦痛对她来说是陌生的，她只相信今生的幸福，这得碰运气，而她自己碰巧很不走运。

她可要做给大家瞧瞧。

但是怎么做呢？

她多想真正地冲动一次啊！结果她真就冲动了一次：“我今天很冲动，给自己买了件衬衫。”至少在她所处的环境中，这已经是过分的了。她学会了抽烟，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抽。

那个地方有很多女人都偷偷酗酒，她反感这些人长着肥厚歪斜的嘴唇：要凭这可没法让谁瞧什么。她充其量是喝个微醉——要么是和谁喝杯确立朋友关系的酒。就用这种方式，她没多久就和年龄比较轻的乡绅们你我相称了。虽然是个小地方，日子过得比较好的一些人还是形成了一个社交圈。这个圈子里的人都乐意接纳她。一次，她在化

妆舞会上扮成罗马人，得了一等奖。至少在娱乐方面，只要能做到**有教养，风趣又活泼**，那么乡下的社交圈是不分阶层的。

在家里，她是“妈妈”，就连丈夫也这样叫她，比叫她名字的时候多。她就由他去。本来这个词也更适合用来描述她和丈夫之间的关系。对她来说，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心上人儿。

现在成了她来积攒，但是她不可能像父亲那样靠把钱搁着来积攒，只能省吃俭用，对欲望的限制使它们很快就变成**贪念**，并因此受到更严格的限制。

尽管可供发挥的空间小得可怜，也还是要通过模仿市民阶级的生活模式来获得安慰：货品依然可笑地被分为必需品，只是有用的物品和奢侈品。

必需的只有食物，有用的就是冬天取暖的材料，此外的一切都是奢侈品。

如果这样还能有剩余，那就能让人至少每周会有一次小小的自豪感：“我们的日子还是比别人好过的。”

于是，你就能够有如下的奢侈享受：一张九排的电影票，和之后的一杯加气的葡萄酒；第二天早晨花一两个先令给孩子们买上一板多浦牌巧克力，每年一瓶自制的鸡蛋利口酒；到了冬天，有时星期天还能享用这一周积攒起来的掼奶油，方法是夜里把奶钵放到冬季夹窗的两层窗玻璃间。那个时候真是像过节一样呀！如果这不是我自己的故事的话，或许我会这样写；但那不过是对无法企及的生活方式一种身不由己的拙劣模仿，是小孩儿玩的人间天堂的游戏。

圣诞节：那些不过节也是必需的东西被包装成礼物。大家用必需品给对方带去惊喜，有内衣、袜子、手帕等，同时说，自己**渴望要**的正是这个！就这样，除了吃的东西以外，几乎收到任何东西都要做出收到了礼物的样子，比如我就因为收到最基本的学习用品而由衷地感激，把这些东西如同收到的礼物一样摆在床边。

生活不能够超越经济实力。而经济实力则是由她给丈夫计算出来的每月的工时决定的。她贪婪地算计着哪怕是一时半刻的时间，害怕那种几乎挣不到什么钱的雨天。碰上这样的天气，丈夫要么在小屋里坐在她身边喋喋不休，要么就委屈地瞪着窗户外面。

冬天，建筑行业的人有失业补贴，这钱被丈夫用在喝酒上。为了找他，她从一家酒馆到另一家酒馆，他则幸灾乐祸地给她看剩下的钱。她躲开拳头；她不再跟他说话。因为寂静而感到恐惧的孩子们形影不离地跟着懊悔的丈夫，她因此疏远了孩子。巫婆！孩子们的目光中满是敌意，因为她态度太强硬。父母亲外出时，他们就揣着怦怦乱跳的心去睡觉，等到凌晨听见丈夫把妻子推搡着穿过房间，就马上在被子里缩成一团。她不断停下来，向前面迈一步，然后又被猛地往前推一把，两个人都恨恨地一言不发，直到她终于开口，为他送去话柄："你这个畜牲！你这个畜牲！"有了这话，他就可以痛痛快快地揍她一顿了。而她每挨一下打，都对他发出一声嘲笑。

平日里，他们几乎不看对方，但在这种公开敌对的时候，他从下往上，她从上往下，两个人都死死地盯着对方的眼睛。缩在被窝里的孩子们只听到推搡的声音，呼吸的声音，有时还有餐具柜里的餐具颤动的声音。第二天早上，孩子们就自己做早餐。这时，丈夫一动不动躺在床上，妻子则闭着眼睛躺在他旁边装睡。（没错：这种描述的方式就像是抄来的，从别人的描述中借用来的，是可替换的，陈词滥调，与所描述的那个时代没有关系，简单说就是："十九世纪"；但恰恰就是这个看来是必要的；因为尽管雷同，没有时代限制，永远一样，简单说，十九世纪，总还是有要描述的事件，至少在这个地区，在所描绘出的经济条件下。到了今天也还是老一套：乡公所的通告栏上贴的几乎只有给某某的酒馆禁足令。）

她从来都不跑开。这期间，她已经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我只等着孩子们长大成人。"第三次堕胎，这次造成了大出血。快满四十岁的时候，她又怀孕了，已经不可能再打掉，她把孩子生了下来。

“贫穷”是个美妙的词，不管怎么说也是个高贵的词。这个词能立刻引发出想像，就像老教科书里说的一样：贫穷而干净。干净让穷人具备了社会行为能力。社会的进步体现在一种关于干净的教育中，穷人一旦干净起来了，“贫穷”也就成了一个荣耀的词。对于那些身在其中的人来说，贫穷只是在别的一个国家那些害群之马的肮脏。

“窗户是住户的名片。”

于是，那些一贫如洗的人们乖乖地把代表进步、用来达到干净卫生目的的拨款拿出来清洁自己的窝。以前穷困的时候，他们还曾经用一些令人厌恶的，却也因此具体的、可体验的画面来搅扰公众的想像，现在作为经过消毒而清洁的“贫困阶层”，他们的生活抽象得超出了所有的想像，可以不必理会了。关于贫穷还有感性的描述，对于贫穷却只剩下象征而已。

而那些对贫穷的感性描述的目的也只是要使身体对贫穷产生恶心的感觉而已。是的，正是那种乐在其中的描述方式才**制造了**这种恶心的感觉，而这种恶心的感觉却并没有转化成行为的动力，仅仅勾起了一个人对于自己还在抓屎抓尿的蒙昧时期的回忆。

比如，在有些人家里，那惟一在晚上用作夜壶的盆，第二天又被用来揉面。这个盆之前自然是用开水仔细清洗过，所以本来也没有什么：不过很简单，就是因为你描述了这个过程，它也会令人作呕：“他们用同一个盆子，方便完了又在里面吃饭。”——“呸！”比起光凭眼睛看到这些事情来，词语的描述更加能带来这种被动而愉悦的恶心感。（自己回忆起，分别在文学化描述晨服上的蛋黄痕迹时吓得缩成一团。）所以，描写贫穷时，我心里就不是滋味，因为那干净的、一成不变的穷困，没有什么可描写的。

看到“贫穷”这个词时，我总会想到：曾经是这样。这个词大多也只是从那些已经摆脱了贫穷的人嘴里才能听得到，作为一个属于孩提时代的词，不是“我以前很穷”，而是“我是穷人家的孩子”（莫里斯·谢瓦利埃[10]），一个既可爱又滑稽的回忆信号。但是一想到母亲的生存条件，我就无法玩起这样的回忆游戏。从一开始就被胁迫任何时候都要完全维持那个形式：早在学校里，乡下孩子的课程中，教师们认为对女孩子最最重要的一门就是：“书面作业的外在形式”。

之后又发展为妇女对外凝聚家庭的任务；不是什么令人愉悦的贫穷，而是为了成就完美形式的悲惨；每天都为维持脸面不断操劳，脸面却因此逐渐失却了灵魂。

或许在无形式的悲惨中，你会觉得要舒服些，会产生一种最小限度的无产者的自信。但是那个地方没有无产者，连贫民都没有，至多是些被救济院收留的衣衫褴褛的穷人，没有无所顾忌的人，赤贫者只会感到羞愧，贫困的的确确是一种耻辱。

对母亲而言，那无休止的逼迫会贬抑她，这无论怎么说都是难以接受的。有一次母亲被这样形象地描述过：她已经不再属于那些**从来没见过白人的土著人了**；她能够设想一种不用一辈子只做家务的生活。只需要有人动动小手指，她似乎马上就能心领神会。

要是，似乎，或许。

实实在在发生的是：

一出用人作道具的大自然剧，其中有条不紊地剥夺了人的尊严。一次次跑去求哥哥再收回一次成命，不要解雇酒鬼丈夫；恳求检查非法收听的人不要揭发家里没有登记缴费的收音机；强调自己作为国家的女性公民也有资格获得房屋建设贷款；为证明自己的贫穷在各个机关之间奔波；每年都得为当时已经上大学的儿子申请贫困证明；申请病假补助金、子女津贴，申请减少教堂税——这大多数都要靠别人大发慈悲，不过即便那些依法应该享有的也需要仔仔细细地证明，直到千恩万谢地收到作为慈悲心证明的“批准！”。

家里没有电器，一切都还要靠双手。上个世纪的各种物件，在大家的意识里已经被当成纪念品：不光是已经变成可爱玩具的咖啡磨——还有**宽大的**搓板；**舒服的**火炉；边边角角都补过的**好玩的**锅；**危险的**拨火钩；**帅气的**侧面装着栅栏的板车；**蠢蠢欲动的**割荒草的镰刀；年复一年被**粗鲁却心地善良的**磨剪人几乎磨秃了的**闪闪发亮的**刀；**好笑的**顶针；缝补时用的**笨重的**蘑菇形木头托子；一再要拿到炉

子上加热而让人觉得好玩的**硕大**熨斗，最后还有那样**宝贝**，用手和脚一起操纵的歌唱家牌缝纫机——只有一一地列举这一切，才能让人感到亲切。

当然，用另外一种方式列举也同样有田园气息：背部的疼痛；先在煮衣服时烫红又在晾衣绳上冻红的手——冻硬的衣服叠的时候发出的喀喀声真响！有时弯腰后直起身子时流的鼻血；女人们一心只想着赶紧把活儿干完，结果裙子上抹上了血迹还浑然不知地去买东西；虽然不断抱怨这儿疼那儿疼，但因为毕竟是女人而得到宽容；女人们之间：不问“好吗？”，而是问“好点儿了吗？”。

大家都知道这点，这证明不了什么，因为凡事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这种想法彻底失去了证明力；这种想法是所有生活原则中最可怕的。

“凡事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一这样想，过分的事就不再过分——不好的一面，正是那个好的方面的一个必要佐证。

通常，好只是因为缺少了坏的方面：**没有**喧闹，**没有**责任，**没有**为陌生人的工作，没有每日离开家和孩子。那些真正的坏被**缺少了的东西**抵消了。

所以任何事都没有那么糟，随随便便地就解决了，在睡梦里。只不过所有的一切都看不到结束的时候。

今天是昨天，昨天是一切依旧。又挺过了一天，又过了一个星期了，新年快乐。明天吃什么？邮递员来过了吗？你一整天在家里都做了什么？

摆桌子，收拾；“都分到吃的了吗？”；拉开窗帘，拉上窗帘；开灯，关灯；“你们不要老是让浴室里的灯开着！”；叠起，展开；倒空，装满；插上插头，拔掉插头。“好了，今天的活儿干完了。”

第一台电器：一个电熨斗；一个“一直想要的”神奇物件。拘谨，就好像自己不配用这样的东西：“我有什么功劳要用这个？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会愉快地盼望每一次熨衣服！说不定我还能留出点时间给自己。”

搅拌机、电炉子、电冰箱、洗衣机：留给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多。但是你却只是愣愣地站着，因为之前那被当做宝贝和家神[11]的漫长岁月而感到眩晕。以前就连情感都得精打细算，所以最多莫过是在失言的时候表达出来，而且还要立刻掩饰过去。以前全身散发出的那种生活热情只是偶然显现。这时，在安静而沉重的手上，一根手指偷偷地、羞怯地抽动一下，紧接着这只手就被另一只手盖了起来。

但是母亲并没有就此彻底变得胆怯，没有了性格。她开始表现自我。因为不用再一身多用，于是她逐渐找回了自己，不再浮躁忙碌。她展示给大家一张能让自己稍微感到舒服些的面孔。

她看报纸，更喜欢看书，书里的故事能让她拿来跟自己的经历作比较。我看什么她就看什么，先是法拉达[12]、克努特·汉姆生[13]、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克西姆·高尔基，　；然后是托马斯·沃尔夫[14]、威廉·福克纳。她对这些书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解，只是复述特别引起自己注意的章节。她有时会说“这跟我还是不一样”，就好像作者描写的就是她本人。她把每一本书都当做对自己生活的记录来读，在阅读中苏醒，通过阅 读生平第一次袒露自我，学会谈论自己。每看一本书她都能想起更多。就这样，我慢慢了解了一些她的事。

到那时为止，她一直把自己搞得很局促，自我的存在让她感到别扭；随着阅 读和谈论，她沉陷其中又带着一种全新的自信重新浮出。“我又变年轻了。”当然，她只是把这些书当做过去的故事来读，从来没有对未来的憧憬。她在书中找到了各种错失的、永远无法再弥补的遗憾，而她自己已经过早地把未来从头脑中抹去了。第二春现在实际上只是给自己曾经参与过的事涂抹光彩。

文学并没有教会她从现在开始为自己着想，而是告诉她现在这些都已经太迟了。她**本来可以**不平凡。现在她顶多是**也**为自己着想一次，买东西时，偶尔允许自己到酒馆里喝杯咖啡，不再**那么**在意别人怎么看。

对丈夫，她变得宽容，由他把话说完，不再是一句都没听完就拼命地点头来打断他，让他一下子就没了话。她同情他，她常常这样，

因为同情而失去了抵抗力——就算别人根本不苦。她可能只是想像他周围有某样东西，而这样东西又特别能体现自己摆脱了的绝望境地：脱落了搪瓷的洗衣盆，小得可怜的电炉总是让溢出的奶给弄得黑乎乎的。

如果家里有人不在，她脑海里浮现的就全是这个人孤独的样子，不再跟她一起在家里的人只可能是孤独的。寒冷、饥饿、敌意：都是因为她，就连看不上眼的丈夫都被她纳入了这种负罪感之中。如果他要过没有她的日子，她就会实实在在地为他担忧，就连进了医院也一样。她常进医院，其中一次被怀疑得了癌症，就连躺在那儿时，她依然感到不安，因为估计丈夫在家里吃不到热饭了。

因为对别人，对不在她身边的人的同情，她自己从不感到孤独，只是当这人重新成为她的负担时，才会有一闪而过的凄凉；对松松垮垮挂在臀部的裤子、没有硬气的膝盖挥之不去的厌恶。“我希望有一个能够崇拜的人”，如果对一个人总是没法不蔑视的话，那是让人不快的。这种明显的厌烦从一开始的动作上就流露了出来，久而久之，逐渐变成了耐心地端坐，变成了从手头正在忙碌的事情上礼貌地抬起眼睛，这只能让丈夫更加抬不起头。她总说他是软骨头。他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去问她为什么讨厌自己——她当然每次都回答说：“你怎么会这样想？”他不依不饶，又问她自己真这么让人厌恶吗。她安慰他，随后对他更加厌恶。两个人能白头偕老并不让她感动。但表面上看，她因为他改掉了殴打自己的习惯，也不再是自己的对手而变得温和。

由于过度辛劳的工作，每天都被人要求做同样的苦工却没什么成就，他变得羸弱、温和。小睡醒来，他感到了真正的孤独，而她只有他不在的时候对此才能有些想法。

他们并没有疏远，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亲近过。信里的一句话：“我丈夫变得安静了。”她也更平静地跟他生活，自信地认为自己对他来说一辈子都是个谜。

现在，她也开始对政治感兴趣了，不再选哥哥的那个党。作为哥哥的雇员，丈夫到目前为止总是先替她选择这个党。现在她选的是社会党，慢慢地，她的丈夫也开始选择社会党，出于对她的依赖。但她

从来不认为政治对她个人有什么好处。她从一开始就把投选票当成做善事，并不期待什么回报。“社会党人更关心工人”——不过她并不觉得自己是工人。

需要操持的家务越少，就越是有事纠缠着她，而这些事在她所了解的社会主义制度里是没有的。她独自面对着被驱赶到梦里的对性的厌恶，被雾气打湿的床单，低低地压在头上的房顶。真正与她有关的事与政治无关。这种想法当然有错误，但是错在哪里？哪个政治家能解释给她听？用什么样的话解释？

政治家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跟他们说话时，他们不是回答，而是表达立场。“反正大多数事情都没法拿来讨论。”只有那些能够用来讨论的才是政治要关心的事，其他的事就得靠自己想办法，或者是和自己的主达成协议。如果有哪个政治家真的关心起谁，那倒会把人吓住了。那无非套近乎而已。

渐渐地，不再是“有人”，只有“她”。

在外面的时候，她习惯了作出一副高贵的表情，坐在我给她买的那辆二手车的副驾驶座位上时，也是不苟言笑地盯着正前方。就连在家里，她打喷嚏时也不再声嘶力竭，笑的声音也没有那么大了。

（葬礼上，最小的儿子回忆说，自己以前有一回从远处就听到她在楼上尖声大笑。）

买东西时，她更多是象征性地向四下里的人致意。理发师那儿去得更勤，还让人做指甲。这不再是战后的艰苦岁月里，她为了对付处处遭人白眼的日子故意装出来的高贵——再没有人能像当年那样投来一个眼神就让她乱了方寸。

不过在家里，当她摆着全新笔挺的姿势坐在桌旁时，丈夫却背对着她，背后的衬衫从裤子里钻出来，双手深深地插在兜里，一言不发，只是偶尔小声咳嗽两下，看着下面的山谷。小儿子吸着鼻涕缩在

厨房角落的沙发上看米老鼠杂志。这时，她经常会狠狠地用指关节敲击桌子的边缘，然后突然用双手捂住脸。这种情况下，丈夫有时候会走出房门，在那儿干咳一阵，然后再进来。她斜着身子坐在那里，垂着头，直到儿子来要抹好的面包。她站起来时，得用双手帮忙。

另一个儿子无照驾驶，把车撞坏后被关了起来。他和父亲一样酗酒，她又得从一家酒馆找到另一家酒馆。这个逆子！他不听她的，她总是重复同样的话，对他没有影响力的语言。“你不害臊吗？”——“我知道。”他说。——“你至少自己到别的地方找个房间去住。”——“我知道。”他依旧住在家里，成了又一个丈夫那样的人，又搞坏了第二辆车。她把他的包放在门外，他去了国外，她想像着他的各种悲惨模样，给他的信上写着“你哀伤的母亲”。他马上就回来了，如此这般。她觉得什么都是自己的错，什么事情都想得很严重。

然后还有那些永远不变的东西，从永远不变的角度对着她！她尝试凌乱，但双手已经太过习惯每天的那些动作。她想就这样死掉，但是又害怕死。她也太好奇。“我总是得坚强，但是我宁愿软弱。”

她没有爱好，没有偏爱的东西，不搞收集，不搞交换，也不再做填字游戏。她也早就不贴照片了，只是把照片清理开。

她从不参与社会生活，只是每年去献一次血，大衣上别着献血的证章。有一天，她作为第十万名献血者上了广播，收到了一篮子礼物。

有时候，她去新的自动保龄球道上玩保龄球。当瓶柱全倒，铃声响起时，她会抿着嘴嘻嘻笑。

有一次，东柏林的亲戚通过电台的点歌栏目点了亨德尔的《哈利路亚》，并向全家人问好。

她害怕冬天，因为冬天所有的人都待在同一个空间里。没有人来拜访她，每次听到什么动静抬头去看时，都只是丈夫而已：“哦，是你啊。”

她的头开始剧烈地疼痛。药片都吐了出来，栓剂没多久也不管用了。头嗡嗡响，响得她只能用指尖轻轻地触摸头部。医生每星期给她

打一针，给她麻醉一段时间，后来打针也不管用了。医生说她得给头部保暖，她就走到哪儿都带着头巾。吃了各种安眠药，她依然还是到后半夜就醒，然后就把枕头盖在脸上，等待天终于亮起来的那几个钟头，让她一整天都颤颤巍巍。疼痛让她出现了幻觉。

这时，丈夫因为肺结核住进了疗养院，他给她写温情脉脉的信，请求能够再睡到她身边。她的回答很友好。

医生不知道她得的什么病，常见的妇女病？更年期？

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她抓东西会抓歪，双手从身上侧滑下。下午洗好碗以后，她要在厨房的沙发上躺一会儿，卧室里太冷。有时候，头疼得她谁都不认得。她什么都不想看见。因为脑袋里嗡嗡作响，所以跟她说话得非常大声。她对身体失去了所有的感觉，总是撞在棱棱角角上，而且从楼梯上摔下来。笑让她感到疼，她只是偶尔抽动一下脸颊。医生说可能是有一根神经受到了压迫。她只小声说话，身体状况糟得连抱怨的力气都没有了。她把头歪在肩膀上，疼痛却尾随到了那里。“我根本就不是人了。”

我去年夏天在她那儿时，有一次看到她躺在床上，那样悲惨的一副模样，让我竟不敢再靠前一步。就像是躺在动物园里一堆落寞的行尸走肉。看到她不知害羞地袒露自己是一种折磨；她身上的一切都扭曲、破碎、开裂、发炎，五脏六腑扭结在一起。她远远地看着我，那眼神就仿佛我是她**那颗饱受折磨的心**，就像卡夫卡小说里的卡尔·罗斯曼[15]对于遭到所有人唾弃的司炉一样。我马上离开了房间，感到又害怕又生气。

从这时起，我才真正意识到母亲的存在。之前，我常常忘记她，顶多有时想起她这辈子做过的蠢事会有刺痛的感觉。现在，她实实在在地向我挤靠了过来，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她的状况我一清二楚，甚至有时也完全会感同身受。

周围的人也突然开始用另外一种眼光看她：就好像她命中注定是要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生活，他们虽然也问为什么、怎么会，不过只是限于表面，他们也是这样理解她的。

她没有了感觉，什么都不记得，连最熟悉的家用电器都认不出来了。小儿子放学回家后，越来越频繁地看到桌子上放着说她出去散步的纸条，让他要么自己弄面包吃，要么上邻居家去吃饭。这些从账本上撕下来的纸条在抽屉里越积越多。

她没法再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在家里，她醒来时身体就已经伤痕累累。她任由一切掉落在地上，希望自己能跟着每样东西一起掉落。

门挡着她的路，从墙边走过时，墙上就仿佛有霉点纷纷落下。

看电视时，她什么也看不懂了。为了不让自己睡着，她的手隔一会儿会动一动。

散步时，她时而会出神。她坐在树林边上，尽量远离房舍，或是坐在一个废弃的木材厂下面的小溪边。看着庄稼地或者河流虽然不能减轻病痛，但至少偶尔能有麻痹的作用。每一个景象都能马上变成一种折磨，让她迅速地转移开目光，而下一个景象继续折磨着她。于是，在景象与感情的混乱交织中出现了那样一些空白点。在这些点上，那猴子荡秋千似的环境使得她能够短暂地得到少许安宁。在这个时刻，她只是感到疲惫，从那眩晕的感觉中恢复，头脑空空地深陷在流水之中。

随后，在她的内心里，一切又变得与环境格格不入，她也许会慌乱地挥舞手脚，但是已经没法控制自己，从安宁的状态中跌跌撞撞地滚出来，她不得不站起身，继续走。

她告诉我恐惧如何在行走中依然扼住她的脖子，所以她只能非常慢地走。

她走啊走啊，直到因为虚弱不得不再次坐下来。不久后她又被迫站起来继续走。

她经常就这样消磨时间，意识不到天色已暗。她有夜盲症，很艰难地才能摸回家。在家门口，她停住脚步，在一张长椅上坐下，不敢

进去。

如果她还是决定进来的话，门就缓缓地打开。母亲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像鬼一样。

即便是在白天，她通常也只是到处乱撞，搞不清不同的门还有方向。她常常说不清自己是怎么到的一个地方，时间又是怎么过去的。她完全没有了时间和空间的感觉。

她什么人也不想见，顶多在酒馆里混在从旅行车里下来的人中间。那些行色匆匆的人没有时间看她的脸。她没法再伪装自己，所有的一切都随意耷拉着，每一个看到她的人都一定会明白是怎么回事。

她害怕脑子糊涂，趁着还不太晚，赶紧写了几封告别的信。

这些信写得那样急迫，仿佛她想把自己也刻画到纸上去。在这个阶段，对于她来说，写东西已经不像处在一定生活状态中的平常人那样，是种身外的工作，而是不受意志左右的呼吸的过程。跟她自然是没办法再说什么，每个字都能勾起她对某些可怕事情的回忆，让她马上就丧失理智。“我没法说，不要再折磨我了。”她回避着，再次回避着，继续回避着，直到她完全转过身去。随后，她便不得不闭上眼睛，静静的泪水毫无用处地从别转的脸上淌下来。

她去州首府看神经科医生，在医生面前她能说，而他作为医生是要对她负责的。她自己都奇怪竟然会给他讲那么多事儿。说话时，她才真正开始回忆。不管她说什么，医生都点头，立刻把细节甄别为某种病征，用“精神崩溃”这个大概念将这一切归纳进一个体系之中。这让她感到安慰。他知道她怎么了，至少能给她这样的状态一个概念。不是只有她一个，外间屋里还有一些人在等着。

到了下一次，她就津津有味地观察起这些人。医生建议她多在空气新鲜的地方散步。他给她开了一种药，能够稍稍缓解头部的压力。旅行应该能够分散她的注意力。她每次都支付给他现金；工人医疗保险不为参保人提供这方面的支出。她因为自己花了钱又感到压抑。有时候，她会徒劳地去找能够用在某件事上的某个词。她通常是知道这

个词的，这样做只是想唤起别人对她的同情。她怀念起那个短暂的时期，那阵子她真的谁也不认识，也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

她把生过病这件事当做撒娇的理由，只是装成生病的样子。她装得好像脑子里一片混乱，就为了摆脱终于清晰起来的思想，因为如果头脑完全清醒了，她就会把自己当成特殊情况，对让人感到安慰的被归类充耳不闻。通过夸大的健忘和丢三落四，她希望在自己真的能回忆起什么或者什么都准确地理解时，能够得到这样的鼓励：行啊！已经好多了呀！——就好像所有骇人听闻的事，都只是因为她恼火自己失去了记忆，所以跟人说不上话。

她受不了别人拿她开玩笑。用她的状态开她的玩笑帮不了她。**她什么话都当真**。如果有人在她面前特意装成开心的样子，她就会痛哭流涕。

盛夏季节，她去南斯拉夫待了四个星期。一开始，她只是躲在遮去光线的旅馆房间里，在头上摸来摸去。她没法看书，因为自己的思想马上就会掺和进来。她不断地去浴室里洗漱。

之后，她敢出门了，在海里蹚一蹚水。她是第一次度假，也是第一次到海边。她喜欢大海，晚上常常有风暴，那么即便躺着睡不着也没什么。她买了一顶草帽遮阳，在出发的那天又把帽子卖了。每天下午她都坐在酒吧里，喝一杯特浓的咖啡。她给所有认识的人写明信片和信，其中只是顺便提到自己。

她对时间的流逝和周围的环境又有了感觉，好奇地偷听邻桌人的谈话，竭力要搞明白不同人之间的关系。

傍晚天不太热时，她穿行在周围的村庄里，朝没有门的房屋里看去，就事论事地表示惊奇，因为她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原始的贫困。头不疼了，她不用再想什么，时不时完全游离这个世界，她感到一种惬意的无聊。

回到家中，她长久以来第一次又主动开口说话了。她讲了很多事。她同意我陪她一起散步。我们常常到饭馆吃饭，她养成了饭前喝一杯金巴利酒的习惯，摸脑袋的动作几乎变成了一种改不掉的毛病。她想起一年前在一个咖啡馆里，甚至曾有一个男人跟她搭话。“不过他非常有礼貌！”明年夏天她打算去北边不太热的地方。

她懒洋洋地跟老姐妹们坐在花园里，抽着烟，把咖啡杯里的马蜂赶出去。

天气晴朗温暖。周围山包上的杉树林整日笼罩在一片雾气中，好久不再那么黑油油一片了。她腌制冬天要吃的水果和蔬菜，心里琢磨着要去救济院收养个孩子。

我已经独立生活惯了，八月中旬就回到德国，丢下她自己。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写我的故事，她偶尔有信来。

“我脑子有点糊涂，有些日子让人难以忍受。”

“这儿又冷又难受，早上雾散得很慢。我睡的时间很长，就算从床上爬起来了，也没有兴趣干什么。领养孩子的事儿目前还不行，因为我丈夫有肺结核，所以我不能领养。”

“每次只要想点开心的事，门马上就关闭。我又孤零零地守着那些让人动弹不得的念头。我真希望能写点高兴的事，但是没有这样的事。我丈夫在这儿待了五天，我们之间没什么话说。就算我提起话头，他也不明白我的意思，那我不如什么也别说好了。不过我仿佛还是因为他要来而感到高兴——等他来了，我又连看也不想看他一眼。我知道自己得找一种方式，让自己能够忍受这种状态，我也不断地琢磨这事，但就是想不出什么聪明的做法。最好是你看完了这堆屁话，然后就赶快把它忘掉。”

“我在家里待不下去了，所以就在周围乱转。现在我起得早了些，对我来说那是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我必须强迫自己干点什么，不然就又会回到床上去。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打发时间。心里有种强烈的孤独感，我不想和任何人说什么。晚上我常常想喝点儿，但是又不能喝，因为那样的话药就不起作用了。昨天，我坐车去了克拉根福，

一整天不是闲坐，就是转悠，晚上差点儿没赶上最后一班公共汽车。”

到了十月，她一个字也不写了。在那些美丽的秋日，人们看见她在马路上极其缓慢地向前挪动，于是就鼓励她稍微走得快一点。她央求每一个认识的人陪自己在酒馆里喝上杯咖啡。也不断有人邀请她星期日一起去郊游，她欣然跟着人家到这儿到那儿。她和别人一起去了这一年最后几次教堂纪念日的集市。有时她甚至还跟人去看足球赛，宽容地坐在观看球赛的兴奋人群中间，几乎连嘴都不张。但是当联邦总理为了竞选来到当地并分送丁香花时，她突然大大咧咧地挤上前去，也想要一枝丁香花：“您就不给我一枝吗？”“对不起，尊贵的夫人！”

十一月初，她又开始写信。“我不能善始善终地把事情想完，我头疼，头里面有时嗡嗡响，或是有哨声，让我没法再忍受一点点额外的噪音。”

“我自言自语，因为没法跟任何一个人说些什么。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部机器。我很想坐车去个什么地方，但是天一黑，我就害怕自己找不回来。早晨是一堆浓雾，一切又那么寂静。我每天都干同样的活儿，但到早晨又是乱七八糟。这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我真的想死，走在街上我就想倒在飞驰而过的汽车前。但是那样就百分之百能够成功吗？”

“昨天，我在电视上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温顺的女性》，整个晚上我眼前都是可怕的画面，不是做梦，我是真的看到了，几个男人光着身子走来走去，性器官的位置挂着的是肠子。12月1日，我丈夫就要回家来了，我一天比一天更加不安，无法想像怎么还能够跟他生活在一起。两个人的眼睛盯着不同的角落，孤独的感觉更加强烈。我冷，要再出去转转。”

她常常把自己关在家里，如果有人像往常一样在她面前抱怨，她就打断人家的话。她对谁都很严厉，摆手表示拒绝，嘲笑一声。其他那些人都还是孩子，他们打扰她了，最多是对她有些许触动。

她很容易就会不耐烦，粗暴地指出别人的不是，让人在她面前觉得自己很虚伪。

照相时，她不会摆弄表情了，虽然皱着眉头，牵动脸颊摆出微笑，但是瞳孔从虹膜的正中滑向一边，眼睛里尽是无法愈合的哀伤。

活着成了一种酷刑。

但是她同时又惧怕死亡。

“您到森林里去散步吧！”（**精神科**医生）

“但是森林里很昏暗！”当地的兽医时而是她信任的人，她死后，他这样讥讽地说。

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是雾蒙蒙的。到了中午，她想试试看能不能把灯关了，但马上就又把灯打开。朝哪儿看呢？胳膊交叉，双手放在肩上。偶尔传来看不见的电锯发出的响声。一只公鸡一整天都以为这一天才刚刚开始，打鸣一直打到下午，——接着下班的汽笛声就响了。

晚上，雾气滚滚地扑在窗户上，她听见在没有规律的时间间隔之后，玻璃外表面上又有一滴水滑动了起来。整个晚上，床单下面的电褥子都开着。

炉子里的火到了早晨总是灭。“我不想再打起精神。”她无法合眼，脑海里发生着**那件大事**。（弗兰茨·格里尔帕策尔[16]）

（从现在起，我得小心不要让故事过分地自说自话了。）

她给所有的亲属写遗书。她不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还知道自己为什么别无选择。“你不会理解的，”她这样给丈夫写道，“但是我已经不能想像继续活下去了。”她给我寄了一封挂号信，里面有遗嘱的副本，而且还是用的快递。“我数次动笔，但是感不到安慰，得不到帮助。”所有的信不但都像往常一样标了日期，而且还写了星期几：“71年11月18日，星期四”。

接下来的那天，她坐公共汽车去了区首府，用家庭医生给她开的长期处方给自己买了大约一百片小安眠药片。她还另外给自己买了一把红色的雨伞，虽然没有下雨，那伞把很漂亮，稍稍有点弯。

傍晚，她坐上一趟通常没什么人的公共汽车赶回去。不少人还看见过她。她回到家，在隔壁女儿那里吃了晚饭。一切都跟平常一样："我们还讲了笑话。"

回到自己家，她又和最小的孩子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了一集《父子联手》。

她打发孩子去睡觉，自己坐在开着的电视机前。前一天她去了理发店，还修了指甲。她关上电视，走进卧室，把一身两件套的咖啡色套裙挂到柜子里，吃下所有的止痛片，里面混着所有治疗抑郁症的药，穿上生理裤，里面还衬上纸尿裤，又另外加了两条裤子，用一条头巾把下巴扎紧，没有开电褥子，穿着一条长及脚踝的睡裙躺在床上。她舒展开身体，将手叠放在一起。在那封内容基本上是交代如何为她办理后事的信里，她在结尾的地方给我写道，她很平静，很幸福，终于能够安安稳稳地睡去了。但是我确信事实不是这样的。

第二天晚上，接到她的死讯后，我坐飞机去奥地利。飞机里的乘客不多，飞行过程平稳、安静，空气纯净，没有雾，远远的下方断断续续出现城市的灯光。在看报纸、喝啤酒、朝窗外看期间，我慢慢地陷入了一种疲惫的、没有个人成分的舒适状态。是啊，我不断地想，并默默而小心翼翼地重复这想法：**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很好。很好。很好。**整个飞行过程中，我都因为她的自杀而忘我地骄傲。接着，飞机开始下降了，越来越亮。我无法自拔地融化在一种柔软的狂喜中，穿行在空荡荡的机场建筑里。

第二天早上坐火车继续走时，我听到一个女人说话，她是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歌唱老师。她告诉同行的人，这些合唱团的孩子今后长大了如何也同样不独立。她有一个儿子也是童声合唱团的成员。一次在南美巡回演出时，他不但是惟一一个零花钱够用的，甚至还剩了一些钱带回来。至少他有希望成为有出息的人。我没法不听她说话。

有人开车到火车站接我。晚上下过雪，现在万里无云，阳光灿烂，很冷，空气中浮着亮晶晶的霜。多么矛盾，一片快乐、文明的景色，天气让这景色如此像是属于上方永恒的深蓝色宇宙，让人无法想像它会产生什么突然的改变，而我正穿过这片景色，朝着那栋死了人的房子驶去；尸体可能正在其中腐烂！直到到达之前，我都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和征兆，所以看到寒冷的卧室里那僵死的躯体时，依然非常意外。

从四周围来的很多女人并肩坐在排成行的椅子上，喝着别人递过来的葡萄酒。我体味到她们是如何在看到死者时慢慢地开始想到自己。

葬礼那天早晨，我独自在房间里守着尸体待了很久。突然间，个人的感情和流行的守灵习俗达成了一致。那僵死的躯体在我看来显得异常地孤单和渴望爱。接着我又觉得无聊，看了看表，我之前打算至少跟她待一个小时。她眼睛下面的皮肤全是皱纹，脸上有些地方还能看到洒在她身上的圣水。肚子让药片弄得有点鼓。我把放在她胸口的手和远处的一个固定点作比较，想看看她会不会还有呼吸。上嘴唇和鼻子之间完全没有了皱纹。脸变得非常男性化。有时候，我在久久地观察之后，就不再知道自己该作何感想。随后，无聊的感觉无以复加，我只有心不在焉地站在尸体旁边。然而，当那一个钟头过去时，我还是不想出去，依然在房间里跟她在一起。

然后是给她照相。她从哪个角度看起来更漂亮？“死者最美的角度。”

葬礼仪式彻底使她非个性化，让所有的人都松了口气。我们在漫天的雪花中跟在遗体后面。在那些宗教的仪式里，只要加进去她的名字就可以了。“我们的姐妹……”大衣上沾着回头要熨掉的蜡。

雪大得让人无法习惯，我一个劲地望着天，看是不是有变小的迹象。蜡烛一根接一根地熄灭了，不再点燃了。我想起常常读到有人在参加葬礼时会染上后来要了命的病。

公墓的墙外面就是森林。那是一片杉树林，长在陡峭的山丘上。树木长得茂密，连第二排的树都只能看到树梢而已，后面就是树梢连着树梢。雪花飘落，不时刮来阵阵风，但是那些树却纹丝不动。目光从大家正迅速离开的坟墓移到一动不动的树木：我第一次感到大自然真是没有怜悯心。原来就是这样的事实！树林是不言自明。除了不计其数的树梢外，什么都指望不上了。前面是一段喧嚷人群的插曲，他们渐渐地从画面中消失。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嘲弄，完全不知所措。在无能为力的愤怒下，我突然有了想写写母亲的欲望。

回到屋里，我晚上沿着楼梯往上走，突然一步跨了几个台阶，同时孩子气地吃吃笑了起来，发出的声音很陌生，就像是在腹语一样。最后几级台阶我跑了上去。在上面，我兴奋地用拳头敲打着胸膛，拥抱自己。随后我慢慢地，像个拥有了不起秘密的人一样，自信地又走下了楼。

说写作对我有用并不正确。在我写这个故事的几周里，这个故事也不停地让我思考。写作并不像我最初以为的那样，是对自己生活中一个已经完结的阶段的回忆，不过是以语句的形式不断装作回忆的样子而已，这些语句只是宣称保持了距离。我依然会不时在深夜突然醒来，就像从内心深处突然被轻轻地推出睡梦，体验到自己如何在因为恐惧而屏住呼吸的同时，身体一秒钟一秒钟地腐朽。黑暗中的空气凝固不动，让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重心，仿佛拔地而起，只是在没有重心的状态下无声地四处飘动，马上就要从四面八方砸下来，把我憋死。在这种恐惧的狂潮中，人就像腐烂的牲口一样具有磁力。与交织了各种感情的漠然的心满意足迥然不同，不自主地朝你扑来的是漠然而真实的恐惧。

当然，描述只是一个回忆的过程，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无法为下次保留下什么，只是通过尝试尽可能合适而贴切的表达方式，从恐惧的状态中找到些许兴趣，从那恐惧的愉悦中创造出一种回忆的愉悦。

白天，我常常觉得被人盯着。我打开门查看。每一个响动都会马上被我当成是对自己的袭击。

但是在写这个故事时，我偶尔会对所有那些坦率和真诚感到厌恶，渴望不久后能够重新写些可以让自己撒撒谎或是伪装自己的东西，比如话剧。

有一次在切面包时，刀子从我手中滑落，我马上就想到她怎样在早晨给孩子们把面包切成小块泡进热牛奶里。

她常常顺便用唾沫替孩子们快速地清理鼻孔和耳朵。我总是猛地向后一躲，不喜欢唾沫那股味道。

有一次，在一群登山的人中，她想到旁边去方便一下。我为她感到害臊，号啕大哭起来，她最终没有去。

在医院里，她总是跟许多人一起躺在大病房里。是啊，还有那样的病房！她有一次在那儿长久地握住我的手。

每个人都分到了饭，并且吃完以后，她总是装腔作势地把剩下来的果皮塞进嘴里。

（当然，这都是些琐事。但是科学的演绎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会显得像琐碎。所有的表达方式都太过温和。）

餐具柜里鸡蛋利口酒的瓶子！

每天干活，特别是在厨房干活时便想起那些关于她的痛苦回忆。

她生气时不打孩子，顶多是狠狠地捏他们的鼻子。

夜里醒来时走廊里的灯亮着，对死亡的恐惧。

几年前，我曾经计划和所有的家庭成员一起拍一部和他们本人没有任何关系的探险片。

小时候她有夜游症。

起初，每周一到她死的那个日子，我就特别真切地感受到她死亡时的疼痛。每当星期五黄昏降临，天色开始变得昏暗时，就能痛苦地体会到。夜晚的雾气中乡间主干道上黄色的灯光，肮脏的雪和沟渠里发出的臭气，看电视的椅子里交叉的双臂，最后冲一次马桶，冲了两遍。

我写这个故事时，常常觉得写歌曲或许能更贴近那些事件。可爱的新英格兰……

侦探系列剧《警官》里的一个乡村教师说：“也许有新的绝望类型，我们对此依然一无所知，人们也没有意识到。”

在这个地方，所有点唱机里都有一张标题是《**厌世波尔卡**》的唱片。

春天的气息开始露出端倪，泥泞的水洼，温暖的风，没有雪的树，在打字机后面很远的地方。

“她把自己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在一个梦里，她还有另外一张面孔，不过那张面孔也已经非常苍老。

她很随和。

然后又是一些非常快乐的事：我梦到自己看见的尽是些让人看了痛苦不堪的东西。突然有个人走过来，一下将那些东西里的痛苦都揭走了，就像揭走了**过期的布告**。就连这个比喻也是出现在梦里的。

我曾在夏天到过外祖父的房间，朝窗外看去，能看到的东西不多：一条路穿过村庄延伸向前面一座涂成深黄色（“美泉宫色”[17]）

的建筑物——一座曾经的客栈，并在那儿拐弯。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路上**空荡荡的**。我突然为这个房间里居住的人感到一种苦涩，并且苦涩地感觉到他不久后将死去。但是这种苦涩感却因为我知道他的死将是完全自然的死亡而减轻了。

恐惧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心中的对空虚的恐惧[18]。想像只要一形成，就突然意识到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想像的了，于是立刻坠落，就像一个发觉自己早已行走在空气中的卡通人物一样。

今后我会更详细地写这一切。

（1972年）

大黄蜂

聂军　译

你走了还会回来

不会在战争中死去

记忆的开始

那时，我弟弟说，我坐在火炉前，两眼注视着炉火。

他冒着雨，趁天还没亮，从后面来到了小山丘；他没有看路，径直穿过牧场的铁丝网走进田野，铁丝划破了他的脸，他继续往下走过庄稼地。当时那片庄稼地已经休耕了。他走着，脚底沾满了泥和从树上飘落的、已经腐烂的树叶。他就这样一步一步地穿过庄稼地朝家里走去，靠近树林时，他又奔跑起来，跑过草地，穿过小路，一刻也不停步，双脚踩进湿草里，把鞋底左右两边的泥团蹭掉。然后，他顺着墙走到柴堆前，脚踩进柴缝里，一开始猫着腰手忙脚乱，后来稳住劲儿爬上了柴堆，爬的时候就看见了双层玻璃后面的动静。他看见屋里的东西，看见有人坐在那儿，看见一个穿衬衣的人坐在炉火旁，看见我靠里面坐在炉火旁边的床上。

他说，我穿的衬衣被撕开一道道口子，我用力把双肩向前拱着，衬衣上起了细小的皱褶。我隆起背部，凹凸不平的脊梁骨朝两边移动，臂膀上泛着光，皱褶间露出黝黑的皮肤，和浅色衣料搭配起来，在我的背部形成了花斑。我双臂交叉紧贴胸前，人能看见指尖在衬衣上越抠越深。我用力抱住上身，污迹斑斑的指甲盖上泛出了光亮。正像他说的那样，我双臂搂紧上身的时间越长，指尖把皮肤抠得就越深，连同衣服一起，把皮肤摁得贴近肋骨。可是我并没有活动身体，只是低着头，肩头贴近耳朵，半个身子坐在草垫子上，半个身子靠在床沿上，双腿斜蹬在敞开的箱子边上，箱子里面放着一把铁锹和一些碎煤块。我就这样呆呆地望着炉火。

起先，他把我当成了别人。后来，他的眼睛很快扫视到他以前曾和另一个兄弟一块儿睡过的那张床，可是床空着。他久久地望着这张床：在枕垫上隐约有一个头形的凹痕，他说道。但那可能是火的影子迷惑了他，因为火的影子蹿到了墙壁上。

他的目光又折回来，重新望着我。他望着我那不停向前抓衣服的指尖，看见那沾着沥青的指甲。他看见我手的皮肤上的干泥裂开了缝。他转过头，扫视了一下门口。他的目光很快又落到炉火上，注视着炉火，那火苗的缝隙和条纹随着风吹动和停止的不断交替，也摆动着吸气和呼气。他随即收回目光，脸庞紧贴到靠墙边的玻璃上，不过隔着两层窗户，脸触碰玻璃的声音在里面是听不到的。

他一动不动，从屋檐下朝上看，脑袋往脖子里缩。他的手飞快抓住窗户上方的窗棱，靠稳身体，然后跪在柴堆上，斜靠在手指和脸庞碰过的地方，透过雾蒙蒙的玻璃，对着我朝屋里张望。我的脚正好挪开箱子，在空中转了半圈，先被明亮的炉火染得发亮，又黯淡下来，然后在阴暗的屋里又显得发亮。我把脚放回到草垫上，压得草垫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他就这样从侧面朝屋里人的脑袋观望了片刻，因为认识我，所以就认出了我。他的手轻轻离开外窗台，把重量落在脚后跟上，脑袋藏在宽宽的窗框后面。他把手背横搭在额头上，放在额头和玻璃之间，贴着玻璃，望着我。而此时我面朝窗户上方的日历，眼睛却是一副茫然的样子，他从侧面也只能看见我眼皮鼓起的地方。他没有改变两臂的姿势，又看出了我想睡觉的表情。我的手指离开背部，在衬衣上留下了汗迹，两臂交叉着还没有分开，向下滑到肚子上，上身向后摇晃着靠在床头杆上。可是，当我目不转睛盯着那本日历时，我弟弟正用拇指指甲刮着玻璃。

我没有立即朝窗户那边看。当他猫下腰平趴在柴堆上的时候，我正从睡意中醒来，晕乎乎地坐在吱吱作响的草垫上。后来，等到他跪起身来、双手撑在油毡上，我才听见好像有声音从远处传来，听见指甲划玻璃发出的嘎吱声：开始是低沉的、没有回音的声响，是指甲碰玻璃的声音，随后是长长的摩擦玻璃的沙沙声。一个沉重的柜子或箱子在木地板上被拖动。我慢慢地把头转向窗户玻璃，做出张望的样子。这时候，我弟弟正用拳头擦拭他呼到玻璃上的雾气。他一直保持着这个动作。他觉得我好像朝窗户这边看，便也望着我；可是当我吸气时，我的脸绷紧了，倒不是因为我的目光落到了他身上，而是因为

我还一直在听那柜子发出的声音。然后，我那好奇的眼珠子才直直地望着他，心里却还倾听着耳朵里的声音。

我弟弟说，这天早上，我的眼皮眨来眨去的，就像一个盲人一样。

我只感到窗外是黑乎乎的天空，有光亮的部分是杨树林，小山丘在天地相交的地方，山上的庄稼地后面是牧场的栅栏。可是我却没有看见弟弟的脑袋在窗台外面急切地窥探着我的回应。

又过了一阵儿，他讲述道，我起来了。没料想，我没有朝窗户走去，而是走向窗户对面的门：挪柜子的事，只能是屋里的人干的；我觉得那声音好像是从妹妹的屋里传来的。

我似乎会很快地拉开门闩。另一只手抓住门把手，朝走廊把门开了一条缝儿。寂静打破了，传来的是木头沉重的声音和铰链的嘎嘎声。楼梯栏杆上传来铜器的碰击声。门对着栏杆大声地说起话，声音逐渐变小，细声细语；木头与木地板摩擦发出响声；然后一切又恢复了寂静。

我向黑暗处呼喊着一个名字，还没等喊出来，就已经不懂这个名字了。我弟弟听见了一声呼喊，他没有听懂我喊什么，他一边等待回答，一边又在窗户上刮来刮去。他一动不动地待在那儿，一直死死地盯着我。我跨过门槛，走到那冰冷刺骨的水泥地上，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他听不懂的名字。然后我更大声喊着另一个下落不明的兄弟那令人不解的名字，仿佛挪柜子的声音就是他们回家的信号。

他看不见我在走道里踮起脚尖儿走路，沿着墙壁寻找窗口。不过他能看见楼梯下面那只猫卧在锄头和铁锹中间，听见手指刮玻璃的声音后抬起了头，一抬头就醒来了。

我忽然想起来，我没有听到计数器的蜂鸣声。这时我才发觉牛伸长了尾巴，跨过门槛溜进屋里，脑袋连同身体都朝向窗户。现在我想起来了，夜里有轰炸机飞过。

起初，我看见过道里有干泥巴，顺着脚印从门口进来，留在水泥地上的泥巴逐渐减少了。然后，我又看见泥巴还留在先前父亲夜里回

家时跺脚的地方。他在那儿手扶笼头，拿着马灯，徒劳地寻找什么。他穿着靴子踩到那褐色的、边上还闪烁着微光的水滩上，走到我的门前，敲门，吼叫，用力砸门。我拉开门闩后，他径直走进房间，靴子踢到那被一阵风吹得摇摆不定的灯罩底部，才停住脚步。我穿着衬衣站在父亲旁边，他环视整个房间。除了我，他没有看见任何人，这才无可奈何地站在空荡荡的屋当中，手松软无力地提着那盏散发着油味的马灯，目光沉重，久久站在那里。

这时，我看见他靴底粘的泥巴已经变硬了，在那儿留下了清晰的脚印。

那只猫朝着窗户大声尖叫。

那声音吸引着我从过道回到房间。在窗玻璃背后，我看见弟弟的脸。因为我认识他，也就认出了他。

你的皮肤很脏，我说道，是在牧场的铁丝网上弄黑的。每一次，我定神张望的时候，那跳跃的火苗就挡住了你的脸。我一直望着炉火。

当时，雪赶走了雨，屋里逐渐亮堂起来，紧接着就飘来大片的雪花。他不和我打招呼，我也不和他打招呼。不过我们都知道彼此看见了对方。我默默地望着庄稼地前面那颗脑袋。庄稼地距离脑袋很近，仿佛我在透过望远镜看这颗脑袋似的。

他丝毫不改变当时那种神态，那种注视的目光很快落到柴堆上。一开始，他后脑勺那蓬乱的头发竖了起来，还没等他的脸庞从我的视线里消失，头发又恢复了原状。

逃亡

十一月的早晨经常下雪。这件事情的经过大致描述如下：“醒来的人和被叫醒的人都朝外面张望，想根据天的亮度来估摸时间。他看见外面的雪赶走了雨。柴堆上的油毡可能什么地方松脱了，慢慢地从上面滑落下来，被漫天飞舞的雪花埋住了。有些地方还存留些许温热，也许是某个热血动物趴过的地方，落在上面的雪花还在渐渐融

化。雨刚刚才变成了雪。云层阴沉沉地走了形，天空一片单调。你看见这一切了吗？你没有看见吗？风停了，你才什么都听不到了。田野旁的杨树，田野旁的野草，田野旁那野草茎都受到突如其来的大雪侵袭，还有放在那儿的犁铧（当然还可以提到别的农具），似乎还在雨中闪烁着，呼吸着，也被这种场面惊得目瞪口呆。下雪的时候，你看不见云层下面的雪花，只能看见飞舞的雪花飘落到长着结疤的树皮上面，那树皮的结疤随着积雪越发显得黑暗。然后，积雪覆盖了田野，田野上一片松软、万物合一的景象。”你还看见雪花落到孩子那黑色的湿外套上，孩子顺着垄沟朝上，顺着他跑来的路，朝着地平线跑去。他的双臂抬起，离开身体，两只手握成拳头，随着田野的上下起伏也上下摇摆着。他在垄沟里跺跺粘在脚上的泥巴，“最后，你还看见那大雪茫茫无际，飘落到那刚犁过的土地上，直到现在那些土还保存着被雨淋过的颜色。”

这位观望者急忙拉过一条凳子，放到打开的窗户前面，站在上面，一只手向前伸到雪中，眼前一片茫然，各种平面相互交错，弄得他眼花缭乱：天空的白色平面与田野的褐色和黄色平面交叉在一起；田野的白色平面与天空的褐色之间穿插着油毡顶棚的白色平面，油毡顶棚上的积雪由于某个身体的温热才刚刚融化；那被杨树梢刺伤了的油毡棚的白色平面、天空的白色平面、还有田野的白色平面，那刺眼的白色和空荡的平面，还有那割断和切碎大脑的白色和空虚的平面。

隐瞒消息

墙顶上沉重的大梁掉了下来，慢慢地滚动着逼近主人公。此时主人公正带着他的消息走上阶梯。它一步步逼近那面朝它的视网膜，上下晃来晃去。当那钉着钉子的木拖鞋在木阶梯上发出吧嗒吧嗒的拖地声时，他便叉开双腿，手臂也向两边伸开。一开始，我正往楼上走，从下往上看，只看见一个削成垂直的平面，上面钉满了细木条，从天窗透进来的强烈光线照射在上面，椽木的影子也投射到那里，让人从台阶底部看不清大梁上那些翘起的碎木片和无数个黑洞洞的小孔。那些碎片让大梁显得更暗了，许多小黑眼儿周围积聚了一圈木屑。可是后来，当大梁还在摇晃和抖动的时候，这些我原先只是想像的东西就变得清晰了，也可以看见大梁的水平断面没有任何阴影，那些椽木由此斜着通向屋脊。我看见上面的蜘蛛网挂满了尘土和蜷缩成一团干瘪

了的苍蝇躯体。我走过去，从墙砖上拽下蜘蛛网，网丝粘在我的手上。这时，我沿着大梁，带着消息，在楼上屋顶下继续朝前走，进了妹妹的房间。

“她张开手指，立刻遮住那个小圆镜子。但我在壁镜里看见了她的肩膀，她也就藏不住了。”

可是这天早晨，我在房间里没有碰见妹妹。我还隐约记得她的味道，于是便回忆着，嗅着这些味道。我闻到了指甲油的胶味，闻到了那种药水味；她用这种药水把刚涂上的指甲油清洗掉，然后再涂新的指甲油。我闻到那已经放凉的、用来明目的甘菊茶味道，从收藏的空粉盒里散发出来的甜点心味道，用来喷洒房间的香水味道，那种类似柠檬的苹果味，还有战争时期用的肥皂发出的焦油味，那是从衣柜里母亲留下的衣服里发出的味道。

我觉得房间里的东西都没有颜色，都褪色了，这种感觉就像我先前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太阳的感觉，或者像刚刚醒来还分辨不出黑暗与光明那样。不过，我很快就意识到，那是下面房间的炉火，我注视已久的炉火，然后是雪，因为我的目光透过雪，一直目送着匆匆离开的弟弟，结果我现在成了色盲，感到这些无色的东西在愚弄我。我的眼睛受到火焰刺激成了色盲，看不出颜色，而眼前这些东西也许正要把我蒙在鼓里，不让我看到它们坦然地展现在我眼前。如果有人在我身后悄悄把门打开，让屋里亮堂起来，情况更是如此。它们便开始舞弄颜色，也许我身后有人悄声无息地把门打开，光线随之照射进来，它们就会迎合光照，由此相互辉映。

桌子、柜子、衣柜、铺好的床完好无损，整洁有序，显得极不自然。

然而，我没有回头看，而是吸了一口气，想呼喊一声打破沉寂。

这时，我听见从顶楼楼梯传来了她的拖鞋的踢踏声。她去屋顶干什么了？

我快步走出房间。

她停住脚步，透过那高高的拖鞋朝下望着我。我们都立刻垂下目光，默默不语地向下面的楼梯口走去。

她沉默不语，走在前面。我跟在她后面，望着她那咯吱咯吱踮起脚后跟走路的姿势。我竭力回想着走出她房门时忘掉的那些话。

我能阻止她立刻走开吗？能不让她做已经习惯了的事情吗？

她把报纸铺到膝盖下面，蹲下来，身体支撑在脚后跟上。或者她在厨房灶台前保持另外一种姿势，让身体保持平衡，上下摇晃着，点着了火，用手背搓搓眼睛。可是，要是我把消息说出来的话，我就能改变这种自然而然的过程，那一切就都不一样了。可是，在我说出来之前，这些话在我的大脑里早已经分裂成音节和字母，已经无法去把握了。我无法预见，要是我告诉了她，那将会是怎样的情形。我既不能预见她那惊恐的表情，也无法预见她急促询问的声音，更无法预见她可能倒地的动作。这一切我都无法预见、却自以为会出现的情形，最后我强忍住自己，隐瞒了这个消息。

我沉默不语，我妹妹也一声不吭。她抬着脚后跟走下楼梯，我也跟着她走下去。这时，父亲正好穿过那片芦苇地。

抬走淹死的弟弟

当叙事者的父亲穿过那片芦苇地的时候，有三个男人走过大街。他们从社区教堂走出来。第三个人是警察，与另外两人会合在一起。他们朝那座房子走去，在房屋前面的一个猪圈旁和房门台阶上看见了两个困倦不堪的孩子。他们从这儿进了屋，默默地穿过走道，又走进一个房间，坐下来，一个挨着一个靠墙坐着，眼睛充满期待地望着屋门。然而，叙事者的父亲此时正在穿过那片芦苇地，他和政府签了租约，可以占用这片芦苇地。

他走进屋里，自己坐在长凳上，然后那几个外地人也坐到那条长凳上。他收起一条腿，喘着粗气，用皮靴后跟蹭着脚后跟。这时，前面那两个人一副普通百姓的模样，用一辆本地常见的小推车，一前一后，从易伯塞穿过公路朝厄德方向走去。天已经麻麻亮了。其中一人随即叫醒了警察。此时，叙事者的父亲从打谷场走到马厩，手里握着

镰刀，手指在黑暗里摸索着挂在木板墙钉子上那冰凉的外衣和蓝色亚麻裤子。他把裤子扔到马车上，把马从马厩里赶出来套进车辕的时候，第二个人和被叫醒的警察一起回到了教堂前面的空地上。

叙事者的父亲把外衣甩到肩膀上，一次又一次在缰绳前面弯腰屈膝忙活着。缰绳拉着马走过院子的石头路面，马就不听命令拉着车向前走。他从靴筒里抽出鞭子，骂骂咧咧地用鞭杆子敲打着车辕。这时，警察向教堂前面看车的那个人提了一些问题。据第一个人讲，那是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被问的人盘着腿，斜靠在雨棚下面的柱子上，操着一口生硬的方言回答问题，说话的时候姿势一动不动。他的同伴按照警察的吩咐，把口袋从小车上搬下来打开。这时，叙事者的父亲已经把马赶了起来，在靠近下坡的地方拉紧了刹车手柄。被刹住的车轮一蹿一跳地向前打滑，甩了跑在后面猫腰拽着嘎吱作响的手柄的人一脸泥水。后来，车轮被紧紧刹住了，车子还来回晃动着向下滑。他在奔跑中立起身来，把脸上的泥水抹掉，又弯下腰，用力拉住刹车，开始很吃力。他竭尽全身的力气，随后便只是轻松地用手腕操作，让车咯吱咯吱地转向另一个方向，松开的车轮几乎碰到了马屁股。他朝前跑到车的中部，暴躁地猛拽左边的缰绳，车子便朝右拐进了公路。

叙事者的父亲从后面登上正在行驶的车子，侧身朝着行驶方向坐在车帮子上，丝毫不顾及周围的一切。这时，警察在车前说了句认出什么的话，并点了点头。然后，那只口袋又被绑紧了。警察的靴子尖蹭到硬灰岩上，心里想着怎么回事，然后说了一些表态的话。第一个人攀到车辕和车杠中间，胳膊肘一弯，拦住车子，另一个人以为这是上路的信号，也从后面帮了一把。

车轮吱吱咕咕地碾过石头路面，让人耳朵感到嘈杂。这声音随即又传到公路旁一条宽阔的泥泞路面上，并随着车子朝叙事者的父亲也要去的方向越走越远，逐渐变小，最后消失了。叙事者的父亲在去通往池塘的路之前，也朝这个方向走了一段。天空雪花飞舞。他阴郁地蜷缩在车帮子上，靴筒里的鞭杆子在脚踝骨上蹭来蹭去。

故事情节里除了这两个地方以外，也就是父亲驶向池塘，那些男人穿过公路，情节里还有第三个地方，里面描写道，叙事者从宽敞的屋子走到外面，站在台阶上朝下面院子里望去。

他看见妹妹正好穿过院子从前面走过，就一直望着她。她胳膊上挎着一个空篮子，急匆匆地沿着马厩的墙向茅棚走去。她一不小心，头碰到马厩窗户上，猛然一愣，停住脚步，身体也碰到了窗玻璃上。她抬起下巴，愣在那儿。她打量着自己。叙事者望着她。

可是，她还一直站在那儿两眼观望着。叙事者望着她，那三个男人跟着车子穿过马路。这时，叙事者的父亲已经把缰绳捆在前面的树杈上。他把亚麻裤子朝皮靴上拽一拽，把另一条裤子往肚子上紧一紧，穿过芦苇草地朝那棵树的方向走去，解开裤带，把鞭子扔到一边，小便完，用手指系上不同裤子的扣子，然后登上那条摇摇晃晃的小船，离开了河岸。他用船桨顶了一下后面的木桩，随之驶向那片租来的芦苇地。

那三个男人跟着车子穿过马路。这时，叙事者的父亲蹲在船头自己制作的甲板上，膝盖上沾满了黑泥，那是从不严实的甲板缝里冒上来的。他们还一直跟着车子穿过马路，一根芦苇猛地一下打在他脸上。于是他恼怒地咬牙切齿，把天、地和水都咒骂一通，用镰刀把那棵讨厌的芦苇从水里割掉。由于这个动作，身体还向前滑了一下。他站在甲板上，腰部向前摇晃起来。他一边摇晃着，一边把芦苇打起捆，把大麻草（在外地方言中，指一种牲口爱吃的水草）压紧打捆，用粗大的手把水草扎成捆，然后用力拉过来，扔到小船上，接着又扎起一捆，用镰刀刷刷两下把草割断，拖上甲板。他把草捆扔到甲板上，扎起一捆又一捆，都扔到甲板上。当船上那又绿又嫩的草高高地堆在他身后时，他奋力划着船桨向前行驶，继而又反向撑起咯吱直响的桨。船猛然停下来，他的身体向前冲了一下，直起身，又坐回来。接着，他双手握桨，坐在那儿，让桨上的水滴滴答答地掉下去。然后，他膝盖用力，跪在那儿，帽檐上和帽子里都沾着雪，脸上却没有表情，嘴里呼着热气。他又蹲下来，满身雪花，脸色阴沉地靠在草料堆旁。当那些人还一直跟着车穿过马路的时候，他在芦苇丛里歇息。这片芦苇丛空旷似大海，总让叙事者感到眩晕。父亲身边是那些标记清晰、长着棕色粗节的芦苇秆，芦苇后面只有一片空旷的绿色空间，雪花在那儿窸窣地飘落着。

当那些人穿过马路时，叙事者的父亲又掉头穿过了芦苇丛。当其中两人正推车或拉车、他们身边的警察也跑过来时，叙事者的妹妹走过院子，提着一筐喂牲口的土豆。当叙事者默默地从台阶上朝下观望

时，叙事者的父亲望着水波上的水蛭。当那些人推着车子拐向岔道时，这姑娘正在炉火旁给猪做饲料。当她往锅里加土豆时，叙事者的父亲用手在船上的泥里抓水蛭。当父亲松开手指细看那只被捉住的水蛭时，那些人停在岔路口问前面的路怎么走。当警察伸出胳膊指路时，叙事者的父亲从口袋里掏出准备好的盐撒在水蛭身上。当叙事者走下门前台阶向姑娘要一个土豆时，那些人推着车子走上了通往房屋的路。当叙事者的妹妹从热锅里拿出一个土豆扔给叙事者时，父亲在船上拔出了刀。当叙事者把热土豆从一只手滚到另一只手还不断吹着手指时，父亲在船甲板上把水蛭剁碎了。

当叙事者的父亲在他那蓝亚麻裤子上擦刀子时，第一个人看见了雪中那座房子，然后三人相互点头称是，便加快脚步，终于走到院子门口。这时，那女孩在熊熊的火炉旁烧伤了手指。牛棚里的牛也饿得开始叫唤，惹得旁边猪圈里的猪也跟着叫。

当叙事者的父亲把船绳拴在木桩上时，叙事者站在屋前台阶上，望着那辆推车，停止了咀嚼。

当父亲划船穿过芦苇丛时，他儿子——原先躺在推车上，浑身沾满了污泥——扛着一只口袋。尽管口袋里散发着怪味，可是他觉得根本没有味道。

警察的话

这位警察负责在乡下执法；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在这儿就交给了他，他也有意从外表来炫耀这种权力。不论走到哪里，他都穿着那双笨重而结实的皮鞋。倘若身后有不好的预感时，他肩上总披着那件厚厚的棉大衣。他把一只手放在领扣上，举起另一只手示意，就像穿着制服行国礼那样。

可是走了一段长路，那制服就被弄得不成体统了。黑褐色的泥点在浅色大衣上显得更黑，而在深色皮靴上却越发显亮。他穿皮靴走过院子的声音是一种太严肃太正经的声音，是出了名的。可是他走路的时候，这声音似乎令他心烦，因为他为了避免这声音才变换脚步，拖

着鞋底走路，前脚趾连弯都不打一下。可是他的皮靴还一直嘎吱嘎吱地响。

前面那两个人站在院门口，还像是他们刚到的样子。有人在介绍妹妹，看见她无动于衷地弯着腰站在火炉旁，被一个闪着火光的黑圈子包围着。在这个圈子里，围着火炉的地方雪都融化了。水蒸气从火炉缝里、从盛满土豆的桶里、蒸锅里冒出来，把她笼罩在一片雾气当中。

父亲当时不在家，也被介绍了。他当时正把马连同出故障的车朝后面池塘边的树丛用力推着。他把车子推回灌木丛，推不动，又用拳头把马朝前赶。然后连马带车斜在路上，想调过头来。他用一只脚把叉子踩进大麻草堆里，另一只脚和双手把叉把向下压，叉尖向上挑，把那湿淋淋的东西一团一团地从乱草中分离出来，从船上装到车上。

当警察迈着大步朝叙事者走过来时，他默默无声地嚅动着嘴唇，想好了在路上就打算说的话。（有一次，我躺在床上被惊醒了，听见父亲在大卧室里用力抽打母亲。一开始，我能听懂墙后面父母说的一些习以为常的话。尽管弟弟们在我身边乱嚷着笑着，也学着样儿相互厮打起来，我还是听得清那打人的声音。可是后来他越打越厉害，我就不知所措，神情麻木，什么声音都听不见，只能听见我体内的血在咆哮。）

警察问了三次我的名字，我才告诉他。当时我神情呆滞，没有听见他的声音。然后没等问，我就继续说道，我父亲去了池塘，因此不必静静地待着，看着院子：他肯定很快就回来的，我继续说道。也许吧，我又改口说道。热土豆烫坏了我的手。

叙事者的父亲把缰绳捆在横木上，顺着车拉紧绳子，跳上车去。在跳上车的一瞬间，他改变了主意，又跳下车，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过松软的草地，朝那棵树皮上留着洋葱头形状的小便印记的大树走去，捡起忘记的鞭子，深深地插进皮靴筒里，在上车以前，又把鞭子抽出来，等到他叉开两腿坐到草料堆上时，才又把鞭杆插回靴筒里。这时，马已经把他和车从沼泽沟里拉了出来。

离开那儿的人是我妹妹，我激动地说道。警察无力地摇了摇手，向这伙人打了个招呼。虽然他们在院门口推着车子准备动身，但好像

并没有挪动地方，他们的动作反而倒好像在促使大地旋转，推着车子径直朝我走来。他们走得越近，车上的口袋就越是要撞上我那没有自卫能力的眼睛。车子上已经覆盖了一层雪。

各种车辆都依旧行驶在石头路面和木板路上，不同的车轮分别发出嘎吱声和咕隆声。

我父亲用食指和拇指捏着烟斗，另一只手的拇指尖把柔软的烟丝一点一点地塞进去。他俯身向前，像拿着诱饵一样，把点燃了的火柴贴近烟丝，粗大的手握着烟斗，嘴里一个劲儿地把那长长的火苗吸进去。车轮下地面高低不平，车子摇摇晃晃，他蹲在草料上面抽烟，烟向水平方向移动，飘到垂直下落的雪花上。他马上就回来了，我重复说道。这时候，我身后那几个人抬着那遮盖得严实的东西，默默地穿过走廊向屋里走去。

父亲没有随我的意愿，反而勒住了马。他从侧面跳下车，双手伸开搭在大腿上，瞪着眼睛检查后车轮。他双手从灌木丛里折断一根树枝当手杖，捅掉粘在刹车块上的泥巴。

警察并没有让步。他在屋里来回走动时，甚至还强调了他的问题。他为了不让皮靴发出那种咯吱声，就迫使自己停下来。可是当他站在那儿忍受不了自己发问的声音时，就又迫使自己不停地走动，并扯开喉咙，对着那些听他说话的人高声喊叫，夸夸其谈，以此来干扰和盖过皮靴发出的响声。他还随时关注着自己说话的效果，不过他的说话声既不能感动那些背靠墙坐在那儿的人，让他们站起身来，也无法让他们怜悯他，没完没了地说话来支持他。这时，他搓一搓手，张开干燥的拳头，把问题朝我甩了过来，而且还竖起手指来炫耀他的职权：这就是我的兄弟马特，这一点他很熟悉，只是他才知道我的兄弟汉斯仍然没有音信。至于我这个被问的人一天前在什么地方，这与他无关。他的任务是，警察解释道，弄清楚为什么这兄弟俩在外毫无音信竟然没有人告诉他。至于我父亲（或者不管谁负有责任），他像争吵似的从房间最远的角落喊了起来，可对这事儿怎样想怎样看，这一点并不重要，根本不值一提，可以毫无疑问地忽略掉。好像人什么都是不一样的！他径直从口中吼出了最后一句话，此时他也放慢了那不安的脚步，最后突然停止了说话。好像就不能想别的办法了！他又恼火地喊了起来，阴沉着脸面表示不满。好像就没有什么办法了！他又

爆发了出来。他站在窗户旁，刚把这一通怀疑的话发泄到那些无动于衷蹲着的外地人身上，就立刻变得呆滞、沉默，忧心忡忡地注意到自己，一边看着其他打盹儿的人，一边胡乱想着自己的事儿。

这时，父亲低头直愣愣地望着皮靴，咧开嘴，忧郁地往胶皮上吐了一口唾沫。他听着车轮发出低沉的辘辘声。车子咕隆咕隆地从木板路驶上木板桥面。过桥之后，他听到木板在泥沼里发出那熟悉的吧嗒吧嗒和咯咯唧唧的声音，听到链条的哗啦声，听到马肚子里的咕噜声，听到玉米地里的干叶片那熟悉的窸窣声。他赶着车上坡。斜坡让他的身体向后仰起来，靠在那扎在草料堆里的叉把上。他摇晃着，身体前屈在膝盖上，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他展开双臂横扶住车两边的侧栏，手指紧抓侧栏的横木。马每走一步都要仰一下头。我父亲站起身来，从车的一侧跳了下去。他一瘸一拐地赶到马前，拽一拽缰绳，又继续往坡上走。由于重物的后坠，马把头仰得高高的，停在那儿望着前方，露出黄黄的、滴着黏液的牙齿，两条腿蹦着跳着，仿佛它要仰着脑袋坐下去。然后，那嘎吱嘎吱摇摇晃晃的车拖着它向后面滑动。尽管他立刻跪下身去，手拽住皮带用力拉车，可是那车还是连马带人向后滑去。他粗暴地抓住马鬃，拳头变成了粗大的爪子。我看见他们又到了坡下面。灵活的前轴把车拐进了田地里。他直挺着身子，从马身旁绕过去，大步走过田地，返回到圆木旁。那该死的刹车器和手柄就固定在这圆木上。他弯下腰，叉开两腿，合拢双手放在圆木下面。他做好这种准备的姿势，想着办法，又站起身，想别的办法。他一个箭步冲到狂躁的马身旁，用力拉住马笼头，把马驯服了。他用手掌轻轻地拍着马脖子，捋一捋鬃毛，然后猛拉缰绳，策马把车从田地里拉出来。不过，他的胳膊并没有松弛无力地垂落下来，而是停在他那朝路上用力向前弯曲的身体和拉紧的缰绳中间。于是，我父亲顶着风雪，吃力地向前迈着步子，脸、胸脯和用力的膝盖几乎水平地伏在地面上。他牵着马，拉着滑溜溜的车子，也拖着属于自己的身体，不停地骂着粗野的话，即使气喘吁吁也还是不停嘴，使劲把车子拉到救命的大道上。然后，父亲停下来，回头看了看那条路，一副恼怒的样子。他的目光落在烟斗上，那烟斗是他刚才用力迈步时从衣兜里抖落下来的。他松手放开缰绳，用皮靴在两脚之间倒弄起一块石头，将它顶到前轮后面。他攥起左手塞进裤兜里，伸开右手去拿烟斗，曲着双腿走到斜坡上，然后逐渐远去，身影逐渐缩小，最后由下而上，直到地平线下，消失在我那目不转睛的心灵视野里。然而，在他完全消失之前，马发出喘气声，车轮碾过石头发出咯吱声，他又现

出了身影。他的手指向空中去摸烟斗，身体用力向前去抓缰绳，也抓着马鬃，烦躁地用皮靴踢着地面，然后又松开缰绳和马鬃。由于车子打转，他自己先迷失了方向，又在大地的吸引力下随着马车慢腾腾地走了下去。那牲畜嘶叫着，马蹄下迸发出的火星宛如一个大铁环，随后便消失了。

这期间，警察竖起耳朵，听其中一个男子诉说是什么事让他们到这儿来的。这人背靠墙，头也不离开墙，每说一句话都要把脑袋转向身边那个坐在长凳上的人，然后又转向他的伙伴。其实这两人都是目击证人，本来也都知道实情。他操着一口含混不清的外乡口音和同伴说话，声音嘶哑，还一边咳嗽着，让声音从喉咙里咕哝出来。他还挥动着胳膊向警察演示他们俩当时在干什么。他说，他们事先毫无预感，干完活就一起上路了。他脸上露出愉快的神情，向警察证明他们当时的高兴劲儿，还有一路上那明媚的阳光。接着，叙述者的表情受到什么触动，满脸恐惧地睁大了眼睛。然后他一脸悲苦，喘着粗气，不停地喊着说着，他的同伴也叫喊着认同他的话。最后，他和同伴都因为看到了当时的情形，惊恐地把双手贴在额前。他并不想掩饰什么，警察在火炉边说话了，打断了他们的哀诉。可是，这世道让人无可奈何，作为个人也同样，只能纠缠在某些想法里，他没好气地盖过他们的声音，那些想法和所有东西一样，都有不好的一面，也就是说，他把那断断续续的词句整理到一块儿，无论好歹，人都会被搞得晕头转向的！说完这些话，他毫不耐烦地望着这些沉默的人，致使他们心里那些不祥的念头溜到嘴边又灰溜溜地退了回去。事情总是一个接一个的嘛，警察以安慰的口气结束了他的话。

父亲跪在田地里，一条腿在犁沟里，用肩膀撑着翻倒的车。从大路上看去，在厚厚的积雪里，他动作显得迟缓无力。当他顶着车一侧把车帮子从地里往上拖时，膝盖因用力咯吱作响，悬在空中的另一侧又摇摇晃晃落了地。他重新把车调整好，上归上，下归下。他斜着放好木板，靠在车横杠上后面，就把草料扔上了车。他把叉尖插了进去，在大道上都能听见草茎的碎裂声。他撩起掉落下来的草料塞到车上，再用叉子固定好。他面部肌肉抽搐，脸被划破了，嘴里露出一排明亮的牙齿。这时，妹妹正迈着轻柔的脚步朝他走去，所以什么都听得见。她听得见他骂人的声音。

也许马出了什么事，我说道。

突然，父亲吼叫了起来。

怎么啦？警察问道。

没什么。我说着，就把注意力转移到那几个争相诉说的男子那儿。于是，警察就寻思着自己的事情。

我父亲趴在车上，用拳头把草料砸碎。当妹妹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大声怒吼，来回翻腾起草料来。

她可是在大路上碰到他的，我妹妹说道。她看见他跑过来时，他根本就没有停车。后来她一步一步紧追不舍，从后面攀上跑动的车子。这时，他才拉着缰绳，让马放慢脚步，不再狂奔了。然后，当她爬上草料堆靠近他时，他才慢慢地把头转过来，下巴压在肩膀上望着她。她就这样在他身后，为了不溜下车去，双手紧紧地抓住咔嚓咔嚓作响的草秆，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这一次他停了车。几天前有一次，他后来说道，他喝醉了酒，躺在口袋下面，看见了他的儿子，当时头发还湿漉漉的，和兄弟们一起跪在阳台上；他们一个紧挨着一个，每个人都准备好姿势，估计好路线，透过雕花栏杆往院子里撒尿。谁尿得最远，就算赢家。现在，他脸上黯淡无光，显出失去生命的征兆，鼻孔与上唇之间那条垂直的深槽绷得紧紧的，就像一头被捅死的猪那样，凹陷的嘴上的皮肤和肉被完全拉平了，牙齿露了出来。这就是我们三人当中的赢家。

我父亲就这样静静地坐在那里，直到她在他身边坐下，我妹妹说道。然后他拉起缰绳，又赶车上路了。

声音

炽热的风卷着灰尘吹进了窗户。我听见窗帘的声音。我听见沙粒敲打玻璃的声音。我听见敞开着的衣柜的声音。我听见树上那湿淋淋的叶子的声音。我听见自行车挡泥板的声音。我听见白杨树间电线的声音。我听见挂在谷仓墙上的轮胎的声音。我听见挂在铁丝上的湿衣服的声音。我听见仓库门碰到柴垛的声音。我听见一列正在行驶的火车的声音。

“据说我当时坐在火炉前，呆呆地注视着炉火。”

妹妹的叙述

我妹妹注意到一只掉了翅膀的飞虫，呆呆地注视着敞开的衣柜。

晚上，她在楼下把饭端上桌以后，就经常上楼到她的房间，坐在两面镜子前面。如果楼下有人需要她，就会喊她下来。

当时，她正心不在焉地从近处看着手中的飞虫背上驮着一个黑色的圆壳。她用双手的前两个指头细心地拨开飞虫的两对翅膀，用四个指头把两对翅膀拽出来，然后分开。这飞虫上下各有两个小翅膀和两个大翅膀。她松开一侧的一对翅膀，飞虫便扑腾着落到别的手指上。她闻了闻手上的灰尘，弯着腰，还是那么贴近地瞅着两个相邻的圆球，那是飞虫的脑袋，还瞅着脑袋中间的黑点。她用两个指甲掐掉飞虫的两瓣脑袋，然后又把飞虫夹在指缝中。

这就是她注视着飞虫翅膀掉落时朝衣柜里观望的那一刻。她把飞虫扔掉了。她穿着崭新的黑衣服靠在椅背上，目光呆滞地停留在衣柜里那不可思议的黑暗之中。她坐在刺眼的电灯下面，下午又来电了（轰炸机没有再来），望着那一堆一动不动挂在衣柜里的衣服发呆，也望着衣服后面那神秘的黑暗，似乎那神秘的黑暗在她眼前永远不会消失。那没有尽头的深处令她双眼迷茫，神情沉重。她开始感到眼睛刺痛，于是便快速地、像发誓要放弃什么一样，从嘴里说出一个字。终于，那些衣物的图像和衣物后面的空间与她所知道的名称相吻合，因为她认识这些东西，于是就念叨着它们叫什么。大衣、熨斗、飞蛾和灰尘。当她被自己发出的声音而惊动，眼睛环顾四周时，嘴里还继续念叨着：窗户、墙壁、门、门把手、火炉、炉条、火焰。五斗橱、镜子、床、镜子。指印。手的指印。手在镜子上留下的指印。她笑了起来，望着自己的笑脸。雪、石头、水。冰、指甲、木板。水、口袋、沙子。她站起身来，穿着母亲那件华丽的衣服向窗户走去。这时，她听见牛棚里传来乱糟糟的声音，伴随着她不慌不忙的脚步。那是链条生硬的碰撞声和牛嘴里嚼草料的咔嚓声。她急忙转身往回走，

刚迈出脚步，就滑倒在大镜子前，跪在了地上。这时，她还听见楼下房间里咕咕哝哝含混不清的祷告声。她站起身来，走到衣柜前面，关上衣柜门，遮住那漆黑的洞穴。然后，她走到挂在墙上的那面旧镜子前，转过身，慢慢地把头朝后仰起。她一边向后仰起头，一边返回来斜着眼睛望着镜子。忽然，她张大嘴巴，下巴垂了下来，鼻子与嘴唇之间的皱纹开始变得平展了。

然而，就在这时，她没有看见什么，又向前弯下身子，眼睛不离开镜子，退到椅子那儿，拿起第二面镜子。她又走向墙上那面镜子。她举起第二面镜子。她转过脸，手拿着第二面镜子照着自己，慢慢地合上眼皮，却看见墙上镜子里自己的侧影。她又张大嘴巴。她望着镜子里那张开的嘴巴和鼻子与上唇之间平展开来的隆起皮肤：这儿以前是一条有缺口的竖直槽纹。她望着夹在镜子里的照片，那是她曾经为她哥哥拍摄的。她现在能模仿那淹死的哥哥了。

她走近照片，脸贴得很近，她的呼吸给玻璃蒙上了一层湿气。她一边用手抹掉湿气，一边好奇地望着那张大脸上不断显现出来的痛苦和哀怨。桌子。窗户。椅子。窗户、桌子、椅子。椅子桌子窗户。窗户；窗户；窗户！

溺水的故事

我在讲述。

我是三兄弟中的老大。我们作为父母的儿子，能回想起我们的母亲是一个善良本分的女人。

那时候，我们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们走在一条小溪沿岸的道上。有些日子，我们也在公路上搭乘拉牛奶的便车。后来就习以为常了，司机只要看见我们走来或者站着时，就自己停下车来，等我们从后面踩着车轮翻过护栏爬上车，挤到牛奶罐中间在书包上坐定以后，他才开车走。可是，当我们常常从家里赶到公路上时，车已经开走了。然后我们就抄近路，从大路上下去拐进一条峡谷里，顺着小溪走去。

学校在一个叫易伯塞的地方。更近一点的地方叫厄德，那儿的学校一年前被一场大火烧毁了。因此，厄德享受义务教育的孩子们就必

须到易伯塞去上学。后来，由于战争也波及到了易伯塞的学校，易伯塞和厄德享受义务教育的孩子们就不得不去一个叫安赫的地方上学。安赫这个地方曾经通过了《城市法》，算是一座城市，在易伯塞和厄德以南好远的地方。这些地方相隔的距离和它们的地理环境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再后来，在那敌对僵持的日子结束前不久，厄德那座还俗的修道院被强制腾出了一些房间，这地方享受义务教育的孩子们就去修道院里上学，而易伯塞享受义务教育者的监护人则可以选择把孩子送到北面距公路好远的厄德去上学，或者也可以送到安赫的学校。这地方朝南挨着一条柏油马路，人可以算出距离来。在那动荡的年代，没有人知道明天将会怎样，所以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厄德。这地方没有城市法，更谈不上在本地建几座有威胁的军营成为空袭瞄准的目标了。的确，这地方甚至都没有定期开放集市的权力。

关于上学的路，有三句话成了口头禅：我去修道院。我去易伯塞。我去下面爬一座山。

我又开始讲述。

我们常常沿着一条小溪去上学。可是有一天，在十一月份，我弟弟独自走了。当时学校在易伯塞。可他们并没有去这个地方，而是先待在湖水边，折断芦苇秆儿，轰赶那些野鸡、野鸭和其他猎物。然后，他们在两地之间的田地里把腐烂的南瓜都捣碎，带着偷来的萝卜，跑过田地溜走了。

也许可以这样接着叙述，最后大约傍晚时分，天还没有下雨，他们从玉米地里出来的时候让人看见了。他们顺着斜坡往上走，来到公路上，然后相隔一段距离（有扔石头的距离那么远）坐在路边石头上，啃着偷来的萝卜。

这一切都只是例子。

如果我这样来叙述的话，也算是一个例子：他们是被一辆小车里的人看见的，这辆小车正在从厄德疾驶向易伯塞。有人在行驶中，如果这样叙述的话，那么情形如下，看见他们从玉米地里跑出来，停住脚步，正大口喘气，忽然听到一种吓人的轰隆声。然而，有人这样看见他们，也只是一架照相机咔嚓拍照的一瞬间。因为他们一听见那越来越大的声音时，就立刻钻进玉米地里，双手护着脑袋，而这轰隆声

从地平线上冲过来，渐渐平静地和汽车的声音凝固在一起；轮胎咔嚓噼啪地把碎石子从公路上抛向广阔的田野。这时，他们抬起头，透过光秃秃的玉米秆，看见那汽车轮子从碎石子上卷起的灰尘。那轰隆声减弱消失了以后，他们听到飞驰的汽车里不停地传来狗叫声。

当这辆汽车从易伯塞疾驰返回厄德时，他们已经穿过灰蒙蒙的草地，放心地走上了大路。他们相离好几十米远，静静地坐在路边的石沿儿上。他们都一样向前弯着腰，使劲儿抓住萝卜 ，一只手在张开的、一侧还嚼着东西的嘴下面，用小刀切下小薄片，用刀尖扎着送到嘴唇边，只需要张开嘴就能吃到东西。当弟弟们第二次听到那轰炸机一样的声音时，就朝那儿望着发愣，一双呆呆的眼睛就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样。嘴里还没有咽下去的东西在脸庞后笨拙地堆积着、蠕动着。这一次，他们感到那汽车从天空的另一边飞驰而过。他们用力屏住呼吸，脸色憋得涨红。

不过，还是有人从车里看见他们又在使劲儿嚼东西。有人说，他们吃得津津有味，没有注意到汽车。他们也没有注意到那条狗在车里尖叫。现在下雨了。弟弟们为躲雨把书包放到膝盖上，其中一人把手绢盖到头上。他站起身来，有人这样讲述，在起身时抓住从膝盖上滑落的书包，摇了摇头，抓起飘落的湿手绢，随手就塞进裤兜里。他后来不停地动来动去，此时飞驰的汽车渐渐远去，消失在大路和田野中。透过后窗户落满雨水的玻璃望去，似乎大路上和田野里都沸腾起来了。而大路和田野似乎把我的弟弟们所在的洼地拖向天边，然后填平洼地，与田野融合到一起。

我在讲述。

我急着要继续讲述。

十一月的一天，有这样的说法，我的弟弟们坐在厄德和易伯塞之间公路边的石沿儿上。

现在，我要间接地结束故事。

他们在石沿儿上坐了坐，就继续走他们的路。他们继续走，回到大路上，拐到一条岔路上，还是继续走，又到了一条岔路上，还是继续走。然后，他们在这条岔路上顺着溪流向上，走进一条峡谷。他们

顺着峡谷往前走，来到一座桥跟前。这座桥通往一条岔道。这时，他们就不再往前走了。有些日子是这样的：他们在这条岔道上继续前行，就又到了厄德和北面莱亭之间的公路上。然后，他们在公路上又继续往前走，来到一条岔道上，再继续往前走，就到了一座房子跟前。他们穿过房廊，就到了我现在躺着的这间屋子。可是，他们当时在桥边差点儿就不往前走了，而是停在那儿聊天。然后，他们转身返回峡谷。他们当时还是两个人。

太胆小了，一个说道。你自己也很胆小，另一个说：这算是他们谈话的一个例子。后来，他们站在峡谷里说着话，还大声叫喊，打着手势。

你不敢跳啊。（一个太胆小，不敢跳。）

把藤条给我。（他让另一个在河边给他折一根藤条。）

胆小鬼。（一个又受到挑逗。）

藤条。（另一个不愿意为说话浪费时间。）

汉斯把藤条递给马特。马特借助藤条又回到岩石这边。两边岩壁之间流淌着一条溪，形成了一道峡谷。

我先来，然后你再来。（一个跳过去之后再让另一个跳。）

行。（他同意了。）

这个拿藤条的扬起下巴，望着对岸。（这一点让人猜测，他还是犹豫不决。）

你胆小。（另一个又得意地炫耀起来。）

不是。（指责被驳回。）

你就是胆小。（巧妙地重复指责。）

突然，他跑动起来。当他跳离岩石时，汉斯听到他的鞋发出了嚓嚓声。马特高高地越过小溪，跌倒在对岸的草地上，跪在那里。在他

跳起的瞬间，汉斯抓住了挥动的藤条。马特舔了舔指头，用唾沫擦掉膝盖上的草印。

我讲完了。

据说，汉斯把藤条扔给了马特。马特抓起藤条退到岩石边，就跑动起来。汉斯朝他大喊，他也不答应。当他跃起时，那股劲儿把藤条从树上拽了下来。

声音的名字

风中窗帘的声音被称为飘动。这声音也可以和火炉中炭火苗呼呼的晃动声相比拟。如果窗帘布料比较硬的话，那么它在风中飘动的声音被说成是哗啦啦。这种说法也可以用来表示旗帜的飘动。风吹沙粒打到玻璃上的声音被称作嚓嚓声，这也可以和雨水滴在铁皮屋顶上细小的噼啪声相比拟。雨水滴在铁皮屋顶上发出更重一点儿的噼啪声被称为敲打声。衣柜门被风吹开的声音被称为嘎吱声。白杨树在风中的声音可以和潺潺流水声相比拟。铁轮箍被风从仓库墙上刮下来滚落到院子里的声音被说成是当啷声。风吹湿漉漉的草地的声音被说成是嘶嘶声，通常也可以和燃烧的木头浸入水中发出的声音相比拟。如果草茎干枯了，那么风吹草茎的声音被说成是簌簌响。自行车松动的挡泥板的声音被称为啪嗒声。拉紧的铁丝在风中的声音被称为唧唧声。挂在铁丝上的湿衬衣的声音被说成是噼啪声，风吹衬衣的噼啪声常常可以和低沉的振翅声相比拟。远远一大群小鸟那无法分辨的振翅声被称为呼呼声。院子那边的柴房门碰到木板堆的声音被称为爆裂声；可是，如果两者之一，或者木板，或者门的木条，受潮腐朽了，那么门在风中碰撞木板堆的声音被称为噼啪声。自行车（不摔倒的话）的声音被说成是沙沙声。自行车辐条旋转的声音被称为嗡嗡声。车梁碰石头的声音是短促清脆的咔嚓声。

马眼睛上的虫子

有这样的描述：父亲常常在天麻麻亮时就把马套在车上。他弯下腰，扳着生硬弯曲的马前腿，顶在马蹄上方的蹄冠和膝盖中间，好让

这条前腿和其他腿协调一致地套进车辕里。这样，马就随着这条服从命令的腿温顺地进入车辕中间，同时两个后蹄蹬出来。我还记得，他走回去，肩膀和头部用力顶在马身上，一边用嘴发出简短而粗鲁的命令，一边用他宽大的手掌在马的臀部猛拍几下。马腿在车前移动起来，迈出缓慢的步子，那毛皮上就出现长长的皱纹。当马交换步伐、另一条腿向前迈出时，那毛皮上长长的皱纹就又消失，变平展了。我还记得，他的手拍在马身上，然后握起拳头，用头顶在汗水流淌的马肚子上，然后马温顺地抬起蹄子，扭来扭去，但很顺从地退到车辕里。他不喊叫了，攥紧的手指也松开了，并从石头上拿起帽子。接下来就是一些习惯动作：他把帽子扣到头上，又向前走去，围着马儿走来走去，来来回回把车辕两端塞进挽具的环扣里，把挽具的绳索缠在车辕顶端，然后扎结实。他用胳膊肘抹一抹汗淋淋的脸，然后“就像抹去刀刃上的污垢一样”，把落在胸前衬衣上的汗珠擦掉。不过这些都属于另外一段情节，其中这样描述道，在从水塘返回的路上，车拉着割来的草料侧翻了。由于这场事故，车辕从扣结上脱落了，车倒在地边的一大堆石头上，他就用肩膀把车轮子顶回来，第二次把马套在车辕上。可是随后，他擦去脸上的汗水，又发现了手背和衣袖上有虫子尸体留下的斑点（我夏天在乡下骑自行车的时候，也经常发现脸上有这些斑点。我用手把虫子一个挨一个地放到一张空白的笔记本纸上，然后，它们在这张纸上就成了语句的标点符号。那些语句是我按照父亲的旨 意写下的一些打算）。

“虫子死了。”他先把手上的虫子抹掉，然后转动手关节，把衣袖上的虫子也抹掉了。“他收拾好了之后，太阳就出来了。伴随着日出，昏暗的光线里吹来了燥热的风。那昏暗的光线既不是日光也不是朦胧的曙光，此时人的一切活动都显得迟钝麻木、缺少活力。热风拽着大地上万物的长长影子，侵蚀着他布满皱纹的脸。”他正用指尖刮掉衬衣上剩下的虫子，并没有抬头顾及这些。当他用另一只手去抓缰绳时，又发现裤子上也有模糊不清的黑斑点：虫子的翅膀完好无损，直直地伸展着。他弯曲食指掏出手绢，擦掉裤子上的小斑点，然后抖了抖手绢。他相信已经把飞虫全抖掉了。后来到上午，他把手绢平铺在教堂的石地板上。吃圣餐时，他为了让裤子不打褶就挽起了裤脚，一条腿跪在那还沾着虫子的手绢上。

不过，情节还没有描写到这儿。描写中没有提到他站在马前面的情形。日出的时候，他看见比较大的虫子“像聚在粪便上一样，聚集

在马睁开的、湿漉漉的眼睛上。它们紧紧地挤在一起吮吸着，几乎无法活动了，所以，马眨眼睛的时候，大部分虫子还是一动不动地趴在眼圈儿上，似乎成了眼睛的一部分。少数飞起来的虫子立刻又回到虫堆里，在近处爬来爬去寻找着什么。另一群虫子围挤在马的鼻孔周围。还有马肚子上和尾巴下面有汗迹的地方都爬满了小飞虫。”他看见那只牛虻的翅膀两侧挤满了小飞虫，几乎成了一只独眼。它那灰色的躯体被描写得又细长，又平展。那是一种较小的虫类，单独飞起来几乎没有声音，只有当它蜇到人背部皮肤时才能被感觉到。它从马耳朵下面那粗糙的笼头横带开始，挤过虫子堆，爬到眼睛边上，却看不见它的腿在爬行。它爬在上眼皮那些鳞片似的虫子中间。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他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已经显现出老人的灰暗之光。“风吹着，马臀部的毛竖直了，石缝中的草茎竖直了，石缝中草茎的影子竖直了，额头上头发的影子也竖直了；那竖直的鬃毛和石缝中竖直的飞廉草影子成了风影。不过，车上的湿草料、草料上的叉子、车本身、马和这个人等等有重量的东西还依然不动。”可是，当马甩开脖子、毫不在乎颈圈和车辕的累赘一跃而起时，那些有重量的东西和它们在田边相互交织的影子就猛然动了起来。他拉着缰绳把马往前赶，马就猛地把车向前拉，虫子立刻飞了起来，然后又快速围攻裸露的眼睛；车板上草料抖动起来，叉子开始摇晃，车轮压着车辙滚向田地，虫子又围挤在马眼睛上。“那只牛虻趴在马眼皮底下，蜇了一下以后，便斜起那宽扁的身体离开马眼睛，变得很醒目。”当我现在回想起马旁边这个人的情形时，当我听到院子里传来自行车倒地的声音和所有别的声音时，当我在床底下摸鞋子时，我同时也就想起了那只牛虻的嗡嗡声。那是一只巨大的牛虻，马是另一匹马，仰着头，似乎在倾听那只牛虻的声音。我想起那嗡嗡声临近时变成了轰隆隆的嘎哒声，戛然而止了。同时我还想起那匹马套在装载着成捆草料的车上，被牛虻攻击之前，叉开腿，甩着尾巴拍打着两肋腹部。当我现在站在这儿时，当我走向那敞开的衣柜时，我就想起了汉斯从田地里拔出那根笔直的草茎的情形，想起那只牛虻使劲地往皮毛里钻，而马突然停止了反抗，只能笨拙地用头在空中划来划去的情形。那马从脖子起全身都显得僵直。汉斯轻松地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牛虻，拽住头部，把它从马肚子上拿开了。当我从这儿的衣柜里挑选过节穿的衣服时，就回想起弟弟用另一个拇指和食指捏着从田地里拔出来的草茎的尖头，扎进牛虻那肥厚笨拙的屁股里。他用翘起来的硬刺一点一点地戳进牛虻的身体，牛虻也翘起身体，蜷缩着进行抵抗。他继续往里扎去，那牛虻便放弃抵抗了。我回想起，后来我们弟兄三人光脚丫儿站在麦茬地

里，三个人用六只眼睛看着那只牛虻。它样子恶狠狠的，拖着那根假刺趴在我的手上，我们异口同声，吹口哨，呼喊着，想让它飞起来。我用手指继续把刺往里捅，于是它开始用力，飞过我们头顶。它发出嗡嗡的声音，向空中飞去，最后我们手抓不着，脚够不着，眼睛也看不见了。在一个夏季的某一天，阳光明媚，今天也阳光明媚，在一个夏日，当时是个星期天，现在也是星期天，我醒得过早，就半醒半睡地躺着，时而又睡着了。在睡着之前，我听见院子里传来刮风的声音。这声音令我感到奇怪，我就一边想着，思索着。当时我在睡觉，似睡非睡，后来也就没有醒来。当时我忽然想起，屋后那电网线的呼呼声消失了。那呼呼声消失了，它的消失令我想起了弟弟，他已经不在这儿了，他当下就不在这儿了，不在这屋里，不在这个地方，不在这个地区了。在一个夏日的早晨，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我把双手浸泡在那暖融融的、经过夜里雷雨而变得发黄的水中，指甲木然地碰到盆底上。

谁也没有从镜子里看见过盲人的脸。

苏醒

我弟弟说，苏醒和睡足之间的时间，两段脉搏间隔的时间，从睡觉人睡眠后由于脉搏跳动而清醒过来，到睡觉人的感官由于脉搏跳动而又恢复知觉，于是又能听、能闻、能品尝味道，这段时间里，人的意识是没有抵抗能力的，是空白的。由于睡觉人还没有知觉，他就无法抵御和摆脱产生的想法。相反，在他睡足的情况下，他会平静地与这些想法达成一致，不是靠吃顿饭就把它们打发掉，靠美味的饮料把它们淹没，靠触摸的手指头使它们变得迟钝麻木，靠说话让它们沉默下去，靠声音来限制它们，就是靠某种感官刺激削弱它们。相反，他以教导的口气对我说，从苏醒到睡觉人恢复知觉的这段间隔，是醒来人困惑的时间，恶劣的时间，他感到羞耻而蜷缩着身体忏悔的时间，出汗的时间，他说道，是明白事理的时间，头脑清醒的时间，冰期的时间，战争的时间，他说道，不合适的时间。

虽然我的身体由于睡了觉还瘫软，可是我已经感觉到双手在床边耷拉着。当我弯曲手指、用指尖摩挲手掌肌肉的时候，我觉得摸到了上面的干泥巴。我没有感觉到手掌和指尖的皮肤，可是我凭经验就能断定我摸到的是什么和我用什么去摸了。那皮肤发出沙沙声，就像一张经过日晒干得发脆的纸一样。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夜里下了雨，等到白天，我都能从手上看出下雨的迹象：那干瘪的皮肤和胳膊的皮肤完全两样，就像涂了一层泥一样。有一次，我睡觉的时候，指头上沾满了干泥。那是因为我前一天晚上在沙坑里寻找东西把沙子铲成一堆，天一下雨，沙堆又垮了下来。我回到家没有洗手。我钻进被窝想睡觉，想尽快入睡。那情形就像父亲晚上在外没有回家的时候一样：我们都躺在被窝里，想办法尽快入睡。每当我们早上去看他时，他就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身上散发着臭味。当时有很多催眠的办法，比如经常提到的数数。可是有些夜里，我总是在不停地胡思乱想，等停下来才发现，我在胡思乱想的同时竟然还一直不知不觉地在数数。所以我就躺着，屏住呼吸，极力把大脑里胡思乱想的东西驱逐出去。可是，它们有时穿过夜空又从四面八方溜进来。于是，我就摆脱一种想法去跟踪我不愿意想的其他东西。正当我要进入这个思路时，被我摆脱的那个想法又涌现出来，占据了我的大脑。或者，我均匀呼吸，让气在喉部、胸脯和肚子里变成一个弹簧，把我弹来弹去，后来一吸气，就把不好的想法吸了进来。或者，我呼吸的时候，把知觉集中到呼吸本身，吸气和呼气，然后我就只想这一件事。后来呼吸和知觉胡乱搅在一起，令我头脑发涨。可是，当我还没等到呼吸困难就有意要呼吸时，然后，当我顺从身体按照自身的规律不带任何意愿呼吸起伏时，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因为这样，呼吸就和凹陷的肚子保持一致，我除了听见耳道里那种呼呼声以外什么也听不见了。那呼呼声令我脑袋发涨，折磨得我又不得不急于吸气了。然后我就摸黑穿过走廊进到厨房，摸黑打开橱柜的门，伸手去摸面包和刀子。我又躺回床上，吃着面包，就不那么困倦了。我可以伸展四肢，一边嚼着，一边不停地把面包塞进嘴里，并且伴随着面包，把一些胡思乱想也嚼进了睡梦之中。可是每当我醒来时，那些胡思乱想又回到舌头上那黏稠的唾沫里和那块剩下的——我记起来——紧紧攥在手里的面包中。我一动不动。我明白舌头上的滋味，也明白手上沾满沙子，指头一搓皮肤就沙沙作响，好像外面下起了雨。我忽然想起，有一次，我睡觉的时候，手指上沾满了干泥，后来我挪动身体时，大脑想起了耳朵早已听见的声音，想起了喉咙里的煤炭味，还想起了那烧红的炭火苗窜动着映照

在黑暗的墙上非常显眼。而我当时躺着，还处在知觉苏醒和感官苏醒之间那短暂的时间里，处在毫无抵御的胡思乱想之中。

据说，我后来坐在火炉前，呆呆地注视着炉火。

自行车

“这是几天前的事了。”

这是几天前的事了。当时我从操场旁边走过，听见孩子们的叫喊声。我停下来，听到他们朝这边跑过来。我听到他们把球传来传去，渐渐停止了喊叫，开始乱糟糟地说着话，声音越来越大，拖着腔调，脚步慢了下来，语速也慢了下来。我站在那里，听他们在说什么，我听见他们议论纷纷，说过的话又继续说，我听见他们在不停地谈论着一辆自行车，听见有人边说边问道，这辆自行车是否是我的，然后我听见另一个人也说了同样的话，然后又听见第三个人也说了同样的话：这辆自行车是不是我的。

哪辆车？我说道。

电影院门口那辆，我听见一个孩子说道。

我怎么会有一辆车子呢？我说道。

可能是我昨天放在那儿的，我听见另一个孩子说道。什么时候？我说道。

下午，我又听见一个孩子说道。

下午什么时候？我说道。

我听见一个孩子说了一个时间。

当时我在家呀，我说道。

我当时就在那儿，我听见另一个孩子说道。

我在那儿可没有什么事呀，我说道。

我也没有什么事，我又听见另一位说道。

我在这儿也没有什么事，我说道。

我在这儿也许有事，我听见一位说道。

决不会，我说道，我有其他事要做，不会去那里的。

我的表情证明了我说的是谎话，我听见另一位说道。

那好，我说道，正如你们说的那样，我去过那地方，还推了一辆自行车。

我是推着车从他们旁边走过的，我听见一位说道。

对，我说道，你们看见我在提到的那个时间推着一辆自行车去过那地方，这也许是事实，我相信你们。我把大衣挂在车把上，推着车子去了那地方，一只手扶住车座，另一只手抓着车把。那儿的房屋紧挨在一起，没有墙缝，房屋的墙给我指示了方向。你们站在窗前，也许你们还拿来椅子，大点儿的孩子站在地上，小的站在大的身后的椅子上。你们站在窗户后面，没有推推搡搡，没有挤来挤去，没有大声呼喊，也没有对那个推着自行车路过那地方的人议论什么。完全是另一回事：你们静静地待在那儿，你们随着我的脚步静静地转过头来；我缓慢地走在大路旁边那宽阔的、满是灰尘的人行道上，沿着屋墙朝太阳方向走去。在一个拐弯处绕过车铺的自行车停车处，绕过第一家餐馆的停车处，绕过第二家餐馆的停车处，绕过车库的停车处，绕过第三家餐馆的停车处，绕过我妹妹餐馆的停车处，绕过电器行的停车处，绕过饮料店的停车处，绕过农贸市场的停车处，来到电影院。最后，我把车子靠在橱窗下面的墙上。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又听见另一位说道，我会稳着脚步走遍所有地方的。

那么除了你们，肯定还有人看见我了，我说道。

所有人都看见我了，我听见另一位说道。我觉得，我听见第三位说道，在人面前推自行车走路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那些看见我的人，谁也没有说什么呀，我说道。

完全相反，我又听见一位说道，很多人从屋里跑了出来。餐馆的窗户，我听见另一位说道，被客人都挤满了。跑到街上的人，我又听见另一位说道，出于好奇都急匆匆地交头接耳议论着。不过他们的话，我听见第四位说道，怕我听见，都没有大声说出来。

这一点我承认，我说道。正因为如此，我才把车子停在橱窗下就走了。

不是，我听见几位争先恐后地说道，我把车子停靠在电影院前面的车站牌上了。然后，我站在旁边等公共汽车。

我明白了，我说道，不过，你们知道我把车子停在那儿的原因吗？

车把上系着一张纸条，我听见一位说道。纸条上，我听见另一位说道，写着一个地址。其中一位客人，我听见第三位说道，竟然走上前来问我，天啊，你要把这辆车寄给谁呀。这是我兄弟的车，我随口回答道，我今天在车棚里摔了一跤，该走了，我朝问话的人淡淡地甩了一句。我用剪刀做了一只小环，穿上一根纸绳子，然后再用绳子把纸条系在车把上了。

描述一下车子的样儿吧，我说道。

这是一辆变速车，我听见一位说道，把手上的变速器钢丝断了，漆皮起包了，有些包已经破裂了。这辆车被日晒雨淋太久了。它老是停在外面，我听到另一位说道，后挡泥板松了，一道锯齿形的斜缝裂到尾灯上了。“如果你跨腿的话，裤子很容易被挂上。你得小心，左面踏板的橡胶有点儿磨损了。你最好脱掉鞋，免得打滑。过来。这很简单。你只需要把左脚踩在左踏板上，起步时身体朝着车把向前倾，右腿向后伸，向前冲去时跨过后轮就行了。你站在踏板上时，脚尖要弯曲。不要看地面。往哪儿骑就往哪儿看。朝木桩的方向看。胆小鬼。朝桩子这儿看。把车子推回到屋门口，停在下面台阶上。现在，

你站着把腿跨过横梁。现在用脚尖踩踏板，向前冲。笨蛋。站起来。快站起来。把车子扶起来。站在台阶上。把腿跨过去，脚向下踩踏板。把车子扶正。离开台阶。你只需要往前冲一下，同时另一只脚踩住踏板就行了。然后，往下踩踏板，踏板又上来了，你就往下踩。不要看脚。看木桩那儿。朝这儿看。现在往前冲。小心石头。绕道。绕过去。我给你说了，要小心石头。站起来。快站起来。不要紧。过来。站在台阶上。不要看脚。看你骑车的方向。战壕。抓紧车把。不要看双手。现在往前冲。别忘了踩。往旁边拐。看那木桩。踩倒挡。我说，踩倒挡！”

变速车没有倒挡，我说道。

没人说起倒挡，我听见一位说道。这车子的油漆是红白色，我听见另一位说道。红车架上有一个长长的白色箭头，我听见还有一位说道。我走了以后，那脚踏板转来转去的，歪歪扭扭的后挡泥板摩擦着轮胎，辐条弯了，总碰得车架某个地方咔嗒咔嗒响，发电机有嗡嗡声。

怎么会这样？我说道，可我白天还到处骑来骑去啊。

是这样的，我听见一位说道，可是到晚上我又回来了。

继续说下去，我说道。

因为我也没有把车子搬上最后一趟公交车，我听见另一位说道。下车的人都惊异地议论着我是怎么来的，并徒劳地待在空车前面。可是，我又听见另一位说道，他们无法从轮胎磨擦面发亮的条纹来推断，我是从大路旁边那条满地灰尘的走道上推车走过来的。

好，我说道，正如你们说的那样，我在车门口站着，等到车门关闭。然后我一无所获，手推着车子，立刻从那儿回来了。

不是这样的，我听见一位说道。而是，我听见另一位说道，我还待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站到深夜。

我很难相信，我说道，你们能在那儿待到深夜。

有人告诉了他们，我听见一位说道。

谁？我说道。

从电影院出来的人，我又听见一位说道。

你们丝毫不怀疑吗？我说道。

不，怎么会呢，我听见另一位说道，那是一个很短的影片。我又听见另一位说道，那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电影。那是一个会议，我还听见一位说道。

那是一个电影短片，我听见一位说道；或者是一个广告活动，我听见一位说道；或者是一个紧急情况的应急训练，我听见一位说道；或者是一次非法集会，我听见一位说道；不，是一场政府的号召，我听见另一位说道；是一个通告，我又听见一位说道；一场警报，我听见一位说道；是宣布一个紧急情况，我听见一位说道；一个官方警告，我还听见一位说道。就这样，我听见他们乱糟糟地说这说那，还窃窃私语，时而小声，时而大声，音量一会儿又变小，一会儿又抬高，而且还辩解着。我听见他们商量好了什么，又供认出别的什么，自相矛盾，又相互提醒矛盾。我听见他们说这说那，辩解着，就只能站着，站在那里望着他们。虽然我双目失明，但是我还是望着他们。

穿衣服

这时候，格里高尔·贝尼迪克特（这是他的名字，或者类似这样一个名字）为星期天穿着了一番。

他坐在床上，擦好了皮鞋。他刮完脸，洗漱过了。他走到床边，用软刷子给皮衣打了油。他走近桌子，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

他穿上袜子。他站起身来，走向衣柜。

他做这一切费了很多时间。他穿袜子没有费多少时间。

他转动钥匙，打开了衣柜门。他从衣柜里拿出了西服。他把裤子熨得平平展展，把上衣放到床上。他坐到上衣旁边。他把左腿伸进裤子。他把右腿伸进裤子。他这样费了很长时间。

他站起身来，提起裤子。他扣好裤子。他把皮带穿进裤腰。他系好皮带。他用拇指把皮带扣针塞进那熟悉的、与其他皮带孔相比稍大一点儿的孔里。他慢慢地把皮带头塞进扣里。

为此，他也花费了大量时间。

现在，他站在桌子和床中间。

他随后走到敞开的衣柜前。他从衣柜里取出了领带。

他走近窗户。他一边走一边把领带套过头。他系好衬衣扣子，把领子挨近下巴立起来。他用两个指头捏着领带结，另一只手把领带套到脖子上。

他系领带折腾了很长时间。

他走近床，拿起上衣。他把上衣搭在肩上，朝衣柜走去。他把衣柜门关上，转动了一下钥匙。

他把上衣从肩上拽下来。他用胳膊把上衣撑开。

这时，他站在房子正中间。

他右手伸到左胳膊下穿上衣，他把上衣拉过右肩。他左手伸过右肩穿好上衣。他的手松开肩膀。

松开手花费了这个盲人很多时间。

他把左胳膊伸向身后。他把左胳膊伸到上衣里。他把上衣往上提过肩头。

他走近床。他弯腰取刷子。他把刷子放在专门的盒子里。他拿着盒子走近桌子。他把盒子放在桌子下面。

这个动作占用了他一些时间。

他走近洗脸池，把碗里的水倒进水池里。

他站在旁边。

然后，他用很长时间走向屋门，用更长时间走出屋门，用最长时间从屋门走下台阶。

他快步走过院子。

他返身回来。

现在他双手插进裤兜，靠在阶梯旁边的屋墙上。有人给他作介绍，一边吸着烟，一边很正式地频频点头，脖子和胳膊还被阴影遮盖着，拘束的手一直抓着上衣的衣摆边儿，脸被阳光照耀着。他闲着没事，从嘴里和眼窝里吐着烟雾。

各种念头一闪而过。

他想像着一列火车行驶中的情形。

女人的出现

后来我又回到家，坐在厨房里，听见父亲干完了活儿穿过走廊踏在水泥地上的脚步声。我还听见他停下来站着，并快速脱下靴子，起先一只靴子后跟上面和内脚脖卡在一起，于是他把脚后跟脱到靴筒的位置，把松动的靴子像皮球一样顶在脚尖上，用力往阶梯下面的墙上磕，发出沉闷的咚咚声。我还听见他用这只光脚当鞋拔子，后跟顶在门框上，连蹬带踩地又把另一只靴子从腿上拽下来，动作不紧不慢，又把这只靴子扔到了墙上。然后，我听见他气呼呼地走过来，然后又往前走，从灶台上拿起大汤勺，伸到水龙头下面。我听见水龙头哗哗的流水声。父亲把手指塞进出水口时，水龙头发出嘶嘶的喷气声；父亲拿开手指时，伴随着嘶嘶的喷气声，指间又发出沉闷的汲水声。我

又听见水管哗哗的流水声。他把大汤勺挂到水池边上，弯下腰，把嘴唇凑到水龙头上。他用力一吸气，我就听见他口腔里发出生硬而响亮的咕咕声，感觉和一只野鸡的叫声差不多。他吧嗒着嘴离开水龙头，弯腰站着，把汤勺放到嘴边。水滴进汤勺里，发出清脆的声音，犹如滴在铁皮上似的，接着就几乎无声无息了。可是还不等水贴到嘴边，父亲就赶紧把汤勺向下一转，把水倒掉了。等到水管流出的水变凉了，他重新接满水，咕嘟咕嘟喝下去。喝水时，勺子挡住了鼻子，他就不停地把勺子往上翻。半球似的勺子挡住了他的脸。他喝着水，眼睛一动不动朝我这边看着，嘴里冒出了一个我听不懂的问题。我只从最后一个词抬高的声调里听出来他在问什么，赶紧点头，并说了和点头一致的话。他站直身体，抹了抹嘴，但没有用手背，而是用那粗大的拇指在嘴唇上刮了一下。然后，他把汤勺挂回炉台边，关上身后的水龙头。他背对着我，先抬了抬左肩，又抬了抬右肩，挠挠腋窝下，然后手伸进裤子里挠挠肚子下面，最后用右脚尖蹭着左踝骨，第二次提出那个问题。他（用别的说法）问我下午去了哪里。我就在这儿，我回答道，到处转了转。我有事要做，我改口说道，没有闲着。听到这话，我父亲正用抹布擦手指，便（用别的说法）说道，他很高兴。可是你后来又去哪儿逛荡了？我去了电影院的放映室，我回答道，可那儿没有人。所以我去了妹妹的餐馆，打听点儿事。晚上，我结束我的叙述，我除了回家没别的事。父亲没有回头，而是不停地转着身体审视着，然后走向橱柜。我听得出他光脚走路离地时脚底板吧嗒吧嗒的声音，然后他蹲下拉开抽屉时膝盖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我听见他把胳膊伸进橱柜，又把平底锅拿了出来，跪着，后来站起身，用脚尖踢门，重重地把柜门关上，走向桌子，继续问我别的问题，返回灶台的那一刻说完了最后一句：把自行车放到柴棚前面是不是我干的？怎么能干这种事。他完全相信这是我干的，他说道，不论在别处，还是在这儿，我都很喜欢这辆自行车，所以不得不把它搬到这儿来。我来回摇着头，说出了属于摇头的话。这是真的吗？他问道（用别的说法）。是真的，我坚持我的回答。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告诉他回来的时间。我坐在桌子后面，先望着他的脸，他正好弯腰从抽屉里取出刀子。然后我说话也用同样生硬的嗓音，看着他走近冰箱，从里面取出黄油。

然而，就在这时，她走了进来。他腋下夹着平底锅，两手分别拿着黄油和刀子，回到灶台前。黄油从一只手滚到拿刀子的那只手上，于是他腾开空手去拿腋下的平底锅，把它放在灶台上。我听见炉子上

那开关的咔嚓声，看见刀子在黄油纸上的刮痕，黄油在热锅里轻轻地滑动和碰撞，刀子在锅沿上刮蹭。融化了的黄油滚热起来发出咝咝声。这时，父亲又跑回炉灶旁，把鸡蛋打进锅里，把蛋壳扔进垃圾桶。他把盐巴撒在鸡蛋上。我听见桌子对面那把椅子的咯吱声和钢制餐具的叮当声。我眼看着父亲在摇晃那被卡住的抽屉，用胸脯和肚子把抽屉往里猛推，一声不响地靠近我坐在桌子旁，在我面前把面包片放到手里的油布上，用叉子的齿尖从上往下斜着扎进锅里的鸡蛋，头甩过肩膀，转过身，像被打扰似的把目光投向她，而在我的耳旁响起了爆裂声。她走过来把围裙挂到灶台边，光着双脚，轻轻地从父亲身边走过，然后轻声地大步走向长沙发。我听到了拖鞋在地上摩擦的声音。我闻到了马厩的烟味。她神情忧郁，轻轻地坐在沙发上。她穿着宽大的裙子，笨拙地把两腿并在一起。她把自己的脚勾在沙发腿上。她坐在那儿，身体靠着墙，朝这边望着，眼睛都不眨一下，也没有理睬我那沉默的目光，或者说，没有朝我看上一眼。然后，当他忙碌着给自己做晚饭时，她坐在那儿陷入了沉思，坐在那儿，一副失神的表情。这时，他把满满的锅端上桌，慢腾腾地坐下来，舌头舔着，准备一口气把饭吃完；他坐在那儿，身体向前凑了凑，嘴微微张开，停止了刚才发出的声音，用茫然的眼睛看着一直沉默不语听人说话的盲人。最后，她终于问起这个人的父亲，好像他本人不在这儿似的，连嘴几乎都没有张开，问起儿子是否已经吃饱了。我在桌子这边听见父亲咂起嘴，（用别的说法）问儿子是否已经吃饱了，听见儿子为了她，为了父亲的妻子回答父亲，他这个儿子在妹妹那儿吃过饭了，已经饱了，并说他感谢这个问题。我还听见父亲虽然继续吃着饭，可嘴里冒着热气，用别的说法向她转述那个答复，说儿子已经吃饱了，他在妹妹那儿吃的饭。她慢慢地站起身，看着父亲的脚板在地面上留下的水迹渐渐消散，还有桌子下光脚面上已经变黑了的汗迹。父亲张嘴吃东西时头往前一动，脚随之抬起来，弯曲着脚尖。

我怎么了？她问道，这声音在我的耳朵里像爆炸了一样。他用别的说法继续转达问题。这是叉子的声音吗？我一边听着动静一边问道。

她站起身时，只觉得一张硬信纸从手里或者从衣服里掉了下来。

发电站电缆

电缆是从布隆茨发电站引出来的。“电缆从那儿朝东引到乔这个地方，拐到东北方向，越过森林地带到瓦尔山，再朝同一方向下到格伦登，不经过施兰茨、里赤、珀罗施、切尔诺格劳、迪恩、尼茨、山茨以及兹万西、德莱西和摩尔等地方，而是出人意料地转向北面，继续延伸，经过施拉姆、普鲁赫地方、施莱克、斯里德马、斯尤特拉、特雷奇施、克里施等地方，再继续延伸经过安赫、经过易伯塞到厄德。”在这儿，我脚踩着一座电缆架的水泥底座，用石头打到丁铃作响的铁杆上，接着就站在电缆架的侧翼下面，把耳朵贴到横梁上。我站在这儿，听见头顶的轰隆声和沉重的呼呼声。在这儿，我现在听见那远远的声音渐渐消失，朝着北面，“电缆从那儿越过田野继续延伸，从厄德经过莱廷、卡纳伦、加琉施这些地方，转个弯返回向西，大概经过圣克罗曼、圣贝尼迪克特、绿荫中的圣约翰、圣克斯马斯和公路边的达缅、圣阿加塔、圣阿格尼丝、圣露奇娅（为我们而祷告）”，又朝这个方向经过类似的地方，再往前我就没有听说过有轰炸机了。

“傻瓜们从早到晚靠墙站着，流着口水，做着他们的美梦。”

靠墙待着的时候

我靠墙站着时（描写还没有进一步展开），打算走过院子，去柴棚把自行车扶起来。夜里，我听见风把车子吹倒了，或者是雨水让车轮下面的地打滑造成的。这至少是后来父亲吃早餐时的解释。我打算这样做，左右两边不免要用手扶住墙。我靠着屋墙站着，根据背阴来判断时间。那是清晨时分，我打算去柴棚，当时我自认为去那儿把自行车扶起来有多重要。我呆呆地靠墙站着。雨水从地上蒸腾起来，空气闷热。还没干什么就说了很多话。时间在说话和行动之间消逝了。身体变得懒散沉重。手指胡乱在墙上抠来抠去。满脑子胡思乱想，可全身关节懒散，无从说起。我萎缩的身影映到墙上。大脑的命令碰到麻木的岩石上。我无法离开这里去柴棚。指尖懒散地抠着颗粒状的灰浆。时间从手中流逝，而我却恼怒自己的懒散，恼怒得几乎丧失理智。我没有勇气离开这里越过院子的深渊去另一个地方。不论我怎样命令自己迈出双脚，可动起来也挪不过十来步。墙上满是灰尘。圆鼓

鼓的蜘蛛凭着细长的腿爬上爬下。粉刷的墙上那小坑就像子弹孔。白天，飞蛾伸展翅膀钻进小孔里睡眠。手指头可能会抠到那里，摸到某只飞蛾。可飞蛾一动不动。我讨厌起自己来。我蒙着双眼，靠墙站着。我利用时间，用蒙着的眼睛寻找从墙头到柴棚的路。我踉踉跄跄，好像才失明了一样。这时，我在柴棚边找不到自行车了。那儿曾放过自行车吗？我父亲还在从池塘回来的路上。父亲的妻子还没有离开家。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听到有第三个人。

猫

虽然柴棚里没有草，但有一股草味。这股味是从第二辆车上来的，那车辕高高竖起，挡住了后面的水泥墙头。第一辆车还正在路上。它经过的地面和空间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脚底下能感觉到滑板在厚实的泥土上留下的凹槽，感觉到有锯末和咔嚓作响的树皮碎片，那是在锯木头时从原木上掉下来的。我的膝盖从旁边碰到斧头把上。我去摸斧头把时注意到，由于我的膝盖一碰，斧头从劈开的大木块里脱落了，慢慢在前面露了出来，握在我手里的斧头把随之垂下去。还没等斧头从木头里掉下来，我就把它拽出来，抡过头顶。抡起来时，那只松开的手顺着斧头把滑动，快触到了金属，然后我的手猛一用力，又把斧刃砍进木头里。有时候，你没有抓紧鸡翅膀，鸡就在柴棚里乱飞一气：它碰到水泥墙上，碰到柴堆上，碰到横杆上，碰到屋顶木板上，碰到挂在横杆上的锯子上，碰到还一直摇动的斧头把上，从木头上仰起头，再一次碰到水泥墙后又摔到地上，扑腾着翅膀打转，并用它那长脖子拍打着锯末，跌跌撞撞地吐出了血。要么你想听点儿别的什么？你问道。

从我坐着的车上，能听到哗哗的流水声。水从柴棚顶流下来，再远一点的地方，从马厩的屋顶流下来，从大房屋顶经过排水管流到院子里。能看见的东西不多：一群鸡，有的站在马厩门口，有的站在两个窗台上和打谷场的黑木板前的墙头上。它们紧紧挨在一起一动不动。不，它们没有竖起羽毛。现在有一只鸡从窗台上被挤了下来：它落下来时扑腾着翅膀。我看清了它拍打翅膀和水洼四溅的情形。这只鸡在一块石头上左右摇头磨它的尖嘴，然后一头钻到马厩门下，挤进鸡群当中，它的腿在那一排静止不动的黄色中分辨不出来了。我看见水滴落到水洼里形成了圆形凹口，溅起的水泡飞向四周。我听见柴棚

的铁皮屋顶上噼里啪啦响亮的声音和外面院子里连续不断的滴答声。房屋门的下半部分已经被雨水打湿了，呈现出暗色，你能看见飞溅到清漆面上的水滴，而漆皮脱落的地方，雨水浸入木头里。现在，门已经被浸泡了，但门把手还算完好，只能从门把手边上逐渐扩大的阴影部分看出门的移动。我什么都听不见。猫蜷缩着身体露出头。你没有发现更好的东西吗？那是一只猫，你说道。它跑下台阶，沿着墙根溜到屋檐下，停在排水管拐弯处，跳过排水管，继续沿着马厩的墙根跑到屋檐下。它现在望着那成排的鸡群。这时候，我什么都听不见。它把头转向那一群在窗台上打盹的鸡。然后，它忽然把头转向柴棚。它还在马厩檐下窥望。我只听见外面院子里滴滴答答的声音，你叫它的声音它是听不到的。它听到了我的声音。它蹦蹦跳跳地跑过来。现在，它溜进柴棚里。我没有听见它跑过来的声音。我还一直听不见它的声音。它站在锯末上，抖了抖全身的毛。既然它是从雨中跑过来的，既然满院子都是雾腾腾的雨水，那么这个动作就是意料之中的。它现在大胆地跃过柴堆，跳到锯木架上，蹲在那儿的岔口上。它又跳起身，跑下来，惶恐地溜到了柴堆那儿。这是一只瘦骨嶙峋的猫，本来就快饿死了。它的眼角上挤满了脓屎，颈部只有干瘦的毛皮。它现在蹲在柴堆上面。它站起来，朝这边瞥了一眼。它在原地转圈，然后跳过柴堆，钻到柴棚的角落深处。在屋檐下的地面上滴水形成了凹槽，凹槽上横着一根方木。水滴落到木头上的声音不同于落在石子、沙子或者水洼上的声音。猫站在柴棚角落深处的柴堆上，浑身的毛都竖了起来。它往下面看看，又朝四周张望。现在，它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坐在上面的那辆车，悄悄地沿着后墙爬过柴堆。这只猫瘦得可怜，皮毛下的肋骨清晰可见。

我能听见水滴从瓦上落到方木上的声音。同时，这声音也随着水滴延伸到木头里。虽然这声音低沉，比水滴落到石子上和水洼里的声音还要小，我还是听得很清楚。木头上一层水面闪着亮光，像玻璃一样。木节孔里的水滴闪闪发亮，又很快被后来的水滴溅飞了。雨变小了。猫跳起来碰到屋顶的木板上。它又跳了一次，它被水泥里伸出来的铁丝缠住了脚。我听见水落到凹槽里的声音。现在，那声音到处都一样。猫跑回角落，它在那儿忽然缩起身子，快步小跑起来，越跑越近。它一翻身，又跳回角落里。它藏在柴堆后面，忽然发出尖细的、孩子般的叫声，后腿直立，前腿伸向屋顶木板。它伸展肢体，肚子贴着墙，只有双爪着地。这时，它的背部看上去瘦骨嶙峋。它把头缩进脖子里，目光扫视着那无法穿透的屋顶。它疯狂地用前爪去抓水泥墙

面。我听见抓墙的声音，我曾说过。现在，我听见风的呼啸和碰撞声。它只剩下皮包骨头了，你说道：你可以摸摸它，水泥棱角都扎进它肚子里了。我听见噼里啪啦的拍打声和尖细的呻吟声。呻吟声压住了拍打声，拍打声又惹出了呻吟声。我听见了拍打声、呼啸声、呻吟声。然后我只听见呻吟声。然后我听见拍打声和呻吟声。然后我只听见拍打声。然后我听见拍打声、呼啸声和呻吟声。所有这些声音构成了一个三音节单位。

我松开手指，终于放下了斧头把。我听见外面院子里父亲的妻子走路的声音，她胳膊上挎着衬衣。她的动作一个接一个，连续不断。而我开始的动作一个脱离另一个，要连续起来相当吃力。可是，走动的身体停下来都是相似的。我是第一个听见她的声音，并且从后面呼喊她。然后，她用眼睛证明了她听见的声音。然后，在我们走进房屋以前，她在上面屋门里，我在院子当中，我们一起听见马车从大路拐到小路上来，重压下草料堆噼啪作响，听见父亲笑声爽朗，远远地就朝庄园这边高喊着打招呼。

早餐时一段情节的产生

“当我在那儿时。”

当我在屋里时，我听见夜里火车的声音。直到深夜，我都能听见下面市区有轨电车的声音。整夜里，我都能听见绕行道上长途载重卡车的声音。我把这些声音区别开来，有马达声，有钢轨声，还有鸣笛声、扳岔道声、蒸汽机声。我根据马达声音来判断速度，分辨是穿着鞋还是光着脚以及用脚尖踩油门的速度，还有手拉操纵杆的速度。我又从鞋和手来判断人，把肩膀上的脑袋安在这个人身上，又给这个脑袋配上一双狭小疲倦的眼睛，再从眼睛来判断目光。开始，我不知道该给目光安排点儿什么。可后来我从中想到了焦油的逆流，又从流动想到把路边石头作为河岸标记，又从标记联想到猫儿眯起眼睛打哈欠的样子和急剧缩小并旋转的影子。

我把听到的声音和图像联系起来。我把图像和没有听见的声音联系起来。我把没有听见的声音和图像联系起来。我从离合器和铰链的声音想到了有轨电车的后车厢。我从有轨电车的灯光想到了窗户后面

一个个乘客的样子，从乘客的膝盖想到裤兜，从他们的手想到那皱褶并散发着酸味的报纸、证件、帽子、白色手套，中指尖上还沾着唇膏的颜色。我把嘴的样子和声音联系在一起。我把更迭变换的嘴和更迭变换的声音联系在一起。我让一张嘴的样子和另一张嘴的样子交替发声，让更迭变换的身体的样子相互鞠躬。我从嘴唇联想到嘴动的样子，又从动作联想到声音。我把身体相互贴近的样子归于聊天。我让身体的样子站起来，让一张脸的样子在前行的时候回头观望另一张脸的样子，让后面的那张脸向前面的脸点头示意。我竭力把这个点头示意的样子描绘得精确明晰，我描绘出一副手臂伸展下垂的样子、手指紧抓木棍的样子。然后，我把木棍和腾空摇晃的金属片的图像联系在一起。让人的图像成排成排地穿过车厢。我让他们上车，我让他们鱼贯而过，我让他们下车。我从火车静止不动和周围一片沉寂联想到终点站的光亮、草坪上的水泥长凳、半明半暗的茅草棚和关闭的厕所。我把这些看不见的图像和那些听不见的声音联系起来，又从这些声音联想到那些看不见的、顺着风向从明亮处消失了的人群的样子，联想到柏油路面上衣服闪烁飘动的样子，穿过马路之前脑袋转动的样子，香烟渐渐熄灭的样子，垃圾篓里的报纸闪闪发光的样子。

我从那些听不见的声音联想到各种图像之后，把随后那听不见的寂静和那个坐在敞开着的门边那把高椅子上填写数字的检票员的样子联系到一起，联想到那位在亮处来回溜达、一脚踢开一张揉皱了的车票的司机的样子，联想到一个人被灯光照得全身明亮、随后被阴影遮住、从大街另一边的黑暗处出来、经过草地走向汽车的样子。然后响起了汽车开走的声音。我听到这个声音，但已经厌倦了在这儿从声音联系到图像，并从那看不见的图像联系到声音。我把听见的其他声音和其他图像联系起来。

我听见远处火车行驶的呼啸声。我想像着火车行驶的样子。我为这种呼啸声补充我没有听见的声音。尽管火车的呼啸声渐渐远去，最后消失了，可我还是能从这些声音联想到图像。我用所学过的符号和名称来表示每一种声音，并且和其他声音相比较来消磨时间。我为了消磨时间，就把刹车的声音称为呼啸声，还把这种呼啸声比拟为倾盆大雨中阵阵刮风的声音。

然后，这种呼啸声戛然而止。我就把随后车轮几乎无声的转动和混凝土搅拌机的马达空转时皮带发出的声音相对比。我听见火车飞驰

中那呼呼的迎面风、那越来越快的咣当声和连接杆沉闷的声音，我从这些还能听见的声音里联想到火车在空旷的路段行驶的情形。我从火车联想到向外喷涌的油，联想到沿着车厢迸发出来的火花和每节车厢那幽暗的窗户。我让窗户后面的旅客躺下休息。我配给他们长椅和大衣，想像着他们把大衣叠起来当靠垫放在胳膊肘下，手放在脸和靠垫中间，以免被纽扣蹭伤皮肤。我给那些坐在窗户旁的人配备上窗帘，让他们用手指把窗帘从时而低下的头上方撩开。我描绘着车厢里的样子，那行李网里箱子上面的姓名牌，挂钩上摇摇晃晃的伞，地面上解开鞋带的鞋子，脚上滑脱了的长筒袜，蜷缩到肚子上的腿，裤子和长筒袜之间露出的皮肤。我从现在所处的寂静联想到行驶在乡间穿越黑暗的火车，还联想到车厢里熟睡的人们那隐秘的呼吸。我从列车联想到飒飒声和嘎嘎声，还从车厢的空座位上联想到一种沙沙声。

然后，我让所有的声音在呼呼的迎面风中渐渐消逝。我把这种呼呼声和听到的发电厂的鸣叫声相比拟，又和管道里还没流出来的哗啦流水声相比拟。这种呼呼声时而增大，时而变小，然后又增大。我想像着那空车厢的情形。我让它散发出烟草、橘子皮、胶水、融化的巧克力味道。我从这些味道联想到车厢里的样子。我让有指甲的手指剥掉水果皮，并从这个情景联想到果皮被剥开时发出轻轻的咝咝声，联想到果皮上面那上下张开的嘴唇。我让这副嘴唇提出一个问题，让对面的脑袋作一个阻止的摇头姿势。然后，我让拇指掰开水果，并把一块递给另一个人。虽然我想像着这个脑袋第二次摇头阻止的样子，我还是卑鄙地想像着让手去拿水果并送到嘴里（之前我曾说过一个词）的样子。我现在让这两位旅客把水果一块一块地吃掉，其中一人是所有者，整个面部快速地抽搐和嚅动，另一位在慢腾腾地吃着剩下的水果。然后我不再去想那些味道了，而让车厢变得空无一人。

我躺在寂静中。我把寂静和呼呼的鸣叫联系起来。我无法把这呼呼的鸣叫和别的什么联系起来：我就躺着，想像着这种呼呼鸣叫的样子。后来，我从寂静联想到刹车的呼啸声、车轮几乎无声的空转声、第二次刹车的呼啸声、道岔的啪嗒声、火车的进站口。随后，我立刻让蒸汽的刺耳声跟上来，还有关闭一扇车厢门的沉闷声音、车向后猛一撞的声音和那明快的、听得见的寂静。我把寂静和寂静联系起来，然后联想到成年人的样子、询问的声音、脑袋挤向窗户的躁动、回答问题的声音、一下子清楚无比的谈话、从站台上传来的轻快声音。

现在，我正想像着站台的样子。我让站台上出现一辆电动车。我抹去这辆电动车缓慢行驶的图像，让站台上空无一人。我想像着候车室的情形。我还让大喇叭咔嚓咔嚓响起来。我想像着候车室的大门和门后座位的情形。我还让候车室里的长椅空着。不过我让一扇门来回摇晃。我想像着火车站墙里面的水龙头和水龙头下面水池的样子。我想像着那空车厢的样子。我让井旁边站着一个男人。我让这人的拇指勾在肩部的背包带上，并用胳膊肘把背包往上扶。我想像着这个人向前弯腰的样子，我让他手心朝上，翘起嘴唇。随后我让大喇叭说话，宣告通知。我想像着一位正喝水的人，同时还想像着那空无一人的车厢。我让这个喝水的人显出更焦急的样子。这时电子钟的图像自行出现了。我抹去这个图像。我让这个人伸展身体站起来。我让他用手抹一下流出的口水。我抹去这个图像。我看见这个人站在水池旁边。我抹去电子钟的图像，一会儿又让它闪现出来。我抹去火车的图像，让站台的图像闪现出来。可是，与我的意愿相违背，被抹去的图像上出现了一直站在烟雾中的这个人，还出现了他那浅色的背包带破损了、又鼓鼓地贴在他衣服上的样子。我看见拇指勾在背包带和锁骨中间。我极不情愿地看见候车室两扇门中间那门缝的样子。我对这些情形听之任之了。这个人自己迈开脚步，脚步有了声音，从这声音就联系到发车前蒸汽锅炉里水沸腾的样子。我想像着一个人登上车踏板的样子。可是这个图像很快就被抹掉了。我看见他舔着嘴从水池向候车室走去。我看见候车室门扇中间的缝隙。空车厢自行出现了，我听见车厢下面的缓冲器不可避免地猛然一震的声音。我想像着这个人在车厢过道的情形。这个图像被抹去了。我又看见这个人站在水池边。我看见他垂下肩膀，让背包带滑到胳膊肘上。我抹去了站台的图像，想像着火车启动的样子。我让这个人在车厢过道里绊了一下。我想像着这个人歪斜着脑袋，背包随着脚步来回摇摆。

我让这个人在这寂静中低声吹口哨。我让别的轨道上另一列货车的声音盖过这列火车的声音。我让这两辆火车交汇时发出刺耳的尖叫和巨大的轰隆，并且撕破车厢上的外罩。我让这个走路的人去摇动那些关闭着的门。我想像着门后面正睡觉的人的模样。然而，我看见这个人站在水池旁边。我抹去这个图像，让这个人站在空车厢门口。这个图像又被抹掉了。我让外面这个人的轮廓站在又出现的车厢里。这个人在车厢过道里，把额头贴在门上，牙齿不停地咬着嘴唇。我让他的手活动，让手去抓那竖直的门把手。

这时候，这个人又把背包抡到肩头上。我看见他回到候车室。我抹掉了这个图像。我想像着这个人拉开那扇咕噜作响的门。可是，我看见他用脚踢开门扇，走进候车室。我抹掉了这个图像。我看见他又沿着长椅子走路。我把这些长椅子组成空车厢里的凹面长椅。然而我看见了候车室的长椅。我抹去这个图像。我看见他坐下来，坐下以后放下背包。然后，我所看见的一切都压倒了我的意愿。

我看见长椅上这个人的身体夹在那些自在垂挂的手指中间。他孤身一人在房间里。他目光离开鞋子抬起了头。这里禁止躺在长椅上。他望着粘在鞋缝里的灰尘。然后，他猛地站起身来，又把目光投向墙上。到处都找不见能让他在房间里关灯睡觉的开关。

他坐下来，看见了鞋上的灰尘留下的印迹。他听见电灯的嗡嗡声。在站台门前出现了一个警察，双手习惯地背在后面。出于对环境整洁和安静的关心，他觉得最好进去站在那儿，和那位坐着的、回避他目光的人谈谈话，问问他的年龄、住所和职业。这个人都一一认真地回答了他。然后，这位警察又询问另一个人的打算。他原本是想通过问话和说话把车站上漫长的黑夜变为愉快的白天。被问的人立刻告诉了他的打算。然而，这个人流露出不满的目光，请求问话的人停止谈话。这俩人还能达成一致，一起穿过大厅门走进大厅。可是他们在外面就分手了：警察轻松愉快地去了丁铃一响就打开的小窗口，而这个背着背包的人为了避免与人打招呼，便极不耐烦地去了上厕所的路。

在那儿，他从肩上放下背包，从口袋里掏出两枚硬币，把第一枚塞进香水自动售货机里。然后，他弯腿屈膝，扳动摇杆，那香水就喷洒在他的衬衣上。

他舒展身体，然后抓住背带，在地板砖上拖着背包，慢慢地移动着。

虽然由于他现在脸上喷了香水，显出满意的表情，但是他的脸色像往常一样，总是急躁不安。

他用拇指把第二枚硬币塞进小隔间的投币孔里，然后以习惯的动作推门而入，把背包摇摆着拖到脚前面，又继续拖到水池边。他径直进了这个避难所，猛地关上门，把自己关了进去。

他双腿用力把背包抵在墙上。

他跪着解开背包带，从里面抽出一份报纸。他把报纸一张接一张打开，铺到地面上。他看见在潮湿的地方报纸被浸透了。他就用另外的报纸盖在上面保持干燥。所有小隔间里哗哗的流水声盖住了报纸的声音。

他坐在报纸上，让自己安静下来。他半高不低地用手支撑着身体，环顾四周墙上的图画和胡乱写的字。

然后，他仰起脖子向后靠在背包上。

由于小隔间狭小，他的腿长，于是就侧着身子，腿弯曲贴着肚子。

现在，他的姿势就是火车上那些人睡觉的姿势。

他在水池的釉面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那是脸的影子。在地面砖缝里和马桶旁的脚垫上，他发现了那已经变干了的润滑油的污斑。他看见里面还有又短又硬的头发，油污上面还粘着絮絮灰尘，令他恶心。他看见一个螺丝孔周围的瓷釉脱落了。他还看见那个脱落的螺丝。

他的胳膊支在耳朵下面咯吱咯吱地响。他没有在意所看到的东西，而是目光沉陷于一片白亮的混沌之中。这白亮的混沌渐渐地延伸扩大，占据了他的意识。最后，他的眼睛也像搪瓷面一样变得发白。

“他睡着了。”

我拿着杯子离开嘴边，两手摸索着找桌子，后来碰上桌子了。手挪开时，虽然皮肤好像只是朝里出汗，可桌上的油布还是粘在手指上了。

那女人懒散地坐在炉灶旁边的凳子上，看看正在磨东西的父亲的后背，也看看正狼吞虎咽的儿子的脸，心里十分得意。她朝父亲的后

背干巴巴地问道，我刚才说了什么。父亲嘴里正咯吱咯吱嚼着面包皮，可是他并不压低声音，下咽之前，自己也忘记了嘴里还是满满的。他用几乎相同的话向我问起同一件事。

“是谁来的信？”我也许这样问道。

然而，我只是高声反问了一句，是否该上路了。到时会让我知道的，我父亲用别的话回应了一句。同时，他咳嗽了一声，又恢复了精神。随后，我听见一滴水滴落到灶台上，一边沸腾着一边缩小。我吓了一跳。那女人站起身来。

可是，如果我联想的图像超出我的经验范围，那么我就无法再联想下去了。我在黑暗的空间里，躺在睡着了的和醒着的盲人当中，再也想像不出一幅图像了。外面传来有轨电车驶过岔道的声音，载重汽车在绕行道路上行驶的声音，火车交汇的声音。我说出我所听到的声音，我还不断重复这些声音的名称，说出这些声音的名称和图像的名称，说出图像的名称和我没有听见的声音的名称。然而，我无法再从某个声音联想到某个图像了。我现在躺在这里，想到了站满人的火车站，可我对这些搞不明白。我想起轰隆巨响中穿越黑暗的火车，车站的站棚，站棚下面的长凳，长凳上被人咬过的双层面包片，面包下面的纸在风中抖动着。这些我也搞不明白。我想起火车上睡觉的人们，明亮的候车室，候车室长凳上睡觉的人，醒着的人，火车站厕所里睡觉的人，车站站棚下睡觉的人和醒着的人，睡觉的人睁着眼睛，醒着的人闭着眼睛，睡觉的人嘴唇上的唾沫，醒着的人和睡觉的人脑袋里乱七八糟的图像和话语，还有那些人、活着的生物脑袋里乱七八糟的图像和话语，不论他们在哪儿栖居，或者在半路上。可是我对这一切都搞不明白了，是因为我躺在那儿醒着，双目失明，躺在盲人当中；是因为我感到白天到来之前时间变得漫长，就像在梦中一样；也是因为我对于那些能想到的东西的思考方式所致，就好像它们仅有名称一样。

有些东西在描述中被忘记了。不。是有意没有提到。不，是忘记了。不。我不知道从何谈起。

父亲的面孔

描写了父亲从水塘回来以后：比如他卸下马车套具，双手把草料搬到马厩，再把车倒回去停在柴棚里放车的地方，随即开始描写换衣服，然后再描写早餐的情形。可是，描写了父亲在厨房吃完早餐之后，接着出现了大量篇幅描写他的脸色。这时，他正对他的儿子说话，告诉儿子什么。父亲的脸从外表上被描写成一副温和的面孔。我的头歪向一边，好让他对着耳朵讲话。我也听见那女人在外面脚后跟不着地、撩着裙子匆忙走过阶梯的声音。现在我听不见她的声音了。她停在一级台阶上，朝上面望着：她看见所描述的墙顶上的大梁和瓦片底面。我听见她越走越慢。她一只手从身后滑过栏杆，我从木头上都能听出她皮肤的声音。她看见了什么。什么东西在描写中被忘记了。我父亲正向我叙述什么。“他的面孔似乎一直注视着自己的嘴，在胡子下面说话像流水一样。他的脑袋似乎一直在听着自己的声音。”“眉毛一动，额头就向上窜到头发下面，遮住了帽子阴影没有遮住的白色部分，额头最上面皱纹里的疣子夹在抽搐的皮肤里。不过，当他放松眉毛，让眉毛朝鼻梁根靠近时，额头正中间就会出现一道横槽，皱纹绷得紧紧的，成了明显的凹痕，边上的汗珠闪着亮光。褐色的疣子也从头发里露了出来，随后，帽子的水平压痕泛出微红色，也下垂了。父亲脸也不抬起来，就弯曲手指，用指节骨揉眼睛。当他把一个小黑点揉出眼睑抹到泪囊上时，他的嘴便以那种一成不变的口气继续讲述事情了。他把胳膊肘支撑在桌子上。外衣袖子滑下来，衬衣袖子露了出来。他把脸撑在两个支起的拳头中间。拳头照亮了他的脸。由于他背对窗户，他的脸也被墙上太阳的反光照亮了，里面的骨骼似乎发出红光。他的颧骨从下眼圈延伸到外耳，颧骨上面的皮肤发出黯淡的光，就像每次刮完胡子那样。头发因出汗而显出黑色，倒也梳得纹理平整。不过有帽子压痕的地方头发隆了起来，汗也干了。他的头发长得浓密散乱，鼻孔和耳孔也长出浓密的毛发。如果你到近处看，就会发现那浓浓的眉毛一直向外延伸到太阳穴上。留小胡子的地方，一束灰色的胡须向下直冲嘴的中部，而在平时，你只能看见一道深深的横槽。”他长时间咬着下嘴唇。他就这样仔细听着，舔着上下嘴唇之间生出的唾沫。从他喉咙里出来的那些话和词语，一出口就变得干巴巴，小声小气。最后，他干脆闭上嘴不说话，让嘴巴变哑。他坐在靠桌子的椅子上，双手支撑着脸。腿是这样描述的，他伸开腿，在桌子下面朝我这边斜着伸过来。他中断了叙述。什么东西

打断了他的话。现在，他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地出气。他安然地动了动嘴唇，神情严肃，又开始说话。他开始说话了，又舔着他的唾液，接上了他刚才叙述的话题。比如，他叙述了马车陷到地里和往车上装草料时，他费了很大力气。

忘记了的东西

前面提到了大梁。提到了大梁上木蠹虫的孔。有些虫孔周围的粉末也提到了。可是有些东西被忘记了。不，那是有意忽略跳过去的。也许是大梁上的檩条。是用木匠铅笔在木头上写下的数字。是吊线在边棱上留下的红线印。陈旧的木屑。木屑上的砖灰。木屑上的蜘蛛网。网子里的苍蝇和黑色的躯体空壳。屋顶下面的椽木。几根椽木的树皮。在一块成型不好的砖块上糊了一堆水泥。砖块上的蚂蚁。椽木上凝固的沥青黑点。大梁水平面上的一排樱桃核。樱桃核上面干枯的棕色果肉。不。是忘记了什么。有些东西是有意没有提到的。大梁上？不。墙上？不。地面上？不。砖块上？是的。

名称的丢失

我听到屋顶下的动静，我在感受着它。我在感受着厨房里的动静和说话声。我听到院子里和马厩里的动静和说话声，我在感受着它。厨房里有什么在说话：我在感受着；屋顶下的卧室里发生了别的什么：我在感受着；别的什么后来发生在台阶上，我在感受着；别的什么已经发生在台阶上，可是之前就曾经出现过什么，它就发生在靠墙的屋檐下，还有别的什么在我之前就已经坐在厨房里说过话，现在一直还在说话：它坐在厨房里，面色苍白，我觉察到了。什么感受着别的什么：这一个坐在厨房里，并且觉察到另一个。可是，依然有什么执意出现在台阶上，执意跨过台阶：在它出现之前，这个就已经出现在台阶上；在它发生之前，这个就已经发生了。而它把衣服和鞋子弄出了响动，我却愚蠢地认为这是真的。什么叙述了什么；另一个不是什么的什么听了叙述；我这个不是什么的什么听了那个听着叙述而不是什么的什么，尽管如此却没有感受到它。这座房子曾经是空的。房间里曾经有过椅子和长椅，有过床和桌子。一个水池里曾经有一个气泡破灭了。这一切都使我这个目空一切而又是别的一个什么的人感到

吃惊和诧异。我感到非常惊奇，不知道房屋里所有东西的名称，然而我却感受到了。一个不同于我的别的什么从台阶上走上走下：这我已经觉察到了；另一个什么在厨房里全神贯注地向我讲了一个故事：这我已经觉察到了。可是，有什么也听了，这我没有觉察到：这我就没有感受到。

橡木上的马蜂窝？是的。

通往教堂的路

当这女人拿着提包从她房间里再出来时，她问我们是否可以走了。我父亲站起身，告诉她我们都准备好了。我也点头称是，和他一样站了起来。我是否愿意带上拐杖，她匆匆问道。我想不想带上拐杖，我父亲又转述了一遍。是的，我赶忙回答道。是的，我父亲用间接引语转述，我想带上拐杖。她走进我的房间，带上了拐杖。她把拐杖递给我父亲，我父亲又递到我手里。我拄着拐杖，走向她打开的门。我父亲跟在我后面。这女人最后走过走廊并锁上了厨房门。然后她从我们身边走过，先走到房门口，把我扶到外面。我父亲跟在我身后。她也把房门锁好，然后问我们是否忘了什么。没忘什么，我父亲肯定地说，我们没有忘记什么重要的东西。买供品的钱呢？这女人问道。这他可忘了，我父亲坦然承认道。她从提包里取出钥匙，打开房门。她去取买供品的钱，我们就站着说话。然后，她重新锁好门，走下台阶，把钱递到父亲手里。他把钱塞进马甲兜里，不说话就算表示谢意。我们现在终于可以上路了吗？她彬彬有礼地问道。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妨碍，我父亲说道。这时，当儿子的急忙附和他。她看了看四周，便走到我们中间。我们各走一边，我父亲向她伸出胳膊，她便挽起我父亲的胳膊，毕竟是她的丈夫嘛。我们穿过院子走上小路，我们顺着小路往下来到大路上。天气变得闷热，我父亲在路上说道，然后我们每人都以自己的习惯方式表示赞同：现在就够闷热的，我说道。还要热成什么样啊，我父亲担心地说——他想饭后和邻居打牌。她想睡觉，女人说了一句自己的话。傍晚时，他俩都想到外面凉爽的地方透透气。这时，我们顺利地走上好走的大路。我们拐进大街，越走越快。送牛奶的车星期天还忙个不停吗？我问道。不，我父亲回应道，

他知道，星期天送奶车是不送奶的。可牛奶罐怎么都堆在奶站上呢？我追问不舍。当然，我父亲赞同地说道。我们大步朝前走着，可是，还没等他喘口气继续说下去，我们就在大街另一边碰到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妇。她长得不漂亮，但穿着华丽讲究。这时，我父亲把帽子掀起，殷勤地向她大声问候，她也殷勤地小声回首致意，并在走过我们身旁时说道，天气变得好闷热啊。是啊，我父亲会意地应道。可是奶站上这些牛奶罐，他立刻又转向了我，都是空的，因为热天里牛奶到第二天都变酸了。这我明白，我表现出镇定自若的样子，好像听到父亲的解释我会感到恶心似的。不过我马上继续问道，公共汽车什么时候来。我指的哪一趟？我父亲询问道。最近的一趟，我回答道。那就是十点左右的，他肯定地说。是这一趟，我附和说道。第一趟七点钟已经过去了，我父亲慢条斯理地说道。第二趟，他接着说，在十点钟做完弥撒后来，大约两点钟，他一边回忆着说道，第三趟车就来，第四趟车的行车时刻表他忘记了，最后一趟晚上八点钟来。我向他表示感谢。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呼地一声超过了我们并问了声好。我们停住脚步，也向他问好。我父亲朝他身后喊了一声。啊，是真的，骑车人离去时扭头喊道，在去的路上我就注意到了。我们又加快了步伐。我问，这骑车的人是谁呢。父亲像平常一样，只说了他是干什么的。我们急匆匆地赶路。到了地方，大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他们互相打招呼问好，我们也向他们致意问好，他们表示会意，并说了符合他们想法的话。是的，这是真的，父亲附和着他们的看法，他只能证实他们的说法：恰恰这一点他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可不用赶紧啊，他让我不要匆忙，提高嗓门对我说，我们有的是时间呢，不会误事的。这儿的人都是干什么的？我大声问道。怎么啦？我父亲非常吃惊，我不认识这些老熟人了？我把他们所有人的嗓音都忘了？无论怎么说，他提高嗓门，这对他可是件新鲜事，真够逗他笑的。然后他追着我问，我怎么会突然问起这些熟人来了？怎么回事？他追问道。我今天的心思跑到哪儿去啦？我瞎想些什么呀？当然啦，我极力想说个明白，嘴上却卡壳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无可奈何，过了一会儿，只好和气地张嘴回答我的问题：这是马蹄匠，父亲答道，这是庄园雇工，那是修路工。我用非常热情的话感谢他们，并向这些人问声好。他们也向我表示欢迎，然后我们一起向前走。我们走在他们中间，不时地朝左右两边的人示意问好。那些人丝毫不知道怎么回事，紧挨着站在街道边的空地上说着话。那些站在一起说话的人也向我们示意问好。于是，我们就和马蹄匠、马蹄匠的儿子和女儿、庄园雇工、修路工、修路工的女儿一起，穿过街道向教堂走去。走路的人先打招呼问好，站

着的人再挥手致意。走路时问候的声调不同于站着问候的声调。当我们匆匆忙忙穿过一排又一排人群时，所有说话的人都唉声叹气，担心这样弄不好会出事的，即使肯定不出现大的混乱，可许多事情也免不了会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我不停地问道，这个人是谁，那个推自行车的旁边的人是谁。再说，我刚才靠近那个人时，为什么他不说话呢。他不认识那个人，父亲对我说道，那个推自行车的人旁边的人他也不认识。那两个陌生人，他猜测道，也许是骑自行车到这个地区考察的。是从安赫来的，他更像是自言自语，或许是从克里施来的：他从脸面上看不出他们的来历。我们不停脚步走过这地方，穿过胡同走向教堂。我们互相说着话，不时向左右两边的人群、三三两两的人打招呼问好，还有那些腿不打哆嗦靠墙站着的人。我们一起走上教堂台阶。我父亲请马蹄匠走在前面。他就先走了进去，手挽着儿子和女儿。随后，贝内迪克特先生携妻子和儿子跟了进去。接着，轮到了修路工和修路工的女儿，庄园雇工最后一个独自走了进去。然而，我们参加典礼统统都来晚了。女人们才不管这些，立刻走到别的女人旁边找座位坐下了；孩子们也到专门留给孩子的长凳那儿坐下了；而男人们只有站在廊台下面了。主教从布道台上正好朝下面喊道，如果我的眼睛，让我生气的话，那我就恨不得把它抠出来，让我遭受那无尽的黑暗的打击。在这无尽的黑暗中，他朝我示意了一下，我悲恸地哀哭着，咬牙切齿，到头来，正像我平日里吹嘘炫耀、愚弄人们那样，我感到后悔和痛苦，感到我的身躯无比丑恶和卑鄙。无穷无尽，他说道。

背旅行包的人

这个人醒来后就坐了起来，伸手抓住鞋尖。他前后摇摆着身体。站起身时，他也顺便把旅行包提了起来。又有人在敲门。他随即放下旅行包，从裤兜里掏出烟盒。他用手指弹了一下烟盒底部，用嘴唇叼住一根香烟，从烟盒里抽了出来。他没有抬胳膊把手指放在嘴上，靠着厕所的边墙抽起烟来。有人在敲门，用拳头砸门。烟头在水池里熄灭了。他从地面上把纸捡起来，叠在一起，穿着鞋把纸踩到水池里。他拉上链子。他用胳膊肘拎着旅行包走了出去。外面另一个人望着他，他拉上链子以后，说的话就含混不清了。他既不回头看，也不理睬。他用自来水冲洗手上的灰尘。他从小隔间里走了出去。他走出厕所。他走出了火车站。

隔墙望

“弟兄俩一个给另一个带路，”书里有一处这样写道，“经常顺着教堂尖塔里陡直的环形阶梯爬上钟楼。”

在墓地后面的墙根下，能看见雨水流过的锈色痕迹，墙顶上是稀稀落落的顶盖板，盖板下面有粗壮的横梁，墙盖板和墙之间露出一线天空，一只猫正好穿过这一线天空，悄声无息地溜了过来。

猫。

我看见这只猫悄悄地溜过来要把天空吞掉。我看见一块石头从墙上掉下来。我看见鸡群在坟墓上刨来刨去。我看见一个女人走进公墓。

栏杆。

我靠栏杆站着。我把脚蹬在下面的横杠上。我抬起另一条腿。我全身坐在栏杆上。我用手指抓住上面的横杠。我朝下面那个女人来的方向吐了一口唾沫。

这女人。

这女人提着一只桶。她左手拿着一只玻璃杯。她张开手拿着杯子。她的手挡住了视线，我看不见杯子底。

杯子底。

杯子底上粘了一些腐烂的花瓣叶子，变得有些发黑。水泡烂了剩下的叶瓣。剩下的部分搅浑了水。她端着杯子，提着桶，走过一排排坟墓。

第二口唾沫在空中四散无影，像第一口一样。女人脚不停步，走过一排排墓碑。她把桶放在石头上。她把杯子放在台沿上。她把另一只杯子从台沿上挪到石头上。她从这只杯子里抽出一束黑色的草茎。

她摊开手，手心向上。她用手背在鼻子上揉了揉。她闻了闻。她闻到腐臭的水、腐臭的叶子、腐烂的花蕊。她绷起了脸。

栏杆。

我骑在栏杆上。我用脚后跟踢下面的木条。我弯腰向前。我伸直腿。我的脚趾蹬到了墙台上。我抬起第二条腿。我双腿站在墙台上。我站在栏杆另一边。我站在墙上往下看。

这女人。

这女人朝水井那儿走去。她浇花用了很多水，水泛绿色。她冲洗杯子。她跑回来。一群鸡急忙跑开了。她提起桶，又放下桶。她围着墓地走来走去。

墓碑。

我跪下了。我跪在台檐上。我就地跪下了。

这女人。

我用脚后跟走出去。我的脚尖滑了下来。我的膝盖从台檐上滑了下来。

这女人。

我悬在空中，用手指抓住木条。啊，我悬在墙上。

这女人用裙角擦去石头上的灰尘。她用衣服擦掉字上的灰尘。她松开揉成一团的衣服。她从下面朝上望着我们。你看见衣服上那灰色的字迹。

我们亲爱的兄弟马蒂亚斯·贝尼迪克特。

礼拜

可是，当他们把猪拖进院子时，猪尖叫个不停。四个人都得上前，一起用力把猪拖进院子。猪一尖叫，鸡就扑腾着乱跑，鸡爪子扬起灰尘，叫唤着，扑腾着翅膀飞上房顶。于是，屋脊上还传来一只乌鸦低沉沙哑的叫声，尖叫声乱成一片。家禽一叫，牛圈里拴牛的铁链子也哗啦哗啦地响了起来。两个男人腿顶在门框和墙上，把猪拽出圈门。孩子们在屋门里等着。一个长形的盆子放在院子当中，旁边有一个烧水壶。院子当中盆子里的开水冒着热气。两个人拽前蹄，另两个人拽后蹄；猪四肢伸直，身体使劲摇动挣扎，拽猪的人有的腿伸直，有的腿弯曲，不停地挪着步子。谁捂住耳朵了？没有人捂住耳朵。一只箍桶铁环从仓库的木墙上掉落下来，一只毛虫从牛圈玻璃上掉落下来。那只铁环晃悠悠地滚过院子。可是，当猪被悬吊在盆子上方时，突然停止了叫，鸡也突然不叫了，鸡爪子在屋顶上刨来刨去，孩子们也瞪大眼睛，猫卧在鸡群当中也瞪着眼睛观望，铁环摇摇晃晃滚到一边，当啷一声碰到石头上，牛圈里拴牛铁链的声音渐渐变小了。一个人给另一个使了个眼色，然后鸡又从屋顶上扑腾起来，毛虫爬过玻璃，水冒着茫茫蒸汽，把这些人的眼睛都遮住了。

你们看看耶稣吧，神父说道，他在承受着。你们看看耶稣吧，他重复道，他在承受着罪恶。他又说了第三遍：你们看看耶稣吧，看看他在承受世间的罪恶。为了不让摇铃发出响声，一个徒儿小心翼翼地把摇铃从地毯上拿起来。他三次抖动关节，抬起手向前猛摇铃。铃舌击打的声音报了三次时间。仪式完毕，徒儿没有放下摇铃，而是小心翼翼地用另一只手抓住铃舌，以免再发出响声，然后立正，等候神父屈膝弯腰。可是，当神父屈膝弯腰时，徒儿第四次摇响了铃。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把摇铃放回到地毯上，并把头转向第二个徒儿。那个徒儿跪在左边最低的阶梯上。然后，他们像一个人一样，同时离开了阶梯。他们像一个人一样，同时从地毯上站起身来，双手合拢，指尖指向下颚，相向而去。他们转身面向圣坛，屈膝跪在圣坛前面。然后，他们仰望教堂穹顶，还转头望望旁边的人们。接着，两人分别从左右两端斜着走向圣餐台，走的线路像一把张开的剪子。他们好像面对面站在一个圆圈上各自用胳膊画了半圈一样，把长台连在一起挡在前面，给圣坛留出一些空间。这时，人们也都纷纷双臂交叉搭在胸前，低着头，从教堂大厅向前走去。神父手拿着圣餐杯和圣餐盘，一边小心地看着地毯，一边走下阶梯，踏到石头路面上，同样向人们走去。

神父的徒儿们忙碌着把带有刺绣和钩织的台布铺到台面上，人们黑压压一排跪在圣餐台前，神父一步一步向前走着分发圣餐，把圣餐饼放到大家的舌头上。然后就出现了下面的情节：人们咽下圣饼，恭敬地回到教堂大厅。徒儿们又从台面上收起台布，随后沿着弧线撤掉了隔挡。神父也拿着器具回到了圣坛。在这里，他用布把圣杯擦干净，放进盒子里。然而在这之后还有这样的情形：部分散开的人群静静地站在圣餐台周围的空处，弯曲的舌头把剩下的圣饼从上颚舔下去，徒儿们同时也双手合拢，急步跟着神父走向圣坛。然后，他们像一个人一样同时在阶梯中间屈膝跪下；他们双手合拢，相互分开，走向各自的方向：一个向右走向靠墙的神龛，另一个向左回到原地最低的阶梯那儿。如果不撒谎的话，之后还发生了事情：右边那个人从墙上神龛里拿出酒壶和水壶，从边上匆匆走上台阶；他把酒和水倒满圣杯，洒在神父手指上。左边那个人站起身来，径直走到圣书那里；他像神父端着圣杯面向人们那样，小心翼翼地把书连同书架斜着搬下来。然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在正中间，这个徒儿和空手离开靠墙神龛的另一个徒儿碰面了；他们屈膝跪下，右边的徒儿走到左边，左边的徒儿拿着圣书，顺台阶斜着向上走到右边，把东西摆放到圣坛上，空着双手直接走下台阶。然后两人同时撩起外衣，又跪下去。毫无疑问，此时神父走到右边的圣书那里，翻开了当天的诗句；他有意要说什么，就回身走到前台中间：domnus wobisku[19]，他对人们说道；etkuspiritutu[20]，徒儿们作为众人代表回应道。接着，神父又走到右边圣书那里，宣读了最后的祷告，然后又回到前台中间；他们又说了一遍刚才的话。神父很快地吻了一下圣坛，当众转过身向大家说可以离开了。神父又转向圣坛，又转回身来，伸展双臂，为徒儿和大家祝福。随后，所有的人都站起身来，右边的徒儿走向圣书，而左边的徒儿走到前台中间，右边的徒儿拿着书向左斜着走上了台阶。这时，神父也去了左边，说了些什么，他的徒儿在左边第二个台阶上点了点头，表示回应他的话。他走下台阶，站在左边，神父也站在左边。右边只站着右边的徒儿。肯定还有事情发生了。人们先前一起从长凳上站起身来，短时间里乱哄哄的。所有的人还同时跪了一次。神父合上书，走到前台中间。左边那个徒儿拿走了书，右边那个徒儿拿走了礼帽，三人一起面朝上望着穹顶，还转向旁边望着人们，迈着从容的步伐走向圣坛。他们转过身，身披长袍，同时屈膝跪下。右边那个徒儿把礼帽递给神父，神父把礼帽戴到头上。他们又转身朝向人们，右边那个徒儿走在前头，左边那个徒儿胸前抱着书跟在他后面，神父拿着

一些器具，在后面催促他们，跟着他们走下去了。不过，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Je k smerti obsojen（被判处死刑），我在我的位置开始阅读起那陌生的方言；useme te krish na suoie rame（将十字架背在肩上），我的兄弟在第二站前接着念道；pade prauish krisham（第一次倒在十字架下），我接着念道；pomagh krish nositi（遇见他悲伤的母亲），他接着念道；podapenti pert（帮着背起十字架），我接着念道；pada petni pert（递给擦汗毛巾），他接着念道；pade drugesh pod krisham（第二次倒在十字架下吗）？我问道；troshta te Jerusalemske shene（是在安慰耶路撒冷那些女人吗）？他反问道；pade trekish pod krisham（第三次倒在十字架下），我接着又念了下去；je do nasiga slienzhen inu jemo so te grenki shauz pitidali（衣服被脱得光光的，人家让他尝苦胆），他又接着念了下去；po na krish perbit（被钉在十字架上），我接着念道；je pouishan inu umerie na krishu（遭受苦难，死在十字架上），他继续念道；je od krisha dou uset inu na roke Marie poloshen（从十字架上被抬下来，放到圣母怀抱里），他最后念道[21]。你听见了吗？我问道。这都过去了，他说道。我听见了，我说道。他们不来这里，他说道。他们俭省，是为了去大一点儿的城市。我听说了，我说道。

什么？我父亲问道。公共汽车，我说道。十点整，我父亲说道。

有序地离开教堂

人们挤向出口。可是只有一个侧门开着。那么大家怎样才能有秩序地走出大门呢？再说，大门两边各有一个石盆。人们之所以要挤过出口，就是因为要用石盆里的水来浸润手指。人们纷纷涌向出口。人群中有一个人弯腰去开关闭着的侧门，可是由于别人拥挤，他被挤得紧紧贴住了门，胳膊和手没有活动空间，无法把竖直的门闩从地面插

孔里拔出来。最后，这人被人群从半开的门中挤到了外面。人们纷纷拥向出口。大家的胳膊依然伸向石盆：女人的胳膊向右伸，男人的胳膊向左伸。那么一个夹在中间的人怎么才能在水里把手指头浸润呢？他既不能从一边把胳膊伸过男人的肩膀和头顶，也不能从另一边伸过女人遮盖着的头发。由于人群拥挤，他的双臂紧紧地贴到身上，似乎不是他用双脚往前走，而是站在那里被人群拥挤着推向前。可是那个用膝盖顶住关闭着的侧门的人，最后还是把铁门闩从地面插孔里拔了出来。然而，侧门都是朝里面开的。既然人们不断从后面涌上来，挤得门无法打开，那么从地面插孔拔出铁门闩还有什么用呢？也许有人愿意再回到教堂里。他把脸和脖子探进门口，在关闭的侧门外面等候着，他的肩膀抵挡不过挤过来的人群。他的脚刚跨过门槛，膝盖和肩膀就被推了回来。虽然按他的说法，他可以轻易向人群当中的另一个人大声呼喊，但是他考虑到这是一个庄严肃穆的地方，所以就不出声，只喘着粗气，牙齿把嘴唇都咬破了。人们纷纷涌向出口。可是当大家都蜂拥向前时，常常谁都举步不前。有几个被后面挤到侧门前的人从旁边挤向出口，但是又挡住了后面的人，于是，那些把手指浸入石盆的人停在那里，结果跟在后面的人也停下了脚步。在这种情况下，外面想进去的人怎样才能及时把消息传达给人群当中的人呢？拥挤当中的人又怎样才能举起胳膊招招手，好让另一个人看见呢？人群不停地在原地拥来挤去，像一堆苍蝇围在马的眼睛上那样。这时，又有一个人把侧门朝教堂里拉开了一条缝，马上需要来几个人，用肩和手从外向里把侧门完全推开。可是只有一个人在外面顶住侧门。人人把手都伸向石盆，白色的衬衣袖子就像撒开的大网封锁了出口。后面的人开始嚷嚷，说那个人要出去真不是时候；前面的人也开始嚷嚷，说那个人要进去也不是时候。公共汽车十点整已经来了。人群当中那个人只听见人们的嚷嚷声和教堂钟声，没有听见汽车又开走的声音。反正还有好些分钟可以在电影院门口等车。这期间，乘客或许已经下车了。有一个眼看乘客下车了，假如他跑去教堂的话，需要好几分钟时间。这个无法挤进教堂的人还能把他看到的一切及时告诉别人吗？人们纷纷涌向出口。人群当中那个人眼窝里都冒出了汗。他浸润另一只手的手指，从拥挤的人群里抽出手，抹了一下汗津津的额头。他用手抹过额头，捋了捋头发，就举过头顶：现在，他招招手就能让人注意到他了。他身边的一个女人用水把他的手指浸湿了。盲人身边的这个女人是谁呢？他能借助她一臂之力及时来到外面吗？由于他的胳膊放不下来，他就把胳膊伸直，高高举起。他感觉背部皮肤冰冷发僵；他挤在人群里，感觉到僵硬的皮肤下的肌肉阵阵火辣辣的酸痛；由于

身体的重量，他的双腿忽然站不住了，腿脚开始发痒。他在想，如果出现火灾的话，这大门应该可以朝外开的；不过也考虑到别的情况。于是，他缩起脖子向出口挤去。人们纷纷涌向出口。人们能在……之前来到外面吗？

我出门时被绊倒了。她从石头上把我的拐杖捡起来，递给父亲。父亲又递给了我。我道了声谢。他提到神父演讲的一句话。是的，可是他身边的另一个人耐人寻思。当然是这样，他赞同地说道。我们在屋檐阴凉处一边聊天，一边走下台阶，到了有阳光的地方。

宰猪

“猪被泡进盆子里，在滚烫的水里翻腾了一阵。然后，人们用刀子把猪鬃从热气腾腾的皮上刮下来，再把刀刃往盆边上一抹，猪鬃和那油乎乎的脏东西就一起被刮了下来。”

村里广场上宣布规定

这个要宣布管理部门决定的人从人行道走下来，大拇指夹在纸的折缝处，纸下面是别的手指。人们聚集在一起，还有人不断从教堂胡同走出来。这人胳膊肘靠在屋角上，抬起一条腿，脚后跟蹬在身后墙上。他的左大拇指挂在外衣最下面的纽孔里。这是一位还很年轻的人。他能从那块高高的石头上——这也是他经常待的地方，越过好奇地观望他的面孔，看见街道以及街道两边那宽阔的走道。夜里下了雨，两边走道还湿漉漉的。他能看见那些小孩子和半大小子在路旁停放的汽车身上和玻璃上写下他说过的话。

“最近常常看到，半大小子和小孩子整日没人照料。他们到处乱跑，还经常干坏事。他们用粉笔在电影院墙上乱写乱画。”这人抬起头，目光扫过一张张观望他的面孔，扫过后面那些朝他转过身来并且张望着他的孩子们和半大小子，看见电影院那熏黑了的墙壁和反光耀眼的玻璃橱窗，还有这座建筑物前面那粘着干泥点的黄车站牌子。

“在站牌旁靠着一辆自行车，红白相交，粘满了干泥点，红色车梁上有一道白色箭头。车子已经锈迹斑斑。那是一辆换挡钢丝断了的变速车，挡泥板上的尾灯没了，车铃丢了铃盖，车座也磨破了。”一个孩子从旁边走过时用拳头砸在车座上。

他听见那些停放路边的小轿车当中有轻轻的狗叫声。“节假日期间，有些养狗的人随随便便把他们的狗锁进车里。于是，狗就蹦起来乱撞玻璃，狂吠，扰乱夏日的安宁；或者，它们趴到车座底下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狂吼乱叫，惹得许多居民很恼火。”一旦车门打开，车里就冒出一股尿臊味。狗用舌头默默地舔着主人抚慰的双手，眼睛里充满了血丝。一开始，主人为了让车通风，就先让狗出来放风。狗就围着车转圈，跑到车的阴影处趴到地上。过了一会儿，狗又伸着舌头，急促地喘起气来。尽管车门一直开着，车里面还是有一股尿臊味。于是主人和主妇就摇摆车门，把空气往车里扇。后座椅的皮革热得烫手；这表明车漆是深色的。狗爬过已经坐下的主人的鞋子，回到它的座位上。

“有一点提请大家注意。”

这人把目光移开那些望着他的好奇面孔，右手把纸递到左手上，另一只脚后跟蹬在身后的墙台上。然后，他宣读写在折缝的最后规定，这一部分先前被他的拇指盖住了。

当有人吹口哨扰乱他时，他就停下不念了。

口哨声扰乱了会场。

他是在场的人当中惟一向口哨方向望去的人，而其他人都望着他，连车里的人也都放下玻璃朝他望去，甚至连最后一排的人都不再低声说话了，而是好奇地望着他。同样，他刚停止讲话，那些已经心不在焉地走在回家路上的人边走边扭头望着他。这是叫谁呢？是向谁发暗号呢？这口哨是给会场上谁吹的呢？

走路的，停住了脚步。站着的，走向一边，都想看看吹口哨的人。在人群里挤着还看不见电影院的人，便问前面其他人是谁吹了口哨。惟有这个脚蹬墙台的人朝口哨方向看去。然而，由于他在自己的视线里只看见了大拇指的影子，所以也不知道是谁吹的口哨。什么也

没有看见的人，就听信了别人的说法。他坐在车里，伸展四肢，仔细听着人们相互询问和低声细语。终于，那个被叫的人吹起同样的口哨回应了一声。那边先吹起口哨的人隔着街道大声喊着他这样做的原因。我来了，被叫的人回应喊了一句。人们并没有特意停下来，而是又聚集在一起。那些面孔重新望着走道上那个人，他正用指头在纸上寻找刚才的话。“今后，所有这种干扰都要禁止。”他念道。

他在膝盖上把纸叠起来，用手指拨掉肩膀上的石灰。人群散去时，中间出现了空隙。那空隙逐渐扩大到街道两边空荡昏暗的走道上。汽车玻璃摇上去了，在人脸上反射着光。发动机声音盖过了狗叫声，狗喘着粗气，呼哧呼哧地冲到坐着的人的腿肚子上。车从静止状态忽地冲到大路上以后，车主、旁边的主妇、后排座三位应邀同行的人就身体离开靠背，向前探着身子。

妹妹的讲述

我妹妹说，十一月那一天，我的眼睛瞎了。两个当兵的开了一辆军车，穿过深深的积雪，不知从哪儿把我拉了回来。当时天已经黑了。当时，她正在照镜子，那摇摇晃晃、越来越近的汽车灯慢慢地在屋里天花板上打转。

背旅行包的人

他可能赶不上这趟公共汽车了。还不等他赶到地方，就会眼看到汽车开走了。他可能会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汽车离开。他可能不会奔跑。他可能连汽车离开都看不到。他可能会低着头走到城里，看着自己的脚尖追逐着自己的影子。他了解这座城市。他经常去那里。他不会忘记城里的大街小巷。他也不会忘记出城的路口。他在城里不需要找当地人问路。他可能会默默地在城里转悠，光着头，屁股后面的旅行包上下拍打着。也许还不到时间，他就已经来到这城门口了，或者他已经远远离开城，站在街道边上，胳膊支在牛奶站的售货台上，等候着汽车。他早就认识汽车司机。如果这样描写属实的话，那他就经常坐着送奶车，挤在牛奶罐当中去上学，把书包当坐垫。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也许司机已经不认识他了。尽管如此，他也许

还要坚持把牛奶罐从奶站往车上搬。司机的助手总是要帮司机干活的。这个背旅行包的人也许看见他们俩在干活。这个人不认识助手，助手也不认识这个脚蹬在奶站最下面的横木上、默默地望着他们干活的人。他望着他们把那些有时还哗啦响的奶罐斜着搬到车沿上，然后推上去滚到车厢平板上。司机会把车后厢板再关上锁好。同时，司机的助手会从路上把空奶罐抡过膝盖放到奶站上。而这个背着旅行包的人眼球滴溜溜地转，也许会一直保持沉默。司机进了驾驶室，助手一跃而上，也从另一边上了车。当他用手指把裤子上的奶渍抹掉时，司机从夹克口袋里抽出双手。可是他并没有背起双手，当手从背后自由落下时，他就把身体靠到后厢板上，腰背部把衣服夹在中间。我们经常看到他这样的动作。然后，他也许会用胳膊捅一下助手。助手会看司机一眼。司机不会望着这个人，而是会皱起一边的眉毛，然后助手就会看一看这个人。嘿，助手简单地对这个人说道。这个人动了动下巴，微笑一下。他会走上前去，助手会给他打开车门，这个人会爬上车，把旅行包放到两腿之间。如果还不到时间的话，他就会搭送奶车走。他坐在两人旁边一声不吭。他不停地点头打盹儿，也许睡着了。到了早晨，车厢里也许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热气腾腾。车会在每个奶站停下来，司机和他的助手会把奶罐放好。旁边的过路人不会看不见敞开的车厢里端坐着的那个人。他的拳头紧紧攥住旅行包背带。他的面孔也绷得紧紧的。

狗

你安静点儿，主妇恶狠狠地骂道。你能安静点儿吗？她问道。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安静点儿？她把她的问题再说明一遍。你究竟能不能安静点儿？她恼怒地问道。安静点儿吧，她祈求道。安静点儿。

背旅行包的人

后来车厢里会变得热起来。司机手中操纵杆上的黑疙瘩会像一只昆虫挥动翅膀一样剧烈地抖动。助手用凸透镜点燃了一支香烟。然后，他用这支香烟点起第二支，塞到司机嘴里。烟会弄醒睡觉的那个人。尽管他没有睡觉，他还是会被烟熏得抬起头来。他会请司机把车停下。然后他会连声谢谢都不说就下车了。这一切也许还是在公路上

发生的事，是在一个岔路口上。当我们还在教堂里时，他也许已经在这条岔路上沿着小溪走过峡谷了。当我们在这儿下车并且与主人和主妇说话时，他也许已经走完了峡谷的路。当我们沿路朝上走向这家庄户时，他也许已经走到另一条大路上了。还有，当我们现在停在庄园门口、听到一片吵闹声、准备调头时，他也许会气喘吁吁地一路跑过来，背上的旅行包剧烈拍打着。他会跟在我们后面，叫喊着我的名字。

星期天路上没有货车。

母亲的死亡

当时，我妹妹说道，母亲死的时候，她还看见她病着坐在上面的靠背椅上。这女人透过那雕花栏杆朝院子凝望着。她尽力向前探着身子，头微微向前，手扶额头，透过鼓鼓的雕花栏杆，似乎在朝她张望。姑娘看见女人身后有一个孩子在跑动：这个孩子就是我。我想不起来，我说道。你会想起来的，我妹妹说道。我看见你在跑，她说道。我逃走的时候，她看到草茎和玉米粒从地板缝里掉落下来，走廊地板在脚下嘎吱嘎吱响。她把篮子挂到马厩墙上，从那儿朝上面呼叫母亲。她走过去，向我演示了她呼叫母亲的情形。病人没有回应：她隔着雕花栏杆一个劲儿地朝院子张望，连头也没有抬一下。虽然妹妹踮起脚尖走上台阶，可是她从下面只能看见母亲的手和一双张望的眼睛。当那些鸡抖动着脖子叫唤着从柴棚里冲出来时，她穿过鸡群跑进屋里。在走廊里，她跑掉了鞋子，又跳回去，拿起鞋子，边跑边把鞋穿上。她跑上台阶，她说道。可是由于她摔倒了跪在地上，她没有听见上面走廊里靠背椅倒地的声音。靠背椅倒地之前还有别的轰响声，她也没有听见。后来，她说道，她没有去看躺着的母亲，而是先把倒地的椅子扶起来，然后仔细把被子整理好。她向我演示起她扶起靠背椅的情形。我想不起来了，我说道。母亲跪在地板上。她把脸紧紧贴在一个木节孔上。那情形好像是她要透过走廊地板的小孔看着下面那一群鸡。我妹妹说，她恼怒地把手指塞进地板缝里，抠住一块木板，想用力把这块木板从地上抠出来，还猛烈地扭动脖子，把她那骨骼突出的额头往地板上碰。姑娘站在那里，背过脸去。她把靠背椅上的被子弄平展。开始，她没有看见母亲在吐唾沫，妹妹说道。她待在原地没动。我看见母亲跪下趴着，从地板的小孔向院子里的鸡群吐唾沫。

妹妹模仿母亲吐唾沫的动作。她当时并没有慌神，她说道，而是正好蹲在那里打嗝，哗啦一蹬腿，一下子就站了起来。母亲把耳朵贴近小木孔，表情坦然，仔细听那群鸡咯咯的叫声。她双眼突出，脸上还残留着呕吐的饭渣。她斜眼望着自己身边的那本小说。不是自己身边，我说道：在她的身边。当时怎么啦？我妹妹说道。说吧，当时怎么啦？我想不起来：既想不起来那些晾在母亲头顶绳子上的洋葱，它们经风一吹慢慢地左右摇摆；也想不起来妹妹弯下腰把母亲的手指从木板缝里抽出来并且问母亲的那些问题。那些洋葱摇晃起来，还是因为靠背椅哗啦一声向后翻倒引起的，我妹妹说道。阴影没怎么向前移动。她从坐着的栅栏上跳下来，一边叙说着，一边做样子让我看她是怎样把母亲的手从木板缝里拽出来的：就是这样，她说着，便直起身子，头发遮住了她的脸。她透过头发望着我。我坐在栅栏最高的横杠上，胳膊支撑在木桩上。我不停地耸耸肩，呆呆地望着楼上的走廊一筹莫展。我不知道，我说道。这个事件究竟和故事有什么关系呢？

格里高尔·贝内迪克特是个骗子

墙上的字

他的名字被写在一堵墙上。有人骂他犯了法，做了不光彩的事，或者说，身体有缺陷。有人用粉笔在墙上把他的名字写得大大的。那粗糙的混凝土表面很费粉笔，而写字的人只有一支粉笔，他就得省着用了。这不是他想写字的惟一一面墙。他写字时，脚后跟和脚板都要踮起来离开地面，胳膊也要高高地举过头顶，结果写字时指头开始颤抖，但他还是继续写下去。不过，当脚关节开始疼痛时，那一行字就开始向下倾斜了。如果墙是浅色的，写字的人就不用白色粉笔。在这种情况下，挨骂者的名字就写成蓝色或者红色，在墙上特别醒目。如果有人大白天推着自行车走过这里并对此轻蔑地表示否定的话，他就被认为是一个撒谎的人。他的名字会出现在电影院的墙上。不过，一个否定事情的人并不一定是撒谎：他只是不认可别人强加给他的东西而已。他甚至相信自己说了真话，而且别人也可能相信墙上写的就是谎言：尽管如此，既然有人问了他，他矢口否认，他还是被骂成一个撒谎的人，而且他的名字被写在墙上。不过，光在墙上写字是不够的，因为这堵墙上还有太多在其他时候写上的字，让过路人看不出这些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如果有人受指责犯了事，那么他的名字也会出现在粮仓的墙上。首先，人家把竞选广告和某个好事的标语从木板上撕下来，给要写的字腾出地方。通常，打谷场的木板是黑色，这就适合用浅色粉笔。如果担心有人会用抹布把字擦掉的话，那你就要在夜里或者雾天扛着一把梯子悄悄地转悠，或者拿裁缝用的硬粉笔，或者用石灰来写字。木板上的木纹决定着笔画的方向：出于这个原因，一般都选用直纹木板来写字。嫌疑人的名字用白色写在粮仓黑木板上显得特别醒目，在粮仓墙脚下的灰土里能清楚地看到脚尖的深印。要不然，夜里刮风就能把脚印和梯子留下的斜坑埋掉。如果被指责的人从外面回来，想着自己的处境，又若无其事地靠在敞开的窗户旁，那么从旁边走过的人就可能向他大声读出那木板上的字。他长途跋涉回来，双腿跷在厨房的水池上，一定能听见这声音。不过，他很少把这当回事。

“发生”这个词

事情发生了。要让事情发生，肯定会有另一个事件发生变化。或者说，迄今没有变动的东西，肯定要动起来。如果某个东西一直静止不动，那就什么都不会发生；要么它自身动起来，要么另一个东西从外部使它动起来：然后事情才可能发生。运动不需要别人看见，也不需要听见；即使思想是看不见的，它也是一种运动：如果说思想产生了，那么事情就发生了。疼痛的产生也是一种运动；它产生于别人看得见而感觉不到的身体之中。这种事情的发生，是由于身体里原先没有运动的东西发生了运动。什么只要开始了，那么事情就发生了；什么只要变化了，那么事情就发生了；什么只要结束了，那么事情就发生了。可是，如果什么始终保持不变，无论是静止状态还是运动状态，如果什么既没有自身变化，也没有受外部作用而变化，那么它就不会发生什么；如果什么是在一种给定的自然规律中运行着，自身从不变化，那么即使它也在运动，也不会发生什么。水池里一直散发出一股变质牛奶和脏水的臭味，就不会发生什么，也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发生。可是在一个弯下腰、忽然把水池里的味道吸进体内的人身上的确发生了什么。

在这期间发生的事情：

钥匙

应该强调的是，父亲站在屋门口，双手叉腰，对站在他身边的妻子说话：应该强调的是，他眯着眼睛望着路上时说道，他没有怀疑谁偷走了钥匙。他惟一关心的是，他说道，用别的话来说，找到丢失的钥匙，使我们都能澄清嫌疑。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妻子接着说道，是不可能改变的。也许掉在路上了，我父亲思量道，毫不在意她的责备。谁都无法知道，他心不在焉地朝鸡群瞥了一眼，补上了一句。在教堂的时候，妻子说道，它还在提包里呢。可能她把钥匙丢在车里了，父亲帮她回忆道。在那儿，她回答道，她手里没有拿提包啊。可能还在那个地方，父亲自己寻思道。肯定还在那里面呢，他妻子让他失望了。她能肯定吗？父亲审视道。她敢肯定，妻子立刻回答道：当她，她接着说道，从提包里拿东西时，她翻着找东西，钥匙就从手边掉了。可她从提包里拿什么呢？那封信，她答道，她把信给我妹妹

了。她应该说这事发生在什么地方，父亲提醒她。在教堂里，妻子回忆道：当人们涌门口时。那么说，钥匙还在那里面呢？父亲补充道。她已经说过了，妻子说道。它肯定在什么地方，父亲发脾气了，它不可能从地面上消失吧。他说得对，妻子说道，不过我们还有他的钥匙。说得没错，父亲马上讥讽道：无论说什么都没错，但他还是想知道钥匙丢在什么地方了，他很不高兴地说道。他的钥匙，妻子说道，在他的衣服里。她太无聊了，父亲重重地说道。是的，她顺着话说道。我想，我知道情况，他忽然想到了什么说道。不！他又推翻了他的想法，那不会有结果的。等等！他忽然喊道：她敢不敢肯定在车里没有动过提包呢？她没有动过，我把妻子推到一边。我应该冷静点，父亲斥责我。说够了吧！他应该抓紧点儿，妻子说道，好让她准备饭菜。这太荒唐了！父亲发起火来了：没有动过，我们没有动过提包！这太费时间了，他恼怒地说道，怎么能这样做事！我们还不知道什么钥匙！他说道。我们好像还不知道结果怎样呢！

真的，这人（父亲）在儿子们面前用同样的话炫耀自己，今天太让我们生气了！如果允许说的话，他继续骂道，如果按他说的去做，那我们现在就不这样了！他剔着牙恼火地说道，我们敢在他面前露面吗？这会让我们后悔的！他继续挑衅地说道。你们这些该死的恶棍！他转向自己的名字。你们这些无赖！我们不想再见到他！快点儿！他命令道。我们是什么东西？他问道。流氓和无赖！他自问自答，懒汉、土匪和强盗！夜魔！他又反驳自己：杂种，私生子！他还会改变我们的看法！一切，他喊道，都将被毁掉！

然而，当他用一连串话使自己的激动情绪缓和下来并且尽力劝诫自己时，他还是考虑了这件事情。然后，他转身把钥匙插进门里。尽管他的鞋是干净的，可是进屋之前，他长时间地在门口栅栏上不停地蹭鞋上的脏东西。他从上面斜着头转过来，阴沉着脸，怒气冲冲地朝下面的我们看了一眼。他进屋以后，儿子们还能听见他那没完没了的骂声；他那沙哑的叽里咕噜的音调在长长的走廊里被拖长了。我们默默地跟着父亲走进屋里。

厨房里的排水池

房间角落现在放柜子的地方是水泥地面。前面那儿放着一个加工牛奶的机器。这儿屋顶中间还有那些黑乎乎的电线，吊着灯罩，灯罩下面每天都有苍蝇飞来飞去。特别在这宽大的窗台中间，排水池散发出臭气，那些被打死的苍蝇和水池边上霉坏的残奶渣也散发出臭气。餐后，在厨房餐桌上，吃完饭后，舌头舔着手指时，也会感觉到苍蝇的翅膀和肠子的味道，像烤焦的面包皮一样。这机器每星期工作三天，把奶油从牛奶里分离出来。这期间，机器里和地面锅里剩下的牛奶和奶油就变质发臭了。机器运转前，先用热水把残留的牛奶和奶油冲洗干净。但是，这些残奶渣常常都变硬了，必须用刀子从铁皮上刮下来，然后盛在桶里，倒进这里的排水池里。我坐在前面的凳子上，或者把凳子靠着墙，站在凳子上，闻着这种气味。我张开嘴，鼻翼一动不动。我缓缓地呼吸着，就像跑步一样。脸上没有阴影。变了形的面孔一般都会有阴影出现，脸会胀起来，嘴唇也朝里卷着。这是常见的令人恶心的表情，我弟弟说道。他站在灯罩下面，苍蝇在他头顶上盘旋，正如他说的那样，苍蝇飞来飞去，头碰到他的皮肤上，感觉凉飕飕的。为什么苍蝇在灯罩下面盘旋呢？为什么它们不落到锅里，爬到机器上，或者围在我面前这个排水池的下水口周围呢？我弟弟站着发呆，手指颤抖，只是嘴在狡黠地对我说话。他双手摸着自己的身体，慢慢地向上移动。我轻轻地转过身，耳朵朝着他：我听见他嘴里咕哝着什么，然后拳头打到灯罩上，灯剧烈摇晃起来，那些苍蝇盘旋着又飞了回来，在逐渐停止摇晃的灯罩下互相追逐。他朝我走来，把手伸到水池上面。我听见那手指搓来搓去的声音。他猛地一下举起胳膊，正当他要挥动胳膊时，我听见他手里还有一只苍蝇发出嗡嗡的声音。这时，他跑到机器跟前，冲洗他抓到的东西，还把锅里残存的变质牛奶顺着排水池倒下去：闻闻吧，他随后说道，现在闻闻吧。我弓着身，听见下水管流水的声音。还不行吗？他问道，还不行吗？不行，我说着，便出了一口气。马上管道里就没有声音了。我说完话又吸气时，我无法闭住喉咙，便随着呼吸，吸进一股浓烈的恶臭味。这臭味像一股火焰从水池里冒出来，一下子让我兴味全无。你现在闻到了吧？我弟弟问道，你闻到了吧？没有，我平静地答道，我没有闻到什么，我根本没有闻到什么，我根本没有闻到什么。

马蜂窝

“马蜂把纸浆团夹在面颊中间，慢慢地斜着从上往下继续它的劳作。它顺着已经完成部分的边沿，一直编制着那柔软的、被它的唾液浸湿了的丝带。可是，这种劳动常常被打断，又重新开始，因为每一次它的储备很快就消耗殆尽了。所以，它就在打谷场附近寻找一根受潮风化、又被阳光晒得褪了色的干树枝，用牙啃掉表面，抽出里面的纤维，咬烂，做成一个柔软的纤维团。然后，它用新的纤维团在我们头顶继续筑窝。我们看见马蜂的尾巴翘了起来，身体钻进自己的窝里。胆小鬼，你说道。你自己才是胆小鬼呢，我反驳道。我们这样说着话，站在没过膝盖的草料堆里，还继续向前走。同时，用好奇的眼光向上面张望，看见了打谷场旁边库房上的瓦片。”

后来发生的事情：

我们俩走进柴棚，我说道。我们从柴棚里搬出梯子。我们穿过院子又回到打谷场。

我在柴棚里顺着墙爬到柴堆上，你说道。我把梯子从挂钩上搬下来。我用胳膊撑着，让梯子滑到你手上。我把梯子的一头横放在柴堆上。

我把我这一头顶到地上，我说道。你从柴堆上踩着梯子爬下来。我把梯子斜着从柴棚里拖出来。你跑过来抓住后面一端，跟着我一起，抬着梯子走过院子。

我们抬着梯子，穿过院子，又回到打谷场，你说道。你一脚把门踢开了；门开的时候，被风吹到门缝里的谷壳扑到了你的脸上。你把我和梯子猛地往后推了一下。

我们立刻赶到打谷场，我说道。我扛着梯子顶端径直朝后面的木板走去。我毫无声息地放下了梯子一端。

我把梯子立起来了，你说道。我一步一步走到梯子下面，胳膊搭在梯子横杠上往上攀。由于肚子一挺一挺，衬衣就从裤子里露出来了。你把双脚分得太开，横着踩在梯子顶上。你像我一样，把梯子搬起来竖着往自己身边挪。我把梯子交给了你。

我们把梯子搭在屋顶下面的大梁上，我说道。你把棍子递给我。我手拿着棍子爬了上去。

你攀爬的时候眼睛老盯着鞋，你说道。你的腿打弯儿和伸直时，你就朝我看。你在横杠棱角上蹭你脚底板上的脏东西。

我一抬腿就看看你，我说道。你在我下面把膝盖和额头都贴到梯子上了。你不停地转过脑袋朝大门那边看。打谷场的大门还一直开着。

你在梯子中间停了下来，你说道。你一开始无法转身。你一只手拿木棍，另一只手抓着梯子横杠，在上面停了很长时间没有动手。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双脚斜着交叉在一起，我说道。我很快把木棍从右手传到左手，身体差点儿翻倒，空着的手又赶紧抓住身后的横杠。

你背着身子继续爬梯子，你说道。你在上面横杠上蹭鞋后跟。你把鞋脱了下来。你穿着袜子站在上面。脚尖踩到横杠上。你把身体靠在梯子上。

我把梯子准备好了，我说道。大门还一直开着。你缩起脑袋爬了上去。

你双手抓着木棍往上捅，你说道。你没有碰着蜂窝。你捅开了梁上的一片瓦，什么也没有碰到。我们俩猫腰从敞开的大门朝院子里张望。

只有你猫腰来着，我说道。我接着又往上捅。我也没有碰到蜂窝。但是，木棍一碰，蜂窝就从瓦上掉了下来。

它嗡嗡地发出响声掉了下来，你说道。我蹲到最下面的横杠上。蜂窝掉下来以后，我们都愣了神。一开始，我们都往房顶上看。然后才慢慢地往下看。最后你往下面探头，我也直盯着地面。我们保持这种姿势都没有动。

蜂窝旋转着掉落下来，我说道。它被风沙吹着，滚到打谷场上。

我们平静了下来，你说道。我们的脑袋一动不动，目光盯着前面。蜂窝的巢口向上，停在大门前的一堆谷壳和谷粒上。它在松软的地面尘土上划了一道痕迹。

蜂窝是空的，没有蜂，我说道。鸡咯咯直叫，从院子里跑出来，穿过敞开的大门。

它们没有动蜂窝，你说道。它们只是来回乱跑吃谷粒。然后我站起身来。

你在梯子上弯着腰往上捅来着，我说道。保险起见，你就缩着手把胳膊伸到后面去了。你弯着腰慢慢地接近蜂窝。可是蜂窝是空的，你看见它从屋顶掉下来时就是空的。

蜂窝不是空的，你说道。我看见一个蜂窝里面有东西。

你什么都没有看见，我说道。你只是在蜂窝前站了一下就要准备逃跑。风从院子那边刮到打谷场上。蜂窝被风一吹就动了起来。你因为害怕，就跳到蜂窝上了。

我把蜂窝拿在手里，你说道。我把蜂窝的皮层一个一个都撕破了。而你当时坐在梯子横杠上。

我从梯子上下来了，我说道。我们拿着蜂窝坐在草堆上休息。你捏着被踩死的马蜂翅膀，把它从蜂窝里拽了出来。

风把鸡赶走了，咔嗒一声门关上了，你说道。

我看不见你手上的马蜂，我说道。

它还没有死，你说道。它还不停地摇头。一只翅膀像箭一样斜插进它的身体里。脱落的腿还在空中乱抓。

可它现在死了，我说道。

没有，你说道。它伸腿乱动，碰到我的手指皮肤。腿在发抖。身体在发抖。马蜂的身体一舒展，就拍打着翅膀想飞。它的体内受伤了。疼痛或者别的什么折磨着它。它躺在这儿。它的腿交叉着缩在肚

子上。它的身体缩成一团。翅膀在抽搐。它刺得皮肤发痒。它被折腾得不像样子，被剧烈的震动震坏了。它呼吸着，肚子起伏不停。你能听见那翅膀发出的咝咝声。疼痛或者不管什么感觉都让它很难受。它叫出声来了。它在地上打转转儿。它真可怜。它不停地甩着身体。它伸展身体。它伸直尾巴，而且

洪水

一个人站在河里，我弟弟说道。他站在卵石中间，低着头，双臂下垂。他从我们坐着的河岸走向河床，脚踩着石头慢慢地朝水面走去。因为我们离他很远，所以感觉他好像临近波涛：他只要再往前走一步，水就会淹没他的膝盖，再走一步，河水就会把他全部吞没。然而，他并没有离水那么近，而是距河水好几米远，站在一片积水前面的鹅卵石当中。实际上，他肯定能听见我说话。

他听不见你说话，我说道。要不然，他听见你说话，只能像听到流水碰到树枝发出的声音那样。如果你大声喊，他就会转过身来。

不，他说道。他会吓一跳的。如果他转身太快，就会从石头上滑倒。

他究竟在看什么呢？我问道。

我不知道，我弟弟说道。我只能看见他背面。他的脸庞轮廓泛着阳光，我什么都看不出来。

他疲惫地张开了嘴，我说道。他的脚是干的，走过石头，站在那儿，在河床上睡觉了吧。风的气流包围了他，模糊了他的脸。

他没有睡觉，我弟弟说道。他在望着水面。

他从这儿跳下去了，我说道，他夹在水壶和气垫中间跑到水里了。

他没有跑到水里，我弟弟说道。他慢慢走过石头，在鹅卵石当中停下了。

拉住我的手，帮我走下去吧，我说道。我要去找那个人，问问他在那儿看什么。

来吧，我弟弟说道。

走路小声点儿。他会转过身的。

他听不见我们，他说道。他正两臂交叉在胸前，手放进外衣里取暖。他站在那儿，望着什么出神。

太阳下山了吗？我问道。

太阳？我弟弟问道。

天突然变得很冷，我说道。

你走到阴凉处了，他说道。

是河对岸的树荫下吗？我问道。

不是，我弟弟说道，是这个人的影子。你的脸在这个人的阴影下面。

这人在干什么？我问道。

他在看一块石头，他说道。

他没有转过身来看看我们吗？我问道。

他一直盯着那块石头，他说道。

是一块有棱角的石头吗？我问道。

那块石头是圆的，我弟弟说道。石头的下半部分在一片水洼中，河道里有一条水沟通向这片水洼。石头周围的水清澈见底，平静得就像快结冰一样。我能看见河底淤泥里的斑点闪光，一根腐朽的树枝从淤泥里伸出来，树枝顶端被一根布条缠住了。

里面没有动物吗？没有螃蟹和蚯蚓吗？

里面有一只蚊子，我弟弟说道。

蚊子不动吗？我问道。

它在转圈，他说道。

它死了吗？我问道。

是的，他说道。

如果它死了，那这水一定是活水，我说道。

涨水了，他说道。

为什么会涨水？我问道。

发洪水了，我弟弟说道。

这是一条河，我说道，不是大海。

这就是大海，他说道。这是大洋。

这是河，我说道。我们是孤零零的。没有人站在我们前面。

是的，他说道。我们是孤零零的。我们从河岸走过斜坡，来到河床上，站在鹅卵石当中一块石头前面。石头上半部分还没有见水，上面的槽纹就像蜗牛壳上的曲线。上面有干泥巴。除了这些，什么都看不见了。

也许有一只蚂蚁，我说道。

有两只，我弟弟说道，两只蚂蚁。它们爬上岩石，在上面爬来爬去。从飞机上看，它们像蚂蚁。它们在向我们招手，呼喊着。

那是孩子吧？我问道。

是的，我弟弟说道。他们趴在岩石上，紧紧抓住苔藓。一个孩子站起身来望着水面：这水是否还要上涨？他对另一个孩子说道：我什么都看不见。我冷。

我也冷，我说道。

穿上我的毛衣吧，我弟弟说道。

我们还是回去吧，我说道。

不，他说道。

怎么啦？我问道。你喊什么？

看这水，他说道。

大声一点，我说道。有马达的噪音，我什么都听不懂。

水上涨了，把他们俩挤到一小块地方，他说道。一个孩子拖着另一个朝这边走来。水又停了下来。从它本身看不出有什么动静。一个稻草屋顶在水里忽上忽下地摇晃着。屋顶摇晃时，屋脊上的气象标快速旋转着。下面的风肯定很大。屋顶的稻草从椽木上被掀起来，衣柜里的衣服都被水冲了出来，漂浮在水上。水把屋顶淹没得倾斜了，完全变了样。

孩子们在干什么呢？我问道。

他们在说话，我弟弟说道。

他们在说什么呢？我问道。

他们在说水，他说道。

他们还有多大的空间？我问道。

你可以在上面走三步，他说道。他们伸直腿并排坐在一起，双手平放在身边的岩石上。他们坐的岩石下面就是水。水清澈平静。这时，他们大声呼喊着。我从他们那黑乎乎的脸庞看得出，他们是朝我

们呼喊的。一个孩子的鼻子流着血。这个孩子只有右脚穿着鞋，同样用脚尖朝我们示意。我看见他左脚上穿着皱巴巴的袜子。另一个孩子光着双脚，那踝骨都挤在了一起。

我们的绳子呢？我问道。

我们忘带绳子了，他说道。

那水怎样了？我问道。

水还包围着他俩，他说道。他们坐在当中的干地方，正在小声急促地说话。忽然，他们抬起头，往上看着那个气象标。它现在停下来时，他们才听见它嘎嘎地响。我们在上面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时，水正好从一个地方漫了上来，浸湿了一个孩子的鞋底。虽然天黑，他们看不见水面，但俩人立刻停止了说话。不过，他们并没有互相催促，而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倾听，张开着嘴。这时

不，我说道。

这时，我弟弟说道，从黑暗处漂过来一头死猪，慢慢地从孩子们身边漂走了。他们无意识地抬起胳膊，用手背揉揉眼睛，望着那头猪。猪肚子摇摇晃晃地浮出水面，上面的奶头又白又亮。它碰到屋顶上，在屋梁上蹭了几下，又继续向前翻滚着漂走了。一头猪，一个孩子惊奇地对另一个孩子说道。是一头猪，另一个孩子也惊奇地说道，并舔了舔嘴唇上的血迹。当他们坐在那里说那头猪时，方圆大地从水底产生了震动，波及乡村和森林，而我们却没有看见。

我们回去吧，我说道，我们回去吧！

一下子，他说道，一下子，一下子涨水了，水涨起来了，水一下子涨起来了，涨水了，水一下子涨起来了，涨水了，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那那那那那

不！我说道。

那么现在，他说道。

死马蜂

它闻着有一股烧焦的火柴棍的味道，我说道。它闻着有一股嚼碎了的面包味。它闻着有一股洪水过后的淤泥味道。它闻着有雨中着火的味道。

背旅行包的人

中午时分，某个地方的房屋和其他建筑物都处在清澈沸腾的水中。观望的人在房顶上能看见红色屋瓦下面人们正生火烧水，也能看见水波在闪烁颤动。家家都在为午餐炖肉，熊熊的烟火把水烧得直翻腾。房顶上，沥青路面上，停放的车顶上，都闪烁着水花。水吞没了脚步声。有人就待在外面那儿，与众不同；他满面愤怒，抬起胳膊斜着挡在眼前，走路时用力跺着脚。虽然他嘴唇煞白，被牙齿咬掉了皮，瞳孔焦黑，水流进他那张开的大口，经过隆起的舌头，也流进他的喉咙里，可这个不停脚步的行路人却无法把水咽下去。他根本就没有走路：他不是在走路，而是被洪水慢慢地向前推着。街道上一道道泥土是水里交错缠绕的水草。纸团在地面上悄无声息地滚动。还有从一辆车上掉下来的一堆草料。沥青路上的毛虫爬在生锈的铁栅上，尽管肢体还不时拱起、伸长，但自己已经动不了，而是铁栅迫使它们的肢体蜷曲和伸直。它们的蠕动是借来的，就像泥尘、草料和纸团的运动一样。

这里，这个行路人已经把那个地方远远地抛到身后（因为在一个地方的居住区，街道上是没有爬行动物的），只有水还在沥青路面上沸腾着，一直延续到天边。不论这个行路人走多远，天空都在不断扩大、延伸，水也包围着他。他身穿深色衣服，肩上背着一个镶着皮革边的黑色旅行包。他的眼睛无法朝两边张望，同样也充满着愤怒，瞪得圆圆的，眼球从眼窝里鼓出来，呆呆地望着前方。他听不见自己的脚步声了。即使有人走近他，也听不见他在软软的地面上走路的声音。看见他的人会觉得他像纸一样在地上飘动。这个人不可能坐在路沿上；即使他想坐下来，也不可能向后收起两腿，稳稳地坐在路沿石上：不等他坐下来，不等这个背旅行包的人明白怎么回事，那滚滚的洪水就已经把他的身体推向前去了。

那张纸在沸腾的水里没有立即漂浮起来。它逐渐被那翻腾的热浪撕成碎片，卷在漩涡里，一片一片地从水底向上翻滚着。

路边的草已经发霉了。电线杆上的一圈柏油爆裂开来流淌着黏液。电线杆里的嗡嗡声钻进耳朵里，就像马蹄声一样。

在那目光背后，憔悴的眼睛也显得很无奈：视网膜防护层后面的记忆所创造的图像被火焰熔化成一片迷茫和眩晕。这个行路人迈着步子，心中的怒火油然升起。

他的兴奋是从下面穿过脚底迸发出来的。旅行包在地上投下高低不平的阴影，显得短小而臃肿，这阴影在他身后剧烈地晃动着。当观望他的人不得不走近他时，这人脚底粘的沥青自然逃不过他的眼睛。看那情形，他似乎愿意一直独行，一直走到下一个地方。

当滚滚洪水迫使他不得不把头缩回脖子时，他发现头顶的整个水面无边无际地蔓延成大火。

另一次，他发现他走过的地方在这场熊熊大火中消失了。

中午时分，敲钟的槌在敲打木头。

汽车在路上发出沉闷的刹车声。

如果你仔细听，你会在旷野中听到太阳打哈欠的声音。

锅里的水开始完全沸腾之前，锅底就出现白亮的水泡：水珠滴落下来，有这样的说法。

思想也随着阴影萎缩成一团。

父亲经过走廊时，把最后一句谚语掺到了他的骂人话中。

疲倦

有时候，我坐在这儿，感到困乏无力。正好我松弛的胳膊触到了座椅下面的圆木框，木头扎进食指和拇指中间的皮肤上。我正好还听见柜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水池里散发出开水烫死蚂蚁的味道。房间被描写得比较凉爽。外面一群鸟紧贴着栅栏低飞过屋顶。可是后来，我的双腿不由自主地伸直了，慢慢拖着地面，而鞋底在木地板上留下划痕，说明我已经累了。头沉重地落在靠背上。

忽然一下子，身体似乎被蜡封闭了。不知怎的，屋顶上传来鸟叫声，柜子的咯吱声变成了嚓嚓声和沙沙声。先前，耳朵还细听过发电厂电缆的声音。而现在，那沉寂的电缆依然如此寂静，简直令我感受不到这种寂静。那些声音和气味聚集在皮肤上，却没有渗入皮肤里。身体似乎被蜡塞满了，疲倦得一动不动。我坐着，思绪油然升起。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我忘记了我在房间里等待开饭的叫声，我忘记了我自己，这是由于我感觉不到外面的任何东西，我的身体僵硬了。没有声音能够吸引我的注意力，思绪驱使我游荡在无人的荒漠中。那不是我在思索什么，而是我心中产生的思绪。

我看见一些从来没有见过的地方和画面，它们在我的心中川流不息。发黑的香蕉皮丢在一条满是尘土的乡间小路上，这让我感到惊奇。我对香蕉皮里面发黄的纤维丝感到惊奇，还对那里一只白肚皮小鸟扑腾着翅膀闪过的影子感到惊奇。

可是我还没有睡觉。流动的空气里传来各种声音，循环往复，越来越大。那些声音生硬、冷漠，就像一群苍蝇的脑袋碰到僵冷的皮肤上一样。我坐在这里，听到这些声音，不知它们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是从人嘴里传出来，就是什么东西从外面传进来了。然后，碎石子在我坐着的空房间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由于声音吵闹，我把头从座椅靠背上向前抬起来，抬高以后又猛地落下，落下的时候耳边响起呼呼的风声。

还有那些先前聚集到皮肤上的声音现在渗入到体内。起初，那些声音平滑地贴着皮肤飘走了，可是后来就黏附在皮肤上，然后就变得越来越尖硬，越来越锋利，一个劲儿地往皮肤里钻。响声融化了蜡，也驱散了人的倦意。那声音现在如此贴近，耳朵都能分辨出响声，而那响声就是我的名字。听见那呼唤声，我又把头从靠背上抬起来，手也松开座椅的扶手。那呼唤声依然显得那么平淡无奇，可是（现

在），当外面走廊门打开时，那声音就会传向四周，传到空中四散消失。

妹妹的叙述

她看见吉普车的灯光在墙上晃动，就跑下来进了大厅。女人们正在那儿为死去的弟弟作祷告。她们一听到消息就赶来了。弟弟的脸面和身体都已经洗干净，也穿戴整齐了。可是，她并没有向吊丧的客人们讲吉普车越来越临近的事情。她转过脸，面无表情地走向柴堆，用毛刷在一个以前用来喝水的杯子里蘸了水，随意地把水洒在那高低不平的床单上。床单遮盖着淹死的弟弟。她又回到那靠墙的长凳前，并拢双腿坐在长凳上，瞪大眼睛朝大门张望着。这时，女人们坐在桌旁叽叽喳喳地唠叨着。她们只管上下翻动着嘴唇，也不管对方爱听不爱听。最后，她们那没有声音的祷告，尤其是女人们在合唱时还不停地说着话，听起来不像是活人在说话，倒像是来自地下的死人。女人们说话时，双手搭在桌子上。她们的身体随着合唱的均匀节奏前后摇动，用茶杯把儿在用盐擦过的桌面上磨来磨去。

直到现在，她们还没有穿上深色衣服，也没有围上黑色丝头巾，而是围着桌子挤在一起，裹着高高的绑腿，毛袜子上还粘着泥点。她们是听从安排跑来的，坐在桌子旁。她们听到消息后，就放下手头的活儿，裹上衣服和头巾，冒着越下越大的雪赶来为死去的人做寿衣，张罗着死人需要的东西。做完这一切，天就黑了。她们围着桌子坐下来开始祷告。其中一人问起什么来，其他人马上也像她那样抬起头来窃窃私语，议论着如何回答。后来，第一个人在回答问题时低着头，当她又抬起头来时，就收回了她的问题。

她望着大门，我妹妹说道，女人们当中显然没有人听见吉普车停下来的声音，更没有人想到她们会立即中断祷告，便在一起窃窃私语，还时而悄悄地观察她。但事情却不是这么回事：她们专心祷告时，并没有感觉到院子外面发生的事情。在大门口，有警方的人出来干涉，不加解释，显然不让人进来。一时外面发生了争吵，耽误了一些时间，所以她误以为自己开始也许听错了。可是随后那些当兵的磕掉皮靴上的雪，迈着沉重的脚步进了走廊。

大厅的门已经消过毒了，吊丧的人和我妹妹都在那里。不知什么原因，钥匙松松地斜插在门的锁孔里。

当兵的抬起担架，胳膊肘和担架扶手碰到了墙上，不过，祷告的人还是专心致志，并没有因为这清楚的声响而受到惊吓。

他们带着我穿过走廊。她说，一个给抬担架的人指路的嗓音很特别，让她感到惊异。她急忙从长凳上站起身来，向房门走去。或者换一种说法，她说得更确切些：门忽然开了或者门打开的情形似乎把她吸引了过去，为什么，她自己也不清楚。这时，她叙述道，还有第三个人和第四个人在门口跺了跺脚。

她问我，当你正把手伸向门把手，或者当你的手已经抓住门把手时，忽然门连同你的手被从外面推开了，那松松的钥匙也从门上掉了下来，你该怎么办呢？

那女人走了进来，默默地请我入座就餐。

开始吃饭

父亲默默地坐在厨房里，窝着一肚子火，脑袋深深地埋到报纸里，其实并没有读报。我用膝盖把桌子朝前顶了顶，在桌椅之间腾出空间，就挤到他对面坐了下来。他妻子走了又回来，没有注意到他的手指和展开的报纸，漫不经心地把白色桌布铺到桌子上。父亲默默地把胳膊连同报纸抽回来，骨碌碌地转着眼睛看着她把桌布铺平展。等她在桌边四周夹好了夹子，他手拿着报纸又把胳膊放回到桌子上，拇指把报纸捏得紧紧的。随后，我听见报纸中缝被撕开的声音，他才松开手，报纸落到了我手上。我慢慢地挪开手指，他假装读的那张报纸就滑落下来，平展地落到桌面上。这样的情形无疑触动了他，他要么前倾身子伏在桌子上，以便能够辨认出那一个个字母，拼读出那一个个符号，要么又把手伸向前，随之把报纸拿过来，再把椅子向前靠近桌子挪一挪，因为他不想流露出一副轻蔑神情，仿佛他在全神贯注地阅读，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似的。最后，他把胳膊肘压在报纸上，双手支撑着下巴。他妻子一手托着盘子，拇指压在盘子上面，另一只手

端着汤锅，像走钢丝一样来到桌前。我盲目地向她伸出胳膊，扶着盘子放到我面前的桌面上。丈夫心里窝火，执意看着报纸上的报道，而妻子则把汤碗推到报纸下面。可是他一声不吭，坐在椅子上只把身体直起来，嘴里吧嗒吧嗒发出响声，把那些没有说出的话都吞咽了下去。我听见这声音，也照着他的样子，像他一样收拢双腿。妻子把圆木垫放到桌子上，然后把锅放到木垫上。而丈夫则不顾这些，一直读报纸，甚至连水蒸气扑到脸上都默默地忍受着。于是，她开始把汤从锅里盛到盘子里。她盛满一勺汤在报纸上面等待着，丈夫一动不动，她就又把汤盘抽出来，把一勺汤倒在里面。尽管有汤水溅到丈夫的背心上，可他还是一声不吭。直到他听见前面和身旁有人吃饭时，他依然没有打算停止他的事情。两个人不停地吃着盘子里的东西，而他还的确有理由蔑视他们。他们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让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是不是该让他眼看着他们花他的钱吃饱肚子呢？于是，他收拢起报纸，眼睛骨碌碌地四下乱转寻找什么。妻子起身拿起报纸，向橱柜走去。我伸手去拽桌子下面桌布的缨穗，它们洗过之后变硬了，粘在了一起。这时，她又回来，一声不吭地坐到我们当中。丈夫这才把身体靠近盘子。当他把勺子送进嘴里时，热气蒙住了他的眼睛。他正喝汤的当儿停下来，又阴沉沉地、气势汹汹地四下张望。妻子也收起双腿，脚尖顶在地面上。所有准备吃饭的人都把脚紧紧收起：所有的脚围成一个三角形，形成一块空地，当中有一块磁铁发出两道光。丈夫把勺子放进汤里，拇指用力一压，手腕一转，盛出一勺汤来。我们也学他的样子。与此同时，外面院子里的墙脚下一大群蚂蚁排着长队向厨房窗户爬上来。是因为我们已经吃饭了，还是因为丈夫在发脾气，我们当中没有人说一句话。

消气

一个正吃饭的人会发脾气吗？

通常，久而久之气就消了。一个发脾气的人吃着饭，心里的气会由于吃饭越来越大，或者始终保持不变，或者随着时间逐渐减弱，而不受吃饭的影响，或者由于吃饭气消得更快，比时间的作用还大。甚至也许由于一顿美餐，他会立即窒息而死，先前还生气的人面孔会表现出一种满足感。

如果发脾气的人吃面包，而这面包已经干硬发霉了，面包屑和面包皮老扎破牙龈，这样他就会心烦意乱地冒火气，就开始更用力、更任性地嚼面包。愈来愈猛烈地吞咽预示着他的情绪在膨胀；大拇指在鞋窝里弯曲着那愤怒的脚会腾空而起。不过幸运的是，发脾气的人并没有吃这样的面包，而是喝着美味的高汤。再说，他吃饭的房间也几乎不受别人发出的响声干扰，身边都是最亲近的人。他们为了不惹他心烦，尽量小声地喝汤。这样，当他大发雷霆时，就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

开始，他还是按照往常的习惯俯身贴近盘子，手拿勺子刚盛上汤，嘴唇就贴在边沿把汤吸进嘴里了。可是现在，因为太安静了，他听见汤溢出勺子滴落到盘子里的声音就感到不舒服，牙缝里总是发出吱吱声，嘴唇吧唧吧唧的响声也让他很难受，甚至每一次吞咽时，喉咙里咕噜咕噜的声音也会让他想到别的东西。

面对这种情况，他吃东西时还会发脾气吗？在这极其安静的房间里，吃饭声音带来的难堪不能转移他那激动的情绪吗？

最后，他为了不让别人听见他的吃饭声，就先消除自己心中的怒火，然后正襟危坐，开始和他们搭讪，比如说起一只长翅膀的蚂蚁从敞开的窗户飞进来，摇摇晃晃地落到厨房地面上。尽管厨房里只有垃圾和土，那只蚂蚁头朝前想钻进一道缝里，然后又回过身来想钻进土里。

蚂蚁

每年夏天都会有一天，很多蚂蚁从土里爬出来。在这一天之前和之后，只能偶尔看见几只蚂蚁，一只跟着一只在墙上爬行。这一天，你正好贴着灰墙从窗台溜到院子里，手上和裤子上都没有感觉到有蚂蚁。可是还没等你走开，你就听见它们从地缝里爬出来。你环顾四周：你看见液体焦油从下往上蔓延到墙上，你看见焦油上漂浮着灰色的碎石片，你看见那些碎石片翻滚着飞到窗台上，压在这群蚂蚁的背上。尽管你走上前去，你也分辨不出一群中的这只或者那只。这都是些长翅膀的蚂蚁，你看不见它们脚下的墙了。你离开时，还盯着那群蚂蚁顺着墙不停往上爬。你看呀，看呀，目光死死地盯着，最后简直

看花了眼。厨房的窗户还敞开着。你喊叫一声，就有人来了。来到窗户跟前的人把双手搭在窗台上，俯身靠在那儿。他吃完饭后还感觉困倦，把手夹在木板里，抽不出来了。于是，他弯腰站在那儿，双手被夹在里面。当他看见蚂蚁爬过来时，就喊出声来。这时，蚂蚁爬到他手指上，爬过手指上那稀疏的汗毛，爬过节骨之间凹陷的地方，爬过血管和手臂上的汗毛，顺着卷起的衬衣袖子往上爬。你估计他可能会转身就跑，在厨房里乱甩胳膊，把胳膊在门框上、桌子上、灶台上蹭来蹭去。可是，他却站在那儿一动没动。他伸出那黑乎乎的、爬满蚂蚁的胳膊，关上了窗户。蚂蚁群不停地顺着衬衣往上爬。一些长翅膀的蚂蚁飞了起来，飞到他的脸上。然后，你还可以看见外面的蚂蚁聚集在墙上和窗台上：它们成群成堆地往上爬，后面的蚂蚁把前面的挤到窗玻璃上，越堆越高，有多少只腿滑脱了，多少只脑袋被挤得弹回来，还有多少只蚂蚁向外喷溅体液，你听见蚂蚁拖翅膀的声音像水的沸腾声，像湿漉漉的草坪上水气的嘶嘶声。它们在窗玻璃前聚集成黑乎乎的一堆。你既看不见厨房里的东西，也听不见里面的声音：眼前的情形让你看花了眼。如果把房门向里打开，你就会瞪大眼睛，看见一道黑影在行走，并沿着墙爬上窗户。于是，你使劲摇头，结果你的眼前全是黑影。你认得出那双拿着搪瓷壶的手，你从那双手上认得出那件邋遢的衬衣。在那张聚满了飞蚂蚁的脸上，你认得那出着粗气的鼻孔下面熟悉的八字胡。

这个人没有用两手端着壶，而是用纸巾包住壶把手，一只手轻松地把壶端起来。当他把壶嘴向下时，你就能看见空气在上面翻腾。然而一开始，壶嘴里既不冒热气，也不出水，好像水在里面粘住了一样。后来，一股水终于喷了出来，浇在蚂蚁堆上。这个人又马上把壶放好推向一边，低头观察着窗户。你可以看见蚂蚁群里冒着热气，微微发光，那被烫死的蚂蚁的味道钻进你的喉咙里。你克制着自己，观望着眼前的情形。你看见还有更多的蚂蚁涌向窗户，而且上面那些死蚂蚁被下面的挤上来又掉下去。这个人走向一旁，拿起水壶，端起壶，把滚烫的开水浇到蚂蚁队伍中，浇到窗户玻璃中间和墙上。然后你看见他用拳头敲玻璃，把领头蚂蚁驱赶到窗台上。他放下水壶，朝你转过身来，让你跑进屋里。在厨房里，你看见一个女人正不慌不忙地往大锅里舀水；你就从桌子上拿起一只杯子帮她舀水。你们用抹布和一块破窗帘布包住锅把手，弯着腰一瘸一拐地把锅拖到外面院子的人跟前。你到了外面，才想起来炉盘上那些缩小的星星点点，想起了地板缝里那些伸直了的、被踩碎了的星星点点，还有盘子和碗里，本

来已经盛上了可口的饭菜，而准备吃饭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动手，还有那些被浸泡的、脱落的肢体，像老鼠屎一样，散发出酸味。到处都能看见那些蚂蚁身上脱落的残缺翅膀。你们把锅放在窗户前面，你从锅把上把抹布拽了下来。当你准备用抹布往墙上拍打时，你发现抹布里也有这些被压碎的蚂蚁肢体。正好这个人给你使眼色让你离开。于是，你就走到台阶上去了。你坐下来，看着这个人正在弄死蚂蚁。他先把壶底塞进锅里，把它灌满水后再拿出来，胳膊提着壶掠过空中，随后把水浇到墙上。这时，你听见蚂蚁群还一直在涌向窗玻璃，还以为听见了蚂蚁咯叽咯叽的声音。你呼吸时，也把那股呛人的酸味吸进了你的喉咙。你看见那女人站在旁边：她没有在观望，她也没有朝你看：她就这么站着，正如人家说的，手扶在腰上，哪儿也没有看。或者说，她往哪儿看，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他现在不用再去管它了，她对这个人说道，他真的用不着再管它了。可是他不肯放手：他一意孤行。因此，他越是一再重复实施这样的动作，它就越发与他格格不入，就越发自成一体，就越发变得顽固不堪。他把脑袋俯在锅上方，将壶压进水里，然后把开水浇到蚂蚁群里，再把壶压进水里，再把开水浇向蚂蚁群。这时，你看见两只带翅膀的蚂蚁（也许还更多）粘在他的脸上，他似乎根本无所谓。别的蚂蚁经水一浇便顺着墙往下流，零零碎碎地流到地面的缝隙里。然后，这女人迈着平静的步子走到男人和窗户之间。虽然他已经停止了那一上一下的动作，等在那里看，但还是一脸呆滞的样子。他望着她，问了她什么，她没有回答，却一转身拿起那块破窗帘布去揩拭滴在窗台上的水。于是，他松手把水壶放到空锅里。他用脚把沙子从院子里踢到墙脚，把地上的缝隙埋住。他把沙子抹来抹去，用脚踩平踩实，直到地面干了为止。他还注意着那女人的脚，以免踩伤她：这些我都看在眼里了。后来，他脸上还粘着蚂蚁就走了过来，坐在我上面最高的台阶上。

突然，我听到别处有人在说话。他的额头上有什么东西，我听见女的说道。男的还一直在说话。可后来他也感觉到皮肤上有东西：一只蚂蚁，我听见他在别处说道。但是，他不敢把刚才割肉的刀子搁在盘子边上，用手背去打额头。他连嚼东西也停止了。尽管眼球转来转去，并且抽动着皮肤，但是他的眼睛却一眨都不眨。他嘴里的东西让脸部鼓鼓囊囊的。在雷雨来到之前，他的面部骨骼和那些灰白的房屋颜色一样，泛出暗淡的光。他不敢动眼皮，或者把上面的眉毛朝额头隆起。那没有吃掉的东西在他的耳边留下一道静止不动的黑影，颧骨的光泽变得模糊了。如果他不用唾液把食物咽下去，不用这个动作让

整个脸部都动起来把昆虫吓跑的话，他还能坐多久呢？因为这不是一只蚂蚁，我弟弟说道。

停下来，我说道。

不，他说道。

停。不停。

停，我说道。

不停。

停！

好吧，他说道。

不，我说道。

停下来，他说道。

不。

因为他继续吃着，因为他继续说话，“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因为他把手抬到额头时嗓音只有一点变形，说话也慢了下来，他的脸肯定只被一根烧焦的草茎尖儿划了一下。

门

“那座房子里有五道门。”

过去和现在，那儿的房子都有五道门。过去，我曾穿过这些门，现在我同样穿过这些门来到我的房间。过去和现在，这座房子都建在

城市的高处，我从城里可以往上走到这座房子里。第一道门是围墙大门，我走进大门，经过门房，可以来到院子里。然后我横穿过院子，走进房门来到屋里。现在我在前厅里。第三道门是双开门，我进了这道门，就从前厅来到走廊里，顺着走廊可以在房屋底层转一圈。我穿过这个长走廊来到双开门，可以从底层来到楼梯间。最后，我经过顶层的走廊走到我的房间门前。

于是，我从下面的有轨电车走向高处的围墙大门。我提着一只皮包，皮包的颜色我认不出来，但是我相信那是深色的，因为它在阳光下闪烁着黯淡模糊的微光。我一步一步地走着，后脚跟着前脚向前走，一只手又拿拐杖又拿提包。我走路时，空闲的手指抓着衣服下摆。我还没有走到大门口，就听见一个人从我身旁走过，超过了我。他走起路来步态轻盈，硬朗有力，我看得出他的眼力很好。他从我身旁走过，也许他不是城里人，也许是从某个居民比较密集的地方来的。他走路穿着厚厚的硬底鞋，鞋底还钉了铁掌。他身上散发出山羊的臭味。他会比我早些走到大门口，所以我更是不慌不忙地走着，还把皮包夹在颏下，拉开锁扣，似乎要在里面找什么，手就在包里翻腾，就这样在别人面前佯装找东西，并借找东西这个由头，走得更慢了。可是随后我听见，虽然这人已经把门打开了，也没有什么阻挡他走进院子，他却抓着门把手，一直站在那里等着。我心想，他在等待有人从里面穿过院子走出来，比如某个政府的人物出来，请他进去。所以我也停住脚步，站在那里等着。可是随后我又听见这人也站在那里，一边等待一边望着我。于是，我合上皮包，假装把找到的一张纸匆匆塞进衣服口袋里，快步从这人身边走过，进了院子。当我经过院子时，我听见这人在我身后用脚尖和双手关上大门，随意地靠在门房窗口，然后操着乡下口音，问了一些熟悉的、一般生人来访都会问到的问题。于是，我尽量争取时间，穿过院子向屋里走去。因为走得急，我开始一瘸一拐，裤子还不停地拽腿。我听见这人对回答询问的人道了谢，便跟在我身后走过来。他一边慢慢地走着，一边环顾四周，审视着院墙和人家指给他的大门。他甚至还停下脚步，回头看看他问的那个人是否向他点头示意，他走对了还是走错了。我原本有时间走进屋里，可是我也停住了脚步，因为裤子被风吹得紧紧地裹在腿上了。碰巧，这人正迟疑地看着我，随后从我身旁走过，走在我前面，急匆匆走向屋门。我跟在他后面，他却停在开着的侧门后面，看着我怎么走。于是，我走过他身边，进门到了前厅。我一声不吭走在前面，直走到那扇双开门前。然而，侧门自动关闭会让这人感到很纳

闷，他用力关闭侧门，可是门却反弹回来，这让他感到惊讶，因为他不了解这种自动关闭的门。不过，他并不在意这种反弹门：他没有停步，从我身旁走过，迈开大步，在我前面打开了门。他向里推门走进去，同时抓着门把手，抽身出来，然后尽量让门转回原处。我在自己这一边也让门转回到墙面才松手，以免门弹回来碰着脸。然而，门并没有反弹回来。这个人站在我对面，始终彬彬有礼地伸出胳膊为盲人扶门。我不说话，脸上也没有表情，而是鼓着劲儿从他旁边进了走廊。墙上装有栏杆，保证屋里的人走路安全：当这个人松手放开门时，我感到身后气流的冲力把我推向前面的栏杆。我停住脚步，然后沿着墙往前走，也听见了这人的脚步声：他鞋上的一只铁掌坏了，走在石头路面上发出咯咯吱吱的声音。我迅速转身向右（或向左），走向通往楼梯间的门。另一边，盲人们扶着栏杆，弯着腰，缓缓地走向大厅吃饭。这时，我停了下来，听见对面那些盲人排成长队缓缓走过。我听见他们慢慢地走动，脚下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他们踩着八字脚，脚底板完全着地，小心翼翼地把他们那熟悉的和陌生的身体转过来。他们转过身，手不松开栏杆，沿栏杆排成一字形，高声激动地议论着他们碰到的这个农民模样的人。他们不认识他，互相大声地询问情况。这时，他走到门口，目的是想打开这门。当他打开门后回头向走廊望去时，他也许看见有一个人跑了过去，耳朵朝门，胳膊抬起，五指伸开探路；他也许看见这位盲人独自扶着旁边的栏杆快步向前走。这人耐心等待着。他拉开一扇门等着我过去。于是，我友好地走过去，并向他道了谢。如果我走过长长的阶梯，他肯定也在那上面，还会把门打开。我们一起走上阶梯。因为他总是沉默不语，所以我也一声不吭。我们愉快地走到顶层，然后，就不得不分手，分别走向两个方向了。我走我的方向，他朝另一个方向望了望，却跟在我的后面走来。如果他认识我，他就知道我在哪个门前面停下来，然后走上前去为我把门打开。我们在走廊里一前一后越走越慢，我在某道门前停住，站在那里等待着。他快步走上前去，插在我和门之间，嘴里嘟哝着门牌号，然后继续嘟哝着向前走去。我就跟在他身后。

诱骗

你的手伸开五指，离水越来越近。因为你预料到手要浸入冷水里，所以手上皮肤就提前收缩，汗毛孔都封闭了。不等手浸入水中，你就得先做好接受寒冷的准备，在你毫无感觉的情况下，让手指尖的

皮肤收缩起来。同时，手离水越来越近，受水的吸力作用，手上产生了一种骨头的重力。手指尖上的重量不断增加，这重量硬是要把手拽进那充满诱惑的水中。手入水之前，皮肤上的汗腺就紧绷起来了，潮湿的皮肤便没有了皱纹。水把皱纹抹平了。其实，并不是手指尖的重量把手拉下水的，而是因为你感到水冷，水本身在手上产生了重量，把手指尖往水里吸。这时，你会不假思索地伸出胳膊，伸开手指，走向水桶，好让冷水浸透你的手。你走得离水越近，你手上的骨骼就会生出一种拉力。那种拉力来自于你的手所期待的寒冷。正如你所想的，你的汗手伸到水里，水如此冰冷，近乎于要结冰的程度。在你走向水之前，或者正在走向水的路上，你的手会不知不觉地去适应那种你所预想的寒冷程度。

你还是一直漫不经心地把手伸进桶里。

可是，桶里的水被火烧得直沸腾。

饭后，餐具都脏了。为了让餐具在下一顿饭时又干干净净的，一般要用温水甚至烫水来清洗餐具。在此之前，已经把水壶、或者至少一口盛满凉水的大锅放到炉灶上了。此外，在电炉烧水时，还有一个铁皮盖子，盖住壶水冒出的蒸汽，好让水烧开沸腾起来。

这时，所有用过的餐具都堆到灶台的水池边上了，需要时随手可取。圆橡皮塞子被塞进水池里，壶里的水也倒进水池里。手颤抖着把白色粉末撒进水里。开始，那粉末还是干干的颗粒状落到水面上，不过很快就被水浸透，变成粉雾状溶化到水里了。把一块破抹布缠在手指上，就开始洗早餐用过的杯子、煮牛奶的锅和沾着咖啡渣的壶。杯子里残留的灰白色咖啡皮闪烁着流进水里，还有那凝固了的糖渣在慢慢溶化。用钢丝球把奶锅里鼓起的一圈厚厚的奶油擦掉。粘在锅上的奶皮泡在水里呈淡蓝色、褐色和淡黄色，一块一块地从锅底翻腾上来。一股热腾腾的水从壶里流出来，一点一点地冲刷掉锅里的残汤。干净的器皿都堆在水池的第二个筐子里。另一只拿抹布的手已经伸过灶台把脏盘子端了过来，洗完杯子后空出来的第一只手立刻又伸进水里，两只手就在水里碰来碰去，这只手抓住盘子，另一只手用抹布转圈擦洗，盘子就这样洗干净了。汤锅里的油花子被撕开了，顺着盘子

边流进水池里，胡椒粉粒从盘子底翻腾上来。于是，胡椒粉、油花子和奶皮子一起翻腾着，流进那浑浊的脏水里。

没有拿抹布的手把洗净的盘子拿出来，一个挨一个地排列到水池边的另一个筐子里。然后，洗掉平锅里干硬的洋葱，用刀子刮掉粘在上面的油污，用刷子刷掉锅底上乌黑的调料残渣，把平底锅架在干净盘子上面，然后又把汤锅放进水里转来转去，用力擦洗锅壁上干硬发黄的饭渍，用钢丝球擦掉锅底烧焦发黑的东西。最后，把洗净的锅放到干净的杯子上、盘子上和平锅上。

接着，她又把搅拌器放进洗碗水里。她手指缠着抹布伸到钢丝中间，把钢丝又是撑开，又是弯曲。就这样，手指从搅拌器的把手到圆鼓鼓的钢丝头上，把糊成一团团的东西捋到水里。随后，她就把这东西竖在那些干净的锅碗瓢盆中间的一个空当儿。接着，她依然忙个不停，又擦洗砧板缝里的肉渣，那是剁生肉时留下的。她用指甲把木槌齿缝里的肉渣抠出来。然后，她把木槌和砧板都放在那一堆洗干净的东西上面。

然后，她把盛着剩酸菜的碗泡进水里，结果水池满了，直往外流水。从水底翻腾起清亮发绿的颜色，那是醋的颜色。胳膊伸到碗下面捞刀叉时，菜根子翻腾上来溢出了碗边。她把捞出来的刀、叉、勺抓在一起，放在左边洗净的一堆餐具的缝隙里。另一只手把水池下面的圆塞子拔了出来。尽管她的手在晃动的水里没有动，但是水往下流时，就显得手在往上移动。她胳膊周围的脏水急促下降。同时，那只空着的手立即拧开水龙头，喷出来的水把所有的残羹都冲走了，饭渣、酸菜根、肉渣、奶皮、土豆皮等顺着胳膊流进下水道里。

一切就绪了。可是如果想从餐具下面拿一个杯子喝点什么的话，事情就麻烦了。洗碗的主妇表示反对，并且说道，如果有人饭后已经休息了，就会被这声音打扰。为什么要用杯子呢？她愤愤地问道。干吗要动这些东西呢？盘子、刀叉、汤锅、平底锅、搅拌器、碗都堆在一起，动辄全都会塌下来。难道还要再挪挪地方，把这些东西放在水池边的另一个筐子里吗？如果你渴得要死，这女人说道，你也可以用你的空手接水喝，要么从那边的柜子里拿一个杯子，要么用你面前桌子上的水罐，要么用我旁边灶台上这个搪瓷杯。你为什么要喝水呢？要么你根本就不想喝水？你只想听这些器皿打碎的声音？要么听摔碎

的声音？那么，要我帮你吗？要我帮你把这些器皿打碎吗？当然，我说道。她假装吃惊，猛然大笑起来：来呀，她说道，过来呀。我懵懵懂懂，不知所云：到我这儿来呀，过来，你不愿意到我这儿来吗？

“每一次，”在描写中这样写道，“当一个女人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为什么，无论怎样，无论什么时候对我说，让我去她那儿（过来，您到我这儿来，您来呀，来呀），或者问我是否愿意去找她（你| 您到我这儿来吧，您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想到我这儿来），也无论她多大年龄，我都被这样的话吓住了，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午休

在这个季节里我父亲习惯饭后休息。他独自躺在大厅的床上，手放在身体两边，脸朝着窗户。他总是张着嘴睡觉。他外出之前，总是久坐在桌前沉默不语，手里还端着空盘子，闷闷不乐地把目光投向身边的人。他透过心灵看人，那眼光阴沉沉地令人忐忑不安。他用鞋底交替拍打着地面，同时松手把盘子重重地放回桌子上。不过，桌布很厚，下面的油布能缓和冲力，所以击打桌子的声音就变得平缓了。这又令我父亲明显感到不快。他想到了别的什么，猛然站起身来。平静被打破了。他内心烦躁不安，起身向屋后面走去，急促而鲁莽地挽起袖子，抹到肩头上，又弯腰回来，嘴里嘟哝着什么。他的手粗暴地抓起烟斗，便去休息了。

然后（当这一切都过去以后，当事情发生了以后，后来，以后，事后），然后他（这位盲人）完全失明了，还要去那个地方等班车。

马蜂

她，这个人的妻子，在妹妹以前的房间里休息。这里的空间是这样被描述的，房间里很亮堂，窗帘并没有挡住阳光，而是让阳光进来，使光线更明亮。不过，衣柜肯定不是敞开着的。她躺在床上毫无睡意，她像平时休息那样躺着，自由自在地休息。她也没有必要，或

者说有必要慢慢地、或快或慢地脱衣服，等脱了衣服之后再把床铺好。她躺在床上，舒展身体，但双腿弯曲着。她穿着衣服躺着，她一直穿着衣服，鞋子除外。那鞋底朝上，是乱扔在屋里的。然而，尽管她这样蜷曲着腿休息，但这种情形并不能说明她没有休息而在想着别的事。

她穿着衣服。她和丈夫一样都在休息，直到现在也没有挪动一下。她始终一动不动。她的双眼总是快速向窗户瞥一下。她把胳膊放在胸脯上，双手交叉摸着肩膀。她望着，笑着，笑出声来，朝别处望去。她没有把胳膊放在胸脯上，因为就在这时，她从脖子下面把胳膊从两边抽了出来。她也没有伸展胳膊，而是让胳膊松弛地垂落在身体两侧，手心逐渐向上张开，好像她只要张开手转动一下，那比手背更白亮的手心就会给这房间增添一片更明亮的光芒一样。既然她的眼睛是闭着的，那么她就是睡着了。或者说，她闭着眼睛，眼皮不停颤动，让人明显看得出来，她还是在假装睡觉。还有让她不能完全安静下来的，那就是耳朵总听见外面、屋顶上、屋顶的椽木上发出讨厌的咯吱声。她的手指干燥，松弛地搭在被子上张开着。或者说，如果她躺在地板上，那么手是搁在木板上的。不过她是躺在床上的。她的脸也是干巴巴的，头发上还有一股厨房泔水的味道，闻着像干鸡毛味，而头发根却散发出一股烟味。嘴角绷得紧紧的，或者说冷酷无情，嘴唇紧闭，似乎长到了一起。而在嘴里面，那是阳光照不进去的地方，内唇的皮肤肯定是潮湿的，柔软的。嘴唇外面这一道干硬的表皮被阳光晒得粗糙干裂，围着嘴一圈，让嘴都干裂得咝咝作响。不过嘴上可没有流血，只是出现了一道白色的干皮肤。嘴唇上有一道干皮裂开了，粘在紧闭的嘴上。然而，那下颏颤抖的动作则向上延伸，使眼睛下面粗糙的皮肤也跟着抖动起来。这一抖动又让额头冒出汗水和光泽，一直到两鬓的头发根上。耳朵还能听见咯吱咯吱的声音，耳边的头发散发出一股湿鸡毛的味道。这时，她的嘴嚅动着张开了，厚厚的舌头来回翻动着，似乎要把下颏窒息闷死。

这女人静静地躺在屋里睡觉。

不！连这个“不”字也不是她说的话，因为她什么也没有说，而是把话压在心里，一声不吭。可是在屋外，一群马蜂围着蜂窝疯狂地飞来飞去，发出嗡嗡的叫声。嘴唇焦灼干燥。女人的手指现在不再干燥了：她的手指湿了，紧紧地抠着床。表面上看，这女人并没有入

睡，因为她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不停地翻来覆去。这还不够，她顶着另一股力量挤到一边，结果身体坐了起来，勉勉强强地用手脚支撑着。在这种情况下，她怎么（这就是她担心的）能睡着觉呢？满脑子马蜂的嗡嗡声，自己还紧压着大腿，皮肤都粘在了一起，里面又湿又热，这样她怎么能休息呢？这也算是她的担心。

因此，便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她伸开四肢平躺着，终于感到满意了。这时，她膝盖上的伤疤露在外面。可她不需要什么标记，她没有伤疤，这只是那长满皱纹的皮肤，只要她把膝盖靠近身体，皮肤就会自己平展起来。可现在有必要让这个膝盖和另一个膝盖永远顽固地分离开来，让她觉得那带着泥土味的舌头贴紧上颚，让她展开双臂，随之横着紧紧地贴在床沿上，并且这样充满好奇地垂望着她那张饱经沧桑开怀大笑的脸。由于她伤痕累累地躺在下面，所以，你有必要仔细地观望着：她用胳膊肘撑起肩膀；她不时地坐起来；她又无力地倒下去，并且在自己上方挥舞着颤抖的手指，大口地喘着气。这时，那脚后跟——这取决于她躺在什么地方——不是蹬破了床单，就是大汗淋漓弄脏了木地板。你有必要仔细地观望着：她在压抑的呻吟中，张开那张陌生的嘴巴，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她瞪起鼓鼓的双眼，神情慢慢变得呆滞；她此刻带着真正的、而不是假装的神情进入梦乡，进入那焦躁不安的、不停抽搐和紧张激动的梦乡里。此时此刻，她的身体就像在水里一样突然从这梦乡里翻腾起来，而那粘着血迹的嘴唇不曾发出一点儿声音。你有必要仔细地观望着：她的身子猛然跃起，我的弟弟这样开导我说，又在空中被一阵剧烈的爆炸力震得摇来晃去。而当一群马蜂嗡嗡地飞向窗帘时，这股爆炸力并没有减弱，她反而抖动得更厉害了。这群马蜂都聚集到那散发着汗味的皮肤上，疯狂地把刺扎进肉里。不过，那是些小马蜂，他安慰我说道，是中等大的马蜂，他说道，比不上你的脚指甲那么长，也没有我手上的这么长，他说道。

因为他对任何人都没有好感。

这个女人

这女人像往常那样在房间里睡觉。她想怎么睡就怎么睡。正因为她在睡觉，她挡住了别人的路。另一个人靠墙坐着，想着该怎么办。风吹着窗帘，吹得别针碰到窗帘杆叮当作响，吹得窗帘飘来飘去。窗帘的飘动遮掩得阳光跟着闪闪烁烁，照射到我身上，也照射到这女人身上。她用手臂遮住眼睛，只露出一排牙齿，似乎从嘴里往外看。她缩起肩膀，向后一沉靠在椅背上：去镇上？她问道：现在？为什么现在去镇上？

她也可以弯下身子，望着这个一声不吭、倔强固执、多少还有些心不在焉的人。她可以望着他，双手交叉着蜷起腿，抬起膝盖靠近胸脯，并且把一只圆圆的膝盖头窝在下巴颏下面：他这样保持着这种经常被描写的经典姿势，她可以把脸转向他，从后面望着那颗在她看来长得畸形的脑袋。

她的嘴唇干裂，自从得了严重的恐水症以来，就出现了一道道竖直的干皱纹。而现在，她把嘴唇贴在手背上用力摩擦。她弯曲手指，从鼻子旁边顺着脸颊斜着抠出一道深纹。然而，这道深纹在皮肤上刚刚出现，上面就渗出了黑褐色的血迹。当她擦掉脸上的灰尘，或者无论擦掉什么时，就歪着脸，咧着嘴：为什么现在去？她歪着脸问道：你为什么要现在去镇上？

他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他站起身来，上身穿一件干净的白衬衣，袖子上还有熨烫过的皱褶。他下身穿着一条熨烫得笔直的裤子，站起身时，裤脚落到脚面上。脚上穿着一双厚鞋，犹如包在水泥里，身上也像凝固了一层水泥一样：他发现自己坐错了地方。他莫名奇妙地穿着这身衣服，像被拴住了一样。他在这儿显然是多余的。他想走开。他想从她身边走开一步。他想继续往前走。他怎么那样激动啊？是因为这身没有感觉的衣服吗？或者说，如果他感觉到了，而且感觉别扭的话，那么是否因为这身衣服在这一天这个时间，也就是不合适的时间，把他拴在这屋里呢？

他懵懵懂懂，又猛然看见一条布满焦灰的路，路上有发黑的香蕉皮，上面忽闪着一只白肚皮小鸟的影子。不，他没有睡着，或者说，至少他的意识还是清醒的：当他还坐在椅子上听到她问话（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时，不，他没有听见谁在问话，而是只听见这些不知从哪儿来的问题本身冲着他。这时，一个声音刺入那些嘈杂的声音

当中，而他在这种状态下弄不清楚是什么声音。虽然他听见了这声音，却说不清是从哪儿来的。他在想：当时就是那样。而且他还很开心地想：当时我就坐在那儿，我听见了，我想，在这个时间里，那响声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是过去的事了。可是现在（他在想：现在），他想起来了，他当时是坐在床上或者椅子上听见那声音的，现在他听出那是钟表报时的声音，是大厅里钟表报时惟一的一声。他继续回忆到，响了第一声之后，那声音刚把他的手从膝盖上震下来，深入到他心里把手从膝盖上，不，是声音本身把手从膝盖上震下来的，当手落下来时，接下来的两声则让他感到一种莫名奇妙的寒冷，似乎又把落下的手浸入沸腾的水中。然而，那种恐惧感集中到已经不属于他的手指上，而大脑却是完好无损的。现在，这些击打声几乎打在他那颤抖的手上。他把这些响声称为一刻钟的流逝，而手上的恐惧则深深地刺进大脑里。

他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在一个陌生女人的身边。这女人横躺在床上，身穿宽大的衣服，衣服的褶裥盖过了膝盖。她弯着腿，一双光脚触到地面上。这女人的头悬在床的另一边。她仰面躺着，望着上方的天花板。他想到这情形，就又感到一阵眩晕。从墙这边看不见她的脸，因为她的头悬在床沿下面，所以只能看见（是谁？他在想）那绷紧的脖颈和三角形下颌骨。从他的角度看，这女人没有头。她点头时，只见显露在眼前的一段脖颈和那柔韧的三角骨在动弹。那下巴像拐杖手柄一样，他在想，不，那脖子本身就是一块骨头，下巴就是这块骨头的顶部。

他和这女人有过关系。现在他想走开。有什么拦着你啦？什么东西在阻拦他走出去，顺着屋檐下的横梁走上台阶呢？他不需要什么，只需要拿起手杖，拿起来，伸直，根据头上屋檐的椽木探着路向前走去，探着自己的路。然而，他不能从右向左、从下往上离开，他这样为自己辩解道。尤其像他这样，什么都看不见，他补充道。

不，她没有横躺在床上，因为他没有听见她站起身来：更确切地说，她站着，而他坐着，在那儿靠着窗户，脸半遮在窗帘里，而并不是风吹得扣环丁铃铃地响。两重皱褶，他寻思道：因为四肢，这女人的衣服越显皱褶和柔软，而垂挂的窗帘则越显垂直和笔挺。

他没有听见她从床上起来。他也没有听见她离开这个地方。突然，她站在他面前，一句话没说就把他引到外面，紧挨着墙，沿着屋檐，让他放慢脚步，小心走过喀嚓作响的阶梯，穿过走廊，从正在那儿睡觉、嘴里还气愤地叽咕叽咕的父亲旁边走过，出了大门，老远就感到一股热气扑面而来，一下子走到阳光下，不过他没有停步，继续走去，因为时间在催促他。

他想着自己，就像想着另外一个人；他在想，如果有事情发生，那么发生在他身上是怎样的情形呢，就像在想着一件早已在他身上发生过的事一样；他有时候在想着一件早已在他身上发生过的事，就像在想着一件将要在他身上发生的事一样。那时，他的眼睛已经瞎了。

鹰

不是那条路。那么这是一条通往沙坑的路吗？不，这也不是通往沙坑的路；这是一条陌生的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路，一条不是穿过田野的田间小路。我曾经见过这样的白腹鸟儿，不过并不是在这个地方拍打着翅膀，盘旋在一根发黑的香蕉皮上方。我也看见过那根香蕉皮，不过不是在一条路上，而是在一道铁丝网篱笆的水泥座上。这铁丝网围着学校，后来有炸弹落在那里。我见过的这只鸟把影子投在剥开的香蕉皮上。尽管这香蕉皮在尘土里无能为力，但却在影子的剧烈摆动下又是翻腾，又是伸展。我看见这鸟站在沙坑边一棵树前，可是它并不像经常所描写的动作那样，在地上乱挖乱刨，而是望着树上，张着那“弯钩”嘴。我们看见它站在那儿望着那棵树。它摇摇晃晃地蹦来蹦去，蹦上小半圈，又转过头来朝树上望望，然后开始鸣叫起来。我们悄悄地溜过去，缩起脖子，听见它叽里咕噜的叫声，也看见它蹦了好长一段，拉下鸟屎，张开翅膀飞走了。我们扔出去的石头无声无息地落到它身后的沙子里。我看见过这鸟儿。我看见过它那熟悉的影子飘在一根发黑的香蕉皮上。那影子扬起灰尘，因为鸟的翅膀离得很近。那不是我现在所走的这条路：我没有看见路上有石头，没有看见这只皮鞋底，上面有一排裂开的穿孔，我现在就踩到上面，没有这个扁扁的罐头盒或者这只瓶塞，没有这被踩成尘灰的马粪，没有现在的这张纸，这也许是，不，这不是一封夜里淋过雨后变得又硬又脆

的信，也没有这条车辆滑板留下的印迹，光滑而已经变得黯淡无光；车辆滑板把高出地面的石头碾磨成灰白色。那不是我现在所走的这条路，我现在踩到一根腐朽的圆木上了；那不是这条路，我现在走在上面踩到一根空玉米棒子上；那不是这条路，在上面迈出下一步就会让我踩上一个空水泥袋；那不是这条路，它此刻让脚踩到一颗粗钉子上，踩到这颗螺丝钉上，踩到这个子弹壳上，脚尖又把子弹壳踢进草地里；那不是这条路，只要我此刻在上面迈出这一步后，接着就不得不迈着短促的步子，噼里啪啦地踩踏在那丢在路上的草料上。我越往前走，路上堆积的草料就越多，这让我感到离大路越来越近了。那不是这儿这条路，我在上面疾步朝大路走去：那鸟儿的影子曾经飘动在另一条路上。

我又看见它了：它现在没有飞；它静静地站立着，凝固在那黑乎乎的香蕉皮上。那鸟儿猛地飞下来。由于它俯冲而下，便吞没了腹下自己的影子；它靠着影子打碎了那香蕉皮，那也可能是一个腐烂的橙子皮。那里面被撕裂成一个个亮闪闪的流苏状火山口；从鸟嘴里掉下来的碎渣散落在周围，上面沾满了尘灰。然而，那鸟儿的爪子撕裂捣碎的并不单单是这只果子；我竭尽全力，也难以看见它用爪子刨碎什么，因为现在那拍打的翅膀把尘土扬到了自己身上，扬到了果皮和路上，如同在许多报道里看到的那样，灰蒙蒙雾沉沉地遮挡了视线，因此，无论我怎样努力去张望，我都无法透过那烟雾缭绕的昏暗，既看不清那片被击中的地方，也辨不出它周围的一切。这时，脚步催促并推着我踏上了那又烫又滑的柏油路。

太阳

如果没有人来的话，这对我来说无所谓，因为我就是这样想的。如果我想到那儿没有人，而且真没有人来的话，我对此也不感兴趣。我得告诫自己，这对我来说无所谓，即使果真没有人来时，那我也会无所谓的。尽管太阳火辣辣地烤着，但我还得这样想，这样想是让我对弟弟还没来要有个思想准备。如果这样去想，那我就会感到无所谓，因为之前已经想到他不会来了。这就是那大太阳，我在这烈日下不得不想到，我来了，可没有人从车里下来，或者，从车上下来的人我都不认识。因为我谁都不认识，所以那车对我来说就无所谓了。如果没有人来，那就无所谓了，于是我可以这样说，果真就没有人来。

因为我在想，只要有太阳在，会不会有人来呢，哪怕我觉得无所谓。就像他在那封信里写的，太阳在哪儿运行呢，目的就是不让人知道太阳在哪儿。即使那封信是空的，可太阳正在当头运行着，哪怕在那车来到之前太阳停止了运动。犹如我此刻在这儿走动一样，目的就是我不用停下来，因为事先已经想到了，好让太阳牵着我走。就像你在那封信里写的那样，为的就是没人知道，这就是那个所谓的太阳。比如说吧，尽管对我来说无所谓，可我现在可以这样说，因为他毕竟就站在那儿的阳光下。没有人来无所谓，因为我这样想了。因为我这样想了，所以，尽管太阳牵着我走，我对此还是不感兴趣。尽管太阳牵着我走，可我要是这样想的话，无非就是让自己心安理得了。不管它会不会从身旁疾速通过，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因为太阳毕竟在运行着，尽管我对它不感兴趣；即使事情发生了，那也无所谓，因为我就是这样想的。

星期天散步

第二牌手是最先在街上碰见他的那个人，虽然他是个木匠，但名字是按他死去的父亲的意愿给起的，名叫Koch[22]，因为他死去的父亲曾经在当地一个大镇子上当过跑堂。他头戴一顶宽大的遮阳帽向前走，帽檐一圈歪歪扭扭地下垂着，看上去邋里邋遢的样子。所以，从局部看，整个帽子可以叫做宽边软呢帽。他看见别人时，便停住脚步，但又没有完全停下来，就问起他想问的事。当然，别人会三言两语打发开他。这个牌手匆忙间竟相信了别人的话，因为他走过去时并没有往这边看：要是他和颜悦色地去回答他的问题，好让这个牌手心里完全清楚，不早也不晚地赶到那儿和他们一起会面，那么，仿佛他就会失去什么似的。那人匆匆走了，背上的衬衣看上去并没有湿透。他踉踉跄跄地走去，两条腿不停地探来探去。行进中，他一个劲儿点着头，竖起耳朵，空闲的手臂在保护着他免得碰到墙上。一个瞎子玩起捉迷藏游戏，但不是原地打着转儿，而是径直走去，因为他猜到了所要寻找的对象藏匿的地方。他保持着一个人在黑暗中去摸开关的那种姿势，却露出一副狡黠的神情，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情，一副统领盲人的威严。他紧闭眼皮，显得让人难以接近；由于烈日当空，阳光又把这种神情伪装得更为阴沉，让那些随后一起走近他的人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上前和他搭话。他老远就感觉到第一牌手和第三牌手，也就是先拍手的到来。最后，第三牌手终于迟疑地向第一牌手使使眼

色，并悄悄地问道，他们会不会打扰了那个人走路的步伐。看样子，要是一切没有弄错的话，这个盲人看起来有什么心事，仿佛他今天不是会耽误看电影，就是会耽误看足球赛似的。然而，当他们从旁边走过时，都一声不吭。要说这第三牌手，虽然他本人是靠掩埋死人为生，可他的名字却叫Räuber[23]，是随父亲取的名字，他父亲在战争时期被绞死在一棵白蜡树上。还有这第一牌手，虽然他自己是个盖房工匠，可也是按照他自然去世的父亲取的名字，叫Ausländer[24]，因为他死去的父亲曾经有过离开这儿移居到外国（失败了）的打算。或者说，他们只说些简短客气的话向他表示问候，好让他觉得没有受到打扰，像现在一样，一直冒失地走下去，并且没有东西扶靠（因为他没有穿那件可以用手抓着衣边的外衣）。于是，他踉踉跄跄，与他人毫不相干地误入街道中间；或者是那些在他的方向上行驶的车辆把他搞得晕头转向，不知道往哪儿走，最后竟然忘记了他正在走路。然而，这样走自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凭着脚下的感觉，让石头或沙子领着他走去。哪怕他会走错了路：可那些长眼睛的司机会看见他，并且立即刹车。这是一点；第二点，他走在运动场旁边，那儿有够多的人会朝他喊，提醒他，可我认为这是不必要的，因为他这是轻车熟路。路左右两边围着两排孩子，可他们在星期天不想给这个盲人制造一点麻烦，因为他们没有打算站成一溜儿堵在他前面，这是他们的一个习惯。他们的目光不会因为他离开足球比赛，别让他觉得他在他们心目中很重要。其实，虽然他是个骗子，人们私下也这样指责他，可要再说呢，那些骂他的声音毕竟还没有从其他声音里露出风头来，因为比赛继续进行着，比赛暂时拴住了人们的舌头，所以，如果他们现在才（好吧，我们一起来）开始久久期待的大声喊的话，那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那人（那个不中用的人）已经走远了，来到那块地界牌前。在这里，他听到那个代言人说话了，也就是那个还没有长大的屠夫的儿子，由同伴依其父而取的名，他第一个让那个站在近旁的人先说话，接着就是那些还没有长大的接生婆的儿子们，由同伴们依其母而取的名，他们眼睛离开那些精疲力竭的球员，一个接一个地传话，句句离不开一个修饰词，这个一说完，便继续传给另一个。这个盲人已经走过地界牌，此刻就再也听不见他们所有那些从鼓鼓的面颊里爆发出来的喊叫声。或者说，那些叫喊毕竟不是冲他而来的，或者很少与他有关。更确切地说，无论如何是冲着比赛场上气喘吁吁的球员，但是球员们并不在乎他们的喊叫声。过了地界牌后，盲人碰见了一群人。那是一群兴致勃勃地在外面散步的人；充足的睡眠使得他们显得

神清气爽。走在前面的是那位老师悲伤的女儿们，依她们刚去世的父亲而被称之为Traurige Töchter des Lehrers[25]，由一个中年男子陪伴着。他在这个地方的政府部门供职，事务不多，依其父母（他是在这个国家某地捡来的）而被称为弃儿；由第二个老师陪伴着，出于无法说清的原因，第二个老师被称为第三个老师；由女儿们的姨母陪伴着，那个老师，是学校的临时领导，被称为教育事业；由姨母的母亲陪伴着，按照思想观念，她被称为教会；由政府部门主管陪伴着，那个被选举出来的市民代表，被称为国家；此外，还有政府部门主管那些长大成人的儿子们陪伴，被称为同伴；此外，还有醉醺醺的医生陪伴，依其在心醉神迷中生产的儿子被称为Hausstock[26]，意思是白痴；此外，还有第二个老师那些正在成长的儿子们陪伴，被称为A、B、C；此外，还有宠物医生那些正在成长的儿子们陪同，被称为真实和虚假；此外，还有政府秘书那个正在成长的儿子陪同，依其父的谈话被称为战争；最后，还有庄园雇工那个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小儿子，依其父的谈话被称为和平。当老师那些悲伤的女儿们为了恢复精神，一边慢慢腾腾，一边喜笑颜开地走出这个地方时，所有这些人都寸步不离她们。这时，大家都无一例外地把目光都转向那个匆匆行走的盲人。盲人之所以这样，也难怪他，因为他无能为力啊（庄园雇工的儿子从后面插话说道）。其实眼睛瞎了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可无论这样或那样，听句善言恐怕还是必要的。可不管怎么说，尽管这些观望的人什么话都没有说，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让人给他领路，但事情只能全怪他了；他这样急匆匆地向前走，未免太可笑了（别走了！快停下！姨母的母亲气愤地叫道）。就在这时，那辆车扬着灰尘，非常准时地开到了这个地方。那个警察，虽然他没有携带武器，可人们还是这样称呼，他站在窗下，眼看着贝纳迪克特的儿子正要径直穿过尘雾，拼命地朝着那辆停下来的车跑去。遇到紧急情况时，他好赖能够从这儿一览这个地方。尽管他有些疲惫不堪，显得很狼狈，这当然是因为他在烈日下跑了好长一段路，可话说回来，他这样急忙跑向汽车时，还是给人留下了一种诚实可信的印象。起先，这种过度匆忙引起了警察的怀疑，而现在，这种印象完全打消了警察的疑心。况且就他所知，还从来没有什么对这个人不利的事情传到他耳朵里。电影院门前有两个男子，被称为Toto和Lotto，[27]拇指插在裤袋里。当他们其中一人还没有把身体转向开着门的汽车时，他们就看见盲人迈着脚步向前走去，显然想在开车之前赶上这趟车，于是他们停止了谈话，急切地注视着他的步子。当盲人穿过依然飞扬的尘土走上前去时，车上那

位司机把装着车票的袋子吧嗒一声合上了，挂到腰间的皮带上；当盲人（他是上来呢，还是不上来）在后面拄着拐棍走到排气筒前时，司机就把门朝里闭上了；现在，司机（快点儿，怎么回事啊，别泄气，别站着不动，他不大愿意，直走到车门口来，你只要走到车门口就行了），他现在可是等够了，于是踩下离合器，挂上挡，同时松开手刹。他一边松手刹，一边用力踩油门，最后松开离合器，汽车随之开动了。结果呢，那两个人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赢了；他们就是这样赌的，可是结果早就会预想到，也能预见到。

玩纸牌

有一次，他们玩纸牌时，我坐在桌子下面出不来了。于是，我就在那里睡着了。等我醒来，就看见有八只鞋和八条腿包围着我，成了把我圈起来的柱子。我蹲起来，用头往桌子上顶，碰得抽屉里的刀叉哗啦啦地响。我又猛地弯下腰，用鼻子嗅着这些玩牌人的气味，用耳朵听他们发出的声音，用手指去抹他们从分开的大腿间唾到地面上的唾沫。因为手在地上摸来摸去，所以就常常摸到那些透明的硬痰上了，那都是过去的星期天里留下的，偶尔摸到新吐的痰，也还以为就是过去吐下的。我心不在焉地蹲在桌子下面，脑袋晃来晃去想找一个出口：我认得父亲的鞋子，因为那解开的鞋带钻到脚底下了，鞋舌（像舌头一样）露在外面，两只鞋之间离得老远，而上面裤子里的膝盖却并在一起蹭来蹭去。这样一来，两腿之间就留有一个宽大的空间，往上逐渐变小，如果你想出去的话，只要一鼓劲儿钻过去，你似乎就自由了。我稍稍向后爬去，脚后跟碰到了第三牌手的鞋子。我正估量着起跑距离：大王！我父亲这样喊到。我猫起腰，准备从父亲两腿中间穿过去。这时，父亲正把桌上的纸牌拢到自己面前，膝盖用力合在一起，两只脚也立刻收拢回来，像老虎钳一样紧紧夹住了儿子的脖子：让这小子给溜掉了！他炫耀道，随即伸开大手放到那一摞牌上。他抹了牌，重新洗牌，胳膊都没有从桌子上抬起来，气也没有出一下，也没有松开夹着的双腿。他右手拿着一摞牌，左拇指不停地在下嘴唇上抹来抹去，把右手里的牌一张一张抽出来，然后再把剩下的牌插进左手抽出的牌当中，等他右边先出牌的人也把手放在那一摞牌上之后，便按顺时针方向开始转圈发起牌来。他现在改用右手拇指（以前他用左手拇指），把拇指在嘴唇上抹湿，然后舒展身体往后一靠，很娴熟地把牌发到每个人手里。我用力把头往回抽，耳朵向前翻

卷着，父亲倒没有阻拦。他跑不掉的！他向那个先出牌的人喊道，而这个出牌的人随即也喊道：我们会跑掉的！随之他的同伴也喊道：看谁笑到最后！接着，最后出牌的人低声问道，看他们还说些什么呢，并且不由分说地打断了别人的话。他的两腿合拢起来了，两边能钻过去人了。可我正要钻过去时，他却把脚蹬来蹬去。与此同时，在牌桌上，他眼睛嘲笑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镇静自若地出着手里的牌。我坐下来，望着上面的抽屉，抽屉背后还留着指头宽的一道缝：什么！我父亲喊道，完了！先出牌的人喊道，对不起啦！他的同伙喊道；可是，等着瞧吧！那个最后出牌的人低声警告所有的人。这时，我把抽屉猛地一下撞到他的肚子上，而他又把抽屉猛地推回来：这可不叫吹牛吧？他这样让其他人十分恼怒，让人家恼怒得连气都喘上不来。然后，他就打出王牌来。我听见他伸出胳膊把桌上的牌拢到自己面前，还没有把那些吃进的牌翻过来或者盖住，就拢成一堆翻来翻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过了一会儿，先出牌的人喊道；他坐在靠墙的长凳子上，尽管说话时抬起了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却帮不了我。我靠到一个桌子腿上，眼睛盯着他同伴的袜子。那样的玩法显然让他的同伴很激动：真的！他在我头顶上对着桌子喊道，这背后有什么名堂吧！不过，当他把这话说出口时，就把脚向前一蹬，正好蹬到我的脸前。我赶紧后退，爬到中间。我躺在地上。我转身趴在地上。我缩起身子，准备跪着转圈走。我跪着转圈走，肩膀老碰到围着我的腿。可是，这些男人对此并不感到惊异。我抓住父亲的双脚，透过脚踝朝房间里张望：我弟弟疲倦地蹲在床角回头望着。我给他使眼色示意我的困境，他却没有搭理，而是装出一副醒来后仍然睡意朦胧的样子，目光呆滞，望着桌子下面又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即使看见我的脑袋钻到坐着的人的膝盖中间，他也装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可就在这时，父亲突然把手里的一抹牌合到一起摔到桌子上，弯下腰，另一只手伸到桌子下面放走儿子，同时，在上面扯着嗓门，（换句话说）恶声恶气地说道：只要他坐在这儿，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私人住宅受到侵犯，不能遭到一个流氓、一个无赖的诬蔑。他继续责备那些在场的人，可是从接下来的话里并没有让人听出来，是谁或者什么事情让他如此懊恼和尴尬，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说完这些，他还不作罢，又再三叮嘱大家要竖起耳朵，提防如今有人向他们散布一些谎言和无中生有的事，比如，他一本正经地说道，某个邻居不得不监视别的邻居，丈夫不得不监视妻子，免得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自家的粮仓和圈棚全都给毁了。他又对他们解释道，因为那样一觉醒来似乎不是什么舒服的事儿！不玩了！他随之十分扫兴地喊道，满脸涨

得通红，露出极不愉快的神情。任何事情都要深入了解才对嘛！先出牌的人赞同地喊道。那当然啦！他的同伴也喊道。这可是你发的牌呀，最后出牌的人低声说，并且不愿意接受那无缘无故的指责。发得太糟糕了！先出牌的人接受了这个反驳。你这个局开得可好哇！父亲按顺时针方向继续指责着。开得好！同伴竟胆敢为自己辩解，仿佛一切都是开局惹的事！还有一句话！父亲厉声地对他说道。我们言归正传吧！最后出牌的人说道。言归正传！先出牌的人插了几句。别耽搁了！同伴说道。说不玩就不玩了！我父亲故意用眼睛把他们一一审视了很长时间以后，终于忍让着说了一句。我给弟弟打了一个手势。我又给他打了一个手势。我似乎又是结结巴巴地说话，又是给他打手势。最后，我干脆自己从下面用头顶住桌子，双手举过肩膀抓住桌子，把桌子顶了起来。我把脚后跟并在一起，脚尖在前面分开，大拇指使劲抓着。当我转过脸斜眼看胳膊时，我能看见衬衣里面肌肉在抖动。膝盖骨因用力变得发白，我看见脚趾紧紧地盘绕在一起，几乎支撑不住了。桌子刚离开地面，我就感觉到阴部因害怕而抽动，眼睛里顿时充满了泪水。我勉勉强强地把桌子连同四条腿撑着离开地面；要是大人们乐意的话，似乎可以把他们的鞋子踢到下面，这样一来，桌子就会落到他们的鞋上了。然而，当我艰难地把头转向弟弟时，桌子却滑向一侧，落到肩膀上了。我听见两条桌腿又斜着落在地面上。这时，我低下头，另外两条桌腿也落在地面上，又变成了先前的样子。只有我头顶上的硬币蹦来蹦去，发出丁零当啷的响声，后来那些大人们这样说道。该谁了？我父亲在上面喊道。是啊，该谁了？先出牌的人也喊道。我也问你呢！他的同伴也喊道。该你了，最后出牌的人镇静地提示道。我呀！先出牌的人喊道。简直把我搞糊涂了！他的同伴喊道，发牌吧，最后出牌的人低声打消他们的疑虑，他不让人说话了，结果他们都很生气，一辈子也高兴不起来了。

“隐藏”这个词

我想把自己藏起来。于是，我走开把自己藏了起来。我一边走一边想，哪儿能藏身呢。然后我在想，并不是我在走路，而是我身下这一双脚在走路；并不是我在考虑，而是我的大脑在考虑。这是因为，如果考虑到这双脚属于我，走路的脚是我的脚，那么走路的就不可能是我，那么正在考虑的大脑，作为我的大脑，也不可能是我，因为那是我的大脑，因为大脑是我的，凡是我的东西，都不可能是我。不是

我能在这儿考虑问题。我不可能自己藏身。我的大脑考虑过我能否在别人面前藏起来。可是我无法藏起来，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把自己藏起来：我不能把我自己藏起来。那么，我的身体也不能把自己藏起来。它不能把自己藏起来。不是我把我的身体藏起来，就是身体把我藏起来。可是我的身体不是我：这就是我无法把自己藏起来的原因。不过，我会让自己开心，我能让自己寻某事开心，因为我既不知道“我”是什么，尤其还因为我不知道（开心的）“我”是什么。我可以这样让自己寻某事开心，比如，我决定伪装自己，并装作毫不惊奇的样子，好像我知道我要干什么，准备在某个地方，在别人面前把自己藏起来，但由于血管害怕，双脚拖不动身体。我寻找东西开心，或者说，我一边寻找藏身之处，一边让自己开心，让自己得到消遣。我让自己消遣，我把自己藏起来，我问我自己是谁，所以我就装作我能不能问自己的样子。不过，我的身体是被我的双脚藏起来的。我不需要在我自己面前把自己藏起来，因为我看不见我自己；因为我失明了，也就是说，我的眼睛瞎了，也就是说，我的眼睛不是眼睛了，也可以说，我不存在了。可是，当我把自己藏起来时，我可以轻易地让自己开心，并且忘掉自己。

前厅

“在这个时分，可以看见电影院的前厅还是空空的。卖票的女人要为放映电影期间出租座位，她事先已经先到了前厅，满以为现在、也许开演前一小时会有一些人来，想走进这凉爽通风的大厅，到处转一转，看看那些广告画和照片，根据人物面部表情来推断是一部喜剧还是悲剧。可是，由于预期的人没有来（是什么原因呢？），她要么就在自己的玻璃房里睡着了，一只胳膊伏在付款台上，不出声地咬着嘴唇，另一只胳膊似乎由于睡觉的困顿，松弛地搭在身后的椅靠背上；要么就走掉了，离开时忘了把门锁上。大家都知道，前厅里很凉快，至少第一个迈步走进去的人有这样的感觉。然后，他可以在里面来回转悠，因为前厅里空荡荡的。里面静悄悄的，这个说法很合适。你可以先找个座位坐下来，然后再协调别的事情。当你把身子挤进那光亮的、涂着清漆的桌子和长凳中间时，手指尖在清漆面上留下四道汗印，印迹周围还有雾气。你靠着墙，夹在长凳和桌子中间，就可以考虑自己的事情。也许有人会这样做，而另一个人也许就不会这样；他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地坐在桌子后面。没有声音打扰这位坐着的

人，凉气从墙上吹下来让他感到很舒服，也从桌子下面吹上来，吹到他那散开的、似乎被他拧掉了的手指上。对他来说，前提条件是有利的：他现在坐这儿，他还有时间。因为他坐在角落里，所以可以这样说，他就在这儿把双腿伸开了；他在这儿可以摆脱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他可以充分利用从他进来到第一批观众进来后他不得不走开的这段时间，专心致志地思考问题，平心静气地理出个头绪来。他感到周围一片寂静（这是他回忆起来的第二个说法）。他坐在那儿回忆着往事，脸上的表情时而舒展开来，时而又很快紧锁眉头，神情严肃。如果不想事情，他就时而微笑一下，或者不笑，浑身热得冒汗，难闻的汗味不停地散发到桌子上、凳子上、墙上和周围的空气中。最后，那些来得早的观众敲门，那女人从玻璃房里出来，把他从前厅里赶了出去。”

警报器

电影放映员两腿夹着一个啤酒瓶子，手里拿着三层夹馅的面包片，嘴里也鼓鼓囊囊地嚼着。他躺在三张椅子上，或者躺在两张椅子和一个小坐凳上。他躺在后面花园的小房间里，喝完的啤酒瓶里还沾着泡沫，随地立在旁边，或者倒着放在下面存放空瓶子的地方，或者别的地方。他正睡觉，或者没有睡觉。他喝多了，或者说，他头脑清醒着。可是，不论他是在睡觉，还是没有，他嘴里肯定还一直嚼着面包。如果他真的一直睡到现在，那么他现在就不睡觉了。然而，即使他没有睡觉，他似乎也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因为他摇摇晃晃，很吃力地站起身来，离开他坐靠的桌子，把影片粘接好，再前去拿录音带。他是自己醒来的：他用手指拧开开关，结果影片一转动就碰到他的指甲，把他从朦胧中惊醒了。不过，如果他指甲上这种砂粒般的感觉还没能让他清醒过来的话，（这是第三种说法）放映室的喇叭和下面大厅里同时打开的喇叭都会在放映之前响起熟悉的音乐，足以把放映员从睡梦中吵醒。不过，他在两台放映机之间的盖板上来回转接的动作还是非常娴熟自如的；只有从那咯吱咯吱的咬牙声——牙齿咬动，颌骨突出，脸上现出阴影——能看出他用力咀嚼的动作，这是惟一能说明他醒来的动作。盖板敞开着横在他的头上，他透过小窗口望着下面大厅：他看见，座位一排接一排，那十五排（或多或少）靠背上沿的棱条时隐时现，屋顶毛玻璃后面的淡紫色灯光照在上面泛出蓝色，侧门上方的红灯照射在出口两旁发出橙色和紫色光。尽管音乐已经在呼

唤观众该入场了，可依然没有人走进大厅。没有门的那堵墙，这是第四个说法，墙中间的圆壁炉闪烁着金属的色彩。银幕和银幕前的平台在描写中暂且被排除在外了。入口前那宽厚的红帘子下沿被油污抹得黑乎乎的。每当外面有观众要走进前厅，或者有人要进来大声宣告什么，或者进来的人又成群离开前厅时，那帘子都笨重地晃动一下又回到原位。然而，在外面，值得钦佩的是，其他人还在泰然自若地聊着天。柜台旁那位姑娘正在叫卖自己的糖果；由于她的发音与众不同，所以，直到放映厅里，在观众类同的嘈杂声中，她的声音以及她所说的都可以凭着感觉听个明白的。不过，那个放映员因为嘴里啃着苹果，咔嚓咔嚓声灌进他的耳朵里，一点儿都听不见那姑娘在说什么。所以，在放映厅里问过他的问题还得一再重新提出来；这时，他把脑袋从盖板下抽出来，保持着同样弯腰的姿势，眼睛里装着那依然空荡荡的大厅，回身走出来。胶水味是怎么回事呢？那儿机器里的嘶嘶声会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又在用一把锉刀锉起那已经装进机器里的胶片呢？下面门帘对面另一位姑娘懒洋洋地跷起腿，一边用牙齿咯嘣咯嘣地咬着东西，一边伸出手准备检票。这时，上面那个放映员已经给自己那个坐在小凳子上的客人指定好座位，而客人则竖起耳朵才能听见他的解释。电影放映员和这客人从小就认识。虽然其他人员不允许入内，可这位客人则经常坐在里面，像放映员一样，一边嚼着东西，一边听着电影胶片转动的声音来打发时间。可是今天，他听见外面街道上乱哄哄的声音，自己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便问这问那。他的手刮着身后倒出来的胶片胶水留下的槽纹。当他把手放到脸前时，就闻到一股胶水和油漆的味道。大厅里还是空荡荡的。这位客人一边用纸巾擦手，一边问道，人们今天怎么了，怎么还不进大厅呢？

银幕上只能看见一幅无关紧要的定格，是为一种商品做的广告，下面的字幕包括这家商业公司的名称，是专门用有声幻灯片和扩音器播放给观众的。放映员耸了耸肩，这是最后一个说法。他用牙齿猛啃一口那只被阳光晒得发软的苹果，嘴唇上下都翻了起来，同时还说了几句回答问题的话。现在，那红门帘不停地鼓进来鼓出去，买了票的人很快有序地走进朝外开着的门，离开了前厅。玻璃房里的女人关上窗户，最后一个离开了电影院；她一直听着那乱哄哄的声音，但是并没有从走路动作和神态举止上流露出烦躁的样子。这时，放映员把头伸进盖板下面查看，脸像石磨，面颊像磨盘，下巴深深地支在锁骨上，半转身回过头，也许在和他的客人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肯定没有谈论什么。但是这位客人却变得话多起来，举动异乎寻常，

无拘无束；他从身后抽屉里摸出一个苹果，一边啃着，一边向放映员询问应急照明设备情况，弄得放映员不知所措。于是，他就诧异地反问，是不是这位客人随便问问而已。随之，客人便直言不讳地提出他的问题，如果胶片开始烧起来该怎么办呢？放映机里有一个开关，叫烧片传动开关，放映员给他解释着，一边说话，一边把手掌放在后脖子上向前搓着圈，一直搓到喉头上，就像抹去汗水一样，然后把手从纽扣之间伸进衬衣里。这个开关，他继续解释道，是由两个开关件组成的，它们借助一种火棉连在一起。一旦胶片烧了，火棉就会随之烧焦，防火盖便脱落下来，大厅里的应急照明，他解释道，就会立刻亮起来。应急照明不靠公共电网，而是靠一个蓄电池来供电的。放映员一边讲着，一边在衬衣里轻轻地挠着肚皮。那些相关的照明设备都安装在天花板上，确切地说，安装在两个带波纹的玻璃罩里，而且各有两个一定瓦数的照明灯，发出的白光非常耀眼。那么，大厅里一开始会不会一片漆黑呢？客人一边插话问道，一边赶紧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免得错过放映员接下来的解释。只要不是所有供电系统都瘫痪了，放映员反驳客人说道，墙壁踢脚板下面的应急照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直亮着的。不过，一旦供电系统出了故障，放映员一边走向开着的楼梯房门，把苹果皮吐到花园里，一边一本正经地承认说，比如不管由于雷电，还是其他突发事件，因为先前人只能看见放电影的光，这时，大厅里先前惟有放电影的光亮吸引着那一双双眼睛，就会一下子（一下子，客人也抢着说了一遍）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然后，他开始提到的应急照明灯就会启动，大厅里顿时亮得像白昼一样（亮得像白昼一样）。观众看电影时，眼睛似乎就不离开银幕，放映员形象地说道：黑暗突然降临，眼前顿时一片漆黑，弄得观众连头脑都摸不着了，不知所措，晕头转向，弄不明白自己是站着，还是坐着，是在空中，还是在水里。正因为如此，也就屡见不鲜了，放映员下结论说，观众为了弄清他们究竟在哪儿，或者就在现场，于是就开始吹口哨，乱喊乱叫，乱跺脚，仿佛这就是确信自己在场和存在的手段。然后，灯光一亮，那些瞪大的眼睛仿佛跟爆炸了一样，放映员又解释说：嘴里嚼着糖果和口香糖，他却立刻这样削弱了自己一番话的分量。那些观众此刻几乎就配不上这样的称号；当这些人去寻找糖果时，他们似乎找到的无非就是咽喉里有一种憋气的感觉，食道里堵塞和疼痛的感觉。为了证明自己的话，放映员用舌头舔了舔上颚，有一种空空的、发麻的感觉，意味着里面什么地方肯定还留下一块苹果残渣。他找到残渣捏在手里。可是，如果烧片传动开关失灵了怎么办呢？放映员不厌其烦地解释着：有一个应急开关和灯光室相连，借助

这个开关就会切断灯光室电源，于是，遮板随之落下来，胶片就免遭着火了。但是，如果紧急开关也失灵了，放映员还没等客人快到嘴边的问题说出口，便抢先说道，外面木阶梯旁边还有一个所谓的逃生开关，人们在逃跑中也可以关掉放映室的电源。太好了。可是，如果不是容易着火的胶片，而是座椅或者下面大厅的衣服着火了，比如在冬天，烧锯末的壁炉里飞出的火星点着了火，这难道没有可能吗？或者，我们不谈火了，谈点儿别的吧：难道那坐满观众的大厅里没有可能忽然落进一颗炸弹吗？

这时，放映员又猫起腰钻到遮板下面。也到时间了，他轻松地说道。他又听见下面前厅里熙熙攘攘的脚步声。当帷幕拉开时，还看见人们脸色苍白、默默地挤向大厅。大家还没有涌向出口，因为他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

不会发生什么事，这位客人走向楼梯房门，打断了那些愚蠢的想法。可是，由于他没有把别的想法说出来，放映员一边用指头从牙缝里掏着果肉，一边忙着别的事（机器里的胶片也在剧烈抖动），终究没有弄懂客人说话的意思。

人们零零散散地经过电影院前厅一阵乱哄哄的场面之后，都不说话了。可是由于一个奇迹的出现，他们在大厅里又开始说话了。他们把胳膊搭在空着的座椅靠背上，眼睛斜视着银幕，谈论着某个不幸，或者某个不寻常的事件或者发生在街头的事情。这种情形对这个放映员来说，肯定是无法理解的。

消息

他为什么这样急匆匆的呢？如果他听到什么事情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了：某处着火了，某人出了事故：如果他听到有事情发生了，却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或者，如果他没有听清有关事件的人的名字，那么他听到的事就会催促他赶到出事地点去。他首先把自己当做出事的原因，于是便寻思着，要么心急如焚，要么又像以前一样急火攻心。当大街上传来一阵笑声，而他却搞不清那笑声的来由时，他就急忙用手搓搓脸，或者搓搓衣服，好像他身上有什么丢人或耻辱的东西一样。然后，他发现，事情与他无关，或者与他本人无关，而是

涉及某个也许离他很近的人。那些一直成群站在街道两旁的人，没有一个敢站出来说话。即使他过来了，他们也没有必要停止说话，或者小声嘀嘀咕咕；他们要想迷惑他，照旧说话就足够了，或者表面上把说话变成一种激烈的争吵，争吵围绕着一场当地自行车赛的参赛人员。在说话人当中，其中一个和另一个为车手的号码争论不休，也许所争论的号码是不对的。他们转移他的视线，不让他注意真正发生的事件，恰恰是因为他从旁边走过时更注意到他们在说话。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尽管如此，他说话时依然表现出友好的样子，流露出那种一般称之为镇定的表情，通过这种方式把他们那些激烈的话语轻松地说出来。可是他们还一直在说那些自行车车手，他对此毫无兴趣。他没有让他们说的话给吓住：他弟弟出事了，因为当他费力地拖着双腿犹豫不前时，他听见人们在身后偷偷地把脸转向他。他从他们那坦率明了的说话声调中听得出来：仿佛一直在说那双伸出来的空手。可现在却让一只手随着另一只手落下来，而嘴上并不费力，继续说着他刚才也一直说的话。他在行走中一再停住脚步等待着。这样也许可以给他们勇气，他暗暗地心想。他觉得，一声问候或者随便一句无关紧要的话都是一个不错的表示。可他们假装没有看见的样子却让他不安起来，连手中的拐杖也差点儿掉下来。对此，他要找出答案。正巧，他妹妹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餐馆。

争吵

一场争吵挡住了他去妹妹家的路。太阳刺激人的情绪，既刺激人生来俱有的睡意，催人睡眠，却也刺激人生来俱有的暴躁情绪，让人吵架。烈日似火，刺激人的感官；感官又刺激人生来俱有的暴躁性格。这种性格刺激双手，让吵架的人手指也跟着颤抖。

争吵是小范围的战争，区别则在于：战争是在非人之间和国家之间进行的，因而有血有肉的自然人只是被当成工具。然而，在简单的吵架中，吵架的人自己主宰自己的意志，并不是在战争中必须服从非人的仆从。

格斗一般被描写成战争的要素。格斗的本质是用一种暴力行为来制服对手，实现自己的意图。

从一般随便的口头争吵会产生动手的争吵，动手就是要制服对方。

一个人不可能和自己争吵，除非发生在心里的思想争斗。左手几乎不可能和右手争斗，一只眼睛更不可能和另一只眼睛争斗。但是，把格斗所要求的力量用在与自己不同的另一个人身上，这肯定是可能的；第二种力量为了与第一种力量相对抗，便采用技能和科学发明来装备自己。第一种力量也同样。

桌上的玻璃杯无疑是一项科学发明。争斗的人生来就有一双拳头。武力争斗之前所说的话，那种你来我往的口水仗，便是一种技能发明。

在餐馆里，人的行为是有规定的。由于使用了大量易碎的玻璃杯，所以各种活动都需要特别小心。如果有争执从口角和手势变成动粗的话，那么行为规定就被破坏了。在简单的争吵中所使用的力量，是把意志强加给对方（敌人）的一种手段。为了保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使敌方丧失抵抗能力：也就是说，这正是军事行动的真正目的。由于双方争执破坏了规定，首先会出现一片混乱景象。在这种情况下，一把椅子就改变了位置；其中一个吵架的人站起身来，猛地把椅子推到墙上。因为通常情况下，椅子是放在桌子旁边的。

反之，新规则只能是在打破旧规则的前提下产生。一场竞争的出现，是由于破坏了一项规则，同时又产生了一项新规则。没有规则，任何竞争恐怕都不会成为乐趣。

一场游戏的每个规则都是在打破了另一项规则之后产生的。一场没有章法的竞争一旦混乱无序，就会变成一种不真实的游戏。而由于没有规则，就不会给任何参与者带来乐趣。

如果两个争斗者之间展开一场公平的竞争，那么旁观者都必须遵守规则，除了呼喊外，不能干扰竞争者。

在争吵者周围，人们围成一个圈子。谁要加入进来，就必须站在圈内，而无权越过圈子。在这个圈子里，人们都用目光互相监视着；谁要是敢走进圈子，就会被人扯着衣服拽回来，好让中间那两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一个个问题就会免去了。那些已经上路的人返回来。低个子站在前面，高个子站在后面。

那个来晚的人是不许进去的。如果他用肩膀往前挤，就会引起别人的厌恶和反感；如果还继续有人来的话，那他就既不能向前也无法后退了。

在争吵还没有变成大打出手之前，出现了一阵宁静。餐馆女老板手托着脸，胳膊撑在柜台上，观望着事态。后面几排当中有人刚嘟哝了一句，她就竖起眉毛，让大家安静。

这时，吵架的人准备动手打架；他们互相绕着圈子，脚底下发出轻轻的声音。其中一个身体强壮，个子也比第二个人高，而且不可一世地炫耀他那强健的筋骨。他的手掌可称得上是铁锹，膝盖坚挺，裤腿里的腿肚子肌肉结实有力，胳膊似乎也伸得更长些，那一双拳头令人望而生畏。这人用一只胳膊就能紧紧夹住别人的脑袋，这在当地是远近有名的。难道他还能受别人的气吗？怀疑的围观者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另一个人可不一样，长期游手好闲，肚子变得松软无力，躯体也萎缩了，大腿和胸脯上明显堆积着脂肪，几乎没有人不觉得他今天喝多了，肯定要倒霉的。他能做到手脚麻利吗？当然，他的腿功还是相当厉害的。尽管他的身体显得瘦小，甩着胳膊，一副沧桑的脸上没有表情，不过，当对手想利用他的弱点时，他肯定是有希望获胜的。他也许能够以眼疾手快来对付久经磨炼的对手。所以，大多数人都站在小个子一边，并呼喊着催他出手，同时又扯着嗓子辱骂高个子，骂他是胆小鬼。

可是，格斗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不过，因为在开始之前，一切都不可能结束，所以在这种没有出现的开始之前，格斗无疑需要另外一个开始：一种准备格斗的开始，它表现在格斗对手离开座椅站起来，表现在格斗对手动起手来的真正格斗开始之前。在双方动手之前，这场格斗就结束了。

通常情况下，是由当权者来裁定格斗结束的，因为他们用法律的规定，又使得违法的格斗规定无效。但是，一旦权力机构出于私利不愿意对事件进行干预的话，那么这个被剥夺的权利就靠自己裁定了；如果受权的代表无动于衷的话，那么，每个人就可以认为自己有权来

主张自己的规定。因为正义是不会回避非正义的。常言道：每项法律规定所应该追求的正义都是盲目的：既然是这样，那么当一位盲人就要遭遇不幸时，为什么就不能主张自己呢？他在门口久久地挤来挤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伸张权利；他露出一副狂怒的、让周围人几乎认不出来的面孔，仿佛他判若两人，变成了一个看得见的人似的；他高高地抬起手臂，一边跺脚，一边吼着挤过人群，无所顾忌地闯进那些格斗者的禁区。

一个规则被一种无规则打破了。然后，根据约定俗成的传统，这种无规则偏离了新的争斗规则。于是，这个新的规则由于盲人的违规行为被废除了。如果没有什么其他规定的话，那么两次违规又推出了旧规则，尤其那个还会长时间停留在毫无内容的表面形式，比如说这种情况，这两个争吵的人只互相绕圈子而并没有动手接触，就让人觉得乏味无聊；由于乏味无聊，人们便寻求新花样，尽管有些观众还一直在议论这场争斗受干扰的事情以及争斗者那愤怒的神态。其实，那两个争斗者紧握的拳头早已经松开了；这些观众的议论大都在指责他们当中的那个盲人，就好像这场格斗片刻间陷入个别人的任意摆布，因为这盲人正在吞吞吐吐地劝说柜台前的女老板。然而，无论他说话怎样吞吞吐吐，就是一句话也不吐露给她：他带着满嘴的话，坚定不移和不可阻挡地从这群人当中挤过去，没有对任何毫不相干的人说一句话。现在，他开始对他妹妹说话，那是他已经自言自语说了很久的话。他的嘴唇不停地上下动来动去，舌头打在牙齿上，愤怒得嘴里直冒白沫，一席话从牙齿里喷涌而出。

这时，那两个争斗的人冷静下来，开始注意到他了。他双目失明，这是他的福分，否则他可能会倒霉的。他们又开始说话了，脸上的表情自然也就放松了：人有这样一副轻松的表情，是不可能争吵的。

他们一边开着玩笑斗嘴，一边相互骂来骂去，而那些观望的人齐声说这两个争斗的人都是胆小鬼；他们时而走向前，时而又散开，时而走到椅子跟前，时而又走开。所以女老板竟难以听清楚他哥哥在那儿说什么。她向他招手让他过去，然后又喊他，弯下腰对他说：这么嘈杂，他应该贴着她的耳朵说话。

她一只眼看着盲人。他急切地为自己感到惊讶，竟然连话都说不出来，便停下来；他惊讶得什么都说不出来，为什么连自己的舌头都不听使唤了。她另一只眼看着那两个争斗的人，低个子把椅子挪开墙，放回到桌子旁边，而高个子就像取得胜利一样，目光飞快地扫视一下周围，便猛地坐到一把椅子上了。女老板一只手扶在盲人肩上，用手指头在布满雾气的咖啡机上画了一张微笑的脸。

尽管如此，是Sacramento[28]，此刻站在桌子旁的低个子开始说道。是Santamaria[29]，高个子傲慢地坚持道。Sacramento更好，低个子又坚定地说道。Santamaria更好，高个子轻蔑地把烟头掐灭塞进铁皮烟灰缸里。你们当年看过萨克拉门托吗？低个子向客人们喊去，让他们作证：他无所不能。Santamaria，高个子拖着腔调说道。Sacramento。Santamaria。Sacramento。Santamento。Sacramaria。Sacramantia。Santamerto。Santrament。Santanto。Santro。Sand。Santamia。Santo。

战争并不是消磨时间。它是为了一个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严肃手段。它让一切事态更难以把握，并且干扰事件的进程。战争是偶发事件的领地。

梦

一天夜里，我听见弟弟回来了，躺在院子的柴棚里。我跑到房间里叫醒父亲：弟弟躺在那边的柴棚里。他回来了。我们起来去看看他吧。我正说话时，邻居们嘀嘀咕咕地说着话推门进来，围在父亲的床左右两边，面朝他躬起身。这时，父亲正躺着，醒来后便用胳膊肘撑起身子。然后我又听见人们纷纷议论，说我弟弟得病了。弟弟的病很重，我恳求父亲，而父亲只是望着我，我就来回走到邻居身边，一个一个地恳求他们，抬高嗓门，让他们行行好，赶紧去看看。我急切地恳求着，大声劝他们，心里着急得直搓手：弟弟病着躺在柴棚里，你们来呀，我们出去看看他，把他抬进屋里吧。可是那些邻居都戴着黑色的、留着花边的尖顶帽子，他们撇开我转过身去，聚到一起，诡异地议论着他们当中的那个人。那人静静地躺在干草袋上，穿着一条破破烂烂的裤子，他“就像猪圈栏板上的裂缝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那些酣睡的猪一样”，把大家的目光吸引到他那满是皱纹毫无活力的阴茎

上。我看见他的胸脯干瘦，没有汗毛，长着几颗大大的黑痣。肚脐周围有一圈污垢，像旧梳子上的污垢一样。看到这情形，我还一直在昏暗的房间里转着圈儿向男人们祈求。这时，我心中忽然冒出一股无法抑制的怒火和悲伤，不得不转过脸向别处望去。我看见窗外夜色明亮，一座从未见过的大桥横贯夜空，桥上有一辆大轿车正在行驶。那大轿车就像一些电器公司为展示商品特制的车一样。况且，那大轿车比一座村庄还长，比一列长长的货运列车还长，极目望去，怎么都望不到头。后来我又听人们说，刚才我弟弟在柴棚里不幸死去了。我当时在柴棚里，一眼只能看见扔在锯末里的斧头和堆得乱七八糟的木柴。可此时我放眼望去，却看见车轮似乎和一个同行的人一起转动着。或许只是我看见车玻璃后面的云彩在移动，并从云彩的移动推断出车轮在转动。我看见那又长又宽的玻璃外罩被一排新刨平的红杉木板沿水平方向从中间分成两部分，我弟弟在昏暗中躺在木板上，身体挺得直直的，直立着的鞋子从脚后跟起向两边分开。可是我现在看到的已经不是我身外的东西了，而且我也不可能不知道事情真是如此，或是我在梦乡里。地方的区别也不可能把我和所看到的东西分开，甚至人能拿折尺量出来的距离也做不到这一点。这也并不意味着，我得从我原来的地方走到我看见事情发生的地方，就能克服这种距离，更不用说我再用手指在汽车那沾满灰尘的铁皮上画上标记，来证明我曾经去过那里，证明我从一处挪到另一处了。我所看到的东西，既不是先用眼睛看见，然后经过大脑判断后给出一个熟悉的名称，也不是让神经感到愉悦或者不愉悦，从中也许产生一种感觉；我所看见的东西，并不是通过眼睛，而是由于那些无生命的东西本身在颤动。此时此刻，我既不觉得它们是异物，也没有感觉它们和我之间存在距离，因为仅仅由于我看见它们，它们就撕开我的血管，仿佛这种没有生命的东西，也可以说毫不引人注目，在为不用眼睛看它的人而痛苦地颤动着，并且在向看它的人诉说着这种莫名的痛苦；仿佛我心中那可笑的悲伤就是这些东西无法消除永无止境的悲伤，让邻居们双手拍着大腿，大声笑弯了腰：那黑乎乎的、棱角分明的橡胶轮胎面，胎纹里夹带着发亮的石子，那碰到玻璃上的昆虫留下的灰色干污迹，那屋梁上如同在水中一样缓缓抖动的遮篷，那从雾气中凸显出多彩的车尾上翻起的铁栅栏，那些缠在汽车保险杠和排气管上，拖过水泥桥面的干草。躺在我下面床上的那个人被称之为我的父亲，因为他曾经毫不犹豫地在我母亲身上把自己排空了。

咖啡馆里

如果有人喝醉了酒，他就走来走去，唠叨自己的故事。一个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故事，当他喝醉了酒，就会从一个桌子转到另一个桌子，然后唠叨个不停。他不一定非要喝酒或者服用别的麻醉剂才会醉倒。有时候，太阳也会让他心绪烦乱，变得神志不清，但更多情况下是自己无缘无故的疲倦所导致的。当他坐在人们当中时，除了面前这杯黑咖啡，他从不喝别的饮料。他的舌头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兴头上来，就忍不住走到餐馆里每个人面前，站在那儿，胳膊搭在一把空椅子上，然后从上往下向坐着的人唠叨自己的故事，好像有什么东西始终在逼迫他这样做似的。他心里一边构思故事，好让别人听得明白，一边用手撕破塑料包装，把小袋里的白糖撒到褐色咖啡沫上。白糖晶体一落到咖啡沫上，咖啡就立刻显出黑色。于是，只要现在从那空袋子里零零星星抖出糖粒来，每每落到咖啡沫上，这位观望者也就觉得咖啡是黑色的。也就是说，用不锈钢小勺子细心地搅匀咖啡。他并不开口说话。他期待有人走上前来询问他什么。他希望和随便什么人说话都行。他想说说壁纸的颜色，说说能写信的纸。他想听听自己的嗓音发出声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他还想让所有其他人都过来，坐在他熟悉的挨着衣架的桌子旁，然后一个接一个给他讲述那些让他们得意的故事。他向餐馆女老板提出一个要求：他让她端一杯水来；他要求她过来。他有要求，她就应该过来。他说明提出要求的理由是，她是他的亲人，所以她有义务，也许这是一条充足的理由。那封信在哪儿呢？他急切地问道。哪封信？我弟弟的信。你喝醉了吧？我想要这封信。你说谎。我弟弟汉斯写过一封信，写在布纹纸上，写在一张牛皮纸碎片上。他写在一个本子的软皮上，用的是铅笔，写在棉纸上，写在这张包面包的软纸上。你又说谎了。没有。他写信时坐在草地上，在池塘边一片茂密的草地上，在一片池塘草地上。他写信时，风从上往下吹拂着草丛。他想把草茎的影子描绘到纸上，可是你只能看见一些凌乱弯曲的线条，因为风不停地吹着，打乱了那草茎的平静状态。你一直在说谎，总是这样。他为了写信方便，把纸叠起来，以免铅笔戳破纸，因为那纸太薄了。他先试着垫在手上写，因为他想写的话的确很短。可是后来他坐起来，风把拳头下面的纸吹皱了，他就在一块皮革上继续写，一块被雨水浸透的皮革垫在信的背页上。然后，他伸手把纸夹在皮革上。他没有抬笔，坐着继续写，而风却把那湿透的纸吹得鼓起来。是的，他是在一只箱子的皮革上写的，一个提包的

皮革上，在旅行包的皮镶边上写的。铅笔滑脱弄脏了纸，他便乱画一气，写成自己的话。后来下起了雨，到处都很脏。或者说，一位走过泥泞草地的人用脚尖把水滴甩到了纸上。那是一只钢笔，那人用钢笔写下他的消息。信里的字母经水滴一泡，泛起了蓝色的圆圈。那是在一片茂密的草地上，他独自思忖道，当时天阴沉沉的。如果有阳光的话，纸很快就会变黄的。风从上往下刮，把草茎和树叶吹得直打转，枯萎了。这人头上的乱发也被风吹得忽上忽下。他身体后仰，躺在这茂密的深草丛中。这里，风把草茎吞噬了。他把手伸到弯曲的膝盖下面，那些只能听见的草茎阴影在脸上回旋飞舞着。但是，这不是你的故事；这是另一个人的故事。他自己的故事搞得他晕头转向，所以还一直模糊不清。他不想再朝妹妹走去的方向回头了，他想鼓起勇气，张开嘴，大声和她说话。可是，她却急匆匆地跑来跑去，把空啤酒瓶放到柜台下面的箱子里。她走向桌子，重新贴好那沾满水汽的瓶子上滑脱的标签。当她从一张桌子上拿起烟灰缸和玻璃杯、并用抹布或者围裙揩拭桌面上的水时，她从被货架挡住的镜子里看见自己手拿抹布，在桌面上由里向外缓慢地转圈，一直抹到桌沿儿画出一条螺旋线。她专门用托盘给他端来所要的东西，然后站在他的椅子旁听候他的吩咐，同时还望着身后的镜子系上了围裙。现在，他本可以拉着她的胳膊，请她弯下腰对她说话。他谈兴正浓，可以向这个亲人讲讲自己的故事。也许他一倾诉，那僵直的舌头就会灵活起来，随之他也会激动起来。可是他却神情麻木，只含糊地说了一句感谢送来饮料。后来（什么时候？），他要烟抽。当她用拇指打开烟盒，侧着身唠叨起生意时，他开始说话了：眼下生意萧条，没有人愿意从位子上起来，或者抬起沉闷的嗓门要点什么。因为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再说，她从他的桌子向外望去，门口和街道似乎都变小了，外面似乎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能够逃过她的眼睛。他歪着头听着，她把香烟塞进他的嘴里，并用打火机给他点火。可是，火也不能让他多说出一句话来；他只回想起来（或者他被提醒），有一次，一个打火机罩子里冒出一股蓝色的鬼火。他心不在焉，常常说漏嘴；他发不出来这个和那个字母的音，或者整个字都读不出来。他缺少每天闲聊的习惯。如果他过些日子在某个地方由于什么微不足道的事情听见了自己的声音，他就会跑来跑去，满腹猜疑地寻找说话的人。他那种表达思想的特殊方式（他思忖道）妨碍了他的发音。“是的，那封。”他说道。“你这是在瞎想呢。”女老板一边说，一边对着火吸起烟。“他们给了你一封。”他心不在焉，说话颠三倒四。“一封商务信。”女老板说道。“不，不是真的，绝对不是。”他说道。屋子里其他人也在私下嘀咕

他们说的话。在他的桌子旁，一个这样说，一个那样说，另一个又有自己的说法，每个人都说出他必然会说的话和能说给别人的话。谢谢，盲人终于忿忿地朝女老板说了一句，而她已经回到柜台后面，正在满是泡沫的水池里冲洗玻璃杯子。谁有残疾，谁就会用很多时间来说感谢的话。谁要表示感谢，那他总是回想起发生在自己身上一切。他思忖道，因为他的思想离他太远了，也因为这些思想也从未触动过他，所以他的思想让他在这家餐馆里感到无聊。不过，这里毕竟还是一个能寻找安慰的地方，他可以在这儿一直待到晚上。要是此刻在家里的话，他可是孤身一人啊，窗户也会关得严严实实的。再说，预告又有公共汽车很快就到。他可以迎上前去，上车去易伯塞方向。他走开，去易伯塞。他回家去。他待在这个适合他的地方。新来的客人疯狂地冲进餐馆，消除了他的内心矛盾。他以为他们是足球运动员。他们又是顿足，又是目空一切，又是相互扯来扯去；他们把椅子从空桌旁拉开，把这个盲人团团围住。这时，他们就大肆吹嘘他们当中的事儿。起先，当他们看见他默默无声而若有所思地坐在那儿时，就感到很新奇，于是就上下打量着他。当然，他依旧一声不吭，却轻而易举地顶住了他们的目光。可就在这时，最后一个人拇指勾着上衣，搭在肩膀上，在大街上就大喊大叫着进来了。所有的人都走上前来逼迫这个盲人。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习惯说自己的事。第一个怪声大叫，第二个不停咳嗽，第三个吹起尖厉的口哨，另一个嘻嘻哈哈笑个不停，把一只冷玻璃杯贴在脸上，还有最后一个，他赞许地敲敲盲人的肩膀，可是这盲人不论怎样都站不起来，也无法行走。这时，妹妹上前来帮他：她耐着性子走过来，眼睛盯着镜子，听他们所有人讲的事情，没有对哥哥说一句话，就帮他转身走开了。

他喝得醉醺醺的，来到大街上。他自问是否神志清楚。他自己点点头，完全肯定了这一点。他是从一家餐馆里被赶出来的。被赶出来这件事是他这一天的最后一个故事。十一月里，天几乎全黑了。在某个十一月里，当他寻找弟弟时，天色已经黑了，而弟弟却淹死了，躺在被单下面。那被单把他的头部和沾满泥土的口袋混淆了。天还一直在下雪。直至现在，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矛盾

他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他身上所发生的，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而是一件在他看来和所有人一样的事情。因此，他说起自己的遭遇时，就像在说别人的遭遇一样：即使别人在考虑朝哪个方向迈起步子时，思想也会矛盾的。特别是因为他失明了更是如此，这也许只是编造出来的。用“人”替代“我”，用“我”替代“人”，他用“他”来替代“我”。或者说，虽然一件事情只涉及他本人，但是他却让事情和所有人都相关，这就是他想用来保护自己却终归徒劳的一个骗局吗？如果他给所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巧妙地说道：我（他显然是指“某个人”，“随便某个人”）站在大街上，犹豫不决究竟该去哪儿，比方说（他显然指某个例子）去电影院，那儿的车站上靠着一辆自行车，我可以把它推回家，或者（他显然又指一个例子）走向公路的另一个方向，去另一个地方乘公共汽车。这时，我的思想发生矛盾了：我怎样才能消除矛盾做出决定呢？如果他装作一个人似乎可以对所有人这样发问的样子，那么常常会发生这种情况：他把这个表面上涉及所有人的问题作为引子，随即便陷入自己的意识之中了，因为这里所提到的，并不是一个适合于所有人的例子，而是只对他而言真实有效的东西，也只涉及他本人。再说，如果他在“问题”中说到了“我”，而这个“我”让别人理解为“随意某一个人”，就像在每一个问题中那样，那么他真正指的是他自己。他认为，用一种既符合时代又具普遍性的说法来说明那些时兴的事情，就能免受自己的故事的影响。可是，他总是归咎于自己，最后竟无法从自身中解脱出来。他可以这样开始：如果……，“我”就该去这个或那个方向。此外，他还罗列了去这两个方向有利和不利的原因。这样还是让人觉得有普遍性，也很少会令人生疑。不过，让他列举一下否定其中之一的理由吧。去易伯塞要走多少路，路上要花多少时间，“我”有多少钱乘公共汽车返回。说到这里，大家还可以接受他的考虑。现在还要等待更详细的说明，以便好算账。他肯定会从中算出一本普遍适用的经济账来。如果我考虑到这样和那样的因素，那么我怎样才能算得更好呢？让他继续算吧：我忽然想起来，我没有坐车返回的钱了。况且，我喝醉了酒，会引起旅客注意的，是的，我甚至故意表现得行为恶劣，结果司机在半路上停下车，把这位盲人乘客赶了下去。如果我说出来，我只想引起别人注意，好让车上的某个人看见并认出我来，这样就能阻止别人骂我吗？我究竟该不该去这个地方呢？如果他这样说话，那么他那不着边际的荒唐问题就破绽百出了，因为他的陈述已经不是普遍性的说明了，而从外表看，只能构成一个无法让人领会的问题，因为它们相互间找不出任何联系，而且也无法让你为它们做出具体说

明：常言道，不按常规做事的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是无法估量的。所以，你只好把答案留给他自己，而他也别指望从别人那儿得到答案了。他将去电影院，把弟弟的自行车推回家去。如果他要下车，那么目击证人们就会告诉他这件事。他不会去的。他已经走了，而且到了那里。是他的考虑把他从餐馆引到了电影院。他还会继续走。“我”继续朝前走。然而，也可能有别的答案：比方说，我可能又在电影院的墙下等公共汽车。什么原因不让我这样做呢？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而是一个任何人都不会感兴趣的谜。一个局外人怎么可能知道，当时他的弟兄们失踪了以后，他为了应付将要发生的事情，就用一块面包填了肚子睡下了，心里期盼着，等他一觉醒来，也许他们就回来了。他当时的心情就是这样。可是现在，他走开了，不去想他期待的兄弟可能会到达的那个地方，似乎只要他在墙边等着，就意味着弟弟发生了不幸，而只要他推着自行车离开了，似乎就可以改变事实或者改变什么。可是一个局外人怎么可能了解他这种心境呢？

回家路上

虽然他走对了路的一边，走对了街道，走对了方向，可他一直以为走错了路。他尊敬那些向他问好的人，向他们回敬的声音令他感到轻松：当有人问候他时，说明人家认出了他；只要人们还认得出他，那么他就不可能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他自以为他的担忧非常可笑，如果有别的人未注意到他默默无声地走过去，他就会感到压抑；他只要感到压抑，就会嘲笑自己。所以从现在起，他先向别人问好。他听见脚步声时，心里就揣摩着这里常用来问好的话。然后，他拖着腔问好，就像摘下帽子一样。有时候，他想问候别人，就揣摩着话，竟停下脚步，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只摆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舌头绕不过来那些拼音字母，憋得哑口无言。于是，他无可奈何，只有把力量从胳膊传到手上，手又用力捏住那刺耳的车铃。他深感窘迫。他百般劝告自己；他又以为自己走路并不怪异，即使他走路怪异，他也不需要装模作样：因为的确有这样的时候：他一边想着什么，一边把要说的话转移到了他的脚步上。

他对自己的预感很恼火，恶狠狠地用脚尖踢脚蹬子；他对自己的双手骂了一些粗俗下流的话，讨厌手把他引到了荒地里，还说一些难听的话来贬损和辱骂自己家的名字。可是，不管他做什么，他都没有

丧失理智。他思考问题时面色凝重。他不停地深刻审视自己刚才在哪儿，很信赖自己的经验。他甚至还说出号码，而且先说出街道的徽标，以便确认自己的路。当然，遇到别的情况，他就没有十分把握了：因为那些属于他的话和概念渐渐用完了；他身体的各个部分所处的地方他并不熟悉：他脚下踩着石头路面，一只手扶住自行车把手，另一只手用棍子敲打着人行道沿。对他来说，这又像一个看得见、但此时被蒙住眼睛的人：他不熟悉路，而且担心会迷路。当他在路边向前摸索时，只有自行车是他能靠得住的东西。他感觉仿佛走进了一摊烂泥里，或者在一条河床上向上游走去。他忽然想起来，为了让盲人用手指识别地图，那地图上的河流是凸出来的，用泥做成线条敷在上面，这样，手指就可以从河流源头一直摸索着流入大海。国界线也是用这种细细的线条标明的。当他区分不开河流和国界线时，他的手指常常就相互弄得不知所措。

他咒骂自己的记性总是让他忘记自己周围发生的一切；因为现在没有什么地图让他烦心，何况他在地图上连一点苍蝇屎都不是，而是他的脚步让他感到痛苦；他熟悉它们，却没有听出来，而且称之为自己的脚步：他的脚步常常把他连同那辆横着前轮不听使唤的车子从大路上推到草地里。此外，让他恼火的是还有那一身干净衣服。他习惯于讲究穿着干净，所以一直注意着身体远离那生锈的车框。只要脚踝骨一碰上脚蹬子，他就骂脚蹬子很阴险。还有齿轮上那吧嗒吧嗒直响的链条，他骂起来比父亲更起劲儿。

他要一坐下就起不来了。然而，如果他继续走下去的话，路就会耗尽他的力量。他宁愿走下去，因为只要他停下来，他就会由于重力而趴在地上起不来了。

一句话在他的脑海里萦绕，时而持续不断，时而飘忽不定，因为他时而坚持不懈，时而又犹豫不决地向前走去；在石灰坑里，存在于石灰坑里，沙子在石灰坑里。他正琢磨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然而，他很快就会进入的房间却加入到那些词语里，不过不是字面上的，而是那个空间的图像，墙上挂着一家保险公司的挂历，他在墙的高处添加上那凝固成凹槽的石灰浆，而画面上则依然看不到。他很快就会到那儿。他将随意地坐在关闭严实的窗户前。虽然他知道有几个去处，但是对他来说只有这一个目标。他会到那儿的。不论他怎样对自己说，不会有事的，他还是一下子心里没了底；他感到阴森可怕，因为

事情会像他心里想像的那样发生，而他什么也改变不了。即使他走向别处，他也得先明确自己的目标，并且确定下来；如果他哪儿也不去，他也要事先明确他哪儿也不去：他要预先确定他去哪儿和在哪儿，而且他似乎必须想到：我会到那儿的，而且如果他要去那儿的话，那他似乎始终要去做那些预先考虑的动作，去听预先听到的声音，去想像预先想像过的事情。惟独不同的是，如果他要去国外，去一个陌生而荒凉的地方，一个他从未见过、从未听说过的地方，一个既没有听人讲过、也没有人描述过的地方。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回家好了，而且心里明白他将要面对什么。那儿墙上挂着挂历。如果他进屋里关上门，他会被一阵风吹得摇摇晃晃，身体靠在石灰墙上，一把锉刀锉纸板的声音会让他不堪忍受。

他会来到这个房间，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他尽力迈着均匀的步子走去，就像他睡前均匀地呼吸那样，以便能入睡，进入梦乡。他寻思着，走路的过程也决定着思想过程；如果他迈着均匀的步子走，他会有意识停留在他走路的地方，这样就不会去想别的事情；如果他踉踉跄跄，或者加快脚步，或者自行车没有停稳，把他一起拽到草地里，那么他的思想也就失去了和谐。

双脚相互交叉在一起；哪条腿是哪条腿；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干什么。他说话颠三倒四，仿佛他忘记了怎样动来动去：仿佛这些东西（他指的是坑里的沙子和挂历）息息相关似的。

他集中思想，颤抖的手扶在车座上，反复命令双脚迈步。可是脚不听使唤了。他不知如何是好，就松手放开车子，好让他有个借口，弯下腰，假装在干什么。自行车倒地之前的声音可以称作沙沙声，车子辐条还在转动的声音叫嗡嗡声，车子撞在道沿上的声音叫啪啪声。

现在他有理由休息了。可是当他一直站着时，他就觉得要赶快坐下来，否则他就无法从站立中解脱出来了。他是一个身体强壮的人；他有劲儿立刻站起来，拖着身体走向奶站，右手像一个徽标一样搭在左肩上。这时，他把自行车扔到路边的草地上。

平时，那些奶罐都放在木板上。可是现在，这奶站空荡荡的，一个人影也没有。他和自己身心分离了，不知道该坐在木板上呢，还是木板下面交叉的斜撑上。还没等他决定下来，虚弱的身体就抢在他前

头，使他解脱开那些关节，头耷拉到胸前，送他坐到了斜撑上。这斜撑是用木材厂废弃的木板皮做成的，他的手还能摸到棱角上的树皮。

他斜着身子坐在木板下面，头顶上那些平时摆放奶罐的木板上抹的灰浆裂成了碎片。他很想背靠在一根支柱上，也许那儿有一个太阳照不着脸的地方。可是，他担心，如果向后找个靠的地方的话，那他可能完全力不从心了，这样一来，他的身体就会失去控制，向后瘫倒在满是灰尘的草地上，弄脏这身干净的衣服。

谁累了，一旦坐下来，他就会伸展双腿，好让血液流动通畅。他这一天也是这样：在他的房间，在电影院前厅，在电影院放映厅里，他都是伸开双腿坐着的。可是现在他坐到斜撑上时，要么忘记了，要么坐着无法伸展双腿，他膝盖高高隆起，下面双脚呈一个字母形状，微微撇开。蹬开双腿，是人困倦时一个习以为常的姿势，可是他已经累得连腿都伸不开了。他感到脚底沉重，仿佛牢牢地粘在地上。

他并不为自己虚弱感到忧伤，相反，他竟天真而愚蠢地在想，如果这般虚弱能让他笑出声来的话，他希望能大笑一场。

他畅快地大笑起来，笑得头脑发晕。

不过，他的困倦并不像他原先以为的那样，是他身上的一种感觉，只要做一个动作就能消除掉，比如笑一场，而是源于一种离他而去的东西；这是一种匮乏，他思忖着。当力量抛弃了他时，环境也就抛弃了他。

今天，他时常感到眩晕。这时，他露出上排牙齿，伸长脖子，脑袋向前耷拉着，身体瘫软，又不想倒下，竭力睁大眼睛，眼窝里都能感觉到风在朝下吹；这时，他想到人跌倒时那种令人头晕目眩的情形，脑袋嗡嗡作响，伸得长长的，猛地甩到胸前。

尽管他很窝囊地坐在奶站底下，但他还是放松自己，从容呼吸，来保全自己的脸面。可是呼吸又让他感到头晕目眩，身体向后倒去，靠在一根柱子上。他摸着木板上的树皮，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可是他已经动弹不得了——是因为这个巨大的奶站压得他身体虚弱，透不过气来。他百无聊赖地回想起一种儿童游戏里有许多小站，游戏就是从困倦开始的。他想起了几种手势，那些颤巍巍的胳膊和腿，上下和水

平伸直，来表示游戏的过程。那些规则他已经忘记了。或者说，他懒得去想那些规则，他知道他什么都忘不了。

他想起了另一种游戏。孩子们站在一个圆圈的各个区域里。这些区域表示国家和省份，当孩子们选择国家名称时，都会首选那些大国，似乎这样能给他们带来好运。他们轮换着，一个向另一个宣战。随后，接受宣战者必须立刻制止跑出圈外的人。他的喊声就是一个发出命令的信号。他在自己的区域里趴在地上，脚尖不能伸到外面，然后趴着伸直胳膊去摸别人，而被摸着的人就得被迫求和，按规定割让一片区域给胜者，否则人家就会采取强硬手段，因为人家不能容忍那种在众目睽睽之下无视国际法规定的国家主权的行为，而且还要郑重警告，不得干涉国家内政。

他不再胡思乱想了。他越是胡思乱想，就越是钻牛角，这样，无论他自言自语，还是和别人说话，都会因为混乱无序而乱了套。

他究竟怎么了？他足可以把日子过得安宁平稳，他的生活也有保障。他坐在这个奶站底下死钻牛角尖，臆想这是命中注定。他能放声哀叹什么呢？明天还是一天。后天也还是一天。为什么他哭丧着脸坐在奶站底下呢？有什么让他恼怒不堪呢？

他用手抹了抹前额，告诫自己要冷静。这样居然挺灵验的，也让他感到高兴。然后，他向前弯了弯腰，竟然也奏效了，就用手在地上划来划去：他摸来摸去，用手指征服了一个碎石堆，碎石里有一块光滑的圆形石子，一个被雨水淋坏的盒子从碎石堆里露了出来：他就这样光复了世界。他摸到的东西和听到的声音帮助他征服了这个失落的世界。

他常常感觉自己好像真地可以走在人们当中说这说那。他还常常感觉到自己可怜得像一块疥癣一样被许多生物所包围。他竭尽全力怒吼着向它们冲去，让它们信服；然而他被卡住了喉咙，只能叽叽咕咕地叫。他明白这一切。有时候，他觉得没有人注意他，便挠起头来，把手指塞进耳朵里。然后他听见自己说话很特别。他很惊讶听见自己的嗓音。他也可以为此而感到高兴。

他在遭受着折磨，而他不是待在木板下遭受着折磨。他没有出汗，却感到大汗淋漓，似乎有什么东西催促着他，不让他死死地待在

这里，而是让他动起来，离开这里。然而，他甘心于自己的无奈，因为他觉着他在思考，或者说，因为他装出思考的样子来欺骗自己。可是，这种欺骗也是出于无奈。他心里一直想着要离开这里。这并不是让人关注他的惟一方式。

他尝试这样和那样的办法，一想到那辆还不得不推着的自行车，他就没有了主意。他竭力集中那些混乱的思想。他想不停地说话。他想问是不是有人也和他一样。他想通过说话打开一个他不了解的话题。他常常固执地去摸一些东西，却总是抓不住；当他去抓摸时，它们就溜掉了，并且还会自我保护，躲到一堵空墙后面，他既不能透过墙听到什么，也不能穿墙而过。然后，这些东西突然把墙推倒，攻击他，侮辱他：他原先摸到的水并不是水，还有他说过的话既不是对自己说的，也不是对别人说的。可是现在这些东西竟然打动了他，听命于他，而他虽然制服了它们，却像一个新生儿一样无法摆脱它们。

当他改变他的自言自语时，便暗暗地在想，惟独涉及他的东西对他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他想说的话，他认为都是大多数人所说的千篇一律的话。

有一次，他在大街上看见一个人从旁边走过去。

时光把他搞得晕头转向。他为保护自己再现出一句格言：过去已经死亡了。

有一次，一个星期天，他看见一个人走在大街上。他和父亲朝这个方向走，另一个人迎面走来。在这人两腿中间，小男孩看见那裤子哗哗地摆动。他们乘着轻便马车去镇上。可是在回来的路上，他看见那个人穿着那摆动的裤子，还一直在那儿的大街上走来走去。他问父亲，父亲回答了他。这个星期天，这个人马不停蹄不知疲倦地走过乡间。现在他在想，这一切都值得和别人说一说：一个人不知疲倦地走过乡间，穿的裤子在两腿中间哗哗摆动；他还在想，他会不停地说，人们曾在这里相邻而居，而且有时悠然散步，他们互相关心。还有，他会说个没完没了，要么说得口干舌燥，可能什么都说，比如，说一个人穿着那摆动的裤子一直在乡间走路。他要用钉子把自己的话死死钉住，好穿过那充耳不闻、麻木无声的人群。

他一想到自己的处境，便收起那些荒诞无稽的想法。他在哪儿？他要干什么？他在谴责自己。十一月这个时分，天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现在也看不见眼前的手。由于天热，他手上的皮肤散发出一股金龟子的味道。他又反驳道，是毛虫的味道，是新出世的湿漉漉的幼虫味道。

有一次，一只口袋曾经散发出这样的味道，他想起来了，要么是那只口袋里冰雪融化的味道，要么是他淹死的弟弟身上的泥土味。还有那从山坡上滑到沙坑里的沙子，他当时寻找自己的兄弟时，就以为他们被埋在沙子里，刨沙子的双手也散发出类似的味道。

他陷入沉思。他无法从深沉的思绪中摆脱出来。他忽然想起来，又有一次，他在屋门口的路上老远就看见母亲走着走着停住脚步。母亲沿路走过来后停住了脚步。不。后来她才站住了，停在那里。起初，他站在雕花栏杆后面，望着母亲挎着那装满草的筐子，迈着笨重的脚步从大老远走过来。可是后来，她越走越近，仿佛要脱开地平线上那黏糊糊的、要吸住人的粘蝇纸。她从身后那宽阔的地方越来越走近了，此刻脚踏实地，迈着更稳健的步子，身影越来越清晰。这时，晴朗的天空忽然闪出一道雷电。她被雷电击中了，被雷声打懵了，被一根绳子猛地拽回去了，这种情形使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顿时，空气里结了冰，把母亲冻僵了。他心里想着那雷电通常持续的情形，并数来数去。后来，雷电再也没有碰上母亲——她没有向前伸腿，没有把筐子搁在膝盖上歇一歇，筐子反而一点儿也没有从她那鼓起的肚子上往下滑。她当时正抬起头，摇晃了一下，也许是想赶走脸上的一只苍蝇；她正在做这个怪动作时，突然停住了。他没有朝她呼喊。他充满好奇地望着母亲站立的姿势。他感到，似乎有一种恐惧或者惊慌把母亲吹得鼓起来了，把全身都涂黑了。母亲在那下面多危险哪！她没有听见那可怕的声音吗？她怎么能没有听到什么呢？当时那个时代基本上被描写成一个和平年代，尽管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由于人们常常没有事干，为一块面包都相互嫉妒。尽管如此，正如报道的那样，人们在没有法律和法官的情况下生活还过得去，也还能和睦相处。一些人靠冬青栎树上流出的蜜汁为生。河里流淌的水来自那些溺水女人的奶汁。

他的眼泪多少次润湿了眼睛？之前，母亲又把筐子稍稍捧起，转来转去寻找着什么，可他却感受不到。他回想起，母亲当时还怀着弟

弟。是什么让母亲在这条宁静的路上如此心神不安呢？她当时是谁的见证人呢？

他猛地拉动碎石堆里的一只盒子。这样，他兴头就来了，身上又来劲儿了。有些人在街上晃悠过去；有几个看见他坐在奶站下面，便热情地向他问好；另一些则故意装作没有看见他。不过，没有人走近他，比如风趣地弯下腰，张口询问一下。许多人利用傍晚时分，趁空气又变得洁净，出来消除白天的劳累，让身体得到恢复。大家都觉得他坐在木板下面挺好；在他们看来，这是他合情合理歇息的地方。他从那越来越大的噪声中听出了汽车驶过的隆隆声。他还听见一只狗在叫。他已经习惯这样了。这是刹车的声音，那是手摇手柄落下窗户玻璃的声音。可能是，可能不是，他竭力猜测着。他身体紧贴立柱，把手放到膝盖中间，免得被人发现。然而，只有所描写的那位家庭主妇走过来，用一种严厉的嗓门训斥狗，又用另一种既随和又热心的声调询问他父母的身体状况。他还真行，直接告诉她说，他父母很可能比较熟悉这晚上的空气。于是，她和丈夫一起对没有见到他们表示遗憾，最后的告别很冷淡。过去，这位主妇总是尽情地表达自己的热情好意。

可是，他不认识她。他忽然想起来，他也不认识她丈夫。他怎么能回答他们的问题呢？他处在一个还没有经过研究的地区。他身在异乡。他羞于自己缺少高傲的气质，又紧张地躲到立柱后面，站起身来，双脚立地，可惜那双脚已经不听使唤了。他很快就找到了自行车。

他心里一一地列举那些能够让他迈步向前的原则，敦促自己匆匆赶路。他只剩下一小段路了。一路上，他的思绪总是不停地先于脚步。他看见自己的身体像死去一样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你在晚上就不知道在早晨是否还能醒来。他想起宗教里的一条教诲和教导者美化教诲的情形：从前，一位四个孩子的父亲正是坐在这个地方心情愉快地吃着晚餐，可是到了早上，孩子们就可能发现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晚上，他教训完孩子们以后，就躺在床上的被窝里，由于害怕而咬破了被子里的绒毛。他吓得毛骨悚然，感到头发刺痛了头皮。

尽管如此，他现在可以舒一口气了，那不听使唤的双脚现在听话了。只要他愿意，就能走路。他对外语一窍不通。他琢磨着想到的那些词语，就像追踪自己的影子一样，简直不知所云。他自言自语，随口说出这些词语，琢磨那熟悉的音调，试图把握它们。可是，那些音调在他的脑子里简直毫无意义，于是他就放弃了。他在心上把这些词语的消失比作老鼠逃跑。

一个雨夜之后，路上到处躺着死去的蛤蟆。他反复重复这句话，并用它来堵住别的话。有时候，他怀疑自己脚下踩上一只蛤蟆，或者只是一堆粪便。节假日里，护路工人都扛着铁锹休息去了。到了第二天，把那些干掉的蛤蟆从路面上铲掉再扔到小车上挺费事的。夜里，可以看见蛤蟆在汽车灯光下笨拙地——这也是它们天生的走路方式——连爬带跳穿过马路，数不胜数，没完没了。一旦它们被轧死在路上，那姿势就像登山者攀岩壁时的姿势一样。在许多画面里，他的右臂举过头顶，手抠在岩缝里，左臂斜着伸向右臂，给身体找一个能安置的地方。他抬起一条腿，弯曲着贴紧肚子，另一条腿随意蹬向空中。下面的沥青路面积满了雨水，驶近的汽车灯照射在路面上泛着白光，显得深不可测。岩壁直上直下，公路是水平的。这人还悬在岩壁上。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脖子上的肌肉不停地抽动。危急中，他的脚尖把一块裂开的石头从岩石上蹬了下来，惊得那些正在栖息的鸟儿尖叫起来，拍打着翅膀从岩洞里飞走了。当下一辆车的灯光照射到他身上时，他就抬起头，吼出一声来示意他在干什么。

这个推着自行车的行人想到这些之后，忽然发现别人并没有在意他。那辆自行车从他的手里脱开了，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也用不着骂骂咧咧的。

他要让脚步和那些逃避的词语的跳跃不定和急促节奏协调一致。

他心里在想，热天里，那些带翅膀的蝗虫经常成群结队地飞过公路。虽然它们那布满脉络的翅膀沙沙地一扫而过，不再给他带来什么恐惧，可他似乎总是不甘心地在琢磨着，为什么它们要遵循这种规律呢。忽然，他回想起一片绿草丛生的废墟上乱哄哄地聚集着成群的蝗虫。那些被轧扁在公路上的蝗虫头部和那些凸出来的、完好无损的后半身让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深深刺痛了他，就像一场捧腹大笑之后肋下疼痛的感觉那样。一辆小轿车疾驶而过，一阵风惊动了那些蜷曲着

的动物，惊动了蝗虫和那些趴在地上的蛤蟆，吹得它们身体翻腾，卷进了风里。那些没有被轧成肉酱粘在路上的虫子吓得连滚带爬，四下逃窜，卷入汽车尾部的气流中。

他在想，从那些汽车发出的声音里，他似乎用耳朵可以听得出这个他要经过的地方。一条小溪架着一座小桥，站在桥栏杆旁，那迎面风和受汽车挤压而涌动的空气在桥栏杆之间变得断断续续，犹如一台拖拉机爬坡时发出的突突声。穿过路边的房屋时，那声音凝聚在一起，经过洗练，然后又被轰然释放出来。同样，他继续想着，穿越峭壁峡谷的流水声和在宽阔的河床上的流水声是迥然不同的。

他极力抵制着这些突发奇想。他自言自语道，一个人从汽车的声音里就能听出，他是正穿行在一个房屋林立的地方，还是正走一片旷野上。他仅凭听觉也能把那些如粮仓、奶站之类的木房子和砖砌的住宅区分开来。城市里的街道发出的回声和乡村不同。如果他不考虑借助汽车声音的话，那么也可以想得到，要么是由于例外情况——汽车被禁止发出声音，要么是为特殊情况而颁布的法律所致，禁止汽车发车声音，或者在其他情况下汽车没有可能在公共线路上行驶；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的脚步声似乎就是这个行人判定的依据。这样行得通，并且会履行自己的使命，因为天气寒冷时，声音会得到很好的传导，于是，他就可以凭听觉，从回声和声音的范围来确定自己周围环境。如果像今天这样的天气，那情况就不同了：由于天气闷热，他听到的那些声音如同在睡梦中一样。他无法说清那些声音的名称。由于他借着别人走路的声音还迷失了路，所以他无法说清他走到哪儿了。他走在一条大道上，或者走在一条乡间小路上，穿过一座城市或者一个乡村，他走在野外或者封闭的房间里，光着脚或穿着鞋，他走在他认为自己走的路上。为了自己，他越过重重障碍。

思绪使他的表情显得复杂，那两条宣告独立的腿相互缠绕，于是，他独自依靠这辆自行车，使他感到很舒心。一路上，他整个时间都在心里暗暗地想着弟弟，懊恼地指责着他所干的坏事。没过多久，他就再也分辨不清“你的”和“我的”了，双脚在身下向前迈着步子，手指拽着肩上的旅行袋，嘴唇嘟哝着陌生的话语。他欺骗自己，从今往后，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他是个盲人，他假装自己能看得见。他曾经高傲自大，盛气凌人，狂妄至极，不知天高地厚，所以，他现在进退维谷。当他闷闷不乐地扶着那松松垮垮的自行车把手时，他甚至

十分严肃地质问自己；然后他又狡黠地嘲弄着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种种不幸，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打算。

于是他说道。

他弟弟已经说过了。

后来，他再也听不见有人从旁边走过去或说话了。他从各种迹象感觉到他已经走在回家的路上。由于自行车一侧不听使唤，他无意识拐到了回家的路上。从走廊上，一双探望的目光会轻而易举地透过雕花栏杆，朝下落在他的身上。他去哪一座房子呢？他去一座什么样的房子呢？他朝着父亲的房子走去，因为土地册里登记的有关数字正式确认了父亲作为房产所有者的权利，而儿子问世以后，便拥有走在这条自家的路上、穿过这块地产的权利。他把身子伏在自行车上，在父亲的田地里穿行。房门的钥匙或许就装在衣兜里。然而他缩起手指，不去掏兜；如果他把手伸进兜里，就能摸到里面的钥匙，它是那个女人在汽车里递给他的。他把自己的担忧埋在心里；他不让手指过于鲁莽。当他还一直听不到什么动静时，他就开始怀疑自己的听觉。他摇了摇头，可周围的声音依然如故。他可以暂时弯下身子藏在自行车后面。

他想起往事：雪停了以后，呼喊的人会冻坏舌头的。当时，他从白天到晚上都在荒芜的雪地里跑来跑去，呼喊着，张望着，寻找下落不明的弟弟。

他数着他去过的一个个地方：去的地方太多了，那些地名在他的记忆里都混在一起了。

他加快脚步。

听不见有什么动静。

他开始推着车跑起来。

根据描述，当时，在他失明的那天晚上，他弟弟又回到了家里。这是一个星期六。他回想起民间还保留的那种习俗：这一天，你要抢在其他农户之前扫院子。可是当时下起了雪。这样的障碍就干扰了习

俗。此外，你还可以设想，某个事件让一家人的担忧甚于打扫院子。据说弟弟是在漆黑的夜晚回到家里，而且在外面就把雪从院子里扫了出去。因为在所有住人的房间里都在抱怨着另一个人，也就是淹死的弟弟的死亡，所以没有一个抱怨的人注意到他回来了。正是父亲，他在回来的路上听见了扫帚沉重的扫地声。父亲从镇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向家里走去。后来，他喝得醉醺醺不省人事，他叙述道，他当即就认出了这个失踪的儿子。此时此刻，这位盲人思来想去，绞尽脑汁，父亲怎么能在黑夜里认出扫地的弟弟呢。院子里除了白茫茫的雪，到处漆黑一片。女人们都挤在大屋里，那儿的灯光映照到远远的输电杆上。虽然妹妹房间的灯光照射到父亲回来的方向，但是正因为有这点儿光亮，所以光亮下的黑暗就更是漆黑一团了：弟弟清扫的院子就在妹妹那被照亮的窗户下面，于是，雪落到这种光照的地面上就像掉进水里一样，所以眼睛无法穿透，黑洞洞的。弟弟靠着马厩墙站在那里。刚下过的雪盖住了女人们的脚印，父亲走路的脚步咯吱咯吱作响。开始，儿子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动作。他想像自己的手抓着扫帚下端。由于两天来满面尘灰，他的神情显得呆滞。两天来，他无处藏身，躲在灌木丛和沼泽地里睡觉。这个盲人一直在想，这两个人中谁先看见了对方。就在这时，根据父亲和妹妹的描述，一辆军车拐了个弯，离开公路拐进通往这座房屋的小路。再说，从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人那杂乱无章的自我叙述和证明中可以确信不疑，那个遭受失明打击的人当时就住在里面。那车灯无疑照来照去，扫过院子，越过院墙，照射到窗户上。所以，那个拿扫帚的男孩被照得眼花缭乱，认不出远处站着的父亲。相反，父亲一眼就看出儿子回来了。实际上，父亲也是这样描述了事情经过。灯光从远处照过来时，光线很弱，把树杈的黑影投射到墙上，照不出什么轮廓来，就像一阵风刮到墙上一样。起先，墙上这种暗淡模糊的云雾才是即将到来的影子。后来，当车轮碾过雪地越来越近时，那灯光照在墙上越来越亮，灯光前面的障碍物也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大地投射在石灰墙上。最后，那障碍物的影子超过了障碍物本身。从公路上看，那些树木还挺立在光束里。可是，车走得越近，那些树枝就越来越高地逃离开光束了。当汽车从树枝下面驶过时，墙上树枝的映像不断地四面延伸，向上被拉回黑暗里。只有那挡住灯光的东西被投射到墙上：父亲一动未动，身影被照在墙上放大了；可是儿子的映像却缩小了，还不停地颤抖，因为他紧靠墙站着，甚至就站在马厩门前，在灯光的颤动下，他和自己的影子被那不断聚集的灯光贴在了墙上。最后，那灯光吞噬了他的影子，他没有了影子，紧紧地贴在那里。

据说，父亲看见儿子时，心里一阵激动，双手伸到上衣口袋里。他受不了一直这样站着，嘴不说话，手不干事：于是，他伸开手指插进口袋里，脑袋不安地摇来晃去，又提了提裤子，好像丢了皮带似的。他急促而毫无目的地动来动去，想使自己摆脱掉与另一个人那不可企及的遥远和距离。之所以这样，后来他喝醉酒时换了另外的说法，他实在不忍心看见儿子站在那里。要么是这样，虽然他们相互没有人移开目光，但他们似乎也都没有正眼打量对方。要么是这样，父亲避开儿子的目光，一个劲儿地在口袋里翻来翻去，把口袋翻了个底儿朝天，似乎无法感受眼前发生的事情。谁都没搭理谁。

盲人在想，如果谁的习惯总表现在手上，那么一个意外事件就会妨碍那习惯的进程；这事件会让他大吃一惊，使他意识到自己那摸来摸去的手指；这些手指，当它们在口袋里摸不到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找的什么时，就像被电击了一样，会被这个事件吓得缩成一团。于是，两手的动作就变得贪婪和迫不及待，手指疯狂地乱抓一气，那镇定自若的神情顿时魂飞魄散。不过，他又一次抑制住自己的预感。此外，那扇朝着他房间的窗户敞开着，他可以轻易地绕过房屋，从后面越过柴堆爬进去；他会一边跑着把自行车靠在柴棚上。然后，他只需要留神窗户下面那个石灰坑就是了——那些木板可能会滑脱的。当他放下百叶窗以后，那么对他来说，什么事都不会再发生了。可是事情已经到了如此地步，让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手指。

这时，他没有注意到汽车开过来了，离他那么近，父亲好歹也得避开车。车轮子碾过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地面。虽然父亲平时说话老爱骂骂咧咧，是出了名的，但是他喝醉酒后依然能把话说得有模有样。他叙说道，当汽车开到他面前时，他突然感到一阵可怕的绝望，这种感觉又在他肚子里产生一种强烈的饥饿感，于是，他从身边木桩尖上抓起一把雪来充饥，恼怒地用牙去啃雪；打着手势，醉醺醺的父亲为他的故事辩护道，无法解释一切。

这么说吧，这个从镇上或是从别处回来的人站在那儿，那儿站着弟弟，手里拿着扫帚。思考这件事的人，他自己就站在这儿。这儿停着汽车，他当时就躺在里面。更详细的情况就随他去想像吧。他躺在担架上时又昏迷不醒了。人面对一场不幸时的表情大都是相同的：女人一般都惊呆了，男人呢，如果他们正好坐着，就把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捂住脸。可是，如果他们站着的话，他们就宁愿默默地走向

一边，待在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或者在原地一动不动，呆若木鸡。只要有昏暗的地方就好，男人可以利用它，把拳头重重地砸在额头上。纷纷扬扬的雪花更加剧了他的悲痛。这期间，面对不拘形式的不幸，送交尸体的人的种种客套让这个男子有时间克制自己的情绪。可是，有些声音和味道使他异乎寻常的心境更加忧伤，使他面对这个不幸者显得古怪：母牛嚼草料时牙齿的咯吱声，女人们祷告时发出的哀泣和颤抖，嘴里雪的味道和肠子里的酒气混合在一起，马厩里那匹马的嘶叫声，那些士兵到来时，它就开始撒起尿，又是四处乱溅，又是丝丝作响，又是噼噼啪啪：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他痛苦的表情和神态。然而，父亲接着再也承受不了他那不得体的、近乎轻松的平静心态了，于是突然朝马厩里大喊起来，命令这匹马停止那没完没了的撒尿。可是，他自然刚张口说出这话，他自己随之又这样说道，我恨不得打自己一个嘴巴。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嘴里嘟囔了几句，让士兵们穿过敞开的房门，走进屋里；他们抬着担架，一步并作一步走去，尴尬地听着他愤怒的吼叫，不知所措地四处张望。父亲一边没完没了地磕打着鞋子，一边指给他们穿过走道进入房间的路。可是对儿子们，不论是那个靠马厩墙站着的，还是躺在担架上昏迷不醒的，连一句话都没有说。所以，等大家都进屋以后，这个故事现在就可以结束了。

另一段故事还没有结束呢。他还根本没有开始一步一步地讲述关于这座房子的故事。他还一直惦记着为什么忘了带钥匙。他觉得，当时那辆小车和两个外地男子抬着弟弟的尸体穿过院子来到他跟前时，仿佛顿时天塌地陷了似的，并且使他瞬间从毫无预感的行动中立刻停滞不动了。可是，他现在竭尽全力，要把自己从这种停滞状态中解脱出来，要把自行车推向前去，这样就可以把那样的动作继续下去。这时，他又觉得，仿佛过了好长时间，他第一次靠着自己的双脚走路；仿佛他第一次有意识地调动起走路的意志，来完成那样的动作：他让自己推着自行车顺着小山坡往下跑去，跑到下面的平路上，他不由得自己去踩上那脚蹬子。

这座房子处于一片静谧之中。连鸡也不愿意干扰这种宁静。他推着丁丁当当的自行车朝着他估摸那柴棚坐落的方向跑去。把车子靠在木板条上继续向前跑，这是一件事；另一件事是，靠着双手和双脚，千万别迷路。这是马厩墙边的那口井。他称之为屋角。在右拐角上有第二道墙，他伸开四肢顺墙往前爬。他贴着墙，又贴着打谷场的厚木板向前移动。他手上粘的是白灰。地上有猪鬃和一撮剪下来的女人头

发。他跌倒了。他可不能忘了那个坑。父亲和父亲的妻子正在远处什么地方忙着干活。他希望能背靠墙，向他们说他回来了；他想让他们看见他已经到家了。况且，他靠着墙，不会有人或别的什么东西向他突然袭击。

他竖起耳朵倾听周围的动静。什么也看不见。他想把自己藏起来。这片田地是个斜坡，他想道。大地一片宁静。闷热了一天之后，晚上会转凉的。他在想，明天这时候，他就会在别处了。这是石灰坑。他可以爬过柴堆绕过这个坑。这柴堆是分层堆放的，他可以把脚塞进柴缝中。他双手抓紧向上一跃，跳到油毡上。现在，他完全不需要另一条腿跟着跳上来，不需要膝盖跪在油毡上，也不需要手抓紧把整个身体拽上来；他的手就快摸到窗台了。他曾经寻找过失踪的弟弟。现在，他筋疲力尽地趴在敞开的窗户前面的柴堆上。选择这个地方说话太不方便了。而且他还笨手笨脚地趴着。他很恼火自己困倦无力，因为一旦趴在那变软的油毡上困了，就会弄脏他的干净衣服。他躬起身子。他坐起来。他陷入沉思。“没有任何迹象。”他歪着头坐在柴堆上，右手搭在左肩上。他在想，晚上会起风，发出很多声音，风吹到不同的东西上，发出的声音也是各不相同的。如果前一天夜里下了雨，泥干了以后，路上就会留下行人的脚印。那雨后变干的泥土呈褐色，跟烧焦了似的。有人光着脚从上面走过去，泥土就会被踩成碎末。

另有一次，天麻麻亮，他走过一片厚厚的白色泥土。他忽然想起那泥土的颜色像水的颜色，时而也像天空的颜色。有时候，天空布满尘灰，一片灰蒙蒙的。真要下雨前，零零星星的雨点落到路面的尘土上，便打出一个个小坑点。然而，当密集的雨点落下来，你可以称得上是下雨的话，那些凹凸不平的圆石头就会露出脸来闪闪发亮，而路上的尘土看上去依然没有被雨淋湿。走在这样的路上，你会感到很惬意。他吓了一大跳。幸好窗户开着。他的耳朵感到一阵刺痛。什么也看不见。他龇牙咧嘴，久久地细听着周围的动静。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血液流遍他的全身。他坚持着，想证明自己的勇敢。后来，他感到一阵恐惧，牙齿上下打架，咯咯直响。依然什么都听不见。他感到呼吸困难。于是，他尽力去闻一闻周围的气味，像狗一样不停地喘息。他简直要跳起来了，他在想。他想出的那些句子都因为他呼吸困难而显得别别扭扭的。他跳起来。他跳进房间里。这里是安全的地

面。这是水池子。这是窗户，现在已经关上了。那关得严严实实的窗户。

以前，他光着脚走过满是尘灰的土路。他曾经走过。他已经走过了。他正在走。他父亲撑着船穿过了芦苇丛。他弟弟穿过雪地跑到田野里，然后钻过牧场的铁丝网回来了。他弟弟坐着小推车走了。他一头栽到床上。他全身缩在一起。他滚来滚去。他浑身发抖。他抬起胳膊，似乎要飞起来。他转着圈。他哀叹着。他伸开四肢。

他失去了知觉。

他做了一场白日梦。他奔跑在一条路上，刚下过雨，路面泥泞。他的脚踩上去很稳当。他竭尽全力快跑，低着头，双手在腿边一前一后地摆动着。不等他的脚印里又灌满水，脚下的泥团就发出咯叽咯叽的声音。他正在逃跑的路上。他不知道为什么要逃跑。他一边跑，一边琢磨着迫使他逃跑的原因。他不清楚自己干了什么违法的事情。可是，他正跑着，看见弟弟在一片空地后面等着他。他弟弟已经先跑掉了，说特意在那儿等他。他听之任之，并没有感到惊奇，依然跑个不停。他甚至跑得更急了。他听见有议论他的行为和为之表示担忧的声音，盘问是怎么回事。他又听见人说，他没有掩饰好自己的踪迹，结果让追赶的人发现了，这太马虎了。他还一直跑着，回头左右望望，瞥见身后泥沼里留下一串清晰的脚印。这时，他意识到他肯定泄露了弟弟的藏身地，所以一边跑，一边担忧，几乎要发疯了。他在路上还听到，由于他的逃跑，整个国家都骚动了；军队已经严阵以待，紧急令发布了，像人们说的，已经发出最后通牒了。为了和平，他一定要投降。这让那个逃跑的人感到很奇怪。直到现在，他都不了解时间和天气状况。可是听见这消息以后，他觉得这两点太重要了。他一边吃力地跑着，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询问。他得知，虽然地面是阴天，但是云层上面的视野极好。马上有人说快到那片空地了。大喇叭里宣布了一条特别报道，可是由于那咔嚓咔嚓的杂音，他不知道是耳朵里还是那机器里的杂音，他也没有完全听懂。他只听懂了句子里的许多问号和结尾的感叹号，这感叹号用一声呼喊就把这些问号扯平了。这就是那片空地：高高的蕨草和茂密丛生的杂草上沾着布谷鸟的唾液，高高挺立的红松和云杉越来越低矮，越来越稀疏。他得到消息说，他弟弟将穿过草丛，不停地用手指折断草茎，从左边回来。他直起身子，向所指的方向望去。他一辈子都在想，他的目光是一片空白。手里那

尖利的草割破了指头。有人命令他抬起头来。他正是那个抬起头的人，这让他感到好奇怪。他放眼前方，望着一片广阔的地方；他还没怎么抬头，就看见了地平线，天空很低，似乎要把这个瞭望的人直接推进草丛里。然后，他看见小朵云彩从天边滚滚而来，一团团云彩，一簇簇云彩，一片片云彩。有人告诉他，天空一片灰白，而云的颜色是灰黄色。这片地方的草地都被染成了天空的灰白色。他还想知道这轰隆声是什么。可是，喇叭里传来的宣战声打断了他的话。他立刻猫下腰，望着天空，感觉自己在嗅闻、品尝、触摸那天空：他闻到正在弥散的汽油味，也尝到了变质的牛奶味。他感觉自己浑身发烫，像烫手的水一样。那小小的云朵布满整个天空滚滚而来，那是轰炸机。

在这个空间里，他现在或许无话可说了，都可能变得毫无意义了；他只需要说出字母和音节，或者发出动物的声音；他只需要平静地说说无关紧要的事：尽管如此，他的声音，只要是从他嘴里发出的，也不管他现在说什么，都会坠入这个长久精心挖好的陷阱里，它使得声音变得响亮和重要；他甚至只需要说说，那些远距离传送的电线，比如说经过在发电厂修理以后，突然又开始发出嗡嗡声，尽管这可能和他的听众毫不相干；他只需要张开嘴说话就行了。他说话的空间是一片空旷地。

有一次，他做了一个梦，梦见的无非一个比喻而已。他弟弟笑起来，那声音就像抓起一把玉米粒使劲地扔到水泥地上一样。然后，那一群鸡乱哄哄地跑上去猛吃这些玉米粒。

大黄蜂

你走在一条布满尘土的小路上，你用不着这样告诉人家。观望的人不需要看清楚那条路的状况。他们看见你正在走路，这就够了。天气很热，这也用不着告诉人家。你只需要注意你走进来的样子，让观望的人觉得你不是刚刚才走动的，而是已经走了很久，就像你走进来一样。你走进来了，要让人觉得，仿佛你不是要来这个确切而特定的地方，而是一个和所有其他地方相同的、你都已经走过的地方。你所到达的地方，你在观望的人可以看见你的地方，与其他地方没有任何

不同。你不是走进来，你不是进入现场，更确切地说，你是穿过那些目光。没有人在场。你双腿的动作应该让观望的人想到，它们是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不用你为它们的运动再做任何事情。当你四处张望时，这种张望必须要让观望的人觉得，仿佛你是分别按照一定数量的脚步来分配这个动作的。你走路时，你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走动的双脚。你四处张望，就像一个人在一片旷地上寻找一个树荫似的。你的打扮很朴素。它不应该把观望的人的目光吸引过来。你穿着一件没有领子的衬衣，像一个囚犯或者农民。你来到的时间并不长。你在路上走了很长时间，观望的人是会理解的。他们没有必要了解更多的情况。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你出现在他们面前和按照你的脚步用分开的拇指和食指可以估算出来的这一小段时间在他们眼前变成极长的一段时间，也就是从他们第一眼看见你的动作起，直到你停下来四处张望逝去的这段时间。如果你突然让不知情的人看出你疲惫不堪，比如说你假装蹲下来，所谓按照民间一个治疗侧胸刺痛的偏方，从路上挖出来一块石头，再往上面吐唾沫，这是不够的。除了让人家看到你的脸和手势，你什么都做不到。你那似乎可以和他们说话的声音是哑的。在你走来的那一刻里，一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这正是别人必须要明白的。在半天时间里，灯光和风都在发生变化。路在发生变化。从地上凸出的东西的阴影在变化着。你只能让观望的人看到你自己的变化。相反，在你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那一刻里，除了你让他们看到的东西以外，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如果你把手搭在眼前，回头看你在他们眼前走过的十二步的话，这就太少了。如果你装作没完没了地四处张望的话，这也是不够的。虽然他们明白你的意思，而且你的姿态也会使他们相信，他们应该成倍地估算那些步伐，但是他们终究不会明白已经过去了多少时间。他们不会在意的。你要想让他们看个明白，那你或许就耍魔术，或者十分能说会道，或者用一种能召唤他们耳朵的说法。然而，人家要求你一声不吭。改变你双脚走路的姿态是不够的，改变你的面部表情和闪烁眼睛是不够的，让胳膊软弱无力地从肩膀上耷拉下来是不够的。你不拥有任何能够移动你身影的照明设备。如果你假装疲惫不堪地倒在地上，那就大错特错了。你无法用手势和表情把那逝去的时间占为己有。不论你做什么，无非都是木偶戏而已。可是，如果你自己要表演这样一场戏的话，那你就会受到嘲笑的，正如你想把自己当做计时器来让人家看到时间是怎样流逝的那样：你把手心捧在自己面前，拿另一只手的手指当指针，而观望的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看不见的、表示数字的点和你每走一步都向前移动的手指。你走十二步，表示十二个小时。现在，手指又回到了它

离开的那个点上。与此同时，你也停住脚步，正准备坐在路边休息。可是，那个你用来让观望的人明白时间的魔术，那个你使观望的人感到恐怖的魔术被封杀在你的嘴里。你的声音是哑的。以后你的声音也依然会是哑的。在你借以休息的动作当中，那个引起你注意的响声，你让人家看到了，因为你歪着抬起了脑袋，像个盲人一样。

这条路上尽是沙子，被大水漫过。只有那些被汽车碾过的坑洼里填满了碎石子。你听见的那个响声，不需要让观望的人知道得更加确切。还有你看到的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不可知晓的。他们只能从你的表情看出什么发生变化了。你到了另外一个发生变化的地方。你看见前面有一个沙坑，坑壁上杂草丛生，脱落的沙粒灰蒙蒙一片，像云雾一样洒落在淡灰色的石头上。你听见的，大概是沙子纷纷落下的簌簌声，是碎石子的当啷声，或者是这些原材料在筛子里的刷刷声，因为坑底下一个光着膀子的男人正在摇筛子。你默默地把这声音比成人们从教堂长椅上站起来时发出的声音。这个人正好停下手里的活儿，把工具锁进小木屋里。他把衬衣往肩上一搭，迈着重重的脚步奔着你走上来。当这个人忽然跑起来时，你发现在脑袋上汗水淋淋的头发和沉重的双脚之间的身躯缩短了，左右腿迈向前去时膝盖上露出强健的肌肉。你不必向任何人表明，你坐在一个沙坑边上，望着那个人在奔跑。你只需要让人家看见你身上表现出的状态，比如，那种让你跳起来，让那个人赶紧躲开的惊讶。你的表情是这个人的一面镜子，因为对观望的人来说，他不在考虑之内。但是，你不要扮演这个人，而是要表现他的惊恐状。如果你想像着沙坑另一边有棵树，在第一个树杈的节疤下面，有个脑袋一般大的空洞，你就会彻底领悟这种惊恐。这棵树从空洞口昏昏欲睡地打着哈欠。你就待在你现在待的地方。你不需要模仿那个人的表情和向前走动的姿势。观望的人也待在自己的座位上。你惟一的任务是，向他们传递你的惊恐，或者那个人的惊恐，或者干脆一种惊恐。你也只是在开始展现出你的表情。一一列举出各个神态细节，就意味着消磨时间。你的所见所闻在脸上的反应，那是你的本能。你又用自己的眼光朝那棵树看去，仿佛那树下的阴凉处就是你为休息寻找的地方。再说，你可不要表现出故意造作的神情。你可得让观望的人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地看着，好让他们后来会大吃一惊。虽然你面临着某些危险，可你的前景显然还是祥和如意的。但是，你后来用另外的目光望着这棵树。你脸上的表情相互交织在一起。你现在明白了事情是怎么回事。你也要向那些正在观望的人挨个儿展示出你那极其恐怖的神情。你跳起来。你跳起来了。你站着。你

让人看得出，你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至于那个人从沙坑一侧滑下去，手脚忙乱地像锄头一样在石头上乱抓一气，这你不需要让人家看到。别人不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也不必去想它。你只需要在他们面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你务必要保持自己的角色。你现在跪着，那就一直这样。那些正在观望的人的神态也就会保持刚才的样子。你扮演着那个跪着的人在等待，他已经无法从石头堆里出来了。他快要不行了，后来果真不行了。任何动作都再也无法撼动他了。他是沙坑里一个固执的人，其他人都观望着他，凝视着他，他现在会从墙上迸出来，可他却依然一动不动。你是电表的指针，观望的人盯着它在不停地跳动，直到眼睛酸痛难忍。你在琢磨和研究着你那一动不动的身体从一头到另一头的瞬间。你根本就没有风平浪静的时候。一旦你又是说话，又是走动，你就会遭殃。如果你一声不吭，你就会幸免于难。不过，如果你一声不吭，观望的人中就没有人知道你要告诉他们什么。可是，如果你开口说话和动起来，那么说话就会让你倒霉的。

故事的产生

他不知道的事情急于想知道，知道后就不感兴趣了。如果他只知其一而不知事情是什么和怎么样的话，他就会受到诱惑而想知道。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是很诱人的。表面上被遗忘了的东西也是诱人的。有时候，只有书中描写的那条崎岖不平的小路诱惑着他。在那些偏僻地区也发生过这样的故事。尽管传说从前那儿曾有军队经过，但是有些路却像一条秘密小路一样。他的耳朵感到新鲜的，是那脚步踩在潮湿的沙地上发出的嚓嚓声。要是他没有记错的话，书中这样描写道，前一天夜里下了一场雨。然而，他已经记不清楚他是怎样得到这本书的。他现在想知道的有关内容，似乎都被当今摒弃和改动了。在他的记忆里，那些记录被没收了。由于他忘记了判决书的内容，关于那本书能不能阅 读的判决就失效了，也从他的记忆里被消除了。然而，他毫不怀疑，他曾经读过这本书。既然他读过这本书，那么他当时还不可能失明。只是当他怀疑到书中所描写的事情时，他就感到痛苦。这本书是以描写一条小路开始的，一个人领着儿子走在路上，正在寻找一位失踪的兄弟。正像前面所说的，鞋子踩在一片雨后潮湿的、或者说依然湿漉漉的沙地上，发出嚓嚓的声音。那是一个晚上。他不可能记错时间，因为他记得，他们一边走路一边说话时，有句话提到房屋

的颜色。那石灰墙闪闪发亮，就像雷雨来临时一样，周围已经夜幕降临了。他又忽然想起，两个人正走的那条路是一条山间羊肠小道，或者是一条林荫便道，两边杂乱的榛子树挡住了路。当他们伸开手臂时，树叶子上还滴着雨水。两个人打算从这儿抄近路走去。然而，他们在寻找的路上不可能看见一座房子。那丛林本身是看不透的。大家都说这片地区人烟稀少，每平方公里平均不超过四十人，而这里也许只有他们两个人。所以，书里提到的那个地方并没有说起房屋的颜色。如果两个人没有谈起那发亮的房屋颜色的话，那么也不必要是晚上了。他只能肯定，他们的鞋底在潮湿的沙地上发出嚓嚓的声音，别的他都忘记了。

这本书讲述的是兄弟俩的故事，其中一个后来独自去寻找失散的另一个时双目失明了。书里并没有完全讲清楚这位少年是怎么失明的，只是多次提到当时处于战争状态。然而关于这个不幸并没有详细的描述，或者说他忘记了。故事是这样开始的：这个盲人已经长大成人了。一个星期天，他一觉醒来，因为有些事情怎么想也想不清楚，于是就想起了出门在外的弟弟。接着，他的大脑里乱成一团，不断萦绕着他认为自己能够回想起来的东西。不论怎样，当地每一趟公共汽车的到来对这盲人都非常重要。他和在世的父亲一起生活在郊外，待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父亲的第二任妻子是在战争暂时停止以后来到这里的。所以，当他不幸失明时，这个星期天里所发生的事情和战争时期那一天里所发生的事情是相吻合的。但是这种吻合并不在于表面的行为和神态上，而仅仅是在盲人现在遇到的事情和他曾经遇到的事情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改变的吻合，尽管它们表面上并没有相似之处。碰巧，盲人心里的一些想法使他更加怀疑有些事情被隐瞒了。反过来说，如果他没有弄错的话，有一处描写到一封信从父亲的妻子衣服里掉了出来。当他问起信时，得到的答复显然是撒谎，或者根本没有说话就搪塞过去了。于是，他也就默认了这个谎言。被问的人在许多地方都一声不吭，他都默认了。

整个故事的细节都来源于他的记忆。他独自构思了这个简单的框架，并且还信以为真。幸好他只保留了结尾。这位盲人虚弱地躺在屋里的床上，靠胡思乱想来聊以自慰。谁失明了，别人也就看不见他了。在外国方言里，无论是对一个双目失明的人，还是一个让别人看不见的人，用的是同一句话。没有人能够从外面看见他，因为他眼睛瞎了。瞎子不可能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如果瞎子在照镜子，那就

等于没有人在照镜子。他房间的窗户从外面反射着外面存在的东西；谁要往里面望，就必须走近窗玻璃，透过自己的脸才能看见里面那个盲人。同时，他可千万别忘了窗户下面的石灰坑。那个看不见的人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而且不必让人看见。再说，那个看不见的人就没有失明；他想自己看见什么就能看得见；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还有第二张脸，他从中也可以看见那遥远的东西。这个盲人也能看见自己想要看的东西；因为别人看不见他，所以没有人能阻止他观看。但是他看不到将来会是什么样子。他不能预见和预言事情会怎样变化和将来是什么样子。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只关心当下经历的和已经经历过的事情。在许多传说中，盲人恰恰是先知。先知是瞎子。然而在这里，这位躺在屋里床上的人却悠然自得，因为即使涉及他所面临的事情，他也得不到任何预告，除了依靠自己的思想外，他没有任何别的的依靠；他想到有事要发生，它要么发生了，要么也不会，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于是他就对自己的思想予以认可。凡是他想的事情，即使后来被推翻了，他依然会心满意足。由于他在想像着，他就能够坚持不懈。

到了这个地方，记忆便遗弃了他。不管怎么说，此间再也没有发生什么事。这个盲人躺在自己房间里思考着。他不是咳嗽一下，就是用脚尖在墙上来回拨弄着一副挂历或者一幅画，就是要让自己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一只飞不出去的大苍蝇嗡嗡地撞到封得严严实实的窗玻璃上。甚至他连故事情节发生的地方和季节都忘记了。正因为他忘记了这一切，或者说只剩下一些零碎的记忆，也正因为他确信自己曾经读过这本书，所以他才为之苦恼不堪，急于想知道一切。这使得他陷入长久的思绪之中。可是他的记忆没有说服力了；他所想像的东西不需要是真实的，只是符合一点，那就是它要令人信服地和书里描写的那些过程一致；由于它本身是令人信服的，所以，它只要可能和可以想像就行了。一个虚假的、不自然的描述是会遭到经验的驳斥和拒绝的。由于他不能确切地回忆，这使得他变得焦虑不安。他如此觉得，在书最后的某一页里说道，这个盲人走到窗前，不知用什么方法使自己解脱了苍蝇的嗡嗡声。不过，这种想法有点站不住脚，因为他已经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动弹不得，让人再也无法合情合理地苛求他能做出一个从这儿移到那儿的动作来。所以这个盲人可再叙说的东西就少之又少了。他弟弟是乘最后一趟公共汽车到来，还是就没有来，他已经记不起来了。这本书出人意料地以描写晚餐而结束。“黑夜是无法得到描述的。”

记忆的中断

又有一次，我看见弟弟走在一片结冰的雪地上。冰雪表面一整天被强烈的阳光照得融化了。晚上天气寒冷，雪地上又结上了冰。第二天，阳光又消融了冰层，有些地方布满了雪霜，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这位走在雪地上的人会小心翼翼地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去。在那晶莹的雪霜下面，冰层还很坚硬。他会注意不让自己乱了脚步不慎跌倒，会保持他开始走路的姿态。如果他乱了脚步，就会滑倒。于是，他像开始走路那样，稳住脚步继续前行。他一旦停下来，身体的重量就会使自己在冰面上向前晃一下。如果他跑动，那么脚步向前的冲力也会让他在冰面上滑行。为了让身体各处重力都保持均衡，他会在上路前卸去身上所有的累赘。最初的几步只在雪地上留下了那浅浅的脚印。他掌握了出行动作的规则。如果有人喊他，他既不能停下来，也不能应声回答。我呼喊他时，他滑倒了。他抬起左脚时，右脚滑倒了。他抬起右脚时，左脚也明显滑倒了。当他跑动时，双脚都滑倒了。冰层下面的雪里夹杂着厚厚的泥土。

（1966年）

[1] 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希特勒解散帝国议会，并将4月10日定为举行选举和全民公决的日期。——中译注，下同

[2]Badehweiler Marsch，此曲为一战时期Georg Fürst为皇家巴伐利亚步兵团所作。后希特勒喜爱此曲，在重大场合常用此曲伴奏。

[3]指纳粹德国。

[4]代表奥地利。

[5][5]代表德国。

[6]德国全球电影股份有限公司（Universum Film A.G.）的简称，成立于1917年，是由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德国制片厂合并组建的电影垄断企业。

[7]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1931—1989），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

[8]克劳塞维茨（C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1780—1831），普鲁士军事理论家，西方近代军事理论奠基者，代表著作是《战争论》。

[9]德国刑法第175条于1871年5月15日颁布，该条例将男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视为刑事犯罪。1935年，纳粹德国扩大了该条例的适用范围，并加重刑罚。

[10]莫里斯·谢瓦利埃（Maurice Chevalier，1888—1972），法国歌手和演员。

[11]传说中身材矮小，帮助做家务的精灵。

[12]汉斯·法拉达（Hans Fallada，1893—1947），德国作家。

[13]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1859—1952），挪威作家。

[14]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1900—1938），美国作家。

[15]卡夫卡小说《失踪者》主人公。

[16]弗兰茨·格里尔帕策尔（Franz Grillparzer，1791—1872），奥地利剧作家。

[17]因维也纳西部美泉宫而得名并在奥地利流行起来的建筑物外立面色彩。

[18]拉丁语：horror vacui。

[19]拉丁语，常用于天主教弥撒，意为：上帝与你们同在。

[20]拉丁语，常用于天主教弥撒，意为：愿神灵保佑。

[21]这段古老的斯洛文尼亚语出自汉德克家乡的教堂里，描写的是耶稣受难之路。译文中保留了斯洛文尼亚语，括弧里是译文。

[22]意为“厨师”。

[23]意为“强盗”。

[24]意为“外国人”。

[25]意为“老师悲伤的女儿们”。

[26]奥地利克恩滕地区方言。

[27]意思分别是“体育彩票”和“彩票”。

[28]一部美国西部电影名。作者借此在语言上戏谑式地隐喻圣体（Sakrament）。

[29]与前者相对，作者借此在语言上戏谑式地隐喻圣母玛利亚（heilige Maria）。作者在下面借用对这两个词语的随意组合来展示两个争斗者混乱无序的争斗情形。

Wunschloses Unglück by Peter Handke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2

Die Hornissen by Peter Handke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66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3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出版得到奥地利教育、艺术和文化部所提供之翻译资助

Die Übersetzung wurde gefördert mit Mitteln des Bundesministeriums

für Unterricht, Kunst und Kultur

Peter Handke

Die linkshndige Frau

左撇子女人

[奥地利] 彼得·汉德克 著

任卫东 等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左撇子女人/（奥）汉德克（Handke, P.）著；韩瑞祥主编；任卫东，王丽萍，丁君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7-208-11368-8

I.①左……II.①汉……②韩……③任……④王……⑤丁……III.①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IV.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5940号

书名：左撇子女人

作者：【 奥地利】汉德克（Handke, P.）

主编：韩瑞祥

译者：任卫东　王丽萍　丁君君

责任编辑：陈欢欢

封扉设计：园里

转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1368-8|I·1129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 文景每月书情

目　录

编者前言
短信长别
真实感受的时刻
左撇子女人

左撇子女人

[奥地利] 彼得·汉德克 著

韩瑞祥 主编

任卫东 王丽萍 丁君君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者前言

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被奉为奥地利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也是当今德语乃至世界文坛始终关注的焦点之一。汉德克的一生可以说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像许多著名作家一样，他以独具风格的创作在文坛上引起了持久的争论，更确立了令人仰慕的地位。从1966年成名开始，汉德克为德语文学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因此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如“霍普特曼奖”（1967年）、“毕希纳奖”（1973年）、“海涅奖”（2007年）、“托马斯·曼奖”（2008年）、“卡夫卡奖”（2009年）、“拉扎尔国王金质十字勋章”（塞尔维亚文学勋章，2009年）等。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介到世界许多国家，为当代德语文学赢来了举世瞩目的声望。

汉德克出生在奥地利克恩滕州格里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他孩童时代随父母在柏林（1944—1948）的经历，青年时期在克恩滕乡间的生活都渗透进他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里。1961年，汉德克入格拉茨大学读法律，开始参加“城市公园论坛”的文学活动，成为“格拉茨文学社”的一员。他的第一部小说《大黄蜂》（1966）的问世促使他弃学专事文学创作。1966年，汉德克发表了使他一举成名的剧本《骂观众》，在德语文坛引起空前的轰动，从此也使“格拉茨文学社”名声大振。《骂观众》是汉德克对传统戏剧的公开挑战，也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格拉茨文学社”在文学创造上的共同追求。

就在《骂观众》发表之前不久，汉德克已经在“四七社”文学年会上展露锋芒，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严厉地批评了当代文学墨守于传统描写的软弱无能。在他纲领性的杂文（《文学是浪漫的》，1966；《我是一个住在象牙塔里的人》，1967）中，汉德克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文学对他来说，是不断明白自我的手段；他期待文学作品要表现还没有被意识到的现实，破除一成不变的价值模式，认为追求现实主义的描写文学对此则无能为力。与此同时，他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反对文学作品直接服务于政治目的。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剧作《自我控诉》（1966）、《预言》（1966）、

《卡斯帕》（1968），诗集《内部世界之外部世界之内部世界》（1969）等。

进入70年代后，汉德克在“格拉茨文学社”中的创作率先从语言游戏及语言批判转向寻求自我的“新主体性”文学。标志着这个阶段的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1970）、《无欲的悲歌》（1972）、《短信长别（1972）、《真实感受的时刻》（1975）、《左撇子女人》（1976）分别从不同的度，试图在表现真实的人生经历中寻找自我，借以摆脱现实生存的困惑。《无欲的悲歌》开辟了70年代“格拉茨文学社”从抽象的语言尝试到自传性文学倾向的先河。这部小说是德语文坛70年代新主体性文学的巅峰之作，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1979年，汉德克在巴黎居住了几年之后回到奥地利，在萨尔茨堡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四部曲《缓慢的归乡》（《缓慢的归乡》，1979；《圣山启示录》，1980；《孩子的故事》，1981；《关于乡村》，1981）虽然在叙述风格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生存空间的缺失和寻找自我依然是其表现的主题；主体与世界的冲突构成了叙述的核心，因为对汉德克来说，现实世界不过是一个虚伪的名称，丑恶、僵化、陌生。他厌倦这个世界，试图通过艺术的手段实现自我构想的完美世界。

从80年代开始，汉德克似乎日益陷入封闭的自我世界里，面对社会生存现实的困惑，他寻求在艺术世界里感受永恒与和谐，在文化寻根中哀悼传统价值的缺失。他先后写了《铅笔的故事》（1982）、《痛苦的中国人（1983）、《重现》（1986）、《一个作家的下午》（1987）、《试论疲倦（1989）、《试论成功的日子》（1990）等。但汉德克不是一个陶醉在象牙塔里的作家，他的创作是当代文学困惑的自然表现：世界的无所适从，价值体系的崩溃和叙述危机使文学表现陷入困境。汉德克封闭式的内省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生存的深切反思。

进入90年代后，汉德克定居在巴黎附近的乡村里。从这个时期起，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动荡，南斯拉夫战争也把这位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从《梦幻者告别第九国度》（1991）开始，汉德克的作品（《形同陌路的时刻》，1992；《我在无人湾的岁

月》，1994；《筹划生命的永恒》，1997；《图像消失》，2002；《迷路者的踪迹》，2007等）中到处都潜藏着战争的现实，人性的灾难。1996年，汉德克发表了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批评媒体语言和信息政治，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汉德克对此不屑一顾，一意孤行。1999年，在北约空袭的日子里，他两次穿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旅行。同年，他的南斯拉夫题材戏剧《独木舟之行或者关于战争电影的戏剧》在维也纳皇家剧院首演。为了抗议德国军队轰炸这两个国家和地区，汉德克退回了1973年颁发给他的毕希纳奖。2006年3月18日，汉德克参加了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媒体群起而攻之，他的剧作演出因此在欧洲一些国家被取消，杜塞尔多夫市政府拒绝支付授予他的海涅奖奖金。然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汉德克无视这一切，依然我行我素，坚定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对人性的呼唤，对战争的控诉，对以恶惩恶以牙还牙的非人道毁灭方式的反思："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他因此而成为"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另类。

世纪文景将陆续推出八卷本《汉德克作品集》，意在让我国读者来共同了解和认识这位独具风格和人格魅力的奥地利作家。《左撇子女人》卷收录了汉德克70年代创作的三部小说《短信长别》《真实感受的时刻》和《左撇子女人》。这个时期是汉德克小说创作的盛期，继《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和《无欲的悲歌》之后，本卷所收录的三部小说同样是"新主体性"文学的代表作，在当代德语文学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短信长别》是一部充满自传色彩的小说。上世纪70年代初，与演员利普加特·施瓦茨的婚姻危机使得汉德克在寻求另一种生存时陷入了矛盾重重的困惑中。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作者这个时期自我反思的一面镜子，他把细腻的自我观察和感受转化成了一种虚构的文学形式，并且寻求以这种方式来改变自己："我在这本书里试图描述的是一种希望……一种你有可能如此逐渐发展变化的希望。"（汉德克）。与同年发表的《无欲的悲歌》一样，《短信长别》的表现超越了作者早期所注重的语言批判与实验的叙事态度，采用了客观冷静具

体写实的风格，融传统发展、侦探和多愁善感的旅行小说模式于一体，从中演绎出了“一个心灵的童话”（赫尔维格）。

这部小说分为“短信”和“长别”两个部分，每个部分之前分别引用了莫里茨的心理小说《安东·赖泽尔》中一段与旅行相关的名言作为引子。旅行对叙述者“我”来说是逐渐解脱心灵创伤经历的精神空间；他试图通过美国之行来摆脱现实生存的忧虑与恐惧。叙述者“我”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奥地利作家，与妻子尤迪特分手以后，他心灵里充满了对变化的渴望，因此前往美国旅行。伴随着那一个个梦境和那一个个无意识的过错，叙述者披露出自身经历的深层，从而使小说最隐秘的语言成为普遍的自我精神困惑的表现。叙述者以为，妻子尤迪特在追踪他，要置他于死地。他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困惑中，爱与恨，追寻与逃避交替，这个横穿美国的旅行因此呈现为这个旅行者在意识危机中发展变化的过程，外部世界被内化为叙述者的意识变化的镜像。他活动在这个“新世界”里，在观察，在阅读，在回忆，在反思，特别是戈特弗里德·凯勒的成长小说《绿衣亨利》是伴随叙述者心灵变化的影子，是其克服生存和意识危机的镜像。这一切使得他逐渐摆脱了一种离群索居独来独往的思维与感知方式，获得了能够有关联地反思自我经历的意识，取代了那种“不伦不类的欧洲个人主义”（汉德克）。叙述者与妻子尤迪特在西部电影导演约翰·福特花园里的会面是这部小说叙述的高潮，他们追随着这个偶像的人生感悟和教诲和平分手。旅行使得叙述者在深切的人生体验中走出了意识危机，感悟到了生存的普遍意义。

小说《真实感受的时刻》进一步延伸了《短信长别》的主题，把对充满危机的生存感受的主体性表现推到了一个极致，因此也引起了批评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争论。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科士尼格是奥地利驻法国大使馆新闻官员，他一夜之间突然脱离了自己迄今的生存常规。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杀人凶手，变得面目全非，就像卡夫卡小说《变形记》里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萨姆萨一样，突然间与周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这个梦使他一下子意识到了那种完全异化的生存方式，让他变成了另一个人，然而他又不得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如既往地照常去生活。这样一来，他变得越来越喜怒无常，觉得这种千篇一律丧失自我的生存节奏日益难以忍受。在痛苦的分裂中，他变成了游离于社会体系之外的人。科士尼格感受到自己的生存陷入了一种茫然无措的境地，“无言以表，无力行动，迷

失在死亡的恐惧中”。他的妻子离他而去，他又丢失了孩子。于是他萌生了自杀的念头。而在小说叙述中，找到孩子的幸运时刻成为拯救危机的转折。科士尼格从孩子身上获得了新的感知。他随之所发现的“三个神奇之物”——“一片栗子树叶，一块小镜子，一个女孩辫子发夹”——突然间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神秘之门：“我在它们身上发现的不是我个人的秘密，他心想着，而是一个为大家而存在的秘密的核心所在。”他因此拥有了真实感受的能力，赢得了一块生存的新天地。小说结尾，在经历了生与死的危机后，读者看到了主人公科士尼格身着新装，“目标明确地”走在巴黎的大街上。

《真实感受的时刻》是汉德克在新主体叙事上的又一大胆尝试，细腻的外在世界描写融化在对主人公意识过程发展变化的精心刻画之中，从而使主体性成为小说叙事的根本原则。尽管有批评家认为这种表现是不合时宜的标新立异，但这部小说无疑不是作者无病呻吟的心灵披露，而是以汉德克式的叙事映现出作者对现代人生存问题“更加神秘的”反思（汉德克）。

小说《左撇子女人》标志着汉德克这个时期创作的巅峰，与其同期导演的同名电影又一次轰动了德语文坛。这部小说表现的主题同样是自我经历和生存问题。可以说，它是《无欲的悲歌》的姊妹篇，因为它们同为汉德克新主体文学的经典之作，同为作者赢得了巨大声誉，女性形象同为艺术表现的中心。如果说《无欲的悲歌》悲叹的是一个生存被社会现实异化了的不幸的母亲的话，那么《左撇子女人》则以饱含着渴望女性解放的艺术之笔把一个女人的生存有意识地移植到一个“更好的世界”里，“要让这个有梦想的女人活着，永远活下去”（汉德克）。

小说主人公玛丽安娜似乎毫无先兆突如其来地解除了与丈夫的婚姻，要过上一种独立自主的日子，她好像神秘地幡然醒悟了一样。她独自承受着寂寞、忧虑、考验和时间的折磨，竭力保持独立，不屈从于任何世俗理念。她被丈夫称为走火入魔的“神秘主义者”。在独善其身的生存中，为了保证经济上的独立，她重操起当翻译的旧业。她拒绝了丈夫要重新赢得旧情的种种努力，摆脱了加入一个女性主义者圈子的诱惑，寻求志同道合的交往，毅然决然走自己选择的路。小说叙述中，镜子成为主人公自我审视、自我反思的媒介，形象地展现出一个女性心灵世界从沉思走向自信的意识发展过程。小说结尾，玛丽

安娜在家庭聚会结束后无语的绘画情节极具象征意义，它既象征着主人公追求独立和自由的艰难，又预示着未来的希望，与小说之后出自歌德小说《亲和力》的名言遥相呼应。

《左撇子女人》叙述的中心是主人公的意识世界，从她的心灵深处所迸发出的独立生存的潜在力量；“她最本原的领域就是那纯粹的精神世界”。小说客观的叙事风格使得外在的情节始终呈现为这个女人意识状态的折射，是其内在观察和感知的映像。《左撇子女人》无疑是当代德语中篇小说一部独具特色的杰作。

我们选编出版汉德克的作品，意在能够不断地给读者带来另一番阅 读的感受和愉悦，并从中有所受益。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选编和翻译疏漏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韩瑞祥

2013年3月

短信长别

王丽萍　译

“很久以前，因为她是在温暖的晨曦中走出大门，伊夫兰说道，这是个出走的好天气——这天气看来确实适合旅行，天空贴着地面，周围的景物黑蒙蒙，这样一来，人们的视线似乎只有盯在脚下行走的路上。”

——卡尔·菲利普·莫里茨《安东·赖泽尔》

1　短信

杰斐逊街在普罗维登斯是条宁静的街道，它绕着商业区通向城南，在这儿它叫挪威街，可以驶上通往纽约的辅路。杰斐逊街错落变宽的地方，形成了围着山毛榉和槭树的小广场，其中韦兰广场旁有座英式楼房，这便是韦兰酒店。四月底我到达的时候，门房打开信箱取出一封信，连同钥匙一起交给我。尽管电梯工已候在那儿，我还是在开着的电梯门口，扯开没有完全封上口的信。信很短：“我在纽约，请别找我，找到我，不一定会是好事。”

据我所能记起的事来看，我就是专为吃惊受吓而来到这个世界的。美国轰炸时我被抱回家中，院中到处散落柴禾，阳光静静地照在它们上面。门一侧周末杀兔子的台阶上面，血迹泛着光。有天黄昏，正是夜幕即将降临时，因而更显恐怖，我盲目地挥动着手臂沿着已陷入昏暗的森林跌跌撞撞地奔跑，林中只有最前面的树干隐约可辨。我时而停下呼唤着什么，因羞涩而不敢大叫出声，时而又从心灵深处向森林里大声喊去，恐怖使我忘却了羞涩，我呼唤着我至爱的人，他早晨走进森林，晚上还没走出来。院子里又是逃跑的母鸡落下满地轻飘飘的鸡毛，阳光下的院墙上也粘着许多。

我走进电梯，就在年迈的黑人提醒我注意脚下台阶时，我差点儿被电梯间高出的地面绊倒。黑人用手关上门，又拉上一道铁栏，用手

柄启动了电梯。

载客电梯旁边想必有个货梯，因为在我们上行时，旁边一直有声响，就像一摞盘子不断摇晃发出的声音。我从信上抬起头，打量着低头不与我对视、靠着手柄站在暗处的电梯工，只有他深蓝色制服下的白色衬衫还算醒目……突然，就像总是发生在我身上那样，当我和别人同在一个空间，又一直没人说话时，我觉得，对面的黑人肯定马上就要发狂似的扑向我。我从大衣里拿出今早在波士顿出发前买的报纸，边用手指着大标题，边试着向他解释，因为欧洲货币对美元升值，我只得将我换来的钱都用在这次旅行中，因为回到欧洲再换回去就不划算了。电梯工指了指电梯凳子下的报纸作为回答，最上面放着一些他卖报纸所得的硬币，并向我点了点头。下面这一摞《普罗维登斯论坛报》上印着与我手中的《波士顿环球报》上一样的大标题。

电梯工乐意与我交流使我松了口气，我在裤子口袋里摸索着纸币，一旦他把箱子放进房间，我就可以立即塞给他。到了房间，我手里却拿出一张10美元的纸币。我将它换到另一只手里，试着不将整个钱包都给带出来并掏出一张一美元的票子。我摸到一张钱，立即从口袋里拿出递给了他。那是张5美元纸币，那黑人立即将它攥在手里。“我只是刚到不久。”当剩下我一个人时，我对自己大声说。我没脱大衣就走进浴室，在镜子里端详自己。我看到了大衣上有几根头发，“这一定是在公交车上掉落的。”我诧异地坐到浴缸沿上，因为自童年以来，这还是我头一次又开始自言自语。孩童大声自语，是在想像着面对听众。我到这里只想先看看，并非想和谁有来往，我的自言自语让我莫名其妙。我不由自主地窃笑，用拳头捶打自己的头，差点滑倒在浴缸里。

浴缸的底部纵横贴着淡色粗条纹，像是防滑条。观察防滑条和思考自言自语之间立刻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吻合，于是我收住窃笑，走回房间。

窗外望去是一片小屋，窗前并列着桦树，树干上的叶子还小，阳光从其中穿透过来。我将窗户向上推开，拉过一把靠背椅坐下，将脚搁在尚留有早晨余温的暖气片上，我来回滑动靠背椅的轱辘打量着信

封。这是一个淡蓝色的酒店信封，背面印着：“德尔蒙尼克酒店，59街派克路，纽约。”信封正面的邮戳却是“费城”，信是五天前从那儿寄出的。“是下午寄的。”当我看到“p.m.”时大声说道。

“她哪来的钱旅游呢？”我问自己，“想必她身上有很多钱啊，那儿的房间至少要30美元一晚。”我只是从音乐剧里对德尔蒙尼克有一些了解：剧中的乡下人从街头迈着舞步走进来，在包厢里笨手笨脚地用起餐。“再说，她对钱没有概念，起码不像普通人那样。她总是像小孩子那样乐于交换，钱对她而言不过是个交换工具。她喜欢一切容易消费，或者至少可以马上换掉的东西，而在她看来，钱正好合二为一，既可以消费，又能够交换。”我极目远眺，注视着一座笼罩在一家棉纺织厂雾气中的教堂，从城市地图上看，它准是浸信会教堂。“信在路上走了好长时间。”我说道，“她此时会不会已经死了？”有天傍晚，我在一座小山包上寻找过我的妈妈，她时常会情绪低落。我认为，她不是掉下去，或许就是自己跳下去了。我站在小山包上往下看那块慢慢变暗的地方，并没有看出有什么异样。只有一些女人站在一起，她们的购物袋放在地上，似乎受到了什么惊吓，而且又有人加入她们的行列，这不由得让我在岩石突出的地方又开始寻找起衣物的碎条。我张不开口，空气使我疼痛，因为害怕，周围的一切都深深地陷入我的体内。后来下面的灯亮了，有些车已经开着大灯行驶。小山包上方十分宁静，只有蟋蟀还在叫。我心事越发沉重。这个地方入口的加油站里，灯也亮了起来。天还没黑呢！街上的行人匆匆忙忙。我一边在小山包上迈着小步走来走去，一边观望着下面的行人，有一个人走得十分缓慢，我认出来那是母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她做什么都慢腾腾的。她不再像以往那样直接穿过马路，而是走很长的斜线。

我将靠背椅滑向床头柜，让人给我接通纽约德尔蒙尼克酒店的电话。等我通报了尤迪特的娘家姓后，他们才在登记簿上找到了她。她五天前已经走了，并没有留下地址，倒是把相机落在了房间里：要不要把它寄到她在欧洲的住处呢？我说我明天去纽约，自己去取那相机。

我放下电话重复道：“是的，我是她丈夫。”为了不再吃吃发笑，我赶紧滑回窗前。

我坐着上下摸着大衣，将我在奥地利用现金兑换的支票数了一遍，大家都相传这儿会有抢劫。银行职员虽然向我保证，会以同等的汇率回购我的支票，但现在汇率的开放使他不必恪守承诺。“我该怎样花掉这三千块钱呢？”我问自己。突然间，我决定用我一时心血来潮而换来的这么多钱在这儿过一段懒散和忘我的日子。我给德尔蒙尼克酒店又打了电话，想在那儿订个房间。那儿已经没有空房，我即刻想到让门童帮我在华尔道夫饭店[1]订一间房，随即又打消这个念头，想到常在那儿的菲茨杰拉德，我正读着他的书，便在44街上的阿尔贡金饭店[2]订了房，那儿还有一间空房。

后来，在放水准备洗澡时我想起来，尤迪特一定把我账上的钱都取走了。“我不该授权给她的。”我自语道，其实我对此当然也无所谓；我甚至觉得好笑，并且怀着好奇的心理等待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过只有片刻，因为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时，那是一个下午，她四肢横着躺在床上，已无法跟人说话，她看着我的目光使我停住走向她的脚步，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来帮她。

我坐进浴缸里，把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读完。这是一个爱情故事，说的是一个男人在河湾边上买了一座房子，就是为了每天晚上看着对岸自己所爱的女人与另一个男人一同生活的房子里的灯光亮起。盖茨比深陷此情中，有多么难以自拔，就有多么羞愧难当，而那女人，她的爱变得越热切，越无所顾忌，她就越发胆小懦弱。

“是的，”我说道，“一方面，我很羞涩，而就我对尤迪特的情感而言，我又很懦弱。在她面前，我总是感到不自在，我就不是我了。我越来越意识到，我那羞涩的天性，当它成为我情感的标准时，便是一种胆怯。我始终坚持我的天性，因为我觉得，她不会随随便便地接受我的一切。了不起的盖茨比只是在他对待爱的方式上羞涩，因为他太痴情了。他彬彬有礼。如果还为时不晚的话，我真的愿意像他那样既彬彬有礼又无所顾忌。”

当我还坐在里面时，我就开始放走浴缸里的水。水流得很缓慢，我闭起双眼向后靠着。这时，我感到自己随着流水缓慢的咕嘟声而变得越来越小，最终溶解了。直到感到了冷我才重新感觉到自己，因为我躺在已没水的浴缸里。我站起来擦干身子，并从上到下打量着自己

的身体。我抓住自己的阳具，先是裹着毛巾，然后直接用手开始站着自慰。我用了很长时间，有时睁开眼睛，从浴室雾蒙蒙的窗子向外望去，那儿桦树叶的影子上下摇曳。当精液终于流出来时，我屈膝跪了下去。事后我清洗自己，冲净浴缸，穿上衣服。

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什么也不能想像。开始那会儿是非常痛苦，后来我感到很舒服。我并不瞌睡，但脑子一片空白。窗外稍远一些的地方时不时传来一阵不大的响声，像是噼里啪啦的声音，随之而来的是在布朗大学校园打球的大学生的呼喊声。

我从床上起来，用酒店的肥皂洗了几双袜子，然后走进楼下大厅里。电梯工坐在电梯旁的凳子上，用手撑着头。我走出饭店，几乎已经是晚上了，外面广场上，那些出租车司机互相聊着天，当我从他们旁边走过时，他们和我搭上话。我已走出很远，才发现自己懒得理睬他们，连个手势都没打，这样事后才觉得挺开心的。

“我现在到美国已两天了。”我边说边从人行道走到马路上，又从马路走回人行道，“我有没有什么变化呢？”我走着走着，不由自主地四处张望，然后简直急不可耐地看看手表。犹如常常阅读到的东西促使我急着去体验一样，了不起的盖茨比催促着我立即去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需求突然如此真切，成了本能的冲动。我思量着，我可以将那些盖茨比带给我的感受表现出来，并且在我的周围加以应用。那是热情和专注的感觉，爽朗与幸福的感觉，我感到它们会永远驱走我与生俱来的惊恐与慌乱。这些感觉是可以运用的，我再也不会因恐惧而窒息了！可是我最终要表现自己的环境在哪儿呢？我能够改变自己的环境又在哪儿呢？我暂时把固有的环境抛到了身后；在眼下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我不过是一个使用公共设施的人，一个在马路上行走的人，一个乘坐汽车的人，一个住酒店和光顾酒吧的人。我也不愿意有更多身份，因为那样我恐怕不得不去装腔作势啊。为了讨得人家多看你一眼，你到处去装腔作势，我觉得我终于摆脱掉了这种强迫感。尽管如此——面对这个环境，尽管我受到强烈的驱使，要处处留心，落落大方，可是此时此刻，我急切地避开人行道上每个向我迎面走来的人，不愿表现出另一副面孔，首先是那固有的恶心，因为那就不是我自己了。当我沿着杰斐逊街一直走下去时，尽管突然无意间想

起了尤迪特，可是我深深呼着气跑了几步，要将她驱赶掉，让我的意识中无人存在，直到我怒火中烧，气愤得几乎产生杀人的欲望，因为我无处发泄这愤怒，既不能冲着自己，又不能冲着别的什么东西。

我穿过几条横街。路灯已经亮起来，天空显得一片湛蓝。树下的青草闪耀着夕阳的余晖。房前花园里，一片片花瓣飘落在地上。在另一条街上，一辆美制大轿车关上了门。我折回杰斐逊街，在一家小吃店里喝了杯姜汁汽水，那儿不卖酒精饮料。我直等到两块冰块在杯中融化了，才将水喝下去；水有点苦，可喝过甜的姜汁汽水后倒不错。每张桌子旁边的墙上都有个自动点唱机，你可以按下去选放唱片，不用站起身来。我投了25美分，选了奥蒂斯·雷丁的《坐在海湾码头上》。这时，我想起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因而变得从未有过的自信：直到我再也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我或许会如愿以偿，做出让人刮目相看的事来！我点了个汉堡和一杯可口可乐。我有些累，打着哈欠。而就在打哈欠时，我的体内出现了一个空洞，它马上又被一幅布满阴森森的矮木丛的画面充满，就像旧病复发一样，尤迪特死了的念头又攫住了我。当我向快餐店外越来越深的黑暗望去时，那充斥着阴森森的矮木丛的画面也越加黑暗，我的恐惧如此强烈，我突然又变成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再也吃不下饭，只能小口地吸着饮料。我又点了杯可乐，心神不宁地坐在那儿。

这种恐惧和这种尽快改变自己、最终摆脱恐惧的欲望使我厌烦透顶。时间似乎停止不动，我又一次去看看自己的手表。那种熟悉不过的歇斯底里的时间感又出现了。几年前，我曾看见一个胖女人在海里游泳，每隔十分钟我都向她望一下，因为我正儿八经相信，想必她此时会变得苗条一些。而在这家快餐店里，我一次次地去看那个男人额头上结痂的伤口，因为我想要知道，伤口是否在此时已经长好了。

尤迪特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我心想着。她虽然不至于忘了约会，但事事都迟到，犹如笑话中的女人。她简直就感受不到什么时间该干什么。她很少知道今天是几号。只要有人告知她时间，她总是吓一跳。而我则每隔一小时就去打电话收听电话报时。她每次都跳起来说："嗷，都这么晚啦！"她从来都不说："啊，还这么早！"她根本不可能想到，什么时间会做什么事。我对她说："这可能是因为你

小时候经常搬家，在很多地方生活过。你虽然一直知道你待过的地方，却从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你的方向感比我强，我常常迷路。或者是因为你太早地从事了一项具有固定工作时间的职业。其实我确信，你之所以对时间没感觉，是因为你对其他人没感觉。”她回答说：“不，不对，我只是对自己没感觉。”“还有，你对钱也没有概念。”我又说。她答道：“是的，我对数字没概念。”“你的方向感也让人头晕。”我接着说，“如果你要去对面的屋子，你会说下去；当我们已从屋里出来了，你还说汽车依然停在外边；当你开车去下面的城里，你却说去上面的城里，只不过因为这条路是向北边去的。”

我现在认为，我对时间的夸张感觉，就我而言，阻碍了我的自如和专注，而这些是我想拥有的。

我站起来，回忆是如此可笑。迷迷糊糊地拿着账单走向付款台，一言不发地递上钱，这正是我当时的状态。我连姿势都无须改变，这让我很受用。一种对概念、定义和抽象强烈而又滑稽的厌恶，使我在出门后停留了片刻，我刚才就是依靠这些来思考的。我试着打嗝，可乐帮了我。一个短发圆脸大学生，穿着沙滩裤，露着粗壮的大腿，脚上穿着运动鞋，在外面与我迎面相遇。我吃惊地望着他，脑子里想着人们竟会对惟一的他统而言之，把他归类并让他成为什么的代表，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我不由自主地用“哈啰！”招呼他并直视他的双眼，他也回应了我。他成了一幅突然鲜活的图像，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一段时间以来总是愿意读有关各种人物的故事。刚才快餐店付款台旁那个女人！她的头发是漂染过的，黑发根已露了出来，她身旁插着一面小小的美国国旗，还有呢？没有什么还有了。她的面孔在回忆中竟然开始明朗起来，变得如圣像般奇特。我回头又看了一眼那个胖学生，他的T恤背后印着罐装燃料乐队歌手阿兰·威尔逊的头像。威尔逊是个小个胖男孩，脸上的青春痘从电视上就能看得真真切切，戴着一副眼镜。几个月前，在他洛杉矶的月桂树峡谷的家前，人们发现他死在睡袋中。他用温柔的高音演唱了“又在路上”和“到乡下去”。不像吉米·亨德里克斯和詹尼斯·乔普林，还有其他的摇滚乐让我无动于衷，他的死让我至今还感到受伤。他短暂的，我自认为能理解的一生，常使我在似睡非睡的思考中痛惜不已。在回酒店的路上，我想起我常常需要重新寻觅的两句话：

“我告别了科罗拉多——

走在加州是如此惬意。”

酒店地下理发店旁有个酒吧，我在黑暗中坐到一张桌边，吃着薯片，喝着龙舌兰酒。酒吧女时不时走来将新袋子里的薯片倒到盘子里。旁边桌坐着两个男人，我听着他们交谈，直到弄清楚他们是邻城福尔里弗的商人。酒吧女坐到了他们那里，我仔细地打量他们三人，却并不好奇。那张桌子对他们三人来说有些小，他们在威士忌酒杯之间玩掷色子游戏，掷出的色子像玩纸牌一样排列开，那些杯子也许是酒吧女故意没有拿走。除此之外，酒吧里几乎很安静，只有吧台上的风扇轻声转动着，再就是色子碰到杯子时发出的响声；吧台下偶尔传来录音机倒带的啪啦声。我发现自己渐渐开始轻松自如地接受着这个环境。

酒吧女用手示意我坐到那张桌旁，直到其中一个商人拉来一把椅子并用手指了指时我才走过去。开始我只是观看，后来也玩了一下，就又不想玩了，因为我总是把一个色子弄到桌子下面。我又点了一杯龙舌兰酒，女人去吧台拿酒时打开了录音机。在桌旁她把盐撒在手背上去舔，掉了些在桌子上，用我的杯子接着喝酒。酒瓶的商标上是金黄沙漠中的一棵龙舌兰，录音机里传来西部音乐，由男声合唱的一首美国骑兵队的歌曲，接着是不带演唱的尾声部分，号声渐去渐远直至最后只有口琴在低吟。吧女说她儿子正在服兵役，我对她说，我还想和他们再玩一次。

掷色子时我觉得很奇怪：我将色子从杯子磕出，所有的色子都停止不动了，单单一个色子在杯子之间转动，而我想要的那个数字闪现一下又转没了，最后还是另一个数字向上停住了。就这一闪现的数字居然让我觉得它似乎真的出现过，只是不是刚才，而是在另一个时间里。

这另一个时间并不意味着将来或者过去，它之所以是另一个时间，是因为我生活在其中却思前想后。这是对另一个时间非常强烈的

感觉。在那个时间里，想必也存在着与现在任何地方都不一样的地方；想必一切都拥有与我现在意识中迥然不同的意义；感觉也跟现在的感觉不一样，并且人们在这个瞬间正好才处于那样的状态，其中也许这个无生命的地球就是当初的情形，在千年之久的雨季之后，第一次落入了一滴没有立刻蒸发掉的雨水。然而，这种一闪即逝的感觉如此揪心和痛苦，以至于它依然闪现在酒吧女那短暂和淡然的目光中。这样的目光，我立刻感受为那另一个时间中另一女人既不闪烁也不呆滞、只是无限遥远、永远觉醒同时又熄灭不尽，直渴望到视网膜撕裂和发出轻轻一声呐喊的目光。我迄今的人生，不能就此而已啊！我看了看表，付了钱，回到楼上房间里。

我睡得很沉，无梦，整夜全身都感到一种充满期待的幸福。快到早晨时，这种感觉才消失，我开始做梦，醒来时很不舒服。袜子挂在暖气片上，窗帘随意拉开一条缝。它上面印着美国历史上的各种场景：沃尔特·雷利爵士在弗吉尼亚殖民地上悠闲抽烟；满载移民先驱的“五月花号”在马萨诸塞靠岸；乔治·华盛顿让本杰明·富兰克林朗读美国宪法；路易斯和克拉克船长在从密西西比河沿哥伦比亚河流至太平洋入口处的途中射杀黑脚印第安人[3]的场景（画中山坡的远处一个印第安人对着枪口半举起双手）；阿波马托克斯战场旁，亚伯拉罕·林肯身体后靠着向一个黑人伸出手。

我将窗帘拉到一边，并没向外多看一眼。太阳照到地面上，温暖了我光着的脚。我把床头柜上的教友派圣经拿来翻阅，并没去翻找有关犹滴与和罗孚尼的章节，我却一下子想起她在他酣睡中割下其头颅的故事。[4]“她只是总踩我的脚，”我说，“或者是绊了一下。总而言之，她总是绊到什么东西。她步态轻盈、高雅，同时又磕磕碰碰。边跳边舞地向前，又绊到了什么。她跳过去后，接着撞到迎面过来的人。不一会儿她又滑倒，戳到毛线针上。她总是把针带在身边，尽管她从未织完一件什么东西，每次都是织了又拆。”“她其实是个很实在的人。”我在卫生间刮着胡子接着说。回到房间穿衣服和装箱子时我又说：“她钉钉子竟然一个也不会锤弯，她会铺地毯、刷墙、裁衣服、做木凳，还会把车上的瘪坑敲平。可她总是会滑倒、绊着或踩到什么，直弄得我看不下去。特别是她的表情！有一次她进房间想关掉留声机，她停在门口不动，只是将头朝留声机那儿摆了摆。还有一次

是门铃响了，她先我一步到了门口，看到门前的垫子上放着封信，她把门轻轻掩上，待我过来时再打开，为了让我来捡起信。她当时没想什么，可我的手却不由自主地挥了出去，朝她的脸上打去，还好我比较笨拙，没有打到她。这让我们不一会儿就又和好了。”

我在楼下用支票结了账，乘出租车去灰狗大巴车站。这里的出租车不是黄色的，而是和英国一样的黑色。

在去新英格兰的途中我有时间做……什么呢？我思量着。不一会儿我就对窗外的景色失去了兴趣，大巴玻璃的颜色使窗外看上去更加灰暗。收费站使行程偶尔中断一下，司机向车外一个漏斗状的桶里扔几枚硬币。我推开窗户想看看外面，便有人说，开着空调呢，我只好将窗户关上。离纽约越近，广告上的文字越来越多地被画面取代了：冒着泡沫的巨大啤酒杯、灯塔般大的番茄酱瓶子、和原型一般大的喷气飞机飞在云端。我身边的人正吃着花生米，打开啤酒喝。尽管车内禁止吸烟，香烟却从这张嘴上消失又出现在另一张嘴上。不需我抬头去看，就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地上是核桃和花生壳，有些包在口香糖纸中。我开始读戈特弗里德·凯勒的《绿衣亨利》。

亨利·雷的父亲在他五岁时去世，他只记得父亲如何把土豆藤从土中拔出来，让他看上面的土豆。由于他总是穿着绿色衣服，大家都叫他“绿衣亨利”。

汽车沿着布鲁克纳高速公路穿过布朗克斯城区，向右拐，越过哈莱姆河到达曼哈顿。车速慢了下来，却尽力快速沿着公园大道穿过哈莱姆。车里的人开始拍照、摄像。这是周六，哈莱姆的黑人居民在破车和废墟之间散步。那些废墟只有底层还住着人。他们在读报，有人在街上玩棒球，姑娘们打羽毛球，那些常见的标识如汉堡包、比萨在这里使人感到如此怪异和不协调。大巴继续前行，驶过中央公园，最后拐进50街附近一个昏暗的车站里。在那儿我上了辆出租车，它们在这儿是黄色的，前往阿尔贡金饭店。

阿尔贡金饭店是座又高又窄的楼房，房间较小。房间的门全关上，也依然有个大缝隙，像是经常被摇晃过。我路过时发现，有些锁

上还有划痕。这次我很麻利地塞给那个帮我提箱子的日本人一张一美元的钞票。

房间朝向后院，厨房也是朝向后院，因为我看到排气口冒着热气并听到碗碟和刀叉的撞击声。房间里很冷，空调声音很大。坐了一整天车没怎么动，我开始冷得发抖，同时为了能够静下来，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我试着关掉空调，却找不到开关。给前台打电话，他们从那儿把空调关了，空调的嗡嗡声也停止了。安静下来后，房间显得大了起来。我躺在床上，吃着床头柜上与其他水果一同放在盘子里的葡萄。

开始我以为是葡萄让我有点胀气，身体开始膨胀，而头和四肢缩成了鸟脑袋和鱼鳍。身体里面燥热难忍，手脚却冰凉。得想办法控制身体状况的发展！手上的一根血管抽搐着，鼻子直冒火，犹如里面被用力挤压进什么东西似的。这时我才明白，又是死亡的恐惧，不是害怕自己死去，而是几近疯狂地害怕另一个人突然死去。经过长途旅行后，这种刚摆脱掉的恐惧变成了生理性的。鼻子一下子不再冒火，抽搐的血管也突然舒缓了，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使人窒息的死寂、黑暗的深渊，看不到任何生灵。

我打电话去普罗维登斯的酒店问有没有人给我留言，回答没有。我一边把我在纽约住的酒店地址告诉他们，一边翻看一本旅游指南。保险起见我也留下了我在费城住的酒店通讯地址，即利顿豪斯广场旁的巴克利酒店。然后我在巴克利酒店订了往后几天的房间。我又给楼下打电话让门房替我买去费城的火车票，又给德尔蒙尼克酒店打电话询问我妻子有没有去取相机，很遗憾没有。我说一小时后我自己过去取。略等几分钟，我拨了“0”，要了去欧洲的长途连接。酒店接线员帮我接通了越洋长途接线员，我便将母亲在奥地利邻居的电话号码告诉他。“您是想与某个人直接说话还是随便谁接听都无所谓呢？第二种情况话费会便宜些。”“谁接都行。”我说。作为陌生人接听电话比较轻松，你可以做一件事并且乐在其中。接线员要我这里的号码，我把电话机上的号码读给他后，他让我放下话筒。

我静静地坐着，望着刚刚打开的衣橱里的空衣架，厨房里传来很响的声音，想必已是下午了。其他房间的电话偶尔响起，接着我的电话响了，越洋长途接线员让我等一等。听筒里传来咔哒咔哒的声音，

我对里面叫了几声，没人回答。很长时间我只能听到一种空洞的声响和低微的嗡嗡声。随后响起咔哒一声，我又听到了同样的声响，不过与先前有些不同。紧接着不知哪里响起了长音，持续了几次。我仍握着听筒，维也纳电话局接听了，我听到维也纳越洋接线小姐通报我的号码，也听到拨号的声音，铃声又一次响起，我听到另一条线上一个女人的笑声并用奥地利方言说“我知道！”，另一个女人说“你知道个屁！”。声音中断了，邻居的孩子像用假嗓对着话筒叫着自己的名字。我试着告诉他我是谁，在哪儿，可惜他像刚被叫醒一样糊里糊涂，只是一个劲地说：“她坐末班车回来！她坐末班车回来！”直至我很快、却是下意识地轻轻放下了听筒。这时我又一次看到了一个场景，在一个路边有一个狩猎台，狩猎台旁是个岔路口，岔路前一棵沼泽草正在慢慢地直立起来。

“我永远没法适应打电话，”我说，“上大学时我才第一次从电话亭里打电话。很多事我开始做的时候，都已过了恰当的年龄段，因而很多事我没法习惯。即便我有那么一次不用多想便能与某人熟悉起来，第二天也得从头开始。与一个女人相处，我迄今依然觉得就像是个装模作样的情景。我如果在饭店里为她点菜，这让我觉得过分；如果我与她并肩而行，并排而坐，我马上觉得，好像是一个哑剧演员在演戏，觉得自己只是在装模作样。”

电话又响了，由于我刚才等候时，把话筒握得太久，它还是湿的。酒店接线员告知我刚才的通话费，并问是否将7美元与房费一起结算。我很高兴，又花掉了7美元。我回问，这附近什么地方能买到世界各地的报纸。这时我想起欧洲现在已是晚上了。接线员告诉了我一个时代广场附近的地址，接着我前往那儿。

我沿44街向东走去，“向西！”我转身朝相反方向而去。我要去百老汇，可直到越过了美洲大道和50街我才发现，其实我并没有转身往回走。由于总觉得是往回走了，所以我停下来，想来想去，开始有点晕。接着，我沿着麦迪逊大道走到42街，在这儿我又拐了个弯慢慢走下去，的确走到了时代广场旁的百老汇大道。

我买了份费城的《星期六晚邮报》，随即在卖报处打开阅读。没有什么与尤迪特相关的内容。因为我也没期待找到什么，就把它随便放到一旁什么地方，然后又买了几份德文报纸，在杂货店的吧台旁边喝着美式啤酒时读了起来，却发现这些我在去波士顿的飞机上都已看过了。我虽然只是翻了一遍，却真的都读了，因为现在我能想起每个细节来。

我穿过几条大道回去，拐入公园大道，感到自己又像前一段时间那样，当向某人描述刚刚做了什么时，我总是不能放下构成整个过程的任何动作。我走进一座房子，我不是说“我走进房子”，而是“我蹭干净鞋子，按下门把手，推开门，走进去，然后将身后的门再关上”。还有，当我给谁寄信，我总是（而不是“我寄信”）“把一张干净的纸放在一张垫纸板上，拔下钢笔帽，在纸上书写，将纸折起来，装入信封，填写信封，贴上邮票，投入信筒”。就像现在陌生的环境中一样，那时我因缺乏知识与经历，便去将自己仅有的几件事情在描述中分割细化，迷惑自己，似乎这样它们才会意义非凡。我现在也如此这般地越过美洲大道，50街和麦迪逊大道，沿公园大道直到59街，跨过一个拱门，走近旋转门，推动转门，走进德尔蒙尼克酒店。

门卫手里拿着相机在等我，他没看一眼我的护照就把它递给了我。这是一部宝丽来相机，是我在一个机场买的，比在其他地方买贵得多。从粘在一侧的小条上的数字可以看出，尤迪特已拍了一些照片。她看了什么并且还想用照片留住它们！这对我来说是个好兆头，使我在走出饭店时已不再担忧。

这是晴朗的一天，而风使天空更明亮，云彩在天际飘移。我一度只是站在街头东张西望。在地铁入口旁的电话亭里靠着两个姑娘，一个对着话筒说话，另一个偶尔将身子弯过去，一边用手把头发别到耳后。刚开始看到她们时，我愣了一下，她们的样子使我兴奋，以至于我真的来了兴致观看她们在这个小亭子里嬉笑，将话筒推来让去，互相耳语，还一边不断地投着硬币，然后又弯着身子靠近电话。她们旁边地面的盖子里涌出地铁的热气，向一旁的柏油马路上涌动。这情景让我解脱，使我放松。我轻松地观看着，处于一种天堂般的状态，一

种只是想观看，观看就意味着认知的状态。我这样走回公园大道，直到它变成了第四大道，接着一直走向18街。

在爱尔金影院，我看了场由约翰尼·韦斯穆勒出演的《人猿泰山》。一开始我就有像观看禁片的感觉，而且事先知道是禁止观看的。画面唤回了一个已经忘却的梦幻，一架小型客机紧贴在丛林上空盘旋，从飞机的内部能看到坐着一男一女和一个婴儿，飞机轰鸣着急速地飞来转去，其实真正的飞机几乎不可能那样转来转去。就在它急剧地飞转时，我儿时坐在上面看这部电影的凳子跳入我的脑海。“他们是去内罗毕，”我大声嚷道，但电影并没提到这个城市，“飞机马上就要掉下来了！”机舱内这对夫妻紧紧相拥。这时镜头切换到飞机外面，只见它摇摆着跌下来，坠入原始森林。随着一声巨响，升起的不是一股浓烟，而是从一片可笑的场景中冒出的一个个气泡。后来我才搞清楚，这下面是池塘，泰山口衔一柄匕 首，那个已长成男孩的昔日孤儿先后从相隔甚远的气泡中冒出水面。他不紧不慢，梦幻般地游来游去，水泡随之富有节奏地从深处冒出水面。然而，就在飞机坠毁的瞬间，那种观看时定型的回忆过程在一种神秘的预感中伴随着同样的节奏，逐渐成为固定的回忆图像。

尽管电影让我觉得无趣，我还是没走开。我想，连漫画书也不再让我感兴趣了，这并不是从我到这里才开始的。有段时间我看了很多漫画书，我不该看合订本。一个接一个的冒险故事此起彼伏。有一次我看了几本《花生漫画》[5]，结果夜里直犯晕，因为每场梦都是出现四格画面后结束，又以新的四格画面形式开始。我感觉就像是到第四个画面时，双脚生生地被截去，我的肚子直接戳在地上一样。现在却是这么个故事！即便是无声喜剧片我也不想看了，它们对笨拙的欣赏已不再能打动我。那些帽子不被风吹掉就不能过马路，向女士鞠躬就必定要弄翻咖啡的主人公，让我越来越觉得是难脱幼稚、不近人情的典型：这些形象慌乱不安，内心挣扎，自我扭曲，也同时扭曲着环境，因为他们只想仰望一切，事也好人也罢。卓别林固有的讥讽式的幸灾乐祸，可是看他那样子不是畏畏缩缩，就是唯唯诺诺；哈里·朗东的习惯总是缩手缩脚。惟有巴斯特·基顿努力寻找一个出路，板着一副警觉而誓不罢休的面孔，尽管他从来都没有搞清楚自己的状况。他的样子我还是挺喜欢看的。在一部电影中看到梦露皱着眉头一副无助的样子和斯坦·劳莱如何望向她，也是挺不错的。

电影院外已是黄昏，我思考着要去哪儿，于是放慢了脚步。我前面走着一位高大的姑娘，似乎被她那摆来摆去的书包牵引着，也在人行道上不紧不慢地走来走去。她的头发是黑色的，穿着牛仔裤。她不经意地走着，裤子却不像一般牛仔裤随着步子的起落，后面会起个皱，也不像其他布料在膝盖后有折痕。她左顾右盼，略带雀斑的脸庞很白，慢腾腾地走着，一如既往。我突然感到被挑逗了起来，因为我知道我会去跟她搭讪。我们就这样走着，一会儿几乎并排而行，一会儿她在我前面，一会儿我超过她，直到走到百老汇大道。我后来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真想把她当街按倒。当我跟她说话时，却只问她是否愿意和我去喝一杯。

她说，“为什么不呢？”可一切稍纵即逝，尽管两人的脸色还因刚才相互靠近的兴奋而发红，现在我们却并肩而行。如果我们俩有意的话，那么，急促的脚步可能会让我们更加兴奋，并随即消失在一个门后。可我们只是继续向前走着，比先前不快也不慢，还得从头开始。尽管如此，我还是试着去碰她，她只当是我不小心而已。

我们来到一个咖啡馆，这里一切都要自助。我要走，她却排起了队。我也拿起托盘放上一块三明治。我们坐到桌边，我吃三明治，她喝咖啡。她问我名字时，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撒谎，说自己叫威廉。之后，我立刻觉得自在了许多，并问她，要不要尝尝我的三明治，她掰了一点儿。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说头痛，对我摆摆手就走了出去。

我取了杯啤酒又坐下来，从挂着帘子的窄门向路上望去，能看见的空间很小，以至于其间的景象越发清晰。里面的人行动似乎很缓慢，像在演戏。他们好像不是从门前走过，而是在门前信步。女人们的胸部从来都没有现在这般好看和充满魅力，她们的样子几乎是忧伤的。好在我并无所求，只是想看看她们如何在宽大的广告牌前自得其乐地走来走去。有个女人几乎停在了门中，寻找着什么。我着实被自己欲冲向她的渴求吓了一跳，却立刻又想道：“我真的能和她怎样呢？那样无非就是不负责而已！”随之又释然了。我不可能想像与一个女人缠绵，就在我想着要向女人伸出手时，随即便兴味索然，疲倦不堪。

旁边的桌上放着一份报纸，我拿过来看起来。我看着发生了的和该发生的事情，一页接着一页，感到越来越舒服。在开往长岛的城际列车上有个孩子出生；一个加油站工人手足并用行走在从亚拉巴马的蒙哥马利到大西洋边佐治亚州的萨瓦纳的路上；内华达荒漠中的仙人掌开花了。我内心对所有的事都产生了一种必然的好感，只要它们能够被描述。每个地方都吸引着我，每个出现的人都合我的意，即便面对一篇报道，看到法官把一个躁动的被告粗暴地用链子绑在椅子上时，我也命令自己，即便是不理解，也要表现出没有什么不对劲的样子。我读到的每一个人都让我有亲切感。我看着一个女人的专栏，其中谈论的是拒服兵役的人，她说要是自己生出这样的孩子的话，她就会躲起来不见人。没有一种顿时休戚相关的感觉，我是不可能观看她的照片的。一个上尉说他从直升飞机上看到稻田中的东西，像是一群女人和孩子，但也可能是“一个男人和两头水牛”。哪怕只是看到这些词语，我都会突然感到遗憾，没能像这个上尉一样亲眼目睹如此情形。所有的人，特别是我还不知道的每个地方，都会让我在阅读时感到亲切，从而使我对它们产生一种渴望。我读到有关蒙大拿一个电报局和弗吉尼亚军营中的一条街，立即就希望自己在那儿并能在那儿生活一段日子；不然的话，我就会觉得像错过了永远再也无法弥补的东西一样。

这种感觉我太熟悉了。小时候，我就常常在争吵或打架当间，突然觉得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我便停止说话或干脆躺在地上；即使我正在大喊大叫着逃离某人时，有时也会停住步子，甚至会坐下来直直地看着对方，大多数情况下，对方也就从我身旁走过去，仿佛追赶的是另一个人。如果我去骂人，很少能坚持到底；一说话我就变得和善，我不再责骂，立即和解。就拿我和尤迪特的争吵来说，我一直认为一个争吵重复着另一个争吵，并不是争吵本身让我觉得可笑，而是在说着话的时候，什么东西突然对我来说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后来虽然还正处在敌对情绪之中时，我则觉得自己随时都会笑出声来，而且我或许也不得不很快笑出声来，但我们相互已经伤害得如此之深，每次中断争吵，也包括和解的笑声，似乎只会伤害对方。又是长久以来，在纽约这儿，并且看着报纸时，我觉得自己以这种不可名状的方式陷入这一切之中，实在让我吃惊；可是我现在不想去想这些。这种感觉也只是短暂的；当我去考虑它时，它也随之消失，就像从未有过一样；等我站在外面马路上时，我又是独自一人。

我漫无目的却充满好奇地荡来荡去。在时代广场上，我看着裸体照；我从百老汇上空的霓虹灯字幕上读着当天新闻；对着报社大楼的钟我对了对自己的手表。街道灯火通明，就算走进没有照明的小巷里，头几步时还觉得晃眼。我从报上读到，在中央公园有一家被烧毁的饭店又重新开业，有些燃烧的痕迹又被利用到新的装饰中。我在人行道上边走边寻找出租车时，有人问我要不要音乐剧门票，我想走开，又想到劳伦·巴考尔在里面出演。几十年前在霍华德·霍克斯的电影《逃亡》中，她演一个十分年轻的女郎，在一个港口酒吧里倾身围住钢琴伴奏者的肩头，斜靠在钢琴旁，用低沉沙哑的声音唱着一首歌。我给那人20美元，手拿着票跑向剧院。

我坐在前排。乐队的声音从乐池下震荡而出。和其他人一样，我把大衣放在膝上。劳伦·巴考尔是台上年龄最大的演员，那些男人都显得比较年轻。她不再像从前在酒吧那样坐下和轻步走动，而是跑来跑去。有一回，她和留着长发、戴着项链的年轻男人在桌上跳舞。她吃力地落下来，下落时还得重新跃起并带着表情。她的每个动作必须连贯并富有娱乐性。打电话时她也得边穿鞋，为了不耽误时间又能随即离开。她每说一句话就变换一个姿势，起码会变换双腿的位置。她长着一双大眼睛，眼球随着她的动作转动。每演一个新场景，她就换一身行头，尽管她似乎没有换衣服的时间。只有当她伸开长胳膊端着威士忌酒杯时，大家才开始为她感到自在。她让人觉得，离开银幕以后，在这儿不得不靠出演不属于自己的节目为生，这让她并不开心。于是，人们观看她也像观看任何别的人一样，虽然他们为了尊严在演出，可是观看势必只会使他们受到伤害。我突然想起尤迪特：她的日常行为就是由很多小动作组成的，而劳伦·巴考尔的身体犹如一台机器将它们一一复制出来了。在一家时装店里，她不自觉地换了一副趾高气扬的顾客面孔，我心想着：她会立刻停在门口，四面环顾，却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只有当售货员走上前来时，她才会向她转过身去，仿佛她十分吃惊居然会碰上什么人。而一上舞台，她就变了样：她做出各种动作的简练并不是那种傻气的潇洒，那种不管是常人还是演员故作的潇洒，而是她只有面对舞台时才有可能展示出的严肃和放松。无论她平常怎样表演，可在舞台上始终镇静自若，忘我地面对他人；尽管她如此自如地表演了自己的角色，可人们几乎过后就忘了她。

剧院前一辆警车开进了我的思绪，嘶鸣的警笛几乎盖过了乐队。我从楼上栏杆旁看到从节目单中掉出的一张纸摇曳而下。这时，这张上下舞动的纸一下子使我全然断定，尤迪特此刻坐在一个饭店里漫不经心地用餐，翘起小手指还要点什么。她如此地专注，根本不会想其他什么事了。乐队指挥在乐池中上下跳动！演员的裤子熨烫得多么平整！此刻还有舞台上那个女对手正顺着橄榄舔吸着马提尼酒，然后又将橄榄塞进口里！她反正不会有什么事的。很难想像她会让自己过得不好。靠我的钱！我饿了，中场休息时我就去了中央公园旁的饭馆。

公园中树木沙沙作响，像是要下雨一样。饭馆中菜单的边角，都有故意烧焦的痕迹。衣帽间旁有一本贵宾册，里面的字迹如报纸的黑体字那么醒目。外面又有一辆警车在鸣叫。有一个服务员拉开面前的窗帘站在那里，另一个交叉双臂走到门口往外看。警笛十分刺耳，在立刻就给我端到桌上的玻璃水杯中，冰块短暂晃动着漂了上来。只有几个人还坐在桌边，脸部半明半暗。餐厅几乎空空如也，显得很大，随着警笛声在远处消失，我越来越感到疲惫。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脑袋里开始有东西动来动去，伴随着我一整天在纽约穿来穿去的同样节奏。它卡了一下壳，然后好长时间勇往直前，后来开始拐弯，绕了一会儿圈，最后停止了。这既不是一种想像，也不是一种声音，只是一种时不时会造成这两种错觉的节奏。现在我才开始在内心感受着这座我先前几乎忽略了的城市。

一个我白天只是擦肩而过的环境攫住了我。一排排大楼和一条条街道事后由留在我大脑里的颤动、停息、纠结和冲击组合而成。当这些颤动也变成响声时，一种呼啸和鸣叫犹如发自一片沉寂的、被洪水淹没的大地的河床里，共同加入其中。窗前那些厚实的窗帘挡不住这些声音和图像，因为它们就发生在大脑里；一旦这些声音和图像陷入颤动和节奏，它们就会一再被大脑加速，从而重新开始剧烈震荡，并且闪现为更长的街道、更高的大楼、遭到撞击似的越来越远去的地平线遁点。尽管如此，这个过程依然让我感到惬意：纽约的面目祥和地在我内心展开，并没有对我施加什么压力。我坐在这儿，既放松，又好奇，吃着一块羊排，这是我自己请的客；喝着加州的红葡萄酒，这酒让我越喝越渴。就这样，我把这个拥挤不堪的、隆隆声不绝于耳的城市当成一个温情的自然剧来感受。我刚才就近可以看到的一切，如

玻璃窗、停车牌、旗杆、霓虹灯字幕，正因为我几个钟头之久难以看得更远，此刻分散成了一种你可以在其中极目远眺的景象。于是我有了融于其中和读本书的兴致。

吃完饭我又将菜单从头看到尾，津津有味地读着菜名，就像我以前读祷告书中圣人身世一样，有阿来摩牛排、路易斯安那小鸡、丹尼尔·布火腿、汤姆叔叔式大排。零零散散的客人都还没走，大声交谈着。一个卖报的走进来在衣帽架上丢下几份报纸，一个化了妆的老妇人拿着花从一张桌子走向另一张，一个服务生漫不经心地在一对胖夫妻旁将法国白兰地倒在煎蛋饼上。这女人替他划着一根火柴，他鞠躬接过来放在平锅边，蛋饼升起火焰，这对夫妻拍起手来。服务生微笑着将蛋饼分到盘中端给他们，然后他用餐巾纸从冰桶里拿起葡萄酒，一只手背在身后，给他们斟上白葡萄酒。一个钢琴师不知从何而来，开始演奏，一个厨师走到厨房门上的圆窗旁向琴师张望。我又点了一瓶红酒，喝干了后依然坐着没动。一个服务生走进厨房，嘴里嚼着什么又走出来。负责衣帽间的女人正玩纸牌，嘴里含着大头针，搅着柜台上一小杯咖啡，然后她放下勺子，让嘴里的针落下，一口气将咖啡饮下，接着晃动杯子想让下面的糖溶化，晃动着倒入口中，继续玩她的牌。两个妇人从外面进来，一个用宽手包向服务生打招呼，另一个马上走到钢琴旁，琴师换了一个曲调，她唱道：

“在那过去的年代，那黄金的岁月，那49年。”

午夜很久以后，我才步行回到酒店，让门房把去费城的火车票给我，然后坐到那个叫蓝吧的酒吧里又喝了一杯肯塔基威士忌，慢慢地喝，不让自己喝醉。我从一张桌上拿了些酒店的明信片，写给很多人，包括那些我从没写过信的人。我从酒店一台自动机上买了航空邮票，随后将明信片投进了店内的邮筒里。我又回到吧间，坐在一个我能将身体转来转去的宽大皮沙发上，伸开手托着杯子，时而弯腰喝上一口。服务生过来把我桌上的烟灰缸拿到另一个时而笑出声的女人桌上。她每次笑完后都从那皱皮包里拿出笔记本，用银色小圆珠笔往里面写着什么。然后，我今夜第二次感到了累，拿了一张明信片上楼回到房间。我边走边在上面写地址，把它投到楼道里的邮箱中。它哗啦啦地响着，滑落到下面。

我房间地上有一张白纸条，我马上确信，一定是给我的留言，捡起来，却只是酒店经理原本放在果盘上的推荐条。我给楼下打电话让他们把空调重新打开，接着我没有洗漱就上了床，打开了《绿衣亨利》。

我读着亨利在学校如何遇上他第一个敌人。一个同学和他对大自然现象打赌：鸟落在哪根树枝上，树在风中摆动的最低幅度，湖里是五个还是六个小波浪后会起一个大浪。亨利打赌成了瘾，他总输，已付不出钱来，两人成了敌人。后来仅有一次在狭窄的山路上相遇，他们马上就扑向对方，一言不发拼死搏斗。亨利以致死的冷静摁住对方，逮住机会就用拳头往他脸上打，感到的却是一种疯狂的痛，永远再也不会更深切地感受到的痛。不久他就离开学校去了乡下。在那儿，他第一次自由地领略大自然，兴致盎然地要把它们立即都描绘下来。

我自己在农村长大，很难理解大自然怎么就会让人重新解脱，它只是让我感到压抑，或者至少让我不舒服。谷场、果树和草地让我觉得不舒服，隐藏着一些吓人的东西。我对它们有着切肤的了解：赤脚在谷场上奔跑，爬树时树皮划破皮肤，雨天穿着胶靴跟在奶牛后面在泥泞中行走。今天我才明白，之所以我对那些小小的不如意感受那么深、那么强，是因为我在大自然中从不被允许自由活动。果树是属于别人的，主人来时必须穿越田野逃跑，照看牲畜，也是为挣钱买照看牲口穿的靴子。孩子很早就被迫在大自然中劳作，没有人教给他们那样的眼光，至多只是对岩缝、朽空了的树以及地洞有些许关注，那里可以藏身，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各式各样的地下洞穴。矮树林也吸引我，还有玉米地、密密麻麻的榛子树丛、狭道和河谷。我喜欢房屋和街道胜于自然，在这里我做不了那么多禁止的事。当风吹过麦田时，我讨厌它将我的头发吹到脸上，尽管后来我常常想像着一片**在风中来回舞动的麦田**，无非为了给自己找借口说，在自然中自己是多么的不舒服，其实只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能力去欣赏大自然。

我已把书放在一边，躺在黑暗的房间里。空调嗡嗡作响，我慢慢开始看着自己是如何入睡的。浴室的门变成山丘上一座白房子。有人正用鼻子呼吸，在我下面的岩壁脚上，有条狗呻吟着回应。我翻个身，马上从坡上滚了下去，掉到一个干涸的小河床上，那里有衣架和

开了口的胶靴，我蜷缩成一团睡在那里。雨沙沙地下个不停，还有潮汐隆隆逼近，却并没有来到近前。“我忘记在贵宾册上登记了！”

第二天临近中午时，我在宾夕法尼亚车站登上了开往费城的火车。

回想起来，我再也弄不明白：然而，我觉得这一天过得如此之快，就像吸血鬼电影里的日子一般。你走进一个地下火车站，滚梯把你一直带到下面，最后一级立刻就把你推进一扇敞开的门内。等到你在座位上坐下了，车开动了，才感到心定，觉得真的身在车厢里了。窗前先黑了几分钟，火车穿过哈德逊河下的隧道，在新泽西这边驶出地面，出现在一片朦胧的大地上，车窗的有色玻璃使窗外显得更加昏暗。车厢内很亮，书页在翻动时都反光。可是只要朝外望去，云彩显得越发昏暗，这个笼罩在昏暗之中的地方看来看去都空空荡荡：看不到房屋，到处是垃圾堆，地平线上升起黄烟，看不见烟囱，一辆汽车四轮朝天，没有了轮胎，卧在荒野里，一片片森林荒芜不堪，被大风连根拔起的树木枯萎地挂在返绿的树上，其间还挂着像降落伞布的破布条，迷失在这个地方的海鸥卧在沙丘上。由于这家铁路公司不久前已经破产，火车直接驶过一个个关闭的车站，穿过一座座城市，其间的大楼背离铁路而去，因此看上去好像被疏散和无人居住似的。两个半小时后，当那些黑乎乎的、钉死的窗上画着毒鼠药的房子突然紧逼轨道时，车厢里瞬间暗了下来，还没看清隧道入口，火车就钻入了费城地下车站。

又是滚梯；不用下楼梯就可以直接迈上一个大广场。我环顾四周，看有没有人来接站。“你不用躲，正在哪棵树后偷窥我吧？我才不会去找你呢！”我说道，“你别拿我自己来吓唬我，我生来就没有惧怕的感觉，反正早就没有了，我对此不会再无招架之力了。”两位身穿着长袖黑袍、头戴宽边小礼帽的教友会牧师穿过广场，走向一辆开着门的汽车，黑人司机立在车旁，衬衫口袋里装着一个小收音机。一个我在火车上见过的海军士兵追上牧师给他们看什么东西，他们只是微笑，其中一个摇着手拒绝，另一个已上了车，他突然又从车里出来指向我。我吓了一跳。他们向我招手，我便向他们慢慢走过去。大兵抬起胳膊把我的相机晃来晃去；我把相机忘在了火车上。

然后，我和大兵一同走过广场，两人都不知去哪儿，互相陪伴着。到威廉·潘纪念碑前，我给他照了张相，等相片干了后，他就塞进钱包里。他随之掏出一张剪报来，打开它，就像捏着一张证书似的紧紧地捏着边缘。这是一篇关于士兵返回家乡明尼苏达雷德温的报道。他受到老兵俱乐部的欢迎并作了演讲，尽管简单，却很轻松，让人信服。大兵说："其实我只是讲了鲍勃·霍普[6]带着女友来看过我们一次。我还给他们讲了他给我们说过的几个笑话，气氛不错，没人问我什么。"大兵接着又说："是我把摇滚乐带到了雷德温，我们在家里先和我的姑娘练习过，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在自动点唱机上选择了《监狱摇滚》[7]，仿佛我们要跳华尔兹似的。突然间，我将她扔过我的肩头。"大兵又说："我崇拜猫王，他在部队待过两年多，现在又回到老本行。我并不喜欢待在海军里，可那是工作啊。有一次，我在浅水里看到了一根芦苇秆冒了出来。那儿附近还有一些芦苇秆，可是它们都移动过。这一个却没有动过。有时候，你非得杀死什么人不可，不然你自己就会被人杀掉的。"这个大兵长着圆圆的脸庞，大大的鼻孔。他戴着一副眼镜，镜片粘着从他眉毛上落下的皮屑。他的嘴唇苍白，嘴里有颗金牙，说话轻声细语，每句话结尾时总是像唱歌一样扬起来，仿佛他要等人点头后才能继续说下去。他拉下帽子，让我看他的摇滚发型。这时，他的眼镜滑落到鼻子上，他的眼里流露出一种盲目而无所谓的热情，并没真正地注视我。我发现，好久以来，我第一次又能够近距离而且不紧张地打量别人。你看着这个大兵。同时我却受到伤害，因为他偏偏给我讲了他的故事。为什么偏偏总会有人给我讲故事呢？我心想着。人们总该看得出来，其实我从一开始就什么都不想听。尽管如此，还总是有人把这些愚蠢的故事讲给我听，如此慢条斯理，仿佛谁都根本想像不到我不会像个同谋一样洗耳恭听的。

"难道我非得干些什么名堂来让别人注意到我吗？"我自问道。然后，我借口要去打个电话而离开。"难道我想怎样或不想怎样的方式，总是在我说话或拒绝时才表现出来吗？难道人们从我如何行动，如何保持脑袋姿势，如何四面环顾还看不出来我的态度吗？""或者难道我的表情还和以前一模一样吗？"我坐在去酒店的出租车里想着，"难道我得一步一步地想像出一个新姿态来吗？那么人们会不会发现，我总是不得不从许多表情中先选一种来？也许人们因此会觉得，我对任何可能的观点都会同意？"

“或者他们只是想吓唬我吧。”我心想着。这时，我站在酒店门口看着出租车司机把我的箱子交给一个服务生。“也许我看起来属于那类人，人们可以随便玩弄他们；面对这样的人，人们立刻就会无所顾忌，不像对待别的人那样小心翼翼：难道面对这样的人，人们马上会一见如故，因为你觉得他们没什么可怕的，无论怎么对待他们，他们都会听之任之？”

我不由自主地将脑袋朝后仰去，就像流鼻血时那样。这时，云彩耀眼夺目，我却害怕夜晚越发来得快了。我差不多一大早才上了火车，然后就和那个当兵的在广场上走了走，而现在已经快傍晚了：太阳短暂露出脸时，影子拉得长长的，而且这也表明天快要黑了，那么一切都将不复存在。我觉得迈向前的脚轻盈，而拖在后面的脚沉重。就这样，我跟着行李员走进位于酒店深处的前台。我填好登记表，在电梯里久久地等待着，直到又有人被塞进来后电梯才开动。等我到了房间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我从浴室出来，天色已经暗下来；我把大衣挂到衣橱里，也许比平时做得仔细些吧，转过身时，天已经全黑了。

“你这个臭家伙！”我说道，“我要打你个稀巴烂，我要打你个稀巴烂，我要打你个稀巴烂。你可别让我看见你，你这个捣蛋鬼。要让我捉住你的话，可就没你的好果子吃了。”

有人在挣扎，他被抬了出去，我跑过去，看到他在门口窒息，“是花粉过敏！”那个扶着他的人滑了一下，摔倒了，我帮着把人抬进屋，然后慢慢走开。当我赤脚踩到一个并不尖锐的小石子上时，一种刻骨的痛如电流从脚底窜到大脑里。接着，女人们在我身后窃窃私语地传递着死亡的消息，小心翼翼，她们并没有窃窃私语，只是她们的衣服在沙沙作响，从一个泥潭里露出一对癞蛤蟆的眼睛，一只门把手慢慢地上下移动，小心翼翼，我伸出光着的腿，碰到荨麻草。一只壁虎从我视线旁跑过，那不过是钥匙旁的酒店招牌，还挂在门上荡来荡去。“我再也不愿孤单一人。”我说。

我已给住在费城西部菲尼克斯维尔的一个女人写信，告知她，我也许会去看她。她叫克莱尔·麦迪逊，三年前我来美国时，我们上过

一次床。我们几乎互不相识，我当时是那么地急切，所以才老会想起。

我在电话簿上找到她的名字，和她接通电话。“你在什么地方？”她问。“在费城。”我回答。“明天我和孩子开车去圣路易斯。”她说，“你想一起去吗？”我们说好，我明天中午时分去菲尼克斯维尔，等孩子睡完午觉后我们就会出发。

她马上就挂了电话，我还留坐在电话机旁。床头柜上有一个小电子钟，钟面的微光在黑暗的房间里照得很远，每当分针移动一格，它会轻声地响一下。我把钟的插头拔出来，房间里顿时一片漆黑。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克莱尔三十岁左右，高个子，长着一张大嘴，微笑时她的嘴不张开，只是双唇变得更薄更长了些。她的脸也很大，抚摸她，不太合适。几乎不太可能去亲近她，她从不谈论自己，我也从来没想到要说说她的什么事，她总是真真切切地在那儿，以至于没必要再说什么。我跟她谈论自己或窗前的东西，这是我们惟一能够亲密的方式。要是会有其他什么过渡的方法，我们俩都会觉得太累。第二天我去找她，她从房间里向外叫我，让我进来就是，门是开着的。我进去时，她靠在另一扇门旁。一切突然像是在梦中安排好的，我走向她，拥抱她，马上将一条腿伸到她两腿之间。当意识到该站起来时便站起身，再坐下，使劲闭上眼，闭到双眼发痛。经过那么长的呻吟，她开始脱衣服！我们相互转过身去，说话声音陌生，默默地投去发自内心但空洞的目光，长久地打量对方，一次次地亲吻爱抚，直到欲火使两人大声喘息，只得分开身体，眼光从对方下身移向上方，又不得不转过身，一个开始娇气地呻吟，直到另一个夸张地给予爱抚。而她刚才倚着的不过是一扇美国大冰箱的门！后来在我们三心二意的亲热中，我突然进入了她的身体。我要叫她的名字，却叫不出口。她在一所学校教德语，她父亲战后随军驻守在海德堡，没让她跟着，而只是在信中让她学德语。她有过一段婚姻，她身边这孩子不是我的。

深夜，房间很高，在顶层，路灯也照不进来。那些大楼都是黑洞洞的办公楼；清洁工也都走了。只有当一架飞机低低飞过时，房间的墙壁闪亮了一下。我给费城几家豪华酒店打电话，那儿的高价会使尤迪特选择去住：喜来登酒店、华威酒店、阿德菲亚、诺曼底酒店。我

突然想到她也可能就住在这个酒店里，我给下面打电话。她在巴克利酒店住过，两天前刚走，没有留下或忘了什么东西，房费是用现金付的。

我气愤起来；愤怒随后消失，而一种厌恶如此强烈，房间里的物件似乎如蝙蝠的翅膀开始抖动起来。接着，厌恶也随之而去，我感到一股强烈的厌倦，我依然还是那个我，不知该怎么办。我向厨房订了一份吐司和法国红酒，把房间里的灯全都打开，就像人们平常看到的酒店房间广告画那样。我也打开了卫生间的灯。当服务生把餐车推进房间时，我把电视也打开了。餐车上面的吐司和红酒奇怪地并列着。我边吃边喝，当有女人在影片中尖叫，或者好长时间没动静时，便抬头看一下。有一次，当电视长时间地只有电流声时，我抬头看到由空空荡荡的德国市民房子组成的电影画面。屏幕前方突然有一头怪兽走过，图像很大，只见到它的头。其间，画面里一个戴着厨师帽子的男人正不断地介绍着由五道菜组成的晚餐，这些菜只需要简单地包在袋子里放进开水中浸泡几分钟拿出来即可。他还示范如何用剪刀把袋子剪开，将食物倒出，并用近镜头展示食物倒入盘子时热气腾腾的样子。我只喝了酒，换到另一个频道看动画片，演的是一只猫在吹泡泡糖，直到吹爆，把自己给憋死了。我还头一次在动画片中看到有谁死了。

后来我还想出去走走。没有关电视，灯也亮着，我就下楼了。因为是星期天，酒吧关门，我走到街上。费城的马路平行排列，纵横交叉形成直角。我朝前走去，拐进栗树街。这是一条主街，我继续往前走。街上静悄悄的，在一个地下音乐厅里我又遇到了那个大兵。尽管这里不卖酒，他像是喝醉了，靠在墙上看着那些年轻人跳舞，没穿军装，穿着一件皮衣，眼镜插在口袋里。我对他点头，他挥手回应，似乎并没有认出我。我端着一杯叫“根汁汽水”的饮料，颜色很暗有点焦味，在桌旁坐下，目光却不能从他身上移开。

乐队已经撤走了，只剩下那个歌手。这歌手拿来一把吉他，坐到麦克风前的凳子上，开始一边歌唱，一边叙述着或许他自己经历的故事。大家都不再跳舞了，站在周围倾听着。他讲述了一个傻姑娘的故事：她在农庄工作，被农庄主强奸后生下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我！”歌手用力拨响吉他说，吉他声余音未止，他又接着讲下去。“就在她去井旁打水时，生下了这个孩子，她用围裙裹起他，把他抱

回了家。于是我就成了农庄主和他太太的儿子一天天长大。有一天，我翻铁丝网时挂在上面下不来。这时，那傻子奔过来将孩子抱下来，她甚至连话也说不出来。那孩子对农庄主太太说：‘喂，妈妈，为什么这傻女人的手这样柔软？’而这个傻女人就是我的母亲！”歌手喊叫着。他举起吉他，蜷缩着身子，开始用缓缓而颤抖的和弦演奏着。

当音乐越来越激烈和急促时，那个大兵突然激动起来。他举起手臂，仿佛要伸展四肢似的。可是他此刻碰到什么不能完全掠过头顶的东西：他双手停滞，颤抖着攥成一团。他紧闭双眼，连眼珠都开始颤抖起来。他顶着无比巨大的阻力将头扭向一边，然后耸了耸肩，试图顶住自己的耳朵。这时，他张开嘴巴，牙咬得咯咯响。他所开始的每个动作都立刻停滞在一个同样强大的反动作中。他面孔歪斜，脑袋扭曲，仿佛它马上就会弹回来一样。他一再试图高高地推开什么；双臂一次次努力举过肩，举到那儿就开始颤抖，稍稍垂落下来，又重新使劲举起来，后来甚至连两臂垂落好像对他来说都不堪重负。他接着抬起一条腿，将脑袋硬抵在膝盖上，额头在上面蹭来蹭去。汗水从他的鬓角流出，牙床因白沫而闪亮。然而，我怀着崇敬和爱慕注视着他。他的陶醉不像其他此时又开始跳舞的人那样做作和讨厌，而且这种陶醉使他诧异，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来收场。他再也说不出话来，甚至连结结巴巴都不能，就这样，他试图让自己解脱，因为他的一举一动看上去仿佛有个史前的魔鬼在他的身上死去了。然后他突然安静下来，手上拿着一把刀。那个盯着他的人立刻朝他小臂打去，刀随之掉在地上。只有几个人眼看着这个士兵怎样被带了出去。

后来，我回到酒店，又看了《绿衣亨利》，亨利怎样开始模仿自然作画，然后才在其中寻找那些遥远和神秘的东西。他凭着对残缺树干和岩石幽灵的想像要超越自然，为了使自己这个观察家更开心。他虚构出怪模怪样的树木和岩石，并画上一些神奇而衣衫褴褛的形象作为陪衬，因为他对自己了解如此之少，连那简单存在的大自然都对他一语不发。直到有一个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亲戚让他意识到，他画的那些树，棵棵看上去都很相像，统统堆在一起，没有一棵像真的。“这些岩石和石块一刻也不可能如此垒在一起，肯定早就垮塌了！”这位亲戚让他画他拥有的财产；尽管他只是这样说说，可亨利则不得不仔细端详那些东西。此时此刻，那些寻常不过的东西，哪怕是屋顶上的

瓦片，都比他想像的要难多了。我突然又想起来，有好一阵子，我也对环境抱有一种古怪的看法：当我要描述什么时，我从来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最多莫过回想起怪异的特征，如果没有什么怪异的话，我就虚构。所以，在我的描述中，出现的总是长着红痣的巨人，说话嗓门尖细。他们大多数都是些逃犯，在雨中几个小时坐在林中的树桩上，冲着风讲述着他们的故事。残疾人、瞎子和傻子我一眼就看出，但却根本无法详细描述他们的模样。我对废墟比对房子更有兴趣。我喜欢待在墓地里，站在墓地围墙边数起有多少自杀者的坟墓。我可以与某人在一起待很长时间，然后他出出进进时，我却认不出他来，至多还记得他脸上有颗痘痘或者他咬舌。只有不同寻常的特征和不良的习惯动作会吸引我多看一眼，别的看一眼就不会再去看了；如果我要讲述的话，那只有去想像了；如果想像不出来的话，那我就编造出一些特征，像通缉令一样。于是，这些特征取代了整个场景、关联和命运。而在尤迪特那儿，我才第一次开始感受起什么；我获得了观察环境的目光，而且不再一味是邪恶的目光。我不再去收集特征，开始变得耐心了。

我睡着了，没有关灯，所以做梦时太阳照在脸上。有一次，我等在十字路口；身旁停着一辆小车，我立刻将身子俯在上面，用手将雨刷推到挡风玻璃上。一个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女人探出身子将雨刷拉回原处。与此同时，她指了指天空，我发现太阳当空。我笑了，开车的也冲着我笑了，他是个法国人。可这似乎是个噩梦，我醒来时，阴茎挺得直直的，但并不兴奋。然后我关上了灯。黎明时有人使劲拍手，我喊道："唉！"，从床上跳起来，原来只是一只鸽子在窗前扇着翅膀飞起来。

菲尼克斯维尔只是一座拥有一万五千居民的小城，离费城约三十公里。我与出租车司机谈妥价钱，吃了早饭便上路。途中我们停了一次，在一家折扣店我买了些宝丽来用的胶卷，这里比机场要便宜一半，给孩子买了个口琴。给克莱尔买礼物让我感到为难，我想不起来什么东西适合她，也想像不出她手中拿到东西的样子，她一定会显得很尴尬。可当出租车在绿叶街她家门前停下时，她正手提箱子朝车子走去。这是辆旧车，后备厢盖开着，孩子在克莱尔前面笨拙地走来走去，拿着个化妆包。屋门也敞开着，门旁还有几只箱子，屋前的草地上闪耀着露珠。

我下了车，提着箱子向她的车子走去。我们互相问候，随即我将箱子放进车里。接着我去取门旁的行李，她接过手，把它们放进去。孩子大声叫她关上后备厢盖。这是个大约十二岁的女孩，因出生在新奥尔良，叫德尔塔·本尼迪克蒂娜。克莱尔将后备厢盖合上说："如果本尼迪克蒂娜在，什么都要关上，不然她马上就开始害怕。昨天她突然开始大叫个不停，直到我终于明白是因为我衬衣上的一个扣子没有扣上。"她抱起孩子，因为我在，她不愿动。我们走进屋子，我关上门。

"你变了，"克莱尔说，"你看上去无忧无虑，你也不再介意穿着件脏衬衫。三年前你来时，总是穿着白衬衣，每次都是件新的，胸前的折痕都清晰可见。这次你来竟然还穿着上次那件大衣，纤维里子的。"

"我哪里还有兴致买穿的呢，"我说，"我不再看橱窗。以前我每天都要穿不同的衣服，现在几个月都穿一样的。这衬衫嘛，那是因为昨天住的饭店没有洗衣服务。"

"箱子里是些什么？"克莱尔问。

"换洗衣服和书。"我说。

"正在读什么书呢？"克莱尔问。

我回答道："戈特弗里德·凯勒的《绿衣亨利》。"

她还没有读过这本书，我说，我会念给她听的。"今天晚上吧，"她说，"睡觉前？"

"会在什么地方？"我问道。

"在匹兹堡的多诺拉，"她说，"我知道那儿有一家远离马路的汽车旅馆，孩子在那儿可以睡得踏实些。我希望今天我们能开到那里，到那儿有三百公里路程，阿勒格尼山脉就在这段路中。你还是不会开车？"

“是的，”我说，“我不想再让人考我，这现在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让人来向我提问，以我的回答作判断。以前，十年前，我也许还会去考，既便是满怀抵触和愤懑。现在绝对不会了。”

“你总提到‘以前’和‘现在’。”克莱尔说。

“这是因为我急着变老。”我回答道，并不得不笑起来。

“你多大了？”克莱尔问。

“三天后就三十岁了。”我说。

“在圣路易斯！”她说。

“是呀，”我答道，“我几乎都等不及了。”

“去圣路易斯，还是三十而立？”

“三十而立，并且要在圣路易斯。”我说。

她给孩子弄吃的，我去卫生间洗头发。因为她把吹风机已装在了车上，我就湿着头发坐在屋前的草地上。今天阳光明媚，我觉得理所当然。

我回到屋里时，她正给孩子脱衣服，我看着她。她将孩子套进睡袋，把她放到另一个房间的床上。我听到她拉上窗帘，然后她走出来，我们一起吃牛排和团子，喝着啤酒。

“你依旧不喜欢奥地利吗？”她问。

“我现在挺喜欢那儿。”我说，“我发现，我先前差一点儿就相信，那里没有最通常的标识。事实上我看到，不是开玩笑，是与其他各地相同的交通标志，相同的瓶子形状，相同的螺丝纹路。我着实惊讶，这里也有酒店、商场和柏油马路。一切应有尽有，我之所以惊异，因为我是在这里长大的，童年时却什么都没有感觉到，我所感觉到的却是我不曾拥有的。甚至连始终让我不安、使我对自己不满的大自然，我也渐渐地用另一种眼光去审视。”我其实想说的不是这些，而是别的，于是我不再说下去。

后来我收拾好桌子，给自己从冰箱里又拿了瓶啤酒。克莱尔说，现在正是假期，她想去圣路易斯看朋友。“这是一对恋人！”她说，另外有个受德国外交部委派的剧团，应圣路易斯大学邀请，出演几部他们还未曾上演过的剧目，她对此很是好奇。

我原想帮她一起洗碗，可她现在已有一个洗碗机了，只需将盘子放进去。我问洗碗机怎么工作。“有些东西还是要用手洗，”她说，“比如银餐具还有煮锅和炒锅，它们太大了。银餐具我本来就没有，但我常常事先做好几周的饭菜，将它们冷藏在冷冻柜里，常用到大锅。”她让我看冷冻柜里冻起来的汤。“这些到秋天还可以吃。”她说。我突然觉得，到了秋天，她将汤化开时，不会发生什么事吧。

洗碗机洗完后，我们把餐具取出来。我刚才还不知道它们该放在哪儿，可当我忙来忙去的时候，便弄清楚了它们分别摆放的位置。我把啤酒瓶扔进垃圾桶，然后打开唱机，并没看上面放着什么唱片。克莱尔将音量拧小，指了指孩子睡觉房间的门。这张唱片叫《她系一条黄丝带》，有人用鼓演奏约翰·福特电影中的主旋律。“在普罗维登斯，我听到军乐团演奏的就是这首曲子！”我叫道，并且低声重复着，好像克莱尔听不懂这样大的声音似的。

她光着脚走来走去，收拾着一些小玩意，有缝纫针、孩子可能需要的药、体温表、孩子的防疫证、挡太阳的草帽。接着，她烧苏打水做了茴香茶以备路上用。坐在这儿，真是太好了；一切是如此神奇的美妙！

她走进一间房间，而当她从另一间出来时我抬头望去，居然认不出她了。她换了件连衣裙，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我们来到屋前，她坐在一张吊床上，我坐在摇椅中讲述着我这三年的经历。

后来我们听到孩子在里面喊叫，克莱尔走进去，给孩子穿上衣服，我则在那儿继续摇来晃去。我发现还有几件孩子的衣服晾在绳子上，便取下来，放进了她装着其他小东西的包里，也没有告诉克莱尔。我被笼罩在周围的美妙所感染。孩子坐在后座上，我们驶出了菲尼克斯维尔。

到了76号高速公路上，她想起了孩子的衣服，我指了指装着衣服的包，“唱机和烧水壶我也关上了。”我说。

76号高速路，从费城到匹兹堡，是宾夕法尼亚收费公路，有五百公里长。我们越过100号高速，从市中心第八收费站驶入。克莱尔身边有个装着零钱的盒子，每到一个收费站，她就从中拿出硬币扔进收费桶里，几乎不需将车完全停下来。到多诺拉时，我们已过了十五个收费站，克莱尔一共扔进收费桶里五个多美元。

我们说话不多，要说也是对孩子说，她一路上询问各种各样的景物。天空晴朗，万里无云，田间已长着小小的啤酒花和玉米苗，从山丘后面的大片居住区升起阵阵烟雾。尽管每块土地看上去就像刚刚耕种过，四周还是荒无人迹，如同原始大自然的翻版。在依然崭新如故的公路上也看不到一处作业点，柏油路面泛着光芒，车辆行驶缓慢，最高时速为一百多公里。突然有一架空军的飞机擦着我们头顶飞过，投下巨大的阴影，以至于我以为它要坠落下来。远处的风似乎比近处的树丛中要缓些。一群白鸟掉头飞行，而且突然变得黑乎乎的。天空一片透亮，几乎没有昆虫撞上玻璃。偶尔我看到被车碾过的动物，猫和狗都被放在了路边，而刺猬则无人问津。克莱尔向孩子解释说，农场的大铝球里装的是水。

我有了拍照的兴致，尽管看不到多少东西，我先后拍了几张照片，看上去几乎都一模一样。后来我就拍孩子，拍她怎么站着，从车后向外看。再后来我还拍克莱尔，我尽量将身体后倾，相机拍不了大镜头，还没到哈里斯堡[8]，最后一卷胶卷就拍完了。我把照片排放在窗玻璃上，一会儿看看外面，一会儿又看看照片。

“你也变了。”我对克莱尔说，吃惊她也能成为话题，并且指着她的一张照片。“你看上去，好像你每次思考时都深思熟虑接着要考虑到什么。以前你有时全然心不在焉，甚至是迟钝，现在你的目光显得严肃，似乎也有点儿忧虑。”

“似乎有点儿？”

“是的，似乎有点儿忧虑，”我说着，“具体我也说不清。你走路快多了，行动更敏捷了，举止更沉稳，说话声大了，响声更多了。好像你有意要引开人家对你的注意似的。”

她按了按喇叭当作回应，什么话都没有说。过了一会儿，听我们讲话的孩子要求我们继续说下去。

“我比以前更健忘了，”克莱尔说，“也许不对：我很少回忆往事。有时候，有人对我说起我们前几天一起做过的事，可我压根儿就不愿意去回想。”

“自从我来美国后，我越来越爱回忆了。”我说道。这时，她不往下说了。“我只要一踏上滚梯，立刻就回想起我第一次上滚梯时有多么害怕。要是我走进一条死胡同里，马上就回想起一生中所有那些我迷失在其中的、早已忘却的死胡同。首先我在这儿弄明白了，为什么除了对恐惧状态的回忆以外，在我身上并没有形成回忆的能力。我从来都无法拿我每天所看见的东西与什么东西相比较。一切印象都是业已熟悉的印象的重复。这样说来，我不只是指我很少四处走动，而且我也很少关注与我生活在不同条件中的人。因为我贫穷，所以我感受的也几乎都是穷人。因为我们对事物关注得如此少，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话可说，于是我们几乎天天说的都是同样的话题。谁说得多，只要他显得滑稽，能让人开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是活宝；如果他像我一样想入非非的话，那就是个梦想者；因为我不想当个活宝。而这些梦想在我生活的这个环境里真的是想入非非，因为对它们而言，在这个环境里就不存在相应的东西，不存在什么或许使之成为可能的、与之可以比拟的东西。因此，梦想和环境从来都没有真正进入过我的意识，其结果是，我对二者从来也就没有什么记忆。惟有恐惧的瞬间立刻又突然出现在我的记忆里，因为在这其中，本来互不相关的环境和梦想突然变成了同一个东西。环境催生了梦想，而梦想突然使我对本来因想入非非而忘却的环境看得清晰了。因此，恐惧瞬间对我来说始终是认识的过程；只有恐惧时，我才会关注环境，看它究竟会给我好的还是坏的兆头，并且事后留在记忆里。这样的回忆也只是不期而遇，我从来没有学过主动去回忆。如果说我当年曾经抱有过希望的瞬间的话，那么我现在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越来越向高处开去，却看不到山峦起伏的样子。太阳斜挂天空，山坡上闪烁着光芒。孩子又要听我们说话。克莱尔向她解释说，我们后面还有很多话要说呢。我递给她一杯茶。她喝完后双手捧着杯子还给我。我们穿过一个隧道去新巴尔的摩，克莱尔把孩子抱到前面。到了隧道另一边，我又把她放回后座。山丘之间现在笼罩上越来越昏暗的阴影，从后窗已经看到月亮挂在天上。

“如果我们七点前能到多诺拉，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吃饭。”克莱尔说。“那家酒店对面有家饭店，叫‘黄丝带’。”

我们又去了加油站。加油时，克莱尔让孩子在房子后面方便。我则去自动售货机买了一听汽水。天快黑了，售货机里大概没几听了，这一听从上方滚落下来，我打开时直冒泡沫。大楼上方那个蓝白红相间的椭圆形美国标志在缓缓转动，克莱尔和孩子回来时，孩子正在说着这个。我们离开时，孩子突然大叫起来，我们回头看去，加油站的照明灯全亮了起来。“天还亮着呢！”突然间，我觉得我们至此只是穿行而过的这片地方就像是个可以抵达的地方。我开始说话，感到轻松，因为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自己说话自己听。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我不由自主地在回忆。”我说道，“而之前，我只感受到了回忆的痛苦。我自觉地去回忆，可我不愿意将那些经历作为完整的经历来重复，而只想着别让那些我此刻首先感受到的微不足道的希望再次化为想入非非的梦幻。小时候，我常常将一些东西埋起来，希望当我再挖出它们时，它们已经变成了宝藏。如今，我不像以前那样，还为之感到难为情，在其中看到的是稚气的游戏，而是有意去回忆它，以此让我确信，我没有能力用别的眼光去观察周围的事物，去改变它们，这不是我的天性，抑或是迟钝，抑或是外在的无意愿。当我回想起我常常表演自己是个魔术师时，我就越发觉得清晰了。在这期间，与其说我要无中生有或变此为彼，倒不如说我要自我陶醉。我旋转一枚戒指或者藏在被子下说，我会让魔法把自己变得不存在了！这自然很可笑，只要有人揭开被子，你还是坐在那儿。可是对回忆更重要的是那短暂的一瞬间，你认为自己也真的不在这儿了。而这种感觉，我现在不再解释为渴望从地上消失，而是对将来的喜悦，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不再不是此刻的自己了。于是我每天都告诉自己，我每天都在长大，人们应该都看得到的。我迫不及待地希望时间逝去，我变得越来越老。”

“让你死去。”克莱尔说。

“我很少想到自己死。”我说。

我们在匹兹堡前向南拐上70号高速，而76号高速路向西北继续延伸。这儿没有收费站，在日落前我们到达多诺拉。酒店接待厅的电视里正放着有亨利·方达主演的一个警察家庭连续剧，他正好发现女儿吸毒。电视机旁放着个鸟笼，里面的金丝雀正在啄一块墨鱼骨。我们要了两间挨在一起的房间。

我们穿过停车场走回汽车时，我看到山坡后的阳光照射着坡地上方一缕云，绽放出耀眼的光彩。云彩如此闪亮发白，下面的山丘变换成一片黑乎乎的阴影，我不由自主地打眼朝空中望去，又看到一块墨鱼骨。我突然明白了，从混淆与错觉之中产生了隐喻。太阳刚落下去的那片天空现在比先前阳光直射时更加耀眼。当我朝地上看去时，光点跳跃着，就是到了酒店房间里，我在黑暗中去拿东西时还抓到一旁去。“我的整个心灵都屏息倾听着”：以前人们就是这样面对大自然的；可在这样的时刻，我却面对大自然又一次极其真切地感觉到自己。

我打开通往另一个房间的门，看着克莱尔给孩子脱下连衣裙，穿上裤子和毛衣，注视着这些习以为常的事情，我的心里恢复了平静。我们从一座过街天桥上穿过高速路，前往黄丝带饭店，店前立着一个创业女子的霓虹灯塑像，脖子上围着一条黄丝巾。店里的女服务员也围着同样的黄丝巾，对叠成三角形搭在肩后。孩子喝着牛奶吃着玉米片，偶尔从克莱尔的叉子上吃口我们点的鳟鱼。与此同时，窗前的天色越来越暗，之前那些山丘又闪亮起来。接着，山丘也昏暗了。这时再往外看去，只能看到玻璃上自己的影子。孩子开始话多起来，眼睛变大了，她离开桌子跑到屋子里。克莱尔说，她是累了；她让孩子跑了会儿就把她抱了出去，让她到酒店房间去睡觉。等孩子睡着了，她再回来。

过了一段时间她又走进来，微笑着。这期间，我点了葡萄酒并斟满了两杯。“本尼迪克蒂娜问我，你的手指甲怎么这么脏。”克莱尔说，“她很快就睡着了。”

我本想解释我的指甲为何这样脏，却打住了，不想说我自己，于是我们谈论起美国来。

“在美国，我不像你，有可以去的地方。”克莱尔说，“你来到这儿，就像带着一个时间机器，不是来换地方的，而是要驶入未来。我们在这儿，也不再想我们将会怎样。如果我们要比较什么的话，那就与过去相比。我们也没有什么奢望，最多也不过是想回到童年。我们常常谈论那些最初的岁月，我们自己最初的岁月以及我们历史的最初岁月；可是我们这样做，目的并不是否认，而是有一种浓缩的渴望。你会看到，这儿绝大部分疯子都不是躁狂，只是又变得孩子气。在大庭广众之下，越来越多的人突然蒙上了孩子的面孔。接着，他们不是唱起摇篮曲，就是至死都背诵着历史数据。欧洲的疯子绝大部分都说的是宗教套话，而这儿的疯子，即便他们只是谈论吃喝，其间也会突然不由自主地念叨起这个国家所赢得的战役名称。”

“我第一次到这儿时，就只想看看那一幅幅情景。”我说道，“加油站、黄色出租车、汽车影院、广告牌、高速公路、灰狗大巴、乡村公路上的汽车站牌、圣达菲铁路、沙漠等。我有意识地避开人群，这样感到惬意。现在所有这些情景我都看腻了，想看看别的什么，但我也常常感到不自在，因为这儿的人对我来说还过于陌生。”

“可你此刻感觉不错吧？”克莱尔问。

“是的。”我说。

我发现我又在说我自己，便问她，我能否回酒店后再给她读一读《绿衣亨利》。我们穿过高速公路往回走，星星布满天空，月光皎洁，远处弯道上的汽车拖着长影。走近酒店与饭店灯光时，它们的影子就不见了，又缩成一团。我们向下看了一阵子，然后穿过每走一步就变得越寂静的深院，回到房间里。

她去看看孩子睡觉，然后从房间隔门过来找我。她坐到床上，身子往后一靠。外面偶尔有汽车轻轻开走的声音。我坐在一个宽大的沙发中，两条腿搭在沙发一边，读着亨利·雷第一次与人拥抱时陷入冰冷的境地，以至于他和这个姑娘突然感觉像敌人似的。他们就这样一起回家，亨利接着还给马喂料，而姑娘披散着头发站在敞开的窗前，解开发束望着他。“我们手上缓慢的动作，这笼罩在院落里的静谧，

赋予了我们一种深切而实在的安详，我们应该这样一直相守下去。有时我在把面包喂给马之前，啃一小块，安娜接着也从柜中拿来面包坐在窗前吃起来。我们对此不禁发笑，这干面包吃起来准像热热闹闹的盛宴的味道，而我们如今共同生活的这种形式也好像是我们经历过小小的风暴后驶入了正确的航道，并且会沿着这条航道继续前进。”我又读了关于另一个姑娘的故事，她之所以爱亨利，是因为亨利的表情让她渴望也始终能够想他之所想。

我发现克莱尔闭上了眼睛，几乎睡着了。“不早了。”我们又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她说道，“开车开累了。”她有些晕乎乎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这一夜，即使在梦乡里，我也觉得时间过得异常缓慢。床那样宽大，我在上面辗转反侧，让我觉得这一夜分外长。可是在这里，我几个月来第一次做梦，梦见我又想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和她睡觉。在过去半年里，只要尤迪特和我相互一见面，出于仇视嘴仗打个没完没了，只要我们相互见面。在那些日子里，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去接近一个女人，跟她发生关系。不是进入她的身体的念头让我恶心，而是我根本就无法产生这样的念头。这下我倒提醒自己，这样的事是有可能的，但没有什么能够刺激我，连想都不想一下。我又描述着这样的状态，直到逐渐出现一种固定不变的淡泊，它最终又让我吃了一惊。至少我现在又在做梦，梦见与一个女人在一起，让我彻夜难眠，让我迫不及待地醒来。我想告诉克莱尔，可是后来还是觉得等等为好，看看这种感受会不会再出现。

当我听到隔壁孩子在说话时，便穿上衣服走过去。我帮着打点好东西，我们先吃早饭才上路。我们想在中午前到达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到那儿大约还有三百公里路程。在俄亥俄州得穿过几个城市，另外南北向好几条公路与70号高速相交，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哥伦布需要五个小时。在那儿我们得吃些东西，不然孩子会在接下来的途中睡着。我们当天的目的地是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离多诺拉六百公里。

又是一个晴朗的天，太阳刚刚升起，阳光从车后照射进来。我给孩子戴上遮阳帽，因为我没有给她把帽子戴正，她受到刺激而大叫着。还没等她安静下来，另一车道上有一辆车从我们车旁疾驶而过；它的后备厢没关严，里面装着几个麻袋。这又让这孩子激动不安。不过我们还可以让她明白，这是因为麻袋的缘故只能这样。我们离开宾夕法尼亚。当我们穿过西弗吉尼亚北角几公里时，我突然想起一个我在一本冒险故事书中读到的句子："对得克萨斯大草原来说，弗吉尼亚的草地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越过俄亥俄河驶进俄亥俄州。尽管我们已经稍稍打开车窗，可车内变得很热，孩子全神贯注地坐着，上嘴唇上冒出小小的汗珠。随后她开始躁动起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我把茶水瓶递给她，她却不肯接。她看上去那么吃惊，好像是十分害怕似的。克莱尔说，可能是我拿瓶子的手不对。我把瓶子换到另一只手上，这时她才接过去喝起来，一边还长长地叹了口气。当她放下瓶子时，我用她各种名字叫她，与她交谈。克莱尔说，"你还是只用一种名字称呼她吧，给她起这么多名字真是我的错，如果我对她表达温情时，我每次都用各种各样的名字称呼她，每次还发明些新名字，这让她很迷惑。她只愿别人用惟一的名字称呼她，用不一样的名字叫她，就会让她非常错乱。"

"在带孩子方面我犯了不少错，"克莱尔说，"我刚才已经给你提过那个错：出于深爱，我每次都给她起个名字，而且还不止这些：在这种深爱的状态下，我向来还把与她有关的东西乱叫一气，这更让她不知所措。后来我发现，她就认定事物的第一个名称，只要用第二个名称，她就受不了。她常常也独自静静地琢磨着什么，而我在一旁看着她。然后我就再也忍不住走到她跟前，和她说说话；我一开口说话，就打破了她的宁静。而在这个时刻，她就被从她的关联世界里拽了出来，那你得设法重新使她安静下来。另一个错误首先是，我的教育方式不是美国化的。我不希望她的行为举止让人觉得好像这个世界是属于她的，或者至少是把属于她的东西看成整个世界。我想避免她过分地拘泥于具体的事物，因为美式教育会加深对这些具体事物的依赖。我不给她买玩具，只让她去玩用于其他目的的东西，如牙刷、鞋油盒，还有其他居家的物件。她拿它们玩，而且也毫不厌烦地观看着它们怎样用。可一旦有别的人也像她一样要玩这些东西时，她决不放手，而且像对待真正的玩具一样。于是我觉得，这是在她身上形成的

占有欲，就尽力说服她把东西让给其他想玩的孩子去玩。她死抱着不放，而且我始终认为是她的占有欲作怪，便夺走东西。直到后来我才发现，那是因为她害怕才不放手。我现在确信不疑，如果孩子不能与什么东西分离的话，那不是什么占有欲，而是恐惧。他们会惊慌无比，如果原本属于他们的东西突然不在了，或放那东西的地方空了，他们就会无比惊慌，因为他们再也不知道自己该属于哪儿。可我却自以为是地让理智蒙蔽了双眼，没去关心孩子本人，关注的却只是孩子的行为方式，并立刻将这些归结一个解释的模式。”

“现在情况怎样？”我问。

“我也不知该怎么办，”克莱尔说，“特别是在路上时间长了，她就容易情绪躁动，因为她每每看到的都是不同的东西，使她无所适从。我很高兴你在身边，这样她会把我们俩当作关注点。”

我想回头看看孩子，可忍住了，因为她刚刚安静下来。

“有一次我的手表被人偷了，”我说，“其实我也根本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因为事先我也对这表其实早就没有了感觉。尽管如此，很长时间里，每次我只要一看到手腕上空荡荡的，都会吃惊的。”

在一片田野上，一排杆子中有一根是斜的，孩子便立刻开始叫了起来。我们在路旁一个购物中心停下；克莱尔带着她走走。她让孩子坐到一个投10美分就可以晃动起来的玩具大象上，让她骑着摇来晃去，直到她看上去放松下来。接着，她肯定看到了大象脚边狗尿的黑迹，因为她立刻要人抱她下来。她猛然四处张望，可目光又急促地回避开一切，好像每看一眼都让她恐惧不安。克莱尔甚至都不能指给她懒洋洋地盘旋在屋顶上方的大鹰，她的手被孩子打落下来。她把孩子放进汽车，她躺着不动，只是要求车前窗上的照片得重新摆放。克莱尔去购物中心买橙汁时，我必须一次次重新组合照片的摆放，怎么摆都不合她的要求，她又不许我把它们拿走。有一次，我移动一张照片时，她惊恐地大叫起来，犹如一个成人的声音。想必她希望看到一个自己想看到的神秘图案，而我一次次无助地试图开始组合时立刻又被破坏了。克莱尔回来时，孩子情绪彻底失控，狂躁不已。我排列照片的动作停住了，孩子突然安静了下来，可我并没有发现这些照片现在形成了一个什么特别的排列。克莱尔把果汁灌进瓶子里递给孩子喝。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孩子的眼睛睁得老大，她原来越少地眨眼睛了，然后就睡着了。我们买了几个三明治和一些水果，立刻又上路了。

“我突然能设身处地为孩子着想了。”我过了一会儿说道，“我回忆起自己人生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所发出的喊叫。当时，我被放在盆里洗澡，水塞突然一拔出，水从我下面汩汩地流出去。”

“我经常完全忘记孩子，”克莱尔回应道，“那么我就彻底无忧无虑，我根本感受不到她，她像个宠物围着我跑来跑去。后来我又感受到她，发现自己无法不去爱她。爱得越深，对死亡的恐惧就越大。有时候，当我久久地注视着孩子时，我简直再也无法分得清是爱还是怕。温柔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它转化成了死亡的恐惧。在这种状态下，有一次，我竟然把她口中的糖果挖了出来，因为我突然看到她要窒息。”克莱尔用平静的声音讲述着，犹如在为自己而感到奇怪。她朝高速公路上的绿牌子看过去，以便从哥伦布改道时别开错了道。这一段路几乎没有弯道，差不多开了一个小时都没有一个拐弯；这也有利于孩子睡觉。这里的丘陵小些，田野已经郁郁葱葱，玉米长得比在宾夕法尼亚要高。

过了哥伦布，克莱尔指了指后视镜，我从中看到孩子慢慢醒来，太阳穴上沾着湿漉漉的头发，脸红扑扑的。她睁着双眼躺了一阵子，一动不动，后来发现我们在看她，微微笑了一下。她一声不吭，满意地四处张望着。这是个游戏，个个都等着第一句话或者第一个动作。最终我输了，因为我挪了坐姿，孩子开始说话了。

驶离高速公路后，我们在一条乡间公路旁停下车。我们穿过一片空旷的草地，一阵轻风吹起我们的头发。我看见孩子太阳穴上还湿漉漉的，我们朝她俯下身去，发现下面孩子的高度几乎一点风也没有。克莱尔抱起她，让风吹干她的头发。在一片水塘旁，我们坐下来，地上的草和沼泽草一样坚硬，牛脚印中都长着小小的白蘑菇，水面上到处露出淤泥包，牛粪和蝌蚪漂浮在旁边的水面上，偶尔有一只飞舞的蚊子划动水面；泡沫汇集在一个半没在水里的树枝周围，上面的空气雾蒙蒙的。

我们吃完面包，然后走到一片树下，太阳下实在太热。孩子现在让我抱了，我抱着她奔跑在橡树和榆树之中，而克莱尔先是慢慢地跟在后面，后来落得好远。想必附近有条铁路，因为孩子从树上摘下叶子后，手上弄得黑乎乎的，而那些叶子几乎是才长出来的。我们来到一片林中空地上，一条小溪在沼泽地下隐隐地流过。我眼角余光看到一只大动物，吓了一跳，其实只是一只耗子爬进树叶里。它暂时待在下面，尾巴露在草丛外面。我和孩子弯下身子，想找个小石头扔过去；可是周围连石头的影子都没有，当我直起身来时才发现，我们已经陷了下去。我抬起脚，因为脚周围已积了水，向边上跨了一大步：一条腿立刻陷入齐膝深的、热热的淤泥中，我还感觉到下陷是淤泥中腐烂的树枝在断裂。

我分开腿站着，然而不再往下陷了。在我往下陷的时候，那耗子的尾巴也消失了。当我突然不再动的时候，孩子紧紧地搂住我，呼吸急促起来。我喊着克莱尔，尽量拖着若无其事的声音。“别喊！”孩子说。我开始把腿往外拔，还没等到脚全都拔出来就跳回树丛里，结果鞋子落在了淤泥里。我以为孩子吓得尖叫，其实她在笑，因为我如此蹦起来。克莱尔靠在一棵树上睡着了。我坐在她对面，孩子在去年的落叶中找到了几颗橡子，她静静地将它们排放在我身旁。过了一会儿，克莱尔睁开眼，好像她刚才是假装睡觉似的。她立即就发现我少了一只鞋，还有裤腿上的泥巴。她说起我的遭遇来，仿佛是在讲述一场梦似的，我证实了她所说的一切。“你有没有感到害怕？”——“那更是一种愤怒。”我说。

我们穿过草地回去，燕子飞得很低，像平时在城市上空飞行一样。“在美国几乎就没有人去散步，”克莱尔说，“人们要么开着车，要么就坐在屋前的摇椅里。谁到田里走走，或者无所事事地走走，会引人注目的。”她指向一个穿格子衬衣的男人，他穿过一片田野，手里拿着一个棍棒向我们跑过来。当我们站住时，他也站着不动了，也许他现在才看到我们带着孩子，于是也像我们一样停下了。他扔掉了手中的棍棒，弯下腰，抓起一团牛粪扔向我们。他等在那儿，当我开始慢慢地接着走，他突然掏出阳具朝我们的方向撒尿。与此同时，他还前后晃动着，犹如在性交时一样，并且溅到了自己的裤子和鞋子上，后来他失去平衡，仰面倒了下去。

我们注视着他，没有走得更快。克莱尔一言未发；只是到了车里，车子启动前，她才无声地笑了，她笑得不得不双手捧住自己的头。

因为我只有这一双鞋，在下一个购物中心我们买了一双新鞋。我们又上路时，看到裤子上的泥巴还没有干，我开始变得烦躁和不安。我一再去看看泥巴到底干没干，终于将我的烦躁转嫁到我们一路要经过的这个地方。我从不情愿变干的泥巴抬头望向一成不变的景象，我们的行驶让我觉得如此毫无意义，以至于我难以想像我们还会到达我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目的地。行进中，我感到一种厌烦，一种好像开着发动机却停滞不前的感觉，可我又希望真的停下别动了。我注意着什么时候不再是俄亥俄的车牌，而是印第安纳的车牌出现；什么时候被超过的车不再是七叶果之州[9]，而是可以看到别的标志。后来我们超过了越来越多挂着胡希尔之州[10]车牌的车。到了印第安纳时，首先变干的泥巴终于从我的裤子上脱落下来，可我却依然越来越烦躁不安，开始数起了从这里到印第安纳波利斯之间的里程碑，因为它是这一成不变的风景中惟一变化着的东西，并且不由自主地随着它们相互之间的距离节奏而呼吸，直到我的脑袋开始疼痛。我很沮丧，你要去别的地方，还非得走完一段段里程，而克莱尔脚踩油门的方式也让我觉得可笑，甚至一点用也没有。而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她踩得更深些，恨不得将新鞋的鞋跟也压在她的脚背上。烦躁不安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我的厌烦变成杀人的欲望。尽管太阳已经落山了，到处还是一片光亮，天色没有暗下来，我感受到的无形怪异的寂静。当我们后来黄昏时驶入印第安纳波利斯时，我从一侧观察打量着克莱尔，我觉得这寂静犹如一个凶手的冷酷。

我不想去看这个城市：仿佛它事先已经让我失望，使我对它厌倦，我目光盯着地面。这时，我听到克莱尔紧靠赛车场后的丽都酒店里要两个房间。一进房间，我就拉上窗帘，给在普罗维登斯的酒店打电话。有人昨晚打过电话到那儿，酒店给了他我纽约和费城的地址。“给他？”“不，是个女的。”女接线员说。我又给阿尔贡金饭店打电话，然后又打到费城的巴克利酒店。尤迪特虽然往那儿打过电话，问我在不在，自己却没有留下任何信息。我留下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地址，并说明天会再打电话告知我在圣路易斯的地址。我刚一放下

电话，铃声又响起。因为两个房间之间没有隔门，克莱尔从隔壁打来电话问："你怎么样？"我们要不要一起在下面餐厅里吃饭？

我不饿，并且说道，等孩子睡了，我们可以出去走一走。她说行，当我放下话筒时，听到墙后短暂一声响，她也放下话筒。我把窗帘又拉开朝外望去，什么细节也感受不到。窗前一种均匀的节奏声使我犯困，却又引起我的注意。远处小山丘上有棵柏树，它的枝杈在黄昏中看上去光秃秃的。树轻轻地摆来摆去，如同自己呼吸一样的动作。我又忘了它，可是当我后来也忘记自己，一味痴痴地盯着外面时，那棵柏树随着每个呼吸节奏轻柔地摇摆着靠近我，直到最终钻进我的胸膛。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头上血管停止了搏动，心也不跳了。我不再呼吸，皮肤一片片地死去，我以一种不由自主的惬意感受着，柏树的动作接管了呼吸中心的作用，让我内心跟着摇摆，摆脱开我；感受着我停止充当阻力，最终成为多余的人被淘汰出它那温柔的游戏。接着，我那凶犯般的寂静也化解了，我倒在床上，虚弱而舒心的慵倦。我人在哪儿，什么时候还会在什么地方，这一切我都无所谓了。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深夜了，克莱尔已经在敲门叫我。

我们坐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沃伦公园里聊天；丽都酒店一个员工会时不时去看看孩子。皎洁的满月此刻正在升起，周围白色的长椅和树丛犹如幻影。有个路灯的玻璃碎了，里面一只蛾子在扑腾，直到被烧死。月光明亮，但又不是亮到让人觉得它会爆裂。我的心跳得很痛，吸气时老是叹气。长茎的花开在路边，白色的花瓣伸展在月光中，纹丝不动，濒临怒放的高峰——谁都再也没有力量使它们动起来——时而有一朵花蕾爆裂似的绽开。一只垃圾桶里窸窣作响，接着又静了下来。草地毫无生机，好像干枯了，短暂的树影在其中犹如焚烧的残迹。我内心热乎乎的，尽管天气好凉爽。在那些人工栽培的郁金香和棕榈后面，丽都的指路箭头和上面的五角星闪着微光。

"我感到，童年的经历在我这次来美国后一一重现，"我说道，"我以为早已置于脑后的所有恐惧和渴望都历历在目。有一次，也就是小时候，我觉得好像周围的世界突然崩裂，裂成了什么完全另外的东西，比如一个庞然大物的嘴。今天在途中，我就重新经历了这样的渴望，渴望自己穿上七里靴，不用再把时间花在路程上。一想到别的

地方另有一番洞天，而你又无法立刻到达，我便跟小时候一样几乎要发疯。只是小时候深陷在一种梦魇中，而现在我谈论它、作比较，并开始学习。我觉得要解这些谜很可笑；我只是描述它们，别再让自己像从前那样孤苦伶仃。我举止自由散漫，爱说话，喜欢笑，总盼着自己发福，能够用肚皮顶动旋转门，希望自己慢慢地不引人注意。”

“《绿衣亨利》也不想解释什么，”克莱尔突然说，“他只是尽可能不受任何拘束地感受和观察一种经历是对另一种的阐释，而下一次同样又是对这一次。他让所有经历自然而然地展现，自己不去横加干涉，这样，他所经历的人也就从他面前翩翩而过。他既不要求他们，也不把他们从轮舞中拽出来。他对什么都不想绞尽脑汁弄出什么结果来；一切都会顺其自然。我觉得你也一样，仿佛你不过是让周围的一切从身边翩翩而过。你让经历自然而然地展现，而不纠缠于其中。你的行为举止看上去，好像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赠品，专门赠给你的。所以，你只是彬彬有礼地观看着一切事物逐渐被展现出来；横加干涉似乎是一种失礼。你任其自然，而一旦事情发生在身上的话，你就惊讶地对待，欣赏其中那种神秘莫测的东西，并将它与过去的神秘来做比较。”我想到尤迪特，吃了一惊，惭愧得出了汗，不得不站起来在月光中走来走去。

“的确如此，”我说，又是无忧无虑，如同游戏中的心不在焉，“每当我看到什么或开始经历什么，我马上就会想：‘对，就是这个！这正是我还缺少的经历！’随之同样又砍断它。一旦我纠缠到什么之中，我就开始给自己描述，并且从中退出来。你不可把它经历到底，而要让它从身边自然而然过去。‘事情就是这样！’我边想边等着接下来肯定会出现什么。”

“可绿衣亨利并不讨人厌，即便你让他四处碰壁。”克莱尔说，同样带着戏谑的口气。“他之所以回避经历，并不是因为胆小或怪僻，而是因为他总是担心，这跟他无关，如果他纠缠进去的话，无非会碰个头破血流。小时候，他总是这样碰得头破血流。”

“可要这样说的话，他不是胆小又是什么呢？”我说道。克莱尔站起身，我朝一边让开。我又走上前，克莱尔展了展衣服坐下来，我坐到她身边。我们说了这么多话，这让我们越走越近了。我们毕竟还没有相互拥抱，更说不上肌肤接触，可我们却把这种亲近感受为温情

交流。我觉得自己受人指点，却又那样自信，仿佛我受到了恭维似的。我惊讶克莱尔说得对，接着又深感欣慰，因为她弄错了。当我倾听着别人描述我时，我经常会抱着这样的心理；它让我刻骨铭心，可它却大言不惭。我描述别人时，尽管没撒谎，但觉得自己像个说大话的人。“绿衣亨利的童话到此结束。”我对克莱尔说。

她深深地吸口气，犹如认可似的，而在吸这口气时，仿佛她的身体慢慢膨胀起来，触摸到我。其实她并没有碰到我，这个想像只是先说出了我为什么如此的不安，可尽管如此我还如此不自在地抱以期待呢。我突然想起那个在我们面前撒尿的人，他的样子现在并不让我反感。我开始发抖，害怕暴露自己。我站起来，很激动，但还不至于迫不及待。我摸着克莱尔的手臂，表面上看是示意我们该回去了，可同时我又试图让她推开我。克莱尔伸伸腰，然后站起来，我又走过去，用手势扶她站起来，并没有去抓她。“开车一直伸着头看前面，弄得我脖子痛。”克莱尔说，她此时谈及她身体的一部分，让我吃了一惊，好像她这样暴露了自己。我加快步子，不想让她看到我有多么激动。克莱尔慢慢地跟在我身后，沐浴在月光之中。

听到她在我身后走来，约翰·福特一部叫《铁骑》的老电影中的一个画面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这部电影讲述的是1861年至1869年之间建造密苏里与加州跨州铁路的事。两个铁路公司从两端开始铺轨，西边是中央太平洋公司，东边是联合太平洋公司。很早以前就有人怀着这样的梦想，带着自己的儿子去西部寻找一条穿过落基山脉的通道。他和邻居告别，小儿子告别时笨拙地拥抱了邻居年龄更小的女儿。父亲遇难了，儿子成人以后找到了那条通道；而昔日的邻居成了联合太平洋公司总裁。许多年后——即使你观看这部再次描绘了所有工程的电影，也会觉得时间难熬，铁路终于在犹他州普罗蒙特里丘陵汇合，总裁将一颗金钉子敲入了最后一根枕木。随之，那个梦想者的儿子这才得以与离别多年的总裁女儿再次拥抱。我也说不清楚，在观看时我很不舒服，感到胸部有一种揪心的痛，想哭，受伤，浑身的皮肤都不是滋味，几乎是战栗——但在那颗钉子钉入和两人相互投入怀抱时，我也对这样的拥抱感同身受，内心无限满足地伸展开身体：这个身体多么渴望这两个人又抱在一起。

我等克莱尔赶上我，我们肩并肩回到丽都酒店。服务员说孩子睡得很安稳，而我觉得饿了。我吃了些东西，克莱尔双手放在胸前，身子靠在椅子里看着我。她眼睛几乎眨都不眨一下，然后又那样犹犹豫豫，好像眼睛要合上似的。我专注地回望她。突然间，我们又一次感受了我们同床的情形，而且现在才弄明白了。对克莱尔的感觉会这样强烈，我不得不移开目光。那个我在普罗维登斯从色子闪动中所感受到的另外的时间，此刻在我眼前延伸为另一个世界，只要我踏进去，就会永远摆脱掉我容易害怕的天性及其局限。可我却害怕迈出这一步，因为我想到，我必然会不知所措和无比空虚活动在另外那个世界里，没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普遍的天堂般的生活情感，没有拘束和恐惧。在这种生活情感中，犹如在那棵柏树的游戏中一样，连我自己都不再会出现。我如此地害怕这个空虚的世界，以至于我在一个恐惧瞬间重新感受到童年那种无与伦比的恐惧，那就是刚刚还在一个地方看见过的东西却转眼即逝。在这样的时刻，我便永远失去了摆脱自己的渴望。想到我那些常常幼稚的恐惧，想到我厌恶真的与他人为伍，想到莫名其妙的反应迟钝，我突然觉得自豪，随之而来的是理所当然的惬意。我明白，我永远都不会摆脱掉所有这些局限，从现在起，关键是要为它们找到一种安排和生存方式，既适应于我，又让我在其中能够正确对待别人。好像迄今的一切不过是彩排似的，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事关重大！该是动真格的时候啦！"

我感觉克莱尔还一直看着我，"她是多么可怜啊！"我心想，可是这样想并没有脱离开她。以前，只要我一想到有人与我自己迥然各异，我常常就会晕眩甚至厌恶，而现在，在这样的时刻，我第一次让这样的想像平静地有始有终，感受到的不再是与自己相关的厌恶，而是一种对克莱尔深切的惋惜，惋惜她不能处在我的地位，不能感受我正在感受的东西——作为克莱尔，她无疑觉得多么无聊啊——可我又顿生妒嫉，反过来我不也是一样吗？可是这样的想像不再独立存在，只是在一个持久而变换的过程中短暂出现和消失，而这个过程则围绕着完全另外的东西。我告诉克莱尔，我看过约翰·福特的电影《铁骑》以及我期间的感受。

她在大学电影俱乐部看过这部影片，还记得爱尔兰工人铺枕木时扯着嗓子唱的那首歌。"这其实是个无声电影！"她突然说。我们共同回想起，人们分别所看到的这首歌曲，是写在那些歌唱的工人画面上方的音符。我们又谈了很多，不是有关我们自己，而是只讲故事，

我们总是想到新的故事，谁也不愿意输给对方，尽管我们都已忍受不了还没回房间去。终于是克莱尔，当我心头怦怦直跳讲起一个有关一头猪和一辆马车的故事时，她突然变得那样严肃，脸色立即变得让人都认不出来了。放在以前的话，我也许会认为这是疯狂的爆发，可在这个晚上，我带着一种久违的、对昔日的庄重的兴致把它感受为一个真实的时刻。这种真实使我的疯狂永远显得可笑，因为我的疯狂在于，我害怕面对我的另一个人会突然变得疯狂。

我们几乎困倦地睡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动静，呼吸着，终于屏住呼吸。半夜里，我突然想到躺在另一个房间里的孩子来，一股恻隐之心油然而起，于是就对克莱尔说，我们应该过去看看孩子。“一想到本尼迪克蒂娜独自一人，我就为她感到一种可怜的孤独。不是因为我们俩此刻在一起，而是因为我抱有同感，当没有人在身边时，那种尚未存在的意识是可怕的寂寞状态。我觉得，仿佛我立即非得叫醒孩子不可，与她说说话，驱除她的寂寞。我感受到她遭受着寂寞的睡眠和梦境的折磨，我想躺在她身边，给她安慰，赶走漫长的寂寥。人不是一生下来立刻就有意识，这让人难以承受。我突然明白了那些有人要去拯救别人的故事。”我向克莱尔谈起费城那个士兵，他是多么需要人来拯救他啊。

我们过去到另一个房间里，我看着孩子躺在床上睡着。

克莱尔在浴室时，我悄悄叫醒她。她睁开眼睛，语无伦次地说着梦话。她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我朝她口腔看去，她的舌头在上腭颤动，她又睡着了。克莱尔走出来，我们并排躺下；后来她也睡着了，轻轻地打着鼾，一路驾车疲惫了。我望着电视机那暗暗闪烁的屏幕，上面反射着缩小了的丽都酒店的指示箭头和五角星。临入睡时，我还看了看手表：午夜已经过去很久了，我突然想到，我此刻是三十岁的人了。

我睡得很差，戳着一只煮烂的鸡，骨头立即散开，一胖一瘦两个女人站在一起，瘦子胖子里走进，两人都爆裂了，一个爱教训别人的妇人用刀柄托着个孩子走进地铁敞开的大门，总是急件，沙地里的符号，被一个愚蠢的园丁当作花来浇，组成字的植物，教堂纪念日摊点

上心形饼干上的神秘标志，一个奥地利旅店的四床位客房，只有一张上面铺好东西。我从这些恐怖的梦中醒来，阳具勃起，立即挺入熟睡的克莱尔，全身瘫软，接着又睡着了。

“地点的变化常常会强烈地促使我们把我们不愿意当作真实想像的那些东西如同梦幻一样忘却，这难道不会让人觉得惊奇吗？”

—卡尔·菲利普·莫里茨《安东·赖泽尔》

2　长别

那天中午我们到达圣路易斯。接下来几天里，我一直与克莱尔和孩子在一起。我们住在克莱尔称之为“可爱的一对”朋友那里，几乎一直待在他们位于罗克希尔的家中，那是圣路易斯西边的郊区，已深入密苏里州腹地。这是一幢正在油漆的木头房子，我们帮这对夫妻一起干活。我从来都不知道他们真正叫什么名字，他们相互不断地用新的昵称。我开始看到他们时，想到了克莱尔给我讲述过的萎缩的渴望，后来再看时，我又忘记了人们普遍会怎样对他们评头论足，只是好奇地观察他们，看他们的生活方式会告诉我什么。女主人总是神神秘秘，而男主人总是看着沮丧失望和受到伤害的样子，可在他们这儿住久了，你就会发现，女主人并没什么秘密，男人也很快乐和满足。尽管如此，你每天一早又得习惯，他们那神秘兮兮和沮丧失望的神色其实并没什么。男主人为圣路易斯的新电影画广告画，女人帮着他画背景。他也画些油画，有表现西部开发的，有上面画着帆布车和汽艇的风景画，这些画都卖给商场。他们相互的爱慕如此强烈，从而一再变成短暂的神经过敏。他们事先已经预感到不对劲，便相互安抚，可这样的安抚才真正引发来神经过敏。为了平息下来，他们不会相互分开不说话，而是一起待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相互抚摸和拥抱，这样一来越发生气和厌烦，于是就继续相互用昵称来安抚——就连他们争吵的物体，他们也会用昵称，直到他们真的慢慢缓和下来，可以分开了。这是他们惟一能够相互给予自由的时刻。他们这样已经生活了十年之久，从来就没有一天分开过。

在这期间，他们始终也没有搞清楚该怎样真正相处。如果其中一个干了一件事，这并不意味着下一次还是他接着干；但也不意味着另

一个接着干。每件事都要重新商定，由于每次两个人都要去干，所以事先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成一致。他们始终还没有角色分配：如果有一个喜欢对方干的事，不管是画画、做饭、说什么或者只是简单动一动，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另一个下一次画同样的画、做相同的饭、说类似的话或者试图重复同样的动作；他也不会去做与之相反的事，他必须在和对方相处时每次又完全从头开始。可是当一个不喜欢对方什么时，他也不会马上就回避，而是试图寻找机会才告诉他，这属于他生活的方式。

他们相互如此关注，以至于他们觉得，在他们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所积累的一切，哪怕是那些微不足道的物品都如他们身体一般珍贵。他们积攒家当和家具，好像只有这些物品才使得他们在其中会感到安全。有一次，孩子打碎了一个玻璃杯，你看他们那样吃惊和受伤的样子。一个一声不吭地把玻璃碎片扫在一起，另一个丢魂失魄似的站在旁边。当他们提起在他们这儿住过的人时，他们也总是说东家长西家短：这个靠在墙上，留下了脚印；那个把毛巾上的挂圈撕掉了；又一个将他的手印留在了还没干的画上；还有一个借了本书至今未还。这时，他们还指着书架上的空位，突然你会觉得，他们那神秘兮兮和受到伤害的面孔与他们的情绪状态实在如出一辙，也符合他们对敌对的外界的态度，而且你会忐忑不安地看到，当玻璃碎片倒进垃圾桶时，他们又是那样沮丧，相互悲伤地面面相觑。他们不责怪你，因为他们不会特意去告诫你，而是在当着你面一味特别夸张地相互关注，这样就将你完全排除在外了。

他们对人很友好，总是接待新客人，沉浸在一再感到失望和因此而能够相互依存的快乐中。当你接近一件物品时，他们就会向你描述起这个物品在他们生活中占有怎样的位置，以此来警示你，或者他们抢在你前面，一声不吭地给你示范最好怎样对待这个物品。他们如此在意自己的东西，以至于他们不是两人共同占有它们，而是每件东西分别各有其主。每个细节都专门归二者之一所有，这样可以得到保护。这种情况不仅限于餐巾环、毛巾和浴巾上的个人姓名，而且还包括任意一本书、一张唱片、所有的装饰靠垫。屋子里所有的角落都划分界限，不是属于这个，就是属于那个，绝对不会两人共有。当然他们也相互交换一切，理所当然地可以使用对方的领地，不过他们使用归属对方的东西，正是这种想法好像才把他们一再真正地连接在一起。依靠这样的归属，他们给自己制定了一种宪法。有了它，他们能

够以假乱真模仿传说中的黄金国[11]，那个从外部不可进入、内部却完全自给自足的国度。

他们也如此严肃对待自己的日常生活，干什么事都像过节一样。他们互为主仆，画家要给商场作画了，女人就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绷好画布，摆放好颜料，排好画笔，拉开帘子。这期间，男人只是抱着双臂走来走去。可当女人做饭时，一切所需的东西男人已为她就近摆成一圈，她做起来只需要显示出高贵的几手就是了。真的干活时，任何帮助他们都会觉得碍手碍脚。所以，在粉刷房子时，我也只能搬搬梯子，或者调调颜色，干别的事好像又会伤害他们。

他们那种向内弯曲的恩爱方式常常让我心里不是滋味。他们的行为好像在指责我独自一人，而且也让克莱尔独自一人。于是我不得不向克莱尔望去，以便我去回想，要看见她不是独自一人，那才不可思议呢。我们常常有合有分，相互并不陌生，但相互也没有什么要求。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可能，而克莱尔似乎也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可能。她认为这对恩爱夫妻的生活是一种折磨，她自己永远都不会这样活着。当我们注视着他们时，她常常一笑了之，而我们觉得自己很自由。

我们的平静变成渴求，渴求又回到平静。其间我们并没有觉得发生了什么变化，就像在梦中一样，一个行动接着另一个。我们相互几乎没有身体接触，从来都不接吻，只是相互抚摸；我们躺在一起，就是呼气和吸气。惟一的温情来自我爱说话，克莱尔倾听着，偶尔也说上几句。

我也和孩子说很多话，每天都给她照相，看看她有什么变化。别人以此来取笑，我现在也无所谓：我指着那些照片告诉你，就是因为给孩子照相了，她确实每天都表现出另外的神态。另外我也认为，我可以通过拍照给孩子留下未来记忆的画面，并且想像着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孩子的记忆中。怀着同样的意图，我也经常带着她走来走去，和她乘公共汽车进了一次圣路易斯城，一起久久地站在密西西比河岸边；河水的气味也许会帮助记忆。

在和孩子相处时她常问这问那，这让我觉得，我迄今只是关注过自己，因为周围有不少东西我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这时我才发现，对自己周围那些再也平常不过的动作，我都缺少相应的语言表述。于是我就慢慢地学习不再只是去观察，而是要作为“原来如此”来感受，将一个个发展过程观察到底。尤其对声音，怎样去描述它们，我知之甚少：有时候，连滑稽表演中简洁形式也帮不上忙。如果我不说话，孩子又会害怕，开始哭叫。她玩的时候，你跟她说话，她常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搭理你；只有当你说出新词汇时，她才会去关注。有一次，晚上很冷，我却不能说服她穿上外衣：只有当我说出不然要起鸡皮疙瘩时，她才竖起耳朵，平静地让人给她穿上了衣服。

奇怪的是，本尼迪克蒂娜几乎对大自然不再有什么感知，而是将人为的符号以及文明产物当作大自然来感受。相对于森林和草木，她会更多对电视天线、斑马线和警笛发问。她好像一进入信号灯、霓虹灯广告和交通灯的环境里就会变得更活跃，同时也更安静。这样看来，她把字母和数字当成大自然的恩赐，视它们为理所当然的事物，不必将它们作为符号来解释。这期间，当我在这个地方好长时间只是面对自然景观，又没有发现其中任何可以解读的东西时，我发现自己也觉得无聊了。

当一个孩子看到一些模仿大自然本原的东西时，如画家的一幅油画，那么对他来说，有没有实景和哪儿是它的实景，便都不重要了，因为临摹的画已经永远取代了真实。这时我又回想起来，与之相反，我小时候却总想知道那些表现的事物实际上究竟在哪儿。比如说，我们家里有一幅画着冰川的油画，画的下部还有个高原小屋。我曾一直坚信，世上确实存在这样的地方和这样的小屋，甚至以为知道画家当时站立的地方。有人告诉我，这只是一幅想像画，我简直难以相信。好长时间里，只要想到这幅画独自存在，我不能对其有所联想，我就觉得自己好像非得窒息不可。类似的情景也发生在我开始学习阅读时：我难以想像，大自然里不存在的东西会被描述。教科书里的地方是一个确定的地方，虽然不是自己的，然而却是附近一个地方，我甚至都知道是哪儿。由于我后来自愿读过的最初那些书都是第一人称故事，突然碰到一本没有了第一人称叙事者的书，着实让我吃惊。这样的感知形式总体上对我其他的经历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我现在事后觉得，我十分震惊地意识到了它们是不合适的，也恨不得让我的人生

重新开始。这个孩子一下子就将这些模仿和数字看作自成一体的东西，这又让我几乎顿生嫉妒。

再说吧，这个画家也难以想像去画不存在的东西：在他的画中，想必不仅那些风景是对真实风景的忠实模仿，而且画中的人也在其中真实生活过，他们在画上做什么，想必也是他们在某个时间真实做过的。所以，他只画历史场景中的历史时刻，比如第一辆在圣路易斯驶过密西西比河桥面的马车，剧场里朝亚伯拉罕·林肯的射击；他最多不过是对画面稍加修饰；有其一切他都觉得是弄虚作假。“所以我不喜欢画小巨角战役，”他说，“因为在这场战役中，印第安人没让一个美国兵活下来，根本就不存在目击证人。”我突然发现，到美国后，无论是在普罗维登斯酒店的窗帘上，还是在其他酒店里，我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一幅想像画，尽是模仿画，其中绝大部分都出自美国历史。

我问画家，如果不是为某个确定的客户，而是为自己的话，他会不会画些其他东西呢。他压根儿就难以想像一幅独立存在的话，他回应道，而女主人说：“我们这里的人无一不是以历史画开始观察的。一幅风景画，只有当它在其中展现出某些历史东西时才有意义。一棵巨大的橡树单独不成一幅画：只有当它代表着别的东西时，它才能被称为一幅画：比如说那些摩门教徒在去大盐湖的途中在这棵树下扎过营。我们自小看到的东西，都有传说故事，而这些故事总是与英雄传说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也不把这一个个风景看作是自然，而是那些人作为财富奉献给美国留住的事迹，而每个风景同样也是一种呼唤，要无愧于这些事迹。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就是每每带着道德震撼看待大自然。每每将目光投向一个峡谷时，都会从中闪现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的某句话。”——“我们常说，我们没法再爱这个国家了，”男主人说，“尽管这样，我们也不可能在这样一幅画上看不到那宪法的召唤。每只鸟都成为国鸟，每朵花都成为民族的象征。”——“每每看到金樱子，我就不由自主地被感动。”女主人说。“不是因为我出生在佐治亚州，而是因为金樱子是佐治亚的州花。”克莱尔突然说道：“就像你们被你们的东西所感动一样，不是因为它们卖得很贵，而是因为它们是你们共同生活的象征。”这对恩爱夫妻笑起来，也惹得站在旁边的孩子笑个没完没了。“在我们的梦里，久而久之，连我们的家常用品也慢慢地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家当了。”这对恩爱夫妻说，“于是我们俩也终于能够做起同样的梦了。”

我们交谈时，已经坐在“马克·吐温”号汽轮甲板上，等待开向密西西比河。四周都是游客，只有美国人，和我们一样在等待着。他们手上拿着听装啤酒、可口可乐和爆米花，几乎都不说话，眼睛盯着缆绳从堤桩上解开，然后又望着那两个巨大的黑烟囱。汽轮慢慢倒着开向河流，随即就地摇晃了一下，人们听到蒸汽从阀门挤出的嘶嘶声，乌黑的浓烟从烟囱中冒出，立刻让天空一片昏暗。这时汽轮拉响了我们谁都无法描述的汽笛，连克莱尔也不能，孩子立刻就把她的脑袋藏到我们的腿之间：它不是一个声音，而是一个巨大的横笛发出经久不息、无限重复的响声，让人觉得是整个民族共同在吹着这个笛子；响声是那样的强悍和野蛮，而同时注视着越来越猛烈地喷涌而出的浓烟和宽阔无比的密西西比河，又是那样激动和自豪，于是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尴尬地、全身却受到震撼地向一边望去。这信号如此强烈，在它鸣响期间，吓得我魂不附体，片刻间，我感受了一个梦幻的美国；直到此刻，我只是听说过人家讲述给我的美国。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再生时刻。在这个时刻，周围的一切都不再没有关联；在这个时刻，人和环境、生者和死者都各就各位，一个独一无二的、悲痛而戏剧性的历史在启示。密西西比河此刻戏剧性地流淌着；游客们戏剧性地从一个甲板到另一个，上上下下。这期间，一个年长的男子拖着深沉而传遍四方的声音，通过广播讲述着那一个个汽轮行驶在大江大河上的历史：讲述着交通与贸易所开创的新时代；讲述着汽轮比赛；讲述着月光中装卸取暖木材的黑奴；讲述着锅炉的爆炸；最后是汽轮被火车所取代。尽管我向来就厌烦参观途中喇叭的声音，可是这种激情洋溢的声音我却听而不厌。

在这些日子里，我也第一次感受到持续更长的、不只是激动不安的生活情趣。我坐在那儿，大家吃吃喝喝，我随意轻松。可我不那么活跃，而是懒洋洋，不大走动，也不再关注自我，也不像以前那样将注意力集中在别人身上，一切观察都自然而然发生，不紧不慢，是一种平平常常的生活感受的结果。其他人跳舞时，我只是看着，一心关注着他们，并没有觉得受到要求一起跳。我再也弄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被强制接受了别的生活方式。我从来就觉得跳舞很别扭，人们开始跳，又停下来，非得要等到又可以开始了。美妙的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出现的个别行为是你正好在合适的和适当的距离中采用的一个告别行为，一个表情，它让你省去了明确的回答，可是显得有礼有

节，也包括你示意服务员不必找零的手势；这样一来，我觉得很惬意，几乎飘飘然，也许像别人跳舞时的心情一样。

我喝很多酒，可不会喝醉的，表面上邋里邋遢的，但举止却很自信。我们离开时，就坐到一张长桌上吃饭，孩子就坐在我们中间，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糊得满脸都是，这样才让我们吃得开心和完美。有时候，她事后会使用完整和有序的句子向我们讲述我们干过和经历过什么："我们去了饭店，我们又吃又喝，又说又笑。"而与此同时，她用完整的句子讲述了所有这些过程，却只字不提，尽管我们在一起，却又迥然不同，犹如我们可能经历过的一样，那么我就出于同情，再次感到吃惊。我觉得，仿佛她尽管说出了这一切，可她压根儿就不在场似的：她所说的，不管多么有意义和多么正确，好像都是些胡言乱语不着边际的废话，恰恰是因为以如此理智的口气说出来的。我回想起自己好多年不顾禁止和否定，一味学着去描述种种经历，可是却不许其中某些确实可以经历的东西，更谈不上会实现这些经历的。我在寄宿学校体制里长大，那里几乎与外界隔绝。然而，恰恰是因为有许许多多禁令和不许做的规定，它倒教会了我更多经历的可能，似乎比我在外面世界里，在一个通常环境中能够学到的还要多。就这样，幻想开始说个没完没了，直到我几乎变成了白痴。尽管意识到这些，只要一想起这些，我就又觉得挺痛苦的。尽管如此，到了后来，当我面对那一个个经历时，那些禁令却使得我可以系统地经历，并且能够将每个经历排列起来，因为那些禁令形成了一个体系。我也明白了，我还缺少哪些经历，不可以点带面，并且以这样的方式至少没有发疯。我也可以这样来对付自杀的念头；相反，我常常更加担心的是其他人自杀，因为我的体系帮不了他们。

我不再跟自己自言自语了，期盼着白天带来，就像以前期盼夜晚一样；指甲和头发也长得比以前快了。

可我还是常做噩梦，突然猛地惊醒后，然后久久地躺在那儿，也不知道自己已醒来。那些恐怖的画面"犹如从内心深处无比的远方传来的号角"（《绿衣亨利》）一再将我唤醒。有一次，我梦到我大张着嘴巴，醒来时自己的嘴巴却闭得紧紧的。

也是在圣路易斯，我向克莱尔讲述了和尤迪特的事。我再也不用替她担心了。就像你碰到一个螺丝一样，你几次都想把它拧紧，却劳而无功，又突然已经事先确信不疑，这螺丝下一次立刻会被拧动的，于是我现在终于可以轻松地开始说话了。“我怕会打死她，”我说，“而且我依然害怕这样。有一次，我们在大街上相互掐住脖子，后来我回到家里，不自觉地径直去洗了手。还有一次，我们好长时间后又重新见面了，开始时表现出了往日的友好，可是几分钟后，还没说上几句话，突然自己心里就像有一个几乎还没有蓄上水的马桶冲刷器在抽动。我们虽然生活在一起，却如此的可悲，就是在海边游泳时，都是各给自己背上抹油。如果我们形同陌路互不干扰的话，至少还忍受得了。尽管如此，谁都几乎离不开对方，每次吵闹以后，其中一个至多走到阳台上，过会儿又回到对方跟前。我们始终相互担心，有一次，我在黑暗中揍了她，一会儿又回来看她，拥抱着她，问她是否还活着。

“当我试图弄清楚一切怎么会这样时，这些经历就会变成赤裸裸的表象和疑点，然后看样子，好像我冤枉了尤迪特，因为我在玩着预先规定好的因果游戏，其中每个经历都先有了解释，因此也变得不真实。我们的憎恨却如此真实，让我们觉得这些解释可笑又有失尊严，是对我们痛苦的嘲讽，哪怕我们开始一再去努力也罢。有一次，我对尤迪特说，她倾向于把任何哪怕是有关小环境的信息，所有印刷品都马上以宗教的陶醉看成一个普遍适用的、自成一体的世界模式，并且使她的整个生活方式都要遵循这样的信息——她的环保怪癖和对有机食品的着魔——其原因无非她因为自己所受到的教育，绝对没有正确地获得信息，于是就痴迷每件小事。我每次解释完以后，自己就咬着嘴唇，听凭尤迪特同样把我解释的方式称为盲目崇拜，就是想借此避开人家对我自己的注意。总之，开始时，当尤迪特的变化时而引起我的注意时，我并没有太在意，那些解释常常可以轻而易举地说出口；我甚至为之感到自豪，因为尤迪斯也能明白它们，我只是感到奇怪的是，她没有坚持到底。后来我发现，她开始恨它们，不是因为她觉得这些解释不对，而是因为它们是解释，并且当我坐在那儿一解释时，她就不再愿意听了。‘你真蠢！’尤迪特说，我突然也觉得自己真是个大笨蛋。愚蠢的感觉在我内心蔓延，我以此安抚自己，甚至觉得这样很舒服。我们最终成了敌人，我不再解释，只有谩骂，不言而喻，我们很快都再也无法忍受了，自然升级为身体上的伤害。在这其间，尽管我被勒住过脖子，可是一想到我也能像其他人一样愚蠢就又特别

高兴。这是因为，迄今为止，当你刚才还与之很亲近的人突然变得愚蠢了，我就感到特别害怕。‘这太不可思议了！’我总是这样说。现在我自己就这样，没有别的可能，我们两人都变成了魔鬼。

“我们没分手，因为谁都不想放弃。如果一个指责另一个，谁错谁对根本就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守候着对方在这样指责以后让自己陷入无理之中。当一个人遭到指责，他之后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督，从而让他认识到自己的过失。最糟糕的是，我们相互不再指责，而是无声无息地制造出让对方在其中独自感到愧疚的情境。我们不再对骂，只是想羞辱对方。于是，我们就把对方洗过的餐具再洗一遍，只要对方一站起来，就立刻在他身后整理好一切，悄悄地干起对方要干的事，把对方放错了地方的东西立即放到该放的地方。尤迪特突然开始把重东西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天天倒垃圾，不要我帮她。‘我已经做过了。’她说。这样我们相互抢着做事，越来越勤劳，越来越紧张。每人都寻思着自己还可以干什么，我失去了安宁。不是用道理来决定争执的对错，而是比着谁先做什么事。不是你做些什么决定这种决斗的结果，而是谁先做事的顺序。一种错误的节奏，一条多余的路，面对下一件事的犹豫不决都会立刻让你陷入尴尬境地。谁为自己所选择的事能不假思索地找到捷径，谁就总赢。于是，我们俩充满仇恨踩着舞步相互擦肩而过，带着故作高贵的姿态；如果两人都没如愿以偿的话，就算打了个平手。

“像这对恩爱夫妻一样，我们将周围所有的事情都告诉给对方，不是出于恩爱，而是出于敌意，将这种敌意转嫁到这些事情上。尽管你本来就明明白白，比如你还是要说：‘你的椅子嘎吱响’，‘你啃过的苹果到处乱丢。’

“有时候，我们相互描述我们的行为举止。于是我们诧异，觉得自己可笑。当我们分开时，一切立刻就变得不真实。我们对自己的神经已无能为力。我们希望各自放弃，可这也于事无补了。

“曾经有过偶然和解的片刻：我们偶尔因为有什么障碍要紧贴着对方插肩而过时，结果就拥抱到了一起，并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了这样的事。或者她朝我弯腰去拿开什么东西，我却突然把她拉向自己，其实我并不情愿这样做：于是我们久久地拥抱在一起，感到自己变得越来越空虚；最终我们又受到刺激似的相互分开。这样的和解如此偶

然，犹如你的孩子产生愿望：她坐在车上，遇到拐弯时身体倾向一边，便顺势就想躺下来。她躺下了，马上又起来，因为她并不累。同样，我们并没有相互和解的愿望。

“尽管如此，我感到自己越来越自由了，相信她也是这样。我感到轻松，因为我们不再能够以往日的亲密结成同盟来对付别人；我们不再需要相互挑逗；我们不再需要说夫妻之间的秘密语言，不再说只有我们自己明白的暗语，将其他人排除在我们的谈话之外。我们几乎相互不再说话，可是我觉得自己坦率而开诚。当我们不是独自在一起，而是扮演着角色时，诸如被饭店老板对待的角色、机场游客、看电影的人、客人，以及被别人当作角色的代表等，我们又能重新和睦相处，因为我们彻底把自己当角色扮演者感受，而且几乎为此感到自豪，我们多么自然地扮演着角色。我们当然小心翼翼，免得相互走近，各自保持独立，至多在走过身边时扯一下对方。再就是说，恰恰接着这还可以想像的卑鄙行为，当我们脸色发白和颤抖着还能够站在那儿时，久而久之，在我的心里越来越经常地会产生对尤迪特的柔情，我觉得比之前的爱还强烈。然后，我就忙着做点什么事，平静便随之而来，紧张在其中化解为让人惬意的痛苦。

“但愿我能够一直这样生活下去，”我说，“这是一种快乐而甜蜜的异化。在这其中，仇恨时我视尤迪特为物；释然时，又把她当作人。我相信，尤迪特和我一样，可是我又发现，她只是变得冷漠了；有人跟她搭话时，她就吓一跳。她一个人玩着需要几个人才玩的游戏。她告诉我，她这样聊以自慰；可是我没跟她说我也开始手淫。想像着我们躺在不同的房间，也许同时都在各自自慰，这让我觉得可笑又可悲。可是我帮不了她，被仇恨和卑鄙所挤压，麻痹地躺在那儿。我也不再会梦见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就是在手淫时，我也无法想像到一个女人来：我只得睁大眼睛，盯着一张裸照。

“我们只是偶尔互相抓扯。尤迪特常常突然扭过脸去，但不再像先前那样哭了。只要一有钱，她就立刻花个精光，什么都买，一张白熊皮，一个手动留声机，一支笛子，之所以喜欢，只是因为它吹口上有个蜘蛛网。饮食上她只挑选极品和特产去买，她常常因为没有找到她称心如意的东西空手而归，并因此生那些愚蠢的女售货员的气。我越来越没有耐心，却怕她出事。她弯腰探出窗外，我就站到她身后，装着也要向外去看。我总看到她跌跌绊绊，撞在墙角上。有一次，看

到几年前她做的一个书架，我真的吃了一惊，这个书架居然还完好如初地立在那儿，这时我才突然明白，我已经认为尤迪特无可救药了。她的表情越来越沉重，可这种沉重我再也看不下去。现在你明白了，我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

我们刚一到达，我就打电话去费城的酒店告知我在圣路易斯的电话和地址。然后，我谈起她时，渐渐忘了她，也根本没有想到她会在附近。一切对我来说好像都已经过去了。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屋子凉台上，孩子已经躺在屋里床上正在自言自语，我们倾听着，或者相互时而也说说话，不过声音很低。那对恩爱夫妻坐在一张沙发上，披着一条披肩：克莱尔在读《绿衣亨利》，我这两天没兴致读书，看着她读。这时电话响了起来。当女主人走进去时，我停住了摇椅，知道那是我的电话。她走到门口，一声不响地向我指了指听筒。我猫着腰，踮着脚尖走进屋里，仿佛我要表示劳驾似的。我几乎窃窃私语似的报了自己的名字，却没有人回应：我又说了一遍是我，也没想到要问对方是谁。除了一辆疾驰而过的大卡车的噪声外，我什么也没听见，接着铃又响了，我听到以后立刻就想像着一个加油站的铃声。我再也没说什么，轻轻地放下听筒。我也不想去问女主人是谁打来的电话。

两天后，我收到一张预先印制好的生日贺卡：在“生日快乐”这几个字之间，手写添上了“最后一次”几个字。这字迹很像尤迪特的，可尽管如此仍显得十分陌生。当然，她向来只用钢笔写字，从来都没有用过圆珠笔。贺卡反面地址旁贴着一张手枪照片，是一张不太清楚的近照，尚未全部塞入枪膛的子弹清晰可见。后来我才慢慢地明白，这张贺卡应该是个恫吓，事情一下子显而易见，也不言而喻，尤迪特要杀我。我虽然不信她真会这样做，可就她有这样的想法，让我对自己几乎感到自豪。我心想着，我起码不再会发生别的什么不测了，我觉得她的恐吓是防止其他危险和不幸的护身符。“现在我平安无事了。”我想着，甚至把我所有的支票都换成了现金。

我现在也知道，这个念头让尤迪特一直跟踪着我。我们以前有时候就互相以死要挟过，不是我们想看到谁死去，而是要将对方除掉和毁灭。这样的行为似乎犹如有杀人瘾似的，你借以折磨和羞辱受害

者，而让他最终自认为自己什么都不是。可是，当对方突然自觉自愿地要求杀死他时，我们会是多么吃惊啊！尤迪特写了这张贺卡并将它寄出来，一点也不奇怪，符合她的性格，甚至在绝望时也要摆一摆架势。她端坐着，侧着脸，身体向后靠着，手枪拿在胸前，窗帘半开半掩，处在饭店客房的半明半暗之中，转动着她的戒指。我在半睡半醒中经历了自己的死亡：一些人站在我面前，踮着脚尖走来走去；接着个个都慢慢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大家静下来；又来了几个人，站得好远，沉默不语；只有在很远的后面，有一个孩子跑过来，他一个劲儿地晃来晃去，然后站稳了，我死去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想到过自己死，只是时而觉得不舒服。那么现在看来，尤迪特在半开半掩的窗帘前的画面成了一幅告别画，而且我也知道，从今以后我们就互不相干了。我一次也没有再梦到过她，我想杀她的念头也烟消云散。有时候我觉得有人在监视我，可我却并不回头去看。以前我们一段时间没见面时，也许还会写道："我好想你啊。"我现在不再想了。

画家画海报时，就会得到电影赠票，因此我们经常去看电影。绝大多数情况下，我渴望从电影院里出来，去外面深深呼吸。观看特定的东西让我很吃力，画面的节奏挤压着我，使我呼吸困难。仅有一次，克莱尔带孩子参观1904年世博园去了，我和画家夫妻一起观看约翰·福特的《青年时代的林肯》时，我十分忘情，观看变成了梦幻。在这些历史，也就是亚伯拉罕·林肯青年时代的画面中，我梦想着自己的将来，在电影的形象中预先梦想着我将来还会遇到的人。越往下看，越是想遇到像电影中的人，自己不再需要去装腔作势，而是像他们一样，以完美的身心活动在他们之中，随着他们一起，却有自己独立的活动空间，也尊重他人的活动空间。小时候，我什么都想模仿，表情、姿势，甚至字体，可是现在，我以那些尽自己所能的人为榜样：我不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能人，而是要尽我之所能。就在不久前，我或许还可能去模仿他们说话时所带有的这种南国口音，好像他们只是想轻轻地互相提醒什么，或者这是那个还很年轻的亨利·方达发自内心而难以模仿的微笑，绝对不是冲着自己的，而总是忘我地投给别人的。三十年前，他扮演了年轻的律师亚伯拉罕·林肯——现在我摆脱了这种矫揉造作的渴望，我只是仿佛向银幕上致意。

亚伯拉罕·林肯在电影里为两个外地兄弟辩护，他们被控谋杀了一个长官助理。另一个名叫J.帕尔默·卡斯的长官助理声称在月色中看见了两兄弟中的高个子刺死了那个助理。而小个子兄弟现在却说是自己杀了人。两兄弟的母亲在大篷车上看到了打斗过程，却不想说出是哪个儿子杀了人。人们企图用私刑处死这两兄弟，林肯阻止了；他轻声提醒这些醉醺醺的人想想，他们会是什么人，他们或许忘记了什么。他这时站在监狱前那个木楼梯上，胳膊夹着横梁咄咄逼人的情景，不放过任何义正言辞的机会，而且持续好久，直到你看到，不仅那些醉汉，还有扮演醉汉的演员都自然而然洗耳恭听林肯的演讲，最后都彻底变化了，情景也到此结束。你感觉到电影院周围的观众的呼吸也不一样了，大家都高兴起来。在庭审时，林肯证实，卡斯不可能看到了凶手，因为那天晚上是新月。从这时起，他不再称呼他为J.帕尔默·卡斯，而只叫他约翰·P.卡斯，并且证明这个约翰·P.卡斯杀害了他的同事，而两兄弟只不过在扭打时打伤了他。在载着一家人西行的大篷车上，被判无罪兄弟的母亲递给亚伯拉罕·林肯一袋钱作为辩护费。“拿着吧，我们有的都在这儿啦。”林肯真的接过了钱袋。“谢谢，太太！”然后与他们分手，独自走向一个山坡。在电影里有一次，他骑驴与一个猎手同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戴着黑高筒礼帽，双脚几乎拖到地上，穿行在春天的景色中，一路演奏着竖琴。“这是什么乐器？”猎人问道，“犹太人的竖琴。”亚伯拉罕·林肯答道。“很少有人演奏这种音乐，”猎人说，“可它很好听。”一个人弹着琴，一个人跟着点头，就这样他们久久地行走在乡间。

去世博园接她们母女时，我对克莱尔说，“我打算去拜访约翰·福特的，我会问他是否还记得这部电影，有没有偶尔与现在演系列电视剧的亨利·方达见面。我要告诉他，这部电影让我认识了美国；它教会了我从观察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人来解读历史；它使我情绪高涨。我会请求他告诉我，他自己从前是什么样的人，还有自从他不再拍电影以来，美国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接着又走了走，孩子在我们身边跑来跑去，路灯在夕阳中反射着光芒，好像它们已经点亮似的。我想扔点什么，就朝动物园铁丝网里扔了块橡皮糖。人们向我们迎面而来，睁着因上山和下山而发红的眼睛。我们和孩子也坐上了一辆车。我们行驶途中，太阳已落到那些大广告牌后面，依然放射着些许光芒。当车开到山顶上时，还能看上最后一眼，再看到时，它已经落进密西西比平原里了。

暮色中，我们站在木屋前的花园里，几乎无所事事，连脚都不换一下，沉醉，像是独腿似的。时不时有人从几乎被忘记的手中杯子里喝上一口葡萄酒。有时候，你会担心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你身上的一切变得如此无影无踪了！鸟儿不再歌唱，只是在树丛中跳跃。周围可以看到一些人下车走向自己家门。街上空荡荡的，渐弱的风依然卷着玉兰花瓣飞舞，它们是黄昏后被第一阵风从树丛下吹到了人行道上的。邻居的窗上在上演着色彩游戏，每隔几秒钟就变换一种色彩：那儿人家在平日就昏暗的屋里已经打开了电视机。我们房子下面也有一扇窗户敞开着，屋里亮着灯，除了被照亮的后墙，什么也看不到。克莱尔时而从前面走过，因为她正要去哄孩子睡觉：一会儿抱着脱光衣服的孩子，然后又独自一人从另一边走出来，端着一个茶杯，随之墙面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克莱尔淡淡的影子，她在房里什么地方弯着腰照看孩子，最后只剩下空荡荡的墙壁。四围变得越黑，墙壁反光就越强烈，笼罩在均匀的深黄色光亮中。这光亮并没有被墙体吸收，而是好像自行弥散开来。“类似的光亮只有在上世纪的油画上看得到。”画家说，“那光亮并不是来自别的什么地方，比如从天上；而是从底色本身散射出来的。在卡特林和雷明顿的画中，天空总是惨淡和苍白的，雾蒙蒙的，从不见有太阳，只有从底色中泛出一种神秘的深黄色，从下面照到人物的脸部。黄色是这些画的主色调：马车轮子、枪筒里喷出的火药烟雾、行将死亡的马匹的牙床、铁路轨道等，一切都泛着黄光，从内向外；这样一来，每个对象都突显出来，就像在徽章上一样。如今可以看到这种黄色处处被模仿：停车场的停车线和马路线、花园前的信箱、带有美国图案的T恤等。”——“丽都酒店牌子上的箭头。”我说道。画家和妻子让我看他们的手掌：妻子的双手总是给他描绘天空，几乎难以看得出来；可丈夫的双手却在昏暗的其他色彩中闪现出黄色。“这是一种颜色，只要你一看到，立刻就会产生联想，”画家说，“你观看的时间越长，就想得越远，直到突然想不起来为止。那么这是一个瞬间，你无非站在它面前在做梦。”——“在那些黄金年代里。”站在远处的太太突然说道。屋里的灯关了，不管你望向哪儿，余光到处反照。克莱尔嘴里含一个面包走出来，那是孩子晚饭时剩下的。我们又坐到凉台上，这对恩爱夫妻放起老唱片来。唱片刚一放完，他们就相互提醒刚才感受了什么。《我想牵你的手》：“我们那时在洛杉矶一家墨西哥餐厅喝着冰镇啤酒。”——《决斗》：“你还记得当时风暴把气垫都刮到海滩上去了吗？”——

《城市的夏天》：“那是我们最后一次收到家里寄来的钱！”——《野兽》“我们那时候像小精灵似的生活。”——《日升之屋》……他们越来越兴奋，克莱尔突然说道：“你们给自己一生找好了赞歌，什么也不再会使你们不舒服。你们将来要经历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我说，我觉得在我的回忆里，或许我曾经经历的东西不会被美化的，而是真正才发生。“那么对我来说，漫长遥远的路更加漫长，一记耳光两边发烫。我简直难以想像，我怎么就忍受了这一切呢。”

“我父亲是个酒鬼。”我说，听口气，好像我只是想把《日升之屋》歌里的“我的父亲是个赌徒”变个样似的：“我躺在床上时，常常听到旁边房间里他给酒杯倒酒的咕嘟声：一想起来，我就恨不得用个打谷棒把他的脑袋敲下来，而当时我就盼着能早点睡着。我还从来没有过因为一次美好的回忆而激动，只是听别人谈起回忆时，我有时觉得我有一种解脱了那个特殊回忆的感觉，渴望回到从前去。比如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女人从身边走过时说：‘那个时候，我泡了很多咸菜……’听到这话，我几乎要哭起来。还有个我不曾仔细看过的女人，因为每次见她都是在她的香肠店里，胳膊上挂满了香肠，我听她说：‘那时候，我的孩子得了百日咳，我还不得不和他们飞来飞去……’突然间，我对她的回忆顿生嫉妒，希望回到我自己得百日咳的过去，而当我现在读到飞来飞去时，我就会觉得自己错过了很多东西，再也补不回来了。所以，恰恰那些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东西，我常常会觉得它们具有一种奇怪的亲切感。”

“可你说起绿衣亨利时，你也许确实相信你可以重复他的冒险经历吧，”克莱尔说，“你认为靠着来自另一时代的人就能够重复这个时代，像他那样慢慢地经历，从一个经历到另一个，变得越来越聪明，在你的故事结束时达到圆满。”

“我知道，现在不可能完全像绿衣亨利那样悠哉地生活。”我回答道。“我读起他时，就觉得自己的心里和他一模一样。有一次，他躺在静静的森林里，内心里感受着上个世纪的田园惬意；我读他的故事时，也感受着想像另一个时代的惬意。在那个时代里，人们还会相信，无疑会变成另一个人，这个世界对每人都敞开胸襟。再说吧，几天来，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向我敞开胸襟，无论我看什么，都会有一

种新的感受。只要我感受到一个对我来说已经逝去的世纪那种惬意的话，那我就要认真对待和审视它。”

“直到你把钱花得一干二净。”克莱尔说，因为我也正好在想这事，便让她看看，我用支票兑换来的一摞美金。这对恩爱夫妻此刻在笑话我们的对话，我们不说了，听起唱片来，还有他们俩为之而讲述的那一个个故事，时而也为某个细节争来争去，直至夜色又变得明亮起来，晨露落下。此时此刻，这两人才担心露水打湿他们的唱片，于是我们站起来去睡觉。

第二天下午，我和克莱尔正要把孩子留在画家夫妻那儿，去看德国剧团演出的《唐·卡洛》。这时，我收到了一个急件。那是一个用绳子仔细扎好的小盒子，地址是大写印刷体，像是用左手写的。我走到房后，用园艺剪剪开，小心地打开包装纸。盒子用电线捆着，上面有个红封条。当我打开封条时，手抽搐了一下，我又去碰那两根电线，又抽搐了一下。此刻我才发现，我遭到了电线里释放出的电击。我戴上挂在树杈上的橡皮手套，将电线从盒子上解去。当我要把它放到一边时，我发现盒子和里面的东西连成一体。我不由自主地要拉开它，盖子随之掉了下来，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看着盒子，里面除了一个连着电线的小电池外，什么也没有。我就知道尤迪特会变本加厉，非得弄出什么名堂不可，可我一点也笑不出来。她给予我的这个小小打击，我突然听起来就像是一声尖锐而低沉的哀鸣，我几乎要扭头去看看。我简直倒霉透顶。究竟怎么回事啊？为了什么呀？这叫人还活不活呢？一切不是都过去了吗？我不愿对此多想，只知道我得立即出发了。周围的草木本来一片明亮，此刻又变得昏暗，又有松鼠跑进我的视野里，我周围的东西都变得难以辨认，我躲开一只昆虫，一辆摩托车在远处轰鸣而过，吓得它在树丛中沙沙作响。我把盒子扔进垃圾桶，向克莱尔走过去，她已坐在车上。我拉开车门时才发现还戴着橡皮手套。“它们的颜色真黄啊，不是吗？”我边说边赶紧脱下手套，克莱尔一点儿都不奇怪。我关门时，碰到了金属，手指又抽搐了一下。

这剧院是殖民时代风格。里面的空间因为有壁画，让人觉得好像还有与之相连的空间，门厅里，人们在涂满画的台阶前抬起腿，迈上涂满画的柱脚，想去摸一摸浮雕，可当你触摸时，凸出部分缩了回去。真正的观众席相当小，可左右和上面却有不少包厢，黑暗中你一进门就看见反光闪闪的望远镜。大衣和帽子随身带入剧院里。开演前，大学系主任向德国剧团的导演，同时也是旅行领队致欢迎词。这人我觉得好面熟，再仔细一看，原来是我以前喜欢与之交谈的一个朋友。他俩身后跟着一些圣路易斯的德国移民后代，穿着戏服。他们先用合唱，然后以生动的形象表演着他们的祖先来到美洲安家落户的情形。移民前，他们还生活在德国各个邦国里，直到1848年，相互在工作和娱乐时成为障碍，行业的不自由阻止他们使用自己的工具。而在到了美国后的场景里，他们分散开来，交换工具，表明每个人都可以去干自己喜欢的职业。娱乐方面，他们现在也有了自己的空间。最后一场生动的表演中，他们跳舞，男人们在头顶上挥动带边礼帽，膝盖直抬到胸前，只有一人叉开双腿，双手叉腰；女人们踮起脚走着散步，扭着身子，一只手伸到男人手中，另一只轻轻撩起衣裙，只有叉腿男人的女伴与他面对面，双手放肆地撩起裙边。他们都站到了幕前一动不动，时而会晃动一下身体，男人汗流满面，女人踮着脚尖抖动，然后大声喊叫，用那种美国式的大嗓门。他们真的开始跳起舞来，再次挥了挥礼帽。在他们下面的乐队里，有三个乐手同时也赶紧站起来，随之演奏着，有两个拉提琴，颈部暴起青筋，第三个心醉神迷地拨着大提琴。这些乐手最后拨响了一声琴弦，重新落座，舞者也鞠躬，翩翩跃向两边，同时大幕从中间又拉开，人们看到卡洛王子伴随着一个修士缓缓走上台。

事后我对导演说："像我周围的人一样，我首先关注的是，幕布是否会对称地向两边拉开——先前那些舞者跳得很呆板。那两个演员走进观众时，两个人走上来时，步调不一致，好不自然。他们走上来，仿佛来到一片无人之地，然后又表演得那样小心和匆忙，好像人家压根儿就不允许他们在那儿表演似的。舞台不是随便什么表演场所，而是陌生的领地。"

"所以，这些演员也常常跌跌撞撞的样子，"导演说，"他们感到他们确实需要有别的动作。他们常常刚一抬腿就要换步子，因为他

们以为，他们太长时间在观众面前以同样的步子走来走去。然后他们正要跨步时突然跳起来。或者他们说错台词，因为他们以为是该唱的时候了。他们知道，观众要看的他们是跟平常不一样的节奏，可是他们却找不到那个节奏。”

“他们也一再重新编排，”我说，“因为观众根本就不会听任他们习以为常的模式。”

“我们在这里已经习惯了看到具体的历史人物都是站立的形象，”克莱尔说，“我们不是去演他们，而是去追踪他们，而且只是追踪他们人尽皆知的行为方式。如果看到的不是他们流传下来的事迹，而干着别的事情，我们或许会觉得滑稽。对我们来说，他们没有个人的故事，他们的生活我们也不感兴趣，他们只是自己所做过的事情或者至少在他们那个时代发生过的事情的符号。我们用纪念碑或者邮票图像来纪念他们。在游行和庆典时，他们不要由人，而是要由无声而行动呆板的木偶来表演。真要演绎的话，他们最多不过出现在电影里，而且绝大多数不过是些边缘角色。惟一例外的是亚伯拉罕·林肯，可他的故事却让我们感兴趣，因为这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让他像菲利普国王那样，作为戏剧人物艰辛地在舞台上走上走下，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想像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人物想像为英雄，因为他们是由我们选出来的，我们永远都不必害怕和敬畏他们。我们心里的英雄只是那些经历过冒险的人，独当一面的人、垦荒者和开拓者。”

“唐·卡洛正好就是一个欧洲冒险故事，”导演说，“席勒在其中不是描绘那些历史人物，而是在演绎自己，不过是借用他们的名字，用他们如此缺少魅力和尊严所经历过的冒险行为；他描写了他在这个过程中的行为举止会是多么的自信，多么具有角色意识。因为那时的欧洲只有侯爵才是历史人物，而只有历史人物才有可能扮演角色和经历风险，所以，席勒通过写他们，同时给予他们榜样，他们需要在冒险中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克莱尔稍稍合起双唇，她微笑着说：“对这儿的观众来说，开拓者就是英雄，因此，冒险对他们来说始终是身体上的冒险。他们不愿意看角色，要看故事情节，因为他们认为，反正我们这儿人人都可以扮演角色，而角色当然就不是冒险了。也就是说，当他们看到手只是

按在剑鞘上，同时又听到说个没完没了时，他们会失去耐心的。他们只希望人物得到暗示，而故事情节却要详细展开。而从舞台后朝波萨侯爵开一枪，会让他们失望的。当唐·卡洛最后抽出长剑时，他们欢呼雀跃。多刺激的冒险行为！可是我们在台上没法模仿这些冒险行为，更不用说那些开拓者的，再说我们对你们的历史人物不感兴趣。所以，我们正好在舞台上大多情况下只是在演绎我们自己，那么通常都是些梦想冒险的人。”

“可是为什么，当你们的戏里没有出现冒险行为时，人们在观看唐·卡洛时变得激动不安呢？”导演问道。

克莱尔说：“因为按在剑鞘上的手给他们预示着在舞台上不会发生的事情。”她边说边指向这家法国咖啡厅墙上的画。演出结束后，她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在这张画上，盖瑞特警官正向童匪比利开枪，两人在一个有壁炉和五斗橱的房间里将枪口瞄准对方；比利小子另一只手上还握着一把匕 首；从他的枪里没有冒出火舌，可从警官的枪里冒出的巨大火舌几乎击中了他。月光从有栏杆的窗后照进来，月色中三只狗在这两个男人之间穿梭，警官穿着闪亮的靴子，而比利小子却光着脚。

“尤迪特在哪儿呢？”导演突然一边问我，一边正从他的旅行药箱里拿出一粒药丸服下。“我们在华盛顿碰到了她。她来到后台问我，她能不能参加演出。刚好有个演员要回欧洲，所以我就高兴地答应了她。我们约好在圣路易斯见面。我们还要在这里稍微排练一下，后天，在堪萨斯城，她就要演埃伯利公主了。今天她发来了电报说，她不来了。”

“电报从哪儿发的？”克莱尔这样问道。“我不认识这个地方，”导演说，“叫罗克希尔。”

罗克希尔是圣路易斯的郊区，前几天我就住在那儿。

“我不知道尤迪特在那儿，”我说，“我们分手了。”

导演又拿出一颗药丸，他说得和上一颗一起服用，为了缓减上一颗的副作用。他问我近来写什么剧本没有。

“我觉得书写角色挺难的，”我答道，“每当我赋予他们个性时，觉得就像在羞辱他们。一个人物的一切特点变成了惯例。我感到既对不住别人，也对不住自己。当我让人在舞台上说话时，他们说不了几句就没词了，永远成为一个概念。所以我也许更情愿去写故事。”

“成为什么概念呢？”

“也许你认识这样的人吧。”我说道，“他们把自己看到的一切，也包括十分奇怪的事，立即就要归结成一个概念，通过一种表达使之魔化，从而不用去感受它。他们对什么都有个说法。那么他们所说的，正因为本来就不存在说法，所以大多情况下都让人发笑；尽管他们的表述就没有这样的初衷，却很滑稽。因此，剧中人物一说话，也许只是一个表情，我就觉得一切立刻成了这样的概念，那么，这些人物我就再也想不下去了。此时我在考虑，是否在每场表演时，再让一个人物上台，一个仆人角色，他立刻就给别的角色创造了新环境。这应该是个反角，而不是那个通常评论故事、掌控情节、全知全能的观察者。这是因为，这个仆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所解释的一切——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解释一切——结果证明是错误的。他所预言的，永远都不会应验，他的所有解释都是无稽之谈。他作为解围机器登场，可压根儿就不需要他。这里只需要两个人偶然朝着不同的方向观察，而他就凑上来的目的就是化解分歧。”

“这部剧叫什么？”导演问。

“《汉斯·摩塞尔与他的世界》。”我说。

我告诉克莱尔，汉斯·摩塞尔曾经是一个奥地利演员，虽然他只演仆人角色，可在事态发展过程中，他却会给每个人安排自己的位置。“他演戏很专注，非常严肃，因为他十分投入，只是时而在他插科打诨后，他会意味深长地微笑。看他演的电影里，观众总盼着他出场。”

我说了很多话，此刻又意识到我周围发生了什么。在旁边桌上，烟灰缸里放着一种雪茄的包装玻璃纸。那根雪茄想必够长的！我笑了。克莱尔迅速地看了我一眼，我们想靠得更近些。柜台后的女人用圆珠笔头敲击着收款机的键盘，钱盒子弹出来撞到她的肚子上！导演

瞪着黄眼珠，十分疲倦地望去。我恨不得将手臂搭在他的肩上，又怕吓着他。“钱盒子挤到她的肚子上，这叫她好惬意。”他说道。我打算提醒他注意，却发现他只是在念台词。

我们喝了不少，克莱尔请我们喝黑麦威士忌，她一人喝的比我和导演加起来还多。到了街上，我们东倒西歪，几乎看不到车辆行驶，到处都有我们相互提醒关注的东西。在一条横街上，导演与两个黑人妓女搭讪，他时而也回头望望我们；他站在离女人们一步开外的地方和她们说话，她们回答时，他把头伸过去，像个倾听者。他不靠拢，朝她们弯着腰，让她们对着耳朵说话的姿势让我突然感到，他老了不少，又觉得他从未有过的可敬。他用两根手指轻轻地撩起一个女子的假发，被她骂着打开手。他回来后告诉我们，她冲他说了些什么：“别碰我！这是我的国家！在我的国家别碰我！”他迅速地在胸前揉了揉，一个我在他身上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动作。看样子，好像他用这个动作可以挽回自己的无助似的。

“我完全脱离了生活。”他后来在饭店酒吧里对我们说。“对我而言，它仅仅出现我内心状态的比较中。我已有很长时间没见过去了鳞的鱼了，可昨夜当我在恐惧中醒来，突然发现周围有鱼鳞闪闪发光。同样我也长时间没有亲近过大自然了，尽管如此，当我把手伸向酒杯时，浑身上下此刻都觉得像一只刚才被弄死的蜘蛛，慢慢地沿着蛛丝，像活着时一样坠落到地上。日常生活过程，如戴帽子、乘电梯、或是品尝软乎乎的冰激凌，我都再也没有任何感知，它们过后才会以隐喻的方式使我明确自己的各种处境。”他出去一会儿后又回来了，告诉我们他吐了。他的嘴唇还湿漉漉的，是吐过后喝水弄的。他把各种药丸排在面前，按顺序一一服下。“开始我觉得，仿佛手指塞进水龙头里，而里面空气就要爆炸了。”他说道。他在克莱尔前躬了躬身，请求我允许他和她跳舞。我看着他们跳：克莱尔站在那儿，懒洋洋地原地打转，他换着步子在她前面跳来跳去。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那沉闷的音乐在低矮的房间里震动：《穿过丛林》。

我们陪他回到上面的房间。“我明天又要上路了。”我说道。我和克莱尔回到饭店前时，我向后打了一个趔趄，外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回到车跟前，彼此一再紧紧地靠在一起。真安静呀，只听得

到一个幽灵似的响声；我想，那是从密西西比河传来的。我们跑到一个工地上，我坐在一个箱子上，把克莱尔拉过来。我立刻就跟她干了起来，我觉得好像此刻嚓嚓作响。我们不再听对方说什么，我很疼，我出血了，那疼痛散去，一个曲子总是萦绕在我脑海里，一遍遍重复着“周日薄荷牛排”。

在回罗克希尔的路上，我对克莱尔说：“我觉得像在梦里一样：我慢慢地醒过来，醒来时梦里的画面变得越来越慢，后来就不动了，变成了静静的梦幻般的画面。我不再像梦中那么害怕，而是让这些画面安抚自己。”

我们下车从一个路灯旁走过时，一只巨大的夜鸟的影子飞过明亮的街面。“有一次，在路易斯安那的原始森林里乘船时，有只猫头鹰从我头旁飞过”，克莱尔说，“当时我正怀孕。”

第二天她开车送我去机场，她和孩子站在露台上，我朝亮着灯的黄色飞机走去，是布拉尼夫航空公司飞往亚利桑那州图森的飞机。我们三人都挥手，直到互相看不见为止。

在科罗拉多的丹佛换机后，我马不停蹄地来到图森。城市位于沙漠中央，热风整日拂面，机场跑道上弥漫着沙雾，跑道边仙人掌开着黄白相间的花。在机场大厅等候取行李时，我把表调后一小时，做了个含糊的动作，就像做坏事被人发现，我四周张望，看到周围的传送带上的行李也像指针转得一样缓慢。我稳住自己，呼吸又均匀了。我来图森干什么呢？旅行社的职员把图森填在了环游单上，因为他一看到我，就觉得我挺怕冷的，说道：“那里现在已是夏天了。”我要夏天干什么呢？在飞机中我就已经想像不出，我还会对什么有兴趣。但凡能想到的，我在来的路上在图片上都看过了。现在我却在机场旁，一眼就看到了普罗维登斯酒瓶商标上的龙舌兰草。我有些忐忑不安，仿佛自己对此有愧疚似的。或者是对什么别的事情？我心想着。尽管大厅里开着空调，我还是汗流不止，不是因为想到就要走进酷暑里，而是我对此就根本无法想像。又一次思维休克！阳光透过大块的有色玻璃昏暗地照进来，旅客站在阴影里。我无聊地来回走动着，时不时看看我的箱子出来没有，结果它成了布兰尼夫航空公司传送带上惟一

的一件行李。我从自动售货机里买了一听啤酒，坐到一个可以从小屏幕上看免费电影的地方。人们来来往往，有时停下来朝这里看一眼，多是看人，不是看电影。除我之外，还有一个墨西哥人在看电影，他把双脚踩在椅子上屈膝坐着，为了能看到屏幕，将头绕开膝盖倚在肩上，一只手按住挂在膝盖上的宽沿帽。屏幕上放映的是图森附近一家橙子种植园的广告。那另一只手呢？我朝墨西哥人望过去，发现他另一只手一动不动地放在我身边的大衣下面。我站起来，还看到一个橙子从堆满橙子的筐上滚落下来，慢慢拿起大衣，又从眼角望去……墨西哥人那一动不动的拳头上，食指和中指以及中指和小指间各夹着一个刀片，那人好像睡着了，我踮着脚尖走了出来。

在另一家航空公司的传送带上也有惟一一件行李在转动，我差不多已从它旁边走了过去，才发现它。我走回去，是尤迪特的棕色皮包，上面挂着一把各种航班的行李牌。包是随边疆航空公司从堪萨斯城来的。我在它转了几圈后才去拎它，抓住行李牌，它们是用皮筋系着的，我一拉，它们有弹性，让我向后打了一个趔趄。我松开行李，它又转起来，我跟上，取下来，又放回去。我从布兰尼夫航空公司传送带上拿起自己的箱子，在大厅里站了一会儿。我身后一个门内有人窃窃私语，一个女人吓得在吸气，有人喉咙发出短促又可怕的声音，接着有人窒息。沼泽草丛里群蛾飞舞，我什么也听不到了，突然觉得两只耳朵沉重地垂在两边，就和我当时在刚去世的外婆身边醒来时一样。我朝出口望去，那儿有叹气或吸气声音，原来是刚自动打开的两扇玻璃门，现在正发出吸气声自动关上，我松了口气。外面，一个用拳头按住头上浅色宽帽檐的男人走向一辆车，风很大，他的帽檐几次被掀起。大厅内，一个女人从厕所出来，化着浓妆，穿一条裤缝笔挺的西装裤，上面以前的熨痕依然可见。一个印第安女人，她走进大厅，门随即在她身后关上，她朝那个正跑向门的孩子转过身，示意他踩上门前的橡胶地面。孩子跳上去，可他太轻了，门没动，这个印第安女人又走出来，再和孩子一起走了进去，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在图森的第一天，我再也没有离开饭店，洗了很长时间澡，磨磨蹭蹭地穿着衣服，直到天黑了，我才扣上衬衫扣子，拉起拉链，系上鞋带。在圣路易斯，我几乎彻底戒除了自己的习惯，现在都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一个人这样待着，我都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如此孤零

零的，好可笑啊。我恨不得揍自己一顿，我觉得自己是如此地无聊。我不想与谁相处，只是想摆脱自己。哪怕跟自己有一丝关联，都立刻让我很不自在，我把手臂伸得很远。只要我在一把椅子上感受到自己的体温，便坐到另一把上去。后来我就干脆站着，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椅面都被我坐热了。一想到曾经自慰过，我就发抖。我叉开双腿走来走去，不愿听到裤子摩擦发出的声响。什么也别碰！什么也别看！快点来人敲门吧！想打开电视，听听声音，看看图像，一个可怕的念头。我走到镜子前，对着自己做各种表情。我想把手指伸进喉咙里，让自己彻底吐个痛快。自伤和自残！我走来走去，走前走后。或者翻开一本书，强迫自己看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朝窗外看去，又是快餐店、德士古公司、冰激凌广告！把一切都封上，浇上水泥！我躺到床上，把所有的垫子压在头上。我咬起自己的手背，用脚踢来蹬去。

“时间如此缓慢地流去。”

我想起阿德尔伯特·斯蒂夫特一个故事中的这句话。我坐起来，打了个喷嚏。我突然觉得，我好像越过了一大段时间。我真希望自己快点出个什么事。

夜里我做了很多梦。那些梦如此激烈，以至于我只能回想起那些伴随着我做梦的痛苦。一个印第安服务生给我送早餐到房间里。我当着他的面数了数我还剩下的钱——还有一多半，我考虑着该拿它们干什么。看到我在数钱，印第安人走到门前停下来，我继续数着。他的脸发炎了，额头上有几个黑色小痘痘。印第安人说，前几天风很大，风沙把他的脸打出了血。他住在郊外父母那儿，在沙漠教堂附近，那儿的房子都很低矮，去汽车站要走好几条街。“我父母从没离开过这个居住地。”印第安服务生说。他说话很费劲，口水溢于齿间。尽管饭店游泳池坐落在内院里，他也要每两天清理一次沙子，他说道。

中午我叫了出租车去机场，要确定尤迪特的皮包已经不在传送带上转来转去了。我还去了行李寄存处，从很远处望着货架，没有问什么。我回到城里，在那儿跑来跑去，不知该朝哪个方向去，总是不断地回头。等红灯时，灯变绿了，我站着没动，直到灯又变红了。还有我在汽车站等车，却让车在面前开走了。站在一个沙堆中的电话亭里，我拿起话筒，手持硬币正要投入，却想去买什么东西，而在商店里几乎一件东西也没看，就又离开了。我接近什么，就对什么马上失

去了兴趣。我饿了，可当我在饭店前看到菜单时，饥饿感就消失了。后来我去了一家自助餐厅，人们可以穿过珠帘走进去，随意拿些吃的喝的放在托盘上，自己去取餐具和餐巾纸。在这儿，我才感到来对了地方。当我到付款台时，收款的女人并不看我，只是按顺序数着托盘上的盘子，这时我觉得一切如愿以偿。忘记那些已经开始成为我的需要的就餐规矩。于是我也不再去看那个女人，盯着她放在托盘上的小票，随随便便地把钱递给她。接着我坐到一张桌子边，无忧无虑地吃起配有薯条和番茄酱的鸡腿。

沙漠教堂是西班牙在美国最早传教的地方。它位于图森南部，一个印第安人居住地边上。我还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第一次有了想参观什么的兴趣。外面还很亮，车轮盖子反着光。我买了个太阳镜，而当我在一张布告上看到举办草帽周活动时，又买了一顶草帽，遇到刮风时，可以紧紧地系在下巴上。在图森的百老汇，有庆祝建军节的游行队伍走过。这天是五月的第三个周六，很多人伸长腿坐在马路沿上，孩子舔着冰激凌，拿着美国小国旗跑来跑去，大家都穿着T恤，上面印着与这个纪念日交相辉映的标识："美国"、"热爱她还是离开她"、"乐观者国际"。游行队伍旁，走着身穿衬裙的女孩，她们叫卖有类似语录的贴标，就像人们通常贴在车牌边上的一样。几个一战老兵乘着马车通过，二战老兵步行紧跟其后，其中还有一个印第安冲锋队队员，他们在占领西海岸时是先头部队。他们有骑手陪同。这些骑兵不由让人想到内战时的骑兵。天气很热，四周叫声笑声不断，几乎听不到马的声音。骑手扛着大旗，它们在风中哗啦啦地响，时而让马受惊。然后它们就跑到了马路中间新刷漆的双线上，骑手牵回它们后，柏油路上就留下了白色的蹄印。直到另一条平行的路上，我才叫到一辆出租车送我去教堂。

经过刚才的嘈杂，这儿是如此清静，你会以为是在做梦，不得不揉揉眼睛。每走一步，我都回头看看。瓦楞铁皮屋后恐怕会突然跳出另一个双影人来将我赶走！我没有权力代表自己，我只是偷偷地潜入了自己；现在他回来了，要重新占据他的位置。我似乎要从自身中倒出来，不再存在。从一截用作烟囱的黑炉管里，穿过小屋的窗户，突然冒出一股浓烟，一只狗匍匐在屋角。我是个骗子，我占据了他人的位置。我该去哪儿？我是多余的；我把自己偷偷带入什么东西里，现

在就等着被人抓。还有救，一步之遥。可我站着不动，紧握双拳，用草帽掩护着自己。可是，是个冒牌货的感觉只是闪现了一会儿，我随之觉得那不过是一时的心情。后来，我才想起来，小时候，我就是多么希望有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一个双影人；而我此时因为想像一个双影人感到害怕，我又把这当作一个好兆头。我厌恶只是看到一个可能和我一模一样的人的图像时，我就感到恶心。看到某人做着和我一样的动作，似乎很肮脏。连我影子里的轮廓，我现在都觉得不道德。更何况第二个这样的身体，这样一个嘴脸！我必须跑几步才行。

可是话说回来，我也没有兴趣看见另外的人。走一走，往印第安人的小屋里看看，我就心满意足了。没有人跟我搭话。我甚至走进一个小屋里，那个老妇只是微笑着；她坐在那儿，怀里抱着一个玉米棒，嘴里含着烟斗。太阳火辣辣的，炉子上却燃着大火，洗碗槽里摞着一堆碗，从水龙头里无声无息地流出的水柱落在碗上。这场景帮了我，驱赶走我对自己那种双重感觉。我要继续走去时，看到另外一个门后有个弹子忽隐忽现；路过下一家时，我看到窗里有人抖动着一个黄色假发，然后又收了起来。我怀着一片虔诚观察着这一切。这种虔诚我以前在教堂看那些圣物和圣像才又过。好像这种少有的虔诚状态又是一个兆头，那就是我始终只能沉湎于对物体观察中，却不能深入到别的人之中！难道在我身上始终还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吗？我跺了跺脚。真幼稚！我茫然无助却心平气和地来到教堂前。

在教堂里，我摘下墨镜和草帽。快到傍晚，正在做圣母念珠祈祷。静下来时，你可以听到外面风沙敲打着教堂门。几个女人排队站在忏悔屋前。我向祭坛望去时，记忆里看到有只燕子在前面飞。我又沉浸于那种观望之中。我一直反感宗教，尽管如此，我突然有一种能够与什么产生关联的愿望。真让人受不了，总是独来独往，形影相伴。想必存在着一种与他人的关系，它不只是个人的、偶然的或者一次性的，在这种关系中，你不用依靠不断要挟或者欺骗来的爱情来相互维系，而是通过一种必然的、非个人的关联。为什么我从来都不能如同现在观察这些教堂穹顶，或者石头地面上的蜡点这样来无所顾忌地友好对待尤迪特呢？无法以这样一种感觉从自身里解脱出来，实在糟糕透顶。那么你不得不站在那儿，沉浸在事情和过程中，怀着莫名的虔诚。

我走到教堂前时，草坪上浇灌器的水喷到我脸上。我走进公墓里，坐在一个西班牙墓碑的基石上。眼睛火辣辣的，我将脸埋入双手，觉得脑浆流向前额。这时，教堂钟声响起，我抬起头来。一只白肚小鸟从教堂阴影里飞出，在天空中熠熠生辉。钟楼好像随着每一声钟响移动一下，接着又摆到它的位置上。这一切我都曾看见过！我悄悄地观赏着这个画面，低着头，同时追寻着一段回忆。有一种记忆，当我靠近它时，大脑立刻又回避之。教堂，还有我自己，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够了，我从那儿走开。

交通信号灯挂在路面上方的电线上，摇晃得如此强烈，谁也弄不明白绿灯指示哪个方向。高高低低漆成黑色的电线杆上，裂开的木片嗡嗡作响。我尽力快步地向北朝图森方向走去，把手帕系在脸上挡风沙。

一个印第安人向我乞讨。我给了他一美元，他跟在我身后，伸手抓在我肩上。我开始跑起来，他也跟着跑，然后我停下来，他挤眉弄眼地从我身边走过去。我拦下一辆出租车，看到有房子时又下了车。这是些两层楼木头房子，里面住着墨西哥人，有很多突出来的阳台。一会儿，有小孩在上面还跟着我跑起来，直跑到阳台尽头。又一会儿，铃声响起，接着一个火车头几乎悄无声息地从楼房之间开出来停下，直接横在路中间，司机戴着厚手套拉车闸，因为闸的把手被太阳晒得滚烫。我又看到这个画面，就像在寻觅它，我曾经见过的。我脚下的路面突然倾斜，画面一下跑到了我的下方，我就要一头栽下去了。这时一个孩子从火车头边跑过，消失在房子之间，犹如另一个梦境里跑出来的人。我拐弯走到一条小路上。

天还没黑，空气和中午一样炎热。夕阳中，公共汽车从远处开过，布满尘灰的车窗上映着乘客的身影。当我要在一个酒吧买可口可乐时，才发现自己脸上还一直蒙着手帕。我在桌下把鞋子和裤脚里的沙子倒出来。甚至连自动点唱机里的唱片都有沙子划过的痕迹。我投进一个硬币，却什么也没去按。路上还有人挥着旗子游行归来。我坐在那儿，喝一口就看一下表。后来走进来一个男孩，金发灿灿，让人动情。

我看着杯子边上的柠檬片，迷失了自己。天后来就突然黑了下来，我犹豫地迈上大街，走到对面，又折回来。房子之间漆黑一片，但抬起头却能看到天上喷气式战斗机飞过的痕迹，依然沐浴在阳光里。我身后响起油脂发出的咝咝声。一辆汽车慢慢地从我身后驶过来，发出了如同油脂的咝咝响声。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那个金发少年也在其中，向我走来，转移了我对车的注意，他们向我讨钱买车票。我停下来，他们围过来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奥地利。他们一边笑，一边学着这句话。除了那个金发男孩，他们都是墨西哥人，有一个孩子穿着一双浅色帆布鞋。他用手摸我的脸，我退后一步，又撞到已站到我身后的另一个人，我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掏硬币，可这只手被紧紧地抓住，看见一把匕 首顶在我的肚子上。刀刃不长，刚好露出手心。那个金发男孩站在一旁，双脚轮换着跳来跳去，同时朝我这边抡着拳头。有一个墨西哥男孩绊了他一脚，他随即跪在地上。我尴尬地挤出笑脸。马路对面有士兵走动，可我不好意思喊叫。我的帽子被打落了，有几只手迅速将我的口袋翻过来，不曾触碰我的身体。那个金发男孩在地上爬来爬去，捡拾从我口袋里掉落的东西。他们又打了我一下，随之就跑到我身后那辆门子大开的车跟前。他们一跳上去，车就启动了，门一个接一个地关上了。在一扇门上，我还是看到了“赫兹”两字。我看到尤迪特坐在驾驶位上，脸色苍白，眼睛紧盯方向盘，张开的唇上挂着一根火柴，随着车子启动，火柴跌落了下去。

我在那儿转悠了好一会。真可笑！全身挂满口袋里子，我把它们塞回去，又拉出来，好像这样就可以证明什么似的。我这才发现，里面的口袋也被翻了过来。我低头看着自己：胸前口袋的白衬里鼓在我面前，从纽约前往费城的火车票落在人行道上。“一条木头人行道！”我心想着。然后我大声地说出来。我戴好帽子，把口袋的衬里塞回去；离开吧。

我找不到回饭店的路了。后来我想起来，我常把钱塞在衬衣口袋里：那里还真有一张10美元的票子，于是我坐出租车回到饭店。我不禁发笑，房间的门果真锁着，门锁上这一次也没有刮痕。我躺到床上。终于回来了！慢慢地我觉得有些得意，好在我把机票放在大衣里了，钱也在里面，总共有一百多美元，这是找给我的零钱，我到处都用大钞付款，只需掏一次口袋，现在看来这样做是值得的。我越发高兴，跳起来到处在我的东西里找钱。衬衫里有响声，我伸手进去，甚至在一个裤脚里还藏着一个25分硬币。我把钱堆在桌子上，像今天下

午看着静静流动的水光那样，陷入凝视之中。空调风吹着窗帘在窗前摇曳，这里还有暖气！有五片，它们斜着并列在一起！仔细再看，原来是我的角度不对。

我给在奥地利的母亲打电话。那儿已是第二天早晨。她说，她那儿刚才电闪雷鸣，一大早就下雷阵雨！她出去把衣服收了。现在忙来忙去，完全忘了时间。总统选举还是选上了社民党的候选人，那个竞选对手在一次集会上澄清了人家说他是纳粹，甚或是犹太人的恶意攻击。我觉得，仿佛母亲在说笑话。我向她问起我弟弟的地址；他是林业工人，几年来生活在这个国家北方的俄勒冈州。为什么？我说："我要去看看。"我记下地址：那地方叫埃斯塔卡达。我会去改签机票，明天就飞过去。

我走到楼下，在院内游泳池边上一棵芭蕉树下坐下。现在风已停了，身后吧台侍者偶尔摇晃出个饮品，池边可口可乐和姜汁水自动机有时咕咕作响，机器的制冷只要关上，里面的罐子就吧嗒地响。池里没水，探照灯照着底部，风轻轻晃动，像是喧嚣后的余痛。院子上空繁星璀璨，你得眯起眼睛看。空气如此清透，不仅可以看到明亮的月牙，连它的阴影部分也能分辨出。我突然发觉，在美国，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一个人沉浸在什么事情中。感知到什么，这就够了，接着就将目光转移到别的地方。谁看的时间长些，也就立刻摆起行家的姿态。连那些居住地也不是沉没在景色中，它们总是建在高处，突现出来，似乎是随意捡起来的。只有醉汉和吸毒者，还有失业者在这个地方发呆，完全没有知觉。我喝醉了吗？我把杯子推到桌边，直到它从桌边自己掉进游泳池里。

听得到，外面大街上，红绿灯变灯时，很少有车开动。我身后酒吧里有一个男人对他的女孩说话时总是盯着空杯子，还不时地用牙齿蹭着杯口。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自行离开了。

在房间里，我把《绿衣亨利》读完了。在一个他无法临摹的小石膏像旁，他发现自己从来就不会与人打交道。他回家看望向来支持他的母亲，看到她双颊颤抖临近死亡。之后多年，他如行尸走肉，忧郁而厌倦。直到曾因他的思想而对他产生过爱情的那个女人从美国回来时，他才开始又活过来；这个女人敬佩他的思想。于是，他的故事成了童话。当我读到"现在我们兴奋而欣喜地在金星饭馆的贵宾间里共

享美食”这个地方时，我不得不移开目光，以免掉下泪来。结果我还是哭了，相当歇斯底里，可这又让我忘掉了时间。

我躺在黑暗中，在朦朦胧胧中，我突然悲伤自己竟然被人抢走了钱。我不遗憾，只是有一种切身的、无头绪的痛苦，我无论怎样都难以打消的痛苦：从我身上被掳走了什么东西；有一个空白，它需要时间才会重新弥合。我什么都不愿意再去想了。梦乡里，有人掉进了一个巨大的盆中，盆里正好长着西红柿。他消失在西红柿中，而我望着这个通常放在舞台上的大盆，想着他什么时候又会出现呢。“如果我现在还经历什么的话，那我就过去看看。”我在梦中大声对自己说。

第二天中午，俄勒冈 下起雨。尽管不允许，我还是站在波特兰机场出口处，戴着草帽，试图拦一辆去埃斯塔卡达的出租车。我乘坐“西部航空公司”的班机途经盐湖城飞到这里，依然觉得自己是别人的双影人，游走在一片虚无中。我曾经读到过，受惊者会事后进行毫无目的咀嚼活动：在我看来，我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到了俄勒冈 。

一辆从加州运菜进山的车终于把我捎到了埃斯塔卡达。车子只有司机那边有雨刷，因而外面的一切我几乎什么也看不清。这对我再好不过了，因为我的头很痛。我偶尔会忘记疼痛，但吸气时又会感觉到。司机身穿一件格子衬衣，衬衣下还有件带扣子的底衫。一路上，他脑子里肯定回响着一个曲子，因为他不停地调整坐姿，用手指在方向盘上击打着节拍。可他始终不声不响，只有当我们到达高处时，雨慢慢变成了雪，他才吹起口哨来。雪从车窗上滑去，后来慢慢挂在上面。

埃斯塔卡达海拔一千多米，人口大约一千五百人，绝大多数从事伐木工作。我发现自己马上开始寻找事故、急救、火警、警察之类的牌子。埃斯塔卡达这个地方只有两条乡村公路交错。我们进入时，我在司机指给我的汽车旅店里要了一个房间过夜，费用是5美元。我一觉睡到晚上，后来就干脆让自己滚落到地上。当我感到地上太冷时，便裹上大衣，在打开的电视前踱来踱去。电视画面不清，因为埃斯塔卡达位于群山之中。我在前台询问怎么去单身伐木工人的住地。你得穿过厚厚的积雪，因为这个季节不再有铲雪车。这个地方几乎看不到什

么树，只是这儿或那儿象征性地立着一棵松树，只要上面的雪落下来，树枝突然弹回去，会把人吓一跳。有一片松树立在开拓者纪念碑周围，路过时我听到后面有对恋人在窃窃私语。到处都拉着窗帘，从快餐店的排风扇里和运河铁丝网里涌出雾气来，周边的雪已融化了。那个开着门的杂货店里，有个拇指包扎的人在喝咖啡。

格里高尔·巴拉克家门口的灯灭了，可能雪化时水进去短路了。我跺去鞋上的雪，可没人出来。门没关，我走进去，里面黑洞洞的，只有一盏路灯的亮光照进屋里。我弯腰捡起地上的纸片，猜想可能是给我的留言，凑到灯光下去看，原来是我途中给我兄弟发的西联汇款电报。

桌子上有一副牌，彩色的德国牌，旁边是个闹钟，像是铃响时给弄翻了。一把椅子上挂着两根带着泥的鞋带，另一把椅子上放着件睡衣，是格里高尔从我这儿继承的，睡衣上面的手帕上绣着248，是我在寄宿学校的编号，这手帕至少有十五年了。

衣橱门敞开着；门内侧与炉子管道之间拉着一条绳子，挂着内裤和袜子。我伸手去摸它们，都干了，硬邦邦的。冰冷的炉子上有个底盘，上面是一团已变质的黄油，盘上还有个拇指印。衣橱里挂着几个铁丝衣架，是洗衣店同衣服一起送来的，上面挂着洗过还没熨烫的衬衣，袖窝下已开线。

床上没有罩，床单上有拍死的蛾子留下的印子，有只蛾子还夹在褶皱中，床底下满是空啤酒瓶。

窗台上放着洗衣粉，旁边有猫爪子印。

墙壁上挂着奥地利挂历，上面的彩色照片是开满水仙的田野，田野前站着个头戴民族风格帽子的女人，照片下面印着家乡一家贸易公司的名字。

那挂历上的照片——

小时候，我们见识那么少，也没有什么好见识的，以至于我们甚至每次都为挂历上的照片而欣喜。秋天里，我们盼望着保险公司来收年费的人，他们会把公司明年的挂历带来，上面会有一个新画面。

那么弟弟现在还让人寄新挂历到美国吗？

这念头让人受不了，我赶快用一种轻松些的感觉将它驱走。我把电报搁在桌上，一只手护着，免得碰倒桌上其他东西。

出来时我还看到洗衣盆旁的低帮鞋子，袜子缩在里面。“穷困潦倒”，人们都这样说。还是十年前流行的尖头鞋。小孩子拿着汽球在一个屠宰场旁跑来跑去，肉店的伙计把一个孩子举到死猪上方。一步一滑，我头也没回地走上埃斯塔卡达的主道。

四周如此静谧，我不由得一次次停下来。比萨店和加油站的霓虹灯热气笼罩，远处能看到一个汽车影院的银幕，只看得到亮光和阴影，听不到声音。我走进一个游戏厅，却不想玩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从一个机器走向另一个机器，悄然地让球滚动起来。

我突然发现，我对任何游戏都很讨厌，简直不可想像，居然会站到这样一个机器跟前，或者洗牌，或者掷色子。突然对这一切没了兴致，我疲惫地坐在一个凳子上，旁边有一个醉汉靠墙睡着了。他脸上出了很多汗，敞着衬衫，脖子窝里积了一窝汗，不时地溢出来。他睁开眼，不得不先眨一眨，直到瞳孔调整好，像剥下的兔子皮。我走出去。

回到酒店里，我立即去浴室洗手。当我去拧热水龙头时，发现龙头很烫。是龙头刚才流水了吗？我退后一步打开龙头，开始出来的是空气，然后突然喷出一股滚烫的液体到水池里，有几滴喷到我的裤子上，立即在裤子上烧出黑边小洞。这可好啦！我点着头，像赞成似的。我看到两个水龙头螺口均有刮痕，便也小心地打开冷水龙头，跳到一边，让硫酸水流出来。洗手时，我看到水杯上的玻璃纸套已打开，让人拿起即可喝。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们：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物品，另一个星球的物品。

夜里我敞开着房门。有一阵子，我似乎听到有人在我窗前走动，其实是个夜蛾子被困在了窗户与窗帘之间。很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再也没有做梦。

醒来时，我像变了个人。上午一大早我去了我弟弟工作的锯木场。雾气沉沉，运河铁丝网下融化的雪水咕嘟咕嘟，我变了人似的行

动着，犹如在别人的思想里。我不得不跑起来，因为再也走不下去了。像以前寻找语言一样，我现在寻找能让我回到自身的画面。烧焦了的树桩，部分已被砍光了的山脊，燃烧过的垃圾筐，田里什么地方燃烧着稻草，在正午的炎热中沙沙作响。我再也不愿意去想像什么跟我有关了，可是却突然听到自己成了腹语者，肚子取代了我的角色，并且教给我说我不愿意承认什么。迎面走来一个拎着个牛奶桶的女孩；她那样瘦骨嶙峋，我惊讶得立刻又醒悟过来。

水轮锯竖立在一片低处，克拉克马斯河从中间穿过。一群男人站在一台轰鸣的烘干机旁，正给一根粗壮的松木脱皮，我老远就认出了我兄弟。他站在树上，正在将一根铁棍塞进树皮和树干之间。我在一片高处停住步子，从那儿朝他看下去。他戴着手套和毛线帽。他用力撬着铁棍，后腿时而从脱了皮的树干上滑下。另一个工人也将一个铁棍插到树皮下，并从另一端拽出来，树皮变成长长的纤维从树干上脱开。他们用斧子砍断树皮，将它们扔成一堆。

格里高尔此刻走到一边。我想他看见了我，便向前迈了一步。他停在一堆灌木丛旁，四下张望着，却并没有抬起头来。灌木丛旁边还有积雪。他褪下裤子，蹲了下去。我眼看着大便从他光屁股里出来，慢慢落在雪地里。虽然已经完事了，可他还蹲了会儿。他站起来同时将内裤和外面的裤子一起拉上，拍着手走回树干旁。好像我只是为看这些特意跑来似的，我转身走开，径直又回到酒店里。

那里有给我的留言：那是张明信片，上面是从空中俯拍的太平洋岸边的双岩，离埃斯塔卡达有一百多公里。海滨公路画着一条大弧线从那儿穿过，海里耸立着两块黑礁石，海水在周围溅起浪花。尽管拍摄的高度很高，但公路线条依然清晰可辨。在一个地方，公路呈拱形延伸到海边，犹如一个海景观赏点，或者只是一个汽车站，上面用钢笔画了个圈，画得很用力，从背面都可以看到划痕。“这么说，此间她又换了一支钢笔？”我对那个酒店收包裹的女士说；她正在分拣我付给她的硬币。她抬头看了一下，又得从头再数一遍。她用一只手数着，另一只手张开，让刚涂抹的指甲油晾干。她的围脖后，我看到一条长长的红色疤痕，开始我还以为是汗湿后的化妆印。我不想再给她制造麻烦，也没问明信片是怎样到她手里的。

我用最后剩下的钱乘出租车穿过俄勒冈 州。这是阴沉沉的一天，好像专门为你出门才这样，只有下雨时天时而会亮起来。相机放在膝上，可看的东西很多，前后左右都是，可我太伤心，不想拍什么。

我有时小睡一会儿，一次醒来时，我看到一条河流在面前延伸，河中有一座光秃秃的小山包。又一次醒来时，我们正在穿越黑漆漆的针叶林，我必须把身体伸出车外才能看到天空。“别开窗，空调不然就白开了。”出租车司机说道。我就受不了清醒时闭着眼睛，因为这样的话，闭眼前我最后看到的一切立即就会袭来，令我窒息；等我睁开眼睛时，它才退回原位。又下起雨了，车窗变得模模糊糊，想必我睡着了，因为接着车窗玻璃又明又亮，阳光有气无力的样子，车窗前耸立着一面巨大的灰色岩壁。我直起身，摇醒自己，这面岩壁一直延伸到天边，那是太平洋。司机打开收音机；里面全是噪音。几分钟后，我们停在双岩，海鸥卧在惟一一家加油站的屋顶上。

下车！“这不过是个不到百人的小地方。”就是这样的话现在也不管用了。我本想放下箱子，却一直提着它。这里天空晴朗；阳光透过云彩时，汽车牌照的底板闪烁着。我站了一会儿，并没有放下箱子，看到一扇窗里有个孩子注视着我，还懵懵懂懂地学我的表情。我走开了；许多燕子飞来飞去，飞得那样快，你几乎只能看到它们一闪而过，就像暮色中的蝙蝠一样。

坐在刨床上，

等妈回家转，

等来黑山羊，

把咱顶地上，

飞来白蝙蝠，

将咱又来搀。

在最后那些房子玻璃上，已经映现出大海的情景。没错：烧焦的垃圾筐！在一个房子前，有一个蓝白相间的圆柱在转动：一家理发店。里面只坐着一个女人，头戴头罩，一直遮到眼边。女理发师蹲在

她面前给她涂指甲油。女人将脚趾张开，它们有点弯曲和变形，关节部位长着老茧；我认出这是尤迪特的脚：年轻时，她当售货员时将脚站坏了。这时，我也在衣帽间看到了那个棕色皮包；皮包半开着，尤迪特大概从这里面拿出了披肩，现在就围在她的肩上。这条披肩是锦缎的，在夕阳中闪闪发光。“她竟把披肩也带到美国来！”我心里大声说着。女理发师给她涂手指甲时，我观察着她用一只脚的两个脚趾夹住另一只脚的大脚趾。简直是梦魇，清早醒来，口中呕出一条蚯蚓。我目瞪口呆。尤迪特在椅子上动来动去，猛地愤然的样子，好像她预感到了什么。在一个莫名的记忆中，有一个瓶塞刺耳地发出吱吱声，它是被人用嘴咬着从瓶子上拔出来的。女理发师抬头望着，由于她将手指就紧放在自己眼前，什么都看不到，我赶紧躲开她的视线。

鱼骨卡在运河的铁丝网上；霉菌长在小屋的缝隙里；走出屋子的人们，看看天空，又回到屋里；作为开拓者纪念碑，这次是超市前用装着润滑油和猪油的大桶搭建的，上面是讲述这个地方历史的文字。一个没穿内裤敞着裤裆的醉汉拐过来，径直向我走来。我给他让开道，他在我正好挪开的地方绊了一下，脸向下倒进一摊雨水中。

尽管天还没有黑，可街上的霓虹照明灯亮起来了；有根灯管闪烁着。我嘴里有一根头发，老是吐不出来。我觉得倒挺惬意的，这样就不至于我走路时无事可做啊。有时我也跑一跑，沿着没有了房屋的海岸，我一直走到我能看到海中那两块礁石的地方停下。在这里，我穿过马路，跑到这条路伸向大海的地方——也就是明信片上圈定的——坐在箱子上。太阳刚刚落山，起风了。这儿既是观光广场也是车站。很少看到来往车辆。我朝脚下深处的海滩望去。这是个岩滩，泛着泡沫的水中漂着木片。广场有栏杆围着。一个女人还站在那儿，身边有个傻孩子，一次次地爬上护栏。女人紧紧地抓住他，他不断冲着大海狂叫，让人抱他下来。一辆写着湾城的汽车停下，她们上了车，就剩下我一人了。

我朝着太平洋望去。虽然水上还泛着夕阳的余光，却是黑汪汪的。我想找回它给我的第一印象，那高耸陡峭的岩壁：可是我面前依旧是平缓的大海，直到我的脑筋转不动了。

对尤迪特的第一印象：为什么我对此一点也想不起来呢？我努力地去想：一种甜蜜的爱慕，它让我忘乎所以，飘飘然。难道这就是我

们非得始终相处的标准吗？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我们相互只会是怒目而视。

目光又投向大海：如此空荡，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它吞噬了似的。雾气弥漫在海滩上。我疲惫得全身像散了架，这些空空荡荡的中间空间使我晕眩。跌跌绊绊，肮脏不堪，糟糕透顶。在这些随意拥有的陌生姿态中，我太久地感受到了惬意；我和所有的人都保持距离，因为我让他们成为“生物”：这个生物，我这样说尤迪特，这个东西：他，她，它。我将双手插进两腿间，身子缩成一团。一架直升机飞过街面，照亮了柏油路面。

万籁俱寂。远处能听到有一架飞机，它的嗡嗡声如此低微，让人去倾听头都会痛。

我朝四周望望，看到尤迪特拎着包从双岩最后边的房子之间走出来。她在街对面停下，左右看看，然后走过来。她还戴着头巾，也许头发还没有干吧。她身后几乎一片黑，她早就用手枪对着我。“她对我动真的了！”我心想着，“没错，她真的动真的了！”她拉上栓。响声那样轻微，你只能在想像中听得到，根本不会信以为真。我烧成了灰，也还是个整体，恐怕只是稍稍一碰就会散开。不过如此呀！我相信自己就是为此而生的！我失望地从箱子上站起来迎着她走去。我们如魔鬼般凝视的面孔冲着对方走去；她突然将头扭向一边大叫起来，如此凄厉，就像一个大喊大叫的孩子一样，几乎要窒息了。我屏住呼吸，等她接着再叫下去，她肯定立刻还会叫下去，还会这么尖厉。可她没有叫，只是哽咽着，几乎要窒息。我从她手中拿下手枪。

我们并排站着，双脚不断交替，不知所措，心情糟糕至极。我把手枪扔到海里，它落在一块礁石上，撞出一发子弹，钻进海水里，尤迪特用拳头将嘴唇摁在牙齿上。

我们走来走去；一个人走动时，另一人便停止不动。已经入夜了，一辆灯火通明的巴士摇摇晃晃地开过来；那是一辆灰狗，车内只有几个人，枕着垫子睡觉。司机向我们招手。我问他去哪儿，他说：“向南。”我们上了车，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到了加州。

电影导演约翰·福特当时七十六岁高龄，住在自己位于贝莱尔的一栋房子里，离洛杉矶不远。他六年没有拍电影了。房子是按殖民时代的风格建造的，他常常坐在屋前的露台上与老朋友聊天。从露台向山谷望去，是一片片橙子树和柏树。客人坐的是藤编扶手椅，并排放在一起，前面的脚凳上铺着印第安式的垫子。只要你坐到椅子说起话，很快就会开始向对方讲故事。

约翰·福特满头银发，他脸上布满皱纹，有发白的胡茬。他戴着一只黑眼罩，另一只眼睛忧郁地望着前方，下巴上的肉偶尔会抽搐一下。他穿着一件海军蓝上衣和一条卡其色布裤子，脚上是一双浅色厚橡胶底布鞋。他说话时，即便是坐着，也把手插在裤兜里；他不动声色。只要他一讲完故事，就把脑袋朝着我和尤迪特转来转去，直到能够用那只眼睛看见我们。他头很大，表情严肃，从来不苟言笑；他在场时，大家都变得严肃起来，即使忍不住为他的讲述发笑。他有时起身，亲自给尤迪特续上加州红酒；我可以自己随便倒白兰地喝。他太太玛丽·弗朗西斯过后从屋里出来，和我们一起听他说话。她和他一样来自东海岸，来自北边的缅因州，也是一个爱尔兰移民后裔。你可以从阴凉的露台里望着外面的阳光；雷阵雨前的乌云从四面涌起。

“在爱尔兰我父母的村子里有一家食品店，”约翰·福特说，“小时候，我去买东西，要找回的钱用糖果来代替，糖果就放在一个桶里。几个星期前我去过那儿，五十多年来是第一次。我想在那儿买雪茄。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他们把手伸进收款台下的桶里，给我找回来的不是钞票，而是糖果。”

约翰·福特重复了很多我在旅途中从克莱尔和别人那里所听过的有关美国的事；他的看法并不新鲜，但他可以讲出那一个个故事来，指出这些看法的来龙去脉。常常在人家问他一些普通事情时，他总是思维跳跃，讲起一个个细节，特别是一个个具体的人。问起美国时，他总会想起与他共过事的人。他从不评判他们，只是原原本本地告诉大家，他们说了些什么，他和他们一起经历了什么。他也只是直呼朋友的大名。“与人为敌是让人难受的事，”他说，“对方会突然变成无名无姓，一个赤裸裸的形象，他的面目进入阴暗中，变得模糊不清，扭曲不堪，我们的目光只会一扫而过，由下而上，像耗子一样。如果我们有了敌人，我们会讨厌自己的。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始终有过敌人。”

“为什么您总是说‘我们’而不是‘我’呢？”尤迪特问道。

“我们美国人，即使谈论我们的私事，都说‘我们’，”约翰·福特说，“这也许出自于此：在我们看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大家共同行动的一部分。‘自我’故事只存在于一个人代表所有别的人的地方。我们不像你们那样庄重地对待自我。在你们那儿，哪怕是售货员，出售根本就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时也说：‘这个和那个我已经卖光了’，或者‘我还有件哥萨克式样衬衣’。我自己在那边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情，这是我实实在在的经历啊。”约翰·福特说，“另外你们又相互模仿，将自己隐藏，甚至连那些服务小姐都用女主人的口吻接电话，”他说，“你们总是说‘我’呀‘我’的，可当你们被看成另外什么人时，你们却觉得受宠若惊。那么你们可是一再希望绝对不可混淆啊！正因为如此，你们一再抱怨，你们受到伤害，每个人都很特别。在美国这儿，不存在这种抱怨，没有人会退缩到自我世界里。我们不渴望独来独往；如果你独来独往的话，人家会瞧不起你，那么你只有围着自己去寻寻觅觅。如果你依然我行我素自说自演的话，等不到你说完第一句话，人家就跟你不说了。”

“您常做梦吗？”尤迪特问。

“我们几乎不再做梦了。”约翰·福特说，“即使做，我们也会忘了它。我们无所不谈，也就没有什么梦可做了。”

“讲讲您自己吧。”尤迪特说。

“每当人家让我讲自己时，我就觉得这还为时太早。”约翰·福特回应道，“我自己的经历离我还不够远，因而我喜欢说我之前人的事情。我更喜欢拍有关以前的电影。我经历的事我几乎不想回头，但是我对还没做的事和还没去的地方的渴望更大。小时候，我被一群意大利移民小孩揍过，虽然我们都信天主教！其中一个胖子很狡猾，他只对我吐口水，用脚踢我，没动手。一个小时后，我在街上看到他一人独自走过，肥头大耳，平足，突然我觉得他是那样孤独，我有一种冲动，想对他好，去安慰他。后来我们真的成了好朋友！”他回想着，过了一会儿说道：“那时我还穿着短裤呢！”

他向山谷下望去，最后几束夕阳落在橙子树枝叶上。“看到阳光照射下的树叶那样摇曳着，我觉得它们自古就这样一直摇曳着。这的

确是种永恒的感觉，我会忘了还有历史。你们可能会说这属于中世纪的情感，是那种一切都还处于天然时的状态。”

“可是橙子树是人栽的，并不是天然的。”尤迪特说。

“当阳光照射其中，不断闪动，我便忘了这点。”约翰·福特说，“我也忘了自己和自身的存在。我希望，什么也不要改变，树叶永远这样摇曳下去，橙子永不被采摘，总之，一切保留这样不变。”

“那么，您也希望人们也这样一直生活下去，和他们有生以来一样？”尤迪特问道。

约翰·福特忧郁地看着她说：“是的，我们想这样。直到一个世纪前，人们要求进步，他们也有权利推行进步：从新时期起到前不久，救治理论都出自当权者：出自公爵、工厂主、慈善家。可现在，当权者不再是慈善家，最多也就是个别人充当慈善家，只有穷人、那些无产者和无权者在渴望着什么新的变化。那些有能力改变的人不再想变，这样一切就得保持老样子了。”

“您愿意这样吗？”尤迪特问。

“我不愿意这样，”约翰·福特说，“可当我这样向下看出去时，这些正出现在我脑海中。”

一个印第安女仆出来，拄着拐杖，给他膝上盖了条毯子。“她在我的几个电影中演过戏，”约翰·福特说，“她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可她不会说话，是哑巴。于是她成了走钢丝杂技演员，摔了下来，后来又到我这儿来了。”

“在钢丝上她感觉不错，”他说，“她觉得自己似乎会说话了。现在她落脚的样子也像是在走钢丝。”

“在有些行为中，你会突然感觉到自我的存在。”约翰·福特说，“对，这才是真正的我，你会这样想。可惜当你真正感知到自我时，你大多情况下却是独自一人。然后你就立刻努力投入社会，同时又失去自我，装腔作势。这是不幸。这很可笑。人们要在思考时获得惊喜，而不是固守自我。有时你一说出真话，连自己都吓一跳。幸福

感是那样大，你一个人是忍受不了的，而且立刻又要说出真话，那么你当然就是说假话了。我还总是说假话。”约翰·福特说。“刚才我还知道我要做什么，可此刻又忘得一干二净了。只有我明确知道我要做什么时，我才是幸福的。那么我想我会高兴得牙全都掉光的。”

他领我们去房间看那一摞电影脚本，人们还源源不断地给他送来。“这里有不少好故事，简洁明快。人们需要这样的故事。”他太太站在我们身后的门口；他转过身向她望去，她微笑着。女仆用一只金属杯给他端来咖啡，他仰头喝着，耳朵上竖起一束白毛，另一只手叉在腰间。他太太走过来指着墙上的照片：一张是约翰·福特拍摄电影时照的，坐在一把X型导演椅里，脸上戴着一个蜜蜂防护罩，几个人或站或坐在他身旁，也都戴着防护罩，他脚下是一条耷拉着耳朵的狗。另一张照片上是他刚拍完一部电影的情形，他单腿跪着，紧紧地抓着三脚架，演员们围着他，头都伸向他，其中一个手搭在相机上，像是在抚摸它。“这是《铁骑》拍摄结束的那天，”约翰·福特说，“有个女演员拍摄时哭个不停。等她不哭了，大家给她擦去了眼泪。这时，她想起了自己的伤心事，又开始哭起来。”

他朝窗外望去，我们也跟随着他的目光：外面是一座山脊，长满青草和开花的灌木丛；有一条小路盘绕着山丘直到山顶。“美国没有小路，只有大道。”约翰·福特说，“我铺了这条小路，因为我喜欢在新鲜的空气里走走。”他的床上铺着一条海军毯，床边墙上挂着一幅《卡布里尼修女》画，她是美国最早的圣人。福特曾想过要拍一部有关她的电影。

他太太坐到放在房间中央的手风琴旁，演奏了一首《绿袖子》。印第安女仆用托盘端来涂过黄油的热玉米面包片，我们边吃边眺望窗外。“皮毛里的猪耳朵望着我们。”约翰·福特突然说，“您愿意陪我走走吗？”

他向尤迪特伸出手臂，我们跟他登上山丘。路面上满是闪亮的尘土；天已经落下几滴雨点，雨点落在哪儿，那儿就缩成一个个小泥球。约翰·福特边走边说，如果有谁落下，他就停下来，因为他不想对着下面说话。他谈到他的电影，一再强调其中那些故事实实在在。“没有一个是虚构的，”他说，“一切都是真正发生过的事！”

我们坐在山顶上的草丛中，向山谷下望去。他用一根长长的火柴点起一支雪茄。“我总想与人交往，”他说，“我也总想着最后一个离开，因为我不想让留下来的人中有人对我评头论足，同样也想阻止别人离开时让人说三道四。我也是这样拍我的电影的。”

对面山上开始打雷。我们周围的草很高，时而有风忽明忽暗地吹过去，树上的叶子翻卷着，颤抖着，好似枯萎了一样。

好长一阵子，一片宁静。然后，我们身后一丛灌木沙沙地响起来，可其他所有灌木依然静静的。风在这丛灌木中停息了，一转眼，山下房子旁一棵树的树冠晃动了片刻。一切又平静下来，一点动静都没有：一种长久持续的宁静；突然间，我们脚前的草开始波动。一眨眼，四周变得一片昏暗，万物紧贴着大地。空气令人窒息。刚才还待在灌木叶子上的黄色大蜘蛛，死在我们面前。约翰·福特在草上擦擦手，同时转着戒指，仿佛他要变什么戏法似的。我的手背痒痒的。我一看，是只蝴蝶，它正扇动着翅膀；与此同时，尤迪特的睫毛垂了下来。你只需要少呼一口气，就能看到这一景。下面山谷里的橙树林里传来了雨声。“上周我们晚上驾车穿越荒漠，”约翰·福特说，“在下面的亚利桑那，那儿落下了很多露水，我们都得打开雨刷。”在亚利桑那下面：这几个字勾起了我的回忆。约翰·福特弯腰坐下来，几乎闭着眼睛。大家等着下个故事，于是都俯身恭听着，而我发现，我此刻在重复着他一部电影中一个人的动作；他原地不动，伸长脖子，身子俯在一个行将死去的人上方，看他是否还活着。

“讲讲你们的故事！”约翰·福特说。

于是尤迪特就说起我们怎样来到了美国，她怎样跟踪我，抢劫我，还要杀死我，以及我们现在终于愿意和平分手。当她讲完我们的故事后，约翰·福特静静地笑了，笑容溢满他的脸庞。

“噢，上帝！”他用德语说。

他严肃起来，转向尤迪特。

“这一切都是真的？”他用英语问道，“这个故事没有一点虚构？”

“是的，”尤迪特说，“这一切都发生了。”

（1972年）

真实感受的时刻

丁君君　译

说到底，暴力和愚蠢难道不是同一回事吗？

——M.霍克海默

1

有谁曾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凶手，只能装模作样地继续从前的生活？从前，时光仍连绵不息的时候，格里高尔·科士尼格在奥地利驻巴黎大使馆担任了几个月的媒体官员。他和妻子、四岁的女儿阿涅丝住在十六区一间阴暗公寓里。房子建于世纪之交，是一栋法国市民住宅楼，二楼和五楼分别有一个石砌的铁艺阳台。这栋楼坐落在一条宁静的林荫道上，四周都是风格类似的建筑，顺着林荫道走下去有一个小小的下坡，那条路通向奥特伊门——城西出口之一。白天，每五分钟就有一趟火车经过林荫道边的低地。每到此时，饭厅里的玻璃和碗碟就会乒乓作响，列车上的旅客都是从郊区去市中心的圣拉扎尔火车站，然后转乘西北方向的火车去大西洋，去多维尔或勒阿弗尔。（百年前，这个居民区还是葡萄园，现在，这里的一些老居民周末偶尔也会带着狗，乘坐同样方向的火车去海边。）晚上九点之后这里就没有火车了，林荫道一片静谧，不时有微风吹拂，连窗前梧桐叶的刷刷声都切切可闻。七月底的这样一个夜晚，格里高尔·科士尼格做了一个悠长的梦，梦的开端便是他杀了一个人。

突然间，他和世界脱钩了。他想改变自己，就像一个求职者想“改变自我”一样。然而为了不被觉察出异样，他还得延续从前的生活和自我。这样一来，即便他每天毫无异样地和旁人一同坐在餐桌边，已然是一种伪装；他突然开始长篇大论地谈论自己，谈论“从前的生活”，也是为了岔开别人的注意。他杀害了一个老妇人，草草处

理尸体后放进了一个木箱里——我会给父母带来多大的耻辱，他想。家里竟出了一个凶手！他最大的困扰是，自己已变得面目全非，却还得假装合群。那个梦的结尾是，陈尸的木箱已明目张胆地竖在他住的公寓门外，终于有一个路人打开了木箱。

从前，科士尼格对某事忍无可忍时，一般会找个地方躺下来睡一觉。而这天夜里，情况截然相反：那个梦令他不堪忍受，终于醒了过来。然而他很快发现，清醒和睡眠一样不再可能，甚至比后者更可笑，更无聊。仿佛他已开始受到无法预见的惩罚。事已发生，无法挽回。他双手交叉枕在脑后，但这个习惯对现状没有任何改观。卧室的窗外风平浪静；寂静良久后，院里常青树的一根枝条抖了抖，他却觉得，那根枝条并不是为风而动，而是因为自身内部蓄积已久的压力而动。科士尼格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屋子在底层，上方还有六层楼，重重叠叠，很可能都配备着沉重的家具，暗漆箱柜。他没有把手从脑后抽出来，而是鼓起了腮帮，仿佛在找一种庇护。他左思右想，希望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然而，既然一切都已失效，他也无能为力。他蜷起身体想重新入睡，却史无前例地第一次失眠了。快六点时，第一趟火车开过，床柜上的水杯终于叮当响起，他木然地起了床。

科士尼格的公寓很大，结构错杂。屋里走道繁多，两个人会不期然地忽地撞个满怀。走廊很长，看似通往一面墙，到墙边却又有一个拐角，拐过去又是一段悠长的廊道，你不禁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同一所公寓里。走廊一直通向一间里屋，他的妻子正在自学一个听说教程，偶尔会待在那个房间学法语，有时就睡在那里，对此她解释道：疲倦的时候，她很恐惧幽长的走廊和那些曲折的拐角。公寓如此曲径交叉，他们虽然明知女儿不会在里面走失，但还会不时叫一声：“你在哪？”女儿的房间有三个入口：走廊，被妻子称作“工作室”的里屋，以及不明就里的客人眼中的“父母卧房”。再往前还有饭厅和厨房，厨房还有一个“用人入口”——他们没有用人——以及用人专用的洗手间（洗手间的门锁莫名其妙地安在外面）。公寓最前方的“几间沙龙”紧挨着街边，妻子称其为“起居室”，租房合同把其中一个沙龙列为“图书馆”，因为墙上有一个小书龛。直通街面的房间在合

同里名为“前厅”。公寓每月房租是三千法郎；房东是一个法国老女人，丈夫曾在印度支那有过地产，现在她只得靠房租度日。奥地利外交部承担了三分之二的房租。

通过里屋半开半合的门，科士尼格观察着沉睡的妻子。他希望妻子一醒来就会问他在想什么，然后他会答道：“我正在想，怎么才能不想我的生活。”突然他又希望再也见不到她，听不到她的声音。把她撵走。她闭着眼，眼皮皱巴巴，不时悸动一下，看起来快醒了。她的肚子咕咕作响。窗外有两只麻雀正在叽叽喳喳地尖叫，应声总要比呼声高几个八度。都市夜间的朦胧低语正渐渐清晰，不同的声音凸现出来：车流渐密，刹车声和鸣笛声此起彼伏。妻子头上还戴着耳机，语言教学唱片还在唱机里转动。他关上唱机，她睁开眼。睁眼的她看起来要年轻一些。她叫斯蒂芬妮，直到昨天，他至少还曾为她心动过。为什么她看不出他的异样？“你已经穿好衣服了。”她说，一边摘下耳机。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几乎要跪在她面前，和盘托出一切的一切。从哪里说起呢？从前，他有时会用手按住她的喉咙，那不是粗暴，而是他表达感动的某种方式。现在他想，除非她死了，否则我再也不会为她感动。他站着不动，仿佛罪犯名录里的人物一样，把头转向一侧，以一种家常便饭式的口气对她说：“你在我心中没有分量。我再也不想跟你共度一世。我再也不想关心你的任何事。”——“很押韵么。”她说。话脱口后，他才意识到最后两句押韵，太迟了——这样的话，她就不会当真。果然，她闭上了眼睛，问他：“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他瞥也没瞥窗外一眼，就径直答道：“天高云淡。”她笑，很快又睡着了。一无所获，他想。太奇妙了！这个早晨，在他眼里，自己的任何行为都那么奇妙！

来到孩子的房间，他觉得自己在告别；不仅向孩子告别，还向迄今为止与自己相得益彰的一种生活方式告别。再也不会有任何适合他的生活方式了。他站在堆放着乱七八糟的玩具的房间里，心里惶惑不已，一不小心竟扭伤了膝盖。他坐下来。短暂的想像缺席让他很疲倦，觉得自己应该找些事来做。孩子昨晚睡前把鞋带抽了出来，于是他给孩子穿鞋带。沉睡的阿涅丝的头发遮住了整张脸，他看不见她的

样子。他把手放在阿涅丝背上，感受她的呼吸。孩子的呼吸很宁静，闻起来很温暖，以至他回忆起了从前，那时的一切都和谐美满，仿佛蜗居在一片巨大穹顶之下。那时他常常把妻子误叫成“阿涅丝”，把女儿误叫成“斯蒂芬妮”。这些现在都已成泡影，他甚至连再多的回忆都没有了。科士尼格站起身时，觉得大脑似乎正在缓缓冷却。他皱起眉峰，死死合上双眼，仿佛要将麻木的头脑重新催热。从今天开始，他想，我要过一种双面生活。不，我没有生活：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旧生活只是一种伪装，而新的生活则泯灭在旧生活的伪装中。我的心已不在此地，却又无法设想去往别处；我无法设想再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却也不能想像别人那样去生活。我并不是排斥，只是无法想像自己像佛教徒、前卫者、人道主义者，或一个绝望者那样生活。对我而言，“如何”并不是一个问题，最多只是如何继续“如我”地活下去。——这个念头突然让科士尼格喘不过气来。下一刻，他觉得自己几乎冲破了躯壳飞出去，留下一大团湿糊糊的血肉在地毯上。仿佛这个念头已经玷污了孩子的房间，他匆匆离开了。

不要东张西望！他走在走廊里，心里念叨着。“目不斜视！”他大声道。他盯着一间起居室里的红沙发，沙发上放着一本打开的儿童书，乱七八糟。一切如此熟悉，却让他厌恶。他合起书放在桌上，让书和桌沿保持平行。然后他从地毯上拾起一根线，捏着它穿过走廊走进厨房，扔进垃圾桶里。做这些事的同时，他一直沉浸在恐慌中，竭力以完整的语句来思考。

他神色木然地离开幽暗的公寓，走到街上。外面一片残酷的明亮！我也可以这样赤条条地一览无遗，他心想。一有这个念头，他不由自主地低头看看自己的裤链是否拉上了，并悄悄地整理了一下。不能让别人看出他的异样。他出门前刷牙了吗？马路的另一边，排水槽中的流水正灿烂地汇入奥特伊门，那景象暂时驱散了他脸上的木讷。水底石板的颜色已经被冲洗得很淡。科士尼格走着走着，忽然瞥见了一条很像自己家乡附近的小路，路边的墙上爬满了细溜溜、湿乎乎的黑色蓝莓根。他小时候经常在家乡的那条路上刨粘土，然后捏成弹子和火箭形状。幸亏刚才和斯蒂芬妮说话时不小心押了韵，他心想：不然我就暴露了自己。他将袖口从大衣中抽出来。今天起床以来，他终于首次有了一点好奇心。通常科士尼格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但他

从不会给自己惹事。这条路的尽头有什么？他一般会在奥特伊门坐地铁，在拉莫特-毕盖-格勒奈尔转车，一直坐到荣军院广场附近的拉杜尔大街。奥地利使馆是一幢三层建筑，位于法贝尔街附近的七区。今天他打算步行去使馆，给自己开个小差——或许这就是一种方式。他可以从米拉波桥过塞纳河，然后沿着码头一直走到荣军院广场。走路时，他或许能理清脑中那团“非此非彼”的乱麻。对，理清！他一边想着，一边注视着自己在奥特伊街一家面包店橱窗里的形象，看起来很整洁。他好奇地伸展了一下身体。

作为媒体负责人，科士尼格打开任何一份报纸第一眼都会搜索“奥地利”和“奥地利人”等字眼，好像那才是他的名字。走到米拉波街，他经过一栋楼时瞥见了一块纪念碑，上面竟写着“奥地利”。原来这块碑纪念的是一个奥地利籍游击队员，参加了法国抵抗军抗击纳粹的战斗，三十年前在这里被德国人枪杀了。7月14日国庆节，人们打扫了碑石，在碑下的人行道上放了一个铁盒，里面是一根冷杉枝条。这个蠢货，科士尼格暗想，踢了一下铁盒，盒子向前滚了几步，他只好又用脚拦住。他走过凡尔赛大道，看见一排工地围栏上挂着一幅海报，鼓动人们参加某个会议：“伊莎贝尔·阿连德对我们说……”对我们！他想，转头吐了一口痰。垃圾！他经过一家报刊亭，早报栏只有五点发行的《费加罗报》，他在上面读到，土耳其军侵入塞浦路斯后，现在已经攻进了首都尼科西亚；战争一触即发。真烦人，科士尼格想：干扰我的生活！桥上有一对情侣向他迎面走来，手挽着手。女人啃着一块长长的白面包，毫无战争临头的忧伤感，这让他的心绪平静了一些。那个男人怎么这么矮？这种身高真让人倒胃口。想想看，他怎么把可笑的精子射进这个女人可怜的肚子里！他走到桥中央停住脚步，低头看塞纳河。“米拉波桥下流淌着塞纳河和我们的爱。”[12]对面的河岸上挂着一幅推销高层公寓的海报，上面写道：“从米拉波桥上看诗一样的巴黎。”失势的诗歌！塞纳河水一如既往地泛着褐色，一如既往地向西边的丘陵流去，晨光正渐渐漫向市郊的默东森林。对于科士尼格而言，一切都同样遥不可及，同样毫无意义：左岸的淘沙厂、默东的丘陵、圣克劳德、他的鞋头。仿佛他的目光在接收任何对象之前，就已经被一层不可见的隔阂消解了。一切都是不可触及的——他也没有兴趣去触及什么。眼中没有任何可爱之物，他以一个受虐者的目光看着外界，心里想：我这时就是跳进地铁

轨道，也没有人会注意，大家都只看自己的眼前。他在雅威尔坐上了列车，然后像往常一样，刚过七点时走进了奥地利使馆，惟一的不同就是万念俱灰的糟糕神色。

科士尼格的办公室在使馆楼三层，窗外有一棵栗子树。他的主要工作是读法国的各类报刊杂志，从中圈出与奥地利相关的所有文章或报道，差不多每天向大使作一个总结报告，每月还给维也纳的外交部打两篇报告，报告的内容是法国大众媒体中的奥地利形象。奥地利为自己设定了一种新的形象定位，他得以这种定位为标准来衡量法国媒体中的奥地利形象。新定位认为：奥地利不仅仅只是一个以利皮扎马和滑雪著称的国家。因此，如果法国报纸或电视媒体仅仅传达了奥地利的传统形象，科士尼格就得去信予以纠正。他在办公桌上贴了一份信件样本。比如说去年，《金融时报》为奥地利颁发了一份“经济奥斯卡”奖——奥地利在工业国统计数据中位居第一。科士尼格寄出去的纠正信件很少受到重视；他写给外交部的报告更是回音寥寥。他偶尔也会参与记者们和法国政客的工作餐，餐费得提前汇款支付。有时他也会请请那些记者，之后都能入账，因为这些花费都属于他的工作范畴，可以报销。餐费的入账名目为“坐式活动”。“立式活动”指喝酒，顶多加一份自助快餐。这些差不多就是他的工作内容。迄今为止，他的工作态度一直无可指摘。他自己心中并没有奥地利形象，因此很高兴有官方的形象指南。惟独有时，他会收到一些孩子写来的信，向他打听奥地利的事，这些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复。好在这些信中的问题大多是在成年人的指示下提出的。

几个月前，科士尼格向在夏悠宫举办的一个系列电影展提供了一套奥地利默片，之后虽多次催促，对方也没有归还。这天早上才终于来了一辆货车，送还了电影胶卷。他在使馆楼的院子里对照送货单一卷一卷地检查，对司机的不耐烦置若罔闻。没人注意这里。使馆里几乎空无一人。他因为要读报纸，像一贯那样来得很早。到办公室，他打开夜班工人放在门前的包裹，扯掉印着“奥地利大使馆”红色字样的地址标签。他想起联合国派到塞浦路斯的维和部队里有奥地利士兵，于是在各个报纸上寻找相关报道。还没死人吗？他手里拿着一支

油笔，开始认真读报，每半个小时起身一次，从嘀答不停的传真机上扯下法国媒体发来的报道。短波收音机也打开了。八点前后，他就收到了关于塞浦路斯暂时停火的消息。现在，他可以不受干扰地独自待着。像平时一样，他的手指在报纸上摩挲得乌黑。读报时的他纹丝不动，连脸上的痒也不知道挠一下，只是一直读，看到所谓的“关键语句”便用笔画出来，果断得头都不抬。哪些是奥地利形象定位需要的“具有推广意味的”报道呢？贡比涅的农业经济博览会上展出了一种奥地利制造的造林设备。里昂的显微镜展览中有一款奥地利的研究型显微镜。《世界报》称赞了蒂罗尔自然环境的改善。《作者报》又提到了奥地利的反犹主义，虽然科士尼格根据形象定位方针已经多次去信纠正。一家试用商品杂志推荐了一款奥地利的滑雪板皮带。可是《解放巴黎人》报把奥地利的布鲁克纳误称为德国人。九点左右，科士尼格认真洗净了手，去找大使。大使今天来得比较早，他问科士尼格对塞浦路斯局势的看法，然后几乎关切地自己替他回答，科士尼格只须偶尔应道“很有可能”或“这也不排除”。虽然大使自己也常常宣称，上级应该有察言观色的能力，但连他都没有发现科士尼格的异样。（否则他会跟科士尼格一道一道地细数昨天和法国伯爵晚餐的菜肴吗？）科士尼格如释重负，却也有一丝莫名的失望。

他像往常一样，在拉杜尔大道的咖啡馆要了一杯茶。望着街道，他忽然发现，自己对所有人都已无话可说。他常听人说：“要我说……”现在他只想：要我说，我要消除一切。人行道上的垃圾桶上浇满了咖啡汁，中间还有滤纸，这让科士尼格想到了一块刚用人粪施肥的草坪：草芽间尽是点点厕纸。他走进洗手间，郁闷地对着洞撒尿。尿液的气味让他清醒了。他想起了明天和后天，十分厌恶，不由拉响了手指骨节。他咧了咧嘴，同时立刻左右打量了一眼，生怕有人在看他。回使馆的路上，他突然很想表达自己的愤怒。他从咖啡馆舒适的椅子上站起身来，前景黑暗。他紧紧抿着嘴，以这副表情和一个迎面而来的同事打招呼。那人的样子让他想起了袖套，虽然他很久都没见过戴袖套的人了。为什么这些人不能对他视而不见？为什么非得朝他迎面走来呢？一杯放了几天的牛奶上结了一层褐色的奶皮。他目前虽然还活着，能自由行动，但很快就会完蛋。他想揍所有人！一切的一切，甚至连喝第一口茶的享受，突然都变得那么有限。我的生活轨道中断了，科士尼格想，仿佛想让自己心情好一些。一辆童车停在

一个楼道里，车上盖着一块塑料遮雨篷，他匆匆走过时瞥了一眼，那景象令他顷刻毛骨悚然，仿佛昨晚未完成的噩梦在这里被续写了。他强迫自己走回来，仔仔细细地打量童车。

他看见前面走着两个黑人，双手插在口袋里，外套被撑裂了一道缝，从后面能看见露出来的屁股——两人都是同样的裂口，同样的屁股！一个女人左右脚穿不同的鞋，一只的鞋跟比另一只高出很多。还有个女人正抱着一只美国可卡狗失声痛哭。他觉得自己仿佛被囚禁在迪士尼乐园里。

他看见人行道上有一行粉笔字："哦，美丽的人生啊！"下面还有一行"我和你一样。"旁边还有一串小小的电话号码。这个人书写"美丽的人生"时，还得弯下腰。他想，一边抄下了那串号码。

他坐在办公室里读着刚送来的报纸。阅读中，他发现那些版面的标题上经常出现"越来越多……"的字眼。"越来越多的婴儿有营养过剩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儿童自杀行为。"读《时代周刊》时，他看见很多版面上都有"我正在发掘生活"这句话。一个篮球巨星说："我正在发掘生活。"一个退伍老兵说："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一个乡村女歌手说："我非常幸福。"一个使用新牙粉的男人说："现在，我要发掘生活。"科士尼格想冲着整栋大楼怒吼。但他只是静静地盯着天花板，小心翼翼，仿佛这样即会被人识破秘密。

他把人行道上的电话号码放在面前，却先拨了其他几个号码。接下来的这段日子里，他想尽可能避免独处，找些熟人一个接一个地见面。由于害怕自己在电话里说漏嘴，或突然哑口无言，他在每拨一个号码前都把自己想说的话写了下来。最后，记事本上直到月底的日程全部爆满，每天晚上都有一个约会。我要献身工作，他想。最后，他拨通了人行道上的那串号码。接电话的是个女人。她说不记得自己在马路上写过什么，可能是醉酒后写的。科士尼格原本只想讽刺她几句，这时却改口说："您没有喝醉。明天晚上九点，我会在剧院旁边的和平咖啡馆。您来吗？""也许吧，"女人说，然后又补了一句，"我去。我们不要约定接头暗号。我希望自然见面。我会到的。"

中午时分，科士尼格穿过圣多米尼街去坐68路巴士，照常去蒙马特见一个情人。他跟着一个裤子上印着“芝加哥城”的女孩走了好几条小街，想看清她的脸，后来又意识到自己已经忘了她。上车后，他发现车厢里只有他自己一人，亢奋了一阵，蓦地打了个寒战，心中泛起了一股不针对任何人的强大感。到了下一站，他抬头一看，前面已有了几个后脑勺。

科士尼格朝车窗外看，眼前仿佛闪动着无数透明的斑点，他闭上眼再睁开，斑点竟然更多了。下车后，他决定静静站立片刻，耐心地盯着什么看，比如说天空。他麻木地站着不动。一个人走过他身边，淡淡地说了一句：“很平常。”是啊，一切都平常得可悲。他忽然想起了某乡村里的一个朝圣地，地名就叫做“玛利亚·可悲”。

他尽量让自己不引人注目，于是第一次为情人买花。如果有人在观察他，看着他走进花店，也不再会觉得他有什么异样。他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沉浸在日常琐碎中，无忧无虑到了买花的境界。他打算做个正统的人。花店里很凉爽，有人要买一束剑兰，他心里充满了安全感，竟很想帮女店员扎花束的蝴蝶结。店内的环境、水的气息、四处的水池，都让他很舒服。店员以一种优美而细腻的认真态度，将剑兰一枝又一枝摆到包装纸上。以前如果有人问他，送人的花束应不应该精致包装，他会不假思索地回答：简单包就可以了。今天他却在一旁认真观察，看女店员如何用针线缝合包装纸。整个包装过程中——无论是剪断花茎，摘下枯萎的花瓣，还是将花束递给客户，女孩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科士尼格认为很妙。在这家店里，他觉得自己似乎很卑微。如果嘴唇能绷紧，他就能笑出来，女孩也笑了。这种纯粹客套的友善在他看来却是一种人道待遇，她令他感动了。

他拿着那束花往蒙马特走，看起来毫不起眼。勒皮克街各家市集的气息混在一起，根本无法辨别源头：鱼、奶酪、阳光下的法兰绒西

装的味道……从一家面包房敞开的门内飘出一缕白面包的香味，那气味令他措手不及地沉入了回忆之中，并非他自己的回忆，而是一种全新的、更宏大清晰的回忆，他眼前的平面世界骤然立起来了。所有人的举止都果断自如，没有人自怨自艾：在这些他永远不会认识的人中间，他有了一种归属感。他在情人的门前慢吞吞地脱鞋，一边幸灾乐祸地笑——笑谁呢？门内传来了脚步声，越来越近，他知道，一切马上就会重演，毫无廉耻，他们将认出对方，然后彼此微笑，这个念头让他的目光无地自容。还不晚，他还可以顺着楼梯火速窜上去。科士尼格一动不动地站着，双脚并拢，直到门像往常那样打开。惟一不同于往常的是，他几乎要被心中的荒谬感击溃。

他不动声色。贝亚特丽斯第一眼就认出了他，这让他颇有些困惑。他突然担心自己下次认不出她，于是努力想记住她脸上的细节，或记住某个特殊标志。贝亚特丽斯在十五区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兼职翻译。丈夫骑摩托车时撞死在一辆拖车上，她独自拉扯着两个孩子——孩子此时不在家里。他们是在一次使馆的接待活动中认识的。她走到他面前，问："接下来我们做什么？"科士尼格经常来看她。他喜欢望着她忙活家务。她话很多，听她说话时，他有一种宁静而又强烈的兴趣。"在你面前，我不怕自己会做错事。"她说。他们从来不想彼此的关系。"不多想或许是个好征兆。"贝亚特丽斯说。她把自己遭遇的一切都理解成一种征兆；即便在别人眼中是很坏的信号，她也只会看到事情将有转机。她不喜欢困境，却把困境看成是好事的兆头。因此她才能开朗地活下去，和她在一起，科士尼格至少能暂时忘却那个万念俱灰的开端时刻。

然而现在，他所见到的一切都成了死亡的征兆。他什么都不想看。虽然睁着眼，却感知不到任何令他欣慰的事情，忧虑令他一阵剧痛，从心口一直痛到舌尖。他想起了那条楼道里盖着雨篷的童车，雨篷上还有水泥块，贝亚特丽斯想帮他脱大衣，他不情愿地转过头去。现在，他突然变得担心自己说错话做错事，担心自己做事心不在焉——切肉也罢，拥抱也罢，甚至是呼吸。一切惯熟的动作，他都做得谨慎庄严，因为担心自己会脱离角色：从酒瓶里拔出软木塞，把餐巾

铺在膝盖上。在致命的恐惧中，他突然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一切都还安好吧？”他用了“安好”这个生僻的词，掩饰自己的恐惧。再次坐在饭桌边，他什么都想自己来，虽然平时他很喜欢贝亚特丽斯在饭后给他削一个苹果。

他没让她帮脱衣服。如果她敢碰他，他会一拳把她打倒。裤子放到椅子上；双双躺倒在床上；阴道接纳他的阳具。女人用指甲轻轻摩挲他的阳具时，他觉得她正在传染一种恶心的皮肤病给他。做爱时，她的肚子轻轻擦着他，他才有了安全感，然而到高潮时，他体会到的不再是一种火热感，竟是一阵迅速漫遍全身的冷战。他巴不得马上冲个澡，穿上衣服，跟她面对面远远地坐着。她望着他，于是他用大拇指爱抚般地摸她的眼帘，让她合上眼不看他。但她立刻又睁开了。他觉得那双大睁的眼睛仿佛在笑，于是强迫她合上。贝亚特丽斯挣脱了他的手转开头，依然继续望着他，她并没有紧张，反倒有些忍俊不禁。于是他只好闭上眼睛——随她去，直到他觉得有了安全感为止。然而失明般的感觉很快让他难以忍受。他想睁眼，眼睛却无耻地拒绝就范：眼皮仿佛粘在了一起，很费力才能扯开，先是一只，然后另一只。贝亚特丽斯还在盯着他看，或许她一直都在注视他——仿佛他有问题。她抿紧了嘴唇，但嘴角还有一丝缝隙，里面似乎有一颗闪着光的虎牙。他在脑中想像一只死猪，其实只是为了不居于她的下风。他们对视的时间越长，她越发显得关切，而他越发心不在焉。由于脑中一片空白，他做了个鬼脸——不，他的脸变成了一个鬼脸，虽然他并没有刻意作任何表情。他假装打了个呵欠，这样至少能暂时再次闭上眼。他抓住贝亚特丽斯的头发，推着她的头沿着自己的肚子滑下去，让她含住阳具，用舌头从下往上舔，仿佛要把它舔长。他的身体暖和了，觉得自己和贝亚特丽斯暂时是一体的。他还觉得，自己只要此时开口说话，就能彻底理解她。

他们在厨房里喝咖啡，他望着她从冰箱里拿出焦糖布丁，这样孩子回家时布丁就不会太冰。如他所愿，她真的坐在了他对面，在他伸手能及的范围之外，她认真地为还在上幼儿园的大孩子削着用钝的彩色铅笔。凝望着她时，他终于能纵深地进入视线之中。透过敞开的窗

口，他听见了寂静的街道上排水渠中的水流声。在某些悬突的石头上，水的叮咚声格外清晰。他聆听得越久，周围的空间就延伸得越远，水渠的水在他心中变成了一条小溪流，汩汩的溪水声讲述着一段几乎被遗忘的故事。贝亚特丽斯一直不停地转动着卷笔刀中的铅笔，咯吱咯吱——科士尼格突然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只要厨房用桌上还有这些未完成的工作，他就能远离危险。厨房用桌：这个词语现在有了更重要的含义，某种安全的含义。他可以从桌边站起，一直向后退，退到红色地板砖那里。贝亚特丽斯专心致志地转动着铅笔，忽然停住了手，反过来开始转动削笔刀，仿佛她脑中掠过的某个念头突然变成了一种强烈的意愿，一个客观意向变成了一种主观矛盾，或是一段早被遗弃的回忆变成了一种当下的感觉！他周围的公寓仿佛变成了平地，明亮通透，宛若在一片高地上——科士尼格心醉神迷地闭上眼，想阻止自己哭出来，又像要更好地享受眼泪。

他以一种“再不来”的目光看着一切。虽然眼睛望着贝亚特丽斯，但他已将她抛到了脑后。他已经不再属于她，只能如此；必须如此。他的体内一阵噼啪作响，然后轰然崩溃。一次复杂的灵魂塌方，他想。一些零星的思想突破了外壳，他永远地僵化了。人的身体上有丑陋的痛苦吗？身体有丑陋的伤口，灵魂才有丑陋的痛苦。身体的伤口有时也是美好的，尤其那些令人扼腕的伤口，美好在于它们愈合时——而灵魂中只有一种，一种丑陋的痛苦——“我觉得自己吃太饱了。”他对贝亚特丽斯说。她在一边不时投来同情而又冷漠的目光。窗外飘过一颗球状的花种。怜悯！科士尼格觉得自己体内的那团垃圾仿佛倾塌了。他几乎想对着房间大声放出一个响屁。

贝亚特丽斯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了一阵，很快又看过来。她想帮助我，他愤怒地想，几乎要一拳砸向她的脸。摆在桌上的前臂已绷紧，他悄悄地抽回了胳膊，她把卷笔刀里的木屑吹了出来。不要特殊处置！他偷偷看自己桌面下的双腿是不是像平时那样放着。一条腿伸开，另一条弯曲——正常！现在，科士尼格最害怕的是别人的洞察力，害怕别人会真正读懂他。如果一个人心领神会地说：“生活有时就是这样，我也经历过！”他会觉得恶心；但如果有人沉默不语地看

穿了他，那又会成为他的耻辱。贝亚特丽斯移开了目光，仿佛不想看穿他……或许她根本没有兴趣看穿他吧？不错，她没有兴趣。谢天谢地，这就意味着她并不把他当回事。他站起身，隔着桌子俯身凑近她，高兴地抚摸她。她完全不理解他的动作，高高地耸起了肩膀，但并没有拒绝，因为对方是他。一切都不会再回到从前了，科士尼格想。——他也不愿回到从前。从前根本就不是从前！之前的生活令他呼吸艰难，令他……他简直无法描述。他第二次有了好奇心。“你突然眯起眼睛，”贝亚特丽斯说，“想起了什么好玩的事吗？”——“你呢？”——“每时每刻。”她答道，“我总在最开心的瞬间想，还有好事会发生。”

他们一起离开公寓。她乘电梯，他走楼梯。两人在街道上遇上了，又分道扬镳，贝亚特丽斯的神情严肃而淡漠，没有语言，仿佛以后的事都已安排妥当。再见，明天见。今天呢？他得回去工作。六点钟，他得参加在爱丽舍宫举办的一场关于政府新政的媒体发布会；九点钟，他还要在家里会见一位旅居巴黎的奥地利作家，和他一起吃饭（预算之内的坐式活动）；然后他会筋疲力尽地睡死过去，无梦。满满的日程，他感恩地想，没有自由的空间，包括深夜熄灯的动作在内，一切都已得到安顿。至少今天的每分每秒都已有安排，没有危险的多余行为，日程表爆满的幸福。想到这里，他真真切切有了一种被呵护的幸福感，可以放心大胆地抬起眼睛，世界就候在他面前，仿佛一直在等待他的到来。

空气很澄净，站在小山上可以鸟瞰巴黎城内城外的全貌，眼中绿意盎然。城市的全貌毫无零乱感，每一个叛逆的细节都被归约到整体印象下。这一点让他很舒服，因为他不愿被唤起任何记忆。第一眼望去，这幅全景并没有任何不寻常之处，因此他能够在呼吸中将内在的自我推出体外，不留一丝烦闷。他蓦地发现旁边冒出了一个游客，穿着军夹克，前胸口袋里插着一支牙刷。在看清牙刷之前，他突然抽搐了一下，仿佛裂成了两半。他想起昨夜的梦，梦里也出现了这样一支牙刷。那支牙刷和他这个逃窜的凶手有关。而在此之前，站在高处，他已成功地把那个梦放在了其应有的位置上——梦就是梦。现在呢？

我真蠢，居然认为这种高处的全景图就能修正所有的维度。真正的维度是什么呢？那个梦是真实的，他想，但我竟被这个全景摆布了，出卖了自己的梦。登高望远的懦夫！这么久以来，那个梦或许才是我的第一个生命征兆。它想警告我，它要扭转我，因为我一直站错了边。为了保持清醒，我要忘却这种梦游式的安全感。忘却梦向来容易。然而摒弃安全感却很困难，因为每天我都会迎头碰上这样的安全感——其实那只是旁人灌输给我的梦。我站在高点，俯视低处的芸芸众生，这种视线给了我安全感，然而这种安全感守护的只是别人的生之梦。我的生之梦是什么？科士尼格思索着。只要我找到自己的生之梦，就能忘却那些安全感。或许，昨天夜里的梦就是我的生之梦吧。——排水渠中的水沿着山势向下淌去，汇入另一条水流，科士尼格很想追随这条水流穿过整个城市。

这一天，他的情绪虽然偶尔也会开朗起来，但都是转瞬即逝，只能持续一次呼吸的时间，一切都变得不可救药。甚至在那些开心的时刻，他依然还在思考以后该怎么做。令人绝望的是，他一刻不停地想着未来，却又无法想像未来的模样。他从来没有如此开心，也没有这样绝望过。虽然情绪不断好转，但他已不再信任自己的感觉。对他而言，愉悦并不能留驻在当前，一切都不能留驻在当前——哪怕是对生之梦的念头。他就像一个浪荡子，脑中只盘旋着一个念头，不是女人的阴部，而是一种无法想像之物。难道没有人察觉他猥亵的表情吗？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别人瞥他一眼后不再投来意味深长的第二眼，为什么女人看见他竟不扭过头去。不对，的确有一个女人转开了头，脸扭曲成了一种厌恶的表情。或许，他应该去公园，坐到一丛灌木边？这样就会有更多人以这样的目光看他了。

他闻到了嘴里的血腥味。令人厌恶的，并不是他一夜之间的诡异变化，而是其他的一切都如此永恒不变。令人厌恶的，并不是他展现给外界的形象，而是其他人没有展现出同样的形象。他思忖着自己的年龄，不但计算年份，甚至还算到了月、日，一直算到他站在蒙马特高地上的那一分钟为止。原来他已经活了这么久！想到之前那一个小时的煎熬，他奇怪自己为何没有在很久之前就窒息而死。无论如何，时光终究还是消逝了吧？是的，无论如何，时光已逝。无论如何，时光就这样一点点消逝。无论如何，将来的时光也会这般消逝：这是最

令人作呕的事实。他一看见比他老的人，就觉得这些人已经活得太久。他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死。他们是怎么扛过来的，怎么继续活下来的，他实在无法想像。肯定有什么伎俩——单靠循规蹈矩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他有点佩服他们，但这些人还是唤起他的厌恶感；他不想知道他们的伎俩。一个丹麦人开着一辆哥本哈根车牌的小车，那家伙真令人致敬，居然高高兴兴地开着车穿越了整个欧洲，居然没有在半路上开进某个悬崖下。或者，他应该在某条德国高速公路上，及时掉转车头，连人带车滚到桥下，这样不是更令人肃然起敬？在这里展示自己的丹麦身份，只能是个笑话！一切都毫无意义，只是一种合理的假象；太有意义了，科士尼格想。一对情人坐在咖啡馆里，起身离开时，他们还是一对情人：非常合理。他不理解，这对情侣为什么起身离开时还和对方讲话，甚至很友善，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其实，他这种对己对他的观念并不是昨夜之后才有的。慢慢地他想起来了，从前他偶尔也会对这个世界的运作和状态感到疑惑。一次，他坐着地铁9号线穿过了整个巴黎城，只是想看清杜本内葡萄酒的广告牌，那些广告牌悬挂在各个地铁站之间，坐在车上隔一刻就会看见一幅。可是地铁开得太快，他每次只能看到广告牌的同一个角，而不是全貌，而那个角传递的信息又不够。本来他可以在市中心站下车，但他还是坚持坐到了巴黎东南郊的夏朗门，列车在经过一处工地时减缓了速度，这时他才最终看明白了，那些莫名其妙的斑点原来表现的是一团彩云，前方的圆球则是太阳状的地球，球面上用不同颜色标示了所有有杜本内酒的国家……从前，如果事情发生得太快，他会快步跟上，想认清其真相。自从昨夜之后，某些东西停滞了。它的面目无法辨认，他只能回避。投奔它已成了一个笑话，重归旧世界又不可想像，安身其中等于人间地狱！他仿佛看见了一口和世界一般大小的锅，焦烂的米粒在锅中胶结成块。骗局已被识破，他已清醒。

科士尼格一步一步，沿着小山坡走下来。他的走路方式中有一种造作的无动于衷，他的表情中有一种敌意的冷漠。他已失去了模仿的兴趣，只想恶意地去戏仿别人——每个人的神色都洋溢着夏天般的高涨热情，只有在一种恶意的戏仿中，他才能忍受这些嘴脸，就像在咖啡馆中，他常会不由自主地去戏仿那些矫揉造作地匆匆走过的女人，

她们目不斜视，生怕破坏了自己美观形象，或担心自己像酒鬼一样，傻乎乎地将真正的面孔暴露给迎面走来的人。

他在路上看到一个女人，走到路中间。她突然开始微笑，向前跑了几步。他大吃一惊。她疯了吗？这时他才看见有男人从远处向她走来——他也在笑！两人全神贯注地微笑着奔向对方，虽然距离很远，障碍不断，虽然男人差点被一个空箱子绊倒，虽然女人和一个路人撞了个满怀，但他们还是坚持不懈地维持着微笑。科士尼格难以忍受这样的闹剧，又尿急，便继续走他的路。接下来，他们要用可笑的胳膊抱住对方，交换可悲的眼神，亲吻对方可怜的脸颊，他想。然后他们又会全神贯注地走自己毫无意义的路。恐怖！他觉得自己应该垂下下巴，让满嘴的唾沫流出来。他看见一个孩子满怀心思地站着，嘴里吐出一个水泡，又破了。他遇见了一个手提黑色文件包的男人。这个人真不知羞耻！科士尼格立刻想。我应该对着他在胸前画十字。——可是他自己也提着一个相似的文件包，他不但没有把包扔进旁边的垃圾桶里，却也得意洋洋地拎着走。都是俗世的英雄，他想。他模仿别人的傻笑表情，那笑容竟挥之不去了，脸上开始发痒。他没有用手抓脸，而是变本加厉地扭曲面部肌肉。连那些阳伞下的小婴儿们，脸颊上泛着婴儿食品的褐红色，也让他觉得造作。这些小东西也会装腔作势，他想。事实上，他们对婴儿的乏味存在方式厌恶至极！看见一只动物，他会惊讶为什么它不拉一泡屎。有一阵他心想：如果有人上来跟我搭讪，我就打得他头破血流。只要有人看他一眼，他就在心里说：哼！（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来搭话。后来一个乡下来的法国人问他去东方街的路，他为自己能帮上忙而感到一丝感激，然后飞一般地走开了。）

对于遇到的一切，他只想说：别进入我的视线！可是它们还是孜孜不倦地跳进他的视野，不同的形态，同样的恶意。他无法感知事物，它们只是进入他的视线！他走得很快，这样别人才不会发觉他的肆无忌惮。可是每当眼前出现一个有点胸部的女人时，他就很自然地想多瞅一眼。一切看起来都很合理：好像在玩“抢凳子”游戏时，每

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再不需要多余的人站在圈外。他觉得自己无聊之极，孤独至极！

以前，即便他和贝亚特丽斯分开很久后，阳具上还会留有一丝熟悉而甜蜜的感觉。今天，那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他眼睛只看着地面。人行道上有一颗刚被人丢弃的桃核，湿漉漉的，这时他才真正意识到，现在正是夏天，此时，这个认识有一种莫名的重要性。好兆头，他心想，终于放慢了脚步。是不是还有更多类似的征兆呢？一家咖啡馆整个夏天都关门，玻璃内面被刷白了……一辆轿车开过他身边，车顶上放着一辆自行车，轮子闪着光咕噜噜地转。他深深吸入已关门的集市摊篷的海鲜气息，那味道让他心情舒畅。

走到山脚，他来到布兰奇广场，路面豁然广阔起来，他不由停住了脚。“圣地亚哥！”这是他听到的声音，还是脑中的念头？——然而一想到圣地亚哥，他不由攥紧了拳头，心想：是谁说世界已经被发现了？

他站在布兰奇广场上一动不动。这一刻，他想立即离开巴黎。然而他很快意识到，如果在过去，一次旅行或许能改变现状，现在已不行了。他所遭遇的问题是无法逃避的。更何况，那个问题也不是一种遭遇，而是注定的降临。早就应该发生在他身上。圣地亚哥和攥紧的双拳：这意味着，他要继续待下去，他还没有输。我会让你们见识到的！他想。——虽然这样想，但耳中听到一家旅行社里传来的打字机声，他还是感到一阵急切的嫉妒。打字机的声音很犹豫，一个字母，又一个字母，仿佛正在敲击某个大洋彼岸城市的复杂名字。然后是计算器的嘀嘀声，好像正在给旁边的客户打印机票和住宿费用的账单。

一对男女站在人行道上，苍老让他们颤颤巍巍，男人把颤抖的头靠在女人的肩膀上，那并不是一种暂时的姿态，他已无力做出任何其

他举动。女人用手按着男人的头，两人就这样缓慢地、不可分离地穿越广场。就像男人和女人一样，科士尼格讥讽地想，然而在某一刻，另一种念头平息了他的情绪。“你不等于全世界。”他对自己说，忽然为那对男女感到一丝奇特的骄傲。——然而坐上出租车后，副驾驶座上那只狗——巴黎的常见景观——对他一阵狂吠，仿佛他是违禁人员，再加上那股柴油发动机的熟悉气味，他心中又浮起了一种愤怒的杀人冲动。不对，现在他就等于全世界，他试图掩藏这一念头，这一感觉在他心中化成了一种图景：他始终想把一只咬过的苹果塞到别人的篮子里，让它看起来完好无缺，可是苹果总是滚来滚去，露出咬过的痕迹。事实也是如此：司机摇下车窗，大吼了一声“杂种”，然后立刻转过头来跟他讲话，仿佛他们是同谋。我再也不会回答任何人，科士尼格心想，我只会作旁白，在一旁悲鸣。他突然觉得自己像狗一样，舌头斜耷在嘴角。没有任何香盐能对付这种彻底的饱和。默哀一分钟！他想，请在这场永恒不休的闹剧中让出一分钟的默哀时刻！有人在街角处吵嚷起来。这时，他眼前的一切都乱了套；望不见终点——然而脑中除了终点已再无他物。

他在车窗玻璃中突然看见了自己的脸。那张脸如此扭曲，他起初简直无法接受。根本不用刻意比较，他脑海中已浮现了很多野兽的形象。长着这样一张脸的人根本无法表达任何观念或情感。他再次去看玻璃中的自己，这次他像早上在面包店橱窗前一样，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那张脸竟不见了，即便他努力做鬼脸，还是找不回之前的面孔。但事已发生：在那措手不及的一眼中，他已然失去了对自己相貌的认同。贝亚特丽斯真是忍辱负重！难道正如人所言，女人对厌恶的忍耐力更强一些？不论怎样，有这样一张脸的人应该保持沉默，他心想。在这副面具下，连自言自语都需要勇气。很难想像，他还能对自己友好地打一声招呼吗？不过话说回来——想到这里，他坐起身——有这张脸，他才能应付之前只在梦境中出现的那些情感！——他立刻回忆起来，一次他梦见自己往一个女人身上撒尿，那行为给了他一种莫名的快感。从那个梦里醒来后，他还觉得很难堪。那不是我，他立刻认为。但那份快感却和现在这张新面孔很合拍；那快感对他并不陌生——那就是他。这时他醒悟到，发现这张脸之后，他不会再对任何事物感到陌生。对陌生之物的歉意已成过往；他也不再会为任何事而懊悔。如此卑鄙的表情不需要任何借口。科士尼格相信自己有能

力做出任何事，包括强奸杀人。终于他向自己承认，在梦里，他对那个老女人施行了奸杀。——司机的狗突然对科士尼格发出狺狺吼声，他对自己产生了一丝恐惧。赶紧去工作，他心想：美好的，甜蜜的办公室。

这是一个漫长的下午。然而时间突然变得急迫起来，就像人的某个器官，只有在出问题时才会受到重视。时间忽然生出了无数事端，变成了一种自主存在之物，不再了无痕迹地流逝。一切都为之改变：再没有任何可以用来藏身的事务；科士尼格几乎有一种解放的感觉，相信终于不再只有自己为其所害了。那普遍统一的依赖性器官突变成了自主之物，不再满足于乖乖运作，一切都不再运作。这一天似乎太过漫长，时间变成了一种充满敌意的元素，以灾难来恐吓昏昏欲睡的文明。正常的时间仿佛已失势，构成这个敌意元素的东西，现在只是针对一个人的，犹如一个捕猎的陷阱，不被动物所察觉的陷阱。流动在楼房之间的时间忽然开始服务于一个人类之外的体系，和街道的走向无关；和码头墙的伸展无关；和起重机的摇摆无关；和屋顶落下的鸽子羽毛在空中的打旋无关；和花的种子在车流间的飘浮无关。在科士尼格眼里，这种残忍的本原时间下的世界似乎已失去了灵魂。世界在光芒四射的天穹下蹒跚而行，人的任何一种行为只是一段失却了意义的插曲。庆典早已结束，一群孩子在草草搭建的舞台上蹦来跳去，一些已无人理解的可笑通告在空中飘荡。文明堆起的峰巅占满了画面的前景，天空太高，竟不能入画，仿佛它已属于另一个体系。科士尼格看见，在密密麻麻的背景下，人类的风景正在破败成集市的废墟。伴着溢满的时间一起倾压下来的幽蓝天空是一部分，而天空下那些拙劣的通告则是无关紧要的另一部分，他（只有他一人！）只是出于对生死的恐惧，才能从其中杜撰出某种貌似意义的东西。科士尼格看见协和广场上的天空拱成穹状，天空仿佛一种外来之物，边缘恶狠狠地倾压在广场上。荣军院门前亮着街灯，在科士尼格眼中，那灯射出的光是黑色的，就像久久凝视万里无云的天空之后眼前泛起的黑色，那是对一段已成过往的庆典的回忆。这时候不要去看空旷无人的广场！他在荣军院广场前早早下了出租车，决定步行，这一举动能让他安全吗？走在路上，晴朗而低沉的天空中忽然落下了一滴温暖的雨，砸在他的手背上……走到法贝尔路，科士尼格看见黄铜门牌上的“奥地利使馆”时，差点“再次大笑出来”。之后，他在办公室里开始正经工

作，打字机的黑色滚筒吐出洁白的纸张，这时他才觉得一切事物又恢复了正常的功能……只有一次他弯下腰，竖起耳朵聆听心脏在体内的深处悸动，似乎在守护着他的墙外，有某种东西正在呼啸而至，最无懈可击的通告也无法抵挡它的到来。可怜可悲，我们这些没有防卫的人，他想，但同时他又希望这种状态延续下去。在灾难情结中，他已丝毫感觉不到自身的存在，即使有那么一点，他也已和其他人完全脱节。如果这只是他的错觉呢？——科士尼格心想，如果这种充斥一切的状态依然是我自己的心态，那就是一种可能性的终结。

2

这几天，科士尼格正在为外交部写一份报告，题为《法国电视中的奥地利形象》，副标题“奥地利，一部室内电影”。他是在看了几部根据阿图尔·施尼茨勒[13]小说改编的电影之后才有了写这份报告的念头。这几部电影中的人物无一不是在单调的室内活动；所谓的“外界”顶多只是一辆马车的内车厢。科士尼格在报告中已提到，电影正是以这样的布景来传达奥地利形象，布景指的并不是用来装饰场地的奥地利特色，那些单调的房间本身就是奥地利特色，人物正是在其中经历外界的一切。无历史的无人之国，无历史的小人物：在这些电影中，奥地利特色似乎就体现于此。如果有人激动万分地走进房间，令他激动的原因必然与国家无关，只和公寓的前厅有关。科士尼格试图说明，由于电影从不表现国家，也没有介绍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角度——如历史——因此片中人物仿佛在作一种朗诵表演（或许他们之前就在前厅里背台词）——拥抱也是一种记诵，熟记对视的方式，熟记接吻的方式；而电影本身……（他想说什么？）而由于电影中的角色……（他也会熟记句子吗？）并不是真正生动的人（什么意思？），而只是……熟记表演，就像伪装一种生活……而正如上文所言，科士尼格写道，当一个国家的特色似乎仅限于单调的装饰，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体验层面……因此这些电影将奥地利塑造成一个仅仅只在讲述“连载故事”的国家，仿佛这就是真正的生活！（话说回来，哪个国家和体制不把连载故事当作体验呢？）因此这些电影……

科士尼格忽然忘了自己到底想证明什么，对此他感到很开心。他撕掉稿子，然后接着寻找可以撕毁的东西。把一张张的纸揉皱、撕碎、扔掉，这样的行为让他心满意足，仿佛在以此进行某种报复！他把整个办公室里可以扔掉的东西聚集起来，排成一行，然后一件件地扔掉，大挥臂地扔进废纸篓，哪怕只是一个轻巧的信封。他撕掉了使馆同事从度假地寄来的明信片，然后扔掉。其实，我在这些电影里也能证明相反的观点，他想。如果是在昨天，他还愿意以严密的论证逐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现在他宁肯去读报，享受一个无所作为的下午。他也读一些占星术文章，同时意识到自己正在趋向平庸。他独自一人，舒舒服服、正经八百地坐在房间里，顶多望一眼窗外的栗子树，墨绿的叶片间已闪耀着毛茬茬的青果。今天报纸上的报道很有道理——评论员有个人观点，他极为钦佩！这些人并不想着自己！他想，觉得很感动。他想把每句话都画出来。读到一篇《……的悲惨命运》时，他觉得应该把这位无私的记者视为自己的楷模，这个人的命运无疑也是同样的悲惨，但他竟置之不顾。——最触动科士尼格的是笑话。创造一个笑话需要多么灿烂的情绪啊！在自己的所有遭遇中寻找笑料，太有意义了！所有事情肯定都能被理解成一个笑话！“你听说过这个吗，有个人梦见自己成了一个凶手。”——“听说过，可这有什么好笑的？”这就是答案吗？——在他惬意平庸地读报纸时，所有人都对死亡不屑一顾，这一点还是让他很嫉妒。

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注意力早就离开了报纸——他一直在盯着面前的办公桌：打字机，摆得整整齐齐的铅笔，手中拔出笔帽的钢笔。我这么快就把屋子整理干净了！他想。我用这种整洁让自己笃信一种并不存在的安全感。难道把办公用品整理完毕，一切就能自动运作了？我就不会再遭遇厄运了？——把这些东西布置成用品，然后自己藏起来，难道他不是这一切的运作者？使用短波收音机能保障他的未来吗？在门边放一个文件筐，上面贴上“待发”，就能保证办公人员即时完成待交的报告和信件吗？——门外广场上，一辆车发出尖锐的刹车声，科士尼格听见了一只狗的吼声，他曾经踩过那只狗的爪子。转瞬之间，一切又恢复了正常程序。他还是得开始思索自己。怎么想？我出生于……，我的父亲是……，母亲曾……幼年的我有时认为……还有其他思索自己的方式吗？科士尼格突然想，如果我现在死了，只会留下一片烂摊子！——于是他用拔出笔帽的钢笔写遗书，每

一个字，甚至每一个数字，他都写得完完整整，尽可能地拖延时间，因为写字让他觉得安全。笔尖沙沙地刮着纸面，此时此刻，死亡似乎正在大步离去。他把遗书装进一个信封，外面写上“在我辞世后打开”，因为他想逃避“死”这个词。

他望向外面的荣军院广场，毫无特色，对他毫无触动。他强迫自己观察什么，好让心痛的感觉止住：比方说，他可以观察那些临时工棚，是在连接地铁线路吗？这些工棚小得可怜，工人们得弯腰弓着身子才能从里面出来。啊哈，他想。宽大广场上的阔叶树的叶子都已变黄，碎裂：如此而已。他还可以观察东方那轮苍白的月亮。为什么不呢？广场远处的另一头，法国航空巴士站的一扇玻璃又反射来刺目的阳光，比昨天早了一些。就这样吧，科士尼格心想。他把看到的一切一件件口头数落出来——这样他才能真正感知其存在。

然后他发现，在同一楼层，隔着几个房间的旗杆后面，也有一个人站在窗口：一个他不太熟的女孩；她这几天才开始在资料室工作，顶替休假的人员。她并没有特别注意科士尼格，正在用一个小咖啡盘为一盆天竺葵浇水。然后她从窗口消失了，不一会儿又端着续了水的盘子回来。他注意到，她将盘子高高地举过花顶，然后小心翼翼地往下浇注出一条水线。她的嘴唇微微张开，面容显出一种奇特的苍老感。他突然心里一动，怀疑自己是不是偷窥了不该知道的事情。他身体很热，汗也出来了，却无法移开双眼。——她离开窗口后，他心里希望她再回来。她果然又回来了，甚至比他期待的更快。她是跑着回来的，仿佛很激动，飞快地瞄了他一眼——她浇得愈加小心，连倾倒盘子的动作都慢腾腾的，仿佛在克服某种障碍。她突然又朝他看来，表情却毫无变化，久久地望着他，毫不回避，眼神好沧桑，满含欲望的邪恶和痛苦。他的阳具硬了，他大吃一惊，向后退了几步。——很快他又忘记了一切，快步穿过走廊去找她。她面对着他站在房间中。他关上了门。两三个动作之后，两人已经在地上缠成一体，又几个回合后，她睁开双眼，他却让她合上。——下一刻，他们同时向对方发出一阵可怕的大笑。

科士尼格并没有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特别与众不同的女人，事后他在对方身上也感到了一种力量和漠然。只不过是互相帮忙。他们坐在两张椅子上，隔着办公桌，疑惑地面面相觑。她很严肃，对他微笑时也抿着双唇，之后又很快恢复严肃。他也能自如地打量她，并不觉得难受；不怕泄露秘密。他的目光不需要支撑物，他不需要知道她的细节、特点，以便以后认出来。——他泛泛地看着她，没有发现任何特殊之处。如果在这一刻他对她说“我爱你”，至少在一瞬间，他会知道自己话下的含义。此刻就是此刻，不需要说什么。在她面前，他不用玩捉迷藏游戏，再也不用。没有恐惧，他就能专注于她：他们对彼此没有秘密，却向外界隐瞒了一个共同的秘密。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他们共享一切。他们听任办公楼里的电话此起彼伏地尖叫，听任电梯轰然上下，听任院子里的门铃嘀嘀作响，听任一只苍蝇在房间里嗡嗡乱撞：任何事物都无法阻止他们沉浸在宁静的思想空白状态中。他看见墙上挂着她手写的Per Aspera AD ACTA [14]，丝毫不觉得好笑，窗外对面房子墙头的常春藤上，两只鸽子正在咕咕对话，毫无含沙射影的意思。即便刚才有人偷看了他俩的行为，他也无所谓。看就看吧！——他们不需要秘密，或许那个人能从中受到一点启发？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忽然想到：现在我终于有了一个盟友！这个念头他并没有说出口，女人竟点头了，将一根手指放在嘴前，然后落在下唇上，仿佛要取消那层意思。他们又大笑出来，惊讶，几乎有些自豪。然后他们开始交谈，女人说“每当我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时……当男人摸我这里”，他没有丝毫不快。相反，他对这个女人可有可无的意义让他觉得很高兴。离开房间时，他吻了她的手。——然而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想她时，他突然觉得喘不过气来，因为没有任何痕迹让他记得起自己跟她做爱的过程。没有任何细节——既没有温暖感，也没有柔滑松软的感觉——没有一丝能唤起他回忆的痕迹！——为此他感到有些羞耻。

六点左右时，科士尼格走到广场上，打算参加爱丽舍宫的媒体发布会。突然他停住脚，双手叉住了腰。他想攻击整个世界。“现在我让你见识到了！”他说，“我会征服你的。”他攥紧双拳，朝荣军院桥跑去，穿过奥赛码头，毫不顾忌路上的车流。他渴望在此时此地就发起抗争，以某种行为来证明自己。现在他很明白，还有些事可以做，可是在哪里呢？狂奔时，一些硬币在口袋里叮当作响，他跑得更

快了，跑啊跑，被迫害的人们。起码在短短的一刻间，他有一种无所不能、藐视世界的感觉。世界是强加于他的世界，现在他侵入了世界内部，去改变那些被遗弃的事情。“塞纳河，你在这里啊！”穿过大桥时，他居高临下地说，“继续不声不响地流吧——我终究会知道你的秘密！”然后他想：我正在体验。他突然觉得很开心，放慢了脚步。阿涅丝经常对他说：你从来不说什么！这时他倒有话说了：“住口！”最起码，世界向他臣服了几分钟。他还要添油加醋：陡峭的街道突然变平了，所有楼房都矮了一层。这个故事她肯定会喜欢。对她而言，“世界”还是一种空间概念。如果他什么都不对她说呢？他已经无话可说了。——最少他给自己留了什么，面对这种无法逃避之物，如果有这样的记忆，或许更容易去想像它是什么。我应该高兴，他惊讶地想：我是一个能高兴的人。这也是我直到今天才意识到的一件事实。他突然很想画画：于是他用手指在空中画大皇宫的玻璃尖顶，刚才他沿着富兰克林罗斯福大道恰好经过皇宫……

在巴黎，人不需要抬头就能经常看到天空：哪怕只是望着前方，天空总会落在道路的尽头。科士尼格发现天上出现了几片云，几条洁白的云线一动不动地停在高处，离得极远的斜下方还有几片云，因为距离较近而显得有些阴暗，这些云极快地贴着屋顶移动，不断变幻，让他目不暇接。为什么我现在会注意天空呢？他想。其实他并没有注意天空，只是恰好看见，被带入其中，没有多余想法。他想着天空走了几步路，只想着天空，以至于后来他想：我想一直沉浸在这种忘我的、充实的瞬间里，不去留意某事，却也不会遗漏什么。然而云朵的景象很快又让他的情绪糟糕起来。他什么都不想看。消失吧，一切！他走在人行道的中央，双手叉腰，很想骂人。滚开，聪明的人们！他要是现在对一个女人大喝一句，她肯定会终生难忘。只要找到那句话，一句没有人能回答的话！

上方的香榭丽舍大街尽头只有一个景观——凯旋门，站在下面的圆形广场；目光穿过凯旋门，只能看到西面的天空落在宽街的地平线上。“一直往上走，穿过凯旋门，会看到几架起重机，孜孜不倦地在

市郊的拉德芳斯区盖新楼。”我在为别人感知！科士尼格想。但这一念头暂时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他从人行道拐到马提尼翁大道的药店。拐弯的动作——最少在那一瞬间——突然让他觉得自己得到了拯救。拐弯的动作让他摆脱了沮丧的直行动作，就像是一种歇息。他穿过药店，在人群中继续前行，在一种不为他所支配的节奏感中停顿、避让、前进，参与其中，只重复穿越药店的动作：这时他才能想像自己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自由自在地跟着药店的感觉，一切都不再是他的难题。“不错，我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他大声说出口，仿佛事关重大。此时他脑中浮现出一段回忆：一群小学生穿着运动裤站成一列，前面是两个队长，不断喊着队列里孩子的名字，让他们加入自己的团队。被叫到名字的人走出队列，玩得好的孩子很快就被叫走了。队列里剩下的都是没人要的，十分尴尬：拜托，叫我的名字吧！倒数第二个孩子也被叫走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孤零零地被扔在那里……而在这里，皱巴巴的纸巾堆在糊满番茄酱的餐盘上，桌边坐着年轻的单身女人们，在拉开的手提包上重读情书：这个混乱的世界中，不再有游戏让人成为挑剩的最后一个。科士尼格在书摊买了三本餐饮指南；他想从头到尾读完这三本。还有一些能让我有所依靠的事，他想。

然后他又回到大街上……油腻的药店，路面上被人踩烂的薯条，充满折页的杂志！他站在交叉路口，看着天上的云层渐渐积厚。他想回忆起刚才拐弯时的新感受。哪个拐弯？忽然他什么都回忆不起来；其他的事也都一概想不起来。虽然他能历数发生的事，却不能回忆。他记住的只是事实，却不是感觉。几年前，婴儿护士让他隔着玻璃看孩子，看见那张被孩子自己抓破的脸蛋，当时他难道不是有所心动吗？他有一种幸福感，真真切切——但那是怎样的幸福感呢？他回忆不起任何感受，只有曾经幸福的事实。幸福从他身边擦过，当然，可是即便闭上眼睛，他也无法再重现当时的那种状态。耐心地吸气，尝试。他尝试……可是空气走错了路，他被呛住了。——他看着一辆空荡荡的公车从面前开过，落日的光芒斜斜照在车边，每扇窗户上都显出了密密麻麻的鼻印。真是一个动物，科士尼格想，没有记忆。他只

能数着脚步往前走：一……二……三，仿佛只有通过欺骗自己才能继续前进。

时值七月末，广场绿地上的儿童游乐场已空无一人，他走过广场时，天空已完全被云层遮住。一阵强劲的冷风吹来，栗子树沙沙作响，甚至盖过了香榭丽舍大街上的车流声。一些小枯枝刷刷落到地上。旋转木马场上的马在夏天都被包在塑料袋里，用粗绳子捆着。天色已暗，科士尼格独自一人站在广场上，尘土飞进了他的鼻孔。风很大，他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恐惧，简直无法抑制自己。他跑到加布里埃尔大道巴士站边的公用电话边打了一个电话：阿涅丝在家，她自己接的电话，得意洋洋地回答他的问题，一边咬着糖果……

再往前走时，他突然想到自己刚才的恐惧。一种感觉；……记住。刚才是怎么回事？他全身的肌肉在一瞬间忽然凝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结构……仿佛变成了第二副骨骼。是，那就是他感到的恐惧。我要重新发现所有的感受！他想。

3

爱丽舍宫所在的绿地大道虽然从中横贯巴黎城，走在路上却看不到一家商铺，也不见居民公寓的窗口，只有栗子树和高高的公园围墙。只有在通往圣奥诺雷街的入口处有一家带报摊的餐厅。作为通往高速路的并线公路，这条大街的长度和宽度都很有限，但路面笔直且一览无遗。很少有车停在路边，连人行道上都没有，因为路上设着密密的混凝土路障。大街上也不见人影，只有警察在围墙前走来走去，手背在身后。科士尼格拐到这条路上时，不由自主地去摸自己的护照，仿佛没有身份证明就不能上这条街……街口的岗亭里站着一个警察，正在用手指转动一个挂在长绳上的哨子。科士尼格突然想打喷嚏，真不巧。这应该是一种没有什么危险的证明，对不对？但他觉得，自己今天的面孔很难让人忘记。每一个试图让自己显得自然的尝试，只能更让他惹人注意。他看见警察的脖子有一个蚊子叮的小包，这时梦里的一个场景又浮现出来：他的上身布满了蚊子叮咬的痕迹。他想起来，梦里的自己是赤裸裸的，他经常做这样的梦——但这个梦

和以往不同，他的赤裸是自愿的。他第一次很想展示自己的赤裸，不是对一个人，而是展示给整个社会；他不是从他们身边走过，而是站在所有人面前。

排水渠中积满了栗子树的枯叶！他一字一句地想，仿佛这种字斟句酌的思考能保护他。面前又走来了两个警察，腰间的白色皮带后挂着皮手套，裤脚扎在高高的系带皮靴里。在他看来，相伴通行让他们显得很放松，两人连成了一个整体。他只是一个第三者。可是即便他身边还有一个人，甚至是很多人，迎面走来的人还是会立刻揪出他：就是他！——他嫉妒这两个警察的面孔。他们的自信在他眼中显得多么美妙；他们不需要掩藏秘密，多么美妙；他们的外表多么流畅。在危急情况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清楚自己每一步该做什么。他们已久经世道，不会有预料之外的遭遇，因为他们早早就为一切都制定了次序。试过所有的可能性，能够防备一切不测。他觉得他们像来自大急流城的美国人一样，是先驱者——这些人注定会永垂不朽。

我也需要一种次序，科士尼格想。要次序的话，他首先得建立一种体系。可是他已经没有体系。可是他要次序做什么？为了掩盖他没有体系的事实。我只会想到那些用不着的东西，他想。

他又从一个警察身边经过，这次是一个人。虽然是独自行动，那人也显得很和谐。或许是制服的原因，科士尼格想。后来他又遇见一个便装男人，那人的面孔也很悦目。和他相比起来，所有人都很像人类。风吹翻了一个禁止停车的牌子，他又感到了那种死亡征兆。本来已走过去了，但他还是折回来，重新把路牌竖起来，仿佛这么做能取消某种效力。接下来，他透过围墙的一处豁口，看见一条碎石路上立着一排空荡荡的岗亭。他再次转身回来，仔细打量那些岗亭的细节——两边的瞭望口，后墙上的小暖气片——这样它们才会乖乖充当人类的用品。他甚至数了数暖气片的数目：刚好六片，这有什么意义吗？下一个征兆是街口的餐厅：如果是餐饮指南里提过的地方，就不会有什么事，他想。如果不是的话——果然三本手册里都没有提到这家！一辆警车开过来，开着警灯和警笛，拐进了另一条街。他走过一

家报摊，摊主担心下雨，正用塑料布盖住报纸，至少在这个人眼中，他此时应该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这一刻他们拥有了某种共同点。有一捆报纸上竟然斜斜立着一个半空的酒瓶！他想一直走进空间的深处，手上转着一根手杖，就像……

借来的生存感。这一天，生物体不断排斥这种感觉。生物体只想在排斥中证明自己：如果关闭了这种人为的情感，他就连自身都感觉不到了。它不过是一种空洞感，和整个世界相逆，负重累累，像尸体一样沉重。排斥是一种厌恶感，对呼入的一切陌生物的厌恶：经过全世界认证的体验形式只是一个拙劣的骗局！当然，他也可以随便在这个城市的某处看一部亨弗莱·鲍嘉[15]的电影。现在是夏天，正是上映老电影的季节，这周正在放《盖世枭雄》。但他也知道，看完电影后，他在下楼梯时或许还会想着鲍嘉和他那令人心跳的湿漉漉的嘴唇，但在街道上走几步后，他又会失去这个同伴，一无所有，然后他又会问自己，他为什么还要往前走，往哪里走？他不想愚弄自己：对他而言，老电影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任何以金钱轻松获得的产品能满足他的新状态，也没有任何产品研究小组和体系能研制出满足他需要的产品。他需要什么？他追求什么？他追求虚无，他答道：我追求虚无。这样想时，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了一种权利，并且要维护这一权利，向所有人。他干吗还要伪装自己？难道他会危害公众吗？直到这一刻为止，他今天只有做某事的欲望，却都没有真正去做，除了和那个女孩（但他已想不起任何细节了）。他有大吼的欲望，赤身裸体的欲望，龇牙咧嘴的欲望。懦夫，他想。但他同时又害怕起来，怕自己会在下一刻泄露秘密。

一个军人肩扛刺刀，站在爱丽舍宫入口处的岗亭里，他发觉自己很想仔细看那个军人。我现在就这么做！他想。他仔细观察刺刀的刀锋前后摇摆的样子；那军人突然盯了他一眼，他立刻移开目光看表。秒针走得多么欢快！时间的流逝几乎令人欣慰。科士尼格又开始装模作样：环顾左右，仿佛……没有可以打招呼的熟人，这样别人就不会以为有人在等他。那边的清洁工应该可以随便打量吧？可是在这个地

方，似乎连清洁工都在装模作样地工作，如果有人盯着他看，肯定不会是没有危险的路人。

他更想和其他人一起进门。难道他是最后一个到的，没有其他人了吗？几点了？（他之前瞥了一眼表，仿佛瞥上一眼就会知道时间似的！）他来对地方了吧？不管怎样，法国电视台的采访车停在院子里。科士尼格出示了证件，门卫招招手让他进去。爱丽舍宫上有一扇角窗晃荡不停；另一个窗口前走过一个自助餐女侍者，头戴白色软帽；一辆黑色雪铁龙大巴停在一个侧门前，司机望着阴沉沉的天空，收起了天线；有人骑着摩托车从后面公园围墙的小门中离开了：这些景象让他觉得这栋楼很亲切，不拒绝观看。一个官员对他进行身体搜查，另一人检查他的公文包。他透过举起的双手，看那人小心翼翼地盖上他的文件包，心想：终于有一件不需要我参与的事了——我只须在一旁观看。自由的一秒！他想对某人或某事表达感激……搜身的人用双手拍着他的肩膀，在这一刻，他惊讶地发现，这种令人不快的接触竟像是一种鼓励，又一个自由的一秒，那官员摸索着他的胸袋，这一天他体会到的长久而丑陋的痛苦突然化成了一丝甜蜜的、充满怜悯的忧伤。不要很快就忘了这一刻，科士尼格想。今天晚上六点，我把这种冷冰冰的搜查体会成了一种温情！

他颤抖了。同时，他的表情由于恐惧的自我抑制而变得非常空洞。一个法西斯分子空洞而浮夸的严肃，他心想。那官员惊异地盯着他看，科士尼格愚蠢的表情逗得他短促地笑了出来，另一个官员也笑了。

科士尼格之前无法想像人在这个地方奔跑的样子——但他竟跑了起来，穿过那种满盆栽树的庭院跑向入口。没有哨声，也没有人吆喝他停步。一群穿着黑西装的人迎面而来，他立刻放缓脚步走起来。他想起来，自己小时候，如果跑步时有人从对面走来，他立刻会停下来一步一步地走，直到那群人过去后才敢继续跑。现在，那群人已经走过去了——为什么他不继续跑呢？——他回忆起了无数情景，无数地

点，他在人群前停住脚——无数不同的人——他回忆起，自己那时只能一步一步走。——他还惊讶地发现：之前，整个周边环境仿佛正在逃离他——他什么都看不见！——而跑了几步之后，这片空间又充满关爱地环绕了他。之前他仿佛是从一切的背面经过，而现在他却看到了一些向他敞开的细节。——他又跑起来，注意到了碎石路上刚浇过水的盆栽树下闪亮的小水洼，同时感到一股梦幻般的归属感。他在大门前站住了，摇着脑袋，仿佛要否认之前的郁闷。现在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四处观望了。进门前，他又恋恋不舍地回了一次头，怕自己漏看了什么。和之前相比，整个环境现在变得多么宽敞！只有以这双自由的眼睛，他才能发现环境的丰美和无私。缀满低低云层的天空此刻仿佛也敞开了胸怀。科士尼格咬牙切齿。——沿着楼梯往上走时，他惊讶地重复了梦中的一次奔跑。在奔跑的过程中，他第一次在一个梦中移动了身体。

此次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新政府政策，参加这种活动，科士尼格的烦闷很快一扫而光。一进到里面，死亡迹象立刻显得不可想像。他不需要设想自己的未来，不用担心不测，只须坐着，和很多人一起，聚精会神地记录发言，这就是和平。共和国总统站在遥远的前台，介绍政策大纲，科士尼格心中浮起了一股强劲的希望，他相信一切都会改观。一个记者问总统某一项政策是不是毫无意义。他答道："我不容许自己做的事情被视为毫无意义。"科士尼格很喜欢这个回答，把它记了下来。在这个场合，一切说出的话都是为了被记录下来，这一点就很让人放心！科士尼格不理解的是，几个月前大选结束后，墙上的选举海报被替换成熟悉亲切的广告时，他为什么会觉得如释重负。难道选举海报预示着会发生什么吗？为什么他那时会觉得大选是一场赤裸裸的闹剧呢？现在他却有了一种奇妙的安全感，因为政策是为他所制定的。以别人的言论来思考自己多么令人愉快：他正在记录的政策大纲能告诉他，他是怎样的人，他需要什么，甚至不缺次序！大纲中没有定义的他的那部分，则可以忽略不计——那些是因为自身过错而导致的无法克服的行为方式，是顽固老化的后果。我是被定义的！他想，并感到受宠若惊。被定义的事实终于让他显得平庸无奇，包括在自己的眼中。仅仅因为一个愚蠢的梦就不知所措！他算什么人物，居然认为自己只能在神圣时期寻找生命的意义！告别自说自话的情绪无常吧！思想游戏太困难了，其他人根本无法应付。如果今天的危机

再次发生呢？如果发生的话，只要他还是一个成年人，明白自己分内的事，他就永远有一个简单明了的体系，在其中对自己进行重新定义。以这种方法，科士尼格心满意足地想，真正的我就永远不会跳出来了！总统那张意味深长的脸……不管多么纠结复杂的语句，他都能找到一个稳健的结尾。任何意料之外的问题他都能立刻应答，然后闭上嘴，仿佛一切都已说完。科士尼格觉得如释重负，彻底得到解脱了。他听着别人的一问一答，相机嗡嗡作响，快拍发出的尖锐声音，仿佛这些都是为他量身定做的音乐。后来，一盏灯碎了。一只鸟从外面撞到顶上的一块薄玻璃上，又拍着翅膀飞走了，然后又撞上了另一块。科士尼格想到自己如何通过自我欺骗来营造安全感，突然一阵恐慌。不能再分心了！这真是生死攸关的问题。风已经停了，一群鸽子在沉寂中飞过庭院，那声音在他听来仿佛是一场风暴。总统化了一点镜头妆，他在专心致志中撅了撅嘴唇，胸有成竹的他看起来很优雅。科士尼格这才意识到是什么让他不安：这个政策大纲并不是只为他制定的，而是针对所有人。就像以前在大学听讲座时一样，他心不在焉地往窗外望去：白色的窗帷被拉到一边——那声音从哪传来的？啊，下雨了，他开心地想。雨沙沙地落下来，就像一辆沉甸甸的卡车开动起来。爱丽舍宫上空传来了雷声，安全感漫过他的全身。

总统摘下了眼镜，说："我喜欢改变。"这个回答之后，场内静了片刻，科士尼格担心那些记者已经没有问题了。他很快地翻了翻笔记本——他听到了某种动静，好像之前鸽群飞过的声音。他想不出任何问题。总统先生，您愿意看到流血吗？镁光灯灭了，他还没来得及利用最后的共同点，和其他人一样用手去揉双眼，共和国的总统就消失了。（是第几共和国来着？科士尼格想。此时数数又派上了用场：他觉得自己也被数了进去，至少能感到自己也是一个当代人。）

他还不想回家。他想像自己如果早早回家，斯蒂芬妮会毫无准备。（今天他还得争取重见自己的妻女。）如果他早早回家推开门，说不定会撞上她正在做什么呢？他在绿地大道的报亭——他朋友的店——买了一份报纸，举在头顶挡雨，尽可能地放慢脚步，在八区的街道间穿来叉去，丝毫不觉郁闷。

一个女店员独自坐在货架几乎全空的面包店里，眼睛瞪着前方。他买了一块椭圆的白面包，她心不在焉地招待他，找回零钱，走开时用手擦了擦指甲。他看到后心情很好。他走过一家早就歇业了的彩票站，屋里的衣架上只挂着一件毛织背心。几个面色苍白的女人已坐在一家洗衣店里，双手放在胸前，不时笑出声来。一家餐馆的所有桌子都已摆放完毕，却没有一个客人，老板和侍者坐在里面的角落里，胳膊摊在桌面上吃饭，喝着没有标签的酒瓶里的红酒。——一辆巴士从他身边经过，往街道前方驶去，车里的扶手晃晃悠悠，乘客被雨淋湿的衣服冒出腾腾水汽，蒸得车窗里一片模糊，巴士离开时似乎带走了他身上的什么。我会想出办法的！科士尼格想。巴士门边写着“服务正常”。

他跟在一个推着购物车穿过米罗梅斯尼尔街的女人身后，很好奇如果自己一直这样跟下去会发生什么。周围非常安静，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深深地呼吸。他叹了一口气。四周传来的轻微声响仿佛在维护自身的宁静：女人的高跟鞋偶尔刮擦地面的声音，远方门铃的嗡嗡声，几乎是同时响起的开门声，集市苹果摊上的一个苹果从果堆上滚到街上……科士尼格开始有些兴奋，因为他一直都没有看到那女人的脸。他在一家肉店前等她，购物车被她留在外面，车上挂着一包香芹菜。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店里瓷砖地面上的锯木屑吸引住了，经过漫长的一天，那些木屑都结成了块状，他抬起眼时，女人刚好拐进了另一条喧闹的街道。他一直跟着她到香榭丽舍大街，走进了“不二价”大超市。在音乐和“不二价电台”广告语的陪伴中上下楼梯，他感到很欣慰，他在其中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女人在宠物食品柜边买了一罐鱼酱，让店员用棕色纸袋包起来，然后转过身，此时他几乎已失去了对她的好奇心。她皱了皱脸，似乎对他毫无兴趣。她眼睛看到的并不是他，而是和他类似的人。刚才我还有些忧伤，以为这个女人此刻之后将永远退出我的人生，科士尼格心想：现在我很开心，因为没有漏掉什么。——他心情舒畅，在自动照相机前给自己拍照。由于是彩色照片，闪光灯十分强烈，他觉得脸上很热，仿佛享受了一次舒适而礼貌的抚摸。——后来，超市关门了，他只好又回到街上。

他坐在绿地广场儿童游乐场旁的一个长椅上，期待某个偶然事件的降临，好给他一次思考自己的机会，虽然他经常有意识地去思考，却已不相信自己的思想——那些已不属于他自己。像往常一样，巴黎的雨很快就停了，沙地上的水洼在最后一丝夕阳中闪着微光。鸽子们都回到树丛里了。他坐在摊开的报纸上，直直地看着前方，避免注意力集中在某个特别的地方。地面上的一切似乎都逼得很近。只有栗树小巷里的深色树叶，后方大皇宫的宫顶和埃菲尔铁塔的尖顶才不让人觉得憋闷。太阳落山了，所有的物体仿佛开始从自身发出光芒，而它们之间的暮色却正在渐渐昏暗。某一刻，这些物体的光芒如此强烈，仿佛它们即将在能量中爆炸。在这种闪烁的光芒中，科士尼格看不见任何细节。另一个体系降临了。光后来消失了，但那些物体依然透亮，只是不散出光来，它们之间的那种暮色又变成了日光。——这种光拒绝退去。一切都拒绝退去。一个地狱般的万物界建立了，仿佛将永远留驻下去。科士尼格觉得这一天似乎会永远持续下去。惨淡永恒的光芒中，树木单调的沙沙声让他觉得头疼。这些物体显得如此牢固，单是看它们一眼，他就会得脑震荡。他像害怕体罚一样，在它们面前卑躬屈膝。如果他跑到孩子们的秋千前，踢一脚让它晃动，向后倒下的肯定是他，因为秋千就像其他一切物体一样，是被封锁、捆死、拧紧的。秋千边有一些小小的沙漏，如果孩子投钱的话，里面的沙子就会流动起来——今天不会了。科士尼格诅咒这种死亡之光。在这种光中，他变成了自己的幽灵。他厌恶地摇着手。他想抱怨，抱怨这个再次变得空荡、贫瘠、冰冷、渺小的世界。求求你了，让天黑下来吧，他心想，脑中轰然作响……

一个女人提着满满的购物袋走过广场，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嘿，望着我！科士尼格想。没有人愿意看我……很快，她会回到家里，在乏味的厨房里把黄得恶心的油倒进热好的平底锅里，一点也不会觉得害怕。她把一块肉放进锅里时，会爆起一阵难以入耳的、可笑的噼啪声……然后，就像祈祷中的“阿门”一样，会掀起一股令人绝望的、难以抗拒的香味。她任凭那味道飘到无辜的路人身边！科士尼格想像她一手戴着厨用花手套，毫无悬念地走到自己的男人前，那家伙肯定在起居室（或图书馆）里，手里举着一杯开胃 酒等她，女人会坚定地向他打个手势，告诉他饭已做好。（或许她会在他起居室的门上敲四下，两声短，两声长……）然后男人必然会去取开瓶器……做

所有这些事时，她都怀着一种毫无羞耻的自信，科士尼格心想：面对这种彻头彻尾的单调，她居然没有找个地洞钻进去！——他突然开始想像巴黎城各个角落里同时发生的事件：在游客集中的圣日耳曼德佩区，盘子里的比萨饼被切开，饥饿的游客们在无数餐馆前犹豫不决地读菜单；在工人集中的梅尼蒙当区，工人们在真正的工友餐厅享受下班后的啤酒，那家餐厅叫“司机之家”，今天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也会到那里去；在外国人集中的美丽城，黑人们三五成群，一些戴着非洲斗篷，露天站着，手上拿着一罐啤酒，沉默不语；在富人集中的奥特伊区，大资本家的后代们在英国装潢风格的酒吧里，侍者问他们喝法国啤酒还是外国啤酒；——整个城市中，没人玩的弹子球机正在闪闪发光，有人玩的则叮当作响，街道上的梧桐树和栗子树沙沙作响，地铁车厢间的车钩在行车时摇摆不停，恋人们正在对视，在仍未倒闭的温比快餐店里，汉堡包里的洋葱圈已经软化了——科士尼格依然盯着那束不变的光，眼睛刺痛，他想，所有的这一切，都会经年累月地延续下去，以同样的不可抗拒性，不可预见性，同样的无聊，要命的惟一性，正是在这样的惟一性中，那个为人或许不错的女人才会用辣酱汁烹制鳄梨来做开胃 菜。

他哪里都不想去，什么都不想要。取消一切！“我不相信上帝！”他说，这句话并不代表任何意义。（他以前也经常这么说过。）

天黑了，终于只剩下科士尼格一人。他伸开双腿，手放在长椅背上，心想：我孤独得多么奇妙！他真的开始咬牙切齿了。他还想：不仅仅因为必要性——现在我自己也很想以关联的眼光看待一切。风突然猛烈起来，科士尼格迷失了自己……

过了片刻，他发觉，在这一天，他的大脑第一次处于一种完全沉寂的状态。这一整天，他几乎没有一刻不在说话。现在他只倾听。游乐场边的草被风吹倒的声音……他聆听着。风停了。他站起来，树的沙沙声又响起来，此时他感受到了一种陌生而宁静的生存感。草立起

来，瑟瑟发抖。树后不断有车子开往香榭丽舍大街，有时会传来一阵喇叭声，摩托车赶汽车时，会发出嗒嗒的尖声。他有些分心，却没有完全走神。

然后，他有了一段体验——在体验的同时，他希望自己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刻。在脚下的沙子里，他看见了三个物体：一片栗子树叶；一面化妆镜的碎片；一根孩子用的头绳。它们一直躺在那里。突然间，这些物品共同构成了奇迹。——“谁说世界已经被发现了？”“世界只是在故作神秘的意义上被发现了，有些人以这种神秘性来对抗别人，维护自己的安定，这种人为的秘密已经不存在了，不会有人再向他们逼供，不管是神圣同盟的秘密还是宇宙的秘密：任何一个高尚的秘密本质上都是黑蜘蛛的秘密，或中国围巾的秘密——恐吓的工具。然而这些躺在他面前土地上的神奇物品不是恐吓。它们让他充满希望，激动得难以自抑。他用脚跟擦着地面，笑了出来……在它们身上，我发现的不是针对我个人的秘密，而是一种关于秘密的观念，面对所有人的观念！”“当名称在概念的意义上无能为力时，它们就以观念的手段来表现。”这是他在哪儿读到的？他不需要秘密，但或许需要秘密的观念——如果他拥有的只是秘密的观念时，就不需要再借助虚假的秘密隐藏他对死亡的恐惧了！想到这里，科士尼格无比开心，连自己都大吃一惊。他突然觉得自己已被解放了，甚至不想再独处。他要走到某人面前说：“你在我面前不需要有秘密！”沙子中三个奇妙物体的景象令他充满力量，对一切都产生了一种无助的爱意，但他不想放弃这种感觉，因为此刻它是理性的表现。我有的是未来！他满怀胜利的喜悦想。栗子树叶、镜子碎片和头绳似乎仍在渐渐合拢——其他的事物也在随它们一起合拢……直到什么都剩不下。魔法变出的亲切感！“我可以改变自己。”他大声说。他跺脚，但那的确不是幻觉。他四处看去，眼中已没有敌对的对象。因为已经从那三个物件中得到了一切，他踢起沙子把它们埋了起来。他想把那片树叶收起来，留作纪念吗？不需要纪念，他又扔掉了树叶。然后他开始咬那块白面包。现在我可以允许自己饥饿，他离开时心想：因为我终于有了一个观念。——他又一次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但并不是拥有凌驾在他人之上的能力。

真是刺激的一天！他无法步行，又跑了起来。他九点钟必须到家。只有坐出租车才能在那个奥地利作家来前准时到家。后来他又想：我还得体验什么，于是在一棵栗子树前停住了脚步，那棵树的后方还有一线明亮的天空，他突然觉得很欣赏。我有资格观看它，他想，久久盯着荡来荡去的树叶。——坐巴士的体验比出租车丰富。因此他在加布里埃尔大道坐上了从歌剧院直接开往奥特伊门的52路巴士。

坐在巴士里他想：直到昨晚为止，我好像从来没有体验过什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我之前已为体验作了定义。就像旅游传单一样，自始只有一项活动代表着“体验”——“篝火宴会的体验”。——而在我看来，排水渠里的流水，新鞋油罐里柔滑的表层油脂、刚铺好的床、一个老人好奇的表情才是体验——不要再依赖这种对体验的许诺，他想。

巴士里只有他和一个醉醺醺的北非工人。车子开得很快，因为几乎没有人在站前等车。巴士猛地拐进了弗里德兰大道，丝毫没有减速，那人走到过道中间。司机将车开到路边，一语不发地打开车门。醉鬼用母语大声嘟哝着什么，说话时却没有面朝司机。科士尼格假装望着窗外。车里三个人彼此都没有目光接触。北非人开始大喊大叫。司机关了发动机。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科士尼格想。突然他发觉北非人转向了他，开始对他说话。他一脸若无其事地望回去，于是北非人沉默了，下了车，车子立刻开动了。司机没有说话，仿佛他不需要证明什么。科士尼格看见地上有一摊呕吐物，旁边也星星点点地溅了一些，映着顶灯发出的惨白的光，那呕吐物仿佛是为他准备的。——他在下一站下了车，那里离奥特伊还很远。下车时他对司机说：“先生，您不是个好人。”他说这话时还犯了语法错误。

他没看见那个醉鬼，此时他很怜悯那人——虽然刚才觉得他很讨厌。如果他不是骂骂咧咧的话，我会帮他的，他想。正是因为他要自卫，变得怒气冲冲，所以他才失去了同情。我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想

法？那不是我对从前的自己的怜悯吗？看着那个受辱的人，我想起的是那个一声不吭接受屈辱的孩子。——侮辱行为的目击者：在这样的侮辱行为中，目击者也会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科士尼格悄悄跑起来。他沿着台阶走到下一个地铁站里，很快转到托卡德罗公园，坐在开往奥特伊的9号线熟悉的车厢里，他才觉得清净了。

虽然没有特别留意，但他整个身体都能体会到站点之间的不同距离。像往常一样，庞佩街站和缪特站之间的距离显得特别长。到了缪特，他照例会惊讶车才走了一站；车从捷思敏站开往米歇尔-安热-奥特伊站时，他照例不知不觉地早早站到门边等着下车，虽然地铁照例因为拐弯而越开越慢。——终于，蓝底白字的“米歇尔-安热-奥特伊”出现了，他觉得那就像一段漫长艰辛旅程的终点站牌。——很多事情都和平时没有两样，但他已不再留意，只是心不在焉地感受着。他小心翼翼地把用过的车票扔进了垃圾桶，仿佛这个动作关系重大。车票却没掉进去……他已经走到围栏了，又转回来，捡起车票，把要扔票的手深深地探进垃圾桶，直到碰到了桶底。

差不多到家了。他又拐了一条岔路，穿过让-洛兰大街，这里每周有三天是集市。广场空无一人，中心有一口小小的喷泉，水流静静地注进盆中。那水线如此圆润，清澄，科士尼格不禁走近去撩拨。柏油路上落满了梧桐叶，拥着叶片的路面平时很干燥，此时却湿漉漉的。天色越发黑了。平时安插摊位支架的洞眼里还有一些油腻腻的水迹，映射着微亮的天空。一个人骑着发动机轰隆作响的摩托车拐进了一条小路。在一家餐厅的窗口，科士尼格看见窗帘上映着很多被夸张放大的大衣影子。排水渠里的水已经流干了，一只麻雀在几个残留的小水洼里一来一去地喝水。科士尼格突然想起之前地铁通道里的一只飞来飞去的小鸟。他抬起头，夜色已深的天空下，无数车灯从远方穿过凯旋门。然后他垂下双眼，经过一些被管理员刷得白亮的房基，小狗们每天都会在这里撒尿。

科士尼格站在家门前，他不知道自己现在该怎么做，以什么样的次序做，因此感到很厌恶。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每天都能找到回家的

路，从来都没有走失在半路上。今天在地铁里，他干吗小心翼翼地攥着家里的钥匙呢？我得先在脑中演练一遍待会儿要做的事，他想。首先，他肯定要把文件包放进衣帽间。然后，最好（不要像童话故事里那样害怕）是孩子先来迎接他，在见其他人之前先给他一层保护。如果孩子不在（已经睡着了），他就得抓紧时间在衣帽间练好一副合适的表情——想想那个花店女孩——，然后去见那些人，不要有任何多余动作。他没有什么期待，也不想见任何人。和他们离得越近，他们的共同点就越少。转动钥匙时，他故意转错方向，轻咳一声，他觉得自己仿佛正在走向刻在石头上的古老象形文字，根本无法读懂它们。马上就会有人问他："你好吗？"——他连狠狠关门的机会都没有。他来回活动下巴，放松表情，提前微笑，至少给别人一种他还没有走样的假象。

公寓的通道如此之长，他走到一半就演不下去了，表情变得很空洞，只能重新挤出一张笑脸。他伸手给作家的女朋友，却抓了个空，只摸到对方的小指头——于是他只好握了握那只手指。到他的妻子来吻他左右脸颊时——这是她从法国女人身上学来的——他也没对准脸。她怎么又穿着这件衬衫，同样布料的围巾，还有这件斜拉扣的外套？同时他问："阿涅丝呢？""她想等你，"斯蒂芬妮说，"但等得太困了……""知道了。"科士尼格无法忍受让她说完他知道结尾的话。他不自觉地转着手中的面包，被咬过的那一面露了出来。作家拿出了一个笔记本，往里面写了些什么，然后微微一笑。斯蒂芬妮为什么又以那种女主人的姿态坐着：一手抵着脸颊，胳膊肘撑在另一只手的手心上！"我去看看她是不是还醒着。"为了不让作家看见自己那张泄露秘密的脸，科士尼格只好说。"别把她弄醒了，如果……"他打断了斯蒂芬妮，弯腰看她的衬衫，仿佛上面沾了什么似的。她怎么那么多话？

孩子还在房间里唱歌，没有发现科士尼格走了进来。我来这里干什么呢？他心不在焉地想。他来找孩子的举动，其实是一种并不由衷的表示。我要想着她，这样才能感受到她。——阿涅丝的歌声更响了，几乎在尖叫，然后她安静下来，发出各种奇奇怪怪的唇音。科士

尼格坐下来，昏暗的房间中，一种宁静感从床上弥散开来。孩子还在蹬脚……终于睡着了，进入深沉的睡眠前，她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科士尼格站起身来，清醒地浸透在一种完全陌生的忧伤感中。这种忧伤让他抛开了对外面几个人的恐惧。他很愿意跟他们混在一起。他要全心全意地坐下来，直视他们。“她安静地睡着了，肯定会一直睡到大清早。”他说，很享受自己也开始说废话的感觉。仿佛一场经过调解的争执后，当事者只说那些理所当然的废话，以此向对方表示自己愿意跟他讲话。“今天的风真够大！”他坚定地说。作家的女朋友接口道：“把我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这番应答后，这几人似乎重新建立了一种共同的信任感。他轻松地把餐巾铺在膝盖上；斯蒂芬妮问“来点开胃 酒吗？”时，他颇为感动。不管别人说什么，他都说“我也是”，此刻这就意味着和谐。作家仍在笔记本里写东西。“你是警察吗？”科士尼格问。

作家很胖，比他大几岁。虽然动作并不显得笨拙，但他似乎拥有一种摧毁所有手边用品的能力。比方说，他想擦燃一根火柴，却点着了整个火柴盒……收起笔记本后，他开始不断谈论自己，仿佛这是对之前的弥补。“我没什么特别想说的，”他说，“我对任何人都不再好奇。从前有段时间，如果有人对我说‘您是作家——写写我吧！’我会想，干吗不呢？现在如果有人开口说：‘我母亲会弹钢琴……’我会觉得恶心。我发现，和别人的共同点越多，自己对他们认同感就越少。每次听人说‘学习目标：团结一致’，我都想吐。一个女人站在去厕所的楼梯上絮叨自己，我真想问她：你这个小脸婆，有什么权利说我这个字？在街上看着迎面走来的人，我总是想：千万个不同的命运——同样的无聊。有时候我也想了解卖报女的社会拼搏历程——只是出于嘲弄。在咖啡厅里，一个女人站在柜台边，大声打电话，我会捂住耳朵，不想听到她的任何故事。或者‘邻桌’的那些谈话，它们有时也能逗我们开开心：但现在我也腻了这种偷听的体验！看见一个车队，我会想：我永远不会对这些人产生兴趣。昨天我在纳伊一个企业家的别墅里，他妻子说：‘我很喜欢观察人，比如说他们的手。’还说：‘我的葡萄牙保姆今天声称心情不好，但我希望拥有一个和谐的环境，毕竟我从来不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心情。’——我厌恶得无以复加，心想：哦，上帝，现在她开始剖析自我了。今天，我看到了某个不认识的人的讣告，立刻想：这头猪，终于死了。

一次我去拜访某人，他说：‘我家里灰太重了。’其实我家里的灰更重，但我就是不说，不想安慰他。”（他停顿了一下，惊讶地说：“这些西红柿真好吃！”）然后又继续说：“我不想再观察任何人。前几天，我看着街上的人流，问自己：我是不是应该看看他们怎么工作，或在家里干什么？但我很快就意识到，在那些地方，他们的行为举止也毫无悬念，和在大街上一模一样……有人找我来诉苦，我说自己更想看电视里的球赛。遇到一个漂亮女人……我会想：又一个平庸的美女。有时我出于老习惯观察着某人，然后却突然醒悟：我怎么了？我害怕东张西望：到处都有渴望被看到的东西。到处都有人把外套围在脖子上，在屋前花园里烧炭。每次见一个人前，我都打算好好研究他——可是一站到他面前，我就想：研究他干吗？然后我只能一直郁闷地盯着那张无聊的脸……我很奇怪，别人是怎么从星空中看出画面的。我从来不能从繁星中认出星座来。因此我也不懂如何把那些零碎的现象组合成一种表象。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些哲学家经常使用‘调解’、‘蕴藏’和‘拯救’这些词汇？在他们看来，要调解的是概念；要拯救的是表象，而且要从那些概念之中来拯救；然后就是这些从概念中拯救出来的表象蕴藏在观念里。我很了解那些观念，但在观念中我并没有安全感。我并不鄙视观念，只是鄙视那些以观念为保护伞的人——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我面前满怀安全感。格里高尔，你有类似的感觉吗？如果你永远都不醒来的话，难道那样的关联就不存在了吗？”——“哦，”科士尼格说，“我每天都很高兴自己还活着，我的好奇心永远在增长。对你的问题，我似乎也很愿意回答‘不错，我也有同感。’——因为我知道，你依赖于这种感觉。但我不能容许把自己做的事情看成毫无意义。”——“很奇怪，”作家说，一边往杯子里倒满红酒，甚至都洒在桌布上了，“如果别人跟我感觉不一样，我就觉得很痛苦。只有和那些觉得自己每天所作所为都毫无意义的人在一起时，我才有认同感。最近这段时间，我就遇到了很多这样的人，证实了他们的感觉。在我的统计调查中，我本也希望你属于其中之一。难道我能坑害你吗？”——“我险些就上了你的当，”科士尼格说，“后来我发觉，你一边喋喋不休地抱怨，一边专心地、甚至可以说是狡猾地观察着我。这是我从孩子身上发现的：不管孩子哭得多么伤心，她同时也在观察我脸上的每一个细节，眼都不眨一下。我怎么可能相信你不会再对旁人有好奇心呢，之前你不是在拼命地做笔记吗？”——“我当时只是突然想起，”作家说，“今天惟一深刻的体验，是午饭时喝的马德里汤。也就是说，在我面前，你暂且可以放心。”——“要不然我跟你换一换，”科士尼格说，“在

别人面前这样抱怨，或许能给人一种成功感。”——“首先，这种行为能让别人觉得轻松。”作家说。——这时，斯蒂芬妮忽然问他：“您是什么星座？”话音刚落，所有人，除了作家的女朋友弗朗索瓦，都开始大笑。——作家笑得连鼻涕都出来了。

他们笑声未停，弗朗索瓦就严肃地说：“我想谈自己的生活，因为我渐渐意识到，自己和同龄人，尤其是同龄的女人们，是多么相似。其实我经历的无非完全普遍的东西，但每次我都把它当作特别的东西来经历。如果回忆起来，在我看来，那些个人的经历始终都表现为那些同时发生的政治事件的后果。北越人占领奠边府[16]的那一天，我的继父喝醉了酒，强奸了我。我后来的老公是在巴士上向我搭讪的，搭讪的话题是法国秘密军队组织的行刺事件。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我们被迫搬家，因为公寓是一个阿尔及利亚农夫的，他的财产被政府没收了，因此得索回公寓。法国退出北约时，我失去了在一家美国空军基地的秘书职位。1968年5月，我的丈夫和另一个女人同居了……我以前想，是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所以自己的经历才会被这些公共事件所左右？这些几乎都是悲惨经历，其实也都不是。但它们改变了我。如果我在四十岁时得了癌症，或进了疯人院，或许就知道为什么了。”——“那些不悲惨的经历呢，”作家说，“那些也是类似的情况吗？比如说，你爱上我的经历？”——“工会让我每天只用工作半天，但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弗朗索瓦答道，“因此我不厌恶工作，也不用担心求职，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美好的感情。”——作家在笔记本里记录着。他说：“我刚想起来，今天在餐馆里，侍者打开酒瓶时把瓶塞放在鼻子下，却根本没有去闻。”——“你当时注意到他那双完全磨平的鞋跟了吗？”弗朗索瓦问，“我认为，你之所以不想了解别人，是因为你希望看到的那些特殊之处已经被发掘光了。剩下的只有那些毫无新意的日常琐碎，这些你都看不上眼。”——“我所依赖的是那些人们所注意不到的特殊之处，它们并没有被挖掘完，”作家答道，同时一边左手吃饭，右手记录，连桌子都被撼动了，“刚才这几分钟，我又对某人产生了好奇。”弗朗索瓦捏了捏他胖乎乎的脸颊，他突然把一根手指伸进她的耳朵里。“对谁？”科士尼格问，刚才那段时间，他一直沉浸在一种安全感中，几乎是温顺地听着他们一问一答，同时还盯着弗朗索瓦刮得干干净净的腋窝里的小疙瘩。“对你，亲爱的格里高尔。”作家低头记着笔记，头都不抬

地答道。圆珠笔断了，于是他又掏出一支继续写。这次只有斯蒂芬妮笑了。

到此为止了，科士尼格想，刚吃到嘴里的桃子变得索然无味。“连法国的水果都这么难吃。”他大声说。——“你进门之前，我们一直在谈你。”作家说。科士尼格虽然很想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却并没有问下去。“我有什么可谈的。”他说。他很不喜欢斯蒂芬妮从一旁投来的目光，却不想回望她，给她一种权利。现在千万不要心虚地冷笑！他想着沉睡中的孩子，渴望把头埋在桌上立刻睡着。走廊里传来公寓水管里的水流声，他突然像很久之前那样，抠自己的指甲盖，想看上面的小月亮。屋里突然响起圆珠笔的咔嚓声，他吓了一跳。灾难降临了，他想。我的真实面目暴露了。他立刻站起来，把窗帘拉上，以防外面的人看到屋里发生的事情。此时他想起了斯蒂芬妮以前说过的一句话，那次，阿涅丝和另一个孩子不知所措地站在一堆玩具里，她说：“他们玩完了！”我玩完了，他想，眼睛下的一根血管突突地跳，竟让他觉得很舒服。他还想控制住自己，却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回到桌边坐下，给手表上发条。他的西装上一尘不染。终于，那支圆珠笔指向了他，科士尼格不由自主地冷笑出来。

“今天我在城里看见了你，”作家缓缓地说，同时吧唧着回味刚才喝下去的酒，“你变了。平时我每次看你都是一个模样，但每次我对你的体会都不一样——这种感觉很好。今天你之所以变了，是因为你一直在绝望地想维持自己平时的模样。你努力显得不动声色，我吓坏了，仿佛看见了一具行尸走肉。我只是从西装上才认出你来。你现在这样死盯着我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样也骗不了我。刚才斯蒂芬妮拿走你的碟子后，你用手挡在前面，把吃饭时掉落的豆子捡了起来。每喝一口酒，你都会把自己嘴唇和手指留在酒杯上的印记擦掉，刚才你放在桌上的餐巾上露出了擦过嘴的痕迹，你立刻把它翻了过去，——就像之前翻咬过的面包一样。你不想别人帮你做任何事，格里高尔。甚至不让人给你递盐瓶——好像你很害怕别人帮你做什么，害怕他们以此接近你，看穿你。你在隐瞒着什么吧？”

科士尼格装出盯着作家的样子，实际上他看的是作家面前的托盘，斯蒂芬妮刚才在盘里烧了一块法式橙酒薄饼，炙热的酒精冒起了一个气泡——泡泡破了。他用餐刀的刀尖抵着额头，心想：刚才的对话本来是为了让我觉得自己不引人注目。他忽然想在碟子里找到什么可以扔的东西。现在我就扔了！他想，但最终只向作家扔了一块面包屑。连斯蒂芬妮都没有笑。很快，他就会让自己变得不可救药了！他这才真正地望向作家，满怀哀求，作家却移开了目光，不是出于怜悯，而像一个胜券在握的人，对自己的成绩不无骄傲，带着优雅的微笑从已丧失生命意识的牺牲者身边走开。荒谬感让科士尼格头疼欲裂。他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复制了作家的面部表情，同样的微笑，同样低垂的眼帘——在满屋的寂静中，他们以同样的狡猾表情不断交换着目光……

在这一刻——他嘴里正含着一颗桃核——科士尼格在完全清醒的意识中，体验了一种一般只有在梦里才会出现的状态：自己变成了一种可笑的异物，但所有人都认识他，对他了如指掌——就像巢穴里一个供人观看的动物，为自己感到无穷尽的羞耻，无休止地出尽洋相，在孵化成形的过程中被揪出了正道，变成了一个难以捉摸的怪物，一个半成品的臭皮囊，自然的困惑，一个四不像，整个世界都对它指指点点——如此引人作呕，以至于他们指点时都得转过脸去！科士尼格尖叫出来，将桃核吐到作家脸上，开始脱衣服。

他仔仔细细地解开领带，然后严谨地把裤子沿裤缝折好挂在椅子上。其他人都站了起来。作家观察着他。弗朗索瓦望向斯蒂芬妮，后者则垂下了头。赤裸裸的科士尼格沿着桌子转圈跑，弗朗索瓦还想笑，他扑向了她。他们叠在一起倒下去。科士尼格盲目地抓起一只碟子，将剩余的肉汁抹在自己脸上。期间他不小心碰到了作家的腿。“你别插手！”他说，向他扑过去。他站起来，两人开始打架，打得很慢，一来一回，死盯着对方，不发一语，像孩子打架一样，规规矩矩，慢慢吞吞。终于，科士尼格发觉自己有了哭出来的冲动，因为他如释重负，不用再在万念俱灰的悲痛中伪装自己。啊，我哭了，他满足地想。他从作家面前转过身，带着一种巨大的愉悦感对斯蒂芬妮

说："今天下午，我在使馆和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女孩子一起睡在地上。"——她撇着半张嘴强笑，于是他又重复了一遍，要明明白白说出自己话里的恶毒。

4

洗完澡，换上衣服后，科士尼格邀请作家一同去散步。两个女人钻进了里屋，听不见声息。"我们晚上从米拉波桥过来时，塞纳河很安静。"作家说，"波平如镜。"——"我今天看水看腻了。"科士尼格说，"还是沿着铁轨往帕西走吧。我想出去，只想去外面走走。其他什么都不想做。"

他们默默地沿着林荫道往前走。几乎所有高楼的窗口都已熄灯，很多外出度假人家的百叶窗都低垂着；惟有一些顶层小天窗里还闪着光。大街很宽阔，加上铁道的洼地，他们脚步声的回音从另一边传了回来。他们没有碰到一个人。路边有一辆车，一对男女坐在黑暗中，直直盯着前方。夜空中有一些明亮的云朵，被城市的黄色灯火染了色，透过云能看到黑幕中的星辰。微风吹拂，只有树梢的叶子在瑟瑟颤动。在树后灯火的映衬下，树枝仿佛一种牢固的黑色枝形装饰，四周装饰着叶形饰品，那叶形仿佛从内部散出光来，静静地戏耍着光和影。只有细心地听，才能辨出叶片抖动的声音：不是沙沙声，而是一种宁静的、几乎令人害怕的沸腾声。有时，某一片绿丛中的枯叶会发出尤其响亮的声音。在科士尼格的余光里，那些不是缓缓舞动的树叶，而是一群突然探头又缩回去的动物。一只黑色甲虫从一棵树上重重地摔到地上。人行道上到处是新撒的狗尿……虽然并没有特意观察，但科士尼格发现自己没有错过任何一个景象。他停住脚步，感受着风像一丝凉气拂过自己的太阳穴。

他们经过圣母升天街时，科士尼格又想到了和平咖啡馆那个约好明晚见面的女人。他在路边一个长椅上坐下来，望着幽长昏黑的圣母

升天街，名字令它含着一种纯真的希望意味。他不愿意看到任何征兆，但现在他还是身不由己地体验了一个。他需要这个征兆吗？

作家在他身边坐下来，伸展开四肢，差点把他挤下去。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突然想再看一遍希区柯克的《迷魂记》，西班牙尖塔和后面蒙着纱幕般的蓝天，现在就想看！有人出文集时问我如何看待祈祷，现在大家好像又开始祈祷了。你祈祷过吗？"科士尼格想回答，却只是呼了一口气。接下来，他突然很满意自己没有说话。我是自由的，他想：我不用再说话了。终于能沉默不语了，他几乎心满意足，惊讶地笑了。

他们继续走，从帕西往上走到火车站，科士尼格很想消失在黑色的布洛涅森林里。但现在他不想再跑了。铁轨沟里的蓝色信号灯会毫无意义地闪耀一整夜……他们走进了惟一一家还在营业的咖啡馆，在架在桌上的椅子的簇拥下喝白兰地，作家谈起前不久遇到的一个弹吉他的乐手，他很惊讶那人从来不走调。"那人肯定对世界无欲无求。"作家叼起一支烟，却把烟折断了。帕西门边寂静的街道上忽然响起了一只狗的吠声，另一只狗呼应了一声，声音仿佛来自奥特伊门下面，仿佛乡下深夜里的狗。无数黑乎乎的房子中，有一间的厕灯亮起来，很快又灭了。虽然已过午夜，百叶窗还是被拉了下来。这些民宅现在看起来简直像不可攻破的壁垒！远方的环城大道上仍有车流声，却没有一辆往这个方向来。那个窜过街道的白脚小动物是一只老鼠吗？人行道上的碎石闪着光，像地铁的台阶……这一刻，科士尼格惟一的感觉就是疲倦。

回家的路上，疲倦变成了恐惧，恐惧则令他肆无忌惮。他走得飞快，终于把胖胖的作家甩在了身后。在恐惧中，他甚至忘了去注意各种征兆。通往铁轨洼地的人行道没有铺石子，路上那些光秃秃的树根单独看起来很狰狞。他惊慌失措地回到家时，发现两个女人正交头接耳地坐在房前的台阶上低声交谈着，丝毫不理睬他，两人构成了一道充满敌意的防线，敞开的门内飘出了吉他曲声。

他从她们身边走过时，两人并没有让开身体。他经过时碰到了她们，两人惟一的反应是提高了话音。他恨不得她们死去。

他在堆着脏碗盘的饭厅里坐下。无数念头纠结在一起，每个都是完整的句子，却都无法说出口。他根本无法再鼓起说话的力气，却又厌恶上床睡觉的念头。他像一个病人，既不能站也不能躺，只能一动不动地弯腰坐着。闭上眼睛，什么都不要看——这样他还得为整个身体动用眼帘。他得听听门外台阶上的女人们怎么说他，两人提及他时俨然已在用第三人称——“像格里高尔那样的男人们”，好像他已经算不上数了。期间有几个人从公寓一层的窗外走过，在寂静的夜里用西班牙语交谈，他有了短短一瞬的渴望和舒缓。作家呼哧喘着气走进来，坐在他对面的地上。太可笑了！他不用抬头就能感觉到他的动静。有这个无所不知的作家在一旁，他觉得自己身体所有毛孔里仿佛都有毛虫在爬动，感到一阵奇痒，尤其是四肢和鼻孔。他抓着身体。耳道里有一块干耳屎松动了，掉到了什么地方……我想看无辜的东西，他想，看一个我毫无了解的人，不知道他未来的人。他听见作家嘴里发出响亮的咂舌声，仿佛要讲话的舌头即将和上颚脱节——果然他听见作家开始清嗓子了。什么都别说！“如果一切只是玩笑的话，”作家说，“你这种态度也说得过去——但事情严峻了，你总得开口说话才行。”科士尼格对他龇了龇牙，作家想走，却无法从地上站起来。他滚来滚去，最后只好把女人们叫进来帮忙，她们把他拉起来，和他一起走了出来，在科士尼格面前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笑。到了外面，几人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话。

科士尼格保持着那个姿势一动不动，直到他听见客人们坐在一辆轰鸣声震耳欲聋的柴油发动机出租车离开了这个坐在一起的聚会，听见斯蒂芬妮关上屋里各处的灯，走进卫生间里。他坐在黑暗中，听着她刷牙的声音，听着她穿过长长的回廊走进自己房间，听着她开门、关门。他听着一个接一个的动静，听着事情的运行。在这一天，他无法错过或忽视任何一个环节。

过了很久，他突然站了起来，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怎么站起来了，并且已经向她走去。房间里黑洞洞的。她呼吸着，就像在梦乡里一样。他冷漠地站着不动，感到一阵困意袭来。这时，她以缓慢清醒的口气说道："你知道，格里高尔，我爱你……"话音如此平静，科士尼格非常惊讶。他打开灯，坐在她旁边。她的脸色无比严峻，以至于他都觉得不好意思去看房间里她那乱七八糟的物品。看着这个脸色时，她在他眼中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他们面面相觑。他忽然想把她的头扳到自己下巴底下。她开始抽噎起来。他发觉她胳膊上出现了鸡皮疙瘩。"你伤心吗？"他问。"是的，"她说，"可是这事你是无法改变的。"他俯下身抚摸着她，自己也颤抖不已，心里一片空白。她的身上多么冰冷啊！他激动起来，爬到她身上。她一脚把他从床上蹬下去，他滚到地上。然后，他几乎心满意足地溜出了房间。

现在一切真的成了个笑话！他弓着背，乜斜着眼走进父母卧房，不怀好意把裤子乱扔在椅子上，然后坐在床上读那三本餐饮指南，手上拿着一支圆珠笔，不时在那些星级、花冠、厨师帽上面画个圈。一个如此偏远的小角落也不会被人遗忘，因为那里有一家被推荐的餐馆！他有这么多逃难所！他想回忆过去的这一天，发现已经忘了大半。他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骄傲。他的头垂到了一边，于是他立刻关了灯。头一碰到枕头，他就睡着了。

片刻之后，他从梦中醒来，以为自己在一个险峻的悬崖上，他梦见有人想杀他。之所以醒来，是因为他在最后的时刻陡然想起，自己才是凶手。他是被害者，同时又是从屋外的浓雾中闯进来的凶手。醒来也没有改观局面——只是他的惊恐没有了对象和图像。他醒来时身体摊得很开，双手平放在身上，一只脚的脚跟压在另一只的脚背上，牙齿咬得紧紧的，双眼猛地炸开，像骤然苏醒的吸血鬼一样。他躺着，既无语又无力，身上发出恐惧死亡的恶臭。什么也不会改变。既不能逃难，也不能得到拯救。连保护心脏的肋骨都没有，跳动的心脏之外似乎只剩下一层皮肤。

屋里弥漫着化不开的黑暗。他在各种念头中呻吟着，因为仇恨、厌恶、愤怒——却无法发出任何声音。从前他以为，在陌生的国家里，陌生的语言中，那种贯穿人生的恐慌瞬间应该具有另一种意义，最少不会如此不可救药，最重要的是，这种异国语言并没有渗透进他的身体，他在法国的生活远不像在奥地利那样真切实在，因此他在法国不会像在自己出生成长的国家那样，毫无抵抗地任由那种恐慌瞬间来摆布……这些想法似乎松动了他的身体，他一拳打到床上，就像一个孩子捶打自己撞到的东西一样。

后来他很不愉快地想起来，关灯前看见床头柜上有一些水杯留下的干环印。明天早上，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擦掉那些痕迹。他还想起饭厅里的脏碗碟。一切都混乱得不可救药，仿佛已经彻底腐烂。冰箱里还有一盒打开的玉米罐头，里面剩下的玉米马上就要坏了，也没有人把它们倒进碗里。唱片也没有放回套子里……还有洗手间里梳子上的头发！在这样的环境里，除非是疯子才会想像自己的未来。

他想接着睡。睡觉时或许会有新的事发生呢。我需要一个全新的人，他又重复了一遍，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以前我就是这样祈祷的，他惊讶地想，我祈祷的方式就是绷紧身体，默默无声地许愿。他走到窗边，拉起窗帘。

回到床上后，他感到累了，他认为这是自己终于赢得的疲惫感。楼上有个孩子在咳嗽，从胸口呛出的咳嗽，咳得很久。孩子肯定咳得很疼，因为他咳完后哭了一阵，重重地喘了几口气，或许还没睡醒。科士尼格弓起双腿，用手盖住脸。除了管理员夫妇，他从来没有和楼里的住户讲过话，不知道他们都长什么样。奥特伊教堂传来了整点的钟声。孩子又咳嗽了，叫了几声妈妈。科士尼格发现自己一直在不自觉地数着数：他知道孩子咳了几声，教堂的钟敲了几下，孩子叫了几次……他怀着好奇睡着了。

接下来的梦是关于母亲的，梦里母亲的样子越来越生动。他和她跳舞，挨得很紧，却又怕碰到她的身体，所以跳舞时，他几乎站在母亲身边。他醒来时脑中还留有“客床”、“北德地区”、“看望病人”、“新年快乐！”、“奥地利酒家”、“固定菜单”、“小女儿”、“银杏”这些词——都是昨晚谈话间的词汇——想起斯蒂芬妮在一家中餐馆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里的杂碎怎么样？”他不得不翻个身，否则会呕吐。接下来，他梦见一只死乌鸦从冬天的天空中落下来，掉在一只熊身上。与此同时，厨房里的锅中正在煮着碎肉冻。然后他发现了一具女尸，尸体赤裸裸地躺在一座陡峭的山上，大张的嘴中有凝固的黑色血迹，他往她身上撒沙子。然后他又一次站在舞台上，不知道该如何演下去——虽然剧本是他自己写的。他醒来了，望着闪光的卫星从窗外的灰色夜空中掠过。一切都结束了，他想，我再也不爱任何人。接下来，他又梦见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公寓里，大便后忘了冲水，这时另一人正朝厕所走去。他梦见所有人突然都变成了他的敌人，他独自一人跑在寂静的阿尔卑斯高原上，云影飞速掠过地面，却一直没有人朝他开枪。他梦见战争又爆发了，最后一辆巴士带他离开，而孩子却被留在了车外。他醒来时，因为害怕而流出了口水。他梦见自己骑在一个胖女人身上，她的经血粘在他阴毛上。他梦见自己犯下了无数罪行，最后凭借假护照和假指纹改头换面，过上了新生活。这个梦进行得无比缓慢，他甚至信以为真。梦里得知自己不用服刑，能隐姓埋名地过完余生，他感到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快乐。半梦半醒间他想，这是一个重要的夜晚。想到要回到空虚荒谬的清醒状态，他十分厌恶。再来最后一个梦吧，或许能拯救我！——屋里的收音机闹铃声在他头顶响起时，他已走进了一个缤纷的凌晨梦境中，他正在穿越一个阳光明媚的山谷，那山谷如此庞大，充满天堂般的气息，几乎给他一种痛苦的愉悦。所有的房子都变成了旅舍，门前快乐的草坪上摆着木桌和长椅，空气很温暖，他仿佛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福地。这时厨房里的碎肉冻被倒出来了。打雷了，所有的梦都消逝了，科士尼格终于在一片阴沉的天空下醒了，他还是一个渺小的、令人厌恶的罪犯，很快失去了梦里的意义。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在这一天，妻子将离开他，他将失去孩子，他将失去生存的意志；在这一天，终于有些事情会变样了。

闪电和雷声几乎是同步进行，因此科士尼格没有时间考虑那些梦。在早晨的雷雨中，他有了短暂的回家的感觉——宛如身处乡下夏天某个阴沉的早晨。邻居的花园里有一男一女在讲话，声音很小，期间有很长的停顿，仿佛时间又到了傍晚！他们又不是瞎子，科士尼格心想。楼里四处有人在跑动，关上刚刚打开的窗户，关上唱机和收音机。天开始下起雨，雨声却并没有让他平静。雨不是为他而落，而是为了这个陌生国度的其他人。天不再阴沉，他难受得发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这样一来，他的沮丧和愤懑似乎成了一种懒惰，而在对懒惰的内疚中，他更感沮丧了，同时还失去了之前的理直气壮。这种对自己深切失意的内疚，如果被解释成是出于督促勤奋的需要——他心想——那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吗？难道应该用宗教来解释吗？别再想着解释了。大脑仿佛也自动背弃了他。

这个早上，起码他能在各种物品中找到安慰：他站在淋浴喷头下，热水流到他的肚子上，他再也不想离开；在柔软的手巾中，他突然闻到了一股醋味，那是很久之前他在别处用来擦洗过的头发的。他决定不刮脸。这是一个决定，它让他松了一口气，但他后来还是刮脸了，并为自己做出了第二个决定而感到骄傲，怀着这样的骄傲他在屋里走来走去。

他在外间碰见了斯蒂芬妮。她穿着灰色的旅行装，坐在一个石桌边写着什么，字迹很工整。“我等到雷雨停了再走，”她说，“麻烦你待会儿帮我叫辆出租车。”她望着他说，“我的感觉都是同步的——我很幸福，同时我也想自杀，同时我还有心思听唱片。我只是可怜孩子。”看她那张脸，好像在绝望的情绪中睡了一夜，他想。同时他还想：她走前连碗盘都没有洗。她那呆滞的动物眼睛和张开的黑鼻孔让他很吃惊，无法说出话来。“你是不是病了？”她问道，仿佛希望他病了。如果他至少承认这一事实的话，她还能帮上忙。科士尼格还是一言不发，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心里无意识地想：我该给她买些什么呢？“叫出租车吧。”她说。出租车的号码现在也成了让他欣慰的物品：七个几乎相同的数字。等待电话中心回复时，他听着电话里的小夜曲。这时，斯蒂芬妮忽然摔倒了，甚至没有用手护住自己。他弯下身，拍打她的脸。他希望她就这么死了。“五分钟后到。”电话员说。他不禁笑了。斯蒂芬妮还是躺着不动，他把她扶起来，冷漠

得连呼吸都感到艰难。他并不希望她走，却又厌烦她。她坐进出租车时，他想对她说：我希望你还回来。出口时却说错了，以“希望你回来”的语气，他说：“我希望你去死。”太阳又出来了。天空很蓝，街上的水几乎都干了。只有那些从阴沉的北部开来的汽车顶上还有颤巍巍的雨点。布洛涅森林上弯着一条宽阔而闪亮的彩虹。其他人现在可以着手干活了！他想。

科士尼格走到石桌边，看斯蒂芬妮刚写的纸条。“不要指望我给你的生活赋予意义。”她比我先下手了，他屈辱地想。现在我就不能对她说这句话了。突然，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早已讲完的故事中的角色。“这天早上，他比平时醒得早一些。连小鸟们都似乎还在半梦半醒地叫着。今天肯定会很热……”这是对过去日子的表述。彩虹还在，但他希望它消失。他穿过幽长昏黑的走廊走进孩子的房间，想到手帕放错了包——本来应该放在左边的包里，却放进了右边的——他觉得很好笑。他竟然无动于衷地继续活着！

他不知所措地打量着沉睡的孩子，闻她的气味。孩子翻了个身，然后叹口气醒了，但没有发现他。她叫了一声想吃椰子，然后又睡着了。她在一个愿望中醒来！他想。孩子睁开了眼，第一眼就望向窗外的远方。他故意做出一些动静，孩子看着他，毫无惊讶的样子。她说，刚才有一片很白的云飘过去了。他沮丧地看着她床单上的巧克力污迹——难以想像在今天还得换床单。她对他说话时，他特意弯腰靠近她，表示自己在认真听，实际上却不断走神。他心不在焉地抱紧了孩子。“不要忘记我。”他不知所云地说。孩子答道，有时她会忘记他。他走开了，望着镜中的自己。

在厨房里，他在热牛奶前一直沉浸在一个想像中：他们正在沙漠中，现在他要擦燃的火柴是最后一根。会成功吗？火柴点着了，他感到一阵轻松。然后他又不由自主地有了另一个想像：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所有人都不能上街购物，解禁时间难以确定。他紧张地看着几乎空荡荡的冰箱。他给大使打电话请假，说孩子病了。乌鸦嘴，他马上想到，于是改口说，孩子也没有生病，只是要去打疫苗。如果她

真因为我撒谎而病了呢？他后来想，于是去看孩子。她躺在床上打着哈欠，他认为这是让他安心的迹象。然而孩子房间里翻倒的玩具箱让他很警觉。以防万一，他把玩具箱放好了。接下来他在裤袋里发现了两张几个月前的卢森堡公园的木偶剧场票，于是有了短暂的安全感。不一会儿，他发现自己在孩子房间前叠白床单时，竟吓了一跳，于是抱着床单走到别处……气球里的气一夜之间都漏光了！他急匆匆地重新吹胀气球。孩子坐在床上吃的香肠肯定不是熏肠！他立刻从她手里夺走香肠，换了一根蒜肠……他自己吃了一个梨，像一个锦衣玉食的闲人。现在一切该回复平静了吧？为了提前应对下一个坏兆头，他捡起地上的一本书，工工整整地塞进书架。后来他在一管以为已用光的牙膏中又挤出了一点，竟有些感动，因为这些物品都在支持他。

他在又变得明媚的花园里坐下来，把所有能找到的鞋都刷了一遍。他有穿不完的鞋子！孩子沉默地看着他，他脑中什么都不想，能想到的念头都仿佛是一段惬意的小睡……把脚探进被阳光晒得里面暖暖的鞋中，他感到一阵突兀的幸福。然而他又觉得这种安全感仅仅只是一种情绪，于是很惊恐，同时又不快乐了。

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捡起东西放到一边，过一会又放回到原来的位置。他走一回停一回，然后转个圈，突然发觉，自己在茫然和沮丧中仿佛跳起了什么舞蹈！每经过一面镜子，他就不禁要瞅自己一眼。在一面镜前厌恶地转身离开，走到下一面又去看。我真的在跳舞！他想。带着这种念头，他才能在那些昏暗的房间中从一个尽头走到另一个。

他想看火车，火车会经过公寓，开往圣拉扎尔车站，从那里再坐两个小时就能到海边了……他站在敞开的窗前等着，火车终于开出了奥特伊车站。经过岔路时，车厢里的灯泡不断闪烁着。他看着车厢上宽宽的黄带和车轮下的蓝色火花，那景象很亲切，仿佛是专门为他准备的……乘客们撑着胳膊肘坐着，表情放松而宁静，仿佛他们没有任何糟糕的念头，起码在车离开车站那几百米的时间里……

他想出门。但阿涅丝要待在家里。他想给她穿衣服，孩子拒绝时，他差点用暴力逼她就范。他用拳头狠狠地捶自己的脑袋，捶得眼泪都流了出来。然后他走到一边开始撕纸。他想用头去撞墙，不带任何信念地撞！

他又开始在屋里四处徘徊。阿涅丝坐着画画，一边吧嗒嗒地吃蛋糕。他突然差点朝她扔了一把刀。他奔到她身边抚摸她。她推开他，并非出于敌意，而是因为他干扰了她画画。他往她脸上泼脏水。如果能给她讲一讲昨天的故事就好了，告诉她整个世界是怎么对他言听计从的！他试着跟她讲，但心思却在别处——甚至不在别处，而是不在任何地方，以至于每句话都有口误。孩子笑他说错的词，并帮他纠正。“快走开！”她说。突然他很担心会一拳打死她。他走开了，走得远远的，对自己做鬼脸。他觉得，因为产生了打阿涅丝的念头，他已失去了待在她身边哪怕是一秒的权利。他看见湿漉漉的墙面，觉得它马上就会脱落。从前，只要一拉上门闩，他在厕所里总能幸福地吁一口气，今天他在厕所里也不觉得安全。他在里面坐了一会儿，毫不在意能不能大便，很快又走到屋里的另一个地方，然后愣住了，不知道自己到那里做什么。他想起从前有一次问斯蒂芬妮愿不愿意去伦敦待几天，她答道：“我不想一个人坐在伦敦。”现在我也坐在这里，他想，像一个女人坐在陌生城市的酒店客房里。孩子阻止了我的思考！或许我能从孩子身上学到一种思考的方法？他感到一种无趣的孤独。一幅记忆中的景象浮现起来：在一条刚刚灌满水的田间水渠里，一只裂成两半的金龟子在抽搐。科士尼格垂着头转着圈子，一直转。孩子提出了一些理所当然的愿望：要他折纸飞机——要他陪着她玩。但他现在不可能玩，不可能满足她那些理所当然的愿望。所有被他扔掉的东西，她又从废纸篓里扒出来了……他打报时电话，听见一个粗暴得令人厌恶的男人声音，他想像那是一个坐在安乐椅上的胖男人，满怀鄙视地报着时间。他又开始转圈，心里越发沉重，他喊着累，不要孩子打扰他。有没有人让他踢一脚？他走着，看着，呼吸着，听着——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是，他居然还活着。

走来走去时，他无意识地读了一封随便放在一旁的打印信件，读到最后一行事先印在纸上的“友好地祝福”时，他突然觉得那是针对自己的，受到了一丝鼓舞。他贪婪地重读了一遍。“祝贺您——您的交易很成功。”他找到了一个女人度假时寄给他的明信片：“昨天晚上我梦见了你，此刻我正在想你。”他读了最近几天的所有信件。这些写给他的信都很温柔，充满渴望——这些享受夏天休闲的人们仿佛不仅睡懒觉做美梦，还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梦。然而看到信封上的笔迹时，他又不开心了。他希望能收到一封陌生人寄来的信。

他洗了昨晚的碗盘，熨了几块手帕，给阿涅丝的一件衣服缝上扣子。然后他感到一阵满足，走来走去检查自己的工作。他想起了斯蒂芬妮：她在父母身边和女子学院长大，第一次和他去饭店吃饭时，得知自己不用吃完所有的饭菜，她对他多么感激！她感动得热泪盈眶地望着他……

他哼哼唱唱，装作振奋的样子——这样另一个房间里的阿涅丝才不会觉得太安静。她很快叫着要他安静。他到底要怎样才能取悦她呢？一次他不小心踢倒了什么，于是故意大声呻吟，夸张疼痛，希望这样能帮她打发时间。“你要不要一个苹果？”他问道，那口气仿佛苹果是一种观念。洗苹果前，他特意走过来给她看一看，借此跟她搭话，因为他没有更好的主意。“看，这苹果多红啊！”他故作惊讶地说，为了让她也惊讶。苹果的红色能够告诉她一些什么，那是他自己无法教给她的。他最害怕的是她问：“现在我该干什么？”因为他根本不能给出任何建议。

他想去厨房。去厨房的路上，他突然很急切地想查一个餐馆的资料。然后他又徒劳地想查另一家海边餐馆——他曾在那家点了一份自制肉馅饼，吃的时候却咬到了一粒砂子。他继续往厨房走，走到门前却转了个身，因为饭厅里还放着一个满满的烟灰缸。同时他又想起来床还没有整理，于是他拿着满满的烟灰缸去铺床。在此之前他还想关浴室的灯。往那边走时，他又瞥见一份报纸，于是捡起来看了很

久……然后他走进厨房，打开水一个劲地流，却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才关上水。

在这样的混沌状态中，他希望能再次体验各种征兆。他把吃剩的苹果扔进一个空铁桶里。苹果撞到了桶身，发出一声极具威胁性的响动。他立刻重新扔了一次，让苹果直接落到桶底：那里不会发出声音。衣架上挂的一件衬衣慢慢滑下来，他竟没有抓住！为了弥补，他立刻把孩子揉皱的一幅画展平，并在上面放了一双长靴，一只摇摇欲坠地压在另一只上。储藏室的门开了一条缝，他疾步走上前去关好。他想：以后我会为此笑死。他走进花园，夏天的微风吹拂着他的脸，缓解了他的压抑。楼上的孩子突然痛苦地大叫了一声，同时教堂的钟声冷静地响起——顽固的恐怖又一次飘进了他耳中。他开始觉得冷，跑进了屋子，给贝亚特丽斯打电话。“我马上去找你。”——“如果你愿意的话。”她答道，然后犹豫着没有挂电话，仿佛在等他问：你也愿意吗？但他已经无所顾忌地带着阿涅丝往门口走去。

他从外面锁上了所有三道门，钥匙每次都转两次，就像他每次回家开门一样，为了赢取时间。铁道洼地对面一棵梧桐树的树荫下，管理员夫妇坐在一张白漆长椅上，由于大多数住户夏天都出游了，楼里没有什么工作。他们年纪已经很老了，女人在织毛衣，男人用一只胳膊挽着她。她身边的椅子上放着一只线团，男人脚下有一只鸟笼，许多金丝雀在里面跳来跳去。这两人以后可以证明今天下午在这里看见过他，他不由自主地想，因此故意隔着街道和他们打招呼——仿佛他以后就需要这两人做目击证人。和孩子一起，他觉得自己不会太显眼。用孩子来获取一种幸福的平庸！他突然想。街角的餐馆已为午餐在桌上铺好了白色桌布，女店主牵着狗在门外走来走去。科士尼格认真地跟她打招呼：如果出事了，店主也可以为他作证。在餐馆的窗户上，他瞥见了一张昨天经过时还没有的手写条：“本店”不再接受支票。他在这里从没用过支票，因此第一次觉得自己和店主之间有了一种关系：厚道客户和店主的关系。其实他并不是厚道客户。我需要目击证人，他想，急切地想立刻见到贝亚特丽斯。排水渠里闪光的激流终于又对他产生了影响。

在心不在焉的美妙状态中坐出租车，惟一的感觉就是自己正在穿越空荡的夏季街道，然后脑中一片空白，牵着好奇得一声不吭的孩子，背着走进电梯，毫不犹豫地按响门铃，不用担心自己的表情。然后像个老顾客一样，背对着正在打开的门，仿佛除他之外不会有任何人。

贝亚特丽斯说："啊，是你。"她对阿涅丝很友好，把她带到两个孩子的房间里。他要求贝亚特丽斯弄点喝的，仿佛为了向她证明自己有所改变：他想让别人为他做些什么！"你知道饮料在哪里。"她说。他仍然沉浸在出租车里的欢快情绪中，走进厨房，看见贝亚特丽斯早上喝茶用的杯子放在桌上。她一个人坐在那里，他想，突然觉得自己理解了她的辛酸。他很快回到她身边，拥抱她，假惺惺地说爱她。她惊异地望着他，然后说："去洗个澡，你看起来脏兮兮的。"他吹着口哨走进浴室，洗了洗脸。他不会让别人糊弄他。然后他看见由下到上整齐叠放的脚霜、手霜和牙膏柜，才终于确切地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被抛弃了。三个孩子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模仿着外面的鸟叫声。

他坐在贝亚特丽斯对面。她一直看着他，却没有问一个字。很快她就会去想别的事，他们的关系将永远结束。这一刻突然决定了全局：再沉默一秒，他在她眼中就会变成一个烦人的陌生人。寂静中她已经开始深深地呼吸，目光望向了别处……他立刻开始讲话，跟她谈南斯拉夫海滩上一棵桑树下的餐馆……要在平时，她听了立刻会做各种各样的计划："我要跟你去这个餐馆，下次我们去那个海滩！"今天她只是沉默。他试着谈起两人共同的回忆，她也没什么反应。于是他像往常那样开玩笑，平时她会大笑，今天却面无表情。她不想遵守两人默认的游戏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她希望他能有更多的表示？他贴近她坐下，忽然想起了隔壁房间里的孩子，这才自然地用胳膊挽住她——虽然并非出自本意。他抚摸她的乳房，这才破天荒地有了一点感动，同时他产生了一种很刺激的想像：在这一刻，他想为自己——只

为自己——在新英格兰发现一个偏远的地域。她还是无动于衷吗？不，她正在充满渴望地看着他，但那渴望并不是对他，而是对她从前和未来的所有情人的渴望。和谐的一刻结束了，两人的头猛地贴到一起。

他和她睡觉，毫无爱意，同时充满恐惧。她并不掩饰自己的感觉，冷酷地看着他，以至于他都不敢合上双眼。孩子们在隔壁房间莫名其妙地大笑，笑声持续了几分钟。他徒劳地在脑海里想像着另一个女人，却想像不出。他的动作越来越猛烈，贝亚特丽斯却早就不再配合他。他终于落进了陷阱，被看穿了。他的阴囊越来越冷。他大张着嘴，舌头沙沙作响。他抚摸着她胳膊肘上干枯的皮肤，万念俱灰，想大吼一声。冲动时，他胳膊下的一捆报纸正在往下滑……贝亚特丽斯把手放在他肩膀上，从他下面翻开身，然后坐起来，梳头整理发髻。他绝望地躺着。她离开前帮着他盖上了被子。一扇窗子拍打着，整个城市喧嚣着：世界仿佛凝缩成了一些恐怖的声音，除此之外都空空如也。外面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他是受害者。为什么听不见孩子们的声音了？孩子的声音至少还能给他一些慰藉！

他在厨房找到了贝亚特丽斯，她正在往碗里剥豆子。做事时她还在唱歌，唱到一半忘了词，她连剥豆子的动作都停了，直到重新想起歌词。她了解他的一切——而他再也无法理解她了。“我今天充满渴望。”她说，一边在他面前走来走去。她跟他讲话的语气很小心，仿佛在打电话，“早上我看见了一条彩虹，然后变得很虚弱。我想去体验什么！”不错，她说得对：和他在一起，她已经“体验完一切了”，甚至没有值得一提的体验。他叫来阿涅丝，离开了唱歌的贝亚特丽斯，悄悄逃走。电梯还停在同一层：夏天的人真少。楼下走廊里的石块地刚用水管浇湿过，科士尼格似乎突然闻到了家乡那阴暗的教堂味道。这条街上有一家餐饮指南里提到的餐馆，却关着门，正在年度休假，玻璃内面被刷白了，他看不见店里的样子。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他想。从现在开始，我要在所有事之前都做好计划，就像做生意一样。一家餐馆的广告是“新配方”，店里却只有一份单一的菜单。在生意场上，人们会在事情停滞之前找到新的方案：他为什么不为自己制订一份方案呢？重新营造自己！为此，他首先要做的是耐心观察其他人，要重新组装自己，这一点很必要。

他和孩子在克利希广场一家餐馆里吃饭，里面用的是布餐巾。他很享受展开餐巾的过程。（因为夏季的食客大多是游客，因此很多餐厅用的都是纸巾。）他摊开双腿，充满期待地观察着其他桌上的客人。未来似乎暂时得到了保障。阿涅丝大声地喝着汤。他喂她喝水，在饮料流动的过程中，他才觉得自己离她很近。她只是自顾自地坐着。之所以需要他，是为了可以放心地做自己的事！尝着嘴里的酒，科士尼格很想找一个陌生美丽的国度。在那里，死亡将不再是一件切肤的事情。这一天终于开始了，他想，并感觉到双眼睁开了，根本不需要他的介入。

邻桌坐着一对男女，两人从坐下到离开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话，中间没有一秒的反应停顿。他们找到了方案，他想。刚开始时，他很羡慕他们，后来却觉得两人的脸好像都做过拉皮。男人每次说完了什么，女人都会奖励般地说一句：“哦，我爱你！”两人都感冒了，却很享受用鼻音讲话的感觉。女人亲吻男人的脸颊，他同时还在抠着鼻孔。另一桌正有人给一个孩子照相——只有当孩子做出真正孩子气的笑脸时，照相的人才按下快门。他们跟孩子讲话时，故意不说每句话的最后一个词，而让孩子来填。这样，他们跟孩子说的每一句话都变成了问题。“餐巾纸放在——”“膝盖上。”孩子答道。“塞纳河流向——”“大海。”孩子答道。“太棒了！”其他人说。两个独自吃饭的男人如此对话：“我最近很顺！”另一人说：“这三周我都过得不错。”店主站在另一张桌边，正在讲一个笑话。他走开时，桌上客人说话的声音小了很多。一个胖男人独自坐在一张桌边，所有侍者都上来和他握手招呼。填支票前，他大幅度地挥着手，以至于夹克的袖子都缩到了上臂上。他伸着舌头一个个地签字，然后四处检查是否还有签字的栏目。另一对男女正在讨论诗歌。男人经常一句话讲到一半

停一刻，仿佛在思考，然后再不出所料地继续讲下去。邻桌的人问科士尼格借盐瓶时，他吃了一惊，仿佛做梦时被惊醒了。“我一直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他对那个女人说。有个人在看《法国晚报》，看了一小时还在同一页，一次都没有翻过——他看的是根据读者的愿望每天连载的小说，报纸的另一面刊登着一个民意调查结果，宣称在本月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的法国人数量超过了上个月。收银台的女人正在弯着腰看一张纸，以最大限度的认真复查账单。一个黑衣侍者在厨房揪一个白衣侍者的耳朵。一个英俊男人从街上逛进店里，双唇微张，仿佛他能通晓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他扬着一边的眉毛，鼻毛修剪得干干净净，咬着下唇。一个姿色平平的女人跟在他身后，脸色僵硬而谨慎，为了维持自己并不可观的美丽。这些人不知羞耻地展示自己——仿佛所有形容他们的话已说尽，不必再担心什么。他们已不再担忧了，科士尼格想。在这些和自己如此相似的人面前，他除了想死，竟没有任何想法。

他觉得饭菜干巴巴的。他推开盘子，望着正在用面包蘸汁的阿涅丝。她俯在桌上忙着吃东西，脸上带着微笑。最琐碎的事都能逗笑她，他想。在这一刻，他并不渴望进入同样的状态；惟一令他高兴的是，她永远不会像他一样，感受到如此的恐惧、仇恨和厌恶。

他发什么神经呢，竟然指望在一家餐馆里获得安全感？他再不可能找到任何逃脱这个世界的场所。已没有任何有效法则适用于他的状态。他观察别人越久，想像力就越萎缩。他和所有人仿佛都是一部电影中的角色，一部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局的电影。（连侍者事先都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他立刻点了别的东西。）或许他从一开始就把他们观察错了，待在错误的位置，带着错误的态度——不管怎么说，无论他如何整合自己的感知印象，它们都会与他毫不相干地组合成一团习以为常的、精心呵护的混乱。餐巾铺在膝上是一个骗局！女人们的香水代表着他无意了解的记忆，而薯条——之前他还在脑海里想着“美好的老式薯条！”——只能让他头痛。很久以前，如果科士尼格不喜欢别人，他就会想像他们在睡觉，这样能让他们显得可爱一些。现在这些人如此让他厌恶，即便他想像他们正在抱膝酣睡，也无济于事。

甚至那些让他备感安慰的“美妙景象”——譬如孩子穿着不合身的大衣服的样子，看着她，他有一种奇特而充满希望的想像，一种确信感，知道衣服终究会合身——也越来越短暂了，已经没有了回味！一个女人从餐馆外面经过，对他友好地微笑着——他们彼此没有威胁。而餐馆里那个独自坐着的女人却在看他。他的样子让她撇了撇嘴，他冲动的表情令她厌恶。她连座位都不愿调换，仿佛担心他会把她的任何一个小动作理解成和他的默契，甚至看成一种性暗示。在看他之前，她一直在无声地哭泣，鼻子都哭红了。你很无聊，他想对她说，你和世界一样无聊。他需要一个白日梦，否则他会立刻爆发出一声野兽般的狂吼。如果要玩思想游戏，我就不应该看那些人。他虽然移开了目光，却是出于一种本能——就像对一把从天而降的刀子的反应……他们是怎么坚持住的！他想：然后他们还会懒洋洋地走到街上，掌心摊在身前，而我们之间惟一的纽带就是，吃饭时大衣领上的头皮屑越积越多。下午刚刚开始，一切再次显得如此无望。

一个半裸的醉鬼在广场上大吼。看到他的样子，坐在屋里的那些穿着衣服、稍微清醒的人心照不宣地微微一笑。一些人开始隔着桌子聊天，也有人向他搭讪。他垂下目光。这是他们的团结方式，他想——他也感受到了这种团结，一种疲惫沉重的疑虑之后出现的虚伪的回归行为，然后，这将成为不可预见的孤立降临之前的最后一个集体瞬间。孩子却是天真的，所有人相视微笑时，她已被那声吼叫吓呆了！他第一次感到高兴，因为自己只和孩子在一起。

6

往克利希广场的北边走，从上坡的科兰库尔街穿过蒙马特墓园，在喧声渐静的麦斯特街继续走一段时间后，会来到一个灰尘遍地、寸草不生的公园。园子的角落里有一个儿童乐园。科士尼格几年前在这个区住过，周日的上午偶尔会带着刚学会站的孩子到这里玩，让她坐在沙盘上。公园离克利希广场不远，他向公园走去，途中还拐过一条经过圣万大街的路。他在路上看到的征兆很少，即便有，也只让他觉得好笑：一辆被遗弃在路上的购物车里有一只长靴；一张巴士车票落在他脚前，每次他弯下腰去捡时，那张票都会往前飘几步……像多年

前一样，他看见那个会学鸟叫的乞丐还站在同样的位置，旁边系着几条狗，有女人来逗弄时，它们就会拽住她们，最终她们只好乖乖塞给乞丐一个硬币，以免遭受被狗淋尿的屈辱……科士尼格牵着蹦蹦跳跳的孩子，走在明亮炎热的街道上，觉得很舒服。他不想去电影院，因为从克里希广场的海报来看，那些电影都是在室内放映。他一边走一边想，这里的自动机器居然还是坏的，几乎觉得很好笑：自动洗衣机、自动邮票机都不能用了，连印刷品店外的自动相片复印机也坏了。以前那里就一直竖着一面“停电”的牌子。天气太热，一家面包房外装着煎饼的玻璃纸里蒙上了一层油雾。一个瘦骨嶙峋的男人走到了科士尼格前面。在街上所有的行人中，惟独那人显得行色匆匆；紧身夏装下面，他的肩胛骨大幅度地起伏着。路边很多台基上挤坐着北非工人，等待午休结束，他们仿佛已经适应了如此狭小的空间。一个非常苍白的女孩子，围裙领上挂着姓名牌，闭着双眼从一家糕点店走到阳光下，叹着气垂下头。另一个女孩手上拿着一杯咖啡，缓缓地走在街上，步子很稳，为了不让咖啡洒出来。科士尼格站住了，不需要他说什么，阿涅丝也停住了脚步——天气热得摧枯拉朽，除了热再无他物。这时，地铁让整个街道颤抖了，地铁无声地从街道下方开过，科士尼格也被撼动了，这一刻他感到：就是这个！就是现在这个！——仿佛是一段他已不抱期望的体验。

他们走在提前降临的温暖中，四处已不再有危机。那个女孩子稳当当地走路并不是出于必要性，而是出于享受。科士尼格不再像从前那样，为了迎合孩子而下意识地放慢步伐，而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夏风偶尔会吹断一根枝条，在他的感觉中，那风仿佛是对愿望的满足——维持着希望。一架飞机从高空中飞过，光短暂地变幻了一下，仿佛飞机的影子闪电般地从街上掠了过去。他想对着远方那些在阳光中闪耀的树丛大吼：保持现状！为什么没有人跟他搭讪呢？

在一条小街上，科士尼格看见了自己几年前住过的房子。房前还有一棵枫树，现在刚好长到了他从前公寓的窗口处。片刻间，他感到一阵剧烈的辛酸，为从那之后所虚度的光阴，以及对自己的失望。从那时到现在，他一无所获，一无所成。一切都维持着混乱的原状，而那时他毫不恐惧的死亡此刻已逼近了许多。我得做些什么，他绝望地想，刚有这个念头，他就自信地对孩子说：“我得开始工作了。我要

发明。我需要一份能让我发明什么的工作。”阿涅丝听到的无非是他的声音，她天真地跳了一下回应他。这么久以来，他第一次对她又产生了好感，不再像之前那样心不在焉，怀着心惊胆战的爱意。

他想过后在游乐场上读读书，于是在一家书店里买了一本亨利·詹姆斯的平装本小说集。就像那个“当一切肇始”的清晨一样，他在一栋房子的墙上看到了一块大理石碑，纪念一位抵抗战士。那人正是在这里被德军枪杀的。纪念碑下放着一根枯萎的枝条，他给孩子讲述了三十年前发生的事。那个叫“雅克”的男人被杀时正值七月底，和现在一样，卡尔波广场和三年前一样，还是灰扑扑，同时又面目全非——科士尼格觉得，自己很快就能发现那个细节，那个可以让其他一切合为一体的细节。

孩子却有些变了。几天前她下地铁站台阶时，还是踉踉跄跄，一脚拖一脚地走，现在她很自然地沿着台阶跑上了游乐场，动作节奏一致，总是先迈右脚，再迈左脚。刚开始她只站在场边东张西望。他们走来的街道几乎空无一人，而广场上却熙熙攘攘地挤着很多小孩和大人。大人们多是法国老妇和年轻的外国女人。科士尼格在一个长椅上坐下，用脚抚摸站着出神的阿涅丝，她没有回头看他就笑了，仿佛一直在期待这个抚摸。她的自由自在令她散发着一种骄傲的光芒。那光芒如此真实，甚至传递给了他。和她一起感知吧！这样能暂时驱走他的无聊和沮丧。他凭什么自命不凡地鄙视那些疲倦、怨愤的女人们，身后拖着哭喊的孩子们——他们不时忘我地蹦蹦跳跳——还打他们？其中一个女人，站在烦躁不安地尖叫的孩子面前，正悄悄地伸手欲打，发觉科士尼格正在看她，突然间她的目光放开了，同时变得失望、愤怒，仿佛看她的是一个同道人，在他面前她已不需要掩藏。

无数事物以这样的方式显现出来，厌恶感也不能终结这种陈腐！高大无比的白蜡树，阴暗无比的广场……洒下来的阳光太少，年轻的女人们一直朝着仅有的阳光地带挪动自己的椅子。不时有一个女人站起来，往一个孩子面前的沙地上扔一把塑料铲，想吸引他过来，孩子

却毫不理睬。被拆得七零八落的玩具很快又在孩子手上合成了一体……如果孩子不听话，人们只要在远处拍手就能制止。这时，在孩子们中间的沙地上踱步的鸽子们都飞了起来。一个正要从爬杆上跳下来的孩子叫妈妈，女人望向他，左手摇摇坐着一个宝宝的婴儿车，右手则盖在再次微微隆起的腹部上。他望着一个女人数织衣针的针脚，另一个正在给痛哭的孩子吹出眼里的沙子。呼唤着陌生名字的声音此起彼伏。蒂茨娅娜！费莉西塔斯！普鲁登茨娅！绝望和苍凉仿佛最后一丝和谐，降临在此地，降临在灰扑扑、人头攒动的广场上，降临在身边放着塑料袋的女人们身上，降临在八角值班室里一边打盹一边待命的公园管理员身上，降临在用脚跟跺着铁板的孩子们身上——然后他们会伴着尖锐的摩擦声从滑板上滑下来，另一些则不耐烦地在下边的梯子边跳来跳去——降临在这种不断重复、毫无内容的来回劳作上——排水栏的沟槽也被灰尘和沙子堵塞了，这里散发着香皂的气味，充斥着孩子们的呼叫，充斥着女人们的呼声，还有公园管理员的口哨声，以及水泥旱冰场上旱冰鞋的尖叫。

观望太久后，连吐气都疼起来。孩子突然重重扑倒在他身上，他差点儿也一起倒下去，孩子的脸颊软乎乎的，哭诉着某种撕心裂肺的可怕东西——原来是一只惊恐的小刚毛狗，被人用包拎着经过。“不能因为这个哭啊。”他说。泪水止住了，孩子脸颊上又放出光来，皮肤也明亮起来……一只蝴蝶飞到他指尖旁徘徊着不愿走，它之所以依附在他身边，仿佛是为了不被他杀死。他看见一个身着黑衣的葡萄牙老妇人，胳膊上套着一件针织马甲，外衣下方露出了一截衬裙。虽然心思游离，她似乎同时在关注着一切，什么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她旁若无人地演示着自己，带着一种蠢人的优雅，而她的孩子僵硬地在她身下行走，被照管得严严实实！她身边的一个孩子向妈妈提出了一个愿望，老人笑了，然而并不是出于感动，或许是因为孩子的要求立刻得到了满足，而勾起了她的一段平静的、至少毫无妒意的回忆，想起了一件和她的所见完全相反的故事。看着她的马甲和露出来的衬裙，科士尼格想起了自己的小农家庭：在那个环境中，人们喜欢自己亲戚的所有特点，而对于具有同样特点的非亲人群，他们却无比厌恶，虽然自己也毫无两样！

他一直坐在广场上，身处人群中，不想未来。他没有任何期待，只是有过一种想像，希望所有人突然面目全非，开始撕心裂肺地哭泣，同时还为此道歉：他们昨晚没有睡着，他们受不了暴晒，他们没有胃 口。那时该由谁来告诉他们不用为此羞愧呢？——他抬头望天，疑惑为什么一切到现在还没有变化。阿涅丝平静下来后，终于开始跟他讲话，仿佛对他满怀信任。她讲了一些自己的事，他才发现，原来她有那么多秘密。她有秘密！他心中浮起了一股强烈的幸福感。她突然很友好地使用了一些平时只有他才会说的语句。在万千事物中——云朵、树影、水洼——她看见了各种形象——这些都是他再也感受不到的……

阿涅丝跑到孩子们中间，他心满意足地读着亨利·詹姆斯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服饰描写。终于不用读报纸了。“她穿着一件白色棉布裙，上面有无数皱褶和镶边，还系着一个浅蓝的蝴蝶结。她没有戴帽子，手上却摇着一顶镶着宽边的绣花大阳伞：她有一种令人惊叹爱慕的美貌……”他不断往下读，同时感到很开心，因为待会儿要去给自己买东西——他很久没有这么做过了。他想像着自己穿一件崭新的浅色夏装穿过广场的样子。带着他遭遇的新事物，和他无法遗忘的旧事物，他将经历一段闻所未闻的故事。

科士尼格抬起头，发现孩子不见了。其他的孩子依然在投入地玩耍，仿佛阿涅丝早就不在了，他们已经制定了不包括她在内的新游戏规则。他跳起来，然后立即坐下，甚至又往下读了几行，一个字都没有漏。涂脏自己的脸，赶快！剪掉头发！树刷刷地响起来。在盛夏时节，他突然感到了一丝阴冷无比的寒冬气息。他屏住呼吸，试图不想任何事情，仿佛为了制止什么。他沉浸在恐慌中，想让自己为即将降临的事件做好准备。一个女人盯着他，仿佛了解某种他不知情的事情。谁会第一个告诉他？身后传来女人的吵嚷，不是笑声，而是灾难临头的怒吼。之前这些人是怎么嬉戏打闹的！现在一切都严峻了。此时此刻，仿佛在一切力所能及的尝试之后，他决定不再活下去。

7

他找遍了整个广场，看所有经过车辆的车厢，但这些只不过是必经程序。无法想像之物才有一种更可怕的真实感。他巴不得自己立刻发疯，似乎那才是最后的救命稻草。在疯狂中，一切都可以挽回，死人都会复活！人们可以永远和死人们相伴，不再有死亡的念头……然而他无法进入疯癫状态，只觉得浑身无力。他沉浸在一种恐怖的清醒状态中，双手自动地摸索着脸上的所有骨骼，伴着一种莫名的享受。他冷静而审慎地——管理员以后会这样形容他——将自己的地址告诉了公园管理员，声称自己要去叫警察，然后斜穿过城区，朝东走去。

在死亡的意识中，科士尼格和路上相逢的人们有了同感，而长久以来的无动于衷变成了一种甜美的参与感。那些开车的人们——他们无休无止地奔波在路上，关在铁盒子里，痛苦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多么辛苦；这样生存下去多么辛苦！货车的气闸多么绝望地一路鸣叫！刹那间，他想到，政治不仅是一种生意，不仅是对荒诞的粗暴掩饰，同时还是一种世界性的地区自治手段，因此政治是一种可以想像的事件，是值得拼搏的。他坦然接纳每一个细节，不再觉得一切都是断裂的。一个女出租车司机拉着一位女乘客；一个男孩拿着玩具冲锋枪大喊大叫着跑在母亲身后……他觉得自己变强大了。他愿意和所有人说话，祝福他们。一次他走过一个男人身边时，还提醒他鞋带松了，那男人向他表示感谢，一点都不惊讶。他看见一个头戴得克萨斯牛仔帽的人，便上前去问他从哪里来，仿佛在帮助他。他不再觉得一切都很可笑。看见一个戴红头巾的女人下地铁站的台阶，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从前只想着自己。想到自己现在要去死，一种强烈的遗憾攫住了他。他小心地避开每一辆车，不想被撞上。

他完全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轻巧地穿越在疲惫缓行的人群中，并为其他人感到遗憾！他连一丝一毫的牙疼都没有了！一个男人坐在巴士车站边，头低垂着，双手放在胸前，仿佛正在等待迫害者的到来。他觉得只要随便搭讪一句，那人就会全盘托出。他真的在那人身

边坐了一会儿，问他在干什么。那人望着他，仿佛这样的问题是对他的侮辱！

城里到处都有喷泉，他就着一个小喷泉清澄宁静的水流洗把脸，仿佛之前真的在脸上涂了什么。在这个温暖的日子，连流水也如此温暖！越接近巴黎东边的绍蒙丘陵，科士尼格看到的城市就越发生机盎然。他看见一个女孩子用脚跟蹬开摩托车支架，骑着车扬长而去；一个高大的女黑人用头顶着一个满满的塑料包；一辆拖拉机穿过城市，车后落了一地干草；一个面包店店员像往日一样，提着一篮长面包从一家咖啡馆走到另一家；一个胖男人坐在长椅上，身边放着一大堆皮带；遥远的地方，公园栅栏的顶部在某一刻泛出了金色光芒……他能用目光攫住一切。一个女人把钱包夹在下巴下，购物袋夹在膝盖间，打开一扇门，用脚踢开，这一幕在他眼中代表了一种可能的生活瞬间，这是他事后才窥见的生活。他看见人行横道上闪光的金属片，看见树冠无风自动，仿佛要不断变幻形状。他听见一群鸽子飞过，声音仿佛人的低笑，电影院里的枪声和嘶叫声结束后传来了影片的剧终声——轻柔的音乐和一对男女低沉友好的对话。他闻到一家开门的修鞋店飘来的刚上色的鞋的气味，看见一家理发店地上堆满了头发，一个冰激凌自动售货机上插在脏兮兮奶汁里的大勺，一只没有尾巴的猫从一户人家出来，飞快地蹿到一辆停靠的汽车底下蹲着不动，他听见一家马肉店香肠切割机的轰隆声，一个即将完工的楼盘各层都传出了水泥块的撞击声。他看见一家餐馆的女店主抱着一束花打开餐馆门，为晚上的营业做准备，他大声说："真丰富！"今年的第一批葡萄上盘旋着第一批黄蜂；第一批榛果装在一个木箱子里，旁边还有皱巴巴的果叶；人行道上留着第一批被吹落到地上又飞开的树叶的痕迹……夏天的集市规模比平时小了很多。咖啡馆里的服装摊位几乎都是空的！邮局大楼刚被重新粉刷过，人行道路面被挖开了，为了装新电话线，工人们站在矿井里，看着一个摇摇晃晃踩着塑料旱冰鞋的孩子笑。一家电影院正在上映动画片，放的是《大力水手》，这个家伙只需吃一罐菠菜就足以对抗全世界。他觉得自己很做作，很无耻！他肯定漏看了什么，错过了什么，这些都是补不回来的。他站住了，在所有的口袋里翻找。一个女人不会在人行道上这样站着不动，他想。终于他觉得自己不引人注目了。他几乎是满足地闻着自己的汗味。无休无止的车流轰鸣声让他觉得头很舒服，他发出了一声动物般的吼声。既然已经没有可以爱的人，我也就不再需要死亡征兆了！他想。一个人的钥匙链掉到地上。一个优雅的女人滑倒了，一屁股坐在地上。但他没有

像平时那样移开目光，他观察那个女人，看她如何羞涩地微笑着站起身来。他双手背在身后走，仿佛一个无所事事的餐馆领班。飘浮的云层下，起重机正在摇摇晃晃地工作，他怀着一种永恒的安宁感从它们下面穿过。

科士尼格不想再为自己追求什么。一些日常的景象在他面前闪动，仿佛它们只是现象——自然现象——每个细节都展示给他一种无限的丰满。他是一个已经脱轨的人，走入了在忘我的精力中四处奔波的人群中。他相信，当他把自己已不再需要的幸福传递给他们时，这些人都会改变自己的步伐。他依然在以某种方式活着——和他们一起。这种状况不是一种情绪，不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短暂气氛，而是一种他从所有流逝不息的短暂气氛中获得的信念，是有所用处的。这时，他想起自己在绿地广场的沙地上看见的三个物品，那时产生的观念现在似乎能派上用场了。正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变得神秘了，它才敞开了自己，你就可以重新赢得这个世界。他走过东站边一座桥时，看见桥下的铁轨旁躺着一把黑伞：它不再是某种其他事物的征兆，而是一个自我存在的事物，为自己而美丽或丑陋，和万物同时美丽或丑陋。他的目光所及之处总是有所发现，仿佛身在一个捡钱的梦里，每一次弯腰都能看到闪光的东西。无数细节分散在各处——街面上一只沾着蛋黄的勺子、高空的燕群——在一种整体感中震颤着，他不需要任何记忆或梦境来认识它：那是一种让人随时可以回家的感觉。

太阳已偏西，行驶在明亮逼人的大街上的汽车变得轮廓模糊。有人走在他身后，步伐跟他一致，既没有赶前也没有落后，但他并没有回头。一些人在影院前排队准备看《宾虚》。他自己第一次看这部电影，已经是很久之前了——然而到处都在不断放映它，还在放，又在放！那些第一次看的人和他完全不同，此刻却又相同。很多人和他迎面走过，胳膊下夹着衣服袋，因为七月底时，大多数洗衣店都会关门，另一些人用篮子装着叠起的气垫，从游泳馆回家。他坐在一家咖啡馆的天台上，馆子的遮篷上缝着一块布，上面写着“改变方向”：旅游真美。街上一节已废弃不用的老电车轨闪着微光，柏油还没有完

全掩盖铁轨。对面的一幢楼房里有一家公寓出售。两只狗在咖啡馆的桌子下吵架。一个很苍老的男人将一封航空信扔进邮筒里，然后微笑了……

只有在看见一个女人走过时，科士尼格才有些紧张。小腿肚的线条、膝盖、大腿和正在萌发的胸部令他充满渴望，并感到自己的脸色变得非常严肃！一次，他透过牛奶杯看见一个女人经过一个巴士站的轮廓，竟盼望她能永远在牛奶杯后行走。一种痛苦攫住了他，他感到愤怒，因为这些女人都不是为他而生，他再也不会见到她们，他已预知到她们对他可能具有的意义。如果恰好看不清楚她们的脸，他会感到非常失落，仿佛错过了十分重大的事情。

后来遮阳伞被撑开了，风渐渐猛烈起来，支架上的伞打着圈转动。拿到小费的侍者微笑着，他很认真地接受了。他感激那些坐在他身边却不观察他的人。脚边有水从消防栓中淌出来，鼓着泡沫流进了排水渠，他便久久地盯着水看。他在一份别人没带走的报纸上看到一句话：一个歌手成功地唱出了“灿烂的C大调”，为他感到开心，差点大叫出来。他想在桌上到处留下自己的指印。一个坐在他旁边读书的人突然摘下了眼镜。他蓦地很害怕那人会离开——但那人只是突然把书推远了一点，又继续读下去：他才感到一阵轻松，一阵平静……

科士尼格东张西望，看周围还有没有能够启发他思考的事物，或机遇。早早就有人在咖啡馆的地下室打乒乓球，他厌恶地听着那有规律的啪答声。球终于打飞了……他脑中一片空白，毫无恐惧地离开了，沿着比特-绍蒙公园陡峭的台阶往山上走去。

他经过一个红色柱子，是用来在紧急情况下叫警察的。在这片蔓延的痛苦荒野中，那深红色的柱子仿佛是一种真切的慰藉，他毫无必要地记下了这个位置。有人在他身后跑，不，那人并不是为他而跑；

有人在吹口哨，为什么不对他吹呢？！此刻他还感觉到了自己的身体的紊乱：一个女人用报纸包裹的马铃薯滚出了一只，他吃了一惊；一个孩子在山下骑车过一个水坑时，他不由得拐了个弯。

他又觉得冷。公园边的灌木丛后有蓝色的衣服在动，他莫名其妙地想起了自己的出生地，他回忆的并不是某个特殊事件，而是一段漫长至极的死寂时期。这段回忆似乎成了一个机遇，他试着打开记忆中的其他图景。但什么都没有发生。他突然觉得自己正身处冬天的斯德哥尔摩，站在一个地铁站的入口……

能不能在新的姿势和表情中找到出路呢？比如说，撅起嘴唇，来回摇头，用手往嘴里扇气，像这里的法国人那样？一点乐趣都没有……他站在一座假山的高处，眺望黄色夕阳下的巴黎西部。这是一个短暂的白日梦，或许这就是拯救！他摸索身上，看护照在不在身边。现在只有另一个体系的人才能制止他。他身旁有一个女人，满脸皱纹，下巴汗毛很重，正在啧啧有声地和一个比她年轻的男人接吻，似乎在告别。科士尼格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好奇，一直等在一旁看，想看看那男人擦拭对方的口水。但男人只是一动不动地望着山下的城市，然后拖着缓慢的步子离开了。

这一刻，科士尼格为自己的求死和死亡感到羞耻。事已成定局，最后一口呼吸，然后成为尸体。如果世界和他同时完蛋，他还可以忍受自己成为尸体的事实。但他只是自欺欺人，他的身体在面临死亡时突然开始自命不凡起来。他向前迈了一步，不是想做什么，而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这只是一种抵抗方式。——他经常感到一种毛骨悚然的羞愧，因为自己还活着，因为自己是一种赤条条、肉乎乎的奇怪生物。这种多余的感觉阻止了他发出最后一句特别的生存感言，他愣愣站在假山顶上。

他环顾四周，虽然知道已无出路，但这个动作只是出于本能。在不远的地方，他竟看见了那个胖作家。作家似乎已观察了他很久，因为他并没有因为陡峭的山路而气喘吁吁。他合上了笔记本，放到大衣内口袋里，仿佛现在已经不需要它了。“我跟了你一天，格里高尔，”他说，“我把自己的观念藏到各种现象当中，现在已经满足了。《迷魂记》这部电影的最后，那个女凶手从西班牙的教堂钟楼上掉下来时，天空并不是蓝的，而是在最后的夕阳中乌云密布。‘愿上帝宽恕她的灵魂。’修女说，并让人敲响了钟。你的孩子和斯蒂芬妮一起在我家，她暂时会在那里住一阵子。我已不需要你了，祝你一切都好。”作家站了很久，然后做了几个鬼脸，似乎为了向科士尼格证实他是真切存在的，然后穿过草坪走了，走时不小心还踩坏了一个花坛。“你根本不了解我！”科士尼格在他身后大喊，但作家只是挥挥手，根本没有回头。

科士尼格想马上跟人说话，他可以给使馆的那个女孩打电话。但只有看到他现在的样子，别人或许才会相信他！

8

他离开比特-绍蒙公园，继续往东走去，下了山后来到乡下的茅屋和美丽城的高层楼房之间。高楼上的遮阳帘已经卷了起来。他买了一套带裤兜的西装，这样可以把手斜插进兜里，此外还买了袜子和鞋。“不贵的！”卖主由衷地说——在这个商业萧条的地区，他或许经常说这句话。科士尼格把脱下来的衣服留在店里，沿着山路回城西，朝着歌剧院广场走，去和平咖啡馆。

在他眼中，一切现在都显得无比清晰，仿佛是展品，不再像一小时之前那样灿烂。一切宛如都被清洗过一遍。他在水底潜了那么久，现在终于浮出了水面，阳光渐渐温暖着他冰冷的身体。看着石板路缝里的闪光，他想起了一个在夏天空荡的街道上朝他微笑的女人的嘴角。云层飘动着，树冠绽开又合起，叶子滑落下来，散落在广场的四处，盖住街面，一切似乎都在运动。他望着一片漏斗形状的云——我感知到了一个形象！他想——再去看时，那云却已消散在蓝天中。他

惊讶地站住了，激动地观察着笼罩在楼顶上的天空，天的光芒穿透了树叶，仿佛有新的事物正在那后面起步——不是海洋，更不是任何地区，而是一种陌生的感觉。他突然想到家里的床还没有铺好，这个念头并不让他难受。美丽城的小茅屋给人一种黄昏的假象，科士尼格听见从其中一栋茅屋里传来一声喷嚏。一个黑衣老妇人站在家门前，长筒袜外还套着短袜，正朝着街道另一头的人说话，两人的话声都清晰可闻。晚风中，树叶的影子在房子的墙面上瑟瑟闪动着。一个敞开的楼梯间外有一块标牌，写着：不要在台阶上吐痰！巴黎在他脚下延伸，城市浸在红光中，已变成了一个荒漠都市，楼房的窗户反射着刺眼的光，那些房子宛如被遗弃的殖民建筑。他望向西边灿烂逼人的天空，楼房和树木丛生的小巷似乎连成了一个整体，车流仿佛是从幽暗无比的原始森林中冒出来……太阳正在下沉。暮霭降临了，晦暗的光线中，几个孩子宁静地坐在围着人行道的铁路护栏上。那护栏已被磨得十分光滑，孩子们很安静，一语不发，有人喊他们回家睡觉，他们也不愿散开。一个女孩在一丛接骨木后面观察他，膝上放着一本书，他也回望她。注视她的同时，他也渐渐看清了自己。他从厌烦中开始感知世界，现在竟一发而不可收拾！所有那些无言地向他袭来的故事几乎让他感到痛苦。不要睡觉——保持空洞！一辆停靠的车敞开着车门，他听见车里传出羽管键琴的音乐。突然他为自己今后面对的时光感到一阵深切的愉悦。他需要一个工作，他的成果应该像法律一样具有效力，不可逆转！他的生活不需要体系，他想，如果未来的生活中不再会有新事物和新面孔，那么他需要一种更稳定的渴望。

他望着迎面而来的一切，仿佛其中有为他存在的什么。一家咖啡馆平时很整洁的柜台上放着一个盛煮蛋的餐盘！那个黑人是怎么回事，大衣上竟别着竹纽扣？他始终害怕做错事，错过什么本质的东西！一个女人迎面而过，他很喜欢她走路的方式，片刻后他转身跟在她后面跑，想看看她走路。她有时会回头看一眼，仿佛正在离开他，惟独离开他一人……

他看见一个被打翻的活动箱，这时意识到自己对此多么无动于衷——箱子倒了，可这跟他不再有什么关系了。他是自由的，至少在这

个黄昏，这个夜晚。他怀着一种征服的欲望往山上跑去，一排排高楼渐渐矮下去，仿佛已经被他的目光所征服。“我正在改变！”他说。他觉得自己仿佛已经沉默了难以想像的漫长时间。他吼出一种人们恐吓动物的声音，但他恐吓的是所有的一切。就连纯粹的呼吸、甚至吞咽都让他觉得舒服——每一次吞咽的动作都有一种新鲜感。周围的环境似乎已然改变，他看见一张电影海报上画着一对赤裸的男女躺在床单下，竟感到惊讶：现在居然还有电影用床单来装饰情侣！有人扔了一份报纸，他习惯性地瞥了一眼上面的标题：“……腹部中枪”，心想：原来还有人因为腹部中枪而死！虽然他看的是同样的事物，用的也是同样的视角，但一切都变得陌生了，变得可以体验。他神情坚决，伸展着四肢。暮色中飘来一阵陌生的香水味，那味道并不像往常那样，让他想起令人窒息的绝望拥抱——他不再回忆，只是怀着期待。经过一个长廊时，他想：就在这里，那件独一无二、闻所未闻的事要发生了！他看见一家咖啡馆外有一个独身女人，浑身散发着不可接近的游离感，但在他眼中，女人还是获得了某种象征：她是一个诱人的禁忌，他又想：这就是她的所有故事——我对她的了解永远不会超过这一刻，因为现在我看见的她正独自坐着。他贪婪地跟踪自己的念头，随时做好制止它们的准备。他什么都不想忘记，为了以后派上用场。（无论如何，他为今天将遇到的所有人感到开心，即便不和他们交谈。）他经过一个灯火通明的教堂，门大开着，他看见一个神父正在挥手让大家开始唱祷歌。他又注意到，一只手正将一支燃烧蜡烛的烛泪滴到一个托盘上，盘里竖着很多点燃的蜡烛。倾斜的蜡烛滴出的烛泪突然让他喘不过气来，并不是那个物体本身，而是他正在体验的所见之物。他继续走在山下的平坦街道上，同时觉得自己能看到路面下方的景观，仿佛道路正在离他远去。他一眼可以览尽正在朝下卷起的地面。这时他发现石子路上有个东西（是什么？他想），那玩意儿似乎对他意义重大——原来是最后一缕日光。他在巴士站读着《注册机械师》，仿佛那是一首流行歌的歌名……夜蓝色的天幕中，已有一颗星星出现在西方，他看见内城的大片楼群已成一片黑影，却显出一种毛绒绒的柔感和圆润，仿佛它们都变成了帐篷，而那巨型大皇宫是其中的主帐篷。他放慢了脚步。街道依然空空如也。有人群活动的地方却很拥挤，他们低声交谈，比平时靠得更近。突然他以为一场战争即将爆发，炮弹将轰隆隆地从天而降。一切都已转好，再没有不测降临，他觉得有些难受。

从博纳努韦勒大道开始，街道又热闹起来。还没有睡觉的孩子被拖着走，走到排气管下便咳嗽起来；四处都是喧闹声，如果孩子们想说话，大人们得弯下腰凑近他们。科士尼格听见人群中传来一声怒吼，所有人都乱了阵脚，想逃开。这些人怕什么呢？只有他一个人去歌剧院广场吗？很多老人都一副愤懑不平的表情，虽然他们已经那么苍老。他看见一个女人站在敞开的窗口，立刻认定她会跳下来。一个人打哈欠时连口水都喷出来了。科士尼格想招一辆出租车，但他招呼司机时，那人看都不看他一眼，只是往车顶牌上盖了一个黑色皮套作为回应。一个迎面而来的女人对他做了一个鬼脸，他发现女人的脚踝肿得很大。一个人靠在挡风玻璃已经开裂的车边呕吐。几个男人蹦蹦跳跳地走在人行道上，不时笑着捏对方的脸，捏时却咬紧牙关，因为下一秒他们会真的打起来。一个西装口袋里插着白手绢的男人坐着轮椅被人推着经过。整个大街充斥着混浊的烟雾，地铁入口处的黑色街灯下方已经被煤烟熏得漆黑。一个正在尖声大笑的女人笑到一半突然严肃起来，猛一转头，仿佛她在这一刻必死无疑。没有人给旁人让路；在这些你挤我撞的混乱中，马上就会有人抽出一支手枪，朝人群乱射。他看着迎面而来的人，仿佛在看一部历史已久的老电影；事实上他们早已不存在了——他所看到的，只是他们的最后一段影像。他们活动着，听任自己行走，仿佛早就腻烦了自己的功能。虽则如此，但他们还是顺从地显现出影像！他们家里的牛奶早就酸了，橙汁也结了块，抽水马桶里的水面已经蒙了一层灰尘！他走在人群中，不断躲避，生怕失去重获的平衡感。如果有人挡住了路，他会很客气地将对方挤到一旁——经历了一切之后，他容许自己这样做。他在排水渠里捡起了一封被踩烂的信，一边走一边看。“很多年前的一天，我在转瞬之间突然变得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由此，我一生中最恐怖的一章开始了……”他突然想到，自己从来都没有一个真正的敌人，没有一个他想毫不留情地毁灭的人。我要尽可能地与人为敌！他怀着一种奇特的快乐想。望着脚下被炎热烘软的石子路面，他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陌生故事中的主角……想到待会儿要结识某人，他觉得有些无趣，有些郁闷。他走向和平咖啡馆，歌剧院广场的三盏街灯恰好在这一刻照亮了咖啡馆门外。天台上掠过一道闪光灯的光。卖烟的女人站在店里，对顾客们晃着她的托盘。有人走近咖啡馆，里面的人正向他招手。

在一个夏天炎热的黄昏，一个男人穿过巴黎的歌剧院广场。他的双手斜插在看起来簇新的西装裤袋里，方向明确地朝和平咖啡馆走去。那件西装是浅蓝色的，那男人穿着白袜子和一双黄鞋。他走得很快，系得松松的领带走动时被甩来甩去……

（1975年）

左撇子女人

任卫东　译

她三十岁了，住在一片坐落于一个小山南坡的别墅区里，正好在城市的雾霭之上。她的眼睛，即使是在不看着人的时候，有时也会闪闪发亮，但面部表情不会发生变化。在一个冬日的下午，她坐在向外伸出去的房间的窗前，用电动缝纫机干活，黄色的光线从窗外射进来，照在她身上。身边是她八岁的儿子，正在写学校布置的作文。这间房子的一侧全部是玻璃，面对着一个长满青草的平台，边上是邻居房子的一堵墙。孩子坐在一张漆成棕色的桌子旁，俯身在作业本上，用一支钢笔在写着，舌头伸在外面。有时候，他停下笔，看一会儿窗外，然后又更快地继续写；或者，他朝母亲看去，母亲虽然没有面朝着他，但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于是也转过头来看他。女人嫁给了一家欧洲著名瓷器公司本地分公司的销售经理，他去斯堪的纳维亚出差好几个星期了，今天晚上应该回来。这个家庭并不富有，但生活得还算舒适，住的别墅是租的，因为男人随时会被派到其他地方。

孩子写完了，开始读他的作文："《我想像的美好生活》，我希望，天气不冷也不热。应该一直吹着温暖的风，有时候刮狂风，行人不得不蹲下来。汽车应该消失。所有房子都是红色的。灌木是金色的。人们什么都知道了，不需要再学习。大家都住在岛上。街上的汽车都开着门，谁累了，就可以进去休息。而且，人们根本就不会再感到累。那些汽车谁的也不是。晚上，大家都不睡觉。人们在哪儿觉得累了，就在哪儿睡。从来不下雨。所有朋友中，各样的有四个，那些不认识的人都消失掉。所有不认识的东西都消失掉。"

女人站起来，从那扇狭小的横窗看出去，远处有几棵云杉树，一动不动。树下有好几排独立的车库，外表很相似，都是四方形的，都有着像别墅一样的平顶，车库前都有进出车的通道，有个孩子正在没有雪的人行道上拉着雪橇。树后面很远处，地势平缓的地方，是城市最边缘的住宅区，一架飞机正从那里拔地而起。孩子走过来问女人在看什么，女人已经完全陷入沉思，但并没有发呆，而是漫不经心地站在那里。女人什么也没有听见，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孩子摇晃着她嚷

道："醒醒！"女人回过神来，把手放在孩子肩上。孩子也把目光投向窗外，张着嘴，呆呆地看着。过了一会儿，他摇晃着身子说："我现在也瞎看起来了，像你一样！"两个人都笑了起来，笑得停不下来。当他们终于平静下来时，其中一个立刻又开始笑，另一个也跟着笑起来。最后，他们笑得抱在一起倒在地上。

孩子问，现在可不可以看电视。女人回答说："我们不是要去机场接布鲁诺吗。"不过，孩子已经打开了电视机，坐下看了起来。女人俯下身来对他说："我该怎么跟你爸爸解释呢？他已经出国好几个星期……"看着电视的孩子什么也不听。女人大声叫他，用双手在嘴边拢成喇叭形，好像他们是在室外什么地方。但是孩子只是盯着电视看。她把手挡在他眼前，孩子把头侧向一边，大张着嘴继续看。

女人站在车库前的院子里，裘皮大衣敞开着，天色开始渐渐暗下来，积雪开始冻结。人行道上到处散落着圣诞树被拖走时留下的松针。她一边打开车库门，一边抬头望着山坡上的住宅区，几座相互掩映的方盒子形别墅里，已经亮起了灯。住宅区后面是一片混杂的树林，主要是橡树、山毛榉和云杉，树林从住宅区后面一直缓缓延伸到山顶，其间没有村庄或房屋。孩子出现在她那个"单元"——她丈夫把别墅称为单元——的窗户前，朝她挥手。

到达机场时，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女人在进入境外到达大厅之前，抬头看到灯光已经打到了旗杆上挂着的各种旗帜，上面的天空还显露出一些亮点。她站在人群中等待着；她的脸充满了期待，但很放松；坦然而心无旁骛。广播通知来自赫尔辛基的航班已经降落，乘客们陆续出现在海关安检口后面，布鲁诺也在人群中，手里提着一个箱子和一个免税店的手提袋；一脸倦色。他跟她年纪一样大，总是穿着双排扣的灰色细条纹西服，不打领带。他的眼睛是深棕色，颜色深得几乎看不到瞳孔，所以，他可以长时间地盯着别人看，而被看的人不会察觉到。小时候，他曾经梦游；长大了以后，他也经常说梦话。

在接机大厅里，众目睽睽之下，他把头靠在女人的肩膀上，仿佛他必须立刻在女人的裘皮大衣里休息一下。她接过他手里的箱子和手提袋，现在他可以拥抱她了。他们长时间拥抱着；布鲁诺身上有些许酒味。

在去地下车库的电梯里，他仔细看着她，而她也在打量着他。

她先坐进汽车，给他打开副驾驶的车门。他还在外面站着，两眼看着前方。他用拳头敲了敲自己的额头，然后捏住鼻子，使劲呼气让空气从耳朵里出来，好像长途飞行把他的耳朵堵塞了。

他们开车驶向坐落在坡上的小城，他们的别墅区就在那里。车上，女人一边伸手打开收音机一边问："想听音乐吗？"他摇摇头。这时天已经黑透了，路旁的高层写字楼里，几乎所有灯都熄灭了，而四周山坡上的住宅区里却灯光闪烁。

过了一会儿，布鲁诺说："芬兰总是黑天，不管白天还是夜晚。他们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在其他国家，至少总有些相似的词语——但是在芬兰，没有一个字是国际通用的。我记住的惟一一个词是啤酒：olut。我在那里经常喝醉。有一天午后，天刚刚开始有点亮，我在一家自助咖啡馆吃了饭，突然开始抓挠桌子。黑暗，钻进鼻孔里的寒冷，我不能跟任何人交谈。有一次我在夜里听到狼叫，对我来说，那狼叫声几乎是种安慰。或者，偶尔，我小便时发现小便池上有我们公司的缩写，也能让我感到很亲切！我想告诉你，玛丽安娜：我在那儿的时候想你，想施泰凡，在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么多年中，我第一次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相互属于对方。我突然之间有了一种恐惧感，怕我会因为孤独而疯掉，以一种极其痛苦的、没有任何人体验过的方式疯掉。我以前经常跟你说我爱你，但是直到现在，我才感觉到，我和你是紧紧连在一起的。生生死死。而最奇怪的是，我甚至认为，没有你们我也可以生活，因为我已经经历了这一切。"过了一会儿，女人把手放到布鲁诺的腿上问："谈判怎么样？"

布鲁诺笑了："订单又增加了。北欧人吃得已经很差了，那至少应该用我们的瓷器吃吧。下一次，那里的客户就会争相到我们这里来订货了。价格下滑已经止住了。我们也用不着像在危机期间给他们那么高的折扣了。"他又笑着说："他们连英语也不说。我们不得不通过翻译跟他们交谈，那是一个有孩子的单身女翻译，她在这里上过大学，我觉得是在南方。"

女人："你觉得？"

布鲁诺："不，是我知道。她跟我说的。"

进入住宅区，他们经过一个亮着灯的电话亭，里面有人影晃动。然后，他们拐进一条人造的弯弯曲曲的小窄路，这些小路把住宅区分割成一块一块的。他一只手搂着她的肩膀。女人开门时，又抬眼向上看去，夜幕下的小路静静地躺在昏暗的路灯下，别墅层层叠叠坐落在山坡上。

布鲁诺问："你还愿意住在这里吗？"

女人说："有时候，我真希望，家附近就有一个散发着奶酪臭味的比萨饼店，或者是一个报刊亭。"

布鲁诺："反正我一回到这里，就能长出一口气。"

女人微微笑了一下。

客厅里，孩子坐在落地灯旁一把宽大椅子里看书。父母进来时，他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继续看书。布鲁诺走到他身边；但他没有停止看书。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让人察觉不到地偷偷笑了一下，然后起身在布鲁诺的包里翻找起来。

女人从厨房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银托盘，上面有一杯伏特加，但父子两人已经不在客厅了。她到房间里去找，这些房间在过道两边，像是过道延伸出来的枝杈。当她打开浴室门时，看到布鲁诺坐在浴缸的边缘，一动不动地看着孩子，孩子已经换上睡衣，正在刷牙。孩子把袖子卷得高高的，免得被水弄湿，他仔细地把牙膏管边上的牙膏舔干净——儿童牙膏是草莓味的，然后踮起脚尖把牙膏放回架子上。布鲁诺接过托盘上的酒杯，问道："你不喝吗？你今天晚上还有什么事要做吗？

女人："我今天跟往常不同吗？"

布鲁诺："跟往常一样不同。"

女人："这是什么意思？"

布鲁诺："你属于为数不多的那种人，在你面前，别人用不着害怕。而且，你是那种别人不愿意在你面前装假的女人。"他轻轻拍了

孩子一下，孩子走了出去。

客厅里，女人和布鲁诺整理着孩子白天游戏时乱扔在地上的东西，布鲁诺直起身来说："我耳朵里还有飞机的嗡嗡声。我们去好好吃顿饭吧。我觉得今天晚上的时间都是我自己的——好像有什么魔力。请你穿上那条低胸连衣裙，好吗？"

女人弯着腰继续收拾，问道："你穿什么？"

布鲁诺："我就这样出门；不是一直这样吗？我到饭店的前台借一条领带就行了。你愿意一起走着去吗？"

他们来到附近一家饭店，一个罗圈腿服务员领他们走进餐厅，布鲁诺边走边整理那条刚借来的领带。餐厅天花板很高，给人置身宫殿的感觉，装饰得富丽堂皇，但客人很少。服务员殷勤地帮他们在椅子上坐好。他们同时打开白色的餐巾；他们笑了起来。

布鲁诺不仅吃光了自己那份食物，而且还用白面包把盘子擦得干干净净。然后，他一边举起一杯法国白兰地，对着灯光欣赏着，一边说："我今天需要这样的服务。一种很安全的感觉！一种永恒的感觉！"服务员静静地站在后面。布鲁诺继续说："在飞机上我看了一本英国小说。里面有一个场景是，一个服务员通过自己高贵的服务，让主人公赞叹几百年来封建服务的成熟美。能成为这种骄傲的、充满尊重的服务的对象，哪怕只是在喝茶时的短暂时间，对他来说，不仅意味着与自己的和解，而且也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与整个人类的和解。"女人把目光转向别处。布鲁诺叫她，她转回目光，却没有看他。

布鲁诺说："我们今天晚上住这个饭店。施泰凡知道我们在哪里。我把这饭店的电话号码放在他床边上了。"女人低下头，布鲁诺挥手叫来服务员。服务员躬下身来。布鲁诺说："我今天晚上需要一个房间。我太太和我要睡觉，马上，您明白吗？"服务员看了看他们两人，带着并不诡秘、而是显得很理解的微笑说："现在有个展览会正在举办，但我会去问一下。"在门边，他又回身说："我马上回来。"

就剩他们两人在餐厅里，每张桌子上都点着蜡烛。旁边的圣诞树上，无声无息地落下松针。墙上的挂毯是狩猎的场景，上面光影摇曳。女人长久地看着布鲁诺。虽然她很严肃，但她的脸闪闪发光，让人感觉不到她的严肃。

服务员回来了，用一种仿佛匆匆赶回来的声音说："这是塔楼房间的钥匙。国家领导人在那里面住过的；但愿这不会影响您。"布鲁诺挥了下手，服务员诚恳地补充道："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但愿塔楼的钟不会打扰您，因为那个巨大的指针每分钟都会嘎嘎响。"

布鲁诺推开房门时平静地说："今天晚上，我觉得我希望的一切都实现了。仿佛我能把自己从一个幸运的地方变到另一个幸运的地方，中间就没有停顿。玛丽安娜，我现在能感觉到一种魔力。我需要你。我很幸福。我身体里的一切都发出幸福的嗡嗡声。"他向她微笑着。他们进了房间，立刻打开所有的灯，包括前庭和浴室的灯。

天刚亮，女人就醒了。她朝开着一条缝的窗户望去，窗帘没有拉上，冬天的雾气钻了进来。塔楼钟的指针发出嘎嘎的声音。她对睡在旁边的布鲁诺说："我想回家。"

他在睡梦中，但立刻就明白了。

他们沿着回家的路慢慢往山下走；布鲁诺伸手搂着她。然后他跑开，在冻得硬邦邦的草地上翻了个跟头。

女人停下来，摇了摇头。已经跑到前面去的布鲁诺询问地看着她。她说："没什么，没什么！"然后又摇了摇头。她长时间看着布鲁诺，仿佛她的注视有助于思考。之后，他走近她，她把目光转向公园里的树木，树木挂满白霜，在晨风中摇动。

女人说："我有了个奇异的想法；其实不是，而是一种——念头。但是我不想说。我们回家吧，布鲁诺，赶快。我要送施泰凡上学。"她想继续走，但布鲁诺拦住了她："你要是不说出来，多难受啊。"

女人说："我要是说出来了，你会难受的。"同时，她为自己说的话笑了起来。他们长时间互相看着，一开始不太严肃，然后变得很

紧张、恐惧，最后很冷静。

布鲁诺："好了，现在说吧。"

女人："我突然有了个念头，"她为这个字眼又笑了起来，"你要离开我；你要留下我一个人。是的，就是这些：走吧，布鲁诺。让我一个人吧。"

过了一会儿，布鲁诺不停点着头，抬起双臂问道："是永远吗？"

女人："我不知道。只是你会离开我，留下我一个人。"他们沉默着。

然后，布鲁诺微笑着说："我先回饭店去喝杯热咖啡。今天下午我去取我的东西。"

女人毫无恶意，而是关心地说："头几天你可以搬到弗兰齐斯卡那里去住。她的那个男同事刚和她分手。"

布鲁诺："我喝咖啡的时候会考虑的。"

他返回饭店。她离开了公园。

在通往住宅区的长长林荫路上，她跳了一步；然后突然开始奔跑。回到家，她拉开窗帘，打开唱机，音乐还没开始，她就舞动起来。孩子穿着睡衣走过来问："你在干什么？"女人说："我觉得我有点儿不安。"然后又说："穿衣服，施泰凡。该去上学了。我去给你烤面包。"她走到过道里的镜子面前说："耶稣——耶稣——耶稣。"

这是一个晴朗的冬季早晨，散开的浓雾里飘落下雪花样的东西，很慢，很少。在学校外面，女人遇到了她的女友，弗兰齐斯卡老师，一个留着金色短发的健壮女人，她的嗓音极具穿透力，让人能从众多的声音中立刻分辨出来，哪怕她并没有大声说话。她几乎只发表看

法，但并不是出于深信不疑，而是出于担心，担心交谈或许会成为闲话。

上课铃声正好响了。弗兰齐斯卡拍了一下孩子的肩膀，算是打招呼，然后，等孩子进了校门后对女人说："我都知道了。布鲁诺马上就给我打了电话。我和他说：你的玛丽安娜终于清醒了——你也这么认为吗？你是认真的吗？"

女人说："我现在不能说，弗兰齐斯卡。"

弗兰齐斯卡老师边进校门边回头说："放学后我们在咖啡馆见面。我很兴奋。"

女人拿着一大包衣服从洗衣店出来，进了一家肉店，又在这座小城超市的停车场上把沉重的塑料购物袋堆进他们那辆大众车的后备厢里。她还有点时间，于是穿过丘陵起伏、视野开阔的公园，走过结了冰的池塘，冰面上有几只鸭子在蹒跚行走。她想找个地方坐一会儿，但是，冬天里的公园长椅上总是坐满了人。所以，她站下来，注视着天空的云彩。几个老人在她身边停下来，也抬头看着。

她在咖啡馆跟弗兰齐斯卡见面；孩子坐在她身边读一本漫画书。弗兰齐斯卡指着书说："这本书里的这只鸭子，是我惟一允许班上孩子看的。我甚至要求他们，读一读它忧伤的冒险故事。从这只总是吃亏的小动物身上，孩子们能了解各种生存形式，比他们在舒适的家里或者只知道模仿电视的生活环境中了解得更多。"看书的孩子和女人交换了一下眼神。

弗兰齐斯卡问道："你想怎么办呢？一个人？"

女人："坐在家里，不知所措。"

弗兰齐斯卡："不，别开玩笑：还有别人吗？"

女人只是摇摇头。

弗兰齐斯卡："你考虑过没有，你们两个靠什么生活？"

女人："没有。不过我可以重新开始翻译工作。我当时离开出版社的时候，出版商就跟我说，原来作为出版社的雇员，我不得不处理外国法律合同，现在离开出版社，我终于可以开始翻译真正的书了。从那以后，他还经常问我能不能翻译书。"

弗兰齐斯卡："小说？诗歌？这种东西可能也就20马克一页吧，折合小时工资3马克。"

女人："我觉得每页15马克。"

弗兰齐斯卡久久地看着她。"我希望，你能尽快加入到我们中间来。你会看到：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神采奕奕！我们不是交换菜谱！你根本不知道，女人之间有多少美妙的可能。"

女人："我很愿意去看看。"

弗兰齐斯卡："你一个人生活过吗？"

当女人又摇摇头时，弗兰齐斯卡说："我一个人生活过。而我蔑视孤独。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也蔑视我自己。另外，布鲁诺会暂时住在我那里——假如你，我估计，今天晚上不想要他回去的话。我还不能相信这一切。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兴奋，玛丽安娜，而且很奇怪，我为你感到骄傲。"

她把女人拉到自己身边拥抱着。然后，她敲了敲孩子的膝盖问道："那个显摆自己有钱的人是怎么对待他的穷亲戚的？"孩子正专心致志看书，没有回答她，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说话。然后，女人回答说："施泰凡总是想成为富人，因为他说，富人是好人。"

弗兰齐斯卡把空杯子举到嘴边，做了个喝水的动作。她放下杯子，来回打量着女人和孩子，渐渐地，她的脸变得柔和了。（有时候，弗兰齐斯卡会突然没有任何具体原因而陷入一种无言的感动，这时，她的脸就会因为放松而与其他各种各样的脸有一种相似——仿佛她在这种莫名的感动中发现了自己。）

在家里的过道里，女人打开壁柜，为布鲁诺收拾箱子。当她打开一个箱子时，发现孩子蜷缩在里面。他跳起来，跑了出去。从第二个箱子里跳出来施泰凡的一个朋友，一个胖胖的男孩，他随着施泰凡跑到平台上去了，两个孩子把脸贴在门玻璃上，伸出舌头，冰冷的玻璃立刻让他们觉得疼了。女人跪在过道里，仔细叠着衬衫，把箱子拖到客厅放好，让它随时可以被拿走。门铃一响，她立刻跑到厨房。布鲁诺打开门进来，像个不速之客一样四处看看。他看到地上的箱子，然后叫女人的名字；他指着箱子冷笑着说："你是不是把床头柜上我那张照片也拿掉了？"

他们握了握手。

他问她施泰凡在哪儿。她指了指落地窗那边，两个孩子正不出声地做着鬼脸。

过了一会儿，布鲁诺说："今天早上我们俩之间的事，太奇怪了，是不是？而且当时我们两个都没喝醉。现在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可笑。你不觉得自己可笑吗？"

女人："是的。不，其实没有。"

布鲁诺拿起箱子："明天又开始上班了，挺好。——你还从没有一个人生活过。"

女人："你从弗兰齐斯卡那里来？"

然后她又说："你不想坐一会儿吗？"

布鲁诺一边往外走一边摇着头说："你什么也别担心……你还记得吗，我们之间曾经那么亲密，这跟我们是男人女人没有关系，但肯定跟我们曾经是夫妻有关。"女人在他身后关上门，站在那里。她听到汽车开走的声音。然后她走到门边的衣帽架旁，把脸埋在挂着的衣服中间。

傍晚，女人坐在电视机前，没有开灯，她通过一个监控频道看着小区的儿童乐园。她看着无声的黑白画面，看见自己的儿子正在一个

倒着的树干上练平衡走路，那个胖男孩老是掉下来；除了这两个孩子，乐园里什么人也没有。女人的眼中泪光闪烁。

晚上，女人和孩子在客厅里吃饭。她已经吃完了，看着孩子出声地喝汤，吧唧吧唧地吃东西。屋子里非常安静；只是偶尔能听到厨房里冰箱的工作声，厨房跟客厅之间有一个递菜窗口。女人的脚下是电话机。

她问施泰凡，要不要陪他上床睡觉。孩子回答说："我不是一直自己睡觉吗。"

女人："至少让我陪着你嘛。"

在儿童房里，她给略显吃惊的孩子换上睡衣，想把他抱起来放到床上。孩子不让，自己躺下了，然后她给孩子把被子盖得严严实实。孩子拿了一本书，指着上面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明亮的背景下，是一座高山，一群寒鸦正在盘旋。孩子大声读着图下的文字："深秋的山里，如果天气适宜，高山仍然有吸引力。"孩子问这是什么意思，她给他解释说：天气好的时候，人们仍然可以在深秋季节登山。她朝他俯下身来，他说："你身上有洋葱味。"

女人独自蹲在厨房里一个敞开的橱柜前，里面是垃圾桶，她手里端着孩子用过的餐盘，一只脚已经踩在垃圾桶的踏板上了，桶盖翻开。她就这样弓着身子，用叉子盛起几片食物放到嘴里咀嚼，把剩下的食物倒进垃圾桶。她保持这个姿势一动不动很长时间。

夜里，女人躺在床上，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寂静无声；她跑到窗边，打开窗户；但是寂静只是窃窃私语。她手上拿着自己的被子，走进孩子的卧室，躺在他床边的地板上。

第二天早上，女人坐在客厅，在一台打字机上打字。她出声地读着刚打出的句子："现在，我终于可以答应您翻译法语书的要求。请您告知您的条件。目前，我更愿意翻译通俗的专业书籍。我常常回想

起在出版社的工作。（她自言自语地补充说：‘当时我经常因为打字引发腱鞘炎。’）期待您的回电。”

在住宅区的电话亭边，有一个信筒，她把信发了出去。她转过身来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布鲁诺。他粗暴地抓住她的胳膊，然后又四周看了看，看是否有人在看着他们：路上面很远的地方，有一对夫妇正在树林里走路，身上背着背包，手里拿着登山拐杖，灯笼裤挽了起来。布鲁诺把女人推进电话亭里，然后突然开始道歉。

他长时间地看着她：“这个游戏还要继续下去吗，玛丽安娜？我反正是不想玩了。”

女人回答道：“你别开始跟我谈孩子。”他挥手打她，但是在狭小的电话亭里却没有打到她。然后，他做了个手势，仿佛要用双手捂住脸，但是又立刻垂下双手：“弗兰齐斯卡认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说，你对自己行为方式的历史条件没有意识。”他笑了，“你知道她叫你什么吗——私人神秘主义者。是的，你是神秘主义者。神秘主义者！见鬼。你有病。我对弗兰齐斯卡说，让你挨几下电击就能恢复理智了。”

接着，他们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女人说：“你当然可以经常来，比如周末带施泰凡去动物园。或者是历史博物馆。”

他们又不说话了。突然，布鲁诺把一张照片举到女人面前，让她看看清楚，然后用打火机点燃。女人试着忍住笑，把目光转向一边；但还是笑了。

布鲁诺走出电话亭，扔掉烧着了的照片。她也跟了出来。他朝四周看了看，平静地说：“那我呢？你觉得我不存在吗？你觉得，所有人中只有你是有生命的？我也活着，玛丽安娜。我活着！”

这时，女人拉了布鲁诺一把，他已经走到了马路上，一辆车正好开过来。

布鲁诺问：“你需要钱吗？”然后掏出几张钞票。

女人：“我们不是有个共同账户嘛。还是你已经把它冻结了？”

布鲁诺："当然没有。不过请你还是拿着吧，哪怕你不需要。"他把钱递到她面前，最后她还是收下了，两个人都感到轻松了。临走，他让她问候施泰凡，她点点头说，她很快会去他办公室找他。

从远处，布鲁诺再次回头冲她大声说："别老一个人待着。否则你早晚会孤独死的。"

回到家里，女人站在镜子前，长时间地看着自己的眼睛。她并不是在观察眼睛，仿佛这是一种能安静地反思自己的可能性。

她开始大声说话："你们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你们越觉得可以对我指手画脚，我就离你们越远。有时候我觉得，人们刚知道别人的某些新情况，其实已经不是这么回事了。如果以后有人想告诉我，我是什么样的——哪怕他是想讨好我或者鼓励我——我一定会禁止他这样做。"她伸展双臂：毛衣的腋下有个洞，她把一个手指头伸了进去。

她立刻开始重新摆放家具；孩子帮助她。两个人站在不同的角落，打量着变化了的房间。外面下起了大雨，冬季的雨，像冰雹一样砸在坚硬的地上。孩子推着一个地毯刷来回来去清扫地毯。女人光着脚在平台上用旧报纸擦玻璃。她把去污剂喷洒在地毯上。她把报纸和旧书扔到一个垃圾袋里，旁边已经放着几个满满的、扎紧了口的袋子。她用一块抹布擦门口的信箱；在客厅里站在一个梯子上，拧下旧的灯泡，换上一盏新的，比原来的亮多了。

晚上，房间里灯光明亮，棕色的桌子上铺了白色的桌布，摆好了两个人的餐具。桌子中间点燃了一根粗壮的黄色蜂蜡蜡烛，能听到蜡烛融化的声音。孩子叠好餐巾，放到盘子上。在轻柔的宴会音乐声中（"单元里的宴会音乐"，这曾经是布鲁诺的表达方式），他们面对面坐下。当他们同时打开餐巾时，女人愣住了，孩子问她是不是又抑郁了。女人长时间地摇头，否认了，同时感到惊讶。她揭开锅盖。

吃饭时，孩子说："学校里又有新鲜事了。我们班现在只要四分钟就能脱了大衣和鞋子，换上拖鞋和学校的大褂。校长今天计时了，用一个真正的秒表。这个学年开始时，我们还是十分钟呢！校长说，

到学年结束，我们肯定能轻松地把纪录缩短到三分钟。要不是胖尤尔根半天解不开大衣扣子，我们本来今天就能这么快的。后来他哭了一上午。休息的时候，他还藏到大衣里，还尿裤子了。你知道我们要怎么达到三分钟吗？我们会在楼梯间就开始跑，一边跑一边脱衣服！”

女人说：“所以你这么冷的天还要穿薄大衣——因为扣子容易解开！”她笑了。孩子说：“别这么笑。你笑起来像胖尤尔根一样：他总是努力让自己笑。你从来没有真正高兴过。只有一次，你为我而高兴——那是游泳的时候，我突然不用救生圈就游到了你身边。那次，你抱住我，真的欢呼起来。”

女人：“我根本想不起来了。”

孩子：“但我能想起来。”他恶毒地嚷着，“我能想起来！我能想起来！”

夜里，女人坐在窗边，拉上窗帘，读书，旁边摆着一本厚厚的字典。她放下书，又拉开窗帘。一辆汽车正拐进车库的院子，人行道上，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正牵着狗出门，仿佛一切都逃不过她的眼睛似的，她立刻抬头看着窗户，并挥了挥手。

女人推着购物车穿过超市狭窄的通道。这种通道窄到只能通过一辆购物车，如果有人从对面走来，就必须拐到另外一条通道去。一个工作人员正把空购物车推到一起，空空的购物车咣当咣当地响着，还有收款机嘎啦嘎啦的声音，空瓶回收处的摇铃声。同时，超市的音乐震耳欲聋，间或插播当日、本周和本月的优惠信息。女人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越来越平静地看着周围。她的眼睛开始发亮。

在一条比较安静的通道，她遇到了弗兰齐斯卡。弗兰齐斯卡说：“我刚才在面包柜台看到，他们用纸为一个本地女顾客包面包，而对后面一个南斯拉夫人就直接递到手里……平常我都是到我家附近拐角的那家零售店去买东西，哪怕那里的生菜经常是打蔫儿的，或者像现在这种天气就冻了。但是，要是一个月都在这里经历这样的不友善态度，那可没人受得了。”

两人都被别人撞了一下，女人说：“我在这里还感觉挺好。”

弗兰齐斯卡指了指一堵塑料泡沫隔墙后的监视孔，那里有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正监视着顾客们。超市里噪音很大，她们只能大声嚷嚷：“有这么个活死人，你是不是有安全感啊？”

女人：“他挺适合超市。超市挺适合我。至少今天是这样。”

她们在一个收款台排队。弗兰齐斯卡突然轻轻抚摸女人的胳膊肘。她有些尴尬地说：“我们肯定又站错队了。左右两边的队都比我们走得快，就我们这队不动。我每次都这样。”

超市外面拴着几条狗，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弗兰齐斯卡挽着女人的胳膊说：“明天晚上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吧。其他人都盼着你来。现在那里有一种感觉，就是脑子里都明白了，但生活却还是另一回事。我们需要有个能在世界的前进中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的人。简单说吧，一个有点儿胡思乱想的人。你知道我的意思。”

女人：“最近一段时间施泰凡晚上不愿意一个人待着。”

弗兰齐斯卡：“这个原因你可以在任何一本心理学概论里找到答案。布鲁诺也受不了一个人。他说，每当这时候，他都会犯一些小时候的老毛病。另外，你昨天晚上看没看电视里关于孤独者的纪录片？”

女人：“我只记得里面有一段，采访者对一个人说：‘请您谈一件关于孤独的事！’而被问到的人只是沉默不语地坐着。”

停了一会儿，弗兰齐斯卡说：“明天能来还是来吧。我们不像平常那些女人聚在餐馆里叽叽喳喳。”

女人朝停车场走去，弗兰齐斯卡在她身后大声说：“玛丽安娜，可别一个人喝酒啊。”

她提着满满的购物袋子继续走。购物袋的提手拉断了，她只好用一只手托着。

晚上，女人和孩子坐在电视机前。终于，孩子跳起来关了电视机。女人迷乱而吃惊地说：“噢，谢谢。”她揉揉眼睛。

门铃响了；孩子跑去开门，她恍恍惚惚地站起来。出版商从门缝里迅速挤了进来。他是个粗壮又有点儿好动的人，五十岁左右，说话时习惯不断靠近谈话对象。这时，他的声音就会有一点点加重。（反正是他认为要讲什么重要的事了，他只是发挥一下，让别人感觉到，他不需要显示自己。包括他与非常熟悉的人在一起时，他也会一开始表现出好像是刚刚被叫醒似的漫不经心，然后，好像才真正醒过来，恢复状态。他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好像是主人一样，他的自来熟风格，常常会令人感到惊奇，并且会让人跟他保持距离。只有遇到一个非常沉默寡言的对象时，他才会有所收敛，才会在他不停的交谈中休息片刻。）

他一手拿着花，一手拿着一瓶香槟酒。

他说：“我知道您是一个人，玛丽安娜。一个出版商必须具有能从字里行间读出些什么的能力。”

他递去手里的东西：“十年了！您还认得出我吗？反正，我还记得当时您在出版社告别聚会上的一切细节，玛丽安娜。我尤其记得您某一只耳朵后面散发出的铃兰香味。”

孩子站在那里听着。女人问：“您今天闻到什么味儿了？”

出版商吸了一口气。

女人：“是紫甘蓝味儿。这种味道几天都散不掉。但是孩子们喜欢吃。——我去拿两个汽酒杯子。”出版商大声说：“不是汽酒！是香槟！”很快，他换了一种语气说：“顺便问一下，法语里紫甘蓝怎么说？”

女人说：“Choux de Bruxelles。”

出版商拍了拍手说："考试合格！我给您带来了一本法国女人的回忆录，里面有许多这样的词。您明天就可以开始翻译了。"

女人："为什么不今天晚上就开始呢？"

出版商："金龟子在飞。"

女人："您怎么会想到金龟子呢？"

出版商："可能使我想到了铃兰。"

女人只是微笑了一下："您打开酒瓶吧？"她把花拿进厨房。出版商摇晃着香槟酒瓶子；孩子看着。

他们坐在客厅里喝酒，孩子也跟着喝了一点儿。隆重地碰了一下杯后，女人抚摸着孩子。出版商说："我本来也是来这附近办事的。我的一个作者住在附近。他让我很担心，是个非常难办的事。他不写了，我担心他再也写不出来了。当然，出版社会每个月资助他，直到责任期满。我今天晚上又催他了，至少要写出本自传——传记现在很受欢迎。但他只是摆手；他不再跟任何人说话，只是发出一些声响。玛丽安娜，等待他的将是一个可怕的晚年，没有工作，没有人陪。"

女人很令人惊讶地激动地说："您其实根本不了解他。也许他有时候感到很快乐呢。"

出版商转身对孩子说："现在我给你把桌子上的酒瓶塞变走。"孩子盯着桌上的瓶塞。出版商一只手指着空气说："它飞了。"但孩子仍然不错眼珠地盯着瓶塞，于是，出版商只能放下胳膊。

他很快地对女人说："您为什么要替那个男人辩护？"女人挠起孩子的痒痒，好像代替了回答。她亲了亲孩子的头，抱起孩子放在腿上，拥抱着他。

出版商："您不愿意跟我在一起？我感觉，您没完没了地弄孩子，只是为了不必搭理我。您为什么要玩这个妈妈—孩子的游戏呢？你是怕我吗？"

女人推开孩子说："也许您说得有道理。"然后她对孩子说："去睡觉吧。"

孩子没有反应。然后她抱起他离开。

她一个人回来时说："施泰凡今天不想睡觉。香槟让他想起了除夕夜。除夕夜他可以一直到半夜不睡觉。"出版商拉着女人在自己身边坐下，要一起坐在一张宽大的椅子上，女人似乎宽容地坐下了。

出版商慢慢地问："哪个是您的杯子？"

她指了指自己的杯子，出版商端起来说："我现在想用您的杯子喝，玛丽安娜。"然后他闻了闻她的头发："我喜欢，您的头发只是头发的味道。这不是嗅觉，而是立刻会变成一种感觉。我也喜欢您走路的样子：那不是一种特别的姿势，不像其他女人那样；您只是自然地走着，这样真好。"

女人自己微笑了一下，然后转向他，仿佛她现在有了说话的兴趣："有一次，一个女人来我这儿，是位淑女。她跟施泰凡玩儿。突然，施泰凡抓住她的头发说：'你有味儿！'那个女人非常吃惊：'是厨房的味儿吗？''不是，是香水味儿。'施泰凡回答。——然后，那个淑女松了一口气。"

过了一会儿，出版商看着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仿佛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孩子叫她，但她没有反应，而是好像好奇地也看着他。出版商垂下目光说："您的袜子脱丝了。"她做了个无所谓的手势。孩子又叫她了。她站起身来，但没有马上走开。

女人回来后，坐到了出版商对面自己的老位子上。她说："我不喜欢这个房子曲里拐弯的设计，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总是要拐个直角弯，而且总是向左拐。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讨厌拐弯；反正它就是让我很烦。"出版商说："那您就把它写下来，玛丽安娜。否则，有一天就突然没有您了。"

孩子第三次叫她了，她立刻过去了。

出版商一个人，神情疲惫。他的头垂向一边。他立刻坐直身子，接着笑了，仿佛是笑自己，然后又允许自己放松身体，后背稍微弯曲一些。

女人回来了，就站在他对面。他抬起头看着她。她把一只手放在他额头上，然后在他对面坐下。他拿起她放在桌子上的手亲吻着。他们长时间沉默着。

她说："要我给您放音乐吗？"出版商立刻轻轻摇了摇头，仿佛他知道她要问这个问题。他们沉默着。出版商问："您的电话从来不响吗？"

女人："最近几天几乎没响过。冬天本来电话就很少。也许春天会多一些。"

长时间的安静之后，女人说："施泰凡现在肯定睡着了。"然后又说："要不是您刚成了我的雇主，我可能敢在您面前表现出我累了。"

出版商说："而且酒瓶也空了。"

他站起身了，她陪他走到门口。他拿着自己的大衣，低垂着头，挺直身子。突然，她拿过他手里的大衣说："我们再喝一杯吧。我现在突然感觉，我们每一分钟都会错过一些永远不会再来的东西。您知道，死亡。请您原谅我说这个词。反正这个词现在让我很伤心。我希望您别误解我。厨房里还有一瓶勃艮第红酒。它酒劲很大，喝完了能睡个好觉。"

他们站在客厅的窗户前，喝着红酒。窗帘没有拉上；他们看着窗外的花园，外面正下着雪。

出版商说："不久前，我刚跟一个女朋友分手，分手的方式很奇特，所以我想跟您说说。那天夜里，我们坐出租车。我一只手搂着她，我们都看着一侧的车窗外面，我们感觉很好。您肯定也知道，她是个很年轻的姑娘，刚刚二十岁，我非常喜欢她。我突然看到外面的人行道上有个男人走过。当时外面很黑，我看不清他的样子。我只是看到，那人很年轻。突然，我想像，身边的女孩看到那个男人会意识

到，坐在自己身边搂着自己的是个老男人，她肯定会在这一刻觉得我恶心！这个想像让我感到震惊，所以我立刻把手从她肩上拿开。虽然我还继续跟她坐在车上，一直陪她到她家门口，但是我随后跟她说，我不想再见她了。我朝她吼叫，让她消失，我受不了她了，我们之间完了。然后我立刻走了。我敢肯定，她到今天都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她。很可能她看到人行道上的那个男人时什么都没想。可能她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

他喝干了杯子里的酒。他们沉默地看着窗外，正好那个老妇带着狗走过，并且马上朝上面打了个招呼；她打着一把伞。

出版商说：“跟您在一起真好，玛丽安娜。不，不是好，而是很不同。”

他们朝门口走去。出版商：“我会让您的电话有响起的时候，哪怕是在深冬。”

在打开的门边，她问已经穿上大衣的他，是不是开车来的。出版商：“对，但是有司机。他在车里等着呢。”

女人：“您让他等了这么长时间？”

出版商：“他习惯了。”

车子在门口等着。司机坐在昏暗的车里。女人：“您忘记把那本要翻译的书给我了。”

出版商：“在车里。”

他朝司机招了招手，司机马上把书送了过来。

出版商把书递给女人，她问：“您是想试探我吗？”

出版商停了一会儿说：“玛丽安娜，您要开始很长一段时间的孤独了。”

女人：“最近所有人都这么威胁我。”她转头向站在旁边的司机说：“您呢，您也威胁我吗？”司机不知所措地笑了笑。

夜里，女人一个人站在过道里看书。她头顶上的天窗，在积雪下发出轻微的声音。她开始读出声来："Au pays de l'idéal：J'attends d'un home qu'il m'aime pour ce que je suis et pour ce que je deviendrai."她试着翻译："在理想国：我期待遇到一个男人，他爱我，爱我现在的样子和我将会成为的样子。"她耸耸肩。

白天，她坐在桌边的打字机前，戴上眼镜。她把要翻译的书，按照每天能完成的页数，分成几部分，用铅笔标上计划的日期：结束的日期将是春季的一天。她一边翻着字典，一边用一根针清洁打字机上的一个字母键，一边用抹布擦拭着键盘，断断续续写着："迄今为止，所有男人们都削弱了我。我丈夫对我的评价是：'米谢勒很能干。'实际上他希望的是，我能在他不感兴趣的事情上能干些：比如孩子、家务、税务。但是，在我的工作方面，他却打击我。他说：'我妻子是个爱做梦的人。'如果做梦意味着自己是什么样就什么样，那我愿意当一个爱做梦的人。"

女人抬头看着平台，孩子正一手提着书包，在那里跺掉鞋子上的雪。他从平台的门进来，笑了。女人问他为什么笑。

孩子："我还从没见过你戴眼镜。"

女人摘下眼镜，又戴上说："你回来这么早。"

孩子："今天又取消了两节课。"

女人继续打字，孩子靠近她坐下来。孩子异乎寻常地安静。女人停下来，抬起头来说："你饿了，对吗？"孩子摇摇头。女人："我做事情打扰你吗？"孩子自己笑了笑。

于是，女人移到卧室窗边的桌子上去工作，抬头就能看到云杉。孩子和他的胖朋友出现在门口："外面太冷了。我们又不能去尤尔根家，他们家正在打扫卫生呢。"

女人："他们家不是昨天就打扫卫生了吗？"孩子耸了耸肩；女人重新开始工作。

孩子们站在门口。虽然他们没有动，女人还是察觉到了，她转过身来。

后来，她打字时，听到隔壁房间传来唱片的声音：是配音演员的声音，在模仿孩子和精灵说话。她起身穿过过道走进孩子的房间，看见一张唱片在一架小唱片机上转着，一个人都没有。她关掉唱机。这时，两个孩子喊叫着从窗帘后面冲出来，好像要吓唬女人。女人也确实被吓了一跳，因为两个孩子互相换了衣服。

她对他们说："你们听着，也许你们不觉得我是在工作，但我确实在工作。所以，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不被打扰。因为我工作的时候不能想别的，这跟做饭不一样。"

孩子们看着她，然后开始互相做鬼脸。

女人："请你们理解我。"

孩子："你现在给我们做点什么吃吗？"

女人低下头。然后孩子生气地说："我也难过，不光是你会难过。"

她坐在卧室的打字机前，没有打字。房子里很安静。孩子们从过道走了过来，小声说着话，吃吃地笑着。突然，女人把打字机推到一边，打字机掉到地上。

在附近一家大型购物中心，她把巨大的商品包装堆到购物车里，然后推着购物车从一个商品部到另一个商品部，直到购物车满得再也堆不下了。她在收款台前排在长队里。她前面顾客的购物车都跟她的一样满。在购物中心前面的停车场上，她推着沉重的购物车走向自己的汽车，购物车的轮子不时歪向一边。她的东西塞满了汽车，就连后

座上都装满了，她看不到后窗外面。到了家，她把这些东西都搬到地下室里，因为所有的柜子和冷藏柜早就装满了。

夜里，她坐在别墅客厅的桌边，把一张纸装到打字机上。她静静地坐在打字机前。过了一会儿，她把双臂伸到打字机上，把头放在手臂上。

夜深了，她还是这个姿势，已经睡着了。

她醒过来，关了灯，走出客厅。她脸上印着毛衣袖子上的图案。小区里只有路灯还亮着。

他们去市中心布鲁诺的办公室看他。从窗户往外看，能看到城市的全景。布鲁诺跟她和孩子坐在屋角的一张桌子边，孩子在读一本书。

他看着孩子："弗兰齐斯卡说，施泰凡最近明显变得沉默寡言。而且他不洗澡了。弗兰齐斯卡认为，这意味着……"

女人："弗兰齐斯卡还认为什么？"

布鲁诺笑了，女人也跟着笑了。

当他把手伸向她时，她往后缩了一下。他只是说："玛丽安娜。"女人："请原谅。"

布鲁诺："我只是想靠近些看看你的大衣。好像掉了颗扣子。"

他们无望地沉默着。

布鲁诺对孩子说："施泰凡，我现在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吓唬进我办公室的人的。"他抓住女人的胳膊，微笑着看着孩子，表演道："首先，我把我的受害者和他的椅子挤到一个非常狭窄的角落，让他觉得自己很无力。我在他面前很近的地方说话。如果他是个上了年纪

的人，”他突然用耳语般的声音说，“我就会用特别小的声音说话，让他以为自己已经耳背了。穿什么鞋，也是很重要的，要穿这种皱胶底的鞋，比如我脚上的这双，这是权力之鞋。而且必须擦得锃亮！你必须要能散发出一种神秘的气息。而最重要的是一张有威慑力的脸。”他在女人面前坐下，开始紧紧盯着看。同时，他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弯回小臂，把手指握成拳，但没有全部握回来：大拇指还竖着，好像要戳人一样。他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一边把嘴撇向一边，并保持着这个姿势说：“我让人从美国带来一种特殊的药膏：我把这种药膏抹在眼睛周围，就可以不眨眼睛；或者涂在嘴周围，嘴就可以不抽动。”他真的把一种药膏抹在眼睛周围：“这就是我权利的注视。我希望，它能很快让我当上公司董事。”他继续一动不动地盯着看，女人和孩子也看着他。

他挥了挥手，站起身来对孩子说：“我们下星期天去暖房看食肉植物。或者去天文馆！我们去看穹顶上演示的南十字星座，就像夜空一样——好像我们真的就在南海边。”

他送他们两人去门口。在门口，他在女人耳边说了句什么。她看着他，然后摇摇头。布鲁诺过了一会儿说：“玛丽安娜，事情还没有解决。”他让他们出了门。一个人的时候，他挥拳打在自己脸上。

女人和孩子走出写字楼，走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冬日下午的阳光很晃眼，他们眯起了眼睛。他们沿着一条允许机动车通行的马路朝市中心方向走去。街道左右两侧都是银行大楼，玻璃立面里相互映照出对方的影子。在一个行人红绿灯前，孩子模仿着灯上人形的动作，停下的样子，过马路的样子。在步行街上，孩子在很多商店橱窗前停下来，女人在前面很远的地方等他。她每次都要走回来把孩子拉走。每隔几步张贴着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报纸的晚报版广告，标题都一样。暮色降临时，他们走上了一座过河的桥。车辆很多。孩子在说什么。女人向他打手势，表示她听不见，孩子挥了下手。他们在暮色中沿着河走，孩子的节奏跟女人不一样：他停一下，然后跑几步到前面去，所以，女人一会儿要等他，一会儿要追他。有一段时间，她走在他身边，用自己的步伐告诉他走路要流畅，并默默地用手势催促他。当孩子在离她比较远的昏暗之处盯着一丛灌木看时，她跺着脚催他走，结

果鞋跟断了。两个小年轻从她身边走过，朝着她的脸打了个嗝。她和孩子走进河边的一个公共厕所，孩子不敢一个人进去，所以她不得不陪着孩子进男厕所。他们把自己锁在一个小隔间里，女人闭上眼睛，背靠着门。旁边隔间的隔断墙上——隔断墙没有一直到天花板，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的头，他是跳起来看的；然后他又跳了一次。接着，这个男人狞笑的脸出现在他们的脚边，因为隔断墙也没有接着地面。她跟孩子逃出厕所，飞快地跑了，因为鞋跟断了，跑起来一瘸一拐的。当他们路过一个低层住宅时，看见屋里的电视已经打开了，正好有一只巨大的鸟从画面的前方飞过。一个老妇在马路中间脸朝下摔倒了。两辆车撞在一起，开车的两个男人冲下来，一个要打另一个，另一个则死死拽住对方。这时几乎已经是夜里了，女人和孩子站在市中心，在两幢银行大楼之间，一个快餐店旁边，孩子正在吃一个咸面包圈。马路上汽车的声音很大，仿佛正在发生一场有规律的灾难。一个男人走到售货亭边，用手捂着心口，请求给他一杯水来吃药。他蹲下身子，缩成一团。各个教堂的夜晚钟声敲响了，一辆消防车驶过，接着是好几辆闪着蓝灯、响着警报的救护车。灯光在女人的脸上闪烁。她额头上渗出了汗珠，嘴唇干裂了。

晚上，她站在家中客厅里那面没有窗户的墙边，在写字台上那盏阅读灯的灯影里。四周寂静无声。远处有狗叫声。然后电话响了。她让电话响了几声。她轻轻接起电话。出版商用法语说，她的声音今天很奇怪。

女人：“可能是因为我正在工作吧。我发现了，我工作的时候声音会变得不一样。”

出版商：“您是一个人吗？”

女人：“孩子跟我在一起，他睡了。”

出版商：“我也是一个人。今天夜里天非常晴朗。我一直能看到您住的那个山坡上。”

女人：“我愿意在白天见到您。”

出版商：“您也在勤奋工作吗，玛丽安娜？还是您只是闲坐着，看着窗外的荒野？”

女人：“我今天跟施泰凡进城去了。他不理解我。银行大楼、加油站、地铁站，他觉得这些都好极了。”

出版商：“也可能那些东西真的有一种新的美，只不过我们还不能看到。我也喜欢城市。从出版社的平台上，我能一直看到机场，看到飞机的起降，而听不到它们的声音。那是一幅非常柔美的画面，能让我内心深处感到振奋。”

过了一会儿，出版商说：“您现在要干什么呢？”

女人：“我要穿上漂亮的衣服。”

出版商：“也就是说我们见面？”

女人：“我穿上漂亮衣服是为了继续工作。我突然来兴致了。”

出版商：“您吃药吗？”

女人：“有时候——是为了不睡着。”

出版商：“我还是什么都不说了吧，因为您把每个劝告都理解成威胁。只是您要当心，不要像我的很多译者那样，最后都变得目光柔弱而忧伤。”

她让他先挂了电话，然后从壁橱里拿出一条真丝连衣裙。她站在镜子前试戴一条珍珠项链，又立刻摘了下来。她默默地从侧面打量着自己。

晨曦中的小区，路灯刚刚熄灭。女人一动不动地坐在写字台边。

她闭着眼睛，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然后，每次都用脚后跟转身，又来来回回地走。她倒退着走，非常快，转弯，又转弯。她站在厨房里，面前的水槽里堆着用过的餐具。她把餐具放进洗碗机，打开配餐

柜上的晶体管收音机，收音机里立刻传出晨间音乐和播音员欢快的声音。她关掉收音机，弯腰打开洗衣机，取出里面缠绕在一起的湿床单，平铺在厨房地上。她用手使劲挠着发际线，一直挠到皮肤渗血。

她打开门口的信箱，里面塞满了广告宣传单；没有任何手写品，就是有，也是广告里模仿的手写体。她把这些纸揉成一团撕掉。她在屋里走来走去做家务，一会儿停下来，一会儿回身，一会儿弯腰，路过时顺便擦掉一块污迹，或者捡起地上的一个米粒扔到厨房垃圾桶里。她坐下，又站起来，走几步，又坐下来。她拿起靠在墙角的一个纸卷，把纸散开，然后又卷上，最后又放回去，在原来位置旁边一点儿的地方。

孩子坐在一边看着她，看她这儿一下那儿一下地忙着。她用刷子清扫孩子坐的那个沙发椅，打了个手势让他起来。孩子刚站起来，她就用胳膊肘把他推到一边，立刻扫起孩子刚坐过的地方，其实那里根本不脏。孩子往后推了一步，静静地站在那里。突然，她用尽全力把手里的刷子扔向孩子，但没有打中，只是打碎了一个玻璃杯。她握紧双拳走向孩子，孩子只是看着她。

门铃响了：他们两人都争着跑去开门。她推了孩子一把，孩子仰面倒在地上。她打开门，却没有看到人。然后她往下一看，孩子的那个胖朋友正蹲在门边坏笑。

她呆呆地坐在客厅里，孩子和他的胖朋友大声唱着歌从椅子上往垫子上蹦："屎跳到尿上，尿跳到屎上，屎跳到痰上……"他们边唱边发出尖叫，笑得直不起腰来。然后，他们相互耳语了几句，指指点点地看着女人，又开始笑。他们不停地笑，女人毫无反应。

她坐在打字机前。孩子踮着脚尖走过来，靠在她身上。她用肩膀把孩子顶开，孩子站在她身边。女人把孩子拉到自己怀里，突然掐住他的脖子，摇晃他，然后放开他，把目光转向一边。

夜里，女人坐在桌旁。她哭了，默默地，一动不动。

白天，她去外面，在平坦、开阔、冰冻的户外，她走在一条笔直的路上。她一直走，一直向前走。直到天黑了，她仍然这样走着。

在这个小地方的电影院里，两个孩子互相推搡，银幕上正放映一部动画片，发出巨大的声响。她打着盹儿，突然又醒了。然后，她把头靠在孩子的肩膀上，孩子张着嘴看着电影。她睡着了，头靠着孩子的肩膀，直到电影结束。

夜里，她站在打字机前，读着自己的翻译："'没人帮助您吗？'来访者问。——'没有，'她回答说，'我梦想的男人，应该爱我的独立性格。'——'那您会爱他的什么呢？'——'他的这种爱。'"她耸了耸肩，突然伸出舌头。

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床头柜上有一杯水和一把折叠刀。外面，有人在拼命敲打百叶窗。她打开折叠刀，爬起来，穿上睡袍。是布鲁诺的声音："马上打开门，要不我就踹门了。快开门，要不我就炸了这房子！"她放下刀，打开灯和平台的门，让布鲁诺进来。他大衣和衬衫都敞着。他们面对面站着，然后穿过过道走进客厅，客厅里亮着灯。他们又面对面地站着。

布鲁诺："你夜里也开着灯。"他四处看看："你还重新摆放家具了。"他拿起几本书："你现在看的书也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他靠近女人："我给你从远东带回来的化妆包，你大概也不用了吧。"女人："你不脱了大衣吗？你想喝杯伏特加吗？"

布鲁诺："你还是用'您'来跟我说话吧。"

过了一会儿，布鲁诺说："你呢？你得癌症了吗？"

女人没有回答。

布鲁诺："这儿允许抽烟吧？"他坐了下来。她站着。

布鲁诺："你就是这样让自己过得好的，一个人，跟你的儿子，在一所温暖漂亮的别墅里，有花园、车库和新鲜的空气！你多大岁数了？很快，你的脖子上就会堆满皱纹，你脸上的色斑上会长出毛，你的腿会变成青蛙腿那样细，上面的身体会成为一个松松垮垮的口袋。你会变得越来越老，但你会说，这没关系，然后有一天，你会自己上吊而死。你会这样懵懵懂懂地进入坟墓，就像你懵懵懂懂地生活过一样。你要怎样度过死之前的时间？很可能你就这么呆坐着，啃着自己的手指甲，对不对？"

女人说："别嚷嚷，孩子在睡觉。"

布鲁诺："你说'孩子'，你不能对我提他的名字吗！你总是这么理智！你们女人们病态的理智！对一切事物和人的残酷理解！你们这些废物，从来不会觉得无聊。你们高高兴兴无所事事地让时间溜过。你知道你们为什么一事无成吗？因为你们从来不会一个人喝醉！你们像高傲的照片一样，懒洋洋地坐在你们舒适整洁的房子里。你们故作神秘，为一点屁事兴奋不已，你们是出色的伙伴，能用你们无聊的人性杀死别人，你们是摧毁一切生命力的机器。你们在地上爬来爬去，到处嗅来嗅去，直到死亡撬开你们的嘴边。"他朝旁边啐了一口："我还没见过一个永远改变自己生活的女人。也就是橱柜——然后又是老一套。你知道吗，你现在做的一切，以后你会像翻看发黄的旧报纸一样翻过，作为你一生中惟一的时间！那时候你就会明白，你只不过是在赶时髦，玛丽安娜，就像一个冬季的时髦！"

女人："你来之前就想好了这些话，对吗？你根本不想跟我交谈，根本不想跟我在一起。"

布鲁诺嚷道："我更情愿跟一个鬼魂交谈！"

女人："布鲁诺，你看上去非常难过。"

布鲁诺："你说这些就是为了让我无力反抗。"

他们沉默着。然后布鲁诺笑了。他转过身，很快就控制住自己："我是走路来的。我想打垮你。"女人靠近他。他说："别碰我。请你别碰我。"过了一会儿，他说："有时候我觉得，你可能只是在跟我做个试验；现在发生的一切，只是在考验我。这个想法能让我稍微

平静些。”过了一会儿：“昨天我在想，要是有个上帝，有时候也挺好。”

女人长时间看着他说：“你刮掉胡子了。”

布鲁诺摆了一下手：“一个星期前就刮了。——你换新窗帘了。”

女人：“没有，还是旧的。——你要是给施泰凡写信，他会高兴的。”

布鲁诺点点头，女人笑了。

他问她为什么笑。

她回答说，她只是突然想到，他是这几天来惟一跟她交谈的成年人。

他们就这样站着，每个人做着自己的小动作，过了很长时间，布鲁诺问她怎么样。

女人仿佛在说别人一样平静地回答说：“一个人待在家里，很容易就累了。”

她陪他走到街上。他们并肩走着，到了电话亭。突然，布鲁诺停下来，卧倒在地上，脸朝下。她蹲在她身边。

寒冷的上午，女人坐在平台的秋千椅上，一动不动。孩子站在她旁边，看着自己嘴里呼出的白气。女人看着远方。她身后的玻璃窗上映射出云杉的影子。

晚上，她走在这个小地方空旷的街道上，仿佛在朝着一个目标走去。在一个巨大的落地窗前，她停了下来。里面亮着灯，几个女人坐在一个像教室一样的房间里，前面有黑板，弗兰齐斯卡正用粉笔在上

面画一个国民经济流程图，听不见她在说什么。笔记本都合上了，弗兰齐斯卡走到她们中间。她说了些什么，其他人都笑了起来，但不是放声大笑，而是会心地笑。有两个女人伸出胳膊相互搂着。一个女人在抽着烟斗。另一个女人替同桌轻轻擦掉脸上什么东西。弗兰齐斯卡停止了说话，几个女人举起手。弗兰齐斯卡数了一下，然后又有另外几个女人举起手。最后，所有人像鼓掌一样一起敲桌子。女人们的样子显得很平和：好像这不是一个小组，而是每个人出于自己的需要走到一起来了。

女人离开了窗户。她走在空旷的小城里。教堂的钟敲响了。她走过教堂时，里面传出了歌声和管风琴声。

她走进教堂，站在旁边一个角落里。一排排的长凳之间站着许多人，跟着牧师唱圣歌；中间有人咳嗽。一个孩子坐在大人两腿之间的地上，吃着自己的大拇指。管风琴发出轰鸣声。过了一会儿，女人走了出去。

她沿着夜色中的林荫路，朝住宅区走去，边走边做出一些手势，仿佛在跟自己说话。

夜里，她一个人站在厨房，喝光了一杯水。

明亮的中午，女人和弗兰齐斯卡穿得整整齐齐的，并肩坐在平台的两个秋千椅上。她们看着孩子，孩子们正在砍一棵干枯的圣诞树，想用干树枝点火。

过了一会儿，弗兰齐斯卡说："我理解你当时不能进来和我们在一起。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特别是我从安静的家走到聚会地点，我会突然之间因为毫无兴趣而变得非常疲惫，不想加入到聚会中……"

女人："我在等着你说'但是'。"

弗兰齐斯卡："我以前也跟你一样。比如说，我会在某一天不能说话。我只能写纸条跟别人交流。或者，我会几个小时地站在打开的衣柜前哭泣，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该穿什么。有一次，我跟男朋友去一

个地方，路上，我突然不走了。我站在那儿，他劝说我。那时候，我当然还很年轻……你没有渴望幸福的要求吗？跟别人一起？”

女人：“没有。我不想幸福，最多只是满意。我害怕幸福。我觉得我脑子里承受不了幸福。我会彻底疯掉，或者死掉。或者我会杀人。”

弗兰齐斯卡：“那你就想一辈子这样一个人？你就不渴望有一个人，一个心灵和肉体都是你朋友的人？”

女人大声说：“当然。当然。——但是我不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就算我跟他永远在一起，我也绝对不想认识他。我只有一个要求，”她好像在笑自己似的说，“我只希望他笨手笨脚，是个笨蛋；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她打断自己说：“弗兰齐斯卡，我这样说话像个没长大的人。”

弗兰齐斯卡：“但是我能解释你为什么想要一个笨蛋！你父亲不也是这样一个人吗？上一次他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他隔着桌子跟我握手，一下子把手伸到芥末瓶子里了。”

女人笑了，正在玩的孩子转身看着她，仿佛这笑声在他母亲身上是不寻常的。

弗兰齐斯卡：“顺便告诉你，他今天下午坐火车来。我是发电报请他来的。他希望你们去车站接他。”

过了一会儿，女人说：“你不该这么做。我现在不需要任何人。在大家看来，这一切都无关紧要。”

弗兰齐斯卡：“我感觉，你现在觉得这个屋子里的其他人都是些陌生的噪音。”

她把手放到女人的胳膊上。女人说：“我正翻译的那本书里引用了波德莱尔的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他惟一能理解的政治行动是造反。我突然想到：我惟一能理解的政治行动是持刀杀人。”

弗兰齐斯卡：“一般认为男人才会这么干。”

女人：“你跟布鲁诺在一起怎么样？”

弗兰齐斯卡：“布鲁诺是那种似乎只适合快乐的人。所以他现在完全不知所措。就像演戏一样！他快烦死我了。我会把他轰出去的。”

女人：“弗兰齐斯卡。你总是这样说别人。但是到最后，都是别人离开你。”

过了一会儿，弗兰齐斯卡打了一个抗议的手势，令人惊讶地说：“其实你说得对！”

她们相互看着。然后女人朝孩子们喊道：“孩子们，今天别打架！”——两个孩子正好像互相生着气，背朝着对方站着，那个胖孩子好像很难过。

胖孩子解脱般地笑了，两人开始慢慢朝对方走去，尽管还都低着头。

女人和孩子在小城的终点站等着。火车进站后，一个戴眼镜的苍白老人在一扇车窗后挥手，那是她父亲。很多年以前，他曾是个著名作家，现在只是用复写纸誊写一些随笔和幽默故事给报社投稿。下车的时候，他打不开车厢门，女人从外面打开门，帮他下到站台上。他们相互打量着，然后都高兴地笑了。父亲耸起肩膀，向四周看了看，抹了一下嘴唇说，他的手摸过火车，现在都是金属味儿。

到了家，他和孩子坐在地上，孩子从旅行包里掏出给他的礼物：一个指南针，一个色子游戏。孩子指着屋里屋外的各种东西问外公它们的颜色。外公经常说错。孩子说：“你还是色盲啊！”外公：“我只不过是没学过看颜色。”女人走过来，手里端着一个银托盘，上面放着浅蓝色的茶具。刚倒出的茶冒着热气，父亲用茶壶暖着手。他坐在地上时，兜里的硬币和钥匙都掉了出来。女人捡起这些东西说：“你现在又把钱乱塞在衣兜里。”父亲：“上次你送我的钱包，我回家的路上就丢了。”

他们喝着茶，父亲说：“前几天，我家里来客人。我一打开门就发现，来人全身都被雨淋湿了，正滴着水。而我刚刚打扫过家里！我把他让进屋里，跟他握手，却发现，我自己正站在门口的脚垫上拼命蹭我的鞋底，好像我是那个浑身湿透的客人。”他吃吃地笑着。

女人：“你还是老觉得自己干坏事被当场抓住了？”

父亲继续吃吃笑着用手挡着嘴说：“最难堪的就是躺在停尸床上的时候张着嘴。”

他喝茶的时候呛了一下。

女人说：“爸爸，你今天晚上在布鲁诺的房间睡吧。”

父亲回答说：“我反正明天就走。”

晚上，女人在客厅写字；父亲拿着一瓶葡萄酒，坐在离她很远的地方，看着她。然后，他走到她身边。她抬起头看了一眼，继续打字。他朝她弯下身来说：“我刚发现，你这件衣服上少了一粒扣子。”她脱下衣服递给他。

她继续打着字。他从一个饭店带回的针线包里找出针和线缝扣子。他又看着她。她感觉到了，于是询问地看着他。他道了歉，然后说：“你真漂亮，玛丽安娜！”她笑了。

她结束了工作，又做了些修改。父亲尝试着打开一瓶新的葡萄酒，半天都没成功。她过来帮忙。他去厨房给她拿个杯子。她大声告诉他杯子放在哪儿。但是，她还是听到父亲在厨房里翻找了半天，然后没有声音了。最后，还是她到厨房去帮他找到了杯子。

他们面对面坐着喝酒。父亲打了个手势。女人说：“说吧。你不就是为这个来的吗！对吧？”

父亲又开始打手势，他摆了下手说：“我们不出去走走吗？”他朝不同的方向指了指，然后说：“你小的时候，从来不愿意跟我一起

去散步。只要我一说出‘散步’这个词，你就不乐意了。但是如果是‘傍晚散步’，你立刻就会同意。”

他们走在夜里的街上，朝电话亭方向走去，经过一个个车库时，常常会听到汽车防护罩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在电话亭前，父亲说：“我得赶紧打个电话。”女人：“你可以在我家里打。”父亲只说了句：“我的女朋友等着呢！”就已经走进电话亭了。他打着电话，隔着棱纹玻璃听不清他说什么，只看见他有很多肢体动作。

他们朝山上走去，旁边是沉睡中的住宅区，偶尔能听到抽水马桶的声音。

女人：“你的女朋友，她说什么？”

父亲：“她就是问问，我是不是吃药了。”

女人：“还是去年那个女的吗？”

父亲打了几个手势说：“现在这个生活在另外一个城市。”

他们到了小区最上边，再往前就是森林了。天上飘着小小的雪花，落在干枯的橡树叶上，发出沙沙声，在冻住的狗尿上慢慢堆积起来。

他们停住脚步，看着山下平地上的灯火。他们脚下一幢房子里，有人开始弹钢琴，《致爱丽丝》。

女人问：“爸爸，你满意吗？”父亲摇了摇头，然后，仿佛光有手势还不够似的，又补充说：“不。”

女人：“你有没有设想，人能够怎样生活呢？”

父亲：“行了吧，别谈这个了。”

他们沿着森林外面继续走。女人又是抬起头来，让雪花飘落在脸上。她朝森林里看去，里面悄无声息，只有雪花轻轻飘落。在稀疏的

树木后面，远处有个人工水塘，水面闪闪发亮，有细细的小溪流进水塘，发出清亮的水声。

女人问：“你还在写作吗？”

父亲笑了：“你是想问，我是不是会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继续写作，对吗？”他转身朝着她说：“我觉得，我肯定是在某个时候开始朝着错误的方向生活了——我不是把责任推到战争或者其他外部事物上。现在，我有时候会觉得写作是个借口，”他吃吃地笑着，“有时候当然也不是。我太孤独了，常常在晚上睡觉前，都没有一个人可以想念，因为我白天就是一个人。如果连一个可想的人都没有的话，那还怎么写作呢？另外，我跟那个女的在一起，主要是想在万一猝死的时候，能及时被发现，不会让尸体躺那么长时间。”他又吃吃地笑了。

女人：“你别胡说八道了。”

父亲打了个手势，然后指着森林上面说：“那后面的山根本看不见了。”

女人：“你有时候也会哭吗？”

父亲：“哭过一次，对——是在一年前，当时是傍晚，我坐在家里。哭完后我就去散步了。”

女人：“你还像年轻时候那样，觉得时间过得很沉重吗？”

父亲：“噢，比以往都沉重。每天我都会有一次停在时间里不动。比如现在：天黑已经好几个小时了，可我还在想，夜才刚刚开始。”

他挥动着手臂在头顶上转圈。

女人模仿着他的动作，问这是什么意思。

父亲：“我刚把厚厚的毛巾裹在头上，想像着漫漫长夜。”

他不吃吃地笑了，而是放开声音笑着说：“玛丽安娜，你的结果也会跟我一样。这是我要提醒你的，说出这句话，我到这儿来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他们微笑着，女人说：“天冷了，是吧？”

他们沿着小区的另一边下山。父亲突然停了下来，竖起食指。女人边走边转身对他说：“爸爸，你突然想起什么事时，别老停下来。我小时候就特别烦你这点。”

第二天，他们在一家购物中心，走过一个大店铺的女装部。一个外国女顾客正穿着一件绿色套装，从试衣间出来照镜子，一个女售货员对她说：“这件衣服您穿着合适极了。”父亲走过去说：“这不是真话。这件衣服难看极了，根本不适合她穿。”女人赶紧走过来把父亲拉走了。

他们上了滚梯，到了顶头时他绊了一下。他一边继续走，一边看着她说：“我现在一定要看看我们两个在照片上的样子。这儿有快速自动照相亭吗？”他们站在自动照相亭前，有个男的正在更换洗相液。父亲弯腰看着那些贴在照相亭外面的样片：样片上是同一个年轻人的四张相片，照片上的人咧开上嘴唇、露出牙齿笑着。其中一张照片上还有个女孩。父亲审视着那个更换洗相液的人，他正关上盒子站起身来。然后，父亲惊奇地指着照片对他说：“这是您吧，对不对？”

那人站在照片旁边：他现在已经老多了，几乎秃顶了，笑得也不一样了。他只是点点头。父亲又打听那个女孩，但那人只是打了个好像是往身后扔东西的手势，然后走开了。

照完相，在等照片的时候，他们在附近闲逛。父亲在很多东西前站下来看。当他们又回到照相亭前时，正好有一条照片出来了。女人伸手拿过来，但照片上是一个陌生男人。

她回身寻找：照片上那个人站在她身后说：“您的照片早就出来了。请您原谅，我未经允许就看了您的照片。”他们交换了照片。父亲看了那个男人很久，然后说：“您是演员，对不对？”

男人默默地点点头，把目光转向一边：“但眼下我失业了。”

父亲：“您总是为您说的话感到不好意思。其实这才是尴尬的原因。”

男人笑了，又朝旁边看去。

父亲：“您是放不开还是胆小？”

男人先是笑了笑，朝旁边看着，然后很快把目光转过来。

父亲：“我认为，您的错误是，您总是把自己的一些事留给自己。作为一个演员，您脸皮太薄了。您想成为像美国电影中那样的人物，但又从不去冒险争取。所以您只是装腔作势啊。”

男人看着女人，但女人没有干预。

父亲：“我认为，您应该学习真正奔跑，真正喊叫，张大嘴。我观察了，您就连打哈欠时都不敢使劲张开嘴。”父亲朝他肚子上打了一拳，男人缩起身子。“您也没有经过训练。您失业多长时间了？”

男人：“我根本不数日子了。”

父亲：“如果您理解了我的话，请您在您的下一部电影中给我打个手势。”

男人一手握拳打在另一个手掌上。父亲也做了一下这个动作：“就是这样！”他转身走了，又回头大声说：“您还没被发现呢！我希望能在一部接一部电影里看着您慢慢老去。”

演员和女人看着父亲的背影，互相伸出手来告别，但是因为静电又缩了回去。

女人说：“冬天容易有静电。”

他们想分手，但又发现，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走。于是，他们默默地一起走着。在停车场前，他们赶上了父亲。他们又相互点头告别，但又继续一起往前走，因为他们的车几乎停在一起了。

女人开着车，看到男人超过自己。他看着前方。她拐弯了。

她和父亲还有孩子站在火车站。火车进站时，她说："爸爸，你来这儿我感觉很好。"她还想继续说，但结结巴巴说不出来了。父亲打着各种手势，突然对提着旅行包的孩子说："你知道，我还是分不清颜色。但是你必须知道，还有一些别的事我仍然不做：比如说，我很快就会被人称作老头了，但我在家里从不穿家居鞋，我为此几乎感到自豪。"他敏捷而利索地倒退着上了脚踏板，消失在已经开动了的火车里。孩子说："他一点儿也不笨手笨脚。"女人说："他只是一直装得笨手笨脚。"

他们站在空旷的站台上——下一列火车要一个多小时后才进站——转身看着小城后面缓慢升起的山坡。女人说："明天我们去爬山吧。我还从来没上去过呢。"孩子点点头。女人说："那我们不能磨蹭。现在天还是很短。带上指南针。"

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到了附近一个露天动物园。那里有很多游人，默默地在园子里走动。只有在一个游乐室里有一些人站着，笑着。太阳下山了，大多数游客马上朝出口走去。女人和孩子站在一个笼子前看着。天色变暗了；起风了，动物园里几乎只剩他们两人了。女人坐在一片水泥地边上，孩子在玩电动车。

女人站起来，孩子大声说："这里真好。我还不想回家。"

女人："我也不想。我站起来只是因为太美了。"

她看着西边的天际，最下边还有一道黄色。天幕前，掉光了叶子的树枝显得尤其光秃秃的。突然，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卷来干枯的落叶扫过水泥地面，仿佛来自另外一个季节。

他们在黑暗中回到自己家门前。信箱里有一封信。女人看了看地址，递给孩子。她把钥匙插进锁眼，但并没有转动钥匙。孩子等着，最后说："我们不进去吗？"

女人："我们再在外面待一会儿吧！"

他们在门外站了很长时间。一个提着公文箱的男人从他们面前走过，走过去很远了还不断回头看他们。

晚上，女人在厨房里准备晚饭，还不时跑到客厅修改她的翻译稿，孩子自己在念那封信："亲爱的施泰凡！昨天我看见你了，你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当时我正开着车，车很多，我没法停下来。你用胳膊卡着你那个胖朋友的脖子。"读到这里，孩子笑了。"有时候我感觉从来没有过你。我想马上见到你……"——孩子一边读一遍皱起眉头——"闻一闻你身上的味儿……"

夜里，女人一个坐在客厅里听着音乐，翻来覆去同一张唱片：《左撇子女人》。

她跟别人从地下通道走出来

她跟别人在一家快餐店吃饭

她跟别人在一家洗衣店坐着

但是有一次

我看见她独自站在报刊窗前

她跟别人从一幢办公高楼出来

她跟别人挤在一个市场摊位前

她跟别人坐在沙地游乐场边

但是有一次

我透过窗户看见她独自下象棋

她跟别人躺在公园草地上

她跟别人在一个游艺厅笑着

她跟别人在过山车上尖叫

然而我看见她

独自穿过我的梦想

但是今天在我敞开的房子里：

电话听筒突然放反了

铅笔放在记事本的左边

旁边的茶杯手柄朝左

旁边的（削了一半的）苹果

是朝相反的方向削的皮

窗帘是从左边拉开的

房门钥匙放在外衣左手兜里

你暴露了自己，左撇子女人！

还是你想给我一个暗号？

我想在地球上一个陌生的地方看见你

因为在那里我将看到人群中孤独的你

而你将在千万人中看到我

我们终将走向对方

早上，女人和孩子穿着登山的衣服出了门，山不太高。他们穿过街道，走过其他的别墅；在一座正面几乎没有窗户的房子前停下，在一扇棕色的门前，门的左右两边各立着一个黑杆路灯，好像守卫着一个巨大的石棺。

他们走上一条坡度不大的林中小路，阳光被树遮挡住，显得很昏暗。他们离开小路，开始朝一个山坡爬上去。他们路过一个鱼池，不过冬天池子里的水都放干了。他们在林中一个犹太人公墓停住脚步，墓碑的一半都埋在地下。头顶上空的风在簌簌作响，音频很高，让人觉得耳朵疼。这里的雪洁白，而山下的雪上却有煤末子；这里的雪地上不再有狗的踪迹，而是鹿的脚印。

他们穿过矮树丛往山上走。周围传来鸟叫声。融化的雪水欢唱着流进一条小溪里。橡树的树干上长出了细细的树枝，零星的枯树叶挂在上面，在风中摇摆。桦树的树干挂着一条一条的干树皮，在风中颤抖。

他们穿过一片林中空地，旁边有鹿群挤在一起。不深的积雪里有枯萎的草尖露出来，在风中摇曳。

他们上得越高，光线越明亮。他们的脸都刮破了，上面全是汗水。走了没多久，他们就到了山顶。他们在一块大石头的背风处坐下，用干树枝点起一堆篝火。

现在刚过中午，他们坐在火边，看着山下的平原，偶尔会有汽车反射太阳光。孩子手里拿着指南针。有时候，山下远处会有一道非常亮的光，过一会儿就消失了：那是许多关着的窗户中有一扇被打开了。

天气非常寒冷，篝火上升起的烟雾刚一离开背风处，就立刻散成碎片消失了。他们把随身带来的土豆放到火里烤熟了吃，喝着保温瓶

里的热咖啡。女人转向孩子，孩子正一动不动地看着山下的平原。她轻轻抚摸着孩子的后背，孩子笑着说，好像因为自己离她最近。

过了一会儿她说："有一次，你就这样坐在海边，盯着海浪看了好几个小时。你还记得吗？"孩子："当然。当时天已经暗下来了，但是我还不想走。你们生气了，因为你们没法回酒店。你当时穿着一条绿裙子，一件尖摆的衬衫，还有一顶宽边帽子，你不得不用手紧紧抓住帽子，因为起风了。那个海边没有贝壳，只有圆圆的石子。"

女人："你开始回忆都让我有点儿害怕了，怕我有什么不好的事以后被你记住。"

孩子："第二天，布鲁诺开玩笑地把你连衣服带鞋推到海里。你当时穿着一双棕色的鞋，带系扣儿的——"

女人："那你还记得吗，有一天傍晚你静静地躺在门前的沙箱里？"

孩子："这我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女人："现在轮到我回忆了！你当时把双手垫在头下面，弯着一条腿。那是夏天，夜空非常晴朗，没有月亮，满天星星。你躺在沙箱里，谁也不理。"

过了一会儿，孩子说："可能是因为沙箱里很安静吧。"

他们看着，吃着。女人笑了起来，摇了摇头。然后她说道："好多年以前，我看过一位美国画家的画，十四幅画是一个系列，据说画的是基督耶稣受难的过程——你知道的，就是耶稣在橄榄山上流血，被鞭打，等等。那些画面都由黑白色块组成，画面下部是白色的，上面是纵横交错的黑色线条。倒数第二个场景是'耶稣被从十字架上放下来'，画面几乎是黑的，后面一个场景，也就是最后一个——耶稣被埋葬到坟墓里，又突然变成全白的。而最奇特的是：我沿着这些画慢慢走过，当我站在最后一幅画前——就是那幅全白的——时，我突然在一个瞬间觉得视网膜上还遗留着前面那幅几乎全黑的画，然后又只有白色的了。"

他们看着，吃着喝着。孩子试着吹口哨，但因为太冷吹不出声来。女人说：“我们走之前照张相吧。”

孩子用一架笨重的老款宝丽来给她拍照。照片是从下往上照的，她的目光朝下看着，头顶着天空，连树枝都没照进去。女人好像是吃惊似的大声说：“孩子们原来是这样看成年人的！”

在家中的浴室里，她跨进浴缸，孩子也进来了。他们两人躺下闭上眼睛。孩子说：“我眼前还全是山上的树木。”浴缸里升腾起水蒸气。暮色中的住宅区仿佛与它后面山上森林和半明半暗的天空融为一体。孩子在浴缸里吹着口哨，女人盯着他看，表情几乎是严肃的。

夜里，她挺直身子坐在打字机前，飞快地打着字。

白天，她在这个小城的步行区混杂在人群中，手里提着一个被用得皱巴巴的塑料袋。她前面人群里有布鲁诺。她跟着他，他继续往前走着。过了一会儿，他好像是偶然地回过身来，她立刻说：“我前两天在前面一家店里看见一件毛衣挺适合你。”她马上拉住他的胳膊，一起走进那家服装店，里面有个女售货员坐在一个橱窗模特前打盹儿，粗糙发红的双手放在两腿间，眉毛像是在平静的痛苦中皱在一起，嘴角向下垂着。他们两人进店时，她立刻站起来，碰翻了椅子，被扔在地上的一个衣架绊了一下。

她打了个喷嚏，戴上眼镜，又打了个喷嚏。

女人仿佛是要让售货员平静下来似的慢慢说：“我上个星期在橱窗里看见一件灰色的男式羊绒衫。”

女售货员在架子上翻找着。女人从她肩膀上看过去，伸手把毛衣拿了过来递给布鲁诺，让他试试。一个角落的地板上放着一个篮子，里面传出婴儿的哭声。女售货员说：“我感冒了，不敢靠近孩子。”女人走过去弯下腰去哄着孩子。布鲁诺穿上毛衣，询问地看着女售货员，她只是耸了耸肩，使劲擤着鼻涕。女人小声示意布鲁诺就穿着这件毛衣。他想付钱，但她摇摇头，指了指自己，递给售货员一张钞票。女售货员指了指空空的收款箱，女人小声说，她可以明天再过来一趟取找的零钱。“或者您来找我。对，您来找我吧！”她立刻写下自己的地址。“您是自己带着这个孩子，对吗？偶尔在时装店里见到

一个不是画成鬼一样的人，感觉也挺好的。请您原谅我这样说您，好像我有资格能这样说似的。”

他们往外走时，女售货员掏出一面小化妆镜打量自己。她取出一管鼻塞膏放在鼻子下面，然后往嘴唇上涂。

外面，女人对布鲁诺说：“你还活着。”

布鲁诺用几乎欢快的声音回答说：“有些下午，我自己也会突然感到惊奇，自己还存在。另外，我昨天突然发现，我已经不再数跟你分开的日子了。”他笑着说：“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所有人都一个接一个地疯了。每次轮到某个人疯的时候，他都明显开始为自己的生活感到高兴，所有我们剩下的人都用不着内疚。——施泰凡问起过我吗？”

女人一边撕下毛衣后面的价格标签一边说：“尽快过来看看吧。”她走开了。他朝着另一个方向走了。

她在咖啡馆里看着日报，嘴里小声嘟嘟囔囔着。那个演员走过来站在她面前：“我认出您的汽车了，在外面停车场里。”

她毫不惊讶地看着他说：“我正在看报纸，已经很长时间没看报纸了。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现在是几月？”

演员在她对面坐下：“二月。”

“我们生活在地球的哪个部分？”

“许多部分中的一个。”

女人：“您有名字吗？”演员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他把目光转向一边，笑了，把桌子上的玻璃杯推来推去。终于，他又看着她说：“我还从没有追过女人。我找您好几天了。您的脸非常柔和——仿佛您一直意识到，人是要死的！请原谅我说傻话。”他摇摇头。“每次

我都想立刻收回我说的话！前几天，我因为渴望您而无法安静下来。请您别生我的气。我觉得您是那么自由，您脸上有一条”——他笑了——“生命的线条！我抑制不住地想您，我身体里的一切都火烧火燎地渴望您。也许您认为，我是因为失业太久过于紧张了？但是您什么都别说。您必须跟我走。您别让我一个人。我想要您。我们一直都是迷失了的存在，不是吗？我在一个电车站看到：**他**爱你，他会解脱你。当时我立刻就想到了您：不，不是**他**，而是**我们**将相互解脱。我想全方位跟您在一起，到处感受您，我要在我触摸到您之前，就用我的手感觉您的体温逐渐升高！噢，我是多么渴望您！跟您在一起，现在马上，非常强烈，直到永远！”

他们一动不动地相对而坐。他几乎有点生气了。然后他跑出咖啡馆。女人继续坐着，没有动。

一辆车厢里灯光明亮的公共汽车在夜色中行驶，只有几个老女人坐在里面，车正绕着一个大广场缓缓行驶，然后消失在黑暗中；空荡荡的吊环扶手不停地摇晃。

晚上，女人和孩子坐在客厅里玩色子。外面狂风呼啸，拍打着门窗。有时候，两人都停下游戏，静静地听着风声。

电话响了，很长时间。终于，孩子走过去接电话，说：“我现在不想说话。”他对女人说：“布鲁诺想过来，跟那个女老师。”女人打了个同意的手势，孩子对着电话说：“好吧，我还不会睡觉的。”

然后，他们继续玩，铃声又响了。这回是门铃。

出版商站在门外，立刻对开门的孩子说：“小伙子，眼睛都睁不开了，看完儿童节目还不去睡觉？”

他迈着大步走向女人，拥抱她。

女人问：“您这回又是从那个失去的作家那儿来吗？”

出版商：“没有失去的作家。从来就没有过。”

他从大衣兜里掏出一瓶香槟酒来说，汽车里还有几瓶。

女人：“您让司机也进来吧！”

出版商想了一会儿，打开门朝司机招了招手，司机在门口蹭了半天鞋底，才犹犹豫豫地走进来。

出版商说：“您被邀请进来喝一杯。”

女人：“或者两杯。”

门铃又响了，司机过去打开门，服装店的女售货员微笑着站在门口，漂亮了。

所有人在客厅里或坐或站，喝着酒。孩子还在玩色子。音乐。出版商盯着自己眼前，然后走到别人面前。他突然看上去很高兴，给司机又倒了一杯酒。

电话又响了。女人跑过去接起来，立刻说：“是您，对吗？您的声音听起来很近。您就在拐角的电话亭里，我听出来了！”

门铃响了，很短，好像门外是熟人。

女人向别人示意去开门，自己继续对着电话说：“不，我不是一个人。您能听出来吧。不过您尽管来吧。您来吧！”

布鲁诺和弗兰齐斯卡从门口进来。

弗兰齐斯卡对女人说：“我们以为会在这里见到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女人：“请原谅，今天晚上很偶然，我不是一个人。”

弗兰齐斯卡对孩子说：“我有名字。以后再提起我，不要像刚才在电话里那样说‘那个女老师’。”

出版商：“那我现在也不愿意被称作‘出版商’，而是恩斯特。”

女人拥抱了布鲁诺。

出版商走过来对弗兰齐斯卡说："那我们也互相拥抱吧！"说着已经用双臂拥住了她。

女人出门站在路上，演员正慢慢往下走。她默默地让他进屋。

布鲁诺打量着他，然后说："您是她男朋友？"然后说，"您跟我妻子睡觉，对吗？至少您有这个念头，对不对？"

他像在办公室那样紧紧盯着演员："您肯定是那种人，开着一辆破旧的小车，后座上扔着那些政治裸体杂志。"

他继续盯着："你的鞋也没擦。不过至少您是金发。也许您还是蓝眼睛？"他继续盯着演员，突然放松下来。女人静静地站在一边。

他说："您知道，我只是这么说说而已，没什么别的意思。"

他们都在客厅。出版商跟女售货员跳舞。司机从车里拿进来好几瓶香槟酒。然后，他一个接一个跟所有人碰杯。

孩子在大人们中间，坐在地上玩。布鲁诺蹲在他身边，看着他。

孩子："你跟我玩吗？"

布鲁诺："我今天晚上不能玩。"他扔了几下色子，说："真的，我今天晚上不能玩！"

女售货员松开出版商，弯下腰来掷色子；又接着跳舞，间或又来跟孩子玩色子。

出版商和弗兰齐斯卡端着斟满的酒杯，面对面绕着圈走。

布鲁诺在浴室里给孩子剪脚指甲。

出版商和弗兰齐斯卡在过道里微笑着慢慢擦肩而过。

布鲁诺站在孩子旁边，孩子已经躺在床上了。孩子说：“你们大家都出奇地安静。”布鲁诺还站在那儿，只是把头歪向一边，然后关了灯。

他跟女人穿过过道走向大家。演员迎面走来，布鲁诺把手臂搭到妻子肩上，然后又放了下来。

演员对她说，他在找她。

他们都坐在客厅，偶尔说几句话。他们似乎越来越对别人没有什么要求，只是这样待着。

女售货员把头往后仰着说：“又是漫长的一天！我都感觉不到自己的眼睛了，只是两个洞，火烧火燎的。现在才不怎么疼了，我又慢慢能看见东西了。”

坐在她旁边的司机手动了动，似乎要去抓她的头发，但又把手放下了。

出版商在女售货员面前跪下，一个挨一个亲吻她的手指尖。

司机从钱包里掏出照片，一一给大家看。弗兰齐斯卡对女售货员说：“您为什么不加入一个党派？”

女售货员沉默着，突然拥抱弗兰齐斯卡。弗兰齐斯卡挣脱开，眼睛看着女人说：“孤独会让人感到最冰冷、最恶心的疼痛，那是空虚的疼痛。那么就需要有人来教给他，不能这么堕落。”

司机使劲点着头，看着出版商。出版商抬起双臂说：“我不反对。”

女售货员轻轻跟着音乐哼唱。然后她躺在地上伸开双腿。

司机拿来一个便条本，一一给大家画像。

弗兰齐斯卡想张开嘴，但司机说：“请您不要动！”弗兰齐斯卡又闭上嘴。

所有人都沉默着；喝酒；又沉默。

突然，他们同时笑起来。

布鲁诺对演员说："您知道吗，您坐在我的位子上了？"

演员站起来，想换个座位。正在画像的司机严厉地说："您待在那里别动！"

布鲁诺把正在继续摆着架势的演员身后的椅子挪走，演员一屁股坐在地上。

演员慢慢站起来。然后，他犹豫不决地，朝布鲁诺走过来。

两个人扭打在一起，在地上滚来滚去，司机想拉开他们。

女售货员戴上眼镜。

弗兰齐斯卡跟出版商交换了眼色，然后，出版商说，他在战争中曾经遇到过一次海难。

女人朝窗外看去，花园里的树冠在风中一个劲地摇摆。

司机从车里拿来一个急救箱。

他把两个男人的手放在一起，然后往后退去，示意他们两人保持这个姿势，然后开始画画。布鲁诺和演员脸部抽搐了一下，司机大声说："不要笑！"

布鲁诺和演员在浴室里一起洗脸。

女售货员和弗兰齐斯卡走进来，用毛巾给他们擦拭。

司机四处展示他画好的画。

女人和布鲁诺站在平台上。

过了一会儿，布鲁诺问：“现在你知道自己以后要怎么样了吗？”

女人回答：“不知道。有一个瞬间，我似乎清楚地看到了我未来的生活，这让我感到不寒而栗。”

他们站着，看着下面的车库，塑料袋在四处飞舞。那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在路上走着，这回没牵着狗，大衣下面穿着长长的晚礼服，伸出双臂抬头朝他们打招呼，仿佛她对一切了如指掌。他们俩一起朝她挥手回应。

女人问他是不是明天要去办公室。

布鲁诺：“现在别说这个。”

他们手挽手穿过平台门走进客厅，正在喝酒的司机指着他们大声说：“真的，还是有爱情的！”

女售货员打了一下他伸出的手指说：“孩子在睡觉。”

司机小声重复了一遍他的看法。

出版商靠着弗兰齐斯卡的椅子在打盹，睡着了。弗兰齐斯卡小心翼翼地站起来，拉着司机的手跳舞，脸贴着脸。

演员走到女人身边，女人站在窗户前。

他们一起往外看着，外面狂风大作，天空群星璀璨，星星后面的天空反射着星光。过了一会儿，他说：“有一些星座距离我们很远，所以光线很弱，只能作为夜空的背景光。我想现在跟您一起在别的地方。”

女人立刻回答说：“请您不要跟我订规划。”

演员长时间地看着她，直到她也盯着他看。突然，她说：“有一次，我住医院，我看到一个极其悲伤、病重的老妇抚摸着站在她身边的女护士，不过只是抚摸拇指的指甲，只是拇指的指甲。”

他们继续互相看着。

终于，演员说：“我们现在互相看着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我前半生的障碍，就像门槛，一道接一道的门槛，威胁着我对您的注意，同时，只有我一直看着您的时候，我才体验到，这些障碍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只有您还在。现在我爱您。我爱您。”

布鲁诺一动不动地坐着；只是喝酒。

女售货员推开司机，跟弗兰齐斯卡跳舞。

司机脚下有些蹒跚。他走了几步，想去一个人面前，然后又想去另一个人那里，最终还是站在人群之外。

布鲁诺在自己吟诗：

痛苦就像螺旋桨

却不能把人带向任何地方

只有螺旋桨在空转。

弗兰齐斯卡一边跳舞一边笑他。

演员从窗前回头看着布鲁诺，布鲁诺问这是不是一首优美的诗。

出版商闭着眼睛回答，仿佛他只是在装睡：“我把这首诗印在明年的出版社日历上。”他看着喝酒的司机说：“您喝醉了。”他摇摇晃晃站起来说：“我送您回家。您住在哪儿？”

司机：“哦，我们再待一会儿吧。明天反正您不会再跟我说话了。”

出版商：“您怎么知道的？”

女售货员走到窗前的女人身边说："我住在阁楼上，也常常站在天窗前，只为了看看云。每当这时候我都能感觉到，我还活着。"

她看了看表，女人立刻转身向正跟弗兰齐斯卡跳舞的出版商说："她得回家照顾孩子了。"

出版商在弗兰齐斯卡面前把手放在胸口，对女售货员欠了欠身。

他非常严肃地对女人说："我们又没有在白天见面！"

他们朝门口走去，司机在他们身后跌跌撞撞，手里的车钥匙叮叮当当直响，出版商从他手里拿过钥匙。

女人送走他们，关上房门，回到客厅，弗兰齐斯卡一个人坐着，揪着自己金色的短发。女人寻找布鲁诺和演员，弗兰齐斯卡打了个手势，表示两人在地下室。音乐结束了，能听到乒乓球的声音。弗兰齐斯卡和女人面对面坐着。狂风吹着平台上的秋千椅。

弗兰齐斯卡："女售货员和她的婴儿！你和你的孩子！明天又要上学！其实孩子挺让我烦的。有时候我从他们脸上看得出来，他们想杀了我，用他们的声音和动作。他们乱喊乱叫，到处乱跑，让人窒息、头晕。有孩子有什么好？"

女人像是赞同似的垂下头，过了一会儿回答说："没有孩子的话，可能会多一些思考的机会。"

弗兰齐斯卡手里拿着一张小卡片说："临走的时候，你那个出版商把他的地址塞给我了。"她站起身来："现在连我也想一个人了。"

女人伸出胳膊搂着她。

弗兰齐斯卡："这样好多了。"

房门打开了，弗兰齐斯卡穿上大衣，说："我有我的间谍，告诉我你自己跟自己说话。"

女人：“我知道。我非常喜欢自言自语，所以我会做得有些过。”

过了一会儿，弗兰齐斯卡说：“关门吧。你会着凉的。”她沿着小巷慢慢往上走，一步一步，头向前垂着，一只手背在后面，好像拖着一辆满满的手推车。

女人来到地下室，布鲁诺和演员在那里。布鲁诺问：“就剩下我们了吗？”

女人点点头。

布鲁诺：“我们打完这一盘就走。”

他们打得很认真，女人抱紧双臂——因为地下室很冷——看着他们。

他们三个从楼梯走上来。

在衣帽间，布鲁诺穿上外衣。演员也穿上。他穿无袖毛衣的时候，头差点儿钻到胳膊那个口去。

女人看到笑了。

她打开门。

布鲁诺已经穿好大衣了。演员跟着布鲁诺走出来说，他是开车来的。

布鲁诺盯着面前发了一会儿呆说：“好。我出了很多汗。”

女人站在门口，看着他们两人沿着小巷往上走。

他们停下来，并排站在那儿小便，背朝着她。继续往前走，谁也不想走在右边，所以他们不断交换着位置。

女人回到房里。她关上门，上了锁。她把杯子和酒瓶拿到厨房，倒干净烟灰缸，冲洗。她把客厅里的椅子都放回原位，打开窗户通

风。

她打开儿童房的门，孩子正在睡梦中翻了个身，布鲁诺笨手笨脚帮他剪的脚指甲在被子里刮着床单。

她站在镜子前说："你没有暴露自己。不会再有人贬低你了！"

她坐在客厅里，腿平放在另一张椅子上，看着司机放在这里的那些画。她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捋起毛衣袖子。她自己微笑了，摇晃着色子杯。她把身子靠在椅子背上，除了脚指头浑身一动不动。她这样静静地坐了很长时间，她的瞳孔因为血液不断流动而越来越大，越来越黑。她突然跳起来，拿来一支铅笔和一张纸，开始画画：先是她放在椅子上的双脚，然后是后面的房间，窗户、在夜里不断变化的星空——每件物品的所有细节。她画得并不连贯，而是颤颤巍巍，很不熟练，不过偶尔会有一些几乎一笔画成的线条。几个小时过去了，她把纸放到一边。她长时间地看着纸，然后继续画。

明亮的白天，她坐在平台的秋千椅上。窗户里映出她身后杉树的树冠。她开始摇晃秋千。她举起胳膊。她穿得很少，膝盖上也没有盖毯子。

"大家就这样，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继续着日常生活，有人反思，有人不反思；一切似乎都按部就班地进行，就连一切都处于危险时的极端情况下，大家也继续这样生活，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歌德《亲和力》

（1976年）

[1]华尔道夫（Waldorf）饭店，位于纽约，著名的豪华饭店。—中译注，下同

[2]阿尔贡金（Alqonquin）饭店，纽约豪华饭店，菲茨杰拉德曾在此长住。

[3]美洲土著居民，名字来源于他们的鹿皮靴底，一说源自他们的肤色。

[4]指《犹滴传》中，希伯来女子犹滴为保护耶路撒冷，设计刺杀亚述大将和罗孚尼的故事。

[5]花生漫画（Peanuts），美国漫画家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M.Schulz）创作的漫画，从1950年起一直连载至作者逝世，主要角色有史努比等。

[6]鲍勃·霍普（Bob Hope，1903—2003），美国喜剧演员，多次赴海外美军驻地慰问演出。

[7]猫王演唱的歌曲。

[8]宾夕法尼亚州首府。

[9]俄亥俄州的别称。

[10]印第安纳州的别称。

[11]黄金国（El Dorado），最早是一位挥金如土的穆伊斯卡酋长的名字，后来用来指代传说中的“迷失的黄金城”。

[12]引自法国现代诗人吉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1880—1918）的名作《米拉波桥》。

[13]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1862—1931），奥地利著名作家，代表作有《古斯特少尉》、《梦的故事》、《轮舞》、《阿纳托尔》等。

[14]拉丁文，大意为“殚精竭虑，以至遗忘”。

[15]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1899-1957），美国电影演员，代表作有《卡萨布兰卡》、《马耳他之鹰》等。

[16]Dien Bien Phu（奠边府），位于越南和老挝边境地区，这里指1954年5月越军攻破法军防线，占领了奠边府。

Die linkshändige Frau by Peter Handke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6

Der kurze Brief zum langen Abschied by Peter Handke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2

Die Stunde der wahren Empfindung by Peter Handke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5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3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出版得到奥地利教育、艺术和文化部所提供之翻译资助

Peter Handke

Die Wiederholung

去往第九王国

[奥地利] 彼得·汉德克 著

韩瑞祥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去往第九王国/（奥）汉德克（Handke, P.）著；韩瑞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7-208-11514-9

I.①去……II.①汉……②韩……III.①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IV.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3377号

书名：去往第九王国

作者：【 奥地利】 彼得·汉德克

主编：韩瑞祥

译者：韩瑞祥

责任编辑：陈欢欢

封扉设计：荀冠虹

转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1514-9|I·1158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 文景每月书情

目　录

编者前言
第一部分 盲窗
第二部分 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
第三部分 自由热带稀树草原与第九王国

去往第九王国

[奥地利] 彼得·汉德克 著

韩瑞祥 主编

韩瑞祥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者前言

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被奉为奥地利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也是当今德语乃至世界文坛始终关注的焦点之一。汉德克的一生可以说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像许多著名作家一样，他以独具风格的创作在文坛上引起了持久的争论，更确立了令人仰慕的地位。从1966年成名开始，汉德克为德语文学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因此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如“霍普特曼奖”（1967年）、“毕希纳奖”（1973年）、“海涅奖”（2007年）、“托马斯·曼奖”（2008年）、“卡夫卡奖”（2009年）、“拉扎尔国王金质十字勋章”（塞尔维亚文学勋章，2009年）等。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介到世界许多国家，为当代德语文学赢来了举世瞩目的声望。

汉德克出生在奥地利克恩滕州格里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他孩童时代随父母在柏林（1944—1948）的经历，青年时期在克恩滕乡间的生活都渗透进他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里。1961年，汉德克入格拉茨大学读法律，开始参加“城市公园论坛”的文学活动，成为“格拉茨文学社”的一员。他的第一部小说《大黄蜂》（1966）的问世促使他弃学专事文学创作。1966年，汉德克发表了使他一举成名的剧本《骂观众》，在德语文坛引起空前的轰动，从此也使“格拉茨文学社”名声大振。《骂观众》是汉德克对传统戏剧的公开挑战，也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格拉茨文学社”在文学创造上的共同追求。

就在《骂观众》发表之前不久，汉德克已经在“四七社”文学年会上展露锋芒，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严厉地批评了当代文学墨守于传统描写的软弱无能。在他纲领性的杂文（《文学是浪漫的》，1966；《我是一个住在象牙塔里的人》，1967）中，汉德克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文学对他来说，是不断明白自我的手段；他期待文学作品要表现还没有被意识到的现实，破除一成不变的价值模式，认为追求现实主义的描写文学对此则无能为力。与此同时，他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反对文学作品直接服务于政治目的。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剧作《自我控诉》（1966）、《预言》（1966）、

《卡斯帕》（1968）、诗集《内部世界之外部世界之内部世界》（1969）等。

进入70年代后，汉德克的创作在“格拉茨文学社”率先从语言游戏及语言批判转向寻求自我的“新主体性”文学。标志着这个阶段的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1970）、《无欲的悲歌》（1972）、《短信长别》（1972）、《真实感受的时刻》（1975）、《左撇子女人》（1976）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在表现真实的人生经历中寻找自我，借以摆脱现实生存的困惑。《无欲的悲歌》开辟了70年代“格拉茨文学社”从抽象的语言尝试到自传性文学倾向的先河。这部小说是德语文坛70年代新主体性文学的经典之作，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1979年，汉德克在巴黎居住了几年之后回到奥地利，在萨尔茨堡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四部曲《缓慢的归乡》（《缓慢的归乡》，1979；《圣山启示录》，1980；《孩子的故事》，1981；《关于乡村》，1981）虽然在叙述风格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生存空间的缺失和寻找自我依然是其表现的主题；主体与世界的冲突构成了叙述的核心，因为对汉德克来说，现实世界莫过是一个虚伪的名称，丑恶、僵化、陌生。他厌倦这个世界，试图通过艺术的手段实现自我构想的完美世界。

从80年代开始，汉德克似乎日益陷入封闭的自我世界里，面对社会生存现实的困惑，他寻求在艺术世界里感受永恒与和谐，在文化寻根中哀悼传统价值的缺失。他先后写了《铅笔的故事》（1982）、《痛苦的中国人》（1983）、《去往第九王国》（1986）、《一个作家的下午》（1987）、《试论疲倦》（1989）、《试论成功的日子》（1990）等。但汉德克不是一个陶醉在象牙塔里的作家，他的创作是当代文学困惑的自然表现：世界的无所适从，价值体系的崩溃和叙述危机使文学表现陷入困境。汉德克封闭式的内省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生存的深切反思。

进入90年代后，汉德克定居在巴黎附近的乡村里。从这个时期起，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动荡，南斯拉夫战争也把这位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从《梦幻者告别第九王国》（1991）开始，汉德克的作品（《形同陌路的时刻》，1992；《我在无人湾的岁

月》，1994；《筹划生命的永恒》，1997；《图像消失》，2002；《迷路者的踪迹》，2007等）中到处都潜藏着战争的现实，人性的灾难。1996年，汉德克发表了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批评媒体语言和信息政治，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汉德克对此不屑一顾，一意孤行。1999年，在北约空袭的日子里，他两次穿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旅行。同年，他的南斯拉夫题材戏剧《独木舟之行或者关于战争电影的戏剧》在维也纳皇家剧院首演。为了抗议德国军队轰炸这两个国家和地区，汉德克退回了1973年颁发给他的毕希纳奖。2006年3月18日，汉德克参加了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媒体群起而攻之，他的剧作演出因此在欧洲一些国家被取消，杜塞尔多夫市政府拒绝支付授予他的海涅奖奖金。然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汉德克无视这一切，依然我行我素，坚定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对人性的呼唤，对战争的控诉，对以恶惩恶以牙还牙的非人道毁灭方式的反思："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他因此而成为"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另类。

世纪文景将陆续推出八卷本《汉德克文集》，意在让我国读者来共同了解和认识这位独具风格和人格魅力的奥地利作家。《去往第九王国》卷收录了汉德克198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去往第九王国》。

上世纪80年代是汉德克面临种种危机而苦苦思索的时期，既有对文学感知孜孜不倦的探索，也有对生存困惑的深层思考。这一切都以汉德克独有的方式深深地渗透到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小说《去往第九王国》正是这种思考最闪亮的结晶，也代表着汉德克创作的又一个高潮。

小说《去往第九王国》集汉德克迄今叙述之大成，从篇幅、结构和叙事方式来看，它是作者对宏大叙事前所未有的尝试。这部小说秉承了作者根本的审美原则，融历史回忆和现实思考于一体，又吸收了传统的家庭和成长小说的诸多因素，并且与叙事问题相互交织，相辅相成，形成了一幅结构独特层次分明张弛有致的叙事画面。

这部小说的叙述通过多层交织的回忆展现了作者对现实生存的感知和反思。“我追寻着失踪的哥哥的足迹，来到了耶森尼克。二十五年过去了，或者就是一天”，小说就这样开始了主人公菲利普·柯巴尔的经历、回忆和叙述之旅。四十五岁的菲利普·柯巴尔既是小说叙述者，又是小说被叙述的中心人物。作为叙述者，二十五年前去往斯洛文尼亚的寻根旅程构成了他回忆的中心，而在这个回忆与反思交融的叙事框架中，又嵌入了青年柯巴尔对童年的回忆。在这里，被叙述的时间呈现为三个层面，相衬相映，水乳交融，形象地勾画出了叙述者人生的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现代人成长模式。在现实感知中，叙述者才有能力以匠心独运的叙述方式来重现过去“一部纷乱无序的史诗”，因为“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所经历的一切，还不是什么回忆……对我来说，回忆并不是什么随随便便地回首往事，而是一种正在进行的行为，而这样的回忆行为赋予所经历的东西地位，体现在使之生存下去的结果中，体现在叙述里，它可以一再传递到尚未完结的叙述里，传递到更伟大的生活中，传递到虚构中”（《去往第九王国》）。因此可以说，在汉德克的笔下，小说多线穿行错落有致的回忆流成为叙述者反思现实的精神空间。

这部小说分为三个部分，其标题分别是“盲窗”、“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和“自由热带稀树草原与第九王国”。这些神秘的标题正是小说密码似的叙述象征。小说第一部分回忆和描述了叙述者1960年夏天离开家乡前往斯洛文尼亚的旅行。伴随着追寻失踪的哥哥的踪迹，叙述者回首自己童年和青年时期的一幕幕被感受为恐惧的经历，异乎寻常的感觉，陌生无助的氛围始终是主人公心灵上挥之不去的生存阴影。菲利普的这种认同困惑源于其家庭出身：作为“奴仆部落”，柯巴尔家族世世代代生活在流亡中。语言也与这个家庭的生存危机形影相伴，世代相传的斯洛文尼亚语与作为“敌对民族”语言的德语形成对立。这种缺少尊严和自主的生存也感染了这个小儿子；菲利普与父亲、病入膏肓的母亲和那个智障姐姐处在一种矛盾重重的状态中。在学校里，他孤立无助，放弃了参加中学毕业旅行，只身前往那个祖先的国度。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个“盲窗”成为主导这个旅行者感受生存的标志，因为在菲利普看来，它们成为一种“友好的象征”。

小说第二部分表现了菲利普的寻根之旅也是走上叙述之旅。对主人公来说，既陌生又熟悉的斯洛文尼亚风光成为一个令人解脱的生存

空间。在那一个个一见如故的地方，他怀揣哥哥的两本书度过了那美妙的停留时刻。一本是哥哥在那里的农业技术学校用斯洛文尼亚教学语言写成的笔记本。那个曾经与众不同硕果累累的家乡果园在叙述者的童年记忆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它正是这个笔记本的结晶。因此，在旅途中，这个青年人自然也把这些种植和优化果树指南当成“教育故事”来阅读。在观察这个如今处于“自然凋零”中的果园时，叙述者觉得这个地方“彻底变成了一个杰作，一个使人的手得以流传和赞美的形式，具有由别的手可以转化成别的形式的裨益，比如说以文字形式”，并且因此赋予自己创作的使命：“真的，我将会向你们叙述的！”而另一本则是1895年版斯洛文尼亚语-德语大词典。菲利普仔细地品味着那一个个由哥哥画上标记的词语，越来越觉得斯洛文尼亚语以其“一个词语童话集和富有活力的世界图像”成为真正的人性生存的象征，因为在这个民族的语言根源中就找不到“战争”、“屠杀”、“暴力”等词语。出于对杀死哥哥的战争的悲伤和愤怒，菲利普在这里发现了充满人性的生存希望。当他沉思于那最后一个被哥哥打上标记的词语时，他的目光便落在了山边那条条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上，觉得它们变成了一行行需要书写的图像。他毅然决然地认识到自己负有叙述的使命，因为“没有这些词语的隐含，这个地球，不管是黑色的，还是红色的，或者是绿色的，便是一片无与伦比的荒漠”。于是，菲利普把这个决定生存的现实经历永远铭刻在心上。

小说第三部分里，叙述者跋山涉水，步行来到位于的里雅斯特海湾高原的喀斯特地区。像坐落着玛雅文化丰碑的自由热带稀树草原一样，喀斯特地区也开启了其民族的历史，创建了辉煌的文化。那充满神奇的灰岩坑地貌教诲他观察和区别一个个原始图像和本原形式，去发现它们的相互关联。喀斯特风使得他的感官变得敏锐，他在这里发现了“那些毫无用处的东西获得了价值”，并且能够用语言将它们启人深思地关联在一起。旅途中，一个人工开发的、肥沃的大灰岩坑吸引住这位旅行者渴望的目光，向他预示着一个可能的未来，即使发生核灾难，而在他看来，人们也能够在这里找到一个新的开始。显而易见，在叙述者的意识中，历史回忆与现实思考在这里融合成一个理想的生存图像。最后在那所农业学校的教堂墙上，菲利普发现上面刻着哥哥的名字。叙述者寻找失踪哥哥的踪迹之旅在喀斯特地区圆满结束。伴随着叙述，叙述者成功地使哥哥的踪迹付诸文字，让回忆成为现实的一面镜子。

“叙述，没有什么更现实的东西比得上你，没有什么更公正的东西比得上你，你是我最神圣的东西。”因为“叙述的阳光，永远会普照在那只有伴随着生命的最后一息才能够被摧毁的第九王国之上”。叙述者结尾对叙述的无比赞颂深切地体现了这部小说重现历史经历的叙事意图之所在。可以说，小说《去往第九王国》的叙述在回忆历史和反思现实的交织中或多或少地蒙上了乌托邦色彩，渗透了作者对人性生存的美好渴望。

我们选编出版汉德克的作品，意在能够不断地给读者带来另一番阅 读的感受和愉悦，并从中有所受益。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选编和翻译疏漏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韩瑞祥

2013年3月

“远古时期的国王死去了，因为他们没有找到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壤。”

——《光辉之书》

“我曾经时而驻足于这群人里，时而又来到那群人里。”

——埃庇卡摩斯

“……我们将会尽力而为之。”

——科鲁迈拉

第一部分　盲窗

我追寻着失踪的哥哥的足迹，来到了耶森尼克。二十五年过去了，或者就是一天。当时我还不满二十岁，刚刚在学校里考完最后一次试。本来我会觉得一身轻松，因为在苦读了数个星期之后，这个夏日也该听我安排了。然而，我却心事重重地驱车离去了：在位于林肯山村的家里，有年迈的父亲，多病的母亲和那个精神错乱的姐姐。此外，在最后一年里，我摆脱了教会寄宿学校的日子，已经习惯了克拉根福特班级的群体生活。这里女孩占多数。此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孤零零的。当别人一起踏上前往希腊的汽车时，我却充当了一个离群索居的人，宁愿独自踏上去南斯拉夫的征程。（实际上，我只是没钱一起去旅行。）再说，我还从来没有去过国外。虽然斯洛文尼亚语对克恩滕南部乡村的人来说也不是什么外语，可我几乎并不怎么精通。

那个耶森尼克边防士兵看了一眼我那本新近签发的奥地利护照，自然用他的语言跟我搭上了话。他一看我听不懂，便用德语说，Kobal（柯巴尔）不就是个斯拉夫名字吗。“Kobal”意味着两腿叉开之间的空间，意味着“步伐”，而且也意味着一个叉开两腿站立的人。照这样说，我的姓则更适合他，也就是这个士兵了。他身旁那个年长些的官员身着便衣，满头银发，架着一副圆形无框学者眼镜，面带微笑解释说，那个从属的动词则意味着“klettern”（攀登）或者“reiten”（骑马），所以，我的名字因为对马的热爱与Kobal很般配。我总归有一天要为自己这个名字而争光。（后来我又多次碰到，偏偏就是一个所谓进步国家的这些官员却显示出惊人的素养。这个国家曾经是昔日一个大帝国的部分。）突然间，他变得严肃起来，靠前挪了一步，神情郑重地看着我的眼睛：我一定要知道，二百五十年前左右，曾经有一个名叫Kobal（柯巴尔）的民族英雄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格里高尔·柯巴尔出生在托尔敏地区，在这条河上游，继续往下流到意大利就叫伊松佐河。1713年，柯巴尔是托尔敏农民大起义的一个首领，第二年就与同伙一起被处决了。如今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依然因其“放肆”和“大胆”而著名的警句就出自他之口：皇帝不过是一个“仆人”而已，人们要自己来掌管一切事务！受到如此一番教诲——用我所知道的东西——之后，我才获准挎上海员背包，不用出示

现金，走出那个黑乎乎的边境火车站，进入那个南斯拉夫的北方城市。当时，在教学地图上，在耶森尼克旁边，括弧里依照标示着“阿斯令”这个奥地利原名。

我久久地站在火车站前，连绵的卡拉万肯山脉就耸立在我身后。我有生以来，它始终展现在我眼前的远方。一走出隧道，便是一片城市，直穿过蜿蜒狭长的河谷。河谷两边的上方露出一线天空，向南延伸而去，又被笼罩在钢铁厂的烟雾之中。眼前一道长廊，一条马路，熙熙攘攘的，左右两边尽是岔开的陡峭小道。那是1960年6月末一个酷热的夜晚，路面上泛起一道直刺眼睛的亮光。我发现在那扇大弹簧门前，川流不息的小车一辆接一辆停靠后又驶去，让门后的大厅里充满了一片昏暗。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情形，到处灰蒙蒙一片，灰蒙蒙的房子，灰蒙蒙的街道，灰蒙蒙的汽车，与克恩滕城市的色彩缤纷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毗邻的斯洛文尼亚，克恩滕有“圣美”之称。这个美誉是从19世纪流传下来的。在那里，夜晚之光让我的眼睛无比惬意。我乘坐通往这里的奥地利短途客车即刻又会穿过隧道返回去。它就停在后面的轨道上，被夹在那些庞大的南斯拉夫老式火车中间，看上去干干净净，五彩缤纷，活像一个玩具火车。那些在站台上大声寒暄的乘务人员身着蓝色制服，为这灰蒙蒙的氛围点缀起他国异乡的色彩。再说让你注目的是，成群结队的人们忙碌在这座的确不算大的小城里，同家乡小城里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他们虽然时而会觉察到你的存在，可是从不会去注视你。我在这里站得越久，心里就越断定，自己身在一个大王国里。

这时几乎还没有过去几个钟头，可在菲拉赫度过的下午似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那里，我拜访了教我历史和地理的老师。我们一起商议了我这个秋天面临的各种可能：我是该马上去服兵役呢，还是往后推一推，先开始大学学业？再说学什么呢？然后，在一个公园里，老师给我朗诵了他自己创作的一篇童话，征询我的看法，并且带着极其认真的神情洗耳恭听。他是个单身汉，与母亲相依为命。当我在他家里时，母亲一再透过关闭的门，询问儿子是否安好，需要什么。他陪我到了车站，顺手塞给我一张纸币，那偷偷摸摸的样子，仿

佛有人在监视着他似的。尽管我打心底里感激他，可我却没有能够表达出来，况且我此刻在边界的另一端想像着这个人的时候，只是看到一个苍白的额头上长着一颗痣。那张属于他的面孔成了那个边防士兵的面孔。虽说那个士兵和我年龄不相上下，可是从他的举止、声音和目光看得出来，他显然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立身之地。除了在公园的树荫下对弈的两个领养老金的人和中心广场圣母头顶上那闪烁的光环外，那位老师，他的居所，以及这座城市都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图像。

与之相反，今天早上的一幕却萦绕在我的心头，不折不扣地历历在目。就是到了今天，也就是二十五年之后，又会完完全全浮现在眼前。在那片叫做林肯的山丘上，告别了父亲。这个村子因此而得名林肯山村。这个老态龙钟的人，身板瘦削，比我瘦小得多，他弯曲着双膝，垂挂两臂，因痛风而变形的手指此刻攥成了愤怒的拳头。他站在十字路口，冲着我大声喊道："你去见鬼吧！像你哥哥一样见了鬼就安心了！像我们这个家的所有人一样都见鬼去吧！谁都一事无成，而你也不会有任何出息的！你甚至都不会成为一个会玩的人，而我好赖也算是一个！"此时此刻，他正好搂抱住我，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而我掠过肩膀，望着他被露水打湿的裤腿，顿时觉得他搂抱的不是我，而更多是他自己。可是在回忆中，我后来被父亲的搂抱留住了，不仅在耶森尼克火车站前那个晚上，而且在过了这么些年后依然如此，我倾听着他的诅咒，就像祝福一样。实际上，他是完全当真的，而在想像中，我看见他抿着嘴微笑。但愿他的搂抱也承载着我走完这个叙述的历程。

我站在朦胧的夜色里，被包围在来来往往的火车的隆隆声中，简直感觉惬意。我心想着，在有生以来与女人的拥抱中，从来还没有过被吸引住的感觉。我没有过女朋友。我所认识的惟一姑娘，每每拥抱我时，我都把她不是当作戏弄就是看成打赌。然而，同她一起拉开距离走在街头上又是多么自豪呀。在那些迎面而来的人看来，显然我们是天生的一对。有一次，碰到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他们中有人喊道："你的女朋友好美啊！"还有一次，一位老妇人停住步子，从这位姑娘打量到我，随之一本正经地说："你好福气呀！"在这样的时刻，那种渴望似乎就已经满足了。要说幸福，那就是过去在电影院里不断变幻的灯光下看着身旁那闪烁的侧影，还有嘴巴、面颊、眼睛。最快乐的就是身体与身体时而不由自主地微微靠拢。此时此刻，哪怕是偶尔的接触都会被看做是逾越雷池。照这样说来，我不就是没有女

朋友吗？因为我所理解的女人不是贪欲或者要求，而仅仅是这个与我面对面的美人的理想图像——是的，这个面对面的人就应该漂亮！——我终于可以给这个人叙述了。叙述什么呢？干脆就开始吧。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想像着相互拥抱、喜欢和爱慕犹如一种持久的叙述，既小心翼翼，又无所顾忌；既从容不迫，又石破天惊，犹如一种净化的叙述，一种澄澈的叙述。同时，他也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只要他离家久了，不论是去城里，还是独自待在林子里或者田野上，她每次都会逼着他说："你说吧！"可是一到这时候，尽管他事先还经常进行演练，却从来都没有顺顺当当地向她叙述过，至少在她患病前如此；你事先不用问他，他倒会娓娓道来——当然往后需要那些恰如其分的插问。

而我眼下在火车站前发现，从那个女朋友出现以来，我已经在默默地叙述着这一天了。可我给她叙述了什么呢？既没有意外变故，也没有不寻常的事件，而只是些平平常常的过程，或者仅仅不过是一个景象，一片噪声，一种气味。街对面那个小喷泉的水柱，那个报亭红色的闪光，那些载重汽车喷出的尾气：在我默默无声的叙述中，它们都不再是独立的东西，而是相互交融在一起。这个叙述的人根本就不是我，而是它，是经历本身。在我内心深处，那个默默无声的叙述者是某种超越我的东西。这时，它的叙述所针对的那个姑娘变成了一个永不衰老的年轻妇人，就像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一样，他在自身发现了那个叙述者，也成了一个没有年龄的成人。我们面对面站着，恰好齐眉高。因为齐眉高是叙述的标尺！我打心底里感觉到那深深柔情的力量。而它对我来说则意味着："跳跃吧！"

在耶森尼克泛黄的工厂天空上，闪烁着一颗星星，独自构成了一个星像。一只发红的甲虫飞过下面街道的烟雾。两节车厢砰的撞在一起。那家超市里，清洁女工已经接替了收银员。一个抽着烟的男子身着内衣站在一幢高楼的窗口前。

我精疲力竭地坐在火车站的饭店里，就像经历了一次艰辛的劳顿，守着一瓶当时在南斯拉夫取代了可口可乐的深色甜饮料，几乎直到午夜时分。同时，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跟在家里的那些夜晚如此不同。那些时候，不管是在村子里，还是在寄宿学校里，或者在城里，

我总是一再犯困，每每扫大家的兴。我惟有一次被带去参加舞会，居然也睁着眼睛睡着了。每到新年来临的最后时刻，父亲总是竭力拿玩牌来不让我睡觉，可也徒劳无用。我思量着什么东西会让我如此清醒呢，不仅仅是这个异乡他国的缘故，而且也少不了这个餐厅；要是在一间候车室里，我势必很快就要犯困的。

我坐在一个用栗色木板装饰的隔间里。那一个个隔间犹如一长排座位。我身前是一排排站台，一片灯火通明，向后远远依次排列；身后是那条同样灯火通明的长途干线，一片片住宅区里亮着灯火。这里满载的小车和那里满载的火车依然纵横交错，川流不息。我看不见那些旅游者的面孔，只是一个个影子。然而，这些影子是通过一张反射到玻璃墙上的面孔观察来的，那就是我的面孔。凭着这个使我显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映像——只有额头、眼窝、嘴唇——我便可以幻想着那些影子，不单是那些行人，而且还有那些高楼大厦的居住者，他们时而在房间里穿来穿去，时而又坐在凉台上。这是一个轻松、明亮和清晰的梦。在这个梦里，从所有那些黑乎乎的人影中，我都在想像着友善的东西，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不友善。老人像老人，情侣像情侣，家庭像家庭，孩子像孩子，孤独者像孤独者，宠物像宠物，每个个体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而我连同自己的映像都属于这个人群，我在不停地、温和地、冒险而泰然地漫游过一个夜晚时想像着他们，连那些睡眠者、病人、弥留者，甚至故去的人都一起走进我的想像里。我站起身来，想认可这个梦。然而，它惟独被那个国家的总统的巨幅画像扰乱了。画像就挂在餐厅中央，柜台上方。铁托将军身着挂满勋章的镶边制服的形象显得十分清晰。他站在一张讲桌前，向前倾着身子，紧攥着的拳头立在桌上，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俯视着我。我甚至听到他在说“我认识你”，而想要回答说：“可我却不认识自己啊。”

在柜台后，昏暗的灯光下，服务员出现了。一张影影绰绰的脸庞上，惟独能够看得清楚的是那径直看上去时几乎遮住眼睛的眼皮。这时，梦才继续做下去了。看着这眼皮，母亲的身影突然鬼使神差地浮动在我的眼前。她把酒杯放进水盆里，拿针别起一张付款单，冲洗铜餐具。她的目光瞬间击中了我，嘲笑我，让我不可捉摸。这时，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油然而起；与其说是恐惧，倒不如说是一种震撼，一种对更大的梦的神迷。在这个梦里，那个病怏怏的女人又恢复健康

了。她装扮成服务员，蹦蹦跳跳地迈着大步走过这家分店，从后跟敞开的服务员高跟鞋里闪现出那丰满白皙的脚跟。母亲获得了多么壮实的两条腿，多么充满活力的圆臀，多么高高竖立的发式。她与村里的大多数女人不一样，虽然只会几个斯洛文尼亚词语，可她在这里就是说个不停，和旁屋一群看不见的男人寒暄着，完全无拘无束的样子，甚至有些盛气凌人。毕竟她不是弃儿，不是难民，也不是德国人，而始终声称自己是外国人。瞬间，这位二十岁的年轻人感到羞愧的是，这个女人连同确定的行为举止、哼唱、大笑声和敏捷的目光居然会成为自己的母亲。然后，我打量起这一个个人，打量起这个异乡女人，从来没有如此仔细：是的，直到不久前，母亲也是拖着这样的唱腔说话，而且每当她真的开始唱起来时，儿子就要堵上自己的耳朵。在每次那么大的合唱中，总会立刻听出母亲的声音来：一种颤抖，一种震动，一种热烈的声响，与那位听者相反，这位歌唱者则完全陶醉其中。她的笑声不只是高亢，简直就是疯狂，是呐喊，是爆发，有高兴，有愤怒，有苦衷，有蔑视，也有判决。还在患病最初的痛苦中，那与之相应的叫喊听起来就像是惊异的大笑，半是高兴半是愤怒的大笑，她竭力靠着自己那歌唱的颤音要驱走那大笑声，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无助了。我想像着回荡在我们家里的各种声音，父亲咒骂着，姐姐自言自语地嘟哝，又是傻笑又是哭泣，母亲从一个村口直笑到另一个——林肯山村是一个狭长的村子。（我在想像中看到自己总是默默无声。）于是，我发现母亲的举止不仅像眼下这个服务员一样盛气凌人，而且颇有统治欲。她始终打算经营一家巨大的旅店，让所有的雇员都成为她的仆人。我们的家底不大，可她的胃 口却不小：在她的叙述中，我哥哥总是作为被骗去了王位的国王出现的。

在她眼里，我被看做理所当然的王位继承人。与此同时，她一开始就怀疑我能不能担此重任。有时候，她落在我身上的目光会凝固在一种没有一丝怜惜的同情里。至今，我已经一再被人所描述，有神父，有老师，有姑娘，也有同学：然而，从母亲那无声无息的目光中，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如此的描述，我由此不仅认识了自己，而且也看到自己命该如此。我深信，她并不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那些外在的状况才如此凝视我，而是从我降生的瞬间就已经开始了。她将我高高托起，捧到光亮的地方，笑着弃之一边，从而宣判了我的命运。同样，为了证实自己，她后来又捡起了这个在草丛里手舞足蹈和出于生存的欲望而尖叫的小孩，将他捧到阳光下，笑着看他，从而又宣判了他的命运。我竭力想像着。此前哥哥和姐姐的情况也不会有什

么两样，可我却怎么也想像不出来。惟独我使她的目光在通常情况下显得那样缺少怜悯，紧接着就爆发出惊叫："天哪，我们两个人！"她时而面对一个被推上屠宰台的牲口也会发出这样的惊叫。虽然我很早就有被人看在眼里，被感知，被描述，被认识的需求——但却不是这个样！比如有一天，不是母亲，而是那个姑娘说了声"我们两个"时，我就感到自己被认识了。在教会寄宿学校度过的岁月里，姓就是陪伴着我们的称呼，谁也不例外。当我在普通学校里第一次被同桌的女生完全无意间直呼大名时，我感受到这就是一种使我如释重负的描述，甚至是让我松口气的爱抚。直到今天，这位同桌女生的秀发依然闪耀在我的眼前。不，自从我能够看懂母亲的目光以来，我就知道：这里没有我的立足之地。

与此同时，在这二十年里，她事实上已经两次挽救过我。我从布莱堡的普通中学转到高级中学，根本不是出于父母的什么厚望，儿子将来会更有出息。（我觉得，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都深信，我要么就是一事无成，要么就是"与众不同"。他们这么说，更多包含的是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要说转学的主要原因吧，那是在我十二岁时，有了我的第一个敌人，而且立刻就成了死敌。

在村子里，孩子们之间打打闹闹向来都司空见惯。大家都是邻居，而且由于近邻关系，各种不同的性格特点往往难以相容，就是成人也莫不如此，老人亦不例外。过后好一阵子，相互形同路人，谁跟谁都不打招呼；你装着在自家屋前的院子里忙碌，而就在你眼皮底下的邻居屋前，他也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忙碌的样子。突然间，尽管没有围栏，乡邻间却划起了不可逾越的分界。哪怕在自家屋里，假如一个孩子觉得受到了某个家庭成员不公正的对待，似乎就会按照古老的习俗，自己站到客厅一个划清界限的墙角去，面对墙壁，一声不吭。在我的想像里，一到这个时候，村子里的所有客厅就组合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多角形空间，其中每个角落都被那些孩子占去，他们相互背靠背，闹来闹去，别别扭扭，直到终于有一个人或者全部同时（事实上常常也就是这样）说出打破僵局的话或者笑出声来。在这个村子里，没有人会把别人称作朋友——要说起来，就是"好邻居"——可也没有无休无止的争吵会导致持久的敌意。

还在我遇到自己第一个敌人之前，当然就经历过被人追踪的事。这样的经历多多少少地决定了我后来生活的走向。然而，在当时，并

不是我这个人，而是这个来自林肯山村的孩子受到来自另外一个村子一群孩子的追踪。那里的孩子们去学校的路程要比我们远，比我们艰难；他们要跨越过一条深沟，因此自视比我们强壮。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要共同走到一个岔道口，通常都是“胡姆查赫人”追赶“林肯山村人”。尽管那些人年龄并不比我们大，可在他们身上，我却从来都看不出一群孩子的面目。（如今面对墓碑上那些英年遇难者的肖像，我才恍然觉得他们一个个多么年轻，多么孩子气，就是成了小伙子也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久久地奔跑在一条乡间马路上。恰好在这个时分，那里根本也没有车辆过往。我们的身后回荡着一群闹事者咄咄逼人的怒号，看不到脸面，两腿粗壮，两脚笨拙。他们挥舞着大猩猩一样的长臂，就像是棍棒；挎在背上的书包就像是冲锋时的背囊。有好些日子，等我知道已经穿越过原始森林的危险，经历了这样的时刻，我就觉得如此地饥饿，便留在布莱堡这座保护你的小城里。平日总是牵记离开这里回家，可到了这个时候，它在我心里是很可爱的。然而，事情后来可谓出现了转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转变，是骤变。又有一次，已经过了城界，我听到身后那正因为不可理解而显得如此咄咄逼人的怒号。于是，我让同村的孩子们快跑，自己却坐到那个岔道口的草丛里。这条马路和那条交汇道路的三岔口在这里围起了一块三角地。就在他们向我冲来的时刻，我很自信，我是不会出什么事的。我坐在这三角地里，伸开两腿，朝南望着拜岑山脉，南斯拉夫边境就绵延在那山峰的高处。我相信自己会安然无恙的。我所看到的，同时也是我所想到的，我仿佛感觉这就是心灵的标志。到后来，不仅我安然无恙，而且那帮追赶的人靠近时越来越放慢了步子，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追寻着我的目光。“那山顶上好美啊！”我听到有人说。“我曾经和父亲一起登上去过。”我挨个儿打量着他们，发现这群家伙瓦解得零零散散的。他们从身旁溜达过去时笑着看我，仿佛我看穿了他们的把戏，他们自己也因此变得轻松了。谁也一声不吭，可显而易见，随着这个瞬间，一切追赶都停止了。望着他们的背影，我心想着那一伸一屈的两腿和拖拖曳曳的步伐：比起我来，他们还要走好远啊。而在距离中，一种亲密的感觉油然而起——在自己村子里，对那些邻居的孩子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感觉。因此，后来接着在时间距离中，这群胡姆查赫孩子乱作一团跌跌撞撞，卷得尘土飞扬，声嘶力竭的吼叫让恐惧传向四方。这一切变成了一个舞蹈和跳跃的队列，而今依然在童年的乡间大道上扬长而去，犹如一群部落成员，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个图像中存在下去。（事后我自然浑身都打颤，久

久地在草地上无法挪动身子。我靠在那儿的木头奶站上，默默地背诵着那些数字。）

相反，要对付我的第一个敌人，却什么招也没有了。他是邻居的儿子，白天挨母亲打，晚上挨父亲揍，一天到晚，没完没了。（我在家里从来都不会挨打，取而代之的是，父亲生我气时，常常就在我眼前自个儿不是捶胸，就是打脸。可更有甚者，他会握紧拳头，狠劲地捶打自己的额头，直打得他不是踉踉跄跄地向后摇晃，就是双膝跪倒在地。可是我哥哥就不同了，尽管他只有一只眼睛，可是据说他不光是挨打，而且常常整个下午被关在屋后的地下室里。在这个用来储藏土豆的地下室里，我哥哥只要一闭上那只独眼，无疑要比他睁着那只眼时看见的要多得多。）我那个“小敌人”——相对那个后来的“大敌人”，我现在这样称呼他——可是不会动手的。尽管如此，他一下子就成了敌人，一眼就是了，好久什么都不用再说了，甚至连再看一眼都用不着。没有习以为常的吐舌头，吐唾沫，使绊腿。儿童敌人不用声明，仅仅就是怀有敌意。他的敌意会爆发为突然袭击。

有一天，教堂里在朗读新约四福音书，大家都站在那儿。这时，我觉得膝窝后面挨了轻轻的一击，几乎只是没有使劲地撞了一下，可是却足以让我支撑不住。我转过身去，看见那个家伙在独自出神。从这个时刻起，他就再也没有让我安宁过。他不打我，不扔石块，也不骂我——只是堵住我的去路。只要我一出门，他就跟在身旁。他甚至闯到家里来——在村子里，小孩去邻居家串门，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挤着我的身子，一点也不显眼，平常谁也发现不了。他从来都不会动手；他所做的一切，就是用肩膀轻轻地顶你（甚至连踢球时的冲撞都说不上），看上去，仿佛他要友好地向我说什么悄悄话似的。而事实上，他要把我挤到一个墙角去。然而，他通常压根儿都不会碰我一下，只是故意学着我的样子。比如说，不管我去哪儿，他就会冲出灌木丛，跟在我身旁，学着我的架势舞来弄去，同时迈起脚步，以同样的节奏甩起手臂。我一跑起来，他也跟着跑；我一停住步，他也跟着停下来；我眨一眨眼，他也跟着眨。此刻，他从来都不会看着我的眼睛，只是打量着它们，就像其他身体部位一样，目的是尽可能早地捕捉到每个动作的苗头来重复它。我常常试图使他对我的下一步行为产生错觉，故意朝着错误的方向接着又迅速掉头转向。然而，你永远都不会骗过他。他以这样的方式与其说是学着我的样子，倒不如说使我黯然失色，我成了自己影子的俘虏。

平心想一想，他或许只是讨厌。这种讨厌劲久而久之自然会变成一种敌意，搅得你永无宁日。那个家伙始终与你形影相随，即便他本人不在我身旁。每当我高兴的时候，立刻又会失去这种兴致，因为我在思想里看到它被我的敌人模仿，而且这样被否定了。其他生存感受——自豪、哀伤、愤怒、爱慕——同样如此：在影子游戏中，它们立刻就会失去其真实性。凡是我感觉自己最有生气的时候，在专心致志的时候，这个敌手就趁机而入，切断我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哪怕是我与这个对象之间才出现一丝一毫的接近，不管它是一本书，一个水上广场，一座田间小屋，还是一只眼睛。在这种持久的、犹如在无声无息的鞭笞下进行的追逐中，没有仇恨能够表现得如此难以忍受。我无法理解会受到如此仇视，并竭力要求得到和解。可是他就是不买账，他压根儿就无动于衷，只是一个劲学着我寻求和解的样子，完全不假思索。再也没有一天，甚至没有一个梦会过得没有我这个守护者。后来，我终于第一次朝他吼起来，可他并没有退缩，而是洗耳恭听：这吼叫声就是他梦寐以求的象征。可最终动起手的就是我。当时我十二岁，在和那个家伙扭打中，我再也不知道我是谁；也就是说，我什么再也不是了；再就是说，我变得凶恶了。我的童年敌人告诉了我（我深信不疑，他明明事先就是这样预谋的），我凶恶了，我比他凶恶了，我是一个恶人。

起初，我不过是拉开挥来挥去的架势抵抗，更像是一个快要溺死的人四处抓来抓去的样子。尽管如此，这家伙也不向一旁躲闪，相反却把自己的脸伸过来挑衅。面孔贴得如此之近，也许就像在一个坠落的梦境里，接近撞点了。我顺手抓上去，这可不仅仅是抵抗的一种反射，而且也是态度的表现，承认，人人都期待已久的表白：我跟这家伙平分秋色。由于我动起手了，我终于承认是一个比自己的敌人还要更为凶恶得多的敌人。说实在的，在接触到别人的唾液和鼻涕时，我有一种双重感觉，既暴力，又冤屈，这种感觉我永远都不想再经历。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胜利的面具："对你来说，再也没有任何退路了！"于是，我就一脚踹到他屁股上，用尽浑身的力量！他没有还手，只是忍受着，扮演出一副不可动摇的怪相。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从这天起，在所有人眼里，可以说我成了"打他的人"。他现在就有理由和权利，永远不再让我安宁。我们迄今暗自较劲的敌意变成了一场战争，而且不可避免地要斗出个名堂来，可是这样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只有我们俩共下地狱。后来有一次，他父亲发现我打他儿子，就直奔过来，把我们拉开，将我推倒在地上，用他在牛圈干活的

鞋子（吼着尖细的嗓门，连连不断地诅咒我这，诅咒我那，而我父亲平常只是在诅咒滑坡、雷电大火、冰雹和破坏房屋和地板的害虫时才这样无以复加地一吐为快）在我身上踩来踩去。这事让我感到幸运——再说是我确实懂得的独一无二的幸运，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十多年之后依然如此。

遭受了这次虐待后，我的话就多起来了，并且能够向母亲（是的，她）叙述那个敌人了。每次叙述都是用一个命令句开始："你听着！"用另一个命令句结束："你可要管一管啊！"母亲成为行动者，在家里向来如此：她说干就干起来了。她借口神父和老师劝说她，就领着这个十二岁的儿子去参加寄宿学校的招生考试了。

在考完试回来的路上，我们在克拉根福特误了开往布莱堡的最后一趟火车。我们走到城外，站在通往家乡的大街上，四面一片漆黑，天下着雨，我也顾不上被雨淋得湿透了。过了一阵子，有一辆车停下来，这车驶往南斯拉夫，去德拉瓦山谷，马里博尔或马堡[1]的司机让我们上了车。车里没有后座，我们就坐在车后面的厢板上。这时，母亲用斯洛文尼亚语向这男人说了我们的目的地，于是这男人就开始试图与她聊起天来。然而，他发现除了那些应付问候的套话和几首民歌歌词外，她对这门语言几乎一窍不通，便也一声不吭了。这次坐在汽车后面铁皮厢板上无声无息的夜间之行给我留下了一幅与母亲融为一体的画面，一再显现出作用和效果，至少在接下来寄宿学校的岁月里如此。为了这次行程，母亲专门让人理了波浪式发型，终于有一天不戴头巾了。尽管五十岁的身躯显得十分臃肿，可一道道的亮光时而掠过时，我觉得她的面目好年轻。她蜷曲着两腿坐在那里，手提包搁在身旁。雨点打在车窗玻璃外面，歪歪斜斜地流去。坐在遮雨的车厢里面，每到拐弯时，不知什么工具、装着钉子的包、空桶都朝着我们滑来。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在心灵深处感受到某种不可遏制的东西，激情澎湃的东西——似乎就像信心一样。母亲的帮助使我上了道，对我来说是一条正道。之前和之后，我确实没有少否定过这个女人。在我的眼里，她是那样的陌生——就连一句合她心意的话，我几乎都难以张口。然而，在1952年这个夏日的雨夜，我突然觉得，有一个母亲，当她的儿子，这是天经地义的。在这个时刻，她也不再是那个农家女人，那个乡巴农妇，那个牛圈女仆，或者那个常去做礼拜的女信徒

了；她常常打扮成这般样子穿梭在村子里。她露出了潜藏在深处的东西：她不是家庭妇女，而更是一个女管家；她不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人，而更是一个精通世故的人；她不是一个观望者，而更是一个行动者。

在去往林肯山村的岔路口，司机让我们下了车。我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母亲挽着我的胳膊，直到她转了一圈。雨停了。月光下，拜岑山脉呈现在平川的边缘，一丝一毫都清晰可见，犹如一种图像文字：一条条峡谷，一道道岩壁，分明的树木线，一块块凹地，一座座山峰。“我们的山！”母亲接着说，早在战前，就在下边沿着山势的地方，像“我们的司机”现在一样，我哥哥朝着相同的方向驶去了，向着东南越过边界，去马里博尔上农业学校了。

在寄宿学校度过的这五年是不值得叙述的。乡愁、遭受压抑、冷酷、集体坐牢，这些词汇就足够了。我们大家所谓孜孜追求的僧侣精神却从来没有使我获得某种使命感。我也觉得几乎没有一个年轻人会有能力胜任。那些神秘的东西早就在乡村教堂举行的圣礼中传播过了，如今在这里从早到晚都失去了任何吸引力。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主管神职人员会充当神父的职责。他们要么关在那暖和的私有屋子里深居简出，一旦叫谁前去，那也仅仅是要警告你，威胁你，摸你的底——要么总是披着拖在地上的黑色教士长袍在楼里来回巡视，充当看守人和探子，形形色色，千差万别。就是在圣坛前，每天做礼拜时，他们也不会承担起曾经被授予的这个神父圣职，而是充当了秩序守护者的角色，履行着仪式的每个细节：当他们转过身去，一声不吭，手臂伸向苍天站在那里时，就好像在倾听着自己的背后发生了什么；然后当他们又回过头来，仿佛要为所有的人赐福时，于是他们心里就只有一个抓住我的念头。而乡村的神父则完全两样：他刚刚还在我眼前把装满苹果的箱子搬入地窖里，听着广播新闻，剪去耳边的头发——而现在就穿着庄重的礼服站在教堂里，不管膝盖怎样咔嚓作响，一心虔诚地屈膝在圣体前，完全忘却了我们其余人的存在。然而，我们正是因为如此才走到一起来了。

与此相反，在学习时，我独自感受了教会兵营里独一无二的美妙交往。在独自学习中，我掌握的每个字眼都先说出了我正确运用的每

个简单明了的表达形式；我能够信手描绘的每个河道都先说出了当时催促着我要奔向的惟一目标：到外面去，生活在自由的天地里。要是你问我想像的“王国”是什么，我要说出的不会是一个确定的国家，而是“自由的王国”。

然而，我觉得，恰恰是人成了那个当时只有在学习中才隐约意识到的王国的化身。接着在寄宿学校的最后一年里，人却成了我的大敌。这一次，不是我的同龄人，而是一个成年人；也不是一个神职人员，而是一个外来人，来自世俗世界，一个世俗的人，一个老师。他还很年轻，刚刚完成学业，住在那幢所谓的教师楼里。在方圆广阔的范围内，这幢楼连同寄宿学校的城堡和凿进山坡的主教墓地一起，孤零零地坐落在偏僻而光突突的山丘上。平日，我对所有人来说都不那么起眼（就是在十多年之后，遇到当年的相识时，我总是听到同样的描述：“好静，独来独往，专心致志。”这样一说，我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他立刻就注意上我了。他讲起课来，都是针对我来的，仿佛在专门给我一个人上课似的。此时此刻，他说起话来，没有一点教训人的口气，更好像是他每讲一句话，就要问问我，是否同意他这样划分材料的方式。真的，看他的样子，好像我早就对这材料了如指掌，而他只是每每期待着我点点头认可，他对其他人并没有叙述什么不对的东西。有一次，当我真的纠正了他时，他非但没有佯装不理，反而兴致勃勃地表明了他的热忱，一个学生居然能够强过老师：这样的情形始终是他梦寐以求的。我一刻也没有忘乎所以——完全是另外的心境：我觉得自己得到承认了。多年让人视而不见之后，我终于被人注意到了，这恰恰就是一种觉醒。我在感情洋溢中觉醒了。有一阵子，一切都很美好：我那些同龄人，首先是那个年轻老师，我们走出了那个令人窒息的信仰地狱，走进了一个学习、研究和观察世界的自由天地里，走进了一个我当时觉得很美妙的荒僻世界里。每天下课以后，我就不知不觉地陪着这位老师走到对面的教师楼前。当他周末驱车离去时，我的心就随着一起飞到城里。在那儿，他无论做什么事情，无非都是为上课的日子在养精蓄锐。一旦他留在这里，教师楼上那间惟一亮灯的窗户就在我的心底里点燃起一种永恒的光明，与昏暗的寄宿学校教堂圣坛旁那闪烁不定的小烛火迥然不同。

这期间，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成为一个老师——我永远就想着当一个学生，比如说当一个这样的老师的学生，他同时也是学生的学生。这样的情形当然只有保持距离才会有可能，可这多么必要的距

离，我们却人为地丧失了，也许是我陶醉在觉醒的感情洋溢中，也许是他沉浸在发现的无比热忱中。直到这个时候，他对于这样的发现也只有做做梦罢了。不过也许会是这样，时间久了，我无法忍受人家拿我当目标。这正好促使我要毁掉那个在他心目中描述的图像，哪怕它也符合我心灵最深处的东西。我要逃开他的视野。我渴望着重新过上默默无闻的日子，就像此前的十六年一样，躲在自己的书桌前，躲在那宽敞的蓝色棚屋里，谁也不会对我有什么看法，更何况如此高的评价——可事到如今，我如此亲密无间地被一个人了如指掌之后，甚至连那个当年常常在我心中作祟的双影人都望尘莫及。到了这个地步，我觉得默默无闻才是真实的，才是美妙的。如果超过了一定的时刻，被当作楷模，甚至是奇迹，虽然面对的并不是别人，而是自身，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忍受的。我渴望着在重重矛盾中消失。有一次，我插问了一句，肯定又一次表明了我的“同步思考”，于是一种兴高采烈，甚至激动不已的不寻常目光直冲我而来，我做出了一副极其难堪的怪相，只是要分散对我的注意力，却刺伤了这位年轻老师。在这同一时刻，我感觉和他一样。他目瞪口呆，然后离开教室，这节课再也没有回来。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他觉得正好看到了我真实的面孔；我真诚的想法，对学习对象的热爱，对他这个将全部身心都投注到自己事业之中的人的好感，都是我伪装起来的；我是个骗子，是个伪君子，是个背叛者。当其他人在热烈地谈论时，我却一声不吭地朝窗外望去。这位老师就站在下面楼前的场地上，背向楼。他一转过身来，正好对着我，我看见的不是他的眼睛，而是撅起的嘴唇，强硬得就像是鸟喙。这既让我痛心，也使我惬意。我甚至在享受着，除了我自己以外，终于不用亲近任何人了。

接着，那鸟喙只是撅得越来越尖了。然而，我现在面对的不是一个憎恨你的敌人，而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执行者。他一旦作出了判决，那就不可挽回了。再说那个放着书桌的棚屋并没有表现为避难所。我再也学不下去了。这位老师每天向我表明，我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我所知道的，不是“所要求的”：我那所谓的知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文不值的东西”，不是那“材料”；它不过是出自于我而已，以这种形式，没有一个被大家共同认可的表达方式，对谁都没有什么用处。我凝视着那棚屋，独自与笼罩在心中的乌云为伍。在这棚屋里，那一个个符号、辨别、过渡、连接和组合的光明世界曾经呈现给我一片蔚蓝的天空，又让我兴趣盎然。不可想像，这乌云会一散而去；它越来越沉重，四处弥漫开来，涌到口腔里，钻进眼窝里，堵住了我的

声音，遮挡住我的目光。这些都是无声无息地发生着：在教堂里，集体做礼拜时，我本来就只是动动嘴唇，而在学校里，因为这位老师同时是班主任，不久便不提问我了，更不用说关注我了。在这段日子里，我经历了可谓失去语言的感受——不仅在其他人面前默默无声了，而且面对自己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发不出一个音了，做不出一个动作了。这样的沉默在呼唤着力量；任何退让都是不可想像的。可与那个小敌人不同，这力量是无法向外发泄的。这个大敌人，他沉甸甸地压在你的心头上，你的腹腔里，你的横膈膜上，你的肺翼上，你的气管上，你的喉头上，你的软腭上，堵塞了你的鼻孔和听觉，那个被他包围在中间的心脏，不再跳动了，不再搏动了，不再嗡嗡地响了，也不再输送血液了，而是滴滴答答地响，刺耳，辛辣和凶恶。

这时候，有一天早上，我在上课前被叫到寄宿学校校长跟前。他呼着我的名字告诉我，我母亲马上会打电话来（当着她的面，他总是叫我“菲利普”，而平日里，人家只是呼我“柯巴尔”）。到那个时刻，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母亲在电话里的声音。而直到今天，几乎所有她的其他表现，不管是说话、唱歌、大笑还是无休无止的抱怨，都逐渐消失了。可她当时的声音依然萦绕在我的耳边，低沉得就像一个刚从邮局的电话亭里传出来的声音，单调而清楚。她说，父亲和她商量好了，让我离开这个“男子学校”，转到一所普通学校里，而且立刻就转。两个钟头后，她会乘坐邻居的车到达，在楼下大门口等我。她已经给我在克拉根福特的高级中学报上名了。“明天一早，你就会进入你的新班级。你将坐在一个姑娘旁边。你天天要坐火车去。你可以在家里有一个自己的房间；餐厅不再需要了；父亲正在给你做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我想要反对，可突然又不再反对了。母亲的声音是一个判决者的声音。她对我能知道的都知道了，她为我负责，她作决定，而且由她来宣布释放我的决定，刻不容缓。那是一个从内心深处跃起的声音，一个毕生都在那儿积聚的沉默中迸发出来的声音，仅仅就这一次。这样的积聚也许正是为了在仅有的一个时刻，把握住合适的机会，令人折服和一劳永逸地来行使权力要求。这声音随之又会立刻回归到那沉默之中。在那里，它的臣民拥有了王位和帝国。那也是一个轻快的、让人振奋的、简直是舞蹈般的声音，几乎和老生常谈不分你我。我把母亲的这个决定告诉给校长。他一言不发地接受了。转瞬间，一小队兴高采烈的人马，穿行在那广阔的原野上，带着这个被赦免的家伙和放在后座上的旅行箱，行进在一片高高的天空下。在灿烂的阳光里，仿佛汽车的顶盖被掀开了似的。每当我们前方的道路

没有车辆时，手握方向盘的邻居就手舞足蹈，蜿蜒蛇行，并且放声歌唱游击队歌。不知道歌词的母亲随着一起哼唱，其间拖着一种越来越庄重的音调呼叫出点缀在我回家路上左右两边的地方名字。我感觉眩晕，紧紧地抓住旅行箱。假如我当时要说出自己的感受是什么的话，那也不会是“轻松”、“高兴”、或者“幸福”，而是“光明”，几乎是太多的光明。

尽管如此，我再也没有称心如意地回过家。这期间，恰好就在寄宿学校的这些年里，每次回家的行程都是在一种隆重喜庆的启程气氛中进行的。这不只是因为除了夏天外，我们只是每逢神圣的节日时才被允许离开。在圣诞节前夕，那些被释放的学生顾不上天空还一片漆黑，就冲下山去，首先抓住时机离开那条盘道，带着行李越过栅栏，仿佛走在一条直行线上，穿过那陡峭的、荒无人烟的、冻得实实在在的牲畜攀爬的坡地，继续跋涉过那片溪水释放着雾气的沼泽地，直奔向火车站。接着，在火车行驶中，我站在车厢外面的平台上，和其他人拥挤在一起，我的耳边回响着他们高兴的吼叫声。天依然还没有发亮，笼罩着一片把天地合拢起来的强劲的黑暗，上面是群星闪耀，下面是从火车头里飞出的火花。这种黑暗的力量空间被那自然力交织为一体，就是到了今天，我依然会把它想像成某种神圣的东西。看样子，仿佛我根本就不用再特意去呼吸了。那流动的空气让我的内心热血沸腾，直涌向鼻腔。我听到了身旁的人从心底里发出的欢呼声，听到了自己只是默默地埋在心底里的欢呼声。这欢呼声来自那隆隆运转的车轮，那嗒嗒鸣叫的铁轨，那咔啦作响的道岔，那指引开道的信号灯，那确保道路畅通无阻的道口杆，那响彻在这整个呼啸而去的铁道系统里的噼啪声。

然后，大家一个个分手离去，深信眼前呈现的是最美好的一段路程，最有冒险经历和结束行程的步行路程，一个家。可是，这个同被隔离的人却从来都不知道有这样的家。实际上，有一次，在这样一个日子里，这位成长中的年轻人抵达火车站后，穿过田野朝着村子走去。这时，有一样东西和他形影不离。这期间，他看见了那个被宗教历法所宣告的救世童。当然，这里并没有发生什么别的事情，只是当他走过去的时候，在路边那些干枯的玉米秸秆后面，一道道的间隙闪闪烁烁。它们动来动去，一步接一步，一排并一排，总是一个样子，

空荡荡，白茫茫，飘来飞去。这时，他有一个幻影，那是一个小小的空间，而且是同样一个，它此刻不仅陪伴着他，而且又猛地一下飞到他前面；那是一丝微风，它总是在你的眼角呼呼地飞来飞去，像鸟儿一样，在等待着我，然后又先飞去。在一片平坦的耕地上，从一条犁沟里卷起一堆玉米叶飞向空中，灰黄色的叶子先是原地飘上一会儿，然后变成了圆柱形，又慢慢飘落到地上。在远处，有一列火车在行驶，它几乎隐没在雾气中，仿佛要突然停在轨道上，又突然远远地冲上前去，同样猛地一下，就像我身旁那轻轻飘动的东西一样。我朝着回家的方向奔去，心急如焚地要去叙述，可是我一跨进门槛就知道，那是不可直接叙述的，口头也叙述不了。一打开门，就只剩下这座房子了，暖融融的，闻着一股清爽的木头味，里面住着人，可是和在寄宿学校里不一样，那都是我的亲人。这一大早的火车行程集结在脸上的煤黑叙述着就够受欢迎的了。

寄宿学校是一个十分陌生的世界，离开那儿，无论去东南西北，就只有一个方向：回家。你晚上躺在寝室里，听到火车在下面的平川上缓缓行驶时，你就会想像着坐在里面的人无非都是要赶着回家去。飞机飞行在那条国际航线上，正好从这村子上方越过，云彩也从这里飘去。那条林荫道指引着回家的路。在它的尽头，一片牲畜攀爬的坡地倾斜而下；在一条条长满草、空荡荡的羊肠小道上，你会觉得目标已经近在咫尺了，就像在捉迷藏时一样，仿佛听到了声音："太让人激动了！"每个星期来一次的面包车，然后继续驶向一个只是闻其名而熟悉的地方。然而在那里，大街上的灯光就是我家乡的灯光。恰恰那些最遥远的对象——山峦、月亮、灯标——好像就是通向那个地方的空中桥梁。你在那里才是"主人"，和出生证里写的一样。那些天天都要逃脱的想法从来都不会向着一个大城市，甚或是国外，而始终只是滞留在家乡的天地里：那儿的谷仓、某个田间小屋、林中小教堂，湖畔的芦苇风雨棚。几乎所有的教会学生都来自乡村。谁要是真的逃走了，他立刻就会被抓住的，不是在自己的村子周围，就是在通向那里最近的捷径上。

然而到了今天，一切变得来去自由了，每天往返于这个偏远的村子和城里的学校之间，我感受着自己不再有固定地点的滋味。那个专门给我准备的房间，无非用来睡觉而已。在我住寄宿学校的这些年里，林肯山村几乎就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座教堂，那些低矮的斯洛文尼亚式的农家房舍，那些不围篱笆的果园。我现在体会的林肯山

村不再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而仅仅是一个零零散散的乡村居住区。虽然村子广场、谷仓坡道、保龄球道、养蜂场、草垫子、炸弹坑、圣坛塑像、林中的空旷地依然如故，但是它们不再显现出昔日那相互关联的统一。而我当年在其中的一举一动就是本地人中的一员，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现在看上去，仿佛连个挡风避雨的地方都荡然无存了，在那刺眼冷酷的光线下，似乎没有了聚会的地点，欢乐的地方，隐匿的角落，引人注目的东西，休息的场所——一言以蔽之，再也没有了相互转换的空间。起初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个村子上，因为机器代替了许多手工家具。然后我就认识到：这个格格不入的人，这个脱离了关联的人，那就是我。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跌跌撞撞，不是碰壁，就是抓空。我一迎面碰上什么人，就躲开人家的目光，哪怕我们是从小就认识也罢。这么久离家在外，没有在家里待过，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地方，这些就像罪孽一样刺痛了我。我错失了留在这里的权利。有一个同龄人，当年在村子里，我和他一起度过了小学的岁月。有一次，他想给我讲一讲邻居的这事和那事，然后中断叙述说：“你看来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再也走不进那些同龄人的圈子里了。我也是他们之中惟一还在上学的人。别的那些人，不管是农庄继承人还是手艺人，他们都成了有工作的人了。照法律说，他们还是青少年，可我觉得他们已经成人了。我看到他们不是在一心一意做事，就是正要去找事做。他们身着工作服和围裙，直挺着脑袋，睁着始终果断的眼睛，放开劲头十足的手脚，有点像军人的样子。与之相应，学校教室里那嘈杂的声音，不是变成了三言两语，就是点点头而已，或者骑在摩托上擦肩而过（挥一挥手就足够了），既不说上一句话，也不看上你一眼。他们的娱乐也是成人的娱乐。而我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局外人。我目睹着一对对舞伴那样庄重，那样全神贯注地迈着矫健的步子旋转在舞池中，禁不住打起诧异的寒战，甚至肃然起敬的寒战，仿佛是在朝拜一个神秘的东西。这个庄重而翩翩舞动的少妇不就是那个曾经用一条腿跨越过粉笔划定的天堂与地狱之界的女子吗？而这个现在从容不迫，稍稍撩起衣服，迈着舞步跨上舞台的女子在不久前还向我们展示过她那未长阴毛的小孩生殖器呢！就在野外的牧场上。多快呀，他们一个个都脱离了童年的幼稚，长大成人了，确确实实看不起我了。每个小伙子也都经受过很大的不幸了；不是这个缺一根指头，就是那个少一只耳朵，或者失去整个手臂；至少有一个不幸丧生了。有些人已经当了父亲；又有不少人做了母亲。而这个他，却依然被关在那个地方。我到底是怎

么回事呢？我认识到，随着在寄宿学校的岁月，我的青春逝去了，我似乎就没有感受过青春，哪怕是一时一刻也好。我把青春看成是一条河，自由自在地涌流在一起，共同向前奔流不息。随着踏进寄宿学校的大门，我和那里所有的人一起都被隔绝在世外了。那是一个一去不返的年代，再也无法挽回了。我缺少某些东西，某些决定命运的东西，也许我会永远缺少下去。像村子里一些同龄人一样，我也有身体上的缺陷。然而，这种缺陷并没有脱离我，不像一只脚或者一只手，而且也根本不是现在才形成的。再说它不仅只是一种所谓的肢体现象，而更多是一种无可替代的组织。我的缺陷则意味着我再也赶不上其他人了：既做不到一起，又说不到一起。看样子，我好像搁浅了，成了一个废物，而那条似乎惟独承载了我的水流好像永远从我身边流去了。我心里明白，为了未来的一切，我需要这青春。如今我无可挽回地错失了这青春，这才使得你进退维谷，甚至在你的内心深处时而会引起无比痛苦的抽搐，尤其是在与我不相上下的同龄人交往时更是如此。要想从中解脱出来，我发誓要与那些让我麻木不仁的人——本来就存在这样的人！——势不两立。

虽然我也一再对这种袖手旁观的日子感到满意，可是久而久之，我也不甘心这样孤独地过下去。于是，我就和村子里那些年龄小一些的孩子结伴。这些孩子乐意地接受了我，把我当作他们嬉闹的裁判，当作支持者，当作一个不跟他们说实话的人。在傍晚和黑夜降临的时刻，教堂前的空地就成了属于孩子们聚集的地方。他们要么坐在教堂墙壁的外台上，要么把身子撑在自己的自行车上，通常要让人呼叫好多次以后才回家去睡觉。他们几乎都不说话，无非就是在这儿凑到一起，蝙蝠围着飞来飞去，时间就这样流去，直到谁都几乎看不到谁。在这里，我就使尽浑身解数，试着充当起一个叙述者。我时而划起一根火柴，时而拿起两块石头相互敲击，时而向握成空心球似的双手里口气。这期间，我当然从始到终也就是玩玩把戏——畸形足走路，洪水猛涨，鬼火临近。这些听众压根儿也不想听什么情节，这些把戏就足够了。然而，这个快要成年的男子好像并不满足于这样围绕着别人转来转去，于是他就坐到这些孩子中间，犹如他们的一员。他们觉得这完全是不言而喻的事，可是那些当年的伙伴却冷嘲热讽我。他们此间已经变成“大人”了。有一次，我和几个几乎没有一个能够到我肩膀的毛孩子在广场上赛跑。这时，那个我在寄宿学校的夜晚常常看见

隐现在蓝色帷幕后的姑娘——从来没有过对一个女人如愿以偿的裸体想像——脚穿高跟鞋，昂着头挺着胸走过去了。她撅起嘴，几乎让你觉察不到，一副地地道道不屑一顾的神气：仿佛从眼角投来的一瞥已经吐露出了她的一切，也就是说我怎么看着都让人不是滋味。

突然间，我不仅被阻断了与那些孩子的交往，而且也无法去广场上了。我被驱赶到那个在当地语言运用中被称为“花园之后”的边缘地带。换句话说，这个表达也就意味着那个地方虽说也住着人，可不再那样合情合理地被当作村子的一部分：栖身在那儿的人都是孤寡人。比如那个护路人就住在那儿的一间窝棚里。窝棚墙壁很厚，涂成了深黄色，犹如一个无论哪儿都不会再有的（而且在那些村子周边也从来没有过的）城堡的门房。我没有进过这间屋子，也与这个人始终保持距离。在我的周围，他是惟一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人。只要一有秘密，他不但守不住，而且要一吐为快。他每天的工作无非就是养护这个地区的公路。然而，有些日子里，他也会起身离开那个放在乡间公路荒僻野外中的碎石箱，变个样儿站在一个梯子上，比如在村子中间的客栈门口上方，成为一个写写画画的人。看着他用极其缓慢的笔触给写好的字母再加上一道彩虹，看着他用几条细如发丝的笔线似乎要给那粗壮的字母透透气，并且从一片空白中变幻出下一个字来，仿佛它早就在那里存在似的，而他不过是描描而已。此时，我就在这显现的文字中看到了一个隐藏着的、不可名状的、因此愈显富丽堂皇的、并且首先无边无界的世界帝国的象征物。正是由于这个帝国的存在，这个村子似乎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走出了无足轻重的境地，成为这个帝国圈子的核心。这个文字图像的形式和颜色此刻在这里浑然一体，构成中心，把这个圈子照得通亮。在这样的时刻，连这位写写画画的人站的梯子也变得非同一般了：它不是倚靠着，而是高高耸立着，两条腿旁的路缘石闪闪发光。一辆满载秸秆的马车从旁边驶过，一捆捆秸秆编织成了一个个花环。百叶窗上的挂钩不再是下垂着，而是指示着方向。客栈的门变成了庄重的大门，进入的人都听从这文字的召唤，一边注视着它，一边脱下帽子。从背景中，突显出一只在那儿扒食的鸡的爪子——是一只徽章动物的黄色爪子。这位写写画画的人站着的这条街，不是通往那个临近的小城，而是通向村外的旷野，并且同时径直指向他的笔尖。在别的一些日子里，秋天的狂风落叶，冬天的雪花飘舞，春天的繁花似锦，夏天的远方闪电，在我眼前这乡村广场上，那个大世界曾经作为不折不扣的现实而主宰过。然而，在

这些写写画画的日子里，我却有了更多的感受：在现实中感受的时间，升华为时代的感受。

我觉得，那个护路人还有另外一个变身法：他给坐落在野外田间小道旁的圣像柱重新涂色。有一个田间的圣地就像是一个小教堂，有一个内室，当然小得可怜，其中仅仅不过一步的空间。我总是碰到他在忙活着。他身子挤进这坐落在偏远十字路口的四方空间里，只露出脑袋和胳膊肘。他把胳膊肘撑在小窗腰上，小窗朝着我的方向敞开着。此刻，圣像柱不禁使人想起一个被掏空的树干，一个驾驶室，一个岗亭。看样子，仿佛这人把它扛在自己肩上，扛到野外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这位写写画画的人简直连退一步来审视一下自己干了什么的空隙都没有。然而，他站在那里，头上戴着礼帽，一点也不为我的脚步而分心。这镇静自若劲表明，他根本就不需要那样一个活动空间。那幅需要修复的壁画从外面是看不见的。过路人要想看看上面画的是什么，就得把身子弯到窗腰上。在这个小室里，惟独反射着主要色彩，一种浅蓝色。在这个色彩中，久久看去，每个别的色彩运动就像榜样一样影响着我。真的，有朝一日，我也希望这样来干我的事情。如此悠然自得，如此从容不迫，如此无声无息，不为任何人而动摇，完全自由自在地活着，没有劝说，没有赞扬，没有期望，没有要求，一句话，没有任何别的想法。不管今后干什么工作，它都要和这儿的工作一个样。这样的工作使得从事它的人如此显然地变得完美，并且让这个偶然的见证人得以分享。

在这些年里，我每天不得不感受着。对我来说，在这个村子里，在过早因为暴力断送了童年之后，再也没有可能建立什么联系了，不存在什么延续了，也不会再持久下去了。与此同时，我那神经错乱的姐姐第一次开始接近我。说来也奇怪，从小时候开始，周围所有的疯子都吸引着我，而我反过来也吸引着他们。他们在不间断地漫游时，常常走到窗前，将鼻子和嘴唇贴到玻璃上，龇牙咧嘴地朝屋里冷笑。当我在布莱堡上学的时候，在我的眼里，那儿有个独一无二的地方，让我越来越着迷，那就是护理院，疯人院。我定期在放学以后绕道前往，让人家透过围栏，用叫喊和无声的挥舞——我也回想起拥抱空气的情景——来欢迎我。接着，我一边十分兴奋地往回走，一边在空荡荡的乡间大路上自个儿挥舞来，叫喊去。看样子，好像那些精神病人

或呆子都是我的保护神。当我好久碰不到他们时，那么只要一看见第一个十分友好的呆子就高兴极了，顿时会充满力量，如同大病初愈。

然而，在我看来，姐姐既不是那群劲头十足的呆子中的一员，也不属于疯子行列。她总是独自一人，不可捉摸。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怕她，躲避她。只要一想到她的目光，我也觉得就像人家说得我心悦诚服一样，那不是精神错乱的目光，而更多是凝视；不是呆若木鸡，而更多是清清白白；不是沉迷于过去，而是任何时候都在现场。我不断地与这双眼睛进行较量，可是较量的结果没有一次对我有利。此间，这个工具（我把那个不动声色的目光看成是这样的工具）表明的并不是我当时的过失或者无耻行为，而更多是那根本的不幸：我伪装了；我不是那个自己表现的我；我不是真实的，我根本不是这样，我是在演戏。而且她也真的从来都没有善良过。无论干什么事——只要我这样或那样一盯望——我都觉得做什么都是给她和我自己看的，再说是虚伪和拙劣的。起初，她嘲笑我，起码有时在她那咯咯笑声中几乎还带着同情味。后来，在经过这样蔑视的折磨瞬间之后，她只是一声不吭地幸灾乐祸。因此，我就尽可能地躲开她（当然，她过后也许会出乎意料地站在回廊里，并且在那儿设下她的目光陷阱）。

我姐姐大我那么多，这无疑也让我感到诧异。哥哥和她只相差一岁，而我和她却相差二十多岁。实际上，这孩子久久地把她当成家里的一个陌生人，一个可怕的入侵者，她随时都会从头发里拔出一根发针来刺人。那么到了如今，当我从寄宿学校回来时，她又从自己的头发里拔出饰针，不过这却意味着：她靠近了，她向我表白心事，她接近我，带着关怀的神情，也是一种激动。当我下了火车时，她激动地穿过田野，迎着我走来；她激动地帮我拎着包；她激动地递给我一支鸟羽毛，拿来一个苹果，献上一杯果子酒。我否定了全部的过去，我最终就是这个样子：最终不仅她不知所措，无可归属，而且我也一样。她最终有了一个同谋，一个同盟，可以围着我转了。她的目光不但不伤害我，而且停留在我身上。如果说这目光迄今向我预言了不幸的话，那么它现在无非就预示着对我的、她的、我们俩的现实存在的惬意。然而，此时此刻，它绝对不是强加于你，始终不过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征兆，像符号一样，无视于我需要的任何第三者。

在我的想像中，姐姐相应的举止就是坐姿，安安静静地挺着身子坐在那儿，两手搁在身边的长凳上。虽说家家门前都放着这样一条长

凳，可平日都是男人们坐在那里，大多数是老人——而惟独作为老者留在我记忆中的父亲却没有给我留下一次坐着的印记。相反，我看见村子的女人们“一天到晚都忙个不停”，就像人们谈论女店主时说的；要么奔忙在大街上，要么弯腰劳作在花园里，要么在屋子里奔来跑去。也许我只是这样想像，不过在我看来，这是斯洛文尼亚乡村女人的一个特点。在屋里，她们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每个动作都是奔跑。她们从桌前跑到灶前，从灶前跑到菜案前，又从菜案前跑回桌前，尽管各个点之间都近在咫尺。这种在狭小空间里的奔跑开始于站立，是由短步急走、踮起足尖一闪而过、就地奔跑、换换脚、转向和再短步急走组合而成的快速延续，从整体上呈现为一种脚步沉重的跳跳蹦蹦，一种长年累月的女仆人的舞蹈。连那些少女也一样，她们刚一走出校门回到家里，就刻不容缓地开始在那里奔忙，在客厅厨房里蹦来蹦去，要和别人争个高低，就像自然而然地迈着效劳的急步。甚至连我那个不是本地人的母亲也接受了这种习俗，比如说，她眼睛盯着地板，屏住呼吸急急忙忙地蹦过来，就是要为我送杯水，仿佛我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贵客。此时此刻，我想不起来什么时候会有这样一个客人光顾过我们这个家，甚至连神父也不曾来过。可眼下这位姐姐是村里女人中惟一让我看见坐着的一个。她坐在门前的长凳上，光天化日之下，无所事事，就是坐着。而且像那个护路人一样，我也把她看做一个榜样。她坐在那里，指头扳来弄去，指间并没有通常的十字架念珠。这时，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变成了一个空中精灵，只是让她自己最愿意看到的人才看得见，那就是我。与那个写写画画的人一模一样，她远离其他人的舞蹈，以其愚人百无禁忌的自由，也代表了这个村子的中心。我心想，她现在坐的那个地方，那坐落在教堂某个昏暗的角落里而不为人注意的千年小石像似乎就可以正襟危坐在那里。它就只剩下躯干、手和头。从那饱经沧桑的脸上，隆起的不过是眼睛和满带微笑的嘴，二者都紧闭。眼皮、嘴唇和拿着石球的手在露天里反射着太阳的光芒，这全部图像挪进了那光芒闪烁的房屋墙壁里，成为它的基座。

是呀，那帮孩子在夜幕中的时刻；是呀，那个没有见证人而辛勤写写画画的人的时刻；是呀，那个坐在太阳下的同谋者的时刻：然而，久而久之，所有这些时刻都不能替代我那失去的天地。

这个梦结束了，许多梦肯定又随之而来了，大梦和小梦，白日梦和黑夜梦。可是在这些年里，我也没有变成城里人。虽然我在村子里变得可怕了，常常在放学以后直等到最后一趟火车才回家，可我在城里到处都格格不入。那时，我不去饭馆里，同样也不去看电影。于是我不是四处荡来荡去，就是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消磨时间。或许也是克拉根福特的特点使我毫无目的：要走路去湖边，离得太远。这个的确让我觉得广阔的城市，一个州的首府却没有河流经过，要不就可以去河边，站在桥上。那惟一对我来说像客店一样的城市大楼就是学校，它坐落在火车站旁。我在那儿独自度过了一个个下午，不是在教室里，就是在走廊某个被打扫干净的角落，里面摆放着桌子和长凳。有时候，其他名义上的走读生也加入到这里来。于是在这座宏伟的、空荡荡的、越来越变得无声无息和昏暗的大楼里，我们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小团体，一个默默无声地坐在窗前长凳上和站在拐角的小群体。在这里，我遇到了那个很有主见的姑娘，过后还和她看过一次电影呢。她同样住在离得很远的地方，位于相反的方向。我现在想起来，与寄宿学校的岁月不同，那个地方要比自己的家乡诱人得多；凭她那张从走廊的昏暗中迎着我照亮的脸看来，她只有可能属于坐落在某条繁华大街上的豪门望族之家。

相反，和同班的同学，我惟独在上课期间有一种群体的感受。在这里，我有话可说，甚至有时候是代言人（或者是遇到疑难问题时被提问的人）。然而，下课后，我就孤零零的。其他同学都住在城里，不是和父母一起就是寄宿在亲朋家里。而且他们都是律师、医生、厂主和商人家的孩子。没有人像我一样，连自己父亲的职业都说不出口。那么我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山涧工人”的儿子呢（这些是我父亲几十年里干过的工作），还是干脆回避说我父亲“退休了”不就够了吗？我也隐瞒了自己的出身，因此也撒了谎，一会儿说得高高在上，一会儿又说得什么都不是。我甚至想跳过这出身，让我像一个压根儿就没有出身的人，这样对我来说无疑再好不过了——当年在布莱堡这座小城里，在和那些教师、警察、邮局经理、银行职员家的孩子们打交道时，我确实已经清清楚楚地认识到那影影绰绰感觉到的东西：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从心灵深处和他们完全两样，他们不是我的世界。他们有自己交往的规矩，而我根本就没有。他们的社交活动不仅让我感到陌生，而且反感。他们起初还客气地邀请我去参加社交活动。站在一个舞蹈培训馆门前，听到那女培训师数着节拍的命令，我不禁想像着，这里面都是终身被监禁

的人，而且是自觉自愿的。我觉得抓住的门把手如同相应的手铐。在一次花园聚会时，我曾经屈起双膝闲坐在挂在我头顶上方的吊床里，笼罩在五彩缤纷的灯笼，闪烁的风灯，烟雾浓浓的烤肉篝火中，沉迷在轻音乐和喷泉哗哗的水声中，包围在一群舞动和聊天的人之中，就像进入了一张罗网，再也无法逃脱了。

在学习群体之外，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无论站在哪儿，都成了碍事的。由于我对每句话都踌躇不定，那些本来进行得如此应对自如的谈话被弄得戛然而止。当其他人都昂头挺胸地从人行道中间走去时，我却弯着身子，紧贴着墙壁和栅栏挪过去；当他们不管在哪儿，比如大门口停下来要让人看看时，我就利用这个瞬间，悄悄地从他们身旁跨过门槛（这样有时反而更加引起他们对我的注意，就像发生在教室里的哄堂大笑所表明的一样）。一句话，与同学们在一起的那些自由时光就是笼罩在我反应迟钝的征兆之下，这无疑只有我一个人心里明白。好些年以后，我似乎在有轨电车里一个男子身上看见了自己当年的影子：那个人坐在一群讲着笑话的同伴圈里。他总是随声附和别人的笑声，然而每次都慢了一点，而且也是笑到一半又一再戛然而止，发起呆，接着又跟着一起笑，声嘶力竭的样子。在他的周围，没有一个人能觉察到让我这个局外人立刻就明白的一切：他肯定听懂了这儿所叙述的东西，可是并没弄明白这笑话的弦外之音。他对双重意义和影射彻底没有感觉，于是，别人讲什么，他就完全当什么。在沉默的瞬间里，我从那简直吃惊的眼神中看得出，他甚至在共同经历着那些叙述的一个个细节，当作某种十分严肃的东西。这时，我就在有轨电车上想着，当时我坐在同学们中间，情形也一模一样，惟有局外人，像我现在一样，似乎才会认识到，有人处在这个圈子里是“不合宜的”。

有一次，我们好几个人坐在一张桌旁聊天。起初，我还跟得上，可是后来，十分突然，我与别人之间就一刀两断了，那儿是交往的人群，这儿是我。我只是听到他们在说话，没有看他们。在我的余光里，最多不过是几个肢体闪来闪去，或者动来动去。因此，这听觉就越发敏锐：让人吃惊的是，无论是每个句子的一字一词还是抑扬顿挫，我似乎都能够立刻清清楚楚地复述出来，比最好的录音机还要真实。人们谈论的无非都是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借以消遣。然而，恰恰

就是人们谈论的那些事，还有他们谈论那些事的方式使我气愤。这期间，我自己不是也竭力想参与其中吗？是呀，可是此刻我无声无息地坐在一旁，就想着让这一圈人来问一问。在我看来，那些人当然只是谈得越发来劲，旁若无我，无视我，仿佛此间惟独就是要这样做给我看的，他们就是他们，而我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是的，这帮市民子女当着我的面，当着这个一声不吭的人的面，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没了，压根儿连问都不问你一声。他们如此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像我这样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驱除出去，就连他们说话的方式也是冲着我来的，尽管其中也没有什么恶语相加，像是平平淡淡，容易上口的歌唱。我感到，面对这样的聚会，在孤独的境地中，能量在我的身上聚集——那种总有一天也要说话和叙述的冲动——，在我的脑海里突然变向，一边猛烈地震撼和麻醉了整个大脑，一边弹回我的身体里。那种“孤独”，我不过是把它当成一个字眼：我就是这样感受孤独的。在这一天里，我打定主意，这种形式的交往永远也不会是我的。甚或不能在这儿跟他们一起谈论，充当一个另类，这不也是一种无声的胜利吗？我不告而别，离开那张桌子，他们甚至连片刻都不停顿。后来，当再发生这样的事时，我才听到有人说，我没有过“儿童游戏室”。随之我想起来了，在我们家里，确实没有过孩子们的专用空间。再说，从发生这些事情后，留给我的就是一个后来我自己无论如何非要改掉的不好习惯：在一次争论中，冲着一个对手说出了“你们”，尽管他就一个人而已。

这样一来，我那时的家园就是乘车，在汽车站和火车站等待，一句话，在路途上。每天九十公里路程，或者加上步行，来往于村子和那个城市之间花去的三个钟头构成了一个时间空间。由于各种各样的麻烦，它同样也给予了适合于我的生存空间。每次都会让我深吸一口气，终于又来到这些绝大多数不相识的人之中，我不需要把他们之中的任何人分类，他们也不用将我去分类。在乘车期间，我们既不是穷人，也不是富人，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斯洛文尼亚人，充其量就是年轻和年老而已——而晚上乘车回来时，我甚或觉得，仿佛我们之间压根儿连年龄都不算不上什么了。可是我们到底是什么呢？在这没有等级的客车里，干脆就叫做“旅行者”或者“旅客”，而在汽车里，则更好听些，叫做“乘客”。有时候，由于各种原因，我选择乘汽车：一方面，这样我路途上会长些；另一方面，这时天已经黑了；再说乘坐汽车时，我觉得连那些令人厌烦的熟人一个个都变样了。无论是在村子还是小城里，我哪儿都会把他们和

他们的声音、他们走路的姿势、他们的目光，他们胳膊肘撑在窗台上扭头望着过路人的样子，也包括我对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来历所知道的东西等同起来。可在这儿，他们一上汽车，一下子就变得无法确定。而作为无法确定的人，他们在我的眼里超越了平日：他们被消除了自己的特征，终于表现为独自，惟一和现在。在这飞快行驶摇摇晃晃的汽车里，他们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显得比他们在家乡坚守的教堂固定座位上要真实多了，就像被共同的行程脱胎换骨了。变得无法确定以后，他们才显现出自己的图像。他们这时表明了什么，同时却又是无法阐释的，这也就是实实在在的他们。他们和一个个乘客打招呼毕竟就是招呼；他们的询问毕竟就是想要知道。我虽说没有能够这样坚持，可是我本该如此啊！在这几乎总是零零散散的人堆里，或者由小孩和成人组成的一个个人群里，我感到就像受到保护一样，如同在像我这样的人之中似的。这些人由一个可信任的公职人员（在家乡或许就是个闷闷不乐的邻居）驾驶着穿行在城市和乡间公路上，不是什么郊游，也不是什么娱乐目的把大家联系到一起，而是不得不做的事情使他们离开住地和花园，去看医生，去上学，去逛市场，去当局办事。这种感觉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黑暗的保护。有一次，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坐在几个女人后边，她们谈论着自己的亲戚，满车都听得到。她们正好都是去医院方向的路上。她们的病史形成了各种声音清晰的连续，一个扯开嗓门，一个低声低气，一个痛苦抱怨，一个泰然自若，其间各个声部分别加入合唱。于是，这辆行驶的汽车就变成了一个现在单独属于这些女叙述者的舞台，而在这个装着玻璃的保护罩里，最后集结成一个完整的王国的光束，一道驱散一切现实存在和让人透不过气的东西的光束，一道催人振奋的光束。这是一个特殊的，此刻却与这辆汽车一起运行的王国。那些女人的头巾闪闪发光，从她们手提包里闪耀着一束束花园鲜花的绚丽色彩。

我一再看到那些在停车站下了车的乘客以相似的方式匆匆地消失在黑暗里：这些停车站同样也是舞台，一个情节发生的地方。它不外乎就是人们在这里来来往往，首先是等待。有几个人在转身离去之前，还要在灯光圈里停留片刻，仿佛面对回家的路犹豫不决（当时我也属于他们的一员）；其他人几乎刚一下车，就像梦中的孩子们有时候那样，立刻就无影无踪了，仿佛永远消失了。而旁边热乎乎的座位，呼吸时散发在玻璃窗上的雾气、手指和头发的印记充斥着他们留下的空虚。

那时候，市汽车站一带成为我的主舞台。一条位于火车道旁的横街设有临时售票房，街道两旁都是木板搭起的小客店。那儿有汽车开往国内各个方向，甚至在有些日子还开往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在这里，我感觉自己处在事件的中心。要说发生什么事了，当然莫过于临时售票房里油黑闪亮的木地板的气味，铁炉里呼呼燃烧的响声，门扇砰砰的撞击声，外面摊位上广告晃来晃去的样子，一辆辆汽车发动时的颤动，一辆辆汽车停站时噼啪咔嚓的响声，粉尘、碎片、雪花和报纸飘过刮风的大街。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些东西，或者说它们本来就存在，大树高处浅黄色的灯，小客店巨大的支梁，标记目的地的锈迹斑斑的金属牌子，这些对我来说，作为情节就足够了，再多也根本用不着发生，这已经很丰富了。一个面孔从黑暗里走出来，变得那样容易认识，那样有个性，这就已经太多了。它不但不碍事，反而使你清醒。在那些我为此不由自主想像出的故事中，那么主人公也同样是一个冒充上帝的人，或者是一个白痴，他在上车时受到了大家的冷眼，而在夜间行驶中充当了复仇者，把汽车开到万丈深渊里。连那个女朋友坐在自己出发的汽车上，从街道另一边向我转过脸时都阻挡住了那望向自由空间的目光。只有当她离开了视线，那个地方又空荡荡时，我才会去回应她的招呼。然后，她自然好像定居在那整个国家里，我和她一起行驶着她的路程，就像她和我一起行驶着我的路程一样。

是的，我的路程，不是坐火车就是乘汽车，火车站和汽车站，这就是我当走读生的岁月里的家。寄宿学校岁月的乡愁一去不复返了。在没有课的日子里，我就被牵引到那条有等待位置的大街上，它不同于村子，无愧于“地方”这个名称。我被迫永不停息地奔波，居无定所，没有落脚的地方。在此间经历的一切痛苦中，当年的乡愁是最残酷的，是一种折磨，不同于平常只袭击一个人的折磨，从天而降，而在你的周围，一切都安然无恙；它也不同于一般的折磨，无可对付，屈服于一种漫不经心，只要这种漫不经心没有目标，我就觉得无聊；可一旦它获得了方向，我才觉得这是对远方的向往：不是折磨，而是兴致。

我乘来乘去的一个认识是，连父母在村子里都是陌生人。并不是同村的人这样看待他们，而是他们本身。一到外面，他们就受到尊敬：父亲被委以不断变化的职务（在林肯山村，几乎只有教堂的职务），母亲被视为与当局和当权者打交道的行家，一句话，打理外务的能手。她像一个乡村文书先生，替邻居写信和申请。然而在家里，只要他们在一起，偏偏在谁都不干事的时候，既笼罩着一种动荡不安和争吵，又充斥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图谋，看样子，仿佛他们俩都不情愿出现在这里，是被拘禁者或者被驱逐者。

父亲的形象使我想起了一个人，他早就在外面的岗位上毫无希望了，又一次毫无希望地寻求着回归的信号；他踱来踱去，突然跑到那个小收音机前，面带越来越阴郁的神情，打开收音机旋钮。起初我觉得，这是多年来变得空空荡荡的牛棚和谷仓里黯淡沉寂的后果。堆放在那儿的工具不过是陈列品或者破烂。后来我才发现，父亲在他当年屋后的作坊里一再要证明自己，尽管没有订货，他却无愧于一个木匠的手艺，做出了绝对棱边笔直无可挑剔的桌子和椅子，是对不公正无可补救的愤怒和反抗的表现。有时候，我从外面透过玻璃观察，他干活时眼睛看都不看工件：他要么直直地瞪着眼睛无视它，要么就猛地抬起头来，在长久的麻木之后，眼睛里闪现出短暂的挑战。在这个地方，对于他的狂怒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而干活时，它转变成一种稳定而持续的愤怒。不管是画出尽可能粗的木线，还是钉钉子，或者打磨棱边，这愤怒都尽情地发泄在其中。后来我才想到，问题就出在我们家，在我哥哥失踪二十年以后，这个家始终还笼罩在一片哀伤之中。这个失踪的人，不同于一个确定无疑的死者，不但使得家庭成员心无宁日，而且日复一日远离他们而死去，他们却丝毫无能为力。

不过，这也不是症结所在，至少不是惟一的。那个仿佛扭曲了这个庄园的角角落落的意识要古老得多。在这里没有家乡感，甚至说生活在这个地方是一种惩罚。这是一个——惟一的——家庭传统，从父亲的父亲传到父亲，一代接着一代。也许这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在那个世代相传的古训里："不，我不进去，因为我一进去，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这样的遗产来源于一个历史事件，从而出现了我们这个家族的传奇：据说我们的根真的就是那个格里高尔·柯巴尔，托尔敏农民起义的首领。在他被处决以后，他的后人被驱赶出伊松佐河谷地了，其中

一支翻过卡拉万肯山脉，流落到克恩滕。因此，第一个儿子都取名为格里高尔。从这个传说中，对我父亲产生影响的，当然不是那个叛乱者或者首领名分，而是处决和驱逐。从此以后，我们成了奴仆族，流浪族，哪儿也没有居住地，注定永远就是这个命运。我们惟一享有的权力就是娱乐，我们在其中可以找到短暂的平静。而在娱乐中，他虽说是个老人了，可是每次都会成为村里的头名。对他来说，驱逐判决的一部分也包括：斯洛文尼亚语本来就是他祖先的语言，可它在自己家里不但得不到重视，而且一定要彻底废除。他虽然也不间断地在心灵深处说这个语言，从他那有规律的，常常声音很大的作坊自言自语就看得出来，可是它不允许再说出口来，而且也不能再传给自己的孩子们——因此，当他娶了敌对民族的一员，一个说德语的女人为妻时，说来无非就是合情合理了。看他的行为举止，仿佛这是一个最高的意志施加给我们这个家族的，比那个当年命令处决我们的祖先格里高尔·柯巴尔的皇上的意志还强大；仿佛他的长子——叫这个名字的最后一个人——失踪以后，他也一定要在家里让那些剩下的斯洛文尼亚语音素沉默起来。这样一来，在别人面前，只有骂人时，他才会情不自禁地说出自己的语言，或者受到感动时脱口而出。惟独在娱乐时，他才会自如地说出这个语言，无论是揭牌，还是投掷保龄球，或者在一边召唤一边督促朝着目标滑去的冰壶：一到这个时候，他就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斯洛文尼亚语了；一到这个时候，平日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跟着唱歌的他，却领着别人唱起来。可在平日里，只要他开口说话就只讲德语，讲的是一种丝毫不带地方腔调的德语，并且感染了整个家庭。后来，就因为这口德语，无论我走到这个国家什么地方，人家都会问我，仿佛那是一种被禁止的外语。（当然，父亲说起德语来怯生，一丝不苟，每个字眼都苦苦思索，都要变成一个图像，而回响在我耳际的，是再清晰不过、纯洁无瑕、地地道道和声如其人的声音，我有生以来在奥地利所能够听到的声音。）

这期间，我父亲当然不会只是对柯巴尔家族打入地狱的惩罚忍气吞声，诸如流亡、奴仆地位、语言禁锢等；他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过，他并没有通过反抗或者哪怕只是不顺从来寻求拯救，而是通过他特有的方式，那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地遵从那不公正的戒律，也许正因为如此而显得更加激烈，更具讽刺性，更为鄙视。他就是要以这样的方式把那不公正的戒律展现给当局，从而使之最终不得不来对付你。父亲竭尽全力，尤其是凭着他那坚忍不拔的力量，坚持不懈地为自己和他的家人寻求拯救，甚至要迫不及待地强求获得拯救，像

对付动物时爆发的狂怒和残暴所表现出的一样。然而，尽管如此，看样子，仿佛这就是那种渴望不可分割的部分，没有希望，没有梦想，没有想像，也没有给我们主意。在这片土地上，拯救这个家庭看上去无非就是如此的处境了。为此，他怪罪于两次世界大战；他几乎完全是在我们那条传奇的家乡河——伊松佐河边上熬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作为一个逃兵，在流放地林肯山村挺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相反，我母亲是娶过来的，是迁到这儿来的，她对这个家族传统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彻头彻尾地转向了。在她看来，这个传统意味的不是徒然的斗争和被迫迁移的悲壮之歌，而可以说是目的和权利的原始见证：一种希望。与寻求拯救的父亲不同，她并不指望从第三者身上获得拯救：她要求我们自己来救自己。父亲总是一再痴迷于信仰，听凭命运的安排，而母亲则坚定不移地不信神，不信鬼，无论什么时候都尽力去行使自己的权利（这也是她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中体会出来的）。而这个权利表明：她的家庭——她指的是自己的孩子们——的安身之地数百年来就在卡拉万肯山脉的那边，拥有回归故里的权利，并且最终一定要靠自己来实现。望着西南方，奔向西南方，回到西南方去，无论情况怎么样，去收复那块土地吧！这样收复土地也包括洗刷那由于祖先遭到当权者的杀害而让“我们”蒙受的耻辱。（母亲，这个弃儿，这个漂泊而来的人，为那个向她提供避难的氏族用了一个最盛气凌人的称呼“我们”。）我们似乎就要这样来对那个皇帝，对那些贵族，对那帮当权者，一句话，对那些“奥地利人”——对她这个奥地利女人来说，那是蔑视人的无以复加的表现——进行报复。她惯于靠着玩弄字眼，也就是我们的发祥地应该所在的伊松佐河谷地的那个地方名称，将这个报复象征化：等我们回归并且从长达千年之久的奴役中重新站立起来以后，这个在德语中称为“Karfreit”（卡尔弗莱特）的村子，实际上斯洛文尼亚语叫做“Kobarid”（柯巴里德）的，将会改名为“Kobalid”[2]（柯巴利德）。随之，父亲讥讽地回敬她说，这倒也可以翻译成“骑着马离去了”，她最好还是让它保留卡尔弗莱特这个名字吧，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就这个命了，或者起码保留Kobarid这个名称，其中比如就包含着共生的水晶，或者也包含着一束榛子。接着母亲又惯于应对说，是不是这个如今彻底退化为臣民的他，居然忘记了有关自己的儿子，那个抵抗战士最后的消息就来自那个著名的“柯巴利德共和国”。战争期间，那儿独独一个村子宣告为反法西斯共和国，并且也存在了好些日

子。对此，父亲只不过说道，他既不知道什么消息，也不知道什么反抗。

过后，两人自然又一再在我们家里那惟一的相片前碰面（除了我哥哥那张放大的相片之外，它挂在那神圣的收音机暗室里）：相片挂在前厅里，并且有一张斯洛文尼亚地图。就是在这个地方，父母通常也是唇枪舌剑，要争个高下。母亲平日那样不信鬼神，甚至对上帝也不恭不敬，可面对这张地图，在念着一个个名称时却抬高嗓门，吟唱起来，一如既往，有板有眼，忽高忽低。而父亲对她要么直言不讳态度生硬地纠正，要么干脆就对她的外来词发音摇摇头而已。尽管她此时此刻已经咬牙切齿，舌头僵硬，可是也无法使她脱离那斯拉夫语冗长乏味的列举。她一个接一个地吟唱着“Ljubljana”，“Ptuj”，“Kranj”，“Gorica”，“Bistrica”，“Postojna”，“Ajdovscina”（我特别期待着这个音色图像），而不是“Laibach”，“Pettau”，“Krainburg”，“Görz”，“Feistritz”，“Adelsberg”，“Heidenschaft”。[3]奇怪的是，与母亲平日的歌唱相反，我觉得那单调的地名吟唱得很美妙，尽管她的重读错误不断。听起来，仿佛每个名称都是一个祈求，而所有的名称一起联结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亢而亲切的祈求。而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对此非但没有回绝，反而作为这个民族——很小的民族——的代表唱起了第二部，仿佛这狭小的前厅——铺着木地板，围着栏杆的木楼梯通到地下室，出门就是木走廊——变成了一个神圣的殿堂，比任何乡村教堂的殿堂都要宏大。

再说，母亲从来也没有跨出过国门一步。那些南斯拉夫地名，她首先是从丈夫的叙述中知道的。而对他来说，那些名称体现的仅仅是战争而已，一如既往。这些年里，他对地名也没有什么好讲的，更多总是那同一个布满岩石的高地，被攻克了，又失陷了，再被夺回来，等等。照他的说法，这场世界大战就发生在这样一道光秃秃的、石灰色的山背上，一个接着一个战场的前线仿佛就是向前或向后扔去一块石头划定的。只要你听一听村子里其他老兵的叙述就是了，这曾经是他们所有人的真实所在。父亲本来就抖抖颤颤的。只要一提起山里那些深深的岩体弹坑，他就抖颤得更厉害了。在那些弹坑深处，夏日里积雪还不融化。他有过许许多多的害怕，然而，他主要害怕的是可能会杀死一个人，至今依然如此。他十分镇定自若地给人家看他身上的多处伤口，有胫骨上的，有大腿上的，还有肩上的——只要一提起那

个意大利人来，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会非常激动，因为他曾经奉命瞄准他开了枪。“我并没有直接瞄准他，”父亲说，“可是我一扣动扳机，他就飞起来了，两臂伸得开开的。然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他的影子。”这一瞬间，他总是瞪大眼睛讲来讲去，因为过了三十、四十、五十年之后，那个人依然不断地飞到空中，而且似乎永远也无法让人知道，他是有意躲进战壕里了，还是一头栽下去了。“太卑鄙了！”他一边骂，一边用斯洛文尼亚语重复着这骂声，“Svinjerija！”听起来，仿佛这种语言毕竟是他发泄给这段历史，这个世界和这个人生的愤怒更好的表达。在战争中，他无论如何几乎没有看到过什么村庄，至多是曾经到过“……地方的附近”或者“通往……地方的大路上”。惟独戈尔兹对父亲来说意味着超过了战区：“这是一座城市，”他说，“我们的克拉根福特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跟它比的！”然而，当你再问下去时，无非就是一句话：“在那些花园里，长满了棕榈树，而在一个修道院陵墓里，埋葬着一个国王。”

父亲重述时，只要一提到那个引起悲痛和愤怒的战场名字，这可给倾听的母亲创造了借题发挥的机会。凡是被他诅咒的——“该死的特诺瓦纳森林！”——，在她那里则变成了一个充满期待的家园。而且她把所有那些地方又在我的面前（这事姐姐是做不到的）整体勾画成一个国家来。这个国家与事实上的斯洛文尼亚并不相干，而纯粹是那些名称，那些由父亲提到的战役和痛苦经历构成的，无论是令人毛骨悚然或者只是顺便说说也罢。这个国家仅仅存在着主要的地方，一个个都有童话般的名称，如Lipica, Temnica, Vipava, Doberdob, Tomaj, Tabor, Kopriva等。[4]在母亲的言谈里，它成了和平之国。在这个国度里，我们这个柯巴尔家族终于能够再现当年了，并且长久地存在下去。这样的魅力蓝图与其说产生于那铿锵的语言或者家族传说，倒不如说出自我哥哥在南斯拉夫的岁月，出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写给家里的几封信。在那些信里，这个儿子常常在那些同样的地名，也就是父亲借以把这个世界诅咒得一无是处的地名之前加上一个赞美之词：“这座神圣的纳诺斯（山）”，“那条神圣的蒂马沃（河）”。而在我这个晚到人世的次子心里，从一开始，不管母亲的想像与经验世界多么遥远，都比父亲那些战争叙述的影响要强烈。如果我要为此构想出这两个人的图像来，那么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无可奈何和一个分享快乐的叙述者：一个袖手观望，另一个置身其中，主张权利。

不言而喻，现实生存，也就是这个家里平常的日子取决于父亲那闭关自守的行为。恰恰是他的地方陌生感使他成了家庭的暴君。他无论在哪儿都找不到自己的位子，因此他就去折磨其他家庭成员；不是把他们从各自的位子上赶走，至少就是让他们待着不是滋味。只要父亲一进来，大家顿时就变得提心吊胆。即便他只是往窗前一站，我们其他人都会被害得手忙脚乱，让我们无论干什么都不知所措。甚至连正襟危坐的姐姐也捍卫不了自己的权利；气喘吁吁的发愣替代了心灵的平静。他那喜怒无常的行为像瘟疫一样：在大厅里，他是一个绕着圈子走来走去的矮小男人，他这样走的时间越长，围绕着他的一个个眼睛，一个个脑袋，一个个肢体就越发开始闪动、颤抖和抽搐。哪怕是他一个小小的举动，常常都会弄得这样鸡犬不宁。他猛地一下推开门，朝其他家庭成员投射出那遭受到伤害而无望的目光，然后又走开了，或者我们感到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前厅里，仿佛在那儿等待着自己的救星，同样就像等待着那个最终会将他连同这个庄园一起埋葬的山崩地陷一样。只要他一进自己的作坊里，我们才长出一口气，可是从那儿也会传来他愤怒的吼叫。虽然数十年来我们都习惯了，可一听到这吼叫声，我们总是禁不住吓一跳。甚至这个或许会使他真的觉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作坊，也不会被父亲当成家。

就是到了星期天，除了下午玩牌，原本也只有做完弥撒回来时，才会出现那相应的平静。这时，父亲打开每周出版一次的斯洛文尼亚语《教会报》。这是他向来惟一阅 读的东西。此时此刻，他戴上眼镜，掠过每个字眼时都无声无息地动起嘴唇，仿佛不但是一行一行地看着，而且也是一字一句地琢磨着。在这段时间里，从他那从容的神态中弥漫出一种宁静，笼罩着他，充满整个屋子。在这阅 读的时刻里，父亲终于有机会找到了自己的位子。风和日丽时，他坐在屋外的长凳上，平时都坐在东窗前那张没有扶手的长凳上，他面带着一种充满童稚的研究者的神情，逐字逐句地研读着——一想起这样的情景时，我就觉得好像自己此刻依然和他坐在一起似的。

实际上，我们当时根本连一顿饭都没有在一起吃过：总是用密封的金属盒把饭菜给父亲送到对面的作坊里，仿佛他依旧还在外面劳作，不是同那些山农在一起，就是在山涧的沟底里。母亲除了做饭，也在灶台前吃饭。像通常看到的“精神错乱者”一样，姐姐在门口的

台阶上，一勺一勺地从一个大碗里舀着吃。而我随便走到或站在什么地方就吃了。饭后，我们都盼望着那些牌友到来，不只是因为父亲向来是赢家：这时，他正襟危坐，敢于一个接着一个下大赌注，这种从容不迫的神情放射出一种喜悦，连那些输家也被感染了。每当这个凭着自己的冒险劲而赢得成功的牌友突然大笑起来时，大家都会意地跟着一起笑。他的笑那样少见，既不是幸灾乐祸的笑声，也不是同情怜悯的笑声，而是胜利者直截了当的、自由自在的笑声。这些牌友都是父亲的朋友，像他一样是奴仆，当牌友时成了平起平坐的人，乡村绅士、本地人、发言人、叙述者，和谁都不谈自己。不过，这种友谊只是在玩牌期间活跃起来，随着牌局的结束，大家相互离去，各奔自己家，没有了协作，零零散散，纯粹的邻居，疏远的相识，首先是相互之间对各自的弱点和嗜好了如指掌的乡民：色鬼、守财奴、夜游症患者。而父亲，尽管依然正襟危坐在桌前，一手抓着牌，一手在点钱，却又失去了自己的位子。牌局结束后灯一关，屋里似乎闪闪烁烁，似灭非灭，就像当年那微弱的、跳跃不定的电流。在整个国家电气化之前，我们这个地区是由一个位于德拉瓦河上、甚至没有一个水磨那样大的小电厂供电的。

虽然父亲亲手建造和布置了这座房子，集泥瓦匠、木匠和细木工于一身，可是他住在里面却不是其主人。他是自己的劳工，无法放弃和欣赏自己的工作，哪怕一时一刻也好，而且因此也不会觉得自己就是创作者。在自家庄园对面的建筑物上和别人一起干活时，比如教堂塔顶，他不时地也带着某种成就感指指画画，而对由他在自家房子里里外外所做的一切，他想都不想瞥上一眼。他只要一砌起墙来，就竭尽全力，一丝不苟，可同时又毫无目的地直视着前方。他只要一把做好的小凳子送给别人，他的眼里除了下一个凳子的木材，什么都没有了。我从来连想都不会想，当时作为年轻人，当这座几乎独自长年累月、辛辛苦苦建造的房子完工时，他上山来到那片树林边上，从那里自豪地一览整个林肯山村，因为那儿有他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成员建起的住处。这可是二百多年之后柯巴尔家族第一座自家的房子啊。真的，在我看来，甚至在房屋上梁的庆祝仪式上，连格里高尔·柯巴尔这个不动产拥有者举起一大杯果酒都是不可想像的。

所以，首先是这个不会生活的父亲，在我上中学的最后几年里，使我失去了回家的兴致。虽然从火车站或者汽车站的回程一帆风顺，我甚至克服了村子这个障碍，依然满怀着与那些素不相识的人，那些送来温暖的影子同行的心情；可一到村界上，一股不快的感觉油然袭上心头，又是脑袋发痒，又是手臂变得僵直，又是两脚不听使唤，实在没有法子不让它们发生。这时，情形不是这样的：我事先在旷野途中为自己虚构出了什么图像，陷入了沉思之中，心醉神迷了，就像人们常说的，睁着眼做梦了——我虽然“睁着眼做梦了”，然而不过都是同时在我周围发生的事：夜晚、下雪、玉米地里刷刷的响声、吹进眼窝里的风，而这一切，凭借着在思想上依然继续的行程，显得比平日更加清晰，别有天地，像符号一样。那立在奶摊上的奶桶就像印刷字母。一个接着一个在黑暗里闪耀的小水洼连结成一行。然而，一到家门前，这些符号便失去了自己的力量，这些事物便失去了自己的特质。我常常久久地站在门口，几乎喘不上气来。那些如此清晰可见的东西，瞬间变得杂乱无序。由于我再也无法做梦了，也就再也看不见什么东西了。一路上，彩虹似的接骨木枝条一道接一道，盘旋而上，向天梯一样，最后消失在花园里，成为树篱的一部分。上方那些刚才还个个清楚可辨的群星图像此刻闪闪烁烁，无法辨认。多亏迎面而来的姐姐帮忙，我也才有可能顺顺当当地跨过门槛。她像一个家庭宠物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又像一个家庭宠物，融入了那梦幻般的路标秩序中。然而，一走进前厅里，我就觉得在每个空间里都听到了父亲那没完没了的喧闹声，犹如到处存在的不和谐，它也立刻感染了这个回家的人，倒不是让我不再着迷，而是一并败了我的兴，于是，我便没有了任何情绪，恨不得立刻钻进卧室里。

母亲患病了，父亲才学着生活了。这样一来，在这几个月里，这个家也就成了我们其他人的生存之地。还在母亲住院期间，也就是动完手术以后，可以说他从那个作坊里搬出来了，搬进主楼里了。在这里，他好像不再寡言少语了，也不再自个儿发无名火了——每个举止同时也是一种绝望的表现，你反正弄不明白他的心思，所以谁都帮不了他——，而且突然变样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处于窘境时会求人帮忙。因此，我就再也不那么笨手笨脚了。在此之前，每当我要帮助这个性情急躁的人时，顿时就会乱了手脚。我现在密切地和他一起干活，那样稳妥，就像我单独一个人似的。而且姐姐这个迄今不被放在眼里的人，被不屑一顾的人一下子成了父亲同等相待的人。她表明自己原来是个有理性的人。她只是在等待着人家注意到她的存在，

拿她当回事。好比一个不明原因瘫痪的人，只要你对他说句好话就够了，于是他就蹦起来，跑来跑去了。现在就是这样，转瞬间，随着父亲叫着“干这干那！”这个精神错乱的人脱胎换骨成一个脑袋里装着很多东西的人。她也不用说上一句话就明白他的意思，从那个让人讨厌的先知变成了另一个类似人的先知，既不是洞察秋毫，也不是悲观观望，而更多是预感到什么事需要做，并且已经预先相应采取了行动。虽然她一如既往，没有放弃坐的习惯，可是她现在坐在灶前，坐在卷心菜坛子旁，坐在面包炉前，坐在酸莓灌木丛旁，而父亲就蹲在旁边，常常是无所事事。即使他也在干活，可看上去不再是独来独往，或者蓄意找事的样子，显得就像他平日惟独在阅读时才会表现出的从容不迫，就像与某种东西交融在一起了。而在我的想像中，那就是照射进屋里的光明。窗台上闪光的栗色，连他自己眼睛的颜色因此才让我觉得变得明亮，一种深深的、不禁让人想起那些圣像柱背景上的蓝色。

虽然父亲惟独看重的是相信文字，可是事后，他那一举一动，所作所为以其几乎令人诧异的从容不迫蒙上了某些迷信的色彩：仿佛每个举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驱除母亲的病魔。打上一个节，就像要勒住病魔；钉上钉子，就像要阻止病魔蔓延；密封一个桶，就像要把病魔关在里面；支起一根树枝，就像在给病人鼓劲；开门拖过一个麻袋，就像是把病人从医院里接出来；削去一个苹果上的腐烂处，就像……举不胜举。

随着父亲变得让人熟悉了，第一次在这个家里充满了不言而喻的氛围。我每次回到家里，便自然而然地融入到其他两个人的行列里。数十年来，姐姐被锁闭在自己的爱情故事里。据说这次归咎于父亲的失恋是她精神错乱的一个原因。如今她忘却了这一切，表现出与人交往的能力，不仅局限在干活上。她挑战这个竞赛能手来玩牌，每次都输，一次比一次懊恼，与一个智力健全的人毫无两样。在这种懊恼中——悲伤岁月的终结！——，她紧咬嘴唇，甚至要掉下眼泪，看上去就是一个实实在在活灵活现的人。这时，这个成长中的旁观者把自己、这个从桌子上一股脑将牌扫到地上的头发花白的女人和脸上闪现着胜利喜悦的父亲看成了同龄人。

当然，我们的家庭生活不过是展现在舞台的周围而已。我们扮演的都是些应急替场的角色。这种表演同时也是一种等待，等待着那些真正的角色登场，并且控制发生的事。当母亲从医院里被接回来时，这个家才有了中心，而真正的角色并不是别的什么了不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这些替代角色鼓起劲来，人人现在都有施展之地，成了“有生的力量”。虽然人家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病人再也活不了多久了，可是我们哪会这样相信呢？她没有痛苦，静静地待在床上，不是躺着就是坐着，变得完全悄然无声了，和那个有时在劳作间无缘无故发出抱怨的健康人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了。无论怎样，我都不会想着她会死去的。父亲和姐姐看来和我也没有什么两样：一个在最近几年里，也就是退休以来，几乎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庄园，现在却绕着它迈出越来越大的圈子，起初远足去邻近的村子林考拉赫和多布，这对他的同伴来说就已经越过雷池了，后来甚至去北边，跨过德拉瓦河，“去德国人那里”。在他看来，外国的核心就是从那儿开始的。而另一个穿着十分讲究，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首先表明自己是个学过手艺的厨师，能够信手折腾出一些迄今在我们家里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也没有名分的菜肴来。再说，这事好像也在这个卧床不起的病人的意愿之中：她让父亲——正值晚春时节——叙述树木花草、庄稼、德拉瓦河河水、拜岑山上的融雪，叫这个终于有了用处的姐姐伺候她，仿佛她这辈子就等着这个时刻似的。她正儿八经地坐起来，一口一口地享用着那些菜肴，心满意足，两眼闪闪放光（而我们其他人弥漫在这饭菜散发的味道中，竟短暂地忘记了那些药的气味）。而我呢？在这个仪式中——要是有人错过了自己的角色，那好痛苦啊！——，我是作为叙述者登场的。我终于不会被问来问去了，可以坐到床边上，也就是床边中间，因为按照迷信说法，那些死神就站在床头和床脚，并且可以通过叙述把它们驱赶出屋子。可我向母亲叙述什么呢？我的愿望，当她的目光嘲笑起那些愿望时，这不过是催促我去重新开始，接着从很久以前的事情讲起，用另外的话绕着她打转儿。当语言和愿望偶尔成为一体时，一股暖流顿时涌遍全身，而在这个将信将疑的听者眼里，却突然闪现出某种如同信任的东西，一种更宁静更纯洁的颜色——闪烁出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然而，在我们的仪式中，这座房子现在扮演了主角。它表现得温馨惬意，是这样一种沉思的真正家园，连往日那一个个别别扭扭令人

不快的角落都不例外。木头和墙壁拥有一种色调，从床头到桌子，从窗户到门，从炉灶到水龙头的距离在扩展。父亲建造了一座房子，在这其中，生存是美好的，无论你是动来动去还是静静地坐着；在这其中，迄今不可想像的东西现在成为可能了。他自己也证明这一点，比如，他用收音机给我们演奏了一场管弦音乐会，并且从房间最不起眼的角落里直接说出每一个刚刚开始演奏的乐器名称来。我以这样的方式感受了各种不同的音调，后来在任何音乐厅里都没有过如此的感受。接下来他让我们感到吃惊，因为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展示了那些他平日只是在教堂里，在烛光照耀时才那样做的东西：有一次散步回来，他跪倒在地，双膝同时，额头久久地贴在母亲的额头上。后来，在我的心里，这对男女组合一再出现在卡拉万肯山脉的一对山头上，也就是尖耸的霍赫奥比尔山和扁平的克舒塔山。

惟独到晚上，这几个月里为我们提供保护的避难所就解体了。尤其在黎明时刻，我就惊醒了，是被一阵无声无息的爆裂唤醒的，和他们一起睁着眼躺着，我知道他们同样睁着眼躺在床上，仿佛再也没有隔墙了。这个病人没有呻吟，也没有镜子打碎了——因为我们家里就没有挂镜子——，并且屋后的树林里也没有小鸟叫过。没有滴答的钟声，因为这屋里就没有钟，而在平坦的约恩原野上也没有火车隆隆驶过。我也听不到自己的呼吸声，惟有一种潺潺流水的声音。在我的想像中，这声音来自那深深沉降下去的特罗格谷底。德拉瓦河从那儿流过。姐姐躺在楼下那间当年的奶房里，房子的排水槽里依然还弥散出腐臭的气味。父亲躺在母亲身旁，睁大眼睛，满嘴没有了牙齿。母亲是惟一在梦乡里的人，或者至少是没有被唤醒的人。哪怕再细小的木头咔嚓声穿过这屋子，都像鞭打一样，常常有许多响声从各个无法确定的方向，如同回声在弥漫，与教堂里的钟声不同，不计其数。后来，每当父亲还没有听到第一声鸟叫之前就起身去周边地区时，我便觉得他好像要摆脱掉自己那垂死的妻子，要把我们孤零零地丢弃在他那梦魇似的房子里。

在这样一个夜晚里，我梦见，我们大家在这个被折腾得空空如也的、黑洞洞的客厅里走来走去，哥哥就站在客厅中间，含着激动的泪水，感激这些围在四周的人都爱着他。当我把目光投进人圈里时，我看到其他人如出一辙，然后看到待在一个角落的父亲也同样如此：流着眼泪，你可回来了，犹如一个深爱着自己家人的人，就只爱他们。而且也只有这样，我们这些柯巴尔家的人才会是一个家，流着眼泪，

在这空荡荡的屋子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既不能相互接近，也不能相互接触，垂挂双臂。这是一个归根到底只会在梦里出现的家。可是，难道这“只会发生在梦里吗”？

因为在我起程去南斯拉夫前一天，我果真眼睁睁地感受到这场梦境应验了。本来我在这天应该乘上火车离开了，我反正也告别过了，哪怕是不痛快，心不在焉，毫无感觉也罢。然而，我独自在米特勒恩火车站逗留了一个钟头后，便毅然决定掉头回家，在家里再过一夜。我把海员背包放在售票厅那个职员那里，朝着东方返回去，先是顺着轨道走，然后穿过多布拉瓦那片稀疏的松树林。那是这个国家最大的一片次生林地。时值一个初夏的下午，我背着太阳行进。在林子里熟悉的地方，我发现了今年长出的第一茬蘑菇，开始是形状不大和一成不变的鸡油菌，在这片多布拉瓦卵石地上呈现出一派白晃晃的景象。然后走着走着，迎面越来越多地闪耀着牛肝菌，个个掂在手里都沉甸甸的。在这里，我这个平日对颜色缺少感觉的人居然能够分辨出颜色来。我最后来到林边，站在齐腰深的草丛里，那些又高又细的空心草茎随风摇来荡去，我径直朝着一棵孤零零的、可以看得见的高脚小伞菌奔去，仿佛我一定要第一个到达这位王者跟前似的。小伞菌头有龟甲大小，中间鼓得圆圆的，超出了我的两个掌心，掂量着要比一块揉得如此薄的面饼还轻盈。

我将这个蘑菇包到我哥哥那块连同他的衣物一起送给我上路的特大手帕里，慢慢靠近林肯山村和那座位于其中的房子。在那里，母亲只能面向墙壁躺着；姐姐无非就是四肢趴着等待再犯起精神错乱来；父亲只能像Hiob（约伯）[5]一样坐在粪堆上。

可情形并不是这样的。房门敞开着，里面一个人也没有，病人的卧具晾晒在窗台上。我发现这三个人在屋后的草坪上，还有一个人，是邻居，他帮着父亲一起把母亲放在靠背椅上抬到外面了。她光着脚坐在那儿，身上穿着一件白色长衬衫，两个膝盖上盖着一张旧粗羊毛毯。其他人都将就在草地的长凳上，身子微微倾向她坐的地方，将她围起来。起初，我觉得，仿佛我发现了自己的家人在干什么事；仿佛他们高兴的是，终于没有我在场，他们自己在一起了，并且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展现自己了：因为他们看上去兴高采烈的样子，一点也不

喧闹；姐姐做出各种各样的怪相，逗着这一圈人乐，一边模仿着这个或那个的神情，一边要求猜测，其中我也认出了自己的神情，让大家，也包括礼帽歪戴在头上的父亲，笑得不亦乐乎。（我一再想像着会打扰他们，回来的不是时候，充当了一个让人扫兴的角色。我后来常常真的也变成这样了。）然而，当他们发现我时，一阵喜形于色的气氛弥漫过这块草坪，而在二十五年之后，才真正掠过了这个变得空空如也的家。从那个遭受病魔折磨的人脸上，迎我而来的是无限亲切的微笑，我从来还没有感受过的微笑，并且让我无地自容的微笑。

我坐上前去。这样一来，这个家现在就算齐了。姐姐很快就把蘑菇做好了，甚至连我都觉得很好吃，因为我平日更喜欢采摘林中果实。虽然没有支起饭桌，也没有铺上什么台布，可这毕竟是一次欢宴，连那个正好有活儿“要去干”的邻居也乘兴作陪了。此后，我回想起的不过是大家一个钟头之久无声无息地坐在那儿的情形。一对对狭长的眼睛，眼角弯曲得像小舟一样。从这个不寻常的视点——我们平常从来都不坐在草坪上，这里通常是晾晒白色亚麻布的地方——眺望，父亲这座房子好像就是为自己而存在着，不是坐落在这个名叫林肯山村的村落里，而是位于地球上一个不为人知的、也不可名状的地方，在一个同样陌生的天底下。房间里掠过一阵穿堂风，在外面这软乎乎的草垫子上都感觉得到。那棵行道树上，一个梨子摇来摆去，落在地上。那个早就遭到灭绝的养蜂棚正面，显露出一块块木板的颜色，共同表现出一个幻境，又重映在那只半掩在深绿色黄杨灌木丛里的猫所呈现的白色里。车棚里那辆四轮单驾马车像所有的机具一样早就退役了，可它却和其他那些车辆和车辆部件不同，它的漆面光泽经受住了岁月的剥蚀，呈现着节日般的光彩，有理由再次驶出车棚，在一群从灌木丛里嗡嗡飞起、像海豚似的翱翔在天空的鸟儿的陪伴下掠过大地。然而，攫住我们的不是行动的兴致，而是畏惧，伴随着一种信念。当这信念失去意义时，畏惧就越发强烈。惟独姐姐扰动了这些事物的秩序，因为她忙个不停，走过来走过去，说这说那，又是给母亲梳头，又是给她洗脚。当然，她的扰动更多是加强了这秩序。事情就得是这样，以便让这个秩序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持久下去。每当她摸一摸这位坐在靠背椅里的女人，拉一拉她的手，围着她转一转时，她所做的这一切仿佛在履行公事：以我们这个女代表的名义。在我的记忆中，坐在太阳底下的不是一群人，而是通常晾晒在草坪上耀眼的白色布块，由那个被委以此任的人用喷壶喷洒着水。喷水发出激

烈噼啪的响声；一片片小水印即刻就蒸发了。草坪是一片斜面，其他一切东西，也包括我，都从上面消失了，滑去了，翻走了。

当时，那些时刻就是这样自我叙述的。可是，那个导致了那些时刻的事件，那个掉头返回的决定，一个赤裸裸的瞬间是怎么回事呢？我究竟为什么没有直接去布莱堡，而舍近求远地去了米特勒恩火车站呢？我错过了中午那趟火车，可要等到下午那趟，还要好长时间，于是我就想着向西走两站路，步行十来公里路程来消磨时间。然而，我也无法磨磨蹭蹭，慢慢吞吞，绕着道走去，结果我还是到得太早了。米特勒恩火车站坐落在一个村子旁，多布拉瓦森林边上。在雅恩费尔德平原上，它可是一座坚固巨大、看上去高高耸立的建筑物，岩灰色的墙石光秃秃的。因为竖立在这片平原上的一切——房屋、树木，连同教堂——就像那里的居民一样，更确切地说纤细和矮小。我在站前转悠了一个钟头之久，空空荡荡的，除了脚下黑乎乎的炉渣石嚓嚓作响外，什么声音也听不到。阳光下，耀眼的单道铁轨那边，时而传来松涛声。如今在我看来，那些树干如此纤细，松塔又小又黑的松树就是这整个地区的象征，与那些零零散散地嵌镶在林中的桦树白色（连那些裸露在地面上的根都是白色的）相映。当时，那片林子还没有变成草坪园林，成为观赏植物。那个铁路职员的住地位于车站一层，挂在窗户上的帘子千疮百孔，窗前的木盒里栽着也在这地方不可或缺的、红闪闪的天竺葵花。我在家里向来就厌恶这种花的气味。窗后一点生机也没有。不时有箭头似的花瓣飞落下来，有点像昆虫的翅膀在飞舞。我坐到阴凉处一条长凳上，面前是这座建筑狭窄的一边。长凳位于灌木丛旁，当年上面挂满了泛绿的避孕套，而不是如今一团团白色的烂纸片。我脚前几乎长满草，有一圈裸露的石头，莫非是当年的建筑地基？我抬头望去，看见火车站的侧墙上有一个盲窗，呈现出像墙一样的白灰色，惟有一个四方框缩进墙去。盲窗是见不到阳光的，可是不知从哪儿照来一道反光，闪闪烁烁。在村子里，仅有一个类似的盲窗，独一无二，它恰好就开在那座最小的建筑物上，也就是那个护路人的房子上。它真的会让人想起一个不存在的地主庄园的门房。它也呈现出像墙一样的颜色——那儿是黄色的——，当然，四边都是白色的。每次路过时，它都会吸引住我的目光，看样子，仿佛那儿有什么东西非要看不可。然而，当我停住步，特意望去时，它却一次又一次地捉弄了我。尽管如此，它依然保留着自己那不可确定的意义，

而且在我看来，在父亲的房子上缺少的就是它。此时此刻，面对米特勒恩这个盲窗，我不禁回想起：1920年的一个夜晚，也就是四十年前，父亲用一个小车推着我哥哥，一个当时几乎还不会走路的孩子，一路跑到这里来赶早班火车，要把这个患上一种“眼睛高烧”的孩子送到克拉根福特去看医生。这一整夜奔跑也无济于事，那只眼睛结果也没有保住。在那张照片上，那只眼睛看上去只是一个乳白色的亮点。照片就挂在那神圣的收音机暗室里。但回忆并不是解释：那个盲窗的意义依然是不可确定的，可是突然变成了符号。就在这一瞬间，事情就定下来了，我要掉头回去。而这掉头回去是那个符号进一步的力量，却不是什么不可更改的东西，而仅仅适用于直到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刻。然后，我才可能真正起程，才可能真正赶路，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伴随着那些反复自我叙述的盲窗，作为我的研究对象，我的旅行伴侣，我的引路人。当我后来，也就是第二天晚上在车站旅店里想起那闪闪烁烁的盲窗时，它真的传递了一个清清楚楚的意义——它对我来说则意味着：“朋友，你不用着急！”

第二部分　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

我到此叙述了父亲的房子，叙述了林肯山村，也叙述了雅恩费尔德平原。二十五年前，在耶森尼克火车站，这一切无疑全都历历在目。然而，我却似乎没有可能把它叙述给任何人听。在我的心里，我只是感觉到了没有声音的起唱，没有调门的节奏，有短音长音，抑扬顿挫，却没有相应的音节，有一个铿锵有力，跌宕起伏的乐段，却没有与之匹配的字符，有舒缓的、广阔拓展的、感天动地的、持续不断的格律节奏，却没有属于它的诗行，有一个共同的高唱，却找不到开头，为之一震却一片空白，一部纷乱无序的史诗，没有名称，没有心灵最深处的声音，没有一个文字关联。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所经历的一切，还不是什么回忆。而回忆并不意味着：凡是曾经发生的事情，现在又再现了；而是：凡是曾经发生的事情，现在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因为它又再现了。当我回忆时，我就感受到：事情就是这样，千真万确！于是，我才明白了这事，可以有了名分，有了声音，也可以作出判断了。所以，对我来说，回忆并不是什么随随便便地回首往事，而是一种正在进行的行为，而这样的回忆行为赋予所经历的东西地位，体现在使之生存下去的结果中，体现在叙述里，它可以一再传递到尚未完结的叙述里，传递到更伟大的生活中，传递到虚构中。

奇怪的是，当时，只要我一从那个隔间里朝着柜台望去，那个女服务员就回头望过来，仿佛只有她从我的观望、坐相、挪动和时而用手指敲击着桌子的举止里猜出了那整个我今天才为之找到了语言的故事，仿佛我也不用再告诉她任何东西！我旋转着一只空酒瓶，一转就是几个钟头，一声不吭地构思着我的叙述，而柜台前那个女人自己也随着同样的节奏，一起旋转着一个烟灰缸。这样的共同旋转完全不同于我那个敌手的模仿，令我兴奋。所以，我也没有觉得那是催着我走开，因为旁边隔间里还有一群男人在玩色子。只要他们还在玩，我就可以待下去。我在享受着，我一点也听不懂那些看不见的人所讲的语言。我这个外国人时不时地可以把掉在地上的色子捡起来递给他们，那些人保准也不是耶森尼克当地人，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马

其顿人（不然的话，他们不都早就会回到各自的家了吗？）。我想像着，一个来自邻邦的人给一帮真正的外来者，一帮从世界的另一端稀里糊涂来到这儿的人指出了道路。我首先在享受着，我在这个女服务员身上还看到了已经恢复健康的、生机勃勃的、安然无恙的母亲。当然，我肯定已经疲倦了。然而，看看这光景令我兴奋不已，于是，我就不会有倦意了。当那些玩色子的人离去后，这个母亲的扮演者才从柜台后走出来。这时，她不过是个打破吸引力的女服务员。她的举动现在就是冲着我来的，要求我离去："快到午夜了。"

一到外面的大街上，疲倦才袭击了我。这不是别的地方，而是过往之地。没有停顿，我就穿过它了，仿佛这里一无所有似的。几步过后，那个最近几个钟头的环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地方了，现在停滞的就是呼吸。

我不能再回车站去，那么去别的什么地方呢，我也不知道。我停住脚步。这不再是悠然自得地站着，不像刚到达时，而是一种盲目的闲站，而且它也与初来乍到另一个国家毫无相干：在这一生中，无论是过去还是后来，有多少次我就是这样茫然地站着！再去哪儿呢？哪儿有过往之地呢？地方会有的，而且一定会找得到。我漫不经心地转过来转过去，四面八方，也说不上目的何在。一生中，我有多少次如此四处茫然寻找，连在自家的屋子里，自己的房间里也不例外，眼睛瞅着衣柜，手却抓向工具箱。

这时，公交车都停了，惟一还能看到的就是那些南斯拉夫军队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全部驶向边境方向。车篷敞开着。在如此形成的洞穴中间，有两张长凳，我看见上面背靠背坐着两排士兵。在前面平台边上，有两个士兵背对着背，分别把一只手臂搭在保证洞穴出口安全的横条带上。后面的车一辆接着一辆，和前面的一模一样。横条带并不宽，中间下垂着。尽管如此，那些士兵的胳膊都如此稳稳当当，如此一动不动地搭在上面，仿佛他们都被紧紧地系在上面，不是用带子或绳子，而是被自己的疲倦系上去的。我跟随着车队，向城外走去，朝着北方，也就是我刚才过来的方向。军事巡逻队的一辆汽车慢慢地从我身旁驶过，但是没有停下来：想起胡姆查赫那一群孩子，我就随便地挥一挥手打招呼，来回应人家的打量，甚至还得到了回敬。

一个军队逃兵看上去则完全两样。又是那样的敞篷卡车，背后是隆起的洞穴，两个一动不动的脑袋，被横条带紧紧地固定着胳膊，垂着手臂。这车流或许就没有个尽头。然后，最后一辆却出现了，几乎让人感到失望。车厢后面同样是敞开的，却空空如也，没有载人。这个洞穴呈半圆形，此刻让人想起一个隧洞，一个确定的隧洞。在穿越卡拉万肯山时，我眼看着它以同样的方式离我而去，正好就像这黑洞洞的半圆一样。几个钟头前——经过耶森尼克的夜晚，已经成了属于一个毫无疑义的往事的瞬间——，我坐在最后一节车厢里，火车一出隧洞出口，我又一次回过头去。再也没有了军车。街道空荡荡的。然而，现在似乎更加强烈地让人感到，穿过这整个谷地，就像横贯一条疲倦的道路，一片浓密的烟雾，比南边那些钢铁厂的烟雾要更令人窒息，把最后一片天空遮得严严实实。它像那神奇的空军一样，也立刻从空中袭击了我，因为它给我的两鬓和额头上箍起了螺丝和绑带，推着我走过城边的房子，来到无人居住的地带。

在国外的第一个晚上也许叙述得简短，可是在记忆中，它却变成了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一夜。不只是因为我一心省着花钱：对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在旅店里过夜压根儿就是办不到的事。尽管如此，我还是一味想着要睡觉。因此，在我看来，去隧洞里的想法并非不合情理，而且毅然响应了。那儿刚才还是出口，现在却要成为我的入口；火车拉着我远离的地方，现在我却在靠近它。现在什么都顾不上了，就盼着走进一个洞龛里！

我不假思索地找到了铁路旁边那条道，同样也找到了护栏上那个洞，仿佛不可能有别的办法了。我很快就到了隧洞里，就像进了房子一样，而且如同预先设想的，还没走几步，就有一个凿入崖壁的洞龛，洞前有一道水泥护墙，使它免受铁轨的影响。“我的安身之窝！”我心想着。我打着手电筒，照一照泥地，看去有点像溪流边上云母闪闪发光的样儿。我带着这把手电筒，为了继续在南方，在一个喀斯特溶洞里（这样无论如何是我青年时代的思想游戏）去寻找我哥哥的踪影。水泥墙上，除了一根沾在上面的微细的头发外，什么也没有，一根睫毛，看看它，我不禁想起费拉赫，也就是奥地利出口一边那位历史老师：他今天下午还给我讲过，这条邻近的隧洞是一条公路隧洞，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俘修建的，其中有许多人丧命了，也

有遇害的。他甚至还——莫非开玩笑？——给我出主意，一旦在别的地方找不到住处，就在这儿过夜：一个“还纯洁无瑕的人”的睡梦会“让这个罪恶的地方得到洗礼”，“驱赶走那些邪恶的魔鬼”，“吹散那可怕的恐怖”，老师这样说。他正在创作那个相应的童话。对他来说，每个建造于皇家时代的隧洞，连耶森尼克那家无辜的矿井也不例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都是“不体面的”。

不过，在黑暗里，我先吃了一块面包和一个苹果。苹果的气味驱赶走了开始闻到的霉味，让人觉得仿佛刮来了一股完全不同的、更为新鲜的空气。然后，我躺下蜷缩成一团，却无法入睡。就是睡着了，那也是一个劲没完没了地做噩梦，不是刹那间，就是无休止。父亲的房子空空如也，变成废墟。德拉瓦河从深深的特罗格峡谷泛滥，淹没了整个平原。太阳映照在多布拉瓦松树林上，可是战争来临了。还有我丢了一只鞋；我的分头突然留在左边，而不是右边；我们家里所有花盆里的泥土都龟裂了，花草全都干死了。这一个个梦吓得我直冒汗，立刻使我惊醒过来。有一次，不是噩梦让我惊跳起来，而是夜间火车。它以巨大的呼啸声，几乎就在护墙那边一步之遥的地方，从我身旁风驰电掣而过。这只可能是远途客车，去贝尔格莱德、伊斯坦布尔或者雅典，我想起了我的同学，他们在前往希腊的途中，肯定已经在相当遥远的南方，不是一起睡在自己的帐篷里，就是钻在睡袋里躺在露天下。我想像着，他们不仅为在异国之城的夜间漫步，为这温暖的夜晚而精神振奋，而且也为同行的人，不是当年邻座的男生，就是当年邻座的女生如此别开生面的参与而欢欣鼓舞，他们激动地谈论着，海阔天空。谁要是已经睡着了，那他就会静静地安睡在这一圈人里，没有噩梦。大家都咒骂着我，因为我没有和他们在一起。

然而，并不是命运让我流落到这个地方，这个昏暗的、承载着厄运的隧洞折磨着我，而更多是一种负罪感。我也感觉自己是无辜的，并不是因为我离开了自己家人，而是因为我独自一人。在这个晚上，我又一次感受着，虽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恶行，可是故意独来独往，这就是一种恶行。这我早就明白了，而且今后也一定还会感受到。一种恶行，针对什么呢？针对的就是我自己。甚至现在同那些敌手交往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坏事。难道不就是那个女朋友向这个菲利普·柯巴尔多次承诺说，要陪伴他走遍他那个传说的故乡吗？她和我不

同，熟悉另外那种语言。难道在这个时刻，可以想像出比我们相互迎着对方呼吸的身体更好的事情吗？一整夜如此躺在她身旁，清早醒来时手搭在她身上！

当然，真正的噩梦即将来临。在梦里，那随着离开车站饭店而中断的叙述在我的心里又活跃起来了。然而，与清醒时截然不同，粗暴，变化无常，毫无关联。它不再是从我的心里跃然而出，连同一个“和”，一个“然后”，一个“好像”，而是盯住我，追赶我，强迫我，就蹲在我的胸口上，扼住我的咽喉，直到我无论如何要说出纯粹由子音组成的词语来。最糟糕的是，没有一个句子能够有始有终，所有的句子在中间被卡断了，被摒弃了，被肢解了，被弄巧成拙了，被宣布无用了。与此同时，叙述还不得停止，我歇口气都不行，必须一再重新开始，开一个新头，找到一个新开端。我好像终生注定就是这种节奏，如此啰唆，又毫无意义，也没有取得意义，就连当天已经找到的意义也在回首时毁灭了，丧失了。我心里那个叙述者，刚才还发觉是隐秘的王者，被拖入梦幻的光明里，在那儿充当了结结巴巴的劳役，苦苦挣扎，也没有迸出一个有用的句子来，在这膨胀为庞然大物惟独以死亡结束的包围中，却以清醒的感官又被感知为温存本身。这个叙述的灵魂——它会变得多么令人不快啊！

然后，经过了十分长久的冲击之后，我突然成功地说出了两个清清楚楚的、自然相辅相成的句子。而且在这同一时刻，我身上也没有压力了，我又有了一个面对面的人。在梦乡里，这个面对面的人以一个小孩的形象站在那儿。这孩子虽然在纠正着那些由我叙述的东西，却同样也赞成这个叙述者。紧接着，有一棵树，一根根枝条上结的不是果实，而全都是石头，它让人把自己看成神树，可这孩子似乎并不知道“Unheil”（不祥）的意义。突然间，在湍急的洪水里，许多镇定自若的游泳者，其中也包括我，在嬉闹。这个在梦乡里的人的面颊感觉身下的地面就是一本书。

就这样，在我这个最漫长的夜晚，也出现了一个半睡半醒的消遣时刻。这时，我可以伸展四肢，双手交错在脖颈上，仰面躺在那儿，耳边响着从隧洞顶上滴水的声音，这好让人惬意啊。况且我和平日完全不一样，不用侧身躺在心脏一边，在自个儿身上寻找感觉。我先是

爬进隧洞里，眼下在这儿有了自己的位子，哥哥的那件大衣像一床温暖的被子盖在我身上，周围被一片漆黑笼罩着，可比起当年他在地窖里的情形，准是明亮多了。不远的出口灰蒙蒙一片，不停地飞来萤火虫，靠着落在手心上的一只，我照了照自己周围，令人吃惊地亮了一大圈。我始终把梦乡那些花絮想像成这样的安身之地。这期间，精疲力竭的奥德赛静静地卧在那史诗中。

一个钟头以后，不用说，这样的梦也突然背叛我了。于是，那不可改变的孤独降临了。半睡半醒可以说是我进入无人世界的最后伴侣，是我从一个瞬间到另一个瞬间表现为幻象的保镖。如果说在那曲解语言的叙述的梦里，当鬼魂兴风作浪时，你还保留着那样的清醒的话，那么它现在看上去就像是咄咄逼人的惩罚。而这样的惩罚并不在于指责一个也许偏僻的地方，而在于一种普遍的沉默：如此置身于人的社会之外，连一个个事物也不再有语言了，变成了对手，变成了判决执行者。说真的：那毁灭性的东西，并不是那根铁棒从隧洞壁里伸出来，又向内扭曲，不禁让人想起酷刑或者处决来——而对于活生生的躯体来说，具有毁灭性的则是，没有了交流，而且我自己现在觉得再也没有交流的可能了。面对它，就像它面对我一样，我只有沉默了。虽然我看到这铁棒扭曲成了字母S，数字8和一个乐谱的形状，可是这些都一闪而过；那个“字母S、数字8和乐谱”的童话失去了其象征力。

如此说来，我后来离开了那个地方，绝非是出于对其历史，或者对那儿的沉寂，对那污浊的空气，对洞顶坍塌的危险，对一个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我甚至恨不得心存感激地让这样一个人抓住我的领口，用尽这地球上所有的语言来咒骂我——的恐惧，而是因为对在那儿涌上心头的、犹如与世隔绝的失语的恐惧。这恐惧直往上冒，无可比拟。失语超越了躯体的死亡，意味着灵魂的毁灭。如今在事后，当我力图去叙述它时，又更加强烈，更具暴力，更为危险地重现了：要是我当初会跨出几步跑到外面去的话，那么我今天肯定就会干坐在这隧洞里，那儿也不会再显示给我什么藏身之地，什么洞龛，什么护墙来。我惟一通往人性的路，就是让这个沉默的星球上的事物长上一对宽恕我的语言的眼睛。我是这个星球的囚犯，想当叙述者——自己就负有罪责！因此，我现在看见那一堆趴在隧洞前草丛上的萤火虫膨胀

成一条喷吐火焰的巨龙，警戒通往阴间世界的大门——我不知道，它是在那儿守护着什么宝藏呢，还是为了保护我？

可是，这个阳世，或者干脆说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呢，我后来在返回途中才感受到了。虽然清晨还远没有到来，而且没有月光，可这峡谷却展现出清清楚楚的轮廓。那条从属的河流，也就是萨瓦多林卡河（或者像父亲可能会用德语说的“沃尔岑纳萨瓦河”），像一条黯淡的光带，流动在两岸稀疏的灌木丛之间。在向下通到水边的山坡草地上，一棵树旁边站着一匹马。虽然这时还不会有什么蚊虫，可马尾巴扫来扫去。马儿吃草的声音是这个地区主要的响声，伴随着那条河潺潺流动的水声和远处火车站上车辆对接的轱辘声。在轨道和谷底之间，与草地相连的是一排排小花园，留在我记忆中的就是“耶森尼克的空中花园”。它们构成了一幅由菜畦和果树组合的图案，四周都护着低矮的篱笆，中间分别都有一个小木屋，屋前摆放着一条长凳。这个图案，一部分呈斜坡状，一部分呈梯形，向下延伸到河边。看样子，仿佛那条河浇灌着这些花园。这时已经可见的颜色是黄白色：树上挂着早熟苹果，菜畦里长着各种豆角。我走在铁道旁边的羊肠小道上。小道软乎乎的，积起深深的尘土——尘土那样厚实，那样松软，连我走过的脚印都根本留不住。露水也湿不透它，而是一起滚成小球形，浮在表面上。如果说随着迈出隧洞的第一步，沉重的石头从肩上卸去了，牙缝里的金属感都消失了的话，那么我的眼睛现在就得到了洗礼，不是被那流水，而更多是被它那如此奇特的景象。之前，这峡谷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已经被我尽收眼底了，可是现在，我觉得它们才以自己真真正正的面目，像一排事后相互连在一起的活字，展现为关联，文字，而那匹吃草的马就是打头的字母。这个呈现在我眼前的地区，这条水平线，连同它那拔地而起的物体，不管是卧着，站着，还是靠着，这片可以描述的土地，我现在就把它理解成“这个世界”。这个地区，我没有拿它当作萨瓦河峡谷或者南斯拉夫，我可以称其为“我的祖国”！而这样显现的世界同样也是对一个上帝独一无二的想像。多年以后，我的想像如愿以偿了。

这样，继续行走在清晨到来之前的时刻，变成了一种辨认，一种进一步的解读，一种发现，一种静静的记录（可不是吗？我在童年时期就始终在空中画来画去，被人家取笑）。而在这里，我区分了这个世界的两类支柱：一个是大地，它承载着那匹马，那些空中花园，那些木屋；另一个就是这个解读的人，他把这些事物用它们的特征和符

号扛起来了。我也真正感觉到了这副肩膀，它们在哥哥那宽大无比的大衣里扩展开来，并且——因为接收和连接那些符号看上去就像是与物承重的对应——耸立起来，看样子，仿佛这大地的重力通过解读化解成一种空气文字，或者一个纯粹由元音组成的、自由自在飞动的、独一无二的词语，比如就像在拉丁语表达Eoae中可以看到的，这个词可以译为“厄俄斯时辰”，“朝露时辰”，或者干脆就是：“黎明！”

早在日出之前，这条峡谷在我的眼前就沐浴在另外一个太阳里，也就是那个字母的太阳里，又反作用到夜晚的隧洞里，并且在那儿真的创造了一种赎罪的形式，因为它在我睡觉的地方——上面有青铜色的外表——把泥土上的裂纹连接成一个由多边形组成的、有规律的文字，连接成与这个地方相应的纪念牌。每当我后来再乘车穿过卡拉万肯隧洞时，我就倚靠在窗前，在黑暗中等待着从南斯拉夫那一边出现的第一缕阳光。无论火车过后多么快地驶出隧洞：我在出洞前的一瞬间真的看到了那个黏土似的洞龛，通常情况下遍地落满了随风刮进来的树叶，里面躺着那个蜷缩成一团的二十岁的年轻人，连同他那个圆筒形的海员背包，一个依然还躺在那儿的空气塑像。对我来说，这个地方与其说意味着那场战争的现场或者当年沉默的万恶之地，倒不如说是我的栖身之处。“Eoae！”在我生存的地方，当曙光到来之际，无论你从哪个窗户望出第一眼时，这变成了一声响亮的、或者也只是埋在心底的起床号。因此，这些从我内心深处跃然而出的元音应该再转借到外面那些事物圈子里，这儿的树，那儿邻居的房子，其间的街道，后面的飞机场，地平线。为了那个新的世界之日，那些真正的东西，那些可以描述的东西，它们应该向我敞开全部的心扉。

E—O—A—E：在昏暗里，轨道和河流此刻形成了一条林荫道，我行走在它们之间。我连一个人影也没看见，可这片土地却显得有生气，挤满了人，因为那开发感官的东西就是人造物，可以说，随时能够投入使用。火车站前，有几个工作棚和车间真的已经开始运作了。一个配电盘被照得通亮，而其余的空间还黑洞洞的；那些测量仪表上的指针跳动着，偏转着；到处回响着一片有节奏的隆隆运转声。一个

大铁轮子开始运转起来，越转越快，直到轮辐都看不见了。在后面的墙上，整个轮子就像一个隐隐约约的幽灵。同样，在一个昏暗的办公室桌子上，亮着一盏灯，照亮了一部电话，一根计算尺和一个闹钟。通往一个装卸台的大门半掩着，平台向外延伸到朝两边张开的轨道区，轨道信号在那儿变换着它的颜色。这时，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不间断的活动，虽然让你看不到那些相关的人，无疑却让你猜得出他们的存在。惟有一次，这一系列夜晚的图像被一个布灯罩替代了，一个黄色的半圆球，呈现在一面孤零零的窗帘后。随之又立刻接续上了，同样也看不到一个人，一个嗒嗒转动的仓库风扇，一根在自己光滑的支架上快速运转时来回滑动的传送带，还有烟囱的烟雾投在大街上的阴影。这期间，因为别的地方再也没有什么要看的，我就改换走到这条大街上了。

在家乡，在边境那边，我也曾经看见过这样的情形，首先在我知道的几个城市的边缘上。于是，我此时此刻在问自己，为什么我在那儿始终感到自己像一个被拒之门外的人，可在这儿，为什么从那些室内传来的振动如此自然而然地感染了这个局外人；为什么这个有布灯罩的房间跟家里如此不同，呈现为让人惬意的起居的象征，普照四方的万物中心，简直就是一个安逸和温馨的殿堂。同时，我也想起了前一天，想起了一群工人的谈话；他们坐在我们奥地利罗森巴赫边境车站一条长凳上，等待着边境班车。谈话大概是这样的："又是一天。"——"已经到星期四了。"——"可接着又要从头开始。"——"秋天快来了。"——"那么冬天也就不远了。"——"起码不是星期一吧。"——"我起来时，天黑洞洞的；我回家时，又是黑洞洞的。在这一年里，我还没有看见过我的房子呢。"

到了南斯拉夫这儿，这个工业区在曙光降临之前看上去如此不起眼，一双双看不见的手使它好像永远要运转个不停。比起我迄今对自己的祖国那司空见惯的印象来，为什么这个工业区却给了我对工人，说来说去就是对人截然不同的印象呢？不，根源并不在于那根本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就像曾经教给我们的一样（尽管似乎曾经合我的意，不要什么特征，用号码代替我的名字，放弃我的独立，甚至我那所谓的自由），而且也不仅仅是到了外国（尽管我就在初来乍到的第一天，感受到这里许许多多习以为常的景象令人振奋，让人耳目一新）：它比一个想像或者感受要更多——那是一种确信，终于在度过了二十年人生之后，在一个没有地位的国家里，一个冷酷的、不友

好的、吃人的产物里，踏上了通往一个王国的门槛。这个王国完全不同于所谓生我养我的祖国。它不要求我充当一个学龄人，服兵役，替代性服役，或者干脆就“充军”，而是与之相反，让我来要求，因为它是我祖先的国度，无论多么陌生，毕竟也是我自己的国度！我终于无国籍了。我终于可以无忧无虑地置身其外了，不用持续地身陷其中了。我终于感到自己生存在像我一样的人群里，尽管一个人也无法看得到。不就是在家乡的环境里，在罗森巴赫的站台上，有一个小孩指着我，扯起嗓子大喊道：“瞧，一个从下边来的人！”吗？（“下边”就是指南斯拉夫，而从德国或者维也纳就叫做“出去”。）那个自由世界，就是我刚刚过来的那个世界，如此地默契——而此刻对我来说，就是我如此真真正正面对的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幻觉，我当时就已经明白了。不过，这样的知识我是不想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要摆脱它，而这样的意志，我认识到就是我的生存情感。我这样从幻觉中获得的原动力，无论如何到今天都没有消散。

我一想到那个时刻，首当其冲的不是那些迷惑我而等待使用的工具和那些隆隆运转的机器，就像是我的家人在隐蔽地、不动声色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而首先是那些灯光，一家居室里有罩子的灯光，一张写字台上的办公灯光，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布满灰尘的粉白色氖管灯光，从一个车间到下一个车间，就像是穿过粮食加工厂的一个个生产车间。加入进去吧，转动一个辊子，一起干吧！十分令人惊异的是，这种行动起来的欲望萌发在一个平日被父亲说成“几乎对任何工作都没有用的”人身上。而他来到这里，并不是因为没有人会看着他在干活（还是像父亲所说的，让我显得“笨手笨脚的”）。在这里，我对自己很有信心，谁爱怎么看就看去吧，和在家里不一样，我不会觉得有人在监视我，我的每一个操作都会无可挑剔，一句话：“太到位了！”

然而，无论这灯光图像多么遥远，可它真的把我吸引到那些车间里，吸引到那些看不见的劳作者跟前。它不是更多地要求我用完全不同的方式一起干吗？这样的一起干也许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在我从外面，从大街上，从边缘漫步穿过的一个个图像剪影里，路过时短暂地

在这儿停息一阵子。不，这条皮腕带是父亲的旅行护身符，它现在戴在我的手腕上，并不是为了让我能够更好地去抓东西，而是充当了温暖脉搏的东西。与那些劳作者的默契与其说出自一起搭把手的兴致，倒不如说出自那兴致勃勃无忧无虑的路过。

就这样，我感受到了同步、同音和平衡之间的区别。与别人，哪怕是单独一个人同步，向来是我无法忍受的。一旦同步了，我一定会立刻要么停住脚步，要么加快步伐，要么走到一边去。甚至当我跟着那个女朋友的节奏运动时，我看到我们就像是两个冷漠的人，两个逆世界而行的人。而像同音一类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要是别人给我定了音，在唱歌时，我就没有能力去接受它，复制它，把它进行下去。反之，即便别人过渡到我的声调上，我就立马陷入停滞。惟有不和谐的争论声才会使我免遭沉默之苦，我通常就很乐于去争论（一场这样争论的原因常常就是那个女朋友把我们俩称作“我们”，一个我不愿意说出口的字眼）。

然而，平衡可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经历。我经历了平衡，比如说，有一天早晨，我一边扭开窗把手，一边听到远处一辆汽车的关门声，一起伴随着一辆雪铲车咔嚓的响声和一个铁路信号响彻地平线的鸣叫。或者：还有一次，在厨房里，我一边把碗放在灶台上，一边打开信。或者：我现正好目光移开写字纸，投向对面墙上那幅古老的、被夜色笼罩的风景画。像每天的这个时刻一样，那儿有一缕阳光犹如一个圆点辐射器，一边慢慢地从左边移向右边，一边把每棵树，每道水光，每条岔道，每片云彩一个一个地从那昏暗的平面上托举出来——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平衡是可以经历的；就在天亮之前，我背着自己的海员背包，里面装着哥哥沉甸甸的两本书，走过那些隆隆运转的、嗡嗡回响的、或者只是悄然无声地亮着灯的车间。我甚至步子踏得更坚定了，就像要使这平衡迸发出生气来——没有什么小敌手或者大敌手会从身后捅我的膝窝——像那些空空如也的车间一样，一个人影也看不到。后来我才看到了那天的第一个人，一个坐在黑洞洞的，而且空无一人的公共汽车里的司机的轮廓。他很快就上路了，看样子，好像人家已经在峡谷里的所有车站上都在等待着他似的。接着就是第一对，出现在一个高楼窗户后面，男人和女人，女的站着，身穿晨服，男的坐着，身着内衣。而过了好些年以后，首先留在我记忆里的是那雾蒙蒙的玻璃。当时，我想像着，上面那个男人不是要起床去

上班，而是刚刚下班回来，大汗淋漓，一夜的劳累弄得他上气不接下气。这劳累蔓延到了我身上，仿佛那就是我自己的劳累。

在车站斜对面一家饭馆前，孤零零地摆着一张上面什么都没有的桌子和一把油布面餐椅。然后，我坐在那儿，等着天亮。我坐的地方要比铁路地基和那条有人行道的大街低一些。有几级台阶从人行道通到下边那块不大而多角的水泥地面上。因为它的另一边被围在一排排房子的半圆里，每道墙与相邻的墙都形成了一个不同的角度，如此看上去有点像一个四面都屏蔽的海湾，一个受到保护的观景台。在这里，和通常不一样，是从下向上观看，看到的不是什么全景，而是一个近在眼前，因此越发容易记住的周边景象，如同从一片凹地里向上观看。那些房子低矮而破旧，每座都建于不同的时代。房子紧后边就是向上延展的谷坡，在那幽暗的树林里，云杉尖慢慢地显露出来了。

在我的凹地里，依然是漫长的黑夜。上方人行道旁有只小鸟，一个一动不动的轮廓，是不是在做梦呢？我在夜间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只白天活动的鸟儿。大街看上去像一道墙，那只鹪鹩此刻卧在上面。酒店很早就开门了，第一批进店的客人都是铁路工人。他们匆匆忙忙喝杯咖啡或者喝口烧酒——我掠过肩膀观望着——就又离去了。天空开始发亮时，好像要下雨了，可现在晴空万里，一丝云彩也没有。一个老态龙钟的女服务员长着一张布满皱纹的男人脸，她给我端出来一壶咖啡，旁边放着一盘厚厚一摞白面包片。咖啡上结起的一层奶皮不禁使我想起叙述过的哥哥，他向来就厌恶这一片片软乎乎的奶皮。当他第一次从前线回来休假时，母亲像平日一样给他送上咖啡，心想着，经过了战争，他所有那些难伺候的毛病都改掉了，可是他把杯子推到一边说："你是昨天才来的吧！"我眼看着奶泛起波纹，形成一层奶皮，在黑乎乎的、慢慢变得清亮的水域上分裂成一个个小岛。旁边的白面包塔仅仅竖立了短暂的时刻——然后，我一边用力地切，一边又透口气，面包塔迎着这位饥肠辘辘的人隆起来，我趁着新鲜，一口气就把它干光了，消灭了，夷为平地了。从此以后，对我来说，这样的白面包就意味着"南斯拉夫"。

当我吃完面包抬头望去时，上方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已经成群结队，街道变成了一道堤坝。学校可能还没有放假，因为有许多学

龄儿童走在行人中，向前倾着身子，好像迎着风似的。确实也刮着风，堤坝旁那修长而无生气的草茎犹如喜沙草一样飒飒摇动。尽管我还从来没有到过海边，可是我不由自主地想像着，在这铁道后面，向前延展的就是大西洋岸边的沙丘。

一个老人从酒馆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把餐椅，在不远的地方和我结伴了。他根本也用不着有一张桌面去观看。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却共同关注着发生的事。我们两人的眼里都是同样的事情，同样久久地注视着，又同样等待着下一件事情发生。我从此再也没有经历过像当年度过了那个最漫长的夜晚之后那样一致的目光，再也没有过那样一个空间，面对过那样一种视野。像那样的观看时一样，我知道和自己身旁那个人如出一辙。我们专注地望着一只鸽子在下方水泥海湾里迎风飞翔，颈项上微微闪亮，又扭过头去向上望着堤坝。钢铁厂的烟雾从峡谷升腾而起，朝着隧洞飘去，仿佛要把隧洞熏个通透。

在这次旅行前，天空晴朗时，我从家乡朝南望去，在蔚蓝的天空下，在边界山脊的那边，莫非坐落着一个个五彩缤纷的城市，没有丘陵地带阻挡，展开的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平原，向下通到海边去，相互交融在一起。眼前的工业城耶森尼克看上去灰蒙蒙一片，它被卡在一条峡谷的深处，被关在遮天蔽日的群山之间，然而却完完全全证实了那幅展望的图像。上面堤坝上，有一个男人走过去，每只手里都拿着一把闪着红光的锯子，跟在他身后的是两个吃着冰糕的孩子和一个临产的孕妇。孕妇身上穿着宽大的衣服，脚上穿着一双木拖鞋。在车行道一段没有铺沥青的石子路面上，来往的长途载重汽车不断地发出轰隆声，这又不禁使我想起了哥哥，他在战前的那些来信中，提起过马堡-的里雅斯特公路上一个类似的地方。他每次去亚得里亚海郊游时，（校长）那辆小汽车都在那里“短暂颠簸得一塌糊涂”，过后他就觉得“完全沉陷到盐一般的空气里”。

与北方群山那边，也就是内陆故乡之国相比，在南斯拉夫，好像不仅存在着一个不同的空间单位，而且也存在着一个不同的时间单位。出现在我眼前的建筑物，常常是每一座都有自己的名堂，可以与沉积岩媲美，标志着建筑历史的一个个层面，从奥地利皇家时代的基座，经过南斯拉夫王国时期的转角挑楼，再到今天“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那简朴的、毫无矫饰的顶楼，连同屋檐下旗杆的插口。在注视着这样一个建筑物的正面时，我禁不住有一种期望，竭尽我的全力期待

着，那个失踪的哥哥随时会推开那半是过时的、用不透明和带着波纹的玻璃包装起来的挑楼门，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甚至直言不讳地心想着："先人，出来吧！"并且看到我身旁这个老人的脑袋也朝挑楼望去。仿佛惟独一声呼唤就意味着如愿以偿：跳跃过一个时代，在能够呼唤中，我觉察到了哥哥的存在，与真人一样高低（我压根儿就没有见过他），宽肩膀，褐色皮肤，披着一头又厚又乌的卷发，梳向脑后，额头宽阔；一对眼睛如此深陷在眼窝里，连那只盲眼，那个白点都给遮掩住了。一阵寒栗袭上我的心头，看样子，仿佛我这时看见了我的国王就站在面前，敬畏的寒栗，然而更多是担忧的寒栗，它驱使着我立刻离开这个凹地上的位子，加入到上边街道的人流里。

这人流也立刻接纳了我，而且那根本不是什么人流，与置身其外的印象如此不同，更多是一种缓慢得让人惊讶的蠕动。这时，没有了我对如愿以偿地恳求祖先的激动，惟独笼罩着我们缓慢行进的现实。

在这样的人流里走动，对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有点新鲜感。那个村子就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至多不过是节日或者葬礼列队行进时被延缓的步伐或者原地踏步。在寄宿学校里，只要不是单独行动，大家总是以义不容辞的集体形式行动（星期天散步，也只允许以班级形式进行，排成两队，后边的人紧踩着前边的人的鞋跟。谁要是想离队，只要刚一露出念头，就会立刻被看穿，并且被吹着哨子赶回来）。而在故乡的小城里——我也就只知道这样的城市，在一次学校郊游时，我目睹维也纳的视线被其他人的肩膀和老师们的食指给挡住了——，我至多也是耷拉着脑袋没精打采地在边上慢慢地跟着一起走：在那儿，只要一上街，我立刻就茫然了（比起那个常用的"怯生"来，这也许是一个更为形象的词语）。这就是说，我不知道要朝哪儿看，或者四处张望，惟独不直接向前方望去。和在林肯山村里不同，一到那些奥地利小城里，我的目光要么处处都被那些橱窗、那些广告牌，首先是那些报纸头条新闻吸引过去，或者只要我一把目光暗自投向街道某个遁点上，便径直沦入那目光的陷阱里，于是我至少想像着这时迎面而来的一道目光。这种陷阱伤害了我，它不是目光，而是凝视，或者干脆就是没有眼睛和脸面，比如说从中撅起一个可怕的长嘴巴，作为惟一的器官，一句话，总是三言两语，总是没有声音，总是可以看得出来，哪怕是地地道道的方言形式，死死地缠住我了。

是的，在那些故乡城市里，你一上街，不会加入什么行列里，而我觉得，你立刻就成了人家的囊中之物了，被那些长久以来连同他们的狗一起暗中守候，兜着圈子和居心叵测的行人监禁了。他们坚定不移，天生就注定是一帮这样靠兜圈子为生的人，觉得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合情合理的，无可挑剔的。在故乡之国里迎面传到我耳际的“Grüβ Gott”[6]，我觉得听上去不是问候，而是一种威胁（“说出密码来，或者——！”），今天也一个样。首先是一听到孩子们吼叫起它，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举起两手来。难道这是纯粹的想像吗？从奥地利人中，从大多数奥地利人中，无论是走在一旁还是中间，我都看到自己总是一再被人评头论足，怪罪，并且也总是一再认可这样的怪罪，当然却认识不到我罪在何处。有一次，我走在人行道上，立刻就意识到，正好下一个来自目光捕捉队的目光会在此刻从一侧打量起我，可我抬头一看，我面对的不过是一个橱窗木偶那种无神的眼睛。那可是如释重负啊！

然而，在这条南斯拉夫大街上，眼下就不存在什么多数或少数，因此，也没有谁是少数——惟有形形色色的，同时又步调一致的熙熙攘攘。继耶森尼克这个小地方之后，我后来仅仅在那些世界大都市里有过这样的经历。而我活动在其中，首先是作为外国人，在那些群山之后，在一条条克恩滕大街上，我每次都感激外国人的出现，因为他吸引去了人家对我的注意。然而，在这里，在这人群中，在这些街头行人堆里，他拥有了自己的位置。在那儿，我通常总是不断地变换步子，躲来躲去也躲之不及，免不了与人相撞。而现在，我跟着一起走，尽管对拥挤如此不习惯，可在这柏油路上，我的每一步都有自己的活动空间。终于有一次，我不用没精打采慢腾腾地走了，不用吧嗒吧嗒地拖着脚走路了（就像大家在寄宿学校的楼道里一样），而且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脚步，踏着让人可以感觉到从脚趾经过拇指直到脚跟展开的脚掌，晃晃悠悠地走去，顺便把小东西踢到一旁去，有一种宁静放肆的感觉。当我再次经历时，我才感觉到这样的放肆当初就是我童年的特性。与我熟知的那群人相比，这群人真正让人惬意的东西首先是在他们身上没有出现的东西，找不到的东西：羚羊毛帽饰、鹿角扣子、罗登缩绒厚呢西装、皮裤子，总而言之，找不到任何地方服装。这些街头行人不仅没有地方服装，而且身上也没有什么徽章，没有社会等级偏见。就连警察的制服也不起眼，有点像公职人员的服装，也很得体。一种让人觉得无比强大的惬意是，从“茫然无措”中解脱出来了，可以昂首挺胸，直面而视，望着一双双眼睛。它们不是

在轻视一个人，而只是显现出自己的颜色，并且以这样的褐黑和灰黑的颜色来展现“这个世界”。还让我觉得既新鲜又自豪的是，在这里，外国人这个概念不复存在了。在和人家一起行进的行列里，我认识到了自己的相似性，外在和内在的相似性，仿佛从来就没有过一面镜子会给我映现出这样的相似性来：我的身材和他们一样，体格细长、瘦骨嶙峋、脸面粗糙、动作迟钝、两臂摆动也不灵巧；我的本性和他们一样：顺从、甘愿效劳、俭朴，就是那些数百年来沦为无王的人、无国籍的人、小工、奴仆（其中没有贵人，也没有大师）的本性——与此同时，我们这些蒙昧主义者也共同放射出美好、自信、大胆、造反、渴望独立的光芒，这个人民大众中的每一个都是另一个心目中的英雄。

此时此刻，那些行走的人仿佛成了辅音，加入到那些在我心里唤起了一个个事物的元音，然而并没有因此组成词语。惟独打动我的是那完全独立于自身肺腑之外的第二呼吸，一种令人激动的气息。突然间，凭着它，我可以解读出从我身旁扛过去的报纸标题了，是斯洛文尼亚语，没有头版头条，犹如我的德语，况且让人耳目一新，如同看不到那地方服装的五颜六色，是实实在在的消息。再说这群人里叙述的许多东西，我也一下子听懂了。难道是因为在这儿街头上没有人和我搭话吗？难道是我从上小学以来一直耿耿于怀，就是因为当时出于义务，必须和老师用外语交谈吗——仅仅是顽固不化？和通常一样，jutro就是早上，danes就是今天，delo就是工作，ceste就是大街，predor就是隧洞。连那些商铺的名称我都可以翻译了，它们真的都好简单：在奶站里，与北方或者西方的市场叫卖不同，标识的无非就是个“奶”字；在面包店里，标识的也干脆就是“面包”两个字；mleko和krub这两个词的翻译并不是翻译成另外的语言，它是一种回归到那些图像，回归到词语的童年，回归到奶和面包的第一个图像的翻译。银行，即banka，以此类推，无非又是那习以为常的东西。然而在这里，银行也显现为某些本原的东西，因为它的窗户并不是橱窗，也不是用来陈列展品的；因为在这儿，这些地方什么也不摆放，空空如也。可在我的故乡之国里，比如说，一到这样的地方，那五颜六色的储蓄罐简直堆成了金字塔，好诱人啊。那是一种向我开放的空白，一种我可以向它求教的空白，就像求教行人那一张张空白的面孔一样。在这些行人中，与在家乡不同，我不用去寻找这个家人或者那个同村人，让他们面带洞察的微笑，把我从面具枷锁中解救出来。在这儿，一张张面孔是空白的，这就是说，它们没有面具——这时，我眼前又

浮现出那些年轻人的图像。他们挤在一辆拖拉机拖斗里，皮衣直裹到脖颈上，正在前往一座阿尔卑斯山城的途中，要在那儿的大街小巷里，按照习俗，表演他们那野蛮的狩猎情景：直到城边上，那些为此必需的荆条和锁链，他们还没有握在手里；那些即刻就要套在自己头上的巨大而可怕的面具依然放在他们脚下。尽管小伙子们一个个都那样土里土气，可是他们露在外面的一张张面孔连同他们打着褶子的皮领子看上去却多么苗条，多么善良，又多么随和！同样，我也可以看到耶森尼克那一张张面孔里去，仿佛那是独一无二的面孔，仿佛这给了我在国内一次也没有感受过的尊严，无论在自己身上还是别的什么人身上——或者还是曾经感受过，是的，在父亲身上，在复活节的晚上，在林肯山村教堂里，他披着一件拖在地上的紫色长袍，和村子里另外几个男人一起跪在那应该预示着空空的墓穴中有复活者会冒出来的洞窟前，然后猛地一下在前面伸开四肢，五体投地，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遮盖在那带有蜡渍的红色中，让谁都认不出来了。就像父亲听广播音乐会时列举起一个个乐器一样，那么我现在从交通和工厂的轰隆中听得出一个个响声，并且可以清楚地把它们相互区分开来，火车站里缓冲器砰的碰撞声与超市里购物车的丁零当啷声；烟囱出口蒸汽的咝咝声与高跟鞋的嘎吱声；锤子的击打声与自己吸气和呼气的声音。我心里盘旋着，这样突然会听辨的能力够奇怪了，同样也来自这里不存在的东西，找不到的东西，应该有而没有的东西，在这个斯洛文尼亚工业城里缺少的东西。由于那习以为常的教堂大钟不响了，我才对这周围的一切获得了灵敏的听觉。也就是说，这不是随便哪个国家，而是这个确定的国家，这个有缺陷的国家。让它和我那个习以为常的国家的富裕比起来，才可以辨认它，看懂它是个“世界”。

然而，我如此感知的世界王国超越了当今的南斯拉夫，也超越了所有那些从前的王国和帝国，因为它的符号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有些过境旅客报纸的西里尔字母依然清清楚楚；一幢公务大楼上的古奥地利铭文依稀可见；一座别墅山墙上的“欢迎您！”，看上去就像古希腊椅[7]一样。——可是，一家加油站那块透过树枝隐隐可见的加油标牌却显得意义模糊了。它不禁使人想起只有在梦中才经历的东西，想起中国来。而且一片同样陌生的西奈沙漠显现在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后面，连同一辆映入视野的、布满灰尘的长途公共汽车。在车的正面，那个显示目的地的滚筒转错了位置，正好停在两个不可辨认的地名中间。车辆穿过去时，一幅希伯来语字卷片段跃入我的眼帘——真的，“跃入眼帘”；因为展现在这文字图像周围的景象伴随着一种惊恐。

与之相应，一个盲窗的不可确定性也融入其中了。此刻，我的目光被吸引到那里，就像被吸引到这个世界王国的中心。盲窗出现在谷坡上相当高的地方，镶嵌在一座高大建筑物的阳面。一看见它，我就觉得，边境那边，那座与那个小门房成为一体的地主庄园便浮现在我眼前。它坐落在一片开阔的地带，前面仅有一棵孤零零的松树，那闪闪发光的皮棕色使得正面的黄色越发强劲有力。穿过一片草地，一道陡峭的岩石台阶向上通往入口大门，那儿站着一个小孩，背向我，一条腿踩在另一条腿上方的台阶上，像是犹犹豫豫的样子。对小孩子来说，那些台阶太高了。草坡仿佛被特有的横向条纹画上了一道道阴影线，变成一块块长满草的小梯田。梯田精美的阴影图案又重现在正面的横条纹上。这样，在那棵松树后面，这座房子让人想起了与其说是一座建筑物，倒不如说是一个天然的黄色岩石。它看上去没有人居住。小孩站在台阶上，不是在入口处，而是在一个游乐场上。

盲窗远近独一无二。而且它给人的印象来自那看不到的习以为常的东西，来自那应该存在而不存在的东西：那无法透过的东西。凭借那融通于自身之中的不确定性，它把我的目光反射回来了。而在我的心里，一切语言纷乱和七嘴八舌的讲话都终止了：我全部的内在都沉默了，并且阅读起来了。

我似乎从来都不会相信，又会失去这个盲窗。我感觉它的符号是不可动摇的。然而，一看侧面就够受了，从中弥散出的光亮熄灭了：旁边的窗子——可以说是观望窗——推开了，又关上了，虽然是被两只手，可是属于两个不同的人，先是一个年迈的女人，后是一个年轻些的。刹那间，我认识到了，那个老妪不仅仅年事已高，她是一个垂死的人，她正好最后从那个被拘禁的房间里猛然直起身来，想要逃脱死亡，穿过铁栅窗子，躲到外面去。一张被恐惧撕得扭曲的面孔上，下嘴唇收拢，眼睛睁得老大，再也不会自个儿重新合上了。

窗子空荡荡的，清晨的太阳映照在其中。可是刚才还发挥作用的光芒不仅被熄灭了，而且也被吞没了。那个小孩也消失了，仿佛他是一个幻觉。房子和草坡上的横条纹像投影一样击中了我。“菲利浦·柯巴尔醉心于假象！”这就是那个历史老师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表扬，又是批评——而这个假象又一次化为乌有了。就在一个号啕大哭的女人的怪脸迎面而来时，在这人群中再也不分什么女人、男人、小孩了。在人行道上，流动的就只有一群长得不够体面的、不苟

言笑的、瘦骨嶙峋的、不起眼的粗野之人，相互碰来撞去，抄着近道走动，无论从哪个视角，都被那位国家首脑喷射光芒的眼睛监视着。他现在就是那个凌驾于我们大家之上的独裁者，无论是汽车生产车间里那个年轻的游击队首领，还是理发馆里那个身着白装的海军将军；无论是电影院前厅里那个魁伟的、被同样魁伟的夫人挽着手臂的黑礼服穿戴者，还是校园里那个水泥浇筑的帝王脑袋。当最后一道探寻的目光朝上投向盲窗时，仅仅强化了当局的权力，仿佛我这样看要让自己受到怀疑似的，因为我立刻就被一个警察挥起慢慢弯曲的食指叫到街道另一边，要我出示证件。后来我想起来，这个身着制服的人就是昨天到达时检查我护照的那个年轻人，和我一般年龄——可是在这乌云蔽日的时刻，好像谁都不再认识谁了。看样子，仿佛我们都失去记忆了。

我数着步子走进火车站。一道湿漉漉的楼梯通到下面的卫生间里，就像走进一个地堡里，前面站着一个相应的地堡女人，只不过她的腰带上少了钥匙串。我在没有插销的小隔间里徒劳地寻找着那些习以为常的格言和图画；它们现在或许会进一步帮助我。盥洗盆上方没有水龙头，墙上只有一个洞。上面的候车室里黑洞洞的，很难闻。首先在挤成一团坐在那儿的人身上，我只看到了一片白，引人注目的是，许多扎着绑带或者裹着石膏的肢体。亮光不是来自站台上，而是其间昏暗的走道里。后来，我还辨清了这个和那个罩在受伤拇指上的皮套子以及我身旁那个人头发上的血块。（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的感官被这样的东西吸引住了。）连我自个儿身上，我也独自发现了那令人厌恶的东西：鞋上沾满了泥巴，裤子鼓起了包，指甲缝里黑乎乎的。肯定谁都看得出来，我是和衣过夜了，也没有洗漱，头皮发痒，同样，值盛夏时节，脚趾上长起了像在寄宿学校时一样的冻疮来。我也徒劳地试图在地图上看出我的下一个目的地，而投射到地图上的光线只够你看清灰白色的低地和蓝白相间的冰川。

我出门来到站台上，那儿有一个工人正在用冲击钻挖凿柏油地面。对面轨道上，停靠着那列奥地利早班车，向北方向，准备发车。车厢通亮，干干净净，几乎空空的（这列车还没有被许多南斯拉夫人用于前往菲拉赫购物郊游，在后来的年代里才这样）。那些身着蓝色制服的铁路人员又是在机车头前等待着某个尚未上车的乘客，和那些

奥地利边防官员一起——认不出来他们都是这样的官员，因为他们身着便装，穿着长袖衫，外套就搭在肩上。虽然我原地一动未动，可我一下子着急了。下决心吧！返回的愿望几乎不可抗拒，不仅要越过边界，而且要回到村子里，回到家里，回到房间里，回到床上，在那儿美美地睡一觉。可首先想到的安慰，是在机车头侧面可以看见的那个语言，我那熟悉的、与生俱来的德语，无论是在“Heimatbahnhof”这个字眼里，还是——因为不是意义，而只是文字图像说了算——在带着“Arbeitsrichtung”图标的箭头里。[8]

我是多么犹豫不决啊！我想像着站错了地。在冲击钻头撞击的地方，沥青地面上的裂块四处飞溅，就像你走在一摊结了冰的水上时一样，有一块直飞到我的鞋后跟下。我被这砰砰的撞击声震动了，低头望着地面，在这灰色的沥青路上又发现了那样的盲窗，同样作为那个如此友好的、不用着急的符号。难道我不是对自己这个“世界王国”要求太多了吗？我到底是什么人呢？面对这沥青路，我永远认识到了我是谁：一个外来人，一个外国人，一个在这儿也许要寻找点什么，可什么都不能说的人。我没有权利要求所谓的人的尊严，像在家，在国内一样。而伴随着这个认识，我觉得不光是静下心来了，而更多是——处之泰然的状态。

那列奥地利火车发车了。那个列车员不是在疑惑地望着我吗？车站变得明亮和空旷。那些突然落在我脚前沥青路上的麻雀已经飞走了。它们片刻前还卧在一堆林肯山村的灌木丛里呢。轨道碎石上那片椭圆形车前草叶也是从那边飘过来的，一个所谓的花园逃兵。我迈着大步，走进售票厅，买了一张车票，仿佛我就是决断的化身。我又迈着大步，穿过地下通道，直奔最后一个站台而去，就像一个终于明白了他不再只是为自己一个做事的人。我匆匆地在井边洗把脸，一下子就跳上开往西北方向的火车。看样子，仿佛我以此结束了这越过边境的郊游，现在才开始真正旅行了。上了火车，刚一坐到靠窗的位子上，就立刻进入了梦乡。——而我今天一想到这位成长的年轻人，连同脚底下掘开的沥青，那么他也许之所以会获得一个图像，是因为他正好面临着跌倒的危险。就像有些事物，由于它们在最后的关头免遭了坠落的命运，因此在颤抖的双手中成为自由观察的对象，这时才会让你刻骨铭心。

后来几天，我是在波希斯卡这个地方（“沃凯因”）度过的，拜读了哥哥的那两本书。每当我乘车前往那儿时，总是睁着眼睛，怕耽搁了下车。我始终望着立在草地上那细长的、被人称为“干草晒架”的木支架：两根打入地里的木桩（今天也许是水泥做的），之间平行架着许多横杆，顶端盖着木板，每年第一茬收割的草就晾晒在架上。那些割下来的草里夹带着春天的鲜花，灰色的草堆上闪现着星星点点的色彩。横杆超出了木桩，有点像捆在一起的路牌，共同指着一个方向。看样子，仿佛火车就是跟着这一个紧接着一个、从峡谷到峡谷越来越厉害地向西转弯的箭头群行驶。在我的梦乡中，道轨两边的晒草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承载装置，借助它，旅客们不用花时间就被送到目的地了。

我不再在露天里过夜了，而是住在这个地区中心一家旅店里，叫波希斯卡-毕斯特里卡或者沃凯因-菲斯特里兹。我看到房间价格实惠，数了数自己的钱，就决定住下了。靠着那位老师的接济，靠着给人家补习功课，再加上一篇“自己撰写”的文章上了报纸（“那是你自己撰写的吗？”一个旁座的同学摇着头这样问道）。事后我也想了想，跟他们一起去希腊，这也不是我没能力办得到的事。

然而，正好是这一篇发表的东西，妨碍了我一起去旅行，远远超过了缺钱。那是一个故事，其中描写了一个小伙子，他在一户人家院子里修自行车。这个过程写得很细腻，包括阳光、风、飒飒的树声，雨季开始，到结尾时，主人公听到一声喊叫，便冲进屋里，在空荡荡的房间地上，发现了父亲或母亲——我记不起来了——睁着挤得满满的、最后的瞬间还映现出外部世界的眼睛。当然，跟这样的内容根本不相干。惟独我“写作”了这个事实，使得同学们疏远我了。虽然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在一个剧组里演戏，然而却有一个写作了，而且凭着这个东西“成了公众人物”，这至少让人很诧异。而且那个女朋友连故事看都没看，几乎连扉页上的题目和作者名也没有瞥上一眼，就投来了一种奇怪的、拒绝的目光。看完以后，这目光转化为一种由不理解、同情、诧异，首先是畏惧错综交织的神色，这让我很伤心。后来，我一再不由自主地想起，当时，我想要把她拉到跟前，可她的脖梗子却挺得僵直。

难道不也是自个儿招致了这普遍的回避吗？难道我不是在报纸刊登的那天，把每一个打开报纸的人都看做是一个立刻会感受到我全部

的罪过，并且会继续讲下去来羞辱我的人吗？这篇发表的东西受到了创作童话的历史老师的鼓励，得到了一位撰写地方评论的编辑的提携。尽管我事先也觉得这是无可非议的，（人家终于会知道我是谁了！）可后来我越发觉得这就是一个原罪。庆幸的是，惟一没有被这个穷追不舍的原罪波及的地方就是那个村子。在那里，和今天不一样——其间，村子入口处竖起了那个“林肯山村拜读……”的牌子——，甚至在牧师家里，一张日报都不会引起我的注意。当然，迄今无论怎么说，我毕竟在那里还是土生土长的，坐着汽车和火车来来去去。如今在我的眼里，我永远都不会使自己招人注意了。无论在哪儿，凡是我往日如愿以偿地不招惹人眼了，也包括面对自己，当个无名之辈，而现在，我却在那儿表现为“某个人”。一走出隐蔽，我便因此失去了自己喜爱的环境。在拥挤的人群里，首先是站在火车的过道里或者汽车中间走道里时，一时的惬意感觉为那不舒服的感觉让开道了，变得可以辨认了，我在遭受着一种使我变得孤单无靠的强光线，并且如此——让我最羞愧的——打扰了我那些同行者独自存在的状态。难道在最近几个星期里，我因此才常常骑着自行车去上学吗？这样，我来回几乎需要半天的时间。有许许多多的原因，现在打动了我去独自旅行，然而其中一个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让自己忘记成了公众人物，我暴露自己了，不管这是想像或者不是也罢。那么，伴随着每一个我又会在其中成为默默无闻的人的时刻，我现在不是感觉到这种忘记强有力地在我周围扩展开来吗？不是感觉到一种随着时间和距离越来越有疗效的恩赐吗？难道不是我刚到沃凯因时就被吸引到一个村落里来了吗？这村子在地图上叫做“Pozabljeno”，意思大概是“被遗忘的东西”或者“遗忘”。难道在后来的日子里，人家不是真的让我随心所欲吗？无论我在什么特殊的地方走也好，站也好，坐也好，躺也好或者跑也好，仿佛那都是不言而喻的。

惟独菲拉赫那位老师还神出鬼没地闪现过这个无名之辈的世界里，因为他一再重复着他当时第一眼看到我的印刷品时禁不住呼叫着说出的话。看神态，仿佛他要和一个音乐人合唱似的：“菲利普·柯巴尔”——他直呼了我的大名，我当时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呼叫我，先呼大名后叫姓。的确，直到这个时候，人家只是呼我“柯巴尔·菲利普”，比如，刚刚在服兵役资格考试时还是这样。“别说了！”我这样暗暗地回答他：是的，我下定决心了，永远不再出现在报纸上了，永远不再让自己、家人和同村人蒙受耻辱了。那个沉醉于名望的梦想永远一去不复返了。难道我不是向来就知道自己这辈子永远都一

事无成吗？恰恰当我和别人一起在汽车或者火车里时就这样扪心自问，即使我自己在兴奋地看着一本书，在听着一个新的发明，在欣赏着一首乐曲。难道我不是向来就知道自己迟早都会没用了吗？我注定最多不过是当个会计，当个小职员，干一个无非只能和数字打交道的工作吗？有一次，在一个教会节上，有位算命先生就这样告诉我母亲，肯定是想以此来恭维这个乡村妇女和她那个干什么事都不会有用的儿子。而现在，在这家斯洛文尼亚旅店房间里数起钱来，这不就是我的命运的一部分吗？

沃凯因是一片开阔的山谷高地，四面群山环抱。它是从前一个冰川的地表，在西部边缘留下了浩瀚而平静的、在我的记忆中几乎始终没有人烟的沃凯因湖。从它的北岸边，尤利安山脉陡峭耸立，主峰是依然被冰川覆盖的特里格拉夫峰，也叫做“三头峰”。三头峰的模型就坐落在山脚下的湖边上，是供前来度假的孩子们游乐的。南面的山峦是大海前的最后一道大屏障，往后向下通到伊松佐河（斯洛文尼亚的Soca河）。这条河接着继续流经其间的坡地再也看不到树木线了。由于交通十分不便，沃凯因盆地数百年来远离世界，惟有山间羊肠小道将它与伊松佐河谷地和弗留利平原相连，而我经过的东部通道，是随着铁路的建造才真正打开了。

奥地利可谓是一个阿尔卑斯山山国。这个国家有一个别名，叫做“阿尔卑斯山共和国”，它总让我感到诧异，因为我生长在广阔而平坦的雅恩费尔德平原上，离那些山峰还有一些距离（在这个村子里，几乎就没有人有滑雪板，而惟一的雪橇道就是从树林边通到下面的街道上，你几乎刚一滑起来，就又停住了）。然而，在沃凯因，我现在真的发现自己被阿尔卑斯山包围了，并且觉得处在一个阿尔卑斯山山国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沟壑、深谷、阳面和阴面，少见天日，尽管是锅状盆地，却更多是高原，因此视野很开阔。要是我现在闭上眼睛的话，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远离世界的世外桃源。那荒无人烟和深蓝色的湖注定了它的命运，四周群山环抱，地面上连绵起伏的冰川堆石将它划分开来。对它来说，没有一个名称会像开头使用的“山谷高地”更贴切了。

再说，沃凯因是个忙忙碌碌的地方，无论如何从稍微隆起的火车站看去如此。当时我一下火车，首先看到和闻到的几乎只有木材。就在货运轨道后边，我看到堆成一摞摞的树干、方形的木梁、宽厚的木

板和狭长的板条，听到房屋之间隆隆的电锯声。我在那儿停留的所有日子里，从早到晚，我没有碰到过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如果谁看上去是这样的话，那也无非是一个在等待着的人，要么在一个常常都不加标记的停车站（一道木条围栏，一个桥头）等候汽车，要么在守着一棵要锯伐的松树倒下的地点，要么就期待晾晒干草的好天气，或者只是像旅馆灶台前那个老厨娘一样，在等着牛奶烧开了，菜肴煮熟了。偶尔有士兵独自无声无息地坐在路边，可走近一看，耳朵上却戴着无线电报话机。连孩子们都一个样，尽管他们看上去慢慢腾腾的，不时从灌木丛里撕去一片纸，可此刻就有点像正在学习追寻前人足迹的童子军。甚至到了星期天，人们排着长队等候在教堂里的忏悔室前。教堂坐落在一片草地中央，和主教堂一般大小。谁摆脱了自己的罪孽后一走出来，正好可以借机走近自己的心灵深处去嘲笑自己，接着便继续走到座位前屈膝跪下，立刻在那里做起忏悔祈祷。从这个山谷高地的居民中，散发出的不是世代居住者的安逸，而是新拓荒者不可遏制的特性，忙忙碌碌的存在，持续而必要的机智果断精神。因此，同样考虑到它的自然位置，白天我常常把沃凯因看成一个特殊的欧洲国家。在这其中，我几乎就看不到白痴或者醉鬼。这种人的存在准会扰乱这忙忙碌碌的氛围，因为他们无聊透顶地四处摇摇晃晃，跌跌撞撞，不时地会分散了那些整日忙碌者的专注和勤奋。直到我突然发现，我扮演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双影人角色。在寻找去研究那两本书的地方时，我停滞了，掉头了，拐弯了，试探着这块和那块草地，看它们是否适合于坐下来，靠在一棵树上，立刻又从那儿的松脂上脱开身来，然后继续踉踉跄跄地走去。

我住的这家旅馆，译成德语叫“Schwarze Erde”（黑土地），取名于南部山脉的一个山峰。这是建于大战之前的一座大房子，我立刻在上面寻找着盲窗。除了我，只有偶尔来几个登山者入住。因此，我自个儿住了一间有四张床的房间，像是为一家人准备的。房间位于二层，就在入口上方。从窗户望出去，眼前是一排松树，像一片树林留下来的，从这个地方中间穿过。从另一面望去，是一条直接从房子旁边湍急流去的山涧，一片白茫茫的怒号淹没了载重汽车和电锯的轰鸣。穿透过来的声音最多不过是火车的汽笛或者一架军用飞机突然的呼啸。那些松树和流水不一样，你坐下时也可以看得到。于是，我把

小木桌挪到相应的窗户前，并且试了试各种不同的椅子。由于我无法决定坐哪一把，于是我把它们都排放在桌旁，不时地变换着座位。

第一天，我只是从行李中拿出那两本书来，却没有打开它们。我让通往过道的门敞开着，因为听着溪流的咆哮，我觉得自己在这封闭的房间里就像远离了世界似的。这样一来，从楼下的餐厅和厨房里至少时而可以传来当啷声或者其他刺耳的响声。在正对着房门的过道墙上，挂着一个制成标本的深棕色雄松鸡，摆开一副发情期的架势——脖子伸得长长的，鸣叫时肿胀起来，眼睛紧闭——，真的也像是被射杀时的样子。旁边的钥匙盘上挂着各种形状的钥匙，放在一个玻璃窗里，有点像近乎完美无缺的蝴蝶收藏。我第一瞬间立刻就觉得，似曾看到过这一切，或者还要更多：仿佛我又回到这儿了，不是回到一个昔日的生存里，而是回到一个预感的生存里，让你觉得更真实，或者更明确，又不可思议。这一切是来自桌子、椅子和床架呢，还是来自窗前飞溅的雾气？前者让我想起身为木匠的父亲；后者又让我想起身为山涧工人的父亲。或者是来自哥哥那个写在信里的表达？他在信中用了“祖籍”这个专门的词汇来描述沃凯因。因为我真的觉得，不单是房间和屋舍如此实实在在地重新找到了，也包括毕斯特里卡这个地方，这个“一目了然的地方”，这个“一清二楚的地方”，这个“山涧村庄”，连同这整个山谷高地：一个孩子惊奇地注视着她；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观察着她；一个四十五岁的人俯瞰着她。在这个时刻，所有这三个人融为一体，也没有了年龄区别。再说，毕斯特里卡完全不像一个普通的村庄，更像一个将会从许许多多空旷的空间间隔中拔地而起的城市的前站。那几座位于边缘的高楼大厦，连同超市，还有那个坐落在草地中央的大教堂看上去已经是预兆了。

当时，对这个有房无地的村民儿子来说，坐在旅馆餐桌旁，吆喝着服务员要菜，这是多么不像话啊。开始的日子里，他仅仅靠着从超市买来的蛋奶烤饼和饼干，首先是姐姐给他塞进海员背包里的面包和苹果糊口。苹果是去年最后剩下的，已经放得太久了，只要一拿到手里，里面的果核就吱吱地响。我吃这两样东西，并不是因为饿极了，而是因为那是我最喜欢吃的，多少年以后依然如故。“美味可口”这

个词对苹果与用和兰芹调味的、几乎就不加盐的黑麦和小麦面包组合起来的甜酸味再也恰当不过了。窗台上，面包、苹果和折叠刀摆成了一行。面对带着深深裂纹的圆面包，我想像着月亮的背面。当然，它一天缩小的速度都比这个天体一个星期的都要快，很快也就没有那些旁边的月亮了。最后一片是如此的薄，拿到阳光下一照，它不禁让人想起了一个透明的雪花结晶网，然后也就融化了。

然而，真正的童话才要开始。我打开那两本书时，发现它们分别夹着一张纸币，像衬页一样。这时，我才突然想起了姐姐的叮咛，在旅途中，我每天一定要吃上一顿“热饭”，“这样至少别让肠胃 觉得到外国了”。就像我当年常常做梦都梦见捡到钱一样，我现在看到四处有更多的钱在闪烁，并且事后感到遗憾的是，姐姐怎么就没有给面包里也夹上钱，或者给苹果里塞进钱呢。我把这几张纸币折起来塞进后面的裤兜里——家里从来没有人有过钱包——，发现这个样子重复了父亲的举动。每次打完牌后，他都要向这一圈人久久地投去胜利和复仇的目光，收回自己赢得的战利品。于是，我也可以把这笔当女儿的从父亲那里弄来的钱当作赌注，兑换掉，而且就在同一天晚上，在楼下餐厅里要了第一顿热饭，语气坚定，并且自以为没有口音。那服务员脸上表现出的关注，我此刻觉得她是在微笑。

两本书的第一本原来是一个硬皮笔记本，是我哥哥在马堡上农业学校时的工作笔记。然而，因为这个本子挺厚的，再加上两张硬皮，便散发出相应的气味。所以，我总是拿它当本书看。它和另外一本，也就是那本出自19世纪的斯洛文尼亚语-德语大词典、一包信、一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军帽（儿子）以及一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匕 首和一个同一时期的防毒面罩（父亲）平时都放在木回廊上的箱子里。箱子就在父母房子的屋檐下。到我开始看书时，那儿也就只有这两本书，而且始终都放在这个半是露在外面的箱子里。我要阅 读它们时，从不带进房间里，大多都坐在箱子上。看样子，仿佛同时也一起领略了各种天气，这理所当然地属于这样的阅 读不可分割的部分：感受着从侧面吹来的风，眼看着光线在书上不断变换，有一次甚至被刮到房子挑檐下的雨水给淋湿了。哪儿放着这些书，那儿就是我读书的地方；因为父亲不愿意看到屋子里有书，尽管他星期天在窗台前仔细阅读报纸已经成了不可动摇的习惯；只要他在那儿碰到我手里拿本书

看，就愤怒地嘟嘟哝哝，因此，浑身直冒的冷汗，立刻就粉碎了这位吓得发愣的读者的文字图像。

这些年里，我多么艰难地寻找着去解读这些书的地方啊！我在三岔路口旁边的奶站后面坐过，在离得远远的田野里的圣像柱旁的长凳上待过，也去过德拉瓦特罗格峡谷里一段与世隔绝的河岸边。我的脚前，那片被堵起来的河水如此平静，上下一个样，天地为一体……有一次，我登上了林肯山。快到山顶时，在一片覆盖着蕨类植物的空旷地上，孤零零地长着一棵松树，我看到面前这个地方，那肯定就是每个读书人的梦想之地：这棵树周围有一片软乎乎的草地，人们习惯叫它“女人发”，一个由天然软垫搭建起来的床铺；它不是罪恶之地，而是一个似乎立刻会从那名为“恐惧与战栗”[9]的书中吹向我的精神宝座。然而，我在那里卡在第一页了，甚至连第一句话都弄不明白。直到有一天下午，在学校走廊里，看着旁边别的走读生正在做自己的作业，我眼前才豁然一亮，便立刻明白了那些句子和结果从句。伴随着这些语句，我同时看清了周围一个个细节，凳子的纹理，前座那个人的发型和走廊尽头的电灯。这时，我才听到了那棵松树里的涛声。可在之前，在那片旷地上，当你打开那本书时，涛声突然减弱了。那个地方，所有那些地方，尽管它们都那样可爱，那样诱人去读书，可是，每当我要坐到那儿时，它们却都一个个地消失了。于是，我就偷偷地走开了，就像被父亲那愤愤的嘟哝弄得不认识字了似的。直到今天，这个读者惟一固定的座位始终就是那个放在父亲房子回廊上的，如今早已被砍成劈柴的箱子。在寻找座位的过程中，我惟独感受到的是，难以隐退到一个荒无人烟的世界里，恰恰是因为带着一本书。

我也同样如此陪伴着哥哥那本工作笔记，经历了习以为常的辗转——在火车站那几乎始终空空如也的，掩映在栗子树中的候车室里，在公墓里一座上面刻着一架正在俯冲的飞机的墓碑前，在那座湖泊出口旁的石桥上，我都一一地尝试过——，最终又在这旅店房间里，一只眼角里隐隐约约地映现出那只雄松鸡，另一只里明明亮亮地映现出摆满碗盘和酒杯的灶台，眼前是一棵棵松树梢，目光再投向远处，就是一座邻居的房子，屋顶的一行行脊瓦从左向右排列着，类似于笔记本里的一行行字。

虽然我迄今一再把这本书读来读去，却不能真正读懂它，因为在农业学校里，授课语言是斯洛文尼亚语。我之所以观赏它，是因为那些图样，首先是因为字迹。它一目了然，十分工整；字母又细又长，微微向右倾斜，一页一页地翻阅时，让人会觉得像是在淅淅沥沥地、没完没了地、一成不变地下雨的样子。它既没有曲线，也没有弧线；既没有缩略，也没有疏忽，因此，它无疑永远也不会成为印刷字体。没有一个字母在词语中与其他字母分离，不存在联系，同时又区别于过去一百年里那美丽如画的文献，因为它的流畅与之所属的图样笔画融为一体了。在观赏时，我觉得好像它不仅要把什么东西记录下来，而是要和它的对象一起继续坚定不移地奔向一个目标，而行列中的每个字母都是这个对象的图像承载者。在沃凯因，在这片新开垦的土地上，我后来在哥哥的字迹里看到了一种很适合于这个地区的字迹：一个拓荒者的字迹，一个正在崛起的拓荒者的字迹！在这个拓荒者身上，书写也成为崛起的一部分；它不是对一种行为纯粹的见证，而是继续着同样的行为。

他在一封信里说，一个精通书写的人就会断定，“我们大家的写写画画（这个家庭的）都是同源同根的”，而我在其中始终读出了执着和自豪的韵味。他从来就没有过一个所谓的孩童的字迹。即使在最早的作业本里，他书写得就像一个以此要介入某个事件的人，像一个有责任的人，像一个领头人，像一个发现者。

实际上，正如那个护路人和写画人所说的，这整个家族恰恰是由于其“出类拔萃的”手写体远近闻名了（这个柯巴尔家族不光是用手在书写着！他一边说，一边表情夸张地伸开自己的手臂）。这给我们带来了自信而高贵的家族声誉，因为这个地区说到底也没有一家配得上“名家”这个称号。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书写——既不“像画的”，也不“像印的”，而是以不可混淆的“柯巴尔”神态——，提出了我们的要求。母亲是个非常忙碌的写信人，正如前面提到过的，被视为公家的人。无论我问起哪个邻居有关哥哥的情况，除了那几个轶闻趣事外，通常都要说起格里高尔和他的果园，“经营得那样精细，那样宏伟，那样富有创造性，就跟他的字迹一样”（护路人）。甚至连姐姐也从疯疯癫癫的状态里清醒过来了。当她以“乌尔苏拉·柯巴尔”这个名字提前领到了自己的养老金时，显示出了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在这些以其字迹出类拔萃的人中，惟一的例外就是这个家里最老的和最小的，那就是父亲和我。一个手太沉重，而另一个手则变幻无常。谁都看得出，父亲从来就没有当过一个真正的小学生；无论阅读还是书写，他看上去确实又慢又费力。在母亲给我写到寄宿学校的那些信里，他最多不过是加上惟一同时也代表他问候的字“父亲”。退休以后，他好久都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便觉得，给他一个本子，让他把自己的人生记下来，这倒是一个主意，因为他口头叙述这人生时——几乎让人吃惊，他沉默良久之后，常常开始拖着那声音深沉的“那么……”——，一再陷入结结巴巴的境地，并且说上一句就中止了：“这无法让人说得出来，只有写下来才是！”。然而，几个月以后，当我在本子里查看时却发现，尽管他整个冬天有的是时间，可上面连一句话也没写，只有数字，哥哥的战地邮政编码、我的衣服号码、门牌号、大家的生日，像楔形文字一样。（惟独那些线条，他可以用自己那根木工铅笔画得不费吹灰之力，他本来就可以十分麻利地把图样画在要加工的木材上。）

我自己始终在变换着字迹，常常在词中间写着写着就变大了，迫使那些字母从其后面的模样里解脱出来，又回到前面去，迫不及待地——从字迹图像可以看得出来——追着快点结束，也顾不上每个开头是多么认真仔细。首先，我并没有把我的手写体感受为自己的。就是到了今天，虽说它变得规范了，可我依然觉得它是不自然的，是一种模仿。和哥哥不同，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字体，而我现在的字体也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当我心不在焉的时候，我就脱离开那继承来的匀称了，就不再是什么“写写画画”了，而退变成一种不成形的、连我自己都觉得无法辨认的潦草之笔，一个忙忙乱乱和不知所云的图像，替代了那个强劲有力的家族风格。我心想着，靠着打字机，我才学会了真正的书写。坐在打字机前面，那个让我适应的字体无非就是虚幻的字体，没有什么工具，食指独个儿就当铅笔用了。恰恰是我眼前并没有看到我在写什么，动一动指头就足够了，从而使我感觉到有了一个自己的手写体和其中相应的笔锋。在虚幻地书写时，我也可以慢慢悠悠，可以停顿，也可以停止。不然的话，我用手握着那个让它感到陌生的工具局促不安，就它发出的响声也叫我心烦意乱。我非但不能直着身子坐在那儿，反而要伏在书写纸上，急急忙忙地一行接着一行写来写去，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身上散发着一种如此发馊又毫无结果的汗臭味，也难以抬起头来，哪怕眼睛扫视一下最近的周围也好。当我全身心专注自己的事情时，我在书写纸上才感受得到一种自

然字体的要素。这样一来，仿佛字体图像就会与事物图像一同出现在我的心里。那么，我在哪儿能够在书写时专注一件事呢？比如说在昏暗中：这时，一笔一画，铅笔和手指打成一片，我获得了一只书写之手，某种美妙而沉重的东西，意味深长的东西。这不再是什么随笔写去，而是一种描绘。实际上，当我把那个如此产生的东西拿到光明处观看时，我的事情就以我的字迹形式展现在我面前。在这个字迹上，哥哥那美妙的创造者之手与父亲那断断续续的自学者之手似乎融为一体了。

哥哥的工作笔记首先叙述的是果树栽培。借助词典，我大概可以弄明白什么意思，它出自一个尚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然而却不是什么学习笔记，而首先是一位年轻学者独立的研究报告。到了第二部分，它就转为对事物的思考，一种论文，最后是常用规则和建议目录。总地来看，学习手册和教本在这里合二为一了。

工作笔记的主题是苹果树的栽培和优化，就像哥哥在故乡果园里自己动手试验的一样。他叙述了关于合适的土壤（“松软和肥沃”，“平整且稍微隆起”）、地形（“东西走向，但要防风”）以及最佳栽培时节（往往取决于昼夜平分时节，或者某些星象出现的时节，或者乡村的节日时节）。

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把哥哥嫁接树枝和移栽小树苗的经验同时当作教育故事阅读了。他把那些小树苗从苗圃里“连带着土壤一起”移植到自己的果园里，并且把它们像在那里一样安置在同样的方向上，同时将间隔增大了好多倍：一棵树的枝条永远不应该触及另一棵的。树栽到坑里之前，他先把各个根系编织成一个具有保护作用的蓝网状。那些就地从果核里长出来的树似乎表现为生命力是最顽强的，不过也是最不能结果的。树冠上面，最好是枝叶繁茂，这样一来，树冠下面就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实来。垂直地面的枝条要比端直朝上的结的果多。（然而，挂在高处的果实却不易腐烂。）要说嫁接吧，他只采用那些朝东生长的枝条。它们的形状像支铅笔，切面是斜的，好让雨水流去。切割不能直着切下去，而是顺势拉开（为了让皮面保持平滑）。为此，他一味选择已经结过一茬果实的幼枝，“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会不是为了收成，而是为了乘凉辛勤劳作了”。况且他也

绝对不会把幼枝嫁接到另外两条幼枝相连的岔口上，因为这样会和那两条幼枝争夺营养。他尤其就剪枝写道，枝剪得越早，你得到的“木材”就越多；枝剪得越晚，你得到的“果实”就越多；木材“向上冒”，而果实则“弯着身子”。

他在笔记本开头叙述道，在后来变成果园的那片地方，最初只孤零零地长着一棵果树，完全荒芜得不成样子了（他的用词是“长荒了”，这样说的意思是，那些树枝长得乱七八糟，挤成一团），也不结果：在这棵树皮表面枝条交错最少的地方，他用一根铁冲子，直扎进木质里，从那些形成溃疡的伤口里，很快就迸发出一种弯曲的本能，睁开一个接一个预兆果实的眼睛。更确切地说，这种铁冲子就是一个钻子——他的“发明”，因为在扎洞眼时，产生的不是堵塞洞眼的木末，而更多是轻轻就可以吹出来的碎片（旁边有一张“柯巴尔钻子”的图样）。

然而，在阅读时，我向来觉得那感官的东西，那些仅仅提说的，迄今让我看来一片纷乱的东西，比那些附带着教育意图的比喻式故事更深邃，也比那伴随着的弦外之音更深邃。哥哥用来把嫁接幼枝捆绑到树枝上的韧皮、相关的木夹板——不是圆形的，而是“四棱形的！”——，还有调节下面根部土壤温湿度和阻挡潜水的小石子，它们都获得了表象，我会特别关注这一切的。可是话说回来，果园里的空间如今越来越通亮起来了。这期间，由于再也没有人精管它了，整个果园荒芜不堪，就像当年最初那棵树的样子。从那手写体里，一道四周筑得清楚分明的篱笆在注视着我。面对“我的事业”（哥哥这样称呼自己的成果之地）的多样性和多种性的奇观，这位读者在其中把脑袋转来转去，仿佛他就站在中心，站在那个创造者的位置上似的。“我们不会为将来乘凉而辛苦劳作了！”此刻，在窗前的桌旁，这就是这位读者奋斗的呼唤，汇入山涧的咆哮里。与此同时，一只眼角里是雄松鸡的黑色，另一只眼角里是盥洗盆的白色，它们如同两个相互交错的钟摆摇荡在他的视野里。

那些词语之所以具有如此的力量，不也是因为它们不同于德语词汇，我不是马上弄懂了它们，而通常是先将它们转换过来了吗？当然，并不是从外语转换成自己的语言了，而是从一种想像——虽然我几乎就不懂斯洛文尼亚语，可它真的让我觉得又是那样地熟悉——直接转换成了图像：转换成了果园，一根树撑子，一段铁丝网？对哥哥

叙述的一些工作，比如剪去不结果的嫩枝，他采用的是“瞎忙活”这个字眼：通过这样的转换，盲读，不就成了洞察吗？茫然的举动不就成了有效的行为吗？我在想像着，甚至连父亲，似乎他这时只要一走进房间里，一站在门槛前，就会忘记了自己的愤怒，并且面对这双闪耀着机智果断光芒的转换者眼睛，顿时就会对儿子表示一致的赞同：“是的，这现在就是他的正事吧！”

在笔记的第二部分，哥哥离开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果园话题，详细地叙述着通常各种苹果的品种。然而在这里，他那一棵棵实实在在的果树依然浮现在我眼前。凡是他一味描述方法的地方，我就继续当成纯粹的叙事作品来阅读，它叙述的是一个地方及其主人公。然后，我也把这个主人公和那些针对每个果农的结束语联系在一起。在这样一件仿佛与智慧血脉相通的事上既不会有师傅，也不会有徒弟，而对栽培最重要的就是“主人亲临现场”。

哥哥的果园与众不同的是，它远在村子外面，三面有耕田和牧场环绕，一面与一小片混合林地毗邻，而其他人家的果园都紧挨在房子后面。从公路上看去，一行行果树望不到边。在它们尽头，你只能想像那休耕的平川，连同坐落在边缘的林肯山村成为苹果和梨子的乐园。另一个区别是：哥哥的果树像种植园的一样低矮，除了果园入口那些仿佛要掩蔽果园本色的、和村里普遍一样的李子和果酒梨树群外，每棵树都结出味道不同的果子。真的，甚至有这样的果树，从一层树枝到另一层树枝结出的果子品种都不一样。甚至也有这样的树顶，在它结出的果子梨里，就有一根树枝上的果实是秘密的，只有自家人才知道，很迷惑人，而旁边树枝上结的是同样的果实，可是只要你咬上一口，不是——就像顺口溜说的——屁股眼儿抽紧了，而更多是让你的眼睛瞪得老大。

整个果园朝着那片小林地延伸去。只要你一身临其间，那它看上去就越来越像一片同时会带来无限好处的试验园地。它开始呈现为尖嘴形，仅有一棵杨树突现出来，面临果园显得好奇特。一走进去，果园变成了一条越来越宽的地带，而到了林地后面则变成了许多行。虽然没有篱笆，像村子里那些看上去连成一片无疆无界的果园一样，可杨树后面那片地是一块隐蔽的地带。因此，你只要穿过那空旷的田野，便突然身临其间，也没有任何房子当标志，眼前尽是挂满优质苹果的树枝，尤其是因为哥哥把果树栽培在低地里。从平坦的地方出人

意料地下到果园里，而在它的尽头，也就是那片小林地边上，同样又延伸上去了。低地并不深，然而只有到了边上，才看得出是一片后来才形成的低地。对初来乍到的人来说，就是那些小果树的树冠，只有到了和你脚尖同样高度的地方，你才会发现它们。从远处看去，无论从村子里还是从公路上，惟有那棵奇特的杨树耸立在没有长树的田野上，有时候在下雷雨时充当了闪电的火炬。

这片低地是由远古时期一条溪流形成的——地理老师就是这样向我描述的。那是一股地下水，它没有停留在这片特殊的平地上，而是流过了它，直到德拉瓦河的特罗格峡谷。那是一条独一无二的、有规律的涌流，几乎就在“散步手杖一般深”的地表下面。在如今果园这块地方，那股水流喷涌出来了，变成了一条小溪，冲带着泥土流去，并且把泉眼这块地方舔成了碗状，像一个“终端火车站”，又从这里向下为自己冲出了一条狭长的沟道流入河里。后来这条小溪消失了——这个地区的沟道有个别名叫“暗溪”——，这片由泉水形成的碗状椭圆形土地干涸了，再也看不到水流了，沉降下去了，汇入那广阔的水平线上的地下暗流里了；或者作为“上天之水”，把从四壁上剥蚀的沃土变成了碗状的土地。哥哥在工作笔记中把雨水直呼为“上天之水”。（当然，在沟口开始的地方，这块碗状的土地有一个被灌木丛堵住的洞。）

在果树周围，长着果园草，比草地上的草稀疏，几乎就看不到什么花。那条穿过田间直通到低地边缘的沙石路，在杨树旁边岔开一条草路，然后到下坡时变窄了。小路上深深地压出了一道小推车的槽印，被制动的车轮磨得闪闪发光。在果树行之间，这道儿变成了一条地地道道的草路，一条“绿色通道”（在家里都这样称呼它），在这片微微隆起的碗状土地上，笔直地通到果园最后面一棵树前。它不光比自己周围的地要亮得多，简直就是太显眼了。

在这片低地里，果园可以说不受风的侵袭。惟独从南面刮来的温暖的下降风会掠过地面。一根根树干都长得笔直，树枝均匀地弯向四面八方，尤其是冬天的图景，格外清晰。此外，这片地方也免受了无论是来自村里还是公路上任何噪音的影响，除了教堂钟声和火车汽笛声之外，它让人几乎只能听到自己的动静，首先是嗡嗡声，更多不是来自飞蝇，而是果树花上面的蜜蜂，或者落果上的马蜂。这个地方也弥漫出自己特殊的味道，某种厚重的味道，果酒似的味道，更多是从

草丛里发酵的落果散发出来的，而不是从树上。这儿的苹果只有采摘下来后放到果窖里，才会开始真正释放出香味来——在此之前，你只有把它捧到鼻子跟前才闻得到。（可是过后多香啊！）到了春天，果花白茫茫一片，美妙无比；果树从一棵到另一棵，颜色变幻各异，其中那些发白的早熟苹果最快又消失了，成为过路人无可厚非的口福了。

童年的一部分，就是期待着各种各样的水果品种成熟。尤其下过暴雨后，我就会被吸引到野外的果园里，而且也总会在树下的草丛里拾到美味可口的苹果（或者在专为果子酒嫁接的树枝下相应的梨）。在我和姐姐之间，常常甚至出现争前恐后的事，而姐姐早就不再是小孩了：谁都预先知道，这次在哪棵树下会落什么东西，谁都想第一个赶到那儿——这样争来争去，争的倒不是谁占有和吃掉，而是谁找到了，拿在手里炫耀。秋天采摘果子，可是我为数不多的得心应手的体力活之一（或者瞎抓来抓去）。果树如此低矮，采摘时几乎就用不上乡村果园里那司空见惯的梯子。采摘首先凭借一根长杆进行，长杆顶上固定着一个带有锯齿形硬边的袋子。此时此刻，我甚至感觉得到两个手臂猛地一动，一个苹果便随之从枝条上脱落下来，顺着袋子滚到苹果堆里。

童年的一部分，也包括那一箱箱装得满满的苹果。这一箱呈现出柠檬黄，那一箱又是与众不同的紫红，仔细看上去，它们的血管从外面的皮层透过果肉，直穿进果核里。惟有果酒梨允许从树上摇下来。你抱着树狠狠地一摇，整个果园里都回响着巨大的啪啦声。然后靠在树干上的不是堆成一摞摞的箱子，而是一圈鼓鼓的袋子。

后来就是那未能如愿以偿的青春时期，寄宿学校的岁月。在这些年里，我也错过了收获果实的季节。再也看不到那一摞摞苹果箱了，最多不过是去学校时给行李包里塞上几个苹果，一年里还有那么几次，一包比一包更蔫了。

接着就是母亲得病了，父亲的关节僵硬了，我几乎把所有的体力活都荒疏了（真的，这个词恰如其分）。而那些体力活与在露台上阅读没有什么两样，共同构建起了童年之梦，不管是劈柴和盖屋顶，还是赶牲畜放牧和堆摞禾把（无论如何对我来说，这从来都不会成为一个苦差事或者劳累，即便是，也不会超过几个钟头）。

接下来的数十年里，果园没有人照看，彻底荒芜了。惟有姐姐还有那么一段时间，提着自己的小篮子，前往那里，从那些用手可以够得着的树枝上给自己采摘果子吃。到了后来，她也不再去了。留下的只有哥哥那果品之乡的梦想：在冰天雪地里，那些淡黄色的早熟苹果挂在果园的树顶上。而与此同时，这一家人则坐在一条长凳上晒太阳。然而，在我回到家乡后的那些年里，我又不时地去探究这果园。在它附近，始终还看不到一座房子。昔日那条通往果园的沙石路和低地下面那条绿色通道一样，变成了一条草路。树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菌类植物。

我最后一次到那儿时，雨水也把沟道洞口前剩下的几块水堤冲走了。水堤是哥哥当年用荆条、石头和土建造的。那是冬日的一天，这片地方被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青苔里。一棵棵果树完全被青苔缠绕了，直到树枝顶尖，彻底没有面目了，一部分树皮也被剥蚀去了。那些树好像被青苔简直压得喘不上气来。事实上，断裂的树枝卧在下面的草丛里，像鹿角一样。草不是草，而是青苔。有几根佯装的草茎也像嫩芽一样苍白和沉重，它们交织在黑莓的卷须里，从林子和沟渠里挣扎着露出脸来。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棵从果园里冒出来的白腊树，实实在在地抢夺了一棵苹果树的生存空间：它的种子无疑是在那棵苹果树的脚前扎下根了。朝气蓬勃的白腊树在成长中把老苹果树半边都围起来了，犹如用自己的树身包住了它似的，如今透过那生机勃勃的树身长缝，显露出一棵被剥去皮的死树。那些嫁接的枝条过去从光滑而闪烁的树皮上一眼就看得出来，如今却埋没在四处可见、纵横交织的鳞皮中，早就再也分辨不出来了。惟有一个地方还留下了一个四棱木条，表明了当年的迹象。木条压在这棵树上，同一根嫁接的树枝相依为命：在时光流逝中，发生了奇怪的倒转，因为那根树枝起初是二者之中比较细的，后来就变粗了，并且把那个当年用生了锈的铁丝缠绕起来的木条当作毫无用处的附属物托在自己背上。

除了那条绿色通道，在这片整个笼罩在灰暗之中的低地里，独一无二的颜色，就是在开裂成形形色色的树冠上，一个个槲寄生团显现出如此异样和刺目的绿色。树枝上挂着几个干瘪的果子，都是前几年结的。而落在苔藓里的果子，我一踩上去，如同灰球菌一样破裂了。

惟有一棵叶子已经落光了的树上挂满了今年的苹果，也没有人去采摘。然而，这黄色的苹果也一再被那灰色和黑色的椋鸟和乌鸦遮

蔽。它们分别抢占着一个个圆球啄个不停，吧嗒的响声弥漫果园。好在远处传来了火车的汽笛声、鸡叫声、犬吠声和摩托车的嗒嗒声。那沟道洞口早被野葡萄藤蔓遮得严严实实，我仿佛听到从深深的地下，传上来了河水流动的轰鸣声，透过沟槽显得格外强烈。

我心想着，逃离这个远离尘世的低地吧，可又决定留下来了。那个坐落在后面通往林地出口的木板棚屋已经不复存在了。它当年是用来避雨遮阳的。散落在那条绿色通道边上的残木断板同那些废弃的支撑杆一起形成了一个介于柴垛和晒草架之间的东西，对前者自然太稀疏了，而对后者又太不规则了。我站在这前面等待着，可等待的并不是什么确定的东西。

天开始下雪了，始终只是些零零星星的雪花，突然间从云层里飞出来，在空中飘来飘去，又消失了。我不禁回想起了父亲那个习惯，每当要作所谓的决定——无论是一项开支还是写遗嘱——前，就在那条绿色通道上踱来踱去，而我此刻在重复着这一切。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他的一个家庭格言："我就是一个可怜巴巴的果园看守人！"他常常面对挂着那位失踪者照片的暗室这样说。

到了路的尽头，我转过身子，抬起头来，看见在那一堆木板和支撑杆中竖立起了一个耸立云端的哀诉架，我想像中就跪在它前面。走近一看，这架子图像突然变成了一尊雕像，而且那一排排果树也接着以同样的方式展现在我眼前。我实实在在地心想着，这就是"那些显贵的祖先的纪念碑"。

我待得越久，不管是上上下下、转来转去、走走站站还是这边看看，那边望望，作为正处在自然衰亡之中的果园，这个地方越来越清楚地彻底变成了一个杰作，一个使人的手得以流传和赞美的形式，具有由别的手可以转化成别的形式的裨益，比如说以文字形式可以转化到被孤寂的山间小径分成梯级的低地侧面那儿——雪天里，逐渐突显出一行行越来越白的道儿。这样一来，在由苔藓和槲寄生团形成的包围圈背后，那一根根果树枝上，它们的"眼睛"重新活跃起来；火石的光芒闪过树根旁那腐烂的光亮；从果园中心的框架上吹来一阵阵南风，后来也一再会吹拂在那密闭的房间里。

这时，我在思考着两件事：面对这些像鸭舌帽似的附着在枯树干上的腐木菌，我想起了哥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到了名叫“格巴”的这样一个女孩。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天黄昏，他和那个姑娘一起去观赏复活节焰火（这对他来说是“最神圣和最高兴的事”，之后，“节日也就告结束了，甚至连那些香肠都不会让我如此高兴的”）——而面对那些支撑杆，那根顶端叉开的榛条棍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对动物常常残忍的父亲，当年就把一条割草时被他一刀两断的蛇叉在上面：它不仅在当时一整天里，而且在这些年间就缠绕在那个叉子上。叉子固定在打入地里的木桩上。比起所有那些阳光果实来，它更加持久地成为这个地方的标志。它如今已经悄然地消失了。在果园最荒凉的角落里，我对着自己的祖先，同样在寻找着一个孩童的那双眼睛，离开了亡灵的声声哀诉，摆脱了那个“分离的永久王国”（哥哥如是说），我直言不讳地进一步说：“真的，我将会给你们叙述的！”当然不是以胜利的声音，而更多是以失败的声音。

从哥哥在农业学校的三年里，同样留下了许多班级照片。在第一张照片上，小伙子们个个都敞开着衣领，挽起了袖子，并且穿着齐膝的深色围裙。他们站在一条宽阔而阳光灿烂的林荫道上，并且在那里安营扎寨。两边都是果树，鲜花盛开，连一片树叶都看不到。背景是一片枝蔓还很小的坡地葡萄园，一行行垂直的葡萄架通到坡顶上的小教堂前。繁花似锦的果树白茫茫一片，与春天的云彩相映生辉。阴影是短暂的，正值午间休息，哥哥甚至连梳一梳头的时间都没有了，一束头发挂在他的额头。一照完相，人人都立刻又开始干活了。这一班人紧紧地站在一起，有几个人把手臂搭在旁边人的肩上，不过哪儿也看不到有人对这种姿态作出回应。有一个，也就是那个最年轻的，将自己的身子撑在旁边两个人身上。由于阳光强烈，看不到一个同学的眼睛。哥哥站在最后，要比其他人略高一些，也许只是由于头发又密又厚，看上去才那样儿。惟独那张脸被前边的脑袋挡住了，看样子，仿佛他是到了最后一刻才站进去的。在后面的林荫道上，有一个衣着宽松的女人远离去。

在另一张照片上，很少认得出环境来，而更多是这个班的形象。地点是一排松树前的道上，不是树林，而同样是一个林荫道的部分，前面是一根电线杆，后面是一排瓦屋顶。他们个个都身着西服，有些

甚至打着领带，领结像一个嗉囊大小，有的表链从马甲扣上吊到下面的衣兜里。前面有一个盘腿端坐着，怀里抱着一个小酒桶，手里拿着一只倒成水平位置的酒瓶。这张照片有点秋天的景象，也是因为路边的花已经凋谢。可首先看到是，有个小伙子在别人塞手绢和插钢笔的位置上捧着一根鸟尾一般长的谷穗。哥哥坐在第一排，属于敞开着衣衫族。他的西装翻领奇大，没有塞手绢的兜，也没有纽孔。他双手交错搁在膝上，从一边朝着照片以外望去。他挺得直直地坐着，同时看上去又无拘无束：他不摆什么架势，总是这个样儿。和去年不一样了，他们都不再是青年了，而是生龙活虎的男人了。那嘴唇不是首先为摄影师闭着的。有一个已经将双手叉在腰间了。

最后一张上，他们站在学校大楼正前方，人数变少了，只看得到学校的院墙和窗户的断面。在他们前面，老师们坐在圆椅上，除了那个面色苍白的神父，他们更多都有点像富裕的农民、年长些的亲戚或者坚信礼教父。每个毕业生都系着领带，再也没有一个人把手臂搭在别人的肩上了。他们是成人了，哥哥也一样，二十岁了，他把两手交在背后。这样，作为年轻有学问的农民，他将会回到一个不是讲他的语言，而是讲另一种语言的国家里。他的目光投向了南方，而不是他家乡所在的北方。1938级所有那些斯洛文尼亚农民都在望着前方，连下巴也不用抬一下，仿佛他们虽然代表的不是一个国家，不过作为替代，是别的什么东西。经过了这么些年，我哥哥的脑袋变得沉重了，那只健康眼睛变小了，眼角犹如刻上去的。惟独那只瞎眼鼓得又圆又白，仿佛它向来都看见的更多。

我们这个家很奇怪，听到的几乎只是父亲的童年故事。说来说去（尽管没有人亲身经历过，一切无非都是道听途说来的），要么是那个如今已经变得老态龙钟的孩子当年夜游时如何出洋相——一天夜里，当其他人还坐在桌旁聊天时，他从床上爬起来，夹着被子走到桌前，把它放在那里，然后又回到床上，开始大声嚷嚷着好冷啊；要么他常常接连几天没有记性，四处跑来跑去，最后终于找回家了，然而却不敢进屋，而是黎明时在屋外打扫起院落，这既是周日之前的习惯，又成了他回来的信号；或者他还幼小时动不动就发起怒来。有一次，他被一个人激怒了，从房间里跑出来，抱起他几乎都拖不过门槛的半根树干，直冲那个人而去。当然，接着他把树干砸向人家两脚的

架势，就更加让人可怕了！更奇怪的是，父亲喜欢让人给自己叙述关于自己童年时期的这样一些传说（往往是他的女儿扮演叙述者）：这时，他不是露出会心的一笑，就是眼泪汪汪的，或者又紧握起拳头来，仿佛当年的愤怒还一如既往地持续着。最后，他就像那个赢家一样，目光扫过这一圈人。

与之相反，关于哥哥的童年，我的脑海里仅仅留下了一个轶事的记忆：据说有一次，他和姐姐肩并肩跑过林肯山村长长的街道，从头到尾，没完没了地给她讲着屁话，一刻也不停息。再说吧，也就只有那桩伤心的事：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到了十七岁，他才作为行动者出场了，动身进了边境彼岸的农业学校。然后在第一个假期里，他就像个发现者一样，迎向这个家了。他不单单发现了种植庄稼和牧草的新方法，而且首先发现了一件事：斯洛文尼亚语。这种语言被德语潜移默化了，到那时为止，不过是他的方言而已——这整个地区的方言。然而，它现在成了他不仅仅在自己的工作笔记里，而且也在书信和便条上习作的书面语言。为此，除了小折刀和扎绳，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本夹着纸条和铅笔的小词典，即便是后来从一个战场到另一个，这本词典也依旧与他形影不离。而且其他家庭成员要与他同心同德，不管在城里，还是面对当局，或者在火车上终归都要遵守自己的出身。父亲当然不愿意，母亲也不可能，姐姐当时一声不吭，因为失恋痛苦而心不在焉，而我自己还没有出世呢。尽管恰恰是亲生母亲对斯洛文尼亚语几乎一窍不通，然而，就在最初从马堡写来的那些信里，这种语言对他来说则意味着“母语”，而且他给这个词前也加上了“我们的”（“我们的母语”），并补充说道：“我们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谁也不能规定我们是德意志人。”几乎已经成人的他离家出走了，况且是自觉自愿，和我不一样。他在外国找到的根本不是异国他乡，而是“我们自己的土地”（信），他的语言。经过了十七年的沉默和屁话以后，他作为具有自觉意识的发言人登场了。真的，就像他在一些零散的便条上写的，作为一个随随便便的文字游戏者（有一张相片与之太相配了：他站在村子中间，礼帽歪戴在脑袋上，一条腿支撑着身子，另一条伸得好远）。就这样，他也是这个家第一个不思乡念家的人，无论如何，在南方上学期间如此，紧挨着“大城市马堡”的学校成了他的另一个家。而且也正是他，从一次游历斯洛文尼亚的旅行中带着那个后来被处死的造反农民格里高尔·柯巴尔的故事回来了：“柯巴尔”，一个刻写在柯巴里德公墓里最常见的名字，立刻就被他在当地教父院落中那些古老的洗礼书里查找到了，追根溯源，直

到17世纪末，上面记载着那个人的身世。他后来确定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先。

当然，哥哥从来也没有变成叛逆者，而总是濒临叛逆的边缘，即便后来在战争年代里也是如此。他更多被视为我们当中的温顺者，甚至是一个笃信的人。从他那些信里所流露出来的某些东西，我只是在几个孩子身上亲身感受过。对他来说，如此经常使用的“神圣”这个词并不意味着教会、上天或者别的什么虚无缥缈的地方，而始终是那平平常常的东西，通常总是与闻鸡而起、下地劳作、一日三餐以及林林总总周而复始的日常事务息息相关。“说起家来，那里的一切被料理得如此生气勃勃，如此神圣”，从俄国写来的一封信里这样说。家就和那次观看复活节焰火以后的散步一模一样，是“最神圣和最快乐的东西”——而圣灵降临节对他来说就是那样一个节日，“人们一大早拿着大镰刀，出门去果园里，在神圣的时刻割草，简直太美妙了”。一条白巾，战地祈祷时铺在一张桌子上，就是“献给那可怜心灵的礼物”；哈利路亚[10]，他在家里大声唱过，和别的人一起合唱过，又在前线“喃喃自唱”，“静静地让自己听”。他还在最后一封信里写道：“我认识和经历了这个世界的肮脏，没有什么比我们的信仰更美好了。”（照他看来，信仰当然只有在母语里才变得富有生气。这是因为，在第一共和国结束后，在教堂里也只允许用德语来祷告和歌唱，而在他听起来，这再也“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了，而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让我无法理解的呻吟”。）他的虔诚也与那真挚的讽刺相辅相成，借着这讽刺，他从远方呼唤着家园和田产：他称那几公顷地为“不动产”，或者：“柯巴尔不动产”；家里的房子称为“贵室”，连厨房，牲口棚和谷仓都算在其中；要“研读”他的信，大家只能够“围坐在桌旁”，作为那个“阁下之家”。

战争期间，这样的讽刺也阻挡住了他采取暴力反抗的行为。他只是在信中的言词里表达出了愤怒。当他得知邻居一家迁居到说德语的外国时，“惟一的愿望就是要把那个家伙……撕得粉碎，恨不得自己非动手不可。然而，对父母和姐姐的思念克制住了这样的愤怒”。这样一来，如果说母亲要自己的儿子在度过了所谓的“农忙假”以后参加游击队，成了一名战士，这便更多是一个传说了。在我的想像里，反正他就是这样失踪了，谁也不会知道去哪儿了。不可思议的是，说

他曾经扯开嗓子一起吼着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游击队歌——更不可思议的是，说他和别的几个人一起，突进一片隐蔽的空旷地里，来到一片掩蔽的田地前，十分轻蔑地向那帮战争先生发出了这样的喊话："我现在告诉你们那句话，那就是在家里玩保龄球时，当球击中的不是瓶柱，而是瓶洞时，它常常会吊在人们嘴上！"——在他从前线的一封来信里，用"该死"这个说法取而代之了。他的确是一个歌手，但不是一个执迷不悟彻头彻尾的歌手，而是一个歪着沉重的脑袋、和两三个志同道合的人围坐在桌前的歌手。他也是一个舞伴，但不是一个跺脚的舞伴，而更多是一条腿搭在舞池边上愉快活泼的人。

他失踪以后，村子里的人都以为他死了。像村子里所有死去的人（除了这个或者那个神父）一样，他很快就被人遗忘了。有几个或许能够念起他的同龄人差不多都没有从战场返回家乡来。那个曾被视为他未婚妻的姑娘嫁给了另外一个人，无声无息了。他也过早地离开了家，有谁还想得起一个五月树的攀登者或者教堂里的一个独唱者呢。回来后不久，那个穿着围裙的年轻农民就变成了那个"名叫格里高尔·柯巴尔的士兵"。按照他文字游戏的说法，"不是原野上一个天蓝色的使者，而是一个军灰色的影子"。

然而在家里，人人都尊重他。在我童年时，大家都如此不厌其烦地说起他，现在让我觉得他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我甚至仿佛听到了每次谈话都附加了一个声音；仿佛那一个个脑袋都一再转向那空荡荡的暗室里，望着那个不在场的人的身影。母亲总是首先把话题引到他身上，而父亲则是他事业的守护人，不仅守护着那片果园，而且也守护着那些衣物和几本书。难道那仅仅是我后来的幻觉吗？父母亲在病房里额头贴着额头的情形与其说是夫妻恩爱，倒不如说是相聚一起为那个最心爱的儿子而哀叹，两个额头要为始终还期盼着他的归来架起一座桥梁。毫无疑问，丈夫和妻子以各自的方式，都在兴奋地爱着那个失踪的儿子，正像这个不信上帝的母亲说的，他是"为人之子的榜样"。妻子一听到他临近的消息，立刻就会给他准备好"居室"，洗一洗门槛，给大门装扮上花环，而丈夫则会套上从邻居借来的白马，坐上那擦得铮铮发亮的四轮单驾轻便马车，鼻子上挂着幸福的泪水迎着他赶向空旷的天边去。

惟独姐姐一再反对这样的神话（像父母亲认为的：因为她把自己爱情失败的责任怪罪于他了）。她反驳说，他肯定把自己那一只独眼投向一个个女人了，只是由于破相而没有在她们那里找到幸福罢了；他没完没了地咒骂干农活，尤其在炎热时，在陡一些的坡地上则更为甚之（讨厌的差事！）；他作为讲斯洛文尼亚语的政治家从农业学校回到家乡，在家里和村子里挑起了事端；他尤其是犯了亵渎圣灵罪，因为他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对一切灰心丧气了，比如说那个姑娘简直不得不求着结婚却被他拒绝了，理由是他反正会早死的。

说实在的，从哥哥的信中和便条里，也流露了一种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多地表现出的绝望。首先是那些机械，它们“看样子反正要不了多久就会替代了我们，因此我根本就不用再回家了”。然后他在战争刚开始时认为，当“一个永久的士兵”。他的书面诅咒越来越频繁了。恰恰“在这美好的季节里”，行军数日，他听不到“一声鸟叫”，看不到“路旁有鲜花”，并且害怕变得不会说话了：“一年后，我就再也不会说话了。我们现在已经如此怕见人，犹如山上的动物一样，一看到有人来，立刻就溜不见了。我们的情感需要和谐，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让我们开心的。”天天都一个样，感受不到周末或者节日的气氛。他没有能力回首往日了，“恨不得把一切都给颠倒过来”。到了最后，他不仅诅咒这场战争，而且也诅咒这个世界：“这个该死的世界！”

当然，就我本人而言，不管是作为听众还是读者，我也从来没有可能怀疑过一个绝望的哥哥。难道始终不就是表象（“菲利普·柯巴尔就醉心于表象”）比每个依然那样确定无疑的事实更强烈地控制了我吗？那么这个表象到底是什么呢？姐姐那突然的沉默，那变得越来越从容的神态，那深思熟虑的样子，这一切不也属于表象吗？即使她对这个失踪的人持反对态度也罢。只要一说起她哥哥，她那做鬼脸的习惯立刻就停止了，平时总是剧烈地眨个没完没了的眼睛也眨得少多了。看样子，仿佛她这会儿苏醒过来了。她说话时的神气也一模一样，刚刚还笨口拙舌，又杂乱无章，像一个沉睡者在说梦话，可现在又是吸气，又是把脑袋从容地耷到一边，倾听着她说出的每一句话。

这样的表象尤其来自格里高尔所书写的东西。这东西给了我一个现时的图像，同时也伴随着抱怨，哪怕有些地方描述的是不可挽回地逝去的东西，比如他不直截了当地说：“当我的情况还挺好的时

候……”，而是采用了一种表达方式，直译叫做“当鸟儿为我歌唱的时候……”；他把家乡的春天换句话说成“当蜜蜂穿着（花粉）裤子的时候”；在他那里，“丑陋的母亲，可口的饭菜”替代了我们“不幸中的万幸”；他在词典里为自己的大名找到了附带的意义，那就是让他一看见就作呕的“奶皮”。说到底，首先是他那些对于颜色的表达，本身就生动而形象地描述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生灵或者事物的范围：“那个带花斑的东西怎么样？”可以是问一只蜜蜂、一头奶牛、一只山羊、一只鸡、一种豌豆等。

然而，在阅读时，我觉得那些时态独特的句子要比这样的图像影响更加深远——指向也超越了我的现实——，那就是所谓的“第二将来式”。显而易见，哥哥经常运用它，因为斯洛文尼亚语中没有这种时态，所以，他不得不分别把它转换成德语：“我们将走在这绿色之道上。界石将站立在那边缘上。一旦种上了荞麦，届时我将又是干活，又是歌唱，又是跳舞，又是睡在女人身边了。”

我此刻意识到，也是双重的缺失形成了这样的表象：我哥哥那些手稿是不完全的，我对他也没有亲身的回忆。由于他遗留下来的东西那样残缺不全，所以，我觉得阅读起来就像在阅读那些分别由古希腊寻找真理的人（无论如何我想像着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又是哀求，又是结结巴巴，最终发出他们幸福的叫喊）零零散散传承下来的残章断篇：比如“女舞伴，女葡萄农”这两个独立的、脱离了关联的词围绕着自身显示出一个晕圈，并且照亮了这个世界；它们的光芒也在于没有进入一个完整的句子里，或者一个“详细的论述”中。特别是由于一想到这个失踪的人时，没有对一个活着的人的想像，没有气味，没有声音大小，没有步伐声，一句话，没有什么特性参与其间。所以，在我的心里，哥哥会成为那个传说中的英雄，那个坚如磐石的虚幻形象。想必他曾经在休假时看到了我，因为他不在场却被指派为我的洗礼教父。可我当时还是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再也记不得什么真切的事儿了。“我届时将弯下身子看看这个受洗者”，从前线来的信中这样说。

在这句比我的回忆都如此更加唾手可及的话语里，我感觉到哥哥始终在弯下身子看着我。这时，他常常是母亲的对立形象：如果说母亲预见我的未来时恨不得蒙上头去的话，那么哥哥那只健康眼睛则亲切而殷勤地打量着我，并且高兴和我一起沐浴在阳光下，而那只瞎眼

也不再有什么感知了：反正是看不见了。一个压得让人透不过气，笼罩着我，另一个是虚幻和表象，二者势不两立——就是到了今天，这依然是斗争。也正因为如此，我把一个与我同父同母的人称为我的“祖先”。是的，我把格里高尔·柯巴尔，那个叛乱者最温和的后人，一个甚至连姐姐都承认“从来都没有带过响鞭走来”的人确立为我的祖先，尽管我自己，无论如何在想像中，却始终在身上带着一根鞭子，以对付这个或者那个敌手。说实在的，恰恰在有些充满冒险的生存时刻，一种宁静便弥漫在我的周围。在这宁静中，我不仅看到这个选择的祖先在亲切地弯下身子看我，而且就代表着他本人。当然，我不可能把他呼唤过来，以便在危险之中找到宁静——恰恰相反，我找到了宁静，而他作为我的坚强后盾到场了。也就是说，要想求助于那些祖先是不可能的（我心里明白，那个惟一起作用的祖先就是语句，它走在我正好要面对的一切前面了）。

然而，这或许也是表象：伴随我心中的一个祖先，我不再只是单枪匹马了，坐得更笔挺了，举止不一样了。在危险中该做的就做，不该做的就别做；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要对付这种表象，什么是事实呢？“要是我能够成功地把敏锐的思想投向远方的话，”哥哥在他最后一封信里这样写道，“便会出现柯巴尔家族的图像，他们一起坐在桌前，阅 读着我这些写写画画的东西。”表象，他活着，而且就是我的素材！

在我的记忆中，沃凯因当时经常下雨，不光是旅馆窗前持续不断的山涧咆哮会使我想起下雨。在一条林间道上，我的两脚就陷入淤泥里，果树上的塑料袋本来是挂在那儿吓唬鸟的，却都被雨水淋得鼓鼓的。我坐在一个凉草棚下，身旁还有度假的一家人，关注着乡间公路上一个农妇，牵着一匹马的缰绳，马儿拉着一辆小车：倾盆大雨那样猛烈地从柏油路面上弹起来，只见农妇就像没了两腿，马儿就像没了蹄子，小车就像没了轮子在移动着。大白天里，闪电照亮了房子的墙壁。然后，太阳又出来了，过了好久，已经平静的湖岸边，从灌木丛里落下来的水珠依然还在闪烁。

尽管如此，我每天下午都要出门去那个地方，始终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去一片平展的高地上，就像家乡雅恩费尔德那一大片松林。这

地方叫“多布拉瓦”（意思是“橡树林区”），可是几乎光秃秃的，只能看到零零星星的松树和橡树，没有人烟，几乎荒芜了，看样子——离山谷高地近在咫尺，令人感到奇怪——像一片被遗弃的高山牧场。

在这片高地上，我完全醉心于自我之中，然而并没有脱离这个世界，因为在每个地方都会感受到文明就在眼前，甚至要比笼罩在山涧咆哮的旅馆里更加强烈：林子里的拖拉机、割草机、木材烘干机的鼓风；到处烟雾升腾，汽车玻璃的反光闪耀到山上来；下边湖面上，一条孤零零的船满载着人；连天上的鸟儿和身旁的蜜蜂也像电线杆一样给我指向了冰川堆石脚下一群看不清的人。犹如动都没有动一样，我不知不觉地顺着一条条道儿上走上来了，先是一条不再通车的老公路，已经连沥青路面的裂缝里都长满草了，然后沿着一条当年的、而今已经被那又矮又软的高原牧草覆盖的小河床走上来了。到了这儿，我也得首先找到自己的位子。像口头语常说的：高处的位子嫌太高，低处的又嫌太低，阳光下嫌太热，阴凉处又嫌太凉，避风的地方又嫌太平静，有风的地方又嫌太迎风向，岩石嫌太古怪，倒塌的小蜂房又嫌太美妙。最后，我坐到草丛里，背靠一个田间谷仓的厚板条。那是朝南的一面墙，不只是当太阳照耀的时候，我感觉到那被日晒雨淋成灰色的木头里正好散发出“真正的温暖”来。同样这整个地方也正好是适当的地方。棚屋的挑檐向外挑得够深，我可以伸开两条腿也不会淋着雨。那些也许会飞溅过来的水珠不禁使我想起了父母家里那个露台。在那里，像此刻在这里一样，我的座位就在里外分界上——不同的是，坐在那儿的木箱上，因为露台的尽头就是厕所，有一个竖坑向下通到粪堆前，所以，充斥着另一种气味，而且苍蝇要比这片平展的高地上多。

我随身又带着一本书，哥哥的大词典，它是这个被清空的海员背包里惟一的东西。这背包是不怕雨淋的。那本关于果园的工作笔记很适合于在房间里，在四堵墙之间阅读，而一个个单词则会在露天里充分展现出来，并且在这里派生出所有箭头似的意义符号来。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身在他乡异国，天天下午就躺在一个偏僻的野外小棚前，沉浸在一本词典里，一页纸里，甚至一个词里，然后从中抬头望去，摇摇脑袋，笑出声来，又是用脚跟叩击着地，又是鼓掌（蝗虫闻之嗡嗡飞开，蝴蝶闻之颤抖着离去），期间也跃起两脚，在雨底下跑上一圈，这样的表演可谓滑稽透顶。旅店里和地方上的人，他们看到

我背着包，每天行走在这条道上，还当我是一个“未来的学者”或者一个“年轻的画家”（19世纪，沃凯因连同那个湖和那座孤零零的教堂曾经是一个常常谈论的风景话题）：然而，这个小伙子如今拿着那本书，待在自己的位子上，蜷蹲着，突然间扯开嗓子唱起一个词，这无非就是一个脑袋有问题的人，一个白痴吧。

与此同时，我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几乎从来都没有过的洞察力——洞察的目光与敏锐的听觉融为一体——，就像当时阅 读那些毫无关联的单词表时一样。难道这就是一种阅 读吗？难道这不再是一种发现，一种与之相应的惬意吗？我呼喊着那些陌生的词语，让它们融入这片天地里！可是这其中会发现什么呢？

童年时期，我恰恰对外语很着迷。家里有一个咖啡盒，上面贴着一个个披着黑鬈发的女舞伴，数年以后，它导致了我学习那个美人的语言，也就是西班牙语的尝试。从那本匈牙利语语法书里，我至少把前几课都抄下来了。那是从寄宿学校里带来的一个小礼物，就在接触那神秘的文字图像之前，它的气味已经吸引住我了。与之相反，每天在村子里听到的斯洛文尼亚语却更多是让我厌恶。这并非来自斯洛文尼亚语的音调，而是那许许多多的德语词汇，它们一再破坏了那个音调。因此，我听到村民的方言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种惹人嘲笑的大杂烩。在牌桌上，父亲常常学着他们说话的样子，把一个个牌友都给吓住了——又是喃喃低语，又是发出汩汩的喉音，又是猛地冒出后腭音，就像出自天生的一族——，之后，他就只说出一个纯正的、富有韵味的斯洛文尼亚语句子（因此他又一次表现为这一圈人的主宰）。可话说回来，无论在哪儿听到有人“按照文字”来讲这种语言时，回响在我耳际的通常就是一种威胁；首先是讲这种语言的那些地方更多地让人想起官方公告，而不是信息传递。广播里插播每日外语新闻简要，像恐怖新闻一样；学校里那些意思空洞的句子纯粹是用来灌输语法的；教堂里布道的神父常常不由自主地换着讲起德语来，它好像远比前者更适合于这样的场合——他泰然自若地接着讲下去。可他开始却不得不用斯拉夫语吼叫着，一句接一句，拖着兴师问罪的讲话腔调。

只有在连祷时，我才洗耳恭听，比在唱颂歌时还要专注。在救世主和那些圣人的所有呼唤中，我完完全全融入其中了，因为救世主会可怜我们的，圣人们会为我们说情的。在昏暗的教堂大堂里，挤满了那些变得无法辨认的村民的影子，他们口口声声念叨着求助于前面的祭坛。从另一种语言的音节里，从领读祈祷文的神父那变换的音节和教徒们千篇一律的音节里弥漫出一种炽热，仿佛我们全体都躺在地上，恳求着大门关闭的上天，一声接一声地呼喊着。这些外语音节永远都不会使我觉得够长；它们应该始终继续下去；连祷做完了，我随之感受到的不是结束，而是中断。

可是后来，恰恰在教会寄宿学校里，我遗忘了这种感受。在那里，有几个讲斯洛文尼亚语的人激起了其他人的不满和怀疑。他们讲这种语言，和学校、广播和教堂这些机构不一样，总是轻声低语。他们聚集在大教堂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几乎是在窃窃私语，因此，对于那些不理解的耳朵来说，传过来的无非是嘶嘶声。他们也会背向大家，仿佛故意躲开似的站在讲台的四方形场地里。这样一来，他们就有点像一个阴谋策划者小集团，而那些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干扰叫喊更是支持了他们的阴谋计划。而我呢？我妒忌他们相互交头接耳吗？我妒忌他们显而易见的共同目的吗？说来更深一层，是一种厌恶：讨厌看到在这个我——孤独，被挤出来了，又再挤回去，惟独被课桌那蓝色的洞穴和睡眠温暖着——不得不把自己也算做其中的大多数人群里，有这样一伙自高自大的人物从我们之中分离出去。这帮斯洛文尼亚小伙子应该立刻保持沉默，应该从他们那见不得人的阴谋角落里爬出来。他们个个都和我一样，就请乖乖地蹲到那些指定的座位上去吧，身旁有一个偶然的、身上散发着臭味的、喘息着的、抓耳挠腮的陌生躯体，然后同样一声不吭，别一个个像同谋者似的亲密无间，窃窃私语，一门心思地听着寄宿学校喷水池里那哗哗的水声就是了，该放风时就放风去，像这个菲利普·柯巴尔一样。比起那张口结舌、意见不一、没有方向、耷拉着脑袋和紧握着拳头无所事事四处乱跑的多数来，你们这个抱成一团的少数更加让我恶心！

好久以后，我才从其中一个讲另外那种语言的人那里得知，他们根本就没有搞什么小集团，结盟来对付我们其他人。他们相互围着站在角落里，更多是他们惟一的可能，那就是一整天不得不用外语舌头

说话以后，终于能够从对方的嘴里听到母语的声音。这种语言不仅被那些讲德语的同学，而且也被那些监护人嗤之以鼻。他们之所以如此轻声低语地相互交谈，是因为不愿意刺激任何人。而且他们之间说来说去，无非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要么是天气，要么是学校的事，要不就是从家里寄来的香肠和熏肉面包。当然聊聊这些事，就可以深深地舒口气了：一个把熟悉的声音直截了当地传递给另一个，“就像在举行圣餐仪式时一样”。在一天的几个瞬间里，他们能够聚在一起，讲一讲他们那遭到禁止的方言，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太开心了”，即便他们有意识地把话题都局限在平平常常的事情上。“不管我会说njiva，而不说Acker，或者jabolko，而不说Apfel”，[11]那位提供信息的人大声说，“这难道有什么区别吗？！”

然而，对这个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只有在昏暗的教堂里举行的连祷和失踪的哥哥，也就是他心目中的英雄的身影，阻挡着他没有把在这个王国里的第二语言——对不少人来说是第一语言——理解为针对他个人的敌意行为。然而这种情况对讲德语的大多数人来说，却一如既往，就是到了这个世纪末也没有两样，而且常常甚至也没有什么恶意。

后来，那本老词典才把我从自己的狭隘中解救出来了。它出自上世纪末，也就是1895年，父亲出生的那一年，是一部力求完美的词典，收集了来自各个斯洛文尼亚语地区的表达和常用语。此时此刻，一抹接一抹的阳光正好又漫游过写字台对面那夜色降临的风景图像。凭借着阳光，我随之感觉到那些最微小的事物和形象连同它们的空间间隙都显现出来了——那个坐在河边的姑娘，一只手弯曲着，地平线上那棵弯曲的树，三岔路口那个小伙子脑袋扭向姑娘。同样，当时在野外谷仓的屋檐下，借助文字图像，我认识到了那一个个独特的细节。如果要我想像出自己的童年来，那么我迄今几乎始终缺少的就是这样独特的词语。事情是这样开始的，词语一个接着一个——哥哥把某些词语画线标出来了，因此我可以跳过许多——，在我眼前聚合成一个民族，家乡的村民清清楚楚地出现在其中。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就像四处流传的故事和轶事中所说的一样，并没有萎缩成类型、角色和角色承载者。我从那些人和事物身上，看到的只是他们喜形于色的轮廓。那些词语描述的是一个乡村农牧民族，其中连一个个比喻都

出自农牧范围："他像奶牛摆尾一样鼓弄自己的舌头"；"你迟钝得就像无风的大雾"；"你们家里冷得就像在失火现场一样"。此外，城市也吓不住人，而是等着被人去占领：人们可以赶着马车"丁零当啷地闯进去"，或者乘着雪橇"滑进去"。骂起人来五花八门，死亡换句话说叫做："他骂人骂到头了。"如果说这个民族对弥留之际拥有不计其数的说法的话，那么要说起女人的生殖器来就多得数不胜数了。从一个山谷到另一个，苹果和梨子的名字也是千变万化，同样数不胜数（有按农具命名的，有叫"割草女人"和"收割者"的，或者干脆就像七女神一样，称作"天女散花"的），像天空中似锦的繁星一样。这个民族从来就没有建立过自己的政府，因此，一切政府的东西，一切官方的东西，也包括一切抽象的东西都不得不引用统治者的语言，即德语和拉丁语逐字逐句的译文，这看上去同样不自然和古怪，似乎就像这位读者在这里找到的不是像Substanz（事物的实质）这样一个词，而是一个Unterstand（风雨棚）。然而作为补偿，它干脆就赋予那唾手可得的东西——一个个事物，而且不只是有用的事物——以爱称。在这件事上，一切家中的东西都好像以女性命名，而一切家外的东西都好像以男性命名：比如一个在热灰里烘烤的面包翻译过来叫做"Unterascher"（灰鬼），与之相应，一种梨子则叫做"Fräulein"（小姐）。一个特有的标志是，那些表示广大区域的词语仅仅加上一个音节就够了，而不需要第二个词，这样就可以生成缩小词形式。这种形式是这个区域里的事物称呼，而这个区域又为它的事物形成了这样一种栖息场所：比方说，在"Wald"（森林）一词里就隐含着"Wälderin"（森林之花），这不仅意味着居住在森林之中的女性，而且也意味着森林草，一种确切的森林花，一棵野生樱桃树，一棵野生苹果树，一个传说形象和仿佛是森林心脏的"冷杉山雀"：通过一个与习以为常的名称截然不同的名称，这位词典读者才晓得了那些事物的意义所在。

这时，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如此充满深情却又如此粗俗无礼的民族，在许许多多行为中嘲笑思想上的敏捷和行动上的迟钝。勤劳（"干活时我们远在前面"，哥哥一封信里这样说）；成人的语言中交织着儿童的表达；绝望时寡言少语，几乎一声不吭，高兴和渴望时，说个没完，简直就是欢欣鼓舞；没有贵族，没有一致的步伐，没有地产（地只是佃租来的）；惟一的国王就是那个传奇英雄，被美化了，四处漫游着，短暂地显现出来，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尽管如此，思来想去，这个民族压根儿也不是那个特有的斯洛文尼亚民族，

或者那个我凭着词语感知的世纪转折时期的民族，而更多是一个不确定的、永恒的、超然于历史之外的民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存在于永恒不变的、惟独受到四季调节的当下的民族，存在于一个听凭于天气、收获和牲畜疾病规律的此岸之中的民族，而且同时存在于任何历史的彼岸，或者之前，或者之后，或者一旁——此时此刻，我意识到了，连哥哥那些画叉的标记也帮助形成了这样一个永恒的图像。你怎么会不愿意把自己算作那个不为人知的民族的一员呢？就战争、贵权和凯旋的队伍而言，可以说她只有借用来的词语，然而却为那些最不显眼的东西创造出一个个名称来，不管是为屋子里窗台下的空间，还是为野外田间道上的石头被刹车的轮子磨得闪闪发光的地方。她最有创造性的就是为那些只有孩子们才会梦寐以求的避难所、隐蔽所和活下去的场所取名：低矮丛林里的掩体、洞穴后面的洞穴、森林深处肥沃的空旷地——而她同样从来也没有必要去反对其他民族把自己当作那样一个上等民族而隔离开来（因为她真的居住和耕作在自己的土地上，在每个词语里都显而易见）。

如果说哥哥的工作笔记直截了当地通过另一种语言立刻就转化为他的事业，也就是那个果园的话，那么他这本词典则超越了果园，转化为全部的童年情景。童年？是我那特殊的童年吗？是我凭借着那些名称发现我个人经历的地方和事物吗？毫无疑问：情节就发生在父亲的庄园里。火炉后面的空间、地下室里果子酒桶的支架、炉灶里的灰洞、牛棚里用石头围起来的水槽、突现在花园里的葡萄叶、耕地时的最后一道犁沟，从这一个个表达的词语中，我在我们家里分别都看到了那个相应的事物。真的，那一个词才把光明投向了“我们的”大镰刀那壮实的末端，“我们”那与果核分不开的桃子，“我们的”李子那蓝蓝的色彩；自个儿把我们的底土——腐殖质层下的鹅卵石层，萝卜 坑——抬升到一个虚幻和光明的空间里。

然而，不是也有许许多多的词语，我从中看出了我一辈子从来也没有碰到过的，而同样只可能属于家乡，属于我们的图像吗？我们的马从来就没有过那样的“鳗鲡条纹”。可是现在，就凭借着这样一个为之确立的表述，我在家乡的围牧场里看到了那匹马具有一模一样的条纹。之前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蜂王的声音，而它现在通过那个拟声动词从父亲那个被遗弃的蜂房里回响在这位读者心灵的深处，伴随着

家乡一大群蜜蜂的嘈杂声，“像从沸腾的泥浆里发出来一样”。是的，那个“用桦木声管吹奏出乱哄哄的声音的人”就是我，这个拿一个个词语来表述这一切的读者。而同样也是这个读者，他沉浸在那根“上面长着一排排草莓的草茎上”，立刻又把它拿在手上，从七峰山后面，走出那片共有的森林里。

在这里，我想起了那位老师，那位童话诗人。在旅行过程中，他正是作为不在场的人成了对我的一种支持。他写的那些童话从来都没有一个故事，而是对事物的描述，并且分别涉及的也只是一个独立的东西，自成一体。当然这个东西作为情节背景或者发生地在民间童话中肯定是不陌生的。可在他那里，出现的无非是森林里的茅舍，没有女巫，没有迷途的孩子，也没有火光（至多不过是从烟囱里喷出烟雾来，在冷冰冰的空气中立刻又消散了）；在七峰山后面，不过是一条小溪，清澈见底，让人看上去分不清是河床还是路，可在那深暗而微长的路石上，只见鱼鳍动来动去，终于也可以听到水声了，流水在冲过一块突出的圆形岩石时发出了永不停息的响声。他的童话中，惟有一个可以说其中有故事发生了，它描述的是一个荆棘灌木丛（当然其中并没有那个会分身术的邪恶犹太人）：这个灌木丛位于一片不可穿越的荒漠之中，周围被一道宽阔的沙圈包围了。在这个沙圈里，随着结尾一句话，突然出现了一个我——叙述者，并且把一大把沙子扔进那稀疏的灌木丛里，“接着再来一把，再来一把，永不停息地如此扔下去”。按照作者的说法，他那“一个事物的童话”应该是个“阳光童话”，不用那习以为常的、阴森森的月光陪衬就足够了。“阳光和事物”，他认为这就够神奇了：这就是“事态”。哪怕只是朝上望一眼树冠，也会产生出童话的氛围来。

与之相应，这本老词典现在作为一个词语的童话集，借助世界图像的力量影响着我，即使这个读者并没有亲自经历过那些图像，犹如没有亲自经历过那根结着一串串草莓的草茎一样。真的，围绕着每一个我一看到就会陷入沉思的词语都形成了世界图像，无论是那“空李子壳”，还是“那留在烟斗里潮湿的烟丝”。就是那赤裸裸的“晴天雨”和那同样意味着“一个美丽而唐突无礼的姑娘”的白鼬也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哥哥有些信的片断在自身周围营造出一个晕圈，可以与古希腊的真理寻求者那些残章断篇可以比美的话，那么，这一个个独立的词语现在就画上了一个个圈，它们不禁使我想起了一个史前的人物，一个尚在那些初期收集者之前而无法确定的世纪里的人物，想

起了那个传奇式的俄耳甫斯[12]：人们也只是收集了他几个与众不同的表达而已，并没有把他的诗句或者歌唱看做值得流传的东西，而流传下来的是，他把耕田的垄沟称做“经纱”，把犁称做“弯曲的织梭”，把谷种称做“线”，把播种时机称做“阿佛洛狄忒”[13]，把下雨称做“宙斯眼泪”。

从这些词语圈里弥漫出童话的力量，也影响着我，因为在这其中虽然出现了相当多令人恐惧的东西，令人厌恶的东西，邪恶的东西，但不过是如此当一当陪衬，在整体中占上自己的位置而已，永远都不会占上风的，无论如何在这本词典里是如此。对我当年写的那些故事，老师常常指责说，我不但对阴森森的东西缺乏抵抗力，而且恰恰热衷于昏暗的东西，令人恐惧的东西。与之相反，写作的原则就是，要字字句句有板有眼地去创造光明中的光明；连临终的一息也一定要塑造成生命的气息。而现在，这位读者沉浸在那“血雨”、“鼠粪”、“恶心的唾液”、“蚯蚓的粪肠”、“角落里发霉的鞋”、名叫“石下虫”的动物（蝰蛇）、名叫“田鼠之国”的地方（坟墓）等一个个名称里，觉得自己脱离了对恐惧以及不幸的东西的沉溺。他在观察这些名称时，认识到了这个世界里的一个模式，也就是一个意图。这个意图从一开始就把乡民和村舍变成了世界民众和世界城市。每个词语圈就是一个世界圈！在这里，具有决定性的是，这个圈分别都来自那独一无二的、陌生的词语。当一次经历不愿意s倾诉衷情时，你不是一再会听到“哪怕为之只要有一个词语表述就好了！”的抱怨吗？而认识的瞬间不是更多地伴随着“是的，事情就是这样！”而不是“是的，这就是那个词！”吗？

可是，这个读者不就是在袒护另一种语言，而反对自己的语言吗？他不就只是赋予斯洛文尼亚语“那种一个词语的魔力”，而把他的德语排除在外了吗？——不，这两种语言的确在一起，左边是一个个词语，右边是一个个改写的形式。这些改写形式一个符号接一个符号，使得空间弯曲，形成角度，进行比较，突现轮廓，实现建构。照这么说来，有各种各样的语言，这多让人开眼界啊，那个传说如此具有破坏性的巴比伦语言混乱是多么有意义啊。那座塔不是秘密地建造了吗？它不就是虚幻地够上天了吗？

我天天抱着越来越有兴致探险的心态，打开这本智慧之书。是否存在着一个能够描述我所经历的那些探险的表达呢？怎样能够表述童

年与环境融为一体的经历呢？就是有这样的表达，它是德语，叫“子女对父母的关系”！既令人恐惧，又让人拍手叫绝。

这位读者一个个下午待在那平坦的高地上，一再向一个个词语的史诗表示了新的赞许，而且也笑出声来：那不是借以开心的笑声，而是借以去认识和参与的笑声。是的，词语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布满云层的天空上一块晴朗的地方、大热天被牛虻叮得来回奔跑的牛、突然从火炉里迸出的火星、烧煮的梨汤、公牛额头的花斑、伸着四肢从雪堆里爬出来的男人、穿上夏装的女人、半满的挑水桶里噼噼啪啪的泼溅声、果实从荚壳里纷纷落下的响声、扁平的石块滑过池塘水面时的蹦蹦跳跳、冬天树上的冰柱、煮好的土豆里的夹生块和黏土地上的一洼水。是的，这就是它，词语！

可这个意图到底还有效吗？那个表述打谷连枷交替打击的词语不是已经失效了吗？因为那些相应的农具已经长久不用了，走进博物馆了。那经久流传的东西不就是描述着“一个坠落物体回响”的词语吗？那个在过去的世纪里还纯粹表示“移居国外”的表述，不就是因为上次世界大战的事件把它重新解释为被迫“移居异乡”而已经失去了“它的纯洁”吗？在这本老词典里，缺少的不就是那些抵抗战士，那些游击队员吗？对这些人来说，“矛”，这个退役的古老武器也不可能成为替代了。是的，就在当时收集词语的时候，不是有许多地方名称引人注目吗？那儿曾经存在过某些东西，而如今再也什么都看不到了吗？有“昔日生长大麦”的休耕地，有“昔日坐落着一个谷仓”的广场，还有“昔日长满灌木”的石头地。莫非人们当年就对一些特别发现的名称标明它们会变得无用了吗？而研究者们不是一再也把那些连它们的渊源，也就是山谷最深处的原始居民只不过当作一种音节字谜使用的词语收入到这个词典里了吗？难道我不更应该把一个调查表的作用，而不是童话力量赋予这些词语吗：我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的情况怎么样呢？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然而，这同时也是童话；因为作为对每个询问我的词语的回答，即使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相应的事物，即使它早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但从这个事物中始终会产生一个图像，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表象。

后来，有一天下午在这片高地上，我偶然发现了哥哥给我画上叉标注的最后一个词语。像许多先前过目的词语一样，上面也注了一个日期，并且附加了一句：“在战地上”。战争初期，他还始终把这本词典带在身边，只是到了战争快结束时，它才和那套西装一起“作为洗礼赠物”留在家里了。那些更加广泛的剩余部分就再也没有了铅笔标记，似乎永远封存起来了：书页之间再也没有了战前的草茎和战争的苍蝇。

我坐着，注视着这一个词语，又翻回到其他词语上：意图是要表述地球空间呢，还是仅仅将它们留作记忆，或者干脆就是它们的悼词呢？这期间，在我生存其中的时代，也就是在我的时代，人类的语言如此的无表现力，致使我们这些说话的人不得不一再强调某些东西。这难道仅仅是那些战争造成的吗？为什么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哪怕只要一想到任何一个面对面的人会开口说话时就已经疲倦了呢？为什么讲话，也包括自己讲话如此经常地把他放逐到一个密不透声的市民房间里呢？（就那些习以为常的盲窗而言，作为另一种表现形式，“聋盲”适合于这里。）为什么词语什么再也表达不了呢？为什么他只是在那少有的、真正的词语上感受到寓于其中的灵魂呢？

在走过来的路上，我在村子里每次都要经过一座房子。它的一面墙壁无缝无隙地对接到一块漂砾岩石上。当我从那些古老的词语里抬头望去时，我现在也以同样的方式看到这本词典的上棱则直接与那空间毗邻。从这里开始，目光以这本词典作为舞台前沿，径直远远地被引向地平线，引向南部山脉脚下（它有个斯洛文尼亚语名字，直接翻译过来叫做“在翅膀下”）。那里显现出一面光秃秃的陡坡，已经隐隐地笼罩在远方的雾气中。然而透过这片小高地边上稀稀拉拉的松树，似乎仅有一步之遥。那面坡地被草覆盖着，当年山间小道在上面形成了一个密密麻麻的图案，印出了一道道阴影，直延伸到圆圆的山顶上。这道道阴影看上去有点像阶梯，占去了前山的整个横面，不过也一再相互交错，因此又形成了一个个网状。宽大的水平图案被一个由垂直的地面沟槽构成的小图案撕裂了。在这些沟槽上，下午的雨水此刻呈现出土黄色流向山谷里。从远方望去，如此缓缓地蠕动着，不禁让我想起了垂悬的钟乳石凝结的样子。说到底，想像着奶牛从前在这里上上下下，那整个不复存在的山间牲口小道斜坡便显现出一幅惬

意的图像：一个个身躯慢慢悠悠，走走停停，一口一口地吃草，无论如何也跳不上一层层阶梯，也许不像羊和狗那样能干。身躯下的乳房掠过草茎尖，蹄子常常陷在淤泥里。有些牛从一层滑到另一层，因此才害怕下雨后流水的沟槽。一头牛趴到走在自己前面的那头身上交配，在其背上被拖着走了一程；一头牛翘起尾巴撒尿了，如此猛烈，我确实觉得听到了响声，接着又是一摊牛粪的噼啪声。之后，我也看到小道上方尿汽升腾的情形。牛群如此慢慢悠悠，它不禁让人想起了要越过一座巍峨的山峦的情形，想起了从远古以来就发生的民族迁徙。恰恰这空空如也的形式——空空如也的网状构造，空空如也的道路交织，空空如也的盘山小路——连同其微小的不规则性增强了那迟钝和可悲的印象。与一座矿山或者鹅卵石开采场的梯地上不同，这里没有头戴钢盔、扛着枪支的人四处巡游在峰巅与谷底之间，而是一群无目的的生灵没精打采地慢慢移动，几乎原地不动，耷拉着脑袋，四肢爬行着，或者用臀部滑行着。一群由苦力和奴隶组成的生灵，不知从哪儿上的路，也不知去往何方。对这些生灵来说，这山坡甚至连个驿站都不是，除非腿骨折了，被迫屠宰了。

在这里，我又想起了那位老师。作为历史专家，他表现出了对那些从地球上已经消失的民族非同寻常的偏爱。他简直以十分隆重的方式，从自己对玛雅人的研究成果中拿出一个例证，开始讲起课来（他因此在同学们那里有了一个相应的绰号）。在大学期间，他就对尤卡坦[14]考察了数年之久，他为之的格言是："作为地理学者，我变黑了，而作为历史学者苍白了——今天依然如此苍白。"他认为，玛雅人从来就没有发展到形成一个国家的程度，因此他们生存的半岛上就"没有形成国家的河流"。"与之相反，人们关注的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和尼罗河！"轮子对他们来说始终是陌生的，同样也包括滑轮和卷扬机。惟一的轮子形状是在一个很小的儿童玩具上发现的。当然，之所以没有建立国家，是因为玛雅人没有建造拱顶的能力。他们只知道"想像的拱顶"，容不得任何大堂或者大厅。这个民族的惟一支柱就是宗教。没有轮子，没有路碾子。路碾子是用来专门为宗教仪式修建通往热带丛林深处圣地道路的。可是每座农舍本身也被视为庙堂。主宰的东西就是天体。天体被当作神圣的东西，因为从它们那里可以看出每天生活的行为准则。在人们为太阳建立的石碑上，太阳同时也指示着播种的季节：那些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似乎起着像时

钟一样的作用。在这样古老的铭文上，也有崇拜祖先的。属于这个民族宗教的有，每一个家族都知道自己的根源，大家共同的祖先是从玉米中产生的。当每个人的祈祷排挤了大众的崇拜时，玛雅人的灭亡便开始了。就像老师说的，家庭本来“更确切地说就是不合群，相互保持距离”，仅仅通过约定俗成的礼拜维系着，各自为政，随意袖手旁观，逐渐过渡到建立自己的小教堂——忘记了家本身就是某种神圣的东西的理念——，联盟便解体了。这可以从石碑图像文字的突然中断再次感受得到：“公元900年”，他说，“在离那片后来被西班牙人称为自由热带稀树草原不远的地方，有一根柱子上刻着最后的铭文。此时此刻，你们想像一下从用作石碑的主要材料，也就是火石里迸溅的火星吧，可接着就熄灭了！”尤其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民族的命运会发生在一个金字塔形的阶梯上：一级挨着一级，依然用神圣的浮雕和雕刻的石头装扮得很华丽，那是晨星的符号，使所有的村民能够乘凉的大树的符号，共同意味着“时间”的太阳和白天的符号——然而，在最上边一级，仅仅只留下了“几道模糊不清，十分粗糙的雕刻痕迹”！

我觉得，这个阶梯就出现在那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的斜坡上：与家乡果园里的斜坡相比，这斜坡大得无与伦比，它的的确确具有金字塔的形状，由于数以百计的阶梯往上变得越来越狭小，看上去像天一样高。这时，我看到那些被哥哥画着标记的词语攀级而上，然后就中断了。那斜坡上的每一道阶梯都是一个被推倒的铭文柱，面朝下趴在淤泥里。一条条夹带着泥土的小溪从地面的疤痕里涌出，彻底冲刷走了一个接一个的音节，直到整个地区都弥漫在雾气里，像一片废墟一样，没有了从前的样子，甚至连樱桃树都不生长了。一种哀伤的需求攫取了我，于是我拿着哥哥这本词典站起身来。在那空空如也的梯田上，再也没有什么动来动去了，连草茎也没有了，甚至连水都凝固了。能够与那潺潺流水，与那飘拂的牧草，与那繁茂的树枝同呼吸，这种完美无缺充满活力的生存不是曾经一直存在吗？然而，我要哀悼的不仅是一个孤零零的亡灵，而且是某种超越了这个亡灵的东西：一种毁灭。毁灭，这就是说，拿这个不同寻常的人也要把那赋予这个世界核心支柱的东西从这个世界里清除出去。要除掉像哥哥这样的人，就意味着灭绝语言本身——这普遍流传下来的东西，这传递和平的东西——，因为与那些不计其数的代言人和墨客迥然不同，哥哥具有唤起词语，并通过词语唤起事物生机的天赋，他在其中也坚持不懈地磨

练自己，并且指出了一个个范例，犹如现在对我一样。灭绝语言本身，这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行，是所有世界大战中最野蛮的。

然而，这种所希望的哀伤并没有如愿以偿。取而代之的是，惟有那个表达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古老的权利！"在那次最早的农民起义中，这曾经是他们的口号。是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不该失效的权利。一旦我们放弃要求这个权利，它就失效了。可是究竟该向谁要求我们的权利呢？而我们为什么总是向一个第三者要求它呢？一个是向皇帝，另一个是向上帝。为什么我们不能掌握自己的权利呢？它本来注定就是要自我保护的，而且不允许任何人插手其间。终归是一场比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同任何人较量，一场孤独的比赛，一场野蛮的比赛——父亲，那伟大的比赛！

我从那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上又回到这本词典上，以便静心地想一想。我拿着它在野外茅舍前踱来踱去，光着脚板，像蹲着和站着时一样。那个被哥哥画叉标记的最后一个词语具有双层意思：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既是自强不息，又是吟唱诗篇。（沉浸在这一个个独立的词语里，与我通常沉浸在那些所谓的"扣人心弦的故事"里形成了截然的对立：它始终让我抬头远望。）这位读者停住脚步，抬起头来，就像穿过了一道河里的浅滩，由那棵树做标记，又进入了斜面书桌那浅蓝色的洞穴里，洞穴的后墙就是那条条槽纹的山侧面。太阳斜照在上面，像是快要落山了，透过那棵未被映照的松树，山前更加明亮了。阳光十分精细地勾画出了斜坡上哪怕最细小的形状——一堆草、一个畸形的蹄印、一个田鼠土丘、小溪旁一群鸟儿，旁边有一只真正的野兔——并且通过相互之间的空间把各个形状连接起来。我继续阅读着，两眼同时停留在这本词典上和山边。从目不转睛的注视中产生了期待的守望，就像你在一个陌生的人群里，却认识这张或那张熟悉的面孔。在阳光里，当年在昏暗的教堂里信徒们鸣响的连祷，此刻在这些如此多义的词语无声无息的连祷中继续着。强烈的呼吸就是渴望，就是绷紧最强健的肌体。强烈的愤怒就是抽噎，那些萤火虫就是六月，就是一种樱桃。那收割者就是水蛸，就是猎户星座的衣袋星。蝗虫就是一个琴马，就是一个坚果的隔膜，就是一根鞭子的梢尖……通过交换一个字母，从那个表述微风的词语里就滋生出一阵强风来，再交换另一个字母，就成了同样也是飞沙走石名称的暴风……无声的呼唤终于形成了人物形象，我看到那些不在场的人出现在阶梯上，被词语的光芒勾画得清清楚楚：母亲是个"从姑娘走过来的人"了；父

亲是个“永远当奴仆的人”；姐姐是个“神经错乱的人”，通过一个小小的辅音转移就变成了“有福的人”；那个女朋友是个“从容不迫的人”；那个老师是个“辛酸的业余爱好者”；那个村里的白痴是个“走起路来一阵风的人”；那个敌人的样子像“脚后跟上一块磨破的地方”；而走在大家最前面的是哥哥，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同样也是一个“镇静自若的人”的名称。那我呢？——认识到融读者与旁观者于一身的自己是个事情取决于他的第三者，没有他就没有游戏，而且他如此在自己身上一并经历了每个游戏者的主要轮廓：父亲一双白皙的奴仆脚和哥哥被撕裂的眼角。

当然，这个图像文字只是瞬间闪现在那山坡上，然后又是那没有地势起伏空空如也的形状；太阳落山了。可是，我知道，我可以决定返回了。返回与哀伤不同，只要你想就可以：那些空空如也的形状，无论是那些山间小道还是那些盲窗，它们都是我们权利的印记。“哥哥，你将会行走在那儿的蓝灰色之中！”

我闭上眼睛。我现在才觉得它们湿漉漉的。然而，这并不是为我自己或者我的家人而痛哭，这泪水来自那些事物和它们的词语。

在这紧闭的两眼后面，出现了那些山间小道的余象。一个岩灰色的图案。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距离中，我在那儿桌面似的高地上看见了一个年龄无法确定的人。这人光着脚，披着一件深色的、过于宽大的长袍，开始在空中挥舞着手臂。这挥舞成了有规律的动作，它似乎并没有发生在整个手上，拳头上，而是好像在写写画画什么。这是“他”呢，还是我？这就是我，一如既往。不像孩童时期了，我也不再在空中写来画去了。而是在一张平放在岩灰色阶梯上的纸上画着阴影线，既像一个研究者，又像做手工活的人。那是我确定为自己叙述的动作。一个字母接一个，一个词语接一个，在这张纸上，应该出现那自古以来就雕刻在石头上的铭文，然而只有通过我轻轻画上的阴影线才可以辨认出来，传承下去。是的，我那柔和的铅笔印记应该与那强硬的东西、那精炼的东西连在一起，以我祖先的语言为榜样，在那里，那个用来描述“无聊而轻浮的燕雀鸣叫”的表达就是由仅有一个“字母”的词语派生而来的。因为，没有这词语的隐含，这个地球，不管是黑色的，还是红色的，或者是绿色的，便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荒漠。除了关于这个可爱的世界的事物和词汇——关于生存的——戏剧以外，我不愿意再承认任何戏剧，任何历史戏剧。那威胁着山间小道

金字塔的炸弹应该在那里以那个表述“长形梨”的词语形式软着地！我将会给白色的李子花深色的内在、湿漉漉的积雪之下黏土的黄色、苹果上花的残余、河里鱼儿跃起的声音找到表达。

我又睁开眼睛，又在野外茅舍前踱来踱去，越来越快，看样子，仿佛我要助跑似的。我又停住了。我觉得胸腔变成了乐器，于是我呐喊起来。这个菲利普·柯巴尔，他向来就是由于自己声音太小而被人听而不闻，而且在教会学校里受到了监管者的训斥，因为他的祷告“没有穿透力”。他呐喊着，所有认识他的人从现在开始似乎都会对他刮目相看了。

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事迄今只发生过一次，正是在寄宿学校里。他向来深信自己不会唱歌。可有一天，老师要求他唱歌，于是他惴惴不安地站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并且当着一班面面相觑的同学，开始从自己内心深处唱起一支奇特而轻柔的歌。这歌先是让这帮听众哄堂大笑，然后奇怪的是，他们受惊似的把目光移开了。从此以后，这唱歌的人就心想着，他的歌唱肯定是与生俱来的，深深地埋藏着。此刻在这高地上，他独自一人，却唱不出来，也吼不起来，或者哪怕是一声呼唤。那是一种清清楚楚的呐喊，一种简直是盛气凌人地寻求自己权利的呐喊。他从心灵深处喊出了哥哥词典里那些言简意赅或者回肠荡气的、单音节的或者多音节的词语。这些词语回荡在大地上，并且在那山间小道上产生了另一个名字，叫“世界之音”的回声。每呐喊一声，我就发觉那些祖先在洗耳恭听，喜上眉梢，心旷神怡。

我把这本词典举得高高的，用嘴唇吻它，面对这个地方鞠躬致意。然后，我从茅舍角上的榛子树上割下一根主干，在上面刻上了这个地方的名字和年份——“多布拉瓦，斯洛文尼亚，南斯拉夫，1960年”——，宣告它为我们家族的墓碑，依次向前推算。——此时此刻，这位二十岁的年轻人对未来多么不抱希望（他的国王似乎永远也不会出现了）；他对现在的期望多么不可动摇；那个回应他的声音是多么微弱，或者多么小心翼翼啊。它不是早就被那些来自四面八方——所有的山谷，从一个个兵营里回响在这平展的高地上的命令呼喊，练习射击的岩灰色士兵和地区公墓里掘墓铁锹刨挖——的声音淹没了吗？不，一如既往，不管我在哪里，那盲窗和那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就像一个王国重现的透明水印花纹。面对这一切，火车的汽笛同样会变成和平鸽的鸣叫，像印第安人的呐喊一样。我始终感受到里面

装着那本词典的海员背包带系在我肩上。母亲，你的儿子依然行走在天底下！

我一下子扑倒在地上，永远感受到了什么是精神。

第三部分　自由热带稀树草原与第九王国

当时，我就待在那高地上，直到太阳余象从我的视网膜中消失。仿佛觉得在我的心里有一个轴心在旋转，越来越慢。凭着它，我也观察到了自己背后的事物。在北面群山之后，天空浮现出一片火云，想像中正好在我们家的上方。谷仓西墙上，有一个锯成红桃、方块、黑桃和梅花的图案用来通风，而透过那黑乎乎的洞口，飘散着我父亲那百年之久的孤独。

我背对着离开这地方，后来也是边走边转过身朝那儿望去。一只小鸟从高地边上直飞云天，就像刚从下面那个侏儒手里溜脱似的，它要这样来赢得与巨人的投石角斗。随之，它又从空中俯冲下来，就像被击落了。在白日的余晖里，后面谷地深处旁的湖面上显现出透明的胶体色彩。这时，我心想着那全然是一片被淹没的蜜蜂在旋转着透明的翅膀。

每次去的时候，我都耷拉着脑袋，回来时总是挺胸昂首。在村口一座房子的墙上，有一块纪念碑，上面说的是，1941年的某一天，人们第一次聚集在这里的地下室里，抵抗法西斯主义。（在斯洛文尼亚每个我后来还要去的地方，我都碰到了墙上镶着相应铭文的房子。）我也想进行抵抗，而且下定决心抵抗，不是在哪一个地下室里，而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在和平中，没有集会，就我自己。“用战斗造一个句子吧！”我对自己说，然后我才发现，这可就是那样一个句子，像甲骨文一样多义。有一次，我乘兴拐进一个木棚里，随手抓起斧子狠狠地劈在砧板上。一个妇人走过来，要我把一堆锯成一截一截的木块劈开来。我使劲地劈起来，木块四处乱飞——我现在还觉得额头上就有一块——，过了一个钟头，我就赚到了一顿晚饭和几个新词，比如用“分裂光明”来表述“制造麻烦”。另有一次，一个皮球滚到我脚前，我一脚踢得那样精准，人家就邀请我一起玩了（就是到了今天，我有时还梦想着在国家队里当个前锋）。一双鞋合力抱着脚腕，而父亲的皮腕带使手臂强壮有力，也不再仅仅是个腕套了。

一到晚上，菲利普·柯巴尔就坐在“黑土地”旅店拐角的位子上。谁也不问他的名字，甚至连那些不断巡视的警察也不闻不问。在所有人那里，他只是被称作“客人”。连这里照片上的铁托都转过身离他而去了，朝着天空望向一个轰炸机中队。

餐桌上，没有放满各种各样的，时而令人想起万人坑里那一具具头朝前栽倒的尸体的奥地利烤点心，又是简简单单的一摞白面包片，放在桌布上，那桌布自古以来就叫做“面包布”。

时值盛夏，有时候坐在房子外边热得要命。返回时，我通常甚至会很热，感觉山涧的空气吹拂在脸上，犹如扇起令人惬意的扇子。在通往餐厅敞开的窗户前，放着一个有几级台阶的踏板，服务员每次都要踏上去，以便从里面的厨师手里接过盛菜的盘子。在托架旁边，是一片水泥地，上面布满深深的条纹，看上去有点像一排钢琴键：自行车存放场，大多数时候空空的。避雷针从上面引到这里：也真是的，这地方几乎没有一天不下雷雨的。夜晚一到外面，到处都是闪电，这个中学毕业生索性用上了“宇宙眼”这个古希腊词语。因此到了七月里，那些萤火虫刚刚还在灌木丛里飞来飞去，转眼间就钻到草地里消失了。

那个服务员比我还要小一些，或许是刚刚从学校毕业来到这里。他个头儿不高，瘦小，长着一副狭窄的、近乎三角形的棕色面孔。在我的眼里，他只会出身于人烟稀少的深山里，是一户平常人家许多孩子中的一个，生在四周都围着石墙的独门独户里，小的时候不是牧童就是森林野果的采集者，知道每一个哪怕再隐蔽的角落。那个女朋友，向来只有别人说她长得漂亮——他可是我自个儿用这个词语描述的第一个人。和他说话，从来都没有超出问候、订餐和道谢之类。他不和客人交谈，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说。这人身上的美更多则来自一种坚持不懈的专注，一种友善的警觉，而不是他的形象。你从来都不用去呼叫他，或者哪怕只是挥一挥手：他站在餐厅或者花园里最后边的角落里，那儿就是他闲时歇口气的位子。看样子，他像沉醉在对哪个远方的梦幻里，然而却眼疾手快，哪怕是最细微的神色都逃不过他专注的目光，甚至抢在每个神色之先，以特有的方式显现出一个“彬彬有礼者”的图像，是行为模式的典范。一到上午，即便已经雷声阵阵，他也要摆好李子树下的餐桌，然后还要在第一滴雨点掉下来之前

就又把它们收拾好。他就是与众不同，有时候碰到他独自一人在餐厅里，给每把椅子都寻找着各自的位置，好像这关系到给一群喜庆的人排座位似的，一场洗礼仪式或者婚礼，因为所有的客人毕竟在这样的场合都特别挑剔。他对那些一点都不值钱的、已经磨损不堪的物品（在这家旅店里，几乎只有这样的物品）所表示出的小心仔细，同样也与众不同：他把金属餐具摆放得工工整整的，把调料瓶上的塑料盖子擦洗得干干净净的。有一次，傍晚时分，他站在那寒碜空荡的空间里，一动不动地直看着前面，然后走到远处的一个壁龛前，给放在那儿的大肚子玻璃瓶上加了一个小小而温馨的变化，顿时让这整个房间充满了宾至如归的气氛。又有一次，餐厅里坐满了人，吃晚饭时常常就这样，他把就要送到客人桌前的一壶咖啡放到柜台上，小心翼翼地将把手弄直了，然后以一种夸张的架势抓起那微小的容器径直递给了要咖啡的客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自己给那些醉酒的人点烟时十分一本正经，他也始终只需要做一个动作。此时此刻，我看到他那半闭的眼睛闪闪发亮。

白天里，独自待在房间里或者去野外时，我更多思念的是那个服务员，而不是父母或者女朋友。我现在才明白，这就是一种爱。我并不是想去他那里，而是有意要在他近旁。一到休息日，他不在了，我便觉得若有所失。一旦他出现，他那一身黑白装扮顿时让满屋的各个角落里充满了生气，我也获得了色彩感觉。或许这样的爱慕也来自他始终保持的距离中，而且不仅在上班时如此。有一天，我碰见他身着便装，站在汽车站的快餐铺前，自个儿成了客人，而且旅店里那个服务员和面前这位身着灰色便装的年轻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他把雨衣搭在胳膊上，一只脚撑在下面的横杆上，慢条斯理地吃着香肠，目光落在来来往往的车辆上。或许就是这种距离感汇同那专注和平静的神气一起形成了那既震撼着这位观察者，又获得了典范力量的美。直到今天，我依然处在一种不得已的境况中，还在回想着那个沃凯因服务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这在通常情况下虽说无济于事，然而，他的图像毕竟又回来了，至少在这一瞬间，我可以心平气静了。

在“黑土地”旅馆停留的最后一天里，快到午夜时分——所有的客人，也包括那个女厨师都已经走开了——，我回房间时经过敞开着的厨房，看见那服务员坐在满满一大木盆碗盘前，用一条桌布一个接一个地擦着碗盘。后来我从上面的窗户望出去，只见他站在下面的山涧桥上，穿着裤衩和衬衣。他那弯曲的右臂上托着一摞盘子，他一个

接一个地拿下来，又一个接一个地让它们漂到水上去，像一堆飞盘一样，整齐，优雅。

这个年轻的菲利普·柯巴尔在“黑土地”旅馆四人间里度过的夜晚几乎完全是没有梦的。几年前，被关挤在寄宿学校宿舍里，让持续的头痛牢牢地钉在枕头上。我常常想像着，独自在自由的天空下躺在自己的床上，躺在一片广袤的平原中间，暴风和雪片席卷扫过，我暖暖和和地裹在被子里，直到耳根，惟独我的脑袋冻得都要炸裂了：由于这咆哮的山涧，这样的想像现在成了现实；山涧推移了这位睡眠者房间的墙壁，替代了他的梦。

仅有一次，他梦见父亲了（他当之无愧地享受着山涧工人的养老金），或者其实只是梦见了那个父亲可能要把家史写上去的本子。它变成了一本书，和实际不一样了，不是一行行写得歪歪斜斜的，记着哥哥的战地邮政编码和菲利普的衣服的数字，满本子都是文章，不是手写的，而是印刷的。这位山涧工人成了农民作家，世纪转折时期斯洛文尼亚农民一个合乎时代的继承人。他们的作品被收集起来了，按照他们习以为常的叙述时间，他们被翻译过来的意思叫做“夜晚之人”，这在他们登场之前也可能就是晚风或者晚间飞蛾，而在他们离去之后无非就是那“晚报”了。这本梦中之书专心致志的读者就是那个年轻的服务员。

我背着那蓝色的海员背包，拿着那根榛子树杖，站在波希斯卡-毕斯特里卡火车站的高台上。这时，刮起一阵徐徐的晨风。我打算继续南行。从发车轨道处望去，穿越群山的隧道在背面那儿依稀可见。像边境那边的米特尔一样，这里也是楼房第二层用作住宅。像那里一样，天竺葵的花也从小木盒里飘落到鹅卵石上。这期间，我觉得气味都变得让人惬意了。这两个国家的小火车站，连搪瓷牌上的文字都是共有的，上面都标的是“超越亚得里亚海的高度”，显示的是同样一个基本图案：昔日帝国的图案。一道石门通往旁边的厕所里，门上涂的是蓝色，就像家乡圣像柱上的苍穹一样（里面仅仅只有一个坑是用来大小便的）。一间木屋上，钉着一个个牛角，巨大无比，像是水牛角。那个归属车站的菜园子顶头呈现出一个三角地，被豆蔓围起来

了，其中一个调料作物菜畦里覆盖着郁郁葱葱的莳萝菜。三角地尖上长着一棵樱桃树，地面上留下了黑乎乎的果实痕迹。在站前广场的栗子树上，燕子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一个也看不见，只听到它们在树叶丛里持续不断地扑棱来扑棱去。候车室里铺的是木地板，镶着黑色的缝条，连同高高的铁火炉一起，看上去和家乡汽车站的木板棚一模一样。候车室两面开着窗户，像几乎始终空着的样子，笼罩在一种住家的光亮中。在水泥地面上已经半是沉陷的入口旁边，有一个脚踏垫，是由皇家铸钢做成的，像一把朝上翻起的刀刃，左右镶嵌着有装饰图案的小画像柱。整个建筑显得如此宽敞，同时每个细节又那样精雕细刻。在这里，我感觉到一种宽厚的精神在呼吸着，那些当年在帝国时期曾经构想并使之充满生气的人，他们的精神在呼吸着，而且连这个现在正在思考着这一切的人也不是什么恶人了。

在我旁边，一队士兵等待着，鸦雀无声，胡子拉碴的面颊上，留着汗水干结的痕迹。靴筒上满是泥点。我的目光从他们身上移向南面的群山，山顶已经映照在阳光下。沃凯因的上空终于露出了笑脸。在这一瞬间，我下定了决心，徒步翻过这座山脉，说着就上路了。（“再也不过隧洞了！”再说：“我有的是时间！”）随着这个决心，大地猛地一动，看样子，仿佛伴随着它，白天才来到了。而在那个另外的语言里，这“猛地一动”不也同时意味着“战斗”吗？

直到这时候，我知道的惟一山峰就是拜岑山峰，比这里的山还要略高一些。在背阴的围谷里，就是到了夏天，有时候也会看到雪景。不过，你慢慢悠悠地攀登上去，更确切地说，那是一种漫游，而且我常常和父亲一起登山漫游。到了半山腰上，我们就在一个谷仓里满是尘灰的干草上过夜，过后我的眼睛因此而肿胀得无法眺望四周。只要我们一走到一户人家附近，通常都有一条狗扑过来，主人紧随其后，一边跑着，一边又是吆喝，又是挥舞棍杖：山民从骨子里就怀疑这些来自平川的小民，因为这些人踩踏了他们的牧草，使他们的牲畜受到了惊吓，采走了他们树林里的蘑菇。等你走到近前时，他们才会和缓下来；一看见这些陌生人中有那个远近有名的木匠，自家的屋架也是出自他手，又是叫你吃熏肉和面包，又是让你喝果子酒。有一次，到了再往后就是南斯拉夫的山脊边境线上时，父亲叉开两腿站立，一只脚站在这边，另一只踩在那边，然后给我来了一次简短的演讲：“你

来看看吧，我们的名字意味着什么：不是两腿叉开站立的人，而是边缘人。你哥哥是个中间人——而我们俩就是边缘人。一个柯巴尔人，既是那个用四肢爬行的人，又是那个步伐轻盈的攀登者。一个边缘人，这是一种边缘生存，却不是一个边缘形象！”

上山时，我不时地回头望那片他国之地，像出于感激之情一样。在那个与家乡如此不同的地方，没有人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人家对我提出的几个问题，无论如何不是什么狡诈的问题。通常情况下，我总是低着头，面对夏日的草地从我的下方无声无息掠过，思念着开往战争前线的哥哥，他再也听不到鸟叫了，再也看不到“路边盛开的鲜花”了。我浑身都感到，这坚持不懈的攀登使得身子骨作好了应对秋天的事情的准备，不管是服兵役还是上大学，作好了应对下一个敌手的准备。那些蜥蜴要么变换成滚动到一旁的路石，要么像鸟儿一样在灌木丛里刷刷响动。我久久感受着最后一丝人气：山村尽头一户人家门前一堆湿漉漉黑乎乎的衣服（这时，我心想着，斯洛文尼亚语中有一个独特的词语表达这样一户“尽头人家”）。然后，我就一个劲地顺着草丛里那一道道证实就是把人常常引到无路可走的野兽足迹行进。我所听到的一切是一种和谐的昆虫嗡嗡声，像一群离得越来越远的人的声音。在我背后，那片谷地沉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尤利安山天际线上，浮现出了那三头峰，也就是南斯拉夫的群山之巅特里格拉夫峰。我身前身后无非都是荒野而已。

我又一次抄近路走去，打算走一条直道，可是由于有水阻挡的缘故，也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直道。我如此深思熟虑地开始了，又如此不假思索地赶忙奔个不停。我觉得有必要勇往直上，穿过矮木丛林，越过卵石沟槽。到了树木线上，光秃秃的山岗临近了，本来齐膝高的草丛也变得低矮和稀疏了，我看到面前是一片纹丝不动的阴云。就在同一时刻，阴云里开始电闪雷鸣了。我并非不在意，甚至害怕起来了——正好在昨天晚上，人们在旅馆里还说起一个在雷雨中丧生的人——，同时毫不犹豫地继续往上走去。我倒常常像被那危险吸住了一样，径直奔它而去，绝对不是轻率，甚或开心，而是惊慌失措，要么结结巴巴地哼着一首流行歌曲，要么就数着数。真的，这个翻山越岭的人是如此害怕，他把自己裤子发出的哗哩哗啦的响声都听成了雷声。被他在远处当成山顶石屋的建筑，一到山岗上，原来是一个战争要塞的遗迹；一个可能的栖身之地的窗户原来是要塞的射击孔。不管怎样，这个废墟给了他一块遮风避雨的地方。猛地一下，他完全平静

了：他心平气和地注视着远方一片草地，四周都在下雨，惟独那块地方被大冰雹覆盖，白茫茫一片。这时，他已经精疲力竭了，目光连那远景都忘记了，在那片白茫茫的地方，看到的是一条床单放到场地上曝晒漂白。他坐在那儿就倒下了，像昏过去一样。哥哥在一次急行军后写的一封信里称这样的昏昏沉沉为“无意识睡眠”。

当我苏醒过来时，天色已经变暗了。在那些射击孔首先瞄准的南边山谷低处，星星点点地亮起灯了。我在外面雨里走上走下，然后决定留下来。在白天就要消失的时刻，要塞那些蜂房简直显得太诱人了，如同酒店的小房间一样。雾蒙蒙的东西笼罩在山岗上，就是云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投身于这样一个景象里，下面的草地格外清晰，一朵朵小山花被笼罩在雾霭中，闪闪烁烁。一只老鹰飘浮在移动的云层里，翅膀一动也不动，像受伤了一样。我在碉堡里安下营，躺在一层旧报纸上，品尝着我随身带来的干粮。无论如何我今天不会再出什么事了——此时此刻，我想起了那个关于地灵[15]的传说，他从自己栖身的石窟里把舌头吐出来给那些神灵鬼怪看。结果他抵不住一个居心叵测的人的诱惑，最终还是被雷劈死了。

夜晚还远未降临，黄昏的轮廓只是融化成了一种越来越无形的光亮，其中惟一的轮廓就是那个蓝色的背包：“山岗上的海员背包”，这个昏昏欲睡的人感到奇怪。然后，他在冰冻的海里游了几个时辰，他四周的海都结冰了。突然间，一把指尖浮现在他的脸上，一种不会比这会儿再温暖和真实的触摸，而且伴随着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我亲爱的！”然而，当他在黑暗里睁开眼时，周围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只听见越来越响的沙沙声，而且越来越近了，啪地一声，不是野兽来了，而是那个海员背包倒在地上了。

当第一缕晨曦到来之前，我就上路了，顺着山岗，一步一步地走去。我就是要这样走一走。终于又要像当年那个光着脚的孩子与父亲并肩走在田野上一样，在这夜晚的尽头，来辨别那个既意味着白天的开始，同时又意味着一切的细节，终于又要经历“生存”这个冒险了。然而事与愿违：当初，清晨淅淅沥沥的雨点，滴在路上的尘土里，溅起一个个微小的火山口，恰恰伴随着这雨点，那远古世界才让人刻骨铭心了。然而在这里，一切立刻就是那远古世界——雨水就像

自古以来从黑压压的天空里倾泻，从黑黝黝的大地里直上云霄，雾霭就像从火山口里喷发出来一样，湿冷的岩石灰上加灰，匍匐的灌木给脚下设起一个个圈套，平静得连一丝风也没有——，因此，没有什么东西会形成尘土里那样的图案。再说，或许也缺少与另一个人牵手的感觉，而大地的亲近，惟有这位叙述者现在才会回味过来。然而对于那个孩子的继任者来说，当时处在那儿的山岗上是无法企及的。照这么说来，有些东西是可以重现和恢复的，更多是靠着描粗和勾画，而不是仿效和学样？这个独来独往的人，无论他怎样企盼也好，可他感受到的不是从那些尘土火山口里升起的闪光，仿佛太阳就是从这个星球里升起来似的，而是一种赤裸裸的、麻木的曙光，一切形状，甚至夜晚的形状都在其中融化了，并且压根儿就没有感觉到一个还那样遥远的太阳的存在。黎明时刻，他跌跌撞撞地跨过一块块岩石和一条条根蔓，又是发冷又是出汗，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背上湿成一团的海员背包成了越来越沉重的行军背囊。这时，他重复的不是同父亲一起走过的童年之路，而是当兵的哥哥拖着艰难的步子穿过不毛之地，去参加一场预先注定要失败的战斗；重复的不是田野之路，而是行军之道。虽然我确信向西走去，可我愤愤不平地想着，像哥哥当年一样，我似乎被遣送去东边了；虽然我明明白白地朝着自己向往的目的地走去，可我的思想抱怨我，随着每一个步子，我越来越远地离开了那个对我意味着全部的地方。这第一声旱獭警叫，与其说是冲着自己的同类，倒不如说是冲着我来的？那只雪白的山兔从草丛里尖叫着擦我身边闪过去，它不就是勾画出了一幅不可挽救的逃亡的图像吗？

我心想着这一切，既愤愤不平，又惴惴不安，同时又坚定不移地继续走下去。天亮时，雨变小了。我顺着山坡向下，朝着依然看不见的伊松佐河谷地走去。这里没有可以看得见的路，可是，我会给自己开辟一条路的。我在自己身上真的发现了父亲在山顶演讲中所说的灵巧敏捷，均匀快捷地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上，不停止或者不歇息。此时此刻，我甚至感到了惬意。当我在一个地方不得不成为会爬山的人时，这惬意就越发强烈了：这时，我四肢趴在岩壁上，父亲，然而身子挺得直直的，并且感觉到指头尖和脚趾球之间在共同行动，绝对不像在干那些你命令我要干的体力活儿时的感觉！我十分活跃地踩到了小岩壁脚下，就像沐浴在阳光里一样。不大一会儿，太阳也真的出来了。

于是，我来到阳面的树木线上。我依然面临着一段虽说漫长，却不用着急的旅程。在继续行进中，当然是某种异样的东西，侵袭着这位漫游者，不是害怕暴雨、野兽或者悬崖。那位老师叙述他作为年轻的地理学者独自探险的经历时说，每当他过了“那些最后的猎人标志”时，才会觉得自己自由了：我则与之相反，远离开任何一户人家，置身于一个地方，几乎不用置疑，除了我，好久都没有人闯到这里来了（谁也真的不知道我在这儿），现在害怕起来了，害怕一个庞然大物——这个庞然大物就是我自己。世界的任何线索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苍白。这个名为“孤独”的庞然大物被从心灵深处突然扑出来的猎狗追赶着，盲目地在这苍白中瞎跑。又是猛地一下，它同时也是知觉。是我不得不给自己猛地一下呢，还是它发生了？它发生了，他，给了这个瞎跑的人猛地一下，这个他就是我。有时候，这个年轻人就是这样来对待自己的，通常是在清醒情况下，然后总是在他自己认为遭到某种东西威胁时才这样。这害怕先是突转为恐惧，仿佛已经到了如此地步，而恐惧又突转为毛骨悚然。他抱着这样的心境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它被驱除，因为它不过是一个畸形物而已。然而，这样的驱除却没有发生。相反存在的是一个不能再陌生的陌生人，这人就是我。这就是我，而这个我是大写的我，因为它不是任何一个人，而是凌驾于他之上，巨大无比，并且控制着空间，使他有话说了，四肢灵便了，是他的书写名字。于是毛骨悚然变成了惊叹（对此，修饰词“无限的”再也合适不过了），邪恶的精灵变成了善良的精灵，畸形物变成了创造物。在我的想像中，不是一根预示不祥的指头，而是整个一只祝福的手指向这创造物——当这个我出现时，情形的确是这样的，仿佛你刚刚获得新生似的：眼睛变得又圆又亮了，耳朵变得又聪又灵了。（今天，这些东西当然不愿意再显现给我了；对于那个难以置信的“整体我！”的惊奇好像离我一去不复返了。这也许与那个责任难解难分，它成为这个四十五岁的人的一部分，使之孤独地陪伴着他那常常哀伤的理性，而我则看到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尚沉浸在天真烂漫的疯狂慈悲状态里，疯狂？当时在那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它治愈了害怕。）

我镇静地继续走着自己的路，背负着我自己，不是当成负担，而是护身。一到树林里，我的身后就响起了爆裂声，一块岩石随之从树木之间滚下山谷。苔藓里响起一阵嗡嗡声，像是来自一群受到惊扰从粪堆上飞起的苍蝇。这嗡嗡声来自一条直挺着脑袋、苔藓般的绿蛇，它向我发出咝咝声。这时，我如愿以偿地欣赏着它。干树枝堆下那个

骷髅是一只雄狍的，犄角还连在脑壳上，我连同脑袋拿着走了一程，然后又扔掉了。到了一片林中旷地上，没有路可走了。旷地上密密麻麻长满齐胸高的蕨类植物。穿越时，我从容不迫地倾听着那些平常无声无息的、看不见的鸟儿在蕨类植物下面飞过发出的嗖嗖声。与这样的无忧无虑相映相衬，我接着高兴地看到了一条长满青苔的山间小道，通往山下时变宽了，成了一条老路。而更高兴于路上出现了刚刚驶过的小车的印子，绿色的草带上留下了刹车的痕迹——下山的坡是那样地陡——这时，我甚至觉得，仿佛伴随着这印记、被刹车榫头拔起的草团、深深切入的、油光闪亮的、积满了油乎乎的水的车轮沟、马蹄印和在一旁同行的人的靴子留下的印记，伴随着足底下这清清楚楚的文字映像，开始了一场完美的交响乐，而且这种最柔和的方式就是我迄今对音乐的理想所在。然后响在耳际的就是麻雀鸣叫和狗叫。虽然天又开始下起雨了，可我坐到树林边上，享用起黑莓来。这里和阴面的山谷不同，已经有了成熟的黑莓。我脱去鞋，让“天水”冲洗那疼痛的双脚。我累得身上直往外冒气。在手电筒的镜子柄上，我看到了一张脸上沾满松针。由于黑莓不解渴，继续行进时，我便享用着温暖的雨水。村口那棵接骨木也已经泛起黑色的斑点，旁边是第一棵不寻常的无花果树，果实好像直接长在树枝上。村子梯田脚下是一片白茫茫的石头荒漠，一条呈绿色的彩带蜿蜒穿过，那就是索卡河或者伊松佐河。

我四处乱走了两天，一到安全地方，于是就心想着，我走错的路还是太少了。后来也一样，只要一遇到这样的情况，总是同样的想法。安全地方？在我一生中，我还没有一次觉得在哪儿是安全的。

当时，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在伊松佐河上游山谷里只停留了一天一夜。他是在这个山谷的中心地托尔敏镇上过的夜。在这个地方的徽章上，那条河蜿蜒流过，上面交叉着象征那次伟大的农民起义的长柄叉和斧子。他在一户人家里找到了住处，租了间半地下室。天花板上布满了蜘蛛网。过了午夜，地下室的空气里充斥了一股强烈的呕吐物臭味：隔壁同住的一个人扯开嗓子一言不发地吐个没完没了，直到黎明时分。我起来时，只见上面的厨房里坐着一个一声不吭的孩子，怀里抱着一只猫，父母亲已经出门上班了。我往桌子上放了些钱，在客店里用起了早餐，望着面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梯田上有一条老公路穿过，那里坐落着一个个村庄。我沿着梯田逆流而上，朝着柯巴里德或者卡尔弗莱特走去。伊松佐河先是在山谷深处，然后越来越近了。在对面放牧的草地上，有一个个用来堆放干草的石房子，没有窗户和烟囱。在公路外切道和河流弯道结合的地方，我下去走到河岸边，在雨里脱去衣服，从一块突出的石头上下到河水里。水流从表面看上去那样湍急，而此刻并非那样激烈地在我面前分成两股了。河水直没到我肩上，十分冰冷，因为刚刚才从山里流出来。我下水的一瞬间，冰冷直钻到五脏六腑里了。我立刻鼓起全身的力量，逆流游去，可划动了数百次之后，却发现那块上面放着我衣服的石头依然在同一个地方。于是，这位游泳者停在原地，脑袋正好露在水面上，观察着这个地方。从这个视角望去，它属于一个陌生的大陆，独一无二，闪烁流动，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惟独被那些舌头状的卵石滩划分开来。河面上笼罩着一团团雾霭，水平线后与一片覆盖着黑油油的针叶林山脉相连。山脉雨蒙蒙的，是这一条条无名的河流永不停息的源头和后盾。索卡河？伊松佐河？荒无人烟，从我的下巴尖直延伸到一座船首似的、被遥远的太阳照亮的山峰，只有那冰冷的波浪和那温暖的雨水，这更可能使人想起一个太古时代，它也不需要去描述，而自成一体存在着。可后来，在河中间，我先后碰到了三个游泳同伴，显然——从那栗色的胳膊上留下的内衣印记看得出来——是几个工人在午休：匆匆忙忙地赶着趟儿，同时又欢呼雀跃的样子，一个比一个声音洪大，很快又从那图像里消失了（然后我看见他们站在河岸公路上一个载运碎石的车队里）。索卡河或者伊松佐河？是用这种阴性的斯洛文尼亚语表达还是那个阳性的意大利语表达更适合这条河呢？我心想着，在我看来，更确切地说，它应该是阳性的。而对那三个工人来说，它应该是阴性的。——在河岸公路上继续行走时，我感到一只让人温暖的手搭在肩胛骨上，一双鞋子变成了慢慢划去的独木舟。

后来，当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当地人说出“柯巴里德”这个名字时，它听起来就像出自一个孩子之口。真的，名字会一再使这个世界焕发出青春来！接着，和在家乡不一样了，我面前没有了村庄，而是站在一座大都市的残垣断壁里，森林突伸到有书店和花店的市中心，紧靠外围圈上的工厂旁边是一样被淋湿的奶牛。虽说在阿尔卑斯山余脉前，可在这位年轻人看来，柯巴里德或者卡尔弗莱特就是南方完美

的代表；门口两旁长着夹竹桃，教堂前有月桂树，到处是石头建筑，路面铺着色彩斑斓的圆头石（当然走不了几步，它们就通到中欧那茂密的松林里去了）。

人们既讲斯洛文尼亚语又说意大利语，混乱一起，同房子的风格一模一样，杂乱无章，密密麻麻，有木头的，有石头的，也有大理石的。这一切闪烁出一种粗犷的情形。在那个同样按照山脉来命名的客店里，坐着一个玩牌的人。牌局结束时，他面带短暂的微笑，向自己的对手出示了赢来胜局的一张牌。在一个呈弧形的平台上，一个女人从那排与墙壁一般长的天竺葵花里，用手指弹去凋谢的花朵，最后又把一个红光闪亮的花盆摆上去。“这里就是我的祖籍地！”我就这样确定了。

从北方来的公共汽车开到拐弯的地方了，我坐在一张长木椅上等待着它的到来。然而却不是这辆车。与南斯拉夫的汽车不同，这辆车的车身漆面锃亮。车停下来时，里面映现出月桂树的影子。而当我此刻抬头望去时，只见车里端坐着我们村子的全体村民，一个接一个窗口显现出一副副熟悉的侧影。我不由自主地给自己寻找一个离得远远的地方，一个让人看不到的地方。难道端端正正坐在里面的真的是那些村民吗？他们更多不就是蹲伏着吗？当他们现在挺起身来时——那更多不就是吃力地站起来吗？他们伛偻着身子，非常艰难地从车里缓缓地移动出来，许多人还得要司机扶着从踏板上走下来。下了车，他们聚集在一起，站在公路拐弯的地方，目光相互寻找着，仿佛生怕丢掉自己似的。虽然是工作日，可他们都身着节日盛装，甚至是一身乡村的传统服装。惟独那位带队的神父穿着黑色旅行制服，领子是白色的。男人都头戴礼帽，在棕色的西装里面，全都是带金属扣的丝绒马甲；女人都披着带着缨子的五颜六色的披肩，每个人都在手腕上挂着一个超大的、可掀开的手包，而且全部一个样式。就连那些年龄最大的女人也梳起了一条辫子，并且将辫子在脑袋上盘成花环状。我拉开距离，躲在一个室外楼梯下，坐在一个砧板上，半掩着身子。肯定有几个人朝我望过来了，却没有人认出我来。惟有神父愣住了，而我想像着，一看见这个陌生的小伙子，他或许一下子想起了那个逃课的学生和宗教叛逆者柯巴尔·菲利普。他现在究竟会在哪儿呢？

他们始终是一个跟着一个走进客店里，久久停在那里。我打算等他们都进去。晚些时候还有一辆公共汽车开往喀斯特方向，那儿应该

是我寻根问祖的目的地。我身旁有个柴堆，底部有个锥形洞口，像是一个狗洞。洞口上有句拉丁语壁文的残迹："时机是不会让人知道的。"我想像着从这些村民的一举一动里看出了我母亲的情况挺好的。仅仅看着那些熟悉的手包就让你放下心了。

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也没有人来打扰。我如此显然地不用着急，看来证件足够了。当那些林肯山村的人走出来时，连老人的面颊都发红了。他们并没有醉酒，却全都被一种奇异的、迟钝的兴奋劲攫取了。我听到他们在讲国语，第一次讲得如此纯正，声音清晰，也没有村子里那习以为常的大杂烩和含含糊糊的发音了。这时，他们像是听到一声命令，在上车之前一起转过身去，面朝客栈墙壁。墙壁在这个地方没有窗户，只是一块上面开着一条条横道的黄色大平面。这墙壁把村民们那深暗的背影衬托得清清楚楚。我看见几个女人也不分年龄大小，相互手拉着手，男人们把两臂交叉着抱在胸前。没有一个人不屈着膝，于是我恍然大悟，不仅我们柯巴尔家的人是被逐出家园的，而且所有这些有房无地的村民都一个样；整个林肯山村从太古以来就是一个流亡村；人人都一样奴颜婢膝，一样不幸，一样不合时宜；在我看来，连那个神父也不是什么教士了，在这儿的编队里更像是一个被剪短头发的、瘦骨嶙峋的囚徒。即使他们因为在这里受到了友好而廉价的招待而对着客栈抬起头来，可在我眼里，他们如此站在那里，的确就像站在一面哭诉墙的横道前一样，这些远足者同时也是朝圣者，那严肃的发型与打扮也与之般配。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出了民族服装里的名堂（就像后来又一次在那个老妪的照片上看到的一样：她几乎紧闭两眼，站在自家喀斯特茅舍前，胳膊上搭着黑白两色的寿袍，也就是当年的婚礼服）。这队伍里也有一个小孩。这时，他敏捷地攀爬上外墙台，从那里用指尖和脚尖继续交替着向前移动，并且从墙壁一半的地方，在观望者的喝彩声中，轻盈地跳到地上：旅行的结束和返回的信号。

那辆远足汽车拐了一个之字形弯后向北离去，驶往那个所谓的阿尔卑斯山共和国。这时，在我的眼里，它越来越小了，和在疲惫不堪的目光里非常相像，发出嗡嗡的响声而去，变成了一个玩具小汽车。随之，一群乡巴佬奴仆永远消失在从祖国被遣送到流亡地的途中。我觉得，那群无望的人是多么灵巧和高贵啊（就连手上的血管都显现出一种高贵的图案），而这些自古本乡本土的南斯拉夫居民现在看上去

多么粗笨和世俗啊，不是一个劲地抽烟，就是四处吐痰，或者给自己的生殖器挠痒。

我穿过空空如也的广场，走到那面墙跟前，事后才加入到那个行列里。从外面看去，我是帝国时代一个建筑物的观察者，一边描摹着那条条横道，一边仰头来仔细观看着屋檐。可在内心里，我把两臂举向天空，同时觉得它们就像是残余部分。在想像中，是诅咒和唾弃：没有什么东西是通向上天的。哭诉墙是幻想，这里只存在着水平线上的平行构造，没有什么准线，而且凹槽里粘满了街道的粉尘和蜘蛛网。房子两边的墙棱角，无论是朝南还是向北，都没有与任何东西相邻。我的祖籍地吗？——一旦这面近看闪烁出一片黄色的墙壁碎裂和崩塌了，肯定就是冲我来的！——可是一边有棵南方的柏树，火焰的余象，被果球照得亮闪闪，充斥在无所不在的麻雀的鸣叫声中——往树木隐藏深处瞪着眼睛偷偷看去——，难道那些闻上去像香子兰的夹竹桃花什么都不是吗？——“夹竹桃”、“柏树”、“月桂树”——这些都不是我的词语——我不是伴随着它们成长的——从来也没有在它们所指代的环境中生活过——我们这样的人所认识的月桂树，最多不过是烹饪在汤里的干叶而已。——由于这样的描述，这个问题也就更加复杂了：如果我要叙述一棵棕榈树，当我站在跟前时，它就成了我的经历，那么此间浮现在我脑海里的就是（棕榈树）这个外来词。伴随着它，这棵树本身，连同鳞状树干和合抱的扇叶一起都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了。比如说，我可以一再把正好又从南北窗户前飞过的雪花重新命名为风、草、“云杉”、“赤松”（父亲的可用木材）、“天竺葵”、“莳萝”。然而，又比如说，当这个在内陆国家长大的人物要唤起他后来如此丰富多样地感受过的“海洋”情景时，海洋立刻就随着这个与自己不相干的“海洋”一词从你的视野里消失了。我始终就没有把握提起对那个孩子来说不过是名称或者压根儿就一无所知的事物。真的，连一切城市的东西，无论是“大广场”还是“有轨电车”，“公园”还是“高楼大厦”，这些对那个童年在乡下度过的孩子来说，是实在难以说出口的，比画得出手的。即使为了一个叙述那棵变得让人喜爱的树，也就是“悬铃木”的句子，近距离也是必不可少的，以便克服那自以为是的感觉，因为它那带有浅色斑点的树干和来回摆动的果球如此经常地把他从那乡巴佬的沉思中拖出来，使他喜笑颜开。对他来说，这种树就代表着融为一体的南方和城市——也像我面对柏树时一样，本来它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同时却又让我那样感兴趣，犹如从远方看去苍天之下那片虚幻的哭诉墙，并且告诫

自己说："事情肯定就是这样！国外的这些事物与家乡的圣像柱和黄杨树一模一样，都是我不可分割的部分。"此时此刻，我又这样告诫自己了。

能够从容不迫地思考这一切，这就是满足：仿佛在这准要随着诅咒而来的平静中才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无论怎么说，为每一个所经历的事物重新找到为之命名的规则，这是一次什么样的考察旅行呢！愿你们这些信徒幸福吧！该死的边缘人？！难道说在另一个语言里就没有那样一个词语来表述这个被"无止境地在这个世界上被推来推去"的人，以及相应的格言："异乡的门将会猛地撞上你的脚后跟"吗？

然后，晚班公共汽车行驶在维帕瓦平原上，穿过最后的山谷隘口，来到喀斯特海滨高地前，早就变成了夜间车。透过车顶窗，月亮映照到车里，几乎原地一动不动。汽车终于直行了。在之前许多盘旋和转弯行进中，我失去了方向感，直到在一个停车站的客店招牌前，才又回过神来。招牌上画着葡萄和鱼，给人一种静谧的生活景象。接着映入眼帘的是第一棵葡萄，犹如黑暗中闪现出的一个标志，随之而来的就是大片斜坡葡萄园边上一行行闪烁的葡萄。在挤得满满的汽车里，人们七嘴八舌说个不停，连司机也和坐在自己旁边折叠座椅上的乘务员（长途公共汽车里特有的人物）说个没完没了。与此同时，喇叭里也播放着广播节目，民间音乐与旅行速度齐头前进，一再被穿插的信息打断了。在这样的场景里，那些士兵扮演了主要角色，他们不是拥在中间走道里，就是挤在后排座位上，一个不时地坐在另一个的腿上，这一站成群结队地上了车，下一站又一窝蜂似的冲下去，随即消失在石墙后面。在长途行驶中，每个钟头都少不了休息。司机时而把车停在客栈前的小酒店旁，并告知停歇时间："5分钟"或"10分钟"。我每次都跟着一起下车去，尝尝当地人一口就干光的葡萄酒。没过多久，我就觉得，仿佛自己从现在起将永远是这辆夜间长途公共汽车的一员了，是那群喋喋不休的、麻木不仁的、无法确定的乘客的一员了，而且仿佛我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生命里程。车里的座位被撕破了，无盖的烟灰盒里粘满了口香糖，一路咯咯吱吱响个不停。在这里，一切既是速度，同时又是惬意。我不是有时候真的就觉得自己到了安全地了吗？

当我们最后一次歇息后上车时，我们之中多了一个陌生的士兵。他身着制服，却没戴帽子。他手上提着一把包扎得严严实实的枪。车一开动，他就把枪竖着夹在两腿之间。他和自己的同伴分开坐着，就在我的前排。我望着他的侧影，而不是那武器，断定会发生什么事。是我们吗？是这个士兵吗？是我吗？注意力本身就是答案了。我注视着他的头顶，头顶旋多处断开了，我从后面在其中看到我自己了。剪得短短的头发，直立在头顶上，呈现出一幅双影图像，一个年轻士兵和一个同龄的无名小卒的双影图像。这个人或许毕竟会感受到他是谁（如果被一个第三者描述，他每次都知道自己不是被低估了就是被高看了。那个自己的图像——如果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一个图像的话——他从来都不会相信的，然而，“我是谁？”这个问题常常变得如此紧迫，就像突发的祈祷一样）。他终于在自己面前看到了来自童年的主角，自己的双影人。这时，他完全确信，在这个世界什么地方，这人与他同样一起长大了，并且完全确定，这人总有一天干脆就会在这里出现，作为好朋友，不声不响地理解他，为他开脱，甚至不像自己的父母那样，只是一味地看透他。反过来，他对他也一样，怀着认知的喜色或者只是轻松地叹口气。他终于看到这个可靠的镜像了！

这个镜像首先向他显现出一个肯定人人都喜欢的形象。一个年轻人坐在那里，一点也不引人注意，从外表上看几乎与他的同龄人没有任何区别。然而由于他独自待着，并没有刻意离群，却显得鹤立鸡群。他周围发生的一切，没有他察觉不到的，可是他只关心与自己相关的事。在整个行驶过程中，他目不斜视，脑袋始终直直地向着正前方，身子从座位上挪都不挪一下；一对眼睛半睁半闭，睫毛几乎一动不动，给人一种沉思同时又警觉的形象。他可能正好在想像着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似乎同时既不中断自己的想像，又会用一只手镇定自若地接住那个谁都想不到从行李网掉落到旁边人头上的包裹，转眼间又把它放得整整齐齐的。看样子，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只是眨了眨眼睛，这也许是冲着南极圈里一座山而去的。尤其是那一对耳朵，它们表现出了同时感受在场的和不在场的东西的敏锐，对这个年轻人来说如此与众不同：它们觉察到了行驶中的汽车里的每个响动，同样又可能觉察到了一条在同一瞬间崩裂的冰川，那些在地球各个角落的城市里正拖着步子摸着走去的盲人，或者那条在家乡的村旁此刻一如既往地流去的小溪。与此同时，它们除了薄、透明、纤细和微微翘起外，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征，同样也一动不动。这时，你会心想着，它们在不受任何影响地行动着。真的，是周围独一无二的行

动者，是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集合点，这个人简直整个都成了耳朵。这想法无疑更可能来自那活似雕像般的姿态，一个严阵以待和作好最坏准备的人的姿态，整个行程中保持不变的姿态。无论发生什么事，他时刻都准备好去应对，虽然会因此受到触动，却不会为之吃惊。

这就是行程。到达兵营地时，这个立式雕像自然就失去力量了，只剩下零零星星变换不定的图像，伴随着每一瞥目光，就是另外一个图像。在后来几年里，我经常来到维帕瓦这个地方，并且把斯洛文尼亚“神圣的”纳诺山（白色的、孤零零的石灰石，行人的旅伴，旋转着，变换着形象，同样滋养着心灵，像许多普通国货上的图案和商标一样）山脚下的村庄、城市、“庄园”与同名的水流（许许多多的泉水，一眼挨着一眼，它们完全无声无息地直接从岩缝里汩汩流出来，汇聚成一条条水沟，像小池沼似的，同样无声无息。然后一下子统统聚集成一条独一无二的河流，汹涌澎湃，回响在石屋之间和一座座石桥之下，在水流的风浪里冲卷走岸边树木，也就是野无花果树悬垂的枝条，浪涛滚滚地冲进宽阔的山谷里，随即又在那里平静下来了）连同以其命名的葡萄（白色，像野草，而且有点苦涩味道）一起感受为一个我一再想要看见的地方，越久越好，为了不忘记我会成为这个世界，而且这也正是我对自己本身和这个世界期盼已久的。然而，第一次到那儿时，我只是把目光投向那个士兵了，现在不得不使他蒙上阴影，直到发生不寻常的事件。我很兴奋，同时也很冷静，小心翼翼，像密探一样：这期间，我经历了一些事情——可没有任何事情像我的双影人这样闻所未闻。此时此刻，压根儿就没有必要小心翼翼。我或许都可以把鞋踩到另外那个人的脚后跟上，而他或许连头都不回一下，继续径直走去。他始终用左手紧握着那杆包起来的枪，可在我看来，那空着的右手显得更加重要，拇指和食指形成了一个圆圈。我先是跟着他进了电影院。一到人群里，他一下子成了个喜笑颜开的人。接着来到一家名叫“游击队员”的酒店里，那里只有服务员和我是平民。我假装成什么人呢？惟一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就是我。士兵们都对我视而不见。

那个士兵加入到其他人桌旁，只是当个听众。在这里，一幅幅图像开始跳跃不定了。我时而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觉得看到一张脸孔，

上面的表情以十分之一秒的频率在变化着：我眼睛一刻也不离开的这个双影人也在这样变换着他的表情。严肃变成了愉悦；愉悦变成了嘲讽；嘲讽变成了蔑视；蔑视变成了同情；同情变成了心不在焉；心不在焉变成了孤独；孤独变成了绝望；绝望变成了黑暗；黑暗变成了幸福；幸福变成了无忧无虑；无忧无虑变成了满不在乎。期间，他压根儿就没有在听，时而让一只苍蝇弄得没有心思，时而被外面楼道里打乒乓球的人搞得晕头转向，时而又被那闹哄哄地响彻大厅的自动投币点唱机牵走神了。当他真的洗耳恭听时，便表现为这个空间的中心人物。引人注目的是，有人从他身边走开了，总是又有新人凑上前来，向他叙述他们的事情。即使他独自一人坐着，周围的人却都注视着他。看样子，仿佛他的同伴们不是等待着他的一个信号，就是更多地等待着他出洋相。真的，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遭受折磨的人，一个受到别人窥视的人，因为他融一切于一身，然而久而久之却什么都不是。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这样或那样来和他较量。而他也意识到了这一切，与旅途中截然不同，逐渐失去了那绝对让他出类拔萃的东西，失去了自制力。他觉得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自然的。这时，他自己变成了最不自然的东西。他不仅不断地变换着神色，而且也变换着姿态。他跷起两条腿，又伸开它们，再把它们收拢到椅子下，最后又徒劳地试着把蜷起的右腿随随便便地搭在左膝上。从这整个形象中，那曾经把从容、警觉、温厚和首先是纯洁感染给这位观察者的远近并存，美好的远近并存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扭曲的形象和令人反感的乱作一团；两眼呆滞，两耳发红，两肩倾斜，一只手握成了拳头，伸向酒杯，并撞翻了它。那么我是这样吗？是旅程的结束，梦幻的结局吗？这个问题变成了吃惊；吃惊变成了厌恶；厌恶变成了对厌恶的认识（对自己，对别人，对生存的）；厌恶是我们这个家族的病态；对这个病态的认识变成了惊奇；惊奇变成了中断。那么我所遇到的这个双影人到底是什么呢？是朋友？就像那个孩子曾经希望得到的朋友吗？是对手？就像不会再比他更可怕的、从现在起一辈子都陪伴着我的对手吗？——连答案都成了一个变换不定的图像：朋友—对手—朋友对手—对手朋友……

快到午夜时分，客人们都离开了酒店。古朴的沃利策牌自动点唱机靠着后墙，上面盖着一个穹形玻璃罩，里面有一个黑色的圆盘在旋转，弥漫在闪烁的灯光里，被一个抓臂托举起来，直立着像一个轮子。看这景象，如此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音乐不管怎么说只是弦外之音而已。那位士兵和我，我们俩都望着同样的方向，目光穿过这又大

又昏暗的空间，同时伴随空间尽头轮子的旋转——在灯光下闪闪烁烁的条纹——我又看到了另外那个人的分头线，怪模怪样，像一片三角洲。

我们俩走出酒店，我又跟在他后面，两人站在空空如也的广场上。广场另一边围着一排帝国时期的石质地灵雕像。两人看着沥青地面，我们的祖国，又仰望着月亮，我们的家畜，再望向什么都没有的一旁。噢，斯洛文尼亚语，还有什么更活生生的语言呢？对二人的所作所为来说，它拥有一个特别的表达形式，就是双数形式；其间也在这里濒临消失了；惟独在文字里常用！

我们沿着河绕道去兵营里。这时，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在一片沙滩前，我看到的不是那个士兵，而只是他系着鞋带的鞋子留下的印记，在这地上纵横交错，一个印记多次盖着另一个，所有的印记都模糊不清了，边上满是泥团。看样子，仿佛在这个圈里刚刚发生过一场生死角斗。

在兵营一扇窗前，我才又看见他了。他站在黑暗里，可是我认得出他的身影。他手里拿着一个圆东西，可能是个苹果，或者也可能是一块准备投掷的石头。当他抽起烟时，瞬间显现出了那张如此熟悉而又可怕的面孔。像在旅途中一样，我又一次感受着那双审视的眼睛。然而，我同时又想起了一个什么都不愿意发现的探询者的眼睛，取而代之的是，让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巡视着那陌生的东西的范围，并且使之扩展蔓延。

那是一个温暖静谧的夜晚，我发现那儿停着一辆车，车门敞开着，顺便就钻进去了。我伸展四肢躺在最后一排长座上，拿海员背包当枕头。起初并不舒服，过了一阵子，这就是我容身的地方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入睡。汽车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仿佛立刻就要开动似的。月亮映照在我紧闭的眼睛上，刺眼得就像探照灯一样。我想到了秋天和服兵役的日子，一下子觉得和现在不一样了，可以想像了。一生中的所有努力，我都是独自付出的。而且我向来就是这样，过后又缓过气来，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人是不可能满意地回顾自己的。可对那些士兵来说，我这样想像着，在共同翻越过一座

山脉或者架设起一座桥梁以后，才会使另一个确信这些事实，就是因为他们作为团体，躺在路边什么地方，个个都同样筋疲力尽。我想使自己筋疲力尽，一再如此。我已经不再是乡民了，也没有成为工人，所以，精疲力竭是我惟一的自我辩护。

然后，我在思考着服兵役资格考试之后的那个讲话，是一个从边防城市专门赶过来的训练军官讲给这些乡村小伙子听的。这个军官晃动着脚跟，拳头敲击着讲桌，目光凝视着远方，并且在那里觉察到了英雄墓地之间那冰冷的冻原风。他深深地吸口风，接着以独一无二没完没了的吼叫声把它又灌进站在自己脚跟前一伙懦夫和胆小鬼的耳朵里。随之，伴随着破锣似的吼叫，他发出了最后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挑战——“任何美好的死亡都比不上战死在沙场上！”——在共同唱了一再为歌词而冷场的国歌以后，他收起脚后跟，用手背轻轻地拍了拍额头，穿过一个活门，急急忙忙地回到自己的地狱里。对这个年轻的菲利普·柯巴尔来说，这是第一次遇上了一个疯子和对公众有危险的人。相反，在他的同龄人眼里，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件。也许直到今日，他们依然惟命是从地臣服于他，就像当年在那个专为一次讲话遮得昏暗的区首府“多功能厅”里时一样。不过，这次对孤独的经历，不也同时放射出了解放的光芒吗？

这个躺在汽车里的人，最后看见自己面前有一个海峡，并且已经进入战时状态了。除了两个岗哨外，这个世界上连一个人也没有，一个在海峡这边，一个在海峡那边，两个都远在外水域里，人人都站在一个狭小的、在海浪里晃来晃去的圆盘上，而且有一个声音说，你立刻就会感受到，为什么战争会是惟一实际的东西。

等我醒来时，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没有恐惧，只是陶醉。汽车停下了，然而是一个陌生的、色彩异样的地方。刚才还发着红光的月亮变成了一个淡色的白日月亮，是天空上惟一的云朵，圆圆的，小小的，与又圆又小的太阳正好相对。我不知道自己怎样从一个地方到了另一个地方，至多不过想起了离合器频繁转换和灌木条掠过车窗玻璃的响声。折合门敞开着，一下车，我碰到了司机，他从容地——现在说起这一切来，只会像童话一样——向我说了一声早晨好，并且让这个似曾相识的小伙子来共享他的早点。

汽车停在空旷的路段上，不过有一条田间小道通往一个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村子里。然后，乘车的人们也从那里走过来，大家都一

下子出现了，像从同一个家出来似的。这里想必就是始发点。他们编队移动着，穿得像是外出什么地方去上班。其中有一个警察，他身着制服，走在其他人一旁，充当着元帅角色。他们刚一上车，离开视线，那村子看上去就没有人烟了，犹如打眼看上去时一样，一座脱离了历史的浅灰色的石头纪念碑，一座周边地区空荡和多风的纪念碑。我一走进里面时，当然听到了收音机声，闻到了汽油味，碰到了一个丑陋得令人失望的年长女人，她把一封信投进了常见的黄色邮筒里。与此同时，她为什么非要把我当作“终于又一次回家来的那个过世的铁匠 的儿子”来欢迎呢？请我坐到院里的长条椅上，四面高墙挡着风，给我端来一盆水让我洗洗，给我缝好上衣缺失的扣子，为我织补破损的短袜——与哥哥不同，我压根儿就不会爱惜自己的东西。一件衬衣，他穿上十年还像新的，而我刚穿上一天就扯破了——，给我看她女儿的照片，让我住在她家里呢？仿佛童话规则就这样，我一个问题也没提，既不问这个地方的名字，也不问这个虚幻而自由的王国的名字。我在梦里越过了这王国的边界，之前有过渡，而之后就没有了。到了这里，与在路上截然不同，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熟悉的，所以我也明白自己已经到了喀斯特。

伴随着铺着漆布的餐桌，沉湎在神话里的惊奇和不安很快就让位于一张报纸的头版头条（通过另外一种语言，再也没有了掩饰），一个地下蓄水池，上面有一块牌子提醒你，在那次世界大战中，这个井状空间曾经是抵抗战士的秘密电台所在地。尽管如此，喀斯特连同失踪的哥哥一起，就是这个叙述的动机。可话说回来，难道一个地方是可以叙述的吗？

早在孩童时，喀斯特虹吸管流一开始就被弄错了。我从小就把哥哥的果园所在的那片碗状凹地当成了一个灰岩坑，因为它是再也明显不过的喀斯特地貌。就是因为有了它，才使得我们这片不起眼的雅恩费尔德平原引人注意了；多布拉瓦森林里的几个弹坑正好够垃圾坑的大小，德拉瓦河如此深深地隐藏着，流动在特罗格峡谷里，既不能行船，也不能载舟（最多不过是游击队员当年划着双把大木盆夜间渡过）。而在林肯山村里，肯定没有一个人曾经意识到生活在一条真正的、十分重要的河边上。这片平地上的凹地是我们这里惟一值得一看的东西，不是因为其形状，而是其独一无二性：这位学生自豪地心想

着，这儿如此远在喀斯特北面，像那儿不计其数的地方一样，也有一个地下岩洞塌陷了，土壤从上面垮下去了，从而形成了这片肥沃的碗状土地。在我孩童的心灵里，凡是曾经发生过事情的地方，将来还会发生事情，完全另外的事情。而我望着这片被信以为真的灰岩坑的目光，既是期待的，同时又是畏惧的。

后来，当我受到那位（地理和历史）老师的启发时，这表象，这多年的表象早就根深蒂固了。如果说我有一个想往异地的目标的话，那就是喀斯特。与此同时，除了光秃秃的岩石镶嵌在其中，密密麻麻，除了一个个灰岩坑，坑底尽是红土，我对它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概念。在我的回忆中，有一次，那个半大不小的家伙坐在家里的窗台上，神往那群山之后不为人所知的海滨高原时号啕大哭起来，那样猛烈，这哭声和孩子有时候的哭叫不一样，拥有一种惊叫的力量：我现在认识到，那是他未被问及，自觉自愿地从自身发出的最初的东西——他第一句自己的话。

又是那个老师，我现在从他那里继承来这个方法，为我叙述喀斯特的努力开个头（虽然与当年在窗台上的恸哭相应，在我的心里，有一个单纯的“噢，被加上翅膀的岩石！”的声音）。他虽然用一声惊呼开始了他心爱的历史，即玛雅人的历史，但不是从历史事件，而是从地下的演变而来的。他认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是由于土地特性预先确定的，只有当土地一同参与到每个阶段时，才可能有规律地叙述；惟一真实的历史撰写必须始终和地理研究同时来进行。他甚至敢于单从一个国家的各种地貌中来判定一个民族的循环，能不能在那儿居住的人群中形成循环以及民族。玛雅人的国家尤卡坦半岛也是喀斯特，一片塌陷的灰岩平地。然而与这个喀斯特，也就是“喀斯特鼻祖”的里雅斯特海湾的高原不同，世界上所有可以相比的地貌或许都从这里获得了自己的名称，是它的“翻转形式”：在地中海之上的地区，到处都是岩灰坑。而在热带地区都会翻转向上形成塔形和锥形地貌。在欧洲这样的地方，少得可怜的雨水以及从大陆腹地流过来的河水被多缝的灰岩就地吞没了。而中美洲地区充沛的雨水则又从岩石孔里冒出来了，甚至成了海滨之前的淡水井，含盐的大西洋中的淡水井，而玛雅人当年就是划着小船出去汲水的。

所以，按照这位老师的学说，生活在原始喀斯特的人无疑就是玛雅人“翻转的民族”。他们不是去田间劳作要下到灰岩坑里，而不是

攀上梯田吗？他们的圣地不就清清楚楚地展现在那光秃秃的山包上，而不是掩藏在原始森林里吗？对他们来说，岩洞不就是他们的庇护所，而玛雅人则把人当作祭品呈献在其中吗？他们所有的建筑物——不仅是庙宇，也包括偏远的田间小屋——不就是用坚硬的石头，而不是用木头和玉米叶子建造的吗？无论是主建筑还是鸡舍，是门槛还是屋顶，是这儿还是那儿，甚至连排水管也不例外。

尽管如此，在我的记忆里，那些从田间小道上走向汽车的人和那个招待我的、非常肥胖的女人以及所有跟随她的人变成了一群印第安人。这些人是一个民族吗？是斯洛文尼亚人还是意大利人，这在我看来，无论如何不是他们的主要特征。可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这些喀斯特人就太少了，尽管他们拥有广阔的疆土和数以百计的村庄。或者也许他们是许许多多的人：无论怎么说，我向来只是看到他们要么单枪匹马，要么三三两两。如果说有许多人在一起，最多不过在教堂里，在汽车里和火车上，以及某个喀斯特影院里。要么一个人站在公墓里；要么一个或者两个（通常是夫妇二人）在自己的灰岩坑下面耙地；要么三个一堆（通常是老兵）坐在石头酒店里玩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同桌吃饭，或者形成一个圈子，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举行集会。虽然这里也不缺少铁托像，可我觉得，仿佛在这片高原上，无论是国家权力还是政治制度，仅仅是形式上的东西而已。在这片不毛之地上，可利用的面积真的是那样稀少和碎小，集体压根儿就行不通的：在灰岩坑底，田块就一棵苹果树的影子大小，远离村庄，只能被单个人占用。那么自然要问，为什么托尔敏的那次农民起义也蔓延到了喀斯特呢？他们在这里不再仅仅为了那“古老的权利”，而是喊着“我们不要什么权利，我们要的是战争，而且整个国家都会加入到我们的行列里”这个口号，为“最终的解放”而战斗。为什么在后来几个世纪里，这里建立的学校比别的地方都要多呢？为什么我在想像着，那个沃凯因的服务员和那个维帕瓦的士兵走在一群无特征的人堆里，相互立刻就会认得出来，哪怕只是瞥上一眼都会作为从家乡高原上溃逃到这里的人相互致以问候呢？在那里，地球依然是个圆盘，而不是新时期的球体。尽管如此：在喀斯特，我没有遇到一个独立的民族（连同循环），相反只是一群对他们来说四面八方不是“下面”就是“外面”的居民，共同概念和地方意识相当于一个世界城市的意识，从村庄到村庄的区别与那儿各个城区之间的一模一样（在哥哥的词典里，整个斯洛文尼亚的喀斯特拥有最多的语言发源地），只是每个城区独立存在，离下一个步行个把钟头远，坐落在真空地带里，而

且没有一个城区叫做贫民区、市民区或者富人区：个个城区都通公路，几乎没有一条有名字，同样都是上坡，城南边，也许在高处教堂前长着一棵雪松，替代了城北边那棵栗子树，而城西边，也许在阵亡烈士纪念碑上多了一个意大利名字。无论是临时住处还是别墅都是不可想像的。那惟一的城堡坐落在圆圆的山顶上，孤寂，衰落，像一座荒漠城堡。它是由威尼斯人建造的。他们像之前的罗马人一样，把喀斯特的树都砍光了，用来给他们造船，这样才造就了这吞没流水的灰岩地区。在这从前单调和一望无边的氛围中，那些被锯成弧形的首领帝国的山巅成了与之格格不入的多余的修饰。

这个民族，在家乡一再被一些人引证，又一再被一些人召唤：在喀斯特，我并不因缺少它而感到不幸；也没有找到一个被驱逐的国王来悼念；也不再需要像在家乡时一样，去寻找那山间小道和盲窗，当成那个沉没的帝国的印记。这里的房屋不用基石和装饰条纹就可以存在下去——远望北方，纳诺山山脊上方聚集着我那中欧的云带，我说：他们＜b＞别无选择＜| b＞！

这样的自由自在是从哪儿来的呢？当时首次四面环顾时我就如此自问。一个地方怎么会意味着像“自由自在”一样的东西呢？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我真的又多次踏上了喀斯特，背着背包（那儿惟一有这样一个东西的人），提着提包和箱子——为什么我觉得，仿佛手臂总是空着没事似的，仿佛从第一天开始，那个到处与我形影不离的海员背包从我的肩头消失了呢？

我首先想到的答案只有喀斯特风（也许还要加上太阳）。那是一种通常从西南方向刮来的风。它从亚得里亚海边升到高原上来，作为持续不断的、坐着或者站着几乎都感受不到的气流又掠过高原。一进入这样的风里，那个只会在喀斯特几个简直隐蔽的地方才看得到的大海就是一个永不平息的强大想像，远比你真的站在大海边上，或者甚至驾着帆船远远地向外自由自在地划去更加可信，更具感染力。要说脸上能够感觉到盐分的存在，这无疑只是一种幻觉而已。可路边像百里香、鼠尾草、迷迭香等野生草药（全都比我们菜园里的更要坚韧、精细和天然——每片叶子和每个精细部分同样早就成了调料的精华），几乎已经如同非洲的多节薄荷的香包，花白蜡树的花蕊，从树木里浸滴出来的树脂，让人想起一种浓烈饮料的刺柏球（没有陶醉于

其中的危险），这些就不是什么幻觉了。这种风不只是因为是从低处的海上刮来的而成为上升气流：它极其柔和地吹拂到你的腋窝下，从而使走道的人觉得是被架着行走的，哪怕他是迎着风走动也罢。不就有古老的海滨民族吗？首先在南方，她们最盛大的节日，就是在一定的时候，再回到被遗忘的高原上，在那里隐秘地为风举行庆典，可谓让风来透露给她们世界规则的秘密。

我也一再把喀斯特风感受为这样一种秘密透露——可是透露什么样的规则呢？到底有没有规则呢？有一次，母亲向我叙述了我降生人世的时刻：虽然我是她继另外两个之后最后一个孩子，可在娘胎里却待过了头，后来再也一动不动了。我终于来到世上了，开始哇哇叫了一声以后，便发出了一声大叫，接生婆为之用了“像一声胜利的号角”来表达。母亲这样叙述，也许是要让我高兴。然而与此同时，我感觉到的是恐惧，仿佛这是在叙述着我的死亡，而不是降生。这里描述的不是我初来到人世的时刻，而是我的末日，令我窒息，感觉就像我在那个号角声中正在被拖到刑场上去似的。实际上，我一再责备母亲生了我。这种责备根本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我随意顺口说出来的，这更多是一种无奈，而不是什么诅咒。有时是因为对手跟踪我，有时是因为冻疮，或者哪怕只是一个倒刺火辣辣地作痛，有时候只要一望出窗外不由自主就这样。母亲把我的哀诉放在心里了，一到这时候，她每次都泪流满面，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把它完全当回事。在这个正在成长的年轻人身上，有某种坚忍不拔的东西要与厌恶和不满的情绪争个高低，这就是期待的快乐，它自然无声无息，因为它没有对象。感受着喀斯特地貌，他现在领悟到这个对象了，而且他可以告诉自己的母亲了，尽管已经来得太晚了：我喜欢来到这世上。那么喀斯特风呢？我胆敢用这个词：它当年为我举行了洗礼（而今又给我举行洗礼了），直到头发梢上。然而，这样的洗礼风却并没有赋予自己的受洗者一个名称——“不可名状”不也属于“快乐”吗？——而是把名称赋予了小车道上的绿草带、各种树木的响声（声声都不一样）、漂在一洼水面上的鸟羽毛、布满窟窿的岩石、长着玉米的灰岩坑、长着苜蓿的灰岩坑、长着三棵向日葵的灰岩坑：那些圆坑里的事物。从这吹拂中，我所学到的比从最优秀的老师那里还要多：我所有的感知器官同时都变得敏锐了，在表面上彻底杂乱无序中，在远离人烟的荒漠里，它为我展现出了一个接一个的形态，一个清清楚楚地与另一个不同，一个是另一个的补充，我发现连最无用的事物都拥有了价值，并且能够给这些事物一起来命名。要是没有喀斯特风，那么要说起那

个无风的克恩滕村庄来，我可能什么都叙述不出来了；我的墓碑上或许就没有连续的碑文了。这不就得出一个规则了吗？

可是那个反向风，也就是那个从北方吹过来的臭名昭著的布拉风[16]是怎么回事呢？它寒冷刺骨无与伦比，呼啸着横扫过这片高地，过后你就再也闻不到芳香了，你的眼睛和耳朵都没用了。一刮起这样的风来，当你在野外什么地方时，就有路向下通到灰岩坑里。灰岩坑坐落在风的下方，喀斯特的野生动物随之也聚集在灰岩坑里，不用相互惧怕了，一只敦实的小鹿旁边就是一只野兔和一群黑野猪。在碗状坑地的圆形地平线上，一棵棵树均匀地向一边倾斜着，而在树下面，高高矮矮的野草几乎一动不动，豆蔓或者马铃薯秧苗几乎毫不晃动。即使当你遭到高原上这种暴风袭击而没有灰岩坑当屏障时，你只需要躲到一道石堤后面，那儿垒着许多这样的石堤，一瞬间便从呼啸的冰冷里沐浴在平静的温泉里。在这屏障里，你要么有的是时间去回想古代那场战役，在两方军队的对峙中，布拉风不是把他们的箭和矛分别越过敌方的脑袋带走，就是分别又投射到他们的脚跟前；要么就像在吹拂的西风中欣赏着自然事物的价值一样，有机会去观赏那些人造物，那一道道石堤，以及其中的一个个小木栅门。栅门是由从近旁的灌木丛里剪下来的枝条组成的平行图案，那样细长，那样弯曲，间隔又那样大，从而在这其中，一个栅门、一扇门、一扇大门、一扇小门的原始图像变得可认识了：像大自然为形成水晶需要间隔一样，审视的目光为领悟那一个个原始图像同样如此。即使一条后来消失在草原草丛里和荒漠岩石中的路（整个喀斯特交织着这样迷惑人的目标希望），也并不是任意一条踏出来的小径，而是那条路，犹如一座建筑物，因为至少直到绿洲或者灰岩坑使用面积的高度上，它呈现为由边墙、路基坚实的车行道和隆起的中间带清晰地组合而成的三位一体。

这些现象，在外面无人居住的地方独立存在着——在这片高原上，没有哪儿会存在一个偏僻的独门独户——，而在村庄里就连在一起了。恰恰是布拉风把独立的个体聚拢在一起了，并且让你认识到连为一体的自卫能力和美妙。房屋朝北一面石块犬牙交错，墙壁上几乎连个小窗都不留，同时常常像教堂侧墙一般长，弯曲成一条柔和的大弧线来抵御狂风。它如此绝妙地避开了狂风的侵袭。院墙比院内有些无花果树还要高，向上砌成圆形，大理石大门足够一辆王公贵族的马车出入（包括与门第相配的白色路缘石和门弧顶上的IHS花押字[17]）。院墙围成一个四方形。你刚刚还被那暴风的呼啸弄得晕头转向，可你

一走进去，就像进入一个陈列室，一个汇聚了各种珍品的市场，锯木架与葡萄棚、干树枝束与玉米棒子墙和南瓜堆、藤条车与木栏杆、支撑的敞棚子与劈柴垛子（把你的榛子棒和包着蘑菇的手巾放到院子的长条凳上，它们与这个图像太相配了）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喀斯特的房子从外面看是防御堡垒，一个与另一个相互重叠，上面一个个烟囱标志着一户户独立的人家。房子里面显得越发秀美了。喀斯特的房子不需要什么圆筒形穹顶，只是外面随心所欲地隆起来就行了，以防御气候的侵袭。

在那里，我没有在一座房子里看到人们称为艺术品的东西：可是后来为什么几乎每看到一家院落——哪怕只是顺便路过也罢——，我就心花怒放，心旷神怡，犹如在观赏图片展览，而且是最壮观的，是各个神圣时代绝无仅有的珍品呢？为什么一个坐面仅仅容得下小孩子屁股的小板凳却吸引着我郑重其事地坐上去呢？这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喀斯特人如此众多的器物都再现了这片地貌的主要形式，也就是灰岩坑碗一般的圆形；所有那些可爱的篮子、用过的马车、呈现凹面的坐凳、顶上做成弧形的草靶子似乎无一不崇拜着这片土地上那惟一肥沃的东西，即母亲灰岩坑。教堂里那尊中世纪时期的木制圣母像同样也挺着相应向前隆起的大腹。

要是没有喀斯特地区这些托架和工具，我也永远不会去欣赏我的祖先留下的那些东西，既不会去欣赏哥哥留下的果园，也不会去赞叹父亲的屋架和家具。直到这个时候，我总是希望我们这个家能够加上些点缀，不光留一个盲窗，而且还要在里面放上一尊雕像，旁边也许还残留着百年之久的壁画碎片，屋子里挂着装饰壁毯，或者一张罗马拼贴画残迹；哥哥的手风琴放在一个角落里，上面是珠母色按键，在那里闪闪烁烁，成了一件装饰品，而且每隔几年，用油漆滚子给墙壁涂抹出新的图案来，这就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了。总而言之，一提起我们这片平原来，都说她的居民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实实在在。在他们的意识里，除了有用的东西和最简便朴实的东西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可是现在，我正好在这样的东西里看到了我多么盼望能够找到并且指望从这些添加物和附带物中获得的表现力：父亲的桌子和椅子、窗樘中的十字架和门框一起不仅使这个空间适宜居住，它也弥漫出某种精美和可爱的东西；不仅证明了一双精巧能干的手，而且流传给了后世某种这个在行为举止上常常变化无常，性情暴躁，显得严酷的男子汉惟独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和继续传递的东西，而且这个无

非就是全部的他：站在他本人身旁，你会感到拘束和胆怯，而面对他的物品，你就可以舒口气了，并且会从中学到洞察力。所以，我觉得喀斯特大门上的字母IHS与年代紧紧地连在一起，由父亲锯好后安在木谷仓的山墙上，当作干草的通风孔。从此以后，我仰望着这个犹如烙刻到那饱经风吹雨淋、在阳光里变得灰暗的厚木板三角形上的图案，就像看到了那个绝无仅有的东西，无论如何只能是艺术品的东西，而且不需要在这座房子上再添加任何装饰了。哥哥果园里那条绿色小道，虽说短得不能再短，可在喀斯特，它汇入一条接纳了北国条条道路的、通向海洋水平线的、端直的喀斯特—中心带，如同水沟入口那儿的石堤一样，哥哥当年修建它是来保护腐殖质层的，此间不过是成了一堆废墟，现在却延伸到那些完整的、匀称的、弧形的喀斯特—原野墙里——仿佛它在自己的阿尔卑斯山王国里仅仅这样沉于地下了，而在海洋附近这儿又露出来了，像第一天一样完好无损，被南方的太阳装扮起来了，就像去参加封顶庆典似的，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显高贵，仿佛以此要来显露。和中国长城并驾齐驱，也有一条欧洲长城横贯我们这个大陆。

可是，难道可以经久不变地信赖一个地区的事物及其居民的创造物吗？喀斯特那些风平浪静的日子怎么样呢？每个季节都有这样的日子，没有阳光，也没有在无世界空间中的云层形式，而在那光秃秃的地球圆盘上——既没有轮廓，也没有声音，更没有颜色闪烁——，一夜之间，那种生机肯定就灭绝了，你自己就是最后那个恰恰还有一丝气的东西。压抑，与任何别的地方都不一样，它没有局限于苏醒的瞬间，也无法被打鸣的公鸡和后来正午的钟声从数百个城区驱赶出去，因为这些同样都软弱无力（从孤寂的屋子里发出电视机的回响，公共汽车空空地疾驶而去，黑乎乎的扶杆，方向盘前的司机，像早就烧焦了似的，只是还被他们的制服支撑着）。在这样的日子里，没有一个死亡的星球会比这像用骨灰覆盖起来的喀斯特更惨淡。一到这时候，无数的骨架，也就是那些所谓的喀斯特沟田凸显出来了，像刀一样锋利，无法进入。然而，恰恰就是这个情景教给了正好只有一个城市才会教给一个乡民的东西：一种步态。

在家乡土地上走，就是简简单单地把路程置于自己身后，尽可能走直线，考虑到每条捷径，走弯路总是个错误，径直朝着一个目标走

去！惟独那些不幸的人，陷入绝望的人才会感受到一种无目的的走：他们就像失去控制一样，突然会疾速越过田野，盲目地冲进树林里，穿过藤蔓丛生的壕沟，不知所措地走到下面的河沟里。一旦什么时候有谁这样无所顾忌地径直奔去时，那你肯定就会担心，他再也不会活着回来了。母亲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后，就要立刻跑到村外去，实在没有法子，才把她锁在屋里了。她接下来几乎都要把门把手给弄断了。对乡里人来说，散步者的悠闲自得和漫游者的大步奔走都是陌生的，各种专业登山以及潜随捕猎也一样。猎人始终是外乡人。这里只有去干活，进教堂。也许还有顺道上酒馆，再就是回家。两条腿平常不过是运送东西的高跷而已，而身子就僵直地架在它们上面，通常只有在跳舞时，它们才会协调一致。一种引人注目的走并不是一个残疾人或者傻子的走，而是被林肯山村人视为妄自尊大的走。在斯洛文尼亚语里，他们有一个专门词，可以译为“走起路来一阵风”。

同样，在喀斯特，一旦风停息了，走也会招来一阵风，并且随着它，那些苦思冥想便悄然走开了。而那个伟大的想法又把我转向外部世界了，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会让人如此解脱：“朋友，你有的是时间。”也正是这有时间，它帮助这个乡里人获得了特别的步态，自然是一种步态，它随着一次次耸肩，挥臂和扭头，进一步指向了周围的人，而目光捕捉不应该针对某个确定的人（就像有时候一个生灵，一个人或者一只动物的特别观望会让你转过身去，寻找那闻所未闻的东西，想必别人这会儿在看着，而且按照他那轻松愉快的神情来推测，这只会是什么令人高兴的东西）。这样一种步态也包括，这个行走的人本身时而不由自主地，却越发自觉地四面环顾，不是出于害怕有跟踪者，而是出于对不停走动的纯粹兴趣，越无目的越好，并且确信同时在自己背后发现了一种形式，哪怕只是柏油路面上的小裂缝也罢。真的，确信找到一种步态，确信是地地道道的步态，并且确信因此成为发现者，这使我觉得喀斯特与另外几个我走过来的自由世界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这“起来，走吧！”也在别的地方经受过考验，无论是在干涸的小溪沟里，还是在大城市通往郊外的公路干线边上，无论在阳光明媚的白天，还是在更有感受漆黑一团的夜晚——可是，没有一次前往喀斯特似乎不是取决于我深信不疑会超越对新鲜空气的深呼吸，感受到新的收获。我对这样一个地区的力量抱以深切的期待，那样坚定不移，因为它每次都重新赋予这个有的是时间的人一个原始图像，一个原始形式，一个事物完美的化身，因此也没有什么缺憾，我或许会把它称作信仰。洗礼风像第一天一样起着作用，而这

位行走的人被它拥抱着，始终还感受着自己是个享受现实生活的人。为此，他当然不会无所顾忌地径直奔去，像个过路人一样，而是会放慢速度，转着圈子，走走停停，弯下身子：那一个个发现地往往就在你眼皮底下。他不需要强迫自己那样做。转眼之间，地貌和风就给他分配好了尺度。我意识到有的是时间，在喀斯特从来都没有着急过。只有疲倦时，我才会跑起来，那也是慢慢吞吞地跑。

然而，那些发现物不就是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吗？那不就是某种东西最后的遗迹、残余和碎片吗？它不可挽回地失去了，通过这个世界上的任何艺术再也无法拼合在一起了，而惟独这个幼稚的发现者还要为之想像出一种辉煌来。那些想像的原始微粒不就跟钟乳石的情况一模一样吗？它们生长在自己的岩洞里，在闪闪烁烁的烛光里预示为一种宝贝，而后被砸下来，弄到外面光天化日之下，落在强盗手里不过是成了灰色的石土豆，连任何一个塑料杯都不如。不，这是因为，凡是可以找到的东西，都是无法带走的。这里涉及的不是你塞满提包可以带走的东西，而更多是它们的原型。这些原型自我展现。发现者铭刻到他的内心深处，与钟乳石相反，在那里会变得活跃，变得有益，可以传播到任何一个国家里，经久不衰地传播到叙述的王国里。真的，如果说喀斯特的自然和造物是远古存在的话，那么这并不是在“从前”，而是在“开始吧！”这样的意义来说，就像我看到一个石檐槽时，想到的从来都不是“中世纪”，而是“当今！”（天堂般的想法），像在任何地方看到新建筑时一样，那么面对一个灰岩坑时，我也永远不会去感受那史前时期地面突然沉降下去的瞬间，而是从那空荡荡的碗状地形里一再可靠地看到了某种未来的东西升起来了，一团接一团，一种预先形式：你只需将这些东西留住就是了！我迄今没有在任何地方碰到一个像喀斯特这样的地方，它以其所有独立的部分（连同那几辆拖拉机，几家工作和超市一起）使我觉得就是一个可能的未来的雏形。

有一天，我在那里迷路了——常常是有意的，出于好奇，出于好学——，迷入了一片无路可走的荒原上，荒原上茂密的灌木丛和林立的石柱纵横交错。没过多久，我就再也不知道自己到什么地方了。有关这个边境地区，除了保密的军事地图，就没有任何别的详细地图可言了。从那数以百计的村庄里，通常越过田野走几步就是一个，风吹

过来的不再是生存信号，既听不到犬吠，也听不到孩子们哭叫（这些都是传得最远的）。我故意而艰难地走了数小时之后，拐来拐去，从许多荒废的灰岩坑旁穿过，红土坑里凸显出巨大的灰白色岩石，原始森林的树从其间冒出来，树梢伸到与这位行者齐脚跟的高度。我现在可以谈论荒芜之地了。我在这片地带里经历了缺水，也包括整体上是什么样儿：无边无际的荒漠，只是由于它的植被看上去是可以开发的。在徐徐的和风里，肯定已经有不熟悉这地方的人给活活地渴死了，耳旁也许到临终都回响着花白蜡树轻柔的飒飒声，而他觉得是一条清澈的山泉在潺潺地流淌，简直是天大的嘲弄。早就再也听不到鸣叫了（本来嘛，仅靠那些村庄边上，只剩下时而一阵声嘶力竭的鸡叫），甚至连蜥蜴或者蛇都不露面了。这时，快到黄昏时分，这个迷路的人站在那里，寻找一条穿过灌木丛的路，十分突然地来到一个和体育场一般大小的巨大碗状灰岩坑前，坑上面周围都被一圈又高又密的原始森林树栅封得严严实实的，只有当你挤过去的时刻，才会发现它。这灰岩坑看上去异常深，也是阶梯的缘故。阶梯镶嵌在石墙上，形成了均匀而缓缓的斜坡。每级梯田上栽的都是不同的果树品种，分别显现出别样的绿色，而最浓郁的绿色闪耀在下面那荒芜的，空荡荡的坑底圆圈里，比一个奥林匹克的泛光灯草坪还要神奇。如果说我迄今在所有那些灰岩坑里至多不过看到一两个人在劳作的话，那么此刻我惊奇地注视着面前这坑里的一大群人：在所有的梯田上，直到坑底下，小块耕地上和果园里同样都有不少人在干活。他们干得慢条斯理，尽善尽美，甚至从他们弯着身子和叉开双腿蹲在那儿的姿态中都散发出优雅的气质来。从那宽阔的圆坑里发出的回响，停留在我的耳旁。那是喀斯特原始的响声，既和谐又轻柔：耙地声。我只看到站立的人，他们要么半遮在树叶里，要么站在梯田葡萄园里，不是把那些显然弯弯曲曲的葡萄藤绑到桩子上，就是在喷洒什么，要么就在那小小的橄榄林里，仅仅可以看见一双双手。从阶梯到阶梯，至少都有一棵树总是另一个品种。在它们下面，甚至长着像桤树和柳树一类河谷低地树木，（我曾经听到一个阿尔卑斯山居民这样说，“这些玩意儿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树，而尽是些不成材的东西。云杉或者橡树，那才真的算得上是树啊！”）如此远离流动的水，简直不可思议。我在这里分辨着如此丰富多彩的绿色，从而或许能够给每一种独特的绿色起上一个特殊的名字，它们要是全部连接起来，亲爱的品达罗斯[18]，就会汇聚成另一首“奥林匹克颂歌”！最后的阳光好像要聚集在这灰岩坑里，像在透视镜里一样，线条分明地勾画和放大出了一个个细节。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道墙和另一道相同：这一道是由两排石头

砌成的，而下一道又在这两排之间加上一层土，而那个坐落在坑底圆圈边上真假难辨的岩石堆原来是一处住房，一座田间棚舍，圆锥形，石块向上越来越小，上面是一块地地道道的拱顶石，形状像一个动物脑袋，还有一个檐槽，从中有一条长管子引到下边的雨水桶里。地面上那个洞口并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缺口，而是这个“小饭馆”的入口，入口上槛宽如山雕展翅，上面真的刻着一个太阳钟。

这时，有人弯着身子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半大小子，手里拿着一本书，挺起身子走到一个男人跟前。而这个观察者又进入了父亲的田间风雨棚里，被包围在那木材气息和夏日炎热中。他从学校直接就去田里找父母，坐在那儿，趴在桌前做自己功课，光着脚，一个角落里放着上面盖有白布的篮子，里面装有熏肉和面包，旁边是果子酒杯，而在另一个角落是荨麻灌木丛，空间里没有穿堂风，可从灌木丛里一再飞起一团团花粉，描绘着那由木头节孔和木板缝线在地面上形成的阳光网，听到外面父母说话的声音，像是从田间两端彼此干着活要相遇了（先是三言两语告知的呼叫，接着就是斗嘴——父亲的诅咒，母亲的嘲笑——最后在地中间一起“吃点心！”）。一个人玩玩牌，听着隆隆的雷声，伸展四肢躺在长条凳上，进入梦乡，被一只黄蜂不断的嗡嗡声吵醒了。随之立刻从天空的云雾里急速地冒出整整一个轰炸机联队来。他吃起一个苹果，上面显现出鲜明的余象，是在树上被树叶遮盖时留下的，苹果把上粘着干瘪的花瓣。他走出棚子，自个儿挺起身子，走到一个成年人，也就是一个男人跟前，深深吸口气，发现这个田间棚舍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这个叙述者向来就坐在这圣像柱大小的洞穴里叙述着。

我向下瞧着那空间，它显得那样亲切，于是那样一股力量从深处涌上来了，从而我可以想像出来，即便是巨大的原子弹光也不会伤及这个灰岩坑一根毫毛，爆炸冲击波会越过它而去，辐射也同样如此。在这种预先认识中，我接着看到那些就在我脚跟前，在这片肥沃的碗状土地上劳作的人是人类的残存，经历了灾难之后，他们在这里重新又开始劳作了。真的，在我看来，这块隐藏在死寂的荒漠之中的地方存在着一种经济，一种况且自给自足的经济。而大地在这里始终还滋养着它的居民。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彻底失去了；虽然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大量存在了，然而从每个原始物质和每个原始形式里起码还存在着一种有生命力的样本。由于一切必然的东西既存在于手边，同时又很稀有，因此显现出了起源的美妙。而宝贵的不只是存在于手

头的东西，而且也包括一切出现在眼前的东西，无论是谷物还是石头上的蕨类植物——在这里，喀斯特人支持了我这样的幻想，尽管他们向来生活在贫困之中，遭受着一无所有的威胁，可除了玉米棒子、麦穗和葡萄束有数百个名称外，所有那些少得可怜的鸟儿和花儿也同样有许许多多的名称，全都听起来像昵称（无论怎么说既不是“伯劳鸟”，也不是“模仿鸟”，既不是“大戟鸟”，也不是“白头翁”），仿佛要用这许许多多的名称将这个物自身围起来，保护起来。这片沉降于喀斯特地表之下的种植园免受任何敌人侵袭，防原子弹，坐落在自由的天空之下。作为目的地，它的图像至今也没有离开过我，连同从田间石屋里咿咿呀呀那唱颂歌似的半导体收音机声一起。图像？幻想？海市蜃楼？——图像；因为它产生力量了。

虽然我在喀斯特的时间几乎只是走走停停，再继续走，可我从来就没有过通常会感受到是个废物和无所事事的人的内疚。每到一个新地方，那自由的欢欣鼓舞并不是来自什么超脱，我终于明白了，自己是超脱不了的，更多是心心相印。跨上这片高原门槛之后，太阳穴里就搏动起来了，我不是一再默默地说：“现在我们来到这儿了！”不是看到单枪匹马的我处在多数之中吗？应该像父亲的日常工作一样，堵住一个洞，缠上一条绳，劈劈松木柴火，有时候为母亲恢复健康做做仪式。那么我也想像着，用我对喀斯特的研究来服务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不仅是一件好事情，而且是一件伟大而辉煌的事情。许多动因共同汇聚到一起了：表明自己无愧于祖先，要以我的方式来拯救他们所代表的东西；成为那位老师名副其实的被如此寄予厚望的学生——反正是他惟一的。在与我想像中的对手决斗——奇怪的强迫症——中，令人折服地虚晃一枪；正好通过来到这遥远的荒无人烟之地，忍受着各种各样的困苦，来为自己赢得女人中饱含深情者的爱情——然而，有某种东西超越了这一切，我不妨称之为庆祝狂欢的冲动或兴致。

什么样的狂欢呢？向来信仰梦幻的我，对此的回答就是叙述一个梦。那些同样的旅客一再聚集在一个融班车和悬空缆车为一体的玻璃驾驶舱里，相互之间一句话也不说，共同前往喀斯特这个世界王国。过往的标志是一块闪光的、高高耸立的、蔚蓝色的天空覆盖之下的印第安纳石，每个孩子都可以攀登上去，那儿也是最后一个停车站。这

时，我们都到齐了。可是在继续旅行中，看不到这个王国什么东西，惟有这辆车在行驶，路途上如此宁静，仿佛车停着似的。这个旅行团里，人人都保持距离，自成一体，没有成双成对的。虽然我在大街上认识这个或者那个人，有窗口工作人员，有“我的鞋匠”，也有小店铺的女售货员，而且我们平日至少相互都打打招呼，可是上了车，谁都不再认识谁了。我们一动不动地面对面坐在那里，没有目光交流，共同在期待之中。我们总是从一个热闹非凡的、向所有人都开放的车站踏上旅程。这样的启程重复的次数越多，车厢里的灯光就越显得庄重。我们期盼着在旅行的终点，在这个王国的中心感受到一种不会再比之更大的陶醉：共同被接纳到空虚里的幸福。当然，这种情况是永远都不会发生的，我们连接近的可能都没有的。相反，在最后的梦境旅途中，中途上车时我迎来了其中一个旅伴的微笑，他这样向我自我介绍，这同时也表示认识我。相互认识的狂欢：不是陶醉和联合，而是震惊和一致，“狂欢”的动词可以翻译成“坚定不移的渴望”，而狂欢这个地方则可以翻译成“德墨忒尔[19]的国度”或者“河谷低地”，或者“富庶之国”。

实际上，喀斯特是个贫困地区，过往道上也没有奇异的印第安纳石。过了边界好久以后，你才会感受到惊奇，上山时则是另一番情形，不只是风：没有潺潺流动的溪水，甚至连涓涓细流也不再有了；黑油油的松树梢替代了稀疏的阔叶树冠。相反，褐色的黏土和形状似砖的深灰色页岩久久地陪伴着你的行程，时而让位于一片险峻而巨大的白石灰岩，上面的草皮几乎没有巴掌大，再也看不到茂盛的草地了，一片稀稀拉拉的高山牧场，尽管下方平原离得还不太远，城市和河流历历在目，甚至连一个机场和一架升起的喷气式飞机以及士兵们正在蹦蹦跳跳的训练场都看得清清楚楚。高原上笼罩着一片寂静，仿佛你已经远远地漂流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起初是麻雀先你飞去，现在又轮上蝴蝶了。如此寂静，就连一只蝴蝶展开双翅去追逐一片飘落的花瓣时，你都能听得到它掠过地面的簌簌声。在一棵松树旁，往年干枯的松球在阳光里沙沙作响，一粒高高在上，下一粒就在眼前，如此连续不断，一拨接一拨，沙沙声没完没了，直到太阳落山。而从今年的新松球里同样持续不断地滴着松脂——路边尘土里深暗的、变得越来越大的斑点。

留在这路途上吧，反正你久久也不会碰到什么人，左右两边那些神秘的男人就是刺柏丛，它们护送着你，一再成群结队地簇拥向远方

那无生机的热带稀树草原里。几小时、几天、几年以后，你站在一棵白花绽放的野樱桃树前，第一朵花上是只蜜蜂，第二朵上是只丸花蜂，第三朵上是只苍蝇，第四朵上是几只蚂蚁，第五朵上是只甲虫，第六朵上是只蝴蝶。远处的路上有像水洼一样的东西闪闪发光，原来是一条银色的蛇皮。经过一排排大柴垛，走近仔细一看，全都是伪装起来的武器仓库；经过一个个圆形石堆，它们实际上是通往地下物质储藏库的入口；你用脚一踢，岩石是油毛毡。每走一步，蝗虫就在你面前从中间草丛里飞起。一只死去的、黄黑色的蝾螈在脚前的推车印上微动，几乎让人觉察不到：当你弯下身子时，却发现是一群食尸甲虫拖着尸体移动。第一只大些的动物是只白狐狸，在见过所有那些小生灵以后，一只缠绕在树枝上的睡鼠会使你觉得像一个兄弟。紧接着，你的脸上都会感觉到各个树丛里发出的沙沙声。你的歇息地是一个洞穴，进去时也不需要手电筒，因为从洞穴另一端以及洞顶上方几个孔里透进日光来。在这里，水珠滴在你发热的额头上，一个洞龛里堆着鹌鹑蛋，不是枪弹，而是石球，比在任何一条山涧里都圆滑和明亮。出了洞继续走去时，你把它们拿在手里晃来晃去，它们的气味不同于蝙蝠那臭乎乎的粪堆，你会永远把这气味，把这一排排广泛分支的，黏土似的喀斯特洞穴带进你的房间里。

这时，你可以光着走了。那头野猪，惟一凶悍的黑褐色家伙，它一边咕咕叫着，一边喘息着从右边的矮树丛里钻出来，后面跟着两个兔子大小的崽子，又继续咕咕隆隆地钻进你左边的矮树丛里。它看都不看你一眼。你的两脚踩踏在地上，你的双肩振作起来了，你的眼皮触摸着天空。

到了下一个休息地，寂静中，你听到了一声拖得很长的、预言着不祥的蛙叫：荒漠里一个柔弱而孤独的声音。你会走到近前，来到一片占去了大段路面的水洼旁。水洼清澈见底，上面漂着一根羽毛。在被撕裂成六角形图案的深红色底上，留下了一个个狍子的蹄印和许多鸟儿的足迹，呈箭形，辐射向四面八方，一种需要去破解的楔形文字。你在头顶的天空上看到了类似的东西，在一片小腿肚似的云端里——为我们的卷毛云，有“天空开花了”这样的喀斯特表达，同样像用“大海流动了”来表达我们那不平静的湖一样——，出现了蔚蓝色的一块，形状像你的脚一样。那羽毛会漂动的，那狭长的水洼会在风里缓缓地向前波动，犹如在一片水波粼粼的海浪里一样。伸开四肢躺在水边吧，把你的衣服叠起来当枕头用。你会进入梦乡的。这个沉睡

的人一只手塞在蜷在地上的两膝之间，另一只放在耳旁（我们这种被撕裂的眼角，哥哥，就是由倾听所造成的）。在梦里，你听到水洼犹如湖一样，看到那儿的芦苇荡里有一条小舟，拿你的榛条棍当桨划。随之，凭空冒出一条海豚来，背着果实的脊背凹陷成一个灰岩坑。这会是一个恢复精神的短暂睡眠，你会被开始下雨时滴在耳轮上的雨点给唤醒的——再没有更温柔的闹钟了。你立起身来，穿上衣服。你不会脱离这个世界的，而是完全入乡随俗了。真的，这时有一只鸭子从那片热带稀树草原上低飞来到水洼前，轻轻地落下来，在你面前游来游去；一头迷途的奶牛把这水当饮料用。——你一动不动地让雨淋着。你因此显得如此平静，连各种各样的蝴蝶都落在你身上了，一只在膝盖上，另一只在手背上，还有一只遮盖住了你的眉毛。

当你继续穿越喀斯特时，天空又变蓝了（感受“天气”，无非就是依据北方，也就是纳诺山上通常密布的乌云）。这时，树木会顺时针沙沙作响，各有各的特点，而你就会领悟到，为什么听上去尤其清楚和紧迫的橡树呼呼声能够在古代圣贤那里被看做神谕的声音。你会一边听一边记，你写字时的沙沙声会是阳光下最和谐的响声之一。它会把你带回到那数以百计的村庄和城区（喀斯特电影院，喀斯特舞厅，喀斯特的沃利策音乐厅）去。当夜晚到来和天空又阴云密布时，这些村庄和城市在此刻鸦雀无声的荒漠中，从云层这儿和那儿的圆圈形光泽里是可以认出来的。你会在那里受到款待，白面包和喀斯特葡萄酒，还有特别的火腿。你一路上在品尝着它所有的味道，从中间草带的迷迭香越过田边围墙旁的百里香，再到外面热带稀树草原上的刺柏球：你现在不需要更多了。以后，在你的岁月进程中，有一天，你会来到这个地方，在水平线深深的下方，那条沐浴在阳光中的雾带就会是亚得里亚海。你这个熟悉地方情况的人，会在这里分辨出的里雅斯特海湾里的货船和帆船与蒙法尔科内造船厂的吊车、杜伊诺和米拉马尔城堡以及蒂马沃河畔的圣乔瓦尼大教堂的穹顶来。然后，你会在自己脚跟前的灰岩坑底里，在两块岩石之间发现那条实实在在的、多座位的、半是腐烂的小舟连同划桨，并且会不由主地馈赠给它约柜[20]这个名称，因为它是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此时此刻，你是如此地自由自在。

当然，终归有一天，即便是在中心地带走，也会不再可能存在了，或者不会再起作用了。不过到了那个时候，叙述会存在的，并且会重复着走下去！

第一次旅行时，我在喀斯特的路上差不多逗留了两个星期，几乎天天判若两人。我不仅是个寻根问祖的人，而且也是个打短工的、新郎、酒鬼、乡村录事、守尸人。在加布洛维卡，看到了从教堂塔上掉落下来的大钟，斜插在地上，孩子们在上面嬉戏；在思科波，一走出荒漠，吓坏了那个独自在灰岩坑里耙地的老妪；在普利斯科维卡，在那个惟一工作日不关门的教堂里，描绘了一只爬过祭坛遮帘的黑黄色的黄蜂；在赫路谢维卡一个像喀斯特所有的村庄一样的、没有溪流的村庄里，惊奇地看到了平常只是在桥头上可以看得到的守护圣徒的石雕像；从克门的电影院走出来进入月夜里——比理查·韦德马克[21]刚刚才艰苦穿过的莫哈韦荒漠还明亮和寂静；迷失在康斯坦耶维卡的栗子树林里，那儿生长着喀斯特仅有的高大树木，行走时，过去所有年月里齐踝深的落叶发出刷刷的响声，果壳也嚓嚓作响，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响声是可以与之比拟的；穿过特穆尼卡那敞开的大门，从田间小道旁朝外，通往草原和荒漠；在托马耶的斯洛文尼亚诗人斯莱克·柯索维尔[22]逝世的故居前鞠躬致意，几乎还是个孩子时，他就使得自己家乡的松树、石头和宁静的道路唤起了神奇的力量。后来从那里出发——战争结束时，外来帝国王朝的统治结束时，南斯拉夫的时代开启时——进入（“丁零当啷地走进去”）他的首府卢布尔雅那。在那里，他是那个服务员和那个士兵的弟兄，俨然以新时代的示威旅游者自居，并且为了这样的事情，久而久之，也许太温文尔雅了，也过分地取决于喀斯特的“宁静”（“tisina”[23]，他的心爱之词），——你就看看他那招风耳吧！——没有过多久，他就离开人世了。

那个印第安女人，她当时接纳了我，而且把我当成邻村过世的铁匠的儿子：我从来没有向她挑明她弄错了。听她打招呼的口气，她也是那样确信不疑，从而让我很高兴被当成另外一个人了。况且我在她面前鼓足勇气，扮演了一个长久在外而返回故里的人的角色。我叙述了自己童年在喀斯特的故事，这位老妪为之又是摇头，又是点头。这样的效果，只有对那闻所未闻却又确实可信的东西的惊讶才会产生。我领会到了编造故事的乐趣。这些故事当然总是从一个确切的细节出发，一定得合乎逻辑，又要轻松愉快：这样的编造是我的一份兴趣。在这里，我终于自由自在了，真的是一气呵成的。

与此同时，我觉得，那个女人是第一个既看透了我，又认准了我的人。对我的父母亲来说，我总是“过分严肃”（母亲）或者“过分不通世故”（父亲）。姐姐无疑在我身上只看到了疯狂的秘密同盟。每次见面，女朋友的一双眼睛常常羞怯得发呆，只有当我终于——我不是总会如愿以偿——发自肺腑含笑注视她时，这羞怯才会缓解下来。有一次，全班出去郊游，我突然无缘无故地溜走了，越过田野，钻到灌木丛里去了，离开吧！独自一个人待着！等我回去以后，那位百般体谅的老师以一种不容改变的宣判的口气说：“菲利普，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相反，在那个喀斯特印第安女人那里，这位年轻人第一眼就领受到了信任。她住在名叫利帕（德语的大意是“椴树”）的村庄里。在她家里待了几天以后，这信任变成了一种期待，一种对自己永久的自卑（“我将永远一事无成”）无声无息的反驳：一种释放，既出乎意料，又显而易见；令人鼓舞，让人安心，今天依然如故。也正是她，还在我开口说话之前，就赞扬起我的幽默了。在家里，我常常不让母亲笑出声来，因为这笑声会使我想起像在一帮讲下流笑话的男人堆里，女人们不断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而在同学那里，我被视为扫兴者，这是因为，一到讲笑话的时候，我就惯于在高潮到来的瞬间，要么指着桌面上的一道划痕，要么指着叙述者外套上一枚松动的扣子。惟独那个女朋友，有一次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她最后也许会惊讶地叫出声来，并且对我用第三人称来说话，就像在两百年前的对话一样：“他可真是个有趣的人！”然而，我的女主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她一听到我脱口说出的小小议论，就会对我观察和倾听事物的方式表现出满意的神情。无论她要给我讲解或者示意什么，都显出一副热情奔放兴致勃勃的样子。这样的情形，只有一个演员从自己那完全心领神会的观众身上才会享受得到——照此说来，所谓的幽默无非就是幸福的心领神会了？当然有一次，也就是后来我要动身回家的前夕，我们两个一起坐在餐桌前，我只是一声不吭地朝外望着院子。这时，她告诉了我什么别的东西，相反的东西？附带的东西？她的话似乎让我从内心深处都要流泪了，独一无二，不同凡响，既平静又猛烈，势不可挡地要涌出来。那不仅仅是要流泪，而是要“发怒”，而这恰恰就是我的过人之处。她补充说，有一天，在几乎漆黑一片的利帕教堂里，她偷偷地听了一个男人在吟唱圣经诗篇，他独自一人，身子挺得直直的，声音又轻柔又坚定。尤其特别的是：这位吟唱者同时用十根指头紧紧地按着眼睛。然后当她站起来要向我演示这些时，我们真的为那不在场的第三者而会心地号啕大哭起来了。

有时候，我帮她干活，和她一起耙那片小小的家庭灰岩坑。我们从红土地里刨出第一批土豆来，在院子里锯开过冬用的劈柴。我为她起草每天写给在德国的女儿的信，把她的房间粉刷得又白又亮（仿佛她随时都会回到这儿来似的）。我知道在灰岩坑里不刮风，那咸咸的汗水是无法吹干的。像在家里一样，我首先不得不勉强让自己去干每一样体力活，可通常的劲头在其间刚一冒头，我就只想着收工了。比起以往来，我干活的动作也几乎没有麻利多少。然而，由于这位老妪与父亲如此不同，不催不逼我，所以，她给我打开了眼界，让我知道干错了什么。尤其从我要干活的第一刻开始，她告诉了我，我是什么状态和怎样来干。

她让我认识到了，当活儿摆在面前时，我向来都不在场，而常常非得要人家从某个远远的角落里叫过来才是。然而，我的懒惰实际上是害怕失败了。我不只是害怕帮不了别人的忙：更为甚之，我会到处碍手碍脚，帮人家倒忙，让人家事倍功半，如此帮得不是地方，最终让人家一整天，也许甚至整个夏天的辛劳都泡汤了。（在他的作坊里，父亲动不动就朝着我又是咒骂又是吼叫，我刚一抡起锤子，就无声无息地又被打发走了。）凡是我要互相连接的东西，我都是勉勉强强地凑合在一起；凡是我要分开的东西，我都给撕裂了；凡是我要堆整起来的东西，我都是塞来堵去；无论和谁拉锯，我都找不到节奏；递到我手上的瓦片总是接不住；我垛成的柴堆，还没等到我转过身去就垮下来了。即便根本就不用着急，可我总是干什么都操之过急。虽然也许看上去我干得顺顺当当，可是我旁边的人一个动作接着另一个，慢慢悠悠，每次都比我先干完。由于我想同时干一切，所以，每个部分势必都乱了套：我不是什么灵巧的人，而是个生手。我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抓瞎的能手；凡是别人需要打一个手势的地方，我却如此反复地把我的对象摸索来摸索去，从而不是把它损坏了就是弄碎了；假如我是个小偷的话，那么我就会在最细小的东西上留下无数的指纹。我黯然明白了，从我要使自己有作为的瞬间开始，我就变得目光呆滞了，就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特别是看不到我手头的活儿了。于是我就面对那件分派给我的事情，盲目地晃来晃去，扯来扯去，翻来翻去，走来走去，挥来挥去，直到活儿没有干成，工具也给毁掉了，这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而且一提起那想像中的陌生活儿，甚至是大镰刀那轻轻的嗖嗖声和把土豆从箱子倒进车筐时那柔和的轱辘声，我顿

时什么都听不见了。想必是听到了，可是再也没有能力去接受那个我最喜爱的响声了，那个从树种到树种各不相同的沙沙声了。就是有了那样容易干的差事——“把奶桶送到奶站去！”，“帮我把床单拉平整！”——，可我只要一听到立刻就喘不过气来，脸涨得通红，张开大嘴喘息，我的身体一下子就散架了，和行走、阅读、学习或者干脆静静地坐在那儿时不一样了；躯干失去了与下身的连接，弯腰不再自如了，不像在采拾蘑菇或者捡起苹果时那样了，而是一种木偶似的弯曲。

首先，在和那个喀斯特印第安女人的合作中，我明白了，只要人家一叫我帮忙，我的问题就开始了，哪怕你有足够的时间去作任何准备也罢。我不是去作准备，而是立刻把手指和胳膊缩到身子上，甚至把脚蜷缩在鞋里，犹如要防卫似的。我在问自己，我对体力活儿的畏惧是不是也来自对父母形象的观察？我不是从小就为父亲那塌陷的胸腔和弯曲的膝盖以及母亲的肥臀而感到抬不起头吗？在学校的最后两年里，面对那些律师、医生、建筑师以及他们的贵夫人，这种羞惭越发升级了。那些家伙统统都人模人样的，尽管他们低三下四地去打听他们的孩子是否学习取得了进步。

于是，对于我干活的状况和我的困难来自何处的认识帮助我梳理了自己的操作，直到我对打短工一天比一天兴致大起来。我一边注视着老妪，一边学习在干活时怎样停顿。随之，虽然开始没有头绪，可是一个个交接变得越来越清楚了，我干活的范围，红土和白墙也绽放出色彩了。当我有一次抓着满满一把terra rossa（红土）往回走的时候，我甚至闻到了它发出的香味。于是命令自己：脱离父亲吧！

后来有一天，这个让我有吃有喝的女人招呼我出了村子，领着我去邻近的荒漠里，来到一片少见的喀斯特耕田前，它没有沉降在灰岩坑里。这片田地四周围着低矮的围墙，杂草丛生，然而犁沟的起伏依然清晰可见，地面上闪烁出一片鲜红的色彩。入口用一个木栅栏门封着，旁边的围墙里外有石头台阶，仅供一个人跨越；墙根上开着一个四方孔，路边的雨水可以穿过孔淌到田地里。一到这里，这女人便伸开手臂，一板一眼地说出下面的话：“To je vasa njiva！”（“这就是你们家的耕地！”）

我跨过围墙，身子弯到地上，土壤松松软软的，仿佛不久前才刚犁过似的。这块田地狭长，中间微微隆起，后面连着一片果树，棵棵都不一样。是这老妪弄错了呢，还是她有意要取笑我，或者她就是一个疯女人？我第一眼看见她时就这样盘思过。当我朝她转过身去时，她笑了，一副大脸笑容堆得满满的，笑声又轻柔又迷人，像一个非常年轻的姑娘，那是名副其实的笑啊。

不只是那个印第安女人，而在那数以百计的村庄里，人人都把我当作一个老相识或者老相识的儿子。我也只能是这样的人，因为从来就没有陌生人来过喀斯特。像奥德赛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一样，那么后来在寻找他的过程中，我，他的儿子，也有一次醉醺醺地躺在地上了。在我们家乡，人们最多不过是喝喝果子酒，而且仅仅是为了解渴。我向来就远离那些酗酒的同学，也不是打那次一起去维也纳旅行之后才这样。当时，他们中有一个在呻吟和窒息中从青年旅馆的架子床上喷射出一股强大而酸臭的洪流，迎头浇在我身上。光是那酒精味、那奇怪的咕嘟声，首先是酗酒者那一瞬间洋相百出的举止就让我感到毛骨悚然了。要说喝酒，我向来不过呷一口而已。可是在喀斯特，在野外，在阳光下，在充满芬芳的和风里，酒对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开始——那个生动的词汇又是什么呢？——对上口味了。他一口接着一口地喝酒，每喝一口都把酒杯放下，而且常常在喝第一口时，他既感觉到与现实存在的亲密联系，又感觉到了平等，就像在两个终于同等晃动着的秤盘上一样。随之，我看得更确切了，梦得敏锐了，认清了各种各样的联系，拥有了一个个按照层次划分得清清楚楚的空间间隔，它们以顺时针方向给我描绘了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我根本不用自己随之旋转。简直不可思议，人们怎么会把“葡萄酒”诽谤成“酒精”呢。

当我独自饮酒时，感觉就是这样。可是大家凑在一起——同伴们真的都去投奔忒勒马科斯——时，我时常就失去了对度的意识。我虽然不酗酒，也不像别人那样常常一口气干光，可是我把酒喝进去，却尝不出它的味道来，尤其想成为那个最终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一天夜晚，鸡已经打鸣了，同伴们个个都喝得不省人事，我一站起来，发现我生来第一次醉酒了。刚走出几步，我就栽倒了。我面朝下趴在草丛里，连一根指头再也无法动起来了。我还从来没有感受过自己与大

地如此地亲近。我闻着大地，感到大地就挨着脸颊，听到地下河在深处汹涌澎湃，并且暗暗地笑起来，仿佛我完成了什么事情似的。当人们后来拽着胳膊拖着腿把我弄到屋里时，我也能够把我的成就说出一二来：一辈子都想要独立自主的我终于表现得像我现在这样无依无靠。这个人终于可以服服帖帖地让人帮助了，他曾经暗地里经常如此气急败坏，因此谁也不会赶去帮他的忙——一种解脱。

第二天，我听人家说，他们之前压根儿就没有看出我喝醉了；我不过是“非常严肃和傲慢”而已；两眼“直冒光”；我在向所有人宣告他们实际上是什么货色；最后我就语法发表了演讲，首先是关于斯洛文尼亚语中不存在的“被动式”，因此可以要求斯洛文尼亚民族最终一定要放弃作为“遭受痛苦的民族”而自我哀叹。

在这同样的时间里，我也第一次看到有人死了。我经过一个村子时，险些被一个女人撞翻在地。她从一户人家的大门里冲出来，在街道上打滚，尖声嘶叫着，两膝蜷缩成一团，仿佛处在分娩时的阵痛里。她被抬到一张长凳上，伸展开四肢，脑袋向后耷拉着。我从来都没有听到过像她最后的气息那样深沉和充满哀诉的声音。死者的下嘴唇还蠕动了一会儿，节奏变得越来越慢，就像是为了这样来吸气似的。等到这种蠕动凝固了，在这简直震耳欲聋的无比寂静中，我想像那嘴唇上还书写了什么东西，而这书写的文字现在已经写完了。我觉得，仿佛我认识这个陌生的女人，而且对家属来说，我和他们一起在灵旁守夜也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后来在不间断地做十字架念珠祷告时，我两眼都睁不开了。死者脸上没有皱纹，然而那干瘪和变形的眼皮上依旧铭刻着一切痛苦。奇怪，面对这个素不相识的死者，我顿时肃然起敬；奇怪，我发誓要无愧于她。

这样一个忠诚的许诺，当时在喀斯特，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独自当作自己的“婚礼”来庆贺，后来依然如故。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天做完礼拜之后，一家旅馆四面围着墙的大院里，一棵枝叶稀少的桑树下。当时，我正好坐在那里饮酒，大大小小一群人身着节日盛装，从大门走进来，看那高兴劲，仿佛“走向和平”的祝福把他们所有人依然紧密地连在一起。孩子们跑来跑去，大人们不间断地相互转过脸

去，有一个独腿男子和一个矮小女人使得这场轮舞锦上添花。他们向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打招呼，一副友好且不言而喻的神情，男人们个个都脱去礼帽，女人们个个都面带微笑。他们坐在一张长条桌旁，然后桌上需要铺上几条桌布。桌布在高原风里不断鼓起，又随着时间变红，不仅因为酒，而且也因为那些落下来的软桑葚。这一群人虽然爱说爱笑，可是从中并没有突现出一个代言人更高的声音来。我注意到了一个年轻女子，她从头到尾一声不吭，仅仅是个听众，全神贯注，两眼几乎眨也不眨一下。最后，她微微转过脑袋，打量起我。她神情严肃。随之，这个听众变成了一个发言人，而被问话的人就是我。没有微笑，没有撅起嘴唇，惟有一双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的眼睛告诉说："你就是。"惊恐之中，我险些向一旁望去。然而，我抵挡住了这目光，镇静下来，并且自己找到了一种类似镇静的严肃，如此强大，仿佛这二十年之久我过的是非人的日子，没有意识，没有灵魂，只是在遇到这双女人的眼睛时才醒悟过来了，才获得新生了。果真如此啊；那举足轻重的事件就发生在这里；我心上之人的容貌就显现在这里！于是，这位年轻人就在一种我们两个独自可以感受到的仪式中嫁给了这个女人，仪式详尽，层次分明，隆重，庄严——"以心对天国！"（sursum corda）——，还有喀斯特阳光和海风陪伴，同时又保持距离，羞怯，没有言语或者姿态，在目光中心心相印，没有证人，除了这儿的叙述，也没有任何证明。面对面，冲动接着冲动，一个人如此接近另一个人，直到你是我，我是你。桑树下一个值得崇敬的人。你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女人。从她身上让我感受到了她就是我的心上人。

这些日子里，我也两次看到了失踪的哥哥。在火车站低地里的那天晚上教我认识到了，一个地方常常只有通过相邻的地方——刑讯隧道通过先驱隧道——才会成为完美的化身。于是，我现在避开那些在哥哥的信里提到的喀斯特村庄，相信通过探究所有与它们相邻的地方能够更加清晰地描绘它们。

那些童年的地方，虽然它们的名字我天天听得耳熟能详，可是我始终不过是接近它们而已。它们不也放射出比那些我真的已经走过的地方更加强烈的光芒吗？比如在雅恩费尔德平原东部边缘，有个叫圣卢兹亚的小村庄，除了一座孤零零耸立的教堂，几乎什么都没有，父

母亲经常提起那个地方，因为他们是在那里结婚的：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可是我把它的周围都走遍了。由于我感知的圣卢兹亚也许无非森林深处一条耕田边缘的犁沟，或者傍晚教堂的钟声和公鸡鸣叫。因此直到今天，我都觉得，仿佛那里开始了一个新的世界，尽管它距离家乡步行不到个把钟头的路程。后来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时刻，又是在一家旅店前，在那样一个邻村里，我看到哥哥从大门里走进来。我觉得他出现在一个拥挤的人群里，因为教区在庆祝他们的教会日，人们从喀斯特高原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朝圣。他真的进来了吗？没有，更确切地说，他只是站在那儿，站在大门口，站在门槛上，虽然出出进进的人很多，可是在他周围却形成了一个没有人的空间。伴随着这一时刻，他向我再现了他那个时代，也就是世界大战前那个时代。哥哥比我这个二十岁的后人要年轻，并且刚刚经历了他青年时代的最后一个节日。他穿着那套其间已经传给我的宽领西装，而他的两眼——他两眼望去——在梦想着逃离那些深不可测的洞穴，走向无限的广阔。虽然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同伴中间，可是同时觉得，仿佛我站起身来要证实我的存在似的。这个小伙子那一双眼睛黑得不能再黑了，犹如那些在夏日里到处都成熟了的接骨木果球的色彩，也绽放出其生机勃勃的光芒。我们久久地、一动不动地面对面站着，遥远，不可企及，无法搭话，在悲哀、从容、坦然和无望中融为一体。我额头骨上感受到了阳光和微风，观看着黑乎乎的小通道两旁的庆典活动，哥哥的形象就夹在其中，知道自己身在一年的中间。神圣的先人，小伙子殉难者，可爱的小孩。

另一次，那是一张空空的床，它向我叙述了格里高尔。我经常乘坐喀斯特火车，或者也只是在那些如此奇特的火车站停留。那些火车站，一般都远离村庄，坐落在荒郊野外，常常只是通过羊肠小道可以到达，也没有标识牌。一到晚上，有些火车站就笼罩在一片漆黑之中，只能摸索着向前才找得到，最好是叫一个当地人当向导。就在火车要到达之前，尽管我作为独一无二的候车人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可整个站区自然都亮起来了，显现出一片宽阔，有多种多样的设施，像一座工厂大小，像一个地主庄园雄伟：亮闪闪的碎石，雪松下的喷泉，在发出芳香的浅蓝色紫藤丛中闪烁的房屋立面，徽章似的盲窗。在这里，顶层上也住着人。在下面狭小的办公室里，一个男工作人员坐在闪亮的配电盘前，就像是坐在宇航员座舱里。而在他的头顶上方，一个相关的女人穿过房间过道，从许多窗户前走过。在荒漠的寂静中，一再响起刺耳的电话铃声，最后就是预告的排钟，像发号施令

似的维持着秩序。条条轨道几乎全部都深深地开凿到喀斯特岩石里，就像切入峡谷似的。与之相应，火车越来越近的响声，嗒嗒声和隆隆声发出阵阵回响，与地铁隧洞里的回响不相上下。外面荒漠中那强大的铿锵声常常直接伴随着车站里的铃声，听上去，仿佛火车瞬间就会风驰电掣般地从岩洞里钻出来，又消失在许许多多的峡谷弯道里，许久之后又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回响起来，伴随着一艘远洋轮船那间歇重复的洪亮鸣响。你还以为是耳朵听错了，喀斯特这个转动的管风琴终于从后面的漆黑里闪现出来了，在所有音区里又是鸣叫，又是呼啸，又是颤唱，又是轰隆。从车头前面那构成三角形的眼睛里可以看得出来，其中额头上那只在靠近时熄灭了。更加离奇的是一列列急驶而过的货车，那巨大的车厢一片黑乎乎的样子，常常是每个车厢都不一般长，其间也立着一排排未装货物的底架，带着高高耸立的支柱，一排看上去无穷无尽的连合音栓，伴随着强有力的叩击、锤打、啪嗒和敲击，在空旷的地方，留下了一条散发着钢铁气味的拖带，嗡嗡和歌唱，仿佛人类世界是不可战胜的。

在这样一个夜晚，我在一个喀斯特火车站里等待着最后一班客车。还要等好久，于是我坐在雪松旁的草地上，又在碎石上走来走去，描绘着候车室桌子上的条纹连同我放在上面的木棍，注视着那个涂成绿色的、缺少管道的铁炉子。外面繁星似锦的天空之下飞动着蝙蝠的影子。一个温暖的夜晚，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紫藤的香味比丁香的柔和。我不禁想起了帝国时期那个计划，那就是把维也纳到的里雅斯特位于斯洛文尼亚的一段铁路线修成地下线，用一条穿越喀斯特溶洞的地下通道连接起来。我走过来走过去，然后经过一个亮灯的地下室窗户。它之前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弯下身去，望进一间大房子里。里面有一排书墙，一张床，布置得舒舒服服的。床铺得整整齐齐，被子叠着，好像是为使用者准备的。床头灯的一圈亮光照在枕头上。这莫非就是哥哥，那个逃兵哥哥藏身的地方吧！我向后退去，在上层一扇高窗前看到了一个女人的侧影。她悉心照料着他。在她那里，他过得挺自在的。

我看到自己到达目的地了。我本来就没有打算找到哥哥，而是叙述关于他的事情。——另一个记忆攫取了我：在一封前线来信里，格里高尔在一句话里提起了那个传说中的王国，它在我们斯洛文尼亚祖先的语言里叫做“第九王国”，是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要是我们大家失散后有一天又重聚在一起，乘坐上披着节日盛装的四轮单驾轻

便车，前往第九王国，参加第九代国王的婚礼——听着吧，上帝，我的请求！”这时，我觉得他那虔诚的愿望可以转换到人世间来实现：文字。就像火车站地下室里那张空空的床一样，我似乎也把外边车站房屋正面的那个寒暑表（是由世纪转折时期一位维也纳光学仪器制造者制作的）、旁边那个三腿木凳子、候车室里的葡萄图案和蟋蟀的啾啾声转换到我们家的屋子里。就这样，我要乘坐的火车越来越近了，蜿蜒穿越过荒野，一阵阵轰隆，又一阵阵减弱，若即若离，突然又爆发，机车头灯的光芒远远地从一条条深谷里预先扫射过来，然后自己出现了。车头最后停下来，所有那些内部小灯勾绘出了一道道细小的轮廓，一个噼噼啪啪、力大无比和童话般的庞然大物。一节节车厢里坐满了从各个城市、从海滨、从国外返回家乡的人，有打鼾的，有猜纵横填字字谜的，也有编织的。

当时在喀斯特，清醒的时刻，无论是夜晚还是白天，是那样明亮，梦幻是那样昏暗。它们把我从那梦寐以求的天堂里驱赶出来，又把我推进地狱里，没有平日的人群，我既是个该死的东西，又是个顽皮的家伙。我害怕睡着了；因为每个梦都关系到我愧疚自己不待在家里，不留在亲人身边。这时，我在那儿始终只看到庄园，从来也看不到一个人。而且庄园是废墟，屋顶塌陷到房子里，花园里荒草丛生，群蛇乱舞。从家人那里，除了他们越来越远的抱怨声，没有任何踪迹。或者就是几个像是融化的冰块留在地面尘土里的痕迹。我一次又一次醒来后，成了一个堕落的人。就连白天的阳光、洗礼风、行走、院里晾晒在我房间窗下的、不禁让人想起渔网里的一堆洋葱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它们的力量。于是我下定决心，随时随地朝着家乡方向逃去。

一路上，我才为自己南斯拉夫之行的最后一站赢回了平静。我乘车前往马堡，或者马里博尔，为的是寻找哥哥的学校。然而，寻找毕竟是没有必要的。从火车里望去，眼前显现出那座山丘，上面坐落着那个我从战前的照片上似曾相识的小教堂。近前一看，也好像二十五年过后，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没有什么被毁坏了，也没有增添什么。惟独那个涂得五彩缤纷的大蜂房坍塌了，取而代之的是五颜六色的蜂箱散落在果树之间的草地上。我在这片开阔自由的绿色场地上走

来走去，注视着主楼前的扇叶棕榈树，注视着缠绕在一棵杨树上的野葡萄，注视着大片蔓生在一棵鹅耳枥那光滑的树皮上的花体字母。许多字母向上通往一座侧楼大门的台阶（“到了晚上，他就和其他人一起坐在那里”）。我事后希望这样的活动、这样的种植园、这样的完美之地就曾经应该是我的寄宿学校。我攀葡萄山而上——这时，脚跟上的泥土变得越来越厚重了——，觉得需要一再弯下身去，用手抓进泥土里，收集起来，随身带走一些。保存，保存，再保存！在这包含着碎煤块的灰岩山里，我挖出碎煤块来。而且今天，也就是过了二十五年之后，我依然用它们在白纸上画起一道道歪歪斜斜的笔画：你们现在才有用武之地了。

小教堂坐落在山丘的一块岩顶上。山下的农业学校如此完好无损——一个个树冠伴随着一片橄榄林的闪烁，灰色的瓦屋顶格外醒目，像一种神秘的文字——，这块小小的圣地是如此荒芜不堪。看样子，仿佛我走进了出现在我那些噩梦中没有屋顶、无人居住的房子里。祭坛石被打碎了；壁画让那些抢占山头的人涂改上了他们的名字（惟独还留下了对圣像柱蓝的想像）。地面上，在十字架下殉难的耶稣的雕像被埋在瓦砾和碎木片里，倒卧在那里，身首分离了，铁丝网取代了荆冠。入口的门槛被树根撕裂了。我并非独自一人待在那里：一个年轻人站到我身旁，两臂交叉在胸前。然后，我听到他只是一个劲地深呼吸。后来还有一队人走进去，看样子，像一群集体出游的人。更加让人意外的是，他们都拐向小教堂，叉开两腿列队站在前面。这片废墟博得了他们彻头彻尾不理解的目光，而这位祈祷者又招来了他们同样怀疑的目光。随后继续走去，这目光变成了一个共同的、呆滞的冷笑，与其说是嘲讽，倒不如说是诧异和窘迫。这时，我才从永恒的梦境里被拖出来，我获得了一个清清楚楚的历史图像，无论如何是此时此刻这个地方的图像。在这里，我并不是不要历史，而是要的另一个。我觉得，这个独一无二的凝神的人就是它的化身，就是它的人民，昂首挺立，意识清醒，容光焕发，聚精会神，坚定不移，不可征服，天真单纯，拥有权利。

然后，在外边正墙上，我找到了哥哥的名字。他以无比优雅的字体，用大写字母把名字刻在灰泥面上，那样高，想必他此时是站在墙脚上刻上去的：GREGOR KOBAL（格里高尔·柯巴尔）。这事发生在他离开学校回到敌视他的祖国的前一天。在这个祖国里，等待他的不是一个心上人，而是那种陌生的语言和那场战争，被小伙子们看成是对

手。可在这里，经过这些年，他成了小伙子们的朋友。宁静包围了我。草丛里响起下雨的沙沙声，那是蜻蜓的一对翅膀发出的。

夜幕降临时，我站在下面城墙里，站在德拉瓦河大桥上。这条河在东边距我出生的村庄不到百十公里的地方成了另一条河。在家乡，它沉陷于特罗格峡谷里，掩藏在茂密的野生植物下面，河岸几乎难以到达，流水几乎无声无息。而到了马堡这里，便又露出自己的身影了，成了这片平原上远近可以看见的、闪闪发光的动脉，快速地流去，时而一个个的沙湾已经预示着黑海离得不远了。用哥哥的眼睛来看，我觉得它具有王者的风范，就像插满了无数的信号旗一样。那碧波荡漾的水面重现了那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犹如一个个车厢从平行的火车桥上投下的阴影图像，重现了那个隐秘的帝国的盲窗。那些战前的筏子又顺流漂去，一个接着一个。我悠然自在地走在桥上，人群越来越稠密了，人人都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睁着在风里眯起的眼睛。球形桥灯散射出一片白色光芒。在这座桥上，左右两侧都是穹顶结构。从那时起，我的目光就在世界各地所有的桥上寻求着那样的东西。身后那些接连不断走去的人让我感到脚底下在震动。我用双手紧紧抓住桥栏，直到我把这座桥连同风、夜晚、桥灯和行人一起转换成了我，并且心想着："不，我们不是无家可归。"

第二天，在回家的火车上，人们一下子蜂拥而来，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仿佛这是最后的逃亡机会。（之所以这样说，只是因为之前的车次被取消了。）夹在一堆陌生的躯体之间，犹如没有了手臂和腿脚，连下巴都扭歪了，免得撞上旁人的下巴。我逐渐在心里感到了一种越来越多的愉悦。我挤在这群人里。如此挤成一团，这甚至变成了一种惬意，而且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比如我看到一个男人在这种迫不得已的境况中居然找到了读书的空间，一个女人在编织，一个小孩在吃苹果。到达边境之前，独自享有这列车厢，这是悲哀的奢望。

我很高兴，又和奥地利久别重逢了。我感觉到了，就是在喀斯特，我也非常迷恋这中欧的郁郁葱葱。这是我天生就注定的。又从那熟悉的一侧观看着拜岑山，“我们的山”，这也让人心旷神怡。想像着在绕口的外语天地里，首先是在困苦中度过了这些日子后，现在又要被包围在那熟悉的德语里，这就足够了，而且获得了安全感。在从边境车站前往布莱堡市途中，我在那被五彩缤纷的云朵粉饰得绚丽灿烂的夕阳西下的天空上看到了第二个更加深邃的天空。这个天空在灵光中红光四射。而这位行者发誓要与人为善，好像那是他不可分离的部分，没有什么奢求，也没有什么期待，是在自己的祖国充当客人而已的那个人。那一个个树冠拓宽了他承载的肩膀。

刚到达这小城里，这位返回家乡的人就陷入了那社会的喧嚣中。他觉得，就是在他离开的日子里，这个社会也一如既往地运转着，寻求着一个牺牲品。而现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人，这个敌人又回来了！就在过来的途中，他们开着自己的小车超越了他，并且告诉其他人，他靠近了。他们的派遣队化装成夜晚散步的人，在等待着他。那些挂在身上牵狗的皮带实际上是枪背带。他们从街道各个角落传来的口哨和呼叫无非是用来包抄人的。然而，在这一天，他们不会动这个敌手一根毫毛。他注视着他们的眼睛，仿佛他在叙述着这样一个遥远的国度，使得他们不是不由自主地问候他，就是看到别处去，比如朝着那鼠疫灾难纪念碑望去。当他们朝着那些动物转过身去时，这更多是出于担忧，既为了自己，也为那四条腿朋友。

事实上，每踏进城里一步，仇恨与厌恶就在我的心里增多。我感到胸腔里热血沸腾，怒火中烧。他们在那儿又是齐头并进，又是迈着趾高气扬的步子，又是小步奔跑，又是慢慢悠悠地漫步，又是吧嗒吧嗒地拖着脚行走。他们在交通车辆的呵护中相互咧嘴对笑。他们的声音不是幸灾乐祸，就是叫苦不迭，或者假装虔诚，驱走了天上的蔚蓝和地上的葱郁。比起这些声音来，树枝的沙沙作响或者木头虫蚕食的响声都显得有灵魂了。他们说出的每句话都是客套话，一句比一句无情，从“停止使用！”到“一首诗等等”。无论是望着或者听着这一切，我都恨不得喷出火焰来烧死他们。这些同代人是彻头彻尾爱干净的人，发型整洁，衣冠楚楚，礼帽和扣眼上别着闪闪发光的徽章，散发出这样或那样的香气来，指甲修剪得尽善尽美，皮鞋锃亮（此时此刻，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欢迎的目光最先落在了我那泥迹斑斑的鞋面上）——然而，这整个人流里却充斥着一种简直是有罪的、应该受到

惩罚的丑陋和奇形怪状。在我看来，这个中的原因就在于那缺少的目光色彩，它已经被一种冥顽不化的心怀恶意磨灭了。当我思考着这也许不过是我的想像时，就在同一瞬间，有人斜眼瞥了我一下。这目光气急败坏，恨不能把最先遇到的这个人杀死，接着闪着移向下一个人。在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心里，思考重新开始了。在这群人里，有不少曾经刑讯和杀害他人或者为之至少拍手叫好的人，一如既往地守在自己的圈子里。他们的子子孙孙似乎也会如此忠诚不渝，不假思索地把这传统的东西继承下去。现在，他们作为怀着强烈复仇心理的失败者缓缓走去，厌烦了这简直持续太久的和平时期。诚然，他们一天到晚都在忙忙碌碌，可是，他们的工作并没有为他们带来什么乐趣——他们最多不过是满足于不是把谁送进监牢里，就是向他发出警告——，所以，他们憎恨自己，与现代格格不入。在我的心里，简直就渴望着那一个，真的，我似乎能够回敬的基督徒目光。白痴、傻瓜、疯子，复活这个幽灵队伍吧，只有你们才是故乡的歌颂者。那么后来便是一个动物。由于这个动物的出现是作为小城市所有被追踪的人的化身，它使得我平静下来了，并且为这个乡巴佬在这区区小国的背后展现出了那个最广阔的王国，有草原、海滨和大海。黎明时分，突然有一只野兔出现在城边上，它拐来拐去，穿行在车辆和行人之间，横越过中心广场，谁也没有发现，就又消失了。野兔，被追踪着的徽章动物。

我尾随着它，来到一个下等酒吧里。我所了解的下等酒吧，迄今只是道听途说来的，它因为是酒鬼的聚集地而声名狼藉。在那里，我后来又碰到了来自市民行列的几个人。他们坐在那些堕落和出轨的人之中，像变了个人似的。仿佛他们终于成为平民百姓了，从而放射出善于交往和令人信赖的光彩。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叙述，不只是关于战争。在记忆中，我从他们那里听到了一首异常温和的感恩歌和哀歌，关于甜蜜的童年，关于被窃取的青春，看到他们是孤苦伶仃的人，是逃亡者，是被赶出局的人。他们正是那些遭受着身在同类朋党之中折磨的人；他们也正是那些做梦都想得到接纳的人，不是被一个显贵的俱乐部，而是被这个熙熙攘攘的集会接纳。熙熙攘攘？人们也许在七嘴八舌地说这说那，可是我觉得，似乎我听懂了每句话。对我来说，这个烟雾缭绕的洞窟的中心图像就是一个一目了然的秩序的图像。这个秩序是由个体放纵与共同迫切的严肃之间的相互协调来调节的。女服务员去哪儿，哪儿就有座位，厨师的手臂端着菜盘，从蒸汽里伸出来，就像从云里伸出来一样。洗牌时的响声不禁让人想起狗耳朵的抖

动声和鸟羽毛的嗖嗖声。滚动着的色子块的响声替代了音乐。只要电话铃一响，个个都抬起头来，期待着去接电话。站在柜台后的女店主睁着一双什么都不会使之吃惊的眼睛。一个农妇进来，在这个环境里显得非常陌生。她把一捆新洗好的衣服放在自己那个趴在桌子上沉睡的儿子一旁，给自己要了一杯烧酒，然后借以慢慢消磨起时间来。我旁边那个人问我是谁，也听到了我的回答。我们肩并肩站着。后面可以看到一片菜园，前面望出去是大街，一辆辆小车嗖嗖地驶过去，一辆未亮灯的公共汽车超越了一辆亮灯的，犹如在一个无名而自由的大都市里。

回家之路穿过没有人烟的平原，笼罩在没有月光的星空之下。一如既往，当我久久离家之后，走近村庄时，总是兴奋不已。我的心简直像过节似的。它拉着我走去，仿佛我被这个地方吸住了。然而，我却一再告诫自己的心灵放慢步子。夜晚暖融融的，在这个地方太少有了，惟一的响动就是时而传来的狗叫声。虽然哪儿都再也没有大户农家了，可这狗叫声不由得让人想起宽敞的田园来。繁星撒满天空，甚或连那螺旋星云都清晰可见。一个个独立的画面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展现出一座覆盖地球的宇宙之城。银河呈现为它的交通大动脉，而周围的群星为那条与之相应的机场跑道镶上了亮边。整个城市都作好了迎接的准备。我想像着火星上那座山峰，它几乎比珠穆朗玛峰还高两倍。山坡上的天空家园绵延向四面八方。

回到地球上吧：远处显现着林肯山村几扇亮灯的窗户，就像镶嵌在那黑沉沉的同名山脊上一样。仿佛这山脊是一座太古的建筑，如今变成了一片现代化的居住群。到了那个设有奶站的、标志着地界的三岔路口，我庆幸自己身上压着里面装着那两本厚书的海员背包。不然的话，我或许会欢呼雀跃起来。屋顶上，首先是那些饱经风雨沧桑的木屋顶上，闪烁出银色的亮光，屋顶在其中弯曲成了尖塔。那个护路人影影绰绰地站在门房入口。他问候我时，声音颤抖，听起来像是从与世隔绝的远方传来的，也不期待着得到回应，带着清真寺里宣礼的人在尖塔上召唤的腔调。在一个远离公路、坐落在一条果树林荫道尽头的庄园前，一家村民悉数紧紧地挨着坐在一张长凳上，沉浸在相互认同的默契中，犹如那个转化到尘世的夏夜的完美化身。我绕道走到公墓前：没有新添的坟堆（我后来一次次回家时才有，自然每次都少

不了）。在回我们家的路上，一个女邻居从我身边走过，一声不吭，半挥起手臂，一个深深地印在心里的无能为力的标志。我再也无法辨清响在我耳际的沙沙声是来自旅店的风扇呢，还是我的热血里。

我们家个个房间里都亮着灯，姐姐坐在外面的长凳上，独自一人。虽然她的目光认出了这位来者，可是她并没有欢迎他的归来。她脸上露出了一种绝望的神色，那样无辜，我开始还把它看做是幸福。然而，我过后觉得才弄明白了，与其说是为弥留之际的母亲而绝望，倒不如说是为那个失去的心上人而哀伤，数十年之久，永世永生："舞伴加哭丧的女人"。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从来还没有见过一个更美的女人。我想吻去姐姐脸上的悲伤，而此时此刻，出于怜悯，那神秘的东西被激起了，然而，她却无动于衷。

在那棵行道树下，没人采摘，梨子成堆地落在地上烂掉了。我走到窗前，看到父母双双躺在里面小屋的床上。他们紧紧地搂抱在一起，相互侧着身子，男人把一条腿搭在女人腰上。他们翻来滚去，于是我轮番看到了这张和那张面孔。强悍的父亲毕竟表现得力不从心了，最后瘫倒在妻子胸前，把那件他复活节之夜披着的、在教堂地上伸展开四肢朝拜的大衣红红火火地披在肩上。母亲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瞪大眼睛，想要靠着丈夫的搂抱继续活下去。——多年之后，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我还在床上那个地方发现了一棵生机勃勃的橡胶树。回想起了当年的痛苦隐秘，才真正地感受到了，并且事先看到了那个时刻，那攀缘蔓生的观赏植物似乎又会屈从于一个弯曲的人性。

无数个夜晚里，我在屋前踱来踱去，直等到我可以进去走到那两个人跟前，我爱他们，因为感谢他们生养了我。——而对接着发生的事情，始终还留在我心里的不是什么别的画面，而是热切和巨大的渴望，我空空的双手、等待着接受父母的目光，永生永世。

我常常在叙述中提起数字、年份、公里数、人数和物件数，为此我始终不得不克制自己，仿佛数字与叙述的精魂水火不容。因此，应该再一次说说我那个创作童话的老师。其间，他已经退休了，我偶尔去看望他。他在城外边修了一个花园，里面有一间屋子，他有时甚至在那里过夜，而且那个苍白的历史家面孔变成了栗色的地质学者面孔。他母亲还活着，一个白发老人，尽管我经常去那儿，可我从来还

没有见过她；我向来只是听到她透过门与自己的独生儿子说话，不再像以前那样用言语了，而只是用敲击来交流，儿子一边数着敲击声，一边领会着其中的含义。他已经放弃创作童话了，取而代之的似乎就是数数。据说还在童年时期，他就默默地、常常不自觉地、持续地数着数。他当时觉得这是一种病。可是后来，当他独自在尤卡坦的原始森林里探险时，他自觉地发现了数数，数自己的步子，数自己的呼吸节奏是一种生还的手段；数数常常帮助他克服危险，是比任何童话都强有力的符咒，比任何祈祷都管用。现在，年龄大了，他越来越对与日俱增的公众标识和广告图像敏感，觉得自己就安居在数字之中，连那些价格牌和加油站的夜光钟都不例外。那些远古的诗人不就把数字看成了超越一切诀窍的东西吗？数数，它使他变得温和，让他悠然自在和富有秩序，并且悉心照料着他。他因此也摆脱了那个头版头条世界。他神圣的数字就是玛雅人的数字：9和13。进屋之前，他要分9次把鞋蹭干净；清早起来，他要把自己的枕头抖13次；一定要等到有13只鸟儿从花园上方飞过，他才出门干活，并且要歇息9次；晚上睡觉之前，他要转9乘13个圈。

这位老人就说到这儿了。——与之相反，在这叙述结束时，即使我今天就死了，我现在看到自己还处在人生的盛期，注视着空白纸上春天的阳光，回响着秋天和冬天，并且写起来：叙述，没有什么更现实的东西比得上你，没有什么更公正的东西比得上你，你是我最神圣的东西。叙述，远方战士的守护女圣徒，我的女主人。叙述，一个个宽敞无比的运输工具，天国之车。叙述的眼睛，映照出我吧，因为惟独你认识我，赏识我。天空的蔚蓝，通过叙述，降临到这低地上吧。叙述，参与的音乐，赦免、恩赐和净化我们吧。叙述，生机勃勃地掷出字母，充溢那词句的联系，组合成文字，以你别开生面的图案表现出我们共同的图案吧。叙述，重现吧，这就是说，重新活跃起来吧。一再推迟一个不许存在的决定吧。盲窗和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愿你们是叙述的激励和透明水印花纹。叙述万岁。叙述一定要长存。叙述的阳光将会永远普照在那只有伴随着生命的最后一息才能够被摧毁的第九王国之上。从叙述王国里被驱逐的人，和你们一起离开那悲伤的本都，返回吧。后来者，当我永远不在这里时，你会在叙述的王国里找到我，在第九王国里。在你那杂草丛生的田间小屋里的叙述者，你怀着地方意识，哪怕你平静得一声不吭，也许沉默数百年之久，倾听着外面，沉浸在内心，可是过后呢，王者，孩子，集中心思，挺直身

子，支撑在胳膊肘上，微笑一圈，深深地呼吸，再拿起你那调停一切争端的东西开始吧：“……”

[1]马里博尔（Maribor），斯洛文尼亚东北部城市，与奥地利距离很近，德语中称为德拉瓦河畔的马堡（Marburg）。——中译注，下同

[2]Kobalid：叙述者在这里想像着按照这个家族的名字Kobal把这个地方改名为Kobalid。

[3]前一组是斯洛文尼亚语地名，而后一组是相应的德语地名。

[4]这些都是与斯洛文尼亚历史和文化相关的地方。

[5]《圣经·约伯记》中努力了解自己苦难的主人公。

[6]Grüβ Gott：意思是“你好”，是奥地利人见面时常用的问候语。

[7]古希腊椅（Klismos）是最精美的椅子之一，用细绳编织成的椅座有弯弯的、一头收细的马刀形腿支撑，椅背横栏呈曲线状，由三根垂直的柱子支撑。

[8]Heimatbahnhof，德语，意为“家乡车站”；Arbeitsrichtung，德语，意为“行驶方向”。

[9]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的著作。

[10]希伯来文礼拜仪式用语，意为“要赞美主”。

[11]前一组为斯洛文尼亚语，后一组为德语，意思分别是“耕田”和“苹果”。

[12]俄耳甫斯，又译奥尔普斯，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有超人的音乐天赋。据说他的歌声和琴韵十分优美动听，各种鸟兽木石都围绕着他翩翩起舞。

[13]古希腊性爱与美貌之女神。

[14]Yucatan（尤卡坦），墨西哥东南部尤卡坦半岛，玛雅文化古迹。

[15]Kobold（地灵），日耳曼民间传说中的淘气精灵。有些地灵被称为洞穴精灵或矿井精灵。

[16]Burja或者Bora（布拉风），亚得里亚海域寒冷强劲的东北风，常见于冬季。

[17]IHS（希腊语）意思是“耶稣”。

[18]品达罗斯（约公元前518—前438），古希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所写颂歌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合唱抒情诗的高峰。

[19]Demeter（德墨忒尔），希腊宗教崇拜的女神，她是宙斯的配偶，司掌农耕。

[20]约柜（BUNDESLADE），犹太教和基督教用语，指在《圣经》时代存放刻有上帝授予摩西十诫的镀金木柜，装饰华丽，里面放着刻有十诫的两块石板。以色列人占领迦南后，约柜安放在示罗。大卫王把它迁到耶路撒冷，最后所罗门王把它安置在圣殿内。约柜最后下落不明。

[21]理查·韦德马克（Richard Widmark），美国西部片和侦探片电影演员。

[22]斯莱克·柯索维尔（Srecko Kosovel，1904—1926），斯洛文尼亚著名诗人。

[23]Tisina，斯洛文尼亚语，意思是“宁静”。

Die Wiederholung by Peter Handke

Copyright©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86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4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出版得到奥地利教育、艺术和文化部所提供之翻译资助

Die Übersetzung wurde gefördert mit Mitteln des Bundesministeriums

für Unterricht, Kunst und Kultur

Peter Handke

Langsame Heimkehr

缓慢的归乡

[奥地利] 彼得·汉德克 著

韩瑞祥 主编 周新建 梁锡江 译

文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景

Horiz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缓慢的归乡/（奥）汉德克（Handke, P.）著；周新建，梁锡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ISBN 978-7-208-12572-8

I.①缓……II.①汉……②周……③梁……III.①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IV.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5312号

书名：缓慢的归乡

作者：【 奥地利】 彼得·汉德克

译者：周新 建　梁锡江

责任编辑：陈欢欢

封扉设计：园里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2572-8|I·1310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 文景每月书情

目　录

编者前言
缓慢的归乡
　　1 史前形态
　　2 空间禁地
　　3 法则
圣山启示录
　　大弯路
　　颜色的高地
　　哲学家的高地
　　狼跃
　　桑树小径
　　万像之像
　　冰冷原野
　　陀螺之丘
　　大森林

缓慢的归乡

[奥地利] 彼得·汉德克 著

韩瑞祥 主编

周新建 梁锡江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者前言

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被奉为奥地利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也是当今德语乃至世界文坛始终关注的焦点之一。汉德克的一生可以说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像许多著名作家一样，他以独具风格的创作在文坛上引起了持久的争论，更确立了令人仰慕的地位。从1966年成名开始，汉德克为德语文学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因此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如“霍普特曼奖”（1967年）、“毕希纳奖”（1973年）、“海涅奖”（2007年）、“托马斯·曼奖”（2008年）、“卡夫卡奖”（2009年）、“拉扎尔国王金质十字勋章”（塞尔维亚文学勋章，2009年）等。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介到世界许多国家，为当代德语文学赢来了举世瞩目的声望。

汉德克出生在奥地利克恩滕州格里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他孩童时代随父母在柏林（1944—1948）的经历，青年时期在克恩滕乡间的生活都渗透进他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里。1961年，汉德克入格拉茨大学读法律，开始参加“城市公园论坛”的文学活动，成为“格拉茨文学社”的一员。他的第一部小说《大黄蜂》（1966）的问世促使他弃学专事文学创作。1966年，汉德克发表了使他一举成名的剧本《骂观众》，在德语文坛引起空前的轰动，从此也使“格拉茨文学社”名声大振。《骂观众》是汉德克对传统戏剧的公开挑战，也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格拉茨文学社”在文学创造上的共同追求。

就在《骂观众》发表之前不久，汉德克已经在“四七社”文学年会上展露锋芒，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严厉地批评了当代文学墨守于传统描写的软弱无能。在他纲领性的杂文（《文学是浪漫的》，1966；《我是一个住在象牙塔里的人》，1967）中，汉德克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文学对他来说，是不断明白自我的手段；他期待文学作品要表现还没有被意识到的现实，破除一成不变的价值模式，认为追求现实主义的描写文学对此则无能为力。与此同时，他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反对文学作品直接服务于政治目的。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剧作《自我控诉》（1966）、《预言》（1966）、

《卡斯帕》（1968），诗集《内部世界之外部世界之内部世界》（1969）等。

进入70年代后，汉德克在“格拉茨文学社”中的创作率先从语言游戏及语言批判转向寻求自我的“新主体性”文学。标志着这个阶段的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1970）、《无欲的悲歌》（1972）、《短信长别》（1972）、《真实感受的时刻》（1975）、《左撇子女人》（1976）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在表现真实的人生经历中寻找自我，借以摆脱现实生存的困惑。《无欲的悲歌》开辟了70年代“格拉茨文学社”从抽象的语言尝试到自传性文学倾向的先河。这部小说是德语文坛70年代新主体性文学的巅峰之作，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1979年，汉德克在巴黎居住了几年之后回到奥地利，在萨尔茨堡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四部曲《缓慢的归乡》（《缓慢的归乡》，1979；《圣山启示录》，1980；《孩子的故事》，1981；《关于乡村》，1981）虽然在叙述风格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生存空间的缺失和寻找自我依然是其表现的主题；主体与世界的冲突构成了叙述的核心，因为对汉德克来说，现实世界不过是一个虚伪的名称，丑恶、僵化、陌生。他厌倦这个世界，试图通过艺术的手段实现自我构想的完美世界。

从80年代开始，汉德克似乎日益陷入封闭的自我世界里，面对社会生存现实的困惑，他寻求在艺术世界里感受永恒与和谐，在文化寻根中哀悼传统价值的缺失。他先后写了《铅笔的故事》（1982）、《痛苦的中国人》（1983）、《去往第九帝国》（1986）、《一个作家的下午》（1987）、《试论疲倦》（1989）、《试论成功的日子》（1990）等。但汉德克不是一个陶醉在象牙塔里的作家，他的创作是当代文学困惑的自然表现：世界的无所适从，价值体系的崩溃和叙述危机使文学表现陷入困境。汉德克封闭式的内省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生存的深切反思。

进入90年代后，汉德克定居在巴黎附近的乡村里。从这个时期起，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动荡，南斯拉夫战争也把这位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从《梦幻者告别第九王国》（1991）开始，汉德克的作品（《形同陌路的时刻》，1992；《我在无人湾的岁

月》，1994；《筹划生命的永恒》，1997；《图像消失》，2002；《迷路者的踪迹》，2007等）中到处都潜藏着战争的现实、人性的灾难。1996年，汉德克发表了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批评媒体语言和信息政治，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汉德克对此不屑一顾、一意孤行。1999年，在北约空袭的日子里，他两次穿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旅行。同年，他的南斯拉夫题材戏剧《独木舟之行或者关于战争电影的戏剧》在维也纳皇家剧院首演。

为了抗议德国军队轰炸这两个国家和地区，汉德克退回了1973年颁发给他的毕希纳奖。2006年3月18日，汉德克参加了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媒体群起而攻之，他的剧作演出因此在欧洲一些国家被取消，杜塞尔多夫市政府拒绝支付授予他的海涅奖奖金。然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汉德克无视这一切，依然我行我素，坚定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对人性的呼唤，对战争的控诉，对以恶惩恶以牙还牙的非人道毁灭方式的反思："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他因此而成为"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另类。

世纪文景将陆续推出九卷本《汉德克文集》，意在让我国读者来共同了解和认识这位独具风格和人格魅力的奥地利作家。《缓慢的归乡》卷收录了汉德克称之为"同名四部曲"的前两部，即小说《缓慢的归乡》和《圣山启示录》。70年代末，汉德克经历了人生中短暂而近乎绝望的生存与写作危机，陷入了为"生存下去！"而苦苦思索的迷惘中。他连续数月遭受着对自我要求、对生存世界过分的批评以及孤傲不群的折磨，沉浮在再也无法写作和"再也没有资格言说"的恐惧中。为了能够生存下去，汉德克竭力寻求一种新的语言，借以表达主体与世界的依存关系："永远不再孤傲不群：也就是说，通过写作与他人心灵交流，永远；为他们写作，为他们创造艺术图像。"（汉德克）《缓慢的归乡》四部曲正是汉德克这段心灵煎熬和渴望变化时期的产物，也标志着他的创作风格的转变。四部曲虽然在主题上承继了70年代中期的小说创作，但汉德克越来越远离之前那带有神秘色彩的生存感受，日益趋向于通过叙事来调解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从而使

形式与内容、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及自然与艺术之间形成不可或缺充满张力的联系。

同名小说《缓慢的归乡》是四部曲的第一部，也奠定了汉德克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基调。可以说，“归乡”是汉德克努力克服危机的必然归宿。小说描写的是地质学家瓦伦丁·索尔格在苦苦思索“缓慢归乡”中的心路历程。它在结构上分为三章，各章都有一个标题。表面上看，它们似乎扑朔迷离，可叙事的内在却使之丝丝入扣，形成了一条时隐时现此起彼伏的“归乡”主线。这也是汉德克一贯采取的叙事结构手段。

小说主人公索尔格是中欧人，几年来一直在加利福尼亚一所大学工作。小说一开始，映入读者眼帘的就是一个孤傲不群的形象。索尔格身在几乎与世隔绝的阿拉斯加腹地孤独地从事着他所钟爱的地质研究。他感受着大自然，融合在大自然中。而与此同时，一种寻求“拯救”的欲望袭上他的心头：拯救心灵上的裂痕，结束与世对立的孤独，自我与世界重新合一。他徘徊在厌世与充满幸福的幻想之间，渴望实现某种持续的平衡。在他那奉若神明的工作中，索尔格预感到了那梦寐以求的东西：在沉思中，他作为自然观察者所获取的空间显现为生存意义的承载者，也成为“向别人敞开心扉的神圣之物”；他对自然界的形式和规律的探究赋予他一种“全然当下”的时间尺度。索尔格感受到自己无足轻重的生存就是自我丧失，于是他下定决心将自己置于历史的责任中。小说第二章，索尔格从阿拉斯加回到任教的大学，要撰写那酝酿已久的科学论文《论空间》。这部所谓的地质学研究著作实际上是索尔格试图克服危机的写照。他要远离“厌恶与分离的痛苦”，实现自我与世界的和解。伴随着地质观察和研究的进程，他的自我感受越来越激化。一方面他竭力去寻求空间的“主导形式”，另一方面他又一再感受到空间的丧失：他“不是孤独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而是没有世界的孤独”。索尔格又一次陷入心灰意冷的生存深渊而无力自拔。然而，当他在加利福尼亚踏进那个邻居家的门槛时，顿时觉得走出了那令他极度沮丧的深渊，又回到生活的怀抱里。他视邻居为“神圣的他者”，因为在这个温馨的邻居家里，精神上几乎被击垮的索尔格又振作起来了，在对归属和群体的渴望中确立了自我的地位，认识到了“我”与世界的关联。“归乡”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他心灵上的“拯救”：“您听听吧。我不想走向毁灭。在这遭受巨大丧失的时刻，我有了归乡的反射，不仅回归到一个国家，回归

到某个地方，而是回归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索尔格最后决意要回到欧洲去，回到自己孩子身边。到了第三章，索尔格开始了他回归生存的“归乡”之路。归乡在这里不仅是心灵的反射，而且也是小说慢慢展开的叙事对象。在主人公的心里，渴望拯救的力量不可阻挡地要把“他这个个体与世界整体永远维系在一起”。在飞往纽约的飞机上，他决心赋予自己一个负有责任的“个人法则”。当他徜徉在纽约这座世界都市的人群里时，时间与空间在他眼前豁然开朗，“他有了言语，时间成了光明”。自我与世界交织，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交融。索尔格感受到自己的“历史性时刻：我在学习……历史不仅是像我这样的人只会横加指责的邪恶的序列，而且自古以来也是一个每个人（也包括我）可以继续和促成和解的形式”。

小说《圣山启示录》是汉德克漫长而曲折的“归乡”之路的继续。当《缓慢的归乡》中的索尔格降落在乡土上时，《圣山启示录》中返回欧洲的叙述者“我”便开始了探寻新的写作之旅。后者虽然在叙事方式上不同，但却进一步演绎了前者所表现的主题，读起来似乎或多或少是对前者的评述，审美与诗学问题构成了叙事的核心。这部所谓的随笔小说以夹叙夹议叙议相佐的方式融自我经历、自然描写、对哲学家和艺术家的议论、对油画的思考和引言于一体，从而在潜移默化的交织中给读者展现了一幅诗学宣言的图像。

《圣山启示录》描写的是叙述者“我”两次前往普罗旺斯圣维克多山追寻法国印象派画家塞尚油画创作的源泉之行。踏着这位“当今时代人类大师”的足迹，“我”观察和感受着圣维克多山无比奇妙的神韵，又漫游在巴黎、柏林和萨尔茨堡的圣山神水间。在与形式万象色彩斑斓的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和同时对塞尚绘画世界在精神和艺术上的领悟及思考中，“我”情不自禁地生发出超越自我的审美追求；塞尚贴近大自然的艺术表现成为“我”倾慕和效仿的楷模：“我不应该‘虚构’，而应该‘写实’。”“我”在这里坚持不懈地追寻就是要经历和感受一个通过自己而变得和谐的现实，就像画家塞尚的绘画充满了一种调节对立的力量一样，“我”也必须创造出“与大自然平行的艺术结构与和谐”。在两次与圣维克多山和塞尚绘画的心灵交汇中，叙述者把创作自己的诗学看成是圣维克多山的“启示”。对他来说，“写作的权利”是建立在自我与世界、自我与事物关联或者亲缘关系的基础上；作家的意图就是“采用一种促成真实的形式，再现这样的关联”。小说结尾一章借助对萨尔茨堡附近的莫兹格森林的描写

展现了一个和谐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通过对大自然与文明造物的观察和描写使得一切现象达到了一个更高层面的和谐；“大森林”的图像就是叙述者在经历了启示之旅后的艺术情怀的镜像：“那么真实的东西就是那所实现的形式；它不是对历史交替中那逝去的东西的控诉，而再现的是一种和谐中的存在。”

继这两部小说之后，汉德克又接连发表了在主题和认知方面与之紧密相连的小说《孩子的故事》和诗剧《关于乡村》，并统称为《缓慢的归乡》四部曲。从整体上来看，四部曲无疑既是汉德克与危机抗争中寻求“拯救”的结晶，同样也标志着他的审美意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的文学创作又迎来了一个高潮。

我们选编出版汉德克的作品，意在能够不断地给读者带来另一番阅 读的感受和愉悦，并从中有所受益。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选编和翻译疏漏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韩瑞祥

2013年7月

缓慢的归乡

周新建　译

“后来，当我头朝前从那条小路跌跌撞撞走下来时，突然出现了一种形态……”

1　史前形态

索尔格比一些曾与他走得很近的人都活得长久，他心中不再有任何向往，不过却常常体验到一种无我的生存之趣，而且时不时还感受到一种对福祉的需求，这是一种已经动物化的需求，它压迫着一双眼睑。他一方面能够保持一种沉静的和谐——一种作为欢快的力量也感染他人的和谐，但另一方面也极易被那些威力强大的事实所伤。他熟谙这种失落，意欲肩负起责任，一心一意寻觅着种种形态，寻求区别它们，力求描述它们，其间他想越出作为他的职业活动场所（“在旷野”，“在某地带”）。这些活动常常折磨着他，但随后又给他带来欢愉，运气好时也给他以成就感。

在遥远的另一块大陆的高纬度地区，在一个主要由印第安人构成的聚居地边缘，坐落着一栋刷成浅灰色的三角山墙木头房子。几个月来，这栋房子既是索尔格和他的同事劳费尔的工作室，同时又是他们的住所。在这栋房子里忙完一天之后，索尔格给那些交替使用过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套好护罩，穿过户外由落日余晖映照的一个通道似的空间，犹如穿过一条下班后必经的长廊，向“他自己的”河岸走去。那余晖映照的空间中飘浮着白絮状灌木杨种子。由于工作时常得变换目光，他的脸还歪歪斜斜的。

广阔的河面从河岸的黏土岸边铺展开来——其实他或许可以从河岸上跳下去。这条河漫延向整个地平线，消失在天际之上，不见一丝人类踪迹而闪烁着亮光。它自东向西奔涌过这片陆地，同时又不停地流经那些稀疏分布而实际上并没有人住的居民点，转而折向南或北。由于季节性干旱和冰川停止融化，在索尔格脚下，河水已退到一片宽

阔的鹅卵石和砾石河床后面，退到一面湿乎乎的土坡后面，涌着又宽又缓的水波拍打着陆地。

这里的河面看上去犹如一片静止的水域还有一个原因：它是从四面八方延伸向地平线。然而作为这条河流蜿蜒曲折造成的一个现象，构成地平线的不是由东而西奔涌的河水，而是陆地，是那里弯弯曲曲的河岸。河岸上生长着灌木杨或低矮的原始针叶林。那些针叶林本身长得很稀疏，然而远远望过去却像紧密排列在一起的锯齿。

放眼天际，为这片虚假之湖标出边界的只是那些看上去平平坦坦的狭长地带。河流中的水自然是在奔涌着，但却让人察觉不出，除了波浪拍打泥滩时发出的类似浴缸中水波的哗啦声外，它无声无息，而且几乎没有一处不是平平稳稳，就如同一个充溢着整个低地的异体，被落日映照的天空染得泛着黄色，乍一看根本不会将其感受为湿润之物，其间散落着一些在昏暗的暮色中已经没有凸凹感的小岛和沙洲。只有在那些隐没在河床的细沙和砾石床底的坑沟、凹陷和洞穴上方的水面上，才会现出一个个旋涡，而其余的地方看上去犹如一个坚实的金黄色庞大物体。在那些呈漏斗形就地急速旋转的地方，河水呈现的不是黄色，而是那种相距较远的白昼的天蓝色，因为它们与平稳奔涌的河水不同，和天空构成的倾斜度更大。其他地方的水流几乎都在毫无声息地奔涌着，而那蓝色的内部却传出小溪似的潺潺声。

索尔格觉得，由于这几个月的观察，在（大致）了解了其形态及产生过程之后，他眼前的这片荒野已经全然成为他个人的空间。他为这种想法感到欢欣鼓舞。参与营造这些形态的各种力量历历显现在他的眼前。他并非只是竭尽全力通过想象才寻得了它们，而是在纯粹的感受过程中感知到它们，同时也凭借着对这条大河、河流的奔涌、河流的旋涡和流速的把握。通过其自身的法则，这些力量看上去已变成一种良性的内部力量，它们使他精神振奋，给他以慰藉，而它们在外部世界可能曾具有破坏性（这种破坏可能还将永远继续下去）。他坚信自己的科学，因为它能帮助他感受到自己某个时刻身在何地。你此时此刻正好站在一条平坦河岸的河堤之上，而在几公里以外，因为一个个小岛横在河间而几乎看不见的对面河岸实际上却有些陡峭，这种奇特的不对称可以归因于地球旋转的挤压力，而意识到这些并未令人心生恐惧，反倒更让人领悟到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已一目了然地文明

化和家园化，这使得他的头脑具有了游戏的特性，使得他的身体敏捷灵巧。

同属此类的也还有这样的瞬时想象：在灌木杨种子漂过这一区域的同时，那些鹅卵石正隐匿在河床上漂滑而去，或翻转滚挪，甚或腾身跃出缓缓的弧线，裹在浓云似的泥浆之中，被欢舞的自然水流挟着继续前行。在静静的水面下，深处的这种逆向翻滚情形不是他推想出来的，而是能够凭借感官去经历：无论身在何地，索尔格总是想方设法搞明白这种奇特而细小的过程，它们有时能让他得到惬意的消遣，随后又令他十分激动，完全令他着迷。

几年来——自从几乎总是一个人生活以来，他极其需要准确感知自己每时每刻所在之处：判定各种距离；确定倾斜的角度；推定每时每刻自己脚踏之地的岩土材料和地层情况，至少要达到地下相当的深度；通过测量和划定界线首先为自己造出一个个空间，作为“纯粹的纸上形态”，借助这些形态，他甚至也拼合自己（至少是短时间的），让自己不受到伤害。

索尔格也利用大自然，然而并不是将其仅仅作为“自然”存在而加以利用，要满足他的需求要以另一些形态，比如说，辨明任意一个大城市里那些几乎察觉不出的低凹和隆起——即使它们覆盖着沥青，分清石子路面轻微的下陷或凸起，看清因几百年间的踩踏而破损的教堂地面和石台阶；或在一个起初还陌生的高层建筑里从顶楼垂直向下经过所有的楼层一直遐想到底层，以这种形态做一次白日梦中神游，例如去感受一下那里的花岗岩基座——方位和生命所必需的呼吸空间（与此关联的还有自信心）都一致得出另外的结果。

他具有一种能力（此种能力当然不是持续性的，而是间或性的和偶然的，正是他的职业活动才使得这种偶然成为可能，并使其具有略微的持续性），能在紧急情况下呼唤那些曾因自己的工作而熟悉的世界空间来帮忙——或者仅仅为了供自己和他人消遣而唤来它们。这些空间标着所有的界线，标有光照和风的情况，标有经纬度，标有各个天体的位置，它们被当作人人共享而又不属于任何人的永远和谐的图像，是属于那些能够想象出的事件的图像。

每进入一个新环境，它展现给人第一眼的印象可能是单调得一目了然，也可能因为有对比而如诗如画，总之是具体而清晰的。然而待天真地以为熟识了空间的瞬间一过，随之而来的却总是感官钝化的惊异，怎么又一次面对着无遮无掩而且还是熟识的背景。这种惊异好似无可避免，扰乱他的平衡，而且因即使这里也“不是合适之地”的过失感而更加强烈：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停留在户外，忍受着最初的空寂，通过观察、绘图和记录为自己赢回如此之快就又失去的一个个空间，这已成为索尔格的挚爱。长久以来，他在家里的任何地方都无法重新找回自我。也就是说，在那些地区将他贬黜为旅游者后无法关在屋子里重新找回自我，因而他将此时此地所在之处看成是自己唯一的希望：如若自己不以某种工作上的努力投身于这个地方（常常心中窝着恼怒），那就不会再有其他道路逃往自己过去的那些空间——在最好的情况下，在充满快意的疲惫中，他所有的空间，他新近征服的某个空间和从前的那些空间，组合成一个包覆天地的穹顶。这穹顶不仅是一个自我圣地，而且也为其他人敞开着大门。

大自然每一次都是匆匆地显露一下真容，随即又隐身避去，索尔格对此感到非常恼火。但在最初的气愤之后，他又必须以最大的干劲儿投入到它中间去，他不愿意迷失。对周围的环境，他必须认真仔细地看待每一个形态，不管它有多么微小——石头上的一条裂纹，泥土中的某种颜色变换，被风吹到一株植物前的沙粒，只有一个小孩才可能如此认真。这样一来，他这个几乎不属于任何地方、不在其他任何地方负有责任的人才能保持克制，无论为什么人也罢——而他只是在愤愤地自我克制中才偶尔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又是为了何人而保持这样的克制呢？索尔格清楚地意识到，他努力从事自己的科学活动的同时，他也是在从事一种宗教式的活动：首先是他的工作使他具有不断地保持着各种关系的能力，让他具有选择权，一种双重意义的选择权：他可以进行选择，也可以被选择。由谁来选择呢？管他由谁来选择。他想要的只是可以选择。

他理解大地形态并不带有狂热，不过十分急切，以致他渐渐将自己也连带感受为一种特别形态。这种对大地形态的理解确实拯救了他的灵魂，因为它将他与那以赤裸裸的变化无常而咄咄逼人的无形态的大千世界分隔开来了。

那么其他人呢？在自己从事的职业中，索尔格从未干过一件对他人明显有益的工作，甚至从未干过一件或许能为某个群体服务的工作：他既未参与过一次石油钻井，也未能预报过一次地震，即便是仅仅作为责任人检测某个建筑项目地下土层的坚固度的工作也没有干过。然而他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却很有把握：如若自己不努力承受每个地区给人的惊异，如若不努力用可供利用的种种方法解读地形地貌，并将解读的结果按照某种严格的规程交给别人，那他就不可能再有交际了，与任何人都不可能打交道。

他相信自己的科学，但绝对不把它等同于一种世界宗教，而是一贯严谨地从事自己的职业（“工作精细”是索尔格之所以胜过混乱无序、常常率性而为的劳费尔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在练习对这个世界的信任。在这种时候，既用于技术工作也用于日常生活的严谨就是一种对深思苦想的不懈尝试。当然，这种尝试也只是让他偶尔威严地在诸如浴室、厨房或工具间之类的地方笨拙地走来走去。索尔格的信仰不针对任何东西，它起的作用（如果他能获得这种信仰）只是让他能够分享“它的对象”（一块穿透的石头，不过也有桌子上的一只鞋、显微镜上的一根线），并且赋予他这个时常受到压抑，而此时确实能够感受到自己是研究者的人以幽默：置于一种静静的震颤中，他便直接更加亲近地观察着自己的世界。

处在这种无我的时空中时（在那些怀有希望的瞬间，他将自己看成是愚者），索尔格丝毫也不神圣。他只知道什么是美与好，虽然短暂，但通过形式可以不朽。

或许他期盼着一种有什么具体对象的信仰，然而他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为自己想象出一位神。可是身处困境时，他察觉到，自己（仅仅是出于被迫？）总喜欢即时想象出一位神，而且简直就像在祈求。（有时候，他希望自己有一颗虔诚的心，这一点他从来没有做到过。不过随后他确信无疑，“众神”理解他。）

他羡慕那些从未中断过自己信仰的人吗？他羡慕已经得到拯救的芸芸信徒吗？至少他为他们的不温不火而感动；为他们能那么轻松地在严肃和欢快之间转来换去而感动；为他们坚定不移、积德行善、舒舒服服地回返外界而感动。他自己有时候一点都不舒服，而且他也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他太频繁地用堆砌词句的欢呼迎接某些东西，可

随即又以默默的不满摒弃了它们——他本该用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幽默一劳永逸地回答它们。

然而那些信徒不可能成为他的交往对象。他能听懂他们的话，但却无法用他们的语言参与交谈，因为他没有那种语言能力。或者说，即便他破例十分虔诚地用一张对他们来说十分陌生的嘴说话，那么，当他身在“他们那信仰的昏暗之夜”里时，当唇齿间语不成句时，他依旧处在不为他们所理解的状态之中。

而对索尔格来说，他的科学的习惯用语是可以不断地重新以一种快乐的晕眩出现的，他对此深信不疑。它们在理解地貌形态方面的礼仪，它们的各种描述和命名约定，它们对时间和空间的表述，都让他觉得心存疑问：一种在人类历史中形成的语言竟被用于思考地球各种无可比拟的其他运动及产物的历史，这种情形还一直产生着一种冲动式的肉体陶醉感。他常常觉得借助研究地点来思考时间简直就不可能。他猜想可能有一种完全不同的阐述地貌形态的时间过程模式，他觉得自己就像自古至今那些思想变革者一样狡黠而暗带微笑（在他们的所有照片中他都注意到这一点）；他觉得他在把自己的眩晕强加给这个世界。

在下班后的轻松愉快中，索尔格有如此浮想联翩的能力。此时面对着眼前这片黄色的荒野，他能够切身感受到这样一个人的那份孤独，此人不相信各种形态的力量，或因一无所知也就谈不上信与不信，如在梦魇中孤零零地面对着这样一片大地：难道这就是面对魔鬼时的那种惊恐，就是面对无可更改的世界终结时的惊恐。一旦处在那种终结状态之中，一个人绝对不会因孤单——在他之后再也没有任何存在——当场死去，因为那时既不存在地点也不存在处所——绝对不会被魔鬼掳走，因为就连这类名字也不复存在——只是面对惊恐处在永恒的消亡过程中，因为也不再有时间。这条河的平原和平原上方辽阔平展的天空骤然间成了一个张开的蚌壳的两个壳盖，伴随着一种急促而刺激的快感的战栗，带着可怕的诱惑力，壳盖间涌出自时间开始以来逝去的种种东西组成的涡流。

他的另外一个自我身在一个由黏土、泥灰岩、也许还有金粉组成的前沿上，承受着这种呼呼作响的、仿佛在不断变换着方向的空寂。这时，索尔格从遐想中挣脱出来，自觉不自觉地向身后已经文明化的

腹地转过身去。在那里，到处都是铁链拴着的狗，那毛茸茸的浅色尾巴在灌木丛间摇来摆去；在印第安人小土屋的屋顶上，一簇簇刚刚吐出嫩芽的青草闪着光亮；那个“永远的他人”——此刻他看到自己的同事劳费尔就是这样——脚穿挂着泥巴的高筒靴，身穿有许多口袋的专用上衣，脖子上挂着一个闪闪发亮的放大镜，刚从野外作业点回来，正站在房前木楼梯最高一级台阶上，脸和上身还浸在阳光里，显露出回到一个纯粹作为居所的地方时最初的不知所措。起初发了一阵呆，同时还肆意模仿索尔格的姿势，像他那样望着广阔的河域，抽着一支香烟，同样紧板着脸，仿佛在扮演一个需要特别帮助的角色，扮演在某人身后排成一列的一模一样的人当中的一个。

劳费尔是这样一个朋友：与他的亲密关系不是体现在伙伴情分上，而是表现在有时几乎显得十分拘谨的礼貌上。在他们这两个天天情绪都变化不定的人之间，似乎从来都不可能发生情绪的暴泄（有时候他们理应需要出现这种暴泄）。虽然他们只能共用这栋房子里的工作间，但妨碍对方的情况仅仅发生在最初那段日子里。即使在卧室里——这栋房子仅有这两个房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地方，不过并不是刻意而为。他们也很自然地共同做一些事情，但看上去却像出自偶然，如果他们在某个时间一起做什么的话。每个人都只忙自己的事情，即便在屋子里，也是各走各的路。他们从不名副其实地一起吃饭，而是其中的一个过来与另一个正在吃饭的人一同吃，然后就会这样来邀请对方：“和我一起喝杯酒好吗？”如果一个想听音乐，那么这个伙伴就不出去了，而是并没有明显的情投意合，也许渐渐地留心听起来——甚至希望再来一曲。

劳费尔是个说谎的人，而索尔格虽说极其安静且让人琢磨不透，但他依旧属于变化不定的人，甚至会突然间变得冷漠乃至不忠：两人都能默默地感受或熟悉对方的不善之处（甚至比事实上的当事人更为恐怖地预先感受到这种不善之处）。他们聪明地意识到，面对第三者时，他们尽可以一再当恶人，但相互之间从不如此，这些年里他们都为拥有对方而感到高兴：与这样的朋友在一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善良之人，至少从未感到自己是恶人。

他们不是一对儿，甚至连对比分明的一对儿也谈不上。或者更确切地说，久而久之，加上距离的疏远，他们才成了伙伴儿——是慢慢

习惯了角色，但并没有盟誓：其中一个的对头可能依然是另一个要好的熟人。

不过劳费尔这个说谎的人没有敌人。他好说谎话几乎只是偶尔被女性注意到，而且人数相当少。不过随后她们与他结成联盟，好像她们知道了一个不幸的秘密，比如一个关系到生死的秘密。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完全是为自己占有劳费尔，并将所有其他人都排除在自己的关系之外。

无论在什么地方，用不着讨好献殷勤，他都会立刻招人喜欢。即便他本人不在场，人们说到他时也只是直呼其名[1]而且并非在流行这种称谓的美洲大陆上才是如此。虽然他也遭骂，但每一次都是像人们偶尔也会贬损自己的英雄那样：恐怕大家任何时候都不会允许一个圈外人攻击他。他身体极其好动——如果强制自己默默坐在常常沉思默想的索尔格对面，他就显得像个木偶似的，只需看一眼，他就向人展示出自己是一个幸福的统一体，是一个不停移动的、人们都乐于参与其中的中心。这种展示靠的是他的笨拙，可这种笨拙不是彪形大汉式的笨拙，而是能给人带来欢笑的笨拙，因此让人觉得十分亲切。他这个说谎的人具备一些让人信得过的地方：每一次再看见他时，人们都会觉得轻松，或者就是高兴，即便他只是短暂地在门口探一下头。

他撒谎自然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好像仅在回应需要他去充任中间人的期待时才说谎。这种期待从各个方面注视着他，是由所有的好心人——他只熟识这样的人——寄予的，也是不容他辜负的。不过时间一久，他就没有能力承担这种期待了。于是他就厚起脸皮、完全不顾道德原则地撒起谎来。真实的情况是，无论在哪里，劳费尔不用做什么，都会起着一个召集散兵的人的作用，因而他觉得自己在众人眼里绝对是善良的，善良得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他不是一个没有激情的或没有性欲的人，而是一个暗暗追求着伟人之梦或伟人幻想的人，为自己做英雄与为众多称自己为朋友的人做英雄所用的方法完全不同。

“我想和你一样具有危险性。”与索尔格坐在屋里吃晚饭时他这样说。这顿晚饭又是一次偶然产生的结果。

桌子摆在西边的窗口。窗户的中间部分是一个带着一些深色长条的黄色四边形。那条河和傍晚的天空横于其间，上面和下面（云带和陆地）已是浓浓的黑色。窗户没有装挡蚊子的窗纱。虽然还有蚊子一只只东摇西晃地径直飞进来，但已不再叮人，只是偶尔落在人的手背上，停留在那里。

这顿晚饭吃的是野外作业时采回的浅褐色蘑菇。这蘑菇吸收了不透水的永久性冻土中的些许湿润，味道与中国蘑菇相仿；另外还有从印第安打鱼人那里买来的厚厚的白色鲱鱼块和最后几个超大土豆，土豆就是实在没有形状可言的“夏园”中产的。园子就位于屋后东边风吹不到的地方。他们喝着一杯从聚居地一家叫“贸易站”的超市买来的葡萄酒。酒是冰的，就着稍苦的蘑菇和鲱鱼，其香甜味片刻之间十分爽口。

这是初秋的一天，在一栋放置着家具、摆设和技术器械的房子里。房子的内部作为实用而毫无秘密可言的普通处所给人一种家的感觉：即便是毫不经意地向外面望一望，好像也会出现那种既崇高同时又不安的感觉，也会出现那样一种感觉，仿佛这空间令人头晕目眩地遁入外面向天际延展的高纬度地区。就算不向外看，即使在吃饭饮酒中，一种令人惊异的光也会从人的眼角射进来。虽然这光同时也持续不断地对各种物体产生着作用，但只有在那奇妙的来自内部的小小抖动中，你才能感受到它本身的亮度，借此意识便会获知，确实相距“很远，很远很远”，“完全是另外一个地方”，是在地球上的另一个洲。

有只黑白斑猫也是这栋房子的一个成员，吃完残剩的鱼后，它依旧蹲在桌子上——木头墙体很薄，没有窗台，向外面沙滩上随着晚风剧烈摇摆的灌木丛望着，时而朝着灌木丛中的一个个反向动作，转动一下它那一向都很僵直的头，并抬起爪子。

风向上游方向吹着，此时在依然泛着黄色的河面上，掀出一层层疾速涌向东方的小浪花，仿佛连河水也在朝那个方向流。在这幅画面的边缘，真正的奔涌在那些巨大的螺旋状流层中才清晰起来。在那里，一个个已经呈漆黑色的旋涡看上去几乎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犹如投入水中的小牛小羊的内脏似的旋转着。西面下游远处，一半河面已隐没在河岸的阴影中，不停地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高高耸出水面，同

时发出一种有节奏的嘎嘎声，这种声音一直传入屋内，随后又落入水中，带出一种响彻整个空旷地带、好似野兽发出的鼾声：河水水位在下降，印第安人能借助那里的河水驱动他们的巨型木制捕鱼水车的日子只剩最后几天了。这天就是其中的一天，即使在夜间，这种水车也在为他们搜集着鲱鱼。

水车的另一边，河顺着弯弯曲曲的河道流向北方，由低矮茂密的褐色针叶原始林构成的锯齿状的天际线犹如沿着一个潟湖的弧形边缘伸展开来。向远处绵延而去的矮树丛中耸立出为数不多的高树的树尖，仿佛在那后面的远处，在由一个个狭长的岛脊造出的虚幻潟湖的映衬下，真有一个潟湖岛小城的几座塔楼竖立在天穹的纯清空间前面。完全浸入黑暗中的小城的各种细节只有靠在还比较明亮的河水中的倒影才能看出来，城中时不时响起几声枪声，或是传出一只走失的狗的叫声，不过或许它们只是从那里又传回村子里的回声。在村子里各个角落，常常聚成群的狗一直要狂叫到深夜。

一只小船，由于乘船的人或跪或蹲，一个人都看不到，它漂出潟湖湾的暗影，遁入残留的光亮中，身后拖着一个深蓝色的浅滩。一颗枪弹仿佛从潜伏点射出，掠过平静的河面，几乎没有惊起涟漪，然后窜进岛上一个灌木林中。林中飞起几只乌鸦。

入夜不久，索尔格开着劳费尔借来的吉普车去找印第安女人。那个印第安女人从不等他，不过遇有机会还是侍候他，侍候时她一副热心肠而又不乏嘲讽，有时甚至流露着一种满足的威严。在他面前，沿河岸修的石子路坑坑洼洼，一溜小水洼虽然已不再闪闪发光，但依然还闪着惨淡的亮色，与同样泛着惨淡亮色的河面似乎归在一处。然而即使那藏着一个个浅滩的水面也不再是静静地守着自己，没有一丝界线清晰可辨地融入吞没了整个地平线的、犹如极圈标志的、形似长带的淡淡天际：天际中那些薄薄的黑云带可能也就是大河流经之地最后面的岛屿，而空中云带四周被割裂的最后亮色或许依然还是西去的河流。

索尔格停下车，想紧紧抓住这一空间事件。然而空间已经不复存在，没有了前景和后景，远近层次感正在最终消失，他面前仅剩下一

种强劲而缓缓耸起的空敞，并非完全空寂，而是有一种灼热的实在感，他愈加强烈地感受到头顶上方和背后那漆黑的夜空，愈加强烈地感受到两侧和脚下那浓黑的大地。心神不宁的索尔格试图阻住这一自然现象以及在这一现象中生发的对流逝的沉思，采用的办法是在自己的头脑中将这种种矛盾的细节狂暴地逐出这幅画面——直至远近层次感、没影点[2]和可怜的孤单再次出现。确实有那么一瞬间，他感受到自己体内有一种力量，能将自己整个射入泛着亮光的地平线，能让自己在那里永远化入无可分辨的天与地的混沌中。

他坐在继续行驶的汽车里，身体僵硬，好像要远离所有的仪表装置，手把着方向盘相当靠上的地方，就像他不属于这里。

一条条没有名字的路从一个个没有门牌号的小屋边经过。有些窗户挂着绵羊皮，好像已经准备好过冬了。大门上方那些驼鹿角进入车前灯的光线时显得又白又大。小屋都高高地建在成排的粗圆木上，屋下黑乎乎的区域里，放在那里的杂物的影子在移动着。顺着林边修建的飞机跑道成了一块在汽车灯光中越来越细的石子地，很是空旷，两边夹着低杆红色标志灯。一条没有主人的狗瞪着发亮的眼睛从它的地下洞窟中伸出脑袋。这是一片被遗弃的移民地，美国联邦公路网中没有一条公路通这里，也不通船。要来这里，只能乘坐小型飞机。然而这里却有许多又窄又短的小路伸入原始森林，直通到一片片沼泽地，而那里也就是路的尽头。每户人家至少有一辆汽车，即使再短的路，住在这里的人也要开上车，在灌木丛之间快速拐来拐去，将从未干过的道路上的泥巴甩向树干和小屋的墙壁。这个偏远之地虽然平平展展，却拥有所有自己的物体、植物、动物和人，每天都会重新变得毛糙，像骨质一样，轮廓清晰分明。“印第安女人”（索尔格在心中总是这样称呼她，即使在她身边时也是如此）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出现在他的面前，身上透着迷人同时又泛着冷光的圆滑——好像这“圆滑”就是她经久的美称。

当时，夜晚还从未真正黑起来，在与超市相邻的酒吧里，她邀请了他去跳舞。她那宽宽的、与众不同的秀美身子（他不知道跳舞时该将双手放在何处）为他示范着各种动作，首先让他感到惊异，并且以一种他自己不大喜欢的方式刺激着他。与此相比，她倒觉得他身上的一切似乎都平平常常，或者说她至少是忍受了他。她的光滑具有诱惑力，她的宽容具有传染性。

关于她与这个外地人的关系，不应让部落成员们——其实几乎已不再有部落，有的只是听着卡带音乐、喝着啤酒、坚守在一个个小屋中的人，而他们屋后的森林里就是那些古老墓地的巨坟——得知任何风声：不然的话，作为卫生部门聘任的、独自掌管着该聚居地储备药品的护士，她也会失去自己族人的信任，“身上沾上了味儿”，“她的脸蛋中会蹦出青蛙”，给村子传染种种神秘的疾病，因而她本人必定会死于“一把石头剪刀”。和众多居住在这种纬度上的人一样，她丈夫不会游泳，一次在河里捕鱼时淹死了。她反复做着一个梦，她把他从水中拽出来了，却是一个装饰着羽毛的木制面具。

她的屋前竖着一个高高的图腾柱，在汽车灯光中色彩斑斓，柱子边靠着她两个孩子的自行车。透过没挂窗帘的窗户，他首先看到的是她那圆圆的额头，这意味着一种亲热的欢迎。于是他根本没等她的信号立刻就走了进去。他确信孩子们已经睡着了。

一个孩子在甜甜的睡梦中就像没有性别，松松地咬着另一个熟睡的孩子的胳膊肘。这个硕大的空间半明半暗，但却不黑，好像与其余空间分离开来了，一个只有他们才能进入的营地，屋外夜色中摇曳的灌木丛的影子在它的墙壁上蹿来蹿去：尽管如此，他——注视着她，顺从她，决心化作她美妙的机器（就像她化作他的一样），与其说使她“幸福”，倒不如说分享她那更为持久的骄傲——并没有把自己看成骗子，而是看到那个无可避免的、根本无须由他承担责任的欺骗行为的事实。

事情不单单是这样：他在她面前不得不使用一种（况且对她来说也是如此）陌生的语言。在这其中，他会有一种不同于使用自己的语言时的声音：在这种大概只涉及他们两人的特殊情况出现之前，就存在着没有实际行动的渴望与真正付诸实施之间的矛盾。对前者来说，他知道自己和对方都处在完美的状态中；而对后者来说，这种实施随后必定将以某种方式结束。尽管能够一次又一次地预感到凯旋，然而每一次都见不到胜利的影子。每一次似乎都是唯一有效的手段，而后来却几乎不起任何作用。那所期待的结合并未阻碍这种渴望，但却使它衰减成突然的难以持续的瞬间，正是在这样虚弱无力中，产生了一种愧疚感，而随后更加愧疚。这就意味着，他不爱她。他知道自己本不该到她这里来，而当她拥抱住他时，他在游移不定中突然与她做了

那事。他竟然对拥抱没有一点感觉，只是依旧觉得孤单，怎么会成了这样呢？

他希望用自己的语言去爱她，通过自己的语言去爱她，以此作为补偿。然而，实际上他并没有这样，而是用咄咄逼人的眼光默默地盯着她。她起先是一阵惊讶——不单是在讨他的欢心——随即害怕起来。他把玩这样的念头：杀了她，或者至少偷她一些东西，或者至少毁坏她一些东西，没人知道他在这里。“我不喜欢这个世纪。”然后他说。她慢慢悠悠地回答，好似在为他解读未来：“是的，你身体健康，也许会走失的。”

她压根儿就不知道他来自哪里，想象不出地球的另一块地方时就笑。天上那条长长的亮带现在终于消失了吧？发电机在屋后的铁皮棚屋中隆隆响着。在一种没有地点的黑暗中，超越出所有的纬度和经度，那些水滩在颤动，在围着圈子旋转。欧蓍草的白色花朵在寒冷中弯曲着身子，开黄花的母菊丛成了燃烧着的森林的航拍照片。此时，一种好似丁零零的失却方向感的警报声从索尔格内心深处飘出，穿过如夜沉寂的洼地，一直向北而去（此时此刻北是什么？），直至冻原滩地，在那里让一个冰柱崩陷下去。那冰柱是千年之前水泡出口的隆起物，被沙土和碎石覆盖，从外面根本辨认不出是一个冰块。说不定一个火山口正在形成，还带有一个湖，似乎极点附近确实曾有过一个小小的火山。屋子斜坡后面那条河里，只有河水表面还在流动：紧挨着河水表层下面，光滑的冰体填满了从源头到河口的河床，抓住上面漂游的树枝树叶并快速裹住它们，给河水染上了它的玻璃色。许多人的额头正放在盥洗池那冰凉的瓷边上，睡在这张床上的两个孩子大概整个夜里不再会翻身。而劳费尔呢，他正站着在看一封信（今天并不是送邮件的日子呀？），信纸用手指捏着，但更多的是用手掌捧着。在索尔格的遥想中，他身边沙发上有一个稍稍侧斜的水果篮。这期间，他一直盯着也瞄着他的猫，直到它最终闭上了眼睛。风在屋外灌木丛中的空啤酒桶中呜呜呜吼，同时来自史前时期的风也在他的脑子里发出埃俄罗斯[3]式的怒吼，而小屋此时立身的土地就是由这种风吹聚在一起的。索尔格察觉到，十分熟悉的非现实从所有共时但却互不相容的物象中聚向他的四周，马上就会将他刮走。这恐怕又是他自己的过错。“我必须回家。我必须睡觉。”拳头捶着脑袋；这也是一种祈祷：这甚至在起作用。恐怖的景象消逝而去，空间感重新归来。“你在看什么？”印第安女人问，他在自己的眼角中感受到对她的好感，

张臂抱住女人。他此举是当真的。她紧紧抱着他。当他抬眼向上望去时，第一次发现她面部没有任何表露，就是一种完全的投入，他在那张脸上预先看到了一个漂亮的老人。

索尔格一边受着她的款待，一边还认真地听完了一个长长的故事。故事讲的是有一个人让一个女人闻铜，用这种方法诱奸了睡着的她。他被礼貌地送到门口，然后心情愉快地在怡人的极地夜色中驱车回家。还从未有过这种提前的倦乏，它的降临“犹如偏离了垂直”，也许是因为用那种陌生语言滔滔不绝地说话所致（其间他仿佛觉得他的“危险性”是作为古怪而阴森恐怖的人出现的）。他踏入在黑暗中闪烁着亮光的木头房子里。这房子的颜色、形状和材料离得老远就已经作为能量传给了他（斜坡后面的水流已成了细小的潺潺声）。他有一种活动欲，有一种十分强烈的研究大自然的冲动——尽管后来他只是端了杯葡萄酒来到孤寂的实验室里（劳费尔已在隔壁睡着了），把猫抱在膝头，百无聊赖地遐想着里里外外的昏暗中的概貌和秩序。

他可以自由自在地使用自己的语言了，终于开口对那只猫说：“尊敬的有魔力的动物，大眼睛的家伙，食肉的家伙。别害怕：现在谁也没有我们强大，谁也不可能对我们造成损害。窗前流淌着怀有敌意的水，可我们坐在我们自己的地方，直到今天，我们一直运气不错。我并不太弱，我并不太无能，我能够自由自在。我想获得成功，我想经历冒险，我想教会大地理智，教会天空悲伤。你懂得这些吗？——我心情难以平静。”

他们两个向夜色望出去，猫的注意力远远超过人，高高竖起的尾巴下面的排泄孔犹如一道闪烁的目光对着他。一阵这个地区少见的风在外面狂吼，静静的屋子的木头里面也发出咔咔声。索尔格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最后觉得自己在用头盖骨称自己脑髓的重量：一台秤所做的事情就是让它所称的东西没有重量。一阵神经的震颤又一次围着脑袋转圈子，好像皮层下有什么东西在扑打着翅膀；随后出现了完全的寂静。在这种寂静中，一切都在说着这样的话：“夜——窗户——猫。”索尔格感到屋外的寒冷和风是在自己的肺叶中做着善事。

他抓住猫的前腿抬起来，因而它只能挺直身子立在那里。他将耳朵贴近它的嘴边："现在说点什么。别再装了，假惺惺的四条腿的家伙，没爸没妈的怪物，无子无女的强盗。倒是加一把劲呐。谁都知道你们会说话。"

他将圆乎乎的小猫头紧紧按在自己的耳朵上，同时越来越用劲地抚摩它的身子，最后他的手穿过它的毛抚摩到它的骨架。

猫一动不动，几乎不再喘气，在这种困境中眼睛瞪得滚圆，晶莹透亮，瞳孔中现出这个男人的影像。过了好大一阵子，它才开始呼哧呼哧地喘气，最后用热乎乎的气流将一个短促的悲伤之音送进他的外耳。那声音不是出自痛苦，而是发自最后的紧要关头，发自一种终于出现的放松。随后它甚至用一只爪子完全家养动物式地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脸。

"荒谬的畜生，"折磨者说，"魔鬼似的夜行动物，可以随意比喻的家伙。"

猫抓了他一下，趁他松手之机，将他的膝盖作为中间踏板跳离开他，立刻钻进房间的长条地毯里，在地毯下使劲弓了一下身子，呆呆地卧在那里。

索尔格脸上先是有一种凉意，后来伤口才微微出了点儿血。逃离而去的猫的身后，家具还在嗡嗡作响。他面前的桌子上，一个罗盘指针的褐色针尖在颤动。隔壁房间里，另外那个人在床上重重地翻来颠去，似乎是没找好自己的位置，在睡梦中说着什么。或者那已经是一种吟唱？到底有什么可庆贺的？人是那么容易泄露自己的秘密。人如此之快就乐于说话了。相对之下，猫的忸怩是那样美好。别再说了，伙计。赶快来吧，沉默不语的时代。

罗盘旁边放着一封写给他的信，从欧洲来的，他还没有打开。（看看从哪个国家在冒着什么样的烟？）单单在今天这个日子，还有多少其他事情被拖延了呢？犯了一个无可补偿的过失的感觉戏弄着他，且说不上是攫取了他。因为他只是隐隐约约有这种感觉，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后悔，不可能去补救什么。"绝对不会再这样了。"他说，正是夜间睡意朦胧拿定主意的时间，"这一天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什么？一种强烈的炎热，几乎是臭的，迅速向房间压下来，

向房间中这个依然顽固的没有入睡的人压下来：无可弥补的不足和没有止境的无能的意识。他没有权利看那些用于技术目的的物品，他没有权利看那条河。他曾让人拥抱自己，那是骗人的假象。劳费尔此时真的在睡梦中唱着歌。“滑稽的另一个，可笑的自己，笑呵呵的第三者。”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向来如此，他们所有的人都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他们都是造假者，无一例外。夜晚变成一个在外面倚着窗户玻璃的物体；索尔格此时真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危险的人：因为他想丢弃一切，想自己走失。

当然很久以来，他就熟知无人居住地带的种种状态。它们会在第二天清新的空气中化为乌有，只要不是还在睡梦中；而且这时那只猫又从地毯下钻了出来，在准备上床睡觉的他面前过来过去好几次，借以表示它的亲热。“你也看见了，我现在去睡觉。”他低头对它说。他又补充说：“乐去吧，我的动物，你有一个故乡。”狂风中的房子飘走在夜色中，索尔格高兴地期待着晨光。“我想与动物们生活一段时间。它们不出汗，不为自己的处境大声哀怨……”

然而在极为需求沉默不语的情况下，真的就不存在对某种出自本能的呼叫的乐趣吗？用这种呼叫不仅可以证实过失的不存在，而且可以重塑那种光辉四射的清白，凭借它生命亦会持久。

不管用什么语言，索尔格没有什么可呼叫的。半睡半醒中，他清楚地意识到：又是一天逝去了。在这一天里，他推延了某件很快就不可推延的事情。到了做出一个决断的时间了，这个决断尽在他的掌握之中，或者不是——不管怎么说，得由他将它导引过来。

他呼吸深沉，一动不动中觉得自己采取了某种姿势。此时此刻，他感受到一种对这种决断的渴盼，感受到一种几近愤怒的期待和焦躁。此情此境中，他觉得自己不是孤单一人，而是平生第一次将自己想象成民众中的一员。这样的情况十分奇特，对索尔格来说完全属于绝无仅有，即便是在入睡过程中也毫不可笑。他此时此刻不单单是代表大多数，而且为他们需要一个决断的愿望承担着责任。就是这个愿望将他们所有的人首先聚合在一起，让他们感到欢快幸福。

所有重重叠叠的高屋大厦的窗户系统式样划一，他甚至瞬间将它们看成是凝固在专注中的期待用具；它们也仅仅是出于他的这一目的

被嵌入一面面凄凉的墙壁，而不是作为观望和通风的孔洞。与通常半睡半醒时不同，显现在他面前的不是无人居住的地带——取而代之的是许许多多飘浮而过的脸。它们离得很近，没有丝毫的民族特征，挂满忧愁，其中没有一个是他熟悉的；然而它们总体构成了一种活生生的、他也属于其中的多样性。

他到底是否为一个决断做好了准备？这一点他也不知道。若不身临其中，他永远也不会得知这一点。

然而这个决断又是什么呢？作为答案，几乎已经进入睡眠状态的索尔格看到的只是一幅沉默的画面。在这画面中，他坐在一个小小的位置极高的空间里，是长着圆乎乎的肩膀的勤劳的人民官员，将他和其他一切分隔开来的一大片水域的对面，那些统一的窗户向他望过来。

一种将人耗得筋疲力尽的奇怪的肉欲向他袭来。过于虚弱时，他看见自己已经消失在不远处的一个拱门下。那拱门继续把他引入一个眼下还锁着门的避难所里：那里与许多事情有关系，但都是生死之外的事情。

热浪传遍他的整个身体，他遇见了自己，是在松弛地放在手心里。他满足地感受到自己的性器官，没有兴奋；同时他有一种饥饿感，还有金钱欲。那只猫跳上床来，卧在他的双脚上；“一只屋子里的动物”。细细长长的行军床正好适合于他。一旁的劳费尔在睡梦中笑着；或者是他自己？外面的风化作一片尘雾。那个蜷身而卧的印第安女人正在忘记他，忘记所有的人，连同她的孩子们。（就连她此时也是他合适的女人。）

白日里，通过工作一般都能与自己和地貌达到一致，他“面对着现场”——面对着由他探察的地区（“城镇”就是他那方方正正的、无人居住的、除了荒野还是荒野的作业场地）；夜间，睡在一张高高的铁床上的索尔格依旧还在体味着与欧洲和“祖先”的距离：不仅将其体味成自己与另外一点之间无法想象的路程，而且将自己也体味成一个远离者（在此情形下只能怪距离这一事实）。睡梦中不存在另外一点的概念，只有一种与他纠缠不休的、烦扰他身上一切的意识，那

就是没有睡在自己的床上。睡梦中时时有一种被强制远离的感觉，尽管改换大陆已经数年，他还从未在有家的感觉的地方睡过一个安宁觉，更多的是刚一合眼（一个每次他都抗拒的时刻），随即整个夜里都在朝有磁力的地平线慢慢沉离，愈加黏稠，愈加沉重——后来在什么地方发生着什么事情？

一伙醉醺醺的印第安人大喊大叫，围着一堆篝火站在河岸斜坡上，其中一个东摇西晃地倒退着离开人堆儿，手里还攥着一个酒瓶，跌入平展而湍急的水流里，竟然沉下去了；不过做梦的人替代他站在那短短的斜坡上。他再未浮出水面。没有人对他的消失做出反应。

若是俯瞰（比如从一架低空飞行的直升机上看下去），这条河的河水表面清澈透亮。河面下，犹如裹在一个清亮的水体中，一团团黄褐色的泥浆云清晰可见，它们是一个个边缘分明的独立团块，因而才显出湍急强劲，从河水深处冲涌而出，占满整个河道，向西方滚滚而去。

在这团团浑浊之上，紧贴着透亮的河水表层下面，即便站在河岸边，你也分辨不清那黑乎乎的树干漂着滑着而去，还有大都被水流剥得露出黑皮的桦树，它们时不时被冲得特别高的泥浆团短暂地裹住。在河岸边，看得一清二楚的是那些单个漂游的残断云杉，因为后部的树根重量较大，所以头部一次次翘出水面，随即又沉没下去。

有几根树干被水流冲向浅滩，因树根挂在河底而停泊在那里，只有趾高气扬的头伸出水面来。

再也听不到呼喊声了。河在晨光中弯出一个弧形，流向一个在更远的地方永不停息的大海那平静的海湾。海面上不时有风带起的水波在昏暗中缓缓地爬向四方。

一条粉红色的死鲱鱼被冲到岸边的沙滩上。凝重弥漫的昏暗中闪现着一种很弱的色彩，上面是与其截然分离的惨白天空，挂着失色的、犹如向后坠落的月亮。那条鱼肿胀得怪模怪样，横在因露水而泥泞的沙滩上，好像是在嬉戏中偶然进入这个冰冷的晨色风景画中，与稀疏的矮树林中的印第安人墓地那一个个同样鼓鼓的坟包形成对应。坟包由白色的木栅栏围着，矮树林是那片小屋另外一边的分界标志。

小屋隔墙昏暗地立在中间地带的灌木丛中，看不到生命迹象，只能听见发电机的哒哒声。河岸斜坡上被遗弃的火堆还在冒着烟。

这个居住区小路纵横交错，数不胜数。然而它们却很少将一个个小屋相互连接起来。它们只是这样或是伸进一片小树林，或是伸进灌木丛，不是在那里到了尽头，就是作为一个个隧洞通道再通向四面八方，而且也许尽头就在狐狸修筑的一个地下迷宫里。这个村落被荒野团团围住，还不仅仅如此：原始森林和史前地貌都完整地保留着，即使村子里也依然大体如此。这个地区从未开垦过，因而也从未有过诸如田垄或各种完全文明化的地貌形态。除了住房的修建地之外，大地表面的自然起伏几乎没有一处改变：即使那些比较宽的路也都是高低不平，上上下下，只是从空中俯瞰时才显得平坦（照这样看，一条“垄”，加上那条宽带，无非就是那条又短又宽的石子路，它作为禁区通向一个军事基地，伸入沼泽地带）。由于大多数小屋都修建在柱座上，甚至那些建了房屋的地上，即房屋下面的小洼地、沟渠和土包，也保持着原先的地貌。

仿佛与原始地貌这种纯真的状态遥相呼应，那些散落在灌木丛中的一个个住所没有在任何地方相互形成一种组合；它们东一个西一个，即便与最近的房屋也没有关联，常常远离能够行车的道路，也远远避开能够行车的道路。没有能将这个移民区尽收眼底的地方，但它却以附近唯一的居民点而闻名：每一个建筑出现时，都让人觉得不会再有别的建筑了。

只有乘飞机从高空看去，河边原始森林里才会令人几乎神迷地突然现出一个规划中的小镇。小镇有一个甚至呈直角形的道路网，有一条所谓的“宽敞大道”斜穿小镇，是真正的主干道——突然出现了一个理想之地，已经文明化，同时又是原始的，时而有一把黄铜门把手在晨曦中闪烁着亮光，同时雾气从云杉树自然保护区那无边无际的浅棕色中腾起。

在这片给人以亲切感的肥沃的河边平原上——那些低矮杂乱的针叶树很可能是葡萄藤——自然看不见任何农田和牧场（初看到这样的缺失很是让人费解），也看不到一条横穿原野延伸向天尽头的道路。

（由于乱扔乱放的坏损汽车和锈迹斑斑的电器，从高处看，大多数小屋都变成了被洗劫过的废物集装箱。）

三角山墙木房有一个白色木头教堂，是这个地区最高的建筑，也是唯一有阁楼的建筑，两位住客有时候把阁楼当暗室用。这个山墙是一个标志点，因为即便在这个有人居住的地区里，在灌木丛和沼泽地间迷路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索尔格早早就起了床，想立刻就开始干活。太阳还没有出来，但那些光滑的鹅卵石已经在河岸的路上闪闪发亮。他站在河岸边画着近处一个探出河面的沙滩，沙滩边上沿水平方向仿佛标画着一条条凸线。那是聚在一起的落叶、残枝和针叶。河面好像一夜之间陡然落了下去。天气寒冷，可他并不觉得冷；任何一种天气都能给他活力，只要他置身户外的空气中，只要他用自己的力量去完全领受它。

即使在工作中，他也是更喜欢画画而不大乐意照相，因为他觉得在画画中才能领会地貌的所有形态。每一次他都感到惊讶，那儿竟呈现出如此多姿的形态，即便是在乍一看十分单调的荒野之中。另外，无论什么样的地区，只有尽可能忠实地逐条线画出它来，不使用在自己的科学中已经习以为常的图解和删略法，他才觉得更接近它，他才能心安理得地宣称曾经到过那里，尽管仅仅是自己对自己宣称。

与这个季节通常所见一样，这片河域空荡荡的。然而，在这个如同从大地深处映射出的早晨，环绕着它所有的边缘，让人重新感受到世纪之交那个短暂的时代。那时，河里行驶着明轮船，各家贸易公司将这里划归为各自的基地，一群又一群淘金人在这里涌来涌去。这个地区载入了世界史册：这些都一去不复返了，消失在出自虚假“贸易站”的塑料网筛里；消失在从事家庭手工制作的印第安人仿刻的袖珍探险雪橇里；消失在因天气变化剧烈而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风化得快的墓碑铭文里，而在没有时间没有意识的河里，逝去的东西现在作为有意识的永恒的水流一起运动着。观察者感受到平静和安慰，轻松愉快起来，有了做成什么事的乐趣。

素描簿那结实而没有光泽的纸；为能画出粗细不同的线条而将笔尖削成斜楔状的绘画笔；香烟发出美丽的亮光；没有一丝风；烟雾没有飘走，而是缓缓沉降在地面上。

晨景中首先出现的颜色一如物体本身：一种砾石的红色，一种汽油桶的蓝色，一种刀叶的黄色，一种桦树干的白色。草地里长着炸裂的小灰球菌。另一处地方长着一株毛茸茸的罂粟，它的花不是红的，而是美妙的黄色。金合欢与各地一样长着深色的刺，它们只是灌木，不是乔木。火红的花楸浆果的果肉里面已经比雪球还要冰冷，在手掌里还在长时间地燃烧。柳树枝的砖红色似乎适合做书的封皮。还有钉在仓房墙上那一缕一缕的熊皮的棕色。

最先动起来的是水面上一团一团的水汽，在往东飘移。黏土斜坡上的洞里飞出一些河燕，很快又转身飞回来。一些黑乎乎的野狗在河滩斜坡上嗅来嗅去，可随后却摇身变成巨大的乌鸦升向空中，呼呼地挥舞着翅膀在这个男人的头顶上盘旋，转换方向时发出如同呼喊似的沙哑叫声。有一只飞了回来，无声无息地再次从那个站在那里的人头顶掠过。它飞得很低，扑打翅膀发出的声响就像电动机传动带发出的声音。

那些夜间被冲到河岸上的鱼几乎已被吃光。在松软的沙地上，时而还可以看到鱼眼睛被啄出时留下的印迹。一条猎食的狗顺着河岸跑来跑去，一身银灰色，头部蓝色眼睛往下一色白毛：一张真正的脸。它左一下右一下撕扯着地上的一只死海鸥，咔嚓咔嚓地嚼着海鸥——远近唯一能听见的声音。聚居地那些被链条拴着的狗从它们的土窝里钻出来，尽可能远地四下乱跑，哀号狂吠，还带着被抑制的狂躁。

一个司空见惯的清晨交通的种种声响开始了，然而坚实的土地上没有一处行驶着汽车，而各处灌木丛上方出现了无数架小飞机，另一些小飞机在河对岸的空中发出轰轰的响声。“你必须知道，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如此程度上听凭自己置身于这样的生活之中，因而也就不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听任自己。”

敬慕谁？敬慕难道不是他的需求？难道他不想有所依托？他能够为他们做点儿什么的人在什么地方？他到底在什么地方？

作为样例，那个不仅被压扁而且完全被压进路面的啤酒罐在展示着自己。它是在向不可能再增强的强力展示自己，是在向他不熟悉的但此时已经体验到的绝望展示自己。这种绝望关系到一种无可补救的

不足和一种冷酷的缺失，为此村子里所有的狗都在怒不可遏地狂叫着。

同事劳费尔已经又穿上了他那件口袋很多的马甲和那双长筒靴，在安装于三角山墙木房大门上方的一个飘动的球网前跑过来跑过去，自己打着篮球。正在往回走的索尔格开始加快脚步，抢断朋友的球，和他一起打了起来。

在十分遥远的洼地里，太阳缓缓升起，稍稍有点儿偏，用深深的投影使这里的景色暗淡下来：一种昏暗，不如说是一种朦胧，利用那些几乎毫无收缩、也几乎不挪不移的影子沟壑，将在树木和灌木丛间停留整整一个白天——从索尔格参加打篮球那一刻起，时间立刻化成一个沐浴着清晨阳光的空间，就像在一个开放式的舞台上，没有特别的事件，没有昼与夜的更替，而且没有特别的感受：此时此地，他既不是有事要做的人，也不是无事可做的人，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旁观者。

他刚刚还冲撞了他的对手，闻了闻篮球，在别人的，后来在自己的汗味中喘着气，还被拦腰抱住一次，被体格强壮的劳费尔挡在了一边——遭燕群丢弃的独燕越来越多地飞离它们在河岸边的洞窝，远远飞至河中心的上方，从那里加快速度飞回来，好像那里有一道隐形边界。它们腹部是白色的，比别处的燕子肥胖，个头要小许多，整整一天以及随后的每一天都在重复这种长短两节拍的运动，有时会遇到一只亮白色的鹰沿着河流巡游，燕子便随着它飞上一段路程。

在这个时空中，有着持续永远的现时，有着持续永远的万物共享的世界，有着持续永远的可居住性。这种现时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现时，曾经被爱的死者一起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最遥远的爱就隐藏在一个可以进出的相邻空间里，而且欢快乐观；这万物共享的世界是一个别样的所在，那里不再有逃离和归去的压力，但也不会强迫人融入老辈居民的习俗；这里的可居住性是一种整个地区的住房和工作场所的可居性，在内部空间不施加习俗压力的情况下，个人的特立独行成为了可能。

秋日的阳光不强，或者说热乎乎的，或者说在相距很远的水面上的某个地方闪着亮光——至少这秋日的太阳不仅仅是一个无关紧要

的、司空见惯的、背后或眼前的光源。在露天已摆好餐具的桌子上，树叶纷纷地落在一个个盘子里，或者大批地漂向河流下游；或者根本就不是树叶，而是作为鸟儿，从草地飞回灌木丛里，突然停在一团飞旋的惊恐中，作为人间的动物向完全不同的方向窜去，是青蛙脑袋，在那一片片黑乎乎的沼泽水滩里，它们流动在那黄色落叶层之间，或是野兽，它们远远地逃入低洼地里，在枪声中翻滚着；或者说它们归根结底无非全都树叶而已（比如从树上落下的鸟儿，在风中无非脱落的树皮）。

在这一时间里，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并非仅仅是凑巧分不清这种种细节的人自己莫名其妙地搞混了。这样的事情是对其自身的强制性提示。就像整体而言一个大轮回（“年轮”）中的季节一样，这样的事情从个体看来，无论对什么样的观察者来说，都会从一个个单一的时间流程转换成形形色色的空间事件：乍一看时是种种混乱，但之后却作为外部的转换而受到欢迎，其间在一个深深的观察空间里，凭借奇妙的自然现象，植物遭遇了动物以及人，未显现的遭遇了正在那里发生的，“一如既往，独一无二”。这样的情景既使索尔格的特殊故事与北方秋日的遭遇转化为一，又从这个人的故事回归到一个时间的苍穹里，这位忘却自身的人也依然置身其中，没有命运，但也没有缺憾（完全从变换不定的感觉中解脱出来了）。

在这个地区，甚至有一个确切的地方（索尔格天天在画它）。在那里，充满希望的世界历史在他眼前一目了然地演进，再也不会发生什么暴力甚或突发的事情。这个地方并非一开始就作为地点或地段而引人注目，它是伴随着持续不断的绘画的辛劳才形成的，并因此而变得可以描述。

那是一个普通不过的地区的中心，之所以被索尔格选中，是因为前景中的一条地震断裂带和后方远处一片黄土梯地的残留。这个中心没有显露出任何特别的表面形貌，就连一个小小的泥洼地也没有，他只是在一种填充的冲动下才顺带画下了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不经意间成了一个相当独特的地段。它几乎没有树木或矮树，是一片平展的草原。草原上有几处小屋，屋前横着一条笔直的路。它的后方地带与一片稀疏的原始树林相接，但是却相距得如此之近，谁都可以看进去，而对画画的人的眼睛来说，前景上那许许多多分别可以感知的小形态本身则与荒野截然分开，犹如一道小菜园的镶边：这两个地段

与这里的地貌形成鲜明的对照，而在它们之间，这个不成形状的中间地带虽然与之延展在同一块平原上，却像沉陷下去一样，是在这些星期的进程中形成的一条地带，最终成为一个人类山谷的范例，存在于一种可能而永恒的宁静中。

印第安人天天驾着车穿行在这个浸在秋日阳光中的地带，或向左去劳作，或往右回家去。他们的孩子也一样，每天早晨一个一个地从那里去学校，每天中午又在那里成群结队地回家：这里发生着他们那没有其他事件的生活进程；谁从这一边踏上这个舞台，那他补偿了他在另一端正好要离开的这个舞台；如果这些人在途中相遇，一起待上一会儿，然后又各自走开了，那么他们只是去往庄园的路上，总是在村子的公共区域里。载货汽车后车厢里汪汪吼叫的狗是他们带出来溜达的家养动物。

与在超市、公用建筑或酒吧里不同，那些在这个中间地段里不断来来往往的人展示的是一幅毫不气馁、生气勃勃，甚至常常欢快热闹的村镇的画面。由此而摆脱了许多强迫观念的索尔格知道，他是可以相信这幅画面的。此前，印第安人事实上有时曾经是一个敌对的种族，他在他们的土地上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因为这片土地只是从表面上属于他的西方世界。“伟大的印第安人”——他可能自己曾这么想过，不过只有最终撇开“那入侵者”甚至“那另一个”不考虑时，他才敢于去关注，或者干脆不言而喻地就在其中。瞧瞧：他们针对“白人”的那些口号和诅咒至少最后才指向了他。

在所有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对索尔格不理不睬。当他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他们目不斜视，或许还快速地撞他一下，然后可能会回过身来看他，不过更像是看路上的一个障碍物，撞过之后谁都想知道那障碍物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现在，当把他们理解为一个村镇联合体中休戚与共的人时，他发现，只有这样，他们才感受得到他。他知道，不受他们轻视理应是他的事情。他们现在过来过去时，从不特意转过头来看他带着自己的仪器站在那里沉思，尽管如此，在消除了自己先前的局限后，他确信他们在接近自己：他不再妨碍他们，而他们甚至向他表现出一种关注，仅仅就是因为他们显得那么兴高采烈。这种注意本身就已经是友善了。

索尔格觉得，仿佛在这个舞台上，他第一次看到印第安人的孩子们在表演；仿佛他其实也是第一次在高纬度的北方见到孩子们；仿佛连那些成年人也变得那么亲切，无论他们在他眼前做什么，即便只是坐在汽车里飞驰而过，他们都好像在为他表演。他变得无拘无束——他们已经在表演了。

后来，一到晚上，他果真走进酒吧坐在他们中间，他们挤在一起，就像在电影院那昏昏暗暗的光线中前后一个挨一个坐着。他没有特别注视什么人（总是同时看着多个身影）。他们也没有特别注意他，不过他们经过他座位周围时，每次都是小心翼翼的，几乎就是在舞动。或许会有一张恐吓的脸凑上前来——而且可能立刻变作一张满意的脸缩回去，因为这恐吓——不是脸——立刻就在第一次回应的目光中会被忽略了。（如果有醉汉不停止这样的恐吓行为，因为他根本就不会再感知到另一个人的目光，常常都是由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印第安女人将呆立在那里的人轰走，轰他去跳一个悲伤的、能让人平和下来的长舞，从那里他就不会回不来了。）

索尔格不属于作为一个部落的印第安人中的一员，可是分别在酒吧里，在这个聚居地里，或者无论在这个地区什么地方，他都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并未忘记他们的肤色，只是在他们中间再也感觉不到自己的肤色。有时候，他甚至会想象自己在他们某个家族中隐藏起来，永远待在那里。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秋日之梦看样子更像一个自然的白日梦幻，而且超出了索尔格本人的想象世界：仿佛大自然本身将一个相应的超越个人的故事展现给这位无非是心满意足地身在其中的人。他将带着他的家人生活在村落联合体里，即使教堂和学校自然也属于村落联合体。通过自己的工作，他甚至会成为这个村中的有用之人。教堂、学校、家庭、村子：这些又意味着全新的生活希望，索尔格把中间地带里那些小屋白天升起的炊烟感受为从未见过的新奇之事。他先前无疑就看见过那烟，可怎么直到现在才——到底在何地？到底是何时？没有何地，没有何时：无须再想着这里的人无非是被遗弃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荒凉地区的人，这让人如释重负。然而这里什么都有。

他现在不再悄悄地去会那个印第安女人了。他把她也介绍给自己的同事劳费尔，尽管通常他都不将自己与女人的关系告诉别人：“这是我的女友。”从那时起，她甚至时不时到三角山墙木屋来，带着孩

子们，或是晚上作为第三个人来玩牌。索尔格非常渴望带着她在人前走一走，可又不知道能到谁面前走。她的眼睛很特别，几乎看不出深色虹膜后的黑色瞳孔，从前他从未从这双目光中感觉到什么含义，现在他信赖她——感受到了她的目光（一如既往的目光）。在她身边，他是那样心不在焉，因而他现在才与她保持持久的关系，再没有那种负疚感，只有一种他终于觉得十分奇特、不再让他惊异的快乐。（好像在她的身体里他才体验到真正的大地重力；一天夜里他们犹如躺在一块高高的平地上，后来突然间那块平地对他们来说太小了：他们长得超过真人的大小，变成了彼此的世界，因为快乐，令人难以置信。）

早先，索尔格曾认为自己具有一种获取幸福的能力。这体现在哥们儿气的放任上。这种放任也传给了一些人。眼下已不存在任何寻求幸福状态的欲望，他甚至像躲疾病似的躲避幸福状态。他只是有时候感到惊讶，其他人竟然会随同他那么快活：后来这迅速让他确信，逆时代而行也会过上一种真正的生活，同时也一再让他有了负疚意识，因为他不在乎持续性。不过现在他不再期待未来，只是缘分说了算。他在一张照片上看到，那个女人和他相互鞠了个躬，然后就各自走开了：能够像他们现在这样在一起，就是一种永恒的结合。

道别时，他也毫不费劲地说着另外一种语言，不过倒还没有借助特别的俚语或语调硬充当地人。说话时，他丧失了自己声音的意识；就像他作为生灵在这秋日的景色中忘却了一切痛苦一样，现在他说话仿佛也对其他人话语的亦步亦趋。说到底，他对陌生的语言萌发了一种新的乐趣，并且还想学会它们。他说："在我的故土之国，这种属于这片土地，属于这群人的想象想一想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就连一个这片土地和这群人的想法也根本不曾有过。正是这里的荒野促使我产生了这样的念头：一个村子会是什么？为什么首先是这个陌生女人显现为一种存在的可能性呢？"

还有劳费尔，在离开他的欧洲之后，时间对他来说常常是漫长的——他十分孩子气地早早上床睡觉，"就是为了躺在床上想家，像在寄宿学校里一样"，而且睡的时间很长。而现在，他几乎像个农民似的在这个地区忙活着，就像在自己的地质公园里一样。

他常常先于他的朋友起床，用瓶子、木板和金属条手工制作各种器具。他可以用来测量河边风和水的搬运力、斜坡的运动（地下的“挪移”或“流动”）以及土地结冻时的膨胀。

研究斜坡的劳费尔最终也忘了套上他那僵硬的职业装，因为穿上职业装也许就有了研究人员的模样，但却也像个奇怪的没有生育能力的人。他穿着一件没扣上扣子的大格子法兰绒衬衫，一条上面肥大自胫骨往下收得很紧的浅色亚麻布裤子，裤子的背带很宽，他变成一个在这里十分常见的肥肥胖胖的本地人。

他制作的主要是各种所谓的沉沙槽，有水平的，格子相互并列在一起（他用来测量水平面位置的沙石搬移）；有垂直的，分为好几层，用于测量地面和一定高度之间风的搬运力。他也使用一种“沉沙瓶”。他将这种瓶子埋在土里，地面上仅露出一个毫不引人注意的沙石拦截装置，固定在瓶颈上，能使开口转至迎向地面风的位置。他那数目众多的碎石收集箱总是安放在斜坡的坡底，为了防止侧面碎石混入而影响测定真正的斜坡运动，这个一丝不苟的劳费尔在每个收集箱前都安了长长的护板。为了测定被他称作斜坡地下土层中岩石的“肘弯击”，他将铅条垂直沉入地洞，铅条里有事先打入的与铅条形状一模一样的探条，然后观察碎石的位移，其方法是小心翼翼地挖开那些铅条旁边的土，测定它们的倾斜度。他将所有这些框架结构都安放在这个地区里，像个脚步沉重的人到处巡视看护着它们。

然而，成为他特殊领域的是建在基柱上的房子下面那些地方：那儿一个个土石小形态避开了来自上方的气候影响，与那些有本源关系的但此间已遭破坏的基柱区域以外的形态截然不同。

这个小小的观察作为发现，着实让他激动：一种小小的自然形态，不像其他地方已遭文明毁灭，而是恰恰因为文明才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时间的印记。南美的一个沙漠里情况正相反，那里从不降雨或下露水，一个世纪以来也没再刮过风，已经过去很久的时代的人类脚印和马掌印依旧留在那里，大自然对它们纹丝未动。（那个沙漠里的岩石由于风吹日晒染上了深深的颜色，由它们发出的热辐射阻碍了任何风的形成。）劳费尔想在一篇论文中对这两类现象相互进行比较，“这将不是一种研究，”他说，“更应是一种图像的描述。”

索尔格说："对我来说是这样，在尽力设想同一地区里各种不同类型的地貌的年龄和产生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恰恰是由于这种令人头晕目眩的多样性，有时候我开始在一个绝无仅有的宽幅想象画中驰骋遐想，期盼着最终能够获得这幅画。在这样的时刻，我心里清清楚楚，我不是一个哲学家，却十分自然地进行着哲学思考。"

劳费尔："不过这些可不是专业要求的对事物的思维，而且在一门专业哲学里我们也不可能有话语权。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拥有一种突发的富有哲学意味的想象，我可就太高兴了，仅仅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科学给了我一些其他人即使睡着时也不可能有的白日梦。"

索尔格："那你不妨给我讲一点儿。"

劳费尔："讲地貌？"

索尔格："讲地貌和你。"

积蓄热情；对秩序的乐趣（也包括对一张长方形桌子的乐趣）；对简单的居住的享受；再次发现的学习之乐；对身体的愉悦：对其种种需求的愉悦，也无非就是对种种活动的愉悦。再也无欲无求：并非不幸。充实：没有任何超自然的东西。并非撇开不去想，但没有固执。感受着一个永远发热的脑袋：没有个人的思想，不寻求任何结论，谁都没有预先想到气喘吁吁的（"帮帮我吧"），然后深深地呼吸着（"感谢谁呢？"），唯有**随同**思考。随同大地思考而思考大地。随同大地思考而思考大地，当作没有结果思考着的世界。那个伴随着我的循环才循环的世界，连同我一起，连同最终思考过的东西，作为仅有的**思考过的东西**。再也没有血液，再也没有心脏跳动，再也没有人类的时间：只有那强劲搏动的、因自己的搏动而震颤的绝对透明。再也没有世纪，只有季节。从躺卧到站立；从站立到跳跃和奔跑。说话和竞赛的乐趣。没有表演的兴趣，但却乐于看别人表演。强劲的风，而没有一片叶子从那些桦树上落下来。一阵子宁静：后来又刮起另一阵轻风，树叶纷纷扬扬地落到地面上。一条干涸的支流上有一群挤在一起的海鸥，伴随着一片缓慢飘动的云彩被推向一边。在那些腐烂的死鱼上撒满白色的乌鸦粪便，上面插着红色的柳枝。石子上散落着一个个空弹壳，枪声响在别处。屋内一把椅子上方挂着一件衬

衫，落山的太阳透过最上面的扣眼缝闪着光亮。那个在一只飞经这里的鸟儿（或飞机）的影子里大吃一惊的房间。“非常欢迎，你们这些笑吟吟的死者”：然而只有自己的记忆在额头后的大脑里微笑着，太弱了，无法接回那些像歪斜的布袋一样短暂出现的死者。你呀，这条河流。你呀，这座房子。（呼喊。）在敞开的窗框外面，站着那个干活归来的朋友。一片片小水洼中，树叶在打着转转。就连那些草茎看上去也像是落叶。

索尔格动身离开北方这个低地平原的前一天，也是发现这块大陆的纪念日，是个一年一度的节庆日。时间几近十月中，清晨，河水拍打在从河岸斜坡下伸出来的细小的冰凌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冰上散落着一些竖立的冰雪晶体；水面上那许许多多的小雪团是那些依旧随流漂浮的海鸥。

在一个废弃的、已经倒塌的小屋旁，长着一棵桦树，树干上一个残留的篮球网被一阵劲风甩到了铁框的上方。河边有一条条小沟，深色的风影犹如一个个在水下漂移的浅滩在那里移动。那些白色树干上的斑驳暗影后来常常让索尔格想起那只猫，它头藏在皮毛里，卧在窗口那张桌子上，显得那么亲密。一只家养动物也只能如此亲密了。

劳费尔还睡着，头像那只动物一样藏了起来。半夜他从床上起来，在外面起居间里到处转悠着。回卧室时还问东问西，说话时只动笨拙的厚嘴唇（这让坐在床上的索尔格想起了自己的兄弟），而不动舌头，每发一个音都要快速地闭一下眼睛（不是只眨动眼睫毛），就像他说谎时做的动作：直到这时，索尔格才发现，这位朋友在梦游。

看他现在的样子，好像还要睡很长时间。此间，风在他那些沉沙槽里添加着收获。看着他和窗口的那只动物，索尔格又找到了自己（那样不经意地忘却的）对正在逝去的时间的感觉，同时发现前些天那没有自身重量的存在的缺失，对他来说，那些天犹如“按照他的时间”逝去的：然而对他来说，在所有那些以非暴力方式出现在一个没有生命和死亡的中心地带的图像上，缺少的——并不是对自己的感觉，而是对自己作为一种形态感觉的意识：直到此时，他才感知到这一形态，因为他目睹着那个蜷身而卧的人时，意识到了自己的关注，

在他那双能够穿透那纯粹画面的、并非永生的眼睛的椭圆形视野里——意识是这种形态的感受，而这种形态的感受是宽容——不，他不愿意什么都不是。

索尔格和那只跟在身后的猫来到外面，它“这一天好像知道些什么”。河滩上，那些被河水冲下来的树木摆成了一个个圆圈，或者是偶然被水冲成这副模样，他在想象着。印第安人或许想用这样的圆圈将自己与这个节庆日以及可能因他而能想起的事隔离开来。整个聚居地在他眼前好似一个神秘的禁区，作为了解底细的人，他正在最后一次环游这个聚居地。

军用道路上的一根根通信电杆上确实时不时能看见图腾标记。路上烂泥中的轮胎印说不定就是一种神秘的印第安象形文字的图案；低矮的木头厕所上面伸出的一个个驼鹿角不过是在讥笑无权闯入这里的外人。“**是的**，我们敞开了大门”：在这个国家节庆日里，平日里超市门边常见的这句四处通行的套话有一种另外的特别含义。在疾驶而过的警车里（此前索尔格在这个地区从未见过一辆），一个占领国那一张张毫无表情无名无姓的脸招摇过市，这里的人民只有让自己的狗对着它们狂叫。“转转圈子，做做联想游戏。”索尔格对在他身后跑过来的猫说，它总是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连孩子们也到校了；他看见他们坐在长长的低矮房子里，坐在那面涂了色的玻璃后面，不过一点看不见他们的面孔，只能看到许多圆圆的、浓黑的、突然让他觉得非常可爱的头顶。有人在用一支笛子吹着一首美国圣诞曲，声音很是刺耳——不是在练习，好像是故意吹错的。一个孩子走到窗前，面对正在抬头望着他的索尔格啪的一声吹破了一个口香糖的泡泡。他拐进了那个公用木板房，像以往常常做的那样翻着用铁链连着的通缉令相册：许多被通缉者都有在野外生存的经验，身上刺着“命定失踪”的文身。

目光转向墓地：几乎所有躺在这里的人都是年纪轻轻死去的。地面上有许多落球果，高高低低的，长着一小片一小片的白蘑菇。走进木头教堂歇歇脚：树叶纷纷从外面吹到座椅间，一直吹到摊放在一张桌子上的借书处的长条椅上方；风琴上摆着一本打开的乐谱；隔壁房间是教士的住处，里面飘出一团团油腻的早餐的雾气。拐过下一个弯，只见树木间挂着印第安人晾的衣服，全是深色的。一个个小屋的

窗户后面，显现出主人的轮廓，他们的身材是那样矮小，即使站着最多也只能看到脖子：因而他不仅仅是从他们那里走开，而且还能够与他们道别。

风很大，他行走间上衣的扣子都被风解开了。风暖融融的，其间也裹挟着一股股寒气，吹到嘴里已经有了雪的味道。那只猫时不时停住步子，转动着脑袋，注视着一个个屋子里黑乎乎的身影。当他抱起猫时，它弓起身子向他脸上喷着寒气：它不能忍受在户外被人抱着。

在身后那只猫的陪伴下，索尔格又结束了河岸边的环行（最后从精力充沛的走动变成跑动），他心里嘀咕着：今天我第一次看见这些住户家四周围的院子，而且发现这个聚居地有一条环形路。

最近这段时间，河水水面下降了不少，因而浅滩之间形成了许多河中小岛，河水围着小岛旋转着，好像是被困在里面的一条鱼搅起来的："连这里也是这样的圆圈。"尽管看不见一个人影，但此时从河谷低处，到处传来人声的回音（无人的小舟在河岸的砾石上发出的摩擦声中夹着一只河燕的尖叫声）——索尔格看见村里的人好像头挨头齐聚在河湾里，像"伟大的水族之家"：这条河的流域，从源头到河口，"除了这里，其他地方都不值得一提"；这里简直就是"世界上唯一值得一提的地方"——仿佛就像在那些下降后的河水到处留在沙子上的文字中可以看出的那样（另一个河岸的边缘在"最后那条界线的那一边"）。

那是印第安人的声音，是从那没有人影的潺潺流水中传来的回声。然而，索尔格却认为（他没有听懂一个词）听到了自己的语言，听到了这个地区的特殊土语。这里曾经是自己祖先的故乡。他蹲下去看着猫的双眼，它退着躲开他；当他试图去抚摸它时，它跑开了。它好像反感人家在户外这样对它，逃开的动作和一条狗差不多。

他脚下到处是干涸的岸边淤泥，活像一片由近乎规则的多边形（大多是六边形）织成的大网。看着这一条条裂纹时，它们渐渐开始反过来影响着他，不过并没把他肢解得像地面一样，而是将他所有的细胞（此时才能够体验到的空虚）聚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从碎裂的地面上，有某种东西飞向这个男人，使他的体魄变得强大、温暖和沉稳。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望着那幅图案，想象着自己就是一个接

受者，接受的不是什么消息或信息，而是一种双重的、在他脸上分属两个不同层面可以接受的力量：在额头上，他也真真切切地感觉到那别扭的骨头消失了，无非就是因为在他的意识里，除了这个障碍之外，再也没有了任何别的东西；眼眶以下的平面——与地面几乎成直角——重新获得一张脸的各个特征，有一双人眼，有一张人嘴；每样东西自成一体，但并未被意识分开；他的的确确感受到那垂下的眼睑的拱形是接收屏。此时此刻，那垂得越来越低的脑袋并不意味着自我放弃，而是意味着坚决果断："我正是做出决断的人。"他向上望着，似乎已经为一切做好了准备；伴随着每一道目光，应允而来的是别的目光，在空虚中同样如此；但愿能够首先对那些目光产生影响。

这时，河水刷刷地流淌——那些灌木丛又发出窸窣声，那么引人注意的轻柔，就像他到达这里的那个夏日一样，是这条河流当时展现的第一标志。

这个从地上站起身的人并不沉迷，只有内心的平静。他期待的不再是顿悟，而是均衡和持久。"我的脸什么时候才能画完呢？"他可能会说，他为此生而感到高兴，赞同自己的死亡，爱这个世界；他可能会注意到，在这样的和谐氛围里，河水因此流得更加缓慢了；草丛闪着光亮；被太阳晒热的汽油桶发着声响。他看到身边一根亮红色树枝上有一片孤零零的柳叶，并且明白了，在他死后，在所有的人死后，他还会出现在这片大地的深处，还会赋予他此刻四处观察的每样东西这样的轮廓；为此他感受到一种使他超越了所有树冠的幸福：与此同时，他的脸作为"表现这种幸福"的面具留了下来。（后来甚至还存在着一种希望：那就是知道一些东西的感受。）

抓住这个瞬间吧，索尔格"这位英雄"放下了原本打算作为这个地区的纪念品装进衣袋里的石头，快步穿过那延展草地的草丛，朝三角山墙木屋走去。那只蹲坐在屋前的花猫又一次忘记了他。有一次，劳费尔曾说，他"或许会更长久地生活在这里，但还是要回到欧洲去死"。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时，劳费尔投来一种盛气凌人和像无赖一样的目光，迎接着这个走进屋里的人：他留在了另一个人即将离开的地方。他脚穿白色短棉袜，身穿一件鼓起来的衬衫，裤子后兜露出一块格子手绢和一双分指手套——和一个地地道道的当地人一模一样。所有的想象四散飘

去，怎样去告别，这让索尔格好心烦：比如就像一些人要离开一个地方，而其他人还在睡觉时，那么难道就没有可能无意地、作为沉浸在梦乡里的人离开一个地方吗？突然间有了这样一个想法："今天晚上为我辞行，到天亮时，如果你还躺在床上的话，我就去坐邮政飞机。"

就这样决定了，白天一块儿工作。也就是说，一个人正式邀请另一个参与自己的工作，最后他们统一了意见，一起去航拍。

租来的单引擎飞机在河流上空飞得很低，甚至连地表植被下那些暗色小冰晶的轮廓都能看得见。虽然索尔格以前常常从空中观察这个地带，然而直到就要离开它的现在，他才想象出一个特别的形状。他将这个基本上不成形状的平原看成一个多肢的躯体，那躯体还有一张不可能混淆、独一无二、此时此刻倾情于他的脸。这张脸显得丰富、神秘而令人惊奇：丰富不仅在于形态的多种多样，而且还在于它显露出的永不枯竭；神秘在于那不计其数的个体形态近乎无名无姓，它们总是奇异地让人想起（或预先认知）一个人类世界，犹如一个个呼唤着要获得名字的小形态——那么，这张脸上令人惊奇的是，每每看去时，那在其中汹涌澎湃的水流就会扩展开来：想象从来都是靠不住的——那宽度每每都是一个新的事件，哪怕你只是将目光短暂地移开；它的确是不可思议的。

索尔格很快便将拍摄忘在了一边，而让他把河流看成一张脸的轮廓的是那种切身的感激，甚或是惊叹，一种现在才能感受到的对近几个月爱的工作区域的惊叹。**那一个个马蹄湖，一个个泉源锅穴，一个个槽谷，一个个熔岩滩或冰川源头出来的冰河乳浆：**在这里，在"他自己的"地区上空，他懂得了这些如此流行的形态名称。然而之前他却常常觉得它们是不可容忍的儿戏。就像他在这里体验到一张脸一样，其他研究者在他们的区域也就可能看到一个个好似虔诚的梦幻屋宇，有**柱子、大门、台阶、讲坛和塔楼**，还配有**碗、钵、勺和祭锅**，比如那屋宇就坐落在一条喇叭状的小谷地里。谷地两边或许镶嵌着串串小丘；他此时很有兴致地为每一个形体的类名称再添加一个亲切的专有名称——因为地图上那些为数不多的名字或出自该地区短暂的淘金史（"幻影峡谷"、"无功湖"、"冻脚山"、"半美元溪"、"恐怖岛"），或纯粹以数字作名称，如"八里沼泽地"后面的"九里湖"，"九里湖"前面的"六里湖"。一些印第安地名堪为典范：

“小痴狂山”北边的“大痴狂山”，或穿经“小风谷”消失在一个无名沼泽里的“大无名溪”。

虽然河水冰得即便在夏日里人也不可能下去，索尔格面前却突然冒出一个场景，他正在河中戏水、潜水、畅游。曾几何时，这些河流不也是一个个神的化身吗？“丽水。”他说，随后觉察到自己刚刚为这条河命了名。（被截断的一条条蜿蜒曲折的支流犹如一条条彩带在下边翩翩起舞。）

他从来就不相信自己会爱上这种景色，甚至不相信会爱上景色——在出乎意料地喜欢上这条河流的同时，他此刻还感受到那独特的历史：它并没有终止，并不像自己那一个个噩梦或仅仅是一个个观念蒙骗了自己那样，这历史随着滚滚流水的宽容在继续前行。面对这丰富的景色，自身极其富有的意识犹如一支欢乐剂唤醒了他——也迫使他立刻并且不断地舍弃它，否则他必定会窒息而死。

他的下一个念头是，现在自己完全有能力掌控住规划已久的论文“论空间”，于是他对劳费尔说：“完事后我想请你给欧洲打一个电话，我付钱。”劳费尔先前给飞行员讲解了航拍相机，这时飞行员正给他讲着各种仪器。

当地的公用电话安装在滑行区对面一个飞机库里。穹顶机库后部的一个角落里修了一个没有窗户的板屋，就像一个一直住着人的屋子一样，里面摆着一张配有台灯的桌子，一张铺着狼皮的床，一个书架和一个小铁炉（要过电话到电话接通总是要等很长时间）。这个隔间有两面是借用机库的铁皮墙，电话机作为显而易见的公共用品安装在其中一面墙上，而进小板屋的钥匙要到村子另一头的超市里拿。

当初，索尔格经常开着吉普车来这里，这也是因为他喜欢在这间昏暗的小屋里坐在桌边等候。在远隔大洋的线路终于为他接通之前，每一次都会出现卫星传来的沙沙声，随之而来的是远隔重洋的画面。这种短暂的沙沙声使这个已准备好说话的人突然置身于一种莫名的激动之中。随着他的第一句话，这一端的人因激动名副其实地向另一端的人“呼喊”起来。然而到后来，即便是在说话时，也常常只有神思恍惚：另一头的声音即使再清晰，也会在说话间显得越来越远，而且

屋子里除了电话中的声音从未有过其他声响（或音乐声，或狗叫声，或什么背景声音）；打电话的人将自己看成被禁锢在电话线前的人，将自己的声音当作耳中的回音；挂上电话时的沉迷之感就称作“非真实”。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被这个奇异的空间所吸引的索尔格习惯了只陪着劳费尔来这里，边等边喝酒，边等边下棋。后来成了一个共同的习惯，索尔格请这位朋友打电话，而劳费尔则邀请他一同前去跟着听。

在欧洲早已是白天了，而他们在这里却坐在漫漫夜色中的小机库里的小格子间里。唯一陌生的声音是电话机里面偶尔发出的嘟嘟声，不过那是针对其他人的；在另外一个“村镇”里；在一个另行标注的荒野地图网格里。

后来，索尔格根本就不去听沉浸在电话机旁或问或答或讲述的劳费尔的话，只是看着他被卡进角落里，贴在电话机旁，或地地道道的说话人，或地地道道的听话人：这位朋友随后摆脱了男人对男人时的那种近似畏怯的举止，显示出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索尔格而言，在“八英里村”（距北极圈的距离）的最后一夜变得非同寻常，尽管并未发生任何不寻常的事情。先前他曾有过一些想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顺带思考过它们，现在一定要使它们更加清晰起来；它们关系到一种责任——不是被疏忽的责任，而是一种渐渐到了履行日期的责任；因为履行这种责任将会要求他做一些无法想象的事情，所以，在一次经历非凡的第一夜里，他在感受着自己，却对此没有确定的图像。

索尔格偶尔也会有兴致忙活点吃的。他在准备晚餐，也跟他的朋友和那个印第安女人一起做。晚饭后，他们三人围着桌子坐下打牌，牌是从一个散发着清新气味的新盒子里取出来的，是印第安女人带来的送别礼物。纸牌上印着乌鸦、鹰、狼和狐狸，王牌上这四种动物围成一个大圆圈，圆圈中间是一张印第安人的脸。

三角山墙木屋里有一个枝形吊灯，装着几个又长又薄的锥形玻璃灯泡。在它们发出的光芒里里，每个人都看着自己手里排成扇形而闪着宁静光泽的淡色纸牌。通向所有房间的门都敞开着，就连阁楼暗室的门也开着，整座房子里的灯也都开着。那只猫蹲着，眼睛盯着索尔格装好的箱子，摆动着耳朵，不时将尾巴从这一边甩到另一边；它微微亮出自己的爪子，好像那是它的指甲；它将前爪缩进身下，最后进入了梦乡。

劳费尔的下巴泛着光。他穿了一件丝绸衬衫和一件缀着金纽扣的黑色丝绒马甲，系在上臂上的饰带使丝绸鼓了起来。他在这里第一次穿上了从欧洲带来的低帮鞋。鞋子在桌下不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在这之前，鞋里塞的只是撑鞋物。他剪了鼻毛，挺胸昂首坐在那里。他从不甩牌，每次都是用展开的手掌将牌放下。如果赢了牌，他会露出毫无恶意的喜色，输了时会面带愤怒的威严。他自己内心的克制力和外露的豪气表现得十分完美。

虽然他们坐在一张没有上位下位之分的桌子旁，但印第安女人俨然是圆的起点。她不在两个男人的左边或右边，而是两个男人坐在她的两侧。正是她，让人迷醉。她打牌时全然一副干她本行时的姿态，她就是这样分发药品的：发药品的动作随意灵巧，从不间断，仿佛有许多只手在工作（而每次分别从其他人那里收取归她所有的东西则被看成是一种感激）。她的妆容和佩戴的饰物（脖子上挂着一个玉石护身符）给人一种印象，她不是一个印第安女人，而是一台深色而危险的、具有神采奕奕的身影的机器；只要她低头把那双人的眼睛投向纸牌时，这台机器便从那空空的黑边拱状眼睑中发出凝视的目光，将整个空间都收在眼里。

“是呀”（用这唯一的一个词，索尔格终于认为自己长时间以来只是如此思来想去的事情是一种责任）：劳费尔在某些时刻的确曾是自己的朋友；而和这个女人，他们刚才还紧紧地贴在一起，他和她那实实在在的身体，如胶似漆的身体——然而，他，一个单身汉，一个又要启程离开的人，一个“陌生的家伙”（一种令人作呕的蘑菇的名字），以一个“朋友”或“情人”的姿态闯进这两人的联合体，这是何等肆意的行为啊。

索尔格并没有预先切身感受到这二人的联盟，而是此时此刻才感受到；他现在就眼睁睁地看着这对已经成双的情侣：这个出色卓越的大地形态研究者和这个非凡绝妙的畜生。

没有人问他为什么笑：他们也知道原因。接下来的时刻自然将还在继续玩牌的索尔格置于一个正在发生的史前事件里：河流中，有一座微微上升的狭长小岛，看上去很独特：岛的中心下陷成一个小小的近似圆形的坑，一片针叶林茂密而幽暗地从那里长出来，其余四处都光秃秃的。或许这个锅状的坑穴是由一个地下洞穴形成的，索尔格一下子，但同时又梦幻般地缓慢陷入其中，而两个牌友刚才还和他一起处在齐眉高的地方，现在却清清楚楚地上升到他视野的上边缘上。坑穴里已经长满青苔，树木间立起一只只黑熊。

索尔格就像取得胜利似的来到外面。他在窗户透出来的光中走动着。外面没有其他光线，连一颗星星也没有。起先他还看得见两人坐在桌子旁边，后来灌木枝条伸进了渐渐远去的发亮的四边形：仿佛那一块块玻璃涂上了污物。“请你们忘了我吧。”他不大看得清眼前的东西——时而能看出一个浅色的石头轮廓——因此只得用脚和胳膊肘摸索着往前走。连一点嘀嗒声都听不到，只是偶尔传来一声轻微的摩擦声。

后来，在一片漆黑中，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单独显现出来；再也没有了任何图像，终归如此。所有这些相互衬托的平面，不管它们显现出什么颜色（该不会还有“婚礼颜色”吧？），还让他想到了死人：他仿佛在凝望着那里面的逝者。这时，他看见河流在这种黑暗中奔涌的地方：淡薄的黑色之上茫茫一片。正像他所崇敬的一位画家曾说过的一样，这些形态现在就是他的“表现者”，然而却没有“他的窘迫”，没有“他的羞愧”；因而它们看上去更像是他的“造型师”。

要合乎规范地描述一个作业区域，尽管使用了所有独立的专业方法，可索尔格的科学还要求运用最后一个特别的技术，它被称为“概览”。面对黑中之黑显现出来的极地之夜，这样的一种概览自然会显得无章无序，没有所要求的客观：另一种宁静在他的内心具有决定性（他真正体验着中心和深度），同时超越他自己而延伸，使他的手掌（轻轻张开的手指）发热，让他大脚趾根部的肌肉鼓起，让他感觉到自己的一颗颗牙齿，并将他作为一个整体变成一种物体，这种物体成

了一种所有感知的器官，完全朝向外界：一个愤怒之极的人用“美妙”这个唯一的词语可以表述的平静征服了这个在黑暗的地带里观望自己的人。

在这黑暗中，这个人不仅回过头去，而且肩部和腰间也在松弛地绕着自己的轴心旋转。他看出来了，自己的生活必将变得危险重重。他没有看到那些危险，他预感到了它们的存在；他不可能去寻找它们，因为它们是必然来临的；他预感到了无可避免的孤单和持续的远离。所有这些预感接踵而来，却形不成一个清晰的预见；它们汇聚成一种感觉，那样具有冒险性，仿佛他刚刚离开了自己所有的爱，没有了任何回转的可能性；他沉迷在永远的孤单中，大声地欢呼道：“没有人知道我在哪儿。没有人知道我在哪儿！”（月亮出来了片刻，被训斥了一顿。）

这时，在他旁边，有人在黑暗中抽泣，像一个遭到遗弃的小孩。或者是一只大型动物的鼻息声？

然而，那只是一个离得相当近但却不在视觉范围以内的人清嗓子的声音。他这样做是想表示他没有恶意。于是两个谁也看不见谁的人之间有了如下一段对话：“你好，陌生人。你今天晚上感觉怎么样？”索尔格：“谢谢，很好？您好吗？”说话人：“短暂的秋天。燃料用完了。”索尔格：“下面河边不是放着一堆木头吗？”说话人：“不错的河流。美丽的夏天。漫长的冬天。这位先生大概不会在意二十五美分吧？”（一只手，温暖得就像自己的手，取走了那枚硬币。）说话人：“上帝祝福你，伙计。绿色的北极光，顶端是黄颜色。你从哪里来？”索尔格：“从欧洲来。”说话人：“我得给你讲点什么：永远也别太长时间看着雪地。你会因此变成瞎子。这种事已发生在我本人身上。再来一个故事好吗？”索尔格：“不用了，谢谢。”说话人：“你曾经是受欢迎的，我亲爱的。别吃太多的肉。再在这里好好待一段时间。照顾好自己。要为自己感到高兴。祝旅途顺心。尽快和家里联系。”

索尔格不知道此人是印第安人还是白种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听着这人在黑暗中离去，然后七拐八绕地快步往回跑，但还可以把握得住路、方向和自己的身子。他回到村子，回到三角山墙木屋，屋子里另外两个人站在窗户旁边，没有回头看他：好像他们根本就没发现

他曾离开过；或者说他确实已经被忘记了，因而他此时必须得斥责他们——印第安女人肩膀上，两只玻璃制的狐狸眼在凝视着他。

再没有什么好说的；被那光滑的女人用双手最后一次拉到身边，又微微笑着推了开来，而且被一种惊异的目光扫过。在此期间，她的整个脸似乎在变大，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将站到他们身边来告别的朋友抱了起来；然后自己离开，去突然间（但很短暂）寒气逼人的夜色中的隔壁房间躺下睡觉，带着责任感（“邮政飞机”等）。

索尔格在睡梦中一直在等着一个人，可他没有来。他醒过一次，看见那只猫蹲在屋子角落里：“小家伙，巨大无比的动物。”他平心静气地和它攀谈，呼唤它。它走上前来，把头拱到他的下巴底下：它要生活，他想被自己最好的朋友忘记并走向毁灭吗？他突然把那只动物称作“孩子”，爱抚着它（他的胳膊因爱而变得强劲有力），把它称作亲爱的，因为它的颜色：“黑白！”

睡梦中，索尔格的大脑变成一幅世界地图，他作为夹裹着许多石头的土堆醒来。天蒙蒙亮时，劳费尔躺在原以为是空着的床上，闭着眼睛，一副满怀恶意的怪相。提着箱子从无神地盯着某处看的猫身边走过，它不再有任何认识他的表示。他将许多东西留在了这所房子里。“我走啦。”

邮政飞机里，索尔格与几个马上又打起盹的印第安人坐在后面。太阳从无边无际的原始针叶林中升起时，他看到一片桦树叶闪着亮光，叶子的黄色令人气爽，他想着那个印第安女人（“那下面有一个可爱的女人”），出于一种难以确定的好奇站起身来。这好奇随后变成一种饥渴，不是对什么触手可摸之物，而是对未来之事的饥渴：他在感受着“未来”，没有任何具体图像的未来。在这样一种没有图像的暖洋洋的想象中，他看见飞机驾驶员扭过头来，从他的唇形中解读出这样一句话：“我们必须返航。”

返航的原因是南边山脉后面的高原上这个冬季的第一场暴风雪。那个更大的聚居地（从前的一个淘金人聚居中心）就坐落在那里。从那里可以乘坐喷气式飞机继续飞。驾驶员驾机返航飞着“8”字形时经过的区域里，下面的地貌都变了形：一个沼泽湖的圆变成一种令人昏

昏欲睡的僵物，一条条蜿蜒曲折的小河被沼泽绿所覆盖，只是偶尔某个地方才有粼粼波光泛出。山坡上一条条长泄水槽本是春季融化的雪水在石子中掘出的又长又直的宽带，现在却折向各个方向。飞机恐怕第二天早晨才能再次起飞。

着陆后，索尔格在小小的滑行区边上停住脚步。他提着箱子竖在那里，就像耸立在一个哈哈镜室里，两条腿粗壮短小，脖子长得超过了耳朵。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无非也就是飞机在天上绕了一圈的时间里，村子似乎整个儿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不得入内的“工厂”。他坐在箱子上，以村子的身份在嘲笑自己，嘲笑索尔格。他还从未回到过这样一种非真实的境地中来。怎样避免被人看见呢？他站起身来，迈步走开和改换方向时一个劲儿地耸着肩膀。还能再走哪一步棋：赤裸裸的房屋墙体那些失真的颜色；虚假的河流那失去神奇之力的水。这样的破损十分普遍，如今显得肆无忌惮和毫不掩饰，因而，这个愚笨的受骗者的嘲笑弯弯曲曲地爬在脸上。

不知往何处去，在这种情形下，他是很危险的；不是进攻者，而是送上门的牺牲品。

在踌躇而行的索尔格前面，在狭窄的小路上，一个似乎没有年龄的人往这边走过来，和他走得一样缓慢；并未沉浸在深思中，但也没有观望任何东西——因而他那缓慢的走动渐渐显出古里古怪的样子。他没有四下张望，只是一再略略显露着自己的侧影，看不见眼睛，就像有时候狗从身边溜过去那样。最后他来到近旁，从袋子里扯出一根固定在手腕上的链条，拳头攥着那沉甸甸的家伙径直朝“我！”而来。

就像没有年龄一样，这个男人也没有种族。眼睛呈浅色，没有中心，似乎就看不到有目光。他每次弯腿时，似乎都要将嘴咧向一边，可是他没有微笑。当他（“果真”！）挥起铁链时，两个人都没有了脸，整个世界的面目在这一刻都扭曲变形了，悲喜交加地没有了脸。

“亲爱的兄弟。”醉汉将链条抡向箱子，箱子立刻破裂开来。醉汉随后瘫倒在上面。

索尔格推开醉汉的身子，用胳膊夹着自己的东西，径直向以尘世间至美的方式召唤着他的三角山墙木屋走去。这时，他是那样愤怒，

是那样憎恨所有的人，因而每一个动作都是以直线进行的。房门紧锁，他直接坐在屋前的木墩上。一片落叶碰到了他的后脑勺，犹如一只动物的爪子。可那只猫在房子里面，在一间间清冷的房间里溜达着，不时有一个棋子暗示性地分散着它的注意力，它在忙着做出自己的反应，这些反应让它打发时间。屋外台阶上的这个男人被不情愿的百无聊赖羞辱着——此间，他脚边摆着那个让人想起浴场更衣室门前踏板的擦鞋垫，还有放在旁边的足球，它们似乎也在为讥讽添油加醋，好像也在诅咒人。

这次攻击并未伤着他，而是大大羞辱了他；这不是殴打，而是一种对他的人和物的蔑视——似乎有一个声音高声讥讽道："你和你的照片。你和你的绘图。你和你的'论文'。"这时，索尔格才给予还击，向空中挥出拳头。对于一个无事可做的人来说，已经不再有北极地区，只有一如既往的寒冷且灰蒙蒙的天气。在这个空间里，在一座座小屋底下，他这个闲汉看到的只是生锈的破烂，而不是"劳费尔的静态小地貌"——关于他的工作，他原以为唯有自己知道其秘密。然而在此期间，那些工作却由一个不知是谁的人在实施，由某个人在干着许多事情的同时顺带完成的。当那家伙举起铁链准备动手打来时，索尔格死去了片刻，现在他又活了。然而那种无形之感并未减弱：在每一个瞬间还是一个无限量时，下一个无形之点又已经在其中搏动了——正如在一种恶性的疼痛中，它既是点状的，又没有终止：作为点极为沉重，而作为无限量却几近失重。那个印第安女人又成了"另外的种族"。在所有可能的插曲中，她最终只会期盼着他的毁灭——"你呀，劳费尔，欺骗其他人（处于自身无形状态中而骂兴大发的索尔格说），其根源就在于他们的社会，无所谓属于哪一种，让你感到深深的厌倦——另一方面，你不想向任何人展示你自己：因为你或许和蔼可亲，心地善良，怜悯每一个生灵，但归根结底是一个厌倦了的家伙。"

这时，这位怒火中烧的演讲者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怪物，一个有点小小的喘息空隙的怪物。他抬起目光，看着那片水面，它仿佛在观察着他。这平坦的大地过于寂静——而索尔格此时期待着爆发，甚至有一种顷刻间经历一次山脉形成的需求，或者至少感受一下一块石头从山岩爆裂而出。他跳起身来，将那只球踢向房子的墙，用力非常猛，球在弹回时呼啸着从他耳边擦过。接下来，他继续踢着，也不喘

口气，直到他眼前的那些小石子像一朵朵花似的发出光亮，直到觉得独自踢球的自己十分可怕。

他停下来，注意到水面上方那些向后排成阶梯的低云。它们呈惨淡的亮色，底部不像往常那样平平展展，而是圆形的，挂在那里一动不动。一阵风从这片大地的深处吹出来，浓密的雪雾突然间从云中落下，不是同时从所有的云中落下，而是以极小的间隔先后从一团团云中落下。天际上还有纷乱的暗色在涌动，好似一群飞蝗，那是些从云团里剥离出来的奇怪物体，像一连串雪崩扬起无数粉末，到最后，在近前处，一股短小但却强有力的白色波浪夹裹着一种干涩的轰鸣扑向那座房子和这个站在房前的人，而整个河域已经不再有一片雪花飘落。

紧接着，风停以后，单调的灰蒙蒙天空下开始飘起雪花，密密麻麻，均匀缓慢，弄得人嘴唇一阵阵发痒，屋子周围变成一个院子似的空间。明亮的欢快！可爱的汗水！这个呼吸还不顺畅的人快步跑了出去，跑到又重新获得的空气中，欢蹦乱跳地围着屋子转了好几圈，犹如身在永恒的孩童时代似的高声呼喊。不久连那个可爱的同事也来了（隔着老远就看见他站在满是灌木丛的平地上）。他很吃惊。在一种悲伤而形态完美的新友情中，第二天天亮前的一个个小时过去了。第二天，瓦伦丁·索尔格提着另外一个箱子，离开了这个没有名字的、已经笼罩着冬日曙光的地方（劳费尔和印第安女人的两双眼睛此时可是清清楚楚的），飞回那有着各种名称的世界。几年来，他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那个坐落于这块大陆西海岸边上的大学城里。那里有一条非常宽阔的大道，重要的是大道两边有一个个加油站和购物中心。大道的名字叫“北极光路”。

2　空间禁地

索尔格住的房子和一些相似的小型建筑物位于一个松树林里，坐落在太平洋一个平坦的海岸边上。大海和这些房子之间没有公路连接，只有灌木丛和一个个青草覆盖的低矮沙丘。一条条分割森林的道路成直角伸向大海方向，到沙丘前已是尽头，再不通往任何地方。从那里望去，所有的房子似乎都建在林子深处，每座房子都有一条自己的通道，这条通道都划出几个相连的弧线绕开林木。这里的土是沙质

的，那些低矮的深褐色松树旁边是一片自成一体的亮黄色海岸草滩，草长得很高，跟草原似的。借助风力的搬移，有几溜沙丘伸进林子里，在一些地方形成了浅色的土堤，又有新草在上面安家落了户，而根扎在旧土中的那些树干则从土堤中探出身子，大都只有一些干枯的粗枝。随着岁月的推移，所有这样的沙丘由于植物的覆盖停止了移动，作为这个地区仅有的几个小山包，它们和那少见的森林草地一样，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森林草地里的草又密又茂盛，几乎无法用割草机去割，因为到处都长着树。虽然从每一座房子看去都至少能看到另一座，但由于被森林团团围定，这些房子犹如一个个隐居者的小屋；它们虽然抹着一种浅色粗砂浆，但只要敲一敲便可断定是木建筑，这是因为一直存在着地震的威胁。在十年前的一次强烈地震中，相邻一块不太高的海岸连同那些修建在上面的带石膏花饰的别墅滑进大海里，加上它的平台台阶和一条条又被各种植物覆盖的横向裂缝，那里如今已成了一个无人居住的“地震公园”。

坐在飞机里时，天在很长时间内还很大。回味着与留在那里的人的情意，索尔格心里暖融融的。他觉得自己和那些人犹如被铭刻在了北极那面山墙的三棱面上。飞机一起飞，他便默默地对自己说：“上一个夏天和秋天我在北极地区。”西海岸属于另外一个时区（晚两个小时），他是在一片昏暗中到达的。刚才他还看见那条孤寂的河流里翻滚着浑浊的泥浆。他和许多人同在旅途中，那些人并非长途旅客，而是与他一样，仅仅是被不同的飞机送上去又放了下来。降落期间，也就是飞机从冰雪覆盖的山脉上空，飞过地势明显缓缓下降的丘陵地带，降落在那宽阔的、闪烁着运河波光的海岸平原上时，他看见了海洋雾霭中的落日——在一个机场大厅的人造地面上，他从一台台小型电视机的后面走过。它们与那些蛋形座椅以及坐成蛋状的看客构成了一个整体。尽管他已经在这里生活过很长时间，但直到这次返回这个犹如自我管理的大陆的“低地地区”（北方居民对联邦其他区域的叫法），他才看到了一个国家的强劲有力，灯火耀眼的机场大楼给他一种军事禁地的感觉（尽管看不到士兵）。

他眼中不由自主地出现了两种目光：他先是在等候在出口的人群中寻找“熟识的面孔”，尽管谁也不可能知道他到达的时间和航班——然后四下张望寻找那个穿着很短的裤子和白色硬帮皮鞋的男人。那人早晨和自己同乘邮政飞机，每次转机上的又是同一架飞机；他们相互之间没有说过话，但却一次又一次地会心一笑。索尔格很喜欢这

个想法，从现在起到这几天结束为止，而且总是出于偶然，相互不说一句话，他俩将都同路。他有意慢慢向出口走着，以便有人（是谁无所谓）能看见他，来接他。

后来他让出租车停在住宅区边上，步行走那最后一段路，不时能走进一片灯光里，那是房子的灯光透过树木间隙投到原本一片昏暗的路上来的。那些林中房屋显得很安静，同时因为到处亮着灯又显得很喜庆。他走在还不大习惯的沥青路面上，与此相一致的是，他依然想象着自己浑身透散着无名氏的气息，隐没于在到达区和出发区之间纵横奔忙、和他一样不受任何国籍约束的一群群世界公民中，而且因为对他这个来自另一个时区的人来说还没到夜间（也因为他数小时的飞行时间大多是在云层以上的明亮光线中度过的），他的眼睛感受的还是白天的光线，因而他眯缝起眼睛看着那一片昏暗，似乎这种昏暗是人造的。

他在邻居家取他的邮件，在那里将带给孩子们的玩具雪橇放在已经入睡的他们床边，然后返回像在其他各地一样按工作间布置的自己的住处去看信。在外面，几只狗冲他狂叫了一通。他朝天空望了一眼，奇特的是这里新月的形状与许多个小时前（晨曦中）挂在相距那么遥远的地球另一个地区上空的没有差别，这让他心中一动。

信很多，带来了很多消息；大部分是友好的；或者说是客观实在的，没有威胁或敌意。有几个人眼睛看着那风景心中思念着他。他们想让他这个“相距太远”的人离得近一点。

屋子里所有的窗帘都是拉上的。他穿着还扣着扣子的大衣坐着。一个高大宽敞的玻璃柜里摆放着一堆堆岩石碎块，似乎它们就是这样成堆地直接从自然界滑落进这个房间，停留在橱柜玻璃后面。装在玻璃柜里上方的一根淡青色氖光灯照耀着那些岩石，发出低微的嘶嘶声（这是唯一的响声）。一把椅子的椅面上有几处隆起，那是数月前有人坐在上面时留下的。昏暗的隔壁房间的门敞开着，里面竖立着一个形似消防栓的床杆的黑影，一只猫立起耳朵在上面蹲了一会儿。

那些信件连同空信封被横七竖八地随便扔在底部装有灯的玻璃桌上，堆成一个松散透亮的纸堆；一些信立在那里，犹如一个纸牌房子的一部分，闪亮的信纸切口和破裂开来的信封边对着这个收信人。他

不再欣然平静，不过只是还悄无声息地坐在那里。不再有伸手摸得着的物体，而是他四周最后那个他能够为其命名的东西——除此之外只有帘布，不是柔软地垂下，而是僵硬地朝他拱起。

在开房子大门时，甚至是在从路上拐进来时，一直在刮的风不是就已经突然间停了吗？没多大工夫，喘息的宁静化成了麻木。有个人挺身端坐着，同时也倒下了，却不像通常倒的人，起码会平躺着。“那个人”一动不动地坐着，而那个倒地的人的平面将他横着分割了。

索尔格没有了鲜血，仅仅还有燥热，在这个回归的夜晚，他看到自己进入了这个西方世界，没有梦幻，畸形发育成一颗没有大气层的行星（喀斯特和怪异的空虚），岩石般沉重，没有坠落；不是孤单地待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孤单得没有世界；而在他的心里——非时间——存在着星体和旋涡状星云，像是眼睛，却不关注他。他不仅遭到语言的遗弃，而且被所有的发声能力抛弃了；就像他内心无声无息一样，他对外界也保持着无声的沉默。没有任何声响，就连骨头的咔嚓声也没有。仅仅在幻象中能够旋转向一面峭壁，作为岩画蹲伏进岩石里。实际上，肌肉因虚弱在瑟瑟发抖。

“被强风的那一个个旋涡掠到了哪个出身的国度呢？”——于是，出现了那个索尔格觉得在其中看到了自己变得麻木的一个原因的画面：在那个“世纪之夜”里，在那些低矮空寂的“各个大陆的大厅”里，他远远坐在后面，像一个正在伴随着这个该诅咒的世纪，至少在为自己和自己的同类而痛哭的人——而同时又不许可他这样做，因为“责任在他自己”。是的，他连一个“受害者”都不是，因而也不可能与这个世纪的受害者联合起来进行大诉讼，并在共同苦难的陶醉中再恢复到能够发声的状态。他，这个“默默坐着的人”也许虚弱，然而却是犯罪者的一个后代，而且也将自己看成是犯罪者；而他的世纪那些种族屠杀者就像是祖先。

紧闭的帘布团团围着他，那堆信件像敌方的一块带有纹章的盾牌威胁着他。在这一时刻，索尔格发现，他怎样代表着每一个强加给自己的前辈，而且也根本用不着去装腔作势：他那神魂出窍的麻木重复着那些残暴的畸形怪物的麻木；他不仅在外形上像他们，而且与他们心心相印，与他们如此心心相印，就连他们自己也从来都不可能这

样。没有命运，没有关系，没有痛苦的权利，没有爱的力量（那些信件无非意味着无序），他就只剩下忠诚：忠诚得成为崇拜死神大师的化身。他闻到那战争的气味，在自己的陋室里已经被战争团团包围。

然而，留心了这个原因，使他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语言。然后，他会憎恨自己，因为他曾经为那些行尸走肉而鬼迷心窍，仿佛他“与他们亲如一家”。憎恨中，他呼吸得更深切；把自己从那墓穴旋涡中呼吸出来了。“我再也没有父亲了。”他闭上双眼，在眼睑后面看到了那条河明亮的残像。他的语言是“游戏”，身在其中，他又变得“灵动”了：他站起身来，脱下衣服洗浴，在水下唱着一支很糟糕的歌，出水后完美地唱到头。他拉开了所有的帘布。

语言，和平的缔造者：它的作用就像是那完美的心境。这样的心境使得这位观察者感知到了外界万物的灵魂。那些树木间刮起一股旋风，一张完整的报纸随着树叶和碎纸屑在风中旋转着，飞动中甚至还有模有样地打开合上：它总是在黑暗中折叠起来后飞快地飘向窗户，可每次快到跟前时却掉转了方向，在越来越缓慢的飘动中（“为我”）又展开。那后面，野草像庄稼似的摇曳起伏。可以听到大海的声音，像一所相距遥远的学校里传出的嚷嚷声。索尔格可能一时间想起自己在欧洲的孩子，又打开了房子的大门，发誓永远不再关上一扇门。

他终于躺下睡觉了（之前，床曾经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东西），最后的亮光伴随着岩石柜里硫矿石的黄色，最后的光亮消失在眼帘后。他还想起来头朝着北睡（在三角山墙木屋里，他头冲着南睡）。

当然，他若有所失的样子，但“无可抵偿”这个明摆的事实却被淡化成一种对种种缺失不确定的感受。他没有忘记，麻木作为无法避免的命运，已经深深地烙在他的身上，成为他实实在在的状态。除此之外，其他的一切（说话、行动）都游离成一种非真实的装腔作势。

在他脚下的沙质土地里，像是有一条通向大洋的沟堑，那里出现了一个当年激浪拍打的礁石，是被史前的海浪从海岸岩石上拍打下来的：在这一夜里，这所房子缓缓地绕着那个轴心在旋转，像一艘木制方舟沉降在这块礁石上（陆地的尽头）。

索尔格应邀在邻居家吃早餐。从那里，他观察到，那个昨夜的陷阱在晨光中显现为留置的房产。

一棵松树的枝条从旁边悬吊在房屋的正面，高高的草丛里站着一只好似没有腿的狗，它长着一张怪人的脸，注视着在林木间滑翔的一只只海鸥。他离开期间，那些草都已经长到了大门跟前。索尔格和邻居一家坐在一个半圆形空间里，是起居室向外突出的部分，被阳光照得通亮。他知道自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沉着镇定，能应对一切，有能力做好自己希望有能力做好的事情。他的眼睛在荒野中已经习惯了远距离，现在毫不费力就适应了围成圈坐在他左右的邻居一家。现在才回来，他带着一个地质学家的威严参与到邻居家的生活。由于经历了种种坎坷，他还略显疲惫，而正是这种微不足道的疲惫使他显得很有生气。

他不像以往参加聚会时那样常常心不在焉地想着各种不相干的图像，而是演绎着一出独一无二的、全面的幻想剧。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使自己周围的人处于当下的状态，把他们纳入自己的世界里。地地道道的全神贯注（更像是清心寡欲），索尔格在享受中甚至变得强壮了；这种对吃的快乐以无目的的占有乐趣（“特别”）打动着他：直至遥远的生命终点，他想要一味地去享受。在这个过程中，对自己的脸，尤其是对眼睛和嘴巴，他总有一种美妙的感受。而那些塞在裤兜里时而沙沙作响的纸钞却给他另外一种感受，它现在也加入其中。

“我们的邻居先生，”双手抱在胸前打量着他的邻居家女主人说，“今天看上去气色很好。”（她丈夫接着这个话头说：“就像吉星高照的有福之人。”孩子们蹙起眉头望过去，然后跑到户外，去和狗在草地上玩捉迷藏。）

麻木之夜过后的这个早上，索尔格其实比以往更为引人注目，作为行人走在人群当中时，他常常被误认作公交车司机、电工和粉刷工。身子似乎变宽了，面部神态平静，而且越看越显得平静，好像从来就是一个主角的脸（想到过去的那个夜晚，他有一种调整成功的感觉），双眼更深地陷进它们的孔穴中，蒙着一种全知的亮光。“是的，今天我的力量出自我自己。”他说。

和索尔格一样，这家人祖上来自中欧；和他一样，多年来生活在这另一块大陆的西海岸；在索尔格眼里，这对夫妻是他至今还可以相信彼此相爱的一对。他们的孩子与其说是正式的家庭成员，倒不如说是纯属偶然，是这一结合的见证。有时候他们就站在一边，惊讶地看着这对嬉闹的成年人。

索尔格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两个不怀恶意的人”。他们肯定是不怀恶意的。不过后来证明，那是他们特有的善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善良也转移到另一位不怎么和善、和他们聚会时不可能感受到恶意的人身上。这样感受着他们，可以想象出来，他们实际上当初是作为两个贫苦的一半相互走到一起的。表面上，他们常常显得头脑简单，而且由于智力缺陷甚至显得丑陋。然而，他们却给想象力以施展的空间，使想象力首先成为一种可能，并且在其中安身立命，成为地地道道的代表——几乎没有任何别的人会像索尔格一样，以如此安详的幻想（而不是封闭在那些司空见惯的幻想之中）让索尔格充满生气：作为美好的想象，从他们身上毕竟只能想到善良的东西。

丈夫是一个富家的后代，但却无能在举止方面显示其出身（即便仅仅在回应的神态上）。他或许是好心肠，但却很无助。在许多事情上，他既好心肠，又很无助，不过也会让人感到诧异，因为他突然会“施展魔法”，哪怕只是投去一道目光或说上一句话。他的妻子“来自乡村”，起初好像也是一个无遮无蔽的人，是从当年乡村四周那些破乱不堪的地方走出来的。在那样的地方，对那些一生一世都只能待在窗户玻璃后面的人来说，所能做的只有向在外面闲荡的陌生人无情地投去恶狠狠的目光。然而很快就不能这样看她了：她只是在执拗时才会表现出“狭隘”或“带着恶狠狠的目光”——只要另一个人在她面前掩饰自己的真性，她就会变得执拗。索尔格或许常常看见她“在窗户后面”，不过总是把她看成一个“友好关注的人”：是一个对所有的真性都怀着一种宽容的爱的人。不管在任何人身上，只要她再也看不到任何真性的东西，这种爱自然就立刻将他轻蔑地逐之一旁。然而，她投向另外这个人的目光（在这几年里，索尔格感受到了这一点）不是恶狠狠的，而是带着失望和受到伤害：一个以万物统领者自居的人又一次拒绝了她。她只是在看丈夫时才带着一种持久而洋溢着激情的体恤目光，哪怕同时也在指责他。有时候，索尔格发现这种目光也投向了自己（只是更加礼貌，不太那样率直，因而也更加有效力）。

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都不起眼，笨手笨脚，慢慢腾腾——即使别的人都早已无精打采地等着她，她依然固执地埋头忙着本来是一起开始的事——然而她却是两人中有榜样性的人，她丈夫通过她才得以被确定为有自我的人。他，这个平平常常的人，这个常常没有个性的人（在这一点上，他自己也愤愤不平）当年是被更胜一筹的她发现的，并且只有执拗的她在场时，才会坚强起来，如今一如既往；没有她，他常常只会跟着第三者学舌或木讷地站在一旁。他妻子不奉承恭维他，但却会（自己十分骄傲）赞赏他，毫无条件地赞赏，因而他会丢开所有的内心矛盾，心存感动地信从她，把她当作“自己民族”的人信从。他也感动她，不过只因一个理由：她和这个人事实上曾被宣布为“丈夫和妻子”。对于他们个人而言，似乎已不受任何流行观念束缚的婚姻还依旧是一件圣事。在这件圣事中，那些“涣散的感官”被集中统一起来，强有力地展示出对另一方的关切，并使之变成一种用之不竭的生活形态。不过对索尔格来说，她身上那榜样性的东西在于，在她眼里，“这另一方”不仅仅表现为丈夫（他毕竟一辈子是她丈夫），而且表现为任何一个人，也包括一个外来人：对她而言，婚姻已经变成了形态。这种形态既为她保存着一种孩子般的率真，又同时使之表现为一种无拘无束的共同意识，与一个纯粹的成年女人的履行责任迥然不同。（索尔格常常看见她无所事事；她喜欢让人服侍，孩子们简单地称她为“懒女人”。）

这对夫妻没有任何闹心的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担心对方会怎么样。简直无法想象他们有一天会死去。对索尔格来说，他们其实不过是一家实实在在的对面住户而已吧？（丈夫有时捎带他进城，妻子常常不声不响地做着一些他正打算动手做的家务琐事。）他们的关系是从做邻居开始的，之后也没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他们也从未十分亲密：比如这一个从未向另一个描述过从前，相识之初，他怎么看他。索尔格连这个丈夫的具体职业都不知道，只知道“城里”有间“办公室”。他们也就是“邻居”，然而索尔格暗暗地把他们算作自己人；他对他们的想法常常以美好的祝愿结束，就像一封封信那样，而且他不想失去这个友好关系。

索尔格此前写过一些论文，一般都是对一个划定地区的总体描述，或是对彼此分隔开来的不同大陆上相同现象进行的比较观察。如

果尝试写计划中的《论空间》，他恐怕不得不背离他那些科学的约定；它们至多有时能帮助他继续进行，因为它们能给他的想象一种结构。

好久以来，他就已经在探讨着，显然意识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每一个地区创造出自己的一个个小空间来，而且在看上去直至天际也不存在界定的地方同样如此。看样子，仿佛对这个更长久地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会从一个让这个初来乍到的人看来无边无际的平面中涌现出形形色色的、相互严格区分的空间来。甚至在一个一眼就能分辨出被分割的丘陵或山地，一个人也可以持久地想象出（索尔格的经历就如此）完全另外的空间，与从那些巨大和显而易见的形体所产生的空间不同。

这也是他的出发点：在任何一个地带，只要意识有时间与它结合在一起，一个个独特的空间终归会展现在意识里。尤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空间并不是由那些立刻就进入眼帘的决定地貌的要素，而是由那些毫不显眼的、采用任何锐利的科学目光都不可能感知到的要素创造的。（这些要素之所以能够真的感受得到，是因为与那日复一日度过的时间息息相关，而这个时间后来在那个似乎由什么人居住的自然界里作为生命的时间流逝着——也许仅仅是在某一块地上一再绊个踉跄时；也许是在一块从前是沼泽的、有弹性的草地上不由自主地改换行走方式时；也许是在一个隘口里声响视域变化时；也许是在立在一片庄稼地里一个冰碛的残留小丘上看到突然完全变样的环景时。）

激起索尔格研究乐趣的还有，这些地方大都不仅仅是某个个人的想象空间，而且都有一个流传下来的名字：虽然是被某个个人新发现的，可对于当地全体居民而言却早就是人人皆知的；那些纳税登记册和土地登记册上记载着一些常常有几百年历史的名称。那些不引人注目的地貌形态中，有哪些能够成为这样独特的区域（“田野”和“开阔地”），既可以在一个偏远乡村的平常日子里，也能够在一个世界都市的平常日子里感受得到？是什么颜色在那里共同起作用呢，是什么物质——是什么特征？在这里，索尔格或许还可以使用那些普遍赞同的方法：然而其余的一切（他的动机，还有他的梦想，那就是能够纯粹地、不加解释地描绘这些形态）可以说就是童年地理学。

这也曾是索尔格最初的想法：描绘（他的）童年时代的各种原野形态；绘出那些完全不同的“有趣的地方”的地形图；制出孩童时代所有起初看不透彻、但在记忆中却营造出家的感觉的原野象征的纵剖面图和横剖面图——不是给孩子们，而是给自己。另外，在对他来说几个星期后就要开始的一年空闲里，他想横穿欧洲仔细看看这样的地方，尤其要去那些他曾亲身感受过的地区。他也许知道，这样一种“游戏”不会有任何用处（或许将永远如此），但不管怎么说，他常常做着这样的梦，或者高兴地期待着，或者变得灰心丧气，好像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此。当他高兴地期待时，他在心中体验到一种新的胆气，体验到近乎不容冒犯的气概。他要来一次跳跃，也许不跳向任何地方，但却要跳离开什么。

他从未感觉自己是位科学家，顶多（有时）是个认真的地貌描述者。后者当然有可能陷入一种激动之中，仿佛他当时就是那地貌的发明者——作为发明者不可能是个邪恶之人，也不可能是个好得没有自我的人，而是一个理想的人。后来他或许也在想，自己可是在做善事——做善事的方式不是为其他人送上什么东西，而是自己不背叛他们：他的不背叛可不是停手放弃，而是强有力的作为。在理解地貌的过程中，他有时觉得自己是研究宁静的人。

“让这种宁静充满生气。”回来的第二天，他就将一把折叠椅夹在胳膊下，沐浴着下午的阳光，顺着海岸溜达着朝“地震公园”的海湾走去（他步行体验着这座位于海边的城市）。在那里，他坐在一个高处画一幅地貌轮廓图。

这个公园里没有任何人工修饰，就是那场灾难发生时断裂滑下去的一块地，后来被宣布为“公园”。第一眼看上去时引人注目的东西很少：一个微微向大海倾斜的宽阔平面，上面长着些许灌木丛，不像周围长着针叶林；已经又变得十分坚实的地面没有冒出房屋的残存，也看不见汽车部件。那块坚实的地面构成了一个黏土小丘地貌，除了一些灌木，其余的地方都是光秃秃的，上面有许多由散步的人踩出来的纵横小路。那些从前的大地裂缝中零零散散地出现了几条谷地，弯弯曲曲游走在那些小丘之间，其中一部分被当作了小路：索尔格觉得，在那里四处散步的人似乎每一次都是从一个奇异土城的一条条街巷中冒出来，又立刻消失在目光无法穿透的市区里，但依然能长时间

听到一道道围墙后面传来的他们的声音，只有在欧洲的一些地区才有这样的情形。

画图时，他觉得暖和起来，背景上海湾的水移得更近了。没有任何东西分散他的注意力，他有时间。画出来的东西开始回应他的目光。自己没有任何表达，他在这地貌中等待着“那个形象”：“我只在沉思中看这个世界是什么。”

他画着一个地方的草图。那块地方是被地震从较深的地下翻到地表上来的：从前那些树木细细的根端在新长出的绿草间显露出来，就像常见的雪崩中露出的夹带物。那块截面很小，然而各个地层在里面清晰地向四面八方散开来——描画时依然还能从极其细微的方向改变中感受到那场大灾难的威力。

画图的人发现了蛛丝马迹。他的线条起初挨得很紧，几乎是对应的，现在间隔较宽；它们只是在追寻着那个事件。他激动地发现，这个没有形状的黏土堆在变化，变成一张丑陋的脸；随后他明白了，他曾经见到过它：在那个印第安女人的房子里，是一个木头做的舞蹈面具，据说它表现的就是“地震”。

那个面具的额边装饰着一排浅色羽毛。在这里，他在构成边缘的青草带里重新找到了它。面具的双眼部位鼓着两个木球，而这里的相似物是那些树根，就连鼻孔也同样是翘出老远的残木，只是要窄一些。然而，索尔格并不是直接在大自然中再次找到了那个面具，而是在他那由此而产生的图里；其实在图里也没有发生再次找到那个特殊面具的事——倒不如说那完全是面具冲动式的内化；这种冲动同时继续引导出一连串舞步的想象：在一个独一无二的瞬间里，索尔格经历了那次地震和人类的地震舞蹈。

“这种关联是可能的。”他写在图的下方，“我生命的每一个瞬间与所有其他瞬间都是相互配合的——没有辅助环节。存在着一种直接的联系：我只能自由地去想象它们。”

太阳落山时分，小丘之间诸多通道其中的一条上，出现了两个女人，光线洒落在她们的臀部，是那样华丽光彩和傲慢，画图人自己心花怒放，不由自主地冲她们喊道：“你们是电影明星吗？”她们应声

反问道："你是军官吗？"一阵脚步立刻从位于下面搞不清有多远的"谷底"奔这小山包而来。

索尔格心里明白：如果他现在确确实实想要这两个女人的话，那她们就是他的了。因为在这里万事皆有可能：就站在那里，完全是顺带而为，第一阵触摸已经穿透了衣服和皮肤，他们三个马上相互黏糊在一起；他此时不是"诱惑者"，而仅仅是为等待着像他这样的人的她们做好了准备。

索尔格继续画着图，竭力抵御着他那蠢蠢欲动的力量，但两个女人却打断了他："让自己快活快活吧。"真是美妙的天真烂漫，这两个女历险者就这样奔来奔去：她们的确很美。或者他知道另外一条法则？

她们甚至有能力保持严肃的神情，而他与她们一道体验着那完美的机智果断的胜利。"太阳落山了，暗影淹没了所有的街道"：他没有请她们跟自己走，她们跟在他的身后。

她们的天真烂漫不单单是没有错；它很美妙。她们指甲盖的寒冷。她们身体内在的清澈！在这个温暖之夜，他觉得自己的四肢伸过各个大陆，觉得那两个关心照料自己的女人是看不到尽头的时间的最后标记。

这些幻象离他而去之后，他坐在昏暗中，望着对面的房子。"不，你们曾经是真实的。"他断然肯定，喝下三个酒杯中剩下的葡萄酒，希望下起雨来。后来，松树间还就飘飘洒洒下起了细雨。

对面小孩房间窗户里的灯光构成了一顶黄色帐篷，里面立着一个黑色玩具马。索尔格走出房子，来到高高的草丛里，想打湿自己。可他的身体是那样燥热，雨水一沾到身立刻就干了。大海上方是一条深黑色的地平线：陌生女人闭合的眼睑还在那里颤抖，而她们的呼喊声现在才充溢着那一个个空荡荡的空间。

这座城市的中心坐落在一个深深切入陆地的曲曲弯弯的海湾边上（低矮的住宅群和海岸边住有人家的一片片森林只是它的末端）。它

今后是一个无法再测定位置的城市行星，不依附于本身就是不可企及的史前过去的大地：昔日那里曾发生过一些事情——作为幸运事件的可爱的联合，作为危急事件的一次次战争爆发。在这片天地里，这些绝不会再激发起想象来。（那一个个防御工事用混凝土浇灌进海岸峭壁，它们是一段共同的早期历史的见证石，已变得难以理解。）这个行星呈现为一台机器，各种各样的纠纷都与它隔得很远；或许存在着一种幸运和一种危急：不过作为幸运被理解的是纯粹的无后果，作为危急被理解的是“就这样”游离在外；二者在其他各种纯粹的进程中进行着，不再产生任何单独事件。

首先，在这里，似乎再也没有可做之事，对任何人都是如此。这个城市已经不知不觉地自动化了，好像永远如此，只是还会在某些地方得到些许改善。它一劳永逸了，白昼和黑夜仿佛在自动地开来关去，没有了那古老而不稳定的晨曦与黄昏；从那机器的内部传出的（不是一个“民族”充满忧虑的声音）是一个洪亮的、继续帮助的回答，不管是通过多么小的设备，对任何需要都有保证。

傍晚，城区以及更远的地区大都渐渐被雾海吞没，在第二天的正午阳光中雾气又蒸发而去，太阳就像一辆车穿破重重雾气越来越近，越来越大。随后白天即刻变得炎热，光线亮得耀眼，白白的是屋舍，蓝蓝的是天，厚厚的叶子没有染上秋色，几乎直直而快速地从它们的树上坠落而下。在这种“迟滞的阳光”里——索尔格对它就是这种感受——他漫无目的地四下里走着，从未无忧无虑（他可以在下一个拐角就废除这种迟滞），也从不沮丧（因为根本就不是去对付什么陌生的超级力量），然而——此时此刻突然觉得自己那么可怕——总是果断地不负责任。

他并非无所事事，然而他从来也不会说自己正在工作：对此他缺乏那种日复一日的辛勤努力，因为要是那样的话，他，这个通常慢手慢脚的人，必定会一次又一次重新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做起事来，手脚灵活敏捷，仿佛那是一件很随意的活儿，或者是一件打发时间的事。

这样独自做事时，他不需要任何人（邻居们只是林中还十分遥远的声音），也没有人（他希望这样）需要他。尽管他十分熟悉这个城市，但每一次外出时，最后都会出现一次迷路似的拐弯：他“迷路”

走进一座教堂，“迷路”来到海边，“迷路”进了一家夜总会。虽然他可以辨得清方向，从未丧失过方位感，但这方位感使他走得慢慢腾腾，不像以往那样使他保持清醒的头脑。无论身在何处，他都不是决定好去那里的；他常常在事后才想到：“现在我是在这里呀。”

对索尔格来说，有两个方向历来都意味着什么，它们就是北和西。然而现在“西海岸”这个词似乎与这广阔的大陆无关，仅仅指一个有别于其他所有地区的小地区：与极其遥远无关，和“西头”这个词一样，指的就是纯粹的城区。就是在这里，索尔格大概也看得到那龟裂的多边形地面，这在北方河岸边干涸的淤泥地上屡见不鲜（在地震造成龟裂的网状沥青地面上，或是在由一些橱窗上剥落下来的犹如心中所要图案的防晒涂层上），但他在这些东西上看到的无非是偶然的、捉弄人的相似。这个世界不像北极地区的河流那样“古老”（那个地区显然在继续变老，还有与它相伴的观察者），而是无可置疑的年轻。它使索尔格回到一段时光里，他在其中又辨认出自己是一个无忧无虑的执拗的使用者。“谁是这个城市的王呢？”他不由自主地问。

常常在地球另外那个大陆上，而且恰恰就在荒野中，伴随着对那广阔土地的感受，他常常无疑就感到心满意足，自己身在一个民族之中；可那座海岸城市却始终自我存在：它的神态中显示不出任何独特之处，它的杂乱无章中没有丝毫的统一。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期，当时，就是在这里，居民们甚至从种种交通声响中听出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为他们所有的人说道：“瞧瞧吧，我们能一起做什么？”——不管怎么说，尚在数十年之前，那些沿着这条海岸行驶的一列列火车就是这样被理解的。而现在，虽然这座城市沐浴在明亮的阳光里，犹如一劳永逸地坐落在那里，可在那依旧看不透的海湾周围，那些雾笛只是无声地在呜呜。一座座房屋和一辆辆汽车虽然立在这位观察者面前，像豪华物品那样熠熠发光，但没有一样东西能将他的目光带向更远的地方，带过这片陆地或海洋，带到相同的人们那里，带进一个更大的世界里。即使在北方，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距离也是犹如天方夜谭的数字（在那个最小的聚居点里，一个捆扎得密密实实的路标指示着所有世界都市的方向，标着相应的距离）：可索尔格从未像现在在这里这样，觉得与任何一种关联都是那样遥远。后来在他的想象中，几乎连在那些房屋上空升起降下的飞机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在那些屋顶后面不停地扭来扭去的纸风筝的彩色飘带。

他在路过什么时，常常感觉到人家就期待着自己的（一如既往的）关注目光。随后在移开目光时，他似乎又将目光移开一次，投向远方，而那个远方常常只是他用来迷惑人的，他想阻止别人来观察自己。取而代之的是，他独自坐在一个光线昏暗的脱衣舞夜总会里，充当起神情严肃专心致志的观众，面对那些随着优美的节律扭动着的裸体心满意足地遐想着，装成“那个端着酒杯的男人”；或者和其他陌生人待在一家色情影院里装作“双臂抱在胸前的男人”，而且在银幕上认出自己是表演者。他克制住一切个人的东西，采用的不是欺骗，而是用一种隐秘的胜利感来确认那许许多多表露出来的虚假想象。他去与陌生人聚会时，就打算看着他们的脸，同时又忘掉它们，而就连他在告别时也常常被问到：“您的名字是……”

索尔格重新发现了“投币自动点唱机内那雷鸣似的持续隆隆声”，因而变成了一个玩家。在这种情况下，他变成了多面手，发现自己可以是另外的——完全另外的——情形，什么样的都行。事后他觉得，仿佛在这几个星期里，他就没有弄明白一个人，不过却像每一个表演者那样感觉敏锐，预先看出了每一个反应。他再没有经历强与弱之间变换的时刻，这一般都会给他那种持久不变的感觉。由硬币的叮当声陪伴着，他心神不宁地在城里到处转悠，秋叶在那里作为一动不动的饰物摆在陈列橱窗里。现在他当然觉得惬意，他不再硬充专业人员，甚至在每天的专业工作里也不再出现任何与职业相应的东西：他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干自己的事了，以一个外行人的秘而不宣的、梦游人似的认真劲儿。他回避所有的人，不与任何人分享自己的时间，有时觉得自己被包围在一种神秘之美中。

宣称脱离了这个民族，并且不足以为那些平静的世界宗教所鼓动，这座西海岸城市成了各个教派的一个节日，到处都有神秘符号翩翩舞动。在这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与其他人沾亲带故——因此，那些短时间内偶然志趣相投的人便聚在一起，急匆匆地隐身于一个个圈子里。一天傍晚，索尔格发现自己就这样在一条街上站到一个长队里，一步一步地随人移动着，最后站在一个被遮得十分昏暗的宽敞大厅里，周围的人和他一样，都在等着那位歌手，因为他曾经是他们所有人年青时代心中的英雄。

没有任何东西驱使他来这里；他更多是在履行一种理所当然的义务，一种在想象中甚至曾经令人厌烦的义务：他已有很长时间没有机

缘让第三者来代替自己了。在此期间，他需要各种导引形态，它们应不同于歌曲的终结音，应给他不断重新开始的办法，比如就像那些最早的、有几千年历史的、用诗的语言循循道来的文字，而不像他的科学那冷冰冰地进行证明的文字，或者像画家对各种形象的探索。他也许会像沉迷在这位歌手的音乐中一样也沉迷于其中，但同时作为自我坚强起来的人，又能重新找回自己。

歌手是个身材又胖又矮的男子，显得极其强壮和心不在焉。他来到舞台上，凝神盯着灯光，立刻唱了起来。随着第一组音列响起，整个空间都跟着歌手稳稳拿在手里的麦克风线形成了那条蛇形线。他的声音同样强劲有力，用不着大声去唱。这声音不是来自胸腔内部，一开始就独立于他，是独特的、坚实的、同时又无法确定方位的物体。这声音听起来不是唱腔：与其说它可以让人听得到，倒不如说那是一个人在经过长时间的、充满煎熬的、非语言所能描述的苦思冥想之后突然发出的响声。这期间，他的每一首歌都先从整体上给出一个音符，再由一种快速的、时而断断续续的、一再重复的音列分别组合起来，让人听到的是痛苦的呼喊，尖利、怨愤、咄咄逼人（至少是从不轻松）。

他没有露出过一次微笑。他拖着自己沉重的身子跳了一次，跳得还相当高。用无神的眼光凝视时，他终于可以在自己的内心里对他们诉说了，用自己的声音，用他首先从外面深深地驱赶进自己体内的声音——首先他不愿意和任何人共同拥有什么。他不是满怀深情演唱他的歌曲，而是像一个狂人在寻找着一种对他自己来说像谜一般的感觉。

他在台上演唱了很长时间，也是由于那些几乎只打着节奏的伴奏乐器，他活脱脱就是一个没有生命、招人诅咒的古怪机器——然而，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发动机似的叫声渐渐地给那声音蒙上了那种震颤的弦外之音。就这样，演唱接近尾声时，这位吞咽了一腔怨恨的人爆发了，唱起一首他们所有人共有的颂歌，同时还保留着他那近乎报复欲的背世弃俗。索尔格跟着一起见识了什么东西可能是“颂歌”，把舞台上那个奇形怪状的、和任何人都无相似之处的男人理解为一个违心的自由歌手。从前他曾敬仰过他，像一个其实并没有资格让人敬仰的人：而现在呢，只是一个饶有兴趣的听众，他觉得自己已经跻身为一个不相上下的人。他离开大厅，走进一条又一条很有生气但却安安

静静的街道，边走边想，为什么他把自己童年时代的一个个英雄几乎全都忘掉了。他心满意足地待在缓缓移动的人群中，与人们身子挨着身子。在人群的声音中，甚至在一只鞋摩擦沥青路面的声音中，还回响着那个歌手的声音。

毕竟这还是一种改变：这座城市分成两个区域，它们自成一体，变得越来越异样（而索尔格也随着它们在变）。

索尔格的房子坐落在狭长而平坦的海岸地带里，周围为赤松所环抱。过了海岸地带，地势向东缓缓朝一个住宅密集没有森林的山梁隆起，随后又向与大海平行的海湾一个指头状水湾低下去。海湾岸就是大学公园的边缘。通向那里的公路在一个几乎察觉不出的凹地翻过那个小山。那片凹地，再加上那条几乎天天都要走的路，就构成了一个“马鞍形山口”。大学校园离太平洋不远（索尔格经常步行去那里）。可是久而久之，征服那个小小的“马鞍”就成了进出一道神秘莫测、意味着不确定的弧状门。这位到达“制高点”的人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或者至少扭头迅速望过去：虽然修建在那里的都是常见的低矮房屋，千篇一律地散落在两面坡地上，但在索尔格眼里，这个山口地区却犹如一个重要之地，这里将会出现一次“抉择”（尽管那里唯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条雾带，接近傍晚时分，它便像一个缓缓移动的板结雪块从上面翻滚进城里）。

有时候，当索尔格想象这座城市的画面时，就看见那个山口非真实地从中凸显出来，没有人居住，甚至没有植被，陷进一个石山的幽灰色花岗岩中；他的停留时间将近结束时，他觉得就连自己的人也变得那样非真实。不与任何人交谈，最终也停止与自己交谈。至少还有长短不一的呼吸在一段时间内秘密地为他发送来这样那样的信息，于是他几乎一身轻松地相信，没有语言照样过得去。在这种情况下，他甚至觉得很完美。后来他觉得内在的无语具有了威胁性——仿佛他是一个啥也听不见的物件，声音永远消失了，他希望说话的激情回来。非真实就叫做：一切都可能发生，但他却没有任何介入的可能。这可不是去对付一个陌生的超级力量呀？索尔格惧怕这种抉择，因为他对此无能为力。他再看不清自己（这以往会赋予他介入的力量）；虽然他的目光常常搜寻着“地震公园”里那两个女人，但谁也没有给他划

定触摸的界线。他做着自己的事情（为酝酿中的论文做各种前期工作），不瞥着眼看别的东西，不再停下来，简直就是心如乱麻地集中注意力。这座城市从他身边移去：仿佛所有的窗户都渐渐在他面前关了起来。被遗忘不曾是一个甜美的想法吗——那让人遗忘自己岂 不是一门艺术？

远离众生，因傲慢而难以接近，无论在哪里都不辞别而销声匿迹。他在等待着“惩罚”；同时那个歌手的一首颂歌还没有从他的脑海中消失：“我成就伟大之日就在眼前。”

白天依然会暖和起来。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他在校园里的工作室对他来说同时也是住处。有时候，他也通宵达旦地待在实验室里，就睡在那里的一张行军床上。（他的房子据说要卖掉，已经有些人在那里出出进进。）显微镜旁立着一把剃须刷，刷子旁边放着一个咖啡壶。实验室位于一座特别长的玻璃平房内。按照建筑师的意愿，它应该让人联想起一座横卧在草地上的摩天大楼。从窗户望出去，索尔格的对面是一堵棚房的铝板墙，那里（为其他一门学科）养着实验用动物；再往后已经是海湾那泛着涟漪的水，几乎总是静静地卧在那里。

学院被一条走廊纵向分开：走廊的那一边是大教室，相互之间通过一道道双扇门贯通。不上课时那些门全都开着，因此目光可以从第一间教室一直看到最后一间。走廊这一面，一边是索尔格的房间，多重隔离，没有窗户，里面的空气都经过了过滤，可以在那一台台低声嗡嗡作响的仪器里测定岩石的年代。另一边房间里是一台台地震仪。它们被安放在一张张沉重的大理石桌台上，即使发生较强烈的震动也不会滑动。地震仪的金属转筒会伴着一声高频的嗞啦声突然从缓缓的圆周运动变成快速运动。（一台机器不停地接收着地球内部传来的各种声波，它们在仪器里变成一种遥远的嗡嗡声，而在这嗡嗡声中闪跳着一种十分明快的近于歌唱的声音。）

就是在这里，索尔格也有“自己的区域”：那是在外面，对着海湾方向，铝板棚房和他的实验室之间有片草地，实验室甚至有自己单独的门（就像一些列车上的隔间那样）通向外面。这里长着桉树，并且还有一种特别的蕨类，由一圈篱笆护着，属于现在依然存活、最古老的地球植物之一。一张桌子摆在草地里，桌前有一把铁椅。

有多少次，索尔格离开之前，还要在实验室里待上一会儿，什么都不干。通向走廊的门开着，一条狗迅速地跑过去。索尔格叫它一声，那家伙也只是抬了抬头。它后面跟过来的是那个校警，还没见人就先听见他身上那串钥匙的叮当声；连他也对实验室里的这个人视而不见。

外面那张桌子上放着一台打字机，一张空白纸夹在上面，纸在微微飘舞，阳光穿它而过。打字机旁放着一个橙子。太阳突然之间变成了一轮夕阳，橙子和纸都染上了红色。一片僵直的桉树叶在椅子靠背上贴了一会儿，猛地掉到地上。那所实验动物的监狱中传来一声呱呱的鸣叫。下方，海湾石堤边上，海浪的白色泡沫顺岸边漂动着。那不是一个一个的浪花，而是一整条宽宽的洪流，被风（或是被远处的一次小地震）挤压进海湾：水的表面依然平静，但已倾斜，呈拱形冲进海湾。随后，前景中的空气浑浊起来，雾一团浓似一团从树冠上沉下来。

这时，索尔格离开了宽阔的校园公园。公园在市区之外，微微向海水方向倾斜着，很不显眼，只能靠一些建筑辨别出来，即它们的房基向上坡方向微微变细。这个地区十分安静，同时也总是显得很有生气，即使没有那些在里面穿行的电动汽车，即使没有一到白天便不断响起又消失、好像来自四面八方的脚步声。有时候，一声男人或女人的咳嗽在这里会出奇地清晰，而在城里任何地方都不会如此。雾霭弥漫在整个公园里，不是白色的，而是朦胧的，而且浓淡不匀，因此在一片浑浊中，有的地方会透射出一缕缕微微变化着的阳光，里面的草闪着光亮，在里面穿过的移动物短暂地有了颜色。在一直要把雾层压向下方的下行风中，一个空饮料罐在一张草地桌上慢慢前后滚动着，与校园塔楼的钟声协调一致。那钟声沉稳，但却像失真的破锣似的。这个报时钟采用电子技术模仿着一组编钟的声音。一个很大的飞行物低低地飘到那些树的上方，几乎没有声音，金属腹部是灰白色的。

一条笔直的马路沿着海湾，离开公园后而通向市中心。远近的汽车和行人还借着最后的阳光在路上移动着，而他们头顶上方那些高层建筑的尖顶直至较低的楼层已经笼罩在灰色的雾气中。

回头望去时，在这条路的尽头，现在从远处看上去是自然森林公园的地平线上，或许就矗立着大学的山顶塔楼：然而那里却仅仅隆起

一从地里蔓生出来的、然后又变得僵硬而巨大的白马躯体，一个在夕照中闪着金属光亮的雾碉堡，它将整个校园都纳入自己的拱形之中。它的侧翼让犹如具有磁性的天蓝色衬托得十分显眼。这天蓝色就是由一小块一小块衔接起来的周边地区组成的。

索尔格在他的山口制高点停住脚步时，天已经黑了（对他来说行走已越来越困难，同时那段记忆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再次来到他的身边）；第一批灯光出现了，连远处也有灯光在闪动，最终几乎就要消失的城市越来越宽广，成了一个广阔的夜间灯海。雾并没有悄然散去，不过淡了，能被任何灯光穿透，在一片昏暗中几乎看不见了。

索尔格回头向市中心望去，那里和各住宅区不一样，几乎没有跳闪的灯光，而是构成了一种灯火凝滞的秩序。他在想象中看到自己顺着下面那一座座房屋正面游荡；而他站立的这个地方（山口），他此刻才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是自己脚下的土地，他坐到一个公共汽车站的长椅上。

一辆接一辆不停驶过的汽车里，几乎都只坐着开车的人；它们作为黑色剪影从昏暗中驶近，被后方驶来的车将空荡荡的车体内部照得明晃晃的，端坐不动的黑色半身肖像（一个个没有脸的头被光环罩着）一个接一个快速掠过，尽管速度很快而且发动机的声音也不停变换着，但却长时间地组成一支庄严的骑兵队伍；仿佛车里坐的不是驾驶人员，而是一条条被照得通亮的、一成不变的传动杆上的人影，它们与四个车轮没有关系，就像是自动将车体上半部送进夜色中。

然而在这个队列中，也有许多上下班的人乘坐的大巴。它们粗壮庞大，不透光，夹在车流中，否则整个队列都能被灯光穿透。你只能猜测那些大巴深暗色的玻璃后面有乘客，当然也不时能看见他们当中有个别人或者一小伙人开着头顶上方的射灯，他们不再是剪影，而是清晰的人影，他们正是因为笼罩在四周的黑暗中而分外清晰：能看清面貌的乘客坐在车里，头大都略侧向一边靠在椅背上，透过有色窗户玻璃，他们的面容显得黄中带红。这些脸在路面上方大巴中一张张地快速晃过，没有任何个人特征，是些提醒人记起一种被遗忘的宁静时光的景深照片，是一个个“端坐者”、“观察者”、“阅读者”和“休息者”的景深照片。他们从远处突然间就来到近前，以一种重新找回感觉的震惊感使得外面这个目击者恢复了精神。

然后，一辆灯光刺眼的公共汽车拐进了车站，索尔格看见邻居太太带着她的孩子们在车上。孩子们相互说着话，而那女人则默默无语地看着。他之所以注意到她，是因为车里的她从额头拿开手时的神情与坐在外面长椅上的他几乎一样。她的脸上——他这样想——挂着“一丝痛苦”，而这种痛苦（后来他知道了这一点）他只感同身受而已。她暗自微微一笑，解下头上的围巾，仿佛已经到了家里。那一头秀发在白色的灯光中一时间好像成了“一个自己的王国”。他挥手打着招呼。车再次启动时，她往侧面看过来，看到了他，垂下目光打量着他，甚至一直打量到鞋子，但却没有认出他。他跳起身，敲打着车窗玻璃，可那已经是另外一块玻璃，玻璃后面是另外一张脸，她扭过来从继续行驶的公共汽车里惊异地朝他望着——于是索尔格满脸通红，这在夜空下是观察不到的。

起初，他脑子里只有迷茫，他在迷乱中与一个女人搭话，她是从那辆公共汽车上下来的，好像犹豫不定地站在那里。她一眼也不看他，只是说着：“不！”当他试着解释自己的意思时，她把脸扭向一边，朝他亮出攥起来的手（绝对不是一个拳头），走了开来，一边向他讨好，一个人溜达进昏暗之中，她身上有一种他不熟悉的旋律。

很久以后，当索尔格又能够回忆起他后来才知道这个决定一生的时刻，并且能够理解它时，他就认为，当时只要“停下来”或“放慢”自己的一切（动作、思维、呼吸）或许就足够了，那么或许“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然而此时此刻，他心里只想着，跟在那个女人后面几步远的地方：“我有的是钱。”随后他脚下的地变得那么清晰，好像他已经摔倒在地了。犹如一次事故后的寂静，还有狗吠声。摔倒突如其来，空寂完全出乎意料。不用说“没有人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可以这样说：“对我来说再没有任何人了。每个人都有另一个。”

他走来走去，没有了思维能力。他先前可认为自己是不可摧垮的。他停住脚步，感受到就那篇酝酿已久的论文而言，自己正面临着永远的失败：他也许能够写出它，但“不可能被任何人听到”了。“别乱了方寸！”这是他唯一还能说的话：然后，他犹如坐在一个没有语言的驾驶舱里嗖地出了那空间。那空间在扭曲变形，随后完全消失了。

“空间禁地！”

大海变得阴森森的，可连松林里的住宅区也是如此；整座城市都让人绝望，可连大自然的个个现象也都如此。“你们的大巴车，带我离开这里吧。”

他踱来踱去；停住脚步：他刚刚不仅仅失去了“山口制高点”（它只是还作为“坑洼”显现着，然后又成了手指节骨之间的讥讽物），而且也丧失了自己所有的想象空间：桉树下那张桌子，就像北方那条河流，他怀着无以复加的分离之痛看着它似乎永远消失在一个斜坡后面。

人生规划毁灭了：不再有“区域”了，任何地方都不再有了，甚至连脚掌下地层的方位也无法断定了。他也连同那“丽水”一起干涸了，爆裂开来，皮层被剥去了；那个“活着的死人”从地下出来进入他的内心。

索尔格踱来踱去，意识到自己被自己彻底看透了。往常这种认识自我的时刻总是给他一种振奋的推动，而现在，他丧失了同时又意味着一个有保障的未来的“自己的”空间，因而觉得自己是一个拙劣的造假者。“你的那些空间不存在了。你完蛋了。”

到底是谁在那里说话呢？自他有了意识以来，是哪种声音在贬损他呢？有一阵子，他的身体内呼呼作响，似乎他就是自己的作恶者。他成了一个没有毛的标本，看着那灵魂，依照那个不停诅咒的声音，就要从它的躯体中被剥离出去，而没有了躯体，它也就迷失了：是那只猫的残象。有一次，它曾被带上飞机，在那里因恐惧而得到了一个骷髅头。

几年前，在刚刚到达西海岸时，索尔格就经历了一次地震：他坐在一个游泳池边上，突然看见池子里的水倾斜。空气中充满尘土，到处是一种奇异的光，一座座巨大的山仿佛在运动。他感受到这种震动，甚至向前摔倒了，可他不会相信这样的事情：他觉得此时自己的终点非常之近，同时又完全不可能：难道“我”命该走向毁灭吗？那些房子里飘出的饭菜味多么美妙，还有下班后的灯光，甚至连黑暗中的一声吐痰也是如此。

那么，自然好就好在，那个世界法官的声音，它的判决越清楚，可反驳的地方就越多；它控诉他多么可笑的事情（指责他的名字，或者没有参加修建那个地区的房子），最后甚至指控他在暴力统治时期（索尔格那时才刚刚出生啊）“没有进行任何反抗”。

他不停地踱来踱去。久而久之，他安抚着自己不知不觉地走起来，而且一个劲儿地数着数字。

后来一辆汽车停在他身边，车内传出邻居丈夫的声音，用的是他俩共同的语言：“喂，邻居。”正要上那欢快的传动杆的索尔格心想着：“谢谢啦，你们这些强大的势力。”先前他是那样热切地期盼着什么，因而他觉得这辆车是“文字”，而自己的脑袋是“充满期盼的拱状物”。他想象着自己一个人找不到回家的路，把手放在了邻居丈夫的臂弯里：谁又会觉得一个人变得如此实实在在呢？——“神性的另一个。”

索尔格跟着邻居丈夫进了邻居家。他在前厅站了很长时间，仿佛那现在是一个特别的地方。进入起居室时有那种“门槛”的感受：又置身于世界的游戏之中。

他对邻居妻子和孩子们说，甚至说了好几遍：“是我来了。”与他们坐在一张桌子边；高高举起孩子们（他们很乐意这样）；观赏着那些饭菜（“好鲜亮的肉”）；同坐在一个屋顶下：对索尔格来说，这是一个证实乐趣的晚上。这座房子里住着一户人家，他们勤俭地过着一种有可能过上的生活；他属于这座房子，这里的东西漂亮，这里的人纯真无瑕。

这同时也是个恭维的晚上。他对夫妻俩说：“你们对我来说弥足珍贵。”不过也同样煞有介事地（对丈夫）说：“到了欧洲，我就看不见您那些条纹棉布衬衣了。”他（在妻子面前）称赞白面包皮上“自然的多边形图案”。他在自己的礼貌中又重新认出了自己：它在这个晚上造就出“一个国家”的观念，彬彬有礼的索尔格就体现着这一观念，他展现出的自己就是这一观念的具体形象；他的名字甚至就意味着名字的所有者（和许许多多的同名者）来自哪个省；最后他用自己几乎忘却的方言说着话，说得那么自然，因而谁也没有注意到。

他身上再没有一点儿比较呆板的客人通常所有的那种拘谨。他将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拉扯其他人的衣服，带着一种家人似的亲热琢磨着他们的神情。他无法自己单独待上片刻，跟着邻居家的人到处走：跟着丈夫去地下室，跟着孩子们去卧室，跟着妻子去厨房。一道道门槛的美！他将一个个饮料杯斟满。他送孩子们上床睡觉。这时，他们把自己最隐秘的事情讲给他听，就连他们的父母对这些事也一无所知。然后，他说话时一次又一次地在起居室里走来走去，好像他才是这房子里的主人。“你们离我那么远。”他对主人夫妇说，并请求他们挪得离他近一些。他掌握着那咄咄逼人的、一味要说话的欲望，每一句话都是说给其他人听的，或许又会帮助把他与人类世界连接起来，因为他认为自己在说出每一句话时都（单独）负有责任。索尔格这个晚上（艰难地）说出（“慢慢地措辞组合句子！”他在想）的每一句话，同时都是要争取被接纳进这所房子，融入这个房子里的人之中——融入它的“国度”（“只要我创造出这一形态，我就与其他人有了联系”）；失去了那些大空间的他孜孜不倦地深入到这些最小的空间里。

房子里的夜晚很明亮；满月在外面洒着光辉。孩子们在自己的屋子里笑着。在这个清亮的夜晚光线中，每一样东西都在一个新的空间深度里找到了各自的位置。这个“心情沉重的游戏者”（对他来说，这现在就像一个关键词，但不仅仅是针对他此刻的生存状态）看见了对面的邻居妻子的脸，他还从未这样看过其他什么人。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她的头发又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对那头卷发的欢快，是对那条发线的欢快，是对满头头发的欢快。那张脸的一个个细节也渐渐显露在他的面前：此时此刻，它们无可挑剔——可它们同时也变得富于戏剧性：一个细节把他的目光（他绝对不情愿自己是任何别的样子）继续引向另一个。“这样的事就是为我而发生的。”他在想。其实他并没有盯着邻居妻子看：更确切地说说，他用自己的目光使礼貌达到了完美的境地，因为他在感受时将自己隐藏起来，隐藏在一种仅仅是人在场的情形中。他感受到自己又变成了一个“接受者”，就像在河岸边的淤泥地上感受着那些多边形图案时一样。然而在这里，他不再那样积聚力量，而是相反，他有能力在重塑另一个形象时，用尽一切在大自然那里积聚起的力量，直至这种纯粹接受对方的能力（此前依靠的是好感，限定在个别细节上、特殊细节

上）成为新的全面的力量：他现在唯一的力量——但对他来说足够了。

在这张脸上，最先变得充满生气的是有点儿前突的上唇，它在闭合的嘴上投下淡淡的暗影，好像嘴同时又微微张着：不管怎么说，索尔格看到的这张嘴不仅仅是默默无语，而是随时都能说话——这两片嘴唇或许不用准备就立刻能为另一个人吐出恰当的话语，而且就是说完之后，还随时准备着为他侃侃而谈。她的两边脸蛋没有什么特点（在这个毫无条件地接受着的、创造着这张脸的目光看来，这脸上根本不再有任何东西显得特别），它们看上去无非就是一个光滑坚实的平面，从中有一条与面颊线条一起形成的、瞬间的（不可固定的，且是不断重新变幻的）宽度飞向这位观看者。随后那双眼睛（又是没有什么特点，只是活生生的事实存在）是多么乐于助人啊。它们被遮挡在暗影里，在其地地道道的“昏暗”中已经理解了一切。之后，唯独那隆起额头的事实存在寻求着保护（并且作为这出剧的结尾要求他行动）。这个隆起的额头是一个闪着脆弱的光、就像没有骨头一样任人摆布的亮闪闪的圆拱。最终，索尔格不再是一个完全忘却自我的、另外一张脸上各种事件的观察者，而且此刻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凭借着一种极其轻柔的介入，他那有限的个人生命化解在这张人类之脸的一个个特征里，并且在其坦诚中不可改变地继续着。

索尔格与邻居丈夫坐在一张桌子旁下棋，邻居妻子坐在一边看书。其间，他从桌边站起身来，在房子里到处走来走去，远离开那张脸，然而它同时又立刻离他很近。后来，在灯光下变大的影子里，就像那一辆辆昏暗的大巴车里作为“睡着的人和醒着的人”显现着身影的那些人，她的整个身影在远处变成一个“同代女人”；就连因垂着头而形成的轻微的双下巴也与此相称：“我们来自一个地方。”脖子部位有一道小光圈：“亮得像两个光圈。”在那只犹如飘浮的手上，却有一根指头紧紧压在书上：“像你一样普普通通。”

索尔格又坐回桌子旁，但没有走棋盘上的棋子，而是开始说起话来。他自己依然像不可见似的，洞察起另外两个人的脸，好像他与他们已经分离了，不是因为时间的跳跃，而是因为潜移默化（用说话）使他远离去的时间的落差。他一边说话和讲述时，他感觉到这种落差就是始终不变的轻柔的触摸；他就这样沉思着与自己无拘无束地说着

话，其间他在想：“我之前为自己所想的一切什么都不是：凡是我如愿以偿地告诉你们的一切，那就是我。”

隔壁又是一阵孩子们的笑声；后来是远处海鸥的鸣叫声。索尔格此时心情非常平静，因而直截了当地讲起了那幻想的“山口制高点”上所发生的“空间消失”。“今天，突然之间，一种力量离我而去，我失去了对大地形态的特殊感知力。我的那些空间从一个瞬间到另一个，它们再也无法命名了，而且也不再有命名的价值。”然后他就可以提高嗓门并且说：“你们听听我说吧。我不愿走向毁灭。在这一巨大损失来临之刻，我的反应是归乡，不仅仅是回到一个国家，不仅仅是回到一个确切的地方，而是回到我出生的故居；不过我总是想继续留在异国他乡，自己周围有一些人，似乎不太亲近。我知道，我不是一个邪恶的人。我也不愿做一个离群索居的人。我看见自己走在人群中间，认为这样很合适。我甚至在一些友好的梦中梦见那些希望我死的人，我常常感受到那种能达到永久和解的力量。我希望和谐，我希望没有矛盾，我希望快乐，难道这是狂妄吗？完善和尽善尽美是我的强迫观念？我感到变得更好是一种责任：更好地做我自己。我想做个好人。有时候，我有那种作恶的需求，而另一方面也摆脱不了惩罚的观念，然后又有了对永恒纯洁的需求。今天我想起过一种拯救：但当时进入我脑海的不是上帝，而是文化。我没有文化；我长久没有文化，而且我没有喊出来的能力；在此期间，我抱怨自己，而没有严厉地控诉。我不愿做一个悲叹中消失的人，而要做一个强有力的控诉者。我的呼喊是：我需要你！可我跟谁去说呢？我只能去找我的同类人。可谁又是我的同类人呢？在哪个国家？在什么时间？我需要确定我是我自己，并且对他人负有责任。我能够活着！我感受到那个力量，**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我又想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说：做人人都知道而又无人知晓的人，非常**富有生气**。是的，我感觉到对这个世界空间有暂时的权力。我的时间**是现在**；现在是**我们的**时间。也就是说，我要向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纪提出要求——因为这是我的世界和我的世纪。”

索尔格看到自己像一个可笑而骄傲的动物晃着脑袋（同时在给双肘充着气，可怜地想尝试着振翅飞翔），滔滔不绝大讲了一通之后很想来点儿什么“甜食”，得到了邻居妻子端上来的一个“甜面卷”。另外他还想听音乐，然后让邻居给自己讲他们的故事。大概是为了表示自己是他的同盟者，他们开始讲起各种不幸的事情，但很快就转换

了话题，最后给他描述起他们如何成了一对夫妻。讲述中，平静的叙述渐渐变成激动的对话，还分着角色，总是相互插话。索尔格为这顿“热菜热饭”道谢，又说道：“你们可别忘了我。”

事后，离开时（他并未做出决定，却已踏上那条穿过树林的捷径去海滩），他注意到他俩曾取笑他说的最后那句话，这不仅让人失去力量，同时也有点儿令人吃惊，仿佛人们就不会拿这样的事情来取笑。于是他此时心中暗暗补充说：“我想很快就再次坐在你们的灯罩下面。”

夜暖融融的，没有雾。他还走在树林之间，愉快地感受着脚下的海沙。一团团树叶被风追着穿过针叶林，挂在草间，犹如挂在铁丝栅栏上，最后证实它们是干枯的海藻碎叶。一阵自行车在沙地里穿行的声音，是一条狗奔跑时弄出来的。风在一个个侏儒似的松树间呼啸着，声音和在高大的林子里的动静没有两样。索尔格的脸上有气流的感觉，似乎这就是重新找到的真实，仿佛它是在作为幸运气流吹拂着他。

他拐过一个沙丘的突出部分，就像拐过一个建筑物的拐角，不曾想到大海哗的一声朝他掀过一个白色巨浪。浪花碎沫被高高甩向夜空，似乎在那里停留了片刻，随后才在新溅起的更亮的浪花碎沫间与在下落时染成淡蓝色的泡沫团一同四下飘向地面。随即大海连同月亮和悬浮在波浪上方的一只只海鸥又回到他所熟悉的画面里，水面离索尔格而去，它的哗哗声似乎成了工业的嘈杂声。他躲避着一眼也不看海面，只是鸟瞰似的看着在自己下方深处双脚沉重地踏过的那片沙地。“关上你那些感官的大门。”

他跑了起来，跑了好一阵，什么也不看，然后又改成走，闭起双眼，越走越慢。这时，从那个巨浪中穿行而过的是一列有轨电车。轨道间发出一种古老刺耳的声音。继续往前走的他觉得，最先是随着一辆两侧装着栅栏的马车的辘辘声，大海的喧闹声变成了自己历史的种种声音。一个叮当声和轰隆声响成一片的锯木厂里，正在卸着木板，木板相互撞击噼里啪啦地响着；家具装运工搬着沉重的东西四下走着，一点儿都不当心。这些响声并不均匀；其间常常出现一种似乎调好长度的寂静，这种寂静几乎令人愉快。这时，你只能听出一个封闭家庭那些细小的声音：牛奶煮开时向上噗的声音，水的沸腾声，毛线

针的碰击声，衣架在一个桶边掉落下来。（看样子，仿佛大海可以收集在一口锅里。）后来，有人跳进游泳池里，响起一声耳光。街道上越来越响的嘈杂声中，砰的一声闷响，一个人的身体应声倒在地上。一个奶站正在卸奶桶。香炉发出短暂的叮咚声。然后是军事演习的呐喊声。坦克的轰鸣声；碎裂声和爆裂声；短时间内笼罩着一片战争声响。之后是和平的寂静；或者是？睁开眼睛的索尔格面前，一个宽阔的古代立柱空间在大海上方延展开来，一直伸向天尽头。

最后那些立柱后面，月亮正在落下，有那么一会儿，非常短暂，那里有一个落月的天空，挂着一大片从底部照亮的云彩，是文石色。然后，那片天空便和各处一样黑了，只有星星在波浪的雾气中闪烁着朦胧的光。

索尔格用自己的后脑勺感受着大海，后脑勺变成一个又大又冰冷的地方。那些波浪的峰顶是积雪的山峦。空气为他送来了焦煳味。他在西海岸第一次有了秋天的感觉。大海之秋和立柱空间：这个世界又变古老了。他置身这季节里，来得正是时候。他的身体变得又能够感觉到水、陆、空之间的三重界限。很久以来他再次感受到渴望的力量，那是一种难以约束的冲出胸膛的欲望；同时他很想躺到床上去。

他快步返回他的房子。和平常一样，另一所房子不见人影的卧室里，天一黑床头灯就打开了。邻居们坐在半明半暗的起居室里，丈夫攥着妻子的手指。如流如涌的重现：血液循环的温热中，那个印第安女人——闪动的光泽——向近处移来。他觉得一阵倦意袭来。在这种倦意中，他只想躺在昏暗中静听。一个钟发出滴答滴答的响声，好像是一只猫在挠脖子。后来，那个幻景中的黑白动物的美妙图像发出阵阵呼噜声。

索尔格躺下去，并非没有耐心地等待着各种梦的念头。这时，灯塔的闪光从“大地尽头”有规律地射进房间里。他甚至有勇气想自己的孩子——在所有这些年里，这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在第一次尝试时，他的头就已经变成了石头。此时，他只在感受着脸上的那个重力，一个滚热的拳头贴在脸上。不过这种自我怜悯对他来说是合适的：因为这时能够感觉到那种需要一种信念的愿望，这种愿望或许会赋予他一种形态，这种愿望要比突然想念那可爱的小家伙的瞬间长久。“如果再见到他时，我会敬奉他的。”

他怀着感激之情将被子拉到身上。孩子和女人们才能使他真实。睡梦中，一个浪花碎沫幻化的女人从大海中升起，睡在他身边。整个一夜，他们静静地并排睡着，眼睛对着眼睛，嘴对着嘴。

“几次日出之后”（后来他的确觉得西海岸最后那段时光是这样的），索尔格在收拾箱子时，觉得自己置身在一个依然是秋日清晨的光线中。动身去欧洲的时刻就在眼前。房子几乎空了，没有了窗帘，没有了地毯，一个房间里还放着一张木头桌子和那把折叠椅，另一个屋子里放着被推斜了的床。索尔格扔了很多东西，送出去了一些东西。除了仔细摞起来的一本本近些年的相册和野外记录册，箱子里还放着一些他喜欢的日常用品。他已经穿好了这次旅行的衣服，一件穿了好些年头已经破旧的亚麻衬衫服服帖帖地裹着两个手腕，一身蓝色的“欧式”精纺毛纱套装，裤子稍稍有些贴着膝盖，薄薄的棉袜从下面给他送着温馨的暖意，他的鞋是一双北方产的系带靴子。从上往下看着自己，他对自己忠诚的衣物致了一段答谢词。

空气清新：“美好的早晨，美国的早晨！”阳光照进那搬得空空的房间里，照在地板上，犹如照进一艘客轮的大厅。这位乘客在装好的箱子边读着最后收到的信件。其间他一再向邻居家的房子望过去，所有的房间里都有人影在动：孩子们准备上学，丈夫准备去办公室。这家人在一片忙碌中有时也显露出一种极度的平静：丈夫躬起身子看着自己的卷宗。卷宗放在一个小斜面桌上，好似一本打开来的祈祷书；妻子做出一种近乎滑稽的优雅姿势，小口小口地抿着茶；书包已经背在背上的孩子们沉迷在一个在桌子上旋转的陀螺上。

劳费尔的信里写着：河已经封冻。起先他在户外时戴着一个棉布脸罩，但这段时间以印第安女人为榜样，甚至敞着衬衫在外面走。他觉得自己的论文“越来越美妙”（每个次要的可能性——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关注它——都在无穷尽地延展）。他觉得自己在与索尔格进行着极为理想的竞争：索尔格追求去物质化，但他追求的是材料丰富；因而他的问题是“语言”过多，但索尔格的危险在于“无语”。那只猫变得“越来越不能接近，越来越带有帝王之气”：它就要说它的第一句话了。

他坐在桌子旁边（后来看起了一本书）时，云雾（他没有抬眼看它们）在拖拽着这位准备好上路的人。那些松树的树梢似乎已经在别的地方晃动。在整个这段时间里，许多人在他的背后过来过去，由一个女经纪人领着看这所待出售的房子，他没有回头朝他们看一眼。

此间，只剩下邻家妻子在对面的房子里走过来走过去。她胳膊上搭着白色布单，她穿过有阳光照耀的地方时，那些布单便闪着亮光。有一次她看见了他，和他打着招呼，既不尴尬也不扭捏，用了那样一个动作，好像他已经离得很远了。她好像忘了他，后来连自己也忘了，在忙着玩一个游戏，自己玩的从一间屋子跑到另一间屋子的游戏。

他在读一位罗马自然研究者试图解读世界的书，已有两千年历史，其语言中还有那种诗的“柔性和连通性的东西”。“也就是说，由固体构成的物质会永存，而其他的东西将消解。”

3　法则

一种比较低沉的轰鸣声，坐在飞机里飞向遥远的天边。内心里也有一种飞行。说话是多么容易；甚至生活也是多么容易。一个瞬间的想法：“一些新东西开始光顾我了。”下面沙嘴上，西海岸边的那座城市快速地远去。

这架飞机伴随着时间在飞行。事实上，好像那些白日梦的幻想也在时间的陪伴下渐渐到来，“犹如交替变换月相”。飞机中途在一座城市降落。这座城市坐落在落基山脉的东山脚下，自称为“一英里高城”[4]。降落时那里下着雪。本来预定继续飞的索尔格拿起箱子下了飞机，坐上一辆满载乘客的大巴。大巴行驶在一条雪被吹散的远郊公路上，正在穿过一片空无人烟的地区。这地方他从未来过。

雪花轻轻地撞在前窗玻璃上，然后又飞走了。那些白日梦闪闪烁烁，越来越深。在内心深处飘越出自己的界限：这是他思念其他人的方式。他不是刻意让他们出现在自己的脑海中，而是在他的自由想象中，他们渐渐走进他的意识里。

远处，一匹被雪覆盖的马一动不动地立在一棵枯死的柳树旁，树干斜着沉入泥土里。小学生们纷纷拉上带风帽的羽绒衣的拉链，他们第一批下车：雪花飘进打开的车门，隔了一会儿才在温暖的手上开始融化。大巴里很快一片寂静。那是成年人的寂静。

后来，白日梦中出现了一张脸，一双圆圆的眼睛分得很开，一道道褶子从眼边伸出，像一道道光似的。这时，索尔格确信无疑：他将在这辆大巴驶往的小山城里找一间旅店客房住一晚上，给在那里当滑雪教师的小学同学一个意外惊喜。

他还清楚地记着一年夏天自己在西海岸最后一次遇见他的情形：他那张藏不住任何东西的脸，脸上那张嘴还像上小学时那样，下嘴唇不停地往前伸，即使不说话时也是如此；然而说话时一个个词就像一个个小工件从那里面吐出来。

即使在平静时，这个滑雪教师看上去也十分疲倦，似乎总是在竭力将什么东西搞得更明白。他说话嗓门极大，但却从来没说清楚过。他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常常是大吼大叫，只要吼叫起来，他的声音听上去充满恐惧。他信任谁，就向谁提出他的最终问题，也期望得到一个最后的回答。大家也认真地尽力给他一个这样的回答，于是他，一个骄傲的人，立刻变成别人的一个仆人：夏季无法干他本行的几个月里，他满世界去拜访的不是自己的“朋友”，而是自己的“主人”，即使再琐碎的家务活他也热情地替他们干。他没有孩子，还在等着自己生命中的那个女人（他能够详尽地描绘出她），几十年来一直在等；可就连那些起初喜欢他的女人后来对他也只是表示惊讶。

在自己的白日梦中，索尔格将他看成是一个因没有过错而被轻视的人，他想象着，在问候时立刻就拥抱他；他看到了滑雪教师那粗壮的脖子，看到了他那宽宽的银色皮带，看到了他那两条细腿。坐着时，他总是将两手插在双腿之间。暮色垂入行驶中的大巴，滑雪教师的喉结在抖动，一簇簇坚硬的野草滚过雪地，一片玉米地上干枯的叶子呈水平状立在风中。

大巴后来穿行在一个还没有下雪的地区，似乎除此之外此地什么也没发生。过了一阵子，连这里也开始飘起了雪花，更加寂静，雪片越来越大。山坡带着冲刷印记的一座座山已经不见踪影，只能看见离

得比较近的休耕地，地里偶尔有一群野牛，鼻孔中喷着气，撕咬着浅黄色的草尖；一辆辆小轿车开得很慢，好像出来就是为了完成一段特殊的行驶，它们溅起一股股白色的喷泉，而公路上脏污的雪末在追逐着它们的后轮。这段路上，偶尔能看见一些独个儿跑步的人的身影。除此之外，没有一个人影。最终索尔格想象着，这帮人是在为应对一场世界大战而训练。

就连旅店电梯的地板上都有雪末。这家旅店是仿照欧洲阿尔卑斯山中的旅店修建的，有一个木头阳台，窗子周围画有画，还有一个太阳钟。楼下那一大块平地上一片灯火，索尔格在他那装着木墙板的房间里看着报，一条条勾勒出山峰的线条伸进了报头里。翻着翻着，他立刻看到了小学同学的名字。他定睛看过去：是登载短讣告的版面。他神思恍惚地还继续看着下面的名字，听见淋浴器中响起一阵滋滋声。

过世的小学同学的讣告是滑雪学校发的：他是一位“多年的成员”；其他仅告知了殡仪馆的地点和开门时间，此地称殡仪馆为“小教堂”。

索尔格立刻动身前往早已关门的殡仪馆。殡仪馆没有三角山墙，是一座连体房子，他从街上透过纱帘朝亮着灯却空无一人的一个个前厅望进去：一张张深色的小桌子上立着布灯罩台灯；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张较大的桌子，旁边有几个座位，桌上放着一个玻璃烟灰缸，旁边摆着一部象牙色电话机。这座房子共三层，有一部电梯供上两层使用。电梯里同样也亮着灯，里面是空的，停在底层。索尔格在靠院子一方找到一个大门，两个门扇非常宽，外面没有门把手。天刮着风，很冷。汽车的雨刷发出刺耳的声音，犹如铁锹蹭出的。自己踩在坚硬的雪地里的脚步声让人想起草地上割草机的割草声。后来他听到西部人说话的鼻音，这才又意识到自己身在什么地方。

他回到旅店，皮肤在雪中冻得没有了知觉。脸上的骨头直发疼。他喝着酒，心情愉快起来。他用双手捧着酒杯，好像捧着一个碗，咧嘴龇牙。

夜里他梦见了逝去的人。他们两个人穿过田野。然而滑雪教师没有了形体，消失了，索尔格醒过来，身边没有人。他看见了另一个

人，那人系着一件蓝色围裙；他的双眼被反射着亮光的黑漆封住了。之后，索尔格想着极其没有意思的事，又睡着了，心中充满对一个虚拟世界的渴望。那个虚拟世界透入真实世界，将真实世界推入虚拟之中。

清晨，阳光照进立在屋角的一个空木头表盒里。索尔格去看望停尸间里的遗体。滑雪教师像个布偶躺在棺材里。眼皮的皱褶化成一条条纹路向旁边延伸到太阳穴上；一只眼睛没有完全闭合，闪着微弱的光。他戴着那顶毛线织的帽子。见到他时，他几乎总戴着这顶帽子，上面有“天国峡谷”字样；脖子上戴着一个绿松石护身符。

索尔格站在房前人行道上。殡仪馆的看门人穿着一身缀着黄铜纽扣的制服，在大门前走来走去，路面上到处是他扔掉的香烟头，有的还冒着烟。他们的上方悬挂着星条旗。星条旗一旁，一种深绿色悬垂植物抽出的一条条嫩枝顺着房墙飘舞着。一大卷电缆从旁边滚过。一个个清晰的云团高耸在其他蒙蒙云团上方，近处是这样，远处也是这样。

出了小城，他坐上一辆上山的索道车。车厢因有人进来突然晃动起来，刚进来的人身上的滑雪鞋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好似燃烧的木柴。即使在这群人中也有好看的脸。车厢外的雪地上，一些孩子在奔跑，摔倒后又爬起来接着跑，好像一个个可爱的轮子在滚动。

到了山顶站后，索尔格先是跟在一队并不相识的人后面，原因仅仅是他们都穿着相同的浅色毛皮大衣，后来才一个人接着走自己的路。下过这场雪后，还没有人来过这里。天暖洋洋的，但任何地方都没有融化的雪水流淌。积雪很厚，同时又松散，因而常常还能看见土地泛出的亮光。

他朝上攀登着，直到再听不到任何声音。在一个马鞍形山脊后，他看到了真正的石山，它们呈暗红黄色，一条白色云带在它们身后缓缓飘移而过。他快步顺着山坡向上爬，直到脸上沾了不少松针，随后他停下脚步，仿佛是走入了一个禁区。听不见一声鸟鸣，只能看见依旧还十分遥远的印第安人身影似的一个个圆形山头。他的前面，一条深深的沟壑边上，耸立着一棵山间孤松，旁边长着低矮的橡树林，雪花从橡树干枯的树叶间飘舞而出。这时，那棵松树里传出一种声响，

但什么也看不见：一种轻细而清晰的噗噗声，持续的时间很短，一阵寂静之后，又重复了一次。过了一会儿，第三次响起那种噗噗声：但不再是同一棵树里，而是来自远处的一棵松树。它长在下面沟壑中，同样也是一棵孤松。紧接着，有两群尖声鸣叫的白肚皮小鸟从高处垂直而下，落在两棵树上。

索尔格站在厚厚的积雪里，好像又套了一双靴子，望着下面黄色雾气中的广阔平原，从山脚下向东延伸出几千英里的平原。这片土地大概从未经受过战争的苦难。他用雪洗了洗脸和手，开始吹起单调的口哨。他将雪塞进嘴里，但吹出的口哨声更大了。他咳嗽起来，最后成了抽泣。后来他垂下头，为那位逝者（和其他逝去者）大声痛哭。

他向上望去，觉得自己看见那些人使足了劲在笑话自己。他随着他们一起笑。现时在熊熊燃烧，往昔在闪着光亮。想象着自己的不复存在，他感受到一种深深的享受，脑海中现出河岸边的灌木丛。“不要极度兴奋！”（永远再不要极度兴奋。）为了战胜这种极度兴奋，他在四周寻找着某种依据。积雪在阳光照耀下的沟壑中构成一条闪闪发亮的垄沟：他曾经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一声情不自禁的呐喊，一片树丛甚至传回轻细的回声。抑郁和情欲袭上索尔格的全身。

在返回这个一英里高的城市途中，又见那一簇簇坚硬的野草在冰冻的积雪上滚过那片休耕地。光秃秃的平原上有一片孤零零的矮树林，投出一个巨大的阴影。迫切的期待。然而，尽管什么也没有发生，那或许也是期待吧。这样你就可以把玩一切都皆（极其）有可能的游戏，就像那地震化作人类的舞蹈一样，一种无意义的活着也成了有意义的游戏。

这架傍晚载着你继续东行的夜航班机中就再没有其他人吗？你这排座位都空着，前排那些靠背都立得直直的，影影绰绰地笼罩由客舱舱顶反射下来的昏暗的光线中——在深深的、半明半暗的机身中，那富有节奏的轰鸣声成了一种调节情绪的声音，它使得这位乘客获得了与过去的数小时的联系。他在想着“自己的人”，构想起种种立刻与他们相见的计划；他再也不想到得太晚了。由于那个逝去的滑雪教师，他自己出身的那个家庭又真真切切一点一滴地浮现在索尔格眼

前。他曾觉得对兄弟姐妹负有责任。他们之间甚至曾有过一种休戚与共的感情。在这种情感中，他们组成了一个圆圈形态，现在依然留在他的记忆里。他们几乎再没有机会说共同的语言了（其间他们并没有失去它，但却只是作为记忆游戏背诵着它）。父母去世时——这个正在遐想的人就是这么看的。同时，他觉得下面深处平原上的灯火就是墓园中的一条条道，后来又变成了一个个星象——兄弟姐妹第一次相互拥抱了，此后这么多年，彼此间再没有通过信息：起先还是淡漠，久而久之甚至怀有敌意。这一个只当另一个消失不在了。如果他想起了兄弟姐妹，那就是突然在想象着一则讣告（他们也一样，对自己的兄弟也只是在等候着死讯，他认为自己对此一清二楚）。他们当然也常常出现在他的梦中，有时相互之间也说说话，可在现实当中，他们从未这样做过。不过在大多数梦中，他们只是作为具有危险的、无法移走的尸体四下里躺在祖屋里。因为他们从未明确表示成为敌人，所以相互和解也就无从谈起。

索尔格也没有幻想与他们之间能再变得“和从前一样”。他只希望能够像现在一样清醒，外部世界已经在他的脑海里成为活生生的空间的现在：或许以后一种新的交往形态就是顺其自然。他也看到了村里的其他居民。之前，他通常只能将他们看作一群幸灾乐祸地等待着自己的终结的人，而现在，他知道了相反的一面：他们向来站在他的一边（他离开了），认为他是正确的。

他在给兄弟姐妹写着心书，并在写好的内容里再添上一句亲切的骂人话。问题：“这些计划是否想入非非了？”自己十分确定地回答：“我无非在感受着他们而已。”

飞机响声有了变化。那种氛围离这位旅行者而去，而他还默默地继续说着（一边思索，一边编排着每一个词，仿佛他在写它们）：“那么说？如果说没有一种普遍的法则适用于我的话，那我将一步一步地建立一部个人的法则，我自己必须遵守的法则。我今天就要找好它的第一个句子。”

一个个云团在舷窗边闪过，后来在视野的尽头，那座城市从晨曦中显露出来，好似已被烧毁，有的地方还闪着微弱的火光，准备降落的飞机在大海上空绕着“8”字，大海空寂而汹涌，太阳在它的雾气上方冉冉升起。那是许许多多的城市之一。飞机的轮子触到地面时，机

舱里所有的灯都亮了，一个个靠背前响起了掌声；是为着陆还是为这座城市呢？这下子，索尔格知道了，这一路上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出机舱时，他前面走着一个男人，他觉得这人很熟悉。那人回过身来，他们相互问了好，这才发现彼此并不是熟人。在出口，那个陌生人得体地弓身拦住了索尔格，请他和自己同乘一辆出租车。说话间闹清楚了，他们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本来我是要马上继续飞往欧洲的。”索尔格说。然而，他随之却跟在那人身后，仿佛这就属于那个法则似的。出租车里，他抬起目光看着旁边行驶的一辆辆大巴里那些放松的脸，心里想着：“其实我倒是更想……”那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说：“请您原谅。让您为我花费时间了。我需要您的好心。您看上去是那样好说话。”

到了城里，他们分手了。城里到处是气喘吁吁匆匆忙忙的行人。他们约好过后再见。在试图想象他时，没有睡足觉的索尔格只看见那个男人手中一个咬过的苹果，果核中向外透着亮光。

通常情况下，索尔格到了一个地方，总是急于“熟悉情况”，为的是能够及时找到自己的落脚地。然而这一次，他立刻就在世界都市饭店住下了。他的房间位于一座塔楼似的越往上越细的建筑的边角，有两个窗户，一个朝西，另一个朝南。从西边望出去，可以看见那个地势朝市中心沉降下去的大公园，里面有一个蓄着饮用水的湖，目光久久地落在那里——而目光望向南边，越过一片密密麻麻、层层叠叠、遮挡住街道网的屋顶，立刻就跃向天际。那些直插蓝天的商业摩天大楼从这一端到另一端锁住了天际。看样子，仿佛这个真正的都市是在那遥远的蓝色中才开始的。摩天大楼的前面是较小的住宅大楼，形成了色彩各异的平楼顶区域，绵延而自成为一体的风景，从那里，那一辆辆汽车鸣着喇叭，但身影却深深地隐没在像峡谷似的街道里，看上去要比那不计其数地在上方隆隆飞过的飞机远得多。目光从西窗和那片水面移开，在几秒钟的梦境中，这位观察者将这个封闭的体系看成是一个停工的工厂。湖上，一只只海鸥掠过浅灰色的水面。从另一个窗口看去，是一座大教堂的双塔，比周围那些高层建筑要低许多。索尔格感到疲倦，刚才还是精疲力竭，现在却成了自制和力量。他清楚地看见了这个陌生者的脸，有两个面颊，仿佛所有的肌肉都抽搐到一起；有一绺头发，贴到额头，在下唇的凹陷处好像又冒了出来。他听到他那跳跃的声音，一声高，然后又一声低，好像他在寻找

正确的音位。一幢幢高层建筑那生硬的线条，一架架飞机的闪亮，一声声警笛的嘶鸣，它们犹如抛出的一条套索：房间里充斥着一种来自于整个城市的牵引力。

对过路旅客来说，与其说这是家饭店，倒不如说一座出租屋。许多人在这里要住好长时间，而且常常带着他们的家人。这位新到的人（忘记了睡眠需求）由一个身着镶边制服的电梯司机送往楼下大厅时，每一层都有成年人上电梯，还有孩子（膝盖都弯曲着），他们用不同的语言七嘴八舌地说着，直到索尔格（电梯运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作为“一个离开电梯群体的人”来到街上，在其他人的推拥下走着自己的路。

他有的是时间，可以绕道走。走在太阳底下时，从昏昏睡意中萌发出一种色迷迷的自我意识。每每绕道走时，他就越发强烈地觉得，许多地方重复走来走去，其间豁然展开一个个中间空间，这难道就是疲倦吗？

他一边以这样的方式为这个陌生的地方做准备，一边慢慢地拐进公园里。那里有一些花岗岩石块，犹如一架架被掩埋的飞机的机翼末端从草地上矗立起来。他在一块花岗石前停住脚步。然后他抬起头来，看到人们在两个山丘之间一片宽阔和雾蒙蒙的凹地中走过，就像北极地区的那些印第安人：在那个持续不断的行列中，此时突然跃出他那些故人的影像来。这些影像并不是产生于相像，而是只须凝神于这个世界都市南来北往的人群中就足够了。在这里和那里，在一个小小的手势里，在一条面颊线条里，在一瞥急促的目光里，在一条额头饰带里，这个图像自然而然地朝那些逝者延展过去，没有梦或者魔法呼唤。然而那些逝者并没有（像常常在梦境中那样）阻碍广大的生命活动，更确切地说，在激励这种活动，在重新发起这种活动。与其他地区不同，这个世界都市为这位观察者调动来了他“自己的人”，不仅仅是那些生者，还有那些死者。在这里，他们在那些东奔西走的人身上又复活了。

看着自己那些故去的人灵巧地行走在人群之中，这位依旧活着的人不由自主地用手搓着花岗岩石块上一条条凹槽，这是出于对时间有了新的理解而生发的喜悦，从前他只能将它想象成敌对者。在这里，时间不再意味着孤寂和走向毁灭，而是意味着团结和安全；在一个明

亮的瞬间（不知何时他将再次失去它？），他将时间想象为一个“神”，一位“善神”。

是的，他说了那句话，于是时间变成一种光。在这座城市的中心，这个光照向一盏被朝阳照耀着的公园路灯的玻璃罩。那玻璃灯罩很厚，浑浊不清，落满尘土，里面立着被阳光放大了的电蜡烛的阴影。它在城市的雾霭中闪闪发亮，让人这样看着它，又继续将人的目光引向那些从旁边跑过的狗身上：再从它们引向一摞放在一棵小树树杈上的五颜六色的衣服：再从衣服引向那些在树下太阳地里踢球的孩子们以及那个滚动在他们脚间的黑乎乎的球。

他像一个远古世界的人似的走开了，也要去别的地方分享在每个物体上重新开始的白天的光。迎面走来一个人，他的眼睛与一个闪闪发亮的金属箱子以及惨白的月亮似乎连成一个三角形。光变得太多了——没有与那些自然形态排列组合的重力联起手来，如何独自避免那极度兴奋的轻率和毫无结果呢？

他走进一家咖啡店，看起报纸。店里有一幅天气图，这个国家的各个地区在图上只被称作“极度寒冷”|“阵雪”|“温暖”|“晴有雾”。他深深地沉浸于其中，在杯子的叮当声和收音机里低沉的音乐声中，它们聚合成一个深秋中的亲切如家的大陆。在这个大陆最大的城市里，他像一个世世代代居住在此地的市民“喝着咖啡”，并“看着报纸”：在这里，索尔格完成了他的第二次，也是未来更加确定的回归西方世界的旅程。他看着外面一辆辆被阳光照得通亮的大巴，坐在车内纵向长椅上的乘客随车晃过，只能看见他们的后影，不过只是闪着各色光亮的发型。他置身其中的这个空间随之开始变得重要起来。

这家咖啡店很狭窄，只有一排座位，但往里却很深，犹如进了一个隧道。（长筒子似的屋子尽头打着灯光字：“女| 水”。）地铁出入口就位于正面大窗户的正前方。外面水平方向过来过去的行人中，一再有人猛地一下奇怪地斜着向下退出画面，就像地铁出入口的阶梯，或者以同样的方式在四边形的窗前冒出来。这期间，首先让人看到的是脑袋。

索尔格听着身后这个都市人的说话声。那些声音并非总不带口音，但就是带着口音也是那么自信。他发现外面街道上孩子显得特别多，这也正是这里首先让人惊讶的地方。一个孩子走进店来，想买什么东西，但却没有。索尔格听见那孩子叹了一口气。这时，后面收银台边有人一边填着一张支票，一边大声与人交谈着，说出当天的日期，这时（所有的声响都消失了，只有收音机里的音乐继续不紧不慢地响着，咖啡机的蒸汽仿佛在穿越日期）在咖啡店里，在普遍喘不上气的情况下，时间变得具有更加持久的效力（索尔格在一眨眼的瞬间看见一个巨大的身影立在一片河流地区的上空），用一种暖融融的光波将屋子空间照得通亮。

这位目击者为此仅仅说了“世纪”和“和平时代”。他看到日历一页页落下，就像一部默片中那样。然而“时间女神”并未将这家突然间亮得像间大厅似的咖啡店从当天的日期中取出来，还有那些铁皮烟灰缸和糖瓶（它们成了珍贵器皿），而是相反，她将其与那些逝去的日子联在一起，直到这个空间（不再陌生，而是变得越来越像家）拥有了一个个世纪里所有那些继续有助于人类迈向某种可能的发明、发现、声音、画卷和形态。

一种共同的呼吸攫取了所有在场的人。光变成了物质，现时变成了历史；为了在其逃逸之前让目睹之事具有法律上的确定效力，索尔格起初在痛苦的抽搐中（就没有语言能够描述这一时刻），后来平静和客观了。他要记录下所看到的一切，使之具有法律效应，免得它又化为乌有：“凡是我在这里所经历的，不容逝去。这是一个立法的时刻：它宣布我免除了我的罪责，免除了那自我承担的罪责，也免除了那后来感受到的罪责。它让我这个独来独往的、始终只是偶然有能力参与的人承担起尽可能坚持不懈地参与的责任。这同时也是我的历史性时刻：我在学习（是的，我还能学习），历史不仅是像我这样的人只会横加指责的序列，而且自古以来也是一个每个人（也包括我）可以继续和促成和解的**形式**。我刚刚感受过，迄今为止还是个局外人的我（当然也是个时而全力为他人着想的人）也属于那些形态的历史之列，甚至与里面咖啡馆里这些人以及外面街道上那些行人共同在其中发挥着作用，都重新被赋予了灵魂。在这个世纪的黑夜里，我被迫在自己的脸上研究着独裁者和世界统领的种种特征。对我来说，这个黑夜就此结束了。我的历史（我们的历史，你们这些人呐）理应光明鲜亮，就像这一时刻光明鲜亮一样；它直到现在似乎还根本没有开始：

作为有负罪意识的人，我们不属于任何人之列，也不属于其他有负罪意识的人之列，我们无力在这和平的人类历史中一同振作起来，而我们的无形态只能不断导致新的罪责。我刚刚第一次看到了白昼之光中我的世纪，向其他各个世纪敞开着大门，而我赞同生活在现在。我甚至很高兴做你们这些同时代人中的一个同时代人，做尘世人中的一个尘世人：承载着我的（超越了所有的希望）是一种崇高情感——不是我的而是人类不朽的崇高情感。我相信这一时刻：我将它写下来，它应该就是我的法则。我宣布自己对自己的未来负有责任，我向往那永恒的理性，我再也不愿孤单。谨记。”

索尔格呆呆地与咖啡店镜子里的自己对望着，就好像在多少个世纪的深渊中望着自己，空虚而精疲力竭，是人却已石化。就在这一天，他被他自己的脸打动了。

他抬起目光，作为某种极为自然的事，他看见在西海岸地震公园遇见的那两个女人走在外面行人的队列里；他首先发现了她们的手，它们举起来打着招呼，等着他终究会注意到它们。他微微一笑，那两个女人很有风度地向他打着手势，消失在地铁出入口里：他们没准会更频繁地相遇。

后来有了一种奇异的变化：窗前的人群速度越来越快，他们在往一起挤，脸挨着脸，每一张脸都近似于恐惧，在匆匆经过时都显露出其所有的特征，最后占满了整条街道。几千双眼睛对着他发出火热的光。他看见这画面在晃动，觉察到自己又睡了一会儿。他感觉到胳膊里的热血，仿佛那就是与祖先的一种联系。他高兴地期待着同下飞机的那个男人。“我还能认出你吗？你会讲些什么呢？”

咖啡店里还发生了这样的事：看着桌面上的刮痕，索尔格趁机又找到了回归“他的”大地形态意识的路：他坐在这里，坐在这低矮昏暗的底层屋子里，犹如被四周高耸起的都市圈在当中，而那条已经封冻的河流的一片微光却在冬夜里闪烁着；一辆辆上下班人乘坐的大巴翻过重新显现的西海岸城市那个山口制高点驶入东方的晨曦，犹如翻过一个大陆上的分水岭。大洋上一个个波涛在他们身后翻滚着，在渐渐向空中升起的雾中清晰起来。不仅是桌面上那一道道刮痕，就连这家咖啡店的地面也在模仿大地的表面形状。它出人意料地朝收银台方向一个小小的凹地倾斜下去。索尔格走过去时，脚下的地不见了，也

不过是在吓了一跳的那个瞬间里。咖啡店的地板似乎是直接铺在原样的地上，事先未经找平。由于内部空间的这种不规则，这个城市即使作为一个巨大的自然体也显得有了生气，来自地下深处的生气：继续走出户外，那条起伏不平的大街顺势也就成了咖啡店地面的延续，索尔格在一口呼吸中仿佛将整个岩石半岛都纳入自己胸中。走在人行道一块块花岗岩石板上，更加增强了这种空间征服感，使它具有了持久性。这时，他感受到这个似乎刚刚才从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石子路面上冒出来的城市的地下土层；那一栋栋建筑好像不再是单纯地搁置在这片土地上，而是与它结合成一体：仿佛这个石岛的的确确就是“摩天大楼的故乡”。这座城市甚至渐渐成了一个乡村式的聚居地，一个个带有凸窗的低矮房屋与大量小砖小瓦的高层住宅楼相邻而立。一个戴着圆点图案头巾的女人在等公共汽车，购物网兜里装着一个长棍面包，手里牵着一个背着书包的孩子。炎热的夏天在一块深深插在焦油中的砖头上还留有它的气息。而在沥青路面上一个个此时积着雨水的深坑里，乡村冬天携着它的冰面已经现身了。

在一处地方，在随处可见的高耸的楼房之间，索尔格放慢了脚步，意识到已经身在地理意义上的纽约最高处。他看到一棵槐树，风从树梢高处刮过时，它不仅失去了一片片叶子，而且失去了一根根枝杈。

索尔格在西海岸那座城市里从未去找过什么人，而现在他有那个从同一架飞机下来的人，一个可以去找的人。那个陌生人称自己为埃施，还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就像坐在出租车里的那个早晨一样，仿佛索尔格人虽不在他跟前，但脸却一直浮现在他的眼前。

他们坐在一家宽敞的饭馆里，起初几乎只有他俩，面前有许多空桌子，但之后不久好像就全被客人占了，夜幕降临时，他们好像一拥而上就把老大的大厅装满了。整个晚上，地铁都在他们脚下颤动。他们的座位是一个隔间里的拐角长椅，只要一扬头，那里的一棵橡胶树的叶子就会碰到他们的头。大厅的背景是白色，还有从厨房里冒出的蒸汽，那一个个盘子动起来有那么一会儿像明轮船。

陌生人的嘴唇起初十分苍白，但过了一会儿就不再那么显眼了，即便在说话和吃喝时，他也常常将脑袋倚在手上。他说（其间他一再伸出舌头）：“您别以为我要向您提一些问题。我并没有打算结识您。白天一想到我们的约定，我就对自己的心急感到遗憾。我盘算着根本就不来这里——当时我估摸您也是这么想的。”

索尔格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当他再抬起头看时，那简直是个幽灵似的瞬间，仿佛在往自己瞪得大大的眼睛里看。后来他才发现陌生人在哭。同时那双眼睛的颜色也变成一个自在之物（还有那光秃秃的脑门也是如此）。他俩往隔间的深处挪了挪，没有一个人再能看见他们。那人向索尔格要了一块手绢，擤了鼻涕，然后说：“您就好好听我讲一会儿吧。”他讲着“职场的失败”，讲着“无力竞争”，讲着“女人和孩子”，讲着“钱”，讲着“没有可能重返欧洲”，一段用了三句感叹的故事：“我根本什么也不知道呀！”——“我所能做的就是攥起拳头。”——（最后只有：）“唉，我呀！”

索尔格期盼自己的强大力量能够到来，让自己变成（这很困难）他俩坐在其中的这个小隔间，身子俯在这个偶然相识的人的上方，并且接纳他，因为这人已经对自己的状态感到惊讶，开始摇着头，其间又一次客气地借去那块手绢。他要等到另外这个人那呆滞而残缺不全的塑像渐渐重新恢复生气，获得一个开始滑稽可笑的、后来却令人喜爱的孩子脑袋，最后搓起手臂。如他所说，刚才就是从这里“恐惧忽地一下飞走了”。在这一刻，索尔格觉得自己从这深深的黑夜空间飞越出来，犹如从创造的战栗中飞越出来一样。在这一刻，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他真想在身体上与这个人融为一体：仿佛这是唯一能使他维持生存的可能。然而到后来，一道强烈的包含着其他所有意愿的目光就足够了，这个陌生人似乎可以在其中仰靠了。过了一会儿，索尔格索性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仿佛若要治愈这患病的世界，就要避开它较长一段时间。

这期间，他从一开始就觉得，仿佛他在聆听着是自己的故事；不是因为它有相似性，而是因为他在这位自责的人嘴里又听出了那个也常常使他本人否认自己生存权利的声音。但在这里，这个声音出自一个陌生人之口（不是自己内心深处的一架无声古琴），它没有诅咒他，而是变得可以让人看透了，看成有时不仅仅扼住他一人咽喉的荒谬。于是，索尔格打开“各个感官的大门”，离开自己和陌生人，可

以成为那个“面带笑意的第三者”，赋予他们俩那欢快的秩序；虽说会因他人的不幸而震惊，他也依然在所见所闻中感受着一种淡漠的愉悦，无非就像是一个随行的观众。他甚至时而送出一个微笑，刚才还结结巴巴的埃施看出了他的微笑，感受到信任，便无拘无束地讲起来。

他描绘着自己的绝望，成为绝望的表现者：这并不是说，他在表演这种绝望——更确切地说，他为此成功地找到了一个个唯一恰当的表情和句子，并在唯一可能的时刻机智地将它们表达出来。起先作为自我的展示者，他描绘出一幅自身不幸的画面，既热烈，同时也简洁，因而成为自己真实情况的公布者；他就这样（与作为必不可少的对方的索尔格一起）避免了惊慌失措，对自己的听众变得挺殷勤，毫不做作。他一边精力集中地继续着自己的哀诉，同时在每次需要帮忙时都抢先伸手——斟酒、接账单。最后他已经完全控制了自己的状态，进而以一种滑稽的表情动作组合将它像最后一轮组舞一样展示给自己的这位观众。他说：“我经常会哭——您往这儿瞧！”果然他真的就有了眼泪，当然只是有一种迹象——紧接着他亮出颤抖的双手，时间同样很短暂——之后发际线上冒出明晃晃的冷汗，随即又马上消失了——随后又出现了一个欢快的停顿，不过讲述者（又是在恰当的时刻）中断了，对他的听众耳语道：“我曾临近末日。”——然后将放着账单的盘子拿在手里，一支铅笔在盘中滚动着，他垂下目光看着盘子，声音平静地讲着自己故事的结尾：“公园里搬出来的那些死亡岩石下午还立着，动物园里的猛兽笼都空了。现在这个晚上：手里拿着一个盘子，上面还有一支铅笔在滚动，这是怎样的惬意啊。我祝我们大家长寿。”

他指着饭店的水族箱，用一种自嘲自讽结束了他的展示。水族箱里放着几个花岗岩小石块，装点着那些观赏鱼。最后，他让索尔格注意相邻的隔间，表情严肃，没有什么暗示。隔壁隔间里，坐在里面的一个女人的一条漂亮的腿上下来回晃动着——此外再也看不到什么。他也不躲避索尔格的目光，立誓要“自然死亡”。（之前在回答一个有关死亡愿望的问题时，他的两个瞳孔只是快速地转开了。）

这时，陌生人有了食欲。他吃得并不贪婪，一举一动完全符合礼仪要求，就是喝酒，也是每次只抿一下；每一口饭菜他都要看上很长时间，然后带着对饭菜一往情深的神情送向嘴里。他说，他感觉到吃

的喝的确实在口腔里“放着亮光”；然后他送出一个微笑，持续了好多分钟：仿佛他就是这样来集结能量的。

索尔格看着这位进餐的人，学着他的样子，感觉到额头热乎乎的。他的脸被对方的脸覆盖住，最后也不再有另一个什么人了。

他们坐在这个隔间里，犹如坐在一座桥上。他们几乎不再说一句话。中间像同谋似的相互咧嘴笑着瞅瞅对方就足够了。他们沉溺于个人的想象之中，各想各的，但在其中却有着共同的惬意。“一个神在和他们消遣。”索尔格甚至睁着眼睛睡过去了，是被对方的声音唤醒的，但只听到最后一个句子：“您是第一个听到我讲述这些的人。”——这人讲了些什么呢？

苦难自然又一次在这人身上施展着余威。从洗手间回来时，他迷失了方向，自己毫无察觉，在一张桌子边坐下，左右都是陌生人，后来索尔格把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失神地望着前方的他接了回来。

他以前该不会也常常抓错酒杯吧？他的套装马甲从前不会是反穿着吧？“强大的力量，赶快回来。”索尔格成了他的代言人：给他发出指令，不许他做这做那（再度陷入恐惧中的他倒是乐于服从）；宣布把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预言他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最后还为他祝福。接着，那最后的霉气从这位如此被劝来劝去的人的嘴上消失了，这位“绅士”的脸上只显露出一种“悲伤的满意”，后来衣帽间的那个女人这么说。

他们并没有出门“进入夜色之中”，而是从饭店走到街上，犹如从这座城市的一个空间走入另一个空间。埃施好像就是这些空间的主人，他走到门口就要踏出去时，甚至当着索尔格面前打了一个邀请的手势，他把索尔格当成了客人。

索尔格曾听人说起过中国一座奇特的圣山，它对外国人来说是禁地：据说，站在它的顶峰，中国人在下方的云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而从影子的特殊形状中可以解读出自己的未来，不过只有运气好碰到合适天气的人才能看到。在纽约这条被黄色灯光照亮的大街上，他俩自南向北，也就是从“商业区”往上面的“非商业区”走去，穿过半个城市，互相送对方回住处。就在这条大街上，就在这个夜晚，也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影子：这条大街到处都有一团团蒸汽透过沥青路

面从地底下冒出来，颜色极白，闻着有一股热烘烘的糕点味，常常还带着细微的嘶嘶声，在眼角的余光里犹如一条条浅色的狗在跑动，在夜风中它们很快飘进暗色之中。就在这众多蒸汽团其中的一团上，显现出这个奇特的影子。在一处地下工地，一根口径极大的白铁皮通风管高高耸出街道地面，白色的烟雾从工地升腾而起，比其他的浓得多，也粗得多。那烟雾并没有立刻向一边散开，而是高高地冲出工地，形成一个稳定的汽团，但却在不停地改换形象。纽约有不少极其明亮的路灯，其中一个将人行道上一棵小树的影子投到这团蒸汽上：这个蒸汽团既屈从风，也屈从下方上来的一股股有节奏的推力，或变粗变宽，或重新冲向高处变细变瘦，汽团上的树影也或变大或变小——这时，它膨胀得大而模糊不清，紧接着又收缩起来，颜色深黑，被勾勒得十分清晰。就在同一时间，没有相互约定，两个漫步的人停住脚步，观赏着蒸汽团上有枝有杈的树影，枝杈上甚至还显现出个别悬吊的树叶。当然没有人提什么关于未来的问题，也就是他们能在那嬉戏的黑影中找到答案的问题——确切地说，看到这种（既不属“禁地”也不算多么“神圣”的、任何人都可以享有的）寻常景象，对于剩下的路段来说，一种将他俩毫无差别地纳入其中的现时开始占统治地位。在沥青路面上每走一步，他们都感受到土地那行善事似的硬度。

难道出现在这条起伏不平的大街上的这种美又仅仅是个匆匆的过客（只是偶然让这两个人生地不熟的夜游人碰上了）吗？难道那无与伦比的、有黄色的灯光、有耀眼的白色蒸汽、有似乎在蒸汽上吐着气前摇后晃的树影登场表演的舞台又将永远消失在永恒的无形之中吗？

索尔格和埃施在这条大街上继续走着，其间也有众多的夜间行路人与他们同行。这条“现时的大街”成为自成一体的地区，在他们面前显示着生机，有一个个属于它的奇特的街角，有处处目光无遮无挡的地方和一个个突出的建筑物，犹如一个为它的常年居民而形成的地界分明的城区：在许许多多的橱窗里，还真的立着邀请人们“来这条街上用星期日早餐”的牌子，仿佛这条从中间横穿都市的大街是一个传统的出游地。大街的这一边，每条横街的尽头都能看到那个如同跌入黑暗的公园。公园中不时有微弱的光从那些石头山包上闪过来。大街的另一边挂着残月，每走过一个建筑群，它都向顶点升高一点儿，都会洒下新的辉光，颜色渐渐——可以感觉到越来越冷了——变成白色，随后将一个宽敞的院子照得通亮。两人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它

消失在一片仅仅反射着城市灯光的云雾中。他们在十字路口旁一家通宵营业的超市门前停下来（似乎这里就是分手的地方）。后来，一堆又一堆模模糊糊的影子在沥青路面上奔跑着，那些与之相关的形体也立刻随着它们而来：大片的雪花晶体，它们纷纷扬扬地从夜空中落下来，不断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埃施说："放在几个小时前，我在这些幻影中还会看到老鼠。"

他们现在位于美国辽阔的"阵雪"地区（想象中的图像：一个乡村丘陵地区，有一道道小车的车辙印和一个孤零零的木栅栏桩）。他们有时间并肩站在扬扬飘洒的雪花中。时间已经过了午夜，但直到这条大街的深处，到处都还有移动的人，有的向上走，有的往下走。有些人已经在收拢停在路边的车顶上的雪花，准备用它们打雪仗。

在他们近旁，一个女人拥抱着一个男人，男人十分惬意地回头看着回应她。但当男人在聊了几句之后想抚摸女人时，她的头却躲开他。他低声劝着她，再次开始宽慰她，用整个身体把其间已僵硬的她拉到自己跟前——后来突然间做了个停止的手势，将身子扭向一边。他双颊绯红。这时，索尔格才注意到那两个人年龄那么小，那个滑雪教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作为死者，滑雪教师曾有一张极其失望的脸。索尔格把这个家伙完全放到自己的世界里——这就是说，放进这让整个世界都在闪闪发亮的雪夜里，放进这疗效很强的冬季空间里，让他在那里复活再生。

后来他发现，就像一段荒诞的描写在嘲笑人类世界，在人行道上闹别扭的那一对可以说又跑到超市里，在紧靠窗户的地方再次登场了。他们成了收银台边两个年龄较大的男人（坐在收银台后面的是一个白人，站在收银台前面的是一个黑人），他们相互扫了一眼，仿佛除了他们分别是"雇员"和"顾客"以及"白人"和"黑人"这个肯定可以算作的事实之外，在两人之间刚刚爆发了比个人间的敌意更为糟糕的事：有伤脸面的、让人头脑混乱的、可悲可叹的缺乏理解——他俩谁也不愿意这样，这样让两个人同样不愉快。

与外面大街上那年少的一对儿不同（人行道上的男人偏着脸又在怯生生地挠着女人的痒痒），超市里那两个老人脸色煞白。他们什么也不说，也几乎一动不动（只是黑人把他那棕色的纸袋子捏来捏去）。两人都低垂着目光不看对方，各自的眼皮都在颤抖，没有请其

余的人评价是非或求助他们，哪怕是一次。其余的人都拿着他们要买的东西，排成一条冰冷凝固的队站在他们身后，根本不是在等候，同样脸色苍白，一声不吭，各自站着；等到那个黑人终于无声无息地动着嘴唇打开大门时，收银员才抬起头来接待下一个顾客——然而他并没有（像外面的目击者所期望的那样）朝顾客笑，而仅仅是（没有任何具体对象地）露出他那双深色的、无神地瞪圆的、有那么一瞬间还闪着祈求之光的眼睛。

黑人不时举起他的胳膊，走进夜色中的大街，索尔格目送着他。这时，一道光突然扫过他们所有走在路上的人的脸——还包括一群在远处的黑暗里等公共汽车的人，随后又顺着一幢幢建筑的墙角继续扫过街道，就像一束正在搜索的探照灯灯光，尽管大街上根本就没有车在行驶。接着，大地发出颤抖以及随之而来的气流。一切都不言而喻，扫过人行道栅栏的那道闪光来自在下面行驶的地铁。

索尔格看着已经将身子转向半暗处的埃施，他立刻对这目光做出回应，两人此刻一次次互相望着对方，仿佛是在一个内心的圆弧上描画着他们共同的路：先是在热切地寻求办法时无奈地睁圆了双眼，然后“像知情者一样”半闭上眼睛，随之又近乎无赖地向对方眨着眼睛，最后只是恭恭敬敬地告别（似乎他们知道他们也可能是敌人）——直到他们的目光各自离开对方伸向夜色中的城市。在那里，秋叶夹裹着雪在进地铁的人身后飘舞着，朦朦胧胧的城市上空，一架接一架的夜航飞机不时突然在空中亮起来，犹如在一条附加的大道上飘浮。

最后，埃施递上了自己的（一个“悲伤的商人”的）名片，将他的“欧洲钥匙”弄得叮当直响，以显示他具有回乡的能力（这时，索尔格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钥匙）；他做出极为顽皮的脸（此时他将脸凑到对方的近前）指责索尔格一时心不在焉，这也是“有罪责的”；他背诵着一首诗歌的片段：“美的行程短暂| 如雪光中一梦”。临别时，他将自己的帽子送给了这位“同胞”。

那场灾祸不仅仅是延迟了吧？不会有人死亡！索尔格有力量祝愿，这个世界的宁静开始了。风变换着方向。雪和树叶朝大街高处飘舞而去：“我们所有的人都在那里飞！”

这家饭店的接待厅与众不同，它比外面的街道低：好几级台阶从街道通向这个灯光耀眼的半地下层。时到深夜，这里空荡荡的，电梯司机在远处一个角落里坐在板凳上睡着了，从入口处看不见看门人，但却能听见他的声音，他向这个可以从后面的墙镜里看到的人打着招呼："回来晚了？"一时间外面的空气从慢慢闭合的大门间嗖嗖地钻进来。随后大厅里的声音突然小了许多，这个回来晚的人要了一个越洋电话。

他坐在侧墙边一个绷着红色套子的扶手椅上等电话，旁边是那个睡着了的电梯司机，一头白发光溜溜地向后梳着。只能听见这个空间特有的声音：一台空调吱吱响着，一台制冰机每咔嚓响一声，里面就吐出一个亮亮的冰块。一个急步而行的人穿过大厅，走到另一面侧墙前，身上和扶手椅一样红。开着门的电梯前有一道黄铜栅栏，它将自己饱经岁月的光泽渐渐洒进（与整个旅店一样）起初只是给人牢固之感的大厅里。他上一次有闲暇注意这些毫不起眼、没有戏剧效果、只能暖暖人心的东西是什么时候呢？"难道我想要的更多？只求心满意足地拥有周围之物那既属尘世又属天堂的魅力，这不就是我梦中的生活吗？"

后来电话响起刺耳的铃声，索尔格摇摇晃晃地进了电话间。他激动地说着，同时感到一种奇异的疼痛，就像在动一次手术。那疼痛将他从胸腔最深处往上直到额头切了开来，还伴随着一种折磨人的声响，那是他极具个人特色的笑声。（"你们那里在过什么节吗？"电话里问他。）

电话打完后，他依然毫无感觉地坐在昏暗的电话间里，只是还活着。回去的事他根本就没有提，而别人也没有好奇心。只有一阵尴尬的笑声表明了他的心情。索尔格心里明白了，根本就没有人需要自己。他就该如此，他坐在那里浑身冒汗，耳中还萦绕着其他声音，想说的总是同样一句话。同时，他还一直在默默数着从街道通向大厅的台阶。他期盼所爱的人到来，他们到了（他们整个时间都在相邻的空间里）；同时那浩瀚的大洋横在他们之间。

"他无非是个动物。"

这是谁说的？他猛力推开电话间的门，看见夜班看门人隔着挂钥匙那面墙上的一个小窗子在和女接线员说话。她在隔墙的另一面，好像是坐在一个隔间里，面前是一个个插销接头。那句话似乎不是说在场的任何人：索尔格不由得朝闪着亮光的电梯司机望去，此时他注意到司机面颊上有一个流血的瘊子，制服的肩上没有饰带。看门人又对小窗口里的女人说："他是一只动物——是一只已经发疯的动物。对付发疯的动物的唯一办法就是灭掉它们。"

更加深沉的夜降临了，像突发的（同时又是无法理解的）预感涌进灯光温馨的大厅上方，空调的叶片咔嚓咔嚓响了一会儿，大厅里的四个人仿佛失魂地坐在一列幽灵火车里：在空间| 时间的一次抖动中，那几张脸扭曲成一个个往死里打的面具。这些面具显露出不可改变的凶恶，回响那暴力历史的一个个口号，也包括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有时确实曾"神奇地"展现在这位外国人的面前。这微微的一抖足以将这明亮如昼的前厅连同门前这座灯火辉煌的城市荒芜成热带丛林的余象，一把把刺刀的黑影从四面八方穿进这个余象里。这列火车发出一声吼叫，其中还能听见电传打字机的嗒嗒声。在看门人昏暗的脸上，索尔格辨认出一张印第安人的面具，它表现出一个"失去自己灵魂"的人，在那木头似的双颊上蹲着两只老鼠，正在吞食着灵魂——当然后来证实，看门人刚才只是在读一份报纸。

现在到底什么是有效的：是那美丽的序幕还是后来那可怕的混乱？"我想要什么呢？什么对我来说是真实的呢？"

放钥匙那面墙上的儿童绘画是真实的；女接线员那双因为困而一动不动的眼睛是真实的；让很大的声音惊醒的电梯司机那威风的神情是真实的，他用这种神情将索尔格请进了那装着玻璃枝形灯架放着红丝绒座椅的电梯；这位老人的一缕缕白发、歪斜的双肩和亮闪闪的漆皮皮鞋是真实的。他那一缕缕白发整整齐齐地平行排列着，因蘸着什么液体梳过而显得挺挺的。电梯缓缓升向塔楼里的房间时，他站在那里背对着乘客，说着听不明白的告诫话，最后竖起两个手指做出放行的姿势，手指间夹着小费："这还有点儿意思！"凡是宁静的，都是真实的。

短短的走廊里弥散着一股油漆味。索尔格发现，他那早晨还是绿色的门已经被刷成了深红色。在夜色中回饭店的路上，一家白天还码

着一堆堆闪光发亮的水果的商店不也变成了一个烧黑的窟窿吗？窟窿里的灰烬中不是只有个别皮绽肉裂的苹果吗？（他大衣后面有几道深深的口子，好像是剃须刀片划的。）

索尔格心里哼着那位歌手的一首歌走进房间。这首歌说的是一个人为避免身陷“死亡洞穴”甚至“准备像一个拙劣的侦探到处乱涂乱画”：“天生的赢家”。房间里的床好像是双人的，两边床头柜上的灯都开着，洋溢着黄色的光线。亚麻被单上的皱褶组成了一个世界地图的模样。在一呼一吸的瞬间，索尔格经历着从在遥远的欧洲出生至眼下现时的整个时间，那是缓缓的持续不断的上行运动。其间他感觉到，他是自己变得强壮起来的。

他又拉开了窗帘，打开了百叶窗（窗户玻璃前飘舞着飞蛾似的雪花，夜色漆黑），翻看着这些年的一本本笔记。在看的过程中他明白了，自己关于那篇计划中的论文的想法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对各种时间长久的自然空间的兴趣掺杂进了一种因种种空间形态引发的惊恐。就在“我索尔格”几乎可以说成了“它们的瞬间”的地方（不仅仅在大自然中），那些空间形态只是以片断的方式形成了，而那个瞬间同时也使那些空间形态成为一个个时间现象。然而对于这些倏忽即过的、几乎没有给记忆留下话语和图像的一个个独一无二的现象，难道就没有一种术语吗？

那个沉重的东西，那个光滑的东西，索尔格看见它就在面前，同时要挤出位置来在内心接纳它，那是一座玻璃山，它阻挠他归乡。他朝白色的床铺望去，犹如在看着一种逃离的可能性。难道这些未经证明的短暂空间就因为与那个最深层的人物交织在一起而不太适合作为重述的对象吗？正是那短暂的“空间环绕”每每令他兴奋不已，成了幸运的认识事件，而它随之则要求以某种形态存在下去，并这样传授给他一种真正的人的工作的观念。在这里，他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厌恶感和分隔的痛苦或许都被消除了。事情难道不就是这样吗？然而你怎样会如愿以偿地“讲述”那些自身连“逐渐”都不知道的空间呢？

索尔格将那一个个记录本摊在桌子上，于是每个本子都显露出自己独特的颜色，整个桌面仿佛变成一幅地质图，而图中各种各样的颜色则意味着各种不同的地质年代。一种巨大而不确定的柔情袭上他的全身：自然他希望有一种“附加的光”！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弯腰看

着那五颜六色、有些地方因年久而发白的图案，直到自己成为其他颜色中一种平静的色彩。他翻看着一个个本子，觉得自己消失在文字里：消失在一段段历史里，消失在阳光和雪的历史里。现在他或许可以说服所有的人来自己这里，而这深色的地球仿佛是一台可以掌控的机器，甚至是可以让人破译最深处秘密的机器。

“伪造！”：然而此时这已不再是谴责罪责，而是一种救世理念：他，索尔格，或许要写出一本“伪造的福音书”；充当伪造者当中的伪造者，这是一个伟大的想象。（单个的伪造者仅仅适合做不完整的事情。）同时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承受失败：已经通过“自己”的拱门消失了。水流淌在一条小溪中，水中夹带着一个个冰块。

睡在床上，他在床垫上拍打掉最后的孤独，一边关灯一边祝所有的人万事如意。昏暗的房间里那一件件物品在拖着亲人的声音说话。他看见了两只眼睛，从它们那里感受到了爱；或离得很远，或离得很近，的确有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说着：“我爱你。”他停住了呼吸，他充满了乐趣，后来他睡着了。

欧洲在他的身下，成了响着夜之回声的迷宫，迷宫里响着刺耳的汽车喇叭声。他看见了那部描述他的人生的大手稿，甚至从中读出了一个句子（它十分清晰地从其他字词中凸显出来）：“他毕竟就是他，镜子、虚无和威严相互触摸着。”

这是一个演绎着种种变形的睡梦：塞在双膝之间的胳膊变成一棵树，一根根手指化成树根扎进泥土里。并非只有他一个人：在阿拉斯加那个印第安人村落的电话间里，劳费尔那不受管束的肩膀在一条宽宽的裤子吊带下一耸一耸的；太平洋那边那个邻居太太的眉毛变成圆形；埃施借助一个著名演员的脸给地球施着魔法，而索尔格则是囊括他们所有人的百搭[5]。

后来在一个阳光明媚的雪原上，他们一起坐在一张餐桌旁开家庭会（其中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人）。一棵枝杈像驼鹿角的果树上挂满硕大的黄白色早熟苹果，树下雪地里也有很多苹果。

同时，他的各个感官依旧保持着清醒的状态：他合上眼皮，看着曙光降临，透过隔墙上的那道门听着隔壁房间里一个人诅咒着天地间

所有的人和物，一直诅咒到夜色离去，也没有停过一次，冗长而乏味的列举越来越混乱。

那枕头像一个婴儿的光脚掌触摸着他。醒来时，他内心里有一个小孩在活动。这孩子后来静静地朝外望去，睫毛一眨不眨，在与自己的呼吸嬉戏。凡是他自身从器官上所希望的一切，都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而所有非器官的东西都是毫无关联的。

“这就是我！”

有一次，索尔格对如愿以偿的一天有过这样的想法：在这样一天中，晨去暮来，有亮有暗，这一事实肯定就足以构成美了。向纽约辞行的几个小时里，他又有了这种感觉，他迅速而轻手轻脚地起了床，“用这个城市的水”漱洗完毕，心境既欢快又冷静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天色放亮的过程，仿佛昼光特地为他稍稍延迟了到来的时间。他光着身子，而且很乐意就这样展现给别人。他在腋下感受到自由，在脑袋里感受到一种极强的洞察力；他可以沉入任何地方，而那不会是死亡。雪已经停了，西边渐渐明亮的天空悬着就要落山的深黄色月亮，像一只先前逃走现在又归来的家畜（“你到底是又回来了”）；众星像一个个模范在四周闪烁着。远近的景色同时跳到了眼前，因而既可以看到身影模糊的鸟从塔楼窗户左右飞过，又可以望见新泽西州已披上白日光芒的群山在天际延伸开来。一片黄色的光从下面深处一条条看不见的大街里漫出来，但只照到一座座高楼最下面的几层，其余部分依然矗立在黑暗之中，不时有一道道看不见的汽车的远光灯在高层一排排窗户上画着圆圈。公园沉入市区，湖水的灰色真切地飘入眼帘；心形的水面因黄中泛绿的颜色变得又大又平静；海鸥栖息在昏暗的湖面上，只要其中有一只原地扇起翅膀，便会显现羽毛的白色。弧形的湖岸边有一溜儿积雪，如同凝固的波浪。第一批跑步的人已经像湖水本身那样十分信赖地围着湖跑，仿佛在用他们的大腿迎接这个世界。随着太阳的升起，湖水很快变成蓝色，闪出粼粼波光，风拖着暗色的轨迹在水面上恣意而行，突进，戛然而止，改换方向——最后，晨光终于与水波分离，作为昼光到处洒满城市空间。索尔格想象着自己站在底下的湖边，望着高楼上他此刻正站在里面的这个房间，呼吸

着淡薄而给人力量的空气。烟雾犹如一个男人的身影走过所有的屋顶，公园的每棵树上都纷纷扬扬地洒下上面的积雪。

“这就是现在！”

每次眺望这座城市时，都不会再次出现（以及确认）在别处经历过的、本以为已经消失的其他事件？——就连这间客房也掠过飞鸟（和飞机）的影子。相邻高楼的顶层有人穿过一个个阳光斑驳的房间，胳膊夹着一摞毛巾，毛巾一会儿亮一会儿暗，就像一条小溪里的水在一块色彩斑斓的鹅卵石上流过。一个移动物身后跑来一条狗，它作为海鸥升向空中，在湖水中照着自己的身影。“要获得再现的感知力！到下面去找那些人。”但之前一个整理房间的女服务员走了进来，她说：“上帝保佑你。尽快与家人联系。”（然后喘着粗气看着他。）

索尔格又进了一座教堂参加星期日弥撒，由一个身穿黑色衣服、扣眼里插着丁香花的男人（您想在哪里祈祷？）专门陪着走到长椅边。（这个星期天首先向他展现的是寥寥无几的汽车，它们远远地在几乎空荡荡的、水灰色的麦迪逊大街上一起一伏，像一条条小船。）信徒们的面容被捐献袋上的铜条映得发亮，募捐人一只只手在一根根铁条上弄出面包师从烤炉中拉出面包时的声响时，随同捐钱的索尔格觉得自己在与金钱结伍。当这面包变为上帝的身体时（“晚餐后他同样拿起这杯来”），当这酒化作上帝的血时，一种震颤传遍这个世界。

众人“以同样的方式”去领受圣餐。“我，索尔格”，又是作为辅弥撒者[6]以同样的方式在地毯边上绊了个踉跄。这个成年人态度坚决地跪了下去。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以同样的方式向他问好。在上午明亮的大街上，他从一队高高兴兴地送葬的人身边走过。站在相邻的大街边上，他观望着一支南斯拉夫少数民族的游行队伍，他们的穿着相当军事化，他的先辈还曾被归为那个少数民族（还有极小的孩子，几乎刚会走路的孩子，也一身民族穿着，踉踉跄跄地跟随在队伍里）。公园里，他看着一个接一个从自己身边跑过的人（身后一再响起剧烈的喘息声和踢踏声），他们与那些只是走过去的人不一样，再未显露出熟人的面容特征：他甚至确定有一个欧洲上大学时曾与自己关系不错的男人疲惫不堪的脸显现在人群之中，随后他也就匆匆地望了望，那

又变成了一个陌生人的背影，一片暗色汗迹的背影。就连另外一个跑过时用明亮的眼睛盯着他看的人也仅仅说了句："多像瓦伦丁·索尔格！"——他们或许永远不会再相见了。

这另一个大陆的最后一个画面，索尔格是在一个博物馆里经历的。面对着那些作品，犹如面对着一个个严格的（并且还毫无顾忌地发出噼里啪啦响声的）榜样，他渐渐挺立起身子。在它们还在为他增添力量时，他高高地站在博物馆内那巨大的石头台阶上，仿佛就在一次充满力量的心跳中，一幅幅画面展现在他的眼前：大厅里黑压压一片，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再穿过那些像房子一样高的玻璃大门，就是通向这座（坐落在公园边上的）建筑的岩灰色的82号大街的整个纵深；在那条与好几条车水马龙的大街交叉而过的街道尽头，从那个与曼哈顿岛比邻的、被称为**东河**的细长海湾闪烁着一片灰蓝色光亮；在那条状水面上，一片白茫茫的鸟群一直飞来飞去。每当转身回飞的瞬间，那白色的鸟群就变成透明的。

天又下起了雪。孩子们在外面的雪花中旋转着身子，在雪花中伸出舌头。一个个卖面包圈的摊位冒着烟。后来，天色变暗了——在这样一个居住着平民的、生机勃勃的区域里，从这个内空间——前景的大理石台阶直至后景中天际处的海湾已不再有距离可言，那一辆辆汽车或疾驰或拐弯；那一个个行人或站立或行走；那一个个跑步的人一个接一个向各个方向或急奔或冲刺，这是一种渐渐向黄昏中移动的情意切切的秩序。索尔格迫不及待地要加入到这个秩序之中；他被这样的意识攫取了，要凭着自己的目光参与到现时的宁静之美和黄昏的昏暗乐园中来，因为这目光把自己早先的经历那样深化了，具有从容穿越空间的能力，此时此地能让他获得成功。

"噢，慢悠悠的世界！"

他那渴望的力量从内心最深处的自我喷薄而出，直至最外层的世界，因为它要将他这个独来独往的人与这个世界整体永远地连在一起。然而，为什么恰恰伴随着这种渴望的力量，立刻就会出现了一种苍白无声的闪电之光呢？在这种闪电之光中，那如此强烈渴望的东西又轻轻地、几近柔缓地离他而去，同时有一条张在大地之上的死亡之带的空寂显现在面前，削弱他的力量，让他突然之间又晕晕沉沉地返回自己之中。不过从所有的自私行为升华到所表现出的果敢坚定，而

且只剩下对充实世界的志趣的热情（“我想拥有你，我想做你的一部分！”），只有在这时，他才为认识到一种无可补救的缺失而深受触动。这种缺失既不是因他个人而生，也不可能被归结到这个无论如何也很可爱的星球的这一历史时期。他不再期望进入另外一个时代——然而在现今时代，虽然怀着最纯真最热切的激情，可他从这个世界所能企及和所能悟透的东西却还一直少之又少。

难道他就从未觉得自己富有过吗？楼梯边上挤满了休息的人，他坐到台阶上，将鞋带解开又系上，速度非常慢。那些管理人员已经在拍着手掌，众人踏着小小的步子在他们面前向出口移动着。索尔格，刹那间，你的脑海中闪过一个想法，人类的历史似乎很快就要完结，一片和谐，没有惊恐。是的，会有仁慈。（或者？）那种没有幻想、吸血鬼似的愁苦放过了你，你感受到自己的眼睑仿佛涂抹着永恒而野性十足的对解脱的需求。一声深深的叹息不仅穿透了你，而且穿透了整个人群，你用新获得的力量抬眼望去，寻找着与你的眼睛似乎一样沉重的其他眼睛的目光。想到自己不得不马上离开这个宁静的舞台，你感到惆怅，最后感到切肤的疼痛，因而希望自己至少应该是最后走出博物馆的人之一。然而这疼痛中的美在于，大地在其中升华了（一如史前时期石灰岩在高温和压力的作用下变成了如今在你脚下闪闪发亮的大理石）。

这是在飞往欧洲的夜航飞机里，仿佛是你，我亲爱的索尔格，在你“第一次真正的旅行”中。在这里，正像人们所说的，你在学习“什么是自己的风格”。在你的身前身后，那些婴儿悲伤地大呼小叫，等他们终于平静下来之后，便瞪着深色的眼睛凝神而望，犹如一个个先知。你不再知道自己是谁。你的伟人之梦在什么地方？你谁也不是。在第一缕晨曦中，你看到了烧焦的机翼。你们那一张张熬夜之后的脸上犹如涂抹着果酱。空姐们已经穿上那城市的鞋。空空的银幕刚才还映着日出的亮光，现在暗了下来。飞机隆隆地穿破一个个云团。

“飘然欲去的脸！

我脚边的石头将你送到近前：

沉醉于它们之中，

用它们压住我们。”

（1979年）

圣山启示录

梁锡江　译

“今天晚上我答应给你们讲一个童话，通过它，你们既不会回忆起任何事情，也将回想起所有的事情。”

——歌德《童话》

大弯路

回到欧洲之后，我每天都需要文字，就好像每天都需要面包，然后又重新读了许多东西。

在施蒂弗特的小说《水晶》[7]里面，有一个偏远的小村庄，里面居民的生活仿佛亘古不变。如果有一块石头从围墙上掉下来，这块石头还会被重新嵌回去。新建的房子造得与原来的老房子一模一样，受损的屋顶也会用同样的木瓦修好。这种持久的稳定性在家畜的例子上显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家里的动物永远保持一个颜色”。

然后我也曾在这样的颜色里待过一阵子。灌木、乔木、天上的云，甚至街上的沥青都焕发着一种光彩，这光彩既不是来自那天的日光，也与当时的季节无涉。自然造化与人工营造，彼此交错，赋予了我一种幸福的时刻，那是我在半梦半醒之时见到的画面中所熟悉的感觉（但却没有后者那种总是预示着最坏或最后的情况即将出现的危机感），拉丁语里面把这种时刻称为“Nunc stans”：永恒的瞬间——矮小的灌木丛是黄色的染料木，散落的乔木是棕褐色的欧洲赤松，云彩在升腾的雾气的掩映下呈现淡青色，天空是蓝色的（正如施蒂弗特在他的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平静）。当时我正站在“塞尚之路”[8]上的一个山丘上面，这条路从普罗旺斯的艾克斯市向东一直延伸到托罗奈村。

一直以来，对我而言，区分颜色、乃至于对颜色命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那个有点喜欢卖弄的歌德在他的《颜色学》中曾经讲到过两种人，我在这两者身上都重新部分地发现了自己的影子。例如，这两种人都会彻底混淆“玫瑰色、蓝色和紫罗兰色”：只有通过细小的明暗与强弱的色彩对比，他们才能将这些颜色区别开来。其中一种人会把黑色看成淡褐色，把灰色看成淡红色。另外，这两种人对明暗的层次变化都感觉非常敏锐——他们可能是一种病态，但是歌德认为他们还属于难以界定的类型。当然了，如果有人在和他们聊天的时候很偶然地询问他们前面摆放着的物体的颜色的话，那么询问者就会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并且担心自己会疯掉。

除了单纯的对自己的再发现之外，通过科学家歌德的说明，一幅将我最遥远的过去与现在统一起来的画面在我面前展开：在“Nunc stans”的某个接下来的瞬间，我看到当年的人们——父母，兄弟姐妹，甚至还包括外祖父母——与现在的人们统一起来，他们都在利用周边的东西来取笑我的颜色认知。那看起来简直就是一个让我猜颜色的家庭游戏，这时困惑的人当然不是他们，而是我。

但是与歌德所描述的两种人不同，在我身上发生的并不是一种遗传疾病。我在周围的圈子里面是一个特例。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识到，我并不是人们一般所说的那种色盲，也没有患上某种特殊的色盲病症。有时我也能看见我的颜色，而且是正确的颜色。

不久以前，我站在温特斯山[9]山顶的雪地里。就在我头上不远、差不多手可以够到的地方，有一只小嘴乌鸦静静地在风中飘浮。我看到鸟儿那蜷在身旁的脚爪，脚爪呈现鸟类典型的黄色；翅膀在阳光的映衬下呈金褐色；天空呈蓝色。在一个广阔的透明平面上，这三者形成了不同的轨迹。在那一刻，它们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面三色旗。那是一面没有任何诉求的旗子，一个纯粹由颜色组成的物体。也因为它的存在，那些用布料做的旗子，那些到目前为止主要只是负责遮蔽景象的旗子，至少也变成了一些可以被观赏的东西；因为我的想象世界自有其温和的理由。

二十年前，我曾经参加过入伍体检。那个平时对颜色没有自信的小伙子，也就是我，在色盲测试中非常准确地找出了隐藏在那些花花绿绿的碎点中的数字。然后我回到家中宣布体检结果（“准予服兵役”），继父——我们平时彼此从不说话——找到我说，他生平第一次为我感到骄傲。

我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是因为我在这方面的口头叙述总是很不完备，而且错得很离谱。在每次的聊天中，我总是叫继父“酒鬼”。这一细节本身虽然非常准确，但是它也使得整个故事变得并不真实。那天体检后，看到家里的房子和花园，我竟然有了一种少有的回家的感觉。这件事情难道不更符合事实吗？继父的话马上令我很反感。但是为什么在我的记忆中，这句话却与那刚被那个男人翻掘过的花园所显现的新鲜的红褐色紧紧相连呢？我自己不也是带着一定的骄傲情绪回家的吗？

不管怎么样，园土的颜色依然对整件事情发挥着作用。如果我现在要找寻那个瞬间，我不会再作为一个青年面对着它，而是会发现自己作为理想中的自我，永恒却无形地出现在那片红湿地中。这地点乃一处澄明之地，使得我能够理解自己，也理解那个曾经的军人[10]。（在施蒂弗特最初的记忆中，他的身体里面有许多黑色的斑点。后来他知道，“那些是森林，是我身体外面的森林。”现在，他的小说总是能让我在同样的一些森林里面发现许多彩色的地点。）

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期间，保罗·塞尚通过他的父亲，一位富有的银行家，花钱逃过了兵役。他在埃斯塔克终日作画，就这样度过了整场战争。埃斯塔克当时是马赛西面一处海湾里的小渔村，今天则成了这座工业重镇的郊区。

我只是从塞尚的画上知道了这个地方的存在。但光是“埃斯塔克”这名字本身就已经让我有了一种空间上的和平感。不管这地方后来发展成了什么样子，它一直都是“隐居的理想地点”；这针对的不仅是1870年的那场战争，不仅是当时的画家，也并不仅是任何一场宣告爆发的战争。

此后许多年里，塞尚仍经常在那里作画，他尤其喜欢酷热的天气和“令人生畏的阳光”，在他看来，“所有的物体似乎都因此而作为阴影凸显出来，阴影不仅是黑白两色，而且还有蓝色、红色、栗色和紫色”。出自那段隐居岁月的画作几乎都是黑白的，其基调也主要是冬日氛围。但此后，这个满是红瓦蓝海的地方却渐渐变成了他那色彩丰富的“纸牌游戏”[11]。

也是在寄自埃斯塔克的信中，他第一次在自己的名字前添加了一个拉丁单词“pictor”[12]，这也是从前许多古典画家的做法。埃斯塔克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如果我要离开这里，那么我希望越晚越好，因为这里有几处非常美的风景。”在普法战争之后的那些画作里，再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气氛和情调出现，也没有什么特定的时刻与季节：画的形式总是充满激情地展现静谧的蓝色海洋旁边的那个自然村落。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埃斯塔克周围建起了精炼厂，而塞尚也停止了画这个地方。在几百年后，也许活着本身会变得完全没有意义——只有在地质图上，这个地区依然未受侵害，色彩斑斓。也许上面还有一小块木犀草一般翠绿的地方，甚至还可能长期被冠以这样一个名字：“埃斯塔克的石灰山”[13]。

是的，我要感谢画家保罗·塞尚，是他让我站在艾克斯市与托罗奈村之间的那个空旷的地点上，站在那里的颜色里面，甚至铺满沥青的街道在我眼中也成了颜料。

我是在一个小农意识很浓的环境里长大的。在那里，绘画几乎只存在于教堂里或圣像柱上。所以，从一开始，我可能只把它们看作是单纯的附属品，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没有期待过从它们那里发现些什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有时候，我甚至能够理解诸如宗教和国家禁止任何神像绘画之类的惯例和传统。作为一个心不在焉的单纯瞪视者，这传统本该是我所希冀的。而假如一个可延伸至无限的图案能够满足、传达并加强我对于无限的需求，那么它难道不是一个更为正确的对立物吗？（在面对着一个古罗马时代的马赛克地面时，我成功地将濒死过程想象成一个美的通道，上面并没有一般都会出现的

狭窄之处，即“死亡”。）而且，能够将那种完全的无色无形的空虚重新充实，这难道不是最为神奇美妙的吗？（有一位同样“偏远的村庄”里面的神父说的话——普通教徒也许不敢如此宣称——很适合用在这里，这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句子，因为最后一个单词前面的冠词被去掉了：“在灵魂与上帝之间无限的爱之回响，那就是天空。”）

所以，从前我对绘画者是一种忘恩负义的态度；因为那个臆想中的附属品至少经常被我当成视力表使用，而且其中不少也成了后来一再出现的想象中与生活中的图景。当然，在那个时候，绘画的色彩与形式并没有得到专门的感知。对我起作用的，一直还是特殊的物体。没有了物体，色彩与形式就显得太少了——而物体在日常生活中又太多了。“特殊的物体”还并不是一个正确的词汇；因为能引起注意的正是那些平常的东西，它们被画家放置在了特殊的光线之中——现在我很简短地称它们为“魔物”。

现在我能想起的例子全部都是风景：半梦半醒之间，我会看到很多颇具威胁性的画面，里面荒无人烟，寂静而优美；我的例子总是与这些画面相吻合。这些例子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它们分别展现了不同的系列。它们甚至经常体现出画家的某个完整的时期：例如德·基里科[14]的那些空旷的形而上的广场；马克斯·恩斯特[15]的那些月色笼罩下的热带雨林中的荒凉城市，而且每幅画的名字都叫做“城市全景”；勒内·马格里特[16]的《光之帝国》里面阔叶树下那个位于黑暗之中的被重复的房子，而周围却是闪耀着白光的蔚蓝天空；还有最后就是美国画家爱德华·霍普[17]，他在作品如《街道与房子》和《街道与树木》等里面描绘了那些隐藏在马萨诸塞州科德角的欧洲赤松林里的木房子。

但是，爱德华·霍普画笔下的风景与其说是咄咄逼人的梦幻，不如说是荒凉孤寂的真实。人们可以在当地，在大白天重新发现这些风景。几年前，我曾经去过一次吸引了我很长时间的科德角。在那里，我追寻着他笔下的那些画。在那个岬角上的每一个角落，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一种感觉：我站在了一个艺术家的王国里面。海边沙丘路上那些弯弯曲曲与错落起伏，我现在仍可以描摹出来。许多细节经常与爱德华·霍普所画的并不相同，它们就像在画布上一样，分布在我记忆画面的左边与右边。记忆画面的中间则是一根芦苇秆，插在一处水洼厚厚的冰层里，它应该被放在旁边的铁盒子里面——对我而言，到

了那里之后，我在意识中却已经离开了那里。而在身外，在对一个画家以及新英格兰地区风光的体验中，我已经做好了一个导游该做的准备：夜里，我曾经望见那松树林中的木屋里灯光闪耀。那并不是一些孤零零的房子，它们展示出的更多的是一个理想房屋的气势。我在那里为我一部还在创作中的小说的主人公找到了居所。

诗人说谎，一位最早期的哲学家[18]这样说过。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就存在着一种意见：真实的东西就是恶劣的状态与多舛的遭遇；而如果恶，或者面对恶的那种或多或少的滑稽的绝望成了艺术的主要与主导性对象的话，那么这样的艺术才是完全符合现实的。但是为什么我却不想再听到，不想再看到或者再读到所有这样的东西呢？而每当我自己也写下哪怕唯一一个控诉我自己，也谴责并揭露我自己和其他人的句子的时候（除了出于义愤的时候），为什么我会彻底晕倒？在另一方面，我也绝对不会去书写什么生于人世的幸运，或者是来自某个更好的彼岸世界的安慰：必死的结局将一直是指引我的东西，但是我也希望它不再成为我的主要题材。

塞尚最初也曾经画过像《圣安东尼的诱惑》一类的恐怖图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唯一的问题则变成了如何将那纯粹且无辜的尘世之物加以实现的问题（“réalisation”）：苹果、岩石、人的脸。在这里，真实的东西变成了已获得的形式，它不是要控诉世事变幻、历史湮灭，而是要将一种和平的存在加以传达——艺术之道不外如是。但是，在传达的过程之中，他的感觉将何物赋予生活则成为了问题。

就在那个神奇图景的年代，我们，即那个女人和我，当时开车穿过了法国南部的另一处地方，到底有什么东西在我内心开始萌发了呢？

当时还有一次散步应该被计算入这次旅行之内：那是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来到了一处尚未开发的丘陵地带，那个女人的家就在那

里。当时是岁末，密史脱拉风[19]通常是来自法国中央高原的寒冷的下行风，但那次却是暖风。

风虽然很大，但却刮得一直很平稳，并没有那种突如其来的狂风大作，让人睁不开眼睛。尽管很快就找不到路了，但我总有一种那个女人的房子应该很近的感觉。就是这个女人，她是第一个拿爱德华·霍普的画给我看的人，她可以对不起眼的东西抱有好感，她也很清楚“我是谁”的问题。我在草场的一处空地上坐了下来，整片草地在风中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颤抖。低垂的树冠却几乎纹丝未动。天空很晴朗，在西边依然明亮的地平线上，云絮正在不断地形成，它们冲向天空，然后又消失于彼处——紧接着，月亮出来了，出现在了“对所见之物的思考中”（塞尚有一次曾经这样形容过他的工作方式），出现在了与另一个月亮的对比中（那是在一个类似的宁静夜晚，我把近处地平线上方的月亮看成了某个谷仓前发出黄色亮光的门拱）。我坐在那里，风声在耳畔呼啸，正如从前的那个小男孩坐在某棵云杉树旁，树叶在沙沙作响（也正如我后来站在城市的喧闹中，彼处的那条河正哗哗流淌）。

第二天，我们驱车前行，那是一段共同旅行的开始。我们从丘陵来到了海滨。密史脱拉风早已停息；那是一个温和又敞亮的冬日。在遍布石头的地形里，稀稀落落地生长着一些意大利五针松。我从那个女人那里学到了五针松那特别的法语名字：Pins parasol。它听起来就像是诗歌的叠句，而且它总是与那个年份数字1974一起经常重现在我的记忆中。那条略呈下坡的道路就在这些松树旁经过。这时（不是“突然”），树随路转，世界变得开阔起来。而“此地”也变成了彼处。世界乃坚固、能承载的土地。时间永恒而又平庸。那开阔者也可以一再地成为我本人。我能够离开那封闭状态。我应当就这样一直安静地待在外面的世界（在色彩与形式之中）。只有在我处于自我闭锁的危险中，不希望得到那种可以维持一生的精神的现时性的时候，我才是有罪的。

在一部我五年前写的小说里面，[20]有一处地形，尽管地势平坦，但却突然凸起成拱形向主人公迫近过来，仿佛要把他排挤出去一样。1974年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凹陷世界，广阔，没有压力和烦心，可以自由思考身体。那待传达的发现之旅至今仍历历在目：伞松与我的人生乐趣，这乃一种有效的真实。不管怎么样，在此期间，每当有突然

隆起的陌生走廊向我逼压过来的时候，“pins parasol”经常会发挥作用；尽管前面小说的主人公总是一再表现得心不在焉、不知所措（这里存在着一种自有的罪愆）。

真的是从那时开始有东西在我内心萌发吗？难道我不曾在更早的时候，在南方的树木前获得过一种理智的喜悦吗？那是1971年的夏天，在南斯拉夫阴暗的柏树林前：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我内心深处日渐凹陷下去，以至于最终有人第一次张开了自己的手臂？（那棵桑树也属于这段记忆。我们经常坐在它的树荫里，树下是浅色的沙子，上面被落下的果实溅上了暗红的斑点。）就在那个时候，转变发生了。那个人，也就是我，变得高大起来。与此同时，他的内心似乎有东西要求他跪下，或者干脆脸朝下躺在那里，然后变得默默无闻。

这转变是很自然的事情。那是一种和解的愿望，按照那位哲学家[21]的说法，这愿望来自于“对他者欲望的欲望”。这愿望于我是真实且理性的，从那以后，它也适用于我的写作。

另外，当时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期。（我的母亲在死亡的恐惧中向我发出了求救的呼喊，而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所以，我也在那些柏树身上又看到了古人那些神奇的树棺。有很长一段时间，“将事物入梦”一直都是我写作的一个准则，即用这样的方式去想象要把握的事物，就好像我在梦中见到它们一样，而且要坚信，只有在梦里，事物才会显现出它的本质。这些事物在写作者的周围制造了一圈的小树林，写作者当然经常只有费尽心力才能返回到生活中去。虽然他一再地看到这些事物的本质，但是这本质却无法被传达。因为他不顾一切想要抓住它，所以他自己也变得没有把握——不，那些神奇的图景——也包括柏树的景象——都不是我想要的。在它们的深处存在的是一个根本不平和的虚无，我绝对不愿再回到那里。只有在外面，在白天的色彩中，我才存在。

国家曾被称作是“所有规范的总和”。而我却深知，我愿意接受另外一种法律规范的约束，即“形式的帝国”。在这个帝国里面，正如有位哲人[22]所言，“真观念总是与其对象相一致”，而每一种作为

榜样的形式都是强有力的（尽管艺术家本身在近代的国家里面也“只剩下半个影子，而现在则几乎是彻底的空洞了”）。

但是，到底是什么给了人们亲自在这个帝国里发挥作用的权利？每每开始一个新工作的时候，这个问题都会折磨着我。总是有一个想法一再地纠缠着我：我只是一个友好且沉默的读者。但是有一次，我终于感觉到了这一权利——这还是发生在我开始写点什么东西之前。我用精神之眼看到了主题，也看到了那本期待中的“书”，还有很多书。那并不是在梦中，而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白天；我也还没有在南方的柏树林前不能自持，而是在这里，我的对象在那里——在夏末的某个周日，我们行驶在上奥地利州一处地势略显起伏的地区，那是一条笔直的公路。路上空荡荡的。只有一次，有一个男人穿着白色衬衫和黑色西装，走在路的另一边。他的裤子很宽大，走路的时候裤脚总是甩在自己的腿上。而等到我们后来返程的时候，令我欣喜的是，那个男人仍然在路上走着，裤脚在他的踝骨周围甩动，上衣的纽扣早已解开，就在上奥地利州的那个周日——我第一本书里的那个“我”就来源于此。这个人就这样地走着，就好像他要走到人们中间去，要对他们讲些什么。他将带着强力与巨雷来到人们中间，然后说服他们。所以，是否可以这样说，1974年的“pins parasol”并没有让什么新的东西萌发，而是有某种东西回归了，某种我可以在回归中作为“真实的东西”来加以欢迎的东西？

塞尚有一幅画，人们称它为“大松树”。（画家本人从来没有给自己的画起过特别的名字，也很少在作品上签名。）画的是阿尔克河畔一棵孤单的大松树，就在艾克斯市的东南面。那也是他的童年之树。在河里游泳之后，他会和朋友们坐在那棵松树的树荫里。在他二十来岁的时候，他曾经在一封写给童年玩伴埃米尔·左拉的信中问道：“你还记得阿尔克河边的那棵松树吗？”他甚至还为这棵树写了一首诗。在诗里面，密史脱拉风在光秃秃的枝杈间吹过。而这幅画也会让人想到风，特别是因为这棵孤零零的大树的弯曲程度。除了这棵树之外，也许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野外”：它把它所耸立的那块土地变成了一处高台。而它那伸展向四面八方的扭曲的树枝，与它那拥有最多种绿色的针叶衣，都让整个空虚的空间彻底震颤起来。

“大松树”还在塞尚的其他画里面出现过，但是再也没有像这幅画里那样自成一体。在其中的一幅画里，其下部的树枝斜伸进整个风景中，并与旁边一棵树的枝条共同形成了一个通向远方的门拱。而在远处天空明亮的色彩中，圣维克多山脉的山体绵延开去。

在我遇到塞尚之前（并且在爱德华·霍普之后），已经有另外一位画家让我中止了对绘画的单纯评价行为，他教会了我要把绘画看作是榜样与典范，并且要把它们当成作品而加以崇敬。

在那个时候，我读到了一段关于19世纪一个德国村庄的描述。那是一位德国施瓦本地区的农民所作，他后来成为了一名诗人[23]。他想要远离一切人类狭隘的观察，他自称是大自然的读者，并把他写的诗称作是大自然的福音书。（而我则是他的读者。有一次，我望着远处的一片雪地，在阳光雾气的遮罩下，人们往往只能通过一道细小的光芒才能把它与天空区别开来。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感觉到，他诗中的宣告很贴近我的心：“一切都会是你的，包括所有的天空，包括所有的星辰，如果你能与远方的光芒相辉映。”）——但是等到他用散文写作的时候，他却用狭隘的眼光观察着周围的村人。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有的时候，他会感觉很艰难，“那因田间劳动而疲累的身体既不会听也不会看了。”（这位克里斯蒂安·瓦格纳的生活完全配得上“悲惨”这个词，虽然这个词在许多人那里只是空洞的词汇。他的生活连同诗都反映着他的精神。而按照那位哲人的说法，精神只有与“他的对象，即身体”统一起来才能持久。）

与此同时，我第一次开始有意识地去欣赏居斯塔夫·库尔贝[24]的油画。他的许多画表现的都是19世纪中叶的农民生活。我为那些画中从容的静默所感动，特别是其中一幅名为“法国杜省弗拉盖的农民，集市归来”的画。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些才是真正的绘画——这并仅是对我一个人而言。

库尔贝画题的地点定位都非常准确。它表明，画家将这些每天的世俗场景都当作是真实的历史性的事件。所以，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形象，无论是在筛谷粒，还是在坟墓前站立，或者为死者穿上殓衣，抑或在黄昏时分从集市动身回家（也包括他画中那些单纯的闲坐者与休憩者，睡眠者与梦寐者），他们都在画家充满同情的想象中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行进行列——对我而言，有位老妇人的形象也应该属于此

列。那已经是20世纪的某个温暖的晴天，老妇人带着她的购物袋，正慢悠悠地走在西柏林的一条支路上。她用一种深化其形象的沉默向我揭示，周围的房屋立面是我们共同的、仍将幸福地持续下去的和平列车。

同样是这位画家库尔贝，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期间，正是在他的坚决倡议下，人们推倒了旺多姆广场上的凯旋柱[25]：因为在一个通向和平大街的广场上，绝对不可以有“任何战争与侵略的纪念物”存在。他后来也因此被判入狱达数月之久。此后的十来年间（这也是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许多画作所表现的主题只有一片野绿色的大海和与之相映衬的天空，大海前面几乎很少出现沙滩。这一系列海景画中有一幅名叫“巨浪”：水与乌云几乎就是他全部的素材。而整幅画却通过画材那岩石般的颜色而显得很坚实，同时又通过形式上丰富的联系与融合而显得动人心魄。

对于塞尚而言，库尔贝有着“大师般的伟大手法与雍容华贵的风格”。他把《巨浪》称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发现”。当他站在卢浮宫库尔贝的画作前时，他能做的只有不断地喊出画上物体的名字：“你看那群猎犬、那摊血、那棵树。再看这里，那手套、那花边，还有那裙子上断裂的丝绸。”

自从我懂事以后，我就一直有一种需求，想找一个导师。有时候哪怕给我一个词就足够了。在求知欲的鼓舞下，我感觉自己被吸引到了某人的身侧。那些职业上的老师曾经传授了我很多东西，对此我不胜感激。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可以被我称作是“我的老师”。在大学里面，只有一个人，他在法律课上能用神秘的、简单的、数学式的句子来表达事物的必然属性。在他的课上，一种前所未有的求知欲攫住了我，我渴望成为他的“学生”（这的确是一种欲望）。可惜他只是应邀来讲学的，在度过了短暂的一周之后，他消失了。至于那些作家，我是他们严肃的读者，但是对我而言，他们更像是兄弟——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太近了。而现在，我只是偶尔会把外公看作是一位老师（许多人大概也有这样的一位“外公”）：无论他什么时候带我走在某条路上，那条路都会变成我的学徒之路（尽管它与今天森林里面的那些“知识路”[26]并不相同。）

我总是一再地感觉到，无知是一种贫困状态。由此产生的是无目的性的求知欲，它不会发展成任何观念，因为它没有任何可以与之“协调一致”的“对象”。但是，然后也许就会有某个单独的事物给人以明确的暗示，就这样，“最初的精神”得以确立。然后人们可以通过学习研究使之变得严肃和认真，虽然对于其他活动而言，这种学习研究在从前仍然只是一种渴望与憧憬。

这样的“最初的事物”，我在塞尚的绘画那里体验到了。那是在1978年春天的一次展览会上。然后，一种学习的冲动占据了我的心，这种感觉我此前只有在研究福楼拜的语序时才出现过——那是画家最后十年的作品。他一直孜孜追求“实现”他的特定的对象。而在那段时间里，他无限地接近这一点，画的色彩与形式都在为之欢呼。（那位哲人写道：“在我看来，真实与完美就是一回事。”）而且尽管如此，他的画上并没有出现额外附加的光线。受到欢呼的对象显现的仍然是其本色，甚至连更为明亮的风景也构成了一个逐渐暗淡的统一体。那些肖像画的主人公都是19世纪后半叶普罗旺斯地区无名的乡民，处在画面最前部的他们显得很高大。他们正襟危坐，背景是土色的，虽然他们手上并没有握着什么特殊的权杖，但是感觉上，整个背景就是他们拥有的王国。

深色调、块面、结构、重彩、线条、转暗的眼睛：是的，这就是给我的震撼。在经过了两年的“研习”之后，也许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绘画的沉默在此处表现得非常完美，因为结构上的黑块面加强了普遍的线条，以至于我可以（按照那位诗人[27]的说法）朝那线条“暗过去”：这是一种跳跃的体验，在绘画与现时的相隔之际，两双眼睛终于在一块画布上相遇了。

当时的我曾这样写道：“画开始颤抖。这是一种我可以表扬与赞颂某人的解放。”

有一幅肖像画尤其打动我，因为它所展现的正是我将要写出的故事里的主人公。画名叫“交叉双臂的男人”：在画像下方绝对不会出现这个男人的名字（尽管如此，他也并不是某个不确定的人）。他处在某个相当空旷的房间的角落里，房间里镶边的木条勾勒出房间的轮廓。他坐在土色的暗背景中，土色也让人物有了一定的变化。他的年纪在我看来是“最理想的：已经固定化，但还有着憧憬”。（当我想

要模仿他的姿势时，那只藏在胳膊下面的手让我很吃惊。人们需要很强的意志力才能从那种交叉状态中解脱出来。）——那个男人的眼睛斜向上看着，目光中没有任何期待。一个嘴角因为较粗的阴影块面处理而略微扭曲："克制的悲伤"。除了那敞开的白色衬衫之外，他身上的亮色还有那乌黑的头发下面宽阔的圆额头。这也是他在赤裸状态下无法保护的东西。在他身上，我绝对不会看到一个与我相似的人，他也不会是一个兄弟，更像一个同谋。因为我已经结束了他的故事，所以他现在又重新成为了那个不可触碰的Homme aux bras croisés[28]，在那里弥散着沉默的微笑。但是，当时类似的肖像画还有很多，以至于我都无法很好地领会那次画展上的其他画作——在一处单独的圆形房间里，整个一圈展示的都是圣维克多山的山峰。它们都是画家从不同的角度绘制的，其实也就是从下面的平原以及远方两个主要方向绘制的。画家说："同一个物体，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来，都能展现出一个格外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这研究对象的角度非常的丰富多样，我想，我可以就这样不换位置地忙上几个月，因为我只需要向右转转身，然后再向左转转身就可以了。"

在那次画展上，我很快就从那座山旁经过，并没有怎么驻足。但是，渐渐地，它在我心中的色彩越来越浓重。然后在很久之后的某一天，我说，我有了一个目标。

颜色的高地

圣维克多山并不是普罗旺斯地区最高的山，但正如人们所说，它是最陡峭的。它并不是一座山峰，而是一长串连绵的山脉，其山脊的高度都大致相同，均在海拔一千米左右，山体绵延，几乎形成一条直线。

在圣维克多山的正西面，步行大约半天的路程就可以到达艾克斯市的一处人工蓄水池。只有在蓄水池这个位置，圣维克多山才看起来不是一串山峦，而是一座陡峭的山峰：虽然从那里看起来是一座完整的山峰，但是那实际上只是山脊的开始，它还要再向东延伸大约半天的路程。

整座山脉是一处巨大的石灰岩地块突起。它从北面缓缓隆起，蜿蜒向南，突然几乎垂直地插入一处高原。山脊构成了它顶部的纵轴线。从西面望去，三角帽形状的山体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它上面布满了各种不同的褶皱岩层，就好像是整个山岳的一个剖面图。就连此前对于这座山一无所知的人，也会不自觉地了解到一些这座山形成的历史，感受到它的特别之处。

作为地块隆起，整个山体拔地而起，直冲云霄 。在它的周围还有许多更为平缓的地块，它们因为断层的存在而彼此离裂，上面岩石的颜色与花纹也各不相同。从前这些地块曾经挤压在一起，如今却已经舒展开来，以至于各种形式的山体都在平原上面得到了小规模的延续。

圣维克多山最让人惊叹与讶异之处就在于那些明亮的石灰岩，焕发着白云岩一般的光泽。有一本登山的小册子称之为“质量最好的岩石”。那里没有道路通往山上。整座山脉，包括几乎呈平角的北坡，上面都没有一条可以通车辆的路，也没有住人的房子和耕地（只有在山脊上还矗立着一座废弃的17世纪小教堂）。南面的峭壁只有登山家才感兴趣。而从其他的方向人们都可以不大费劲地登上来，然后在山脊上继续前行很长时间。就算是从下面距离最近的村庄出发，整段旅程都要一天的时间。

是的，在那个七月的日子里，我就在“塞尚之路”上向东行进。我还没有走出艾克斯市，就已经禁不住浮想联翩：我要给一个不确定的人群提供旅游建议（虽然我也只是那些从世纪初开始就走在这条路上的许多人中的一员）。

还有一个念头，此前也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那就是去亲眼目睹一下这座山真正的样子。一个曾经是某位画家所钟爱的东西，它本身就一定会展现出某种特质，这难道不是一种固定的观念吗？直到有一天，这种联想变成了幻想，我的决心也越发坚定（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舒适的快感）：没错，我要从近处观察圣维克多山！所以，我并没有怎么特别地去追寻塞尚笔下的那些画题，反正我也知道，大部分画上的主题早已经面目全非，不复当年风采。我只是跟着自己的感觉

走：那里就是那座一直吸引我的山，从来还没有某个东西如此地吸引着我。

在艾克斯，米拉波大街的两侧长满了法国梧桐，枝叶相互交错覆盖，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穹顶。清晨走在树下，感觉甚是昏暗。长长的林荫大道的远处出口处是一个门，旁边的喷泉喷射着白色的水花。在水花的掩映下，门仿佛成了一面小小的镜子。只有到了城市边缘的时候，周围才慢慢泛起柔和的灰色日光。

天气炎热且阴霾，但我却在一种通畅的温暖中行走。还没有望到山。那条马路一开始还在蜿蜒蛇行，总体走势却还是缓缓向上。街道十分狭长，人行道早在未到市郊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于是躲避汽车就变成了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不过，在走了正好一个小时之后，托罗奈村已经在我的身后，这时的道路变得相当空旷了。

尽管路上车来车往，我还是感觉到了宁静。正如此前的一天，虽然身处巴黎的喧嚣之中，我还是感觉到了我们住过的那条街道上的宁静。当时，我曾考虑过和别人一同前往这里；现在，我却很高兴能够独自一人。我走在那条《小路》上。我在绿荫遮蔽的沟渠里看到了《小溪》。我还驻足于那座《石桥》[29]之上。这边是山岩的裂缝。那边是一条两旁种满五针松的岔路；路的尽头有一只喜鹊的黑白双色格外醒目。

我深吸着树木的香气，心里想着："但愿永远如此。"我停了下来，提笔写道："这是何等的机遇啊——就在此时此刻！塞尚之路上的宁静。"一阵夏天的小雨下了又停，偶尔有些小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只有那条路在雨后是湿湿的，沥青的小石子五颜六色。

当时对我来说正是一个间歇期；那是居无定所的一年。此前，我已经在美国的一处宾馆里将那个交叉双臂的男人的故事基本写就。故事的底色则与每日所见的湖光一同成就了那小湖的灰色晨曦（然后我发现，这时的我就好像"刚在田里犁过地"一样）。也正是在这部小说的撰写当中，我才下定决心，回到我的故土——虽然有位哲学家[30]

的话一直在我心头萦绕不去：放逐别人乃一切罪行中最恶劣者，而放逐自己则是一切成就中最伟大者。

那时距离回到奥地利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其间我要么哪儿也不住，要么就住在别人那里。期待的喜悦与逼窄的束缚错杂交织。

以前我经常听人说，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即使那里缺少某种特殊或是幸福的时刻，事后总会唤起辽远与安详的感觉。现在我在这里拧开水龙头，巴黎克里尼昂古尔门旁的那条宽阔的灰色林荫大道就会在我面前延展开来。于是，遵循着路德维希·霍尔[31]的说法，我急切地要“绕个大弯才回家”，我想在欧洲兜一圈。

与许多前人一样，我的英雄也是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他陪伴着我：像他一样，我也通过说自己是无名之辈而获得了（暂时的）安全；关于我故事的主人公，我也曾这样设想过，他就像当初的奥德修斯被费阿刻斯人在睡梦中抬下了船一样回到了故乡，而且一开始也根本无法认出故乡的土地。

我曾经真的在希腊伊塔卡岛[32]的一处海湾中度过了一夜，从那里有一条路直通到一片漆黑的腹地。一个孩子被带入了那黑暗深处，他的哭声至今仍在我耳际久久回响。那边桉树的树叶间有白炽灯在燃烧，清晨被露水濡湿的船舱板上有雾气在蒸腾。

德尔斐[33]，那里曾被认为是世界的中心。在圣地体育场[34]四周的草丛里，有蝴蝶在翩翩飞舞。诗人克里斯蒂安·瓦格纳曾认为它们是“圣徒死后解脱的思想”。然而，当我来到圣维克多山面前，站在艾克斯市与托罗奈村之间的一处空旷的地点上，身处那些色彩当中的我不由得想到：“一个大艺术家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难道不比类似德尔斐这样的地方更像是世界的中心吗？”

哲学家的高地

还未到托罗奈村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望到山了。山光秃秃的，几乎只有一种颜色；那与其说是颜色，不如说是一种光泽。有的时候，你也许会把云的边线看成是齐天的群山：而在这里却正好相反，那座

山峰的光影第一眼看上去仿佛是某种天空现象；这也要归因于那些平行的陡坡和地块上水平延伸的褶皱岩层，它们看起来似乎刚刚才停止了山体运动。人们会有这样的印象，这座山好像是从几乎与它同色的大气圈那里流淌下来的，然后在这里浓缩成了一座小型的外太空山体。

一般说来，人们在远方的平面上往往能够观察到一些很特别的东西：比如，一旦有一只鸟在平面前面很远的地方展翅飞过，就算是那些原本无形无状的背景也会随之有所变化。这些平面让人迷醉，而它们又在逐渐形成明显的影像；眼睛与它们之间的空气变得很有质感。然后，那些已经熟悉到生厌的地步的东西，那些位置固定的东西，那些因为它们的俗名而似乎变得空洞无物的东西，突然一下子都处在了一个正确的距离上，连同它们真正的名字，成为了“我的物体”。在撰写本书的此地[35]，这种观察不仅适用于远处泰嫩山脉[36]上那白雪掩映的高地，还适用于萨尔察赫河畔[37]的那家游客咖啡馆（有一次，因为旁边盘旋的海鸥群，这咖啡馆给人一种类似于“河对岸人家”的印象），同时也适用于卡布齐纳山[38]（那是另外一次，有一只孤零零的燕子从山前飞过。突然之间，山的深度显现出来。它成了一个新发现的熟悉之山，永远开放，从不遮掩）。

17世纪伟大的荷兰王国发展出了“全景画”形式的绘画类型，以便能够将人们的目光吸引入无限的远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许多王国的画家都采用了在中景部分画上翱翔的鸟儿的手法。（博尔赫斯在一部小说当中这样写道：“没有一只鸟儿能够为他拯救这风景。”）但是，一辆从桥上驶过的公共汽车连同它的车窗框和乘客的剪影一起不也能将远处的天空拉近了吗？树褐色不也足够用了吗，而且从那明蓝的颜色里不也发展出了一种形式吗？虽然我与山之间并没有什么鸟群（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但是圣维克多山同样地引人入胜，而且给站在它面前的我一种更为直接的感觉。

等到过了托罗奈村之后，三角帽形状的山体才出现在了我的视野之内，那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连绵山体。我走的那条马路在下面的平原上与之相伴了一段距离，一路平坦，再没有蜿蜒和起伏，然后向上延伸进了通向一处石灰岩断层地块的盘陀山路。这地块在陡坡脚下形成

了一处平坦的高地，绵延其上的盘陀路刚好与高处绵延的山脊相平行。

时值中午，我登上了盘陀路，天空是深蓝色的。四周的悬崖峭壁像是一条固定不变的浅白色轨迹，一直向后延伸进地平线。一处干涸的溪床上，红色的泥灰沙里有孩子的脚印。没有任何声响，唯有四野的鸣蝉向着山峰发出尖利的叫声。一棵五针松上正渗着树脂。我咬了一口嫩绿的闻起来像苹果的松球，上面早已被某只鸟儿捷喙先尝。树干那灰色的树皮已经龟裂成天然的多边形图案。在我最初在某处河岸干枯的淤泥里发现了这种图案之后，它就随处可见了。从那些断层地块的某个地方传来了一声特别贴近的鸣叫；但那只鸣蝉却要等到它移动身体，倒退着爬下树干的时候才被我发现，因为它的身体是树皮一样的灰色。长长的透明的蝉翼上有许多黑色的凸起。我朝它扔了一块小木片，发现飞起来的却是两只，它们发出鬼魂一样的尖叫，让人不得安生。细看之下，山崖上的缝隙中生长着深色的小灌木，那里也不断有蝉翼的图案出现。

上面，在高地的西侧，坐落着圣安东尼村。（塞尚在一封信中说，晚年的他还曾在这里“迷过路”。）这里有一家小饭馆，人们可以在那里空地上的阔叶树下坐下（“周二休息”）。金合欢树的枝叶芜蔓，在微微透光的山崖的映衬下像是夹道欢迎的队伍。

在高地之上，17号省道继续向东延伸，仿佛通往一处尚未探明的陆地深处。高地似乎很荒凉，上面几乎无人居住。在这个椭圆形的平面上，西侧的巴约圣安东尼村是唯一的村子。下一处地方叫做毗卢毕，坐落在高地之外的一处山坡上，海拔与下普罗旺斯地区的平均海拔大致相当，步行到那里大约要两小时。我把这片巨大的高地，这座水平地悬于周遭之上的平顶山称为哲学家的高地。

马路上空荡荡的，我继续前行。一开始，我还有点拿不定主意（从这里开始就没有返回艾克斯市的公共汽车了）。但是随后我下定决心，继续前往毗卢毕。路上没有车。在寂静中，每一个细小的声响听起来都像是有人在说话。那是一种普通的轻微的沙沙声。我走在路上，总是朝着山的方向；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停下。在一处槽型的山脊隘口那里，天特别地蓝，我发现了最理想的通行口。干枯的高山草场一直延伸至陡峭的山坡脚下，花枝上凝结着大片大片的蜗牛壳，将整

个草场漂成了白色。这些蜗牛壳构成了一处化石地貌。有的时候，乍看之下，山本身似乎也成了这地貌的一部分，因为它有时会突然显露出它的本来面目，一座巨大的珊瑚暗礁。已经是下午了。阳光从一面斜射过来，另一面吹来了轻柔的下行风。那去年被人用犁杖在大地上书写下的东西如今已经绽放，发射出一种强有力的光线。路边的麦秆仪态万方，列队从我身旁经过。在山的皎洁中，我有意识地放慢了脚步。怎么了？什么也没发生。而且什么也不需要发生。我已摆脱了期待的束缚，远离了每一种迷醉。整齐的步伐已经成了舞蹈。那具完全伸展的躯体，也就是我，为自己的脚步所驱使，如同坐在轿里一样。在那个完美的时刻，那行进的舞者，例如我，将“广延的形式和关于这个形式的观念”（按照那位哲人的看法，这两者“乃同一的东西，不过由两种不同的方式表示出来罢了”）同时表示了出来——游戏的规则与规则的游戏，就好像从前上奥地利州马路上的那位甩动裤脚的男人。是的，那个时候我自己也知道了，“我是谁”，并且随之感受到了某种不确定的使命。没错，那位哲人的著作就曾是一种伦理学。

有一张塞尚的照片，画家拄着一根粗粗的手杖，背上系着作画的工具，照片的标题颇具传奇色彩：“向主题进发”。而在高地上，我满心喜悦地行进着，却不必烦心什么进发，或是什么主题的事情——但是我知道，我们的画家也没有使用过任何特殊的“鸟群”来让他画上那广阔的世界集合成一个整体。动物只在他最初的画作中出现过，而且全部都是野狗，它们都以蹲坐的姿态出现在那些恐怖狞厉的野餐或是赤裸图画上。有人将其解释为那些抗拒精神憧憬的愚人。

尽管心情愉悦，但在旅程之后，能够坐在毗卢毕一处普罗旺斯村庄的梧桐树下，并且在一群陌生人当中喝一杯啤酒，还是很令人快乐的。在山的线条的映衬下，这里房子的屋顶显得格外安详。一条洒满阳光的街道名叫“rue du Midi”[39]。一位老兵气质的老先生在咖啡馆的露台上向我们其他人温柔地展示他那根欧洲刺柏木做的手杖，让我想起了电影大师约翰·福特[40]。两位年轻的女士好像刚从大师的老电影中走出来一样，背着背包，穿着钉鞋，正向山脊方面行进，她们打算在山脊上向西漫游。

狼跃

毗卢毕也是我与“我的”狗发生经历的地方。在我摆脱它之前，我是无法继续前进的。

我们家里还从来没有养过狗；只有一次，一条流浪狗在我们家留了下来，然后我就离不开它了。有一年夏天，它被车轧了，又过了几天，我们用小车把它送到了邻村的病畜屠宰场。这一过程后来演变成了一次为期较长的科学探险，因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因为忍受不了那里的臭气而跑开，最后不得不把我们的小车停在了空旷的田地上。（那也是孩提时代的我唯一一次感受到了某些类似绝望的东西。）后来，在某一个城市，我又亲眼见证了，一条黑色的大丹獒犬与一条同样黑色的杜宾犬两面夹击一条白色的长卷毛犬，然后把它撕成了两半。

而自从我步行走了很多地方之后，我才对绝大多数的狗有了一种难以克服的厌恶。现在每到了一处空旷的地方，我都不得不提防像毗卢毕那次一样的猛兽出现。猫专注地躲在草丛里窥伺；溪水深处的鱼因为受惊而四散奔逃；大黄蜂嗡嗡的鸣叫只是在发出一种警告；蝴蝶依然是“我那圣徒死后解脱的思想”；蜻蜓则呈现复活节前的颜色；清晨的鸟儿成群结队，汇成海洋，傍晚则回复到头埋在翅膀底下的状态，在羽毛下面发出轻微的声响；蛇依然还是蛇（或者是空空的蛇蜕）——但是，在那幽暗的远处还有一条狗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走近一看原来只是一根篱笆桩，然后真的来了一条狗。

在毗卢毕之外，有一处外国军队的兵营。在返回艾克斯的路上，我特意绕着毗卢毕兜了一下，途中经过这里。整个营地是一个混凝土建造的场地，没有树，也没有灌木丛，四周都是高高的铁丝网。操场与大楼都是空荡荡的，部队似乎已经开拔了。

尽管如此，我随后还是听到了一种刺耳的金属的声响，仿佛一个疾奔的人带着拔出的武器。一阵隆隆的声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空气中一种低沉的声音从远处越来越近。几乎与此同时，我在离我极近的地方听到了一阵吼叫：那是所有声响中最为凶恶的，是死亡与战争的嘶号，心脏毫无来由地开始狂跳起来，在我短暂的想象中，心脏就像是一只弓起背来戒备的猫。周围一切风景的颜色与形式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牙齿的白色，和后面那团晃动的略显淡蓝的肉紫色。

是的，在我的面前，在栅栏的后面，站着一只大狗——一种獒犬，我马上就在它身上重新认出了我的敌人。还有另外一些狗也从院子其他地方跑了过来，爪子在水泥地上挠刮。但是，它们都同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那第一只狗，从它的姿势与声音上判断似乎是狗王。

它的身体看上去色彩斑斓，而头和脸都是深黑色的。我当时想，“仔细看看这恶魔”。它的颅骨很宽，尽管有悬垂的上唇，但看起来却显得比实际短；三角形的耳朵像是拔出的小匕 首。我找了一下它的眼睛，遇到了一丝闪烁的微光。在咆哮的间歇，它大口大口地喘气，只有口涎静静地滴淌下来。其他的狗也开始吠叫，但是相形之下，却显得麻木和空洞。它的毛很短，很光滑，上面有黄色的条纹；肛门上有一个纸一样白的圆圈；尾巴上没有很长的毛。当那凶恶的号叫再次响起的时候，周围的风景都消失在唯一一个由炸弹坑和炮弹洞形成的旋涡当中。

回过神来的我又看向了那条狗，看得出来，它恨我——但是，还有一个看得出来的东西，那就是这个动物的痛苦，似乎有某种受诅咒的东西在里面翻腾。它全身没有一处地方能够保持安静。只有一次，好像是对我丧失了兴趣，它停了下来，假意向旁边眨眨眼睛，甚至屈尊降贵地与它的伙伴们玩了起来（它或许会把它们全都咬死）——然后在下一秒突然向栅栏这边跃了过来，惊险得足以拍成电影，它跳得非常高，吓得我真的向后退了几步。

然后，它静静地站在那里，保持着威胁的姿态，很专注地看着我的脸，看了很长时间，当然只是为了找到一些恐惧与虚弱的迹象。我马上明白了：它并不是专门针对我个人，而是在这块外国军队的地盘上，战争法则乃更为有效的东西，而它那对杀戮和血液的渴望则被人训练用于攻击没有武器和制服的人，像**它一样手无寸铁、身无寸缕的人**。（至少一定会有不拿武器的人，一个手无寸铁、身无寸缕的我曾经对此这样写道。）它，警卫犬，站在营地里；而我站在田野里（根据它的天性，它对此视而不见，因为对它而言，真实的事物仅仅只存在于它的封锁区域里而已，此外别无他物）；铁丝网在我们中间，正如一首老诗所描写的那样，**它就是一场永恒的、该死的、冰冷的、猛烈的大雨**。透过它，我打量着我的敌人，既沉着又迷离，观察它那嗜血的欲望因为隔断而更加强化，而它又如何因为这强化的欲望而丧失了所有的物种特征，变成了所有刽子手中的典范。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段与外公散步的经历。当时他向我展示了，人们在野外步行的时候应该如何与狗保持距离：虽然手上并没有拿石头，但是他总会弯下腰去，做出要捡石头的样子，而且每次都会真的吓退那些动物。有一次，他甚至把土扔进了一条狗的嘴里，而那狗把土咽了下去，然后让我们过去了。

我也想在毗卢毕的那条獒犬身上尝试类似的举动，但是这条狗随即却只是张开那张血盆大口向我狂吠。在我弯腰的时候，一张黄色的巴黎地铁票从外套里掉了出来，那是一张废票，背面记满了笔记：完全是出于任性，我把那张票扔过了栅栏——而那条狗马上就变成了一只黄鼬，一个众所周知的杂食动物，它把我的票吞了下去：那是贪婪的欲望，同时也是对人的反感。

在我的想象世界里，这个时候，那群在它身体里面靠它生活的虫子们会立即在一阵幽深的混乱之后冲向那张车票——而这时，那狗真的就排出了一坨扭结的、像它的匕 首耳朵一样尖尖的塔形粪便。这时，我才留意到，原来这条獒犬早已在周围的水泥地上堆积了其他一些干燥的、早已褪色的类似物体（真是既傲慢自大又一塌糊涂），给自己划定了一个公共的势力范围。

在这样一个毫无自觉意识可言的凶恶意志面前，任何好言好语（乃至任何言语）都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我坚定地蹲了下去，而外国军队的狗也哑火了。（更确切地说，它只是愣住了。）然后，我们的脸相互贴在一起，并且消失在一片共同的云雾里。那条狗的目光已经失去了闪烁的微光，而那深色的头部则具有了一种额外的面纱般的黑色。我们的眼光交会——但只有一只眼睛与另一只对视：它只有一只眼睛，我正视着它那只独眼；然后我们彼此都从对方那里意识到了我们是谁，但我们却只能是永远的死敌。同时，我意识到，这个动物已经疯了很长时间了。

那条狗的下一声响动却不是吠叫，而是一种急切的喘息，越来越强烈，到了最后，就好像它刚刚长上了一双不停扇动的翅膀，它要马上带着这双翅膀飞过这栅栏一样。周围伴随着它那些同伙的叫声，那叫声不再针对我一个人，而是后面那连绵山体的白色，或者它们这动物王国对面的一切东西：没错，现在它要猎取我的生命；而我也想要用一个强有力的字眼杀死它或是驱走它。

因为仇恨，我默默地离开了那个地方；与此同时，我也很清楚自己的罪责：“我不能为了我的企图而仇恨。”一路走来的感激之情已经被遗忘；山的美已经毫无意义；只有“恶”才是真实的。

我沉默不语，走路也变得异常困难。敌意在我的身体里继续抽搐，已经开始发臭。身处大自然里，我却找不到任何可以辨识的东西，尤其是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命名的东西了——对于我那种手足无措、如临大敌的僵硬状态，当时的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在法国经常使用的德语外来词“这是啥”（Was-ist-das）：这个词应该是来源于1871年的普鲁士占领军。当时这些入侵者可能对于许多巴黎阁楼上面的天窗比较陌生，所以就把它称为“这是啥”。

在毗卢毕之外，西方已经成了前进的方向，我来到了一个杂草丛生的羊肠小道上。这条路从一处坡地上的葡萄种植园中间穿过，我让阳光照着我。也许是走得太多太累，我小睡了一会儿。我梦见了那只狗，它已经变成了一头猪。明亮、结实而且丰满，它已经不再是某个人鄙视的东西，而是一个自在自为的动物；我赢得了它的欢心，爱抚着它——但是，醒来的时候却并没有因此而解脱，而是按照那位哲学家的说法，“通过狂欢的涤荡而为那神圣存在的作品做好了准备”。

在依然明亮的天空上，月亮升起来了。我因此想起了天使安息的“沉默之海”，而福楼拜的“安慰”则直达我心里。在布满黏土的羊肠小路上，我闻到了清凉的空气，要下雨了。我新发现了一棵桦树的白色。葡萄园里所有的行列都是向不确定方向延伸的道路。竖直的葡萄藤就是静谧的烛台；而月亮则是幻想旧有的星宿。

伴着落日最后的余晖，我走在路上，迎面是欢快的风。山的蓝色，森林的褐色与泥灰岩斜坡的朱红色是我的彩带。同时，我也奔跑起来。有一回，在一处小沟壑上方的桥面上，我甚至跳了起来，又高又远，迸发出一阵邪恶的笑声，于是我将该地点命名为“狼跃”（用法语说就是“saut du loup”）。然后，我安静地继续前行，心中只剩下对艾克斯的佳肴与美酒的期待。

当我在深夜到达那里的时候，我看到米拉波大街多余的石块上有螃蟹爬上爬下，我还把夜风中一只蓝色的气球想象成了升腾的香烟。疲惫中的我别无思绪，唯念着一首“长日蓝调”。

桑树小径

我在普罗旺斯又待了几天。有时，因为太多寂寞，我失去了幽默感，而颜色也逐渐褪去：苍白兼奇形怪状（总是越来越坏）。一天夜里，一个男人穿过马路，走到我面前说："我要杀你。"我看看他空空的双手，说道："不行，不要用刀。"我成功地看到了他的目光，然后我们一起走了一程，作为伪装的同伴。

在洛甫路（Chemin des Lauves）的塞尚工作室里，他的东西都已经变成了圣物。在窗台上面干瘪的水果旁边，我外祖父那件肥大的黑色上衣被小心翼翼地悬挂在烙铁的上方。在米拉波大街的咖啡馆里，我遇到了"玩纸牌者"。他们已经在桌子上铺好了玩牌用的桌布，他们的外貌与画上的并不一样：红红的脸颊，健谈，几乎不怎么休息；但是又和画上的一模一样（总是向纸牌方向下垂的眼皮）我坐在旁边，读着巴尔扎克的小说《无名的杰作》，里面那位失败的画家弗朗霍夫一直在追求完美的真正的绘画，而塞尚正是在这一追求中重新认识到自己的。这时，我发现，法国的东西（作为文化）已经变成了一个管辖着我的——但却一再令人想念的——故乡。"Jas de Bouffan"（"风之别墅"）一度是塞尚全家的庄园，同时也是画家的工作地点和他的作画主题。它现在与马赛的一处高速公路相毗邻；它的后面则是一片与它同名的新建区域。那里一个有关房屋密封的广告牌上写着："Réussir votre isolation"（"您的封闭大获成功"）。但是，随后，一家超市的"全部价格"（"Omniprix"）被我看成了塞尚一封信中提到的"全知全能"（"Omnipotens"）。

还有一次，我在外面的地中海常绿灌木林里迷了路，突然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水库的前面，湖水湛蓝而又空洞，卷着猛烈的浪涛，正巧有一堆枯萎的树叶从上面漂过，水的深处看上去仿佛是一处挪威的狭湾。强烈的阵风像是一颗炸弹拍在树上，而一棵常绿灌木反射的光芒，仿佛上面挤满了密密麻麻的蚂蚁。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断地感受到，美在包围着我，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很想去给别人一个拥抱。

最后一天里，我终于下定决心，登上山顶，因为此前我都是在下面兜圈子。出发点是在沃夫恩盖，那是位于山脊北部向斜褶皱的山谷

里的一处村庄。那位与村庄同名的哲学家[41]曾在此有过评论：“是激情先教会了人类理智。”

通向山脊的路上有一座废弃的小教堂，路很长，但走得并不辛苦。（为了防止口渴，我特意带了苹果。）迎着强风，我坐在山上的一处岩石缺口里，在下面的时候，我曾经把这里看作是“最理想的通行口”。我眺望着南面的大海，北面是旺图山（Mont Ventoux）那灰色的山梁，而在东北方，很远的地方，那是阿尔卑斯山的峰顶线：“真的很白”（某人曾经这样形容白色的风信子）。曾经的**修道士花园**为了防风被深深地嵌在了岩石里，仿佛一个灰岩坑；其上的高空中有燕子翅膀扇动的声音（在回来的路上，这声音不时地与摇晃的蜘蛛网一起重现）。沿着山脊再往上，有一个很小的石头垒成的简陋兵站，几乎无法与周围的岩石相区别，有两名士兵弯着腰进进出出。他们在站岗，还有一个无线电通话器，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传得很远。

不过，让这山的高度变得很不真实的并不仅仅只是这处军事设施，或许是那近在眼前的暗灰色的石灰岩。这里没有所谓的登顶体验——我想起了一位著名的登山家，他登上了世界的最高点，为了表达这种极度兴奋的心情，他在书中引用了另外一个人（并非登山家）的感受，那是该人在海拔不足一百米的、几乎完全平坦的市郊街道上漫步时写下的句子。所以，我很快就从西面下山，期待着下面的高地、山谷和普罗旺斯的街道。塞尚曾称赞这些街道是古罗马人的街道：“这些古罗马人的道路铺设得至今依然令人惊奇。它们曾对地形风貌深具意义。路上的每一个点都有一处图景。”（这也是为什么我宁愿在有车行驶的道路上行走，而不和别人在所谓的徒步旅行者之路上相互推挤的一个原因。）

当我之后从第一处高地那里向山的方向回首时，山的侧面再次闪烁着光芒，华丽而又隆重（某个发光的地点简直就像是一个大理石纹路）；回头再看第二眼的时候，在下面一片五针松林那里，山的光亮透过树尖，好像一件挂在那里的洁白婚纱。继续前行，我把一个苹果扔向天空，它在空中转动，将我脚下的小径同森林与山崖连接了起来。

从那条路那里，我要推导出写一部《圣维克多山启示录》的权利。

在那位伟大画家的王国里，我已日渐隐形——不论是对我自己，还是对其他人而言，均是如此。这个陌生的社会协助完成这一过程，它非常友好地忽视了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甚至似乎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自行决定，是否成为一名“隐形者”。我并不是消失在或者融入到风光地貌中，而是很好地隐身在风光地貌中的物体（塞尚的物体）里。

难道很久以来不就应当如此吗？在童年时代不就已经出现了对我而言是隐身之物的东西（就像是后来埃斯塔克村这个地方）吗？塞尚和这个东西并无关联（但也许是另外一位画家）。通过一个神圣的传奇，此物变得对我异常重要（虽然在那个传奇里面，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被提及）。

这东西就是一个“柴火堆”。那个神圣的传奇是圣亚历克斯[42]住在楼梯底下的故事；而“另一位画家”则是来自末代沙皇时代的格鲁吉亚农民画家，生前一贫如洗，如今却举世闻名，他的名字是皮罗斯马尼[43]——这里的关联也许无法解释，但还是可以讲述的。

在我外公的房子里，有一个木质的狭窄楼梯，楼梯下面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楼梯间。对当时的我来说，圣亚历克斯就在那个“楼梯底下”的空间里，他从陌生的远方回来，默默无闻，处于隐身的伟大战栗之中（那是我自己的战栗）。然后，在村子的其他房子那里，在它们的外面，我也看到了相似的木板隔成的小空间，其中有许多木板隔间，里面用来存放工具，或者干脆就堆放着密密麻麻的柴火——在很久以后，我有过幻想，我那些先祖，关于他们我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就来自“格鲁吉亚”；正如我在新英格兰海岸的科德角上为我还在撰写的故事的主人公找到了居所一样，我希望，我能够在东方获得一些关于他的祖先的信息——而我故事的依据就是皮罗斯马尼的那些画作，它们讲述的同时也是画家自己的生活：这位格鲁吉亚画家曾经到处流浪，他当时主要是靠帮人制作乡间客栈的招牌来维持生计，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就是“悄无声息”地在一个木板隔间里度过的。在我的想象当中，那个木板隔间一定是在“楼梯底下”……——而（这也许是一个封闭的循环？）我的一个理想画面就是，作为一名作家，

用我所写的东西去做另一个人（这个人也可以总是我自己）脚下的厚木板路，或者干脆做一个明亮、均匀、堆放紧密的“柴火堆”。

“写作的权利”——这是每每开始一项工作所必需的东西——早在从圣维克多山下来的时候就已经预示过它的到来，因为当时的我成功地批判了自己（一般下山的时候，我总会陷入沉思，从而变得毫无幽默感可言）。一片透着微弱光芒的草地，马上让我想到了“伊甸园”，就连上面的鼹鼠丘也仿佛“置身在深蓝色的背景里”。站在草地前，我做好了演讲的准备：“面对美，不要总是想着天空光线的对比——而是要看看这土地。你要谈论这土地，或者只谈谈这块污迹也可以。请你给这污迹连同它的所有颜色命名吧。”

接着，觉悟的我缓缓走开，头几乎总是低垂着，尽量避免去追寻每一个远处。在暮霭中，我只是用余光朝一条岔路的深处望去——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我是否停下了脚步；也许我没有遭遇任何阻拦就继续前行；但我的心境却是宁静与欢欣的；我那写作的正当权利刚刚渗透了我的全身；我刚刚对文字与叙述充满信心。

为什么我要说：写作的**权利**？这就要提及某个不确定的爱的时刻。如果没有它，也就没有了写作。在那条岔路的深处，我看见了一棵桑树（实际上我只看到了在浅色的尘埃上的一抹略红的果汁斑点）。它与1971年夏天的那些桑葚果实的红色形成了清新且耀眼的统一。正是在那一年，我在南斯拉夫获得了一种理智的喜悦。还有一些东西暗了下来，是景色，还是我的眼睛？而同时，每一个细节都显现得既完满又清楚；对此保持沉默，让惯常的我变成了纯粹的无名者，而我，摇身一变，变得比单纯隐形的时候多了一些东西：**作家**。

没错：那个暮色中的岔路现在属于我了，它可以被命名了。通过尘埃上的桑葚斑点，幻想时刻（此时，对我而言，只有我是非常真实的，并且知晓一切真相。）不仅将无辜的自身生活碎片整合起来，同时也为我重新打开了与其他未知生活的联系。这幻想时刻就是那不确定的爱，它希望将这爱以一种能够唤起忠诚的形式（！）来加以传达；它就是合理的建议，那是为我那整个从未确定的隐形民族的团结而做出的建议；它就是我们共同的存在形式，即写作那令人放松和愉悦但又胆大包天的道德时刻。在这一时刻，我平静了下来，就像待在“一条船的理念上”。然而，那种惯常的痛苦，或者说折磨（当然，

这是绝望的反义词）马上又随之而来：“但是什么才是形式？那个无辜的人，也就是这里的我（我没有感觉很好，只是感觉无辜），到底该讲些什么？而谁才是这段讲述里的英雄？”（因为，不确定的读者们，到底是谁平时曾作为画的对象或是故事的英雄给过你们生活上的建议呢？）

一辆汽车停了下来，后座上是一条安静的小狗，车把我带进了城市，我带着一个热切的决定到达了那里；我要探寻那无质但却有形的语言，我希望用它来继续讲述那个交叉双臂的男人的故事，讲述他那迟迟未兑现的归来。不，这不是痛苦；这是工作。

万像之像

迄今为止，这里涉及的主要是一个画家和一个作家，关涉的是图像和文字。现在，终于是时候讲讲我为何感觉画家塞尚是一位人类的导师——请允许我大胆地使用这个词：现世的人类导师。

众所周知，施蒂弗特曾这样表达过艺术的永恒法则：“风声飒飒流水潺潺谷物生长海泛波澜大地回春天空明朗星光灿烂，这一切我都认为是伟大的。（……）我们想要窥见这引领人类的柔美法则。”值得注意的是，施蒂弗特的小说通常总会朝着灾难方向发展；不需要添加任何戏剧效果，仅仅是物体的静止状态就经常会成为一种威胁。首先是雪“悄无声息地”下着，形成了“美的银装”，孩子们走在“美的”冰川上，但当他们迷路时，这冰川却“透着瘆人的蓝光”。这时，“美的银装”也变成了“惨白的幽暗”。[44]而那座荒原村落上方的“耀眼天空”已经持续数周之久了，并最终使得那“柔软蔚蓝的空气”变成了“闪闪发亮的石头”。事物总是朝着恐怖神秘的方向转变，对于这种转变的解释是在作者笔下的人物那里找到的。但是，通过时间上刻意的叙述，那草地上静静的流水也许就会与危险的大坑相关联——没有人会彻底陷进去，所以，小说《石灰岩》[45]的第一个句子也完全可以用来指称其他所有彩色的石头：“我要在这里讲一个故事，那是一个朋友讲给我们的，里面虽没有任何奇特的内容，但是我却无法将它遗忘。”（作为画家的时候，施蒂弗特却从未在画里面描绘过灾难；最多用素描来反映一下大风造成的树木损害。）在巴黎的国家影像美术馆里有一幅塞尚的画，站在画的前面，我相信我懂得

了，对我们而言什么才是关键，这个“我们”指的不仅是他，一个画家，也不仅指的是现在的我，一个作家。

此画作于塞尚晚年，当时已是20世纪初，而且与以前的许多画一样，它的主题也是山崖与松树。画的标题里面清楚地交代了所画地点与方位：Rochers près des grottes au-dessus de Chàteau-Noir[46]。（那是位于托罗奈村上方的一座古老的地主庄园。）

很难说，我在这里理解到了什么。当时，我的主要感觉就是“贴近”。而现在，在我有了一种将我的经历将以传达的需要之后，在进行了长时间的“对于所见之物的思考”（或者说就是一场头脑风暴）之后，我想到了一个电影场景：在约翰·福特的电影《愤怒的葡萄》里面，亨利·方达[47]与自己的母亲共舞。

在那个场景里面，所有的人都在成双共舞，为的是抵御一个致命的威胁：他们是群因为受灾而到处流浪的人。当他们终于在一小块土地上找到自己的栖身之所时，他们要奋起反抗包围他们的敌人，保卫他们的土地。尽管跳舞本身完全是一个计策（母亲与儿子，他们到处旋转，向彼此、也向其他人投去狡猾警惕的目光），但这舞蹈却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它迸射的是一种真挚的团结。

危险、舞蹈、团结、真挚——这些也构成了我在塞尚画前所领悟到的“贴近感”：因为那松树与山崖在电光火石之间就已经高高地矗立在了我的内心最深处——仿佛一只翱翔的鸟，带着巨大的翅膀，穿过整个身体；它们不会像恐惧那样的情绪一样很快烟消云散，它们将长存。没错，这种贴近感也是一种认识：1904年，在画完成的那一年，有一件不可逆转的事情发生了，那是世界性的大事件；而这个历史性的大事就是这幅画本身。

曾经有人请求塞尚，要他描述一下他对“主题”的理解，塞尚“很缓慢地”将双手的手指叉开，相互靠拢，弯曲手指，然后相互交叉。当我读到这段内容时，我又记起了，在我欣赏那幅画的时候，我曾经把那些松树与山崖看成了纠缠交织的文字，令人难以名状。在塞尚的那封信中，我还了解到，他的绘画绝对不是“模仿自然”——更多地是“平行于自然的营造与和谐”。然后，通过亲自在画布上实践，我意识到：那些物体，即松树和山崖，它们已经在那个历史性的

时刻在那个纯粹的平面上（这意味着空间假想的结束），带着平面上那受地点与方位（“au-dessus de Chteau-Noir”[48]）约束的颜色与形式（！），不可逆转地交织重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象形文字。

物体——图像——文字融为一体：这正是那独一无二之处——尽管如此，它依然还没有表现出我全部的贴近感——同样属于这一贴近感觉的还有那棵孤零零的室内观赏植物。有一次，我在屋外透过一扇窗，把它看成了中国的汉字：塞尚的山崖与树木不仅仅只是这样的文字；它们不仅仅只是没有尘世痕迹的纯粹形式——通过画家之手所添加的戏剧性的**线条**（以及虚线），它们被额外地相互接合成了咒语——刚开始站在塞尚的画前面时，我的想法只有一个：“真近啊！”而现在，它们让我想起了原始的山洞岩画——那是**物体**；那是**图像**；那是文字；那是**线条**——所有的一切均和谐归一。

在几百年之后，所有的一切均将被夷为平地，我们的画家曾在寄自埃斯塔克的信中这样写道。然后他又补充道：“但是还有少数的东西将保留，它们仍将为我们的心与眼所珍爱。”然后在那些岩石与树木的绘画完成三年之后，他说：“情况很糟。如果有人还想看点什么东西的话，那他可要抓紧时间。一切都在消失。”

一切都消失了吗？在国家影像美术馆里，难道我无法感受到塞尚那伟大的、在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物体——图像——文字——线条——舞蹈吗？无法感受到它用雄浑的力量为我们打开的广阔天地吗？难道我没有把那些松树和山崖当作是万像之像来加以体验吗？难道在画前不总是那个“善的自我”得到振奋吗？就好像面对着周围的人们？也好像身处其他的地点？难道我不是已经把对面墙上的静物看成是得到悉心照料的“孩子”了吗？

国家影像美术馆是一家非常普通的博物馆——但是那面被可爱的东西所映照的墙却**是美的典范**（而且透过窗户还可以看到协和广场，对于塞尚而言，那是“唯一的广场”）。梨、桃子、苹果和洋葱、花瓶、碗碟与瓶子，通过轻微的挪动和平面的倾斜，它们就像是童话中的物件，马上就要活过来一样。但是，很显然，那是地震之前的一瞬：这些东西仿佛是世界上的最后一批。

瑞士一家博物馆的墙与之很相似。墙上挂着三幅大的排成一列的肖像画：画家本人、他的妻子，以及那个穿红马甲的男孩。这几个没有自己专有名字的人好像是在火车里透过三扇车窗向外张望。那是一列静止的火车，但是它又穿越所有的时代。里面的三个人已经坐了很长时间。旅程还远未到终点。只有那个孩子似乎累了，手支着头；两个大人正襟危坐，沉着镇静——现在，他们背后的墙与国家影像美术馆里的静物墙有了一个交集：那列载着三个人的苏黎世火车停靠在了巴黎的水果大街上。

这样说，塞尚的作品就是意义重大的消息吗？对我来说，它们是建议。（在路德维希·霍尔看来，梵高笔下的人物“还可以描述出来”；而塞尚的人物却“只能用笔画出来”。）它们建议我什么呢？它们能发挥建议的作用，这就是它们的秘密。

因为很显然：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消逝了。在一堆水果当中，有那个涂蜡的橙子的土黄色就已经够人受的了，我已经无法再去设想其他的东西。物体本身的颜色在哪里？哪一种现时的东西是**视角对象**呢？我越来越急切地找寻一种尚未被染指的天性。也许人们总会将“崇高”算作此列，但它同时又总是带给我那种面对着一个要将我吞噬的地平线的恐惧。于是，为了能够长久地存在，我特意埋身于那些日常的人造之物中间。我不正是在沥青那灰蓝的颜色里面看到了一个山毛榉树林的倒影的吗？而夜间航班的轰鸣声不也偶尔曾让一天重新开始吗？孩子毛衣上面的星形金属装饰难道不是一件久经考验的东西吗？而在阳光下面，那只终于将里面的报纸清空了的塑料袋迎风招展，它难道不像是浅色的百褶裙吗？是的，但是这些不是平常琐事。也许有人会抱怨说：日常琐事已经变得很邪恶。在这些人造之物的周围，只存在着暂时性的悲伤的美。这种美并不是任何的确可以重复再现的东西，所以它并不真实。（没错，在前往艾克斯之前，我就曾在马赛机场那红色的塑胶地板上面看到了圣维克多山泥灰岩一般的光亮。）所以，可能对那个有一双眼睛在家里期待着他的男人而言，这美并不真实。

我曾在这儿的村子里听到两位老人说：“如果他们什么都不信——那么他们到底为了什么来这儿的呢？”虽然他们说的不是我，但我还是感觉被包括在内。我不是早就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只有与信仰联系在一起，物体才能持久地保持真实？”那两位乡村

法官似乎很熟知的信仰的秘密到底是什么？我本来不可能用虔诚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童年的我比现在还要糟糕：但是难道很早以前不就已经有一个万像之像出现在我面前吗？

我将要描述此物，因为它属于这里。那个图像是一件东西，放在一个特定的器具里面，位于一个很大的空间里。那个空间就是教区的礼拜堂，那件东西就是和白色圣餐饼（即祝圣的圣体）在一起的圣餐杯，而供奉它的器具则是那个嵌在圣餐台上的、像转门一样开关的镀金的圣体龛——这所谓的“最神圣者”于我当时而言是“最真实者”。

这真实者也有它不断重现的时刻，即每当那通过化体[49]而变成圣体的圣餐饼连同它的圣餐杯一起被藏在圣体龛里的时候。圣体龛旋开；那件物体，即圣餐杯，被织物覆盖着，放置在了软龛的色彩斑斓中了；圣体龛再次闭合——现在就剩下那关闭的凹形穹顶的闪闪金光了。

而现在我对塞尚所谓的“实现”也是同样的看法（只不过我在其面前是笔直站立的，而不需要顶礼膜拜）：对于处在危险之中的物体进行转化和隐藏——不过不是通过某种宗教仪式，而是通过作为画家的秘密出现的信仰形式。

冰冷原野

巴黎的街道给我的印象总是出人意料地麻烦，即使我只是在其中短暂而行。与之相反，圣维克多山的山岳自那以后却一次也没有出现在我的幻想当中。不过，当我进行颜色和形式的类比时，这座山却几乎每天都会重现。不起眼的山路可以通往自由的顶峰与惊险的高地；而我也不需要专门地研究就会相信，我能够了解我周围的区域。

那座山对我的影响当然远远不止于一堂肤浅的自然课。

在巴黎有一座小山丘，但与蒙马特高地[50]不同，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它。它位于城市的西郊，那里已经属于郊区的苏黑尼地区了，它的名字叫瓦莱利安山。沿着塞纳河的西侧有一串连绵的小山丘，这座

山在其中并不引人注目，山上修建了一座用作防御工事的要塞。二战期间，德国占领军曾将此要塞当大规模处决人犯的地点。

以前我从未登过此山，但是在圣维克多山之后，我却迫切地要登上它。于是，在某个美妙的夏季周日，我在上面看到了一处石头公墓。在蓝天的掩映下，我把它想象成了明亮的史前大墓地；采摘着又硬又甜的覆盆子；眺望着山丘支脉上的小房子，彼处的犬吠声不时响起，还有零星的炊烟冉冉升起，这时我体验到的只有这个与恐惧和阴森绝缘的当下。然后我继续向东慢慢走下山去，穿过河上的桥，回到了巴黎市区，然后在布洛涅森林公园里面，我马上又登上了第二座并不明显的山丘，它叫菲西莱山。这座山丘同样曾与战争有关，有些树干上面还可以辨认出子弹的痕迹（与其他地方一样，那些树下是周末郊游的人们露营的地方）。虽然经常有人拿塞尚的作品与音乐作对比，但是类似的情况出现在我身上却仅有一次，而这也发生在那个下午：就在我为了达到将“这个当下”长久保藏的目的，而试图像对待“一把马林巴木琴”[51]一样让它振动起来的时候。

傍晚的时候，我站在市郊的一处公路桥上，望着下面的郊区高速公路犹如流动的金色。而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在想些什么：像歌德那样的人一定会很羡慕我，因为我生活在20世纪末。

环绕着圣维克多山的圆圈越扩越大，并非故意；情况就是如此。

我的继父来自德国。他的父母在一战前从西里西亚[52]迁到了柏林。我的生父也是德国人；他来自哈尔茨山[53]（我从未去过那里）。而我母亲这边的所有祖先都是斯洛文尼亚人。我的外祖父曾在1920年投票赞成将南奥地利地区并入新成立的南斯拉夫，所以曾有德语族群的人威胁要打死他。（我的外祖母居中调停。调停的地点：“田埂”，斯洛文尼亚语叫“ozara”。）后来他对所有的公共事件几乎都保持沉默——我的母亲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曾参加过一个斯洛文尼亚的业余剧社。她后来总是对自己能说这种语言感到自豪。而且她的斯洛文尼亚语也在战后在俄国人占领的柏林帮了我们不少忙。当然，她

从来不感觉自己是斯洛文尼亚人。有人说，这个民族完全缺乏民族的自我意识，因为与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不同，斯洛文尼亚人从来不需要在战争中保卫自己的国家。所以，甚至连合唱的时候也经常是令人遗憾地沉浸在各自的世界中。——据说我最初的语言也是斯洛文尼亚语。当地的理发师后来跟我讲了很多遍，说我第一次去理发的时候一个德语单词都听不懂，和理发师对话用的是纯粹的斯洛文尼亚语。我已经记不得了，这门语言也被我差不多彻底遗忘了。（可能我总是幻想自己来自别的什么地方。）在奥地利乡下念书的时候，我偶尔会很思念德国。在我看来，那里充满了大城市的气氛——例如战后的柏林。当我得知第三帝国的事情的时候，我认识到，再没有比它更邪恶的东西了，而且只要我力所能及，我都会按照这个认识行事。但同时我又总会觉得，我孩提时代所经历的那个德国是与之无关的。

后来，我在联邦德国的不同地方生活了大约十年，那是一个看起来比我出生的国家更辽阔更明亮的国度。在奥地利——这是一种经验——几乎没有人会说我的语言，而在德国，我有时甚至可以满怀激情地插别人的话（每当我想要透露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直至今日，我依然有在那里生活的设想；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地方能像那里一样有那么多每天都需要写些东西出来的“不懈努力者”；世界上也再没有哪个地方能像那里一样有那么多分散的、隐秘的读者。

但是，直到来了巴黎之后，我才体验到了群体的精神，我消失在了喧嚣之中。而从法国再去观察德国，我却发现了一个越来越丑恶的僵化的联邦德国。即使那些将“温情”、“团结”和“鼓励”挂在嘴边的人，做起事来也像是暴徒，而每个个体都变得多愁善感。（“固执、感伤与旅行”，是一个德国朋友的座右铭。）那些路人，无论多大年龄，看上去都是暮气沉沉；眼睛里没有色彩。就连小孩子也似乎不是逐步成长的，而是突然间就长高了。荒凉的街道上，五颜六色的大楼似乎分解成了各自行驶的彩色汽车，而车里的人们也似乎被座位上的头靠所替代。那里典型的声响就是停车计时器那丁零当啷的声音以及香烟自动售卖机的喀喀声；与之相符的词汇则是“对排水口的忧虑”和“电视带来的烦恼”。商店的标牌上写的不是“面包”和“牛奶”，而是鱼鲁亥豕与僭越乱悖。几乎所有的东西，在报纸与书籍中也是如此，都有一个伪造的名字。星期天那些商店的旗帜在空洞中飘舞。而方言，那曾经是“灵魂的口音”，如今也只能算是毫无灵魂可

言的笨拙，就像是在说外语，它在内心深处已经与人们背道而驰（在奥地利也是如此）。可能还存在与“其他方向”相连接的信箱——但是，却再也没有一种对于地理方位的感觉：就连大自然也好像变得失效了；树梢和上面的云都只会完成猛然抖动的动作——就在那些公共汽车般的高楼上的霓虹灯以你为目标的时候，就在住宅门后有拴狗的链子发出铿锵之声的时候，就在打开的窗子旁有人向远处的车祸一味张望的时候，就在大楼的对讲装置里有一个声音朝着孤寂的街道方向喊“是谁呀”的时候，就在报头上写着有人工草坪可以提供的时候，以及就在好像悲伤的美一样的东西偶尔在公共厕所周围飘浮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懂得了暴力。德国这片世界总是以“合理的形式”进行运作，就连死和永恒都会被它贴上方便识别的标签。它同时又是一个彻底无言无语且无声无调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并无公理可言。也许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但是这里却给了我赤裸裸的伤害，我真的想要随便找个人把他干掉。我对这个国家心怀仇恨，这仇恨非常强烈，就像当年我对继父的感情一样。在我的想象当中，这个男人经常遭受刀斧的菹戮。而在政治家那里（正如在所有的政治家一般的“艺术家”那里）我也只是看到了一些拙劣的演员——没有任何能够从不偏不倚的角度出发的态度和意见——而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缺乏赎罪精神”。

在那段时间里，我甚至对德国的地形地貌也非常反感：那些山谷、河流与山脉。没错，这种反感一直渗透到地层深处。所以，当时我对那个交叉双臂的男人的故事的设想就是，作为地质研究者，他要在题为《论空间》的论文中对联邦德国一种所谓的**冰冷原野**旁的地貌进行客观描写。在史前时代，那里曾有两条河流为了分水岭而“争斗”。其中一条河，因为落差更大，河道向后偏移，与原来分水岭另一侧的第二条河接在了一起，并且“强行夺走了”（术语就是如此）第二条河的水。按照人们的说法，第二条河的河谷被第一条河用“宝剑”“砍掉了脑袋”，变得荒芜了。河谷位于两河接合部下游的部分于是变成了“贫水河”，所以，今天的河谷看起来非常的宽阔，因此也被叫做**冰冷原野**。

不过，在踏上欧洲的土地之前，那位地质学家又重新变回了我自己，而我在回奥地利之前的那段间歇期里又重新住在了柏林。我重新阅读了《许佩里翁》[54]，终于看懂了每一个句子，而且可以像观赏图

画一样欣赏那些语句——我也经常在达勒姆[55]博物馆那些古老画作前驻足。有一次，我从地铁里出来，走到了达勒姆村地铁站前的那个圆形小广场上，看着广场周围那些结构复杂的路灯，让我想起了巴黎的协和广场，我的内心觉察到了一个“民族”的美，甚至还感受到了一些近乎于渴望的东西。也正是在德国，“王国”这个词向我展现出了新的意义。这时，我一直还绕着大弯奔波在那个博尔恩[56]曾经描写过的北方“平原上”，在那些曲折的沙路与幽暗的水洼再次让我想起17世纪荷兰的风景画。这一新的涵义来自于一个区分：那些风景，即使里面只有一棵枯萎的树或者一头孤零零的奶牛，它仍然能展现出一个“王国”的光彩——而在这里，我不过是在一个毫无光芒可言的“小县城”出没而已。

直到那时我才留意到，原来柏林位于一个宽阔的冰蚀谷内（可能我从前对此根本不感兴趣）。那些房子看起来依然好像很偶然地被散乱地安放在一个荒草平原上。在此期间我发现，远处的一些街道属于城市里面少有的几处地点，那里曾被史前正在融化的冰川水侵蚀成了一个明显的山坡。圣马太乌斯公墓就坐落在那里，而那圆形的山坡顶正好比周围的地区高出一座房子的高度，那里也应该是其所在的舍内贝格区的最高海拔。（那些因战争而形成的人造废墟山不算。）有天下午，我前往那里。天气很闷热，远处还传来阵阵雷声。街道上第一个微小的斜坡就已经让我陷入了焦急的期待中。不过，直到走进公墓，我才看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山坡。山坡上也盖有房子。在山坡的顶上，整个地形伸展为一个平面，因为一个小的斜面的缘故，那里变成了一处梯地。我在那里坐了下来（我身旁的墓碑上刻着格林兄弟的名字），然后望着下面的一处大洼地，整座城市看起来在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伸展。远处，在谷底那里，甚至让人有了一种河的感觉。雷雨的第一批暖暖的雨点拍在额头，而我现在完全有理由用老小说里经常出现的一个句子来形容当时坐在那里的我：“那一刻，没有人比他更幸福。”回去的路上，我在那条更为倾斜的郎根沙伊特大街上感受着那些史前冰川水的冲刷：那是一种柔和清澈的感觉。夜晚，铅笔的石墨尖熠熠发光，而位于一处谷底里的“西方百货大楼”前的旗帜又飘扬了好几天。

最后，我前往哈韦尔山，海拔几乎不到一百米，它应该是西柏林最高的山了。在上山的时候，我看到草地中央的空地上有几个巨大的灰色袋子，有一些睡眼惺忪的士兵从里面出来。我兜了个圈子，然后

到达了我所认为的山顶，因为实际上哈韦尔山山脊的高度非常平均。我躺在一棵大松树的下面，再一次呼吸到了当下的风。晨曦中，我从一处高台上眺望，高台下面有野猪在奔跑。我朝东柏林方向望去，那是我们战后曾经住过的地方。

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很偶然的事情，我去看望了我的父亲。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所以当他接电话的时候，我很吃惊。他住在北德一座小城里。我们到目前为止只见过几次面，与前几次一样，我们详细地进行了约定，但还是像往常一样相互错过了，然后又花了整个晚上的时间来寻找原因。他在太太死后就一个人生活着；连条狗都没有。他还有个孀居的女友，他们只在周末碰面；而平时他们会在晚上让对方的电话响那么一小会儿，以表示他们还活着。（但是，根据相应的惯例，这里就不将姓名与住址加以公布了。）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对死亡的恐惧，并且感受到了一种迟来的责任。我感觉他像是朋友的小孩。那种半真半假的刨根问底已经偏离了提问的精神，而我可以要求长时间地保持沉默（我只能这样打算）。他负责回答，他自己也喜欢这样做。他偶然提到，每当他早上照镜子时，他真想“痛扁那张臭脸”。这时，我才第一次看到了一个英雄的迷失、痛苦与倔强。深夜，他送我去火车站，车站一棵树上的招贴画熊熊燃烧起来，让周围悠闲的出租车司机陷入了火海。

在那之后，我领略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德国：不是联邦德国和那些联邦州，也不是那个恐怖的帝国，更不是那些小联邦州的桁架建筑。它是土黄色的，沐浴着风雨；它坐落在一座山丘上；它是那些窗子；它具有城市气息，但又杳无人烟，而且盛大欢快；我透过火车的窗子看到了它；它是河对岸的那些房子；赫尔曼·伦茨说，它就在“屋外”；它沉默且幽默，这叫做**中庸感**；它是“平静中有规律的沉默生活”；它是“美的中心”与“呼与吸的转折”[57]；它是一个谜；它能够重现，所以是真实的。看到它的人，就会像神探科伦布[58]在解决案件时一样机智。但是他也知道，从来就不可能存在一个彻底的放松。

陀螺之丘

我已经确定要传达一些有关塞尚的那座山峰的事情。但是什么才是我那对象的法则，即它那自然且必需的形式呢？（因为很自然，我力图通过写作去影响一些事情。）

我写的东西不会是那种完全停留在专业领域内寻找证据与关联的科学论文——我的理想一直以来都是，像小说那样将重点以温和的方式加以体现，同时其叙述的顺序应该能给人以慰藉。

是的，我力图要讲述（并且饶有兴味地研究了那些论文）。因为无论是在阅 读还是写作之时，我都经常将讲述的真相理解为一种明亮的状态。在那里面，一个句子很平静地传递出另一个句子，而真实的东西，即之前所得到的认识——只能在句与句的过渡间作为某种温柔的东西被觉察到。另外，我深知：理智会健忘；但想象绝对不会。

有一段时间，我心里一直有这样的目标，要去描述那些单独的事件，例如那山和我，那些图像和我，并且将它们以毫无关联的断片的形式并置在一起。但是然后，我又感觉，在这里断片式的随想是庸俗的东西，因为它并不是一种努力的结果（这种努力会渴望同一，并且也许会就此失败），而仅仅主要是一种可靠的方法。

不久，我在格里尔帕策的《穷乐师》[59]当中读到：“我的身体因为对于关联的渴望而不停颤抖。”于是，我又重新提起了对万物同一（das Eine in Allem）的兴趣。我深知：它们之间的关联是可能的。我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总是与另外的瞬间联合行动——不需要任何辅助的环节。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我只需要加之以自由的想象。与此同时，那种熟悉的束缚感也随之而来：因为我也知道，类比的相似性不可以轻易地显现；它们与头脑中日常的混乱状态相反，它们乃幻想经历热烈的震撼后结出的金色果实，它们是**真实的类比**。然后，按照某位诗人的说法，它们将成为“作品的额头，光耀四方”。这是一种能把小说紧紧束缚的类比，对它的信任难道不是一直都是一种狂妄的表现吗？

下一个问题则是情节的时间。很长时间以来，我就有这样的感觉，似乎时至今日再也没有任何适合于小说的地点了。早在写那个交叉双臂的男人的故事时，我就不得不将故事的开头撤回到遥远的荒野中，而随后的故事仅仅在遭遇诸如“飞机”或“电视机”之类的东西

时就几乎要失败了。于是，我考虑将情节安排在19与20世纪之交，故事的主人公将是年轻的画家与作家莫里斯·德尼[60]。而在现实中，德尼的确很崇拜塞尚，并且曾专程去拜访过隐居乡间的塞尚。而我也感受到了当时的气氛，仅仅通过塞尚工作室里那件肥大的黑色上衣，它与外公的那件几乎完全一样。

但是，主人公应该说德语，这难道不是我的真相的一部分吗？所以，我又开始了关于生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位成长中的奥地利画家的想象。他在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不久动身去了普罗旺斯。我早已对这样的人物有过深刻的印象：那是我母亲的一位后来在东方阵亡的兄弟，他一只眼睛已经瞎了，而他从战场上寄回来的信件总是字迹非常清楚，我小的时候总是喜欢一读再读。长大以后我也经常梦到他，所以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愿望，就是再变成他，然后重新体验圣像柱旁那蓝色的背景。

最后我也希望，主人公可以是“我”（我把索尔格，那个地质学家，变成了我自己，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会在许多风景中继续发挥作用）。根据圣维克多山的启示，我不应该“虚构”，而应该去“实现”（具体来讲，虚构也一直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而我个人的信心就来自于对歌德所谓的“善的自我”的信心，那将是小说内在的光线，它是明亮与崇高的，只有它才能在阅读的时候传递信任的精神。再没有其他的东西值得一读了。

然后，我决定，再去一次普罗旺斯。在那里，我将期待我的最后一个启示。不过，我不想再一个人去那里了。我的心里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需求，要找一个对我负责的人：不是那种什么都知道的人，而是一个自己也在踉跄而行的人，就像是某些小孩，人们可以向他们提出那些很重大的问题。

于是，我与D约好了在艾克斯市见面—D来自德国施瓦本地区的一个小城，目前在巴黎当裁缝。她是中学毕业之后就来到巴黎的。在市中心，她租了两间房子，然后很快就通过制衣工作赚到了钱——虽然一开始在一些商店那里有过屈辱的经历。与许多人一样，“去看牙医”的时候，她还是每次都会吓得缩回到自己童年时的情形。她的父母同样属于“隐身者一族”，而她从一开始就熟悉那些图景，不仅仅是作为装饰品。

她自己的图景就是那些衣服，每一件都有其特别的创意。那两间租来的房子同时也是一个大的工作室，里面挂满了彩色的料子。她比所有我认识的人都更在乎自己的工作。她的自豪感也由此而来，也只有艺术家才会这样。而对待每一个打扰她工作的人，她都非常粗鲁。

她说，有一次，她曾经试图制作一件“大衣之王”。她也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但是最后她失败了，失败在“连接的问题”上。作为作家我对此也深有体会。（在此过程中，她失去了她的“自大狂”症状。）而那件“大衣之王”的未尽部分依然很美，所以据说在地铁里面，她受到过别人崇敬的凝视。

D也是那个总是在巴黎为我传达消息的人：例如“通过自我控制来战胜敌人”，或者“一个人通过敏感而获得对别人的控制权”。看了希区柯克电影《历劫佳人》（*Under the Capricorn*）之后，她就讲起了里面演员约瑟夫·考登“脸上那平静”的嘴唇。而在看过了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之后，她在剪指甲时总会在下面铺一张报纸，因为在那位日本大师的电影里一再出现的主演就是这么做的。

D的身上没有任何女性或是母性的东西。她是小孩——男性——少女。而如果别人允许她说出她知道的事情的话，她就会让你想起那个比任何主人都聪明的奴隶。有一次我在伦勃朗的画《雅各与天使角力》上看到了她，她就是那个天使，虽然圣经创世记提到她的时候只是说“有一个人”。有许多人，如果你与他们熟悉之后，就会发现那不过是一个毫无自我可言的空洞，疯狂且邪恶。但是D却总是令人难以捉摸——而且无法忍受陌生人的触碰。而在我问她为什么需要她的男朋友时，她的回答是：“光说话是很难安慰我的。”

她的眼睛是明亮的，眼周布满圆圈。有一次我生病了，她来了之后就很冷酷地盯着我，直到我把她轰走。而平时她也会让人想起一只羽毛蓬乱的走地禽：她不做手势，脸上几乎很少有什么表情，要么十分安静，要么就会活动身体（非常的笨拙）。这种时候，她总是很机警；从没有陷入沉思的时候。如果她在你身边，那她只是参与你的思考，而在她参与思考时，她就是伏尔泰那个所谓的“好伙伴”：“他蔑视科学家，只想在好圈子里生活。”

同时，D很少露面；她很害羞，很容易难为情。她的才华在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才能发挥到最佳，例如在工作中，或者当夜晚在巴黎的街道上闲逛，偶尔有一只手落在她的头上的时候（据说，她的父母也曾经这样“爱过”她的头）。

一般来讲，她是一个沉默的人（不过最近会讲很多东西，她还会在感动或激动时发出些莫名其妙的声音），而且——很少有女人会如此吧？——擅长走路。我们经常在巴黎与凡尔赛之间的阔叶林里穿行，那里处处耸立着枝干宽阔的深色雪松。

时光差不多已是冬天了。此前我刚见证了一个朋友的死去，重新对自己的生存感到了欣慰。那位朋友一直自视为“第一个经历痛苦的人”，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抗拒死亡。而我则对每一件事物都充满了感激之情，我决定：“要为健康的每一天感到快乐，并尽量不让它虚度。”

有一次在机场的时候，人群站立于庄严的暮色之中；阴影覆盖的脸颊上面没有了惯常的恐怖。当有一个我很熟悉的人被广播叫到名字时，我突然感觉，似乎我从前遇到这些人的时候，他们都只是国际机场扬声器里的名字而已。

快要在马赛降落的时候，圣维克多山的山体在北方的地平线上一闪而过，像是一头鲸鱼。米拉波大街两侧的梧桐树已经落光了叶子，而整条林荫大道看上去像是一排灰白色的骨架。而艾克斯夏季那条繁华的街道如今却显得潮湿、灰暗而且荒凉，简直与巴黎的街道一模一样。和那些古老的书籍上写的一样，我们两人得到了“两个舒适的房间”。我望着D那双明亮且看不透的双眼。她也已经穿好了合适的鞋，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向东进发了。

在我对于关联性的渴望里面，还有一条很特殊的痕迹很值得一提，虽然我并不知道，这条痕迹到底有何指向，抑或它到底能否有所延续。在我欣赏塞尚有关那座山的绘画的所有时日里，我总会遭遇到它，最终它成为了一个我摆脱不掉的思想。

从西面望去，圣维克多山的山岳呈现三角帽形状，上面布满了岩层和褶皱，简直就是一个地质的横断面。我曾经在一本书里读到过，塞尚青年时代的一位名叫马里昂的朋友后来成了一名地质学家，他经

常陪画家去野外写生。当我在研究有关这座山的相关地图与描述时，我的想象力不由自主地，并且不可思议地总是不停歇地萦绕着同一个点：那是两个不同质的岩层之间的一个断裂口。它恰好位于那条平缓上升的山脊小路上，该小路从西面一直向上延伸至真正的山顶。这个断裂口也可以说是一个“点”，因为在两处岩层形成的拱形隆起的最外端那里，山脊线正好从中间穿过。在野外用肉眼是不可能看到的，但是这个点却在画家的图画上作为或大或小的阴影条纹一再地出现。甚至在铅笔素描上，海湾也会被画上阴影线，或者至少具有一个柔和的轮廓。

正是这个断裂口——相关工作即将开始——打动了我，让我去重复这次普罗旺斯之旅。我希望从它那里得到解决问题的钥匙；虽然理智总是试图说服我：但是我知道，幻想说的是对的。然后到了艾克斯市，我满心期待的当然只有接下来的道路。

我们乘坐的公共汽车一直开到了一处高架渠，然后从那里我们步行沿着比贝米路向上来到了一处名叫“水手高地”的荒原高地。人站在上面第一眼望去，圣维克多山就像是从长满荆棘的杜鹃花丛后面突然冒起的一块漂砾石。这里也是塞尚之路比较幽静的一段，而且它不需要穿过村庄，而只是通到山脊上面，所以很快，路上既没有沥青也没有汽车了。

在城里的时候，一场晨雨还遮蔽着天空。等到来到高地上时，蓝色在广阔的天空上迅速绽放。我们走进了一片稀疏的五针松林，那向四面八方反射的针叶临摹的其实是那射破树林的阳光。过了一会儿，我小心翼翼地问D，问她到底是如何在制作“大衣之王”的时候失去她的“自大狂”症状的。她答道：“我最近已经重新找回感觉了。”

上山的路上还有一片橡树林，叶子早已落尽。如今只有四季常青的松树挺立在温暖的空气中，而远处地平线上则是一年四季都在闪耀着光芒的圣维克多山。粗大的树枝相互摩挲，并用嘎吱嘎吱的声音代替了夏天的鸣蝉。而黑白相间的喜鹊也出现在了一条岔路的尽头，动作活像一架纸飞机。高地上越来越静，以至于从下面各个平原上传来的细小的声响都听起来像是连续不断的钟声。目光在五针松球果打开

的塔褶间穿过，一直瞄向那幽深的内在。但同时，这目光又聚焦在高空中流卷的云层里透过来的蓝色缝隙，牵挂着鸟鸣的念头变成了这鸣叫本身。

我们遇到了跑步者、猎人和士兵，他们似乎都是更有存在道理的一方。外国军营里的那条狗不见了。或许它已经化为了山隘间的一团黏土。山路不停地起起伏伏，蜿蜒迂回：这个高地并不是一个“水平延展的一马平川”（许多人在看了塞尚的画之后经常会这样描述），而是布满了沟壑与塌陷。我怀着不小的野心，想要熟悉这片山水的一草一木。我总是喜欢抄近路，这也使得我们不止一次迷失了方向，不得不找寻正确的道路，然后发现我们像两个白痴一样站在了不同的山丘上。

我们原本并没有登顶的打算，但是最终，虽然我们并未专门对此做出决定，我们还是继续向上攀登，一直到了最上面。上面还是像夏天一样风很大，与当时相比既不冷也不热。然后在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托罗奈村，疲惫但又心满意足地坐在了叫做托梅，又名黄金之星（L’Etoile d’Or）的客栈里。能够说自己饿了，真是一种美好的感觉啊。

我的目光又望向了窗外那座我们刚刚登上过的山。山前是一片低矮连绵的丘陵，中间因为某一处洼地而截成两段。其中一段因为遭受过森林大火而显得十分荒凉。山坡上连一处灌木都没有，雨水在光秃的红色石灰岩上挖出了深深的沟纹。这些沟渠在非常平整的山坡上纵横交错，显得杂乱无章且漫无头绪。雨水冲刷去土层，形成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小塔楼与小型金字塔，最上面堆积着淡青色的粗大石块。这一整片的荒凉区域连同那些纵横交错的、毫无方向性可言的沟渠，在一定程度上让人想起了美国南达科他州那些开阔的荒地，有许多西部片就曾以它们为背景，当年在这些荒地上四处寻找道路的人们将它命名为“Badlands”[61]。丘陵的另一段则免于山火的荼毒，上面长满了松树，茂密的枝叶相互覆盖，就像是层层叠叠的大楼，一直长到了丘陵顶上。D坐在我与远处的景色之间，身上穿着那件由不同颜色的布料缝合而成的连衣裙。那同时也是一件大衣。

直到此刻，我的想象力曾经长期萦绕的那个点又重新浮现在了我的脑海。我朝山脊方向望去，想要找到那个断裂口。虽然用肉眼是看

不到的，但是我知道，它有一个标记，那就是一个位于山顶位置的电线杆。这个斑点甚至有它专门的名字：Pas de l’Escalette（即埃卡莱特隘口）。而它的下方，在一处较为平整的低洼地上有一个孤零零的小木屋，地图上称之为“Cabanne de Cézanne”（“塞尚小屋”）。

有某些东西放慢了速度。我观察那个点越久，我就对此越有信心——那是一个答案？一个认识？一个发现？一个结论？一个定局？渐渐地，那个远在山脊上的断裂口已经在我的内心扎根，发挥着**旋转中心**的作用。

首先，那是对于死亡的恐惧——就好像我正夹在那两个岩层之间被压得粉碎。然后与以往一样，我达到了一种**坦诚的状态**：正如曾经的**每一次呼吸**（也可以再次被忘怀）。山丘顶上的蓝天变得**暖融融**，而在荒凉的那一段山丘那里，红色泥灰岩沙石变得酷热。而旁边，在长满森林的那一段山丘那里，漫山遍野的五针松表现着最丰富多样的绿色，树干之间的阴影就像是山坡上一个由全世界各个民族组成的村子里的一排排各式各样的窗户。现在森林里的每一棵树木都清晰可辨，它们矗立在那里，却又不停旋转着，就像是**永恒的陀螺**。而矗立在那里的整座森林（以及整个世界村）也随之而旋转。这一切的后面就是圣维克多山那久经考验的轮廓，而在这一切的前面，则是D和她的那些颜色，她是能予人慰藉的人类形式（有那么一瞬间，我把她想象成了“乌鸫鸟”）。

没有人情不自禁或是张开双臂。但是内心的感觉非常丰富。所以有人慢慢地将双手靠拢，然后放纵双手，让它们交叉成一个拳头。我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勇敢行动！我还看到单词的王国在我面前展开——带着那**形式的伟大精神**；还有那安全的外壳；以及刀枪不入的中途时间；展开的持续时间则是“存在的不确定延续”，这也是那位哲人对于“期限”的定义。我再也不去想什么“读者”的问题；我只是满怀狂野的感激之情看着地面。那是黑白相间的小石块马赛克。在通向客栈二楼的木质楼梯上方飘着一个被系在栏杆上的蓝色气球。露天的一张桌子上有一个搪瓷罐子。在远处哲学家的高地上方，天空绽放出一种特别清新的蓝色，那是塞尚描绘那座山时经常使用的颜色。悬崖上有云影飘过，仿佛在不停地为它罩上帷幕。然后（其时已是十二月中旬，太阳很早就会落山），整座山终于都处在祥和的黄色光辉

中，仿佛一座玻璃山，而不像另一座山那样阻挡着回家的路。我的内心已经感受到了所有这些事物的内在结构，它变成了我的技能与知识。凯旋！我这样想道——仿佛一切都已经幸福完满地撰写好了。然后，我笑了。

D再次参与了思考，并且能够立即回答困扰我的关于连贯与过渡的问题。她甚至还携带着为那件“大衣之王”准备的各种布料的样本：金丝锦缎、丝绸和花缎。

“我要给你讲讲那件大衣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我将那个我一直在考虑的东西称为伟大的理念。而那件大衣应当将这一理念实际化。

“我先做了一个袖子。这时马上就出现问题了，我必须将我想要的固定的拱形形式强加在那种柔软的、无法固定的材料上。我决定，用厚厚的羊毛做那些料子的底衬。

“袖子做好了。在我眼中，它是那么珍贵、那么漂亮，以至于我不得不承认，我不会再有同样的气力去制作大衣的其他部分了。

“我思索着我的伟大理念；我思索着大自然中那些关于紧张与突然松弛的时刻；就如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

“每天我都会望着那件刚刚开始缝制的大衣，一望就是一两个钟头；我将那些已完成的部分与我的伟大理念相比较，并且考虑着后续的事情。

“大衣的上半部分已经完成了。但在下半部分那里，我失去了必要的关联性。我缝好的那些部分明显与上半部分缺乏联系。那些细细的、结实的布料被缝合在一起，非常沉重，这也给我的工作制造了不小的麻烦。每次在缝纫机旁时，我都不得不把那些布料举得老高，脑子里总是要不停地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让任何东西滑下来。

“我将业已完成的各个部分摆在我的面前，它们彼此之间都不搭配。我在等待着突然找到灵感的那一刻。

“在查看与不停尝试的同时，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很虚弱，已经无法胜任工作。于是我禁止自己再去想那个伟大的理念。

“在图片与建筑图纸上，我看到了中国式的斗拱结构，它们令我很激动。减轻重量负荷的问题可以通过正确合适的过渡方式来解决。我意识到，原来到处都存在着一个中间领域。

“后来有一天，我没有再多做考虑，径直将各个部分缝在一起，并且在某一点上为裙子设计了一个向内的拱形曲线结构。我为自己的自信而感到兴奋不已。

“我把大衣挂在墙上。每天我都会审视它，然后开始重视它。它比我其他所有的衣服都要好，而它并不完美。

“在制作一件女装的时候，每一种已经用过的形式都要保留在记忆中，以方便下一步的工作。不过我不需要将它们在脑海中再现出来，我必须马上亲眼见到那个最终的有所延续的颜色。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只会有一种颜色，而形式则决定了整体的颜色，同时它也必须要解决颜色之间如何过渡的问题。

“在我看来，过渡的部分必须既能够清楚地区分彼此，又能够做到彼此交融。”

大森林

在维也纳艺术历史博物馆里，挂着一幅雅各布·范·鲁伊斯达尔[62]的油画，题目叫《大森林》。上面画的是一片广袤的阔叶林和里面粗壮的橡树树干；还有画家一再使用的桦树身上那种引人注目的白色。而另一件画家惯常描绘的对象就是在画的前景部分出现的一汪幽暗反光的水。在这里，画家展现的是一处很浅的浅滩，水下的手推车的车辙痕迹清晰可辨。过了浅滩之后，那条黄沙铺就的手推车路掉头向左，一直延伸进了森林内部。这幅画的名字很有可能来自于画本身的尺寸。因为画上的森林并不大；森林的后面则是一片空旷的平地。人们在森林旁边和平地栖居：前面是一个漫游者，他戴着帽子，拿着拐杖，坐在路边，身旁放着行李；后面则是一男一女，两人正从路的转弯处走过来，他们穿着轻便的衣服，带着一把伞（天上是白里透灰

的云层）。不过，也许这幅画的确是某一个“大森林”的局部；也许画的立足点不是在外部，而是已经在森林内部了，而目光也正从身后森林的深处返回到原来的方向上，这在一个漫游者而言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那种辽远开阔的感觉则因为17世纪荷兰风景画的一个特点而得到加强：尽管那些画的尺寸很小，但是在观赏的时候，它们会连同里面那些宽阔的水面，沙丘小路以及落叶堆（在一片内容丰富的天空下）开始慢慢生长。你可以清楚地感觉到，那些高高耸立的树木在生长，伴随它们生长的还有一片安静的晨光。甚至那两个驻马不前的骑士：他们也在站立和生长。

在萨尔茨堡的附近也有这样一片森林：它既不是今天的那种城市森林，也不是什么万木之林；但是它真实得让人惊叹。森林的东侧有一个村庄名叫莫茨格，这片森林与村庄同名。通向那里的道路开始于修士山（Mönchsberg）与要塞山（Festungsberg）之间的一处类似于隘口的洼地，人们称之为“隘口门”（“Schartentor”）。它在萨尔茨堡内城与南面的平原之间构成了一个准岔路口。平原上村落绵延，一直延伸到温特斯山的山脚下。在隘口门拱那里就已经可以看到森林了：森林里长满了高大的树木，它们由东向西似乎贯穿了整个平原，直至海尔布隆区的那座有两个高耸主峰的山丘前。从城区的角度看过去，在走路不到一个小时的远处，就已经可以望见森林处在一种淡淡的蓝色中，仿佛有个类似河流的东西在中间流过（确实有萨尔察赫河向东流过）。我们的道路途经某处城市草坪，那上面，水泥铺就的小径纵横交错，脚步声此起彼伏，草坪的中央那座孤零零的房子是从前的“农田守卫者之屋”，到了晚上的时候，某扇窗子里面就会有极其微弱的光线透出来，同时还有一支无声的歌曲从里面飘扬出来。经过草坪后又穿过了一条迂回旁道，连续经过了三个有着新的停车标志的红绿灯后，就来到了一个很安静的区域（图莫格城区），在这片区域上再也看不到任何城市气息的东西，一路走来，再也没有什么橱窗来转移你的视线。路旁是一条向相反方向流去的小溪，那原本是某条运河的支流，有时那溪水会焕发出不断膨胀的光芒，让人想起某些不确定的东西。这里的树大多是桦树，质朴如画，就仿佛置身于东欧一样。低矮的树则是灯红色的柳树，在阳光的映衬下，就像是无数支烛台混杂在一起。

突然，这条经过平原延伸到这里的道路略微向上爬坡——以至于骑车的人不得不从鞍座上站起来蹬骑一小会儿——然后，道路又来到

了一个新的平地上继续向前伸展。这几米的落差就已经造就了一个高地。这里的草地不再是城市的草坪，而是一片空旷的田地，上面只有一家孤独的农舍。这时你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一阵从远处高高耸立的温特斯山吹来的下行风（假如在回来的路上，在海拔较低的地方一直都没有风的话，到了这里之后你就会感受到更为强烈与更为突然的暖气流）。在离山脚下的沼泽地不远的上空，经常有轻纱般的雾气升腾。而当这薄雾转成浓雾时，人们就会看到许多如鲜花般绽放的树冠。实际上，这前部的草地就有一部分是沼泽土：田鼠挖出的土丘是黑色的（里面夹杂着白色的小石子）；农舍的母鸡在这里嚓啦嚓啦地刨地，颈部浓毛经常被风吹得竖起。另外一条小的运河从路下方的水泥管道中横穿而过，路面上有一大块石灰岩，就像横在路上的一座桥梁，路从那块岩石上面穿过，一直通向下一个人类的聚集地。

那个聚集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那两株被风刮得已经倾斜的巨大松树，位置就在入口——不过不是在路边，而是在沥青马路的正中间，就像是孤岛上的植物，它们算是街尾那排经常处于强烈的阳光反射中的松树的前奏。透过许多房子的窗户，你就已经可以看到后方一片空旷的土地了：这个地方唯一一个具有城市气息的地方就是它的名字里有“胡同”这两个字。但是，这个地方也没有任何乡村气息。两排房屋似乎要一直延伸进那片荒地。房子都很低矮，颜色各异，主要都是木结构建筑，几乎所有的房子上都爬满了浮雕一样的葡萄藤。这个“陶克斯胡同”又长又直，房子的花园里有黑色的苔原土，而在每家每户都经常会听到不同语言的声音，这一切都让人想起了某一条“北方的先锋大街”。不过，在那条先锋大街上，经常会看到被拴在木桩上的狗在哀鸣与嘶号。而在这里，却只有许多猫静悄悄地在两排房屋间穿行。

胡同的尽头就是那排松树，它们形成了某个公墓的入口。公墓前面的饭馆里偶尔会有醉汉被推了出来，他们还会在门口顽固地唱着歌，然后突然停止，踉跄而去。公墓很大，有好几条平行的道路都从墓地穿过，然后一直通向南方。公墓里最突出的就是某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的雕像，但是——这在油画上是从未出现过的——先看到的却是它的侧面。每一条路都是一条长长的林荫大道，在远处出口的拱门那里，那是莫茨格森林的前沿在闪烁着绿色的光芒。有的时候，这里也会有缓缓行进的送葬队伍，在钟声的不断敲击中，走在棺材后面的陌生人也会在某个瞬间变成了亲属。

莫茨格森林的前沿是路上遇到的第三块草地：它既不是城市草坪，也不是农业用地，而是一片空旷的草地，上面几乎没有一棵树，它不由让人想起了一个刚刚变成陆地的湖泊；风很大，在经历了公墓里柔和的空气之后，这里的风经常伴随着冬天的寒冷。草地的一部分被用作运动场，一个偶尔经过的路人有时会被叫住去充当裁判；孩子在这里比在其他地方都更不认生，大人经常会被他们卷入有关天气的对话中，这类对话的开头通常都是："今天很冷，是吧？"在某个地点，可以看到一排长长的牧马场的木栅栏，在有雾的天气里，放眼望去，目光就好像从日本式的移门中间穿过一样。一座从前的农舍孤零零地伫立在那里，里面的一切都保持原样，很多东西甚至还可以像从前那样使用，例如水井，水槽，和石质长椅，还有一个巨大的圆锥形柴火堆——但是，它却再也无法证明一处庭院的存在了。直到此处，我才又看到了森林：近乎棕色（在暮色中呈蓝墨色），差不多占据了整个地平线；但同时它又是狭长的：至少在某一个地方，人们甚至可以看到森林对面的光线。森林的右边，高耸入云的那是温特斯山尖那金字塔般的石灰岩躯体。森林的左边，远远地可以望见一处礁石山，山上布满了规则的沟槽，在阳光的映照下，就像一只巨大的扇贝。脚下的路正巧通向森林；这片草地实际上已经属于森林的范畴，算是森林中的巨大空地。

森林开始的标志（除了那些猎人用的高台之外）就是那些欧洲榛子树，还有树上那些即使最细小的风也会使之轻轻摆动的柔荑花序。花序在空中舞动出平行紧密的轻柔线条，仿佛雨落在图表上。而整座森林则是幽暗的云杉林，内部紧密有序，每个单独的部分——从而也包括整体——都将开始转动起来。

踏入森林这个动作就发生在那条宽阔笔直的路上，人仿佛从一个真正的大门下穿过。一种无欲而致远的宁静给人一种跨越门槛的感觉。到了森林里面你会发现，从外面看来，森林像是处在一个平原上，但它实际上内部却掩藏着一个向东延伸的小山丘的山脊（只有在下过雪后，人们才能从森林前沿的草地那边看出这是一个山丘，因为那时的山坡会被照得通彻透亮）。萨尔茨堡的居民都很熟悉森林后面那座海尔布隆山丘。山脚下有公园和城堡，是一处郊游胜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前面还有一个莫茨格森林，而更鲜为人知的是，这座森林有一部分坐落在一个山脊之上。里面只有专用通道和一些不平整的小路在林间穿过，所以很少有人在这里散步；最多只有某个跑步者的

喘息声，跑步者的脸孔犹如一个双重面具，每跑一步，就会发生从死寂到鲜活的飞跃。在一处大弹坑里面有一个木头隔板，木板上有一个人脸大小的洞，仿佛被啮齿类动物咬过的一样，它让人想起了另一张面具：乍一看，只是一个木头隔板，从近处观察原来是一个标靶；而它前面那个远看像是长椅的东西原来是靶台。从山的形成历史来说，这座山丘与海尔布隆那座开发已久的山崖是相近的：它们都是在某个间冰期由大量的鹅卵石构造而成，当时融化的冰川水将鹅卵石沉积在一个与加尔达湖[63]一般大小的湖里，然后富含石灰质的湖水又逐渐将它们浇铸成今天的样子。当然，这座森林里的山丘要比海尔布隆那座（大概有四层楼那么高）低矮很多，而且它的长度大致只相当于一个中等长度的街道。在地形图上面，它就好像构筑在萨尔茨堡城市南面的防御工事，坡度一开始非常平缓，但是过了山顶（那里甚至有很多小型的悬崖）之后就会突然变得陡峭起来。

从路这边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西面的山脚。在一片云杉树丛里，它就像一个彩色的杂质，因为那里是一块明亮的区域，像是一个公园，里面有许多金合欢树、桤木和欧洲鹅耳枥。树木间到处都有通向山顶的道路。那里唯一的针叶树种则是落叶松，下面生长着一种密集而且柔软的草。紧挨着这一小片阔叶林的是一棵欧洲山毛榉，仿佛那棵“初始之树”；在它那些如峭壁般倾斜的树根里，嵌着一块古老的界石，为树的结疤所包围，几乎为蔓草所淹没。就在它后面，紧靠界石的基座，是一个水坑，就隐藏在一层落叶之下——乍一看仿佛是一摊偶然形成的雨水；水坑里面是清澈的水，水泛着几乎难以令人觉察的涟漪，自深处的地层里涌出，流动在灰黑的树叶间，水是可以喝的（算得上紧急情况下的秘密储备）。在前往这里的路上，就有一些很值得注意的东西，就是草下面那些圆滚滚的石子，很规整，石子间排列得也很紧密，就像是人工铺成的石头路面。石子五颜六色，而地衣青苔将每个石子的表面都腐蚀成了一个清楚的象形文字，每个石子都迥然相异，仿佛传承自世界各个不同的地域。一处钟形的红色石头小规模地再现了世界上最大的整体岩石，澳大利亚的艾尔斯红色巨石（Ayers Rock）；而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则记载着一部印第安人的狩猎小说。在暮色中，当对面的森林消失不见时，这些石头看上去就好像密码，发散出仿佛罗马人修建的栈道一般的光芒，朦胧中透出白色，一直通向森林内部。

在通向山顶的途中，那些类似人工路面的石子逐渐消失不见了，而罗马人修建的栈道也变成了布满手推车痕迹的山隘狭路。玩耍的孩子在这里弄了很多黏土球（已经变干了），在呼出的水汽作用下，它们又重新焕发出新雨的味道。向上望去，经常会看到一只孤单的鸟儿落在一棵落叶松上，无论它的体形多么微小，在这种树木的枝叶映衬下，它都会显现出特别粗壮的轮廓。那些赭色树干的迎风面呈东西走向，在暴风雪过后，它们仍会保持很长时间的白色，仿佛它们都是白桦树。而在下雨的时候，再没有比那些如象腿般粗大的山毛榉树干更显黑色的东西了。

在那条山隘狭路上，每个季节都会有秋天的叶子飘落，路的尽头是一堆木头。在它的后面，则是一片黑洞洞的灌木丛——当然，这里也是这片小树林里唯一的地点，能够表现出类似于深度的东西。这片幽深的掩体引诱着人去一探究竟；但是没有一个孩子胆敢挤进这片密不透风的灌木丛里。而且有许多桤木非常突兀地挺立在那里。这里没有长满枝条的树木，有的只是彼此交错的光秃秃的树干（它们在遭遇风暴的时候并不会被连根拔起，而是会被拦腰折断）：它们与那些疯长的藤本植物一同在那些低矮树丛前构筑了一道藩篱。

那些在记忆中代表着整座森林的树叶就这样纠缠在这片交织的网络中。它们是被风卷堆在一起的山毛榉叶子，明亮，呈现椭圆形。而在每片树叶上，都有从中央向边缘扩散的纹路，这些纹路让叶子的椭圆形状得到加强；颜色是均匀的亮棕色。有那么一瞬间，那些叶子仿佛是挂在灌木间的纸牌——它们随之覆盖了整个森林的地面，在最微弱的气息中闪烁和抖动，似乎是一场熟悉的游戏的重演，发散出唯一的亮棕色光芒。

在不到一掷之遥的地方，在那些相对于树种而言非常宽阔的云杉林带的缝隙间，那个陡峭的山脊已经隐约可见。这山脊马上就显现出某种“经过剧烈争夺的样子”。上空飞过的鸟群的大合唱在这里听起来就好像是礼炮的鸣响。与之合鸣还有一块石头——这里的土地大部分都是沼泽——在寂静中任意地落在其他石头上发出的尖锐声响。在树木间，有白色云朵如鬼火般闪动，就像是狍鹿的影子。每看一眼，周围都会有它更多的同类加入。（它们都属于那个纸牌游戏。）或者，在那些树干后面，会有玩耍孩童的脸孔出现，那些脸孔很奇特地与他们的身体相分离，就像是那些古老油画上圣徒的容颜。在那片经

常被人用阴森恐怖来形容的云杉林里，即使在刮风下雨的时候，树冠下面都是安静且干爽的，而且明显要比森林外面的空地里暖和很多（当额头靠在一棵树干的时候，心跳会更加强烈有力）。落在地上的云杉松果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焕发出亮棕色的光线。

在山丘顶上，既没有环顾到四周的景色，也没有看到观景用的长椅。不过许多树桩提供了休息用的座位，还可以把腿跷在岩石上。北面的城市（“在将近午夜的时候”）已经看不见了。在迫近“正午”时，只能隐约看到下面有一大片无人居住的草地。那座小山崖的颜色和蚁丘一样是淡灰色，而且很明显与刚刚穿过的公墓里的墓碑的石料完全相同。山崖随后立即转变成了南面的陡坡，坡上到处有石块挂在树间，仿佛经历过岩崩；而满眼的桦树的白色乍看之下好像是来自于一场暴风雪。下面空旷的田地上的绿色渐渐变暖变深，一直朝着城市那边延伸过去。在它的斜对角有一条路，曾有个孩子在路上从后面奔向一个男人，跳到他的背上，然后被背走了。还有一次，在昏暗之中，一位真正的骑士与他的马一同紧密结合成一个巨大的形象。下面行人的方言从远处听起来就像是所有的语言合而为一。

在山顶上，几乎只有村里的孩子经过。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他们就是这森林里的鲜艳色彩。森林就是他们的大游乐场，而且他们可以告诉你很多关于森林的东西。例如“你们熟悉这片森林吗”这样的问题——他们会回答：“太熟悉了。”即使森林里很寂静，没有什么人，但是山丘上总是有他们的身影。每到雷雨来临，第一声雷响的时候，森林里，树木间到处都是奔跑的身影，他们要回家。

山脊上的那条笔直的路显现着淡灰的色彩，一直向东延伸，它偶尔会让人想起一条军用公路。起风的时候，生长在这里的那些光秃秃的树干总会相互摩擦出刺耳的生硬，或者发出沉闷的摩尔斯电码。树皮上那些流淌松脂的地方难道就是弹孔吗？某一棵山毛榉的枝条被雷电打掉了，光秃秃的树干上展现出三面发亮的彩旗：断裂处呈白色，背风的南面呈蓝灰色，而迎风面则是铁锈色（在雨中呈黑色）。草地里的白色花朵仿佛兽牙。而且真的有一条狗，也许是从灌木丛那边转弯跑过来的，它的腿是弯的，舌头在身前像鞭子一样甩来甩去，并且从后面悄无声息地嗅着人的腘窝。路边那些用尖棱的泥砾岩修建的东西依然是古老的岩洞墓穴。不过，里面是空的。亮棕色的山毛榉叶子

被风刮了进去，并带着它们自身的平行线条与椭圆形状一起发散出一种无限的宁静。

然后就到了陡坡上。那里是森林里唯一的常流泉的发源地（今天只有手指一般粗细，明天会像手臂一样粗）。泉水甚至在山下形成了一个小型山谷，里面是经典的三级梯地。在山丘的东面山脚，那里有期待已久的山洞，但是已经被一道铁门封锁了。滴答的水声从里面传出；中间弥漫着许多颤音，好像是有人轻轻敲打着鼓上的皮。孩子们知道很多关于这个洞的东西：他们“经常”在洞里面玩，没有蝙蝠出现；里面似乎在种蘑菇。

山势逐渐平缓，在森林平坦的边缘地带，已经可以看到远处村庄的房子。在这里还有那期待已久的池塘。山泉最终流进这里，而山路也通向这里，宽阔的林间通道看上去仿佛一条林荫大道。一直到乍暖还寒的时候，池塘都会是一个灰白色冰晶体。在前往那里的路上，有意识地放慢了脚步，足底是沼泽地带常见的木板路。这段路的剩余部分是另一段不确定的回忆。在云杉丛中还有大量的接骨木矮树丛，在高大的针叶树下面格外显眼。还是早春时节，那些枝条上就已经长出了浓绿的叶子，叶子的尖端往往呈淡绿色。在这个靠近村庄的地方，还有唯一的一个鸟类聚集地。它们那千奇百怪的声音将整座森林都变成了音乐厅。有些像休止符；一声拉长的鸣叫好像是美国西部牛仔大赛上牛仔甩出的套索。歌唱也随着季节而变换，仿佛是某个缓慢转动的星空。暮色中，在那曾经明亮丰富的接骨木树丛里，仿佛有一缕微光从地面冉冉升起。最后一批孩子光着脚从旁边经过。边上某个云杉树的枝条让人想起了棕榈树的叶子。

圆圆的池塘里没有冰，只有水在里面旋转，速度慢得几乎令人难以觉察。水里面鱼很多，而水面上漂着一些类似火山凝灰岩的东西，那是泡沫塑料。池塘的边缘有一个用木门做的筏子，从森林前沿刮来的暴风，让它不停摇晃，仿佛漂浮在海浪之上。傍晚一场小雨，细小的水滴是对额头的福利。

位于森林与村庄之间的过渡地带，道路上的石头又重新闪烁着罗马栈道的光芒，又是一个柴火堆，上面罩着一层塑料布。在一片幽暗苍茫的背景前，方形的柴火堆与被锯下来的圆木是唯一的亮点。人们站在它面前，打量着它，直到只剩下色彩：形式随之而来。它们是指

向观察者的道路，具体针对的却是另外的方向。呼气。在某个观察的瞬间，最沉醉也最关注的时刻，木头之间的间隙暗了下来，然后柴火堆的内部开始旋转。一开始，它好似一块被切成很多片的孔雀石；然后，色盲测试板上的数字出现了。然后，黑夜出现在它的上面，然后就是白昼。渐渐地，又出现了单细胞生物的颤抖；一个未知的太阳系；巴比伦的一面石墙。它变成了包罗万象的飞行，喷射流非常集中；最后，在某个绝无仅有的光芒中，整座柴火堆上纵横的色彩揭示出第一个人类的足迹。

然后就是吸气，离开森林。回到如今的人们那里；回到城市；回到广场与桥梁；回到码头与通道；回到体育场与新闻；回到钟楼与商店；回到金光闪闪与裙袂褶裥。家中是否还有一双眼睛在等待呢？

（1980年）

[1]只称名不称姓表示关系密切。—中译注，下同

[2]也称为“消失点”，透视画中平行线条的汇聚点。

[3]埃俄罗斯：古希腊神话中的风神。

[4]指海拔一英里高的丹佛市。

[5]百搭：扑克牌中的丑角牌，可以替代任何点数的牌。

[6]辅弥撒者：举行弥撒仪式时神职人员的帮手，多由小孩充当。

[7]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1805—1868）：奥地利小说家。这里提到的《水晶》（Der Bergkristall）是其一部短篇小说。

[8]本书的德语标题原意是《圣维克多山的启示》（*Die Lehre der Sainte-Victoire*，法语发音应为“圣维克图瓦山”，但国内大多译为前者），出于简练的考虑，译者将其改为《圣山启示录》。圣维克多山是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一座山峰，法国绘画大师保罗·塞尚曾为此山画过几十幅油画，因此这里也成了塞尚绘画爱好者们的圣地。当年塞尚曾背着画具，由艾克斯市向东，沿托罗奈街道一直前行到圣维克多山，一路走，一路画——这条路，后来被称为“塞尚之路”。

[9]温特斯山（Untersberg）：奥地利萨尔茨堡西南面的山岳，最高峰海拔1972米，当地传说这是一座魔山。

[10]指继父。作家本人的继父和生父也都曾是士兵。

[11]指塞尚名作《玩纸牌者》，其画中所有远近物象都是用一片片色彩所组成。不同的色块在画中形成和谐的对比。

[12]即“画家”之意。

[13]指圣维克多山。

[14]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1888—1978）：意大利超现实主义画家，形而上学画派创始人之一。

[15]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1891—1976）：德国画家、雕塑家，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

[16]勒内·马格里特（René Magritte，1898—1967）：比利时画家，超现实主义真实主义画派的最重要代表。

[17]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1882—1967）：美国现实主义画家。

[18]指柏拉图。

[19]法国南部及地中海北岸上干寒而强烈的北风或西北风。

[20]指汉德克出版于1970年的作品《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

[21]指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法国精神医生及欧洲精神分析学家。

[22]指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荷兰哲学家。

[23]指克里斯蒂安·瓦格纳（Christian Wagner，1835—1918）：德国诗人。

[24]居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19—1877）：法国画家，现实主义绘画的创始人。

[25]为了庆祝自己在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辉煌胜利，拿破仑下令用战场上缴获的敌军大炮熔铸成“凯旋柱”，并于1810年建成。后于1871年被推倒。

[26]德国人会在森林等地点铺设一些道路，以便人们能够走在路上学习到有关地形地貌或者植物树木的知识。类似于我们公园里的标牌。

[27]指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奥地利诗人。

[28]法语，即“交叉双臂的男人”。

[29]《小路》《小溪》和《石桥》都是塞尚的画作。

[30]指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1909—1943）：法国犹太裔女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31]路德维希·霍尔（Ludwig Hohl，1904—1980）：瑞士德语作家，思想家。

[32]奥德修斯的故乡，他是那里的国王。

[33]希腊地名，那里供奉有太阳神阿波罗的神庙，是所有古希腊城邦共同的圣地。

[34]德尔斐也是四年一度的皮托运动会（Jeux Pythiques）的举办地。这个运动会同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旗鼓相当，也是具有全希腊影响力的重要祭典。

[35]指奥地利的萨尔茨堡。

[36]泰嫩山脉（Tennengebirge）：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的山脉，在萨尔察赫河的东面，海拔2431米。

[37]萨尔察赫河（Salzach）：因河（Inn）的支流，225公里长，其中部分河道是德国与奥地利的天然边境。

[38]卡布齐纳山（Kapuzinerberg）：萨尔茨堡市内的一座小山，在萨尔察赫河的东面，海拔640米。

[39]法语，意即“南方之路”。

[40]约翰·福特（John Ford，1894—1973）：美国电影导演。

[41]沃夫恩盖侯爵（Marquis de Vauvenargues，1715—1747）：法国哲学家，伦理学家，生于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市。

[42]圣亚历克斯（Alexius）：根据一个5世纪的传说，亚历克斯是一位罗马的富人，他自愿选择贫穷的生活，住在埃德萨（Edessa）达17年之久，最后默默无闻地死于自己父母的家中。

[43]皮罗斯马尼（Niko Pirosmani，1862—1918）：格鲁吉亚画家，原始主义绘画的重要代表。

[44]以上引文出自施蒂弗特的小说《水晶》。

[45]施蒂弗特的另一部小说。

[46]法语，意即“黑城堡上方的山洞旁的山崖”。

[47]亨利·方达（Henry Fonda，1905—1982）：美国著名演员。

[48]法语，即“黑城堡的上方”。

[49]使圣餐饼与酒变成耶稣的肉和血。

[50]蒙马特高地（Montmartre）：巴黎的一处高地，也是巴黎的一个区，此处有圣心教堂，有画家聚集的小丘广场，有夜夜笙歌的红磨坊，也有写满爱情的爱之墙，是很受旅游者喜爱的一处名胜。

[51]一种来自西非的旋律性打击乐器。

[52]西里西亚（Schlesien）：中欧的一个历史地域名称，大致在奥德河中上游流域，曾是普鲁士行省，1945年后属波兰。

[53]哈尔茨山（Harz）：是德国中部的一座山脉，横跨下萨克森、萨克森——安哈尔特和图林根三州，是德国旅游胜地。

[54]《许佩里翁》（*Hyperion*）：书信体小说，德国诗人荷尔德林（Hölderlin，1770—1843）的代表作。

[55]达勒姆（Dahlem）：位于柏林西南面，属于柏林的采伦多夫区（Zehlendorf）。

[56]博尔恩（Nikolas Born，1937—1979）：德国小说家，诗人。

[57]系保罗·策兰的作品名。

[58]神探科伦布（Columbo）：美国一个系列电视剧中的主角。

[59]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1791—1872）：奥地利诗人、剧作家。《穷乐师》是其中篇小说。

[60]莫里斯·德尼（Maurice Denis，1870—1943）：法国画家，先知画派（Nabis）的创立者之一。

[61]“贫瘠土地”之意，常见于易于侵蚀岩石的地区，是大面积风化，块体移动，雨水冲刷及冲沟侵蚀的综合结果。“Badlands”一词初期只是用以指称美国南达科他州的半干旱沟谷地貌。

[62]雅各布·范·鲁伊斯达尔（Jakob van Ruisdael，1628|29—1682）：17世纪荷兰最为著名的风景画家之一。

[63]加尔达湖（Gardasee）：意大利最大的湖泊，位于伦巴底与威尼斯之间，面积约368平方公里。

Langsame Heimkehr by Peter Handke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9

Die Lehre der Sainte-Victoire by Peter Handke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80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5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出版得到奥地利教育、艺术和文化部所提供之翻译资助

Die Übersetzung wurde gefördert mit Mitteln des Bundesministeriums

für Unterricht, Kunst und Kultur

Peter Handke

Die Stunde,
da wir nichts voneinander wußten

形同陌路的时刻

[奥地利] 彼得·汉德克 著
韩瑞祥 主编　付天海　刘学慧 译

文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同陌路的时刻/（奥）汉德克（Handke, P.）著；付天海，刘学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7-208-13229-0

Ⅰ.①形…　Ⅱ.①汉……②付……③刘…　Ⅲ.①剧本-作品集-奥地利-现代Ⅳ.①I52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1768号

书名：形同陌路的时刻

作者：【 奥地利】彼得·汉德克

译者：付天海　刘学慧

责任编辑：陈欢欢

封面设计：高熹

转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3229-0|I·1428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 文景每月书情

目　录

编者前言
不理性的人终将消亡
形同陌路的时刻
筹划生命的永恒

形同陌路的时刻

[奥地利] 彼得·汉德克 著

韩瑞祥 主编

付天海 刘学慧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者前言

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被奉为奥地利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也是当今德语乃至世界文坛始终关注的焦点之一。汉德克的一生可以说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像许多著名作家一样，他以独具风格的创作在文坛上引起了持久的争论，更确立了令人仰慕的地位。从1966年成名开始，汉德克为德语文学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因此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如“霍普特曼奖”（1967年）、“毕希纳奖”（1973年）、“海涅奖”（2007年）、“托马斯·曼奖”（2008年）、“卡夫卡奖”（2009年）、“拉扎尔国王金质十字勋章”（塞尔维亚文学勋章，2009年）等。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介到世界许多国家，为当代德语文学赢来了举世瞩目的声望。

汉德克出生在奥地利克恩滕州格里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他孩童时代随父母在柏林（1944—1948）的经历，青年时期在克恩滕乡间的生活都渗透进他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里。1961年，汉德克入格拉茨大学读法律，开始参加“城市公园论坛”的文学活动，成为“格拉茨文学社”的一员。他的第一部小说《大黄蜂》（1966）的问世促使他弃学专事文学创作。1966年，汉德克发表了使他一举成名的剧本《骂观众》，在德语文坛引起空前的轰动，从此也使“格拉茨文学社”名声大振。《骂观众》是汉德克对传统戏剧的公开挑战，也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格拉茨文学社”在文学创造上的共同追求。

就在《骂观众》发表之前不久，汉德克已经在“四七社”文学年会上展露锋芒，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严厉地批评了当代文学墨守于传统描写的软弱无能。在他纲领性的杂文（《文学是浪漫的》，1966；《我是一个住在象牙塔里的人》，1967）中，汉德克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文学对他来说，是不断明白自我的手段；他期待文学作品要表现还没有被意识到的现实，破除一成不变的价值模式，认为追求现实主义的描写文学对此则无能为力。与此同时，他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反对文学作品直接服务于政治目的。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剧作《自我控诉》（1966）、《预言》（1966）、

《卡斯帕》（1968），诗集《内部世界之外部世界之内部世界》（1969）等。

进入70年代后，汉德克在“格拉茨文学社”中的创作率先从语言游戏及语言批判转向寻求自我的“新主体性”文学。标志着这个阶段的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1970）、《无欲的悲歌》（1972）、《短信长别》（1972）、《真实感受的时刻》（1975）、《左撇子女人》（1976）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在表现真实的人生经历中寻找自我，借以摆脱现实生存的困惑。《无欲的悲歌》开辟了70年代“格拉茨文学社”从抽象的语言尝试到自传性文学倾向的先河。这部小说是德语文坛70年代新主体性文学的巅峰之作，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1979年，汉德克在巴黎居住了几年之后回到奥地利，在萨尔茨堡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四部曲《缓慢的归乡》（《缓慢的归乡》，1979；《圣山启示录》，1980；《孩子的故事》，1981；《关于乡村》，1981）虽然在叙述风格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生存空间的缺失和寻找自我依然是其表现的主题；主体与世界的冲突构成了叙述的核心，因为对汉德克来说，现实世界不过是一个虚伪的名称，丑恶、僵化、陌生。他厌倦这个世界，试图通过艺术的手段实现自我构想的完美世界。

从80年代开始，汉德克似乎日益陷入封闭的自我世界里，面对社会生存现实的困惑，他寻求在艺术世界里感受永恒与和谐，在文化寻根中哀悼传统价值的缺失。他先后写了《铅笔的故事》（1982）、《痛苦的中国人》（1983）、《去往第九王国》（1986）、《一个作家的下午》（1987）、《试论疲倦》（1989）、《试论成功的日子》（1990）等。但汉德克不是一个陶醉在象牙塔里的作家，他的创作是当代文学困惑的自然表现：世界的无所适从，价值体系的崩溃和叙述危机使文学表现陷入困境。汉德克封闭式的内省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生存的深切反思。

进入90年代后，汉德克定居在巴黎附近的乡村里。从这个时期起，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动荡，南斯拉夫战争也把这位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从《梦幻者告别第九王国》（1991）开始，汉德克的作品（《形同陌路的时刻》，1992；《我在无人湾的岁

月》，1994；《筹划生命的永恒》，1997；《图像消失》，2002；《迷路者的踪迹》，2007等）中到处都潜藏着战争的现实，人性的灾难。1996年，汉德克发表了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批评媒体语言和信息政治，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汉德克对此不屑一顾，一意孤行。1999年，在北约空袭的日子里，他两次穿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旅行。同年，他的南斯拉夫题材戏剧《独木舟之行或者关于战争电影的戏剧》在维也纳皇家剧院首演。为了抗议德国军队轰炸这两个国家和地区，汉德克退回了1973年颁发给他的毕希纳奖。2006年3月18日，汉德克参加了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媒体群起而攻之，他的剧作演出因此在欧洲一些国家被取消，杜塞尔多夫市政府拒绝支付授予他的海涅奖奖金。然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汉德克无视这一切，依然我行我素，坚定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对人性的呼唤，对战争的控诉，对以恶惩恶以牙还牙的非人道毁灭方式的反思："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他因此而成为"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另类。

世纪文景将陆续推出九卷本《汉德克文集》，意在让我国读者来共同了解和认识这位独具风格和人格魅力的奥地利作家。《形同陌路的时刻》卷收录了汉德克从上世纪70到90年代创作的三部戏剧《不理性的人终将消亡》（1973）、《形同陌路的时刻》（1992）和《筹划生命的永恒》（1997）。如果说他60年代被称为"反戏剧"而闻名于世的"说话剧"着力表现的对象是戏剧和语言本身的话，那么从70年代以来，无论汉德克怎样追求戏剧形式的变化和创新，他的戏剧创作则与小说并驾齐驱，越来越贴近与生存现实的关联，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游刃有余，为日臻成熟的汉德克风格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70年代是汉德克小说创作的盛期，虽说这个时期的剧作不多，但同样受到许多名导、名角和广大观众的青睐。此间发表的《不理性的人终将消亡》当属其中的代表作。1972年元月末，汉德克刚一写完《无欲的悲歌》，就把这部剧作的构思当成对自己心灵"安抚的过程"、"这是我寻求幸福的最终尝试"。在这出剧中，汉德克似乎远离了锋芒毕露的《骂观众》所开创的实验风格，回归到传统的戏剧表现模式。然而，与传统相比，这里的人物都是角色扮演者，相互之间

的对话不过是心照不宣的独白，各种习以为常的形式只是用来烘托氛围的手段，情节或多或少地带有游戏色彩。剧中的主人公奎特是个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他觉得现存的经济秩序已经不再合乎时宜，因为资本家们无限制地相互争来斗去。他要打破这无序的竞争，要求企业家团结起来共同行动。他如愿以偿地与竞争者组成了产品与价格卡特尔。可奎特最终却违反了这个约定，使得其他卡特尔成员一个个走向破产。剧本结尾，奎特多次将脑袋撞向石壁，直到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从表面上看，汉德克似乎把批判的艺术目光直指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现存经济秩序。可实际上，这出剧描绘的是一幅被资本和财富扭曲了心灵的众生相。所谓追求自我实现的奎特就是要一手导演出一幕“生意世界的悲剧”来，因为他觉得自己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异化状态里，不仅失去了“另一种生存”的可能，而且连对这种生存可能的梦想都不复存在了。对他来说，在这个由“概念机器”主宰的时代里，失去自我的生存“像每天的日程表一样”。奎特意识到现实生存就像是“无限空旷的屋子里到处都充斥着垃圾”，最后脑袋撞向石壁正是他对生存“绝望”的表现。因此，他抱着“大脑，它凝固了，进水了或者汽化了？”的无望要告别这样的人生。像在同时期发表的小说一样，汉德克在这里同样表现的是人被社会与环境扭曲的生存状况。正如作者所说的，剧中的人物“在游戏人生，仿佛他们是些悲剧形象似的。然而，他们却永远留在戏讽的阴影里”。

在经历了小说创作的辉煌之后，到了90年代，汉德克又推出了几部各有千秋且影响广泛的剧作。首屈一指的是《形同陌路的时刻》。从形式上看，它似乎是作者60年代末所开创的实验戏剧的延续。汉德克在这里又一反所有的传统规则，让读者和观众领受到一出没有言语别出心裁的剧，一出只有“叙事者”在叙事的剧。在这出毫无情节可言的剧里，不是活动的人物，而是事件发生的地点构成了表现的中心。这个一切都围绕着它行动的中心既具有现实特征，同时也可能会是任意一个地方，而读者和观众则会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发生在这里的一切是一个地地道道让人观看的“表演”：十多个在这个中心上活动的人物在表演着那习以为常和与众不同的东西。这个中心犹如一个世界舞台，各种人物轮番登台亮相，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形形色色。他们在这个中心相互碰面，相互妨碍，共同组成群体，然后又使之解体；他们从始到终都没有任何言语上的交流，只有各自不得不接受的角色表演，像一个个“孤独的心灵”，在“来来往往，往往来来”的擦肩而过的茫然中挣扎着。在这个世界舞台上，每个人都活动

在各自典型的行为中，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他们一部分显得非常滑稽可笑，像是在表演布袋木偶戏；一部分则好像要紧密地结合成一个群体。在作者充满寓意和讽喻的笔下，这个包罗万象、千奇百怪、最终变得昏暗的世界舞台或许就是汉德克所感受的现实世界的微缩，为读者和观众留下了无尽的联想和思考："别吐露你所看见的东西；就让它留在图像里吧。"这句箴言就是汉德克向读者和观众发出的呼唤。

《筹划生命的永恒》是这个时期另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汉德克称之为"国王剧"。这出剧是在南斯拉夫内战的影响下写就的。这是一个渗透着反思战争的现代童话，一部"不可名状的作品"。故事发生在"从上一次战争到现在，再到将来"的时代里，地点是一片四面楚歌、持续遭受战争威胁的飞地。这里的阳光时代一去不返，一切成为强权的掌心玩物，战争的牺牲品。儿子们在战争中阵亡，女儿们怀上了侵略军士兵的孩子，绝望的外祖父期盼着孕育在两姐妹腹中的外孙成为国王，以阻止这片本来宁静的飞地的灭亡。于是降生在飞地的巴勃罗和菲利普承载起建立新王国的希望。这出所谓的国王剧就是围绕着这两个性格对立的人物展开的。巴勃罗成为国王，像所有的英雄一样走向世界，而菲利普则成为拙劣的书写者，留在家里，拒绝寻求那遥远的东西。一个女性漫游叙述者出现了，飞地人民那个不幸的编年史作者"白痴"拱手让位于这个美貌的女子，因为她要将"仙女童话"转化成"国王剧"。伴随着巴勃罗从广阔的世界归来，这片飞地上出现了新的生机，一个新的王国就要应运而生。然而，迫于"空间排挤帮"棍棒挥舞的不断挑战，那个对历史和法律的梦想变成了筹划永恒的梦想。巴勃罗一门心思要进入那个充满伟大而炙热的思想的永恒空间里。相反，他的表弟菲利普则意识到自己持续的失败，是一个不抱怨命运的失败者。然而，在这先知错误地预言和历史书写者没有历史的岁月里，始终在场的是那个压根儿就脱离现实的女叙述者，她在激励人，在指引道路，在呼唤参与。在这里，幻想与现实彻底没有了界限。就这样，巴勃罗继续表演着他的思想，表演着他那永恒的空间。最终，这个以为采用新的"公正的"法规就可以自上而下整治一切的正义思想家不过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幻想者；"人民"拖着一个里面装着王冠的塑料袋走过国王剧；空间排挤帮已经随时准备着；那个女叙述者还要接着叙述。

《筹划生命的永恒》是一部人物关系复杂、结构多层交织和结局呈开放性的剧作。汉德克在这里彻底打破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着意表现的是“童话般真实的东西”。剧中神话般的人物及其错综复杂的隐喻层面给读者留下了太多的谜。像他的许多戏剧一样，这正是汉德克向读者和观众提出的挑战：在巴比伦式的混乱中去感受艺术断片之间的必然联系；在层层迷宫中去寻觅作品表现的内在；在纷繁多变的张力中获取认知的统一。

我们选编出版汉德克的作品，意在能够不断地给读者带来另一番阅 读的感受和愉悦，并从中有所受益。但由于水平有限，选编和翻译疏漏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韩瑞祥

2015年7月

不理性的人终将消亡

两幕话剧

刘学慧　译

“我忽然想到，我在玩一些不曾有过的东西，这就是区别。这也是绝望。”

剧中人物

赫尔曼·奎特

汉斯——奎特的心腹

弗朗茨·基尔布——小股东

奎特的朋友和企业主：

哈尔德·冯·武尔瑙

贝尔托德·科尔伯-肯特

卡尔-海因茨·卢茨

保拉·塔克斯

奎特的妻子

第一幕

一个大房间里。午后的阳光照进来。舞台背景是由类似于电影银幕的幕布搭成的。透过幕布能够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大城市的轮廓。

奎特穿着运动服，用拳头、双脚和膝盖痛击沙袋。他的心腹汉斯穿着燕尾服，手捧托盘和一瓶矿泉水站在旁边看着他。奎特拿起矿泉水瓶喝了几口水，往头上也浇了点，然后坐在凳子上。

奎特　今天我很伤心。

汉斯　嗯？怎么了？

奎特　当我看见我那穿着睡袍的太太和她那涂着指甲油的脚趾时，突然觉得自己很孤单。这种孤单是如此真切实在，以至于我现在都能够不假思索地诉说一番。可是孤单让我变得轻松，它把我揉碎，我融于其中。这种孤单是客观存在，是世界的特性，但不是我的特性。所有的事情都以和谐的方式离我远去。上厕所的时候，我听到自己大便的声音就像是旁边隔间某个陌生人的。当我坐电车来办公室上班的时候……

汉斯　为了不和人们失去联系，为了生产出新的产品而研究他们的需求？

奎特　我早上上班坐的电车拐了一个很大的弯，看到这道弯弯的曲线，我的内心也充满了深深的惆怅。

汉斯　奎特先生有些多愁善感。

奎特　先生，您必须保持冷静。您的身份是不允许这样多愁善感的。作为企业家，即便是真的心情很糟糕，也只能是说说而已，但是千万别影响自己的情绪。对于企业家而言，谈论自己的心情如何简直就是奢侈，而且毫无用处。只有那些根据自己的心情而生活的人才有闲心来谈论心情。奎特先生，与其浪费时间悲天悯人，还不如花点工夫考虑我们眼下的工作吧。要不然……

奎特　要不然就会怎么了？

汉斯　要不然您就会变成艺术家。您资助过小提琴音乐会，还曾为了帮助国家买一幅画，屈尊上街募集过善款。如果您真的是一位艺术家，那么您这个月所经历的如此丰富的精神生活不仅大有裨益，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您真的是一位艺术家，那就请您在画布上画一道优美的曲线，就像早上电车所拐过的弯道那样，用以表达您的无限惆怅，然后把这幅蕴含您自己心路历程的画作卖掉吧！

奎特（站起身）汉斯，你对自己每天的工作倒是驾轻就熟啊。拜托，请你理解我的心情！

汉斯　奎特先生刚才不也是忘了自己的身份吗？这只是个游戏，开个玩笑而已。

奎特　我们都不想变成吹毛求疵的人。不过，我得承认，早上在电车里有一位女士坐在我后面，大口大口地吃着炸薯条，薯条散发出变质油的哈喇味道，一下子把我从沉思中拽回到现实里，当时我真想举起手往她脸上甩一巴掌。紧接着，我下了电车之后，在街上和一个外籍工人撞了个满怀，他当时刚从便利店里取照片出来，完全沉浸在新洗的照片当中，一边看一边笑着回忆那些美好的瞬间。看到他如此投入，我也马上受到感染，陷入了回忆。我忽然觉得，自己和他是惺惺相惜。你别笑，有时候的确是这样，人的意识也会发生质的飞跃。

汉斯　然而现实又会马上让人清醒过来。我之所以笑了，是因为以前经常听您说，您是多么喜欢回忆自己的漫游时代，比如您在巴黎时，好几天都只能靠炸薯条充饥。

奎特　我总是在和朋友们聊天时讲起过去的事情。不过，有时候和朋友们聊天，我也会诗意大发，提到“儿时那早春时节榛子树下的野玫瑰花”。

汉斯　难道这些艺术性的东西会让您的商务谈判变得更容易吗？

奎特　是的，它可以作为隐喻，来指代那些无法明说的事情。榛子树下的野玫瑰花可以代表完全不同的东西。具体含义只有当时参与谈话的人才能明白。那些像诗句一样的话语，对我们而言是历史的一种形式，也是一种交流方式。难以想象，没有诗歌，我们将如何做生意？对了，今天都有谁要来？

汉斯　卡尔-海因茨·卢茨、哈尔德·冯·武尔瑙、贝尔托德·科尔伯-肯特，还有保拉·塔克斯。这些企业家都是您的朋友。

奎特　我得去换衣服。如果我老婆来了，你就告诉她要好好接待这些客人。我敢肯定，她听了这话以后就会去逛街，省得她总是在屋里把窗帘拉来拉去。我跟你说，我真的很伤心。这几乎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

［奎特下。

汉斯　一不小心，奎特先生就会谈起他自己！他的伤心真让人嫉妒。他一感伤起来，就会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仿佛是刚刚拍了电影而兴奋不已。总之，和伤心的奎特在一起，时间过得要快些。因为他心情好的时候，总是另外一副面孔，让人难以接近，他会搓着手，然后一下子跳起来，就像侏儒在跳舞。（汉斯坐到凳子上）而我呢？今天早晨，我的心情又如何呢？往往是从睁眼醒来的一瞬间开始，可以叙述的事情最多，比如说：首先，太阳升起来了，阳光照进了我张开的嘴里，我什么都没有梦到。光是张嘴做出“做梦”这个词的嘴形，我就已经觉得很费劲了。“做——梦……”在刷牙的时候，牙龈会出血。我也希望能这样，但什么也没发生。（停顿）我闭上了嘴。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去哪儿？我？……是的！我！我！……嗯，还是我。为什么不是其他人呢？（边想边摇头）我得找个人好好聊聊。（站起身）

［小股东基尔布出现在背景中。

汉斯　我想不起来任何跟我个人有关的事情了。最后一次说到“我”，是因为必须要学习基督教教义问答手册，手册里面的“我”是臣属于“尊敬的大人”的“渺小的我”。我曾经有一个自己的想法，但是马上就又忘了。直到现在我都在尝试着去想起它，但是从来都没想起来。不过我没有什么奢求，我至少还能做一些动作手势。（汉斯攥起拳，而另一只手马上把它重新按下。注意到了基尔布）您是谁？您从哪儿来？您……

基尔布　我叫弗朗茨·基尔布。

［汉斯笑起来。

基尔布　您不喜欢这个名字？

汉斯　不是这样的。我刚才正在自言自语，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这儿只针对人，不针对名字。您是干什么的？

基尔布　小股东。

汉斯　难道是那个小股东？

基尔布　是的，小股东弗朗茨·基尔布——监事会恐惧的对象、股东大会上的小丑、长在经济界人士肚脐上的虱子，百分之百令人讨厌——正是在下，我这个人今天又要没规矩了。

［汉斯握紧拳头走上前，在基尔布面前比画着。另一只手也伸了出来。

基尔布　您下不了手。

汉斯（退回去，手垂下来）要是真打下去会很棒。可是我的理智控制住了我的本意。尽管如此，您要识抬举，滚蛋。

［基尔布坐到凳子上。

汉斯　您现在就尽管说说您以前的经历吧！

基尔布（神秘地）我在国内每家大的股份制集团都拥有股份。我在不同的股东大会之间赶场，晚上就在睡袋里过夜。我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您看，这就是我骑自行车时用来夹住裤脚的夹子。我可是个钻石王老五，我的膝跳反应十分灵敏。（敲了敲自己的膝盖，脚弹起来踢到了汉斯）这是我的便携式旅行刀。在第三帝国时期，我获得了可以持续游泳十五分钟的资格证明，我可以用牙齿把您从水里捞出来。有些人尊敬我，但是我从不在选举号召书上表决签字。有一次我出席了一个叫“我从事什么职业”的活动，我封自己为自由职业者，没人能猜对我的职业。在股东大会上，我背着双肩包坐在那里，一直举着

手要求发言。如果董事会忽略了任何一个股东的发言请求，决议就不会生效……这儿多安静啊！您听，我说话是多么心平气和。我的上一个情妇说我是个恶魔，（快速拿出几张剪报）媒体认为我很古怪。我的动作比您想的要快。（给了汉斯一脚，汉斯跪倒在地）我靠股份分红生活，是个完完全全的自由人。我的格言是："支持我的人不会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但是反对我的人，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我警告你小心点儿。

［奎特再次上场。基尔布立马起身鞠躬，退到后面。

奎特　这个让人反胃 的基尔布。（对汉斯）不要再拍你的燕尾服了。我刚才换衣服的时候，看了下镜子，突然觉得很可笑，我竟然长着头发！这些没有知觉、没有用途的头发丝儿！我坐在床上，把头埋在手里。我后来想，如果我维持那个姿势再久一点，我所有的想法就都会停止的。另外，我沉浸在悲伤当中，看到我早上掀开的被子，我真的被自己感动了。我会向你证明，我的这些感情是有用的。

汉斯　请您小心点儿。如果您再这么讲的话，那么就真的会突然觉得自己很悲伤了。老实说，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哪个企业家疯掉了。倒是有很多经济不独立的人是这样。但您根本就不能和这个世界唱反调。就算您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那也是为了从中营利！

奎特　汉斯，不要总是高谈阔论。

汉斯　我就是想说出来。

基尔布　问问他父母的事！他爸爸曾经是演员。他妈妈做些卖不出去的玩具娃娃。他们两人一起去环球旅行，再也没回来。据说他们俩都掉进了火山里。他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奎特　（对着汉斯）我没有病。说些轻松点儿的话题吧！

［停顿。

基尔布　比如不死的心灵？

［停顿。

奎特　我没有病，因为我，赫尔曼·奎特，可以随心所欲。而且我也希望这样。汉斯，我有一种伤心的感觉。

［停顿。

有时，我去某些地方，会觉得自己走错了门，马上就会有人问我是谁。或者我站在空空的办公室里，突然觉得地板倾斜，桌上的笔在滚动，所有的纸都往下滑。甚至当我到这儿的时候，常常有种闯进陌生房间的感觉。我看到一个熟悉的东西时，常常会想，会不会又是什么假象？有时候看到老熟人打招呼，我竟然像不认识一样。这不仅仅是曾经的梦境。但是我想说点其他的事情。

［停顿。

［基尔布抬起胳膊。

奎特　（突然将头朝沙包撞去）还能怎么样？我还能做什么？前不久，我开车经过郊区的一条街道，以前我每天都从那儿路过。在那条街上，我又看到了昔日的广告柱子。我以前常常围着广告柱子转，上面所有的广告我都仔细看过。现在，那根柱子基本空了，只有一张奶粉广告的海报还在上边，这种奶粉现在已经没有了。（抬起双臂）我的车缓缓经过那条街道，令我想起了过去所看过的巧克力广告、牙膏广告和选举海报。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我对那些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产生了很强烈的感觉。

基尔布　和汉斯（同时）然后您就和司机称兄道弟？

［停顿。

［喇叭声响起。

奎特　卢茨来了。他晚上回家的时候，经常这样按喇叭。按喇叭是他给老婆的信号，让她提前打开家里那个日本产的微波炉热饭菜。去帮他脱掉大衣。

［汉斯下。

基尔布（向前）刚才讲到您父母的过去，您觉得怎么样？

奎特　还不够清楚。我有一次梦见自己掉头发。有人跟我讲，做这种梦是因为我担心自己会阳痿。可这个梦也许只是说明我害怕脱发。

基尔布　但是您为什么会害怕脱发呢？这又表明了什么？另外，我前段时间看见过您。您坐在河边的凳子上，望着大自然出神。

奎特　为什么会出神呢？

基尔布　您甚至连凳子上的鸽子屎都没擦就直接坐下了。除此之外，照我的经验讲，喜欢观察自然是现实感降低的首要征兆。而且您还跟小孩一样很少眨眼。

奎特　噢，请您接着说。听别人说自己的事很有意思。

基尔布　我之后就去吃午饭了，酸菜炖肘子。吃完饭，我又去了河边。

奎特　基尔布，我很早就佩服您了。我很欣赏您的肆无忌惮。还记得，您上次把我当个玩偶一样带到股东大会上，然后就自顾自地冲上台去大放厥词。后来，别人抓住您的手和脚，好不容易才把您抬出了会场。我也很嫉妒您。在您身边，我觉得自己被箍在了身体里，我感受到，我是多么受限制。因为正好就我们两个人，所以我可以跟您讲这些。

［基尔布拉着奎特的双耳让他靠近自己，叭的一声亲了他一下。

［奎特给了他一脚。

基尔布　这样您就能回到以前的状态了。

［基尔布退后。

汉斯带着卢茨、冯·武尔瑙和科尔伯-肯特进来。科尔伯-肯特是一家天主教堂下属公司的神甫企业家，他穿着便装，并没有穿神甫袍，只是套了一个白色的假领。

卢茨　（对各位同事）就像之前说过的那样，我们不着急抢在前面。我们先观察一段日子，让他们再得意几天。然后海外分厂的情况就能允许我们进行反攻，把他们拉下马来。他当然会试图赌一把，但是我们早就看穿了他的诡计。我们让他再嚣张几天，之后他就是我们的瓮中之鳖了。

［他们神态各异地笑着。

冯·武尔瑙　（对着奎特）那辆靠在栅栏边上的自行车真有意思！在东德的时候，我爸爸送过我一辆类似的车，他同时还送了我第一条灯笼裤。现在的东西没有这么实在了。人们不是简单地卖自行车，而是把它包装成机器，加上速度仪和喇叭。机器当然比一辆简单的自行车更容易磨损，机器当然也会老化，但是自行车就不会。你是骑那辆自行车去上班的吗？

奎特　［指了指基尔布。

冯·武尔瑙　我说呢，它怎么那么脏！

卢茨　我抬着他的胳膊，谁来抬他的腿？

奎特　如果我们绊个踉跄的话，邪恶就会一块一块地从基尔布的嘴里迸出来，这样他就从头到脚重新做人。但是没有了邪恶的老基尔布，我们该怎么办呢？

科尔伯-肯特　他没有影响到我。他给我解闷了，还让我想起我内心阴暗的东西。而且他也不是故意的，他身不由己。自从我有一次和他单独谈了之后，我就相信他了。

卢茨　和别人单独谈话时很容易相信一个人。我会相信任何一个跟我单独谈话的人。但是从谈话中我什么也得不到。因此我尽量不和别人

单独相处。这样会歪曲事实。

冯·武尔瑙　基尔布这个人毫无自尊心，他让我想起我们家以前养的一匹老马。这匹马每次从马厩里来到石子路上的时候都会撒尿，发出稀里哗啦的声音。撒完尿以后，它就一路摇晃着尾巴，到处招摇。你们看看这个家伙的罗圈腿。再看看他的中分头，根本就没有分在正中间。还有那破旧的裤子褡裢，尖尖的皮鞋，这是什么生活方式！

科尔伯-肯特　冯·武尔瑙，您别浪费时间了。您说这些话对他这种人根本就不起作用。无论您如何刻薄地贬损他，都会使他变得更加寡廉鲜耻。大家坐下，我们开始吧！我今天还有其他的事情，在教堂还得准备一场布道。

卢茨　您布道的时候要说些什么呢？

科尔伯-肯特　是不是说每个人都终将走向死亡。在座的都一样。

冯·武尔瑙（看着基尔布）这样的布道应该适合他这个家伙。但是现在——我们谈正事儿吧，他也能听吗？

卢茨　我们谈论的话题并不需要任何人回避，对不对？

［停顿。

［所有的企业家都笑了。基尔布拱起舌头在嘴里打转。汉斯下。企业家们坐在一起。

冯·武尔瑙　基尔布，找个舒服的姿势站好了！大家都是人嘛！

［企业家们大笑。

［奎特的妻子上。她看了所有人一眼，然后默默地横穿过房间，从另一头走出去了。

冯·武尔瑙　（对着科尔伯-肯特）作为一名神甫企业家，您也雇用女员工吗？

科尔伯-肯特　为什么这么问？

冯·武尔瑙　我刚才想到，您还没有结婚，也根本不可能拥有幸福的婚姻。

科尔伯-肯特　是的，我们不允许结婚。

冯·武尔瑙　我是说其他的事。

奎特　我不明白你在暗示什么。

冯·武尔瑙　你怎么知道我是在暗示？

卢茨　（转移话题）妇女劳动力当然便宜些。但是我们也必须小心谨慎。每个月我们都会上几次当。

科尔伯-肯特　是因为她们偷原材料吗？

卢茨　不是的，因为她们怀孕了。她们会故意怀上孩子，而不是因为必须生个小孩。我们刚刚聘用了这些女工，就得支付给她们产假补贴。

冯·武尔瑙　以前根本就不是这样的。那时人们也不用老是谈论从前。在我爸爸的公司里，所有人都亲如一家。工人们不是为我爸爸工作，而是为了公司，也为他们自己——至少人们都有这种感觉，这一点至关重要。总而言之，当时的企业管理体系是唯一能够让人感觉到他们是在为自己而工作的。他们工作时心情愉快，常常哼着轻松的歌曲；或者在担负特别繁重的工作时大家一起喊着独特的节拍号子，以便顺利完成任务。在这样的企业里干活，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也不会产生任何心理落差。每个人都是大集体中的一员，大家都有很强的企业归属感。顺便说一声，当时工人们喊的那些号子，应该赶紧收集整理留下来，否则将来谁也记不得这样的号子了。现在的工人干活时要么心情沉闷，要么心不在焉。他们的心思根本就没有放在工作上头，既没有创造性的主意，也没有想象力。说到这儿，我得表扬那些

从南方来的工人。他们为了工作而生存，为自己处在社会当中而感到幸福。对他们而言，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另外，以前的工人总是为他们的劳动产品而感到自豪。周末带孩子出去散步的时候，他们会无比骄傲地告诉孩子，路上看到的哪些东西是由他们亲手生产制作的。可是到如今，大多数孩子对父母的工作一无所知。

基尔布　如果是您，您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看到父亲拧在汽车上的螺丝吗？或者知道母亲包装的黄油吗？

冯·武尔瑙　我没带拐杖。打你又怕弄脏了我的手。

科尔伯-肯特　前段时间，我让人把图书馆的墙纸重新换了。当然，我也在一旁帮忙。不过，我发现那个裱糊匠工作时满脸郁闷，尽管我是按工资标准付给他报酬的。我问他："您怎么会对您的工作毫无激情呢？您不是还从中获得报酬吗？"那个工人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冯·武尔瑙　都这样。

［基尔布漫不经心地捏着自己的指甲。

科尔伯-肯特　他们只想着钱。我早就说过，在他们的脑袋里，除了钱和荤段子，就没别的了。他们领了工资后，只惦记着买冰柜、水晶镜子、闹钟等家居用品，从来就没想到应该在夜校报个班学习，或者去剧院看场戏。一旦他们不再关注公众利益，而只是惦记着自己的个人享受，那他们就已经被贪图物质享受这个恶魔所掌控。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这听起来像是在教堂里布道。可是，没有公众的利益，又哪里来的个人享受呢？我总是这么打比方：大家在过旋转门的时候，如果所有的人都往门里头挤，谁也不让谁，那么旋转门肯定无法转动，最终谁也出不去。纸包住了石头，追求物质享受最终会让人丧失了个性。

冯·武尔瑙　我也讲个故事。您在布道时总会讲些小故事，对吧？我很精通修辞学。说句题外话，修辞学是一门已经没落了的艺术。我在超市里……

奎特　你在超市里？

冯·武尔瑙　是我自己开的超市。但是我想讲一个故事。

奎特　超市老板冯·武尔瑙，头一回听说这事儿。

冯·武尔瑙　没办法，税收太高，逼得我们必须投资。这个我不用向你们解释吧。开连锁超市正好适合销售我们的某些产品。这样我们就有自己的销售点，省去了中间销售渠道。现在我可以讲我的故事了吗？

奎特　哈尔德·冯·武尔瑙男爵超市。

冯·武尔瑙　我的超市叫米勒超市。有一次，我去超市检查工作，有位女士引起了我的怀疑，她一直推着空空的购物车在那儿徘徊。我很好奇地观察着她，除了那四处张望、偷偷摸摸的眼神外，她可以算是位贵妇人了。她突然朝我走过来，很小声地问我："特价的大包装洗衣粉还有吗？就是上个星期海报上登的促销广告。"事后想想，真可惜啊。她本来正合我的胃口，可惜我又改变了看法。仅仅因为一件日用品就能屈尊降贵吗？不。我为这个人感到羞耻。

［基尔布把手放到腋下，弄出了像放屁一样的响声。

卢茨　我特别烦那些消息不灵通的消费者。他们为什么就不看看报纸的财经栏目呢？那上面经常会公布各类产品的性能测试信息！为什么只有那么少的人加入消费者协会呢？如此下去，他们就再也没有什么判断力了。你们观察过那些在大减价时互相推搡着的家庭主妇的脸吗？那些失去理智的、扭曲的、恐慌的嘴脸，她们只顾着疯狂抢购那些特价品，像着了魔一样。没有思维，没有大脑，除了那沸腾的、让人厌恶的潜意识之外，什么都没有。先生们，那就像在动物园一样。真的，我可不是瞎编的。

基尔布（插嘴）有火吗！

奎特　（没理会基尔布）你在说些什么？

卢茨　你知道的。我们刚刚停产。我们生产的高端产品竞争不过你的大众产品。你的产品已经为人所熟知，而我们的产品，光是那些带六角形盒盖的立体包装就已经过于前卫了。消费者都很保守，他们对新

鲜事物的兴趣转瞬即逝，这是我们的火。对不起，说错了，这是我们的错。（看了基尔布一眼）

奎特　你们的产品刚上市的时候，我就立马把我们的产品列入了“被偷商品名单”。

科尔伯-肯特　什么叫“被偷商品名单”？

奎特　其实就是一整张的广告页，我们每周大量印发一次。上面列有十种“被偷窃最多的产品”。我们把这张单子以海报的形式同时发给各家店铺。各家商铺会专门搭个展示台，把单子上的产品都搁在台上，上面再挂上大幅海报，写着“本周被偷窃最多的商品”。这么做反倒大大促进了我的产品的销售。我总是把我的产品放到最显眼的位置。这个活动我一直在做，直到把卢茨打垮为止。说实话，我的产品就好像长在我心头的肉。我常常以亲切的眼光观赏着它们，把它们放在非常好看的四方形盒子里。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停止生产这种产品。

卢茨　你说什么？

奎特　这个产品很久以前就没有利润了。我之所以坚持了这么久，就是要打败你，不愿意让你觉得你们的产品比我的产品好。

冯·武尔瑙　了不起，奎特。很深刻的教训。但是从中我们也看到：为了将来，我们事先团结起来是多么重要。

奎特　不然你们为什么会在这儿呢？

冯·武尔瑙　就像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1]讲过的一样，企业家的责任就是要让一切事情运转起来。我们今天就是要让世界正常运行。

基尔布　有人来了。

冯·武尔瑙（没有理睬他）这是很重要的一天。我们愿意放弃自己的个人利益，这还是头一遭。我们已经单独行动得够久了。大家单独做计划，在可悲的孤立状态下观察着市场。每个人都无助地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单独定价。我们轻视自己不熟悉的东西，而且从个人角度

出发，观察其他人的营销策略。我们不懂什么是共同利益，却还为我们的自私沾沾自喜。我们必须改变这种情形，否则我们将不复存在。

［保拉·塔克斯冲进来。

奎特　保拉，我刚好想起您。

保拉　想我什么？

奎特　不是什么坏事。

冯·武尔瑙　请坐吧！（对其他人）对女士说“请坐”，这让我觉得很尴尬。（对着保拉）我们所有人都想您了。就连神甫都想了，不是吗？

科尔伯-肯特（开玩笑）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一直觉得好像哪儿的门没关。

基尔布　阁下，您的印章戒指失去了光泽。

科尔伯-肯特　亲爱的基尔布，你接着说。

［基尔布沉默了。

他每次只能说一句话。这种突然插嘴的习惯毁了他。

［保拉坐下了，她还穿着骑马服。奎特的妻子又进来了，她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保拉解掉头巾，甩了甩头发。奎特的妻子在跺脚。她走路的时候，高跟鞋卡进了地板缝里。她跳着返回去，很快地穿上鞋，试图优雅地走出去。基尔布朝她大吼了一声，她尖叫着消失了。

奎特　让人生厌的是：也许一分钟之前刚刚说好的事情，转过脸又改变了主意，然后整个过程完全变了样。

保拉　您这样看着我，好像是等着我问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奎特　待会儿记着提醒我，我还有些事情要跟您解释。

保拉　什么时候？

奎特　等会儿再说。

卢茨　我不想这么催大家，但是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办。昨天夜里，我久久难以入睡，最后不得不自我放松催眠——我先是像往常一样想象着大海，但是大海竟然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菠菜一样波光粼粼，大海上空挂着一轮朦胧的圆月，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月亮。

冯·武尔瑙　谈正事吧。我事先声明，我们这次谈话的内容必须保密。我发誓肯定会保密。（看周围的人）神甫也会发誓，不是吗？卢茨也会保证，对吧！奎特呢？点头了。塔克斯女士还在回味刚才骑马的事。那么，我们尊贵的客人呢？（转头看着基尔布）

奎特　汉斯！

[汉斯立马出现，搜基尔布的身。他摇了摇头——没有发现麦克风之类的录音设备。汉斯下。基尔布蹲在凳子上，脸冲着大家，模样就像只鸡。

冯·武尔瑙　我们不是狼，却有着狼的生存规则。自由竞争就是狼的规则，这个我们都有所体会。在一般人眼里，我们这些人只是坐在汽车后座里捏着雪茄吞云吐雾的怪物。在开车去往郊区的路上，本应该欣赏途中诗意盎然的景色，但是我们却意识到，现在的自己绝对不是我们曾经想要的那个样子。神甫先生，您不要摇头，您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是的，我们不仅仅是在扮演坏蛋的角色，实际上，我们本身就是坏蛋。尽管我每天吃的都是山珍海味，但其实我很长时间以来都不想这么胡吃海塞了，美味佳肴使我慢慢地只剩下一个空洞的躯壳，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看看你那些同事们在三星级饭店里吃工作餐，卢茨，他们吃饭的样子就好像是抢购打折商品一样兴奋。每年冬夏两次季节性打折促销活动能让家庭主妇们疯狂不已，而你的工人们却一辈子都处于这种疯狂状态，每到吃工作餐的时候他们就像一群动物！也许塔克斯女士会认为我这是草率的、不辩证的印象派看法，可我们

毕竟不是自愿变成现在这副嘴脸的。我最初的经历告诉我，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自甘变为非人。因此，当我必须做些不合天性的、让我害怕的事情时，我就老是这么安慰鼓励自己。

奎特　市场是不会通过价格竞争而扩大的，你是这个意思吧？

卢茨（看了看基尔布）反正价格战不能解决问题。大家心里有数就行了。

奎特　竞争就像一出戏，相互打压实在是幼稚的行为。我们联合起来打压小企业，一直压到他们只能啃老本。温柔的排挤手段代替了暴力。这使我想起小的时候，为了不让别人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先悄悄坐在那个东西上，然后若无其事地吹着小曲儿。

科尔伯-肯特　这儿可不是忏悔室，奎特。

奎特　我要说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产品种类过于庞杂，市场令人捉摸不透。谁在大量地生产商品？是我们中的某个人吗？荒唐。那是谁呢？当然是他们那些小企业。我们要让市场重新变得单一透明。

其次，当产品种类不再繁杂时，少数几种商品的产量却大涨。今天我吃早餐时看到报纸上说，黄油产量过剩，冷藏室都要被黄油挤爆了。真的是产品过剩吗？不是产品过剩，而是消费者的需求太少。我们就是靠这点可怜的需求而生存。

第三，需求太少的原因在于高昂的价格吗？对。而价格高居不下又是由于工人酬劳过高，不是吗？因此，我们必须减少劳资开销。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我们可以到别处寻找廉价的劳动力。比如去毛里求斯，那里有不错的劳动力市场，种植园的工作使一代又一代的毛里求斯人适应了辛苦的劳作。亚洲人灵巧的手指非常适合手工业制作。在这些地方生产出来的产品可谓物美价廉，这可是制胜绝招。此外，你们想想看，所有商品上都标着“毛里求斯制造”。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是多么渴望看到这种标签。我们亲爱的消费者难道不也是这样想的吗？总之，我们要以此刺激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同时对价格重新进行调整。

第四，我们应该时不时去大自然里走走，这样才觉得自己还具有人的天性。

第五，（对着冯·武尔瑙）我一直忍不住想擦干你那湿乎乎的嘴。（说着便用手帕在冯·武尔瑙的嘴上抹了两下）

第六，（对着基尔布）请你重复我刚才说过的话。

[停顿。

基尔布（动了动嘴唇，顿住了，又尝试着想开口，但是摇了摇头。他从凳子上跳到奎特面前）真有道理，就和这个一样。（基尔布揪住自己的两只耳朵，舌头就从嘴里伸了出来；再甩甩下巴，舌头就又弹了回去。企业家们都不做声，相互瞅着。）

卢茨　我们已经开始庆祝了吗？

奎特　我还没说完呢。

科尔伯-肯特　您刚才演的是哪出戏？不是认真的吧？实际上您不是……

奎特（打断科尔伯-肯特）对，实际上就是。

（对冯·武尔瑙）你怎么不说话？

冯·武尔瑙　我已经习惯了。可能你就是那类人，那类喜欢挤别人脸上脓包的人。

奎特（夸张地拍了一下脑门）没错，我刚才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不过现在我又恢复常态了。

冯·武尔瑙　真快，一转眼我都忘了你说什么了。好像你刚才还没说完。

奎特　重要的是，从现在起，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和其他人商量。如果我去购买原材料，却没有告诉你们货源，那么这就算背叛。如果卢茨在市场上推出新产品，是为了分走我的一部分市场份额，这就算

出卖。如果我们的神甫仅仅因为工人们都是虔诚的农家姑娘，就付给她们较低的工钱，并以此压低产品价格，这就叫背弃。如果您，保拉，让工人参与利润分配，并因此擅自提高产品价格，也是不守信用的表现。（对冯·武尔瑙）这样做还算合理吧？

冯·武尔瑙　塔克斯女士可能会有不同意见："我让工人们参与利润分配，是一种理智的做法，也许能够提高生产力。"

奎特（就像刚才的话真是保拉说的一样，转向她）只要您和我们一起提价，就不算是出卖。只要您和我有着共同的生活习惯，您便不可能出卖我。上香槟，汉斯。

［幕后砰地响起了开香槟的声音，汉斯迅速上。他手端托盘，上面放着香槟酒杯和正冒着气儿的酒瓶。他依次往杯里倒酒。奎特用嘲讽的口吻向大家介绍香槟和酒杯的质量："法国名贵香槟王唐·培里侬[2]，1935年的战前香槟。比德迈尔酒杯，手工吹制，杯身具有不同的厚度……"所有人举杯、碰杯，大家相互示意，喝着酒。基尔布一直坐着。在大家喝酒的时候，他突然短促地大笑了几声，但没人理他。他拔出旅行刀来左右把玩，最后刀尖朝下落在了地板上。大家对此无动于衷。他收起刀，又摆弄了几下吹弹式口琴。汉斯端着托盘下。基尔布起身，在众人脚前挨个吐了几口唾沫。他来到保拉面前，用手背托着自己的下颌骨，撅着屁股向前挺直了身体。人们还是容忍他的行为。他先后将卢茨和科尔伯-肯特举起来又放在别的地方，他们两人听之任之。他在舞台上走来走去，顺便轻轻踢了几个人的膝盖，他们都打了个趔趄。基尔布没有踢保拉，他像美国喜剧演员哈勃·马克斯一样，大腿挂在保拉身上。保拉不动声色地抓住他的腿，把它从自己身上拿开。基尔布将奎特晾在一边，只是斜眼瞟了他一下。基尔布开始发话了。

基尔布　那我呢？我负责消遣的部分吗？难道我是个听从所有人发落的牲畜？或者是条卷毛狗，看着你们和对方赤裸着上床？我可以咧着嘴追得你们在屋前花园里乱逃。我要用脓血涂抹你们那些冠冕堂皇的大话。我要把你们隐秘的软肋塞到真空包装里。我要用蜡烛把刚宰的鸡身上的毛根燎干净。瑞士人把这叫做"鸡皮疙瘩"。气氛！我要的

就是气氛！我的吹弹式口琴在意大利语中叫做“意念消散器”。我说话总是不动声色，亲爱的女士。您看，您的手纸掉出来了。

［他捡起手纸，放在保拉的手臂上。保拉面不改色地笑了。

如果你们着了火，我会把你们盖起来，直到你们窒息。如果你们所有人都冻死，我会坐在一旁，打着响指。恶毒，不是吗？……（愈发尴尬）从你们各自的荆棘丛里走出来吧，从生意场的魔咒中跳出来吧，一个自由人就在你们面前，他是榜样，是从图画书里走出来的理想人物。（像巴伐利亚跳拍鞋舞的演员一样，拍着手、大腿和鞋底，只是跳得不够快，略显笨拙）各位，高兴点！注意！要像马戏团表演时的气氛！不要只动口，动口就得动脑子。饶了你们的语言中枢吧！多动手，多来些肢体语言！（拿起香槟杯，似乎有些无助地让它脱了手，还假装条件反射似的，想抓住下落的杯子）别傻站着！就像一堆雕像！动起来！只有动起来，人们才能认出你们。庆祝就应该有个庆祝的样子！

［基尔布冲着保拉跳了几步舞，在她面前停住，开始解保拉衬衫上的扣子……他两手抱拳，往中间吹气，给自己鼓劲儿。然后他又像冻着了似的，把手放在胳肢窝里。没有人阻止他。他瞄了一眼奎特。奎特仔细打量着他，可是又有些心不在焉，甚至有点儿不耐烦。基尔布犹豫不决地把衬衫从保拉的马裤腰里扯出来。保拉只是笑。他似乎放弃了，退回来，艰难地做了个痛苦的拍手动作，并没拍上。这时，奎特跳起来。他抓住基尔布的手，想让他把保拉的衬衫拽下来。基尔布挣扎着。奎特的妻子上。她感兴趣地看着。奎特放了基尔布，亲手把保拉的衬衫拽掉。保拉不紧不慢地将双臂交叉于胸前。奎特的妻子下。奎特又把一个香槟杯塞到基尔布手里，而他自己则抓起剩下的杯子，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们狠狠摔碎在地上。他重复着基尔布说过的话：气氛，我要的就是气氛……把基尔布推到一边，直到他也迟疑地扔下杯子。奎特走到众人面前，往每个人脸上吐口水，又捡起一块玻璃碎片，朝基尔布走去。他扔掉玻璃片，从后面勒住基尔布的脖子，弄得基尔布前仰后合，然后将他推向别人。

基尔布（被勒住脖子不能动，想挣脱开来）您误会我了，奎特。您的所作所为毫无章法可言。一点也不美，缺乏品位又十分混乱。尤其和音乐搭不上边儿，它既没有旋律，又没有节奏。当初可不是这么约定

的。您难道不懂什么是玩笑吗？难道不能将仪式和现实区分开来吗？您要注意分寸，奎特。

奎特（把基尔布按在椅子上，拖着椅子在舞台上走）就是因为我有分寸，你才能活到现在，你这个投机倒把的家伙！现在，请你告诉我，我的分寸在哪儿？你这个自由放肆的东西！

［他把基尔布拖到舞台深处看不见的地方，走了回来。保拉镇定自若地下场。汉斯手拿簸箕和扫帚上。其他人整理衣着。所有人都笑了起来。奎特没有笑。汉斯把玻璃碎片扫成一堆。保拉穿好衣服上，抿嘴笑着。

冯·武尔瑙　我看，那个人现在该学乖了。

科尔伯-肯特　他可学不到什么，他没长记性。对不倒翁来说，落到地上还得再弹回去。他什么也记不住，所以也没什么可忘记的。被赶走的牛虻又会在原处卷土重来。和我们人类这种有史可鉴的生物不同，他不会瞻前顾后——塔克斯女士可能会这么说——他只会寻迹而来。我看，他就像一只无头苍蝇，一个四处乱撞的东西。田野上的麻雀居无定所，四处迁徙，这便是上帝的旨 意。我刚刚看到他骑着自行车，就像只动物一样在林荫道上狂飙。

奎特　您说话的时候别老盯着我，弄得我什么也没听进去。

冯·武尔瑙　唉，如今哪还有什么林荫大道了。我还依稀记得以前的林荫道两侧树木成排，在道路的尽头立着一栋庄园主的大房子，晨曦中窗户还比较昏暗，只有佣人居住的阁楼天窗已被照亮；落叶窸窣作响，刺猬悄悄爬过我们的脚旁；白天，空气静止不动，一丝风都没有，垂死的病人在反省中宁愿死去；突然一声脆响，猎枪打爆了树上的一颗栗子，我们把猎枪扛在肩上，回头向家的方向望去，然后悄然潜入猎区中央。是啊，我们这位小股东先生是一个柔弱的家伙，柔弱得就像小偷行窃时蹑手蹑脚地拉开别人的抽屉，又像谋杀者行凶前小心谨慎地抚摸刀刃看是否锋利。

卢茨　您说的话如此高雅，冯·武尔瑙，令我羞于讲出自己的笑话。

冯·武尔瑙　我命令您讲。您刚才看起来一直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卢茨　两个人彼此相爱，他们爱得如此焦灼，就像是人们有时急于吃一块蜂蜜面包似的。他们完事之后——（看了一眼保拉）噢，请原谅。

冯·武尔瑙　塔克斯女士本来就没听进去。再说了，她也不会在意，还可能把这个猥琐的笑话当作我们性欲的真实写照，不是吗？请您接着讲吧！

卢茨　他们完事之后，男人马上站了起来。“噢，”女人说，“你刚结束就把我丢下，这算是爱情吗？”“可是我已经数到了十。”男人回答。

［大家笑了一下，或许根本就没有笑。冯·武尔瑙、卢茨和科尔伯-肯特准备离开。只有汉斯还在清扫玻璃碎片，他跪在地上窃笑了一会儿。那几位先生转过来看着他，他起身，仍然窃笑着从他们面前走过。

冯·武尔瑙　奎特，我们相信你，就如同你信任我们一样。忘记你刚才的感性吧！感性对我来说是形容安全套的字眼。

［三个企业家下。

奎特（对着保拉）您不走？

保拉　我想提醒您，您刚才打算跟我解释些什么。

奎特　我刚才只希望您能留下。现在您可以走了。

［停顿。

［保拉又坐下来。

［停顿。

我发现，我偶尔对您产生的想法有多么恶心。一分钟前，我想的可能只是您的名字。可是您忽然变得有些特别。我想站起来，想把手伸到您的大腿中间。

保拉　您是在说我，还是在说某个东西？

奎特（短促地笑。停顿）我要说：是你，你这个东西。今天我总是蠢蠢欲动，想做些什么。我害怕做这些事，可它们却深深地吸引着我。您一定知道那个在葬礼上大笑的故事。还有一次，一位陌生的女士坐在我对面，我们对视了很久，直到我燥热起来。忽然，她向我伸出了舌头，不是调皮地从唇间伸出舌尖，而是把舌头吐出来，几乎露出了舌根。整张脸看上去像一张恶心、丑陋的鬼脸，她就像要把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吐出来似的。打那时候起，我也想着能够把舌根都伸出来。可我往往只能在头脑中自由地幻想，激起那么一丁点儿的冲动。幻想一般是从解开某个陌生路人的鞋带或者扯掉他的鼻毛开始的，而在公众面前拉开裤子拉链则是幻想的尾声。

保拉　是不是应该谈一谈咱们的约定了？

奎特　可是我刚到兴头儿上，刚才的话才是我真正想说的。之前，说话只是嘴唇一张一合的运动，我必须努力调动起肌肉来，可还是下巴生疼，脸颊酸痛。我现在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保拉　您信天主教？

奎特　请认真听我说。

保拉　您说话的调门就像是大众代言人似的，自己经历的事也想让我们所有人都经历一遍。为了让我们这些顽固不化的人认同您的看法，您恨不得把自己累得趴下。我还是希望做我自己。您的感伤正在感召我冷漠的心；您希望有更多的拥护者，这也让我明白，我还没有被您唤醒。您的所作所为像是在宣布，自己的时代终于到来。而那位曾经甘于忍受生活的奎特已经成为过去。您已经忍受够了，伙伴儿。您的态度如此坚决，简直令人生疑。您不在乎历史对您的评价，对我来说，您几近垂暮。

奎特　可我希望，当人们谈到我时，即便那是最后一次，他们口中的我仍是真实的我。否则我最终的形象将是刻板、机械、千篇一律，毫无特点可言。有一次我从家里出来，几个小孩冲着我大叫："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是谁！"孩子们幸灾乐祸地叫着，就好像他们认出了我，是我的一件糗事似的。另外，您刚才就像讲故事一样表达了您对我的抽象看法，我觉得非常无礼。

［停顿。

保拉　您先坐下。

奎特（坐下）

［停顿。两人相互看着对方。

保拉（扭转视线）是啊，我这身打扮也令自己头疼不已。真不知道该和您说些什么，但我还是想开口。

［停顿。

灯光昏暗，坐在这里很舒服。我刚才什么都没想，这样也很好。

［停顿。

您想来点儿炼乳吗？我忽然很想要点儿。

［停顿。

（说着话，好像想对某个话题避而不谈）我的工人不可以看到我这样。我经常买大众货，穿着要舒服得多。另外我忽然想到，从现在起咱们要一同设计广告。我的宗旨 是，不人为制造消费需求，而是唤醒人们潜意识里的自然需要。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此，那些只介绍产品的广告词实际上就是唤醒人们需求的一种宣传。与产品情况不符的广告是严禁出现的，否则会误导消费者，使他们对产品的本质属性产生错误的认识。这是欺骗和蒙蔽，产品本没有那些作用。这也是人们经常指责我们的原因。产品本身的存在就已经足够理性了，要不然，我们这些理性的人是不会采用理性的材料和理性的生产

工艺再请理性的工人将其生产出来。如果广告不骗人，而是准确地介绍我们理性的产品，那么广告也会变得理性。您看看那些社会主义国家，那里没有一件非理性的商品，可它们同样需要广告，因为理性的广告是必要的。通过这些广告，理性也被传播开来。对我来说，广告是唯一的唯物主义诗篇。由于意识形态不同，许多东西都离我们远去，而广告这种人格化的体系又重新让我们和这些东西变得熟悉起来。广告赋予物质世界灵魂，使它充满人性，从而令我们找到回家般的亲切感觉。我要告诉您，当我在老旧的风火墙[3]上看到几个大字——“您的鞋需要艾达[4]”——时；当我看到洗衣粉广告的背景是大大的太阳时，我是多么感动！我的情感也因此变得伟大。而二十年后的今天，同一种鞋油的广告词——“经受喜马拉雅的考验”——让人感觉庸俗拙劣，我的情感也随之支离破碎。我抛掉生产者的情绪，用纯粹的眼光审视着画册里的广告，它们带来的气氛和情调是那么可笑。虽然它们仍然能使生活变得容易，可那却是一种具体的、理性的东西，它们和市民口中流传的广告语完全不同。请您想想看，广告作家写作时要比诗人更有尊严，更先进！当诗人独自念叨那些无形的东西时，广告作家在小组里分工协作，描绘着有形的物体。只有广告作家才是有创意的作者，他们想到的东西都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最近我们发现，我们某种产品的宣传语有些问题。标有“轻纤汤勺”的商品，销售量低迷。我们小组的一位成员终于有了主意，他把“轻纤”改成了“强劲”。“轻纤汤勺”变成了“强劲茶匙”，销量猛地提升了近两倍。

［汉斯踩着最后一句话上场，打开灯。

奎特（对着汉斯）我们不需要灯光。

［汉斯关灯，下。

保拉　我听到我的手表滴答作响。

奎特　您一定买得起无声手表。不过，这或许和手表没有关系，而是牵扯到一段记忆。请您将往事回忆。

［停顿。

或者不去回忆。

保拉　一个孩子站在您面前唱歌，如果您对他说："真棒，继续！"那么他就会停止歌唱。可是当您说："停下！"他却继续高歌不已。

奎特　有的女人，她们……

保拉　别说了，没有用的。

奎特　有的女人是碰不得的，一旦碰了，就会给她们留下伤痛的回忆。一条项链便有了故事。每次抚摸脖颈，都成了对往事的重温。这个女人的一切都完了，别人和她在一起所做的事都会令她想起过去。没人能向她讲述什么，她心不在焉的一个点头就能马上打断对方。在如此深刻的回忆面前，这个女人的内外都不会受到影响。神秘而又有些欲言又止的冲动使人飞快地换上另一副面孔，它早已让女人认清了这种冲动。大家都知道性爱杀手的故事：一个人只有切腹才能博得对方对自己应有的注意。妓女不让人抚弄她们的头发，怕把发胶弄掉而乱了发型。

保拉　您只是在描述这件事，而它的原因是什么？谁负有责任？谁又任其存在？这样对谁有好处？您没有分析原因，而是从中取乐。这也算是它存在的一个原因。对整件事的描述成为了男人们的笑话。冯·武尔瑙没准儿会说："塔克斯女士可能会把它评价为非辩证的印象主义。"

奎特　而您呢？您只注意找寻内因而忽视了表象。从一开始您看见的便不是事实，只是原因。当您想解决内因，从而改变某种现象时，这种现象早已变了身，您必须再去处理其他动因。就像您现在看着我时，请注意我这个人，而不是我的种种动因。

保拉　您有一支漂亮的领带夹。您的衬衫簇新，都能看到包装时大头针留下的小洞。您正在咬磨自己的颌骨，说明您争强好胜。纤细的手指就像是弹钢琴的。您耳垂上仍有剃须泡沫留下的痕迹。当您想装得像个坏人时，您的裤脚却出卖了您。

［奎特起身，拽起保拉。保拉夸张地用双臂拥抱他，一条腿放到他的胯上。保拉仰起头，嘲讽地叹了口气。奎特立马放开她，离开。保

拉追逐着他，动作幅度很大。奎特站住，向她走去。她却退缩。奎特反过来开始追保拉。然后两人各自转身，站定。

奎特　请您别再这么不近人情。有一次，我送给别人一板巧克力，因为他有个小孩子。巧克力分成许多小块，上面画着童话故事，每块的主题都不相同。“噢，”孩子的父亲遗憾地说，“不是拼图玩具！”他继续说道：“巧克力生产者使想象力变得匮乏……”听到这话，我马上离开他，远远地站在一旁，觉得十分孤独。在孤独面前，我只能低头看着地板。请您不要再这样了。

保拉　是您先开始的。

奎特　您看到从那面墙里伸出来的钉子了吗？

保拉　是的。

奎特　它很长，不是吗？

保拉　很长。

奎特　您的头有多坚固？

［停顿。

保拉　我还是把灯打开吧。

［停顿。

奎特　今天有人按我的门铃。我十分好奇，就亲自去开了门。还是那个卖蛋的，他每周都会挨家挨户地送一趟那所谓的农家货。每次都是在同一个时间，可我忘了这一点。当时我真想冲他嚷嚷，“难道就不能是别的人来按门铃吗？”

［停顿。

保拉　如果我变成了别人呢？

［奎特向她走来。保拉没有退缩。

奎特　前不久我刚刚看了一部无声电影。没有背景音乐，电影院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偶尔，当电影里出现一处奇怪的画面时，几个孩子的笑声会从某个角落里传来，然后又很快沉寂下去。我忽然有了死亡的感受。这种感受是那么强烈，我不由得叉开了双腿，摊开了手掌。这又是由何种社会条件引起的呢？您能为我解释一下吗？这种症状以某人的名字命名了吗？如果有，那个人是谁？

保拉　我不知道它是由何种情况引起的，不能为您解释。这种症状绝对属于您本人，而且也仅限于您本人。这种个例不值得探讨。大众有其他的烦恼。

奎特　大众的烦恼会消失吗？

保拉　会，因为产生烦恼的环境也会消失。

奎特　到时候，大众可能会产生同我一样的烦恼，这种烦恼不会烟消云散。

［奎特妻子上，手里拿着一本画报。

奎特妻　奥地利戏剧家，已逝世，姓氏由七个字母组成，姓什么？

奎特　Nestroy[5]。

奎特妻　不对。

奎特　水平方向还是垂直方向？

奎特妻　水平方向。

奎特　Raimund[6]。

奎特妻　啊，对呀！

［奎特妻下。

［停顿。

保拉　手表——它可不是什么纪念品。

［停顿。

我还是那么不近人情吗？

奎特　我现在不会告诉您，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保拉　您在想什么呢？

奎特　真好，您还能问我。但您为什么不能主动地、发自内心地问我呢？我渴望被您问及。是不是我用头撞地，您才会关心我？（趴在地上，真的用头撞了几下地面，然后马上起身，向保拉走去）我想抓住世界，把它吞噬掉，所有的一切，我都难以触及。而我也令人无法触及，所有的东西都绕我而行。我经历的每件事都会渐渐归于死一般的自然，在那里我什么也不是。我可以直面它，就像刚才直面您一样，那好比尚无人类的远古。我幻想着海洋，幻想着爆发的火山和天际古老的山脉。但是这些想象对我来说根本不起作用，在这些震撼的幻景中我甚至不曾有过一丝的战栗。现在，当我凝视您的时候，看到的只是您自己，没有我在一旁。我看到的不是过去的您，也不是和我在一起的您。这有些不近人情。

保拉　请您原谅，我无法集中注意力。（上前一步，两人的身体挨在一起）你[7]到底在想什么？

［停顿。

奎特　你是知道的。

保拉　可能吧！但我想从你的嘴里听到。

奎特　现在我觉得自己足够坚定，能够不再跟你说什么了。

保拉　（退后）这里只有我们俩。

奎特　我孤身一人，你孤身一人，何谈“我们”。大家共同约定的计划提到了“我们”，可我不想把它挪用到此处指代你和我。

保拉　此时此刻难道不在计划之中？

奎特　你能不能有一秒钟不提什么计划？

保拉　是你的不耐烦逼我这样做的。

［奎特把保拉推倒在地。

［保拉躺在地上，用肘部支起身体。然后站了起来。

奎特　你爬起来的样子多美！

保拉　我想走。

奎特　汉斯！

［汉斯上，臂弯里搭着一件长长的皮大衣，他走错了方向。

奎特　我们在这儿。你刚才走神儿走到哪儿了？

汉斯（帮保拉穿上大衣）刚才一如既往地想到了您，奎特先生。只是因为我刚从外面光线充足的地方进来。

保拉　汉斯，你帮别人穿大衣还真有一套。

汉斯　奎特夫人也有这么一件。

保拉（对着奎特）我想和你说说关于我的事儿，奎特。但只有在不被问及的情况下，我才愿意倾诉，自然而然地倾诉。你发现了吗？我是第一次主动说起自己的事。刚才你妻子走出去时，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在舒这口气的瞬间……请不要笑。

奎特　我没笑。

保拉　在舒气的瞬间……请不要笑。

奎特　我马上就要忍不住了。

保拉（大声地）舒气的瞬间，爱情来了。

［奎特大笑。

［保拉下。

奎特（对着汉斯）什么也别说。

汉斯　我什么也不说。

［奎特的妻子走进来，打开了柔和的暗灯，坐下。给汉斯一个信号，让他离开。

奎特　你还没打扫。

［汉斯开始收拾东西。

奎特（对着妻子）今天一天都干什么了？

奎特妻　你看到了，我进进出出，来来去去。

奎特　在城里怎么样？

奎特妻　人们尊敬我。

［汉斯下。

奎特　有什么新鲜事？

奎特妻　我偷了这件衬衫。

奎特　重要的是，你没被抓到。还有什么新鲜事？

奎特妻　我走走停停，逛来逛去。你为什么不坐下？

奎特　你气色不太好。

［停顿。

奎特妻　是的，不过总算是晚上了。

［奎特妻子起身，快步离开。在她还没下场前，奎特就已经坐下了。

［奎特独坐了一会儿。其间，城市的轮廓被完全照亮。汉斯回来，手拿一本书。奎特抬起头。

汉斯　还是我。

奎特　告诉我，汉斯，你到底如何生活？

［汉斯坐下。

汉斯　您一张嘴，我就知道您要说什么。但我不忍打断您。算了吧！

［停顿。

奎特　不要总是看着我的眼睛。

汉斯　每次，当我想对您献殷勤时就会这样。

奎特　给我讲讲你的事。

汉斯　您指的是什么呢？

奎特　你不明白吗？我对你的故事很好奇。当你想说话却只能呐喊的时候会怎么做？你难道没有浑身乏力、只能躺着想事儿的时候吗？当你思考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时，满眼看到的会不会都是汗水浸透的钱？给我讲讲你的事。

汉斯　其实您是在问您自己。

［停顿。

奎特　我那卑微的意识为什么只能在广阔的世界里如此做作地尖叫，而不能做别的事？（呐喊）为什么不能做别的事？我很重要，我很重要，我很重要。你现在为什么不再看我的眼睛了？

汉斯　因为在您眼里我看不到什么新鲜的东西。

［停顿。

奎特　请给我朗读吧！

汉斯（坐下，开始朗读）[8]一天，午饭过后，暴风雨正猛烈地袭来，骤雨像钻石一样，颗颗打在湖面上，激荡起小小的水泡。“我不久就要离开你了。”叔叔说。维克多没有做声，他只是听着，听叔叔接下来要讲些什么。“到头来一切都是枉然，”叔叔缓慢的声调再次响起，“一切都是枉然。年轻人和老人在一起不合适。中用的时日不久就都会消逝，它们早已日薄西山。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它们拽回到岁月的首页，而首页上的种种已成往事。”维克多深受震撼。老人宁神安坐，闪电的光芒在他的脸庞上闪烁。电光时而闯进昏暗的房间，老人灰白的头发里像有火苗流过，一道白光点亮了他落寞的皱纹。

“噢，维克多，你知道什么是生活吗？你了解那种催人老去的东西吗？

“我怎会知道，叔叔。我还如此年轻。”

“是呀，你不知道，也不会知道。当人们还年轻的时候，生命是那么的漫长，无法度量。人们总认为面前有太多的东西，而自己才走了一小段旅程。所以，他们把这个或那个推到一旁，打算以后再重新捡起。可是当人们把它捡起来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老去。从起点眺望，生活是一片未知的田野；从终点回望，生活竟然不如两个脚背宽广。它是个熠熠发光的东西，它如此美丽，让人情愿跌落进去，永永远远。而衰老是一只傍晚的蝴蝶，恼人地在我们耳边搅扰。人们想撒开双手，止步不前，因为他们错过了太多东西。一位老人站在由许多经历构建的小山上，可是这些对他有什么用？我做过许多事，却也没留下什么。如果生前的所作所为不能在盖棺后继续流传，所有的一切便

会瞬间崩落。一个人老去之时，还有儿子、孙子、重孙围在身边，他往往就会存在一千年。同一种生活多姿多彩，人们前行，而生活仍然一如既往，人们不会意识到，生命的一小部分已经离去，不会回来。我之所以成为我的一切，随我的逝去而崩塌。”说完这些话，老人沉默了。他和往常一样，把餐巾折好，卷成一卷，放在专门箍餐巾的银环里。他又把各种瓶子整理好，把奶酪和糕饼放在盘子上，盖上各自的玻璃罩。可他并没有像以往那样，把东西从桌子上收拾下去，而是就那么摆着，自己坐在它们面前。其间，暴风雨已经过去，它带着温和的闪电和几番虚弱的雷鸣落到东边山巅的背面。太阳挣扎着升起来，逐渐把山上的城堡染得火红。第二天拂晓，维克多拿起手杖，手臂上挂着背包一头的肩带。绒毛狗好像什么都明白，高兴地在一旁跳来跳去。早餐在无关紧要的谈话中结束。维克多起身，背起背包，脸上带着准备启程的表情。“我送你到围栏那儿。”叔叔说。老人走到隔壁房间，他一定是按下了弹簧装置或者什么仪器，因为维克多马上就听到了围栏的叮当声。窗子也慢慢地自动打开，维克多看着窗外。“好了，”叔叔边说边走出来，“准备好了。”维克多拿起手杖，戴好帽子。老人和他一起走下台阶，穿过花园，来到围栏前。两人一言不发。在门口，老人停下。维克多凝视着他，明亮的眼睛里泪光闪闪——这是情感至深的见证。他忽然俯下身，用情地亲吻那满是皱纹的手。老人发出低沉而又难以言明的声音，就像一声啜泣，他把少年推出了围栏。两小时后，少年来到阿特马宁。他从昏暗的树林中走出来，偶然间听到了一阵钟声，钟声丝丝滑入耳间，没有什么音调能比它更加甜美，因为维克多已经好久没听到过钟声了。市政厅前，牲畜贩子驱赶着身披棕色皮毛的漂亮的山区动物，他们把动物从山区赶到了平原这里。小酒馆挤满了人，因为今天正好有周末市集。维克多似乎对此期待已久，今天他终于回到了尘世。当他再次从人群、马路和有趣的活动中走出来时；当他发现平原上点缀的那些线条柔和的小丘在自己面前无限伸长、延展时；当他看到远处的山峰像一顶蓝色的桂冠飘浮于身后时，他的心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狂跳不止，催促着自己越过天边那条遥远而模糊的地平线前行，前行。

[停顿。

奎特　真棒，这把沙发椅还有个垫子。

[停顿。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过去，在19世纪，即便人们毫无探索精神，但至少还有对它的记忆和渴望。这样人们就可以装模作样地表演给别人看，正如故事里讲的那样。因为人们如此严肃、耐心而又认真地模仿，就像一名饭店老板——斯蒂夫特本人就是一名饭店老板，也许就真的产生了这种感情。毕竟人们相信所表演出来的东西是存在的，或是可能的。我只是映射过去的事，把严肃的正经事立刻当作笑话来讲，玩笑当中最多也只是把我个人的消息说漏了。不过，只有在说漏嘴的时候才知道还有我个人的信息存在。自此之后，关于我个人的信息就产生了。以前人们想要看到全局，现在我却只想看到细节。“呵！你这个长着大耳垂的家伙！”我忽然脱口而出，我本该与这个引起我注意的人谈话，而我却从后面踩他的脚后跟，以致他的鞋都掉了。我是多么想充满激情啊！冯·武尔瑙和几个女人在拂晓时分赤裸着泡澡，并在水里一直吼着大学生歌曲。这是有关他的个人信息。我还会一不留神把过去几百年的龌龊事说漏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才开始从商。听到电话的第一声铃响我就去接；当身后的车门打开的时候，我说话会更快。我们制定共同的价格并忠实地遵守。我忽然想到，我在玩一些不曾有过的东西，这就是区别。这也是绝望！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我将违背承诺。我会把他们的价格连同他们一起毁掉。我会把我已经过时了的自我感觉当做生产工具。汉斯，我从自己这里还没有得到过什么。他们会用冰冷的手冷却发热的头脑，接下来头脑也会冷却。这将是一场悲剧，一场商战悲剧。我会是这场悲剧中的幸存者，还有我在这笔买卖中的资本，这只会是我，我自己。我会不小心说漏嘴，这些信息会淹没在百年的龌龊之中。有闪电，看来我的设想将会成为现实。

［雷鸣。

汉斯　这一切我无法理解。

奎特　晚安。

［汉斯下。

［奎特捶打自己的胸膛并发出人猿泰山般的怒吼声。

［停顿。

［他的妻子进来，走到他面前。

奎特妻　我有话想跟你说。

奎特　不要跟我说话。我还不想从自己的世界里出来。现在我就是我自己，只能和自己对话。

奎特妻　可是我有话想跟你说，求你了。

［停顿。

奎特（忽然很温柔地）那就说给我听听。（搂住她的腰，她在他的怀里扭动着）跟我说说吧。

奎特妻　我……这个……因为……嗯……（轻咳）……你……不是真的……（犹豫地笑）……这个，那个……这个秋天……像一块石头……那个沙沙作响……这些菊石……还有鞋底的黄泥。

［她双手掩面，舞台渐暗。

第二幕

城市的轮廓。上一幕放沙袋的地方现在吊着一个大气球，慢慢地漏气，起初并不引人注意。曾经放着一排座椅的地方换成了一个闪着亮光并慢慢融化的大冰块。旁边有一个玻璃面盆，里面装着一块正在发酵的面团，灯光照亮了面盆。一架钢琴。背景中是一块深色的长方形岩石，上面刻着几行字，字迹慢慢地褪去："我们最大的罪恶——缺少耐心"、"最糟糕的东西存留了下来——最后的希望。"旁边是儿童画。舞台灯光同前一幕。

汉斯躺在一把旧躺椅上，身穿和之前一样的衣服睡着了。睡梦中还嘟哝着，笑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奎特从幕后走来，边走边搓着手。不时地跳起舞步来。吹着口哨。

奎特　我有多长时间不吹口哨了！（哼唱着。哼着哼着，便产生了说话的欲望）嗨，汉斯！

［汉斯从睡梦中跳起，伸手要帮奎特脱掉外衣，尽管奎特并没有穿外衣。

你睡觉也忘不了为主人服务。刚刚我在独自哼唱的时候，忽然感觉到难以忍受的孤独。（端详着汉斯）现在你又来打扰我了。你梦到我了吗？噢，还是算了吧！我对此没有兴趣。（继续吹口哨。汉斯也一同吹起来）别吹了。你跟着一块儿吹让我很扫兴。

汉斯　我做梦了！真的，我做梦了！我梦到了一本袖珍日历，日历纸分为毛糙页和光滑页两种。毛糙页上是我的工作日，光滑页上是我休息日。我成天在日历页上滑行。

奎特　做梦吧，你这个梦想家，做你的梦吧——只要你解不了自己的梦，你就做吧。

汉斯　如果这梦本身就有解呢？就像刚才的梦中日历那样。

奎特　你在说你自己。怎么会这样？

汉斯　您传染我的。

奎特　我如何传染你的？

汉斯　通过您个人的表现以及您因此所取得的成功。我忽然发觉我缺了些什么。当我考虑这个问题时，我意识到我缺少一切东西。我头一回觉得我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而且是为了和别人比，比如说跟您比。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比较，于是就开始做梦，分析自己。您刚才正好打断了我的梦，这个梦很重要。（又坐下闭上了眼睛，摇了摇头）可惜啊！结束了。在做梦的时候，我感受到与万物产生了新的联系。（对着奎特）我早就不想再被迫摇头了。

奎特　我似乎应该早些把你唤醒。那样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些想法了。你想离开我吗？

汉斯　正相反，我想永远待在这儿。我还有很多地方要向您学习呢。

奎特　你想和我一样吗？

汉斯　必须的。最近我强迫自己学您写字。我不再斜着写字，而是正着写。这就像是让一个弯了一辈子腰的人站直一样。但是也很痛苦。另外，当我叉腰的时候，再也不会这样（大拇指朝前，其他手指朝后）而是像您那样，（其他手指朝前，大拇指朝后）这会给人更多的自信。最近我也学您站立的样子，（站起来）一条腿直立，另一条腿稍息。感觉很不一样，很放松！只有当我购物时，比如去肉店买肉，我的两条腿会紧紧有力地并在一起，丝毫不挪动。这会给人留下绅士般的印象，于是我总能买到最好的里脊肉和最新鲜的牛肝。（打了个哈欠）您注意到没，我连打哈欠也不像从前那样不拘礼节了，而是像您那样尽量合上嘴。

奎特　也就是说，你会继续为我工作？

汉斯　因为有一种力量驱使着我，要像您那样自由。您拥有一切，只为自己生活，不必拿自己与别人作比较。您的生活充满诗意，奎特先生。众所周知，诗意树立权威，这份权威不会压迫任何人——更多时候是自由压迫着我们。从前我喜欢用舌头舔邮票，再把它贴在信封上，如果旁边有人在看着我，我会感觉就像当众被抓住一样。现在，要是有人喊我男仆，我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我可以镇定自若地抬着垃圾桶走在人行道上；我还能够旁若无人地挽着相貌极其丑陋的女人，与她并排行走；做分外的工作时，我可以毫无怨言——这是我的自由，这一点是我跟您学到的。从前我很羡慕您有能力买得起很多东西，我觉得自己不是汉斯，而是被当成小厮——您注意到我的自由了吗？我已经会玩文字游戏了！我曾经斥责您是吸血鬼，不把您视为人，而把您看成资本家。那时我是如此不自由。现在我一想起您的样子，首先就想到您的表链悬在肚皮上方，就像一条弯弯的曲线，充满了自信，我已深深为之所动。

奎特　听起来很熟悉。

［汉斯笑。

奎特　你是在嘲笑我吧。我本以为有你这样经历的人肯定会一成不变，但是你却不是这样。不会变的是别人，你还是变了。

汉斯　您是在蔑视自己吗？奎特先生。现在您已经把所有的产品都倒手卖出去了。

奎特　蔑视我自己？不。我也许会蔑视像我这样的人。

［长时间的停顿。

你倒是有点反应啊！刚刚你什么都不说的时候，我忽然想收回我所说的话。并且我的身体深处有一股劲在用力吸着，像是也要把我收回去似的。

［长时间的停顿。

你嘲笑我的语言。我倒是宁愿像新近戏剧中那些普通人一样，用沉默来表达自己，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你至少会同情我。说话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我必须得忍受这种折磨。在你们看来，只有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痛苦的人才是值得同情的。

汉斯　您究竟想怎样被同情呢？即使您在痛苦时说不出话来，您的钱也会为您说话，钱就是事实。而您，您只是一种意识。

奎特　（讽刺地）我之所以会提到同情，是因为那部剧中的人物感动了我。并非因为他们无言，而是因为他们原本希望以这种似乎非人性的无语方式善待彼此，正如我们这些观众，虽然生活在更加人性的环境中，但我们与他们并无二致。他们也想要温柔，也想要二人世界等等。只是他们不能言说，所以相互施以暴力和谋杀。这些在非人环境中生活的人在舞台上表现的是终极的人。我喜欢这种矛盾。我想在舞台上看到人——蜷缩着的、有灵性的、将痛苦和快乐统统流露出来的人，而不是一群怪物。这些生命吸引着我——手无寸铁的人、身份低下和被侮辱的人。人，你理解吗？那是真正的人，是我能感受到的活生生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人！就是……人！你知道我是什么意

思吗？不是纸风筝，而是（考虑良久）人。你明白吗？人！我希望你能理解我所说的话。

汉斯　我刚睡醒，还不明白您讲的这个笑话。不过，假设您真的以为必须有另外一种可能，要么是纸怪物，要么是人，那就太可笑了。

奎特　什么？

汉斯　我不知道。

奎特　为什么不知道？

汉斯　正是我的不知道才是希望所在。另外，作为局内人，我可以说：每当舞台上帷幕升起时，我就没有勇气去思考，因为这又要触及到人性的问题。让我们接着假设：您是认真的，也许舞台上的人感动了您，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人，而是因为他们展现了真实的事物。打个比方，如果我们从某人的画像中能够认出原型，一般来说，我们会对画中的人物产生少有的同情心，而不会对现实中的原型有任何同情。这跟您看的戏剧不是一回事吗？您同情剧中那些无言之人，又在现实中瞧不起他们？那么您又为什么要去看这些对您来说已经逝去了的、陌生的舞台形象呢？

奎特　因为我想回忆过去的那段时光，那时我过得还不好，而且也无法表达自己。最主要的是，我这张被伪装的脸已经坐在了观众席中。我期望在舞台上看到其他毫无伪装的脸。还有，我去剧院是为了放松自己。

汉斯（笑）您可真能开玩笑。

奎特　是真的。（笑。两人都笑了）

汉斯　您瞧，真实的人来了。

奎特妻　你们是在笑我吗？

奎特　还能有谁？

奎特妻　你们在说我什么？

汉斯　没什么。我们只是在笑您。

［奎特的妻子也笑了。她捶了奎特的肩，并用拳头敲打他的肋骨。

奎特　我们一下子都很高兴，不是吗？

汉斯　那是因为您的生意好，奎特先生。请您给我一枚硬币。

奎特　给！

［他想把硬币放到汉斯伸出来的手里，但是汉斯把手缩了回去，并把另一只手伸了出来。奎特准备把硬币放在这只手里，但是汉斯又重复了上次的动作，把第一次伸出的手伸了出来，以便顺着奎特的动作。当他意识到奎特要……他又伸出来第二只手。与此同时奎特又准备把硬币放到汉斯第一次伸出的那只手里。就这样来来回回，直到奎特把钱拿走。他走到钢琴前并很快地弹奏起了舞曲。奎特的妻子拽来汉斯，和他跳起了舞……接着奎特忽然弹起了一支缓慢而忧伤的布鲁斯蓝调舞曲，并唱了起来。

有时我在夜里醒来

我打算在第二天做的一切

显得如此可笑

多么可笑地扣上衬衫纽扣

多么可笑地注视着你们的眼睛

多么可笑的啤酒杯里的泡沫

多么可笑地被你爱着

有时我清醒地躺着

我所想象的一切

都那么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地想站在卖香肠的小摊边

不可思议地想着新西兰

不可思议地想着过去和未来

不可思议地活着或死去

我想恨你并恨着人造革

你想恨我并恨着烟雾

我想爱你并爱着丘陵的风景

你想爱我并拥有最爱的城市、最爱的颜色、最爱的动物

都远离我吧

在我死后

我曾经叹息着想象的生命

其实就是我身体上的气泡，

当它们破碎的时候发出一声声叹息

［停止歌唱。

现在我们都感觉很好，不是吗？我曾经看见阳光下走着一个妇人，她提着装满了东西的购物袋，当时我就知道：我再也不会出什么事了。我听到一位老妇人说："我还从来没有吃过带茎的香菜。"接着她又说："得了，我看还是别买了！"我再也不会出什么事了！我再也不会出什么事了！

［继续歌唱。

没有一个梦

能够让我看到

比我所经历的事还要陌生的事

也没有什么草

是为了打破宁静而生长

［又说道。

我每天早上从我的裤裆中掏出我的小东西等待排尿，这是我在无眠的夜晚无法想象的。

［冯·武尔瑙、科尔伯-肯特和卢茨一言不发地出现。奎特的妻子要走。

奎特　别走。

［奎特妻子下。汉斯也下。

［停顿。

奎特　你们来啦。

［停顿。

难道我们不想舒服点吗？

［停顿。

你们想喝点什么？清烧酒还是白兰地？

科尔伯-肯特　不，谢谢。现在喝酒还太早。

奎特　要不来点果汁？新榨的。

科尔伯-肯特　我的胃 受不了这个。胃 酸太多了。

奎特　那至少也要吃点咸饼干棒，或者小熏鱼？

卢茨　谢谢，我们真的不想吃什么。真的，不要麻烦了。

奎特　你嗓子哑了。让汉斯给你沏些甘菊茶。

［卢茨摇摇头。

是我自己从地中海那里采摘来的甘菊花。全都是花。

卢茨（清清嗓子）已经没事了，我什么都不需要。

奎特　您呢，阁下？来点儿薄荷片吧？百分之百的纯薄荷。

科尔伯-肯特　我也什么都不需要了。

奎特　难道让我来喂您吗？

科尔伯-肯特　平时我喜欢含薄荷，但是今天就算了。

奎特　为什么偏偏今天不呢？又不是星期五，您说呢？

科尔伯-肯特　没什么，只是不想。

奎特　难道您要拒绝我？

科尔伯-肯特　如果您这么理解的话。

奎特　我生气了。

［奎特出去了。科尔伯-肯特准备拦住他。冯·武尔瑙示意他算了。

冯·武尔瑙　我知道。我能用鞭子抽掉他的头，再把这个没头的家伙扔到桌子上去。我刚才都咬牙切齿了，以致牙都有了裂纹。（龇牙）

叛徒、无赖、傻瓜！我要平静一下，我的手甚至都发抖了，这是我从不曾遇到的情况。这会儿又完全没事了。你们看！（伸出手）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理智。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说，首先要尽可能地理智，当他不再需要我们的理智时，我们就尽可能地不理智！我现在就盼着对他做出不理智的事情。（做出践踏、欺辱和扼杀的姿势）

卢茨（打断他）正是这样。我们应该像您刚才那样，冷静一会儿。没准儿到时候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把我们头脑里的想法说出来或者做出来，这样才能找到办法。他就是这么做的。唉，上天保佑吧！

［停顿。

［他们聚集到一起。

［停顿。

这招对我来说不管用。我现在只是觉得自己就像被别人逆着纹切的一块里脊肉，或是穿着短裤打网球，以致侧面走光露出了阴囊。

［停顿。

［他们又聚到了一起。

你们知道我最害怕自己什么吗？

［大家好奇地看着他。

我害怕自己会在餐厅里神思恍惚地站起来并忘记了买单。

［停顿。

［科尔伯-肯特挠了挠屁股，大家都看他。

科尔伯-肯特　我刚刚想到了我们的小股东……

［停顿。

卢茨　您从来就不做梦吗？

科尔伯-肯特　唉！阴森可怕的梦！

卢茨　是吗？那您讲讲。

科尔伯-肯特（强有力地）那时……那时我独自一人走在森林里。

［尴尬的，长时间的沉默。

［停顿。

［冯·武尔瑙忽然大笑一声。

卢茨　您笑什么呢？

冯·武尔瑙　我想到过去的事。

卢茨　是什么好笑的事吗？

冯·武尔瑙　只是回忆。

［停顿。

阁楼上的粮仓，撒落的谷粒夹杂着老鼠屎，儿时赤脚陷在谷堆里，脚趾间满是谷粒，墙砖的背面是那个空空的马蜂窝，承载着我深深的回忆。

［停顿。

我必须停止回忆。回想过去的事情会使我成为一个好人。那样的话，我就容易妥协。不，奎特，哦，奎特，你为什么背弃了我们？

卢茨　我现在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了。我们必须谈谈自己，谈谈我们每一个人究竟是怎样的。正如我有的时候想在街上跳起来，却不会那么做。为什么不呢？今年夏天已经过去了，我坐在有挡光玻璃的办公室里，竟然没有感觉到是夏天。有时候我也会做傻事：把苹果坏了的地方一同吃掉；把车门关上，即便还有人坐在里面……诸如此类的事……如果这些还不够，总还有（对科尔伯-肯特）我们的小股东。他会告诉那个家伙，（奎特上）月亮从哪儿升起。

奎特　我想你们了，你们是不是也想我了？

冯·武尔瑙　奎特，今天早上我拿了一包面粉。你知道我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拿过面粉了吗？我自己都不知道。那包面粉又软又沉，我手中既感觉到面粉的重量，又感觉到面粉软软的质地。我沉浸在一种恍惚的喜悦中。你有时候会不会也这样？

奎特　我宁可忍受最残酷的现实，也不能容忍最愉悦的非现实。

卢茨（将话题引开）你妻子怎么样？

奎特　我妻子？我妻子很好。

卢茨　她刚刚看起来确实不错，脸色红润，就像刚打完网球回来。她使我想起我的妻子，她整天都在露台上陪孩子荡秋千。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智力有缺陷的孩子，一旦秋千停下来，他就大声哭喊。想象一下，她成天站在花园里推秋千。但是有时这也会给她带来乐趣。她说，这能使她平静下来。与身边的妇女们比，她感到自己比她们强。她们除了命令别人做家务之外，什么都不会。对不起，我一直在谈论自己的事。

奎特　我喜欢成天指手画脚的女人。

冯·武尔瑙　我知道，你喜欢听故事。我给你讲一个。

奎特　故事长吗？

冯·武尔瑙　非常短。一个小孩子来到商店里说："六个面包，一份《图片报》，三盒咸饼干棒。"

奎特　接下来呢？

冯·武尔瑙　这就是这个故事。

［停顿。

奎特　这个故事很好。

冯·武尔瑙（忽然伸开双臂紧紧抱住奎特）我就知道你会喜欢这个故事。哦，我知道。平时我不敢去碰别人，但是今天我一定要碰碰你。（把奎特夹克里的衬衫袖口拽出来，抓住他的手）我早就注意到了你的脏指甲，现在我得为你清理一下。（用自己的指甲清理奎特的指甲，退后）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最近如此怀旧。还记得我们当工人的时候，去歌剧院舞会的情景吗？我们围着红围巾，穿着紧身T恤、吊腿裤，鞋上还沾着水泥灰。我们是怎样踩到女士们的高跟鞋上的？我们是怎样在两腿间挠痒的？我们张着嘴傻傻地看着周围的一切。我们要了克里米亚香槟，直接对瓶吹。最后还把帽子推到额头上，唱着《国际歌》。

奎特“克里米亚香槟”不是正式的名称，应该叫克里米亚起泡酒。

［停顿。

是的，按照我们的表演水平，也只能演自己，演不了别人。

冯·武尔瑙　你现在和他们一起做事吗？

奎特　你指什么？

冯·武尔瑙　你只考虑你自己。你手里掌控的市场份额让那些投机倒把的人有机可乘。他们就是我们的敌人——

卢茨（很快打断他）不是这样。（对着奎特）最近一段时间我经常想到死。我遇到的一切事情在我看来都是死的征兆。当我在报纸上看到“下周三可以处理大件垃圾！”时，我马上觉得“大件垃圾就是我”。前些时，我去了一家乡下的烟草店，在那儿看到一份讣告，讣告下面是一只又脏又皱的皮手套。“不久后我也会跟这只手套一样。”想到这里，我的心里顿时袭来一阵凉意。

奎特　我最近在门厅里看到一个空塑料袋子，上面写着“燕麦喂养的新鲜鹅，产自波兰”。难道这也是一种征兆吗？反正当我看到这些字的时候，一下子觉得很安全。

卢茨　你就从来没有想到过死吗？

奎特　我不会。

冯·武尔瑙（用拳头击打额头）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现在真想翻开一份报纸，看到“坏蛋”这样的字眼，这堆荆棘、污泥、泥潭、鬼火！

［卢茨用胳膊肘撞了他一下，他平静下来。

那些浮于泥潭上的鬼火，是在一个秋天，我们下了舞蹈课回家路上看到的。我搂着我亲爱的万妲，隔着衬衫我能感觉到她吓得直起鸡皮疙瘩。当我亲吻她的时候，一只野鸡在睡梦中叫了起来。亲吻，原本是个令人恶心的词。我们的嘴唇在接触，我毫无感觉，就像亲吻一块剥下来的树皮。

［停顿。

［瞅着卢茨。卢茨给他提词儿，用嘴做出“自然”这个词的口形。

为什么是自然？啊，是这样的！我想谈谈自然。它教会我感知，让我有了自我意识。房子、街道和我一开始只是同一个气泡中的白日梦，做梦的人和被梦见的东西都存在于这个气泡当中。做梦的人看到家里那堵墙壁立刻就被催眠入睡，墙壁上总是在相同的位置有些起伏不平。在睡梦中，墙壁延伸成一条弧线，就像每天经过的那条街道一样。做梦的人融入其中，把自己也当成了梦的一部分。梦中，我看到我身体内的一些黑点，难以解释清楚它们都是什么。正在这时，气泡破裂，体内的那些黑点扩展开来，飘出我的体外，成为一片一片的森林。直到这时，我才开始想弄清楚自己。不是房屋和街道所代表的文明让我去关注自己，而是自然引起了我对我自身的注意，是自然让我开始关注起自己。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对自然的感知，而不是通过对千篇一律的所谓文明之物的幻觉，我们才能开始对自己有真正的了解。如今，大多数人已经非常文明，他们甚至将自然之感视为向儿童幼稚世界的退化——尽管人们总是刻意让孩子们关注自然；有时候，这些文明人假装对自然充满感情，可一旦脱离了文明的假象，他们根本就无法接受自然。就算这些文明人身处森林当中，他们也不明白何

谓森林。只有从自己设计、建造并出售的楼房窗户所看到的林子，才能给予他们一种自然的体验。你想不想问我，我到底在说什么？

奎特　不。

冯·武尔瑙　我想说，你那毫无顾忌的扩张破坏了我们的自然。曾经让我们陷入深思的大好山水被你肆无忌惮地变成了耕地。在老城里，你那些封闭的商场就像是没有去掉引信的炸弹。每天都有一个新的分店落成，它们千篇一律，唯一的区别就是各个分店的缴税账号不同。你甚至拿这些缴税账号宣传你所谓的公益事业，或者直接把这些数字做成屋顶上闪闪发光的招牌灯。

奎特　是个好主意，你说呢？

冯·武尔瑙　你的所作所为正好符合那些无知民众想象中的企业主形象，可是这毁掉了我们的声誉。

奎特　或许我毁掉的不是我们的声誉，而是你们。

冯·武尔瑙　你既不懂得尊严，也不懂得羞耻。我家屋后的粪坑让你掉进去都有些可惜。我想用吸墨纸把你捂死！谁在我面前提到你的名字，我就要撕烂他的嘴，亲手把他的舌头拽出来。等一下，我现在就踩你的脚。（踩奎特的脚，奎特没反应。冯·武尔瑙鼓起两颊，扇自己耳光，又咬自己的手背。他用拳头打自己的脑袋，忽然又忧虑地理了理头发）你太让我失望了，奎特。可惜，你曾经是所有人中我最喜欢的，我们有那么多的共同之处。我一直还很钦佩你。每做一个决定之前，我都会想，要是奎特，他会怎么做？（大喊）

鼠辈！叛徒犹大！为了20个银币……

奎特　圣经里写的是30个。

冯·武尔瑙　我说20！

奎特（对着科尔伯-肯特）是写着30个银币，对吧？

科尔伯-肯特　对，是30个银币。根据最新的研究结果，是这样……

冯·武尔瑙（大叫）畜生！还没进化的畜生！

［卢茨把手放到他的肩膀上。

我曾经梦到我们一起变老了。每天我们坐着观光马车穿梭在城里，一边游览一边打牌。难道这一切只能是个梦吗？让我们停止争斗吧！奎特。那会多么美好！就我们四个人，如果我们想把塔克斯女士算上的话，就是五个人。那时，其他人都已经放弃了，只剩下我们。我们是如此强大，也不必有什么约定。这些在散会后帮我们穿大衣的人能够帮我们经营生意。我们之间不要再相互倾轧了！

奎特　是我倾轧你们。

［冯·武尔瑙大吼。

奎特　这么着有用吗？

冯·武尔瑙　用钉鞋插入身体的软处。理解我吧！我现在究竟是谁呢？脑子里一片混乱！我真想对你张开大口咆哮。你有面包吗？

奎特　你饿了吗？

冯·武尔瑙　我就是想用手指捏碎什么。我的大脑挤压着我的脑壳。其实是一种舒服的感觉！这就是人的动物性。（对着卢茨）现在我什么也不说了。（对着奎特）我特别想和你互换角色，你这个奸商。另外，这会儿你太太又要来我们这里了，不是吗？说点什么能让我笑的吧！亲爱的赫尔曼……

［停顿。

［挽起奎特的胳膊。

你知道吗，就我的岁数都可以当你父亲了。让我们一起去钓鱼吧，做父亲的总是喜欢带儿子去钓鱼。在雷雨来临前，顺着小溪往上游走去。我希望自己现在酩酊大醉，这样才能想起过去的事情。（从奎特的臂弯里收回手臂，大叫）顺便提一下那些溪流，都被你的塑料怪物给毁了，美丽的自然景区里到处散落着塑料物。在这些塑料制品上还

能看到“环保材料”的字样，可惜自然环境早已不再。满眼看到的也就是地上各色的霉菌、蜷缩的树叶上厚厚的煤烟灰尘，还有在那冒着泡沫的水中漂起的鱼肚。当孩子们有机会看到真正的成熟的大西红柿时，你知道他们会问什么吗？他们的问题是：这是塑料的吗？我曾亲眼看到一个小孩子在乘坐欧洲特快列车时宁愿站着，因为座椅不是塑料的。让我们停止这种扩张和增长吧！赫尔曼！要不我们只生产环保的产品。要补救的东西还有很多。只有这样，一切才能恢复原样。

奎特　你们早就已经停止扩张增长了。另外，你说得对，在我所生产的产品中，真正可以利用的部分，规格越来越小。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手段提高产品的数量，扩大销路，明白吗？我绝对不会止步于现状。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有它可利用的地方。一切都能与众不同。你们也能做到。只是你们不再有这个能力。

冯·武尔瑙（离开奎特）你不想理解我们。

奎特　我是理解你们的。如果我们中的某个人变得有人性或者在谈论死亡，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感觉会在第一次受到惊吓后转变成具体的方法。

冯·武尔瑙　你针对我们所干的一切，我姑且不称之为背叛。可这不是背叛又是什么呢？是没有诚信？是奸诈、不可靠、虚伪、阴险狠毒还是不仁不义？

奎特　这些字眼都是用在下属员工身上的。对我们这些自主创业的企业主来说，我想应该称为经营作风吧。

冯·武尔瑙　现在我真的无话可说了。在你面前，我只想把手指插到喉咙里呕吐。（把手指插到喉咙里，离开，但是很快又回来）我要缠着你。（离开，再回来）你这个令人扫兴的家伙！（离开，又回来）我的口水吐到你身上实在是可惜了！我要张嘴吐满你全身。（照做，离开，又回来，很生气，做了个可怕的鬼脸，最终离开。）

［卢茨想说些什么。

奎特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卢茨　说来听听。

奎特　是真的，我没有遵守我们的协定。

卢茨　你一定不是故意要破坏契约的。

奎特　那难道是我把它给忘了？

卢茨　也许不是忘了吧，而是没当回事儿。

奎特　我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呢？

卢茨（笑）行啊！还是那么嘴硬……

［停顿。

对不起，打断你了。你本来想说什么？

奎特　没什么，该说的都说了。

卢茨　总得辩护几句吧。

奎特　你先骂骂我吧！

卢茨　你肯定非常不幸福。

奎特　为什么呢？

卢茨　身处窘境时，人们只知道想着自己，没有别人。我自己也是这样。

奎特　别拿我跟你比。

卢茨　看到了吧！你的眼里只有你自己，甚至不愿和别人相比。你的境况一定不怎么样。

［卢茨一直下意识地用拇指和食指做出数钱的动作。奎特抓住他的手。

奎特　你这么说是想表示你的强大，对吧？从你开口跟我说话起，就一直在做数钱的动作。

卢茨　那好吧。现在我来说说对你的看法。

奎特　且慢！也许你在说话的时候脑子里想着别的东西。

卢茨　这没有什么可怕。当我开始说话时，都已经想好要说什么了。我不是结巴。（对着科尔伯-肯特）他让我们亏了本，倒把自己的市场做大了。我并不是反对他的做法，只是他至少应该跟我们协商决定啊！不过，我对他的做法还是不太赞成。他从自由市场上招聘了一些刑满释放人员，然后承诺要给他们提供一个大家可以互相沟通的环境——什么意思呢？他把这些人封闭集中起来让他们生产某一类产品，只付给他们很少的工资。正如他自己刚刚承认的，每一类产品的规格越来越小，但用的包装大小却不变，以至于顾客误以为他们买的都是同样规格的产品。通过这种方式，他的产品价格看上去没有发生变化，但却导致我们必须调高我们的价格。他经营药品时给医生提成，前提是这些医生开处方时都开他的产品。他生产的儿童商品，定价都不会超过孩子们一般所拥有的零花钱，这也是我们事先约定好的。但是，他又特地生产出两种不同的产品，加起来的价钱正好是我们约定的价格。这样一来，孩子们当然愿意购买。因为，在孩子们看来，用同样的价钱买到两样商品肯定比买一样划算。（对着奎特）还有，你用廉价的原材料剽窃我们的昂贵产品；你的产品尽管标着有效期，可是往往还没到有效期就已经没用了，除非是那种非常耗电的三星级冰箱，使用寿命稍微长点儿。有的产品上标着“推荐价格”，价格前面甚至还标有国徽上的老鹰图案，看起来好像这个价格是官方正式推荐的一样。你把价签做得大而醒目，以至于人们都以为在你的商店买东西比别处便宜，实际上跟别的地方差不多。奎特，我们都面临着灭亡的结局，曾经的价格观念让我们面临困境。我们深受其害，步履维艰。你在竞争中的卑鄙手段真是让我们不寒而栗。我现在情绪还算稳定，也许这正是下一次暴风雨来临前的风平浪静——如果你再次违反我们的协议，我会崩溃的。我看到天上下起冰雹，于是惊慌地用双手护住脑袋。奎特，我害怕暴风雨，因为我没有那遮风挡雨的资本“大衣”。我曾经尝试着大量裁员，以精简公司的人事结构！奎特，你毁了我们制定的统一价格！你把价格压到了战前的水平！一切都完了。每天都有一种产品被迫退出市场，导致市场上同一类产品越来越少，

市场越来越单一。之前取得的成绩都是白搭，曾经傲人的销售业绩不复存在。我不知所措，绝望至极，走投无路。（对着科尔伯-肯特）我是父母唯一的孩子，我出生时就让人面临两难，最终我被保下来，可我的母亲却死于难产。四岁时，我能用湿黏土捏成钱币形状。七岁时，为了挣钱，我采摘花朵卖给附近的病人。在学校，我被大家称作“数钱能手”。我父亲说我是个理智的小伙子。而他对财富有某种畏惧心理，亲戚们都这么说。我参加第一次圣餐仪式时，神父说过，如果我们今后有什么愿望，只要坚定信念就一定能实现。在回家的路上，我一边回味着圣餐仪式上的教诲，一边低头寻找——我和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坚信，我会捡到一枚渴望已久的硬币。（对着大家）然而从那以后，我对上帝产生了怀疑。（对着科尔伯-肯特）从此我保持理智，并且越来越理智。人们都这样评价我：我是个非常务实的人。但现在一切都完了，彻底玩完了！我不再相信任何事情。奎特破坏了我们制定的统一价格，毁掉了我们的理智体系，我们还应该遵守什么呢？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啊？还有什么规则可依？到最后我也会胡作非为！

[停顿。

我曾经做了个梦，梦见自己不停地奔跑，只有这样，放在我胸口上的那张大钞票才不会掉下来。就像我现在不停地在说。我真希望一头栽进洗脸盆中溺死。

[卢茨下。

[科尔伯-肯特想跟卢茨走，但又折回来。奎特来回踱步。

科尔伯-肯特（垂头丧气）奎特，我一点也不羡慕你。我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谈谈自己，但那不是我的风格。我从来不谈自己。我很骄傲自己已经很久不以自我为中心进行思考了。我不再局限于考虑自己，而是乐于为别人着想。

[停顿。

奎特，我真是同情你啊。同时我也为你担忧。不久前我看到一幅画，那是一个画家为他垂死的妻子画的肖像。由于高烧，他妻子的瞳孔变浅，虹膜泛白。失色的眼睛使得眼圈发黑，界线分明，死神的拉拽使黑眼圈更加明显。那双眼睛好像对着观看者露出惋惜的神情。画家在妻子的瞳孔上画出了一笔仍存生气的叹息——这是我的理解。据说第二天早上他的妻子真的离开了人世。

［舞台后面传来“砰”的一声巨响。

这是什么声音？

奎特　汉斯在干活。他拔瓶塞的技术不太好。每次打开料酒瓶都会有这样的爆炸声。

［停顿。

科尔伯-肯特　你难道一点也不害怕死亡？

［抬起头想盯着奎特看，奎特却正好站在他后面。

奎特　我在这呢！

科尔伯-肯特（转过身来）在死亡面前，你难道不会由于恐惧而迅速地抛开一切？

［奎特离开他，背对着他站着。科尔伯-肯特又一次低下头，闭上双眼。

有人曾经跟我讲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如何死去。梦中，他坐在一个雪橇车上，自言自语道：我要死了。他说完便果真死了，之后有人把他放进棺材，正要盖上棺盖，就在那时，他忽然开始畏惧死亡，他不希望自己被埋葬。他在棺材里惊醒，心脏剧烈地跳动。实际上，他本人病得很严重，是那个噩梦把他逼上死路的。所以说，他死亡的原因就是一个梦。（很大声地）你看，在睡眠中死亡一点也不平静，反而会是最恐怖的，让人饱受惊吓。

［奎特一直漫不经心地来回走动，然后站在科尔伯-肯特面前。

奎特（小声地）是吗？

科尔伯-肯特（很是吃惊，直愣愣地看着奎特）我还知道别的故事——

［舞台后面清晰地响起了扭转钥匙和门把手的声音。

将死的人不会盯着某一处，总是往别处看，好像这样能拖延死亡的时间似的……（认真听着）刚才是不是有人转动了门把手？但为什么我没听到门打开的声音呢？

［停顿。

有一次，我吃饭的时候对面坐着一个人。他突然站起来整理桌子。他把餐具摆放好，用餐巾擦拭玻璃杯的边缘，并把餐巾放进银环中，然后就倒地死了。

奎特（心不在焉）面包怎么掉地上啦？

科尔伯-肯特　我说的是那个人倒地死了。（害怕地）你也害怕死亡吧！

奎特（心不在焉地抓挠着裤子）真讨厌，干洗的时候没有把裤子上的污渍洗干净。啊？我听着呢！

科尔伯-肯特　这个死者在临死之前还在笑着！（舞台后面很明显地传来了两三下脚步声）但由于害怕死亡，他死时露出的是下排的牙齿，而不是像一般人那样露出上排的牙齿。一般来说，一个小矮人死了，没人会注意，因为这就像是植物的代谢过程。但是，一个健全的人死去，就显得很怪异了，你可以自己想象一下！（倾听）为什么他不继续走了？刚刚绝对有人在走路。

奎特　我听您讲话，就好像又一次回到了双颊圆滚的童年时代。带着您对死亡的恐惧赶快走吧！现在所有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可以想象的，一切都无所谓了。

科尔伯-肯特　什么？你说什么？

奎特　刚才只是地板发出了噼啪声。

［保拉出现，她穿着连衣裙，脸上遮着面纱。奎特一看见她，就慢慢拉下裤子的拉链，然后又拉上。舞台后面发出盖子盖在硬物上的啪嗒声，声音很大。

科尔伯-肯特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能一眼看出人的命运。（指着奎特）上唇的细小唇线……（注意到保拉来了）是您！太好了，您来啦！或许您可以……（尝试着用一个词来表达）怎么说来着？

奎特　祝贺我？

科尔伯-肯特　不是。

奎特　恳求我？

科伯-肯特　很像……不过还不是。

奎特　钻到我的胯下？

科尔伯-肯特（恐慌起来）噢，上帝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不起来那个词，我想不起来那个词！我该怎么办？日食啊，快出现吧！地狱之火，从地下喷涌出来吧！

［奎特走向保拉，并对她耳语。

保拉（大声地）“死亡恐惧”？（对着科尔伯-肯特）您要让他产生死亡恐惧心理？为什么？难道您认为他会把市场还给我们吗？

科尔伯-肯特（大声地）我很了解自己。我曾经看到很多人死在战壕里！

［奎特叹了口气。

科尔伯-肯特（很快平静下来）我耽误您时间了？

奎特　当然没有。

科伯-肯特　（大声地）我能看出别人的病症。我知道您为什么老是耸着肩膀走路。赫尔曼·奎特，不久你[9]就会感觉到死亡的沉重。如果你还是照旧晃动着胳膊，来回地交叉小跑，你就会面临死亡，就算你一点都不惧怕死亡！（退后几步。汉斯出现了，他戴着厨师帽，仔细听着）你无法想象那个时刻，猛地一阵，你会剧烈地感觉到将死的恐惧。由于害怕，你连唾沫都不敢咽，口水在你嘴里变酸。你的死亡比任何想象还要可怕，它伴随着刺耳的尖叫声。我知道那情境。伴随着刺耳的尖叫。（科尔伯-肯特倒退着，不小心撞到了汉斯，惊叫。科尔伯-肯特快速下场。汉斯下。奎特和保拉长时间对视。）

奎特　如果你再这么凝视着我，我对你最后的那点感觉也会消失。

保拉　我赢了。

奎特　为什么？

保拉　因为你先开始说话了。

奎特　现在该你说了。

保拉　我爱你，一如既往。（笑）

奎特　为什么笑？

保拉　因为我已经能够把它说出来了。

奎特　我要它有何用？

保拉　你还真是做作啊！脱口而出的真心话，你竟然要放弃。

奎特　顺便说一下，我可没给你机会。

［停顿。

看来我必须再次熟悉你。

［从上到下打量她。

保拉　我不是那种人。

奎特　谁又是那种人呢？

［停顿。

我很累！每跨一步，我都感觉自己的身体要落在后面了。我不需要你了。刚刚看到你的时候，我确实高兴了一阵，可慢慢又失去了兴趣。这就是说，我对你的兴趣已经没有了。

［保拉笑了。奎特和蔼地看着她，直到她止住笑。

保拉　你说的话本来应该让我很心痛才是。但是听到你说话的声音，又感到十分受用。

奎特　你变了。你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以前你抒发感情的时候，总是信心十足。现在为什么不行了？别再假扮怨妇的角色！你只有保持本性才会激起我对你的热情。（嘲讽地）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而不是和他们一起？你就这么一个人跑来对我说这些没谱的话？难道你觉得这样很有创意吗？我头疼。另外，我更喜欢你穿裤子的样子。

保拉　你的想法也让我很头疼，特别是你的生活方式……

［奎特拍拍她的胳膊。

你拍我的感觉就像个指挥家打着音乐节拍……

［抚摸他。

奎特　你摸得我好痒啊！

保拉　啊，那是因为你不想去享受它。

［奎特的妻子走进来。她穿的连衣裙和保拉的一模一样。她注意到这一点，愣住了，然后离开。

保拉　现在你也抚摸抚摸我吧！

［奎特抚摸她，然后走到一边。

保拉　就这么一小会儿啊！

［奎特走近她，又抚摸了一会儿。

保拉　噢，好。

［停顿。

现在来说说你吧！

奎特（显得很活跃）这几天我一直很渴望诉说。

［停顿。

这一点，我刚刚意识到。

保拉　请你看着我。

奎特　我不想看着你。

保拉　你觉得我怎么样？

奎特　没什么变化。

保拉　以前我不太了解你，总觉得你又冷酷又狡猾。我有一次听别人说你是这么评价我的：那个金发女郎，就像一个妓女。

奎特　人们总愿意对这种事嚼舌根。

保拉　我现在说出来了，你们又会怎么评价我？

奎特　别对我说“你们”。

［保拉把手放在奎特肩上，突然掐住他的脖子。奎特让她掐了一会儿，然后才甩开她。

［奎特的妻子换了另一条裙子进来。她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把拇指放在嘴里，无声地窃笑。奎特坐在躺椅上，低着头。保拉蹲下，想抱住奎特的头。他用脚反踢了她一下。她摔倒在地，然后哼着小曲站了起来。他又把她推倒。她还是哼着曲子站了起来。他还想推她，她却哼着曲子避开了。

奎特　你那假惺惺的巧舌，你那可笑的胯骨。

保拉（把裙子提起来）看，我的大腿在抽搐。看到了吗？走近点看。

［奎特小声嘟囔着。

保拉　走近点。

［奎特把手放在保拉的大腿上。

［保拉依偎向他。

［停顿。

奎特　现在你可以消失了吧！（退后几步）

［停顿。

你的眼珠一直在转动！你嘴里的唾液都要流下来了。

［转过身去。

［停顿。

保拉　我要走了。什么都无济于事。我会把公司卖给你。

奎特（看着她）附加条件由我决定。

保拉　答应我，不要我一走就清盘。

奎特　给自己买顶帽子戴吧！它能给你安慰。

保拉　我现在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喜欢你了。因为你说话的时候，我可以美美地想其他事情。

奎特　明天这个时候，情况也许就会好了，或许更糟。即便这样，你也会安心的。

［保拉突然伸手抱住奎特的妻子，然后放开她。离开时，保拉给了奎特一个诚挚友好的飞吻。

保拉　别难过……

［奎特把椅子扔向保拉。保拉下。

［奎特的妻子走近了些。他们面对面站着，沉默不语。少顷，舞台上的灯光发生了变化。起初艳阳高照，而后两人头顶飘过了几片乌云。蟋蟀发出的啾啾声、远处传来的犬吠声、大海的浪涛声、一个孩子在风中的叫喊声、礼拜日的教堂钟声纷纷响起。［舞台上空飘浮着毛茸茸的树种。城市的灯光逐渐亮起，昏暗的灯光中出现奎特夫妇两人模糊的身影。一阵飞机飞过的声音，很近，声音慢慢变小。舞台上的灯光恢复先前的状态。

［寂静。

奎特妻（小声地）你看上去让人难以接近。

奎特　都是回忆惹的祸，我刚才正在回忆往事。让我安静地待一会儿。我还没回忆完。

［沉默。奎特微笑。他坐到躺椅上。奎特妻子走近他，他用脚轻轻地碰了碰妻子。

奎特妻　干吗啊？

奎特　没事，没事。

[躺下来，闭上双眼。

奎特妻（叹气）唉！

奎特　（自言自语）一切都完了……

奎特妻　那你准备做什么？

奎特　（自言自语）停下来。毁灭。（看着妻子）这真是奇怪，一看你，我就有新的想法。

奎特妻　我想说说我自己。

奎特　又要说？

奎特妻　你会认真听吗？

奎特　你问我的这段工夫够你说半天啦！你洗头发了？

奎特妻　对。但不是为你而洗的。我感觉不舒服。

奎特　那就叫喊着寻求帮助吧。

奎特妻　我要是喊着要人帮忙，你一定会讲个故事，讲你自己有一次也需要帮助的故事。

[停顿。

[断断续续地笑了几声，好像是想到了什么好笑的。

[奎特没有反应。

奎特妻　帮帮忙啊！

奎特　你至少要喊两声。

奎特妻　我喊不出来了。

奎特　（站起来）那就别生事。（转过身去）

奎特妻　（在后面机械地给他拍去头屑）你已经有了打算。我不可以长时间地盯着你看，否则我就知道你要做什么了。

奎特　你想要什么？我有红润的脸庞、热血沸腾的身躯，我的脉搏稳健地跳动着，每分钟八十下。

［停顿。

奎特妻　我的眼睛好痛。由于悲伤痛苦，我都忘记了眨眼。

奎特　今天吃什么？

奎特妻　香菇炒牛里脊。

奎特　噢，好，不错。今天吃什么？

奎特妻　你刚刚问过了。你怎么这么心不在焉？

奎特（自言自语）我为什么心不在焉？因为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可最后我们还得努力试试，不能只是空想。对了，你刚刚已经说过了，今天吃香菇炒牛里脊——我现在才听明白。我怎么这么心不在焉？亲爱的，我要和你说点事儿。

［停顿。

［她看着他。

奎特妻　别，别说出来。（退后几步）

奎特　但我必须向某个人诉说。

奎特妻（又退后了几步，捂住双耳）我不想听。

奎特（跟着她）很快你就会知道了。

奎特妻　别说，请你别说出来。

［转身下场，奎特紧随其后。

［寂静。

［停顿。

［奎特妻子缓缓地倒退着回来，然后又缓缓地下场，看不到她的脸。

［基尔布冲了进来。汉斯戴着厨师帽跟在后面。基尔布拿着刀，来回跑着。

基尔布　我现在就杀了他。无所谓了。反正我孤身一人。没人会付给我钱，他们也不会。这是我们最后的出路。别还嘴。（注意到并没有人在场，所以把刀子收了起来）他不在这儿。那我刚刚算是预习了一遍——

走进来，直接冲向他。一！二！无语的场景，只有一堆破折号。一句话也不用说，怎么想就怎么做。

汉斯　您一定要再试一次。

基尔布　为此我必须再一次集中注意力。如果我还像现在这样心烦意乱，我想，那一切可能都是别的样子了，包括我自己在内。这种感觉真不好。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汉斯　但是请你先看看我，现在我终于找回了自我。过去大家经常这样说我：这个人一直忍气吞声，但终有一天他会勃然大怒，把一切都毁掉。这一天到了。我走了，我要把肉煮得嫩嫩的，心里想着，这是给自己煮的。让奎特先生听天由命吧——他相信命运。我现在会克制自己了，并且很好奇，将会发生什么。我的大脚趾发痒，这是一个好兆头，我要脱胎换骨了。

基尔布　为什么？

汉斯　大脚趾发痒就意味着应该回忆过去，而一个会回忆往事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人。我要做的事就是回忆。

有一段时间，我和本我抗争，

因为我希望，自己能去做梦。

我把做梦学起，为了能让自己和琐事脱离。

学习，学习，于是我的双眼学会了紧闭，

剖析，剖析，心中之事更加清晰。

过去，有人看我的手相，

他说，我能改变世界的模样。

而现在，我至少要开始改变自己。

［汉斯像对待一个沙袋一样击打气球。气球爆破。汉斯下。

［基尔布集中注意力，他支起板凳，小心翼翼地合上钢琴盖，然后整理那些摆放不整齐的东西。奎特上。

基尔布　还没整理好。

奎特　您又来了。

基尔布　我们很久没见了。

奎特　还不算久。前些时，我发觉自己好像曾经做了件错事，但又不记得做错了什么。于是我马上断定，这件错事无关紧要。可是后来我又想起来了，这还真不是一个小错。我是在和您打交道的过程中犯了个错。

基尔布　请别说了。

［停顿。

奎特　基尔布，我很高兴您能来。您注意到了吗？我是说“我很高兴您能来”，而不是说“您来了，我很高兴”。

基尔布　现在别假装对我友好的样子。

［停顿。

［奎特一直看着他。

基尔布　干吗看我？

奎特　我只是太困了，懒得往别处看。您至少坐下吧，让我不要看着你那么累。

［指了指躺椅，示意基尔布坐下。

基尔布　我不坐那儿，躺椅太深，坐下去让人起都起不来。

［奎特自己坐到躺椅上。

基尔布　像您这样把手插在裤兜里坐下去，更不容易起来。我碰到危险的时候，从来不把手插在裤兜里。

奎特　基尔布，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人，而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了，这种感觉让人很不舒服。其实，作为一个幸存者感觉应该很不错，但是我对此没有自信，我脑子里整天想到的就是无限空旷的屋子里到处都充斥着垃圾。试想一下：电话不再响了，邮递员不再来了，街上再也没有嘈杂声了，只剩下呼啸的风声把梦吹跑——整个世界已经毁灭了，只有我还不知道发生了这个大灾难。我只是一个灵魂的躯壳。我所见到的一切只是事物的影子，我所想到的一切只是幻想。一绺头发散在我的头上，我吓得要死。下一个时刻就是我最后的时刻，我的死期已近。刚刚在我这儿还有一个气泡，现在却没了。我知道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保拉刚才说得很对。

基尔布　很对。奎特，您的存在就是一个错误，就像现在您的灵魂还在运作。

奎特　安静。现在只有我可以这么说自己。（拍着一个小球，看着基尔布）四目相对的时候，眼里只有恐惧，它们害怕变成别的东西。（停顿）我再也不会草率鲁莽了。所谓潜意识里的失误其实也是一种管理方式。就算是潜意识里的梦境，也还是希望能够解梦。我再也不做无语的梦了，梦里的画面像每天的日程表一样，有条不紊地转换。早上醒来，我发现我在梦里所说的话对自己完全没有影响。现在的梦，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能让我恍然大悟。（小球跳得越来越远了，不见了）唉，真遗憾……（站起来。基尔布走近了些）这躺椅果然凹陷得很深。如果要我定义自己，我觉得自己真的很糟糕——作为一名企业主，身穿英国精纺西装，上衣口袋里塞着方巾。他怀着悲痛的心情坐着自己的私人飞机，飞机尾气扫过工人的住所。机舱里的扩音器播放着古典音乐大师们悠扬的管风琴乐曲——突然，音乐停止，声音关掉，炸弹随之引爆。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但是，我对每个符合逻辑的结局都感觉既没谱，却又无比肯定。

基尔布　有道理。因为您想继续活着。

奎特　小人物都觉得自己很重要。

基尔布　可不是吗？他们还能有什么？

奎特　没错。可不是吗？这句话说得好。我还一直沉浸于梦中的角色。拥挤的诊室里坐满了那些靠医疗保险接受医治的患者，我会幸灾乐祸地从医生身边走过；餐车里，当一个陌生人站在我桌旁时，我连看都不看他。这是为什么呢？大家都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有一次，走在大街上，突然觉得我的脸好像不是自己的……

基尔布　又是以前那个关于面具的老故事。

奎特　对，但现在是当事人亲自讲述。我的肌肉上箍着一层死皮。整个肉体麻木无比，内心深处才是我应该存在的地方——只有那里还有些轻微的颤动，还能让人感觉到些许湿润。快点让电车从我身上轧过吧！这样才能让我不再戴着面具生活。我想，我不再躲避迎面而来的电车，这样才会露出我的本来面目。但现在这张死皮就是我真实的脸面。

基尔布　您讲的这些故事相互之间有什么关系？

奎特　我事先对自己一无所知。在叙述的过程中，我才想到了自己经历的点点滴滴，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地串到了一起。我现在要告诉您，地狱对我来说是什么。地狱就是那些所谓的廉价物、便宜货。天黑的时候，我跌跌撞撞地走进一家餐馆，菜单上列的每道菜其实都和别的餐厅一样，只是价格要便宜一半。但最后我发现这里做的菜其实和其他餐馆不一样：肉还没解冻就直接放进锅里煎；土豆是周一做的，放了好几天了；蔬菜则像是打翻了的罐头食品；餐巾纸显然被人用过；另外还有那块带静电的桌布，惹得我手指上的汗毛根根竖起。我紧贴着桌子，前后左右都坐满了人。透过缝隙唯一能看到的是窗户上的牛眼形玻璃，窗前的盆栽花在暖气的热风中微微摇摆。我想，只有奢侈的生活才让人舒坦。只有极其奢侈的生活才是人应该过的，简朴低成本的生活完全没有人性。

基尔布　这么说，您的产品的价格是最低廉的。

奎特　您这么说有啥意义吗？是冲着我来的？我就是那个让自己都会感到害怕的人，到现在我已经受够自己了，可我又难以释怀，总想着自己。这件事就像是只活鼹鼠一样，怪异又好笑。我感觉周围的人看我的眼神就像看着一块伤疤旁边的结痂，但我内心的自我意识仍然十分强烈。是的，我内心的自我意识很强烈！有一次，我怅然若失地坐在阳光下。太阳照着我，我却一点也没感觉到，觉得自己就像在空气中四处游荡的行尸走肉的影子一样。但是那起码还是我啊！是我，是我！我绝望至极，没有预想也没有回忆，感觉像失去了记忆。每一段回忆都很零碎，就像一段不和谐的性交记忆。这种麻木感令人痛苦万分，这就是我，不仅仅是我，整个世界都如此。当然我也会探究原因。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态呢？为什么不是故事，而是状态？一切有条件的需求都满足了，但我却找不出这些“为什么”的原因。剩下的就是一些绝对的需求了。有一次，一个小孩子说：“我好无聊啊！”他得到的回答是：“那就玩些什么吧，画画、读书，做些事情。”小孩说：“我做不到，因为我很无聊。”（一直从兜里往外掏东西，拿在手里看了看，又放回兜里）你刚刚说我的灵魂还在运作？（笑）我愿意随便讲讲我自己。我再也不想做一个有意义的人，也不想做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五月的一个夜晚，我都快冻僵了。您看，这些都是我的照片。在所有照片上我都显得很开心，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您知不知道裤子穿反了是什么感觉？有一次我很幸运，我去拜访一个人，他住在租来的公寓里，我们在谈话间隙中

听到了隔壁冲马桶的声音。这声音让我觉得充满乐感，我顿时幸福无比！噢，真让人羡慕，他们可以在午后时光躺在租住的公寓里美美地眯一觉，厕所里还有抽水马桶潺潺的声音。我渴望能够住在这样的地方——地处城郊，高层公寓楼，楼下的电话亭夜里还亮着灯光。我走进机场旁一家旅馆，在那儿简单住下。为什么没有一个能够让人脱胎换骨的机构？想想以前打开新买的鞋油盒，那感觉可真好！我还想起买火腿三明治、参观公墓、与人分享一些东西。有的时候需要一个人鼓励另一个人——这才是真正的生活！现在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臃肿笨重、带着伤口的人。（说话时手握拳头支着下巴，小腿交叉站立）我感觉呼吸不顺畅，我不行了。您知道吗？我听到了一种声音，这可不是疯人臆想出来的声音——它既不是传教者的套话，也不是小学生独创的诗歌，不是一句话的哲理箴言，更不是流传下来的俗语，而是电影名字、大字标题、广告口号。“雨点敲打着窗户”，这声音时常在我的脑海里回荡，可是在我和别人拥抱的时候被另一个声音打断：“你猜，谁要来吃饭？”或者“这里不让吸烟……”我敢肯定，今后我们这些狂人只能听到这些声音，再也听不到高度文明的超我之声：“好好认识你自己”或者“你要尊敬父母……”一批妖魔鬼怪刚被解除魔法，另一批就已经站在窗前打嗝儿了。（停顿了一会儿）很奇怪，我现在说话很有逻辑，但是眼前却看到了一个湖，冬天的黄昏，湖面已经结冰了；又看到一棵小树，树梢上挂着一个瓶子；还看到一个胡子拉碴的中国人，站在门拐角处张望，现在他又走了。另外，我心里一直在哼着某种沉闷的旋律。（哼着某种沉闷的曲调。基尔布想说点什么）别，让我说完。您就站在那儿。我说话时喷唾沫星子吗？应该是吧！我能感觉到牙上有唾沫。但我要说的话还没说完。我过去经常想，在我的新西装还没做好前，千万别爆发世界大战！现在，在您和我断绝交往之前，我要把我的想法开口告诉您。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有兴致张开嘴说话。（突然紧紧抱住基尔布）为什么我现在说话这么流利？我宁愿自己是结巴。（弯下身子，更紧地搂住基尔布。基尔布蜷缩起来）我……想结……结巴……为什么我看东西这么清楚？我不想看到地板上这么清晰的纹路。我想近视。我想哆嗦。为什么我不哆嗦呢？为什么我不结巴呢？（腰弯得更厉害了，基尔布也随之弯得更加厉害）我曾经很想睡觉，但是房间实在太大，无论躺在哪儿都会失眠。这房子对我一个人来说实在太大了。哪儿是可以睡觉的地方呢？小点儿的房间！小点儿！[奎特弯得非常厉害，以至于基尔布开始呻吟。他继续使劲，刚刚的呻吟声停止了。基尔布倒在地上，不再动弹。奎特交叉着两臂。

［停顿。

我闻到他身上有股香水味。

［停顿。

那时候，我穿着刚缝好扣子的衬衫，何等惬意啊！

我的衬衫撕破了。太好了！这件衬衫我穿了好长时间了，一撕就破。

［停顿。

［大声打嗝儿，整个房间都能听到。

［长时间的停顿。

［又一阵打嗝儿声。

［奎特奔跑着，头撞向岩石。又站起来，继续撞向岩石。过了一会儿，他又站了起来，再一次撞向岩石。他最后一次站起来，撞向岩石，倒地不动了。舞台灯光逐渐消失，只有几处还有亮光：面盆里的面已经饧好，冰块正在融化，大气球已经瘪皱，岩石还立在原处。一个水果箱滚下来，好像滚过了好几级台阶，停在岩石前。一块很长的灰色地毯从岩石后铺展开。水果箱里、展开的地毯上，群蛇蠕动。

——幕落

（1973年）

形同陌路的时刻

一部舞台剧

付天海　译

“别吐露你所看见的东西；就让它留在图像里吧。”

（多多纳[10]神谕宣示所箴言）

十余名演员和戏剧爱好者

舞台是耀眼灯光下的一块空旷场地。

一个人飞快地跑过场地，表演开始。

又有一个人从另一个方向同样跑过场地。

接着两人呈对角同样跑过场地，各自身后都跟着一个人，彼此保持很近和同等的距离。

[停顿。

一个人从场地后侧走过。

他一边独自走着，一边不停地用力张开十指，伸展并缓慢地举起双臂，直到在头顶上形成拱状，继而又把它们放下来，同样从容不

迫，就像他自由自在地走过场地的样子。

他消失在后面的小巷之前，边走边造着风势，大张开两手将风扇向自己，同时相应地将脖颈后仰，面朝着天，最后转弯走下去。

当这人转瞬间又以相同的节奏出现时，另一个人从舞台中央迎面朝他走来，并且边走边无声无息地打着拍子，先是用一只手，继而另一只也参与其中，最后从场地拐进另一个小巷时，他的整个身子都跟随着拍子的节奏晃动，就连步态也娴熟地融入节拍之中。

他像前者——他在后场以均匀的步调进进出出，继续竭力造着风势，发出光芒——一样，亦步亦趋地转过身去，一而再，再而三，跨着大步走过场地，一个劲地打着拍子。这时，在舞台前面又有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人相继入场，从左边，从右边，从上边，从一个看不见的栏杆或桥梁上跳出来，从下面，从一条沟里或者一个胡同口里钻出来，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

他们也在场地上跑来跑去，在上面一哄而散，离开场地，立刻又跑回来，独来独往，各自“表演着自己拿手的东西”，不断突然变换着形体和姿态，似真似幻：由立定到跳跃，立刻又是过渡状态，再说神情几乎一变不变，突然改变方向，拍打鞋面，伸开双臂，将手遮在眼上方，拄着拐杖行走，轻声踏步，摘下帽子，给自己梳头，拔出一把刀，空中挥拳舞来舞去，回头张望，撑开雨伞，梦游，突然倒地，随地吐痰，沿直线练习平衡，踉踉跄跄，蹦蹦跳跳，行进途中身体旋转一周，轻声哼唱，发出呻吟，用拳头击打自己的脑袋和面部，系紧鞋带，顺着地面短暂打滚，在空中写来画去。所有这一切混乱不堪，无始无终，只是在筹划中。

转眼间他们又消失了，台前那些，场地中央那个，还有最后面那个。

[停顿。

一个人穿过场地，眼睛看都不看场地，他是个钓鱼人，正在前行的路上。

随即有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老妪，同样穿过场地，身后拖着一辆购物车。

她还没有完全走出人们的视线。这时，只见两个头戴消防员钢盔的人冲了上来，手臂上挎着软管和灭火器，与其说是在执行紧急任务，不如说是一场消防演习。

紧随其后的是一个球迷，走起路来神情恍惚的样子，正在回家的路上，离家还很遥远，腋下夹着一面烧焦的小旗，旗子在他行走时开始逐渐脱落。后面又跟着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肩上扛着一把梯子，然后有一个穿高跟鞋的美人紧随着他登场，超过他时蹭上了梯子，可两人对此都没有在意。

[停顿。

一个玩轮滑的人从场地上疾驰而过，转眼间没了踪影。

一个地毯商装扮的人，肩上扛着一摞地毯，佝偻着身子，弯曲着双腿，不时驻足歇息，跟在玩轮滑的人身后横穿过场地，行走在拜访客户的途中。

他依然艰难地拖着步子走去。这时，一个牛仔或牧马人装扮的人与他擦肩而过，每走三步就抽着响鞭，同时和对方一样各走各的路。

此间，同样有一个赤脚女人从远远的后方穿过场地，她走走停停，双手掩在脸上，行进中将双臂垂下，嘴里含着一根手指，咧着嘴傻笑，吧嗒吧嗒地拖着脚兜起圈子来，一副弱智的样子，或许她就是刚才穿场而过的那个美人吧。与此同时，在场地最前方，有两个年轻姑娘紧随着这个赤脚女人，她们登场时手挽着手，一瞬间突然变成一对侧滚翻运动员，不一会儿又悄然不见了踪影。

随之，有一个人像穿插进来的场地守护者，拐来拐去地走过场地，从一个圆桶里大把大把地往外撒灰，有一个罕见的老者当随从。这人高高地昂着脑袋，上面顶着一只硕大的摇篮，连同一个相应的纹章，两个拳头扶着它们，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如同走在钢丝上似的，随后干脆松开双手，让那玩意儿自由地在头顶保持平衡，同时慢慢地开始蹦蹦跳跳，最终成为一种自信的表演。

几乎与他同时，还有一个地方商人打扮的人急匆匆地走过去，他在穿越场地时将自己的一串钥匙（也许是汽车钥匙？）塞进兜里，把另一串大些的钥匙（房门和店铺钥匙？）掏出来，边走边拨弄出合适的那一把来，并且拿着它朝着自己的目标退去。

紧跟着，有个身份无法确定的人出现了，就像是尾随着他跑过来似的。这人在场地中央停住步子，又慢慢转过身去。

[停顿。

耀眼的灯光下，场地上空空如也。

场地高高的上方有一架飞机，一会儿是飞机的影子？

然后又是先前的状态。

一阵尘土飞扬；一阵烟雾缭绕。

一名身着制服的人从舞台一侧阔步穿场而过，随即又从另一侧返回来，手里拿着一束花，随之走捷径消失了。一名滑板爱好者拐来拐去避开某种想象中的障碍，然后从滑板上一跃而下，将滑板夹在腋下，不紧不慢悠然自得地退去，与先前那个玩轮滑的人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转眼间被一个身穿大衣、头戴礼帽的剪影所替代。当这个行者脱帽向四周频频致意时，后者身上不时掉下叶片来；当他要解开大衣纽扣时，前者身上刷刷地落下碎石和细沙来，最后还有几块石头砰砰地滚落下来。

相反，这个身影湿漉漉的人，他此间已经沿着完全不同的轨迹穿过场地，浑身上下水淋淋的，仿佛是一个乘船遇难者，他弯曲着双膝慢慢地移动过来，逐渐夸张地直起身子，然后便踉踉跄跄地从图像上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此刻走来的一个年轻女子，一身轻便的工作装，手里的托盘上放着几只咖啡杯，划起一道弧线穿过舞台，之后便拐进一条小巷里。

有一个马路清洁工同样走过去，沿着另一条路线，推着放有扫帚和铁锹的小车。

[停顿。

灯光下场地空空如也。

一声寒鸦的尖叫，犹如人们会在深山野林里听到的那样。

此后又是一只海鸥的叫声。

一个戴着盲人眼镜的人摸索着走进来，手上没拿拐杖，在场上四处瞎摸，然后茫然若失地站在那里。与此同时，在他周围，四面八方不时地充斥着一种插曲似的热闹情景：一个跑步的人踏着沉重的脚步突然从他身边跑过（他已经跑了很久）；一个人慌慌张张地飞奔而去，不时回过头来张望，他身后有个人穷追不舍，冲着他挥舞拳头，把他当一个小偷在追；一个人作为露台服务生登场，打开一瓶酒的瓶塞，用手指将瓶塞弹过场地，随之又退下场去；又是先前那个推着购物车的老妪，身边跟着另一个几乎同样装束的人，只是购物车不同而已；同时有一个人骑着山地车，一再从车座上抬起身子；同时还有一大帮人迈着大步，一个接一个走过场地，他们身上的旅行袋随之晃来晃去，就像有时候年轻人在火车上从一节车厢涌向另一节，或者一个球队下了巴士赶往赛场时那样；又有一个人行走时翻阅报纸，头抬都不抬一下，绕过那个在场地中央好像侧耳倾听的盲人。这时，一个陌

生的面孔从拐角处奔来，从盲人身后抓住他的肩膀，挽住他的胳膊，拽着他穿过场地中央退去，盲人头也不回一下，退场时小心仔细触摸对方塞到自己手里的书。

在这两个人刚刚站过的地方，此间又一个漫游者在走动，穿着长长的风衣，背着显得不合时宜的背包，脚穿钉有铁掌的鞋子，如此一心只想着赶路，就连在场地上中途歇脚的念头都没有。他夸张地甩着一只胳膊，仿佛要在甩动中抱住一个想象的腰，然后又同样甩动起另一只。

其间一个打扮时尚的年轻女子横穿过舞台，一手握锤，一手拎着一把打开的折尺，嘴里衔着几枚铁钉。

[停顿。

一张报纸从场地上翻卷着飘过，接着又是一张。

一辆遥控玩具车突然从一个角落里冒出来，在场地上猛地冲来冲去，继而又快速驶离。

一只五颜六色的风筝摇摇晃晃地落下来，拖过场地，然后像那张报纸一样被吹进那条小巷里。

一根跌落在什么地方的铁棍发出的声音久久地回荡着。

一声雾笛。

一声短促的不可名状的尖叫，然后是小鸟儿叽叽喳喳的啾唧，接着一阵嗒嗒的脚步声，就像一群孩子欢快地从街道上跑过。

一个醉汉东倒西歪地斜穿过场地后侧进入灯光里，先是嘟囔着什么，然后号啕大哭，继而发出尖锐的喊叫，最后就是龇牙咧嘴，咬牙切齿。

一队机组人员提着各自的行李穿过场地，沿着他们好像事先确定的路线走去，后面跟着一个小丑，紧随着他们，做着鬼脸，亦步亦趋地戏仿着他们，亲吻着他们的脚印，然后伏在地上仔细倾听，最后爬着退去。

在这期间，场上什么地方又冒出一个年轻女子，行进中她从一个袋子里取出一沓照片来，一张一张地仔细观看，停住脚步，露出微笑，笑得越来越起劲，始终沉浸于同一张照片中，继续走去，直至看到迎面走来一个与她同喜同乐无法言状的行人，她立即收起笑容，戴上面具拐进那条小巷里；而对方则继续微笑着走过场地，片刻间，那个小丑画着小弧线翻着跟头闯进来，随之又消失的小丑戏仿着他的模样，随之又消失了，于是那微笑在脸上堆得更满。

一个人从空间深处阔步疾速地走过来，像个年轻的实干家，一身相应的行头，行进中突然停住步子，手猛地伸进上衣兜里，接着翻出其他口袋，先是把兜里的东西倒在手里，然后放在小手提箱上，最后再将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塞回去，小心翼翼，一丝不苟，十分庄重：色彩鲜艳的手帕、游戏色子、一个空鞋油盒（以此弹击出一种丛林鼓声）、一个扇贝、袖珍计算器、钢制短棍、苹果、女式长筒袜、心形胡椒蜂蜜饼、鞋带、一沓零散的钞票、信用卡夹和照明手电。

然后他像先前登场时一样又急匆匆地退去，提箱子的手同时还拿着苹果。

那个马路清洁工又拿着扫帚一路清扫走来。这时，他把那些纸扫到自己前面，可它们立刻又飞到他的身后，他越是朝着一个方向扫去，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纸片反方向从他左右两侧飞过，无论他怎样一再折回来，反复从头开始；他毫不放弃，左右清扫，就这样向前走去，一刻也不停顿，最后消失在视野之外。

终于又有一个美人走过，在她出场的这一刻，她垂着眼睑，看样子，她意识到四面八方的眼睛都盯着她，便故意装成这样——一副漠然置之的样子——，她穿过舞台中央，仅仅从眼角不时投去一瞥，只是让人可以预感到：没有猫的尖叫，没有从扩音器里传来的打嗝声，没有突然而至的喇叭声，也没有从小巷里猛地传出的犬吠——戏仿？——此时此刻，也不是缠在她双腿之间的纸片，那突然从天而降的瓦

块干扰令她不安，更不是那片刻间从一条小巷里直泼遍她全身的水柱；只是在退场时她才又睁开双眼。

一个身着时装的姑娘端着咖啡托盘绕着大圈走来，同时一个乞丐装扮的人坐着当完别人画像的模特后横穿过场地，边走边数着盘子里的钱币，随后将一切统统塞进大衣兜里。

然后两个身份不明的人从不同方向穿过四方形场地，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本书，另一个手里拿着一块面包。

他们齐头并进时，彼此都不看对方一眼，其中一个翻开自己的书，另一人则啃起自己的面包。

看书的放缓了脚步，吃面包的同样如此；然后看书的抬起头来向后张望，啃面包的则左顾右盼地退场。

空空如也的大场地上灯光明亮，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另有两个不明身份的人出现了。

其中一个停住步子，抬起头来，像是到了目的地，环顾四周，深深地呼吸着，点了点头，另一个则不断地向他挥手示意，一而再再而三，最终他从容地转过身去，保持距离跟随他而去。

在这期间，后台响着铃声，一个骑车打扮的年轻人走着。

一个裹着头巾、穿着胶鞋的女子横穿过场地，她拖着一只喷壶，旁边有一把枯萎凋谢、近乎腐烂的花束，她将花束高高地扔到场后。

紧接着，不知从什么地方又来了一个几乎同样装束的女人，名副其实的老太婆，手里拿着一把镰刀，一捆干树枝，还有一只盛满野蘑菇的提篮。

第三个女人，身份不明，几乎同样的装束，沿着第三条路始终如一地在走动着，她两手空空的，脊背和脖颈深深地弯曲着，面朝地，几乎原地未动，所以在她身后另一个漫游者赶上来，放慢步子，一而

再再而三，仿佛那小道过于狭窄而无法超越似的，与此同时，他平静地遥望着远方，毫不理睬近在咫尺的那个人。

在这两个几乎一直在原地踏步的人对面，走来一个厨师装扮的人，看样子好像是在短暂的工作间隙出来透透风，迅速地抽上几口烟，随即又不见踪影了。

又一个人十分吃力地从拐角走来，肩上扛着沉重的渔网，而那个漫游者在退场时捧着飞入自己衬衫里的一只飞虫在亮处看了看，并且放它继续飞走。

打雷了，接着又是一声。

一个女子跑过场地，又跑回来，怀里抱着乱七八糟的一大摞晾晒的衣物。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一个叉开双腿的人大摇大摆地走过去，臀部和肩膀一个劲地摆动着，活像一个场地主人，紧跟其后是个场地小丑，小丑起初戏仿他，然后挽住他，先是挽住手臂，接着抱住腿——一条腿跟在他身旁蹦来蹦去，最后趴在地上，扮作哈巴狗围着主人狂吠不止，而这个只知道独自一人在这个广阔场地上的场地主人在他巡查的过程中也仅仅只有一次感受到了小丑的存在。

这期间，在一条侧道上，一座端直固定在一辆平板车上的雕像被拖过去，而在同样一条侧道上，又有一个人走过，并且捂住双耳要躲开从左右两边响起的警笛声。警笛声越来越大，最后升级为轰鸣的警报声（但随即又中断了）。

一个捕鸟人手提鸟笼，身着羽衣，幽灵般地从舞台上一晃而过。

望着捕鸟人的视线被像一小队伐木工人的东西挡住，他们扛着斧头和锯子走在上班的路上。

在他们身后，一个年轻女子鬼火般地从场上闪过，她瞪着大眼，一手掩口，然后放下来，发出无声的哭喊，周围随即响起一片似乎是正午麻雀的叫声，夏日燕子的唧唧声，还有其他一些叫不上名字的鸟儿的啾唧声。

一个球童装扮的人与这个年轻女子擦肩而过，继而又是一个日本人打扮的人，脖子上挂着一部相机，手里还端着一台随时准备拍照，他毫不理睬这些与他不期而遇的人，眼睛只盯着这个场地，随即将它固定在图像里，连同那个刚才默默哭泣着离去的女子，一个这次前面扬着帆的玩轮滑的人，一个取代了先前的厨师、又跟他一样出来透风抽烟的、转眼又很快离去的医护人员。紧接着，他又径直跑回去，那儿已经有人在招呼他继续往前滑。

两个人分别横穿过后场和前场，耷拉着脑袋，他们身上丝毫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只是他们的行走有点匆忙。

[停顿。

场地空空如也，灯光闪亮。

呼啸声响起来，愈来愈强烈，汹涌澎湃的波涛声在场上激荡回旋，逐渐平静下来。

一个蒙着双眼的男子或者女子拐着小弯摸索着走出一条小巷，复而消失在另一条里。

一个人将手遮在眼上方，头顶一根仿佛忘记拿掉的羽毛从场上走过，而另一个与他迎面走来，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显然刚刚包扎过的手。

两个跑步的人一前一后分别从不同方向疯狂地奔过场地，在咚咚的脚步声中，几乎撞到一起，既无问候，也无致意。

相反，这种情形却发生在两个骑自行车的邮差邂逅时，同样也发生在两个身着制服的巡防员相遇时，接着还发生在一男一女彼此擦肩而过时，当然几乎是隐蔽的，或者是秘密的。

一个人费了好一阵子从场地上拽过一叶蓝色的轻舟，里面有一个白色的身影，像木乃伊似的，可以让人预感到。

一个摆出一副逍遥的店主派头的人从一旁冒出来，如此久久地置身于观众的视野中，然后又退下去。

一小队漫游者呈对角线穿过场地，相应地有打前站的，有大队人马，还有那个孤零零的掉队者，他耷拉着脑袋，拖着沉重的脚步，任由场外有人吹着口哨催促也不加快速度；他退场时甚至停住脚步，脖颈后仰，用手在空中比画着不同鸟儿的飞行动作，继续前行时将这一切都扇到自己的长袍底下。

在这期间，又是那个，或者是另一个美人飘然而过，挽着那个，或者另一个？场地小丑，小丑兴高采烈地跟在一旁一瘸一拐，蹦蹦跳跳，翻着跟斗；行进途中，她的身上闪现出巨大的亮光，从头戴的花环直到高跟鞋和那闪光发亮的饰物，在这其中，她透过一片硕大的、孔状树叶，如同透过一把扇子一样投去一个个目光；小丑则向这一圈人抛去飞吻，其中有一个黑衣修女走出来，面部遮着，一手提着一只塑料箱，另一只手里拎着一个包裹，在这两人身后去往别的地方。

接着几个身份不明的人在舞台上停留了一阵子，从一个行动奔向另一个。

一个人扛着一棵树走过。

一个人从地下，从深处冒出来，戴着下水道工人的头盔，接着又以同样的方式消失。

同样是从场地后侧下方，好像从沟渠里或浅井里又爬上来两个，看样子已经一起在那儿待了很久，他们沐浴在场地的灯光下，拥抱在一起，从那里开始不慌不忙地走着一个开放的螺旋形，一再回过头去张望着他们待过的地方。

一个匪徒装扮的人，两手空空地玩着手指，其间短暂登场，此刻又快速地折回去，两只手提着沉甸甸的购物袋，里面的蔬菜探出头来。

接着有一个被捆绑着的人，同样迅速地穿过，一个赤脚人，由两个身份不明的便衣押送着。

那个被捆绑的人在其短暂的被押解途中用眼光巡视了四面的观众，但是紧随其后的也许又是那个，或者另一个美人，她将观众的目光全都吸引到自己身上，她这次穿过场地时拖着沉重的步子，腹部高高隆起，像临产的孕妇，孤零零的，她手里拿着一封信，一边行走一边往信封上贴了一枚邮票。

这个和那个，老的和少的，男人和女人此后成了她的随从；他们也拿着各式各样的信件，将它们翻来看去，然后才给其中的一部分写上地址，封上口，再看一遍，端详着那些明信片，从不同方向奔往场外一个看不见的中心；这人两手空空地又返回来，去往别的什么地方；另一个朝着那条小巷的纵深走去，还有人回来片刻后又从后场钻入地下。

在这期间，舞台某个地方有一个人几乎一丝不挂，像一道闪电似的划过，又一个人身着工装走过前场，腰间紧束一根粗麻绳，肩上搭着一个海员背包，登场的瞬间卸下包，往里塞进一个硕大的地球仪。继续行走时，地球仪从包里向四周放光，而它的主人一路上兴致高涨，一再不停地说着一些令人无法理解的话语，这些话语逐渐消退为喃喃细语和窃窃私语。

两个猎手用一副绿色的树枝担架抬着一名同伴从场上走过。

接着有两个人干脆只是走动着，一个漫无目标，一个目标明确，其中一个在行进中从一个漫无目标的人变成了一个目标明确的人，而那个目标明确的追随者则突然失去了目标。

场地周围再次响起一阵呼啸。

一个像服务生的人在短暂地登台时，从一个桶里取出冰块在桶边磕成碎块。

[停顿。

明亮的灯光下，场地上空空如也。

一张纸片从高空落下来，宛若夏天里的一片树叶。

一声枪响，其回声不绝于耳。

一个人佩戴着一副阴森古怪的配镜器登场，像是从眼镜店里出来，试了试观看效果，又退下去。

别的地方有一个女子横穿场地，肘窝里挽着一只篮子，里面盛着早熟的苹果，在行走时拿出一个就啃了起来。

一个场地守护员，是同一个呢，还是另一个？刹那间拐进来，手执一根胶皮管冲洗地面。

有人高高地撑着阳伞，率领一个小旅行团登场，更确切地说，他们一个个佝偻着身子，一副乡巴佬模样，身着深色庄重的服装，多数年事已高，他们猛然停住脚步，仿佛面对场地上这赤裸裸的光线，不约而同地发出一片惊奇的呼喊。与此同时，他们个个都弯腰驼背，缓慢地在这个圈子里交头接耳，退场时又在领队默默的见证下，仿佛就是做给他看的，重复着这样的呼喊，而在他们紧闭的嘴唇里，呼喊变成了巨大的嗡嗡声。

又有一对男女从远处彼此迎面而来，其中男的立即垂下头来，而女的则一直昂首挺胸，就在两人即将相遇的时刻，男的突然抬头望着对方的脸，可女的却已抢先一步将头歪向一边。

两个美人，像是竞走运动员——运动项目——，身着相应的装束，一溜烟似的从场地上扭过。

一个女子，看样子像是成长中的现代商业女性，手里拎着一只透明的小提箱，里面的物品清晰可见。她边走边仔细研读一份卷宗，同时手里还夹着一部抽出天线的便携电话。电话顷刻间掉在地上，就在她不情愿地弯腰拾起电话之后，箱子又随之迸开，里面的物品全都撒了出来，在她骂骂咧咧地把散落一地的物品又收集起来之后，刚一迈

出步子就打了个趔趄，对此她突然莫名其妙地微笑起来，继续行走时，她再次埋头于卷宗中，这种微笑便愈发明显，因为在她发出一声痛苦而愤怒的喊叫之后，她此刻才真的踉踉跄跄，跌跌撞撞，几乎跌倒在地；这微笑在退场时居然变成了大笑。

又是一个漫游者，一手拿着礼帽，一手拿着书，低垂着脑袋在走自己的路。这时，另外两个跑步者踏着步子跑过来，脚步声使得整个场地隆隆作响，他们在超越时就像把这个行路者夹住一样，将他手中那两样东西蹭到地上；他们连头都不回一下，便上下晃动着脑袋扬长而去了。这个行路者此刻一本正经地啐口唾沫，弯下腰拾起东西，继续走自己的路，那个跑在后面的人突然举手致意，他也随即突然挥手回应致意。

当他依然逍遥地漫游时，在他的身后已经有一个土地测量员立起了测量支架，透过测量仪窥望，向场地对面那个看不见的伙伴急速地左右挥手示意，向对方竖起大拇指，转眼间已经又撤离了场地。

一个老者出场，手里拎着一把古老的大门钥匙，犹如一个稍纵即逝的边缘形象。

接着一个男子出场，有可能是先前那个日本人。他手里握着一根登山杖，背着一个白发妇人；一个小伙子手里握着一把用棕榈叶或蕨类植物扎成的掸子；有两三个人走过去时从军用水壶里喝着水；一个人装扮成刚刚从西奈半岛返回来的摩西，捧着刻有法典的石碑；一个人显得磨磨蹭蹭的样子，突然打起精神，并拢脚后跟行礼；一小群人身着白色和黑色的节日盛装，行进间不断有米粒从他们的头上和肩膀上滚落下来；又有一个美人，起初只能看到她的背影，突然间却面朝着我！转过身来。

同样是突然之间，一团东西从他们之中飞出来，冲到场地上，先是跳起踢踏舞，就像多声部的哀泣、怒吼、号啕、哆嗦、尖叫，并且这样在场地上滚来滚去，最终真相大白，这不是许多生灵，也不是两个相互打斗的人，而不过是一个孤零零的生灵，处在死亡的挣扎中，然后终于挺过来了；这团东西舒展开来，旁边散落着那些在打斗中丧失的东西，那些鞋子。

那个阿谀逢迎的场地小丑跑了过来，戏仿那个垂死者的挣扎，直到最后抽搐。

一片寂静。

两个人跑过来，身穿白大褂，抬着一副担架：几下子就将尸首抬走，连同死者的遗物。

两个人，起初保持距离，成为死亡的见证人，此刻彼此纠缠在一起；他们相互攻击对方；彼此扑打着迅速离场。

接着，一个快乐而毫不知情的人逍遥自在地走过去。

明亮的灯光下，场地孤零零的。

场地四处又呼啸着，秋天一般。

一个园艺工装扮的人走过去，身后拖着耙子当节杖，上面有一袋干草，其中有几簇掉在地上。

一个残缺不全的马戏团——一个发布人、一个报幕女郎、一个看似玩杂耍的、一个模样像小丑，肩上还蹲着一只小猴，一个侏儒——绕场一圈，就像在圆形竞技场里一样，半路上似乎那个场地小丑也加入其中，瞬间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立脚之地，接下来又孤单一人，并且误入迷途。

又有一个美人趾高气扬地穿过场地，另一个紧随其后，迈着更快的步伐，突然冲向前去，在她前面那个美人的脑袋上狠狠地拍了一下，随即跑进旁边一条巷子里；前者则捂着脑袋，一动不动地站着。

还在她如此一动不动的时候，又有一名玩轮滑的人走过来，并不停地用滑雪杖助推着，在疾驰而过时一把抢走她的手提包，从而使她原地打起转来。

当她依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时候，一个人拿着画架走过去，头戴黑色尖顶礼帽，身着十九世纪服装；一个戴着神怪面具，片刻间从

一个小巷子里闪出来，两人擦肩而过时相互用脚传着一个球；又有一个老妇人走来，推着那辆熟悉的购物车，车里塞满了破破烂烂的塑料袋，此间行进中自然发出刺耳的咯吱声；一个人装扮成人猿泰山，在后方远处的空地上晃来晃去；一个人身着晨服，推着一个垃圾桶一闪而过；这个女的和那个男的再次出现在场上，正在前往发信的路上。

一个男子蹑手蹑脚地从后面靠近那个美人，猛然跃起用手轻轻捂住她的双眼，还没有等到她回过头来看个究竟，就抱着她的膝盖和腋窝将她弄出场外。

她发出一声深切的叹息。

一个人走过去，赤裸裸的手臂上戴满了手表。

两个或者三个人身着沉甸甸的深色防寒服，手提皮箱和木箱，遇到另外两三个人，这几个人路上一身轻，穿着五颜六色的夏装。

他们双方暂时被一辆在其中盘旋行进的橡胶轮胎电瓶车挡住去路，车上两个头戴鸭舌帽的人押送着一口棺材，那个场地小丑双手抱在胸前，扮作参加葬礼的吊唁客，跟在车后一路小跑；这两伙人随之直截了当地开始互换好像早已准备好的衣物，分别继续朝着各自的方向退去。

在这期间，不知从哪儿飘来一块面纱，接踵而来的是一个身穿新娘礼服的年轻女子，看上去显然是在试穿，找寻着，找到了，消失了。

就在场上此刻人来人往的时候，而且更多人都轻手轻脚，场地周围似乎再次响起了孩子们赛跑时发出的嗒嗒脚步声，同时也夹杂着特有的呼喊。

随意一个人此刻从另一个人旁边经过，愣住了，对方也愣住了，他们彼此凝视着对方的脸，彼此认出了对方，相互弄错了，都摇了摇头，远远地闪开道，又一次愣住了，回过头去相互凝视着对方的背影，摇着头各奔东西。

无独有偶，就在这两个人的身影尚未完全消失时，不知从哪儿又有一个摇头晃脑的人走着他的路，他摇得越来越慢，自然逐渐过渡到点头，再由点头回到摇头，由摇头重新过渡到点头，这两个动作越来越慢，一次比一次凝重，直到最后，这个像那个一样表达着同样的东西。

与此同时，他丝毫也没有在意那个身着华贵的东方长袍的老者；老者用手指向前方的亮光，领着一个衣衫褴褛、浑身沾满泥巴、几乎不会走路的男孩穿过场地回家去；他曾经迎着先前那个每向前跨一步又退后一步的人走来，并且把他当成自己丢失的儿子。在这期间，又出现了一个仆人装束的人，他怀里抱着一只羊羔，走在这几人前面。

他们刚一走进各自的巷子里，那个场地小丑或主人便又紧跟着他们，眼镜推在额头上，手指在翻一本类似歌剧剧本的东西，成为他们兴高采烈的戏仿者——他戏仿他们每个人，随心所欲，乱七八糟——离他不远还有一个人陪伴着，手里端着这个沐浴在灯光下的场地的微缩模型，木头或纸板做的；最后又有一个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一只胳膊夹着模特假人，另一只手里捧了一摞服装；他们很快退下场去。

明亮的灯光下，场地上空空如也，四周不时传来此起彼伏的惊涛拍岸声，像在一个小岛上似的。

一声旱獭的鸣哨，一声鹰的嘶叫。

一只蝉幽灵般的短促尖叫声。

两个人推拉着一辆小板车走过，车上斜放着一根柱子。

一个男子尾随着一个女子，刹那间，仿佛这两个人在场地后面迅速地兜了一圈，女子尾随着男子；她挡住了他的去路，于是他躲开，而女子又封住他的路，当他执意要过去时，他的披风被抓住了，他随之脱开身来，半裸着身子冲了过去。这时，又有一个人不知从什么地方走到近前来，这女子连看都没看一眼就直接将披风塞给了他；这个新登场的人迈着大步要赶上第一个人，这女子也紧随其后，半道上又遇到一小队精神矍铄的老年漫游者。

另一个独行老人迎着这伙人走来，同样拄着手杖，突然无缘无故地举杖攻击这些漫游者，对方也不甘示弱，立即挥杖还击，最终打斗成了一场持续多时的花剑比赛，直到独行老人将对手打得落荒而逃，自己又若无其事地继续赶路。

接着有好一阵子，仿佛只有老人在场上走来走去，他们各走各的，总是朝着一个方向，同样这些人，从这一边登场，从另一边离场，又从这一边露面，这样无休止地兜着圈子，时而像排起了缓慢前移的长队，时而像游行时身着长袍的显贵，时而像收获感恩节列队游行的庄稼汉，手捧禾把、葡萄酒花篮和缠系玉米棒子彩带，时而像老兵连同相应的一切，最后无非就是些零零散散的老人，各自为政，或硬朗或虚弱，此刻这样彼此要争个高低，随之又友好和善，这一个此时走到一旁去，其他人则继续兜来兜去，在场地边上，在各个边上笨手笨脚地走动着，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又一个从场地另一边离队，站在那里，为脑袋、手臂、双脚连同手杖寻找着一道墙，一块搁板，然后浑身上下突然战栗起来，神色则依然平静，当此刻从一个小巷里传来孩子的喊叫声时，这种神色显得越发平静，而且越发苍白。喊叫声此起彼伏，那是惊恐与哀怨的声音，甚至盖过了场地上随后出现的来来往往的剧烈嘈杂声，是些随随便便的行路人，其中还有一个漫不经心地控制着这个情景的电影摄制组；尽管这个地方显然不是拍摄地点，可它连同在场的人和过路客都是这个摄制组不可分割的部分；在这种如此突如其来的混乱与喧嚷中，伴随着孩子的尖叫声，地平线后那一圈老人中，最后那个圆脸人战栗地退下去，当然那样从容不迫，以至于在这不停的战栗中，每一个猛然抬头的动作都清晰可见，在这拥挤的人群中寻找着那个或许留意着他的人；一无收获（或者那不是他要寻找的双眼）。

伴随着这个插曲，立刻又出现了几个短些的插曲。这时，场地上一下子只有小伙子们来回穿梭，绕来绕去，交叉而过；转眼间只有男子；转眼间又只有女子。

接着，一个男的装扮成女的，一个女的装扮成男的，他们各自奔跑在场地上；他们奔跑时一件接一件地失去了各自的装扮，急忙把它们拾起来，继续跑动。

在此期间，一个人扮作小伙子走过，现在又折返回来，不是从步态上，而是从皮肤和头发可以看出是个老气横秋的人，在别的什么地方，那个孩子早就不声不响了，而两个年轻人却在灯光下漫步，他们也身着富有东方风格的长袍，亲如兄弟，其中一个用手指勾着一条大鱼，而又是在场上别的什么地方，埃涅阿斯[11]背着年迈的父亲穿过场地，手里拿着一捆正在冒烟燃烧的书卷。

[停顿。

场地上闪耀着空空如也的光芒。

一阵摩托车的轰鸣响彻场地后方，却看不见摩托车手人影，之后，场地上方又响起了直升机螺旋桨的嗒嗒声。

随之又是一阵轰鸣，激荡回旋。

又有一个扮作捕鸟人的人走动在场地一隅，身上穿着不是用羽毛，而是贝壳制成的衣裳，走起路来叮当直响；他提在手里的鸟笼空空的，敞开着。

一名身份不明的人紧随其后，手塞在高高鼓起的大衣下面，捕鸟人频频回首向那人张望，而对方就像是踏着他的脚步节奏亦步亦趋，重复着每一个弯弯曲曲的动作。

这人在追随时啃起一个苹果来，一包婴儿尿布从他大衣里露出来。这时，这个贝壳人才又望着前方，甚至在行进中轻松无忧地转起圈来。

转眼间身后这个人已经到了贝壳人跟前，将他的两手绑在背后，用尿布包狠狠地砸向他的脖颈，致使他栽倒在地，待在那儿一动不动。于是他咔嚓咔嚓地嚼着苹果，挥舞着手中的尿布包离去。

就在这个被击倒的人用痉挛般的拳头攥着鸟笼，朝着那人的背影匍匐追去时，又有一个漫游者登场，头上顶着一截被雨水冲刷得光溜溜的树干，树根朝上；他环顾四周后放下树干，一屁股坐在上面，树根朝下权当凳腿用。

他摊开一张地图。这时，几个扮作士兵的人突然冲进场地，追逐了一阵子，人变得越来越少，然后从相同的方向又追逐过去，最终原地仅仅只剩下一个，变成了一个逃犯，上气不接下气，脑袋前后晃动。随即他出人意料地张开双臂，仿佛到达了目的地，悠闲地绕着同一地方转了一圈，然后凑到这个坐在树墩上的人跟前，举起手来，就像是在接受两小队人马夹道欢迎似的：一队拉着一顶贝都因[12]式帐篷，另一队推着一辆平板车，车上放着一个破裂成许多块的纪念碑；这个漫游者此时脱下鞋子，从里面倒出碎石和沙子，并让它们透过指缝漏下去。

在这期间，一个孕妇装扮的女人再次登场，推着一辆装满东西的超市购物车，现在由一个男子陪伴，这两人在灯光下慢慢停住脚步，尽其所能如胶似漆地拥抱在一起——女人同时还将车子在原地推来推去。

然后两人继续走去，女人此刻头顶一只用白布盖着的篮子，男子推着车子跟在她身后保持距离。这时，又有一个人昂首阔步穿过场地，伸开的双臂上捧着一个建筑模型：这次不是那个微缩的空空如也的场地，而是一座一人多高的传统迷宫，这个行走的人边走边试图描绘这迷宫。

就在他这样比比画画地舞动着退去时，下一个人登场了，又是一个扛着一卷地毯或狭长地毯的人。可是那地毯此刻对角摊开铺在场地上，形成了一条田间小路，连同土黄色的车轮印和中央一条草带；这两个先来的人不假思索地上前去帮忙，将小路尽头踩踏实后才又坐到自己的位置上。

这个扛地毯的人干完活后在路边盘腿坐了下来，与另外那两个人隔开距离。

作为第一批过路客，亚伯拉罕和以撒已经走过去，父亲跟在儿子一步开外的身后，一只手搭在儿子肩头上推着他前行，另一只手握着祭刀藏在背后；[13]后面跟着一对身份不明的夫妇，忽然摇身一变成了国王和王后；跟着的那个“年老的放高利贷者”，片刻间又变成了一个蹦蹦跳跳的舞者；跟着那个《正午》中的英雄[14]，走着走着停住脚步，变成了一个拄着拐杖的行者、打响指的人、敲着节拍的人、空中挥舞的指挥家、摇头晃脑的人，继而又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一个心态平和的写作者，凭着那个从腋窝下抽出的记事本，然后又变成了一个魔术师，将记事本塞回去，用魔法从水晶中变出一个圆球来，它瞬间将全场的灯光都束在一起；与此同时，又是他自己，随着纸袋一声清脆的爆裂，它又失去了魔力。

[停顿。

场地上灯光明亮，依然是那些人物，或坐在树桩上，或坐在路边。

这时，场地四周响起一种像是鱼儿翻滚时发出的噼啪声，一阵巨大的嗡嗡声响彻上空，像是夏日的蜂群在飞来飞去。

一个人慌慌张张迫不及待的样子，拎着一只公司代理的箱子，闯入那块空地上，突然又平静下来，悠闲地走到一侧，走到那个坐在路边的人跟前，坐在他的旁边。

以撒安然无恙地返回来，亚伯拉罕两手空空地跟在后面，显得疲惫不堪。

他们先后坐下歇息，父亲将头埋在儿子怀里。这时，又有一群孩子穿过，看不见他们的影子，却可以听到接连不断的呼喊。一个人跪着靠近，然后一跃而起，拍掉身上的尘土，随便就站在什么地方。

又有一个人扮作场地小丑蹑手蹑脚地走过来，挨个儿自下而上地打量着场上每个人，随后又踮起脚跟退回后场。在这期间，一个“书

呆子”装扮的人登场，不断用手往摊开的书本里扇着光线，就这样在场上走来走去。一个人沿着第二条道蹦蹦跳跳地走进来，仿佛踩在从河中浅滩突出的石头上，此刻在河岸上停住脚步，扭头张望。沿着第三条道又走来一对舔着冰激凌的老年夫妇。

片刻间，场上不再有人走动，每个人都停住脚步，同时都停止活动，站着，坐着，卧着；随后登场的也莫不如此：两个像摔跤手的人彼此盯着对方兜圈子，寻找机会要撂倒对方，突然又平静地走开了；一个人以胜利者的姿态高举双臂登场，但立刻又把胳膊垂下去；一个人跑步进来，胸前别着一个号码，待站定后号码随即从他身上脱落了；一名女子刚迈入灯光下时像是起死回生的幽灵，继而成了翻跟斗的女子，然后成了人群中一个不再引人注意的身影；一个人肩头和帽子上落满了雪，几乎已经走过去时才停住脚步，并且坚定地拐向场地中央，此时他摘下帽子，抖去积雪，脚步越来越轻，步子也越来越小。

最后还有一个身着蓝色学徒工装的身影踉踉跄跄地走到场上，正忙着让一个车轮滚过去——或者那不是一个圆形花窗吗？上面镶着沙特尔的蓝色彩绘玻璃，光线照在里面又折射出五彩缤纷的景象——，半路上又跟那玩意儿一起掉头，已经空着手走回来，在其他人那里寻找自己的位置，当然找了又找，结果未能如愿以偿——，越是找不到位置，他就越显得慌乱，最终那个化名场地主管或主人的场地小丑断然给他在场上什么地方指定了一个位置（向来还没有一个人如此找不到自己的位子），随之那个帮助他的人摘掉面具，成为与所有别的人中间地带的“我不知道我是谁”。

[停顿。

场地上依旧灯光明亮，那些主人公都依然悉数在场，或保持距离，或彼此紧紧地挨在一起，有躺着的，也有站着的，有蹲着的，也有正襟危坐的。

场地上又回荡着轰鸣或呼啸声，接着是对角向后面持续不断的咋舌声，像是湖面结冰时发出的响声，接着是远处蟋蟀单调的唧唧声，之后一片宁静。

接下来的情形交织了好久：他们个个都吓了一跳，同时战栗不停，一阵又一阵，然后是惊醒，再就是猛地一动。

一个扇着自己的耳光。

一个邀请一个女子坐到自己腿上，她即刻就坐在男子身上。

一个把自己的外套当礼服用。

一个给另一个擦鞋，一个男子靠在一个女子身上寻求支撑，一个愤怒地在地上抓来抓去。

一个看样子像等候的人有了一个共同等候者，第三个也凑了过来，扮演着这两个人的等待。

一对男女将手放在对方的生殖器上。

一个剪去自己额前一缕头发，一个在行走时撕碎了胸前的衣襟，一个跺着脚磕掉沾在鞋上的狗屎，一个女的向另一个扔去一把钥匙，接钥匙的人向前蹦了一步。

一个走过时拉扯着另一个。

一个趴在地上，将一只耳朵贴近地面，然后换作另一只。

一个看样子要放弃等候，正要走向一边时，却被另一个弄回自己的位置。

一个在寻找什么，先是弯着腰，然后趴在地上；一个和他一起寻找，如出一辙；第三个加入其中，碍手碍脚的；别的什么地方也有一个人自个儿开始寻找起来。其间第一个找寻者找到这样或那样的东西，举在灯光下仔细查看，发现那根本不是自己想要找的；其中一个共同找寻者重新找到了本以为早已丢失的东西，对着它又是亲吻，又是爱不释手。

一个用军用水壶向躺在地上的另一个人额头浇水。

一个扮作培尔·金特[15]的人在台上走来走去，剥着他的洋葱。

场上这些人越来越多地相互打量着，不，是相互观望着：这个突然大发雷霆、大吵大嚷、狂奔肇事的人却因为这纯粹的观望而平静下来了，而那个突然放声哭泣的女子和那个悲戚地吹口哨的男子也同样如此；只要你每次观望，同时也是接近。

同样的情形也是，大家索性都待在这里，有人用眼睛观察，有人用耳朵倾听，他们就这样相互观望着，又分别转换成对方，如此穿过整个广阔的场地。

一个带着识别记号，先是鲜花，然后是图书，再就是照片，穿过这一个个队列：一个接着一个摇头，惊呆，接着才是真的摇头，终于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无声的肯定和笨手笨脚的拥抱。

同样如此，两个共同继续寻找的人把脑袋撞在一起，一个从地上稍稍地掀起另一个，跟这个喘着气的人一起喘着气打转转，对方也在不停地急促喘息。一个女子抚摸着一个男子，她同时向他做出鬼脸。

他们再次悉数在场，眼睛眯得越来越小。

乌鸦的嘶鸣和犬吠，同时还夹杂着隆隆的雷声。

狂风大作，在场地高高的上方，一阵雷声和哗啦声，而下面的人却纹丝不动。

接着在这情景周围，响起一片纷繁嘈杂的号泣与悲鸣，这儿出自一个孩子，那儿出自一头大象，再远传来的就是一头猪、一条狗、一头犀牛、一头公牛、一头驴、一条鲸鱼、一条蜥蜴、一只猫咪、一只刺猬、一个乌龟、一条蚯蚓、一只老虎、一条蟒蛇发出的声音。

然后出现的无非就是它们各种各样的颜色：有衣裳，有头发，还有眼睛。

一个此间观望着另一个。

两个人分别将双手伸进对方腋窝里取暖；一个面对这个对他心怀好意的人吓了一跳，因为他看到的是自己的双影人；一个出于绝望寻找着那个观望他的人，并且在找到后能够扮演对方的状态；一个盯着每一片缓慢飘落的树叶，只要叶片落到地上，他都大吃一惊。

所有人用他们的身体在场地中央共同构筑起一个露天台阶，那个躺在台阶最上方的人突然挺起身来，顺着台阶拾级而下。这时从众人脚底深处传来一阵钟声，几乎难以预料，时而细弱，时而圆润，时而遥远，时而很近，时而纯正，时而扭曲。他们个个一跃而起，将手搭在大腿上，俯身倾听着这钟声，有人心醉神迷，有人面露愠色，有人喜形于色，也有人痛苦不堪。

在这钟声中，有两个身着非洲盛装的身影在场地后面用篙撑着一只看不见的船划过来，只有上身露在上面，桨板清晰可见。他们停船后不声不响，使劲地挥动着双手邀请大家上船。

没有人应邀上船，尽管一股冲动先后猛地吸引着几乎每一个人，使他们向往那个方向。

他们掉头划去，那些海底深处的钟声仍在继续鸣响。

在最后的时刻，那个身着蓝色学徒装的人要冲着他们的背影狂奔而去，但几乎同时“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因为有人给他使了绊子。

钟声停息，梦境结束。

一个挥手示意，然后又有一个，接着还有一个加入进来，最后全体都挥舞着手臂。

[停顿。

场地，灯光，一个个轮廓。

一个年事已高的老者眼睛睁得圆圆的，其余的人也慢慢地转向他，接近他，从远处观望他。

他突然向这一圈人微笑着。

一片寂静。

就这样，他好像马上就要开口说话，开始兴致勃勃，上下挥舞双手，举起指向苍天的双臂，快速耸了耸肩膀，左摇右晃着脑袋，无声无息地演练起双唇，微微隆起鼻翼，向上拱起眉毛，其间甚至拧起腰扭起胯，这样来勾勒出自己演说的过程。

就连那些站在最远处的人也注意到了。

那些观望者中有人好像事先揣透了他要说的话，连连点头，并跟着他一起拼读，此时他已经哼唱起来，可以说刚一哼起来，便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而且采用各种不同的音高。

他突然停止哼唱了，好像终于要开口说话了，可是他依然一声不吭，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

一个女子走近他，手里捧着一捆襁褓权当新生儿，将它放到他那伸展的双臂上，而老人低头看着眼前，抬头仰望天空，突然欢呼雀跃，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结结巴巴，高声哼唱。

那些观望者中有人又点着头，仿佛每听到一个句子都要点一下头似的；有几个已经起身，点着头从他身旁走过去。

当然，只有场地中心这个老者拍起手来，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共同的队列，绕着场地一大圈，一次又一次，他又发出几声支离破碎的欢呼，随后也怀抱婴儿融入开拔离场的队伍当中。这期间，从襁褓里传来一阵持续不断的叽叽喳喳声，越来越强烈，像是来自一个被遗弃的鸟巢，随之周围再次响起的呼啸也加入到这个声音之中；此前一个同样的老妪还给这个老者按摩了太阳穴，好像为了使他思维敏捷。

接下来一切都进行得很快：就在那个离别时再次漫步穿过田间小路的热带稀树草原之后，这条路就被卷起来了；那个树桩也在大家走

过时的手推和脚踹之下滚到台后去了；那个回头张望的人走到场边时再次踌躇不决，被身后那个一脚踹在屁股上，这样催着他继续走去；那个伸手去抓落下来的叶片时，也是在奔跑中完成的；那个仿佛被脚镣绊住的人越发快速地冲向前去。

当他们向四面八方散去时，场面就变得清晰可见了：有人退去时愤怒失望，伸着舌头，吐着唾沫；有人又高兴又失望，耸耸肩无可奈何；有些人以为摆脱了梦境而更加显得轻松，另一些人则依然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有人号啕大哭，有人哈哈大笑；有人在离别之际亲吻地面；有人出发之前给自己在空中勾勒出路线，酷似比赛前的障碍滑雪运动员；有人中规中矩地在场上助跑；有人手指叉开，好像蓄势待发的举重运动员，随即已经携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溜之大吉了；同样清晰可见的还有每一个各奔东西的人，随风飘舞的夏装，被什么东西吹拂，一片碎纸，一个塑料袋和一团煤烟粉尘——在此期间，难以确定，在场地那边，从许多别的场地，传来一阵燃放烟火的响声，汇聚成和弦，又逐渐消逝。

[停顿。

明亮而空空如也的场地，沐浴在它回忆的光芒里。

片刻间有蝴蝶（或是夜蛾）在飞舞。

一包捆得严严实实的不知什么东西飘进来，上面系着一副微型降落伞。

紧跟着它，又是一个扮作场地清洁工的场地守护员，一手拉着一辆小车，上面一堆金属工具丁零当啷响，旁边是一只垃圾桶；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把枝条扫帚，时而将地面上那些东西推向前去（也包括微型降落伞），时而将扫帚颠倒过来，用带尖的一端叉起杂物塞到垃圾桶里：几个水果——一颗硕大的草莓——，一只死鸟的腐尸、一本闲杂书和一个鱼头；离场时，他暂时停住脚步，用扫帚清洁自己的鞋面。

在这期间，前场已经又有一个美人穿过场地，穿过这条漫长的路程时，她始终保持内向的微笑，即使她在行进中要整好那错位的长筒袜时也是如此；在后场，又有一个人扛着梯子穿过，那样轻盈，以至于这人身后那个东西几乎相形见绌；场地中央有一个像是醉鬼或者伤员的人，跌跌撞撞地走着自己的路，长长的鞋带拉在地上；一个人又捧着一本打开的书在场上兜圈子，而他身旁有一个人走过来，一起读起来，然后给他翻着书页，别的什么地方有几个人穿过，高举的铁棍上挑着一个刚刚点着的稻草人，仿佛在焚烧某人的模拟像。

大白天里一声枭鸣；一个在行进中默默哭泣的人，然后变成呜咽啜泣的人，捶胸顿足；一个被压得喘不过气的人，然后又不停地给自己添加物品，接着面带解脱的微笑走开了；一个两腿间夹着一根树枝的人上上下下；一个端着一个桥梁模型穿越场地，将它与场地进行比较；死神坐在一顶轿子里被人从场上抬过去；猎人运送着装在玻璃瓶里的“白雪公主的心”；那个穿着皮靴的雄猫趾高气扬地走过去；烧焦的纸片从天上飘下来；一个女子带着衣物从洗衣店里出来，衣物罩在一块塑料布下；穿着胶靴的牧人们回家来；一个行人捧着一株向日葵；一个女子在穿过场地时将自己的钥匙串高高抛起扔出去；那个美人手执一根榛树杖；一阵呼哧呼哧的喘气声，紧接着一个身材异常矮小的运动员跑过去；一扇饰以花环的大门被运过去；一个将军穿着童鞋走向前去；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星座图；一个人鼻梁上架着一块折叠起来的纸板；场地主人或守护员又推着小车走来，车上场地小丑正襟危坐，扫帚和铁锹充当权杖；一个人头上顶着皮筏；一个人被蒙着双眼押赴刑场；一个女子手里捧着一张大菜单转来转去；一个逃难家庭，从一个购物袋里露出一个小孩的脑袋；那个图谋骗取遗产的女子陪伴在其有遗产的姑母左右；一个一瘸一拐的男子牵着一条一瘸一拐的狗；一个戏剧节演出团穿着宽大的晚服，昂首挺胸地为自己开出一条道来；一个兴高采烈的跑步者在蹦蹦跳跳地跑动；一个在穿过场地时使手里的纸牌呈扇状的玩牌人；两个人在行进中飞快地交换着什么；一辆两侧有围栏的小车被人从场上拉过，车上满载面具和玩具娃娃；一行人集体下车后四散奔走，每个人朝着自己的目标快速穿越场地；那个沉默寡言的美人在穿越场地时变得开朗了；一个男孩帮一个老者吹灭了蜡烛；那个灯塔守护者从场上巡视而过；一个巡防队员腰间的手铐和警棍晃来晃去；一位漫游者踩过厚厚的落叶，发出清脆的声响；祖父拿着一条缠绕在棍叉上的蛇；那个葡萄牙女子出现在台上；那个来自马赛的姑娘抵临港口码头；那个来自赫兹利亚的犹太女

子将防毒面具扔进小巷里；那个蒙古女子带着自己的鹰阔步穿过；那个托莱多的守护女圣徒身后拖着一张狮皮。

大家终于开始不停地纵横穿梭——其中又有一个人短暂地扮作服务生，把烟灰缸倒在场地上；一个女子端着香槟酒杯托盘，从一条小巷悠闲地走进另一条；又有一个人短暂地冒出来充当悠闲的商人或天气预报员，仰望天空；卓别林的身影隐隐约约从场上漫游而过——，来来往往穿过舞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人都不再是纯粹的行走者，走在路上，摆动双臂，扮演着这样那样的行走姿态（其中一个跑步者的气喘吁吁道出了自己的奔跑节奏，向前伸开的手里握着一具泥塑儿童雕像）；片刻间，看样子，仿佛所有行走者同时都在被车拉着行驶一样。

此时此刻，台下第一个观众从座位上起身，加入到这个游行队伍当中，他在场上瞎转了一阵儿，犹如足球场上的一条狗或一只兔子，之后便逃之夭夭。

此时此刻，第二个观众跃上舞台，试着一起跟着走，但很快被两个女子挡住了去路，因为当其他人可以灵巧地躲开时，她俩却抬着一根上面挂满衣物的金属杆穿过场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转眼间第三个观众也出现在这片高地上，他立刻融入其中，并且随着这个川流不息的队列扭来摆去，十分自然。

来来往往，往往来来。

随后场地变得昏暗了。

（1992年）

筹划生命的永恒

一部国王剧

付天海　译

自人类行走和奔跑穿越荒原以来，

地球上还有许多宁日吗？

如果黑暗在远离——有多少曙光在前头？

已逝的人将何时重见天日？

——吉尔伽美什国王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也不是在海外。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

——《旧约·申命记》

剧中人物

外祖父（或祖先）

外祖父的两个女儿

人民（一个）

白痴

巴勃罗·维加

菲利普·维加

空间排挤帮（一个首领，三个成员）

年轻美貌的漫游叙述者

末代国王（三位）

女难民

许多陌生人

时间：从上一次战争到现在，再到将来

地点：一块飞地，比如在安达卢西亚山区

情节说明不一定是情节指导。

1

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一块飞地，与之相连的还有其他一些分布在舞台左右两侧以及舞台纵深看似更大的场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被垂直及水平的隔板和栅栏所遮蔽。这片飞地在自由的天空下显得空荡荡的——只有一叶像是搁浅的、底朝天的小船，一个消逝的庄园残存下来的大门，没有门扇，孤零零矗立在那里，犹如在荒原上一样（门框上有一行阿拉伯文字），以及一堆好像是就地散架的轻便马车的废墟，在座椅、弧形顶棚和缰绳乱七八糟的混杂物中，几乎只剩下车轮清晰可见。祖父就蹲在上面，几乎一丝不挂，而在他身旁站着两个女子，她们身穿着相应的传统飞地服装、腹部高高隆起，已临近产期。一名身

着制服的伞兵降落在舞台后面另一块地上，其身影刚刚半隐半现地消失在栅栏或挡板的后面，只见四面八方有许多手执棍棒、镰刀、叉子和斧头的**陌生人**向他跑去，当他们拉开架势准备动手时，也几乎被遮挡住了。在另外几个场地上，可以看到**那些末代国王**短暂登上宝座，半转着身子，向无声无息的臣民们挥手。

外祖父

复仇！复仇？正义。

几百年来，我们的家乡这儿就是一块飞地，四面八方都被陌生的区域和异族的语言包围了。飞地处在别人的语言中，处在外语的包围中——但是对我而言，跟你们一样，飞地是一片广阔的土地，它拥有自己的源泉、自己的法律和自己的真诚，每一个远道而来的人在经历了旅途的不真诚之后，先是心灵上为之一震，可是接着又会焕然一新。为此我们早已不再需要我们那远方的祖先，无论他们是在大洋的彼岸，还是西北部的亚特拉斯褶皱山脉，或者高加索地区。恰恰是因为与祖国的分离，我们才在这里保留了自己的风格，才真正获得了一种风格。我们当中从来没有人有过在飞地流亡的感觉，没有人渴望回到埃及享受那美味的肉羹，没有人叹息要回到尼斯或者戈里查亚的棕榈树旁，没有人想往去往纽约东部乡村打台球，没有人在下午观看完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球赛之后又哭又闹，或者在看过桑坦德和龙达之间的斗牛比赛后大声叫骂。我们的区域如此有限：每个人都沿着自己的路走向野外，穿过原野、河谷草地和青蛙的欢唱，到达属于各自的领地。这里的和平氛围是多么浓郁。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岁月。对此我还必须说：它曾经是。并且必须这样说：它是两次战争之间的插曲，这段美好时光的前后充斥着鬼火磷光。不管怎样，你们的兄弟如此经历了这段时光，那个年长的经历短暂，那个年轻的就更短了，再更短的经历几乎就没有了。巴勃罗。菲利普。喷射的天空。每一滴甘露都是一块脂肪。你只说一句话，令我窒息。现在这场战争，这场世界大战：飞地被占领，你们的兄弟们，刚刚还出来在他们的果园和工作台上精心地忙碌着，一转眼就被强制充军，其中一个在第一占领军，另一个在第二占领军，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陌生人与陌生人，肩并肩跟陌生人作战。前天在冰海边，其中一个被炸得粉碎，昨天在

海牙南部的代尔夫特大丘陵上，另一个也被打中。对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没有什么可以让人理解？我也什么都不想理解，而只希望发生些什么——干些什么——采取什么行动——希望得到一个答案，与我们的飞地风格全然相悖。我们是起义者一族。但是这种起义，我们向来只是针对自己的。我们用头去撞墙。我们挖去了自己的双眼。我们剁去了自己的双手。我们不是将皮鞭抽向邪恶之徒，而是与自家兄弟斗来斗去，禁止自己的妻子开口说话，将自己的孩子关进地牢。面对那些陌生至极的势力长久以来施加给我们的伤害，我们迄今却未发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抱怨。你们听着：我现在说的话，并不是针对你们两个糊涂女儿的，你们俩有孕在身，据说一个为暴力所迫，另一个为炽热的爱情所驱使，就在地面入侵部队开进来的当夜，是先头部队的两名英雄所为，如今对你们两人来说，那两个家伙早已成了逃跑英雄：我这番话是说给因命运捉弄而孕育在你们腹中的两个小家伙听的。菲利普·维加二世，巴勃罗·维加二世：你们俩将属于这里的飞地人民。

[飞地人民此间以一个白痴和一名囚犯为代表登台，或者踉踉跄跄走上来，两人头戴花环，然后给这个说话者和他的两个女儿也分别套上一个。

外祖父

挣脱胎盘出来吧，娘胎里的小子们，你们听着吧：你们应该成为这里的首批起义者，要将矛头对准那些暴政的罪魁，而不是指向自家人。可是在一场战争中，你们说说，那些罪魁是怎样一统天下的？不言而喻：一旦爆发战争，一个战争贩子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而这个的背后又会有另一个，那个真正的战争贩子的位子最终依然是空荡荡的。一旦爆发战争，那就只有战争的奴仆，而无战争贩子。战火一旦燃起，战争就是公正的。而我作为诅咒大师，却连一个确定的诅咒对象也找不到。不管怎样：听好了，娘胎里的小子们，你们这些垄沟里和树林边的创造物，你们这些异族婚姻的产物：有朝一日，你们要为你们轻率的母亲那些死于乱世遭到毁灭的高贵兄弟们报仇——即使你

们自己同时一定会沦为恶人，沦为首批大逆不道的恶人。（他转动着那辆散架的马车上的一只轮子——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从这废墟堆里站起来，用手指着四周）这里是一个垂死的世界。但是复仇或者正义的时代就要来临。怎样复仇呢？（他从废墟里拽出一件披风，一件深红色的，让囚犯—人民和白痴—人民将它披在他肩上）你们瞧瞧，这是我复活节之夜穿的大衣，是我庆祝耶稣复活的大衣，快八十年之久了。我总是一再穿着它迎着日出，面朝东方。（他转来转去）唉，东方已不复存在。北方仅剩人工雪地上的一匹木马。西方连杂草和萝卜都找不到。南方只剩下空啤酒瓶。垂死的世界。我再也不会和我的儿子们行走在那绿色和灰色的路上。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在这儿的后代却会与那些愚蠢的娘胎里出来的托马斯·杰斐逊、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曼努埃尔·巴尔韦德和伊斯拉埃尔·迈耶以及这个飞地的其他人一起踏上通往永恒之丘的征程。复仇或者正义就是如此！来吧，充满阳光的时代。

[一个陌生的逃亡者慌慌张张地跑过场地，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边跑边四处张望。两个全副武装的宪兵在后面紧追不舍，他们边追边举枪射击。外祖父倒地。被追踪者和追踪者消失。

大女儿

充满阳光的时代？

二女儿

生命的永恒？

姐妹俩

（共同俯身望着自己的腹部）我们将拭目以待。

外祖父

（躺在地上，嘴里诅咒着）千疮百孔的小船！千疮百孔的大门！千疮百孔的马车！千疮百孔的世界！你们别打扰我，所有的人！

白痴

（指着倒在地上的外祖父）他死了吗？

囚犯或人民

死了。

白痴

他是朝东方躺着吗？

人民

不知道。

[灯光熄灭。

2

飞地变得明亮起来。栅栏和隔板脱落了。一派依然充满生机的和平景象：五颜六色的纸风筝在舞台上空飞扬；这里响起小提琴声，那里又传来钢琴声，随之不知从哪儿又传来手风琴声；锤打声，铁锯声，敲击声；有一个**末代国王**瞬间跨出自己的领地，把手放在一名年老体弱的陌生人头上，而在别的什么地方，又一个**末代国王**将王冠抛向空中，用手接住它——连同一束不知从哪儿飞来的鸟羽毛——离去；降落伞的牵绳变成了儿童秋千，空荡荡地摆来摆去，仿佛被一双双看不见的手在推动着。上方依然是自由的天空。先前那些物件同时出现在场地上——小船，马车残片，大门——好像有些下沉。**姐妹**俩现在分别从两边登场，身穿便装和工装，怀抱新生儿襁褓；两人就像在一个十字路口相遇。

姐姐

他出生时几乎要了我的命。没有明显的出血，可我却因为这家伙几乎流尽了血。他就像一条蚂蟥从里面吸空了我，并因此而膨大起来，让我几乎难产。于是我面色那样苍白，而他却那样红润——甚至红得发紫。第二次遭强暴：先是他的制造者，九个月后又是这个被制造者。因为他长时间一声不吭，当助产士用巴掌拍他的屁股时，我心在想：再来几下！多抽他几下！然后他的喊声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甚至有人从外面大街上跑过来。那是一声不带一丝哭腔的吼叫，一声怒气冲冲或不满的吼叫，不，一声愤怒的吼叫。同时他又极力背过身去，躲开其他人，躲开光线，躲开我。可是周围的人都多么惊奇地注视着他啊。个个都认为他绝非等闲之辈。甚至有人说出了在飞地这里从来没听到过的溢美之词：“王子”、“明星”、“我们的王子”——之所以这样，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拒绝吮吸母乳，显现出一副讨厌的神情，对此除了我之外，无人不大声惊呼：多么优雅！多么尊贵！

妹妹

让我瞧瞧。——他长得多帅啊。（她将小家伙的手放在自己的额头、眼睛等上面）他多招我喜欢呀。巴勃罗·维加。来自河谷低地。头脑的压力不复存在。——我仿佛觉得透过他的脸庞可以预见未来。这不禁让我感到害怕。但这种害怕刺得我浑身发痒。它抓住我的脖颈，将我拽出悲愁。我既担心，又欣慰。——菲利普出生时，情况则完全两样。在临盆的阵痛中，我想起了与他父亲在一起的那个夜晚，一种同样强烈的欲望攫取了我，而且这孩子险些被勒死了。那么必然受到打击的人不是我还会是谁呢。瞧这个只知道吮吸的家伙——从生下来的第一刻起，他就在吮吸着我，一刻不停地吮吸着——结果现在却落下一身的毛病：膝盖扭曲，肩膀脱臼，肺里充水，虚弱不堪。爱情的结晶！这是我的第一个年头，同时也在想：没有生存能力。而且那个接生婆也当场说道："他多么友好啊。他看上去多么快乐，多么随和啊。即使他被奶水呛住了，脸色憋得发青，他却依然显得快乐，仿佛这是玩耍的一部分。这个小残废身上弥散出一种无以言表的光晕。他的第一声哭啼就像是一曲旋律。"同时我又继续想道：这个无用的家伙怎么会为我们死去的兄弟复仇呢？他究竟怎样在这里安身立命呢？

姐姐

让我瞧瞧。——他在笑呢。瞧他笑的样子。他是我们族人中第一个会这样笑的人。我们向来都是以双唇紧闭而著称。谁要是偶尔张口大笑，会丢掉颜面。那是失败者的笑容。有可能，你儿子是我们当中最大的失败者，或者他已经失败了，天生就注定了。但是他的笑与众不同。"穿越那一个个时代"：这应该是我们的座右铭，就写在这儿的大门上——但是我们的族人在穿越那一个个时代时总是跌跌撞撞，一瘸一拐，爬来爬去，急急忙忙，他们在穿越那一个个时代时总是突然变向，或者逃到一旁去。可你怀里这个家伙是我们所有人当中的第一，将会拖着他那弯曲的膝盖、脱臼的胯部和慢性小儿呃逆症穿越那一个个时代。瞧，仅仅他的笑容就足以为我们死去的兄弟报仇雪恨。这种笑多有感染力啊。（她哭了起来）

[她们哭了起来。

姐姐

相反瞧我这个孽种：阴沉沉的。如果说他的眼神里映现出什么的话，那肯定不是天空。有一次梦见他戴着王冠，然后他故意用王冠的棱刺把自己的额头割破。又有一次梦见他口吐白沫，跟他的播种者一模一样，他当年迫不及待地强暴了我，嘴里吐出了猪尿泡大小的泡沫。

妹妹

而我同时就躺在隔壁自己的房间里，和另一个陌生人，我的心上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我看到我们的每一个运动与接触都写入了生命之书。——只是这相关的一页也许早已被撕去了。或者这生命之书此间已经彻底褪色了。或者像这样一本生命之书从一开始就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一个没有心灵的梦想。

[她笑了。

[她们都笑了，笑得相当令人毛骨悚然和凄惨，最后用手掩住了脸面。

姐姐

无论怎么说，我们的儿子没有父亲。而且永远也不会有父亲。我觉得这样也好。这对于今天的日子有好处，对于现在的和平有好处，对于未来有好处。我还做过一个完全不同的梦，梦见了我这个小子，他横渡过海洋，到了我们的故国，并且脸上露出与你儿子一样的笑容：他在欢呼！

妹妹

是的，我觉得眼下地球上笼罩着一种怜悯，对我们和儿子们都有好处。曾有一次，当时在战争之间，情况就是如此：一座宫殿矗立在这里。我们的兄弟在他们短暂的年华中已经知道了这一点，犹如永恒一样。你还记得吗？

[她笑了起来。

[她们笑得像女巫一样。

姐姐

工作在召唤。

妹妹

它已经更美妙地召唤过了。

姐姐

是的，兄弟们从前线寄回的信里充满思乡之情，首先就是对这里的工作的思念。

[这时，从一个襁褓里传出了剧烈的哭喊声，一声愤怒的喊叫：一个儿童秋千的绳索缠到了一起——被母亲解开来，这婴儿随即又平静下来。**姐妹俩**小步奔跑着，朝着不同方向快速退去。

[灯光熄灭。

3

又是几年和几个轮回的岁月从飞地舞台上逝去。舞台上原野和农田的标志又下沉、冲蚀和平整了些许。舞台一侧悬挂着植物，就像从一片森林边缘延伸到场景里一样，藤本植物。还是那自由的天空。远处传来钟声、渡船和火车的鸣响。那个昔日的囚犯此间换了装，成了人民的一员，也就是人民，他和那同一个白痴迅速地并排走来。

人民

为什么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没有战役，没有缔结和平，没有从窗口坠落。我们这个地区甚至连一个土生土长的传说都没有。那个传说收集者当年在战前路过此地时，人们向他乱扯一通出自这片飞地的奇闻轶事，可他早在周边地区全都听说过了，而且细节更诙谐，更美妙，更跌宕起伏，并且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为什么我们当中就未曾涌现出一个英雄、一个名人、一个奇才，甚至一个罪犯呢？当年，你们全家七口在下面的山沟里一夜之间惨遭杀害，只有你一人躲在门后幸免于难，那个杀人凶手则来自境外。我们当中还没有一个人声名远扬。那么在当地说起这个或者那个人“出名”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他无非就是一个怪人或者一个“怪物”而已。比如我们本地有名的发明家，拥有注册专利2004个之多，可从来没有一个具有商业价值。或者那个著名的用测矿叉寻找矿脉的人，有一天，他坐在矮树丛里，嘴里塞着十二根雷管，将自己连同测矿叉一起炸得粉碎。还有那位诗人，既没学过诗律，也根本不懂正字法，可二十二年来却利用每时每刻的业余时间忙于创作飞地赞歌。而且这里也没有一丝孕育历史的气息。当耕犁碰到铁器时，那绝不会是埋在地下的皇室财宝或者什么兵器，而只是前人留下的锈迹斑斑的耕犁残片。那场发生在这里所谓的“黑山战役”应该是一种弄巧成拙，是一次误会，是上百年来以讹传讹的结果，这就好比小孩子在做游戏时将一句话挨个传下去，到了最后，这句话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照此看来，我们在黑山脚下那场战役原本可以叫做“北方斯拉夫人的到来”。从这里穿过的匈奴

人、阿拉伯人和法兰克人干脆忽视了我们这块土地。上一次战争结束时，溃逃的哥萨克军队只是在我们这儿稍作停留，他们只留下几匹马来，现在都成了风烛残年的老马：那些外国士兵都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被俘虏的，又都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被杀戮的，我们这些雇佣兵也一样，个个都客死他乡，就算是墓碑上刻有他们的名字，那也是错误百出。这里没有传说，没有历史，没有伟大的人物。人们讲述的至多是些失踪者的故事——可是讲述什么呢？他们下落不明。或者讲述那些寥寥无几的移民者——可是讲述什么呢？——他们也下落不明。我们当中没有人曾经展翅高飞吧？给自己插上翅膀？哦，我们家乡伟大的荒凉！

[白痴走动中停住脚步，人民也随着他停住脚步，不声不响地询问。

白痴

我不会边走边说话的。我跟你不一样，从未上过学或是进过夜校。我不能同时做两样事情。（他用一本厚厚的小书拍打着自己的脑袋，一连拍了好几下）

人民

就算你只做一件事情，也没人能看明白。你一旦开始做起什么事来，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也包括周围的一切。倘若你加入到我们的民歌合唱里，会使领唱者乱了方寸，而且每个人都会忘记歌词。

白痴

你们听着，飞地的人民。（他拼命地将书砸向人民的脑袋）从前这里是一个王国。只是几乎没人见过国王露面。如果说有的话，那么

他们当场就死去了。根据传说，他们的尸体被绳子拴在一起，挂在边境的树上，作为祛邪除魔的符咒。在那边的树林里有一条路，黑色的门槛是由沼泽树丛形成的，那就是国王路。在那座被洪水冲垮的桥那儿，有一颗明亮闪烁的卵石嵌镶在小溪的底部，它是一只国王贝壳——昨天我潜入水中观赏了它。我们国王的宝座并非庄严地耸立于地上，而更多是沉入地下，与图慕虚荣的御座正好相反——这里的地面上有许多坑，可并不都是弹坑。边境那边的民族在我们之后很晚才有了自己的国王，他们按照完全不同的标准拥戴他们：财富，实力，美貌，嘴巴，之后便世代相传。我们则不同，作为第一个拥有国王的民族，我们通过梦想让国王来统治我们。当时这里的人民尚分毫不差地分别做着同样的梦，每个飞地居民在同一天夜里同一时间都做的是同一个梦，就像更早以前一样，人们告诉我，甚至全世界的人民莫不如此。也就是说，我们古代的国王都是以梦想的形式被选出来的。可是他们为什么几乎就让人看不到呢？这个我不知道。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你告诉我呢？你们告诉我吗？我在寻找他，寻找这里的国王，而且不是从昨天才开始的。听着吧，飞地的人民：这不应意味着新的奴役，而是自由——不，有些东西，你只有在事实的光明中，才会为之找到那一个词语。前兆：只有在我们这片土地的上空，鸟儿才会展翅翱翔；只有在这里，它们才会悠然栖息、觅食和嬉戏；只有在这里，你才会看到那些平日里飞得极高的鸟儿无忧无虑地在下面的草地上跑来奔去。

人民

因为周边地区都在大兴土木，而这里却是远近唯一剩余的一块比较开阔空旷的地带。那些鸟儿就在这里觅食和嬉戏吗？这里首先却是逐猎、残杀和弱肉强食的理想之地——除了我们这儿，你还能在哪儿可以随处看到草丛中这么多血迹斑斑的羽毛和遍地的血迹？不，不仅这个王国已经灭绝了：王国之梦也是如此。只有像你这样的傻瓜才会如此胡言乱语。

白痴

（从裤兜里掏出一只像是已经死去的鸟儿，它却突然拍打着翅膀飞走了）怎么回事呢？

人民

始终就是你们这些白痴，在这里信口雌黄。让你们这些愚蠢的讲述者和你们这些迷惑人的故事见鬼去吧。我，作为人民，虽然需要一位叙述者，为了去观察，去感受事情怎样发展——但需要的是一个叙述者，他不会把一切弄得乱七八糟，相反能区分得井然有序：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位叙述者。如果有个白痴要对我说些什么的话，那他至少必须像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一个人物。而那个作为其宣谕官登场的人必须是一位在莎翁那里也根本不存在的国王，那就更不用说什么纸牌国王或者射击国王了——一种晨风酋长。当然直到那个时候：以人民的名义，闭嘴，飞地白痴。

[他把一块布罩在白痴头上，准备这样和他一块退去，朝着钟声和渡船鸣笛的方向。这时，巴勃罗和菲利普从舞台另一侧登场，作为尚年幼的小男孩，几乎只能看到他们的背影。人民停住脚步，又掀开白痴头上的鸟笼布。小孩菲利普一瘸一拐，走动中同时左顾右盼，也仰望天空，他的一瘸一拐伴随着欢快的雀跃，而他的表兄巴勃罗却像在梦游，一脚又一脚地往前挪去，始终低着头，两臂丝毫不摆动。他的表弟最终拉起他的手，拽着他快步往前走。突然从象征着树林边缘的藤本幕布的后面传来一片沸腾声。一阵乱箭从那里飞出来，接着就是树枝、石块和棍棒。一阵像是陆军冲锋时的号声，听起来破锣一般，毫无生气。兄弟俩继续轻松愉快地赶路，人民和白痴充当观众。这时，从帘后猛地冲出另外四个孩子组成的一队人，他们全都戴着狂欢节面具，抽着响鞭，挥舞着一束束荆棘和荨麻；有一个戴着防毒面具，而不是狂欢节面具，一看就是首领。这四人挡住兄弟俩的去路，开始攻击他们。菲利普面带微笑转着圈抵抗，这样一招至少使得其中一个入侵者停止敌意，随着他的目光望向别处。满脸睡意的少年巴勃罗也转来转去，暂且避开了每一次击打，最后迎向那个戴防毒面具的首领，那家伙向后退去，似乎要为挥鞭赢得更大的空间。

防毒面具

[挥起皮鞭，同时又抽出一条木锁链。

巴勃罗

[睁开迷迷糊糊的双眼。

防毒面具

[垂下胳膊，继而扬起来在空中交替挥舞了几下。

巴勃罗

[用手将一个苹果掰成两半。

防毒面具

[很快亮出一把像是在树林里捡到的刺刀。

巴勃罗

[吞下一条壁虎大小的蠕虫。

防毒面具

[把手中的一切全部扔掉，腾出手来拔出一颗在树林里捡到的手榴弹，开始笨拙地拨弄起它的引线来。

巴勃罗

[从外祖父的马车废墟里拽出一只制成标本的？狐狸，将它夹在腋下；又拽出一条制成标本的？鳄鱼，把它夹在另一个腋下；又拽出一只制成标本的？山雕，嘴里衔着一块蛇皮？把它套在自己头上；最后外祖父？那个幽灵也加入到巴勃罗的行列，身披着那件红色的斗篷。

防毒面具

[停止拨弄手雷的引线，向旁边看去。

外祖父

[握住两个外孙的手。

巴勃罗

[挣脱外祖父的手，从那个戴防毒面具的小伙子手里夺过手榴弹来，拽出引线。

菲利普

[从表兄手里夺过手榴弹，把它扔到树林里，只听到从林中传来一阵呼啸。

巴勃罗和防毒面具

[突然用木棒相互攻击，展开一场古典式剑士决斗，最终戴防毒面具的人被巴勃罗逐出舞台。

[灯光熄灭。

4

像是在当天，又像是在另一个时代。在一如既往自由的天空下，明亮、绚丽和开阔。少年**巴勃罗**和**菲利普**，只能看到他们的背影，并排坐在两只秋千上。**巴勃罗**越荡越高，而他的表弟却在地面上方晃来晃去。

菲利普

谁第一个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巴勃罗

埃德蒙特·希拉里爵士。

菲利普

赫拉克利特是谁？

巴勃罗

来自另一块飞地的一个人。他几乎从不开口说话，如果开口，那他就会说：睡觉的人接近清醒的人，而清醒的人则接近睡觉的人。他从未说过：一切都在流动，而是：谁要是踩入同一条河流里，那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他们身旁流过的却是其他河流。他说过：王国就是一个嬉戏的孩童。他说过：现在是早晨，刚醒来时荨麻扎人还不会感到疼痛。他所说过的一切，即使不具法律形式，也具有法律效力。他常用的措辞是：这不公平。

菲利普

85乘858得多少？

巴勃罗

72930.

菲利普

“小夜曲”怎么唱？

巴勃罗

[轻声哼了起来。

菲利普

啄木鸟怎么叫？

巴勃罗

[模仿啄木鸟的叫声。

菲利普

谁是秋千的发明者？

巴勃罗

我父亲。

菲利普

你父亲是谁？他是干什么的？

巴勃罗

我父亲是外国人。他死了。只是前一阵子，当我在靠近牧场的小溪边，将邻家女孩的衣服扒光时，就听到我母亲，还有当时我家周围挤满了的好奇和叫嚷的人群，一个劲儿地念叨着："你父亲还活着！"据说我很像他。只是我想变得跟他完全不一样。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一个天下独一无二的人。可是我接着又想要死掉。不仅仅是死去，还要像脚指甲一样被弹出尘世。这不公平！（他从高高荡起的秋千上一跃而下，把一根树枝当作长矛向林中投去）打中了！（跳起一支胜利的舞蹈）

菲利普

（在秋千上继续徒劳地尝试将秋千荡起，但却越发纠缠在绳索中不能自拔）我父亲生活在一个辽阔的国度里。有朝一日他会回来接我。他背上也长满了毛发，屁股上还有一颗胎痣。他创作了《战争与和平》一书，画了蒙娜丽莎的乳房，谱写了“雪地圆舞曲”。我将来要和他赛跑。他最终将会换掉灯管里坏掉的灯泡。他将会保护我们，免遭敌人的入侵。只是他恰恰又没赶上火车，像昨天，像前天，像大前天。（他吹着口琴，与秋千完全卷在了一起，他的表兄随即过来，几下子就让他从秋千中解脱了出来）

[他们退去，一瘸一拐，蹦蹦跳跳。

[灯光熄灭。

5

在飞地又过去了几年，几个季节，几个时期。而岁月仍在流逝？依旧是在那自由的天空下，几个**陌生人**正在清理最后的马车废墟，取而代之的是一台水泥搅拌机，上面的滚筒已经开始运转。场地上最后残留的小船或轻舟碎片也被搬走了，原先的位置立即被一小排橙树所占据，有点像种植园。那些秋千转眼变成了爬梯。那些藤本树丛顷刻之间也被砍去。最后几根权当飞地界标的栅栏、木桩和隔板也被抬走了，飞地已不复存在，或者它的版图扩大了？其中一个**末代国王**作为喝醉了酒的群众演员慢慢腾腾地走过舞台，显然是在不合适的时刻，很快又被人吹着口哨叫了回去。刚刚还飘落而下的树叶又向上升腾。两个**陌生人**用木棍在抬着一大簇葡萄，比他们俩还要大。一台桌式足球游戏机现在取代了水泥搅拌机，桌边是近乎成年的**巴勃罗**，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很快就进了球，而**菲利普**，看到他一瘸一拐的样子和徒劳地挥来舞去的神气，不是他还会是谁呢。同样，橙树季节现在也又结束了：取代它的是一个射击场，充当靶子的是一只超过真人大小的类人猿，那四个同样已近成年的空间排挤帮成员朝着靶子乱射一

气，他们的首领让人一眼就看出来，因为他立即将菲利普从游戏桌边推开，表兄弟俩随之将足球游戏机拱手相让，从舞台上消失，当然这个首领不会去玩游戏的……当游戏机和射击靶也被收起和撤下之后，场上所有的人也都消失了。只剩下那扇自始至终空荡荡的大门：它现在不是笼罩在一种特殊的光线之下吗？外祖父或祖先从舞台上漫步而过，他的复活节斗篷里扑通扑通地掉下九十九个苹果来。舞台上又一次刮起了风，看了看那些悬梯。

灯光熄灭。

6

在最前面，在舞台边沿上，在这片如今仿佛已无限广阔的土地上，立着两张小巧的坐凳，正好面对面，中间的空间那样狭小，以至于姐妹俩坐在上面时看上去挤得紧紧的。她们头顶依然还是那自由的天空。姐妹俩几乎有点像城里人的打扮。

姐姐

这都是最初的座椅，自上帝创世以来就为人民立在这里。可以欣慰的是我们赶上了这个新时代：开放的边境，新式的舞蹈，垃圾清运，铺上沥青的田间小路，白金镶牙，用南海大理石制成的墓碑，同时给房间供暖的电视机，火地岛的鲜奶，西藏的板肉，遍及四处的室内外照明，连这个“幽静”古镇的狐狸洞都不例外，现在还有昔日飞地河谷森林中这些观光座椅。

妹妹

是的，令人欣慰。只是远处的景色还要更漂亮一些。我们以前叫什么呢，恰恰是我们，这些飞地的居民？翘首企盼者。当然这些座椅是让我们用来彼此交流的。为了讨论问题。为了坐在一起。眼睛看着眼睛，皱纹挨着皱纹，膝盖靠着膝盖，牙齿对着牙齿。

[双方停止交谈。

姐姐

只是我们这样忽视了复仇一事。不仅仅因为我们的儿子越来越像他们远方的父亲——

他们做梦都梦见他们，而不是我们的两个兄弟，不是他们榜样般的一生及其史无前例的毁灭。

妹妹

我们必须多向他们讲述有关我们兄弟的事迹，讲些别的什么，而不是他们的死亡和毁灭。一些永恒的东西。那些永垂不朽的事情，那些小小的，那几个，那几个核心的事情，它们再过十年还会发芽，再过百年——讲述有关我们兄弟的那些核心故事。

姐姐

比如说大巴勃罗当年胜过飞地所有的孩子，因为他在沿着大街向下飞奔的途中，一路上放屁的时间最长，甚至一直到那片草原上？比如大菲利普当年就着一块面包将一只活生生的金龟子吞了下去？比如大巴勃罗当年就向他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未婚妻要回了订婚戒指，因为让他心潮澎湃的不是她，而始终只是苹果园里各种各样的苹果，他那青梅，他那毕尔巴鄂侯爵夫人，他那金少女，他那白色的约兰达，他那令人垂涎的蕾切尔……？再比如大菲利普当年在战争中经历了六个月的冻原日子，靠着冻原野莓充饥，唯一一次回家探亲时，把我端给他的牛奶咖啡推得好远，始终跟小时候一样，因为咖啡表面确实漂着一层薄薄的乳脂？

[在此期间，如今已长成了小男子汉的两个儿子，走到她们跟前，他们即将动身，已做好了旅行准备，侧影映在那空荡荡的大门里。

妹妹

“当年”，你总这么说。但我们的兄弟谁也不曾拥有属于自己的时光。这就是丑闻，或者犯罪，对此父亲总是喋喋不休。而你却对我们的部落和我们的人民冷嘲热讽。当年他们中有一个独自在门口玩耍，并且无声无息地失去了踪影，另一个从表面上早已又变成黑乎乎一片的粪坑底里嗅出了他的味道，并且把他拉出来后吸出他肺里的粪污，使他又活了过来，这难道不是要留给后世的东西吗？（她转向表兄弟俩）所以，你们要世世代代继续讲下去，他们中有一个那时，当年！在回家的路上，那块在教堂门口被复活节之火点燃的腐木菌闪着火光从铁丝架上跌落在他跟前，他捡起残留的火块，捧在手里一直带到家里，用来生火做饭。另一个作为飞地最聪明的孩子被送到非常偏远的外地就读，在遭受了一个月的思乡之苦后——今天谁还知道什么是思乡呢？——从那里跑出来，历时七天七夜，穿过莫雷纳山，德斯潘-佩罗斯山口，曼夏荒原，埃布罗河三角洲，卢比亚那沼泽地和野狼沟，最后闯过那片自杀荒原，在“夜深人静的时分”，人们当年还这么说，回到了我们“庄园”外面的院子里——当时还称之为“农舍院庭”——他并没有进屋来见我们和他的父亲，而是抄起枝条扫帚开始扫起地来——用后来占领军的语言说就是“清扫”——后来他没有成为主教或政治家，而是学了木匠或者“细木匠”手艺，从此我们家有了用带有螺纹图案的橄榄木制成的门！再比如他们中有一个只因我腹中的婴儿才没有当游击队员，并放弃了十拿九稳的刺杀战争恶魔的计划，在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前线回家探亲的时候，甚至与你的父亲即占领者结为朋友，教会他玩飞地特有的“叫王”扑克牌，给他的包里塞满了自己培育的苹果，一种叫做“公主玛丽亚的化身”的苹果。

姐姐

（在人民和白痴也凑过来之后）你别这样拿传统和祖先给我儿子说三道四。他根本就不像任何人。他的行为方式是新的，不仅仅对我们这个闭塞的地区而言。新的？你让我感到毛骨悚然，儿子。这不符合我的意愿，我不喜欢这样。对于这里的人们来说，你不是新生的爱因斯坦，就是再世的阿威罗伊，不是再世的马诺莱特，就是新马龙·白兰度，要么是再世的成吉思汗，要么是新生的所罗门。没错：你干什么都成功，轻而易举。你打败了每一个对手，而你并不想赢他们。老人和小孩，男人和女人，甚至连牲口，不仅仅是家畜，都为你而惊叹，而你却显得若无其事，甚至连嘴都不张一下。你十岁时就是这里的象棋冠军，十二岁时在风景画比赛中获奖，十四岁时是青少年射击之王，十六岁时拿了全国艺术舞蹈冠军，十八岁时写了一种电脑程序，取代了当地所有的办公人员，十九岁时当上了父亲——妻儿不为人知——二十一岁时远赴他乡，获得马拉喀什大学阿拉伯语文学博士学位，并成为地中海海滨城市休达的预备役上尉。只有唱歌你不会，难道不是吗？人们都说你在这里太屈才了。只有我知道，你是有点不对头。世人看错了你。你因此要报复他们。他们为你欢欣鼓舞，而你却要伤害他们，至少要踹他们一脚。或者干脆走开，自己去折磨自己吧。或者让自己饮弹身亡。不管怎样，这就是你的奋斗，结局无法预见？儿啊，我没有冤枉你。我感觉正如此。

妹妹

我儿子呢？人民怎样说他呢？

人民

没有特别的志向。生活俭朴。喜欢唱歌。性格内向。为人低调。受人喜爱的邻居。乐于助人。身体过早地停止发育。尽管残疾，却脚踏实地。字体飘逸。患有夜游症。喜欢自言自语。能够聆听别人的讲话。喜欢孩子。没有生育能力。相信命运。永远在寻找自己的父亲。最喜欢的音乐作品是“我期盼着自己死亡的到来”。

妹妹

不管怎么说，你并不属于我们这个家族。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因此，你现在就应该尽可能长久地离开这儿，而且走得越远越好。因为你迷恋上了这里的不幸，就跟这个家族里几乎所有的人一样，也包括你。你和你的祖辈们一样，原地待在这个地方等候着不幸、灾祸和沉沦的到来，你希望自己跟祖先们一样到达不幸之中，带着这样的想法：终于活着！在不幸中：跟你的祖辈们一样，你在不幸中松了口气，边说边笑道：这样就对了！或者更有甚者：越是这样就越好！儿啊，既然非要不幸，那么就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不幸吧，可别在我们这个穷乡僻壤——到外面的世界里去寻找吧，在正在发生的事件里，在现实中，在行动中，在某个战区或地震灾区，最好两个一起——这样一来，不幸至少会别有特色。我们这个小小的飞地不幸从来都没有过什么吸引力，从来没有令人感到振奋过，因为它从来都不会和那个广大的民众的不幸同时发生。孤零零并且地处偏远，就像我们分别与自己的灾难相伴一样，孤影相伴，远在天边，再说还要加上孤独与单调。动身离开这里吧。

姐姐

够了，别再说我们的儿子了。自他们出生以来，这里的一切都一味围绕着他们转。别再提他们了，别再提我们的兄弟了，别再提父亲的阴魂了，别再提所有这些男人了。我们母亲身上，看来唯一值得流传的东西，就是她那安静的性格，她那以极大的耐心长期忍受的痛苦。我当时在早晨发现母亲已经断了气，她带着无法想象的疼痛一夜之间命归西天，但一声都没有吭，我吓得把全家人都喊醒了，家人先是粗暴地打断了我，然后才转向母亲的尸体，而此时尸体已几乎无法再跟床板区分开来。（对着妹妹）一味地用那些圣经诗篇哀诉，你们当时只知道大声跟着哀泣。邪恶的敌人包围着你们，你们却吟唱他们的诗篇，这就是你们飞地妇道人家的心愿。回想起来，我在我们整个地区看到了一种持续不断、广为认同的伏地祈祷。但是对我来说，那些圣经诗篇已经不复存在了。不是我！我将另寻出路，而且单枪匹马。每天早晨睁开眼和每晚入睡前我都在想：此时此刻我将会顿悟，我在这里，我本人，终于，最终，为了人生，为了未来，为了我的未

来。不是别人，不是帮助者，不是儿子，我自己将会找到解决办法，而且只为我自己，这样做就足矣，难道不是吗？告诉我门在哪儿，我的门，或者对我来说就不存在门？

白痴

圣经《诗篇》第三千六百六十六篇。

[**姐姐**跑向自己的儿子，边跑边拽出一根荆条，用荆条一再抽打着儿子。

人民

（发表评论）她这么做是按照我们古老的习俗。按照这个习俗，在两个地区之间划定边界时，就像对待一个孩子一样，界碑会染成蓝色，为了未来：同样，从现在起，只要**巴勃罗先生**一回到这里，他就会感觉到踏上了自己的故土。

[现在母亲和儿子相互拥抱告别，**人民**和**白痴**为他们弹奏着一段送别小曲，然后**巴勃罗**和**菲利普**在伴奏声中上路，由飞地乐师陪伴，而在后台远处，**空间排挤帮**短暂出现，拿着一把巨型梳子，篦梳一般地搜索着这个空间——很快又消失了。一阵风吹过舞台，首先看到的是兄弟俩一身旅行打扮。一瘸一拐的菲利普一再回过头来张望：几乎快要看不到影了，他又猛地转过身来，脱去身上的大衣。

菲利普

我不离开。不去异国他乡。只有在这儿我才有用武之地。只有在我们飞地，我才会有所作为。走着瞧吧，你们在这儿会需要我的。我不仅会给你们清运垃圾，整理花圃，而且还会撰写编年史，为梦想谱曲，调解纠纷和致悼词。我身上具有某些可以和大家分享的东西——只是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到了边境那边，它无论如何都会被扼杀的，也包括我本人。那边的权贵们早已成为上次战争的赢家，他们把每一个外来者充其量当作他们的年轻店员。顶多像巴勃罗这样的人，才可能与之相抗衡。他们的领域此间几乎遍及天涯海角——他们根本不再需要自己的帝国。不管他们出现在哪儿，都要发号施令，在和平之中排挤别人的空间。唯独这里还不是，还不是又这样。因此让我留下吧。这里没人相信我，尤其是你，我的母亲，这让我深受刺激，这使我忐忑不安。请你格外赏脸，永远不要停止不相信我！关键是，我在你们当中，与当地的荒原、墓地、田间小路和酒馆为伴。我干吗非要为了见到自己的父亲，去国外找他呢？他应该到这儿来，到我们这儿来，到他的亲人身边。如果要来的话，那他别再像当年那样，作为入侵者，而是以客人的身份。这样一来，我父亲或许会是这里第一个相信我的人。——但是也许我就想把自己藏在这里吧？我不是向来至少在捉迷藏游戏上高人一筹吗？就连这一点你也不相信我，母亲？这样也好。最好这样。

巴勃罗

我把你们全都带上，保护在我的麾下。在我远征归来时，这里会就地开始另一次远征，一次更大规模的远征，一次共同的远征。此外，今天那些故事都属于电影。可是现在这个，我的故事，我们的故事，不管怎么样，将是一个不属于电影的故事。为此我只能忘却自我。为此人们只会将我遗忘。

[舞台纵深，**空间排挤帮**再次短暂出现，就像是从一片沼泽地里冒出来的，手里拿着绳索、套索等。在朝他们走去时，**巴勃罗**的大衣从肩上滑落。他又反穿在身上。然后他甩掉一只鞋，继而又甩掉另一只

——将它们穿反了。就这样，他大声嚷嚷着自己和这些东西过不去，愤怒地叫骂着退去。

巴勃罗

又是我。依然是我！这太不公平了！

[舞台后人声鼎沸。白痴尾随着他，不一会儿便又打着手势退了回去。

白痴

他们想打中他，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第一个家伙给他使绊子，却绊倒了自己。第二个家伙想用头撞他的心窝，却撞到了第三个人身上。第四个家伙浇上汽油，却将自己点着了。当他们一起往巴勃罗身上吐唾沫时，却吐得彼此满身都是。第一个的头发缠到了猴面包树上。第二个哭着喊着要水和乳汁。第三个成了雪人。第四个变成了羞怯腼腆的小姑娘。他们异口同声地喊："这是什么？"以及"还有一道门！"从他们八只眼睛里爬出蚁类来。然后那条边境小溪结上了冰，水漫上河岸。田里的稻草人戴上了耳机。他们相互展示自己的集邮册。可是他却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他仿佛在行走中睡着了，在接下来划桨穿过芦苇荡时也是这样。船已经在等着他，它是用镀金的羊皮纸做成的。我还送他一支用过的铅笔头，而他对我说："快滚开！"这一切发生在儿童节，发生在世界储蓄周，发生在刺猬年和鬣狗时期。

[就在这时候，**空间排挤帮**穿过场地，横冲直撞，野蛮不堪，破坏道路，打砸、踩踏、火烧飞地物品，最后他们又不让白痴说话，交替捂住他的耳朵、嘴巴、鼻子和咽喉，当**白痴**想用脚打拍子的时候，他们就捆住他的脚后跟，将他抛向空中，等等。之后他们胡乱舞动着胳膊肘退去。

白痴

人民，你说得对：你需要一位新的叙述者。我这个白痴该退位了，顶多充当临时顶替的角色，作为这个故事的第五只轮子。（望着一旁）可是谁知道，这是否是件好事呢！（面向场内）谁接替我呢？一个见识和学识都很多的老兵，经历丰富，头发斑白，在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臂膀，嗓音在地下牢房里得到了锤炼，两鬓长满了老年斑，眼睛不仅留意着我们这黑乎乎的现实，更留意着别的东西——哪一位新的塞万提斯来接替我呢？

[这时，那个新的叙述者登场，**女叙述者**，一个美貌年轻的女子，她挽住**白痴**的胳膊。

女叙述者

我在这儿。我是你们新的叙述者，刚刚成年，今天早晨还是个孩子，但愿明天一早又能变成孩子。我的成长经历如下：从小没了父母，下面有六个弟妹，我一个人把他们拉扯大。在一条缓慢流淌的小溪边放牧。一个秋日的夜晚当我坐在土豆蔓篝火旁时，我面前突然一个人也没有了，我什么也没说，久久一声不吭，始终保持沉默。当时不是在战争中，不是在流亡中，不是在洪水肆虐期间，我既无笔墨也无写字板。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对此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但是后来，到了圣烛节，在二月二日那一天，我开始说话了："那么……当……在那之后……当……在那之后……并且……并且后来……并且……并且当……并且在那之后……并且后来……"当时不仅是我的弟妹们聚拢在我周围，我拉扯着他们，指派着他们，围着他们打转，前所未有，而且有人也从大街上闻声进来，一直待到深夜。后来，我就上了几所特殊的叙述者培训学校——当然在哪儿都没待多长时间：在一所学校里，因为只跟现实和科学打交道，任何现实的东西在我眼里都显得不现实；在另一所学校里，我们成天只学深呼吸、超脱的镇静和忘我的快乐，以至于除了平静和呼吸以外，我一无所

获；在第三所学校里，一句话，青草对我来说太绿，蓝天太蓝。于是，我成了一个自由的漫游叙述者，四处漫游，居无定所，自食其力。自食其力？确切地说是这样的：（她将手摊开）我唯一的规则，那就是当初在溪边和篝火旁的开始时刻，当时没有人说话，始终无声无息。无论我漫游到哪儿，那些被人们认为装着满脑子故事四处漫游的老者都会慕名前来，并且说："给我讲讲我自己的故事吧！"我仅仅定居过一次，是在纳瓦拉国王的宫廷里，国王每天早晨不思朝政，只想一头栽进他那条边境河毕达索河里：我一千零十二个早晨不停地讲述，就是为了使国王保住性命。我有一次在途中遭到邪恶势力囚禁时，那么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形呢，你们——但愿——大家都知道那个有关"被束缚的想象"的奇妙神话吗？

所有的人

知道！

[人民想偷偷溜走。

女叙述者

别走，人民。你溜不出我的掌心。你当下的无想象，或者思想狭隘，或者气血不通，或者不善梦想，或者缺乏形象思维能力，这是我们再一次面临灾难的一个原因。菲利普·维加，把这些都记录下来。

[菲利普写起来。

女叙述者

把耳朵竖起来，人民。

[人民竖起耳朵，白痴也在一旁帮他。

女叙述者

还有你们姐妹俩，不要再按照飞地的传统望天看地了，请转向我，看着我的眼睛。

[姐妹俩言听计从，犹如脱臼了一样。

女叙述者

由于想象力夺去了你们的翅膀，它今天的表现形式不再是仙女神话了。它是一出戏剧。传说和童话宣告终结，这并不意味着仅仅剩下一个个尾声了。我的源泉就是那样一些东西。在这种源泉里，那些稠密而淤积的血栓化解了。你听着，人民：只有因为我的到来，你才会来到人间。我来这儿，就是要掌握你的命运——掌握在两只手里——使之生机勃勃，以应对紧急情况或者干脆就这样。要是你早就听从了我所说的，那你也就不需要别的什么秩序和明确的规章了。可是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面前不洗耳朵，始终是一个肮脏不堪的人民。对你这个合法和世袭的女统治者充耳不闻，而你却甘愿忍受每一个异族的统治，这样的或那样的。——你要看着我，人民，如果我不计前嫌地对你这样说的话，而且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在这出戏里——难道你连什么是美都不知道了吗？你对我来说如此难以接近，现在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尽管是和平年代，而且我就在场，近在咫尺。只有叙述者能够理解人们，或者上帝——但是我们还是别提上帝了。人民，我现在是你新的，也是最后一个叙述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会待在你身边，虽说不是每天，但要直到世界的尽头。我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我并非时时都在场，倘若你继续这样对我视而不见的话，我会当场为下一个异族统治腾出位置来，最终的异族统治，你会连这

一点如此微不足道的自由都没有了。离开了我的指引，你会在几个无比强大的猪猡的手指里成为最后的污垢。然后你就会灭亡——干涸，蒸发，破碎，飞散，化成气体。当然了，飞地人民，你会受到爱戴，我那特殊的唾液会保全你。

[她用刚提到的唾液舔舐人民的耳朵、鼻子、眼睛和嘴巴，起了一个调，调音拉得很长，然后和着几个节拍和场上所有的人一起跳起舞来，从他们身上跳过，用拳头击打他们，用双臂抱住他们，用脚踹他们，搂住他们的脖子……然后一溜烟地跑进了田野或荒原。

人民

跟我母亲当年一模一样：直到今天，我还能在自己身上闻到她的唾液味，太难闻了——女叙述者，这么一种虚弱、柔细的声音——几乎根本就听不到声音？

姐姐

奇特的女救世主。本来我对所有的救世主都已厌烦了。在《旧约》中，这不叫“救世主”，而叫“血亲复仇者”。这样的叫法我更喜欢。但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妹妹

在我们这儿，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美人。而在我看来，她具有飞地祖先的所有典型特征。（对着姐姐）她或许可以给你儿子当媳妇。只是我们所了解的他，和她在一起，会因为对她过分喜爱而很快会变得更为伤心。（对着菲利普）你把这一切统统都记下来了吗？

菲利普

（读道）雨水正好降临在合恩角，与这儿相隔万里，如此之近，以至于我可以向它伸过手去。在从东京开往京都的新干线上，速度计上的指针在三百公里左右摆动。现在一股疾风正吹过阿勒颇松树，这些松树全都生长在阿勒颇[16]以外的地区。

妹妹

这就是你称为记录下的东西？

菲利普

是的。（他笑了起来）

[所有的人都不说话。风刮过舞台。

白痴

有谁能告诉我，我们这个所谓的新叙述者刚才所说的一番话，和我这个所谓的白痴一直以来所讲述的究竟有什么不同呢？除了她更年轻，也更漂亮一点儿？可是，也别说了，年轻首先不就是区别吗？——我们拭目以待。

[灯光熄灭。

空旷的飞地，没有季节交替，自由的天空下只有光秃秃的大门。随着**空间排挤帮**的悍然闯入，天空一下子也显得不再那么自由了，各种氛围也立刻消失殆尽。这四个家伙身着崭新、僵硬、厚重的边防制服，看架势像是要发动一场突然袭击——只是恰好没有一个人民在场。于是他们收起棍棒——一切东西到了他们手里都成了棍棒——并且放下铁棍（一切东西到了他们手里……）。首领穿着一身十分考究的西服，但他也显得僵硬和过于沉重。他们显然是在陌生的领地上，他们所做的一切，旨 在挑衅，强占，抢夺空气和光线——尽管有人在梳头，假装小便，吹口哨，溜达。无论他们做什么，动静要么过小，要么过大。

帮伙成员一

我闻到了他们的气味。

帮伙成员二

而这种味道并不新鲜。

帮伙成员三

闻起来像冷冰冰的烟味和发霉的稻草。

帮伙成员一

闻起来像烂苹果和油腻的衣物。

帮伙成员二

像是生锈的铁链，干涸的墨水瓶，一滴不剩的圣水盆，最近的一座村庄。

帮伙成员三

像是堵塞的排气管，踏烂的蜂房，子宫癌，恐惧至极的冷汗，兔笼，狮穴，性欲冲动。

首领

（拖着一种仿佛不做作的温柔的腔调）曾经有过一段日子，这片飞地的居民是我最喜爱的人民。我的外公就出生在这里。听他给我讲述的事情，我每每都会有一种思乡情怀。在那边有我们辽阔、美丽、富足的祖国，只要一听说这个特殊的飞地，我的祖国就变得微不足道。孩提时，即使在我们这个拥有两千万人口的首都，站在那个拥有九十九个世界奇迹的广场上，我也会因渴望这片飞地而流下热泪，流下最炽热的眼泪——就像飞地语言里所说的“泪花飞溅”！就连我父亲也一再讲起当年他占领这里的岁月，尤其是这里的女人，让他永远也玩个没够，使用暴力也是如此。他特别谈到那一个女人，一天夜里，巨人遇上巨人，他仓促地占有了她，然后，他还在死人床上叹息，相信使她怀上了一个孩子，不像我这个被他称为不中用的家伙，是我的一个王室胞弟。——所以，我对这个在外公看来堪称第一百个世界奇迹的传奇越发神秘：再也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出现在我的眼里——或许这个地方可以，但这些人绝对不行。不能出现在我的眼前，更不能传到我的耳朵里：这里所说的，毕竟不是什么语言，也不是什么方言，甚至连原始发音都不是——相反，那是最后的语音，换音，是濒临死亡的人发出的。没有什么更理所当然了，当年我们的父辈在战争中进驻这里，非要把这块让所有有美感的人感到气愤的飞地重新划归它原先的祖国，有公元前时期昆卡的如尼文石碑的文字记载，然后又有大约公元六百年的民族大迁徙，再就是有阿布斯农耕篇为证。人们说，这里是最后一块大自然或者自然的东西，称这里的居民是最后的自然人。是的，我也曾有过天性：然而在这里，大自然的震惊使我的天性立刻荡然无存——这应该是我们的目的。就像我放弃了自己

最后一丝天性一样，所有的人都应该这样！当时见到第一个敢跟我叫板的飞地少年时，我就已经知道了：我想成为他的敌人！我要打败他，直到他的尽头？不，没有尽头。铲除他。但不是一下子，而是渐渐地，斗争一步接着一步，从外到里，直至他彻底完蛋——使他梦想破灭，大势已去，渐渐消失，而且这没有尽头。把这里的居民从他们这块立足之地上赶走，因为他们是远近出现的唯一的人，而且还有类似立足之地的地方，首先就是他，因为他离乡七年的岁月更加巩固了他在这里的地位。此间我无论去哪儿，这个人到处都有——每当我说到“人”时，父亲都会给我一记耳光，对他来说，“人”是一个有伤风化的词语——他的地盘，整个空间里他无处不在。是的，在他返乡之后，这家伙的名字我都不愿说出口，我们要一步接着一步跟他斗，把他从这空间里赶走，连最后的角角落落都不放过，并且也不放过这个空间，这最后一块虚假的大自然，要吞噬、焚烧这个空间，整个这片剩余和阴暗的飞地。而这就是我的使命，我的天职：要向世人证明，事实上早已不存在什么空间了，哪儿都没有，这里也一样。空间：过时了；“空间”这个词：陈旧的词汇，非常可笑，古法兰克语。把词语和事物彻底根除。空间，大空间，空间布局，小空间：全都不复存在了。要向世人证明：这里的空间是假象，空中楼阁，海市蜃楼。不值一提了。无论对谁来说，地球上已不再有小小的死亡空间，更谈不上什么生存空间了。这就是新的开始，只有这样世界才能重新开始。只有这样才有新的世界，独立存在，摆脱那些破损不堪的空间。要向世人证明：盯着空间企盼引发的是永恒的期待和寻觅，它们从来都在毁灭世界。让空间失去魅力，重新创造世界。我们，吞噬空间的英雄——空间吸食者，虚伪的中间空间吸食者。座右铭：不要空间，而要刺激——用刺激取代空间！——当然首要的是——狡诈！——我们要竭尽所能，在那个有意识的人返回时依然巩固他的表面位置，让它越来越高，让它扩张跨越边境。只有这样，围猎才会更加行之有效，才能把他从最大可能的空间里一步一步地赶进不断萎缩的最小空间里：最后从死角赶进零空间，再从那儿赶进负空间，再从那儿赶进负空间的底部，再从那儿赶进混沌空间，最终让他从混沌空间自然而然地回归垃圾。这一切应该引起一场轰动，能够煽动起上上下下形形色色的人跟着幸灾乐祸，并愿意参与这场围猎——当下那些独一无二的集体归属感。在黑暗最终来临的时刻，他应该彻底失去尊严，却让人感受不到丝毫悲情。因此，也不允许有孩子在场——他们会为某些事情而痛哭，会因这原本默契的皆 大欢喜而闹腾。最后他的心灵或许会变得肮脏不堪，彻头彻尾，唯一一块不折不扣的污物。——他

究竟有什么我没有的东西呢？为什么他被普遍称为“一个怀着其他忧虑的人”？“一个怀着其他忧虑的人”在我们祖国的语言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所有三人

一个英雄！

首领

没错。跟我们那个祖国的诗人写的诗句如出一辙：“唯有那些怀着其他忧虑的人才会成为英雄。”你说说，你为什么让那个人成为英雄，而把我看成对手呢？我只知道一首，也是唯一一首圣经诗篇——再多就没有了。——你们这些尊贵的人现在各就各位吧！切记：你们不准擅自行动，相互抬杠，相互吐火——就老老实实地待在这里；我们是野蛮之人，这对我们来说不是骂人的话。切记：你们可以为所欲为，只要它拥有自己的形式，自己的造型，我们必胜的自信。没有了形式，便走向邪恶，这就是他应得的下场。赶紧行动起来吧，奔赴各个战略要点。现在只会有要点，而没有小孩把玩空间和中间空间的儿戏！

[一阵风刮过舞台，四个人身上的衣物和头发在风中却纹丝不动。首领退场。

帮伙成员三

（走向一边）我一直在看着他，而现在他在我眼里连一丝余象都没有。或者是因为成千上万的余象彼此重叠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空间分割吧？

帮伙成员一

我出去，到那条公路干线上，埋伏在昔日的萝卜 窖里。

帮伙成员二

我隐蔽到沟渠里，躲在沼泽里的灌木丛下面。

[两人一边相互挡住去路，一边抽着响鞭退去。

帮伙成员三

那我就带着对讲机钻进乱石堆里，在上面插一面红旗？要不穿上女人衣服，让人看不出是个灯塔守护者？要不我去挪动南面那条分水线？——我们到底为什么就不能善罢甘休呢？自罗马人撤离之后，自阿拉伯人撤离之后，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的优势早已为所有的民族所认可。世界属于我们，以这种或另一种方式。我们的财富早已遍布天下，我们的专家，我们的分公司，我们知道怎么回事，我们知道在哪儿，我们的程序，我们的缩略语，我们的密码，我们第二套和第十套住房。尽管如此，我们为什么还不能善罢甘休呢？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拥有最好的法律，极度发达的文明，最有魅力的女性，最受认可的心脏移植专家，厚得不能再厚的报纸，多得不能再多的诺贝尔奖得主、奥林匹克运动会冠军和在竞赛中获奖的建筑设计师，最完整的童话集，最神奇的诗人，最负盛名的画家，最勤奋的厨师，最分明的四季，最美味的苹果，最值得骄傲的历史，最确定的未来——尽管拥有这一切，可我们为什么还不善罢甘休呢？昨天夜里，我——在我独自一人待的时刻里，尽管作为那个所谓的梦幻强盗民族的一员，我还是能够承认这一点——梦见了一个国王，或者说梦见了一个国王的缺失。按照梦中的情形，有了一个国王，天下恐怕最终会恢复太平，太平是人生的乐趣，太平是理想。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善罢甘休呢？（他扇自己的耳光）想一想吧！——我在想：如果我们这个

可敬的首领所指挥的军事行动正好与他刚刚描述的预期相反的话，那会是怎样的情形呢？会让人刮目相看吗？——我嗅出了阴谋的味道。——可是谁会来策划这场阴谋呢？——圣经中是怎样说的呢：世人与野兽有着相同的气息。（他扇自己的耳光）别再多想了。出发吧，前往老磨坊。或者前往那个被水冲刷的河中浅滩？或者前往当地的电视台？（他踉踉跄跄地退去，同时抽着响鞭，不时打到自己身上）

[灯光熄灭。

8

飞地像开始一样处在始终自由的天空下。姐妹俩、人民和白痴走过来，一身农工的装束，手里提的篮子里装满了万年青、冷杉枝和早春花，花朵不大，却更显色彩斑斓。他们一边用这些花草枝叶装扮那矗立在荒野的大门，一边还唱着一首相当复杂的飞地民歌——一首描写风的歌——但很快就唱不下去了。

人民

他来了吗？

白痴

（跑向边境，充当侦察者）整个荒原到处都飘着扬起的尘土。不，那只是些空塑料袋。一些像月桂花环的东西滚动在他前面。不，那是被风扯断的灌木丛枝。（他回到大门跟前）

人民

在没有他的十四年里，我成长为一个成年的人民。正是他的离去才使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当他还在这里的时候，我虽然受到激励，不断促使自己奋发向上——这当然也符合我的天性——但他的存在同时又阻止了我奋发进取。他每天都期盼着我继续成长，这令我非常生气。只有在他终于离去的时候，我才能满足他的预期。他现在会为他的人民感到诧异。他走得越远，我在这里就越能茁壮成长。榜样人物在远方：我风华正茂。这样一来，我自己就成了周边其他民族的楷模。去年夏天，在我的建议下，首届世界永久和平大会在哪儿召开的呢？在这里，在我们这儿！绝大多数那些电影，有探险故事，有爱情故事，有中世纪和未来的故事等，又是在哪儿拍摄的呢？在这里，在这个独一无二的地方，尽管它什么也没有，尽管它空空如也。那么谁是那些最具异国情调的儿童读物中的主人公呢？是我，飞地人民！他现在回来了，挂着一身胜利的棕榈叶花环，这个横渡白令海峡的英雄，这个波希米亚的拯救者，这个从明尼阿波利斯归来的胜利者，这个海上钻井平台的灭火者，这个女皇的书法家，这个拉普拉塔的隐居者，这个马德雷山脉的失踪者，这个雪人的发现者。他会增强我的人民意识，还是让我的意识化为乌有呢？有了他，我们将会整齐划一，还是他在我们身边是多余的？他会来吗？还是他不会来？

白痴

（又一次跑向边境去侦察）没有人从罗马人桥上走过来。没有人在边境界桩旁等待。没有人在爱抚地拍着牧羊犬！没有人现在跳过护墙，丢了帽子。没有人现在消失在边境的树林里！（他和其他人跑着退去——那扇大门已经装扮一新）

人民

（在奔跑中）女叙述者，美貌，年轻：你在哪儿？我们又需要你了。

[菲利普跑进来，将一个南瓜一般大的苹果放到大门上，当作拱顶石。很快退去。一阵风吹过那悬饰。

巴勃罗

（进入飞地，身穿长风衣，两手空空的，在边境前沿停了下来）啊，空间！在我的记忆里，这里始终是早春：蓓蕾溢彩流光尚无一片花叶，鸟儿的翅膀从阴影里闪现出光芒，绿油油的苔藓令人心旷神怡，而树林里则到处灰蒙蒙一片，就连那沙沙声和呼啸声也好像时而近在咫尺，时而又远在天边。这里永远都是早春。对我来说只有这里吗？这种沙沙声和呼啸声不是到处都能听得到吗？当时在戈壁荒漠里不就是这样的情形吗？那个先知，或者是谁当时坐在自己的岩洞前呢？从那种最微妙的呼啸声中听出了天使的嗓音，而且文献中不也记载着：当时正值早春时节。只是当时上帝或者其他人，在风中对先知或者谁所说的压根儿就不是什么美妙或温柔的话语，而是向他传达了威胁，针对的是这个所谓优等的人民，是地地道道的诅咒，谩骂，各种各样的毁灭方式。那么我们现在从这里早春的呼啸声中听到什么了？来吧，天使，另外一个！（他侧耳倾听）再也不走了。待在这里，直到那遥远的死亡。工作。研究。是的，自由自在地遵照便西拉的智慧之说：在自己的劳动中变老。不再充当胜利者，而要成为关怀者——当今的创造者。宁做一个有耐心的人而不是一个英雄。为我和这里的同胞创立法律，它们前所未有过，它们自然而然一目了然，它们也可以适用于任何地方和所有的人——也适用于我自己！别变得狡黠——锋芒毕露！这个被世界遗弃的飞地不再可能是我们的栖身之地。为什么不上台执政呢？要有对权力的欲望，因为这符合早春所激起的欲望。实施一种全新的、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故而最理所当然的权力——像一场友谊赛一样的东西，它毕竟会产生影响。以一种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的方式热爱权力，这样一来，在全球范围内，这个词恐怕就获得了另外的意义，并且与有轨电车、小溪河床、市郊、第一场雪，或者与板肉、桌布、五行打油诗、多米诺骨牌，或者干脆与早春为伍。一定要建立另一个社会，不是现在这个要么躁动焦虑要么松弛懒散的社会——另外的建筑，另外的形式，另外的运动。谁会相信今天处在这个正确的时代——真的就处在这个时代呢——，除了一些运动员和短跑选手之外？在我四处游历这个世界的那些岁月里，这个问题始终伴随着我……（他侧耳倾听）完蛋了。我在风中压根儿什么都听不到了。而永恒不变的无非是我的厌世情怀。这是我唯一的法则吗？（他侧耳倾听）啊，现在是我的祖先的声音。你们说吧。（他

侧耳倾听）“巴勃罗·维加，你在这里没有什么要寻觅的。立刻越过边境回去吧。到别的地方去展示你的流动奖杯吧。你栽下的那棵苹果树在哪儿呢？你亲手制作的那张桌子呢？你儿子在哪儿呢？你的后裤兜里塞满了奖牌、金质贝壳和银质蕨叶，还有本年度因一项新型沼泽地退水技术由远东西部科学院授予的‘浮士德’奖。”——你们说得没错：当年在那个强大的异国里，我赢得生平第一项八百米赛跑。当时，在各种荣誉的簇拥下，我曾经希望这胜利者的手中捧的是一束家乡的荨麻。我在加里西亚拦住受惊脱缰的怒马时，正好在校园里，而且是课间休息期间，人们为此上千次拥抱我，在离去时，我因为厌恶自己而大把地揪去自己的头发。几个世纪以来，从亚历山大·冯·洪堡[17]到赖因霍尔德·梅斯纳尔[18]，人们都在徒劳地寻觅着雷亚尔河的真正发源地，而就在我发现这个源头的当天，我立刻就心满意足了，甚至连鞋带都断了，我对着整个曼萨纳雷斯高原大声喊叫，直传到雷亚尔城以外，出于愤怒，或者出于仇恨，或者出于对生活的厌倦。这不公平。——可是我并非一个恨自己的人，我把自己看作朋友，像一个父亲一样对待自己——不，不是像一个父亲，无论如何不像我自己的父亲。从那以后，我也真的渴望干出一番事业来，去干，去创造，去努力，而且也向往这样坚持下去，天天如此，永无止境；打造桌子，改良水果，熏烤火腿，庆祝复活节之夜？就我来说——只是某些别的东西符合我的心愿。我想要得到那份荣誉——“切记：追求名望并非罪孽！”，有人在一部电影里这么说道——取得一定的成就，我也打心底里暖洋洋的；只要我取得成功，我最先希望的，就是与人分享。和谁呢？尽可能多的人。而当没有人与我分享时，才会产生厌恶之情。——尽管如此，当我又从一辆凯旋车上跳下来，并且在人群里又被那样欢呼簇拥着时，直到此时此刻，还没有一个人会在一小时之后不令我感到厌烦的，也包括我自己。那样的场面愈宏大，陶醉之后的清醒也就愈发可怕。迄今在我的人生中，没有任何成功或者胜利的一天不伴随着罪责和死亡。——或许吧，迄今的一切都是徒有虚名的行为，而真正的壮举现在才等待着我去实施，因为在实施这样的壮举时，喜悦最晚在入睡前不会被苦闷和罪责感所替代？我的梦想不是追求一种像吉尔伽美什国王那样，或者像图坦卡蒙法老那样，或者像萨尔瓦托·朱利亚诺[19]那样，或者像格瓦拉那样长生不老，而是没有死亡的一天。——那么我的归来现在就要好好庆祝一番？这些白痴。只是被所有的人所遗忘，时至今日我却看到了人性和法则。噢，我们所

有的人都各在其位，而我却是众人里的最后一个，模糊不清，难以辨认。睡一会儿吧！

[他穿过舞台走向那扇被装扮一新的大门，同时有一片树叶从他身后飘过来，后面蹦蹦跳跳地跟着一只鸟儿——鸟儿后面又跟着一条无声无息的大狗——大狗后面又是一只更大的、更无声无息的怪兽——然后才是那个年轻美貌的女叙述者。巴勃罗并没有察觉到这一切，他靠着大门坐了下来，继续说下去，双眼紧闭，而这一群动物则从另一个边界退去，好像被绳子牵着一样。女叙述者靠在第二根门柱上；她穿着农工或农民的节日服装。

巴勃罗

飞地这儿的人们：我在远方常常多么渴望见到他们啊，见到每一个人，见到所有的人：渴望他们的真挚与粗俗；渴望他们既向往天空又脚踏实地的品格。然而，我现在感觉越是接近他们，他们就越发显得模糊不清。啊，我的母亲：她立刻会一如既往，吼着大嗓门，当着其他人的面要置我于死地，却又从远方暗暗地期盼着我，就像我是她唯一的救星一样。啊，她的妹妹：她会一如既往地扮演着那个经历过所有时代最伟大的爱情故事的年轻姑娘，足以与童话故事“睡美人”和《乱世佳人》中的爱情故事相媲美，而她早在十四年前嘴里就只剩几颗残牙，并且下巴上长出几缕蜷曲的毛须来。啊，我亲爱的表弟菲利普：他会立刻向我挥手致意，不仅捧着他那本当地编年史，连同所发现的石油、硫黄和菌类，连同世界飞碟射击锦标赛和搁浅的鲸鱼——以难以辨认的字体记载了一切——而且还捧着他自己出版的十四本诗集，而事实上，他依然还会像四岁时一样，跟在自己的母亲后面一瘸一拐，还会像当年在牛圈里一样，手里总是还拎着那个小板凳，每当母亲挨个儿给牲口梳刷时，他就站到那个小板凳上，就这样站着寻找着母亲的奶头，吮吸着奶汁。再说吧，啊，我马上就又要看到飞地人民了，连同那无法治愈的对眼，那弯弯曲曲的膝盖——这不仅仅是这里的山地所致——那副祭祀羔羊的神态，坚韧却永远沮丧。啊，那个飞地白痴，他又会一如既往，惊奇地打量着我，当然那是笨拙虚

假的惊奇，而不是真实的惊奇，一种还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带来什么变化的惊奇。另一个社会？另一种解决方案。——来吧，最短暂的睡眠：比起我的跳台跳水、观测显微镜和计算机编程来，你始终更为可靠地为刷新世界色彩做出了贡献。世界色彩？游戏色彩。睡觉之前：不幸的结局。醒来的时候：清醒地继续玩色子游戏。

[停止说话。风吹过场地。蟋蟀声？远方的、越来越近的口琴声和单簧管声？

女叙述者

（对着那个睡眠中的人）想一想。回忆吧。让我讲给你听吧。当初你被铁丝网绊住，那个白痴跑过田野，把你从铁丝网里弄了出来，然后你问母亲：娘，为什么这个白痴长着如此细嫩的双手？——像人民一样，你或许也带着他那天生的死亡目光，仿佛每一天都是他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天，然后在这样一天里，当着你的面表现出对生命不是没有意义的深信不疑，对宇宙中恰恰选中这个星球的深信不疑，对他，也就是人民，至高无上的永垂不朽的深信不疑。——像你母亲一样，当她有一次一声不吭时，那样的沉默与这个国度里任何一种所谓的沉默截然不同。——还在上学和学前班之前，她就让你一个人独自一天到晚待在飞地树林最深处的黑莓丛里采摘果实，直到天色很晚时才来接你回去，丝毫也不顾及你几乎还是个不会走路的孩子，而你却在所有这些时刻里，或者是好几天？看到自己受到如此无忧无虑的保护，即使一个人，却不是孤零零的。——而且像后来一样……在那个星期天的上午，你们一块儿坐在草地之间的长凳上。——如此举不胜举——让我讲给你听吧。你是人民的一个孩子，一直都是。通往人民之路不是回头之路，而是向前之路。而那个白痴，就是你。（她踹了一脚将他唤醒。她的头发迎风飘舞，样子十分可怕）

巴勃罗

我认识你。

女叙述者

是的。

巴勃罗

你是瓦帕莱索城那个年轻的寡妇，刚刚接手了那里的港口酒吧。你是梅丽拉城的女走私犯，在夜色中越过边境将我带到了摩洛哥。你是马赛港那个少女，住在埃姆巴卡德城区第五栋楼二楼左手第一个房间里——这就是曾经的你。现在这样很公平！

[在此期间，飞地所有成员悉数登场，穿着朴素的服装，**人民**和**白痴**演奏着单簧管和手风琴，**菲利普**扛着并挥舞着崭新的飞地旗帜，旗子的面料和颜色与头顶那自由的天空遥相呼应，透光，几乎是透明的。现在开始演唱飞地赞歌，先是独唱，然后合唱。

菲利普

当时风在白天吹，

我希望那是夜晚。

姐姐

当时风在他乡吹，

它把我吹回了家。

妹妹

当时风吹在家里冰冷的炉灶里，

他希望风吹在春天的树林里。

人民

当时风是下降风，

我躺在下面的战场上。

白痴

当时风又是一股上升流，

和平的到来还很遥远。

五人齐唱

风在夜里吹，

我希望那是白天。

风在我家四周吹，

它把我吹到了他乡。

风撞击我的后背，

我宁愿它吹着我的脸庞。

风吹在我的面庞上，

我希望它吹得轻柔些。

风吹得轻柔，如此轻柔，

而我的脸庞却已太苍老，

太迟钝，太麻木。

然后我梦见了儿时的风，

但是从那里刮过来、吹过来、

掠过来和呼啸过来的是

历史之风，

战争之风。

菲利普

另一首飞地风之歌的时代来临了！

我今天从边境小桥上走过的时候，

从下面的溪流里刮上来一股河流之风。

然后到了第一栋房子前面，

轻盈的和风将我俘获——

巴勃罗

[插进去。

当我随后转弯的时候，

今天在这儿刮起了

主干道风，

刮起了行动之风，

这里，这里，还是这里。

[在此期间，**空间排挤帮**也不期而至，他们穿着那身僵硬、近乎白铁制的行头，却与他们以往那贴近对打的姿态正好相反：保持着夸张的距离；摆出一副对这个广场及其居民毕恭毕敬的样子；避让那里根本就没有要避让的东西；要是他们中某人变得躁动不安的话，就被其他人告诫要收敛一点——首先是相互阻止这帮人特有的不间断的单腿颤动，也就是说无论站着还是坐着总有一条腿在摇晃和抖动；最后停留在舞台纵深那块再小不过的空间里，犹如到了悬崖边上，小心又灵巧地展示着像屋顶工人一样的动作。

姐姐

（拥抱着**巴勃罗**）儿子啊，你居然在此时学会了唱歌。现在再也没有什么你不会的东西了！

妹妹

欢迎回家，早春男人！那边大门上的早春花全都是我摘的，在外面的树林里。（对着这一圈人）再说呢，正如我所预言的那样：巴勃罗·维加和罗莎丽亚·李娜雷斯，或者阿尔穆德娜·佐默尔，或者不管她叫什么名字，你们瞧一瞧啊，是天生的一对啊。

[一片稀稀落落的欢呼声，可以说，舞台纵深那个**空间排挤帮成员**也跟着欢呼起来。

巴勃罗

[朝**女叙述者**看了一眼，目光又移开了。

女叙述者

[也朝他看了一眼，目光又移开了。

巴勃罗

[目光又回到她的身上。

女叙述者

[目光也又回到他的身上。

[**两人**就这样保持着距离，成为夫妻；停止对视。

菲利普

（从地上扶起他表哥，显得很吃力。然后说道）从今天起，我期待你也能如此，而且更上一层楼，天天如此。

人民

（跟**巴勃罗**握手）你简直就是个怪人啊。（退到一边）永远就这样怪下去。——一个多么喜庆的日子啊。（退到一边）但愿又是一个工作日就好了。——你是一个高贵的人。（退到一边）我干吗需要一个高贵的人呢？——你一来，一切都变样了。（退到一边）最好是一切都保持原原本本的样子。（他当着**巴勃罗**的面磕出单簧管里的口水）

白痴

（揪着**巴勃罗**的头发，拽着他的大衣，将旗子从他的两腿之间扯过去……然后凝视着他，而且可以说是在预言）你会把这些为你准备的彩带扔进沟里去。你会在你的凯旋门上撞破脑门。你会让那些仰视你的面孔一个个从你身边扭过去。你会转身离去，永远不再回来。

[相反，**巴勃罗**在**女叙述者**的推动下，一而再，再而三地迈步穿过那扇大门；站在大门里伸开双臂；抚摸着大门上的彩带；在那个南瓜一般大的苹果上咬了一口；从**白痴**手中夺过旗子插在大门上方。一阵风吹过舞台。

女叙述者

[跺着脚或者拍着巴掌，仿佛在给他打着节拍，场地上所有其他人，也包括那些**空间排挤帮成员**，都跟着打起拍子来。

巴勃罗

从今天起，这里不再是一个飞地，而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地球上所有其他国家都已承认了我们是独立区域，是独立国家，是如今世界

上1007个国家中的一个新成员。我们要利用这一点。再过一百年，即使地球上只剩下漆黑的呼啸，也要通过我们当今这个时代，让被称为阳光、色彩、图像、舞蹈、音乐、声音、幽静和空间的东西传承下去。从今天起，你们，恰恰是你们，这些长久以来对空间无所适从的人，这些天生就长着一双对眼的昔日的飞地人，要散发出这样的光彩来，作为新型民族屹立于其他民族之中，这些民族此间全都分崩离析，成为一个个宗派，民族越大，宗派就越多。我不会再离开这里了。我要为我们的国家创立一部宪法。一个在这里适用的法律，一部又一部全都是新的。没有这样一部新的法律，阳光、色彩、图像、舞蹈、音乐、声音和幽静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只会是偶然的，缺少活动空间和基础。一部法律，它不是限制生存，而是替代生存，或者既限制又替代生存。如果我谈起生存或世界的话，那我所指的是其他一些东西，并非当今人类的总和！一部为每个人发现、昭示、给予适合他的空间的法律。有了这个法律，你们不会再偶尔地说出“好极了！”，而是直言不讳地说个不停：“这样好。好得很。”如果我在这里能够如愿以偿地创立这部新法律：同胞们，这将是一场空前的胜利，它与我此前的种种胜利截然不同，绝对不会使我陷入毫无止境的忧郁之中。人们就会在这里一辈子都怀着一种独一无二的明亮的思想，而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你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一思想的火花：此时此刻，在这早春时节比比皆 是。你们看呀。

[在他演说期间，从舞台纵深处传来一片喧闹声，并最终转化为谩骂、咆哮和骚乱。那个有意识的末代皇帝登场，地地道道的黯淡无光，每走一步还会失去一分光泽，被一个年轻女子，也就是那个女难民搀扶着，她同时还费力地拖着自己的家当。他们拐来拐去朝着那扇大门走去，国王边走边那样夸张和可悲地展示出自己“最终的姿态”。然后他紧紧抓住大门，仿佛那是一个避难所，一只母鸡？夹在胳膊下。接着一声枪响，国王瘫倒在地，那只母鸡？跑走了。女难民在最软弱无能的菲利普那里寻求庇护。此时空间排挤帮已闯入场地，转眼间就把国王的尸体连同权杖和王冠弄走了。那个首领又返回来，趾高气扬地站在大门口。

首领

随着这具尸体的消失，地球上最后一位国王也消失了。而且随着这个国王的消失，那种思想也消失了，或者说是满目疮痍的思想碎片，它以“王权”的名义哆哆嗦嗦地穿越当今的世界。剩下的只是这四个纸牌国王了。一个既有土地又有臣民的王国这样的东西，这个末代国王反正早已不再拥有了。他只能在世界的边缘像鬼魂一样出没，从一个边境被驱逐到另一个边境，这个犹太人意义上永久的国王，昨日还是电影里的群众演员，今天却成了一个鸡贼。如果说昔日那些疮痂病患者从世界各国前来朝拜他的一个个前任者，以求让国王之手摸在头上祈福祛病的话，那么他自己就是疮痂病和疥疮患者了，漫无目的地游走于世界各国，期待着有人将手放在他的头上。而他现在恰恰落入你们的手里，流落到这个绰号叫“国王避难所”的地方。然而，即使对他的尸体来说，这里也不再是那样的地方。无论在什么样的地图上，埋葬地球上这个末代国王尸体的地点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也被人从那梦想的地图学中，也就是那无休无止的、幼稚可笑的转世和所有那些蛊惑人心的再生的温床里抹去了。“那些与国王息息相关的东西”，这虽说曾经是对那个特别的现实的描述：“国王之路”曾经是现实之路，“皇家球队”通常都打最强大的比赛。可是从今天开始，这王权已经死亡了，死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它不再可能变成幽灵。提起“国王”来，你们会想到什么呢？稻草人。再加上百搭和爱斯。吞食人肉。46码鞋。踩着舞伴们的脚。血友病患者。提前退休者。穷途末路。难道不是这样的情形吗？国王游戏已经玩到头了，难道不是吗？你们的新游戏长存，你们全新的游戏长存。你们的新法律长存，就连边境那边的我们也在迫切等待它的创立。在古代雅典人那里，当那个新的立法者出现时，那些国王也就完蛋了。新古典时期长存。（他将那顶此前一直搭在背上的王冠挂在大门上，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就像在挂一只铁皮盆似的，随之退去）

人民

“王国”、“El Camino Real”（皇家大道）、“Mancha Real”（皇家污点）、“Real Sociedad”（皇家学会）、“皇家学会”、“国王与我”、“El Pueblo Real”（皇家子民）、[20]“皇家子

民”、“皇家监狱”、“皇家赤脚女人”：其实都是些美妙的词语，富有乐感的词语。

白痴

明天国王将会在我的茅舍里吃晚饭。他将会向我展示他的王后与王子们的照片。然后我们就会收看皇家电视节目。到了后天我将会等待着皇家的来信。

女叙述者

（对着**菲利普**）编年史作者，档案管理员：你都记录下来了吗？

菲利普

（朗读着，**女难民**也跟着他一起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港口水池里漂浮着一支铅笔。从纳什维尔开往新奥尔良的公共汽车上，有人在翻阅 体育报。山区里现在已经是夜晚了。新地岛和西藏正下着雪。月球上，一大块石头正滚入火山口里。阿留申群岛上，有八座火山正在喷发烈焰。

空荡荡的奥林匹克体育场的草坪上放着三个球。（转向**女难民**）每个难民都可以在这儿获得庇护。你愿意留下吗？

女难民

愿意。

菲利普

留在我这儿？

女难民

是的。

菲利普

可是我一事无成。我连学都没上完。我的房子——我母亲的房子——抵押给了对外空间利用银行，花园里所有的树木都被田鼠连根咬坏了。迄今为止，我输掉了每一场比赛、每一次打赌和每一次诗歌比赛。我在过去十四年里所撰写的地方编年史尽是斑斑墨渍。哪怕是最丑陋的女子也都远远地躲开我——如果万不得已的话，她们会拐进一片萝卜 地，穿过两片沼泽地和三个布雷区。我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失败者和无用的人。

女难民

这样也好。最好就这样。（两人相互拥抱，接着**巴勃罗**和女叙述者也拥抱在一起）

巴勃罗

我们的出发点和基础：渴望和正义。我们为整个国家的目标：梦想与工作；Sueno y trabajo（工作与梦想）；Trabajo y sueno（梦想与工作）；[21]职业与梦乐。我们的期限：适度！我们的新法律：一部令人快乐的法律。如果有法律闭口不谈的东西，那正是它的优雅之处。

[所有人快速退去。

[灯光熄灭。

9

在始终自由而晴朗的天空下，情景进一步扩展。这时，**女叙述者**走进来。情景的扩展首先是搬走舞台地板，就像要露出下面更深的一层来，同时在这里又出现了一只轮子的部分，一只远比开场时更大更华丽的轮子，又出现了一艘整装待发的小船的部分。那扇大门在舞台纵深处有了一个对称物，这个对称物更显霸气，装扮它的不是彩带而是金光灿灿的东西，而且有一道大门栅栏，后面显而易见是一片特殊的新辖区，对它来说，前面的情景不过是前场而已。**女叙述者**在扩展现场充当指定位置的人。

女叙述者

时光流逝，飞地并没有扩展自己的边境，却成了一个辽阔的国家。地下层一天一天地向上隆起来，最终挺进另一片领域，就像是一片海底，一头鲸鱼的背露出了水面。这是那个人的杰作，他就是我的丈夫。我们国家目前实际上是地球上唯一自由且空旷的地方，人们远道而来，就是要让人家来帮着清除他们脑子里的堵塞物。每一位来访者，即使他在抵达时说："这么小！"可临别时他都会回头说道："多大呀！整个世界！"来访者？丈量尺寸的人。目测尺寸的人。呼吸清晨新鲜空气的人。这片飞地成了一个帝国。是的，一个帝国。因为我看到的是这样，我也这样去讲述。今天一大早，在那些露珠中，草丛里的露珠是唯一呈青铜色的。一张木桌是灰色的。一把铁锯锈迹斑斑。一只羚羊与一只兔子嬉戏，兔子旁边站着一头狮子，与此同时，佛陀圆寂，鱼儿大叫，地球抖动，乌鸦黄色的嘴里衔着一颗核桃。身在一个帝国里，这就意味着，眼看着各种日常现象都被打磨成水晶。（对着自己）别下定义。讲述吧。也多亏了你的叙述，这里目前才是一片如此辽阔的国家，这里目前起作用的是另外一个历史。

——如果人们自然都这么想就好了。尽管我作为漫游叙述者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但我还从未遇到过一个民族如此缺乏信念地安身立命——而信念则不同于那毫无疑义的、盲目的希望——一个民族，好像它自古以来渴望的无非就是走向灭亡，为了这样最终和它所有那些失败的、惨死的和默默死去的祖先融为一体。这个民族只愿意听关于祖先的讲述，尤其喜欢听他们遭遇的灾祸、疾病、精神病发作和饥荒，只有在描述他们那些可敬又可怜的祖先弥留的日子、最后的夜晚、垂死的挣扎和死亡的惨叫时，这个可悲的民族的眼里才会闪现出光彩来。毋庸置疑：不是我的叙述——唯有法律才能改变这一切，刑法，它们惩罚的就是如此热衷于从乌鸫到乌鸦世界的民族苦难史！为了更伟大的生存，眼下已经万事俱备——唯独少的就是这个法律——只是那个预先指定的当地立法者恰恰就是飞地民族一个值得尊敬的儿子。一个出众的男人将我引回了家。引回了家？他终于到达了所有那些令他十分沮丧的功名、利禄和辉煌的彼岸，没有被浮士德先生追逼，没有那种病态的创作欲望——而且每天早晨都会这样开始，仿佛他，仿佛这个世界已经走到了尽头，一如既往。我对他说："多亏了你，这里才有了让人效仿的东西——看看那些所有从外地来的优等生！"他会回答道："让所有的老师和优等生都见鬼去吧。杰作不过是见不得人的勾当的另一种表达。"每天早晨我都必须更深地呼吸，为了呼出我丈夫体内对他自己的怒气，激励他继续工作。恶性循环：我越使他接近目标，我就越为他感到担心。他越是追求，我就越觉得这种追求不对头。他是遥远和辽阔的化身，但同时哪怕遭遇微不足道的挫折的时候，又想把自己和世界炸得粉碎。如果说他今天是个"怀有其他忧虑的人"的话，那么第二天早晨他就会完全变成一个被最琐碎和最微不足道的忧虑拖累的人："今天我的鞋带会扯断吗？花园的门锁好了吗？皮肤上的这个斑点是癌症的征兆吗？"他为这个国家创立的法律同样对他个人也是必不可少的。不然的话，它还会在这里令人沮丧。它会在这里令人沮丧？别问了。叙述吧。

[在她说话的时候，不断有**陌生人**，"来访者"穿过舞台。最后**女叙述者**加入他们的行列，和他们一起退场。

[灯光熄灭。

10

这个国家在自由广阔的天空下。春天。寂静。乌鸦嘶叫。原来那扇大门上罩了一层黑纱，“被发掘出”的小船和车辆也被遮盖起来，像是用工地遮篷或者汽车防雨罩盖的。表兄弟俩分别从两侧登场，穿着丧服，手执两根点燃的蜡烛，登场后将其吹灭。

巴勃罗

现在我们是这个家族仅剩的人了。

菲利普

我要不了孩子。而你则不想要孩子，依然不要。这样也好。这也自有它的道理。

巴勃罗

你应该叫“常有理”，或者“强词夺理”。

菲利普

维加就是河谷低地，“河谷草地”的绰号就叫“常有理”。

巴勃罗

失败得越惨痛，意义对你来说就越肯定。各种情况越是充满敌意，对你来说就越理所当然。世界越是令人厌恶，你就越发高唱生存快乐之歌。胡闹越是令人沮丧，你就越发满心欢喜地相信命运。我们俩生活的日子也好长了，你的损失、痛苦或是耻辱一天比一天多，而你却这么高兴，你甚至不感到一丝惊讶。——那么现在讲一讲你的母亲是怎样死的，从头至尾，任何细节也不要放过。

菲利普

这里每个人都知道，你在自己母亲临终前逃跑了。当时她声嘶力竭地喊了三天三夜，甚至在最偏远的角落里都可以听到她的喊声，而你却将自己关在你那隔音工作堡垒里，继续苦思冥想你的世界法律。

巴勃罗

不，当我一筹莫展时，我整天整夜都在那里睡大觉，一如既往。但是当我醒来时，我的工作的确就有了进展。

[两人停止说话。风短暂地刮过舞台。

菲利普

当年，我们的母亲在同一天夜里生下了我们，现在她们又在同一天夜里死去。——是的，在迄今为止我所经历的所有事件中，母亲的死是最令我感到高兴的。没错，当时我日日夜夜都守在她身旁，但并非出于作为儿子的义务，而是因为极度的关注：我不想错过任何瞬间。当她开始垂死挣扎时，我更近地凑到她跟前，将身子更深地俯在她上方：没有比这更甜美的一幕了！她的最后一夜是我喜悦的时刻。如果说我当时看到了某些豁然敞开的东西，那它绝对不是什么坟墓。是的，没错：窗前有只小枭在号叫，但这并非不祥的呼叫。拂晓时，母亲伴随着每一次艰难的喘息、怒号的呼吸、哀诉的呼吸一步步地远

离人世的时候，屋外的苹果树却纹丝不动，但是这也不意味着什么，根本不意味着什么。刚才还紧握着我的那只手从我的手里滑落了，母亲做了垂死的挣扎，死亡的汗水四下飞溅，我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想实实在在地捕捉到每一个瞬间，吮吸每个瞬间，舔舐每个瞬间，收集每个瞬间，筛滤每个瞬间。之后这个世界变得多么广阔，多么广阔。而我变得多么富有，多么富有。（他胡乱敲击一只吹弹式口琴）

巴勃罗

对我而言，那些垂死的人都是扫兴的人。认识我母亲的人都知道，她作为垂死者，恐怕会无所顾忌，要让她身边的人显得更坏，更有负罪感。要是我在她弥留之夜里守在她身旁的话，那她恐怕会背过身去面朝墙，直到生命的尽头，她临终前的每一声呼噜或许都是为了再责备我。“你摆脱了我，这下可高兴了。”“你从未爱过我。”“你跟你父亲一样。”“你没有为我的兄弟们复仇。”（他从大门上扯下黑纱，上面还装饰着用早春花编织的彩带）为什么你们向来都和死亡一起跟踪着我呢？在我的工作日复一日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我为之而发出的欢呼却夹杂着那种死亡的强迫感，欢呼声越响亮，这种感觉就越阴森。然而，多亏那个当我妻子的人，我此间热衷于“连续不断的状态”，于是在最近一段日子里，除了有两个死亡的母亲萦绕之外，又有了第三个念头加入其中：长生不死的念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相信人会长生不死。我只是开始理解，恰恰是基于我的欢呼和我的恐惧之间的转换，这样一种念头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功勋卓著的吉尔伽美什国王最后也开始寻求长生不老之术，结果生命垂危，因为他没有追求到长生不死，这大概就是我们最早的史诗吧。然后是古埃及的法老们，他们的权力越是光芒四射，每个人对于横渡永生之海的筹备就愈加坚决、缜密，同时也更加疯狂。看一看他们的死亡之船吧：这就是准备好了要克服到达永恒的生命地点之前的千难万险。每一次横渡，从现世的死亡启程，经过长久而危险的航程，最终到达彼岸长生不死的地方，法老都为他的渡船设计并让人建造出包括工具、武器、口粮和卫兵在内一套如此丰富和精巧的齿轮机械传动系统，以至于这个系统在创造力方面远远超过当下任何为生计和生存而设计的系统。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再没有比那种国王对死亡的恐惧更全面和更加目标明确的能量了！再没有更强有力的绝望了！（他一把扯下罩

在那小船上的帆布，它虽未完全竣工，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高大和绚丽，那辆单驾轻便马车或者两侧有栅栏的马车或者贵宾豪华马车会同样如此吗？它……）是的，我就是这样理解那种长生不老的念头的，它首先是当时那些统治者所梦寐以求的，只是关系到他们自身，出于无比巨大的恐惧。你想象一下，这里是某某法老的超度之船，在下水试航之后的四千年岁月里，它越来越深地被埋在利比亚的沙漠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来，船体内部早已腐烂或被洗劫一空，这一情形会告诉你什么呢？死亡的恐惧，是最纯粹的，长生不老的能量，是更纯粹的。

菲利普

这两点对我来说都很陌生。

巴勃罗

可你不是曾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吗："现在和现在，二者在互相残杀。"无论怎么说，这种习以为常的时间会要我的命，用它的现在和现在，用它这样的现在，和这样的现在，用它早晨的狭隘和晚上的宽广，颠倒过来，今天和我在一起，明天却又反对我。在我看来，这种普通时间的变化无常并非出自我，而是出自它，也就是这种时间——出自我们这儿现在的时间——出自我们特定的当下和时代。我们的日常时间赋予我们一切，现在是那种统一的陶醉，现在是分崩离析，一切的一切——唯独没有分寸或结果——确切地说，是掌握分寸的才能，人们不就是这样说一个合理分配时间的斗牛士吗？这个现在的时间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专制时间，不允许我们成为它的伙伴或者参与者。甚至连终极时间这样的东西都不会作为安慰向我们任何人招手，而在这样的时间里，每个人至少不必可怜巴巴地独自死去——就连终极时间也已经过去了——而是时间现在正慢慢终止，跳向远方，拖着沉重的脚步，停滞不前，翻着跟头，带着一种可怕的无限蜿蜒向前，而在这无限之中，我觉得自己更加有限，更加短命。这个现在的时间，正像我们正在经历的，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时间。当我想到长生

不老时，那么它就会迫使我寻求一种新的时间方式，并且为了证明它，同样要寻求一种新的法律。

菲利普

我所熟悉的这种时间是我的朋友，或者对我来说是我的上帝，伴随着每一次失败越来越强烈。那会是什么样的悲剧呢，我这样想象着，假如我突然之间交上好运和取得成功的话。

巴勃罗

你以你的时间所经历的历史，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我，而且不单单是我，则需要为一种新的时间方式创立的新法律。十分紧迫。而且这是可能的。我会做到的。或者凭空想象。易如反掌。完全易如反掌。而在我如愿以偿的时刻，这种愚钝而漫不经心的现在时间就会获得一种史无前例的秩序。一种发现者的秩序。是那种意义上造成无序的反面，比如说一个高尔夫球场会使一个地区变得混乱不堪。

菲利普

你的法律令我感到害怕——还是留给你自己用吧。尚在它完成的当晚，你就会纵身跳入埃特纳火山或者一头栽进地球上最后一个粪坑里。

巴勃罗

有可能——是的，有可能。而且有可能，我要把你们所有人都一起拽上。

[灯光熄灭。

11

这个国家始终还在自由的天空下。正值夏季。舞台背景发出亮光，而背景之后还有背景。蟋蟀声。工作——船只、车辆等——几乎已经完成；大门两侧分别栽了一棵低矮的桦树；后面的对称物宛如一座纪念碑闪闪发光，而地面射灯从纪念碑起延伸向纵深，就像是飞机跑道；也许在另一侧，延伸向远方，是一片麦田的一角。刮着夏日的风。**空间排挤帮**此刻越过田野闯入场地，穿着他们那僵硬至极、白铁制的空间排挤制服，制服发出相应的声响。风突然停了。甚至连那一个个东西都仿佛惊呆了，尽管他们暂时只有三个人，那个**首领**不在其中。他们不仅拖着罗网和绳索，而且还有专门的吞噬空间、吸食空间和灭掉空间光亮的器械，这些东西从来就没有人见过。他们此刻共同发出了战场乌拉声，**帮伙成员三**有点迟疑，呼喊声中夹杂着一丝近乎友好的口气。

帮伙成员一

和平年月里我们却在战争中。

帮伙成员二

残忍会再次笼罩在地球上。

帮伙成员三

一定要剥夺这个国家的名誉。它甚至不应该再有自己的名字。它和它的居民必须被贬为纯粹的数字。这里的向日葵从今天起必须改叫雅葱。皇家河流改叫塞克河，也就是干涸之河。菲利普·维加要更名

为弗朗兹·苹果树，巴勃罗·维加要叫做默泽斯·梨茎。雨水洼上的小木桥统统都要被炸掉，篱笆板条统统都要被毁掉，中间区域统统都要被熏干并堵塞。本地的棕榈树要被推上战争审判台。乡间的麻雀要被涂上一个猩红色的斑点。

帮伙成员一

你又一次打偏了，三次了。

帮伙成员二

你忘记了为我们辩解的那个东西：形式。

帮伙成员一

我们毕竟也希望拥有一部新的人类法，而且要集体来创立。我们不愿意再充当被误解和被仇视的人。我们在各民族中是多么孤独，几千年来都是如此，而同时又是多么需要关爱，多么充满温情。昨天我还梦见了自己是圣人马丁，并且将自己的铁皮大衣的一部分赠给了挨冻的乞丐。（他熄灭了一盏背景灯）

帮伙成员二

我的童年是在一间木棚屋里度过的，在学校里也曾经让人抄袭过，熟知诗人贡戈拉[22]的所有诗篇，服兵役期间没有害过一场病，在肯尼迪、卢蒙巴[23]和安东尼奥·马丁斯身亡时掉过眼泪，昨天还跟人合唱“我们在河边相遇”，刚才又为了观赏一朵夏日的云彩做出了立正姿势。（他熄灭了另一盏背景灯：那扇大门消失了，栅栏像蜘蛛网一样被风吹走了，那片麦田卷起来了，并且不复存在……）

帮伙成员三

我是吸音器的发明者。（他用一件器具表演起来，在操作器具之前，他的喊声具有立体效应，之后渐渐消去）我是图片射击装置的发明者。（他用一件器具表演起来，彩色图片在舞台上来回移动，它们相继被射落下来）我是自动伐木机的发明者。（他用一件器具在那两棵低矮的桦树身上表演起来）我是单维眼镜的发明者。

[他给自己和同伴们戴上单维眼镜，在观众眼前，舞台上最后剩余的背景空间也收缩成了线和点。

帮伙成员一

这里有如此多的无人居住区。

[他让那只船沉没或者变黑，眼镜摘下又戴上。

帮伙成员二

废弃了，荒芜了，杂草丛生。那几个结构摇摇晃晃。毫无价值的作品。就为一天搭建的，纯粹是摆设而已。

[他准备去掉——眼镜摘下又戴上——这扇农家大门上的装饰物。

帮伙成员三

从这里会产生新的福祉——请原谅，这个词对我们来说禁止使用，否则就要被革出帮门——我纠正自己：从这里会迎来新的追求，

第三种风，绳索的断裂，新的启程？

[他把那个大车轮子扭来扭去或者“搞得乱七八糟”——眼镜摘下又戴上。

[**首领**登场。

首领

今天我们必须抓到他。不然的话，从下一场开始，历史就会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继续下去。现在或者永远都不行。迄今为止，我们之所以没能阻挡住他，不是来得太晚，就是来得太早。跟创作一首诗、一次拥抱或者一个舞步一样，在对付不共戴天的仇敌时，首先也要抓住正确的时机。这家伙来了，我从指间到脚趾都能感觉得到。在此期间，我们并不是空间排挤者、领域吞噬者、恶霸——而正是他，这个正义和法律的探寻者。没有我们这些冒险家的世界是无法想象的。如果我是毕达哥拉斯同代的人，我会阻止毕达哥拉斯定理的产生，而且永远都不让它问世。要是在乔托那个时代，我就会阻止他那样描绘人的社会，因此也就阻止了描绘在他之后所有可能的人的社会。我恐怕会在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离风口山巅还有很远的路上设下埋伏，这样在他之后，也就不会有人以其开拓者的方式说出“我！”了。而歌德也许会被我这个天然的死敌逐出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几乎不再有什么名分，这样在他之后就不会有人再以成为歌德式的人物自我标榜了。与此同时，我又觉得被这些人物所吸引——只是我不能忍受，我的现在和他们的现在恰好重合了。这就是让我成为亡命之徒的原因。它要遭到毁灭。就是这么想的。可是话说回来，在我这里，它开始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还在孩提时代，我就想拥抱整个世界。只是每次我都抓得不是时机，不经意间给别人造成了痛苦，久而久之，谁见了我都事先回避。或者我本想兴致勃勃地指向远方的地平线上，却无意中将我旁边的人撞到了一边。没有空间感！大家都这么说我，但我除了想让大家高兴之外再无别的念头，不管是谁，就是要讨他喜欢，讨人喜欢，取悦他人，这是最纯粹的快乐。可在这期间，我在地球上已经很久都看不到我还愿意讨好的人了，一个也没有。这样一来，我

很快就踏入了我的另一条人生轨迹，并乐在其中。我成了伟大的吞噬空间者，遮蔽太阳的人，射杀天蓝色的人。（他照样去做）是的，一开始我还怀着最美好的愿望张开嘴——为了让别人快乐，使他们开心，使他们得到慰藉——但是人们还在我开口说第一句话之前就吓得直往后退，如同面对一张死人嘴巴一样，那么我接下来除了证实自己的形象名副其实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变得凶残，去报复他人？我或许会成为一个善良的魔鬼，结果却成为一个邪恶的魔鬼，与人为敌，而这使我感到振奋。感到振奋？是的，感到振奋！——我多么帅气啊。我不帅气吗？你们也很帅气。我们这些冒险家都很帅气，比任何一个被告都要帅气得多。

帮伙成员一

他来了。

帮伙成员二

他们来了。

帮伙成员三

他拿着一个直角三角形来了。他翻过温托索山来了。他带着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来了。两人穿着银鼬皮大衣和马刺靴。他终于来了。他们终于来了。

[罗网等东西向他头顶抛去，这帮人随即撤退。这时，**巴勃罗**和女叙述者登场，穿着夏日的农装，光着脚，舞台上那些东西又恢复了原先的位置和光亮。

巴勃罗

节奏已经在我心中，如此清晰，甚至连那个完全怀有敌意的蒙昧主义者无疑也会明白这部法律。现在我已经恨不得一口气说出什么是公平来。我要创立这部法律，就像一个奇特的乐师创作他的音乐作品一样：在他演奏的每一个节奏里，就已经出现了接下来的节拍，而且是预先确定的。我现在缺少的只有耐心，比如一个白痴的耐心。或许干脆就是一个孩子在这里拍着手，敲打节奏。而我现在最缺少的，是找出适当的距离，以便使法律演讲同时变成一种持续不断的画面展示。没有画面就没有法律。新的法律一定要看和被看。盲目的法律多得是。好吧，现在进入距离，适当的距离。它在哪儿？（他用场上的几件东西比画了一番）太近了：不再与其他东西相连——太远了：虚假的和谐。

女叙述者

那不是距离。那是观察。今天谁还会观察什么呢？教皇是否会正确地观察什么呢？简单的观察现在却成了再困难不过的问题。只有你具备观察的能力，你才会让战争变得不可能。

[**空间排挤帮**悉数走到亮处。

巴勃罗

你们还存在着？

首领

我们会一直存在下去。我们多子多孙。

巴勃罗

欢迎来到这个国度。每当我精疲力竭的时候，你们就来了，为了给我致命打击，可这样一来，我又一次重新振作起来了。

首领

你不仅跟我们完全一样，而且更坏。我从小就在观察你，派出我的密探盯着你。三岁的时候，你在那边的斜坡上将你表弟的脑袋按进荨麻丛里。七岁时，你说服母亲给牛奶里掺水，然后再用马车拉着牛奶送往合作社。十二岁那年，你打扑克时骗去了你们那个白痴整整一个月的零花钱，他当时连“三”都不会数。

巴勃罗

继续说吧。别停下来。

首领

在萨拉戈萨附近的埃布罗河里，[24]一个溺水的女人紧紧抓住你，你却用双腿将她踢开。在波士顿的大学操场上，你在投掷标枪时故意击中一个人的眼睛。当印度大使的夫人因为你要割开动脉时，你反而递给她一个剃须刀片，然后一个劲儿地嘲笑她，直到她最终这么做了。

巴勃罗

（继续在寻找着距离，测量，画线，把物体连接起来，越来越夸张地在空中比画着）别停下来啊。说下去吧！痛痛快快地倒出你的仇恨，别遮遮掩掩的！

首领

你就是想摆脱我们，就跟我们想摆脱你一样，只是你嘴上不明说罢了。无论你做什么美妙和伟大的事情，都是别有用心，就是要把我们从你的路上扫除掉。你的这番用心，第三个浮士德和第四个梭伦先生，在修建堤坝、轰击原子核、设计新游戏的时候甚至是你的主导思想。是什么东西驱使你如此不断地开拓呢，那就是嗜血成性。

[其余三个**帮伙成员**此间悄无声息地站到那些物体和巴勃罗测量的距离及尺度之间，好像别无用心，心不在焉，**帮伙成员三**更是笨手笨脚，几乎有点儿讨人喜爱；最后三人不约而同地蹲在观察对象前，脸上挂着如痴如醉的微笑。

巴勃罗

（继续听任这一切）好热啊。——越来越热了。它会的。——它来了。——它形成了。（对着首领）来吧，最后一击，嘴上再加把劲儿！

首领

总而言之，不管你有什么想法，向来都少不了你那永无止境的别有用心，这就叫做死亡。因此，你是我们这里所有人当中最肮脏的一个。因此你是不可救药的。因此死亡就是你唯一的法律。

巴勃罗

（倾听他说话）炎热！——炎热至极！——它出现了。——那个图像。——那些图像。（他跑向首领拥抱他）兄弟。我的兄弟！（他开始用一支巨型粉笔在大门上画起来。粉笔折断了。他又重新尝试。

粉笔折断。如此等等。一声愤怒的叫喊）卑鄙的世界。邪恶的东西。荒谬的法律。丑恶的美丽。钟情的破烂玩意儿。厄洛斯的渴望。死亡万岁。永远不再要法律。战争，划分地盘。让我们消失。千疮百孔的小船！千疮百孔的大门！千疮百孔的马车！千疮百孔的世界！你们别打扰我了，所有的人！

[他边说边用拳头捶击自己的脑门，将脑袋撞向地面等等，把摆在大门上方的王冠高高地抛出去，就连**女叙述者**也被推开了，被挤到一边去——只有**空间排挤帮成员**安然无恙，他们似乎在为他的神志错乱打起节拍。

女叙述者

（先是劝解和制止，然后转向**那帮人**）你多丑啊。首先是你。（对着**帮伙成员三**）你稍微好一点。（对着**首领**）你多丑啊。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如此丑陋的人。看到如此丑陋的嘴脸，恐怕连象人也会耷拉下象人耳朵罩在眼上。对于你的丑陋，有必要创造一个全新的词语，一个根除丑陋剂词语。你如此丑陋不堪。你们如此丑陋。丑陋，丑陋，丑陋。由于你们的丑陋，你们会被就地从这个世上抹去。你们的历史结束了。我破译了你们的密码，闯入了你们的程序，现在我要将这一程序删除，连同你们这些丑陋的家伙，三个丑陋的家伙，成千上万丑陋的家伙。（她向舞台上空发出一个信号）熄灭灯光。关闭开关。拔掉电源。

帮伙成员一、二和三

（恳求着）姐妹。姐妹！小姐妹！

首领

（同样如此）兄弟。兄弟！小兄弟！

[一道恰到好处的灯光闪烁，然后**空间排挤帮成员**消失了。她扇了巴勃罗几记耳光，用拳头击打他，才使他又清醒过来。

巴勃罗

你夺去了我的兄弟们，我的接替者。

女叙述者

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如果再回来的话，我每次都要靠着讲述把他们又赶走，而且每次都换个花样。地球上越来越多地挤满了这样的入侵者，不仅来自敌对的邻国，而且还来自陌生的星球。

巴勃罗

我刚才的破坏并非出自愤怒，而是出自我内心的一道裂痕，一种犹如天生的无根无底。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奇怪的是，这道裂痕从未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爆发过，而始终只是与物体打交道时才会这样。而且没有一次是在面临什么重大、复杂和棘手的问题时爆发，而总是在面对一些琐碎、长久熟悉和易如反掌的事情上才会如此。我的钥匙掉在地上——一个圆规铅芯折断了——我找不到袖头子：这个世界乱了套。我正走在一道楼梯上，眼前浮现的是宇宙的和谐，楼梯上一级不规则的台阶立即撕断了所有的关联。因为这唯一一级不一样的台阶，马上使我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地，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毁灭，毁灭，再毁灭，也免不了毁灭我自己。我现在要对你说些我还从来没有给任何人说过的话：拉我一把吧。继续拉我一把吧。情况非常紧迫。

女叙述者

在你打算要做的事情里，你不仅仅是你自己。在你打算要做的事情里，你感到如鱼得水。你的本质会保护你。如果这个裂痕还要出现的话，我就会来到这里，完完整整地讲述你。爱情已经到来。我对你非常友好。只有当你离开了自己心爱的人，也就是你的女叙述者时，你才会感到伤心。明白吗？振作起来。事不宜迟。此间我们大家变得多么顽固不化。有时每个人都恨每个人。所有的人都被追逐，也包括那些追逐者。人与人之间形同陌路，但同时又对此毫不惊奇。每个人都自成一派，不计其数。时间紧迫。机不可失。

[阵风。他们正想从后面穿过那扇华丽的大门退去，只见**菲利普**和那个**女难民**从前面上场，她提着一个衣服箩筐。**女叙述者**和**巴勃罗**停住脚步，隐蔽在夏天的阴影里。

菲利普

我完蛋了。

女难民

这样就好。最好就这样。

菲利普

在一场当代的做梦比赛中，名为“生存是一场梦”的奖项落在了一名从蒙特塞拉特岛逃亡出来的僧侣之手。我也做好了再次空手而归的思想准备，因为像我这样，夜里做美梦，白天为之写出一个比赛规

则，这就有点不一样。于是我期盼着蒙特塞拉特岛的职业选手们的做梦比赛。此外，我一直以来就害怕所写的东西被别的任何人看到，也许除了你。而且最难堪的是：被一个本地读者看到。小时候，有一次随母亲进山徒步旅行，情不自禁地在山顶茅舍的留言簿上作了一首诗，这事多年后依然死死地纠缠着我，担心有来自当地的人可能会在山上看到我的手迹，连同下面“菲利普·维加”的署名。后来有一天，我已经长大成人了，又一次费力地独自进山去，爬上那座山的最高峰，就为了从留言簿中把那一页撕下来——只是山上的留言簿和茅屋都不复存在了，我当时就觉得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后来还有一次，当我的第一件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件印刷品，也就是当地一位作坊师傅给他的客户预订的韵体新年祝词，在第二年被换成了洛佩·德·维加的一首短诗，我立刻感到如释重负……其实我只想让我最亲近的人阅 读我的作品，或者干脆就让我父亲一个人——只是我从未见过他，今天仍在寻找他，自己很快也要过了年岁——现在只想让你读，我的妻子。

女难民

早春光辉灿烂，

它来自那一侧。

早春的灿烂

是侧向的灿烂。

灌木和草丛里

阵阵吹过的风儿

增添了早春的灿烂。

早春的灿烂

是吹拂的光泽。

早春的灿烂闪现在

比如

松叶的侧向舞动中……

我这一辈子，直到来到这里之前，只是逃来逃去，眼睛盯着地面，盯着自己的鞋尖，或者直视前方，或者直视身后，“别望着鸟儿——眼睛直视前方！”我的国王总这么说——但尽管如此，我还是看到了这种侧向的光线。为什么说你完蛋了呢？

菲利普

我无论在哪儿，都处处以失败而告终。我母亲的坟墓被人夷为平地。我外祖父的房子片瓦未留。你不得不当清洁工劳作。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此间都有所成就——更不用说我那个几乎与摩西不相上下的表哥了——人民沾沾自喜，就连那个白痴相比其他国家的白痴来也不同凡响，被视为预言家，受到来自日本银座和美国华尔街的求教者的青睐：只有我彻底完蛋了。这样也好。那是真正的“好了”，我瘫倒在地时这样对自己说。

女难民

你的机会会来的。如果它没有来的话，这样更好。你想象一下：你胜利而归。你想象一下：我就站在一位凯旋者的身旁。看看当今天下所有那些首脑，人们只会庆幸自己啥也不是。我压根儿就不希望看到你在劳作。我反而更喜欢看到你来到我身边，注视着我在劳作。我们俩都完蛋了，很久以来。我们是失败的一对儿。这难道不奇妙吗？（她欢呼起来）

菲利普

那么现在呢？

女难民

我们到河边那儿去吧。

菲利普：

那边有河？什么时候有的？

女难民

一直就有。

菲利普

然后呢？

女难民

我把洗好的衣服晾起来。

菲利普

那我呢？

女难民

你坐着就是了。

[两个人蹦蹦跳跳地退下去。

巴勃罗

（和**女叙述者**一起从阴影里出来）有时候我觉得，他过得比我好。于是我就想立即返回我和我们那毫无意义的飞地时代。无论在哪儿，只要默默无闻，我都感到幸福快乐，比如当年那个秋雨之日，在贝那温特高速公路休息站的厕所里，或者当年那个冬日的上午，和一帮坏孩子在23号大街的色情影院门口。那个时候谁也不理睬我，我却觉得如愿以偿。有几次，我也跟表弟菲利普一样感觉完蛋了，可那却是我迄今为止最美好的时光。不被任何人认可，我却觉得最为真切。今天我成了一个大人物，按照你的意愿，夫人，以后还应变得更伟大。（他踹了那华丽的大门一脚）凌驾于他人之上，为所欲为，发号施令，我觉得自己背叛了那些和我在共同的成长中，在大街上，在操场上形影相伴的人。如果说我之所以为自己所有的亲人、同胞和伙伴感到自豪的话，那就是因为他们所谓的成绩没有一个能够在他们身后流传下来。跟他们一样留下如此少的痕迹，我觉得这好像是自己的义务。看一看那些所谓不朽的作品：它们不仅几乎全都不朽得令人厌烦，而且不朽得可怕，这样的作品不仅有拉德斯基进行曲、威廉·布施的连环画册和《魔山》，而且还有小夜曲、大卫·米开朗基罗、麦克贝斯夫人和雅典或其他地方的神庙。有什么比波列罗舞更令人萎靡不振的东西吗？那个被彻底遗忘的流行歌曲则使我更加精神振奋。一个个吞噬空间永恒的东西。所有这些令人恐惧的被遗忘者。现在歌颂的就是这些被遗忘的人。要是所有这些永恒的东西都沉寂下来，沉于梦幻，被吹得无影无踪，那么这个世界会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啊。当还没有出现那种法老式的长生不老的思想时，人类想必是多么美好啊。而你为什么偏偏迫使我这样一个直到今天在尘世上都没有找到自己位置的人去称王统治他人呢？你为什么相信，一个直到今天都没有找到自己法律的人，却能够提供一种无所不包的法制呢？如果我非要成为什么的话，那就做一个受人尊重的失败者，堪称典范的失败。

女叙述者

这样你也摆脱不了我。再说你演了一出错误的戏。我只是陪在你身边保护你而已。在遇到我之前，或许你也在寻觅一个女子，为了和她一起从这个世上消失，那么在找到我之后，你就会知道，我恐怕跟你想要找的女人正好相反！不，朋友，我不希望有一个内心分裂的丈夫。收起你分腿腾越的动作吧，下面没有深渊。登台吧，履行你的职责。间隔时间已经持续够长了，出现了王位空缺期——我当流浪叙述者的时间也够长了。是的，我想拥有像国王那样的东西。我想成为女王。

巴勃罗

在你面前我感到害怕。

女叙述者

我知道，我很肮脏，也许是最堕落的。但只有通过我才能实现净化。

[交换眼色，一去，一回，一去，一回，就像曾经有过的那样。同时在场地四周响起各种声响，它们决定了随后的舞台画面：雷声，骚乱声，备战的声音。

巴勃罗

我看不见你。我再也看不见你了。

女叙述者

触摸我吧，这样你就看到我了。

巴勃罗

（拥抱之后）如果你离开我，我就会死去。

女叙述者

再说一遍：时间紧迫。一种无法比拟的愤怒正在威胁地球。难道只有重新发动一场战争才能带来革新吗？

巴勃罗

我要这样做。我要试一试。可是我首先要消失在我那久经考验的短暂睡眠中。连续睡到法律跟前。（他盲目地跑来跑去）我要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该多好啊。

女叙述者

（用一副绳索套住了他）在这儿。（她用肘窝夹住他，用拳头捶他，推着他穿过那扇大门，朝着想象的宫殿方向走去）

[灯光熄灭，黑暗中，骚乱声——轰炸机，军事演习，大战前的叫喊声——越来越大。

12

在零零星星的灾难声响中，场景起初仍然在自由的天空之下。但此时此刻，明亮的天空渐渐变暗，而且在整个场景系列画面中越来越暗。一切都来得很快：一只巨鸟（或者海怪？）的影子在这片大地上空游弋，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又到那儿，随即只见一根硕大的羽毛，黑乎乎的，从舞台上空摇摇晃晃地飘下来。在舞台纵深的沟渠里，又有一个伞兵降落下来，随之又有几个**陌生人**向他跑去，他们这一次拿着钢棍，到那儿后，他们连同那些拖在后面的降落伞绳一起消失了。在场地边一个地方下起了雪，而另一边则是电闪雷鸣，同时还有一边雾气升腾。然后，一架架起火燃烧的大型纸飞机从空中坠落。接着是许多短暂可见的金属翅膀的相互撞击：翅膀上挂着的不是**空间排挤帮**吗？一个苹果朝着可谓不可能的方向掉落，自下而上，接着又是一个，战争的号角吹响了。一些**陌生人**稀里糊涂地穿过这片地方，个个都伸开双臂去抓住一个人当依靠，结果是徒劳。**女叙述者**也夹在他们当中瞎跑。几个**陌生人**躺在地上，像大鱼一样快速地滚来滚去，急促地渴望得到水，继而很快又滚开了。各种广播声音，听起来更像是汉语、阿拉伯语或外星人的语言。一串像是一队救护车上闪烁的灯光无声无息地穿过舞台。几个**陌生人**拖着一棵罩在罗网里的、鲜花盛开的树走过去。一个**陌生人**拽着一只被拴住的公羊走过去；接着又是一个人抱着一只被捆绑的兔子；然后又是一个人牵着一根铁链，上面拴着一只猴、一个人和一条狗。飞地旗帜起火燃烧起来，很快就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色彩斑斓的旗帜，在瞬间的风暴中穿过像是浓烟滚滚的阴影飞舞。随之，又是一转眼工夫，一个摩托巡逻队清空了场地，以至于除了那扇国王大门之外，台上只剩下一些残片，构成了一个略微起伏不平的地面，一个崎岖不平的世界——在运走那只船时，可以看见**巴勃罗**，他在船后面或者船舱里躺着睡大觉，而且沉睡不醒。四处传来悲哀的叫声。不一会儿，这崎岖不平的世界此刻张开了那片完美无缺的星空，最后在星空下，在寂静中，有一个小孩异常缓慢地行走着，也许他胳膊下夹着一个皮球，一声不响，只是每挪几步都要深深地叹一口气并放声痛哭，之后又是一阵呻吟。最后还有一束灌木枝从空中落下来，正好掉在全程都安然沉睡的**巴勃罗**跟前。

灯光熄灭。

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崎岖不平的世界在自由广阔的清晨天空下。在相当空旷的地面上，到处都郁郁葱葱，不只是那片灌木丛，它此间已经蔓生成为一如既往幸福酣睡的**巴勃罗**的遮棚——一片童话般的郁郁葱葱，特别是在那些场地残余物隆起的地方。从四面八方投射来的光线也同样非常神奇：使得那些在灯光中登场的人显得格外鲜明。难道他们不是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陌生人吗？他们身着节日的盛装穿过那扇大门，仿佛要奔向或走向那个想象的宫殿，因为从那里弥散出所有绿色中最奇妙的东西（大门上现在裹着丝带，或者那是些书页？它们在风中飞舞或者翻来翻去。）而人群中不是也有穿着他那件红色复活节大衣的**外祖父**或**祖先**的身影，那个没有任何象征物的**末代国王**，以及穿着公爵 夫人长袍的姐妹俩吗？但是现在清晰可辨的当属**人民**和**白痴**，他们又

穿着昔日飞地的星期天传统服装：他们也从容不迫地走向那扇大门，手里拿着小号和腰鼓，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在羞怯地摆弄着它们；**菲利普**和**女难民**扛着书写、摄影、摄像和其他照相器械，轻而易举地超过那两个人。**巴勃罗**此时继续酣睡。

人民

你说吧：首先是什么呢？先是国王，然后是法律？或者他应该首先给我立法，然后我这个人民或许才会宣布他为我的国王？白痴：我需要你的建议，因为我从来还没有拥有过一个国王。

白痴

首先是人口统计。（他数道）一、四、十二、七、六、五、四、三、二、一——我来了，我跳跃。（他突然愣住了）我忘了数我自己。

人民

可是对这里来说，难道国王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一个国王，对一个孩子的头脑来说，是这么回事——可是一个国王在这个世界上呢？难道我之所以需要一个国王，就是因为我只有一条腿吗？而一个国王，他今天还会有人性吗？以前有什么不同吗？每当我望着所有那些宫殿时——窗户里闪烁着死亡之光，床榻落满灰尘，御座布满蜘蛛网，一如既往。一个虚幻的国王，或许吧。没有创造奇迹的国王，而只有令人吃惊的国王。再说他就在这儿：（他指向巴勃罗）一旦被确立为国王，他就会立即和我们一起自杀。人们说建筑艺术是统治者的艺术：但是那个家伙会建造出什么呢？地洞。就在登基时，他就会掉进一个地洞里。告诉我该怎么办，白痴。

白痴

（翻着大门挂帘或大门上的书页）怎样才能当上国王？对王权的意义——一无所知——啊，在这儿："只有在那些时代终结时，才会有国王重新出现，时代终结的国王。"你希望这样吗，人民，时代终结？

人民

天哪，不！

白痴

那么？

人民

不要国王！除了法律什么也不要。或许连法律也可以不要。最多不过是一日王权——今天！（他们边走边打转）

白痴

我现在告诉你，以我这个无知的先知和无王之卒的身份：怎样做一个国王，这要比国王本身更为重要。我告诉你：那些国王总是在他们睡觉的时间里干最多的事情。你瞧瞧，他睡得多带劲儿。但愿他还会久久地睡下去。我在此正式宣布，要让我的鼓槌掉入一个地洞里。（说到做到）

人民

我让我的小号也这样。（说到做到）

白痴

可是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呢？

人民

一顶王冠。刚从后面那儿的犁沟里捡来的。起初我把它当成了一个土豆。你瞧瞧：尖角里长出青苔，一条蚯蚓，一块鸟粪的污迹，一片蜗牛爬过的痕迹。

[白痴从他手里抢过王冠，远远地扔到一条河里。

人民

白痴，你在干吗呢？可以让人知道吗？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在一个王国里，每划着一根火柴，每穿上一双袜子，每喝上一勺汤——我

总觉得我们这儿喝汤的动作多么单调无聊——同时都伴随着一场管弦音乐会，伴随着一艘轮船的出海，伴随着一根标枪的投掷。又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当着一位国王的面走动，那不是时代的终结，而是不折不扣的当下，不折不扣的清醒！（他们穿过那扇大门退去，消失在纵深的绿色中）

巴勃罗

（在他的灌木丛下醒来）这正是我所需要的片刻小睡！——现在感到害怕，就像面对一场向全世界转播的音乐会。逃进荒原里，躲藏起来吧！

[他一跃而起，**女叙述者**随即又凑到他跟前，穿着富丽堂皇的女叙述者长裙，胳膊上搭着一件给他准备的戏服，几乎像是给小丑穿的，只是颜色显得更深一些。

女叙述者

开始吧，再演练一次。（她边给他穿衣边说）避免完美无缺——保持漏洞百出。只是映射法律，围着它兜圈子。在这个过程中，要让自己与其说热衷于一种理念，倒不如说对什么都无动于衷。比如摩西律法，据说就是在面对面时产生的？那么这种情况现在也会发生吗？什么都没有面对。关键是：面对。在这种情况下，近看和远看必须融为一体：只有近看，远看才会有可能：只有通过近处路边的野草才能看见远方的群山。你记着：你不是什么新闻人物。你并非沐浴在月光中。嘿，太阳照进了他的鞋里！（在她帮他穿鞋的时候，这种情况果真发生了）

巴勃罗

从我，也就是一个狭小的飞地的后裔，一个昔日被奴役的殖民地的后裔身上怎么会产生什么万能的东西呢？

女叙述者

最卑微的民族，是拥有最真实梦想的民族。恰恰是这个飞地出生的人必然是万能的人。《旧约》中的先知巴兰在走到这个民族跟前时，首先是保持远远的距离，远远地立于一旁，说来说去就只有一句话。开始吧，尽可能即兴表演。巴勃罗这一刻我在想：法律是需要的。而在下一刻：可话说回来，凡是存在的，毕竟都是合理的——再好是不可能的。而在又下一刻：要求太高了。然后：为什么需要法律呢？为什么不是秘密呢？一再是秘密呢？再说我也不是什么思想家——在许多方面太笨了。

女叙述者

没错，你是个笨家伙。可你却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思想家。如果涉及到匡扶正义的话，你就会苏醒过来，开始思考。一个隐藏自己愚蠢的人要比一个隐藏自己智慧的人好。情形肯定是这样的。有一次，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来到塞戈维亚，全城一片死寂，我走过一家屋门紧锁的宠物店的橱窗时，发现里面的一只笼子里挤满了雏鸡，有一只仰面朝天躺在那儿，两条腿蹬来蹬去，试图重新站起身来，每次刚刚勉强站稳一只脚，马上又被百余只同伴撞翻在地，在我站在橱窗前面的几个钟头里，这一幕反复地上演，直到那只小鸡躺在地上两脚抽搐，其他小鸡则从它的肚子上踩踏而过，可在那个星期天，当时还根本不到晚上啊。又有一次，在布劳瑙，一个童年时曾是阿道夫·希特勒邻居的老妇人向我讲述道，那个一岁的孩子，几乎还站立不稳，就已用脚踢人了；那个两岁的孩子，几乎还不会走路，就把同龄人撂倒了；那个三岁的孩子，几乎还不会投掷，就用石块去砸山羊；那个四岁的孩子在当地的太平间里闻来嗅去，就像其他同龄孩子窥探火车头的司炉间一样。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孤独。几乎再也没有一个人会与别人分享自己的生活，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临终时自我坦言：这就是我的人生历史。相反，今天每个人总是一再对别人说：别忘记

我，而自己则早已把人家忘得一干二净。可话说回来，在爱从世界上消失之前，一定要有法律出台，因为爱在日复一日地在逝去。今天整个世界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被强行拖走的、被链条拴在一间棚屋上的没有父母的孩子。一部旨 在安抚公众的法律，而再也没有一片大自然能够做到这一点。法律就是无私的实现！一定要尝试一番。试一下吧。

[四周短暂响起器乐声，就像一支管弦乐队在调音一样。

巴勃罗

（在场地废墟上练习平衡，寻求踩脚的地方，准备表演舞蹈）这就是说，要重新找到一种语言，就像修建巴别塔前的那种语言——当时法律还与欢乐意义相同。为此，比如说观察麻雀吧。可是它们为什么越来越少呢？也许这正合摩西的心意，在沙漠里度过了四十年之后不踏入迦南圣地，只是从远处的一座山峰遥望它？太阳，你说道。可是那些最深沉和最广博的歌唱，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深沉之歌，密西西比河河畔田野里的布鲁斯舞曲，不恰恰是在午夜时分鸣响的吗？唉，从小我就反感做这样的事情，比如我要清晰地画一个“轮子”，或者在小溪旁垒起一台“水磨”，或者削尖一根“长矛”：我属于那种人，他们起初只是干“任意什么事情”，当然这玩意儿令人感兴趣，而且它最终才获得一个名称，一个从未有过的名称，同样像从未有过那个东西一样。所以，就别再提这个“法律”了——另一方面，对又一个世纪来说，实现地球和平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仍无法放弃这种想法。我相信和平。是的，它是一种信仰。战争之地应该失去它们的声响，温泉关和卡法萨拉姆要塞也不例外。只有和平之地才应该发出声音：欧罗佩萨艺术节，小威尼斯的早春，桑坦德的夜风。有朝一日，有人会穿破层层阻力，实现那冒险的和平，以一棵树的年轮为榜样，在一个星期天晚上那潮湿的沥青路上，把这一块世界抹到所有其他人的脸上。伟大的和平将会持续到那最后的月亮升起。——另一方面，在我内心里，一切都是纯粹的前法律，纯粹的前形式。唯独在我的预感中，有一种秩序在等待着我们这样的人，一种前所未有的秩

序，无论在什么地方，也包括在印第安人或者其他原始居民那儿。在这种预感里，我看到自己的祖先不是什么报了仇，而是获得了权利。我怎么预感到这样一种秩序的呢？在它出现的时刻，我不知不觉。就像清澈无味的水一样。或者这样，就像一个人行走在炎炎烈日下，只有到了阴凉地方，远离太阳，他才会开始大汗淋漓。那么我所预感的这种秩序会产生什么效果呢？比如发现那些民族。那些民族尚未被发现。或者：那个不完善的民族。毕竟迄今没有一个地球民族在历史上能够让人看到它的面目，尽管有赫尔德[25]、戈雅[26]和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27]这样的人物。每次首先都必然是战争和悲痛到来，这样一来，各个民族都呈现在这个世界面前。好吧，为了各个民族和平相处的图景而努力，为友好的济济一堂而努力，为各个广场上能够窃窃私议和平而努力。——另一方面：为什么这样的东西偏偏要从这里开始呢？对这样一个童话来说，这里的一个个脑袋早就过于狭隘了——这里是新宪法的第一句条文，或者是我们古老的午夜布鲁斯舞曲的第一个句子：时刻要铭记着，你们从前过着被奴役的生活——在任何陌生人面前，你们都要想到自己的陌生！

女叙述者

而我对此的注释是：凡是你们做或者不做的事情，你们都把它想象成叙述。这有可能吗？是的。也就是说是合理的。这没有可能吗？也就是说是不合理的。

巴勃罗

那些新的人权：向往远方的权利，天天如此。审视空间的权利，天天如此。享有夜风拂面的权利，天天如此。一条新的基本禁令：禁止忧虑。这个法律的主导思想是：省去，彻底省去，省去任何信息和宣告。由渴望和审慎构成的法律！

女叙述者

（给了他一记耳光）现在别再白费唇舌了。快记录，快撰写。

巴勃罗

再来一记耳光，求求你了。（如愿以偿）再来一记。（如愿以偿）再来一记。（如愿以偿）我准备好了。别碰我，我现在不可触犯。——再咬一口苹果。（他咬）苦的。这样也好。

女叙述者

最好就这样。

巴勃罗

再喝一滴露水。（他舔）酸的。酸涩的露水。这样也好。

女叙述家

最好就这样。

[他快速离去。

女叙述者

别跑。走吧。移动。移动吧！——别信那些哈哈大笑的人，特别是那些捧腹大笑的人。他们都是些见风使舵的背叛者，刚刚还在为之哈哈大笑，立刻就极尽诽谤之能事。

[**巴勃罗**退去时在那起伏不平的场地上大概出了三次洋相——绊了个踉跄，自己缠在小丑戏服里，等等，但每一次洋相之后，他都更加生机勃勃，朝纵深那扇华丽的大门方向走去。

女叙述者

你的孤独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不用害怕。（她打了一个响指，那扇大门上应声亮起了一行发光的字：孤独）

[从舞台最深处，一座建筑慢慢从黑暗里闪现出来，不是宫殿，更像是一间狭小的茅舍，旁边的东西像是一处奶站或者一个干草晒架，此外茅舍不是在山丘上，而是在一片低洼地里。

巴勃罗

（回过头去）害怕？旅行的激动！在死亡之国里，我被打上了生命之掌。在凛冽的风暴中，我有一双最暖的手。（他仿佛骑着马奔腾而去——又一次洋相——又一次显得生机勃勃）

[**女叙述者**退到一旁当起了观众。后面的茅舍消失了。下面的绿色依然如故。一群**陌生人**在跑动中彼此相遇，一个想绕过另一个，但却跑错了方向，结果他们全都撞在一起。退场。接着又是一群**陌生人**，像是在玩追逐纸条游戏，一个追着一个跑，猛然下来，捡起固定在灌木枝和其他东西上的写有指令的纸条，拐个弯，仔细阅读纸条，然后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追赶，跑的方向都不一样。接着，一开场那些逃难者又返回来，上气不接下气，仿佛他们整个时间都这样兜着圈子逃来逃去，那些宪兵又紧紧地追着。那个怪兽的巨型爪子顷刻间出现在画

面上。与此同时，先前那辆马车的模型也开始向下沉降，直到距离地面一英尺的地方，轮辐原地转动着，同样还有那扇农家大门的模型，装扮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早春气息，它也悬在接近地面的地方，那只小船的模型也不例外，吊在钢索上摇摇晃晃。从一侧传来孩子的哭喊声，另一侧也有了，听起来让人揪心。各种响声，像是在拆除市场售货亭，从各个角落里传来西班牙彩票商贩的叫卖声："大奖！"然后场上逐渐安静下来，不过四周亮着灯光。**人民**和**白痴**穿过那扇**孤独**大门返回来，身后跟着**菲利普**和**女难民**，再就是身着复活节锦缎的外祖父和公爵 夫人装扮的姐妹俩，但一转眼三个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人民

（指向后面）他未能如愿以偿地创造出永恒的东西来。

白痴

谢天谢地。

人民

我听到更多的是风声，而不是他的声音和他所说的话。

白痴

可话说回来，没有他的声音和他所说的话，我恐怕就不会这样听从风的忠告了。

人民和白痴

（几乎同时说）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美梦。

白痴

我穿了一件方格衬衫——

人民

——我坐在外面那棵无花果树下。

白痴

或者那是一棵柽树？或者一棵松树？不，那是一棵无花果树。它的汁液把我的手指粘在一起了——

人民

——我去了那条边境小溪边。我站在水里——

白痴

——水直漫到膝盖——

人民

——那条河——

白痴

——是的，那是一条河——

人民

——如此清澈，以至于阳光直照到河底——

白痴

——水在流淌，河底的卵石也跟着滚动——

人民

——漂浮在水面上的柳树叶的影子也随它们一起漂动——

白痴和人民

（共同）——树叶影子以和卵石滚动一样的速度漂动着。我简直无法知道，我的梦到底有多美。可是它多美啊！（停顿）回家的路还很远。（停顿。然后对着菲利普）你把这个法律大概都记下来了吧？

菲利普

（手里拎着一摞纸掂量着，而女难民也拿着她的录像机等做着同样的动作）记下来了，动脑子了，一字不差，延伸了。这些纸张因为写上了字反倒变得更轻了。

[他念起来，而女难民在他身后也越过肩膀在看，不时跟他一起念或者替他念。

菲利普

死刑在全球范围内被废除，因为它不仅没有阻止谋杀或者其他犯罪行为，反而更加助长和激励了谋杀，这是因为，死刑为你，也为我内心追求死亡的本能开辟了道路，意思是：什么可以被判死刑，你就干什么，这样就用不着自己再干什么，便可以摆脱你自己；一个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不再是一个可以居住的国家；充其量还有合众国，一个独一无二的执行空间，直延伸到那些天涯海角的庄稼地里和那纪念碑谷纵深的角落里。（他边翻页边继续念下去）法律和余象：没有余象就没有法律。一部对其对象和问题不产生余象的法律必然要被废除。一个运用法律而缺少这样一种余象的法官就是在破坏这个法律。余象和正义。余象和仁慈。（他边翻页边继续念下去。拖着**空间排挤帮**的腔调）灾祸已经注定，你们逃脱不了它。（突然顿住）不，这是别的什么人的声音，一声插入其间的喊叫。（继续翻页，拖着空间排挤帮的腔调）砖块和石头！砖块和石头！（乱翻一气）春天的第一只蜜蜂掉入山湖中。它的翅膀在阳光下旋转，四处平静的湖面上唯一的运动。剧烈而闪亮的旋转。我想用一根树枝把它引上岸，但是树枝荡起的波浪却将它往湖心越推越远。（他停止翻页，信口说来，几乎是在喊叫）我母亲冻红的双手。外祖父复活节之夜的披风。正在融化的草原溪流。垂死的蛇在十一月的星空下爬行。夏天满月时乡村池塘里蝙蝠的倒影。沙丘坟墓里和冻原石堆下母亲的兄弟被撕烂的尸体。我父亲的一去不返。我父亲的袖珍日历。我父亲除此之外的一无所有。故乡该死的绿色。（他将那些纸扔向不停转动的马车车轮）

女难民

然后在五月的白日里，房门大开着，门槛上有个影子，像是外面一个孩子投进来的，一动不动，持续好久，“进来吧！”我说道，我

们俩说道，但是他并没有进来，我们的孩子，直到今天也没进来。该死的梦。该死的希望。该死的世界秩序。（她把她的摄影设备扔进小船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人民

那个白天的国王待在哪儿呢？

白痴

像通常一样，我们已将他忘记。

人民

我为他担心，只要他又上了一个台阶，每次都一样。难道今天不是他最后一个台阶吗？不牺牲人民就不会成为国王。

白痴

谁会成为牺牲品呢？他自己？我们？我们所有的人一起？我害怕他。

巴勃罗

（登场，由一根长矛打前站，长矛插在那扇大门上或别的地方）在投掷方面我总是最出色的。——是的，人民，你说得没错：满足感越强烈，它就越明显地接近周围的不幸。我只是在悬崖上方盘旋了一圈。我现在要把我们全都炸个粉碎。（他给自己套上一圈装满雷管的轮状皱领，划起了一根火柴。然后他吹灭火焰，脱去皱领，皱领原来是儿童玩耍用的拨浪鼓）快来吧，欢乐！他说道。痛苦来临了。欢乐

来临了。（又是向前看，又是向后看，最后盯着地面）有朝一日会有人成功的。许多人都这么说过了？最好这样。阳光下这样一条路多么生机勃勃，没有阳光也一样。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它更加色彩斑斓的了。每一块石头、每一颗沙粒和每一株根茎都会说话，在那儿彼此交谈，跟我说话。互相配合得多好啊。堂吉诃德从那边走过去，那个来自契诃夫草原的男孩，是你，是我。（转向女叙述者）也许现在该有个孩子了？

[她向他吐出不止一条舌头。

巴勃罗

什么是路，只有在路上或者梦见它的人才会知道。现在多么明亮呀。早春的光明。黄翅蝶的闪亮。马上就会有这么一只黄翅蝶出现，或者，民间叫什么来着？“可爱的精灵”，这将意味着：永久的和平，人类的长生不老。来吧，现身吧，蝴蝶，像风筝一样大。

菲利普

也可能很小。

女难民

脱离你的稿纸或者你的蓓蕾吧。

人民和白痴

（共同）从尘埃上飞起来吧。晃晃悠悠。翩翩飞舞。黄色的母亲之色。（然后几乎所有的人）你没有给出信号前，我原地一动不动。让我们看看你吧。

[长时间的停顿。什么也没有。然后**空间排挤帮**从舞台纵深列队入场，当然并没有被其他人看见，大小像风筝，带着翅膀，不过不是黄色的，而且“摆出姿态”。

女叙述者

（走上前去）我们的故事就此结束了。我事先并不知道这个故事，只是在讲述过程中才明白，或者一知半解。它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在那里，上帝，或者谁，早已把一切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在那里，正因为如此，也早已不再有先知出现，或者无论他们叫什么也罢，除非是假冒的；在那里，同样也不再有撰写故事的人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也不再有故事可写了；在那里，毕竟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东西幽灵似的在空中游荡——就像在这里所暗示的那样。当前这个世界不再继续运转，因为太多的东西被封闭了——当前因为有太多的东西是未知的：我来到这里，为了应对这两种情况，用我的叙述驱赶或者呼唤。请你们继续讲述这个故事，或者试一试吧。如果你们找不到人听它的话，那就讲给一个树墩听吧，或者一个被风吹过高原的塑料袋。凡是在这里被当作那个所谓的法律所渲染和影射的东西，漏洞百出，滑稽可笑，实际上在威胁着你们。新的法律不可避免。它将会产生的，广泛传播，独一无二，奠定基础。另一个时代将要来临。另一个时代必然会来临。你们高兴吧。你们担忧吧。天哪，这个法律将具有破坏性，令人可怕，令人窒息。你们真不幸啊，尤其是你们的子孙。安息吧，你们及你们的子孙们。最好是继续那样影射法律，就像在这里发生的一样，以此来延缓恐怖的到来。清楚了？理解了？明白了？染成蓝色了？

[她注视着**空间排挤帮**。其他人也同样注视着她。

女叙述者

一种现象！唉，看来我不应该收这个场。好啊，我没有最后收这个场。尽管如此，或许我依然希望我们大家看到另外一种现象，一种完全不同的现象！

[**空间排挤帮**待在背景上。一动不动。寂静。

[灯光熄灭。

（1997年）

[1]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中译注，下同

[2]唐·培里侬（Dom Perignon），法国传统名贵香槟。

[3]房屋建筑之间用来防止火势蔓延的墙。

[4]原文为“Erdal”，德国鞋油品牌。

[5]这里指剧中人物正在玩填词游戏。J.N.内斯特罗伊（Johann Nepomuk Nestroy，1801—1862），奥地利剧作家兼喜剧演员。他的“大众戏剧”作品不仅在艺术上使维也纳地方色彩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艺术，而且注入了民主主义和社会批判的内容。

[6]F.J.赖蒙德（Ferdinand Jakob Raimund，1790—1836），奥地利剧作家兼喜剧演员。创造了富于想象力和幽默感的童话剧和魔幻滑稽剧，提高了“大众戏剧”的文学水平。

[7]从这个时刻起，保拉对奎特的称呼变得暧昧，不再是德语中刻意保持距离的“您”，而是说“你”。

[8]汉斯所朗读的是奥地利作家阿德尔伯特·斯蒂夫特（Adalbert Stifter）的小说《老鳏夫》（Der Hagestolz）的节选。

[9]神甫在这里改变了对奎特的称呼，不再用企业主之间的“您”，而是说“你”，回归到他自己的本职身份。

[10]多多纳（Dodona），古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的古神殿，位于希腊的伊庇鲁斯。

[11]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在特洛伊城破后背父携子逃出，漂泊海外，历经艰辛，建立罗马城。

[12]中东沙漠地区的游牧民族。

[13]亚伯拉罕和以撒都是《圣经》中的人物，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子，亚伯拉罕受指示准备献祭以撒，在最后时刻被阻止。

[14]指美国经典西部片《正午》（*High Noon*，1952）中与匪徒决斗的主人公。

[15]易卜 生剧作《培尔·金特》（*Peer Gynt*）中的主人公。

[16]阿勒颇（Halab），叙利亚北部城市。

[17]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生于柏林，著名的博物学家、自然地理学家、旅行家。

[18]赖因霍尔德·梅斯纳尔（Reinhold Messner，1944—），意大利登山家、探险家。

[19]萨尔瓦托·朱利亚诺（Salvatore Giuliano，1922—1950），意大利西西里岛历史上著名的黑帮首领，曾公开向政府宣战，最终被击毙。

[20]文中的外语为西班牙语，括弧里为译文。

[21]文中的外语为西班牙语，括弧里为译文。

[22]路易斯·德·贡戈拉·伊·阿尔戈特（Luis de Góngora y Argote，1561—1627），西班牙黄金时代著名诗人。

[23]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Émery Lumumba，1925—1961），非洲政治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遭比利时控制下的军政府绑架并最终遇害。

[24]埃布罗河（Ebro）是伊比利半岛第二长的河流，萨拉戈萨（Zaragoza）是位于该半岛东北部的西班牙城市，埃布罗河流经该城。

[25]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德国哲学家、路德派神学家、诗人。他认为：只要在自己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每个民族对人类的进步都有贡献，他的观点对欧洲民俗学的兴起有重要作用。

[26]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1746—1828），西班牙浪漫主义画派画家。在西班牙被拿破仑军队占领时期，他创作了一批富于激情和逼真表现力的悲剧性作品。

[27]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Euclides de Cunha，1866—1909），巴西作家、记者，代表作为报告文学《腹地》，反映1896年至1897年巴西共和政府派军镇压内陆小城卡奴杜斯农民战争的悲剧。库尼亚深入内陆，描写了起义农民作为人类的尊严，以及他们的传统、气质和永不屈服的性格。

DIE UNVERNÜNFTIGEN STERBEN AUS by Peter Handke

Copyright©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3

DIE STUNDE DA WIR NICHTS VONEINANDER WUSSTEN by Peter Handke

Copyright©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2

ZURÜSTUNGEN FÜR DIE UNSTERBLICHKEIT by Peter Handke

Copyright©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7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6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出版得到奥地利教育、艺术和文化部所提供之翻译资助

Die Übersetzung wurde gefördert mit Mitteln des Bundesministeriums

für Unterricht, Kunst und Kultur

FÜNF VERSUCHE

Peter Handke

试论疲倦

超越一个人本身的疲倦，宇宙的疲倦，树上耷拉的树叶的疲倦，突然好像流动不畅的河流的疲倦，慢慢褪色的天空的疲倦。

[奥地利] 彼得·汉德克——著

文景

韩瑞祥 主编　陈民 贾晨 王雯鹤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试论疲倦/（奥）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著；陈民，王雯鹤，贾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7-208-14081-3

Ⅰ.①试…　Ⅱ.①彼……②陈……③王……④贾…　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Ⅳ.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8571号

书名：试论疲倦

作者：【 奥地利】 彼得 · 汉德克

译者：　陈民　贾晨　王雯鹤

责任编辑：林莉

封面设计：高熹

转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4081-3|Ⅰ·1584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 文景每月书情

目　录

编者前言
试论疲倦
试论点唱机
试论成功的日子——一个冬天的白日梦
试论寂静之地
试论蘑菇痴儿——一个独立的故事

FÜNF VERSUCHE

Peter Handke

试论疲倦

[奥地利] 彼得·汉德克——著

韩瑞祥 主编

陈民 贾晨 王雯鹤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者前言

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被奉为奥地利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也是当今德语乃至世界文坛始终关注的焦点之一。汉德克的一生可以说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像许多著名作家一样，他以独具风格的创作在文坛上引起了持久的争论，更确立了令人仰慕的地位。从1966年成名开始，汉德克为德语文学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因此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如“霍普特曼奖”（1967年）、“毕希纳奖”（1973年）、“海涅奖”（2007年）、“托马斯·曼奖”（2008年）、“卡夫卡奖”（2009年）、“拉扎尔国王金质十字勋章”（塞尔维亚文学勋章，2009年）等。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介到世界许多国家，为当代德语文学赢来了举世瞩目的声望。

汉德克出生在奥地利克恩滕州格里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他孩童时代随父母在柏林（1944—1948）的经历，青年时期在克恩滕乡间的生活都渗透进他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里。1961年，汉德克入格拉茨大学读法律，开始参加“城市公园论坛”的文学活动，成为“格拉茨文学社”的一员。他的第一部小说《大黄蜂》（1966）的问世促使他弃学专事文学创作。1966年，汉德克发表了使他一举成名的剧本《骂观众》，在德语文坛引起空前的轰动，从此也使“格拉茨文学社”名声大振。《骂观众》是汉德克对传统戏剧的公开挑战，也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格拉茨文学社”在文学创造上的共同追求。

就在《骂观众》发表之前不久，汉德克已经在“四七社”文学年会上展露锋芒，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严厉地批评了当代文学墨守于传统描写的软弱无能。在他纲领性的杂文（《文学是浪漫的》，1966；《我是一个住在象牙塔里的人》，1967）中，汉德克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文学对他来说，是不断明白自我的手段；他期待文学作品要表现还没有被意识到的现实，破除一成不变的价值模式，认为追求现实主义的描写文学对此则无能为力。与此同时，他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反对文学作品直接服务于政治目的。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剧作《自我控诉》（1966）、《预言》（1966）、

《卡斯帕》（1968），诗集《内部世界之外部世界之内部世界》（1969）等。

进入70年代后，汉德克在“格拉茨文学社”中的创作率先从语言游戏及语言批判转向寻求自我的“新主体性”文学。标志着这个阶段的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1970）、《无欲的悲歌》（1972）、《短信长别》（1972）、《真实感受的时刻》（1975）、《左撇子女人》（1976）分别从不同的度，试图在表现真实的人生经历中寻找自我，借以摆脱现实生存的困惑。《无欲的悲歌》开辟了70年代“格拉茨文学社”从抽象的语言尝试到自传性文学倾向的先河。这部小说是德语文坛70年代新主体性文学的巅峰之作，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1979年，汉德克在巴黎居住了几年之后回到奥地利，在萨尔茨堡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四部曲《缓慢的归乡》（《缓慢的归乡》，1979；《圣山启示录》，1980；《孩子的故事》，1981；《关于乡村》，1981）虽然在叙述风格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生存空间的缺失和寻找自我依然是其表现的主题；主体与世界的冲突构成了叙述的核心，因为对汉德克来说，现实世界不过是一个虚伪的名称，丑恶、僵化、陌生。他厌倦这个世界，试图通过艺术的手段实现自我构想的完美世界。

从80年代开始，汉德克似乎日益陷入封闭的自我世界里，面对社会生存现实的困惑，他寻求在艺术世界里感受永恒与和谐，在文化寻根中哀悼传统价值的缺失。他先后写了《铅笔的故事》（1982）、《痛苦的中国人》（1983）、《去往第九王国》（1986）、《一个作家的下午》（1987）、《试论疲倦》（1989）、《试论成功的日子》（1990）等。但汉德克不是一个陶醉在象牙塔里的作家，他的创作是当代文学困惑的自然表现：世界的无所适从，价值体系的崩溃和叙述危机使文学表现陷入困境。汉德克封闭式的内省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生存的深切反思。

进入90年代后，汉德克定居在巴黎附近的乡村里。从这个时期起，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动荡，南斯拉夫战争也把这位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从《梦幻者告别第九王国》（1991）开始，汉德克的作品（《形同陌路的时刻》，1992；《我在无人湾的岁

月》，1994；《筹划生命的永恒》，1997；《图像消失》，2002；《迷路者的踪迹》，2007等）中到处都潜藏着战争的现实，人性的灾难。1996年，汉德克发表了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批评媒体语言和信息政治，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汉德克对此不屑一顾，一意孤行。1999年，在北约空袭的日子里，他两次穿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旅行。同年，他的南斯拉夫题材戏剧《独木舟之行或者关于战争电影的戏剧》在维也纳皇家剧院首演。为了抗议德国军队轰炸这两个国家和地区，汉德克退回了1973年颁发给他的毕希纳奖。2006年3月18日，汉德克参加了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媒体群起而攻之，他的剧作演出因此在欧洲一些国家被取消，杜塞尔多夫市政府拒绝支付授予他的海涅奖奖金。然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汉德克无视这一切，依然我行我素，坚定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对人性的呼唤，对战争的控诉，对以恶惩恶以牙还牙的非人道毁灭方式的反思："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他因此而成为"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另类。

世纪文景出版社将陆续推出九卷本《汉德克文集》，意在让我国读者来共同了解和认识这位独具风格和人格魅力的奥地利作家。《试论疲倦》卷收录了汉德克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2013年创作的5篇独具风格的叙事作品，即《试论疲倦》（1989年）、《试论点唱机》（1990年）、《试论成功的日子》（1991年）、《试论寂静之地》（2012年）和《试论蘑菇痴儿》（2013年）。

"试论五部曲"标志着汉德克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文学叙事上的大胆尝试。如果说初出茅庐的剧作《骂观众》是他向传统发起"反戏剧"挑战的话，那么"试论五部曲"则把他的"反小说"叙事推到了一个令读者眼花缭乱的文学世界里。在这里，传统的叙事形式彻底给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夹叙夹议的散文或杂文形式，而且各种体裁交错。在叙事过程中，既没有像小说中行动的人物，也没有叙事情节必然的关联，只有叙述者对各个叙事主题不断转换视角的自叙自议，整个作品如同形式独特的内心独白。汉德克自然赋予其"小说"名称。这样的叙事方式因此也带来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讨论。我们不妨在这里称之为散文小说。"试论五部曲"尽管在叙事形式上发生

了如此大的变化，但依然离不开汉德克作品向来关注的焦点，即世界与自我的关系。

1989年3月间，汉德克在西班牙的利纳雷斯创作了第一部试论：《试论疲倦》。在这里，叙述者采用自问自答的叙述对话形式，通过表现经历和感受疲惫的种种形式和图像，使得通常被贬义理解的疲倦成为生存的一个根本前提。追寻各种各样的疲倦，是这部作品叙事的主线，因为它们为叙事者提供了重新感知现实的可能。在疲倦中，你重新学会了感知事物、理解事物，认识事物和欣赏事物；在疲倦中，你会重新进入与世界心心相印的关联中；在疲倦中，你会重新将事物的存在感知为生存的事实。疲倦既是叙述者感受世界的形式，同时也是其创造性感知的瞬间。《试论疲倦》结尾，叙述者许诺要讲述纳雷斯所发现的一个“十分奇特的”点唱机，于是第二部试论便应运而生了。

《试论点唱机》又是一部回忆和召唤逝去的时光的作品，一部挽歌式的作品，但其基调则与挽歌迥然不同。叙述者在这里通过对具体可感的点唱机的回忆和描写，寓意深刻地要把所书写的东西永远保留在可以借鉴的记忆里。在一个冰天雪地的隆冬里，叙述者在位于卡斯蒂利亚高原边缘被上帝所遗弃的角落——索里亚，艰难而执着地探寻着点唱机的起源及其发展历史。然而在他的眼里，那些被他热切感受和描写的点唱机无非都是“昨日的存在”，它们不会迎来“第二个未来”。像“疲倦”成为“我”书写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形式一样，点唱机的历史经历也象征性地映现出叙事者生存的各个阶段。《试论点唱机》实际上就是叙事者借用对点唱机的描写来追寻自己走过的人生和创作历程，一如既往地反思自我与世界的格格不入和深切的孤独：“圣诞节这一天，雨下得特别大，在习以为常地穿越城区时，除了他，街上只出现了一只麻雀。”

继《试论点唱机》之后发表的《试论成功的日子》寓意比较晦涩，也更具开放性。它同样采用了自问自答的叙事形式，且融入了更多的散文或杂文因素。这篇试论对幸福和成功的追问同样与汉德克在其他作品中所关注的生存问题息息相关。小说中的“我”把这个问题限定在一个一目了然的时间里：“谁曾经历过一个成功的日子呢？”在整个叙事中，“我”通过多层交织的视角、丰富多彩的图像和切身感受的瞬间，试图为之找到一个答案，因为在“我”看来，如果

“我”现在不试试这一天成功与否的话，那么，“我”无疑会失去各种可能。然而，“我”又无可奈何地视成功的一天为冒险，如同“一个冬天的白日梦”（小说副标题）；追寻成功的一天就像是这样的梦一个接着一个，就像是此起彼伏的大海波涛，是些“难以置信的东西”。显而易见，《试论成功的日子》是汉德克以不同凡响的艺术形式对生存困惑的深层反思。

十多年以后，汉德克又发表了《试论寂静之地》和《试论蘑菇痴儿》，“试论”从三部曲变成了五部曲。通过这种不同写作方式并存与交融的叙事形式，作者进一步描述了一种“彻底与众不同的”生存状态。《试论寂静之地》是汉德克送给自己七十岁生日的礼物。在这部作品中，厕所成为艺术表现的中心，整个叙事和议论都围绕着这个看似平常不过但却十分严肃的主题进行；在作者眼里，这个世界上最低俗和最肮脏的地方成为最崇高和最纯洁的澄明之地。汉德克借用对那些铭刻在心的厕所的独特描述向读者敞开了他人生的片段和感悟。从寄宿学校开始，“寂静之地”就始终对他有“超乎寻常或惯常的意义”，是“记忆中的一种媒介”，是“解决一个完全不同的苦恼的地方”；只有在这其中，他“才会感受到某种安全感或者安然无恙”；寂静之地使他“越发有抵抗力，也越发能够进行反抗”；它们不仅仅是他的“避难所、庇护所、藏身地、保护所和隐居处”，“同时也是些完全不同的东西”，更多的东西，多得多的东西。也正是这样的东西让作品中作为“观察者”或者“边缘人物”的“我”对人生和世界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在日本奈良那个寺庙的“寂静之地”里，作者感到“灵魂在那里找到真正的安宁”，“无与伦比的温柔真实地包围着我”，让他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浑身充满令人振奋的力量。说到底，在这篇试论中，寂静之地始终被感受为喧嚣的外部世界的对立面：“在外面：沉默。保持沉默。变得无语。无言。保持无语。丧失语言。语言丧失。”然而，只要一到寂静之地，“语言和词汇的源泉就生机勃勃地迸发了，也许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充满活力”。《试论寂静之地》以独到的表现风格完全超越了人们习以为常和不言而喻的东西，成为一种不同凡响的生存渴望的象征，同样也暗示着作者对现实生存的批判性反思。

《试论蘑菇痴儿》也许是汉德克“试论”系列的收官之作，更具自传色彩。这里表现的是一个蘑菇痴儿的故事，“一个已经发生的故事，一个我时而也在近前共同经历过的故事”。显而易见，这个按时

间顺序讲述的朋友的故事也是汉德克的镜像：二者成长于同一个村庄里；学的都是法律；都从小就跟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都在喧嚣的现实世界里寻找“寂静之地”。可以说，汉德克既是叙述者“我”，又是蘑菇痴儿；既是冷静的主人公生存经历的见证者，又是一个渴望寻找的人。但不管怎么说，他始终是另一个，一个虚构的作者。“我”在讲述蘑菇痴儿的一生时，严肃中饱含着幽默的韵味，而幽默中也不乏善意的嘲笑。蘑菇痴儿放弃现实生存的一切，痴迷地在山林里寻找蘑菇，这段生涯成为一种生存的象征；他在山林里遇到了一个从未有任何蘑菇采摘者涉足的地方，但在他的想象中，这片地方“每时每刻都在延伸”，变成了“一片大陆”。他对蘑菇的痴迷治愈了他称为“我的时间病症”的东西，“他觉得地球上的时间好宝贵，也使他感到生命时间转变为实实在在的东西”。蘑菇痴儿是个寻找者，又是个观察者，在寻找和观察中，在感知“暴风雨或者狂风大作的”外部世界时，他似乎看到了“一幅史无前例的社会图像，一幅人性的、理想的社会图像”。他同时也“像是个被遗弃的人”，一个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人，一个失踪的人。当叙述者“我”沉浸在蘑菇痴儿的故事里时，却听到了这个失踪的朋友那熟悉的脚步声，那个向来与他心心相印的“最悦耳动听的音乐”。在童话般的结尾中，“我”和蘑菇痴儿，还有另外两个人一起坐在饭馆里，“深夜时分，我们猜测着时间。我们四个人都弄错了。但猜得最不准的，差得最远的，就是他”。不难看出，《试论蘑菇痴儿》是汉德克借用一个虚构的人物对自己人生的回顾、反思和总结。

我们选编出版汉德克的作品，意在能够不断地给读者带来另一番阅读的感受和愉悦，并从中有所受益。但由于水平有限，选编和翻译疏漏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韩瑞祥

2015年10月

试论疲倦

陈民　译

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

——《路加福音》，22章45节

过去我只知道令人恐惧的疲倦。

过去是什么时候？

在童年，在所谓的大学时代，还有早恋的岁月，正是那时。某个圣诞子夜的弥撒中，这个孩子坐在亲属中间，在那个拥挤、炫目耀眼、环绕着熟悉的圣诞歌曲的教堂里，周围充斥着布和蜡的气味，突然感到伴随着痛苦重压的疲倦。

怎样的痛苦？

如同人们把疾病称作“可恨”或者“恶性”一样，这种疲倦也是一种可恨和恶性的痛苦。这种痛苦在于它让一切都走了样，不仅是周围环境——教堂的来访者成了紧紧挤在一起的毛毡和厚绒呢玩偶，祭坛，包括很远处熠熠发光的装饰成了拷问的场所，伴随着混乱的仪式和阐释者的套话——而且得了疲倦病的人，自己也变成了大象头的古怪形象，同样那么沉重，眼睛干涩，皮肤浮肿；被疲倦抽走了世界的物质，在这样的冬天世界里，下雪的空气中，人迹罕至，好像在夜晚星光下乘雪橇旅行，远远地走出村庄的边界，一个人，激动不已，而

其他孩子渐渐消失在房子里：全然如此，寂静中，呼啸中，泛蓝的结冰道路上——“很吸引人”，人们这么谈论这种让人舒适的寒冷。但是现在，在教堂那里，这个被如同铁处女[1]的疲倦所包围的人具有完全不同的寒冷感受，而且，这个孩子，也就是我，在礼拜中间央求着要回家，这首先就意味着“出去！”，而且破坏了亲属们同这个地区其他住户在一起共度时光的机会，因为风俗的逐渐消失，这样的机会本来就越来越稀少（又一次）。

你为什么（又一次）自责呢？

因为那时的疲倦本身已经和罪恶感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因罪恶感而加重，成为急性疼痛。你又一次在集体中遭到拒绝：好像太阳穴上又箍上了一个钢带，从心脏里又抽了一次血；几十年之后，突然对这样的疲倦又一次感到羞耻；只是很奇怪，虽然后来一些家人批评了我，但是他们却从不……

那么这类似于大学时代那些疲倦吗？

不。再也没有了罪恶感。在阶梯教室里的疲倦随着课堂的进行反而让我变得反叛或具有反抗性。通常很少因为恶劣的空气和塞得满满的几百号学生，而是因为授课者没有抓住该传授的内容。我再也没遇到过像大学里那些教授和讲师们对自己的职责如此毫无感情的人；每个人，是的，每个银行职员在清点那些根本不属于他的钞票时，每个修路工人在上有烈日暴晒，下有焦油烘烤的酷热中工作时，都比他们显得更有生气。像那些脑袋里塞满了锯木屑的无上高贵者们，他们讲话的内容从未使他们的声音表现出（好老师讲述他的内容表现出的）惊叹、热忱、倾心、自问、敬仰、恼怒、愤慨和自己的无知，他们更多的是在不停地胡扯、抑扬顿挫地朗诵——当然不是荷马式的风格，而是以预先设置的审查的口吻——，至多其中用一种讥笑或对知情者阴险影射的口吻，而外面窗户前已经变绿、变蓝，继而变暗：听众的疲倦变成了不满，不满变成了恶意。又一次，如在童年时代，“出

去！全都从这里滚出去！”到哪儿去呢？回家，像过去一样？但是那里，在出租小屋里，现在大学时代令人担心的是和父母一起住的时候所不知道的，一种不同的、新型的疲倦：在一间屋子里的疲倦，城市边缘，独自一人；那种“孤独疲倦”。

然而对这种疲倦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屋子里桌椅旁边不就是床吗？

睡觉作为出路是不可行的：起先那种疲倦在麻痹中发生作用，通常由于麻痹，小指头甚至都无法弯曲，眼睫毛也无法颤动；连呼吸似乎也陷入了停滞状态，整个人麻木得连内心深处都充斥着疲倦；但是当你向床迈出了那一步时，那么事情就发生了，在很快、类似昏厥地睡过去之后——对睡觉没有感觉——，第一次翻身醒来时就进入失眠状态，常常彻夜不眠，因为在屋子里，疲倦总是在傍晚袭来，随着暮色的降临。关于失眠，其他人叙述得够多了：它甚至最终决定了失眠者的世界图像，因而他无论如何也只能将生存看作是不幸，把每个行动看作是无意义，把所有的爱情看作是可笑的。失眠者躺在那里直到拂晓露出灰暗的光芒，这对他来说意味着地狱的诅咒，超越了独自处于失眠地狱中的他，而是彻底误入迷途的、流落在错误星球上的人……

我也在失眠者的行列中（我是失眠者，一如既往，现在还是）。第一批鸟儿还在昏暗中，在早春：复活节常常就是那样——可是充满讽刺，现在却刺耳尖叫，冲进鸟窝似的小床上，“又一个无眠的夜晚”。教堂塔楼的大钟每一刻都要敲响，即使在最远处也能清楚地听得到，宣告又一个糟糕的日子来临。两只互相袭击的公猫一动不动，但却发出怒吼和尖叫，仿佛在我们世界的中心，那个残忍的家伙变得吵嚷和粗暴。一个女人所谓性感的呻吟或叫唤，在同样静止的空气中突然开始，就像正好在失眠者的脑袋上，摁下电钮，一台成批生产的机器转动起来，我们所有爱慕的面具突然都脱落了，表现出混乱不堪的自私自利（这里没有一对在相爱，而每个人都大声表示只爱自己），表现出卑鄙下流。失眠状态的片断心情——自然是那些顽固失

眠者，我至少是这么理解他们的叙述，它们可能最终出现，组合成合情合理的东西。

但是你，你并不是个持续性失眠者：你现在也想要叙述失眠者的世界图像或者疲倦的世界图像吗？

在从疲倦的世界图像经由失眠的世界图像的必然道路上，或者更准确地说，采用复数的方式：我要叙述各种疲倦的不同世界图像。——比如说当年有一种疲倦就让人害怕，那可能是和女人一起产生的。不，这种疲倦不是产生的，而是出现的，是一个物理过程；裂变。我也从未单独遭遇过它，而是每次出现时都有那个女人，仿佛它就像天气骤变一样，从外面，从大气层，从空间而来的。那时我们躺着、站着或坐着，刚刚我们两个人还很自然地在一起，突然就决绝分开了。这样的时刻一直都是一个令人害怕的时刻，有时甚至令人毛骨悚然，就像骤然跌落时一样："停下来！不！不！"但是于事无补；两人已经不可阻挡地分开了，各自进入到自己疲倦的巅峰，不是我们的，而是我这里的和你那里的。也可能疲倦在这种情况下只是麻木和陌生的另一个称呼而已——但对于压迫环境的压力来说，它算是符合事物的词语了。即使发生的地点可能只是个安装了空调的大型电影院：它变得既闷热又拥挤。座椅排成弧形。幕布已经泛黄褪色。当我们不经意间触碰了对方，每个人的手就都会像被可恶的电击震颤后分开了。"在那个……傍晚……一种灾难般的疲倦如晴天霹雳袭击了……阿波罗电影院。一对年轻人成了它的牺牲品，他们刚刚还肩并肩在一起，却被疲倦的冲击波弹射开。在这部所谓的谈情说爱的电影最后，互相再也不看一眼，再也不说一句话，就那么永远各走各的路了。"是的，这种制造分裂的疲倦分别给他们带来打击，使他们无力注视和无法开口；我恐怕永远都不能对她讲"我对你厌倦了"，甚至不能简单说出"厌倦！"这个词（或许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从各自的痛苦深渊里解脱了，是共同的呼喊吧）：这样的疲倦燃烧尽了我们的语言能力，我们的心灵。要是我们那时真的能走上分开的道路该多好！

不，那样的疲倦会让那些心照不宣的人必须在表面上待在一起，作为肉体。与此同时，便出现了这两个沉醉在疲倦魔鬼之中的人自己变得令人恐惧。

谁导致恐惧呢？

总是另一个人。那种方式的疲倦无法言表，始终必然如此，它迫使你采取暴力。它也许只是表现在眼神里，这眼神歪曲了另一个，并不仅仅作为人，而且是作为另一个性别：丑陋和可笑的女性或男性，带着这种已渗透到骨子里的女性步态，带着这种本性难移的男性做作。或者这种暴力隐蔽地发生在第三者身上，如同随手打死一只苍蝇，或者漫不经心地撕碎一朵花。也会出现人们自我折磨的情形：她去啃手指，而他去抓火焰；他用拳头打自己的脸，她就像个婴儿一样扑倒在地上，只是没有安全护垫。有时候，这样一个疲倦的人会突然袭击那个和他一起受到疲倦困扰的人，要把敌人（他或者她）赶跑，试着用结结巴巴的谩骂叫喊释放疲倦。这种成双成对的疲倦暴力毕竟还是摆脱疲倦的唯一出路；因为这样一来，通常至少会分道扬镳。或者疲倦让位于精疲力竭，在精疲力竭中人们终于可以重新喘口气，思考一下。然后一个人或许会回到另一个人身边，各自惊讶地盯着对方，还在为刚刚发生的事情吓得颤抖，难以理解。由此接着可能又会出现判若两人的打量，但却是用全新的眼光："我们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在电影院里，在街上，在桥上？"（人们又找回了把它表达出来的声音，不由自主地在一起，或者年轻的男人为年轻的女人，或者反过来。）就这点而言，也许这种笼罩两个年轻人的疲倦甚至还意味着一种转变：开始无所谓的热恋状态变得严肃认真了。没人想要因为对方刚刚做过的事而指责他；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睁开双眼，为了在共同相处时，在"将要"走在一起成为夫妻时不依赖于各个人的局限性，一种局限性，人们以往称之为"原罪的作用"，而今却成了我不知道怎么来称谓的东西。要是两人能够如愿以偿地摆脱这种疲倦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在对疲倦的认识中，像两个永远摆脱了灾难的人一样，之后一生一世——但愿如此！——相思相守，这样的疲倦就不会再袭击他们了，但愿如此！然后他们幸福美满地生活在一起，直到另一些东西——相对那种疲倦，没有那么令人不解，那么令人恐惧，那么令人惊羡——出现在他们中间：日常事务，鸡毛蒜皮，习惯。

但是这种制造分离的疲倦难道只发生在男人和女人身上吗？而不会也发生在朋友之间吗？

不。每次在和朋友的相处中我所感觉到的疲倦，绝对不是灾难。我把它当成事物的过程来经历。我们终归只是暂时在一起，这段时间之后每个人又会各走各的路，意识到这种友谊也不过出现在一段无声无息的时刻之后。朋友间的疲倦是没有危险的——相反在年轻的、常常还交往不久的伴侣中间存在危险。和友谊不同，在爱情中——或者那种称作充满自信和完美无缺的感觉？——疲倦的突然爆发会让一切遭遇危险。失去了魅力；对方图像的线条一下子消失了；他、她在那恐怖的一刹那间再也产生不了图像；之前的图像只是海市蜃楼：这样可能转瞬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结束了——可怕的是，往往一个人本身因此也好像完蛋了；你会觉得自己这么可恶，或者，是的：和另一个人一样毫无价值，但你刚才还能感觉到对方代表了一种生存方式（“一心一意”）；你想要自己，如同那该死的对方，立刻被废除或者弄走；甚至一个人周围的东西都分崩离析为毫无价值的废物（“如同快车疲惫不堪、年久失修地从旁边飘过”——回忆起一位朋友写的诗行）：那些成双成对的疲倦有被瞎扯为生存疲倦的危险，超越一个人本身的疲倦，宇宙的疲倦，树上耷拉的树叶的疲倦，突然好像流动不畅的河流的疲倦，慢慢褪色的天空的疲倦。——然而，这种情形常常只会发生在女人和男人单独在一起时，因而我多年来回避所有持续较长时间的“大眼瞪小眼”的情形（尽管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说这是一个懦弱的办法）。

现在是提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的时候了：难道你所叙述的那些令人恐惧的、恶性的疲倦并不只是出于义务的意识——因为这些疲倦属于你的主题——，所以也如同我所感觉到的，慢慢腾腾，没完没了，极其过分——粗暴的疲倦的故事即便不是虚构的，但也过分夸张——也是出于敷衍塞责吗？

至今不仅仅是敷衍塞责地谈起那些糟糕的疲倦，而且是冷酷无情。（这不是什么纯粹的、因为自身的缘故而泄露了一件事的文字游

戏。）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并不将我叙事的冷酷无情视为一种错误。（除非疲倦不是我的主题，而是我的问题——一个我所承受的指责。）而且我也想对其他的疲倦，对那些激励我进行这种尝试的不恶劣的、更美好的和最美好的疲倦同样保持冷酷无情：我应当满足于探究那些我对自己的问题所拥有的种种图像，因为我的问题每次都一丝不苟地使我变成图像，并且用语言将这种图像连同其一丝一毫的颤动和曲折仔细勾画，而且要尽可能地冷酷无情。身在（坐在）图像中，我足以当作一种感觉。如果我可以期望为继续论疲倦做些补充的话，那么这恐怕最多就是一种感受了：如今在利纳雷斯前这片草原外面，要把三月里这几个星期对安达卢西亚早晨的太阳和春风的感受保留在手指间，然后坐在房间里面回味着它，从而使这种留在手指间的美妙感受因瓦砾上甘菊的香气更加强烈，也过渡到那些围绕着这些有益的疲倦而生的句子；正确地评价它们，特别是要让它们比先前那些疲倦来得轻松。但我觉得现在就一清二楚：疲倦是很艰难的；疲倦的问题各种各样，将会一如既往地艰难。（那无所不在的腐尸气味也一再冲击着野白菊的香气，一天比一天强烈；只是我要一如既往地将清除这样的恶臭的责任留给那些为此负责、并最好以此为生的兀鹫了。）——因此，在一个新的早晨，起来，继续，带着字里行间更多的空气和光线，干着符合实际的事情，但与此同时总是接近地面，接近黄白色甘菊间的瓦砾，借助那些经历过的图像的和谐一致。——我过去只了解令人害怕的疲倦，这不完全是事实。在童年时代，40年代末，50年代初，用机器脱粒打谷还是件稀罕事。那时还不能直接在田野里自动操作——麦穗从自动收割机一边进去，一袋又一袋磨好的面粉从另一边钻出来——，而是在家里的脱粒棚里进行，租借机器，那种机器在脱粒时节从一个农家被租借到另一个农家。脱麦粒的过程需要雇合适的小工进行流水作业，他们每次都要有一个人将麦捆从停在外面的、对脱粒棚来说实在太多太高的车辆上扔给下一个人，这一个再将其递给里面那个担当重任的人，尽可能不要把错误的、不适合手握的麦穗对着前面。这个担当重任的人站在轰鸣着、让整个脱粒棚都在抖动的机器旁，来回挥动禾把，慢慢地在脱粒齿轮滚动带之间将麦穗尖推进去——每次都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脱空的秸秆随之从后面滑出来，堆成一堆，另一个小工用一个特别长的木叉举到上面送给流水线上的最后一些小工，通常都是村子里的孩子。他们站在脱粒棚的阁楼上，将秸秆拖到最里面的角落里，四处塞得满满的，踏得实实的。草垛在他们之间堆得越高，里面就变得越黑。这一切要持续到门前的车辆重量不断减轻并卸空为止，脱粒棚里也随之豁然变得光亮。

这个过程没有间歇，迅速且交叉进行，但只要一个环节出错就会很快使得这一进程停顿或失去控制。流水线上最后一位，快到脱粒最后结束的时刻，常常被埋在已经堆积如山的秸秆之中，几乎没有一点活动空间。在黑暗中，如果他不能为一直还在继续快速堆上来的秸秆在自己身边找个空堆好的话，那么也会打乱进程，他自己几乎要窒息似的逃离他的位置。可是脱粒又一次顺利地完成了，盖过一切声音的机器——即使嘴巴对着耳朵大声吼叫也听不明白——关闭了：多么安静啊，不仅在脱粒棚里，而且在整个乡村；多么明亮啊，不是亮晃晃让人眼花，而是照耀着人们四周。当尘雾落下时，我们就双膝发软在外面院子里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拾掇，这在后来有点玩耍的性质。我们的腿和胳膊都被划破了；秸秆刺儿留在头发里、指甲缝里和脚趾间。这幅图像中最持久的就是我们的鼻孔：因为灰尘，不仅变成灰色，而且是黑色，男人、女人，还有我们这些孩子都是。我们坐在——在我的回忆中总是在户外下午的阳光里——享受着共同的疲倦，聊天或者沉默。在这种疲倦中，一些人坐在院落的板凳上，另一些在车杠上，还有一些已经躺在离得远远的草地上，的确好像聚在一起，处在一段短暂的和睦中，也包括所有的邻居，还有老老少少们。一种疲倦的云雾，一种超越尘世的疲倦，那时将我们团结起来（直到宣布下一次卸载禾把）。童年在农村的这种群体疲倦图像我还有很多。

这不是在美化过去吗？

如果过去可以这样被美化的话，名副其实，那么我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对，我相信这样的美化。我知道这个时代曾经是神圣的时代。

但你在这里所阐释的对立，在共同的手工作业和个体工作之间，在自动化机械旁，难道说不是一个纯粹的想法，而要说首先是不公正吗？

我叙述的关键恰恰并不在于这样一个对立，而在于纯粹的图像。然而，如果说违背我的意愿，非得要出现一种对立的话，那么这恐怕就意味着，我也许未能如愿以偿地叙述这纯粹的图像。接下来，我必须比以往更加小心，在描述一个图像时，别让这个图像无声无息地冲着另一个——描述这一个，而牺牲另一个，就像摩尼教的教义一样——要么只有善的，要么只有恶的。这种叙述甚至在当今占主导地位，即以原本最客观和最慷慨的方式讲述：这里我向你们讲述那些善良的园艺工人，但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能够更多地讲述那些邪恶的猎人。——事实却是，我对那些手工业者的疲倦拥有一些动人的、可以叙述的图像，相反，自动机使用者的疲倦却（还）没有。那时，在脱粒后的共同疲倦中，我看见自己坐在那样一个民族中，一个民族，之后在我的祖国奥地利我一再如此期望并且一再怅然若失。我所说的不是“全体民族的疲倦”，压在单个人的眼皮上，一个后来者的眼皮上，而是第二个战后共和国某个小民族的疲倦的理想图像：所有这些族群、阶层、联盟、军团、天主教区修道院的全体修士们就像我们农村人那时坐在这儿一样非常疲倦，逐渐在共同的疲倦中，因它而统一，首先是被净化。一位法国朋友，犹太人，在德国占领时期必须躲躲藏藏地生活，他曾经讲述过，自然也有夸大的成分，但还是很令人信服，他说在自由后，“几个星期整个国家都光芒四射”；类似的也许还有我对共同的、奥地利的劳作疲倦的想法。但是：一个作恶者，毫发未损地逃脱了，即使常常小睡片刻，不管他是坐着还是站着，就像有些东躲西藏的逃亡者一样，即使他后来也睡得很多、很沉，而且鼾声大作——但他并不明白疲倦，更不用说那种同甘共苦的疲倦；直到最后一声呼噜，他似乎不会再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而获得疲倦，除非是因为也许暗地里甚至是他本人渴望得到的惩罚。我的整个国家混杂了这样的不知疲倦者。从热衷于大吹大擂的人，直到那些所谓的精英人士；接踵而来的暴力分子和帮凶成群结队，他们哪里会形成疲倦的队伍，哪怕是一时一刻也罢，他们厚颜无耻地大出风头，和前面所描写的迥然各异。一群已经变老却不知疲倦的大屠杀-小伙子和小姑娘，他们在全国范围内从那些同样不知疲倦的徒子徒孙中精选出了新的一代。这些徒子徒孙准备着也要把子孙后代训练成搜查队。这样一来，在这个卑鄙的多数群体里，所有的少数派永远都不会有一席之地，不会成为一个疲倦的民族中如此必不可少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独自伴随着自己的疲倦直到这个国家历史结束。末日审判，我的确有那么一阵子曾经认为，它就是针对我们这个民族而来的——我不需要说，是什么时候——，看样子，它是不存在的；或者换

句话说：对这种末日审判的认识在奥地利国界内是不会生效的，而且永远也不会生效，正如在短暂的期望之后我所思考的。末日审判是不存在的。我们这个民族，我不得不进一步地思考，是历史上第一个彻底堕落的、第一个无法改良的、第一个对任何未来都无力赎罪、无力悔过的民族。

难道这现在还不明显是一种想法而已吗？

这不是想法，而是图像：因为我所想的，同样也看得到。想法，而且并不正确，在这方面也许就是“民族”这个词；因为在这个图像中，我觉得恰恰就没有“民族”，而是“不知疲倦的一群人”，顽固不化，注定缺少对其非人的罪行的认识，注定无休止地循环往复。但是显而易见，现在立刻就有其他图像与之相矛盾，而且重新要求公正；只是它们对我触动不那么深，无非缓解而已。——那些能够追溯的祖先都是仆人和贫民（没有农田的小农）；如果他们受过点教育，那总会是木匠。这个地区的木匠，也正是我一再看作的那个疲倦的民族。当时是战后初建年代，作为家中最大的孩子，我常常被家里的女人们，母亲、祖母、婶婶打发，带上装午饭的保温罐去周边不同的新建筑工地；家里所有没有在战争中阵亡的男人，有一段时间也包括60岁的祖父，在那里和其他木匠（“木工工人”）一起忙着架屋顶。在我的图像中，他们吃饭时坐在建筑骨架旁——总是以不同的姿态——部分已经被凿好的梁上或者剥了皮正在加工的树干上。他们把帽子摘下，头发粘在一起，额头呈乳白色，和黝黑的脸庞形成鲜明对比。他们所有的人都显得很结实，瘦小，同时四肢很灵巧和柔韧；我回忆不起来其中会有人大腹便便。他们吃饭很从容，而且少言寡语，也包括那个德国继父，他是个“木匠助手”，在这个陌生的国家和村庄里他平时只能通过对世界著名大城市的自吹自擂维持下去（愿他安静吧）。之后他们还会再坐一会儿，稍带疲倦地相互走到一起，他们聊起天，没有诙谐，没有咒骂，甚至从未抬高嗓门，聊起他们的家庭，几乎只这样，或者，非常平静地聊起天气——从来不聊别人的事——，一种聊天，接着就过渡到下午的工作分工。尽管他们中间有工头，但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人可以说一不二，也没有人可以做决定；

在他们之中，仿佛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统治或者可以“占据统治地位”，这也属于他们的疲倦。与此同时，他们的眼皮看上去沉沉的，发了炎——疲倦的一个特点——，意识清醒；每个人身上都有股子机智果断劲（“拿去吧！”——一个苹果扔出去——“接住了！”）；很有生气（总是不断开始多声部、无意识、出乎意料的叙述：“战前，我母亲还活着时，我们有一次去圣维特医院看望她，然后在夜里徒步走了五十公里路，穿过特里克森峡谷回家……”）。这个残缺不全的疲倦民族所拥有的图像颜色和形式就是工作裤的蓝色、大梁上用铅垂线画上的红色直线、红色和紫色的椭圆形木工笔、黄色的折尺和和水平仪上的椭圆形气泡。太阳穴上被汗水弄湿的头发干了后立了起来；摘下又戴上的帽子上没有什么标志，帽檐上不是羽毛而是铅笔。要是那时已经有了晶体管收音机的话，无论如何我可以想象得出来，那也会在远离工地的地方。尽管如此，我觉得，仿佛从各个地方的光明中出现了某些如同音乐的东西——悦耳动听的疲倦音乐。是的：那种亲身经历，又一次让我明白了，这是个神圣的时刻——神圣的插曲。——当然是属于这个疲倦的民族——和在脱粒机旁的群体不同——我不属于其中，却很羡慕他们。可是后来，快成年时，我曾经可以属于其中，这一切变得跟当年我作为一个送饭人的想象完全不同了。祖母死后，祖父退休了，放弃了农业，在这个大院里——在村里不仅仅一家如此——几世同堂的生存模式告终了，我的父母盖起了自己的房子。盖房子时，除了最小的孩子，这个家里的每个人都得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我也被派上用场，于是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疲倦。在头几天里，首先的工作就是，把一个装满细方石的推拉箱拖到山上那个载重汽车没法到达的工地，拖过放置在泥浆上的木板，我所经历的不再是我们共同的工作经历，而是苦役。那漫长的、断断续续的、从早到晚重复向山上推的艰辛，让我感受到无法承载的重压，我的眼睛没法再去观察周围的一切，只能死死盯着前方，盯着那灰色的、棱角分明的砖块瓦片，那些在小路上来回翻滚的、灰乎乎的泥石流，特别是那些木板之间的过渡地带，我通常要在那儿把手推车稍微抬起来或者狠劲推一下，好越过那些棱角和拐弯。载重汽车在那里翻车屡见不鲜，我也一样。在这几个星期里，我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徭役或奴役。“我累死了”，口语是这么说的：是的，这些日子结束时，我不仅手上满是伤痕，而且脚趾也被从它们中间挤出来的水泥灼伤了，我彻底散架了，蹲在那儿（不是坐着），累垮了，只有疲倦。无法吞咽，我吃不下任何东西，也不能说话。这种疲倦的特殊信号也许就在于，看来没法恢复过来了。尽管你几乎可以立马就地睡

着，但第二天黎明，当你在工作开始前不久醒来时，你会感受到比之前更加沉重的疲倦；好像这艰辛的劳累从你身上驱赶走了一切尚属于那样一种渺小的生活感受的东西——晨光的感受，微风拂过两鬓的感受——，而且永远如此；似乎从现在起，那种生不如死的状态就没有尽头似的。难道我之前在烦恼时没有很快找到借口，想好这个或那个诡计吗？现在我实在太虚弱了，以那些久经考验的方式——“我必须学习，准备去上寄宿学校”；“我去给你们到森林里找蘑菇”——来逃避。任何鼓励都于事无补：尽管是关乎我自己的事——我们的房子——，可是作为一个生手工人的疲倦没有一时一刻不纠缠着我；疲倦，个别的疲倦。（再说吧，还有更多这样的工作，让所有的人都害怕，如挖水管壕沟：“这个工作就不是人干的，鬼才干呢！”接着奇怪的是，久而久之，那种极度的疲倦脱离你，而让位于木匠-疲倦？不，让位于一种运动，一种创纪录-雄心，伴随着一种痛苦的幽默。）——

又一个不一样的疲倦经历是在大学读书期间为了挣钱干的倒班。那里人们一大早就得工作——四点我就起床赶第一班有轨电车，没有洗漱，在斗室里小便到空果酱瓶子里，免得打扰到房间里其他人——一直干到下午早些时候，在一家百货商店货物发送部那密不透光的阁楼上，就在圣诞节和复活节前几周里。我拆开旧纸盒，在锋利的裁刀台上裁出一块块大长方形，用作新盒子的衬垫和托架，此外还在流水线车间打包（一个久而久之甚至让我感觉挺惬意的工作，就像过去在家里劈柴火和锯木头一样，因为它让我的思想自由自在，可也不会因为它的节奏造成太多影响）。于是出现了那种新的疲倦，如同我们下班后出去走到街上，人人各走各的路。这时，在我疲倦的孤独中，眯起眼睛，戴着沾满尘灰的眼镜，敞着肮脏的衬衫衣领，我突然对这个熟悉的街景有了另外的眼睛。我看见自己不再和先前一样，同那些忙来忙去的人一起忙忙碌碌，逛商店，去火车站，看电影，学习。尽管我在清醒的疲倦中走去，没有困意，没有封闭在自我中，但我却觉得自己被排除在社会之外，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我是唯一与其他所有人背道而驰的人，走进了无望之境。在下午的阶梯教室里，我一踏进去就如同走进了禁室，能倾听的风琴声比平时还要少；那里所讲述的东西，也不是针对我的，我甚至连个旁听生都不是。我日复一日地怀念在阁楼上面那一小帮疲倦的倒班工人，而现在，当我再次感受着这个图像时，我认识到，我在那个时代，很早，19、20岁的样子，在我

真正开始写作前好长时间，在大学生中就没有了作为一名大学生的感觉，这种感觉并不舒服，更多的是恐惧。

你有没有发觉，你所描绘的疲倦图像都来自手工业者和小农，带点浪漫主义手法，可从来没有过市民的，不管是大市民还是小市民？

我在市民身上还从未感受过那些如画的疲倦。

你对此甚至都不能想象一下吗？

不能。在我看来，疲倦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把它视为一种不好的行为，如同赤脚走路。此外，他们没有能力扮演出疲倦的图像；因为他们的工作就不是这样的。至多他们在最后可以表现出死亡的疲倦，如同我们大家期盼的。同样，我也很难以想象一个富人的疲倦，或者强权者的，也许除了那些被迫退位的，如俄狄浦斯王和李尔王。我甚至看不到在下班时从如今全自动化的公司中走出疲倦的劳动者，而是看到一个个像统治者一样腰板挺直的人，带着胜利者的表情和巨大的婴儿小手，这些手在位于拐角的下一个自动赌博机上会马上继续抓住懒散而快活的手柄。（我知道，你现在会提出反对意见："你在说出同样的话之前，才真正会变得疲倦，目的是保持分寸。"但是：我必须有时变得不公正，我也有这样的兴趣。此外，当这些图像此间萦绕时，人们对我的指责无可辩驳，彻头彻尾疲倦了。）——后来，我认识到一种可以和倒班工人疲倦比拟的疲倦，这时，我终于——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开始写作"，每天，几个月之久。当我后来走到城里的街道上，我又发现自己不再属于那里的大多数。然而，那种随之而来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不同：不是普遍日常生活的参与者，我觉得无所谓；恰恰相反，在我创作的疲倦中，近乎筋疲力尽，这甚至赋予我完全愉快的感觉：不是这个群体对我不可企及，而是我对它，对每个人都如此。你们的娱乐、节日和搂搂抱抱跟我有什么相干呢——我有的是树木、草地、电影院的银幕，那里，罗伯特·米彻姆[2]只为我上演他神秘莫测的表情，还有投币式自动点唱机，鲍勃·迪

伦在其中只为我演唱他的“眼神悲伤的低地女人”，或者雷·戴维斯[3]唱着他和我的“我不像任何其他人”。

可是这样的疲倦有没有转变成傲慢自大的危险呢？

是的。我也总是突然发觉自己处于一种冷漠的、目中无人的傲慢自大，或者更恶劣，居高临下地同情所有那些正儿八经的职业，就是因为它们一生中永远都不可能产生像我那样高贵的疲倦。在写作之后那些时刻里，我是一个不可接触的人——在我的意识中不可接触，可以说是正襟危坐，哪怕是在某个根本无人过问的角落里。“别碰我！”这个疲倦的自豪者毕竟有朝一日会让人触碰，这样的情况好像不曾发生过。——一种成为可接近的疲倦，被触碰和自己可以实现触碰的疲倦，我直到很久以后才经历。这样的情形很少发生，如同生命中只有那些重大事件一样，也已经很长时间再也没有发生过了，仿佛只有在人类生存的某个时期才可能发生，之后也只会在特殊情况下重复，战争中，一场自然灾害发生时或者其他困难时期里。有那么几次，在我身上表现出那种疲倦，哪个动词适合它呢？“被赐予”？“落在身上”？我事实上也处于个人的困难时期，而且我很幸运，在这个时期，我遇到了另一个处于同样困境的人。而且这另一个人总是个女人。只有困难时期还不够；还需要让那种带有情欲的疲倦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加上一种刚刚经受过的艰辛。似乎有这样一个规律，男人和女人，在他们成为几个小时的梦幻伴侣之前，两个人先要走完漫长而艰难的一段路程，在一个对双方来说都很陌生的，尽可能远离任何一种家乡——或者家乡感——的地方相遇，之前也还必须共同经受过一种危险或者漫长的混乱，在敌对的国家之中，也可以是其中一方的国家里。然后才有可能，在这个终于变得平静的避难所，那种疲倦使得这两个人，男人和女人，女人和男人，一下又一下地把自己献给对方，那么自然，那么亲密，如同我现在想象的那样，这样的情形不管在其他类似的结合中，即使是爱情中，也是无可比拟的；“犹如面包和葡萄酒的交换”，另一个朋友这么说道。或者，为了简明扼要地表达在这种疲倦中达到如此的一致，我想起了一句诗：“……爱的词语——每一个都在微笑……”，这与短语“身心合一”相符，即使沉

默笼罩在两个人的身体周围；或者我干脆换个说法，在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一部电影中，那个英格丽·褒曼带点醉意地拥抱住那个疲倦不堪的、（依然）疏离的加里·格兰特时说："您就等着吧——一个疲倦的男人和一个喝醉的女人，这会成为一对很好的伴侣！"。"一个疲倦的男人和一个疲倦的女人，这会成为一对最美好的伴侣。"或者事实表明"和你在一起"是唯一的词语，如同这里在西班牙语中说"contigo"[4]……或者德语的形式也许不是说"我是**你的**——"而是说"我让**你**觉得疲倦了"。在有了这样为数不多的经验以后，我并不把唐璜想象为一个诱拐者，而是一个在不同的适当时刻，面对一个疲倦女人的疲倦英雄，一个永远——疲倦的英雄，每个女人都这样投入他的怀抱——当然不用想念他，于是情爱疲倦的神秘就实现了；因为在这两个疲倦的人身上所发生的，将会永远存在，一生一世：除了成为一体，否则两个人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更持久的东西存在，他们中也没有人需要重复，甚至对此产生畏惧。只是，这个唐璜怎样创造他那些总是新鲜的、令他和下一个美人能如此神奇地屈服的疲倦呢？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千零三个这样的同时性，它们一生一世都铭刻在两个身体里，直到那些最微小的皮肤点上，每个激动都是真实的，可信的，其间没有一丝一毫的不严肃——就是一波又一波？不管怎么说，在这种非常少见的疲倦冲动之后，对于通常的身体状况和行为来说，我们这样的人便不复存在了。

那么之后你还剩下什么呢？

还有更大的疲倦。

难道在你的眼里还有比刚才那些暗示过的更大的疲倦吗？

十多年前，我坐夜班飞机从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到纽约。这是一次非常漫长的航行，午夜过去很久，才从库克湾旁的城市起飞——涨

潮时，那些大块浮冰矗立着涌进海湾，而在退潮时，它们变成了深灰色，从海湾里又迅速回到大洋里——，一次拂晓时，飞机中途降落在加拿大埃德蒙顿的暴风雪中，另一次中途降落时先在空中盘旋等待信号，然后才停在停机坪上，沐浴在芝加哥上午刺眼的阳光下，在闷热的下午，飞机才降落在离纽约市还很远的地方。终于到了旅店，我想立刻去睡觉，好像生病了——与世隔绝——没有睡眠、空气和运动的夜晚。可是过后我看见下面中央公园旁那条条街道，远离早秋太阳。阳光下，在我看来，人们都沉浸在过节般的氛围中，于是感觉到，现在待在房间里会错过什么，这吸引着我出去走到他们之中。我坐到阳光下的咖啡馆平台上，挨着一片喧嚣和汽油烟雾，一直还昏昏沉沉，内心里让这个不眠之夜置于令人担忧的恍惚之中。但之后却变了，我不清楚怎么回事，渐渐地？或者又是一波又一波？我曾经读到过，忧郁的人或许能够渡过他们的危机，因为他们彻夜都难以入眠；那些陷入一种危险的恍惚之中的“自我悬索桥”因此会稳定下来。而窘境此刻在我心里让位于疲倦时，那个图像就浮现在我的眼前。这种疲倦有点恢复健康的作用。人们不是说“同疲倦作斗争”吗？——这种决斗已经结束。疲倦现在是我的朋友。我又回来了，在这个世界中，甚至——绝不是因为这是曼哈顿——在其中间。但后来还有一些东西加入其中，许许多多，一个比一个更加迷人可爱。一直到夜晚，我就坐在那儿观望着；看样子，仿佛我甚至都不用去呼吸似的。没有什么引人注目、装模作样的呼吸练习或者瑜伽姿态：你坐着，并且在疲倦的阳光下才暂时正常呼吸着。总是有很多的、瞬间异常美丽的女人经过——一种美丽，这期间我的眼睛湿润了——，她们所有的人在经过时都掠取我的图像：我是合适的选择。（很奇怪，特别是这些美丽的女人很在乎这种疲倦的目光，跟有些老男人和小孩一样。）但没有想法，我们，她们中的一个和我，超越这一切彼此开始做点什么；我对她们无可求，终于能够这样观看着她们，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也的确是一个好观众的眼光，如同一场游戏，至少有这么一个观众在座时，这场游戏才能成功。这个疲倦者的观看是一种行为，它在做什么事，它在参与其中：由于有人观看，这个游戏的参与者会更好，更出色——比如说，他们在这样的目光面前更加从容不迫。这种缓慢的眼皮开合让她们满意——使她们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这样一个观看者会让自己的疲倦夺取那个自我本身，那个永远制造不安的自我本身，犹如通过奇迹一样：所有平日的扭曲、不良习惯、怪癖和谨小慎微都会离他而去，只剩下那双松弛的眼睛，终于也那样神秘莫测，如同罗伯

特·米彻姆的眼睛[5]一样。接着：忘我的观看成为行动，远远超越了那些美丽的过路女人，将活着和运动着的一切都囊括在他的世界中心。这种疲倦分解——一种划分，它不是肢解，而是标明——那通常的纷乱，通过它有节奏地成为形式的善举——形式，只要眼睛可及——疲倦的大视野。

那些暴力场景、冲突和恐吓也是大视野中的善行吗？

我这里谈的是和平中的疲倦，间歇中的疲倦。在那些时刻里是一片和平的景象，中央公园也是如此。令人吃惊的是，我的疲倦好像在那里共同为暂时的和平起着作用，因为它的目光分别对暴力、争端的姿态或者哪怕只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的萌芽给予缓和？减弱？——消除，通过一种与那种蔑视的同情——有时是创作疲倦的同情——截然不同的同情：同情就是理解。

可是这个目光有什么特别吗？什么是它的特征呢？

我借助它，可以感受到别人，同时也就一起观看到他的东西：那棵他正行走在下面的树，那本他拿在手上的书，他站在其中的灯光，即使这是一家商店里的人造光；那个老花花公子穿着的浅色的西装，还有手里拿着的丁香；那些旅行者带着的行李；那个巨人连同他肩上看不见的孩子；我自己连同从公园林子里飞转出来的树叶；我们每个人连同头顶上的天空。

如果不存在这样一种东西呢？

那么我的疲倦就创造它，而另一个正好还迷失在空虚中的人，从一刻到另一刻，在自己周围，感受着他的事物的光芒。——

再说吧：那种疲倦使得那些成千上万并不连贯的过程纵横交错在我的面前，超越形式，自然形成一个顺序；每个过程都深入到我的内心，成为一个——结构细腻而神奇、连接惟妙惟肖的——讲述那天衣无缝的部分；而且这些过程在自我叙述，并不是通过词语实现的。多亏我的疲倦，世界才摆脱了种种名称，变得伟大。为此，我对我的语言自我与世界的四个关系具有了一个粗略的图像：在第一个关系中，我无话可说，痛苦地被排除在这些过程之外——在第二个关系中，嘈杂的声音，各种废话，从外在逐渐过渡到我的内在，但是与此同时，我依然无话可说，至多有了呼喊能力——在第三个关系中，生活终于走进我的内心，因为它不由自主地、一句一句地开始叙述，一种有的放矢的叙述，大多情况下针对某个确定的人，一个孩子，那些朋友——那么在第四个关系中，正像我时至今日在那种眼睛明亮的疲倦中最持久地经历过的，世界在沉默中完全无声无息地叙述着，向自己，既对着我，又对着这个头发花白的邻座观众，也对着那个从眼前晃过去的漂亮女人；这无声无息发生的一切同时已经是叙述，而这个叙述，和首先需要歌手或者编年史作者的战斗行动和战争不同，在我疲倦的眼里自然而然地组合成史诗，也就是说，我豁然开朗，成为理想的史诗：这个转瞬即逝的世界的那些图像衔接在一起，一个又一个，逐渐表现出来。

理想？

是的，理想：因为其中的一切都伴随着合理的事情发生，而且不断地还有事情发生，从一无所有中没有太多，从一无所有中也没有太少——一切都自然而然地适合于一个史诗；自我叙述的世界就是自我叙述的人类历史，也就是它可能是什么样。乌托邦式？“La utopia no existe”[6]，我在这里的一块牌子上看到，翻译过来就是：乌托邦是不存在的。你好好想一想，世界历史开始转动。我当时的乌托邦式疲倦无论如何产生了一个地点，至少是那个地方。我觉得我的地方意

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看样子，好像我尽管才到这里，但在我的疲倦中已获得了这个地方的气味，世代就居住在这儿似的。——在接下来几年里相似的疲倦中，有越来越多的东西加入到这个地方。引人注目的是，常常有陌生人跟我这个陌生人打招呼，因为他们感觉我很熟悉，或者就那么回事。在爱丁堡，我观看了普桑的《七件圣事》[7]，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它们终归分别遵循着合适的间隔，通过洗礼、圣餐和类似的形式表现出来。之后，我坐在一家意大利餐馆里，有一种容光焕发般的疲倦，并且那样——例外，与这种疲倦息息相关——自信地可以让人服务，最后所有的服务生都一致认为曾经见过我，而且都在不同的地方：一个说在圣托里尼（我还从未到过那儿），另一个说在去年夏天，看见我带着睡袋，就在加尔达湖边——无论是睡袋还是湖边都不搭边。从苏黎世到比尔的火车上，在一夜无眠后去参加孩子们的毕业庆典，一个同样彻夜未眠的年轻女人坐在我对面，她刚参加了环瑞士自行车赛的闭幕式，她受参与活动的银行的委托，在那里照顾那些骑手：献花，分别亲吻台上那些人……这个疲倦的女人叙述时没有过渡，好像我们彼此向来了解对方的一切。有一个人，他连续两届获胜，第二次获得亲吻，但已经不再认识她了；她叙述时那么兴高采烈，怀着无限的敬佩，并不失望，在她的眼里，骑手们只专注于他们的运动。现在她不想去睡觉，而且不管饿不饿都要和她的女友在比尔一起吃午饭——这时，那种让人再熟悉不过的疲倦的另一个萌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某种饥饿感。那种吃饱的疲倦不会创造这样的情形。“我们很饿，很疲倦”，哈米特[8]的《玻璃钥匙》中那个年轻女人对奈德·波蒙特叙述着梦见她俩的情形：将她们聚在一起的，正是饥饿和疲倦，后来依然如此。——在我看来，除了孩子们——一再瞪大眼睛，充满期待地转来转去观望着那个坐在这里的人——一种对这样的疲倦不同凡响的敏感好像也占有了这个跟着疲倦的人，那些傻子和动物。几天前，在安达卢西亚的利纳雷斯有个傻子，他没有牵着他亲人的手，蹦蹦跳跳地跑向前。这时，我整理好上下午的卡片后坐在板凳上。他看见我时瞪着吃惊的眼睛，好像他看到了自己的同类，或者别的什么：一个更加令人吃惊的人。这个像地地道道的蒙古人的脸，不只是眼睛，喜气洋洋地注视着我；他甚至停住脚步，非得让人拽着才继续走——他脸上露出实实在在的愉悦，就是因为一个目光感受到他的，使之发挥作用。这是一种重复：有时就是世界上那些傻子，有欧洲的，有阿拉伯的，有日本的，他们带着童稚的快乐上演着自己的演出，进入这个疲倦的傻子的视野。——当我完

成了一项工作，走过很长的人行道，“精疲力竭地穿过”没有树木的弗留利平原，经过一个叫美狄亚的村子旁的森林边缘时，那里的草地上卧着一对鸭子，旁边是一只狍子和一只兔子。我一出现，它们起初拉开逃跑的架势，然后却表现出和谐的姿态，扯着草吃来吃去，四处摇摆着。——在加泰罗尼亚的波布莱特修道院旁，我在乡间公路上遇到了两条狗，一条大，一条小，好像父子俩，它俩后来跟我一起走，一会儿跟在我身后，一会儿超过我。我疲倦得连平时对狗的惧怕都烟消云散了。此外，我也想象着，似乎因为在这个地方走来走去，已经沾上了这里的气味，狗都不认生了。这两条狗也的确开始嬉闹起来：“爸爸”绕着我兜圈，而“儿子”看样学样，穿过我的腿。是的，我在想，这就是真正的人的疲倦图像：它敞开心扉，它让一切都有穿透力，它为所有生灵的史诗创造通道，也为现在这些动物。——但这里也许需要有所补充：在利纳雷斯郊外瓦砾和甘菊处处可见的草原上，我每天都走出去，我成为人和动物之间截然不同的事件的见证人。对此只是简而言之：远处那些零零星星的人，他们好像要坐在废墟或者大石块的阴凉处休息，事实上却在埋伏守候，目不转睛地盯着四周射程范围内那些小鸟笼子，它们被挂在可以弯曲的棍子上，棍子插在瓦砾里，小鸟在里面几乎连扑腾翅膀的空间都没有，因此越发让笼子晃来晃去，成为那些大鸟活生生的诱饵（可是欧洲鹰的影子却远离陷阱，在我这儿掠过纸张；铅矿遗址旁的桉树林寂静，也阴森森的，这是我露天写作的地方，伴随着西班牙复活节前一周极度兴奋的尖叫声和长号吹奏）；——或者是那些孩子，他们随着日落吵吵嚷嚷地从吉普赛人住地涌向荒野，有一只瘦长的纯种狗围着他们蹦蹦跳跳，然后又是狂叫，又是兴奋不已，犹如一个轰轰烈烈的场面的观众，由一个半大小子一一来表演：在热带稀树草原上撒开兔子让狗追击；这个曲棍球手很快被赶上，这条狗咬住脖子，先是玩来玩去，兔子被抛开，它又一次逃跑，它更快地被捕获，在狗嘴里被上下折腾，这样被抛来抛去，狗嘴里叼着战利品飞快地穿过原野——兔子拖着经久不息的尖叫——，随着这群孩子一同回到住地，轰轰烈烈的场面结束，狗蹦向领头者伸直的手上，兔子被夹着耳朵吊在上面，血淋淋的，虚弱的爪子还在微微颤抖，那小小的躯体呈现在队伍最前列，迎着日落，在孩子们头顶上方，可以从侧影看到兔子的脸庞，在无助和孤独中不仅超越了动物的脸，而且也超越了人的；——或者就是昨天那些半大不小的孩子，在我从桉树林写作回到城里的路上：在橄榄林边的石墙旁，拿着橄榄枝和芦苇棒，在大喊大叫中前后瞄来瞄去，将那些石块推得四处都是，用脚踢来踢去，在石头下面，现在暴露在阳光下的是那条

蜷缩着的、又肥又长的蛇，除了动了动头和吐了吐信子外几乎一动不动——还难以走出冬眠吗？——，棍棒从四面八方劈头盖脸地打到它身上，要裂开的、但却重重地打去的芦苇，一片噼里啪啦声，这些半大小子又大喊大叫着前后瞄准目标（记忆中我也在场），那条蛇终于直起身来，挺得高高的，同时可怜巴巴的，没有要进攻的架势，甚至连一点威胁都没有，只是展示了一下有威慑力的颈子，这是蛇天生的架势，这么直立着，在侧影中伸着被打得不成样子的脑袋，嘴边淌着血，突然，就在它倒在投掷的石头下那一瞬间，同那只兔子一样，第三个形象，犹如一幅画着那些习以为常的动物和人的形象的幕布升起时那个片刻间出现在舞台深处的普通形象：——然而，在我心里，当你目睹了这一切时，从哪儿产生这样的反抗呢，同样可怕的事件，它们什么也没有叙述，更多不过是证实，还可以继续叙述，而与此同时，那些创造统一的疲倦所要对我叙述的东西在我的心里唤起了一种的确自然而然从很久以前开始的叙述，很久很久——唤起了那种叙述的气息？

是的，但你没有认识到，前者并不只是可怕的事件，而且原因在于，尽管你只是想把它们记录下来，却在这期间违背意愿，几乎陷入叙述中，最终只是有意图避免它的动词形式，过去时——通过一种手段？而且除此以外，比起你疲倦史诗中那些尚如此宁静的事件来，对这些可怕事件的描写则更直观，或者无论如何更具影响力？

可是我不想变得具有影响力。我不想去说服，——也不用图像——，而是让每个人回忆自己那独一无二的叙述的疲倦。它的直观性还会出现，在这种尝试的最后，立刻，也许——只要我为此在这期间足够疲倦。

那么在你的轶事和片断之外，什么是那最后疲倦的独一无二性，它的本质呢？它是怎样发生作用呢？开始该怎样来做呢？它可以使这个疲倦的人行动吗？

但是它本身已经是最大可能的行动了，根本不需要特意开始做什么，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开始，一种作为——“开个头”，口头语就是这么说的——。它的开个头是一种教诲。疲倦赋予教诲——是可以运用的。教诲谁呢？你问道。从前在思想史中，存在物“自体”的理念，此间已经过时了，因为客体从来不可能自己表现出来，而只存在于与我的统一中。但是我所说的那些疲倦，会让我更新那种陈旧的理念，因此使之显而易见。进一步，伴随着那种理念，它们使你获得这种想法。再进一步，在这种对事物的想法中，我触及一种法则，仿佛可以用手抓得住似的：如同事物在这一刻所表现的，那么它不仅仅是这样，而且它也应该是这样。更进一步，事物在这样一种基本的疲倦中从来都不会自成一体，而是始终与别的事物息息相关，即使可能只有很少的事物，最终一切都会关联在一起。“现在狗还在叫——一切如此！”最后：这样的疲倦要被分开的。

为什么突然这么多哲学味呢？

没错——也许我一直还没有真正有过疲倦——：在最后疲倦的时刻就不再有哲学问题。这个时间同时也是空间，这个时空同时也是历史。凡是存在，就会是同时性的。另一个同时会是我。那两个此刻在我疲倦的眼睛下的孩子，就是现在的我。那个姐姐拖着小弟弟穿过酒馆，这同时产生了一种意义，有了一种价值，没有什么东西比另一个更有价值——落在这个疲倦者脉搏上的雨点与河对岸那个行走者的目光具有同样的价值——，这简直太美好了，而且理应如此，并且要继续这样，这首先是真实的。我扶着姐姐的腰，如同姐姐扶着我这个弟弟的腰一样，这是真实的。而相对的东西会绝对地表现在疲倦的目光里，部分就是整体。

那么直观在哪儿呢？

我对这种“合为一体”有个图像：那些花卉静物画，通常是17世纪荷兰的，在它们的花朵上，一切都很逼真，这里一只甲虫，那里一只蜗牛，这里一只蜜蜂，那里一只蝴蝶，尽管也许没有一个会知道另一个的存在，可在这一时刻，在我的时刻，所有这些都相互关联。

难道没有转弯抹角的图像，你就不能尝试变得直观吗？

你这样坐下来吧，但愿你在这期间也够疲倦了，和我一起坐到田间小路旁的石墙上，或者更好些，因为更接近地面，你就和我一起蹲在路上吧，蹲在这路中间的草带上。那种“一切相互关联”的世界地图的确会让你看得出来，猛地一下，在这种色彩斑斓的反照中：完全接近这块地面，我们同时也就处在正确的距离中，看着那个猛然直起身子的毛虫，和那个形体大小像蠕虫的、分成很多节、正往沙里钻的甲虫一起，这只甲虫又和在橄榄上摇晃的蚂蚁一起，同时和树皮一起，在我们的目光下卷成8字形。

不是图像报道，而是叙述！

几天前，在安达卢西亚田间小路的灰尘中，一只鼹鼠的尸体十分缓慢地向前移动着，那样庄重，犹如在安达卢西亚复活节期间，那些受难和悲伤的雕像被架起来走过条条大街一样。当我把它翻转过来时，下面行进着一列闪着金光的食尸甲虫。在之前三周的冬日里，我在一条同样的田间小路上，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同样的方式像我们刚才一样蹲下来，看着雪花飘落，雪片非常微小，呈颗粒状，落在地上和明亮的沙粒没有什么区别，可是融化时却留下了一片片固有的水迹，暗暗的污渍和雨滴留下的完全不一样，面积大了许多，更不规则，如此缓慢地渗入尘土中。童年时，我像现在蹲着一样高的时候，

在第一缕晨曦里和祖父走在同样的奥地利田间小路上，光着脚，既接近地面，又距离尘土里那些零零星星的凹坑像太空一样遥远，那是夏季雨滴砸出的小坑，那是我第一个、反复又使之重现的图像。

终于在你那疲倦作用的比喻中，不仅有事物那一个个被缩小的尺度，而且还有人的准则！但是为什么唯独你是那个疲倦者，独自一人？

在我看来，我最高程度的疲倦向来同样是我们的疲倦。在喀斯特地区的杜特夫勒，那些老年男子深夜站在酒馆柜台旁，我曾经和他们处于敌对状态：即使我对另一个人一无所知，可是疲倦却会在他的身上勾勒出他的历史。——那两个人，头发湿漉漉地向后梳着，脸庞瘦削，指甲开裂，穿着干净的衬衫，他们是农业工人。这些工人从早到晚都在荒野里当牛做马，要步行好远的路来这里的城市酒吧，和所有其他站在那儿的人不同；就像那儿那个人，他独自狼吞虎咽地吃着饭，在这里很陌生，从利纳雷斯被当地公司派到这里的路虎汽车厂做装配工作，也远离他的家庭；就像那个老男人，他每天站在外面橄榄林地边上，脚边有只小狗，胳膊肘撑在树杈上，在那里哀悼他死去的老婆。——对这个理想的疲倦者来说，“想象变得”没有幻境，完全是另外一种，与《圣经》或者《奥德赛》里那些睡眠者不同，他们有幻境：告诉他什么是存在。——现在的我，尽管并不疲倦但还是要大胆叙述那些疲倦最后一个阶段我的想象。在这个阶段，你看到的就是那个疲倦的上帝，疲倦而无力，可是在他的疲倦中——比任何一个疲倦的人类都更加疲倦——无所不在，带着一种眼神，它恐怕真的具有一种力量，因为它所看见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的世界事件中，都会使它变得自信和宽容。

这一个个阶段足够了！干脆就谈一谈在混乱中浮现在你眼前的疲倦吧，它是怎样出现的。

谢谢！这样的混乱符合现在的我和我的问题。——也就是说：品达罗斯[9]式的颂歌赞颂的是一位疲倦者，而不是一个胜利者！我疲倦地想象着那个圣灵降临节团体怎样接待圣灵，无一例外。疲倦的灵感与其说要做什么，倒不如说可以不做什么。疲倦：天使，他触摸着正在做梦的国王的手指，而其他国王在继续着他们无梦的睡眠。**健康的**疲倦——它本身就是恢复。某种疲倦者就是另一个俄耳甫斯，那些野性十足的动物聚集在他周围，最终会一同疲倦。疲倦赋予那些分散的个体以节奏。菲利普·马洛[10]——又一个私人侦探——在解决他的案件时，无眠的夜晚越是接二连三，他就越精神，越敏锐。疲倦的奥德赛赢得了娜乌西卡的爱情。疲倦会使你感觉到你从未有过的年轻。疲倦远远胜于自愧不如的我。一切都会在疲倦的宁静中变得令人惊奇——那卷纸多么令人惊奇，那个从容得令人惊奇的男人将它夹在胳膊下，穿过那条寂静得令人惊奇的塞万提斯路！疲倦的完美化身：从前，在复活节之夜里，庆祝耶稣复活时，村里那些老年男子在教堂里趴在那个坟墓前，一条红色的锦缎披肩替代了蓝色的工作服，脖子后面的皮肤由于一生的辛勤劳累而被阳光晒黑皴裂，裂纹和地上的一模一样；行将死亡的祖母以她那寂静的疲倦让一家人都平静了下来，甚至连她那个暴躁成性的丈夫也不例外；在利纳雷斯所有的夜晚，我观看着那许许多多被一起带到酒吧里的小孩子变得疲倦：没有了贪婪，手也不抓来抓去了，就是强打精神玩一玩。——谈起这一切，也有必要说一说，即使在疲倦这样的深层图像中，区别依旧存在吗？

说得好，说得妙：不可否认，你的问题具有某些直观性（即使保留着神秘主义者那种典型吞吞吐吐的直观性）。可是这样的疲倦又是怎样创造的？人为的念念不忘？进行洲际飞行？急行军？一件赫拉克勒斯[11]的工作？试验性地参与死亡？你对自己的乌托邦有什么设想吗？用药片形式让全民保持清醒的领路者？或者采用药粉，添加到那个没有疲倦者之国中家家户户的饮用水里？

我不知道什么良方，而且对自己也没有。我只知道：这样的疲倦是不能计划的；也不可能事先成为目标。但我也知道，它们从来不是无缘无故地出现，而始终是在艰辛过后，在过渡中，在一次次克制中。——那么就让我们现在站起来离开吧，走出去，走到街上，走到人群中，要去看看，也许在这个间隔里，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共同的疲倦在向我们招手，看看它今天会向我们叙述什么。

但是属于真正的疲倦，同样像属于真正的问题一样，是站起来，而不是坐着吗？就像那个年老的弯腰驼背的女人在花园里说道：“唉，我们还是坐着吧！”因为她又一次被她那已经头发花白、但永不停息的儿子所驱赶。

是的，我们坐着，但不在这里，在荒无人烟中，在桉树的沙沙声中，孤零零的，而是在条条大道旁，在观看中，也许近前还有一台自动点唱机。

整个西班牙都没有一台自动点唱机。

在利纳雷斯这里有一台，非常特别。

叙述吧。

不，下一次吧，在试论点唱机的时候。

也许吧。

可在我们上街去之前，现在又出现了最后一个疲倦的图像！

好的。这同时也是我最后一个人类图像：在其最后的时刻，在宇宙的疲倦中取得了和解。

补遗：

那些挂在热带稀树草原的小鸟笼子不是为那里的山雕投放的诱饵。一个保持距离坐在这样一个四方形场地旁边的男人回答了我的问题，他将它们提到田野里，放在瓦砾堆上，为了这样四周能够听到歌唱；还有橄榄枝，插到笼子旁边的地里，不是要把鹰从空中引过来，而是招引黄雀来歌唱。

补遗二：

或者黄雀的确因为鹰蹦到高处——人们想要换换口味来看看它俯冲的样子？

试论点唱机

陈民　译

耐心等待别心急。

——西班牙谚语

然后我看到她站在那儿。

——列依| 麦卡特尼

为了最终开始进行计划已久的论点唱机，他在布尔戈斯火车站附近的汽车总站买了张去索里亚的票。发车平台位于一个加顶的内院里；清晨，许多汽车同一时间启程开往马德里、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方向，车上早就挤满了人；现在，午后，只有开往索里亚的车孤零零地停在那里，里面零零星星坐着乘客，几乎空空如也的行李舱呈半球状敞开着。他将箱子交给站在外面的司机，或者检票员？那人说“索里亚！”同时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位旅行者还想多了解一下这个地方的情况，他在站台上走来走去，直到发动机启动。那个卖彩票的女人从早上就在拥挤的人群中窜来窜去，在空旷中再也看不到人影了；他想象着她在布尔戈斯市场附近某个地方吃饭，桌上摆着一杯红葡萄酒，还有一捆圣诞节博彩彩票。站台的沥青面上有一大片油迹；想必有一辆此间已经开走的汽车的排气管喷了很长时间，黑色的油迹那样厚，上面有许多不同的鞋跟和行李箱轮子的印迹交错：此刻他也特意踩过这片油迹，就是要把自己的鞋印添加到其他印迹上面，仿佛他这样做可以为自己的打算带来一个好兆头。可奇怪的是，他一方面说服自己，那个所谓的“试论点唱机”是些次要的事情，或者附带的事情，而另一方面，和通常一样，他面对行将动笔的写作感到惴惴不安，不由自主地寻求逃避到好的先兆和预示中——除非他一刻也不相信这些，宁可像现在一样，立刻禁止自己这样做，捧起他在路上正好读到的泰奥弗拉斯托斯[12]《品格论》中关于迷信者的一句话：迷信就

是面对神圣的一种胆怯。但不管怎么说，这里多种多样的鞋印，连同不断变化的商标，相互重叠，黑白分明，而在油迹圈外立刻又消失了。这是一幅图像，他可以带着它踏上继续的旅程。

即便他要在索里亚开始写作“试论点唱机”，那也是早就计划好的。眼下十二月初，去年春天，他在飞越西班牙时偶然看到了一篇有关这个喀斯特高原偏远城市的周刊报道。索里亚，由于它的地形，远离交通要道，将近一千年以来几乎置身于历史之外，据说是整个半岛最安静和最无人问津的地方；那儿有许多浪漫主义风格建筑，也包括留存下来的雕塑，无论在城中心还是城外，孤零零地坐落在荒野里；尽管很小，但索里亚城是个首府——同名省的首府；20世纪初，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13]在索里亚生活过，先是当法文教师，接着是年轻的丈夫，然后很快成了鳏夫，他用自己的诗句描写了许许多多具体的事物，让这个地区为世人所知；索里亚，海拔一千多米，据说在这里非常缓慢流动的杜罗河上游环绕着它的基座，在它的岸边——经过那些马查多称之为“鸣唱着”的白杨树，因为在它们密密麻麻的枝杈里栖息着夜莺，穿过那些一再变成峡谷的悬崖峭壁之间——，根据相应的插图报道，有些漫长的路向外直通到原始不毛之地……

他打算用“试论点唱机”来说明这个玩意儿在他已经不再年轻的生命的各个阶段的意义。然而，在他过去几个月里——作为一种市场调查游戏——询问过的亲友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玩意儿会派上什么用场。有些人，其中自然还包括一个教士，只是耸耸肩，摇摇头，这样的东西居然还会有人感兴趣；有些人将点唱机当成了弹球机；又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这个词，只有当你提起“音乐盒”或者“乐柜”时，他们才以为明白了这是什么东西。但正是这种无知和冷漠——在第一次失望之后又来一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有类似的经历——更加吸引他去关注这个玩意儿，或者指责，尤其看来，仿佛点唱机的时代在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地方几乎都成为了历史（也许他本人也会慢慢地超越年龄，站在点唱机前，按起键来）。

当然，他之前也读过关于点唱机的所谓文献，自然带着意图，立刻又将其中的绝大部分忘记；写作时，首先要指望的是自己的眼光。本来相关的文献就很少，不管怎么说，迄今所看到的主要著作也许就是1984年在美国中西部偏远的得梅因出版的《沃利策点唱机指南大全》，著者是里克·博慈茨。读者从点唱机历史中获得的最终可能就

是以下内容：在20年代美国禁酒时期，在“非法经营的酒吧”里第一次放置了自动音乐机。不能肯定“点唱机”这个词的出处是“Jute（黄麻）”还是动词“to jook（伴着自动唱机跳舞）”，这个词或许发源于非洲，意思是“跳舞”。无论怎么说，在那个时代，黑人们在南方黄麻地干完活后，聚集在所谓的“Jute points（黄麻地）”或者“Juke points（点唱地）”，在那里听着音乐自动机里播放的尼克·比莉·哈乐黛、杰利·罗尔·莫顿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14]，所有这些音乐都不会在全部由白人把持的无线电台播放。点唱机的黄金时代随着30年代禁酒令的废除开始了，这时到处都开酒馆；甚至在商店里，如烟草店、理发店等，当时都有了自动留声机，由于那儿空间狭小，这些机器还没有收款机大，就挨着收款机放在柜台上。然后随着那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样的繁荣时期暂告结束了，因为点唱机的材料，特别是塑料和钢材限量配给。木材取代了金属，而在战争期间，生产完全转向了军备。于是，那些点唱机龙头厂家，如沃利策和西波尔格，那时候制造起用于飞机的除冰设备和机电零件来。——另一个历史就是音乐盒外形的发展：通过外形变化，这些音乐盒“从并不总是色彩鲜艳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因此，公司里最重要的人就是设计师：沃利策音乐盒的基本结构是半圆拱形，而西波尔格通常使用的是上面带穹顶的矩形外壳，这里似乎形成了一条规则，每个新模型都只能是在之前的基础上进行改变，这样就可以清楚地辨认出先前的模型来；这样一来，据说有一次，出现了一个特别新式的点唱机，外形酷似方尖碑，顶上不是一个球状或者火焰状，而是一个装了内置话筒的外罩，从里面传出的音乐直回响在天花板上，最终彻底失败了。因此，外形的变化几乎只有在考虑到盒子发出的灯光变幻和框架部件时才有可能：机器中央的孔雀，不断变换着颜色；塑料表面，至今只是简单色彩，现在是大理石花纹；花边装饰，至今是人造青铜，现在镀上铬了；边弧，外形新采用透明荧光管，大大小小的水泡游来游去，“保罗·富勒绘制”——与此同时，这种外形历史的读者和观察者最终也知道了这些外形主角的名字，并且注意到他当时第一次惊叹过后，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某个昏暗的里屋里，对着这样一个闪烁着彩虹颜色的大家伙，已经下意识地想要知道这个名字。

从布尔戈斯到索里亚的汽车向东穿过近乎空荡荡的梅塞塔。尽管有很多的空位子，好像车里聚集的人要比外面整个光秃秃的高原随便什么地方的人都要多。天空灰蒙蒙雾茫茫，岩石和黏土间很少有田地闲置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嗑着瓜子，就像平常在西班牙电影里或者林

荫大道上一样，一脸严肃，大大的眼睛若有所思，瓜子壳如雨点般落在地上；一群背着运动包的男孩子不断把他们新的音乐磁带拿到前面交给司机，他是非常乐意的，这样不用听下午的广播节目，每排座位上面的喇叭都在回响着这个节目；车里有一对老年夫妇默默地坐着，一动不动，男的看样子压根儿没有感觉到时而有男孩子从身旁走过时轻轻地碰到他，不是故意为之；即使有个年轻人要说话时站起来，走到过道上，讲述时靠在老人的椅背上，同时在他面前手舞足蹈，他也一动不动地忍受着，甚至都不把他的报纸推到一边，报纸的边角在这个在他头上挥舞的人的气流中翻来翻去。那个下车的女孩独自走在外面光秃秃的圆形山包上，大衣裹得紧紧的，走在一片好像无路可走的草原上，望不见一栋房子；在她空出的座位地上有一堆瓜子壳，比想象的要少。之后，这片高原时而展现出稀稀疏疏的橡树林，这些树小得像灌木，上面完全干枯的叶子灰蒙蒙的，簌簌地抖动着。过了一个几乎察觉不到的山口之后——在西班牙语中，旅行者从他的袖珍词典里了解到，这和“港口”是同一个词——，也就是到了布尔戈斯省和索里亚省的交界，山崖上是育林区，长满大片闪闪发光的罗汉松，也有不少在狂风肆虐之后，从稀薄的土壤层被拔起或劈开。于是，狭窄的路两旁同样立刻又变得开阔，出现一片不毛之地。时而有轨道交错，锈蚀不堪，是两座城市间被废弃的铁路线，往往被涂上焦油，枕木埋没在丛生的杂草之中或者彻底消失了。在途经的一个村庄里，有一栋房子墙上松松垮垮地挂着街头牌子。村子坐落在一个石丘后面，从乡间公路上看不到影子，汽车一直朝着那里拐来拐去，然后掉过头来，车厢变得越来越空了，不得不倒回去；在那个乡村酒吧的窗户后面，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一只只打扑克的手。

索里亚天气很冷；比布尔戈斯还冷，相比下面靠海边的圣·塞巴斯蒂可谓寒冷刺骨，他来到西班牙的前一天就去过那里。但没有下雪，他曾经期盼雪花为他在这里的行动充当所谓的陪伴，然而此时下起了蒙蒙细雨。在这个穿堂风四起的汽车站里，他马上记下了开往马德里的出发时间，至少到萨拉戈萨。城外的干道上，在小小的危房、高耸的毛坯房和废墟遍布的草原（通常很中他的意）之间，车轮下泥浆四溅，一辆接一辆的长途载重货车呼啸而过，各个都挂着西班牙车牌；他看到其中有一辆挂着英文车牌，然后又看到车棚上那个打眼看去就明白无误、也无需翻译的标语，此时此刻，他简直突然有了回家一样的感觉。他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感觉，他在这样一个陌生的西班牙城市逗留了较长时间，周围没有人会其他语言，也没有任何外国报

纸，他有时候就躲在那里一家中餐馆里，尽管他对那里的语言更加陌生，可是却躲开了那清一色、扎成堆的西班牙语，有了安全的感觉。

暮色降临，各种轮廓变得不清晰了。方向指示牌只有遥远的首府，如巴塞罗那和瓦利亚多利德：他就这么拖着沉重的箱子——他已经出来很久了，并且要在索里亚一直待到新年——沿着马路向下走去；他经常看到，就是那些一抬眼几乎看不见的西班牙城市的中心都坐落在下面什么地方，在没有房子的草原地区，隐藏在那些河流消失的山谷里。这个夜晚，他恐怕无论如何都要留在这里；有一次，他实际上感觉这是一种责任，因为他现在到了这儿，他就需要弄清这个地方，也需要去适应它（此时此刻，走上几步就得换手去拖箱子，一再让开当地人，他们已经开始了自己晚上趾高气扬的直行，他没能如愿以偿），再说吧，只要涉及他的“试论点唱机”，他就有时间，况且实际如此——他现在重复着常常给自己的提示，这次用的是一个希腊语动词，出自泰奥弗拉斯托斯的作品：S-cholazo, s-cholazo（有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想着逃避。为了使他实现自己的计划，这个或那个朋友给他提供了第二住房或者第三住房，因为他已经有好几年颠沛流离，东奔西跑，眼下初冬季节，都空着，周围非常寂静，同时拥有习以为常的文明，特别是童年语言，他的陪伴者（同时也是安慰他的人），就在任何时候步行都可以到达的地平线上。但他逃避的念头排除了任何回归的可能。一个德语环境现在不再适合他了，比如连拉罗谢尔这样的地方也是如此。他自然而然地说着法语，却依然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他几天前就在那里，面对一望无际的大西洋，一座座低矮而明亮的房子，许许多多的电影院，一条条人迹罕至的小巷子，那座老码头上的钟塔。那个钟塔让他想起了乔治·西默农[15]，想起了他在那里成就的作品。甚至连圣塞巴斯提安也不例外，那里有更加温暖的空气，还有一目了然的半圆形海湾，就坐落在如此经常会变得狂怒的比斯开海湾里；就在他的眼前，潮水逆流而上，汹涌澎湃地拍打着巴斯克人的圣河乌鲁梅亚河两岸——相反在中间，波涛朝着大海奔去。而且在一个酒吧里，即使没有照明，也很冷，好像多年不营业了，却立着一个西班牙制造的点唱机，很粗糙，几乎没有样子。他禁止自己这样逃避，走回头路，这也许就是一种强制——也许只有远远地离去，穿过这片大陆——，或许也是一种强迫，在经过一段艰辛的付出后没有了义务和束缚，他便觉得，为了能够开始写作——这样

做当然也无可厚非——，终归有必要将自己放逐到一个正好有待去征服的偏僻地区，放逐到一个同样威胁着每天的生存状态的极端境地，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除了写作这件事外，还涉及第二件：一种对每个陌生地方的侦察或者测量，并且不要老师，独自参与到一种语言中，这个语言首先必须尽可能不熟悉。

然而，他现在不只是想要逃离开这座城市，而且也要逃离开他的主题。他越是接近索里亚这个为写作预先安排的地点，他就越发觉得“点唱机”这个物品微不足道。1989年正好临近岁末的时候，在欧洲，日复一日，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那么多的东西好像都变得格格不入，而且那样神奇地祥和，所以他想象着，有人好久听不到那些世界新闻，比方说自愿置身于一项研究工作里，或者发生意外，数月之久没有意识，那么他在看到第一份报纸时恐怕会认为是号外，其中虚构的是，这个大陆上那些被奴役、被分裂的民族的一个个梦想终于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现实。这一年，甚至对他来说是历史之年，尽管他来自无历史与童年和青年的世界，几乎无法为一个个历史事件（及其伸长脖子的欢呼庆祝）而兴奋，充其量是受到妨碍：这是曾经发生过的，好像这个历史除了它的所有其他形式外，也可能是一个自我叙述的童话，一个最真实、最有影响、既是天堂又是尘世的童话。几个星期前，在德国有一个熟人，在启程前往行将轰然倒塌的城墙时非常激动，无论如何要成为“历史的见证者”，他催促他一起去，为了让这些事件得到“一个专长于图像和语言的人亲眼见证”。那么他呢？——把自己的“工作，实地考察、必要的准备”都提前了，立刻，本能，简直就是畏惧，不假思索（就在第二天一早，在那家承载着国家使命的相关报纸上，便会刊登出那些诗意的历史见证人提供的首批诗篇，当然连同照片一起，并且体面地夹着边框，而在之后的早上，又以同样的方式，会为之刊登第一批颂词）。而现在，当这个历史作为世界和人类的伟大童话，看样子日复一日地继续演进，继续自我叙述，继续变戏法（或者这不过是那些古老的幽灵故事的变种？）时，他要在这里，在这个遥远的地方，在这个被荒原和群山环抱的、对历史充耳不闻的城市里——面对那些电视机，虽然到处回响，却在后来仅有一次的，在地方新闻中播放建筑支架砸死人的消息时，出现了共同的沉默——，试图琢磨起一个像点唱机这样举世陌生的玩意儿来，正如他此刻告诉自己的，一个“世界逃离者”的玩意儿；一个简单的玩具，根据文献记载也许是那次战后“美国人最喜爱的”，但只有那

个“周六狂热之夜”短暂的时刻。那么在当下这个时代，由于每个新的一天都是一个历史的日期，还有没有比他更可笑更固执的人呢？

这些想法他并没有完全当真。而折磨他的则是完全另外的东西，他那小小的打算好像与发生在他夜间最深沉的梦境里的东西发生矛盾，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紧迫。在梦境深处，他的规则显现为图像，一幅接着一幅；他在梦乡里强烈地感受着，醒来后又继续思考着。那些梦叙述着，它们叙述着，即使只是以宏大无比的、常常过渡到那习以为常的梦之荒唐的断片，对他却迫切地叙述着一部波及世界的史诗：战争与和平，天与地，东方与西方，血腥谋杀与镇压，压迫，反抗与和解，城堡与贫民窟，原始森林与体育场，失踪与回乡，完全陌生的人与神圣的婚姻之爱之间胜利的统一，还有无数勾画鲜明的人物：可信赖的陌生人，那些数十年来不断变换的邻居，那些远房兄弟姐妹，电影明星和政客，圣徒和玩偶，那些在梦里摇身一变（就像他们实际上曾经活着那样）而继续活着的祖先，以及一再出现的那些孩子，这些孩子中那个作为主要角色之一的孩子。他自己通常在这个时候根本不一同出现，只是一个观众和听众。和那些图像一样，同样具有规则力量的是这个人此刻所拥有的感觉；其中有些感觉，他在清醒时从来都没有感受过，比如对一张赤裸裸的面孔的敬畏，或者对一座山峦那梦幻般蓝色的陶醉，甚或只是对“我在”的信仰（它也是一种感觉）；别的感觉他虽然也感同身受，但是在他看来，只有当史诗般的梦想的感官性使这位睡眠者激情满怀时，它们才可以变得纯洁和如画：如同他感受到**这种**感激取代了感激一样，同样还有**这种**怜惜，**这种**天真，**这种**仇恨，**这种**惊奇，**这种**友谊，**这种**悲伤，**这种**孤寂，**这种**死亡恐惧。**醒来**后，就像得到了这样的梦幻酣畅淋漓的滋润，来了个脱胎换骨的变化，他感到远远在自身之外那个节奏在大幅振动，他似乎要用写作来追随它。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了，于是他又把这事推后，为了一件次要的事？（正是那些梦，它们促使他去思考，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会主宰他。）而且他认为，像他这样居无定所，也就只能小打小闹而已——说到底，比如西默农的短篇小说，大多都是在一些外国旅馆的房间里写就的，它们似乎也没有一丝史诗的痕迹——，难道这不又是梦的延留音，是他在其间已经过期利用的借口之一吗？为什么他就是不定居呢，不管在哪儿？难道他就没有发现，他不断奔波常常无非就是四处瞎忙吗？——那时候，当“试论点唱机”仅仅还是个初步想法时，毕加索的一句名言犹如一个可能的座右铭浮现在他的眼前：作画就像王子同牧羊女一起造孩子一样。你永

远都临摹不了万神庙，你永远都画不了路易十五的安乐椅，而你画的则是不大不小的茅舍、一小包烟叶、一把旧椅子。然而，这种实现越临近，你就越觉得画家这句名言难以转换到写作对象上。那些史诗般的梦幻一开始就太强大，独一无二，也太有感染力（拥有将它们转换成相应语言的渴望），也就是说，他从青年时代以来就了如指掌，让他始终惊叹不已，现在临近冬至，一夜又一夜，独一无二，绝无例外；伴随着第一个半睡半醒的图像，叙述的大门就已经敞开，这种叙述整夜地向他吟唱。而且除此之外：诸如点唱机、雕像、彩色玻璃杯和铬片究竟和一把椅子或者一个田间小屋有什么相干呢？——一点没有。——或者还是有点相干？

他不知道有哪个画家在其作品中画过点唱机，哪怕作为财产。甚至连那些通俗艺术艺术家，他们那放大的眼光盯着所有系列化的东西，所有非原创的东西，所有第二手东西，好像都觉得这玩意儿就不值得回头看一眼。在爱德华·霍普[16]的几幅画前，上面画着城市真空地带的夜间酒吧里零零星星几个人物，他对此几乎产生了幻觉：好像那些不值一提的玩意儿出现了，可似乎又被抹掉了，有一块空着的、亮闪闪的污渍。他想起来唯有一个歌手，就是范·莫里森[17]，他曾经“一直钟情于点唱机的鸣响”，可这“早就不存在了”，也就是民间常说的“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此外：为什么他把这个对象似乎可以叙说的东西想象成一本书呢，哪怕是一本小得可怜的书？在他的想象中，书这玩意儿毕竟是用来反射自然光的，首先是太阳光，一句一句地，当然不是用来描写由一个电子装置的旋转圆柱灯闪烁进昏暗之中的人造光。（因此，它无论如何符合他那对书习以为常的、无法摆脱的图像。）照此看来，从古到今，这样一小段文字与其说适用于一家什么报纸，倒不如说更适用于那本周末杂志吗？登在那些感伤怀旧的页面上，连同那些点唱机模型的彩色照片一起。

他苦思冥想到了这个地步，便准备好干脆放弃他过去几个月里所怀念过的一切（“凡是你喜爱的，就保持沉默；凡是让你发怒和向你提出挑战的，就将它写下来！”），下定决心，一如既往，无所事事，在这片大陆上四处看看，愉快地享受时间。这时，他突然感觉到一种奇特的愉悦，他的打算可能毫无意义——自由！——同时还有几

乎白白消耗的能量，即使绝对可能在别的什么地方，而不是在这座被世界遗忘的城市索里亚。

为了这一个夜晚，他在一家以西班牙中世纪一位国王的名字命名的饭店里找到了一间房子。在他不停奔波之中，几乎每个陌生的地方，打眼看去他都觉得一文不值，与世隔绝，然后他到处走来走去时，便觉得这个地方神秘地延伸开来，展现为世界的一部分；“一个多么伟大的城市啊！”他总是一再感到惊奇，甚至：“一个多么伟大的村庄啊！”可是索里亚，他在下雨的夜晚漫步在一条条巷子里，走出城穿过昏暗摸索着上了那个当年的要塞小山，它却没有变得开阔；没有灯光闪烁的酒店；这个地方无非就是条条巷子拐角处几面连在一起的光秃秃的围墙。在这个夜晚，还有后来他从一个酒吧窜到另一个酒吧时，几乎到处都早早地空空如也，此刻只有那些赌博机不断重复的诱惑旋律维持着它的生机，给予他一个熟悉得让人厌恶的中欧小城市的印象。在那柔弱的图像里，更多蒙上了黑暗——斗牛竞技场上那冬天遗忘的椭圆形——，周围都被黑暗包围着。没有什么，他如此偏执地认为，可以在这里更多地被发现和被创造。不过起初不带行李走一走倒很惬意。在书店橱窗第一排只摆放着哈罗德·罗宾斯的书——为什么不呢？在旁边广场上，那些湿漉漉的、锯齿状的悬铃木树叶在午夜时分闪烁着，晃动着。两家分别叫雷克斯和艾梵尼达的电影院的售票小屋开着老虎窗，几乎看不见，好像只在西班牙才有，靠近宽阔的入口正面，正好冲着大街，在里面，似乎分别显现出了同一个老妇人的脸，半是被窗框阻隔了。而且葡萄酒也没有小城的品味。索里亚城人行道瓷砖的图样都是正方形，相互拼合在一起，棱边磨得圆圆的，而布尔戈斯城相应的铺石路面则是锯齿形的？西班牙语表示“镇静”的词叫ecuanimidad。他喋喋不休地念叨着这个词，交替变换着与希腊语“有时间”这个词。

梦中出现了成百的人。一位将军，同时又是莎士比亚作品改编者，因为对世界状况感到忧伤开枪自杀。一只兔子穿过田野，一只鸭子顺流而下。一个孩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失踪了。村民们一刻接一刻相继地死去，这是道听途说来的，牧师就只能忙着安葬（在梦中道听途说的角色好奇特——那既不是人说的，也不是听来的，简直是无声无息地穿过空气而来的。）祖父的鼻血闻起来像湿漉漉的狗皮。又一个孩子起了“精灵（Geist）”这个大名。有人宣布，此刻声音很大，在当今时代听的重要性。

第二天——天依然下着雨，报上说索里亚又要成为西班牙最冷的省份——他穿过城市走上告别之路。他无意间突然站在了圣多明各教堂正面，从规模和那些亮闪闪的、常常被吹成圆形的砂石块立刻就可以感受到它的古老。这些罗马式建筑猛地一下十分亲切地感染了他，他随之立刻在心灵深处，在肩头上，在腰间，在脚底感受到它们的比例，如同他那本原的、被掩盖的身体。是的，身体性，那是感觉，带着这样的感觉，他尽可能缓慢地，绕着圈子，朝着这个形式像谷仓似的教堂走去。就在第一瞬间，面对那平面以及嵌镶在里面的圆拱和雕像的精美布局，博尔赫斯的名言“美的兄弟情谊”已经感染了他，但与此同时，恨不得立地要把这一切并吞的恐惧也攫取了他。于是，他决定，无论去哪儿，都要把出发推迟到晚上，而且之前只要阳光还会交替照耀在那些雕塑上的话，他还要再来一次。他先只是研究了一下很快就变得亲切熟悉的群像中的变体。这些就近在眼前（他不需要找很长时间），每次看到罗马式雕像时都一样，在他看来，它们又是这个地方神秘的标志。只要目光所及，它们甚至出现在索里亚这儿：圣父慈爱地弯着腰，他这样要把刚刚创造出来的亚当扶起来；在一个地方几乎光滑的——在其他造型上完全是波浪形的——顶部，下面睡着三圣王；装饰花纹叶片，贝壳形状，像一棵树大小，矗立在那复活者空空如也的墓地后面；在大门上方的半圆里（杏仁轮廓，圣父微笑着，膝盖上坐着那个同样微笑着的儿子，掂着那本厚厚的石头书），福音传教士那些动物象征都没有蹲在地上，而是在天使的怀抱里，不仅仅有那个好像刚刚才出生的狮子和小公牛，甚至还有那强壮的山雕……他迅速地离去时，回头向远方四处张望，于是看到了那座精雕细刻的房子——那个没有雕琢的空间越发清晰——，用卡尔·瓦伦丁[18]的话来说就是站“在露天里”：这座建筑又宽又矮（周围所有的住宅区都要高于它），上面是天穹，尽管不断有载重汽车呼啸而过，它却赋予你那理想的想象；这座建筑与周围那些呆板的立面迥然不同，看上去像是一个百音钟的传动发声装置，正好在它的默默无声中工作着——它在演奏着。他心想着，那时，八百年前，无论如何是在欧洲，一个形式时代之久，人类历史，个体的和普遍的，曾经神奇地清晰可见。或者这只是那个渗透着一切的形式（不是单纯的风格）的表象？可是怎么会出现了这样一个既威严又单纯的形式，这样一个默契的形式呢？

索里亚坐落在两座山丘之间，一座森林覆盖，一座光秃秃的，在一片洼地上通往杜罗河，白天这会儿看上去分外清楚，一座森林覆

盖，一座光秃秃的；这条河从最后那些零零散散的房子旁流过；对岸是片开阔伸展的岩石地。那儿有一座石桥跨越过去，马路通往萨拉戈萨。同时伴随着那些拱桥墩，这个新来乍到的人记下了它的数字。一阵轻风，云彩飘飘。下面那些没有叶子的岸边杨树之间，有一只被激怒的狗在追逐着那片一会儿飞到这里、一会儿又卷到那里的叶子。芦苇被压到了黑汪汪的水里，只有一些芦苇穗露出来。这个陌生人——陌生？得到这个地方准许——朝着相反的方向，走上了那条诗人马查多熟悉的林荫道，逆流而上，行走在一条杉木根交错的土路上。宁静；风阵阵吹过太阳穴（他曾经有一次这样想象着，应该要有一家专门的公司，给脸部的这块地方提供了一种特别的润肤乳，好让那个地方的皮肤连那一丝一毫拂面而过的气息都感受得到，作为完美的化身，你该怎么称谓它呢？当下的）。

从旷野里回来后，他坐在一家名叫“里欧”的河边酒吧里喝了杯咖啡，一个年轻的吉普赛人站在吧台后面。一些退休老人，西班牙语词典里叫“jubilados”，都是完全令人惊奇、激动兴奋的上午电视节目的观看者。外面川流不息的长途运输车辆让所有人手中的各种杯子都在颤抖。在角落里竖着一个差不多齐膝高、圆筒状、上端变细的铁炉，上面垂直刻着槽纹，中间的装饰像地地道道的扇贝壳，从下面的出口火焰在熊熊燃烧。从瓷砖地面上飘起来上午刚刚撒落的锯屑味。

外面马路上，他上山坡时经过一棵接骨木，树干像巨衫一般粗壮，那鲜亮的短枝条形成了无数条相互交织、相互攀爬的弧线。没有迷信，也没有那种图像或者符号：他也许要待在索里亚，而且按照计划，在这里开始他的“试论”。这期间，他要尽可能多地去感受这座如此一目了然的小城那一个个早晚。“不，这个事情完不了，我就不离开这里！”他恐怕要在索里亚眼看着悬铃木最后的树叶怎样纷纷扬扬地飘落。此时此刻，在这片土地上也笼罩着那种昏暗而明亮的、好像从地下弥散出来的光线，一直让他铭刻在心，立刻走到一边去，写吧，写吧，再写吧——没有一个对象，或者我所指的点唱机那样的东西。从那里出去走到远方，可你在这里立刻又身在其中，因为你几乎还没有出城——在哪些大都市里会是这种的情形呢？——，他似乎每天坐下来之前都要走路，为了使自己的脑袋在衰老时得到越来越必要的寂静，以这样的宁静为基础，那些句子便会协调一致地构成；可是随后他也许会听任这座城市那闹哄哄的醒动，也包括安静些的角落；

没有通道，没有墓地，没有酒吧，没有运动场可以在它们各自的特性中不会被感受。

但事实证明，眼下有一些西班牙节日相互重合了——旅游时节——，所以在索里亚到下周初才有房间。那么这对他也不错，他可以依照自己的风格，再次推迟开始；再说，他或许在出发和返回时还要获得一幅索里亚的地形图像，这样独自一人在这片高原上，还要从别的方向，不仅只从布尔戈斯西边方向，因为他为了暂时的躲避，被迫来到另一个城市里——他想象着这对即将面临的事情很有用。他之后有两天空闲，决定第一天在北部，第二天在东部度过，两次都在卡斯蒂利亚之外，先是葡萄种植地区奥哈的洛格罗尼奥，然后是阿拉贡地区的萨拉戈萨：这首先是从汽车时刻表得出来的。但他开始坐进了一家西班牙后院餐馆，他在那里感觉受到了保护，因为你可以独自待在那里，却又能够透过木板一样薄的墙和常常敞开的推拉门，同时获得外面酒吧的一切。在酒吧里，包括电视和自动游戏机，几乎到处熙熙攘攘。

下午时分，只有一个修女和他一起坐在开往洛格罗尼奥的车上。天下着雨，在这两个地区之间的隘口路段上，车子好像穿行在主要降雨云带里：玻璃窗外除了黑压压的云团什么也看不见。随后，车载收音机里传来滚石乐队的《满足》，一首和那个“点唱机的咆哮”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的歌，而且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在全世界的点唱机里很少能坚持几十年播放的（没有被替换过）的歌曲之一，“一个长盛不衰的经典”，这一个乘客心想着——而另一个，她穿着黑色的修道院女装，冲着比尔·怀曼[19]的吉他那充斥整个空间的、似乎令你肃然起敬的响亮度，和司机聊着一个小时之前在一条小巷近旁所发生的建筑工地悲剧，两个死者躺在铁棍和刚混合的混凝土下面。当时，他正在自己的后院里无忧无虑地吃着饭呢。收音机里接着传来杰克斯·布瑞尔[20]的《别离开我》，那是唱给情人的歌，祈求不要离开他，又是几首似乎构成了点唱机经典歌曲之一，至少他在法语国家所了解的情况如此，通常就摆在右边那个好像不可触摸的区域的台架上（在这个地方，比如说在奥地利的音乐盒里，大多都排列着所谓的民间音乐，而在意大利的音乐盒里，有时是歌剧咏叹调和歌剧合唱，特别是《阿依达》和《纳布科》里的犯人合唱）。但现在非常少见的是，这位旅行者继续思考着，这时那个比利时歌手唱的圣歌，从深处冒出来，几乎不成腔调，毫无保留，随心所欲——“我说这些，而且只对你！”

——好像这样压根儿就不适合放置在公共场所的、投掷硬币操作的自动唱机——可是现在却来到这里，回响在这辆几乎空空如也的汽车里。汽车将要蜿蜒穿过一个海拔达到两千米的隘口，穿行在一片细雨蒙蒙的灰色无人地带。

洛格罗尼奥人行道上的瓷砖花样呈葡萄束和葡萄叶状。这座城市有一个专职的编年史作者，他在《里奥哈报》上每天也有一页专版。这里流淌的不是杜罗河，在它的上游是伊布罗河，并且不是绕着城外流去，而是穿城而过，像其他地方一样，对岸是新城。高高的雪檐团团围着这条大河，再看去时却是工业泡沫在浮上浮下。在河岸两边一座座高楼立面，蒙蒙细雨中，那些晾晒床单的绳子拍打着。尽管他也在索里亚看到过类似的情形，尽管洛格罗尼奥位于下面那个气候显然温和的葡萄种植平原上，在节日的灯光下显现为一座广阔而高雅的城市，也包括艾梵尼达和阿卡丹，然而，在想象着那片笼罩在冬日气氛中的居住区时，他突然感受到在那后面的麦西达高原上，有某种东西，犹如思乡的心情要攫取他似的。他在那里几乎还没有度过一夜和半天的时间。

第二天到了萨拉戈萨，位于东南部，离宽阔的伊布罗河河谷下面还很远，这里的人行道装饰呈现为突起的蛇形曲线，它们表现的是这条河的蜿蜒曲折，他这样心想着。在寻找市中心途中，经历了初次在西班牙已经习以为常的迷途之后，他的确觉得这是一座皇家之城，那个足球俱乐部[21]的名称也名副其实。在这里，他似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外国报纸，犹如在任何一座国际都市里一样，每天都可以看到所有刚刚上映的电影，有些也许还是原声，到了周末，只要这一个皇家球队与另外那个来自马德里的皇家球队[22]对阵时，也可以去看球赛——他行李里有只小望远镜——那个真正的埃米利奥·布特拉格诺（身着即使在烂泥里也还保持干净的运动服），人们曾经可能以为他在回答一个记者问他踢足球是不是一门艺术时这样说道：“是的，一个个瞬间。”在城市剧院里上演的是贝克特，看演出的观众就像在电影院售票处一样买票。在艺术博物馆里，他或许会驻足于戈雅的绘画前，可以同样获得那些开放的行动意识，如同在索里亚外围的寂静中一样，添加上这位画家感染给你的惬意的傲慢。戈雅在萨拉戈萨度过了他的学习时代。然而，唯独另外那个地方成为考虑的对象，那里羊群在新建筑旁的瓦砾坡上踩出了它们攀爬的图案；那里也有麻雀，尽管很高，可在风中垂直上下飞来飞去——他也许会怀念着它们。（有人曾

经观察过，每天观看电视里的世界新闻时，不管是在东京还是在约翰内斯堡目睹的，人们可以信赖的东西是什么呢，也许就是麻雀吧：前面是那些政治家群像，或者烟雾缭绕的瓦砾，而背景就是麻雀的叫声。）

他在这两个城市里为之所采取的行动就是追寻，顺便追寻一台点唱机；想必至少在洛格罗尼奥和萨拉戈萨各有一台昔日的点唱机遗留下来了，现在无疑也还可以用（添置一台新的是不可能的，在西班牙的酒吧里，仅有微不足道的空间才属于那些相互堆放起来的赌博机）。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了一种寻找可能尚存的点唱机地点的嗅觉。仅存的希望不在城中心，也不在改造过的城区和文物古迹、教堂、公园、林荫大道的附近（更不用说别墅区了）。他几乎从来没有在疗养地或者滑雪胜地看见过音乐盒（但也许很可能就在那些更没有名气、偏僻的邻邦，如圣莫里茨旁边的萨梅丹），在游艇港口或者海滨浴场几乎也不例外（但也许在捕鱼的港口，更常见的是在渡轮码头：多佛港、奥斯坦德港、勒佐艾米利亚港、皮雷埃尔斯港、洛哈尔什教区凯尔以及轮渡到对岸的内海布里地群岛，青森港，在日本主要岛屿本州岛的最北端，曾经被征用做到对岸北海道岛的轮渡），在陆地和腹地的饭馆里不常有，而常出现在岛屿上或者边界附近。

根据他的经验特别引人关注的是：穿越公路两旁的居民点，对于村庄来说铺得太开，然而却没有市中心，远离任何游客景点，位于周围没有湖的一马平川上（即使有河，也是离得好远，每年大部分时间是干涸的），挤满了太多的外地人、外籍工人和 或士兵（驻防地），就是在那个地方，点唱机既不会在中心——即使这里除了一大摊雨水而没有任何标志——也不会在边缘上寻觅得到（那里，或者外面更远处，在国道边上，最多的是那家迪厅），而是在那些中间地带，最有可能在兵营里，在火车站，在加油站的酒吧，或者一家孤零零地位于运河边上的饭馆里（当然是在一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比如在“货运轨道后面”，在那些面目全非的密集的门脸后面）。一个这样的点唱机典型之地，且不考虑它的诞生之地，他曾经在弗留利低地上的卡扎尔萨碰到了，这个地方因为周边盛产各种各样的葡萄而赋予自己“美味飘香”的称号。在一个夏日的晚上，他从那个幽雅、富裕、清除了点唱机的首府乌迪内来到了这里，也就是“塔格利亚门图之后”，其动机仅仅是因为帕索里尼[23]的一句由六个词组成的诗句，他在这个小城里度过了青年时代的一部分，后来谩骂罗马的点唱机与自动弹球机结

成联盟就是美国采用别的手段继续进行那场战争："卡扎尔萨挣扎在空虚之中。（in der verzweifelten Leere von Casarsa.）"在一次试图走出边缘地带的环游之后，由于所有的出行道路交通繁忙很快就中断了，他转过身，随意走过那一家家为数不少的酒吧，几乎每一家里都有一台点唱机迎着还走在街头的他闪烁（其中有一家比较讲究，里面放着一台视频盒，屏幕高高在上，那里也发出声音来）。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音乐盒，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都在运转，演奏，不是一般常见的背景音乐，更多的是很急迫，声音很大；轰鸣着。那是周日晚上，在饭馆里——他越是接近火车站，人就越多——一边是告别，一边是新兵们要在那里度过午夜必须归队之前的几小时，他们中大部分看上去刚刚休完短假坐火车过来。这时，时间越来越晚了，他们中大多数不再编队，而是三三两两地出现。他们围着这样一个沃利策点唱机，一个经典的、彩虹色类型的复制品，闪现着让穹顶不断变换的小气泡，那么密集，那点唱机的灯光表演有时候从他们的身体之间穿过，他们向唱片抓斗弯去的脸和脖子交替沐浴在蓝色、红色和黄色的光芒中。火车站对面那条马路在他们身后划出了一条宽宽的弧线，很快又消失在黑暗中。连火车站吧台里也已经收拾完毕了。但有几个穿着灰色和褐色制服的小伙子依然站在点唱机旁，其中有人已经扛起了背包——，在这里，与霓虹灯相映的，是一个较新的、简洁的、浅色金属的式样——，每个人各自站着，同时在这个已经空空如也的空间里，伴随着推到墙边的桌子以及四散的椅子，面对着这个更加强烈地回响在潮湿的地砖上的玩意儿，犹如变成梯队一样。当其中一位士兵在拖把拖到跟前的时候迈向一边去，他的眼睛仍然睁得很大，眨都不眨一下，坚定不移地朝着一个方向转过去；另一个扭过头去，同样坚持站在过道门槛上。正是满月，在玻璃门后，一列黑乎乎的货运火车摇晃着，震动着，跳动着，持续好久，它遮挡住了后面的玉米地；吧台前那个年轻女子长着一副匀称而高贵的脸庞，露出牙齿脱落的空隙。——然而，现在在这些西班牙城市里，他的嗅觉每次都让他失望。即使在那些贫民窟的酒吧里，瓦砾堆的后面，一条死胡同的尽头，那些糟糕的照明指示让他时而从远处就加快了步子，而他所寻找的对象，压根儿连早已过期的痕迹都找不到，哪怕是一面熏黑的墙上比较显眼的轮廓。这里所演奏的音乐来自——隔着墙，他有时候会从外面使自己形成错觉——收音机、磁带，或者在那些更为特别的壁龛里，来自一个留声机。这些西班牙街头酒吧，好像每个城市里都有很多，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地方是可以与之比拟的。对这样一个几乎已经变成老古董的东西来说，它们要么太新了（并且因此在相应的

方位全都缺少与这个东西相得益彰的东西，也就是后屋），要么就太老了，首先也肯定对于这些十分严肃地坐在那里打牌的老人如此——点唱机和赌博场所，不过只是出现在不太严肃的地方！——或者脑袋撑在两手之间，独自一人：而且他在想象着，那个玩具在其鼎盛时期被这里的独裁禁止了，之后就再也无人问津了。当然在这样徒劳的寻找过程中，他感受也不少，随后也对那几乎确定无疑的一无所获，对那些显然如此相似的城市各个特殊的角落，各个变体感到些许愉悦。

从萨拉戈萨回到索里亚，从其东边那个省，在马路旁的铁路线上，他夜里几乎一无所获，他现在需要为他的试论寻找一个合适的空间；就在第二天，他终于想要开始了。在两座小山之一上面，或者在下面城里？上面，都已经在城外了，他恐怕又一次觉得太超脱，在房屋和街道之间又太狭小；朝向内院的房间会让他感到太压抑；冲着外面广场的房间又会让他太分心；朝北的房间或许在写作时太缺阳光；而在一间朝南的房间里，只要一有太阳，纸张就会晃眼；在光秃秃的山上风会吹进来，在森林覆盖的山上，散步者的狗会整天叫个不停；在公寓里——他打听了所有的——会离邻居太近；在旅馆里，即使他绕着他们走，可现在冬天坐在那儿写作，会太孤单。这天夜晚，他是第一次在光秃秃的小山上的旅馆过的。马路向上，尽头是一座石屋，坐落在一个黏土场上；步行进城的路——他立刻试着走了一回——越过一片青苔和飞廉草地，随之经过圣多明各的立面[24]——打眼望去，它以自己纯粹的存在同样在昭示着什么——，立刻就到了那些小广场上，山里的悬铃木也依它们的比例，剩下的叶子看上去还在舞来动去，最上面的树梢尖少见地齐整，如同灿烂的星光闪烁在夜晚一片漆黑的天空上。上面的房间也合他的意：不太挤也不太大——恰恰在空间太大的地方，他通常在那儿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座城市，不太近，不太远，下面也不太深，它透过这个玻璃块不太大但也不太小的窗户映现进来，他继续尝试着，立刻把桌子从镜子前移开，推到窗跟前：虽然很小，但面积足够摆放一张纸、铅笔和橡皮。他在这里感觉好舒心；这里是他往后要待的地方。第二天早晨到来时，他试着在恰当的时间，在应急灯的照耀下，在随后开始试论时也可能出现的温度里坐下来：这个空间此刻对他来说太吵了（然而，他本该知道，恰恰在这些所谓的“安静”环境里，在这些“沉默的小客栈”里，你要集中精力，那嘈杂声要远比外面那样一条呼啸的马路更可怕，因为它们毫无规律可言，突如其来，诸如收音机，大笑，回响声，推椅子，爆裂声，唧唧声，还有从附近和房子里、走廊里、隔壁房间、天花板上

传来的声音——一旦这种注意力被破坏了，图像就离写作者而去，没有图像就没有语言）。可奇怪的是，另一个房间里，要是坐久了，他会觉得太寒冷（难道他不知道，只有豪华酒店才白天也供暖，此外他在良好的写作状态时不由自主地总是要这样来呼吸，免得冻着他吗？）。而且突然也太寂静，好像这样待在里面的空间里则意味着被隔绝，畅快只存在于外面的大自然中，怎么会让这种寂静在12月这个时节透过窗户进来呢？第三个房间有两张床——对他来说多余一张。第四个房间只有一个隔门——他觉得起码少了一个……他就这样学会了西班牙语“太”这个词，demasiado，一个非常长的词。那个“对现存心怀不满的人”不就是泰奥弗拉斯托斯所说的“品格”或者典型之一吗？他被女友亲吻后说，他问自己，她是否也打心眼里爱他呢；他对宙斯发怒，并不是因为他让下雨了，而是太晚了，而且在路上找到了一个钱包时说：“我可从来连一个珠宝都没发现过！”而且他也想起了一首儿童诗，说的是有个人在哪儿都感觉格格不入，他为自己对此稍许做了改动：“从前有个男人，他在世时无处可以落下脚。|在家他觉得太冷了，他就走进森林里。|森林对他而言太潮湿，他就躺在草地上。|草对他而言太绿了，他就开车去柏林。|柏林对他而言太大了，他就给自己买了个城堡。|城堡对他而言太小了，他就又回家。|在家……”这现在不就是认识：他在哪儿都觉得格格不入？不，总是有过让他称心如意的地方——比如？——他为写作找到的地方——或者那个曾经摆放点唱机的地方（不仅仅在私人住宅里！）。也就是说，只有那个地方才是他所寻找的立脚之地，可是，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那个地方久而久之毕竟也不是安身之地啊？

他最终要了这个给他的房间，而且房间挺好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挑战——他都会去应对的。“谁将会胜利呢——噪音或是我们？”他朝窗户外削尖那一根根铅笔，它们是在各个国家旅行时买的，可又常常是德国的商标：那一根已经变得多小啊，从1月在爱丁堡以来——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吗？那些铅笔木屑彩环随风一起飘扬，和飞舞在空中的木柴火焰的烟灰片混合在一起。这时，在下面房子前，厨房门旁——从那里一出去立刻就进入飞廉、瓦砾和青苔草地——，一个学徒拿着一把长臂刀在清理一堆体形更长的鱼，那些亮闪闪的鱼鳞从它们身上颤动着，闪烁着，飞向空中。“好征兆，不是吗？”——只是在这一切之后，今天还要开始试论为时太晚。习惯了延迟他的游戏，简直又一次如释重负，并且利用这样的推迟出去到草地上转一转，也就是说，在那里探一探几条可能要走的路，看看它们的土质——既不

太硬，也不太软——还有气候状况：别太遭受强大西风的侵害，但也不能太风平浪静。

这期间，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当时，他突发奇想，真真切切，同时也显而易见，要写“试论点唱机”。他曾经想象这种想法就是发生在舞台上的对话：这个玩意儿，它可能对这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则是那样古怪的东西，从而有一个人似乎作为观众的代表，硬要进入那个创造者的角色中，而第二个人，作为这个领域的“精通者”，则与那些柏拉图对话相反。在那些对话里，比起那个至少在开始被偏见-知识冲昏了头脑的答案宣布者来说，提问的苏格拉底私下里对问题知道的要多：最可能也许是这样，连这个“精通者”也是通过另一个提出的问题才弄明白了，那个道具分别在他的人生游戏中的“重要价值”所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打消了这种舞台对话的念头，这个“试论”作为许多不同的写作形式一种没有关联的相互并存浮现在他的眼前，在他看来就是这样，符合那些如此，他该怎么说呢？不一样的？无节奏的？他在其中感受到了点唱机方式，回想了它们：瞬间的图像会与追溯久远的、然后突然中断的叙事进程交替转换；随着几句单纯的提示，出现的便是一篇关于某个点唱机连同某个确定的地方的完整报道；从一本速记恐怕会跳跃到一本引言，没有过渡，而这本引言又没有过渡，没有和谐的连接，也许专门会给连篇累牍地记录一个特别的发现对象那一个个标题和歌唱者的名字留下位置——在这期间，作为或许会赋予整体一种关联的基本形式，他在继续想象着那个提问-回答-游戏，在其中，自然零零碎碎的，一会儿参与，一会儿躲避，一会儿又与相似的电影场景片断融合，而这些电影场景的中心分别出现另一台点唱机，以这台点唱机为出发点，要么是多姿多彩的事件，要么是静物画，以越来越大的范围围绕着它——哪怕结果是直到另一个国度里，或者只是来到某个站台尽头的黄杨树前。他期望能够让他的“试论”逐渐过渡为一首“点唱机的歌谣”，一个可以吟唱的、可谓“完美的”歌颂这个玩意儿的歌词，当然只有当这个歌词在经历了所有那些图像跳跃之后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时才能如此。在这期间，他曾经觉得，写作中这样一个过程不仅要适应于那个特殊的客体，而且也要与时代相呼应。那么以往各个时代那些史诗形式——它们的统一性，它们召唤和强占（陌生命运）的姿态，它们既无所不知又一无所知的绝对要求——此间不是作为地地道道的装腔作势还依然运用在今天的书本里，对他产生影响吗？多方面大大小小的接近，也就是说，以穿透的形式替代了通常的俘获形式，

在他看来，正是它们才会是现在对待书本的态度，这恰恰是因为他最完整、最深切、能够创造统一地经历了种种对象：保持距离；围绕着；勾画着；绕过去——从边缘出发，伴随着对你的事物加以保护。——那么现在，在热带稀树草原上，他毫无目的地走在探索的道路上，在他的心里，突然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节奏，不是交替变换的，跳跃式的，而是唯一的，匀称的，首先是一种节奏，它不再绕着圈子和绕过去，而是直截了当、一丝不苟、持续不断地走向in medias res [25]：叙事的节奏。首先，他只是经历了所有那些他途中先后遇到的事物，它们是叙事的组成部分；凡是他一再接受的东西，同时在他的内心里得到叙述；那些当下的瞬间以过去的形式发生，也就是说，和在梦里不一样，不拐弯抹角，都是地地道道的主句，和每个瞬间一样短小而朴素："在铁丝网篱笆里飞廉在飘动。一个手拿塑料袋的老男人弯腰去捡草地上的蘑菇。一只狗拖着三条腿从旁边蹦过去，让人想起狍子；它的毛皮是黄色的，脸是白色的；灰蓝色的烟雾从一座石头小屋里冒出来。在那棵孤零零地竖立在那儿的树上，长角果刷刷的响声听起来好像划火柴盒的声音。鱼儿从杜罗河跃起，风浪逆流而上掀起层层浪花。水在对岸拍打在岩石下面。萨拉戈萨开来的火车已经亮起了灯，乘客稀稀落落坐在里面……"然而，这种对当下事物静静的叙事随之也感染到了他所面临的、想象为多种多样游戏似的"试论"：第一个句子还未落下笔，它就变成了叙事，如此有说服力，如此强大，所有其他形式立刻变得微不足道。这在他看来一点都不可怕，而是无与伦比的精彩；因为在这种叙事的节奏中，说话的是那个把一切都变得温暖的想象力，他一如既往地相信这样的想象力，哪怕它极少有机会触及他的内心深处，也是出于与之一起的宁静，甚至在熙熙攘攘的喧嚣中也是如此：大自然的宁静，无论在外面多么遥远的远方，也不会与之发生什么对抗。这种想象力的突出标志是，在它的图像中，地方和地形会共同出现，他或许就会在那儿写就这个叙述。虽然他以往有时候也被迫去为之，那么比如说，他不过是将科隆的桦树当作意大利柏树移植到印第安纳波利斯，或者把萨尔茨堡的羊肠小道搬到了南斯拉夫，或者把写作的整个地区当作次要的东西置于背景中：可是这一次，索里亚就是要作为索里亚出现（或许连同布尔戈斯一起，还有维多利亚，一个的当地老人抢先和他打招呼），同时像那个点唱机一样成为叙事的对象。——直到深夜，那种对叙事形式的感知一直持续在他的内心里：这自然早就困扰着他——事实上，任何微不足道的事情（行人嘴里叼着根牙签，墓碑上面刻着"贝妮塔·索里

亚·维达”的名字，为纪念安东尼奥·马查多用石头和水泥塞满的诗歌-榆树，碑文缺少的刻字是HOTEL [26]）都自然而然地挤进来，想要得到叙述。此时此刻，这不再是有说服力的、给他带来温暖的图像力量，而是一种冷酷的强迫，一再毫无意义地撞向早已关闭的大门，清晰可见，从心里直涌上大脑。他问自己，难道那种首先让他觉得神圣的叙事是一种假象吗——一种对所有零零散散的、没有关联的东西的表现？一种托词？一种胆怯的畸形产物？——然而一个男人嘴上叼着牙签，大冬天里，在卡斯蒂利亚的梅塞塔，打招呼时点点头，这样走去时真的微不足道吗？——不管怎样：他不想事先知道明天开始的第一个句子；在他所有那些之前确定的第一批句子之后，他要叙事的第二个句子立刻就卡壳了。——但另一方面：排除一切所谓的规律性！——然后……

第二天一早。酒店房间窗前的桌子。瓦砾地上空塑料袋飞扬，这里或那里挂在飞廉中。地平线上有一座岩石山，像一个跳台，助跑道上空笼罩着一片蘑菇云团。闭上眼睛。把纸条塞进窗缝里，免得风十分猛烈地透过窗缝吹进来。再次闭上眼睛。抽出桌子抽屉，开始出现写意时抽屉把手啪嗒作响。第三次闭上眼睛。痛苦的号叫。打开窗：一只小黑狗正在下面，被拴在房子墙柱上，全身淋透了：凄惨的叫声，其间短暂的沉寂，可以看见喷向外面草地的呼吸气团。Aullar是西班牙语中的“狗狂叫”。第四次闭上眼睛。

从洛格罗尼奥到萨拉戈萨的路上，他在伊布罗河河谷那些冬日里空荡荡的葡萄园里看到了葡萄农小屋的石头块。在他的家乡，穿过庄稼地路旁，也有这样的小屋，当然是木头搭建起来的，大小像一个木板棚屋。那些房子从里面看上去也像这样的木板棚屋，光线只能从板条缝隙和节孔透进去，地上是草捆，角落里是荨麻，在那些靠在那里的收割工具之间杂草丛生。然而，在祖父那些租地上，他曾经把每个小茅屋都当作自己的领域经历过。接骨木灌丛通常就长在旁边，它的树冠为那个被丢弃在旷野里的东西遮阴，它的枝条也从旁边伸进小屋里。那里还有地方放一张小桌子和一个板凳，板凳也可以放在外面的灌木旁。果汁罐子和下午点心被包在布里，保鲜和防虫。在这些棚屋区域里，他感觉比在任何建得舒适的房子都要亲切。（在这些棚屋里，他至多受到过那种无处不在的战栗的侵袭，因为有时候，一看到一个没有窗户的储藏室，或者身临内外交界线上，你虽然在里面感到安全，可是外面的雨雪也容易吹到你的身上。）然而，他把这些田间

小屋与其说看作避难所，倒不如说是停歇和休息的场所。后来在他的家乡，哪怕是在路过时偶然发现远在一片荒芜的田野上有一个风吹雨淋成浅灰色的、歪歪斜斜的风雨棚，这也会让他心满意足，而且他心底里感觉自己的心简直都跳到那里去了，片刻间在这小屋里有了家的感觉，也包括夏天的苍蝇、秋天的马蜂和冬天冰冷、生锈的链条。

家乡的田间小屋早就不复存在了；只有那些更加庞大的、仅仅用于存储干草的仓房。但就在那个时候，很早以前，对他来说，这些房子或者位置的魅力已经转移到了点唱机上。还是个半大小子时，和父母一起，他不去饭店，不喝汽水，而是去找“沃利策”（“沃利策就是点唱机”，这就是广告语），去听唱片。凡是关于他来到——哪怕只是路过而已——那些田间小屋地区并且受到关照的感觉，他所讲述的一切，字字句句都适用于音乐盒。当然，各个点唱机的外形，甚至作为首选项都比不上那从中发出的特别音响。这个音响跟在家里放在神圣角落里的收音机不一样，声音不是从上面，而是从下面发出来的，而且或许在同样大的音量时，也不是从那个通常的声盒子，而是从一个让空间全都振动的深处传出来的。看样子，仿佛这就不是自动点唱机似的，倒更像是个附加乐器，借助它，音乐——当然，他事后才有了这样的认识，只有一个明确的——才能获得它的基本声调，几乎可以与火车的咔嗒声不相上下，当火车开过铁路桥时，它又突然变成了天然的雷声。许久以后，有一次，一个孩子站在这样一个点唱机旁（里面正好播放着麦当娜演唱的《像一个祈祷者》，是孩子自己选的），他还那样小，以至于喇叭的整个冲击力在他的身体下面震颤着。这个孩子洗耳恭听，一心一意，一本正经，如痴如醉，而他的父母已经站在饭店门口要走了，一再催促他，其间也为他们的孩子向周围其他客人道歉，对他报以微笑，直等到那首歌唱到头，而这个孩子，依然一脸严肃和陶醉，从母亲和父亲身边走过，迈步走到街上。（照这么说，那个方尖碑点唱机模式不成功的原因与其说在于它那不同寻常的外形，倒不如说也许在于那音乐向上，冲向天花板的回响音效？）

可是与感受田间小屋不同，关注留声机，让他满足的不仅仅是它的存在：它们一定要能够运行，轻轻地嗡嗡响——最好别让陌生的手使之动起来——，尽可能强烈地闪现出光芒来，犹如从它们的最深处出来的；没有什么比这个深色的、冷冰冰的、破旧的金属盒子更让人绝望了，不过也有可能用一块阿尔卑斯山的针织罩子遮盖着，羞羞答

答地避开了人们的目光。这当然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他此刻突然想起了日本寺庙圣地日光市[27]里一个坏了的点唱机。那是这个国家的第一台点唱机，在南北之间经历了漫长的旅游辗转，被封盖在报纸堆里，投币孔立刻就被他发现了，用一条胶带封着——但无论如何，最终还是被发现了。为了庆祝这个发现，他多喝了一杯日本米酒，而在外面冬天的昏暗里，眼睁睁地看着开往东京的火车离去了。之前他去了一个被遗弃的寺院，远在高处的森林里，从一堆渐渐熄灭的、还在冒烟的篝火旁走过，旁边是一把枝条扫帚和一堆雪，在山里更远的地方，小溪里凸出一块石头，溪水从上面飞溅过去时发出响亮的声音，如同从另外某个山涧岩石旁流过一样——仿佛你竖起耳朵聆听着一个半是歌唱半是敲鼓的演讲的实况转播，那是讲给一个遥远宇宙深处的星球上的全体大会的。随后在东京的夜晚，人们从那些横七竖八躺在火车站台阶上的人身上跨上去，再晚些，又是在一个寺庙地区，一个醉醺醺的人停留在祭祀香火前，做完祈祷后继续踉踉跄跄消失在黑暗里。

不仅是鲍赫克朗[28]让人青睐：而且他那时从家乡的点唱机里所听到的那些所谓的“美国流行歌曲”也和家里收音机里放出的迥然不同。只要在相应的节目中播放的是保罗·安卡的《戴安娜》、迪翁的《甜心小女人》以及瑞奇·尼尔森的《吉普赛女郎》，他就希望立刻把收音机开大些，可是同时也感到良心不安，他感觉自己居然为这样的非音乐所吸引（他后来上大学时终于在房间里有了个留声机，连同收音机里的放大器，这个在最初几年里只能用于公认的值得称之为音乐的东西）。然而他自觉地让点唱机发出震颤的歌唱，哀号，咆哮，格格声和轰鸣，这使他——不仅开心，而且还蒙上了狂喜、温暖和群体感觉的战栗。在那回响的“阿帕奇”钢吉他哒哒声中，那个坐落在从“1920年全民公决的城市”到“1938年大众起义的城市”主干道旁的、冷森森的、乌七八糟的“咖啡小屋”连接着一个与众不同的电气装置，借助它，你可以在那齐腰高闪亮的刻度盘上选择“孟菲斯市，田纳西州”的号码，甚至可以在自身感觉到那个神秘而“帅气的陌生男人”成长起来，听到外面一辆辆载重汽车的轰隆声和刺耳的刹车声变成了一列迁徙队伍行进在“66号公路”上，发出了整齐划一的响声，于是就心想着：无所谓到何处——出发吧！

尽管在他的家乡音乐盒也是周六夜晚舞会的聚会点——通常都是绕着它们围成一个大半圆——，可是他后来似乎从来没有想起过这样

的情形。他无疑也喜欢观看那些舞动的人，因为在酒馆的昏暗中，他们面对那好像从地里面轰响而出的光束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剪影——只是对于他来说，点唱机就像过去的田间小屋，是一个宁静的玩意儿，或者某种使人变得宁静、让人静坐的东西，相当无动于衷，几乎连续不断，只是被那从容不迫、简直就是庄重的“去按按钮”所打断。他也从未在聆听点唱机时失去自制，不像平时听那让他觉得十分亲切的音乐一样——甚至包括严格的古典主义音乐，以及之前各个时期特别精彩的——，或者狂热，或者心醉神迷。有人曾经告诉他，听音乐的危险在于它迷惑你把才要做的事情当成已经做过的：相反那个开始阶段的点唱机-音响使他完全可以集中心思，在他的心里独一无二地唤起它可能的图像，或者使之震荡，并且使之在其中更加强大。

那些能够让你静心思考的、没有任何别的地方可以比拟的地方，后来在大学岁月里有时候变成了避难所，可以和电影院相比；如果说他自己更多是偷偷地进入这些场所的话，那么他迈进各种不同的点唱机咖啡馆时每次都更加无忧无虑，并且自我宽慰说，这些久经考验可以集中心思的地方也是学习的理想场所。这显然是一种错觉，因为当他试图默默地温习那些在这样的公众场合接受过的材料时，比如临睡觉前，则通常所剩无几。诚然，他要感谢寒窗苦读时那样一间斗室或者栖身之地给予他的一次次经历，当他现在要把它们记下来时，只能用“奇妙”这个词来表述。在一个冬末的夜晚，他坐在这样一家饱经沧桑的点唱机咖啡馆里，他越是在笔记里使劲地勾来勾去，他就越记不住东西。这个咖啡馆所处的位置在这个地方算不上典型，在城市公园旁，而且面包柜和大理石小桌子也不适合他这玩意儿。点唱机在演奏着，但他一如既往在等待被他自己按下的号码；然后真的轮到了。突然，在换唱片的间歇之后，它，连同它的响动——咔嚓声，寻找的嗡嗡声，在点唱机的腹部里穿来穿去，猛地咔嚓响，搭接声，第一个节拍之前的沙沙声——，仿佛都属于点唱机的本质。这时，从那里深处回响起一种音乐，一听到它，他人生第一次，后来只有在爱情发生的时刻有过，感受到了那种专业语言中称为“漂浮感”的东西，那么他自己四分之一多世纪后又会把它称为什么呢：“升天”？“超界”？“成为世界”？或者这样：“这个——这首歌，这种声音——现在就是我；我伴随着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和声，一生中还从未成为那个就是我的人；像这种歌唱一样，我就是这样，不折不扣！”（像通常一样，对此有一个谚语来表述，但是也像通常一样，它不完全名副其实：“他在音乐中升华。”）不想先搞清楚，合唱团都有谁，一

把把吉他在为他们的声音伴奏，同样零零散散，相互交织，终于汹涌齐唱——他听点唱机时，至今喜欢独唱歌手——，他简直惊叹。就在接下来几个星期里，他每天都去这个酒吧待好几个小时，要坐在这个宏大的、同时又那样漫不经心的回声中，他受到其他客人的感染，沉浸在一种让人无法用好奇来言状的惊叹中。（音乐盒意外地成为“公园小屋”的中心，那里通常更多是报夹架子发出咔嚓声，唱片源源不断，只有一些没有名气的合唱组合。）可是后来，当他已经很少听广播时，有一次无意间获悉，那个放荡不羁的人称天使舌头的合唱团，他们无所顾忌地高声唱出了《我想抓住你的手》，《爱我吧》，《摇翻贝多芬》，使他忘却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影响，这就成为他买来的第一批所谓的“不严肃”的唱片（他后来接二连三地几乎只买这样的唱片），后来在那个圆柱式咖啡馆里，正是他，一如既往地按下《我看见她站在那里》（也是在点唱机旁）和《我们今天说的事》[29]不断聆听着（这段时间已经信手拈来，对歌曲序号的数字和字母记得比法律文本还准），直到有一天那些拙劣而虚伪的声音像祸水一样涌来：老牌子依旧保留着，兜售的却是“当下的热门歌曲”，而且是德语的……今天他还在想，披头士最初的歌声依然回响在耳际，从那个被公园树木所环绕的沃利策里发出的：什么时候那样优美的旋律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在后来的岁月里，点唱机对他失去了吸引力——多少也许不是因为他现在更愿意在房子里听音乐，肯定也不是因为他年龄大了，而是——他自己开始忙于“试论”时，他相信自己没有看错——因为他此间生活在外国。不言而喻，只要他出现在某个殷切咕哝着和玩着色光谱的老朋友面前时，比如在杜塞尔多夫、阿姆斯特丹、卡克福斯特斯[30]、圣特雷莎加卢拉[31]等，他都会一如既往地投进硬币去。但这更多是一种习惯或者传统，这时的倾听大多只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相反对它们的意识立刻又回到他那一次次片断的经历中，那里本应当就是他理想的立身之地。在那里，他们在家乡的第一条道路把一些人引向“公墓”，“海边”或者“常去的酒馆”，而他，常常少不了径直从汽车站奔着音乐盒而去，彻底被它的隆隆声所震撼，但愿如此，少些陌生，不灵活地踏上他其余的路程。

说到这里，该谈谈外国的点唱机了，它们不只是放放唱片，而且也在更大的事件中心起作用。这样的情形同时每次都超越了纯粹的外国，发生在某个边界上；一种十分亲切的世界的尽头。如果说美国是

所谓“点唱机的故乡”的话，可是在那里却没有一个地方以这种方式给他留下了如此印象——除非在阿拉斯加，那里依然如故。但是：对他来说，阿拉斯加属于“美利坚合众国”吗？——在一个圣诞前夜，他来到了安克雷奇，做完圣诞夜祷之后，在那个小木教堂门口，在所有那些不熟悉的人中，也包括他，好像笼罩着一种少见的快乐，然后又去了酒吧。在昏暗和酒鬼的乱七八糟之中，他看到在那闪烁的点唱机旁站着一个印第安女人，她是这里唯一安静的人。她朝他转过身来，一张高傲而带着嘲笑的大脸，这是唯一的一次，他在一个点唱机的节奏中和一个人跳舞。这时，就连那些平日喜欢惹是生非的人都为他们让道，仿佛这个女人，看样子与其说年轻，倒不如说样子还不老，简直就是其中最年长的。后来，他们一起穿过后门，她的越野车停在一个结冰的院落里，边窗上画着阿拉斯加松树的轮廓，挺立在一个空荡荡的内陆湖边；天上飘着雪花。他们保持距离，除了在跳舞时轻轻地拉起手外，相互就没有过身体接触，她要求他和她一起走，她和父母在库克湾对面的村子里经营着一家渔场。刹那间他明白了，在他的一生中，终于有一个不是由他独自，而是由另外一个人提出的决定成为可能：他立刻也可以想象，跟着这个陌生的女人穿过那雪地里的边界，完全当真，永远，不回头，也要放弃他的名字，他工作的方式，他的每个习惯；这儿这双眼睛，亲切的彼岸那个地方，不时地浮现在眼前——这正是帕齐伐尔[32]面对那个拯救的问题的时刻，而他呢？面对这相应的时刻，一点不错。和帕齐伐尔一样，不是因为他没有把握——他有那幅图像——，而是仿佛这一切和他融为一体，自然而然，他犹豫了，接着就是那幅图像，那个女人，彻底消失在雪夜里了。接下来的夜晚，他总是来到这家酒馆，在点唱机旁等着她，后来甚至询问和探究她的下落，但尽管很多人想起她来，却没有人能告诉他，她家到底在哪儿。过了十多年以后，这次经历成了契机，他在从日本乘坐飞机返回之前，特意用了一个上午申请了美国签证，然后真的又在笼罩在冬季昏暗的安克雷奇下了飞机，漫无目的地在这座白雪覆盖的城里来来去去好几天，他的心就贴在那干净的空气和宽阔的地平线上。甚至这期间连新的烹饪艺术也渗透到了阿拉斯加。那个“酒吧”变成了“小酒馆”，还有相关的菜牌，看上去蒸蒸日上，这自然就容不下在那变得明亮轻巧的家具旁放一个笨重而陈旧的点唱机，不仅仅在安克雷奇是这样。然而，这样一个点唱机的标志就是那些不是从又窄又长的棚屋里就是从最后面的角落里踉踉跄跄冲到人行道上的人——各种各样的种族——或者一个在外面冰块之间四处打来打去的

人，因为他被警察巡逻队包围着——通常都是白人——，然后他被制伏了，趴在地上，肩膀和弯到大腿后面的胫骨被紧紧地捆住，两手被铐在背上，像雪橇似的蜷曲在冰雪上，被拖到后面敞开着的运输车里：这时，在棚屋里面，有一台历史悠久地占据着这个又窄又长的空间的点唱机，亲切地召唤着一个人，播放着那些相应粗狂的歌曲。这点唱机就放在前面柜台旁，柜台上趴着又是流口水又是呕吐的醉汉（有男人，也有女人，主要是爱斯基摩人）的脑袋——你似乎可以指望找到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33]全部的单曲唱片，马上透过那烟雾缭绕，听到约翰·弗格蒂[34]那迫切而阴沉的悲叹，让人心如刀割，还有他在自己作为歌手的迷途上“不知什么地方”失去了“关联”，“我要是每唱一首歌至少得到一美元该多好啊！”而从冬天只有货运列车通行的火车站下面，可以看到一辆机车的信号，它带着对北极地区来说很特别的标志“南太平洋火车”，让它那轰鸣着穿过城市、拉得长长的、独一无二的管风琴声响彻大地；一只被勒住的乌鸦在通往只有夏天才开放的游船码头小桥的铁丝网旁挣扎着。

这样看来，难道说音乐盒就是无所事事的人，这些城市游手好闲的人，这些当今更摩登的世界一隅游手好闲的人的玩物吗？不。他无论如何在寻找着它们，不是在无所事事的、而是在有事可做的时间里，或者在有计划的时间里，尤其是从所有的外国回到他出生的地方之后更甚。如果说在写作几个小时之前走一走是要求得安静的话，那么之后走一走就是寻找点唱机，几乎同样有规律。——为了让自己散散心？——不。一旦他开始追寻什么东西的话，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分心的。他的房子随着时间的推移的确没有了音乐，没有了唱片机和类似的东西；每当听完收音机里的新闻之后，只要一开始播放音乐，不管是什么，他都立刻关掉；即使他寂寞难熬，在空虚和意识变得麻木的时刻，只要他想象着他现在并不是孤独一人，而是坐在电视机前，这就足够了。他更喜欢自己当下的状态。甚至连电影院，昔日曾经是工作之余的一种避难场所，他都越来越不想去了：这期间，偏偏就在电影院里，一种被世界抛弃的感觉常常侵袭他，他害怕再也无法从这种感觉中走出来，找到自己的东西，于是他电影看到一半就走出去，这无非就是要逃脱开这样一些下午的噩梦。——那么他要去寻找那些点唱机，是为了像开始时一样让自己集中心思吗？——也不再是这样的情形了。在索里亚逗留的那几星期里，他已经想方设法要仔仔细细地读一读圣女大特蕾莎的著作[35]；每每伏案写作之后，他就“径

直坐到”那些不值一提的玩意儿跟前，或许会用一个有点放肆的对比来解释这样的行为：这位圣女曾经受到她那个时代之前一次信仰之争的影响。这次信仰之争16世纪初发生在两个派别之间，关系到接近上帝的方式：一派认为应当为此“集中心思”——那些所谓的recogidos[36]——通过绷紧肌肉及类似的方式，而另一派，也就是dejados [37]，被称之为“顺其自然者”或者“宿命者”，他们无为而治，任凭上帝在他们的心灵—alma—世界里任意主宰，而这位修女看来更接近听任者而不是集中心思者，这是因为，如果有人一味将自己更多地交给上帝的话，那他同时就可能被魔鬼所征服——可以说，他也就是这样坐在他的点唱机跟前，不是为了集中精力继续做下去，而是相反听之任之。他什么别的事情都不做，只是洗耳恭听那些别有洞天的点唱机里的和弦——“特别”也是因为，在一个公共场所里，他并没有遭受这些和弦的折磨，而是选择了它们，仿佛在亲自“演奏”它们——，于是在他那听之任之的内心里得以延续：当他坐在那音乐盒跟前（西班牙语：junto，心心相印）听着鲍勃·马利[38]的“救赎歌”，一个个早就没有生气的图像变得生气勃勃，浮现在眼前，只需要这样写下来就是了；伴随着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爱丽丝的“特别之夜”，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女性人物进入他正在从事的叙述里，而且一再有条不紊地拓展开来；与喝了太多酒时迥然不同，他这样倾听时记下的东西，第二天依然萦绕在耳际。也就是说，在那样的思考时刻（从来都不会发现它们带有什么意图，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桌旁——一种随意的思考，他无非看作是对比和区别），他之所以走出去，不单是为了走得越远越好，而且也走向那些点唱机酒馆。后来，他每每坐在那家点唱机曾经被手枪子弹击中过的皮条客酒吧里，或者坐在失业者咖啡屋里，那里面有为从附近精神病医院里随便跑出来的病人准备的桌子——一张张不声不响、一动不动的苍白面孔，唯独用啤酒送服药片时才会动一下——时，就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他之所以来这里，并不是因为环境的缘故，而更多是为了反复聆听《嘿，乔》和《我和鲍比·麦吉》[39]。——难道这就不意味着，他之所以去寻找那些点唱机，就像人们所说的，是要偷偷地从当下脱身吗？——也许吧。然则，事情通常截然相反：除了他这玩意儿之外，凡是还存在于周围的东西，都获得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当下性。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在那些酒馆里选择自己合适的位子，从那里既可以一览整个空间，又能够看得到外面的剪影。于是，与点唱机为伍，连同那联翩的浮想，没有那令他厌恶的观察，常常出现了一种自我升华，或者恰恰成了当下，也包括其他

那些景象。而体现在它们身上的当下性，与其说是那些引人注目或者令人大受刺激的东西，倒不如说是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哪怕只是习惯的形式或颜色。而他觉得这样升华的当下是些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比它更珍贵，更值得传承下去；这样一种当下，平时也只有在阅读一本可以唤起你思考的书里才会出现的。简单地说，一个人走来走去，一丛灌木动来动去，一辆无轨电车是黄色的，并且拐向火车站，道路交叉口形成一个三角，女招待站在门边，粉笔在台球桌边沿上，天下雨了，如此不胜枚举，那么这一一都会告诉你什么。是的，事情就是这样，当下拥有了四肢！这样一来，甚至连“我们这些玩点唱机的人”那些微不足道的习惯和那些为数不多的变化都值得引起注意了。他自己按键时常常一只手叉在腰间，并且微微倾着身子，几乎要挨上这玩意儿，而另一个人则用双手去选择，他叉开两腿，保持距离，伸展双臂，像个技术员一样，接着第三个人让自己的手指在按键上飞舞，犹如一个钢琴家，之后立刻离去，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或者待在那儿，好像在等待着一个试验结果，直到声音开始响起来（然后也许没有听下去就出门消失在街上了），或者他干脆就从桌旁呼喊着那些记得滚瓜烂熟的编号，让其他人帮他启动所点唱的全部曲目——这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在点唱机里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如同一个生灵，一种宠物：“从昨天起，它就不乐意那么顺顺当当了”，“我不知道，它今天会怎么样，它是故意为之。”——难道他真的觉得这样一个机器和另一个一样吗？——不。它们之间存在决定性的差异，就在于鲜明的厌恶和地地道道的温柔或者显而易见的恭敬之间。——面对的是一个系列产品？——面对的是上面留下的人的踪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不在乎这个机器的形式本身。在他看来，作为战争产物，点唱机也可以是木制的，或者不叫“沃利策”，而叫“音乐箱子”、“交响曲”或者“军乐”，并且拥有那样一个德国经济奇迹产物的小盒子造型，甚至彻底没有光亮，由深色和不透明的玻璃构成的，没有声响，表面上看死气沉沉的，可是你一投入硬币，那多重选择的字体就会闪烁；你一按下键去，伴随着外面黑色玻璃正面的搜索光标，从里面就开始发出嗡嗡声。在这期间，对他来说，如此举足轻重的不再是那种特别的点唱机声响，而是那不同凡响的叫唤声，因为它是如同从许多无声的深层里面发出来的，你常常只有洗耳恭听才可以听得到，他曾经这样想到，与威廉·福克纳在其小说中描写的那条“大河”一样，在那片被淹得一望无际的土地上，让人在那无声而平静的河流深处可以听到它的声音，如同“密西西比河的哗哗声”：必要时，他可以满足于挂在墙上

的盒子，因为声音从那里发出来要比从袖珍收音机里更平淡，或者更细弱。而万不得已时，在酒馆的嘈杂声中，声音变得听不见了，甚至出现了某种有节奏的空气振动，他要从中听出那个——唯一的前提——他所选择的乐曲的副歌或者仅仅是节拍，由此在他的耳朵里，从振动到振动，整个歌曲在演奏着。相反他面对那样的点唱机时很反感，因为那里所播放的歌曲不是独一无二的，也不是依照“风格”分类排列起来的，而本身是一个系列的部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贯穿整个国家，千篇一律，没有变化，由一个无名的中心规定甚或强加给各个酒馆。这样的中心，他只能想象为一种黑手党，点唱机黑手党。这样——在所有国家里，此间几乎只有这样的东西——一些系列组合没有演奏形式，只有在适应当下的前提下才有选择的可能性，人们对此已经洞察秋毫，即使它们被镶嵌进这历史悠久的沃利策模式里，显现在不再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而是预先印制好的节目单上，除了那一个个写着歌手名字和歌曲名的小牌子外，预先做好了全面而周到的准备。然而奇怪的是，他也回避那些点唱机，因为它们的节目单如同一些餐馆的菜单，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显示出唯一的个人手迹，尽管通常恰恰在这里，每个独立的唱片就像是专门为他所确定的：对他来说，一个点唱机的节目不应该体现任何意图——更何况如此高贵的——，任何专长，任何知情，任何和谐——它只需要向他表现出一片混乱不堪，连同它那令人陌生（随着岁月的逝去会越来越多）的部分，以及许许多多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曲目，其间当然愈加珍贵的是，要确切地寻找出那些此刻适合他的方式（从那漫无头绪的范围里能够找出来几个就足够了）来。而且这样的音乐盒，你可以从它们的选择面板上看得出来；机打和手写的大杂烩，特别是那些经常从曲名牌到曲名牌不断变换的手迹多种多样，一个是用墨水写的大写印刷体，下一个则是随随便便、几乎像是用女秘书的速记手法写上去的，但绝大部分不管衔接还是字母方向多么千差万别，可看样子却显得特别认真仔细一丝不苟，有些如同小孩子的字体，涂涂画画的样子，在所有那些错误百出的字迹当中却往往是拼写完全正确的（包括重音符号和连字符），而对那个相关的女招待来说，这些歌曲名无疑带有异域色彩，那纸张不是这儿就是那儿已经变黄褪色，字迹变得暗淡，难以看懂，或许也被刚写上另一个曲目的纸片盖住了，不过，透过光线，尽管已经无法辨认，却也给人一种强烈的预感。久而久之，如果仅有一个点唱机的话，那么他的第一目光越来越看重的是其选择范围，而非“它”那些用这样的笔迹所标记的唱片。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偏偏就倾听起这个点唱机，哪怕他对它之前很陌生或者

完全不熟悉。就这样，有一次，在巴黎一个郊区的北非人酒吧里，站在点唱机前（从它那地地道道的法国式统一编码牌立刻就可以看得出是黑手党提供的），他在边上发现了一个标签，手写的，字母又大又不规则，各个都像惊叹号；他选择了那首走私进来的阿拉伯歌曲，然后不断重复，并且此刻在这里还有那个悠远回荡的西迪曼苏尔[40]陪伴，那个从他沉默中清醒一会儿的酒吧侍者这么说，这是一个“特别的、不同凡响的地方”的名字，那个从他的沉默中清醒片刻的酒吧侍者这样说道。（“人们可不那么容易就能去那儿的！”）

难道这意味着，他为自己心中那些点唱机的消失，这些昔日的物品的消失，也许没有未来的复兴感到遗憾吗？

不。他只是想要在它从自己的目光中消失之前牢牢地把握住它，承认一个东西对一个人会意味着什么，而且首先是从一个单纯的东西里会散发出什么来。——萨尔茨堡城边一个体育场的客栈。外面。一个明亮的夏夜。那台点唱机立在露天，在敞开的门旁。露台上一张张桌旁坐满形形色色的客人，荷兰人，英国人，西班牙人，他们用各自的语言在聊天，因为这个酒馆也招揽相邻的机场前露营地的客人。那是80年代初，这机场还不叫“萨尔茨堡机场”，最后一个航班在太阳落山时降落。在露台和体育场之间全是白桦和杨树，在暖融融的空气中，树叶在那深黄色的天空前不停地颤动着。在一张桌前坐着当地人，“马克斯格兰工人体育运动俱乐部”的会员和他们的妻子。那个当时尚属于奥地利乙级联赛的球队，下午又输掉了一场比赛，也许会降级了。可是这天晚上，这些同心一意的人谈论着，而酒吧间的小窗旁总是人来人往——从帐篷里来来去去——，也有一次是从树丛里来的。他们同时看着那些树：它们如今长得多么高大，多么挺拔啊。他们，也就是这些协会成员，当年共同亲手把这些小苗苗从那边黑沼地里挖出来，一排排地移栽到这里的棕色黏土上！这天晚上，外面的点唱机反复把那首歌播放到渐渐变得昏暗的大地上，间歇中伴随着树叶的唰唰声和沙沙声，弥漫着各种和谐的声音。这首歌是海伦·施奈德[41]用富有活力的声音演唱的，名叫《盛夏夜》。与此同时，酒馆里面空空如也，白色的窗帘迎风飘进敞开的窗户。然后有个人却坐在一个角落里，一个年轻女子，无声地哭泣着。——多年之后。一家酒店，一家gostilna [42]，坐落在南斯拉夫喀斯特地区一个圆形山包上，远离从斯坦尼基（或者桑丹尼勒德卡索）通往公路的干道。里面。一台巨大的老式点唱机立在柜子旁，就在通往洗手间的道上。透过窗户玻

璃，可以看到唱片圈和唱盘。要使之运转起来，不是投硬币，而是筹码，光按键也不行——只有一个键——，而是之前需要转动刻度盘，直到你想要的编号与刻度线相吻合。机械臂随后将唱片优雅地放上去，可以与一个非常彬彬有礼的侍者端上菜肴时肘部弯曲的姿态媲美。这家gostilna很宽敞，有好多空间，在这个早秋的夜晚——外面从北部山区掠过这片高原的Burja或者Bora [43]丝毫没有减弱——坐得满满的，几乎全是年轻人：来自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的许多班级的学生举行毕业联欢；在这里他们第一次相聚好几天。喀斯特火车那特有的信号由山岩向上顺风传过来，拖着一个山间渡轮般沉重的鸣响。在那张司空见惯的铁托画像对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陌生人的画像，同样是彩色的，不过要大得多：这是当年那个店主的画像，他自杀了；他的太太说，他不是本地人（即使是从那个最近的山谷村子来的）。这天夜晚反复回响在大厅里的那首歌被当作一首充满自信的、同时天真烂漫的、甚至在一个民族的想象中可以伴舞的齐唱来歌唱；这些学生一个接一个地按着键钮。作为重唱句，它仅有一个词："南斯拉夫！"——多年后又一次。又是一个夏日的夜晚，还是在黄昏前，这次是在意大利这边的喀斯特地段，更准确地说，就在很久以前从海里抬升起来的石灰山包到没有岩石的低地平原的边界上，这里的标志就是蒙法尔科火车站的轨道：铁轨那边立刻就是缓缓上升为高原的石头荒漠，这段铁路被一片小松林遮挡着——这边是车站大楼，掩映在截然不同的雪松、棕榈、悬铃木和杜鹃花等各种植物之中，也包括与之相关的水，龙头无忧无虑地大开着，从站台喷泉里喷涌而出。那台点唱机就立在酒吧里，在白天酷热之后敞开的窗户下面；门也大开着，向外看去就是轨道区。除此之外，这家酒馆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寥寥无几的家具已经被推到边上，而且擦拭得干干净净。在那湿漉漉的水磨石地面上映现出点唱机的光亮，一种伴随着地面变干而慢慢消失的光芒。酒吧女招待的脸十分苍白地映现在窗户里，恰恰与那对正在外面等待的旅行者晒成古铜色的面目形成鲜明的反差。在的里雅斯特开往威尼斯的快车发出后，这座楼看上去空空如也；只有两个半大小子在板凳上闹腾着相互扭打在一起，火车站成了他们此刻玩耍的地方。夜蛾已经从那边喀斯特松树之间的昏暗中嗡嗡飞来。一列长长的封闭货车丁零当啷开过去，车厢外面那唯一闪亮的东西就是随着其系绳而飘动的小封铅。伴随着接下来的寂静——这是最后归去的燕子和最早飞出的蝙蝠之间的时刻——，那点唱机的声音开始在这个地方响起。那两个年轻人依然继续扭打了一会儿。有两个官员从他们的办公室走

到站台上，不是来听点唱机的，或许更多是巧合吧，从候车室里走来一个清洁女工。突然间，在这个区域到处都出现了直到此刻被忽视的身影。在黄杨树旁的板凳上睡着一个人。在厕所后面的草地上有一大队士兵安营扎寨，看不到任何行李。在开往乌迪内[44]的站台上，有一个强壮的黑人靠在一根柱子上，同样没有行李，只穿着衬衣和裤子，埋头在看一本书。从后面郁郁葱葱的松林间，有一对鸽子在空中盘旋，一只紧跟着另一只。看样子，仿佛它们在这里都不是过客，而是火车站地区的常住居民似的。火车站的中心就是喷泉，饮用水从中哗哗地喷出，在微风中泛起涟漪，并且四处喷溅，在周围的沥青路面上留下了许多湿漉漉的脚印，这个最后喝水的人此刻十分鲜明地把自己的脚印融入其中。稍远一点，沿着轨道，可以走路过去，映入眼帘的就是那条地下喀斯特河，名叫蒂马莫，形成三条支流，而在维吉尔时代，根据《埃涅阿斯纪》记载有九条；它很快就变得宽阔，然后流入地中海。点唱机此刻播放的那首歌吟咏的是一个年轻女子的信，她背井离乡，流落远方，远离所有熟悉和梦寐以求的东西，她此时此刻就是一个无所畏惧的、或许也是悲伤的惊奇，米雪尔·夏克那柔美的唱腔响彻在蒙法尔科内[45]火车站区的夜晚里，这首歌名叫《安克雷奇，阿拉斯加》。

在索里亚的几周里，他有时候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所思考："我干我的事情。它适合我。"此外有一次，我想到了那"我有时间"的日子，没有任何习以为常的别有用心，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想法。喀斯特高原上几乎每天都下雨刮风，他用铅笔将窗帘固定在窗缝里。那喧嚣声越来越折磨着他。下面厨房门口从刮鱼鳞变成了每天肢解动物，用斧头砍，各种各样的动物，外面山坡草地上那条条如此蜿蜒崎岖的道路成为摩托车越野的路段。（他听说，索里亚甚至申请举办欧洲锦标赛。）他在电视里看过这项运动，那些弹跳到空中的英雄犹如录像中的游戏角色，是些值得钦佩的人物。但此刻坐在桌旁，一只大黄蜂冲着他的脑袋嗡嗡叫，他觉得相比之下是一种惬意。他一再从旅途上精神抖擞地——他独有的精神抖擞——回到工作上，立刻又在这嘈杂中丧失殆尽。这喧嚣声不仅仅是片刻破坏了什么，而且是永远。令人忧虑的是，他此间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开始蔑视一种像他感受图像并且相应付诸话语一样的活动，因为它需要那么多的孤独。另一方面，他在寂静中确实时而迷失过，而且他刚刚才从软弱——怀疑，更多是无望——中彻底解脱出来了，变得强大了，无视环境，开始自己的行动。他每天都要绕道从圣多明各教堂正面走过——不，与后面那

些新建筑相比，那不是正面。宁静从中弥漫出来，他只需要去接受它。令人惊奇的是那些雕像故事的叙事方式：夏娃被上帝带到亚当面前的同时就已经和她的男人背靠背站着，他在下一个场景里仰望着智慧之树，耶稣复活的消息是由人群中一个女人传给那些排成长队的人中排在头一个的使徒，与此同时继续向后传下去，从他们说话的身体姿势就可以看得出来；唯有最后一个一动不动，好像对此还一无所知。在工作前他小步走路，接着迈起大步，不是出于胜利的感觉，而是因为他头昏目眩。爬山会使他更深地呼吸，更清醒地思考，只是不能坡度太陡，否则他就觉得那些思考变得太激烈。同样他宁可逆流而上，也不愿意顺水而行，这有点迎上前去的架势，而且带着从中而来的能量。如果他要摆脱冥思苦想的话，那么就走在那条废弃的索里亚——布鲁克斯铁道枕木上，或者更远地走到城外，来到黑暗中，那里他每走一步都得非常当心。当他之后从草原的昏暗中回到大街上时，由于刚才摸索行进，他变得如此紧张，以至于他要在圣多明各的人物塑像前放松自己，揉一揉那僵硬的面孔。他重复着自己的路，只是每天增添一点变化而已；与此同时，他觉得好像所有其他的路也在等待着他去走似的。在安东尼奥·马查多林荫道旁，到处是多年堆积的纸巾和避孕套。白天里，这些草原上除了他的身影，几乎只有年老的男人忙来忙去，常常是孤零零一个人，穿着磨坏的鞋子；他们擤鼻涕之前，不厌其烦地将折叠好的纸巾掏出来抖一抖。在工作之前，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至少要向他们中的一位打招呼，也打算得到回应；要是他经历不到这样微笑的瞬间，他就不想进自己的房间；有时候，他甚至特意停住步子，要让人家超过他，就是为了说声“嗨！”和互相点点头。他之前还要每天坐在索里亚中心酒吧一扇大窗户前，借助词典读报纸。LIavero是“钥匙串”：一个女子举起一串钥匙参加布拉格的游行；dedo pulgar是拇指：美国总统将拇指指向空中，示意巴拿马的血腥之行取得成功；puerta giratoria是旋转门（通过它，塞缪尔·贝克特当年走进了巴黎的“丁香园咖啡馆”）。关于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的消息[46]，他不是带着心满意足的感觉拜读的，而是面对历史怀着一种古老而复苏的恐惧。无论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他都继续在泰奥弗拉斯托斯的《品格论》中寻找答案，而且喜欢上他们之中的许多，至少他们的一些特征——他也许把这些看成自己的——；他觉得他们的弱点和愚蠢是所有孤独人的标志，他们与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与希腊城邦格格不入，但为了以某种方式属于其中的一员，他们鼓起绝望的勇气玩起可笑的游戏；如果他们过分热心，格外青春，夸

夸其谈，或者十分显而易见，总是充当那些“不合时宜的人们”的话，常常随之而来的不过是，他们在其他人之中，也包括他们的孩子和奴隶，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其间，他抬起头来，通过窗户望着外面一棵悬铃木——依然挂着稀疏的树叶——，旁边是一棵已经光秃秃的山槭，上面卧着一群像蓓蕾似的麻雀，反而几乎可以高枕无忧，除非刮起狂风，那么安静，仿佛那些就在旁边摆动着、飞舞着、晃来晃去的锯齿树叶更像鸟儿似的。到了下面那座跨河的桥跟前，他对这个地方有了极为强烈的感受，与其说是面对那些石拱和那浑浊而缓缓流去的冬天河水，倒不如说是因为桥顶上那块牌子：杜罗河。桥头有一家酒吧叫“Alegria del Puente”，意思是：桥的快乐。他一看到这牌子，马上就绕弯儿四处转转，然后走进去。这里的河岸斜坡不是赤裸裸的岩石，而是从泥土里冲刷出了磨成圆形的冰川石块。远在外面那片荒原上的城墙残垣旁，多少世纪的风吹在那些黄色的沙石上留下了纵横交错的沟纹，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图案，他看到马约尔广场旁几座古老的宫殿就坐落在自然凝结的卵石基座上，沉降在昔日那些冰川湖底上。路过时能够通过浮光掠影稍微领略一下这片大地，他了解到，在西班牙，地理曾经长期是历史的仆从，那些征服和划定边界的仆从，直到现在才更多地重视“各个地方的信息”。有时候，偏偏在冬天里，色彩才有生机。天空烟雾弥漫时，下面的垦荒地却郁郁葱葱，连穿过废墟地区的小径也呈现出青苔绿。在其他一切都早已黯然无光时，野蔷薇灌木则形成了亮红色的虹。一对喜鹊叽叽喳喳地飞起来，它们的翅膀又一次在空中闪亮，犹如快速旋转的车轮。在这个没有下雨的日子里，扬起的灰尘围绕着这座城市飘扬，他预感到这里的夏天就要来到。云彩的影子掠过光秃秃的高原，好像从它的怀抱里撕裂出来似的——看样子，仿佛云彩的影子虽然到处都是，可喀斯特地区这儿才是它们的故乡。一天清早，一丝风也没有，在明媚的阳光下，第一次清晰地看到在皑皑白雪之中北边和东边的山脉，尽管这两条山脉相距甚远，可他却看到那熠熠发光的山坡被云影罩得斑驳，光影一动不动，一丝风也没有。他的思绪如此沉浸在那皑皑白雪之中，因而在房门前不由自主地拍打起鞋上的雪。有几个夜晚，当他在外面摸索着穿过荒野时，夜空间或也晴朗无云（他特地把自己打发到那里），而且随之让人感到更加惊奇的是，北河二星和北河三星之间保持着兄弟般的距离，金星闪烁着，毕宿五星闪耀着阿拉伯式的色彩，仙后座的W字形远远地伸开双腿，大熊星座折断了它的弯斧，在猎户前逃跑中的天兔径直朝苍穹冲去。银河和它那无数的三角洲分支是宇宙初次闪耀的白茫茫的映像。他12月在索里亚逗留期间，极少拥有这种

“时间漫长”的感觉：就在写作的第一天之后，他望着下面的河流思绪万千：“它就在眼前，那条古老的杜罗河！”；他觉得，当他有一个周末错过了那次途经里约酒吧的环游后，后来站在它那小小的铁炉前，他好像“已经好久好久再也没有”拜访过这个灰色的圆柱体了；他心想着，他到达这里还不过一个礼拜，就绕来绕去地走过公共汽车总站：“我当时在这里拖着箱子走进雨中！”在暴风骤雨中，下面的荒草地里有一只蟾蜍笨拙地爬行着。悬铃木的树叶落下前，叶茎先折断了，散开来，像流苏似的旋转着。在那泥泞的园子里，那只公鸡抖动着它的尾羽，因为那里散落着还未成熟的西红柿可以吃，或者那是风的缘故？他的象征动物当然是那些狗；他晚上看到它们拖着三条腿，一瘸一拐地找不到回家的路：他走了一天路后，通常也感到膝盖弯曲，难以支撑。有一次，据报纸说，索里亚不是西班牙最冷的城市，他感到很失落。有人在主街上扛着一盆红艳艳的圣诞花，上面是那绿油油的、还没有掉落的、始终湿漉漉的悬铃木树叶；在那几个星期里，根部低洼的积水没有干涸过。迷雾灰蒙蒙的，使得那许多孕育着食叶蛾虫的白茧从山松里更张狂地钻出来。圣诞节这一天，雨下得特别大，在习以为常地穿越城区时，除了他，街上只出现了一只麻雀。后来，从那座省城监狱里走出一个矮小的女人和她高大的儿子，没有打伞。他们穿过那泥泞的原野，前往一座搭建在那里的临时板房。他想象着，他们或许刚才在那高墙深院里看望了他们的亲属，一个绝食的巴斯克人[47]，然后在这里宿营，直到他被释放。到了晚上，雨帘中突然有一道闪光，重重地击中他的额头和下巴，当他看去时，一辆车顶映出白光的轿车从外地开过来，夜色中天空纷纷扬扬地飘下雪花来：“下雪了！”他心想着，不由自主地用西班牙语说出第一句话。从一家酒吧里传来了响声，不是那司空见惯的吉普赛人的无望之声，快乐，自信，带着使者的表情，一首弗拉明戈歌曲，他心想着：这终于是恰当的方式了——唱的不是“Christmas”，更多的是“Navidad”[48]，也就是“降生”；一个牧人如此叙述着他在那个神圣的夜晚所经历过的一切，他的叙述自然也是歌舞。和世界各地一样，他在这里也看到过路人，只要一开始滴雨，他们就撑开了随时备用的伞，而且时髦也渗透到梅塞塔[49]，年轻的姑娘们踏入酒馆时也把头发吹向额头两边。狂风在杜罗河旁的杨树林里呼啸，犹如飞机起飞时的轰鸣（这样的轰鸣在这座城市上空真的几乎从来都听不到）。一只大母鸡十分体贴地给一只小公鸡清理着鸡冠，小公鸡一条腿站在污秽中。一棵光秃秃的杏树上，个别树枝上已经长出了白色的花蕾。他从

自己那熟悉的环境中所看到的种种弊端，也存在于他自身之中，绝大部分都远离这里，如同他又一次放下自己的工作，有了生存的感觉，可是久而久之，一种他在索里亚认识到的生存感觉是不会从不存在的东西中产生的。树根上结了霜，它们将一条纹路分成了阶梯状。有一次，他坐在桌前时，外面什么东西爆炸了，他以为是寺院的钟声。

最后，他相信自己几乎已经走遍了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他记得这些“角落”，仿佛那都是些单词）。也许他进入过上百家房屋，因为伴随着一丝不苟的漫游可以证实，在这个小小的索里亚有上百家酒吧，坐落在一条条偏僻的小巷里，往往没有酒馆招牌，这样的情形在西班牙各地比比皆 是，初来乍到难以看得出来，只有当地人熟悉——仿佛专门为他们保留着。他总是在墙上，也就是在狩猎季节的公告和斗牛士画像旁边发现安东尼奥·马查多的诗歌，也有用作挂历的，又有几首被涂得乱七八糟，甚至有一首被画上一个卍字。然而，在他看来，这并非出于那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是因为它们表现的是大自然，无论如何那些被选作墙饰的是如此。令人惊叹的是，只有小伙子出入的酒吧虽多，但老人专属的酒吧甚至更多，也毫不含糊地禁止其他人进入（角落里有一张专门为那些老妇人准备的桌子）：从表面上看，存在着一种比任何政治派别更强烈的区别。这个省的绝大部分退休人员都在首府这里颐养天年；他们在自己的酒吧里不打牌时，就独自静静地坐在桌旁，或者翻来找去，不停地在这些空间里探寻着什么东西。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也包括他这个异乡人：他们个个都把冬日的双手放在柜台上，同样苍白，而在路灯的照耀下，外面比如说在一面混凝土墙上显现出钢脚手架倒塌时留下的刮痕；他当时来到这里时，有两个路人被砸死了。

除了他对这些显得如此千篇一律的地方的变化感兴趣外，驱使他的还有，就是要在索里亚找到一台点唱机，首先大概又是出于强迫，可是后来越来越自觉自愿，因为现在似乎正是寻找自己这玩意儿的最佳时刻：工作，冬天，大雨中经过长途跋涉之后的那一个个夜晚。有一次，已经到了外面很远的地方，在通往巴利亚多利德[50]的公路旁，他听到从那儿的街头酒吧里传来一个深沉的声音，这无非来自拥有魔鬼宫站的弹球机；在一个加油站酒吧里，他看到了“沃利策”标牌——贴在一个自动售烟机上；在索里亚的市区一座破败不堪的、周围只有废墟瓦砾的房子里，他在那家贴着安达卢西亚式瓷砖的酒吧里瞥见了一个非常古老的马可尼机器的选择盘，它就是点唱机的前身，纯

粹作为墙饰；唯一有一次，他在索里亚看到了自己的目标，是在“君王”电影院上演的一部英语电影里，那是60年代初：它片刻间出现在那儿，在后室里，当时男主人公在去卫生间的通道上从旁边经过。对他来说，那个在西班牙唯一尚在运转的点唱机来自安达卢西亚的利纳雷斯。而且当时正值春天，他急需要有这样一个玩意儿：工作，复活节周的怒号。那个点唱机，他是在出发前不久才偶然碰到的，他早就放弃了寻找，它却在一条小巷的半地下酒吧里给了他一个惊喜。一个仅有储藏室大小的酒吧，没有窗户，只有门。不定期地开门，就是开门，也只是晚上，可是招牌也常常不亮——你要在门口看一看，是否有可能破例在营业。店主是个年迈的男人（只有客人来，才会把主灯打开），大多时候与点唱机相依为命。这个点唱机很特别，所有的选择牌都是空的，就像一座高楼下面的门铃牌，上面一个名字也没有；看样子，整个酒馆好像歇业了；这条空白带的上头只有字母-编号组合。可是取而代之的是，墙上到处横七竖八，直到天花板上，贴满唱片盒，标题是手写的，都是相关的密码，那么当这个自动点唱机根据需要打开以后，那个所期待的唱片——这个好像被清空的玩意儿的腹部原来似乎装得满满的——才能够运转起来。突然间这么多空间，伴随着钢体深处那单调的隆隆声，在这个小小的掩体里，那么多的安静在这个地方弥漫开来，在这种西班牙式的喧嚣中，在这种自我的喧嚣中。这是在利纳雷斯的塞万提斯街上，对面就是那家正在营业的电影院，连同“Estreno”，也就是首映字迹残余部分，遍地都是报纸团，装着栅栏的前室里到处可以看见老鼠。那时，城外的荒原上，那些倔强的草原野菊竞相吐艳，三十多年过去了，在利纳雷斯的竞技场上，被叫作马诺莱特的马努埃尔·罗德里格斯[51]命丧在一头公牛的角下。在那个名叫“El Escudo”，也就是“徽章”酒馆下面几步远的地方，是利纳雷斯的中餐馆，有时候对这个外来者来说，是一个类似的宁静之地，就像点唱机一样。后来在索里亚，令人惊讶的是，他也偶尔发现了一家好像隐藏起来的中餐馆，它看上去没有营业，但门却打开了，当他走进去时，那些大红灯笼都跟着亮起来。这天晚上，他始终是餐馆唯一的客人。他在这座城里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这个亚洲家庭，他们坐在那长长的角桌旁吃饭，然后消失在厨房里。唯有那个女孩留下来，默默无声地服务着他。墙上到处都挂着长城画，酒馆也由此而得名。好奇怪，仿佛当你把瓷调羹沉入那深色的浓汤碗里时，豆芽就探出一顶顶闪亮的脑袋来，在这片喀斯特高原上，一切都如一部动画电影里的种种形象。而与此同时，在夜里的风暴中，杨树枝条在窗前

咔嚓作响。那个年轻姑娘无事可做，便在隔壁桌前在一个本子上写着汉字，密密麻麻的，字迹要比他在这几个星期里写的工整（自从他忙于写作以来，常把笔记本带到室外，不仅仅是风暴和雨水，还有昏暗的光线把字迹弄得如此走样），他一边持续地观望着她，因为在这个地区，在这个西班牙，她肯定比他要陌生得多，一边惊奇地感觉到，他现在才真的从自己所来的地方出发了。

试论成功的日子——一个冬天的白日梦

陈民　译

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

——《罗马书》，14章6节

冬日：马背上冻住了影子。

——日本“俳圣”松尾芭蕉

画家威廉·贺加斯[52]的自画像，在伦敦，18世纪的一个瞬间，还有一块调色板，上面分成两部分，大约在中间，一条柔和的弧线，可谓“美丽优雅的线条”。书桌上放着博登湖岸边一块扁平而磨圆的石头。在这块昏暗的花岗石里，有一条灰白色的岩脉形成对角线，上面呈现出一条精美而纤巧的曲线，正好在恰当的时刻偏离开直线；岩脉将这块砾石既划分为两半又合拢在一起。在巴黎西部塞纳河丘陵之间那次乘坐郊区火车的途中，在那天下午那个时刻，由于清晨动身时的新鲜空气和自然光线已经消耗殆尽，就不再有什么是自然的了，只有夜晚慢慢临近，也许吧，可以帮着你从白天的困境中解脱出来，那么轨道突然偏离，形成一条长长的弧线，十分罕见，令人惊奇，高高地在整个城市的上方，又突然在河谷低地上自由地伸展开来，也包括它那些似真似幻的标志，高高地耸立在大约从圣克洛德到叙雷纳之间的高空上，一条多么让人始料不及的曲线，从隘口穿出来，一天的进程流逝在从睫毛凝滞到睫毛抖动的过渡瞬间里，重新获得了方向，那个几乎已经被搁置的“成功的日子”的念头又复燃了，伴随着那种让人热血沸腾的激情，再次试图去描述，或者枚举，或者叙述这样一个日子的点点滴滴和种种问题。威廉·贺加斯调色板上那“美丽优雅的线条”好像真正要为自己开辟一条通向那奇形怪状的色彩的道路，看上去被埋没在这些色彩之间，同时好像投下了一条阴影。

谁曾经历过一个成功的日子呢？绝大多数人首先也许会这样谈论起自己来。那么就有必要追问下去。你指的是“成功”还是单纯的“美好”呢？你说的是一个“成功的”日子，还是一个——事实上同样罕见的——“无忧无虑的”日子呢？对于你来说，一个成功的日子仅仅就是毫无问题的日子吗？你看到幸福的一天和那个成功的日子之间的区别吗？依靠回忆谈起这个和那个成功的日子，或者现在立刻，之后直接，没有时间间隔的转化，在这一天的晚上，同样也不会存在什么“完成了”或者“度过了”作为它的修饰词，只有“成功了”，这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吗？那么在你看来，这个成功的日子与一个无忧无虑的日子、一个幸福的日子、一个充实的日子、一个没有虚度的日子、一个熬过去的日子、一个被长久的历史美化的日子——一个具体的东西就足以了，而一整天却在荣耀中飘飘然——，以及与任何一个对科学、对你的祖国，对我们的民族，对地球上各个民族，对人类而言的伟大的日子迥然不同吗？（此外：观看——向上看——，那儿高处的树上那只鸟儿的轮廓；对此在保罗的信中[53]，希腊语“阅读”这个动词得到原原本本的翻译，似乎就是“向上-看”，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向上**-感知”，“**向上**-认识”，一个没有特殊命令式的词已经成为一种要求或者呼唤；而且还有南美洲丛林里那些蜂鸟，它们离开自己的栖息树时，为了迷惑凶猛的秃鹫，便模仿着树叶掉落时的晃动……）——是的，这个成功的日子对我来说和其他所有人不一样；它对我则**意味着**更多。这个成功的日子意味着更多。它远远超越了一个“成功的言论”、一步“成功的棋”（甚至一盘完美而成功的比赛）、“冬天里成功的首次登高”；它不同于一次“成功的逃跑”、一次“成功的手术”、一个“成功的关系”，不同于任何一个“成功的事情”；它也与成功的一笔勾画或者句子毫不相干，甚至跟那首“经过一生的等待之后就在一个唯一的时刻取得成功的诗歌”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成功的日子是无可比拟的。它是独一无二的。

单个日子的成功能够成为谈论的对象（或者指责的对象），这是不是和我们这个特殊的时代有关呢？你想一想，先前曾经更多是对那个真正被捕捉到的“瞬间”的信仰在起作用，因为它自然可以代表“整个伟大的人生”。信仰？想象？思想？无论怎么说，昔日毕竟有

什么东西起了作用，不管是在品都斯山脉上放羊，还是在雅典卫城下四处徜徉，或者在阿卡狄亚石头高原上分层堆砌堡垒，就像这样一个成功的瞬间或者时间微粒的神灵，当然是一个对此既不存在图像，也不存在故事的神灵，与希腊诸神灵截然不同：这个神圣的时刻本身时时在创造着自己迥然不同的图像，并且同时在叙述着自己，此刻，此刻，还是此刻，叙述着那个“Kairos”[54]，作为故事，而且那个瞬间神灵当时无疑比所有表面上永恒不变的神灵形象更强大——始终是当下，始终存在，始终发挥作用。但是它最终也被剥夺了权力——或者？谁知道？——，你们“此刻！”的神灵（和一双眼睛这样彼此相遇的神灵，和这片刚才还无形无状的、此刻却获得了形象的天空的神灵，和那块模糊不清的、却如此突然地闪烁着绚丽色彩的石头的神灵，等等），从这个随之而来的信仰——事实上现在既不再是想象，也不再是思想，而是“由爱而生”的信仰——相信新的创世是各个瞬间和时间的实现，通过上帝之子入世、死亡和复活，由此而相信那所谓的永恒；一个福音，它的宣布者一方面自己这样说，它不再是按照人的规范，而另一方面，那些相信它的人在哲学那纯粹的瞬间得以超越，恐怕会如愿以偿地相信万古永世，甚至达到宗教的永恒。消解了瞬间的神灵和永恒的神灵，尽管没有使两者失去作用的热情，但随之而来的阶段是第三种力量，一种纯粹此岸的、完全世俗的力量，它——你们的时间崇拜，古希腊人，你们的天堂幸福，你们这些基督徒和穆斯林，这些对我来说会意味着什么——寄希望于其间某种东西，我的此岸的成功，那个别成功的人生时刻。信仰？梦想？幻想？最多无疑是一种幻想，至少在这个阶段的初始是如此：那些从无论什么信仰之中认清了任何概念的人；一种无所畏惧的白日梦。由于超越我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思考，所以我将会尽我人生之所能。于是这第三种力量的时间在言语和行动中过去就是最高级的时间，赫拉克勒斯工作的时间，世界运动的时间。“过去是”？这意味着它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不，关于一个通过勤勉而成功的整个人生的思想，当然会继续产生作用，而且永无止境。只是在这期间，好像对此几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先驱者的那些史诗和冒险小说已经叙述过了，因为他们坚定不移地牢记着关于生存行为的最初梦想，并且也为那些当今要成功的生存提供了楷模——每次都是那些熟悉的模式的变化：“种棵树，造个孩子，写本书”——在这件事上可以叙述的，至多还可以找到为数不多的、小小的变体或者杂文。顺便说一说，比如一个年轻男子，刚满三十岁，娶了一个他确信一生一世会爱到底的女子。

他是郊区一所小学校里的老师，时而也会给学校的月刊写些戏剧和电影评论，对未来也没有什么别的打算（不栽树，不写书，不要孩子）；他当着自己亲朋好友的面，眼睛里闪烁着节日般的喜悦，突然说道，并且斩钉截铁，他觉得自己的一生是成功的，并不是年满三十岁时才这样说，而是在最近这几个生日时都如此（更为罕见的自然是那句法语原文，“j’ai réussi ma vie”——“我经受住了人生的考验”？“把握住了”？）。难道在这位同时代人身上，那个时代对成功人生的幻想依然在起作用吗？或者这又是一种信仰呢？这个句子已经讲出来很久了，但在现在的想象中，无论那个男子从此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只要有来访者提问，他恐怕只会自然而然地重复。就是信仰。什么样的信仰呢？——从这个年轻的“成功人生”中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难道你想要以此来暗示，你所谓成功的日子和那些成功的人生并不相同，如今比起赤裸裸的杂文或者抄本或者讽刺式的改写来，会有更多新的东西吗？难道这里涉及的是什么与罗马黄金时代的座右铭如此不同的东西吗？就是那个“carpe diem”[55]，两千年之后，如今它似乎同样可以用作葡萄酒商标、T恤衫上的标签或者夜总会的名字。（又一次取决于你怎样去翻译它：“珍惜每一天”——就像这个充满行动的世纪所理解的——？“收获每一天”——这一天因此会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的、富有裨益的瞬间——？或者“让每一天硕果累累”——贺拉斯这句古老的箴言突然看上去真的很接近我现在的问题——？）那么这个成功的日子到底是什么——因为你直到现在一味试图要搞明白它不是什么——呢？而你不断地偏离主题，绕来绕去，繁文缛节，无止境地犹豫不决，哪怕是开始出现一丝的飞跃便立刻又中断了，没完没了地从头开始，可那条美丽优雅的线条在哪儿呢？如同你曾暗示过的，它表现的是那个成功的日子；之后又信誓旦旦，它要引导这试论成功的日子。你什么时候才会不在那些外围圈子里迟疑不决地绕来绕去，不在这样一个显得更加空洞的事情上颤颤抖抖地划来划去，终于一句一句地开始着手进行那如此简单而锋利的剪接，穿过那混乱不堪而进入叙述呢？这样一来，你那模糊不清的“成功的日子”便可以开始清晰地变成为一种形式的普遍性。你是怎样想象这样一个日子的？向我勾画出第一幅图像，向我描述对此的种种图像吧！

叙述这个成功的日子吧！让我感受这个成功的日子在舞动。为我这个成功的日子唱赞歌吧！

真的有一首歌，它可能就叫这个名字。是我喜爱的歌手范·莫里森唱的（或者是另一个歌手），事实上不是这个名字，它的名字出自美国一个很小的、通常也无人问津的地方，并且叙述的是一个周日的汽车旅行，是的，种种图像——在这周日里，这天的成功好像比在其他所有的日子都更加困难——，有两个人，无疑和一个女人一起，以我们-形式（以这种形式，这天的成功比起孤影相伴来是一个更大的事件）：在山里钓鱼，继续行驶，买周日报纸，继续行驶，来些点心，继续行驶，你的头发在闪光，夜晚到达，最后一句大约是这样："为什么不能每天都像这个日子呢？"这是一首非常短的歌曲，也许是有史以来最短的歌曲，持续正好一分钟，唱这首歌的人是一个差不多上了年纪的男人，脑袋上仅剩下几缕头发，叙述着这个日子，与其说在歌唱，倒不如说在讲述，可以说没有歌唱，没有声响，没有音调，仿佛过路时的喃喃自语，同时却发自一个铿锵有力的胸腔里，而在最大可能延伸的那一刻突然中断了。

也许那个美丽优雅的线条——可是"grace"[56]恐怕也可以翻译成别的东西吧？——现在几乎不会再获得像18世纪贺加斯所用的那样柔和飘逸的曲线，因为那个时代不言而喻地号称为地地道道的尘世，无论如何在富裕而自治的英国是如此。难道它现在不适合我们这样的人，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形象一再中断，陷入结结巴巴、吞吞吐吐、无声无息、沉默不语，从头开始，另辟蹊径——但最终却一如既往地瞄准一种统一和什么整体吗？这样不就像到了20世纪末的今天，适合我们的，与其说是任何有关永恒或者完满成功的人生思想，倒不如说是那些有关个别成功的日子的思想在发挥作用，当然不仅仅在"现在就是现在"这个意义上，更加不是在"干脆无忧无虑地过日子"这个意义上，而是特别抱有希望——不，渴望——不，需要——，在探讨那一个时间空间各个要素的同时，要为一个更大的、一个越来越大的、直到那个大到极致的时间空间预想出一个楷模吗？因为我那无忧无虑的生存在所有那些迄今的时间-思想悄然离开之后，现在一天又一天，

没有规矩（尽管只是要放弃什么样的生存），没有关联（和你，和这个路人），没有丝毫的把握（今天这个快乐的时刻明天或者什么时候就会再现），在年轻时可以忍受，有时甚至由无忧无虑陪伴（引导？），在这期间越来越经常地转变为困境，并且随着岁月的流逝上升为愤怒。由于这种愤怒与青年时代不同，既不会针对上天，也不会针对当下的尘世状况，同样也不会针对任何第三者，所以我就向自己宣泄怒火。该死的，为什么我不再看到我们有什么共同之处呢？该死的，为什么我觉得下午三点钟那条狭路上的灯光，铁轨上火车的咣当声，还有你的脸都不再是它，今天早上毕竟还是的，而且在遥远的未来依然是的事件呢？该死的，为什么我与那日益衰老的熟悉图像截然相反，比任何时候都难以抓住那一天天的生存瞬间，领会并珍惜它们呢？该死的，为什么我彻彻底底心不在焉呢？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顺便看看吧，外面那双运动鞋，要晾干，放在山墙房子的顶层窗台上，是邻居半大小子的，我们昨晚在郊区广场的泛光灯下看到他正在拉扯针织紧身衣缝呢，当时他在等着传球。）

因此，对你和现在来说，继那些有关成功的瞬间、永远成功或者一次成功的人生的思想之后，这个成功的日子的思想会被看成仿佛是第四种力量？那么它催促你赋予这个成功的日子以魅力，这种魅力不会悄然逝去，而是无论你明天遭遇什么，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持久存在？于是又到了要提问的时刻：你是怎么具体地想象这种成功的日子呢？

我对这个成功的日子没有什么具体的想象，一点都没有。只有那个思想，这也让我几乎不抱希望，使一个可以辨认的轮廓成为图像，让这个图案透射出光芒，追寻那本原的光的踪迹——简单而纯粹地叙述我的日子，如同我开始所梦寐以求的。因为只有这个思想存在，所以叙述也就只能涉及它。“我想给你叙述一个思想。”可是一个思想——它怎么可以叙述呢？这让人为之一震（人们一再指责我这个词的“丑陋”，可是它又无法被别的词所替代）。变得明亮了？变得宽广了？触动了我？颤动？吹起热乎乎的风？变得清晰？这一天结束时又明白了？不，这个思想，它拒绝我叙述的渴望。它不给我展现任何可

以逃避的图像。尽管如此，它却是真实的，比任何一个图像或者想象都要真实，因为有了它，身体所有那些涣散的感觉才汇聚成能量。思想则意味着：没有图像，只有光明。是的，这个思想不是对某些童年美好岁月的回想，而是无可比拟地预先映照着未来。事情就是这样，如果说可以叙述的话，那么就用将来时态，是未来的叙事，比如："在这个成功的日子里，你将会又一次在这天明白过来。它将会使我为之一震，为之再震：超越我，彻底进入我的内心。在这个成功的日子结束之时，我将会硬着头皮说，我理所当然地活了一生——如此硬着头皮，它将会成为我天性的对立面。"是的，这个思想涉及的不是那些童年的日子，那些从前的日子，而更多的是一个成年的日子，一个未来的日子，它的确是一个行动，它在行动着——影响着——超越那简单的未来，是应有的形式，范·莫里森的一首歌似乎就可以采用这样的形式翻译如下："在这个成功的日子里，卡兹奇山就应当是卡兹奇山，拐进停车场就应当是拐进停车场，周日报纸就应当是周日报纸，夜晚降临就应当是夜晚降临，你的光芒在我身边就应当……"只是不言而喻：怎样实现这样的东西呢？为此我自己的舞动就足以了，或者不用"Anmut"，不用"Grazie"[57]来替代"grace"，而应当特别称之为"仁慈"吗？而当这个成功的日子的念头首次在我的心里"预先滑出第一道轨迹"时，这不仅仅是一个短暂的时刻，而是一个几乎绝望的阶段，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或者应当用"一闪而过"或者"倏然一闪"来替代预先滑出第一道轨迹？）"无语"这个怪物让步于沉默。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个关于干草垒成的鸟巢之梦复苏了，就在下面的地上，里面是那光秃秃的、正嗷嗷待哺的幼鸟。人行道上的花岗石云母碎片就在眼前闪烁。回想起有一天母亲怀着多么大的热情给了他一些钱买条新表带；回想起书上的那句箴言："上帝眷顾快乐的施予者。"那只乌鸫飞行在远处的林荫道上，翅膀掠过灌木丛，同时也掠过他。在伊西——布莱纳郊区车站的沥青站台上，千百双各种各样的鞋跟在昨天的雨水中留下了相互交错的图案，显得又亮又硬。从那个陌生的孩子身旁走过时，他头顶的发旋儿随之萦绕在他的脑海里。圣日耳曼德佩区教堂的塔楼坐落在咖啡馆、书店、电影院、发廊和药店对面，同时沉醉在一个那样不同的日子里，既被排除又自绝于那"当下的日期"及其变化无常之外。昨天夜晚的死亡恐惧就是它本来的样子。那个破碎的橱窗就是它本来的样子。高加索山区那边的骚乱就是它本来的样子。我的手就是我的手，她的腰就是她的腰。那是通往凡尔赛的铁道旁的路上弥漫出各种土色的温暖。那个关于博

大精深的、全知全能的书的梦早已不复存在，早就梦到头了，它猛然又复苏了，或者是“重复”？此时此刻，在光天化日之下，此时此刻——只需要记下来就是了。一个蒙古族女人，或者圣人，背着背包，在奔跑，陷入沉醉或者恐惧中，穿过斑马线。可在另一个郊区车站的酒吧里，这天晚上站着一个孤独的客人，而店主则在擦拭着杯子，那只酒吧猫咪在桌子之间玩着弹子球，在那满是灰尘的玻璃上，那些残余的悬铃木树叶的锯齿状阴影晃动着，因为在铁路路堤上方的树叶后面，一列列灯火通明的火车司空见惯地“闪闪发光”，于是寻找另外一个词语的欲望油然而生——仿佛只要发现一个接近这个事物的词语，这整个一天似乎就取得了成功，在“一切自我呈现（翻译成我们今天的、世俗的说法就是：每种形式）”这个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光芒”。

是的，终于正好有第三个声音，一个叙述的声音介入我们对这个成功的日子的试论中，不顾及逻辑顺序和正确的瞬间，朦胧不清，图像模糊，结结巴巴，踉踉跄跄，仿佛来自下方，来自矮林丛里，来自偏房里。——终于？或者可惜？有损于它？

幸或者不幸：一个“可惜”首先无论如何是少不了的；因为接下来肯定会倒退回钻牛角尖的地步。范·莫里森那首歌叙述的是一个成功的日子，还是一个仅仅只是幸福的日子呢？因为在这里，属于成功的日子，同样也是一个危险的日子，充满障碍、关卡、圈套，遭受折磨，步履艰难，可与奥德赛回家迷途上的日日夜夜相提并论。在对此叙述的结尾，人们每次都领会到，对于那个夜晚来说，理所当然要庆祝一番，又是大吃大喝，又是“绝妙地”爬上一个女人的床。只是在我当今这个日子里，危险既不是那巨人的投石器，也不是其他熟悉的东西，而危险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这个日子本身。虽说这无疑向来如此，特别是在那些好像远离战争和其他苦难的时代和世界区域里（有多少日记，无论出自哪些所谓的黄金时代，它们每天早上以种种打算开始，而晚上则通常注定以失败告终）——可是如此陷入失败，如此到了可以决断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才会是这个日子，这个无非是我的，你的，我们的日子，之前什么时候的日子呢？它的问题在一个或

许更加辉煌的未来变得更现实，更急迫，难道这没有可能吗？那些特殊的“对这个日子的要求”，且不说其义务，奋斗，游戏：这些日子完全自成一体，这些自由自在的日子，每个瞬间都可以当作可能来把握，至少此时此刻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在我们这些还算得上和平的地区里，它们变成了挑战，变成了可能的朋友，变成了可能的敌人，变成了赌博？当然，对在你和日子之间这样一种冒险行为，或者决斗，或者就是较量的存在、输赢和结果而言，还要取决于有没有任何第三者对你起到决定性的帮助，无论是工作，还是那些最美好的打发时间的方式，更不用说范·莫里森那摇摇晃晃的汽车旅行——事情就是这样，好像甚至连“小小的远足”这样一次行动都难以和这个要成功的日子相容——仿佛这个日子本身就是任务，要由我来实施（要带回家来，要收藏好），最好是当场，无一例外地在躺着、坐着、站着和最多稍微来回动一动时，懒洋洋的，就剩下看看和听听，或者也许根本只有呼吸，可这也完全是无意识的——没有意志的帮助，如同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每每迈出别的生命步伐时一样——，仿佛这彻底的不由自主恰恰是某种对其成功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这样一来，事实上恐怕会从中产生出一种舞动？

那么现在就可以勾画出每个人在这个日子的冒险行为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一个说法是，比如在苏醒的时刻，成功地从那一个个梦中剔除那让人转移梦的踪迹的负担，只带上那些也许让日子变得缓慢、在世界事件中经久保持的重量；在清晨的空气中，世界各个不同的区域连成一片：同时伴随着最初的雨滴，这个清晨在火地岛上一丛灌木的叶子沙沙作响；下午那陌生的光芒会随之失去魔力，从一个时刻到另一个时刻，从而认识到一个从你自身产生而又欺骗你的海市蜃楼；接着属于成功的还有，用你辨别双重光芒的眼睛，干脆让黑夜降临，之后便可以叙述你这一天取之不尽的东西，尽管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啊，那个瞬间，最终除了那个穿着蓝色围裙的老年男子站在屋前花园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而那个截然相反的说法呢？它必然很简短——比如说最有可能是这样：已经被黎明弄得晕头转向，一连串的不幸驱使着你，在出海的瞬间，他那命名为“冒险的一天”的船只倾覆在上午的汪洋中，甚至连中午的宁静都意识不到，更谈不上其间的时间，最后就停留在那个我们的主人公“大清早”本来要启程的地方，死死地停滞在黑夜里——而且也没有词语和图像继续描述他在这一天的失败，无非就是那些陈腐和干枯的比喻，像刚才的情形一样。

因此，从苏醒直到入睡的每个瞬间都不可小看，也就是说，它每每都描绘着一次经受过的考验（危险），这样一个日子对你来说才可以称为成功。可是与此同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通常就把唯一一个时刻看作成功的日子（而你对此的概念则与那个人人皆知的、有点自命不凡的概念不同），这难道不引人注目吗？“当我黎明时分站在窗前，一只小鸟倏地从我身旁飞过，发出一声鸣叫，就像冲着我似的——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日子”（叙述者一）；“今天在这个时刻，当电话里——尽管你只是打算把这本书读下去——你的声音把旅行的兴致感染给我时，这个日子就成功了”（叙述者二）；“为了可以对自己说，这个日子是成功的，我永远都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瞬间——醒来时只要有呼吸，有气息，有un souffle [58]，我就心满意足了”（叙述者三）。难道你也没有注意到，总体说来，关于这个日子的成功，在它还没有真正开始之前，就已经盖棺定论了吗？

我们不想，至少在这里，将单个瞬间，那个如此重要的瞬间，看作一个成功的日子！（我们只能认可整个一天。）然而，那些提到的瞬间，尤其是一夜睡醒之后最初那些完全清醒的时刻，无疑要为那美丽优雅的线条提供开端，或者起奏。当你为这个日子确立了第一个起点时，那么事情就要以这样的方式一点一滴地继续下去，并且形成一条高高的弧线。在我倾听一个声音时，它就向我展现出了这完整的一天的音调。这个声音不需要什么音量，它可以随便是哪一个，甚至就是纯粹的噪声，关键是我幸福地觉得自己聚精会神地倾听了。当你今天一早从椅子上轻轻地触摸那衬衫时，它的纽扣发出的咔嚓声不也有点像这样一种音叉声吗？是的，当我昨天早上不是盲目慌张，而是从容不迫地睁开双眼抓住我的第一件东西时，这样的情形不也是演示给我一种节奏，且这一天接下来的一个个东西恐怕也要以同样节奏去把握吗？对水或者风的感觉，一再如此，天天清晨都在脸上——或者适合于这里的不是“感觉”，更好是“领悟”或者干脆就是“发现”？——在眼睛上，在太阳穴上，在两手的脉搏上：难道不是每次都会成为一种合奏吗？为我与这个日子那些未来要素的共同行动合奏，我在它们之中升华，它们对我产生作用（回答首先被取消了）。这样成功的瞬间：旅途中的口粮？动力？——升华，相伴相随，始终如一，对精神而言，是气息，就是为了这样一个日子的持续；因为这样的时刻给予力量，所以对下一个时刻的叙述就可以以“在眼睛的投射

中……”开始，又是依照一个对“瞬间”直译的说法，又是出自保罗的一封信里：在眼睛的投射中，天空似乎变蓝了，在眼睛的再次投射中，绿油油的野草似乎变成了绿油油的一片，并且……谁曾经历过一个成功的日子呢？到底谁曾经历过一个成功的日子呢？那么为此需要不辞辛劳地描绘那条线的活力！

从那条狂吠的狗嘴里喷出的气息穿过栅栏的缝隙，但却看不见狗。树上残留的几片叶子在雾蒙蒙的风里颤动着。郊区火车站后面不远就是森林。两个正在擦洗电话亭的男子中，外面那个是白人，里面那个是黑人。

当我错过这样一个瞬间时，这似乎就意味着我这整个一天失败了吗？这最后一个苹果，不是小心翼翼地摘下来，而是茫然地从树枝上拽下来——那么这个日子和我之间所有之前的协调一致都一无是处了吗？对一个孩子的目光没有感觉，避开这个乞丐的目光，承受不了这个女人的目光（或者干脆就是这个酒鬼的目光）——节奏中断，这一天就毁了？那么新的开始在今天就不再可能吗？在这个日子里不可挽回地失败了？结果对我来说，这个日子的光芒不仅减少到和其他绝大部分人一样的地步，而且还面临着从形式的光亮中堕入无形的地狱，这恐怕就是它的危险所在吧？所以，比如说，在这样一个不成功的日子里，纽扣碰到木头时发出的那种音乐般的咔嚓声，或许现在又会反复，我也会不可抗拒地当成噪音来听？或者我没有抓着一个玻璃杯，在一个心不在焉的时刻，“茫然无措”，它因此打碎了，那么这就意味着这远远不止是一个祸事，而是一场灾难——即使我周围的人自然都说，这不是什么灾难——死亡突然降临到这个正在逝去的日子里？我注定要认识到自己是众生灵中最胆大妄为的，因为我伴随着这个成功日子的行动，执意要变成像神一样？因为这样一个日子的思想——一刻接着一刻继续活动在其高度上，同时也带着一缕又一缕的光芒——毕竟只是一个像那个不幸的路西法[59]一样的魔鬼所拥有的东西？这样一来，我试论成功的日子每时每刻都可能转化成谋杀和故意伤害的故事，滥杀无辜、破坏、蹂躏、毁灭和自我毁灭的故事？

你将这个成功的日子与那个完美的日子混淆了。（对于后者我们要三缄其口，如同对它的上帝一样。）可能有一天，像任何一天一样，并不那么完美，可在它逝去时，你不由自主地默默喊道："成功了！"。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日子里，你同样痛苦地意识到，瞬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了，而你在晚上还要那样详详细细地叙述一个戏剧性的成功，无论是对什么人也罢。那本书，正如你第一眼就感受到的，给这个日子扬起了正确的帆，你不久前把它落在了火车上，这必然不会意味着，与这个日子的天使的斗争已经输定了；即使你再也找不到那本书，但那种充满希望的阅 读则有可能以其他方式继续下去——也许更加自由，更加不需要依托。此外，这个日子的成功还取决于我对种种与那条线的偏差所进行的权衡，不仅是我自己的，而且也包括那些女人赐予世界的（又是这样一个不美的词语，但它展示给了这个苦思冥想的人——"分类"？"斟酌"？"分配"？——没有更适合的）。"成功的日子"之行的前提看来对我自己是某种宽容，对我的天性，对我的执迷不悟，同样也是对每天所发生的事情的审视，甚至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客体的险恶，邪恶的目光，错误的时刻的一句话（哪怕只是被什么人在拥挤中偶然听到）。因此，在我行动时，关键取决于我让给自己的底线。我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自己慢慢腾腾地走在路上，疏忽大意，心不在焉？在怎样无法镇定和不耐烦的情况下，在怎样重新错过的正义感的情况下，从我哪一次错失的举手之劳，哪一次冷酷地或者也只是那么随便说说的句子（也许根本久没有说出来）开始——从哪一次报纸头条，哪一次侵犯我眼睛和耳朵的广告开始，从哪一次刺痛开始，从什么样的痛苦开始，却依然保留着对那种闪耀的开诚，而依靠这种闪耀，与野草和天空那陪衬的绿色和蓝色相呼应，也呼应着偶尔一块石头的"灰色"，在这个相关的日子里，那"黎明破晓"似乎冲着我和这个空间飞奔而来吗？我对自己太苛刻，在不幸中对事物太不冷静，对这个时代要求太多，过于相信今天的一无是处：我没有节制地赞成这个日子的成功。是的，看样子，仿佛有一种特别的讽刺属于其中，面对我自己和那些日复一日的规律及事件——出自善意的讽刺——，还有，哪怕是一种以绞刑架命名的幽默。谁曾经历过一个成功的日子呢？

他的日子充满希望地开始。在窗台上，几支铅笔和一把椭圆形榛子像长矛似的堆放在一起。甚至连这些和那些东西的数量都使这个人

感到惬意。在梦中，有一个孩子躺在一个光秃秃的空间里那光秃秃的地上，当他朝着孩子弯下腰时，孩子对他说道：“你是一个好爸爸。”在街上，邮差像每天早上一样吹着口哨。隔壁房子那个老妇人又关上了阁楼的窗户，要这样度过一天剩下的时光。开往新建筑区路上的卡车装载的沙子是飞沙的黄色，这个地区的丘陵就是由此构成的。掬水撩在脸上，伴随着郊区这儿的水一起，他意识到了“在品都斯山脉那边有约阿尼拉的水”，“马其顿莫拉斯提的水”，“桑坦德清晨的水”，那里的大雨看上去倾泻而下。伴随着耳边书页的翻动声，他远远地听到那一个个花园后面郊区火车缓慢进站时的叮当声，听到房顶上乌鸦叽喳和喜鹊格格的吵闹中有一只麻雀在鸣叫。当他抬头望去时，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远处山丘森林边缘上方那棵光秃秃孤零零的树，透过它那好像在风中闪闪发光的网络，那片高原的光亮向下直透射进房子里。这时，在他读书的桌子上，那个织到桌布里的字母S连同一个苹果和一个黑色光滑的弧形砾石一道显现出一个图像。再次抬头望去时——“工作有时间，我有时间，我和它，我们都有时间”——现在因为这个日子乱哄哄的，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寻找过合适的词语，而是在默默地思考着：“神圣的世界！”他走出去到棚屋里，要为炉火弄些劈柴来，对他来说，这炉火与其说用来过夜，倒不如说更适合这样一个白天。就在要锯开那根又粗又硬的树干时，锯子卡住了，当他中断了节奏用力一拉，它被彻底夹住了；事情干到一半，他只能把锯子拽出来——更多地是“扯”——又从别的地方重新开始。这个过程重复着：锯条卡在那坚硬的树心里，拉来推去，直到它几乎没法再退出来……，接着就是使尽浑身力量，随之而来的更多是撕裂而不是锯开的木块就滚到这个日子那自以为了不起的英雄脚前。然后，当火苗正要燃起火焰来，却又连同那才咝咝作响的劈柴一起熄灭的时候，便是对这个神圣的日子的诅咒，用的恰恰是昔日那个令乡下的祖父扬名全村的说法：住嘴，你们这些鸟人，太阳，滚蛋吧。后来铅笔尖断裂也足够了，不仅仅这个日子，未来也面临危险。当他明白过来，正是伴随着那些不幸，这个日子本来会变得顺顺当当，早就又是另一个日子了。这徒劳的、深思熟虑感知到的点火——熊熊燃起的炭火噼里啪啦并变成炭黑不也同时意味着联合的神秘时刻吗？——对他来说似乎显现为一个化身，一个所有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徒劳的化身，并且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恐怕为了容忍而中断了。同样，大块劈柴迸到他的脚趾上毕竟也从来不仅仅是痛苦。因此让他也有了对另外的东西的感触，在同样的地方：好像是某个动物友好的嘴巴。这又是一幅图像——在这幅图像里，所有从他儿时起直到眼下

的瞬间的一块块劈柴不是聚集在他各种各样的鞋尖、袜子和不同尺寸的儿童和成年的脚上，就是更多地滚动、翻转、飞舞、散落：因为那种不同的感触充满一种非常神奇的柔和，只要他在这片刻间留意的话，他就会惊讶。而且以相似的方式，于是他事后就意识到，过了一段时间，那些在锯木头时令人讨厌的东西毕竟在向他讲述一个完整的譬喻，或者寓言？为了他这个日子的成功。首先有必要轻轻地推一下，为锯齿找到开口，然后在锯口里继续锯下去。之后锯树干就进入了它的节奏，有一阵子很容易，也让人很开心，一下又一下：伴随着两边飞溅的锯末，那棵黄杨树上，一片片细小的叶子卷成小圈圈，从上面掉落的叶子沙沙作响，融入锯齿的嚓嚓声中；伴随着垃圾桶的咕咚声传来了高空之上喷气式飞机的轰鸣。接着，通常渐渐地，只要他依然全神贯注，就会提前感觉到，锯子陷入木头的另一个部分。到这里就意味着要改变节奏——让它慢下来，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中止或者没能来回松一松锯条，那是很危险的：即使节奏在不断变换，但整个锯的动作要保持一致；不然的话，无论如何，这个家伙就会卡在正当中。如果确实还有可能的话，就得把它抽出来重新开始，而后者，寓言这样教诲他，最好不要在同样的位置，也别离得太近，而是在一个全新的地方，因为……在第二次尝试时，一旦位置变换成功了，那么最终就能在树干的下半部那儿锯开了，因为在这里，对这个轻松拉锯的人来说，早已看不见锯齿了——他已经思绪万千，心不在焉，不是在制订晚上的计划，就是在将一个人类的仇敌锯成两半，而不是木头——，可是这样一来就会面临危险，如果不是这个被忽视的枝杈，就是（经常正好距离那个地方一指宽，在旁边锯开那么宽的木块，锯木人反而不费功夫）那个十分狭窄而越发坚硬的层面，在这里，钢锯一下子碰到了石头、钉子和骨头，而这个行动可以说在最后一个节拍上失败了：简而言之，对第三者的耳朵来说，是一次歌唱——对锯木人本身来说更多是一种刺耳的音乐——失败了。与此同时，他毕竟似乎就要到达这样的地步，锯木头本身对他来说理想地代表着对纯粹的快乐的梦想，因为此刻与木头待一起，相伴在一起，连同它的曲线、它的芬芳、它的花纹，是专心致志在测量着这个物质，同样也在探索它的特性和阻力。同样在这个日子里，那根折断的铅笔似乎也表明了……如此种种，不胜枚举。也就是说，他事后这样想到，在试论成功的日子时，恐怕关键在于，每次在不幸的时刻，痛苦的时刻，放弃的时刻——错乱和离题的时刻——，要表现出为这个时刻的其他游戏形式所应有的机智果断，使之转换，只有通过那种使人从狭隘之中解脱出来的意识，现在，刻不容缓，翻掌之间，或者干脆

深思熟虑，才使得这个日子——仿佛这是为“成功”所要求的——或许会得到推动和鼓舞。

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你这个成功的日子看来几乎就是个儿童游戏吧？

没有回答。

中午了。夜里的白霜自行融化在园子的阴暗角落里，青草从蜷缩和僵硬中直起身来，轻柔的风掠过它们。一片寂静，它变成了图像，沐浴在阳光下，正行走在中午一条空荡荡的公路上，伴随着那些成双成对的、色彩斑斓的蝴蝶，它们突然从空虚中冒出来，看样子向后在靠近，每次都贴着那个行走的人那样近，以至于这个漫游者——在这些瞬间，他确实把自己看成这样一个人——以为在自己的耳际听见了翅膀的振动，同时也传递到他的脚步上。他走进那家几乎没人住过的房子里的时候，继那座郊区教堂正午的钟声之后，首先也听到了从西边那个邻近的地方（和这里其他地方一样，它没有什么过渡和间隔空间，从大街的另一边就开始了）传来了那样的响声，听上去真真切切：在召集四面八方所有零零散散的人。一个梦想图像又浮现在眼前，一座座荒芜的石山包围着坐落在盆地深处的大城市巴黎，从所有圆形山顶和山坡那无声的朦胧中，突然传来了那些宣礼员[60]洪亮的呼唤声，回响在这座城市上空。他不由自主地从他正在书写的字行上抬头望去，并且和外面那只猫一起穿过花园，穿过一条长长的、呈弧形的对角线，这时他想起来，曾经有另外一只猫每次都提示天开始下雨了，因为哪怕是最细小的雨点滴在它身上，它都会从很远的地平线上疾奔到屋檐下。他的目光四处巡视着，好几个星期以来一天又一天地观察着，那只硕大的梨子作为花园里最后的果实依然挂在那空荡荡的树上，手掌立刻就可以感受到这果实的沉重；在马路那边，在那个邻近的地方，一个黑发中国女孩背着色彩鲜艳的书包，穿过栅栏也不疲倦，抚摩起那只浅蓝色眼睛的阿拉斯加犬（他并没有听到那狗的呜呜

声，可在他的想象中，那叫声越发持久）；再放眼看去，透过两条大街联接点上的房子间隙，一辆开过去的火车瞬间反射着阳光，长短像一个单词，“单音节”似的照耀着路基上的小草。这时，他瞥见车厢里有一个空位子，座位被刀子划破了，并且被精心修补了，在那个僵硬的塑料制品上一针接着一针地绣着十字花，接着又缝合起来，他觉得自己被那只绷紧线的手抓住了。于是，他的死亡掠过他的额头；他盯着他们看，他们也盯着他这个无所事事坐着的人，神情充满理解，和他们生前迥然不同。在一天里，还能够做什么，发现什么，认识什么，重新找到什么呢？你们看一看：没有永恒之王，没有生命之王（哪怕只是一个“秘密的”）——却有日子之王！只是奇怪的是，在这点上，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就足以把他从那专横的皇座上拉下来。那个路人从巷子里逍遥自在地走出来，将大衣搭在胳膊上，停止了拍打自己的衣兜，并且很快又掉头回去。面对他，他的同行突然变得难以自制。停下来吧！但是毕竟处在心醉神迷之中，他无法再求得内心的平静：瞧那儿，乌鸫那黄色的鸟喙！林荫路尽头的棕色边缘上，锦葵花依然在独自绽放！那片用一条看不见的线牵动着的物体在降落时仿佛又要向着太阳升去，原来是一只熠熠发光的风筝！地平线上黑压压地堆满了如此巨大却又不知所云的词语！停下来，安静！（心醉神迷对他来说就是恐慌。）但是句号，结束，它——阅读、观看、同在图像中、这个日子——不再继续了。现在是怎么回事呢？突然间，在心醉神迷中形式和颜色的跳跃行列之后，夜晚尚未到来之前，死神阻断了通往这个日子的道路。一发命中，瓦解所有狂言妄语。照此说来，还有比成功的日子的思想更愚昧的吗？难道试论成功的日子不是要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即名副其实的黑色幽默态度彻底从头开始吗？难道为这个日子的成功连根线条，甚或是迷宫式的线条都画不出来吗？但这不就意味着，这种试论如此一再重新开始也是一种可能，它特有的可能吗？这种试论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日子（“日子”这个物）在当下这个阶段成了我不共戴天的敌人，不可能转换成一个对我富有裨益的志同道合的人，一个闪闪发光的楷模，一种持久的芬芳，那种对“成功的日子”的指责更多是些魔鬼般的东西，是恶魔，是混淆一切；一种纱巾舞，其后却什么都没有；一种引诱人的绕口令游戏，可之后随即就会被打上结；一种指引方向的箭头，可一旦跟从就会陷入圈套：或许吧，情形就是这样，只是它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时至今日我也许在试论这个日子的成功时经历了这一切失败，我没法说，现在也无法说，始终都无法说，有关成功的日子的思想是空想或者胡闹，所以，这也有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但无疑我可

以说，这个思想事实上就是一个思想，因为它不是我从书本里信手拈来或者冥想出来的，更多地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在艰难困苦的时候，生机勃勃，每一次都使我深信不疑，那种充满幻想的生机勃勃。这种幻想就是我的信仰，而且这个有关成功的日子的思想就是在它那炽热的瞬间成形了，同它一起经历了无数次沉船，而每一次过后的第二天早上（或者下午），它都会富有生机地照亮我向前，就像莫里克[61]那首诗歌中一朵玫瑰“向前照亮”一样，而我借助它就能够一再重新开始，一定要尝试这个日子的成功——哪怕最终表明，这种结果是空洞或者干瘪的；因此，至少对所有的未来而言，这徒劳而执着的努力成为多余，那么这条道路也许对完全不同的东西会畅通无阻？再说这个经验也会持久存在：正是这个日子中的一无所获（在这里，甚至连变换的灯光都没有参与其中，也包括风，包括天气）却预示着最大的收获。一无所获，又是一无所获，还是一无所获。那么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一无所获有什么意义呢？它的意义非同小可。它与其说跟一无所有息息相关，倒不如说对这个日子而言有更多的可能，很多，非常多，对我，同样也对你。这里关系到：我们这些日子的一无所有，现在有必要让它“硕果累累”了。从早到晚（或者也包括午夜？）。我重申：思想过去是光芒。思想现在依然是光芒。

那个无名森林池塘的幽暗。雪云飘浮在巴黎大区的地平线上。铅笔的味道。落在“宝塔电影院”公园岩石上的银杏树叶。韦利济火车站最上层窗户里的壁毯。一所学校，一副儿童眼镜，一本书，一只手。太阳穴上嗡嗡作响。在这个冬天里，鞋底下第一次响起了冰冻强有力的咔嚓声。他看到了铁路涵洞下的光线那特殊的材料。坐在靠近草地的禾草堆上看书。在将树叶耙成堆时，突然嗅到了一丝类似于这衰退年份的气息。当火车驶进站时，它发出的响声一定是“碰击”声（而不会是“敲击”声）。最后一片从树上落下的叶子不是“沙沙响”，而是“啪”的一声。一个陌生人和他下意识地互相打了声招呼。那个老太婆又拉着自己的购物车去郊区周末市场。一个外地司机在这个偏远的地方很常见地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走下去。然后在森林里是那条路慢慢变绿了，昔日他和父亲走在这条路上，每次都要商量点事，在父亲的语言中，它甚至有一个名字，zelena pot，就是绿色大道。再就是临近郊区乡村教堂旁边酒吧里那个退休的人，祖父的表链从他的肚子上伸进裤兜里，呈一条弧线。而且有一次，他故意对一个

年老的当地人那恶狠狠的眼光视而不见。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感谢打扰”（而不是不满）：这样的转变一下子就成功了。可是后来，为什么在愉快的下午里，突然对接下来的日子，对这个日子彻头彻尾地感到恐惧呢？仿佛对面临的时刻来说再也无法渡过难关了（“这个日子将要和我一刀两断！”），再也没有出路了？那梯子靠在秋冬之交的树上——然后呢？各种蓝色的鲜花深陷在铁路路堤的草丛里——然后呢？停滞，惊慌，一种毛骨悚然，而无止境的缄默驱赶走了那明朗的宁静。伊甸园在燃烧。与之相反，或者为了这个日子的成功，现在又表明了，没有什么办法。“噢，早晨！”惊呼，没有效果。阅读结束了，日子到头了？话语表达到头了，日子到头了？而这样的缄默也排除任何祈祷，除非有那样一种诸如“让我回到早晨”、“使我回到当初”、“叫我重新开始”不可能的话语。谁知道，是不是有些谜一般的自杀暗暗地成为这样一种尝试日子成功的结果呢？这种尝试是以高涨的热情开始的，并按照那臆想的完美-线条在进行。然而，我的这个日子的不存在，它不是从另一方面告诉我什么了吗？我的内心里存在着一个错误的秩序？我天生就不适合这整个日子？我不许在夜晚去寻找早晨？或者允许？

他曾经让一切重新开始。这个日子过去整体上是什么样呢？当时，在高高位于巴黎大区上方的郊区火车外切道上，那个有关成功的日子的思想在他的心里又复活了。那样的炽热之前是什么，之后又出现了什么呢？（“Ausculta，o fili[62]，听着吧，噢，儿子”，博登湖畔教堂里的天使说，在那儿，黑色砾石上的石灰线已经为他临摹了贺加斯那“美丽优雅的线条”。）——先前所发生的，他这样回忆道，是一个噩梦的夜晚，那是在巴黎南郊一个平时完全空着的房子里的床垫上度过的。这个梦看上去就存在于一个彻夜的、静止的图像中。在这其中，伴随着始终不变的暮色和无声无息的空气，他发现自己被放逐到一个光秃秃的摩天山岩上，孤苦伶仃，要度过余生。随之所发生的，独一无二，而且它持续不断，心跳接着心跳，被世界遗忘的状态，笼罩在这个星球上的麻木不仁，是一种愈加炽热的渴望风暴，在自己的心里。但是终于苏醒过来时，看样子，仿佛正是这样一种彻夜的渴望将他的失落感燃烧殆尽了，起初无论如何如此。在那半是枯竭的花园上方，天空一片蔚蓝，很久以来第一次这样。他踩着舞步使自己从眩晕的感觉中得以解脱，“这个眩晕者的舞蹈”。他觉得

眼前变得郁郁葱葱：花园围墙边的柏树。在悲伤和绿色的征兆中，他开始了这个日子。“没有花园我会怎么样呢？”他心想着。“没有花园，我就再也不想苟且人生了。”痛苦一直还在胸口作祟，一条龙，它在那里吞食着。麻雀落在灌木丛里，又一次恰到时机的鸟儿。他看到一架梯子，想要爬上去。在排水沟里，泥瓦工的标准木杆在游动，后面远处街道上，一个年轻的女邮差推着她带有黄色邮包的自行车。他没有读出“私人住地，禁止入内”，而是看成了“……禁止爱”。那是上午晚些时候，他让这个地方的寂静在行走时钻过那张开的手指。太阳穴，鼓起来的风帆。他今天还要结束一篇关于翻译的文章，终于也有了这样行动的图像：“这个译者感觉自己不知不觉地取得了成功。”工作还是爱情？去工作，就是要重新找到爱情。在那家北非酒吧里，那个站在柜台后的男人正说着：“噢，愤怒！哦，绝望……”，而一个女人进来时说“今天这里闻着不像蒸丸子，而像五香杂烩”，店主回答着“不，那不是五香杂烩，那是回归的太阳——感谢太阳。”赋予我这个日子，让我融会于这个日子。经过漫长的乘车路途，先是穿越城市南郊，然后又是西郊，漫步走过克拉马尔和默东森林，坐在露天一张桌子旁，停留在森林池塘岸边，翻译的草稿已经完成，而他写完最后一句时就宣布对此弃之不顾了：“不要自信满满地盯着这本业已存在的书，要向前看，把目光投射到那没有把握的事物中！”看样子，仿佛马路边上的草莓在注视的目光下变得通红似的。“风接受了它。”他想起了那只乌鸦，它嘶叫着进入他那孤独的梦中，“犹如一个反坦克导弹发射器”。到了下一个森林池塘边，他在钓鱼者酒吧的露台上吃了一个三明治。天下起了毛毛细雨，像纺线一样，仿佛它自得其乐。然后，就在正下午，开始了那次绕着巴黎外围高处的火车旅程，先是朝东，之后迂回往北，返回时又迂回往东——就这样，他仅仅在一天里就几乎绕着这个世界都市转了一圈——，其间，那个有关成功的日子的思想又复苏了，不，“复苏了”不是正确的词语，而必须称作“转变了”：其间，对他来说，那个有关成功的日子的思想已经从一个生存的思想转变成写作的思想。这个同时还在依然遭受那个噩梦夜晚之痛的心变得无比宽阔，就像俯瞰着“塞纳河高地”的情形一样（突然可以感受到那个行政区叫什么了）。幻想？不，真实的生活元素。那然后呢？现在，半年之后，秋冬之交，他回想起来，在经历了那样一个“目光投射”无比明亮的光芒之后，拉德芳斯区[63]旁边那个阴暗的、地下的路段简直就让他欢欣不已。在圣拉扎尔站[64]的回廊——用法语标识，直译出来叫做“孤独

的脚步大厅”——里，他轻松愉快地听凭下班人群的拥挤和冲撞——事实上，他有一种处在下班高峰的感觉。在歌剧院旁美国运通公司的办公室里，他为自己争取到尽可能多的现金，之前一条长队里等着，怀着一种少有的、并非感到不快的耐心。他对这个办公室洗手间的宽大与空旷感到惊讶，在里面多待了些时间，四下看了又看，仿佛在这样的地方有什么可以发现似的。作为人群中的一员，他站在圣丹尼斯大街一家酒吧的电视机前，那儿正在放世界杯比赛，而此时此刻，他才想起自己心里不是滋味，因为他没有真正地如愿以偿，每每避免目光投向街道两侧房子的走廊深处和后院，那里聚集着成群结队的女人——看样子，好像这个可能忽视的行为也属于这样一个日子不可分割的部分。那后来呢？看样子，好像对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他都失去了记忆，唯有这样一个时刻还留在心里，那是晚上晚些时候，他膝盖上坐着一个孩子，在一张类似的学生书桌旁，时而忙着修改自己翻译草稿中的词句——记忆中浮现出一个双手变幻出不同凡响的图像——，而且对夜晚的时刻产生了影响。当时，我坐在一家花园酒馆里，和你对面的人无意间进入叙述中，而这种叙述成为可能最柔和的敞开心扉，或者是从另外的你出发，与我自己同行。这个日子始终铭刻在心，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像是火车那巨大的S弯道，只能够俯瞰，但在整个内心里感受到了，是所有弯弯曲曲的道路中最美妙的，平行于下面深处塞纳河的蜿蜒，只是蜿蜒得更加广阔；一个月后，在泰特美术馆[65]一个寂静的角落里，又在贺加斯调色板上的褶皱里找到了；又一个月后，在秋季波涛汹涌的博登湖岸边，出现在砾石的白色纹路里；此时此刻，又与我桌上的铅笔一起朝着一个方向奔去：这就是那个日子留下的轮廓。它的颜色半明半暗。它的修饰词，如同它给予我的那个思想，不言而喻就是“神奇”，这个词，在孤独地经历了那个夜晚的磨难之后，它的主导词就是“同在”。

那么试论成功的日子这个思想本身就是个成功的日子吗？

那是夏天前，燕子飞翔在花园上空，“那么高！”，我感染着一个年轻女人拉一拉草帽弧形帽檐的愉快，圣灵降临节[66]已经生动地展现在郊区夜晚的风中，樱桃树立在轨道两旁，上面挂着红彤彤的果

实，那熟悉的公园得到了“胜利脚步公园”的美名——现在是冬天，比如说，我可以证实，它就显现在昨天那一再反复的行车曲线上，显现在铁道的护栏上，是浓雾弥漫的埃菲尔铁塔前那林间葡萄藤开着的灰色的花，是从拉德芳斯远处的尖塔旁一闪而过的白浆果，是从圣心教堂穹顶那只可感受而模糊不清的白色旁一闪而过的金合欢刺。

又一次：这个日子因此就是成功的吗？

没有回答。

我认为，不，我明白，凭借想象：有多少事情会和这个日子息息相关呢，唯独和这个日子。而现在，在我的生命中，在你的生命中，在我们俩的时代，就存在着它的时刻。（“We lost our momentum”[67]，一个棒球队队长这么说，这支球队差点就赢了他们的比赛。）这个日子在我的掌控之中，就我的时间而言。如果我不是现在对这个日子进行尝试的话，那么我就永远地错失了它的可能，毕竟我这样认识到，越来越频繁地，怀着越来越大的怒气，针对我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所度过的那些日子有越来越多的瞬间要告诉我什么，可我却越来越少地去捕捉它们，特别是珍惜它们。我不得不再次重申，我对自己感到愤慨，因为我没有能力抓住地平线上会让我抬头远望和心灵平静的光芒（进入平静，致信人保罗这样写道）；因为写字台上杜鹃花的蓝色，开始阅 读时还是中景，而翻过几页后已经成为辨不清位置的一个模糊的点；也是因为黎明破晓时，在花园灌木丛里，乌鸫那寂静的身影刚刚还是“那汪洋大海上这个日子之后夜晚小岛的轮廓”，可在钟摆滴答的瞬间就再也什么都不是了——没有意义，被遗忘了，被背叛了。是的，事情就是这样：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一个个瞬间越使我感到自己富有，就越强劲地冲着天空叫喊——，我看到自己是一个背叛我这个日子的人，日复一日。忘记日子，忘记世界。我一再重新打算要忠实于这个日子，依靠帮助，借助那些瞬间之力——“珍爱”，占有，这就是你用于“现在”的词语——，因为我想要抓住它

们，思考它们，保存它们，而且天天如此。当我还没有避开它们时，就已经将它们完全忘记了，如同是要惩罚我否认它们，而这种否认无非就存在于我对它们的回避之中。这个日子意味深长的时刻越多，那么对我产生作用的时刻就越来越少，是的，就是这样的表述。今天一大早在狭路上听到那些孩子声音的时刻：它什么作用也没有产生，它在下午此刻，在带来降雪的云团涌向大陆时也没有什么效应——于是我觉得，那冬天的森林让它们“变年轻”了……难道这样说我要试论这个成功的日子的时机不就逝去了吗？我错过了那个时刻吗？我或许倒“应该早点起身”吗？这也许符合这样一个日子的思想，与其说是试论，倒不如说是赞美诗形式，一种也许事先徒劳的祈求？日子，对我产生些许作用吧，越多越好，穷尽你的所有。让我听到那柳叶长矛在穿过空气后落下时的嗒嗒声；让我看着那个左撇子窗口官员吧，他埋头在自己的书里，又一次让我等车票；让我领略门把手上的阳光吧——让我有所作为吧。我成了自己的敌人，毁灭了我这个日子的光芒；毁灭了我的爱情；毁灭了我这本书。这期间，我的一个个时刻越发经常地听起来像一个个纯粹的元音——“元音”：还有另外一个词语用于这样一个瞬间——，我就为之越发稀少地找到那个相应的辅音，因为在我看来，有了它，那些元音才会使这个日子生机勃勃地继续下去。那条沙子路尽头好像通向那个无名的池塘：啊！立刻就慢慢消失了，好像从未有过。神圣的东西，或者你，那个“比我强”的东西，它昔日是“通过那些预言家”说的，然后是“通过子子孙孙”，你在当下不是也完全通过这个日子说吗？那么我为什么不能把这种如此通过这个日子所说的东西抓住、领会、继续传下去呢？我相信这样要依靠想象，我知道随着每个时刻都要重新开始说。“它现在存在，它曾经存在，它将来依然存在”：为什么就不能像当年谈论“上帝”一样来谈论我今天的日子呢？

在这个成功的日子里——试论这同一日子的编年史——，那一粒粒小露珠落在乌鸦羽毛上。和往常一样，有个老妇人站在售报亭里，说着心里话，尽管和昨天不是一个人，并且早已买好了报纸。花园里那个梯子有七根横木，它是应当走出自身的完美化身。郊区那些载重汽车上的沙子显示出圣日耳曼德佩区门面的颜色。一个年轻女读者的下巴碰到了脖子。一个铁皮桶拥有了自己的形式。一个邮筒变成了黄色。那个市场里的女人把自己的账单写到手心上。在这个成功的日子

里，一个烟头在排水口里滚动着，同样，一只杯子在树墩上冒着热气，在昏暗的教堂里，一排椅子被阳光照得通亮。咖啡馆里那几个男人，甚至连那个爱吵闹的孩子，都沉默了好一阵子，那个外地人也和他们一起沉默了。在我的工作中变得敏锐的听觉同时也敞开了我对周围的嘈杂声的心扉。你的一只眼睛比另一只小，那只乌鸫跳过丛林灌木，而我在最下面的树枝向上弹起时则想到了“上升气流”这个词语。最后甚至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在这个成功的日子里，一种习惯将会停止，一种想法将会消失，我将会感到吃惊，因他，因你，因我自己。并且除了“同在”还会有第二个主导词占上风，就是“和”。在房子里，我将会发现一个直到此刻被忽视的、“人们可以居住！”的角落。在拐进一条巷子里时，“我在哪里呢？我还从未来过这里！”将会成为闻所未闻的时刻，同样，面对矮树篱里那半明半暗的中间部分，将会出现“新世界！”开拓者的感觉，在一小段超越了那习以为常的东西的路途上，回首望去，将会发出“我从未见过它！”的呼叫。你的平静同时将会是一种惊讶，如同有时候发生在小孩身上一样。在这个成功的日子里，我将会完全充当它的媒介，和这个日子朴朴实实地共同走去，我将会被太阳照耀，被风吹拂，被雨淋湿，我的动词将会是“听任自便”。你的内心同样将会变得多姿多彩，犹如在这个日子进程中的外部世界一样，而奥德赛的修饰词，也就是那个“四处漫游的人”，你将会在这个日子最后把自己翻译成那个“多层面的人”，这样的多层面将会在你的内心里舞动。在这个成功的日子里，这个主人公也许会“嘲笑”他的不幸（或者至少在第三次发生不幸时开始笑起来）。他也许会处于那些形式的包围中——哪怕只是落在地上各种各样的树叶也罢。他的我-这个日子也许会敞开为世界-这个日子。每个地方也许会获得了它的瞬间，他也许对此可以说：“事情就是这样。”他也许会和他的死亡达成了默契。（“死亡从未破坏过这个日子的兴致。”）他对所有东西的修饰词也许会是一个永久的“面对”，面对你自己，面对一朵玫瑰，面对沥青路，而物质，或者“物质性”？也许会向他呼喊着创世，没完没了。他也许会欣然为之，也许会开心地什么也不做，而在这期间，也许背上的重负会给予他温暖。一瞬间，“投去一个目光”，说出一个词语的工夫，他也许会突然变成了你。在这个日子最后，你也许会呼唤着一本书——远远超过了一本编年史：《成功日子的童话》。到了最后的尽头，也许还会出现那伟大的遗忘，也就是这个日子必须成功……

你曾经历过一个成功的日子吗？

每个我认识的人都经历过一个，通常甚至经历很多。对一些人来说，只要这个日子不是太长就满足了。而另一些人则会说："站在桥上，天空在我头顶上。早上和孩子们一起笑，观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观察能带来幸福。"对第三种人而言，那条他刚刚穿过的郊区马路就意味着这样一个"成功的日子"，因为他的行走伴随着外面钳工车间那巨大的钥匙上挂着的雨滴，伴随着一家院里那根竹子的愤怒，伴随着一家厨房窗台外面三个装着橘子、葡萄以及削了皮的土豆的盘子，伴随着那个又停在司机房前的出租车。对于那个"渴望"这个词时刻不离口的神甫来说，在他听到一个友善的声音的时刻，日子就被看作是成功的。而他自己不也总是不由自主地向往那样一个时刻吗？在这个时刻里，只有一只鸟儿围着树打转，一个白色的球卧在灌木丛里，那些学生坐在站台上沐浴着阳光："此时此刻，这就是一整天了"。当他晚上将这个逝去的日子呼唤到记忆中时——是的，这是一种呼唤——，通常仅仅一个瞬间那些东西或者地点就会作为相应的名字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就是这样的日子，那个男人推着童车在树叶堆里蜿蜒前行"，"就是这样的日子，那个园艺工人的钞票夹杂着草茎和树叶"，"这是那个咖啡馆空荡荡的日子，里面的灯光随着冰箱的轰隆声跳闪着……"那么为什么不满足于这个成功的唯一时刻呢？为什么就不能断然地将这个时刻宣布为这个日子呢？

翁加雷蒂[68]"我照亮自己| 用那个无法比拟的东西"诗句的题目叫"早晨"：这两行诗也可能描写的是"下午"吧？完成的瞬间或者完成的时刻真的足以让你在最后会忽略那个永恒的问题，即你这个日子是否又一次失败了？试论这个成功的日子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满足于试论"这个不算完全不成功的日子"呢？难道有你成功的日子吗——难道那幻想，无论他在其中多么富有和神奇地驰骋，不是都有那种如同面对一个陌生星球的恐惧相伴吗？在你看来，通常你那失败的日子对你来说就是地球这个星球的一个部分，作为一种方式，是一种或许令人可恨的家园。这样说来，仿佛这里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成功的；即使有的话，在优雅中？在仁慈中？在优雅和仁慈中？毕竟会有的——这样的成功如今恐怕造就的不是某些不该得到的东西，受之有愧的东西，也许彻底建立在牺牲他人为代价的基础上？

为什么我在试论“成功的日子”时，此时此刻却想起了濒临死亡的祖父呢？他在弥留的日子里只是一个劲地用手指在房间墙上抠来抠去，一个时刻接着一个时刻，越抠越深？一种个别的成功，在持续和共同的失败和遗失中，它算作什么呢？

并非一无是处。

这个日子，对此我可以说，它是“一个日子”，而那个日子，我就是那样煎熬过来的。在漆黑的清晨。人们迄今是怎样度过了自己的日子呢？在那些古老的小说中，怎么会这样常常来描述“许多日子逝去了”：“许多日子成为现实了”？这个日子的背叛者：我自己的心——它将我从这个日子里驱赶出来，敲击着，把我从中捶打出来，集猎人和猎物于一身。安静！再也没有隐藏的想法。那双花园工作鞋里的树叶。挣脱那个思考的牢笼，保持沉默。在那棵苹果树下弯下腰，走进禾草堆里。这个禾草堆里的读者。这些东西齐膝高为他围成了一方天地。而且他准备好每天受到伤害。脚趾叉开。“花园的七天”，《堂吉诃德》那没有写完的结局会这么叫。存在于花园里，存在于地球上。地球旋转的进程是不稳定的，所以那些日子也不一般长，首先是要分别看山脉对风的阻挡。这个日子的成功和放任；将放任当作行动：他让雾霭在窗前飘去。他让屋后的草随风飘荡。让阳光照耀着自己也是一种行动：现在我让它温暖我的额头，现在让它温暖眼球，现在让它温暖膝盖——然后便是肩胛骨之间毛茸茸的温暖！向日葵的脑袋一味追随着这个日子的光芒。将这个成功的日子与约伯的日子比较一下吧。不是“珍惜这个瞬间”，它应当更准确地叫做“牢记”。这个日子的进程，正好连同它的狭隘，已经让人意识到了——这不就是一种转变吗？——，对我来说则意味着我是什么样儿！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比拟。中断你没完没了的不安，在逃遁中会安静下来。由于在逃遁中安静下来了，那么就会去倾听。我在高处倾听着。是的，“在耳朵里的高处”，一只麻雀的叽喳声穿透了那噪音。一片树叶落到远处的地平线上，悄然无声，在我的心底里听成了铃声。仔细聆听：犹如那些开锁匠聆听着用自己的万能钥匙打开锁子时的碰撞声。我此刻觉得那只变慢飞行的乌鸫在矮树篱笆上的三级跳好像嗡嗡地发

出一种旋律。同样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阅读一本书时也会陷入哼唱中。（从读报读者那儿，你最多可以想象出一声口哨，穿过牙缝。）“你们在倾听中变得迟钝了”，充满热情的保罗在一封致全体教徒的信中这样呵斥道，而在另一封里：“词语较量是完全无用的，对听者是场灾难。”这个纯粹的声音：要是我一天里能如愿以偿地达到这个纯粹的声音多好啊！可是比起倾听来，更多要牢记的也许是那纯粹的在场，就像毕加索最后一任太太所称道的，她什么都没有做过，无非就是在他工作时“在场”？成功的日子，艰难的日子！在耙花园落叶时，突然有一根毛茛闪现出光芒，从那褐色的落叶堆里，闪现出蜡烛光一般的黄色。颜色变暗，形式变亮。在那个依旧冰冻僵硬的阴暗角落里，我听见自己此刻在行走，就像当年杂草丛里一样。抬头仰望时，天空显现出拱形。什么叫“雪云”呢？白茫茫一团，其中夹着一道淡蓝色。欧洲榛子在手掌里互相碰撞出咔嚓声，三个。在希腊语中，曾经有一个词语用于“我存在”，这个词语不过是个拉长的O，比如在这样的句子中就可以找得到它：“只要我存在于世界上，我就是世界之光。”那个用于正好穿过柏树的东西的词语，就是“光波”。用正确的词语眼睛去观看和继续观看。开始下雪了。下雪了！Il neige [69]！沉默。它在沉默。他在那些死者的影响下沉默。不是“他（她）死去了”一定得这么叫，更多是：“他，她，那些死去的人，只要我对他们置之不理，他们就会让我死去！”同时还有对结结巴巴的愿望。他执意要结结巴巴。在郊区，一切都是那样“独有特点”（一个郊区行人的词语）。在那辆卡车后面，那个垃圾工单腿站立着。马路上那些有规律的拱起叫做“减速带”。也许这样一个日子期限根本就不构成一个影响广泛的模式，不过是自成模式而已，——这会让人高兴？午间休息时，我和屋顶上的工人一起从屋脊上踩着木板走下来。我甚至不该一整天都待在家里，蜗居在里面无所事事？这个纯粹蜗居的日子的成功？蜗居：坐着，阅读，抬头望，在无所作为中引人注目。你今天做什么了？我听到了。你听到什么了？哦，房子。啊，在书的帐篷下。你为什么现在走出房子呢？你不是有书陪伴着待在合适的地方吗？为了在露天里牢记那些已经读过的东西。看看房子里那个角落吧，它就叫做启程：一只小箱子，一本法语字典，鞋子。那个乡间教堂的塔楼里又响起了钟声：它的音量现在正好与正午不相上下，在那昏暗的小窗里，只能感觉到它们忽闪忽闪的影子，好像从轮辐里发出的一样。在地球深处，有时会发生地震，那种所谓“缓慢的”地震，而正像人们所说的，这个星球在其中反射；“钟摆运

动”，地球的鸣响。一个男人和一个背书包的孩子的剪影晃动在铁道涵洞里，就像一个男人骑着一头驴似的。又是歌德那句格言，人生苦短，但日子漫长，玛丽莲·梦露不也有一首歌吗？她这样唱道：“One day too long, one life too short……”[70]还唱道：“Morning becomes evening under my body.”[71]那个明快的省略句，那些最后落下的悬铃木叶子这样描述它：在我这个试论过的成功的日子行将结束时，它应当赋予那样的线条——缩写！贺加斯那“美妙的线条”事实上并没有刻画进调色板里，而更多是绷在上面，犹如一条成弧形的曲线，或者一条鞭笞的绳索。这个成功的日子与那简洁性。（此外想要推迟结束——仿佛我，恰恰是我自己，伴随着每每添加的日子，可以从试论中学到更多的东西。）这个成功的日子与那愉快的等待。这个成功的日子与发现的自我迷失。早晨的寂静生活——下午的纷乱：只是一个假象规则吗？千万别让这样日复一日的假象规则所左右！再次引证保罗的话：在他那里，“这个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在你那儿呢？这个有尺度的日子；它不会是矫正你的标尺，而是让你引以为戒；你是它的臣民。谁在这儿对谁说话呢？我在对我自己说。下午那乌黑的寂静。孩子们在奔跑，依然如故，在风里。一如既往，在那高高的上方，在那里，那些悬铃木球形花摇来摆去：“心与之相印”（出自法语）。一如既往，你我现在会身处那沙沙声中，比如那枯萎的橡树灌木丛。如果没有这沙沙声，那我们会是什么呢？什么样的词语适合它呢？赞同（无声的）。沙沙声，留在我们这里吧。伴着这个日子同行——和这个日子一同说话（同源性）。在全巴黎最高处的那条弯道上，在圣克洛德和叙雷纳之间，大约在黄金谷车站附近，那个日子发生了什么呢？它变得摇晃不定。当时那半明半暗的闪光，在夏日的天空上燕子掉头的情形，而现在是黑白蓝相间的时刻：喜鹊和冬日的天空。几天前，在圣日耳曼德佩大街凯旋门上方，最后的晚餐上，又是福音传道者约翰的肩膀、脖子和脑袋上那个S线条，他整个上身紧挨着他的主耶稣，俯在餐桌上——和所有的石刻人物一样，他的脸也被革命给敲掉了。这个成功的日子与再次对历史的伟大遗忘：取而代之的是那个菱形图案，那个无边无际的菱形图案，人的眼睛的菱形图案，在大街上，在地铁通道里，在火车里比比皆是。沥青的灰暗。夜空的深蓝。我这个日子的颤抖，那持续不断的东西？把你的脚印留在站台雪地里的鸟足印旁。有一次，当一滴雨滴进我耳朵里时，一个艰难的日子浮现在眼前。太阳落山时木头台阶上的鞋刷。一个第一次写出自己姓名的孩子。直走到第一颗星星出现。不，范·莫里森

在他的歌里唱的不是在山里“钓鱼”，他唱的是观察鸟儿，歌名叫“out all day”[72]。他让自己的舌头歌唱，他的歌，刚一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溅满泥巴的森林作业汽车排在其他干干净净的汽车行列里的时刻。那片森林的大门嘎嘎地打开了。这个成功的日子的旋转门：里面的事物和人作为众生一齐闪耀。这个成功的日子与分享它的愿望。持续而野蛮地要求公正。噢，艰难的日子！成功了？或者“被拯救了”？出乎意料的是，即使在黑暗中，欢乐的推力还继续着。一个变化了的词语——用于这个日子的词语-矫正：“推力”替代了你习以为常的“猛一推”。要在夜晚行走时遵守：这条路亮起来了——你终于可以说“我的”路了——，并且是对隐秘的领悟，“你看一看，它与那些云彩并肩而来”，与风并肩而来。那只小猫头鹰的三声鸣叫。在一个森林池塘里小船的蓝色时刻，在下一个池塘里小船的黑色时刻。第一次在郊区，在遮挡住巴黎的光线的塞纳河丘陵后面，发现了猎户座，跃入冬天的夜晚里，下面是那些从烟囱里冒出的平行的烟柱，再下面是五级石头台阶，向上通到一个城墙大门前，英格丽·褒曼，她在《火山边缘之恋》[73]中经历了一个几乎致命的夜晚之后，在那个被冲刷成黑色的火山斜坡上昏倒了，太阳落山时苏醒过来，并且对生存发出了无比的惊叹：“多美啊。美丽无比！”在开往凡尔赛的171路夜车里，唯一一个乘客，站着。那个烧毁的电话亭。两辆车在沙维尔角相撞的情形：从一辆里跳出一个人来，持着手枪。在罗杰·萨朗格罗林荫大道窗户正面，电视发出强烈的光亮，那里的门牌号码已经超过了2000。维拉库布莱军用机场轰炸机起飞的轰隆声，就回响在丘陵森林的后面，一天比一天密集，战争日益临近。

——那么你现在最终完全失去了那个线条。回到书里去，去写作，去阅读。去看那些元文本，比如那里这样说道：“让这个词语发出声音来，挺住它——有利的时刻，或者不利的。”你曾经历过一个成功的日子吗？成功的瞬间、成功的生存，也许甚至成功的永恒终归会同什么样的日子融为一体呢？

——还从未有过，不言而喻。

——不言而喻？

——要是我经历过这样的情形的话，哪怕只是接近也罢，那么我可以想象得出，我无疑不仅会害怕接下来的夜晚做噩梦，而且也害怕死亡的汗水。

——这么说你成功的日子根本就不是一个思想，而是梦吗？

——是的。区别在于我不是拥有了它，而是在这里的试论中做过的。你看看这块已经变得如此又黑又小的橡皮，你看看窗户下那一堆铅笔杆。短语接着短语，空洞无物，一再白费力气，一无所获，想到某些第三者的东西，某些无法把握的东西，可是没有它，我们两人都会毫无希望。在他的信里，不是致全体教徒的，而是致个别人的，即他的拯救者，那个被关押在罗马的保罗一再这样描写着冬天："加快步伐吧，赶在冬天之前过来，亲爱的提莫西亚斯。把我落在卡尔波什附近的特罗斯大衣给我带来吧……"

——那件大衣现在在哪儿呢？离开梦吧。瞧，雪片绕过那空空的鸟巢落下来。为了变化，起程吧。

——奔向下一个梦？

试论寂静之地

王雯鹤　译

很久之前，我读过英国作家A.J.（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阿希博尔德·约瑟夫·”）克朗宁一部翻译成德语的小说，名叫《群星俯视》[74]。那是一本相当厚的书，书里的细节我现在几乎一点也不记得了，但这并不能怪在作者和他讲述的故事头上。当时那个故事很吸引我，令我振奋。关于这部小说，除了那些一直在俯视人间的星星，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一个英国矿区和一个贫穷的矿工家庭的编年史，其中也穿插着富有的矿主们的家族史（“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很久之后，面对约翰·福特导演的电影《青山翠谷》[75]，从褒义而言，那些人物形象和情景不禁让我觉得，这部电影与其说是把李察·勒埃林的小说《青山翠谷》，倒不如说是把克朗宁的《群星俯视》搬上了银幕，尽管我心里更明白是怎么回事。然而，从那些俯视人间的星星的史诗里，我仅仅记住了一个细节，它至今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也正是它，构成了我几乎一生都围绕着那个寂静之地和那些寂静的地方转来转去的出发点，而现在与之相应，对此的试论便要由此开始。

或许在我的记忆中，或许在我的想象中，那个细节讲述了如下的故事：《群星俯视》的主人公之一——在我看来，有两个主人公，他们都是孩子，后来长成大人，一个来自富有的家庭，另一个来自贫穷的家庭——养成了一个动不动就上厕所的习惯。只要他对其他人的聚会，不管是大人还是家庭，感到厌倦——感到厌烦——，成为他的负担，成为他的痛苦，就会发生这样的事。他把自己关在厕所（“就像这个名称已经告诉你的”）里，一待便是很久，就是不想再听那些闲言碎语。

这个故事，或者现在是复述？想要描述的是，正是那个富裕人家的孩子被驱赶到那个寂静之地，远离庄园的所有客厅和起居室，而这小子在那儿什么也不做，只是聆听着寂静。可以确定的是，与其说这个故事，这部小说，倒不如说它的复述现在想要描述的是，少年主人公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和近在咫尺的远方产生了一种想法，也有了一种感觉，因为它们，这本书才名副其实：天上的星星在那儿俯视着他。他的寂静之地没有屋顶，向天空敞开。

对这儿的我来说，这个寂静之地同样有一个故事，一个在有些方面不同的，与这个正好被复述的故事可以比拟的故事；考虑到那个压根儿就不“单调无聊”的地方，便是一个生动而丰富多彩的故事。我想试着勾勒这个故事，现在，并非专门详述，同时也对比从别处得到的断断续续的故事和画面。

正是在从孩子到成人过渡的那个年龄，这个寂静之地开始对我有了一些超乎寻常或惯常的意义。当我今天，在这儿坐在书桌前，远离童年生长的地方，远离童年时代，想回忆起“二战”后东柏林、柏林的尼德舍豪森区、潘科区的厕所和之后奥地利南部克恩滕州外祖父农舍的茅房时，脑海中仅仅浮现出寥寥无几的画面——对这个大城市连一个画面也没有——，此外，而且尤其是，我本人并不存在于它之中，不是作为孩子，不是作为一个人；在它们中缺少一个自我或者我自己；这些画面是空洞的。

无非是些平平常常的东西：剪成或多或少有些厚的一摞摞报纸，打了孔，挂在木板墙上用钉子绷起来的绳子上，各式各样，这些纸片的语言大多都是斯洛文尼亚语，大都是外祖父订的周报Vestnik（《使者》）。蹲坑的竖井下方是粪堆，这粪堆是下面牛圈的一部分——或者它会不会继续通向一种渗坑里？——，有个细节是，竖井超乎寻常地长，或者至少在还是孩子的我眼里是如此。这茅厕位于村子中心一面陡坡上的农舍的二层楼上，在一条很长的木制长廊的尽头，在长廊通向粮仓的过道里，既是长廊又是粮仓的部分或者角落，完全不引人注意，与长廊的厚木板和打谷场的木板一样，显现出灰暗的、风化了

的颜色，很容易被人视而不见，几乎让人看不出来是个独立的地方，连棚屋也不像，更别说是个“茅厕”了，尤其是茅厕门上也没有农村厕所门上常见的心形[76]，而且门也像是一扇门——无非是长廊和打谷场之间微微突出的一块木板，在陌生人眼里也许就是放置祖父木匠活工具的小隔间。但是，极少有人来光顾这所房子，每年最多也就有一次，即普通保险公司“Assicurazioni Generali”的地区代表。对这位代表来说，发生火灾或雷击时，一所这样的房子几乎会被忽略不计。显而易见，这样或那样，那个农家的茅厕则远离平常的一切，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节日；与下面平原上的市民集镇不同，在斯塔拉瓦斯这个斯洛文尼亚的农村里，一个像17世纪一些荷兰风俗画上所画的那样的公共厕所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我现在又想起了那个寂静之地的某些特别之处：那个小棚屋里的光亮，甚至是两重光亮（当然没有开关，我不知道这个人丁兴旺的家族的人在晚上是怎么穿过昏暗的长廊找到这儿的。拿着煤油灯？手电筒？蜡烛？摸索着？）：上面，也就是当场的第一种光亮——它是怎么穿过木棚屋的缝隙透射进来的？不，祖父是足够专业的匠人，他做木匠活儿时恐怕连一个缝隙也不会留下的——这光亮更多是透过木板之间和从木板本身钻出来的，好像过滤过一样，呈点状分布，透过这些细小的、针尖一般大小的洞眼，因为被锯成木板的树干上本来都有或多或少呈圆形的节孔，它们在干燥的环境里也许比树干缩得更厉害。不寻常的间接的光亮，房子里哪儿都没有的光亮；间接的光亮，这就是说没有窗户，因此更加实在；周围的光——人们在这寂静之地觉得被它包围着——人们？——我，那时在那儿就已经是“我”吗？

那么第二种光亮呢？从长长的竖井往下看，就是粪堆一小部分上的光亮，似乎在深处。这是一种从竖井照上来的光亮——你们可别期待着“同时伴着臭气”，没有这样的记忆，也没有说过这事——，不会照到这个人，照到从蹲坑向下张望的“我”，而最多只能照到竖井的一半，不，绝对不可能，几乎不到半个手臂的高度，集中在下面那里，与上面包围着这个张望者的光亮迥然不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闪

亮，一种闪亮，它似乎被深处与牲畜粪便混在一起的秸秆的黄色加强了，并且使竖井的内壁呈立体型，因为它旋绕出竖井的形状，旋绕出环形：生动的几何学，自然的几何学。此时此刻，我为什么又想起了那个我母亲讲述过的当地轶事，说有一个孩子拿了满满一篮大小相同闪闪发光的梨子献给乡村牧师，并说道："牧师先生，我的父母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并献给您这些从长在茅厕的梨树上摘下来的梨子！"

不管为什么，也不管怎样：不同于《群星俯视》中的少年主人公，我童年时绝对没有一次需要把厕所当作避难所。从那时起，我只是作为观察者，也作为一个张望的人，把这个寂静之地，这些寂静之地，如果它们确实存在的话，当作记忆中的一种媒介。在这样的地方，我压根儿就没有感受过寂静——既不寂静也不隐蔽，也不是别的什么：声响，无论是什么样的，过去和现在都无关紧要。（更不必说气味会怎样，极少，或也无关紧要。）张望者？过路驿站？边缘人物，无形的，不可见的，地方空荡荡的，不过是一瞥而已，过去和现在都是。

后来，远离农村的家乡——是的，曾经这样称之为家乡——，我第一次在这样一个寂静之地把自己看作一个中心人物，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是的。这是在寄宿学校那几年间。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件事就发生在我刚到那里时，在我入学的那天下午（或者我应该如此称之）。那是20世纪50年代9月初的一天，天下着大雨，很早就黑了；当时，在我们这个纬度地区还没有引入夏令时制。在大约三百名寄宿生第一次共进晚餐前，我们必须全体站立在那个无比巨大的餐厅里——我还从未在一个大厅里吃过饭，根本一次都没有到过这样一个大厅，除非是在体育馆里——跟着年长的神职学生一起做感恩祷告。

这祷告十分漫长，或者只是我感觉如此，大概之所以如此，因为自从下午早些时候到了寄宿学校以后，我就一直想去厕所。在那宽大的、曲里拐弯的大楼（一个当年的城堡）里，我却没有找到厕所，压

根儿也没去找。问一下？怎么到那里去？我们这些新生，来自最偏远地方的野孩子，站着，跟着做祷告，还是跟着做祷告，傍晚冰冷的雨水越来越猛烈地拍打着紧闭的餐厅大门和外面城堡院子里的石子路，在那里，或者是我听错了？还伴随着城堡喷泉的潺潺水声，要是我们能坐下就好了，坐在长长的餐桌前的长凳上。但是不能：还是站着，继续做祷告。当我们终于坐下时，有什么东西涌出来，正如我认为的，不可视而不见的东西，被所有桌边的少年们所看到的东西流在城堡那被许多吊灯照亮的、古老而漂亮的石板地面上，在所有人的目光下，蜿蜒地从一个凳子腿流到另一个凳子腿，又从一个桌子腿流到另一个桌子腿，又湿又冷地流过双腿，从“起点”开始，流过为人生新阶段而准备的新裤子，也流过脚上那双还算全新的鞋。

就这样，我直坐到晚餐结束，僵直地，假装吃饭的样子，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之后便不言而喻，刚一出门，我就立刻脱离开拥挤的人群，走开，远远地走进廊厅最昏暗的角落里。在记忆里，我终于！站在黑暗中，靠在一个柱子上，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这个自小就习惯这个或那个陌生之地的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出去是不可能的，不仅仅是因为大门紧锁和倾盆大雨，而回到其他人中去，回到我的同龄人中去，去自习室，之后去寝室，也是不可能的：我再也没有脸看见他们了。

然后，这个新生听到了背后响起一阵响声，显然感到不同于雨声。响声显然来自门后，门是开着的，通向寄宿学校最偏僻和隐蔽的厕所，也许是访客或者园丁专用的，或者外来的工人，平时总是锁着，这天晚上偶然可以进去。我进去时没有开灯，没有去找开关，只是在一片漆黑之中站着，被那响声包围着，一方面来自男厕所，另一方面来自一两个马桶漏水的隔间。我一动不动地待了很久。我内急的苦恼好歹已经在别的地方解决了。但是现在这里是解决一个完全不同的苦恼的地方，待在这里就把这个烦恼，渐渐地，经过一个小时左右，消除了，至少是暂时地——在刚到寄宿学校的这天。第一次，是我，是我这个人，在这个寂静之地成为关注的中心。第一次，这个寂静之地让我开始倾听，一种对这样一个地方，也对将来而言十分独特并决定我的人生的倾听。这样所能听到的，不只是各种各样的沙沙声，在这不变而冷冰的墙内和墙外，更多是因为这个原因，或由于远离而受到阻滞的喧闹，或者楼上同学们发出的响动，这种响动在我听来不再是喧闹，不再是尖叫和吼叫，片刻间几乎是些亲切的东西，几

乎如此。在那个没有光亮的寂静之地，这响声乃基调。但是，那真正算数的声音则是另一个，远在背景之中。

在教会寄宿学校这几年间，厕所，不仅仅是这个地方的厕所，对我来说则意味着一个可能的避难所，即使我更多也是逃到那儿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更常去的忏悔室如今在做神圣的弥撒过程中会越来越像某些可以相提并论的东西浮现在我的眼前，当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怎样相提并论呢？因为它使我脱离其他人，脱离教堂长凳上的同学们，说到底脱离整个社会，进入旁边一个地方，而不必向那个看不见的“告解神父”忏悔什么罪恶，更何况没有什么特别的罪恶——相反只是按照教义问答手册，从反省目录里随便挑上几条。这个忏悔室，这忏悔的小房子确实位于旁边，按照记忆，它远在教堂后面。动身去那里，挺惬意的。自由自在，至少是比较自由自在。之后，回到伙伴中，回到仪式中，通常几乎会令人欢欣鼓舞，然而，似乎并不是因为在忏悔室的黑暗中，冲着那个向来都看不见的告解神父耳朵边，良心变得轻松了——那时候，“良心”究竟是什么呢？

这两个地方，寂静之地和忏悔室，二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再说，它们也迥然各异。考虑到那些预先浮现（是的，浮现，而且会继续浮现）在我脑海里的东西，既那样不确定，又那样迫切，既是这篇试论的主要的事件或主线，又是我主要着眼的对象：在长凳间，在同学们中间，在弥撒仪式中间站起来，独自走向后面的忏悔室，这二者绝对不是出于一种冲动，更不用说出于一种苦恼了。每次都纯粹是出于无聊。当然：无聊也可能变成，或是发展成一种苦恼，变成一种什么样的苦恼。但是，这种无聊，这种成为痛苦的无聊，这种成为另一种，即相反的时间紧迫感的无聊，当时还是少年的我还不甚了解，或者我现在自以为如此，或者，在这里专注于这篇论寂静之地的试论时，假装好像是这样。

虽然我有时候学习热情很高（“充满学习热情”，这个词依然有效），但也出现过不少的时刻，我盼望着躺在寄宿学校的病房里，远

离自习室和书桌，病得不严重，但可能真的发着高烧，而且首先是烧退之后还可以再在那儿躺几天康复，从早到晚除了看看病房洁白柔软的床单上的几何图案或者其他什么图案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琢磨。这样的愿望在那些年期间几乎从未实现过。即使有一次发烧了，反正也是少之又少，那么从来也不太高，就像别人建议的，摩擦体温计，可似乎在我这儿完全不起作用：我向来只是在做游戏时才能充当一个好骗子，只要事情不关痛痒。只要一涉及什么，比如一个好处，一个骗局，我就会被逮住，甚至经常是无辜的——事实上，骗人的人是我前面、旁边或者后面的人。

但是有一次，我走了运，可以在病房里躺上几天，别问我为什么，是那里唯一生病的学生，被一位圣洁的、像亲姐姐似的修女悉心照料，从早到晚目光从床上透过高大的窗子望向与有着小窗的教室、书桌离每个窗子都很远的自习室完全不同的方向和地方：一个地方，有森林，有草地，也有正在吃草的奶牛，一个熟悉同时也新鲜的地方，没有寄宿学校或者别的什么界限存在于它与这个病房之间。这个病房很小，与那个当年的城堡里所有的房间，自习室、餐厅、寝室不同。

一直待在这个小房间里。然而，有一天早上，好像一下子变样了：起床，穿上衣服，回到生活中，回到健康人的集体中去。从白色的床单，窗前在反刍或睡觉的牛，一个又一个既井然有序又形成毫无变化的视野的杉树树梢的无聊中走出来。（与此同时，在病房那些天里，胸口上带着不知是什么电子设备，看着窗外一块拥挤的墓地，我压根儿就没有觉得无聊过，同样很久以后又一次待在病房里也是如此。如果说有过的话，那么，在这里有发言权的记忆则会说：没有。）有可能，在形影相吊的这段日子里，我想念这个或那个同学，更想老师。只是离开医院病房之后，我压根儿就没有被吸引到他们那里。当然，我似乎应该马上去报到，去城堡顶层的教室上课。相反，我只是漫无目的地在早晨空荡荡的走廊上走来走去，然后躲进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悄悄地溜进了同样空荡荡的公共厕所。距离下一个课间休息还早，我又一次走好运，久久地待在那里，没有受到打扰。只不过离开了有暖气的医院病房以后，在这个空间躲避时或者在这个躲避空间里感到冬天般寒冷，四周持续的水声似乎又加重了寒冷。我感

到越来越冷。之所以这样，是不是因为我发了几天烧之后体温变低了？我发抖，我哆嗦，我打颤，这正合我意。我恐怕要待在厕所里，直到可能加重的烧退下去。我把自己关在距离半开的窗子最近的隔间里。我站在那儿，直到过了课间休息，等着下一个课间休息。还没人找我，还没有。别让牙齿格格打颤。拿出你的本事，寒冷的地方，让我发烧吧。但没有再次发起烧来，直到这冰冷的上午末了也没有。

后来，我仅仅还有一次在这样一个寂静之地坚持待得更久。那是在我的学习生涯结束后漫长的几个月空闲时间里。最后两年是在一家公立学校上的，过得如此愉快，也算圆满结束，就像从来没有上过寄宿学校一样，不过是个幻影而已。新同学很快就成了一个亲密的团体，我，或者说“当时的我”，是其中的一员，虽说不是大家关注的中心，有时也是自鸣得意的一个，受关注的，时而会是这个，时而又会是那个，班级异乎寻常地小，男孩又少之又少——也许正因为如此，大家才团结一致？

现在，学习时代结束，其他人，这个班，我的班，所有其他人，只是除了我，悉数前往南斯拉夫和希腊了。他们都想——这不是我现在想象出来的——让我一同去，是我自己偷偷地溜掉了。溜掉时的借口和托词是：我母亲没钱让我去旅行。（尽管这种说法符合事实，但它还是个借口。）作为无国籍的人，我似乎没有护照。这也符合事实。然而，按照有关负责人的承诺，护照是可以补办的。就这样，我拒绝了，就像之前拒绝别人给我捐款的建议一样，于是，我最后也只是拿它来借口。

直到今天我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在我的心里有某些东西如此抗拒成为那个并不讨厌的团体的一员去旅行。不管怎样，在60年代初一个晴朗的夏日，我独自待在家乡的村子里，远离学校，远离我的家人，在之前享受了丰富多彩的集体生活之后变得全然无所事事。

于是，我后来自行决定动身上路，独自一人，肩上背着一个当时很流行的海员背包，里面塞满了衣服和其他东西，这使我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准备长久旅行的小伙子。

我当然并没有走很远，长久旅行更谈不上。尽管这条路向西走去，可是在这个方向，克恩滕州的土地可以说很狭小，我没有走出它西部边界。第一天毕竟到了菲拉赫，算来离家大约有五十里路，既不知道是怎么到那儿的，也不知道在哪儿过的夜。第二天走的距离就短些——只到了米尔施塔特湖附近的拉登泰因集镇，我在那儿拜访了一个同学的家，并在他们家里过的夜，睡在厚厚的睡袋里，不知道是在床上，还是沙发上，或者别的地方，或者是怎么度过的。

但是我却知道我是在哪儿度过第三个晚上的，尤其是，怎样度过的。这是在德拉瓦河畔的小城斯皮特，距离拉登泰因路程不远，距离米尔施塔特湖更近：现在，这座城市也不再依河的名字命名，而是按照湖的名字：“米尔施塔特湖畔的斯皮特”。

所有在那里的夜晚，我都是在火车站的厕所里度过的——“过夜”似乎不太合适。我的钱用光了，或者无论如何不够去住旅店，也不够住青年旅舍。在斯皮特城里，当年，也许今天？根本就没有青年旅舍。但是，火车站到晚上某个时刻是不会关门的，所以，我可以在火车站大楼里，也包括附近的地方四处游荡，直到午夜，或许更久。

有一段时间几乎还挺暖和的，那可是夏天。不过夏天的夜晚一般都会很快凉快下来，当时至少是这样；一个绝对温暖的夜晚：在记忆中，有一件少有的事，十分特别的事——你后来无论如何都不想进屋去，更想继续坐在外面，大家一起，是的，和其他人一起，静静地，这里偶尔的谈话声和那儿大自然的响动也是这寂静的一部分，即使没有香忍冬的香气飘过这样一个夏夜，只有轻柔的晚风拂面而来。这晚

风更胜于威廉·福克纳书中所描写的南部国家和密西西比州的香忍冬。

德拉瓦河畔的斯皮特火车站内外的夏夜却不是这样的。早在午夜之前，外面就开始变凉了，寒意很快也会在四面敞开的大楼里蔓延开来。起初，我还在外面走大圈，沿着火车站职工花园，走到火车站灯光照不到的河谷草地，后来范围变小，越来越小。

此外，还有一件打发时间的差事，可以说，它暖和了我的身子，赶走了疲倦，那就是在不同的站台上看火车，尤其是长途火车，有开往雅典、贝尔格莱德、索菲亚和布加勒斯特的，还有开往慕尼黑、科隆、哥本哈根、奥斯坦德的——再说，所有这些火车都停站。后来，过往的火车便越来越少，从某个时刻起，你就顶不住疲倦了。它如此咄咄逼人，以至于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或者后来的确还有办法：我把自己关在火车站厕所的隔间里。那儿尽管偏僻，但毕竟是在火车站大楼里面。

打开厕所门需要一个先令硬币，当我关上门时，我才会感受到某种安全感或者安然无恙。我放松地躺在瓷砖地面上，把旅行袋当作枕头。但是小隔间当然如此小，要想伸展开四肢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把头靠着后面的墙上，绕着马桶蜷缩成一团。这个还算宽敞的厕所里灯光相当明亮，白晃晃的，整晚都开着，并且只是微微暗淡地向上照进大概有小孩脚那么宽并向下敞开的隔间里。身上盖着从旅行袋里拿出来的几件衣服，我试着读会儿书，读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前一天在拉登泰因，这本书在使我诧异了好一会儿之后，突然打动了我的心灵，使我兴奋不已，因为小说结尾时关系到死亡，那个濒临死亡的人简直无声无息地陷入了对此的沉思之中。

但是，蜷缩在白色的厕所地砖上，想继续读下去是不可能的。最初找到这样一个睡觉的地方的兴奋劲儿过去之后，疲倦也再次更猛烈地袭来了。（直到现在，今天，在书写时，它依然使我脑袋和眼皮发沉，我不得不与立刻就要躺下睡觉的强烈念头作斗争，就像当时一样，我唯一的愿望是想有张床。）

我的眼睛在那里闭上了。只不过在厕所睡着是不可能的。虽然我进门时交了钱，但是夜越深，我就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像个违法的人。我没有权利躺在火车站厕所的地板上，更不用说在那里睡觉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打开门出去。对我来说，没有别的地方能像这里一样让我待上一个晚上。这里现在是我的地方，包括我的脸在马桶中倒映的影子，天亮前我一直面朝它躺着，包括用来固定坐便器的螺钉上涂的润滑油，或是什么，还有粘在润滑油上的一圈细毛，或是绒毛，或是毫毛，或是什么，包括隔间墙上睡着的苍蝇——“啊，睡觉！”——或是蜘蛛，或是盲蛛，或者不管是什么也罢。

在这种不合法的情境下，我听到外部世界的响动，与迄今所听到的不同，听到它们在我的寂静之地怎样传到我的耳朵里，不是遥不可及甚或空洞，更多的是近在咫尺，直达耳膜。一方面，这样一种聆听也许很正常，因为那些夜晚时刻首先是货车过往的时刻，它们都不停站，像铁制的鬼魂列车一样呼啸而过。另一方面，在越来越长的宁静时刻里，远处河谷低地里猫头鹰的叫声传到这个非法躺在这儿的人的耳际，就像是一句“他在那儿——他就躺在那儿——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的叫喊。甚至连铁路花园里夏天的蟋蟀音乐会（也许那个夜晚根本没那么冷）惊醒了快要进入梦乡的他，因为突然有尖叫声或用颤音的歌唱回响在他的耳际；同样，从火车站一棵树上刮来轻轻的阵风也惊动了他。在那个一再完全寂静的夜晚时分，却根本就谈不上是一个寂静之地。

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到别的地方去。渐渐地，我也不再期盼能躺到床上去了。无论如何我想要整晚，直到天亮——这当然在7月初时很早就可以感受得到——，就躺在火车站厕所的搪瓷马桶旁，蜷缩成半圆或大半圆。我现在想起来，根据那个众所周知的传说，当鬼怪大军[77]夜晚实施杀戮呼啸过天空时，地面上受到威胁的人就会寻找保护；他们躺倒在地，一个挨一个地形成一个个车轮。可是，当你独自一人时，该怎么办呢？我独自围成一个车轮，几乎就是这样，但是这样做后来就渐渐地提供了一个即使并不称心的避难所。

我似乎无论如何也不想跟一个班的其他同学换个位，当我在这里蜷缩着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时，他们却正在南方天空下某个地方钻在他们的睡袋里，这个女孩和那个男孩不是手拉着手，就是摸着别的什么地方，不是在梦乡里，就是醒着躺在那里。当然，他们或许也会有什么要讲述，但这与我在这里要讲述的东西是不可比较的，我不会明天就讲述，明年也不会——要讲述的话，这个事情自身暂时太贫乏——，不会讲述给任何确定的人或者亲近的人：这样一个人恐怕会注视着我，想象着我这个人或我的形象蜷缩在马桶旁，并且摇摇头。

几年后，时机终于到了，这时，我才可以继续讲述那个夜晚的一部分，不是口头上，更多是在书写时，讲述发生了变化，一种不是刻意为之的变化，而是就像自然而然发生，正是发生在写作中。

在我的第一部小说里，那个讲述故事的盲人直到结尾都徒劳地期待着弟弟不久会从战争中返回来，返回叙述者的家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也带着他的海员背包，躺在这样一个火车站厕所里，眼前只有白晃晃的马桶座。这部小说是在学业快结束时创作的。当时，我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学生了。[78]

二十年后，菲利普·柯巴尔，也就是《去往第九王国》[79]故事的主人公或者“我”在中学毕业后独自去旅行，同样带着他的海员背包，在地上度过了第一个夜晚。而就在这时，所有其他同学都在去往德尔法和埃皮达鲁斯[80]的路上。只是这地方不再是一个公共厕所，而是从克恩滕州的罗森巴赫到南斯拉夫的耶森尼克那条漫长的火车隧道的一个壁龛。那是一个冒险的夜晚，在漆黑的隧道里，货运火车不时地从卷缩在壁龛里的“我”的身边风驰电掣般地驶过。第二天，菲利普·柯巴尔开始了他在当时还属于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长达数月之久的史诗般的漫游，又是徒劳地寻找在战争中下落不明的哥哥。在此过程中，各种各样的风景和语言打开了他完全不同的眼界——当时，“我”在德拉瓦河畔的斯皮特火车站厕所度过了一个晚上之后，对周围的环境还有点迷茫。然后：干脆就回家去，回到村子里。斯洛文尼亚，南斯拉夫，包括耶森尼克，我很久之后才去过这些地方，又过了

很久才去了喀斯特高原，如果不去喀斯特高原，恐怕就不会有《去往第九王国》了。

在上大学期间，厕所作为避难所失去了意义。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别的地方，建筑，场所。这些地方我根本也不再需要亲自去光顾。一般情况下，只要感觉到那个“需要的东西”就够了。这可能就是哪个地方一个工具棚，一个有轨电车车库，一辆夜间空着的公交车，一个不知从哪次战争遗留下来的、即便半是坍塌的地下掩体。一些本身根本算不上什么的空间同样也让人感到惬意：只要一看到一个装卸台下空荡荡的地方，一看到一家牛奶场、一家运输公司的装卸台，或者别的什么装卸台，就预示着某些像是可以栖身或隐退的东西，还有组装成金字塔似的广告或竞选海报墙，尽管它们不是真正住人的地方，但毕竟是可以想象的停留之地，想象中那里干燥和温暖，至少比外面暖和舒适。

有时候，这样一些隐秘和安全的瞬间仅仅就来自看一看地面，看一看电车轨道，面对那里的沙子和落叶。然后，这里便会成为一个寂静的地方，即使在这个时候电车的铃声无比刺耳，车轮在急转弯时摩擦，仿佛不会有这样粗壮的粉笔划过石板。你会觉得自己沉浸和超脱到这种宁静的、除了沙子和落叶空空如也的轨道里（就这样，一个“人”便有了自己的位子），而不愿特意爬进一片枯萎的、打卷儿的树叶里，就像赫尔曼·伦茨[81]一首诗里的“我”想着要这样。

也很奇怪，只是一再想象着童年的乡村一个寂静的地方就代表这样的地方本身。是的，与当年在那里的情形相比，在空间和时间的距离中对它的回忆甚至使它产生更加无与伦比的作用。比如说，这样的回家之地、或休息之地，或拐弯之地现在变成了那些反正也越来越没人用的农家牲畜过磅台，是些相当均衡地嵌入地里，嵌入土地或者沥青里的活动木板过磅台，可以容得下身子最长的公牛和身子最肥的母牛。过磅装置安装在平台下面的地底下，牲畜的重量会从这里准确无误地显示在过磅台正后方的表盘上：这个过磅台，如果你小时候或者后来站到上面，晃动，再晃动，像它一样上下晃动，和一个人一起，

从某个时刻起，你就可以静止地站在木台上，而这个木台便会接着晃动一会儿，就像是在荡秋千和被人推着荡秋千一样。

不言而喻，在城里上大学期间，那些之前早就被感受为寂静的地方，比如马路边的牛奶摊，草场上的干草堆和晒草架，特别是远处田间的小木屋，好像更加强烈地弥漫出时而越来越不可或缺的寂静。

这不是乡愁。它并没有吸引你去那里。那些牛奶摊，即使早就被弃之不用了，腐烂了，垮掉了，那些干草堆，即使多年前的干草此间已经发霉腐烂了，那些小木屋，即使里面最后一个果子酒罐子早就在冬天的严寒中裂成了碎片，面包皮硬成了石头，板肉皮风干成了皮革，连田鼠也不再来光顾了：所有那些寂静的地方就在那儿，在这里，在我心中，在我身边，更是包围着我，即使，也有可能，不像从前那样可以拥有，可以触及和“可以闻到”，也许越发不适合当今的时代状况了——越发有抵抗力，也越发能够进行抵抗。

更加奇怪的是，不需要打算，也不需要计划，你可以独自从自身中创造寂静的地方，根据具体情况，在喧闹中（正是在喧闹中），在时而无以复加地扼杀精神的流言蜚语中。在听这个和那个课的时候，通过阅读伟大的和不太伟大的文学作品，这样的地方就会自然出现，会保护你。有一次，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形，不是通过阅读的东西，只是通过对它的回忆，甚至是在学生食堂里，尽管那里直到晚上都人满为患，可常常是我觉得唯一可以停留的地方。

有一天晚上，在食堂里，在距离我所在的角落很远的电视机里播放着新闻。由于持续的吵闹声，你根本就听不到或者几乎听不到什么新闻。好奇怪，屏幕上突然出现了威廉·福克纳的面孔，十分陌生，但很有风度。我不知道，为什么坐在角落里的我立刻就明白，这个作家在这一天去世了。所有这些年来，作为他的读者，他在我的心里是一个父亲的形象。一种强烈的，令人隐隐痛苦的寂静蔓延到我的心里

和我的四周。当我后来——大概是1962年6月？——晚上骑车回城郊的住处时，这种寂静也陪伴着我，一种弥漫到整个城市的寂静。

通过阅读而获得寂静的地方（这里指的并非是所谓在寂静之地的阅读，自然而然，或者也非如此）：几乎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相反，更奇怪的是，也许最奇怪的是，远离书本和童年的栖身之地，一个寂静之地甚至可以从纯粹的身体移动中产生，又是没有计划，又是无意间。一次停顿，一个折返，一种向后走，一种纯粹的屏住呼吸，都可以产生这样的情形。最可靠的，或者只是我现在书写时才又想到的？那样的动作是我当时从托马斯·沃尔夫[82]的书《天使，望故乡》[83]中获得的，主人公早慧的哥哥本，只要他无法忍受家人或者别的什么人的闲话、争吵、胡闹、争斗等时，就会把头扭过去，走到家中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一个没人的角落里，在那里对着他的“天使”说：“你就听听这个吧！”直到今天，只要遇到类似的情境，我依然会模仿本的做法，转过头看向别处，望着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只是我无声地讲出那句对天使说的话，而天使在他的寂静的地方应该倾听的蠢话，通常都出自我本人之口。

现在是该说清楚的时候了：这样或那样的寂静之地不仅仅只是成为我的避难所、庇护所、藏身处、隐身地、保护所、隐居处。尽管从一开始，它们部分是这样。但是，同样从一开始，它们同时也是些完全不同的东西，更多，多得多。尤其是这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个更多的东西促使我在这里写这篇试论，在书写中对它做一点符合它本性的、片段式的阐明。

奇怪或值得回忆的还有：至少在那个时候，那些似乎是官方的或者被承认的寂静之地对于我来说几乎都名不符实。正好在上大学那个时候，我一再被吸引到城里那空荡荡的教堂和墓地里。但是，记忆告诉我，即使在最隔绝喧闹的教堂里也从来透不出一丝光亮和温暖；在幸运的时候，最多不过从旁边，从法衣室里，从隔离栅栏间透出一缕

柔和的微光和一丝短暂和安慰的烟雾。几乎是一种解脱，然后又穿行在外面的巨大喧闹中。

所有那些陌生的公墓，而在万圣节和万灵节时装饰一新的墓地更陌生：更确切地说，当转过头去望着一片空虚时，当想象两脚踩在水平晃动的过磅台上时，当看到那四面透风的小木屋，角落里总是放着祖父或是谁的破烂胶皮靴筒，万灵节便活跃起来，挥手示意，随风而来。

第一个作为寂静之地而包围住我的公墓，是因为其中的厕所才成其为寂静之地，是在很久之后，在日本。是的，从寂静之地回到大写的寂静之地[84]。此外，在如今书写的日子里，我才明白过来，在上大学的几年间，在格拉茨城里的确至少有一个寂静之地可以说名副其实，不同于上述所说的。那不是一间公共厕所，既不是在中心广场上，也不是在火车总站里。在我的记忆中，我更讨厌那些厕所，无疑也是因为那些同性恋者，或者不管是什么人，他们总是在厕所前面不是晃来晃去，就是一动不动，最多不过是有时回头看一眼，不像《天使，望故乡》中的本那样（但是谁知道呢？），他们会在小便池前待数分钟，甚或数小时之久。

那是我当时所在的学院侧楼里的厕所。在那儿四年学习期间，它甚至两次成为我的寂静之地。这种情形总是出现在傍晚时分。这时，教室和走廊已经没人了。在我的想象中，我在城郊的住处，一栋小别墅中的一个小房间，并不受欢迎，不过在我看来，傍晚就蜷缩在那里的狭小和冰冷中也没意思，于是，当我厌烦了食堂，不愿坐着有轨电车来来往往，到了每个终点站又折回来，而且也没有可看的电影时，就习惯了待在教学楼里，越久越好。我是否在部分还开着门的教室里学习或者读书了：我再也记不得了——我现在觉得，我不过是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的半明半暗中。相反，我却记得，我需要时就会去那个明亮宽敞的，记忆中每次都让我感到温暖和友好的厕所，在离厕所隔间有一段距离的水池前洗头。（别墅里的浴室常常锁着门，甚至……）我每次都快快了事，因为这一层可能还有人，另一个学生，

他会让披着湿漉漉的头发待在厕所里的我感到诧异，对他来说更不自在。

有天傍晚，我在那里洗头时被吓了一跳，不是被一个学生，而是被一个教授。这个教授是我一年前一次公开考试的考官之一，当时我对自己的学习资料很有把握，而且脑子里也装得满满的，就反驳了他一两次（现在我耳边还回响着当时身后观众对这种对待教授的放肆行为的窃窃私语）。教授几乎让人看不出有什么反应，只是保持距离地走开了，就在之前，在听课的那一年里，冷漠，尽管站在露天教室下面，却像是居高临下俯视，现在考试时成了冷漠和权威的化身。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尽管我们两个心照不宣地彼此对抗，可是他有可能更加威严地无视我。从此之后，我就把他视为敌人，正是作为被故意无视的人，觉得受到我的老师的迫害。

在那天晚上，这个教授也许是从他对面的办公室出来，走进了厕所，起初装作好像我不存在的样子，无视我浸在盛满水的盥洗盆里的脑袋。周围满地弄得都是水。他在洗手，不是紧挨着我，但也不在这排最远的那个水龙头——有一定距离，但也比较近。我的教授洗了相当长时间手，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洗，而我则拿出特意放在书包里的手巾擦着头发。没人说话，也没有交换眼神。突然，他也开始洗脸，一开始只是用指尖，后来，直接把身子深深地弯在盥洗盆上，手心捧着水，两手并在一起，一遍又一遍仔细地洗着额头和脸颊，就像是西部惊险片里面一个刚从草地或者沙漠骑行回来的人的模样。随后，他开始梳理湿漉漉的头发，又是梳了再梳，梳个不停，像往常一样，在微微发白的鬓角上抹上了发蜡，在厕所镜子前换领带：把上课和办公时戴的深色丝绸领带换成了一条有花纹图案、颜色鲜亮的绉丝领带。这领带是用手指从西服口袋里掏出来的。最后，他还用袖珍剪刀剪了剪耳朵和鼻子里的毛，用镊子修剪了一下那显眼的黑色的浓眉。然后他走了，去见女人，人家约他去“塔利亚”咖啡厅，在停车场还对着车里的镜子在鼻子上搽了粉，舔掉了牙齿上粘上的唇膏。他走了，没看我一眼，也没和我打招呼。

此后，不管在教室还是别的地方，他继续无视我，但是现在我们两个人都明白，这成了一场游戏，我们俩的游戏。他不再是我的敌人了。自从洗手间的插曲以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小秘密。我深信，假如我们今天，在过了近半个世纪之后，彼此相遇的话，我们会马上，也是第一次开始对话，开始讲述——不是学业和那些日子，而是彼此在那个寂静之地一起度过的时刻，那些未曾预料到的，让人惊讶的时刻。

这里所说的另一次，是我在晚上更晚些时候去了系里那个寂静之地洗头，无论如何在我记忆中是这样的。当时已是深夜，我以为，楼里除了我不会再有别人：要到室外去多少只能是偷偷溜出去。推开门进到盥洗室和厕所时，里面的灯立刻就自动亮起来——或者当时还要“摁一下开关”？——，在我平时洗头的盥洗盆里，有一个人把头埋进水里在洗头。我进门时，他斜着眼从下往上打量着我，和我打招呼，一个陌生人，很友好，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一样。

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从没见过他，在大学里没有，在那个我节日前有时在货物发送部打零工的商场里没有，在别的地方也没有。但是我却感觉这个陌生人并不陌生，或者说他弥漫着一种熟悉的感觉方式让人感到陌生。不，与其说是熟悉，倒不如是一种恐惧。尽管这个人在洗头时把衬衫脱掉了，而我从来都不会这样做，而且他的年龄大概和我父亲或者谁差不多，但我看到自己就站在盥洗盆前，而且第一眼立刻就看到了。我在盥洗室里遇到了我的双影人，自童年很早以来我就知道，他存在于某个我看不见的地方，有一天会遇到我，或是我遇到他。

出乎意料，在想象里已经相当苍白，他出现在深夜里，在刺眼的灯光下，弯着身子，湿漉漉的长头发搭在脸前，解开的裤子背带垂到

膝盖间。像我平日一样，他也随身带着一块用来擦头发的手巾，一块大方格图案手巾（与我的不同）。

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也开始洗头，在离他两三个盥洗盆远的地方。就这样，一言不发，又自然而然，我们并排开始梳洗。然后，他刮起胡子，用毛刷刷上泡沫，而我，故意慢腾腾地梳着洗着，从旁边观察着我的双影人，不是偷偷地看，而是直接看过去，同时陷入了沉思，还是那样自然而然。我还从没有这样看过别人，最多也许不过是看一个睡着的人，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或者一个死人。旁边那个人就是我。我有一天会变成他那个样子吗？

那么我是谁呢？根本不像我自己一再认为的独来独往和我行我素。有点奇怪，是的，但是还有更奇怪的人。那么我是谁呢？一个探险队的成员，或者，不，一个独自探险的人，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闯荡以后，要进行休整，现在从探险中回到这儿的文明之中，暂时地，等待着下一次的个人行动。又是谁呢？打眼看去，显然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再看就是一个正常的人，而关键是千万个人中唯一正常的，而其余的人打眼看去全都是些地地道道的疯子。

那么我是谁呢？（仿佛面对我的双影人，我突然不能足够地了解自己——对我自己了解不够。）再让我是“一个人”吧，让我还是扮演一个人吧，先锋，逃兵，足球比赛的裁判员，或者至少是个边裁。

那么，面对厕所那儿白色氖光灯下我的双影人，我是怎样一个人呢？——并不特别。根本不那么讨厌。也许不完全具有哪些确定的东西，但也不是一点没有。与世界明星相去甚远，如果说是个傻瓜的话，那也是个来自乡村的傻瓜，而不是一个省城或者都市傻瓜。我是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哎，就是这样的。是啊，你瞧瞧。你看吧，怎么样？看吧，再看吧。是的，你就看看吧。再看看吧！

后来，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在80年代初，我在日本的一个公墓厕所里又碰到了一个寂静之地，至少是一个，我想把它讲述给自己和 或别的什么人。

在此期间，血——电影里的血——流入和流出厕所；一个熟人，不是电影里的，在茅房里，急着上厕所，却没能打开门，被雷电击中了；另一个人，在另一个国家，朝着一个老式的、很深的厕井呕吐，掉了进去，幸亏他那时（现在仍然是）肩膀很宽，卡在那里，头露在上面，一整夜，几乎要窒息了；直到今天，一个有轨电车终点站的厕所里那个老清洁妇的尖叫声仍然回响在我耳边；当时在那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并且因为那个声音，也因为她所说的话——，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又和一个熟人一起喝光了一瓶威士忌，喝得酩酊大醉，用冰冷刺骨的水冲着脑袋，那个声音，后来当我踉踉跄跄走进黑夜里时，它依然在身后吼叫着："啊，真吓人！这个人多么让人讨厌啊！"

要是这里关于寂静之地的试论，对此的讲述是一部电影的话，那么，那没有真正的寂静之地的数十年的连续镜头恐怕就会伴随着一些目光的节奏；它们透过无数火车厕所的洞眼，向下望着无数相互交错在一起的铁轨；而在飞机厕所里，目光所及，除了那突然冒出的晶蓝色或者别的什么颜色的涡流，更多什么都看不到。

我怎么会想起日本那个寂静之地是在公墓里呢？今天，在开始写作之前，我偶然地，因为那本书就意外地放在那儿，拿起了谷崎润一郎[85]的书《阴翳礼赞》，立刻就读到他对日本寺庙厕所的描述，赞颂其建筑和那里的寂静，"灵魂会在那里找到真正的安宁"；他还描述了那里的茶室。读到这儿，我就想起来，那个厕所并不属于公墓，而是寺庙建筑的一部分。我对寺庙本身几乎没有印象了，只记得在高塔的木板屋顶上有一群麻雀，这些小鸟和木板一样是灰色的，只是因为它们跳来跳去，竖起羽毛，在木板间玩捉迷藏，才能把它们和木板区

分开来。我现在觉得，这就是我唯一感受到的，多亏之前在寺庙厕所里待过。

那座寺庙位于奈良，是日本天皇当年的皇宫。我已经在两三周前就到了日本，在东京待了几天后，大多时间都在路上。其实更多是四处乱走。尽管我一再觉得这样也不错，但总是走错路和四处瞎碰，有时就找不到地方，近乎迷茫，渐渐地，甚至导致内心分裂。我整天在京都街上走来走去，一再走错方向。我最终到了龙安寺的庭园，看到那片已经从成百上千张图片上看到过的砾石地[86]，上面零零星星地分布着岩石；只要一看到岩石，你就会想象到日本海上的各个岛屿，还有那呈波浪形的砾石就是大海——或者不管看到了什么，或者什么也没看到。尽管如此，我还是问自己："我来这儿干什么呢？"在镰仓，我四处久久地荡来荡去，最终还是来到了公墓，站在小津安二郎的墓碑前，他那充满平静和寂静的电影曾经令我十分激动，如今在思想上依然如此。这时，我也同样问自己："我在这儿要干什么呢？"小津安二郎的墓碑上的"无"字——意思大概是"一无所有"。在欧洲家乡，阅读或者观看照片时，这个字周围会闪现出一种晕圈：在镰仓身临其境，呈现在我眼前的是：真的就是一无所有，彻底的一无所有。

那天早上，走进奈良那个寺庙里的厕所时，我才觉得日本变得熟悉了；我真的到了这个岛屿上；这个国家，整个这个国家，才接纳了我。谷崎润一郎在赞颂日本的寺庙厕所时强调那贴着精致木质脱纱的墙壁，尤其是推拉门，门上的木格，上面贴着浅色而透风的纸，从外面只能透进微弱的反光：如果我说这些细节现在依然历历在目的话，那恐怕是在说谎。我只记得，那里笼罩着谷崎润一郎渲染的朦胧，正是这种朦胧立刻让我感到神奇，成为他的客人，因为它以无与伦比的温柔和真实包围着我，欢迎我的到来，使我在迷失了几周之后回到了现实中，回到这个地方，回到生活里。（这时，外面，也就是奈良城中已经是朦朦胧胧的黎明了，而寺庙花园中还没有。当然，这不可能是偏僻的厕所隔间中的光亮。）

到达的感觉，被接受的感觉，宾至如归的感觉？奈良的寂静之地也是一个解脱之地。这不是避难处，不是庇护所，不是上厕所的地方。在那个清晨时分，它只像平日的一个地方一样，也许就像没有过的地方一样，这个地方就是“地方”。该怎么说呢，我在其中难以自制，浑身充满了令人振奋而不确定的能量。这个地方令我兴奋不已。是的，在这个寂静之地有一个“神灵”在活动，按照谷崎润一郎的说法，这个神灵负责“宁静”，同时也催人快快离开，刻不容缓——一个令人不安的神灵，一个让人难以自制的神灵，一个被赋予了魔力的、使人不会受到伤害的神灵。又按照谷崎润一郎的说法，这样的寺庙厕所只有一个缺陷，“如果你非要说的话”，那就是距离主建筑太远，“特别是在冬天潜在着感冒的风险”：但是，在我看来，即使是西伯利亚的寒冷在那里似乎也奈何不了我。要是这个带有“精致木纹”的木屋一瞬间着了火的话，我也正身在其中，我似乎会毫发无损地跑到外面去——甜美的幻想？是否也是由于这个使人不会受到伤害的神灵的缘故，谷崎润一郎才认为，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寺庙厕所更适合“感受昆虫的啾啾鸣叫，鸟儿的歌唱，月夜，这些一年四季转瞬即逝的美丽”，也许这位年老的俳句诗人就是在这样的寂静之地“产生了无尽的创作灵感”？

不管怎样说：自从在奈良的那个寺庙厕所度过了一个早晨之后——如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寂静之地就超越了物质和地点，像思想一样伴陪伴着我。换句话说：从此以后，它就是一个话题，或者，翻译成古希腊语的话，是一个难题，一个吸引人的难题——在它的第一层含义上说是个“前山”，某些必须绕过去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大船，或者小艇，或者小舟就是语言，是绕着圈子或者勾勒的叙述语言。

确实，首先是那里的朦胧激发了我的动力。（不是“影子”，没有阳光照射，也没有人造光源。）看样子，仿佛这个小小的空间不过是一片朦胧，一片既清楚又实在的朦胧。正是这清楚和闪烁的朦胧，

它从那之后就一直搅动我的内心深处；搅动我去做点什么。什么呢？不是什么确定的东西，或者有目标的东西，只是行动起来，出发，不管去哪儿，不管去多远，或者就地待着，立刻做点事情。什么呢？某些美妙的东西；某些让人惊奇的东西；某些似乎与这朦胧的实在和亲切相符合的东西。在奈良那个小小的寂静之地，这样的光亮正中我的内在。

看样子，正因为如此，仿佛在之前四处颠簸的那些年里，透过所有火车厕所向下，望着在身后飞驰而去的铁轨、枕木和灰黑色砾石的目光突然静止了，而伴随着这一静止状态，我下方的东西也变了：不再是铁轨等东西，而只有红黄色的土地，从中弥漫出无可比拟的闪烁。

接着这种朦胧，我后来突然想起来——不，我现在才想起来——，我之前不公正地对待过飞机上的厕所：因为有一次，一个飞机厕所上面的的确确有一个小窗户，透过这窗户，我可以看到上面，也就是月亮，甚至几颗向下张望的星星，一幅图像，我待在那儿可以一直仰望着它；就这样，我乘坐着最小的伊留申民航飞机飞行了好久，再加上我是这架从莫斯科飞往东柏林（当时的）的航班上唯一的乘客，又的的确确：惊奇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

多亏奈良这个寂静之地，我最终感受到了日本这个地方，并且今天可以说："我曾去过远东。"就在一跨过那个我现在想象着由浅色的、布满节孔的松木做成的门槛时，这种感受或许也让之前几周旅行时让我费尽脑筋的烦恼立刻消失了。那弥漫的朦胧立即把我变成了一个无忧无虑的人。我感到，这无忧无虑不仅仅局限于在寺庙厕所里的时刻，它似乎会延续，延续一阵子，无论如何当时是这样。

我又获得了一种什么样的飘飘然啊！啊，无忧无虑和飘飘然，真快活。同时这也与我想对这个地方做出某些承诺并不矛盾，因为这地方使我变得这样飘飘然。向这个寺庙厕所许愿，只是许什么愿呢？我会遇到生命中的那个女人——出于无忧无虑和飘飘然，我确定她一定会存在于什么地方——，和她一起来奈良这儿度蜜月旅行（当时还存有这样的幻想）。

现在，透过茅房木板上的节孔，真的看见了棕黄色的黏土地。但是地面为什么离得如此远，它的闪烁为什么弥漫在我下面很深的地方，如此深邃？因为这不是奈良寂静之地下方的黏土，而是在日本另外一个什么地方看到的，而且也是透过这样一个松木节孔，但是从一个走廊上，一个木走廊，位于一家我们说是酒店，旅馆或者客栈二层外面，在北海边的满岛（即松树岛）。几周之后，我在那儿待了几天，依然无忧无虑。我总是趴在阳台地上，透过一个确定的节孔望着下面的黏土地，寻找着小石子、沙粒、松叶、一个啤酒瓶盖，在这种视角中，它们全都闪烁着光环；同时，是的，同时，我现在，在60年代前，也是脸朝下躺在祖父庄园的长廊上——那个长廊，它由一个个房间通向远处的茅房——，透过木板的裂缝盯着或者凝视着下面养鸡的院子，水泥地面，那里没有闪烁照上来，但取而代之的是，那里撒满了玉米粒，一片黄色，闪烁着，时不时会有另一种黄色的尖嘴在玉米粒中啄来啄去，使得玉米粒四处蹦开来；同时，水泥地上也不断地发出嘣、嘣、嘣的响声。四周不见人影；孤零零的院子，孤零零的房间，扫院子的扫帚不过剩下残干。

我在写作时有时会暗暗地问过自己的东西，现在以文字形式又问道：在我的人生中，向来也没有特别的需要，我似乎在世界各地都会去寻找寂静之地，这也许是一种表达，一种即使不是逃避交往，也许毕竟是厌恶交往，厌恶交际的表达吧？因为我会在众人中突然站起来，远离他们，尽可能拐更多的弯，爬上无数个台阶：一种非社会的——一种反社会的行为？是的，过去是，现在依然是这样，有时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无声而断然地起身走开通常也只是开始一阵子的情形。就在穿过并尽可能绕着道走去时，同

时也说："什么也别管，走开吧！"，去寂静之地，情形就变样了；唯一性就会变成多重性。的确是这样，关上厕所门后，我就会美美地松一口气："终于独自一人了！"

然而，另一方面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这地方的寂静虽说是一种惬意，但每当它伴随有外面世界的喧闹、风声、窗前的河流声、过往的火车声、长途载重汽车声、有轨电车声、甚至警车或者救护车的鸣笛声时，却使得惬意更强烈？也许从与人群，尤其是与我刚起身离开的房间的喧闹保持距离的视角来看，便会从根本上产生最强烈的效果？在那些遥远的寂静之地，几乎每次——不是总是——透过围墙、墙壁和大门传进来的喧闹、笑声、嚷嚷声即使不会变成某种悦耳动听的东西，但会变成在我的耳际中让我感到惬意的东西，这会使我——不是总是——过了一段我同时会超过和力图尽情享受的时光以后，离开那个寂静之地，凭借它的力量，回到其他人之中，回到我的人群之中，即使他们压根儿就不是我的同路人，回到喧闹中，回到吵闹中，但愿上帝成全，回到各种空间那无休止的咆哮中。

在日本之后的岁月里，我把那些在寂静之地度过的、也是我"超过"——在足球比赛中人们称之为"拖延时间"——的时光都用于"社会研究"。我这里不是指厕所里的铭文、涂画和类似的东西。虽然这些东西我时而也会读一下，为什么不呢？也有所了解。但是，仔细观察它们并且沉浸其中，过去不是，现在依然不是我的所好。然而，在那些寂静之地——不是在私人的寂静之地，因为那里多少都有各种变化无常的粗野举止和繁文缛节的东西，而更多是在公共或者半公共的寂静之地——一再重新去观赏，去观察，最终就是思考、幻想和想象。

在法国这个我已经居住了很久的国度里，公共场所，咖啡厅和酒吧很多年前就禁烟了。这样一来，比如说，一些在厕所里可以观察到的东西好像成了考古学关注的对象；这里说的是旧厕所，昔日的厕所，允许室内吸烟的年代的厕所。在一些地方，在当年洁白的马桶水箱的瓷盖上，在同样最初也是白色的铁皮卷纸盖——或者不管叫什么

也罢——上面，咖啡厅和酒吧厕所里的吸烟者把点了的烟放上去，而烟火在这些东西上留下了一种图案。不管怎么说，只要我碰到昔日，禁烟令颁布之前这样一些地方——再说，它们越来越少见了——，就会觉得这样的焦痕像是一个图案，而我每次都会以我作为社会人的角色，尽心尽责地去深入观察。

在我看来，那些图案在每个寂静之地都会有些不同。我没想过要解释它们。在大自然里，我总是尝试解读脚印，动物的和人的，这对我来说自然而然。我也把厕所里烟火烫过的地方看成是印记，有时是叙事性的，有时是戏剧性的，只是我从中什么也看不出来，就像有时在森林里或者河坝边的泥地里，既看不出迷路人的脚印，一场争斗的痕迹，也看不出一个突然不知何去何从的人的脚印，一个与自己较劲的动物或者人的脚印。那些马桶水箱和铁纸盒盖子上的灼伤痕迹都留下了黑乎乎的残迹，不管是零零星星还是聚成一堆，不管是隐隐约约还是清晰可见，它们是不可解读的，但是可以唤起我的想象，而这种想象是不确定的，也绝对不是一个故事的萌芽——既不确定，又自由，是另一个故事的图案；如果观察这个图案会让你联想的话，那也不是任何在这些寂静之地曾经真的发生的事情：当我在探究这些叙事性——戏剧性的图案时，更多一幅又一幅另外的画面，一些可能的画面浮现在我以前所说的内在的眼里，同样是叙事性的和戏剧性的。我，一个古怪的探究者。一个古怪的社会人。然而，难道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吗？

我也成了这样一个社会人，一心想着有益于大众，服务于公众，难道不是吗？因为我刚一关上寂静之地的门，就变成了一个空间丈量员。在几乎所有的厕所里，我都会立即发现一个形状系统，也就是几何形状系统，一个我在门外没有看到过的系统。一旦到了里面，我就会用发现者的眼睛去观察。这里的每一个东西同时都会显现出它的几何形状，圆形，椭圆形，圆柱形，圆锥形，椭圆，棱锥形，平截头棱锥形，截锥形，矩形，切线，弓形，梯形。寂静之地本身就是一个有几何形状的地方，也需要被理解和再现成这样一个地方。而探究这个地方的我就是它的测量师，应该尽可能地履行这一使命。如果说这个

测量师不是有利于大众的话，那又是什么呢，或者？但现在还是停止讽刺吧；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认识到，讽刺不是我的拿手戏，至少在书面上如此。

认真地说：寂静之地那里发生的事跃然眼前，不仅仅是马桶座、马桶基座、水箱、按钮、水管、洗手池、水龙头等等的几何之地，而且除此之外，也是所有那些拥有完全不同用处的、生存必不可少的、利于大众和造福社会的立体形状的几何之地，存在于“petit coin（小角落）”之外，存在于“mustarach（安宁之地）”之外，存在于这个以前被称作“Erdkreis”[87]的巨大球体上。“Aei ho theós geométrei”，这句刻在一座老房子山墙上的希腊名言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因此我也为自己翻译了这个句子：“上帝永远在geometern（测量地球）。”或者，对不想看到“上帝”以及这个外来词[88]，甚至“永远”这个词的人来说：自然自在地呈现。

是的，这些寂静之地集中地体现出几何形态。在我的眼里，除了另外一些自然呈现的寂静之地以外，比起其余大多数寂静之地来，比如寂静的小贮藏间、荒野里隐居者的栖身所、修道院的禁室、电子或中子或别的什么撞击掩体等，它们是更可测定的，至少今天如此；而且，除了必然的公共利益之外，它们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公共利益，就像硅谷或类似的地方一样。——这样一来，你们就会对寂静之地的测量者打上公共利益的烙印，绝对是由他自己证明的！？（感叹号后面紧随着问号，所以，这个故事可以继续下去，不一样地继续下去，有不一样的结局。）

写这篇关于寂静之地的试论之前，我读了不少书，观察了许多照片。然而，其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派上了用场。那些关于人们所说的卫生设施的意义变迁——从更多公开到更多不公开，又或者相反，从自由随便到扭扭捏捏，从扭扭捏捏到社会游戏，而且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都各不相同——的历史和民族学论文，它们是可以让人看出一些名堂的。然而，很久之前促使我去探寻寂静之地的痕迹

的东西则完全不同；这些历史、民俗和社会学读物更多趋向于使这样的痕迹变得模糊不清。

同样，关于“世界上的厕所”（包括宇宙空间，参见宇航员厕所）的画册里的照片，它们看上去那样令人开心，让人惊讶，也时常让人忧虑（参看贫民窟、监狱和停尸间的厕所），但也不能激发人的想象，至少对我来说不能。啊，是这样的，那些由印第安人部落建在巴拿马或者伸向大洋某个地方的木制厕所，可以通过跳板进去，却会被游泳的游客看成是“下水管”：照片上，下面是这样一只不知情的游泳者的手，目光从上向下透过粪孔。啊呵，那些彩色照片就是没有帘子的正方形水泥小厕所，男女通用，在非洲的赞比西河流域，在纳米比亚，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还有，啊，还是在非洲，那个小厕所好像远离别的地方的任何文明，但是却可以望见地球上最大和最漂亮的流动沙丘之一，沙粒在晨曦和暮色中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噢，最后也许还有来自新西兰的照片，它们几乎会让人兴致盎然，单单因为这寂静之地而去那里旅行：画家兼建筑师佛登斯列·汉德瓦萨[89]为那里的一座小城创建的厕所设施，使用了一千零一种颜色，就像他以往的风格和追求一样，避免任何形式的直角空间——但是，如果说风格上矫揉造作的话，那么在这儿，在这座公共建筑上则是不存在的，至少依据那些照片不会得出如此结论。面对这座公共建筑，人们就会对这位建造者负有内疚之感，因为他们对他在世界各地设计建造的其他公共建筑颇有微词。按照我对几何学的评论，我在这里不是自相矛盾吗？果真如此的话，也没有关系。另外，这个在新西兰的厕所设计是汉德瓦萨生前的最后一个作品。

既然开始了探究，我几乎每次在大大小小的世界里发现寂静之地时，便会用我的一次性相机给它拍照（我现在已觉得这些照片毫无意义了）。其中有一些很不常见的地方：风景如画的，花花世界的，傲慢的，残缺不全的，可怜巴巴的，被人遗弃的。有一些建在摩天大楼或是电视塔的顶层，透过观景窗可以看到从中央公园到自由女神像，从科帕卡瓦纳海滩[90]到最后用白波纹铁皮建造房子的Favelas [91]的景色，或者是建在阿拉斯加某个正在崩裂的冰川上的旅店的顶层，而在另一个旅店的顶层，则可以透过纱窗看到盛夏夜晚的育空河[92]，河面上整晚有燕子在飞翔，整个河流一再从那些印第安人的捕鱼木巨轮下

流过，好像在怒号和轰鸣；巨轮转动时而缓慢，时而又突然加快，仿佛突然咬住什么似的。这里就不提巴尔干半岛上的厕所或茅房了，即使不是因为其中没有一个被认为值得收录进“世界厕所”的画册——只有一点：好奇怪，那里所有的蜘蛛网、盲蛛和苍蝇，还有替代刷子的秸秆扫帚和类似的东西，从没有打扰过我，恰恰相反。

最奇怪的是那些被认为很奢侈的寂静之地，它们远离世界的喧嚣和日常的喧闹，通常都建在一个宽敞的、如同迷宫似的地下空间里，在餐馆、会议大楼或者别的什么建筑的地下一层或二层。人们走过一个又一个门，耳边伴着一种天体音乐，走了又走，还是走不到，而当你终于到了时，却发现那个地方什么也不是，甚至连外面的世界和你所熟悉的生活场景的遥远回音都没有。

那些地下墓穴般的寂静之地使我想起了我一生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梦里遇到的连列厅[93]，是的，遇到：就在我的确每天居住的房子或住宅下面。在这些梦里，完全寂静、通亮、布置奢华的套房一个接着一个地敞开，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富丽堂皇，每一间都是空无一人，只有我是它们唯一的主人，这些宫殿般的连列厅已经等了我很久很久，等着我最终使用它们，给我带来好处。

但是，我所认为和在这里迫切想要讲述的寂静之地完全不依赖于特殊的位置，或者别的什么外部特征或不寻常。与我有关的事情，分别同样，或者说也许更多地发生在那些平日里毫不起眼、也很有序的寂静之地，从中也只有那事留在我记忆中，而没有地方的细节，更不用说它的几何形态了。我试图把“理想标准”——不是指那个品牌[94]，而就是这个词——转化为我的问题。

有一个小例子：有一次，在另一个国家，我刚要离开这样一个没有留下印象的厕所时，在门口忽然撞见了一个人，他是“我的读者”，一个来自另一个国家的读者，他好像打心底里对这次邂逅感到

高兴，口口声声不离这个地方；我和他邂逅，只要想起这个地方，就更是感到高兴。

就在几个星期前，我坐在位于葡萄牙大西洋海滨的卡斯凯什一个公园小路边的长凳上，小路通往公园的公共厕所。我坐在那儿，与其说是为了观察研究，倒不如说只是为了感受地方和环境。渐渐地，也许也是因为我的观察，零星来往的人变成了一队人，我已经很久没在街上或者别的地方看到过这样的情形了，心中很是怀念。因为，我，这样或那样的我，不管是什么，都需要这样一个由人组成的队列，一个人的队列。如果我现在写作时想到，在我的眼里，在别的什么地方，一种可以比拟的缓慢移动最有可能发生在做弥撒的时候，教民在举行圣餐仪式时，走过去接受基督的圣体，再走回来，坐回长椅上或者去别的地方。这个想法不会是亵渎神明吧。是的，那里就是这样，去卡斯凯什的寂静之地，又回来，这样一个队列，既不是因为内急，或者之后因为轻松，而且也不是因为我的观察而产生的。因为，当我最后从长凳上站起身来，加入到来来去去的人群里时，我也在并非空虚的瞬间成了这个来来去去的寂静之地的队列的一员，这个既有十分年老的人，又有逃学的学生，既有残废的人，又有体弱多病者，既有当地人，又有外国人，既有寡妇，又有挨饿的人，既有戴着发网的家庭主妇，又有抹着头油的游手好闲者的队列。与圣餐仪式不同，这是一个来来去去的人会彼此打招呼的队列，这样或那样，刻意或无声，只是用眼神，在这些瞬间没有别的用意——果真如此的话：不同于在教堂中，在这里，这些人恰如其分，行为得体。这就是一个由我们这些怪人组成的友好的小队列，情形就是这样，感觉就是这样。

出于“探究”的目的，就寂静之地，我也询问过别的几个人，不，不是询问，只是这样提到了我的问题。不管他们随之拐弯抹角地讲述什么，我从不追问，而只强调预先萦绕在我脑海中的东西。在异乡和孤独中把额头贴在一个厕所的瓷砖墙上。上学的时候，寻找过这个地方去抽烟，但是，更多时候却另有心意，因为你从那里透过窗户可以看到第一个心仪之人住的地方。在令人不愉快的外祖父母的房子里，作为孤儿或者半是孤儿，透过又一扇窗户，数个钟头之久望着一

家名叫“走向太阳”的旅馆，直到那里有客人抵达，望着远处房间里的身影。现在显而易见的是，所有这些关于寂静之地的人片段式的讲述都发生在很久很久的过去，而且在童年时期比在青少年时期，即成长时期更少。那么之后呢，至少在那些被询问的人中，没人反应。最多就是有人讲到他年老的母亲，她每次在外面蹲坑时，都要挑一个环境特别好的地方，尽可能视野要开阔。那不仅仅应该是一个寂静之地，也必须是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但是，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写作期间，我想起来了一个画面，一幅与我写作《试论寂静之地》时在思想上要勾勒的东西完全相反的画面。这幅画面描绘的是一个小姑娘：1999年春天，当西欧对南联盟进行轰炸的时候，在贝尔格莱德西北部城市巴塔尼卡一个出租房里，这个小女孩儿晚上去上厕所，在那儿——所有房子里和城里的居民都安然无恙，至少在那个靠不住的夜晚是如此——被一块穿过厕所墙壁飞进来的炸弹碎片击中而身亡。

写作时，还有另一个画面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与我想要勾勒的画面相反，或者也不是：在一个巨大的会所某个地方，一个男人误进了女厕所，在那儿碰到了一位漂亮的陌生女士——或者相反，是这位女士错进了男厕所？不管怎样，他们在那儿并没有发生关系（或者不管怎么说？），而是从两人在寂静之地的相遇中，演绎出伟大的爱情，尽管发展缓慢，且障碍重重。不过，这是出自一部电影的画面。这部电影将在未来上映，一个即使不是无望但也黯淡无光的未来。

《试论寂静之地》是我在法国一个人烟较为稀少的地方写就的，在巴黎所在的法兰西岛与诺曼底之间某个地方，在一个中间地带，距离巴黎和大海差不多一样远。写作是在一年中可以说是最黑暗的时期进行的，也就是2011年12月的第二周到31号这段日子，这就是：今天。在写作前后，我整天漫步在已经落叶的树林中和方圆几里地收割过的田野里——这片地方曾经是王室的谷仓——以及那些人迹稀少的公路上。确实：天色总是很快就暗下来，即使在白天，那片起伏的广

阔土地上也只有昏暗的光。然而，只要出了太阳，哪怕只有一个小时，我就想象不出会有比这里几乎水平照射过来的十二月的阳光更炽烈的光；没有更开阔的、更充满活力的草地和蓝天，只有田间路上那一道道草径更热切的闪亮。“有点阳光”，唯一能买到的日报《巴黎人报》做出了这样让人心情郁闷的天气预报，可阳光并没有出现：瞬间的阳光也许就是奢求了。从早到晚只有阴云形成“地平线”，因此，乡下人都为这家都市日报感到遗憾。

每次随之而来的连绵阴雨把道路、农田和草场变成了泥地，但是穿着胶皮靴子径直蹚过齐膝深的积水或者穿过田地，这一再是一种完全独特的享受，即使在昏暗中。这时的路上——如果是条路的话——最多时不时会让人知道有水洼存在。从童年在草地上放牛的岁月以来，第一次穿着这样的靴子笨拙地行走，心中要为它们唱一曲赞歌。

在年末和年初时节，夜里雨下得尤其猛烈，这段时间以前被称之为“圣诞节节期”[95]。为此还要再次提到“靴子”：当雨水噼噼啪啪地回响在这偏僻的房子周围时，仿佛雨水在笨重地踩着靴子：一开始它只是摸索着走，后来就迈开了步子，最后索性大步地走起来，整夜不停。天没有下雪，而这一次，我也并没有想念下雪的感觉。

漫步走过这片广阔的，绿意渐浓的土地时——正是在昏暗的反光中，颜色和随之出现的形态尤其清楚地显露出来——，仿佛我专为自己组建了一队步行的人。在这几周中，我几乎没遇到过什么人，除了一些猎人，他们总是至少三个人一起，穿着黄色反光短上衣，像维护秩序的人或者官员，在翻耕过的棕黑色土地上三五成群，端着猎枪准备射击。但是，这并不是愉快的碰面，森林周围连续劈劈啪啪的枪声完全不是欢迎的问候。

在这些相隔甚远，零零散散的村庄里，外面几乎碰不到人。有一次，在那儿透过一扇窗户望去时，看到了一个老妇人，一动不动地撑在行走支架上。在一个步行可以到达的乡村酒吧里，除了那个当年的长途货车司机外，我是唯一的客人。酒吧老板劝司机给这个简陋的房子，只给那里，装一台电视机，而他回答说，他一辈子都坐在方向盘后，“现在是不会让自己坐在椅子上看电视的”。

在写作的日子里，我几乎想不起来哪个人的脸，因此或者取而代之的是，想起不少其他东西的样子。有一次，就突然想起一座耸立在荒野中的、有千年历史的教堂尖塔，便不由自主地举起手臂向它致意。

休耕地上的云雀与其说在啁啾或欢鸣，倒不如说在尖叫。它们猛地直上直下，展翅飞向天空，形成了空中的阶梯。与此同时，有一群麻雀从垄沟里一哄而起，穿行在空中，表演起空中飞人。野鸡在房前谄媚地舞来舞去，摇着颜色鲜亮的长尾巴，仿佛它就是看家的公鸡。夜里，又活过了一个狩猎日的野猪家族在路边的矮树丛里此起彼伏地咕咕叫着，没有猎人能想到它们在那儿，它们在几乎一片漆黑中推来搡去地弓起身子，不，不是咕咕叫，而是窃窃私语，低声交谈，并且弓起了身子。无数猫头鹰在明亮的白天从它们藏身的洞穴飞到这里从前的石灰岩裂缝里，声音轻得好像只有一只似的。它们长着扁平的小脸，羽毛呈现出与它们飞过的石灰岩一模一样的白色。另外一些猫头鹰则整晚用单一的音调鸣叫着，这叫声像一副没有绳圈的套索，快到早上时，作为对第一只醒来的公鸡的打鸣声的回应，则变成有两种甚至三种音调，而这一唱一和通常会以猫头鹰的叫声结尾。然后就是母鸡的咯咯声，牛的哞哞声，驴的哀鸣或默不作声，野鸡的叫声，乌鸦时不时的号叫或沉默，基调则是野鸽子的咕咕声。这声音先于布谷鸟的叫声和早春时分鹰的尖叫。糟糕透顶的混乱？富有裨益的混乱，持续良久。有一天早上，我短暂出门去削完铅笔后回到房子底层的书房里，看见一只刺猬蹲在桌下面——在那儿一蹲就是一整天，时不时竖起身上的刺，蜷成一团，但大多数时间还是自在地把它的长鼻子——或者“大象鼻”？——露出来。我那样不由自主地跟它打起了招呼，

它随之竖起了圆圆的耳朵，用黑色的眼睛看着我。在一个特别漆黑的夜晚，我穿过休耕地时，突然更多是感觉到，而不是看到有两只巨大的猫头鹰成对在我头顶盘旋，或者越聚越多，或者变得越来越多？也是完全无声无息，离这个行走的人的头顶越来越近，怎么叫喊也吓不走它们，拿手电筒照也几乎没用，直到晃了很多下后——它们想要干什么？这些夜间之鸟飞出来要干什么？第二天，我在跨过一条静静流淌的溪流时突然陷了进去，在泥沼中越陷越深，已经快被没到胯部，在“最后时刻”，几乎绝望地鱼跃一跳，抓住了对岸伸过来的一根树枝而得救——不然的话，这个屋子里的书桌前等着接续的故事似乎就不完整了——不管它是什么故事，也不管以另外的什么方式。

今天早上，走在一个草坡上时，看到一只正在逃跑的狍子，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在同时响起来的猎枪声中，一个劲地逃命，并且与此同时，就像在狂奔一样，后面扬起一团白色的尘雾，让人觉得好像是印第安的马匹和骑手的双重影子。在这片草坡上，明晃晃地散落着很多远古时代的贝类、蜗牛和小螺动物的化石，在这片尚未开发的中间地带比比皆 是。这些化石拿在手上沉甸甸的，与如今那些几乎没什么重量的蜗牛壳、贝壳和牡蛎壳形成了一种反差。森林中捕猎的陷阱，有圆柱形的，有立方形的，有截锥形的，也有金字塔形的。在逐渐明朗的夜空中，御夫座呈不规则正方形或五边形，仙后座是两个不完整的三角形，昴宿星团——我变差了的视力——浓缩成一个椭圆形，当然，还有那儿，猎户座，这个冬日的星座，只有它守卫并且统治着天空，即使没有拿着枪，腰间只有一支箭或者什么也没有，肩上和膝上的星星则十分相似。

白天里，从公路和田间小道向田野和森林拐弯时也会想象着相似性：和什么相似呢？和站起身来走向寂静之地，毕生如此。然后，在这样走动时，停下来，站在地球的中心。只有毛核木的白色小果子而已。下面是颗粒很小的椭圆形的兔子粪便。很少有开花的植物：森林边上有一簇银色的铁线莲开着花，它的茎螺旋状地缠绕在一起，让人联想起阿拉伯文字。从泥泞的土地上偶尔冒出一小片显眼的黄色：那是最初或者最后剩下的油菜花花瓣。夏天的时候，整个欧洲都会被油

菜花淹没。能称得上是花的几乎只有路边的小雏菊，法语叫“pâquerettes”，也许这个词源自“Pâques”，复活节？（或许也不是。）

又是一片森林边缘，被呈锐角三角形的杉树割成了锯齿形，在这片城间地带很不寻常——它们是不是表明就是那个按照地图应该坐落在这儿的小公墓，即“Cimetière à Têtu”？可是，在这片小树林里，公墓在哪儿呢？一只兔子跳了出来，拐来拐去地逃去，如此吸引着目光：它就在那儿，公墓——不过是两块石头墓碑，第三块金字塔形的残块已经被推倒了。这个地方被一团原始藤类植物包围，因此几乎什么都看不到，但是那两块墓碑上的碑文却清晰可见，其中较大的那块是一对夫妇的合葬墓碑，他们死于19世纪中期（妻子的碑文是“贤妻良母”）；另一块小得多的墓碑属于一个名叫Arthur Têtu（死于1919年）的人，按照地图，这个林中荒芜的三角形公墓就是以他的名字而来的，像相邻的墓碑一样，上面也用大写字母刻着附言“DE PROFUNDIS”[96]。这就是说，“Têtu”是一个姓氏，这个公墓是以Têtu先生的姓，而不是我想象中的名字Arthur命名的。这个姓氏是以“têtu=固执的”这个思维游戏把我吸引到这里来的，“（一个）固执的人之墓”，这个或一个固执的人的公墓。

直到现在，也就是事情过去很久之后，我才发觉：我忘记了讲述什么是写作《试论寂静之地》最紧要、最强烈的动机，也就是说：那些过渡，那些突然的过渡，从沉默、被打击得目瞪口呆回到语言和讲话——一再感受，在生命的进程中愈来愈强烈，在关闭意识大门的时刻，独自与这样的地方和它的几何形态为伍，远离其他人。

在外面：沉默。保持沉默。变得无语。无言。保持无语。丧失语言。语言丧失。因为别人的言语和词语变得寡言，因为他们变得沉默——厌烦——兴味索然。口里吐不出一个字，更糟糕的是，心中，肺里，血液中或者别的部位也参与其中。最多不过是一种无声的东西，一种听不到的东西：“我暂时告急！”

然而，刚一到寂静之地：语言和词汇的源泉生气勃勃地迸发了，也许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充满活力，尽管这个刚才还一直沉默不语的人

向外不会变得有声。向下走在通常那么陡的、但已经被踩踏得好舒适的楼梯，关上门，横着或者竖着插上门闩，便开始说话了，顽固不化，发自心灵深处，以朗诵颂歌诗篇的语调，热情洋溢，大声惊呼，一句接着一句，怀着一种完全不同的轻松劲，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即使比如只是这样说："是的，你现在瞧瞧吧。这到底可能吗？当危急达到顶点时。你就帮帮我们吧。完完全全地。土归土，尘归尘[97]。孩子，孩子。这会是葡萄酒。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而现在呢？就在今晚或者永远不会。喧哗与骚动[98]。你为什么离开了我？新的词语！伴随着新的词语觉醒。心没有受伤。实实在在地活下去。男人和女人。女人和男人。我永远不会成为歌手。你好啊，莫莉小姐[99]。惊奇就是一切。你们接受我吧。"

外面的怪声大叫，尖叫，怒吼和刺耳的呼喊：变成了大众的喃喃细语和世界响声。走吧，去吧，出发，回到其他人当中去，说多音节的话，满怀兴趣地说。

2011年11月写于法国弗克桑地区马克蒙

试论蘑菇痴儿——一个独立的故事

贾晨　译

“又要开始认真了！”当我从这里起身将要走向写字台之前，我不由自主地对自己说。现在我坐在这里，想要讲述我那个失踪的朋友、那个蘑菇痴儿的故事，探究其最终确凿——抑或是模糊——的结局。我继续不由自由地自语道：“将这样一个丝毫不惊天动地的故事付之于笔墨时，我竟然开始认真了，这一定不会是真的！在开始讲述这个故事前，一部已过数十年的意大利电影在我的脑海中闪现，由乌戈·托格内吉出演片中的人物：《一个可笑人物的悲剧》，我只想起了电影片名，而不是电影情节。”

我这位故友的故事还远远算不上悲剧，至于他以前或现在是否更加可笑，我也搞不清楚，而且今后也不会弄明白；我再次自言自语并同时写下：“但愿就这样保持下去！”

在我从这里走向写字台之前，又有一部电影在我的脑海中掠过。但我这次想起的不是片名，而是片头场景中的一幕，完全是影片开始的一个场景。这是——又是——一部西部片，由——毫无疑问——约翰·福特导演。詹姆斯·斯图尔扮演经墓碑镇枪战后享誉全球的怀特·厄普警长。在影片开头，他闲散却若有所思地坐在警长办公室的阳台上，沐浴着得克萨斯南部的阳光，帽子戴得很深，几乎遮住眼睛。他在如此祥和的场景中，看着时间一点点流逝，这让人心生羡慕和向往之情。但是后来，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受金钱的诱惑，他们离开南部向西北进发，踏上冒险的征程，否则这部影片就不会被称为疯狂的西部片了。但最后，尤其在片尾：詹姆斯·斯图尔再次散发出曾经熟悉的感觉：顺理成章的影响，温柔的聚精会神，使人安静的心境。不仅仅是他们这两位《马上双雄》[100]，片名中所指的第二个骑兵是理查德·韦德马克：而是在影片结尾，大部分人都被生活消耗殆尽，很多人，可以说是全部。在我现在起身将要走向写字台之前，我为什么会忽然想起该影片开头画面中的这位警官？他坐在临街的阳台上，半躺

着，身子深陷在躺椅里，脚上穿着靴子，舒展着的双腿搭在阳台的围栏上，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脸上挂着惬意的笑容。

我恰好穿着靴子，舒展着双腿坐在那里。当然不在阳台上，也不在遥远的南方，而是在阴暗的北方，完全远离阳光，双腿放在临窗的凳子上，居于一处墙体几乎有一米厚的百年老屋里，屋外笼罩着暮秋时分的雨雾，来自山区高地那光秃秃的山毛榉林中的凛冽寒风吹过玻璃窗上的裂纹。我的靴子是橡胶雨靴，没有它几乎不能行走，更别说穿越原野和森林了。在我走向写字台之前，我将它“脱下”，脱在房屋门口，放在一件器物旁，一件曾被称为“靴子仆人”的器物，对我而言就是一件用沉重铁块做成的古老物件，做成一个巨大的蜗牛造型，它那一对金属质地触角帮助我的脚后跟从靴子里撬出来。我走了几步，穿过下一扇门进入旁边的屋子，一间小屋，被我称为房屋“附属物”，在此开始伏案写作。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进进出出至书桌前的几步算一条“路”吗？是一种“启程”，一种“开路”吗？我觉得是这样，我就是这样经历的，就是这样。在此期间，十一月份的山区高地脚下的平原已经逐渐变得昏暗，我就坐在高地陡峭的山崖旁，平原一直延伸至北面远方广阔的地平线，书桌上的灯亮着，“是应该认真起来了。”

蘑菇痴儿很早以前就是我的朋友，尽管在他中年或老年时，朋友这个词的含义发生了改变。直到他渐渐步入晚年时，他的故事才被视为一个痴儿的故事。关于蘑菇痴儿已经写得不少了，通常情况下，甚至无一例外？痴儿本人自称“猎人”，或至少是追踪者、采集者和自然专家。当然不仅仅有蘑菇文学，蘑菇书籍，还有一种文学，其中人将蘑菇与自己的生存联系起来进行叙述，这种现象在现当代才出现，甚至可以说是“二战”结束后才有的事。在19世纪的世界文学中，几乎没有一本书中出现过蘑菇的踪影，即便出现，也是少数，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且蘑菇与主人公之间无任何关联，往往只代表它本身，例如一些俄国作家作品中的蘑菇，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

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独特的故事，有一个人——尽管只是一个片段——身陷蘑菇世界，这个遭遇对他来说完全情非所愿。故事发生在托马斯·哈代的长篇小说《远离尘嚣》—19世纪末的英国文学——中的那个年轻漂亮的女主人公身上，她在夜晚的乡间某个地方迷了路，于是失足滑进一个长满巨型蘑菇的坑里，那些恐怖的东西包围了她，并且不断地疯长，看起来越长越多，女主人公一直身陷蘑菇坑里直至清晨（无论如何这是我很久以前的记忆了）。

那么现在，在这个崭新的——该怎么说呢？——“我们的”时代看似涌现出大量的小说，蘑菇在其中大多遵守了普遍规则，即发挥它在幻觉世界中的角色，不是作为谋杀工具，就是作为一种手段——怎么说呢？——一种“拓宽意识”的手段。

在《试论蘑菇痴儿》中，要讲述的主人公，不同于上述任何一种，他既不是蘑菇猎人，也不是梦见完美谋杀的做梦人，也不是出现另一种自我意识的先驱。或许从动机来看，他还真算一个？这样或那样：这是一个他自己的故事，一个已经发生的故事，一个我时而也在近前共同经历过的故事。不论怎样，这样的故事还从未被写过。

这个故事从金钱开始，始于很久以前，当后来的蘑菇痴儿还是个孩子时。故事从金钱开始，这孩子一直想着它直至入睡。在他整晚的梦境中，所有道路上的硬币都在闪闪发光，随后不见了。故事从金钱开始，对他来说，白天黑夜都缺少金钱，白天黑夜都想着怎样才能得到它。整个白天，无论他走到哪儿或站在哪儿，都耸拉着脑袋，这只意味着：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脚下，寻找着值钱的东西，即使不是在寻找丢失的宝物。为什么他真的身无分文——就算有，最多也就是几个小小的硬币，没用，完全没什么用。他家里也没什么钱，根本看不见一张纸钞——这些都无关紧要。他到底怎样才能有钱呢？他其实对钱并无贪念——而是贪婪地渴望拥有它：要是有一天他真的有钱

了，那他就要付诸行动去花钱，他早就明白，早早就明白，要把钱花在什么地方和用钱做什么。

事情好凑巧，在他从小生长的村子附近，建起了一个蘑菇收购站。那是“二战”结束之后的一段时期。当时，市场交易普遍以一种崭新的、相对于战争时期完全不同的模式重新活跃起来，特别是乡村与大城市之间的贸易往来，城里人对没有品尝过的新口味（无论从热带还是从别的什么地方进口的东西）充满了好奇与向往。尤其是野生蘑菇的交易，和普通菌类有所不同，因为它们既不是在地下室、也不是在山洞中人工种植的，而是纯野生的，每一朵都是经过了长期寻找后手工采摘来的。至少对于那些生活在城市、远离乡村的人来说，野生蘑菇提供了独特而稀少的味道，是一种珍馐美味。

那个蘑菇收购站完全位于森林中，所有的蘑菇都在那里交易，然后满载着运往城市。收购站使童年时期这个渴望有钱的孩子异常兴奋。这个后来成为蘑菇痴儿的人，以前不会为了任何事而进入大自然，丝毫不会：森林里通常只有树叶的沙沙和呼呼声，风吹过森林的呜呜声，或者还有树木簌簌作响的声音。他根本不会为此而特意深入森林或别处，而只是蹲在森林外缘，一直蹲着，静静地待着，背靠大树，面向空旷的大地。

从森林外缘逐渐进入森林，然后直抵森林最深处，是出于所谓的钱的缘故。在他童年时期，这个地区的森林主要是针叶林，山顶上长满落叶松，形成了落叶松岛，光泽闪耀。此外，延伸至岛的地带几乎全部长满杉树，披着它们十分繁茂的针叶外衣。这些树一棵挨着一棵生长着，枝条层层叠叠地彼此缠绕，光线在枝繁叶茂的杉树林中也愈加昏暗。因此越往深处走，就越无法分辨究竟是单棵树还是整片的森林。而最昏暗、最无路可寻的地方无疑是森林内部了。它通常距离森林外缘很近，甚至也就是几步路的距离，能把一个人完全包围起来：人们无法透过那些枝枝干干，那些通常长在下面的枯枝向外张望，无法看见照耀在外面大地上的日光。所谓阳光，其实也仅是恒久不变的

昏暗，根本起不到光的作用。（看不见的）树梢间不是“几乎没有一丝风”，而是完全密不透风，更别说听见几步之外的鸟鸣了。

有这样一种光，它源于某种东西，有时在森林的地上被发现，有时半隐半藏在苔藓植物中。这个孩子进入昏暗的森林越频繁，就越经常遇见这种光，在他尚未有收获之前，是的，离收获还早呢。这种情况曾多次出现，以至于后来能发现蘑菇的地方甚至都空空如也了——他完全被这种苔藓植物中的光所迷惑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光？一种闪闪烁烁的光。在枯木与苔藓形成的灰暗无光的灌木丛下面，闪烁着一种宛如宝库的光芒。怎么回事呢？是一小片鸡油菌，冲着走近的人们真切地散发着光芒；它们一下跳入眼中，使得身处昏暗环境中的人们一眼就能完全看见它们耀眼的光彩。一种珍宝？是珍宝，一种你可以把它们带到外面的蘑菇收购站兑换成钱的东西，运气好时，最多能得到两张小小的纸币。但通常情况下，估计也就是不满一把的普通硬币吧？——但无论多或少，那个孩子当时都乐在其中，然后他花掉钱，并感到骄傲，多么骄傲啊！一种通过自己的双手挣到钱的骄傲：远离他人，远离“尘嚣”，深入森林，如果找到的蘑菇能堆积成山，即使不是很大的一座，但毕竟这样的寻找关系到珍宝，毫无疑问！

在讲述我的蘑菇痴儿故事的时刻，我又突然想起，这个失踪的朋友从小就认定自己是寻宝者，或者按他的话说，肩负着寻宝者的使命。因此在他眼里，他似乎就是一个命中注定的寻宝者，即便他并没有这样称呼自己，而是？只认为自己是个“不那么寻常的人”。无论如何，每当他离开家、离开父母、离开童年的村庄，跑步穿过草地、牧场和田野，然后上坡前行，最后经过几个果园来到森林外缘，在那里聆听各种各样的树叶发出的不同声音时——确切地说森林外缘几乎全都是阔叶树——他都会有意识地开始寻宝，或者在我看来，他把寻宝想象成一个崇高的使命。

树冠在风里摇摆，寂静无声，球形的树冠挤在一起。他把它们感受为一种规则，或者另外的法则。他的思绪随着树冠的摇曳被吹向了天边。同样，这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一个随风摇曳的树梢的故事，仅此而已。可以说，这是一个不是故事的故事，或者说它就是全部故事。边看边听时，他陷入沉思，感到自己的思绪飞向遥远的天边。接着，那些低沉的呼啸声渐渐变成像声音的东西，变成一种声音！这令他多么心潮澎湃啊！因何而激动？无缘无故。他的心随着树梢的摆动起伏。激动的感觉油然而生，犹如你在经历了长期错误的运算后最终顿悟一样，终于顿悟了。对他而言，后来任何汹涌的海浪咆哮声，都无法替代他在森林外缘听到的声音，桦树发出的哗哗声，榉树发出的呼呼声以及橡树发出的呜呜声。从儿时起，这种珍宝对他而言就是确定无疑的。它不是田间路上被压扁的罐头盒，也不是香烟盒。这是树木的球形树冠吗？不完全是。他在树木低沉的呼啸声中所期待的，不是自我愉悦或者置身事外的闲散，而是实现自我的满足。聆听并不意味着要与它们融为一体，而是一种召唤，激励着你去行动。怎样的行动呢？被树木的呼啸声所包围？不全是，亦或完全不是。

就这样，他作为一名寻宝者，一个行家闯入森林外缘，虽然他只是在那里——我此刻在我的书桌前看见他就是这样——架着他的大脑袋，那颗越来越大的脑袋，一声不响地闷坐一下午。他有时挠挠头顶，有时拿起一棵蒲公英吹起来，但吹出的声响完全不能与树叶声形成和弦，而是突兀的跑调，就像牛放屁的声音。后来他也同树木一起颤抖不停，并非激动所致，而明显是由于黄昏将至、气温降低的缘故使他打起冷战。最终，他带着自己那看不见的珍宝慢吞吞地回家，在家里打断母亲责备的话语。母亲早在那时就常常担心儿子走失，因此只敢温柔地轻微责备他，但他每次总是——父母应该会料到，无需他特意解释——在半路上就情不自禁地踏上寻宝之路。

另外，我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我这个蘑菇痴儿朋友，在童年时曾幻想自己拥有施展魔法的力量，尽管这样的念头只是偶尔出现，或者也就出现过一次。他相信自己能够感觉到身体中蕴藏的魔力，藏在肌肉中，在他施展魔法时积聚，并形成独一无二的魔法肌肉。——怎么

变魔法呢？用什么东西变呢？——他本人。——怎么变呢？变成什么？——他想把自己变消失，用积聚的肌肉力量，让自己瞬间在所有人眼前消失。从所有人的眼睛里消失，同时又待在这里。不对，不是这里，不是原地，更多是永远存在，让大家更加感到存在，让所有人惊讶不已。——那么我现在如何看待那个孩子在当时肌肉积聚的样子呢？——无非是顶着一颗比任何时候都大的脑袋而已，像是肿胀了一样。我听见了：那家伙清清嗓子，咳嗽几声，窃窃暗笑，略显羞涩但不是受打击后的垂头丧气。我用鼻子嗅嗅，闻闻味道：我的朋友，那个邻居男孩，他不会放弃。他确信自己下一次能够成功，就算不成，那么他也一定会在什么时候，成功地使用魔法消失，从众人眼前消失。

那个他曾在两三个夏天把宝贝兑换成现金的蘑菇收购站位于村外一所偏僻的、孤零零的房子里。相比这个地区的其他房子，这所房子显得高大宽阔，外形与建筑方式也与众不同。它看起来十分简陋，外国样式，既非农舍也非市民住宅，而是当时一种典型的“穷人住房”。在其中一扇布满灰尘、局部用纸糊的窗户后面，有个一动不动的玩具娃娃沉默地把眼睛睁得老大。这种破旧超乎了现代人的想象。——除此之外，房子里空空如也，悄无声息，连旁边的房间也空无一人。事实上，它是作为避难所用的，或者说收容所，为战后某个相邻的斯拉夫国家流亡至此的、或只是从其他国家来此落脚的家庭充当临时避难所。一直以来，能住人的仅有房屋底层，一个漆黑且无门的穴居房。上面两层空着，无法住人，外表看起来残破不堪，不是战争造成的，而是在更早以前就已经形成的残破景象。如果把房屋底层锁起来，那么整栋房子内部，从上至下空空如也，人们只能伸进脑袋，跨进入口一步就再也无法前行。它完全不是一所居住用房，即便要算的话，也不过是破破烂烂的地下室而已：倘若你再多走一步的话，没准它就会彻底坍塌。

在这里，有一户外国家庭蜗居在底层，看上去犹如消失在地表似的。全家上下几乎都是一副主人派头，甚至连小孩子，或者更小的孩子亦是如此。他们来这里做生意，在这块陌生的土地定居后不久，便

立刻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生意之中。他们的头脑转得飞快，每一次，当我的蘑菇痴儿带着他的货物站在并不存在的门槛上时，他们总会接连从避难所中走出来，其中有一个人，也可能是个年纪比他还小的孩子，用一台战前人们使用的秤开始称量。秤自带两个秤盘，一个盛放货物，另一个加放砝码。

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不是唯一的供货人，仅在第一年夏天，蘑菇收购站刚刚建起之时，他曾是唯一的供货人。随后，在那年夏末和之后的几个夏天里，这个地区采蘑菇的人数逐渐增多，于是，这座残破不堪的房屋门口总是挤满了卖蘑菇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称量蘑菇的秤也逐渐被移出屋外，最终摆在了穴居房的入口中央，仿佛成了贸易的标志。毫无疑问，其他供货商每次都带着比他更多的蘑菇前来；他们扛着大包，背着筐子或背包，两只手全占满了，还有人拉着小车。相比之下，他只是拎着他的货物一前一后地甩动着。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尤其是妇女们对蘑菇的生长地了如指掌。收货商在称量他那少得可怜的蘑菇时，总是保持着从头至尾一成不变的注意力，每次都仔细称量，然后付给他几枚硬币。

独家经营，独家主宰：经过一年又一年的夏天，这个乔迁至此的家族愈加兴旺。虽然他们居住的破烂房子依旧如故，但房前却停了一辆送货小卡车，确切地说，是一辆锈迹斑斑的翻斗拖拉机，随后变成了几辆，然后就变成了崭新的。三年之后，人们在那丝毫未曾改变的破房子前，亲眼看见他们坐进了小汽车，而且不是那种被人淘汰的、在当地多数人使用的旧车。毫无疑问，这些财富——假如它值得称道的话，那也算一种特别的财富，有别于这个地区被公认的财富（一种无形的财富，即贵族身份）——后来当然并不仅仅依靠早期在避难所中红红火火的收购生意而获得：这个家族，包括家族中的每个成员，这几年也投身于森林采蘑菇的活动中。在此期间，他们越来越清楚该去哪里采蘑菇，因为有个别本地人，为了换取少量的养老金或者死亡保险金，可能将蘑菇采摘地的位置信息卖给了他们。

在蘑菇痴儿人生的第一阶段，也就是蘑菇痴儿童年岁月的第三个夏天，他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向山里最深处的森林进发，深入森林尽头，穿梭于生长着杉树、落叶松以及瑞士五针松的森林中。在路上，他要是遇到了一个，不，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来自那个家族中的成员，他们远远地朝他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走近之后意思就更加明显了——这表示他这次什么也别想找到，蘑菇地已被扫荡一空，连个蘑菇的影子也没有了。

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情：根据他的讲述，他唯一记住的采摘者家族或者收购商家族成员，是这些年中从未参与过热闹忙碌的蘑菇生意、置身于家族圈子之外的那个人。另外，作为一个异类，她完完全全被人忽略：当时她被称为痴呆儿或智障儿，一个傻乎乎的女孩，一个智力有缺陷的女孩。她几乎从不出现在人们面前，也可能是那个发展壮大的家族总把她藏起来养活着。他只记得唯一一次与那个痴呆儿待在一起时的情景：那次他卖完蘑菇，换来的硬币在裤兜里沉甸甸的，非同寻常，于是他带着一种放纵且好奇的心情，在这个孤零零呈半废墟状的收购站四周游荡。在房子后面一堆乱七八糟的、曾经也许是葡萄藤蔓的枝枝杈杈那里——她父母家的葡萄架还在开花——他偶遇了这个年纪和他差不多大的女孩。她的脸颊上长着圆形红斑，鼓鼓凸出的眼睛在他的记忆中也是又圆又红。她蹲在一个像是供挤奶用的板凳上面，咧着嘴朝他笑，不对，是抿着厚厚的嘴唇含笑注视着他。她要躲在房子背后的角落不让人看见吗？但她拦住了他，和他讲话，就那样自言自语地说着，仿佛她早已等待着某个人的到来，某个和他类似的人，不对，就是在等待他。她的所言所语，听上去与她红斑的脸颊以及发亮的眼睛极不相称，事后再看，也并不是不相称。光线太强烈，她的脑袋无法承受。上帝想要惩罚她，但假如她真的知道究竟为什么就好了。上帝发出的光不断地打在她的额头上，可惜她的额骨太厚，光始终无法穿透那里。啊，上帝使她多么痛苦啊，这是怎样一种持久永恒的痛苦啊，为什么呢？突然间，她站起身，拉起连衣裙，准确地说是罩衫，然后当着这个陌生孩子的面开始小便。但他什么都没看见，除了她过高的鞋帮，这也许是为了扶正并支撑女孩虚弱的双腿。另外，其中一只鞋上露出羊毛袜子的一角——另一只鞋里的脚是光着的吗？不是，那是因为袜子完全滑进鞋里了，一直滑到脚后跟——这在当时被称为“饿死”——，袜子在鞋子里面被“饿死”了。

不久之后，智障女孩就离开了这里，被送到另一个地区的一家养育院，蘑菇采摘家族现在能承担起这笔费用了。又过了几年，她死在那里。她又被送回到这个破破烂烂的房子，被安葬在那里。那时的他已不再是小孩子，也不是蘑菇采摘者——后来，他采取其他手段赚取所需的钱。在寒假快要结束时，他透过父母家的窗户注视着送葬队伍。雪下了数天，但现在雪变成雨，昏黑的光线，从积雪上升腾的雾气。棺材上盖着一张白布，代表死者还是一名纯洁少女，倾泻而下的雨水使那一抹白色在一片雾气中更加凸显出来，也使得棺材的形状更加清晰可见。后来又回忆起，这个特别的送葬队伍仿佛不仅宣告了寒假的结束，同时也宣告着一种告别，与这块土地、与童年时光以及家人的诀别。

我的朋友在童年时之所以对金钱如此痴迷，是因为他，一定是这样的，非要买些什么。在那个时候，在他的成长环境里，能够得到如此急需的“支付手段”的唯一办法就是采集，采摘森林中的果实，比如树莓和黑莓。而最重要的当属蘑菇，尽人皆 知的黄色的蘑菇。它在不同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名字——它们所有的名字将在后面的故事中提及。在战后不久一段岁月里，至少在他居住的地区，蘑菇几乎是唯一的商品。

他想用卖蘑菇挣来的钱买什么呢？正确的猜测：买书。这个邻居男孩对书的挑选与我的爱好完全不同。对我而言，只有那叙事的东西、虚构的东西、想象的东西，也就是文学才是我所喜爱的。但对他而言，虽然他也把自己喜欢的书称为“文学”，但他喜欢的是那些能够帮助他实现那包罗万象的求知欲，能够满足他难以遏制的对知识的渴望的书籍，或者更确切地说，无论什么印刷品都行。（在我看来，他童年时期的主要特征是：由于接连不断的提问所导致的已经干裂、并且正不断干裂的嘴唇。）于是，他带着自己最初卖蘑菇，从一开始靠卖蘑菇就攒下来的钱，沿着那时还并不繁忙的公路，步行半天进城。当他返回时，那个还散发着蘑菇味（和散发着臭味）的背包里装满了各种小册子，按标题和主题似乎可归纳为：“……：您一直想知道什么呢| 193个最终答案。”

在各种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他的蘑菇痴儿岁月的第一阶段似乎自然而然地结束了。然而，正如他跟我说的，这恰恰是一场噩梦，突然为他那无关痛痒的痴迷和狂热画上了句号，他曾这样对我说。有一次，他进入高山深处的森林里，成功地发现了一个地方，一个看上去还从未被采蘑菇的人光顾过的地方——更别说被那些上了年纪的当地人或者那个涌向偏僻的深山老林的外来家族抢夺和糟蹋了。后来，那个地方就不只是一个小地方了，而在他的想象中是一大片土地，因为这片长满蘑菇的地方每时每刻都在延伸，取之不尽，像一个大洲。无论他朝哪儿望去，走去、跑去、奔去、冲去、拐去、绕弯过去，跃过小溪、枯木和小沟：黄色，黄色，到处都是黄色。他奋力采摘起来，后来干脆两手并用，左一把，右一把；他采摘着，收来收去，一刻不停：森林苔藓丛里黄色的蘑菇，也就是外来家族从斯拉夫语翻译过来的“小狐狸”[101]，“Reherl”、“Finferli”、“setas de San Juan”[102]（很久以后，才成为他熟悉的名称），它们一点都不会变少，这片“黄色”——“这样的词似乎就像‘蓝色’、‘绿色’和‘灰色’一样恰如其分！”他很久以后才这样告诉我说——永远都不会停止延伸。是不是正因为如此，后来在他眼里，才有了所有另外的色彩，另外的红色、另外的灰色、另外的黄色？

然而，那些白天，至少是一时还令人不知所措地感到惊喜甚或陶醉的东西，在当天夜晚就变成了别的东西。这天夜晚，我的蘑菇痴儿迫不得已在一个无人居住的高山牧棚里过夜。白天所看见的那些神圣的蘑菇，继续出现在这个少年的梦中，他整夜都梦见自己蹲在深山的下层丛林里，蹲下去，又跳起来，追着如此一片黄灿灿的蘑菇，接连不断，整整一个晚上。眼前的一片漆黑算不了什么，相比这个做梦者眼前出现的景象而言只是些无关痛痒的东西，因为在做梦者的眼前，出现了铺天盖地、无边无际延伸的，不对，是更迭移动的黄色，黄色，还是黄色。再说一遍，不对：那些永不停息的，对这个做梦者而言永无止境的黄色并非出现在他的眼“前”——它源源不断地迎着他的眼睛而来，溜进去，就像在他被强迫的双手一刻不停地采摘时，鬼火似的忽闪在他心底的最深处，直到他面对这一片形如卷浪、层叠滚动的黄色不知所措：此时此刻，似乎会被这密不透风的黄色世界窒息

了；此时此刻，这片成倍增长的黄色，这片剧烈膨胀的黄色似乎会让他胸腔里的心脏爆裂——，或者他心中的血液似乎会被所有这些黄色的毒物榨干殆尽。

也许，不只是这样一场噩梦让他选择告别少年时期蘑菇痴儿岁月的第一阶段。然而，这个他确信无疑的、胜过任何别的东西——比如外面远离城市的学校、初恋经历、对其他友谊的经历，因为这样的友谊不同于与邻居孩子的——的梦坚定地促使他放弃蘑菇世界，或至少将它置之于地平线，置之于那七座山之后。那里是生养我们的地方，特别是因为他在那里早就能够用蘑菇换来的钱，购买他当时还完全朴实的心灵所渴望的一切东西。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以后不再愿意进入森林，不论是家乡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森林，即使已不再是曾经的森林边缘、森林周围和林中空地，已成为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归功于他漫山遍野的采集游历。他仍然会在周围采蘑菇，但不会特意去仔细寻找——除非它们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依然只采圣约翰山的蘑菇，不管是这边山上还是那边山上。即使采到很多蘑菇，其重量足以让他回想起放在蘑菇收购站入口处的那台秤，他再也没有想过卖蘑菇。并非是他不再需要钱——童年过后，他依旧年复一年地缺钱——：此间，他不愿通过像“交易”这样的方式来挣钱，至少不愿通过这样一种；他觉得，钱应该通过体面的工作去“获取”——不管什么样的体面工作都行。

于是，他把这种偶然或顺手采集到的林中收获赠送他人。如果在家的话，通常都交给母亲。母亲收到这些他带来的为数不多的蘑菇时，往往会装出一副如获至宝的高兴劲，尽管这在母子二人的眼里早就不再是什么珍宝，因为它们不再是商品，更谈不上用于交易了。母亲每次都把黄色的小朵蘑菇这样或那样在“节能灶”上烹饪时，继续假装愉快的样子，况且不论是她还是儿子，都不再稀罕蘑菇的味道，食用时也不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美味。（对儿子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会发生变化的。）

如果说情况偶有不同，最多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时在秋天，在返回上大学的城里之前，他会从像童年时一样依然钟爱的、被他看成是“发源地”的森林边缘带回那种巨型蘑菇，它们通常长着比盘子还大的蘑菇顶，以及又高又嫩的菌柄，被称之为“伞菌”或“高大环柄菇”：这时，母亲就不再假装高兴，而是惊讶地盯着这玩意儿，因为它相比其他蘑菇更为稀奇罕见，也可能因此更加美丽。她将蘑菇顶裹上蛋清和面包屑，在平底锅里煎成一块类似于炸猪排的东西，然后端到儿子和全家人面前，让大家感到无与伦比的喜悦。哦，天哪，家里有人谈起这盘无比软嫩、让人无法联想起蘑菇、超越一切独特味道的珍馐美味，赞不绝口的味道胜过用小锤敲打过的酥软鲜嫩的炸猪排——哦，天哪，有人差点脱口说出那个经久不衰（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战争词汇“素肉”，可在这儿吃的只是这种高大的环柄菇呀。它总是美味无比，香味毫无例外地令这个融洽地团聚在一起的家庭陶醉，弥漫在整个房间里，飘进那变得空荡荡的神圣角落里，冲着那些被放大的战争死难者照片，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都是美味无比，甚至连那时十分挑食的儿子也不例外。数十年后，他早已不是一个儿子了，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当年抗拒现在依然抗拒吃他自己采集和带回家的蘑菇。

反正他给我讲过这件事，而且不止一次。并且，他后来也沿用母亲的烹饪方法，将高大的环柄菇裹上蛋清和面包屑，制作成外观看起来类似炸猪排或者“炸肉块”的东西，端给他的孩子。只不过孩子的口感不容易上当，在咬下第一口时，孩子就大叫“骗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孩子不愿意继续吃，而是恰恰相反。

在他的蘑菇痴儿岁月第一阶段结束之后的半生时光里，蘑菇世界对他而言，几乎已经毫无意义。如果说有的话，那更多就是令人不快：当他买了一座房子后——这座房子，够奇特，孤零零，远离他在城里居住之地的其他住宅，并且搬进去时已经半是废墟模样——，有一面墙基上，他刚带着妻子和孩子收拾好住进去，就长满了所谓的干朽菌。这种菌腐蚀木头和家具，甚至连花岗石都会从墙体上脱落下

来，你对此完全束手无策——不得不打掉墙体（再说，这对室内根本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有了这座摇摇欲坠的房子，他也成了一个荒芜的花园的主人。在经过了开垦、锄草和翻土之后，这里居然每年还会冒出一堆所谓的白鬼笔，而且生长位置年年不同。这些蘑菇散发出阵阵恶臭，穿过花园进入房间，弥漫到最深处的私密角落，浓烈的臭味名副其实[103]。这种东西犹如魔咒破除者，起初藏在枯叶堆里，几乎难以被发现，呈现雪白色的卵球体，尽管柔软却带着香气，像辣根那样生长在灌木丛下。转瞬之间，它们就像电影里的快镜头，迅速抽出了看似泡沫塑料质地的菌柄，然后发育成白鬼笔。“进攻随之开始”，他对我说：“随之而来的就是脑袋：十分像男人的龟头，当然是一个瞬间在空中摇荡的、在卵球体之外的、立刻就腐烂的，流淌着胶状黏液的龟头。并且，这些臭气熏天、在我的、我们的家里肆意横行、滴答着黏液的蘑菇脑袋几乎刚一从卵球体中冒出来，就被一群从天而来嗡嗡乱叫的苍蝇团团围住了。它们猛烈地吸食黏液，以至于压断了十分脆弱的泡沫塑料状菌柄。于是，菌头连同苍蝇一起倒在地上，但苍蝇们一秒钟都没有停止它们的狼吞虎咽，腐臭的味道也丝毫没有减少；当你在注视苍蝇时，会感到那股犹如被诅咒般的恶臭，更加浓烈？不，不可能更浓烈了。

在他人生那几十年中，还有其他一些与蘑菇发生的不愉快事件，但我这个昔日的乡村故友对此闭口不谈，或者留给我这样和那样去猜想。此外：他讲过的事情，即使讲得滔滔不绝，大肆渲染，更多是装腔作势，而不是当真，那也不过是些片段。它们就像这个时期的蘑菇一样，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一些不愉快的小插曲——不考虑那些提到的——也许短暂地折磨过他，但它们并没有说明什么；他并不把它们看作自己人生的一部分，人生的一章，甚至连小小的一章都不是，连他人生故事中的一个插入语都算不上。

他的人生，至少是半生的故事，在他离开我们这个地区后，是被某些人称之为“无趣的心满意足”的东西所决定的，至少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他就这样把人生刻入自己的脑袋里，不仅仅刻入自己的脑袋里；或者就这样，他选择了自己的人生，这也感染了别人，他也以此取得了发展，而且不仅在一个方面。这种“无趣的心满意足”成为一种行为或行动，帮助他权衡利弊轻重，不仅要保持距离，而且刻意拉开距离，而且当有必要去强调、凸显或区分时，这也可以均衡地处理——这作为一种持续的均衡共同产生影响——不，不是什么公正的存在，更多是会变得公正。这时，心满意足则意味着，他实施一些行为、作出一些决定和干预一些事情时，即使冒着部分或全部风险，都会散发出一种热情的、对一些（为数不多）此间也包括我在内的人其实是嘲讽的认同，一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有时会觉得是臆想出比他最高的人格和谐更高和更强大的和谐——可以说是一种可笑的和谐。他以面带微笑的、时而会让我对他不可一世的孤芳自赏感到十分愤怒的淡定从容来回应我，这样一种认同感无疑也是那个生养我们的地方的一部分。在那里，纵使历经数百年至今，也从来没有发生过悲剧的东西：“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就不存在什么悲剧的东西。悲剧的？根本不可能。（看在苍天的面上，快快结束你们的悲剧吧！）”在那个生存阶段，这位此间已失踪的朋友坚信，远离，那样远离痴儿行为，或者与之有意拉开和保持距离，远离，这样远离无论什么样错误的影响。

他从没想到过，自己将来会有什么出息。童年时，当有人问他将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时，他都尴尬得回答不出来，最多不过耸耸肩，或者使用他与生俱来的本领，半认真半玩笑地发呆。纵使他有再强烈的求知欲：他也不想知道自己未来的任何情况。对他来说，没什么好知道的。另外，他从小就觉得不可想象，有朝一日，某种叫未来的东西会召唤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他对这个未来并不特别感兴趣，就像他的第一个妄想化为泡影以后，他就不再对什么东西特别感兴趣了。

尽管如此，我这个一直觉得自己成不了什么大器的乡村朋友，终究还是有所作为，即便只是对外部世界而言如此，正如他曾不止一次地向我强调的："在我的内心中，我来到森林外缘之后，就再也没有继续前行。我七岁时就跑向那里，聆听风吹拂树冠的声音。在外人看来，或者从表面上看，也许我成了这个或者那个与众不同的人，但也仅仅停留于此。这么说吧：我没有成为任何别的人！"这样或那样：几十年来，没有刻意，也没有人帮助，他向外就代表着什么。他给人留下印象。关于他的印象传向四面八方，并且产生影响。产生什么影响呢？根据我在此间从广泛的世界里听到的有关他的情况来看，至少不是什么不可救药的东西。这在我的偏见中是值得尊重的，因为在我看来，所有为了公众、哪怕不是人类为了利益而坚持不懈行动的人，不管他们干多么微不足道的事，比如缝纽扣，拾柴火，甚至无所事事睡大觉，都是无可比拟的；这样一来，他们至少不会制造事端。

他给人留下印象并产生影响，这个我接下来会解释——尽管我明白，这样的解释其实源于我长久以来对这位亲爱的失踪的朋友可靠的想象：对他的印象源自他特有的机智和突然的心不在焉，彻底的心不在焉和突然完全恢复机智，一再交替，如此特有的反复变换。刚才还神情专注，可是一瞬间，他又突然间、出乎意料、简直是突如其来地陷入心不在焉的境地。这时，他不再是你眼前的他，而是另一个人，你就像站在一尊模具或者一个空空如也的空壳前，你要旁敲他的额头，有时甚至用力捶击并叫喊着："喂，这儿有人吗？"又过了片刻之后，这个空壳不仅生机勃勃地住上了人，而且也成了超过它的场所——这个机构，这个置于所有外在机构之上的机构——，它会让你觉得公正，或至少给予公平的希望。这样一个时刻常常正是你所急需的东西。他觉得，他轻而易举地干着自己的工作，不仅是他觉得这样，久久如此。同样，这种工作缺少一个工作本身所拥有的东西。

此时此刻，这种想象进一步使我明白，这种从精神专注到心不在焉、如此往复的节奏根植于他最初的、更多是一种渴望、一种兴致的求知欲与经常急于逃避那些书籍和小册子，即所谓的"文学"之间的交替中。这种逃避同时也是逃离家人和和村庄，远离尘嚣，逃到人烟

稀少的、无声的、无需费力解读、无需读懂、什么都不会告诉的、只是向他预先发出呜呜声、呼啸声和沙沙声、让他乘风而上的森林外缘。但是，然后又是从哪儿来再返回那里，刻不容缓！他的生存就是一种在知识兴趣（！）、交往和秘密之间持续的游戏——此外，这个秘密不关任何别的人，甚至对我，他唯一的朋友，也是很久之后才吐露的。在后来半个人生的岁月里，直到连他自己后来也意识到的痴儿行为爆发时，他恐怕也不会给人产生另外的印象。

他给人留下印象：这意味着，他通过精神专注与心不在焉之间反反复复的转换传播信任——除了那样一些人，因为对他们而言，信任没有用，是一种缺陷。与此同时，看样子，仿佛他既是我的法官，又是我的律师，当然，更像是我的法官，首先关键在于需要他这个法官。事实上，他成了一名律师，一名刑事律师，出没于国际上各个刑事法庭，帮助过很多人——正是因为法官意识一再出现在他的身上，作为一种秩序的呼唤。也有很多人把他想象成政治家，仿佛在世界舞台上；幸运的是，这只是流于想象而已，况且并不是他的想象——他对于自身的发展没有任何想法，即使成了一个“有点出息的人”，也不会有什么想法，更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什么“大器”，更谈不上有人所说的，他将会成为这样和那样的人物。

在这几十年中，我的这位乡村朋友虽然没有以这样的方式变得富有，但就像人们所说的，“经济情况还算不错”。我没听说过他有什么敌人，也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朋友，对他这个被大家公认为可信赖的人来说，令人惊讶。取而代之的，我听说了一些有关他和女人、更确切地说是女人和他的事，又令人惊讶，因为我完全无法把他想象成一个能混迹在女人堆里的男人——可是，我看这事就是这样，因为我了解孩童时代的他，也了解后来那个瘦弱而酷爱运动（踢足球或者做别的运动时，又是那种游移于精神专注与心不在焉之间的节奏，他以此愚弄并战胜对手）的小伙子。一个“女人堆里的英雄”是英雄吗？“女人堆里的幸福”是幸福吗？在我的想象中，我们两个，那个失踪的朋友和我都笑了，二重奏。

在他的——该怎么说呢？——社会升迁时期，他逐渐淡出了我的视线。他一如既往地使我获得他的生存信息，但这些说的绝对不是报纸上有关他生活的流传。我从来都不屑去听那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报纸上传播的东西，天知道为什么。虽然我本人被刊登在上面，偶尔是被涉及的人，或者只是被影射的人，但我似乎永远都不会相信。相反，如果上面涉及的不是我而是别人的话，那我就倾向于相当盲目地相信不管登在什么报纸上的东西，至少早年如此，甚至现在还是，也就是打眼看去如此。根据报纸上说的，我就会知道，我的乡村朋友，这个后来的社交大王，“总是穿着意大利或法国西装，英国皮鞋，每个季节、甚至每天都系着不同的丝绸领带”，已经结了三次还是四次婚，并且刚刚和上一任妻子，一个来自阿拉斯加育空堡市的印第安女人离婚——报道上说，他的女人们一个比一个具有“异域风情”。而另一家报纸则称，是妻子抛弃了他，从第一任妻子开始，他就一直是个被抛弃者：其中会不会有什么秘密，不一定很吸引人的秘密？此外：孩子们都怎么样呢？——几十年中没有生过一个孩子。

相反，大约在同一时期，有他本人发来的一个生存信息：眼下，第一场雪正飘进他的花园里。清晨，当他用耙子清扫树叶时，一只知更鸟像往常一样——“总是同一只鸟，或者这只是我的臆想？”——从灌木丛中扑扑地飞出来，“无声无息地落在刚刚清扫过的黑色土地上，比任何一片树叶还要安静”。他阅读着我写的关于无人的山间平地的生活故事，发现自己也被写进故事中。此外——“这事儿只能告诉你一人，别再讲给任何人”——，他终于遇到那个渴望已久的女人，这就是说，站在她面前，他终于“开始当真了”，这是他对女人一直梦寐以求的。“开始当真了”，这则意味着，他想在这里“拯救”她，这个与众不同的女人，把她“带到安全的地方”，和自己一起，即使对她或他而言，也没有必要被拯救和带到安全地方——不是暂时——，“还不是！”这样或那样：他们在半路上彼此相遇，这样不仅仅是个“形象的表达”。此外，正如他向来所梦寐以求的那样，这个女人“来自咱们俩的故乡，亲爱的朋友”，来自邻村。最关键的是：他们以前曾经在同一个公交站等车，即使在完全不同的时段——

然而，“相比这个与众不同的时刻，所有那些不同的时刻算得了什么呢”？

他和这个邻村女人日复一日——“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整个晚上”——如胶似漆地在一起，两人共同等待着夏天孩子的降生，各自暗暗地想好了名字，而不用把它说出来。“是的，我的朋友：这个女人，她引我走上秘密之路，就像在你的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104]那里说的一样。不要祝我幸福，但祝我顺利吧：祈祷我一直顺利，为我祈祷吧，我需要你的祈祷。我感觉自己单独力不从心，恰恰是现在，因为现在一切终于变得当真了。面对这样的当真，太力不从心。这我感受了，也很担心。这个女人，她信任我，无话可说。但是我不自信，我对自己感到恐惧。是啊，为我祈祷吧。谁在为我祈祷？一方面，我感到自己这般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我又是被选定的，正是这种情形，让我在这样的处境中对自己感到害怕。是的，从那时起，我就急匆匆地像丢了魂儿一般跑到森林外缘，独自一人和树叶的沙沙声以及树枝的哗哗声为伍；我感到自己就是一个被选定的人，也就是说：我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又预感到：女人，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呢？！对我的家人来说，我，长久以来软弱无力，同时？因此？就成了被选定的人，或者这样欺骗自己？——另外的东西，完全另外的东西——那与众不同的东西？或者相反，就是这个从一开始被选定的人，因此，不是为群体确定的，不管什么样的群体。作为被选定的人不可侵犯？别碰我，我是你们的禁地！？——为我祈祷吧！

是不是从那时开始，我这个在种种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失踪的朋友的人生开始演变成一个独立的故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当然不是突如其来，也不令人吃惊。凡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开始都非常柔和，并且也会长久保持这样。首先无非就是日常事情了，同样也能保持良久，也就是那可爱的日常事情，正是为了保护他会成为一个完全特殊的人的意识，会作为一种人生理想预先浮现出来，此外也是一种和善的、如此令人宽慰的日常事情：没有什么比这样一种日常事情更安宁和睦了，但是也——为什么但是？——也没有什么比这样一些日常事情更令人愉快了，就像他后来会遇到的那样——没有什么更单纯的了，或者？

这个故事，这个真正的故事，这个特别的故事，始于夏日的一天，也就是他的孩子出生前的几周。他离开房子和花园，来到附近的山丘森林，穿过树林是一条通往省城最近的路，先是缓坡向上，之后又急坡向下。他在那里无事可做，只是想和他临产的妻子相见并共进晚餐；他刚刚才从法庭事务中短暂地解脱出来。在那里，他出庭替一个违反了战争法规的被告人成功辩护。他想走路而不是开车，并且，为了未出世的孩子，尽量多走路，走上坡路，下坡路，至坡底，再上坡，为此他把车扔进车库，也没乘坐市郊轻轨。他横穿过山丘森林。它算是前往城市必经的一道不高的屏障。他身穿西装，系着领带，戴着帽子（既不是“博萨利诺”牌也不是“斯泰森”牌[105]）。

这条路穿过阔叶林。与我们童年时的云杉林、冷杉林和松树林多么不同啊。这些长在另一片土地上的树林从上至下稀稀疏疏。有橡树，有栗树，有榉树，也有桦树，它们相互之间都有距离，彼此的树杈枝桠也没有交织在一起，几乎没有下层丛林，阳光可以穿透整片森林，即便森林不断地向远方延伸。这种“明亮的广阔”于是拥有了另外的含义。一开始，他并不喜欢这样的明亮，就像在另一片土地上有句谚语：白葡萄酒“不是葡萄酒”一样，他这样想，阔叶林不是森林。对他而言，缺少的是昏暗、幽深、拥挤，不是简单的穿过，而是披荆斩棘的感觉。除此之外，在阔叶林广阔的明亮中，他感到这里不干净，不，更确切地说是不纯净，换句话说，他渴望在其中找到他昔日只有在针叶林中经历过的纯净之感，恰恰是在它们的深处，怀着一切恐惧——纯净与之息息相关；甚至就连被虫子啃过的蘑菇以及死狍子、狐狸、兔子，尤其那洁白的骨架，在丛林和苔藓地上都散发着某种纯洁的东西。再说吧，长期以来，也许一直到那个夏日，他都几乎没有把这些阔叶林接受为一些地方，环境、空间或场所，而更多将它们感受为从出发地A到目的地B之间的中间区域或过渡驿站——只有那一次例外，当时他和未来的妻子又走在去往另一个城市的路上，要穿过这样一片阔叶林，她突然把他拽到一旁，他记不清拽的是拽着衬衣还是皮带了——但无论如何不是领带和帽子，更不是头发了——几乎是撕到一旁，她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她正是要拯救他的人。

迄今为止，他在穿越所说的那片阔叶林时，从未特意低头盯过地面。其实，很久以来，无论在什么地方，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形，正如他长久以来不再特意抬头仰望一样——又只有那一次例外，由于工作的缘故，他来到一个发生内战的国家。这是因为，当炸弹目标精准地落下来时，只有在星光明亮的夜里才能来。无论怎样：在他作为社交大王这段时期，他的目光坚定地直视前方，总是保持平视。

这事也发生在这样一个夏日的下午。当时，他独自一人，手拿帽子，向山丘上那片阔叶林走去。沿途的路上想必有一段十分陡峭难行，不然的话，他定会像平日那样，当地上有东西“突然引人注意”（这就是他后来说给我的话）时，近距离平视。这是一种他似乎从未经历过的平视，没有什么承载历史的东西暗藏在其间，不像在两个政治家之间、两个艺术家之间；没有什么命中注定的东西，就像在人类历史的彼岸，有时发生在男女之间（不仅仅在乔治·西默农的长篇小说中）；没有什么不可描述的东西，就像发生不止一次地在他——这个律师身上，与被告面面相觑——毕竟如此——毕竟如此。

面面相觑，此时此刻，它是可以描述的。“是的，看这里！”事物，东西在他眼前，同时也在他的眼里，它们是可以描述的。然而，它们本身没有名称，至少此刻没有适合它们的名称，甚至“东西”或“事物”，这样的词汇，它们也是不适合的。“别见笑！”我的朋友接着对我说：“凡是突然——不，不是突然、而是突如其来——映入我眼中的东西：在这个瞬间，我就会感受到它是某种无名的东西。或者，如果我要给它一个名称的话，那么，就用一种无声的呼唤，在我的内心里：‘一种生物！’，前面加上一个语气词‘天哪！’，就像克努特·汉姆生在长篇小说的句首常用的句式：‘天哪，一种生物！’，我一直无法忘怀：就在无声的呼唤之前——直到现在，在叙述中，我刚刚才想起这样的情形——发生了一种也许还更无声的呼唤，而且它是这样的：‘现在！’”

天哪！看看这儿吧！他觉得，仿佛他一直在等待这个不期而遇的瞬间、这次邂逅相遇。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是无法计算的时间："在无法预先思考的时间之前"，这既可能始于他出生前，也可能始于昨天。他没有说大话，真的就在他眼前，亲眼所见。他第一次意外地站在牛肝菌前。那是一朵并不特别硕大、但长得十分挺直的蘑菇，拥有一个亮闪闪、红棕色、丝毫没有被蜗牛或其他虫子啃咬过的蘑菇顶，下面呈纯白色。就像画册中的？比它更美丽，就像出自于神奇的王国？它真的就在眼前，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一部分；它如此真实地现出了神奇的原形，简直无可比拟；"在平视的目光下找到它"，他后来给我写信说："对我而言，这比在树丛中看见一只狮子正慢慢靠近——这是我从小到大经常重复的一个梦——的意义更重大。或者，至少完全不同。或者，可以说，就像我突然站在一头不知从哪儿神奇地冒出来的独角兽面前，它和神话故事中的狩猎者、即后来的主保圣人在深山密林中遇到的鹿角上长着十字架的神鹿完全不同。这神奇的生灵，这是我真的第一次、同时至今也是最后一次碰见的神奇的生灵，它跟传说中的动物迥然不同。它是光天化日的一部分，又给光天化日锦上添花。它没有影响现实，也没有把现实置于双重光之下，更不像梦里悄然接近我的狮子夺取我生存的现实，而更加强化了现实的存在，更加强化了现实的光明。这种神奇的植物，它更加增强了我光天化日的现实感，这在我遇到像是从地里冒出来的独角兽时是不可想象的。时至今日，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个真正的牛肝菌就出现在眼前：发现它，犹如眼前惊现雄狮，亦如目睹猎人瞄准神鹿拉弓放箭，似乎会使我心跳更加快，这样或那样。但是，相信我，当我站在我的第一朵牛肝菌前时，虽然已经过了大半辈子时光，但我真的心跳加快了，特别快，无论你相信不相信，前所未有的快！"

怎么会这样？从小生长在森林遍布的地方，而且就像人们那时所说的，从小就"进入蘑菇世界里"。为了寻找蘑菇，寻找所谓能卖钱的黄色蘑菇，慢慢攀登到高山上，进入海拔最高的针叶林深处，从未遇见过这种头戴钢盔的步兵之王吗？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或许有过那么一朵，就像现在这朵牛肝菌一样挺立着，长在那片斑驳的苔藓地里，在掉落的灰色松针堆上熠熠发光，相比眼前的、阳光下从红棕色的陈年落叶中冒出的这朵更加引人注目？如此显而易见的蘑菇，孩提时的他每次都视而不见吗？是的，有可能，或者说一定有可能。然而，在所有其他采蘑菇的人那里，这个孩子也同样没看到过一朵牛肝菌，甚至在森林强盗家族那里也从未见过，这又该如何解释呢？面对

他的竞争对手的筐子和其他容器，眼前除了永远的黄色外，什么也没有看到？或者这个蘑菇冠军、这些神奇的东西都藏在下面，就是不让别人看到？但是，在他的记忆里，为什么只有下面山谷里的蘑菇收购站走廊上整箱整箱堆得冒尖的黄色呢？秘密的角落，见不到光的角落，那些被连根拔起的“王者”都栽倒在里面了？一定流向哪个市场了？——只是它们无论出现在哪儿的市场上，都未引起他的注意而已。或者之后好久，他几乎不再去市场了，除非前去购买来自海外的异域水果，那些“舶来品”。

尽管如此，当我坚持认为他过分夸张了自己近五十岁时“第一次遇见牛肝菌”的经历时，他回应道：“那你当时的情况怎样呢，在你的故事《去往第九王国》中，你作为少年离开了四面群山环抱的山谷，翻越七座山，一直向南前行，跌跌撞撞地朝着第七座山的斜坡，朝着大海，或者也只朝着喀斯特走去，你来到一棵棕榈树前，或者那是一棵小小的银杏树，或者最有可能只是一片吹来的银杏叶，便吟唱起‘第一棵银杏树经历’的赞美诗？！我之所以赞扬我的‘第一朵牛肝菌’，因为它是改变了我人生的一个事件！”（当时，我的童年伙伴这样回应我时，他还不知道也无法预料，伴随着这种改变了的人生，他将会踏上去往何处的迷途。）

他先是在这蘑菇前蹲下来，然后坐在旁边的落叶上，丝毫也不顾及那身平时就算只沾上一根细毛也会让他感到难受的打扮。这个蘑菇长在上坡的路旁。与其他一切物体、植物以及高大的树木不同，它在夏天的风中纹丝不动。他的目光一再不由自主地移开这玩意儿，望着周围，悠然自得，从容平静，一圈又一圈。凡是他能够在这儿和那儿如此看到的一切，他同时预先默默地说给自己听。一株黑莓灌丛上结满了尚未成熟的红色浆果，但里面已有几颗通体发黑，这就是说，已经成熟了。好奇怪，毕竟它们没有受到充足的阳光照耀，并且生长在半明半暗的环境中。好奇怪，他发现有一只幼小的青蛙正在地上蹦蹦跳跳，还没有我朋友的半个手指甲盖大，很容易和一只正在横冲直撞的地蜘蛛混淆。看它跳动的样子，这只不起眼的小动物轻飘飘的，现在，就是现在，扬起了一颗小小的沙粒，“数以万计之中有一只能存活下来了！”在夏初之时，这些小青蛙从无腿的蝌蚪变成了四条腿动物，数以万计地纷纷离开小池塘，来到小山森林里，并把这里当作它

们固定的、谁知道是好是坏、能否长久的生活空间。路边有一颗长着树瘤的橡树，或者这不就是一尊临产女巨人的木质雕像吗？一队山地车骑行者推着车子沿坡而上。他坐在那儿，不由自主地挪到蘑菇前，他们这样恐怕会视而不见的（但谁知道呢）。这是第一次，这样一些陌生人向他打招呼，并不因为他西装革履。他也回应了——或者彼此的问候不是同时发生的，只是像某种东西，如此自然而然？伴随着这一个小小的珍宝的方向，在他的心里默默地发出了“我在这里！我与之同在！”或者只是简单的“这里！”，这样的事儿之前从未发生过。

后来，他甚至在蘑菇旁伸开四肢。他聚精会神，当然不怀任何意图，就像从前在森林边上一样：他开始聆听，就像人们开始行走一样，陷入沉思，或者陷入停滞。敲击声和电锯发出的尖锐声，不远不近，是从郊区湖畔那些与日俱增的新建筑里传来的。蔚蓝的天空中，持续地回响着一种轻轻的声音——一种“轻轻的声音？”：是的——是客机的声音，还有进出于附近军用机场的直升机零零星星的隆隆声——“还有”？：是的，头顶上客机的乘客不会出事的，现在不会，至少一小时内不会，整个飞行中也不会。在森林另一边，从高速公路及连接周边的快道上，传来一种从未有过的如此和谐的呼啸声、隆隆声和叫声，与之融为一体，还有汽车喇叭声，甚至救护车和警车的鸣笛声。所有这些或远或近的喧闹声尤其与同样是第一次在头顶上如此听到的夏日林中树叶的沙沙声在共鸣：还有树梢间相互碰撞的摩擦声，横七竖八的树杈在一阵或阵阵大风里摇摆时的嚓嚓声、尖锐的嘎吱声直至于呼啸、狂鸣声。而存在于外面世界那邪恶的东西竖起耳朵细听这些轰鸣声和此时此刻这接连不断的响声！同时而至，接二连三，此时此刻。此时此刻？因为我的缘故——毕竟是这样——还不算糟糕。他躺在这儿，此刻也不会出什么事，他的妻子以及她腹中的孩子也一样。他旁边的蘑菇是他、他们俩、他们仨的幸运蘑菇。

我的朋友后来再也回想不起来，他最后是如何采下他的第一朵牛肝菌的，Jurček、vrganj、cèpe和boletus edulis。[106]那是采摘下来的？挖出来的？拔出来的？揪出来的？或者从泥土中拧出来的？他可以说的是：他把这只蘑菇“拿回家”了，再说也没有看看周围还会不会有别的、更多的蘑菇。确定无疑的是，在接下来进城的那一段时而

上坡、时而下坡的路上，他既没有把这件珍宝委屈在西装口袋里，也没有把它藏在帽子里：他直接用手拿着它，同时还拿着帽子，他就那样走着，一直保持这个姿势，走完剩下的下午时光，一直走到傍晚时分，朝着和妻子约好的地方走去，从郊区坐公交换乘地铁，最后又步行。没人注意到他手上或者夹在帽檐边上的东西，穿过拥挤的人群保持平衡，巧妙地行走着。看样子，仿佛这是一次十分棘手的运输。

珍宝？运输珍宝？事实上，在那个夏日里，他觉得，仿佛他早年的白日梦想成真了，即使这珍宝与他童年想象中的如此不同。这是因为，在童年的梦想里，作为寻宝者，他找到了一个能够同时帮助他变魔法的珍宝。那时，在那里，他将等待他的珍宝——“我这样告诉谁呢？”——想象成某种金属的、矿物质的、宝石类的、无论如何是坚硬结实和无法毁坏的东西，某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而现在：这件为他特定的珍宝，这件——他想都没有想过的——一直在等待他的珍宝是第一瞬间某些绝对坚硬的东西，实实在在与众不同的东西，此外，也是富有弹性的东西，但不一会儿就开始变软，越变越软，变成某种明显腐烂的东西，没有了起初的弹性，也没有了本来如此纯净的香味——怎么说呢？闻着像“坚果”的香味——，香味纯净。“香味”不仅弥漫在城市的空气里，也转换成两重性：将某些如此转瞬即逝的东西感受为至高无上的珍宝，这难道不幼稚吗？我这个已踏入彻底的蘑菇痴儿门槛的蘑菇痴儿朋友则回答道：“不幼稚！”即便多年和几十年后依然如此。

当他在约好见面的酒吧把这珍宝拿给妻子看时——甚至也没有引起她的注意——这个临产的女人瞪大了双眼，当然吓了一跳。她大吃一惊，连腹中的孩子也吓了一跳。他不得不劝说她拿起蘑菇。它依然值得一看，蘑菇顶上闪现着最后一丝湿润，顶下的菇肉在灯光下依然洁白得像刚从泥土中冒出来一样。她把这东西拿得远远的，打量着它，不是赞赏的眼光，而是有些厌恶。“多难看啊！”她说。他让她仔细地看看红棕色蘑菇顶更闪亮的地方，也无济于事，蘑菇顶形如橡树叶，上面也正好叠盖着一片橡树叶。然而，正如所说的，她毕竟同他一样，也是从乡下来的，是从邻村来的。

在酒吧老板的协助下，才促使她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在端详这朵蘑菇时，酒吧老板也睁大了眼睛，却是由于惊讶，伴随的恐惧也是一种愉快的恐惧。他称自己在休息日那天也去了森林，但那天风太大，是西风，而关键是，刮风时蘑菇就不会从地里冒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一个生活在世界都市酒吧的男人也会寻找并了解蘑菇？他是不是也同他的两位客人一样，是从乡下来的？完全不是，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城市孩子，但是他对蘑菇情有独钟，几乎对所有的蘑菇，至少也是那些可以食用的。在他双脚几乎还无法站稳的孩提时期，有一次被父亲带出城，带到橡树、栗树、榉树和桦树林中，从此他就疯狂地迷上了蘑菇。

酒吧老板满不在乎地把这朵沉甸甸的蘑菇夹在大拇指和小拇指上拿起来观看。这情形深深地刻在这个朋友的记忆里。他拿起一把平时用来切柠檬皮、柑橘片或其他东西的小刀，从蘑菇上切下薄薄的扁圆形小块儿，不是从蘑菇顶上，而是在胖乎乎的蘑菇茎一侧。他一边切，一边从吧台上递过去给两个人看，边演示边说：你们听听切割时蘑菇肉发出的声音，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啊，几乎是一个音色，你们听见了吗？你们看看吧，这些从切口里浸出来，不，是冒出来的小水珠，是的，你们就看看啊，像冒珍珠似的，不断涌出，珍珠源源不断，透明清澈，你们在哪里看见过如此清澈干净的水滴啊？

接着，酒吧老板就把里面盛放着几乎透明的白色圆片的盘子端给他们，半生不熟，上面插着牙签，我的朋友及妻子不假思索地品尝起这道不加作料的菜肴——妻子首先开始。个把钟头工夫，他们就吃掉了整整一朵这样烹饪的蘑菇，吃到最后还是回味无穷。仿佛在这两个人身上，还从来没有唤起过这样的味觉。我的朋友好像还从来没有品尝过这样的滋味。这就是说：吃了这一餐，会好好地想想，会想想好吃的，感受好吃的。

那么后来晚餐呢？这样的品尝使人对别的东西胃 口大开。另外，这位孕妇总是饥肠辘辘，恨不得在孩子出生前的日子里从早吃到晚，一顿接一顿地吃。事情很凑巧，在那个晚夏的黄昏，正巧在他们用餐的小饭馆，送来了一些牛肝菌。他为什么给我讲这些呢？因为它们同是一类，只是烹调方法不同，形状也不一样。继续吃吗？胡说八道：这样会使他的珍宝丧失价值，眼睁睁地看着这些送来的牛肝菌，他的心里五味杂陈。这些蘑菇没有他那朵大，也没有他那朵美丽，都来自相同的、只是离都市不太远的森林里。但它们的数量惊人，堆在本来装水果或土豆的箱子里运过来。筐子很沉，每个箱子都得由两个男人来抬。于是，从入口直到通往餐馆厨房的弹簧门后面，装满蘑菇的箱子和筐子堆得到处都是。从称蘑菇重量的厨房那里传出喋喋不休的叫声，呼喊着似乎永远都没完没了的数字，很长时间用公斤计量，然后又转化成公担，每一次都令人惊讶——难道蘑菇不就是这样的东西，而且永远会是这样的东西吗？——换算成一种计量单位，最后合成一个总量。当厨房的弹簧门——最终整整一卡车、或两卡车的蘑菇被卸空了——终于完全敞开的时候，我的朋友从他就坐的餐桌前向厨房看到（他的妻子一刻不停地狼吞虎咽，来不及细细咀嚼，似乎没有留意到整个过程），筐里的牛肝菌全被倾倒出来，在厨房的瓷砖地板上形成一座高高的蘑菇堆。这样倾倒并非出于漫不经心，而是一个助理厨师拿着一根高压水管要冲洗掉蘑菇上的泥土、沙子和残留的苔藓与野草；他只是喷出细小的水柱，淋湿蘑菇的表面。不少蘑菇帽或脑袋在倾倒时被折断了，现在在水压的冲击力下就进一步脱落了。从这个距离看去，在他依然保留着那个，那一个，那绝无仅有的蘑菇的眼睛里，那些被倾倒在那里的成千上万只蘑菇，那大批的蘑菇，那重达数公担的蘑菇，所有那些缺少脑袋的茎秆，简直完完全全就是一堆石头，一堆笨重、尤其一文不值、至少是廉价的石头。这算得上珍宝吗？只有他那朵，那个玩意儿，那可怜的一朵，才应该是珍宝？

这种使蘑菇丧失魔力的情景并没有持续。它仅仅发生在那天夜晚。第二天，那种魔力再次出现，也就是立刻发生在他睡醒的时候，在半睡半醒的过渡时刻。这种魔力正好由于那一个具有魔力的东西已经不存在而产生作用。“是欲望吗？”我问道。“不是，”我的朋友回答，“是渴望，或者，如果更符合你的心意的话，是探险愿望。”与以往的早晨不同，他立刻就变得兴致勃勃。他被吸引到外面去，奔

向森林，不仅是森林外缘。他有的是时间，一整天，他已彻底从国际法庭的工作中解脱了。

但是，妻子渐渐开始的腹痛当然阻止了他出发的脚步。其实也无大碍，但他并未因此而责怪她，丝毫也没有。但是他那“我是拯救者”的信念，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都也不合适。他们不慌不忙或者毫不担心地一起来到医院预约好的产房。如果出现一系列出乎意料的状态，在这里无计可施，而母子真的需要抢救时，他这个丈夫和父亲却不是母子二人的拯救者。当出乎意料不得不进行手术时，他毫无头绪地游荡在外面的小路上，整个心思被附近足球场上的哗然声所牵绕，以此猜测着场上的比分情况。在返回医院的路上，他先是感到恐惧，接着是轻松，然后是喜悦，最后又是恐惧，事后的恐慌，还持续了很久。

这样一种恐惧使人健忘。后来，我的童年伙伴忘记了那个蘑菇，忘记了所有的蘑菇。或许他并未忘记它，但是这个东西变得没有灵性了——在他的想象中不再是有灵性的东西了。妻子、孩子以及重新操起的律师工作成了“我的唯一与全部”；“多亏有了孩子”，他给我的信中说，律师工作使他焕发出生机。虽然，他仍会带着新生儿走进那时已经入秋的森林——他妻子不去林子里，她对林子里的空气、飞舞的枯叶以及扑面而来的蜘蛛网过敏——，并时不时左顾右看路边以及林子里的空地。可他始终无果而归，当然他也根本不在乎，至少当他怀里抱着孩子，再次走出森林的时候是这样。

就这样，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寻宝”（期间变成了加引号的寻宝）唯一产生的一个小小的后果是：那条他在那个夏日下午遇到牛肝菌的坡路被他暗暗地称之为“出生前之路”。顺便说一句，这个名字一直保留到我的朋友失踪。

后来，这个律师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带着他的刑事卷宗，走进这片离家很近的森林。他想象着，尤其当他润色自己的辩护词时，即使那

里笼罩着不完美的寂静，但在与几乎持续不断的树叶沙沙声，也就是这个多少临近世界都市、尽管如此意义非凡的声音结成的同盟中，那些可能关键的补充就会受益匪浅，或者还有另外关键的停顿、空白和偏差。想象？不寻常的律师？不寻常，或许吧。然而，最初不过是想象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事实。他的辩护词达到了预期，他的被告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宣判无罪。

他当时坐的地方是一片空地，席地而坐，背靠一棵树皮十分光滑的山毛榉，依旧穿着西装，系着领带，帽子放在身旁。这块空地几乎呈圆形，要说是一片真正的林间空地，可不足够大；要说只是一块偶然的歇息之地，那又显得太大，太圆、形状太规则。它虽是一块歇息之地，但不知是何人多年前留下的，或许是伐木工人在修建如今已消失很久的营地时留下的？无论如何，这是一块人为形成的空地。它不在森林深处，而是在距离森林边几步远的地方，这里预先铺设有一条煤气管道或别的什么。尽管如此，这个律师总是一个人独坐在那里，看样子，仿佛他把这个圆圈想象成了中世纪的露天会场，只有他一人能够进入，其他“与此无关的闲人”则禁止入内。再看上去，仿佛预先就确定好了，通往这个地方的入口堆放着栅栏一般高的干树枝，挡住了通道，那个小洞似乎不只是为他开的，而且从一开始就只有他一人能看见。

又是一个夏天，可这次是一个上午，阳光明媚（抑或不是）。当他走到那棵山毛榉旁，来到又是他的工作营地的露天会场。这时，他又一次看见了那些——是的，它们此时此刻又变成了本来那个样子——生物在聚会，就像在期待着他的到来。这些生灵不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被他遗忘了，而且被他背叛了，他现在恍然大悟。“你们又来这里了！”他不由自主地对它们说。“我们确实又来了。”它们站在那里，站在去年的榉树落叶丛及毛茸茸的山毛榉果实空壳堆里，有数十个，几乎一般大小，亭亭玉立，个个都长着苗条匀称的腿，就像清一色的牛肝菌会围着山毛榉列队一样，蘑菇痴儿后来才了解和宣传这样的东西——“够罕见的，如果它们真的生长在这里，并且成功

地从山毛榉旁特别令人窒息和埋没生命的树叶和长满刺的果实——一个绰号！——堆里顶出来多好啊。”

蘑菇太多了，他不一会儿就停止数来数去了。然而，数量并非是主要原因。而在他看来，在如此壮观的景象面前，数来数去是不合适的。此外，这么多蘑菇长在这里也是件稀罕事。他后来再也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奇事。每当他听别人讲述他们碰到了大量的蘑菇，“你似乎可以用大镰刀去收割它们”时，他就知道，如此说话的人对蘑菇，无论如何对像他所经历过的蘑菇一窍不通。

又好奇怪，或者也不奇怪：即使他真的碰到对此有经验、美味可口的大批蘑菇品种时，也不会把它们当作“大批”，正如他从不把自己看作“蘑菇之友”一样；他从来都不说这个词，并且随着事件的推移，从同行真菌学者嘴里听到它时也越来越不屑一顾。“真菌学者”？才不是哩！这些自称“一分钟”就能采到“数公斤”蘑菇并“成桶成桶”运出森林的人，不是什么蘑菇专家，也不是什么蘑菇科学家。不像他，虽然在发现蘑菇的过程中，他也像科学家那样经常动用显微镜，甚至有时还制作标本，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个真菌学者，而只是个蘑菇痴儿，正如他自己时不时所承认的。

很长时间以后，至少从那天早晨坐在山毛榉下开始算起，在之后的十年里，他对蘑菇世界的兴趣、甚至后来的狂热，不但没有束缚他，反而扩大了他的视野；不但没遮蔽他的光明——我觉得是这样——反而更加照亮了他。这样分散注意力，对他的大脑颇有好处，同时也对他的工作大有裨益，但不仅仅有益于工作。这在他当时有了那次大发现以后就感受到了。他把几十朵牛肝菌一个接一个地从地底下拧出来——对每一朵在采摘时都会发出一种（为了增长见识）不同的声响（是的！一种声响，这一次显而易见！）——，并将它们一个个堆起来：研究卷宗、记录、组合、举证和质疑证据，特别是综合思考、得出结论、最终形成结论，这些比平日更加轻而易举，片刻间水到渠成。他瞥一眼堆在脚前的红白棕色的金字塔。他在工作中继续观看着。

这个新近获得的宝贝在这天最后变成了什么呢——他是把它带回家里上了餐桌，还是把它切片晒干了，或者送人了——，蘑菇痴儿是不会告诉我的。但可以肯定：许久以来，他都渴望带一些特别的东西回家，当时在乡下父母家时就是如此，只是这种特别的东西总是落空了：他每次都是两手空空地回家来。而现在，他似乎终于可以带着这种特别的东西站在门口了。对他个人来说，可能也算是一种特别的东西了。（哦，孩子也大开眼界。）而更重要的是：第一眼看见蘑菇的那个瞬间，被他深深地印在记忆里。而那天所有其他瞬间，早被他忘得一干二净。

他还讲述了一些连自己都感到很惊讶的事：他本来打算那天晚上去看电影，看一部他期盼已久的电影。然而，在那如此神奇的发现之后，他就对电影的兴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或者，他感觉，仿佛在那片森林空地上已经看过了这部电影。虽然他后来还是去了电影院，但这完全无法和自己早晨的瞬间经历相提并论。电影院中的时光，他觉得好漫长——这并不意味着，电影使他无聊——，几乎就像自古以来，从儿时，也许出生以来，就像尘世的生存如此漫长。有一次，在学习过后，他白日做梦了，梦见自己成为作家，像我一样，然后真的写了一部小说，题目是《我的一生》，小说仅包含很少几句话，只有一个小段落，最后一行是："他觉得地球上的时光如此漫长。"唯独在电影院里——即使电影让他感到无聊——很少会让他感到漫长。然而，从那个早晨以来，这个时间甚至在之前如此可靠地跳动的黑暗那里变成了这样的情形，之后也一样，伴随着他蘑菇痴儿岁月接踵而至的轰动，与他远离蘑菇的那段人生完全没有两样。

当然，当他的故事接近尾声时，在他失踪之前，这位朋友才走到这样的地步。我捷足先登，其实我们还远没有走到这个地步。首先，他的痴迷治愈了他称之为"我的时间病症"的东西。它不只是表面上治愈了他：这种牵着时间之手恢复的时间观念久而久之转化成了他每天的生活，因为他先前觉得这生活在那些没有尽头的时刻是如此的劳

累，时而会彻底让人荒芜。这种痴迷使他感到尘世的时间变得不再漫长，即使其间偶有例外，至少也不是让人看不到尽头。痴迷没有使他觉得时间过得快了，或变短了——痴迷使这种时间变得富有裨益，甚至一段时期都如此。依靠他的痴迷，恰恰通过它的与众不同，他觉得地球上的时间好珍贵，也使他感到生命时间转变为实实在在的东西。如果说他以前去电影院，是为了缩短一天的时光——啊，终于到晚上了！——的话，而他在森林中翘首企盼与寻寻觅觅时，则会觉得一天时光不够长。他在森林中如鱼得水，就像人生中第一次“获得安慰”，仿佛他以前从未“得到过慰藉”。每当他走到森林的大门前时，心头都会袭来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就像面对一个伟大的行动；就像面对伟大的一天。然后就是寻找和发现蘑菇：与所有电影不同，它能化解没完没了的内心废话，化解空泛的喋喋不休，化解痛苦的错误旋律，让你宁静，让一切变得宁静，让宁静笼罩大地。

他现在觉得时间变得特别实在，因为他重新开始学习。在童年与青年时代，他喜欢学习。后来，最初的兴趣就逐渐减退，越变越少。在他几乎到达了某一特定的、或更确切地说，某一不确定的临界点之后，他就不再继续求知了，只停留在自己知道的知识里。而他现在又开始学习，没有刻意为之，知识自然地飞向他。

什么知识呢？首先是一些有关蘑菇的知识，寻找，生长地点，区分辨别，混淆，变成痴儿，而且为了我的缘故，烹饪，即使在他看来是些不太值得追求的知识。——从寻找蘑菇中，或者走进蘑菇中，有哪些知识尤其要掌握呢？能感受到什么？要赢得什么（这里不是指金钱）？——等着吧！那个与之相关的故事是不会不讲述的。另外，凭借重新学习，他急切地想实现一个目标，这与专门研究蘑菇携手并肩。

虽然自小生长在乡间，但他对自然界知之甚少，这——他在乡民中毫无例外——主要表现在，他大体还不知道自然界里哪些东西为人所需，哪些又让人所惧。现在，也是他后来蘑菇痴儿的并发症之一，在一次次的走寻中，在一次次的——正如他显而易见所经历的——

“探险考察”中，他也积累了许多关于森林树木的知识，尤其是树的根部，以及他在上面行走的地层，石灰岩？泥灰岩？花岗岩？页岩，风的种类——看看市中心那个酒吧老板——，云的形态，行星和月相。在那个时期，也就是接近他极其“博学”的尾声，比如说，在一次蘑菇学者大会上，他身为著名律师，又是贵宾身份，在会上反驳了当时的主流观点，即蘑菇在满月时会加速从地下冒出来。与之相反，他主张这是新月现象：在没有月光的夜晚，只有当月光从晴朗夜空照下来时，才会促使蘑菇，尤其是牛肝菌，如雨后春笋般地从地下钻出来。同时，他还列举出一个个“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来证明。

此外，他身上还有某种东西，使他尤其擅长从一系列飘忽不定的现象中找到或发现什么，某些被他的一位老师称为“病态的眼神”的东西：在那种普遍的、也许只是由于每天的习惯而如此变得千篇一律的情况下，他从小就有一双善于发现矛盾、另外和陌生的形态的眼睛。同样，他对色彩也很敏感，立刻就会对那些显眼的色彩，那些不和谐的色彩做出反应，识别出与之不相配的色调和相对的几何形态，从一成不变的凌乱中发现清晰的对称和闪亮的花斑，从一切无形的繁杂中发现有形的图案。

他也料到有人会驳斥，说他新获得的知识与他早年的知识不同，是些无用的东西。反正他自己心里明白，伴随着这样的再学习，一种不由自主、情不自禁的再学习，他冒着风险，会荒疏成就他职业而必须掌握的知识。但是，随着他寻找蘑菇时变得越来越充实的时间的流逝，他感受到自己丝毫没有荒废为法院工作所必须的知识——相反，它似乎被自然知识激活了，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晰、更有条有理地浮现在他眼前。尽管他确实荒废了一些知识，但那些都是无关紧要的，连这也使他处理各个案件时显得得心应手。难道说他的再学习历程，难道说全部的蘑菇知识以及它所带来的益处完全无用吗：在那些年里，在那十年里，后来不仅在夏天和秋天，而且在冬天和春天，他觉得从中受益匪浅，即使不同于当年在收购站的收益，他不能以此给自己买来什么东西（他也不愿这样做）。

确切地说，他觉得自己之所以受益匪浅，与其说是因为对蘑菇的发现，倒不如说因为那些伴随现象。比如，他受益匪浅，因为他能在夏天区分出橡树、榉树和桦树所发出的不同声响，橡树有时发出近乎轰隆隆的声音，榉树准确地说是一种呼啸声，桦树在强风中刷刷作响而非沙沙声。他积攒了经验并了解到，学习各种树木秋天落叶时的另一番景象，这是一种经验：锯齿状的梧桐树叶先是俯冲而下，然后缓缓地飘落到地上；叶片最大最薄的板栗树叶，形状像一只小船，掉落需要的时间最长——一时半会儿不愿意落在地上，尽管已在空中飘了许久，一再飘动，就是在即将碰到地面的瞬间也会重新往上飘，再次飘飘然然地飞上去；扇形的合欢树叶，几乎所有的扇叶一下就从枝条上脱落下来，转眼间几乎全都落在地上，紧随着最后几片孤零零的扇叶，它们不是共同落下，而是片片各自来回飞舞；还有——但是你们自己去看看吧。

冬天里，看到一张蛇皮挂在一根光秃秃的树枝上摇曳；在早春的一天里，看到一抹斜照的阳光照在一只趴在红棕色泥灰岩斜坡小洞里的壁虎身上，他觉得这就是一种收获。从各种鸟儿这样和那样的飞翔中，他看出来的不是什么在那些痴迷蘑菇的岁月里丝毫没有使他“愁云满额”的未来，而无非是当下，实实在在的现在，此时此刻；他比较着各种不同的飞翔方式、高度和周期，并且听着鸟儿扇动翅膀的声音就知道是哪一种鸟发出的。同样，在穿越森林时，他还遇到不少地下掩体残迹，也有一些十分隐蔽的炸弹坑，里面有锡碗和钢盔，堆积着半个世纪以来的枯叶，或在别处发现更久远的醋栗和鹅莓交错生长在一起——然而，就是在这里，在弹坑里上上下下时，采摘昔日那些野生的、缩小的醋栗和鹅莓时，他也不愿意知道或想象任何过去的事情，只想学习当下。

那时候，他还远远没有达到日后蘑菇痴儿的地步，或者他自己这么认为。他的痴迷，在他看来与不少的痴迷是截然不同的，是一种有理智的痴迷，一种使他受益匪浅的痴迷，同时他也以此让别人受益匪

浅，不仅对他身边的人，而且对那些偶遇的人、那些过往的人如此。不管怎样，一直以来，他始终刻意使自己不融入同代人。而现在，他对蘑菇的痴迷，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同代人的大门。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带着自己的收获走出森林，就好像带着示爱的信物？

那块林中空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块用来“安营扎寨”和准备法院登场的空地，“同时”，还是他所说的，也是用于观察同代人的一个瞭望台。这绝对不是我俩所熟悉的家乡森林边的瞭望台，而更多是一座高度能及杉树树梢顶端的巡视台，为猎人和森林巡视员所设置，时而也有情侣上去坐坐。尽管如此，这块林中空地的平坦处，属于他本人的最高领地，即使不是王国，但足以供他安营扎寨。他感觉，仿佛在工作的过程中，他比出没于森林的人们坐得更高。

这是因为，他看得见他们，却不会被他们看见。从他们的角度看，干枯的荆棘组成的栅栏或隔墙好像望不透；它们堆成了一道屏障，将他的空地与外部世界隔开，尽管这块空地就紧挨着路。他坐在其中，位置与栅栏间有些间距，因此，他可以看见不论是从左边还是右边过来的人影子，虽然看不清细节和特征，但看得见轮廓，在这种方式下更独特——更典型的轮廓。

这条路在他那里称之为“民族迁徙之路”，就像“出生前之路”一样，因为在他的孩子出生前，他曾在那里首次遇到了真正的牛肝菌。他养成一种习惯，身为律师的他一再从那块林中空地上的工作位置站起来，时间或长或短——渐渐地，越来越长——，向身后的大树走去，开始寻找，找什么，你们都知道。虽然他从来都不确定那里有没有蘑菇，但他每次都有收获。每一次吗？是的，每一次。每样收获都送给他一个惊喜，一个未曾预料到的物-灵、一个新地点、新色调、新形状和新气味。并且，他几乎每次都能事先预感到一个新的发现地——一种直觉，这就是说：所有的感官都活跃起来了。如果他偶尔真的失误了，他就会在失误的地方更清醒地去思考和观察那没有发现的东西，那不在场的东西，那缺少的东西。如此一来，他漫漫一生的无

聊变成生机勃勃的驻足逗留。“我感到无聊？我？这里没有什么让我无聊！”

返回空地后，当时不只是他自然而然地继续工作。除此之外，他还会关注那些在枯枝屏障那边来往的身影。在他迄今为止的人生中，他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形。是的，屏障后面的人就出现在他眼前，他承认，相比他与生俱来使他远离他人、让他孑然一身的惧怕交际的性格，所有这些短暂的交际，他那一再在社会上如此富有影响的举动则一文不值。

然而，当时，由于他痴迷于在那块林中空地上工作，特别是发现的喜悦让他开了窍，他时而不但参与其中——他也成为其中一员。一再发生在他身上，不，一再让他撞上的是，他转换成外面路上这个或那个人，就像他曾经在森林边缘转变成了树枝发出的各种声响那样，整个人都转变了，皮肤，头发，特别是骨头，转换成了树冠的摇摆、叠加、伸展和重新聚合。

时至今日，他一直没有摆脱交际恐惧症。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一睡醒来，看见母亲坐在缝纫机旁或者不管什么地方，坐得离他那样远，他的脑袋里就会闪现出对这样一种二人世界或者彼此对立的状态无声的惊叫。在妻子面前亦是如此，甚至在面面相觑、相互接吻的时候，他与她之间的空间也是无法沟通的，就像那大声惊叫一样无法克服——在那里，在应该产生作用的现实中，他们之间的每一块空间都被填满了——，而且这种恐惧在面对儿子时还有增无减，只是私下里说，但是越发会让人感受得到：他似乎绝对且永远都和另一个同样需要亲近的人融为一体，除非那个人最终从这里或那里消失；在成为对方的一部分的行动中，这样的行动恐怕和仁慈没有什么两样。

但也不是：他现在所感受到的，在开窍时，在转化为屏障后那些突然间不再陌生的身影时，这就远离了仁慈，绝对远离了仁慈，因为这和在他身边的人那里不同，和爱没有任何关系。他如此所感受到的，毫无疑问就是一种理解，并且随之而来的也是一种更加广泛的公正，胜于那“迄今”只是在职业上练就的公正，在很少情况下也是一种内化，一种突然的、与其说令人恐惧倒不如说使人平静的内化，是对各种另外的东西，首先是他以前的故事、出身、他从远远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和天知道继续走向何方的内化——正因为如此，这位朋友许久后才向我吐露心声，就是这条“民族迁徙之路”。那个正好在屏障后踉踉跄跄行走、并且用让人无法理解的语言咒骂的人几年前逃离一个内战连连的国家；那个半路上停在一棵桦树前的人，思念着一位离世已久的亲属，他在继续行进前大声打着哈欠，人们在受到惊吓后才这样打哈欠；那个现在冲着他，伸出脚绊他、又被他漫不经心绕开的人，一直梦想能成为圣人。在他面前，所有迎面走来的人，至少他出身这个地区的人，都会怀着敬畏绕道而去。

这种民族迁徙的场景，偶尔会闪现在这位曾经患有交际恐惧症的蘑菇痴儿的脑海里。想起所有这些在他的脑海里继续迁徙的人，他的脑袋就会变得沉重，十分沉重。每次他干完工作——无论是起草辩护词，还是为辩护词定调去寻找，他觉得都是在工作——，便离开这块空地，走在民族迁徙之路上回家，大多情况下都穿着西装，系着浅色的真丝领带，一只手拿着公文包、另一只手拿着他两三个可怜巴巴并不显眼的发现物，起先包在一张报纸里，后来就慢慢地露出来。这时，他看到自己成为世界舞台大众的一份子或一员。在之前的数十年里，他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是众多行动者的一员，个个都代表着截然不同的角色，而这个角色恰恰因为与众不同才属于大游戏的一部分，并且使之接连不断有条不紊地展开来。

在这里，小学生们或围坐在一起，或围着圈跑，结束了他们在森林中的一天；在这里，一列徒步小队站在分岔路口在大声说话，老年人居多，也有几个年轻人，显然他们没有达成统一意见该去往何方；在这里，此时此刻，一个男人正在体育器械前引体向上，另一个男人

在后面等着器械空下来；在这里，此时此刻，有两个骑马的人，同时从小步到飞奔而去；此时此刻，那儿有一些零零散散慢跑的人，在午休时分，森林前面，从他们那里传来过嚷嚷声；在这里，一个年轻女子，一身远足徒步的行装，这里的森林对她来说几乎就不算什么路程了；在这里，一个亚裔家庭正在寻找板栗，一个真正的大家族，上有太祖母、下有重孙——这会使他想起另一个部落吗？同样在这里，有一组警察巡逻队；在这里，道路变得宽阔了，退休的老人在玩滚球。

而他与他们所有的人维持着平衡，寻宝者，同时也是平常人，同仁，而这样一种平衡，不管宝贝如何来来去去，事实上就是一种弥足珍贵的东西。半辈子以来，地球更多是陪着他玩了半辈子：如今，——他在这里陪着地球玩了起来，是他吗？他陪着一起玩。在这个社会上陪着玩。各种各样的人的社会，截然不同的人的社会——正是他们——，有他们存在。其中就包括，他偏离轨道和自我封闭伴随着这样的感觉，同时也是一种确信，他这样的行为，这有益于他的挚友，有益于他周围的人，其中也包括“他的”被告。是的，那就与人为善吧。

那么他，手里拿着蘑菇的那个人？好一阵子，他还这样感觉到自己是个没有归属的人，与这个场景形成了反差。他的同类，像他一样的人，他们既不走大路，也不走小道，而是穿行在大树与灌木之间，也绕着圈，一步一步地走着，显然很缓慢，或者压根儿只是站在或蹲在那里，被树干和树叶半遮半掩。他们突然从灌木丛中钻出来，或者立刻又消失在里面。说得客气点，他们不可能成为游戏的一部分，更何况还带着那些陌生的、如此令人诧异的玩意儿；他们不是把这些玩意儿捧在身前，就是可疑地装在鼓鼓的手提包里。在最好的，要这样说，最无关紧要的情况下，这样的人像他一样都是些边缘角色，跟这个大游戏毫无关系。是的，当他们在这儿和那儿迷失方向乱了方寸时，甚至会影响这游戏。

然而，后来出现了这样的时刻。这时，这个犹豫不决、踌躇不定的人，这个还不遵循群体规矩的人，他又是冲着全体行动者的节奏反其道而行之，又是单枪匹马穿行在这个地方——那些行者分别都是许多人结队而行，即便是一个人，看上也像许多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共同行动者。他是游戏的参与者。他补充了游戏，他掺和到大游戏里。如果没有他作为蘑菇采摘者这一角色的停留、交错、穿插、谢幕，那么这个世界舞台，至少那个夏天和秋天的世界舞台似乎就会有缺憾。像他这样一个人掺和到游戏里，会刮起另一种风。在这种风里，每个映入他眼帘的人都各司其位，各有风格，也包括他自己，这样便产生了一幅史无前例的社会图像，一幅人性的、理想的社会图像。

怀着这样的意识，他走出森林继续前行，穿过人潮拥挤的都市街道。他那根深蒂固的，或者从他的乡村出身来看被感受为奴性的对人的恐惧好像永远消失了。我，一个边缘角色，或许完全是个异类？你们看看吧！他这样说也指的是自己随身携带或者在身前捧着什么东西。不少人就这样加入他的游戏：听从于他，停住脚步，讲述他们以前……在那里，他们的家乡……只是他们把大师的故事更加出色地留在记忆里……——最后，一天结束时，这个采集者返回家中，这是一个与猎人完全不同的返家。

在那个他同时也感受为梦境——一个梦境阶段——的幸运时期，我的朋友，这个蘑菇痴儿几乎没有遇到竞争者。他很少遇到其他找蘑菇的人，就算有，他们找蘑菇的时间与地点也和他不同。有时他会和一个人不期而遇，可这人和他一样低着脑袋，一步一步地挪去，停下来，完全从容不迫，慢慢地在林子里兜来兜去。但是，和后来不同的是，他们两人都不会彼此回避，甚至还可能相互展示各自的珍宝，然后一个羡慕另一个。按照一个近东宗教的说法，这是“允许的”，因为你在这样的羡慕中，会希望自己也得到相同或相似的东西，但绝对不会像赤裸裸的、不允许的嫉妒那样，嫉妒人家有这样的东西。在这样的意义上：盼别人别得到这样的东西。在很久以后，他还会一再将蘑菇示于他人，一个采蘑菇女人也曾在他面前这样展示过，彼此相互

交换对比后发现，两人找到的蘑菇几乎相同，包括蘑菇的数量、大小和品相："这里有足够的蘑菇供我们大家来采，不是吗？！"是的，是这样，哎呀！甚至连上帝或众神所允许的羡慕也不存在了。这个寻找蘑菇的女人是个头戴鸭舌帽的老人，在雨中用一根粗拐棍在落叶里捅来捅去。她的筐子里有一只蘑菇和他的不一样，据说这种蘑菇受到了你们都知道发生在哪儿的核电厂灾难最强烈的辐射，就算再过数百年依然不会改变。当他认为有必要提醒她小心时，她回答说，她知道，可她已经快九十的人了，不想再为此担忧了。

他的痴迷一季又一季变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深入；知识也与日俱增。他感到，这其中有不少东西可以使他局限的领域延伸到其他领域。即使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发现时，他也越发感受着一个发现者的兴奋，并且怀着这样的想法，在法院休假期间撰写一本关于蘑菇的书。还从来没人写过这样的书。这样一来，他似乎就不只是发现者，更是一个先驱；除此之外，或者顺便说，我的朋友还想象着，这样一本蘑菇书，受到他热情的激励，同样有律师实践有条有理的加工，就像是以普及为目的，必然会受到读者广泛的青睐。他期待这本书能带给他人生的成功。正如所说的，他已经丰衣足食，但通过这本蘑菇书，这本十分独特和渊博的书，他恐怕就会变得富有。你们知道他梦想什么吗？买下一片森林，一片很大的森林！

他始终没有动笔撰写这本蘑菇书。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给我讲述了几件会出现在其中的事情。我现在试图在这里继续讲述它们，既不会激动，但同样也不会"平平淡淡"——一种少见的时代赞扬话语，赞扬的是一个讲述他只是要干什么的人，因为他要讲述的东西亟不可待，他也要一吐为快。再说，我也不会把它讲述得有条有理，因为与这个乡村童年伙伴不同，尽管学同样的专业，可我却没有成为一个法学家同行。

于是，那没有写就的蘑菇书毫无规律地穿过我的记忆：他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蘑菇，这种才能或者天赋是这个朋友从那个已经提到的个性发展而来的。这种个性是最强烈地妨碍生存的个性，直到他变得狂热痴迷，他都深受其苦。他这样说指的是自己的注意力被持续地分散了，日复一日，被那样一个东西，不，被那样一个形状；它从成

百上千个形状中凸显在他的视野里，日复一日，时时刻刻，实实在在地浮现在他眼前，作为那一个形状，那独一无二的另一个形状。对这个地地道道的另一个形状，这一个与所有其他形状截然对立的形状，拥有这样一个意识，直到那时，这种情况向他展现出他的反常；这也作为痛苦深深地触动他。

这样一种偏离到陌生形状的个性使他一再陷入停滞状态，让他既不能继续进取，也无法继续进取，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工作中，而且也表现在人们从前所说的生活世界里。他很快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会发呆，比如看到一只被压碎的昆虫留下的印记、一点微不足道的咖啡渍或油渍、国际刑法法典某页上一丝纤细的头发，或者看到那弯曲得不寻常的锁骨、那压根儿就不呈圆形的肚脐眼、那个他正好与之融为一体，或者准备融为一体的女人眼睛里一个乳白色的小点等。那些作为一连串的不幸而深深触动他的东西——违心地偏离了伟大的整体而误入迷途（更确切地说，把无形当成有形），发呆，被抛出生活的常轨，就像永远不能回归，最后意识到无能和永久的内疚——，他认为，这些在寻找和发现蘑菇，特别是那些隐藏并被灌木丛遮盖的蘑菇给他带来了好处，几乎带来了幸福。这期间，他的痴迷日益增长。他竭力祈祷，起初只是为自己一个人。至少，在森林的落叶土地上，在众多不起眼的形状中，出现或者闪现出这一个显眼的形状（为了在这里变换——和细化那已经提到的东西），既没有将他抛出生活轨道，也没有让他发呆：这样一个形状让他着迷，这就是说，它没有分散他的注意力，而是让他重新站了起来。不，在蘑菇世界里，这是他祈祷的主题。依靠祈祷，这位后来失踪的朋友——几天来，我当然觉得可以感受和闻到他真的就在我身边——打算以此作为他的蘑菇书的基础，因此，他目光中那种被信以为真的或者事实上的反常就会得到纠正。反常是寻找和发现的先决条件，这不仅关系到蘑菇的事，而且适用于任何形式的寻找和发现。如果没有这样的反常，就没有发现者的眼光。在这个发现者身上，伴随着这个发现者，通过这个发现者，无形才变成有形，有形变成了珍宝。

我的朋友还想顺便插一句，这一个既独特又给人启示的形状夹在所有那些另外的、毫无意义的形状中，比如有乱七八糟的树叶，有相互交织的蕨类扇叶，还有无数的草叶和苔藓。它使他那几乎毫无长进的色彩感持续地变得充实，因为这个独特的形状，即便它还是一个如此小的形状，就像一首描写玫瑰的古诗中所说的，给他“预先闪烁着光芒”，今天是酒红色，明天是水晶紫色，后天则是像老鼠或老虎那样的灰褐色，变化不断。

他的蘑菇书不会成为什么指南，或者如果是的话，那也首先是一本他为自己本人考虑的指导手册。可是，他后来渐渐地转换成了记录，并让我看，起初暗地里，后来就公开了，同时也让别人看。开头是一种叙述，就像人们有时独自给自己预先讲述些什么，并且说的那么清楚，接下来，他就偏移到理论争议，有时甚至成了煽动。

他特别讲述道，他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习惯了每次在真正寻找蘑菇之前，即使在值得怀疑的森林里，也要专门穿过一些区域走一段，相当一大段。他在那里就会确信无疑，这里并没有长着他想要的东西。或者，这里除了树木和灌木之外什么东西也没有。他走在那里，不断望着地面，知道在树叶之间哪儿只有砂砾和黏土。因此，他的目光对那些希望所看到的东西越来越敏锐，也不用这个行走的人刻意再做什么；他开始走动时，便也开始看起来，哪儿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看的；当他随后来到那些预示着希望的地方时，他的眼睛就已经盯上了。

与此同时，之后助他一臂之力的是，蘑菇痴儿立刻变换成他称之为“寻找脚步”的行动方式，伴随着侧身朝我瞥一眼，也称之为“叙事的脚步”，一种一再近乎停滞不动的行动，但在穿越树林与灌木丛时，却从不会停下来，更像是一步似一步地挪向前；一旦停下来，就意味着寻找脚步找到了意义所在；在寻找的过程中，不是悄然呆立，而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行进，另外一种静默的方式，这样就会有发现，有无与伦比的发现。

他也讲述了不断变换的寻找脚步。这时，他倒着走，小心翼翼地迈出一步又一步。（这难道不是一种前进吗：从当初“倒退”进一筹莫展的境地，到现在出于惬意倒退到作为寻宝人而倒着走？）。或者他告诫自己，只要他长时间只是垂着头四处穿越，偶尔也会停住脚步，从地面不经意地向树冠与天空的方向望去，抬着头，这样至少保持一分钟：如同连细节和最不起眼的形状都描绘到了。之后，当他再次低头望着地面时，便觉得地面仰仗于天空赐予的光亮，那些先前堆得乱七八糟的东西的轮廓简直就像是被光泽照亮了似的。他不止一次地在这样急切地望着脚前，之后才领悟到他几个钟头以来，甚或几天和几周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东西；或者他发现了那样一些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一些他从未寻找过的东西，一些他既没有在大自然中见过、也没有在照片上看到过的东西，一些对他而言新鲜的东西；或者，在仰视之后，他在这块林地上发现的既不是所寻找的蘑菇，也不是另一种，更不是陌生的第三种，其实什么新鲜东西也没有发现，而是根据头顶上的天体，仅仅觉察到他脚尖前的世界：是的，这也称之为他的世界！

在同样的自我告诫中，在他为计划的蘑菇书所撰写的记录里，我的朋友从同样的自我告诫转向针对自己的命令。比如，他这样命令自己，每当他花费了很长时间，迈着寻找脚步走来走去，抬头望来望去，但仍然看不到，甚或压根儿就看不到什么希望得到的东西——他在书中一个地方甚至写了“梦寐以求的东西”——时，取而代之的便是一些别的东西，不仅有别的、更有他觉得毫无价值的蘑菇，而且也有浆果，甚至已经干枯的，或者板栗，包括发霉、变质、碳化的板栗时，他就这样命令自己：“去采集吧！转到一侧去！弯下身子吧！搜寻吧！转身吧！挖掘吧！”这样一些自我命令，同样也考虑到采集别的毫无意义的东西，这时，你就会尽可能地接近地面，这样又会把你引到寻找的路子上，它们或许同时也会引导他这本蘑菇书未来的读者。

好一阵子，他把这事包装在更多是小心翼翼的推荐中。他这样忠告说——“根据多年的经验”（尽管还没那么久远）——，要么在路边和小道旁寻找，要么彻底远离这些地方：通常情况下，对“我们那些东西”——他以此指的是那些很有价值的蘑菇，他一开始也称之为“我那些东西”——来说，介于路边与难以到达的森林深处的广大中间区域并不是一块沃土；据说，他大多数甚至几乎所有的“珍宝”，都是在路边沿线找到的；通常情况下，距离路边较远的区域，不管你找多久，什么都找不到；但是，在森林最深处，只有需要你自己去发现的地方，只有在那里的灌木丛中，在污泥中，在灰烬中，在一棵半死不活的枯树昏暗的脚下，你才会找到这些东西；地上铺满了手枪子弹，还有这样一个规矩，通常在这里会找到这样一个珍宝，独一无二的、胜过其他所有的珍宝：“你好，君王！”有一次他甚至脱口而出：“你好，帝王！万福，凯撒大帝！”

他也抱着同样的意图讲述过，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在别人已经找过的地方继续寻找，即使人家显然在那里翻了个底朝天，而且才刚刚离去。“不骗你说”，他每次都会在眼前发现一些东西，一些被先前的寻找者忽略的东西，一些“值得人人敬重”的东西。

他还告诫说，如果想要找到某些种类的蘑菇，不一定非得在去年一个大量生长的地方去寻找：这又是一个规律，这样的蘑菇群会越过冬天与春天，在地下不停移动，跟着水走，随着风向变换地方，并且常常惊人地在好远的地方探出头来，形成一个扇形，接近阳光和空气；虽然好远，但也不是远不可及，从它们的发源地是可以闻得到的——寻找者只需启动嗅觉，就像他年复一年那样。就这样，他也不提倡在森林中沿着狗的脚印寻找，但是可以顺着马蹄印记和它们的粪便找。而且，蘑菇痴儿更加强烈地主张，要么就在森林里孩子们曾经玩耍过的地方寻找，要么就像此时此刻在这个地方，孩子们在寻找者眼前继续玩耍，肆意叫喊，四处乱跑。按照他的记录，很有希望且完全值得信赖的发现地点——“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真的！”——它们位于公园里、草地上和花园中的儿童秋千附近，哪怕在森林外也罢。

在这本蘑菇书撰写计划中，有一整章专门围绕着弹坑密布的森林展开叙述。在他的住所周围，也就是离国际法院不远的地方，有很多这样的森林；这些弹坑形成于“二战”末期，那些轰炸机都是美国的，它们协助将德国侵占者赶出家园。弹坑早已空空如也，没有一丝炸弹爆炸留下的痕迹。这些森林，以及周围曾经被侵占者使用过的军用机场似乎有节奏地布满弹坑，密密麻麻，以至于不少弹坑甚至重叠在一起。弹坑大小不一，不都是圆形，也有一些呈凹穴状。首先是弹坑的深度不一，由于弹坑和凹穴壁的陡直和平缓不同，它们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状，常常在一个弹坑里也不尽相同。在下面，也就是弹坑底部，深深地埋在数十年之久的落叶沉积下面，他有了最丰饶的发现。于是便出现这样的情形，他不用特意将一层层落叶翻来翻去：蘑菇，或蘑菇们会自己冒出来，至少带着蘑菇盖。这些从弹坑中长出的蘑菇盖要比其他地方的大，形状也颇似弹坑，独具特征，和普通蘑菇不同，并非呈红棕色，而是几乎显得无色，白花花的或者纯白色，就像是毒蘑菇最致命的色彩，或者“不，不是白色，更确切地说是灰白色”，而在蘑菇盖下面，同样是灰白色的菌柄，同样独具特征，由于深埋地下，因此越看越显得长，其长度往往是弹坑外同一品种蘑菇的两倍（“当然，气味和口味则相同”）。

但是，蘑菇痴儿并不想仅仅为此而花一整章的篇幅去讲述布满弹坑的森林：他也别有用心，要建议自己未来的读者亲自在这样的森林里走一走——凭借自己的兴致去感染他们，在那里四处看一看，上上下下，下下上上，穿过那被松软厚厚的落叶铺垫的弹坑景致。每当他一连几个小时穿过这样的地方时，即使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那么他也会觉得，仿佛他心情沉重地从这样一片森林里走出来，哪怕只是呼吸更自由了，那渴望远方的意识被唤醒了。“通过在弹坑里上上下下的走动？”——“是的，正是这样。”

这本蘑菇书，它要在临近结尾时渐渐转移重点，从寻找蘑菇转向走着瞧。所谓在结尾时，虽然他希望继续讲述自己踏入寻找蘑菇之途的故事，但也少不了随着岁月的逝去，他对蘑菇的一片痴情——不，并没有减弱，而是变成了“两股道”。这是因为，越来越常出现这样

的情形，只要他在许多通往寻找蘑菇的路之间有选择的话，那他就选定走那条在他看来更美好或觉得冒险的路，哪怕它预示着更少或更加微不足道的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路与走着瞧相比寻找与发现至少获得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我们两人童年生活过的地方，特别是那些住在高山村庄里的居民，他们几乎就不会“去采蘑菇”，更别说去寻找蘑菇了：他们住得离森林那样近，夏天这里到处都是蘑菇，至少是那些黄色蘑菇、那些圣约翰山的蘑菇。他们几乎足不出户就能将筐子和碗装得满满得；这些人不用“寻找”这个词，而只用“拿来”，“在我们这里，你不用寻找——你顺手拿来就是了！”

但是，这在蘑菇痴儿眼中是不算数的。你要去寻找，你要去行走。你有必要选择一条美好的、更美好的、最美好的路，这是作为第三者加入其中。同样：许多人去寻找，甚至成群结队，这是不行的。只有“独自行走”才是可行的——即便是两人结伴寻找也不行——，仅有一个例外：和孩子一起。在他规划的蘑菇指南中，特别禁忌的是：依靠狗寻找蘑菇（在他眼里，唯有猪适合做这样的事）。——那么，怎样才会找到那些深埋地下、梦寐以求的蘑菇，比如松露，或者怎样才会找到它们呢？怎样才会把它们刺探出来呢？为此，他勾勒了这个故事，有一年夏天，他独自一人在一个儿童秋千架脚下，出乎意料地站在一朵真正的松露前：一堆黑色的东西露出地面，被直射的正午阳光照耀着，像一坨狗屎，但却有一股香气升腾上来，在几乎两米开外的地方都能闻见，闻起来像是松露。没错，它真的就是松露！他赤手刨出这堆玩意儿。此时此刻，在这里，这个菌球，它是怎样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哦，昨夜那场骤雨，冲走了泥土，这朵松露不用狗或猪帮忙就露出脸。它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这个长着褶皱的黑色小球多么芬芳馥郁，直到接下来的爱之夜，甚至数天之后依然如故。然而，这不是从橡树根的块茎中生长出来的，也不是蘑菇书里其他常见的大树，无非就是一棵纤细弱小的刺槐树，几乎还没有一丛灌木大，一棵小树，它们常常生长在铁路边上，没有一丝森林的迹象。这朵松露，它出现在两个几乎光秃秃的城郊之间，在城郊边上，不，出现在一个儿童游乐场的中央。

从此以后，每逢夏日暴雨夜晚过后，我的朋友都会前往儿童游乐场那棵刺槐下：然而，再也没有遇到第二朵松露，永远没有了（而这定格在那一个一个爱之夜里，他的蘑菇书当然对此会守口如瓶）。另一方面：在他眼里，寻找松露也是些踏上蘑菇之途算不上什么的东西。其实，那些最终用于他写作计划的记录与其说在讲述，倒不如说在确立规则。而规则如此之严厉，以至于它们对他来说好像比纯粹游戏规则更为重要。或许那些浮现在他脑海中的东西，他觉得演变成了由规则、戒律、公告和思想构成的目录。

于是有一天，当他又在一片森林里第一次看见孩子们玩着寻宝游戏、穿梭在树林间、在山坡上跑上跑下的时候，他的脑海里就冒出“这个想法”，这些年轻人最好应该被老师或家长送去“见识见识蘑菇”。而此时此刻，他们在那里兴奋地寻找着一片被大人藏在树墩里、灌木丛中以及废弃的狐狸洞口的纸片，对其他一切东西都视而不见，而且不只是蘑菇；他们无意地折断这个和那个，践踏，捣碎；他们顶着一头红发、不再是个孩子，他们伸长舌头，在整个森林里彼此和乱糟糟地呼喊着，或者吼叫着，压根儿不再是童声，上气不接下气，眼睛直瞪瞪地凸出来。这样看来，要是寻找蘑菇的话，他们似乎要一步一步地学习行走，留心——不是一味为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一再屏住呼吸——这是某些别的东西，并不是喘不上气——，他们恐怕会觉得眼睛不是凸出来，而是撑大了；他们时而在这儿或那儿发出的惊叫就会是孩子们发出的一种惊叫，哪怕只是那样一些还处于变声期的孩子们发出的。

从一开始，蘑菇痴儿就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踏上冒险的征程。在孩子身上，他真的感受到了这样一种在路途上的状态会自然而然地起到“教育”作用，无需身后有一个专门的教育者，也不是把教育挂在嘴上。除此以外，也没有任何一种在路途上的状态适合孩子，“不仅适合我的孩子”。再说，“我的后代”对他脚下的东西有了更加敏锐的眼睛，“不只是因为它们离他更近”。的确如此：他这个想法起了作用，它会起作用的。根据他的蘑菇书记载，“在我们这个可爱的世纪里，即使那些最终的社会观念破产消亡后，这种情形似乎最终又会

赋予你一种想象，或者在我看来只是一种预感，为什么真的‘只是’呢，这个，一个社会毕竟继续会有未来。有朝一日会的。有朝一日又会的。”

根据最终的记载，真的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仿佛这位朋友的蘑菇书旨 在不仅把寻找蘑菇的人共同看作一个可能的新社会的典范，而且也超然其上，将他们每个人分别描绘成——不管矛盾与否——人类最后的探险家，即便不是终极的人。每一个采蘑菇的人：作为探险家，同时也是最后或最初的人。

蘑菇作为“最后的冒险”？对于蘑菇痴儿来说显而易见，因为他效仿“最后的边界”而使用这个词，通往野生世界“最后的边界”，在其后面至少还可以发现一片野生世界。这个边界早已不复存在，无论是在阿拉斯加，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如此，更别说在喜马拉雅山上了。相反，最后的冒险依然存在，谁知道还能存在多久，即使你只能从中捕捉到一丁点也罢。

蘑菇作为“Last wilderness”[107]，“最后的野生物种”？照这个蘑菇痴儿的说法又是“显而易见”：因为它们此间已经成为生长在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植物，完全不能人工培育，完全无法被开发，更别说被驯服了；它们只能野生，丝毫不会受到人类任何干涉的影响。

草菇、平菇、滑子菇，所有这些日本的“舶来品”等等，它们不就可以人工培育和种植吗？甚至连松露也可以通过种植特定的树来培育，无非就是过程复杂罢了？这还是蘑菇吗？——“再次显而易见”：能够人工栽培，这就不是他所认为的冒险；只有野生的东西才算数；人工培育的草菇、平菇、滑子菇、金针菇、木耳和榛蘑，给人造成一种视觉陷阱，它们被克隆复制，并且被冠以错误的名称贩卖，它们不仅在颜色与气味上完全不同，而且相比被它们冒名顶替的真

品，彻头彻尾淡而无味，“一文不值，毫无用处，不论拿在手里还是嚼在口中莫不如此”。除此之外：蘑菇家族的主要成员，不仅是真菌类，还有其他一些美味的红菇、伞菌、硬柄小皮伞、松茸、橙盖鹅膏菌、羊肚菌、松口蘑、蕈子、肉色伞杯、灰喇叭菌、黑木耳或云耳、簇生垂幕菇、翘鳞肉齿菌、绣球菌——它们都是不可培育的。只要这些最后的野生植物永远抗拒人工培育，“那么，我和我们去寻找蘑菇将永远是这种抗拒的一部分和因抗拒而生的冒险！”

出发、寻找、发现和继续寻找蘑菇的时光：“是一种永恒的方式”。要说到他本人：在他的人生之书里，他看到写在里面的并非是所有那些在法庭上成功辩护的无罪释放，而只是穿越森林的一次次探险。

蘑菇的烹调方法不会写在这本蘑菇痴儿的书里。这一开始就没出现在他的写作计划中。此外，他暗暗地抱着希望，有朝一日，读者会抱着来自厨房和厨房彼岸的想法和故事迎着面而来，让他感到惊喜，就像他开始让他们感到惊喜一样。

关于口味，他这些年，亦或这几十年才渐渐养成的口味——与许多可以吃的东西，也就是绝大多数其他可以吃的东西不同，他更多是对它们丧失了味觉。在他的写作计划中有一些小小的暗示，这些也是出于“感到惊喜”这个词的缘故：成千上万的可食用蘑菇中，每一个品种都有“令人吃惊的美味”，即使那些在其他蘑菇书中口口相传为口味“一般”甚至“乏味”的蘑菇也是如此。“野味”，不管怎么说，不会有人不爱吃，尤其是形态、色泽、味道都独具特色的野味。它们在嘴里就会变成软乎乎的东西——外表越野，就越软乎，规律就是这样，美在心里，超越味觉。与这样一种野生蘑菇相比，所有其他肉食，即使是炖得最烂的肉、最新鲜的鱼、甚至是鱼子酱，它们的味道都显得极其平常。只有一些稀少的野生植物才会接近这样一种味道，然而这其中还有些附加的东西在起作用，一种超越了一切纯粹的植物性的东西的附加影响——你只有亲自品尝（并且不允许，也不应

该在此之前用别的什么东西弄坏味觉）。“亲自品尝——合口味使吃饭的速度减慢，变成了品尝，合口味、品尝和细嚼慢咽转化成铭刻在心和赋予灵魂。哦，十分稀奇，吃饭、品尝时间，这一切融合在一起，最后咽下。与此同时，天呐，稀奇中的稀奇，平静的流动，伴随着这样的情形。哦，只有在神圣的时刻，你我心中升起与上帝同在的感觉，亲爱的读者：幻想星空的升起！说实在的：你在哪家一星、二星或三星级餐厅里有过这样的感受呢？一种食物能够从土壤深处破土而出，向着天空挺起脑袋，这难道不稀奇吗？”

这个蘑菇痴儿会不会因为这样一本蘑菇书而真的变得富有了呢？一如既往：这本书后来也没有什么结果。开始那些年里——这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他总是重新开始，发现新的东西——，他的激情促成了他在事业上的成功。虽然每次面对一些迄今没人知道的东西时，他都觉得自己少有的富有，但事实上，他并未因此而富足。可他毕竟能够实现自己一个梦想。于是，他在远离城市的地方买下了一片林子。那里到处还是田园风光。那是一小片林子，处在一望无垠的广阔田野和草地中间，不禁让人联想起一座小岛，但与大海无关。在一次探险时，他闯入这片林子里，穿过一道密不透风的自然篱笆，满地的红褐色火炬柔和地映照着他。在我们两个童年之时，这种蘑菇生长在牧场旁边的杉树林里，被称为“熊掌”。后来呢？他的林子被一个如此美丽、但似乎怀有恶意的蘑菇家族侵占了。就是那种“蜜环菌”，它不但吞噬了熊掌蘑菇，也在一年时间内吞噬了所有的树木。

抛开这个损失不谈，渐渐地，面对在数量和种类上发现越来越多的蘑菇，他过渡到使用“经济”一词，：“好啊，经济！”——“又是经济”——“它今天如此兴旺，我的经济！”这个词不仅仅停留在不由自主的字面上。想象着如此大量的蘑菇自然而然地呼唤着销售、交易和市场，他觉得是如此自然，就像平平常常的东西一样，就像他的律师辩护一样，无论如何比我写书要自然得多。这也是因为，我昔日的乡村朋友渐渐无法独自掌控他采到的宝物。有这么多的蘑菇，他自己的消耗几乎无法使它们的数量显著减少，妻子和孩子，一段时期内尽心尽力地吃，也同样无法做到，不管什么样的邻居也是如此，尽

管他恰好把他们想象成他的客户——他心想着，作为交换，这样也许会促成一种从乡村时代起就一直浮现在他脑海中的邻里关系。可惜在现实中，它早已不复存在，更何况在这样的市郊地区。把他的财宝拿到市场上，拿到集市或周末市场上？他十分认真地打算这么做，甚至迫不及待地一同拿上那些意大利、巴尔干和阿富汗西装，每只手里都提着装得满满的沉重筐子前往那里，充当供货人，充当卖家，特别是他的货物相比其他所有卖家的东西，简直是无与伦比的新鲜美味；别家的货品都是萎蔫的、乱糟糟的、被苍蝇包围着，装在一个不透气的容器中，或不知怎样是从遥远的省区或更远的国家，甚至地球的某一角落运送过来的。

只是他采到的大部分美味在一百年前还曾是商品，那样不言而喻，那样备受追捧——但如今时过境迁，一去不返，要说是商品，唯有人工培育的形态：要说那原始形态，那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原始形态，最多不过是习以为常地谈论蘑菇时评头论足而已。靠这些世上无比精美的果实——恰恰说的就是那些美味——，如今，也就是在所谓的“当下”，再也走不进市场了：“退化的顾客”，用他的律师行话说，“退化的市场！”

此外，他恍然大悟：他天生就不是商人，甚至连市场供应者或供货人也不是，这是不是源于他内心深处无法消除的乡下人身份呢？他不是一个开拓市场的人，不是一个创立市场的人，也不是一个市场的料子。

但唯独有一次，他斗胆把满满一筐牛肝菌带到一家餐厅里。那是一家意大利餐厅，而不是别的什么。在那里，他和妻子共进晚餐，心里却抱着另外的想法，要是那个来自阿布鲁佐或撒丁岛的饭店老板盯上这些美妙的东西的话，那恐怕就会有好戏了，这样就会赋予他、这个顾客、这个闻名遐迩的“明星律师”一个普通商人的角色，一个供货人，一个正好要提供这种东西的人，也许是更美妙的东西，就地供不应求的东西，特别需求的东西。事情果真如此，虽然不是以买卖的方式进行的，但是实现了一种交换，这样更好，或者又是更自然，即

使两瓶产自阿布鲁佐或撒丁岛的葡萄酒可能并不能完全抵得上牛肝菌的美味：他不仅仅是个蘑菇痴儿，还是个自然经济的行动者，一个来自远古时代的人。当人家给他妻子斟上这瓶交换来的葡萄酒品尝时，她向他，她的丈夫投去一种来自邻村少女的眼神，他还从未从她那里感受到如此关注、如此遥远而来、持续如此之久的眼神。从此以后，时至今日，在这个蘑菇痴儿故事讲述接近尾声时，他再也不会“品尝”到这样的眼神。

如果说在开始那些年里，他对蘑菇世界的痴迷不仅充实了他的工作和其他附带的美妙的东西，而且也丰富了他与妻儿的共同生活（他有一次这样对我说，她的，也就是我妻子的爱是一种幽默）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就发生了变化。他自己未觉察到，但他妻子会越发有感觉。真的，他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形，他正在因为他的“狂热”而忘记妻子的存在。他的狂热迅速发展成瘾，成为一种恶习，而他妻子则失去了幽默。有一天，她突然离开了他们共同生活的家，也带走了孩子。这是一种逃离，逃离她的丈夫，也逃离那些在地下室和车库里、后来还有其他地方日益增长并且很快就腐烂发霉的、特别送给她“而带回的小礼物”——这个词语，是他作为亲昵的话说出来的。

像他妻子这样的逃离，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和征兆的例子比比皆是，数百年来常常被讲述，而弦外之音在这里应该足够了。只有一点：蘑菇痴儿好像对他亲爱的妻子的逃离压根儿就感知不到，对他亲爱的孩子的消失同样无动于衷。就在妻儿离开后的第二天早晨，在飞往一个遥远的国家去探访一位犯人前，他还利用仅有的一点空闲时间，急切地要去森林里走一走。这条他正在走的路很久以后获得了“离开之路”的名称。

其实，早在妻子出走之前，他的行为，尤其是他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就已经完全改变了，可谓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亲人越来越从他的意识里消去了。他妻子这样写信告诉我：每天晚上，后来甚至每天清早，他都在她面前侃侃而论，口若悬河，她忍受着。

从前，他自身的形象就是一个边缘角色的形象，可是后来就成了在普遍的人生游戏中一个附属的、和别人互补的、享有平等权利的角色承载者的形象，并且被他觉醒的热情加强了。于是，他坚定地视自己为这样一个人，当年作为孩提时期的边缘角色，在森林边聆听风声、任凭风吹雨打和风雪扑面时就曾经暗暗地发号施令。——怎么会这样，成为寻蘑菇的人？——是的，是寻蘑菇的人，采蘑菇的人，蘑菇行家。

这就是说，别的一切东西对他而言渐渐变得无关紧要，在他看来完全不值一提，或者彻底停止存在了。他放弃了阅读，除了那些出自新西兰的、描写高大的阿特拉斯蘑菇的书，以及那本名为《阿拉斯加蘑菇》的精美册子以外——其中提及的蘑菇是相同的；他也不再去电影院，不管是结伴还是一人；他也不再去旅行，不论是独自还是结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连对他来说易如反掌的律师工作，他也不再上心了。

他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也并非故意为之。他满足于一大清早——并且越来越早就动身去森林里——有所发现就是了。在他看来，似乎一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研究卷宗，以及那些在审判之前如此字斟句酌、连停顿和分段都有板有眼的辩护词，通通变得十分多余。他的世界就是研究蘑菇。在法院的工作，也就是在那里为被告人辩护，这曾经是他全部身心所在，可他如今对此无论如何都麻木不仁了，也忘记了那些委托他的人。在他的森林——此时已是他的“领域”——里有所发现，这会使他产生一种幻想，仿佛那些要为被告处理的事情完成了，如同也许听音乐会给人的幻想，或夜猫子幻想着白天早点结束。每一次发现珍宝时，他都觉得，仿佛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无罪辩护，他的辩护已经到处传颂。

更糟糕的是：他开始鄙视那些委托他的罪犯与被告，又是没有意识到，也不知不觉。在他看来，那些他之前认为几乎完美的人变得越来越丑陋。不健全的人。不值一提的人。破碎的人。失败的人。行尸

走肉，没有前途、没有未来——没有远见！与之相反，他是一个有幻想的人！——靠什么？靠的是蘑菇的力量？恰恰那些据说能够唤起幻想的蘑菇，他都视而不见——“靠着他的木耳、他的‘精灵们’、他的口蘑和橙盖鹅膏菌的力量”，他的妻子，也就是那个来自邻村的女人，痛苦地写信告诉我。作为森林中的“独行者”，如果他之前能够感同身受地对待他的委托人，那些“来自所有奴隶国家”的被告的话，那么，他此间真的鄙视他们，就像鄙视奴隶那样，因为他们作为被监禁之人罪有应得。

还有更糟糕的是，或者也不是，或许是另外的糟糕，他对委托他的被告的鄙视渐渐地转向法官席上的人，毫无分别，不仅针对所有的法官（“那些法官，他们不但越来越冷酷无情——而且也很蠢，蠢得要死，你越了解他们，就越觉得他们蠢”），而且也针对翻译，原告代理以及被告代理。他只看重自己，无视他的工作，因为这在他看来已一文不值；他把自己看得越来越高，视自己为芸芸众生中万里挑一的人物。他的卷宗里被夹进了越来越多的印痕，一千零一个蘑菇品种的印痕，犹如陌生的太阳系的图案。

与此同时，他真的不怀恶意。有一次，他的一个对手正在进行辩护，要求给一群可怜的被告判处终身监禁。这时，他突然抓住他的法袍，全然忘记了自己和法庭世界，而观赏起那些东西，怎么回事呢？就在他的手掌里，也让在场的人闻到了。另外，还久久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在一个我们说来特别庄严的审判时刻，当全体起立宣布判决时，蘑菇痴儿也从辩护席上站起来。然而，在长长的审判席上，在宣判仪式开始时，那些国际知名、甚至享誉全球的法官们动作十分一致地“煞有介事地”戴上法官帽。这时——毫无疑问，这次他是有意至少要亵渎法庭的尊严——，蘑菇痴儿却用双手将一顶与法官帽极其相似的“王冠”扣在自己头上。实际上，这是一朵巨大的伞状蘑菇，一朵高大的环柄菇，coulemelle, culumella iganta, makrolepiota [108]。

那些受邀来他家里的客人——那个时候他们还来，而且来的人还不少——必然会料到，这样或那样，从夜幕降临直至午夜，一直会受到蘑菇咒语、蘑菇狂想曲、蘑菇交响曲、蘑菇诗歌、蘑菇寓言和蘑菇大合唱的折磨，与其说是那些可食用的东西，倒不如说是他年复一年不断增长的陶醉。最后对他而言，直到过了午夜，再也没有别的话题可谈。他也不允许别的话题。正如所说的，蘑菇是最后的冒险，他是它们的预言家。它们出现在最后的、不，是唯一的地平线上。世界轴心在围绕着它们旋转，还有天气，变成了蘑菇天气或非蘑菇天气。他早晨醒来后的第一个念头："动身去森林里。动身去许多森林里。去寻找蘑菇！"他的第一个念头？他一年四季、无论夏冬、周而复始的唯一念头？"念头"？一如既往：他讲给我听，最后只剩下我这个听众。他白天黑夜讲述着一个蘑菇发现地，仿佛这是一个大事，可闭口不谈那些每天发生的、堆积如山的世界历史的灾难。他似乎丝毫不想停止持久的喋喋不休与喃喃低语。

他的鄙视也转向和针对所有与他不同类的人，"我们，也就是他的亲人除外，我亲爱的丈夫出于爱而遗忘了他们……"作为寻蘑菇的人，他同时将自己视为保卫者，二者加在一起，使他变成了森林的主人，或者正如他在尚未撰写的蘑菇书中自我称谓的那样，变成了"羊肠小道的儿子"。这个词译自阿拉伯语，据说意思是士兵，圣战中的一名士兵。是的，他进行着一场针对所有不像他一样走在羊肠小道上的人的战争，超越森林之外，尤其是森林里，先是暗地里，后来公开地，尽管只是用言语。甚至连那些玩耍的、手拿玩具手枪互相砰砰开枪的孩子们也感到痛苦。只要他们能够得到正确的教育，他还曾经把他们视为未来的同盟者："废物！让森林保持安静！"（最后他不只是默默地这么讲了。）他为那些虚伪的寻宝者感到羞耻，他们年复一年越来越放荡地住在森林里，不仅带着铁锹和镐头，还带着越来越多先进的盖革计数器[109]，为了寻宝，围着树根，把坑挖得越来越深。他为森林中骑独轮车的人感到羞愧，他们重修了森林中每一条依然隐蔽的隘路，用天然土壤修建人工沟壕、平面和障碍小丘，似乎最原始的大自然只不过是被他们吞并的地区。"这些邪恶的狗，你们应当向我、这个小径的儿子忏悔！"

此外，他的妻子还告诉我，每当有一个砰砰玩枪的孩子或一个快步走过森林的人不经意间向他打招呼时（没有一个寻找金属宝贝的人向他打过招呼），他会感到多么无助；在一次回家的路上，他曾经为一个森林运动者那生机勃勃的肌肤与闪闪发光的眼睛而振奋——与之相反，他的眼睛那样无神，即使有了前所未有的发现，恰恰在这个时候？脸颊似乎因为森林中的蛛网而红肿；额头上每次都带着被树枝划破的血印子，他是怀着被他称之为“渴望”的寻找欲望盲目地撞上去的；他时而被橡树干上一块锋利的枯木块扎到眼角上，昨天是右眼，今天又是左眼，他之所以没有早早成了独眼龙，她这样说到，只是多亏了他的保护神。可他的几个前辈就没有那么幸运。这个保护神在他们两个家乡被称之为警告之神：“留神，朋友，下一次你就不再拥有我的保护了！”

最后她告诉我，他每次出发，总穿着那身精美的西装，系着拉得很紧的真丝领带。——然后脏兮兮地回家吗？——不会的，从来都不会的，没有一次精纺毛料上有什么污迹，其他地方也没有。但取而代之的是：衣服被撕破了，特别是内衬，新买的西装在第一次或最迟在第二次的森林之行中就会被撕破的，久而久之，不是一个破口，而是越来越多，在我们最后那次共同的时刻被彻底撕烂了。

在妻子与孩子——那时孩子几乎已长大成人——离家出走后不久，蘑菇痴儿便停止了律师工作，开始撰写那本特别的蘑菇之书。但是，“正如所说的”，“正如所看到的……”伴随着他在失踪前不久对我所说的，“我一生中最阴森可怕的时期”开始了。但由于这个时期有另外的兆头，有另外的对象数百年来常常被提起，因此在讲述时，我可以长话短说，尽管它持续了一年又一年，再说这讲述自然不过是复述而已——不然的话，这也不是我的事。我至今遵从那安东尼奥·马查多曾经发誓将它作为节奏图像和基调的“荷马出处”。可对即将讲述的东西来说，我该怎么说呢，不再会是这样。或者这再也没有了它的位置。

阴森可怕？是的。同时，在寻找的过程中，他也感受着每天几乎都出现的心醉神迷的时刻，一个时刻决定另一个。他的心醉神迷，甚至出现在少而又少的一无所获之时。他认为，这样的心醉神迷表明他是一个自由的人，“所有人中最自由的，你们其他人，你们是我的，也是我们同类的奴隶。”他的同类人？是的。现在，没有工作，他这样自由，同时也去寻找他的同类人，寻找着其他特殊的寻找者、探寻者、研究者，在他看来和他同样是终极的人。

而这种插曲似的情形甚至好像得到了证实，当然不再像之前有时那样，在寻找时，在森林里或别的探寻地——在除森林之外，这样的时期也日益增多，几乎令人害怕——，更少出现在来自全球的蘑菇专家或者像他们所自诩的“蘑菇朋友”计划的聚会和年会上。他在第一年还出席过。在他的同类人之中，只要他们偶然出现，他通常都会感到自己就像处在酒吧柜台旁一群陌生人之中，其实几乎次次如此。这时，为了聊起来，不需要电视上有足球比赛。一个陌生人一句有关蘑菇的，或者有关一种确定的、很容易被忽视的蘑菇的简单评论，和一种各抒己见的讲述可以开始了，怀着内在的激情，也说地点，说季节，尤其是形形色色，千差万别，还没有如此激烈的足球比赛和世上任何别的对象能够唤起这样的激情。

除此之外，大家绝对不会谈论别的。当他参与谈论那些臆想的他的同类人的生活状态时，那么他们撇开蘑菇世界，更多代表的是他所寻觅的自由人的反面。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大多表现为顺从的臣仆，不管是妻子的臣仆，还是什么人的臣仆；是下属，和他们则无话可谈；是最顺从的臣仆，看样子，仿佛他们的寻找过程不过是一种癖好或无数消磨时间的方式之一——这毕竟与在酒吧柜台旁一再可以看见和听到的不相符。有可能，在那些大会上，他更少会遇见他的同类人，而就更不用说在世界蘑菇研究者大会上了。不像他预先所幻想的，几乎没有一丝自由人的气息，也没有一丝被世界氛围在整个研究者的身躯上点燃的火舌的样子。奇怪的是，怎么会有那么多研究者看上去病怏怏的，是些病人，自以为是的病人。没有一个人自由地挺着脑袋，如果在这个特殊的研究领域，这几乎还说得过去，但总是一些

点头哈腰的人，弓着背，垂着目光，他们能够散发出些许自主的东西，或者？散发出他们本身自主的东西。这样一个人，只需要张开嘴，开完一个会议，奔赴另一个会议，让声音广泛传播，难道不是吗？这样让“那高高在上指导的东西”来“肆意支配”，难道不是吗？歌德早就领受过了这种精神。然而，没有声音在传播甚或肆意支配。这样的大会让人分别只能听到各种像宗教会议的声音，流于蘑菇教皇与许多竞争对手的知识竞赛，在之后最令人惬意的济济一堂时也一样。这时，他，这个自命为来自蘑菇王国的男爵 便希望回到酒吧柜台旁那美妙的偶然交谈中。在会议中心的花园散了一会儿步，这些大多上了年纪的真菌学专家显得有些疲惫，即使其中有一个做一篇革命性的霉菌理论报告，座排间回荡着持续不停的咳嗽声，大家彼此都表现出与对方保持距离的动作，以防被传染——“这一切当年在我的法庭辩护中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最后——在他的故事里，毕竟时而强调过最后——，这些蘑菇专家其实统统都是失败者，也许今天依然是这样。与此同时，每一个人分别都是受到振奋的人和好心人。

尽管如此，他们也不是他的同类人，他认识到：他的同类并不存在，就我所知，在他的故事接近尾声时，他这样给自己说，早就不再抱着也许与生俱来的高傲。在一种间隔期间，在他蘑菇痴儿生涯的高潮时期，这种高傲简直变成了一种盛气凌人。

高傲与盛气凌人消失殆尽——尽管如此，他觉得自己是个独来独往的寻宝者，孤独的寻宝者名副其实。独立自主的人，他曾经是，依然永远是，即使只是在那些心醉神迷的时刻里，在那些日益短暂的、顷刻间就变得十分苍白的、而且更糟糕的是变得无效的时刻里。“独立自主的人”则意味着：无论我在哪儿，我和我划定的圆圈、螺旋形和椭圆都是我的地盘。这块地盘是我的，任何人都不允许在这里打扰我。你最好从我的寻找领域里消失。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你这个奴隶的灵魂滚开吧。由于他恰恰在孤独中重新考虑自己的声望和举止，它们才起作用，他不用特意呼喊出几乎已经到了嘴边的辱骂之词（尽管他又穿起得体的西装，但只是手指甲上沾的森林泥土再也无法弄干净了，因为泥土已经那样深地钻进去了）。

他要求不让任何人打扰，看样子，仿佛这意味着，他正在干一件特别棘手、又十分必要、并且为了公众的利益而不可推卸的工作。要是这个工作受到妨碍的话，就会是个不幸，一个永远的不幸，对公益事业而言如此。此外，仿佛他本人也会跟着遭殃的。是的，好奇怪，或者正是很可怕：在心醉神迷的时刻，他同样也感到恐惧。感到恐惧，因为在这时，这个作为一名特殊的大地测量师的人独自做出这样的测量和球面运动，穿梭在丛林里，拥有世上一切时间，并且表现出背后突然再也没有了时间——似乎脱离开了时间——，这时，他就感到害怕，他的时间似乎到头了。“你真可恶，虚伪的光明使者！”

这样的情形后来也发生了，且最后天天都这样。他那探寻、研究以及发现的心醉神迷每次都面临着突然转化成惊慌失措。他感受着这样的情形，仿佛这是一种无法比拟的仪式，开头美好，温暖心房，然后不知不觉变得可怕而冷漠，超越他本人。这种可怕，他寻找得越长久，可怕就会越强烈地袭击他（他寻找和发现一天比一天更有成果），因为面对一味的寻找和继续探索，他觉得空间变得越来越狭小，最后缩小成一个个点，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如果说他的寻找以前是开拓环境的话，那么现在找到，特别在大量的情况下，就使得环境缩小了。终于有了一次独一无二的发现曾经是多么的美好惬意啊。可如今，这不再是空间了；这意味着：告别了空间的感觉。在一种间隔期间，他的目光游戏般地游移在树梢、树冠、超然至上的苍穹和尽可能遥远的地平线上，这样来迷惑自己还拥有空间感——，并且如此早早地错失了它，也是因为这样的目光短得要命，任凭他投来投去，永远都不会变成观察；就在它们要获得某些连续性之前，便已经被他中断了。他又回到这个点或那个点的张望中，甚或直瞪瞪地盯着眼前。他从东南西北的主人变成了点的奴隶。是的，奴隶，这就是此间的他。

伴随着如此错失的空间，宇宙的规则的一部分？几乎日益加剧的时间窘迫感渐渐逼近，随之而来的是困境，接着是不合时宜。奇怪的是：他的时间困境，他所称道的“时间桑拿”，并非缘于他拥有太少的时间，而是太多——空间感的丧失缘于他度量感的丧失。另外奇特

的是：偶尔还使他保持镇定的东西，恰好就是变得恐慌的外部世界，使他恐慌的大自然。在暴风雨或者狂风大作时，那些时间和空间被弄得混乱不堪，不是存在于他的内心，而是存在于外面，存在于外部世界。这样一来，他把这种情形感受为一种非同寻常的游戏，感受为对他内在的虚幻和伪装具有解脱作用的反运动；在树枝冲下来的当儿，在受惊的鸟儿迎风乱窜时，在震耳欲聋的雷声中，他感到自己很安全；他虽然继续在张望和探寻（仅仅还在某些地方，而不再是一个劲儿地向前），在一旁和树根前，但他也是其中的一员，属于那些在慌乱的世界里把一切都弄得乱七八糟的时间与空间的一部分；他找到了令人羡慕的宁静；他大开眼界，即使掉落的树枝擦肩而过，或者闪电使他不由自主地感到害怕：大吃一惊之后的片刻，他甚至看得更敏锐了。他这样分别所看到的，就像以前一样，是被一种表象包围着——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点。恰好就在这混乱世界的荒芜中，他的地方感又回来了。恰恰作为误入迷途的人，此时此刻，他变成了发现者。

此外，有时还能让他免遭不合时宜之苦的东西，不管矛盾不矛盾，就是那些甚至短暂的小插曲。这时，他寻找，寻找，又寻找——他再也不会做别的什么——，就是什么都找不到。在这些寻找的时刻，他虽然变得越来越气恼，但正是这样的气恼帮助他留在时间里，或者正像他自己所说的，“在此岸”。而且，尤其在徒劳地寻找一天后，两手空空，囊中无物，从森林深处走出来，那里，终于，终于！再也没有什么可找的了，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啊，自由了！”只是这样两手空空、一无所获的情况是很少见的，一次比一次少见。“寻找，但一无所获！”他认为这才是一种理想。问题只是：怎样实现这一理想呢？这是几乎无法实现的，至少一个蘑菇痴儿实现不了，更何况一个不拥有同类人的蘑菇痴儿呢。

是什么东西让他在所有这些愚人社会里成为一个奇葩呢？我问自己。也许吧，他像莎士比亚的变体，超越了他的蘑菇痴儿生涯，还是个“意识痴儿”。在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样一来，意识会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痴儿”。而且这样一来，那不由自主的东西，那无所作为，那顺其自然虽然又是他的理想之一，但与此同时，他始终，从不

间断，每时每刻，一个劲儿地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放任自己无所事事，也不是弃之不顾。他的意识痴性使他患上了时间病，而蘑菇痴性好像曾经使他得到了治愈，随之最终——啊，他似乎得到了一个“最终”的惠赠——他的时间困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又越发咄咄逼人地爆发了。这期间，他最可怜的意识痴性是什么呢？他假装着不去寻找，为了暗暗地找到什么。

他诅咒自己。同时，当恐慌来临时，他也诅咒蘑菇。如果说他后来真的还关注什么东西的话，那也只剩下蘑菇了。越来越多别的东西迷惑他，被他当成蘑菇，即使它们的形状与经典的蘑菇毫不相干。他把邻居家房顶上四方形的烟囱视为蘑菇。面对东方三圣贤正在给圣婴献供品的雕塑像，他们贡在手里的不是金子、香火和没药，而是蘑菇。深夜里，天上的星象被当成蘑菇。睡梦中，他觉得自己身上长出了蘑菇，不是医学上所讲的有害健康的蘑菇，而是森林中散发着迷人香味、受人喜爱、勾人食欲的野生蘑菇。即使在森林里和草地上，采到的蘑菇堆积越多，他就越会将它们与周围的树叶、牛粪甚至野莓和野花相混淆——还有石头、狗屎、纸巾、香烟盒、鸟羽毛、避孕套、生锈的钢盔、破旧的士兵饭盒、引爆后的盘状反坦克地雷残骸都会呈现出蘑菇形状（他会弯着腰把它们当蘑菇捡起来）。

面对脑袋内外清一色的蘑菇形状，他开始辨认不出人的面孔，不论是陌生的，还是熟悉的，这对他来说曾经是至高无上的东西，“可以看得见的第三者”。已经离开他很久的妻子告诉我，有一次，他在森林里遇见了她，但他首先看的是她手里拿着什么东西。——这就是？——一只橙盖鹅膏菌，也叫作G sarenpilz, amanita caesarea，Dottergelb，[110]并不是浅黄色的，外面包裹着一层蛋白色的壳，真正的神仙美味。——怎么回事？难道她也变成了蘑菇痴儿？——是的，但只是例外，是场游戏，她想用这种方式把她的蘑菇痴儿争取回来。——然后呢？——他真的从妻子手里的蘑菇抬起头来，面面相觑。但是，他认不出她来，只是惊讶地看着她，像个陌生人，与其说是因为她的美貌，倒不如说因为她手里的蘑菇。

破晓时分，他倾听着风吹树木发出的沙沙声和簌簌声，儿时的他曾为这声音而着迷，但如今，听起来就像是针对他而来的窃窃私语，像是含糊不清地说三道四，像是预示着不幸的喃喃低语，像是邪恶的咒语。在风中彼此碰来碰去的树枝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即使他遇到最可爱、最美丽的蘑菇丛，它们对他来说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鬼玩意儿！地狱的畸形怪物！与此同时，把这东西捧在手里，冷冰冰的，刺骨的冰冷，就是用如此的热血都无法使它温暖。相反，手上的冰冷侵入他的体内，从手臂向上，直至变成冰块滑到内心深处。但这当然不能阻止他，作为熟悉森林的当地人，去帮助一群迷路的徒步者——迷路的人越来越多——回到正确的路上，并首先问候迎面走来的徒步者，哪怕他连一个面孔也看不到。另一方面，不能阻止他的是，他感到惊讶，过去数百年来那些伟大的森林徒步者，就像他现在一样伟大的森林徒步者，就想一想美国吧，比如沃尔特·惠特曼或亨利·戴维·梭罗，他们并没有歌颂、或者至少提及过蘑菇。沃尔特，你为什么将树木仅仅用于体操训练，为了在你患了心肌梗塞后变得灵活起来？亨利，你为什么在缅因州和马萨诸塞州的森林里只关注植物呢？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究竟是什么样的民族？对这样的民族来说，蘑菇只生长在厕所附近，或者它们就像猪肉似的遭到唾弃，也被驱逐出了伊甸园。

当这个蘑菇痴儿朋友数个月之久横穿了地球上的沙漠和戈壁时，他要这样来摆脱自己的爱恨吗？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在图瓦雷克人那里，在也门，在沙漠和荒漠靠近绿洲的地方，他也开始寻找蘑菇，寻找与沙子和土壤共生的蘑菇。据说他也曾为了躲避蘑菇，逃到我们欧洲中部；他停留在主教座堂前，停留在体育馆里，甚至乘小船在河上游荡，的的确确；他站在地铁轨道之间，站在寸草不生的墓地上，仍然满怀期待地望着它们，或者扭头望着它们，无视于别的一切。有时候，在不渗透的水泥地上，他自己会有所发现，在瞬间的心醉神迷之后，他又会感到遗憾。在一次无关紧要的手术前，他站在医院的窗前，闪烁的目光投向面前的树冠，可随之越发迫不及待、同时越发感到厌恶地探寻着树根，无疑在寻找着什么。

面对他的研究对象，他越来越经常地萌生起无边无际的谩骂：“怪物。雌雄同体。杂种。最易腐烂的造物。一切害虫的根源。”在他眼里，最粗野的谩骂是：“童话德国佬。蛆虫童话。扮成小红帽的恶狼。拥有不计其数怪名的侏儒妖，而‘侏儒妖’当数最怪的名字！赶快滚开！你们这伙让人同情的家伙！”

由于在地球上，从火地群岛到西伯利亚，他无处逃离他曾经的钟爱之物，于是他又返回家乡，回到他的房子和花园，靠近都市，靠近熟悉的森林。你们要理解，或者，你能理解就理解吧，他早就不再是不由自主、而是违心地被吸引进去的。不，是被强迫进去的，简直就是被驱赶进去的。每天醒来时，早在天亮前，他的第一个念头，不，是强迫：“快，快！跟你一起去寻找蘑菇！”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夏天和秋天，冬天到了。一夜之间下起了第一场雪，下了一整天，雪越积越厚。这丝毫也没有阻挡蘑菇痴儿像往常一样去寻找蘑菇；虽然他心头笼罩着歉疚感和自卑感，但考虑到几乎齐膝深的积雪，这反而使他的渴望越发强烈，唆使他。再说“考虑到”也不在话下，更别说额头上的雪花，昔日那个大痣与其说是轻涂上去的，倒不如说是画上去的：这里什么都没有，再也什么都没有。

就像在森林里一样，在深深的积雪中，他然后又是挖，又是刨，又是翻，同时用扎起来的棍子敲击着。突然间，手脚并用，左一下，右一下，像个足球运动员：只有秋天的落叶，在如此洁白的积雪下面，闪现出各种各样湿乎乎的色彩。对此，他几乎就没有什么心思。然而，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在冬天里，从十二月到来年一月，甚至在积雪下面生长着他所钟爱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它们就是这样的——，因为雪保护着它们免遭寒冻的侵袭。尤其是，在所谓的“死亡喇叭菌”[111]——又是这样一个错误的名称，这种蘑菇在那里闪现出生机勃勃的黑灰色——旺季过后，他有可能采集到它的孪生种属，它同样呈微型喇叭状，只是色泽有浅黄，有深黄，而变得专横的他擅自将

这个通用的名称改成了“窜地蝴蝶”。当时，他还给它起了一个昵称，叫“小地蝶”。那个塔克汉姆药剂师曾经告诉他，这种“喇叭菌”在第一次霜冻之后，味道会更好。这个药剂师不同于今天众多的药剂师，是个蘑菇行家，几乎无人比拟。

说来也巧，那是他失踪的前一天；他从地球表面消失之前。他接连几个钟头徒劳地翻起积雪。有人会认为，我朋友蜿蜒搜寻的这片森林区域，被其他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寻宝者玷污了，或者被一大群野猪拱坏了。让他感到庆幸或者不幸的是，那天雪停了，在十二月冬日的斜阳余晖中，一朵“小地蝶”棕黄色的“翅膀”在挖开的雪洞里闪烁着光芒，仅仅一朵，它吸引了他，在被发现的一瞬间也清新地听到了这个昵称。先是黄色的细柄沐浴在阳光中：全世界哪里还有这样的光泽，会报以更加热烈的欢迎呢？

蘑菇痴儿又是出于多年的经验，他心里明白，就像人们通常那样，常常经过大半天的寻找后，终于发现了第一朵，就像现在这一朵，独一无二，从厚厚的落叶里“飞出”一只蝴蝶，同时静静地待在原地。于是，就坚信它的周围不止有一朵，而是一簇一簇的，会发掘出一堆、一丛甚至成百上千美味可口，无与伦比——就像几乎所有的蘑菇一样——的“小地蝶”，藏匿于井然有序的地沟里，延伸至树木间，如此之多，以至于他在采摘、攀折（他觉得清脆的折断声像音乐，“像约翰·米尔顿·凯奇[112]和朱塞佩·多梅尼科·斯卡拉蒂[113]谱写的合奏”）和收获时，想象着森林深处一片隐秘的蘑菇苗圃，他觉得就像是一个隐秘的大农场。

于是在那一天，在积雪下发现以后，一垅又一垅的“小地蝶”横穿森林，延伸至远方；这个大农场也不断延伸，一眼望不到尽头。一刻又一刻收获到的东西越来越丰盛，盛在众多容器、袋子、背包里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求他不停地弯腰去采摘。此间，他脚下延伸至远方的黄色蘑菇垅逐渐变得稀疏，一旦再往前挪动几步，它又重新闪耀出

金黄色。这时，他渴望着自己终于能直起身来，带着收获的东西回家。没有别的想法，只有快快离开森林！但他无法做到。“小地蝶垅”延伸着，不断地吸引着。他不仅无法离去，他也不被允许离去，这些恶棍，这些流氓，这些无赖不允许他这样做。那些生长蘑菇的地方，那些蘑菇田野，那些蘑菇垅子，那些众蘑菇纹饰，它们蜿蜒盘旋，迂回曲折，抖动着老鼠尾巴，用龙的尾巴抽打着，向他抛出圈套，毫不间断，毫不心软。

夜幕降临，还不到傍晚，而是十二月的夜晚。他继续从森林纵深朝着高处走去，咒骂着，恳求着，啜泣着，哭嚎着，他成了被强迫劳动的收割工人（他律师时期的套话），开始还借着雪光，后来则依靠额头上的矿灯。自从他的蘑菇狂热蜕变成瘾以来，他穿梭森林时就与矿灯形影不离。“我，是猎人？绝不是！我是个被蘑菇追捕的人！”（又是这样一句套话。）

后来呢？恐惧最终爆发，吼叫或者一声不响地一头撞向那个最深的弹坑边一个树干上？另一个“大事件”？或者，他哼着歌，唱着歌，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在一个弹坑里，整个人穿过此间已经冰冻的雪，钻进下面的树叶里翻滚着？这些都不是。就像在哈巴谷，《圣经》旧约中一个所谓的先知的故事中一样，你读过吗？他被人抓住头发提溜起来不知扔向何处。——是谁抓他呢？——不知道。你们自己去想象吧。——也许就是他自己？——也许吧。

我从谁那里得知他失踪前的最后几年、最后一年和最后一天的这一切呢？从他本人，这个童年时的乡村朋友和后来的蘑菇痴儿，即便不是蘑菇疯子那里得知的。

我的感知，他正在来我这里的路上，到达了：几天来，他在跟我聊天，或者我们彼此聊天，在他远离整整一年之后。由于他的出现，且安然无恙，我则希望，那一丝热情也飘到我的和他的故事里。如果

没有这样的东西，我的讲述将无法实现这个故事必然的趋向和归属，就会走向像是另外一个人，而不是我所呼叫的悬而未决！

又是一个十二月初，但没有下雪。有一天下午，我坐在自己那个相当偏僻的房子里。它位于巴黎与博韦地区之间，当年曾经是来往的马匹和车夫过夜的驿站，无论是昔日还是今天依然人烟稀少。我沉浸在他的故事里。这时，这位老朋友从那条只有早晚才有些许车辆行驶的小路上走过来。我认出了他，也许吧，因为我“不知为何”在等待着他；也许吧，由于专注的写作，听觉变得更加敏锐了，听到了他的脚步声。老朋友？迈着青年的、几乎是孩子的步伐，接近孩童蹦蹦跳跳的走法。不管在哪儿听到这脚步声，我都觉得这向来是最悦耳动听的音乐。

我从正在伏案撰写他的故事结尾的桌前站起来，还没等他敲门或喊我，就为他打开了花园围墙的大门。我把门牌号——周围远近也找不到数字大于三或四的门牌号——就安在这门上。门牌是用在附近草原上捡来的史前贝壳组合起来的。他对这样的迎接没有感到一丝的惊讶，径直走进我这个非同寻常历来如此的“寒酸”花园里。我自认为仿照了维吉尔的《牧歌》。——仍感不足的是，他夜里到访，你应该在窗台上点上一支蜡烛！——之前的夜晚，我都是这样做的。——你要用代表着热情好客的盐巴来迎接他。——事情就是这样。

在这历经了百年的石屋门口，他犹豫地停下来，远远地超越了一个礼貌的距离，因此我也有机会来感受他对我带来的影响。我也关注别人的一些细节，尽管与他不同。于是，我发现他的指甲缝不再又脏又黑，而是保养得那样得体，和他那些抛头露面的同行一样；他的额头与脸颊安然无恙，没有了在那段森林痴儿时期天天都挂彩的血印；同样，他挺着身子，一身看上去新买的西装显得格外优雅；他庄重而沉稳地（外来词，常出现在他的辩护词中）齐眉而视，目光不再盯着地板或特意躲避到一旁。无论如何，他看起来不再害怕目光对视。同时，他的眼角上一如既往地流露出那个久无音信的人的神气。

我们只在第一天晚上聊到了他的蘑菇痴儿时代。（他坚持要在那个狭小的偏房里过夜。那是一个当年存放工具的窝棚，连一匹马都容不下，更不用说钉马掌了。这时，马有一半身子站在外面，或者？）就像是为了宽慰他，我讲述了，在这块我居住了将近三年的荒无人烟的地方，还没有发现一个蘑菇，至少没有发现可食用的或其他值得寻找的，这里的土层都是石灰与石膏——不是生长珍贵植物的地方。在贫瘠的草原里，这片可怜巴巴像小岛似的林子的土壤无非是些碎石、沙砾和岩屑——看看那少得可怜的、被鼹鼠拱起的小土堆，里面找不出一粒肥沃的森林黑土壤——一堆散沙，充其量是一堆没有养分、互不粘连的脓黄色土粒。最多也许可以在这儿和那儿看到一些马勃菌，但在它们之中——“我不必在你面前班门弄斧”——，眼下初冬时节，满是棕黑色的粉尘。

我的朋友似乎压根儿就不需要我的安慰，他对此充耳不闻。我也没告诉他，我正在撰写他的故事（并且在进展之中）。再说他也明白：关于我的工作（游戏）的对象，他不闻不问；“对我而言，知道你坐在桌前，能够从花园尽头远远地望着你坐在窗边，这就足够了”，他说到：“这让人—（他没有说‘让我’）——感觉惬意。”他刚到我家那天，我问起有关他和蘑菇的事情，他好像更多把我的问话归咎于我有意偏离主题。此外，他认为，蘑菇和他不值得写成故事，更不用说成为我“笔下”一本书了。有一次，我看见——这事其实不该在这里说——他在房间里踱步时，将一本蘑菇书的封面倒扣过去，为了不让人看到封面图像。在我的想象中，他把这本书丢进壁炉里了。或一页页撕下来，撕成碎片，揉成团，干脆用于点火。在另一天晚上，在火炉前取暖时，他犹犹豫豫地说出打算写一本抵抗蘑菇的书，是的，一本抵抗森林的书。寻找蘑菇，更确切地说，寻找使你的视线范围，你的视野收缩成一个视点。视线？没有视线。直盯着地面的眼睛毕竟使脑袋变得多么沉重，眼睛变得多么模糊：白内障，一种寻找者的疾病！从地球上一个眼睛明亮的客人变成了一个眼睛浑浊的客人！久而久之，森林，其实森林空气是有害的，十分有害健康，它们压迫肺叶，散发出浊气，最终只有令人恶心的东西。当采集者突然偏离了他们“寻找的步伐”时，猛然的动作就会传递至心脏，导致心

律不齐。采集者无一例外：一旦踏上寻觅之途，会变得越来越像强盗，出于赤裸裸的贪欲，而贪欲无异于掠夺。哎，所有这些不信神的自我满足的采集者。这时，他倒更喜欢那些猎人，因为他们起码在敬畏上帝的神圣时期跪拜，你就看看他们的首领吧。哎，这些森林，这些狗屁森林，它们沙沙作响，响个不停，永远会响下去。

当我白天撰写他的故事时，他在后花园里几乎悄无声息地忙碌着，不是将树叶耙成一堆，就是收集从老苹果树上掉下的枯枝，用作夜晚壁炉烧火。这期间，他从不会弄脏自己，甚至连衬衣领口也从未弄脏过。我也告诉他，在草原上，特别是入冬前翻耕过很多遍的耕地上，可以找到几百万年前随着海浪冲上岸的蜗牛壳与贝壳，即使最小的蜗牛壳拿在手里也沉甸甸的，令人惊讶。他每次都会满载而归，一次比一次收获丰富，而且更漂亮，比我在所有这些年里都幸运。此外，他还带回了满满一袋野蔷薇果实，并将它们加工成无与伦比的红色果酱，就像野蔷薇果实一样红；另一天，又带回来满满一袋榛子，被他这个厨师烘烤并端到晚餐桌上，与产自大西洋诺瓦木提耶岛的、几乎不比榛子大多少的小土豆配在一起。还有酸模和来自特罗艾斯纳小河的独行菜（即女贞子）当沙拉，它们都来自高原脚下的平原上。正如所说的，那个当年的马棚就坐落在高原的边缘上。所有这些东西，包括稀少的板栗，每当他回家时，都会像变戏法似的让它们从袋子、袖筒以及裤腿里冒出来。照这么说，他这种乐于变戏法和迷惑人的本能也不减当年。除了寻找地上的东西，他还描绘着，特别是一些齐眉高的东西，首先是那银色的、透明的、涡型卷曲的冬日森林灌木丛，仿佛在他的心里，还保留着对涡卷形、螺旋形、卷曲形、有花斑的、有条纹的、呈球形的东西的需求！同样：除此以外，我发现我的鞋子每天早晨都被擦得锃锃闪亮，雨靴也被洗得干干净净，而且，每隔三天，这位朋友都会用橄榄油将燧石地板浸润一遍——又是一种不同的锃亮。

在我每天工作完后，在十二月的夜幕早早降临前，我们两人每天都会出门去周围散步，每个人都朝着不同的方向，通常都是天黑后很久才回家。这时，我觉得，仿佛猎户星座比之前所有那些年里都更迅

速地移动着，从东向南，然后又向西划过冬日的天空；这是不是因为变老的缘故呢？在疏浚的特罗艾斯纳河里，有巨大的老鼠在游动，露出黑色的背，它们实际上是一种特有的河狸，不知为什么，住在这里的人称其为“智利河狸”。那个在运河桥上站在我们身旁等待的猎人知道，它们可以被制成一种很棒的“肉丁”。面对草原夜色中两匹阔背短腿马的黑影，我们幻想着不用马鞍骑上它们，无论去哪儿都行，就像我们昔日在乡村里养成的习惯，骑上两匹阔背短腿的老耕马，从村子一头走到另一头。在另一片草原上，站着一只十分健壮的公牛，它似乎从头到脚都长满了结实的肌肉，皮毛是白色的，甚至在黑夜中也不会失去光彩，腹下的睾丸犹如两个超大的葫芦。突然间，一颗流星霎时划过天际，就像一根火柴被西部片中的主人公或其他人在墙上或别的什么地方点燃。天边层层叠叠的云彩，看起来就像是拖拉机轮胎留下的痕迹。野兔在草原上的冬草丛里穿梭蹦跳，从一个洞穴到另一个洞穴。

有一天晚上，我们漫步来到远处的村庄，在那里的酒吧前和三两个常客站在一起，几年来始终是同样的人。我这位看重衣装的朋友发现，“被遗弃的人常常穿着尤其笔挺的衣服”。对此我沉默不语，因为在这些天里，我会时不时觉得他本人就像是个被遗弃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因为他，恰恰就是我们两人中平和的那个，会突然变得笨拙，实实在在地遭到笨拙的袭击，只要动手就出错；无论他手里拿什么东西，都会掉在地上。还有呢？他不用看表，每次都能精准地知晓时间，即使在睡觉时，能够精确到分钟。无论在哪儿出现数字，不管是在温度调节器上，还是在我的汽车仪表盘上，他都认定上面显示的数字就是时间，是当下的时间，是现实时间。有一次，那是很久以前了，他曾告诉我，他唯一的骄傲就是拥有时间——正是因为他感受到没有时间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天龙在心；心亦天龙。也就是说，他至今都还没从他过去的时间困境，那可怕的无聊中缓过来。

他的生日到了，为了和他共庆生日，我放下了工作。我们走过乡间公路、村庄、田间小道和灌木丛——“这不是穿越”（我说）——

“这当然是穿越！”（他说）——然后又一起走过村庄和乡间公路，来到高原丘陵后面那家饭馆共进晚餐。这饭馆有个确确切切的名字L’Auberge du Saint Graal，即“通向圣杯的小饭馆”。（这家饭馆此间改过一次名字，如今又改回了最初的名字）。

我们在日出前很早就上路了。他知道，生日这天的日出时间是早晨八点三十三分。高原东部接近南部边缘的云彩看上去金灿灿的，这个上了年纪的寿星为之而高声呼叫：“荣归主颂！”当我们穿过田野时，一阵温暖的和风拂面而来，朋友说这是从也门吹来的风，来自天堂。在一条林荫大道尽头，有一辆蓝色的带篷马车：天蓝色。我和这个同行一天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那位青春永驻、害羞、却又突然纵情的理查德·韦德马克。我是他在《马上双雄》中的同伴吗？有多好啊；那一定太棒了。但无论如何，我对自己的同伴十分认真，正如詹姆斯·斯图尔认真对待伙伴和 或者对手一样。这个同伴？这件事？！他的。我们的。我们共同的冒险。同时，我从身边这个同伴那里听到了什么呢？——“奇怪，一种光亮，像当年埋葬那个纯洁的智障少女时出现的一样”。

我们不是漫步，更谈不上是疾走前进。我们蹒跚而行。“我终于又踏起沉重的步子”，他说。我听见我们踏着沉重的脚步时节奏如此均匀的响声，尤其在落叶里，就像一列火车隆隆地驶去，一列十分缓慢、还没有完全达到全速前进的火车——非常像！我想起有人评论我的《试论》系列文集时说过的一句话：“就像大清早一列缓慢行驶运送牛奶的火车。”我们就这样迈着沉重的步子行进。行进。再行进。沉重脚步的音乐，另一种荒漠之旅的音乐。

只要我们走上一条对我们两人来说变得太窄的路上，我的朋友就走在前面，我看见他的背上粘满了牛蒡叶。它们也成堆成簇地粘在我身上。他有时转过身来，给我讲他的故事中一些迄今尚不为人知的片段，就好像讲述某些早就挺过去的事情：有一次，就像“二战”时游击队员们乔装成采蘑菇的人一样，他反过来装扮成森林中的游击队

员，为了寻找他梦寐以求的东西。还有一次，他绘制了一张整个地区的“珍藏分布图”，当作遗产或遗嘱留给他的孩子。还有一次，他回过头来，与其说看着我，倒不如说望着空旷的远方，并且大发感慨：“我是如此幸运，一生都是！我一再迷失过，时而痛苦，时而美妙。美好的迷失！正说着，他踩中了草丛边一朵熟透的、满是窟窿的马勃菌，一下子从中冒出褐色粉末状的烟尘，像是踩在冬天到来之前活动的门槛上。

正午时分，天空阴云密布，气温骤降，风向突变，从北边刮来。经过灌木丛中的Arthur Têtu墓地，爬上丘陵的脊梁，来到这个方向巴黎与迪耶普附近海域之间的最高地带。这时，天下起了雨，不一会儿，又夹杂着冰雹打在我们脸上，但这对我们来说都无所谓。“我们”，我的朋友转身高喊着，“这些大山的儿子！”此前，我们当然还横穿过那片依然延伸的平原上的村子沙旺松，两人站在乡间公路旁边那个早已废弃的地秤上——这里的牲畜市场早已消失——荡来荡去，蹦蹦跳跳，好一阵子压根儿就再也不愿意继续漫游了。

后来，到了下午，太阳又出来了，风也停了。天空中的蓝色变成了一片蔚蓝；纹丝不动的云层堆聚起来；最后的绿色变得郁郁葱葱。在丘陵脊梁的半高处，我们来到那一大片森林，也就是这个地区唯一的森林前，穿过一片牧场。这时，我不由自主地伸望着那些亦被称作独柄伞菌、山中精灵以及硬柄小皮伞的伞菌。我知道，它们在这里每年都会生长至十二月末，像仙女环的形状：是的，一点不错，哼，很长一段时间，这位朋友对蘑菇的痴迷感染了我——而我老远处就真的看见那些小精灵围成圆圈，犹如套索环一样：我赶紧把蘑菇傻痴儿拉到一旁，装作好像我走错了路的样子。他问：“我们还有时间吗？”我答：“还早呢，谢天谢地！”后来，牧场上真的站着两匹老耕马，我们一跃而上，就像童年时在村子里那样，只骑了一小段，但也足够了。这两匹老马发现自己被当成骑乘的马，便不情愿地摇来摆去，又是嘶鸣，又是打响鼻，还能怎样呢？片刻间，一匹马变成了驴，呻吟和嘶叫着跑过原野，而它的同伴则打着响鼻相呼应。

之后，我们又穿过那片大森林，到处是稀稀疏疏的橡树、栗树和榉树，而不是这个地区常见的灌木丛：难道有意要这样吗？——是的，有意要这样。——谁的主意呢？——我的。有意为之。白日做梦。预先安排好的。这样的天意？是的，确实存在。

快到森林边上时，天空又变阴沉了，接着开始下起雪，今年的第一场雪，如此宁静，如此稠密，就像自古以来第一次。“或者最后一次？”（他又这样说道。）顷刻间，眼前又是那个古老而新鲜的白茫茫的世界。到了山脊那边脚下，就是我们下榻的目的地。尽管我们走在一条宽阔的道上，可这位寿星却一直跟在我后面，亦步亦趋地踩着我沉重的脚步；我们的脚步不再是火车头的隆隆声，而更像是咯吱咯吱的响声，与两只乌鸦的叫声和彼此鸣叫何等相似，随之而来的便是森林边一只乌鸦嘎嘎地叫：另一个，那个身后的人，突然停在被风雪吹打的林边树木前，我听见只是自言自语地对自己说道：“在树叶的沙沙声中，在发生的事件当中。头顶的树冠在剧烈地晃动，晃动与晃动的物质融为一体。啊，我为什么没有守在森林边上呢？！”森林边那里发出剧烈的呼啸声，干枯的树枝咔嚓咔嚓响，像是从一个隆重的华盖上掉下来的。在我们脚前，有一只死去的信鸽，好像刚刚才从天上掉在新鲜的雪地上，在上面砸了一个坑，它的腿上还绑着传递的消息。但我们不想知道是什么信息。

上山，进入森林里，顺其自然，必须顺其自然。如果你们觉得合适的话，也是有意为之。谁的主意呢？看看上文吧。恰恰是道路左右两旁深深的积雪，白茫茫一片——天气预报是准确的——，在一个地方清晰地凸显出一个形状，某些平躺在地上的东西，有可能是一颗盘状地雷。可是，这种形式的东西，它不是平躺着，它立着，它凸出来。“嘿”，蘑菇痴儿冲上去，“嘿，你怎么回事！”随之，像是有意为之（作为短暂的蘑菇痴儿同伙，我熟悉这个地方，也知道，那里秋冬之交时还生长着牛肝菌呢）？不，与有意为之不同，他先是向后退了几步。可是接着一边喊着“嘿，你正是我要找的呀！”一边冲着这个圆东西走去，更确切地说，是庄重而缓慢地走去，绕着圆形、螺旋形和椭圆形。

然而最后，却没有出现必然要出现的情形，更确切地说，独一无二，就是有意为之——梦寐以求——预先安排——精心准备的结果；符合灵感的需要：在最后的时刻，还没等到蘑菇痴儿弯下腰，或者，绝对没有！甚至跪在雪地上时，突然出现一个身影，抢先他一步。谁呢？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一个女人。那个女人。那一个女人：在他过生日时，被我，或谁呼唤出来了。这时，她就站在他面前，仿佛站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就是这个地平线。这一次，他没有看她拿在手里的东西，而是盯着她的脸；他又认出了她。从前，他把自己当成她的救命恩人。或者当成让她更完美的那个人。而现在呢？现在完全颠倒了。他向她走去吗？不。虽然他距离她仅两步，三步，最多也就四步之遥，但他跑向她，就像离弦之箭，飞奔向她。这种飞奔入怀的场面，我以前只在孩子那里见过，孩子飞奔投入父亲、母亲、或某个人的怀抱。——夏天里，山丘的轮廓被蓝莓灌木环绕着。而现在呢？——时光静止 在长满蓝莓的山丘上。

我们三个人幸福美满地在名为Auberge du Saint Graal的小饭馆共进晚餐。它位于山丘背面的格里西莱普拉特勒村，“普拉特勒”，这就是“石膏”。下榻的地方是：Place du Soleil Levant，即“太阳升起的地方”。前菜是什么，你们可以猜一猜。正吃饭时，又有一人加入我们三人之中，多少有点出乎意料。哦，年轻人。哦，变得年轻的世界。

然而，到了结尾，这是不是有太多的童话色彩呢？有可能：在童话里，他获得了救赎。可在现实中——当然，灵感会告诉你怎么回事，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或者别的什么人：这童话的东西，比如在这种情况下，是最现实的东西，最必要的东西。空气，水，土和火当属四行，而这童话时刻就是第五行，附加的一行。对于一个来自蘑菇世界的故事，至少这个故事而言，不管有人天天喋喋不休地恶意攻击，不管冬天和秋天持续的恶雨腥风，不管一年四季怎样给国际毒品中心

打电话，也不管有毒厨房永无宁静的争吵，正如所说的，童话最终必然拥有它的位置。

在Auberge du Saint Graal深夜时分，我们猜测着时间。我们四个人都弄错了。但猜得最不准的，差得太远的，就是他。

（马里纳| 弗克桑地区——沙维尔镇——马里纳

2012年11月至12月）

[1]中世纪用来拷问的一种刑具。

[2]罗伯特·米彻姆（Robert Mitchum，1917—1997）：美国著名电影演员。

[3]雷·戴维斯（Ray Davies，1944—）：美国著名歌星和作曲家。

[4]西班牙语，“和你”。

[5]罗伯特·米彻姆以一双睡眼为其最大的个人特色。

[6]法语。

[7]普桑（Nicolas Poussin，1594—1665）：17世纪法国巴洛克时期重要画家，古典主义绘画的奠基人，《七件圣事》是他的重要作品。

[8]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1894—1961）：美国作家，美国侦探小说“硬汉派”的开创者。

[9]品达罗斯（Pindaros，公元前518—前438）：古希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所写颂歌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合唱抒情诗的高峰。

[10]美国作家雷蒙德·钱德勒创作的系列侦探小说主人公。

[11]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完成了十二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2]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公元前372—前287）：古希腊逍遥学派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品格论》是其主要著作之一。

[13]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ado，1875—1939）：西班牙“九八年一代”的杰出诗人和剧作家。

[14]三位均为20世纪早期著名的黑人爵士乐歌手、乐手。

[15]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1903—1989）：比利时法语小说家。

[16]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1882—1967）：美国都会写实画家。

[17]范·莫里森（Van Morrison，1945—）：英国歌手、音乐家。

[18]卡尔·瓦伦丁（Karl Valentin，1882—1948）：德国喜剧演员，民谣歌手，作家和电影制作人。

[19]比尔·怀曼（Bill Wyman，1936—）：滚石乐队前贝斯手。

[20]杰克斯·布瑞尔（Jacques Brel，1929—1978）：比利时法语歌手。

[21]指皇家萨拉戈萨足球俱乐部。

[22]指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

[23]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1922—1975）：意大利电影导演、诗人和小说家。

[24]索里亚的圣多明各教堂立面被认为是12世纪建筑中最和谐的一个。

[25]西班牙语，“事件中”。

[26]英语，“旅馆”。

[27]日光市（Nikko）：位于日本关东地方北部。

[28]鲍赫克朗（Bauchklang）：奥地利一支专门表演Beatbox的乐队。Beatbox是指用口技形式模仿鼓、打碟、喇叭等声音的音乐表演形式。

[29]以上提及的五首歌曲，《摇翻贝多芬》为美国著名摇滚音乐家恰克·贝里（Chuck Bemy）的歌曲，其他四首均为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的歌曲。

[30]英国伦敦北部郊区的一个地区。

[31]意大利撒丁岛的一个市镇。

[32]Parzival：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英雄。

[33]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Creendence Clearwater Revival，简称CCR），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一支著名的美国摇滚乐队。

[34]约翰·弗格蒂（John Fogerty，1945—）：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的主唱和灵魂人物。

[35]圣女大特蕾莎（Teresa von Avila，也称为阿维拉的特蕾莎，1515—1582）：西班牙修女，天主教伟大的奥秘神学家和圣女，天主教灵修经典著作《内在的堡垒》（旧译《七宝楼台》）的作者。

[36]西班牙语，“集中心思的人”。

[37]西班牙语，“无为的人”。

[38]鲍勃·马利（Bob Marley，1945—1981）：牙买加著名音乐家，世界流行音乐的伟大旗手。

[39]分别为著名摇滚歌手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和詹尼丝·乔普林（Janis Joplin）的名曲。

[40]突尼斯最有名的一首歌。

[41]海伦·施奈德（Helen Schneider，1952—）：美国歌手、演员，其演艺活动主要在德国。

[42]斯洛文尼亚语，“酒店”。

[43]布拉风，亚得里亚海域寒冷强劲的东北风，常见于冬季。

[44]意大利东北部城市。

[45]意大利东北部城市。

[46]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是罗马尼亚政治家，独裁者。1965年—1989年任罗马尼亚国家领导人。1989年罗马尼亚爆发革命推翻了齐奥塞斯库政权，并将其本人与妻子枪决。

[47]巴斯克人（Basque）：西南欧民族，是欧洲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48]西班牙语，“圣诞节”。

[49]梅塞塔高原，该地名在西班牙语中意为“中央高原”。

[50]西班牙西部城市。

[51]马努埃尔·罗德里格斯（Manuel Rodriguez Sánchez，1917—1947）：西班牙历史上最伟大的斗牛士之一，他的父亲和祖父也都是斗牛士，祖孙三代都以“马诺莱特”为艺名。

[52]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英国油画家、版画家和艺术理论家。

[53]保罗（Paulus，353—431）：罗马基督教拉丁语诗人。保罗同当时名人有书信往来，现存约50封。

[54]希腊语，“时间”。

[55]拉丁文，“抓住今天，及时行乐”。

[56]英语，“优雅”。

[57]Anmut和Grazie：均为德语，“优雅”。

[58]法语，“一丝气息”。

[59]路西法，撒旦在被逐出天堂堕落成为魔鬼之前的名字。

[60]宣礼员，伊斯兰教教职，负责每天按时呼唤做礼拜的人，也音译为“穆安津”或“鸣教”。

[61]莫里克（Eduard Friedrich Mörike，1804—1875）：德国浪漫主义诗人。

[62]拉丁文，“听着，儿子！”

[63]巴黎首要的中心商务区，位于巴黎西郊上塞纳省。

[64]在巴黎地铁全网中，该站客流量仅次于巴黎北站。

[65]位于伦敦泰晤士河南岸，英国最著名的美术馆之一。

[66]也称五旬节，基督教节日，在复活节后第50天。

[67]英语，“我们失去了自己的气势”。

[68]翁加雷蒂（Giuseppe Ungretti，1888—1970）：意大利诗人，隐逸派创始人。

[69]法语，“下雪”。

[70]英语，“一天太长，一生太短……”

[71]英语，“在我的身下白天变成了夜晚。”

[72]英语，“整天在外”。

[73]又译为《荒岛怨侣》，意大利导演罗伯特·罗西里尼导演的影片。

[74]小说The Stars Look Down，出版于1935年，讲述了英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矿工的苦难生活和他们的反抗精神。

[75]电影How Green Was My Valley，上映于1941年，改编自英国小说家李察·勒埃林的同名小说。影片获得第1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76]在欧洲国家的农村，茅厕的木制门上经常镂空一个心形作为厕所的标志。

[77]“鬼怪大军”（Wilde Jagd, Wildes Heer）源自德国民间传说。它们会在夜晚伴随着狩猎呼叫和狗叫飞过天空。

[78]作者出版于1966年的小说《大黄蜂》（Die Hornissen），中译本收录于《无欲的悲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79]作者出版于1986年的小说Die Wiederholung，中译本《去往第九王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80]均为希腊城市。

[81]赫尔曼·伦茨（Hermann Lenz，1913—1998）：德国诗人、作家。

[82]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Clayton Wolfe，1900—1938）：美国作家。

[83]托马斯·沃尔夫出版于1929年的小说Look Homeward, Angel。

[84]原文“寂静之地”一词中，开头字母大写，表示特指，即“寂静之地”特指厕所。

[85]谷崎润一郎（1886—1965）：日本著名小说家，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被日本文学界推崇为经典的唯美派大师。其随笔集《阴翳礼赞》从“阴翳造就了东方建筑美”这一观点出发，探讨了东方建筑和文化的精妙之处。

[86]指枯山水。

[87]德语，“地球”，是一种较高雅的用法。

[88]“geometern”在德语中是外来词。

[89]佛登斯列·汉德瓦萨（Friedensrein Hundertwasser，1928—2000）：又译百水先生，奥地利画家、雕塑家。

[90]位于巴西。

[91]特指巴西的贫民窟。

[92]北美主要河流之一。

[93]属于巴洛克建筑风格，指一长排房间，间间相通，而且门都在一条直线上。

[94]一家比利时卫浴公司名叫“Ideal Standard”，即“理想标准”。

[95]指每年12月24日到次年1月6日。

[96]法语，“自深处”。

[97]出自《圣经·创世记》：“尘归尘，土归土，让往生者安宁，让在世者重获解脱。”

[98]出自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的台词：“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书名亦出自此句。

[99]《你好啊，莫莉小姐》是美国歌手理查德·韦恩·潘尼曼（Richard Wayne Penniman，1935—），外号“小理查德”发行于1958年的一首摇滚歌曲。

[100]1961年上映的一部美国西部片，由理查德·韦德马克和詹姆斯·斯图尔主演。

[101]这里指鸡油菌。

[102]分别为鸡油菌的奥地利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名称。

[103]“白笔鬼”的德文名直译为：散发臭味的羊肚菌。

[104]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1160？——1220）：中世纪德国史诗和吟游诗人。

[105]分别为意大利和美国的知名帽子品牌，均以制作宽檐毡帽著称。

[106]依次分别为牛肝菌的斯洛文尼亚语、克罗地亚语、法语以及拉丁文名称。

[107]英文，“野生物种”。

[108]分别为“高大环柄菇”的法语名称、斯洛文尼亚语名称以及拉丁文学名。

[109]一种探测电离辐射强度的记数仪器。

[110]分别为“橙盖鹅膏菌”的德语俗名、拉丁文学名、德语学名。

[111]该菌类德语名为“Totentrompeten”，直译为“死亡喇叭”，国内将此菌称为“灰喇叭菌”。

[112]约翰·米尔顿·凯奇（John Milton Cage Jr.，1912—1992）：美国实验音乐作曲家、作家、视觉艺术家。

[113]朱塞佩·多梅尼科·斯卡拉蒂（Giuseppe Domenico Scarlatti，1685—1757）：意大利作曲家，键盘演奏家，著名作曲家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之子。

Versuch über die Müdigkeit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89

Versuch über die Jukebox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1990

Versuch über den geglückten Tag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1

Versuch über den Stillen Ort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12

Versuch über den Pilznarren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13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6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出版得到奥地利教育、艺术和文化部所提供之翻译资助

Die Übersetzung wurde gefordert mit Mitteln des Bundesministeriums

für Unterricht, Kunst und Kultur

韩瑞祥 主编

刘学慧 张帆 译

Peter Handke

Der Chinese des Schmerzes

痛苦的中国人

[奥地利] 彼得·汉德克——著

文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京

Horiz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痛苦的中国人/（奥）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著；刘学慧，张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7-208-14082-0

Ⅰ.①痛…　Ⅱ.①彼……②刘……③张…　Ⅲ.①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②游记-作品集-奥地利-现代Ⅳ.①I52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8556号

书名：痛苦的中国人

作者：【 奥地利】彼得·汉德克

译者：刘学慧　张帆

责任编辑：陈欢欢

封面设计：高熹

转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4082-0|Ⅰ·1585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 文景每月书情

目　录

编者前言
痛苦的中国人
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
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
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

痛苦的中国人

[奥地利] 彼得·汉德克 著

韩瑞祥 主编

刘学慧 张帆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者前言

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被奉为奥地利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也是当今德语乃至世界文坛始终关注的焦点之一。汉德克的一生可以说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像许多著名作家一样，他以独具风格的创作在文坛上引起了持久的争论，更确立了令人仰慕的地位。从1966年成名开始，汉德克为德语文学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因此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如“霍普特曼奖”（1967年）、“毕希纳奖”（1973年）、“海涅奖”（2007年）、“托马斯·曼奖”（2008年）、“卡夫卡奖”（2009年）、“拉扎尔国王金质十字勋章”（塞尔维亚文学勋章，2009年）等。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介到世界许多国家，为当代德语文学赢来了举世瞩目的声望。

汉德克出生在奥地利克恩滕州格里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他孩童时代随父母在柏林（1944—1948）的经历，青年时期在克恩滕乡间的生活都渗透进他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里。1961年，汉德克入格拉茨大学读法律，开始参加“城市公园论坛”的文学活动，成为“格拉茨文学社”的一员。他的第一部小说《大黄蜂》（1966）的问世促使他弃学专事文学创作。1966年，汉德克发表了使他一举成名的剧本《骂观众》，在德语文坛引起空前的轰动，从此也使“格拉茨文学社”名声大振。《骂观众》是汉德克对传统戏剧的公开挑战，也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格拉茨文学社”在文学创造上的共同追求。

就在《骂观众》发表之前不久，汉德克已经在“四七社”文学年会上展露锋芒，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严厉地批评了当代文学墨守于传统描写的软弱无能。在他纲领性的杂文（《文学是浪漫的》，1966；《我是一个住在象牙塔里的人》，1967）中，汉德克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文学对他来说，是不断明白自我的手段；他期待文学作品要表现还没有被意识到的现实，破除一成不变的价值模式，认为追求现实主义的描写文学对此则无能为力。与此同时，他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反对文学作品直接服务于政治目的。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剧作《自我控诉》（1966）、《预言》（1966）、

《卡斯帕》（1968），诗集《内部世界之外部世界之内部世界》（1969）等。

进入70年代后，汉德克在“格拉茨文学社”中的创作率先从语言游戏及语言批判转向寻求自我的“新主体性”文学。标志着这个阶段的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1970）、《无欲的悲歌》（1972）、《短信长别》（1972）、《真实感受的时刻》（1975）、《左撇子女人》（1976）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在表现真实的人生经历中寻找自我，借以摆脱现实生存的困惑。《无欲的悲歌》开辟了70年代“格拉茨文学社”从抽象的语言尝试到自传性文学倾向的先河。这部小说是德语文坛70年代新主体性文学的巅峰之作，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1979年，汉德克在巴黎居住了几年之后回到奥地利，在萨尔茨堡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四部曲《缓慢的归乡》（《缓慢的归乡》，1979；《圣山启示录》，1980；《孩子的故事》，1981；《关于乡村》，1981）虽然在叙述风格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生存空间的缺失和寻找自我依然是其表现的主题；主体与世界的冲突构成了叙述的核心，因为对汉德克来说，现实世界不过是一个虚伪的名称，丑恶、僵化、陌生。他厌倦这个世界，试图通过艺术的手段实现自我构想的完美世界。

从80年代开始，汉德克似乎日益陷入封闭的自我世界里，面对社会生存现实的困惑，他寻求在艺术世界里感受永恒与和谐，在文化寻根中哀悼传统价值的缺失。他先后写了《铅笔的故事》（1982）、《痛苦的中国人》（1983）、《去往第九王国》（1986）、《一个作家的下午》（1987）、《试论疲倦》（1989）、《试论成功的日子》（1990）等。但汉德克不是一个陶醉在象牙塔里的作家，他的创作是当代文学困惑的自然表现：世界的无所适从，价值体系的崩溃和叙述危机使文学表现陷入困境。汉德克封闭式的内省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生存的深切反思。

进入90年代后，汉德克定居在巴黎附近的乡村里。从这个时期起，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动荡，南斯拉夫战争也把这位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从《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1991）开始，汉德克的作品（《形同陌路的时刻》，1992；《我在无人湾的岁

月》，1994；《筹划生命的永恒》，1997；《图像消失》，2002；《迷路者的踪迹》，2007）等中到处都潜藏着战争的现实，人性的灾难。1996年，汉德克发表了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批评媒体语言和信息政治，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汉德克对此不屑一顾，一意孤行。1999年，在北约空袭的日子里，他两次穿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旅行。同年，他的南斯拉夫题材戏剧《独木舟之行或者关于战争电影的戏剧》在维也纳皇家剧院首演。为了抗议德国军队轰炸这两个国家和地区，汉德克退回了1973年颁发给他的毕希纳奖。2006年3月18日，汉德克参加了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媒体群起而攻之，他的剧作演出因此在欧洲一些国家被取消，杜塞尔多夫市政府拒绝支付授予他的海涅奖奖金。然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汉德克无视这一切，依然我行我素，坚定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对人性的呼唤，对战争的控诉，对以恶惩恶以牙还牙的非人道毁灭方式的反思："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他因此而成为"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另类。

世纪文景将陆续推出九卷本《汉德克作品集》，意在让我国读者来共同了解和认识这位独具风格和人格魅力的奥地利作家。《痛苦的中国人》卷收录了汉德克的四部作品，其中包括小说《痛苦的中国人》（1983年）和三篇观察与游记，即《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1991年）、《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1996年）和《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1996年）。这四部作品分别属于汉德克不同的创作时期。小说《痛苦的中国人》在表现主题和叙事风格上更接近于同期问世的《缓慢的归乡》四部曲，是汉德克这个时期在文学叙事上备受关注的作品之一。在经历了80年代中期回归传统叙事的长篇小说《去往第九王国》的巨大成功之后，汉德克的叙事形式日益趋于多元化。写于90年代的三篇观察和游记是汉德克为数不多的文学叙事直接涉及政治批评的代表作。这三篇作品的问世也把作者推到了欧洲政治舆论的风口浪尖上，甚至成为欧洲媒体的众矢之的。

小说《痛苦的中国人》是汉德克在写作《缓慢的归乡》期间就酝酿而成的，那就是要"写人的故事"。小说描写的是古典语言学家洛

泽的故事。故事发生的确切地点是作者生活的萨尔茨堡。这个故事被称为“凶杀故事”，却与传统的凶杀故事毫不相干。小说虽然在结构上分为三章和一个尾声，但整个叙事却打破了一切现成的规则，既没有相互关联的情节主线，也没有主人公性格发展的踪迹可循，而是一如既往地采用了断片式的叙事手段，象征性地勾画出主人公的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矛盾。

安德烈亚斯·洛泽是小说的主人公，同时也是叙述者“我”。小说断片式的叙事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外在情节表现与内心世界感知相辅相成，交相辉映。从外在情节上看，小说第一部分写的是洛泽离家索居。他是个业余考古学者，专门研究古代门槛遗迹。对他来说，“周围的一切都处在飘忽不定的状态”。他趋向于身不由己而不守法的暴力行为，因此自愿要求离职。到了第二部分，洛泽变成了案犯：在定期去玩杜洛克牌的途中，他在僧侣山上逮住了一个喷涂万字符的人，用石头砸死了他，并将死者推入山崖里，之后依然去玩他的牌，而且与牌友们久久地谈论起“门槛”这个始终引导小说叙事的象征意象。他独自回到家里后，情不自禁地“渴望一个肉体”，渴望一种“爱的当下”。在第三部分里，洛泽丝毫也不觉得自己的凶杀行为就是“罪责”，而将其看成是“使命”。他要为这种行为找到一个证人。在与一个素不相识的美女经历了融为一体的一夜情后，这个案犯叙述者“成为这个世界中心的主人”，并最终选择儿子作为他的故事的证人：“我的故事就叫做门槛故事。”然而，透过这个叙事表层，读者更多感受到的是洛泽内心世界摇摆在“门槛”内外的感知空间，外在瞬间自然而然地成为内心感知的映像。这里所描写的凶杀行为、性爱结合、儿子充当故事的证人等情节无不象征着洛泽内心深处经历的地狱与拯救的冲突。在他的内心世界里，喧嚣残酷的外在与空虚无助的内心相互交织，他竭力要从这种纠结的矛盾状态中解脱出来，实现自我平衡，“我的位置就是中间状态”作为贯穿整个叙述的象征，横亘在主人公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门槛”构成了叙事的核心，而这种叙事同时也成为叙事者试图克服内心矛盾的手段。与之紧密相关的是小说的题目：作为一个出现在洛泽梦境中充满神秘的陌生人，“痛苦的中国人”一再呈现为主人公竭力克服内心痛苦的隐喻。洛泽的叙事就是要对“我这个痛苦的中国人”说声“再见”。小说结尾描绘了一幅外在与内在和谐的图像：“这条中世纪的运河流淌着……宁静、狡黠、静默、庄严、徐缓且宽容。”这或许就是《痛苦的中国人》叙事的内涵所在。

《痛苦的中国人》在叙事上充满挑战，为多视角阐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是一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引发诸多争论的作品。

而三篇观察和游记则标志着汉德克一个新的创作时期，也体现了这位作家面对欧洲剧烈的政治动荡所表现出的无所畏惧的正义良知。1991年7月底，也就是在南斯拉夫解体后不久，汉德克在《南德意志报》上发表了一篇影响广泛的观察檄文，题为《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一个逝去的现实：追忆斯洛文尼亚》，一时在文坛和政坛上激起了千层浪。汉德克因此也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猛烈攻击，有人甚至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撰文呼吁把汉德克送到精神病医院去。在这篇观察中，汉德克怀着近乎挽歌式的深情描写了他与南斯拉夫的内在关系，特别是其解体在他心灵深处所留下的震撼。在作者眼里，作为第九王国的斯洛文尼亚是逝去的南斯拉夫的象征；“那里的一切事物都能让我感觉到真实的存在”，能够让他“找到家的感觉”，因为“无论是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还是南斯拉夫联盟中的斯洛文尼亚”都是作者心中独一无二的“第九王国”，是“童话般真实的东西”，是一个逝去的“历史图像”。所以，汉德克最终不无惋惜地在文中发问道：“难道那个最终好像躲过了人们称为‘历史厄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南斯拉夫，如今却要遭受这样特殊的厄运吗？”在作者笔下，现实以令人不解的存在是对历史“绝妙的戏讽”。

从此以后，汉德克更加关注发生在昔日南斯拉夫这片土地上的一切。1995年底，他决定赴塞尔维亚旅行，之后发表了引起轰动和争议的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第二年夏天，他又前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斯雷布雷尼察，并撰写了对他来说大有雪上加霜之势的《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在这两篇游记中，作者从切身体验和感受出发，以独特的视角，向读者描述了南斯拉夫解体后一幅与众不同的现实画面，把批判和嘲讽的矛头直接指向西方主流媒体先入为主、无视事实的报道。读者在这里可以看到，汉德克亲临其境目睹的真实存在与西方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令读者掩卷之后一再发问和深思。汉德克为什么要冒着如此风险，逆潮流而行，亲身去经历一个动乱的现实，并给予针锋相对的描述呢？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在文中所说的：南斯拉夫解体后几年的内战促使他要“去塞尔维亚看看”，要弄清和还原事实的真相，因为在他看来，西方关于塞尔维亚的媒体报道和看法铺天盖地，“非常有意思”，甚至“让人难以置信”；他也越来越

“觉得这些消息只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人为的视角”，一定要深入到这个“镜子的背后去探个究竟”，游记也自然而然成为他表达心声的叙述形式。汉德克借此要发问的就是“在那里真的发生了什么？”（汉德克），要挑战的就是被主流媒体所扭曲的现实。伴随着调侃与嘲讽的文字游戏，游记夹叙夹议的字里行间中真切地流露出了作者对战争的痛恨，对正义的期盼，对遭受战乱灾难的民众的同情，以及对是非不分颠倒黑白的媒体舆论的憎恶。在经历了深入实地的“耳闻目睹”之后，作者深深地感受到那些千篇一律的媒体报道的“讲话方式是一种几乎完全由事先已经绷紧的狗链子牵制授意的”，它们所描绘的无非是些肆意歪曲的图像，因为那些“倒卖现实或者转嫁现实的食客”在有意制造一个蛊惑人心的现实。两篇游记自始至终“关注的是些绝对完整现实的东西”；作者敞开心扉，无所顾忌，旨 在从人道和正义出发，让“那些无声的事物”说话，彻底“澄清”一个“没有正义的国家”的真相，“要使所有乱作一团的现实形式让人感受到某些像关联一样的东西”。作者在这里一再追问道：“谁知道，在那里，身临其境几乎始终只是（远）看的身临其境？谁知道，在那里，人们面对纯粹的网络和在线浏览只是占有知识，而没有那种实实在在的，只有通过学习，观察和再学习才可以获取的知识？”

可以说，在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问题上，汉德克的三篇观察和游记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政治宣言，展现在其中的政治思考值得读者深思，也值得读者尊敬。从这三篇作品不难看出，作者借以挑战的是西方主流媒体的虚伪，抨击的是西方人道和正义的假象，捍卫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精神”和向往（汉德克）。这三篇作品是作者用真爱实施的“叙事祈祷”，用深情变成文字的梦想之国，正如他所说的：挑战是“写作的一部分，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挑战出某些东西让人看看”；“要是我不这样表达自己的看法的话，那我的人生中就缺少某些决定性的东西。”（汉德克）

我们选编出版汉德克的作品，意在能够不断地给读者带来另一番阅 读的感受和愉悦，并从中有所受益。但由于水平有限，选编和翻译疏漏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韩瑞祥

2016年5月

痛苦的中国人

张帆　译

1　观察者分心

闭上双眼，城市的灯光在铅字般的黑色中闪烁。那不是老城区的灯光，而是城市南郊林林总总的新建住宅区里，街灯初上。这个住宅区里有多幢多层别墅，位于温特山脚下一片大平原上。这片平原曾是一个天然水库，后来逐渐形成了一片沼泽地——至今仍有许多沼泽和池塘——被称为“湿地”：“莱奥波尔兹克罗恩湿地”。那些灯起初只是闪烁着微光，而后逐渐亮起来，发出乳白色的亮光。住宅区东侧的拐弯处是无轨电车终点站，固定在水泥电线杆上的弧光灯投射出红黄色的光影。在无轨电车的拐弯处和住宅区之间，流淌着一条源自中世纪盛期的运河——“阿尔姆运河”，或称“阿尔姆河”[1]，河水来自国王湖和温特山上的一条小溪。住宅区恰好位于城市边缘的对面（在车行道路前不远处，有块指示牌，上面的地名“萨尔茨堡”被人们用一条对角线涂抹掉了），现在叫“橡树住宅区”。所有大街都是以树名命名的，例如：桤木街、柳树街、桦树街、赤松街。只有从西面人烟稀少的黑土沼泽里延伸出的那条路，还保留着“果汁压榨机街”的名字。街边住宅区内有几幢年久失修、濒临倒塌、或已另作他用的农舍。

一辆电车拐进了终点站的弯道，车身很长，前后两节车厢被铰链连为一体。很多人下了车，有上学的孩子们，还有当地人和外国人（这些外国人通常住在几幢木屋里）。人们脚步匆匆，只有孩子们磨磨蹭蹭。人们一边欣赏着运河小桥上的风景，一边向前挪动着；后面有几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白天他们会把自行车停放在电车终点站。这些人一同走进了住宅小区，刚刚还空荡荡的小区突然拥挤了起来。狗叫着穿过花园的门。住宅区门口的电话亭刚刚还清晰可见，空无一人，现在却已淹没在打电话的人和等待的人群之中。

夜幕还未降临，但在整个市区，灯光像往常一样很早就已经亮了起来。落日的余晖在南面的温特山和西面的斯陶芬山[2]之间凹陷的地平线上洒下了一条橘黄色的光带。平日里，温特山的背面此时已是漆黑一片，而此刻三角岩石正映着微光，像一艘帆船。最后一辆缆车正越过山顶围谷的碎石滩地顺势而下。遥远的斯陶芬山，在德国边境后面，呈蓝黑色；只有高山上的沟壑还依稀可见。山顶的一个茅屋正闪烁着灯光。其实那里有两座山峰——“大斯陶芬”和“小斯陶芬”，从萨尔茨堡市眺望，两座山峰矗立于南面，相隔数千米，遥遥相应。而从这边的苔藓草地望去，两座山峦连绵起伏，浑然一体，在空旷的平原上形成两座“金字塔”，与东边的盖斯山壁立对峙。不同的是，盖斯山的顶部为拱形，且有森林覆盖，不再是光秃秃的“金字塔”，山顶没有峰尖，而是一片平地。在斯陶芬山，山间木屋里闪烁的灯光像天际升起的第一颗星星。盖斯山的山脚下，贫瘠的苔藓草地渐渐演变成肥沃的黏土地。自此，萨尔察赫河[3]蜿蜒流淌于苍茫暮色中。我在岸边一个叫“原石”的岩石河床上遇到过一个男人，他迎面走来，望着微微倾斜的岩石和散布其间的许多被水流冲刷而成的窟窿，说道：“这个世界老了，不是么，洛泽先生？”

就在我清醒的那一刻，四处静悄悄的，一种温暖的虚无开始蔓延，这正是我急需的，像是豁然开朗，或者也可以说是茅塞顿开，终于不用再绞尽脑汁、费尽心思了。这其实不是“温暖”，而是“光辉”；不是“蔓延”，而是“沸腾”；不是“虚无”，而是“空洞”；不是我个人的“空洞”，而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这种空洞的形式叫：小说。它也可以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为了让小说开始，我必须抹去我的足迹，让自己不留痕迹。虚无本身并不是秘密，秘密是虚无产生的原因。它如此盛气凌人，又是如此抚慰人心。它的沉静意味着，我必须闭上嘴巴。万物在它面前都可以回归自我。“虚无！”缪斯曾在史诗的开头这样呼唤道。它没有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而是让人感到轻松和无拘无束，并且符合一条规律：现在怎样，就是怎样。它在画面中是一片河中浅滩。

这种虚无以不同的形态呈现着。一个年轻女孩走在小镇朦胧昏暗的马路上，她穿着蓝色的扎腿灯笼裤，径直走向泛黄的天际。从一条横路上蹿出一个骑着自行车、上了年纪的女人，手里拿着一个装满牛奶的罐子（黑土地里零零星星坐落着一些农庄）。一个老人从家门口走向花园门口，又折了回去。他在出来的路上换了一副眼镜，在回去

的路上又把了一下脉。风还是像往常一样从西边吹来。傍晚时分，风刮得很猛，现在又减弱了。各种树在院子里依次排列，枝叶或是左右摇晃，或是上下摆动，渐渐地让人感觉像织布机在有规律地运作，抑或像在拉锯一样。房间角落里积了一团灰尘，由落地灯映照着。飞机在天空中留下的飞行尾迹在阳光中闪闪发光。运河底部的沼泽泥团在翻滚着。一群狍鹿跃过草地中的水沟。

我在运河大桥边租了两间房，那是小镇上唯一一栋出租公寓。楼房是在战后十年建的，只有两层，没有电梯，也没有阳台。底楼是超市，附近就这么一家商店。我刚搬过来时，有人告诉我，要是别人问我家住在哪里，或是问起我的新地址，我便可以这样回答：5号线终点站，SPAR连锁超市上面。（这些信息并非来自我的妻子和孩子，而是一个邻居告诉我的。）房间的确在二楼。夜深人静时，偶尔还会从楼下传来冷藏柜震动的嗡嗡声。其中一间朝东，可以一眼望见运河和无轨电车的蜿蜒车道，之字形弯道渐渐伸向墨兹克[4]城郊的森林。森林边缘的平坦地带密密匝匝地覆盖着墨绿的云杉和矮林。另一间的窗户分别朝西和朝北，可以瞭望萨尔茨堡市。从这片湿地望去，城区犹如天空下的一道光，依稀可见。它被几座名为“城市山丘”的要塞山、僧侣山和莱恩山遮挡了面目。山顶上，飞机导航灯闪烁着红宝石般的光芒。虽然相距仅数公里，萨尔茨堡却显得十分遥远。几座城市山丘矗立在人口稀少的平原上，别看这几座毫不起眼的驼峰，它们表面像丘陵一般，但你却很难想象，这些驼峰或多或少都是由几处险要的悬崖峭壁组成，若有人不小心掉下去，则必死无疑。古城郊的旅游大巴——白天总是排着长龙——这会儿只是零零星星地停放着几辆。当熙熙攘攘的人流逐渐散去后，广场喷泉发出的潺潺流水声愈发变得清脆。不久前，这座城市所有喷泉的水都来自阿尔姆运河，而如今，运河除了还在为两座磨坊提供动力外，已全然沦为点缀。因此，当局正准备废弃这条运河。教堂的穹顶在夕阳的余晖下闪烁着铜绿色的光芒。

喷泉是几天前才开始喷水的。整个冬天，它都被木板框子围着，缝隙中只露出了其中一匹铁马的眼睛和鼻子，它们都已被流水冲刷成白色。如今，人们又在浅黄色沙土路面的主教官邸广场中央见到那四匹铜马的身影，它们或仰天长啸，或低头沉思。相应地，我们小镇在暮冬里的景象是：人们屋前的柴堆一天天地被消耗掉，一天天地变少。要知道，深秋时节，有些走廊上的柴堆都堆得很高，甚至堆到屋

顶。我的卧室朝东，确切地说可称为斗室，里面放了一个多层搁架，其中有一格是专门用来放水果的：初冬时，格子里的苹果塞得满满的，一直贴到墙壁，而如今已所剩无几了，房间里也闻不到苹果的香味了。楼下的运河水位渐涨，冰雪刚刚融化，河水比以往还要浑浊。几天后，简直又像是夏天了。此时，树木还都光秃秃的，只有接骨木开始抽芽，树梢渐渐变绿。另外，冬季里的景象还有：太阳总是从斯陶芬山的左边落下。而在我看来，只有当太阳移到山的右边落下时，才能算是夏天到了："金字塔峰"在这里变成了记日石或巨石柱。小镇上，几乎每户人家的烟囱里都冒着浓浓的烟，呈现出乡村独有的景象。浓烟色彩各异，蓝色、灰色、淡黄色，先在空中交织，尔后又如同火车的浓烟一般消散在空中。"大家都回家吧。"——我想起了这首仿佛来自两千多年前的诗。当然，这里指的不是人，而是指填饱了肚子的牧场牲畜和夜空中正在升起的金星。

我在列恩的一所学校里教古代语言，学校位于萨尔茨堡西南郊区，萨尔察赫河左岸。列恩是市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被称作工人区，中心地带建了一个足球场，是昔日"奥地利队"的主场，如今这支球队已经像奥地利其他球队一样改成了它们赞助商的名字。南面的橡树住宅区和列恩之间的直线距离很近，但是两地之间偏偏隔了一片黑土沼地，没有横跨两地的路，只有"沼泽路"，修建所谓"南外切道"的计划被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因为没有车，去学校只能绕远路。先坐无轨电车到市区，然后再转车。有时我会在回家的路上步行穿过那片湿地，有时还会碰碰运气穿过黑土沼地，等到了阿尔姆运河，再沿着堤坝边的小路走，就可以直接到家门口了。

但不久前，我不教书了。被解雇了？休假？病假？还是停薪留职？我只知道，我现在的状态还没有一个专门的词可以形容："一切都悬而未决"，我这样告诉自己。几天前，我在一条空旷的马路上撞倒了一个人，那是在穿过粮食胡同[5]的路上。当时是下午，人比平时要少。有一个男人从我身边超车，把我挤到一边，很快又往商店橱窗方向一拐，就这样我们俩撞到了一起。但其实，这完全称不上是相撞，因为我本可以给他让道的。事实上，我是故意冲着他撞过去的，而且这也不单单是撞，确切地说是撞击，一次突如其来的撞击，就撞击的程度而言，我倒是无意的。那个人踉踉跄跄地倒在地上，发出一声怪异的惨叫，声音不大。我还没来得及伸手去扶他，他很快就自己站了起来。但他倒在地上时，倒是瞥了一眼撞他的人，他当时应该明白我

是蓄意而为的。很快，他便消失在一条过道中。他很有可能不是游客，而是本地人。表面看来，两个行人在狭窄的巷子里相撞，这一情景再寻常不过了，只是这次撞击要猛烈一些。

回顾成年后的几十年里，我曾有过两次打人的经历。一次是在参加舞会的夜晚，我打了初恋女友，那是因为她当着我和众人的面和别的男人接吻。发生这事的前几年（其实那时我还没有成年），我还在学生宿舍楼里打了一个低年级的男孩，那天下午我正负责管理图书室的秩序。和女友离开舞会后，我打了她，其实这是她自己要求的。动手打她时，我自己也感到吃惊，她要我继续打她，但我没有，打了她之后我们之间的问题便解决了。我当时的行为让自己觉得得到了精神补偿。确切地说，这根本不算是行为，而是在面对唯一机会时的瞬间反应，类似运动员的一个跳跃或一次投掷，突然做出了反应：错过现在，不会再有别的机会了！所以，我对这事并不感到愧疚，也不存在是否该遭到谴责的问题。我那一下打得很重。我知道，我打她并没有给她带来疼痛，而是让我们之间再次燃起了激情的火花，那是一次转折。我们之间的麻痹状态开始融化、消失。在这次事件中，我没有责任。图书室里的那记耳光，虽然是因为一件小事而引起的，但对我影响至深。那次，我是动手打人的元凶，——在那之前，这只会是别人，绝对不会是我。这几十年来，挨打的那个男孩的眼神——其实，我那时甚至没有正眼看过这个眼神——告诉我：现在我算是认识你了——我现在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了——我会对你留有戒心的。那不是一个孩子的眼神，也不是某一个人的眼神；那眼神并不是从一双眼睛，而是从一只眼睛里流露出来的。这些年来，这只眼睛从来没有眨过。这次在粮食胡同里，我从摔倒的那个人的眼睛里再次感受到了这种眼神。那是一只深褐色的眼睛，流露出的不是愤懑，不是怒不可遏或深恶痛绝，更不是强烈的报复欲，而是一种强硬的、毫不退让的、倔强的眼神。这眼神似乎让我显得有些不可理喻或不像话，不是在别人面前，而是在自己面前。我感到，他是有道理的，但我又觉得自己也有道理。对于那次窄巷里的碰撞，我自始至终没有感到过吃惊。是的，后来我甚至看到：巷子一下子变得崎岖不平、连绵蜿蜒，在远处汇成一点。从那一点开始，我的同道人正沿着盖斯山杳无人烟的环形山道朝着山巅攀登！这样的幻影伴随了我很久，我总能隐隐约约地看到这个景象，我现在就想让自己把这一景象当作事实来看待，这已经成了我的目标。另外，“悬而未决”并不意味“风险”，只是未见分晓而已，或者我们也可以换个词来解释：“尚无定论”。

就在粮食胡同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我申请了暂时离职。我的理由是，有一篇论文急需完成，得赶在夏天到来之前刊登在《萨尔茨堡地理年鉴》上。萨尔茨堡机场对面有一个名叫洛伊克的村庄，那里发现了一处古罗马时期的别墅遗址，我的论文便是有关这一遗址发掘工作某个方面的报告。我其实并不是专业考古学家，但没有教学任务时，便会参与全国各地的发掘工作，而最主要的工作则集中在克恩滕州南面的黑玛山上。那座山上有一个早期基督教大教堂的遗址，我在那儿亲历了拆解教堂马赛克地面的整个过程。在我刚刚从事这个兼职工作时，曾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考古学家对我说："他们总想找点东西出来。"这句话让我受益匪浅，我总是提醒自己，少费些力气去寻找那些尚存的东西，而要多在意那些已经丢失的东西：那些不可挽回的、消失了的——那些被劫走的——那些已经完全腐烂了、同时却又作为空穴继续存在的空位或空缺。就这样，我渐渐对过道产生了兴趣。一般来说，过道是被忽略的研究对象，若不是我，想必将来也不会有人在发掘中关注它。我有时会在打牌时称自己为"门槛专家"（或"门槛探索者"），这个称呼形象且易于理解。我的确成了门槛探索者，在各种住房、教堂、圣殿、古建筑群等遗址中寻找它们的蛛丝马迹。虽然多数大理石或花岗石门槛都已被拆走，木头门槛大多已腐烂，但是，我还是能够通过观察那些沉陷的凹坑、嵌板废墟、色调变化和残留的木材来判断它曾经横立在这里的模样。我的工作不止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总平面图的设计可以将门槛位置的确立作为出发点，以它们为界限诠释一个建筑乃至整个村庄的原始布局。

我的写字台上放着一个装有碎木粉的玻璃杯：那是我在黑玛山的遗址中发现的一个门槛遗存，也是我撰写的第一篇文章的研究对象。寻觅和描述门槛已经成了我的爱好，对此我满怀热情。有课的时候，我还是会趁下午的时间做些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参与附近遗址的发掘工作，如哈莱恩附近凯尔特人出没过的杜恩山，或者像最近发掘的那个洛伊克"罗马人之路"。次日感到的丝丝倦意对授课来说反倒有益，它使我清醒而冷静，我能认真倾听学生发言，学生也能专心听讲。

那篇挖掘报告便是在这期间完成的，其中还包括相关的一些照片、断面和平面图纸，我还在底下的留白处签上了我名字的首字母：A.L.（安德烈亚斯·洛泽）。我的任务是负责别墅前厅的测量工作，而内部马赛克地面的描写和说明则由重要专家负责。"通过一扇（差

不多）一英尺宽的古罗马式大门可以进入别墅，底下是堆砌而成的台基，它曾承载着木制的门槛，东边的墙角处为门槛的嵌入留下了（差不多）一英尺宽和（差不多）一英尺高的空隙……”在做这项工作时，我总会把房间地板上的黑色节孔看成彩色的马赛克砖块，公寓的白色墙壁上似乎还闪现过一幅湿壁画：伊菲革涅亚手持阿耳忒弥斯女神像走向大海，和弟弟一起逃回祖国——希腊。这幅源自庞贝古城[6]的壁画，对我意义非凡，意味着我的测量工作或许并非毫无意义。快完成报告时，我抬起头，瞬间看到温特山在阳光的映衬下回到了古希腊罗马时期，斯陶芬山脚下堆积起的冲积扇正渐渐向外延伸。

写字台又被清理干净了，那是一张浅色的小办公桌，带有胶木木板和铁制桌腿，与周围风格十分协调。装有门槛碎木粉的玻璃杯旁放着一块微长的、顶部带孔的木条，棱角被磨成了圆的，上面横向分布着各种扁平的凹槽。它有一个有趣的叫法：“谄媚手的家伙”。[7]这是我儿子在几年前雕刻而成的（多半是学校布置的作业）。常被手指压的地方已渐渐呈灰黑色，但是闻起来却始终有股新鲜木头的味道。旁边还放着一个棕色的、拳头大小且早已变硬的黏土球，同样，每次把它放到手里把玩一下，它都会散发出潮湿的山间泥土味儿。小球当时就是用这种黏土制成的，上面用铅笔写着希腊文“Galene”，意思是“沉静的、闪烁着粼粼波光的、微微起伏的海面”。这个词被哲学家伊壁鸠鲁[8]奉为一种存在模式的典范。（先哲把这个闪烁石墨光泽的词视为遵守秩序的命令。）这一系列玩意儿中还有一个鸟蛋大小的小泥团。不久前，在地中海一个小岛上，它被一片枯萎的荆棘丛弄破，从此遗留在我这里。这是一件神秘的东西，是以一根荆棘枝条为轴心做成的泥团，沙土里掺着某种昆虫和一些小石子，那荆棘枝条就这样一直插在里面，像一支箭穿进泥团。泥团里有许多深窟窿，这使得泥团看起来像陶笛或奥卡利那笛[9]，只不过，这些窟窿都没有出口。至于内部结构，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弯曲空间——用手电筒无法将内部照得通亮，但是它们似乎在一个共同的空穴里形成了错综相通的网络。空穴通道的深处闪烁着一点亮红，这使整个穴壁仿佛被涂上了一层釉。如果往其中的一个窟窿里吹气，隔壁的窟窿里就会马上露出一对长长的触角，这对触角长在一只不知名的黑壳小动物头上，它一冒出来就又会马上缩回去。——其实，所有这些玩意儿都可以作为我“遵守秩序的命令”，因为它们总能让我分心，免得我过分沉迷于工作。

现在，那个带有圆形黑色空穴的小泥团正摆放在那儿，就好像远古时期的一座被废弃的死城，只剩下草蜥还在跳跃。灯光洒在空荡荡的桌子上，上面就只放了这么四样东西。因为只有一盏灯，房间里其他角落都处于半昏暗状态。隔壁或对面的公寓楼里会相继传来水龙头的哗哗声。两条铁路线分别经过平原西部和东部的边缘地区，那里会不停地传出拖着长音的鸣笛声和紧随而来的隆隆声；从温特山的高速公路上还会传来连续不断的轰隆声和喇叭声。柔和的晚风中，出租公寓的几扇窗户敞开着：其中一扇窗户前倚靠着一个身穿白色汗衫、抽着烟的男人；另一扇窗户前搁着一个陶土罐，罐中长出的纸莎草如烟火般射向天空，星星点点的鲜绿色在昏黄的天空下被映衬得分外显眼；楼下的窗前放着一个鸟笼，里面站着一只哑巴鹦鹉，脑袋一伸一缩的，它那蓝色的羽毛在昏暗中熠熠发光；还有一扇敞开的窗户前空荡荡的。

为什么我不和家人住在一起呢？是被赶出了家门，还是我抛弃了他们娘仨？我的离开到底有没有缘由？（这种分居状态就这么一直保持着，但我们不可能离婚。）我的离开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我是否还记得他们生活作息的规律，似乎这样可以让自己觉得仍在家里，仍和他们在一起？每当我在路上遇见儿子或女儿时，他们就会问我一个绝非迫切而是漫不经心的问题："你什么时候回来？"好像是对一个普通房客提出的问题。我将来会不会重新和他们住到一起呢？这一系列的疑问我都无法解答，虽然有一点我是确信的：我们最终不会真正分开。我姓"洛泽"，这是奥地利很常见的姓氏（甚至在意大利北部，尤其是戈里齐亚、的里雅斯特这些城市，这个姓也会经常出现在电话本上）。在我的概念中，这个姓氏绝非表示"摆脱了某物的人"，它和"失败者"[10]更是不沾边，而是更多地与动词"倾听"联系在一起，这个具有方言特色的词和"偷听"或"细听"意义相似。另外，萨尔茨卡默古特湖区有一座山，名字就叫"洛泽"，它的底部只是一些起伏平缓的圆穹形丘陵，然而上面却突兀地隆起，形成一座气势雄伟的岩峰，看上去像一座坚固无比的岩石防空洞，岩壁陡峭，势如刀削，冬天几乎没有积雪，偶有几处积雪的地方有点像几扇虚设的窗户。

关于我妻子的情况，我实在不知道能说些什么：她和哪些人来往？她做什么工作？和我截然不同的她，擅长很多种现代语言，她会不会在做翻译呢？她是否完成了因结婚而中断了的学业？她在带游客

参观城市吗？（我似乎见过她一次，她撑着一把伞走在一队人前面。）还是在成人大学里作报告？我从没问起过，就是以前我也很少问。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导致我们分居？我这个人的毛病就是不懂询问，所以身上充满了各种疑问。我一般都会把那些询问看作是虚伪的表现，所以是绝对说不出口的。或者说，我内心深处极力抗拒着任何形式的提问，即使只是最普通的询问也一样。

然而，我还是会经常回家看看。虽然会间隔一段时间，但我们还是会定期见面，很少会有久别重逢的感觉。每次他们和我打招呼，就像平时在白天分开的人晚上又见了面一样。有一次，我离开半年后回到家，儿子在房间里看到我，只是从自己专注的事情中稍稍抬了抬头，说了一声：嗨！

我们的房子有点像老式的教师公寓或公务员公寓，面积不大，坡顶设计，外墙是黄色的，门口设有木制挑棚，可以用作暖房。房子在哥伊斯，位于发现古罗马别墅遗址的洛伊克的西边，中间隔着几块平原和草地。哥伊斯属于萨尔茨堡郊区（步行到市区需要整整一个小时），是一个偏僻的乡村，它和市区的交通连接只能靠邮政公交车[11]，而从市区开出的末班车下班之前就没有了。一条狭长的、人迹罕至的乡村公路通往那里。到达村庄前，公共汽车还要经过一小段田间小路。那几户农舍就是这个地方图像的标志，新房子很少。农舍围墙由疏松多孔的青灰色石块堆垒而成，外墙未抹泥灰，中间嵌有漆黑的熔渣小颗粒，它们粘在一起，形成纹理图案，覆盖着整个墙面。大门由砾岩建成，表面镶着椭圆形鹅卵石。大理石门槛呈浅红色，表面带有鲜亮的纹理，同时还夹杂着各种菊石螺纹。这些都使农舍显得颇具古风，与周围那些独宅相比，它们似乎属于另一个时代。农舍后面的哥伊斯小丘陵上有一座白色的哥特式教堂，村庄和丘陵前后呼应，浑然一体。那座丘陵平地而起，是一座独特的小土丘，让人联想到史前社会的土垒。村庄的四周分布着农田和通往城区的铁路线，从这里眺望城区只能看到要塞山那边秀丽鲜亮的岩峰。农田里种的大多是蔬菜，而不是庄稼，它们一直延伸到城市边缘，让人觉得眼前呈现的是一座为整个萨尔茨堡供应粮菜的大种植园。黄昏中，尖塔的红灯亮了，开始为飞机提供信号。从格劳斯格迈恩开出的末班车正在返城，中途停靠在一家乡村旅店门口，车厢里一片漆黑。旅店的窗帘早在太阳刚下山时就拉下来了，这在全国都一样。虽然有一小串灯光，但在晚上你肯定找不到一个比这里还要寂静的地方。这个村庄不信教，所

以晚上是听不到钟声的。然而，当月光的银辉洒向大片田野时，这边的星空比任何其他地方的星空都要清澈明亮。仰望星空，每个星座都一目了然，无需人们费力地去仔细辨认。路边灌木丛中，那细微的簌簌声变得格外清晰。从市区眺望哥伊斯只能望见教堂尖塔上的红灯，抑或照亮山下瓦尔泽山高速公路的亮黄色林间路灯。

是什么事情耽搁了我，为何我完成了论文却迟迟不回学校？我难道不需要日常的工作吗？或者至少参与到集体中去，以尽到所谓的个人对社会的责任？置身于忙碌奔波之中，同时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不就是我曾经喜欢的生活方式吗？是不是走进校门就意味着社会公共生活的开始，意味着我的人生会变得更加完整？重新回去任职，这对我来说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我清楚自己不是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也不是一个靠资产过日子的人，当然也不是那种没有任何固定职业、而只知一心潜学的学者（虽然我求学时有人建议我成为这样的人）。我知道我应该投身到社会中去，不是偶尔，而是日复一日。只有这样，我才会依稀看到世界，哪怕只能短短一瞥南极地衣的褐色光彩。就这样，忽然有一个陌生人走出那片平原，甚至靠近这个地方的城堡。他迎着一个尚未被发现的城市走去，而他脚前那条运河似乎流入亘古不变的低地，或者是流经拥有喀斯特地貌的中国桂林。为此我就得需要拥有一份职业，一份属于我的职业吗？可是现在我不是还有几天空闲时间吗？复活节假期不就快到了吗？

我打开书房的两扇窗户，让外面的噪声传进来。从南边传来了附近的哥奈斯的钟声，这钟声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因为有风，所以西边较远的墨斯教堂的钟声一样听得清清楚楚。楼下超市老板将一些箱子和写着粉笔字的广告牌搬回店里。地平线上驶过一列火车，它没有发出鸣笛声，而是发出了一种你双手空心握成碗状并向内吹气时发出的声音。一家酿酒厂的机车收工后正开回车棚。巴伐利亚上阿尔卑斯山区的冰碛地带上空飞过一架来自苏黎世的飞机，闪起了强烈的信号灯。事实上，地面上已经为它照得通亮，探照灯也突然亮了起来，投向这架上下盘旋缓缓靠近的飞机。飞机着陆后，隔了片刻，那轰隆声便响彻整个平原。

我现在有时间了。那些事件与疑问开始相互分离。所谓有时间，并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解脱：解脱了所有矛盾的感觉。这意味着：缓冲与前进，无拘无束与全心投入，解除心理武装与顽强抵抗，

休养生息与奋发进取。“有时间”这种情况很少有，也许所谓的“天恩眷顾”应叫做“时间眷顾”。对“门槛”概念的一种传统解读也异曲同工：由俭入奢。是“从贫穷匮乏到丰饶富有的过渡”。因为“有时间”，才有轰鸣声响彻大地，才有缤纷色彩射出光芒，才有草木颤动，才有湿地草垫覆盖大地。

我坐在厨房里，厨房小得放不下一张桌子，我只能把碟子放在双膝上。墙上趴着几只盲蛛，紧贴着粗糙的石灰粉墙，它们的腿像指针一样细长，不停地在原地轻轻颤动，这使得整个厨房像一家静悄悄的、只有钟摆在滴滴答答的钟表店。有时，这些“钟”会交换位置，或者一只“钟”拖着“长腿”趴在另外一只上面，两只一起摆动。瓷砖地面上趴着几只短命的小动物，绽放不出一点生命的光彩：其中一只即将死去，弯曲的双腿剧烈地颤抖着；另外一只已经死了，它的腿呈拱形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并完全隐藏在干瘪的尸体下面，形成木乃伊似的一小团，上面已积聚了厚厚的灰尘。万物生生不息，它们的陨落自有新生力量代替。这时，墙上出现了两只个头明显要小、颜色较浅的小家伙，它们或是刚出生或是新成员，很快就融入到同盟里，一起发出“滴答”声。在发掘工作期间，我已经很熟悉这些小动物了。它们在地穴里爬来爬去，一直伴随着工作人员。它们似乎已经成了房间的宠物，也包括里面写字台上那个黏土球里的不知名昆虫。它们是另外的太阳钟，支持那所谓的“有时间”，因为它们会引起我的注意，中断我的思绪。如果说人们以前用膜拜甲虫来膜拜太阳[12]（或者至少是观察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为什么就不能在这种无毒的、不织网的蜘蛛中也得到同样的感悟呢？这些小动物要是突然出现，不会让人吓一跳，只会让人感到吃惊或欣喜。“盲蛛，门槛探寻者的守护者。”我在厨房里这么说道。夜间，听到了霓虹灯的嗞嗞声、电炉上方那个钟的闷闷作响声、楼下正在终点站拐弯处行驶的巴士反光镜的金属臂发出的咔嚓声。

那些长腿小动物发出的“滴答”声和摇摆声与我每天朗读的那首诗是有联系的。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我都会慢慢地、逐字逐句地研读其中的几句：维吉尔[13]关于农学的诗《农事诗》（等我老了，无事可做的时候，我想翻译这首诗）。那些诗句使我觉得时间倒退，或者让时间获得了另外的意义。

这部诗作的开头介绍了创作的意图：传授田间耕耘和捆绑葡萄藤的合适时机、养牛和养蜂技术，当然这些都是以“歌唱”形式呈现的。实际上，这首诗中蕴含了很多大自然的规律，它们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过时。比如说，我在哥伊斯的家里有一株濒临枯死的葡萄藤，直到我在《农事诗》里读到了两句以前时常忽略的诗句，才知道谷物需要“殷实的土壤”，而葡萄则相反，需要“松软的泥土”。同样，我曾十分担心院子里的那棵月桂树，担心仲夏里即使很小的风也会吹落树上的叶子，后来读了维吉尔的诗才消除了这个顾虑，原来诗中曾提到，月桂树和橙树很相似，只是闻起来有区别，“风吹不落它翩翩起舞的叶子”（这看起来更像月桂树的特性，而非病症）。

然而，我觉得所受到的教育，并非那些农业知识，而是对那些一如既往有效的事物所持有的热情（绝非陶醉）——同样来自这首诗——太阳、大地、河流、风、树木和灌木林、家畜、果实（装在筐子和罐子里的）、器械和工具所持有的热情。在这些物体身上，可以说公理从世界上消失之前，留下了它的轮廓；远离那些制造分裂的武器（这个常用的词“武器”在这里代表的是那些追求和平的工具），这些物体中的每一个都这样给我打开了通往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的大门，因为它们永远脱离了那个历史，若即若离地共同存在着——这个故事通常仅仅用一个修饰词就会被讲述：缓慢生长的橄榄树，单薄的椴树，明亮的枫树，坚硬的榛树，松散的泥灰，炎热的东风，清爽的北风，带来露水的月亮。还有按照现在的审美观修剪成球状或方正的黄杨树篱笆，自身就包含着（或者保存着）——我还可以再次使用那个合适的修饰词——那“波动的黄杨树”；在我看来，由于有那个适合于物体的修饰词，它是可以再现的。正如人们所说的，维吉尔“是以一种雌熊生育幼崽的方式”把他的诗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既有生产时的巨大艰辛，又要在“舔抚”时付出更大的艰辛，从而让幼崽获得自己的生存形式：而且因为那些诗句对这些事物来说再适合不过了，所以在我这个读者看来，它们都一再使那些被歌颂的事物获得新生。此时此刻在什么地方，不是正有母山羊“吊着硕大的乳房，十分艰难地跨过门槛”吗？不是正好有走在田间小路上的母牛“用尾巴又抹去了走路时留下的脚印”吗？——抬起头时，正好看到一辆不知从何处开来的汽车拐上了运河桥，多亏有维吉尔的那些诗句，这辆车现在闪烁着异样的蓝光。

台灯洒在桌面上的光圈；车站拐角处的自行车架（替代了消失在暮色之中的斯陶芬山的山顶）；坐在公交车里等候的司机；邻居家卧在花园里休息的狗；超市里堆叠的购物篮；灌木上栖息的鸟儿；萨尔察赫河河谷草地上垂挂着的树木的枝蔓；沼泽地农庄前空荡荡的木椅；平原上交错的十字路口；弯弯的弦月（取代了之前的飞机信号灯）；绿油油的菜田；温特山喀斯特地貌的落水洞（犹如倒置的金字塔）；电表盒里慢慢旋转的圆盘；滴落的露水；卵石滩淤积而成的冲积扇；陈列的尸体；插上翅膀的白羊[14]。

书打开着，灯也亮着，我走下楼去。我和司机单独坐在停靠的无轨电车里。外面避雨棚的长椅上放着一份叠好的报纸，下面是一摊呕吐物，像是已经凝固了。旁边海报上的年轻女子近乎赤裸，目光深邃，神情充满期待。一对情侣依偎着坐在运河桥的栏杆上，男子搂着女子。两人亲吻时，女子的白色漆皮皮鞋在栏杆下一动不动。

对面树林边缘的榛子树上，有时会有些淡黄色的柔荑花飘散下来，看不出是被风吹落的。许多刚刚开放、颜色微暗的柔荑花，像鸟爪一样散落在那桦树上。月亮周围泛起红红的月晕，按照《农事诗》的说法，这预示着暴风即将来临（白色的月晕则预示下雨）。

无轨电车只跑长途。这辆车在这个拐角处停了这么久，好像在等什么人。过了一会儿，确实从居民小区里走来一个女孩子，涂着黑色的眼影，脸颊上抹着粉红色的胭脂，身穿红色大衣，从远处就听到她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响。车子行驶后，她一直站在司机旁边，有时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或用屁股碰碰他。傍晚，街上弥漫着沼泽地里常见的低雾，但时而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过了几站，离老城区还有一段距离，我在哥奈斯网球馆那明亮的玻璃墙边下了车。那个女孩在我身后漫不经心地说：“印第安人”，我之所以在意，是因为就在不久前也听到了同样的话。那是一个朝我迎面走来的小男孩，对与他同行的妈妈大声喊道：“瞧，印第安人！”

网球馆明亮的玻璃墙后面，紧挨着地区公墓。这公墓在夜色中看起来不过是一大片树林，坟墓上燃烧着的蜡烛也不容易被看到，会让人误以为是森林公园。网球馆里传出击球、呼喊和跑步的声音。有时候，在那不透明的毛玻璃上，会隐隐约约看到上面浮现的肩膀或髋部的白影。紧挨着运动场，有一家饭店，从它的排气扇里传出的嘈杂

声，与其说是从这家小饭馆里传出来的，倒不如说是从一家熙熙攘攘的酒店里传出来的。停车场里，密密麻麻地停着被露水打湿的车辆。毗邻公墓的郊外原野里，不断出现傍晚散步和跑步的人，他们要么到附近的咖啡馆里休息，要么消失在最高也不超过杨树的新房子里（至今在整个沼泽区还没有高楼）。

街道上方的金属电线在无轨电车经过时闪着亮光，电车驶过后还依然如此，一直延伸到街道深处，都被缓缓驶过的汽车前灯照得发亮。网球馆上方盘旋着欢快的鸽子，透过哥奈斯教堂的钟楼看到的是一片被月光照亮的云彩，它们把夜空衬托得分外明亮。这一城乡中间地带的夜晚充满活力。城里则截然不同。此时，城里的街道和广场都已人迹稀少，仅有的几个行人要么举止文雅，要么大喊大叫。这时，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烧柴的气味（难道是从火葬场漫过树梢而飘来的烟雾？火葬场的大烟囱一天到晚都冒着浓烟）。一架单引擎飞机在住宅区上空转了个弯，发出有节奏的隆隆声（这次没有发生坠落，至少在这里没有）。

一边是网球馆和公墓，另一边是阿尔姆运河。在运河坝基旁，有一座像农舍一样的建筑，素有“运河小屋”之称。一条路穿过一片荒芜的草场通往那里，饭店里的灯光洒在草场上空，在黄昏中的西天下呈乳白色，在黑暗中显得很刺眼，这便是草地边缘低矮房子的奇特之处。经营这家咖啡店的是一位退休老人，他的妻子是老板娘（这样可以避免丧失领养老金的权利）。店前的花园比紧挨着的小区的房子还要小，点唱机不在招待客人的房间里，而是在外面的前厅里。这前厅无论大小还是外形都像是一个走廊。点唱机旁边有一个亮着灯的食品陈列柜。

我穿过田野走了一段，在店门前跺了跺鞋上的泥巴。这房子里的嘈杂声不绝于耳——突然爆发的齐声大笑；混杂的叫喊声，此起彼伏，一声压过一声；咖啡壶烧开的声音；在小小的停歇期间，听到的是投币自动点唱机发出的基调——里面一定是一幅人挤得满满的画面。但当我走进去时，却发现这两间矮矮的运河小屋几乎是空的。一张桌子周围坐了四个人在打牌，头上都戴着帽子；邻桌坐着三个年轻女子，其中一个是临产的孕妇，一个似乎有一点髭须，头发染成了栗色，另一个女子的脚边卧着一条猎犬。还有一个人抱着手风琴，轻轻地为那些打牌的人伴奏，他们每出一张牌，他就会弹出一个特别的音

符。店主倚靠在柜台桌上，腰带后面系着一根绳子，上面拴着一支铅笔，一直垂到小腿肚上。窗台上的一摞画刊和盆栽一样高。这里不像市里的咖啡店那样有挂在架子上的报纸，如果有人想看报的话，老板就会从二楼拿他自己的报纸来给客人看。这两间房子沿着运河大坝的方向排开，大坝远远高出窗户的下沿，一天到晚遮着光。仅有的几张桌子异常宽大，就像在乡村酒店里那样，“可以多坐些人”，还有双层的桌布也是依照饭店里常见的样子铺的：一张白色方格桌布斜铺在一张颜色较深、质地较厚的垫布上，上面放着一堆啤酒杯垫和一个编织筐，筐里装着调料瓶和木质牙签（不再像以前一样是用“柔韧的小檗木”做的）。房间里微弱的灯光与外面的灯光形成鲜明对比，只有灯光从上面直射的那张桌子才稍微亮一些。

工作了一整天后，走进这家饭店，就是听听餐桌旁的人们在攀谈中时不时提及的地名“马武特尔村”、“阿布特瑙”、“格尔林”、“伊本”，我已经感到很惬意了。疲倦的我也融入其中，在那微弱的灯光下，我在想，这正好使我变得不那么显眼：没有人会问我，或者反对我。当我离开时，也不会有人谈起我。不过总会有人注意到我。

我坐在角落里的老位子上，看着饭馆里这两伙人，也偶尔会透过窗帘的缝隙望着外面。北面天空下，城堡那高高耸立的灰色监狱大墙依稀可见，运河蜿蜒朝着那面墙的方向流去，上面横贯许许多多的小桥，前景中就有一座。桥上并排停着两辆车，车窗都开着，司机们透过车窗聊着天，好像他们在这儿不期而遇似的。一辆轻型摩托车敏捷地从他们中间穿过，这位桥上的车手有一瞬仿佛在飞驰。不一会儿，桥上就空荡荡的了。一对白发老人坐在堤坝旁一条长椅上，长椅像运河边的其他长椅一样，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此时，桥上出现了一辆像匣子一样的环城小电动公交车，里面唯一一位乘客像坐在地上一样。过了一会儿，又在同样的位置闪烁起救护车的蓝光。那蓝光很亮，照在酒馆里一个哈哈大笑的女人牙齿上，耀眼夺目。

这里也住着南欧人，一个黑眼睛、棕色皮肤的半大小子和一个跟他长相相似的孩子走了进来，拿着一个大空酒瓶，在柜台前换满满一瓶酒。其间，他说那个孩子是他“叔叔”。他在这里上小学，那里有专设的外国人班，叫“五彩班”：不是因为他们近乎独特的授课工具——彩色粉笔，而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肤色，校长常以这个班为骄傲。他们甚至有专用的校门，开学时间也跟其他奥地利学生不同。到

了岁末，他们画的画不光贴满了整个墙面，连所有的柜子里都塞满了。大礼堂展出的画作不仅有充满异域特色的风景，还有本地人所看不到的本地美景。这个有五彩班的学校位于城市另一端，在卡普齐纳山[15]后面的沙尔沼泽地区。那些外国孩子来自城市的各个地区。今天的报纸上报道说，有一个学生昨天在街上被撞死了。不过报纸大多报道战争：土耳其人对希腊人，伊朗人对伊拉克人，南斯拉夫人对阿尔巴尼亚人。——这个讲述者身旁那个孩子正举起一根棍子朝四周挥舞着。

两人临走时，又在前厅站了一会儿，往点唱机里投了一枚硬币，里面只有一张马其顿民间音乐唱片。片刻间，这个无头无尾的旋律便响彻整个小屋。顿时，眼前发生了变化：饭店变成了约旦河西岸某个餐馆的花园露台，露台是空的，充斥着沙团的沙沙声、棕榈叶的噼啪声、还有无尽的音乐，东面就是死海。孕妇直起腰来，双手把散在双肩上的头发撩到头顶。歌声中，她久久地坐在那儿，就像一个坐在死海岸边的女人，代表着大海本身。

房门时开时关。透过窗帘的缝隙，看见那个少年正走在外面的小路上，手里拿着酒瓶，背着他的“叔叔”，步履稳健。背上那个孩子则把棍子搭在他的肩上，似乎瞄准黑暗中的什么东西。

那些玩牌的人已经不玩了，但仍坐在原来的位置上。现在他们静静地聊起天来，没有喧哗也没有大笑，近乎无声。老板招待完最后一位客人后也参与进来。我现在才发现其中一个牌友是女的，最年轻的那个男人朝她那边挪了挪位子。邻桌的三个女人已经走了。那只狗还趴在椅子腿边睡觉。排气扇朝着运河嗡嗡地吐着气。一个穿着橘色塑料雨衣的亚洲人走进来，腋下夹着一包新印的报纸，随即又走开了，此刻没人想看报纸。

打烊的时间推迟了，这似乎正合各位的心意：大家原本流露出要走的神情，迟疑了一会儿后，又忽然一点也不着急了。大家都很有耐性，连老板也不看表了。那个女人把牌扔给那个男人，看起来很不情愿。她开始玩弄起他的衬衫领，他吻着她的每一个指关节。其他人在旁边小声谈论着什么，顶多偶尔看他们一眼，不是用眼角瞥一下，而是睁大眼睛直视着，若有所思的样子。老板娘穿着长筒胶靴，打扫完毕后，站在从敞开的厨房门里透出的白色灯光中。有一个坐在桌旁的

人观察着自己的手心，掌纹被煤烟或油腻染成了黑色。另一个人发出了一声呼叫，有点像真假音反复变换的唱腔，不是高兴或悲伤的呼叫，而是疲倦的呼叫，是所有这样的呼叫中最疲倦的。

后来，除了那对情侣，大家都回家了。老板和妻子在厨房里说着明天要买的东西。一个晚到的客人还站在卫生间的盥洗盆前，从背影看到他帽子上向外伸着的羚羊毛束在猛烈地晃动着，尽管那人几乎一动不动。

此间，那对男女脸贴着脸，坐在一起，他们一副严肃的神情，从侧面看上去像埃及人。他们挽着胳膊，身体小心翼翼地相互贴近，让人联想起慢慢扭结在一起的藤蔓。那男人把指尖按在女人脖颈上，像要感觉她的心跳。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眼睛。与此同时，两人你来我往，迫不及待，相互窃窃私语。然后，他们脸贴着脸，再也无法相认，相向而坐，久久一动不动，犹如古老绘画上太阳与月亮围成一个圆圈似的。对这个男人来说，这个女人想必正好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两人的脸颊泛起的红晕良久都没散去，直到——相互动来动去——他朝她弯下身子，而她同时歪向一边，不只是头，而是整个身子，就像一个晕倒在地的女人一样，她仿佛要把后面墙上那张熊皮连同自己拽到这共同的床铺上。“最伟大的一幕发生了”——这原本是昔日田园诗对身体结合的另一个说法：可是，这两人此刻还需要在“运河小屋”的桌旁结合吗？他们这样不是已经合为一体了吗？一支黄色的小铅笔掉到地上，几乎听不到声音，像鸟儿的喙一样。

之后，我又在堤道上待了一会儿，身后的饭店已拉下了帘子，透过呼啸的排气扇可以听到那对夫妻的声音：不是耳语或嘟哝，甚至不是嗓音，而是时高时低的响声，时而难懂时而易懂。其间能清楚地听到老板的声音：“十号桌。”

运河彼岸一片草地上，有些地方被雾染白了，其他地方却清晰得很。雾气没有上升，而是厚厚地笼罩在地面上，刚好遮住草尖。那里潜伏着一只猫，却只能看到它那竖立的两只三角耳。尽管如此，在另一大片没有被雾笼罩的草地上，似乎看到有个东西在移动：不是烟雾持续不断地往一边移动，而是来来回回，时而狂奔，时而后退，突然涌现，又突然消散，好像不是雾，更像是草地下面泥石沼里冒出的浓烟。有时，白雾漫延、蒸腾，似乎超过一人高，仿佛是地下间歇泉冒

出的蒸汽。夜空晴朗无比；草场另一头的房子挺立在烟雾缭绕的地面上，轮廓越发显得清晰，也比平时更有家的感觉。后面的斯陶芬峰耸立在月光中；想象中似乎已不存在国界。

雾气陪伴着我回家，我沿着运河逆流而上，经过一座桥，走到彼岸，在下一座桥那儿，又返回来。一开始走的是堤上的一条柏油小路，走到尽头时，是一条住宅区的街道；再径直走到公共汽车站的拐角处，那是一条人行道和自行车道。奇怪的是，雾气一直没有越过运河，左边和右边的情形泾渭分明，水流成了雾霭的分界线（每片草场、牧场和沼泽地都有各自奇特的雾景）。河面上只飘着淡淡的烟云。一片树林，前一刻还是雾海中的一个岛屿，随即又清晰地矗立在黑土地上，仿佛低矮的灌木丛把那片白雾吞噬了。雾气在一个牧场门口停滞、积聚，就像遇到了一个障碍物或门槛。雾气像河流一样拐进一个果园，裹住了那幢濒临倒塌的小面包房及其对面的蜂箱。四周是昏暗的夜色，蜂箱在乳白色雾气的映托下呈现出各种色泽。我经常不得不停下脚步，寻觅那些羊肠小路。当我往地上看时，过膝的雾气已经让我看不到自己的脚。透过远处一户亮着灯光的人家的窗户，我却能清楚地看到厨房墙面瓷砖上的玫瑰图案。四周充斥着各种各样电器的嘈杂声——自行车、发电机、电视机、家用电钻，然而却又如此宁静，一头哞哞长叫的奶牛仿佛走进了一幅画卷：一幅幅图像，有牛角，有雨，还有另外一条河流。那牛角直伸进我的胸膛；那副我总是戴着的胸甲消失得无影无踪。

运河四周间隔均匀地立着一些木板，木板上贴着各个地区政党的宣传海报（不久又要举行选举了），海报上贴着乡镇政治家的肖像，还有些标语。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总能记住这些标语，而且过目难忘。我随便踢了一块木板一脚，那块木板颤了颤，好像要被这不经意的一脚踢倒一样。我没有环顾四周，就从地里拔起它扔进了运河，接着它便沉入了水中。紧挨着的一块木板，底部被削尖了，紧紧地插在地里，还被楔子固定住了。我毫不迟疑——像要打开罐头一样——猛地一拉就能把它拽出来，然后扔进水里（我也的确这么做了）。就这样，我把剩下的宣传板全都扔进水里。秋天里，阿尔姆运河通常会有一个月变得干枯，也就是所谓的“阿尔姆枯水期”。那时，木板底部插在烂泥里，残留的彩色纸张打着卷，运河挖泥船会把所有这些破烂连同那些车轮外胎、衣服包裹和死鱼一起扔到垃圾车上。我曾经问过一个熟人，问他是否相信我会做出杀人这种事，现在我仍记得他的回

答："不会杀人，但是有这个念头。"这算是杀人欲望吗？不算。只不过是恶作剧而已，或者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故意损害他人财产"？也不是。不管怎么样，我总会漫不经心地大声说一个词："复仇"，我知道这也不是正确答案；补充一句："人们享有观看水的权利，你们挡住水是一种侵权行为。"（我第一眼看到这些沉默的宣传海报时，内心便惊呼道："住嘴！"）

类似的事情我至今只对某个教堂墙上的一句箴言干过（但那只是用铅笔把句子涂掉而已）。现在我又拿出随身带着的小折叠刀，把固定在岸边牧场树干上的徒步旅行路标撬下来扔到活动隔板后面。那些路标红白相间，上面写着："欧洲远途徒步旅行道路：波西米亚森林——石湖——卡尔尼斯——阿尔卑斯山"。我又以同样的方式对付了一个小鸟窝、一个活动展柜、一家新开张的理发店的海报，那张画着模特发型的海报，是通缉恐怖分子的。一座尚未装修的房子前，用木桩固定了一个山墙式的牌子，这是一家企业为寻找一片"可以开发的土地"而竖立的（字在黑暗中闪着磷光），我用打火机把它点燃了，看着它和连带的山墙装饰如何烧着，然后炭化。没有人看到我，即便有人看到，那也只是对一种奇怪举动的观察。

之后，我还从来没有发现那些柳树干竟然那么粗。运河上那一个个突起的小树墩，以前曾是洗衣服的地方，看上去像一个个小码头。那么以前那些船在哪儿呢？阿尔姆运河木头装扮的河床本身就是船，河水又是缓缓流过，又是静静伫立。那水不是在流动，而是在活动。柳树皮弯弯曲曲的，犹如可以制成救生衣的栓皮栎。柳树天生就该长在河边……枝叶繁茂的柳树……人们用枝条为蜜蜂搭建了一条条小路……蜜蜂以此"乘着东风潜入水中，又逃脱到上面，可以向着夏日的阳光舒展开翅膀……"

继续产生作用的事实，还是已经失效的咒语？合理的生存方式，还是狂妄的咒语？预示着倾盆大雨即将来临的蚂蚁，"安全起见，它们通过拥挤的地道把自己的卵从蚂蚁窝里搬出来"；在夜间织布的姑娘们"从飞溅的灯油和在烛心上聚集和外溅的烛泪就看得出暴风雨即将来临"——：不断更新的画面，还是已经失效的老画面？无论如何都十分惹眼，如同常用语里的重复总显得那么拙劣、病态、甚至讨厌。相反，难道就没有与"令人乏味的重复"相对的"令人振奋的重复"、与"被迫重复"相对的"主动重复"、与"重复的危险性"相

对的“重复的可能性”吗？坚硬的榛树在我面前透着光；单薄的椴树映入我的脑海；在柳树下寻求庇护；接骨木树的树干苍劲曲折；在此我替代重复的另一个词是：“重新找到！”

回到家后，我在黑暗中吃了一个苹果，喝了一杯葡萄酒，浇了浇花。终点站拐角处的自行车架现在已空空如也。空空的末班车朝市里开去。金属电线不再吱吱作响，但仍在持久地摇晃着。月亮落山了，现在正是观星的时候。以前我会定期参加“萨尔茨堡观星爱好者协会”的聚会，地点经常是在墨兹克小山的圆形山顶上，以前那里很适合观察夜空，是附近最暗的地方。后来城里的灯光越来越多，我们社团只好另选远一些的盖斯山。可是渐渐地，连那儿也没有真正的夜色了，漫射的光线弥散在星空，观星爱好者协会最终也解散了。尽管如此，这段小插曲对我来说还是有益的。我刚刚入会时，协会领导就观察星空的方式给我上了一课，他说：“您总想一下子就辨认出来，而不是先仔细去观察。”——而就我本人而言，每次观察星辰久了，我的注意力又会轻易地转向山下树叶的沙沙声。

随着月亮落山，天空此刻看上去不完美了；那里面到处是黑洞洞的瑕疵。冬季的大星象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循环，夏季星象即将开始。山下的平原，除了墨斯大街上的一连串灯光，几乎一片昏暗；机场的信号灯熄灭了；山上的警示灯也关掉了。只有高速公路过境关卡整晚都被刺眼的黄色灯光照得通亮，而不远处那扇灰白的、设有围栏的瓦尔泽菲尔德兵营大门，乍一看上去像是另一处过境关卡：没有车辆过境时，那空空如也的、从高处被照得通亮的混凝土高速路看上去就像是个处决场。平原上一个个村庄消失在黑暗中，正如人们所说，它们那凯尔特式的名称反而活灵活现：阿尼夫、格勒第希、墨兹克、哥奈斯、洛伊克、瓦尔斯、哥伊斯。我儿子有一次说，这些地名让他想起一个个树名来。

依然还有嘈杂声，但是包括窗外山雀那短促而心不在焉的鸣叫声，都停留在远处：砰砰声、吵闹声、呼啸声或刺耳的铃声。它们有规律地时远时近，好像是来报到：先是高速公路上的摩托车，随后是超市里的冰柜，然后是沼泽农庄里的狗，还有遥远的地方——平原上方高处，温特山的巨石在整夜的冷冻后，砰的一声脱落，滚进冰斗中。每一种声响都在绝妙的宁静中产生，又烘托着绝妙的宁静。与此同时，在这昏暗的夜色中，出现了犹如遥远东方的墨迹一样的东西，

缓缓有序，间隔巨大，同样一片昏暗，只是形式严格，光线有力，并且清清楚楚地展现在这个倾听的入睡者的眼帘里。

然而在深夜里——不再有声响，那些墨迹也早已消失——突然，一阵声响惊起，跌落在窗后边，又是一阵呼喊声，这种呼喊声绝无仅有，它使一切声音黯然失色，甚至连垂死时喉咙里不断发出的痛苦的呻吟也无法与之比拟。的确是一声呼喊，有人在不停地呼喊。不，准确地说，是一个孩子在喊，那是一个孩子无休止的呼喊声，来自外面，来自平原上某个地方。它们不是来自左邻右舍。然而，即使关着窗户和百叶窗，这个小区里（远远超出这个小区，在别的市区里也不例外）谁都免不了在熟睡中被吵醒。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倾听这个孩子的呼喊声（即使明早我们会装作什么也没发生过）。那不是平平常常的哭泣或哭喊，但也不是无言的呐喊：听起来像是在呼喊；总是不断喊出一个双音节词，似乎在呼喊着某人。这个孩子是无助的，他只能在那里呼喊着这么一个名字。听上去，他不在房子里，或至少是在一个完全敞开的房子里，他在原地无法动弹。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点。我立刻就想起附近有一家“生活救助”收养所，是为那些所谓的残障儿童开设的，不过只负责短时的安抚：救助是根本不可能的；你只能当个证人而已。那呼喊声丝毫没有减弱。它们那样充斥四周，以至于温特山里那成百个（还有更多）的喀斯特溶洞——冰窖、竖井、深渊、落水洞、深谷、风眼——突然显现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从一个洞到另一个洞不断增大的呼喊洞。房间里，那只不知所措的红螯昆虫吓得直往黏土球里钻；在喊叫的间歇里，一只肥大的苍蝇一再朝着窗玻璃撞去。那个孩子现在把他的全部剧痛都喊了出来，而这种疼痛在成人身上成了内心深处的默默不语；如果每个遭受疼痛的人都这样喊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不是早就脱离正轨了？而且依照自然规律，久而久之，这个孩子无论如何准保也会沉默不语了。（他现在已经沉默了。）星空再次恢复了宁静，它会被矫正吗？会扭曲变形？后来，那接下来的噪音，即使还在一片漆黑之中，无疑是垃圾车那可靠的轰隆声和咔嗒声。但我毕竟曾经是证人：见证了整个过程，桦树街、赤松街、柳树街，乃至这个小区的所有街道，如何因为这些呼喊，有了一个名字——无名街。

2　观察者介入

复活节前一周，濯足节的前夜，便会举行每月一次的杜洛克纸牌游戏。每到这时候，我们几个好友或熟人会约好在城里什么地方碰面，不是在某个朋友就是在某个熟人家里。一般情况下，主人还会邀请第五个人一起参加聚会，因为这样一来，每人都能轮空一次，只是在旁边充当观众。（迄今为止，这第五个人经常是另外三个人不认识的。）这天，我们约定在僧侣山上的一幢房子里打牌。这幢房子可以说坐落在山谷里，穿过这里，有一条道路从一片长满苔藓的平地通向下面的戏剧节剧场大院里，并继续延伸向老城区。

那些纸牌——不只是杜洛克纸牌——对我而言，从儿时起就成为了“陆地”的代名词，不管怎么说，这或许就是我对那个问题的回答：听到“纸牌游戏”这个词语时，我眼前看到的是什么。它是四面八方让人感知的陆地：空旷的陆地；平坦的陆地；乡间的陆地；小小的陆地（有点类似于想象里的安道尔或是圣马利诺）；内陆（没有海岸线）；区别于国家的陆地，没有立法的权力，而只有游戏规则……对于成年人而言，纸牌总是具有某种魔力，始终能把一块块普通的陆地拼合成一个整体。它们成扇形散开在牌桌的四个方位，仿佛使我联想到一片“核心大陆”，它让自己的色彩、气味和语言在玩牌的过程中穿越这间陋室，投射向更远的四周。早在孩提时代，当我还只是一个观望者时，我便把每一个牌局看作是一条呈螺旋状的回路，它不断回转，直到使窗外的地平线在这片纸牌大陆的缤纷色彩和各式各样的缩略语中闪出熠熠的光芒。然后纳入其中的不仅有屋外传来的警车汽笛声，同样还有公墓门口那个疯子的歌唱。终于轮到我坐庄时，楼下的大街上走过一支送葬队伍。那个弱智女人死了。记得她还活着的时候，有时会让我们这些正处于发育期的孩子钻到她的裙子下面去偷窥。棺木是白色的，象征着贞洁。那是一月初的一天，下着雨，树木呈棕黑色，略微发黄的雪堆上出现一个个田鼠掘出的小土丘。是的，纸牌游戏对我而言，犹如伊甸园。在那里，我可以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不同的纸牌花色，也可以为此添加一些色彩。最重要的是，我可以简明扼要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再说吧，也不一定非得是杜洛克纸牌不可，它只是其中最五花八门的一种，或许正如人们常说的，杜洛克是“最美妙的一种纸牌游戏”。

眼下已进入夏季好几天了。尽管太阳还没有落山，可楼下出租公寓里的超市已经关门了。微微发红的光线从外面投射进去，货架看上去更宽更大了。像往常一样，那个老妇人提着那个塑料牛奶桶，正在

去沼泽地农庄途中。平日里，这个牛奶桶不过是黄昏时分让人再熟悉不过的标志，而现在，它却闪烁出令人诧异的白昼之光。那一座座住宅房屋依然半映在阳光里，而百叶窗已经全都拉下来了。一个穿着睡衣的孩子用手挡住刺眼的光线，走到露台门口，向难得提早下班、正闲坐在花园里的父母喊道："我睡不着。"在那些空荡荡的大街和那个诱人的空桥拱上，成群结队地站着麻雀。尽管百叶窗已使屋里暗了下来，但投射进来的光线依旧在电视机屏幕里的新闻播音员身上落下一道道斑驳的斜纹。

我过早地上了山，牌局天黑以后才开始。在此期间，我本可以下山去城里的咖啡馆看看报纸。后来我一再问自己，我为什么没有遵循这个习惯呢。每次我都在棋牌室门前拐弯，踏上通往高处的山路。山路崎岖不平，不一会儿便把绵延不断的山脊上露出的圆顶远远抛在了后面。迂回曲折的山路似乎总也望不到尽头，于是我边走边想："现在到了考验我的时刻。"我要坚持住，我从未抱怨过此类偶然发生的事情，我会忍住的。

天渐渐暗下来，山路变得空旷。就在刚才，这条山路还几乎和山下城里的街巷一样拥挤不堪。刚才这个地方还与一个被人开发的普通公园没什么两样，而现在，它向四面八方延展开来，俨然成了一片原始的岩石。

僧侣山的山脊并不是笔直的，而是重复着下方蜿蜒向四面八方的萨尔察赫河。它是由大河在汇入当年那个大湖的入口处淤积的碎石堆积而成的。那淤积的过程均匀且富有节奏，现在依然可以在山体的条纹图案上让人重新感受得到。那略微倾斜的花纹把整座山纵向划分开来。到了冬天，一片片雪花在条纹状的凹槽中飘扬，一根根冰柱互相紧挨着垂下，把这个条纹图案衬托得更加清晰。一片浅灰色的石灰岩把一块块碎石——一堆大小从指甲到拳头不等的鹅卵石——紧紧地聚合在一起，各种陡峭的凸出岩体、尖峰、切面和裂缝使僧侣山呈现出棱角分明与礁石林立的姿态。凡是石子石灰岩掉落的地方，岩石看上去像被火山灰遮盖了一样灰暗。山上的腐殖质层很薄，树根（一般都是山毛榉和橡树）从布满细孔的岩石底部生长出来。靠近主干道的几片低地里，一块块也就一个菜园子大小；或者便是难以涉足的沼地了。尽管这座山的四周都被城市环绕着，但它也完全不像一座"城市山"。一旦散步的人们离去之后，也用不着撇开不考虑这片山脊上那

些城市的东西（那些长椅，那些铺着柏油的小路，那些路灯），它又会回到那荒芜的景象之中。在山下不足百米的地方，浓雾已将城市淹没，而山顶上，月亮已当空高挂。从我头顶飘过的雪花，瞬间就在下面的广场上化作蒙蒙细雨。

如果把这座山想象成是由不断向前推进的碎石在三角洲地带堆积而成的话，那么难道就不能谈论它的“开始”与“尽头”吗？——就这样，我一直走到山的尽头。那里有一条台阶，半铺着旧大理石，半是混凝土（由于台阶高低不平，导致下山时两脚一再踏空）。台阶通往山下的米伦城区和萨尔察赫河。河岸边有一座疗养院，我已有好几次看到有人把棺木抬进去了。后面是一片平原，是新城区“列恩”和“里弗令”。探照灯的光束在足球场上方逡巡，鸟儿们则上上下下地在这束灯光里穿梭。我在台阶前又折了回来，取道旁边一条小路，朝山口处走去；不然的话，我就要迟到了。

含苞待放的紫丁香蓓蕾四周泛着一圈微微的蓝光。只见一块大大的黑布飞进一棵抽出新芽的大树里：原来是一只乌鸦。岩石上交叉盘绕着一条条闪闪发光的螺旋纹，撒上鸟食的纹路缝隙里粘着白色绒毛。灌木丛和及踝深的落叶中，孤零零地立着一道生锈的花园大门，没有篱笆，后面也没有房子，小路通往一条隐蔽的岩石带。雨水在山毛榉树环状盘曲的根上积聚起来。附近的树墩上趴着一只灰色的野兔，几乎融进了背景的颜色，像注视一个熟人一样看着我。

从岔路口拐出一条之字形的弯道，穿过大片草坡和洼地，一直通往山脊那边的小路。这条小路从山脚下开始延伸，最底部是一级几乎隐蔽起来的台阶，旁边是许多块岩石平地，在其中一块岩石地上矗立着一个小建筑，虽说砌着墙，但却像个小棚屋似的。那真是一个射击棚，也是射击协会的酒吧。射击场在这小屋后面，在台阶与岩石之间的低地里，那里原本是修花园的地方。星期三是箭弩协会的射击日（小屋门前的旗杆上挂着箭弩旗）：好些辆汽车现在停靠在停车场上，其中有几辆来自边界那边，挂着贝希特斯加登[16]地区车牌。只见一个男人正从汽车后备厢里取出一件形状像龙的包裹。一块固定在一根桅杆上的射击协会的宣传牌上写有这样的告示：“男女射击”、“定点射击”和“实弹射击”。从上方的台阶上看去，射击区域内只能看到一个个靶子；整个射击场地周围圈了一个木制的遮阳棚，射手们都隐身其中。每个靶子上都专门配有一盏灯，用于照明。而射击留

下的一个个射孔则显现出盲文似的图案。每次弩箭撞击后——一声十分单调的啪啪响——那靶盘连同箭就会通过绷在射击场上的电线滑到射手跟前来，随着他们放下箭又滑回去。就这样，从这个被灯光照得通亮的场地上接连不断地传来一声又一声啪嗒掉地的声音和嗡嗡声，同时却一个人影也看不到。在后方一块凸出的岩石上有一间狗舍，每当弩箭发出啪啪的声响时，狗舍里便会回响起一条杂种野狗令人悲悯的狂叫。在射击间歇时，可以听见一些说话的声音，大家开始了平平常常的交谈。其中一位说话人听上去好像是个结巴；当他说S开头的词时，交谈就带上了犹犹豫豫的虚拟语气，仿佛在说“或许有”，“或许是”。而交谈想要重新回到原来的话题上，诸如“胜家牌缝纫机”，以及单面绒布、精纺毛纱，还有珠光纽扣，则需要很长时间。

在台阶上方的草坡上——那些箭弩射手的声音已经听不见了——随着夜幕降临，那些密密麻麻的、呈太阳状的、像一个个小孔雀开屏似的相互交织的蒲公英花重新闭合起来了。在它白天呈黄色的地方，现在则都闪烁着毛茛微暗的瓷釉黄光（只是这些蒲公英显得更稀疏了，因为它们的花很小），而且一直延伸到上方的圆形山顶。分叉的茎长得又高又细，尽管山上没有风，但满坡的蒲公英都在那儿摇曳着身姿，更加衬托出夜晚的景象。这片山的岩石几乎到处都被草地覆盖，绿油油的草地像用彩笔涂染了一样，使岩石上的每根凸纹、每道弯痕、每道凹槽和每处裂口都更具有雕塑感。在这片广阔的山坡上，挺立着一棵接骨木树（通常仅仅呈灌木状），它是唯一的一棵树，几乎齐山顶高，树干粗壮，明显前倾，但依然让人感受得到与每一个倾斜点都有一定的距离：一根根弯成拱形的树枝一再来回向上摇摆着，而这棵树全然挺立在苍穹之下，就像蓄势待发一样。当我从这棵树旁走过时，看到那些枝杈里到处有像眼睛一样的东西（就像为了优化树种，人们要把别的树种那些被称作“眼睛”的胚芽嫁接到这些树上）：是那些夜晚栖息在接骨木树上的山雀闪亮的脑袋。登高远眺，山脚下州立医院那片地方尽收眼底。那里有一个被照得透亮的混凝土圆顶，上面有一张用石灰刷白了的直升机示意图。此刻，那儿正有一架货真价实的直升机在降落。与此同时，有一辆救护车停在圆顶边上，车后门敞开着，担架伸在外面。有一位晚来看病的人步履缓慢地穿过那个大拱门，来到大街上。在医院某个科室的楼梯间里，绷着几张网，像一些小饭店里的装饰，它们也许是用来防止病人越过栏杆跳到下面的大厅里。“我们可不想死在这里面，难道不是吗？”我听见

山上一个过路人这么说着。此间，天已经很暗了，也看不清说话人的脸。

这期间，山坡下沉成一个深深的碗状，像一个由于地下空穴坍塌而形成的灰岩坑。一边的碗壁几乎是垂直的，而这片草地上特有的岩石则又重新光秃秃地立在那儿，像一堵和房子一般高的墙壁。碗底是挡风的，墙壁上是一个个夹室和洞窟，那是无家可归者的栖身之地。此刻，有两个身影正蹲在他们简陋的屋子里，一块塑料布直盖到脖子上。一小堆柴火把他们的脸照得通亮。原来是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正肩并肩地蹲着，他们头发花白，脸色铁青，在他们脑袋跟前的岩石台上有几只饮料瓶。可是，两人都没有伸手去碰那些瓶子。他们几乎一动不动，只是偶尔会猛地抖一下，动作显得很突兀，又令人费解，就像是来自另一个地质年代的生物。当然他们也会彼此交谈，只是说话的时候，他们并不将身体转向对方，而是对着火堆说。突然，他们注意到上方碗壁上正在观察着他们一举一动的我，于是，他们沉默不语了，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了一阵，然后又把目光移开了。或许他们并不会做什么，也的确没有做什么，但仅仅这样一个目光，就让我感到我们之间似乎发生了些什么。我接着开始赶路。当我走到下一个看得见光的地方时，听见一位老妇人高声喊着："救命！"这会不会只是在开玩笑呢？

这光线并非来自路灯，而是从学生宿舍楼敞开着的门里射出的。因为有了这栋学生宿舍楼，整座山的照明区域变得清晰可见。可以看到，宿舍楼后面是一片菜园，而菜园后面又是一片树林。这座学生宿舍楼是一幢多层塔状建筑，它矗立在这个史前时代的碗壁上的样子，简直就像一幢摩天大楼。旁边有一座工作人员的小房子，一楼有厨房和餐厅。两幢房子中间有一条小路穿过。餐厅里，一个少年正独自一人等着吃晚饭；此刻，一位身穿白衣的厨房女佣正从一只大锅里舀出汤，盛到碗里，端给这位少年。这阵子，几乎所有住在宿舍里的其他人可能都已经回去过复活节了：塔楼里只有一间屋子里还亮着灯；屋内的柜子上有一只箱子，而楼下走道里停着一辆自行车，行李架上有一只足球。当厨房女佣把碗端到这个寄宿生面前时，他始终低着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吃完饭后，他把自己用过的餐具端回厨房，随后又回到餐厅里坐下，悠然自得地喝起水来。

到了上面的山脊路上，有路灯照亮，我瞥见了一棵山毛榉树干上有两条深黑色的成角度的线条。在来的路上，它们还不可能存在：那个被绘制在一块光滑的浅色山毛榉树皮上的战争标记不可能不吸引我的目光。我满脑子只是想着一个字：现在！我随即弯腰拾起一块碎石，便飞快地跑开了。在当年军事防御围墙的通道旁，我又偶然发现了第二处黑色的横杆，比那棵树干上的还要大，而且颜色——我从旁边跑过时顺手摸了一下——还没有干。或许我完全不会因此而认为，这就是万字符吧？这些标记不仅仅在这里可以看到，而且随处可见。此外，我在从事文物挖掘工作的过程中，已经对一个个古老的标志习以为常了。这个标志具有一种十分纯洁的涵义，或者不过是个纯粹的装饰而已。比方说，我回想起一块早期基督教的马赛克地板上那些鹤，它们的嘴里就含着万字。如此一来，可以想象，在这个新喷涂的和平标记上或许出现了同样的象征吧？不，这可是万字符啊！而正是这个标志，造成了我所有的阴郁情绪——所有的苦闷、所有的愤懑，还有强作的笑颜。而且，这个受到诅咒的标志并不是出于一时兴致或一时轻率而随便涂抹上去的，而是怀着恶意的精确和黑暗的决心画的，浓墨重彩，描绘得地地道道。这些画到极致的万字符或许就是跃入人们眼帘的大难临头。而且它们也跃入我的眼帘。我的？那我呢？一种独一无二的巨大冲动。

我边走边感到一股不同寻常的非个人力量，但它并非是从我手中的石头里焕发出来的。甚至连嘴里的牙齿也变成了武器。在山顶最狭窄的地带，整座山好像缩成了一个岩峰，悬崖峭壁前的栏杆旁站着一个身穿皮大衣的女人。在深深的下方，老城区那一条条小巷犹如一条条狭长而泛红的光带，嵌镶在那些昏暗而几乎无人居住的楼宇之间。那座神学院教堂的双子塔映照在这光亮里，在平缓的屋顶上面，那些闪亮的石头形象形成一个轮舞。白天里，双塔就像是国际象棋里的Turm [17]。而此刻，在周围一片黑暗中——那时钟的圆盘变成睁开的眼睛，外面的窗台成了额头上长长的脓包——这双塔则呈现出一副印度神像面具的模样，而楼顶上的轮舞塑像则是面具上伸向四面八方的一根根毛发。全城中最宁静、最强烈的光源则要数火车站铁轨旁一排排闪着红黄色光的指示灯了。小河上架着一座桥，桥上行驶着一辆接一辆的汽车，车辆倒映在闪闪发光的水面上，仿佛被放大了好多倍，看上去如同源源不断流动着的影子。夜晚，整座城市空荡荡的。无轨电车上的两根电线相互触动，咝咝地穿过各个城区，如同鞭子在抽打一般。

我边走边留意观察着路上的一切事物，顺便把一只躺在马路中央的纸杯踢到了一边，从杯子里掉出了几根吃剩的炸薯条。（前不久，粮食胡同里新开了一家麦当劳，并因其门面与周围的建筑物风格极为协调而受到了老城区委员会的表扬；许多孩子——也包括我的孩子们——都喜欢在那儿聚会）。有一只刺猬，四条腿是深色的，鼻子呈黑色，还有一对闪闪发亮的小眼睛。或许这只刺猬眼下刚从冬眠中苏醒，它刚从一大堆树叶中钻出来，便又在原地迷失了方向，再次朝着通往树林的方向匍匐前行了。在山下岩体里凿建的车库通风井，正排放着一股股废气，形成层层烟云，将圆形的山顶此起彼伏地围绕起来，行走时能够尤为清楚地注意到这一切。在这条路旁边，有一棵从中间被劈开的矮树，看上去像一根光秃秃的长树条，在伸手可及的树枝上，栖息着一只巨大的猫头鹰。当它面对我时，并没有张开翅膀飞走，而是竖起羽毛，将脑袋转向我，两眼紧紧追随着我。

在山顶，这条路穿过两道蜿蜒延伸的岩壁，从而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山隘。在一个地方，这条山隘“并非空空如也”，不管怎么说，我就是这样边走边看到的。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喷头（一看到这个东西，我心里就想到了一枚“炸弹”），之后又是一只按着按钮的手指，最后才终于看出与之相关的形状。这个形状始终没有轮廓，但它却立刻有了一个名字：魔王[18]。在一本据说按字面直译过来的《圣经》里，通常的“恶人”或“鬼怪”就叫这样的名字——人们的确总会遇到一个个怀有敌意的面孔。然而，这个面目全非的魔王却是最大的仇敌。之前，我就已经多次感觉到了它的某些东西，尽管每次只是在人群中，在路过时：一个动作怪异的指关节；一个灰白色的口腔；一只像鳄鱼爪般光秃秃的脚；一只仿佛同时流露出各种色彩的眼睛；一个吹哨子吹得鼓胀起来的脖颈。然而在这里，我终于看清了他的全貌，不是在人群中，而是只有他一个人。

这个跑动的人变成了跟踪者，而这个跟踪者又叫“闯入者”。他心里想的不是“我不被允许”，或者“我不应该”，而最多想到的只是一句话“为了取悦自己，我更应该……”要不是他依然站在路中间的话，或许我就会不顾一切地从另外那个人身边跑过去。然而，一块石头扔出去了，那个敌人随即倒在地上，他是实实在在被击倒的，如此猝不及防，就像童年时一只被我（不过我是无心的）用一颗小石子从远处打中了脑袋的公鸡一样——不过，唯独令人惊讶的是，那只公鸡随后又站了起来，逃之夭夭，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不是随随便便扔去的，而是睁着眼睛。然而，在扔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周围的环境，而是奇怪地、眼睛瞪得老大地看着自己的脸。这张脸看上去既没有扭曲，也不平静：更像一个陌生的第三者的脸，或者更确切地说，像是一个到此仍不熟悉的、而今终已现身的、十分亲密的亲人的脸。

此时此刻，我或许还没有来得及（哪怕只是一瞬间）把另外那个人看成动物，就想起了另一个与动物有关的事情：当时，一群孩子把小石块扔向一只猫，边扔边说道："要是我们打中了它，那就说明我们没瞄准。"而我正好相反，瞄得很准。我迈开步子全速前进，做好投掷的准备。这时，我满有把握认为自己会打中目标，而且会是致命的一击。

起风了。在这孤零零的山顶上，常常会突然刮起风来，没有阵风先打前站。它立刻就冲过来，仿佛那条穿越巴伐利亚平原的道路正是它的助跑道，而这里的阿尔卑斯山边缘是它的目的地。从附近传来的各种噪声，刚刚还清晰可辨，但瞬间就消失殆尽了。取而代之的是，狂风夹杂着远处各种细微的声响一并呼啸而来。突然，一块木板轰然倒地。一匹马也嘶鸣了起来。屋门口站了一个人，正在放声大笑。一声锤击后，紧接着是一只金属桶发出的叮当声。从一间坐落在城郊的小教堂里（也可能是从教堂后面的村落里）传来了钟声。而此时听到的阵阵掌声，或许正是从国界另一边传来的。

黑暗中，有一只天鹅用力地拍打着翅膀，在黑暗中闪闪飞越过山顶。阵阵冷风卷来了大片云朵，厚厚的云层如潮水一般把天空迅速遮了起来。月光从云雾团里探了出来，但不一会儿就又消失了。山顶上的树木不停地来回摇晃，使得山下平原里产生了一条猛烈晃动、并不断颤抖着的灯光带。从树冠上传来了隆隆声，就好像一支飞行大队从此地经过一样。天空中一颗星星也看不见；附近的一个云缝里，有一颗卫星闪烁着迅速从大气层里穿过。树上新长出的嫩叶仿佛从树枝上被吹落下来，以至于有些像成片死去的珊瑚礁一样的东西在岩石上来回摇晃着。定睛一看，原来是几个像被遗弃的鸟巢一样的槲寄生球。这座山是无法让人探个究竟的；同时我在想，它为这大自然敞开着大门："这就是大千世界！"平原上那五彩缤纷的灯光，连同我头顶上那些像鸟喙一般张开的空山毛榉果壳，构成这个相应的国际都市。

我俯身蹲在那个奄奄一息的人跟前。他两颊鼓起，看样子，好像是用腮呼吸似的。从他的衣兜里传出了一个小收音机的音乐，几乎难以听得清楚。这名男子穿着一双鲜艳的齐膝高的长筒袜，上衣的肘部有几块浅色补丁，这不禁使我联想到某种袖章。他看上去年事已高，头发都已花白；或者他事实上还很年轻，只是现在就像动画片里一样突然变得白发苍苍，满脸皱纹了呢？我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恶心——有点与躺倒在地上的这个人感同身受的滋味：一种不久于人世的感同身受；再也不需要有什么教名，无非就是一个类似“濒临死亡的奥托”或“濒临死亡的埃尔温”一样的人。突然，这个白发苍苍的人确实做出一副充满厌恶的怪脸，连这个蹲在一旁的我也不由自主地做出怪相来。

脸上依然带着这个怪相，我迅速地从狭路上抽出身来，踏上了那个斜坡。岩壁离得很近，我将这名死者弃置不顾了。自然，我鬼使神差似的来到这个行将坠崖的男子身后，刹那间，我险些和他一起坠落下去。

有时候，那些跳崖自杀的人掉下去时，不是砸穿了那一个个屋顶，就是撕断了那一条条无轨电车的电线。然而，这里是大山背对老城区的一面，山脚下是很少有人涉足的梯地，是隐蔽的森林角落。刚才发生的这一幕——就在坠落的那一瞬间，我心里一清二楚——或许是永远都说不清的谜团。我的人身自由并未受到威胁。那具尸体会在山下从容地腐烂掉。可尽管如此，还是确信不疑，自从扔了那块石头以后，一直就有某些东西冲我而来——不是诉讼，不是调查，也不是想引渡犯人的愿望；而是——我终于找到了这个使我重新恢复理智的词——挑战。

我又回到了那条狭路上。先前用来投掷的碎石块还在那里，于是，我又把它抓起来，用它去刮岩石上那个只完成了一半的神秘符号。不断的摩擦使这块碎石在我的手里开始发烫，闻起来有火石快要迸出火花前所发出的气味。我坐在一个树根上，树根是从一堵墙里钻出来的，高度和一把折椅差不多，就位于事发地点对面。山路在这个地方正好拐了两道弯，于是我从石道上看去，眼前出现了一片独立的岩体，形状像一个金字塔身，上面覆盖着青草和树苗，就像是一片废墟。片刻间，矗立在这里的是中美洲原始森林里一座神庙的废墟。接着在路灯下，那块岩石看上去像一个灰蒙蒙的马蜂窝，上面布满了黑

乎乎的洞窟，看上去孤零零的，同时又充满生气。堆在岩石基座下方的树叶在狂风中来回涌动，又是不停旋转，又是骤然上升，又是波浪翻滚。这时，那个布满黑窟窿的蜂窝突然掉转方向，蹦进了一个石灰色的牡蛎养殖场（所谓的牡蛎，其实就是从悬崖峭壁中隆起的壳状砾石）。在这个养殖场中心，那个被刮去的符号标志着一个空旷区域。在我看来，这个区域现在又成为鹤、海鸥、翠鸟——这个无声无息的世界——的天地。此时，我感到一种虐杀别人的喜悦。我甚至大声地咂起舌头来。“这就是我的故事，”我心里在想，“我的故事就是我的寄托。”正义得到了伸张，而我属于罪犯之流——一个最四分五裂、孤立无援的群体。

这座山很大。似乎没有血会从城市喷泉里喷出。似乎没有一个动物会开口说话。“山应该是空空如也！”（我这样大声喊道。）此刻，我才意识到：就在那个行将死亡的人弥留之际，我馈赠给他的仍然是一声咒骂，而且对这具坠落悬崖的尸体，我又送去了同样一句话。我的悼词是这样的：“你终于可以什么都不是了！”

在这狭路的尽头，出现了一个正在跑步的女子。然而，她的出现并没有”——减弱山上的空寂，反而使山更加寂静了。此刻，她就是美的体现。她留着一头金发，身穿一件在黑夜中发出消防栓的蓝色的跑步衫。她从身边迅速跑过时，笑着朝这个坐在树根上的人看了一眼。于是我也对她笑了笑。“今晚真美，不是吗？”——“是啊，这条狭路今晚就是永恒的存在。”那女子边跑边把玩从手上摘下来的手套，犹如在玩两个小丑一样。只见这对小丑时而来回摆动，时而向上弹起，时而折弯下来，时而又互相打闹起来，时而又相互拥抱在一起，而且与此同时，他们没完没了地交谈着。一只满身花斑的猫跟在那个跑步的女子身后跑过来，像是逃亡的样子；而追踪它的是一片小小的黄杨树叶，它几乎贴着地面在飞动。

当我又站起身来时，由于出乎意料的疲惫，我自然几乎无力再继续前进。棋牌室就近在咫尺（我是不是已经迟到了好几个小时呢？），可我似乎永远都到不了那儿。我被拽到了山路的一侧，掉进一片沉睡的低地里。我闭着眼睛，懵懵懂懂地离开了那个地方。这时，我身后传来了喘气声（原来是一群跑步的人），可我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我茫然地感受着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仿佛我在山下的平地上沿着那条运河边走去。当我终于再次睁开双眼时，只见山路清洁

工那把大扫帚靠在一块石板旁边，异乎寻常地结实。石板对面是那堵恭候已久的屋墙，犹如在强光的照射下，粗糙的墙面泛着白光，一扇扇窗户被照得通亮："我来了。"是谁这样对谁说话呢？

另外那些牌手里，有一位神父、一位年轻的政治家、一位画家和主人。他们坐在主人的藏书室里。室内除了书，几乎什么陈设都没有。地面铺着宽木板，打眼看去，木板上的孔节仿佛在雪茄冒出的烟雾中不停地动来动去。正在打牌的人见我进了屋，便暂停了牌局。在我进门时，神父解释道，那张浅色的槭木桌的桌腿是圣安德烈十字架的形状，这位圣徒曾在一个X形十字架上受难。我碰巧叫"安德烈亚斯"，这名字引来哄堂大笑，也让我自然地加入了牌局。我坐到牌桌前，将扑克牌摆成一个扇形，仿佛压根儿就没有迟到似的。

进门之前，我还在楼下的门槛旁站了良久。这道门槛是由一根根粗细不一的圆形木桩组合而成的。木桩的顶端直打进地里。每根木桩上的年轮各异，它们总体上给人的印象如同一个交错啮合的齿轮组，或者由于木头里的裂缝呈散射状，更像相互嬉戏的日轮。门口左右两边覆盖着深绿色的植物和两棵夹竹桃叶尖儿。门槛和夹竹桃都被安装在门楣上的一个射灯照得通亮，是要告诉人们，这里现在是一间棋牌室。"门槛，奏乐吧，"这是刻在大门上的一句古代铭文，"不停地奏乐吧。"

开窗的那堵墙上没有藏书，上面挂着画家的几幅画作。画作既没有装裱，也没有装玻璃，看上去像从墙里长出来一样：这些画作中有一幅铁锈红的、一幅硝酸灰的、一幅霉菌银的、一幅砖红的和一幅松脂黄的。与一般画作不同的是，这些画的色泽没有弥漫到屋内，而是浸润在原画中。据画家所说，"如果将色彩紧贴在玻璃窗上呈现的话，其光度就会取得更好的展示效果，这是我想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尽管有一个男人很长时间以来就居住在城里，可他依然是这个圈里的陌生人。他的眼睛始终让人无法看得见，它们如此深地陷在眼窝里，以至于看上去有点像假面具上的视孔。他的声音有时听上去就像个小孩儿一样，轻柔，不做作，从来不用在说话前先清一清嗓子。他一再拖延牌局的进程，因为每当轮到他出牌时，他总会在自己的牌上发现一种特定的花色，从而使他要对此详加评述。（或者他有时候

弯下腰去，伏在地毯上，看上去好像要把那个酒红与钴蓝相间的图案涂抹到脸上似的。）他的身材极其矮小，脑袋正好高出了桌沿。每次发牌时，他都必须站起来。他要吃进的牌也只得让人推到他面前。

楼梯间里四处弥漫着一股苹果的香味，香味如此浓郁，让人觉得就像在一个专门存放水果的地窖里。尽管棋牌室里闻不到果香，但每每踏进门前时却觉得更加清爽了。然后，从楼下的厨房里时不时会弥漫出烧菜用的调料的味道，当然了，谁都几乎说不清那是些什么调料。主人一边打牌，一边还总惦记着正在烹饪的菜肴。所以，每回轮到他休息时，他总会在一旁猜测着调料的名称：百里香？鼠尾草？肉桂？有一回，窗户短暂打开时，便听见有人在说："已经闻到了他预报的降雪。"（"他"指的就是气象预报员。）

屋子里并不安静。通往藏书室和各间卧室的旋梯上总会听得见脚步声；楼下，有人正摸索着穿过房间，那声音又轻又急，像动物的爪子发出的声音。从屋外传来一阵抓门的声音，一只猫被人放了进来，只见它一路小跑窜到桌子底下，舒舒服服地躺在那里。这只猫脸上的毛呈深黑色，眼睛是黄色的；一旦它闭上两眼，整个脑袋就只剩下漆黑一团了。

楼底下一间屋子里，有人在拉大提琴。那低沉而持久的乐声为整幢房子增添了一种动听的氛围。随着大提琴乐声的回荡，那时间的节奏也放慢了：几乎每个从屋外路过的人都会驻足聆听；屋里打牌的人也会时不时地停下来倾听着。看样子，仿佛对这些听众来说，在这时而悠长时而短促的乐声中，那一个个事物都停滞不动了，就像传说中的俄耳甫斯[19]的声音一样。与此同时，那也是一曲轮船上的音乐：藏书室天花板上的护板就属于那个对应的轮船大厅，而镶嵌在三角墙里的椭圆形小窗就相当于舷窗。

这时，大提琴的演奏戛然而止。随后响起了葡萄酒瓶开盖的响声。走道里又响起了电话铃声。（"不是我的"，主人这样说道。与此同时，有人从楼梯上跑了下去，可能是个年纪不大的人。）在那漆黑的花园里，有一棵冬青树上的长春花闪闪发亮，树上有一团黑糊糊的东西一动不动，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乌鸫。花园大门前的柱脚旁，卧着一头石狮，大小和兔子差不多。此时，在山下的城里，那家出售香烟报纸的正在营业的小店前围满了人，这就是"晚间烟店"。

停在火车站的那一列列火车看上去五彩缤纷，无比巨大，就像是那些更大些的城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那里既是它们的起点，也是它们的终点；而轨道则像一座横卧的金字塔一样。在距离火车站较远的地方，那座监狱围墙上尖利的玻璃碎片看上去像迥然不同的金字塔。

我们在山上的牌局打得很仓促。要说有一个人走了神，那就不用再说了，其他人哪里还会有心思玩下去呢？可是，我们大家都完全专注于打牌。我很少玩得这样干净利索，甚至每次都想赢牌。这期间，只是没有什么乐趣可言，最终无非就是一场索然无味的自相残杀而已。尽管如此，可我们就是停不下来。尽管我们平常都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可是牌打得越久，我们彼此就越觉得陌生，甚至连搭档都置之不顾了。即使我们谨小慎微地维护着游戏规则，可我们的眼神和手势却是作弊者的眼神和手势；而这样的作弊则意味着：你要玩就一味地玩下去吧。此时此刻，聚会笼罩在一种普遍的沉醉之中。我们中不会再有人会感到自己在场——而那个我们本该早就待着的地方，此刻“一切都为时太晚”了。一方面，这五个沉醉其中的人开始发起牢骚，而另一方面，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继续玩下去：主人不停地斟满酒杯；画家每瞥上一眼，就会在屋里高声叫出一个新的花色（哪怕只是书本背面的几个霉点）；而神父则与众不同，他是一位享有盛名的杜洛克研究大师，又撰写了一部关于该游戏在欧洲各国发展史的论著，他总是出其不意地向大家提出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和特殊规则，且一个比一个奇特，一个比一个复杂（尽管这些规则并非每次都对他自己有利）。

唯独那个政治家可谓是竭尽全力，寻求转机。他表现得好像自己是这次聚会的负责人。而这个夜晚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一次随便的聚会，而是一种考验的时刻。恰恰在休息时，他就始终跃跃欲试来证明自己。他感到自己受到挑战，要向人们展示自己有能力应对各种状况。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机会，他都不放过，立刻会果断地参与其中。要是屋里出现一只老鼠，他便会去叫醒正在熟睡的猫，并赶它去捉老鼠；要是一只玻璃杯掉到地上，他便会立刻把散落着碎片的周围区域都封锁起来——就好像那里发生了一场大灾难似的——还会像一个维持秩序的人一样向那个拎着铁锹和扫帚前来的人招手示意。一些别人心不在焉或犹豫不决的地方，对他而言却如同一方乐土。然而，他当初用以证明自己的领导才能、活力和掌控权的每一刻，现在看来，无非就是给别人带来不快。他的一言一行就像是一个坐在一条超

载的小船里的人一样：他一个劲地使劲摇动，试图把熄火的引擎发动起来，结果却折腾得更难发动了；与此同时，他的动作幅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坐在他左右两边的人轮番被他打到脸和肚子；最终，他用尽了一番力气，却使小船难逃被掀翻的厄运。为了让几个打牌的人重新聚起来，他首选的方法是寻找共同点。由此，他发现，主人和画家每喝一口葡萄酒后放下玻璃杯的方式是相同的；而在神父和主人身上，他又发现了一个共性，两人眼镜的镜片度数是一样的；而我“这样一名老师”，则和他本人有一点是一致的，尽管我们打牌时不是搭档，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癖好：喜欢把扑克牌用力扣在桌上，而不是拿起来。

但这位政治家还是输了，是我们大家之中最显而易见的；他惊诧地瞪大眼睛，豆大的汗珠从发际上滚落下来。最糟糕的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这样一个场合里不具有掌控权，而是一意孤行。恰恰正是这一点，自然把其他人渐渐地相互拢在一起了。刚才还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的他们，此刻却在暗暗地互相使着眼色，甚或在偷偷地抿着嘴笑。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桌下轻松地伸开两条腿。唯独就缺少那样一句或许能够带来气氛骤然转变的话：然后，这样的时刻也来到了，简直莫名其妙，有人顺便提起即将到来的复活节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再过三天，钟声又会响起了。”这就是转机：我们无拘无束地打完了最后一轮，接着便下楼去餐厅吃夜宵了。

随后，主人提议在壁炉里生火。话音刚落，大家便争先恐后地要去点火。山毛榉劈柴已经几乎发白了，这些劈柴没有被整齐地码放起来，而是横七竖八地堆在宽敞的入口走道里。牌手们手里都拿了几块劈柴，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壁炉室。门外过道里的电话机旁，一直站着一个半大小子，那是主人的儿子。他背对着大家，把听筒紧紧贴在耳边，丝毫也没有转过身来看一看那哄哄嚷嚷的情形。（“自从放假开始到现在，一直就是这样。”他父亲说道。）

餐桌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门关上了，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这些牌手坐在那里喝酒，天气预报有雪，雪花（有人说是“最后一场雪”）从黑暗里（“成群结队的鬼眼睛”）飞出来，飘落到窗户玻璃上，刚开始还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但随后就无声无息了，好像玻璃上张开一个什么东西似的。主人的儿子继续在走道里对着电话机嘟哝

着。每一片飞舞而来的雪花都像是一种象征，既不确定，又无法确定。

我用指尖轻轻地触了一下太阳穴，就像是在感到沉闷或者疼痛时一样。我把椅子推回去，转过身去问神父："在宗教传说中有没有门槛的说法呢？"——"是作为物体还是意象呢？"——"两者兼而有之。"

当神父思考这个问题时，其他人也纷纷议论着，犹如他们也意识到了似的。

主人说："我们这儿的猫从来不会莽撞地从门槛上跨过去。它们每次跑到门槛跟前时，都会停住脚步，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地面。有时候，它们还会避免和门槛接触，直接从上面跳过去。只有在逃跑的时候，比如被狗追赶时，它们才不再会在门槛前迟疑：这时，跨过门槛进入屋子里才是上策。反而追赶的那一方自然会在那里犹豫起来。"

那位政治家说："我总是反复做着两个有关门槛的梦。在第一个梦里，我光着脚，从门槛上滑到门柱上，原因是，无论这个门槛的材料是木头还是石头的，表面都很光滑，边缘还被打成了圆形。但我每次都会安然无恙地滑到另外一边，而受到惊吓是有益的，因为我在滑倒时一直问自己：我在哪儿呢？而且正是由于这样的惊吓，我才明白自己究竟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门槛就有点像跳远运动员的踏板。而在另一个梦里，它只是一个房子的门槛，况且就像如今的新式楼房一样，只是一根金属条。但我总是跨不过去。在整个梦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只是站在那敞开的门前，打量着自己的脸在脚下的金属门槛里映现出来的模样。当我终于抬起头来环顾四周时，只见身后有一间玻璃房，里面有几个同声传译员正等着我开始一番演讲。"

画家说："有一些古老的民族，他们相互那样仇视，以至于一个民族将另一个征服之后，便将该民族寺庙中的雕像砸成碎块，用来铺成自己家的门槛。在一些民族文化中，门槛前画有迷宫似的图案；正如人们所说的，这些图案与其说是用来辟邪驱魔的，倒不如说是让人驻足，并且建议绕而行之。对我个人而言，这些门槛完全不成什么问题。换句话说：我对此还不够成熟。然而，有时我也在想：如果门框上方可以画上画的话，那该多好啊——那么为什么脚下这些门槛就不

能通过颜色形态变得可让人辨认呢，或是干脆涂好色彩后再铺设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此间，神父始终聚精会神地听着，然后他说道：“就我所知，门槛作为物体很少出现在传说故事中。有一位先知预言说，神庙会经受强烈的震动，即便是石头门槛也会被掀起。但是，门槛作为一个意象却屡见不鲜，虽然通常会用另一个词来表述。在一些相关文献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门槛’这个词语旁大多会有一个箭头，并且注明：见门。门槛和门（或大门）都是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这个整体在《旧约》中指的就是城市，时而只是尘世间的——怒吼吧，大门！咆哮吧，城市！——时而又是天堂上的：上帝热爱锡安的大门[20]，胜过雅各布所有的帐篷；而在《新约》中，它时而象征诅咒——象征地狱之门——时而又象征拯救：我就是一扇门。凡是穿过我进来的人将获得拯救。——然而，在人们的通常意识里，门槛则意味着：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的过渡。但我们或许很少意识到，其实门槛本身也是一个区域，说得更确切地说：一个特别的区域，一个考验或保护的特别区域。那个约伯贫困潦倒地蹲在上面的垃圾堆，不就是这样一个用来考验的门槛吗？从前，如果有人逃到某户人家避难，不也就是坐到那户人家的门槛上吗？一个像‘门厅’一样的古老词语不也正说明门槛是一个逗留的地方，是一个特别的空间吗？可是，如今的学说表明，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门槛已经不复存在了。近代有一位哲人说，对于我们这辈人而言，唯一保留下来的门槛就介于清醒和梦境之间，可就连这个门槛也几乎被人视而不见了。唯独对于那些精神错乱的人而言，举世共睹，它公然突显在那日常事件中，就像那些被摧毁的神庙所留下的残垣碎块。他说，门槛不是界线——内在和外在的界线都越来越多了——而是地带。在‘门槛’这个词里，似乎包含着转变、洪流、河中浅滩、马鞍、障碍（是避难的障碍）。正如一句已经几乎失传的成语所说：‘门槛就是泉源。’而那个哲人则如是说：‘正是那些门槛，无论相爱的人，还是朋友，都从其中汲取了力量。——可是，如今（这样继续说道）要是不在我们自身中重新找回那些被抹去的门槛，那会在哪儿呢？通过我们自己的创伤，我们才会得以康复。即使天上不再下雪，那雪花也会在我的心里继续飘落。’每一步，每个目光，每个表情，都应该意识到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可能的门槛，并且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创造那些失去的东西。然后，这个改变了的门槛意识就会把人们的注意力重新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上，接着再从这个转移到下一个上，如此类推，直至地球上重新

呈现出一场和平盛宴，起码对于这一天是这样的——然后，每天再继续循环往复下去，有点儿像孩子们玩的游戏一样。在这个游戏中，石头磨剪刀，剪刀剪纸片，纸片包石头。——这就是说，门槛作为力量的聚集地或许并没有消失，而是可以说，变得符合要求，是内在的力量。在这样的门槛意识中，至少每个人都可以让其他人自然死亡。这样的门槛意识就是自然宗教。再多就不用承诺了。”

神父坐直了身子，朝在座的望了一眼，好像他还想把自己的说教依然继续下去。可是他接着出乎意料地笑起来，深深地吐了一口气，接着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开始讲述起来。这时，他恰好想起父母家里那个石头门槛。当年他常常“光着屁股”坐在上面。那门槛是由一块花岗石凿成的，可它并没有铺在屋门口，而是在木头谷仓门口。相反，屋门前的门槛则由一块简易而宽大的赤松木板制成，上面有一个深深的孔节格外引人注目。雨天里，他和兄弟姐妹常常在那儿玩玻璃弹子。有时候，手指会被粗糙的木板擦破皮，或者会有木刺嵌入皮肤，导致后来化脓。

此刻，那些听众也想起了早就被遗忘的往事。于是，大家开始七嘴八舌争先恐后地交谈起来，以至于最后只听得一个独一无二的多声部讲述。

“坐在屋门槛上，就有点周末或者下班的样子。一项义务完成了，人们可以休息了。如果那些路过的人看见你这样坐在屋前的门槛上，他们会变得友好。你这会儿待在自己应该待的地方。有一次，当一群半大的孩子手里拿着棍棒紧跟在在我身后时，我并没有为了躲开他们而逃进屋子里，而是在门槛上等候他们。于是他们同我打招呼，向我点点头，仿佛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有些门槛很高：你跨过门槛时要抬起膝盖，脑袋会撞上门框。坐在门槛上，则意味着：这里的房门可能就没有上锁！当然，这时候你也做不了多少事情，最多就是吹吹肥皂泡，或者脚后跟和肩膀抵在门框上看看书。妇女们习惯于搬一把椅子坐到门槛上，做些编织的活儿。而我则经常坐在门槛上，观察外面的暴风雨，任凭一颗颗雨点和零零星星的冰雹轻轻地打在身上。当时，我的祖母哮喘病突然发作，她从屋子里冲出来，恐惧地站在门槛上喊了几声，便窒息而亡了（最后的几声喊叫像吱吱的尖叫声）。早晨起来，门槛上有时会有死老鼠和鸟儿羽毛，上面还粘着残留的内脏。每逢复活节前大扫除时，门槛都会被彻底地冲洗一遍。于是，只

见热腾腾的雾气袅袅升起，门槛则又呈现出它最初的模样，且气味也变得很好闻。到圣灵降临节时，门槛两边则用一小棵桦木加以装饰，显得格外喜庆。父母房门前的门槛对我来说特别高。而邻居家门前的门槛上则刻着少见而奇特的字，那个门槛是用一块上世纪的墓石凿成的，现已破烂不堪。据村里人说，地震时不应该逃到室外去，而应该跑到门楣下方的门槛上站着，因为那里比较安全。对我而言，‘门槛’还包括‘拆除’的涵义，因为门槛的木头需要不断频繁地更换；不过它也会首当其冲地遭到霉菌的侵蚀。显然，门槛只出现在农村，城里人已经把它遗忘了。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最美的门槛当属一个钟乳石洞入口处天然形成的门槛了：那是一条从一片黏土中向外延伸的坚实稳固的光道，四周呈圆弧形，向洞里望去，只见巷道下方又伸出一条巷道，像玻璃一般透亮。而我所体验过的最美的门槛则是一间厨房门口的门槛。门槛铺着一块地毡，上面钉了一些图钉：没完没了地说了一整天话之后，我又会重新回到这些物体身边；‘门槛就是我的归属’，我是这么想的，且坚持这样的想法。记得童年时代，有一次，我站在一扇紧锁的房门前，冲着门大声喊叫，然而，我喊的不是‘开门！’，而是‘你快开门！’—而且每次走到森林的门槛上，在踏进去之前，我也会同样喊道：‘你快开门！’在那积雪覆盖的门槛上留下了鸟儿的足迹！那么，门槛-恐惧的反义词是什么呢？——是附带好处。”

大家都纷纷求助于那个提问的人，问他是不是想要对在座的各位进行一次“测试”。他的回答是：不是，不是测试，而是想让大家讲述。“因为我注意到，除了这个有关门槛的问题之外，没有其他话题可以让大家畅所欲言了。”

在这兴致勃勃的讲述中，甚至有人打断了正在打电话的主人的儿子，也想听听他对门槛的理解。但他只说了两个字“干扰”，便又躲进墙角继续打他的电话了。

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沉默起来。然而，这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谈话间歇的停顿。讲述好像更加在沉默中继续下去，而且以这样的方式变得更为意味深长。每个人都越来越深地沉浸于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并在那里与另外那个人相遇，因为他现在与之无拘无束地拥有一切共同的东西。“那毕竟可以说是我们了。”（为什么我可以说“我们”呢？——我们可不是许许多多的人。我信赖的就是这个“我们”。这毕竟

是事实啊。）有一个人放声大笑起来，看样子很突然，另一个人点了点头。或者在一轮喝酒时，有人在桌子上划了一道线，下一个人要接着继续划下去。

大家都已经不再喝酒了：主人忘了给大家添酒，客人们也忘了把杯里的酒喝光。雪茄熄灭了，烟斗不冒烟了。反而有一股榲桲树的气味扑鼻而来，从屋外吹来夹带着雪花的微风。主人不再扮演主人的角色了；“主人”，有人这么叫道，然而，主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声是在叫自己：他只不过是偶然聚集在一家小酒馆里的一群人中的一分子而已。

这些人在各自的沙发椅上正襟危坐，仿佛靠背成了多余的。他们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吗？不，那个事件——这样的讲述——已经发生了。在那个化为焦炭的火堆里，我们共同的眼睛认出了一座灯火通明的夜间大都市。在这座城市里，呼啸声接连不断，闪光纵横交错，隆隆声不绝于耳，光与影的队列从这一端奔向另一端；时而有一道道闪光穿越，就像救护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过。奇怪，目光遇着火就变为凝视，碰到流水却常常避开。

我们并没有在等待。尽管如此，依然缺少一个人。直到女主人进屋后，我们才意识到她之前一直不在家。她刚从什么地方回来，身着一件颜色如子夜星空般的深蓝色节日礼服，脚穿一双如鸟喙颜色的黄靴子。她径直坐到我们中间。她弥补了这样一个圈子。男人们在她身边一个个都显得胡子拉碴的。尽管这位女士的脸被宽帽檐遮在下面，但依然难掩其满脸的倦容。这是一种幸福的倦容：她肯定刚刚经历了一些什么（一段音乐？一个雪夜？）。就这样，她落落大方地参与到我们那要澄清一切而沉默不语的讲述讨论中来。屋子里暖洋洋的，但从她的大衣里弥漫出一股寒意；衣服上的起初还片片成形，但不一会儿就融化成一颗颗小水珠。这时，一只盲蛛迈着长腿穿过大家的视野，球形身体在其下面的影子映衬下显得格外硕大。有一只像小猫一般大小的枭在窗户前不停地嘶叫着，它距离窗户如此之近，好像立刻就会栖息在窗台上似的。邻居家的房屋清晰可见，一堵黄色的墙上爬着一棵紫藤，那如手臂粗的树干相互缠绕蜷曲着，好似许多轮船缆绳的绳结一般。一棵白桦树在昏暗中显得格外明亮，树上垂下来的枝条让飘落的雪片打得来回晃动；空寂中，一根树杈在轻微地颤动着：刚才一定有只小鸟从那儿飞过。一棵紫杉呈星状拔地而起，满树的针叶

也呈星状，它像一个路标一样，指向那个马鞍形低地上的拱门。那拱门将山下沼泽平原上那稀稀疏疏却越发显得明亮的灯光嵌镶起来。

大家在屋前互相道别。这里的路分别通往好多方向。飘落在路边的雪花，通常都会立即融化掉（唯独在那些半卷起的黄杨树小叶片里，雪花才会留得住，从而使整个灌木丛变成了一个雪白的发光体），此刻把那一条条分岔装点得格外分明。人人都拐向各个不同的方向。主人转身穿过屋前花园回到屋里。他的妻子站在楼上一扇敞开的窗户前，远远地望着我们离去，她身上散发出的一种独特的魅力：她不是那种令人出神凝视的女人，而恰恰相反，她是会引发你思考的女人。这座房子外墙上挂着一盏灯，是院子里照明用的。片刻间，它好像属于一个山村似的。

我没有沿着回家的路下山，而是拐到了一条小巷里。巷子极其狭窄，两个人都难以在里面并肩行走。巷内的弯道呈之字形，拐了一个弯儿后便又重新踏上了通往老城区的大道。突然，从拐角处的一排房子里传来电话铃声。铃声只响了一下就停了，仿佛响起的那一声只是为了向人们发出一个信号似的。此刻，我只想一个人投入这漫天飞雪的怀抱中。下山途中有一段上行的路，但那段路通往树林对面的另一座更高的山峰：我想象着自己正在温特山山脊上走着夜路，两旁除了光秃秃的石灰墙外，什么都看不见，所以只好什么都不去想，一心一意地扶着身旁的栏杆赶路："就在那儿！"

在山下两条路交汇的地方，我遇见了那位画家。他正冲着一道岩石上的裂缝出神地观看着。裂口上覆盖着一株攀爬植物——其实不只是覆盖在上面，而是完完全全地塞满了。画家手里捧着那株植物沉甸甸的垂摆，上面开满了一朵朵蓝茵茵的小花，在片片绿叶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灵动可人。雪花被风吹成一堆，融化，然后又结成冰。在这样的雪地里，那片蓝蒙上了一道十分古老的冰川的色泽，那垂摆就是对应的冰舌。再久久地看去，这片蓝就会被映衬得更加鲜明。随后，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人们在考古发掘时常说的一句话："你们首先得找到那些边缘。"画家一边晃着手中那条用植物编成的长裙，一边冲着我喊道："这些五彩缤纷的颜色流动起来多有意思啊！"再说："各种各样的颜色到处都是！"再说："这些颜色应该行动起来！"

我们一起从这条所谓为节日文艺会演铺设的台阶上走下来。当走到最后一个台阶时，画家停住了脚步。他一只手指着我们身后那片悬崖峭壁，另一只则指着前方那戏剧节剧场，并且说道：“并不是什么门槛或许使我止步不前。我更多是在一个边界上停住了脚步。或者：即使我没有停下脚步，可内心深处有某些东西也被叫停了。随着进入内心深处，我的体内有某些东西停止呼吸了。有些人说，他们会在心灵深处被坏情绪所攫取。要我说，这是一种掩饰：这是因为，如果那坏情绪可以通过呐喊得以释放的话，那它肯定就会成为一种痛苦。每当我走到这里时，我都下定决心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可是，我经常走着走着，那个边界会再次袭上心头：即使眼前一片五彩缤纷也无济于事，甚至就算我跑起来，也感觉不到有丝毫的风能让我透透气。这其中，关键的问题或许压根就不是那拥挤的人群——比如说，这会儿城里空荡荡的——而是那占压倒优势的中心区域，那拥挤的人群是填不满它的。或者情况会不会正好相反：没有任何东西能将这个中心区域填满？所以，结果只能是一片混乱不堪的拥挤——大家你推我搡，跌跌撞撞，相互抄近路拦截对方，这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没错，在这儿，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赢得立足之地，无论是那些欢庆的队伍，还是那些身挂佩带、满脸刀疤的人的游行，或者那些傻瓜在山上那一座座褐色的棚屋顶上摇来晃去，这些都显得微不足道。那些满是闪闪发亮的锦缎斗篷和黄金圣体匣的宗教仪式游行，那些疯子的来回奔跑，那些神色阴郁的人伫立在墙角边，这些都同样如此。不过，有一回，我在城里看到过一队人：那是一群白痴，他们又是彼此拍着肩膀，又是相互推搡，又是突然用肘窝卡住对方的脖子狠劲往下按；他们就这样从一家家纪念品商店门前走过；他们之所以有这么好的心情，是因为他们心里高兴：可以出来看看。在城里转转。而也正是那些大钟，总是伴随着它们，会让人迸发出另一种地方意识——只要不是偏偏涉及到那丁零当啷的钟声就好了，因为在我的想象里，它总是跟铁门砰的一声被关上的声音、汽车发动不起来时的声音、轻轻的咳嗽声、还有小跑时高跟鞋发出的声音联系在一起。您曾经在树林里，比如在爬山途中滑倒过吗？这时，您的手穿过地面上的层层树叶，抓到一个早已腐烂的树墩上。正因为这只手没有遇到丝毫的阻力，所以，您一瞬间会觉得，好像手不存在了似的（一只黄黑色的蝾螈，或别的什么爬行的动物），我经常会在进城时有类似的经历。正如腐烂物与树叶之间的界限已变得模糊不清一样，这里的国度同样如此。您瞧瞧，我们眼前这个戏剧节剧场的正面与我们身后那座悬崖峭

壁是多么般配啊[21]。在那些负责建造剧场的人看来，这座由一粒粒石灰石包裹的小石子堆砌而成的山峦就像是一堆混凝土：如此看来，这幢与山连成一体的建筑也可以由不加粉饰的混凝土筑起来就行了。据说，这甚至就是主导思想：这样一来，山和建筑似乎融为一个整体了。为使这座建筑更好地配合整座山的基调，人们还在混凝土砌成的楼房正面上刻意雕凿了一个龟裂图案。而正是这一切制造出了那界限的假象，换句话说，就是亵渎。请您留意后面这条线，碎石就是在这个地方看似天衣无缝地过渡到浇注混凝土：就是打眼看去，这两种相互强扭在一起的材料也是互不关联。山峦呈现的是一层层斜切的纹理结构。当你久久地观察时，就会发现，在每一层结构上都重复着砾石昔日沉积、滚动、停滞和分离留下的痕迹，还有那不流动的水久久留下的层层印记，所以，伴随着每一个新的层面的形成，都会发生如同潮汐变换一样的东西。相反，在这个连成一体的混凝土墙面上，最多只能感受到那股洪流，伴随着它，曾几何时——这里不存在对时间的感觉——水泥连同碎石滚入壳子板之间。岩石上爬满了苔藓，伸进和凸起的地方都生长着鲜花和青草。相反，那件‘仿造品’上面铺了一层水泥胶片，而在那刻意雕凿的龟裂缝里却从来没有长出过一根绿草茎来。有时，山峦会显得多么绚丽多彩，尤其在那湿漉漉的雾气里：从表面上的灰蒙蒙，然后会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色彩，时而棕色，时而红黄相间，也有蛋壳般的白色、玄武岩般的黑色和玻璃瓶般的绿色，就像刚开始下雨时碎石路面上的样子——相比之下，那个堆砌在前面的粗制滥造的畸形的东西永远都显得黯淡无色：惨淡。这难道不令人奇怪吗？那岩体是大自然的一分子，看上去像个物体——而那个要乔装打扮成与之亲如一家的人工产品却是个非物体，令人生厌。这样的界限假象就是一种亵渎，而那些亵渎者就是我的敌人。那些人甚至可以将自己的堡垒修筑到山顶上去，却没有人去制裁：他们只需要让自己这些居住和经营的堡垒的门面保持原模原样就是了，并且为此可以获得证明，他们忠实地顺应了周围的环境。与此同时，每间铁棚屋、每个空间站以及每顶贝都因人[22]的帐篷也都会显得更加忠实！在这里，那个特别象征我们这座城市‘背信弃义’的典范，当属这个戏剧节台阶了：我们正好站在这个台阶的底层，那些主管的人为之而心醉神迷。而在我看来，这个台阶是世界上所有露天台阶中最不配这样一个名称的。平日踏上‘台阶’时，我心里在想着：‘清新的空气’。而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的却是：‘萧条’。整座城市的腐臭味就是从这里，从这上方的台阶开始的。在这个戏剧节台阶上，也没有什么

空间可言。几乎没有人会在那儿坐下来。没有栏杆，最多会有人在固定在混凝土墙面的铁杆上靠一靠，喘口气。下山时，许多人都会一个劲地跑下来——而上山时则会一边数着台阶，无论是大声，还是默默地数，那就像在爬塔楼一样。下山的人一个劲地跑着，而上山的人则走走歇歇。那踏板和开裂了的花岗岩石条，太高，太窄，也太短。在这里，那一个个脚步发出的响声不是沉闷的爆裂，就是尖厉刺耳；只有迎面没有人走来时，你才可以与人并肩走；而当你并肩行走时，由于台阶比较陡峭，那么交谈就不得不变得尖锐刺耳，而且时常会因为气喘吁吁而中断。要是在这里与我最好的朋友不期而遇，我们几乎认不出彼此，因为高度差，我们的模样会显得那样扭曲不堪——常常不仅仅会变得扭曲，而且因为那闪烁不定的水泥带，我们简直被照射得无影无踪了——或者我看到的对方无非就是一个剪影，因为他仿佛在一条隧道的另一端与我不期而遇：作为一个自成一体的建筑物，那台阶并非直通山顶，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混凝土配套建筑，恰恰呈现出一个个隧道洞口形态，必然会把整个建筑分割成一段又一段。台阶的弯角不是弧形的，而是折形的，伴随着一个个急转弯。因此，只要一到转弯处，无论是缓缓走动的人，还是箭步如飞的人都只能迈着笨拙的步伐慢慢行动。每个拐弯之间的平台，通常是在台阶上供人半途歇脚，环顾四周风景用的，可在这里，它却被掩遮在一段昏暗的、并散发出一股霉味的隧洞中间，这一边墙角有一摊黑乎乎的便溺痕迹，另一边则是一摊鸽子粪。不，这不是什么露天台阶，而是一个排水沟。护墙一路上，那条凿在石头上的《魔笛》里的蛇也不是什么装饰物[23]，而是一些破烂。还有这条排水沟直通到山下的那个院子，它也没有什么两样，全都堆满了破烂，堆满了戏剧节的破烂和其他破烂。您可千万别以为，随着我现在插进来夜间呼喊，这种亵渎界限的行为就了解了。我将会——”

画家一边大笑，一边断断续续地说道：“是啊，我将要做什么呢？我们将要做什么呢？因为那些敌人已经逃脱了我的敌意。”

他走下石阶，站在和这座城市同一高度上，并且又说道：“有一天，我路过莫扎特雕像时，一瞬间感到很惊讶，他的脸朝着老城区。因为在我的想象中，他应该背对老城区，两眼望着那条河。同样有一天，我也感到很奇怪，在新城门——真正的岩石隧洞——左右两边，有两个美杜莎[24]的头指引着出城的方向，在我的想象中，那些蛇应该是盘曲在蛇发里，而那具有魔力的目光更多是针对那些进城的人。”

我们从一个老城区广场走到另一个广场。所有的广场都空空如也。唯独在一个喷泉旁靠着一个醉汉，手里握着酒瓶，伸着舌头，正在呼呼大睡。当然，在那一家家小餐馆里，突然爆发出阵阵乱哄哄的纵情大笑，用画家先生的话说，“这笑声又是怀着必胜信念的冷酷”。这时，我如愿以偿地想起了某些无言以对的东西，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不已。

然而，如果说光与空气存在于那些所谓的界限彼岸的话”，我说，“因为一切如此有效，如此令人神清气爽，如此实实在在，那么中心就不会存在风平浪静吗？”要不我怎么会在离开老城区前往沼泽地的路上一再会被一种空间-波攫取呢？——然而，一旦我避开老城区，那种波就消失了。照这样说来，这一个区域的存在不就使另一区域的存在才有可能吗？再说：空虚与丰盈在此难道不是相辅相成，任何地方都无与伦比吗？我无论如何都需要这个中心；我需要那个原原本本的中心。我的位置就是中心：从外部，从平原上，它也分别赢得了自己的尺度。然后我为它做主。每个在街上挡住我去路的旅行团，我都会觉得是合情合理的；每条我为了绕过那些拍照留影的游客而走的弯路，都已经绷紧了指向那广阔天地的箭头；每个我在拥挤的人群中突然改变的方向，都会让我过后在外面感受到更强烈的自然光线。那个咏叹‘美丽的城市’的诗人[25]，不也几乎每天都会去城外空旷的平原上散步吗？或许萨尔茨堡得换一个名字，叫沙勒罗瓦或塔兰托或萨利纳斯？——其实Salz [26]以前是一种神圣的矿石：能把陌生人变成贵宾。您用放大镜观察一下这个水晶体，便会发现，从那一个个透明的方块中散射出亮晶晶的光芒来，犹如一座亮晶晶的城邦的围墙里，远远近近到处撒满了晶粒，是这座城市的前堡。我觉得盐是一种可爱的调味品：既可观赏，又可触摸，还可以调味。它使我回想到我的出生，代表着一种尺度或法则。在地中海一个盐场海湾里，我曾经看见过那个加工盐的‘故居’。那是一幢石头建筑，位于远处海面一个防波堤上，楼梯在外面，通往顶层，入口大门也设在那里。在维吉尔那里，盐总是与‘渺小’和‘隐蔽’这样的词语联系在一起。这个盐场作坊看上去很渺小，而住在里面的人，至少我心里在这样想，在这里过着一种隐蔽的生活吧。”

我们在通往萨尔察赫河对岸的莫扎特小桥前停住了脚步。这时，画家询问起我的名字，在我之前自我介绍时，他没听清楚。于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名叫“投手”，甚

至还补充道：“没错，我说的是实话，这不是在开玩笑——我的确叫‘投手’！”

画家听后，便带着一种友好的口吻取笑道：“照您刚才所说的来看，您倒应该叫‘老顽固’。”随后，他踏上了那座木头小桥，停在与我齐眉高的地方，我就站在下边的河堤上。他似乎道别时这样说：我的脸使他想起了那些自命不凡的白痴的脸。当年那些人在城里漫步时，他多么想加入到他们的行列里去啊：“那曾经是我的同僚。”说完，他便消失在桥的另一端，走到桥中央时，他回头冲我喊了一声，并祝福我，说但愿今晚下的雪都能变成盐粒。那一刻，我又学会了一个新单词：目送，或者说，如果真有这么一个词的话，“目送的眼神”。

这座小桥上空荡荡的。仅仅有一次，有两个人从桥上走过来，那个女人身上披了一件皮大衣，里面穿着一身长长的晚礼服，她身后跟着一个戴着牙套、推着自行车的小女孩。伴随着她们的步伐，那些厚厚的板条晃动着，仿佛那是些船舱板似的。而上桥的坡道连同上面的横木条则像一座舷梯，只要你一过去，它就会马上被收起来：任何人不得再上这条船。

河对岸那些敦实斑驳的梧桐树干为彼岸的城区增添了一抹亮色。而在河这一边，那些行驶的汽车会溅起褐色的雪水，从那昏暗的车里面不时会闪现出一个白色的衬衫领来。在纷纷扬扬的雪花里，接连不断行驶的车辆之间，那一道道前灯光束显得格外清晰，仿佛一根根牵引绳。有一次，就在这儿的河滨大道边上，我曾见过一个遭遇车祸的人。他躺在那里呻吟着，双腿蜷曲在身体上，口里吐着白沫，上下两排牙齿碰得咯咯直响。刚开始，我还误以为是急救培训班上的一名学员正在演练呢。河水开始上涨，几乎无声无息，冲卷着整个岸边葱郁的灌木丛。听不到钟声。卡普齐纳山上面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里，灯光相继都熄灭了。闹钟在嘀嗒作响；印台干得没法用了。这时，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此刻站着的这个河堤有个男人的名字，叫鲁道夫河堤；而对岸的河堤则有个女人的名字，叫吉泽拉河堤。这座空荡荡的小桥两边都嵌镶了一个钢结构体，形成三道拱门，跨越过这条河，像三级跳似的：有一道拱门标志着小桥的入口，门框上装饰着藤蔓，它使我不禁联想起那叶状装饰花纹[27]。它在维吉尔那里“微笑着”。当然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在微笑。从桥上而来的则是另一番空荡荡的情景

——不是人们所向往的。片刻间，我继续默默地演绎着和画家的交谈，一开始是那样的活跃，以至于我甚至还想做出这样那样的手势来。随后，那做手势的手臂就再也不抬起来了；渐渐地，我的自言自语也无声无息了。这时，从拱门那儿飘来了一团浓郁的香雾——是那位身穿晚间礼服的女人身上的香水味吗？——雪水汩汩地滴到排水沟的孔眼中。雪花飘落到我的肩上，形成了一个像肩章似的印记，但很快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尽管夜间末班车——“流民收容车”——上有许多座位，但我一直都站在这辆车中间的活动圆盘上，车辆转弯时，它也跟着转起来。行驶中，这条“长龙”内的地板时而上时而下，又是向左，又是向右，穿梭在山峦与深谷之间。在此期间，一个座位下方，有一只空啤酒瓶也跟着不断地滚来滚去。那两个连接在上方电线上的抓臂不仅传输行驶所需要的电流，而且好像保护着这辆电车连同乘客不会沉没到地里去；因此，我也学着这两个抓臂的样子，双手紧紧地抓住头顶上方的安全环。

行程很短：晚间时刻，终点站提前到公墓车站。其间，我是车上唯一的乘客，直到人家要求，才走下车去。下车前，我不厌其烦地对司机说了许多告别的话，一级接着一级地踏着台阶，废话也越说越多。“晚安，中国人先生！”司机应声这样一边对我说，一边将车子拐了个8字形弯便往城里方向驶去。

然而，我要回住地，只有走那条通往相反方向的路。离那儿还有很长一段路程；可这还不可能足够远。片刻间，那些电车电线在空旷的天际上拐到日本的一个城市近郊。墓地大门上那些镀金的印刷字体在路灯的照射下闪着微光，看上去就像是一种无法辨认的外国文字，或者是所有的文字都融为一体了。

我向西走去，越过那片草地，来到运河路上。然而，看样子，好像我现在到了运河那儿，也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我走在这条公路干线上，左侧围着一道墓地高墙。我边走边望着远处的河堤，前面就是那家“运河小屋”，唯有楼上还亮着灯。而这幢房子有了另一个象征，使我不禁想起一座水闸房来。

一瞬间，我是这条路上唯一的行人。我边走边在脑海中想象着，“独行者”，如同“迷路者”，“投手”以及“老顽固”一样，亦是一个名字。后来，迎面走过来一名男子，鞋底钉着铁掌，他从我身边走过时，带着充满恶意的口气说：“我知道你是谁，但你不知道我是谁！”

于是，我拔腿就跑，一口气跑到了墓地围墙的尽头。掩映在云杉树丛里的火葬场此刻火光通明，像城里的一处名胜古迹。人行道旁的一根树枝上有一只黄色的五指手套。在街道上空，那些电车电线看样子结成一片钢网，或许直到黎明时分，它都不会再发出任何动静。

这条街有一小段上行路——那条如今改道向东方流去的萨尔察赫河曾经从这里流过——使得我深深地呼吸着，感觉很舒服。尽管当年的河岸平地高出无几，但上方那片沼泽平原连同哥奈斯地区一起展现为高地。一到上面，人立刻能明显感觉到冷多了。这儿草地上的积雪一直没有融化。凡是有土壤露出的地方，让人看到的是一种如同鸟爪子留下的图案。树上的槲寄生球顶上覆盖着一层白雪。四月里，这一片郁郁葱葱的美景被屋檐口的冰柱打破了，而夜晚的灯光则反射出一道道晶莹透亮的光芒。鸟儿在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仿佛为了确认同伴们在狂风过后是否依然幸存。

我弯下腰，用湿漉漉的雪湿润着眼睛和两鬓。我期待着能快点再下一场雪。我的双唇和额头都很想喝口雪水：似乎这个冬天里，我最期待的那场雪还没有降临。

哥奈斯的郊外几乎只能看见亮着的路灯。有一间底层的房间里，窗帘大开着，屋里光线很昏暗，窗前站着一位年迈的老妇人，把脸紧紧地贴在窗户玻璃上，呼出的水汽遮住了半边脸。此时此刻，似乎就没有人能抵挡住她的目光。

在这个地方中心前面，马路上画着两个孩子的身影，那个比女孩高出一头的男孩把那个女孩搂住，保护着她。两人都背着书包。女孩的辫子上绑了一个蝴蝶结，清晰可见，男孩的后脑勺向外凸出。这两个人的图像还有好几层被遮盖在这一层下面，是以前画上去的，几乎毫厘不差，仅仅有点错位。这两个图像周围的雪已经融化了，那信号色彩闪闪发光，而他们从头到脚都已被轮胎的印迹压黑了。

我久久地站在大街上，出神地注视着这两个千篇一律的形象。观察？然而，不管怎么说，我的目光后来则绝不会冲着那辆在我面前突然刹车的小车：那位司机把半开的车窗玻璃又迅速地摇了上去，一句话也不说，便又飞快地开走了。或许他原本只是想问一下路——不然的话，或许那个坐在一旁的女士会说："算了——难道你没看出来，这个人本身也不是当地人吗？"我冲着驶去的车子喊去："我只和一个个敌人为伍。只有敌人才是我的同伙。"因为这样的敌人自然已不复存在了，所以就只剩下一个毫无目的词语了："干掉吧！"（可是我也会这么想："幸好车里坐着的不是某个学生的父母！"）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自己内心里有过多少想法啊，想法一个接着一个，就在几个小时之前还依然如此——此时此刻，连一个想法都没有了。或者说：我再也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了。

在住宅区前那片森林里，天开始变得雾蒙蒙的。只有几根凸现出来的树枝依稀可见，树干和树梢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我沉浸于其中，感觉就像进入了一片无比熟悉的天地里，一片游刃有余的环境里。这里好像有无穷无尽的空间，全都是我的。到了一棵树干旁，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影子迎面而来。

然而，随之而来的又是一座座房屋，这让我不免有些失望；那灰蒙蒙的夜色或许作为光亮就足够了。然而，在这片橡树住宅区里——在这个时刻，很有必要澄清这一切——我才有家的感觉。我脚下的柏油是家乡般的土壤；在这里，我现在为每一种意识都负有责任。今天早些时候，我不是曾经要冲着一群吵吵嚷嚷的外国人大喊"安静——这里是奥地利"吗？我的祖国，在我看来，它如今已变成了一个乡间火车站里搪瓷指示牌上那个伸手指向的图像，上面标着"往喷泉方向"。那独一无二的环境，它意味着避风港，你在那里就可以抵挡外部世界的侵袭。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或许也会这样来保卫这个国家吗？"——"也许不是那个议会大厦吧，"这可能就会是我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但无论如何，这边田地里的粮仓，还有那边葡萄农的小茅屋，则是一定要守卫的。"因为我可以打心底里说：我遭受着祖国的苦难。

黑土平原上弥漫着一层浓雾，除了这住宅区以外，什么也看不见了，既看不见山，也看不见天空，天地几乎融为一体。一些新造的房子里还没有住人，大街上到处都能闻到一股新鲜的油漆味。那些外国人居住的房子里，窗帘都是深色的，就连晾衣绳上的衣服也几乎没有白色的。在农庄通往沼泽地的必经之道旁有一个牲畜棚，里面亮着灯，牲畜的身躯和人的头影相互交错，动来动去，看样子，似乎有一匹小马驹或一头小牛犊即将诞生。远在沼泽地外面堆起的一个土丘是一个足球场，在旁边那家昏暗的餐馆里，那只名叫逆风耳的狗被惊醒了，它睁着一双玻璃般明亮的眼睛，竖起一对犄角般的耳朵。从残障儿童收养所里突然传出一声短促而强烈的尖叫声，听上去有点像孔雀的叫声；一盏霓虹灯忽明忽暗地闪烁着；那些窗户的上半面开着，百叶窗斜垂在那里。一个车库的大门敞开着，看上去像一家小店铺，里面停着一辆刚刚开来的汽车，车顶上积了一层雪，夹带着绿树叶。那个坐在车里的人两手搁在方向盘上，还在听着收音机里的新闻。车库旁的别墅里，唯有一个鱼缸在屋子的深处闪着亮光，里面的金鱼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

我坐到运河边上，坐在那电话亭旁边一个长椅上。眼前就是那个公寓，我就住在那里面。河边有一棵孤零零的云杉，那里不断传来阵阵嗡嗡声。我闭上了眼睛。我身后就是阿尔姆运河。在其他地方，它都无声无息地流淌着。可是到了这里一小段陡峭的下坡上，它却像水流湍急的大河一样咆哮起来了。我是不是睡着了？因为当我再睁开眼睛时，天上正挂着一轮半月，看上去就像一位行将就木的白发老人。一根杉树枝条在前方像鸟羽毛一样摆动着。就在醒来的那一瞬间，我觉得那整棵树变得一团漆黑，仿佛是我的影子。

我走进屋子，便立即躺倒在床上。我没有打开任何一盏灯，不管是走道上还是房子里。我合上眼，感到暖和起来了。在我眼前出现了那座与我同名的山（我只在插图上见过这座山）。广袤的天际下，这位“迷路者”正呆呆地站着，仿佛在另外一个世界似的。然而，看样子，仿佛那个世界离他就近在咫尺。在那个充当基石的圆形山顶上，矗立着那座巨大的、完全用岩石筑造成的山顶建筑。那平缓的屋顶上积了厚厚一层雪，笼罩在一片灰得透明的天空中。积雪形成了像沙丘一样均匀的波浪。山边上，一道白茫茫的喷泉飘落到那灰蒙蒙的天空里：这是山上即将刮起暴风的信号。这暴风想必非常猛烈；因为那雪旗飘得很长，而且几乎呈水平状，甚至还向上形成了一个轻微的角

度。与此同时，那远处的景象看上去万籁俱寂；就连这白茫茫的喷泉也一动不动了。在那下方的悬崖峭壁上，有几个黑乎乎的地方，看上去几乎就像一扇扇大门或一个个洞口。岩石大门，敞开吧！一切都会近在咫尺！你这个被风神铸就的迷路者！

尽管如此，还是没有安静下来。就是缺少什么东西，没有它，无论转向什么样的事物都是纯粹的草率。然而，由于草率，这样的转向就会变得毫无对象可言：这个事物也就不再是这大千世界的事物。“仍然缺少什么东西”则意味着：在我心里有一个空间，但这个空间始终空空如也。我并没有期待这个缺失的东西：我也无法期待它——我就不应该期待它。只是在我心里存在着一个空荡荡的空间——它始终没有被填满，这就叫做苦恼。

“然而，这个不可期待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是变成了嗓音的树的沙沙声？是一股从岩石中喷涌而出的泉水？还是一个正在熊熊燃烧的荆棘丛？——你就直言不讳地说吧，你缺少的就是爱！”

这时，我终于发怒了。“你们总是口口声声说爱，可这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是性爱吗？是对某个人的爱吗？是对大自然的爱吗？是对工作的爱吗？——无论如何，我现在所渴望的是一个躯体，渴望的不是性器官，更多是爱的肩膀，爱的脸蛋，爱的目光，爱的存在——爱？爱的无能？爱的烦恼？现在我只有苦闷，因为我的生活中没有爱。那无能纯粹是被你们编造出来的，就是为了开始你们那彻底无爱的争吵。一旦出现了爱，那我就会再也没有必要去求助于那遥远的山峰了，它会自然而然地进入我们共同的世界里，成为我们坚强的后盾，成为能包容你我这样的存在的苍穹。随着爱的出现，我便会有了安全感。或者，终归都不会有爱的存在。”

3　观察者寻求一名证人

之后几天里，我没有出过一次门。大多数时间里，我都趴在床上，把头埋在胳膊肘窝里。这只手臂有点像一个壁垒，我觉得在它的后方完全无忧无虑了。有时，我会伸手抓起一只盲蛛放在手心里，任它跑来跑去，手心感觉痒痒的，很惬意。其间，我也会仰面朝天躺在

床上，凝望着房间里的墙壁。墙上有一只挂钩，上面挂着一只手电筒和一只鞋拔。

窗外，两根绳子如拇指一般粗，来回晃动着。白天，会看见人们用其中一根绳子吊起一只盛满灰浆的桶，把灰浆运往楼上施工，然后再用另一根绳子把空桶送下来，再装满灰浆，两根绳子就这样交替运行着：人们正在重新粉刷大楼的正面外墙。清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这两根麻绳看上去特别粗壮结实，颜色也显得更加暗淡模糊。可是一到夜里，绳子便显得筋疲力尽。好在它们时不时会撞击一下窗玻璃，倒还能让人重新看得清楚些。如果夜里有月光的话，绳子便会闪现出如玻璃般晶莹透亮的光芒：白天，融化后的雪水会沿着绳子往下流淌，随即又重新冻结起来。

电话铃一次次地响起，但都是一些因拨错号码而打错的电话——似乎在萨尔茨堡这座城市里，不仅满大街都能看到秩序混乱的竞走运动员，而且到处都有乱拨电话号码的人。电话那头，一会儿说是要找“神甫室”里某个名叫“西格弗里德”的男人，一会儿又说找“过境货物海关”，后来甚至还有人打来找“兼职公司”。之后，我终于忍无可忍地冲着电话机大吼道：“别再烦我了！”接着，我便远离电话机，再也不去靠近它了。

这几天上午，总会有邮件从门缝里塞进来。大多都是些广告传单，不过有一次塞进来一封信，是一张表格，还在某处打了一个叉，上面的标题是：“简要通知”。

白天，从超市里不时传来嘈杂声，算是为生活增添了一点色彩。每到午休时，我甚至都会迫不及待地想再次听到楼下那些杯子碰撞所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响声。

当然，这一切也可以以另外的方式来讲述。照镜子时，看不到眼睛了。我完全感觉不到自己躯体的存在：这就是说，我再也感受不到阳光和风雨，再也感觉不到寒冷和温暖，这是一种缺失。我就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的我，没有神态，只不过是一个浑身疼痛的躯壳：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因为不存在什么观察者，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好观察的。暮色里，我有一次把温特山错看成一片森林了。还有一次，我把悬崖峭壁错当成了一个绞刑架。在斯陶芬山里，有火山爆发了，紫

灰色的烟团从三角锥状的尖顶里大量向外喷发。然而，当我后来又望向西边时，那整座山早就缩成了只有原来一半高的废墟堆。（事实上，主峰此时刚好被大片雨云覆盖，因此唯有山前那个小得多的山峰显露在我的眼前。）那么，“西边”指的是什么呢？要说那些地理方位则毫无意义，就像是对一个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乘船遇难的人而言：谈不上什么方位，笼罩的是混乱不堪。然而，有一次我试图穿上衣服时，我的手脚都不听使唤，伸不进衣服里，站着像与耶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脱了臼的罪犯一样（简直是可笑）。我听到那些喧闹声，仿佛到了季节：仿佛它们并不是从地平线那儿传来的，而是所谓从某个角落里，阴险地从背后而来，犹如突然袭击，也没有那些与之相关的躯体图像。那些习以为常的寒鸦叫声，此刻听上去像一排正在齐射的枪炮轰鸣声；突然响起的一阵马蹄声，就像一个已经停止不动的钟突然又走了起来（但很快又停了）；那一声声公鸡的啼叫既像是警报，又像是吹响最后归营的号角。每当树林上空那些电车电线相互碰撞到一起时，便会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就像一场正在熊熊燃烧的大火。

也时常会见到一些令人发笑的情景：有一次，在终点站回形弯道上确实站着几匹马。它们在出租马车前，可能是因为迷了路才来到这里的。而在马车座上坐着几个胸前挂着相机的外国游客，面朝着这个居民区，犹豫地把相机拿在胸口高度。然而，我并没有笑。

此时，我绝对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堕落。我的内心里甚至产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放逐”自己的惬意，一种前所未有的惬意，让自己遭受那地地道道的黑暗，那刺骨寒风的磨难；让自己经受和坦然面对最恶劣的逆境的考验。是惬意？是兴致。是兴致？是坚定不移。是坚定不移吗？是对生存条件的认可吧。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我从来也没有感觉到像罪责一样的东西。我所感受的东西，是些更为可怕的东西。我将一根很长的毛线针戳进了某个人的心脏里，如此正中要害，甚至连皮肤表面都看不出半点伤口来。大家居然还因此向我表示祝贺。唯独我看到自己从此以后——这个词语是无法避免的——便活在了诅咒之中。（而且也没有亲眼目睹的人伸出手去遮住自己的脸；即使有人喊出“举起手来！”，我或许也不会把手举起来，当然并非出于对死亡的蔑视。）晚上人们下班回家后，总会一坐下来就开始感叹：“终于能坐下来了，这样多好

啊！”然而，“坐”对我而言却刚好相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我称心如意。或许我应该避免说出“诅咒”这个词，取而代之来说：“视野中心既不见那只飞来飞去的鸟儿，也不见那只给自己洗脸的猫。”这中心什么都没有，看不见正在玩耍的小狗，也看不见来回爬动的盲蛛（即便有，它也会马上从这儿逃走的）。或者说，即使这视野中心能看到什么东西，可也没有什么令人觉得可爱的东西。在一家敞开的别墅车库大门里，挂着两只刚刚猎获的岩羚羊，身上还滴着血，两只羊角被挂在钩子上，面对面。是的，视野中心甚至还出现了鸟儿和猫咪，但它们不过是漂在运河中的几具尸体。或者这中心就是出现令人晕眩的错觉的中心：每每看去那些交叉着堆放在草地上的木棍，都会让人觉得那是一头累得瘫倒在地的牛；那只挥动着翅膀飞来飞去的黄翅蝶始终让人失望地感到是一张发黄的碎纸片。或许，这中心就是一个伪造品聚集的中心：当我四处寻觅它时，它就被那一堵堵贴满海报的墙壁或者那些来自国外的、颜色虚假的观赏灌木伪装起来了。或许它本身，这中心就是伪造的：那座邻居家的房子因为人工筑起了一个平台而抬高了，屋脊上有一座小钟楼，像那些古老的庄园一样——可平台下方的区域看上去像是被水冲刷过似的——不过房门上方那个用来祈祷的壁龛似乎在告诉人们：“你在这儿是一位不速之客。”——然而，那个处于中心的小楼无非一个空洞而已：里面既没有钟，也没有钟槌，也没有钟挂。白日里，这个大洞看上去常常像一个发了霉的牛奶漩涡；而到了夜晚，里面至多也只会亮起一颗传来噩耗和战争消息的星星。在这些日子里，那些赝品中最拙劣的当数那些所谓“天然形成”的中心点了。它们都被那一座座教堂塔楼占据了。在这个地方，无论你抬头向哪儿望去，至少都会看到这样一座，都是自然而然地映入眼帘。这些塔楼，无论是洋葱形的，还是尖顶的，或者圆柱形的，可在我看来，它们不仅是一个个飞扬跋扈的象征，而且也是一个个变得僵死不堪的幻象，在嘲笑我们所有的孤寂。没有人需要它们，可它们却假托是救苦救难的救世主。难道不是有时候，也包括艰难困苦的时候，有阳光和空气从地平线上投来吗？它们想要进入我们的世界，可是那些塔楼却挡住了你的远眺。

然而，在复活节前一周，我则向往那习以为常的钟声。我甚至急切地渴望着听到那样的钟声。早在几十年前，有位思想家曾经对那些共产主义大都市大加赞赏，因为到了那个时候，“那悲壮至极的西方世界的钟声”就会被废除了。可现在在我看来，这是完全不可理喻的。那些钟声沉默了，然而呼啸的风声却无法满足我。下边运河湍急

的流水声也无法满足我。电车行驶中发出的那单一美妙的嗡嗡声也无法满足我。此时此刻，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上个世纪一位作家说过的一句话，一句赞美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的诗句。对这位诗人而言，那“黑洞即无限本身”；而在他那个时代，即从西塞罗[28]到马可·奥勒留[29]，曾有过一段无与伦比的美好时光。当时，“诸神已不复存在，基督尚未诞生，唯有人类存在”。这几天里，始终听不到钟声，只有风在呼啸，电车在嗡嗡。我在仿效着那个时代的生活，我后来无论如何觉得如此。

当然，我的情况则与那位据说在无神年代如此神勇无比的诗人卢克莱修有点不一样。唯有我这个人存在着，死亡是终极目标，如此坦然，简直无法想象。这里就是缺点什么，不是基督，不是诸神，也不是那不朽的灵魂。这里缺乏的是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一种感觉器官，而且是那个关键的，没有它，呼啸的风声和嗡嗡的电车声就是不完美的。

之前，当我眺望远处某个山脊时，常常会看到不见首尾的人群正在向上攀登。这时，我的脑海里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象着那个著名的淘金队伍，他们正走在一条通往山口的路上，因为穿过这个山口就可以到达那片宝藏所在地。而我这个观察者也在这个队列里，是他们之中一个全副武装的身影，一起攀登着。现在，无论我什么时候望去，那条缓缓上行的、云杉树梢此起彼伏的线路空空如也。它显得孤零零的。那里一点儿动静都没有。那些线路从山口上上下下，越来越长，再也没有出现人的金字塔队形了。我自己尚且缺乏这种感受力，又怎样才能更加确切地描述我如此若有所失的那种感知呢？——而对于那种感知力与想象力（这是构成感知的首要因素）的统一体来说，也许只有在希腊语中才能找到那个相应的动词：这个词开始表明的只是“看见”或“发现”，但其中却伴随着弦外之音“白色”、“明朗”、“光泽”、“照亮”和“闪耀”。而我的内心深处，简直就是渴望着这样的被“照亮”，因为它更加胜过观察。我会永远渴望那种在希腊语中被称为感同身受（leukein）的观察方式。

就在我热切期待着那些大钟再次响起时，一种从未有过的憎恶感在我心里油然滋生，那是一种对动物的憎恶——更多不是对鸟儿，而是对四足和多足动物。鸟儿好像不停地飞来飞去，一再在空中划起一条条看不见的远距离传输线。可是，我鄙视陆地上的一切动物，因为

它们显然完全无法理解复活这个概念。它们只会随便找个地方，懒洋洋地蹲下，慢吞吞地爬行，不时地挠挠痒，相互嬉戏打闹，然后再匍匐前进几步，潜伏在某处窥伺动静，或是偏离自己前进的方向，打打盹儿。所以，孩子们把猫砸死，把盲蛛的腿拔掉，这样的残暴行为，我几乎是能够理解的。

与此同时，我则觉得在重新感受着一些复活节习俗的本源，比如说，当你观察着从地里连同黑乎乎的泥土一起被挖出来的辣根时，你就会觉得那新鲜的、肉乎乎的白色是一种闪烁着生命之光的色彩。

周末，我伸展着四肢躺在床上，一点动弹的力气也没有。我咬紧牙关，握起拳头。躺着不觉得是躺着，而是相反。清晨，从楼下大街上传来一个女人的说话声："眼下，我们的复活节彩蛋卖得很紧俏啊！"她可能是在一家蛋糕店里上班。中午时分，超市的百叶窗被拉了下来，三天来一直是这样。下午，有一只小鸟在那窗前拍打着翅膀，忽而飞上，忽而飞下。

我与一个不知从哪儿来的旅行团一同在"月亮机场"下了飞机。候机大厅里有个楼梯，沿着楼梯往下走，便会走进一家餐馆。此时，餐馆里已坐满了人，他们清一色都是中国人。餐馆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灯光昏暗、又脏又乱、低矮而简陋的贫民窟。餐馆的中央有一个平台，用作屠宰场。几个光着上身的彪形大汉，两只手里各举着一把长刀，正向另几个同样赤身露体、手无寸铁的男子猛冲过去。没有战斗。那些手无寸铁的男子也不逃走。更确切地说，他们弓起背，活像猴子似的，等着那头追踪而来的狮子把他们抓住。他们龇牙咧嘴，冲着那些屠户发出最后的恐惧嘶叫（其实更像尖叫）。与此同时，就连那些受害者的脚掌也好像已经弓了起来，在平台上弯成了若干个拱形，咔嚓作响地抽搐着。转眼间，那个完整的躯体便不复存在了。它不仅被砍成了一个个碎块，而且这些碎块也几乎同时被那些坐在下面大厅里的人全都吞没了。刚才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此刻却已变成了食道里的最后一块碎肉。那一张张嘴，连同这不停运作的食道，则标志着一个所谓的华人区最深层的区域。而这个区就其自身而言是整个天下事件的核心区域。这样的屠杀恐怕永远都不会终结。恐怕总会有新的死难者的手臂和肩膀随之而来，而且这些手臂和肩膀很快又会消

失得无影无踪。——我们这些游客则被这个贫民窟外围的绳索拦在外面。于是，我们提着手里沉甸甸的行李，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机场。月亮机场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得先走到位于停机坪旁边的一部电梯前，再搭乘这部电梯回到平地上。通往那儿的一条路在室外。高大的金合欢树簌簌作响，在一盏灯的映衬下，显得灰暗而又苍白，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样子。与预想中的情况不同，在“月亮”的氛围里行走一点都不轻松——我们的步伐并非轻盈飘逸—；我们每走一步，双腿的沉重感便会加剧一些。尽管我还没有感到呼吸困难，但这种感觉已经在向我步步逼近了。电梯间离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它是一个没有窗户的钢板结构。这时，电梯门口站着许多提着行李等候的人。人们能做的只有保持清醒，然而，这很难做到。

床上那个人终于睁开了眼睛，立刻坐了起来。在这间小屋子里，充斥着一种颜色，那是一个大花盆里木槿花的颜色。花盆摆放在墙边。有一朵花孤零零地在这里绽放，呈朱红色，底部略带紫红，几乎接近于黑色。花朵中央的玫瑰色雌蕊耀眼夺目，犹如一只白炽灯泡里的发光体，而花蕊的顶部则是一些橙黄色的花粉星子。这花唾手可得，于是我伸出手臂，想去摸一下。其实，早在前一天，我就已经做过这样的尝试了，可指间没有丝毫的触摸感觉。我常常在看到木槿花时就这样，我在这里也同样把正在绽放的花朵看成已经凋谢了。但此时此刻，我手里分明感受到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它让这只手清爽，也调节着我的脉搏。

清晨，那股稀里糊涂被疑为公猫身上发出的恶臭，现在却井然有序地变成了乱七八糟放在台架上的苹果发出的清香味。想必夜晚临近了，因为已经没有阳光从西房那敞开的大门照进来，只看到一道黯淡的深黄色、没有射线的光亮。在这个亮光里，那株木槿花在墙上投下一个模糊不清的轮廓，零零星星的茎叶轮廓清晰可见。另外，说起“临近傍晚”来，我就会突然想起我儿子曾说过的话，它令人沮丧，就像小说里一再出现的“黄昏时分”——最好要用“临近傍晚”来取代之：“他们会在临近傍晚时抵达。”

我站起身来，在这间小屋里四面环顾。我还未曾见过比这间更漂亮的房间。我走到木槿花前，弯下腰，对着墙上那只盲蛛说：“哦呵。原来如此。啊哈。嗯。好吧。好。就这样吧。”

我洗了个淋浴，洗了很久。身体在温暖的水里逐渐膨胀起来了。静止不动的腿和自由活动的腿都成了形。我大口大口地喝着水，就在几小时前，我险些因为缺水而窒息。

我在厨房里吃了一整袋干面包片，一边吃，一边回想起儿时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人在头晕的时候不会感到饥饿。"我一整天都感到头晕，可现在感觉饥肠辘辘。我吃起苹果来，并且在咬第一口时，就知道自己还要再多咬几口。

我站在书桌前，把一篇题为"罗马人别墅的门槛"的手稿塞进一个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上写好地址，并贴好邮票。就在不久前，我还是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在一边冷眼旁观，仿佛所有稿纸都已被烧毁或飘出了窗外。

我读起一封中学领导寄来的信。他以前曾教过我，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他在信中写道，希望我过完复活节后能回去，学生们都问起我，而这封信的署名者不仅是以官员的身份表示问候，更表达了对我的思念。之后他又补充道：或许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教师。尽管我的表现可能与这一身份有点不符，但我仍是一名教师——而这正是由于我对做一名教师不是很在行的缘故。正是那微微的窘迫，连同那对教材的透彻把握，证明了我的教学能力。在所有的学校里，名副其实的人或许太多了，然而，学生只有通过那些在自己的教师生涯中时而显然感到窘迫的人，那些说话结结巴巴的人，那些失去思路的人才能获得对教材的理解和领悟。唯独这样的人，往后才会作为"我的老师"留在学生的记忆里。"Quin age！[30]开始吧！"

读着这封信，我不自觉地蹲在地上，眼泪也随之掉了下来。可这眼泪并不是因为得到了这番夸赞，而是因为"亲爱的安德烈亚斯"这声称呼，仿佛在漫长的岁月里，都不曾有人叫过我的大名。

我蹲着打开窗户。西风吹拂着我的脖子和两鬓。深呼吸时，我突然猛地一阵咳嗽。这些天里，我没有做过一次深呼吸。一匹马在我身边打起响鼻：其实那就是我自己，一个劲地打着响鼻，好像鼻孔突然长大了似的。

我一般不常用“神情”这个词。但此刻，我的确蒙上了这样一种神情。我似乎看见自己的生命之舟被围困在某个地方，舟身的下半部分已经沉入水中，但突然间，它又灵活自如地动了起来，无拘无束地在水面上颠簸了一阵之后，又渐渐驶远了。即使这流水也许只是一股涓涓细流，而这叶小舟也许只是纸糊的：那种走投无路的绝望感立刻转变为一份悠然自得的闲适。它绝对不是一种单纯的心境，因为它第一次成了我的依靠。

与此同时，我当然也意识到：随着几天前那致命的投掷石头，我自己的死亡也一天天地逼近了。自那以后，我就感觉到体内有个致命的东西堵在那儿。可以掩盖起来——就像刚才那样——，但却无法排除。我不再是一副举棋不定的样子：那当下的无所谓中，增添了悲伤的感觉，与无所谓相依为命。“掩盖”就是“能够”。而“能够”则意味着“我有的是时间”。

我从小凳上站起身来，走到写字台前坐了下来。我翻开维吉尔的《农事诗》，拿起铅笔，在背面的空页上记录下了这么一段话：“没有什么偶然的不幸发生，其实都是命中注定。偶然即命运。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普遍存在的命运。命运就是人的命运。可又不是人的命运，而是人不可分割的部分。请区分人类的两重命运：命运与必然。众所周知，命运就是：死亡。而必然呢？——我只知道，如果我没有经历自己的必然的话，那么我如此死去，就没有实现我的命运。这个必然归我所有：也就是说，只有当我向它发起挑战时，我才有机会去经历我的必然。不幸变成了命运。通过命运达到了自我意识。我，这个主宰命运的人，主宰了自己的命运。自己站起来吧！没错，可不是在法官面前站起来，不是‘投案自首’，而是‘寻找证人’。为什么呢？是为了能向这个人请教。那么谁会成为我的证人呢？——还是‘那个门槛’：为了不错过这个‘门槛’，你就得把步伐收缩成孩子的步伐。不是：停滞不前；而是：放慢脚步。——雾霭中的向日葵。——维吉尔作品里形容木槿花时所用的那个形容词：轻盈。”

在大街通往沼泽地的地方，有一个金字塔形柴堆，是为复活节燃烧篝火准备的，被夕阳的余晖照得通亮。我从一扇窗户走到另一扇窗户，就这么来来回回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这时，山坡上几个零零星星的爆竹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运河里的水流从几个缺口处溢出来。一辆刚被清洗干净的电车正停在山下那个8字形弯道上，车顶上竖起两

根又长又粗的电杆，看上去像种鹿场里那头最强壮的雄鹿。一架飞机正在起飞，机身一侧的一排舷窗玻璃上映出了后面那片明亮的天空；一群又一群黑乌鸦沿着飞机在空中留下的那道浓黑的轨迹飞去，就像海鸥在海面上跟着轮船的浪花在飞翔。山脚下的大街上，一个孩子边走边将几只吹得鼓鼓的纸袋——看似复活节爆竹——放在马路上。与此同时，一个少年正在果园里漫无目的地来回乱跑，还一边挥动着手里的鞭子，将它狠狠地往地上抽；他每抽一次鞭子，树冠间便会升腾起一团烟雾。

这一天，桥栏杆上坐着另外一对人。那个男人年纪要大一些，他穿着一件双排扣西装，上衣口袋里塞了一块小方巾，里面还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衣，并且系着一条领带。那个年轻女子则紧紧地依偎在男人的身上，又是嘟嘟哝哝，又是低声耳语，两人的脑袋一直不停地在对方身上蹭来蹭去，额头还会时不时地相互顶在一起。我不禁想象着，如果这俩人不小心跌入运河里，那么便能听见像烧热的东西碰到水时发出的咝咝声了。

除此以外，那条条大街都空空如也。相反，大概人们都挤到教堂里，参加复活节庆典了吧。那一座座山峰呈现出郁郁葱葱的景象，然后变成灰蒙蒙的，最后成了黑魆魆一片。机场上条条灯火通明的跑道让人想起一幅被持续变换的箭头不断击穿的火十字架。地平线上的边境通道上闪着耀眼的光芒，如同一座热闹非凡的工厂。

爱在这座平原上的城市上空翱翔。爱的存在："城市-存在"。城市-存在：令人愉悦的存在。这个圆圆的地球在我的内心苏醒，伴随着一座白色的玛雅城，它就位于尤卡坦半岛陡峭的石灰石海岸上。还有那个正在炉子边取暖的赫拉克利特[31]，冲着那些站在门口的朝圣者喊道："你们进去吧，这里也有神灵。"我恨不得扑倒在地，但不是独自一人。此时此刻，仅仅一个词语就足够了："身临其境！"

远处的大教堂终于传来了嗡嗡的钟声，那里正在举行圣餐仪式：圣餐面包化作耶稣的"肉体"，酒化作耶稣的"血"。大钟又连续发出了嗡嗡的两声响，每一声都很短促。听上去，就像一个停止跳动的心脏又恢复了跳动。有一匹马昂起头来，将那双睫毛翘起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那些海鸥把嘴伸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尖，都要弯。

渐渐地，钟声开始在整座城市里此起彼伏。我能区分埃尔斯贝滕、埃根、帕尔施、格尼格尔、圣安德里亚、玛丽亚布莱恩、贝格海姆、费赖拉辛（位于边境的另一端）、拜恩格美茵、格劳斯格迈恩（在这一面）、里弗恩、瓦尔斯、哥伊斯、塔克斯哈姆、格勒第希、阿尼夫、墨兹克和哥奈斯的钟声；此外，我也能区分奥恩教堂、敬老院教堂、寄宿学校教堂、避难所教堂和墨斯教堂的钟声。

夜里，水管曾经发出猛烈的敲击声。那木槿花卷起来，从花茎上掉落下来，发出一丝轻柔的声音。一股暖融融的风一再穿过这间门敞开着的小屋。空气里能闻到一股柴火的味道。第一辆电车还未到达之前，便已传来了电线发出的嗡嗡声，犹如一个弹弓弹去时发出的声音，而后传来啪啪的响声，听上去就像两个曲棍球球棍相互碰在一起。其间，周围已经变得如此寂静，连山间的瀑布声都显得格外响亮。过了一会儿，一曲奇特而洪亮的旋律从平原的一端传到另一端：半梦半醒里——其实这更像一种特别的清醒状态——，那一个个声音相互回应，由此而形成了一串高低起伏的音调。随着火车一声鸣笛，便传来了滚动的车轮下钢轨发出的隆隆声。而这隆隆声很快又被淹没在一条狗的狂吠声中。这狂吠声因为随之而来的树叶沙沙声变成了音节，接着又汇入了阵雨那包容一切的噼里啪啦的雨声里。真的观察起来，你就会发现，这原来不是什么小曲调，而是一首永无休止的主旋律。每一个新加入的声音都继续演绎着这个既定的主旋律，使之不断得到加强。每一个发出音节的物体仿佛都在想象中振作起来，颤动着，变成一个个完美的乐器。首先奏响的是弦乐器、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其间还恰到好处地和着一声不同寻常的弦乐所发出的音调，仿佛是从一个冰冻的高山湖泊传来的。在街道下方很深的地方，有一个类似震音钢片琴发出的声响，从排水沟盖板上的圆形洞口传了出来，赋予哗哗的雨声以节奏感。以前，我曾和孩子们一起看过一部电影。在电影中，世俗的与超凡的东西就是靠着这样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相互协调一致的。难道那脱离世俗的东西也降临在这里了吗？此刻听到的这个声调便是它的信号吗？不是！发出旋律的更多是是那些世俗的东西。一个世俗的人躺在这儿，一边呼吸着，一边做着梦，梦见靠着唯一一张嘴，指挥着这个大地乐团。做着梦？我还从未感到如此清醒。没有比这唤醒曲或者白昼曲更美妙绝伦的了。

伴随着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我就起床了，并且擦洗起两间屋子的窗户和地板。屋外的苔藓地呈现出其大地的颜色，有绿色，有棕色，有赭色，还有黑色。上面笼罩着一层雾霭，在太阳快要露头时，到处是一片紫红色。从那苍白的西方地平线上，斯陶芬那陡峭宽阔的山峰展现出巨大的侧翼，闪烁着雪白色的光芒，犹如一个奇特罕见的天体。“可爱的色彩，我们就是靠着对你们的观察而活着。”

我像自己的仆人一样，先把那一件件衣物搭在胳膊上，然后再一一穿到身上：一件蓝白条纹衬衫、一条丝绸领带、一件带双排纽扣的夏日外套、一双黑色低帮皮鞋和一件浅灰色的休闲大衣。在胸前口袋里，我插上一朵已经干瘪得像一根淡红色雪茄般的木槿花。接着，我来到镜子前，久久地注视着自己的眼睛，甚至觉得自己看上去很迷人。我修了修自己的指甲，直到它们都变得又圆又光。我做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动作戴上礼帽。我把纸币都数了一遍，便卷起来塞进裤兜里。我走出屋子，并没有锁上门。

我在大街上遇见了一位年迈的妇女。她脸上和脖子上的皱纹罗织成了一张由无数小六边形组成的密网。她说道：“好啊，来了个风华正茂的男子！”街边的柏油也裂成了六边形图案。一个身穿制服、脚蹬尖头鞋的小伙子正提着一只大行李箱，从运河的桥上穿过。太阳升起时，苔藓地的一条岔路上跑来了一条狗。它背着光，晃来晃去，像西部牛仔的斗篷车一样。其实，我也是一直朝着西方前进的，当然一再向南朝北地拐着弯，或者索性久久地站在那里原地不动。走着走着，我也会回过身去，朝着东方去。这时，从东边射来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在阳光的照耀下，那雾霭并没有从平原上散去，而是变得五彩缤纷。之后，它持久地保持着淡淡的紫色。在这抹紫色的映衬下，树上的粗枝条则显得又黑又浓密。

温特山顶上，唯独在树木生长线以上，还可以看到有积雪。顶峰的高地因为积雪而呈现出斑斑点点的样子。整座山峰看上去轮廓分明，就连每个峡谷和每个岩石尖坡上的细节都清晰可见。唯独峰顶下方的一片洼地看上去像一个云圈，从中不断喷出螺旋形的云雾。然后，有一团云雾像一只巨型山雕，张开利爪，睁着天蓝色的眼睛，追逐在那平原高高的上方。

我迈着大步，跨越这片几乎无人居住的土地，连一个人也没有遇到。只有一次，我看见有个人正走在另一条黑土铺成的小路上。他边走边摘下帽子，向远处的另一个人问候致意。我中途走进苔藓地里的一个教堂，那儿正在做礼拜。教堂里只有几个人，他们正在举行仪式的地方相互握手。每个在场的人都必须说出自己的节日愿望。一位裹着一条点状花纹头巾的妇女说道："但愿奥地利不会走向灭亡。"而另一个年轻人则大声说道："但愿我们大家都能成为圣人。"有两个孩子面面相觑，随后咧起嘴大笑着。

听完祈祷祝福后，我便立刻离开了教堂，继续赶路。平原上，有一小块地非常崎岖不平，那里以前曾是一块黑土采掘地，而现在已是杂草丛生。在那片休耕地上，人们划分出一个个小菜园。走进一个类似于牧场的栅栏，有一条砾石路像主大街一般宽，像林荫道一样长，一直通到后面那一排排凉亭大小的木屋前。

远处的机场塔楼就像一个没有手臂的机器人，它是这片平原上最高的一座建筑。我沿着一条从一家啤酒厂的卸货区延伸出来的铁轨，朝着那塔楼靠近。那个车棚是一个黄色的长条形建筑，其中正墙面上只有盲窗。阳光照在上方那块又大又空的三角形玻璃上，又被反射回来。有两只蝴蝶的影子在一扇盲窗旁晃来晃去，犹如在舞池上翩翩起舞，时而相互遮在一起。周围那空空如也的三角形窗口就是一个闪闪发光的自由信号。从草地里的轨道上弥漫出一片亮光，耀眼夺目。一块块枕木使你不得不将前行的步伐转换成类似于老年人的步伐。我离开轨道走上大街后，才又回到原来的步伐节奏上。仅仅有一次，有一辆机车头从这片草地上驶过，从踏板到车顶，都挤满了下班回家的工人。

大街从一条长长的隧道穿过机场区域。隧道出口坐落着一个运动场，有一个活动围栏将它与外部隔离开来。这时，围栏上方片刻间出现了一只白色的球。海报墙上张贴着一幅随处可见的海报，画面中一位身着淡紫色内衣的金发女郎在搔首弄姿，要让人们知道："这样的曲线多么令人倾慕！"旁边那条长途公路上，来往车辆穿梭不息。那一辆辆闪着前灯的车辆从隧道中驶出，有些立刻把前灯关上了，有些则过了一会儿才关，而另一些干脆就不关灯。（"我们就是这样。"）在这样一辆车顶上扎着滑雪板，而在随后的那辆车上粘着一朵朵花，而第三辆则拖挂着一只小船。这时，一辆车疾驰而过，只见

方向盘上有一只瘦削的手，一个女人正叉开手指，夹着一根特别长的肉色雪茄，给人留下了螳螂般的图像。在这没有尽头的车水马龙的上空，与这喧闹不堪、喇叭声此起彼伏的地面相对照，完全无声无息地出现了一个孤零零的巨大飞行物，那是一架正要着陆的班机。一瞬间，它好像停滞在那里一动不动。随着飞机在滑行道上着陆，隆隆的震动声响彻大地。

隧道里，车辆的噪音剧增，变成了怒号和雄鹿发情的嘶叫。这响声透过混凝土墙壁上那一个个圆窗，回响在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上。那一长串霓虹灯使得这隧道变成了看上去没有尽头的一连串灯和暗室的组合。而在这忽明忽暗中，那些行人要么闪闪发亮，要么销声匿迹。两旁的墙壁上满是涂鸦，画的尽是一个个神气活现或虚张声势的人物形象。那些涂鸦大同小异："帅哥寻觅美女共度良宵"，"犹太人，魔鬼面包之树"，"母亲，你的儿子到现在都还没有一片立身之地呢！"，"孔德维拉穆尔"[32]。这时，迎面走来两个脚穿绑带靴、头戴船形军帽的士兵。他们见到我，便问候道："向您致敬，上校先生！"随后来了一个胡子拉碴的男子，他一边骑着自行车，一边和我打着招呼："你好！"（我又转而对一位正在跑步的女子说道："别跑那么急！"）隧道里的空气闻上去很清新：它在那一端为西风敞开着大门。那柏油路面已被皮鞋的细高跟和鞋钉凿出了一个个小洞，当你久久地望去，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一条尘土飞扬、带有雨点花纹的田间小路来。

那些被风吹进隧道的树叶则标志着尽头的到来。出口这片地方看上去交织着一片似乎横跨洲际的光亮：从这个视角看去，斯陶芬山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景象；那司空见惯的金字塔山尖化成了三个高高耸起的驼峰，使人能一眼望到远处的风景。那一个个加油站、那一个个仓库，还有那个停机坪都有点像海外殖民地：像火地岛或蒙大拿。

此外，飞机场也相应地变小了，仿佛它并不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而是一个殖民地的代办处。大厅前面那些桦树雪一样白。一棵落叶松上新抽出了许多嫩芽，绿油油的，像一只只异国的小鸟，使整棵树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那个由大石块垒起来的火箭矗立在前广场上，在它的下方，草坪上有一朵含苞欲放的藏红花再现出类似的形状。它那深紫色跃跃欲试，在银灰色的花瓣里显得格外耀眼。

中午时分，天气暖融融的。随处可见的麻雀叽叽喳喳地飞出灌木丛，它们那短小的翅膀上泛着阳光。从毗邻机场的田野里传来一股混着大粪的杂草味，而从后面那片当年罗马人的聚居地洛伊克传来牛群和猪群的叫声。道路两旁的金链花，像一条延伸至地平线的金黄色色带，而一旁那座黄色的加油站也使这条色带看上去更加鲜艳夺目。像往常一样，我总会站在一圈篱笆后面，念着上面写的字“昼夜停车场”、“农家停车场”。

机场大楼是一幢两层建筑。最上面是观景平台，下面一层是餐厅和一家所谓的旅店。旅店里有一条很短的走道，两旁有几间客房。房间很窄，两张床只能一前一后地摆放在一侧。从大部分房间的窗户向外望去，只能看见坐落在附近的塔台和一段封闭的跑道。除夏天外，这家旅店生意萧条，几乎常年都没有客人，充其量也就来几个旅行团在这里过夜，订房的同时也会顺便订一顿餐厅里准备的晚餐，因为夜里通常没有航班。

旅店的前台有一张柜台，摆放在一扇始终敞开着的玻璃门后面。现在，前台像往常一样空无一人。我从服务员那里才能拿到房门钥匙，而服务员同时还在露台咖啡馆里做事，所以我得先把他叫过来，才能拿到钥匙。“所有房间都是空的。”服务员说道。我登记了两个名字：“安德烈亚斯·洛泽”和“蒂莉娅·李维斯”。看来，服务员至少还把其中的第二个当作一个名字来看，因为他问我：“这不是一位女演员吗？”还没等我回答，这个留着浓黑髭须的服务员便又开口了：“要不然是一个飞行员？或者是来自边境那边的人？——我是库尔德斯坦人。”

房间里冷冰冰的，光线也很昏暗。在窗帘轨道下和淋浴房里，氖光灯正在嗡嗡作响。一打开窗户，暖洋洋的春日气息和宁静的阳光便迅速填满了整个房间。中午时分，机场好像停止了运转；只有一架直升机在空中不停地巡视着，一直都在离地很近的上空飞行，就像一架正在海面上搜救的救援机。上方塔楼的小房间装了玻璃窗，屋内的雷达屏幕前坐着一名男子，戴着耳机在看报纸。

我跟随餐厅服务员来到窗前一张餐桌旁，眺望着西边的那些村落和山峰。楼下环绕着一片草丛，中间有一根蓝色的消防栓，颜色酷似路旁的圣像柱。而消防栓的旁边长着一棵像羽毛一样闪闪发亮的褐色

云杉。我吃了些看上去颜色较淡的小羊肉，又喝了点勃艮第红葡萄酒。这酒在瓶子里呈颠茄色，而倒入酒杯后，却又呈现出小檗红，所有这些色彩都将周围的景物衬托得更加鲜明。

这天下午我是在洛伊克度过的，就在文物发掘地附近（其中有些坑已经重新填平了）。在那些还未被填平的坑里，几个孩子正在找着诸如马赛克小瓷块等一些被人忽略的东西。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正在笔记本上画着一根古代水管的铸模，他的鞋底上粘了一些并非这一地带的黏土——或许他是穿过田野来到这里的。在一圈粘满泥巴的篱笆里，长着一棵果树，也是里面唯一的植物，上面除了粉色的小花，什么都没有。在上下交叠的两根枝杈上，卧着一只肥母鸡和几只小巧玲珑的山雀，犹如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示意图，仿佛在告诉人们，这里的物种和形态如此丰富多样，这绝对不会是偶然的。

然后，在机场候机厅里，阳光已经变成了橘红色，无人问津的服务窗口显得尤为宽大。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摆着座位的区域里，这个人要么是早到的乘客，要么就是来接人的。这个区域看上去更像属于一个长途公交汽车站。过了一会儿，大厅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那些站立的人拖着长长的身影。服务窗口前又挤满了人，行李传输带运转着。那些女人爽快地钻进出租车里，有涂睫毛膏的，有染指甲盖的，也有染黄头发的。这家公司的车是红的，那家公司的是黄的。一个身穿灰色制服的男人挎着冲锋枪，仰着头，半闭着双眼穿过大厅，脸色苍白，表情呆滞，像个死人似的。

尽管人群里空气污浊，令人窒息，闻上去有股变质面包的酸味，但我仍然向着他们走去。

太阳落山了。整个下午，前广场上一直空荡荡的，只停着一长溜亮着灯的出租车。环绕整个大厅的绿色植物随风摇曳，犹如伴随着从袖珍收音机里传来的歌声；一个男孩坐在我身边的座位上，耳朵贴着袖珍收音机，一边听歌一边晃动着身体。一条狗在汪汪地叫着，叫声透过大厅的玻璃墙，听上去变了样，像从赌博机里发出的声音。那架正要着陆的飞机或许马上又要飞往另一个国家。今天是节假日的最后一天：乘客多得出奇，他们下了飞机，或者登机前在另一侧挤作一团。到达的乘客在等待行李，他们站在乳白色玻璃门后，只留下一个个模糊不清的身影，他们的亲人则围在狭小的出口处，不断地挥手或

打手势。一位旅客刚跨出机场大厅，就径直迈向车辆租赁处。有一位年轻姑娘像推销员一样靠着柜台，伸出一根手指，把车钥匙递给他。他飞快地用嘴接住钥匙，同时也咬住了姑娘的指尖。姑娘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把手指猛地往里一伸。当这个男人跑向车子时，姑娘把男人扔给她的一张纸条打开，然后把它放在电话机下边。

我正襟危坐，两腿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大厅外，在通向市区的马路上，在那些司空见惯的红绿灯、交通指示牌和起重机之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新信号灯：那是一轮正在升起的红得耀眼的圆月。大厅里面，两扇门被站在前面的人挡住了，被站在后面的人堵得严严实实，只看得见一条脖子和臀部的线条。这时，大门之间出现了一个年轻女子。我起身摘下帽子。那女人挤出人群，打了一个趔趄，身子转了半个圈，随之闪到一边，转身离开出口，不过看样子，仿佛她这么做，就是有意要让什么人可以发现她。

没有人来。最后一辆出租车也开走了。那架飞机又起飞了。当它飞上天空时，从温特山山脊上再次传来震耳欲聋的声音。那是飞机刚才疾驶过跑道时发出的声响，整座山都在咆哮，回响震天，而飞机早已越飞越远，像蜻蜓一样大小，最后消失在天际。其间，那个背影图像连同在观察时看到的那条三角披肩在渐渐靠近呢，或者同时不也远去了？当这个身影最终转过来时，机场大厅里几乎人去楼空了。那女子脸上浮现出一种沉思的美；在所有的美人中，她是一个沉思的美人。

她透过玻璃向飞机场望去，然后看着我手里的帽子，仿佛这是事先约定的信号。最后她注视着我的眼睛，这是一次目光的交汇，就连我们在经历恐怖事件后的那种空洞的眼神，似乎也不能抵消这相互的注视。她说了几句话，带着口音，模模糊糊听不清楚。我走向她，与她拥抱。我被相互间仅说的一个词征服了：“你”。

我们缓缓走上二楼，或者说是跑上去的。我从空无一人的前台柜台上取了钥匙。短短的过道仿佛变成了一道长廊。天花板上的吊灯将一排光圈投射到地毯上。除了灯发出的轻微声响外，周围一片寂静。

她有意无意地用臀部碰我。她拿房间说笑。我看了她一眼，她随即又变得一本正经。她在硬橡胶门槛上绊了一下，不知道是装的还是

真的。

屋外，大街上飞驰的汽车前灯的光映照在塔顶的斜窗上。机场工作人员的餐厅里，无人就座的桌子上摆着一些糖罐，每个透明罐子上都有一个圆盖子。昏暗的隔壁房间里，窗台上放着一个熨斗和一个奶瓶。

一阵战栗穿过这个昏暗的房间，只有从机场区域里有灯光照过来——在墙上留下彩色的圆点——接着就是悄无声息。有时候，一个蜷缩着身子垂死挣扎的人难道不是会让人觉得像两个相互敌对、进行生死搏斗的人而真伪难辨吗？而此时此刻却恰恰相反：的确是两个人，默默地并排站在一起，不是死到临头，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正是这个距离才给人以亲近感。有人问道："你知道吗？"仿佛两个人拥有共同的回忆。有人说道："所以，'软弱'有时也是'有理'的代名词。"不是"救救我"，最多只是"帮帮我"而已。

尽管房间很狭小，但两个人仍然获得了足够的空间。我们躺到床上，床的大小正合适，床前放着一块餐巾纸大小的白布。我在黑暗中寻找她，愈发深入地触摸她的身体。不，不必寻找，她就躺在我身旁，我感觉到她内心的炽热。我犹豫了——正是由于我的犹豫，她识破了我。是的，这个女子识破了这个男人，却仍坚定庄严地与这个男人合而为一。

在欲望的驱使下，两个身体没有离开彼此，而是紧紧地贴在一起。他们完成那个动作，不像一场令人陶醉的战斗，而像一个盛大的游戏；"游戏中的珍宝"。这个爱意浓浓的夜晚让人感觉似乎身临另一个时空。现在天下起雨来，湿漉漉的水泥路像宁静的湖泊。满月下有一朵像小游艇似的云彩，里面有一对恋人。此时此刻，在你的躯体深处，激情的火花四溅，犹如上方无轨电车的电线。此时此刻，你的肩膀又成了你的脸面。此时此刻，东方的天空呈现出西班牙紫丁香的颜色。此时此刻，这个女人的说话瞬间化作为歌唱：她这样无欲无求；她只是要唱出自己的美来。

那一个个梦接踵而来：我从这个事件中走出来。这时，它沿着长满青草的夜晚山坡走下去。山坡下流淌着一条小溪，在晨光中熠熠生辉，岸边有人影在晃动。你仰着头，向上望着一个女人的怀抱，如同

眺望着一个活力四射青春靓丽的穹顶深处——这难道又是一个梦吗？当我试图让自己深信不疑时，一个美丽的陌生女子那双眼睛从容地落在我的身上。——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梦，与另一个人融为一体，成为这个世界中心的主人。

这张陌生的脸上，双眼和嘴唇紧闭，让人想起一尊远古时期的石像，而你却无法确定，它表达的究竟是幸福、狡黠还是危险。接下来，这张脸可能会含笑看着我，可能会对我啐唾沫，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然而，这张脸只是睁开眼睛打量着我。一个女人的声音——不再是某个人——说道："我得走了，已经很晚了。"

屋外，有一队小型的机场安全车沿着机场滑行道驶去，车顶上闪烁着信号灯。一夜之间，月亮变小了。一辆行李车发出当啷当啷的声响。停车场上打开了一道围栏。机场滑行道尽头的农庄里升起一股炊烟，院子里有一个男人的身影正缓缓走向牲口棚。

当我问她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她时，她回答说："事情已经发生了。"这是否意味着我一厢情愿呢？"别提什么愿望，不过问问也未尝不可。"——于是，我问她如何看待我。我似乎渴望人家对我略加描述，"说说你对我的印象吧，也可以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这时，她回答说："你好像有些心不在焉，同时也让人觉得一点都不满足。况且你有点不修边幅。我渴望得到你，可我不信任你。你良心会有些不安：不是什么偷窃——不然的话，你恐怕早就临阵脱逃了。从你身上可以看得出来，你游离在那些通常的权利之外，而且这种状态是一种痛苦。我既不相信你，又相信你。你很像'门缝里的那个男人'：他病得很重，还去看望一个好朋友。临别时，他久久地站在门缝里，强装笑脸，眼睛眯成一条缝嵌在眼窝里，像被嵌在打磨得铮亮的眼镜里一样。'再见，痛苦的中国人！'那位朋友说。"

"那两个人有没有再见面？"

这个会说话的女子没有再往下说，而是放声大笑起来，她自己已站在门缝里，一副极其坦诚的神情。我闭上眼睛，还是听到一种回答："那位朋友最后对他的朋友说：'终于来了个中国人——终于在所有当地人中间，出现了一张中国人的面孔。'"

上午，我穿过田野去看望住在瓦尔斯的母亲。她住在养老院里。养老院坐落在一个宽阔得几近空旷的村庄广场上。我们坐在花园里一棵梨树下的木椅上，树上白色和粉色的梨花开得十分灿烂。

起初，她把我当成了给她送钱的邮递员，随后又一再叫着不同的名字和我说话。当她认出我时，便咯咯地笑个不停。她闭着嘴，要遮住残留的牙根。她的眼睛非常明亮，脸就像孩子的脸一般大小，脑袋缩成一团。她正在吃煮鸡蛋，与其说是咬，不如说是抠出来吃；吃着吃着，彩蛋壳落到她怀里；她一口吞下蛋黄。她久久地注视着我，最后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冷酷无情的年代，不是吗？早在你被迫去参军之前，我就一直对你的处境感同身受。"她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时，用了"瞎忙活"一词："你，还有你的瞎忙活"——一个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不可对它又贬义理解，多多少少要表明一种诧异的关注。接着她又说了另一句奇特的话："没有你，我恐怕早就失去信心了。"她这是在说谁呢？有一次她说："你小时候，我经常拿饭勺揍你。"她肯定指的就是我吧。后来她又一次提到我："你爸和你都像是拉锯人：你们被拉来拉去，奔波在家乡与各地之间，可你们在哪儿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临别时，我把一些钱放在长椅上留给她用。她为此而好多次欢叫着，并且围着那些纸币，艰难地踏着步子舞动起来。不一会儿，养老院的其他几个老太太也加入进来。

我穿过广场，走进教堂，在纪念堂那里翻看着那本大书，里面有那些阵亡士兵的照片。战争伊始，我父亲就阵亡了。他从未见过自己的儿子。从他那张包在塑料皮里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他和相册里的其他人不大一样，鼻子下面没有蓄须。也许照相的时候，他年纪太轻，还没有留胡子。

从教堂顶上的平台望去，下面是一片低地，萨拉赫河[33]在此形成了与德国的边界：一条冰冷的山间河流，宽阔的河床上到处堆满小鹅卵石。平滑的石块会被河水成堆地冲到对岸的灌木丛里。然而，每一次，我身上的一切都让对岸那个国家索取得荡然无存——仿佛那虚无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永远。

就在当天晚上，我已经站在另一条河的岸边。下午早些时候，我乘飞机从苏黎世飞往米兰，并在那里搭上了开往曼图亚的火车。往南几公里坐落着一个名叫“皮特罗”的村庄，以前叫“安德斯”，被视为维吉尔的出生地。水坝后面，明乔河流经这个村庄，维吉尔曾用“神秘”一词形容它。它“缓缓地蜿蜒”流经伦巴第低地，“轻柔的芦苇缠绕”着河岸，维吉尔的作品里这样说道。如今，明乔河不过是条狭窄的小河。然而，身临其境，我却看到：事实并非如此。这条河和两千年来人们对它的描述却不太相符。它在此处或彼处分成好多条支流，其间矗立着一座座林木茂密的小岛。

白色的睡莲，花蕊呈黄色，忽高忽低地散落在这条缓缓流淌的河中。小鱼儿腾空跃出水面。一只布谷鸟在小岛树林里啼鸣。一只鹭鸟从河面上掠过。河对岸，远处一家炼油厂的“火炬”正在熊熊燃烧。

那是一个温暖而明朗的夜晚，路上没有人，只有从一个没有筑围墙的狗窝里传出狗叫声，就像不同的乐曲倒带时发出的声音。鸟儿飞过时，扶摇直上冲向天空。我脱光衣服，潜入浑浊的水里，直到水打在脖颈上。

重新穿好衣服后，我往西走进村庄，坐在一家名叫安德斯的小饭店前。这个饭店位于两条铺了柏油的乡间小路交叉口，周围是一大片玉米地，几乎每株半大不小的玉米上都有一只麻雀。维吉尔未曾听说过玉米，他也不认得相邻农田里种的马铃薯、西红柿，还有从其他大洲引进的“长着柔软的小叶子，在风中比其他树发出更大响声的洋槐”（这是我儿子从自然课上学来的说法）。

在返回曼图亚的路上，我漫不经心地穿过这片耕地，田间有许多没有架桥的水渠。大多数水渠我都一跃而过，而其中一条太宽了，我只得游过去（我先把衣服团成一团扔过去）。一种被人们称为“熊掌”或“爪子”的、供兔子食用的野草，在这里看上去纤细得多，观察时间久一些，会发现它真的像“卷曲的叶蓟”。接骨木长得十分矮小。“为喝酒的人们遮荫的梧桐树”像修剪过的篱笆似的立在田埂边，一串串去年的干桐铃随风发出阵阵声响。

夜里，我梦见安德斯村坐落在一个海湾里。在另一个梦里，我看见了母亲的那张空床。她的睡衣平铺在床上，受伤的身体留下的印痕清晰可见。

第二天一早，我从米兰飞往撒丁岛上的阿尔盖罗。在撒丁岛上，连续两个夏天里，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一次，我从船上望去，阿尔盖罗犹如一座白色的城市。从此，这个岛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都不用说"，"可以保持沉默"。飞行途中，广袤的大海在闪闪发光，两条渡船迎面驶过。飞机着陆后，水泥场地中间，那些行李小推车上的小纸条在迎风飘扬。

我一整天都待在偏远的拉格蒂巴拉茨，它被海上的一道沙丘隔开，是撒丁岛上唯一的天然淡水湖。除了其他人留下的脚印以外，只有我一人待在那里。我光着脚站在水里，踝骨以下埋在黑色淤泥里，一条小水蛭咬了我一口后变得粗厚，继而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用手指夹住一只朝我飞过来的蝗虫，几乎有麻雀那么大，锯齿状的腿在我皮肤上划出一道裂口。湖边高大繁茂和芦笋般绿的柽柳和汩汩的蓝色湖水汇成了一道流动的风景——"流动的柽柳"。后方沙土色的高地上有一头深色公牛，它始终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在回车站的路上，那块我曾经用来"杀过人"的石灰石头上已布满了红尘土，石头里的小圆洞像手指一样。村里有个孩子看见我一直光脚走路，朝我喊道："你没有鞋子！"随之就应声站起来了。

第二天——我本该又要在萨尔茨堡上课了——我途经阿尔盖罗那家所谓的"残疾人"收容所。它叫"多莫斯慈善机构"，被一条河岸街与大海隔开。那些智障者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几乎都背对着大街，坐在院子里一条长椅上。有几个从篱笆桩向下好奇地打量着那些过路人。有一个人摆弄着手指，仿佛有一个口琴似的，无声无息地吹着。我与他面面相觑；可那个坐在凳子上的人赢了：我垂下眼帘走开了。傍晚时分，我又回来了，并且准备应对那个好像吹口琴的人。他始终原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我们久久地相互打量着，面无表情，同时也没有凝视。最后，有人在篱笆后面使了个眼色，站在我对面的这个人转过身去，但不是面带被征服的表情，而是漫不经心的样子，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片刻间，不再存在什么弱智，更多只有其狡黠的扮演者。"讨厌的笨蛋！"他说。

第二天，在去岛中心的车上，我又一次与一个婴儿玩起这个游戏。之前，这个婴儿把头靠在坐在前排的母亲肩膀上，久久地盯着我看：当我回过头看他时，这个婴儿像被看穿了似的转过脸去，搂住母亲的脖子寻求躲避。然而，他同时又微微一笑，仿佛他如此被看穿后感到如释重负似的。母亲和孩子的脑袋紧靠在一起。我回到海岸边。周日早晨，我又去了收容所。在露天树阴下正在举行弥撒。突然间，一只壁虎掉下来落到神父肩膀上。当他举起白色圣餐饼时，这块饼在阴影的遮挡下看上去像一轮落日。那个辅助弥撒的侍祭趁神父布道的时候在逗弄一只蜘蛛。那些傻子挥舞着双手，掌声不断，絮絮叨叨地喊来叫去，或咕咕哝哝，或喃喃自语，或哇哇乱叫，或咒骂，或哀叹，谁都听不明白。有只麻雀在土坑里又是竖起羽毛，又是抖动双翅，变成了一切可能的动物：一只老鼠、一只乌鸦、一只公鸡、一头狮子、一个海豚；一幅字谜画。阿尔盖罗前这片海面上时而波澜起伏，时而线条柔美，时而险象环生，犹如一条长卷文字。一只鹦鹉卧在前面一个放在石灰块上的鸟笼里，一声不吭。

我晚几天回到萨尔茨堡，在学校里报到上班，这不是梦。那个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的朋友只是说了句“没什么”，就和我一起去教室，替我把门打开。不过在去的路上，他久久地注视着我，显然有些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把我当作一个不可救药的和失败的，还是一个变形的人来看呢。

教学大楼是当年皇家的步兵营，坐落在萨尔察赫河岸边。教室的墙壁很高，十分明亮。我从未见过这么多不同颜色的眼睛，我觉得每种颜色都很美。上课的时候，教室里出奇地安静，直到我忍不住发话：“为什么你们不说话呢？你们毕竟得说话呀。”我让学生们害怕了。不过之前他们也一直都很怕我呀。

对岸市政供暖公司的烟囱里冒出的白烟，指示着风向。从铁路桥上传来的声音可以辨别出什么样的火车正在开过：客车发出嗡嗡或隆隆的声响，货车则是轰隆轰隆地驶过，而其间听到的咣当咣当的响声，则是调度机车头发出的。站在这里，我油然觉得很幸福；不是永远，而是暂时待在这里。我把身子探出敞开的窗外，沿河往上看到阿尔姆运河支流上泛起的浪花像瀑布一样注入萨尔察赫河。这座城市上空突然闪现出光亮，让所有的房舍，甚至连要塞城堡的墙壁都蒙上了柔和的色彩：整个画面看上去不是背景或表象，更像童话，庄严而静

谧。同时，我也觉得明白了，有些东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的一部分连同那个被石头砸死的人一道坠落到岩石上。我不再参与其中了，或者无论怎么说我玩起了另一个游戏，或者仅仅是一轮安慰而已。这个世界笼罩着忧伤；忧伤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在扭曲着，在失去色彩。撒丁岛上一个不堪入目的情景闯入我的脑海：一个住宅区，名叫佛基亚，战争期间，是那个独裁者的随从让建在这座白色城市旁边的。这里再也没有一座建筑不存在门槛，房门无非一个窟窿而已。“肮脏的民族！”我在教室休息室的桌边大声说道。这里原先是兵营的拘留室。邻桌有人回答说：“好样的，洛泽！”当我抬眼看去时，我才发现我在这里已经属于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之列了。

这一天的最后一堂课，我是这样开始的：“希腊语中lalein [34]等同于我们德语的‘呓语’。不过，诗人也把lalle [35]称作卵石。”这时，我又站在窗前，看着那条春天的河流向前奔腾，风在河里画出一个密密麻麻的横条图案，一直延伸到两边的天际，犹如一场空空如也的划船比赛。“我会没有爱的，”我心想着，“我会没有爱吗？——无论如何我再也没有把握了！”

那忧伤骤然变成了某种彻头彻尾另外的东西：从未如此经历过的东西，传奇的东西，闻所未闻的东西，同时立刻又是显而易见的东西，简直令人振奋的东西——它就叫做“孤独”；不是我的命运，而是现实存在。这个词由于有一幅画面，就显而易见：在一条清晨的大街上，一幢房屋入口前立着世界上最短的栏杆，几乎不到手掌长，只是为一级台阶设立的；但它是弧形的，打磨得锃亮，在清净无比的空气里闪闪发光。

几天后，我在橡树住宅区的超市里经历了一次小小的奇遇。（这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原因。）也许出于防盗考虑，超市的天花板上安装了一块斜面镜子，我无意间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人们总说，孩子都像自己的生身父母，然而，在这个时刻，我的感受则截然相反：并非像别人有时断定的，我的儿子长得像我；而是我——一个成年人——长得像我儿子。先人和后人的相似性通常都会使我更加感到不快，甚至让人难以容忍：但是，现在这个相似性却恰恰相反；除了我自己以外，恐怕没有人会察觉到这一点。这个相似性不涉及容貌，而

是眼睛；不是眼睛的形状或颜色，而是眼神，“观察的眼神”。“我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独有的东西！”我寻思着，片刻间觉得自己如释重负。超市最后面的角落里是肉食专柜，有两个白衣女子在全然的沉默中站着。屋外，一辆汽车从桥面上隆隆驶过。在这个橱窗前，笼罩着一片巨大的神圣氛围；一道光的彩虹横跨在桥面上。“可怎么会有这样的观察呢？”我稍后这样思索着。——回答是：“创伤。”

在接下来的周末里，我回到哥伊斯的家里。“哥伊斯、瓦尔斯和塞岑海姆可是好地方啊”，平原西边的三个村里，人们都这么说。这就是说，那里不再存在当年那贫瘠的沼泽地了。屋里正好没有人。我在工具棚里打磨好那把经过冬天而生锈的镰刀。然后去果园里割春天的第一茬草。

果园里有很多树冠常常交错在一起的树木，奇异地包围着那个小小的“教师之家”，更确切地说，与之般配的似乎是苗圃和草坪。那黄色的房屋正面被一个空棚子遮掩着。这里以前长着形状像心一样的杏。整座房子看上去，就好像是从别的什么地方，从城市一个居民区或者郊区挪到这个偏远村庄里来的。门边上那棵月桂树郁郁葱葱，布满透光的枝条；椴树花、梧桐树花絮、从毗邻耕地里飞来的谷壳都落在上面。

这是五月初的一个傍晚，天下着雨。我依然在茅屋前劈柴，把葡萄藤周围的土翻松。葡萄藤上已长出毛茸茸的叶子。我坐在院子后面一条草凳上，因为有树阴遮蔽，凳子干干的。片刻间，快要落山的太阳出来露了露脸。

先是我女儿回来了，还有另一个女孩陪着。女儿自己有钥匙，两人进了屋，并没有发现我。昏暗的楼梯间里一直没有人，此刻亮起了灯。从敞开的屋顶窗口看到两个人正用手托着脑袋，从屋里传出了流行歌曲，伴着两位听众的表情，曲调听起来尤为柔美。我们也曾爱听流行歌曲。两个女孩又是窃窃私语，又是咯咯地笑着，又是相互嗔骂，又是互相取笑。这时，她们额头、脸颊、脖子和肩膀透出新娘的光彩，如此耐心，如此信心百倍地等待着新郎。哦，青春啊！哦，充满年轻的世界啊！

妻子的车停在屋前。她已经从大老远看到我了，朝我做手势。她越过边境去基姆湖郊游了，然后坐船去岛上玩。“没有人来哥伊斯游玩。”雨中游览基姆湖女士岛，使她“心旷神怡，不寒而栗”；湖中央有个电话亭；有个醉汉看着她，“像个独眼龙”。湖岸“在蒙蒙细雨中有点像北海的景象”。

言谈间，我又看了她一眼。多年前我追求她时（我居然追求过别人！），我曾在给她的信里写道：“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我来自无忧星球，你来自烦恼星球。”面对眼前的访客，她精神振奋，神情严肃。一般来说，面对另一个人时，我会先看到身形——“身材”，而这里却只有眼睛，近乎黑色；下面是洁白的项颈。（我知道，不管怎么说，描述别人都是不合情理，尽管如此，我有时觉得非得要谈谈她不可。）

我去迎接儿子，他大概还在从操场回来的路上。我们在乡间小路上相遇了，这条路穿越了一片玉米地。有一次，我在沼泽地里看到一个腿脚残疾的筑路工人，肩上扛着工具。现在我也看到儿子手里提着装球的袋子，行走在这片天空下。他在路上迂回曲折绕路前行，但是目标很明确，我还听到了牛仔裤腿的摩擦声。

然后，前来拜访的是那个厨师。吃晚饭时，全家人聚集在西边的花园里。女儿的那个朋友也来参加了，她晚上会在这里过夜。天黑还早着呢。从那些农户院旁的粪堆里，那一根根探出头来的秸秆闪闪发亮；果树下的草地上闪闪烁烁。高速公路上传来车来车往的呼啸声。边境站离这里很近：一个像油田一样的火炬出现在半圆形山丘上的树丛中，最上边是犬牙交错的云杉树冠，这让人想起一头沉睡的野猪；前面那座白色的小教堂在深色的山丘映衬下，扩大成了主教教堂。

阳台上，天气变凉了。那个客人拿着木柴在走廊里的炉子上生起火来。一棵产自沉默之岛（撒丁岛）的“矮棕榈”——据说这一树种只有那里才有——摇曳着自己的扇叶。树底下，趴着一只古怪的野兔，不停地抽动着鼻子。两个姑娘中有一个说，她想要一幢房子，所有的东西都要有自己的房间：一个存放石头，一个养花养草，一个专门放鞋。一阵轰鸣从东边的机场传过来，那是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接着是“林茨”，再下来是“阿姆斯特丹”。

厨师在洗餐具。妻子拿着一本书走进厨房，从一对生活在世纪之交的夫妇的通信中朗读起一段来：“因为你长久的远离，我获得了一种倍加高尚的生存，更为振奋的精神，对此我似乎向来一无所知。”她情不自禁地又加了一句：“这是一个性别说给另一个性别的话，这难道不也是人跟上帝在对话吗？”之后，大家一起看电视新闻，最后就是那惊呼：“然而，无论怎样，某种永生毕竟是可能的！”

我走上阁楼，敲了敲儿子的房门。他压低声音向我表明：“别这样毕恭毕敬地站着。”再说吧，或许他的同学已经告诉他，我毫无目标地在城市里东游西荡，“像个精神病患者”；有人也讲过，我从公用厕所里跑出来，清洁工在我背后喊道：“走着瞧吧，你再不来才怪呢！”有一次，他亲眼看见我坐在长凳上，两边都是塞得鼓鼓囊囊的塑料袋，“像个城市流浪汉”。

房间里只有台灯亮着，屋顶半明半暗。搁架上摆放着许许多多小玩意儿，绝大多数是金属和玻璃制品。在它们的映衬下，靠近写字台的那堵墙闪闪烁烁，犹如一个夜间飞机驾驶舱的仪表台。此时此刻，外面那片平原尽收我们眼底。绿色是一天最后的色彩。随之，一切都变得昏暗，到处闪现出一道道光环。我坐在儿子的工作软椅旁边的凳子上，说道：“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接着说道，“我的故事的名字叫‘门槛的故事’。”

这个讲述的人在开始讲以前，儿子照例又一次打断了他，身子转向自己说：“停！一切的关键就是要找到那正确的顺序！”讲述中，他始终耷拉着眼皮，偶尔也眨一眨，像不可一世的样子。他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自己的讲述：“我需要你当我的证人。”

这位听众是这样回答的：“我觉得，我的父亲有时有些倔强。”

这个讲述的人睁开眼睛，松开手，叉开双腿，正襟危坐，深吸一口气，然后越过儿子的肩膀，急切地眺望着空旷的远处，仿佛他期盼着什么人，或者想起了什么人；或者正在聚精会神地构思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讲述。（讲述则意味着：从前、现在、将来——意味着：未来！）然而，他首先躺在儿子房间的地板上睡着了，有人后来给他盖上被子。他睡了一天两夜。他做了一个梦：“这个讲述的人就是那道门槛。他必须保持镇静，自我克制。门槛的韵味何在呢？”

尾声

桥上吹过一阵特别的微风：不仅是这条河流引起了这样的风，而且还有那条微微抬高而流经这个地区的运河。表面上，河水如此平静，看上去好像停止不动，就像盛在浴缸或木盆里似的。而就在河面下方，那深暗的树叶漩涡却给人一种奔腾不息的印象。两者都会迷惑人：你可以伴随着那些漂浮在水面上的鸟窝、纸船或栗子花，不紧不慢地与之同行；你一定要不时地放慢自己的脚步。

在这片平原上，这座桥形成了几乎不为人所觉察的拱形；过桥的摩托车毕竟要加油，有些骑自行车的人要抬一抬屁股，汽车驶上桥面时车灯斜斜地射向天空。紫燕掠过水面。水面上漂浮着大片草团，像游离的小岛一样。深处那黑乎乎的梧桐树犬牙交错，有点像蝙蝠的翅膀。看样子，仿佛那奔流不息的河水无非是后面那多石的阿尔卑斯山山脊的另一个影子——是它的另一种时间-形式，是它的骤变图像，是它更加自由的形象，是它的平原-本身。同样，山前草地上那两只狂吠的狗无非就是山的转换形态，是它的细胞分裂，是它转变成那细小的微粒，却又生气勃勃。两只狂吠的狗变成了一对紧紧相拥的情侣；这对情侣又变成了一个戴兜帽的孩子。

岸边的紫丁香盛开了。傍晚时分，后面的山峦也蒙上了紫丁香的紫红色。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站在桥上，半闭着双眼说道："这条运河如此沉静——如此讨人喜爱，如此朴实无华。这条河是不可战胜的！"有个身穿白裙的姑娘停下自行车，用一只脚撑着栏杆，在桥上点上一支烟。岸边茂盛的青草，甚至连僵硬的飞廉都在风中簌簌作响，像芦苇杆一样。在一棵枝叶繁茂的柳树中，有一只乌鸫在啼鸣，身子几乎掩映在树叶里，可从它那一声接一声闪闪发光的喉咙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柳树在摆动着，下面的河水在流淌着；那棵云杉孤独地耸立着，整片大地在上面呼啸。是的，在这座空空如也的小桥上方，整个欧洲的天空曾经绽放出蓝蓝的色彩。

天开始下起雨来，雨滴在水面上溅起一个个圆圈，顺着水流逝去。相反，雪花完全无影无踪地飘落在运河上，立刻被河水吞没。一条大肚皮鱼在桥前像海豚一样高高地跃出水面，过了桥后再次跃出水面。对于这条狭窄的河流而言，它显然太庞大了。一只鸭子犹如一叶小舟在河岸间划来划去。有只狗猛地冲上来，可它昂着头，一动不动

地顺着水流向下漂去。雨后，桥上升腾起一股水汽，散发出一股木头的味道。

每当载重汽车驶过桥面时，这个站在这里的人的脚下就晃动起来，犹如当年那些农家的牲口车驶过一样。这时，那些之前看不见的小鱼儿在河底四散逃去。然而，有些时节里，河里除了流水，什么也没有，没有什么物体，也没有什么动物——清一色的水：时而清澈，时而混浊；桦树般洁白，天空般泛黄，岩石般的灰色、肉色，云的色彩，铁蓝色，土色，草绿色，黑土色，蓄水池一样的黑色；无声无息；只有在枝条垂入的地方——或在一个比较狭窄的地方——，有汩汩的响声，就像从一眼隐蔽的泉水里发出来的。有时候，这流水具有回忆的色彩：无可比拟，只能让人回忆。临近傍晚时，那通常深色的水面上涌起了一个个闪亮的小漩涡。

秋天里，运河床上一个月之久没有流水，要清理河道，修缮堤岸。鱼儿被安置到了别处。淤泥散发着恶臭味。有些地方的河床完全干涸了，像旱谷。可有一天，河水又开始流淌，夹带着泥沙，灰蒙蒙的，从下到上满是断水期间沉积起来的大大小小的杂物。一个老妇人看到重新奔流的河水后，发出一声惊呼："这么脏！"又补充了一句，"不过这样就不错了。"

桥上有几块木板重新换过了，和周围几块比起来颜色要浅很多，裂缝处也比周围其他地方更早结冰；在柳树的缝隙处，也隆起了晶莹剔透的冰。从远处吹来一片大梧桐树叶，粘在柳树桩上，像漫游路上的另一种指示牌。冬夜里，河上的灯亮起来了，从山上往下看，弯弯曲曲，回环往复，像平原上的星空。从缩小了很多倍的地图上看，蜿蜒的河流仿佛在颤抖。

水面上不断升起的雾气将运河分隔成了这边区域和那边区域：那一座座雾霭之后的房舍变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地方，一个古老的水车来回运转着，灌溉着河岸边的园子，成为整个村庄的标志。而在桥那一边，那些行人已经到了家门前：当他们之前全都沿着街边鱼贯而行时，那么他们之后不是相互靠拢在一起，就是三三两两地散去，犹如在一个环形村庄或者集体院落里一样。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半大小子在驶过最后一块木板后，立刻把双手从车把上放开，手臂交叉着一直骑到家门口。跟在他后面的那个男孩，车轮左右摇晃，咯吱作响，好像

整辆车马上就要散架一样。他在桥上下了车，看着自行车架自言自语道："唉，我看骑回家还是可以的！"于是他重新骑上车，一路咯吱咯吱地继续驶去。

这个站在桥头的人，别称"守桥人"或者"这个人口统计员"，始终没有引起人家的注意。如果有人问及他在那里干什么时，他会回答："我在等人。"他边等待，边在桥上走来走去，或者靠在桥栏上，一个脚后跟撑在身后。他看着驾校的学生如何在桥上练习掉头。那辆停靠着的电车发出隆隆声，准备要出发了。平原上的树木在雾中看起来很稀疏，树冠上有很多黑色的槲寄生球，旁边是一轮光芒四射的满月。运河从山间流过来的水冷冰冰的，让人的脉搏平静下来。站在这里，他毕竟就是他："我在。"

他心想着，这座桥太小了，出于战略的原因，它非得炸掉不可。这里恐怕永远都不会展开一面旗帜。只要有坦克开上去，它会立刻轰然垮塌的。连大自然都几乎不会在这里展示自己的威力：发大水时，阿赫河上游的塞口——运河的发源地——干脆就会合拢起来。

周日上午，一个即将分娩的妇女和一个年轻小伙子在阳光下手拉着手，伴着缓缓流淌的河水，迈着轻盈的步伐，在拱桥上为孕妇而翩翩起舞。有一天夜晚，在桥头人家的花园里，挂着几乎清一色的白衣物。那里住着一家外国人，平日里晾晒的都是五颜六色的衣物。这个观察者分别为流水、树木、风和桥找到了一个不寻常的词："运河、灯光、柳树、桥面：它们主宰着。"

电线发出吱吱的声响，又一辆电车驶过来了。一般情况下，下车的乘客中总会有一个要赶在其他人前边，也总会有一个人最后一个下车。夏日里，乘客们身穿五颜六色的衣服，当他们纷纷跳下踏板时，要么像四处倒下的保龄球，要么像一个肤色奇特的人群，有红皮肤，有白皮肤，还有棕皮肤；到了冬天，他们穿着深色衣服，裹得严严实实的，在终点站环道路灯的照射下，像被火烧伤的人或去朝拜的人。（在这里，我们和印第安人一模一样。）他们急匆匆地走过这座小桥；不是所有回家的人都像现在那个孩子一样晃动着自己的背包。很少有路人会驻足朝水面张望（最多会有人短暂放下自己的包，或者换到另一只手上来）。相反，有几个人用拐杖和伞把使劲地敲击桥面。几乎没有一个过桥的人会咒骂、抱怨或大笑。然而，时而会隐隐传来

讲述的声音："当我父亲……"一辆咯吱咯吱响的购物车；一辆摇摇晃晃的婴儿车；一辆嗡嗡作响的电动轮椅。接着出现的是集市-瞬间：两个学生利用这座桥做着交易，他们事先在公交车上已经商量好了。与此同时，一个成年人投了一枚硬币后，从固定在栏杆上的塑料袋里取出一张报纸。一个因为痛风直不起身的老妇人在桥拱上停下脚步，抬头观察着天色，说道："天意难料啊。"

那个最后下车的人是一位年轻女子，头发盘在头上。她走过桥时，那些五颜六色的发簪闪闪发光。

一瞬间，这空荡荡的桥面上散发出女人的香水味。

随后不远，有一辆用彩带装饰的马车驶过来，车上坐满了从一个演出地赶往下一个演出地的乐师。他们把单簧管、小号和钹放在一边，眼神里充满倦意。只有那个手风琴手坐在马车后面的横杆上。到了桥上，他把琴放在手臂上打开，奏出一个长音。

这条中世纪的运河流淌着——和城里教堂大门上那些石像一样——宁静、狡黠、静默、庄严、徐缓且宽容。

（1983年）

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

刘学慧　译

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把一个独特而又符合规则的国家称为“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可是，为了让这些理由站得住脚，为了一一弄明白这些理由，我似乎觉得首先得看到这些理由。起码对于我来说，“理由”这个词必须跟“看到”这个动作联系在一起才行。我没有看到任何理由可以称这个国家为斯洛文尼亚，甚至连“大塞尔维亚的坦克共产主义”也不能成其为理由。我所看到的只是业已形成的事实。同样，我也没有看到任何理由可以称一个国家为“克罗地亚”。这又是另一回事，跟我的关系不太大（我毕竟压根儿也没有弄明白它是怎么回事）。只有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以及200万斯洛文尼亚人民才与我紧密相连，是我一生的牵挂。

我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硬要自诩为斯洛文尼亚人。我出生于奥地利克恩滕州的一个村庄，当时正值“二战”期间，村子里的大部分人，不，全村人都是奥地利-斯洛文尼亚人。他们都能听懂对方的方言，能用对方的方言交流。我的母亲在少女时期受到了她哥哥的深刻影响，曾经认为自己是奥地利-斯洛文尼亚人（后来，在“二战”之后，又是另一种情况）。当时她的哥哥在边界的另一边，也就是在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的马里博尔学习水果种植。不过，我的父亲是德国士兵，因此，我童年生活的最初时光是在东柏林度过的，德语也就成了我的语言。古老的斯洛文尼亚村庄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从记忆中淡去，最后也只有村里人自己笑称其为“老村”。对我这样一个德国大城市的孩子来说，斯拉夫语的古老发音极其难听，即使我的母亲偶尔讲讲斯拉夫语，我也会粗暴地打断她。

多年来，我主要是从图片上了解斯洛文尼亚，或者是从上一辈人那里听到有关斯洛文尼亚的事情，这些可能与它本来的样子不符（或者不是它该有的样子）。我绝不会成为一个斯洛文尼亚人，尽管我现在差不多能够看懂斯洛文尼亚语，其实连半个斯洛文尼亚人也算不

上。如果我今天一定要弄清楚我属于哪一个民族，那我就属于一个没人的民族，这个民族一会儿有救，一会儿又无可救药（当我再也无法想象出那些到处流窜的人到底应该归属哪个民族时，我就觉得他们算彻底无可救药了）。

尽管如此，在我的生活中，我觉得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地方都不能像斯洛文尼亚这样让我这个陌生人能够找到家的感觉。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我一直都有这种感觉。后来我发现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实际上跟我小时候听到的不一样，童年时期那些让人充满幻想的传言原来都不是事实。

斯洛文尼亚是我的家吗？南斯拉夫是我的家吗？事实上，这无异于霍夫曼斯塔尔[36]在他的作品《一个回乡者的信》中所描写的那种恐惧感：作品中的主人公离开德国多年，再回到德国之后，竟然体会不到任何物体最初的真实感。罐子不再是罐子，桌子不再是桌子，在这个回乡者的眼里，德国的一切物体都是“抽象空洞的”，让人找不到归属。这么多年来，每当我越过边境去往斯洛文尼亚，那里的一切事物都能让我感觉到真实的存在。我们无法回避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因为它们随处可见。如今，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西方世界，那里的大部分物体都能在斯洛文尼亚看到。看见河流两岸架起的通途就觉得是桥梁；看到水域就觉得是湖面；走在路上，总能感觉到路两旁是连绵的山丘、成排的房屋或者果园。曾经中断了的想象又被眼前真实的事物所包围，一切事物都是真实的，任何一样东西都能给人一种到家了的感觉：“到家了，我终于到家了！”

除了这些细节情形之外，很长时间以来，在我看来，这个国家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无论是游客，还是当地的居民，都觉得这是一个充满真实的国度。不然的话，他们走路的样子、说话的方式、看或不看，怎样会让人觉得与边境那边的意大利人和奥地利人比起来更加真实呢？实际上，在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身在这些斯洛文尼亚人中，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在感受真实：在葡萄园里（喀斯特地貌的葡萄园或者山丘上的葡萄园里）；在教堂钟楼旁；在公共汽车上（从托尔敏到新戈里察，从卢布尔雅那到新梅斯托，从科佩尔到迪瓦查）；在极其简陋的客房中（莫斯特纳索契或者维帕瓦）；在侧耳倾听人们说斯洛

文尼亚语时，感觉这种语言那么真实、柔和、自然、优雅。这个国家的每一块地方都让我感到真实。

这样的经历有可能是我的想象，甚至是一种假象：1991年6、7月间发生的那些事件被斯洛文尼亚人不是悲伤就是自豪地称为“战争”。首先不是这些事件促使我深入思考。霍夫曼斯塔尔的那篇书信体小说讲述的是不真实的事情，或者不存在的事情，或者无法描述的事情。它问世于“一战”爆发前几年的德语区。同样，一段时间以来，斯洛文尼亚的事物、风景以至于整个国家对我来说都是往事了。历史感遗失了，方才使纯粹的现实感成为可能，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即使这种表象看起来很糟糕？），这也不过是历史（或者我们永久不幸的必然发展的）长河中的一个小小停顿。自古以来，斯洛文尼亚对于我来说就属于大南斯拉夫，南部从卡拉万克山脉开始，继续向下延伸，从奥赫里德湖畔的拜占庭式教堂和阿尔巴尼亚的清真寺，直到希腊的马其顿平原结束。在我看来，像其他南部斯拉夫语国家的独立性一样，恰恰这种明显的斯洛文尼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看起来永远都不需要自治权——促成了这个自然而然的大统一。这一点不仅是地理上（比如，喀斯特地貌从的里雅斯特以北的策斯特里山脉一直往下延伸到整个第纳尔平原）的存在，而且尤其是历史的存在。我认为，本世纪有两件大事使南斯拉夫的众多民族实现了统一，并必然持续地保持统一：1918年，伴随着哈布斯堡王朝末日的到来，这些民族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有些甚至满怀热情，聚集在一个自己的帝国。在这个帝国里，各个国家都不再是充满阴暗的殖民地了；各种语言也不用再是奴隶般的低声下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共同抵抗大德意志帝国，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党派和相互对立的世界观——几乎除了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37]法西斯分子外。

（在斯洛文尼亚的村子里，我经常看到老年人三五成群聚在一起，他们都是与我们的，也就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历史迥然不同的见证人，是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南斯拉夫历史的见证人。我在此只能说，我因此而羡慕她的历史。）

但是，在过去几年时间里，随着我去斯洛文尼亚的次数增多，越来越多地听到关于新历史的说法。什么新历史呢？就是有关“中欧”的古老传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又有了新的内容。这种不同于那些保持沉默的老兵的历史没有分散的叙述者，而只有成群结队的发言

人，或多或少夸夸其谈的发言人。或者这么说吧：以前有叙述者讲述中欧的历史，而在这期间，他们的地位几乎毫无例外地被发言人替代了；又或者：最初的讲述者本身，其中有些是我的朋友，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占据了发言人的角色。首先，在我这个斯洛文尼亚的客人看来，正是这种历史主义化的发言人角色在报纸上，在月刊上，在研讨会上众口齐鸣，从而一次又一次使这个国家特有的东西越来越强烈地遁入我所说的不真实、不可触及和不现实的境地。

从政治方面来看，不是所谓的斯洛文尼亚对我来说似乎早就是“东部”。尽管它的方位在南边，但我从不认为它是像意大利一样的南方国家（而且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以及黑山，我从来都没觉得身在南方）。尽管我们奥地利的《边境巡逻报》同样持久地试图蒙骗读者，至少在过去几年的转折期如此，声称从耶塞尼采、德拉沃格勒或者在穆尔斯卡索博塔就已经开始是“巴尔干”。但是，哪个成年读者今天还会将“巴尔干”这个词与某些真实的东西联系到一起呢？

无论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还是在科索沃，无论是漫步，还是乘坐公交车或火车，我从来都没想到这个愚蠢而露骨的词，更不会说出口。要是有人说同样的口号，那必然就如同把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知识分子看作是巴黎或者纽约同行的孪生子。他们之间如同心电感应一般紧密相连，依赖于天天变换的理论，不管是“速度”理论还是“混沌研究”理论。当我给我尊敬的斯洛文尼亚同志、翻译家扎克·拉达科维奇——讲起诺维萨德、贝尔格莱德、科隆、西雅图——顺便提到我沿着索查河（伊松佐河）的上游散步时，他马上就会把他那一套名为“河边漫游”的大小塞尔维亚新理论搬出来，并且为之准备出版一本国际性的论文集，其中包括格奥尔格·施泰纳、让·鲍德里亚、赖因霍尔德·梅斯纳尔的文章。令人可悲又可气的是，到了今天，居然还有像米兰·昆德拉这样的人几个星期前在法国的《世界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拯救斯洛文尼亚”，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一起与塞尔维亚的“巴尔干”割裂开来，并且不加思考地将它划归幽灵般的“中欧”。中欧的众多君主曾经也将斯拉夫语系的捷克语看作是野蛮的、杂交的晦涩语言。可是，来自捷克布尔诺的扬·斯卡采尔却用捷克语创作了20世纪最柔美的诗篇。

不，无论是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还是南斯拉夫联盟中的斯洛文尼亚，在我这个客人眼里，你既不曾是东部，也不是南部，更不用

说是巴尔干的。更确切地说，你是第三者，或者“第九王国”，难以名状的东西，却是童话般真实的东西，通过你迈出每一步——斯洛文尼亚，我的漫步之乡——都感同身受的独特存在，如此神奇的真实，如同我亲眼目睹的，正是在既围绕着你又渗透在你骨子里的——与你相应的——历史图像，即大南斯拉夫联盟中。

如今，第九王国的古老斯拉夫童话已经年复一年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幽灵似的中欧流言。虽然这样的幽灵也出没于国境的那一边，它当然——根本就用不着提起古老的维也纳人、斯太尔人、克恩滕人那高贵的别有用心——似乎也维系在一条“转归家乡”的绳索上：如同奥地利谚语说起自杀者的一样，他们依靠绳索，旋转着“归乡”。这些和那些意大利的弗留利人或的里雅斯特人每年都庆祝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百年之后的生日，好像也要让他们真正的生存空间“旋转归乡”（或者这也许只是一种某些事实上早就放弃了的梦想的讽刺形式？）。但是，在斯洛文尼亚，幽灵却开始干预现实。那些与幽灵一起穿过这片土地的人，既不是他们的祖先，也不是以种植葡萄为生的人，而是通常被称为“精明的脑袋”、“善于思考者”、“沉思者”，科学家、诗人、画家。

比如说，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这样的人每年都在斯洛文尼亚利皮察的喀斯特高原上聚会，首先主要是为了艺术以及美妙的高谈阔论（或者无所事事）。但是一年一年过去，最初大家相互阅读作品，后来却迅速变成了百人参加的短暂集会。再也不可能听到哪怕一首诗歌，每次聚会的核心就是一个相应的幽灵，在其魔力下，在镁光灯下，在麦克风前，同声传译给匈牙利的、波兰的、索布的（即塞尔维亚的，越来越少提及）参会者，也翻译给立陶宛的、下萨克森的、法兰克福的、巴黎的、米兰的参会者。在这里，去年我的斯洛文尼亚朋友操着广播员响亮的声音，扬起电视评论员的眉毛，扮演着政治家们做出重大决定后的诡谲表情（只有在晚上一起喝酒时，我才会重新一一认出他们——越来越经常，不光在那里）。

在铁托逝世之后的几年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形。现在我觉得，南斯拉夫北部民族中的大部分人，起码是多数人，都是被外界说服而接受了国家解体这个事实。

就在事后，还有无稽之谈四处流传。那个四处散布消息、同时又大言不惭无知无畏的《明镜周刊》在封面故事中把南斯拉夫称作“民族监狱”；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那个不分青红皂白的男人窝里派出了一个没有经验的大嘴英雄，从克恩滕边境地区发回报道：那里的德意志奥地利人向来和斯洛文尼亚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七十多年来，在德拉瓦地区，以大德意志为首的强盗行径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并且延续至今。他们对当地斯洛文尼亚居民进行语言上和身份上的掠夺。一种更加绝妙的戏讽，恐怕只有火星上的世界报才会虚构得出。

显然，对任何一个斯洛文尼亚人来说，所谓的“铁托帝国”的解体并非是一种个人的经历——也正如我所调查的，无论如何，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一个人。凡是我听到的，无非都会感受为鹦鹉学舌。共产主义几乎早就成为传说。斯洛文尼亚的实践在文化，首先在经济方面是自由的。最近有人在卢布尔雅那静坐示威，手里的牌子上写着“我宁可不要生命，但要自由”。西方媒体竟然把他称为英雄之类，实在让人感到愤怒和厌恶。斯洛文尼亚人在法律上是自由的，和你我一样，只是这个专制国家的法律已经好久不再被解释了（也有例外，正如我们这里一样）；商业自由，居住自由，言论写作自由。这时，塞尔维亚政府的不公，取消阿尔巴尼亚族在科索沃地区的自治，这样的事情还远远没有发生呢。

有一位斯洛文尼亚熟人就此告诉我说，一年半之前，塞尔维亚议会在普里什蒂纳地区所采取的行动只是“开始”，因此，为了抢在局势进一步发展之前，要建立斯洛文尼亚国家。这里已经足以可以说是一种违背国际法的行为：“这只是开始”，不就是自己在破坏条约吗？——我就是这样看待擅自公投和决定退出一个毕竟是由南斯拉夫各民族共同决定建立的国家联盟的行为的。从人口总数来看，在南斯拉夫国家机器中，塞尔维亚的人口数远远超过了小小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虽然难免在很多地方欺负斯洛文尼亚，或占优势，或颐指气使，然而，不管怎么说，就我所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历史上绝对没有出现过对斯洛文尼亚采取这样一种触犯国际法的行动，从而会允许斯洛文尼亚自行——正如所发生的——宣布历史上签订的国家条约无效。还有一位斯洛文尼亚熟人甚至就此声称，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在南斯拉夫的军队中，“发号施令的语言”，只能用塞尔维亚语，而不能用斯洛文尼亚语。

不，越来越多的斯洛文尼亚人选择离开大南斯拉夫，去往“中欧”或“欧洲”或“西方”，我一直以为他们纯粹是心血来潮。我越来越多地听到有人这样说，每一次都越发奇怪地受到触动，有熟人，也有素不相识的人，在卢布尔雅那或马里博尔的街道和桥梁上，那里有一些河流自古以来就流入贝尔格莱德的多瑙河；要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南部边境上建一道比柏林墙还要高的“城墙”（柏林墙那时候还没拆除），“两层楼高”，用来阻挡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当我问及原因时，他们心照不宣地告诉我：“那边的人不好好工作——南边的人很懒惰——，在北方夺取我们的住房——我们在辛勤工作，他们就知道吃喝！”其中有一些说法还可以理解，或许吧，但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因为没有一句理智的话考虑到南部便利的交通运输和贸易条件，也没有考虑到南部肥沃的土地。当然，毫无疑问，南北之间对于国家财政的分担越来越不平衡，其他地区大概也是这样的情况。只是：这些怎能成为他们变化无常、迫不及待和毫不犹豫地选择脱离南斯拉夫的理由呢？南斯拉夫的天空依然广阔，无论如何，她有存在的理由。这是理由，还是纯粹只是借口呢？

在斯洛文尼亚的历史上，没有什么东西，压根儿就没有什么东西迫使它成为一个国家。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斯洛文尼亚人民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梦想。斯洛文尼亚国家从自身没有闪现过一种思想的光芒（南斯拉夫有过），无论如何直到出现坦克和炸弹武力之前没有过。那么，现在从武力和反抗中就能够滋生出这样一种思想，会持续地充满生命力吗？我不禁要问：这有可能吗？没有。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今天突然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包括国家机器的象征：国徽、国旗、国家法定假日、边境防卫等），这有必要吗？况且这不是自觉自愿实现的，而仅仅是针对某些东西的反应，再说是某种来自外部的东西，更何况有时是些令人气愤和厌烦的东西，但不是真的什么迫不得已的东西，甚至令人发指的东西。（正是这后一种情况，不管先是经历或遭受奥地利人，还是后来德意志人统治，赋予了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的庄严与合法性，并且现在也会继续赋予。）

Slovenski narod, narod trplenja——“斯洛文尼亚民族，忍辱负重的民族”——这是对斯洛文尼亚在“二战”结束之前的状况非常贴切的写照。然而，“二战”之后，在南斯拉夫联盟中，没有一个斯洛文尼亚人会再这样思考它的民族。出于纯粹的自私自利，或者相比那个兄弟国家，出于赤裸裸的、即便还如此可以理解的恶劣情绪而建立国家，难道这是一种新的现代性吗？（不，不是人们所说的“表兄弟”，实际上是些“亲兄弟”。）难道斯洛文尼亚人民不是被人家说服的吗？多么天真的人民，多么幼稚的国家！她也不可能给出什么理由，而只有借口，甚至连那个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愚蠢可笑的口号“小而美”也不例外。难道这不也表明，对游戏当真玩，也就是建立国家，人民的反应更多是厌烦，而不是激动？

然而，我在旅途中一再看到了这样的情形，人民掌握着政权，并且在延续，至少在铁托逝世之后的几年里，为了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的存在。但这种情形不再是意识形态导致的，也不再是铁托主义，不再是游击队或退伍军人。这里特别提及的是年轻人的激情，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无论他们在哪个国家聚集，都能让人最强烈地感受到。对这个节日的客人来说，那样的共同性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是阴谋策划者强制性的集结、靠拢，或者孤儿院里举办的晚会：它显得自然，“理所当然”，开诚布公。如果那样的聚会蒙上了闭幕庆典的色彩，那么，唯愿如此，因为它们标志着一个随之而来的觉醒，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在这轮舞中表演的觉醒。当时，我看到那些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马其顿、黑塞哥维那的大学生、工人、运动员、舞者、歌手、恋人聚集在一起，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充满了青春热情，从内心里对他们羡慕不已。当时，我也觉得南斯拉夫是欧洲最真实的国家。一个小插曲。可是，我现在无法想象，这些当时在共同目标中觉醒的人如今却一个个被分隔在边境线上的铁丝网后面，此间居然变得不真实、无效、无用。

是的，南斯拉夫有了新的边界。我看到它们不是向外，而更多是向内在延伸，当今每个独立的国家莫不如此；延伸成不真实的界限或者条带；直延伸到中心，最终任何国家都不存在，既没有斯洛文尼亚也没有克罗地亚，就如同蒙特卡洛或安道尔。是的，我担心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里总会有一天，就再也不可能闻到国家的味道，就像在安道尔，那里纵横交错地开掘在比利牛斯山脉岩石里的购物街依然是最后的开阔地带——密密麻麻，鳞次栉比，像曼哈顿一样，是城市

公园或者第五大道延伸到山区里的水泥浇筑的购物商店和银行大厦——，早就使国家、地区、空间、地点和真实的味道湮没；这里没有一丝文化气息，只有一个早就被掏空了灵魂的民俗传说的硫磺味和一派胡言乱语。

当然，到处都会听到有人说，在通往一个截然不同的、全新的南斯拉夫的发展道路上，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不过是一个阶段而已。但是，在这个国家里，谁是重新改变这样一个在“独立”和“自由”的幌子下而四处流传的事实的人呢？一个事实，看上去不可动摇，因为它又背负起两个沉重的铅块，一是坦克和炸弹——它们永远都不会从斯洛文尼亚人，首先是经历过1991年的孩子们的记忆中消去。再就是那些斯洛文尼亚边境守卫者的行为，其中不幸的是，有很多人随时准备着杀戮，他们完全变样了。是的，与那些突然不得不针对他们玩起战争把戏的同龄人（或者他们不是更多还年轻一些吗？）截然不同，我就是这样看的。不仅冲突双方伤亡人数如此不同说明这一点，而且还有那一个个图像，比如那些手里挥着白旗，从一个被包围的边境民居里走出来的士兵，却被藏在暗处的人当场射杀。或者一个守卫家乡的士兵神采奕奕的样子，根据与他一起大肆渲染的奥地利日报的报道，他津津有味地讲述了他“杀死的第一个人，一个十八岁的马其顿人”。这种情形，这种疯狂的滥杀行径，连同那狰狞的面目，怎么会从这个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人的心头上抹去呢？难道那个最终好像躲过了人们称为“历史厄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南斯拉夫，如今却要遭受这样特殊的厄运吗？

一线希望，同时令人发笑——仿佛希望和发笑在这种情况下不可分割。前不久，我和一位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伙伴走在巴黎街头时有了这样的感觉。当时，尽管他伤心地认同于他的国家所发生的剧变，却竭力把他服兵役时期就耳熟能详的塞尔维亚命令语言翻译成斯洛文尼亚语。可是，他没能如愿以偿。凡是昔日他立刻就能熟练和自然而然说出口的惯用语，如今却变成了吼叫声、嘎嘎响、呼啸声、鞭打声、嗖嗖声，迷失在那天生的节奏中，拒绝变成声音，仿佛本能地弯曲了，如同卡夫卡笔下那些尽量缩着脖子、“在风里”奔跑的孩子一样，伴随着每一个从行军步伐中发出的音节，躲避开进军的号角，凸显和弯曲成旋律，直到这个说话人最终可笑而认命地中断他的斯洛文尼亚语命令的尝试。

又是这个灰头发的斯洛文尼亚孩子，就在两周前，在他的家乡维帕瓦山谷，他手里牵着十岁的侄女，在纳诺圣山上亲耳听到了炸弹落地爆炸的声音。他后来告诉我说：“迄今为止在整个的斯洛文尼亚历史中，始终只有母亲存在。我们的父亲总是在睡觉。在深山里，你知道的。他最多短暂地冒出来，跟梦游者一样，昨天在这里，明天又在那儿，你知道的，第九王国的国王，立刻又消失了。现在，父亲醒过来了。”这位讲述者开始傻笑，笑个不停，而在他返回家园的整个路上，在巴黎勒克莱尔将军大道上，斯洛文尼亚的孩子越来越少，而越来越多的是尽人皆 知的小精灵：“这真的是这个国家的孩子们的愿望吗？”

（1991年）

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

刘学慧　译

“嗯，我还记得：当时我给母亲写信时没写自己的真名，落款写的是普尔·约里克，她收到信后到处问邻居，究竟谁是普尔·约里克。哎，战前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杀死三百万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天空还是那么蓝，跟以往一样蓝，到处都是蓝天。死亡又一次来临，但是死亡过后将会是自由。我们将变得自由而可笑。”

“下第一场雪时，我们相互认识并加深了了解。”

米卢·科伦扬斯基

关于卡尔诺耶维奇的日记

1921年

1　启程之前

早就打算去一趟塞尔维亚，自从四年前东斯洛文尼亚战争结束、武科瓦尔市被摧毁、波黑战争爆发以来，我就想去塞尔维亚看看。关于这个国家，我只知道贝尔格莱德，将近三十年前我曾经作为哑剧编剧应邀去那里参加一个戏剧节。我大约在那里待了一天半的时间，却碰上了一场持续不断的骚乱，如今我只记得年轻的我满怀愤慨，或者说满腔都是一名作家的愤慨。前来观看哑剧的观众很多都是塞尔维亚

人，我当时以为他们都是南部乡村地区或者巴尔干地区的人，我甚至认为这个地区的人肯定还不够成熟，因此他们根本看不懂舞台上那么长时间无声的表演。对于贝尔格莱德这个大城市，我也没有留下多少记忆，只记得萨瓦河和多瑙河两岸都是缓缓的斜坡，河水流过斜坡，最终在平原汇合。我对河流本身没有什么印象，因为当时满眼看到的就是这块所谓的“典型的共产主义”高地。前不久，我再次去贝尔格莱德，当时它还是南斯拉夫的首都。在一条僻静的大街上，路两旁都是菩提树，秋风吹过，落叶满地。我无意中路过“作家之家”，不禁又想起了上次参加艺术节的经历。当时我在那里受到了热情款待，因为自己年轻气盛，总是高傲地摆出一副作家的姿态，因而遭到了米约德拉克·布拉托维奇的嘲笑。这位先生年纪也不算大，当时在整个欧洲都很有名，我也曾经非常狂热地读过他的书《红公鸡飞上天》。（几年前，南斯拉夫战争期间，先生去世了。在贝尔格莱德，曾经有人告诉我说，布拉托维奇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仍然喜欢嘲弄人，同时也爱帮助人。不知道当时除了南斯拉夫，还有哪个国家会悼念他？）

主要由于这几年的战争，促成我决定去塞尔维亚看看。自战争爆发以来，塞尔维亚这个国家就被普遍称为“侵略者”。当然，在南斯拉夫联盟所有加盟国中，我对塞尔维亚了解最少，这也正是它吸引我的地方。另外，最近有关塞尔维亚的媒体报道和看法也非常有意思，甚至有一些传闻让人难以置信，所以我必须去实地了解一下。过去四年来，关于塞尔维亚的几乎所有图片和报道都是来自战争前线或边境两边的某一方，一旦有来自另一方的消息，我慢慢也觉得这些消息只是一种常见的、人为的视角——是在我们的感官上造成的假象——，无论如何也不是亲眼目睹的。于是，这促使我决定到镜子的背后去探个究竟；这促使我去看看伴随着每一篇报道、每一个评论和每一个分析越来越陌生和值得研究，或者值得看一看的塞尔维亚国家。如果谁现在认为：“啊哈，亲塞尔维亚派！”或者：“嗯哼，亲南斯拉夫派！”——后者是德国《明镜周刊》的用词（这样一个词语？），那他就不必继续往下看了。

虽然前几年我也收到过这个和那个邀请，让我去这个已经大大缩小的南斯拉夫，或者塞尔维亚或者克瑞纳戈拉、黑山等地。但我不想在那里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即使是半个公众人物。一直以来，我的想法是：如果我要去的话，那也仅仅是作为一名普通的过客，不是以外国人的身份，也不是旅行者；不仅要去大城市，比如贝尔格莱德、铁

托格莱德（现名：波德戈里察），而更要去小城镇和村庄看看，可能的话，还要远离居民区。当然，我也需要找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向导、旅伴，也许翻译。虽然我曾经在三十多年前的夏天去过亚得里亚海的克尔克岛，依稀还记得一点点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也会说几句斯洛文尼亚语，但是对于这次非同一般的旅行，我那一点语言水平可能远远就不够了。（相反，那陌生的西里尔字母，我还不成问题；我时常不得不磕磕巴巴地去破解它们，好像这恰恰适合我的打算。）

很凑巧，我早就认识两位塞尔维亚朋友。这两人年轻时就离开了他们的国家，时不时会回家看看，如今在战争期间也一样：看看父母或者守寡的母亲，或者他们婚生和非婚生的孩子，以及他们早年分手的塞尔维亚恋人。其中一个名叫扎克·拉达科维奇，他把我的一些作品翻译成了塞尔维亚语，自己也写些东西，当然为了生计。他在贝尔格莱德上完大学之后，后来在德国的图宾根待了很久，当过翻译，还在“德国之声”广播电台当过德语报刊文章播音员，主要面向巴尔干地区。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也经常处在内心的分裂中，一边身为塞尔维亚人，一边又不得不违心地播音（借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说法，不允许有丝毫的“亲塞尔维亚派”倾向），但他仍不愧是一个忠实的翻译——相反，作为播音员，有时候声音则更加不听使唤。有可能，这样的生存状态使他越来越寡言少语。自战争开始以来，我的这位朋友就突然不说话了，不仅面对敌人圈子是这样，甚至面对朋友圈子也如此，在我面前也一样。他还继续翻译一些东西，尽管战事不断，仍然在贝尔格莱德、尼斯或者诺维萨德出版成书，可是我再也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消息——扎克·R还活着，在翻译，在写作，仿佛自愿选择消失在黑暗里。为了寻找到他的下落，我只能求助于那最后一个还和他保持联系的人，一个远在美国犹他州的摩门教徒。虽然寻找这个摩门教徒费了很多周折，但是这个塞尔维亚人和我这个奥地利人很快就又联系上了：从科隆打来电话——是的，约定十一月初在贝尔格莱德见面，“我正打算去那里看望我母亲”。接下来一个星期，我们计划一起驱车前往波斯尼亚边境。同样“正好”，他也要去德里纳界河边一个小城，约好去会见前妻以及他们的女儿。她们就生活在那里，如今女儿快18岁了。

另一位塞尔维亚朋友叫兹拉特科·B，差不多十年前，我在萨尔茨堡认识了他。我早就想通过他进一步了解他的国家和人民。兹拉特科是萨尔茨堡一家餐厅的常客。这家餐厅位于城郊出城方向的莎尔莫斯

大街主干道旁。当时，我也经常去那里，多年来养成了习惯，也是因为餐厅里的老式点唱机总是大声播放着同一个乐队的曲子：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38]的歌曲，诸如：《你看见下雨了吗？》《从后门往外看》《洛迪》等。兹拉特科起初在那里玩牌，每次都下很大的注。他出生在塞尔维亚东部一个农家，后来在贝尔格莱德学习办公机械修理，之后在部队服役了很长时间，驻守过南斯拉夫的很多边防地区。之后，他离开塞尔维亚来到奥地利，据他自己说，为了赚钱。他在萨尔茨堡郊区一家洗衣店里打工，没有赚到什么钱。后来他又去一家旅行社帮忙跑差，仍然没有赚到钱。再后来，他就在一家名为米尔杰姆的酒吧做了职业牌手。很可惜，他只是单兵作战，面对欧洲成熟的牌手帮派，他一直都没有机会获胜。（我还记得他每次输了牌之后，总是仰望着看不见的天空发呆。）从那以后，可以说，他变得规矩了，踏踏实实地找些零工做，都是一些临时的散活，也需要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有时候，只要有人需要，他也能充当一个画一些奇怪的风俗画的画工，远离斑斓的色彩，也不仅仅是塞尔维亚式的幼稚想象——会让人想起19世纪斯洛文尼亚的蜂箱画（可以在布拉德湖畔的拉多夫利察一家可爱的博物馆里看到），或者还会让人想起格鲁吉亚流浪画家皮罗斯马尼[39]的旅馆招牌画。和扎克·R一样，兹拉特科·B自南斯拉夫战争爆发以来也隐退了，从萨尔茨堡市搬到了乡下，甚至还去政府部门申请改了名字，把原来的塞尔维亚名字改成了听起来像德语的名字——实际上，听起来像是他一直以来颇为崇拜的17世纪的荷兰风俗画家阿德里安·布鲁维尔（Adriaen Brouwer）的名字。

兹拉特科·B，又名阿德里安·Br立刻就同意了我的提议，准备和我一起前往塞尔维亚。我们打算去坡洛丁小村看望他种植葡萄的父母亲。这个村子靠近大塞尔维亚中部地区的摩拉瓦河——有可能我们最好在十一月初去，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那里秋日的美景，品尝到葡萄园里的新鲜美味。他只是有些犹豫是否开自己的车去，因为他听说，在他的家乡塞尔维亚，汽车眨眼间就会被偷走。

就这样，1995年10月底，我们各自从不同的地方出发前往贝尔格莱德：一个从萨尔茨堡的乡下开车横穿奥地利和匈牙利（最终他还是开着自己的车）；另一个从科隆乘坐汉莎航空的航班飞往贝尔格莱德；而我则从巴黎郊区出发，先是开车经过法国的洛林进入瑞士，然后在苏黎世乘坐瑞士航空公司的航班。S和我一起同行。这次旅行是我

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次与他人同行。对我来说，这也是我第一次旅途上有人陪伴。

再说，我没有为这次塞尔维亚之行做什么特别准备。我和S差一点就错过了办签证的时间，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南斯拉夫一直还是1970年至1990年的那个样子，地域辽阔，也不用签证，而且没有战争。现在，南斯拉夫在法国已经没有大使馆了，只有一个临时办事处，负责办理签证等事务。办签证时还需要说明去南斯拉夫的具体原因——“旅游”，毕竟合乎实际，可人家并不相信（难道我是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个申请人吗？），也认为理由不够充分。幸运的是，从办事处的里屋出来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塞尔维亚女代办，她不仅没问我们什么原因，还向我们保证说：在她的国家，无论在哪儿，都不用担心公共安全问题。（可是，什么是“她的国家”呢？她是克拉伊纳人，如今克拉伊纳已经永远属于克罗地亚了。[40]）

出发的前夜，我去凡尔赛宫附近的电影院看了埃米尔·库斯图里卡[41]的《地下》。我很赞赏这个来自萨拉热窝的波斯尼亚人以前拍的电影，比如《流浪者之歌》《亚利桑那之梦》。一方面，它们的想象力不是简单地飘逸，而是在自由飞翔，图像和镜头如此丝丝入扣，富有节奏，以至于它们常常会慢慢变为具有东方色彩的丰富景象（这样就使电影画面更加开阔）；另一方面，面对电影当中快速的画面切换，我总觉得缺少点什么，比如说一种与大地、与国家、与世界的联系。所以，画面给人的整个想象很快就破灭了，变成了填堵眼球的妄想。我向来宁要感人至深，而不要博人喝彩，或者说宁要几乎感人至深，这会最强烈地打动我的心灵，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持续不断。

《地下》的故事（几乎）抓住了我的心，我第一次被库斯图里卡的电影所打动。纯粹的叙事技巧终于变成了一种叙事冲击力，因为一个有梦想的天才，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把自己与一片确切的世界，也包括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昔日的南斯拉夫。它曾经是这个年轻的导演的家乡。电影接近尾声时有一个宏大的场面，内战硝烟弥漫，主人公之一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找他当年在贝尔格莱德多瑙河失踪的儿子，他穿梭在战火的硝烟中，一边不断地大声呼喊着失踪的儿子，一边传来咆哮的命令：“开火！”，难道说这不是一种冲击力

——一种莎士比亚式的、又一再与马克思兄弟的那种冲击力交相辉映的冲击力吗？——在针对《地下》的批评中，我觉得有那么多东西好愚蠢或者不怀好意。不仅仅是《地下》在戛纳上映之后，阿兰·芬克尔克劳特——法国现代哲学家之一在《世界报》上撰文指责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宣扬恐怖主义，搞亲塞尔维亚宣传。芬克尔克劳特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自南斯拉夫爆发战争以来，他一直令人不解地叫嚣支持克罗地亚建立独立国家。而就在几天前，另一位法国现代哲学家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在《解放报》上以怪诞的方式反唇相讥，他声称看过这部电影！并向库斯图里卡表示祝贺，因为这是对塞尔维亚恐怖共产主义的清算。与德国人不同，这种共产主义压根儿就没有从它的历史罪行中吸取教训——谁会从电影《地下》中看出这样的东西？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到底在关注什么？还有一位电影批评家在德国《时代周刊》上撰文，一改平素的温和笔调，认为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中充满愤怒、怨恨，甚至“复仇”情结。事情毕竟不是这样：《地下》这部电影问世了，成功了，既存在着，又在产生影响，我都看到了，无非是出于悲伤、痛苦和强烈的爱；即使它有粗糙和渲染之处，那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切最终凸显出对另一个南斯拉夫的历史敏锐的目光，有时候甚至是有预见的慧眼，或者质朴而童话般的东西。我看到在这座游离大陆的小岛上充满节日气氛的结局。在那里，电影里那个蠢家伙突然间不再疯疯癫癫了，而且一点儿也不傻，说话有条有理，就像一个童话讲述者，面向听众，娓娓道来：“从前，有一个国家……”（只可惜，我在电影院里觉得，他的童话简直太短了。）

当然，迄今为止对库斯图里卡的电影最为恶劣的指责又出现在《世界报》上。这本来是我最喜欢看的报纸之一。在昔日那同样严肃而高雅的幌子下——几乎看不到图片，全是密集的近乎官方口气的栏目。几年来，它偏离了几乎过分认真的主体风格，变成了一个具有隐蔽性和煽动性的小道消息报，而且不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事情还不仅仅是这样，比如，有关当年总统密特朗患病的消息，它竟然打着消息的幌子，在总统任期届满之前连篇累牍地传播这个消息，唯恐人家不死。这也许合乎时宜，但绝对不合乎当时的现实。这家报纸不再关注自己的主题，也不再专门报道，更谈不上格调高雅，只是一味地大肆渲染——使之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对这种新的导向来说，十分典型的是所采取的方式，从一开始就根据人物的外貌来判断他们的性格特点，以前这在《世界报》上是不可想象的。而现在，他们直接就在报道的标题中给人物贴标签，比如：本来是报道一名美国的艺术摄影

师，标题却是“令人着迷的四十岁少妇”（或者类似的用词）——仿佛这家报纸限制刊登图片会产生出一种完全另类的图像，即话语图像。毫无疑问，这是些不值得当真的图像。

针对电影《地下》，《世界报》的编辑团队与芬克尔克劳特狼狈为奸，不约而同，意在消除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和他的亲塞尔维亚或亲南斯拉夫麻醉剂的影响，于是就出现了这个电影批评大师——一个平日分析聪颖和细腻的写作者——语言破绽百出、像是被人操纵的评论。他在其中指责这部电影在形式上是巴洛克式的，也就是说，只是为了自娱自乐。在可怜的文化专栏上，还有一篇出自一个女人之手的文章。作为报纸读者，我迄今只觉得她是《世界报》驻南斯拉夫战地记者，并且是一个不仅有成见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又不会呢？更为甚者，她对一切塞尔维亚的东西怀有刻骨铭心和特别自觉的仇恨，渗透在她一篇又一篇报道中。在这篇提及的文章中，她要表明，库斯图里卡在塞尔维亚土地（还有水域）上拍摄的这部电影，肯定得到了当地企业的支持，因此违反了联合国针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贸易禁令或禁运制裁。然后，她以过分细致的、近乎最高法官的架势，同时完全表面化的缜密列举出全部可以拿来针对电影《地下》使用的联合国决议，大约占了四分之一版面，逐条逐句，附加条款一条又一条，一切都迂腐地排列、叠加和串联成一条支撑罪责的连祷，就像一种无懈可击的、最终的、不可撤销的判决理由——并且以此来暗示：仅仅作为产品或者商品，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从根本上说是非法的东西；他的非塞尔维亚（法国和德国的）“合作人”都是践踏法律的人；这部电影，至少在负有禁运职责的国家中，应该从银幕上消失，撤出流通领域（我在此更确切地说，我在此温和地翻译了这位战地女记者的暗示）；电影《地下》没有存在的权利，电影制片人和导演库斯图里卡都是战争的既得利益者，至少是这样。（为了正义，这里也提到，此间，也就是这篇文章发表约莫一个月之后，《世界报》刊登了一封简短的读者来信，其中彬彬有礼地发出请求，不要再对“这个不愉快的事件”纠缠不休——不过在之后的一期上，又刊登了另外一位战地女记者如出一辙的报道，这一次是关于“贝尔格莱德红星”足球俱乐部的现状。事实上，至少对逐字逐句阅读的人来说，这是一条天衣无缝的谴责链条，最终给了一击：这个俱乐部——无论如何国际媒体心知肚明——与“臭名昭著的强盗和战争杀手阿尔坎”[42]的瓜葛由来已久，正像俱乐部的头目声称的，现在的确没有与这伙人断绝关系——不然的话，怎么会在俱乐部的纪念品商店里除了常见的队服、

烟灰缸等商品等，始终还可以看到战争贩子阿尔坎与“沙文主义的塞尔维亚摇滚歌手塞卡”的“黄色”婚礼录像呢？）

我之所以不得不这么久停留在这些与其说值得菲利普·马洛[43]，倒不如说值得风俗警察关注的（也许是）次要的现场以及无聊的文字游戏中，因为在我看来，这里所引证的讲话方式是一种几乎完全由事先已经绷紧的狗链牵制授意的，对有关南斯拉夫战争铺天盖地的报道是很有代表性的，从战争开始以来就是这样。媒体就这样被一条强大的绳索牵制着。——什么？难道你要通过一种无视这先行的现实的媒体批评帮助在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克拉伊纳和斯拉沃尼亚所犯下的塞尔维亚罪行开脱吗？——从容，耐心，公正。问题，难道只是我的吗？它更加纠结，与许多现实程度或层面纠结在一起。而我关注的是些绝对完整现实的东西，因为我要澄清它。在这其中，要让所有乱作一团的现实形式给人感受到某些像关联一样的东西。这是因为，谁知道，在那里，身临其境几乎始终只是（远）看的身临其境？谁知道，在那里，人们面对纯粹的网络和在线浏览只是占有知识，而没有那实实在在的，只有通过学习、观察和再学习才可以获取的知识？如果一个人不了解事件，而只知道它的图像，或者如同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一个图像的缩影；或者，如同在网络世界里看到的缩影的缩影，那他究竟知道什么呢？

有两样东西，我一直无法摆脱，要比摆脱那些纷乱的游戏还难，如今已经有四年半了，从1991年6月，也就是在斯洛文尼亚爆发所谓的“十日战争”，打响了南斯拉夫解体的第一枪以来——两样东西：一个数据和一张图片，即照片。一个数据是：大约有70个人在那场开始的战争中丧生，可以说，与在随后死于战争的14，000人相比没有多少。然而，几乎所有70个死者都是南斯拉夫人民军战士，这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南斯拉夫人民军已经被视为最大的侵略者，无论怎么说都远远处于优势，难道它和那些为数不多的斯洛文尼亚独立势力玩了一场十分简单的游戏吗？（一场游戏？）（数量关系人人皆知，但奇怪的是，理所当然地没有进入世界意识中。）那么，到底是谁首先向谁开枪射击呢？还有，难道不是有人发出明确的命令，绝对不许还手吗？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怎样，双方毕竟还都是南部斯拉夫地区的兄弟国家，并且执意也要坚守这样的信仰或者幻想，至少这一方面如此。至于那张照片，我是在美国《时代周刊》上看到的：确切地说，上面是一群七零八散的斯洛文尼亚人，身着奇怪的迷彩服，手上举着

旗帜和标语，就这样宣告了新建立的共和国。在我的记忆里，画面上几乎看不到真正的年轻人，或者无论怎么说，这一群人根本就没有一点青年人的迹象——首先在我看来，这群自由战士更多是些三十来岁的人，大腹便便，仿佛正要结束一场向女士献殷勤的郊游，一面面旗帜就像是露天剧场。直到今天，我对这张照片的最初印象依然在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是这样一些半是滑稽的业余人物，而不是什么自由战士。就是这帮人，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枪杀了近七十个装备精良，可是毫无防备的人民军士兵。当然，这也许是一派胡言——但是这也说明，一些如此光彩夺目的报道和图片是怎样在一个接受者那里变化或者变形的。

同样，我也看到了后来的战争报道，越来越频繁。那些倒卖现实或者转嫁现实的食客在哪儿呢：在新闻本身，还是在接受者的意识里？当1991年11月底传来武科瓦尔城沦陷的消息时，为什么我在第一时刻就会感同身受呢？就在当天晚上，巴黎地铁的斯大林格勒站站牌被一只愤怒和激动的行人之手改写成武科瓦尔。我把这事看成是如此现实和神圣的行为，或者是艺术与政治行为的完美结合——可是就在第二天早上，就像是在看一部片刻间虽然会打动人心，但在“剧终”之后立刻就不再完全是这样，后来一回想起来越来越不可信的电影（通常就是好莱坞的）一样，我开始怀疑了，“斯大林格勒”和“武科瓦尔”怎么会扯到一起呢。我怎么会把《法兰克福汇报》一个充满仇恨的社论作者的那句名言从这个如今发生在东斯拉沃尼亚的事件剥离出来呢。按照这个说法，生活在克罗地亚（包括武科瓦尔及其周边地区）的塞族人一直以来都是南斯拉夫公民，并且与克罗地亚同胞享有同等的地位。可是，在为这个无视他们的意愿而确立的新国家克罗地亚的宪法中，他们突然间被划为二等公民。这样一来，六十万塞族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会被并入一个克罗地亚国家，而不再是克罗地亚人的管理，他们应该感到理应如此，心满意足，服服帖帖，用德国记者的话来说，就是“应该感觉自己就是少数民族（是这样！）！？”。“好吧，听从命令，从今天开始，我们愿意在自己的国家里感觉为少数民族，因此也愿意被你们的克罗地亚宪法划分为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照此看来，这恐怕就是摆脱在克拉伊纳地区和武科瓦尔市发生的战争的出路吧？到底谁是首先发动侵略的一方？为什么建立了一个国家，却要把那里的人民划分为三六九等呢？那么多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如今却要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他们甚至永远也不会忘记曾经遭受到希特勒-克罗地亚法西斯政权的迫害。那么，究竟

谁是侵略者呢？挑衅战争和发动战争的是同一个人吗？什么叫“发动”呢？难道这样一种挑衅就是发动吗？（“是你先动手的！”——“不对，你先动的手！”）那么，我们该怎么办？作为身在克罗地亚的塞族人，面对这样一个针对我和我的民族而确立的国家，我该怎么办呢？我的祖辈世世代代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难道我如今要选择离开，跨过多瑙河，回到我的“家乡”塞尔维亚？也许吧。或者，即使突然间变成二等公民，即使被强制成为克罗地亚公民，我仍然应该选择留下来，无论多么不情愿，无论多么伤心，无论多么痛苦的幽默，我还是应该选择留下来，为了和平？也许吧。或者，我会奋起反抗，这似乎就是我的权利，当然要和另外许多和我同命运的人一起，必要时，还要求助于南斯拉夫那无头苍蝇一样的败军力量？有可能，或者我身为一名还算年轻的塞族人，无牵无挂，几乎可以肯定，我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奋起反抗。事实上，伴随着首批克罗地亚民兵进入到武科瓦尔周边的塞族人村庄，并不是这样发生了战争，可是对此本身，像我这样一个人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依然产生作用的就是那个可怕的“战争就是战争”，还有更加可怕的：内战就是内战。如果现在还有谁没有把这一切理解为被扼住了喉咙，而是理解为冷漠，那他就不需要继续往下看了。（不是在德国报纸上经常被斥为“冷酷无情”吗？这引人注意，比塞尔维亚-犹太作家兼编剧亚历山大·提斯玛连同他的《战争就是战争》更引人注意，比起所有那些愤怒的唇舌之战，那些强逼的、远离原始呐喊的唇舌之战更值得去思考。）

后来，也就是1992年春天开始，媒体上出现了来自波斯尼亚战争的最初报道图像，很快就是图像系列，或曰系列图像，其中有一部分是我自己非常关注的（始终也代表“我的整体”）。这些图像把全副武装的波斯尼亚塞族人，不管是军队还是散兵，特别是活跃在萨拉热窝一带丘陵和山区的散兵，表现为“人类的敌人”，这是德国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44]针对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说过的一句话。随着战争的持续发展，看到来自波斯尼亚塞族拘留营的报道和图像，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似乎会赞成一个毕竟是塞族爱国人士、诗人以及当时的反对派瓦克（“狼”）·德拉斯科维奇的一句话，由于在波黑地区的大屠杀，连迄今在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当过凶手，至少不是先下手的凶手的塞族也变成了一个罪行累累的民族，一种“该隐[45]民族”。面对又一个被杀害的、停放在萨拉热窝某个停尸

房里的孩子，就像被孤零零地抛在空虚的宇宙里，不只一次是这样，也不只一刻是这样——再说那些照片，西班牙的报纸，比如《国家报》，是些放大和发表的世界大师，按照它们的自我意识，大概继承了弗朗西斯科·戈雅的衣钵？因此，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这里或者最好是那里终归没有人站出来，没有一个塞族人自己站出来，把这个为此而负有责任的人，也就是这个波黑塞族的罪魁祸首，这个据说战前还是童谣作者（！）的拉多万·卡拉季奇杀死呢？怎么就没有出现另一个施陶芬贝格或者另一个乔治·埃尔瑟呢[46]！？

尽管如此，几乎同时伴随着一个远方观察参与者这样一些无力的暴力冲动，我心中的另一部分（这当然绝对代表不了我的整体）则不愿意相信这场战争以及关于这些战争的报道。是不愿意相信吗？不，是没法相信。因为对所谓的世界舆论而言，在这场战争中，攻击者和被攻击者、真正的受害者和赤裸裸的施害者，他们的角色太快地被确定，成了白纸黑字。而我即刻的想法是，这样怎么会有一个好结局呢？又是通过单独一个民族，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如果波斯尼亚那些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塞族的穆斯林要成为一个民族的话——在一片土地上，那里还生活着另外两个民族，他们享有同等的权利！更何况所有这三个民族的居民分散在各地，并不只是共同生活在多元文化的首都，而且村村不一样，家家不一样，毗邻生活，混杂生活。再说，作为生活在波斯尼亚的塞族人，婉转地说，当在我的、我们的土地上你争我抢地建立一个根本就不符合我心愿的国家时，我该怎么办呢？那么，究竟谁是侵略者呢？（参见上文）。

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有为数不多的远方观察者久久地会有这样的感觉，当此间有一张战争牺牲品的照片突然例外地加着“塞族人”传奇的文字时，我们便将它看成是一个错误，一个印刷错误，无论如何是一个可以置之不理的例外？这是因为，如果真有这样一些无辜的塞族受害者，那么，按照他们如此稀少地出现在世界舆论中，他们也只能处于1: 1000的比例中——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塞族人死亡，就有一千个穆斯林死亡。如果涉及战争中被杀害、被屠杀的人，那么对报道和拍照而言，战争的哪一方是光明的一方呢？那么，到了1995年夏天，伴随着塞族人被驱逐出克拉伊纳，战争的双方怎么会第一次有点变换角色呢——虽然“只是”可以看到无家可归的人，而看不到被屠杀的人的面孔，并且以此来暗示，“这些同样的人”之前赶走了另一个民族？难道海牙国际法庭刚刚公布的南斯拉夫战争中的战争嫌犯

人数不是与此如出一辙吗？——四十七名塞族人，八名克罗地亚人，一名穆斯林人，他们也许成为海牙法庭追捕的对象——这样看来，仿佛对这一方而言，为了从形式上也可以说得过去，需要有一个，一个不在场的战争罪犯，类似于从前一个不在场的乐善好施的人。

但是，难道这个和那个远方的观察者面对这些从克拉伊纳逃出来的难民照片就没有注意到，直到这个时候，那些几乎微不足道的塞族受难者通常在照片、声音和文字上与别的种族的大牺牲迥然不同吗？是的，在先前几个例外值得报道的塞族人的照片及其他媒体上，我觉得这些人确实“微不足道”，与其他两个民族的苦难同胞相比，他们确实太不起眼了——这些人，无论如何屡见不鲜，虽然没有“装模作样”，但是他们却通过观察或者报道视角被置于装腔作势的姿态——可能真的在受难，他们被表现为受难的姿态。在战争报道岁月的进程中，他们同时可能真的继续在受难，而且可能越来越厉害。显而易见，他们服服帖帖地为那些国际曝光者和报道人的镜头和耳麦作出别人希望的表情和姿态。他们此间受到这些人的指点、引导和示意（“嗨，伙计！”）。谁会对我说，我弄错了，或者压根儿就心怀鬼胎，因为我真的就是这样一起来观察一个妇女双手紧紧抓住拘留营的铁丝网号啕大哭的照片的，顺从地遵照国际新闻媒体在拘留所铁丝网外拍摄的指示，即使这个女人趴在铁丝网上的样子也流露出摄影师给她预先指定的东西？也许吧，我自己弄错了，食客就在我的眼睛里（照片上那个孩子，很大，在大声哭喊，一个女人抱着他，他的母亲？而在接下来的一张照片上，远远地出现在一群人里，被另一个女人抱着，显得十分安详，他真正的母亲？）——然而，我为什么还从来没有——至少在这里，在“西方”——看到过一个塞族战争牺牲品这样一些如此精心炮制的照片呢？为什么几乎就看不到这样的塞族人的特写照片呢？他们几乎没有单个出现过，而总是一小群人，几乎都出现在中景或远景上，恰好微不足道。与他们的克族和穆族受难同胞迥然不同，几乎从来都不会目光朝着正前方，充满痛苦地望着镜头，而更多的不是望着一侧，就是盯着脚前，就像一些自知有罪的人。就像是一个外来的部落？——或者不屑于装腔作势？——或者为之而过分悲伤？

就这样，我的一部分不会去袒护谁，更说不上去谴责。这样就会导致——不仅仅使我——产生这样一些荒唐的、可同时并非完全不可理解的行为（？），就像年轻的法国作家（其母亲是克罗地亚人）帕特里克·贝松几个月前的辩护，更确切地说是为塞族人写的一本小册子（“小册子”是……？）中描述的，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无论如何介于诙谐与荒唐之间。这本小册子开头这么说，他，也就是贝松最初也和所有其他西方观察者一样，站在同样一边看待战争的残酷。可是后来有一天——他如此巧妙地戏弄那些消息的消费者和情绪无常的巴黎时尚分子——彻底厌倦了这样无聊的报道。接下来的话当然与情绪毫不相干，唯独与作者的语言和图像敏感性有关。他特意让人回忆起南斯拉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的苦难和反抗历史——这几乎已经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对于这段历史，我们要求那些战争参与者如今终于可以忘掉了，世世代代——，贝松极其愤怒地列举了针对当前南斯拉夫事件种种惯常的媒体标准，近乎延续了福楼拜式的“形式上的陈词滥调”。当然，与其说令人发笑，倒不如说让人哭泣和呐喊。仅举一个例子，这里引用了广为传播的针对拉多万·卡拉季奇的描绘：一说起这个人，自然就会同时联想到他的精神病医生职业，这已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因为众所周知，在福楼拜看来，凡是治疗精神病患者的医生，自己心里也有一种阴影。此外，无论他走到哪里，从维也纳到巴黎，在他发表的作品里都会有规律地被冠以“医生”这个头衔，显然就像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电影中那个要把我们的世界炸毁的“奇爱博士”。结果是，在阅读贝松这个小册子的同时，我在《世界报》上又看到了对这个塞族领袖的一种形象描写，一张又一张埃皮纳勒画[47]，一堆又一堆陈词滥调，付诸实践的是刚才提到的语言方式，也就是所谓严肃地再现一种现实，只不过又多了一堆陈词滥调，诸如：精神病医生卡拉季奇还写诗歌，当然是“业余”的，是不会有人读的，不言而喻，它们都“比较平庸”，等等。然而，一个那样荒唐的行为会产生如此的效果，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我很想读一读卡拉季奇的这一类诗——同样，那些有关杀手阿尔坎的新娘、沙文主义歌手塞卡的空话也勾起我对她的歌曲的兴致。一种也许在帕特里克·贝松的描述里类似的行为：在所有这些先入为主的报道之后，他有一次在帕莱亲眼见到了拉多万·卡拉季奇，并且把他描写得像一位苍老、疲惫、心不在焉的伤心女人——这是一种近乎可爱的描写——一种不被允许的针锋相对的行为？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种行为，或者更确切地说防守，或者再确切地说反向行动值得一提，也是因为它们冒着会失去平衡和正义感的风险——比如就像贝松为塞族人辩解时那幅也许独一无二的埃皮纳勒小图像，他以此随手拿来一个同样模糊不清的刻板印象，与他借用小册子来针对的那些人也没有什么两样：他讲述了士兵集合的场面，同样在帕莱，波斯尼亚塞族士兵与我们所了解的他们完全不同，这或许也没有什么不对。从简单的描述中，这些年轻男子展现出不太优雅的样子，具体说来就是“有活力、快乐、自在”。于是我就想，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似乎可以与30年代一些西方旅行者对当年苏联体制的种种赞美相比，这可能就是那样的反向行为的危险所在吧。当然：当你看到每一篇新的报道，上面又是这样一群喝着梅子白兰地的塞族民族主义分子、狂热的农民和偏执狂时，眼前就会看到一群与之根本不相上下的、令人讨厌的驻外记者；他们晚上聚集在酒吧，手里端的不是李子烧酒，而是一种用葡萄或者别的什么东西酿制的烈酒；或者，当你看到一些记者连篇累牍地写出千篇一律的南斯拉夫的相关文章时，虽然不会希望就像在先知以赛亚那里一样用一把燃烧的圣火来洁净他的嘴巴，但你毕竟会盼着在他写作的手上裹起荨麻布，难道这就是错误循环的行为吗？

这里接着发生的事情可不仅仅出自我那也许机械的、对你们那些习以为常的重大消息报道的怀疑，而是一些针对事情本身的问题：说在萨拉热窝的玛尔喀勒集贸市场上发生的两次袭击真的是波斯尼亚塞族人干的，这事被证实了吗？就像贝尔纳·亨利-列维所说的，他也是一位现代哲学家，一个而今越来越多、比比皆是无处不有的哲学家。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他马上就会以荒谬的口吻大肆渲染：“毋庸置疑，塞族人是这次袭击的罪魁祸首！”另外还有一个食客-疑问：发生在杜布罗夫尼克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这个古老而神奇的小城盆地或者盆地小城坐落在达尔马提亚海滨，当时在1991年初冬，它真的遭到了轰炸和炮火袭击吗？或者只是——够恶劣的——短暂遭到炮击？或者那些被炮击的对象位于厚厚的城墙之外，炮弹打偏了、跳弹了？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或者容忍（这也够恶劣的）？

最后，我甚至也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不禁要问，不仅问自己：这些跟那个“大塞尔维亚”的权力梦想真的有什么关系呢？即使塞尔维

亚的当权者做着这样的美梦，可是他们恐怕也没有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轻而易举地让美梦成真吧？或者，难道也没有可能，在这里，一些传奇的沙粒，不计其数之中的几粒，就像在分崩离析的帝国里的一样，不仅是巴尔干地区的，还有四处散落的，在我们这些外国的暗室里被放大成一块块阻断的巨石？（就在前不久，《法兰克福汇报》开始按照时间顺序连载关于南斯拉夫四年内战的系列报道，副标题把国家解体的罪责归咎于塞尔维亚科学院那些匿名的备忘录撰写人："前南斯拉夫的战争始于书房| 科学家为这场大冲突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撑。"）那么结果呢，与其说证明了那些吞没了传奇、绝对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凝聚成一个统一的权力思想和政治的塞尔维亚的黄粱美梦，倒不如说一个"大克罗地亚"显现为某种无与伦比更真实的东西，或者更有效的东西，更坚决和更确定的东西，难道不是这样吗？与今天这些预先问罪的报道不同，关于这场战争的历史，难道不会有朝一日写成另外的样子吗？然而，由于这些问罪的存在，难道这段历史不是早就永远成为定论了吗？成为定论了？更确切地说不是一成不变了吗？就像1914年之后，还有1941年之后——在南斯拉夫邻国，尤其是奥地利和德国的意识中一成不变，死死地守住不变，于是等待着下一次爆发，等待着下一个1991年？谁会重写这段历史，哪怕只有细微的不同——它们当然有可能更有利于把这些民族从相互对立的僵死图像中解脱出来？

2　第一段旅程：旅行至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

关于我们的塞尔维亚之行，我要讲述的，并非是些故意针对那些反复预先确定对这个国家管窥的反图像。因为我印象最深的，几乎都是居于其间的东西，我既不必刻意为之，也不用添枝加叶——所谓介于其间的东西，在德国小说家赫尔曼·伦茨那里，必须"从局外的一侧"去观察或者眺望；而在那个老一辈的哲学家（可是丝毫没有反对现代哲学家的意思，我时而还需要这样一个）埃德蒙德·胡塞尔那里被称为"生活世界"。当然，我同时一直意识到自己身处在战事不断的塞尔维亚国家，一个不断缩小的南斯拉夫联盟的一部分。这样介于其间的东西，这样的生活世界并非在现实或者时代符号的旁边或者一侧。

在苏黎世登机前，我还买了一本小朗氏词典：在标准的黄色封面上以前写的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现在却只写着“克罗地亚语”（1992年版）。我一边翻着词典一边问自己，词典后面的“常用缩略语”附录里有没有“DIN，德国工业标准”这个词的缩写，因为在那个时候，用塞尔维亚语当然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其中。新版是由“赖因哈德·劳尔教授”修订的。而就在同一年，他应《法兰克福汇报》的招募，在那里连篇累牍地抨击全体塞尔维亚人民患上了最危险的神话病，连他们的作家也不放过，批评他们没有经过启蒙，从浪漫作家尼杰格斯到瓦斯科·波帕[48]莫不如此，看看这些狼的化身！看看波帕的狼诗！

与苏黎世机场的其他登机者不同，飞往贝尔格莱德的乘客登机时几乎没人说话，飞行途中我们也更多地保持沉默，看样子，仿佛连飞机上远远占多数的塞尔维亚人（外国劳工？看望父母亲的人？）也正在前往一个他们觉得没有把握的目的地。

飞机降落在平坦的、早就收获完毕的土地上，远近让人都丝毫感觉不到贝尔格莱德这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这座“巴尔干地区独一无二的世界政治都市”（德拉甘·维利奇科，下文会讲到他）。S让我看看跑道附近一群人或者侧影，他们正在农田边上烤一头小猪。晚秋时节的空中到处弥漫着烧烤的烟雾。我之前读过塞尔维亚小说家米洛拉德·帕维奇[49]写的小说，其中有一个女子一边亲吻她的情人，一边一颗接一颗地舔他的牙齿。其中还写道，自南向北流淌的河里的鱼不好吃，比如摩拉瓦河；往葡萄酒中兑水，而不是颠倒过来，这是野蛮的行为。

我的朋友和翻译扎克站在机场出口等候，他先我们从科隆飞过来。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他的面了。尽管如此，有人来接机，我此刻几乎感到失望，为了进入这个世界，我宁愿独自踏进这个陌生国度的第一道门槛——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连忙说道，连他也在此间对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相当陌生了（后来，打开宾馆大门的时候，从他一个个迟钝的动作得到证实）。

坐车去往新城“诺维贝尔格莱德”的路上，不时能看见人群聚集在近乎荒原的空旷处，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人在狭窄的街旁排队，一个紧跟一个，同时也是各走各的：好像全国人民都在这里等待着，此时

此刻，正值近乎失业的下午——所有的新楼都还没有建成，看来已经停工很久了。他们自称走向公交车和有轨电车，这种情形好像也很久了，等车的队伍半天都没挪动。这时，S又让我看看街旁卖汽油的流动商贩，他们也是一拨一拨地站在路边，手里拿着塑料油桶。在第一时间，不管是不是在特殊地区里，我为什么会常常对所有这些已经预先知道的现实情境视而不见呢。

我们住在“莫斯卡瓦”饭店。这家饭店位于市中心，坐落在萨瓦河和多瑙河上方的平原上，建于世纪转折时期，随着岁月的流逝，成为一座看上去很高贵的街拐角建筑。饭店几乎所有房间都空着，而在楼下的接待大厅里有一群服务员，还有他们的朋友？懒懒散散地走来走去。起初，我们在自己的房间里觉得，我们是好久以来的第一批客人，也会是好久以后最后一批客人。从S的房间瞭望，透过高高的阳台落地窗俯瞰那落满树叶、破旧的汽车突突驶过，完全不同于在巴黎的感觉的林荫大道，不，是“bulear”，我觉得她法国式的“乡愁”也感染了我，她的诧异，她在这里的陌生感，或者确切地说，她“离开祖国的感受”，她“身在异乡的感受”（就像失去了自制）。这时，我多么希望我的另一位塞尔维亚朋友兹拉特科能过来多好啊，那个当年的洗衣工和赌徒，他四海为家，不管在萨尔茨堡还是在他祖国的首都，他似乎立刻都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如果我非要找一个本地人做向导，他一定会对此嗤之以鼻。（他自己开车穿过东欧，晚到了两天。）

对我而言，感觉是“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是“返乡”，不管是在那条陌生的林荫大道上，还是在商店里买东西时，特别是当我按下商店那古旧的铁门把手，不得不费力地推开店门时，我立刻就有了这样的感觉，变得不可更改，适用于所有接下来的日子。我说着之前在街上学到的商品名称，售货员立刻就听懂了。到了傍晚，我们穿过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出乎我们的意料，并不是一片漆黑。我们朝着卡莱梅格丹城堡方向走去。那是一座古老的土耳其城堡，高高地矗立在萨瓦河和多瑙河交汇的地方。这时，S好像脚步变稳了。只是扎克这个当地人，我们的向导，踉踉跄跄，摔了一跤，迷路了，辨不清楚方向，而且还喋喋不休地说他在自己祖国的首都感到多么陌生。可是，他在这儿已经又待了好几天，还有母亲悉心照料。我随之就想到，也许他在贝尔格莱德一直都很陌生——果不其然，他似乎又回答说：其

实他家在贝尔格莱德郊外的策穆恩，在多瑙河边，河水从那里流向潘诺尼亚平原。他出生和成长在那里，直至离开。

在贝尔格莱德的第一个夜晚暖融融的。一轮半月当空，沐浴着古老的土耳其城堡。大街上来来往往有很多人，这才像个南欧大都市的样子。只是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起那不勒斯或者雅典的人来，不仅更安静，而且也更自觉，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行人，也更专注。一种特有的彬彬有礼，一种一点都不张扬十分含蓄的彬彬有礼。看他们走路的样子，即使匆忙，也绝不会冲撞别人。或者一种近乎温文尔雅、给别人留下空间的言谈，而不是常见的高声叫嚷、吹口哨、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街上的小商贩也不会随便和人搭话，更多地是静静地等候顾客（有这样的顾客，完全出乎我的预想图像）。这天晚上，我随意地看来看去，没有看到一个塞族人酗酒。取而代之的，倒是有人在街边的井里掬水喝。大街上看不到任何标语或者暗示战争的宣传，几乎没什么警察，无论如何显得比一般的城中心少得多。S后来认为，贝尔格莱德人显得沉重而忧伤。与之相反，在我看来，至少第一眼看去，这里的人民特别有活力（与当年在剧院里截然不同，也就是三十年前），而且很有教养。出于普遍的罪责感？不，出于某种伟大的思考，出于一种无与伦比的意识以及——我在那里有这样的感觉，我此刻在这里也这样想着——出于一种高贵的集体个性，或许也出于自豪感，当然是一个毫不张扬的人的自豪感。后来我在德国《时代》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塞尔维亚人变得谦虚了”，之后在《时代》杂志上也看到有人这样说。变得谦虚了？凭什么这样说？或者，用我最喜爱的（奥地利的）话说，除了“你必须早点起床才能这样说！”：“一个外国人，知道什么呢？”

那许许多多的老人是干什么的？第二天，我看到他们几乎是各走各的，被笼罩在从两条河河面上升腾起的早冬的雾气中，在卡莱梅格丹城堡废墟一带如此不声不响，悠闲自得地走来走去。他们常常系着领带，戴着礼帽，按照巴尔干人的生活习惯，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们既不像是退休工人，而且这么多人，也不像是以前的政府职员或自由职业者。虽然他们都绽放出一种身份意识，但是有一点——这也表现在他们之中这个或者那个医生、律师或者商人身上——，比如说，与我在德国尤其是奥地利所熟悉的中产阶级的风度显然不同。此外，这些绝对不显老态龙钟的老人给我的感觉既不像欧洲人，当然也不像东方人，而十分确切地说，更像是在巴斯克潮湿的林荫道上散步的

人，虽然没有戴他们那种便帽。他们迈着有力的步子，在城堡废墟之间走来走去，雾气中一个个身影清晰可见，一副近乎狂怒的表情。然而，慢慢地，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现实，或者自制。他们也不像是老单身汉——都有过多年的幸福婚姻，只是现在成了鳏夫，这种情形还没有那么长久：像是鳏夫，同时也像孤寡老人，对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很少见。不，在我看来，他们不可能是塞尔维亚爱国主义者或沙文主义者，也不是极端的东正教教徒；他们既不是忠臣，也不是老游击队员，更不会是纳粹内奸，可是也难以想象他们是与铁托同呼吸共命运的游击队员、之后的南斯拉夫干部、政治家、实业家。显而易见的只有，他们都遭受了同样的损失，不管他们在这里怎样游荡，损失依然活生生地浮现在他们那忧郁的眼前。那么，损失是什么呢？损失？难道更多不是这样的情形，仿佛他们被无情地骗取了什么？

这次在塞尔维亚旅途中，我实际上也想搞清楚一些问题，其中我最常提到的一个问题——如此反复地提出，它已经快让我发疯了——那个问题，你会不会认为，大南斯拉夫联盟还会重新崛起？被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相信有可能，“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不可能”。只有一次，有人这样说，“我们无论如何再也看不到了”。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认为，如果南斯拉夫联盟各成员国有可能再度靠近的话，那也只是通过经济途径。他还讲到，比如说，以前，斯洛文尼亚的产品在塞尔维亚非常受欢迎。哪些产品呢？“化妆品，斯洛文尼亚的润肤霜，噢！”唯独兹拉特科年近八十岁的老父亲却说：“就算要靠近，那也不会跟克罗地亚，而肯定跟斯洛文尼亚。没错，而且很快就会这样。我们塞尔维亚人总是生产大件东西，而斯洛文尼亚人则生产精美的小部件，双方向来都得到了很好的互补。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在任何其他地方像在斯洛文尼亚一样得到过如此周到的款待。”（他的老伴为他发表的一番议论频频点头。）他住在一个位于摩拉瓦平原的村子里，村名叫坡洛丁。

雾天之后，有几天是好天气，晴朗温暖。有一次，就在兹拉特科（这个可爱的人）入伙之前，我们和扎克（这个活泼的人）一起驱车前往贝尔格莱德城郊策穆恩，他美好的青春之地，如今大概是他想象中的家乡——跨过萨瓦河大桥出城，这座桥被城里人称为“羚羊”。到了扎克老家后，他带着我们看看他们家老房子的两扇窗户（他的父

亲是一个地方小官员，早年就过世了）。这承租房位于楼上，又矮又破，街拐角是些常见的杨树。起初，简直让人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扎克还指给我们他以前上学的路，而我心想着或者说道，这路也太近了，恐怕一路上也不会看到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吧——扎克随即回答说："但是，我们放学回家都是绕道走的！"策穆恩的水果和蔬菜市场当然会让人有某些特别的感受，它分成了两大区域，干干净净的，在城郊这个地方绝对很宽敞，还有从河面上吹来的风（我买了几个苹果，因为我可不想只是作为一个好奇的人走过异乡的市场）。

之后，有这位朋友破例而出色的引路，最后又让我们走在前面，于是，我们不知不觉地穿过那连绵一片、矮小而带有毕德迈耶风格[50]的房子，来到多瑙河畔。在这里，与我在奥地利境内终究熟悉的那条也叫多瑙河的河流相比，河面无比开阔。在水面之后那里，同时还远离开另一边的河岸，又有一片蜿蜒曲折的领域，这才使得多瑙河真正成为一条"大河"（出自奥地利国歌里的一个词，每当我打眼看去时，我都会觉得它言过其实）。一种内陆水上世界，一个河流世界展现在我们眼前，贝尔格莱德或者策穆恩的多瑙河。岸边的林荫道上坐落着多家餐厅，从这里就可以步行回到首都；远远望去，水面上停泊的船只鳞次栉比，小小的三桅帆船就跟独木舟一样，还未盖上过冬的护幔。时而就会有这样一个玩意儿动起来——小发动机的隆隆声，与零星的人声混杂在一起，这是远近能够听到的唯一声响。朝着斜对岸望去，仿佛是一道跨越大陆的彼岸。在那里的林子边上，矗立着支撑在木桩上的茅舍。然而，大多数船只在水面上随波起伏摇荡，偶尔可以看到船上升起炊烟。此外，整个下午，河中间都没有船只航行；禁运。这个河的世界景象也许是一个沉没的世界，一个正在沉没的世界，一个腐烂的世界，一个古老的世界。然而，它同时也呈现出一种世界景象，而在那些出自17世纪的荷兰油画上，我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一个原始世界，它就像是一个尚不为人所知的文明，更是一片让人感兴趣的天地。后来，我们在河边一家叫"鲤鱼"饭店享用了美味的鲤鱼。黄昏时分，我们登策穆恩城堡，途中有一位较年长的女人向我们询问去城堡的路，操着纯正的英语，可她马上抱歉地说，她虽然是塞族人，可是不会讲塞尔维亚语。在上面的公墓里，墓碑上刻着逝者的面部轮廓，是忠实地按照照片刻上去的，只是放大了好多倍，大都是夫妇俩，通常都是这样，不管他们多大年纪去世，墓碑上刻的都是他们新婚时的年轻模样——也许吧，这是他们一辈子唯一的合影？

返回贝尔格莱德（白色之城）后，月亮已经近乎满月，我们终于见到了兹拉特科。由于超速驾驶，他不得不在匈牙利度过一个晚上（他的车被送到旅馆附近一个停车场保管起来了）。我们四个人一起，在一家名为“那些日子”（一首塞尔维亚歌曲的名字）的酒吧里听音乐，直至午夜过后好久。我们听的是南斯拉夫各个地方的音乐。而就在同一时刻，伊扎克·拉宾在特拉维夫遇刺身亡——第二天早上，反对派的报纸《我们的战斗》虽然在头版报道了这一刺杀事件，但是有关拉宾的照片只是依稀可辨，文字也没有特别编排，既不是高亮印刷，也没有凹版设计。深夜返回饭店的路上，雾气重又袭来，浓雾使得行人的身影若隐若现。在贝尔格莱德的大街上，突然间，到处都是成群的路人。他们仿佛是从两河之间一片灰白的浓雾中突然冒出来的，奔跑着，然后又在某一处停下，拥挤在一起；这些人都是赶末班电车的乘客。从旅店窗户向外看去，浓雾弥漫，什么也看不清，只看到路面上飘来飘去的闪亮纸片，还有旁边模糊的扫帚轮廓，以及贝尔格莱德街头环卫工人劳作的身影。在塞尔维亚官方电视上，还可以看到米洛舍维奇总统告别的场面；他即将启程飞往美国，参加在俄亥俄州代顿市举行的和平会谈。停机坪上，长长一队军人、还有普通民众列队送行。米洛舍维奇与每个人都紧紧拥抱，可惜只能看到他的背面——长达几分钟的告别画面，这个即将启程的人仅仅留下的是背影。

关于《那些日子》这首歌曲，兹拉特科讲述了多瑙河一个传奇的地方，就在斯梅代雷沃城边。在那里——他自己并没有亲眼看过，只是道听途说来的，是当年在乡村小学里听一个老师讲的——，这条河静静地流淌着，静得一点声响都听不到。第二天，我们乘坐他的车（既没被偷也没被刮蹭）前往那个神奇的地方，并且同时第一次更加深入到塞尔维亚腹地。正如兹拉特科所说，这里朝着东南方向，才显示出典型的塞尔维亚地貌：平缓的丘陵连绵起伏，一望无际（阿瓦拉山，距离贝尔格莱德一个小时的车程，要说是“看家山”有些言过其实。尽管海拔并不高，但是风景秀丽——看样子，仿佛每一个如此不显眼的风景都宛如法国普罗旺斯的圣维克多山）。这里的村落星罗棋布，错落有致，分别由大大小小的院落组成，可谓大村庄里包含着小村庄。还有田野里一座座公墓，看起来也跟村庄差不多，不是“逝者的城市”，而是逝者的村落，当然是生机勃勃，特别是现在正值万灵

节。在塞尔维亚，“在我们之后”几天才祭拜：他们给逝者带去食物，在墓前与他们一起进餐和饮酒。这里的土地打眼看去非常肥沃，直到连绵起伏的大地尽头，到处都生长着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玉米、向日葵和粮食，当然早已收割完毕；山坡上，只是依稀可见闪闪发黑的葡萄藤蔓。当然，到处还可以看到贩卖汽油和柴油的小贩，手里举着油桶或大大小小的油瓶——油品来自不远的罗马尼亚。路上总能看到稀稀拉拉的人群徒步穿来穿去，他们大多是本地人，也有来自波斯尼亚和克拉伊纳的难民，就像不久之前，在“我们”中欧地区，也可以看到乡民赶路去遥远的医院看病，或去周末集市赶集一样。他们大多走在高速公路旁的辅路上，也有人干脆走在高速公路上。高速公路上几乎就没有车辆行驶（高昂的高速费，对外国人更甚。）

到了斯梅代雷沃市，我们步行到多瑙河边，看到了中世纪的平原古城堡——斯梅代雷沃城堡。它在“二战”期间几乎被德国占领者炸掉了一半。广阔、平静和波光粼粼的多瑙河毫无声息地缓缓流过，一片寂静；我们在岸边待了一个小时，没有听见哪怕是一丝潺潺流水声。在返回贝尔格莱德的途中，我们向一位老者问路，可他并不知道怎么走，原来他是来自克宁的难民。

这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临近黄昏时，在塞尔维亚，天气第一次变得这么冷，还下起零星小雪。还好，第二天天气又转好了，风和日丽，我们赶上了深秋的最后一次暖阳。我们决定从今后命运就取决于那些和平谈判的贝尔格莱德启程去探望兹拉特科的父母。他们住在一个小村子里，得知我们要去，已经提前好几天开始张罗。离开贝尔格莱德之前，我们绕道去城里的市场转了转。市场位于萨瓦河边的一面斜坡上，缓缓地延伸到河边。

在为数不少的报道中，人们热衷于对那些可笑的东西冷嘲热讽，说如果不是当地的黑手党，塞族人就会试图拿着这些玩意儿做买卖，从歪歪扭扭的钉子到不能再薄的塑料袋，还有空火柴盒。现在看来，这里也可以买到很多漂亮的东西、令人喜爱的东西和——为什么不呢？——十分可爱的东西。比如说，市场大大小小的摊位上堆着切得精细的烟丝，柔软纤细，可以用来自制烟卷，看上去那样令人垂涎。一个不抽烟的人是难以体会到其中的滋味的。可我对市场上一些食品

的滋味胸有成竹，有只是打眼看上去形式单调、品种单一的南斯拉夫面包，有深褐色的大罐森林蜂蜜，有跟火鸡一样大的熬汤柴鸡，有炸得焦黄的面窝点心，还有长着猛兽似的尖嘴、肥美胖大的河鱼。然而，这样的市场景象，虽然让人觉得受到一个物资匮乏时期的影响，但是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不管是看到那些美味的食品，还是那许许多多似乎真的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谁知道呢？），这都呈现出一种活力，是些令人心旷神怡的东西、轻松愉快的东西，买卖过程中为之一振的东西，因为这个过程常常在别的地方彻底变得奢华浮夸，也互不信任，甚至带着些许鄙视——一种普遍的、优美的指舞，纵横穿越在市场区域，一种手脚灵活自如的轻舞。在这里，从生意场上熙熙攘攘的混乱、气味和必然中，凸显出某些像原始和民间的交易所渴望的东西，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各式各样，连我们这些从犯也从中获得了乐趣。一桩又一桩生意：这样一句话在这个只有依靠自己的国家里才又获得了它的意义，同样就像“零用品”这个词一样。赞赏这种交易——你恐怕会期待自己说出这样的话（这话绝对不是预定的）？后来，我甚至萌发了这样的愿望，但愿对这个国家的封锁——不，不是战争——延续下去；但愿这种西方或者不管别的什么商品和垄断世界的缺失依然延续下去。

在去往坡洛丁村的路上，我们终于跨过了摩拉瓦河。这条河千百年来被人传唱歌颂，无疑也在土耳其战争以及巴尔干战争中被迫成为了一个象征角色，被挤成一条象征的河床，而眼下随着深秋的来临，正处于枯水期，河床上的鹅卵石到处可见。在行车桥的旁边，是那座当年的车马和人行小桥，已经快要坍塌了。坡洛丁村沿着马路延伸，也许是欧洲最狭长的村庄之一，有许多小中心，像个“村庄之国”。据说在这个县里，这样的村庄之国的确比比皆 是，相互离得很远。到了其中一个中心，我们在一家杂货铺里停留了一会儿。正值中午，几个村民在杂货铺前喝啤酒；在这些遭受限制的岁月里，咖啡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太昂贵了。所以，这个商店就改卖酒。杂货铺斜对面的房前挂着一块黑布，那家有一个小孩子不久前在村子里被车撞死了。在沿路的村子里，车子通常都开得飞快。当一个穿着农夫衣服的年轻人两眼红肿嘴唇肿胀地进入杂货铺时，我们大家都立刻意识到，这一定是孩子的父亲。

兹拉特科父母的庄园——实际上早就过户到他们的独生子，这个生活在国外的塞族人名下——位于坡洛丁村最远的一端，不是在七座

山，而是在七道长拐弯的后面。房子两边前面是他母亲种的花花草草，紧挨着就是棚屋和马厩前一大片泥泞。田野和栽种葡萄的山丘四处分散，大多都相距很远。兹拉特科父母的居室位于形式各样难以捉摸的建筑群中，到处都可以看到，新房子要么贴着旧房子，要么盖在旧房子上面，或者包住旧房子，其中当然有不少东西还没有完工。对这样一个急于去挣钱和回家的外籍工人来说，人们可能习以为常了：有一个这样的附属建筑看上去像一个不说是空空如也，但也彻底与乡村格格不入的会议厅。令人震惊的是，里面摆放着好多崭新的椅子，一种可谓萨尔茨堡式的华丽，中间同样是明光闪闪的椭圆形长桌，就像会议室一样。在这层的三个拐角，等待客人的是贴着巴洛克蓝瓷砖的浴室。显然，他的父母从来都没有敢进去过。也许令人感到最为惊讶的是，在这个新旧交织、弄不清究竟是为谁设计的（？）居住区里，虽然到处都可以看到狭窄的厨房长椅，却无论在哪儿也找不到像是给父母准备的卧室或双人床："扎特克，你父母睡在哪儿呢？"——"随他们的便，爱睡哪儿就睡哪儿。我父亲有时在楼下住，母亲一般睡楼上，可以看电视。"

吃饭时，有鸡汤，有烤乳猪，有"塞尔维亚"卷心菜沙拉，还有那样一种口感浓郁和清新的葡萄酒，它是用马路对面山坡上的葡萄自酿的。在那里，朦胧中最后还可以看见的东西就是漫山遍野的羊群。在这个回家的儿子和父母聊天期间，尽管我竭尽全力去听，可压根儿什么都听不懂——那是塞尔维亚语吗？不是，他们一家人不由自主地说起了罗马尼亚语，这是大多数村民聊天和感到亲切的语言。坡洛丁村作为这样一个语言孤岛也远近闻名。可是，他们还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塞尔维亚人呢？当然是——不然会是什么呢？返回贝尔格莱德的路上，我们穿过一条水果之路，路两旁挂满了葡萄，直到快要驶进城里时，满眼还都是亮晶晶的葡萄。

在塞尔维亚唯一带点官方色彩的这天，我们驱车前往南部山区的斯图德尼察修道院，一个中世纪教堂和修道院建筑群，一个民族圣地。这是一次旅行之内还是旅行之外的旅行？我们与著名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结伴而行。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者。他讲述说，虽然他一直在写作，但是直到五十多岁成名之前，更多只是作为文学教授，

作为塞尔维亚巴洛克文学专家而出名，曾在巴黎索邦大学讲学。我记得他还去过普林斯顿。

与此同时，这也是初雪的一天，就在早上从贝尔格莱德出发时下起了雪，十一月的雪，伴随着它，一阵阵寒风袭来，树叶也开始纷纷扬扬地落在地上，那些不太结实的南斯拉夫雨伞也被掀翻了。雪越下越大，后来，应这个民族作家的提议，我们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休息一下，顺便喝点……，当然少不了喝热水。服务区一个孤独的老板为我们敬酒。在这五个小时行程中，几乎没有人不认识“帕维奇先生”（想必不仅仅是从电视上认识的，塞尔维亚人是个喜欢看书的民族）。

克拉古耶瓦茨和克拉列沃——塞尔维亚中部比较大的城市，从这里继续往西南方向走就是另外一个塞尔维亚：山峦起伏，峡谷众多，几乎荒无人烟，到处都会看到城堡遗迹，围绕着光秃秃的山，就像是西班牙高原被遗忘的城堡。渐渐地，只要一看到任何哪怕只是让你领略一下的地方或者风景，我就预先猜测，这个在车后排坐在我身边的人已经为之拟就了什么东西，而且几乎每次都猜对了，甚至连针对这个乡村讲堂写散文，或者针对那个山涧写诗都没错。

我们上山去修道院，沿着斯图德尼察那条荒僻的小溪（冰冷的溪水意味着是这样）越走越进入寒冷刺骨的隆冬。在所有剩下的日子里，它就一直这样等待着我们。这个古老的拜占庭教堂坐落在高原山谷底部，海拔近千米——在塞尔维亚如此可以感受的遥远的大海之上。雪花飞扬，下个不停。在那些壁画上，我又认出了奥赫里德、斯科普里、塞萨洛尼基等地的东罗马教堂里圆形的晚餐桌，耶稣及其门徒围坐在桌子旁，就像围坐在托勒密[51]的地球圆盘旁；施洗的约翰看起来就像切·格瓦拉，乳头周围还依稀长着胸毛，就像一个微小的弹孔。修道院接待厅位于冷冰冰的院子对面，里面的壁炉冒着火苗，仿佛白色的烤炉。那个留着传统的东正教大胡子的修道院院长先是让我们吃了一些专门招待客人的小点心，然后让人摆上兑了水的热李子酒，他自己甚至也陪着我们喝起这种劣质酒来。

鹅毛大雪纷纷地打在修道院下面的旅馆窗户上，后面的山崖立刻消失在初冬的昏暗中。一个鞋盒大小的加热器给这个平日没有暖气的餐厅增添了些许暖意。湿冷，无助，无人理睬。与此同时，我倒饶有

兴致，要在这个远离世界的地方度过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可后来几乎感到失望，因为下雪并没有阻挡住我们的返程。

后来，当我问起S那天——大家始终都会觉得是近乎半官方的——有哪些最不起眼和无关紧要的细节时，她立刻就说起我们在那家阴冷的小餐馆吃法式可丽煎饼的情形：那些又凉又厚的煎饼端上桌后，帕维奇先生对此说，别指望了，塞尔维亚人似乎永远也学不会怎样做可丽煎饼。是的，我也想起来了，这位作家一反他的作品里通常所描写的，居然往葡萄酒里兑水（而不是相反）。他解释说，这毕竟是矿泉水，而这样的水对他来说则不是水。而且，在一次漫长的行驶途中，他提起了那个塞尔维亚流亡国王。这位国王（自南斯拉夫解体之后）现在已经很好地掌握了他祖先的语言；身为枢密院成员，他越来越频繁地被国王邀请去伦敦，或者他们也在希腊碰面。这时，我讲了我生活在克恩滕的斯洛文尼亚外祖父：他在1920年全民公决时，投票赞成并入新成立的南斯拉夫，而我总认为这种行为就是决定赞成斯拉夫的东西、反对1918年缩成小德语国家奥地利。可是在此间，我也问自己，在哈布斯堡王朝灭亡后，随着共和国的成立，他的这个决定是不是更多出于一种渴望或者需要，即使不是渴望一个皇帝，至少也是一个国王，而这个年轻的南部斯拉夫民族就有一个国王在位？！

就在这有点官方色彩的同一天，我还约好与42岁的作家德拉甘·维利奇科晚上在贝尔格莱德见面（一天见了两位作家）。在战争之前的岁月里，有一次，我在斯洛文尼亚喀斯特地区的利皮卡与他邂逅。我读过他两本篇幅不长的小说，一本名叫《路过普拉》，其中讲述了一个生活在克罗地亚普拉的塞尔维亚人的青年时代，相当豪放，一再出现了向第二或者第三生活的过渡或展望。另一部是《子午线画家》，这是我从塞尔维亚回去之后才读的（两本书都是由维泽尔出版社出版的）。后者是一个关于分崩离析的南斯拉夫解体的故事，充满影射，也断断续续，片段式——叙述和被叙述的东西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结果就是在“作品”和“国家”之外形成了第三种东西。维利奇科写作离奇；他是一位反其道而行之的作家，源于地理-历史的“我”与相应分裂的“我”相互碰撞，这同样也是一个不相上下的“我！”。这就是这部作品的内在或支撑。这种支撑使那些片段和章节水乳交融。当然这里必须举例为证。“生存就是坟墓。这种情形也许在一个国家里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在那里，在经历了数百年的风向旋转中心，系着丝绸腰带的狡猾太监、穿着袈裟的蛇眼僧侣和蓄着大

胡子的教会分裂者彼此处于对立状态。只有通过假象才能使他们彼此交融。”又如：“在欧洲城市里，90年代初逃亡的贝尔格莱德青年人过着生不如死的飞地生活（1995年）；在战争期间，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亦是如此。人们遗忘了他们，这就是他们的命运。因为那些争斗的党派，那些战争疯狗，不管他们叫什么，也不管他们用多少指头画十字，都是一丘之貉。他们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就好了。”还有：“他（英雄）就像一只睡着的蝎子，在绿色的墙壁里安享他的岁月，梦想着那没有实现的生存。让跳动着的脉搏停下来，这是不可能的。”

那天晚上在贝尔格莱德，我觉得德拉甘·维利奇科起初看上去更为压抑和失望，几乎丧失勇气。而留在我记忆里的他，有活力，有热情，同时很专注，值得信赖。也许我们见面的地点不合适：那个所谓的私人地址结果是一家小出版社。在那里，和维利奇科一起，还有其他几个圈里的人等着，肯定是为了避免让人觉得我们是在搞什么政治阴谋。由于已近深夜，再也没有可能去附近的餐馆，于是，大家都正儿八经地坐下来，就像是按照预先安排好的日程，以奇怪的方式直到深夜。大家可能都在寻思着说些什么，关于目前的局势、关于波斯尼亚战争、关于这场战争中波斯尼亚塞族人的角色以及塞尔维亚塞族人的角色，好像要举行一场圆桌对话。我们久久地坐在那里，几乎没有说话，受到刺激，不知所措。我们喝了一大瓶弗拉斯卡蒂酒，有些窖藏的年头了，其实当地产的白葡萄酒味道更好。德拉甘同时也带来了一瓶帕里克产的非常有名的雷司令，但是因为大家都不说话，低着头喝酒，一会儿工夫瓶子就见底了：很少见，可以看到产于1990年的标签，时间也就是在那场斯洛文尼亚小战争之后，那些大战争之前。

后来，有人拿出一个出自波斯尼亚战争的纪念品让大家传看，正如所说的，这是一个刚刚在去年秋天针对塞尔维亚发射的“战斧”导弹的制导盒。这时，出现了最糟糕或者最尴尬的时刻。制导盒有橄榄球大小，是沉重的钢制品，介于半球、圆锥和迷你金字塔形状。据称，这枚导弹在即将命中目标时被导弹击落了。这个纪念品是在波斯尼亚塞族人居住地巴尼亚卢卡附近弄到的（实际上，制导盒上的美国空军徽记清晰可见）。然而，我并没有想对此看个究竟，只是突然觉得大家一起不知身处何地，并且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想，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幸好，我后来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让维利奇科讲讲他在普拉和伊斯特利亚的情况。和在座的其他人一样，维

利奇科如释重负。他说，他在普拉租的房子已经被克罗地亚军队占领了，一名军官住在里面。他现在远在贝尔格莱德，却还要继续交租金——短暂而有力地笑一声。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接着，气氛活跃起来，大家很快就你一言我一语，谈论着大大小小的地方，比如谈到维也纳，他的小儿子去年夏天待在维也纳，把所有地铁站的换乘方法差不多记得滚瓜烂熟，还谈到巴伐利亚州的费尔达芬小镇。

渐渐地，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南斯拉夫的现状上。在场的有一个人首先声嘶力竭地说道，塞尔维亚最高当权者对他们的人民目前所遭受的苦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还说到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压迫以及盲目认可的克拉伊纳共和国。这是在大声喧闹，而不是在发表意见，也不仅是一帮在野的文化人聚在后院里发发牢骚。这个塞尔维亚人也独一无二地说到他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而并未提到其他地方的战争疯狗。看样子，仿佛这只是冲着老天，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叫喊着他们的行为。

但是，奇怪的是：虽然我最终面对这个人，再也没有感受到这种情形有什么冠冕堂皇或者事先准备好的东西——他不是在发表声明，而是心里痛苦、愤怒和清醒——，可我还是不想听他对当权者的严厉谴责；不应该在这里，在这样的空间里，也不应该在这个城市里，在这个国家里；不应该是现在，因为这也许关系到一场战争之后的和平。这场战争是由外部的、完全另外的强权挑起的，并且最终的结局无疑也是由他们决定的。（告别时，他拥抱了我。这时，我在想，他可能觉得被别人理解，并且此刻还问我，是不是恰恰相反。）

3　第二段旅程

接下来，我们开始了此行的最后一段旅程，一路上险象环生。

我们依然冒着十一月的落叶伴随着下雪的天气，最后离开了贝尔格莱德，离开了莫斯卡瓦酒店，踏上了前往波斯尼亚的旅途。S一大早就乘车回法国了，因为孩子们过完万圣节又要上学了。于是，我们三个人，兹拉特科、扎克和我，乘坐前者的车，一路摸索着前往德里纳河畔的巴伊纳巴什塔。后者的前妻和他们的女儿就生活在那里。摸索着——这是因为，虽然这位父亲在孩子成长的十八年里经常往返这段

路线，可是他现在却连一条路都不熟悉了；他当时一直是坐大巴车去的（而此时此刻，也弄不到塞尔维亚的专用地图）。

可是之前，也就是在离开首都之前，我们在这个号称“世界上加油站最多的国家”第一次加了油。在通往城外的公路干线两旁，密密麻麻地站满了提着油桶或拿着油瓶的人。也是在之后一次次加油时，我获得的第一印象是，在一双双绝对小心翼翼的手里，这种绿红相间的黏稠液体缓慢而清晰可见地喷入油箱中，绝对不会让人看到它事实上就是那个样子：某些相当奇缺的东西，十分值钱的东西，一种宝藏。这时，我又一次丝毫也不会压抑我萌发的愿望：这样的加油方式可能还会延续很久，甚至还会传到另有其主的国家。（后来，我们被一队巡逻的警察拦下来接受检查，仿佛有人闻到了什么。因为“Zlatko Bo.”——塞尔维亚驾驶证上的名字——开着另一个人“Adrian Br.”——奥地利驾照上的名字——的车，所以必须缴纳一笔不太大的罚款；要是能够证明这两个名字指的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整个事情就不会这样倒霉了。）

我们大概朝着西南方向前往德里纳河畔，穿过一片辽阔的原野，久久地看不到丘陵山峦，照扎克的说法，这就是通往他家乡的方向（扎克，这个东塞尔维亚人再也不像最初几天的样子了），“终于到了真正的塞尔维亚”。在这旷野上，雪花越来越密集。约莫第三次迷路以后——星期天，公路上的人寥寥无几，我们当然一边走一边问路，才发现他们都喝得醉醺醺的，一句话都不说。夜幕已经慢慢降临。我们久久地滞留在一个不确切的、也叫不上名字和不为人知的地方，面对着我们这个越来越寡言少语的向导所说的“大荒山”，我们只有翻过它，才能到达目的地。天色已晚，我们拿定主意，不再前往那里；我们掉头去路旁一家孤零零的小饭馆。饭馆墙上，在曾经挂着铁托画像的地方，如今却挂着一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个塞尔维亚英雄将军的照片。桌上放着前一天的《维塞恩新闻报》，而整整一周后，这家报纸的头版以巨大的大写字母写着俄语、德语和塞尔维亚语的“和平”一词（我立刻心想着，1945年，这个词恐怕也会如此有纪念意义地登在哪家德国报纸上？）

正像在关于迷路的故事中常说的：“不管怎么说”，我们最终还是到达了瓦列沃城，也就是盘山公路的出口。这座山叫“Debelo Brdo”，即“大肚子山”。据说巴伊纳巴什塔——在这个雪下得越来

越猛的夜晚，我们的向导把它翻译为“巴亚花园”（巴亚是抗击土耳其人侵略的塞尔维亚英雄）——隘口海拔超过一千米。上山的路越来越白茫茫一片，哪怕轻轻一刹车，车轮都会打转。夜空同样一片漆黑，很快就再也看不到一丝亮光，既看不到居民屋里的灯光，也没有其他车辆驶过。白天的时候，我们就听说过，从贝尔格莱德开出的夜班车中途停在瓦列沃躲避风雪，乘客们都在山脚下的城里过夜。

途中有很长一段路不是柏油路，路面到处坑坑洼洼。我们的司机就像参加汽车拉力赛一样穿行在其间。但是我们同时满怀希望，因为在裸露的泥地上，雪花几乎是留不住的。我们的向导后来说，当天早晨，电视上的天气预报显示，瓦列沃一带不再下雪了。但是现在，每拐过一个长弯，雪都越下越大。大约到了半山腰，又刮起了大风，不一会儿又变成了暴风，雪花立刻被吹成一道道雪丘，这儿矮矮的，在继续移动，那儿又停滞了，凝结在一起，横竖积满狭窄的公路。这时，这个牌手和客栈招牌画匠则以欧洲赛车冠军般的娴熟技术驾驶着车辆又是穿行，又是爬坡，即使在陡坡换挡时也充满了一种意味：再也没有退路可走（探险故事里不也是这么说的吗？）。

有时，我们中也有人会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一边说着吸引大家注意力的话，不着边际的话，可是，几乎再也没有人回应。后来，在继续翻越大肚子山时，也许有一个钟头之久，我们三人中甚至连一句话也没说；而且策卡也不唱歌了，况且再也听不到民谣歌手托佐瓦克的歌声了。如果说在不断转弯的汽车远灯里，除了闪现在我们眼前的雪檐上一道又一道雪障外真的还有什么的话，那就是越来多地出现了光秃秃的崖壁。此时此刻，我满脑子都在想：万一，车子现在走不动了——我要往哪个方向逃生呢？这样没有帽子和合适的鞋子，我能走多远？好紧张！简直不可思议，漫天大雪中并没有闪现出一丝亮光，因为暴风雪恐怕会在这高高的巴尔干山区使雪夜达到完美无缺的境界。这种不安也转换成了某些别的东西，转换成了恐慌？或者恰恰是它的反面？

“鬼使神差似的”，我们几乎以步行的车速终于驶出了山口，缓缓地盘山而下。雪花也变得缓慢了。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就像在原野上一样，路上有些地方甚至没有积雪——我们的向导随之指着那黑暗的山谷什么地方，激动地说出了久久以来的第一句话：“下面就是德里纳河，下面一定就是巴伊纳巴什塔，再往后就是波斯尼亚了。”

我们终于到达南斯拉夫的偏远小城巴伊纳巴什塔。看样子，周日的夜晚一片沉寂，主干道上灯火通明。之后，一所公寓的门旁响起奇怪的铃声。这座城市尽管素不相识，却让人感到有某些亲切感（此时此刻，我才想起来，三十多年前，青年时期的我在克罗地亚腹地就这样来到一个女朋友门前敲门）。然后，我们分别住在三个灯光明亮、暖意融融的房间里，这在整个塞尔维亚都不多见。还有果子酱接风，装在玻璃杯里，里面还放着小勺。女主人以前在贝尔格莱德念考古学，如今在离市区不远的德里纳河水电站当秘书。她女儿房间的墙上挂满了青春长在的好莱坞偶像詹姆斯·迪恩的招贴画。我们享用了白菜卷（一种卷心菜肉卷）、奶油（黄油软酪）、面包、斯梅德雷沃产的红葡萄酒（就是多瑙河无声无息流过的那个地方）。这期间，目光透过厚厚的窗帘缝隙，可以看到这个巴尔干式的庭院，四周都是相似的多层楼房：雪花纷纷扬扬，一直下个不停。

奥尔加是一个巴伊纳巴什塔本地女人。她几乎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电影。她告诉我们说，当地居民对一公里外发生的战争几乎一无所知。传说在德里纳河河面上，总是有成堆的尸体顺流而下。然而，她也不认识一个目睹过这种情形的人。不管怎么说，在战争发生以前，每到夏天，这条河里满是游泳的人，不管是在塞尔维亚一边，还是在波斯尼亚一边，他们在河里来来往往穿梭。而现在，河里已经再也没有人游泳了，游船当然也停运了。她和女儿甚是怀念一起横穿波斯尼亚、去往斯普利特和亚得里亚海边的杜布罗夫尼克的共同旅程。她本人也很想念和穆斯林朋友在一起的时光，无论他们是来自她最喜欢的波斯尼亚小镇维舍格勒（伊沃·安德里奇[52]的《德里纳河上的桥》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还是来自更近一些的斯雷布雷尼察。她相信，1995年夏天，在斯雷布雷尼察，真的有成千上万人被杀害了。不管这场波斯尼亚战争规模多小，它真的发生了：一夜之间，整个村庄的穆斯林被屠杀殆尽。下一夜，又是一个塞族村庄，如此等等。于是，在这座边境城市，塞尔维亚人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谁也不和别的人说话。主干道两边那些崭新的、有品位的商店和酒吧都是波斯尼亚-塞族战争既得利益者开的。她绝不会迈进那里一步。她靠前夫寄来的德国马克勉强度日，可是其他人又靠谁呢？靠着同样艰难的邻居施舍——虽然物资很匮乏，但首先还是内心的贫困；他们跟以前的大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一味生活在他们的天地里。他们还会有人恋爱吗，还会生儿育女吗？“最多也是在流亡者中。”（说到这儿，这个还年轻和有青春活力的女人自己也笑了。）虽然时不时会有记者从西

边冒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也指的是波斯尼亚——，可是已经预先什么都知道，所以他们提出的问题也与之相应；没有一个人对这个边境城市居民的生活哪怕有一丁点的兴趣和好奇。联合国观察员刚来不久就从酒店搬走了，因为他们反觉得自己成了被观察的对象。

晚上，我和兹拉特科（别名阿德里安）两人住在“德里纳”酒店里。房间里没有暖气，也没有像样的窗帘。在第一个夜晚，当黄色刺眼的街灯照进屋里时，我不时地睁开眼，雪花连续不断地拍打在窗户上，直到天亮还下个不停，在巴伊纳巴什塔的日日夜夜一直都这样。整个城市都被大雪掩埋了。只剩下向北穿过德里纳河河谷一条公路了，兹拉特科听人这样说。早餐时，我们旁边坐着几个年轻的民兵，个个都带着冲锋枪。脸和手已经冻得红肿的兹拉特科从他们那里得知，翻越大肚子山的路早就被阻断了，只剩下向北穿过德里纳河河谷一条公路了。可是，这条路上有没有扫雪车扫雪呢？

于是，我们蛮有兴致地决定，有必要待多久就待多久吧。我们买来雪地靴和保暖帽。当我们几个显然人生地不熟的人一进商店，看到售货员警觉的神色时，我就想着，在战争期间，所谓“潜在的顾客”结果全都露出了外国记者的原形，他们不是来买东西的，只是为了探听物价，搜集信息。

在条条边境大街上，在家家边境饭店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着半是像制服的防风雪衣男子，我们不由自主地会理所当然（？）把他们看成是准军事化的杀手。你就看看他们那与之相应的眼神，分明“一派杀气腾腾的样子”。扎克也这样看。他在临时家里过了一宿后又回到了她们的怀抱里。后来，那个与我们一起来的当地图书馆管理员，一个读者（读过娜塔莉·萨洛特[53]、费尔南多·佩索阿[54]等人的书）向我们解释说，那些人都是大肚子山上的林业工人和护林员；这座山就像是国家公园，无论如何是一个疗养地，山上长着一种世界上仅有的云杉，它是从最后的间冰期存活下来的。然而，我们还是怀疑这些人可能是某些团伙成员，不过是乔装成护林工人或猎场管理员而已。

我们出城走向德里纳河，走向界桥。也许边防哨兵会允许我们过桥到对岸的波斯尼亚。它依稀出现在那铺天盖地的积雪后方。积雪现在鲜明地勾画出山丘和草地的轮廓；积雪现在又将它们掩埋。有不少人在厚厚的雪地里行进，可大多只是老人和小孩，后者跨过那座桥以

后去城里上学，头上戴着各式各样、来自世界各地的帽子，其间有一个老人，头上缠着编织的头巾。一小群孩子不停地冲着我们用英语说“你好！”，然后放声大笑起来。几乎所有迎面走来的人，不管老人还是小孩，都缺了很多牙，连塞尔维亚这一侧的边防哨兵亦是如此。他最终还是让我们上桥了，当然后果自负。众所周知，河对岸的波斯尼亚-塞族人早就不喜欢自己的祖国了。

现在的德里纳河，宽阔的河面上呈现出一片冬日的深绿，从山里流出来的水湍急而富有节奏，在河岸两边朦朦胧胧的物体的映衬下，显得更加昏暗，更加阴郁。我们慢慢走上桥，那位图书馆管理员，这个当地人，仿佛每走一步都准备着掉头，目光里露出提心吊胆的神色，近乎赤裸裸的恐惧。在这两个国家正中间，桥栏上安着一个灯箱，像是临时将就，也像安在一条佛教传说里的河上。在我的想象中，它是用来放蜡烛的，要为逝者照亮黑暗的夜晚。但是打开灯箱一看，里面全是烟蒂和烟灰。

我们最终来到河对岸的边防哨所前，在那里又向波斯尼亚纵深走了几步，值得纪念的几步。哨所的窗户玻璃是破的，后面有两条岔路，或多或少都是陡峭的山路。那个边防哨兵目光直直地盯着你——或者说，难道这不更多像是一种无法治愈也不可接近的忧伤？恐怕只有上帝才能帮他解脱这忧伤。而在我眼里，昏暗空荡的德里纳河就像这样一个上帝一样流过，尽管只是个没有权力的上帝。不行，我们不被允许进入他的国家，但他允许我们在他的国门口站一会儿，观看，聆听——这时，我们大家都不感到好奇，只是战战兢兢。在这片波斯尼亚山坡上，可以看到一些零零散散的农家，院落彼此也有一段距离，每个院子周围都是苹果园以及巴尔干地区特有的干草垛，像房子一样高的圆锥形或金字塔形。有些地方甚至还有烟囱在冒烟（我起初以为那是焚烧垃圾冒的烟，或许真的就是这样？）然而，绝大多数家里都没有冒烟，常常不光是不冒烟，甚至连屋顶都看不到，下面也没有门窗。然而奇怪的是，几乎就看不到有烧毁的痕迹。所以这些院落又像是整个南斯拉夫那些永远都不会完工的、典型的外籍工人住房。你不仅第二眼看去是这样，就是再看上去也没有两样。那么，它们到底是未完工还是已经被毁坏了？如果是被毁坏了，那么无论如何有些部分是被小心翼翼拆除搬走的，那些部分接着又被弄走了。

这时，这个边城的图书管理员突然说道：“在这片昔日鸟声不绝于耳的沼泽里，曾经活跃着欧洲的精灵。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变得越来越像南斯拉夫人。对这样的人来说，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刻。只要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对这样的人来说实在是难上加难了。我不可能是塞尔维亚人，也不可能是克罗地亚人，同样不可能是匈牙利人，更不可能是德国人，因为我在哪儿都找不到家的感觉。”

然后，我的朋友扎克，这个吃着德国面包的塞尔维亚人，忍不住唱起针锋相对的反调：“那么对我这个塞尔维亚人来说，现在生活在德国，是不是就很可怕呢？事实是，德国已经努力变成了一个美好、富有、天堂般的国家。世界就是机器。房子也是机器。街上的狗叫声就像工厂里机器的轰鸣声。在自选商店里也是这样，似乎你要买的是螺丝钉，而不是牛奶；在肉店里，似乎你要买的是钉子，而不是火腿；在药店里，似乎你要买的是锤子，而不是阿司匹林。”

要说到我，现在我可以说，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持之以恒地让自己融入到这个世界、或者世界事件里？让自己参与其中？——在巴伊纳巴什塔地区，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界河边上，在这些风雪肆虐、大雾弥漫和事件多发的日子里，结果让我感到自己成为这个地区的一员。在这种的确窘迫的困境下，我没有遭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丝毫也没有。这就意味着：只有好事。可是有哪些事件呢？

我们本来打算参观附近一家古老的修道院，但雪下个不停，没法去。于是我们开车一直沿着边界往德里纳河上游走。奥尔加的母亲住在那里。“二战”期间，她在铁托游击队当护士。她丈夫几年前用他的游击队步枪自杀了，与其说是因为重病缠身，倒不如说更多是出于对南斯拉夫解体的忧伤。如今，她孤身一人住在山脚下一个小房子里（就跟养路工的房子不相上下）。在陡峭的山崖之间，正好有一块可以用作花园的地方，还有一长条土豆地垄。虽然老妇人整个下午在屋子里都戴着头巾，但是她依然有一个女指挥员的架势，或者一个连队里独一无二的、与男兵平起平坐的女性的气势，举止优雅自信，同时也随时准备出征。她恐怕直到生命的尽头都会是一个骨子里的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塞尔维亚的，而且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代里——在她看来，对南部斯拉夫各民族来说，共产主义直到今天依然还是唯一理性的可能：1941年，在德国入侵之前，在这个王国里，几乎一切财产都属于少数几个人，而就在他们身旁，则是一贫

如洗的民众。而现在，在这个塞尔维亚特别国家里——它的当权者像在其他新生国家一样都是“叛徒”———，历史还在重演，一边是战争的既得利益获得者，一边是一无所有、挨饿受冻的人民。（至少这话没有说错，因为立刻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兹拉特科，这个从奥地利归来的、习惯了别的东西的外国继承人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整个民族都在挨冻。”）

我们在这边境小屋里坐了一下午。后来，德里纳河这边的村庄亮起了灯，对岸却仍然完全一片黑暗，或者有人使之变得黑暗了？而在战前，对岸的窗户照射出那样的光亮，连河这边都成了对岸的镜子。老人说，她很想念那些波斯尼亚人，不管是塞族人还是穆斯林人，尤其是每到秋天水果成熟的季节，他们就会跨过德里纳河来这边卖水果，因为那边的山坡不太陡，更适合种水果。（从河岸马路边上那个村子返回的路上，汽车大灯照亮了从黑暗中闪现出成群的身影，他们都是在这儿宿营的逃亡者，已经等候了几个钟头，希望能搭便车进城去——可是几乎没有一辆车经过。）

或者我们也只是蹲在早就没有了灯光的“德里纳”酒店的大厅里，身上裹着大衣和夹克，两个人一起，大概也是仅有的真正的客人，听着一个独弦琴歌手的歌唱和震耳的叫声来休息。据说这种演唱继承了荷马的传统，歌颂的是塞尔维亚的英雄。在之前整整一个夜晚，我们的耳朵里灌满了这种演唱，况且是在一个狭小的私人房子里。他的古斯拉琴琴声使那震耳的叫声更加高亢。古斯拉琴只有一根弦，但却编得十分精美——我们在黑暗中休息，彼此讲一些算不上英雄的事情，也少不了一些不着边际的瞎聊，或者干脆就望着远处街道上纷纷扬扬的雪花（对了，我们的车子还在那儿吗？）。

一天下午早些时候，雪终于变小了，我们启程了。这时，我们也只好两个人成行，因为扎克（这个所谓的“热心人”或者“火辣辣的人”）还想再陪陪他女儿，继续在奥尔加女士温暖的房间里待一段时间（“德国之声”给他还有一周假）。于是，我们沿河向下游驶去，一路向北，一会儿就暮色降临，而且很快就进入漆黑一片的塞尔维亚，穿过越来越泥泞的雪堆。在到达诺维萨德之前，我们横穿了绵延的弗鲁什卡格拉山（对伟大的塞尔维亚诗人米卢·科伦扬斯基来说，这座山在“一战”后更多时候变成了异国的山，而不再是故乡的山。），积雪最终变成了冰崖。在伏伊伏丁那省城的“游客”酒店里

度过了又一个寒冷的夜晚后，第二天一早，我们在诺维萨德的市场上买了几包“摩拉瓦”牌和“德里纳”牌香烟，还在诺城一家书店里买来了塞尔维亚-西里尔语蘑菇指南，二者都是为巴黎的近郊生活准备的。在那儿，在我的整个塞尔维亚之行中，第一次碰到了其他游客，有两个来自纽约的小伙子向我打听便宜旅馆，准备在诺维萨德拍一部电影，“只是一个短片”。后来，在前往匈牙利边境的途中，快到苏博蒂察时，又是寒冷刺骨，雪粒尽管稀稀拉拉，可仿佛要穿透这一马平川似的大草原。像从前一样，到处可以看到在这片大地上乱蹿或者已经死亡的僵硬地横在车道上的狗（兹拉特科说：“在罗马尼亚还有更多！”）；有一只麻雀砰地撞在挡风玻璃上；成群成群的乌鸦落在空旷的柏油马路上。兹拉特科嘴里念叨着：真是少见，乌鸦群里还会看到一只喜鹊——我也看见了，正想告诉他呢。

在南斯拉夫各国纷纷独立的战争时期，我总是在新成立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漫游，这个国家昔日是“我漫游的故乡”。然而，与此同时，这样的情感意识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哪怕一时一刻（它似乎是不会逝去的）。有可能，这也跟我自己，跟我也许幼稚的失落息息相关，比如，面对那座巍峨的、坐落在尤利安阿尔卑斯山里和波希涅湖北面的特里格拉夫峰（曾是南斯拉夫的最高峰），我心里明白这座三头峰的轮廓同时也是斯洛文尼亚国家车牌和国旗上的图案；或许我走错路了。在我看来，恐怕要在那里走新路了，而不该一如既往地走同样的路。

尽管如此，这个国家如此突然的转变、如此突然的封闭和难以接近，不只是留在我的想象中而已。在我们来塞尔维亚旅行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一如既往，独自漫步穿过波希涅谷地，并一直往南穿过伊松佐河河谷，又下又上，就到了的里雅斯特上方的喀斯特地区。波希涅地区及其那样灵动而静谧的湖泊位于最后方，从那里只是还没有公路直接进山去。这里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对塞尔维亚人来说也是如此：有许多塞尔维亚诗人留下了不少的诗篇（或者见证，对一种少些日常的盲目、富有诗意的生存的呼吁），他们都是“斯洛文尼亚人的兄弟”，对美丽的波希涅地区有感而发。

然而，如今我找到了一家合适的酒店，名叫“Zlatorog”（意思是：寓言中的北山羊），其实更像是高山牧场小屋，在山谷尽头的后面，这里的一切都是为讲德语的游客准备好的。入口处，当年铁托来访时的照片被弄走了——也没什么遗憾——取而代之的是维利·勃兰特[55]的照片。这时，我问自己，是不是马歇尔当年陪他来的呢。在国家电视台——平时只有德国和奥地利频道——的节目上，来自国外的贸易或经济代表团一再受到纯正的民族音乐的颂扬，最后由斯洛文尼亚总统出面接见。一个当年能干自豪的官员？可现在却像个服务员，甚或走狗，向外国人兜售他的国家。看样子，仿佛他要一丝不苟地迎合德国企业家和委托人的说法，斯洛文尼亚人民不是别人所说的这样或那样，而是一个“勤劳肯干的阿尔卑斯民族”？此外，一大早，酒店后面那个不怎么令人愉快的、半是在山林里的超市，就已经准备好了德国的《图片》报，也许比当地的日报《劳动报》，即《卢布尔雅那日报》还要来得早。就在堆起来的管装和罐装的妮维雅护肤品旁边，要说有斯洛文尼亚的东西，也不过是产品包装醒目的德语说明上贴了一小条斯洛文尼亚标签（第一批顾客的话：“《图片报》到了吗？”）。后来，在依然保持着美丽的乡土本色的比斯特里察火车站里，为了顺应自然或历史，那些简直像真油画的照片都被替换掉了，其中有塞尔维亚的修道院、黑山的科托尔海湾、奥赫里德的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湖——取而代之的绝对不是纯粹斯洛文尼亚的风景照片，而是儿童绘画的印刷品。

那么，这是一个处于童年的国家？我不会忘记，而且之前在这个新建的国家的一次次旅行时就目睹过，在一望无际的喀斯特高原上，通向类似的、即使远在荒野的火车站的通道两旁，到处都挂满了广告牌，上面写着，国家一再要求保持（无愧于欧洲）的环境整洁和相互对此进行监督——与之相适应，你不得不听的、无法听而不闻的广播音乐回响在整个国家；如果不是这个小民族的传统音乐，那就毫无例外地是高雅的欧洲古典音乐，即使是莫扎特或海顿最轻快的曲目，也会使游客的心情变得阴郁。

有一次，我去往一个灰白色的石灰石火车站，它距离喀斯特村庄杜托弗列很远。从国道上拐弯下来的地方，我没有听到那家精神病院的声音。精神病院坐落在以前没有任何建筑的拐角。当年一次次漫游时，我都听得到从窗户传来病人的尖叫声、哭号声和磨牙声：可是现在，时过境迁，不是这扇窗户后面是一片谨慎的沉寂，就是那扇后面

的收音机里在轻轻地播放着钢琴音乐会。然后，我继续走到火车站里，在黑色古旧的候车大厅的墙上，前南斯拉夫时期的照片全都被清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火车站入口贴了一个提醒保持公共环境整洁的标语。在这条路尽头，也就是在喀斯特稀树草原之前，我看见一辆大货车停在那里，挂着斯科普里 马其顿的牌照，这种情形以前在斯洛文尼亚的公路上比比皆 是，但现在却很罕见了。特别是正在休息的司机，躺在外面的草地上，远近就他一个人，就像是从战争之前的岁月里残留下来的。他听着半导体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声音很小，像是东方或阿拉伯音乐。这种音乐以前在这儿到处都能听到，现在几乎销声匿迹了。司机和我面面相觑，一会儿，某种东西足以使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事情更胜于一种共同的想法，那是些更深层的东西：一种共同的记忆；尽管周边地区好像要在这种音乐声中重新绽放和延伸，直到遥远的、快要接近希腊的南部，可是这样一种大陆情怀（与“海洋”情怀的热情不同）几乎立刻就烟消云散，空气中只是跳动着一阵十分强烈的幻肢痛[56]，无疑也不只是个人的。

之后，在塞尔维亚的旅行中，我再没有了失去故乡的感觉。既不是因为这个国家对我来说变陌生了，也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前，巴斯克的毕尔巴鄂，首先是它的文字给人一种陌生的感觉，甚至有一次我进男厕所时心想着，连那儿的小便池恐怕也会呈现出闻所未闻的、从未见过的样子，或者就不是在地上，而是高高地挂在墙上。不，在塞尔维亚，我既不会有家的感觉，可是也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外地人，既不属于其中，也不会受到伤害。我始终是一个旅行者，是的，即使是一个所谓新型的观光客。最近以来，旅游研究者或学者把这种新型的旅游推荐给“度假的人”，称之为“可持续观光”。因为旅行——参见《法兰克福汇报》1995年11月23日的旅游版面——但愿“最终能够被理解为一种宝贵的财富”。可是，“只要旅行目的地的选择依赖于附着其中的面子”，这又谈何容易；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旅游者关心的不是“当地能看到什么，而是自己需要什么”——度假的人只有这样来感受“旅行会给他带来什么”；简言之，“可持续观光”。

就塞尔维亚之旅来说，怎样可持续呢？比如，那里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一个与我们的日常现实相比强化了的、近乎结晶的日常现实的图像。是因为战争状态吗？不，更多是因为整个一个伟大的民族，她显然明白自己在欧洲范围内遭到排斥，感受到这种境况是极为荒唐的

不公正，并且现在就是要让这个世界知道，她是另类，不仅在大街上是这样，而且在一旁同样如此，即使这个世界压根儿就不愿意对此有任何感知。

其实，恰好当你十分鲜明地感受到那里几乎人人都被解体时，首先留在记忆里的就像是这个在别的地方早就被合法地宣布死亡的“民族”：可以理解，因为这个民族在自己的国家里这么明显地分散居住，人人都是一个高度分散的个体（此外，返程时，在郊区火车站旁那棵鸟儿栖息的树上，我看到在上面过夜的鸟儿冻得竖起了羽毛，彼此之间却保持距离，身体之间也积满了雪）。简单地说，留在记忆里或者挥之不去的只是在一个纯粹的内陆国家的旅行，那里甚至没有天然湖泊，只有河流，但是什么样的河流呢——谁有朝一日想象经历一个未来的、只有河流而且远近都没有海洋的内陆国家的话：那就随他一起去塞尔维亚吧。

最后，留在我记忆里挥之不去的首先是：没有人了解塞尔维亚——按照托马斯·沃尔夫的小说描述的，“只有死人了解布鲁克林”。

如果我在以前那些可持续的独自旅途上常常想象或者希望有选择的结伴来重新体验的话，那么我这一次——之前几乎始终是这样的结伴之行——则希望能够独自在这个国家走走看看，不开车，只坐公交，最好就是徒步。

后记

但是，难道我真的没有一次独自去塞尔维亚旅行过吗？那是一个雪天，在边境城市巴伊纳巴什塔。天刚破晓，我就出发了，心里只想着两个目的地：长途汽车站和德里纳河（我常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为了达此目的，你恐怕必须早点起来！”）。我不是要过桥去波斯尼亚，而是要去更远的地方，尽可能远离房屋和花园，去德里纳河蜿蜒流过田野和牧场的地方，这儿看看，那儿走走。

天色阴暗，下着雪，周围群山环绕。汽车站很难找，根本就没有指示牌，我又不想问别人。最后，终于找到了，果然跟我想象的一

样，汽车站是一座平房，坐落在被德里纳河支流冲刷而成的一片洼地上，对面就是我在巴伊纳巴什塔镇第一眼所看到的那栋房子，除了顶上有个十字架之外，一点也不像教堂。

在车站售票大厅里，墙上有一张很大的班车目的地列表，就像纪念油画那么大。上面的文字跟书法一样，是当年在这里通用的西里尔字母：贝尔格莱德，在这下面，也就是最后，是斯雷布雷尼察和图兹拉。这块巨大而古老的公告牌现在已经不用了。当下的发车时刻表贴在一个角落里，草草地写在很小的一张纸上。再说，已经没有开往最后提及的两个地方的班车了。隔壁的咖啡馆是一个巴洛克风格的大厅，空荡荡的，只有一位老妇人坐在一张很大的桌子旁，不知是老板还是服务员。里面有两个人在下棋，他们俩在接下来的半个钟头里下了大约二十盘快棋。远远的角落里有一位孤独的老人，他喋喋不休地朝着咖啡馆里说着什么，不是自言自语，而是迫切地希望有人听他说话（可惜没人听）。

后来，我漫步穿过田野，远离最后一处城郊房舍，可是不大一会儿，我就打算放弃继续往前走了：湿漉漉的深雪灌进我的鞋里，特别是面前的雪地上看不到任何脚印，犹如在警告我。难道我还没看够德里纳河吗？可是我的双腿却不由自主地接着向前挪去。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一直朝着远处昏暗的河谷走去，那里就是边界和德里纳河。（在那本纯克罗地亚语词典里，“河谷”被“港口”取而代之，因为这个意思符合这个海洋之国，而我后来在另一本战前的词典中还找到了“草地”的意思。）河对岸是否也有人在看着我呢？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那是一片废墟，还是尚未完工的新建筑？不，是废墟，河两岸又堆放着与房子一般高的、发黑的干草堆，仿佛已经好多年了。我终于穿过了一片洼地，仿佛所有的小鸟都聚集在这里。之前，在穿越塞尔维亚的旅途中，我曾经那样期盼着能够看到它们，有麻雀、山雀、红胸鸲、鹪鹩、戴胜和蜂鸟（不，没有蜂鸟）。我现在终于又可以从一个光秃秃的堤坝上看到德里纳河。它湍急地流去，河面宽阔，河水闪现着深绿色的光。然后，从斜坡上溜下去，越过尚未收割完的、迎风沙沙作响的玉米地，穿行在密密麻麻的河谷灌木丛中，我几乎觉得比在大坝上更安全。

“你可别继续走下去了！”脑子里一边这么想着，可是双腿还是伴我一起走出灌木丛，径直来到河边，经过一个出现不久的地坑，里

面散落着大量的子弹壳（不，应该不是）。我蹲下身子，这时，河面显得更加宽阔，从脚上的塞尔维亚棉鞋鞋尖到波斯尼亚河岸，无非是冷冰冰雾蒙蒙的德里纳河水，湿乎乎的雪花纷纷落入水中。这时，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会不会也在一次德-德战争中这样蹲在界河边上呢。顺流而下，将近三十公里，应该就到了斯雷布雷尼察这块飞地了。一只儿童凉鞋漂到我脚前。“你不是依然执意质疑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杀吗？”回到巴黎之后，S这样问我。“不，”我回答说，“但我只是想问问，怎么来解释这样一次大屠杀。正如所说的，在整个世界眼皮下，而且经过了长达三年的战争。人们说，在这场战争中，战争各方，甚至连那些战争疯狗此间都变得已经懒得再杀戮了。更有甚者，据说这是一场有组织的、系统的、预谋已久的屠杀？”为什么要这样大规模地杀戮呢？到底是什么动因？想达到什么目的？为什么不进行彻底的原因调查（“精神病患者”不成其为理由），却又是赤裸裸的、无与伦比的、由市场决定的事实和假象的交易呢？

我就这样继续蹲在德里纳河边，想到伊沃·安德里奇笔下的维舍格勒城，或者它就闪现在我的脑海里，溯流而上大概五十公里——尤其想到那个在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最初名为《德里纳河上有一座桥》）中塑造得如此鲜明的城市编年史作者的形象。这部小说写于“二战”期间德军占领的贝尔格莱德，男主人公在他的整个书写生涯中几乎没有记录下任何当地的重要事件，并不是由于懒惰或粗心，更多是因为自负，首先是傲慢——在他眼里，那些事件，无论怎样，根本都不值得记录下来。

我在那里继续思考着（或者想象着这样的情景）；我在这儿思考着这样的情景，坚决，一丝不苟，实实在在，觉得那里有太多报道波斯尼亚及其那场战争的记者都是些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人。他们不仅是傲慢的，而且也是虚伪的编年史作者。

这样说，丝毫没有针对那些——胜过揭示真相——善于发现的记者，实地（或者更确切地说：深入实地，并且把实地的人们卷入其中），也不是为另外那些战地研究者叫好！但的确不敢恭维那些远远手舞足蹈的乌合之众，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书写职业与法官的，甚至蛊惑人心者的角色混为一谈；多少年来，他们总是用千篇一律的笔调和画面夸夸其谈。他们身在国外，高高在上，自行其是，跟战场上那些疯狗没有两样，同样是些凶恶的战争疯狗。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闻，比如德国《明镜周刊》上连篇累牍的新闻，在那里，卡拉季奇“先是喋喋不休”，然后又是“表示让步”；在那里，一次晚餐时，在美国的代顿军营——据这家消息灵通的周刊透露说，那些联邦共和国的调停人就在那里，当然是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人——进行和平谈判期间，其中一位与会者被描述（？）如下：“战斗轰炸机和长崎原子弹模型，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会更喜欢哪一个呢？”（如果说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是一个出了名的恶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或者人们以前恐怕会这样说，他就是个“臭名昭著”的恶棍，那么相比之下，米洛舍维奇则显得逊色，即使他也是个恶棍，那么也是个直到今天还相当不出名的恶棍，一个似乎有待记者去发掘的恶棍，而不是一味地对他进行谩骂和谴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闻呢？一个星期以后，在这些新闻中，那些因为条约而被置于伊斯兰国家统治之下的萨拉热窝塞尔维亚人“觉得自己被骗走了犹大的酬金”；《明镜》语言突然从商业通常的低俗转换为圣经似的神圣。（为此，那个不可缺少的“巴尔干专家”后来在《世界报》上撰文独一无二地认为，在下面那里，“如今很少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些地方，因为那里的立法者并不是本民族的代表”——难道今天才这样吗？唯独在巴尔干半岛？）《明镜》不愧是德国人的一面特殊的镜子。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压根儿说的不是“我要控诉”。我只是被迫寻求公正。或者也许真的只是迫使我产生怀疑，令我思考。

这样一来，比如说，我就能够很好地理解，那个常驻波斯尼亚的《解放报》特派记者战前与其说是个南斯拉夫通，倒不如说是一个活跃的、时而可以让人赏心悦目的体育记者（尤其是在环法自行车大赛时大出风头）。可是，他从战争前线发回的加急报道，都是关于这样和那样的英雄，还有面目全非、垂头丧气、目光呆滞的战败者或者无足挂齿的士兵——然而，当他在萨拉热窝塞族人居住区看到大幅标语上写着：“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吗[57]？”这个问题时，他为什么非要公开嘲笑这种“荒唐”和“偏执”呢？就像我也能够理解这样的情形一样——当然不是那么好——，有这么多的国际媒体，从《时代周刊》到《新观察家》，为了把这场战争兜售给顾客

们，都把“塞族人”说成是不折不扣的坏蛋，而将“穆斯林”说成十全十美的好人。

而此间甚至让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在那家要吃掉塞族人的欧洲主流报纸，即《法兰克福汇报》上，他们在那里的仇恨代言人，也是其仇恨的根源，天天都用一种刽子手的语气（？）发表社论（“必须予以清除”，“必须予以隔离”，“一定要使之靠边站”），反对一切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的东西，怒不可遏，非要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位记者从居高临下的德国视角出发，为什么会走到如此口诛笔伐坚持不懈的地步。我绝对无法理解这个人，也无法理解他为什么总是口沫横飞地反对塞族人。然而，我此间不得不认为：莫非他和他的家人就来自南斯拉夫？他，或许他的家人，就像斯洛文尼亚哥特舍地区讲德语的人一样，“二战”后被铁托政权驱逐，无辜，遭受迫害，成为牺牲品，被剥夺了财产，就是因为他或者他的家人是德意志人？或许终归有一天，这位写手不再靠着撰写杀人的文章而同流合污，而是告诉世人，他对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怀有的不知疲倦和造成损害的仇恨是从哪里来的？然而，他当然是不会独自行动的（是的，行动）；整个报纸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我看来，与当年南斯拉夫分崩离析时这个和那个联邦共和国的政客不同：表面上看，它时而充满清醒可喜的理性，可从骨子里是一个十分阴暗的派系的喉舌，一个权力派系的喉舌，而且是一个德国权力派系的喉舌。它向外散发的是绝对和永远都不会有益的毒药：文字毒药。

我继续在那里，在十一月的德里纳河畔思考着。而此刻在这里，在一个类似于冬日的平静的森林池塘边上依然思考着，正好有十多架直升机轰隆隆地飞过池塘上空，载着来自各个大国的首脑，从巴黎郊区的维拉库布里空军基地飞往巴黎去签订和平条约，时间是1995年12月14日：这是不是各民族之间一场程序化的文字游戏呢？即使数代人恐怕都会对此保持沉默，也许是可以遗传的，就像我在我的同胞那里所感受的一样，只要涉及塞族人，一方面是那固有的、针对帝国杀手的愤恨：“塞尔维亚必然成为死敌”；另一方面是那又像新的、居高临下和蔼可亲地冲着阿尔卑斯地区的斯洛文尼亚人的欢呼：“来吧，到我们这里来！”这样一些盲目愤怒变化无常的人会世世代代实现和维护和平吗？不会的，和平只有这样实现：让死人去埋葬死人。让南斯拉夫的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让活着的人重新回到他们的活人中。

我当时思考过，现在依然在思考：那种“偏执狂”，也就是对塞族人民最惯用的谴责是从哪儿来的？与之相比，德国（和奥地利）人民对于“二战”期间他们在巴尔干地区直接和间接造成的巨大伤害抱什么态度呢？这只是“众所周知”，还是依然真的历历在目，在共同的记忆中，就像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灾难一样，或者只是似真似幻，就像遭受创伤的南斯拉夫人今天乃至世世代代依然感受到的？然而，南斯拉夫人因此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国际媒体集团发动的疯狂攻势，一种“人为而冷漠的回忆”，一种“幼稚的不愿忘却”——除非在此期间，一位奥地利总统候选人卷入巴尔干的事件突然间成为时下热门焦点，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只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却无视当下发生的一切，难道这不是一种与所谓的“偏执狂”迥然各异的精神或心灵疾病吗？一种独一无二的狂妄症？

在旅途中，至少我并没有把塞尔维亚看成是一个偏执狂的国家——更多是一个孤儿的巨大房间。是的，一个失去父母的遗孤的巨大房间，这是我所有这些年里在斯洛文尼亚从未感受到的东西（但是也许吧，如上所述，我只是走错路了：最近不是又有一个权力集团的喉舌再次大言不惭地辱骂这个小国家吗？说它眼睛就是盯着“历史沿袭下来的东西”，并且坚守“那个变得不安全的巴尔干”）。我无法想象克罗地亚，虽然大南斯拉夫的想法当初就是从那里起家的。但是，谁知道呢？一个陌生人知道什么呢？

我一边把手伸到冬日的德里纳河水里，一边思考着，现在依然在思考：我为什么不能像伊沃·安德里奇在他那永远富有教益的德里纳河史诗中所描述的那样悲观呢？我为什么没有能力形成他确切预见波斯尼亚各民族之间每隔一百年势必要爆发一场战争灾难的图像呢？这到底是不是我的病态呢？难道安德里奇不是一个具有知人之明的人，如此尖锐，从而在他看来，人类的种种图像有时候会变得苍白？难道伴随着眼前的德里纳河，无望会流淌到时代的尽头？一条昔日的竹筏从我眼前划过，上面站着那个著名的形象，一个德里纳河上划竹筏的人——不对，眼前什么也没有。此时此刻，从波斯尼亚岸边传来了吉卜赛人嘹亮的喇叭声，出自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德里纳河进行曲》？[58]—不，眼前什么都没有。

面对德里纳河，我思考着；现在我坐在写字台旁，依然在思考：难道我们这一代人在南斯拉夫战争中没有错过成长吗？没有成长为像

父辈那一代如此众多的成员一样；他们自以为是、精疲力竭、见识短浅、毫无主见、近乎世故，又那样心胸狭小，而是成长为，成长为什么呢？也许是这样的：坚定而开放，或者容易接受事物，或者像歌德所说的“可教育”，还有被看作这位德国大师的格言的一对连韵诗行“天真的| 不可战胜的”，连同变体“天真的-可战胜的”。以这种长大成人的方式，我，一个德国人的儿子心想着，脱离这百年的历史，脱离这一系列的灾祸，去寻求另一种历史。

然而，我们这一代人该如何面对南斯拉夫呢？对此，那个新派哲学家格鲁克斯曼的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关系到世界，可是与当年的西班牙内战时期则完全不同：关系到真实的欧洲，与之并行，其余的欧洲似乎才会构建起来。在我的同龄人中，我知道几乎只有约瑟夫·布罗茨基在《纽约时报》上对塞族人冷酷无情的谩骂，有眼无珠，也不分青红皂白，就像挥舞着一把生锈的大刀；还有作家彼德·施奈德的一封信，同样鹦鹉学舌，渲染敌人和战争图像，随波逐流而不是冲破偏见，支持北约对所谓罪行累累的波黑的干预。此外，这封信在德国发表之前，就已经可以在《解放报》上看到法语版。接着，就是挺进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别的地方？——要变得成熟，要变得公正，不再充当这个世纪之夜的应声虫，使之变得更加黑暗；挣脱这个夜晚。耽误了？我们之后的人们？

然而，我在德里纳河那里思考着，此刻在这儿继续思考着：带着这些发生在塞尔维亚的小小苦难，带着那里的些许寒冷，带着些许孤独，带着诸如雪花、帽子和奶酪的小东西走来，而边境那边则笼罩着巨大的苦难，有萨拉热窝的苦难，有图兹拉的苦难，有斯雷布雷尼察的苦难，还有比哈奇的苦难。与之相比，塞尔维亚那小小的苦难又算得了什么。难道这最终不就是不负责任吗？是的，我也常常一句又一句地问自己，这样一种书写是不是伤风败俗，甚至被唾弃，被禁止——正因为如此，这个书写之旅就变成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冒险、危险、常常令人压抑（相信我）之旅。我深深地感受到什么叫“前有岩礁，后有漩涡”。难道讲述这小小的不足（不足挂齿），就能够冲淡、掩盖和模糊大问题吗？

当然，最后我每次都在想：可这不是最终所要的结果。我的工作应该是另外的样子。坚持揭露那些邪恶的事实，就不错了。但是为了和平，还需要另外的东西，不逊色于事实的东西。

你现在玩起这诗意的东西？是的，如果这诗意的东西恰恰被理解为朦胧的对立面的话。或者不说“这诗意的东西”，最好说“有联系的东西”、“包罗一切的东西”——促成共同回忆的东西，因为对第二个童年，对共同的童年而言，回忆是唯一的谅解可能。

如何实现呢？我在这里所书写的一切，不仅面向这些或那些德语读者，同样也面向这些或那些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以及塞尔维亚的读者。这样做出于经验，恰恰通过间接地捕捉一些小事，那共同的回忆、那共同的第二个童年才会苏醒，因为捕捉小事无论如何远比强加主要事实影响更加持久。“在桥上，有一块木板松动有好几年了。”——“是呀！你也注意到了？”“在教堂唱诗班下面一个地方，走路时会产生回响。”——“是呀！你也注意到了？”或者干脆把我们所有人从对历史和当下的无稽之谈的桎梏中转移到无比有益的当下：“看看吧，下雪了！看看吧，那里有孩子在玩耍”（转移的技巧；艺术乃根本的转移）。就这样，我站在德里纳河那里才觉得有必要，找一块石头扔到水面上打水漂，朝着对岸的波斯尼亚（只是一块石头也没找到）。

在这次塞尔维亚旅行中，我唯一记录下来的东西，除了塞尔维亚语“操！”这种骂人的脏话之外，就是一个男人的告别信里的一段话。他和妻子同是当年的游击队员，在波黑战争爆发后就自杀了。在此，我重复一遍这段话的德语译文，是由扎克·拉德科维奇和兹拉特科·伯科季奇（又名阿德里安·布罗维尔）共同翻译的：

背叛、我们国家的解体和混乱、我们的人民被抛入其中的严重局势、波黑战争（塞尔维亚克-克罗地亚语为“rat”），灭绝塞尔维亚人民以及我自身的疾病已经使我的余生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我决定摆脱所遭受的病痛，尤其要摆脱国家灭亡所带来的苦难。我的身体已经精疲力竭，难以继续承受这一切，那就让它好好休息吧。

（斯洛博丹·尼科利奇，写于德里纳河边的巴伊纳巴什塔附近的佩鲁采克村，1992年10月8日。）

（1995年11月27日—12月19日）

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

刘学慧　译

“必须考虑的是：我们是否可以书写和阅读历史？特别是关于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圣西门回忆录》第一章的标题）

——圣西门（1675—1755）

“那是一个夏天，清晨的时光非常美妙，树都是绿的，草地上满是青草和花朵。”（兰斯洛特和格温娜维尔的中世纪史诗，第841页）

1995年底，我去塞尔维亚旅行，并写下了冬日旅行的故事。如今，半年多过去了，也许有必要为上次的冬日旅行做一个补遗。

春末时节，我在贝尔格莱德与塞尔维亚的朋友会合，一个是外语老师兼翻译扎克，另一个就是画家兼司机、生活艺术家兹拉特科。这次故地重游，我们想变换一下路线，从塞尔维亚西部的边境城市巴伊纳巴什塔到维舍格勒，最后抵达现名为波斯尼亚的“塞族共和国”，主要是想看看德里纳河大桥，因为伊沃·安德里奇写过那座桥，仅仅就是这样。

这次重游塞尔维亚，有一个契机——但仅仅是一个契机——把我的冬日旅行故事翻译成塞尔维亚语。带着这本书，我和我的两个塞族朋友准备立即驱车去贝尔格莱德城外，去寻找那广阔的东西。像第一次一样，我来塞尔维亚，迫切地想作为一个旅行者，独自一人，一切

自理，当然也就是“自掏腰包”；比起第一次，我打算更少记录下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后来，我的确也没有记录什么，甚至一点都没有。

当南斯拉夫航班在贝尔格莱德河谷平原地带降落时，天气闷热无比。机场周围杂草丛生，连一朵小花都看不见，让人感觉仿佛已经到了夏天，春天早已过去。贝尔格莱德主街两旁的加油站又像以前一样照常营业，马路边上已经见不到小贩手举汽油瓶叫卖加油。取而代之的，是在市中心可以看到一些罢工的工人，尽管人数不是很多。他们来自国有企业，聚集在南斯拉夫联邦政府的大楼前讨要被拖欠的薪水。在那高高的玻璃窗后面，时不时会露出一个官员或者更多是官员秘书的面孔。

然而，在贝尔格莱德那几天，留在记忆里的无非只有郊区策穆恩的多瑙河畔此起彼伏的蛙叫声。自从解除禁运之后，多瑙河上的货运船只又恢复了繁忙的运行。那是一种嘎嘎格格声，随着闷热的暴风雨的第一次雷声，突然变成了一种愤怒的吼叫。然而，当雷声再起时，它却沉寂了；当雷声一声接着一声时，它仿佛变得无声无息了，越来越宁静。之后，还有足球赛在城市的另一边举行，靠近铁托纪念堂，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对阵贝尔格莱德游击队：人声鼎沸，一片喧闹——观众共同成为一个巨人——在椭圆形露天球场上，两支纯粹的塞尔维亚球队。看样子，仿佛现在和以前没有两样，这是一场大南斯拉夫决赛。我们说，是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对阵萨格勒布迪纳摩队，或者是贝尔格莱德游击队对斯普利特哈伊杜克队，又或是卢布尔雅那奥林匹克队。伴随着一系列烟雾弹助威，有毒绿色，有硫黄色，也有亮蓝色，一会儿在红星队的球门后面，一会儿又在游击队的球门后面。弥漫的烟雾不仅笼罩在球迷上方，而且也淹没了绿茵场上的球员，以至于这场比赛在很长时间内丝毫看不清传球的路线，只看到身着球衣的人影在烟雾中奔跑。大家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看台的观众身上：在所有座位上站着和坐着的观众，一片狂热，一片兴奋，仿佛这样一来，在这个小小的塞尔维亚，要召回昔日的、包括从里耶卡到马其顿的整个迪纳拉疆域，几乎可以歇斯底里地说，难道在这些欣喜若狂的游击队

或红星队球迷的眼神里，不也同时一起回荡着一种讽刺吗？你只需打眼看去，它就会眨眼或者眨眼示意，不，闪烁回应。

终于可以离开酷热难忍的贝尔格莱德了，启程向西前往波斯尼亚山地。与战前和禁运前相比，首都的汽车声显得更加喧嚣。我们怀揣着塞尔维亚共和国开具的一纸简短的通行证。通行证是我们从贝尔格莱德市内一座办公或者小公司楼里取来的；从大街上走进去，开始还很宽敞，但后来越来越像迷宫——之所以像迷宫，也是因为办公室一层比一层破烂，或者更确切地说，都是临时凑合。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办事处，或者说什么都行，就在这里租了一间房子办公。这里有许多房子，看样子更加寒酸，就像是在等待订单的贸易代办处。一再走错门之后，终于找到了负责办理我们事务的房间。然而，这里的墙上，同样并未挂着预想的拉多万·K[59]或者拉特科·M [60]的肖像，而只是一张风景画，上面画的是典型的波斯尼亚高山牧场，就像一片四周被森林环抱的空旷地。从画边到画边有一条小车道，消失在齐腰高的草丛中。画前面两张近乎空荡荡的写字桌旁，此刻坐着两名身着夏装的女子，透出那种对整个南斯拉夫来说特有的高雅——自豪而不失风度；自豪而神情专注，或者机智果断——，同时也打量着我们三个人，充满一种淳朴的（而不是土里土气的）信任感。这简直让人觉得不好意思：是的，她们并没有一开始就把我们看成敌人或者居心叵测的人，不怀好意来到她们这个遭人唾弃的国家；他们的旅行目的或者意图和主导思想无论如何不是对那种谣言进一步滥发议论，说她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施暴者、屠夫、非欧洲传统的野蛮人的民族——于是说道："Sretan put！一路顺风！"

启程伊始，我们这次还是朝着大肚子山方向进发，刚一驶出贝尔格莱德，进入典型的塞尔维亚平原（后面就是德里纳河……再往后就是波斯尼亚……）。跟之前的冬日旅行时一样，又迷路了，而且在同样的地方，于是又在乡间公路上绕来绕去，坑坑洼洼，又小——很难看清——又深，简直成了跨越障碍之行，比许多弯道还要蜿蜒曲折，如同去年十一月的大雪之行。直到山脚下的瓦列沃城，我们才重新回到那条正确的道上，也就是快车道。在驶入瓦列沃城之前，路两旁密密麻麻站满了人。为什么他们都穿着统一的制服，是警察吗？这时，我们突然想起来：这天正好是德国外长来访，表示承认这个"南斯拉

夫残余之国”；此时此刻，他可能要从波德戈里察| 黑山回到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我们并没有看到外长的车队，因为我们又像去年冬天一样，一到瓦列沃城里，立刻就从那条车队穿行的大道上拐进了辅路，沿着山路向上，穿行在Debelo Brdo，也就是大肚子山上；它此时不再冰雪覆盖，也不再早早就变得昏暗了，而是漫山遍野一片翠绿。然而，今天车窗外又是一丝丝凉意袭来（当然只是来自山涧峡谷）；今天，在几乎整个漫长的盘山行程中，也有一簇又一簇的东西轻轻地落在前挡风玻璃上——不过不是雪花，而是从山涧和道旁的杨树上四处飞来的花絮，直到高高的上空，到处都飘着花絮，车道两旁银装素裹，白茫茫一片，一直延续到半山腰。从那里往上走，几乎全都是松树和杉树——终于不再飞絮漫天了。

我们在一个山口同时也是高山牧场停下来休息。这里放牧的不是那些在欧洲还常见的牛群，而是巴尔干的猪群，不，是塞尔维亚的猪群。它们在吃草吗？不，它们在狼吞虎咽——很小，很渺小，几乎全身都是白色，就像是到处凸显在草甸子之间的一块块迪纳拉石灰石。在休息站那里，在那片荒无人烟的地方，在那些小猪旁边，还有一个小伙子，他在牧场边上捣鼓着他那刚打开的手机。看样子，这是整个巨人山上首屈一指的新鲜玩意儿。接着，别的小伙子都好奇地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打量，就像忽然间从岩缝里和粮草垛上冒出来的，个个都是浪迹天涯的人，可是离回家还早着呢，也不操心回家的事。

终于到了河谷，德里纳河就在深深的下方，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群山之间是可以清晰地看到的，可又看不到，就像上次在雪夜里一样，只能感觉得到——但是跟上次一样，又是扎克，他又一次行驶在夏日的道路上，下山去那座河畔城市，看望他的女儿和前妻；他激动地说道：“下面那里就是巴伊纳巴什塔城，再往下，那肯定就是德里纳河了。”这句话不仅表明我们现在到达目的地，而且还更像是一句引言：在我们第一次来这里的旅途上，他喊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一句话，或者说，在我冬日旅行的讲述里，我就是这样把他固定下来了——而且看样子，仿佛他、他和他正在旅途上，我们三个人瞬间同时也作为一个故事中的人物，此时此刻穿行在这个塞尔维亚，作为一个

几乎已经古老的游戏人物。然而，这绝对不会意味着非现实化，既不会对此刻，也不会对当下，更不会对我们自己。

然后下山，顺着河谷向前，沿着德里纳河向前，又是杨絮漫天飞扬，从此刻敞开的车窗里飘进来，时而弄得鼻孔阵阵发痒，最终确定到达边境小城巴伊纳巴什塔。傍晚的到达，初夏的到达。

主街旁的酒吧门前，都支着欧洲时尚、像帐篷似的太阳伞，即使到了深夜，在星空下，它们依然撑在那里——坐在伞底下，有一种更加令人窒息的感觉，就像有全新格局的整个欧洲一样，所有的地方莫不如此，哪儿也没变好。我们又住在“德里纳”酒店，这个我们早就熟悉的酒店——或许也是因为我写过它吧？与之相应，在之前的露台上，夜里又增加了我的和我们的冬日故事中的另外两个人物：那个当地“图书管理员”和“扎克年轻时候的女朋友”“奥尔加”（连同两人的“女儿”，她当然立刻就走开了，因为她第二天有毕业考试。也是的，她干吗要待在我们这里，既然她满脑子想的是詹姆斯·迪恩或者像他那样的人？）。

而在这里也是第一次，在经历了所有对我的冬日旅行故事这样和那样的反应以后，突然有一种想法萦绕在我心头，我可能因为书写这个故事而做了什么不正确的事，什么错误的事，甚或不合法的事。这更不会是针对那个友好而胆怯的图书管理员而发的。当问到他读了我的冬日之行故事有什么看法时，他首先是狐疑地盯着，而且很久，最后以一种我觉得受到委屈的语气说道，其一，他的职业不是我所写的“图书管理员”，而是“教授”；其二，我的描写不恰当，因为说他站在德里纳河大桥上，看到我们走向对岸的波斯尼亚感到害怕！还有我在书中提到的那个独弦音乐家，即那个塞尔维亚荷马英雄传说歌唱家，对我把他的说唱形容为“乱喊一气”不太高兴（我用德语写的是“大声高唱”，所以，如果塞尔维亚语写成有些失敬的“乱喊一气”的话，那我只能把责任推到译者身上）。还有，“德里纳”酒店的经理也拒绝接受我所描写的他们酒店没有暖气的片段；一到夜里，暖气

向来都关掉了，战争和塞尔维亚你来我往。我所描写的那个长途汽车站的站长反对说，在我的书里看到的是一个“小得可怜”的车站，而实际上那是一个跨地区运营的大车站。这时，当着这些错误的引证，我才明白过来：巴伊纳巴什塔的这位图书馆管理员之前一直只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并且要以这种方式告诉我们，看到他本人以及他的小镇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他是多么自豪或者高兴啊！

不，因为我发表的那些言辞，让我满腹狐疑，这后来更确切地说是出自奥尔加的一句话，我在书里写到，她是这样反驳的，她，这位“来自巴伊纳巴什塔的女子”“坚信”，在斯雷布雷尼察，数以千计的穆族人遭到德里纳河对岸的同胞杀害。然而，她毕竟没有这样说，最多也就说了“我相信”，或者是“有可能”。说她绝对不会踏进主街旁那些新的“战争既得利益者酒吧”一步——我真不应该把她这句话写进我的故事里；因为她现在每次经过这些酒吧时（她就住在主街里），总是担心有哪位店主会听到她曾这样“诅咒”的风声。她并没有直接怪罪我这个始作俑者、作者，只是喃喃自语，或者夜深人静时才又想起来，恰恰这样一来，她正好刺痛了我。当时我就想，现在依然在想，这些有疑问的议论——虽然已经无法减弱其影响，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删掉，但可以换另一种方法来讲述那个“说话”的人，转换成另一种形式讲述，给她冠另外一个名字，换一个不同的居住地。从最大限度意义来说：“为了真实，转换方式。”

与冬天不一样，德里纳河畔这座边城现在不是此行的目的地，而是过路驿站。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们就继续沿着德里纳河向上游行驶，朝着维舍格勒方向，去河对岸的波斯尼亚。途中，我们在佩鲁卡察村短暂停留，去看望奥尔加的母亲，那个“老游击队员”——这次旅行中的最后一个故地重游。我们坐在一起，但与去年冬天不同，这次不是坐在她那“养路人的小房子”里，而是坐在露天，身后就是果园。细心的读者可能马上就会注意到，果园旁边不是我上次提到的“土豆地垄”，而是一片直延伸到山脚下的草地——不是“大肚子山”（这是我本人犯的第二个错误），更确切地说是“塔拉”山脉，

必须翻过这座山脉，才能到达维舍格勒——德里纳河沿岸的马路通到这村子后面，也就是电厂大坝跟前就是尽头了。

那位优雅的女士就在村子苹果园里，就在每天摆得像过节一样的桌子旁。最初，我还以为她是另外一位客人，之后才又认出来她就是在去年十一月的大雪天里招待过我们的人，这个老奶奶，这个当年的游击队员。半年前，在那个小房子里面，她戴着农妇头巾，穿着棉拖鞋，而现在完全换了一个人，她头上没戴头巾，一头古铜色的头发，穿着精致的皮鞋，走起路来身板挺得笔直，雄赳赳气昂昂，简直就像个女首领：不仅是季节变化使然，而且首先是由于屋内和露天的区别；露天如此显然地成为这个女人特有的内在。又是那铁红色的浊葡萄酒，又是山坡上一望无际的羊群，又是那深色的森林蜂蜜（不，这曾经是塞尔维亚另外什么地方……）。在德里纳河对岸，山脚下还有几家小农舍，在这个和那个里面住着来自德里纳河对岸的难民，他们来自萨拉热窝等地。在草场周围，这儿和那儿，延伸出了新整理的菜园，即使只是刚刚延伸出来，一块一块的，尝试之中，犹犹豫豫，显然不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正是难民们的菜园（后来在波斯尼亚随处可见）。

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在塞尔维亚河岸这边，不仅在我们身边的苹果园里，在那些刚刚才蝇头大小的苹果下面，这种近乎神奇的景象看上去祥和平安。可对岸的波斯尼亚草坡上，几乎所有的农舍都没了屋顶，只剩下光秃秃的残垣断壁。每每想起她的丈夫，女主人总是泪眼婆娑。丈夫在上次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开枪自杀了。是吗？不，此时此刻，就在她的眼前，结束了他的生命，离开了她的生活。

在塔拉山脉和德里纳河之间短暂的果园停留期间，有一些路人驻足在栅栏外，跨过围栏，径直坐到长桌旁——这里开始了乡间的周末生活。就这样，这种情形就会在这位老妇人的果园里继续下去，直到周日夜里：有电厂的工程师，有难民邻居，有城里来的亲戚，也就是来自小城巴伊纳巴什塔和大城市贝尔格莱德，有村子里的孩子，还有

长途卡车司机，其中包括那个地质学家，他一边讲述，一边感到惊奇：从这里到海边的直线距离多么近啊，亚得里亚海，一座山脉接一座，都是南北走向，绝大多数河流也一样，截断了向西的路；没有一条向西通往地中海的河谷，更不会笔直和直截了当，而这样的地貌现象——广阔的大海前一道又一道屏障——无疑共同决定了整个波斯尼亚以及整个波斯尼亚的思想历史。——而维舍格勒，这个战前令人喜爱的短途旅行目的地，其间只隔着一道山脊？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去过那里，即使已经恢复和平半年多了，依然无人问津。

后来，在这个周末下午，我们沿着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登上塔拉山脉。途中，波斯尼亚的丘陵对面，有一个山洞直延伸到深山里，洞门锁着，但可以看到洞内灯光明亮，一个防空洞？不，那是栽培蘑菇的山洞。在深深的下方就是德里纳河，它穿过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之间的陡峭山谷一直向北流去，巴伊纳巴什塔小城已经在很远的地方，一颗明亮密集的四方块儿坐落在一片不多见的河谷平原上。扎克，作为翻译，他理所当然熟悉我的出生地奥地利的克恩滕；他此刻深有感慨地说，这两种地形给他留下了同样的印象。是的，一点没错：这种内陆锅形地貌何等相似，四面环山，地势平缓，山上都是深绿色的针叶树林，中间错落有致地分布着绿油油的草地和果园，使得针叶林的深暗显得明亮。在这样的林中空地上，没有人口密集的村庄，顶多也就是分散居住的民居，通常都是独家独院——唯独那条河，也就是德拉瓦河在我的家乡远离所有的居住点流去，而且从山上看去，也像隐藏在山谷中一样。

塔拉高原恐怕也是欧洲中部阿尔卑斯山脉的一部分，上面到处都是高低不平的短草草场，不见云杉、松树以及蕨类植物的踪影，与生机勃勃的、时而闪烁着汽车灯光的河谷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下车，去灌木丛里，去苔藓地里，去寻找蘑菇。不，继续在山上盘来盘去，终于来到塔拉山的另一边，然后拐进一条短暂又变得宽阔的、标有“维舍格勒”指示牌的公路驶去。尽管之前似乎要经过两个边防站，但却没有看到任何迹象。难道穿过了一条长长的、漆黑的、滴着水的隧道后，就进入波斯尼亚了？按照兹拉特科的说法是这样。他以

前当过兵，熟悉南斯拉夫地理。这是因为，刚一出隧道口，就有一只狗毛竖立的小狗直冲着小车扑过来，这肯定“是条波斯尼亚狗——这样的狗一旦发起攻击，是决不会退缩的！”确实如此，车子在马路中间绕着躲来闪去：这条狗不仅没有停下来，而且立刻又龇牙咧嘴地冲向车轮和轮胎。

但是接下来，在峡谷中，我们首先碰到了第一个塞尔维亚或者南斯拉夫边境检查站。之后恐怕就到波斯尼亚了，我的两位同行者如是说。他们此刻同样熟悉这里的地形，因为你会看到路边有燃烧木炭的烟雾，能闻到烤羊肉的味道。可那里什么都没有：越过第一道边境，继续盘山而下，来到峡谷深处，是一片无人之地，如此之长，这在两个国家之间是很少见的，比起之前的全部行程，也更少有车辆行使过。芳香透过敞开的车窗飘进来，又只是来自正在盛开的金合欢，这在整个南斯拉夫四处可见。金合欢的葱绿在这里变成了独一无二的、像灌木丛似的白茫茫的海洋。

终于到了第二道边境关卡，看上去更像是一道田间小道栅栏，旁边是波斯尼亚-塞族边检人员的小屋，更像是一个田间风雨棚，一侧确实有一条田间小道通到公路上。这时，小道上有几个小孩正向关卡走过来，手里拿着刚刚采摘的野花。靠近谷底那里，到处是明晃晃的石灰岩石，尘灰飞扬，还有傍晚的闷热（再走几里，就到了德里纳河畔的维舍格勒）。当我们在边检站呈递护照和通行证时，那几个孩子跑到边境小屋里要水喝：渴了吗？嗯，很渴。他们喝完水后又转身跑向远处，不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这里到处只有灌木和荒石。边检人员像我们一样，也是三个人。在辽阔的西部天空下，就像在美国的怀俄明州或俄勒冈州，他们用响板和电话示意我们进屋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也没有任何表情，或者的确有？因为疲惫？谁也不用大声说话，边境这样安静。他们没有问护照之外的信息，除了“父亲叫什么？母亲叫什么？”最后离开的时候，那个最年轻的边检官员，我们六个人里最年轻的说道：“你们看上去真年轻。我也想重新这么年轻。”

过了边境之后，出现了第一个地名指示牌：“多布伦”。可是，这个村子除了名字外，几乎只剩下没有屋顶和门窗的残垣断壁。是些被洗劫一空的房子吗？这样的房子也算是房子，像这样的房子，给人的印象就是被洗劫一空，比起那样一种彻底的摧毁，这种情形显得更加糟糕；仿佛通过这样一种洗劫方式，不仅摧毁了一座独立的房子，这座确定的房子，而且可以说摧毁了房子本身，摧毁了可称之为“房子”的房子，摧毁了房子的本质（这种本质恰恰以这样一种摧毁的形式才是可以理解的）。

最晚就是在这里，我们三个坐在车里的男人停止了初夏之日重复我们的塞尔维亚冬日旅行故事；干脆停止了充当一个已经发生和书写下来的故事中的人物（这的确可能是一种恢复、兴致，首先是保护）。最晚就是在第二天晚上，也就是在维舍格勒待了一宿和一个白天之后，看样子有必要或者有好处，为我们的冬日旅行故事书写这个补遗或补充。

毫无疑问，我们大家都以为维舍格勒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市，哪怕只是一个小城也罢。所以，尽管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了那些典型的西部电影风格式的、彼此显然没有丝毫关联的地方边缘建筑，但依然期待着最终能够住在那样一个像中心的地方，比如说像一条商业大街或者一条南欧或东方宽阔美丽的林荫大道。可是后来，我们不知不觉地已经来到下面的德里纳河畔，它在这里又变得跟上游的巴伊纳巴什塔那里一样宽；我们踏上了举世闻名的土耳其大桥——它就在这儿，比我们想象的桥拱还要多。这时，我们才发现，这些灰头土面、斑驳陆离的简易建筑曾经几乎就是维舍格勒的一切。湍急的河流对岸那一排排房子看起来更没有城市的样子，而无异于当地常见的、地势陡峭、崎岖不平的荒野，满是泥土、灌木和石头，上面交错着一些牲口或人走的阡陌小道。

尽管这座城市更像是一堆杂乱无序毫无关联的房子，看上去空空如也，被掏空了，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周六下午的缘故，但我们还是幸运地在维舍格勒酒店里得到了最后三间空房子。酒店位于德里纳河右

岸，就在桥旁，正门的屋檐深深地突出来。酒店其他房间里住的不是难民，就是新迁来的人，或者被安置的人。从一些窗户里可以看到湿漉漉的衣服，就像是刚从打开的洗衣机里掏出来的。里面暂时看不到人影，压根儿也听不到孩子的叫声，空落落的，没有一点生机。楼道里无声无息。其实，有些迹象表明，这里的确住着不少孩子——难道他们，包括襁褓里的婴儿（但是他们有奶可吃吗？）都不会啼哭叫喊了吗？终于在一个楼梯拐角上看到了一位老妇人，她用手托着下巴，或者捂着耳朵。这个动作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天中还会经常看到，仿佛这现在已经成为波斯尼亚的典型动作，无论老幼。而我呢，当此刻有一个朋友在老夫人那里打听从哪儿来，打算去哪儿时，我很反感，因为我几乎是养成了自然而然的习惯，而且随着旅行的展开变得越来越强烈：千万别追问，千万别打听人家的情况，千万别追问某些显然会升天或者去往别的什么地方的东西。然而，我却每次都随之近乎贪婪地关注着回答，觉得为这样一个即便伴随着残酷无比的细节的回答而感到平静，有时候甚至是欣慰，而且是我们三个同行者中那个一路上承担所有提问的人——但在之后却又心想着，就连这些无声无息，这些一声不吭的动作和这些沉默不语的东西，也就是这些附属之物恐怕也会告诉我们什么（比如，在维舍格勒酒店里，那些堆放在一层又一层拐角的木盒子，以前，也就是战前，肯定是用来栽花的，可现在里面只剩下变成了垃圾的泥土，已经结成干块了，很难想象，那里还能长出什么东西来）。

直到晚上，我们三人都是各干各的。比如说，我去爬遍布裂纹、被雨水冲蚀的维舍格勒地区的一座丘陵，目的地是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堂。除了那座具有四百五十年历史的大桥之外，这是远近唯一的建筑，是值得一看的东西（那座举世闻名的大桥，我今天先不着急去，从教堂高处根本也看不到它的影子。其实就像在波斯尼亚群山之间，常常向一旁走上几步似乎就看不到整个地带了，连同村落、河流等，而展现在眼前的是全新的景象，有另外的河流，或者还有穆斯林墓地，而没有了之前可以看到的基督徒墓地）。

教堂的门关着，可上面贴了一张告示，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做圣礼：一个打算，在这里的一片死寂和封闭中，一种前景！教堂有一个洋葱形圆顶，建于十九世纪末，也就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就在下面的草坡上，立着石匠新打磨出来的墓碑。这里是战士墓地，或者“borac”也许可以更确切地译为斗士。有一百多块墓碑，或者更多，都是一些黑色光滑的四方石头。我们前一天听说，这些墓碑石头都是从瑞典进口的，途经意大利（但是，为什么要用这种大理石，或者这是抛光的玄武岩？为什么不从意大利就近取材呢？因为意大利只有浅色的大理石？）。每块墓碑上都有逝者真人大小的头像，一般都穿着军装，全副武装，名字都加上了“Srpski borac”，即塞尔维亚斗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死于1992年，也就是第一个波斯尼亚战争年。墓碑的背面雕刻着逝者真身大小的全身肖像，这是按照他们在平民与和平时期的照片雕刻的，比如说，这一个未来的斗士穿着白色运动鞋，站在花地毯上；另一个坐在德里纳河大桥那个凸出来的桥洞上。几百年来，这里一直是青年人聚会的地方，不只伊沃·安德里奇这样说过；还有一个正在豪放地拉着手风琴……依然是傍晚的闷热；阴森森的墓地里黑压压一片，没有任何活着的生灵。从这里俯瞰全城，再也看不到那些清真寺尖塔的一丝痕迹。那些图片是我在一本于1989年在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安德里奇传记中看到的（在其中一张出自上世纪的图片上，我数过有两个清真寺尖塔——这里的东正教教堂塔顶看样子还没有建造；而在另一张更晚一些的图片上——维舍格勒最终还是穆斯林占多数——，至少已经有六个清真寺尖塔，或者这些尖塔中也有工厂烟囱？如果真有的话，那么战后现在当然也不复存在了）。

到了晚上，三个人终于又聚集到河边招待所的露台上。开始还可以清晰地听到德里纳河汩汩流动的声音，听到河水迫不及待地从十多个桥墩之间穿过的哗哗声——哗哗声和节奏声，它们很快就全然消失在一个酒店乐队的乐声中，依然像是古老的南斯拉夫音乐。乐声来自水泥露天看台，如此喧闹，连同回声一起，震耳欲聋，一直持续到午夜。“这声音一定要这么喧闹，这就是塞尔维亚风情，塞尔维亚人就是这样！”（坐在桌旁的这个塞尔维亚人兹拉特科几乎满怀自豪地这样说。随之，另一个塞尔维亚人扎克只是打了一个典型的塞尔维亚手势，将手挥向身后那越来越有点寒意的夜晚。）

酒店花园十分宽敞，像一个停车场，不知不觉地坐满了人，弥漫着星期六夜晚的气氛。一群身穿白衬衫的孩子显得特别宁静，要么只是沉默寡言，要么懒得说话。在那个表情放肆的塞尔维亚女歌手的歌声和周围的轰鸣声中，恐怕他们也没有人能够听清自己的话。在接下来的所有时刻里，不管桌子上摆的是什么，也没有人去吃，哪怕只有一块面包。也没有人跳舞（或者我只是没有留意那些跳舞的人，没有留意难民和当地人在一起跳舞吗？）。而在那座没有灯光、完全灰蒙蒙的——此外跟夜间的凡尔赛宫不相上下——穿过黑暗的举世闻名的大桥上，夜晚甚至连一丝车辆过往的迹象都没有，最多是些零零星星返回家园（？）的人。

后来，直到深夜里，我仍然站在维舍格勒酒店客房敞开的窗户前。身后的城市繁星俱寂。那座黑暗中微微闪烁的宏伟大桥上此间也彻底没有动静了。夏日的夜空繁星密布，南方一片明朗，同时就像没有归属，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使之与下面的地球息息相关。此时此刻，对那些关于四年前在这个乡镇发生杀戮的报道的思考与这种图像交织在一起：据目击者（也像我在这儿一样，正好从一个饭店房间里目睹的）称，许多受害者被人从对面桥栏上推到河里，而这一切都是由一个年轻的塞尔维亚民兵队长下令执行的。为此，我还特别清楚地记得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振振有词地讨伐了这个此间已经销声匿迹的民兵队长：这人——他的主要特点——在那个被他称为“狼队”的准军事化队伍里“经常光脚走路”；在其他那些司空见惯清一色的穆斯林原告证人中，又是司空见惯，也有那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塞尔维亚人，一个来自这座城市的士兵身陷囹圄，在那里受到了联合国警察的审问。可是后来，文中这样写道，被交换了，同样消失了（报纸上几乎肯定说“他走向毁灭了”）。现在我禁不住问自己，为什么在这场战争中，一再偏偏是那些恐怖行为可能的主要见证者看样子被毫无例外地释放用于交换了，一个几乎出现在所有这样的报道中的事实，而每一次都毫无疑问地继续传递下去：如果这一个和那一个证人知道如此惨不忍睹的事情、如此暴露真相的罪行——为什么后来还要交换并且放走他呢？为什么所提到的那篇文章装模作样，仿佛那个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塞族狼队在1992年的维舍格勒完全随心所欲地横

行了数月？整个城市成了区区几个光脚的人玩弄猫鼠游戏的惨无人道的空间，制造了成百上千的受害者？（又像报道中司空见惯的，塞尔维亚-塞族军队在边境那边不动声色地观望着，又像报道中更加显而易见的，根本就是隔岸观火。）当时的波斯尼亚，不是已经全面爆发了内战，到处都在争战吗？面对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早就为了战争武装到牙齿的，而且也是当权的人民，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恐怖怎么会恣意肆虐呢？那个立在桥头上的伊沃·安德里奇纪念雕像不是就在战争爆发前一年被炸掉了吗？作为战争的一个先兆，又是被谁炸掉的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几乎是通过银行越洋而来或远道飞来的信息收集人关心的只是他们的故事、他们引起轰动的新闻、他们的战利品、他们可以出售的东西（其实这压根儿也没什么可鄙视的）———“目击者称”，“幸存者说”，就这样，连篇累牍，似乎盖上了真实的印章。但是，他们几乎不关心任何来龙去脉，而进一步的、针对问题说明和澄清，根本别提了，早就不复存在了。就连那些昔日严肃的“世界报刊”也不再关注对波斯尼亚和南斯拉夫特有的历史，一个又一个来历了——一种问题表现，它以另外一种意义去打动人，就像那个被雇佣来到维舍格勒、并且深入波斯尼亚山区的曼哈顿记者撰写的拙劣的文学式结尾一样（全然不会打动人，而只是厚颜无耻地追寻着这个目标）。他在文中让一个从城里逃出来的女证人说出田纳西·威廉斯式的话：“就是这座桥。就是这座桥。就是这座桥……”因为她最近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和妹妹被人从桥上推下去。

五月里的周日清晨，德里纳河左岸零零星星地已经有人开始垂钓，在岸边的灌木丛中，不一会儿就烈日当头。我又想起了维舍格勒的另一篇战时报道，不是一个扮演成作家，恨不得就是第二个阿尔伯特·加缪的记者写的，而是一个无名无姓的游客。在他的报道中，与其说意在搜集证据、追踪或者编造故事，倒不如说要把当初一些无可怀疑的、也未受到怀疑的个别现象进行分门别类，最终发现中间的空白——因此，他并没有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只有私下里传来传去：其中有这样一个维舍格勒的德里纳河垂钓者，已经截肢了，只能从桥上高高地把鱼竿甩下去——因为在下面的斜坡上，他根本就无法支撑身子——，所以，作为一个残疾人，他只能靠钓鱼为生，可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

后来，我终于踏上了穆罕默德-帕夏古桥。帕夏是来自伊斯坦布尔的穆族人后代，曾经是这个地方最有权力的首领。我走过那矗立在桥中间的纪念碑，高得出奇，就像纪念堂的墙一样，上面刻着奥斯曼帝国文字。之后，来到平时空荡荡的河对岸，那里聚集着一群人，一动不动地站在一个十分平常的大街广场上，面前就是崖壁；那些人在等早班公交车，可是要去哪儿呢？因为离这里最近的另一座城市就是上游的戈拉兹德，可它此间不是已经成为敌国的领土了吗？（已经被炸倒的安德里奇雕像还躺在那边的桥头上，连同掉落的脑袋。当然就在近在咫尺的旁边，矗立起了一个新的、就像是认同的纪念雕像。）

其实，越过德里纳河古桥，我更打算沿着对面荒山上的羊肠小道登高爬山；我想起了刚才提到的那个维舍格勒作家的一篇短文，一种童年时期的召唤。按照这个召唤，他一心向往的既不是传颂五洲的，也不是层次复杂、历史丰富的伊斯兰-东正教-天主教-犹太教的，可对于这位已近暮年的作家来说意味着世界的德里纳河居住区，自始至终是这荒野世界中偏远的、满是尘土的攀山小径；那里是开阔的世界；世界之爱也源自那里。据说直到不久前，这些羊肠小道还布满地雷，现在可能已经排除干净了（别制造紧张了）。于是，我后来在那里深一脚浅一脚地上上下下，挥霍属于我的时间，穿行在可怜巴巴的植物之间。在这位本地作家，也就是这个生活在波斯尼亚内陆而渴望大海的人的另一篇短文中，这种植物被称作“无名草”；因为对他来说，往西过了七道或者或多或少的山梁后，在杜布罗夫尼克河亚得里亚海附近，这种植物才会过渡到所谓的“棕榈树”和“迷迭香”的本质。

接着，在左岸维舍格勒郊区，在德里纳河畔一个山涧河谷里，分布着一排排的简易住房，其间露出了一些空缺，那是些当年的住宅：那里高低不平，上面搭起了塑料棚，还留有窗户，是为那些“新迁来的人”的临时居住点，他们大多来自以前的萨拉热窝塞族人区。简易房前是同样简陋的园子，就像是打工者自己开垦的，只是为了一个季节——然而，从外面山涧小路上朝上透过塑料棚布缝隙打声招呼，得

到了那里已经差不多是习惯了的人的回应——有可能，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吧？

山上的教堂里传来第一声破锣似的钟声。我站在河边，天气又开始变得闷热。我当机立断，顺着一道灌木丛，从德里纳河岸斜坡走下去，直到河水淹到下巴——想想那些水尸故事吧，千万别让水灌进嘴里！——潜入冷冰冰的、快速流动的河水中。这时，那十一个桥拱往远处漂去，一种奇怪的触手可及的远方；打眼看去，感知十一个桥拱是个数字，一个个跃入眼帘，单数，双数。接着，回到上面岸边的路上，碰到一个难民，半大的孩子，从临时棚屋里出来顺流而上，显然漫无目的，当着我的面随地吐痰？路上还有好几个“这样的家伙”在走动，各走各的。石坡站旁又有人在等公交车，让人吃惊，他们到底要去哪儿？不要问。回到桥上，教堂里的金属钟又响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别的教徒跟我一起爬上草坡和果园去教堂呢？（在这里问谁呢。）

到了山顶上，穿过那扇显然早就打开的大门，进入东正教教堂。这座从外面看上去不大的建筑，里面就像在巴黎郊区我所习惯了的那个俄罗斯小教堂一样，尽管司祭室前的圣像有一道隔离墙，可空间显得非常宽敞。和那个正沉浸在准备做圣礼的司祭及其助手为伍，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擅自闯入的人，便赶紧又退到外面去：教堂下方是阵亡者公墓，四周杂草丛生，长得像庄稼一样高，此间黑压压一片，不仅因为彼此连环套在一起的墓碑石块，而且因为来祭拜的人，开始几乎全是妇女，老年妇女，蹲在墓碑前后，与这些墓碑形成了一个动态的统一体。她们用海绵和抹布认真擦拭着亲人的墓碑，把墓碑擦得锃亮，就像在家里干家务一样。然而，她们清理那些有缝隙或者被腐蚀的肖像时，动作显得异乎寻常的轻柔，时不时也很用力。

然后，有一个母亲，或者祖母？蹲在儿子的墓后，或开始吟唱，或祷告，或呼叫，或干脆悲泣。在整个过程中，虽然墓碑及底座早就擦得干干净净，可她仍然一个劲地擦来擦去：绝对不是我们有人也许

想象的南部的“哭灵女人”那种又哭又闹、大喊大叫和号啕痛哭，更多是因为悲痛而生、伴随着悲痛和忧伤、十分克制的停尸床前的独白，不是对着某个人说，也不是对着尸体；几乎无声无息，哪怕是轻声或嗫嚅；简直就是在深深地吸气，仅此而已——没有多余之举，也没有过分之处，每一个声音、每一个音节都这样穿过嘴唇，一丝气息都不多；既不随心所欲，也不刻意为之，只是这个上帝造物的表达；她不用费劲，或者“不用大声”，呼出，时而也呜咽出悲伤，不，失去的痛苦。就这样，也许还受到了这周日早晨的宁静的宠爱，迥然不同地飞向空中，弥漫在那里，就像一个咏叹调，当然不是那种男女升天的咏叹调。这也是一个少见的时刻，因为我在维舍格勒不能赞同伊沃·安德里奇的说法；在《德里纳河上的桥》一书中，他把这样一种几百年来在这个地区一再流传的咏叹方式描写成哀思者对自身痛苦的一种爱慕。我并没有从中听到这样的说法；此时此刻，在这里也听不到这样的东西。难道在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在这个塞族-东正教墓地上，那样的哀思当然也包括在其他地方一模一样、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的痛苦？

圣礼终于开始了：尽管教堂里渐渐地出乎意料地拥挤，但大家都奇怪地陷入沉思之中，没有真正的齐声歌唱，也没有所谓的斯拉夫人的胸腔音。在偏僻的巴黎远郊，在那蓝色的洋葱头教堂塔顶下，我自己已经习惯了这个和那个年老的俄罗斯流亡者及其后代发出的这种声音。在这个几年前还是由穆斯林伊玛目掌管命运的小城里，这种情形来自那个之前的少数派宗教吗？或者这种陷入沉思的气氛自古以来就是塞尔维亚-东正教一个特点？它从来都没有企图俘获其他民族的心灵，比如它也与克罗地亚的天主教截然不同，就看看“二战”期间数千塞族人被天主教强迫皈依的事实吧（即使不是杀戮）。

经历了维舍格勒的这个早晨之后，我才得知：如果说在这个此间已经成了纯塞族人居住的地区，除了星期天弥撒其间的拥挤和保持宁静之外真的还有类似群体生活的东西的话，那么，确切地说，就是做完圣礼之后一起去墓地——甚至连我的两位同伴也参与其中，一个是兹拉特科，从他在塞尔维亚东部摩拉瓦河附近的坡洛丁村度过了童年

时期以来是第一次；另一个是扎克，他是铁托共产主义时期一名共产党领导人的儿子，也是第一次。圣礼持续了很长时间，快到了中午时分，恐怕到了东正教徒诵念神圣信条的时刻，对当今的天主教徒来说，应该是唱弥撒曲祈神赐福了。此时此刻，女人们在墓碑前的悲泣声听起来有好多声部，即使每个女人的声音从墓碑到墓碑各不相同。这期间，用来擦拭墓碑的海绵和抹布又拿来擦眼泪。此刻人群中也有很多较年轻的、甚至是非常年轻的女子，斗士们的遗孀？姐妹？接着，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男人，父辈和兄弟，还有一些局外人（局外？）、从前战争的退伍军人，墓地越来越被大多都穿着白衬衫、运动鞋和外套的年轻人照亮了。在狭长而无靠背的长椅上，越来越显而易见地挤满了人。托盘上端着自酿的瓶装烧酒传来传去，酒杯如顶针大小，配上专为圣礼活动特制的小吃，有切得薄薄的黄瓜片、西红柿和生火腿片，也有乳脂做的奶酪等。哭声一片（渐渐地，无声，抽泣或呜咽，零零星星），擦拭墓碑，相互祝酒，咀嚼食物，走到一旁，转身回来，继续哭泣。

我的两个同伴，作为移居国外的塞族人，身处这遭受苦难的人群中，我看到他们正在问她们什么。哎，问来问去问什么！我已经看到他们举起手中的小酒杯，与维舍格勒当地人亲切地碰起杯，还招呼我也过去。就这样，我也不知不觉地加入了碰杯的行列，也是一起问来问去。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必要问什么。居住在波斯尼亚乡间的塞族人面对我们这些陌生人和外国人虽然心里有那样强烈的戒备，但同时也很容易消除。消除？不，在这样的时刻，它干脆就从他们身上离去了；这时，又可以看到，有人来到他们这个地方，即使不是怀着特别善良的愿望，但至少也不是带着恶意，就像最近几年那些反正稀稀拉拉来这里的人一样，几乎所有的人都如此；或者干脆就是一个没有先入为主，也不是别有用心的人；他不是听到他们说每一句话时暗地里就开始琢磨着，他过后要把什么东西记录下来当作他的证据链：“啊哈，他们又说谎了。啊哈，他们终于说出来了。啊哈，他们现在又开始想入非非了。啊哈，这就是塞族-波斯尼亚的狂妄！”或者干脆就

是："啊哈，他们又没有认真看我们这些西方记者所做的抽样调查，对信息了解不够。"为什么要反对首先或许也不仅仅继续充当证人，为什么恰恰相反呢？首先或许也继续不仅要充当证人，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毕竟不是可以用来针对所有战争各方的"目击者说"，而且要保持沉默，至少暂时要保持沉默，要充当沉默的证人，闭口不谈这种如此显然无处不存在的、让这个国家所有人切身感受的、特别是如此咄咄逼人的、从所有的身体细胞里渗透出来的、对理解也尤为重要的痛苦。

进退两难的瞬间，那些当地人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瞬间，我们特别关注的是那一个根本还不太显老的逝者母亲。这时，她刚擦拭完墓碑，正准备向这几位陌生人哭诉，可她的亲人似乎阻止她说："算了吧——这些人对我们这里的情况一无所知！"这位母亲面对这几个外国人，不由自主地审视着我们，然后大声喊道："不，他们懂，他们懂！"

就这样，转瞬间，防御没有了对象：从这个时刻起，人们从维舍格勒墓地的各个角落跑过来力劝我们，诉说着，咒骂着，告知信息（是完全另外的信息，与那些在别的地方给我们染过色加过工的信息完全不同）。大概如此，只是暗示，比如说："德国人曾经长期在我们这里很受欢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之后也是如此。如今他们成了我们最可恶的敌人。我们是一个如此弱小的民族，可整个世界（边说边用手指着空中，整个"世界"指的是北约轰炸纵队）都针对我们——你们告诉德国吧，它应该感到羞耻！我们再也不会有欢乐，再也不会有庆祝，再也不会有节日。我们大家如今能够一起去的地方就只有墓地了，维舍格勒一带还有很多这样的墓地。教堂，礼拜，是的，不过只是形式而已，宗教已经死了。唯一的生活、唯一的群体生活就发生在我们的公墓里。体育运动，就这样：最优秀的运动员都死了，无论是足球还是篮球——战前，我们曾经有一支非常优秀的篮球队！贝尔格莱德那边的当权者背叛了我们，但是他们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像我们这样的弱小民族早就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了。那又是谁来决定呢？决定？谁把这些小小的民族捏在手里？捏在拳头里？摁

在拇指下？如今，对操纵最高权力的司法机构来说，追求的是这样一种权力和专制，而不是权利。审判，是的！但是，同时针对的是来自所有三个交战民族的人，而首先不是针对一个塞族人——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完全另外猛烈地指向那样一个被告，而且他还是第一位被告，这将会影响世人了解真相，将会继续歪曲历史！这辈子，我不止一次躲过了枪林弹雨，躲过了纳粹，躲过了乌斯塔沙。我马上就八十岁了，最后还是我自我了结吧（这位退伍老兵握着拳头使劲敲打自己的额头，如此猛烈，他蹒跚着倒退了几步）。只有一死我才能从这里解脱。再也不跟穆斯林生活在一起了，当然，我在他们之中也有朋友。”（我记得最后这句话是一个年轻人随口说出来的，现在书写时我就在想：他说“再也不”是不是实际上就是这样认为的，他如今显然再也没有一个穆斯林朋友了：下一次，在合适的时刻，要问问他！因为这句话让人难以置信。）

当然，相比所诉说的，这些人对待我们这些陌生人的方式和方法则给我留下更为持久的印象：你一言我一语，久久地被压抑，激动，解脱；毫无恶意，头脑简单，那些话就像是终于喊了出来——与其说是来自一个居留地，倒不如说来自一个隔离站。与此同时，也没有针对西方世界的仇恨之音，至多不过是一些愤怒而已。如果是一个民族的愤怒，那（也许之所以如此，因为它终于发泄出来了）也是一种几乎开心或者快乐的愤怒，同时又是一种悲伤、平静的（是的，有这样的）愤怒，一种不太严肃的愤怒：一种几乎只有零零散散的表演者的民族愤怒。

这些零零散散的塞族人，这些居住在波斯尼亚的塞族人是多么需要我们这些倾听者！后来我还一直在想，我们中的这个和那个有朝一日还会动身去那里，首先什么都不用做，只需静静地听他们诉说。

已经远远地离开维舍格勒和波斯尼亚之后，有些事情我事后才恍然大悟，回想着他们的哀诉，不仅仅是那些母亲的哀诉，还有在群山之后的人的哀诉：他们所哀思的人并不是早已死去了，升天了，对那

些亲人和受到打击的人而言，他们刚刚才死去，就在眼前，就是现在、现在、现在、现在，历历在目的现在。死亡一直在公墓里上演。这不是我们的死亡，我们的死亡不是这样？懂了吗？真的懂了吗？或者理解，理解过去，压根儿就不理解，五十年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死亡在当时的波斯尼亚到底意味着什么。当年？对于那些活下来的人来说，死亡就发生在现在，就是现在。在此也许有必要补充说：我觉得，这样一种不同的时间观念不仅仅是斯拉夫人或塞族人对死亡的特别崇拜的后果——同样，在其他被波及的人那里也可以确切地感受到，也许流传着一个传言，比如说，在穆斯林看来，他们的墓地不是参观之地：我不相信这样的说法。

在那天下午，我还去看了星期天的足球比赛，在一个位于维舍格勒小城的很远的高高的看台上。这是第二赛季的波斯尼亚-塞族联赛的一场比赛，对阵特雷比涅队。特雷比涅市位于亚得里亚海附近，在杜布罗夫尼克山区。特雷比涅队运动员坐大巴车来参赛，一路上要绕过戈拉日代飞地，所以花了七个小时；而在战前，则可以直接穿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只要三个小时就能到达。天气闷热，比赛乏味，所以，眼睛有时间环顾维舍格勒的丘陵山区——就在这个时候，跟欧洲到处同样乏味的比赛一样，有一个观众站起来大声喊叫，一边骂脏话一边喝倒彩；也跟所有其他地方一样，其他观众肯定都参与进来一起喊，不再关心下面的绿茵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是的，即使在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波斯尼亚，也有某种东西像球场的草坪绿色一样在闪亮）。在一片陡峭的丘陵坡地上，坐落着一个穆斯林公墓，立着一根根木桩一样的白色墓碑。然后，我觉得依稀看见一个女人的身影向山上走去，头上戴着头巾。这是白日做梦吧？然而，在维舍格勒不就真的有一些“穆斯林女子”与“东正教男子”通婚，形成了“异教婚姻”吗？紧接着，一个早年生活在这里的人突然走到水泥座位上，加入观众之中；他头上戴着锥形毡帽，向四周的人打着招呼！——不，我看错了，这显然是个幻象……

后来，我毕竟还是问了一个问题：问起当地那两个清真寺为什么被毁了。答复是：必须毁掉。一个清真寺里存放着大型武器，另一个

则存放着弹药。那些清真寺平时空空如也，这好像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尽管如此……就像在那篇已经提到的，两年前出自一个非职业记者之手对维舍格勒的形势报道中说的：当地人虽然都很坦诚，但是他们似乎还守着一个秘密，一个对谁都不好的秘密。

然而，无疑不仅仅因为这样，启程离开这个城市之前的最后印象就像一个走进死胡同的印象，漫无目的的印象，不知何去何从的印象，心情沉重，忧伤，几乎不能克制自己——周日的傍晚也使得这种痛苦和忧伤更加强烈，又跟在欧洲各处一样，也许不仅仅在这里。

在傍晚的光亮中，我们越过边界又回到塞尔维亚，沿着山路一直往上，深入塔拉山脉，在那里穿过在整个植物学圈里被称为“塞尔维亚云杉”的森林，那些经历了冰河时期仍然存活了下来的参天大树，那些原始细长和高耸岩石的参天大树，而且还能闻到高原树林蘑菇的香味。之后，在深深的星期日夜色里，拐过一道又一道弯，一直下山又回到巴伊纳巴什塔。跟之前的波斯尼亚小城相比，此刻是难以描述的反差，一派“活灵活现的”雅致（而在战前，情况应该完全相反）。自从战争结束以来，没有一个当年喜欢维舍格勒的塞尔维亚人从巴伊纳巴什塔再去昔日的朝圣和观光之地看看。为什么？耸耸肩。在我们返回的路上，我们也真的了解到，从其他塞尔维亚地区，比如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尼什，也没有人愿意去。看样子，仿佛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塞尔维亚的塞族人来说，生活在波斯尼亚的塞族人都是外国人。这种情况也许不是在那场战争以后才出现的。

在伊沃·安德里奇以前生活过的城市待了一个漫长的周日后，直到夏日深夜里，我们还在回味着白天的经历，或者更确切地说那冲向我们的东西，或者那撞击我们的东西，那没完没了的杂乱，那粗俗的语言，还有新学来的波斯尼亚语骂人话，比如“jebo te miš”（狗日的！），“老鼠会操你的”，“你妈傻逼，操你妈，操死她！”“你家房子上CNN新闻了！”（意思是：起火了，爆炸了，等等）。之所以聊这些，因为这是为第二天越过边境，再回到波斯尼亚准备的；我们从另外一个地方，沿着德里纳河顺流而下，去斯雷布雷尼察——一个

多么好听的名字，去“银城”，去“阿尔根塔利亚”。然而，这个“斯雷布雷尼察”几乎无法从我们口中说出。可以感觉到，我的两位塞尔维亚朋友压根儿就没有兴趣去那儿。但是，必须去。谁说必须去？最后，我们每个人都同意去。

又是一个美妙的夏日清晨，小燕子在蓝天下高高地飞翔。我们晚些时候从巴伊纳巴什塔出发，沿着德里纳河边的公路一路向北。在两岸灌木丛的映衬下，河水泛着绿色。又是漫天杨絮，已经好几个星期了。一簇簇的金合欢花已经逐渐发白。一直到山顶的针叶松林边缘，盘山公路两旁都五彩缤纷。一阵阵的花蜜香气从完全敞开的车窗飘进来：纵深的塞尔维亚。

与此同时，德里纳河一直以来都是天然的边界和国界。然后过桥就到了布拉图纳茨，回到波斯尼亚塞族共和国。河这边的边界关卡结实，很典型，可谓南斯拉夫特色；河那边的界栏更多只是做做样子，也没有全部拦上，甚至连一半都没拦上。到了那里，又是例行检查：父亲叫什么？母亲叫什么？此外，边检人员那些几乎耳熟能详的简洁表达，无论是言语，还是表情或者眼神，此间已经被我感受为就像这里一些充满诗情画意的山区风光的一样的东西。一位边检人员在审核材料期间示意让我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椅子就放在大桥边上的露天，上面有一个椅垫：我一屁股坐上去，身子往后一靠——椅子没有靠背——，险些掉在斜坡上。看架势，那个边检人员发现了，可同时又视若无睹。

又是夏日正午的闷热，风吹到脸上都热辣辣的。我们沿着德里纳河一侧山谷继续往上走，它的尽头就是斯雷布雷尼察了。此时此刻，又是一阵阵热风。山谷开始挺开阔，近乎平原，四周形成一片片微微隆起的高地——地理学家称之为“山谷地貌”。行驶在山谷里，起初并不觉得身在山中。随着山谷越来越窄，高度落差越来越大，在短短几个波斯尼亚里的路程中，最大落差竟然将近四百米。这时，1992年4月到1995年7月期间发生的那场战争的痕迹渐渐映入眼帘：先是这儿和

那儿有几个弹孔和熏黑的墙壁，再往前走，两边的山越来越靠近，一幕幕彻底摧毁的惨景，起先更多是田间的粮仓、仓库和厂房、变电站、工厂，然后便是城郊的住房，其实是村庄的民居；比较小的弹孔变成了越来越大的穿透孔，整个房子墙壁现在都变成了天底下唯一的弹孔；枪击变为炮轰，熏黑的面积也越来越大。山谷愈深地变成峡谷，建筑就愈发显现出城市的样子，高高耸立，像是高楼大厦，最后笼罩图像的是，没有留下斑痕，没有留下正面，也没有留下墙壁。

如果说路上有其他车辆的话，那么几乎只有迎面而来的。我们下车的地方大概以前是斯雷布雷尼察市中心：现在不过是焦土、烟尘和灰烬的中心。在热浪阵阵袭来时，那句斯洛文尼亚乡下的俗语也同时袭上我的心头："在你们那儿，冷得就像在火场里一样。"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讲述、如何描写图像、如何描写、如何排列图像：仿佛在一个个像S城[61]这样的地方，是可以再次经历那样一些像伊斯兰或东方世界禁止的画面的东西，或者至少是一种从某些现象出发的图像-警告，一种拒绝，无论如何拒绝那些那些大幅的、涂过色的、描写到头的、雄壮和全景式的图像；一种拒绝，它因此似乎会赋予或者留下空间，为地地道道的小图像，为那些几乎再也不能辨认为图像的、同时几乎再也没有什么意义的小图像——再说，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图像与别的小图像连接成一幅赤裸裸的，赤裸裸的？整体上也许会表明这个和那个的"阿拉贝斯克"[62]。是的，阿拉贝斯克。

就这样，S城中心那里就像到了深谷的尽头，在峡谷陡峭的山坡上，曾经是茂密的森林，如今却满目荒凉，到处都光秃秃的。在数年之久的封锁中，树木都用于取暖了？在这儿和那儿的高坡上，只能看到零星的小树。从这些零星的小树那里，不管从那个远处听去，现在持续地传来呼啸声，更像是怒吼。

然而，在这个平日更多无声无息的，但是被不计其数的人，绝大多数情况下昨天还在维舍格勒，今天就无所事事地窜来窜去光顾（？）的地方（？），这种紧迫的响声，就是那些几乎完全被震碎玻璃的、只剩下周围一片黑乎乎的、成千成万个窗洞前蒙着的塑料布随风哗啦哗啦、噼里啪啦、嘎里咔嚓地响动。

透过栖身之地——这是一个词语——上的缝隙和裂口，可以看到这个和那个一动不动地站着或者坐着的人，也有夫妻或全家（？）人，还有战后返回他们（？）家乡的人，完全就像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流亡到此的人。

又是来到一个被烧毁的房屋门面——没有一个房子正面看上去只是近乎安然无恙——就像前一天在维舍格勒那些等公交车的人一样，甚至要多很多倍，而且不少人拎着大箱子。

我们三个S城拜访者早就无声无息地分开了，因为面对这密密麻麻的弹孔和被烧焦的痕迹，为之震惊；我们变成了单独行动；我们分别站在下面的废墟谷里，犹如山脊上那几棵小树；每个人走在废墟堆之间各自跌跌绊绊的路上。断墙残壁之间那些鞋子和破布片属于“阿拉贝斯克”的一部分吗？

又是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堂，几乎完好无损地矗立在一个陡坡平台上，有一扇崭新的、当然也很薄的木门。在下面，在其深深的脚下，是清真寺的残迹，穹顶部分还依稀可辨，即使它像其他建筑部分一样垮塌了；在这个其他部分彻底毁成瓦砾的废墟堆上，只剩下这块有形的残片。正值下午清真寺里传来宣礼声。这声音是从地下传出来的，从穹顶的破洞口之间，穿过破碎的瓦砾，中间还夹杂着S城的山涧小溪流水声。不，绝对不，没有什么呼报声，也没有曾经在这里流淌的山涧声。小溪被掩埋了吗？它在地下流动？它改道了？流向别的山谷了？——然而，顺着山势往上，它当年的发源地不是被称为圣水泉吗？——不管怎么说，后来，可以得知，对S城的居民来说，每隔一天才会有水。水都是从别处送来的，并不是山泉水。山谷中，除了塑料布的噼里啪啦声，什么都没有。

教堂旁边，我用手狠狠地抓了一把野生荨麻，那些正在开花的，现在也是刺得人火辣辣地痛，再抓一次。

在一处陡峭的斜坡上，上面光秃秃的，此刻有几个人正在刨地，在如此狭长的，时而只有一垄的菜地里，就是统统凑在一起也远远不够一个菜园子。这些刨地的人比起小城谷底下面的刨地人是些十足的懒汉，或者茫然晃来晃去的人，不仅因为人数少，而且干起活来也没有章法。与这整个旅程中在对面塞尔维亚到处看到的那些在田野里刨地劳作的人群不可相比，这不仅仅仅因为这里的劳动场所陡峭，那儿是平原和缓缓的波浪形地势。

在另一面峡谷斜坡上，从一小块残存的森林里闪耀着光芒，又是那些闪亮细长的穆斯林墓碑。

然后，从教堂一走一滑地下山来，来到一片沼泽地。在这个圣水和银矿之城当年的疗养院——想象着，它就叫“欧洲酒店”——旁边就是蜜蜂之家。不，在残破的墙壁之间只有一个小蜂箱，真的还有几只蜜蜂嗡嗡地绕着蜂箱飞来飞去，数量与上面荒地里刨地的人几乎不相上下。

这时，从中间一栋黑魆魆的高楼里，终于有一位年长的男子从半中间的一个窗洞里招手示意（后来才弄明白，他的年龄比我还小）。

他这么一招手，我们三个同伴又聚到一起去他“家里”做客（我忘了提及第四个人，也就是我们一个陪同，来自巴伊纳巴什塔，我们在此称他为“修道院图书管理员”。自从战争结束以来，就在去年冬天，他是唯一敢于从家乡塞尔维亚来到之前并不如此遥远的S城的人。那么与眼下的五月相比，这里有什么变化吗？“没什么变化——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这里一点变化都没有。唯一不同的是：当时是雪天，大雪天，城里显得更为宁静。”）。

招待我们的人世代居住在这里。在战争期间，他“逃离”了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S城，又回到了原来的住处，一个在这栋大楼里为数不多的可以居住的房子。楼下入口过道上无人看管的信箱上，大多都写着“土耳其语”姓名，个别上面上又覆盖上了“纯塞尔维亚语”的名字（izbeglice，也就是难民，被安置的人）。

桌上铺着中欧风格的钩织桌布。我们喝着“你可以猜一猜”烧酒。而这个患有糖尿病（没有药）而不能喝酒的主人坐在一边，拖着虚弱的声音——可是他有一双多么亲切而又无助的眼睛——讲到他的

妻子，她正好去近在咫尺却又非常遥远的塞尔维亚看望孩子，他那种口气，仿佛他几乎就不相信妻子还会回来。在熏得黑乎乎的大客厅里，有一个半是完好的角落，那里的墙上挂着一只巨鹿，当作壁画。鹿角正对着钉在窗前的塑料布。在旁边的电炉上，咖啡已经热起来——这里毕竟又通电了，不过电力很弱。还没有等到煮好咖啡，我们就得动身离开了，去约见那个从S城来的人。据图书管理员说，这个人可能上了国际法庭的战犯名单。

可在去之前，我们还要在下面，也就是在一个通过平整而开阔的广场上买点小礼物。我们绕道去那里的一个小木屋：中国产的剃须刀片，还有一袋菠菜种子。我惊讶地发现，菠菜种子的包装上大写着产地Viroflay，就在我居住的巴黎郊区旁边——我平日去那里，只需要出门过条马路就是了（种子是在伏伊伏丁纳省的诺维萨德市包装的；在S城这个废墟广场的售货员以前是德国施瓦本地区的奔驰公司的工人）。

见面是在一家餐馆的侧房或者里屋进行的，有不少人坐在一起，都是当地人，有老师、工程师、政府职员等。门前就是黑灰色的战后废墟，热风扑面，而屋里则可以说得上是装潢华丽，也很凉快。餐厅老板和我们在一起，他就是那个上了海牙战犯名单的人。他不怎么说话，只是一再恳求我们多待一会儿，也不停地让人给我们斟酒。这期间，在座的其他生活在臭名昭著的S城的塞族人，又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对美国、尤其是大德国表示出极度的不信任以及无比愤怒——特别是对后者，只是对这个！好像深信不移地寄予一种救赎的期待。事实上，德国外长先生刚刚访问了塞尔维亚，这毕竟意味着，对于生活在波斯尼亚这里的他们，对于斯雷布雷尼察的塞族人来说，这预示着转机，特别是经济上的转机；德国似乎会帮助他们重开矿场，重振疗养业——战前不就有许多人从德国，从欧洲各地来到斯雷布雷尼察，因为温泉疗养，还有狩猎，全是高级猎物和熊。有德国人，有奥地利人，也有意大利人。这些男人像孩子一样，寻求好兆头，希望在来访者的脸上看到赞同的表情。可是，当他们更多听到的是反面的东西时，总是会那样自在地嘲笑自己。

当然，最后还要问餐厅老板。据说他战前是一个了不起的猎人：为什么呢？为什么在战犯名单上？而回答不过是：这就是战争。奇怪的是：看样子，仿佛他并不是以此要转移话题，而他之所以不愿意多

说，更多是因为他压根儿也没什么可说的，说多了甚至是夸夸其谈，或者也许只是主人的礼貌而已："你们想想吧，你们事先是怎么想的！"而就在同一时间，傍晚时分，窗外驶过国际维和部队的吉普车和坦克，空中有战机飞过，声音震耳欲聋。他们大多是身穿黑色军装的美国士兵，架着机枪和其他武器对着烧焦的房屋以及被洗劫一空的银城山丘，上下挥舞着转了一圈，穿过依然滚烫的烟尘，这样盯着成百上千的当地野蛮人、罪犯、人类的敌人，遏制他们，痛斥他们。他们终于又收起武器，重新装好，盖上坦克舱盖，向山谷下开去。然后，里屋又是越来越热切的恳求："留在这儿吧，等吃完晚饭再走！平时也没什么人来我们S城。即使有许多人来，也是为了其他目的。"——"不行，我们得走了，过边境有时限。"

就这样，我们走出屋子，出发前，外面还很亮，不过已近黄昏，可能是由于山谷里的太阳落山早吧。

在这种双重光芒下，有一个不再年轻的，但此时此刻因为两眼充满愤怒的绝望而看上去还很年轻的男子走在当年的主干道上，如今已经变成了废墟小道。他从我们身边走过，脑袋扬得高高的，双眼瞪得大大的，就像两个空洞。

我们听见他在说话，像是对我们说，又像是对着其他人喊，同时挥舞着手臂："我再也不是塞族人了，我什么都不是了，我再也不想当塞族人了，什么也不想是了。这个山谷里再也不会有苹果成熟了。斯雷布雷尼察再也不会有露水光顾了。这里再也不会有球踢进球门。我再也不是塞族人了。我不知道我是谁。你们别看着我。听到没有？！滚！滚一边儿去，问别人去。世界已经把我们忘了。世界应该忘记我们。结束了，一辈子就这样结束了。我再也不是塞族人了。"

现在记忆告诉你什么呢，事后，在S城的几个小时里？——当然，那里也出现过小孩子，可是记忆既没有留下他们的画面，也没有留下他们的话语。当然，就像之前和之后在对面穿过整个弥漫在五月色彩中的塞尔维亚和在这里穿过波斯尼亚一样，在S城里也是杨絮漫天飞舞，漫山遍野的金合欢花先是白茫茫一片，然后慢慢变成了灰白色。可是，记忆对此也没有留下任何画面和话语。同样，对于远在下方的山谷里以及临近的山谷里可能发生大屠杀的地方，也没有留下什么画面（然而，从中却留下了不少别的、不同的画面：荒野上那些死人头

骨，从眼洞、鼻孔以及嘴巴里长出了鲜艳的花朵——而荒野其他地方根本就看不到一朵花！———，与那些恰如其分的灌木枝条交相辉映。从一个选好了照相机拍摄高度的上方定好位，选取同样的背景，加上更卓越的照明灯光，调高亮度，精心布局色彩，为了获得由星际摄影家协会每周日颁发的戈雅最佳摄影奖、沃利策奖或者“无国界摄影奖”）。

记忆中，没有留下一丝鸟儿在S城上空飞行的画面——即使那里真的还有鸟儿飞行，其中肯定不只是晦气的乌鸦、渡鸦或寒鸦；记忆中，也没有鸡跑、兔跳、驴叫的画面——即使那里真的……

我又在这样想，要是在那里，不管什么地方，有孩子可怜巴巴地哭喊的话，要是有母亲或父亲或父母一起近乎气急败坏地冲着孩子发怒的话：这样一来，对一个证人，一个第三者来说恐怕至少有事可做了。

然而，记忆对S城说的唯一一句话是：“没有什么可做的。”S城不是一个可居住的地方，更谈不上是一个新居住地，而是一个人口外流的地方，无论怎么说就是如此。甚至连平整废墟都缺少任何动力。这里不仅看不到未来，而且也丝毫感觉不到任何当下的气息。父母能够给予孩子们最伟大、最美好的东西就是最好的‘教育’：持续，忍受——忍受在这里再也不存在了，无论是对那些（无论如何好像是这样）更多为勉强的征服者，还是对那些逃回来的人来说莫不如此，更不用说那些新近流落到这里的人，那些逃离苦难迁徙来的人，那些流亡者。就像一个朋友突然得知身患绝症的消息时，大声喊叫或吼叫出来的东西一样，这在S城已经超越了个体，成为所谓的整个集体的心声：“再也没有希望了，我再也没有希望了！”

最特殊的一丝记忆，也是第一丝记忆出现在我们刚一离开S城之后；返程时，我们夜里跨过德里纳河大桥，又回到突然间鲜花盛开、祥和安宁的、像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帝国的塞尔维亚。直到今天，也就是过了几个星期后，在遥远的地方，依然可以清清楚楚地浮现在脑海里：与周围那些大的、有人居住的、的确或多或少幸免于难的地方相比，极其渺小，似乎微不足道，这就是那个战争地区。在山谷尽头那里，发生了长达三年的全面战争；在一个狭小的山谷尽头，发生了世界战火！当整个欧洲蔚蓝一片、郁郁葱葱和飘着雪花的时候，仿佛有人在那里扔进了一个火把，一烧就是数年之久，从未间断，起初在整个山谷里，最终限定在峡谷的一部分，而在那里却动用了最猛烈的火力——要说具体地点或者“现场”，那就是发生在在我们这个大陆中心一场弹丸之地的微型战争，同时也是另一种闻所未闻的核战争。特别是这场战争爆发、怒号并蔓延在我们这个好像已经永远治愈了名为“战争”的精神疾病的欧洲的一个角落。恰恰在这里发生了名为“战争”的战争，似乎是一切战争的本质所在，一些在人类历史上或者人类意识中相当新鲜的东西？——然而，正是这样的东西同时把斯雷布雷尼察那个小山谷弄得漆黑一片，如同时代的黑夜来临，射进了整个山谷。

可以理解，真的可以理解，恐怕有人现在会问：“你们这些生活在波斯尼亚的塞族人，你们在那里做了什么呢——正是你们，这个不是最和平的、但在历史上自古以来最强大地让其他民族、异者、不同的东西存在、生息和发挥作用的民族，其中堪称为几乎所有欧洲民族的典范！？”还有：“塞族人，你们为什么要待在S城？你们为什么不离开，离开你们和昔日的邻居这山谷尽头的燃烧现场？”

然而，又是那个历史渊源，甚至在S城那里也一样——记忆无论如何会告诉你——，它在起作用，并且必然要起作用，对于欧洲以及国际上所有参战国来说，在这种国际快照制作和观看，即一种没有记忆的、精神盲目的生产和观看时，它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

说到“历史渊源”，记忆不仅仅指的是几百年前土耳其人的统治压迫和几十年前纳粹盟友的迫害杀戮。（与其说是“记忆”，倒不如说“浮现在脑海中”、“在脑海里”。）首先，难道说因为历史渊源而发生在这场战争开始时的事情，不，所犯下的罪行——这一次可不是塞族人干的——就不算数吗？难道说一个，或者也许真的那个伟大的原因就是三年之后所发生的不可饶恕的报复行为的借口吗？自从1992年以来，在塞族人村庄以及S城四周一直持续不断地纵火和杀戮，传遍世界，在众目睽睽之下，同样是日复一日，一年时间简直就是报复性的屠杀，而且完全可以理解。难道这也是同样的情况吗？

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一张图像，或者话语图像描述这样的情景，至少在战争那一方，从一开始欧洲的观望世界就站在的那一方没有；或者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把那些尸体和悼念他们的人——在S城地区也有数千塞族受害者——通常都推到另一个受害民族身上。

当然，这里不是要以此来清算——只是要澄清事情真相。如果那些暗示的历史渊源真的要通过我们这些广泛的媒体传播出来的话，那么，始终不过是附带提一提罢了，作为无关紧要的枝节，抹杀和隐藏在一笔带过的从句里，是些可以被疏漏和忽略的东西。“历史是众所周知的。回忆历史，只需简而言之”：有一家当年很严肃的西方报纸，在纪念S城种族灭绝大屠杀一周年的文章中开头这样说（眼下，1996年7月中旬，仍然是这个正确的、合法的修饰语）。

什么是众所周知呢？历史渊源也众所周知吗？有没有一个人，一个机构研究这个历史渊源，不是关注那段骇人的灾难，而是意在某些别的东西？谁愿意理解呢？有人愿意理解吗？

但是，又要注意的是：如果说这样澄清历史渊源真相与清算不相干的话，那么自然也与相对性或弱化毫不相干。对报复而言，没有任

何宽容的理由。——研究历史渊源，或者其实就是历史，看清历史，使之变得明了，虽然可以有助于说明一些问题，提升几个层面，达到对现实的警示。但是——这至少是我个人学习历史的经验，是这几年间研究南斯拉夫历史的经验——，这不是启蒙，不会让光明出现，最多不过是短暂的闪耀，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闪烁。根据（根据？）历史研究，你最终不仅在原地打转，或者更多是曲折运动，不是借助它的帮助看得更远，而是进入了一个迷宫，一个几乎完全黑暗的迷宫？

为之，还要注意的是：现实情况是，我无疑知道一些事情——也许比其他人多一些——，但是，尽管如此，我仍然无能为力。另外，在这次旅途中，我觉得我的知识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但是，按照我的经验，预感却变得越来越明确，因为它预先指出了与任何知识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预感或者恰恰就是几乎没有在任何别的地方出现过——不允许出现——的第三视角——为什么不允许呢？

从斯雷布雷尼察返回途中，我们碰到了国际和平条约执行部队的吉普车和装甲车队。大家不约而同地一致决定，超过去；在那些十分陌生的士兵面孔和我们之间，留下了一道长长的滚滚尘烟，一直绵延到德里纳河上。

界河这边的塞尔维亚依然是——经过了波斯尼亚的几道山脉，然后又走过了塞尔维亚上百英里的丘陵和平原——一个孤儿的巨大房间，跟去年冬天一样。然而，这个房间现在却噪音肆虐，充满了刺眼和不同寻常的颜色和形状。在我们这个纬度，人们把它称为“拜占庭风格”，而我觉得更像是蒂罗尔风格、巴登符腾堡风格、诺曼风格或美国的内华达风格。

夜间在通往贝尔格莱德的高速公路上，又是那样疯狂地超车，又是坦然绝尘而去。我们超过了一辆插着旗子的锃亮公务车，它来自我

们几小时之前刚刚离开的“塞族共和国”：车后座上坐着一位权贵，正在赶去参加一位波黑塞族将军的葬礼。第二天的报纸上有报道。这位将军身患绝症，被关在国际安全委员会法院的监狱里，在他死亡前几天未经审判就被释放了，正好让你去死吧，很仁慈——谁的慈悲呢？———，同时依然作为战犯受到起诉。

从斯雷布雷尼察直到萨瓦河边的沙巴茨，一路上我们没有怎么说话。之后，大家的话匣子才打开了，就像当初去往维舍格勒的途中，首先是咒骂、宣泄，力量的表达。力量？更多是虚弱，还是虚弱。

接下来，我到现在至少这样清楚地记得，一路相当沉默，直到进入嘈杂的贝尔格莱德。而且后来，在离开贝尔格莱德前往南方的科索沃那几天里，依然是一路沉默（关于科索沃，这里就不用赘述了——如果没有科索沃的那些天，那么这些迄今为止所讲述的东西、所问到的东西似乎就会是另外的样子）。

看样子，仿佛我们在那里又一次走进一个不同的历史里——在这个历史里，我们恐怕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这个外国人没有，那两个塞族同伴也没有。

回到另一个欧洲之后，那些所提到的波斯尼亚地区也渗透到这个欧洲里，维舍格勒附近的德里纳河的一个小山谷就这样深入到海德堡附近的内卡河河谷里——不是温和的交汇，更多是这里的安然无恙和那里的截然相反之间的碰撞。或者在巴黎郊区打眼望去那些廉价的高层住宅，跟斯雷布雷尼察的几乎不相上下，黑乎乎的旗帜和塑料篷布也混合到这个图像中，使之变黑和被覆盖；或者在我们这里，森林密布的塞纳河-高地突然间变得光秃秃的。这一切绝对不是交流沟通的地方，不是那种“同步空间感”，因为这种空间感通常作为当下，对在场的东西的补充，作为强化世界的认识会令人高兴——而更像是一种地方掠夺，某些撕裂世界的东西。我现在看到报纸上的天气卫星照片或月球陨石坑照片时，也会这样不由自主地与每天看到的万人坑照片

混淆起来。或者一看到奥地利巴德加斯泰因温泉疗养院的航拍照片，（一定会）同时意识到波斯尼亚的斯雷布雷尼察与之何其相似。

除此之外，恰恰也是在所提到的在“西方”的图像缺失中，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呼唤，呼唤你再次启程“去那里”，而且待更长时间，在斯雷布雷尼察要待到吃晚饭，住一个晚上，不仅仅一个晚上。而且，在那里尽量先不要问什么，要等到合适的时机再问——首先只是坐在那儿，蹲在那儿，用手托着脑袋。

的确如此：在维舍格勒，只有在墓地才能看到生活的气息；而在斯雷布雷尼察，看样子不再有任何生活的气息了——然而，或许在那里能够发现别的什么，一种用我们的概念难以企及的东西？

一位塞尔维亚读者看了我的《冬日之行》之后，写信问我：我是否意识到，对我来说，再也没有退路可走了。

我曾经在脑海中想象过一张我们这个大陆的新地图，S城浓烟滚滚的山谷正好位于地图中心。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这个地球上不管什么地方亡灵复活还是愿望，或者迫切的白日梦，或者放荡的妄想的话，那么在那里，在S城至少一个失去家园的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那里也会有复活，首先是那些先民的复活，或者至少其中一个人的复活，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的复活。不，果真如此的话，这也只会发生在愿望、妄想或梦想的彼岸！或者，难道这不仅仅是突破悲哀的想法，或者突破到悲哀的想法？

在记忆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图像，在S城中心的废墟中，罂粟花绽放，在热风中不断地向后摇摆；真的在那里见过吗？“真的吗”？

这里所说的应该是一个当今的故事？今天谁会读它呢？——一个没有敌视人类的恶人、也没有敌人-图像的故事？

那你为什么要说这一切呢？——因为，要不然，就没有人说，可是人人都可以说。“为什么德里纳河上空最终没有晴朗？”这是一首古老的歌曲曲名，其中有一个塞族人在河对岸整夜等候他的两位穆斯林朋友——几乎是白等了。

“最后一个问题”：你是怎样看待生活在波斯尼亚的塞族人的斗争的呢？——为之，也许又得看看“地理”：上面的自由战士——在高山上——，山谷里的压迫者，就这样被“预先-看成”牺牲品——然而，在西部片里，那些邪恶的印第安人不也生活在山岩顶上，袭击、屠杀无辜的美国人商队——他们不是也在为自由而斗争吗？“真的是最后一个问题”：有朝一日，很快会有人，谁呢？发现波斯尼亚的塞族人也跟这样的印第安人一样吗？

从现在开始什么也不问了，如果非要问的话，无论如何要以完全另外的方式开始，而不会用下面的话，即《纽约客》杂志上一篇较长的波斯尼亚故事的开头第一句话开始：“哈里斯XY和他的朋友打牌时，便经历了种族清洗。”

怎么开头？比如像这样：“在所有桥梁和道路开始的地方，也就是我对此所描绘的图像起源的地方，都有条条小道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我就是自由地从那里迈出了第一步。这就是在维舍格勒，而那

些路面坚硬，凹凸不平，就像被啃过一样……”（伊沃·安德里奇，《小路》）

（1996年6月—7月）

[1]阿尔姆河（Alm），上奥地利地区的山地河流。

[2]斯陶芬山（Staufen），位于奥地利福拉尔贝格州。

[3]萨尔察赫河（Salzach），全长225公里，流经德国和奥地利。名字来源于德语的“盐”（Salz）。

[4]萨尔茨堡南部的一个小城。

[5]粮食胡同（Getreidegasse），位于萨尔茨堡老城区的著名购物街。

[6]古罗马名城，位于意大利西南部，公元79年因附近火山爆发，全城湮毁。

[7]因为它光滑称手，可以拿在手上把玩，像健身球。

[8]伊壁鸠鲁（Epikur，公元前341—前270）是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伊壁鸠鲁学派的创始人。伊壁鸠鲁学说的主要宗旨 就是要达到不受干扰的宁静状态。

[9]一种陶制卵形吹奏乐器。

[10]“洛泽”（Loser），德语的意思是etwas los sein，表示“摆脱某物”，在英语中则有“失败者”之意。

[11]奥地利邮政巴士旅游公司的一种专门的公交车。

[12]古埃及人膜拜太阳，用甲虫的粪球象征太阳，所以甲虫便成了圣物。

[13]维吉尔（Vergil，公元前70—前19），被誉为最伟大的古罗马诗人。

[14]指白羊座的传说中有翅膀的金色公羊。

[15]卡普齐纳山（Kapuzinerberg），萨尔茨堡市中心的一座小山，位于萨尔察赫河东岸。

[16]贝希特斯加登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东南部，靠近德奥边界。

[17]Turm：国际象棋中棋子，因其形状像塔而得名，类似于中国象棋中的“车”。

[18]指犹太教和基督教教义中与上帝为敌的众魔之王撒旦。

[19]Orpheus（俄耳甫斯）：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有超人的音乐天赋。据说他的歌声和琴韵十分优美动听，各种鸟兽木石都围绕着他翩翩起舞。

[20]锡安（Zion）：《旧约》中指耶路撒冷城内两山中的东山。但基督教文献和赞美诗却时常用它指天城或体现基督教信仰和友好的地上城市。

[21]指著名的萨尔茨堡戏剧节剧场。该剧场修建在卡普齐纳山的山崖里。

[22]贝都因人，即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游牧和半游牧的阿拉伯人。

[23]指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跟踪迷路的王子塔米诺的蛇。

[24]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被其目光触及者即化为石头。

[25]指奥地利著名表现主义诗人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1887—1914），“美丽的城市”是其早期一首描写故乡萨尔茨堡的诗作。

[26]Salz，德语意为“盐”，萨尔茨堡（Salzburg）因为附近有盐矿而得名，音译为“萨尔茨”。

[27]叶状装饰花纹（Akanthus）：公元前5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是西方艺术创作中常用的叶子母题，也是维吉尔在其田园诗歌中所钟爱的。

[28]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著有《论善与恶之定义》《论法律》《论国家》等。

[29]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罗马皇帝（161—180），新斯多葛派哲学的主要代表，宣扬禁欲主义和宿命论，对外经年用兵，对内迫害基督教徒，著有《自省录》12篇，死于军中。

[30]Quin age：拉丁语，同样意为“开始吧”。

[31]赫拉克利特（Heraklit，公元前540—前480）：古希腊哲学家，因其宇宙论而著名。

[32]圣杯骑士传说中的一位女王的名字。

[33]萨拉赫河，是萨尔察赫河的支流，德国和奥地利的界河。

[34]Lalein，希腊语，意为“闲谈”。

[35]Lalle，希腊语，意为“卵石”。

[36]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奥地利作家、诗人。

[37]乌斯塔沙（Ustashi）：1929年4月20日在保加利亚成立的克罗地亚独立运动组织，曾于1914—1944年依靠德国势力建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对非克罗地亚居民实施恐怖统治。

[38]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简称CCR，是美国20世纪60、70年代最受欢迎的一支超级摇滚乐队。

[39]尼科·皮罗斯马尼（Niko Pirosmani，1862—1918）：格鲁吉亚原始主义画家，自学成才，生前被社会冷落，死于贫病交加，身后获得承认。

[40]克拉伊纳共和国（1991—1995）：位于克罗地亚境内，首都克宁，原为塞族自治区，于克罗地亚独立战争时期宣布独立，未获国际承认，后由克罗地亚以军事行动收回。

[41]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1954—）：塞尔维亚导演，出生于波斯尼亚。《地下》为其著名代表作，讲述了南斯拉夫自1941年到1992年的历史，获得1995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42]泽利科·拉日纳托维奇（Željko Raznatović，1952—2000）：塞尔维亚人，绰号“阿尔坎”。曾在巴尔干地区经营一个组织严密的犯罪团伙，从事黑市货币交易、石油走私和军火买卖。他还是一个狂热的足球迷，曾经出任贝尔格莱德红星足球俱乐部球迷协会会长，20世纪90年代出资收购了南斯拉夫的奥比利奇足球俱乐部。阿尔坎因在1991—1999年多次卷入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战争而被国际法庭指控犯有战争罪。接受审判前，阿尔坎在贝尔格莱德洲际酒店的大堂里被枪手射杀。

[43]菲利普·马洛（Philip Marlowe）：美国作家雷蒙德·钱德勒笔下的侦探。

[44]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1929—）：德国著名诗人、作家。

[45]该隐（Cain）：《圣经·旧约》人物，亚当和夏娃的长子，杀死其弟亚伯。

[46]这两个是“二战”时期刺杀希特勒的人，前者是纳粹陆军上校，后者是木匠。

[47]埃皮纳勒是法国东北部城市，以版画和图片生产而闻名。

[48]瓦斯科·波帕（Vasko Popa，1922—1991）：罗马尼亚裔塞尔维亚诗人，受到法国超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深入研究塞尔维亚民间传说，并将其引入诗中。

[49]米洛拉德·帕维奇（Milorad Pavić，1929—2009）：塞尔维亚著名作家，代表作为《哈扎尔词典》。

[50]毕德迈耶风格（Biedermeier Style）：1815年—1848年之间在德国及中欧盛行的中产阶级艺术风格。

[51]古希腊天文学家，于公元2世纪提出了自己的宇宙结构学说，即“地心说”。

[52]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ć，1892—1975）：南斯拉夫作家，196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德里纳河上的桥》是他的代表作。

[53]娜塔莉·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1900—1999）：法国小说家、批评家、剧作家。

[54]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1888—1935）：葡萄牙诗人、作家。

[55]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13—1992）：德国政治家，1969—1974年间担任当时的联邦德国（西德）总理。

[56]医学术语，系指截肢患者感到已被截去的肢体仍然存在，并还在疼痛的幻觉。

[57]1914年6月28日，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街头用小型自动手枪连开两枪，刺杀了正在萨拉热窝进行访问的奥匈帝国王储兼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苏菲。这被称为萨拉热窝事件，该刺杀行动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最终导致“一战”的爆发。

[58]此处疑为作者记忆有误，《德里纳河进行曲》的导演应为日沃拉德·米特诺维奇。

[59]指波黑塞族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拉多万·卡拉季奇。

[60]拉特科·姆拉迪奇（1943—）：1992—1995年的波斯尼亚战争中的塞族共和国将军。

[61]即斯雷布雷尼察。

[62]绘画中的阿拉伯风格的装饰，以缠绕交错的线条为特点。

Der Chinese des Schmerzes by Peter Handke

Copyright©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83

Abschied des Träumers vom Neunten Land by Peter Handke

Copyright©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1

Eine winterliche Reise zu den Flüssen Donau, Save, Morawa und Drina oder Gerechtigkeit

für Serbien by Peter Handke

Copyright©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6

Sommerlicher Nachtrag zu einer winterlichen Reise by Peter Handke

Copyright©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6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6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出版得到奥地利教育、艺术和文化部所提供之翻译资助

Die Übersetzung wurde gefördert mit Mitteln des Bundesministeriums

für Unterricht, Kunst und Kultur